

2 0 2 1

世纪文景年度好书

共 10 册

社科
新知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2 0 2 1

世纪文景年度好书

共 10 册

社科
新知



2 0 2 1

世纪文景年度好书

共 10 册

社科
新知



目 录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乔姆斯基精粹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

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印度青年狂想曲

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
与经济发展

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

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兰小欢 著

张军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周黎安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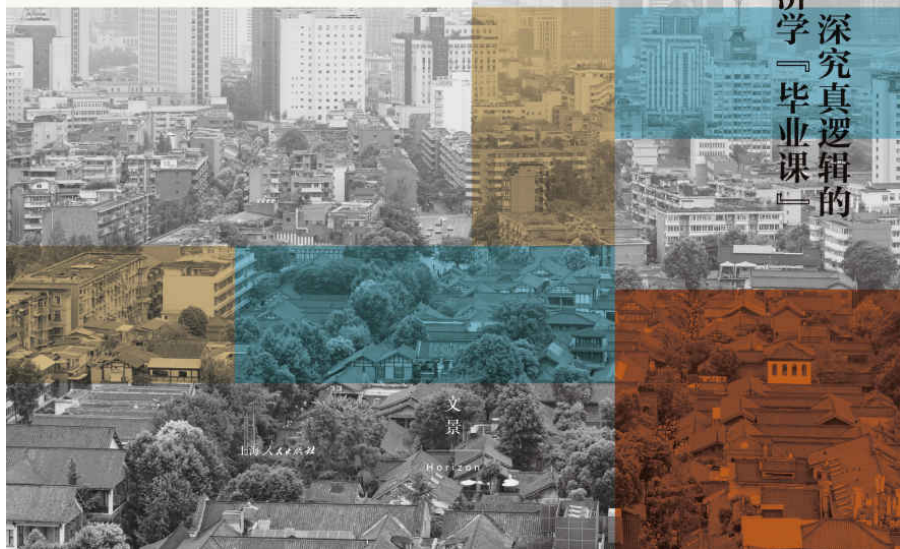
刘格崧
广发基金
高级董事总经理

王烁
财新传媒
总编辑

罗永浩

联袂推荐

直面真问题、深究真逻辑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毕业课」



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
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兰小欢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133-6

I. ①置... II. ①兰... III. ①行政管理部门—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30.1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5010号

书 名：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作 者：兰小欢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曹迪辉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133-6/F·269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目 录

前言 从了解现状开始

上篇 微观机制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第三节 复杂信息

第四节 激励相容

第五节 招商引资

结语

扩展阅读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第二节 土地财政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结语

扩展阅读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结语

扩展阅读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结语

扩展阅读

下篇 宏观现象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结语

扩展阅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第一节 债务与经济衰退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结语

扩展阅读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结语

扩展阅读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结语

扩展阅读

结束语

参考文献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王充《论衡》

社会进程本是整体，密不可分。所谓经济，不过是研究者从这洪流中人工提炼出的部分事实。何谓经济，本身已然是种抽象，而之后大脑还须经过若干抽象，方能复刻现实。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一套严格的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前言 从了解现状开始

这本书讲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故事，其中有让我们骄傲的繁华，也有让我们梦碎的房价。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

本书主角既不是微观的价格机制，也不是宏观的经济周期，而是政府和政策，内容脱胎于我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我剔除了技术细节，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的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我国的政治经济现象非常复杂，不同的理论和信息都只能反映现象的不同侧面，至于哪个侧面有用，由读者决定。对从事经济实务工作（如金融和投资）的读者，我希望能帮助他们了解日常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背景，这些背景的变化往往对行业有深远的影响。对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由于他们所学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脱节严重，我将中国政府作为本书分析的主角，希望可以帮助构建二者之间的桥梁。对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读懂国家政经大事和新闻。

本书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

本书结构与数据说明

本书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对宏观现象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

等。最后一章提炼和总结全书内容。

本书力求简明扼要，突出主要逻辑和重点事实，不会过多展开细节。有兴趣深究的读者可以参考每章末尾“扩展阅读”中推荐的读物。

本书使用了很多数据，若处处标注来源，会影响阅读。所以对于常见数据，如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万得数据库中的数据，我没有标注来源，但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只有那些非常用数据或转引自他人研究的数据，我才注明出处。

本书虽为大众读者所写，但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使用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可用作大学相关课程的参考资料。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



感谢

本书使用的数据和文献，跨度很大。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假如没有近些年本土经济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没有海外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不可能整理出这么多素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镇，向来重视制度和历史分析，也积极参与现实和政策讨论，我对中国经济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在这里开始的。学院几乎每周都有十数场报告，既有前沿学术探讨和热点政策分析，也有与业界和政府的交流讨论，在这种氛围中，研究者自然而然会关注现实问题。本书几乎每一章的主题，复旦的同事都有研究和著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在复旦工作的六七年中，我几乎每周都参加陈钊和陆铭等同仁组织的学习讨论小组，本书中的很多想法都源于这些讨论。

2017—2018年，我做了大量实地调研，与很多企业家、投资人和政府官员交流，这些经历影响了本书的视角和框架。感谢在这个过程中

帮助过我的很多领导和业界精英。

本书涵盖的主题跨度很大，在写作和学习过程中，我请教了很多同事，他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鼓励。尤其要感谢陈硕、陈婷、董丰、刘志阔、吴乐旻，他们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章节，提供了大量宝贵建议。感谢我的教学和研究助理拜敏旸、丁关祖、李嵩同学，他们帮我收集了很多数据。同样也感谢那些帮我审读书稿的聪慧可爱的同学，他们阅读了部分章节的初稿，在内容编排和文字上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的钱敏、贾忠贤、曹迪辉三位编辑老师。他们的专业素养是这本书质量的保证，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对“出一本好书”的热情与执着，让我感动。

本书的一切错漏之处都归我自己。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争取有机会再版时改正。

上篇 微观机制

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本篇第一章介绍决定地方事务范围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会经常变化，所以地方政府要办的事、要花的钱也不会有巨大变动。一旦收入发生大幅变动，收支矛盾就会改变政府行为。第二章介绍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因后果。这次改革对地方政府影响深远，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介绍其中的逻辑、机制、案例，同时解释地方政府的债务和风险，以及相关改革。这些内容是理解下篇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中学时我听过一件事，一直记着：美国就算只把加州单拿出来，也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当时我想，美国有50个州，那真是富强得难以想象。后来我才知道，加州的GDP占美国GDP总量的15%，是美国的第一经济大州，远超其他州。不过这种类比很好记，我现在也常在课堂上套用：广东和江苏相当于世界上第13和第14大经济体，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山东、浙江、河南每一个单独计算都是世界前20大经济体，其中，河南仅次于荷兰。

几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创业团队想进入中国市场。公司做汽车智能驾驶配件，小有规模，势头不错。两个创始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有全球眼光，想在新一轮融资时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当时我正为湖北省政府的投资基金做咨询，就给两人介绍了湖北总体及武汉的汽车产业情况。他们是头一次来中国，对湖北完全没概念。于是我就套用了上述类比：湖北的GDP总量与阿根廷相当，所以湖北省投资基金类似于阿根廷的主权基金。两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几年时间一晃而过，2019年湖北的GDP已经接近瑞士，而阿根廷却再次陷入衰退，其GDP已不足湖北的七成。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大于美国各州。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①不仅如此，我国各地风俗、地理、文化差异也大，仅方言就有上百种，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本章将介绍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逻辑。第一节简要介绍行政体系的几个特点。第二节至第四节结合实际情况，详述事权划分三原则：外部性和受益范围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②第五节介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发展经济是政府的核心任务，而招商引资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手段，所涉具体事务既深且广，远超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讨论范畴。了解招商引资，是理

解地方政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过程的起点。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图1-1描绘了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这一体系从历史上的“中央—省—郡县”三级体系演变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省以下设了“专区”或“地区”。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行“以市管县”，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市的数目不足200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1983年开始，“以市管县”在全国推行，大多数“地区”都改成了“地级市”，城市数目大幅增加到600多个（图1-1中地级市与县级市之和）。^③目前依然存在的“地区”，大都在地广人稀的边疆省份，面积很大，如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和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在县乡一级，帝制时期的地方精英自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随帝制瓦解而终结。民国至新中国初期，政权逐渐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镇和城市的街道。在乡以下的村落，则实行村民自治，因为行政能力毕竟有限，若村落也建制，那财政供养人口又要暴涨一个数量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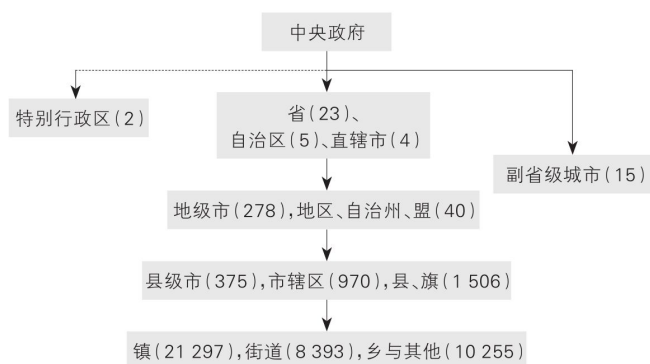


图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18年）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的行政单位数目（单位：个）。

资料来源：民政部网站。

现实情况当然远比简化的“五级”复杂。比如，同样都是地级市，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资源完全不同。再比如，同样都是县级单位，县级市、县、市辖区之间也有重大差别：在土地和经济事务上，县级市的权力比县大，而县的权力又比一般市辖区大。这五级体系也在不断改革，如近些年的“撤县设市”“撤县设区”“省直管县”“撤乡设镇”等。即使在省级层面上也时有重大变革，如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而最近几年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

湾区”等国家战略，也会对现有行政区域内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政府体制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且不断发展变化，非常复杂，研究专著汗牛充栋。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会推荐几本相关读物，本节只简要介绍几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体制特点。

中央与地方政府。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小说《三国演义》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头，正体现了这种平衡之难。按照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我国“统一”（即基本恢复前朝疆域且保持中原地区相对太平）的时间不过950年，占这一历史阶段的45%，而分裂时间则占55%，可见维持大一统国家并不容易。⁽⁴⁾如今，央地关系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宪法中。现行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国体和政体，紧接着第三条便规定了央地关系的总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是一条高度抽象和灵活的原则，之后的章节会结合具体内容来展开讨论。

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的主题。简单说来，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本书主题是经济发展，无须特别强调党政之分，原因有三。其一，地方经济发展依托地方政府。地方党委书记实质上依然是地方官，权力通常无法超越本地。⁽⁵⁾其二，制约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因素，也制约着各级党委的分工。比如，信息沟通既是困扰上下级政府的难题，也是困扰上下级党委的难题。所以在讨论事权划分原理时，无须特别区分党和政府。其三，地方经济事务由政府部门推动和执行。虽然各部门都由党委领导，但地方上并无常设的专职党委机构来领导日常经济工作。假如本书主题是法制建设，那这种党政不分的分析框架就不准确，会遗漏关键党委机构的作用，比如政法委和纪委。⁽⁶⁾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

等个别例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上级领导与协调。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門，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門或跨地区事务，办起来就比较复杂，常常理不清头绪，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部門之间也存在互相扯皮的问题，某件事只要有一个部門反对，就不容易办成。尤其当没有清楚的先例和流程时，办事人员会在部門之间“踢皮球”，或者干脆推给上级，所以权力与决策会自然而然向上集中。制度设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避免把过多决策推给上级，减轻上级负担，提高决策效率，所以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識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⁷⁾若是部門事务，本部門领导就可以决定；若是经常性的跨部門事务，则设置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比如经济事务，常常需要财政、工商、税务、发改委等多部門配合，因为发展经济是核心任务，所以地方大都有分管经济的领导，级别通常较高，比如常务副市长（一般是市委常委）。

官僚体系。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由人来执行和运作。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人手中，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公司，人事制度都是组织机构的核心。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完善、专业、复杂的官僚体系的国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就已开始通过军功和学问等渠道来吸纳人才，且官职不可继承，逐渐削弱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贵族统治体系。唐朝以后，以科举为基础、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庞大官僚体系，成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⁸⁾科举选拔出的官僚，既为政治领导，也为道德表率，不仅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统一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载体。这一体系的三大特点延续至今：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官需要在多地轮换任职。在维持大一统的前提下，这些特点都是央地关系平衡在人事制度上的体现。

总的来说，我国有一套立足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制度。像所有政治制度一样，实际的权力运作与纸面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也

绝不是任性随意的。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些约束条件的影响。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地方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边界，由行政区划决定。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先从行政区划角度来分析权力划分。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在公共场合抽烟，让别人吸二手烟，是负外部性；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是正外部性。

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若此事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比如市里建个小学，只招收本市学生，那市里就可以做决定。但如果本市工厂污染了其他城市，那排污就不能只由本市说了算，需要省里协调。如果污染还跨省，可能就需要中央来协调。因此行政区域大小应该跟政策影响范围一致。若因行政区域太小而导致影响外溢、需要上级协调的事情过多，本级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讲，行政区划也限定了地方可调配的资源，限制了其政策的影响范围。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边界

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看法，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国防和公园。这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大家都能用，用的人越多就越划算——因为建造和维护成本也分摊得越薄，这就是“规模经济”。但绝大部分公共物品只能服务有限人群。一个公园虽然免费，但人太多就会拥挤，服务质量会下降，且住得远的人来往不便，所以公园不能只建一个。一个城市总要划分成不同的区县，而行政边界的划分跟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一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⁹⁾

这个道理看似不起眼，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现象，小到学区划分、大到国家规模。比如，古代王朝搞军事扩张，朝廷就要考虑扩张的限度。即便有实力，是否就越大越好？政府职能会不会鞭长莫及？边远地区的人是否容易教化和统治？汉武帝时武功极盛，但对国家资源的消耗也大。等到其子昭帝继位，便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辩论

武帝时的种种国策，其会议记录就是著名的《盐铁论》。其中《地广第十六》中就有关于国土扩张的辩论，反对方说：“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意思是边远之地物产没什么用，人也野蛮，而且那么远，制度也不容易实施，实在没必要扩张。这些话颇有道理，支持方不易反驳，于是就开始了人身攻击。

(10)

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论，人身攻击大可不必，若想支持扩张，多说说规模经济的好处便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13个州需要决定是否建立一个中央联邦政府。反对的人不少。毕竟刚打跑了英国主子，何必马上给自己立个新主子？所以赞同的人就得想办法说服民众，宣传联邦的好处，他们写了不少文章，这些小文章后来就成了美国的国民经典《联邦党人文集》。其中编号第13的文章出自汉密尔顿之手，正是讲一个大政府比13个小政府更省钱的道理，也就是规模经济。

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也与技术和基础设施有关。比如《新闻联播》，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电视或网络可以收看？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普通话？是不是所有人的教育水平都能听懂基本内容？这些硬件和软件的基础非常重要。所以秦统一六国后，立刻就进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比如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而中小学教育受制于校舍和老师等条件，规模经济较小，主要覆盖当地人，所以硬件和教师支出大都归地方负担。但教材内容却不受物理条件限制，而且外部性极强。如果大家都背诵李白、杜甫、司马迁的作品，不仅能提高自身素养，而且有助于彼此沟通，形成共同的国民意识，在一些基本问题和态度上达成共识。所以教育的日常支出虽由地方负责，但教材编制却由中央主导，教育部投入了很多资源。2019年底，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加强了国家统筹，对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课程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

假如各个市、各个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性质和内容都差不多，基础设施水平也没什么差异，那各地的行政区划面积是不是就该相等呢？当然也不是，还要取决于影响公共服务效果的其他因素。

人口密度、地理与文化差异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密度。我国幅员辽阔，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如果从黑龙江的瑷珲（今黑河市南）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直线，把国土面积一分为二，东边占了43%的面积却住了94%的人口，而西边占了57%的面积却只住了6%的人口。⁽¹¹⁾西边人口密度比东边低得多，行政单位面积自然就大得多。面积最大的四个省级单位（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都在西边，合计占国土面积的一半。新疆有些地区的面积比东部一个省的面积还要大，但人口却尚不及东部一个县多。⁽¹²⁾

按人口密度划分行政区域的思路非常自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成本，人多，不仅税收收入多，而且成本能摊薄，实现规模收益。人口稠密的地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就可以服务足够多的人，实现规模收益，因此行政区域面积可以小一些；而地广人稀的地方，行政区域就该大一些。中国历代最重要的基层单位是县，而县域的划分要依据人口密度，这是早在秦汉时期就定下的基本规则之一，所谓“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行政区域的面积应该越变越小，数目则应该越变越多。所以随着古代经济中心和人口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行政区划也就慢慢从“北密南稀”变成了“南密北稀”。以江西为例，西汉时辖19县，唐朝变成34县，南宋时更成为粮食主产区，达到68县，清朝进一步变成81县。⁽¹³⁾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地理条件。古代交通不便，山川河流也就成了行政管理的自然边界，历史地理学家称之为“随山川形变”，由唐朝开国后提出：“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新唐书·地理志》）。所谓“十道”，基本沿长江、黄河、秦岭等自然边界划分。唐后期演化为40余方镇，很多也以山川为界，比如江西和湖南就以罗霄山脉为界，延续至今。现今省界中仍有不少自然边界：海南自不必说，山西、陕西以黄河为界，四川、云南、西藏则以长江（金沙江）为界，湖北、重庆以巫山为界，广东、广西则共属岭南。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化差异。汉语的方言间有差异，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差异。若语言不通，政务管理或公共服务可能就需要差异化，成本会因此增加，规模收益降低，从而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当然，语言差异和地理差异高度相关。方言之形成，多因山川阻隔而交流有限。世界范围内，一国若地形或适耕土地分布变异大，人口分布就比

较分散，国内的语言变异往往也就更丰富。(14)

我国各省间方言不同，影响了省界划分。而省内市县之间，口音也常有差异，这影响了省内的行政区划。浙江以吴语方言复杂多变闻名，而吴语方言的分布与省内地市的划分高度重合：台州属于吴语台州片，温州属于瓯江片，金华则属于婺州片。同一市内，语言文化分布也会影响到区县划分。杭州下辖的淳安和建德两县，属于皖南的徽文化和徽语区，而其他县及杭州市区，则属于吴语区的太湖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行政区划地图与《中国语言地图集》，很有意思。

理解了这些因素，就能理解很多政策和改革。比如，随着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需要打破现有的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无缝对接的标准化公共服务，所以就有了各种城市群的规划，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比如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再比如，地理阻隔不利沟通，但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政区划也可以简化，比如撤县设区。此外，理解了方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就理解了推广普通话和共同的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当然，无论是人口密度、地理还是语言文化，都只是为理解行政区划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无法涵盖所有复杂情况。其一，人口密度变化频繁，但行政区域的调整要缓慢得多。虽然一些人口流入地可以“撤县建区”来扩张城市，但人口流出地却很少因人口减少去裁撤行政单位，一般只是合并一些公共设施来降低成本，比如撤并农村中小学。其二，古代行政区划除“随山川形变”外，也遵循“犬牙交错”原则，即为了政治稳定需要，人为打破自然边界，不以天险为界来划分行政区，防止地方势力依天险制造分裂。元朝在这方面走了极端，设立的行省面积极大，几乎将主要天险完全消融在各行省内部，但效果并不好。其三，方言与文化区域经常被行政区划割裂。比如客家话虽是主要方言，但整个客家话大区被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分割。再比如有名的苏南、苏北之分：苏州、无锡、常州本和浙江一样同属吴语区，却与讲江淮官话的苏北一道被划进了江苏省。

行政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省级的陆路交界线共66条，总长度5.2万公里，按边界两侧各15公里计算，总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的六分之一。然而，在2012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却有超过一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15)

这一俗称“三不管地带”的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的理论来解释。首先，一省之内以省会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但几乎所有省会（除南京和西宁外）无一临近省边界，这种地理距离限制了边界地区获取公共资源。其次，省边界的划分与地理条件相关。诸多省界县位于山区，坡度平均要比非省界县高35%，不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山西、河北边界的太行山区，江西、福建边界的武夷山区，湖北、河南、安徽边界的大别山区等。再次，省界划分虽与方言和地方文化有关，但并不完全重合。一省之内主流文化一般集中在省会周围，而省界地区往往是本省的非主流文化区，其方言也有可能与主流不同。比如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的客家话区，与三省主流的赣语、闽语、粤语都不相同。再比如安徽北部，基本属于河南、山东一脉的中原官话区，与省内主流的江淮官话不同。这些边界地区，在本省之内与主流文化隔阂，而与邻省同文化区的交流又被行政边界割裂，不利于经济发展。(16)

这些因素在民国时期已存在，所以“三不管地带”才为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空间。家喻户晓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就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之中。其他很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也在省界处，比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赣边区等。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要的“四渡赤水”，就发生在川黔滇边界的赤水河地区。(17)

从公共物品角度看，边界地区首先面临的是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的不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省边界处的“断头路”并不罕见。1992年我从内蒙古乘车到北京，途经山西和河北，本来好好的路，到了省界处路况就变差，常常要绕小道。若是晚间，还可能遇到“路霸”。即使到了2012年，路网交通中的“边界效应”（省界地区路网密度较低）依然存在，虽然比以前改善了很多。即使在排除了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地形等因素之后，“边界效应”也还是存在的，不过只限于由省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和省道中，在由中央政府投资的国道和铁路中则不存在，可见省政府不会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边界地区。(18)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如今省界处的交通已不再是大问题。

另一个曾长期困扰边界公共治理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尤其是跨省的大江、大河、大湖，比如淮河、黄河、太湖等流域的污染。这是典型的跨区域外部性问题。直到中央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且在“十

五”和“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降低水污染的具体目标之后，水质才开始显著改善。但省界处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省份把水污染严重的企业集中到了本省边缘的下游区域，虽然本省的平均污染水平降低了，下游省份的污染却加重了。⁽¹⁹⁾

跨区域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跨区域的上级来协调，这也是为什么行政区域不仅要作横向划分，也要作纵向的上下级划分。下级之间一旦出现了互相影响、难以单独决断的事务，就要诉诸上级决策。反过来说，各级政府的权力都是由上级赋予的，而下放哪些权力也和外部性有关。在外部性较小的事务上，下级一般会有更大决策权。虽然从原则上说，上级可以干预下级的所有事务，但在现实工作中，干预与否、干预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干预效果，都受制于公共事务的外部性大小、规模经济、跨地区协调的难度等。

行政边界影响经济发展，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用地指标和户籍制度对土地和人口流动影响很大。从长期看，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目前的行政区划继承自古代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业与现代服务业急速的发展和集聚。而且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大国，建设产品和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个长期过程，难免要先经过区域性整合。

区域性整合的基本单位是城市，但在城市内部，首先要整合城乡。在市管县体制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工业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的市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县城之间，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调和不同需求、利用好有限的公共资源，就成了一大难题。改革思路有二：一是加强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弱化其与市区的联系。第二章将展开讨论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扩权强县、撤县设市、省直管县等。二是扩张城市，撤县设区。1983—2015年，共有92个地级市撤并了134个县或县级市。⁽²⁰⁾比如北京市原来就8个区，现在是16个，后来的8个都是由县改区，如通州区（原通县）和房山区（原房山县）。上海现有16个市辖区，青浦、奉贤、松江、金山等区也是撤县设区改革的结果。

撤县设区扩张了城市面积，整合了本地人口，将县城很多农民转化为了市民，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服务，发挥规模收益。很多撤县设区的城市还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²¹⁾这些新增人口扩大了市场规模，刺激了经济发展。撤县设区也整合了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资源。

随着区县合并，市郊县的大批农村土地被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城乡土地制度大不相同，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之后章节会详细讨论。

第三节 复杂信息

中国有句老话叫“山高皇帝远”，常用来形容本地当权者恣意妄为、肆无忌惮，因为朝廷不知情，也就管不了，可见信息对权力的影响。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然而信息复杂多变，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代价不小。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信息与权力

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上级领导下级。原则上，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但上级不可能掌握和处理所有信息，所以很多事务实际上由下级全权处理。即使上级想干预，常常也不得不依赖下级提供的信息。比如上级视察工作，都要听取下级汇报，内容是否可靠，上级不见得知道。如果上级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就可能被下级牵着鼻子走。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就该自主决策。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上级就可能多干预。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²²⁾

以国企改革为例。一家国企该由哪一级政府来监管？该是央企、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虽然政府名义上既管辖本级国企，也管辖下级国企，但下级国企实际上主要由下级政府管辖。在国企分级改革中，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企业离上级政府很远，交通不便，且企业间差异又很大，上级政府就很难有效处理相关信息，所以更可能下放管辖权。但如果企业有战略意义，对上级很重要，那无论地理位置如何，都由上级管辖。⁽²³⁾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区别，是个程度问题。工作总要下级来做，不可能没有一点自主性；下级也总要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评价，不可能完全不理上级意见。但无论如何，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所以

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一般都能办，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干，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就可以拖一拖，或者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最终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即使是上级明确交代的事情，如果下级不想办，那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弹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单位内部。单位领导虽有形式权威和最终决策权，但具体工作大都要求专业知识和经验，所以专职办事的人员实际权力很大。比如古代的官和吏，区别很大。唐朝以后，“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下派到地方任职几年，大多根本不熟悉地方事务，所以日常工作主要依靠当地的“吏”。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吏，实际权力大得很，是地方治理的支柱，不但受官员调动的影 响，甚至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清人朱克敬《瞑庵杂识》中有一位吏的自我定位如下：“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意思是说衙门就像车，来办事就像坐车，当官的是骡子，我们才是车把式，决定车的方向。⁽²⁴⁾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比如英国的内阁部门长官随内阁选举换来换去，而各部中工作多年的常务次官（permanent secretary）往往更有实权。著名的英国政治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正是讲述新上任的大臣被常务次官耍得团团转的故事。

上节讨论过的限制公共服务范围的诸多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屏障、方言等，也可以视作收集信息的障碍。因此信息不仅可以帮助理解上下级的分权，也可以帮助理解平级间的分权。行政区划，不仅受公共服务规模经济的影响，也受获取信息比较优势的影响。

信息获取与隐瞒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要不断向下传达，下级要不断向上汇报，平级要不断沟通，所以体制内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山会海”。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件和会议也成了权力的载体之一，而一套复杂的文件和会议制度就成了权力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国政府上下级之间与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大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划

分，主要依赖内部规章制度，也即各类文件。为了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和偏误，降低传递成本，文件类型有严格的区分，格式有严格的规范，报送有严格的流程。按照国务院2012年最新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文共分15种，既有需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决定”和“命令”，也有可以相对灵活处理的“意见”和“通知”，还有信息含量较低的“函”和“纪要”等。每种公文的发文机关、主送机关、紧急程度以及密级，都有严格规定。为了防止信息泛滥，公文的发起和报送要遵循严格的流程。比如说，《条例》规定，“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部门之间未协商一致的，不得向下行文”，这也是为了减少产生无法落实的空头文件。

会议制度也很复杂。什么事项该上什么会，召集谁来开会，会议是以讨论为主还是需要做出决定，这些事项在各级政府中都有相应的制度。比如在中央层面，就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

因为关键信息可能产生重大实际影响，所以也可能被利益相关方有意扭曲和隐瞒，比如地方的GDP数字。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务院每年都有GDP增长目标，所以GDP增长率的高低也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²⁵⁾绝大部分省份公布的增长目标都会高于中央，而绝大多数地市的生长目标又会高于本省。比如2014年中央提出的增长目标是7.5%，但所有省设定的目标均高于7.5%，平均值是9.7%。到了市一级，将近九成的市级目标高于本省，平均值上涨到10.6%。⁽²⁶⁾这种“层层加码”现象的背后，既有上级层层施压和摊派的因素，也有下级为争取表现而主动加压的因素。但这些目标真能实现么？2017—2018年两年，不少省份（如辽宁、内蒙古、天津等）主动给GDP数字“挤水分”，幅度惊人，屡见报端。

因为下级可能扭曲和隐瞒信息，所以上级的监督和审计就非常重要，既要巡视督察工作，也要监督审查官员。但监督机制本身也受信息的制约。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飙升，违法现象（越权批地、非法占用耕地等）层出不穷，且违法主体很多是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其下属的土地管理部门根本无力防范和惩处。2006年，中央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在国土资源部（现改为自然资源部）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现改为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并向地方派驻国家土地监督局（现改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这一督察机制总体上遏制了土地违法现象。但中央派驻地方的督察局只有9

个，在警察局所驻城市，对土地违法的震慑和查处效果比其他城市更强，这种明显的“驻地效应”折射出警察机制受当地信息制约之影响。(27)

第二个例子是水污染治理。与GDP数字相比，水污染指标要简单得多，收集信息也不复杂，所以中央环保部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建立了“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系统”，在各主要河流和湖泊上设置了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直报中央。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目标远比环保重要，所以这些数据主要用于科研而非环保监督。20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且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降低水污染的具体目标，地方必须保证达标。虽然数据直报系统杜绝了数据修改，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扭曲。一个监测站只能监测上游下来的水，监测不到本站下游的水，所以地方政府只要重点降低监测站上游的企业排污，就可以改善上报的污染数据。结果与监测站下游的企业相比，上游企业的排放减少了近六成。虽然总体污染水平降低了，但污染的分布并不合理，上游企业承担了过度的环保成本，可能在短期内降低了其总体效益。(28)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规则模糊不清和权力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考核学生一般有两种方式：考试或写论文。若考卷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那老师虽有出题的权力，但不能决定最后得分。但若考卷都是主观题，老师给分的自由度和权力就大一些。若是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存在严格的客观判断标准，导师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所以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而不会称其他授课教师为“老板”。

如果一件事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清楚，有客观评价的标准，那权力分配就非常简单：参与各方立个约，权责利都协商清楚，照办即可。就像选择题的答题卡一样，机器批阅，没有模糊空间，学生考100分就是100分，老师即使不喜欢也没有办法。但大多数事情都不可能如此简单清楚，千头万绪的政府工作尤其如此：一件事该不该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算做得好？做好了算谁的功劳？做砸了由谁负责？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清楚的标准。一旦说不清楚，谁说了算？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29)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

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本节只讨论前者，第三章再讨论官员的激励。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垂直管理

在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比如海关，主要受上级海关的垂直领导，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力较小。这种权力划分符合激励相容原则：工作主要由系统内的上级安排，所以绩效也主要由上级评价，而无论是职业升迁还是日常福利，也都来自系统内部。

还有一些部门，虽然工作性质也比较专业，但与地方经济密不可分，很多工作需要本地配合，如果完全实行垂直管理可能会有问题。比如工商局，在1999年的改革中，“人财物”收归省级工商部门统管，初衷是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工商部门的干扰，打破地方保护，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多元化，工商局的行政手段的效力一直在减弱，而垂直管理带来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工商工作与所在地区密不可分，但因为垂直管理，当地政府对工商系统的监督和约束都没有力度。在一系列事故尤其是2008年震动全国的“毒奶粉”事件之后，2011年中央再次改革，恢复省级以下工商部门的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经费和编制由地方负担，干部升迁改为地方与上级工商部门双重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³⁰⁾2018年机构改革后，工商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所有面临双重领导的部门，都有一个根本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到底谁是主要领导？工作应该向谁负责？假如所有领导的目标和利益都一样，激励机制就不重要。在计划经济时代，部门间没什么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相对有效，既能形成约束，也有利于

交流和推进工作。但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利益不仅大了，而且多元化了，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统一思想”和“大局观”虽依然重要，但只讲这些就不够了，需要更加精细的激励机制。最起码，能评价和奖惩工作业绩的上级，能决定工作内容的上级，受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上级，应该尽量是同一上级。

当上下级有冲突的时候，改革整个部门的管理体制只是解决方式之一，有时“微调”手段也很有效。拿环保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级虽重视环境质量，但下级担心环保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上下级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政策推行不力，环境质量恶化。⁽³¹⁾但随着技术进步，中央可以直接监控污染企业。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把一些重污染企业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包括3 115家废水排放企业，3 592家废气排放企业，以及658家污水处理厂。这些企业都要安装一套系统，自动记录实时排放数据并直接传送到国家环保监控网络。这套技术系统限制了数据造假，加强了监管效果，大幅降低了污染，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环保管理体制，日常执法依然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³²⁾

随着中央越来越重视环保，跨地区协调的工作也越来越多，环保部门的权力也开始上收。2016年，省级以下环保机构调整为以省环保厅垂直领导为主，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大大降低。这次调整吸取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中的一些教训。比如在工商部门垂直领导时期，不仅市级领导干部由省里负责，市级以下的领导也基本由省里负责，这就不利于市县上下级的沟通和制约。所以在环保体制改革中，县环保局调整为市局的派出分局，由市局直接管理，领导班子也由市局任免。⁽³³⁾

地方管理

对于更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要让地方负责，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要能约束地方不要搞砸，也不要努力过头。做任何事都有代价，最优的结果是让效果和代价匹配，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达成目标。若不加约束，地方政府要实现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目标并不难，可以尽情挥霍手中的资源，大肆借债、寅吃卯粮来推高增长数字，但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最优的。

激励相容原则首先要求明确地方的权利和责任。我国事权划分的一大特点是“属地管理”：一个地区谁主管谁负责，以行政区划为权责边

界。这跟苏联式计划经济从上到下、以中央部委为主调动资源的方式不同。属地管理兼顾了公共服务边界问题和信息优势问题，同时也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力，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就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制度都要可信，才能形成明确的预期。制度建设，一方面是靠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前文中的工商和环保部门改革）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靠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收入和支出的划分，也就约束了谁能调用多少资源，不能花过头的钱，也不能随意借债，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来自外部的竞争也可以约束地方政府。如果生产要素（人、财、物）自由流动，“用脚投票”，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无法吸引资金和人才。虽然地方政府不是企业，不至于破产倒闭，但减少低效政府手中的资源，也可以提高整体效率。

小结：事权划分三大原则

第二至第四节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这三种视角从不同角度出发，揭示现象的不同侧面，但现象仍然是同一个现象，所以这三种视角并不冲突。比如行政区划，既与公共服务的规模有关，也和信息管理的复杂性有关，同时又为激励机制设定了权责边界。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扩展公共服务的范围，又能提高信息沟通效率，还可以方便人、财、物流通，增强各地对资源的竞争，激励地方励精图治。

三大原则的共同主题是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冲突。从公共服务覆盖范围角度看，不同人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同，享受该服务的代价不同，所以要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从信息复杂性角度看，掌握不同信息的人，看法和判断不同，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从激励相容角度看，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所以要设立有效的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假如不同群体间完全没有差别和冲突，那事权如何划分就不重要，对结果影响不大。完全没有冲突当然不可能，但如

果能让各个群体对利益和代价的看法趋同，也能消解很多矛盾，增强互信。所以国家对其公民都有基本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包括历史教育和国家观念教育。而对官员群体，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共同价值观的培养与教化，今天依然如此。

上述三个原则虽不足以涵盖现实中所有的复杂情况，但可以为理解事权划分勾勒一个大致框架，帮助我们理解目前事权改革的方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事权改革方向的阐述就非常符合这些原则：“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³⁴⁾

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细化，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本章讨论的三大原则：“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要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要逐步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区、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

既然是改革的方向，也就意味着目前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事务，原则上都应该主要或完全由中央负责，但国际界河（主要在东北和西南）和海域的管理与治理目前仍主要由地方负责。再比如养老和医疗保险，对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应由中央为主管辖，但目前的管理相当碎片化。而对于本该属于地方的事权，中央虽应保留介入的权力，但过分介入往往会造成地方退出甚至完全放手，效果不一定好。如何从制度上限制过度介入，真正理顺事权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五节 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的权力非常广泛。就发展经济而言，其所能调动的资源和采取的行动远远超过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范围。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很多地方政府都采用“全民招商”策略，即几乎所有部门（包括教育和卫生部门）都要熟悉本地招商政策，要在工作和社交中注意招商机会。

要招商，就要有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这涉及土地开发、产业规划、项目运作等一系列工作，第二章至第四章会详细解释。这里只要了解：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比如以政府控制的投资平台入股，调动本地国企参与投资，通过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等等。对一些业务比较复杂、所在行业管制较严的企业，地方也会提供法律和政策协助。比如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并没有生产汽车的牌照，而要获取牌照（无论是新发，还是收购已有牌照）很不容易，需要和工信部、发改委等中央部门打交道，这其中企业的很多工作都有地方政府的协助。与企业相比，地方政府更加熟悉部委人脉和流程。再比如近年兴起的网络安全和通信服务行业，都受国家管制，需要地方协助企业去获得各类许可。还有些行业对外商投资有准入限制，也需要地方政府去做很多协助落地的工作。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补贴方式五花八门，比如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常见的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的“三免三减半”，即对新开业企业头三年免征所得税，之后三年减半征收。⁽³⁵⁾还有一些针对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对于规模很大的企业，地方政府常常对部分高管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返还。我国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很高，年收入超过96万元的部分税率是45%，所以税收返还对高管个人来说有一定吸引力。对企业高管或特殊人才，若有需要，地方政

府也会帮助安排子女入学、家人就医等。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新设的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招工服务，比如协助建设职工宿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等。大多数城市还对高学历人才实行生活或住房补贴。

总的来说，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其中土地直接归政府所有，资金则大多来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政府控制的其他渠道，比如国有投融资平台。对于劳动力，政府控制着户口，也掌握着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供给，还掌握着土地供应，直接影响住房分配。而生产中的科技投入，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工具，都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结语

本章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种理论：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这些理论为理解政府职能分工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虽各有侧重，但彼此相通。社会科学的理论，刻意追求标新立异没有意义。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单一理论只能启示某个侧面，要从不同理论中看到共同之处，方能融会贯通。

地方政府不止提供公共服务，也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其间得失，之后的章节会结合具体情况展开讨论。若无视这种现实、直接套用主流经济学中“有限政府”的逻辑，容易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产生扭曲和误解。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实事求是了解现状，才能依托现实提炼理论，避免用理论曲解现实，也才能真正深入思考政府在几十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本章讨论的事权划分，是理解政府间资源分配的基础。决定了干哪件事，才能决定用哪些资源。所以下一章所讨论的政府财权和财力的划分，以本章的事权划分为基础。财权领域虽改革频频，但事权划分却相对稳定，因为其决定因素也相对稳定：地理和语言文化边界长期稳定，信息和激励问题也一直存在。

扩展阅读

关于中国政府和政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专家李侃如的著作《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010）是很好的入门读物。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历史遗产及现状，阐释了其演变逻辑，可读性很强。但该书成书于1995年（英文原名为*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修订于2003年（2010年是中译本的出版年份），没有涉及最近十多年的重大改革。作为补充，清华大学景跃进、复旦大学陈明明、中山大学肖滨合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2016）是同类教材中可读性较强的一部，内容比较全面，对党政关系、政法系统、宣传系统、军事系统都有介绍。

我国政府的运作模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的著作《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2013）深入浅出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现象，是很好的普及读物。本章阐释的所有理论在该书中都能找到有趣的佐证。已故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孔飞力的杰作《叫魂》（2014）也与本章内容相关。该书讲述了乾隆盛世年间的一场荒诞事故：本是某些地方流民和乞丐的零星骗局，却被乾隆解读成了要颠覆朝廷的大阴谋，于是发动了全国大清查，造成了朝野和民间的大恐慌，最终却在无数冤案之后不了了之。该书很多史料来自御笔亲批的奏折，从中尤其可以看到信息之关键：诸多信息都在奏折的来往中被扭曲和误解，最终酿成大乱。

- (1) 此处略去人口极少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 (2) 这三项原则的简单论述，见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的著作（2013）。
- (3) 1959年，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开始市领导县的改革。1982年，中央发布《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1983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详情见清华大学景跃进、复旦大学陈明明、中山大学肖滨合编的教科书（2016）。
- (4)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著作（2013）。
- (5) 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一些重要地区的书记也是上级省委常委，如省会城市的书记也是省委常委。
- (6) 省委或市委的直属机构一般包括办公厅、纪委、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和政策研究部门。在组织人事、政法、教育宣传等领域内，党委有独立于政府的职能部门，但在财经领域，党政之分通常并不重要。当然，在中央层面有一些直属小组，负责领导主要经济政策的制定，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 (7) 这项原则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的观察，他的著作（2010）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观察与分析很有见地。
- (8)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福山在其著作（2014）中阐述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基石：政府、法治、民主。其中的“政府”，也就是脱离血缘关系、由专门人才主导的管理机构，起源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2010）曾用“超稳定结构”来描述历经王朝更迭的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结构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子系统组成。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官僚和儒生，是该结构日常运作的关键，也是在结构破裂和王朝崩溃之后修复机制的关键。世界历史上，王朝崩溃并不罕见，但只有中国能在崩溃后不断修复和延续，历经千年。
- (9) 本节依据的理论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伯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开创性论文中提出并完善。相关的数学模型、经验证据、历史和现实案例，都收入在他们的书中（Alesina and Spolaore, 2003）。在本节的写作过程中，阿莱西纳教授于2020年5月23日突发疾病离世，享年63岁。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 (10) 这段人身攻击有些名气，大约是古今中外某些当权者辱骂知识分子的通用套路，大意如下：你智商要真高，怎么做不了官？你财商要真高，怎么那么穷？你们不过是些夸夸其谈之辈，地位不高还爱质疑上司，穷成那样还说富人的坏话，样子清高实则卑鄙，妄发议论，哗众取宠。俸禄吃不饱，家里没余粮，破衣烂衫，也配谈论朝堂大事？何况拓边打仗之事呢！（原文为：“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历而行卑，诽谤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 (11) 这条线的提出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已故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故也被称为“胡焕庸线”。
- (12) 广东省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县级单位有几十个，任何一个都比新疆的阿勒泰或哈密地区的总人口多。
- (13)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的著作（2014）。下一段内容也多取材自该书。
- (14) 地理和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来自布朗大学米哈洛普洛斯（Michalopoulos）的研究（2012）。
- (15) 地理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贫困县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
- (16) 本段中坡度的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高翔与厦门大学的龙小宁（2016）则指出，文化与本省主流不同的省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17)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内容，来自北京大学韩茂莉的著作（2015）。
- (18) 关于道路密度的研究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唐为的论文（2019）。

- (19) 工业水污染向本省下游区域集中这个现象，来自香港大学蔡洪斌、北京大学陈玉宇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宫晴等人的论文（Cai, Chen and Gong, 2016）。
- (20) 数据来自南开大学邵朝对、苏丹妮、包群等人的论文（2018）。
- (21) 上海财经大学唐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王媛的论文（2015）发现撤县设区会增加外来人口。
- (22) “形式权威”（formal authority）和“实际权威”（real authority）的理论，来自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梯若尔（Tirole）的论文（1997）。
- (23) 关于信息和国企分级的关系，来自清华大学黄张凯、北京大学李力行、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与世界银行徐立新等人的论文（Huang et al., 2017）。
- (24) 中国自魏晋以来出现“官吏分途”，即官吏虽同在官僚机构共生共事，但在录用、晋升、俸禄等方面相互隔绝。对这一制度流变的分析描述及对理解当今官僚体系的启示，读者可参考斯坦福大学周雪光（2016）与北京大学周黎安（2016）的精彩文章。
- (25)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务院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属20余年来首次。
- (26) 数据及关于GDP指标“层层加码”现象的详细讨论，见北京大学厉行、刘冲、翁翕、周黎安等人的论文（Li et al., 2019）。
- (27) 9个驻地是：北京、沈阳、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关于“驻地效应”的检验，来自湖南商学院的陈晓红、朱蕾和中南大学汪阳洁等人的论文（2018）。
- (28) 关于水质监测站与临近企业排放行为的讨论，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何国俊、芝加哥大学王绍达和南京大学张炳等人的论文（He, Wang and Zhang, 2020）。
- (29) 从经济学的合同理论出发，合同不可能事先写清楚所有情况，所以权力的实质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情况下的决定权，可以称为“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s）。以这种视角来分析权力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详见其著作（1995）。他用“剩余控制权”的思路去理解“产权”的本质，即在合同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对财产的处置权。而更加广泛的权力或权威，可以视为在各种模糊情况下的决定权。
- (30) 参见2011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文件现已失效。
- (31) 除环保之外，其他领域内也有类似冲突：上级重视质量而下级重视成本，下级为了降低成本会不惜损害质量。这种冲突并不总是因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便没有信息问题，也有能力问题。只要上级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下级，这种冲突就可能发生。此时放权会降低质量，收权又会降低工作效率，就需要妥协和平衡。哈佛大学哈特（Hart）、施莱弗（Shleifer）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Vishny）的论文（1997）详细探讨了这类问题。
- (32) 关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研究，来自南京大学张炳、四川大学陈晓兰、南京审

计大学郭焕修等人的论文（Zhang, Chen and Guo, 2018）。2016年，重点监控企业已经增加到14 312家。

- (33) 详见中央和国务院于2016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 (34) 引文中的强调格式是我在引用时加上的，本书余下部分涉及此类情况皆如此。
- (35) 我国实行分税制，按照中央和省的分税比例，企业所得税六成归中央，剩余部分由省、市、区县来分。企业所得税减免，一般都是减免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留存部分。但对一些国家支持的行业，比如集成电路，企业的全部所得税都可以“三免三减半”。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大明朝的阁老们在算国库的亏空和来年的预算，李鸿章、慈禧和光绪则在为建海军和修颐和园的费用伤脑筋。然而算着算着，观众就看到了刀光剑影，原来所有的政见冲突和人事谋略，都隐在这一两一两银子的账目之中。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财政的定位和功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我对政府和财政一直非常有兴趣，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修习了一整年的“公共财政”课程。第一学期学习财政收入，即与各类税收有关的理论和实证；第二学期学习财政支出，即各类政府支出的设计和实施效果。与我同级的博士生中，美国和非美国同学各占一半，但只有我一个非美国人选修了这门课，可能是因为涉及大量美国制度细节，外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吃力，兴趣也不大。这门课程对我理解美国有很大帮助，但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公共经济学研究”，备课时却很吃力，因为在美国学过的东西大都不能直接拿来用，跟中国情况很不一样，美国的教科书也不好，要自己准备授课讲义。关键在于中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而财政体制要为政府事务服务，因此不能直接拿美国的财政理论往中国硬套。何况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改革，政府事务也经历了很多重大变革，财税体制自然也在随之不断变革。而财税体制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往往复杂深远，我花了好几年边讲边学，才多少摸到了些门道。

上一章介绍了政府的事权划分。而事权必然要求相应的财力支持，否则事情就办不好。所以从花钱的角度看，“事权与财力匹配”或者说“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这个原则，争议不大。但从预算收入的角度看，地方

政府是否也应该有与事权相适应的收钱的权力，让“事权与财权匹配”，这个问题争议就大了。暂先不管这些争议，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入高度不匹配。从图2-1可以看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就一直高于预算收入。近些年地方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5%，但收入的占比只有50%—55%，入不敷出的部分要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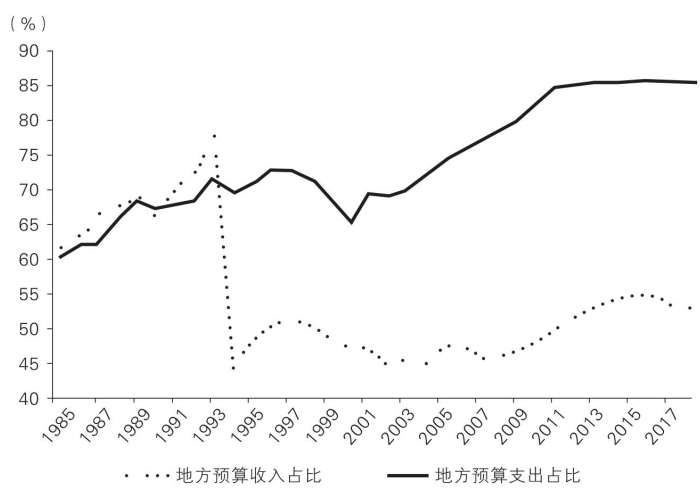


图2-1 地方公共预算收支占全国收支的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本章第一节介绍这次改革的背景和过程，加深我们对央地关系的理解。第二节分析改革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介绍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发展出的“土地财政”，这是理解城市化和债务问题的基础。第三节讨论分税制造成的基层财政压力与地区间不平衡，并介绍相关改革。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财政乃国之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艰辛复杂的改革历程。这方面专著很多，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会推荐几种读物。本节无意追溯完整的改革历程，只从1985年开始谈。1985—1993年，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是比较匹配的（图2-1），这种“事权和财权匹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也造成很多不良后果，催生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财政包干”及后果：1985—1993年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特点，非“承包”莫属：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一时还无法立刻接受“私有”的观念，毕竟之前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1980—1984年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验阶段，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建立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①

既然是承包，当然要根据地方实际来确定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所以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各地不同。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收入递增包干”。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假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元，1988年收入110亿元，增长10%，那超过了4%增长的6亿元都归北京，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

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1988年上解中央14亿元，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剩余的都归自己。1988年，广东预算收入108亿元，上解的14亿元不过只占13%。而且广东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9%（1989年比上年增加了27%），上解负担实际上越来越轻，正因如此，广东对后来的分税制改革一开始是反对的。相比之下，上海的负担就重多了。上海实行“定额上解”，每年雷打不动上缴中央105亿元。1988年，上海的预算收入是162亿元，上解105亿元，占比65%，财政压力很大。

财政承包制下，交完了中央的，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²⁾一种做法就是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可以为地方政府贡献两类收入。第一是交给县政府的增值税（增值税改革前也叫产品税）。企业只要开工生产，不管盈利与否都得交增值税，规模越大缴税越多，所以县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做大、做多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纳税总额也急速增长。在其发展鼎盛期的1995年，乡镇企业雇工人数超过6 000万。乡镇企业为地方政府贡献的第二类收入是上缴的利润，主要交给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作为预算外收入。当时乡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所得税和利润税都很低，1980年的利润税仅为6%，1986年上升到20%，所以企业税后利润可观，给基层政府创造了不少收入。⁽³⁾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在很多根本性制度尚未建立、观念尚未转变之前，各类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整体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收入增长，逐渐转变观念。但也正是因为改革转型的特殊性，很多承包制包括财政包干制注定不能持久。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图2-2）。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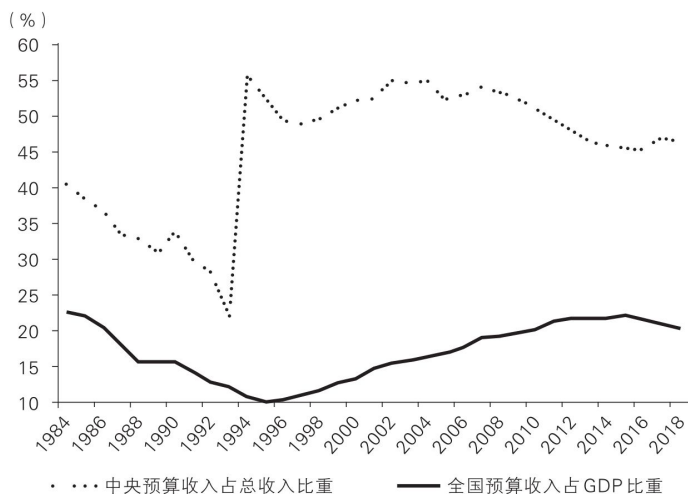


图2-2 “两个比重”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中央占比降低很容易理解。地方经济增长快，20世纪80年代物价涨

得也快，所以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于跟中央约定的固定分成比例增长更快，中央收入占比自然不断下降。至于预算总收入占GDP比重不断降低，原因则比较复杂。一方面，这跟承包制本身的不稳定有关。央地分成比例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谈判一次，若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很快，下次谈判时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落得一个更高的上缴基数和更吃亏的分成比例。为避免“鞭打快牛”，地方政府有意不让预算收入增长太快。另一方面，这也跟当时盛行的预算外收入有关。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了。⁽⁴⁾

“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经济改革让很多人的利益受损，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去补偿，才能保障改革的推行，比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而且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改革后的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东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等），要创造平稳的环境，就需要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也需要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否则连推行和保障义务教育都有困难。如果中央没钱，甚至要向地方借钱，那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的能力。正如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所言：

毛主席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央财政要是这样的状态，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不利的，当时的财税体制是非改不可了。

.....

.....财政体制改革决定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当时的理论界对我讲，财政是国家行政能力、国家办事的能力，你没有财力普及义务教育、救灾等，那就是空话。因此，“国家长治久安”这句话写得是有深意的。⁽⁵⁾

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

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关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之前，增值税（即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假如改革前的1993年，地方增值税收入为100亿元，1994年改革后增长为110亿元，那么按照新税制，地方拿25%，收入一下就从1993年的100亿元下降到了27.5亿元。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1994年，地方可以拿到102.5亿元，而不是27.5亿元。因此改革后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缓慢地逐年下跌（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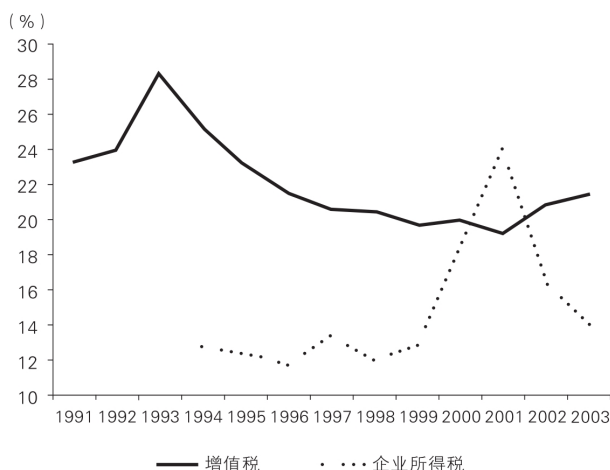


图2-3 地方税收收入中不同税种所占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分税制改革，地方阻力很大。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的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与广东的谈判能否成功，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后来的财政部长项怀诚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激烈博弈：

（项怀诚）分税制的实施远比制订方案要复杂，因为它涉及地方的利益。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30%，我

们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55%，多大的差别！所以说，分税制的改革，必须要有领导的支持。为了这项改革的展开，朱镕基总理⁽⁶⁾亲自带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走了十几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一个省一个省去跑呢，为什么要由一个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带队，一个省一个省去谈呢？因为只有朱总理去才能够和第一把手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地交谈，交换意见。有的时候，书记、省长都拿不了主意的，后面还有很多老同志、老省长、老省委书记啊。如果是我们去，可能连面都见不上。

（刘仲藜）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飞⁽⁷⁾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⁸⁾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驳回去了。这个场面紧张生动，最后应该说谢飞同志不错，广东还是服从了大局，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以1993年为基数、减免税过渡。⁽⁹⁾

这段故事我上课时经常讲，但很多学生不太理解为何谈判如此艰难：只要中央做了决策，地方不就只有照办的份儿吗？“00后”一代有这种观念，不难理解。一方面，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另一方面，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都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广东当年提的要求中有一条，“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大有文章。地方能从“税收返还”中收到多少钱，取决于它在“基年”的增值税收入，所以这个“基年”究竟应该是哪一年，差别很大。中央与广东的谈判是在1993年9月，所以财政部很自然地想把“基年”定为1992年。时光不能倒流，地方做不了假。可一旦把“基年”定在1993年，那到年底还有三个多月，地方可能突击收税，甚至把明年的税都挪到今年来收，大大抬高税收基数，以增加未来的税收返还。所以财政部不同

意广东的要求。但为了改革顺利推行，中央最终做了妥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用1993年做基年。这个决定立刻引发了第四季度的收税狂潮，根据项怀诚和刘克崱的回忆：

（项怀诚）实际上，9月份以后确实出现了这些情况。在那一年，拖欠了多年的欠税，都收上来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亲自出马，贷款交税，造成了1993年后4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刘克崱）……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和150%，带动全年地方税收增长了50%~60%⁽¹⁰⁾。⁽¹¹⁾

由于地方突击征税，图2-3中增值税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在1993年出现了明显反常的尖峰。这让1994年的财政陷入了困境，中央承诺的税收返还因为数额剧增而无法到位，预算迟迟做不出来。这些问题又经过了很多协商和妥协才解决。但从图2-3可以看到，当2001年推行所得税分成改革时，突击征税现象再次出现。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所以六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20世纪90年代，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的烟、喝本地牌子的啤酒，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中，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税归中央外，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样也设置了税收返还机制，并把2001年的所得税收入定为返还基数。所以2001年的最后两个月，地方集中征税做大基数，财政部和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严格依法治税，严禁弄虚作假。2002年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组织专项检查，严厉查处作假账和人为抬高基数的行为。对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虚增基数的地方，相应扣减中央对地方的基数返还，依法追究当地主要领导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¹²⁾但从图2-3中可以看出，2001年不正常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依然非常明显。⁽¹³⁾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图2-2）：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

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第二节 土地财政

分税制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虽然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可以填补预算内收支缺口，但发展经济所需的诸多额外支出，比如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等，就需要另筹资金了。一方面，地方可以努力增加税收规模。虽然需要和中央分成，但蛋糕做大后，自己分得的收入总量也会增加。另一方面，地方可以增加预算外收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

招商引资与税收

给定税率的情况下，想要增加税收收入，要么靠扩大税源，要么靠加强征管。分税制改革之后，全国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参见图2-2），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加强征管力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了税源。⁽¹⁴⁾

改革前，企业的大多数税收按隶属关系上缴，改革后则变成了在所在地上缴，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二是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三是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相关税收。

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以增值税为例，虽然企业可以层层抵扣，最终支付税金的一般是消费者（增值税发票上会分开记录货款和税额，消费者支付的是二者之和），但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这种倚重生产的税制，刺激了各地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内外因素，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然，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比如说，地方为争夺税收和大工业项目，不惜放松环保监督，损害了生态环境，推高了过剩产能。2007—2014年，地方政府的工业税收收入中，一半来自过剩产能行业。而在那些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工业污染水平也普遍较高。⁽¹⁵⁾

不仅九成的税收征收自企业，税收之外的其他政府收入基本也都征收自企业，比如土地转让费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社保费中个人缴纳的比例也低于企业缴纳的比例。所以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头些年，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向招商引资倾斜（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补贴等），而民生支出（教育、医疗、环保等）相对不足。⁽¹⁶⁾20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更加重视民生支出。由于第一章中讨论过的规模经济、信息复杂性等原因，民生支出基本都由地方政府承担，所以地方支出占比从2003年开始快速增长，从70%一直增长到了85%（图2-1）。

总的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手中能用来发展经济的资源受到了几方面的挤压。首先，预算内财政支出从重点支持生产建设转向了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40%，“社会文教费”（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只占26%。到了2018年，“社会文教费”支出占到了40%，“经济建设费”则下降了。⁽¹⁷⁾其次，分税制改革前，企业不仅缴税，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很多费（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这部分预算外收入在改革后大大减少。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也纷纷改制，利润不再上缴，基层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进一步减少。最后，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初探土地财政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或建造住宅（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对此进行了改革，详见第三章），所以国有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为什么会有这种城乡割裂的土地制度？追根溯源，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和顶层设计，不过是从1982年宪法开始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样罢了。⁽¹⁸⁾虽说每一步变化都有道理，针对的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演变到今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飞涨的城市房价以及各种棘手问题。202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而第一条改革意见就是打破城乡割裂的现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当

前制度的积弊。第三章会详细讨论相关改革，此处不再赘述。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当时这部分收益很少。一来虽然乡镇企业当时还很兴盛，但它们占用的都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是城市土地。二来虽然城市土地使用权当时就可以有偿转让，不必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无偿划拨，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土地转让价格大都非常优惠，“卖地收入”并不多。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¹⁹⁾

1999年和2000年这两年的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并不高（图2-4），因为尚未普遍实行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当时的土地转让过程相当不透明，基本靠开发商各显神通。比如有些开发商趁着国有企业改革，拿到了企业出让的土地，再从城市规划部门取得开发许可，只需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这是个转手就能发家致富的买卖，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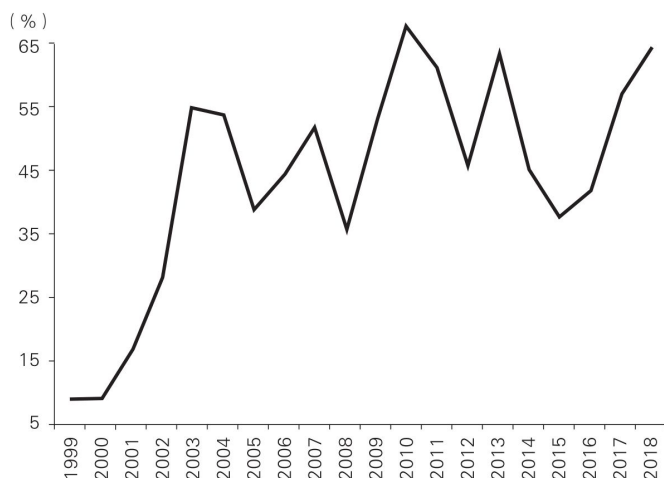


图2-4 国有土地转让收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001年，为治理土地开发中的腐败和混乱，国务院提出“大力推行招标投标”。2002年，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土地出让收入从2001年开始激增，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图2-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刺激之下，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2010年达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68%。最近两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土地转让收入的绝对数额还在上涨，2018年达到62 910亿元，比2010年高2.3倍。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所以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这些税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主要是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2018年，这四类税收共计15 081亿元，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5%，相当可观。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2018年，这两种税收中归属地方的部分（增值税五成，所得税四成）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²⁰⁾若把这些税收与土地转让收入加起来算作“土地财政”的总收入，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土地转让虽然能带来收入，但地方政府也要负担相关支出，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和“七通一平”等基础性土地开发支出。从近几年的数字看，跟土地转让有关的支出总体与收入相当，有时甚至比收入还高。2018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62 910亿元，支出则为68 167亿元。光看这一项，地方政府还入不敷出。当然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

从时间点上，大规模的土地财政收入始于21世纪初。2001年所得税改革后，中央财政进一步集权，拿走了企业所得税的六成。从那以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这些年出让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面积约占一半，但出让价格极低：2000年每平方米是444元，2018年是820元，只涨了85%。而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4.6倍，住宅用地价格更是猛增了7.4倍（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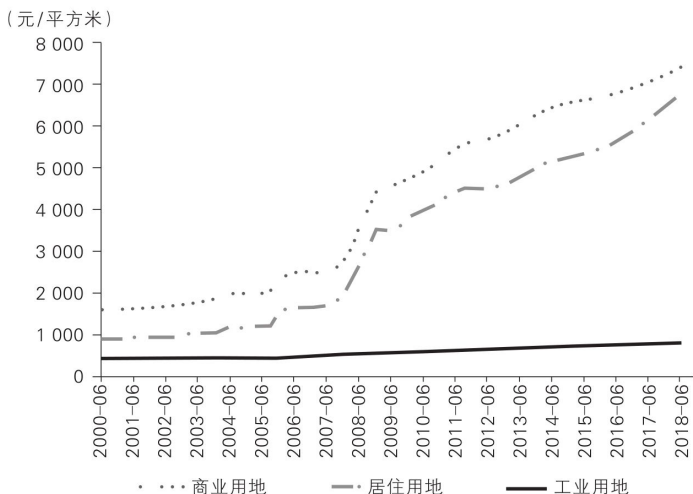


图2-5 100个重点城市土地出让季度平均成交价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所以商住用地虽然面积上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一方面，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这其中的问题及改革之道，第三章会展开分析。

税收、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让我们后退一步，看清楚地方政府究竟在干什么。所谓经济发展，无非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过去几十年的很多重大改革，大都和盘活这两项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有关。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所以“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

前文说过，地方在招商引资和城市化过程中，会利用手中一切资源，所以需要通盘考量税收和土地，平衡税收收入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以达到总体收入最大化。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因为工业对

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强，能带来增值税和其他税收，还能创造就业。而且工业生产率提升空间大、学习效应强，既能帮助本地实现现代化，也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拉动商住用地价格上涨。工业生产上下游链条长，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果显著，若能发展出特色产业集群（如佛山的陶瓷），也就有了长久的竞争优势和稳定的税收来源。此外，地方之间招商引资竞争非常激烈。虽说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都由地方政府垄断，但工业企业可以落地的地方很多，所以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很难抬高地价。商住用地则不同，主要服务本地居民，土地供应方的垄断力量更强，更容易抬高地价。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做过一个比喻：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类似增值税，不管商铺是否盈利，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一些商铺大名鼎鼎，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还可以降低分成，甚至可以倒贴（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²¹⁾

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税收和土地为手段展开招商引资竞争，且在上下级政府间层层承包责任和分享收益，这一制度架构对分税制改革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但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端和负面效果也越来越明显，需要改革。首先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见第三章）。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难免会催生短视行为，寅吃卯粮，过度借债去搞大项目，搞“面子工程”，功是留在当代了，利是不是有千秋，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如此一来，投资质量下降，收益不高，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

若仅仅只是债务问题，倒也不难缓解。最近几年实施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实际上已经遏制住了债务的迅猛增长。但经济增速随之放缓，说明资源的使用效率仍然不高。就拿土地来说，虽然各地都有动力调配好手中的土地资源，平衡工业和商住用地供给，但在全国范围内，土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分配却很难优化。地区间虽然搞竞争，但用地指标不能跨省流动到效率更高的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突飞猛进，人口大量涌入，却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和人口容量都遭遇了人为的限制。寸土寸金的上海，却保留着289.6万亩农田（2020年的数

字），可以说相当不经济。同时，中西部却有大量闲置甚至荒废的产业园区。虽然地广人稀的西北本就有不少荒地，所以真实的浪费情况可能没有媒体宣扬的那么夸张，但这些用地指标本可以分给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如果竞争不能让资源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地方，那这种竞争就和市场竞争不同，无法长久地提高整体效率。一旦投资放水的闸门收紧，经济增长的动力立刻不足。

可是制度一直如此，为什么前些年问题似乎不大？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变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传统农业生产率低，只要把农地变成工商业用地，农业变成工商业，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产业集聚、研发投入、技术升级、物流和金融配套等，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徒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又有何用？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202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放在最前面的就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要求不仅要在省、市、县内部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市场壁垒，建设一个统一的市场，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而且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以提高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拿走了收入的大头，但事情还是要地方办，所以支出的大头仍留在地方，地方收支差距由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从全国总数来看，转移支付足够补上地方收支缺口。⁽²²⁾但总数能补上，不等于各级政府都能补上，也不等于每个地区都能补上。省里有钱，乡里不见得有钱；广州有钱，兰州不见得有钱。这种纵向和横向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少矛盾和冲突，也催生了很多改革。

基层财政困难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省分成，省也要和市县分成。可因为上级权威高于下级，所以越往基层分到的钱往往越少，但分到的任务却越来越多，出现了“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的局面。改革后没几年，基层财政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末有句顺口溜流行很广：“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从全国平均来看，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本级收入加上级转移支付）普遍仅够给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但地区间差异很大。在东部沿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取大量额外收入，一手靠预算财政“吃饭”，一手靠土地财政“办事”。但在很多中西部县乡，土地并不值钱，财政收入可能连发工资都不够，和用于办事的钱相互挤占，连“吃饭财政”都不算，要算“讨饭财政”。⁽²³⁾基层政府一旦没钱，就会想办法增收，以保持正常运转。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基层政府各种工程欠款（会转化为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讨薪事件）、拖欠工资、打白条等，层出不穷。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信中的一句话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三农问题”，就成了21世纪初政策和改革的焦点之一。

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改革及其他根本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与“科学发展观”对应的“五个统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统筹城乡发展”。⁽²⁴⁾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拉开帷幕，制止基

层政府乱摊派和乱收费，陆续取消了“三提五统”和“两工”等。⁽²⁵⁾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终结了农民缴纳了千年的“皇粮国税”。这些税费改革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也降低了农村的贫富差距。⁽²⁶⁾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改革，得益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飞速发展的工商业，使得国家财政不再依赖于农业税费。2000年至2007年，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5%下降到了10%，而全国税收总收入却增加了3.6倍（未扣除物价因素）。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但也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基层财政维持起来更加艰难，所以之后的改革就加大了上级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其一，是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比如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截至2011年，中央财政一共安排了3 300亿元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资金，为约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²⁷⁾再比如2003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与2009年开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等，均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资金参与。

其二，是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入激励机制，鼓励基层政府达成特定目标，并给予奖励。比如2005年开始实施的“三奖一补”，就对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县乡政府给予奖励。⁽²⁸⁾冗员过多一直是政府顽疾，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转移支付体系中，相当一部分转移支付是为了维持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和保障人员工资。财政供养人员（即有编制的人员）越多，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扩编。从1994年到2005年，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员（在职加退休）猛增了60%，从2 981万人增加到4 778万人。2005年实行“三奖一补”之后，2006年财政供养人口下降了318万。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2008年达到4 631万。2009年后，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不再公布。⁽²⁹⁾

其三，是把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政府统筹，比如2003年开始试点的“乡财县管”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入规模和支出范围大大缩减，乡镇冗员问题、管理问题、债务问题就变得突出。通过预算共编、票据统管、县乡联网等手段，把乡镇财政支出的决定权上收到县，有利于规范乡镇行为，也有利于在县域范围内实现乡镇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根据财政部网站，截至2012年底，86%的乡镇都已经实施了“乡财县管”。

让县政府去统筹乡镇财务，那县一级的财政紧张状况又该怎么办呢？在市管县的行政体制下，县的收入要和市里分账，可市财政支出和招商引资却一直偏向市区，“市压县，市刮县，市吃县”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很多城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难以对下辖县产生拉动作用，所以在21世纪初，全国开始推行“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前者给县里下放一些和市里等同的权限，比如土地审批、证照发放等；后者则让县财政和省财政直接发生关系，绕开市财政，在财政收支权力上做到县市平级。这些改革增加了县一级的财政资源，缩小了城乡差距。⁽³⁰⁾

“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把我国五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央—省—市—区—县—乡镇）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拉平”了，变成了三级体制（中央—省—市—县）。县里的财政实力固然是强了，但是否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则不一定。“省直管县”这种做法源于浙江，20世纪90年代就在全省施行，效果很好。但浙江情况特殊，县域经济非常强劲，很多县乃至乡镇都有特色产业集群。2019年，浙江省53个县（含县级市）里，18个是全国百强县。但在其他一些省份，“省直管县”改革至少遭遇了两个困难。首先是省里管不过来。改革前，一个省平均管12个市，改革后平均管52个市县。钱和权给了县，但监管跟不上，县域出现了种种乱象，比如和土地有关的腐败盛行。其次，县市关系变动不一定有利于县的长远发展。以前县归市管，虽受一层“盘剥”，但跟市区通常还是合作大于竞争。但改革以后，很多情况下竞争就大于合作了，导致县域经济“孤岛化”比较严重。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的实力本就不强，现在进一步分裂成区和县，更难以产生规模和集聚效应。经济弱市的“小马”本就拉不动下辖县的“大车”，但改革并没有把“小马”变成“大马”，反倒把“大车”劈成了一辆辆“小车”，结果是小城镇遍地开花，经济活动和人口不但没有向区域经济中心的市区集聚，反而越搞越散。从现有研究来看，省直管县之后，虽然县里有了更多资源，但人均GDP增速反而放缓了。⁽³¹⁾

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基层财政出现了不少困难，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改革，最终涉及了财税体制的层级问题。到底要不要搞扁平化，学发达国家搞三级财政？是不是每个省都应该搞？对于相关改革效果和未来方向，目前仍有争议。

地区间不平等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大。由于出口飞速增长，制造业自然向沿海省份集聚，以降低出口货运成本。这种地理分布符合经济规律，并非税收改革的后果。但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优势，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也越拉越大。公共财政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再分配财政资源，平衡地区间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等），所以中央也开始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1995年至2018年，转移支付总额从665亿元增加到了61 649亿元，增加了93倍，远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占GDP的比重也从1%升至7%。⁽³²⁾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保障了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³³⁾虽然目前东部和中西部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依然明显，但如果没有中央转移支付，地区差异可能更大。

图2-6描绘了最富的3个省（江苏、浙江、广东）与最穷的3个省（云南、贵州、甘肃）之间人均财政收支的差距。以2018年为例，苏浙粤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是云贵甘的2.7倍，但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这些省份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持平，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也一直远小于人均财政收入。自2005年起，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进一步收窄，这与本节提到的“三奖一补”政策有关。虽然省一级的人均财政支出基本均衡，但到了县一级，地区间差距就大了。以2009年为例，人均财政支出最高的1%的县，支出是最低的1%的县的19倍。⁽³⁴⁾这种基层间的差距和上节讨论过的纵向差距有关：越往基层分到的钱越少，省级的差距到了基层，就被层层放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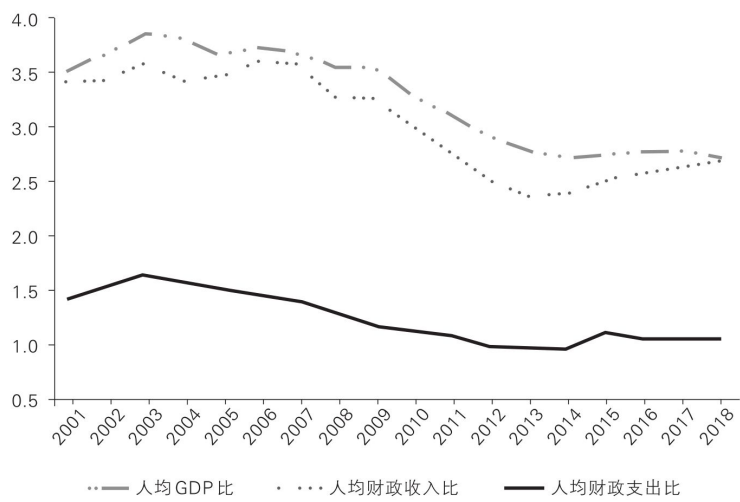


图2-6 苏浙粤与云贵甘人均财力之比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注：江苏、浙江、广东的人均GDP最高，而云南、贵州、甘肃则最低。此处未包括4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这些地区和其他省份不太具有可比性。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之后改称“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³⁵⁾简单来说，前者附加条件少，地方可自行决定用途，而后者必须专款专用。为什么要指定资金用途、不让地方自主决策呢？因为无条件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为了拉平地区差距，所以越穷的地方拿到的钱越多，地方也就越缺乏增收动力。而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要保证政府运作和公务员工资，可能会刺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恶化冗员问题。

专项转移支付约占转移支付总额的四成，一般以“做项目”的形式来分配资金，专款专用，可以约束下级把钱花在上上级指定的地方，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转移支付加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³⁶⁾经济情况越好、财力越雄厚的地区，反而可能拿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原因有三。第一，上级分配项目时一般不会“撒胡椒面儿”，而是倾向于集中财力投资大项目，并且交给有能力和条件的地区来做，所谓“突出重点，择优支持”。第二，2015年之前，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只有有能力配套的地方才有能力承接大项目，拿到更多转移支付。⁽³⁷⁾第三，项目审批过程中人情关系在所难免。很多专项资金是由财政部先拨款给各部委后再层层下拨，所以就有了“跑部钱进”的现象，而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与中央部委的关系也更好。⁽³⁸⁾

公共财政的重要功能是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可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东中西部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城乡之间、同一城市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别依然很大。第五章将会继续探讨这些地区间不均衡、人与人不平等的问题。

结语

要深入了解政府，必须了解财税。本章介绍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逻辑和后果。图2-7总结了本章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制度改革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理解和评价改革，不能生搬硬套某种抽象的哲学或理论标准，而必须深入了解改革背景和约束条件，仔细考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产生的改革效果。只有理解了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经验，才能理解其中哪些元素已经不适应新情况，需要继续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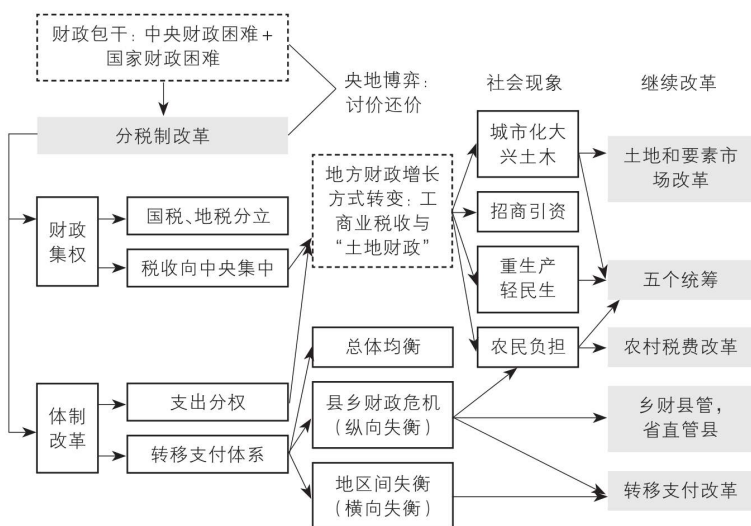


图2-7 第二章内容小结

分税制之后兴起的“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贡献了每年五六万亿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着实可观，但仍不足以撬动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想想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想想高铁从起步到普及不过区区十年，钱从哪里来？每个城市都在大搞建设，高楼、公园、道路、园区……日新月异，钱从哪里来？所以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于“土地财政”，而在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与其他各路资金。“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土地金融”究竟是怎么回事？政府究竟是如何融资和投资的？中外媒体和分析家们都关心的地方政府债务，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些是下一章的内容。

扩展阅读

财政和税收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涉及内容繁多，很多大学都有专门的系所甚至学院。本章重点不是财税本身，而是以财税的视角去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北京大学周飞舟的著作《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2012）与本章视角类似，但更加系统和全面，详细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财政改革的前因后果，有不少一手调研资料，逻辑性和结构都很好，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

要深入了解城市的土地财政，就必须了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因为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大都是从农村征收来的。北京大学周其仁的著作《城乡中国》（2017年修订版）阐释了城乡土地制度，既追溯了过往，也剖析了当下，语言轻松，说理清楚。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的著作《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2018）则更为全面和详细，适合进阶参考。

财政和土地制度是国家大事，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要想真正理解这些改革，需要深入基层，观察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了官员、企业家和普通人的行为，如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吴毅的著作《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2018年新版）是一份非常详细和生动的记录。这本社会学著作以5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21世纪初中部某小镇上发生的很多事，大都围绕经济问题展开。故事本身以及作者的评论，都很精彩，能让人看到“上面”来的改革对基层个体的重大影响。在另一部类似的杰作《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2008）中，田毅和赵旭记录了一个北方小镇的故事。与吴毅之作不同，本书的叙事从1978年开始，记录了30年间财政变革给基层带来的种种变化。读者尤其可以了解分税制后基层财政的悬浮和空转状态，了解农业税费改革之前基层盛行的“买税”或“协税”现象。

- (1) 本小节重点参考了北京大学周飞舟的著作（2012），这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财政改革历程和逻辑的极佳读物。
- (2) 这种激励效果的理论和证据，可参考金和辉、清华大学钱颖一、斯坦福大学温加斯特（Weingast）等人的合作研究（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
- (3) 乡镇企业税收和雇工人数的数据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和林益民的研究（Kung and Lin, 2007）。乡镇企业利润税率的数据来自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诺顿（Naughton）的著作（2020）。
- (4)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在其著作（1997）中讨论了央地之间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地方政府预料到中央在重新谈判中可能“鞭打快牛”，所以不愿意努力征税。这个理

论只是猜测，很难验证。而把预算内收入转成预算外收入的逻辑，有数据支持，参见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李学文和卢新海、浙江大学张蔚文等人的合作研究（2012）。

- (5) 引文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克崮和贾康主编的财政改革回忆录（2008）。
- (6) 1993年带队赴各省份做工作的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 (7)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应为“谢非”。
- (8) 应该是傅锐。
- (9) 引文出自刘克崮和贾康（2008）。
- (10) 此处回忆可能有偏差，1993年全年地方税收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38%。
- (11) 引文参见刘克崮和贾康（2008）。
- (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2001年11月和12月上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报告的紧急通知》。
- (13) 图2-3中，企业所得税在2000年就开始大幅攀升，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口径调整。2000年前的企业所得税统计只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后则包括了所有企业。有一种方法可以剔除统计口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比较同一年中财政预算和决算两个数字。若无特殊情况，这两个数字应该差别不大。根据2002年《中国财政年鉴》，2001年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预算数是1 049亿元，但决算数是1 686亿元，增长了61%。这种暴增在其他税种中是没有的。比如当时改革没有涉及的营业税，预算1 830亿元，决算1 849亿元；而早已经完成改革的增值税，预算是1 229亿元，决算是1 342亿元。再比如同样经历改革但没有“基数投机”冲动的中央企业所得税，预算是937亿元，决算是945亿元。
- (14) 浙江大学方红生和复旦大学张军（2013）总结了分税制改革之后关于税收征管力度的研究。
- (15) 地方税收压力恶化了工业污染，推升了过剩产能，相关证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席鹏辉和厦门大学梁若冰、谢贞发（2017）以及苏国灿等人的研究（2017）。
- (16)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支出重生产而轻民生，证据很多。比如复旦大学傅勇和张晏对省级支出的研究（2007），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和吕冰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凯强对地级市支出的研究（2019），北京师范大学尹恒和北京大学朱虹对县级支出的研究（2011）等。
- (17) 2007年，我国重新调整了政府收支预算科目分类，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比较2007年前后政府预算内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但无疑是下降了。
- (18) 对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产权制度演变过程和逻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章结尾的“扩展阅读”。
- (19) 虽然法律规定集体土地还可以用于乡镇企业建设，但随着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所有制改革，真正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少，因此这个规定意义不大。此外，1997年以后实行用地规模和指标审批管理制度，省级政府自然将紧缺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分配给省会和城市市区，给到县城的用地指标很少，而大部分集体建设土地位于

县城。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的著作（2018）第八章。本段中用到的数字也来自该书。

- (20) 在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前，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缴纳的主要是营业税，百分之百归地方，不用和中央分成，所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甚至更高。以2013年为例，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缴纳的营业税和归属地方的所得税加起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16%。本段中的数字均出自历年的《中国税务年鉴》。
- (21) 详细的阐释可参考张五常的著作（2017）。
- (22) 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一直到2008年，每年中央转移支付总额都高于地方预算收支缺口，一般要高10%—20%。2009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地方可以通过发债来融资，收支缺口才开始大于中央转移支付（2015年新版预算法之后，省级政府才可以发债。但在2009年至2014年间，财政部可以代理省级政府发债）。
- (23) 对基层财政的“悬浮”状态和政府运转中的种种困难，田毅和赵旭的著作（2008）以及吴毅的著作（2018）中都有生动的记录和深刻的分析。
- (24)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 (25) 改革前的农村税费负担，大概可以分为“税”“费”“工”三类。税，即“农业五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涉农契税、耕地占用税。费，即所谓“三提五统”：村集体的三项提留费用（村干部管理费、村公积金、村公益金）和乡政府的五项统筹费用（教育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工，就是“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修缮校舍等。
- (26) 参见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和北京大学李银银的合作研究（2020）。
- (27) 数字来自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和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合作著作（2019）。
- (28) “三奖一补”包括：对财政困难的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对此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给予补助。
- (29) 数据来自财政部预算司原司长李萍主编的读物（2010）。如果按照2006—2008年的年均增速1.8%推算，2018年地方财政供养人员应该在5 500万人左右。根据楼继伟（2013）的数据，全国的公务员中，地方占94%（2011年）。如果这个比例也适用于全部财政供养人员，那2018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在职加退休）大概是5 850万。
- (30) 关于“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复旦大学谭之博、北京大学周黎安、中国人民银行赵岳等人的合作研究（2015）。
- (31) “省直管县”改革引发的土地腐败和经济增速放缓，及改革前后省政府管理的行

政单位数目，来自浙江大学李培、清华大学陆毅、香港科技大学王瑾的合作研究（Li, Lu and Wang, 2016）。

- (32) 1995年的转移支付数据来自《1995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18年的数据来自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关于2018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 (33)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8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当年85%的转移支付用在了中西部地区。而根据云南财经大学缪小林和高跃光以及云南大学王婷等人的计算（2017），从1995年到2014年，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分配到了中西部地区。
- (34) 目前可得的县级财政支出数据只到2009年，来自《2009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我在计算时仅包括了县和县级市，不包括市区，也没有包括4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
- (35) 广义转移支付还应包括税收返还，但这部分钱本就属于地方，不包含在本段的统计中。
- (36) 专项转移支付实际上增大了地方人均财力的差别，这方面证据很多，比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王瑞民和中国人民大学陶然的研究（2017）。
- (37) 201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明确“中央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承担配套资金”。
- (38) 部委的人情关系在专项资金分配中有重要作用，参见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和华中科技大学李欣的研究（2014）。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暨南大学附近有个地方叫石牌村，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很繁华。前两年有个美食节目探访村中一家卖鸭仔饭的小店，东西好吃还便宜，一份只卖12元。中年老板看上去非常朴实，主持人问他：“挣得很少吧？”他说：“挣得少，但是我生活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我告诉你，我也是有……不是很多钱啦，有10栋房子可以收租。”主持人一脸“怪不得”的样子对着镜头哈哈大笑起来：“为什么可以卖12元？因为他有10套房子可以收租！”老板平静地纠正他：“是10栋房哦，不是10套房哦，10栋房，一栋有7层。”主持人的大笑被这突如其来的70层楼拍扁在了脸上……

很多人都有过幻想：要是老家的房子和地能搬到北、上、广、深就好了。都是地，人家的怎么就那么值钱？区区三尺土地，为什么一旦变成房本，别人就得拿大半辈子的收入来换？

再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价值便有限，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它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天然适合做抵押，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身价自然飙升。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由此产生的能量不亚于科技进步，支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¹⁾

上一章介绍了城市政府如何平衡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应，一手搞“工业化”，一手搞“城市化”，用土地使用权转让费撑起了“第二财政”。但这种一笔一笔的转让交易并不能完全体现土地的金融属性。地方政府还可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去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倍放大为“土地金融”。

本章第一节用实例来解释这种“土地金融”与政府投资模式。第二节介绍这种模式的弊端之一，即地方政府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与政府债务相关的各项改革中也涉及对官员评价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因此第三节

将展开分析地方官员在政府投融资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实业投资要比金融投资复杂得多，除了考虑时间、利率、风险等基本要素之外，还要处理现实中的种种复杂情况。基金经理从股票市场上买入千百个散户手中的股票，和地产开发商从一片土地上拆迁掉千百户人家的房子，虽然同样都是购买资产，都算投资，但操作难度完全不同。后者若没有政府介入，根本干不成。实业投资通常是个连续的过程，需要不断投入，每个阶段打交道的对象不同，所需的专业和资源不同，要处理的事务和关系也不同。任一阶段出了纰漏，都会影响整个项目。就拿盖一家商场来说，前期的土地拆迁、中期的开发建设、后期的招商运营，涉及不同的专业和事务，往往由不同的主体来投资和运作，既要考虑项目整体的连续性，也要处理每一阶段的特殊性。

我国政府不但拥有城市土地，也掌控着金融系统，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实业投资不是买卖股票，不能随时退出，且投资过程往往不可逆：未能完成或未能正常运转的项目，前期的投入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政府一旦下场就很难抽身，常常不得不深度干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这种增长方式必然伴随着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这种方式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本书下篇将深入探讨。但我们首先要了解政府究竟是怎么做投资的。本节聚焦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下一章再介绍工业投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成都“宽窄巷子”说起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②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名称突出了其融资和负债功能，所以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在谈及这些公司时，总是和地方债务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公司的正式名称可不是“融资平台”，而大都有“建设投资”或“投资开发”等字样，突出自身的投资功能，因此也常被统称为“城投公司”。比如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奇瑞汽车大股东）和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即上海城投集团），都是当地国资委的全资公司。还有一些公司专门开发旅游景点，名称中一般有“旅游发展”字样，比如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也是成都市政府的全资公司，开

发过著名景点“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这个项目，投融资结构比较简单，从立项开发到运营管理，由政府 and 国企一手包办。“宽窄巷子”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开发过程涉及保护、拆迁、修缮、重建等复杂问题，且投资金额很大，周期很长，盈利前景也不明朗，民营企业难以处理。因此这个项目从2003年启动至今，一直由两家市属全资国企一手操办：2007年之前由成都城投集团负责，之后则由成都文旅集团接手。2008年景区开放，一边运营一边继续开发，直到2019年6月，首期开发才正式完成，整整花了16年。从文旅集团接手开始算，总共投入约6.5亿元，其中既有银行贷款和自有收入，也有政府补贴。

成都文旅集团具有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的典型特征。

第一，它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这些资产价值不菲，再加上公司的运营收入和政府补贴，就可以撬动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实现快速扩张。2007年，公司刚成立时注册资本仅5亿元，主业就是开发“宽窄巷子”。2018年，注册资本已达31亿元，资产204亿元，下属23家子公司，项目很多。⁽³⁾

第二，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2015—2016年，成都文旅集团的净利润为6 600多万元，但从政府接收到的各类补贴总额超过2亿元。补贴种类五花八门，除税收返还之外，还有纳入公共预算的专项补贴。比如成都市公共预算内有一个旅游产业扶持基金，2012—2015年间，每年补贴文旅集团1亿元以上。政府还可以把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文旅集团，再以某种名义将转让费原数返还，作为补贴。⁽⁴⁾2015年新《预算法》要求清理各种补贴。2017—2018年，文旅集团的净利润近1.4亿元，补贴则下降到不足4 000万元。

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是否就是没效率？不能一概而论。融资平台公司投资的大多数项目都有基础设施属性，项目本身盈利能力不强，否则也就无需政府来做了。这类投资的回报不能只看项目本身，要算上它带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说归说，这些“大账”怎么算，争议很大。经济学的福利分析，作为一种推理逻辑有些用处，但从中估算出的具体数字并不可靠。2009年初，我第一次去“宽窄巷子”，当时还是个新景点，人并不多。2016年夏天，我第二次去，这里已经成了著名景点，人山人海。根据文旅集团近几年披露的财务数据，“宽窄巷子”每年接待游客2 000万人次，集团营收八九千万元，净利两三千万元，且增速很快，经济效益很好。但就算没有净利甚至亏损，这项目就不成功么？也

难说。2 000万游客就算人均消费50元，每年10亿元的体量也是个相当不错的小经济群。而且还带动着周边商业、餐饮、交通的繁荣，社会效益也不错。对政府和老百姓来说，这也许比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更加重要。

第三，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银行对成都文旅集团的授信额度为176亿元，而文旅集团发行的债券，评级也是AA+。该公司是否应有这么高的信用，见仁见智。但市场一般认为，融资平台公司背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所谓“隐性”，是因为《担保法》规定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但其实政府不断为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市场自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破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所以风险很低。

“宽窄巷子”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大多数类似的城市休闲娱乐项目并不涉及大量历史建筑的修缮和保护，开发过程也没这么复杂，可以由民营企业完成。比如遍及全国的万达广场和著名的上海新天地（还有武汉天地、重庆天地等），都是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由民营企业（万达集团和瑞安集团）开发和运营。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一般只参与前期的拆迁和土地整理。用术语来说，一块划出来的“生地”，平整清理后才能成为向市场供应的“熟地”，这个过程称为“土地一级开发”。“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之后的建设和运营称为“二级开发”，大都由房地产公司来做。

工业园区开发：苏州工业园区vs华夏幸福

从运营模式上看，成都文旅集团有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显著特点，但大多数融资平台的主业不是旅游开发，而是工业园区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在我国遍地开花。2018年，国家级开发区共552家，省级1 991家，省级以下不计其数。^⑤

苏州工业园区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占地278平方公里。2019年，园区GDP为2 74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70亿元，经济体量比很多地级市还大。^⑥如此大规模园区的开发和运营，自然要比“宽窄巷子”复杂得多，参与公司众多，主力是两家国企：兆润集团负责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2019年底刚上市的中新集团负责建设、招商、运营（土地二级开发）。

兆润集团（全称“苏州工业园区兆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典型的融资平台公司。这家国有企业由园区管委会持有100%股

权，2019年注册资本169亿元，主营业务是典型的“土地金融”：管委会把土地以资本形式直接注入兆润，由它做拆迁及“九通一平”等基础开发，将“生地”变成可供使用的“熟地”，再由管委会回购，在土地市场上以招拍挂等形式出让，卖给中新集团这样的企业去招商和运营。兆润集团可以用政府注入的土地去抵押贷款，或用未来土地出让受益权去质押贷款，还可以发债，而还款来源就是管委会回购土地时支付的转让费及各种财政补贴。兆润集团手中土地很多，在高峰期的2014年末，其长期抵押借款超过200亿元，质押借款超过100亿元。⁽⁷⁾

与成都宽窄巷子或上海新天地这样的商业项目相比，开发工业园区更像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金额大（因为面积大）、盈利低，大都由融资平台类国企主导开发，之后交给政府去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能否成功，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像上海和苏州工业园区这种地方，优秀企业云集，所以招商的重点是“优中选优”，力争更好地聚合本地产业资源和比较优势。我去过苏州工业园区三次，每次都感叹其整洁和绿化环境，不像一个制造业企业云集的地方。2019年，园区进出口总额高达871亿美元。虽说其飞速发展借了长三角的东风，但运营水平如此之高，园区管委会和几家主要国企功不可没。

而在很多中西部市县，招商就困难多了。地理位置不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和人力都有限，除了一些土地，没什么家底。因此有些地方干脆就划一片地出来，完全依托民营企业来开发产业园区，甚至连招商引资也一并委托给这些企业。

这类民企的代表是华夏幸福，这家上市公司的核心经营模式是所谓的“产城结合”，即同时开发产业园区和房地产。简单来说，政府划一大片土地给华夏幸福，既有工业用地，也有商住用地，面积很大，常以“平方公里”为度量单位。华夏幸福不仅负责拆迁和平整，也负责二级开发。在让该公司声名大噪的河北固安高新区项目中，固安县政府签给华夏幸福的土地总面积超过170平方公里。2017年第11期《财新周刊》对华夏幸福做了深度报道，称其为“造城者”，不算夸张。

工业园区开发很难盈利。招商引资本就困难，而想培育一个园区，需要引入一大批企业，过程更是旷日持久，所以华夏幸福赚钱主要靠开发房地产。所谓“产城结合”，“产”是旗帜，“城”是重点，需要用卖房赚到的快钱去支持产业园区运营。按照流程，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做住宅用地的一级开发，之后这片“熟地”要还给政府，再以招拍挂等公开方式出让给中标的房地产企业。假如在这一环节中华夏幸福没能把地拿回来，

也就赚不到房地产二级开发的大钱。但据《财新周刊》报道，在实际操作中，主导一级开发的华夏幸福是近水楼台，其他企业很难参与其产业园区中的房地产项目。

用房地产的盈利去反哺产业园区，这听起来很像第二章所描述的政府“土地财政”：一手低价供应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换取税收和就业；一手高价供应商住用地，取得卖地收入。但政府“亏本”招商引资，图的是税收和就业，可作为民企的华夏幸福，又能从工业园区发展中得到什么呢？答案是它也可以和政府分享税收收益。园区内企业缴纳的税收（地方留存部分），减去园区运营支出，华夏幸福和政府可按约定比例分成。按照法律，政府不能和企业直接分享税收，但可以购买企业服务，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支付约定的分成。

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不算什么新鲜事。这种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源于海外，不是中国的发明。如果非要说中国特色，可能有二。第一是项目多，规模大。截至2020年5月，全国入库的PPP项目共9 575个，总额近15万亿元，但真正开工建设的项目只有四成。第二个特色是“社会资本”大都不是民营企业，而是融资平台公司或其他国企，比如本节中提到的成都文旅集团、兆润集团、中新集团等。截至2019年末，在所有落地的PPP项目中，民营企业参与率不过三成，大都只做些独立项目，比如垃圾或污水处理。^⑧像华夏幸福这样负责园区整体开发的民企并不多，它打造的河北固安高新区项目也是国家级PPP示范项目。最近两年，对房地产行业以及土地市场的限制越来越严，一些大型传统房企也开始探索这种“产城融合”模式，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第二章提到，政府搞城市开发和招商引资，就像运营一个商场，需要用不同的代价引入不同的商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政府还可以把这一整套运作都“外包”给如华夏幸福之类的民营企业，让后者深度参与到招商引资的职能中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问过：“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如果有效，为什么会有企业？”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如果追问下去，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又在哪儿？从纸面定义看，各种实体似乎泾渭分明，但从实际业务和行为模式来看，融资平台类公司就是企业和政府的混合体，而民营企业如华夏幸福，又承担着政府的招商职能。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

环环相扣的权责关系。或者按张五常的说法，只有一系列合约安排。⁽⁹⁾要想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深入调研当事人面临的各种约束，包括能力、资源、政策、信息等，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观，没什么用。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图3-1总结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逻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税收。但因为有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维持运转问题不大。但地方还要发展经济，要招商引资，要投资，都需要钱。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土地价值飙升，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只要不断的投资和建设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就会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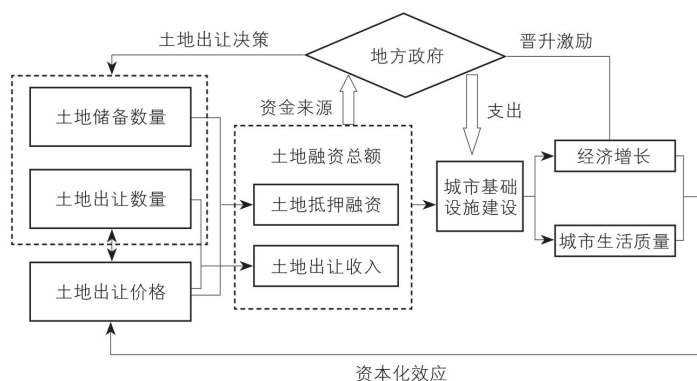


图3-1 “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郑思齐等人的合作研究（2014）。

地方债的爆发始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当时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包括汶川地震重建的财政拨款），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中央也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信贷的限制。2008年，全国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 000余家，2009年激增至8 000余家，其中六成左右是县一级政府融资平台。快速猛烈的经济刺激，对提振急速恶化的经济很有必要，但大水漫灌的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也能大量借钱，盈利前景堪忧的项目也能大量融资。短短三五年，地方政府就积累了天量债务。直到十年后的今天，

这些债务依然没有完全化解，还存在不小的风险。

为政府开发融资：国家开发银行与城投债

实业投资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是只看着财务指标下注后各安天命，而需要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处理各种挑战，所以精心选择投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我国大型项目的投资建设，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工业项目，大都有政府直接参与，主体五花八门：有投融资平台类国企，有相关行业国企，也有科研和设计院所等单位。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有国企参与或有政府背书的项目，融资比较容易。本节聚焦城投公司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第四章和第六章会讨论工业项目中的政府投融资，以及由政府信用催生的过度投资和债务风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城市建设经费要靠财政拨款。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吃紧，城市化又在加速，城建经费非常紧张，如果继续依靠财政从牙缝里一点点抠，大规模城建恐怕遥遥无期。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为解决这三个问题，城投公司就诞生了。发明这套模式的是国家开发银行。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和安徽芜湖市合作，把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在一起，放入专门创立的城投公司芜湖建投，以该公司为单一借款人向国开行借款10.8亿元。这对当时的芜湖来说是笔大钱，为城市建设打下了基础。当时还不能用地生财，只能靠市财政全面兜底，用预算安排的偿还基金做偿债来源。2002年，全国开始推行土地“招拍挂”，政府授权芜湖建投以土地出让收益做质押作为还款保证。2003年，在国开行和天津的合作中，开始允许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这些做法后来就成了全国城投公司的标准模式。⁽¹⁰⁾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2018年资产规模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¹¹⁾2008年之前，国开行是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贷款来源。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各种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才开始大

规模贷款给城投公司。2010年，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所有贷款中，国开行约2万亿元，四大行2万亿元，城商行2.2万亿元，其他股份制银行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计1万亿元，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¹²⁾

城商行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2015年，七成左右的城商行的第一股东是地方政府。⁽¹³⁾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金融资源和融资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掌控至少一家银行，方便为融资平台公司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但城商行为融资平台贷款存在两大风险。其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需要中长期贷款。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提供中长期贷款。但商业银行的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与中长期贷款期限不匹配，容易产生风险。其二，四大行的存款来源庞大稳定，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期限错配。但城商行的存款来源并不稳定，自有资本也比较薄弱，所以经常需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容易出现风险。以包商银行为例，2019年被监管机构接管，2020年提出破产申请，属银行业20年来首次。该行吸收的存款占其负债总额不足一半，剩余负债几乎全部来自银行同业业务。⁽¹⁴⁾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在4万亿刺激后的10年中，全国中小城商行普遍高度依赖同业融资。流动性一旦收紧，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其次是发行债券，即通常所说的城投债。与贷款相比，发行债券有两个理论上的好处。其一，把债券卖给广大投资者可以分散风险，而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其二，债券可以交易，价格和利率时时变动，反映了市场对风险的看法。高风险债券价格更低，利率更高。灵活的价格机制可以把不同风险的债券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高了配置效率。

但对城投债来说，这两个理论上的好处基本都不存在。第一，绝大多数城投债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七八成都被商业银行持有，流动性差，风险依然集中在银行系统。第二，市场认为城投债有政府隐性担保，非常安全。缺钱的地方明明风险不小，但若发债时提高一点利率，也会受市场追捧。⁽¹⁵⁾事实证明市场是理性的。城投债从2008年“4万亿”刺激后开始爆发，虽经历了大小数次改革和清理整顿，但整体违约率极低。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怪胎”对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积累的风险其实不小。

地方债务与风险

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没人知道确切数字。账面上明确的“显性负债”不难算，麻烦主要在于各种“隐性负债”，其中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占大头。中外学术界和业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做了大量研究，所估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在2015年到2017年间约为四五十万亿元，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¹⁶⁾

地方债总体水平虽然不低，但也不算特别高。就算占GDP六成，再加上中央政府国债，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足八成。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7%，日本更是高达237%。⁽¹⁷⁾而且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虽然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可能平均不到1%，但如果“算大账”，事实上也拉动了GDP，完善了基础设施，方便了民众生活，整体经济与社会效益可能比项目回报率高。⁽¹⁸⁾此外，我国政府外债很少。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中的数据，2019年末广义政府（政府加央行）的外债余额为3 072亿美元，仅占GDP的2%。

但是债务风险不能只看整体，因为欠债的不是整体而是个体。如果某人欠了1亿元，虽然理论上全国人民每人出几分钱就够还了，但实际上这笔债务足以压垮这个人。地方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用整体数字掩盖局部风险。纵向上看，层级越低的政府负担越重，风险越高。县级债务负担远高于省级，因为县级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财政收入更少。横向上看，中西部的债务负担和风险远高于东部。⁽¹⁹⁾

虽然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有很多外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现实世界里，还债需要借款人手中实打实的现金，虚的效益没用。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低，收入就低，还债就有困难。由于有地方政府背后支持，这些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大多数融资平台收入太少，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²⁰⁾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对地方债务的治理始于2010年，十年间兜兜转转，除了比较细节的监管措施，重要的改革大概有四项。第一项就是债务置换，从2015年新版《预算法》生效后开始，到2019年基本完成。简单来说，债务置换就是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这么做有三个好处。其一，利率从之前的7%—8%甚至更高，降低到了4%左右，大大减少了利息支出，缓解了偿付压力。低利率也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融资平台占用了大量银行贷款，也发行了大量城投债，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市场认为这些借款风险很低，但利率却高达7%—8%，银行（既是贷款主体，也是城投债主要买家）当然乐于做大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不愿意冒险借钱给其他企业，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成本也因此被推高。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利率调节资金和风险的功能，需要改革。其二，与融资平台贷款和城投债相比，政府公债的期限要长得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周期也很长，所以债务置换就为项目建设注入了长期资金，不用在短期债务到期后屡屡再融资，降低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其三，至少从理论上说，政府信用要比融资平台信用更高，债务置换因此提升了信用级别。

债务置换是为了限制债务增长，规范借债行为，所以地方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发债去置换融资平台债务。中央对发债规模实行限额管理：总体限额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各地区限额则由财政部根据各地债务风险和财力测算决定，报国务院批准。这种数量管制的好处是限额不能突破，是硬约束；坏处是比较僵硬，不够灵活。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项目，但因为超过了限额而无法融资，而欠发达地区一些不怎么样的项目，却因为在限额之内就能借到钱。

第二项改革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融资平台公司业务中一些公共服务性质强的城建或基建项目，可以剥离出来，让地方政府用债务置换的方式承接过去，也可以用PPP模式来继续建设。然而很多平台公司负债累累，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也只能置换一部分，剩余债务剥离不了，公司转型就很困难。而且要想转型为普通国企，公司的业务和治理架构都要改变，业务要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公司领导也不能再由官员兼任。所以融资平台转型并不容易，目前还远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遏制其债务继续增长，就要制止地方政府继续为其提供隐性担保。在近几年的多起法院判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担保函均被判无效。2017年，财政部问责了多起违规担保。比如重庆黔江区财政局曾

为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出具过融资产品本息承诺函，后黔江区政府、区财政局、融资平台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均被处分。⁽²¹⁾

第三项改革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监管的难点不在银行本身，而在各类影子银行业务。第六章会详谈相关改革，包括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

第四项改革就是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这项改革从2016年开始。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最近几年也确实问责了一些干部，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各类违规承诺，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对重庆黔江区政府的问责。这种明显违规的操作容易查处，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明显违规举债却把钱投资到了没效益的项目上的操作，这类行为难以确定和监管。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那么，这种冲动的体制根源在哪里呢？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几年前，我参加中部某市的招商动员大会，有位招商业绩不错的干部分享心得：“要对招商机会有敏感度，要做一个执着的跟踪者，不能轻言放弃。要在招商中锻炼自己，做到‘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铜头，是指敢闯、敢创造机会；铁嘴，是指能说会道，不怕磨破嘴皮；顺风耳和兔子腿，指消息灵通且行动敏捷；茶壶肚，指能喝酒、能社交。这些形容非常形象，容易理解。我当时不太懂什么是“橡皮腰”，后来听他解释：“要尊重客商，身段该软的时候要能弯得下腰，但在谈判过程中也不能随便让步，若涉及本市重要利益，该把腰挺起来的时候也要挺直了。”这些特点让我联想到了推销员。他接下来讲的话又让我想到了客服：“要关注礼仪，注重细节，做到四条。第一，要信守承诺；第二，要记得回电话，客商的电话、信息要及时回复；第三，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去处理；第四，要做个有心人，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当然，台上做报告可以把话说得很漂亮，现实中可能是另一回事。后来我和该市的招商干部打了几次交道，他们确实非常主动，电话打得很勤，有的项目就算已经表示过不适合引入该地区，对方也还会反复联系，拿新的条件和方案不断试探，不会轻易放弃。在几次交流中我了解到，该市招商工作的流程设置得很好，相关激励机制也比较到位，虽然地区资源和条件有限，但招商工作的确做得有声有色。

我国官僚体系庞大，官僚体系自古就是政治和社会支柱之一，而且一直有吸纳社会精英的传统，人力资源雄厚。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5—59岁的城市人口中上过大学的（包括专科）约占22%，但在政府工作人员中上过大学的超过一半。在25—40岁的政府工作人员中，上过大学的超过七成，而同龄城市人口中上过大学的只有三成。⁽²²⁾如今社会虽然早已多元化了，优秀人才选择很多，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价值观一直都在，且政府依然是我国最有资源和影响力的部门，所以每年公务员考试都非常火爆，至少要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才能报考，而录取比例也非常低。

本节聚焦地方官员。从人数构成上看，地方官员是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按公务员总人数算，中央公务员只占6%，若把各类事业单位也算上，中央只占4%。这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是个异数。美国中央政府公务

员占比为19%，日本为14%，德国为11%，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高达41%。⁽²³⁾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事在人为，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所谓激励机制，简单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事情做好了对个人有什么好处？搞砸了有什么坏处？因为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所以激励机制需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既要激励地方主官，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

从“胡萝卜”角度看，经济发展是地方官的主要政绩，对其声望和升迁有重要影响。而对广大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而言，职务晋升机会虽然很少，但实际收入与本地财政情况密切相关，也和本部门、本单位的绩效密切相关，这些又都取决于本地的经济发展。从“大棒”角度看，一方面有党纪国法的监督惩罚体系，另一方面也有地区间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为防止投资和产业流失，地方官员需要改善本地营商环境，提高效率。若某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损害整体营商环境，或部门间扯皮降低了行政效率，上级出于政绩考虑也会进行干预。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又快又猛：上任头两年，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财政支出往往都会快速上涨。而全国平均每年都有三成左右的地级市要更换市长或市委书记，所以各地的投资都热火朝天，“政治—投资周期”比较频繁。⁽²⁴⁾投资需要资金，需要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支持。所以在官员上任的前几年，土地出让数量一般都会增加。而新增的土地供应大多位于城市周边郊区，所以城市发展就呈现出了一种“摊大饼”的态势：建设面积越扩越大，但普遍不够紧凑，通勤时间长、成本高，加重了拥挤程度，也不利于环保。⁽²⁵⁾

虽然官员的晋升动机与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之间不冲突，也对地区经济表现有相当的解释力，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²⁶⁾2016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就无需再对任内的负债负责，而新官又通常不理旧账，会继续加大投资，所以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业投资项目减少，基础设施

和城市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也在减弱，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此外，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比如地下管网。所以每逢暴雨，“看海”的城市就很多。(27)

因为官员政绩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所以近年来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重大改革中，也包含了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2013年，中组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明确了“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这项通知之后，再加上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措施，地方GDP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下降。(28)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明确在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时，要看“全面工作”，“看推动本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和实际成效”。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政绩非常重要，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地衡量（像送快递件数那样），那上级的主观评价就是重要的，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人情和业绩之间可能互相促进：业绩突出容易受领导青睐，而领导支持也有助于做好工作。但如果某些领导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在选人用人中忽视工作业绩，任人唯亲，就可能打击下属的积极性。在这类问题突出的地区，官僚体系为了约束领导的“任性”，可能在晋升中搞论资排辈，因为年龄和工龄客观透明，不能随便修改。但如此一来，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都会降低。(29)

虽然地方官场的人情关系对于局部的政治经济生态会有影响，但是否重要到对整体经济现象有特殊的解释力，我持怀疑态度。一方面，地方之间有竞争关系，会限制地方官员恣意行事；另一方面，人情关系网依赖其中的关键人物，不确定性很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有“树倒猢猻散”。但无论是张三得志还是李四倒霉，工作都还是一样要继续

做，发展经济也一样还是地方政府工作的主题。

政绩和晋升无疑对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要，却无法激励绝大多数公务员。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绩关系不大，晋升希望也十分渺茫。在庞大的政府工作人员群体中，“县处级”及以上的干部大约只占总人数的1%。平均来说，在一个县里所有的正科实职干部中，每年升副县级的概率也就1%，而从副县级干部到县委副书记，还要经历好几个岗位和台阶，动辄数年乃至数十年。⁽³⁰⁾因此绝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最在意的激励并不是晋升，而是实际收入以及一些工作福利，包括工资、奖金、补助、补贴、实惠的食堂、舒适的办公条件，等等。这些收入和福利都与本地经济发展和地区财政紧密相关，在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部门之间，差异很大。大部分人在日常工作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异，知道自己能从本地发展和本单位发展中得到实惠。若有基层部门破坏营商环境，也会受到监督和制约。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外部奖惩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没有清清楚楚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也正是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³¹⁾

腐败与反腐败

政府投资和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一大弊端就是腐败严重。与土地有关的交易和投资往往金额巨大，且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官员手中，极易滋生腐败。近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大多与土地有关。在最高检《检察日报》从2008年到2013年报道的腐败案例中，近一半与土地开发有关。⁽³²⁾随着融资平台和各种融资渠道的兴起，涉嫌腐败的资金又嫁接上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变得更加隐秘和庞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并一直保持了高压态势。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立案审查县处级及以上干部15.6万人，包括中管干部414人和厅局级干部1.8万人。⁽³³⁾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腐

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这与“腐败危害经济”这一过度简单化的主流观念冲突，以腐败为由唱空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落空。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案件大多与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和各种“投机倒把”有关；90年代的案件则多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有关；21世纪以来，与土地开发相关的案件成了主流。⁽³⁴⁾

要理解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理解不同腐败类型的不同影响。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掠夺式”腐败，比如对私营企业敲诈勒索、向老百姓索贿、盗用挪用公款等，这类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极其有害。随着我国各项制度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种监督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类腐败已大大减少。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规范的罚款和乱收费很多，常见的解决方式是私下给办事人员现金，以免去更高额的罚款或收费。如今这种情况少多了，罚款要有凭证，要到特定银行或通过手机缴纳，钱款来去清楚，很难贪腐。我国也基本没有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常见的“小偷小摸”式腐败，比如在机场过检时在护照里夹钱、被警察找茬要钱等。近些年，我国整体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我国从2010年的全球第89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而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近五年来也一直保持在每年1 300亿美元左右的高位。

第二类腐败是“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而企业不仅要完成项目、为官员贡献政绩，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这类腐败发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而相关投资和建设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所以腐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来看，这类腐败会带来四大恶果。其一，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收入占比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第七章会讨论这种扭曲。其二，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把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项目上，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第六章会讨论这种风险。其三，权钱交易扩大了贫富差距。第五章会分析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四，地方上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不仅可能限制市场竞争，也可能破坏政治生态，出现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数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强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是更为广阔的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

其中既包括“去杠杆”等经济结构改革，也包括防范金融风险改革，还包括各类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需要打破在旧有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反腐败会长期保持高压态势。2020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一项针对我国城乡居民独立民调的结果，这项调查从2003年开始，访谈人数超过3万人。调查结果显示，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16年，约65%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整体比较清廉，而2011年这一比例只有35%。⁽³⁵⁾居民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长期居于高位，按百分制计算约83分；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则低一些，省政府约78分，县乡政府约70分。

但在尚未完成转型之前，习惯了旧有工作方式的地方官员在反腐高压之下难免会变得瞻前顾后、缩手缩脚。2016年，中央开始强调“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要破除“为官不为”。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些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财富飞速增长，腐败现象在所难免。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所谓“镀金年代”中，各类腐败现象也非常猖獗，“裙带关系”愈演愈烈，经济腐化政治，政治又反过来腐化经济，形成了所谓的“系统性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政治和法治建设，才逐步缓解。⁽³⁶⁾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角色。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结语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集中到了中央，但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维持运转。但几乎所有省份，无论财政收入多寡，债务都在飞速扩张。可见政府债务问题根源不在收入不够，而在支出太多，因为承担了发展经济的任务，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因此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不是简单修改政府预算框架的问题，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

算账要算两边，算完了负债，当然还要算算借债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既包括基础设施，也包括实体企业。给基础建设投资算账，不能只盯着项目本身的低回报，还要算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整体效益。但说归说，这笔“大账”怎么算并没有一致认可的标准，争议很大。然而无论怎么争，这笔账总归应该考虑人口密度和设施利用率。在小城市修地铁、在百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建设几十万人口的新城、在远离供应链的地方建产业园区，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也很难让人看到效益。至于实体企业，很多行业在资金“大水”漫灌之下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和产品价格下跌。但同时也有很多行业在宽松的投资环境中迅速成长，跻身世界一流水准，为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光电显示、光伏、高铁产业等。下一章就来讲讲它们的故事。

扩展阅读

本章讨论的所有话题，包括拆迁、招商引资、地方债务、户籍与城市化等，都能在周浩导演的杰出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中看到。该片记录了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重建这座城市的故事。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至今已过去七年有余，如今网络上针对当年那场造城运动以及耿彦波本人的评论褒贬不一，对照影片中记录的各种当年的故事和冲突，引人深思。

篇幅所限，本章没有展开分析官员行为对经济的各种影响。北京大学周黎安的杰作《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2017）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军旗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2010）生动细致，是了解我国县域官场的上佳之作。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Ang, 2020）讨论了我国近些年的各类腐败现象，与美国过去及现在的腐败做了对比，解释了腐败为什么可以与经济增长共存。该书也对研究腐败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梳理，有参考价值。

如今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中很少涉及“土地”。在生产和分配中，一般只讲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土地仅被视作资本的一种。而在古典经济学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土地和资本是分开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是两类人。这种变化与经济阶段的有关：在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现代经济中，农业的地位大不如前，所以农业最重要的资本投入——“土地”——也就慢慢被“资本”吞没了。然而土地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毕竟不同（供给量固定、没有折旧等），且如今房产和地产已成为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重新把土地纳入主流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而不是仅将其归类到“城市经济学”或“房地产经济学”等分支。几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Ryan-Collins, Lloyd and Macfarlane, 2017）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 (1)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名著《资本的秘密》（2007）对资本的属性有极佳的论述。
- (2)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中对借款人资格做了严格限定，排除了地方政府。1995年版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2014年修订版则允许省

级政府发债。

- (3) 相关数据来自公司发债时披露的信息和报表，读者可以到上海清算所网站下载。
- (4) 2009年末，成都市财政局把关于“宽窄巷子”历史文化保护区项目的一笔土地出让金3 769.82万元，以“补贴收入”的形式全额返还给了文旅集团，专项用于“宽窄巷子”项目的宣传推广。
- (5)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由发改委和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 (6) 数字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页。我的家乡包头市，人口为290万人，2019年的GDP也只有2 715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不过152亿元。
- (7) 数据来自兆润集团发债的募集说明书和相关评级公告。兆润集团的业务有很多，除开发园区土地之外，也开发房地产。
- (8) 与PPP相关的数据来自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网站（www.cpppc.org）。
- (9) 张五常在其著作（2019）第四卷中深入探讨了关于合约选择的一般性理论。
- (10) 关于“芜湖模式”的来龙去脉，可参考《国家开发银行史（1994—2012）》（编委会，2013）。
- (11) 国开行和世界银行的资产规模来自各自年报。世界银行资产规模仅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
- (12) 数据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风险管理部党均章和王庆华的文章（2010）。
- (13) 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洪正、张硕楠、张琳等人的合作研究（2017）。
- (14) 数据来自《财新周刊》2019年第21期的文章《央行银保监联合接管包商银行全纪录 首次有限打破同业刚兑》。
- (15) 2010—2012年，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收紧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贷款，也收紧了信托等融资渠道。为绕开这些管制，融资平台开始大量发行城投债，不惜支付更高利息。
- (16) 对隐性负债的估计有很多，数据来源差不多，结果大同小异。此处的数字参考了三种文献：清华大学白重恩、芝加哥大学谢长泰及香港中文大学宋铮的论文（Bai, Hsieh and Song, 2016）；海通证券姜超、朱征星、杜佳的研报（2018）；德意志银行张智威和熊奕的论文（Zhang and Xiong, 2019）。
- (17) 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债务数据库，详见第六章图6-3。
- (18) 德意志银行的张智威和熊奕（Zhang and Xiong, 2019）计算了1 10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回报率。2016年，回报率的中位数只有0.8%。
- (19) 越穷的省债务负担越重。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在著作（2016）中分析了这一关系。
- (20) 德意志银行的张智威和熊奕（Zhang and Xiong, 2019）计算了1 109家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利息覆盖率”，即公司收入除以利息支出得到的比值。如果这个比值大于1，就有能力付息。

- (21) 详见《财新周刊》2017年第21期的封面文章《再查地方隐性负债》。
- (22) 城市人口的教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数据来自2006—2013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微观数据。
- (23) 这些数字来自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的文章（2018）。
- (24) 北京大学姚洋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2013）收集了1994—2008年间241个城市1671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发现他们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是3.8年，中位数是3年。中山大学杨海生和罗党论等人（2014）则收集了1999—2013年间近400个地级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资料，发现平均每年都有近三成的地级市中至少有1个人职务发生变更。大量研究显示，地区经济指标随地方主官任期变动，读者可参考北京大学周黎安著作（2017）第六章对这些研究的总结。
- (25) 复旦大学王之、北京大学张庆华和周黎安等人的论文发现，市领导升迁和城市面积扩张之间有正向关系（Wang, Zhang and Zhou, 2020）。
- (26) 关于省、市、县各级地方主官晋升和当地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 (27) 辽宁大学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研究了官员变更和本地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对外经贸大学吴敏和北京大学周黎安（2018）研究了官员晋升和城市“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间的关系。
- (28) 2013年之后，省市GDP和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及相关解释可以参考复旦大学张军和樊海潮等人的论文（2020）。
- (29) 在我国官场晋升中，政绩和人情都重要，是互补关系，读者可参考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贾瑞雪、大阪大学下松真之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大卫·塞姆（David Seim）等人的论文（Jia, Kudamatsu and Seim, 2015）。关于组织中人情关系和工作表现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可以参考芝加哥大学普伦德加斯特（Prendergast）和托佩尔（Topel）的论文（1996），以及复旦大学陈硕、长江商学院范昕宇、香港中文大学朱志韬的论文（Chen, Fan and Zhu, 2020）。
- (30) “县处级”干部占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来自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Ang, 2020）。基层正科晋升副县级的概率，来自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
- (31) 斯坦福大学的克雷普斯（Kreps）教授是经济激励理论的大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公司如何激励员工”的通俗小书（2018）。在这本书中，经济学强调的“外部激励”（incentive）只占一部分，而管理学更加重视的“内心驱动”（motivation）则占了大量篇幅。
- (32)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陈硕和中山大学朱琳的合作研究（2020）。
- (33) 数据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署名钟纪言的文章《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 (34)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腐败形式的详细数据和分析，可以参考复旦大学陈硕和中山

大学朱琳的论文（2020）以及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Ang, 2020）。

- (35)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坎宁安（Cunningham）、赛什（Saich）和图列尔（Turiel）等人的研究报告（2020）。
- (36) 关于美国这一时期的腐败和治理，马里兰大学经济史学家沃利斯（Wallis）的论文（2006）很精彩。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2019年初，我访问台北，遇到一位美国企业的本地高管，他说：“你们大陆的经济学跟我在哈佛商学院学的不一样啊，市场竞争和供给需求嘛，你们企业背后都有政府补贴和支持，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企业都被搞死了哇，这么搞不行哇。”我说：“×总，这企业又不是人，哪有什么死活，就是资源重组嘛。台湾工程师现在在大陆的工资比以前高，产品质量比以前好，价格比以前便宜，不是挺好吗？贵公司去年在武汉落地的厂子，投资百亿元，跟地方政府要补贴和优惠的时候，那可是一点也不让步，一点也不‘市场经济’啊，哈哈。”他说：“补贴嘛，能拿还是要多拿。哎，你回去可别说不该给我们补贴呀！”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土地、金融、国企等），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第三章），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不容易退出。

在每个具体行业中，由于技术、资源、历史等因素，政企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钢铁是一回事，芯片是另一回事。因此，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不能脱离具体行业细节，否则易流于空泛。社会现象复杂多变，任何理论和逻辑都可以找到不少反例，因为逻辑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对结果影响非常大，而结果又直接影响到对过程和理论的评判。成功了才是宝贵经验，失败了只有惨痛教训。产业政策有成功有失败，市场决策也有成功有失败，用一种成功去质疑另一种失败，或者用一种失败去推崇另一种成功，争论没有尽头。

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具体案例。行业和企业如何借力政府来发展？实行了哪些具体政策？政府资金如何投入和退出，又如何影响行业兴衰和技术起落？首先要了解基本事实和经过，才能评判结果。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不是讲道理的唯一形式，也不一定是最优形式，具体的案例故事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启发更大。^①在行业或产业研究中，案例常常包含被模型忽视的大量重要信息，尤其是头部企业的案例。依赖企业财务数据的统计分析，通常强调行业平均值。但平均值信息有限，因为大多数行业“二八分化”严重，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基本没

有可比性。财务数据也无法捕捉大企业的特征：大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汇聚点和创新平台，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核心，与政府关系历来深厚复杂，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

本章前两节是两个行业案例：液晶显示和光伏。叙述的切入点依然是地方政府投融资。读者可以再次看到地方融资平台或城投公司、招商引资竞争、土地金融等，只不过这一次的投资对象不是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而是具体的工业企业。第三节介绍近些年兴起的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这种基金不仅是一种新的招商引资方式和产业政策工具，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2020年“双11”期间，戴尔27吋高清液晶显示屏在天猫的售价为949元。2008年，戴尔27吋液晶显示器售价7 599元，还远达不到高清，不是窄边框，也没有护眼技术。2020年，3 000多元就可以买到70吋的高清液晶电视，各种国产品牌都有。而在2008年，只有三星和索尼能生产这么大的液晶电视，售价接近40万元，是今天价格的100倍，在当时相当于北京、上海的小半套房。

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八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2008年，面板行业由日韩和中国台湾企业主导，大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可以忽略不计。2012年，我国进口显示面板总值高达50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到了2020年，大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接近四成，成为世界第一，彻底摆脱了依赖进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批重量级企业，如京东方、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在显示面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公司京东方为例，其液晶显示面板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领域的销量近些年来一直居于全球首位。⁽²⁾根据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前六大股东均是北京、合肥、重庆三地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合计占股比例为23.8%。其中既有综合类国资集团（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也有聚焦具体行业的国有控股集团（如北京电子控股），还有上一章讨论的地方城投公司（如合肥建投和重庆渝富）。投资方式既有直接股权投资，也有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见本章第三节）进行的投资。

京东方和政府投资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我国大陆彩电行业的重头戏码是各种价格战。当时大陆的主流产品还是笨重的显像管（CRT）电视，建设了大量显像管工厂。但其时国际技术主流却已转向了平板液晶显示，彻底取代显像管之势不可逆转，而占液晶电视成本七八成的显示面板，大陆却没有相关技术，完全依赖进口。大陆花了近20年才让彩电工业价值链

的95%实现了本土化，但由于没跟上液晶显示的技术变迁，一夜之间价值链的80%又需要依赖进口。⁽³⁾而主要的面板厂商都在日韩和中国台湾，他们常常联手操纵价格和供货量。2001年至2006年，三星、LG、奇美、友达、中华映管、瀚宇彩晶等六家主要企业，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召开了共计53次“晶体会议”，协商作价和联合操纵市场，使得液晶面板一度占到电视机总成本的八成。2013年，发改委依照《价格法》（案发时候还没有《反垄断法》，后者自2008年起施行）中操纵市场价格的条款，罚了这六家企业3.5亿元。欧美也对如此恶劣的价格操纵行为做了处罚：欧盟罚了他们6.5亿欧元，美国罚了他们13亿美元。⁽⁴⁾

在这一背景下，具有自主技术和研发能力的京东方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家企业的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经过不断改制和奋斗，21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生产小型液晶显示面板的能力。这些能力大多源自2005年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5代线，这是国内第二条5代线，当时非常先进，距离全球第一条5代线（韩国LG）的建成投产时间也不过三年。⁽⁵⁾这条生产线收购自韩国企业，投资规模很大。当时的融资计划是设立一家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为项目建设融资，但这个上市计划失败了。可生产线已经开始建设，各种设备的订单也已经下了，于是在北京市政府与国开行的协调下，9家银行组成银团，由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牵头，贷款给京东方7.4亿美元。北京市政府也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以国资委的全资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借款主体。这笔政府借款后来转为了股份，在二级市场套现后还赚了一笔。此外，在5代线建设运营期间，北京市政府还先后给予两次政策贴息共1.8亿元，市财政局也给了一笔专项补助资金5 327万元。⁽⁶⁾

天有不测风云。京东方5代线的运气不好，在液晶面板大起大落的行业周期中，投在了波峰，产在了波谷。其主打产品即17吋显示屏的价格从动工建设时的每片300美元暴跌到了量产时的每片150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两年，京东方亏损了33亿元，北京市政府无力救助。若银团贷款不能展期，就会有大麻烦。银团贷款展期必须所有参与的银行都同意，而9家银行中出资最少的1家小银行不同意，反复协调后才做通工作，但其中的风险和难度也让京东方从此改变了融资模式。其后数条生产线的建设都采用股权融资：先向项目所在地政府筹集足够的资本金，剩余部分再使用贷款。

2008年，京东方决定在成都建设4.5代线，第一次试水新的融资模式。这条生产线总投资34亿元，其中向成都市两家城投公司定向增发股

票18亿元，剩余16亿元采用银团贷款，由国开行牵头。两家城投公司分别是成都市政府的全资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现名成都产业投资集团）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这两家公司不仅有大量与土地开发和融资相关的业务（见第三章），也是当地国资最重要的产业投资平台。与北京5代线项目相比，成都4.5代线的资本金充足多了，京东方运气也好多了。这条以小屏幕产品为主的生产线，投产后正好赶上了智能手机的爆发，一直盈利，也为京东方布局手机屏幕领域占了先机。

但当时最赚钱的市场还是电视。主流的27吋和32吋大屏幕电视，显示面板完全依赖进口。但建设一条可生产大屏幕的6代线（可生产18—37吋屏幕）所需投资超过百亿元，融资是个大问题。2005—2006年，国内彩电巨头TCL、创维、康佳、长虹等计划联手解决“卡脖子”问题，于是拉来了京东方，在深圳启动了“聚龙计划”，想借助财力雄厚的深圳市政府的投资，在当地建设6代线。但信息流出后，日本夏普开始游说深圳市政府，提出甩开技术落后的京东方，帮深圳建设一条投资280亿元的7.5代线。由于夏普的技术和经验远胜京东方，深圳市政府于是在2007年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京东方出局，“聚龙计划”流产。但仅一个多月之后，夏普就终止了与深圳的合作。当时上海的上广电（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计划和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建设一条6代线，但夏普再次上门搅局，提出与上广电合作，将京东方踢出局。随后不久，夏普再次找借口退出了与上广电的合作。

夏普的两次搅局推迟了我国高世代产线的建设，但也给了合肥一个与京东方合作的机会。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建一条投资175亿元的6代线，非常困难，经济和政治决策风险都很大。但当时的合肥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甚至传说一度要停了地铁项目来建设这条6代线。融资方案仍然采用京东方在成都项目中用过的股票定向增发，但因为投资金额太大、合肥政府财力不足，所以这次增发对象不限于政府，也面向社会资本。但合肥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定向增发不顺利时，兜底出资90亿元，可以说是把家底押上了。在这个过程中，夏普又来搅局，但因为京东方已经吃过两次夏普的亏，所以在与合肥合作之初就曾问过市领导：如果夏普来了怎么办？领导曾表示过绝不动摇，所以这次搅局没有成功。

上一章说过，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资本市场和信用机制都不完

善，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政府为主体来融资和投资，更为可行。这不仅适用于与土地有关的债务融资，也适用于股权融资。在合肥6代线项目的股票定向增发上，市政府参与的主体又是两家城投公司，市政府的全资公司合肥建投和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合肥鑫城。⁽⁷⁾二者的参与带动了社会资本：2009年的这次定向增发一共融资120亿元，两家城投公司一共只出资了30亿元，其他8家社会投资机构出资90亿元。⁽⁸⁾与成都项目类似，定向增发之外，京东方再次利用了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贷款，金额高达75亿元。

合肥6代线是我国第一条高世代生产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最大的一笔单体工业投资。这条生产线生产出了大陆第一台32吋液晶屏幕，让合肥一跃成为被关注的高技术制造业基地。不仅很多中央领导来视察，周边经济发达的江浙沪领导也都组团来考察，为合肥和安徽政府赢得了声誉。京东方后来又在合肥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代生产线（2018年投产），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4万亿”计划出台之后，京东方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2009年初，中央首次将发展“新型显示器件”列入政策支持范围。⁽⁹⁾6月，合肥6代线开工建设。8月，京东方8.5代线的奠基仪式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彻底打破了韩日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大陆的技术和设厂封锁。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内，坐不住的境外厂商开始迅速推进与大陆的实质性合作。夏普和南京的熊猫集团开始合资建线，LG和广州签约建设8代线，三星则和苏州签约建设7.5代线。中国台湾的面板厂商也开始呼吁台湾当局放开对大陆的技术限制，允许台商在大陆设厂。但这些合资项目并没有获得我国政府的快速批准，京东方赢得了一些发展时间。

在这一快速扩张阶段，京东方的基本融资模式都是“扩充资本金+银团贷款”。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既可以参与京东方股票定向增发来扩充其资本金，也可以用土地使用权收益入股。在鄂尔多斯生产线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甚至拿出了10亿吨煤矿的开采权。此外，地方城投公司也可以委托当地银行向京东方提供低息甚至免息委托贷款。比如在北京亦庄8.5代线的建设过程中，亦庄开发区的全资公司亦庄国投就曾委托北京银行向京东方贷款2亿元，年利率仅为0.01%。⁽¹⁰⁾再比如，2015年京东方在成都高新区建设新的产线，高新区管委会的全资公司成都高投就先后向京东方提供委托贷款44亿元，年利率为4.95%，但所有利息都由高

新区政府全额补贴。(11)

2014年，京东方做了最大的一笔股票定向增发，总额为449亿元，用于北京、重庆、合肥等地的产线建设。这笔增发的参与者中前三位都是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北京约85亿元，重庆约62亿元，合肥约60亿元。(12)2015年之后，随着新世代产线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京东方基本上停止了新的股票定向增发，而让地方政府平台公司通过银团贷款或其他方式去筹集资金。比如2015年开工建设的合肥10.5代线项目，计划投资400亿元，项目资本金220亿元，银团贷款180亿元。在这220亿中，市政府通过本地最大的城投公司合肥建投筹集180亿，京东方自筹40亿。筹资过程中也利用了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如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新的方式引入了外部资金（见本章第三节）。(13)

京东方的发展路径并非孤例。位列国内显示面板第二位的TCL华星光电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同样也是在政府投资推动下发展的。2007年“聚龙计划”流产后，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屡次尝试与外商合资引进高世代面板产线，均告失败，于是他与深圳市政府商议组建团队自主建设8.5代线。该项目计划投资245亿元，是深圳历史上最大的单体投资工业项目。首期出资100亿，TCL从社会上募集50亿，深圳市通过国资委旗下的投资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50亿（具体由子公司深超投资执行）。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因为TCL和京东方不同，并没有相关技术储备和人才，基本依靠从台湾挖来的工程师团队。深圳市政府为降低风险，还将15%的股份卖给了三星。这些股份后来大部分被湖北省政府的投资基金收购，用于建设华星光电在武汉的生产线。2013—2017年，华星光电营业收入从155亿元涨到306亿元，净利润从3.2亿元涨到49亿元。正是因为有华星光电，在家电行业逐渐败退的TCL集团才成功转向面板生产，2019年正式更名为TCL科技。(14)

经济启示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不仅投资额度大，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若新企业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不仅自身成本会降低，还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削弱其规模经济，推高其生产成本，因此一定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比如三星可以打价格战，夏普也可以到处搅局。

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市场竞争的理论一般都是讲国内市场，不涉及国际市场，所以新进入者可以寻求一切市场手段去打破在位者的优势，比如资本市场并购、挖对方技术团队等。若在位者的打压手段太过分，还可以诉诸《反垄断法》。但在国际市场上，由国界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市场扭曲非常多。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不过是常规手段，价格操控、技术封锁、并购审查等也是家常便饭。比如中国公司去海外溢价收购外国公司，标的公司闻风股价大涨，股东开心，皆大欢喜，但对方政府却不允许，市场经济的道理讲不通。若资源不能流动和重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及比较优势等传统经济学推理的有效性，都会受到挑战。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必须依赖出口，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但在我国，使用液晶屏幕的很多终端产品比如电视和手机，其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在国内，所以液晶显示产业的外溢性极强。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不一定非要有技术优势，能够拉低国际厂商的漫天要价也可以），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15)

政府投资上游产业的同时也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这种例子有不少。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利，重新调整亚洲战略。尼克松宣布终止对其亚洲盟友的直接军事支持。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相应地调整了产业发展战略，着力发展重工业，以夯实国防基础。自1973年起，韩国政府通过国家投资基金（National Investment Fund）和韩国产业银行（Korea Development Bank）将大量资金投入六大“战略行业”：钢铁、有色金属、造船、机械、电子、石化。这一产业发展战略在当时受到了很多质疑。1974年，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对韩国的产业目标能否实现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些产业不符合韩国的比较优势，并建议把纺织业这个资金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作为工业化的突破口。(16)韩国人没听他们的。后来不仅这些战略行业本身发展得很好，培育了世界一流的造船业以及浦项制铁和三星电子这样的世界顶尖企业，而且大大降低了下游产业投入品的价格，推动了下游产业如汽车行业的发展，培育出了现代集团这样的一流车企。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韩国产业政策开始转型，原有的很多扶持政策被废止。但这些产业的基础已经扎稳，后来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17)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等企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集聚。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因为规模不够就吸引不到上下游企业向周围集聚。一旦行业集聚形成，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就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光电显示面板产业规模大、链条长，目前很多上游环节（显示材料、生产设备等）依然由国外厂商主导，利润率高于面板制造环节。但京东方等国内面板生产企业的发展，拉动了众多国内企业进入其供应链，而其中用到的很多技术和材料，也可以用于其他产业（比如半导体），从而带动了我国很多相关行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无论是京东方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诸多海外企业纷纷在我国设厂，也带动了我国上游配套企业的发展。(18)

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业的集聚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每年的报告，从2016年到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全球十大公司中，每年都有京东方（还有华为）。

创新当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但创新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己做。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边做边学”，否则永远也学不会。只有自己动手，不是靠简单的模仿和引进，才能真正明白技术原理，才能和产业链上的厂商深入交流，才能学会修改设计以适应本土客户的要求，也才能逐步实现自主创新。若单纯依靠进口或引进，没有自己设厂和学习的机会，那本国的技术就难以进步，很多关键技术都会受制于人，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19)很多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纪录片中都详细记录了我国各行业工人、工程师、科学家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艰难摸索和自主创新，本章的“扩展阅读”中会推荐其中一些作品。这就好比学生学习写论文，不自己动手研究、动手做、动手写，只靠阅读别人的东西，理解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知识消费的层次，不可能产出新知。就算全天下的论文和书籍都摆在面前，一个人也不会自动成为科学家。

强调自主创新不是提倡闭关锁国。当然没必要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况且贸易开放也是学习的捷径，和独立自主并不矛盾。(20)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当大一部分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均来自本土的大型制造业（非自然资源类）企业。(21)这也正是我们从京东方的发展故事中所看到的。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掌握的核心技术及产品种类和数

量，远远多过一些中小型国家。第七章会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假如韩国按照其1970年显示出的“比较优势”来规划产业，就应该听从世界银行的建议去发展纺织业。但韩国没有这么做，而是一头扎进了本国根本没有的产业。到了1990年，韩国最具“比较优势”的十大类出口商品，比如轮船和电子产品，1970年时根本就不存在。(22)可见“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可以靠人为创造的。其实“比较优势”并不神秘，就是机会成本低的意思。而对于没干过的事情，事前其实无从准确判断机会成本，没干过怎么知道呢？

中国也是如此。政府和私人部门合力进入很多复杂的、传统上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经过多年发展，其产品如今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比较优势。(23)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从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24)这不仅反映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的提升，也反映了营商环境和法制环境等软件质量的提升。因为复杂的产品和产业链涉及诸多交易主体和复杂商业关系，投资和交易金额往往巨大，所以对合同的制订和执行、营商环境稳定性、合作伙伴间信任关系等都有很高要求。各国产品的复杂程度与本国法制和营商环境之间直接相关。(25)而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我国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89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

地方政府竞争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京东方落户本地，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上一章曾讨论过，城投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能只看项目本身的财务回报，还要看对当地经济的整体带动。这道理对产业类投资也适用。京东方不仅自身投资规模巨大，且带来的相关上下游企业的投资也很大，带动的GDP、税收及就业十分可观。曾有合肥市政府相关人士反驳外界对其投资京东方的质疑：“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算账，政府是要算细账的。一个京东方生产线，从开始建就能拉动300亿元的工业投资，建成之后的年产值就是千亿级别。从开建到完全投产不到五年时间，五年打造一个千亿级别的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投资效率非常高了。”(26)

新兴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效应很强，因为扎堆生产可以节约原材料和中间投入的运输成本，而且同行聚集在一起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外溢效应很强。因此产业集群一旦形成，自身引力会不断加强，很难被外力打破。但在产业发展早期，究竟在哪个城市形成产业集群，却有很多偶然因素。⁽²⁷⁾大部分新兴制造业对自然条件要求不高，不会特别依赖先天自然资源，而且我国基础设施发达，物流成本低，所以一些内陆的中心城市虽然没有沿海城市便利，但条件也不是差很多。这些城市若能吸引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落户，就有可能带来一大片相关企业，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得一席之地，比如合肥的京东方和郑州的富士康等。

由于京东方生产线投资巨大，很自然首先要谋求与财力雄厚的深圳或上海合作，但两次都被夏普搅局，就给了合肥和成都机会。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广东和江浙沪发展迅猛，而合肥、成都、武汉等内地中心城市则亟待产业转型，提振经济发展，这些城市为此愿意冒险，全力投资新兴产业。京东方在合肥先后投资建设的三条生产线，吸引了大量配套企业，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已如前文所述，这一产业使用的很多技术又与其他产业直接相关，比如芯片和半导体，所以合肥政府利用和京东方合作的经验和产业基础，后来又吸引了兆易创新等半导体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了合肥长鑫，成为我国内存（DRAM）制造产业的中心之一。2008年至2019年，合肥的实际GDP（扣除物价因素）上涨了3.4倍，高于全国GDP同期上涨幅度（2.3倍）。2020年，合肥GDP总量破万亿，新晋“万亿GDP城市”（2020年末共有23个城市）。

这种发展效应自然会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不少城市都上马了液晶面板生产线，而政府扶持也吸引了一些并无技术实力和竞争力的小企业进入该行业，引发了对产能过剩的担忧。⁽²⁸⁾显示面板是一个周期性极强的行业：市场价格高涨时很多企业进入，供给快速增加，推动价格大跌，让不少企业倒闭，而低价又会刺激和创造出更多新的需求和应用场景，推动需求和价格再次上涨。这种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已经清洗掉了很多企业，行业中心也在一轮轮的清洗中从美国转到日本，再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再到大陆。也许在未来的世界，屏幕会无处不在，连房间的整面墙壁甚至窗户，都会是屏幕。但也有可能会有不可思议的“黑科技”出世，完全消灭掉现有显示技术，就像当年液晶技术消灭掉显像管技术一样。没人能够预知未来，但招商引资竞争所引发的重复建设确实屡见不鲜，尤其在那些技术门槛较低、投资额度较小的行业，比如曾经的光伏行业。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光伏就是用太阳能发电。2012年前后，我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全行业进入寒冬。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媒体眼中，光伏都是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失败的“活靶子”。但假如有人在当年滔天的质疑声中悄悄买入一些光伏企业的股票，比如隆基股份，现在也有几十倍的收益了。实际上，经过当年的行业洗牌之后，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龙头，国内企业（包括其海外工厂）的产能占全球八成。该产业的几乎全部关键环节，如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²⁹⁾在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驱动之下，光伏组件的价格在过去十年（2010—2019）下降了85%，同期的全球装机总量上升了16倍。我国国内市场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装机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³⁰⁾光伏已经和高铁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光伏产业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禁运石油，油价飙涨，“石油危机”爆发，刺激了美国政府扶持和发展新能源产业。卡特政府大量资助光伏技术研究，补贴产业发展。80年代初，美国光伏市场占全球市场的85%以上。但随后里根上台，油价回落，对光伏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大都废止。产业链开始向政府补贴更慷慨的德国和日本转移。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马丁·格林（Martin Green）教授发展了很多新技术，极大提升了光伏发电的效率，被誉为“光伏之父”。他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我国光伏产业的中坚，其中就包括施正荣博士。⁽³¹⁾

2001年，施正荣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尚德，占股25%，无锡的三家政府投资平台（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和五家地方国企（如江苏小天鹅集团）共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可以说无锡政府扮演了尚德“天使投资人”的角色。2005年，尚德成为中国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因为在上市前引入了高盛等外资，收购了全部国资股份。施本人的持股比例也达到46.8%，上市后一跃成为中国首富。这种造富的示范效应非常强烈，刺激各地政府纷纷上马光伏项目。2005年，在江西新余市政府的一系列扶持之下，赛维集团成立。2007年就成为江西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创始人彭小峰成为江西首富。2010年，在

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已超过20家。(32)

2008年，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包括光伏。主要手段还是廉价土地、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在刺激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背书之下，尚德和赛维等龙头企业开始大规模负债扩张。2011年初，尚德规模已经不小，但无锡政府又提出“5年内再造一个尚德”，划拨几百亩土地，鼓励尚德再造一个5万人的工厂，并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2011年，赛维已经成了新余财政的第一贡献大户，创造就业岗位2万个，纳税14亿元，相当于当年新余财政总收入的12%。(33)

与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液晶显示面板行业不同，这一时期的光伏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因为其发电成本远高于火电和水电，国内消费不起。2011年的光伏出口中，57%出口欧洲，15%出口美国。虽然国内从2009年起也陆续引入了一些扶持和补贴政策（如“金太阳工程”），补贴光伏装机，但总量并不大。2010年，国内市场只占我国光伏企业销量的6%。(34)

因为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所以光伏的海外需求也离不开政府补贴。欧洲的补贴尤其慷慨。德国不仅对装机有贷款贴息优惠，还在2000年就引入了后来被全球广泛借鉴的“标杆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 FiT）。光伏要依靠太阳能，晚上无法发电，电力供应不稳定，会对电网造成压力，因此电网一般不愿意接入光伏电站。但在“标杆电价”制度下，电网必须以固定价格持续购买光伏电量，期限20年，该价格高于光伏发电成本。这种价格补贴会加到终端电价中，由最终消费者分摊。这个固定价格会逐渐下调，以刺激光伏企业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但事实上，价格下降速度慢于光伏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速度，所以投资光伏发电有利可图。可以说我国光伏产业不仅是国内地方政府扶持出来的，也得益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的“扶持”。在欧美市场，我国企业借助规模效应、政府补贴以及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对其本土企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2008年到2011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同时，为应对我国企业的冲击，美国和欧盟从2011年底开始陆续对我国企业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关税飙升。其实，这一时期我国专门针对光伏的补贴总量很有限，大部分补贴不过都是地方招商引资中的常规操作，比如土地优惠和贷款贴息，并非具体针对光伏。只有光伏产业集聚的江苏省在2009年率先推出了与德国类似的“标杆电价”补贴，确定2009年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度2.15元，远高

于每度约0.4元的煤电上网电价。补贴资金源于向省内电力用户（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收取电价附加费，建立省光伏发电扶持专项资金。为鼓励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江苏将2010年和2011年的“标杆电价”降为每度1.7元和1.4元。⁽³⁵⁾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双反”调查前几年，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在急速扩张中积累了大量产能和债务，如今出口需求锐减，大量企业开始破产倒闭，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尚德和赛维，光伏产业进入寒冬。在这种背景之下，光伏的主要市场开始逐渐向国内转移。

2011年，中央政府开始分阶段对光伏施行“标杆电价”补贴，要求电网按固定价格（1.15元/度）全额购买光伏电量，并从2013年起实行地区差别定价。⁽³⁶⁾具体来说，是把全国分为三类资源区，I类是西北光照强的地区，II类是中西部，III类是东部，每度电上网电价分别定为0.9/0.98/1元。与当时煤电的平均上网电价约0.4元相比，相当于每度电补贴0.6元。对分布式光伏则每度电补贴0.42元。在资金来源方面，是向电力终端用户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上缴中央国库，进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除中央的电价补贴之外，很多省市也有地方电价补贴。比如上海就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对光伏电站实行每度电0.3元的固定补贴，资金来自本级财政预算和本市实行的差别电价电费收入。⁽³⁷⁾

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电价补贴也随时间逐步下调，以引导光伏企业不断降低成本。2016—2017年，我国两次调低三类地区的“标杆电价”至每度电0.65/0.75/0.85元，下降幅度达到28%/23%/15%。实际上，企业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幅远快于补贴降幅，同期光伏组件价格每年的下降幅度均超过30%，所以投资光伏电站有利可图，装机规模因此快速上升。2016—2017年两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73%，而光伏装机量占全球的51%，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产地，也成了最大的市场。⁽³⁸⁾

但装机量的急速上涨造成了补贴资金严重不足，拖欠补贴现象严重。如果把对风电的欠补也算上的话，2018年6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拖欠总额达到1 200亿元。很多光伏电站建在阳光充足且地价便宜的西部，但当地人口密度低、经济欠发达，用电量不足，消纳不了这么多电。跨省配电不仅成本高，且面临配电体系固有的很多制度扭曲，所以电力公司经常以未拿到政府拖欠的补贴为由，拒绝给光伏电厂结算，导致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弃光”现象严重。⁽³⁹⁾

在这种大背景下，2018年5月31号“531新政”出台，大幅降低了补贴电价，也大幅缩减了享有补贴的新增装机总量，超过这个量的新增装机，不再能享受补贴指标。这个政策立即产生了巨大的行业冲击，影响不亚于当年欧美的“双反”。当年第四季度，政策重新转暖。9月，欧盟取消了对我国企业长达五六年的“双反”措施，光伏贸易恢复正常。欧盟的“双反”并未能挽救欧洲企业，除了在最上游的硅料环节，大多欧洲企业已经退出光伏产业。20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而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光伏度电成本已经逼近燃煤电价，正在迈入平价上网时代。2020年，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股价飞涨，反映了市场对光伏技术未来的乐观预期。

经济启示

如果承认全球变暖事关人类存亡，那就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即便不承认全球变暖，但承认我国传统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构成了国家安全隐患，那也必须发展新能源。但传统能源已经积累了多年的技术和成本优势，新能源在刚进入市场时是没有竞争力的。就拿十几年前的光伏来说，度电成本是煤电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若只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没人会用光伏。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实验技术再突破，若没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化量产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下降。研发和创新从来不只是象牙塔里的活动，离不开现实市场，也离不开边干边学的企业。

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且成本低廉，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造成巨大扭曲。所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再逐渐降低补贴，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加速其退出。⁽⁴⁰⁾

因此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光伏的需求都是由政府补贴创造出来的。中国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时，面临的是一个“三头在外”的局面：需求和市场来自海外，关键技术和设备来自海外，关键原材料也来自海外。所以基本就是一个代工行业，处处受制于人。但当时光伏发电成本

太高，国内市场用不起。在地方政府廉价的土地和信贷资源支持下，大量本土光伏企业在海外打“价格战”，用低价占领市场，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技术创新，逐步进入技术更复杂的产业链上游，以求在产能过剩导致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但由于最终市场在海外，所以一旦遭遇欧美“双反”，就从需求端打击了全行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

但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这些资源又可以重新整合。2013年以后，国内市场需求打开，光伏发展进入新阶段。因为整条产业链都在国内，所以同行沟通成本更低，开始出现全产业链的自主和协同创新，各环节共同优化，加速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这又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好地打开了国外市场。2018年以后，不仅欧洲“双反”结束，低价高效的光伏技术也刺激了全球需求的扩张，全球市场遍地开花。我国企业当年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和渠道优势，现在又成了它们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来看，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与企业成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欧美日等先进国家不仅起步早、政府补贴早，而且企业占据技术、原料和设备优势，在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还借助了“双反”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但它们的企业最终衰落，纷纷退出市场。无论是补贴也好、贸易保护也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一些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但政府不能帮助企业克服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保护和补贴政策最终会变成企业的寻租工具。这一点不仅对中国适用，对欧美也适用。但这个逻辑不能构成反对所有产业政策的理由。产业发展，无论政府是否介入，都没有必然的成功或失败。就新能源产业而言，补贴了虽然不见得会成功，但没有补贴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了。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强调出口。当国内市场有限时，海外市场可以促进竞争，迫使企业创新。补贴和优惠政策难免会产生一些低效率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面对挑剔的海外客户时，是无法过关的。而出口量大的公司，往往是效率相对高的公司，它们市场份额的扩大，会吸纳更多的行业资源，压缩国内低效率同行的生存空间，淘汰一些落后产能。⁽⁴¹⁾当然，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要应对的国际局势变幻比小国更加复杂，所以不断扩大和稳定国内市场，才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若地方政府利用行

政手段阻碍落后企业破产，就会阻碍优胜劣汰和效率提升，加剧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与重复建设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这是在关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讨论中经常被批评的弊端，光伏也是常被提及的反面教材。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没有政府干预，也是市场运行的常态。因为投资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自由市场选择的投资水平不可能恰好适应未来需求。尤其产业投资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没下注的还可以驻足观望，但下了注的往往难以收手，所以投资水平常常不是过少就是过多。若市场乐观情绪弥漫，投资者往往一拥而上，导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跌，淘汰一批企业，而价格下跌可能刺激新一轮需求上升，引发新的过剩投资。这种供需动态匹配和调整过程中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产能过剩，企业才不得不在这场生存游戏中不断创新，增加竞争优势，加速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⁴²⁾

在我国，还有起码三个重要因素加剧了“重复投资”。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知道很多产品的市场需求几乎是确定的，也知道相关的生产技术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百姓有钱之后会买冰箱、彩电、洗衣机，需求巨大，也能引进现成的生产技术，而国内产能还没发展起来，人人都有机会，所以投资一拥而上。其次，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很多优惠和补贴，比如低价土地和贴息贷款，都发生在工厂建设阶段，且地方领导更换频繁，倘若谈好的项目不赶紧上马，时间拖久了优惠政策可能就没有了。虽然企业不能完全预料建成投产后的市场需求，但投产后市场若有变化，总是有办法通过调整产量去适应。但如果当下不开工建设，很多机会和资源就拱手让人了，所以要“大干快上”。再次，地方往往追随中央的产业政策。哪怕本地条件不够，也可能投资到中央指定的方向上，这也是会引发各地重复投资的因素之一。⁽⁴³⁾

“重复投资”并不总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早期，各地政府扶持下的工业“重复投资”至少有两个正面作用。首先，当地工厂不仅提供了就业，也为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场所和途径。“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是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不仅仅是工作的转变，也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彻底转变。这个转变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学习和培训，而这种学习

和培训只能在工厂中完成。在乡镇企业兴起的年代，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尚未形成，各地都在政府扶持下重复建设各种小工厂，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都很低。但正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工厂，让当地农民熟悉了工业和工厂，培养了大量工人，为后来我国加入WTO后真正利用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工厂”承担了类似“学校”的教育功能，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应当予以扶持和补贴。

“重复投资”的第二个好处是加剧竞争。蜂拥而上的低水平产能让“价格战”成为我国很多产品的竞争常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本创新”是本土创新的主流。虽然西方会将此讥讽为“仿造”和“山寨”，但其实成本创新和功能简化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在发达国家已经更新迭代了多年的产品，小到家电大到汽车，我国消费者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些复杂精密的产品价格高昂，让试用者望而却步。如果牺牲一些功能和质量能让价格大幅下降，就有利于产品推广。当消费者开始熟悉这些产品后，会逐步提升对质量的需求。正因如此，很多国产货都经历了所谓“山寨+价格战”的阶段。但行业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迅速洗牌，将资源和技术快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质量迅速提高。就拿家电行业来说，国产货从起步到质优价廉、服务可靠、设计精美，占领了大部分国内市场，也就是20年的时间。其他很多消费者熟悉的产品，也大都如此。(44)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45)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46)但所谓“特定”，不好界定。就算中央政府提倡的产业政策是普惠全行业的，并不针对特定企业，但到了地方政府，政策终归要落实到“特定”的本地企业头上。若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哪怕是低效率的“僵尸企业”也要不断输血和挽救，做不到“劣汰”，竞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这是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大项目”偏好，会刺激企业扩张投资。企业一旦做大，就涉及就业、稳定和方方面面的利益，不容易破产重组。这在曾经的光伏巨头——江西赛维的破产重整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2011年，赛维已经成了新余财政的第一贡献大户，创造就业岗位2万个，纳税14亿元，相当于当年新余财政总收入的12%。在政府背书之下，赛维获得了大量银行授信，远超其资产规模。自2012年

起，赛维的债务就开始违约。地方政府屡次注入资金，并动员包括国开行在内的数家银行以各种方式救助，结果却越陷越深。2016年，赛维总资产为137亿元，但负债高达516亿元，严重资不抵债。其破产重整方案由地方政府直接主导，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当受偿率太低的债权人无法接受重整方案时，地方法院又强制裁决，引发了媒体、法律和金融界的高度关注。⁽⁴⁷⁾

所以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若效率低的企业不能退出，“竞争性”就是一句空话。“退出机制”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比如光伏的“标杆电价”补贴，一直在降低，所有企业都非常清楚补贴会逐渐退出，平价上网时代终会来临，所以有动力不断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第二是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这不仅涉及产业政策，也涉及更深层次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如果作为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载体的企业退出渠道不畅，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也就难以深化。然而“破产难”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顽疾。一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在东南沿海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破产程序相对更加规范。同样是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和上海超日的破产重整就更加市场化，债权人的受偿率要比江西赛维高很多，这两个案例均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了“2016年十大破产重整典型案例”。但总体看来，无论是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我国在企业退出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最近几年，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是个热门话题。一讲到对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硅谷风格的风险投资。然而美式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可能直接大规模照搬到我国，而是在移植和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土壤的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实现了嫁接，产生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这种地方政府投资高新产业的方式，脱胎于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传统模式。在地方债务高企和“去产能、去杠杆”等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从2014年开始爆发式增长，规模在五年内翻了几番。根据清科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国内共设立了1 686只政府引导基金，到位资金约4万亿元；而根据投中的数据，引导基金数量为1 311只，规模约2万亿元。⁽⁴⁸⁾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既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新方式和新的产业政策工具，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理解这种基金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的产业发展，也是深入了解“渐进性改革”的绝佳范例。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这种投资方式紧密结合，所以要了解引导基金，需要先从了解私募基金开始。

私募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

私募基金，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去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收益。称其为“私募”，是为了和公众经常买卖的“公募”基金区别开。私募基金对投资人资格、募资和退出方式等都有特殊规定，不像公募基金的份额那样可以每天买卖。图4-1描绘了私募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出钱的人叫“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以下简称LP），管钱和投资的人叫“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以下简称GP）。LP把钱交给GP投资和运作，同时付给GP两种费用：一种是基本管理费。一般是投资总额的2%，无论亏赚，每年都要交。另一种是绩效提成，行话叫“carry”。若投资赚了钱，GP要先偿还LP的本金和事先约定的基本收益（一般为8%），若还有多余利润，GP可从中提成，一般为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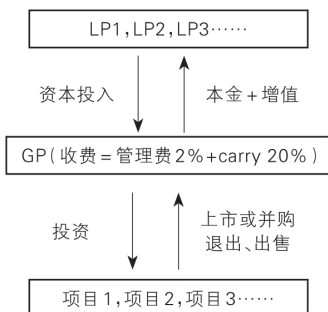


图4-1 私募基金基本运作模式

举个简化的例子。LP投资100万元，基金延续两年，GP每年从中收取2万元管理费。若两年后亏了50万，那GP就只能挣两年总共4万的管理费，把剩下的46万还给LP，LP认亏。若两年后挣了50万，GP先把本金100万还给LP，再给LP约定的每年8%的收益，也就是16万。GP自己拿4万元管理费，剩下30万元的利润，GP提成20%也就是6万，剩余24万归LP。最终，GP挣了4万元管理费和6万元提成，LP连本带利总共拿回140万元。

GP的投资对象既可以是上市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二级市场），也可以是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一级市场），还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一级半市场）。若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那最终的“退出”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把公司包装上市后出售股权、把股权出售给公司管理层或其他投资者、把公司整体卖给另一家并购方等。

LP和GP这种特殊的称呼和合作方式，法律上称为“有限合伙制”。与常见的股份制公司相比，“有限合伙”最大的特点是灵活。股份制公司一般要求“同股同权”和“同股同利”。无论持股多少，每一股附带的投票权和分红权是一样的，持有的股票数量越多，权利越多。但在“有限合伙”中，出钱的是LP，做投资决定的却是GP，LP的权利相当有限。不仅如此，若最后赚了钱，最初基本没出钱的GP也可以分享利润的20%。⁽⁴⁹⁾此外，股份公司在注册时默认是永续经营的，但私募基金却有固定存续期，一般是7—10年。在此期限内，基金要经历募资、投资、管理、退出等四个阶段（统称“募投管退”），到期后必须按照合伙协议分钱和散伙。⁽⁵⁰⁾

在这种合作方式下，活跃在投资舞台镁光灯下的自然就是做具体决策的GP。很多投资业绩出众的GP管理机构和明星管理人大名鼎鼎。他们的投资组合不仅财务回报率高，而且包括了诸多家喻户晓的明星企

业，行业影响力很大。这些明星GP受市场资金追捧，募集的基金规模动辄百亿元。

相比之下，出钱的LP们反倒低调得多。国际上规模大的LP大都是机构投资者，比如美国最大的LP就包括加州公立系统雇员养老金（CalPERS）和宾州公立学校雇员退休金（PSERS）等。一些国家的主权投资机构也是声誉卓著的LP，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和GIC、挪威主权财富基金（GPF）等。而国内最大的一类LP就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基金比如规模庞大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著名的“大基金”），也有地方政府的基金，比如深圳市引导基金及其管理机构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即著名的“深创投”）。

与地方政府投资企业的传统方式相比，产业引导基金或投资基金有三个特点。第一，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企业。一支私募基金的LP通常有多个，不止有政府引导基金，还有其他社会资本。因此通过投资一支私募基金，有限的政府基金就可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目标产业，故称为“产业引导”基金。同时，因为政府引导基金本身就是一支基金，投资对象又是各种私募基金，所以也被称为“基金中的基金”或“母基金”（fund of funds, FOF）。第二，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实质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其中涉及诸多制度改革，也在实践中遭遇了各种困难（见下文）。第三，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有别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常见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见第三章）。

上一章介绍城投公司的时候解释过，政府不可以直接向银行借贷，所以需要设立城投公司。政府当然也不可以直接去资本市场上做股权投资，所以在设立引导基金之后，也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去管理和运营这支基金，通过这些公司把基金投资到其他私募基金手中。这些公司的运作模式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与城投公司类似，是政府独资公司，如曾经投资过京东方的北京亦庄国投，就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100%股权。第二类是混合所有制公司。比如受托管理深圳市引导基金的深创投，其第一大股东是深圳市国资委，但持股占比只有28%左右。第三类则有点像上一章中介绍的华夏幸福。很多小城市的引导基金规模很小，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为其组建一家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干脆把钱委托给市场化的母基金管理人去运营，比如盛

政府引导基金的概念很容易理解。在国际上，作为机构投资者的LP早就有了多年的运作经验，组建了国际行业协会，与全球各种机构型LP分享投资与治理经验。⁽⁵¹⁾但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需要三个外部条件。首先是制度条件。要想让财政预算资金进入风险很大的股权投资领域，必须要有制度和政策指引，否则没人敢做。其次是资本市场的发育要比较成熟。政府基金要做LP，市场上最起码得有足够多的GP去管理这些资金，还要有足够大的股权交易市场 and 退出渠道，否则做不起来。再次是产业条件。产业引导基金最终要流向高技术、高风险的战略新兴行业，而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样的企业才会大批出现。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制度条件

2005年，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门首次明确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投企业的设立与发展。⁽⁵²⁾2007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施行，LP/GP式的基金运作模式正式有了法律保障。本土第一批有限合伙制人民币基金随后成立。2008年，国务院为设立引导基金提供了政策基础，明确其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明确了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按照“母基金”的方式运作，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增加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同时要求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市场化运作。这16个字成了各地引导基金设立和运作的基本原则。⁽⁵³⁾

政府的钱以“股权”形式进入还未上市的企业之后，如果有一天企业上市，这些“国有股份”怎么办？要不要按照规定在IPO（首次公开募股）时将10%的股份划转给社保基金？⁽⁵⁴⁾如果要划转，那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政府出资人，恐怕都不愿意。因此，为提高国有资本从事创业投资的积极性，2010年财政部等部门规定：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机构和国有创投引导基金，可在IPO时申请豁免国有股转持义务。⁽⁵⁵⁾

GP的收费也是个问题。虽然2%的管理费和20%的业绩提成是国际惯例，但如果掌管的是财政资金，也该收取这么高比例的提成么？2011年，财政部和发改委确认了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原则，明确了GP在收取管理费（一般按1.5%—2.5%）的基础上可以收取增值收益部分的20%，相当于承认了GP创造的价值，不再将GP仅仅视作投资“通道”。⁽⁵⁶⁾

以上政策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其爆发式发展却是在2014年前后，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围绕新版《预算法》的一系列改革。改革之前，地方政府经常利用预算内设立的各种专项基金去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补贴（如第三章中介绍的成都市政府对成都文旅的补贴）。而在2014年改革后，国务院开始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这些原本用于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财政资金，就必须寻找新的载体和出路，不能趴在账上。因为新《预算法》规定，连续两年还没花出去的钱，可能将被收归同级或上级财政统筹使用。⁽⁵⁷⁾

到了这个阶段，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搭好，地方政府也需要为一大笔钱寻找出路，产业引导基金已是蓄势待发。但这毕竟是个新事物，还需要更详细的操作指南。自2015年起，财政部和发改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细则，为各地提供了行动指南。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再次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允许使用财政资金的政府投资基金出现亏损。第二，明确了财政部门虽然出资，但“一般不参与基金日常管理事务”，并且明确要求各地财政部门配合，“积极营造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政府投资基金实现市场化运作。⁽⁵⁸⁾

之后，政府引导基金就进入了爆发期。根据清科数据，2013年全国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已到位资金约400亿元，而2014年一年就暴增至2122亿元，2015年3773亿元，2016年超过了1万亿元。很多著名的产业引导基金都创办于这一阶段，比如2014年工信部设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首期规模将近1400亿元。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也成立于这个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金融和产业条件

引导基金大多采用“母基金”方式运行，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于市场化的私募基金，通过后者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这种模式的繁荣，需要三个条件：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参与投资、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畅通的资本市场退出渠道。

21世纪头十年，为资本市场发展打下制度基础的是三项政策。第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风险投资机制等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问题，是证券市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⁵⁹⁾第三，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开始实施，正式把发起人股和风投基金持股区别对待。上市后发起人股仍实行3年禁售，但风投基金的禁售期可缩短至12个月，拓宽了退出渠道。同年，证监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了IPO的审核标准。⁽⁶⁰⁾

这些政策出台前后，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也做了很多改革，拓宽了上市渠道。2004年和2009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分别在深交所开板。2013年，新三板扩容全国。2019年，科创板在上交所开市，并试行注册制。国内上市渠道拓宽后，改变了过去股权投资机构“两头在外”（海外募资，海外上市、退出）的尴尬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开始由人民币基金主导，外币基金不再重要。

至于可以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的“社会资本”，既包括大型企业的投资部门，也包括其他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后者也随着21世纪的各项改革而逐步“解放”，开始进入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比如，在2010年至2014年间，保监会的一系列规定让保险资金可以开始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以及创投基金。⁽⁶¹⁾

所以2006年至2014年，我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很快，一大批优秀的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和人才开始涌现。2014年，境内IPO重启，股权投资市场开始加速发展。也是从这一年起，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趋势和股权投资基金整体的发展趋势开始合流，政府资金开始和社会资本融合，出现了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财政资源的重要现象。政府引导基金也逐渐成为各类股权投资基金最为重要的LP之一。

绝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最终都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产业”），这是由这类产业的三大特性决定的。首先，扶持和发展战新产业是国家战略，将财政预算资金形成的引导基金投向这些产业，符合政策要求，制度上有保障。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国务院都对发展战新产业做了专门的规划，将其视为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要求2015年战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需达到8%（已实现）；2020年达到15%；2030年，战新产业应该发展成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

导力量，使我国成为世界战新产业重要的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在这两个五年规划中，都提出要加大和创新财税与金融政策对战新产业的支持，明确鼓励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扩大投资规模，促进战新产业快速发展。

其次，战新产业处于技术前沿，高度依赖研发和创新，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更需要能共担风险并能为企业解决各类问题的“实力派”股东。从企业角度看，引入政府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不仅引入了资金，也引入了能帮企业解决困难的政府资源。而从政府角度看，股权投资最终需要退出，不像补贴那样有去无回。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与不用偿还的补贴相比，产业基金对被投资企业有更强的约束。

再次，很多战新产业正处在发展早期，尚未形成明显的地理集聚，这让很多地方政府（如投资京东方的合肥、成都、武汉等）看到了在本地投资布局的机会。而“十三五”关于发展战新产业的规划也鼓励地方以产业链和创新协同发展途径，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形成创新经济集聚发展新格局。

引导基金的成绩与困难

最近几年，在公众熟知的很多新技术领域，比如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大多数知名企业和投资基金的背后都有政府引导基金的身影。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了针对我国产业和科技政策的“301调查报告”，其中专门用了一节来讲各类政府产业引导基金。⁽⁶²⁾调查发布后，该报告中提到的基金还收到了一些同行发来的“赞”：工作业绩突出啊，连美国人都知道你们了。

引导基金成效究竟如何，当然取决于这些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情况。成了，引导基金就是巨大的贡献；不成，就是巨大的浪费。投资的道理由结果决定，历来如此，当下言之尚早。从目前情况看，撇开投资方向和效益不论，引导基金的运营也面临多种困难和挑战。与上一章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同，这些困难不是因为地价下跌或债台高筑，而属于运用财政资金做风险投资的体制性困难。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虽然原则上引导基金可以亏钱，但对基金的经营管理者而言，亏了钱不容易向上级交待。当然，对大多数引导基金而言，只要不亏大钱，投资的财务回报率高低并非特别重要，关键还是招商引资，借助引导基金这

个工具把产业带回本地，但这就带来了第二类困难。

第二类困难源自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机构类LP追求的就是财务回报，并不关心资金具体流向什么区域，哪里挣钱就去哪里。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源自地方财政，本质还是招商引资工具，所以不可能让投资流到外地去，一定要求把产业带到本地来。但前两章反复强调过，无论是土地还是税收优惠，都无法改变招商引资的根本决定因素，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前景。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一些中心城市，大企业云集，各种招商引资工具包括引导基金，在完成招商目标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其他地区，引导基金招商作用其实不大，反而造成了新的扭曲。有些地方为吸引企业，把本该是股权投资的引导基金变成了债权工具。比如说，引导基金投资一亿元，本应是股权投资，同赚同亏，但基金却和被投企业约定：若几年后赚了钱，企业可以低价回购这一亿元的股权，只要支付本金再加基本利率（2%—5%）就行；若企业亏了钱，可能也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偿还这一亿元本金。这就不是股权投资了，而是变相的低息贷款。再比如，引导基金为吸引其他社会资本一起投资，承诺未来可以收购这些社会资本的股权份额，相当于给这些资本托了底，消除了它们的投资风险，但同时也给本地政府增加了一笔隐性负债。这种“名股实债”的方式违背了股权投资的原则，也违背了“去杠杆”和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初衷，是中央明确禁止的。⁽⁶³⁾

第三类困难源于资本市场。股权投资对市场 and 资金变化非常敏感，尤其在私募基金领域。在一支私募基金中，作为LP之一的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份额一般不会超过20%。换句话说，若没有其他80%的社会资本，这支私募基金就可能募集失败。在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见第六章）之后，各种社会资本急剧萎缩，大批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倒闭，很多引导基金也独木难支，难有作为。

第四类困难是激励机制。私募基金行业收入高，对人才要求也高。而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脱胎自政府和国企，一般没有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不了很多专业人才，所以才采用“母基金”的运作方式，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GP去管理。但要想和GP有效沟通、监督其行为、完成产业投资目标，引导基金管理机构业务水平也不能落伍，也需要吸引和留住人才，所以需要在体制内调整薪酬结构。各地做法差异很大。在市场化程度高、制度比较灵活的地方如深圳，薪酬也更加灵活一些。但在大部分地区，薪酬激励机制仍是很难突破的瓶颈。

结语

经济发展是企业、政府、社会合力的结果，具体合作方式取决于各自占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禀赋的分布格局由历史决定。我国的经济改革脱胎于计划经济，政府手中掌握大量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土地、银行、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所以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深度参与工业化进程。政府和市场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要想认识复杂的世界，需要小心避免政府和市场的二分法，下过于简化的判断。

因此，本章尽量避免抽象地谈论产业发展和政府干预，着重介绍了两个具体行业的发展过程和一个特定产业政策工具的运作模式，希望帮助读者了解现象的复杂和多面性。大到经济发展模式、小到具体产业政策，不存在脱离了具体场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根据现实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工具需要不断发展和变化，因为政府能力和市场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的真实发展历程，了解其经历的具体困难和脱困方式，比夸夸其谈的“华盛顿共识”更有启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制环境不理想、资本市场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体、以土地为杠杆，可以撬动大量资源，加速投资进程，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这种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会带来如下后果：与土地相关的腐败猖獗；城市化以“地”为本，忽略了“人”，民生支出不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房价飞涨，债务急升；经济过度依赖投资，既表现在民众收入不高所以消费不足，也表现在过剩产能无法被国内消化、向国际输出时又引起贸易失衡和冲突。这些都是近些年的热点问题，催生了诸多改革，本书下篇将逐一展开讨论。

扩展阅读

工业生产离日常生活比较远，所以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最好还是先从感性认识入手。近些年中央电视台拍了很多关于我国工业的纪录片，其中《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创新中国》《大国工匠》《军工记忆》等都值得一看。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很不容易，有很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如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等，这些在上述影像记录中都能看到。

关于行业和企业的研究著作，我首先推荐北京大学路风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2016），讲的是京东方和光电显示行业的故事。这本大书充满了精彩的细节，虽然是单一行业和企业的故事，但如此深度和详细的记录，国内罕见。其中很多对技术工人和经理的访谈非常宝贵，有很多被传统分析和理论抽象掉的重要信息。路风教授研究其他行业的文章结集也都很好，比如《走向自主创新：寻找中国力量的源泉》（2019）和《新火：走向自主创新2》（2020），讲述了我国汽车、大飞机、核能、高铁等行业的发展故事。而对于新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企业和投资故事，吴军的《浪潮之巅》通俗精彩，已经出到了第四版（2019）。

如果想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国家兴衰角度去看待工业投资和发展，我从诸多杰作中推荐三种读物。其共同点是“能大能小”，讲的是经济发展和历史大故事，但切入点还是具体产业和企业。哈佛商学院麦克劳的《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1999）和哈佛大学史学家贝克特的《棉花帝国》（2019）都是杰作，书名解释了内容。斯塔威尔的《亚洲大趋势》（2014）讲的是我们的近邻日韩以及中国自己的成功故事，也对比了一些东南亚的失败故事，思路和结构清楚，案例易懂。无论是制度也好、战略也罢，终究离不开人事关系。事在人为，理解这其中所蕴含的随机性，是理解所谓“entrepreneurship”的起点。相比于“企业家精神”，这个词更应该翻译为“进取精神”，不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社会各界都离不开这种精神。

- (1) 关于这个道理，更详细的阐述可以参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文章（2020）和另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著作（2020）。
- (2) 数据来自中信证券袁健聪等人的行业分析报告（2020）。
- (3) 数据来自北京大学路风的企业史杰作（2016）。如无注明，本节关于京东方发展

历程的介绍均来自该书。

- (4) 见财新网2013年1月4日报道《发改委就三星等垄断液晶面板价格案答问》，以及《中国贸易报》2016年8月2日报道《中企面临反垄断三大挑战四大风险》。
- (5) 简单来说，“X代线”中的X数字越高，产出的屏幕就越大。比如5代线的主打产品是17吋屏，6代线的主打产品是32吋屏。
- (6) 贷款和补贴的具体数字，来自财新网2007年4月16日的文章《疯狂的液晶》。
- (7) 合肥建投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了这次增发。
- (8) 数据来自京东方2009—2011年的年报。从京东方的角度看，大规模定向增发的募资其实不容易，需要找到足够多的机构投资者。倘若合肥政府财力雄厚的话，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 (9) 2009年国务院发布《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 (10) 见京东方2009年年报。
- (11) 这部分贷款贴息由高新区政府支付给成都高投，算作这家城投公司的营业外收入，而不算在京东方的账上，虽然补贴的是京东方。这些财务细节来自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在债券市场上的募集说明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上海清算所的网站上下载。
- (12) 见京东方2014年年报。
- (13) 关于合肥建投对10.5代线的资金投入细节，来自其公司网站上的“大事记”。
- (14) 华星光电和TCL的数据来自《财新周刊》2019年第2期文章《李东生闯关》。
- (15) 产业之间的联系紧密而复杂，犹如巨网。有些产业的外溢性极强，政府若扶持这些产业，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这方面研究很多，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刘斯原的论文（Liu, 2019）。
- (16) 关于世界银行的质疑，来自史塔威尔（Studwell）关于亚洲发展的著作（2014）。
- (17) 关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产业政策有很多研究，基本过程和事实是清楚的。但严谨的微观数据分析尤其是对上下游产业的价格和产出等影响的估计，最近才有，详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莱恩（Lane）的论文（2019）。当然，政府扶持不是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政府扶持和大量资金的投入无疑是这些产业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 (18) 关于光电显示产业链国产化的分析报告很多，因为其中不少国内企业规模已经不小，成了上市公司，比如三利谱和精测电子等。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本地供应链企业的正面拉动作用，有很多研究，几乎算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定论了，读者可以参考哈夫拉内克（Havranek）和伊尔索娃（Irsova）的总结性论文（2011）。
- (19) 国际贸易并不是无条件双赢的。在引入动态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之后，自由贸易可能会损害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读者可参考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Krugman）的论文（1987）、伦敦政经学院阿温·杨（Alwyn Young）的论文

- (1991)或数学家戈莫里(Gomory)和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的著作(2000)。
- (20) 关于自主创新,北京大学路风的著作(2016,2019,2020)中有很多精彩而独到的分析。
- (21) 具体数据参见IMF两位经济学家的论文(Cherif and Hasanov,2019)。
- (22) 韩国的出口数据来自IMF两位经济学家的论文(Cherif and Hasanov,2019)。北京大学林毅夫关于“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的理论被称为“新结构经济学”,读者可以阅读他的著作(2014),其中也包括很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讨论以及林教授回应。这些对话和争论非常精彩,可以帮助理解和澄清很多问题。
- (23) 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和杨继东(2019)统计了我国1240种出口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其中有196种商品2016年在国际上有比较优势,但1995年没有。这些新增产品很多来自复杂程度较高的行业,比如机械、电器、化工等。
- (24) 产品复杂度的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项目。
- (25) 密歇根大学列夫琴科(Levchenko)的论文(2007)分析了制度质量和产品复杂性之间的关联。
- (26) 来自2013年《环球企业家》的文章《烧钱机器京东方:国开行200亿融资背后的政商逻辑》。转引自搜狐财经频道<https://m.sohu.com/n/364543762/>。
- (27) 在“新经济地理学”或“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中,产业一旦形成,经济力量就会加速地理集聚。但对集聚的具体位置而言,“初始条件”影响很大,对初始条件的微小干预就可能影响最终的产业地理格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若追溯很多产业集聚地区的历史根源,都会发现一些偶然因素曾发挥过关键作用,比如在京东方的例子中是合肥时任领导的支持。克鲁格曼写过一本小册子(2002),讲述了这种偶然性和经济力量的结合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28) 见《财新周刊》2019年第44期的文章《面板产能过剩 地方国资投资冲动暗藏隐忧》。
- (29) 我国光伏产业规模的数据来自中信证券弓永峰和林劼的研究报告(2020)。
- (30) 全球光伏组件价格的降幅估算来自能源专家、普利策奖得主耶金(Yergin)的著作(2020)。全球和我国装机总量的数据来自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智库REN21的报告(2020)。
- (31) 关于光伏产业的早期发展史,可以参考西瓦拉姆(Sivaram)的专著(2018)。
- (32) 光伏上市公司数量来自《中国改革》2010年第4期文章《太阳能中国式跃进》。
- (33) 数据来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37期的文章《破产重整的赛维样本》。
- (34) 光伏企业数量和出口的数据来自兴业证券朱玥的报告(2019)。国内市场销量占比数据来自西瓦拉姆(Sivaram)的著作(2018)。
- (35) 参见《江苏省光伏发电推进意见》(苏政办发[2009]85号)。
- (36) 2011年7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核

定上网电价为每度电1.15元。2013年8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布后，开始实行分区上网电价。

- (37) 上海对不同用电量实行差别定价。《上海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中详细规定了对海上风电和光伏电站的补贴办法。
- (38) 数据来自兴业证券朱玥的报告（2019）。
- (39) 欠补总额的数据来自《财新周刊》2018年第25期的封面文章《巨额补贴难支光伏断奶》。关于电网建设和消纳新能源电量之间的矛盾，相关报道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 (40) 关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变的动态过程及其中最优的税收和补贴政策组合，可以参考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人的论文（2016）。
- (41) 进入全球市场会提升本国企业效率，不仅是由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可以提升效率，也是由于更大规模的市场会提升高效企业的市场份额，压缩低效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便是经典贸易理论“Melitz模型”的核心思想。读者可以参考哈佛大学梅里兹（Melitz）和多伦多大学特雷夫莱（Trefler）的介绍性文章（2012）。
- (42) 不确定性对投资行为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是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很长的研究传统。读者可参考斯坦福大学布鲁姆（Bloom）对这个领域精彩且通俗的介绍（2014）。
- (43) 第一个因素被称为“潮涌现象”，详见北京大学林毅夫、巫和懋和邢亦青的论文（2010）。第二个因素被称为“Oi-Hartman-Abel”效应，即企业可以通过扩张（此处指建厂）获得好处，同时可以通过收缩（此处指投产后调整产能）避免风险，详见斯坦福大学布鲁姆（Bloom）的论文（2014）。第三个因素，即各地产业扶持目标逐渐和中央产业政策趋同的现象，见复旦大学赵婧和陈钊的论文（2019）。
- (44) 中欧商学院叶恩华（George Yip）和布鲁斯·马科恩（Bruce Mckern）的著作（2016）系统分析了我国企业成本创新的很多案例。
- (45) 关于市场经济的核心不是决策优势而是优胜劣汰的思想，已故经济学家阿尔钦（Alchian）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1950）今天看依然精彩。
- (46) 我国竞争性的产业政策，比如针对全行业的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对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和效率有正面作用，参见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和马里兰大学蔡婧等人的论文（2015）。
- (47) 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财新周刊》2017年第37期的报道《破产重整的赛维样本》。
- (48) 清科和投中是两家研究私募基金的国内机构。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不完全、不透明，所以不同的估计差别很大，此处的数字引自《财新周刊》2020年第39期的封面报道《监管十万亿私募股权基金》。在私募基金行业，基金的目标规模通常并不重要，实际募资和到位资金一般远小于目标规模。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天文数字般的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没有太大意义。
- (49) 在实际运作中，LP也会设计各种各样的机制来监督和激励GP，使其行事符合LP

利益。比如出资较多的LP可能要求参与GP的投资决策，在GP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有一席投票权或否决权，或者派出观察员。再比如在组建基金时，GP通常也会象征性地投入一些钱，以示与LP利益绑定，一般就是LP出资总额的1%—2%。

- (50) 私募基金兴起于美国，与资本市场上的“杠杆收购”（leverage buy-out）紧密相关。这种金融工具的兴起，背后有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包括对公司角色认知的转变、全球化后劳资关系的转变、金融管制放松等。美国智库CEPR的阿佩尔鲍姆（Appelbaum）和康奈尔大学巴特（Batt）的著作（2014）对私募基金和杠杆收购的时代背景和逻辑做了精彩的分析和介绍。
- (51) 如2002年在华盛顿成立的“机构类LP协会”（Institutional Limited Partner Association, ILPA）。
- (52) 200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 (53)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
- (54) 2002年财政部规定，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要把发行股数的10%划转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2009年，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联合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凡在境内IPO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IPO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国有股东持股数量少于应转持股份数量的，按实际持股数量转持。
- (55) 2010年，财政部联合国资委和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发布《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 (56) 2011年，财政部和发改委发布《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57) 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坚决予以取消”。关于财政结余资金，新版《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金管理。”
- (58) 2015年最后两个月，财政部连续发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和《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 (59) 我国股市上曾经有三分之二的股权不能流通，这种“股”和“权”分置的状况让非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受到严重限制，造成了很多扭曲。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开始。
- (60) 2006年，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管理办法》。
- (61) 2010年，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暂行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公

司直接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或者将总资产的4%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2014年，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为险资进入创投基金扫清了障碍。

- (62) 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调查报告”：“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 (63) 根据海通证券姜超、朱征星、杜佳等人的估计（2018），截至2017年底，由PPP和政府基金所形成的各类“名股实债”，总额约3万亿元左右。2017年初，发改委出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名股实债等变相增加政府债务的行为”。

下篇 宏观现象

上篇介绍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优点是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第五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土地流转和户籍改革等要素市场的改革。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优点是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缺点是加重了债务负担。企业、地方政府、居民三部门债务互相作用，加大了经济整体的债务和金融风险。第六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详述“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第三个特点是发展战略“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优点是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外贸易，使我国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缺点是经济结构不平衡。对内，资源向企业部门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加剧了贸易冲突。第七章分析这些内容，并介绍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主要矛盾”后的相关改革，详述“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改革。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教书久了，对年轻人不同阶段的心态深有体会。大一新生刚从中学毕业，无忧无虑，爱思考“为什么”；大四毕业生和研究生则要走向社会，扛起工作和生活的重担，普遍焦虑，好琢磨“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

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手段。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积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198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足两成，2019年超过了六成（见图5-1）。短短40年，超过5亿人进了城，这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化奇迹。但若按户籍论，2019年的城镇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4%，比常住人口占比少了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超过2亿人虽然常住城镇，却没有当地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因为这些服务的供给是按户籍人数来规划的。这种巨大的供需矛盾，让城市新移民没有归属感，难以在城市中安身立命，也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扭转这种现状，让城市化以人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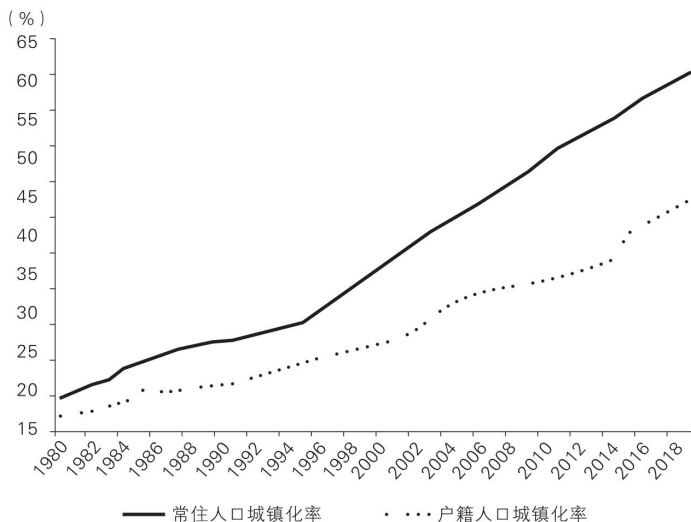


图5-1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与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章第一节分析房价和土地供需间的关系，讨论高房价带来的日益沉重的居民债务负担。第二节分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其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限，所以近年来在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第三节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这一现象也和房价以及要素市场改革有关。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1994年分税制改革（第二章）是很多重大经济现象的分水岭，也是城市化模式的分水岭。1994年之前实行财政包干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农民离土不离乡，大多就地加入乡镇企业，没有大量向城市移民。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大潮开始形成。从图5-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镇常住人口自1995年起加速上涨，城市化逐渐进入了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要推手的阶段。这种模式的关键是房价，所以城市化的矛盾焦点也是房价。房价短期内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求决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屋供需都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年轻人是买房主力。年轻人大都流入经济发达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

房价与土地供需

现代经济集聚效应很强，经济活动及就业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高价竞争城市住房。这种需求压力是否会推升房价，取决于房屋和住宅用地供给是否灵活。若政策严重限制了供给，房价上涨就快。一个地区的土地面积虽然固定，但建造住宅的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同一块住宅开发用地上，容积率和绿化面积也可以调整。⁽¹⁾这些调整都受政策的影响。美国虽然是土地私有制，但城市建设和用地规划也要受政府管制。比如旧金山对新建住房的管制就特别严格，所以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房价也不便宜。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投机大潮中，旧金山的住房建设指标并没有增加，房价于是飙升。再比如亚特兰大，住房建设指标能够灵活调整，因此虽然也有大量人口涌入，但房价一直比较稳定。⁽²⁾

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很快。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全国商品房均价在20年间涨了4.2倍。但各地涨幅大不相同。三、四线城市在2015年实行货币化棚改（见第六章）之前，房价涨幅和当地人均收入涨幅差不多；但在二线城市，房价就比人均收入涨得快了；到了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了收入：2015年之前的十年间，北、上、广、深房价翻了两番，年均增速13%。⁽³⁾

地区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人口大量涌入的大城市，居住用地的供给速度远赶不上人口增长。2006年至2014年，500万人和10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城区人口增量占全国城区人口增量的近四成，但居住用地增量才占全国增量的两成，房价自然快速上涨。而在300万人以下尤其是10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中，居住用地增量比城镇人口增量更快，房价自然涨不上去。从地理分布上看，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要比用地增速高出近10%，住房十分紧张；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反过来，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得比人口快。⁽⁴⁾

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所以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2003年后的十年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给不但没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倾斜，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2003年，中西部土地供给面积占全国新增供给的比重不足三成，2014年上升到了六成。2002年，中小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全国的比重接近一半，2013年上升到了64%。⁽⁵⁾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然而这种土地倾斜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流向，人还是不断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集聚。这些地区不仅房价一直在涨，大学的高考录取分数也一直在涨。中西部房价虽低，但年轻人还是愿意到房价高的东部，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资源。倾斜的土地政策并没有留住人口，也很难留住其他资源。很多资本利用了西部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土地，套取了资源，又回流到东部去“炒”房地产，没在西部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体，只给当地留下了一堆债务和一片空荡荡的工业园区。

建设用地指标不能在全国交易，土地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虽然激烈，也经常以土地作为手段，却很难持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发达地区土地需求旺盛，地价大涨，本应增加用地指标，既满足需求也抑制地价。但因为土地分配受制于行政边界，结果却是欠发达地区能以超低价（甚至免费）大量供应土地。这种“东边干旱，西边浇水”的模式需要改革。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见第二节），已是针对这一情况的改革尝试。⁽⁶⁾

房价与居民债务：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居民债务主要来自买房，房价越高，按揭就越高，债务负担也就越重。各国房价上涨都是因为供不应求，一来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二来土地和银行按揭的供给都受政治因素影响。

在西方，“自有住房”其实是个比较新的现象，“二战”之前，大部分人并没有自己的房子。哪怕在人少地多的美国，1900—1940年的自有住房率也就45%左右。“二战”后这一比率才开始增长，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达到68%。英国也差不多，“二战”前的自有住房率基本在30%，战后才开始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70%。^⑦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英美大部分人都租房，所以主流经济学教材在讲述供需原理时，几乎都会用房租管制举例。1998年，我第一次了解到房租管制，就是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逻辑虽容易理解，但并没有直观感受，因为当时我认识的人很少有租房的，农民有宅基地，城里人有单位分房。城市住房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也是个新现象。

欧美自有住房率不断上升，有两个后果。第一是对待房子的态度变化。对租房族来说，房子就是个住的地方，但对房主来说，房子是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房子数量和价格的攀升，房产成了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50年至2010年，英国房产价值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36%上升到57%，法国从28%升到61%，德国从28%升到57%，美国从38%升到42%。^⑧第二个变化是随着房主越来越多，得益于房价上涨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政府为讨好这部分选民，不愿让房价下跌。无房者也想尽快买房，赶上房价上涨的财富快车，政府于是顺水推舟，降低了买房的首付门槛和按揭利率。

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选举政治紧密相关。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迅速扩大，造成了很多政治问题。而推行根本性的教育或税制等方面的改革，政治阻力很大，且难以在短期见效。相比之下，借钱给穷人买房就容易多了，既能缓解穷人的不满，让人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又能抬高房价，让房主的财富也增加，拉动他们消费，创造更多就业，可谓一举多得。于是政府开始利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以下简称“两房”）来支持穷人贷款买房。“两房”可以买入银行的按揭贷款，相当于借钱给银行发放更多按揭。^⑨1995年，克林顿政府规定“两房”支持低收入者的房贷要占到总资产的42%。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比率提高到50%。2004年，小布什政府将这一比率进一步提高到56%。^⑩“两房”也乐此不疲，因为给穷人的贷款利润较高，风险又似乎很低。此外，对购

房首付的管制也越来越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很多房贷的首付为零，引发了投机狂潮，推动房价大涨。根据Case-Shiller房价指数，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平均涨了将近60%。危机之后，房价从2007年的最高点一直下跌到2012年，累积跌幅27%，之后逐步回升，2016年才又回到十年前的高点。

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加大家庭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消费占美国GDP的七成，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大幅下挫，把经济推向衰退。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¹¹⁾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在2008年之前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房价上涨。涨幅越大的国家居民债务负担越重（绝大多数债务是房贷），危机中消费下降也越多。⁽¹²⁾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房价与居民债务：我国的情况

2008年之后的10年，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图5-2）。2018年末，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54%，虽仍低于美国的76%，但已接近德国和日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总量数据，居民债务中有53%是住房贷款，24%是各类消费贷（如车贷）。⁽¹³⁾这一数据可能还低估了与买房相关的债务。实际上一些消费贷也被用来买了房，比如违规用于购房首付。而且人民银行的数据还无法统计到民间借贷等非正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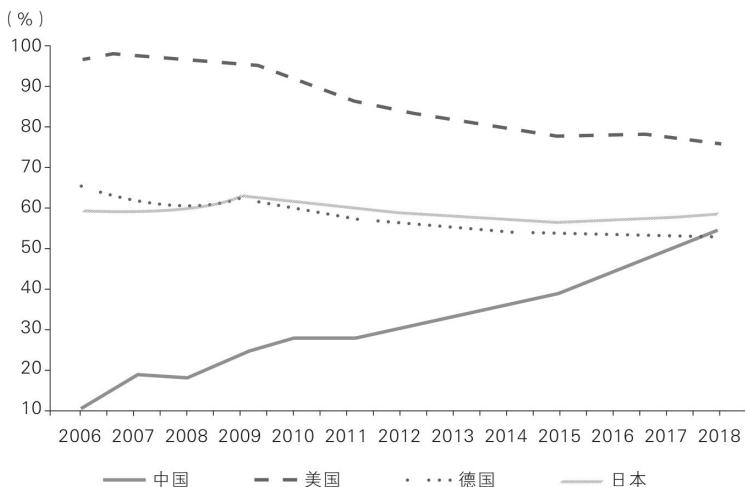


图5-2 居民债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图5-2中债务负担的分母是GDP，这一比率常用于跨国比较，但它低估了居民的实际债务负担。还债不能用抽象的GDP，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收入。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查了全国3万余户城镇居民（农民负债率一般较低，大多没有房贷）的收入和债务情况。接近六成家庭有负债，平均债务收入比为1.6，也就是说债务相当于1.6倍的家庭年收入。这个负担不低，接近美国。2000年，美国家庭负债收入比约为1.5，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飙升至2.1，之后回落到1.7左右。⁽¹⁴⁾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¹⁵⁾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总体看来，我国居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然影响到了消费。以买车为例，这是房子之外最贵的消费品类，对宏观经济非常重要，约占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车是典型的奢侈品，需求收入弹性很大，收入增加时需求大增，收入减少时需求大减。随着居民债务增加，每月还债后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所以经济形势一旦变差，买车需求就会大减。我国家用轿车市场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2018年的私家车数量是2005年的14

倍。但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贸易战”升级，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大，轿车销量开始下降，一直到2019年底，几乎每个月同比都在下降。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2月份的销量同比下跌八成，3月份同比下跌四成，各地于是纷纷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

房价与居民债务风险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不是净资产，未扣除房贷和其他负债）是893万元，上海是807万元，是新疆（128万元）和吉林（142万元）的六七倍。这个差距大部分来自房价。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一边很多房子空置。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净资产）算在一起的话，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201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49%，而最穷的40%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8%。⁽¹⁶⁾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trickle-down consumption），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¹⁷⁾2014—2017年间，我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储蓄基本为零甚至为负（入不敷出）。⁽¹⁸⁾自2015年起，信用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个人消费贷激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付体系运行情况的数据，2016—2018年这三年，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内合计的应偿还信贷余额年均增幅接近30%。2019年，信用卡风险浮现，各家银行纷纷刹车。

在负债的人当中，低收入人群的债务负担尤其重。城镇居民的平均债务收入比约为1.6，而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债务收入比接近3。资产最少的20%的家庭还会更多使用民间借贷，风险更大。⁽¹⁹⁾2020年，随着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各种讨论年轻人“纵欲式消费”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热烈，都与消费类债务急升的大背景有关。这种依靠借债的消费无法持续，因为钱都被花掉了，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负债率很高，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在2008年美国的房贷危机中，每4套按揭贷款中就有1套资不抵债，很多穷人的资产一

夜清零。2007年至2010年，美国最穷的20%的人，净资产从平均3万美元下降到几乎为零。而最富的20%的人，净资产只下跌了不到10%，从平均320万美元变成了290万美元，而且这种下跌非常短暂。2016年，随着股市和房市的反弹，最富的10%的人实际财富（扣除通货膨胀）比危机前还增长了16%。但收入底部的50%的人，实际财富被腰斩，回到了1971年的水平。40年的积累，在一场危机后荡然无存。(20)

我国房价和居民债务的上涨虽然也会引发很多问题，但不太可能突发美国式的房贷和金融危机。首先，我国住房按揭首付比例一般高达30%，而不像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可以为零，所以银行风险小。除非房价暴跌幅度超过首付比例，否则居民不会违约按揭，损失掉自己的首付。2018年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3%。(21)其次，住房按揭形成的信贷资产，没有被层层嵌套金融衍生品，在金融体系中来回翻滚，规模和风险被放大几十倍。2019年末，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RMBS）总量占按揭贷款的总量约3%，而美国这个比率为63%，这还不算基于这种证券的各种衍生产品。(22)再次，由于资本账户管制，外国资金很少参与我国的住房市场。综上所述，像美国那样由房价下跌引发大量按揭违约，并触发衍生品连锁雪崩，再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全球的危机，在我国不太可能会出现。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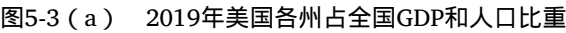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来，中央首次重新定义“主要矛盾”，说明经济政策的根本导向发生了变化。

过去40年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扩大，同期很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与它们相比，我国的收入差距有两个特点：一是城乡差距，二是地区差距。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倍，而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贵州、甘肃、西藏等地的3.5倍。这两项差距都与人口流动受限有关。

人口流动与收入平衡

低收入人群想要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这些城市能为低技能工作（如快递或家政）提供不错的收入。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拉大。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依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推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重土地轻人，民生支出不足，相关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供给不足，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户，不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地方政府长期倚重投资，还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对中低收入人群尤其不利。第七章会讨论这种分配结构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本节先聚焦人口流动问题。

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地区间平衡是个什么样子。图5-3（a）中的柱子代表美国各州GDP占美国全国的比重，折线则代表各州人口占比。美国各州GDP规模差别很大，仅加州就占了美国GDP的15%，而一些小州的占比连1%都不到。GDP衡量的是经济总量，人口越多的地方GDP自然越大，所以图中折线的高度和柱子高度差不多。假如一个州的GDP占比为3%，人口占比差不多也是3%。换句话说，州与州之间虽然规模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差别很小，无论生活在哪个州，平均生活水平都差不多。



省份	GDP占比 (%)	人口占比 (%)
广东	11.0	8.2
江苏	10.1	5.8
山东	7.2	7.2
浙江	6.3	4.1
河南	5.4	6.8
四川	4.6	6.1
湖北	4.1	4.8
福建	3.8	2.8
湖南	4.3	4.6
上海	3.8	1.6
安徽	3.4	4.4
北京	3.4	1.4
河北	3.4	5.4
陕西	2.4	2.8
辽宁	2.4	2.8
江西	2.4	3.1
重庆	2.4	2.1
云南	2.4	3.5
广西	2.4	3.5
内蒙古	1.4	1.6
山西	1.4	2.6
陕西	1.4	2.6
天津	1.4	1.1
黑龙江	1.4	2.6
新疆	1.4	1.8
吉林	1.4	1.8
甘肃	0.8	1.8
海南	0.4	0.6
宁夏	0.4	0.4
青海	0.4	0.4
西藏	0.1	0.1

图5-3 (b) 2019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占全国GDP和人口的比重⁽²³⁾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想达到地区间规模的平均是不可能的。让每个城市都像上海和北京一样，或者在内地再造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巨大的工业和物流网络（包

括港口），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现代经济越来越集聚，即使在欧美和日本，经济在地理上的集聚程度也依然还在加强，没有减弱。⁽²⁴⁾所以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教育和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目前城镇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六成，还有四成人口在农村，但农业产出仅占GDP的一成。四成人口分一成收入，收入自然就相对低。就算部分农民也从事非农经济活动（这部分很难统计），收入也还是相对低。所以，要鼓励更多人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市场规模大，分工细，哪怕低技能的人生产率和收入也更高。比如城市里一个早点摊儿可能就能够养活一家人，甚至有机会发展成连锁生意。而在农村，早餐都在家里吃，市场需求小，可能都没有专门做早餐的生意。类似的例子还有家政、外卖、快递、代驾、餐厅服务员等。因为人口密度高和市场需求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这些工作在大城市的收入都不低。

正是这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若没有物美价廉的服务，生活成本会急升。我家门口有一片商业办公楼宇，离地铁站很近，有不少餐厅。前几年很多服务业人员离开，餐厅成本急升，一些餐厅倒闭了，剩下的也都涨了价，于是带饭上班的白领就多了起来。如果一个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结果多半会事与愿违：服务业价格会越来越高，收入会被生活成本侵蚀，各种不便利也会让生活质量下降，“高端人才”最终可能也不得不离开。靠行政规划来限制人口规模，成功例子不多。人口不断流入的城市，规划人口往往过少；而人口不断流出的城市，规划人口往往过多。

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有做高端制造的，也有做中低端制造的，有做大规模农场的，也有搞旅游的。各地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模式，互通有无，整体效率和收入都会提高。就算是专搞农业的地方，人均收入也会提升，不仅因为规模化后的效率提升，也因为人口基数少了，流动到其他地方搞工商业去了。

让更多人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逻辑上的好处是清楚的，但在现实中尚有很多争议，主要是担心人口涌入会造成住房、教育、医疗、治安等资源紧张。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无限扩张。劳动力自由流动意味着有人来也有人走，若拥挤带来的代价超过收益，自会有人离开。至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缓解压力的根本之道是增加

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涌入城市的人是来工作和谋生的，他们不仅分享资源，也会创造资源。举个例子来说，2019年末，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共512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5%，老龄化严重。若没有不断涌入的城市新血，社保怎么维持？养老服务由谁来做？但如果为这些新移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覆盖有限，孩子上学难，看病报销难，他们便无法安居乐业。存在了很多年的“留守”问题，也还会持续下去。

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

增加城市中的学校和医院数量，可能还相对容易些，增加住房很困难。大城市不仅土地面积有限，而且由于对建设用地指标的管制，就算有土地也盖不了房子。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转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我国的土地分为两类（见第二章）：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在市场上流转；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流转受很多限制。要想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最直接的办法是让市区和近郊的集体建设用地参与流转。比如在北京市域内，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的五成，但容积率平均只有0.3—0.4，建设密度远低于国有土地。上海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总建设用地三成，开发建设强度也大大低于国有土地。^{〔25〕}

关于集体土地入市，早在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就有了原则性条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但地方有地方的利益，这些原则当时未能落到实处。2008年后的数年间，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土地财政 / 金融”的框架下征收集体用地，扩张城市。

自2015年起，全国33个试点县市开始试行俗称“三块地”的改革，即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在此之前也有一些零星的地方试点和创新，比较有名的是重庆的“地票”制度。若一个农民进了城，家里闲置两亩宅基地，他可以将其还原成耕地，据此拿到两亩地“地票”，在土地交易所里卖给重庆市域内需要建设指标的区县。按每亩“地票”均价20万元算，扣除两亩地的复耕成本约5万元，净所得为35万元。农户能分到其中85%（其余15%归村集体），差不多

30万元，可以帮他在城里立足。每年国家给重庆主城区下达的房地产开发指标约2万亩，“地票”制度每年又多供应了2万亩，相当于土地供给翻了一番，所以房价一直比较稳定。⁽²⁶⁾

2017年，中央政府提出，“在租赁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超大和特大城市，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试点”。⁽²⁷⁾这是一个体制上的突破，意味着城市政府对城市住宅用地的垄断将被逐渐打破。2019年，第一批13个试点城市选定，既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包括沈阳、南京、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²⁸⁾同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直接向市场中的用地者出让、出租或作价出资入股，不再需要先行征收为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与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从此拥有了同等权能，可以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城市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被打破了。

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只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宅基地，后者的面积占集体建设用地的一半。虽然宅基地改革的政策尚未落地，但在住房需求旺盛的地方，宅基地之上的小产权房乃至宅基地本身的“非法”转让，一直存在。2019年新版的《土地管理法》对宅基地制度改革只做了些原则性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2020年，中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继续探索“三权分置”，即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强调要守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在这些改革原则之下，具体的政策细则目前仍在探索阶段。

土地改革之外，在“人”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等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2013年，首次中央城镇化会议召开，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4年，两会报告中首次把人口落户城镇作为政府工作目标，之后开始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并逐步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包括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²⁹⁾2016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改进用地计划安排，实施“人地挂钩”，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一年度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合理安排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保障进城落户人口用地需求。⁽³⁰⁾

户籍制度改革近两年开始加速。2019年，发改委提出：“城区常住

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31〕}目前，在最吸引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落户门槛依然不低。虽然很多特大城市近年都加入了“抢人才大战”，放开了包括本科生在内的高学历人才落户条件，甚至还提供生活和住房补贴等，但这些举措并未惠及农村转移人口。这种情况最近也开始改变。2020年4月以来，南昌、昆明、济南等省会城市先后宣布全面放开本市城镇落户限制，取消落户的参保年限、学历要求等限制，实行“零门槛”准入政策。

一国之内，产品的流动和市场化最终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农产品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最终也该自主转让。人为限定城市土地可以转让而集体土地不能转让，用户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除非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否则难以持久。就算不谈权利和价值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些限定性的制度所带来的扭曲也会越来越严重，代价会高到不可维持，比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阐述了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未来改革方向。针对土地，《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针对劳动力，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总的改革方向，就是让市场力量在各类要素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让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在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本节讨论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第三，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收入差距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图5-4）。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中国，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中国。⁽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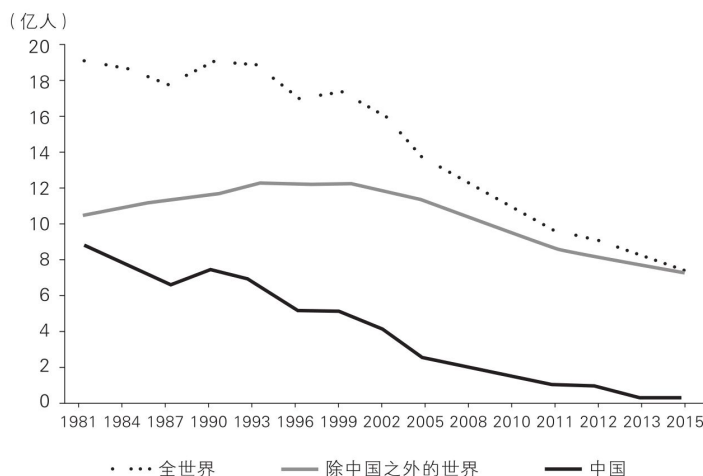


图5-4 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此处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为每人每日收入少于1.9美元。

中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局。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里几乎

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³³⁾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我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2017年上升到了0.47。⁽³⁴⁾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

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经济增长的果实是普惠的。1988年至2018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都增加了8—10倍。无论是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收入都在快速增加。以城镇居民为例，虽然收入最高的20%其实际收入3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收入最低的40%和居中的40%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³⁵⁾

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各种新机会的不断涌现，虽然不一定会降低收入差距，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一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对大多数“70后”来说，生活主要靠自己打拼，因为父母当年收入很低，储蓄也不多。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也要求“70后”必须掌握新的技能、离开家乡在新的地方工作，父母的技能和在家乡的人脉关系，帮助有限。

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父母的财富和资源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就大了。⁽³⁶⁾原因之一是财富差距在其父母一代中就扩大了，财产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扩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在一、二线城市，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收入涨幅。⁽³⁷⁾房产等有形财产与人力资本不同。人力资本无法在代际之间不打折扣地传承，但房产和存款却可以。聪明人的孩子不见得更聪明，“学霸”的孩子也不见得就能成为“学霸”。即使不考虑后天教育中的不确定性，仅仅是从遗传角度讲，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特征（如身高和智商等）也可能在下一代中有所减弱。因为这种“均值回归”现象，人力资本很难百分之百地遗传。但有形资产的传承则不受这种

限制，若没有遗产税，100万元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万元，100平方米的房子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平方米。

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如前文所述，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的人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最低的20%的人只占4%。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2019年净资产最高的20%的家庭占有居民全部净资产的65%，而最低的20%只占有2%。⁽³⁸⁾在经济发达、资产增值更快的沿海省份，父母累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在内地省份更大。⁽³⁹⁾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受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⁴⁰⁾

上文提到，198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中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约13倍，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在“经济蛋糕”膨胀的过程中，虽然高收入群体切走了更大一块，但所有人分到的蛋糕都比以前大多了，因此暂时可以容忍贫富差距拉大。美国情况则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穷人（收入最低的50%）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中产（收入居中的40%）的收入近40年的累积增幅不过区区35%，而富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却增长了2.5倍。因此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贫富差距。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穷人财富大幅缩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越来越严重。

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改革开放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经历都比较相似，或者在农村的集体生产队干活，或者在城镇的单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先富起来可能会给另一些人带来希望：“既然大家都差不多，那我也可以，也有机会。”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下海”发了财，而其他人在羡慕之余也有些不屑：“他们哪里比我强？我要去的话我也行，只不过我不想罢了。”但如果贫富差距中参杂了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那人们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些因素无法靠努力改变，所以穷人就更容易愤怒和绝望。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最高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的概率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却高达37%。⁽⁴¹⁾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而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大环境。我国的“70后”和“80后”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超过父辈。若父母属于收入最低的40%人群，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接近九成；即便父母属于收入居中的40%人群，子女超越的概率也有七成。这种情况很像美国的“战后黄金一代”。美国的“40后”和“50后”收入超越父母的概率很接近我国的“70后”和“80后”。但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母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还不到六成；若父母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⁴²⁾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伏的“波浪形”。⁽⁴³⁾造成这些起落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⁴⁴⁾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1994年之前，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小规模乡镇企业可以迅速切入本地市场，满足本地需求，而农村土地改革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乡镇企业崛起创造了条件。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出口开始加速。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大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城市。这种集聚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飞速发展，吸纳了从农村以及中小城市转移出来的新增劳动力。这些新一代移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很多“农二代”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更希望定居在城市。所以城市化需要转型，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必要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飞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累积的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风险。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经济？又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扩展阅读

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杠杆撬动的飞速城市化，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今站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2016）值得阅读。该书聚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主张扩大城市规模，让更多人定居在城市，在不断集聚中走向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北京大学周其仁的著作《城乡中国（修订版）》（2017）和东南大学华生的著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2014）也是理解城市化的上佳读物。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持不同观点。兼听则明，读者可自行判断。

经济学近年来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不平等，优秀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对比较严肃的读者，我还是推荐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2014）。这是本很多人知道但很少人读完的巨著，因为太厚了。但厚有厚的好处，这本大书里散落着很多有意思的内容，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各类书评中的“中心思想”所能概括。即便只读该书前两部分，也能学到关于经济发展的很多内容。对非专业读者而言，本书中有些内容不太容易理解，而且没有多少关于中国的内容。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两位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岳希明写了一本导读，《〈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2015），解释了原作中一些概念，也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和分析。

- (1) 容积率就是建筑面积和其下土地面积的比值，比值越高，建筑面积越大，楼层越高，容纳的人也越多。给定土地位置，规划容积率越高越值钱。厦门大学傅十和与暨南大学谷一桢等人的论文（Brueckner et al., 2017）发现，我国房地产开发限制越严格的地方，容积率和地价间关联越紧密。
- (2) 旧金山和亚特兰大的例子来自哈佛大学格莱泽（Glaeser）和沃顿商学院吉尤科（Gyourko）的论文（2018）。
- (3) 各类城市房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等人的论文（Fang et al., 2015）。
- (4) 不同地区城镇人口和土地数据来自恒大经济研究院任泽平、夏磊和熊柴的著作（2017）。
- (5) 数字来自复旦大学韩立彬和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论文（2018），他们详细分析了土地供给政策倾斜和地区间房价分化。
- (6) 2020年4月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 (7) 美国的数字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Spader, McCue and Herbert, 2016)。英国的数字来自三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Ryan-Collins, Lloyd and Macfarlane, 2017)。
- (8) 欧洲房产价值占国民财富比例大幅上升,与“二战”后经济复苏与重建有关。美国上升幅度相对较小,部分是因为美国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所以作为分母的国民财富增幅巨大。各国财富构成的数据来自巴黎经济学院皮凯蒂 (Piketty) 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祖克曼 (Zucman) 的论文 (2014)。
- (9) “两房”并非国企,而是和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私企,属于“政府支持企业”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享受各种政府优惠,也承担政策任务。“两房”可以从财政部获取信用额度,几乎相当于政府对其债务的隐性担保,虽然法律上政府并无担保义务。
- (10) 数据来自芝加哥大学拉詹 (Rajan) 的著作 (2015)。
- (11)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注重投资的作用。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但波动远比消费剧烈,常常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推手。随着对债务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迈恩 (Mian) 和芝加哥大学苏非 (Sufi) 的著作 (2015) 详细介绍了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和消费情况。
- (12) 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研究报告 (Glick and Lansing, 2010) 显示:2008年之前的10年间,欧美主要国家的房价和居民负债高度正相关,而负债越多的国家危机之后消费下降也越多。
- (13) 剩余23%是各种经营性贷款。我国的统计口径把所有部门分为政府、居民、企业,但居民中还包括各种非法人企业,比如个体户,所以居民贷款中含有经营性贷款。
- (14) 我国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 (2020)。美国数据来自美联储纽约分行的《家庭债务与信用季报》 (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 (15) 美国居民财富组成的数据来自美联储发布的2019年度美国金融账户组成数据。
- (16) 中央财经大学张川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贾坤、北京大学杨汝岱研究了房价和空置率的正向关系,认为二者同时受到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影响 (2016)。
- (17) 即低收入群体通过借贷消费,可参考芝加哥大学贝特朗 (Bertrand) 和莫尔斯 (Morse) 的论文 (2016)。
- (18) 储蓄不平等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甘犁、赵乃宝和孙永智等人的研究 (2018)。
- (19)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 (2020) 指出,资产最少的20%的负债家庭中,民间借贷占债务的比重将近10%。年收入6万元以下家庭的债务收入比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报告 (2019)。
- (20) 此处数字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 (2015) 以及德国波恩大学三位经济学家的论文 (Kuhn, Schularick and Steins, 2020)。

- (21)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的报告（2019）。
- (22) 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2019年末的美国数据也包含了商业地产，按揭总量数据来自美联储，住房按揭资产证券总量数据来自sifma网站。
- (23) 本图设计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我更新了数据。
- (24)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和城市化还在继续。
- (25) 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邵挺、清华大学田莉、中国人民大学陶然的论文（2018）。
- (26) “地票”价格和土地供应数据来自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的著作（2020）。
- (27) 2017年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 (28) 2019年，国土资源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合肥、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肇庆、成都等13个城市为第一批试点。
- (29) 在居民户口制度下，原城镇户口居民基本不受影响，原农业户居民可以继续保有和农村土地相关的权益（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且在社会保障方面同城镇居民接轨。
- (30) 2016年，国土资源部联合五家中央部委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
- (31)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 (32) 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收入标准，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相当于每年2 441元人民币。而我国2011年的农村最低贫困线标准是每年2 300元，城镇的贫困线标准则高于世行标准。
- (33) 全球人口按不同收入组别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来自“全球不平等实验室”的报告（World Inequality Lab 2017）。
- (34) 基尼系数的数字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李实和朱梦冰的论文（2018）。
- (35) 城镇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2%，中等收入人群为7.6%，高收入人群为8.9%。
- (36) 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和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研究了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
- (37) 房价和收入增长数据可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方汉明等人的研究（Fang et al., 2015）。
- (38)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报告（2020）。
- (39) 在沿海省份，“80后”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相关性，高于“70后”；但在内陆，这一相关性在“80后”与“70后”之间变化不大。这一发现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Fan, Yi and Zhang, 2021）。

- (40) 这一效应由已故的传奇经济学家赫希曼 (Hirschman) 提出, 详见其文集 (Hirschman, 2013)。他也讨论了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诸多因素, 如人群相似性与家庭观念等。
- (41)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切蒂 (Chetty) 等人的论文 (2020)。
- (42) 子女收入超越父母的概率, 称为“绝对流动性”。对我国绝对流动性的估计,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樊漪、易君健以及浙江大学张俊森的论文 (Fan, Yi and Zhang, 2021); 对美国的估计来自哈佛大学切蒂 (Chetty) 等人的论文 (2017)。在本书写作之际 (2020年), 中国“90后”才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 收入还未稳定下来, 数据也有待收集。
- (43)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著作 (2014) 中详细分析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来龙去脉。世界银行的米兰诺维奇 (Milanovic) 在著作 (2019) 中描述了起起落落的“库兹涅茨波浪”。
- (4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的著作 (2013) 讨论了不平等的种种代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沙伊德尔 (Scheidel) 的著作 (2019) 指出, 历史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几乎都难以善终, 最后往往以大规模的暴力和灾难重新洗牌。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有一对年轻情侣，都在上海的金融行业工作，收入不错。研究生刚毕业没几年，算上年终奖，两人每月到手共5万元。他们对前途非常乐观，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决定买房结婚。家里老人凑齐了首付，又贷了几百万元银行按揭，每月还款3万元。上海物价和生活费用不低，年轻人也少不了娱乐和应酬，还完房贷后存不下什么钱。但好在前途光明，再努力几年，收入如果翻一番，房贷压力也就轻了。何况房价一直在涨，就算把买房当投资，回报也不错。

天有不测风云。从2018年开始，金融行业日子开始不好过。一个人的公司倒闭了，暂时失业；另一个也没了年终奖，收入下降不少。每月到手的钱从5万变成了2万，可按揭3万还雷打不动。老人们手头也不宽裕，毕竟一辈子的积蓄大多已经交了首付，顶多也就能帮着再支撑几个月。于是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也不敢太挑，总算找到了一份收入还过得去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来了……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从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到，就算房价不下跌，债务负担重的家庭也面临至少三大风险。一是债务缺乏弹性。若顺风顺水发了财，债务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可一旦倒了霉，债务也一分不会少。二是收入变化弹性很大。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数之不尽，宏观的、行业的、公司的、领导的、同事的、个人的……谁能保证自己未来几十年收入只涨不跌？就算不会失业，收入也不下降，但只要收入增长缓慢或不增长，对于高负债的家庭就已经构成了风险。既要还本又要付息，每个月紧巴巴的“月光”生活，能挺几年？第三个风险来自家庭支出的变动。突然有事要用钱怎么办？家里老人生病怎么办？要养孩子怎么办？

可见债务负担如果过重，会产生各种难以应对的风险。2018年末，我国的债务总量达到了GDP的258%（图6-1），已经和美国持平（257%），超过了德国（173%），也远高于一些发展中大国，比如巴西（158%）和印度（123%）。而且我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这些国家，债务总量在10年间增加了5.5倍。即便我国经济增长强劲，同期GDP还增加了2.8倍，但债务占GDP的比重在10年间还是翻了一番，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诸多举

措，尤其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与债务问题和风险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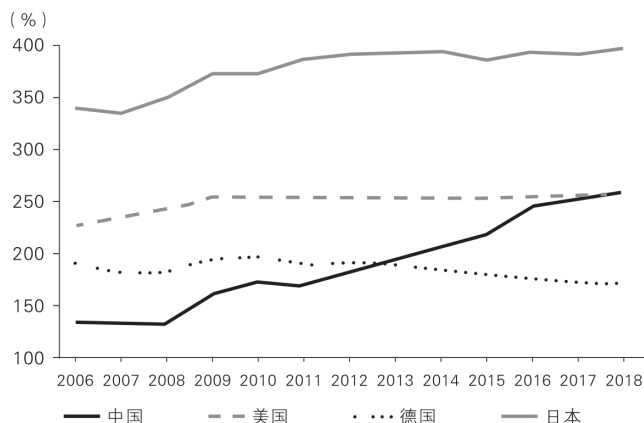


图6-1 中、美、德、日四国债务占各自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就能衡量真实的债务负担，目前尚有争议。当利率为零甚至是负的时候，只要名义GDP（内含物价）保持上涨，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不是个大问题，至少对政府的公共债务来说不是大问题，可以不断借新还旧。^①但对居民和企业而言，债务总量快速上升，依然会带来很大风险。第五章已经分析了居民债务的风险，本章重点分析企业和银行的风险。

第一节和第二节解释债务的一般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介绍欧美情况多一点，希望读者明白我国债务问题虽有诸多特色，但与欧美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前车可鉴。第三节分析我国债务的成因、风险、后果。无论是居民、企业还是政府，负债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第四节讨论如何偿还已有债务和遏制新增债务。

第一节 债务与经济衰退

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债务。企业在卖出产品收到货款之前，需要先建设厂房，购买设备，支付工资，这些支出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个人买房也往往需要贷款，否则光靠一点点储蓄去全款买房，恐怕退休之前都买不起。政府也常需要借钱，否则无力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基础设施。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系统风险。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如果各部门负债都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 and 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这类危机往往来势汹汹，暴发和蔓延速度很快，原因有二。

第一，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²⁾2008—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家庭房贷负担很重，很多人不得不卖房，房价不到一年就跌了两成。2011—2012年，借钱炒房的“温州炒房团”和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房产纷纷被抛售，温州房价一年内跌了近三成。⁽³⁾2013—2014年，内蒙古和晋陕等地的煤炭企业崩盘。很多煤老板曾在煤价上涨时大肆借债扩张，煤价大跌后无力还债，大幅折价变卖豪车和房产。

第二，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通常是银行）坏账就会飙升，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业务难以为继。2004—2008年，爱尔兰经济过热，信贷供给年均增速为20%。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爱尔兰，银行业出现危机，2009—2013年信贷增速剧烈收缩至1.3%，导致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⁴⁾在2011—2012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一些人跑路逃债，信任危机迅速发酵，所有人都捂紧钱包，信用良好的人也借不到钱。可见债务危机往往也会殃及那些债务水平健康的部门，形成连锁反应，造成地区性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衰退。

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举例来说，若房价下跌，老百姓感觉变穷了，就会勒紧裤腰带、压缩消费。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收入减少，就难以还债，债务负担过高的企业就会破产，银行会出现坏账，压缩贷款，哪怕好企业的日子也更紧了。这个过程中物价和工资会下跌（通货紧缩），而欠的钱会因为物价下跌变得更值钱了，实际债务负担就更重了。(5)

发达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消费，对经济影响很大。美国的消费约占GDP七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大幅下挫，成了经济衰退的主要推手。危机之前房价越高的州，老百姓债务负担越重，消费下降也越多，经济衰退越严重。在欧洲，2008年之前房价涨幅越大的国家，居民债务负担越重，危机中消费下降也越多。(6)

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第五章），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源于债的特性，即法律优先保护债权人的索赔权，而欠债的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即使破产也要清算偿债。以按揭为例，穷人因为收入低，买房借债的负担也重，房价一旦下跌，需要先承担损失，直到承担不起破产了，损失才转到银行及其债主或股东，后者往往是更富的人。换句话说，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西班牙。在大多数国家，还不起房贷的人可以宣布破产，银行把房子收走，也就两清了。但在西班牙，哪怕房主把房子给了银行并宣布破产，也只能免于偿还按揭利息，本金仍然要偿还，否则累计的罚金和负债将一直存在，会上失信名单，很难正常生活。在金融危机中，这项法律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动荡，开锁匠和警察拒绝配合银行驱逐房主。破产了也消不掉的债成了沉重的负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西班牙是全球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7)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但人性亘古不变，债务周期却有起有落，每一次起伏都由特定的外部因素推动，这些因素会引发乐观情绪、刺激人们借债，也会增加资金供给、为借债大开方便之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政治经济环境，刺激了居民对房子的需求（第五章）。但买房的前提是银行愿意放贷，否则需求就无法转化为实际购买力。若只是借贷需求增加而资金供给不增加，那利息就会上涨，需求会被抑制，贷款数量和债务水平不一定会上升。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规模，换个角度看也就是银行的信贷和资产规模。所以要理解债务的增长，首先要理解银行为什么会大量放贷。

资金供给与银行管制

资金供给的增加源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一方面，银行越做越大，创造的信贷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层出不穷，整个金融部门的规模 and 风险也越滚越大。

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以固定比例与美元挂钩，美元则以固定比例与黄金挂钩。要维持这一固定汇率体系，各国都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去干预市场，防止汇率波动。所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就可能冲破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威胁整个体系。而要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就要限制国内银行放贷规模，否则借到钱的居民或企业就会增加消费品或投资品的进出口，过量的国际贸易和结算会引发过量的国际资本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了浮动汇率，放开了跨境资本流动。企业和居民既可以从本国银行借钱，也可以从外国银行借钱，所以单方面管控国内银行的信贷规模就没用了，于是各国纷纷放松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但银行危机也随之而来。1980年至2010年，全球发生了153次银行危机，平均每年5次。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945年至1970年，全球总共才发生了2次银行危机。纵观整个19世纪和“二战”之前，全球银行危机的频率都与国

际资本流动规模高度相关。(8)

金融风险的核心是银行，历次金融危机几乎都伴随着银行危机。简单说来原因有四。(9)第一，银行规模大、杠杆高。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在1950年只占GDP的六成，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超过了GDP，且银行自有资本占资产规模的比重下降到了5%左右。换句话说，美国银行业在用5块钱的本钱做着100块钱的生意，平均杠杆率达到了20倍。理论上只要亏5%，银行就蚀光了本。欧洲银行的杠杆率甚至更高，风险可想而知。(10)

第二，银行借进来的钱很多是短期的（比如活期存款），但贷出去的钱却大都是长期的（比如企业贷款），这种负债和资产的期限不匹配会带来流动性风险。一旦储户集中提取存款，银行贷出去的钱又不能立刻收回来，手里钱不够，会出大乱子。后来银行业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承诺对个人存款进行保险，才缓解了挤提风险，但并没有完全解除。现代银行业务复杂，早已不是简单的存贷款机构，很多负债并非来自个人存款，而是来自货币基金和对冲基金，并不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11)一旦机构客户信心不足或急需流动性，也会形成挤提。

第三，银行信贷大都和房地产有关，常常与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银行因为杠杆率高，所以要特别防范风险，贷款往往要求抵押物。土地和房子就是最好的抵押物，不会消失也不会跑掉，价值稳定，潜在用途广，就算砸手里也不难转让出去。因此银行喜欢贷款给房地产企业，也喜欢做居民按揭。2012年，英国的银行贷款中79%都和住房或商业地产有关，其中65%是按揭。美国的银行贷款中也有接近七成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平均来看，欧美主要国家的银行信贷中将近六成都是按揭或不动产行业贷款。(12)所以房地产周期和银行信贷周期常常同步起伏，而这两个行业的杠杆率又都不低，也就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波动。

土地价值顺着经济周期起落，繁荣时地价上涨，衰退时地价下跌。而以土地为抵押物的银行信贷也顺着土地价值起落：地价上涨，抵押物价值上行，银行利润上升，资本充足率也上升，更加愿意多放贷，为此不惜降低放贷标准，逐渐积累了风险。经济衰退时，上述过程逆转。所以银行很少雪中送炭，却常常晴天送伞，繁荣时慷慨解囊、助推经济过热，衰退时却捂紧口袋、加剧经济下行。举例来说，在21世纪初的爱尔兰，大量银行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刺激房价飞涨。金融危机前，爱尔兰房地产建设投资占GDP比重由4%升至9%，建筑部门的就业人数也迅

速增加。危机之后，房地产行业萎缩严重，急需周转资金，然而银行的信贷增速却从危机前的每年20%剧烈收缩至1.3%，很多企业因缺乏资金而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13)

第四，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比如银行可以把各种按揭贷款打包成一个证券组合，卖给其他金融机构。这种业务挫伤了银行信贷分析的积极性。如果银行借出去的钱转手就能打包卖给下家，那银行就不会在乎借钱的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还钱。击鼓传花的游戏，传的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接盘就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很多按揭贷款的质量很差，借款人根本没能力还钱，有人甚至用宠物的名字都能申请到按揭，所以这次危机也被称为“次贷危机”。

随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整个金融部门的规模也越滚越大，成了经济中最大的部门。金融危机前，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已经占到美国GDP的8%。(14)频繁的金融活动并没有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反而给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成本。过多的短期交易扩大了市场波动，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资金和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但实体经济的蛋糕却没有做大。而且大量金融交易都是业内互相“薅羊毛”，所以“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大量投资硬件，高薪聘请人才，导致大量高学历人才放弃本专业而转投金融部门。(15)金融危机后，金融部门的过度繁荣引发了各界的反思和批评，也引发了“占领华尔街”之类的社会运动。

国际不平衡与国内不平

金融自由化浪潮为借贷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涌入金融系统，借贷总量也难以增加。以美国为例，这些资金来源有二。其一，一些国家把钱借给了美国，比如我国就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之一。其二，美国国内不平等急剧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富人有了更多花不完的钱可以借给穷人。

中国等东亚国家借钱给美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逆差约4 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需要从全世界借入4 000亿美元来为它从中国额外的进口买单，其中最主要的债主就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后者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吃过美元储备不足的大亏，所以之后大量增加美元储备，买入美国国债或其他证券，相当于把钱借给了美国。这种现象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称为“全球

储蓄过剩”。他认为这些钱流入美国后压低了美国利率，推动了房地产投机，是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然而借钱给美国的还有欧洲，后者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最大、损失也最大。美国各种金融“毒资产”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并不在亚洲，而在欧洲。东亚借钱给美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资金主要是单向流动。而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基本平衡，资金主要是双向流动：欧洲借钱给美国，美国也借钱给欧洲。这种资本流动总量虽巨大，但双向抵销后的净流量却不大。正是这种“净流量小”的假象掩盖了“总流量大”的风险。“你借我、我借你”的双向流动，让围绕“毒资产”的交易规模越滚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比如，一家德国银行可以在美国发行用美元计价的债券，借入美元，然后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房贷抵押证券，钱又流回了美国。这家银行的负债和资产业务都是美元业务，仿佛是一家美国银行，只不过总部设在德国罢了。类似的欧洲银行很多。金融危机前，跨大西洋的资本流动远多于跨太平洋资本流动。而在危机中，美联储为救市所发放的紧急贷款，实际上大部分给了欧洲银行。(16)

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也有美国自身的原因，否则为什么不流入其他国家？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标的，受到全球资金的追捧，所以美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从全球借钱。大量资本净流入美国，会加剧美国贸易逆差，因为外国人手里的美元也不是自己印出来的，而是把商品和服务卖给美国换来的。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个逻辑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17)所以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贸易失衡和美元地位带来的资本流动失衡所共同造就的。

国际资本流入不是美国可贷资金增加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贫富差距。如果全部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富人就会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可以借贷，而大部分穷人则需要借钱生存，债务总量就会增加。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两个人，每人需要消费50元才能活下去。若总产出100元被二人平分，那总消费就等于产出，既没有储蓄也没有负债。但若甲分得100元而乙分得0元，那甲就花50元存50元，乙就需要借50元，这个国家的储蓄率和负债率就都变成了50%。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过去40年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都伴随着国内债务水平的上升。(18)以美国为例：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将近一半的全部收入，而40年前只占35%。换句话说，40年前每生产100元，

富人拿35元，其他人拿65元，但如今变成了对半分，富人从国民收入这块蛋糕里多切走了15%。与这个收入转移幅度相比，常被政客们说起的中美双边贸易“巨额”逆差，2018年只占美国GDP的2%不到。

如果不看每年收入的差距而看累积的财富差距的话，不平等就更加惊人。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了全部财富的78%。⁽¹⁹⁾富人的钱花不完，消费远低于收入，就产生了大量储蓄。过去40年，美国国内最富有的1%的人的过剩储蓄，与伯南克所谓的由海外涌入美国的全球过剩储蓄，体量相当。⁽²⁰⁾理论上讲，这些富人的储蓄可以借给国内，也可以借给国外。但事实上，美国国内资金并没有流出，反而有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了美国，因此富人的储蓄必然是借给了国内的企业、政府或居民。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美国国内企业的投资不增反降，政府每年的赤字和借债也相对稳定，所以富人的储蓄实际上就是借给了其他居民（穷人），变成了他们的债务。

穷人借债主要是买房，因此富人的余钱也就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流向了房地产。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将近七成的贷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了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的中介。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张，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

这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现象，在我国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在2019年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就强调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好“脱实向虚”问题，下大力气清理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资金。而且特别强调了房地产金融化的问题：“一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贷资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助长了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

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投资形成的资产能增加未来收入，还债就不成问题。假如资金能被实体企业投资所吸纳，就不会流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去推升资产泡沫。然而在过去40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28%下跌到了20%。⁽²¹⁾一个原因是大公司把投资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制造业整体外迁。而制造业又是重资产和重投资的行业，所以国内制造业占比下降就推动了投资下降。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

智能化，需要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而设备本身的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所谓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业，而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22)

实体投资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理论上说，这不一定是坏事，若明星企业通过竞争击败对手，占据市场后依然锐意进取、积极创新，那么投资和生产率还会继续上升。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与企业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23)

大量资金的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利率（扣除物价因素）在过去40年间一直稳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24)因为缺乏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各种短期投机便大行其道，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常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让短期利率也变得极低，大企业便借机利用融资优势大肆购并小企业，进一步增加了行业集中度，降低了竞争。这种低利率环境也把大量追逐回报的资金推入了股市，推高了股价。而美国最富的10%的人掌握着90%的股市资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5)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我国政策制定者的警惕。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26)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我国债务迅速上涨的势头始于2008年。当年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严重打击了我国的出口。为防止经济下滑，中央立即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同时放宽了许多金融管制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限制，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大潮，也推动了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在不断的投资扩张和房价上涨中，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贷款买房的居民，债务都迅速上升。其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也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中举债扩张，但投资回报率却在下降，积累了低效产能。债务（分子）比GDP（分母）增长速度快，因此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外债水平很低，债务基本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内债，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国际上常见的外债危机，像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和每过几年就要上演一次的阿根廷债务危机。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我国2019年末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14%（国际公认安全线是20%），外汇储备是短期外债的2.6倍（国际公认安全线是1倍），足够应对短期偿付。而且即使在外债中也有35%是以人民币计价，违约风险很小。

债务累积过程简述：2008—2018年

图6-2描述了中国始于2008年的债务累积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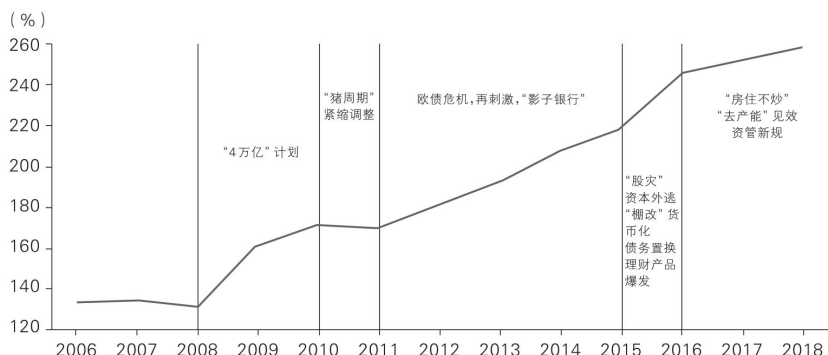


图6-2 中国的宏观债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2008年至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计

划，其中中央政府投资1.18万亿元（包括对汶川地震重建的拨款），地方政府投资2.82万亿元。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中央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第三章），同时不断降准降息，放宽银行信贷。这些资金找到了基建和房地产两大载体，相关投资迅猛增加。比如地方政府配合当时的铁道部，大量借债建设高铁：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从2007年的2 500亿元，猛增到2009年的7 000亿元和2010年的8 300亿元。

2010年至2011年，前期刺激下的经济出现过热迹象，再加上猪肉价格大涨的影响，通货膨胀抬头，所以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到了2011年年中，欧债危机爆发，国内制造业陷入困境，于是央行在2012年又开始降准降息，并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限制，城投债于是激增，净融资额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也是从2012年开始，以信托贷款为主的“影子银行”⁽²⁷⁾开始扩张，把大量资金引向融资平台，推动当年基建投资猛涨，债务负担从2012年起再次加速上涨。这一时期，中央开始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控制和监管。

2015年遭遇“股灾”，前些年投资过度造成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问题也开始凸显。2015年末，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开始加息，再加上一系列内外因素，导致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大量资本流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贬值，接近破七。央行于是连续降准降息，财政部开始置换地方债（第三章），中央也放松了对房地产的调控，全国棚户区改造从实物安置转变为货币化安置，带动房价进一步上涨。同时，“影子银行”开始“变形”：信托贷款在严监管下大幅萎缩，而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开始爆发，流向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总量没有减少，总体债务负担在2015年又一次加速增长。

2016年，在货币化“棚改”的帮助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告一段落，中央在年底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定位，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也是在这一年，“去产能”改革开始见效，工业企业利润率开始回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结束了长达五年的下跌，首次转正。

2018年上半年，在连续两年相对宽松的外部条件下，央行等四部委联合出台“资管新规”，严控“影子银行”，试图降低累积多年的金融风险。信用和资金开始收缩，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全面暴露。下半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经济增长继续放缓。2018年末，我国债务总量占比达到GDP的258%：其中居民债务为54%，政府债务为51%，非金融企业为154%（图6-3）。在政府债务中，中央国债约为17%，地方政府债务

为34%。(28)第三章和第五章已经分别讨论过地方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此处不再赘述，本章重点介绍企业债务以及债主银行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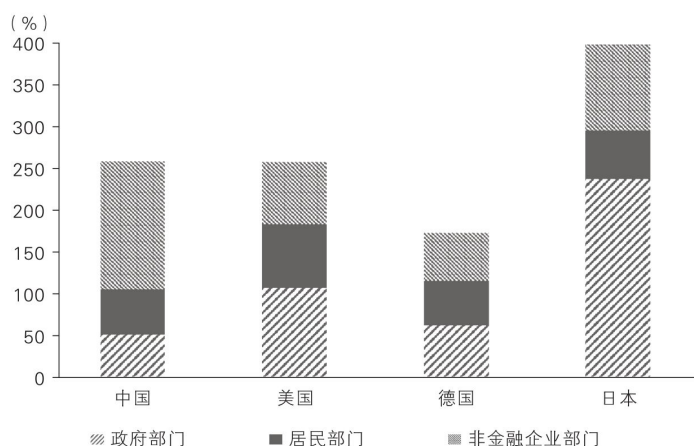


图6-3 2018年中、美、德、日四国各部门债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此处债务仅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

企业债务

从图6-3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债务负担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2018年，美国和德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5%和58%，但我国高达154%。原因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低。2018年末，企业债务总额约140万亿元，但在境内的股票融资余额不过区区7万亿元。(29)

企业债务中第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债务，约占GDP的40%，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很低（平均1%左右）。第三章已详细讨论过这类债务，不再赘述。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国进民退”现象。2008年以后，国有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但效率比民营企业低，多占用的资金没有转化为同比例的新增收入，推升了整体债务负担。按照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中的数据，1998—2007年的10年间，国企资产总额只增长了1.6倍，但2008—2017年这10年间却激增了4.4倍，负债总额也相应增长了4.7倍，占GDP的比重从78%变成144%。(30)但国企总利润占GDP的比重却从4.2%下降到了3.9%，营业收入占GDP比重从72%下降到了65%。(31)

上述国企数据被广泛使用，但这些数据及相关研究尚有诸多不明之处，很难确知国企的整体情况。⁽³²⁾国有工业类企业中的数据更清楚一些，因为国家统计局一直记录详细的工企数据。2008—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规模相对GDP来说并没有大幅扩张，只是略有上升，基本稳定，所以在工业领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一直高于私营企业，但利润率却较低。2008年“4万亿”计划出台之后，国企与私企的利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2013年之后才开始缩小。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不在国企，而是私企利润率在“4万亿”计划之后飙升，2012年以后回落。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信贷宽松的刺激之下，很多有资源、有关系的私营企业（比如上市公司）大肆扩张，偏离主营业务，去“炒地皮”和“炒房子”，虽然获得了短期收益，但最终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³³⁾

低效率乃至亏损的国企或大中型私企，若不能破产重组，常年依靠外力“输血”，挤占有限的信贷资源，变成“僵尸企业”，就会拉低经济整体效率，推升宏观债务负担。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的改革重点包括：推进国企混改，限制地方政府干预；加强金融监管，从源头上拧紧资金的水龙头；在要素市场上推行更加全面的改革，让市场力量在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和完善《企业破产法》，在债务重整过程中“去行政化”，避免地方官员主导企业破产重组，损害债权人利益（比如第四章中的江西赛维案）。

关于企业债务的第三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是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房地产是支柱型产业，不仅本身规模巨大，而且直接带动钢铁、玻璃、家具、家电等众多行业。以2013年为例，房地产及其直接相关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5%，且增速极快，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接近30%。⁽³⁴⁾由于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去购置土地，建设周期也很长，所以企业经营依赖负债，资产负债率接近80%，流动性风险很大。一旦举债渠道受阻，企业就难以为继。举个例子，在上市房企中，与“买地”有关的成本约占总成本的五六成。⁽³⁵⁾在购置土地环节，发达国家一般要求企业使用自有资本金，而我国允许房企借钱“买地”，这就刺激了房企竞相抬高地价和储备土地。储备的土地又可以作为抵押去撬动更多借贷资金，进而储备更多土地，所以房企规模和债务都越滚越大。

2018年，我国房企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5%，且大量债务来自“影子银行”或其他监管薄弱的渠道。⁽³⁶⁾房企的现金流依赖房产预售款和个人按揭，这两项收入占2018年实际到位资金的将近一半。一旦由于

疫情等外部冲击原因出现房产销售问题，房企就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2020年，这类风险开始显现，无论是泰禾集团的违约还是恒大集团的“内部文件”，都吸引了广泛关注。一旦房企出现债务危机，无疑会冲击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而且房价连着地价，地价高低又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收入，危及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债务偿付能力。2020年8月，城乡住房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针对企业的关键债务指标画下“三道红线”，也规定企业不得再挪用贷款购地或竞买炒作土地。(37)

还有一种房企债务是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在外国发行，以外币计价，所以不计入外汇管理局的宏观外债统计口径。截至2019年7月末，这类海外债余额约1 739亿美元。其中可能有风险，因为大多数房企并没有海外收入。自2019年7月起，发改委收紧了房企在海外发债。2020年上半年，这类债务开始净减少。(38)

总体看来，我国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应对风险的能力受限。若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会降低居民收入，加大居民的风险，也加大其债主银行的风险。

银行风险

无论是居民债务还是企业债务，都是从债务人角度看待风险，要想完整理解债务风险，还需要了解债权人的风险。中国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不仅发放贷款，也持有大多数债券。上文讨论的欧美银行业的很多风险点，同样适用于我国。首先是对信贷放松管制，银行规模迅速膨胀。2008年的“4万亿”计划，不仅是财政刺激，也是金融刺激，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贷款利率大幅下调。银行信贷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2左右一路上升到2016年的2.14。

其次是银行偏爱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我再用两个小例子来详细解释一下。先看住房按揭。银行借给张三100万元买房，实质不是房子值100万元，而是张三值100万元，因为他未来有几十年的收入。但未来很长，张三有可能还不了钱，所以银行要张三先抵押房子，才肯借钱。房子是个很好的抵押物，不会消失且容易转手，只要这房子还有人愿意买，银行风险就不大。若没有抵押物，张三的风险就是银行的风险，但有了抵押物，风险就由张三和银行共担。张三还要付30万元首付，相当于抵押了100万元的房子却只借到了70万元，银行的安全垫很

厚。再来看企业贷款。银行贷给企业家李四500万元买设备，实质也不是因为设备值钱，而是用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值钱，这500万元来源于李四公司未来数年的经营收入。但作为抵押物，设备的专用性太强，价值远不如住房或土地，万一出事，想找到人接盘并不容易。就算有人愿意接，价格恐怕也要大打折扣，所以银行风险不小。但若李四的企业有政府担保，甚至干脆就是国企，银行风险就小多了。

所以如果优良的抵押物（住房和土地）越来越多，或者有政府信用担保的企业越来越多，那银行就有动力不断扩大信贷规模。在我国这样一个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地方融资平台能抵押的土地增加、涌入城市买房的人增加、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增加等，都会从需求端刺激信贷规模的扩张。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固然离不开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也同样离不开信贷需求的扩张，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和房地产繁荣，此所谓“银根连着地根”。

再次是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银行是金融体系核心，规模大，杠杆高，又涉及千家万户的储蓄，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受严格监管。若某房地产企业愿意用10%的利息借钱，银行想借，但我国严格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贷款量，怎么办？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有借钱需求的公司很多，愿意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老百姓也很多，所以“影子银行”风生水起。相关的监管措施效果有限，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限制了“银信合作”业务，“银证信合作”业务又兴起：银行把钱委托给券商的资管计划，再让券商委托给信托公司把钱借给企业。管来管去，银行的钱到处跑，渠道越拉越长，滋润着中间各类资管行业欣欣向荣，整个金融业规模越滚越大。21世纪初，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在4%左右，而2015—2019年平均达到了8%，相当于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汇聚了全世界的资金后才达到这个规模，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金融业规模显然过大了。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转来转去，多转一道就多一道费用，利息就又多了一点，等转到实体企业手中的时候，利息已经变得非常高，助推了各种投机行

为和经济“脱实向虚”。此外，银行理财产品虽然表面上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银行既不保本也不保息，但老百姓认为银行要负责，而银行也确实为出问题的产品兜过底。这种刚性兑付的压力加大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³⁹⁾

我国各种“影子银行”业务大都由银行主导，是银行链条的延伸，因此也被称为“银行的影子”。这与国外以非银金融机构主导的“影子银行”不同。中国的业务模式大多简单，无非多转了两道手而已，证券化程度不高，衍生品很少，参与的国际资本也很少，所以监管难度相对较低。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就拧紧了“影子银行”的总闸，也打断了各种通道。但这波及的不仅是想借钱的房地产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也挤压了既没有土地抵押也没有政府背书的中小私营企业，它们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资管新规”之后全面暴露。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偿还已有债务

对债务人来说，偿债是个算术问题：或提高收入，或压缩支出，或变卖资产拆东补西。实在还不上，就只能违约，那债权人就要受损。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若出现大规模坏账，金融系统会受到冲击。

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能变成优质资产、产生更高收入，那债务负担就不是问题。但如果投资失败或干脆借钱消费挥霍，那就没有新增收入，还债就得靠压缩支出：居民少吃少玩，企业裁员控费，政府削减开支。但甲的支出就是乙的收入，甲不花钱乙就不挣钱，乙也得压缩支出。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整个经济就会收缩，大家的收入一起减少。若收入下降得比债务还快，债务负担就会不降反升。这个过程很痛苦，日子紧巴巴，东西没人买，物价普遍下跌，反而会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因为钱更值钱了。如果抛售资产去还债，资产价格就下跌，银行抵押物价值就下降，风险上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以地方政府为例。政府借债搞土地开发和城市化，既能招商引资提高税收，又能抬高地价增加收入，一举两得，债务负担似乎不是大问题。可一旦经济下行，税收减少，土地卖不上价钱，诸多公共支出又难以压缩，债务负担就会加重，就不得不转让和盘活手里的其他资产，比如国有企业。最近一两年经济压力大，中央又收紧了融资渠道，于是地方的国企混改就加速了。比如在2019年，珠海国资委转让了部分格力电器的股份，芜湖国资委也转让了部分奇瑞汽车的股份。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相比之下，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似乎还不那么痛苦，因为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实施起来阻力也小。增发货币的方式大概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若经济增长、实际收入增加，就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就算实际收入不增加，增发货币也能维持稳定温和的通货膨

胀，随着物价上涨和时间推移，债务负担也会减轻，因为欠的债慢慢也就不值钱了。

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在危机中，很多人变卖资产偿债，资产市价大跌，连锁反应后果严重。央行出手买入这些资产，可以托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缓解债务压力。从记账角度看，增发的货币算央行负债，所以“量化宽松”不过是把其他部门的负债转移到了央行身上，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会迅速膨胀。但只要这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印钱，想接手多少就接手多少。这种做法不一定会推高通货膨胀，因为其他经济部门受债务所困，有了钱都在还债，没有增加支出，也就没给物价造成压力。欧美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都搞了大规模“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央行“发钱”的方式是购买各种金融资产，所以会推高资产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维持了好些年，股市大涨，房价也反弹回危机前的水平，但底层百姓并没得到什么实惠，房子在危机中已经没了，手里也没多少股票，眼睁睁看着富人财富屡创新高，非常不满（第五章）。这种不满情绪的高涨对政局的影响也从选举上反映了出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美联储再次开闸放水，资产负债表规模在3个月内扩张了六成以上，而随后的经济反弹被戏称为“K形反弹”：富人往上，穷人向下。

第三类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前两类增发货币的方式基本已经做到了尽头，而经济麻烦依然不断，新冠肺炎疫情雪上加霜，所以近两年对“赤字货币化”这种激进政策的讨论异常热烈，支持这种做法的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也进入了大众视野。

“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从理论上说，若私人部门陷入困境，而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能力过硬，“赤字货币化”也不是不能做。但若政府能力如此过硬却还是陷入了

需要货币化赤字的窘境，那也正说明外部环境相当恶劣莫测。在这种情况下，“赤字货币化”的效果不能仅从理论推断，要看历史经验。从历史上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陷经济于混乱。这种后果每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记录，“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当然也知道。但他们认为历史上那些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在货币，而在于当时恶劣的外部条件（如动荡和战争）摧毁了产能、削弱了政府，若产能和政府都正常，就可以通过货币化赤字来提振经济。可这又回到了根本问题：若产能和政府都正常，怎么会陷入需要货币化赤字的困境？背后的根本原因能否靠货币化赤字化解？财政花钱要花在哪里？谁该受益谁该受损？

国民党政府就曾经搞过赤字化，彻底搞垮了货币经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大手花钱打内战。仅1948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是1945年全年赤字的780倍。央行新发行的货币（“法币”）几乎全部用来为政府垫款，仅1948年上半年新发行的纸币数量就是1945年全年新增发行量的194倍。物价完全失控。1948年8月的物价是1946年初的558万倍。很多老百姓放弃使用法币，宁可以物易物或使用黄金。1948年8月，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替换法币，但政府信用早已尽失。仅8个月后，以金圆券计价的物价就又上涨了112倍。据季羨林先生回忆，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们领了工资以后要立刻跑步去买米，“跑快跑慢价格不一样！”⁽⁴⁰⁾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⁴¹⁾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遏制新增债务

理解了各类债务的成因之后，也就不难理解遏制新增债务的一些基本原则：限制房价上涨，限制“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限制政府担保和国有企业过度借贷，等等。但困难在于，就算搞清楚原因，也不一定就能处理好后果，因为“因”毕竟是过去的“因”，但“果”却是现在的“果”，时过境迁，很多东西都变了。好比一个人胡吃海塞成了大胖子，要想重获健康，少吃虽然是必须的，但简单粗暴的节食可能会出大

问题，必须小心处理肥胖引起的很多并发症。

反过来看，当年种下的“因”，也有当年的道理，或干脆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下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金融海啸一浪高过一浪，出口订单锐减，若刺激力度不够，谁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虽然现在回过头看，有不少声音认为“4万亿”计划用力过猛，但历史不能假设。

再比如，政府通过或明或暗的担保来帮助企业借款，不一定总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早期，有很多潜在收益很高的项目，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规范，不确定性很强，很难吸引足够的投资。正是由于有了政府担保，这些项目才得以进行。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粗放式投资就能带来高收益的项目减少，融资需求逐渐多元化，若此时政府仍过多干预，难免把资金导入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过剩产能，挤占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投资效益越来越低，对经济的拉动效果也越来越弱，债务负担和偿债风险就越来越高。

总的说来，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2008年之后，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减弱，所以国内投资就变得更加重要（见下一章的图7-4以及相关详细解释）。而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的政府所驱动，由此产生的诸多债务，抛开五花八门的“外衣”，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回应。所形成的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的风险，但最终依然是政府风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虽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的约束力更强。一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哪怕同样是借债，债券的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这些年资本市场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根本原因并不难理解。融资体系和投资体系是一体两面：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若投资由政府 and 国企主导，风险也自然该由它们承担。目前的融资体系正是让政府承担风险的体

系，因为银行的风险最终是政府的风险。以201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民间投资”占62%，政府和国企占38%。但这个比例大大低估了政府的影响，很多私人投资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之下才上马的。在房地产开发中，投资总额的四到五成是用来从政府手里买地的。这种投资结构所对应的风险自然主要由政府及其控制的金融机构承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测算，2018年，我国金融资产中72%的风险由金融机构和政府承担。1995年和2007年，这个比例分别是74%和70%，多年来变化并不大。⁽⁴²⁾

因此政府和国企主导投资与国有银行主导融资相辅相成，符合经济逻辑。这一体系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发挥过很大作用，但如果投资主体不变，权力不下放给市场，那想要构建降低政府和银行风险的直接融资体系、想让分散的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就不符合“谁决策谁担风险”的逻辑，自然进展缓慢。当然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也不是万灵药，华尔街的奇迹和灾祸都不少。在我国将来的金融体系中，究竟间接和直接融资各占多大比重，国有金融企业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社保基金等）在其中该扮演何种角色，都还是未知数。

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成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结语

本章分析了我国债务的情况，聚焦企业和银行风险，结合前几章讨论过的政府和居民债务风险，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债务风险的大概。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然而导致目前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却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几年后的欧债危机。这两次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远超“9·11”事件。为应对巨大的外部冲击，我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计划，稳定了我国和世界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第一是生产效率下降。宏观上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微观上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不断为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过度依赖地价上涨和房地产繁荣，推升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也加大了银行风险。

第二个角度是国际失衡。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我国和韩国、日本等东亚邻居不同，体量巨大，所以对国际经济体系冲击巨大，贸易冲突由此而来。

第三个角度是产业升级。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和保持优势，头部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所以我国制造业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在竞争中不断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也带动了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的进步，进一步冲击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本章结束，本书已经详细分析了第一个角度，也为理解第二和第三个角度打下了微观基础。下一章将展开讨论我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并且从国际冲突的角度出发，由外向内再度审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

扩展阅读

最近10年，从债务角度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好书很多。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2015）是一本关于美国房地产及债务的通俗作品。对一般读者来说，该书可能关注面有些狭窄，细节也过于详尽；但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该书值得细读，可以学习如何从微观数据中清楚地解答重要的宏观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特纳的著作《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2016）是针对债务问题更加全面的通俗作品，思路清楚，文笔流畅，可以结合英国央行前行长金关于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杰作《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2016）一起阅读，会大有收获。经济史专家图兹的著作*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18）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非常精彩。著名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Dalio）对债务问题有多年的思考和实践，其著作《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2019）不受经济学理论框框的限制，更加简练直接。

关于中国债务问题有很多讨论和研究，但大多是学术文献或行业报告，全面系统的普及性读物较少。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包尔泰（Armstrong-Taylor）就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债务写过一本简明通俗的书*Debt and Distortion: Risks an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2016），是很好的入门读物。彭博的经济学家欧乐鹰（Orlik）最近出版了一本小书*China: the Bubble that Never Pops*（2020），标题很有趣，“中国，永不破裂的泡沫”。该书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和化解办法。作者坦言，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是各种“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史。在别人忙着讥讽“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手忙脚乱时，作者问：馒头为什么越蒸越大？

银行是金融系统的核心，也是金融危机的风暴眼。理解银行的风险需要深入了解其具体业务，这是近些年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虽然从宏观角度分析危机也很有意思，但只有深入了解具体业务细节，才能真正对现实的复杂性和吊诡之处产生敬畏之心，避免夸夸其谈。虽然业务内容比较专业，但有两本书写的相对简明，是很好的入门读物。一本是耶鲁大学戈顿的《银行的秘密：现代金融生存启示录》（2011），另一本是英国经济学家米尔恩（Milne）的*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Credit: What Went Wrong in Bank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Repair the Damage? (2009)。获过奥斯卡奖的电影《大空头》中也有很多金融业务细节，很精彩。本片虽然取材自真人真事，但主人公们其实不是真正从做空金融危机中赚到大钱的人，还差得远。如果想听听这次危机中“大钱”交易的故事，祖克曼的《史上最伟大的交易》(2018)是一部可以当小说看的杰作。

关于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和改革，两位参与其中的投行经济学家沃尔特和豪伊写了一本很专业但不难理解的书，《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和脆弱的金融基础》(2013)，值得一读。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参与和见证了我国金融改革，他的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2016)中有很多轶事。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的著作《大行蝶变：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复兴之路》(2012)则从中国银行家的角度回顾和分析了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也值得一读。

- (1) 详见哈佛大学福尔曼 (Furman) 和萨默斯 (Summers) 的论文 (2020)。
- (2) 为了还债而低价变卖金融资产的行为，术语称为“fire sale”。读者可参考哈佛大学施莱弗 (Shleifer) 和芝加哥大学维什尼 (Vishny) 对这一现象的简明介绍 (2011)。
- (3) 衡量美国房价的常用指标是Case-Shiller指数，2008年初大约为180，2009年跌至150。根据南京大学包尔泰 (Paul Armstrong-Taylor) 著作 (2016) 中的数据，温州二手房的价格指数从2011年1月的120跌到2012年1月的85。
- (4) 爱尔兰数据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特纳 (Turner) 的著作 (2016)。
- (5) 这种“债务—通货紧缩—经济萧条”螺旋式下行的逻辑，被美国经济学家费雪 (Fisher) 称为“债务—通货循环”，可以解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这种理论后来被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发展成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用来解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长期衰退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的衰退 (辜朝明，2016)。布朗大学埃格特松 (Eggertsson) 和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 (Krugman) 的文章 (2012) 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路。
- (6) 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 (2015) 详细介绍了美国居民的债务和消费情况。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研究 (Glick and Lansing, 2010) 表明，欧美主要国家2008年之前10年的房价和居民负债高度正相关，而负债越多的国家，在危机中消费下降也越多。
- (7) 西班牙的例子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迈恩和芝加哥大学苏非的著作 (2015)。
- (8) 哈佛大学莱因哈特 (Reinhart) 和罗格夫 (Rogoff) 在其著作 (2012) 中统计了过去200年全球主要国家的银行危机次数，发现危机频率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高度正相关。

- (9) 关于银行风险，英国中央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的著作（2016）精彩而深刻。
- (10) 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报告（Haldane, Brennan and Madouros, 2010），2007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总资产 / 一级核心资本）在20倍左右（如美洲银行将近21倍），投资银行则在30倍左右（如雷曼兄弟将近28倍）。而欧洲的德意志银行是52倍，瑞银是58倍。
- (11) 这类资金中数额最大的一类是“回购”（repo），可以理解作为一种短期抵押贷款。耶鲁大学戈顿（Gorton）的著作（2011）对这项重要业务做了简明而精彩的介绍。
- (12) 数据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特纳的著作（2016）以及旧金山美联储霍尔达（Jorda）、德国波恩大学舒拉里克（Schularick）和戴维斯加州大学泰勒（Taylor）的合作研究（2016）。此外，三位德国经济学家的研究（Knoll, Schularick and Steger, 2017）指出，房价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开始加速上涨，比人均GDP增速快得多，这可能跟金融放松管制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有关。
- (13) 爱尔兰的数据来自特纳的著作（2016）。银行信贷的顺周期特性也反映在利息变动中。一旦形势不好，利息也往往迅速升高。纽约大学的格特勒（Gertler）和吉尔克里斯特（Gilchrist）的论文（2018）描述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种利息的变动和金融机构的行为。
- (14) 数字来自英格兰银行的报告（Haldane, Simon and Madouros, 2010）。
- (15) 纽约大学菲利蓬（Philippon）和弗吉尼亚大学雷谢夫（Reshef）的论文（2012）研究了美国金融部门对高学历人才的挤占。
- (16) 国际清算行的研究人员分解了各大陆间的金融资本流动总量，而不是仅仅关注“净流量”（Avdjiev, McCauley and Shin, 2016）。跨大西洋金融机构间的紧密联系，有复杂的成因和后果，经济史专家图兹（Tooze）的著作（2018）对此有非常详尽和精彩的论述。
- (17) 这个理论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之前的金本位所提出的，能否直接套用到如今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上，尚有争议。不能据此认为，人民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我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变成逆差。
- (18) 普林斯顿大学迈恩（Mian）、哈佛大学斯特劳布（Straub）、芝加哥大学苏非（Sufi）等人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和债务上升之间的关联（2020a）。
- (19)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来自德国波恩大学库恩（Kuhn）、舒拉里克（Schularick）和施泰因（Steins）的论文（2020）。
- (20) 富人的钱借给了穷人，逻辑上很好理解，但实际上并不容易证实，需要拨开金融中介的重重迷雾，搞清楚资金的来龙去脉。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储蓄增加，对应着最穷的90%的人债务增加，是普林斯顿大学迈恩（Mian）、哈佛大学斯特劳布（Straub）、芝加哥大学苏非（Sufi）等人最近的发现（2020b）。

- (21) 数据同样来自迈恩 (Mian)、斯特劳布 (Straub) 和苏非 (Sufi) 的论文 (2020a)。
- (22) 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Haskel and Westlake, 2018) 指出: 1990年至2014年, 资本设备相对于当期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了33%。该书把发达国家称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即更重视无形资产和人才的资本主义, 并深入探讨了这种经济中的生产率停滞和收入不平等。
- (23) 纽约大学菲利普 (Philippon) 写过一本精彩的小书 (2019), 分析美国经济越来越偏离自由市场, 竞争力不断下降。
- (24) 数据来自迈恩 (Mian)、斯特劳布 (Straub) 和苏非 (Sufi) 的论文 (2020a)。
- (25) 数据来自库恩 (Kuhn)、舒拉里克 (Schularick) 和施泰因 (Steins) 的论文 (2020)。富人的九成资产都是股票, 这一比例自1950年至今变化不大。
- (26) 见易纲的文章 (2019)。
- (27) 关于“影子银行”, 详见本章后文“银行风险”小节。
- (28) 很多人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不仅应包括政府的显性债务, 也应包括其关联企业的债务, 所以债务负担不止34%。但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算到政府头上的话, 就不能再重复算到企业头上, 因此这类争议并不影响对总体债务水平的估算。
- (29) 企业债务总额按图6-3中占GDP的比重推出。图中的企业不包括金融企业, 这是计算宏观债务负担时的国际惯例。图中债务是指企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从外部 (如银行) 借债的总额, 不包括企业间相互的债务债权关系 (如业务往来产生的应收账款等)。我国非金融企业在境内股票融资的总额,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表”。
- (30) 这个比重与图6-3中企业债务占GDP的154%, 不能直接相比。图中的企业债务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债务总额, 只包括贷款和债券; 而此处的144%也包含了企业间的应付账款等。企业间的相互债务在计算企业总体对外债务负担时会互相抵消。但如果只计算部分企业比如国企的债务规模时, 这些企业间的债务也应该算上。关于国企的宏观数据有两套口径, 一套是国资委的, 一套是财政部的, 后一套涵盖范围更广, 因为很多国企不归国资委管。本节只讨论非金融类企业, 因为图6-3中的企业债务统计仅包括非金融企业。
- (31) 与GDP最可比的企业数据应该是增加值, 但国企整体增加值很难估算, 各种估计方法都有不小缺陷。按张春霖的估计 (2019), 国企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近10年变化不大。
- (32) 比如, 2017年的所有国企资产中有45%被归类为“社会服务业”和“机关社团及其他”, 而这两类企业的营业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财政部没有详细解释这些究竟是什么企业。再比如, 按资产规模算, 2017年至少24%的国企应被归类为基础设施企业, 其中也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类企业对经济的贡献显然不能只看自身的资产回报, 还应该考虑它们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带动作用 and 贡献, 但这些贡献很难估计。

- (33) 关于私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在“4万亿”计划之后的扩张和效率下降，可以参考清华大学白重恩、芝加哥大学谢长泰、香港中文大学宋铮的研究（Bai, Hsieh and Song, 2016）。在房地产繁荣和房价高涨的刺激下，2007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非房地产企业也大量购入了商业地产和住宅，总金额占其投资总额三成，这个数据来自香港浸会大学陈婷、北京大学周黎安和刘晓蕾、普林斯顿大学熊伟等人的研究（Chen et al., 2018）。
- (34) 这种估计比较复杂，涉及房地产相关各行业的投入产出模型。此处的估计结果来自国家统计局许宪春等人的论文（2015）。
- (35) 对上市房企成本构成的估计，来自恒大经济研究院任泽平、夏磊和熊柴的著作（2017）。
- (36) 这里的75%与图6-3中企业债务占GDP的154%，不能直接相比。图中的企业债务只包括了贷款和债券，而这里的债务还包括房企的应付账款等其他债务。在我国会计制度下，预售房产生的收入，也就是在房子交接前所形成的预收房款，记为房企的负债。A股上市房企中，这部分预收款约占总负债的1/3。我国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给房企贷款，所以在房企的负债中，国内银行贷款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15%。然而这种对资金渠道的限制很难影响资金最终流向，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影子银行”流入了房企。
- (37) 所谓“三道红线”，是要求房企在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高于70%、净负债率不得高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倍。
- (38) 关于房企海外债的数据和监管，可参考《财新周刊》2019年第29期的文章《房企境外发债为何收紧》及2020年第37期的文章《房企降杠杆开始》。
- (39)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朱宁的著作（2016）系统地阐释了这种所谓“刚性泡沫”现象。
- (40) 本段中的数字根据民国著名金融家张嘉璈书中（2018）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关于季羨林先生的故事，来自北京大学周其仁的回忆（2012）。
- (41) 2019年末，易纲在《求是》发表文章，阐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理念（2019）。
- (42) 数据来源于易纲的论文（2020）。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十多年前，我去过一次开曼群岛，那是当时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我在一个岛上看到了一家中餐馆，印象很深，觉得不管哪里都有中国人在做生意。又过了两年，我在波多黎各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门上看到一块告示：“本店不卖中国货”。我特地进去看了看，除了当地人的一些手工品之外，义乌货其实不少。

早在2007年，美国就出了一本畅销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讲美国一家人试着不用中国货的生活实验。书本身乏善可陈，但其中的一些情绪在美国普通百姓中颇具代表性。这些情绪在之后的十多年间慢慢发酵，民间反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2018年6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巴苏（Basu）教授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演讲，谈到中美贸易战时说：“我来自印度，过去的大半辈子，一直都是发达国家用各种手段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要求贸易。没想到世界有一天会倒过来。”

我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全球化，但因为自身体量大，也给全球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到全球的28%（图7-1）。我国出口的产品不仅数量巨大，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2019年出口产品中的三成可以归类为“高技术产品”，而在这类高技术产品的全球总出口中，我国约占四分之一。由于本土制造业体量巨大，全球产业链在向我国集聚，也带动了本土供应商越来越壮大。因此我国出口模式早已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绝大部分出口价值均由本土创造。2005年，我国每出口100美元就有26美元是从海外进口的零部件价值，只有74美元的价值来自国内（包括在国内设厂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价值）。2015年，来自海外供应链的价值从26%下降到了17%。^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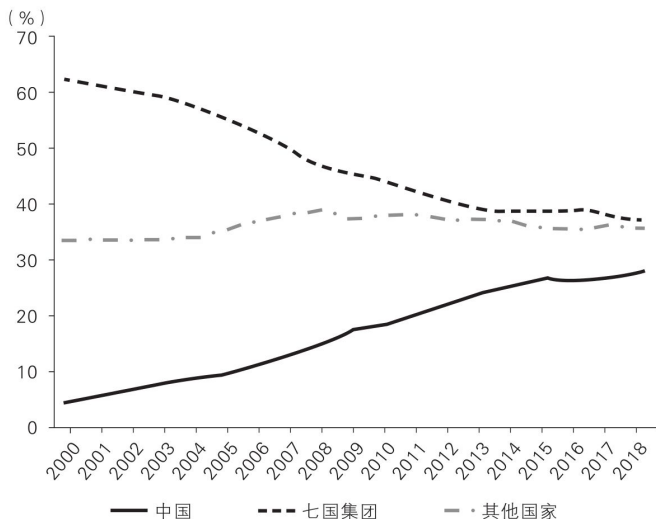


图7-1 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即英、美、日、德、法、意、加。

这些巨大的成功背后，也隐藏着两重问题。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中我国的占比从5%上升到28%，对应的是“七国集团”占比从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国家占比几乎没有变化（图7-1）。这背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面对剧烈调整，出现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一点也不奇怪。

本章第一节分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这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直接相关，也影响了对外贸易失衡。第二节以中美贸易战为例，讨论中国经济对外国形成的冲击和反弹。在这些大背景下，2020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三节分析这一格局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关改革。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②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我国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5%下降到了50%，下降了足足15个百分点，之后逐步反弹到了55%（图7-2）。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的54%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39%，下降了15个百分点。图中总消费和居民最终消费间的差距就是政府消费，一直比较稳定，占GDP的11%左右。



图7-2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居民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下面这个简单的等式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几个变量间的关系：

$$\frac{\text{消费}}{\text{GDP}} = \frac{\text{可支配收入} - \text{储蓄}}{\text{GDP}} = \frac{\text{可支配收入}}{\text{GDP}} \left(1 - \frac{\text{储蓄}}{\text{可支配收入}} \right)$$

所以当我们观察到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时，无非就是两种情况：或者GDP中可供老百姓支配的收入份额下降了，或者老百姓把更大一部分收入存了起来，储蓄率上升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在图7-3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70%下降到了60%，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之后逐步反弹回65%。而

居民储蓄率则从21世纪初的25%上升了10个百分点，最近几年才有所回落。这一降一升，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密切相关，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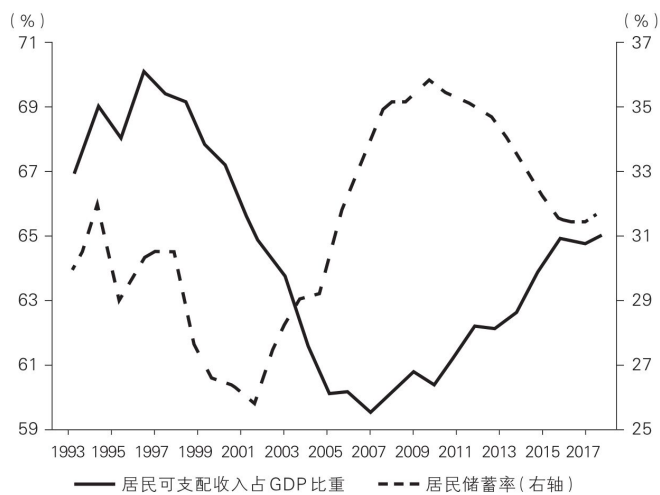


图7-3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及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居民高储蓄

我国居民储蓄率很高，20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25%—30%。同期美国的储蓄率仅为6%—7%，欧洲主要国家比如德、法就是9%—10%。日本算是储蓄率高的，也不过12%—13%。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可能中国人历来就是特别勤俭，舍不得花钱。前些年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研究，讲世界各地的语言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很多语言（如英语）是有时态的，因此在讲到“过去”“现在”“未来”时，语法要改变，会让人产生一种“疏离感”，未来跟现在不是一回事，何必担心未来，活在当下就好。因此说这种语言的人储蓄率较低。很多语言（如汉语和德语）没有时态，“往日之我”“今日之我”“明日之我”绵延不断，因此人们储蓄率也较高。⁽³⁾

天马行空的理论还有不少，但语言、文化、习惯等因素长期不变，解释不了我国储蓄率近些年的起起落落，所以还得从分析经济环境的变化入手。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⁴⁾计划生育后，人口中的小孩占比迅速下降，工作年龄

人口（14—65岁）占比上升，他们是储蓄主力，所以整体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升。孩子数量减少后，“养儿防老”的功效大打折扣，父母必须增加储蓄来养老。虽然父母会对仅有的一个孩子加大培养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但从整体来看，孩子数量的减少还是降低了育儿支出，增加了居民储蓄。21世纪初，独生子女们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而随着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他们不仅要攒钱买房、结婚、培养下一代，还要开始分担多位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储蓄率于是再次攀升。⁽⁵⁾

这一过程中的几个要素，都与地方政府有关。首先是房价上涨，这与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城市化的模式密切相关（第二章和第五章）。在那些土地供应受限和房价上涨快的地区，居民要存钱付首付、还按揭，储蓄率自然上升，消费下降。虽然房价上涨会增加有房者的财富，理论上可能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但大多数房主只有一套住房，变现能力有限，消费水平主要还是受制于收入，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所以整体上看，房价上升拉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⁶⁾

其次，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立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不足（第五章）。而且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由于体制原因，市场化供给受限，市场化服务价格偏高，所以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以应对相关支出。这也造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我国老年人的储蓄率偏高。一般来讲，人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花钱，因此老年人储蓄率一般偏低。但我国老人的储蓄率也很高，因为要补贴儿女的住房支出和第三代的教育费用，还有自身的医疗费用等。此外，地方政府常年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的需要。这些人难以把妻儿老小接到身边安心生活，因此在耐用品消费、住房和教育消费等方面都偏低。他们提高了储蓄，把钱寄回了外地家里。这些外来人口数量庞大，也推高了整体储蓄率。⁽⁷⁾

居民收入份额低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因为储蓄率高，能省，也是因为确实没钱。从21世纪初开始，在整个经济蛋糕的分配中，居民收入的份额就一直在下降，最多时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之后又反弹回来5个百分点（图7-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先降后升的变化并不奇怪。在发展初期，工业化进程要求密集的资本投入，资本所得份额自然比在农业社会中高。与

一把锄头一头牛的农业相比，一堆机器设备的工业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水平，但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也会相对资本而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因此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所得份额降低了。此外，在工业部门内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稳定就业和工资的任务，雇工人数更多，工资占比更大，因此90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也降低了经济中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⁸⁾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兴起，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工业，又推动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升。

在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化的方式加速了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第二至第四章介绍了地方招商引资和投融资模式，这是一个“重企业、重生产、重规模、重资产”的模式。地方政府愿意扶持“大项目”，会提供各种补贴，包括廉价土地、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这都会刺激企业加大资本投入，相对压缩人力需求。虽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工业整体上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但相对我国庞大的劳动力规模而言，工业确实存在资本投入过度的扭曲现象。加入WTO之后，一方面，进口资本品关税下降，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工业在东南沿海集聚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而与户籍和土地有关政策抬高了房价和用工成本，不利于外来人口安居乐业，“用工荒”现象屡有发生，企业于是更加偏向资本投入。⁽⁹⁾

当然，资本相对劳动价格下降后，企业是否会使用更多资本，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可替代性。如今各种信息技术让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对劳动的替代性比较高，所以机器相对劳动的价格下降后，的确挤出了劳动。⁽¹⁰⁾举个例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2016年就已占到了世界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三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工成本上升。⁽¹¹⁾

从收入角度看，国民经济分配中居民占比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占比就必然上升。同理，从支出角度看，居民消费占比下降，政府和企业支出占比就会上升，这些支出绝大多数用于了投资。也就是说，居民收入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厂房和机器设备等，而老百姓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占比则相对降低。此外，总支出中还有一块是外国人的支出，也就是我国的出口。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不仅对应着投资占比上升，也对应着出口占比上升。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力是投资和出口，而国内消费则相对不振。

该如何评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注意上文讲的都是相对份额，不是绝对数量。整个经济规模在急速膨胀，老百姓的收入占比虽然相对下降了，但水平在迅速上升。消费和投资水平也都在迅速上涨，只不过速度快慢有别罢了。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资本占比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数量增加，这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我国几十年内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必然要经历资本积累阶段。欧美和日韩也是如此。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读者们想必耳熟能详。近些年兴起的“新资本主义史”，核心议题之一正是欧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强制性”，比如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压榨和美国的奴隶制等。⁽¹²⁾而在“东亚奇迹”中，人民的勤奋、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积累举世闻名。我国也不例外。除了人民吃苦耐劳之外，各种制度也在加快资本积累。比如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都是把剩余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在城镇，为了降低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刺激投资和工业化，银行压低了给企业的贷款利息。为了保证银行的运转和利差收入，银行给居民储蓄的利率就被压低了。这种“金融抑制”降低了居民的收入。而居民在低利率下为了攒足够的钱，也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消费。⁽¹³⁾

若单纯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出发，穷国底子薄，增长速度应该更快，而像美国这样的巨无霸，每年即便只增长1%—2%，从绝对数量上看也非常惊人，很不容易。假如穷国增长快而富国增长慢的话，久而久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趋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除了一个部门，那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生产率低的国家，生产率进步确实快，而制造业生产率高的国家，进步也的确慢。⁽¹⁴⁾可见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久而久之，后发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率就有机会与先进国家“趋同”。那为什么经济整体却没有“趋同”呢？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国家无法组织和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制造业，无法有效启动和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

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而且起步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投资都有用，都有回报，关键是要加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而在资本市场和法律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信用等级高的政府和国企来调动资源，主导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是有效的方式。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会导致四个问题。第一，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什么都有用的时代过去了，投资难度加大，因此投资决策和调配资源的体制需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需要改变。这方面前文已说过多次（第三章和第六章），不再赘述。第二，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所以债务负担越积越重，带来了一系列风险（第六章），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第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是有限的（第五章）。第四，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见下节）。

在这个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既包括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以及贫富差距（第五章），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等经济结构不平衡。而“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老百姓收入占比不高，“获得感”不够。

针对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并明确了如下原则：“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如果人们把收入中的固定比例用于消费，那要想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只让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是不够的，必须让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才能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才能提高。202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文章，其中就提到“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这些原则，需要很多具体改革。第二章介绍了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加大民生支出。第三章介绍了官员评价体系的改革，要求地方官员重视民生支出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第五章介绍了要素市场改革，试图提高劳动力收入，降低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以增加消费。这里再举一例，即国有企业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改革。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企业留存收入份额（即“企业储蓄”）的上升。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要把这些企业留存资源转给居民。民营企业整体利润率比国企高，所以留存收入或“总储蓄”较多，但这些钱都用作了投资，还不够，所以“净储蓄”是负的，还要融资。而国企整体盈利和“总储蓄”比民营企业少，但“净储蓄”却是正的。“净储蓄”虽是正的，国企的平均分红率比民营企业要低。(15)2017年，国务院提出将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包括金融机构的股权划归社保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10%。2019年改革提速，要求央企在2019年完成划转，地方国企在2020年底基本完成划转。(16)这项改革涉及数万亿元资金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难度很大，但必须下决心完成。毕竟，在当初的社保改革中，国企退休老职工视同已经缴费，造成的社保基金收支缺口也理应由国企资产来填补。2019年底，央企1.3万亿元的划转已经完成。本章写作时的2020年初，地方国企的划转还在推进过程中。

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外部失衡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内部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本国生产的东西若不能在本国消化，就只能对外输出。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我国加入WTO之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图7-4），消费占比自然锐减（图7-2）。这种经济结构比较脆弱，不可持续。一来外国需求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很大，难以掌控；二来投资占比不可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23%。



图7-4 净出口与投资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净出口”按支出法GDP计算。

虽然从会计核算角度讲，投资确实可以提升当下的GDP数字，但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高的收入，不能成为未来更高的消费，这种投资就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财富，就是浪费。假如政府借钱修了一条路，很多人都用，降低了通勤和物流成本，提高了生产率，那就是很好的投资。但若政府不断挖了修、修了再挖，或干脆把路修到人迹罕至之处，经济账就算不回来了。这些工程所带来的收入远远抵不上成本，结果就是债务越积越高。虽然修路时的GDP上升了，但实际资源是被浪费掉了。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当下尚未将这些损失入账，但未来迟早会出现在账上。

投资和消费失衡不是新问题。早在2005—2007年，我国家庭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已经下降到了低点（图7-2和图7-3）。当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就曾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投资与消费者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¹⁷⁾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锐减，不得已出台“4万亿”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从已然很高的40%进一步上升到47%（图7-4），虽然弥补了净出口下降造成的GDP缺口，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强化了结构失衡问题。2011年又逢欧债危机，所以始终没有机会切实调整经济结构。2007—2012年，消费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居民储蓄率几乎没有变化（图7-2和图

7-3)。由于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国外需求也不足，所以企业投资实体产业的动力自然也就不足，导致大量投资流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带动了房价和地价飙升，提升了债务负担和风险（第三章到第六章）。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才开始逐步推行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为我国消费占比过低，纵然极高的投资率也还是无法完全消纳所有产出，剩余必须对外出口。我国出口常年大于进口，也就意味着必然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常年大于出口，其中主要是美国。由于我国体量巨大，对国际贸易的冲击也巨大，所带来的经济调整并不轻松。

当然，国内和国际是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而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我国国内失衡，生产多消费少，必须向外输出剩余。但反过来看，美国人大手支出，高价向我国购买，我国的相应资源也会从本国消费者向出口生产企业转移，以满足外国需求，这就加剧了国内的消费和生产失衡。2001年“9·11”事件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同时国内房地产持续升温，老百姓财富升值，也加大了消费，这些需求中很大一部分都要靠从中国进口来满足。美国由此累积了巨大的对外债务，最大的债主之一就是中国，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内部的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都开始了艰难的调整和再平衡。我国的调整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等等。在美国，这种调整伴随着政治极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现象。

因此，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贸易总量。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会反映到其国际收支状况中。我国国内产出没有被国内消费和投资完全消耗掉，因此出口大于进口，经常账户（可以简单理解为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情况的总结）是顺差，对外净输出。美国的国内产出满足不了本国消费和投资需求，因此进口大于出口，经常账户是逆差，对外净输入。图7-5描绘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国际收支失衡情况，有的国家顺差（黑线之上，大于零），有的国家逆差（黑线之下，小于零）。逻辑上，全球经常账户总差额在各国互相抵消后应该为零。但在现实统计数据中，由于运输时滞或因逃税而虚报等原因，这个差额约占全球GDP的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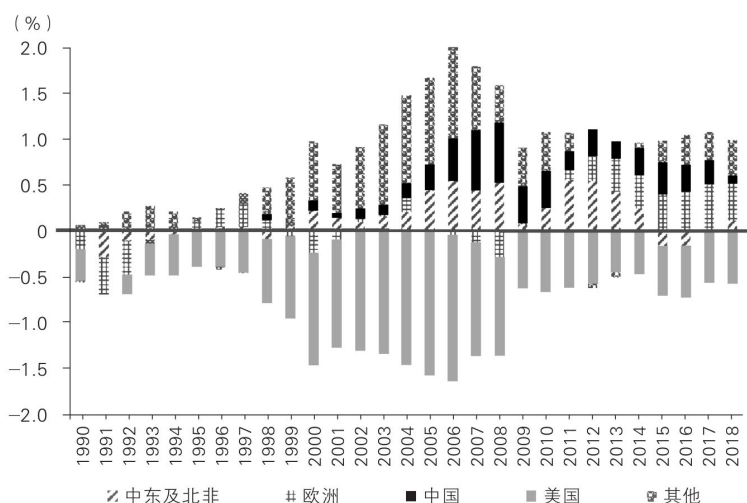


图7-5 经常账户差额占全球GDP比重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图7-5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的失衡情况不严重，约占全球GDP的0.5%以内。从21世纪初开始失衡加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约占全球GDP的1.5%—2%。危机后，失衡情况有所缓解，下降到全球GDP的1%以内。第二，全球经常账户的逆差基本全部由美国构成，而顺差大都由中国、欧洲和中东构成。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飞速发展，占全球顺差的份额扩大了不少，也带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油价飞涨，中东地区顺差因此大增。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支出降低，同时美国国内的页岩油气革命彻底改变了其天然气和石

油依赖进口的局面，而转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油气的国际价格因此大跌，既降低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也降低了中东地区国际收支的顺差。2017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原油最大的进口国。(18)

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当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换句话说，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19)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从21世纪头几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了最近五年的五成到六成。因此美国虽和多国都有贸易冲突，但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20)

就业与政治冲击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国政客和媒体最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主要论据如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货冲击美国各地，工厂纷纷转移至海外，制造业就业占比大幅下滑。受中国货冲击越严重的地区，制造业就业下滑越多。(21)

从数据上看，似乎确实有这个现象。图7-6中两条黑线中间的部分显示：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稳定在15%左右，从2001年开始加速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下降到了11%。然而在两条黑线之外，更明显的现象是制造业就业从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从26%一直下降到个位数。就算把21世纪初下滑的4个百分点全赖在和中国的贸易头上，美国学界和媒体所谓的“中国综合征”在这个大趋势里也无足轻重。此外，虽然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跌，但是从1970年到2013年，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左右。(22)人虽少了，但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机器替代了人工而已，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农业技术进步也曾让农民越来越少，但农业产出并没有降低。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降低了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的成本，刺激了其规模和就业扩张，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虽然确有部分工人因工厂关闭而

失业，但美国整体就业情况并未因中美贸易而降低。(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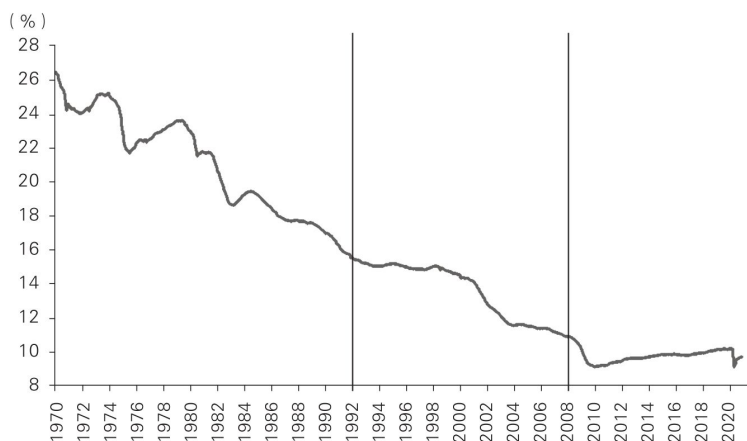


图7-6 美国制造业就业占工作年龄人数比重

数据来源：FRED数据库，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

注：横轴刻度为当年1月1日。

然而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技术进步、公司管理不善、市场需求变化等。但如今不少美国人，似乎普遍认为“全球化”才是祸根，“贸易保护”才是良方。最近的一个基于大规模网络民调的实验很能说明问题。实验人员给被试者看一则新闻，说一家美国公司做出了一些经营调整，既不说调整原因，也没说要裁员，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就有接近两成的人建议“贸易保护”。如果调整一下这则新闻的内容，提到裁员，但明确说原因不是因为贸易冲击，而是因为经营不善或市场变化等其他因素，特朗普支持者中建议“贸易保护”的人会上升到将近三成。如果再调整一下，明确说裁员是因为贸易冲击，特朗普支持者中建议“贸易保护”的人将达到半数。而此时就算政治倾向偏中间，甚至偏克林顿的人，建议“贸易保护”的倾向也会大幅上升。这些倾向不只是说说而已，会直接影响投票结果。(24)

技术冲击

中国制造业崛起和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就业冲击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加实实在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虽然制造业占美国就业的比重已是个位数，但制造业依旧是科技创新之本，美国研发支出和公司专利数

量的六七成均来自制造业企业。(25)

图7-7描绘了我国各项指标相对美国的变化。首先是制造业增加值。199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只相当于美国的0.14，但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76倍。其次是技术，衡量指标是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自1978年该系统运作以来，美国在2019年首次失去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被中国超越。再次是更加基础的科学，衡量指标是国际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数量，即“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这项指数只包括各学科中国际公认的82本高质量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从中计算各国作者所占比例。2012年，我国的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0.24，略高于德国和日本，但2019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0.66，相当于德国的3倍，日本的4.4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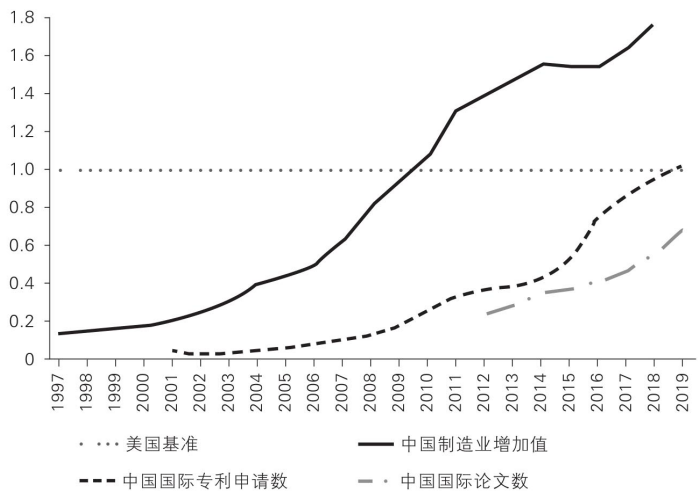


图7-7 中美科技相对变化（美国各项指标设为1）

数据来源：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来自“自然指数”。

这些数量指标当然不能完全代表质量。但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没有数量做基础，也就谈不上质量。此外，这些数据都是每年新增的流量，不是累积的存量。若论累积的科技家底，比如专利保有量和科研水平，中国还远远赶不上美国。这就好比一个年轻人，多年努力后年薪终于突破百万，赶上了公司高管的水平，但老资格的高管们早已年薪百万了几十年，累积的财富和家底自然要比年轻人厚实得多。但这个年薪百万的流量确实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年轻人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经具备

了挣钱的能力，势头很猛，未来可期，累积家底大约只是时间问题。如今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的认可度远高于10年前，这个认知有个滞后的过程。对技术和科学，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专利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之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的科研项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又过了10年，2019年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而按照目前的科学论文增长率，2025年左右中国就可能超过美国（图7-7）。

所以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创新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至少曾经是）。而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最近十几年，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优势一直在自我强化，不断吸引供应链上的外国企业来中国设厂，而本国的上下游厂商也发展迅猛，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效应也很强。我国出口产品中最大的一类是通信技术设备和相关电子产品（比如手机）。2005年，这类出口品中海外进口部件价值的占比高达43%，本土创造的价值只有57%。但到了2015年，来自海外的价值下降到了30%。⁽²⁶⁾

我用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来举个例子。多年前，媒体和分析家中流传一种说法：一台“中国制造”的iPhone，卖大几百美元，但中国大陆贡献的价值只不过是富士康区区二三美元的组装费。最近两年，仍然时不时还会看到有人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与事实相差太远。苹果公司每年都会公布前200家供应商名单，这些公司占了苹果公司原材料、制造和组装金额的98%。在2019年版的名单中，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一共有40家，其中大陆企业30家，包括多家上市公司。⁽²⁷⁾在A股市场上，早有所谓的“果链概念”，包括制造iPhone后盖的蓝思科技、摄像头模组的欧菲光、发声单元的歌尔股份、电池的德赛电池等上市公司。虽然很难估计在一台iPhone中，中国（含香港）产业链贡献的精确增加值，但从国内外一些“拆机报告”中估计的各种零部件价格看，中国（含香港）企业应该贡献了iPhone硬件价值的两成左右。

从理论上说，中美贸易不一定会损害美国的科技创新。虽然一些实

力较弱的企业在和中国的竞争中会丧失优势，利润减少，不得不压缩研发支出和创新活动，最终可能倒闭。但对于很多大公司来说，把制造环节搬到中国，靠近全球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会多赚很多钱，再将这些利润投入位于美国的研发部门，不断创新和提升竞争优势，最终美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不一定会受负面影响。⁽²⁸⁾但在美国政坛和媒体中，这些年保守心态占了上风，对华技术高压政策可能会持续下去。假如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创中心渐行渐远的话，对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是很大的损失。毕竟我国在基础科研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美国要想在全球再找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天方夜谭。没有了市场，美国公司持续不断的高额研发支出很难持续，也就难以长久维持技术优势。同时，技术高压虽然可能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民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全球化，借助巨大的投资和出口，几十年内就成长为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GDP相当于1960年全球GDP的总量（扣除物价因素后）。但过去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经济结构内外失衡严重，而国际局势也日趋复杂，中央于是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上的转型。

从本章的分析角度看，这一战略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虽然政府目前仍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所谓“供给”和“需求”，不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比如从供给角度看是调节产能，从需求角度看就是调整投资支出；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虽然制造业是生产率和科技进步的主要载体，但从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吸纳不了更多就业。产业链全球化之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多数操作工序都由机器完成。比较高端的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极高，自动化车间里没有几个工人。美国制造业虽然一直很强大，但吸纳的就业越来越少（图7-6），这个过程不会逆转。所以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而这只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不仅传统的商铺和餐馆需要人流支撑，新兴的网约车、快递、外卖等都离不开密集的人口。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必须为常住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这方面涉及的要素市场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五章已经详细阐释过。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这会带来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加大民生支出，能改变“重土地、轻人”的城市化模式，让城市“以人为本”，让居民安居乐业，才能降低储蓄和扩大消费。

其二，加大民生支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于投资的生产性支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实业投资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以往的盲目投资所带来的浪费日趋严重，降低了居民部门可使用的实际资源。而且实业投资过程大多不可逆，所以地方政府一旦参与，就不容易退出（第三章）。即便本地企业没有竞争力，政府也可能不得不持续为其输血，挤占了资源，降低了全国统一市场的效率（第四章）。其三，推进国内大循环要求提升技术，攻克各类“卡脖子”的关键环节。而科技进步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因此地方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支出，正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长远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其四，加大民生支出，遏制投资冲动，还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发展模式的依赖，限制其利用土地加大杠杆，撬动信贷资源，降低对土地价格的依赖，有利于稳定房价，防止居民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而侵蚀消费（第五章）。

要提高居民收入，还要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发展各种直接融资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就涉及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但正如第六章所言，融资和投资是一体两面，如果投资决策的主体不改变，依然以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导，那融资体系也必然会把资源和风险向它们集中，难以实质性地推进有更广泛主体参与的直接融资体系。

“双循环”战略在强调“再平衡”和扩大国内大市场的同时，也强调了要扩大对外开放。如果说出口创造了更多制造业就业和收入的话，那进口也可以创造更多服务业就业和收入，包括商贸、仓储、物流、运输、金融、售后服务等。随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从长期看还会继续升值，扩大进口可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扩大消费选择，提升生活水平，也能继续增强我国市场在国际上的吸引力。

世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畅通无阻的市场。市场从建立到完善，其规模和效率都需要逐步提升，完善的市场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结语

本书介绍了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微观机制开始，到宏观现象结束。总结一下，这一模式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第三个特点是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第五章和第六章分析了前两个特点的得失，并介绍了相关改革。本章则分析了第三个特点。其优点是能快速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缺点是经济结构失衡。对内，资源向企业和政府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加剧了贸易冲突。

经济结构再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伴随着国内的痛苦调整和国际冲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期，而我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第二大经济体，百年来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对欧美主导的经济和技术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也面临巨大反弹和调整。其实对于常年关注我国经济改革的人来说，过去的40年中没有几年是容易的，经历过几次大的挑战和危机。所以我常跟学生调侃说经济增长不是请客吃饭，是玩儿命的买卖。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看不见暗潮汹涌。

至于说落后的工业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先进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历史上是常态。盖因落后国家的崛起，必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对先进国的高效模仿和学习；二是结合本土实际，带有本国特色，发展路径与先进国有诸多不同之处。虽然第一个特征也常被先进国斥为“抄袭”，但第二个特征中所蕴含的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先进国恐怕更难接受。⁽²⁹⁾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意识形态，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下一章会展开讨论这些观点。

扩展阅读

国际经济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和新闻中的天下大事，热闹而精彩。但国际经济学分析绕不开经常账户和汇率等基础知识，因此下文中的推荐阅读，可能需要些知识背景才能完全理解，但我尽量挑通俗而准确的读物，相信关心这些现象的读者能够读懂。

国际经济现象一环扣一环，冲击和调整一波接一波。今天回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逻辑，第六章曾推荐过的经济史专家图兹的杰作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2018) 值得再次推荐。站在全球的角度再往前看，2008年的危机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的著作《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2015) 阐述了1997—2008年间的全球经济金融变迁，是一本杰作。那从1997年再往前呢？回到风云变幻、自由市场思潮席卷全球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2016) 也是一本杰作。他们亲历了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拉美债务危机、广场协议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思考深度和叙事细节，别人当然比不了。从更宏观的角度和更长的历史视角切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埃森格林的杰作《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原书第3版）》(2020) 解释了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在过去百年间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各种政经大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佩蒂斯的两本书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国际不平衡的前因后果，通俗易懂：《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2014) 及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Klein and Pettis, 2020)。虽然我并不认同其中的不少分析，但大多数是对“量”和“度”的分歧，我认为一些事情没有他强调的那么重要，但我很赞成他从多个角度解读国际收支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国际失衡程度到达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的文集《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 正收录了他从1996年至2009年发表各类评论和分析文章。这本书很好，但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看懂。与事后回顾类的文章相比，看事件发生当时的分析，情境感更强；而读者借助事后诸葛的帮助，也更能学习和领会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时，每个人思考和推理的局限性。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鲍德温的著作《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2020）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好书，简明通俗。他把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货物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其中对“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发展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全球化当然也冲击了各国的政治体系，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2011）阐述了一个“三元悖论”：深度全球化、政策自主性、民主政治，三者之间不可兼得。其中不少论述对我很有启发。2019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美国工厂》，讲述了中国企业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工厂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对美国的冲击，也能体会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难度。

至于中国崛起对世界和美国的冲击，光是最近几年出版的著作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从“中国统治世界”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各种身份的作者、各种角度的理论、各种可能的预测，眼花缭乱。这里谨推荐一本历史学家王赓武的杰作 *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 (Wang, 2019)。王教授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他是出生在海外的华裔，解放战争时在南京读书，“二战”后辗转东南亚、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工作居住，又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10年香港大学校长，最后回到新加坡。其一生不仅精研中国史，还在数个独特的岗位上亲历了各种政经大事。他能在2019年89岁高龄时出版这样一本小书，谈谈他的思考和观察，非常珍贵。其中见识，胜过无数东拼西凑的见闻。

- (1) 制造业和出口总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出口品中来自海外的增加值占比，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
- (2) 此处使用“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即考虑了各种转移支付之后的实际支出，要高于按GDP支出法直接计算的消费支出。
- (3) 参见洛杉矶加州大学行为经济学家陈（Chen）的论文（2013）。
- (4) IMF的张龙梅等人的论文（Zhang et al., 2018）总结了解释中国储蓄率变化的各种研究。
- (5) 南加州大学伊莫若霍罗格鲁（Imrohorglu）和康涅狄格大学赵开的论文（2018）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刻羽等人的论文（Choukhmane, Coeurdacier and Jin, 2019）讨论了“养儿防老”和计划生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综合影响。
- (6) 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和北京大学杨汝岱的论文（2013）分析了各地土地供给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认为房价是储蓄上升的主要推手。西南财经大学万晓莉和严予若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方芳的论文（2017）估计了房价上涨对消费影响的“财富效应”非常小，影响消费的主因还是收入。

- (7) IMF的张龙梅等人 (Zhang et al., 2018) 对比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差异。IMF的夏蒙 (Chamon) 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德 (Prasad) 在一份研究中 (2010) 描绘了我国老年人的高储蓄率, 认为城镇居民在教育和医疗上的高支出是推高储蓄率的主因。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上海交通大学陆铭、同济大学钟宁桦 (2010) 分析了我国城市移民消费不足的问题。
- (8) 经济发展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起伏, 可参考复旦大学罗长远、张军的论文 (2009) 与清华大学白重恩、钱震杰的论文 (2009), 后者也估计了国企改革的影响。
- (9)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 (2016) 分析了这种“过度资本化”的制度成因。北京大学余森杰和梁中华的论文 (2014) 指出, 加入WTO后, 企业引进资本品和技术的成本下降, 刺激了企业用资本替换劳动。
- (10) 有个经济学概念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该弹性若大于1, 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后, 企业就会使用更多资本、更少劳动, 导致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下降。复旦大学陈登科和陈诗一的论文 (2018) 指出上述替代弹性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大于1。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 (Karabarbounis) 和芝加哥大学奈曼 (Neiman) 的论文 (2014) 指出, 资本品价格相对下降引起的劳动份额占比下降, 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 (11) 武汉大学陈虹和李丹丹, 以及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贾瑞雪和斯坦福大学李宏斌等人的论文 (Chen et al., 2019) 介绍了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情况。
- (12) 哈佛大学史学家贝克特的著作 (2019) 是“新资本主义史”代表作之一, 是一部杰作。但其中一些失实和夸大之处, 也招致了经济史学家的批评, 比如戴维斯加州大学奥姆斯特德 (Olmstead) 和密歇根大学罗德 (Rhode) 的精彩论文 (2018)。
- (13) 关于“亚洲奇迹”和“中国奇迹”这种“重积累、重投资”的模式 (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一般模式), 有两本书做了系统、深入且生动通俗的描述和分析。一本来自史塔威尔 (2014), 另一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李周与北京大学的林毅夫 (2014)。
- (14)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 (Rodrik) 的论文 (2013) 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制造业生产率的“趋同”现象。
- (15) IMF的张龙梅等人 (Zhang et al., 2018) 估计了国企和民企的储蓄率 and 分红率。公司储蓄率或留存利润的上升, 也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比如美国苹果公司账上的天量现金。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可参考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 (Karabarbounis) 和芝加哥大学奈曼 (Neiman) 近几年的论文 (Chen,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7;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9)。
- (16) 2017年, 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2019年,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
- (17) 参见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 (2007年3月)。
- (18) 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总是引人遐想, 充斥着各种阴谋论和地缘政治分析。但这

些起伏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市场供求。中化集团王能全的著作（2018）分析了最近几十年的石油市场起伏，事实清楚，数据翔实，是很好的参考读物。

- (19) 美元特权的源起和影响，著述很多，可参考伯克利加州大学艾肯格林（Eichengreen）的通俗介绍（2019）。
- (20) 美国贸易逆差和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数据，来自美国的BEA和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 (21) 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影响很大（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 (22) 这是在调整完价格因素之后的比重，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2016）。
- (23) 从中国的进口刺激了很多部门的就业，尤其是使用中国货作为投入的部门。详细分析和证据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王直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等人的研究（Wang et al., 2018）以及斯坦福大学布鲁姆（Bloom）等人的研究（2019）。
- (24) 实验结果来自哈佛大学迪泰拉（Di Tella）和罗德里克（Rodrik）的研究（2020）。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2020）指出，那些受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投票中的政治倾向向两级分化更为严重。
- (25) 数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及乔治亚理工学院舒翩等人的研究（Autor et al., 2019）。
- (26) 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数据库。
- (27) 公司的具体名单和简要介绍，可参考宁南山发表在其公众号的文章《从2019年苹果全球200大供应商看全球电子产业链变化》。
- (28) 这方面的理论可参考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等人的论文（2018）。
- (29)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杰作（2012）详细阐述了这两大特征所带来的冲突。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特别多，每个经济学学生都知道起码十个八个，编一本笑话集应该没问题。经济学家们也经常自嘲。有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专门设置了脱口秀环节，供本专业人士吐槽。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孤岛上，饥肠辘辘。这时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岩石对罐头施以动量，使其表层疲劳而断裂。”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然后把罐头加热，使它膨胀以至破裂。”经济学家则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

任何理论当然都需要假设，否则说不清楚。有些假设不符合现实，但是否会削弱甚至推翻其理论，还要依据理论整体来评判。但一旦走出书斋，从理论思考走到现实应用和政策建议，就必须符合实际，要考虑方案的可行性。所以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常常存在着鸿沟。做过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发明过一条“经济政策的墨菲定律”：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依托市场经济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发现问题，觉察到各种各样的“扭曲”和“错配”。但从发现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摸清产生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还要深入了解各种可行方案的得失。现实世界中往往既没有皆大欢喜的改革，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扭曲。得失利弊，各个不同。以假想的完善市场经济为思考和判断基准，不过是无数可能的基准之一，换一套“假想”和“标准”，思路可能完全不同。正如在本书开篇引用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家格申克龙的话：“一套严格的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它缺乏发达国家的很多硬件或软件资源，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国家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注定与发达国家不同。落后国家能否赶超，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组织和动员资源

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推动经济发展。所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站在今天的角度向前看，是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但回过头往后看，市场经济今天的发展状况也是几十年来经济、政府、社会协同发展和建设的结果。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强力推动的。但就算是最坚定的市场改革派，1980年的时候恐怕也想象不到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本书的主题就是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做法，这显然不是一套照搬照抄欧美国家的模式。利弊得失，相信读者可以判断。

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我理解市场和发展的复杂互动过程，不相信单向因果关系。有效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不断建设的结果，这一机制是否构成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

强调政府的作用，当然不是鼓吹计划经济。过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只有计划，否认市场和价格机制，也不允许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存在。第二是封闭，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如今这两个特点早已不复存在，硬谈中国为计划经济，离题万里。

本章第一节总结和提炼本书的主题之一，即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的竞争。第二节讨论政府能力的建设和角色的转变，总结本书介绍的“生产型政府”的历史作用和局限，也解释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必要性。第三节总结本书的关键视角：要区分经济发展过程和发展目标。既不要高估发达国家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老话说回来，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推进改革。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我国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掌控大量资源，还能通过政策间接影响资源分配，这种状况在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中会长期存在。所以要想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就要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理论上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以中央政府为主，按功能划分许多部委，以部委为基本单位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竞争主要体现在中央设定目标和规划过程中部委之间的博弈。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主管工业的就有七八个部委（一机部、二机部等）。这种自上而下的“条条”式竞争模式源自苏联。第二种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之后，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发挥积极性，因地制宜，在实际工作中去竞争资源。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块块”式的竞争模式。^①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模式也一直并存，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动和调整。毛泽东主席也并不信奉苏联模式，1956年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就说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属地管理”和“地方竞争”就构成了政府间竞争的基本模式。第一章到第四章详细介绍了这一模式。这种竞争不仅是资源的竞争，也是地方政策、营商环境、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属地管理”有利于地区性的政策实验和创新，因为毕竟是地方性实验，成功了可以总结和推广经验，失败了也可以将代价和风险限制在当地，不至于影响大局。比如1980年设立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时，政治阻力不小，所以才特意强调叫“经济特区”而不是“特区”，以确保只搞经济实验。当时邓小平对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②

在工业化进程中搞地方竞争，前提是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基础不能相差太远，否则资源会迅速向占绝对优势的地区集聚，劣势地区很难发展起来。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的工业发展和竞争奠定了基础。而导致这种分散分布的重

要原因，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当时国际局势紧张，为了备战，中央决定改变当时工业过于集中、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局面，要求“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③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国将所有工业投资中的四成投向了三线地区，即云贵川渝、宁夏、甘肃、陕南、赣西北、鄂西和湖南等地区。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4.3倍，职工人数增加了2.5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9倍。^④

“三线建设”既建设了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建设了基础设施，在中西部省份建立了虽不发达但比较全面的工业生产体系，彻底改变了工业布局。这种分散在各地的工业知识和体系，为改革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乡镇企业不仅生产满足当地消费需求的轻工业品，而且借助与国企“联营”等各种方式进入了很多生产资料的制造环节，为整个工业体系配套生产，获取了更复杂的生产技术和知识。电视剧《大江大河》中，小雷家村的乡镇企业就通过与附近的国营企业合作，开办了铜厂和电缆厂等，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各地区各行业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民营工业企业，其技术基础很多都源于三线建设时期建设的国营工厂。^⑤

第四章曾解释过这种分散化的乡镇工业企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培训农民成为工人。“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不仅仅是工作的转变，也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彻底转变。要让农民斩断和土地的联系，成为可靠的、守纪律的、能操作机械的工人，并不容易。不是说人多就能成为促进工业化的人口红利，一支合格的产业工人大军，在很多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实际上非常稀缺。^⑥正是因为有了在分散的工业体系和知识环境下孕育的乡镇企业，正是因为其工厂“离土不离乡”，才成了培训农民成为工人的绝佳场所。而且在销售本地工业品的过程中，农民不仅积累了商业经验，也扩大了与外界的联系。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开始的工业加速发展中，我国才有了既熟悉工厂又愿意外出闯荡打工的大量劳动力。

这种分散的体系，以一个全国整合的、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为标准来评价，是低效率的。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评价标准并不合适。我国疆域广阔、各地风俗文化差异很大。改革开放之初，基础设施不发达，经济落后而分散，只能走各地区独自发展再逐步整合的道路。在社会改革和变化过程中，人们需要时间调整 and 适应。变化速度的快

慢，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改革过程，必须为缓冲和适应留足时间和资源。若单纯从理论模型出发来认识经济效率，那么这些缓冲机制，无论是社会自发建立还是政府有意设计，都会被解读为“扭曲”或“资源错配”，因其未能实现提高效率所要求的“最优资源配置”。但这种“最优”往往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人人都知道工业比农业生产效率高得多，但要让几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磨合和冲突。激进改革多半欲速不达，以社会动乱收场。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关键一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评价地方主官，并将这种评价纳入升迁考核。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这种“官场+市场”体制，有三个特点。^⑦第一，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虽然经济建设或GDP目标在官员升迁中的具体机制尚有争议（第三章），但无人否认经济发展是地方主官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政绩。第二，以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虽然地方主官和政府对企业影响极大，但企业的成败，最终还是由其在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表现来决定。这些外部因素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掌控范围。因此，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资源调配，也要考虑市场竞争，考虑效益和成本。此外，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地区之间流动（虽然仍有障碍），如果地方政府恣意妄为，破坏营商环境，资源就可能流出，导致地方经济衰败。第三，当地的经济表现能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一方面，在“属地管理”体制中，更熟悉地方环境的当地政府在处理当地信息和反馈时，比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更有优势（第一章）。另一方面，当地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也会随着地方官员的升迁而产生超越本地的影响。由于常年以经济建设作为政府主要工作目标，各级政府的主官在经济工作方面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中央的主要领导绝大多数也都曾做过多地的主官，也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这对一个政府掌控大量资源调配的经济体系而言，不无益处。

“官场+市场”的竞争体制，可以帮助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这种体制的运行效果，各地差异很大。官员或政府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核心差别有三。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地方政府就算不思进取，也不会像企业一样倒闭。政绩不佳的官员虽然晋升机会可能较少，但只要不违法乱纪，并不会因投资失败或经济低迷而承担个人损失。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有合作共赢、共同做大蛋糕的可能。而官员升迁则是“零和博弈”，晋升位置有限，甲上去了，乙

就上不去。所以在地区经济竞争中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现象。第三，市场和公司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必须在任期内干出政绩，且新官往往不理旧账，因此会刺激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拉动地区GDP数字快速上涨，不惜忽视长期风险和债务负担。

这三大差别增加了地区间竞争所产生的代价，也可能滋生腐败（第三章）。此外，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还要承担多重民生和社会服务职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与企业目标大体一致，可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加多元的职能，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改变与市场和企业的互动方式，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第二节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社会发展是个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因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政府在公立教育、医疗、退休金、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都会随之增加。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外来冲击也大，所以政府要加强各种“保险”功能。⁽⁸⁾另一方面，当今很多贫穷落后国家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政府太弱小，可能连社会治安都维持不了，更无法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⁹⁾

就拿法治能力来说，虽然经济理论和所谓“华盛顿共识”都将产权保护视作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但在现实中，保护产权的能力只能在经济和政府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升。换句话说，对发达国家而言，保护好产权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的产权保护更可能是发展的结果。把产权保护写成法律条文很容易，但假如社会上偷盗猖獗，政府抓捕和审判的能力都很弱，法条不过是一纸空文。再比如，处理商业纠纷需要大量专业的律师和法官，需要能追查或冻结财产的专业金融人士和基础设施，否则既难以审判，更难以执行。但这些软件和硬件资源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积累。第四章中讲过，复杂的产品和产业链涉及诸多交易主体和复杂商业关系，投资和交易金额往往巨大，所以对合同制订和执行的法制环境以及更广义的营商环境都有很高要求。2000年至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从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¹⁰⁾，背后是我国营商环境的逐步改善。正如前述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我国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89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一步一步建设。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事，市场经济和所谓“企业家精神”，不会像变戏法一样自动出现。

在任何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还存在大量政府管制。“打官司”毕竟是一件费时费钱的事儿，不仅诉讼成本高昂，败诉方还可以不断上诉，可能旷日持久。不仅如此，修订法律也不是小事，需要很长时间。

相比之下，政府的管制和规定有时更加灵活有效，可以作为法制的补充。比如19世纪末的美国，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突飞猛进，但也发生了大量工伤事故，死亡率高，官司不断。但败诉公司有权有势，不断上诉，最终约四成的案子干脆没有赔偿。就算有赔付，数额也不大，平均不超过8个月的工资。这种不公正刺激了政府管制的兴起。在事故造成伤害之前，在打官司之前，就可以依据政府管制和规定来进行各种安全检查，防范风险。⁽¹¹⁾

有效的政府管制同样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管制和法制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会不断发展变化。一方面，全社会投入法治建设的资源不断增加，法治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民众和公司也变得更加富有，可以承担更高的诉讼成本，对法治的有效需求也会增加。因此法制相对于管制会变得更重要。这是经济和政治整体发展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国防到社会治安，从基础设施到基本社会保障，都要花钱，所以有效的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可收税从来都不容易，征税和稽查能力也需要长期建设，不断完善。就拿征收个人所得税来说，政府要有能力追踪每个人的各种收入，能核实可以抵扣的支出，能追查和惩处偷税漏税行为。这需要强大的信息追踪和处理能力。即便在以个人所得税为最主要税种的欧美发达国家，足额收税也是个难题。富人会利用各种手段避税。比如在2016年和2017年，身为富豪并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连续两年都只缴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2018年特朗普税收改革之后，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亿万富翁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率只有约20%，甚至低于收入排在50%以后的美国人。就拿扎克伯格来说，坐拥脸书公司的两成股份，2018年脸书的利润是200亿美元，那扎氏的收入是否就是40亿美元呢？不是的。因为脸书不分红，只要扎氏不卖股权，他的“收入”几乎是零。公司还将利润大都转到了“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再加上种种财务运作，也避掉了很多公司所得税。⁽¹²⁾

正因为个人所得税不易征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税制大都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2019年占全国税入的40%；第二大是公司所得税，占24%。相比之下，个人所得税只占不到7%。与个人所得税相比，增值税的征收难度要小很多。一来有发票作为凭证，二来买家和卖家利益不一致，可以互相监督。理论上，卖家希望开票金额少一点甚至不开票，可以少缴税；而买家希望开票金额越大越好，可以多抵税。因此两套票据可以互相比对，降低造假风险。但在现实中，国人对

虚开发票和假发票都不陌生。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违规发票泛滥。2001年初，在全部参与稽核的进项发票中，涉嫌违规的发票比例高达8.5%。⁽¹³⁾随着2003年“金税工程二期”的建设完成，增值税发票的防伪、认证、稽核、协查等系统全面电子化，才逐渐消除了假发票问题，之后的增值税收入大幅增长。⁽¹⁴⁾目前，“金税工程三期”也已完成。2020年在手机上用“个人所得税App”进行过“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的读者，应该记得其中信息的详细和准确程度，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征税能力”需要长期建设。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服务的质量，还是政府收入的数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

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政府能力于是成了市场能力的补充或替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它缺乏先进国家完善的市场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些本就是经济发展所需要达到的目标，而很难说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对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找到其他可行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时间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比如说，发达国家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体系，可以把民间积累的大量财富引导到相对可靠的企业家手中，创造出更多财富。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本市场和法律体系远远谈不上健全，民间财富也极为有限，社会风气也不信任甚至鄙视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这些条件都限制了当时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行方式。

因此落后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所谓“举国体制”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罢，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特色。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但各国由于历史、社会、政治情况不同，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与市场互动和协调的方式也都不同。本书阐述的“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能成功。以工业化进程中对“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为例。有的国家比如韩国，在抬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企业的同时，积极提倡出口，以国际市场竞争来约束本国企业，迫使其提

高效率，并且随着工业发展逐步降低乃至取消保护，最终培育出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但也有很多国家，比如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难以“断奶”，形成了寻租的利益集团和低效的垄断，拖累了经济发展。在更加复杂的大国比如中国，两种状况都存在。既有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企业，也有各种骗补和寻租的低效企业。这种结果上的差异，源于各国和各地政商关系的差异。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有能力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它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15)

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动员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并将其投入生产，满足社会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动员资源，但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无法形成供需良性互动的循环，生产率水平也很低。因此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始于满足社会需要。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市场都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私人部门很难克服各种协调困难和不确定性，政府和国企于是主导投资，深度介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但这种模式不能一成不变，过去的成功经验不见得能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要。所谓“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第七章讲过，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往往也高，其中大部分是保障民生的支出。就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来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方面的政府平均支出占到GDP的24%，而我国只有13%。(16)一方面，随着国家变富裕，民众对这类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和波动会产生失业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去做缓冲。就拿贫富差距扩大来说，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不仅包括对富人多征税，还包括为穷人多花钱，把支出真正花在民生上。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的土地和户籍改革都承认了这种不可逆性。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冲击，回到乡村可能是权宜之计，但不是真正有效的长期缓冲机制。还是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加大民生支出，也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工业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创造就业的能力会减弱，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所以大多数就业都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而后者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¹⁷⁾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其一，与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在这种行业中，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资和决策机制，没有多大优势。其二，“投资型”和“服务型”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但因为服务业更加灵活和市场化，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投入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要投资和培育更一般化的人力资本，而非直接主导具体的项目。

扩大民生支出的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第一章分析了事权划分的逻辑，这些逻辑决定了民生支出的主力必然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2019年，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总支出中，地方占96%，中央只占4%。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均等化（第二章），但这并没有改变地方民生支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事实。在分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改革、营改增改革之后（第二章），中国目前缺乏属于地方的主体税种。以往依托税收之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因此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目前讨论的热点方向是开征房产税。虽然这肯定是个地方税种，但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已经热议了多年，也做了试点，但仍未实质推进。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套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运行的理论。在很多核心议题上，这套理论并不考虑“国别”，抽象掉了政治、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议题并不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而是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资源动员和配置方式，肯定与发达国家不同。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当然也各不相同。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这种“组织学习模式”与“探索创新模式”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不一样。我国的经济学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讨论过这两种模式的不同。问题的核心在于：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式若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¹⁸⁾

本书一直强调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不了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但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未来，所以本书不仅介绍了过往模式的成就，也花了大量篇幅来介绍隐忧和改革。我个人相信，如果“组织学习模式”不止一种，“探索创新模式”自然也不止一种，欧美模式不一定就是最优的模式。

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发展模式也不同。⁽¹⁹⁾从宏观角度看，很多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资本积累的方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汇率操控、金融抑制等。但在不同国家，贯彻和执行这些战略或政策的具体方式并不相同。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哪个国家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便画美丽的图画。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每个国家不一样。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

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不仅国与国之间国情和发展路径有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各个省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第一章开篇就提到，若单独计算经济体量，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都是世界前20的经济体，都相当于一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如果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故事可以写很多本书和论文，我国各省独特的发展路径当然也值得单独研究和记录。⁽²⁰⁾可惜目前的经济学术潮流是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国别和案例研究式微，被称为“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听起来就很“不科学”，低人一等。我对这种风气不以为然。虽然我从抽象和一般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学到了很多，但对具体的做法和模式更感兴趣，所以本书介绍了很多具体案例和政策。

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就拿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说，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表面看，这是个工业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各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看深一层，这是个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市民的问题，这个演变过程，各国差别就大了。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才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化才离不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这些特殊的路径，我认为才是研究经济发展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东西。

可行的政策不仅受既有制度的约束，也受既有利益的约束。政策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保证做决策的人或权力主体的利益不受巨大损害，否则政策就难以推行。⁽²¹⁾可行的经济政策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背后是各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议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激励相容的机制重要，文化的制约也重要。比如政治经济学中有个重要概念叫“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一个例子就是地方政治精英被地方利益集团俘获，损害民众利益。在我国历史上，这一“山高皇帝远”的问题就长期存在，应对之道不仅有各类制度建设，也从来没离开过对官僚群体统一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第一章）。

另一个例子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冲突。支持自由贸易的概念和理论，几乎算是经济学中最强有力的逻辑，但往往也突破不了现实利益的枷锁。只要学过经济学，都知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

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从理论上讲，即便有人受损，也该支持自由贸易，因为整体得益远大于部分损失，只要从受益方那里拿一点利益出来，就足够补偿受损方且有余。但在现实中，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补偿可能迟迟落实不到位，最终是受益者得益越来越多，而受损者却屡遭打击。虽说平均值是变好了，但那些受损的人的生活不是理论上的平均数字，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和行动，这是保护主义的根源。(22)

最后，与主要研究成熟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研究发展过程的经济学还包括两大特殊议题，一是发展顺序，二是发展节奏。在现实中，这两个问题常常重合。但对研究者而言，第一个问题的重点是“结构”，第二个问题的重点是“稳定”或“渐进性”。

改革方向和改革过程是两回事。就算每个人都对改革方向和目的有共识（事实上不可能），但对改革路径和步骤也会有分歧。什么事先办，什么事后办，不容易决定。每一步都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拼命争取和拼命抵制的都大有人在。就算能看清对岸的风景，也不见得就能摸着石头成功过河，绊脚石或深坑比比皆是。20世纪中叶，“二战”刚刚结束，出现了大批新兴国家，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当时研究的重点就是发展顺序或结构转型问题。后来这一研究范式逐渐式微。最近10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领衔的研究中心开始重新重视结构转型问题，其理论称为“新结构经济学”，依托“比较优势”的基本逻辑来解释发展次序和结构转型，也称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这一思路目前尚有很多争议，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探索方向。(23)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经济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国的GDP总量哪年能超过美国，而是探讨我国是否具备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还能继续齐头并进吗？还有几亿的农民能继续城市（镇）化吗？贫富差距能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吗？在现有的基础

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具体政策是什么？因此本书在每个重要议题之后，都尽量介绍了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以便读者了解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把握和施政思路。有经济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言：“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²⁴⁾

结语

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的解读。现象复杂多变，偶然因素非常重要，过往并非必然，未来也不能确定。但经济学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它能从过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提取一些因素，思考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对事件的多种解读，给人启发。但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组合？又如何解读？这些都与所研究事件的所在环境密不可分。任何合格的理论当然都能自圆其说，但应用理论要跳出理论本身，才能审视其适用性和实用性，这种应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对相关因素的提取和组合，本质上是对“何谓重要”这一问题的反复考量，其判断标准只能在比较中产生。这一“比较”的视野，要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既包括跨地区、跨国家的比较，也包括跨时期的比较。研究者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现状和历史，也要了解所比较国家的现状和历史。比较数据和表面现象容易，但要比较数据产生的过程和现象发生的机制就难了，而这些往往更加有用。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理解发展过程，因此必须理解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力量心存敬畏，对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扩展阅读

培养“比较”视野需要大量阅读，这也是本书设立“扩展阅读”部分的初衷。我个人偏爱经济史，所以把最后这部分留给经济史。这个领域的大作很多，以下三本入门读物的共同点是简明通俗，篇幅虽不长，但介绍了很多重要现象，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英国史学家艾伦的《全球经济史》（2015），乔治梅森大学戈德斯通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2010），哈佛大学弗里登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2017）。希望这些书能激发读者兴趣，之后去做深入了解。我个人也经常翻阅卡尔·波兰尼、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乔尔·莫基尔等人的杰作，大都有中译本。都是些老书，常读常新。熟悉这些著作的读者应该能在本书的很多地方看到《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格申克龙，2012）和《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波兰尼，2020）的影子。

国内的经济学学生很了解美国的经济学理论，但不太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推荐两种读物。第一本是西北大学戈登的《美国增长的起落》（2018）。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会给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从很长的时间线上对此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是大大部头，细节丰富，读者的印象和感受会很深。另一本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科恩（Cohen）和德隆（DeLong）合著的*Concrete Economics: the Hamilton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2016），这本书着重强调政府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实行产业政策就实行产业政策、该保护贸易就保护贸易、该操控汇率就操控汇率，坚持务实精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有美国的今天。借回顾历史之机，作者们批评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席卷美国和全球的自由市场思潮。

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在东亚研究领域负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辞世。他的杰作《邓小平时代》清晰易懂，细致流畅，影响很大。改革开放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本书记录了这个伟大开端，放在这里推荐，再合适不过。

- (1) 第一种竞争模式被称为“U型”（unitary），第二种被称为“M型”（multidivision），都是公司治理中常用的结构模式。“U型”公司按功能划分部门，比如生产、销售、采购等。而“M型”公司则分成几个子品牌或事业部，各成系统，彼此独立性很强。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Maskin）、清华大学钱颖一、香港大学许成钢的论文（Maskin, Qian and Xu, 2000）将这种公司治理

结构的理论用于研究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 (2) 经济特区的故事详见傅高义杰作 (2013)。香港大学许成钢的论文 (Xu, 2011) 解释了地区竞争有利于地方性的政策创新和实验。
- (3) 1964年8月19日, 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毛泽东、党中央提交的报告。
- (4) 见薄一波的著作 (2008) 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严鹏的著作 (2018)。
-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樊静霆和密歇根州立大学邹奔的论文 (Fan and Zou, 2019) 分析了“三线建设”对当地工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积极影响。
- (6)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申克龙在著作 (2012) 中指出, 很多落后国家虽人口众多, 却极度缺乏合格的产业工人, “创造一支名副其实的产业工人大军, 是最困难和耗时的过程”。
- (7) 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论文 (2018) 详细阐述了“官场+市场”机制及其优缺点。下文内容取材于该文。
- (8)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 (Rodrik) 的论文 (1998) 探讨了全球化与“大政府”之间的正向关系。
- (9)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贝斯利 (Besley) 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佩尔松 (Persson) 的著作 (2011) 详细阐述了这三大支柱的理论联系, 下文中关于税收能力和法制能力的内容受该书启发。
- (10) 产品复杂度的度量来自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项目。
- (11) 关于美国政府管制的兴起和现状, 以及与法制之间关系的研究, 参见哈佛大学格莱泽 (Glaser) 和施莱弗 (Shleifer) 的论文 (2003), 以及芝加哥大学莫里根 (Mulligan) 和哈佛大学施莱弗 (Shleifer) 的论文 (2005)。
- (12) 美国富人税率数据和扎克伯格的例子, 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塞兹 (Saez) 和祖克曼 (Zucman) 的著作 (2019)。
- (13) 数据来自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全国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统一思想 做好准备 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
- (14) 关于“金税工程二期”对增值税收入影响的估计, 来自复旦大学樊海潮、刘宇及美国西北大学钱楠筠等人的论文 (Fan et al., 2020)。
- (15) 伯克利加州大学巴尔丹 (Bardhan) 的论文 (2016) 总结和讨论了各国保护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得失成败。他特别强调了“幼稚产业”保护承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也就是起初设计好了将来要“断奶”的保护, 最终却迟迟无法“断奶”的问题。
- (16) 数据来自IMF的张龙梅等人的论文 (Zhang et al., 2018)。
- (17) 服务业发展离不开人口密度, 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服务 (比如餐馆或理发店) 都不能跨地区贸易, 需要面对面交易。上海交通大学钟粤俊和陆铭以及复旦大学奚锡灿的论文 (2020) 分析了我国各地区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 (18) 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讨论, 详见哥伦比亚萨克斯 (Sachs)、戴维斯

加州大学胡永泰、莫纳什大学杨小凯的研究以及林毅夫的论文（2003）。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哥伦比亚大学格林沃尔德的著作（2017）系统地阐释了学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讨论了一系列主流经济学中视为“扭曲”的政策积极意义，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等，是一部杰作。

- (19)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著作（2009）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点。
- (20) 其实何止是省，我国很多市的发展故事和模式也各具特色。这方面深入的研究并不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如下著作，很有意思。复旦大学章奇和北京大学刘明兴关于浙江模式的著作（2016）；复旦大学张军主编的关于深圳模式的论文集（2019）。再早一点，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张燕生团队关于佛山模式的研究报告（2001），浙江大学史晋川团队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报告（2002）。
- (21) 清华大学钱颖一的论文集（Qian, 2017）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 (22)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著作（2018）阐述了贸易理论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
- (23) 关于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参见林毅夫的著作（2014），其中也包括了很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讨论以及林教授的回应。
- (24) 参见伯克利加州大学科恩（Cohen）和德隆（DeLong）的著作（2016）。

结束语

写书是需要幻觉的，我必须坚信这本书很重要，很有意义，我才能坚持写完它。但写完了，也就不再需要这种幻觉支撑了。中国经济这台热闹炫目的大戏，说不尽，这本书只是我的一点模糊认识，一鳞半爪都谈不上，盲人摸象更贴切些。凯恩斯在《论概率》中说过一段话，概括了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写这样一本书，若想说清观点，作者有时必须装得成竹在胸一点。想让自己的论述站得稳，便不能再一下笔就顾虑重重。论述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我有时轻描淡写，斩钉截铁，但其实心中始终有所疑虑，也许读者能够体谅。

过去40年，我国的名义GDP增长了242倍，大家从每个月挣二三十元变成了挣四五千元，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被时代甩在了后面。身在其中的风风火火、慌慌张张、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其他国家的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理论，都没有切身感受。

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哪怕只是五六十年，也是一个远超认知的时间跨度，信念因此重要。1912年，溥仪退位，旧制度天崩地裂，新时代风起云涌，直到改革开放，仿佛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但实际不过66年。

所以这本书没什么宏大的构思和框架，也没有预测，就是介绍些当下的情况，如果能帮助读者理解身边的一些事情，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严肃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争取改善一下生活，哪怕只是增加些谈资，也足够了。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

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参考文献

艾肯格林，巴里（2019），《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化之路及对中国的启示》，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

艾伦，罗伯特（2015），《全球经济史》，陆贇译，译林出版社。

埃森格林，巴里（2020），《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原书第3版）》，麻勇爱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载《经济研究》第3期。

鲍德温，理查德（2020），《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格致出版社。

保尔森，亨利（2016），《与中国打交道：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王宇光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贝克特，斯文（2019），《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编委会（2013），《国家开发银行史：1994—2012》，中国金融出版社。

波兰尼，卡尔（2020），《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

蔡昉、李周、林毅夫（201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

陈斌开、李银银（2020），《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2010），《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载《经济研究》增刊。

陈斌开、杨汝岱（2013），《土地供给、住房价格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载《经济研究》第1期。

陈登科、陈诗一（2018），《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

份额》，载《世界经济》第12期。

陈硕、朱琳（2020），《市场转型与腐败治理：基于官员个体证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陈晓红、朱蕾、汪阳洁（2019），《驻地效应——来自国家土地督察的经验证据》，载《经济学（季刊）》第1期。

达利欧，瑞（2019），《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赵灿等译，中信出版社。

党均章、王庆华（201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分析与思考》，载《银行家》第4期。

德·索托，赫尔南多（2007），《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

范子英、李欣（2014），《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载《经济研究》第6期。

方红生、张军（2013），《攫取之手、援助之手与中国税收超GDP增长》，载《经济研究》第3期。

冯军旗（2010），《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傅高义（2013），《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弗里登，杰弗里（2017），《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山，弗朗西斯（2014），《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勇、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第3期。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2018），《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载《经济研究》第12期。

高翔、龙小宁（2016），《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么？》，载《经济学（季刊）》第2期。

戈德斯通，杰克（2010），《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戈登，罗伯特（2018），《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等译，中信出版集团。

戈顿，加里（2011），《银行的秘密：现代金融生存启示录》，陈曦译，中信出版社。

葛剑雄（201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

格申克龙，亚历山大（2012），《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

弓永峰、林劼（2020），《“逆全球化”难撼中国光伏产业链优势地位》，中信证券研报。

辜朝明（2016），《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喻海翔译，东方出版社。

韩立彬、陆铭（2018），《供需错配：解开中国房价分化之谜》，载《世界经济》第10期。

韩茂莉（2015），《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正、张硕楠、张琳（2017），《经济结构、财政禀赋与地方政府控股城商行模式选择》，载《金融研究》第10期。

华生（2014），《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

黄奇帆（2020），《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上海人民出版社。

姜超、朱征星、杜佳（2018），《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海通证券研报。

金，默文（2016），《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束宇译，中信出版社。

金观涛、刘青峰（2010），《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2016），《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克鲁格曼，保罗（2002），《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孔飞力（201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拉詹，拉古拉迈（2015），《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李念等译，中信出版社。

莱因哈特，卡门、肯尼斯·罗格夫（2012），《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纂相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侃如（2010），《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萍（主编）（2010），《财政体制简明图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实、岳希明（2015），《〈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实、朱梦冰（2018），《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载《管理世界》第12期。

李学文、卢新海、张蔚文（2012），《地方政府与预算外收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载《世界经济》第8期。

林毅夫（200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经济学（季刊）》第4期。

林毅夫（201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2010），《“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载《经济研究》第10期。

李克崮、贾康主编（2008），《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守英（2018），《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守英，杨继东（2019），《中国产业升级的演进与政策选择——基于产品空间的视角》，载《管理世界》第6期。

楼继伟（2013），《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楼继伟（2018），《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问题》，载《比较》第4期。

- 楼继伟、刘尚希（2019），《新中国财税发展70年》，人民出版社。
- 路风（2016），《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 路风（2019），《走向自主创新：寻找中国力量的源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路风（2020），《新火：走向自主创新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陆铭（2016），《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长远、张军（2009），《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罗德里克，丹尼（2009），《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侯永志等译，中信出版社。
- 罗德里克，丹尼（2011），《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罗德里克，丹尼（2018），《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卓贤译，中信出版社。
- 马光荣、张凯强、吕冰洋（2019），《分税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载《金融研究》第8期。
- 麦克劳，托马斯（1999），《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迈恩，阿蒂夫、阿米尔·苏非（2015），《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何志强、邢增艺译，中信出版社。
- 米兰诺维奇，布兰科（2019），《全球不平等》，熊金武、刘宣佑译，中信出版社。
- 缪小林、王婷、高跃光（2017），《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载《经济研究》第2期。
- 诺顿，巴里（2020），《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二版）》，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潘功胜（2012），《大行蝶变：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复兴之路》，中国金融出版社。
- 佩蒂斯，迈克尔（2014），《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

路》，王璟译，译林出版社。

皮凯蒂，托马斯（2014），《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

任泽平、夏磊、熊柴（2017），《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

沙伊德尔，沃尔特（2019），《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颜鹏飞等译，中信出版社。

邵朝对、苏丹妮、包群（2018），《中国式分权下撤县设区的增长绩效评估》，载《世界经济》第10期。

邵挺、田莉、陶然（2018），《中国城市二元土地制度与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理论分析框架、政策效应评估与未来改革路径》，载《比较》第6期。

沈联涛（2015），《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版）》，杨宇光、刘敬国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史晋川（等）（2002），《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斯塔威尔，乔（2014），《亚洲大趋势》，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约瑟夫（2013），《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约瑟夫，布鲁斯·格林沃尔德（2017），《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陈宇欣译，中信出版社。

谭之博、周黎安、赵岳（2015），《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倍差法”的估计》，载《经济学（季刊）》第3期。

唐为（2019），《分权、外部性与边界效应》，载《经济研究》第3期。

唐为、王媛（2015），《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载《经济研究》第9期。

特纳，阿代尔（2016），《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王胜邦、徐惊蛰、朱元倩译，中信出版社。

田毅、赵旭（2008），《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中信出版社。

万晓莉、严予若、方芳（2017），《房价变化、房屋资产与中国居民消费——基于总体和调研数据的证据》，载《经济学（季刊）》第2期。

王能全（2018），《石油的时代》，中信出版社。

王瑞民、陶然（2017），《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基于县级数据的评估》，载《世界经济》第12期。

王绍光（1997），《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

沃尔克，保罗、行天丰雄（2016），《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元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于杰译，中信出版社。

沃尔特，卡尔、弗雷泽·豪伊（2013），《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和脆弱的金融基础》，祝捷、刘骏译，东方出版中心。

吴军（2019），《浪潮之巅（第四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吴敏、周黎安（2018），《晋升激励与城市建设：公共品可视性的视角》，载《经济研究》第12期。

吴毅（2018），《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巫永平（2017），《谁创造的经济奇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席鹏辉、梁若冰、谢贞发（2017），《税收分成调整、财政压力与工业污染》，载《世界经济》第10期。

席鹏辉、梁若冰、谢贞发、苏国灿（2017），《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载《经济研究》第9期。

许宪春、贾海、李皎、李俊波（2015），《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徐业坤、马光源（2019），《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产能过剩》，载《经济研究》第5期。

严鹏（2018），《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电子工业出版社。

杨海生、陈少凌、罗党论、余国满（2014），《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载《管理世界》第9

期。

- 姚洋、张牧扬（2013），《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载《经济研究》第1期。
- 叶恩华，布鲁斯·马科恩（2016），《创新驱动中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陈召强、段莉译，中信出版社。
- 易纲（2019），《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载《求是》第23期。
- 易纲（2020），《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载《经济研究》第3期。
- 尹恒、朱虹（2011），《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余森杰、梁中华（2014），《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第7期。
- 余永定（2010），《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袁健聪、徐涛、王喆、敖翀、李超（2020），《新材料行业面板材料系列报告》，中信证券研报。
- 张川川、贾坤、杨汝岱（2016），《“鬼城”下的蜗居：收入不平等与房地产泡沫》，载《世界经济》第2期。
- 张春霖（2019），《从数据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的加速增长》，载《比较》第6期。
- 张嘉璈（2018），《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信出版社。
- 张军、樊海潮、许志伟、周龙飞（2020），《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载《经济研究》第5期。
- 张军（主编）（2019），《深圳奇迹》，东方出版社。
- 章奇、刘明兴（2016），《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五常（2017），《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

- 张五常（2019），《经济解释（2019增订版）》，中信出版社。
- 张燕生（等）（2001），《政府与市场：中国经验》，中信出版社。
- 赵婷、陈钊（2019），《比较优势与中央、地方的产业政策》，载《世界经济》第10期。
- 郑思齐、孙伟增、吴璟、武赟（2014），《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第8期。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19），《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国金融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20），《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
- 钟粤俊、陆铭、奚锡灿（2020），《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载《管理世界》第11期。
- 周飞舟（2012），《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
- 周黎安（2016），《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载《社会》第1期。
- 周黎安（2017），《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黎安（2018），《“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载《社会》第2期。
- 周其仁（2012），《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周其仁（2017），《城乡中国（修订版）》，中信出版社。
- 周雪光（2016），《从“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载《社会》第1期。
- 周振鹤（2014），《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朱宁（2016），《刚性泡沫》，中信出版社。
- 朱玥（2019），《周期的力量，成长的锋芒：光伏产业15年复盘与展望》，兴业证券研报。
- 祖克曼，格里高利（2018），《史上最伟大的交易》，施轶译，中国人

- Acemoglu, Daron, Ufuk Akcigit, Douglas Hanley, and William Kerr (2016),“Transition to Clean Technolog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1):52-104.
- Aghion, Philippe, Antonin Bergeaud, Matthieu Lequien, and Marc J. Melitz(2018),“The Impact of Exports o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NBER Working Paper* 24600.
- Aghion, Philippe, Jing Cai, Mathias Dewatripont, Luosha Du, Ann Harrison,and Patrick Legros (2015),“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4): 1-32.
- Aghion, Philippe, and Jean Tirole (1997),“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1): 1-29.
- Akerlof, George A. (2020),“Sins of Omis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8(2): 405-418.
- Alchian, Armen A. (1950),“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3): 211-221.
-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2003), *The Size of Nations*, MIT Press.
- Ang, Yuen Yuen (2020), *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elbaum, Eileen, and Rosemary Batt (2014), *Private Equity at Work: When Wall Street Manages Main Stree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Armstrong-Taylor, Paul (2016), *Debt and Distortion: Risks an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Palgrave Macmillan.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and Gordon Hanson (2013),“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2020),“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American Economic*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Gary Pisano, and Pian Shu(2020),“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US Pat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forthcoming.
- Avdjiev, Stefan, Robert N. McCauley, and Hyun Song Shin (2016),“Breaking Free of the Triple Coincidenc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Economic Policy* 31(87): 409-451.
-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and Zheng Song (2016),“The Long Shadow of a Fiscal Expans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Fall: 129-165.
- Bardhan, Pranab (2016),“State and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a Reappraisal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4(3): 862-892.
- Bertrand, Marianne, and Adair Morse (2016),“Trickle-down Consump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5): 863-879.
-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2011),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loom, Nicholas (2014),“Fluctuations in Uncertain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2): 153-176.
- Bloom, Nicholas, Kyle Handley, Andre Kurman, and Phillip Luck (2019),“The Impact of Chinese Trade on US Employmen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batable,”*Working Paper*.
- Brueckner, Jan K., Shihe Fu, Yizhen Gu, and Junfu Zhang (2017),“Measuring the Stringency of Land Use Regulation: the Case of China's Building Height Limi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9, no. 4:663-677.
- Cai, Hongbin, Yuyu Chen, and Qing Gong (2016),“Polluting Thy Neighbor: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Pollution Reduction Mandat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76: 86-104.

- Chamon, Marcos D., and Eswar S. Prasad (2010),“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1): 93-130.
- Chen, M. Keith (2013),“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690-731.
- Chen, Peter, 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2017),“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89: 1-19.
- Chen, Shuo, Xinyu Fan, Zhitao Zhu (2020),“The Promotion Club,”*Working Paper*.
- Chen, Ting, Laura Xiaolei Liu, Wei Xiong, and Li-An Zhou (2018),“Real Estate Boom and Misallocation of Capital in China,”*Working Paper*.
- Cheng, Hong, Ruixue Jia, Dandan Li, and Hongbin Li (2019),“The Rise of Robots in China,”*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 no. 2: 71-88.
- Cherif, Reda, and Fuad Hasanov (2019),“The Return of the Policy that Shall Not Be Named: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Policy,”*IMF Working Paper*.
- Chetty, Raj, 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 Nathaniel Hendren, Robert Manduca, and Jimmy Narang (2017),“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Science* 356(6336):398-406.
-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Maggie R. Jones, and Sonya R. Porter(2020),“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2):711-783.
- Choukhmane, Taha, Nicholas Coeurdacier, and Keyu Jin (2019),“The Onechild Policy and Household Savings,”*Working Paper*.
- Cohen, Stephen S., and J. Bradford DeLong (2016), *Concrete Economics: The Hamilton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 Cunningham, Edward, Tony Saich, and Jesse Turiel (2020),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h Center Policy Report*.
- Di Tella, Rafael, and Dani Rodrik (2020), "Labour Market Shocks and the Demand for Trade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Online Surveys," *Economic Journal* 130(628): 1008-1030.
- Eggertsson, Gauti B., and Paul Krugman (2012), "Debt, Deleveraging, and the Liquidity Trap: A Fisher-Minsky-Koo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1469-1513.
- Fan, Haichao, Yu Liu, Nancy Qian, and Jaya Wen (2020), "Computerizing VAT Invoices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24414.
- Fan, Jingting, and Ben Zou (2019),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Working Paper*.
- Fan, Yi, Junjian Yi, and Junsen Zhang (2021), "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3(1): 202-230.
- Fang, Hanming, Quanlin Gu, Wei Xiong, and Li-An Zhou (2015),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Housing Boom," *NBER Macro Annual* (Vol.30): 105-166.
- Furman, Jason, and Lawrence Summers (2020), "A Reconsideration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Era of Low Interest Rates,"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 Gertler, Mark, and Simon Gilchrist (2018), "What Happene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3):3-30.
- Glaeser, Edward, and Joseph Gyourko (2018),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1): 3-30.

- Glaeser, Edward, and Andrei Shleifer (2003),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2): 401-425.
- Glick, Reuven, and Kevin J. Lansing (2010), "Global Household Leverage, House Prices, and Consump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Letter*.
- Gomory, Ralph E., and William J. Baumol (2000),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MIT Press.
- Haldane, Andrew, Simon Brennan, and Vasileios Madouros (2010),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Miracle or Mirage?" *A Technical Report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Hart, Oliver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Clarendon Press.
- Hart, Oliver,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7), "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127-1161.
- Haskel, Jonathan, and Stian Westlake (2018),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vranek, Tomas, and Zuzana Irsova (2011), "Estimating Vertical Spillovers from FDI: Why Results Vary and What the True Effect 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5(2): 234-244.
- He, Guojun, Shaoda Wang, and Bing Zhang (2020), "Leveraging Political Incentives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Hirschman, Albert O. (201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Hirschman*, Ed. by Jeremy Adelman: 74-10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Zhangkai, Lixing Li, Guangrong Ma, and Lixin Colin Xu (2017),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8):2455-2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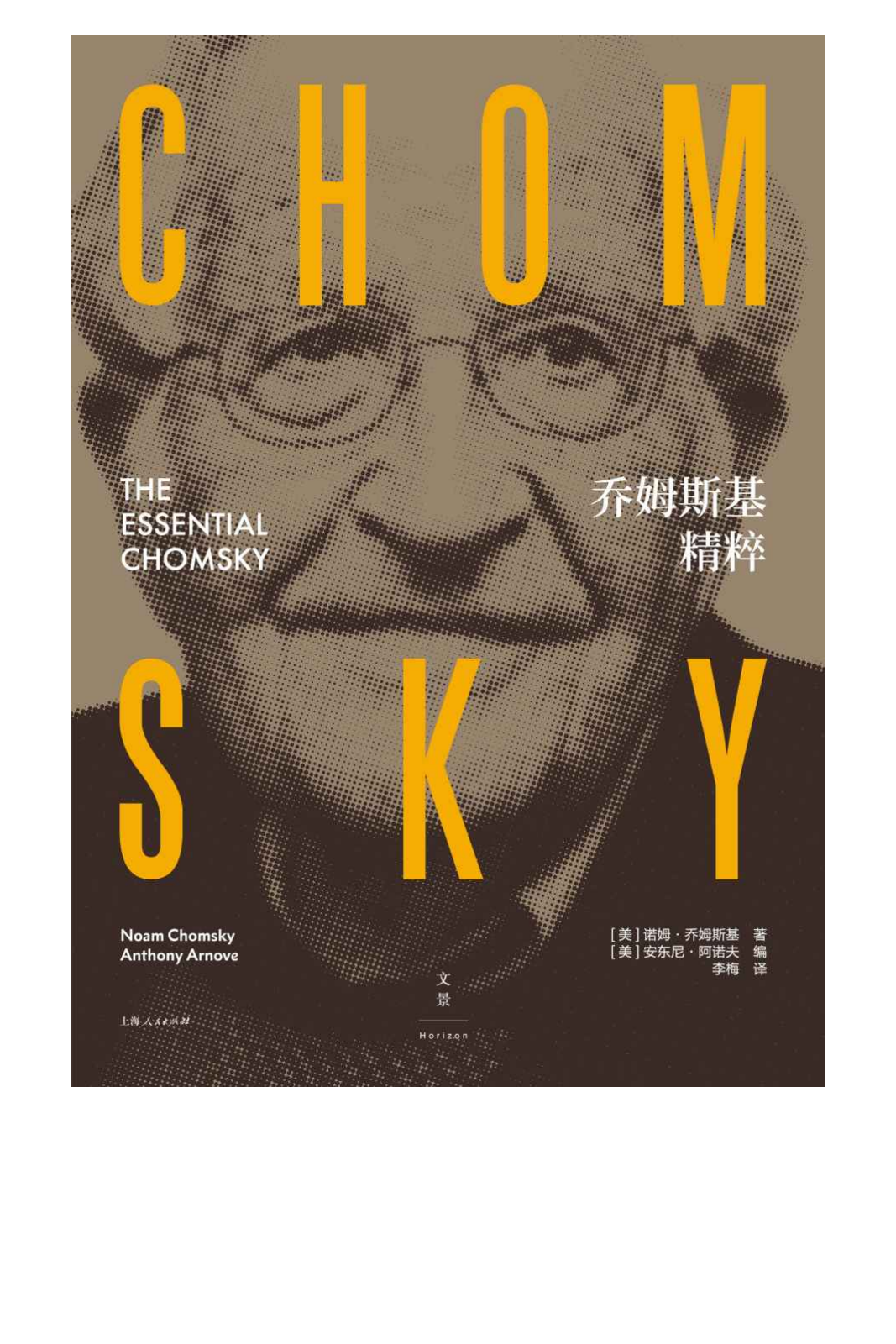
- Jia, Ruixue, Masayuki Kudamatsu, and David Seim (2015),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4), 631-668.
- 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19-1742.
- Jordà, Òscar, Moritz Schularick, and Alan M. Taylor (2016), "The Great Mortgaging: Housing Finance, Crises and Business Cycles," *Economic Policy* 31(85): 107-152.
- Imrohoroglu, Ayşe, and Kai Zhao (2018), "The Chinese Saving Rate: Long-Term Care Risks, Family Insurance, and Demograph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96: 33-52.
- 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Brent Neiman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1): 61-103.
- Karabarbounis, Loukas, and Brent Neiman (2019), "Accounting for Factorless Incom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33(1): 167-228.
- Klein, Matthew C., and Michael Pettis (2020),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noll, Katharina, Moritz Schularick, and Thomas Steger (2017), "No Price Like Home: Global House Prices, 1870-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2): 331-353.
- Kreps, David (2018), *The Motivation Toolkit: How to Align Your Employees' Interests with Your Own*, Findaway World, LLC.
- Krugman, Paul (1987),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7(1-2): 41-55.
- Kuhn, Moritz, Moritz Schularick, and Ulrike I. Steins (2020),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America: 1949-2016," *Journal of Political*

- Kung, James Kai-Sing, and Lin Yi-min (2007), "The Decline of Township-and-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35(4): 569-584.
- Lane, Nathan (2019),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Working Paper*.
- Levchenko, Andrei A (2007),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3): 791-819.
- Li, Pei, Yi Lu, and Jin Wang (2016),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3: 18-37.
- Li, Xing, Chong Liu, Xi Weng, and Li-An Zhou (2019), "Target Setting in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29(10): 2888-2915.
- Liu, Ernest (2019), "Industrial Policie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4): 1883-1948.
- Maskin, Eric, 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 (2000),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7(2): 359-378.
- Melitz, Marc J., and Daniel Trefler (2012), "Gains from Trade when Firms Matt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2): 91-118.
- Michalopoulos, Stelios (2012), "The Origins of Ethnolinguistic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4): 1508-1539.
- Mian, Atif R., Ludwig Straub, and Amir Sufi (2020a), "Indebted Dema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6940.
- Mian, Atif R., Ludwig Straub, and Amir Sufi (2020b), "The Saving Glut of the Rich and the Rise in Household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6941.
- Milne, Alistair (2009),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Credit: What Went Wrong in Bank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Repair the Dam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igan, Casey and Andrei Shleifer (2005),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Supply of Regul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1445-1473.
- Olmstead, Alan L., and Paul W. Rhode (2018), "Cotton, Slaver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7: 1-17.
- Orlik, Thomas (2020), *China: the Bubble that Never Po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pon, Thomas, and Ariell Reshef (2012),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4): 1551-1609.
- Philippon, Thomas (2019),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ketty, Thomas,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2019),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7): 2469-2496.
- Piketty, Thomas, and Gabriel Zucman (2014), "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255-1310.
- Prendergast, Canice, and Robert Topel (1996), "Favoritism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5): 958-978.
- Qian, Yingyi (2017),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the MIT Press
- REN21 (2020), *Renewables 2020 Global Status Report*, Renewable Energy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 Rodrik, Dani (1998),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5): 997-1032.
- Rodrik, Dani (2013),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 165-204.
- Rodrik, Dani (2016),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1): 1-33.

- Ryan-Collins, Josh, Toby Lioyd, and Laurie Macfarlane (2017), *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 Zed Books.
- Saez, Emmanuel, and Gabriel Zucman (2019), *The Triumph of Injustice: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 W.W. Norton &Company.
- Shiller, Robert J. (2020), *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leifer, Andrei, and Robert Vishny (2011),“Fire Sales in 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1): 29-48.
- Sivaram, Varun (2018), *Taming the Sun: Innovation to Harness Solar Energy and Power the Planet*, MIT press.
- Spader, Jonathan, Daniel McCue, and Christopher Herbert (2016),“Homeowner Households and the U.S. Homeownership Rate: Tenure Projections for 2015-2035,”*Working Paper*.
- Tooze, Adam (2018),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Penguin.
- Wallis, John J. (2006),“The Concept of Systematic Corruption in American History,”*Corruption and Reform: Lessons from America's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62.
- Wang, Gungwu (2019), *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 World Scientific.
- Wang, Zhi, Shang-Jin Wei, Xinding Yu, Kunfu Zhu (2018),“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rading With China on Local Labor Market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NBER Working Paper 24886*.
- Wang, Zhi, Qinghua Zhang, and Li-An Zhou (2020),“Career Incentives of City Leaders and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in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2(5): 897-911.
- World Inequality Lab (2017),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 Xu, Chenggang (2011),“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1076-1151.

- Yergin, Deniel (2020) *The New Map: Energy, Climate, and the Clash of Nations*, Penguin Press.
- Young, Alwyn (1991),“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2): 369-405.
- Zhang, Longmei, Ray Brooks, Ding Ding, Haiyan Ding, Hui He, Jing Lu, and Rui Mano (2018),“China's High Savings: Drivers, Prospects, and Policies,”*IMF Working Papers*.
- Zhang, Bing, Xiaolan Chen, and Huanxiu Guo (2018),“Does Central Supervision Enhance Local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4:70-90.
- Zhang, Zhiwei, and Yi Xiong (2019),“Infrastructure Financing,”*Working Paper*.



CHOM

THE
ESSENTIAL
CHOMSKY

乔姆斯基
精粹

SKY

Noam Chomsky
Anthony Arnone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美] 安东尼·阿诺夫 编译
李梅 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THE ESSENTIAL CHOMSKY

Noam Chomsky Anthony Arnone

乔姆斯基精粹

[美] 诺姆·乔姆斯基 著

[美] 安东尼·阿诺夫 编 李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姆斯基精粹 / （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著；（美）安东尼·阿诺夫（Anthony Arnone）编；李梅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The Essential Chomsky

ISBN 978-7-208-16834-3

I．①乔... II．①诺...②安...③李... III．①乔姆斯基（Chomsky, Noam 1928—） - 语言哲学 - 研究 IV．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8979号

书 名：乔姆斯基精粹

作 者：[美] 诺姆·乔姆斯基

编 者：[美] 安东尼·阿诺夫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曹迪辉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834-3/D·368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阅 读 未 来

豆瓣 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The Essential Chomsky by Noam Chomsky; edited by Anthony Arnone

Copyright © Noam Chomsky

Compilation and introduction © 2008 by Anthony Arno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New York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

知识分子的责任

论抵抗

对无政府主义的注释

对水门事件的质疑

重铸历史

遏制敌人

第二部分 论美国政治与外交

国际事务中的武力统治

外交政策与知识分子阶层

美国与东帝汶

“特殊关系”的起源

规划全球霸权

刻意的忽视及其使用

没有战争的世界

反思“9·11”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帝国大战略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后记

第三部分 语言与心智

评B.F.斯金纳著《言语行为》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序

方法论初阶

语言与自由

展望未来：心智研究的前景

《最简方案》导言

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

语言与大脑

致谢

版权许可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主要作品目录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从早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到著作《霸权还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和《干预行动》（*Interventions*），诺姆·乔姆斯基所写的政治评论已自成一体。¹《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是他的第一本政论文集（扉页上写着“献给拒绝加入罪恶战争的青年勇士们”），其中收录的文章在40多年后读来依然洞察入微、诙谐辛辣。乔姆斯基在该书中写道：“面对报纸每天披露的消息，人们易于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并无视了一个事实：这一切仅仅是残忍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重的罪行，造成一种注定带来无尽痛苦、耻辱和剥夺基本人权的社會秩序。”乔姆斯基的这番话把他与大多数越战⁽²⁾评论家区分开来，后者认为越战并非美帝国主义漫长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可悲的错误”。³

自1969年起，乔姆斯基一边致力于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一边不断地著书讨论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力求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延续了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的以知识理性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习惯。

1928年12月7日，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为了躲过沙皇军队的征兵，他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早在1913年就离开了俄国，而母亲艾尔西·西蒙诺夫斯基（Elsie Simonofsky）在一岁时离开了东欧。乔姆斯基成长的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抬头之时。他后来回忆道：“我对最早期的一些生活记忆犹新：家门口附近有人在卖破旧衣服，警察们暴力镇压罢工，还有一些大萧条时期的其他场景。”⁴乔姆斯基很早就有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尽管父母是他所说的“平常的罗斯福派民主党人”，但其同辈亲属中有加入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女装工人，还有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自幼年就受纽约激进犹太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常常光顾出售无政府主义读物的报亭和书店。他后来认为，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文化是一种“具有劳动阶级价值观、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劳动阶级文化”。⁵

乔姆斯基16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中途差点退学。后来，他从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那里获得了知识和政治方面

的激励，也为哈里斯身边独特的知识分子氛围所吸引。哈里斯主讲语言学讨论课，内容涉及哲学讨论、阅读和不受大学体制标准限制的独立研究。乔姆斯基师从哈里斯攻读硕士学位，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职位，并留校继续做语言学研究。到1953年为止，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现有的领域”，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开始重新审视17世纪语言学（尤其是波尔-罗瓦雅尔学派 [the Port-Royal school] 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丰富见地，以及普鲁士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关“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的后期研究。⁶乔姆斯基的政治评论和语言学著作都基于一种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可以从当代无政府主义源流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唯理主义学派，尽管他有时会淡化或否认这其中的关联。

1955年，乔姆斯基26岁便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其语言学研究开始广受认可。此时，他在政治领域内也开始发挥影响力。他先后为《纽约书评》和《解放》（*Liberation*）、《壁垒》（*Ramparts*）、《新政治》（*New Politics*）、《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后改为《社会评论》[*Social Review*]）等左派杂志撰写翔实的长篇文章谴责越战，并批评支持越战的主流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这些文章完整地记录了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并加以谴责，更全面地把此次战争与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针对美国发动的此次战争，他是最重要也是最受尊敬的评论家之一，还被列入尼克松总统那份恶名远扬的“敌人名单”。自此以后，为该体制辩护的人就把乔姆斯基视为他们肆意诽谤的目标。后来，他因撰写有关以色列的评论文章，也同样备受抨击。我们从乔姆斯基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逐步形成了其日后佳作的基本主题：缜密地分析美国的规划性文件、解密档案、官方声明和珍贵资料；不留情面地批评为美帝国主义打掩护的自由派、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评论员；通过分析来证明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并非因为“错误”“诚实的误解”“好心办坏事的举动”或早该被撤换的无能官员。相反，印度支那战争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特征的产物。

乔姆斯基不仅是对这场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战争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他还参与直接行动以证明自己的信念。1965年初，他参加了早期的抗税运动。同年10月，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第一波反越战的公众抗议。当时，抗议者人数不敌反示威者和警察的人数，乔姆斯基就是这场运动重要的日常组织者之一。他不仅关心越南，还投身于中美洲的团结运动，抗议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武力干涉伊拉克的活动和许多其他运动。乔姆斯基坚持不懈地仗义执言、提笔写作、接受访谈、在请愿书上

签名，尽一己之力涉足那些他认为所能改变之处，而他对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和他人也热忱相待，在语言学领域内从未停止挑战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和研究。⁷

乔姆斯基以身作则，力求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启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醒通过“福克斯新闻”或美国对外控制的生硬手段来了解美国的全世界人民：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理想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大相径庭。在发表言论时，他遵循着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秉持异见，从为正义和社会变革而团结并投入战斗的全世界人民的立场出发。他经常与其终身伴侣卡罗尔·乔姆斯基⁽⁸⁾一同出行，到过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家。他们四处游历，了解其他人的战斗情况，而不是去说教或指导他们。乔姆斯基的言语也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这是最出色的评论和分析所能证明的力量——一种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

安东尼·阿诺夫

(2) 作者在原文中用“the war”（这场战争）特指越战。本书中所提到的“越战”和“印度支那战争”均指1955—1975年美国在越南（主战场）、老挝和柬埔寨发动的越南战争。本书括号注（1）皆为译者注，下同。

1 诺姆·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可从该杂志网站（www.nybooks.com）获得，但有些文章仅供订阅用户参看。另见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wl Books, 2004),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Owl Books, 2007) 和 *Intervention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3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313. 另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Oakland: AK Press, 2003)。

4 引自詹姆斯·派克（James Peck）对乔姆斯基的采访。见Noam Chomsky, *A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13。

5 引自Milan Rai, *Chomsky'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8。

6 诺姆·乔姆斯基语，转引自Robert F. Barsky,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80。

7 例如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8) 卡罗尔·乔姆斯基（Carol Chomsky, 1930—2008），美国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1949年与乔姆斯基结婚，2008年12月逝世。

第一部分 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

知识分子的责任

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¹⁾在《政治学》⁽²⁾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众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还在上大学，“二战”结束也还没几年。数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发觉其影响力或说服力丝毫不减当年。麦克唐纳关注的是战争罪责（war guilt）问题，他提出了疑问：当时的德国民众或日本民众，为其政府所犯的暴行负有多大的责任？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把问题抛给我们：对平民的轰炸已被西方民主国家完善为一种战争技巧，在广岛和长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无疑是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行之一，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对这些轰炸平民的恶劣恐怖事件又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于一个1945—1946年间的大学生而言——对于任何从种种经历（1930年代的经济恐慌、埃塞俄比亚战争、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国事件”⁽³⁾、西班牙内战、纳粹暴行、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及其相互之间或多或少的共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觉悟的人而言，麦克唐纳的这些问题都十分尖锐且意义非凡。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些同样令人忧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揭露政府的谎言，并根据政府给出的理由、动机和惯常隐藏的意图分析其种种行径。至少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自由、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为这些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闲暇、设施、培训，使他们得以探求隐蔽在歪曲枉述、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而当代历史中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下的真相。因此，鉴于所享受的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民众责任”要更有深意。

麦克唐纳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和20年前一样中肯。我们必须自问：美国对近乎无助的越南村民发动的野蛮袭击，对亚洲人而言就是世界史上“凡斯科·达·伽马⁽⁴⁾时代”的暴行重演，美国民众对此负有何种程度上的责任呢？这种灾难在过去十几年间慢慢地发展着，我们当中那些冷漠无言的旁观者在史册上又处在何种地位呢？只有麻木至极的人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先大致谈一谈知识分子的责任。

任，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这至少看似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无需置评。然而，并非如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根本不明显。我们从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一篇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宣言中读到：“真相⁽⁵⁾就是揭示使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上变得确定、清楚和强大的东西。”人们有责任说出的就是这种“真相”。美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1965年11月，《纽约时报》要求亚瑟·施莱辛格⁽⁶⁾解释为何他发表的有关猪湾事件的叙述和袭击发生时他告诉新闻界的说法不一致，他只是说，自己撒了谎。几天之后，他又恭维《纽约时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压下了有关那次策划入侵的消息。在最近所著有关肯尼迪政府的回忆录⁽⁷⁾中，施莱辛格也如此谄媚地描述了这群傲慢、执迷不悟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说法被这群人解释得很透彻。一个人乐意为明知非正义的理由说谎，这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类事件鲜有反应、毫无感觉，却意味深长。比如，给某位历史学家安上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职位，他便深感己责，要说服全世界相信由美国发起的入侵邻国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这其中总有些蹊跷。在涉及诸如越南谈判等事宜上，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那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愿意了解的人来说，事实一目了然。谬误出现时，国内外新闻界已提供资料逐一驳斥。但政府宣传机器的力量十分强大，对该问题不做研究的公民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事实来对抗政府的声明。⁸

迄今为止，围绕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歪曲之词已司空见惯，也不再令人震惊。因此，尽管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在不断地达到新高度，但有必要回想的是，此前明显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被默然容忍了。有用的做法是，比较一下1954年美国入侵危地马拉时的政府声明和十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坦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夸耀）——美国飞机是被派去“帮助侵略者”的。⁹口是心非不只在危机时刻才被视为恰如其分。例如，即使没有号召“新拓荒者们”⁽¹⁰⁾为进行中的行动提供“宣传掩护”，他们也很少热忱地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把1965年初对北越的轰炸和大规模升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基于“完全合理的论断”，他写道：“……只要越共认为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显然就不会对任何谈判协定感兴趣。”¹¹日期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在六个月前提出来，人们会视之为无知。但这一说法是在有关联合国、北越和苏联倡议（倡议在1965年2月冲突升级之前被提出，实际上在轰炸发生后的几周之内仍然有效）的详细新闻报道占据头版数月之久以后，也是在华盛顿通讯记者们反躬自问数月（他们拼命地为已披露的惊世骗局寻找减轻罪行的情况。以查尔默

斯·罗伯特⁽¹²⁾为例，他忍不住嘲讽道：1965年 2月下旬“对华盛顿来说不像是谈判的有利时刻，[因为] 约翰逊先生……刚刚下达命令对北越进行首次轰炸，试图把河内带到一个双方筹码相当的谈判桌上”¹³) 以后才发表的。施莱辛格此时的主张与其说是欺骗的范例，不如说是藐视的范例——他藐视了读者，认为他们对该行为若不表示赞同，也会默然容忍。¹⁴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熟悉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士，看一下华尔特·罗斯托⁽¹⁵⁾的一些反思，施莱辛格认为此人为肯尼迪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¹⁶根据罗斯托的分析，是斯大林发起了1946年的中南半岛游击战，¹⁷而河内在1958年发动了反南越的游击战（《从第七层楼看世界》[*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第39和152页）。同样，共产主义规划者们在北阿塞拜疆⁽¹⁸⁾和希腊探查了“自由世界防御范围”（斯大林在这两个地区“支持了大量的游击战”——同上，第36和148页），依照1945年精心制定的计划实施了操作。在中欧，苏联并未“准备接受任何消除危险的中欧紧张关系的决议，哪怕东德共产主义势力面临着被分阶段逐步侵蚀的风险”（同上，第156页）。

把这些观察结果与真正关注历史事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是很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发动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说法甚至无需反驳。至于据传河内在1958年采取的行动，情况则更加扑朔迷离。但连政府方面¹⁹也承认，河内在1959年收到首批行动报告，吴庭艳⁽²⁰⁾把此次行动称作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战争。²¹此后，河内制定计划加入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内的另一个打算是想在当时形势下与西贡政府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再次被西贡和美国回绝了。²²罗斯托没有提供关于斯大林支持希腊游击队的证据。事实上，尽管历史记录模糊不清，但斯大林似乎不会乐意看到希腊游击队的冒险主义势头，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扰乱战后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格局。²³

罗斯托有关德国的言论则更加有趣。例如，他认为不宜提及1952年3—4月间苏联的照会。⁽²⁴⁾苏联在照会中提出，如果能保证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加入任何西方军事联盟，就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并在一年内撤出德国境内所有的军队。²⁵而罗斯托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描述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策略：“在有组织的欧洲体系中重新武装德国，能够与莫斯科对峙，在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西方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²⁶——确切地讲，他是在无视《波茨坦协定》。

但最有趣的是，罗斯托提到了伊朗。事实是，苏联企图通过武力在北阿塞拜疆扶植一个亲苏政府，准许苏联获取伊朗的石油。但处于优势的英美军队在1946年破坏了这一企图。⁽²⁷⁾当时，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北阿塞拜疆政府，把使用伊朗石油的全权归为己有。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50年代初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当唯一有些民众基础的伊朗政府试图实现伊朗石油属于伊朗人民这一奇妙的想法时，都发生了什么。⁽²⁸⁾然而，有趣的是，北阿塞拜疆被描述为“自由世界防御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再评论“自由世界”的词义如何被贬低已经毫无意义。但哪一条自然法则规定伊朗连同其资源都是由西方国家来统治的呢？淡然地假定伊朗本该如此，明显表露了西方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根深蒂固的态度。

除了日益缺乏对真相的关注，我们从近期的宣传中还发现，对美国的种种行径所怀有的或真或假的天真态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最近把我们在1954年的对越政策描述为“国际友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²⁹如果这番话不是出于嘲讽，就反映出他理解当代历史基本现象时相当玩世不恭或无能为力的心态，并且无惧他人评说。同样，人们又如何理解托马斯·谢林⁽³⁰⁾于1966年1月27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呢？谢林在证言中分析了全亚洲都“变成共产主义”后的两大危险。³¹首先，这会把“美国及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贫穷的、居住着有色人种并对我们暗怀敌意的一大部分世界中”排除出去。其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得不承认它所尝试的最伟大之事——在不发达世界创立尊严、繁荣和民主政府的基础——失败了，或承认这种尝试不会再来一次，它也许就无法保持自信了”。即使这番话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说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从更具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把这些说法置于过去那种伪善的道德说教语境（比如伍德罗·威尔逊⁽³²⁾的语境）中，否则就让人难以置信。威尔逊想把良政的艺术教给拉丁美洲人民，他写道（1902），教给殖民地人民“守秩序和自控……[以及]……对法律与顺从的训练和习惯”是“我们的特殊职责”。或者在1840年代传教士的语境中，他们把丑陋、低俗的鸦片战争描述为“源自上帝的伟大计划，通过冲破中国排外的壁垒，使这个帝国更快地接触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借人类的邪恶促进上帝对中国的慈悲之心”。或者往现在来说，在A. A.伯利⁽³³⁾的语境中，在评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时，他鲁莽地把加勒比海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³⁴

最后举一个使这种怀疑主义⁽³⁵⁾无效的例子，就来看看亨利·基辛格在关于美国对越政策的哈佛—剑桥电视辩论中的总结陈词。他十分悲痛地说：最令他烦恼的是，别人不质疑我们的判断，却质疑我们的动机——对一个做政治分析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真是不同凡响的评论。政治分析就是根据官方宣传中未表露的、或许只有其执行人员才能隐约觉察的动机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对苏联人、法国人或坦桑尼亚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并质疑其动机，从长期利益来解读他们隐藏在官方说辞之下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困惑。可是，美国的动机是单纯的，不应拿来做分析，这是一个信条。尽管在美国知识史上——或就此事而言，在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通史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它所效力的强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并因此愈加擅长大众媒体每天所展示的为所欲为的恶意时，这种天真的态度就愈加令人反感。我们绝不是史上第一个集物质利益、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于一体的强权国家。然而，长久以来使我们的知识史蒙羞的天真和自以为是传统肯定向第三世界拉响了警报（如果还需要这种警示的话），提醒他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声称的坦诚而良好的意图。

那些期待学院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人士应该认真思量“新拓荒者们”的基本假设。比如，我曾提到亚瑟·施莱辛格反对入侵猪湾，但说法不够准确。的确，他认为那是个“糟糕的想法”，但“并非因为支持流亡者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本身有多么地难以接受”。这种反应纯属感情用事，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这样想。困难反而在于，这种欺诈似乎不可能得逞。在施莱辛格看来，此次行动考虑欠周，但也不会引起异议。³⁶同样，他赞许地引用了肯尼迪对特鲁希略⁽³⁷⁾被刺杀后的局势的“现实”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优先等级依次是：健全的民主政权、特鲁希略政权的延续或卡斯特罗政权。我们必须力争第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第二种可能性。”³⁸他在几页之后解释了难以接受第三种可能性的原因：“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成功会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当然，我们从未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总是会满足于第二种可能性，比如，就像我们目前在巴西和阿根廷所做的一样。³⁹

要么看看华尔特·罗斯托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观点。⁴⁰我们必须建立该政策的基础在于，“有人公开威胁我们，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恐吓”。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证明自己遭到了恐吓，也没人重视这种事；我们感觉受到了恐吓，这就够了。我们的政策必须基于我们的国家传统和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传统简要罗列如下：“在整个19世纪，美

国人民以良知在这片大陆上努力推广其原则和力量”，并运用“多少有些弹性的门罗主义概念”，当然也把“美国的利益”延伸至“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岛屿……我们坚决主张无条件投降以及战后占领的想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规划的安全利益”。我们的传统不过如此。至于我们的利益，事情也同样简单。我们的“深远利益”，即“海外团体发展并加强各自文化中的要素，提高和保护与政府相对的个人尊严”，是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抗“意识形态的威胁”，也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可能用中国的进步向亚洲人民证明，共产主义方法比民主方法更好、更快”。这里只字未提身处亚洲文化中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关于个人与政府正确关系的构想”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个人尊严”，以抵御国内或国外的资本集中，或反抗由美国军队引入或推上台的半封建制度（例如，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暗示意味，指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体系”以及我们“模糊而复杂的概念”。在亚洲人看来，这些体系和概念比马克思主义教条“更加难以领会”，也因为“它们缺乏教条性”而“令一些亚洲人感到不安”。

知识分子的这些贡献说明，有必要纠正一下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美国“伪装成理想主义的权力意志”这句话。迄今为止，与其说这种权力意志被伪装成了理想主义，不如说已沦为愚蠢，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为这幅可悲的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让我们回到越战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吧。在最近开展的有关东南亚政策的论辩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划分了“负责的批评”和“感伤的”“情绪化的”或“歇斯底里的”批评。仔细研究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情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显然，辨别“歇斯底里的批评家”就是看他们是否毫无理性地拒绝一个基本的政治公理，即美国有权在可行的范围内无限地扩张其势力和控制。负责任的批评不会质疑这种假设，而是辩解说，此时此地，我们也许无法“摆脱”它。

这种划分似乎就是欧文·克里斯托⁽⁴¹⁾所考虑的。例如，在1965年8月的《文汇》⁽⁴²⁾杂志上，他分析了针对越南政策的抗议。他把像《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李普曼⁽⁴³⁾和参议员富布莱特（Fulbright）那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与“宣讲会运动”⁽⁴⁴⁾做了对比。克里斯托强调说：“与大学里的抗议者不同的是，李普曼先生对‘越南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做自以为是的假设——显然，他也不在乎（越南人民的真正需求）——或者对越南是否发生‘侵略’或‘革命’及其达到何种程度不做法律上的诠释。他的

观点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极端情况下，他显然会考虑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可能。”克里斯托这样说是值得赞赏的，这与宣讲会运动中“那类不切实际、讲求意识形态的人”的讲话形成了有效的对比，后者似乎经常被“简单、善良的‘反帝国主义’”愚蠢论调所激励，就“权力结构”发表长篇大论，有时甚至屈尊阅读“国外新闻界关于美国在越南的文章和报道”。况且，这些恶劣之人通常是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或哲学家（顺带说一下，抗议苏联最起劲的通常同样也是物理学家、文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不行使权力的人），而不是与华盛顿有接触的人，后者当然明白，“他们要是有些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在华盛顿“就会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

在此，我不在乎克里斯托对抗议和异见的描述是否准确，我在乎的是这些问题所表达的假设：美国的动机是否单纯得无需讨论呢？抑或与讨论无关？应该把决定交给和华盛顿有接触的“专家”吗？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假设他们掌握了做出“最佳”决定所必需的知识和原则，他们会一致这样做吗？还有一个逻辑上的先行问题：“专家意见”适用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一套未公开的理论或相关信息能用来分析外交政策，或以某种连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证明当前的行动是正确的？尽管克里斯托没有直接审视这些问题，他的态度预设了答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答案。无论如何用道貌岸然的辞藻去掩饰，美国的侵略本性仍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必须从其成因和动因进行分析。任何令外行费解的理论或有意义的相关信息都无法使政策免受批评。就国际事务中所运用的“专家知识”而言，要质疑其质量和所服务的目标肯定是合适的，对于正直之人来说，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事实显而易见，无需更多的讨论。

克里斯托的奇特信条是，政府欢迎有关越南的新想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麦克乔治·邦迪⁽⁴⁵⁾对此提出了修正。⁴⁶邦迪正确地评论道：“在主要舞台上……有关越南的争论在于策略，而不在于根本性原则。”他又补充说，尽管“舞台旁边有些疯狂的家伙”。在舞台中央的当然是总统（在最近的亚洲之行中，他“威严地重申”了我们对“太平洋对岸人民的进步”抱有兴趣）和其顾问，他们理应得到“那些期望控制轰炸规模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也理应因“对北方的轰炸是现代战争中最精准、最有节制的”这一事实赢得信任——南定省（Nam Dinh）、府里市（Phu Ly）和荣市（Vinh）的居民或之前的居民都会感激这种关怀。这些人也理应因马尔科姆·布朗⁽⁴⁷⁾早在1965年5月所报道的景象而赢得信任，布朗写道：“在南方，该国的大片区域被宣布为‘自由轰炸区’，其中任何移动

的东西都是合法的目标。每周都有成千上万吨炸弹、火箭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炮落在这些广阔的区域内。假如单靠随机定律来判断，也会确信这些袭击中的伤亡十分惨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幸运的是，邦迪向我们保证，“美国式的民主不会一直偏向帝国主义”，而且“总体上来看，美国所积累的经验、理解力、同情心和知识目前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的确，“全世界所有外国投资中有五分之四来自美国”，而且“最令人钦佩的那些计划和政策……几乎都表明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正因为此话属实，我们才会在同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读到，在米高扬访问哈瓦那⁽⁴⁸⁾之后的几周内，（美国）对古巴启动了武装行动计划⁽⁴⁹⁾，“入侵了长久以来几乎专属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常被不谙世故的亚洲知识分子视为“偏向帝国主义”的表现。例如，一些印度人表达了他们对下列事实“近乎愤怒”的情绪：“我们竭尽全力地吸引外资建设化肥厂，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公司知道我们处于弱势，因此提出令我们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⁵⁰而“华盛顿……顽固地坚持必须与私营企业做交易”。⁵¹然而，这样的反应无疑再次显示出，亚洲人是多么无法理解西方人思维中“模糊而复杂的概念”。

仔细研究一下最近在华盛顿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的“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对于专家建议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美国政府印刷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真知灼见。比如，在其出版物中，人们能读到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主管饶戴维（David N. Rowe）教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饶教授提出（第266页），美国应该买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剩余小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大饥荒”。他的原话是：“提醒诸位的是，我不是说把这当作对付中国人民的武器。也许会这样，但只是偶然性的。这会成为对付中国政府的武器，因为一个不友好的政府面临大饥荒时是无法维持国家内部稳定的。”感性的道德主义会让人们把这条建议与类似希特勒德国的东进政策⁽⁵²⁾相比较，但饶教授根本没有这种道德原则。⁵³他也不畏惧这些政策对诸如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冲击。他向我们保证，从他“对日本问题的长期接触”来看，“日本人毕竟是尊重实力和决断力的民族”。因此，“面对从武力出发、通过向与我们对抗的当地人民实施武力而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美国对越政策，日本人不会感到太恐慌”。日本人可能会担心的是“优柔寡断的政策，即拒绝面对〔中国和越南〕问题、拒绝以积极方式在那里承担自己责任的政策”，比如我刚刚引述过的方式。一旦确信我们“不愿使用他们明知我们拥有的武力”，也许会“让日本

人感到相当恐慌，并动摇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美国全力出击会让日本人特别放心，因为他们已经证实“美国惊人的行动实力……因为他们已经直接感受过我们的实力”。这肯定是欧文·克里斯托所推崇的“现实政治观点”的重要例子。

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局限于“大饥荒”这种间接的手段呢？为什么不轰炸？毫无疑问，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远东研究院评议员德耶格牧师（R. J. de Jaegher）也在这次委员会发言中暗示了该信息。他解释说，北越人民和所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一样，“会很乐意在轰炸后获得自由”（第345页）。

当然，肯定也有支持共产主义者的人。但这真的不足为虑，正如1953—1959年任远东事务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阁下在这次委员会证词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向我们保证，“北平⁽⁵⁴⁾政权……代表全国不足百分之三的人口”（第402页）。

那么想一想，与越共领导人相比，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何其“幸运”！据阿瑟·戈德堡⁽⁵⁵⁾称，越共代表大约是“南越千分之五的人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相信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这仅是越共1965年在南方招募的新兵数量的一半。⁵⁶

碰到这样的专家，克里斯托提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显然还继续在沙地上画圆圈玩耍着。

解决了抗议活动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之后，克里斯托转而质疑抗议的动机何在——更概括地讲，如他所见，在一片繁荣中，在自由主义福利政府的管理下，是什么促使学生和年轻教师“变得左倾”？他指出，这“是个连社会学家都未曾想出答案的谜”。因为这些年轻人衣食无忧、前途远大，等等，他们的抗议肯定是非理性的。那一定是出于太无聊、感到过度安全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还能想到一些可能性。比如，也许作为诚实之人，学生和年轻教师试着自己寻找真相，而不是把这种责任拱手让给“专家”或政府；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愤怒。克里斯托并未否认这些可能性，只是它们难以令人相信且不值得考虑。更确切地说，这些可能性无法被表达出来，对于铁石心肠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它们被构想的范畴（诚实、愤怒）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以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含蓄蔑视，反映出学术圈相当普遍的态度。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些态度一部分源自社会行为学不

顾一切地企图模仿具有真正知识内容的科学的表象特征。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来源。人人都是关注人权和各种问题的道德个体，但只有大学教授（即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技术问题。因而只有后面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或真实的。负责任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专家会对策略性问题提出建议；不负责任的、“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人”会对原则慷慨陈词，为道德问题、人权而烦恼或为人类和社会的传统问题而烦恼，“社会行为学”对此只能提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然，这类情绪化的、讲意识形态的人士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手握权力，不必操心这些事情。

有时候，这种伪科学的腔调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比如，想一想赫尔曼·卡恩⁽⁵⁷⁾现象。人们谴责卡恩不道德，又赞颂他有勇气。那些本应更明事理的人把他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说成“必定……[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斯图尔特·休斯⁽⁵⁸⁾）。问题的真相是，通过把任何现有学科的学术标准放进该书中，通过对其中一些“翔实可靠的结论”追溯至所得出结论的“客观研究”，通过在可探查之处推知其论证方式，我们会发现这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最空洞的作品之一。与自己试图模仿的科学所不同的是，卡恩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任何解释、任何能被结果检验的实证性假设。他只是提出一个术语，并以理性做伪装。当具体的政策性结论达成时，它们只受权威（*ex cathedra*）言论的支持，但似乎无人支持权威言论（比如，“每年的民防花费也许应略低于50亿美元”，以免激怒苏联人。但为什么不是500亿美元或5美元呢？）。况且，卡恩很清楚，这样说是苍白无力的；他只在更理智的时候声称道：“没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相对复杂的模型比更简单的、常用来帮助判断的模型和类比更有可能误导大家。”对于那些幽默感近乎恐怖的人来说，像卡恩那样玩一下“战略思维”游戏，并证明希望得到的结论，都是很容易的。比如，卡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对应价值目标⁽⁵⁹⁾的全面突袭是不理性的，除非苏联决策者特别缺乏智谋或者真的发疯了，否则这种袭击是绝不可能的”。简单论证一下就能证明这是适得其反的。前提一：美国的决策者按照赫尔曼·卡恩勾画的路线进行思考。前提二：卡恩认为，人人赤化比大家都死掉好一些。前提三：如果美国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那么大家都会死掉。结论：美国人不会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因此，这场袭击应该尽快发动。当然，这个论证还可以更进一步。事实是：苏联人还没有实施对应性全面袭击。由此可见，他们是不理性的。假如他们是不理性的，“战略思维”就毫无意义。因此……

当然，这一切都是胡诌，但与卡恩的胡诌所不同的是，这种论证比在卡恩书中所发现的任何论证都略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认真之人实际上也关注这些荒唐话，肯定是因为它们所显示的决心和伪科学的样子。

奇怪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反战运动”也常常遭遇类似的混淆。比如，在1965年秋，召开了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会上向可能的参加者发放了陈述大会设想的手册。大会计划成立学习小组，代表三种“知识传统类型”：（1）地区专家；（2）“社会理论，尤其着重于国际体系、社会变化和发展、冲突与解决冲突或革命的理论”；（3）“对于根植于不同神学、哲学和人文传统的公共政策，从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第二种知识传统会提供“从社会理论得出并被历史数据、比较数据或实验数据检验的一般性命题”；第三种知识传统“会给出从中提出基本价值观问题的框架，并就此框架分析社会行动的道德内涵”。大会希望“通过所有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道德层面来研究有关越南政策的问题，相比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所显示的结果，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人类基本价值观更一致的解决办法”。

简而言之，研究价值观的专家（即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发言人）会提供道德层面上的根本性见解，而研究社会理论的专家会提供经实证检验的一般性命题和“冲突的一般性模型”。从这种相互影响中可以推测出，从对科学方法准则的应用中将产生出新的政策。在我看来，唯一值得争辩的问题似乎是，向社会理论方面的专家寻求充分验证的一般性命题，或者向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专家寻求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见解，是否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就这一话题还有更多可谈之处，但就此打住吧。我只想强调，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是，崇拜专家既自私（对于建议这么做的人来说）又虚伪。显然，人们必须尽可能地从社会行为学中学习；显然，也必须尽可能严肃认真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然而，假如不接受这些领域，不以其优点和实际（并非虚假的）成就来判断它们，就会十分不幸且极其危险。特别是，如果用一种经过充分测试和验证的理论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解决国内外冲突，那么其存在已经是严加防范的秘密。在越南问题上，如果那些自比专家的人士获得了一些原则或信息，能够证实美国政府在那个不幸国度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在把事实公之于众方面实在是毫无成效。对任何略知社会行为学（或“政策科学”）的人来说，有人声称某些考虑和原则对局外人来说深奥难懂，这简直是不值一评的谬

论。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在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时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解释非理性的、专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专家和负责任的专家之间做对比时，克里斯托所用的字眼立刻让人想到丹尼尔·贝尔⁽⁶⁰⁾那篇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有趣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⁶¹。该文未曾言说的部分和其内容一样重要。贝尔介绍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尤其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条的描述，“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接着他又提出，讲意识形态的时代终结了，至少在西方社会已被一种普遍认同所取代，即必须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就事论事地解决每个问题，并假定公共事务方面的专家在该框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贝尔十分小心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衰微”中的准确含义，他仅指“把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的意识形态，是“一系列充满激情的信念，……[它们]……试图全面地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和“转化为社会杠杆”是关键词。他认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将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并彻底地改变社会的兴趣。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就没必要彻底地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东修西补，但试图有效地更改它，那就错了。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下，意识形态就死亡了。

关于贝尔的文章还有几个突出的事实。第一，他并未指出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把自己有关知识分子大体上已丧失“全面改变生活方式”兴趣的评论，与知识分子在管理福利国家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他也没有把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满意度，与他在别处所说的“美国已经成为富裕社会，给从前的激进分子……提供了地点……和名望”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第二，他并未认真地通过论证来表明，在达成他所暗指的共识（这种共识排除了社会应当被改变的想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或许是“对的”或“客观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尽管贝尔对“新左派”的空谈反应十分尖刻，他似乎也抱有十分乌托邦式的想法，相信技术专家能认真处理现存的少数问题，例如，劳动被当作商品的事实以及“异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典问题似乎还伴随着我们。人们也许会合理地讲，它们的规模和严重性增加了。比如，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经典悖论目前在国际上已是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人们可能会想出（至少从原则上）国内解决办法，但在贝尔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共识的框架之内，如何

以这种方式改变国际社会以应对人类巨大的、可能仍在加剧的痛苦，就几乎无法得出理智的看法。

因此，用略微不同于贝尔的话来描述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会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可以用贝尔的文章第一部分中的术语说，福利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贝尔的“科学”中为自己特殊而杰出的社会地位找到了证据，特别是从以下主张中找到了证据——社会科学能提供一种从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对社会进行修补的技术。然后，他们以常见的方式，进一步要求事实上的阶级利益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自己要求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依赖的特殊条件，实际上是现代社会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在福利国家框架内的社会修补工作必须取代对过去“所有意识形态”的遵从，即曾经关注社会转变的意识形态。在发现了自己的权力位置、获得了安全和富足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寻求激进变化的意识形态。学者型专家取代了“不受约束的知识分子”，后者“在发觉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尊崇时抗拒了社会”，现在已失去其政治地位（也就是说，现在因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受到尊崇）。

可想而知，将要（或希望）管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专家无须激进地改变社会就能应对那些经典问题，这是正确的。正是如此，资产阶级曾正确地把自身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作为现代社会可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这大概也是正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要有论证；没有论证的话，持怀疑态度就是正当的。

在泛乌托邦主义的同一框架中，贝尔继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问题。他十分正确地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该信仰的内容“早被朋友和敌人忘记了”。他反而说：“这是个更老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允许人民自主选择以及志愿牺牲，新社会是否就能继续发展？或者，沉醉于权力的新精英阶层是否会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去改变国家？”这种问题很有趣，但看到它被称为“更老的问题”时多少有些奇怪。他肯定不会暗示说是西方选择了民主方式。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农民自愿选择离开土地、放弃家庭手工业而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已有的民主机构框架下自觉自愿地做出19世纪工业社会经典文学所生动描述的那些牺牲。有人也许会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在不发达世界中，极权控制是否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但西方的发展模式几乎无法让我们引以为傲。找出像华尔特·罗斯托这样能提出“西方价值观预示着更人性化的[工业化]过程”的人⁶²，也许不足为奇。那些深切关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深切

关注先进工业社会（原则上）在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人，必须要稍加谨慎地阐释西方经验的重要性。

再回到那个合理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还是只靠极权方式来“发展新的社会”？我认为，诚实的品质要求我们承认，该问题必须更多地针对美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落后国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克服的问题，几乎别无选择。美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还有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尽管显然没有智力资源或道德资源），至少能对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许即使没有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围”，革命运动中真正的民主要素（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是苏维埃各共和国和集体农庄）也可能被官僚和技术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所破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革命运动目前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对于那些一心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要素、自发要素和民众要素的人来说，这种教训十分清楚。尽管必须付出努力，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到能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及其真正的民主机构的发展提供“社会杠杆”的程度（就此而言，也可以在本国提高），有关两党制或在西方社会中已部分实现的真正民主价值观的说教，在这种努力面前也显得毫不相干。

按照以下结论可以得到好的实例：在已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或在那些感觉通过“接受社会”现状和推广被这个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就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共识。在取代过去那种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中，这种共识很明显。在大学里，这些学者专家构建了一种“不涉及价值观的技术”来解决当代社会出现的技术问题，⁶³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之前提到的“负责任的立场”。在国内，负责任的专家学者的这种共识类似于那些在国际舞台上的人士提出的共识：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美国在亚洲使用武力都是正当的，因为有必要遏制“中国的扩张”（诚然，这种“扩张”目前还是假设）⁶⁴，或用国务院的新话⁶⁵来说，是因为有必要逆转亚洲民族主义革命或至少防止其蔓延。假如我们仔细观察阐述该提议的方式，这种类比就很清楚了。1943年，丘吉尔在德黑兰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对当时的同事约瑟夫·斯大林概述了他的一般性立场：“……世界政府必须托付给那些心满意足的国家，他们除了已拥有的东西之外别无希求。假如世界政府落入饥饿的国家手中，总会有危险。但我们毫无理由寻求更多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且毫无野心的民族才能维护和平。我们的实力将我们置于他人之上。我们像富人那样平静地待在自己的住所中。”⁶⁶

要把丘吉尔《圣经》式的修辞转为当代社会科学的行话，可能要求助于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在前面提及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我怀疑，在长久的未来，中国对包围的担心将不会减弱、缓和和防松。但我希望，我们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会有助于全体中国人民变得更现实、更乐于忍受这一压力，而不是通过支持解放运动纵容它（诚然，这不仅仅依赖于外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不在于这种压力能否被消除或明显减弱，而在于中国能否接受一种激励制度或奖惩制度，使其能乐于忍受这种压力。⁶⁷

该观点被托马斯·谢林进一步澄清：“中国人能从中受益的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尽管美国有意包围他们，有意保护他们的周边地区，但如果他们愿意，美国也准备和平行事。”⁶⁸

简而言之，我们准备和平地生活在我们的——当然是十分广阔的——住所里。很自然的是，来自“仆人角落的不体面的嘈杂声”冒犯了我们。比如说，假如一次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试图从国外势力手中获得独立，或推翻国外列强支持的半封建制度，或假如中国人不理智地拒绝及时回应我们为其准备的增援时间表，假如他们反对被那些想当然地控制其边境周围地区的仁慈的、热爱和平的“富人们”包围，那么，我们显然必须以适当的武力来回应这种挑衅。

正是这种心态说明了美国政府及其学术辩护者为美国拒绝在当地寻求越南政治解决方案而辩护时的坦白态度，虽然该解决方案是基于政治力量的实际分布。甚至连政府专家都直率地承认，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NLF”）是唯一“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南越政治党派”；⁶⁹民族解放阵线已“在当地做了大量自觉的努力来扩大政治参与度（尽管这种努力难免被操控），使更多的民众投入到一场自立、自助的革命中”（第374页）；这种努力已经非常成功，没有什么政治团体“认为自己在规模和力量上能旗鼓相当地贸然建立一个联盟，即使能这样，也害怕被鲸吞”（第362页）。此外，政府专家们承认，在大量美军入侵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认为斗争“应在政治层面进行，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本身是非法的……战场将是越南乡村民众的观念和忠贞所在，而武器会成为其思想”（第91—92页；另见第93、98—108、155—156页）；相应地，直到1964年中期，来自河内的援助“主要限于两个

方面——有关信条的基本知识和领导人员”（第321页）。所截获的民族解放阵线文件对比了敌方的“军事优势”与自身的“政治优势”（第106页），完全确认了美方军事发言人的分析，即把我们的问题确定为如何“动用大批武装部队和较小的政治力量[来]牵制拥有巨大政治力量而军事力量平平的敌手”。⁷⁰

同样，2月的檀香山会议⁽⁷¹⁾和10月的马尼拉会议⁽⁷²⁾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西贡政府的高官坦率地承认，“他们不能忍受和平解决方案，这把越共的政治结构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哪怕越共游击队的组织已被解散”，这样“他们现在就不能在政治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分子竞争”。⁷³因此，莫尔接着说，越南人需要一个“绥靖计划”，其核心是破坏越共的秘密政治结构并创立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的钢铁般的政府制度。10月23日，在马尼拉，还是这位记者引用了一位越南高官的话：“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仅在政治基础上还无法与共产主义分子抗衡。他们有组织、有纪律。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则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组织良好的大党派，而且没有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越共存在下去。”华盛顿的官员们非常明白这种情形。因此，国务卿腊斯克⁽⁷⁴⁾指出：“如果越共作为全面合作伙伴来到会议桌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在南越和美国发誓阻止的目标上赢得了胜利。”（1966年1月28日）同样，麦克斯·弗兰克尔⁽⁷⁵⁾在华盛顿报道说：“妥协在此毫无吸引力，因为政府早已得出结论，认为南越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在与共产党人结成的西贡联盟中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并非因为过于严格的协议——使华盛顿坚决拒绝和越共协商或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⁷⁶

简而言之，我们会“宽宏大量地”允许越共代表出席谈判，只要他们同意承认自己是外国力量的代表，这样就放弃了参与联合政府权利——他们六年来一直要求拥有这项权利。我们深知，在任何由代表组成的联盟中，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我们选出的代表团连一天也撑不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增加美国军队，抵制有意义的谈判，直到有个傀儡政府能对其百姓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一天可能不会到来，因为正如威廉·邦迪⁽⁷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东南亚“在西方势力有效撤离之后”是否安全。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中立旗号下寻求解决办法而谈判”，这“无异于向越南共产党投降”。⁷⁸根据这种推理，南越必须永远做美国的军事基地。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我们接受这条基本的政治公理：凭借一贯对弱者和受压迫者权利的关注，以及对落后国家正确发展

模式的独特洞察力，美国必须要有勇气、有恒心以武力推行其意愿，直到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些真理或者干脆放弃希望。

假如坚持真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待事情也是其责任。因此，必须为国务卿坚持历史类比的重要性（比如，慕尼黑类比⁽⁷⁹⁾）而鼓掌。如同慕尼黑阴谋所显示的，一个强大的、有侵略性的盲信其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国家，会把每一次胜利、每一次自身力量和权威的扩展当作下一步的序曲。阿德莱·史蒂文森⁽⁸⁰⁾对此所言极妙，他说起“在陈旧、古老的道路上，扩张势力猛推着越来越多的门，他们相信门总会被打开，一直到最后一扇门那里，抵抗在所难免，大战就爆发了”。此处存在绥靖的危险，正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向苏联指出的那样，他们说“苏联对我们在越南的希特勒扮演着张伯伦的角色”。⁽⁸¹⁾当然，自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不同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尽管这种区别对于正在吸着毒气或被焚烧的越南农民而言好像太学究气了。我们不想占领亚洲；我们只希望（回到沃尔夫先生所说的话）“帮助亚洲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前进，成为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社会，无论作为国家或作为公民个体，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都是自由的、轻松的”。⁸²这种说法很恰当。最近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拥有何种形式的政府对我们无关紧要，只要其政府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姿态”（以我们对该词的奇特理解），即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或政治控制保持开放。即便为了达到该目标在越南实施种族灭绝，这也是我们为了保卫自由和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

详细讨论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向开放社会前进（而“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起来都是自由的、轻松的”）的方式无疑是多余的。我曾多次引用近期的国会听证会，代表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印度常务委员会的威廉·霍尔斯特（Willem Holst）和罗伯特·马尔（Robert Meagher）在其证词中讨论的一个例子颇具启发性。⁸³马尔先生指出：“如果有可能，印度也许更愿意进口技术工人和技术诀窍而非外国公司。但这不可能，因此印度就把外国资本当作必要之恶⁽⁸⁴⁾来接受。”当然，如果投资的基础不靠外国援助，如果不是出于必要才使印度被迫改变其获得外国私人资本的方式，“印度的私人资本投资问题……只会是理论上的做法”。但现在，“印度对外国私人投资的态度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愤恨和矛盾的角度转向接受其必要性。随着这种必要性日趋明显，矛盾心态会逐渐被更通融的态度所取代”。霍尔斯特先生提供了“一个也许很典型的历史实例”，即“在计划中提出与美国私人财团合作的印度政府每年再增加生产100万吨化肥，也就是成倍增加全印度目前的设备容量。这个大胆的计划不幸破灭了，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咎于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失败，在众所周知的

十项刺激商业的计划框架内，双方都未找到可行的、彼此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此处的困难与业主权益所占的比例有关系。显然，“印度急需化肥”。同样明显的是，财团“坚持认为，事实上需要的是获得合适的过半数控制所有权”。但“印度政府公开坚持他们应该拥有过半数所有权”，而且“如此复杂的情况令人感到这又是弄巧成拙之事”。

幸运的是，这个独特的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之前引述的话是1966年2月发表的。几周之后，正如我们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中读到的那样，印度政府恍然大悟。来自印度国内的批评——“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想要独霸创立我们经济必须赖以运行的框架的权利”——平息了（4月24日）；印度政府接受了恢复经济援助的条件，即“印度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以及美国投资者“拥有相当大的管理权”（5月14日）。截至4月28日，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对这种进展做出如下概括：

改变的迹象发生了。政府同意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也在考虑放手更多的行业，并准备对进口政策（如果能得到充裕的国外援助）放宽限制……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持续不断地受到来自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压力，去年它们一直在敦促大力搞活印度经济，给私人企业更大的业务范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这里卓有成效，因为美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外汇资助印度的发展，使其工业的车轮运转不停。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增加其援助的诸多条款，无论叫它们“附加条款”“条件”或任何什么名称，因为印度简直无处投靠。

该文的标题把这种进展说成是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的流变”。

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充分。于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2月5日）上读到，美国企业家坚持“进口所有设备和机器，虽然在他们的某些要求上印度已具备经过测试的能力。他们坚持进口液态氨这种基本的原材料，不用当地储量丰富的石脑油，并对价格、发行、利润和管理控制都设定了限制”。我已经引述过印度的反应（见第47页）。

我们以这些方式帮助印度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发展，用华尔特·罗斯托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能正确地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个人尊严”。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拒绝接受那些亚洲人的愚蠢观

点，继续用罗斯托的措辞来说，他们“相信或部分地相信，西方被迫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运作创立并依赖自己的帝国主义领地”。⁸⁵

事实上，当美国恣意利用印度当前的痛苦，运用其经济力量推进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流变”时，印度也发生了战后的一起大丑闻。

在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步入开放社会的这一目标时不考虑领土扩张，我们就没有开辟新天地。汉斯·摩根索⁽⁸⁶⁾恰当地把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政策描述为偏向“竞争自由（你们可能称之为剥削中国）”的政策。⁸⁷事实上，帝国主义强国很少有明确的领土野心。比如，英国议会在1784年宣布，“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领土扩张是违背该国希望、荣誉和政策的措施”。此后不久，英国就开始全面地征服印度。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宣布它在埃及的意图时打出的口号是“干预、改革、撤离”。无需再评述这种承诺在后半个世纪里被兑现了多少。1936年，在对华北采取战争行动前夕，日本人颁布了其《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包括使用温和的、和平的方式扩张其势力，促进社会 and 经济发展，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修正列强的侵略政策，确保它在东亚维稳强国的地位。⁽⁸⁸⁾甚至在1937年，日本政府也“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简而言之，我们都如出一辙。

顺便需要记住的是，直到1939年，美国明显仍十分愿意与日本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并做出临时妥协，如国务卿赫尔⁽⁸⁹⁾所言，假如日本愿意“改变其针对我们在中国的权益的态度和做法”。的确，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十分令人厌恶，但正如当时那些负责任的、不会情绪失控的人所清楚地看到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是日本对开放之门的关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真诚的、投入的技术专家的声明常常让人惊奇地洞察到在最近的野蛮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看看经济学家理查德·林道赫姆（Richard Lindholm）在1959年的评论，他如此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越南”的经济发展失败的挫折感：“……如何使用美国的援助由越南人如何使用其收入和存款来决定，大部分受美国援助支持的越南进口货物要么是消费品，要么是直接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材料，这一事实说明越南人渴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愿意拿皮阿斯特⁽⁹⁰⁾购买就表明了他们的渴望。”⁹¹

简而言之，正如越南人民在自由市场中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渴望拥有别克汽车和空调，而不是炼糖设备或筑路机器。不管我们对他们的自由选择多么表示悲叹，我们必须允许这些人随心所欲。当然，在乡下偶尔也会碰到那些负重的两脚兽，但正如任何政治学研究生所能解

释的那样，他们不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精英，因此与人类只有表面的生物相似性。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诸如此类的态度造成了在越南的屠杀。我们最好直率地正视这些态度，否则就会发现，我们的政府正把我们领向一个对越南的“最终解决办法”。不可避免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越南。

让我们最后回到麦克唐纳和知识分子的责任。麦克唐纳引用了对一个死亡集中营出纳的采访，当被告知苏联人要绞死他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并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做了什么？”麦克唐纳总结说：“只有在其道德准则与权威发生了难以容忍的冲突时愿意亲自抵抗权威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谴责这个死亡集中营的出纳。”在我们每天读到越南又发生了暴行时，在我们编造、说出或容忍为下一次捍卫自由的行动而辩解的骗术时，倒可以问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

（本文修改自在哈佛大学的演讲，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Mosaic*] 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 [Theodore Roszak] 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页。）

论抵抗

华盛顿示威游行结束数周之后，我还在努力整理有关那一周的思绪，其性质很难捕捉或表达。也许我的一些个人反思会对其他人有所帮助，他们和我一样凭直觉就不喜欢激进主义，但又发觉自己正在逐渐地靠近一个不必要却又不可避免的危机。

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华盛顿示威游行象征着“从异见到抵抗”的转变。我会再谈谈这个口号及其含义，但我想在一开始说明的是，我确实认为，该口号不仅就示威游行的气氛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恰当地理解的话，它与反战抗议的现状也是相称的。这种抗议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人人都能从很多方面帮助营造表达关注和义愤的气氛，从撰写有关战争的文章或发表演说就可以做起。少数有勇气的人会付诸行动，拒绝与我们一直鄙视的“德国好人”站在一起。一些人应征入伍之后却被迫这

么去做。年轻人拒绝为其鄙视的战争服役时，持异见的议员、作家和教授都在一边旁观。那么然后呢？说自己没有怂恿或鼓励应征入伍的人去反抗，只是促成了舆论气候，认为正派之人都会拒绝加入一场悲惨的战争。那些写反战文章或发表反战言论的人能从这一事实中求得安慰吗？差别并不大。当其他人被迫迈出严肃、痛苦的一步时，我们很难从安全立场看待问题。事实是，在10月20日交给司法部的一万张征兵证和其他文件中，大部分来自能够逃服兵役的人，他们却坚持与弱势群体共命运。这样一来，抵抗的圈子扩大了。此外，人人都明白，若是限制抗议、拒绝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自己就和政府一样接受了共谋。有些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采取行动，并尖锐地提出有良知之人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

10月16日，也就是星期一，我在波士顿公园聆听霍华德·津恩⁽⁹²⁾解释他为何耻于做美国人，并看到数千名年轻人（一些还是我的学生）做出了年轻人不该承受的一个可怕决定：与选征兵役制度⁽⁹³⁾断绝关系。这周之后的星期一，在剑桥进行的一场讨论中，我听到一位国防部学术顾问估测说，必须用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拿掉”北越（“有人会觉得这太骇人听闻了，但是……”；“据我所知，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不会如此建议……”；“我们别用像‘毁灭’这样的情绪词”等），我还倾听了一位苏联事务首席专家解释克里姆林宫方面如何一直密切地关注并决定民族解放战争的成败（一旦成功，他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我们试图给这位专家指出：按照这些假设，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人有理性的话，肯定会立刻支持几十场这样的战争，因为他们无需付出太大代价就能挫败美国军队，把我们的国家撕成碎片——他会说我们不懂俄罗斯人的内心。）

华盛顿示威游行的那个周末给我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但我依然对其影响力不明就里。主要的记忆是场景本身，几万名年轻人围绕他们所认定的（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也赞同是这样）全世界最糟糕的形势，要求停止施加痛苦和破坏。是几万名年轻人啊，我认为这令人费解。可悲而又真实的是，对我们所有人目睹的一切，是年轻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惊呼呐喊，他们在坚守阵地却被打压，他们必须决定是进监狱还是被驱逐，或参加可恶的战争。他们必须独自（或几乎独自地）面对这种决定。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为什么参议员曼斯费尔德（Mansfield）“为他们所表现的国家形象感到羞耻”，却不为他们所对抗的机构呈现的国家形象而感到羞耻

呢？这个机构由一位清醒、温和、异常理智的人领导着，他在国会冷静地证实，用在越南的军火已超过“二战”期间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火总和。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谈起那些辜负了我们建设“法治政府”承诺的人时，为什么总是振振有词？那些人是指进行示威游行的少数群体，不是指九十几个负责任的人，他们在所效力的国家公然违背国家最高法律——《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时，心知肚明地站在参议院观望着。他十分清楚，在我们入侵越南之前，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武装袭击。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还告诉我们：“1965年初，美国的军事行动突然增加时，据估计当时仅有400名北越士兵与14万南越敌军对峙”；我们从曼斯费尔德的报告中才得知，当时在南越已有3.4万名美国士兵，这违背了我们1954年在日内瓦的“庄严承诺”。

这个观点需要继续讨论下去。在1965年10月第一个国际抗议日⁽⁹⁴⁾之后，曼斯费尔德批评示威者们“毫无责任感”。他只字不提（此后也从未提起）自己和其他人所表现的“毫无责任感”：当北越的城市和村庄被摧毁时，当千百万南越难民因美国的轰炸而背井离乡时，他们悄然袖手旁观并投票支持拨款。他现在也未曾说起过，那些允许实施这种策略的人，其道德标准或对法律的尊重何在。

确切地讲，我提起参议员曼斯费尔德是因为他绝非捶胸顿足、想要美国统治世界的狂热爱国分子。从最佳意义上讲，他是一位美国知识分子，是有学者气质、有理智的人，这种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惧怕的人。也许这纯属个人反应。但当我看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发现最可怕的不是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的“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柯蒂斯·勒梅⁽⁹⁵⁾，而是政治科学家们的专题研究，他们在讨论必须动用多少军队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或者什么样的越南政府才能让我们接受。我发觉可怕的是，我们看待和讨论一个无法承受的悲剧时所抱有的冷漠和镇定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如果苏联或中国犯下我们在越南所做的罪行，我们会对这些可怕的罪行迸发道德义愤。

我认为，华盛顿示威游行的计划严重失算。本以为五角大楼游行之后会有一些演讲，那些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会从人群中分身，前往空地对面几百码之外的五角大楼。我之前决定不参加非暴力抵抗，所以对策划的内容一无所知。正如每个人必须意识到的那样，在这些事情上很难分清“合理化”和“合理性”。但我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应该被规定得更具体、更清楚，才能支持那些拒绝去越南服兵役的人，表达异见的担子真正是落在他们肩上的。有人希望能更直接地表达对战

争的厌恶之情，我也理解其观点，但我当时不认为对五角大楼的非暴力不抵抗行动将会有意义或有成效。

无论如何，实际发生的一切与之前所预想的大相径庭。为了聆听演讲，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大批游行示威者直接去了五角大楼，一些人去那里是因为他们奉行直接行动，更多的人是因为受鼓动而前往。从我所站的演讲者讲台上看去，很难确定五角大楼那边发生着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涌动的人群。我从二手的叙述资料中得知，游行示威者穿过并绕开了前排的守卫部队，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占领了一个位置坚守着。不久便显而易见的是，几位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聚集在其周围并以中年人为主的人群还在演讲台那里原地不动，这是错误的；游行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人）都去了五角大楼。（我回想了一下，在演讲台附近看到的人有罗伯特·洛威尔⁽⁹⁶⁾、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斯蒙席⁽⁹⁷⁾、西德尼·伦斯⁽⁹⁸⁾、本杰明·斯伯克⁽⁹⁹⁾及其妻子、达格玛·威尔逊⁽¹⁰⁰⁾、唐纳德·卡里什⁽¹⁰¹⁾。）戴夫·戴林格⁽¹⁰²⁾建议说，我们应该试着靠近五角大楼。我们找到一处没被游行示威者堵塞的地方，向站在大楼几英尺之外的士兵走去。戴林格建议，在集会上没有发言的人应该用小型便携式音响设备直接与士兵对话。从这里开始，我的记忆就支离破碎了。莱斯大人发言了，我也发了言。我发言的时候，士兵队列路过我向前行进——很奇特的经历。我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意是，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士兵们去杀害别人，也不想让他们被杀害，但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那么说的样子好像很愚蠢，而且与他们无关。

行进中的士兵队列从局部上分散了与戴林格一起前来的一小拨人，我们这些留在士兵队列后面的人又重新聚拢，斯伯克博士这时开始演讲了。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排士兵突然出现，这一次他们的队形排列得十分紧密，并手持来复枪缓缓地推进。我们席地而坐。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那一刻之前我无意参加任何非暴力抵抗行动。但当那一队古怪的有机体缓慢地前行时（因为它的各个细胞是清晰可辨的人类就显得更加古怪），显然没人愿意让那团东西支配自己做些什么。当时，我被一名联邦执法官逮捕了，理由是阻碍士兵（描述该行为的术语是“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看到的士兵（他们离我不远）在整个事件中似乎都很不乐意，他们接到命令要踢打和用枪托击打（我猜想是如此命令的）拒绝移动但安静、不抵抗的人群时，都会尽量手下留情。可以想见，联邦执法官就不同了，他们让我想起几年前的夏天我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所监狱见到的警官。一位老人给我们看他腿上自己包扎的血迹斑斑的绷带，试图向我们描述被警察暴打的过程，那些警官

竟然笑了起来。在华盛顿，落入执法官手中境遇最惨的是年轻人，尤其是留着长发的男孩子。看到他们就好像能看出执法官的虐待倾向。尽管我目睹过执法官的一些暴力行径，但他们的行为好像大多是漠不关心或一些小恶行。比如，我们被关在警车里，一两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开门，只有几个气孔通通风——你没法对这些残暴的罪行太较真。

在监狱里以及我被释放之后，我听过很多说法，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年轻人的勇气都是真的。电视台的摄影师和大部分媒体记者离开后，很多年轻人被当晚发生的恐怖行径吓坏了。他们在寒冷的夜里坚持静坐，很多人被踢打、被击倒、被一群警察拖走（这倒更像“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我也听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说法，游行示威者向部队（通常好像不是前排士兵）进行挑衅。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士兵们在无意之间成为实施恐怖行为的工具，我们不能责备或攻击把人打死的棍棒。士兵也是人，有常人可能有的情感。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是，有一名士兵（也许三四名士兵）因拒绝服从命令而被逮捕。士兵毕竟与应征入伍的抵抗者处于相同的立场。如果服从命令，就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变得残暴；反之，个人就要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令人同情，却不应招致虐待。但我们应该对此事保持分寸。我的所见或所闻表明，示威者在引发大规模暴力行动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反战应保持明确的非暴力立场，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作为策略而使用暴力很荒唐。在这个竞技场上，无人能与政府抗衡。诉诸暴力，无疑会失败，只是恐吓和疏离了某些能被影响到的人，并鼓舞了理论家和强力进行镇压的管理者。此外，人们希望，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会成为更受崇敬的人。对于那些在民权运动中成熟的人，大家都会欣赏他们的品性。无论可能获得什么成就，在改变其参与者的生活和品性方面，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中，一场有原则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许能为许多人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国家从可怕的未来中拯救出来，从另一代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一代人认为，把轰炸北越作为策略和成本效益问题来讨论是明智的，他们还支持我们以其知晓的人力成本去征服南越的企图，并温和地宣称“我们的主要动力是自身利益——即我们的国家在这个缩小的世界中的自身利益”（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¹⁰³⁾，《纽约时报》，1967年10月26日）。

再回来谈示威游行，我必须承认，发现自己多年来尊敬的人（诺曼·梅勒⁽¹⁰⁴⁾、吉姆·派克⁽¹⁰⁵⁾、戴夫·戴林格）都在牢房时，我倍感宽慰。我认

为，这让许多在那里的孩子们感到安心，他们能感觉到没有与自己熟知的世界分离，也没有与自己仰慕的人分离。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毫无防备的年轻人，他们失去了很多，但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其中有来自州立大学的年轻讲师，有一旦屈服就会前途光明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我认不出的人。

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显然，这是每个人在想的问题。我认为，“从异见到抵抗”这个口号很有道理，但我希望不要以此来暗示会停止坚持异见。异见和抵抗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互强化的运动。对于那些参加抗税、拒服兵役和其他抵抗行为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对宗教团体或在城镇论坛上发言，或不让他们参与选举政治，去支持主张和平的候选人或就战争进行的公民投票。以我的经验看，通常是那些投身于抵抗运动的人最能全心参与这些劝说性的行动。先暂且不谈抵抗，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耐心解释”的日子尚未终结。随着棺材被运回家、税金上涨，很多之前愿意接受政府宣传的人会更加在乎如何替自己打算。他们如此改变的原因是令人遗憾的，但进行教育活动的机会却恰到好处。

此外，政府近期宣传路线的转换为批评性战争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在最近为美国对越战争的辩护中，有一种刺耳的绝望之声。我们较少听到为南越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却更多地听到“国家利益”。国务卿腊斯克沉思默想，思忖10亿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险；副总统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与“总部在北京”的“好战的亚洲共产主义”对抗，他还补充说，越共的胜利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尤金·罗斯托⁽¹⁰⁶⁾说过“如果在20年的时间里都要遭受轰炸的话，创建模范城市就毫无用处”等的话（所有这一切都被沃尔特·李普曼正确地评论为“对美国海军轻浮的侮辱”）。

这种宣传上的转换使批评性分析更易于攻击越南问题的核心，其核心不在西贡和河内，而在华盛顿和波士顿。反战分子密切关注越南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其中总有些滑稽之事。30多年前，反对日本占领满洲的人并未着眼于满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是着眼于日本的这些问题。他们并未参与有关如何具体扶植傀儡皇帝的荒谬讨论，而是留心日本帝国主义的源头。如今，反战分子更能轻易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侵略的源头，转移到我们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和机构。我们可以质问：10万人的伤亡，还有中途花费1 00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镇压一个小国，是服务于谁的利益呢？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想法的荒谬之处：我们通

过捣毁其边境地区的独立民兵武装，“遏制了中国的势力”，还能指出这种声明的玩世不恭之处，即我们进入越南，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和平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还因为“对自由的压制”决不能“不受到挑战”（又是公民委员会的话）。我们可以质问的是：为什么发出这种声明的那些人不建议往罗德西亚、希腊或密西西比派遣美国远征军，而只建议派往越南？他们想让我们相信，在越南，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就宣称征服了世界，其实只是借林彪之手坚决表态，本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不要指望中国。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07)读出这些“遏制共产主义”的声明时就好像在读一本新的《我的奋斗》，或者，为什么那些人承认“越南的共产主义政权可能会是……反中国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108)，《亚洲研究》，1967年8月），却又在声明上签名？这些声明谎称，我们在越南面对的是北京的“扩张侵略”分子。我们可以质问：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哪些因素促使那些才智出众、见多识广的人士轻易地说，我们“对南越别无所求，只要它能自由规划自己的未来”（公民委员会）？他们当然明白，我们强加给越南的政权排除了所有参与抵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人，而“这样做是恰当的”（国务卿腊斯克，1963年）；此后，我们一直在镇压南越唯一“有真正群众基础的政党”（道格拉斯·派克(109)）领导下的“民众叛乱”（史迪威将军(110)）；在我们的指导下，佛教反对力量被摧毁；我们把农民们赶到有战略意义的村庄，在那里，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同情者已被警察肃清，我们给农民们提供了“自由选择”，选西贡政府还是民族解放阵线（罗杰·希尔斯曼(11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法都是类似的。我们稍许动用一点政治智慧，就能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目前的全球问题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遏制美国。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提出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假设把拒绝屈从于我们的小国家碎尸万段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为了“这种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正当而合法的吗？腊斯克、汉弗莱(112)之流和公民委员会的回答是肯定的。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正在重蹈覆辙，走上一代人之前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

当然，我们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与德国公民或日本公民所处的环境不同。在美国，进行抗议无需什么英雄主义。我们开拓了许多条路径，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存在给美国用一套法律，给全世界其他地方用另一套法律的情况，也没人能委任我们做越南或其他地方的法官和行刑者。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在校园内外已经探索出许多条政治教育的路径。毫无疑问，这种努力应当继续下去，并发展到使命感所能允许的限

度。

有人似乎认为，抵抗会“抹黑”和平运动，很难通过更熟悉的渠道去接触潜在的同情者。我不赞同这种反对意见，但我觉得也不应轻率地漠视它。希望把越南人民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抵抗者，必须选择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所采用的方式，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其行为。他们一定不缺乏清晰的问题和正当的手段，因而也毫无理由在不明朗的问题上强迫别人采取丑陋的行为。尤其在我看来，拒服兵役的正当抵抗（目前为止是这样）不仅是一次非常有原则的英勇行动，也是一次得到广泛支持并产生政治影响力的行动。况且，此次行动或许成功地突出了在战争中被动共谋的问题，这是目前很容易回避的问题。直面这些问题的人，可能会继续摆脱美国生活中摧残思维的意识形态压力，提出严肃的问题，质问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以及这种罪行在美国社会的起因何在。

此外，我觉得反对抵抗的意见没有被恰当地表述出来。“和平运动”只是在偏执狂右派的幻想之中。有人对一些所使用的手段或所追求的目标持有异议，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反对这场战争。他们不会被不存在的运动排除出去，如果没有采用其他形式的抗议，就只能责怪自己了。

我已经谈到最重要问题的末尾了，我对该问题已无话可说。这是有关抵抗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通过交税使国内社会平稳地运转，仅凭这一点，我们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一个人必须自己选择在哪个关头拒绝参与战争，到了那个关头，就会参与抵抗。我相信，我所提及的抵抗原因都是令人信服的，它们都有一种不可削减的、无须过多探讨的道德因素。对于面临征召的年轻人，该问题以其最明显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对于必须决定是否参加义务兵役制的年轻人（义务兵役制可能会把负担从他转向其他不太幸运和享有更少特权的人），该问题的形式则更加复杂。我很难理解其他人为何拒绝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年轻人的困境中去。有很多方式：法律援助和经济支持；参加声援性示威；征兵咨询服务、建立拒服兵役的联盟或以社区为单位的抵抗组织；帮助那些希望逃离这个国家的人；采取牧师们建议的步骤（他们最近宣称要与即将被投入监狱的人共命运）。对于抵抗运动的这个方面，我无话可说，因为这个方面对于任何愿意全面考虑这件事的人来说还不太清楚。

当抵抗被当作一种政治策略时，需要慎思，我不想假装对其了如指掌。大部分情况都取决于接下来几个月中事件如何发展。威斯特摩兰(113)的消耗战也许还会持续，结果还未知，但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可能让

这一切发生。假如民主党人不想在大选中再次失败，他们也许需要一个必胜的策略：可以声称他们会结束这场战争，但对如何结束战争的方式可以依旧含糊不清。在这些情况下，约翰逊不可能允许当前的军事僵局持续下去。那么，就会有几种选择。首先，美国撤军（以所能暗示的任何表达而言）。也许可以伪装撤回“飞地”，再从那里撤军。也可以由某个国际会议来做安排，或者允许在西贡成立政府，在争论不休的南越人中间寻求和平途径，然后要求我们离开。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发明了诸如“革命发展”字眼的同一个公关公司可以把撤退描述为胜利。在行政部门，是否有人具备勇气或想象力促成这一过程，我不得而知。其实，一些议员正在提议，我们要执行这个过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也是沃尔特·李普曼、汉斯·摩根索等战争评论家的观点。关于安排撤军并在南部举行更有意义的新选举，菲利普·德维莱尔（Philippe Devillers）在1967年10月26日的《世界报》周刊（*Le Monde hebdomadaire*）概述了一个详细且相当明智的计划。我们不难想象也会有不同的说法。问题的核心在于决定接受日内瓦的原则，即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人民来解决。

第二种可能是全部歼灭。不会有人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拥有技术能力，只有多愁善感之人才会怀疑我们是否拥有道德力。伯纳德·法尔⁽¹¹⁴⁾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¹曾预测过这一结果，他说：“美国人能够摧毁一切，但无法安抚人心。他们也许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会成为坟墓中的胜利。越南将被毁掉。”

第三种选择是入侵北越。这也许会让我们背负两场打不赢的游击战，而非一场。但假如时机准确，这也许是一个重新团结美国公民的策略。

第四种可能性是进攻中国。那么，我们可以放弃越南，针对中国的工业能力打个胜仗。如此举动应该会赢得大选。这种建议无疑也会合乎所谓的“战略性思考”这种荒谬的推理。假如我们想在亚洲大陆保留占领军或强大的军事基地，我们最好确定中国人没有什么办法威胁我们。当然，会有大规模的核浩劫，但很难看出这会困扰那些被约翰·麦克德蒙特⁽¹¹⁵⁾称为“危机管理者”的人。1962年，正是这些人表示愿意接受极有可能发动的核战争以建立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并且只有我们，才有权在潜在的敌对国边境部署导弹。⁽¹¹⁶⁾

很多人认为“谈判”是很实际的选择，但我不太理解这种逻辑或这种说法的内涵。假如我们停止轰炸北越，我们也许会与河内进行谈判，但

那样一来，也全无可商讨之事。至于南越，唯一可以谈判的问题就是撤出外国军队。其他的事情可以由幸免于美军猛攻的任何越南组织来解决。在我看来，呼吁“谈判”不仅很空洞，而且给反战者设下陷阱。假如我们不统一撤出自己的军队，谈判就会陷入僵局，战争还会继续进行，会对美国军队开火、杀戮。军方会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升级战事去拯救美国人的生命。简而言之，这就是赛明顿⁽¹¹⁷⁾的解决方式：我们以我们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和平，如果遭到拒绝，我们就会在坟墓中获胜。

在所有实际的选择中，我认为只能接受撤退（无论是何种掩饰下的撤退）。抵抗是抗议的一种策略，必须精心地策划，才能提高选择撤退的可能性。况且，采取这种行动的时间也许很短。把抵抗当作结束战争的策略，这种逻辑再清楚不过了。假定决定重大决策的人还愿意推敲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我们（在世界各国中只有我们）是否有权、有能力决定越南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这样想则毫无根据。再者说，选举过程几乎不可能对重大决策有所影响。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也许在下次选举之前就解决了。即使并非如此，也不可能在民意测验时给出慎重的选择。万一奇迹发生，提供了这种选择，有了1964年⁽¹¹⁸⁾的经历之后，我们该如何认真看待“推举和平候选人”的选举承诺呢？鉴于战事升级的巨大危险及其煽动仇恨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各种途径来提高美国侵略的国内代价也不无道理，把代价增加到某种地步，让计较代价的人无法小觑。然后，人们必须考虑怎样才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威胁。可以想到许多可能性：大罢工、大学罢课、试图阻止军工生产和供应等。

我个人认为，假如能有效地避免即将面临的悲剧，这类破坏性行为也是正当的。然而，我对其可能产生的效力表示怀疑。现在，我还无法想象这种行动的广泛基础，至少在白人社会之内以及大学之外的地方。因此，强力镇压不会太困难。我猜测，参加这些行动的人主要是来自人文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还有少数科学家。职业院校、工程师、操纵及控制技术方面（多属于社会科学）的专家相对而言会显得漠不关心。因此，这对美国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将是长期的威胁。我怀疑，这对处于决策位置上的人显得尤为重要。腊斯克和罗斯托及其学术界的同谋好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策已在这些范围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怀疑，他们意识到了创造性能量损耗的范围或重要性，还有年轻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之心。在施展美国力量的过程中，年轻人目睹了暴力和欺骗并心生厌恶。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破坏活动对他们而言也许是可以忽略的代价。

反抗一部分是一种道德责任，一部分是影响政府政策的一种策略。特别就支持反对服兵役的反抗而言，我感觉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策略，我认为，照目前情况看，其效力令人质疑。我这么说也缺乏自信且犹豫不决。

不管在越南发生了什么，一定会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不言而喻的是，军队不会作战失败，勇敢的士兵和无所不知的将领被叛逆的平民从背后捅伤。美国撤军可能会暴露美国文化中最糟糕的特征，也许还会导致严重的内部镇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获胜的话，对国内外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况且，马斯特⁽¹¹⁹⁾还强调了一个问题：“战争结束后，问题在于胜利者。他认为，他证明了战争和暴力是值得的。现在，谁来给他点教训？”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侵略性的国家而言，这才是一个危险。假如我们摆脱幼稚的想法——认为我们有点与众不同并且更加纯正（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帝国辉煌时期就抱有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做此评论时就能诚恳地面对真理。只能希望在各方众多无辜人士遭受痛苦并死去之前，我们会面对这一真理。

最后，我认为必须要强调一些原则，既然我们极力地、积极地反对这场战争和未来的战争。我认为，我们不必一味敦促他人实行非暴力不抵抗行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促成某些局势，让年轻人发觉自己是被诱导而采取了非暴力不抵抗行为，这也许违背了他们的基本信条。我们必须自由地进行抵抗。尽管我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更诚恳的希望是，抵抗会缔结友谊和相互信任，给那些必然要承受苦难的人们带来支持和力量。

（本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67年12月7日]，不同时期的修改稿也多次被发表。文中提到的示威游行发生在1967年10月19—21日周末时间，地点在司法部和五角大楼。向司法部交还征兵证是造成本杰明·斯伯克医生、威廉·斯隆·科芬 [William Sloane Coffin] 牧师、米切尔·古德曼 [Mitchell Goodman] 和迈克尔·法伯 [Michael Ferber] 因“共谋罪”被判刑两年的事件之一。详情见 Noam Chomsky, Paul Lauter, and Florence Howe, “Reflections on a Political Tri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22, 1968, 23-30。据估计，有几十万人参加了五角大楼示威游行，这次反战游行声势浩大、令人难忘。诺曼·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Norman Mailer,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一书中十分准确并敏锐地指出了这些示威游行的精神和特性。本章内容翻印自《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 第367—385页。)

对无政府主义的注释

在19世纪90年代，一位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作家写道：“无政府主义有着宽阔的脊背，它就像纸一样任人涂写。”——他指出，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人，他们类似的行为连“无政府主义的死敌都无法做得更好”。

¹²⁰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风格有很多，试图把这些潮流纳入某种一般性理论或意识形态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们像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一书⁽¹²¹⁾中那样，接着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历史中推断出某种生活方式（即不断变化的传统），仍然很难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并清晰地阐释其原理。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鲁多夫·洛克尔⁽¹²²⁾就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为无政府工团主义

（anarchosyndicalism）提出过系统的构想，他对上述问题也认识得很清楚。洛克尔写道：无政府主义不是

一个固定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明确的趋势。相比从思想上维护一切办公机构和政府机构而言，无政府主义努力让生活中所有个人和社会的力量自由地发挥。自由只是相对的，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它不断地变得更加宽泛，以更多的方式影响到更广的范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至关重要的可能性，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发挥自然赋予他的一切力量、能力和天赋，并将其转入社会账户。人的这种自由发展越少受到教会和政治的保护，人格就会愈加有效、和谐，并成为衡量所处社会理性知识文化的标准。¹²³

有人会质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中明显的趋势”的价值何在，它并未表达出特定的、详细的理论。的确，许多评论家对无政府主义不屑一顾，把它视为乌托邦，毫无固定的形式并且显得很初级，或者与复杂社会的现实不相容。然而，也有人可能看法不同：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关注的是必须废除一些权威和压迫，它们从某个时代遗存下来，当时出于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们被认为是正当的，现在却导致了（而不是缓和了）物质和文化匮乏。既然如此，就不会有什么为当前和未来所设定的社会变革理论，甚至也不必有什么社会变革所倾向的特定的、一成不变的目标概念。当然，我们对人类本性或者可行的社会形式的理解尚为浅薄，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我们听到“人类天

性”或“效率要求”或“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要求这样或那样的压迫和独裁统治时，也会立刻开始产生怀疑。

然而，在某个特殊时刻，只要我们的理解力允许，就有任何理由去具体实现这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明确趋势，使其切合于当下的任务。对洛克尔来说，“摆在我们时代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征服和行使国家权力，也不是把议会制弄得令人生厌，而是“从头开始重建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并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增强它”。

但只有生产者自己才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创造单位，一个新的未来从他们那里诞生。他们的任务必定是把劳动从经济剥削套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各种机构和政治力量的程序中解放出来，并且为基于合作劳动和服务于社会利益的计划性事务管理的自由人联盟开拓道路。让城市和乡村的劳苦大众为这个目标做准备，把他们像军事力量一样团结在一起，这是现代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也是其整体目的所在。[第108页]

作为社会主义者，洛克尔当然认为：“严肃、彻底、完全地解放工人只可能取决于一个条件：由全体工人来占有资本，即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¹²⁴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一直坚信，工人组织在革命发生之前的时期“不仅创造了思想，也创造了未来本身的事实”，因此他们自身就反映出未来社会的结构。洛克尔期望发生一次社会革命来剥夺剥夺者并废除国家机器。“我们用于取代政府的是工业组织。”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命令和规定而产生，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别的生产分支齐心合力地团结协作，即通过生产者自己接管所有工厂的管理，在这种形式下，独立的团体、工厂和工业分支成为一般经济有机体的独立成员，在双方同意的自由基础上系统地为社会利益继续生产和分配产品。[第94页]

洛克尔这样写的时候，这些想法在西班牙革命中已经被戏剧性地实践过。就在革命爆发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经济学家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¹²⁵⁾还写道：

.....西班牙革命面临社会变化问题时，不能把国家当作媒介，必须要依赖生产者的组织。

我们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并发现无需为了建立新的生活秩序而假设有个凌驾于工会工人之上的权力。只要有人向我们指出，在私有制被废除、寄生生活和特权毫无用武之地的经济组织中，国家的作用（假如有什么作用的话）是什么，我们便会心存感激。抑制国家不可能是一件慢吞吞的事情，必须由革命来终结国家。要么是由革命给予生产者社会财富，这样生产者可以自我组织起来及时进行集体分配，国家便会无事可做；要么，革命没有把社会财富给予生产者，这样革命就变成了谎言，国家会继续运作。我们的经济联邦理事会不是一个政治权力，而是一个调节性的经济和行政权力。它从底层找到方向，根据地区和国家大会的决议来运行。它只是个联络团而已。¹²⁶

恩格斯在1883年的一封信⁽¹²⁷⁾中对这种观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¹²⁸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最能言善辩）告诫要警惕“红色官僚主义”的危险，“红色官僚主义”最终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所编造的最低劣、最糟糕的谎言”。¹²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尔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问道：“甚至连我们所必须服从的过渡性国家，也必须不可避免地成为集体牢狱吗？当所有政治机构消失之后，它就无法在一个只受生产和消费制约的自由组织中存在吗？”¹³⁰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装作知道答案。但似乎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肯定的答案，要实现左派人文理想的、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机会就不太大。马丁·布伯⁽¹³¹⁾简要地指出了该问题，他写道：“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一棵已做成木棍的小树长出叶子。”¹³²巴枯宁认为，听命于政府权力或摧毁政府权力是他和马克思的主要不同之处。¹³³自从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从“专制社会主义”划分出来以后，这个问题就以各种形式在20世纪反复地出现。

尽管巴枯宁告诫人们警惕红色官僚主义及其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发展，但凭借当代社会运动的主张从历史根源去解释一个世纪之前的争论，这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很偏执。而左派分子评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时考虑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环境，就更加中肯一些。¹³⁴

反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工人运动反对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为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目标而利用俄国巨变时做得不够彻底。他们成为自身环境的囚徒，用国际激进运动来特别满足俄国的需求，这种需求很快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党——国的需求。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现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身上被发现了：列宁主义被判定为国际社会民主的一部分，只是在战术问题上与后者有所不同。¹³⁵

如果从无政府主义传统中找出一个主导思想，我认为应当是巴枯宁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对自己的认识：

我是自由的狂热爱慕者，把它看作智力、尊严和人类幸福得以发展和增长的唯一条件；这种自由不是由国家承认、给出和规定的完全形式上的自由，那只是永远的谎言，在现实中只能代表建立在奴役他人基础上的某些人的特权；这种自由也不是卢梭学派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鄙陋的、幻想中的自由。他们考虑到所有人都要拥有权利，由限制每个人权利的国家来代表，这种想法难免导致个人权利被削减为零。不，我所说的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由，它把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一切物质力量、理性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全面发展起来；除了受我们个性规则决定的限制之外，这种自由不承认其他的任何限制，我们的个性规则也不能完全被视为限制，因为这些规则不是被我们身边或高于我们的外部立法者所强加的，而是内在的、固有的，形成了我们物质、理性知识和道德存在的基础，它们不是在限制我们，而是我们的自由所需要的真正的、直接的条件。¹³⁶

这些想法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而来，其根源是卢梭的《论不平等》、洪堡的《国家行为的局限》（*Limits of State Action*）和康德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的坚决主张：自由是人为了自由变得成熟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获得这种成熟时被赐予的礼物。随着工业革命——一种新的、前所未有

的不公正制度——的发展，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保留并扩展了启蒙运动中激进的人文主义要旨和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它们曾被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持新兴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就有关让古典自由主义去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生活的相同假设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一点在（例如）洪堡的经典作品《国家行为的局限》中说得很清楚，该书抢先密尔一步，或许还启发了他，我们此后还会讨论这本书。这部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于1792年完成，实质上是深刻地（尽管过早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其思想必须被压缩得面目全非，才会变形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洪堡的社会构想——社会枷锁被社会契约所取代、可以自由地从事劳动——显示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参见注释(86)）。“当工作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而非本性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劳动的异化……[以至于]他在工作中无法成就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于是变得]筋疲力尽、思想堕落。”异化的劳动“令工人回到野蛮的工作，把其他人变成了机器”，因而剥夺了人进行“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生物属性”。同样，马克思设想有“一种需要同伴的新人类……[工人联合会成为]真正有建设性的力量，创造未来人类关系的社会结构”。¹³⁷的确，出于对人类需要自由、多样性、自由联合所做的更深层的假设，古典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出于同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竞争、“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必须被视为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然会被视为启蒙运动自由理想的继承者。

鲁多夫·洛克尔把现代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两股洪流（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汇合，它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从欧洲的知识阶层中找到了典型的表达”。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现实中已被摧毁。无政府主义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反对人剥削人”。但无政府主义也反对“人统治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否则就会完全地不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就在由衷地、深刻地为无政府主义的存在而辩护”。¹³⁸从这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的自由意志派力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和其他著作中都做了无政府主义研究。¹³⁹

盖林引用了阿道夫·菲舍尔(¹⁴⁰)的话：“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每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在巴枯宁组织的国际革命兄弟会的纲领——1865年《无政府主义声明》——中，他规

定的原则是：每位成员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者。

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反对生产方式私有制和其构成部分——雇佣劳动，这又与在生产者控制下自由地从事劳动这一原则相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期望的社会是劳动将“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¹⁴¹但这一点不可能被实现，如果工人不是受内在动力而是受外部权威或需求的驱使：“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可能没有另一种形式那么面目可憎，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痛苦。”¹⁴²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异化劳动，而且反对盲目的劳动分工，这时提高生产的方式

把工人肢解成碎片，使其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受工作的折磨，失去了工作的基本意义；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潜能与工人相异化。¹⁴³

马克思没有把这种方式看作工业化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未来的社会必须考虑“用发展完善的个人……取代今天已沦为碎片的细目工人（detail worker）……去适应各种各样的劳动，而对他们来说，不同的社会功能就是这些给自己的自然力提供自由范围的众多模式……”¹⁴⁴⁽¹⁴⁵⁾前提条件是废除作为社会范畴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且不说“劳动力国家”的产业大军或极权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现代形式）。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专业的生产工具，原则上这种情况可能通过正当的发展和科技的使用被克服，而不会被加强，但也不在某些人专制控制的条件之下，他们使人变成为其目的服务的工具，忽略了个体目的（用洪堡的话来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进行武装斗争，并准备在民主基础上接管生产组织。这些联合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流派”。¹⁴⁶如果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仅仅是——用蒲鲁东常说的话——一种“盗窃”形式，即“强者对弱者的剥削”¹⁴⁷，无论其意图多么仁慈，某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也无法为控制生产创造出条件，使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成为生活的最高需要。那么，两者都必须被克服。

在蒲鲁东抨击私人或官僚有权控制生产方式时，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站在那些通过斗争带来“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历史解放阶段”的人的一边，第一个阶段把奴隶变成了农奴，第二个阶段把农奴变成了工薪阶层，第三个阶段在解放的最终行动中废除了无产阶级，把经济控制权交到生产

者自由志愿联合会的手中（傅立叶，1848）。¹⁴⁸托克维尔也在1848年强调了“文明”所面临的迫切威胁：

只要所有权是许多其他权利的起源和根基，就很容易为自身辩护——或者说它不会受到抨击。因此，所有权是社会的堡垒，而一切其他权利是外围工事；它没有经历过正面的攻击，的确也没人想刻意攻击它。而如今，财产权被看作贵族社会唯一未被摧毁的残余，它孑然独立，是均衡社会中唯一的特权，这时的情况便有所不同。想想工人阶级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吧，尽管我认为他们目前还很心平气和。公平地说，他们的确不像之前在政治热情煽动下那么激愤了。但你们难道没发觉他们的热情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吗？你们难道没发觉，在他们当中逐渐散播的思想和观点，不仅仅要废除这条或那条法律、这个部门或那个政府，而是要冲破社会自身的基础吗？¹⁴⁹

1871年，巴黎工人打破了沉默并进而要

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废除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¹⁵⁰

当然，公社被湮没在血泊中。凡尔赛政府的部队再次从民众手中夺回巴黎时，巴黎工人进攻“社会自身基础”时试图克服的文明本性再次被显露了出来。马克思辛辣而准确地写道：

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褻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同上，第74、77页）

尽管巴黎公社遭到严重的破坏，巴枯宁写道：巴黎（公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明确并彻底地解放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团结的新时代，跨越并无视国家的界限……下一次人类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团

结起来，就是巴黎的重生”——这是全世界仍在期盼的一场革命。

那么，坚持不懈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社会主义者，但只是某种社会主义者。他不仅会反对异化和专业化的劳动、期望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而且坚持认为这种占有必须是直接的，由无需打着无产阶级名号行事的某种精英力量去实施。简而言之，他反对

由政府来组织生产。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官员指挥生产，指挥管理者、科学家、店铺主管……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以自己去替代资产阶级的新的管理和统治阶级，这样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必须由成为生产主人的工人亲自来实现。

这些评论摘自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议会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理论家之一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五个观点”。实际上，激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合并了。

为了进一步举例说明，让我们看看下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描述：

革命社会主义否认国家所有制会终结于官僚专制之外的制度。我们已经明白国家为何不能民主地控制工业。工业只能由工人民主地拥有和控制，由工人从自己的队伍中直接选举出工业管理委员会。社会主义本质上将是一个工业制度，其构成具有工业化性质。因此，在地方和中央社会管理议会中，进行社会运动和社会工业的人会有直接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权力以这种方式从那些从事工作并熟悉社会需求的人当中向上流动。当中央行政工业委员会开会时，它代表的是每种社会活动的层面。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会被社会主义工业行政委员会所取代。从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就是社会革命。历史上的政治国家从来都意味着由统治阶级来管理人的政府。社会主义共和国将是代表全社会进行管理的工业政府。前者意味着从经济和政治上隶属于大多数人，而后者会是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因此，它将是真正的民主。

这种纲领性的陈述来自威廉·保罗（William Paul）1917年初所写的《国家的起源和作用》（*The State,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稍早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这也许是列宁最富自由

意志的著作)。保罗是马克思—德莱昂⁽¹⁵¹⁾社会主义工党的成员，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¹⁵²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论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志原则，后者的信条是：既然国家所有制和管理会导致官僚专制，社会革命必须要以由工人直接控制的社会工业组织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引述许多类似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想法已经在自发的革命行动中得以实现，例如“一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有1936年的西班牙（不仅在农业化的乡村，而且还在工业化的巴塞罗那）。有人也许认为，某种形式的议会共产主义是一个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自然形式，它反映了一种直觉，即工业体系受到任何形式的精英独裁（不管是雇主、经理、技术贵族、先锋党派还是国家官僚）的控制时，民主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极权主义统治的这些状况下，由马克思和巴枯宁进一步发展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意志的理想就无法得以实现，人类将无法自由地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质，而生产者也只是“人的碎片”，被贬低并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受上层指挥的工具。

“自发的革命行动”这一表达可能有误导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认真对待过巴枯宁的话。巴枯宁认为，在革命之前工人组织必须创建“不仅是有关未来的想法，而且是有关未来本身的事实”。西班牙人民革命的成就尤其基于多年的耐心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是由来已久的投入与交锋⁽¹⁵³⁾传统的一个要素。1931年6月的马德里议会和1936年5月的萨拉戈萨议会的决议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西班牙的革命行动，德桑蒂兰提到的略有不同的想法也是这样。他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将来由革命而创立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盖林写道：“和大众的意识一样，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心目中，西班牙革命是相对成熟的。”1936年初的动荡因佛朗哥的叛乱而爆发为社会革命时，工人组织以其结构、经验和理解力承担起了重建社会的任务。在为一本有关西班牙集体化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丁·舒奇⁽¹⁵⁴⁾写道：

多年来，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对其社会进行社会转型。在他们的工团和组织大会上，在他们的杂志、小册子和书里，社会革命的问题被反复、系统地讨论着。¹⁵⁵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自发性的成就，即西班牙革命富有建设性的努力。

从所描述的意义来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融入过去半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后者在美国日益具有军国化性质，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¹⁵⁶但在过去几年间，人们对此又重新产生了兴趣。我所引用的安东·潘涅库克的观点来自一个法国工人团体近期的手册（《工人信息通讯》[*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ère*]）。在1969年3月英国谢菲尔德工人管理全国大会上，沃尔特·肯德尔⁽¹⁵⁷⁾在所宣读的文章中引用了威廉·保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说法。在过去几年中，工人管理运动在英国已成为重要的力量。它曾组织召开过数次会议，产生了大量的小册子文学，在其积极的倡导者中还有来自一些最主要的工会的代表。例如，机械和铸造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Foundryworkers' Union）把受“各级工人管理”的基础工业的国有化计划视为官方政策。¹⁵⁸在欧洲大陆，工人管理运动也有着类似的发展。与英国一样，1968年的5月使人们对议会共产主义以及法国、意大利的相关思想的兴趣倍增。

鉴于保守势力在我们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的普遍存在，美国相对未受上述发展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但这也会改变。冷战神话的式微至少使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提出来。假如当前的镇压狂潮能够被击退，假如左派能克服自身更具自杀性的倾向，立足于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那么，随着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民主体制，对于那些意识到当代社会问题的人而言，如何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去组织工业社会的问题应该是主要的智力问题。况且，随着追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设想应当进一步成为行动。

巴枯宁在其1865年的宣言中预言说，社会革命的一分子将是“青年人中聪颖并真正是贵族的那部分人，尽管他们生来是特权阶级，但以其宽容的信念和热忱的抱负，他们会接纳人民的事业”。也许从1960年代兴起的学生运动中，人们就看到了为实现这种预言而迈出的脚步。

丹尼尔·盖林采取的是他所描述的无政府主义的“恢复过程”。他声辩（我认为他很有说服力）说：“无政府主义富有创建性的想法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们一经重新审视和清理，就可以帮助当代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新的尝试……[并且]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¹⁵⁹他从无政府主义“宽阔的脊背”上，挑选出那些能被说成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进行更严密的审视。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一框架考虑到了被无政府主义情绪和理想振奋着的大众行为，也考虑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盖林不仅关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关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真正

创造出新社会形式的大众力量的自发行动。他既关注知识创新力，也关注政治创新力。此外，他还试图吸取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的建设性成就，这些过去的经验也会丰富社会解放理论。对于那些不仅希望了解世界也希望改变世界的人而言，这就是研究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恰当方式。

盖林把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称为在本质上是教义性的，而20世纪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已经是“革命实践”的年代。¹⁶⁰《无政府主义》反映了这种判断。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解读有意识地指向了未来。亚瑟·罗森伯格⁽¹⁶¹⁾有一次指出，从特征上看，大众革命试图“通过武力”以某种形式的公社制度取代“封建统治或中央集权统治”，这“暗示着旧的国家形式被摧毁并消失”。这种制度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一种“民主的极端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拥有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的世界中实现”。他指出，这种理想对于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很平常。¹⁶²这种争取解放的自然而然的斗争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盛行的集中化背道而驰。

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道：巴黎的资产阶级“感到只有一种选择——公社或者帝国——无论这种选择可能以何种名称再次出现”。

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¹⁶³

悲惨的第二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

把这些话重新措辞，使其切合1970年的帝国主义制度，这不是难事。“把人类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的魔咒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只要仍然如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信条和革命实践就会继续鼓舞和引领着人们。

（本文是为丹尼尔·盖林所著《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写的序言的修改稿。略加改动之后，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0年5月21日]，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70—386页。)

对水门事件的质疑

当尼克松及其同谋者的滑稽伎俩逐渐被披露时，连最愤世嫉俗之士也不会感到诧异。此时，在充斥着伪证、推诿和对政治行为的常规（且难以振奋人心的）准则处处藐视的迷局中，确切的真相在哪里已经无关紧要。显然，沾沾自喜的尼克松团队成功地骗取了1972年选举的胜利。水门事件被谋划运作的时候，尽管马斯基⁽¹⁶⁴⁾在民意调查中占有优势，但就总统任期内的影响力而言，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胜利或许本就属于尼克松团队。在其他方面，他们也违反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些评论员指出，尼克松曾试图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政治政变。政治中心受到了各种技术的侵袭，通常只有违背公认政治信仰准则之人才会使用这些技术。那些通常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强大团体被排除在外，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党派。因此，他们的反击也跨越了党派界限。

整个事件中的小插曲是迪恩—寇尔森⁽¹⁶⁵⁾的“敌人名单”，这是揭示尼克松团伙心机错算的标志，也引出一些具有普遍反响的突出问题。名单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轻率也有愤怒。但假设白宫敌人名单上没有托马斯·沃森⁽¹⁶⁶⁾、詹姆斯·赖斯顿⁽¹⁶⁷⁾或麦克乔治·邦迪，假设这份名单上只有持政治异见者、反战活动家和激进分子，那么我们自然会猜想到的是，《纽约书评》不会登出什么封面故事，那些有责任感的政治评论员也不会引起什么关注。相反，如果被注意到的话，这也只会被看作是另一个合法捍卫秩序和有责任感的信仰的步骤（或许不太体面）。

对水门事件的普遍反应显示出一个共同的道德瑕疵。有关尼克松破坏美国民主基础——两党制——的举动，我们读到的都是高调说教。但与两党在战后时期对共产党的攻击相比，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CREEP）⁽¹⁶⁸⁾对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不如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实例来说，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运动。在水门事件之后的政治气候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提起诉讼，要求制止政府特工对其进行长期的骚扰、恐吓、监视和更恶劣的行为。严肃的民权团体或反战团体经常在其激进的成员中发现政府的密探。无论哪位总统在任，对持

异见者和其组织进行司法骚扰或其他骚扰都是常有的做法。由国家特工实施镇压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在水门事件曝光之后，政府仍继续暗中向盖恩斯维尔越南老兵反战组织审判⁽¹⁶⁹⁾的辩护团派了一个刺探消息的人。特别检察官在宣誓时说，密探虽已暴露身份，却绝非政府特工。¹⁷⁰

水门事件的确背离了以往的做法，与其说是在规模和原则上的背离，不如说是在目标选择上的背离。目前的目标包括富人和广受尊敬的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有望平分权力、制定社会政策和影响公众意见的人。这些人绝非听任国家之手肆意迫害的对象。

伪善之人或许认为，政府打击政治异己通常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至少法庭是如此解读宪法的，而水门事件和白宫进行的其他恐怖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有权对合法性进行强行解释的人也会建构一套法律体系如此解释一番，允许自己扫除敌手。在政治说教失效、充满异见和动荡的时期，陪审团也许都不愿定罪。事实上，一连串案例表明他们就是如此行事的，让擅于观察紧要关头的评论员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开始高唱赞歌。政治迫害十分有效地钳制了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人，摧毁了资源有限的组织或给它们定罪使其无法开展活动。投入到法律辩护的时间和金钱没有花在教育、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上。不管法庭的裁决如何，政府很少会输掉一场政治审判，思想管控方面的专家们肯定对此心知肚明。

总统在4月16日演讲中所说的“更长远的展望”，让我们想起“一切以和平和正义为由的暴力、恐惧、骚乱、纵火、轰炸构成的螺旋式上升局势”。他提醒我们说：“当质问者高声叫喊着压倒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时，言论自由就被残暴地压制了。”的确如此。在1965和1966年，抗议越战的公众和平集会驱散，示威者们遭到人身攻击（例如在后来成为反战活动中心的波士顿）。同时，自由主义派议员和大众媒体谴责示威者公开质疑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和平运动和激进的政治中心被轰炸摧毁，而那些事后只能为“礼节衰败”和“左派的极权主义”哀叹的人们丝毫没有发出抗议之声。用尼克松的话来说，他们是“严肃认真之人”，还“提出了有关我们能否以自由民主的形式生存下去的严肃问题”。当然，理查德·尼克松也是保持缄默的，他当时警告说，假如美国无法在越南获胜，言论自由就会被永久地破坏——尽管在这方面应嘉奖尼克松的伪善，但他连竞争伪善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切毫无新鲜之处。让我们回想一下约瑟夫·麦卡锡议员抨击《纽

约时报》和《国家卫报》⁽¹⁷¹⁾时的反差。为言论自由辩护的那些人是什么反应呢？¹⁷²我们再回想一下对麦卡锡阻止国内反颠覆和反苏联入侵的合法斗争的各种申诉，或对罗森堡夫妇⁽¹⁷³⁾进行司法谋杀的种种反应。实际上，水门事件共谋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吸取20年前麦卡锡听证会的教训。抨击左派，或抨击共产党的残余力量，或抨击快要倒台的、因接受（实际上是策划）战后镇压手段而早已屈从的自由派反对党，或抨击处于官僚体制内可以阻止不断变化的干预反革命国家政策的人，全都是一回事。但用同样的武器对准美国军队，这又是另一回事。麦卡锡没有注意到这种微妙的差别，很快就倒台了。最新的事件充分表明，尼克松的同僚们也犯了类似的判断错误。

这种错误的直接后果是，尼克松的羽翼被折断，权力被传统统治集团广泛地分享，国会对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在新的政治气候中，法庭禁止行政部门通过扣押来彻底侵蚀立法机关的职能。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能随心所欲地杀害柬埔寨人。因此，他们在柬埔寨无法获得他们在南越取得的有限的成功，而南越所有可靠的群众武装力量都因美军对平民社会的谋杀式袭击而遭到重创。尽管1972年圣诞节恐怖大轰炸⁽¹⁷⁴⁾的失败可能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DRV⁽¹⁷⁵⁾）或革命临时政府（PRG⁽¹⁷⁶⁾）提出的谈判解决方式（至少形式上是这样），¹⁷⁷他们仍然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公然破坏1973年1月《巴黎协定》的行动。同时，他们还转而轰炸柬埔寨，希望能摧毁当地的游击队活动。最近，也就是1973年4月，参议院的鸽派人士担心“目前的政治情绪还不适宜”挑战尼克松的战争政策，尽管他们承认，屈服也许是向总统权力投降的“最后行动”。¹⁷⁸但由于尼克松在国内的地位已经衰微，在美国反战派和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敦促之下可能会颁布法案；那些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自1968年的春节攻势之后也逐步意识到，战争不过是一场可疑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易而已。

对约翰·康纳利⁽¹⁷⁹⁾而言，即“令人瞩目又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引起这种关注的潜在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年复一年地被我们的海外军事净支出所填平，后者远远超过外国从美国购买军备所支付的费用”。¹⁸⁰有理智的帝国主义者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但肯定对另一个事实所知甚少——尼克松和基辛格能够在类似美国参加“二战”那么长的时期内“结束越战”，并且还打算大量投入资源镇压印度支那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尽管这种尝试肯定会继续下去，¹⁸¹但其规模会减小（至少暂时如此）。这无疑是水门事件最显著的后果。

尼克松的个人权威因水门事件受到了影响，权力将回到那些更了解美国政治本质的人的手中。但目前国会与总统对峙的长期后果很可能是建立更加稳固的行政权力。若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已经触犯了规则），那么为了维护总统不受法律约束的立场，尼克松的法律策略有可能会赢。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¹⁸²⁾、约翰·埃利希曼⁽¹⁸³⁾以及尼克松的律师们已经稳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偶尔几次发出免责声明，他们表明立场均是，总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单单行政部门就能决定起诉谁、何时起诉，并因此不受外界的影响。发生国家安全问题时，一切禁令都不起作用。

总统的助手们无需发挥想象力就会找到可能的国外情报或国家安全问题，为他们打算发起的任何行动而辩护。而他们这样做也不会受到惩罚。由欧文⁽¹⁸⁴⁾主持的水门事件委员会听证会最糟糕的时刻是，无法迫使埃利希曼承认，在五角大楼公开的文件中存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或迫使他承认自己的暗示，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¹⁸⁵⁾涉嫌为苏联领事馆提供了这些文件。玛丽·麦格罗里⁽¹⁸⁶⁾的暗示似乎合情合理：让白宫在埃尔斯伯格事件中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唯恐此事会引出更多的爆料，尤其会揭发美国对柬埔寨的秘密军事袭击。

一般来说，总统的立场是，假如反对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弹劾他。但民众对总统的尊敬是一种强效麻醉剂，只有可靠的弹劾危机才能令其威力减弱。这种扼杀不同意见、阶级觉悟，甚至批评性思想的有效手段不会被轻易地抛弃。此外，国会既无心也无力去管理国内经济或全球体系。随着生产和经济事务日益国际化，随着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策略的开展，这些相关的“企业”性机构⁽¹⁸⁷⁾又有了新的视角。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策略把苏联当作“秩序总框架”¹⁸⁸（这是基辛格偏爱的术语）中年轻的合作伙伴，正如斯大林在战后初期那几年似乎尝试的做法一样。从很多角度（不止一个角度）都可以这么说：对尼克松最忠实的支持者应当是战俘和共产党的政治局。

假如在弹劾总统和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只出于对国家安全需要的考虑）这一原则之间选择，那么后者会占上风。因此，也许会建立更稳固、更清楚的先例，让总统居于法律之上，这是从以下原则¹⁸⁹得出的必然推论：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一个超级大国在其领土上统一其意识形态。

水门事件和随之披露的卑鄙内情并非一无是处。它们一再表明，在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内，抵御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壁垒是多

么脆弱。由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狭隘的保守主义，由于缺乏群众性政党、缺乏为大公司经济和政治权力集权化提供选择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满足其利益的法律公司以及在私人企业和国家机构都能遵其命令的技术知识阶层，对揭露水门事件丑闻做出积极反应的希望十分渺茫。看不到真正的选择办法，反对派就按兵不动，甚至连自由主义反对派都会心生恐惧，害怕总统的权力会被削弱，国家这艘航船将漫无目的地漂流。因此，结果可能是，在行政部门继续延续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工作人员则继续由操控经济的那些人的代表组成，而且只对他们所构想的国内秩序和全球秩序做出反应。

评论家们曾断言，尼克松的策略有颠覆两党制的危险。他们所言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幻想取决于在两个政治组织之间定期做出选择的机会，这两个政治组织受到相似利益的驱动，并囿于通过美国社会的公司媒体和（极少数情况下）教育机构所表达的狭义信条。而尼克松的策略试图破坏稳定和顺从的传统基础，无法提供某种作为意识形态选择的极权主义政策。

但纵容麦卡锡和尼克松崛起的形势依然存在。对我们和全世界而言，幸运的是，麦卡锡不过是个暴徒，而尼克松的“黑手党”愚钝、粗鄙地玩弄着超出人们容忍限度的欺诈诡计，尚未被摧垮或吞并的强大势力勒令他们做出解释。但在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威胁下，迟早会有某个势均力敌的人物成功地建立起群众政治基础，聚集社会经济力量，有力地、恰到好处地执行像在椭圆形办公室构想过的那些计划。只是他也许会明智地选择其国内敌人，更彻底地打好基础。

替尼克松出面的人辩护说，在1969至1970年，全国处于暴动的边缘，因此有必要放宽宪法的限制。那几年的骚乱主要是对美国入侵印度支那的反应。促使历届行政部门以适应工业资本主义需求的某些特别方式领导“第三世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并未得以改变。我们有理由认为，类似的形势会迫使其继任者执行类似的政策。此外，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的基本前提从未被严肃地质疑过，尽管种种失败带来了政策紧缩。迪恩—寇尔森名单上的大部分敌人和持受人尊敬的、达成共识的观点的其他人都意识到了这些前提。

对最近披露的事实的反应充分地证明了危险所在。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水门事件上时，戈德利大使⁽¹⁹⁰⁾在国会做证说，美国在越南有15 000到20 000名泰国雇佣兵，这直接违背了国会立法。¹⁹¹他的话确认了被西方一贯忽视或嘲笑的来自巴特寮的指控，但并未引起编辑的评论或

民众的愤懑，尽管这件事比欧文委员会听证会所披露的内容更为严重。

揭露尼克松政府从早期就对柬埔寨和老挝北部进行秘密轰炸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所披露的最重要的事实。¹⁹²如果弹劾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向，很难设想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假如是这样，大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错位的。国会领导人和新闻评论员似乎更受表象和欺骗的影响，而非事件本身。国会剥夺了批准权——对1969年秋赛明顿委员会听证会有所研究的人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如果当时有机会的话，国会会批准轰炸和入侵。

至于新闻界，他们当时对轰炸的兴趣和对寻找证据的兴趣一样浓厚。他们试图证明的是，老挝的泰国雇佣兵正在被用船运往柬埔寨，而在柬埔寨作战的伤亡人员已到达孟买的医院。¹⁹³新闻界太关注过往的欺诈，结果并未调查这些正在发生的、也许与东南亚有着长期牵连的关键性事件。¹⁹⁴相似的是，雅克·德克努瓦（Jacques Decornoy）在《世界报》（*Le Monde*）上报导了1968年春对老挝北部城镇和乡村进行的密集轰炸，而美国新闻界不仅没有调查，甚至没有引用德克努瓦报道中的目击者叙述。柬埔寨政府1970年1月发布的白皮书详细描述了美国和越南陆军的袭击，却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兴趣。有关1969年初柬埔寨橡胶种植园大面积落叶的报道，或1966年以来美国政府承认的、有美国观察员碰巧在场的“轰炸错误”这样的偶然事件，亦是如此。¹⁹⁵无论在国会大厅里或在社论专页上，对政府欺骗的抱怨之声听起来都言不由衷。

更令人愤慨的是当前相信美国政治制度十分健全的热情。健全的美国政治制度体现在能够扼制尼克松及其幕僚，或是做出优雅的妥协，允许尼克松和基辛格在8月15日⁽¹⁹⁶⁾之前杀害柬埔寨人并毁掉他们的土地。这真是展示民主如何实施的范本，既没有秩序大乱，也没有丑陋的分裂。

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员们松了一口气：基辛格的名誉还没被玷污——他只有一点窃听嫌疑，没有密切地参与水门闹剧。但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此人都是现代大规模杀戮凶手之一。他力图为帝国主义权力在印度支那获取某种胜利，因此坐镇指挥在柬埔寨的扩张战争，后果如今尽人皆知，还有对老挝乡村轰炸的恶性升级，更不用说在越南实施的暴行。但他没有被牵扯进水门入室盗窃案或暗中削弱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行动，所以他的手是干净的。

假如我们试图保持平衡感，过去几个月曝光的事情就等于让我们发现，谋杀公司的总监们也在个人所得税上作弊。这当然应该受到指责，

但几乎不是要点。

（ 本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 [1973年9月20日] ， 第3—8页。 ）

重铸历史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一败涂地，但这同一拨兵力又开始了另一场战斗，对手是不太灵活的美国人民。在美国，他们获胜的希望更大。战场不是军事战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其结果会决定新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进程和特性。

由美国扶植的西贡政权倒台之后，日本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的编者按评论如下：

从各方面看，越南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强权无休止地镇压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越战的这一评论相当准确，对未来的预测却过于乐观。

问题很尖锐。各个大国当然不会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表明他们不能再使用武力去“镇压民族主义崛起”。事实上，美国在越南溃败期间，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巴西、智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自越战的教训不会教导我们那些处于缓和时期的伙伴们必须放开他们对帝国领地的残忍控制。

为国家暴行而道歉的人深知，公众在帝国主义征服和统治中无关紧要。无论主要社会团体和经济团体的获益有多少，帝国的公共支出也许都会上涨。因此，美军要想随时进行全球管理，就必须唤醒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或者至少让他们循规蹈矩、恭顺服从。

这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任务。如果能够确定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例如说）入侵波斯湾，那么不谙世故的民众就不能从情绪或道德层面上表示反对，当然也不能粗俗地抗议示威。意识形态主义者必须保证的是，从印度支那战争和反对该战争的经验中没学到什么“错误的教训”。

在越战期间，美国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与大量的公众意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假如世界体系在未来几年内能被恰当地管理，这种隔阂定会消失。因此，我们被勒令“避免相互责难”，要认真、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关注毫无意义或毫无长远意义的问题。必须雄心勃勃地投入宣传战，重建这一原则：只要能取得成功，美国使用武力就是合法的。

假如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理解为反和平的重大罪行（本来也确实如此），那么就为美军未来的全球管理设置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障碍。于是，那些遵从于美帝国主义创立原则的人们必须承受的是，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他们也许会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愚蠢，甚至很野蛮，但不会承认整个计划内在的非法性以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先打击南越⁽¹⁹⁷⁾，之后打击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这些问题必须从当前和未来有关“溃败教训”的争论中排除出去，因为它们直接针对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通过诉诸武力和暴力保证全球秩序的假想。

对禁止谈论的问题纠缠不放，就会审视美国发动战争的起源和原因。现在可以看到详尽的文件资料，其所显示的结论在我看来也一清二楚。他们害怕的是——抱着貌似有理的假设认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有很多更合理的说法——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可能会使“堕落蔓延”至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许远至印尼和南亚。在内部政策文件中，战争策划者轻而易举地端出多米诺理论的各种说法恐吓公众。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示范效果，有时也被称作“意识形态的成功”。

在某个领域内现代化的、平等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其他领域也可能是典范。令人惧怕的是，长期效应持续下去也许会缓和日本这个东方工业强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这些亚洲国家已经摆脱了由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最终结果好似是美国输掉了太平洋战争，而美国为之一战的部分原因是，阻止日本建立一个实质上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当然，其中的问题更加复杂，我在其他地方也更加详细地分析过。¹⁹⁸但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有可能做到的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要想这样，就可以再次使用某种抽象的“权力与统治意志”来解释帝国主义，这是与我们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实际结构无关的一个中性范畴。因此，反对越战的人可以写道：“美国干涉越南尤其代表了扩张主义利益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胜利”；“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反革命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预期反应，其主要利益在于维护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与该国家对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假想是同义的（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除外）”。但主流学者和评论未给这种批评挂上“不负责任”之名，因为作者还补充说：“从所有帝国主义假想的方式来看，根深蒂固的假想是，能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去实施对别人的统治，无论抱有这种假想的人的动机是多么仁慈。”这种批评是负责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仁慈的动

机，却并未探寻这种“统治”的本质，因而这种“统治”也许会被理解为社会层面上的某种中立特征。¹⁹⁹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组成成分去分析这种“实施统治的意志”，并把它与控制 and 支配美国社会机构的具体结构相关联时，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才会受到威胁。²⁰⁰必须把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从礼貌话语体系中排除出去，他们被看作“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决定论者”或“共谋理论家”，在严肃问题上并非头脑清醒的评论家。

简而言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允许各种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人们可以批评计划者们不够理性、道德缺失，甚至令人遗憾却又合乎情理地屈从于笼统、抽象的“实施统治的意志”。但美国动用武力保证任由跨国集团突破和控制的全球秩序这一原则，超出了礼貌话语体系的界限。

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几个主要任务。他们必须重写战争史，伪造这一事实：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美国反击南越的战争，是一场蔓延到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歼灭战。他们必须混淆的事实是：这次侵略被一场群众声讨和抗议的运动所牵制并阻止。早在某些知名政治发言人声称自己也是运动领导者之前，这场群众运动就超出了“得体”的界限，采取了直接而有效的行动。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确保把一切原则问题从争论中排除出去，让人们从战争中吸取不到有价值的教训。

那么，越战接近尾声之际，人们能从可怕的经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很幼稚。《纽约时报》的编辑告诉我们：

历史女神克丽奥（Clio）一贯高冷，行事不慌不忙、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后来，在更久的后来，历史才能评判漫长的越南故事中善与恶、智慧与愚蠢、理想与假象交错混杂的情况。

我们不必“竭力预先扮演历史的角色”。相反，“这是一个保持谦逊的时代，一个保持沉默、祈祷的时代”（1975年4月5日）。

哪怕对于愚钝之人，越南战争至少也能教给他的教训是，用谨慎、怀疑的眼光盯着以自由著称的新闻界是个好办法。上面引述的社论就是恰当的实例。编辑们呼吁理智和克制。谁又能反对呢？但让我们再多看一会儿。他们继续说道：

有些美国人认为，维护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战争也许有不同的打法。还有一些美国人曾认为，一个持续发

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是个虚构的故事，目前的军事失败证明他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十年间激烈的说经论道并没有解决当前的争吵。

当我们等待对这个“复杂分歧”做出历史裁决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并祈祷。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因态度谦逊而不敢冒昧传达克丽奥的裁决。但他们仔细地给这些问题做出了合理的界定。鹰派宣称我们本来可以打赢，而鸽派回应说胜利总是无法由我们来掌控。这些对立的观点显示出不负责任地进行思考的局限性，至于这些观点的长处，我们必须等待历史的判断。

确切地讲，还有第三种具有逻辑可能性的立场：不管克丽奥对鹰派和鸽派争论的最终评判是什么，首先，美国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权利去干涉越南的内部事务。美国也无权支持法国重新占领印度支那，或违背1954年《日内瓦协议》，企图（无论成功与否）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或使用武力和暴力“维护”其强加的政权。

能让克丽奥传达的唯一判断是有关策略的判断：我们有可能获胜吗？也可以想象其他的问题。我们本来就应该获胜吗？我们有权去尝试吗？我们是否发动了犯罪侵略？但是这些问题都被排除出了讨论，因为《纽约时报》定下了基本规则。

呼吁保持谦逊、沉默和祈祷也有方法可循，其明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可能一直围绕策略问题的争议，让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站住脚：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才有权威通过武力强加其统治。相应地，挑战这个基本原则的真正的和平运动就从今后的一切讨论中被排除出去了，其立场甚至不会被当作困扰《纽约时报》编辑的“复杂分歧”。

有趣的是，没有一封挑战《纽约时报》编辑用这些词语表达的独特立场的信件被发表。我说的是“发表”。至少有人寄过一封信，也许寄过很多封信。《纽约时报》选了一些适宜发表的回应社论的观点，包括倡导核轰炸的信（1975年5月4日）。但懂礼数的期刊要有些限制。

《纽约时报》并不是唯一一家只限于讨论其社论所涉及的琐碎、狭隘问题的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下简称《箴言报》）的评价如下：

包括这家报纸在内的很多言论都把共产主义获胜看作悲

剧，认为美国干涉越南是件光荣的事情，尽管这种战争行为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满是错误和误判。其他人同样会有说服力地争辩说，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迅速地从中国脱身，允许南越独立地处理事务。但肯定能达成统一的共识……（4月22日）

请注意，对立的观点也被假设为和《箴言报》所持有的基本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时机不同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国家媒体提出的标准立场，只有一些令人尊重的例外而已。对国家政策的批评总是来者不拒，但必须保持在礼数范围之内。像亚瑟·施莱辛格那样的人也许会对约瑟夫·艾尔索普⁽²⁰¹⁾预测美国将在越战中获胜表示质疑，因为他继续强调说：“让我们都祈祷艾尔索普先生是对的。”这比起让头脑健全的人必须为美军的胜利而祈祷再明显不过了，根本无需讨论。施莱辛格在1967年解释说，美国的政策也许还能成功，那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向美国政府的智慧和政治才能致敬”，其体现是发动了一场把越南变成“废墟之地”的战争。²⁰²但他认为战争不可能成功。假如他继续敦促美国放弃失败的计划，《箴言报》也许会回想一下并承认，这个极端的提议和自己的提议一样中肯。

《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也许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坚持不懈地批评越战的报纸。那么来看看编辑们对终止战争的反应。在4月30日一篇题为“解救”的社论中，《邮报》坚持认为，关于这种“特别的痛楚”的意义，我们能够“给予宽松的余地容纳争辩”。美国应该“从整体上对战争做出更广泛的评判”，但必须是一个包括正面和负面要素的平衡评判：

因为如果多年来越南政策具体实施的很多部分是错的或是被误导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也难以否认这种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具体而言，希望南越人民能够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是对的。美国公众有权（实际上是有义务）去探究好的突发奇想怎么会逐渐转变为坏的政策。我们无法忍受抛却一切有关那种突发奇想的回忆，因为从越南吸取到的根本“教训”肯定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天性就是坏的，而是我们会犯错误，甚至大幅度地犯错误。能够包扎民族伤口的不但是不要相互指责，还需要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

请再注意一下这些关键词：“错的”“被误导的”“悲剧性的”和“错

误”。这就是“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带着我们得出判断时所达到的境界。

《邮报》鼓励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对越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即我们帮助越南人民“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显然，我们必须赞同的是，帮助人民达到这个目的是正确而可信的。但这种“早期的突发奇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付诸行动的呢？让我们更准确地标示一下年代，顺便回想有关这场战争的某些关键性事实。

在1954年之前的时期，我们就一直这样帮助南越人民吗？《邮报》编辑几乎不这么认为。当时，美国在给法国人撑腰，支持他们重新征服印度支那。²⁰³杜鲁门在任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²⁰⁴⁾谈到，美国的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克服当地民众的反抗”。越南的抵抗武装由胡志明指挥，他曾呼吁美国给予协助却遭到断然拒绝。人人都坚信，作为越南民族武装的领袖，他深受群众的拥护。但艾奇逊却揭露说：“质疑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分子是无关紧要的。”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共产分子”。因此，我们必须帮助决心（用艾奇逊的话来说）“保护IC⁽²⁰⁵⁾并使其免受共党分子的进一步侵蚀”的法国人。这里没有什么帮助南越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情。

也许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后我们“早期的突发奇想”才蓬勃发展起来。这也很难算是一个貌似合理的争论。协议上的墨迹未干，国家安全委员就采取了一个反颠覆的整体方案，破坏政治解决的途径，直接保留使用军事力量“挫败未构成武装袭击的当地共产主义颠覆或叛乱”的权利（需经国会同意），这直接违背了“美国的最高法律”。这种军事力量可以用于“局部地区或对抗这种颠覆或叛乱的外部来源（包括共产主义中国，如果可以确定为来源的话）”。有美国撑腰的吴庭艳政权发动了残暴血腥的镇压，无视我们宣誓维护的公约，力图捣毁参与打击法国殖民主义的南部军队。这场屠杀似乎十分成功，但到1959年，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的部队放弃了对实施《日内瓦公约》的希望，重新开始武装斗争，激起了预想之中的华盛顿抗议怒潮。那么，这当然不是美国深切关注南越人民是否有自决权利的时候。

《邮报》也许指的是1960年代早期。当时，美方官员估计，大约有一半南越人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用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只有越共才能在乡村的广泛基础上获得真正的支持和影响力”，而越南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肯尼迪总统派美军镇压正在让吴庭艳政权垮台的“颠覆或叛乱”，这一行动被五角大楼文件描述为“本质上是美国的创举”。到1962年为止，美国空军完成的飞行任务占战斗任务的30%，

袭击了“越共”游击队和支持他们的人。由美国组织、训练、充当顾问并提供供给的当地军队用武力把三分之一的人口驱赶到“战略村”⁽²⁰⁶⁾，用美国政府鸽派主要人物罗杰·希尔斯曼的话来说，人们可以在政府或越共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希尔斯曼解释说，这一宽宏大度的努力因警力低效而失败了。完全不可能把越共的政治特工从人口集中的战略村里清除掉。越共特工——是其兄弟或同辈表亲——没被清除出去，人们怎么能在政府和越共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呢？²⁰⁷

显然，我们也许没考虑的可能性是：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那段时期。

根据官方宣传，在1963年11月推翻吴庭艳的政变之后，南越最终走上了民主之路。但这段时期不可能成为《邮报》为好行为颁奖的候选项。²⁰⁸民族解放阵线在1964年提出了一个老挝模式的解决方案，包括建立联合政府和执行中立程序。同时，美国又在竭尽全力地避免内部文件所说的“不成熟的谈判”。根据美国政府学者道格拉斯·派克的解释，原因在于南越的非共产主义者（也许除了佛教徒之外）无法冒险加入联合政府，他们担心“如果这么做，鲸鱼会吞掉小鲱鱼”。至于“佛教徒”（就是政治上有组织的佛教徒群体），威斯特摩兰将军在同年9月提到他们并没有“为国家利益”着想。正如五角大楼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²⁰⁹⁾大使后来认为的那样，佛教徒“相当于正式的共产党员”。美国的立场是，必须防止南越的两大政治力量——南部的鲸鱼和佛教徒——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只有美国才理解“国家利益”，因此一直在养肥小鲱鱼——在当时就是阮庆将军⁽²¹⁰⁾和武装委员会。洛奇大使解释说，将军是“我们拥有的一切”。麦克斯韦尔·泰勒⁽²¹¹⁾大使进一步解释说：“武装力量是南越社会能视为稳定力量的唯一组成部分。”

到1965年1月为止，连小鲱鱼也挣脱了美国的控制。据泰勒大使的回忆录²¹²记载，到1965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对阮庆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写道，阮庆“太令人失望”。他也许能成为“他的国家的乔治·华盛顿”，但他不具备那种“性格和正直品德”，因此几周后他被告知失去了政权。那个命中注定的1月充分表明阮庆缺乏某种性格和正直品德。泰勒解释说，阮庆继而走向“危险的阮庆—佛教徒联盟，最终可能会产生一个我们不愿意合作的不友好政府”。

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阮庆显然快要和民族解放阵线达成政治协议。在巴黎的“南越日”（1975年1月26日）那天发言时，阮庆像以往一样声明说，“外国干涉”让他早在十年前就放弃了“在南越交战各派之间进

行民族和解和协约的希望”。为了证明该观点，他公布了1965年1月28日收到的一封信函的内容，是时任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黄晋发⁽²¹³⁾给他写的回信。黄晋发证实自己支持阮庆明确地要求“美国必须让南越解决南越的问题”以及其“反对参与南越内部事务的外国干涉”的立场。他表示民族解放阵线愿意与阮庆一起“为民族主权和独立以及反抗外国干涉而战斗”。阮庆说，这些谈判本来能把众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并结束战争。但在这一个月的政权交替中，“由于来自国外的压力，我被迫离开了祖国”。

据五角大楼的文件记载，在1月下旬，威斯特摩兰将军“首次获得授权在南越境内的战斗中动用美军”，包括“有权在紧急事件中以打击为由动用美军喷气式飞机”（三年前，美国空军开始参与轰炸南越）。这个时间绝非偶然。为防止南越各派达成政治和解，美国在2月就定期地、逐步轰炸了南越（强度是更公开地轰炸越南北部的程度三倍多），之后美国远征军很快就入侵了南越。

简而言之，从吴庭艳政变到美国于1965年初直接入侵的这段时期很难被描述为这样一段时光：美国因其早期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去帮助南越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

那么1965年2月之后的时期呢？问题到这里就很卑鄙了。

1973年1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被迫接受了此前11月总统大选后他们一直努力修改的和平提议。这也许标志着《邮报》记者提到的某个时期的开始。事实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不可能是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²¹⁴

那么，肯定是越战的最后几天标志着美国寻求促成南越自决的时期。实际上，《邮报》的编辑告诉我们：“美国对越南经久干涉的最后一个阶段比较独特……因为在那个短短的阶段中美国表现得特别负责任和关切”，转移了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在最后几天，美国还做出在我们看来完全真挚、无私的努力以帮助我们找到政治解决办法，使越南人民免受更多的痛苦。”

这十分感人。为了讨论起见，假设这种真挚、无私的努力是坦诚的，这当然能证明我们对越南的干涉交织着善和恶，“[美国]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尤其是我们帮助南越人民“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的“早期的突发奇想”。那么，带着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继续争论下去吧，不要互相指责。同时，我们继续包扎民族伤口，承认我们具备犯下悲剧性错误的能力，但也会坚持我们那些逐渐被

某种难以理解的历史反讽“渐渐变成坏政策”的“好的突发奇想”。

美国政府在越南（部分地）被打败了，但回到国内也只是淤伤而已。因此，知识精英们无须反省就可以自由地解读历史。

在目前铺天盖地有关“越战教训”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诚实的自我评价。詹姆斯·雷斯頓⁽²¹⁵⁾用以下词语解释了有关这场近期灾难的“真相”：

真相是，美国政府除了自身的错误之外还被北越人和南越人欺骗了。北越人破坏了《巴黎协定》，而南越人破坏《巴黎协定》之后没有事先告知就放弃了大部分国土。（《纽约时报》，1975年4月）

美国犯下了错误，但是越南人——北越人和南越人——也犯下了罪行，违背了他们答应维护的协定。事实则有点出入。签订《巴黎协定》时，白宫宣布说，会拒绝美国被迫在巴黎签字的那张纸上所写的每一条主要原则。²¹⁶

美国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按其宣称的那样力图通过大量镇压境内运动和征服南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来违背协定。1974年夏天，美国官员对这些成就感到欣喜，指出阮文绍政权已成功地征服了由人民革命政府（PRG）⁽²¹⁷⁾掌管的15%的区域，有效地运用了因美国的慷慨支持而具有强大火力的优势。他们热切地期待取得更多的成功。²¹⁸

但这一切都不算是美国违反了《巴黎协定》。是那些恶毒的越南人——北越人和南越人——犯下了如此罪行。这是原则问题，无关事实。

此外，“我们的越南人”不但违反了《巴黎协定》，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我们就放弃了越南的大部分国土。雷斯頓抱怨道：“阮文绍政权甚至到最后也没有给福特先生⁽²¹⁹⁾一个公平的机会，只是下令撤退并召集了电视台摄影师，谴责美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越南人太不感恩也太不仗义了！福特再次被无辜欺骗了；他“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不公。因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美国应为东南亚的大屠杀负责”，我们肯定被错误地指控了……

多年之后，也无法指望这位令人尊敬的专家有所不同。那么，让我们转向《纽约时报》最直言不讳的鸽派安东尼·刘易斯⁽²²⁰⁾，他是20世纪70年代严肃而高效的越战评论家。他对越战历史的总结是：

美国对印度支那早期的决定可以被看成是好心办错事。但

到1969年为止，全世界大多数人和大部分美国人都明白，这场干涉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国会和大部分美国人“现在知道对东南亚的干涉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按照美国模式在南越建立一个国家的想法纯属妄想”“这不可行，付出大量武力、金钱或鲜血都无法实现”。只有福特和基辛格没有意识到“这些愚蠢的教训”。越南的教训就是“欺骗不会有好结果，也许在其他某个世纪或某个国家可行，但在20世纪末的美国却不可行”。因此，“到最后，至关重要的因素与导致这场灾难的因素是一样的：美国官员的欺骗行径——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我们自己”。这应该能“为发现整体上出了什么问题提供观察力”。他赞许地引用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判：“亚洲政策中的无数谎言与政策本身的失败一样，给美国社会和美国的名望带来了损害。”²²¹

那么，教训就是，我们应该避免错误和谎言，遵守被诚实地描述的成功政策。只要我们做善事的早期努力没有那么“大错特错”，也许就是合法的。我们必须假定，这也包括做善事的以下努力：支持1954年以后吴庭艳政权的镇压行径，或1960年代早期美军和其训练、掌控的部队的战争行动，或战略村计划，或1962年对10万越南中部山民进行轰炸并把他们赶进“安全区”等。回想一下伯纳德·法尔的估测：到1965年4月为止，16万多名“越共”倒在“美军装甲部队、凝固性汽油、喷气式轰炸机以及最终使用的摧吐气体的沉重打击之下”。²²²但这一切都是“好心办错事”，尽管到1969年为止我们本应明白，这场“干涉”就是一次“灾难性的错误”。

最后，来看一看《新共和》杂志⁽²²³⁾（4月25日）定期评论员（理查德·斯特劳特 [Richard Strout]）在TRB⁽²²⁴⁾专栏中的想法。斯特劳特从巴黎发来稿件，他正在那里参观记录希特勒罪行的纪念碑，带给他的情感冲击是巨大的：“我憎恨狂热的希特勒团伙；我无法原谅德国人。”但他继续说：“其他国家也丧失了其理智；这些国家难道不该上断头台吗？然后，我当然想到了越南。”

有人最终愿意审视由美国发动的战争的犯罪本质。但审视的时间不够长。下一句话写的是：“这不是邪恶；这是愚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错之一。”还有一个信息：“以生活的色彩观看一部漫长的悲剧已是一种惩罚性的经历，但面对它才算勇敢的行为。”假如我们能这样做，也许会有“新成熟期的曙光——一个时代的到来”。

然而，我们的“勇敢”也只能走这么远。我们在“新成熟期”无法接纳对我们基本行为规范的质疑。

既然在TRB中提到了“狂热的希特勒团伙”，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回想起他对如此深恶痛绝的纳粹罪犯的自我判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海因里希·希姆莱⁽²²⁵⁾有关屠杀犹太人的话：

经历了这一切——除了显示人性弱点的事例之外——并保持着体面，我们变得更加强硬。这是我们的历史中未被书写的，也不会被书写的荣耀篇章。²²⁶

按照希姆莱的标准，美国政府的强硬也必须被抬高。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仍然保持着体面。也许犯了大错，但是基本上是体面的。假如有人怀疑我们的强硬，让他们去问问柬埔寨人。

当然，我们也有展露人性弱点的实例。按我们的标准，美莱村就是这样的例子；合理处置罪犯彰显了我们的司法体制。的确，我们没有使用山下将军⁽²²⁷⁾一案中遵循的同样标准。在菲律宾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山下的部队并未受其指挥屠杀平民，但山下因他们犯下的罪行被处以绞刑。但至少卡利中尉⁽²²⁸⁾被软禁了一段时间。然而，司法的强大威力无法触及那些（比如说）应为1969年初在湄公河三角洲建和省（Kien Hoa）采取的“快速行动”⁽²²⁹⁾而负责的人。该行动成功地屠杀了11 000名我们一直要踊跃保护其自决权的南越人，缴获了750件武器，摧毁了民族解放阵线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次行动不仅很体面，艾布拉姆斯将军⁽²³⁰⁾在提拔该行动指挥官的时候甚至高声赞美说：“这个师的表现太优秀了。”²³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历史的守护者会以恰当的角度把这些光辉篇章记入历史。

我们可敬的鸽派与鹰派一样有些共同的基本假设。美国政府是令人尊重的，它也许会犯错，但没有犯罪。它不断地被欺骗，常常显得很愚蠢（切斯特·库珀说，我们与同盟国和附属国打交道时多么“天真、理想化”），但绝不是邪恶的。关键在于，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基于所能觉察到的主要社会团体的自我利益而行事。查理·鲍林⁽²³²⁾大使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解释说：“我们的政策不像过去其他国家大部分外交政策那样根植于美国的国家物质利益。”²³³只有那些“激进的”，或“不负责任的”，或“情绪化的”人——因此也是被排斥在外的人——会坚持给美国使用智力和道德标准。我们在分析和评价官方指定的敌人（或因此也是其他强国）的行为时，认为这些标准是理所当然的。

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美国人游离于合乎情理的批评（即越战是不道德的，而绝非一个战略性错误）界限之外。然而，知识分子通常更屈从于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其社会角色保持一致。这在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评论中一目了然。民意调查显示教育水平与反越战立场之间（特别是有原则的反越战立场，即倡导美军撤离）的负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被如下事实隐藏了起来：毫不奇怪的是，越来越多拥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不和谐地加入到公开的、明确表达的反越战立场。从近期对“美国的知识精英”——假如大家愿意为了讨论而容忍这个荒唐的概念的话——的研究中也能看出，知识分子阶层更加奉承国家意识形态。²³⁴就像本该预想到的一样，该研究表明，这些更敏锐的思想家们普遍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反对越战。换成更直白的话就是，知识精英们普遍认为，我们不可能侥幸成功（至少在春节攻势之后）⁽²³⁵⁾，或者认为代价太高（对一些人而言，是受害者的代价）。

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主要特征在越战的最后一个事件——“马亚圭斯”号（*Mayaguez*）事件——中显露无遗。1975年5月12日，一艘美国商船“马亚圭斯”号在离一个柬埔寨小岛⁽²³⁶⁾三英里处（据柬方称）被柬埔寨巡逻船拦截——据船长说是在距离七英里处。5月14日午夜（美国东部夏令时）后不久，飞机击沉三艘柬埔寨炮艇。那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各方克制使用武力。在晚上7点零7分，柬埔寨电台宣布将会释放商船。几分钟之后，美国海军袭击了唐岛（Tang Island），并登上附近被丢弃的船只。10点45分时，载有“马亚圭斯”号船员的一艘船靠近了美国“威尔逊”号（*Wilson*）驱逐舰。不久，美军飞机轰炸了柬埔寨内陆。在“威尔逊”号船长向白宫汇报说“马亚圭斯”号船员安然无恙之后的43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对平民目标的轰炸。激烈交战后，美国海军撤出。五角大楼宣称曾使用了15 000磅最大型号的炸弹。据五角大楼称，在此次行动中51名美国人丧生（50人受伤），柬埔寨人伤亡人数未知。

几天后，在新闻界较少关注的一次事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登上了一艘波兰拖网渔船“卡尔玛”号（*Kalmar*），迫使它在旧金山靠岸。这艘船据称在美国划定的12英里限制区的两英里范围内捕鱼。船员被武装的警卫队士兵扣押在船上，而法庭则在考虑惩罚办法，包括是否出售渔船及其货物。有很多类似的事件。1975年1月的某一周，报道称，厄瓜多尔在约100英里之外的海上截获了七艘美国金枪鱼捕鱼船，并处以巨额罚金。

在5月19日的一次访谈中，福特总统说，美国知道柬埔寨炮艇在“马

亚圭斯”号事件之前的几天，拦截了一艘来自巴拿马的船和一艘来自韩国的船，然后完好地释放了船只和船员。基辛格肯定地说：“美国已经通知保险公司，柬埔寨正在保卫其领海水域，但美国海上保险商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arine Underwriters）会长却无法验证这种‘预先警告’是否可靠。”

显然，“卡尔玛”号事件无法与“马亚圭斯”号事件相提并论。柬埔寨刚刚从一场美国应付直接责任的残酷战争中崛起。20年来，柬埔寨是美国破坏、骚扰、进行毁灭性空袭和直接入侵的受害方。柬埔寨宣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包括空中的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和破坏性活动”以及“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船闯入沿海水域。柬埔寨宣称，曾抓获过与间谍接触的泰国和柬埔寨国民，他们供认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论这些指控真假与否，毫无疑问的是，柬埔寨基于历史和当前行动，有充分的理由警惕美国的颠覆和干涉。相比之下，波兰对美国的安全或地区完整性没有造成任何威胁。

基辛格认为，美国决定动用武力去避免一场“有伤自尊的讨论”，但没有补充说明是，假如它察觉出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国家的最高法律也会迫使其局限于“有伤自尊的讨论”和其他和平手段。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责任，通知联合国安理会说，它在行使固有的反抗武装袭击的自卫权利，尽管就国际法而言，把柬埔寨的行动描述为针对美国的一次“武装袭击”显然是滑稽透顶的。

尽管官方拒绝承认，美国的军事行动在目的上显然是有惩罚性的。《华盛顿邮报》报道（5月17日）说，美国的消息人士们私下承认“他们满意地看到红色高棉政府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柬埔寨必须因其傲慢地抵抗美国的武装力量而受到惩罚。国内的反响表明，只要能成功（假设我们把损失41名水兵去救39名即将被释放的船员视为“成功”的话），非法使用暴力会继续受到大力的支持。肯尼迪参议员说：“总统坚决而成功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对民族精神的必要鼓舞，他值得我们真挚的支持。”²³⁷每个人的精神是否因在柬埔寨的另一次打击而获得提升也许令人怀疑。然而，这种来自极为关切越战对人类造成影响的参议员的反应却很重要且有启示性。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解释说，福特的政治胜利削弱了国会中反军事主义的力量。支持其结论的是，5月20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削减美国军队的海外任务。参议员多数派领导人托马斯·P.奥尼尔（Thomas P. O'Neill）放弃了当初支持削减军队海外任务的立场。

也有一些可敬的抗议之声。安东尼·刘易斯评论道：“在所有关乎原

则的高声探讨和正义之词中，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除了对付挫败我们的小个儿黄种人的废墟弱国，还能对谁如此行事。”

在主流自由派这边，约翰·奥斯本⁽²³⁸⁾在《新共和》杂志上斥责刘易斯，因为他没有从“马亚圭斯”号事件中看到“一些好处和所得”。奥斯本觉得总统行事“正确、合法、勇敢并出于局势的迫切性需要”。确实，有一些“瑕疵”，其中一个“可以避免的、令人不安和深感遗憾的”瑕疵便是使用B-52轰炸机的暂行计划。但在奥斯本看来，我们保住了颜面，计划被拒绝的“部分原因在于可预知的国内、国际反响，而部分原因在于猛烈轰炸肯定不会让‘马亚圭斯’号船员的命运变得更好，而是更糟”。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考虑：用B-52轰炸毫无抵抗力的柬埔寨也许会造成对柬埔寨人的又一场屠杀。但这种想法不会困扰这位严谨的人民领袖的头脑或良心，他严厉地谴责那些“吮吸拇指的新闻人”以错误的“方式和语调”提出问题，使“新闻业蒙羞”。

高层政府官员告诉新闻界，是亨利·基辛格“在最近有关截获的船只‘马亚圭斯’号的危机中倡导使用B-52轰炸柬埔寨内陆”。²³⁹谢天谢地，他被更有人性的人否决了，后者认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就足够实行惩罚了。

“马亚圭斯”号事件揭示出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基本要素：不合法、野蛮和愚蠢——但也不是彻底的愚蠢，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在国内成功地煽动了爱国主义情绪。事情的关键在于不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违反了这一原则：除了反抗武装袭击的真正自卫之外，不能因任何目的使用武力。不合法性这件事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这一事实：不合法性普遍从大众媒体、舆论刊物和（我们也许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学术界所讨论的“越战教训”中被排除了。

在意识形态机构（大众媒体、学校和大学）之内，有任何理由希望排除这些问题的任务都能被相当成功地执行。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地恢复早年间因循守旧、恭顺服从的状态，还尚需观察。

《邮报》社论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骨子里就是坏的”这种说法，它当然是对的。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所赞同的是，越战不仅仅是个错误。1965年，大学时事辩论会、示威、城镇论坛、广泛的游说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数量可观。到1967年为止，爆发了大量的群众示威、大规模的抵抗征兵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快，美国的政治领导者们就逐渐明白为何帝国主义国家在残酷的殖民

地战争中普遍依赖雇佣兵作战，因为征募的军队（值得赞扬的是）在战场上开始瓦解。到1971年为止，从民意测验判断，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越战是不道德的，要求美军撤离。因此，从负责任的社论观点和绝大多数政治评论员的角度来看，此时“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既非鸽派也非鹰派。

扭转过去年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败，并重建这一原则——美国有权使用武力和暴力来强行建立自认为合适的秩序，这已成为至关重要之事。一些宣传家愿意草草了事。于是，基辛格在其学术生涯中写出了有关一旦“不惩罚不妥协行为”的巨大风险。但还有更多微妙而有效的办法。毫无疑问，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建美国那有些破碎的作为大众恩人的形象。因此，就要强调我们的天真、我们的错误、我们早期想办好事的突发奇想、我们的道德主义和不在乎主导其他大国政策的物质利益。

在有关外交政策的争论中，这条原则未被淡然肯定时一定被迂回暗示了。想一想目前作为关键实例的讨论：是否应使用武力确保美国在中东对世界主要能源资源的控制，并因此维护我们控制和组织“自由世界”的能力。此时，有关这种干涉的争论就是知识分子的消遣活动。

但局势并不稳定。无人能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在负责任的观点的狭窄范围内，还存在就策略性问题发表异议的空间，这个策略性问题是：如何在中东或其他地方建立美国的霸权？有些人认为，武力是必要的保障，保障“美国的利益”。²⁴⁰还有些人断定，经济力量和正常的商业程序就足够了。然而，如果我们被迫要对抗“石油生产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侵略”，就我们的干涉权或将要导致这些举措的仁慈目的而言，并未提出什么严肃的问题。²⁴¹

那么我们就丝毫不惊奇地发现，在目前有关美国干涉阿拉伯半岛的争论中，各方普遍承认，美国在成功地建立其规则之后，会确保公平、公正地分配中东石油。很少有人质疑这一主张：美国将会或可能如此行事。但现在想一想这个心照不宣的假设的基础是什么。是来自历史记载的推论吗？也就是说，就其农业资源、原材料或工业设施生产的产品而言，我们过去能树立有关美国行为的这种信念吗？当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贸易时，它是否动用了自身能力确保其欧洲盟国（比如说）从中东石油低廉的生产成本中获益？这些问题几乎不值得讨论。

当然，也许可以这么说，本性因某种原因也会改变。⁽²⁴²⁾但我们倒可以设想，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也不可能行使其石油控制权来确保石油的公平、公正的分配。比如说，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国外援助上投入的

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比美国为其他工业国家的投入更多，而且把相当大比例的援助提供给了更穷困的国家。²⁴³因此，假如历史是个向导，也许我们应该鼓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攻占得克萨斯，而不是争论美国入侵中东的好处。事实上，整个讨论都表现出一种高级白痴病的危险症状。近来的争论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竟然能继续下去，无论潜在的前提是多么荒谬。

没有什么能更清楚地显示出，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仁慈信条是多么地执着，对这一推论性原则是多么地坚守：美国有权诉诸武力和暴力来维护“全球秩序”——只要我们能成功、（正如更敏感的人所补充的那样）只要我們不要做得太残暴。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全部记录可以用三个词表达：“不合法性”“野蛮”和“愚蠢”——就按这个顺序。从一开始，在政策制定的最高层面就被理解和直接确认的是，美国对南越和其他地区实施的“干涉”会无视任何阻止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法律障碍。鉴于南越当地人抵抗之英勇和顽强，美国被迫采取歼灭战摧毁获得支持的越南社会——用宣传家的话来说，是“被越共控制的社会”。美国在这个目标上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再也无法从废墟中建立一个附属政权。当华盛顿无法再召集B-52轰炸机时，这个腐朽的组织就从内部全部倒塌了。最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在东南亚、美国本土和全世界都遭到了破坏。面临对侵略的抵抗，不合法性导致了野蛮行为。回想起来，计划失败也许应部分归咎于愚蠢。

为国家暴力而道歉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诩为鸽派的人，自然会聚焦愚蠢，并宣称越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是一个从有意义的突发奇想转变为坏政策的实例，原因在于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和能力欠佳的顾问。愚蠢是政治上的一个中性范畴。假如美国的政策是愚蠢的（正如所有人一回想就能明白的那样），那么补救办法就是找到更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假定就是批评家。

一些反对越战的人对美国的野蛮袭击行为大为震惊。即使像伯纳德·法尔这样著名的鹰派人物都转而反对越南战争，他相信，在美国的反革命暴力模式下，越南不可能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整体幸存下来。的确，美国战争政策如同纳粹一般野蛮，这是它在南越和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战争最显著、最令人记忆深刻的特征。但野蛮性也是政治上的一个中性范畴。假如美国领导人施虐成性（肯定如此），（人们要讨论的）补救办法就是，找到以更人道的方式实施同样政策的人。

更尖锐之事是不合法性，特别是诉诸武力去维护“稳定的世界秩

序”，并主要是为了那些声称有权管理世界经济的人的利益。

假设思想控制的体系重新建立的信条是：我们在谴责对他人动用武力和恐怖时提出了正确但假想的原则，而美国一直不受这些原则的限制。那么，这就为帝国主义暴力和侵略的下一阶段奠定了一个基础。只要这些信条有影响力，人们就有任何理由预测，越南的悲剧会重新上演。

（本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144—164页。）

遏制敌人

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第1章，我提到了媒体组织的三种模式：（1）公司寡头垄断，（2）国家控制，以及（3）巴西的主教们倡导的民主传播政策。⁽²⁴⁴⁾第一种模式将媒体中的民主参与度降低为零，就像其他公司在原则上不受劳动力或社区（community）的公众控制一样。在国家控制媒体的情况中，民主参与度可能会有所不同，要取决于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有权主导国家的力量和无法偏离其设定边界的文化管理机构，使国家媒体普遍保持口径一致。第三种模式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未经尝试，只能像一种有大量民众参与的社会政治制度那样，对未来的关注在于：无论是希望或恐惧，都取决于每个人对公众决定自身事务权利的评价。

作为公司寡头垄断的媒体模式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天然制度。于是，这种模式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达到了最高形式，尤其在美国。美国的媒体集中程度⁽²⁴⁵⁾很高，公共广播和电视的范围比较有限，激进的民主模式要素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例如由听众支持的社区电台和类似媒体或当地媒体等，并常常对受益于这些形式的社区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以及赋权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²⁴⁶在这方面，美国代表了资本主义民主所趋向的形式，相关趋势包括：逐步取消干预私人权力的工会和其他大众组织；形成被日益操纵为公共关系运作手段的选举制度；避免采取福利措施，例如影响个人特权的国民健康保险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勒斯·万斯⁽²⁴⁷⁾和亨利·基辛格将美国描述为“民主模范”的说法是合理的，这里的民主被理解为对政治和其他主要机构进行商业控制的制度。

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通常在这些方面落后了几步。它们大多数尚未实现美国的一党制，⁽²⁴⁸⁾由企业部门轮流掌控两个派系。它们仍然保留着以工人和贫苦百姓为基础的党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一切都在衰落，与之同时衰落的还有支撑着不同价值观和关注点的文化体制，以及在私人权力所强加的框架之外为孤立的个体提供思考和行动方式的组织形式。

在资本主义民主中，这是事情发展的自然过程。按乔舒亚·科恩⁽²⁴⁹⁾和乔尔·罗杰斯⁽²⁵⁰⁾的说法就是“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²⁵¹前一种说法直截了当：对资源的控制过于集中，就会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可预见性的影响。需求约束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手段，其影响很少在正常运转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例如美国）被直接观察到，尽管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拉丁美洲，其政治制度有时会产生更广泛的政策选择，包括社会改革方案。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外逃、企业和投资者丧失信心、社会总体衰退，因为那些“拥有国家”的人失去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或者只是一场格外受维护秩序和良好形式的半球局势卫士支持的军事政变。对改革方案更加温和的反应，可以解释需求约束——这是一种要求就是：如果社会要运转，就必须满足把持有效权力的人的利益。

简而言之，一定确保那些掌控国家的人是幸福的，否则大家都会遭殃，因为那些人控制着投资，并决定着要生产和分配的东西以及要把什么好处涓滴（trickle down）给愿意受雇于掌权者的人。那么，相对于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最优先之事便是，必须确保住豪宅的居民心满意足。考虑到制度中可做的选择及其强化下的文化价值观，个人短期收益最大化似乎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还有顺从、服从和放弃公共领域。政治行动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一旦确定下来，无论随后遭受什么磨难，它们都会非常稳定——这是美国的规划者们早已明白的事实。

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决策权分配的结果大体上是，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尤其与控制私人经济的部门相互关联：他们要么直接来自这些部门，要么期待加入其中。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民主派人士认为，“由骑士和绅士为我们制定法律，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要管理我们却又压迫我们，全然不知人民的疾苦，这样做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的世界。我们不适合这么做，除非由像我们一样知道自己需求的乡下人组成的议会”。但议会和其倡导者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我们提到人民的时候，不是

指混杂不堪的人民主体。”民主派人士彻底被挫败，遗留下来的问题用平等派⁽²⁵²⁾小册子中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应该是谁的奴隶？”是国王的还是议会的？²⁵³

美国独立战争早期也出现过同样的争议。爱德华·康特里曼⁽²⁵⁴⁾提到：“国家宪法的制定者坚持认为，代表大会应该密切反映本国人民的意愿。”他们反对政治领导人脱离人民形成“独立阶层”。但联邦宪法保证的是，“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都会明白，他们自己就是例外”。在联邦制之下，普通百姓中的工匠、农民和其他人要求由“和他们一样的”人来代表。他们从革命经验中学到的是，他们“和任何人一样能够确定自己的生活出了什么错，并且能自我组织起来为此做点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革命的原创精神完全信任社区和合作”，在1786年谢斯起义⁽²⁵⁵⁾期间，“它最后的喘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在起义前的一两年间，乡村委员会的决议和讲话就是在重复各种人在1776年说的话。”他们的失败带来了惨痛的教训：“老办法再也行不通了”，而且“他们发觉自己要被迫向自称为人民公仆的统治者跪求原谅”。因此，情况向来如此。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人民代表并非来自工作场所，或者再回到那里；确切地说，他们来自迎合商业利益的律师事务所、行政套房和其他拥有特权的地方。²⁵⁶

谈到媒体，英国有一家内容活泼、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报纸受众颇多，直到1960年代才被市场运作淘汰。詹姆斯·柯伦⁽²⁵⁷⁾谈到，《每日先驱报》在1964年停办时，读者人数是《泰晤士报》的五倍，“几乎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和《卫报》读者总人数的两倍”。他引用调查研究想证明的是，《每日先驱报》的读者“也非常喜爱这些报纸”。这家日报部分归工会所有，读者大部分是劳动阶层，但柯伦继而却说：它“弄错了对象”。在同一时期停办的其他社会民主类报纸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了保持“优质报纸”的地位而动用广告和私人资本，被“剥夺了相同级别的补贴”。优质报纸“不仅反映了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和利益”，也“给他们带来力量、透明度和连贯性”，并且“在加强和更新权威性政治共识中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²⁵⁸

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媒体，柯伦总结说，“与广告相关的社论明显增加”，而且“社论和广告内容之间日趋相融”，这反映了“国家报纸的管理越来越适应广告商的选择性需求”，也普遍适应了商业社区的选择性需求；新闻报道和解说也有可能这样。柯伦继续说，对于整体社会而言，“仅有的几份拥有大量认真关注时事的读者的社会民主报纸消失

了”（包括一直对“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怀着相当激进态度的劳动阶级），这导致“拥有民众激进传统的战后英国逐渐地被侵蚀”，而“坚持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文化基础”也四分五裂，“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不再作为群众运动而出现”。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随着“新闻挑选和处理”以及“相对详尽的、每天有助于在劳动阶级中坚持社会民主文化的政治评论和分析”被去除了，对于“这个认为劳动阶级处于从属地位是自然而然且无可避免的世界”，不会再有什么清晰明了的表达方式，也无法继续表达这一观点：劳动阶级“在道义上有权获得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更大份额，并在其分配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样的趋势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自然会出现有利于控制国内“敌人领土”的过程。同样，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美国精英们的全球规划假设的是，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将普遍用于满足人们所说的“由美国提出的在全世界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的要求”。²⁵⁹全球政策的实施打着“遏制”的名号。国内的赞同之声就是全球政策在国内的对应物。这两种政策实际上是相互交叉的，因为必须动员国内民众为“遏制”付出代价。这些代价也许会很惨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道德上的。

“遏制”这一修辞技巧为全球性管理计划披上了一层防护衣，因而也是国内思想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这一术语能迂回地引出各种问题，它很容易就被采用了。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它隐藏甚多。²⁶⁰

潜在的假设就是，美国必须捍卫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的轮廓是由美国的规划者们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制定的。他们意识到美国权力的特殊范围，提议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会在其中蓬勃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会尽可能组成所谓的大区域（Grand Area）⁽²⁶¹⁾，从属于美国的经济需要。在大区域内，美国鼓励其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发展，但不能使用干涉美国特权的防卫装置，²⁶²尤其只有美国才会被允许控制区域系统。美国开始有效地控制世界能源生产，组建世界体系，其组成部分将履行各自作为工业中心、原材料市场和供应地或附庸国的功能，在美国管理的“总秩序框架”之内追求其“地区利益”（亨利·基辛格后来这样解释道）。

苏联一直被视为对这个既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理由很充分：一方面因为它是个超级大国，控制着无法被纳入大区域的帝国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它时而试图扩大其权力领域，比如在阿富汗，据称它也曾威胁

要入侵西欧（假如不是征服世界的话），这种可能性定期被更严肃的分析家在公开场合和内部文件中贬损。但如果我们希望苏联的罪行评估做出评价，就有必要了解“防御”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宽泛地解释的。因此，如果苏联支持那些反对美国构想的人，例如对其无私的美国捍卫者发动“内部侵略”的南越人（据肯尼迪自由派解释）、对美国组织的“民主抵抗”造成的破坏进行非法抗击的尼加拉瓜人，它就构成了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政治家和评论家清醒地看到，这些行动证明苏联领导人不关心局势缓和，难以被信任。因此，《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解释说：“尼加拉瓜将是检验这个乐观预测——戈尔巴乔夫现在正在降低第三世界的热度——的主要场地。”编辑们把美国袭击尼加拉瓜的污名放在苏联人身上，还警告说，要注意苏联这个前哨会“压制和恐吓”其邻国的危险。²⁶³从这一点来看，当美国不受苏联干涉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由行使其意志时，就会“打赢冷战”。

仅从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真正的全球霸权力量以来，“遏制苏联”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尽管如此，苏联仍被认为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对国际秩序构成了难以容忍的威胁。相应地，苏联便成为独立媒体的主要敌人。

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兹⁽²⁶⁴⁾就《纽约时报》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报道进行了批评性研究，说它“从新闻界的专业视角来看……简直是一场灾难”。编辑方针（editorial policy）满怀敌意，“深刻而愚不可及地影响着新闻专栏”。“出于种种主观原因”，《纽约时报》的员工“接受并相信”美国政府和“旧政权代理人及其附庸者告诉他们的大部分事情”。他们对苏联的和平提议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让布尔什维克能“集中精力为全世界进行革命”并为即将到来的“对欧洲的红色入侵……焕发新的动力”。李普曼和梅尔兹写道，布尔什维克被描述为“遍布全球的威胁”，红色危险“似乎到处在妨碍东欧和亚洲重获和平，并阻挠其恢复经济生活”。当威尔逊总统呼吁进行干预时，《纽约时报》做出回应，敦促我们把“布尔什维克赶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²⁶⁵

只消改变几个名字和日期，我们就能相当公平地评价国家媒体往昔对待印度支那以及今日对待中美洲的做法。当代的外交历史学家们重申了有关苏联的类似假设，认为发展另一种社会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干预他人事务的形式，西方完全有权通过强有力的报复行动来捍卫自己，包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通过军事干预苏联来捍卫自己。²⁶⁶在这些广受推崇和坚持的假设之下，侵略行为轻易地变成了自我防御。

回到“二战”后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当然没有必要去制造理由来反对苏联领导人控制其内部帝国及其附属国的残暴行径，他们同时愉悦地支持着像埃塞俄比亚军事集团和阿根廷新纳粹将领这样的现代恶魔。但可靠的调查会显示，主要的敌人是大区域内的原住民，他们深受错误思想的坑害。因此，有必要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战争，或恐怖和颠覆来消除这些偏差。国内民众必须团结起来致力于抵抗“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些是在国外实施的遏制政策的基本要素，也是与之对应的国内政策的基本要素。就苏联而言，这个概念多年来有两种变体形式。鸽派经调和之后接受了一种遏制形式，即由苏联大致控制红军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所占据的地区。鹰派的志向更大，其表现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0年4月第68号文件（NSC 68）所概述的“回退策略”（rollback strategy）。这份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被公之于众，遏制被解释为试图“培育苏联体制内毁灭性的种子”，并增加“和苏联（或一个或多个继承国）协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战后初期，借助像莱因哈德·盖伦⁽²⁶⁷⁾这样的人物的帮助，美国支持着乌克兰和东欧那些由希特勒组建的军队。盖伦领导着东线纳粹军事情报组织，在中央情报局的密切监管下被委任负责西德的间谍活动，任务是组建一个有上万名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秘密部队”以协助奋战在苏联内部的力量。这些事实远远超出常规的理解范围。一位在开明的《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学问渊博的外交事务专家因此谴责美国对红色高棉的暗中支持。他给出如下类比，并认为是莫大的谬误：“这就好像美国在1945年向纳粹使了个眼色，示意它向苏联发起游击战”——这就是美国一直到1950年代初的所作所为，并且不只是眨眼示意。²⁶⁸

如果这样想也十分自然：苏联应当被敌对国家包围，安之若素地面对将导弹置于警戒状态的北约主要军事基地（就像在土耳其那样）；如果尼加拉瓜拥有喷气式飞机保护其领空不受美军的定期入侵，鸽派和鹰派都会同样认为，根据“遏制”原则一定要确保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使我们免受这种严重的安全威胁。

在国外建立大区域原则、在国内制造必要的幻象，这无需等待市场的隐藏之手。自由国际主义必须定期被辅以强有力的干预。²⁶⁹在国内，国家经常动用武力压制异议，在隐性控制不足之时，企业便发动定期的、相当自觉的运动来控制“公众思想”并打压对私人权力的挑战。自“一战”以来，“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致力于该目标，期间也不断有例

外情况。早年间，美国还对抗过各种邪恶势力：匈牙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的加拿大人和《独立宣言》中提到的“残忍的印第安野人”。但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尤其在从“二战”余烬中涌现的两极世界霸权时期，更确信无疑的敌人是企图颠覆我们崇高事业的“庞大而残忍的阴谋”，用约翰·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罗纳德·里根提出的“邪恶帝国。”

在冷战初期的几年里，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茨⁽²⁷⁰⁾计划要“打击政府高层的群众心理”，艾奇逊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第68号文件（NSC 68）时也这么说过。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在一项战后规划研究中评论道，他们“勾画出共产主义威胁的可怕场景，以打消公众、企业和国会对于和平、低税率以及‘健全’财政政策的渴望”，并动员人们支持全面改良军备，他们觉得要“克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经济的脆弱性，就有必要这么做”。朝鲜战争令人钦佩地达到了这些目的。为了树立一个更有用的、征服世界的克里姆林宫战役的形象，那些引起战争的模糊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被忽略了。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说，在朝鲜的敌对战争中，“出现了一个绝佳时机，可以扰乱占极大比重且对公众舆论有一定影响力的苏联的和平攻势”。这些操纵性行为决定了随后大部分时期的结构，也为后来的做法提供了标准。²⁷¹

在早些年里，伍德罗·威尔逊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摧毁了工会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根据国家有权阻止不当思想及其表达的原则，打击独立政治和自由言论。威尔逊的克里尔委员会⁽²⁷²⁾致力于在反战民众中制造战争的狂热气氛，通过与忠诚的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合作显示出有组织的宣传的有效性。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专心于像“历史工程学”（historical engineering）这样的任务。这个术语是国家史学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y Service）创始人之一弗雷德里克·帕克森⁽²⁷³⁾发明的，该委员会由美国历史学家们创建，通过“对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打赢这场战争的种种问题进行解释”为国家效力。那些在其职位上能使用该术语的人吸收了这一经验。两个影响深远的体制性结果是：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其主要人物之一爱德华·伯尼斯⁽²⁷⁴⁾曾供职于战时宣传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创立。联邦调查局实际上是国家政治警察部门，这是它一直以来发挥的主要作用，例如它在1960年代破坏声势渐长的“民主危机”的罪行，以及20年后对民众反对美国干预中美洲的监视和破坏。²⁷⁵

国家—公司宣传体制的有效性体现在“五一”劳动节的命运上。这是

全世界工人的节日，源自人们对1886年5月干草市场事件⁽²⁷⁶⁾之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遭到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judicial murder）的反应。人们加入了一场与美国工人一起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国际团结运动。在美国，这一切已被忘记。“五一”已经变成“法律日”，是一次沙文主义庆典，庆祝罗纳德·里根于1984年指定5月1日为法律日时所宣称的“法律与自由之间长达200年的伙伴关系”。他还说，没有法律，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在前一天，他宣布，美国不会理睬国际审判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诉讼，该法庭后来还谴责美国政府在进攻尼加拉瓜时“非法使用武力”并违反条约。法律日也为里根的1985年5月1日宣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宣布对尼加拉瓜实施禁运，以“回应尼加拉瓜政府在中美洲的侵略活动所造成的紧急局势”，这实际上是在宣布此后每年都要更新“国家紧急状态”，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非比寻常的特殊威胁”——这一切都得到了国会、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赞同；或者在某些圈子里，出现了尴尬的沉默。

在大萧条时期，在威尔逊红色恐慌政策下出现的社会屈从于企业控制的现象开始减弱。193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董事会采用企业和政府文件内部记录中常见的马克思主义修辞话语，描述了“在人民群众刚刚实现的政治权力”中“工业家所面临的危险”；并警告说，“除非有人引领他们的思想，否则我们肯定在走向逆境”。劳工组织的兴起也带来很大的威胁，部分程度上得到了工业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但过多就会过度。据一份对1937年约翰斯敦（Johnstown）钢铁厂罢工事件的学术研究评论所说，企业很快会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威胁，借助“雇主动员公众”的手段来镇压罢工。商业界对这种“方案”欣喜不已，这正是“企业所希望、梦想和祈祷的”方案。在随后的几年中，宣传活动与铁腕方式结合在一起，被有效地用来压制劳工运动。参议院拉福莱特委员会⁽²⁷⁷⁾在对商业宣传的研究中提到，这些宣传活动花费上千万美元，“告诉公众一切正常，但在工会提出的补救措施中却潜藏着严重的危机”。²⁷⁸

在战后时期，公共关系运动愈演愈烈，开始利用媒体和其他手段来确定所谓的自由企业——受国家补助、不侵犯管理特权的私人利益——是否是受到危险的颠覆分子威胁的“美国方式”。1954年，时任《财富》杂志编辑丹尼尔·贝尔写道：

在战后岁月里，改变……大萧条所导致的舆论是产业界最

关心的问题。这场“自由企业”运动有两个根本的目标：重新赢回现在属于工会的工人的忠诚，并阻止悄然发展的社会主义蔓延。

这就是新政所实行的温和的改良资本主义。贝尔继续说，通过报纸、广播和其他途径做广告，企业公共关系运动的规模是“惊人的”。²⁷⁹从限制工会活动的立法、在麦卡锡主义误导下对独立思想的打击以及消除对商业统治提出任何明确的挑战中，人们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影响。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热情合作，大学尤其受到了清洗，并且情况一直如此，直到“民主的危机”到来之后学生和青年教师才开始提出各种错误的问题。这引起了新一轮（尽管不那么有效）的清洗行动，而通过进一步依赖“必要的幻象”，他们声称（现在依然声称），大学实际上已被左翼极权主义者所控制——这意味着正统教条的控制有了些许松动。²⁸⁰

早在1947年，一位国务院公共关系官员就说道，“精明的公共关系[已经]成功了，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会再次成功”。舆论“不是在朝右倾靠拢，而是已被——聪明地——转向右倾”。“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走向左倾、允许劳工进入政府并通过了自由主义的法律时，美国却进入了反社会变革、反经济变革和反劳工的阶段。”²⁸¹

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正遭受着类似的压力，因为杜鲁门政府反映的是商业界所关心的问题，它积极采取行动，通过极端暴力、控制紧缺食物、施加外交压力和其他多种手段来控制上述趋势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蔓延。²⁸²

人们对这一切所知甚少，但我也无法在此继续正确地描述。在整个现代时期，都使用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措施，以加强“自由市场”的固有压力，自由市场是国际体系中的干涉行为在国内的对应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自由贸易政策，人们讨论了这么多，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一直保持竞争力的两大部分——高科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却都严重依赖国家补贴和受国家保障的市场。²⁸³与在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美国经济早年是靠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起来的。在战后时期，美国高调宣布了自由主义原则，其假设是，美国投资者在任何竞争中都占有优势。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这是个貌似合理的希望，并且多年以来已被实现。出于类似的原因，英国在其称霸期间也一直热衷于提倡自由贸易，当无法承受来自日本的竞争时，便摒弃了自由主义原则和战争期间围绕这些原则所说的高尚言辞。面对类似的挑战，美国如今走的是同

一条路，这些挑战在40年前甚至直到越南战争时期都未被预想过。这条路带来的意外代价削弱了美国经济，却增强了其工业对手的实力，他们通过参与破坏印度支那发达了起来。韩国的经济腾飞归功于这些机遇，这些机遇也为日本经济带来了重要刺激，就像朝鲜战争促成日本的经济复苏并对欧洲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样。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在越南战争期间，加拿大成为世界上人均战争物资出口最大的国家，但它一面谴责美国发动战争的不道德之处，一面又热情地参与了进去。

在国内实施思想控制通常紧跟在战争和其他危机之后。这种动荡助长了特权精英阶层一直以来畏惧的“民主危机”，必须采取措施扭转对现有权力造成威胁的大众民主的推进。“一战”后，威尔逊采用红色恐慌政策达到了这一目的，该模式在“二战”结束时又被重新上演。当下之需，不仅要克服在大萧条期间发生的全民动员运动，而且正如1947年杜鲁门主义被公布时其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所说的那样，要“使人们意识到战争绝不会结束”。公布杜鲁门主义就是“打响了[这场]战役的第一枪”。

越南战争和1960年代的民众运动引起了类似的担忧。必须控制和镇压位于“敌人领土”上的国内居民，通过减少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削弱工人阶级组织，使美国公司在更多样化的世界市场上恢复竞争能力。尤其要让年轻人必须相信，在一种“自恋文化”中，他们只需要关心自己；每个人私底下都会明白，这些假设对他们来说是不真实的，但在人生的某段时期，当人们对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不安全感时，适应宣传体系所鼓吹的规范就变得十分诱人。新近被动员起来的其他“特殊利益”组织也必须被限制或消除，这些任务有时需要一种力度，就像联邦调查局的各种计划一样，他们通过煽动暴力或直接行使暴力以及恐吓和骚扰等其他方式来破坏民族主义运动和崛起的持异见的文化形式。另一项任务是克服可怕的“越南综合征”，该综合征妨碍了诉诸武力来控制附属国；

《评论》（*Commentary*）杂志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解释说，这项任务是要克服“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病态压抑”，这种压抑源自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厌恶情绪。²⁸⁴他希望这一问题在对格林纳达的光荣征服中得以解决。当时，拥有6 000人的精锐部队成功地击败了几十名古巴人和一些格林纳达民兵的抵抗，他们因英勇赢得了8 000枚荣誉勋章。

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就有必要把美国说成是受害方，把越南人说成是侵略者。不熟悉公众思想控制措施或不熟悉那些至少在公众思想中

有价值的要素的人也许会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了越战的后期阶段，民众已经失控。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根本就是错的、不道德的”，而不只是一次“失误”。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却没有提出严肃的问题。与那些如今宣布自己是“越战的早期反对者”的人怀有的回顾性必然幻象相反的是，这些圈中人在现实中除了关心胜利的前景和上涨的费用，只是偶尔反对越战。即使连最严厉的主流评论家也不过为误入歧途的美好意图伤脑筋而已，在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确信这项事业花费相当昂贵并应当被清算之后，这些评论家甚至达到了持异议的那个高度。我在别处也引证过这一事实。

在种种机制下产生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历史版本。这些机制在其他地方也受到评论，²⁸⁵但只有几句有关其显著成就的话是有理有据的。到1977年为止，卡特总统已然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美国人没有必要“道歉、自我谴责或承担罪责”，也没有“亏欠别人”，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捍卫南越人民的自由”（通过摧毁他们的国家和屠杀民众），并且“破坏是相互的”。据我所知，人们对这个声明不置一词，显然该声明被视为是相当有道理的。²⁸⁶顺便说一下，这些不偏不倚的评判不只来自深情的人权拥护者，它们定期被提起，且不会引起任何评论。以最近的一件事为例。当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Vincennes*）在伊朗领海上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之后，杜克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学家杰瑞·霍夫（Jerry Hough）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开辟了专栏。他解释说：

如果这次伊朗客机的坠落灾难能使这个国家摆脱对象征性核武器控制的痴迷，并专注于军队的作战、指挥—控制问题和对常规武器（当然也包括舰队）的限制，那么，这290个人就不会平白死去。

这种评价与KAL 007号⁽²⁸⁷⁾坠落后媒体的猛烈抨击略有不同。几个月后，“文森尼斯”号回到母港，“人们挥舞旗帜热烈欢迎……以气球和海军乐队演奏欢快的歌曲而告终”，而船上的“扬声器高声播放着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的主题曲，附近的海军舰船鸣炮致敬”。一位公共事务官员说，海军军官们不想让“文森尼斯”号“溜进港口”。²⁸⁸关于290个伊朗人，就只有这些内容。

《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拐弯抹角地表达了对卡特总统那段有趣的道德判断的反对。在“拖延的印度支那债务”这一标题下，当提到“很多人

在飞行中经历过来自共产主义的恐怖行径”时，编辑们评论说，“我们不能任由谁欠谁多少的争论掩盖我们卷入东南亚时感到的最恶劣的恐惧”。当时，几百万人中有少部分人逃离了他们在亚洲的家园，其中包括1977年来自菲律宾的十多万船民⁽²⁸⁹⁾，还有上万人逃离了在美国支持下实施恐怖的帝汶岛，更不要说还有几十多万人逃离了美国支持下的拉丁美洲的恐怖国家。如果是这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这种关注，或者不过是新闻栏目中的粗略通告。²⁹⁰在对印度支那的破坏中，没有提到其他恐怖行为，当然也不会有拖延的债务。

几年以后，关注点又升级了，用《纽约时报》头条新闻的标题来说就是，“印度支那的债务正在造成财政外流”，这指的是我们“干涉印度支那并支持战败方”而带来的“道德债务”。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苏联人打赢阿富汗战争，他们就不会欠债。但据一位国务院官员说，我们的债务现在已经“还清”了。我们接纳了从被我们蹂躏的国家逃离的越南难民，已经结清了道德债务，据美国难民委员会主任罗杰·温特（Roger Winter）说，这是“历史上最大、最激动人心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但《纽约时报》外交记者伯纳德·格特茨曼（Bernard Gwertzman）补充说，“除了这份自豪感，里根政府和国会里的一些人会再次询问战争债务现在是否已经偿清。”²⁹¹

在有责任感的圈子中，超乎其想象的是：我们也许要为大屠杀和破坏负责，对千百万伤残人士和孤儿有所亏欠，或者对还会死于美军袭击留下的爆炸性武器的农民有所亏欠，但被问及是否有办法清除几十万枚炸死儿童的杀伤性小炸弹时（像在老挝石缸平原那样的地区），五角大楼给出了有益的说法：“人们知道这个问题，就不应该住在这些地区。”美国甚至拒绝把印度支那的地雷分布图提供给民间排雷小分队。1989年，前海军陆战队前往越南协助清除他们曾埋设的地雷，据他们说，许多地雷还留在这些地区，人们还要在那里耕作、种树。他们得知，到1989年1月还有许多人被炸伤或炸死。²⁹²这一切都没有引起评论或关注。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阿富汗，情况自然大不相同。顺便说一下，被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政权已经公布了地雷分布图。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头条就变成“苏联给阿富汗人留下了致命遗产”“地雷令政权回归后的阿富汗人身陷危险”“美国就阿富汗清雷问题指责苏联”“美国协助训练难民拆除阿富汗地雷”“苏军撤离后遗留地雷致残阿富汗人”等。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都是苏联留下的地雷，所以美国自然要呼吁“通过国际行动给难民提供训

练和设备，让他们摧毁或拆除”那些地雷，并谴责苏联人在这次有价值的行动中缺乏合作精神。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Richard Williamson）悲观地说：“苏联不会承认自己所造成的问题或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很失望”。新闻界也以其惯常的、有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热情地进行回应。²⁹³

媒体对抹杀一切主要战争罪行的“相互破坏”这一说法并不满意。更准确地说，必须把罪行转移到受害者身上。在“试图变得更友善的越南仍然任重道远”的新闻标题下，《纽约时报》亚洲通讯员巴巴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sette）引用了来自国际人权倡导者协会的查尔斯·普林茨（Charles Printz）所说的话，他说：“是需要越南人表现出某种善意的时候了。”普林茨指的是关于美亚混血儿童的谈判，这些儿童是美国对印度支那侵略战争中很少的一部分受害者。克罗赛特补充说，在美军遗骸问题上，越南人一直也不太乐意帮忙，尽管他们的做法也许在改进：“寻找失踪的美国人已经取得了进展，尽管进展缓慢。”但越南人没有还清我们的人情债，因此越战所遗留的人道主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²⁹⁴

回到同样的问题，克罗赛特也解释说，越南人并不理解的是，除了尚未解决的道德问题，他们与美国人“毫无关联”——具体地说，这个道德问题就是越南人“在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人失踪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克罗赛特不考虑越南人对美国不愿改善两国关系所表示的“遗憾”，只引用了一位“亚洲官员”的话说，“如果河内领导人当真要建设自己的国家，越南人也必须公平地对待美国”。她还引用了五角大楼的声明，该声明希望河内能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即被邪恶的北越共产分子枪杀的美军遗骸问题。当我们想到一场导致印度支那千百万人死亡和受伤、三个国家化为废墟的战争所留下的一切时，显然只想到了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另一份报告谴责越南人拒绝在“关键的人道主义领域”进行合作，并引用自由派议员的话谈论河内的“恐怖和残忍”行为以及河内应为其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毫无进展而负责，这些问题指的是“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军问题。河内的顽固态度给忍受苦难的美国人“带来了越南仍能唤起的痛苦回忆”。²⁹⁵

历史学家（和越战退伍老兵）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引用的一些统计数据说明了对“解决这个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即在行动中失踪的美军（MIAs）⁽²⁹⁶⁾问题表示关切的本质所在：

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仍有2万名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而越南人公布的名单显示有20多万名在行动中失踪的越南

士兵。此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8万名、在朝鲜战争中有8 000名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分别占在这些冲突中确认死亡人数的20%和15%；在越南战争中所占的比例是4%。²⁹⁷

安德森说，就像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样，法国已经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他补充道：“当然，我们在1945年赢得了胜利，所以似乎只有在美国战败时，寻找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才是重要的。对于[里根]政府来说，真正的‘崇高事业’不是之前的战争，而是要找回‘所有可找回的遗体’这一情绪化且不可能实现的征讨。”更确切地说，这一“崇高的事业”要利用个人悲剧来满足的政治目的是：克服国内的越南综合征并“让越南流血”。

颇有影响力的民主党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写道：“在越战结束近15年之后，东南亚仍然是美国在人道主义、战略和经济上重点关注的地区。”人道主义关切包括两种情况：（1）“近2 400名美国士兵在印度支那下落不明”；（2）“在波尔布特（Pol Pot）残忍的红色高棉政权统治之下，有100多万柬埔寨人死亡”。尚未达到如此众多人数的还有许多印度支那人，他们在华盛顿的残酷攻击下死亡，现在还有人在死去。汉密尔顿继续说道，尽管不放弃我们的人道主义关注，我们也应该“重新评估我们与越南的关系”，并寻求一种“新的关系”，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制定政策的时机，将持续的压力与对寻找失踪美国军人所取得的进展和对柬埔寨外交让步进行的奖赏合为一体”。在政治光谱的左翼自由派那一边，在一本作为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项目的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期刊上，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呼吁与越南和解，敦促我们抛开“越南经验的痛苦”和“过去的伤害”，克服越南人给我们造成的“仇恨、愤怒和沮丧”，尽管我们不能忘记“越战遗留下来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行动中失踪的士兵，就是那些有资格回到美国的士兵及其留在感化营⁽²⁹⁸⁾里的战友。人道主义动力为这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提供了深厚的指引，连右翼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现在也呼吁政府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据《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大卫·格林威（David Greenway）说，麦凯恩自称对越南人“没有仇恨”，虽然他是一名前海军飞行员，曾“很不情愿地在河内希尔顿⁽²⁹⁹⁾做客达五年半之久”。格林威继续说道：“如果麦凯恩能放下他的怨恨，那么我们所有人也能做到。”³⁰⁰格林威熟知越南，他曾作为战地记者编写过有关越南的详尽资料。但在普遍的道德气氛下，他所面对的受过教育的群体会认为如此敦促不足为奇：不管越南人对我们

做过什么，我们都应该克服由此自然产生的对他们的怨恨。

弗朗西斯·詹宁斯⁽³⁰¹⁾评论说：“在历史上，那些穿着滚边衬衫和金色蕾丝马甲的人总是以某种方式腾空凌驾于血泊之上，他们命令满手污秽的手下去制造血案。”³⁰²

这些例子证明了制造必要幻象的制度所具备的力量，至少在受教育的精英群体中是这样。这些精英是宣传的主要目标，也是其消息传播者。灌输机制可以把美国描述为越南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人们也许很难设想在灌输机制范围之外能取得什么进展，同时也很难对美国过度的自我鞭挞进行思考。

不屈从于同样的影响和要求的新闻记者看到的景象会略有不同。在一家以色列畅销日报上，阿姆农·卡佩柳克⁽³⁰³⁾就其1988年的越南之行发表了一系列令人深思并充满同情心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成千上万越南人还在死于美国化学战的影响”。据他讲述，在南越大约有25万名受害者，还不包括数千名死于未爆炸武器的人——自1975年以来，在岷港地区（Danang）就有3 700人死亡。卡佩柳克描述了南部医院里的“可怕”场景，那里的儿童死于癌症或可怕的先天畸形；他说，化学战当然针对的是南越，而不是北越，在北越没有发现这些后果。越南的医生们担心，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改善的希望很渺茫，因为在这个“失去亲人的国家”，这些影响在满目疮痍的南部地区徘徊不散，成百万人死去，留下数百万名孤儿寡母，在那里听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在艾希曼⁽³⁰⁴⁾和德米扬鲁克⁽³⁰⁵⁾受审期间听到的”受害者讲述，他们显然“没有对美国人心怀仇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做恶之人不会被审判，反而因其在西方文明世界的罪行而获得了荣誉。³⁰⁶

同样，一些人也关注了化学战的影响。在越南，更多的是在老挝和柬埔寨，美军在相当于马萨诸塞州面积大的区域内喷洒了数百万加仑的橙剂⁽³⁰⁷⁾和其他有毒化学物。任教于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格雷斯·齐姆（Grace Ziem）博士是化学物质接触暴露和疾病方面的专家。在越南（1960年代她曾在越南当过医生）的两周行程结束之后，她谈起了这一话题。她还描述了到访南部医院的情形，她在那里发现透明密封容器里装着可怕的畸形婴儿，还有许多患者来自曾被大量喷洒落叶剂的地区，妇女们长了相当罕见的恶性肿瘤，畸形儿童的比例远远超出正常情况。但她的描述和主流说法大相径庭。一旦被报道出来，主流故事的人物和焦点就会完全不同。因此，在一篇有关日本人如何试图掩盖其“二战”罪行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一位日本辩护者提到美国军队用直升机喷洒毒

药；记者解释说，“据推测”，他指的就是“橙剂，这是一种被怀疑导致了越南人和美国士兵子女先天缺陷的落叶剂”。在这种背景下，再也无人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读到“化学公司给橙剂受害者补偿了1.8亿美元”——补偿的是美国士兵，不是受害更深的越南平民。不知何故，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像1998年人们对据称利比亚要发展化学武器的计划所爆发的那种愤怒情绪。³⁰⁸

在卡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以及里根政府当政的几年间，当提出的政策经两党达成共识之后被实施和扩展时，精英中的右翼倾向开始在政治上显现。但正如里根的国家管理者所发现的那样，“越南综合征”很难对付；因为受国内敌人所迫政府转入了地下活动，秘密行动因此逐渐大量地增加。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人们必须要面对里根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military Keynesian policy）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巨额的预算、贸易赤字和外债。因此可以被预见且已被预见到的是，“邪恶帝国”将变得不再有威胁力，国际恐怖主义的祸患也会平息，与其说是因为世界与以前大不相同，不如说是因为国家管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数年之后，结果显而易见。对那些过去一直抱怨野蛮的苏联人及其奴仆犯下根深蒂固的罪恶的思想家来说，如今也必须要采取政客方式，还有高级会议和武器谈判。但根本的长期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加以解决。

在美国实行全球霸权的这段时期，先撇开高尚的言辞不说，如果美国精英们的幸福受到秘密文件中所说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威胁，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民族主义政权”响应了“改善群众低生活水平”、为国内需求进行生产以及寻求控制自身资源的民众要求。高层规划文件解释道，为了对抗这些威胁，美国必须鼓励形成“有利于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包括“赚钱的机会和外资将合理收益汇回本国的机会”。³⁰⁹文件坦白地解释说，这种手段最终必然是武力，因为这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获得很多民众的支持，并不断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的威胁。

在第三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原材料受到保护”（乔治·凯南这么说），并鼓励出口导向型生产，保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框架——至少就其能满足美国投资者的需要而言。在国际上，和在国内一样，如果自由市场的产出符合国内权力和特权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 needs），那么自由市场便是值得颂扬的理想；如果不是这样，必须有效地使用国家权力去指导自由市场。

如果媒体和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群体要普遍服务于“社会意图”，那么上述事情必须被排除在外，而且要远离公众意识，文件记录和不断发展的历史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必须被放在满是灰尘的档案里或边缘出版物中。我们在反思时也许会提起错误、误解、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夸大、对国家安全的错误评估、个人失败，甚至是误入歧途的领导者的腐败和欺诈；但除了边缘研究或相对模糊的学术文献以外，必须要谨慎地忽略对体制及其运作的研究。目前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实现了这些结果。

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情况也大抵如此。例如，哥斯达黎加就正当地视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模范。新闻界被牢牢地掌握在极右分子手中，所以无需担心哥斯达黎加的新闻自由，人们无法表达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果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由控制“共产主义”的法律措施所支持的自由市场来实现，并且似乎是通过1960年代北美资本的涌入来实现的。

在一些地方，使用这种手段不足以实施已被批准的民主和新闻自由范本，随时可以使用其他显然被认为正确而合适的手段，只要它们能成功。在过去10年中，萨尔瓦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在1970年代，“民众组织”遍地开花，许多都得到了教会的赞助，包括农民协会、自助团体、工会等。随之而来的反应是爆发了由美国组织的、残忍的国家恐怖，还得到了美国两党和大部分媒体的支持。在为了国内大后方的利益而进行的“示范性选举”（demonstration elections）结束后，多余的疑虑消失了。³¹⁰但当确定民众深受创伤时，并且当有人担心关于酷刑、谋杀、残害和失踪的报道可能会危及对仍然被认为是必要的、较低程度上的国家恐怖的资助和支持时，里根政府便下令减少愈加明目张胆的暴行。

在萨尔瓦多，有一家独立的新闻媒体，拥有两个小报纸：《人民纪事报》（*La Crónica del Pueblo*，以下简称《纪事报》）和《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两家报社在1980—1981年被安全部队摧毁。一连串爆炸之后，《纪事报》的一名编辑和一名摄影师从圣萨尔瓦多的一家咖啡店里被带走，并被弯刀砍成了碎片；办公室被暗杀小组突袭、轰炸并烧毁，报社出版人逃往美国。《独立报》出版人豪尔赫·平托（Jorge Pinto）在报社遭军队袭击、设备被毁后逃往墨西哥。美国国内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如此之高，《纽约时报》的新闻专栏对此只字未提，没有就这两家报纸被摧毁发表任何评论，此后这些年也毫无只言片语，尽管平托被允许在“观点”页发表声明谴责“杜阿尔特集团”⁽³¹¹⁾已经“成功地扑灭

了所有异议的表达”，并表示他相信，所谓的暗杀小组“完全就是军队自己”——这也是教会和国际人权监督员所认可的结论。

在《独立报》最后被摧毁的前一年，办公室已被炸弹袭击了两次，一位男职员在工厂被机枪扫射时遇害。平托的车也被机枪扫射，他还有两次差点遇害。在报社被彻底摧毁的前两天，陆军部队开着坦克和装甲车，到办公室搜捕他。这些事没人提起过。在《纪事报》被最后摧毁前不久，报社在六个月内被炸了四次；其中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在《纽约时报》上只有40个词的报道。³¹²

这并不是说，美国媒体不关心中美洲的新闻自由。与对萨尔瓦多这两家报纸保持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是尼加拉瓜反对派报纸《新闻报》（*La Prensa*）。媒体评论家弗朗西斯科·戈德曼（Francisco Goldman）注意到《纽约时报》在四年中有263次提到这家报纸所经历的磨难。³¹³这种区分标准是一清二楚的：萨尔瓦多的报纸是被美国附庸国的残酷暴力所平息的独立声音；而《新闻报》是美国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行动工具，因此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害者”，对它进行干扰会让人们感到痛苦和愤懑。我们回到进一步的证据上，就会发觉这的确是个操作标准。

在报社被摧毁的前几个月，《纪事报》出版人豪尔赫·纳波莱昂·冈萨雷斯（Jorge Napoleón Gonzales）博士来到纽约，恳请施加国际压力，“阻止恐怖分子毁坏他的报纸”。《纽约时报》公正地评论说，他以来自右翼的威胁言论以及“[他的报纸]所说的政府的镇压行为”为证。他说，他受到暗杀小组的威胁，这个暗杀小组“毫无疑问受到军方的支持”。他在家中发现了两枚炸弹，报社办公室被机关枪扫射之后燃起大火，他的家被士兵包围。他说，当报纸“开始要求进行土地所有权改革”激怒了“统治阶级”时，种种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没有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安全部队完成了“分内之事”。³¹⁴

同样在这些年间，萨尔瓦多的教会电台被多次轰炸，部队占领了大主教管区内的建筑，捣毁了电台并洗劫了报社办公室。媒体同样对此毫无反应。

这些事情并未出现在对萨尔瓦多1982和1984年举行的“自由选举”的热情报道中。后来，我们定期从《纽约时报》驻中美洲通讯员詹姆斯·勒莫恩（James LeMoyne）那里得知，萨尔瓦多比其敌人尼加拉瓜享有更大的自由，尼加拉瓜远未发生堪比萨尔瓦多那样的暴行，其反对派领袖和媒体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并公开支持美国政府袭击尼加拉瓜，他们抱

怨受到了干扰，但并未发生恐怖和暗杀。《纽约时报》驻中美洲通讯员不会报道说，从萨尔瓦多出逃的教会领导人（包括被暗杀的罗梅罗 [Romero] 大主教的好友）、著名的萨尔瓦多作家、其他无需想象就是政治活动家的人以及《纽约时报》通讯员们熟知的人，因害怕被暗杀，都无法重返他们曾赞美和拥护的暗杀小组民主国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呼吁里根政府“代表尼加拉瓜的和平与多元主义向 [其政府] 施压”。尼加拉瓜政府的“可怕的记录”是“袭击那些敢于行使……自由言论的人”，而且尼加拉瓜从来没有什么“自由竞争的选举”。³¹⁵这些谴责不适用于萨尔瓦多。

通过这些方式，“自由的新闻界”努力向人们灌输了有必要遏制国内敌人的幻象。

（本文最早出现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9]，第21—43页。）

- (1) 德怀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美国作家、批评家，冷战期间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
- (2) *Politics*，亦译为《政治》，是1944年由德怀特·麦克唐纳本人创办的独立杂志，支持无政府和平主义，1949年停刊。
- (3) 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 (4) 凡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早期殖民主义者，曾三次远航至印度。
- (5) “truth”一词有真实、真理、真相、事实等意，海德格尔此处应指“真理”，而乔姆斯基更多地指“真相”之意。
- (6) 亚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1919—2007)，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之子，人称“小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1966—1995年任纽约城市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 (7) 此处指《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一书。
- 8 目前已经开展了这种研究项目，并以“公民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见F. Schurmann, P. D. Scott, and R. Zelnik, *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Boston: Beacon, 1966。关于美国在1965年2月局势大升级之前拒绝联合国倡议外交解决的进一步证据，见Mario Rossi, “The US Rebuff to U Tha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7, 1966。也可参见Theodore Draper, “How Not to Negoti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4, 1967。在道

格拉斯·派克著《越共》（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一书中，有更多的文献证据表明，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建立联合政府，使该地区保持中立，但其努力被美国和其西贡同盟拒绝。我们在阅读后一种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把所陈述的事实和所断定的结论区分开来，个中缘由会在随后简述（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 [Haganah] 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有些人捍卫我们征服越南和建立由我方选出的政府的权利，看看他们对《越南政治局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一书所发表的最早的、有点拐弯抹角的反应，会十分有趣。例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11月11日）认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的主题暗示出我们的领导人是“恶魔”。既然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相信是这样，该观点就被驳倒了。反过来设想（即认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恶魔”）又会显得“不负责任”（就该词的独特含义而言——这个词的含义讽刺性地与本文的题目相反）。斯卡拉皮诺继而指出，此书论述中所谓的主要薄弱之处在于，作者未能体察到我方认真寻求外交解决可能性的尝试，这一失误可能会被我们的对手视为弱点。

- (10) New Frontiersmen，源自New Frontier，即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施政纲领。它分为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肯尼迪要求美国人民准备做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此处的New Frontiersmen指支持或实践新边疆政策的人，即新拓荒者。

9 《纽约时报》，1965年10月14日。

11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 (12) 查尔默斯·罗伯特 (Chalmers Robert, 1910—2005), 时任《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记者。
- (15) 华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1916—2003), 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 1966—1969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 13 *Boston Globe*, November 19, 1965.
- 14 在其他时候, 施莱辛格的确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者式谨慎。例如, 他在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一书所写的序中承认, 河内方面也许“对谈判抱有零星兴趣”。至于政府有关谈判的谎言和其反复影响试探性谈判协议的行动, 他只是评论说, 该书的几位作者可能低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必须把这种警惕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与施莱辛格对重新研究冷战起源的态度比较一下: 在致《纽约书评》(1966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中, 他说道, 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证明, 冷战可能不只是共产主义好战的结果, 是时候对他们“吹响警哨”了。我们因而认为, 无需讨论关于冷战起源这种相对直接的问题, 更复杂的问题是为何回避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 这应当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去思考。
- 需要牢记的是: 美国政府在解释其不考虑通过谈判有意义地解决问题时, 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正如大家欣然承认的那样, 这种解决方式可能让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例子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 1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121.
- 17 Walt W. Rostow, *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149. 还可参见其著作《世界舞台上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第144页: “斯大林利用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衰弱形势, 为力保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 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扩张基地中抽身出来……转向东方, 支持毛 (泽东), 煽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
- (18) 引文出处如此, 此处或指伊朗北部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朗阿塞拜疆地区, 后文同。
- (20) 吴庭艳 (1901—1963), 1955—1963年任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 19 例如, 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乔治·卡佛 (George Carver) 的文章《不露面的越共》(“The Faceless Viet Cong,” in *Foreign Affairs* 44 [April 1966]), 第317—372页。还可参见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 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 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 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 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 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 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 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 [Haganah] 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 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 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 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

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21 参见Jean Lacouture, *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21。当时的西方观察家也认同吴庭艳对局势的这一分析。例如，见外交关系委员会远东问题专家和主管威廉·亨德森（William Henderson）在林道赫姆（R. W. Lindholm）所编《越南：第一个五年》（*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中的评论。他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疏离”“南部武装异见者的复兴”以及“在过去两年间，安全情况明显恶化”的事实都是吴庭艳“严酷专制”的结果，他还预测到“自由越南的政治环境在持续恶化，最终会形成难以预见的灾难”。

(24) 1952年3月10日，苏联政府就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对德和约的原则草案，敦促西方三国加速缔结对德和约的工作。

22 见Bernard Fall, “Vietnam in the Balance,” *Foreign Affairs* 45 (October 1966), 1-18。

23 斯大林既不愿看到希腊共产党内的铁托主义倾向，也不愿意看到巴尔干联邦在铁托分子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可能性。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希腊游击队反抗的某个阶段，斯大林支持过他们，尽管很难找到确凿的文献记载证据。不消说，无需详尽的研究就能证明英美自1944年末在此次内战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更多有关从强烈的反共视角对这些事件进行的严肃研究，见D. G. Kousoulas, *The Price of Freedom*,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3和*Revolution and Defea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5 详细记录见James Warburg, *Germany: Key to Pe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89。因为沃伯格（Warburg）断定，显然“克里姆林宫正准备按‘全德民主’一词的西方含义，去接受这种民主的创立”，西方列强在回应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们计划‘确保德国加入一个纯防御性的欧洲共同体’”（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6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344-345。顺带提及的是，那些正义谴责残忍地镇压东德和匈牙利革命的人也许恰好记得，如果美国愿意考虑中欧中立的提议，

这些丑闻事件或许能够避免。乔治·凯南近来的一些声明为该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解读。例如，有人假设说，苏联试图攻击或以武力威胁欧洲大陆的西部地区，而美军阻止了这一企图，凯南从一开始就评论说这种假设是虚假的；他还评论说，要求苏联单方面撤出东德，并“把德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主要以核武器为基础的西方防御体系之中”，这是极其荒谬且毫无结果的（Edward Reed, ed., *Peace on Earth*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5] ）。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托评论中所显示的这种历史幻想，已成为美国国务院规律性的特征。因此，才会有托马斯·曼把我们对多米尼加的干涉辩解为对“中苏军事集团”行动的正当反应。或者以更深思熟虑的声明为例，比如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于1966年2月12日在波莫纳（Pomona）学院的演讲中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分析。他把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的苏联说成处于“非常军事化和侵略化的阶段”。与彻底的捏造所不同的是，这种幻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是诚挚的，实际上也可能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 (27) 指1946年的伊朗危机，也称阿塞拜疆危机。“二战”后盟军在伊朗的驻军陆续按协议撤出，但苏联仍借故拖延撤军，并在伊朗北部支持阿塞拜疆人与库尔德人势力，同时就石油问题向伊朗施压。在英美支持下，伊朗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后者也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撤军。
- (28) 1951年，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当选伊朗总理后，奉行民族主义政策，提出国有化石油产业，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1953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操纵下，伊朗发生政变，摩萨台政府被推翻。
- (30)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1921—2016），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专家。2005年，因在博弈论领域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32)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国政治家、学者，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 29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 31 《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第89页。
- (33) A. A.伯利（Adolf A. Berle, 1895—1971），律师、教育家、作家、外交家，美国总统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1945—1946年任美国驻巴西大使。
- (35) 指前面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态度。
- 34 《纽约书评》，1966年11月20日。这些评论令人想起特别的一幕：肯尼迪总统劝告英属圭亚那首席部长切迪·贾根（Cheddi Jagan）说，要警惕建立一种“使国家处于经济依赖下”的贸易关系的危险。当然，此处指的是与苏联建立商务关系的危险。见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776。
- (37) 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 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独裁者，1961年5月30日遇刺身亡。

- 36 *A Thousand Days*, 252.
- 38 *A Thousand Days*, 769.
- 39 尽管这一点也并不准确。我们必须记住特鲁希略政权的真正特点，才能意识到肯尼迪这番“现实性”分析中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态度。
- 40 Walter Rostow and R. W.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5.
- (41) 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1920—2009)，美国学者、专栏作家、出版人，因其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被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
- (42) 《文汇》 (*Encounter*) 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美文化圈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刊物之一，赢得了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青睐，后被曝曾长期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而陷入丑闻，1991年停办。
- (43) 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美国作家、新闻评论家，其著作《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 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 (44) 起源于1965年密歇根大学教师组织的反越战宣讲会，后来指美国大学师生对争议性话题 (尤其是政治话题) 进行的专题讨论或辩论。
- (45) 麦乔治·邦迪 (McGeorge Bundy, 1919—1996)，美国国防与外交政策专家，先后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 46 “End of Either/Or,” *Foreign Affairs*, 45 (January 1967): 189-201.
- (47) 马尔科姆·布朗 (Malcolm Browne, 1931—2012)，美国新闻记者、摄影师，于1963年拍摄了越南大乘佛教教徒释广德 (Thích Quảng Đức) 在西贡自焚的照片，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该照片同年赢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 (48) 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古巴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及援助协定。1960年5月7日，古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
- (49) 这些计划导致了1961年4月17日的“猪湾事件”。
- (52) 亦称为“东方政策”，指“二战”后西德政府通过谈判与其共产主义邻居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策略。
- 50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6, 1966.
- 5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5, 1966.
- 53 尽管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记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Alfred Rosenberg) 在他最疯狂的时候说要消灭3 000万斯拉夫人，而不是对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施加饥荒。顺便提一下，这里的类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就之前讨论的这个新词的技术含义而言)。也就是说，它基于这样的假设，美国人的主张和行动和其他任何人的主张和行动一样，都受同样的标准支配并接受同样的解读。
- (54) 1949年9月底，北平 (Peiping) 更名为北京。
- (55) 阿瑟·戈德堡 (Arthur Goldberg, 1908—1990)，美国政治家、法学家、外交

家，1962—196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 56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况且，戈德堡继续说，美国并不确定这些人是否都是志愿拥护者。这并非共产主义者口是心非的第一个实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62年，据美国政府的消息，15 000名游击队员伤亡达30 000人。见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982。
- (57) 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 1922—1983），美国未来学家、军事战略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分析核战争的可能性后果见长。
- (58) 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 1916—1999），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倡导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
- (59) “对应价值目标”指敌方与我方实力对应的导弹或核武器。
- (60)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作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以对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研究而著称。
- 61 重印于论文集*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369-375。在这里，我无意考虑过去12年间讨论“意识形态终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很难看出有理性的人为何能就那么多被提出的论点与人争吵。例如，在某个历史时刻，“文明政治”（politics of civility）是合适的，也许是灵验的；鼓吹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这件事鲜少受到关注）的人有责任评估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应该与教条主义式的狂热和“世俗宗教”做斗争（或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忽略）；解决问题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实行技术性的方法；“为了使思想能重现生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应该消失”（阿隆 [Raymond Aron]）等。有时候，这会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值得牢记的是，这些情绪与诸如卢森堡（Luxemburg）、潘涅库克（Pannekoek）、柯尔施（Korsch）、阿瑟·罗森堡（Arthur Rosenberg）以及其他许多人所代表的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无关。
- 62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 63 鉴于使用者目标明确，这种“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是毫无价值的几乎不重要。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是五角大楼或大公司提出的，而不是什么巴西东北部的革命者或美国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全称为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提出的。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研究项目专门研究装备简陋的游击队如何更有效地抵抗野蛮的、有破坏力的军事技术的问题——当然，这是现在已彻底过时的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
- 64 有关无休止的“中国扩张主义政策”的宣传攻势，也许要稍加评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美国宣传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其去世前不久的评判（见《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3月13日）：“迄今为止，新的共产主义‘王朝’侵略性很强。印度被攻打，马来人不得不奋战12年以抵抗他们本可以用更和平的路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民族解放’。如今，在泰国北部的渗透和侵略组织已经开始活动。”
- 至于马来亚，史蒂文森大概把华人和中国政府混淆了。关心真实事件的人会同意

哈利·米勒（Harry Miller）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威胁》（*Communist Menace in Malay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4）第230页所说的话：“除了通过北京的电台时不时地吵嚷之外，共产主义中国对马来亚的事务并不感兴趣。”至于泰国北部，“渗透组织”可能在活动（尽管猜想是中国人干的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与美国把泰国作为进攻越南的基地脱不了干系。这种瓜葛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进攻越南”源于边界争端。最初，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西藏到新疆的公路，印度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这项工程。根据美国空军的地图，争议地区属于中国领土。见Alastair Lamb, *China Quarterly*, No. 23 (July-September 1965), 202-207。对于这位知名权威而言，“中国似乎不大可能制定出总体规划……接管整个印度次大陆，更别说它那稠密的人口”。相反，他认为，中国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印度对这条公路所通过的区域甚至也声称过主权。中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中国军队在大部分地区都撤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外，这条线是1914年英国企图强加给中国边界的，但从未被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美国或其他政府承认过。

身居要职的人把这一切描述为中国的扩张主义，真是了不起。事实上，对于被美国的导弹包围、被东南亚庞大的美国远征军支持下不断扩大的军事基地网络所包围的中国，争论假想中的侵略性简直荒谬之极。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某天，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变成扩张者。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想象各种类似的可能性，但当前政治中的重要事实是美国的侵略性。

(65) Newspeak，也可译成“新语”，该词来自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设想的一种人工语言，极权主义政府用它来限制民众的思想自由，现在指官方为了欺弄或操纵公众而故意使用的含混、矛盾的言辞。

66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Closing the 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1), 382.

67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4页，《美国的亚洲政策》（*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分委员会的听证会（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第89页。

68 《美国的亚洲政策》，第105页。

69 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 [Haganah] 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 (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

- 70 Lacouture, 前面所引述的著作 (*Vietnam: Between the Two Truces*) 第188页。这位军事发言人继续(不吉利地)说,这是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会遭遇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反应”。
- (71) 指1966年2月美国与南越政府联合召开的第13次檀香山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了对越南的军事战略,之后开启了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
- (72) 指1966年10月23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美国宣称,如果北越武装撤回越南北部,美国及其盟国也会在六个月内从南越撤军。
- (74) 指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1909—1994), 1961—1969年任美国国务卿。
- (75) 麦克斯·弗兰克尔 (Max Frankel), 时任《纽约时报》记者。
- 73 查尔斯·莫尔 (Charles Mohr), 《纽约时报》, 1966年2月11日。着重部分是我引用时添加的。
- 76 《纽约时报》, 1966年2月18日。
- (77) 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 1917—2000), 美国情报专家、外交历史学家, 曾先后担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事务顾问, 离开政府工作后先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 (79) “慕尼黑类比”是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经典实例。1938年9月29日, 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署了《慕尼黑协定》, 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英、法当时迫于德国的战争威胁, 逼迫捷克斯洛伐克让步, 而签署协定时捷克斯洛伐克却无权出席会议。一年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事件被称为“慕尼黑阴谋”, 由此产生了“慕尼黑类比”这种思维方式, 即认为绥靖政策毫无作用, 反而会鼓励侵略, 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当美国对与其敌对的国家采取安抚、妥协的外交政策时, 有人就用慕尼黑类比指其重犯“二战”前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错误。
- 78 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 (80) 阿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1900—1965), 美国政治家、外交家, 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未果, 1961—1965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 (81)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对希特勒纳粹政府实行了绥靖政策，他因此备受谴责。
- 82 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80页。
- (84) “必要之恶”指为了全体利益而选择做某件恶行或含有恶意的事情。政治上通常指政府等国家机器的存在是必要之恶。
- 83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91-201. 例子随处可见。
- (86) 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1904—1980)，德裔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曾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
- (88)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又称《国策基准》），这份纲要伪称要成为东亚的和平势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实质上是日本法西斯势力试图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官方对国内的宣传与应对国联调查时的回应亦采取此类口径。
- (89) 此处指科德尔·赫尔 (Cordell Hull, 1871—1955)，美国政治家，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因创立联合国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85 Rostow and Hatch, *An American Policy in Asia*, 10.
- 87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 128.
- (90) 皮阿斯特 (piaster) 是1955—1975年越南南方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当时的1皮阿斯特相当于1美元。
- 91 Lindholm，前面所引述的著作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第322页。
- (92) 霍华德·津恩 (Howard Zinn, 1922—2012)，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学者、社会活动家。
- (93)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年龄在18—26岁之间的男性美国公民和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都必须登记。一旦国家有需要或遭遇紧急事件，在募兵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会按照规定征召民众入伍。
- (94) 指1965年10月15—16日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反对美国军事入侵越南的游行和静坐活动。此次活动由反越战的左翼学生政治团体“越南日委员会” (Vietnam Day Committee) 发起并组织。
- (95) 柯蒂斯·勒梅 (Curtis LeMay, 1906—1990)，美国空军将军、美国战略轰炸的信奉者和实践者，曾在“二战”期间策划用燃烧弹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低空轰炸。
- (96) 罗伯特·洛威尔 (Robert Lowell, 1917—1977)，美国诗人，曾获普利策诗歌奖，1963—197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并积极投入反对越战和民权运动等活动。
- (97) 即查尔斯·欧文·莱斯 (Charles Owen Rice, 1908—2005)，天主教神父、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蒙席”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荣衔，相当于“大人”的意思。
- (98) 西德尼·伦斯 (Sidney Lens, 1912—1986)，作家、美国工人运动领袖、政治活动家。
- (99) 本杰明·斯伯克 (Benjamin Spock, 1903—1998)，美国著名儿科医生、新左派

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活动家。

- (100) 达格玛·威尔逊 (Dagmar Wilson, 1916—2011), 美国艺术家、儿童读物插图画家, 1961年创立“妇女和平”(Women Strike for Peace)组织, 呼吁停止核试验。
- (101) 唐纳德·卡里什 (Donald Kalish, 1919—2000), 美国逻辑学家、教育家和反战活动家。
- (102) 即大卫·戴林格 (David Dellinger, 1915—2004), 美国反战分子、激进派, 主张通过非暴力方式进行社会变革。
- (103) 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 (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 由美国前总统哈利·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民权领导人组成。
- (104)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1923—2007), 美国著名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和和平主义者, 曾两次获普利策奖。
- (105) 吉姆·派克 (Jim Peck, 1914—1993), 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平主义者, 在“二战”和民权运动中推行非暴力抵抗行为, 被称为“白人民权英雄”。
- (106) 尤金·罗斯托 (Eugene Rostow, 1913—2002), 美国法学家、政治家, 1955—1965年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 1966—1968年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
- (107) 即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1916—2009), 美国政治家、商人。1961—1968年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任国防部长, 因其在越南战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越南战争也被人称作“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 (108)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 (Ithiel de Sola Pool, 1917—1984), 美国社会科学先驱、传播学专家、传播技术学的代表人物。
- (109) 道格拉斯·派克 (Douglas Pike, 1924—2002), 美国历史学家、越战和越共研究专家、学者, 任美国国务院首席分析家达15年之久。
- (110) 即约瑟夫·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1883—1946), 美国四星上将, 先后参与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被派往中国, 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
- (111) 罗杰·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 1919—2014), 美国政治科学家、作家, 1963—1964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 (112) 此处或指美国政治家、第38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 (Hubert Humphrey)。
- (113) 威廉·韦斯特摩兰 (William Westmoreland, 1914—2005),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 1960年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1964—1968年间担任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总司令, 在越南战场奉行歼灭和摧毁战术以及消耗战略, 1968年回国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 (114) 伯纳德·法尔 (Bernard Fall, 1926—1967), 美国著名战地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印度支那研究专家, 出生于奥地利, 先后移居法国、美国, 越战期间曾预见法国和美国终将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 (115) 约翰·麦克德莫特 (John McDermott, 1932—2018), 当代美国哲学家, 曾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

- (116) 其背景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 (117) 指斯图尔特·赛明顿 (Stuart Symington, 1901—1988), 美国政治家, 1953—1976年任民主党参议员。
- (118) 此处指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任期内发动了越南战争。
- (119) A. J. 马斯特 (A. J. Muste, 1885—1967), 荷兰裔美国人, 牧师、政治活动家, 曾致力于美国的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
- (121) 丹尼尔·盖林 (Daniel Guérin, 1904—1988), 法国作家, 主张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反对法西斯和殖民主义。本文修改自乔姆斯基为盖林这部著作写的序言。文中引用该书的选段均用中括号表示, 不另行标明。
- (122) 鲁多夫·洛克 (Rudolf Rocker, 1873—1958), 德国思想家、理论家、作家、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精神领袖。
- 120 Octave Morbeau, 引自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45-146。
- 123 Rudolf Rocker,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 124 引自洛克,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第77页。本句引用和下一句引用皆出自Micheal Bakunin, “The Program of the Alliance,” in Sam Dolgoff, ed. and trans., *Bakunin on Anarchy*(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255。
- (125)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 (Diego Abad de Santillán, 1897—1983), 西班牙作家、经济学家, 曾移居阿根廷, 是西班牙、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 126 Diego Abad de Santillán,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1937), 86。本书的最后一章写于西班牙革命爆发数月之后, 作者对按照这些方法所取得的进展表达了不满。有关西班牙社会革命的成就, 参见我所写的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第1章及其引用的参考文献; Boué和Témime所做的重要研究此后被译成了英文, 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研究, 尤其是: Frank Mintz, *L'Autogestion dans l'Espag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Editions Bélibaste, 1971); Césaire M. Lorenzo, *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oir, 1968—1969*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9); Gaston Leval, *Espagne libertaire, 1936—1939: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1971)。亦可参见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2), 1972年增补本。
- (127) 指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 日致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家菲利普·范·派顿 (Phillip van Patten) 的信。
- 128 引自Robert C.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他在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此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 129 Bakunin, in a letter to Herzen and Ogareff, 1866。引自Daniel Guérin, *Jeunesse du*

- (131) 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1878—1965), 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学者、哲学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
- 130 Fernand Pelloutier, 引自 Joll, *Anarchists*. 最早出自“L’Anarchisme et les syndicats ouvriers,” *Les Temps nouveaux*, 1895. 全文收录在 Daniel Guérin, ed., *Ni Dieu, ni maître* (Lausanne: La Cité diteur, 1969), 这是一本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优秀历史文选。
- 132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6), 127.
- 133 巴枯宁写道:“无论有多么民主,没有哪个国家(甚至连最赤色的共和国)能够给予民众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不受上层干涉或暴力对待的自由的自我组织和自下而上地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因为每个国家,甚至是马克思先生杜撰的伪人民国家,在本质上只是由少数享有特权的、自负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统治着大众,这些知识分子假想自己比民众更清楚民众需要什么……”“但如果一直敲打民众的棍子被标上‘人民的棍子’,民众的感觉也不会好到哪里去。”(*Statism and Anarchy* [1873], in Dolgoff, *Bakunin on Anarchy*, 338) “人民的棍子”指民主制度下的法兰西共和国。
- 当然,马克思对此看法不同。
- 就巴黎公社对此次争论产生的影响的讨论,见丹尼尔·盖林在 *Ni Dieu, ni maître* 杂志上的评论;这些评论略加扩充后发表在他的 *Pour un marxisme libertaire* (Paris: R. Laffont, 1996) 一书。另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24. (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阿维内里认为,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 134 有关列宁在1917年间朝左的“思想转向”,见 Vicent Danile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2, no. 1 (1953)。
- 135 Paul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295.
- 136 Michael Bakunin, “La Commune de Paris et la notion de l’état,” 后又登载于盖林编 *Ni Dieu, ni maître* 杂志。巴枯宁最后有关个性规则是自由的条件的论述,可以与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所形成的创造性思维方式相比较,在第9章有所讨论。参见 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nd Mind*.
- 137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x*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42, 参考了《神圣家族》中的一些评论。阿维内里 (Avineri) 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认识到,现今社会组织模式和形式会决定未来社会的结构”。然而,像此前提到的那样,这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型立场。
- 138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28.

- (140) 阿道夫·菲舍尔 (Adolph Fischer, 1858—1887), 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活动家, 出生于德国, 后移居美国。
- 139 参见此前所引用的盖林的作品。
- 141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 142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cited by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306. 关于这一点, 另参见马蒂克 (Mattick) 的文章“Worker’s Control,” in Priscilla Long, ed., *The New Left*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 143 罗伯特·塔克 (Robert Tucker) 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注) 塔克恰当地强调指出, 马克思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受挫的生产者”而不是“心存不满的消费者”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激进的评论直接来自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意志思想。
- (145) 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特此说明。
- 144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233. 引自Marx, *Capital*.
- 146 Pelloutier, “L’anarchisme.”
- 147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什么是财产?》) 马克思对“财产就是盗窃”的说法并不满意, 他在其使用中发现了逻辑问题, 盗窃预设了财产的合法存在性。参见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 148 引自Buber, *Paths in Utopia*, 19.
- 149 引自J. Hampden Jackson, *Marx, Proudhon and European Soci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7), 60.
- 150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24. (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阿维内里认为, 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 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 (151) 指美国工团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 (Daniel de Leon)。
- 152 相关背景参见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1900—1921: The Origins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 (153) “投入与交锋” (commitment and militancy) 是一种教育理念, 指一个人一方面要坚定而投入地顺从于教导, 另一方面需要质疑、争论和反抗。
- (154) 奥古斯丁·舒奇 (Augustin Souchy, 1892—1984),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者、记者。
- 155 *Collectivisations: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8.

- (157) 沃尔特·肯德尔 (Walter Kendall, 1926—2003), 英国社会活动家、作家, 尤其了解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 156 具体讨论请参见Mattick, *Marx and Keynes*以及Michael Kidron,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相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还可参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23-26。
- 158 参见Hugh Scanlon, *The Way Forward for Workers' Control* (Nottingham: 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 1968)。斯坎伦 (Scanlon) 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AEU (全称为“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 即混合机械工业工会。——译者注) 的主席。
- 工人管理协会 (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 在1968年3月第六次工人管理大会之后成立, 是一个宣传信息和鼓励研究的中心。
- 159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 (161) 亚瑟·罗森伯格 (Arthur Rosenberg, 1889—1943), 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家, “二战”时因犹太人身份先后流亡至瑞士、英国和美国。
- 160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 162 Arthur Rosenberg,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88.
- 163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62-63. (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 (164) 即埃德蒙·马斯基 (Edmund Muskie, 1914—1996), 曾任缅因州州长和第58任国务卿。1972年马斯基参加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但未获成功。
- (165) 即约翰·迪恩 (John Dean, 1938—), 1970—1973年任尼克松的法律顾问; 查尔斯·寇尔森 (Charles Colson, 1931—2012), 1969—1973年任尼克松的特别顾问。
- (166) 托马斯·沃森 (Thomas Watson, 1914—1993), 美国著名商人、政治家和慈善家, 曾任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第二任总裁, 1971—198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 (167) 詹姆斯·赖斯顿 (James Reston, 1909—1995), 苏格兰裔美国人, 记者、作家, 长期为《纽约时报》工作, 两度获普利策奖。
- (168) 全称为“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
- (169) Gainesville VVAW trial, 其中VVAW的全称为“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越南老兵反战组织成立于1967年, 由越南退伍老兵在全美各地组织反战集会游行, 并调查美国人在越战中的种种罪行。1975年美军撤离越南之后, 该组织的活动逐渐停息。此处的盖恩斯维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
- 170 John Kifner, “‘Best Friend’ of Gainesville 8 Defendant Testifies to Being FBI

Inform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1973.

- (171) 《国家卫报》(*National Guardian*) 是美国激进左派的独立周报, 1948年创刊, 1968年改名为《卫报》(与英国《卫报》同名), 1992年停刊。
- (173) 指美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罗森堡 (Julius Rosenberg, 1918—1953) 和艾瑟尔·格林格拉斯·罗森堡 (Ethel Greenglass Rosenberg, 1915—1953)。罗森堡夫妇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分子, 后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1953年被判处死刑。
- 172 健忘之人可以读一读詹姆斯·阿伦森 (James Aronson) 在《新闻界与冷战》(*The Press and the Cold Wa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0) 中对这段往事的回顾。
- (174) 指1972年12月18日至12月29日 (12月25日除外) 之间美军在越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空袭。
- (175) 全称为“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 (176) 全称为“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 (179) 约翰·康纳利 (John Connally, 1917—1993), 美国政治家。于肯尼迪在任期间任美国海军部长, 后任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 于尼克松在任期间任美国财政部长。
- 177 确切地说, 这不是官方的说法。电视和新闻界的共谋使政府再次成功地给这些事件套上与事实南辕北辙的解释。有关政府和新闻界在《巴黎协定》和导致签署这些协定的事件中合力欺骗的细节, 见Chomsky, “Indochina and the Fourth Estate,” *Social Policy* (September 1973)。
- 178 见John W. Finney,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73。
- (182) 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 (Richard Kleindienst, 1923—2000), 美国律师、政治家, 水门事件期间任美国司法部长。
- 180 大卫·P. 卡里奥 (David P. Calleo) 和本杰明·M. 罗兰 (Benjamin M. Rowland) 在《美国与世界政治经济》(*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一书第99页引述的1971年5月28日财政部新闻。《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的编辑们十分有效地解释了帝国主义政策如何造成了经济危机。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 在这个话题广为人知之前, 西摩·梅尔曼 (Seymour Melman, 美国工程与应用科学专家、经济学家、作家, 长期倡导军事工业向民用生产经济转型。——译者注) 是如何提醒人们注意军事化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政策日渐衰微的影响力。
- 181 见Jack Foisie, “US still financing Thai forays in Cambodia,” *Los Angeles Times-Boston Globe*, August 19, 1973。作者从曼谷报道说: “柬埔寨仍然是美国驻泰国基地资助和指挥的活动的秘密目标。”他还提到, 泰国政府怀着“重获马德望省 (Battambang) 的长远希望”。4月19日发生在老挝的政变也许是泰国方面挑起的, 这表明泰国政府也许还想遵从像乔治·波尔 (George Ball) 这样的鸽派人士在1965年提出的政策, 把老挝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小王国。参见*Pentagon Papers*,

- (183) 约翰·埃利希曼 (John Ehrlichman, 1925—1999), 曾任尼克松政府内政事务顾问, 是参与水门事件的重要人物。
- (184) 指小塞缪尔·J. 欧文 (Samuel J. Ervin, Jr., 1896—1985), 美国政治家。1972和1973年参与调查水门事件并主持听证会。
- (185)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1931—), 美国社会活动家、军事分析家。1971年, 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披露了五角大楼的军事文件, 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等罪行, 但最终被判无罪。
- (186) 玛丽·麦格罗里 (Mary McGrory, 1918—2004), 美国新闻记者及专栏作家, 主要关注美国的政治问题, 坚决反对越战, 曾被尼克松列入“敌人名单”。
- (187) 作者把总统、国会等机构比作“企业”或“实业” (enterprise)。
- 188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69), 97. 尼克松认为, 这完全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 而不是丢给幕僚的“各个地区企业的管理”。
- 189 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作“勃列日涅夫主义”, 尽管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早期理念都直接使用了其中相同的表述词。托马斯·M. 弗兰克 (Thomas M. Franck) 和爱德华·韦斯班德 (Edward Weisband) 在其主要研究中提到了这点, 见 *Word Politics: Verbal Strategy Among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90) 指乔治·麦克默特里·戈德利 (George McMurtrie Godley, 1917—1999), 美国外交官, 在1963—1973年任美国驻老挝大使。
- 191 有关国会对于先前披露的事实的反应, 见 Noam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13-14。
- 192 至少对于那些希望知道更多内情的人来说, 很多情况已经提前知晓。见《因为国家》, 第2章及该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有关一些新近披露的事实, 见 Tad Szulc, “Mum’s the War,” *New Republic*, August 18-25, 1973; Walter V. Robinson, “Cambodian Raids—the Real Story,” *Boston Globe*, August 12, 1973。
- 193 见 Marcel Barang, “Le Laos, ou le mirage de la neutralité,”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1973。
- 194 见 Jack Foisie, “US still financing Thai forays in Cambodia,” *Los Angeles Times-Boston Globe*, August 19, 1973。作者从曼谷报道说: “柬埔寨仍然是美国驻泰国基地资助和指挥的活动的秘密目标。”他还提到, 泰国政府怀着“重获马德望省 (Battambang) 的长远希望”。4月19日发生在老挝的政变也许是泰国方面挑起的, 这表明泰国政府也许还想遵从像乔治·波尔 (George Ball) 这样的鸽派人士在1965年提出的政策, 把老挝的一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小王国。参见 *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Boston: Beacon, 1971), vol. 4, 618。
- (196) 尼克松政府自1969年初开始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基地, 之后扩展到柬埔寨内陆。逐步升级的狂轰滥炸引起美国国会的不满, 指责尼克松滥用总统职权。1973年8月15日, 美军停止了对柬埔寨的轰炸。

- 195 早在1962年1月，观察员罗杰·希尔斯曼就发现美军飞机先轰炸了一个柬埔寨村庄，然后又袭击了这个作为既定目标的越南村庄。参见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elta, 1967)。部分记载见本人所著《与亚洲作战》(*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3章。
- (197) 法国退出印度支那之后，美国在1955年将“美驻印支军事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并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随着战局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对越南的介入程度与方式。1965年前，美军的驻扎地与行动地点大部分都在越南共和国境内，与北越支持和领导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战，后者在1960年前后已经控制了南越的大部分农村。
- 198 见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chap. 1, sec. 5。有关共产主义在南越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危险，见 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可参考的重要研究还有 Jeffrey Race, *War Comes to Long 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此外还有 William A.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Praeger, 1967); Robert L. Sansom, *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 这种对共产主义分子成功地组织乡村群体的关注恰恰说明美国袭击南越和老挝乡村社会的野蛮之处，还有其对南越问题的恐惧，他们害怕民族解放阵线可能会实现其促使南越以及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努力。需要承认的是，就基本目标而言，美国赢得了印度支那战争，尽管期间经历惨败。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被摧毁，尤其在春节攻势之后加速的“和平运动”中，民族解放阵线所扎根的乡村社会也同时被摧毁。整个印度支那沦落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准，也许再难恢复。美国战后的政策也旨在确保只有微弱的恢复希望。如需进一步探讨美国在印度支那所取得的巨大（尽管不够彻底）胜利以及拥有自由度的新闻界向公众陈述事实的方式，见 Noam Chomsky 和 Edward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2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 199 Robert W. Tucker, *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Vietnam: The Final Reckoning,” *Commentary* (May 1975)。
- 200 塔克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他认为，既然“帝国主义的开支可能会危害到更宏观的经济体系并因此造成企业型统治者之间的纷争”（就像1968年初在越南发生的那样），把美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推动力归咎于“主要根据美国‘企业型统治者’利益而盘算的……好处”的“过激批评”，肯定犯了一个逻辑谬误。事实上，正如他所讨论的“过激批评”一直所认为的那样，正是重新评估才导致采取不太“昂贵”的策略，包括更多地依靠代理军队和资本密集型的战争，最后走向企业停业清盘。根据塔克的逻辑，似乎可以证明该企业管理者没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既然他们有时会关停毫无效率的工厂。有关塔克评论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错误的进一步讨论，见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然而，这已是主流学者中最好、最严肃的贴近所谓“过激批评”的讨论，但在我看来“过激”一词也不太合适。

(201) 约瑟夫·艾尔索普 (Joseph Alsop , 1910—1989) , “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

202 Arthur Schlesinger, *The Bitter Heritag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7).

(204) 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 1893—1971) , 美国政治家、著名律师, 在制定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203 在阿基米德·L. A. 所著的《为什么是越南? 美国负担的序幕》(Archimedes L.A. Patti, *Why Viet Nam? Prelude to America's Albatro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一书中, 对早些时候以及所丧失的机会的讲述十分富有启示性。与该时期和后来几个时期有关的很多文献被收录在Gareth Porter,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2 vols. (New York: Coleman, Stanfordville, 1979)。有关五角大楼文件记载的讨论, 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另见Richard B. Duboff, “Business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Vietnam,” in Chomsky and Howard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vol. 5 of The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 (Boston: Beacon, 1972)。关于后日内瓦时期, 尤其请参看的是前面提到的雷斯 (Race) 的著作。

(205) 即印度支那 (Indochina) 。

(206) “战略村”是旨在消除越南民间抵抗力量的计划, 被民族解放阵线和百姓称为“集中营”。

207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208 关于这段时期, 见George McT. Kah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South Vietnam: U. S. Policy in the Post-Diem Period,” *Pacific Affairs* (Winter 1979-80)。卡欣 (Kahin , 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是对美国政府发动越战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译者注) 评论道, 取代吴庭艳政权的南越将军和平民们“有一连串显然不同于华盛顿政府的优先考虑, 要取决于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他们期待一个不受美国干涉、经越南各党派谈判而制定的协议”。但这个想法对美国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因为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 (George Ball) 曾解释说: “美国政府所想的远非‘解决越南问题的中立办法’, 我们要赢。”人们普遍认为鲍尔是个“鸽派”, 因为他后来反对超过大约7 500名兵力的全面入侵。吴庭艳政权之后的越南领导人认为, 民族解放阵线“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组织, 而PRP (人民革命党, 即其公开承认的组成部分) 也没占优势, 在组织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并且民族解放阵线“完全不受河内的控制”, 与一个亲西方的中立政府一起“很有可能促使 [在南越达成和平协定] ”。“不幸的是, 我们的计划 [在南越人那里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被泄露了, 美国听闻了一切” (1969年, 曾任总理的阮玉寿 [Nguyen Ngoc Tho] 这么说) 。南越的将军们也反对美国轰炸北越的计划, 但一年后轰炸被付诸实施。出于这些原因, 吴庭艳政权之后的政府被美国策划的政变推翻, 扶植阮庆 (Nguyen Khanh) 当权, 一年以后阮庆政权又被由美国支持的政变推翻。在每个阶段, 美国都强加了一个之后可能邀请美国“保护”使其免遭侵略的政权 (有时候, 美国没有把这些步骤通知给客户, 结果后来就变成了“责令”) 。美国最大的恐惧是, 南越可能遵从民族解放阵线的官方程序安排, 于1964年保持中立。五角大楼的文件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点; 参见《因为国家》。

- (209) 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1902—1985), 美国民主党议员, 1963—1964年任美国驻南越大使, 1965年7月再次被任命为美国驻南越大使。
- (210) 阮庆 (1927—2013), 参与1963年反吴庭艳的军事政变, 1964年1月再度发动政变推翻杨文明 (Dương Văn Minh) 政权, 出任总统, 同年10月改任总理直至1965年6月下台。
- (211) 麦克斯韦尔·泰勒 (Maxwell Taylor, 1901—1987), 美国四星上将, 1964年6月出任美国驻南越大使, 1965年7月由洛奇重新接任。
- 212 Maxwell D.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New York: Norton, 1972).
- (213) 黄晋发 (Huynh Tan Phat, 1913—1989), 1962年和1964年当选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 1964年兼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69年6月—1975年4月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
- (215) 詹姆斯·雷斯頓 (James Reston, 1909—1995),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 曾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 214 参见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chap. 3。
- (217) 全称为“Peopl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 216 参见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chap. 3。
- 218 Taylor, *Swords and Plowshares*, 见第3章注释35中引述的参考文献。
- (219) 此处指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Gerald Rudolph Ford, 1913—2006), 美国第37任副总统和第38任总统。
- (220) 安东尼·刘易斯 (Anthony Lewis, 1927—2013),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公共知识分子, 两度获普利策奖, 长期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 221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4, May 1, 1975. 刘易斯后来反复说明了他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评价, 提到的内容如下: 就罗德西亚而言, 美国什么都不应该做, 因为“如果我们记得越南的话就知道, 不管干涉的初衷多么好, 假如信息不充分就有可能产生可怕的危害”(《纽约时报》1979年2月1日); 在柬埔寨, 美国扔下的炸弹总吨数是“二战”期间投放在日本的三倍, “成千上万平方英里遍布村庄的良田被摧毁”, 同时“产生了红色高棉”(西哈努克语)——“简而言之, 不管这个政策的初衷多么真诚, 结果是灾难性的”(1979年9月24日); 反对越战的观点是, “美国误解了印度支那的文化和政治力量, 结果处于除了采取高昂的代价之外无法强制实施解决方案的立场”(1979年12月27日); 对河内的圣诞节轰炸“象征着更大的失败: 每个消息灵通人士都知道战争不可能胜利之后, 战争还是持续了四年。这种失败的代价在过去很惨痛, 现在依然如此。从1969年到1972年, 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支出500亿美元, 扔下400万吨炸弹, 失去了20 492条生命。但最大的代价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这个国家进一步分化, 充满了政治愤懑”(1980年12月22日); “我们从越南学习并必须继续回想的是, 再伟大的权力也要行使有度”(1979年12月27日)等(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

请回想一下, 我的引述来自美国主流新闻界对越战最直言不讳的一位评论家, 他

几乎是唯一拒绝加入沙文主义共识的人（参见下面的内容）。假如这些情绪引自主流意见光谱中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那可真是对美国及其意识形态机构的伤感评论。

带着毫无悬念的预测，刘易斯坚定地重复了政府对圣诞节轰炸的宣传路线：在“基辛格宣布和平‘即将到来’”之后，阮文绍和其西贡同事“阻挠”了十月协定，并“强迫进入血腥的最后一章”，即轰炸河内。有关事实，见乔姆斯基《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以下称为“TNCW”）一书第3和6章。

- (223) *The New Republic*，于1914年创刊，是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意见杂志，主要介绍与政治、经济、艺术、环境等主题相关的观点。
- (224) TRB由BRT（Brooklyn Rapid Transit，布鲁克林捷运）转化而来，是《新共和》杂志每期一个主要专栏的名称，并无具体含义。
- (225)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法西斯战犯，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等要职。
- 222 Bernard Fall, “Vietcong—the Unseen Enemy in Vietnam,” *New Society*, April 25, 1965, reprinted in Fall and M. G. Raskin, eds., *The Vietnam Reader* (New York: Vintage, 1965).
- (227) 即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陆军大将，“二战”战犯。1945年，马尼拉军事法庭追究山本奉文虐杀马尼拉居民的责任时，有资料证明屠杀是他下达撤退命令后陷入恐慌的马尼拉守军所为，山下本人并未如此下令。山本奉文于1946年2月被处以绞刑，指挥者未能察觉或制止其部下所犯的罪行也应受到惩罚的规则后来被称作“山下标准”。
- (228) 指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1943—），越战期间任美军中尉，被认为参与了美莱村屠杀。1971年3月，美国军事法庭因卡利下令向越南平民开火而判处其终身监禁，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四个半月。
- (229)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美军于1969—1969年发动的针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官方估计造成上万名民族解放阵线士兵死亡以及5 000—7 000名平民伤亡。
- (230) 即克莱顿·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1914—1974），曾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越战期间任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副司令。
- 226 引自纽伦堡文件，见Karl N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New York: Praeger, 1970), 423.
- (232) 查理·鲍林（Charles Bohlen，1904—1974），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3—1957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69年退休。
- 231 讨论基于凯文·巴克利（Kevin Buckley）和亚历克斯·希金（Alex Shimkin）的研究，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1, chap. 5, section 1.3, 还可参

见 *Towards a New Cold War*, chap. 5.

233 Charles E. Bohl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69).

(235) 春节攻势使美国政府之前乐观取胜的心理成为幻想，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也许是不可战胜的。

(236) 指波罗威岛 (Poulo Wei)。

234 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见上面出处第1章。有关民意调查，见Andre Modiglian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72。

(238) 约翰·奥斯本 (John Osborne, 1907—1981)，美国新闻记者、《新共和》杂志的编辑。

237 Evelyn Keene, *Boston Globe*, May 18；在本特利学院 (Bentley College)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39 James McCartney, *Boston Glove*, May 19, 1975.

240 见 *TNCW* 第8章。

(242) 此处修改了英语谚语“A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its spots”的结构，其比喻义是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情。

241 见《新共和》1975年2月1日的社论。编辑们警告读者警惕这种“始终如一的专横政策”，它会让我们逃避使用武器或以武器进行威胁（按照法律要求）。他们向五角大楼保证说：“假设那些反对在越南实施恐怖的人定会盲目地永远反对军事行动，这是错误的。”——相反，“他们会接受有关民族利益和（因此引起的）为受恐怖和侵略威胁的民主盟国所肩负的道德责任的说法”（可以读一下《失去对占领地区控制而遭受威胁的以色列》[“Israel, Threatened with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一文）。如果我们被迫采取这些步骤的话，他们当然会强调我们在中东军事干涉的良好动机。

读者可以查一下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何时被这些编辑们说成是“侵略”的，或者他们何时清醒地讨论过入侵加拿大、英国、委内瑞拉、伊朗（在还是附属政权的时期）以及因支持油价上涨也发动了侵略的国家。

243 见Jonathan Pow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75；还有在《中东问题》(*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April 1975])上的一些文章；有关世界银行政策规划和项目审核巴基斯坦籍负责人的分析，具体内容见David Franci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5, 1975；还有其他很多资料。

(244) 从1960年代直至1980年代左右，巴西教会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教会逐步放弃为现行政府辩护，转而强调人权和民主，倡导给予人民各种自由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等。

(245) 指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所有权通过兼并和联合被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的现象。

(247) 塞勒斯·万斯 (Cyrus Vance, 1917—2002)，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陆军部长

和国务卿。

- (248) 乔姆斯基认为，尽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差别并不大，均以利益为共同目标，就好像受一个共同的“商业政党”（business party）统治。
- 246 对民主的厌恶有时会走向极端，导致通过集中私人财富实现国家控制被当作唯一能想到的统治方法。一定是这种默认为的假设使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New Republic*, 1989年1月9日）断言，在我和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一书中，我们提倡对媒体实施“更多的国家控制”，该说法基于我们的这一主张：“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秩序会要求更广泛地控制媒体和公众大量地接触媒体。”（第307页）这个被引用的主张是我们在回顾了一些可能存在的模态（modalities）之后提出的，这些模态包括“削弱网络寡头权力”和“有可能提高本地团体使用率”的公共电视频道的涌现、“本地非营利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社区机构”（以法国的一个小合作社为例）对广播电台的所有权、在当地社区受到听众支持的广播等。这些选择的确挑战了公司寡头垄断和普遍意义上的富人统治。因此，它们只能被那些认为其不可思议的人解释为“国家控制”，而公众也许或应该接触媒体，将其作为决定自身事务的一个步骤。当然，当我们从该系统的普遍性特征转向微小的细节和影响时，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和限制性条件。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些是分析任何复杂系统都会产生的特点。
- (249) 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 1951— ），美国政治哲学家，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 (250) 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美国政治活动家，法学、政治学和公共关系学专家，现为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
- 251 见他们的著作《论民主》（*On Democracy*），书中详尽地阐释了更广泛的影响。
- (252) 平等派（Leveller）指英国内战期间的一场政治运动，主张所有自由人都应当参与到政府中来。
- (254) 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美国历史学家，现为得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
- 253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Penguin, 1984, 60, 71)，其中引用了当代作家们的话。
- (255) 谢斯起义（1786—1787）指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农民军和资产阶级军队在马萨诸塞州爆发的战斗，由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 1747—1825）领导，起义以失败告终。
- (257) 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英国当代传媒研究专家。
- 256 Edward Countrym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5, 第200页和第224页之后连续几页的内容)。
- 258 James Curran, “Advertising and the Press,” in Curran, ed., *The British Press: A Manifesto* (London: MacMillan, 1978).

- 259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30), 这是一项有关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务院1939—1945年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的研究。
- (261) 也有人译作“宏大区域”或“宏大地区”。
- 260 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我的著作 *Necessary Illusion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9), appendix II, section 2。
- 262 出于要通过剥削他们的前殖民地来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中心的特殊需求，早些年美国是容忍例外存在的，但这只被视为权宜之计。详情见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Andrew J. Rotten,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64) 查尔斯·梅尔兹 (Charles Merz, 1893—1977)，美国《纽约时报》编辑，1938—1961年担任社论版编辑。
- 263 *WP Weekly*, December 28, 1987。
- 265 Lippmann and Merz, “A Test of the News,” Supplement, *New Republic*, August 4, 1920。此处的引用转引自 James Aronson, *The Press and the Cold War* (Boston: Beacon, 1973), 25-26。
- 266 见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I, section 2。
- (267) 莱因哈德·盖伦 (Reinhard Gehlen, 1902—1979)， “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军官，冷战初期受美军招募建立反共产主义间谍组织，后担任西德情报机构头目。
- 268 H. D. S. Greenway, *Boston Globe*, July 8, 1988。有关背景，见 *Tuning the Tide*, 第194—195页及所引用的文献来源；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 (270) 保罗·尼茨 (Paul Nitze, 1907—2004)，美国政治家，曾参与制定冷战防御政策。
- 269 到1960年代晚期为止，事情已经相当明了：这些是美国干涉东南亚的基本因素；在美国的全球规划中，东南亚曾作为日本的“共荣圈”将在美国控制下的大区域内重新组合，同时也作为重建西欧资本主义所需的原材料和美元回收的市场和来源。见我的著作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Introduction;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Chomsky and Howard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vol. 5 of *Pentagon Papers* (Boston: Beacon, 1972)；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相关的其他作品也可参见 Borden, *Pacific Alliance*;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rew Rotten, *Path to Vietna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72) 即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7年建立的公众信息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用以鼓动民众支持战争、参加战争。该委员会由自由派记者乔治·

克里尔 (George Creel) 担任主席，因此又称“克里尔委员会”。

(273) 弗雷德里克·帕克森 (Frederic Paxson , 1877—1948)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边疆研究专家，1925年获普利策奖。

(274) 爱德华·伯尼斯 (Edward Bernays , 1891—1995) ，奥地利裔美国人，美国著名公共关系理论专家。

271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orton, 1969, 374, 489) ; Borden, 出处同前，第44、144页。

(276) Haymarket affair, 也叫作“干草市场屠杀”或“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在干草市场集会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数名警察和平民丧生。

275 见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I, section 2.

(277) 1936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 (Robert La Follette) 主持参议员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调查，揭露雇主为反对工会运动所采取的手段。

278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279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引自 Bell,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Public Opinion,” in A. R. Dubin and A. Ross,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Hill, 1954)。

280 见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V, section 5.

281 Carey, “Managing Public Opinion.” 有关1950年代对大学的清洗运动，见 Ellen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有关后来的清洗运动的小例子，见 Philip J. Meranto, Oneida J. Meranto, and Matthew R. Lippman, *Guarding the Ivory Tower* (Denver: Lucha Publications, 1985) 中的几篇文章。

282 一些讨论可参见我的文章“Democracy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Z Magazine*, January 1989。

283 “食品换和平计划” (The Food for Peace program) (《480公法》) 就是一个有名的案例。罗纳德里根将其描述为“一个国家为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所做出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之一”，《480公法》有效地实现了在订立之初的目的：补贴美国的农业企业；让人们“因食品而依赖我们” (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如此说道。他是该计划的设计者之一，也照顾到了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农业选区的利益) ；有助于镇压叛乱行动；通过要求将当地货币所对应的资金用于改良装备 (威廉·波顿) 来资助“建立支持西方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政府的全球军事网络”，从而也为美国军火生产商提供间接补贴。在其他情况下，美国也采用这种“出口补贴 (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来保住其巨大的日本市场” (波顿) 。这对第三世界的农业和生存产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见 Tom Barry and Deb Preusch, *The Soft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8, 67-68) ; Borden, *Pacific Alliance*, 182-183 ; 还有其他的资料出处。

284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1985.

- 285 见*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and Manufacturing Consent*.
- 286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77.
- (287) 1983年9月1日,从纽约飞往首尔的韩国民航客机KAL 007号航班失联,后来苏联承认因客机侵犯苏联领空而将其击落。
- (289) boat people,即乘船出逃的难民。
- 288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5, 1988; Robert Reinhold, *New York Times*, 同一日期。
- 290 有关当时对比性的估算,见*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II, chap. 3。
- 291 *New York Times*, March 3, 1985.
- 292 T. Hunter Wilson, *Indochina Newsletter* (Asia Resource Center), November-December 1987. Mary Williams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George Esper,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8; *Boston Globe*, picture caption, January 20, 1989.
- 293 Mary Williams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 1989; Robert Pea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Paul Lewi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Walsh,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1988. 沃尔什 (Walsh) 在其1989年1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以懊悔的笔触写道:“阿富汗公布地雷分布区甚至可以算作喀布尔政权一次宣传上的小胜利,因为它在华盛顿的敌人”要在自己离开越南战场14年以后才做这件事。美国的宣传胜利机会极其微小,因为没人承认美国并未提供这一信息,或有责任这样做。
- (296) MIA的全称为“missing in action”。
- 294 Barbara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85.
- 295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E. W. Wayn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24, 1988.
- 297 Anderson,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Diplomatic History*, Fall 1988.
- (298) reeducation camps,即战俘营。
- (299) 即火炉 (Hua Lo) 监狱,原为法国殖民者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后来在越战中被北越用于关押美军俘虏,在美军中得名“河内希尔顿”。
- (301) 弗朗西斯·詹宁斯 (Francis Jennings, 1918—2000),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殖民史研究专家。
- 300 Lee H. Hamilton, “Time for a new 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Vietna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2, 1988; Frederick Z. Brown, *Indochina Issues* 85, November 1988; *Boston Globe*, July 8, 1988.
- 302 Francis 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 (New York: Norton, 1988), 215.
- (303) 阿姆农·卡佩柳克 (Amnon Kapeliouk, 1930—2009), 以色列新闻记者、作家, 是以色列人权组织“采莱姆” (B’Tselem) 的创建人之一。

- (304) 指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1906—1962), 德国纳粹高官, 1961年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1962年6月被处以绞刑。
- (305) 德米扬鲁克 (John Demjanjuk, 1920—2012), 前纳粹集中营看守, 涉嫌协助纳粹杀害犹太人。1986年, 德米扬鲁克在以色列战争法庭受审, 以“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1993年, 其死刑判决因身份疑点被撤销。2011年, 他在德国出庭受审, 在案件审理阶段突然死亡。
- 306 Kapeliouk, *Yediot Ahronot*, April 7, 1988; 亦见于 April 1, 15.
- (307) 一种高效枯叶剂或落叶剂, 含二噁英等强致癌类物质, 因其容器标志条纹为橙色而得名。
- 308 Ziem, *Indochina Newsletter* (Asia Resource Center), July-August 1988; Susan Chir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88;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1985. 见《制造共识》中关于越战十周年回顾展 (1985) 以何种方式逃避展示战争对南越人民 (美国进攻的主要受害者) 造成的影响。
- 309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4/1号文件 (NSC 144/1), 1953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2号文件 (NSC 5432), 1954年; 还有许多其他文件。更多详细的讨论, 见《论权力和意识形态》(*On Power and Ideology*)。基本原则被不断地重申, 并常常用同样的话。
- 310 有关这种针对大后方的宣传手段, 见Herman and Brodhead, *Demonstration Elections*。
- (311) 此处指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 (José Napoleón Duarte, 1925—1990) 领导下的政权, 其政府是实现从军事独裁到民主选举的桥梁和过渡。
- 312 Jorge Pinto, *New York Times*, op-ed, May 6, 1981; 萨尔瓦多一家法律公司高级合伙人里卡多·卡斯塔内达 (Ricardo Castañeda) 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爱德华·梅森 (Edward Mason), P. C.; “Salvador Groups Attack Paper and U. S. Plant,” World News Briefs,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80。《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这条消息是由来自“公正”组织 (英文名为“FAIR”的美国全国媒体观察组织, 全称为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意为“新闻报道中的公正与准确”。该组织创立于1986年, 是与政府和媒体无关的独立民间监督组织。——译者注) 的克里斯·博克 (Chris Burke) 通过搜索《纽约时报》索引找到的。
- 313 “Sad Tales of La Libertad de Prensa,” *Harper’s*, August 1988. 进一步讨论可参见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IV, section 6。
- 314 Deirdre Carmod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1980. 也许我们可以把上面引述过的4月19日的简要通告看作对他的请求的回应。
- 315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March 25, 1988.

第二部分 论美国政治与外交

国际事务中的武力统治

如果把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置于纽伦堡审判和其他相关国际大会的背景下考虑，会出现两个不同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和正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律和历史的技术性问题：根据各大国已正式接受的国际法标准，应该如何评判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呢？第二个问题则更难捉摸，这是个关乎正确标准的问题。例如，在大国干预中，纽伦堡和相关国际法的原则是否像在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表现得令人满意且恰当呢？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历史学家、法学教授、退役准将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近年来对纽伦堡审判和越南战争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一个话题，但偶尔也会谈及第二个话题。泰勒的研究简明扼要却内容丰富，可能会为今后部分有关战争罪行的辩论以及如何才是正确的国际行为等广泛问题设定框架。他试图表明，依据纽伦堡审判的标准，美国自1965年至今的军方官员和文职官员都有可能作为战犯受到起诉。毫无疑问，泰勒的研究不乏自我强加的局限。但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书^①为探究合法性和正义问题提供了便捷的出发点。

一、“战争罪行”与“正义”

正义问题不容低估。国际法实际上是批准条约和其他协议的人视为有效的一套道德原则。此外，正如泰勒所强调的那样，条约和手册“只是战争法的部分化身”。例如，1970年海牙大会的开场白说道，大会未涉及的问题应该由“万国公法的原则”来解决，“因为这些原则源自文明民族已确立的惯例，源自人道法则和公众良知的支配”。²因此，探究这些已编写成文并被普遍采纳的原则的政治和社会内容以及可接受度，并按照公众良知的指挥和人道法则（尽管这些也许还模糊不清）去研究它们，是有意义的。至于“文明民族已确立的惯例”，杰克逊法官^③在1945年给总统的临时报告中写道：“我们肩负重责并且明白，我们的行为在这个动荡时期会指引世界各国愈加坚定地实施国际行为法则，使那些把政府和民族命运掌控于自身权力之下的人不那么着迷于战争”（第77页）。在战后时期，我们如何承担这种责任呢？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美国的行为依

据纽伦堡原则及相关原则是否合法，而且涉及这些原则自身的特性。

泰勒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讨论揭示出，审判中所体现的原则有一个重要的道德瑕疵。泰勒拒绝接受美国轰炸北越而犯下战争罪的这一说法，他评论道：“不管在这一范围内的战争法应该怎样，纽伦堡审判肯定没为这类指控奠定基础”（第142页）。然而，轰炸破坏了北越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城市（除河内和海防市以外）。⁴战争罪的法则无法触及美国轰炸，其原因很简单：

〔“二战”〕双方都在玩摧毁城市的恐怖游戏，同盟国更胜一筹，所以针对德军或日军的刑事指控是毫无基础的，事实上也未曾提出过这种指控。〔第140—141页〕

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广泛、残忍地发动过空袭。无论在纽伦堡或东京，这种问题都未被纳入审判部分。〔第89页〕

同样，在尼米兹上将⁵提供证词之后，对德国海军上将违反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指控就被置之不理了⁶，这“确定了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什么都没做，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什么都没做”（第37页）。纽伦堡法庭规定，德军上将不应为他们违反国际法而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当时的法律“在军事必要性的压力之下已被交战国双方从行为上视为无效”（第38页）。泰勒总结道：“以执行判决的国家也做过的行为去惩罚仇敌，尤其是战败的仇敌，是完全不公正的，也败坏了法律本身。”（第39页）

我们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得出纽伦堡所构想的“战争罪”的操作性定义。犯罪行为只有被打败的敌人做过而获胜者没做，才会被视为有罪。毫无疑问，以执行判决的国家做过的行为去惩罚战败的仇敌是“完全不公正的”。既惩罚获胜者又惩罚战败者的罪行才是正义而公正的。泰勒未提及的这种选择，战后法庭也没做过。他们反而选择“败坏法律本身”，通过限制犯罪行为的定义去排除对获胜者的惩罚。⁷

泰勒对侵略战争的看法更加强了这一结论：纽伦堡被理解为由获胜者进行的评判，而并非是国际道德达到了新高度。他指出，纽伦堡的突出贡献在于确立了危害和平罪的类型：“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为实现任何上述行为“参与共同计划或同谋”。⁸泰勒写道：“就众多的国际法而言，纽伦堡审判在公众心目中的显著特点是，它将个人参与计划和发动‘侵略战争’判定为犯罪。”（第84页）“毫无疑问，根据有关侵略战争的国际法确立犯罪行为，是美国政府战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76页）

但泰勒认为，法庭几乎无法判定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违反了纽伦堡或联合国宪章中的反侵略规定。⁹有一个原因是，“证据问题几乎难以克服”。在纽伦堡和东京，同盟国可以接触到美国政府和韩国政府不愿公开的秘密外交和军事文件档案。“像结束‘二战’那样彻底的军事胜利在现代史上较为罕见，也很难想象会有其他情况使这些档案得以解密”（第118—119页）。但如果仅凭接触秘密档案就能提供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据，那么由此可知“纽伦堡审判的显著特点”通常只涉及受彻底军事打击的敌方案例。

事实上，泰勒对侵略证据一事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尽管存在“难以克服的”证据问题，他似乎还是信任执行分支机构对侵略别国的单方面判断。他写道：“直到1965年[我]还赞同美国干预越南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精神去制止侵略的行为。”（第206页）¹⁰在泰勒看来，由美国执行机构单方面断定北越在1965年之前发动了侵略战争，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与南越一起进行反抗北越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这一切都未尝不可。他似乎相信，美国在执行这一判断时能力超群，甚至不必遵循第51条规定，即为行使自卫权而采取的措施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¹¹或者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将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将采取什么办法。

事实上，我认为泰勒夸大了判定美国是否参加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证据问题”，正如他低估了确定美国是否参加反抗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的难度一样。在我看来，他对侵略战争的讨论在其他方面也不够充分。

我们在考虑能写进《纽伦堡宪章》和其他宪章的国际法原则的可接受度时，还有一个更严肃而危险的问题。这些原则由公认政府的代表制定，有群众基础的、旨在推翻公认政府或建立革命政府的民众运动的代表并未参与其中。理查德·福尔克⁽¹²⁾认为：“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执政能力当然是要求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要素。”¹³而托马斯·J·法若尔⁽¹⁴⁾提到：“叛乱发展到足够的状态需要被平等对待时，正义具有危险的模棱两可之意。”¹⁵这些观点在评价泰勒的看法时至关重要，他坚信美国大约在1962年对越南采取了“制止侵略”的行动。同年，据西贡的美国官员估计，有一半南越人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¹⁶况且，尚无证据表明北越参战，就有1万美国军人驻扎南越，很多部队直接发起了军事行动。¹⁷伯纳德·法尔指出：“自1961年以来，穿着美军制服的美国人死在越南、死于战斗。”¹⁸1962年3月，美国官员承认，美军飞行员正在执行战斗飞行任务（轰炸和扫射）。到10月为止，南越30%的飞行任务都由美国空军

飞行员执行。¹⁹直至1962年后期，美国直接参与了湄公河三角洲和金瓯半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²⁰理查德·特里加斯斯基斯⁽²¹⁾报道了对美国直升机飞行员的采访，飞行员们描述了第362空军中队的“疯子们”经常在“确信无疑的越共地区”把射杀平民当作运动。²²另据报道说，1962年，特种作战部队的空军突击队员们“穿着平民的衣服驾着带有南越空军标记的飞机……袭击了丛林中的越共集中地”。²³

简短地说，美国早在1962年就参与了反对南越本土民众武装的军事袭击，这是个很好的案例。如果执政能力确实是要求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要素，把这种行动称作“侵略战争”也许是公平的。设想有人反而认为，被大国承认的政府从法律上来讲可以召集国外军队来镇压国内的叛乱，但叛乱分子却无权寻求外界帮助。再假设一下，这条规则甚至适用于叛乱分子在大片区域组成唯一有效的政府、唯一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的情况，²⁴处于这些情况下的叛乱分子正寻求某个国家的支持，这个国家因大国干预和颠覆已与其断然分离。²⁵如果假设的这条规则准确地解释了当今盛行的国际法体系，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这一法律体系将被藐视为缺乏道德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结论肯定是：这一法律体系只是认可帝国主义行为的工具。

这些问题在泰勒的讨论中从未直接出现过，部分原因是他很少触及与它们直接相关的1965年之前的时期。然而，他在谈论各种战争模式是否合法时，对类似问题的表述也不清楚。正如已指出的那样，泰勒认为，空战从内在上讲不是非法的，尽管在此事上“纽伦堡的缄默”尤其引起了“与美国对南越轰炸政策相关的”疑问（第142页）。他说，美方火力对村庄的常规性破坏、地面扫荡以及强制性疏散人口的合法性令人怀疑，而对窝藏越共的村庄进行报复性袭击——他指出，这是官方的政策——则“公然违背了”《日内瓦公约》（第145页）。此外，泰勒认为设立自由开火区是非法的（第147页）。但他强调的是更大的问题，是在决定合法原则应如何适用于越南的各种情况时产生的问题，而一个超级大国正在这里运用其技术资源摧毁藏匿于群众之中的游击队武装。基本问题如下：

敌人不尊重那些法律，地形又有利于妇女和儿童频繁地参加秘密行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并不会自报家门，我们的士兵很难区分个体的黄种人。正如65年前我们的部队离家成千上万英里身处菲律宾不适、危险、陌生的环境之中。对现实不会完全视而不见的人定能接受和体谅他们在区分无恶意的非战斗

敌人“无疑违反了传统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基于他们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上的所作所为”，这体现在两个具体方面：敌人没有像美军士兵那样佩戴“固定的、从远处可辨认的明显徽标”或“公开携带武器”。在纽伦堡重申的法律规定是：“协助、煽动或参与战争的平民应受到战争罪的惩罚。”泰勒写道，这貌似严厉却“绝对是法律”（第136—137页），²⁶只是因为这条法律也许不适用于为摧毁敌人意志或断绝其物资或人力资源而对村镇进行的轰炸。

这些评论几乎把“人民战争”定为非法，却容许工业国使用技术镇压它。越南式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把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联合起来，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界限因此模糊不清。越南革命者通常会跟随毛泽东思想的指令：“我们希望和平过渡，也应当争取这样。”²⁷连道格拉斯·派克也让步说，民族解放阵线“坚信它同越南共和国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Vietnam，简称“GVN”）和美国的冲突应该从政治层面解决，大规模地动用军队本身是非法的”，除非在美国和越南共和国政府的逼迫下“为了生存而反击”。²⁸民族解放阵线为了生存而使用反抗力量的时候，利用了其天然优势，它的游击队擅于混入抱有同情心的当地民众之中，美国也利用了自己在侦查和破坏技术方面的天然优势。

多年前，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家长征⁽²⁹⁾概括过人民战争的这些特征：

有些人只想依赖军事行动……他们总是相信，凡事都能被武力解决；他们不采取政治动员，不愿意做出解释去说服大家……他们精神饱满地作战，却忽略了政治工作；他们没有……这么做，让军队和人民能全心全意地彼此帮助。³⁰

伯纳德·法尔引用了这段话并指出：“敌人再一次仁慈地将其胜利的秘诀传给了我们。”³¹秘诀就是，获得人民的政治支持，使全体民众团结一致与受国外军事力量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是强迫——的中央政府做斗争。平民加入革命战争反映了战争的政治和社会特性，在关岛和泰国地盘上用B52进行的饱和轰炸显示出美国“镇压叛乱”行动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性。战争法规定，前者是非法的。而纽伦堡的缄默却栽在了美国的做法上。泰勒坚信，这些法令把拿起武器反抗外敌或反抗受其庇护的当地势力的平民判为战争犯；这些平民“无疑违反了”战争法。但美军飞行员摧毁了乡镇，破坏了农田和森林，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杀害了

无数印度支那的无名百姓，针对他们或制定这项决议的人，战争法几乎只字未提。“纽伦堡的缄默……引起的[疑问]”顶多“关系到美国在南越的轰炸政策”（第142页），也许还包括老挝和柬埔寨。

照此理解的法律是强者的武器，毫无道德力量或有效性。法律认定的是，受国外势力任命和支持的政府（比如在越南或匈牙利），有权召集国外势力镇压受到广泛政治支持且难以分清叛乱分子与老百姓的叛乱，而参与叛乱的平民也是战争犯。法律还规定，作战者必须向外国军队的士兵标示身份，承认这条法律有效是一个政治决定，而这条法律把士兵派到“离家数千英里”的“令人不悦的环境”中，他们在那里分不清非战斗人员和敌对党羽，也没人反对这条法律。

尽管泰勒坚持认为部队面临了种种困难和不确定的情况，但他毫无理由不去谴责把部队派往那里的政治领导人，或毫无理由一边给容许这一切的法律制度赋予合法性，一边又指控敌军的胜利秘诀：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利用这种支持以群众运动唯一可行的方式推翻国外超级大国在当地的代表。也就是说，除了大国有权在某片海外土地上靠武力强行建立它所选择的政权这一政治判断之外，给不出其他理由。照此解释的法律体系只是对帝国主义做法的认可。

尽管泰勒不那么直截了当，他似乎接受了美国有权在南越强行建立其所选政权的这一政治判断。他讨论战争目标时提到“我们的既定政策”，也就是指“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同时给予其对抗一切北越军事行径的防御性支持”（第189页）。他唯一表示的异议是，该政策不可能在越南的种种情况中行得通。至于对抗北越的“防御性支持”，他绝对清楚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作战部队从一开始就是本土化的，美国把这场战争变成国际化战事以后情况依然如此。他显然认为，美国像1960年代初那样引入其军事力量，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其1954年任命的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这是合法的。就像麦金莱⁽³²⁾为1898年美西战争辩护时那样，泰勒说这是“美国干涉主义传统中深厚的理想主义血脉”（第186页）。这是非常肤浅的历史判断。实际上，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以“理想主义”为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过。大英帝国、法兰西王国，还有东亚的日本人³³和东欧的俄国人都如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甚至无法抵抗这些妄想，这也并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用来评判帝国主义干涉其他事情的标准被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时，似乎就很难理解了。³⁴

泰勒质疑的是，强行重新安置居民、折磨囚犯的共谋分子、热衷阵

亡人数统计、破坏大片地区以暴露叛乱者、自由开火区和美山（Son My）屠杀等美国战争行径是否仅仅是“一场可怕、疯狂的过失”（第152页）。他正确地回答说，部分是前文所引述的越南战争的特性所致，这使战争法很难适用。实际上，强行重新安置居民和破坏该国大片地区的政策是对越南战争具体情况采取的合理甚至是必要的应对。伯纳德·法尔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者，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尚未达到最猛烈之时曾大力支持此次战争，他在1960年代初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事实：

我们必须动用优秀的精英部队，即美国、英国、法国的精锐或澳大利亚的突击队员以及特种战争院校，配以尖端技术所能提供的最佳武器，去打败越盟、阿尔及利亚人或某些马来西亚华人，而对方几乎无人接受过类似的专业训练，也仅在极少情况下与我方火力相当而已。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制度提供了全部的熟练技术，弥补了西方迄今为止努力支持的大部分政权缺乏民众支持和政治悟性的遗憾。在南越作战的美国人由于亲身经历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一事实。³⁵

如今，有很多证据支持法尔的结论。他写道：“真正的民众支持这一因素至关重要。”³⁶正是这种“真正的民众支持”导致华盛顿采取了强制性人口移除政策，使乡村荒弃。假如国际法对此只字不提，却把协助抵抗的平民当成战争犯，那么它体现的道德沦丧便昭然若揭。

二、在越南的“战争罪行”

然而，与纽伦堡和相关会议所设定的框架相比，泰勒考虑的主要话题仍是较狭窄的有关美国对越行动合法性的问题。通过分析美国1965年之后的干涉行动，泰勒断定，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美国犯下了战争罪，其罪责直达高层军事长官和文职官员。在这方面的证据十分广泛。

泰勒认为美莱村屠杀（My Lai massacre）是主要的例证。屠杀现场附近一家加拿大医院的院长阿勒耶·万内马（Alje Vennema）博士说，他立即得知了这件事，但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屠杀并不令人意外。他的病人经常告诉他此类事件。美莱村所在的广义省（Quang Ngai）实际上已经被毁坏，一半人口被迫住进难民营，孩子们饱受饥饿和伤痛。³⁷因美莱村屠杀而面临军事法庭指控的当地最高长官奥兰·亨德森（Oran

Henderson) 上校曾说：尽管“不是每个旅级部队都有一个瑞登奥尔”，但“每个类似规模的部队在某个地方都藏着一个美莱村”。³⁸

遍布美国的退伍军人给出的直接证词就能证明这一评论。随便举几个例子吧。1971年5月5日，一位战功卓越的直升机机枪手在得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市作证说，在他杀死的30名越南人中，有一位是骑自行车的老者，还有十人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每次他都听奉指挥官的直接命令执行这种任务。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作证说，给他下达的命令是，驾驶小型汽艇穿越运河三角洲地区，肆意扫射每个村子并检查是否还有居民。1970年12月1—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战争罪公民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上，第101空降师的医生作证说，在一次和平会议上，大约有27名平民无故遭猛烈发射小箭形钉的美军坦克袭击而被杀害。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前线观察员作证说，某次对两个村子进行无故炮火打击之后，他数出了20具平民尸体。另一位海军陆战队下士作证说，他所在的部队曾奉命向在垃圾堆中拾荒的饥饿平民开火，而他们的食物供给早在1966年就被摧毁了（在这片自由开火区，稻田已被凝固汽油弹烧光）。在某次由罗纳德·德勒姆斯（Ronald Dellums）议员主持的非正式议会委员会上，一位前陆军军士作证说，1969年4月，在美莱村附近的光庆村（Truong Khanh），他参与杀害了30名无助的越南平民。某难民营的越南妇女向记者们确认了该报道的真实性。³⁹和其他调查一样，底特律的冬日士兵调查团（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军暴行的证词。⁴⁰

已被确认“杀死”176人的前直升机机枪手曾告诉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他所在的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要阻止一群逃亡的农民。飞行员回答说他无法这么做的时候，接到的命令是“向他们射击”。30到40名手无寸铁的村民被武装直升机扫射而死。受训新兵说，在卡利判决之后，他们的教导员曾写信告知尼克松总统自己所参与的事件，一名直升机机组人员被击毙之后，六架武装直升机袭击了一个村子，杀死了350名村民。⁴¹

难民、记者和其他目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幕幕事件似乎是例行公事。

我曾亲自参与了一次常规行动。在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地区，美国眼镜蛇直升机向一个村子的房屋发射了20毫米口径的子弹，还射杀了逃出屋外的村民。指挥行动的美军中校把这称作“对这一地区的预先演练”。他解释说：“我们大致扫射一遍，

看看有什么活动的家伙。”他一再保证并补充说，这种做法十分常规化。⁴²

第25步兵师的官方地图划出了1967年章克申城行动⁽⁴³⁾开始地面扫荡之前需要炮轰和空袭的大片区域。根据早先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这些区域内有20多个人口达5 000人的可识别的村子。

《纽约时报》通讯记者R. W. 阿普尔（R. W. Apple）写道，他听说过“越南佬规则”（mere gook rule）⁽⁴⁴⁾，即“任何移动的、黄皮肤的家伙就是敌人，除非有无可辩驳的反面证据”，这条规则被“少校、中士、列兵重复讲了100遍”。他写道，这是“官方政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继续说：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制造难民，普通步兵对这一刻意的政策不明就里，在我们这些有机会周游这个国家的人看来却十分明了。一位陆军将军……向我这样解释了这个想法：“你必须排干游击队游泳的海水——就是农民，而最好的办法是猛烈轰炸他们的村子，他们会逃到我们设立的难民营。没有村子，就没有游击队，事情就这么简单。”⁴⁵

他接着说，不仅是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威斯特摩兰将军和艾布拉姆斯将军一定都知道此事。⁴⁶

正是这项“没有村民，就没有游击队”的政策——毁坏乡村社会的政策——被一些更加愤世嫉俗的、研究越南问题的学界技术专家称为“强征入伍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被泰勒恰当地评论为“一个终结一切委婉语的委婉语”（第202页）。阿普尔的叙述表明，这个政策并非疏忽大意或美军指挥部“无意间”才“偶然碰到”的什么办法，⁴⁷而是经过预先策划并达成了共识的。

尼尔·希汉⁽⁴⁸⁾有关战争罪⁴⁹的文章受到了广泛的讨论，他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希汉声称，“保密军事文件特别谈到轰炸共产分子控制地区的村庄，‘夺取敌人的人口资源’”。他指的是1966年夏进行的一次秘密研究，该研究提出重新考虑无限制轰炸和炮击政策，使人口“城市化”。⁵⁰他写道，这个提议被西贡的美方最高领导否决，但他们决定继续动用“空军和炮兵部队威胁农民，把农村夷为平地”。美国的一个基本策略是“无限制地空袭和炮击农民的村落”——“肆意摧毁已经成为〔美军〕获胜策略的基本要素”。乡村平民人口是美军袭击的目标，因为“他们相信其存

在对于敌方而言至关重要”。美军的想法是“通过除掉其战略基础，即农村人口”来打败越南共产分子。⁵¹

美国当局争辩说，美莱村不是越战的典型性事件。这么说也有道理。更典型的、几乎算得上微观战争的是离顺化（Hue）130英里的巴堂干半岛（Batangan Peninsula）普魁村（Phuqui）的故事。1969年1月，在一次美军的扫荡袭击中，这个地区12 000名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被塞上直升机运到广义省附近的各个审问中心和一个缺水的营地，营地上方飘荡的横幅上还写着：“我们感谢你们把我们从共产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根据官方军事统计数据，在六个月的战役中（此次行动也是一部分），有158名北越人民军和越共人员死亡，268人受伤。因为美军的猛烈轰炸、炮击和海上射击，这些难民（好像顺带还包括美莱村的幸存者）在强制疏散之前曾在山洞和煤仓里生活达数月之久。水坝被“美军飞机炸毁，阻断了北越人的食物供给”。⁵²

到1971年4月为止，水坝还没有修复，“结果，南中国海的咸水继而淹没了曾经长着稻谷的农田”。大约有4万名难民（包括普魁村的1 500名难民）重回故乡。普魁村由10英尺高的竹林所围绕，处于监管之下，下午6点到上午5点之间人们不得进入或离开此地。“淹没的稻田四周群山环绕，曾经散落着小屋，现在‘都是铁家伙’——农民们用这个词指四处满是弹片、地雷和未爆炸的炮弹。B-52打出近20英尺深的弹坑，满山遍野凹凸不平。”水坝没有重建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用一位美军官员的话来讲：“两年前半岛上的居民就被当作共产分子勾掉了。假如这些看法如今还在越南人心中徘徊，也不足为奇。”大部分人没有主食可吃。“省级官员们既不确定也不否认要动用警力来限制供给农民大米……然而，长期以来的做法是，控制南越的食物供给，确保越共无法消费农民多余的粮食。”在该省工作的一位美国人说：“你们也许可以说，普魁已经被遗忘了。”和与它类似的成百上千个其他村庄一样，普魁已经被遗忘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记录，也是对不断升级的恐怖局势的记录。根据伯纳德·法尔在战争早期阶段提到的原因，⁵³也许美国别无选择。⁵⁴战争针对的是农村人口和供养他们的土地。自1961至1962年起，美军直接参与轰炸、扫射、强迫千百万名农民进行人口迁移、毁坏庄稼、除尽丛林树叶、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千百万个弹坑使地面坑坑洼洼，树木被弹片击得满是窟窿，森林里无木可伐。大约650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了化学毒剂，通常浓度极高，使树叶全部落下，也许还包括50万英亩种植着农作物的土地。根据越南方面的消息，南越曾是主要的大米出口地，现在却在大量地进口粮食。⁵⁵大约每6英亩土地中

就有1英亩被喷洒了落叶剂，在很多地区没有植被恢复的迹象。农作物主要是被含砷化合物毁坏的，后者会在土壤中残留数年之久，而在美国也没有批准在农作物上使用这种化合物。除草剂中有一种杂质是盐酸强力霉素，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强力药剂，会造成哺乳动物的生殖缺陷。1969年全年，50万英亩的森林被带有罗马式犁片的巨型拖拉机毁坏，这种拖拉机在其他地区也被广泛地使用。这些地区被削刮得干干净净，也许会寸草不生。生物学家、前海军官员、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除草剂评估委员会主任亚瑟·威斯汀（Arthur Westing）写道：“我们可能急剧并有害地改变了南越广大地区的生态。”⁵⁶“这些植被荒地在未来几十年将是我们在场的遗留证据之一”，⁵⁷也许是永久性的。

很容易想象这些人口政策的结果。自1961年起，因毁坏农作物和强制人口迁移造成的饥饿和饥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⁵⁸到1960年代早期，千百万人被迁走——通常靠武力——并住进控制区。1965年以后，空袭、炮击和地面扫荡造成的难民占绝大多数。

在南越，半数人口被杀害、致残或赶出家园。在老挝，300万人口中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难民，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在史上最猛烈的轰炸中过活。难民们说，他们住在山洞和隧道里，轰炸十分猛烈，连狗过马路都会被美军飞机袭击。随着轰炸范围的扩大，整个村子的人不停地搬进森林更深处的隧道。老挝北部肥沃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最终也被清理为自由开火区。这些难民还顺便提到，他们很少见到北越人民军的部队，村子里也很少出现过巴特寮⁽⁵⁹⁾老挝士兵。这里谈到的地区离南越或“胡志明小道”都很远。据肯尼迪政府的小组委员会估计，在柬埔寨，经过四个月的定期轰炸，到1970年9月为止，600万人口中有大约100万难民。被俘的通讯记者也描述了密集的轰炸。据理查德·达德曼（Richard Dudman）在被俘囚禁期间的直接观察，“轰炸和射击使柬埔寨乡村人民更加激进，乡村变成了广阔、有效和专门的革命基地”。⁶⁰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一样，这既是美国轰炸的因，也是果。

1971年4月21日，刚从印度支那回来的保罗·麦克罗斯基（Paul McCloskey）议员在肯尼迪政府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一位泰国乌隆（Udon）空军基地的空军中校说：“从这一点上讲，老挝北部或越南南部已没有任何村庄。”机密的政府报告在麦克罗斯基的辛苦努力下被公之于众，确认了难民叙述的大量证据属实，主要涉及美军对老挝巴特寮控制下的大部分老挝农村地区进行的实质性破坏。⁶¹

在越南的情况几乎一样。麦克罗斯基引用了一位民事行动及革命发展支持计划高级官员的话，一年前他在越南告诉麦克罗斯基：“仅在广南（Quang Nam）一省，美军及其盟军就摧毁并夷平了全省原先555个村落中的307个村子。”他还补充说：“我曾飞过一平方英里又一平方英里的土地，每个村子、家园和树林都被烧成平地。这是‘断绝大米’搜索破坏计划的一部分，无可否认的是，该计划是出于切断越共获取村民能提供的粮食、医疗、掩护和隐蔽的需要。”⁶²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The United States Army Field Manual*）允许采取措施“通过使用对人无害的化学药剂或菌剂毁掉仅供武装部队食用的农作物（若这一事实确凿的话）”。⁶³但上述毁坏农作物的描述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的描述都表明，被毁掉的所有粮食本应供给平民。应该记住的是，戈林⁶⁴在纽伦堡被判反人类罪，部分原因是他下令挪用占领区的粮食供应德军，而在东京，美国也支持起诉日本军事头目毁坏中国的农作物。⁶⁵

麦克罗斯基所描述的广南省是前国际开发署（AID）高级官员威廉·奈斯旺格⁶⁶所写的一本书的主题。他解释说：“政府在广南战役中输给了越共军队，大部分越共军队的士兵都是从该省招募的。”越共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计划显示出“先进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取得成功是通过成功的计划⁶⁷获取了民众的支持，这也导致美国竭力要摧毁革命所根植的农村社会。

罗伯特·沙泼林⁶⁸总结说：“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社会方面，战争对越南人民的总体影响都是灾难般的、毁坏性的。”⁶⁹而且这些影响大部分归咎于美国的火力和战略。除非我们假设美军指挥部和华盛顿的文职领导人愚钝至极，否则就必须假设，这些战略被制定的时候他们就已预想到了一些情况。况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有些刚刚被引述过）表明，他们已预先了解到了一些可能的影响，甚至是蓄意为之。最后，需要牢记的是，这些战略虽然在1965年被加剧地使用，并在1968年再度重演，其实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实际上，在1950年代中期，由美国扶植上台的吴庭艳政权就对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的农民支持者发动了实质性的战争。⁷⁰

面对这些已被详细记录在大量公开资料中的证据，人们必须采取真正显示信仰的行为，从纽伦堡审判的角度去质疑美军指挥部和文职当局是否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事实上，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实施的整体政策背景下，美莱村事件相对而言微不足道，人们很难理解为何要对美

莱村表示惊讶或关注。

泰勒正确且恰当地评论道：“就其1964年以后达到的大规模致命范围而言，这场战争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和管理者所为”——待在约翰逊总统身边的肯尼迪的顾问、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罗斯托，“他们必须对这场战争及其进程负主要的责任”（第205页）。1961—1964年的战争亦是如此，其结果是致命性的，确切地说比起之后的战争虽然影响不算大，但仍然难以符合文明的标准。

若无法以“敌方”罪行描述“相抵”，有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就会被尖锐地批驳为不诚实之举，或是自我憎恶的一种形式。这种批评往好处说是考虑欠周，往坏处说就是言不由衷。美国在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的犯罪暴行不仅比印度支那的任何军队都严重，而且从法律和道德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因为显然其本质是外国势力。若有人声称，对“二战”中法西斯侵略者的行为的讨论必须以占领国的激烈抵抗行动的描述“相抵”，我们将如何回应呢？况且，这些批评家极少提及的是，如果要以均衡的方式来讨论所有参战国的罪行，那么也有必要细究由受雇于美国的韩国和其他亚洲雇佣军所犯下的罪行，更重要的还有受美军扶植和保护的政权的犯罪暴行。美军对南越人民的袭击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并远胜其越南敌手所采取的恐怖行动。⁷¹批评美国干涉的评论家们一致表达的观点也同样考虑欠周或言不由衷。他们说，美军指挥部已经降到了共产分子的水平。毫无疑问，在这场悲惨的冲突中，美国袭击南越民众的野蛮暴行简直无人能及。⁷²

被多次引述以证明相反情况的例子是1968年2月春节攻势⁽⁷³⁾期间发生在顺化的大屠杀。屠杀就发生在1965年初被美军摧毁的地区，我们先不考虑这一事实，只考虑一下屠杀事件本身。该事件在美英两国恶名昭彰，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血洗行动的经典案例。唐·奥伯道夫⁽⁷⁴⁾将其描述为“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⁷⁵据估计，这次共产分子屠杀的人从200人（顺化的警察局长）到1 800人不等（奥伯道夫依据的是道格拉斯·派克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他把派克看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国际志愿服务者莱恩·阿克兰（Len Ackland）1967年在顺化工作，1968年4月返回顺化进行调查。美国和越南的官员告诉他，大约有700名越南人被越共杀害，这一估测人数与他深入调查的结果大致相符，这也说明当地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进行了屠杀，而且主要发生在部队撤离这场持续一个月的血腥战斗的最后几天。⁷⁶无论具体数字有多少，毋庸置疑的是，发生了残忍的屠杀。

奥伯道夫鲜少提到的是，与此同时，顺化还发生了另一场杀戮。⁷⁷ 很多人遗忘了此事或保持沉默、置之不理。据提到越共杀害700人的那些官员估计，有3 000至4 000名平民在美国和越南共和国的轰炸和炮击中死亡。美国空军副部长汤森德·胡普斯（Townsend Hoopes）说，有2 000名平民被埋在轰炸后的碎石中。民族解放阵线也提到，有2 000名轰炸受害者被埋在集体坟墓。（奥伯道夫说，在集体坟墓中发现了“2 800名占领区的受害者”——这些坟墓数月后被人发现，经详细尸检断定这些人是共产分子进行“政治杀戮”的受害者，但有人或许对此表示怀疑。）据奥伯道夫说，海军陆战队列出“共产分子的损失”大约有5 000多人，而胡普斯声称，占领该城的1 000人共产分子部队有“相当多一部分人”逃走了。据一位来自顺化的法国牧师估计，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该城后，约有1 100人（大部分是学生、教师和牧师）被越南共和国当局杀害。⁷⁸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理查德·韦斯特⁽⁷⁹⁾就来到了顺化。据他估计，“有几百名越南人和少数外国人”被共产分子杀害。他还提醒说，在集体坟墓中埋葬的可能是美莱村式屠杀行动的受害者。⁸⁰ 英国摄影记者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总结说，大部分受害者“被所能见到的最疯狂的美军火力杀害”之后被认定为“共产屠杀的受害者”。⁸¹

即使被英语国家一致认定为事实的美国政府宣传是真实的，并且整个事件被切实报道，但在美国杀戮南越人民的背景下，顺化的共产屠杀仍是小事一桩。然而，考虑各种事实之后，顺化屠杀似乎很大程度上，并且可能是主要地，要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各方对抗势力所采用的暴力手段的相对规模而言，这样说不足为奇。

还有两个基本要点需要讨论：第一个是美国采取行动是受“军事上的必要性”促使的观点；第二个说法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美国的干涉在反抗武装袭击的集体自卫方面是合理的。泰勒讨论了这两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却不过尔尔。

三、军事上的必要性

“没有村庄，就没有游击队”的美国式方针是基于军事上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确的。美国的规划者们十分清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即所谓的“越共”）拥有广大的民众支持，而政府却缺乏重要的群众基础（见第108—109页，出处同上）。此外，越共为何如此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也不是什么大秘密。⁸²

1965年，美国援外使团现场操作协调员约翰·保罗·万尼给众人传阅了一份有关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报告。⁸³他设定的前提是，南越正在进行一场“主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社会革命，而“南越政府目前并没有群众政治基础”。他写道：“农业人口的不满……如今主要通过他们与民族解放阵线的结盟表达了出来。现有的政府一心只想剥削农村人口和更底层的城市人口。”他解释道：既然期望“不谙世事、基本不识字的农村人口[会]看出并反对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显得太过天真，那么美国就应在其维护的“独裁政府”体制下对民众实施“有效的政治教导”。该报告反对仅仅依赖机械装置、空军力量、炮兵部队，并拒绝认同某位美国官员的观点，后者声称：“假如这些人想待在那里支持共产分子，那么他们就等着被轰炸吧。”报告又基于进一步的假设，即“社会革命”并非与美国的目标格格不入，只有通过“非共产党的政府”才能实现“大多数人的愿望”。在万尼看来，应该由美国来判定对于不谙世事的越南农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他认为，美国“……在为一个有民主倾向的[政府]奠定基础时”必须强加“一个有仁慈意愿的专制或独裁制度”。万尼的报告表达出帝国主义的仁慈一面，直言不讳地道出其殖民假设。从泰勒对此事的某些评论中，我们也许能推测出他会赞同万尼的建议和主要假设。

正如已提及的那样，泰勒一边接受为“获得并保有南越人对非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忠诚度”而做出努力的合法性（第189页），一边又怀疑这么做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缺陷在于错误评判和过度地依赖军事手段（第188—189页）。他谴责美国当局“维护不善”——轰炸过多但对“半数平民”关注不够（第196—202页）。对于美国在1960年代早期直接动用武力，或为维护其扶植的政权在1950年代晚期支持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他并无异议。⁸⁴他也从未提出过这一根本性问题：美国动用其力量在某片国外土地上强加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那么假设在武力使用“均衡”的限度内可以这样，但这样做合法吗？

泰勒没有提出这一问题，那么他有关“因果关系”的讨论就令人大失所望了。他拒绝接受某些未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观点：“事情[出了]差错……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战犯。”“就因果关系而言”，这“是个不尽人意的答案，因为它假设领导人想让一切成为本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那些负责人显然对其政策实施的当前结果极为不满”。无论是批评还是泰勒对其抗拒的态度，只有在如下假设中才能说得过去：就美国领导层而言，不存在意图合法性的问题。假如我们认为美国领导人的意图具有犯罪性质，那么我们说事情出错（即采取了犯罪行为）——实际上这也是赘述——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是战争罪犯。有了这个假设，再说

事情与他们预想的不同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人们也不会认为，纽伦堡的被告本应被宣判无罪，仅仅因为他们也“对自身政策的结果不满意”。

提到“事情[出了]差错”，泰勒似乎想到的是“大量的死亡和毁坏”，这破坏了“一切可能促使我们当初插手越南、维护和平的保护性意图”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在泰勒看来，这个证据“足以证明目的和手段不一致，军事领导者从未理解干涉的根本政治目标，政治领导人也忽视或无法监督军队为完成他们所构想的任务而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为他们反抗北部军事手段提供防御性帮助时”，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为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而继续执行“我们的既定政策”，相反却选择“忽略所有南越人，把南越当作战场，杀害战场上或向战场聚拢的所有北越人或越共”——实际上，也是以同样方式对待南越的农村人口的。“美国在越南历险的悲痛经历就是，军事手段迅速盖过了政治目的……”，我们“容易弄碎我们极力保护的东西”（第188—189、207页）。

泰勒评论道，是否“我们的既定政策”本应被成功地遵守“是而且将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我们的既定政策”首先是否合法、是否本应被执行不仅是一个未被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从未被提出的问题，但它肯定是根本性问题。

泰勒批评美国政策时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用春节攻势期间因负责摧毁越南槟榔（Ben Tre）而郁闷的美国空军少校的话来说，我们为了保护这个国家而摧毁了它。我认为，真正的“美国悲剧”——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对其他许多国家也是潜在的悲剧——是我们一直无法把我们恰当地用来评价其他列强行为的标准放在自己身上。假如美国人有道德勇气这么做的话，我们会自问在为谁“保护”越南、是否为了“保护”它而有权进行干涉。我们会发觉，美国的干涉应该被看作是打击越南乡村社会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谁去力图保护它，除了服务于通敌卖国的领导人和他们所能召集的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最终，美国领导人是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在保护越南。五角大楼的文件披露，据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估计，越南人民的利益只占美国目标10%的内容（他陈述美国目标时说，其他90%是幻想和自我欺骗的总和——参见《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195）。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目标还是件需要合理辩论的事（本人观点见《因为国家》第1章第5节）。但越南人的需要和利益与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法律禁令一样微不足道。

假如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关心南越人的需要和利益，或关注美国庄严的条约义务，他们就不会执行此类“既定政策”：强行建立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并在1964年一直保护其免受本国国民破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入侵南越去摧毁当地的反抗势力。五角大楼的文件表明，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明知故犯地攻击了南越的乡村社会。上面所说的万尼备忘录以及其他证据都显示，那些正在执行华盛顿拟定的政策的人也是如此。

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的一些失败可以追溯到这一事实：“陆海空三军不再拥有能与‘二战’英雄相提并论的有声望、有想象力的领导者。”（第201页）这个批评并不公正。“二战”与越南的区别与战争性质有关，却与军事指挥员的性格无关。两场战争中的军队都被委托去实施文职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就越南的情况而言，这项政策是“获取并保有南越人对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忠诚度”。为了有效地实施这项政策，军事指挥部被迫放弃温和的帝国主义姿态去摧毁乡村社会——这场革命的社会基础。文职领导人十分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不打算更改政策。

1967—1968年间任越南共和国和平总顾问的罗伯特·W.科默（Robert W. Komer）大使解释说：“美国的军事干预为频繁发生政变的越南共和国免遭最终垮台开创了有利的军事环境，使得控制主要乡村人口并取得其支持的政治竞争再次展开。”⁸⁵美国的军事升级克服了“在西贡以外地区……越南共和国管理薄弱”的困难，在积极应对明显的“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中，最终实行了“综合的”“大规模的”1967—1970年调解计划。⁸⁶像万尼这样仁慈的帝国主义者疑虑重重。此外，他们很难理解，除了运用手段（也就是说科默所说的“付出惊人代价的大规模美国军事干涉”）之外怎么能实现这个目标。⁸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军事干涉所付出的惊人代价——包括喷洒落叶剂、强制性移除人口、轰炸、骚扰和封锁、划出自由开火区、使用杀伤性武器、进行刺杀和恐怖行动的凤凰计划、⁸⁸为获取情报虐囚——是一种军事上的必要性，因此也不算是罪行，假如军事必要性说明背离国际协定的语言是合理的话。考虑到这一根本性的前提——在这场“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中，为确保其在1954年最早强行创立的政权及其继任者的统治，美国进行武力干涉是正当的，这一切是有争议的。该政权的统治是指拥有土地的城市精英、军事长官和北部天主教徒的统治，他们为一个显然无法独自经受国内叛乱的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1965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前提合理与否的问题以最尖锐的

形式体现了出来，而泰勒本人却对此无动于衷。据万尼说，⁸⁹到1965年为止，这些原则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他写道，在“美国地面部队大规模加入”之后，“几乎难以想象的是，因为没有获得军事胜利或确保南越自治的协商解决办法，美国将从越南撤军”。⁹⁰与管理层打交道的平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直言不讳的鸽派。因此，理查德·古德温⁽⁹¹⁾在1966年写道，“坚实、重要的美国利益”证明美国持续进行的战斗是合理的，这一利益必须作为形成政策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要确定美国的军事力量一旦致力于保卫另一个国家，⁹²就不能被迫从阵地上离开”。⁹³

即使在今天，美军指挥部也十分明白，军事力量必须用来摧毁西贡政权无法从政治上击败的政治运动。由湄公河三角洲美军高级官员约翰·H.库什曼（John H. Cushman）将军授意进行的特殊情报调查警告说，敌人正在扩展政治网络并“回到政治斗争的阶段”。⁹⁴威廉·科尔比补充说：“我们需要阻止敌人打入这个网络，因为这样会使共产主义分子很快焕发生机。”⁹⁵让我们再一次假设存在这样的前提：美国有权干涉并强迫自己挑选的政权，那么“军事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证明美国继续动用大量军事力量攻击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的乡村人民是正当的。

应当补充的是，美国干涉别国事务纯属正当这一前提在美国历史上一直被坚信不疑。泰勒提到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征服了菲律宾群岛。不管麦金利可能声称过有什么“理想化”的动机，事实却是，美国运用武力和恐怖行动制服了越南国内的群众运动，使当地居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70年后，农民（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被西班牙占领时期相比差别不大。⁹⁶在泰国，由自由民主派比里·帕侬荣⁽⁹⁷⁾领导的战后议会民主制被军事政变推翻，并把曾向美国宣战的亲日政府重新推上台。美国源源不断的大力援助支撑起一个甘愿将自身纳入美—日太平洋系统的恐怖政权。比里在“二战”期间曾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⁹⁸⁾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后来去了中国。1945年，美国在朝鲜利用日本军队和朝鲜亲日派推翻了当时的群众政权。到1949年为止，美军指挥部已经成功地捣毁了已有的联盟、当地群众委员会以及所有的当地群众组织，建立起由富有精英阶层和宪兵队组成的右翼专制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也采取了大量的恐怖行为。

越南之所以比较特殊，只是因为美国一直很难对其实现这些熟悉的目标。对越南的目标依然是：集中控制人口，将其与游击队的主要兵力隔绝开来，同时发展依赖型经济，在富有的合作派统治下，以民主的幌

子使其适应西方（和日本）工业社会的需求和生产能力。至于农民，我们不妨回想下一位南越作家提到法国人统治时期时所说的话：“农民们[可以]在稻田里咬牙切齿地满怀憎恨。”⁹⁹那么，悲惨的城市贫民窟居民也可以这样做。

这实际上就是那些温和的帝国主义者（例如万尼）为欠发达社会所提供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点。正是为了取得如此辉煌的结果，他们才愿意把印度支那人民（据称是为了印度支那人民好）交付给美国的技术并受其裨益，正如过去十年间他们在越南所做的那样。

四、侵略与集体自卫

最后要考虑的事情是泰勒所说的纽伦堡的“显著特征”，即反和平罪的问题。泰勒认为，美国干涉越南的正当理由只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援引这条规定就是假设美国对北越的武装袭击采取了集体自卫。此事已引起广泛的讨论。奇怪的是，泰勒很少提及相关的讨论，也未全面分析法律和历史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争论。¹⁰⁰要把美国当个案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干涉在先，并且比北越的参与面更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日内瓦协议》的统一规定被推翻之后，北越人和美国人在南越作战的相对权利是什么？）以某个特殊时期来说，想想1965年，当时泰勒开始怀疑美国参与的合法性问题。切斯特·库珀⁽¹⁰¹⁾自1954年起就直接参与东南亚事务，后来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负责白宫的亚洲事务。他写道：

在1965年初的数月间，共产主义力量大幅增长。到4月底，在南越有100 000名越共非正规军和38 000至46 000名左右的敌军主力（其中包括一个营的北越正规军）。同时，美国作战部队快速挺进南越，在4月下旬，已部署了35 000名美军士兵，到5月初，士兵数量增至45 000名。¹⁰²

在4月下旬，还初步探查到一个营的北越兵力，人数为400—500名。¹⁰³

1965年2月，约翰逊政府试图用白皮书为新的军事升级辩白。库珀评论说，这份白皮书“结果令人沮丧且大失所望”。问题在于，“[有关北越军事参与的]实际发现显得微不足道”。无法探查到正规军。至于渗透

者（即使把所说的“已知”和“可能”的渗透者加起来），在1959年叛乱稳步进展时就开始参与一般性渗透南越活动的“每年也只不过9 000人”，与已部署的50万西贡军和23 000名美国正规军相比“出没人数也不算庞大”。他说，“关于敌人武器的消息也没那么耸人听闻”。与美国自1961年起提供给西贡政府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相比，缴获的（也许从公开市场购得的）3座中国产75毫米无后坐力炮、46支苏联造步枪、40支冲锋枪和1支捷克产自动手枪显得微乎其微。¹⁰⁴据I. F.斯通⁽¹⁰⁵⁾当时说，实际上，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武器在被缴获的武器中还不到2.5%。¹⁰⁶

说起渗透者，其数量也显得微不足道，假如我们回想一下，众所周知的是，当时有大量南越人回到了故乡。我们很难理解，在推翻《日内瓦协议》、美国和西贡违反《日内瓦协议》、¹⁰⁷吴庭艳式镇压和1957年南越重新开始游击战之后，南越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况且，库珀没有提到在美国军事基地受训后被美国派遣去渗透南越的南越人；也没有提到自1956年之后以同样方式派遣由南越人组成的渗透北越的破坏组织和游击队（据伯纳德·法尔所说）。¹⁰⁸最后，库珀也没有提到，美军自1961—1962年起就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

总之，美国只是为反击北越武装袭击而行使固有的集体自卫权，这一理由实在太薄弱。但维护美国干预合法性的人甚至得寸进尺地声称，美国有权单方面确定“北越有侵略行为”并继续升级其在南越的大范围军事参与，对《联合国宪章》有关由安理会确定是否对和平造成威胁的规定视而不见。除非承认这一切，否则我们只有得出结论，美国的军事行动是非法的，其本身已构成侵略——侵略不是来自北部，而是来自东部。

不幸的是，泰勒对这些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言不发。他对待侵略问题的态度总体上很难令人满意。在讨论北越对南越犯下侵略罪这一指控时，泰勒提到了“有力证据”。“毫无疑问，地面战争都发生在南越”，而不在北越。但他认为情况尚不明朗，因为《日内瓦协议》只划定了两个“区域”并明确宣布，军事分界线是“暂时的”而并非“政治或地区边界”（第101—102页）。此外，受美国支持的南越拒绝继续进行预定的选举。当然，假如不清楚北越是否犯了侵略罪，相应地也不会清楚根据第51条规定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否正当。第51条规定实际上没有提到“侵略”，而是提到了“武装袭击”这种更细致的分类。¹⁰⁹

此外，泰勒引述和质疑的“有力证据”也开辟了其他道路。例如，地面战争发生在南越，而不在美国。按照泰勒的标准，这样就有“有力证

据”表明美国对南越犯下了侵略罪，尤其是从美国当局承认越南共和国在1965年之前对西贡以外的地区管理薄弱（见此前出处第121、124页）之时起。泰勒讨论侵略战争时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¹¹⁰相反，他陈述了美国可能发起侵略的情况：

.....情况.....基于如下结论：南越和美国都因其对北越的敌对行动、非法对待和拒绝执行规定的1956年全国大选而违背了1954年《日内瓦宣言》；美国也因轰炸北越而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96—97页]

但这些指控只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更严重的指控是，美国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这些指控的依据是打击一次叛乱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此次叛乱有群众基础并且获得了成功，甚至比自己扶植和维护的政府还要深得民心，后者到1965年为止战败，而北越却没有任何正规军。我猜测泰勒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因为他暗自假设美国有权动用地面部队、直升机和空军去干涉美国当局所认定的“革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见此前出处第124页）。

我们也可以认为，《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或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条文（具体是第2条第4款规定）已经失去了约束力，无法被有效地执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托马斯·M.弗兰克⁽¹¹¹⁾讨论了这一问题。¹¹²他探讨了“战后25年间的现实变化”，打破了第2条第4款规定的准则，“留下了的只有文字”。弗兰克讨论说：“两个超级大国都成功地在其区域组织内建立起行为准则，有效地破坏了第2条第4款规定”，而起初是美国坚持强调“国家主权应让位于某个地区要求遵从其地区标准的压倒一切的权利”，他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例子就是美国在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中谴责的“不受外国军队干涉倒要受‘外国’意识形态干涉”。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早期的直接做法。弗兰克评论道：“民族自身利益，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民族自身利益，通常会胜过条约义务。”他这么说也是正确的。还可以补充的是，美国已经形成了“区域组织”概念，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纳入了一个拥有自由行动权的“区域组织”，而违背第2条第4款规定的行为按理可以追溯到战后各强国为获得影响范围而采取的迅速活动。英美自1944年起先后干涉希腊就是明显的实例。

尽管弗兰克对各国的行为做出了重要的评论，但在我看来，他对某些实例的讨论仍有瑕疵，他间接地偏向这些大国。在讨论“变化中的战

争本质”时，他引述了两种分类：“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由代理人进行的煽动性、渗透性、颠覆性战争”和核战争。就直接违背第2条第4款规定而言，主要受到关注的当然是第一种分类，尽管各大国试图掩盖其干涉行动，生怕被推测出其干涉行动与列强间的冲突有关。但弗兰克对这一分类的讨论回避了基本问题的实质。他随后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人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侵略战争或颠覆性战争，反之亦然。”这显示出他的偏向，因为他通常站在第二个人的立场上认为：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新型战争的特点是由代理人所带来的渗透与颠覆。假如从相反的视角看，这些战争就应当具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干涉特色，那么由此可知，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不是“战后25年间的现实变化”造成的，而主要是大国传统行为的战后形式造成的。弗兰克以他特有的方式回避了问题本质，似乎毫无争论地，甚至无需明言地站在了大国一边。他后来提到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第三个因素，即“受某超级大国支配的区域体制日益专制化”，并广泛地讨论了各大国在各自“区域组织”内通过不断干涉最终破坏第2条第4款规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偏向也仅在此时有所缓和。

弗兰克提到为当地共产分子叛乱提供的“重要支持”（例如，中国对老挝和越南的支持）时也有类似的偏向。根据他进一步的评论显示，现有证据表明，与美国和其盟国对右翼势力提供的援助相比，来自中国的援助一直都很少。弗兰克所说的宣传也是一种干涉形式，几乎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立场一向是，民族解放战争肯定是当地事务，不可能依靠大量来自中国的物质支持。顺带提一下，就已知情况而言，在印度支那作战的仅有的中国军队是在老挝的秘密行动中受美国雇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

弗兰克断言：“从本质上来说，小范围的、分散却又重要而频繁的新的叛乱使明确区分侵略和自卫……变得异常困难。”此时他回避了同一个问题的实质。他又指出，“被告知波兰袭击了德国或者韩国袭击了朝鲜”都太脱离实际，但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情况下，“通常甚至更难令人信服地确定”谁才是侵略者。他也许用了不同的类推法。被告知匈牙利在1956年袭击了苏联，或菲律宾在19、20世纪之交袭击了美国，或美国殖民地在1776年袭击了英国，都太脱离实际。假如我们的观点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大国干涉是经典模式的延续，肯定会有某些修改，那么这些类推都是恰当的，战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新事物。

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外部支持，请回想一下法国人在美国革命战争

中对美国殖民地的大力支持吧。

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革命战争如果被认为是“正常”叛乱，完全与许多侵扰20世纪中期的革命相切合。除去近两个世纪之前的7月4日演讲，这场革命是由武装起来的一小部分人进行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军队很快超过了8 000人，而全国至少有300 000名体格健全的男性），后援是有31 897名士兵的法国地面部队，还有驾驶着61艘大船的12 66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¹¹³

即使补足了7月4日演讲的影响力，我们也会毫不费力地评价一下某位当代英国作家的偏见，他套用弗兰克的话把美国革命描述为一场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由代理人进行的煽动性、渗透性、颠覆性战争。我认为，法尔的观点比起此处引述的弗兰克讨论部分所间接体现的立场更近乎准确。按照法尔的观点，我们只好总结说，战后并没有什么导致第2条第4款规定失去约束力的新因素。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人们必须赞同吴丹⁽¹¹⁴⁾的话（根据弗兰克的引用）：“归根结底，只要超级大国一声称他们看到对其安全的威胁就坚持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世界和平就无法有坚实的基础”¹¹⁵——或者我们可以补充说，一旦有对主要社会集团可觉察的自身利益的威胁的话。

尽管我们对第2条第4款规定“仅剩文字”这一点确信无疑，但似乎也没有理由假设说，这是早期模式的某种变化，是《联合国宪章》制定者原本不可能预见的国际事务的变化结果。此外，也没有理由总结说，第2条第4款规定的准则应当被视为无法生效。当然，这些准则缺乏一个强制执行的权威机构，这也是国际法的通病。

无论就纽伦堡而言还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干涉权问题和大国以武力威胁或动用武力强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和政治安排应当处于调查越南问题的首位。泰勒甚至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讨论的意义也就大大削弱。对未来的政策决策而言，这些肯定都是重大的问题。美国在全球十几个地方正为试图镇压内部叛乱的政权提供着军事支持，其方式可能导致直接的军事干预。¹¹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希腊，是美国为上校军官们提供了军事支持而阻止了民众叛乱。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的拉美政权目前都能够镇压其任性的敌手发起的乡村叛乱。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比1950年代富尔亨西奥·

巴蒂斯塔政府⁽¹¹⁷⁾更懦弱的政权。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共安全处至少在14个共和国培训警察，组成抵御恐怖行动的第一道防线；军队的装备更加完善，因为有17.5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投放到美洲；超过20 000名拉丁裔军官和士兵在运河区的古利克堡（Ft. Gulick）受训，现在使用的是在越南开发的新式反游击队武器，包括从特别设计的直升飞机到体味探测器等各个种类。¹¹⁸

这些话令人想起麦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1963年的评论：“我们有一个正在使用的实验室，在那里我们看到颠覆性的叛乱……以各种形式被实施着。”五角大楼意识到“把这片区域当作实验室的重要性”，早已“往那边派出小组，查看这种游击战的设备要求”。¹¹⁹实际上，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美国利用了越南，把那里当作了反暴乱实验室，为其预期的战争测试武器和战略，和1936—1939年间其他列强利用西班牙的方式一样。¹²⁰

在使用越南实验室设计反暴乱技术的拉美政权中，有几个政权的存在要拜美国干涉所赐。在危地马拉，某个具有改革思维的、有前途的政权因美国1954年的颠覆而被推翻。在过去几年的反共歼灭运动中，曾发生过一起实质意义上的大屠杀，大约有4 000名农民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武器则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¹²¹唐纳德·罗宾逊（Donald Robinson）说，他亲眼见过特种作战部队小组训练危地马拉空军如何用新设计的贝尔直升机去追踪游击队。¹²²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也许更多。副总统马洛昆·罗哈斯（Marroquin Rojas）几年前称，在巴拿马基地的美军飞机正在突袭危地马拉，在疑似窝藏游击队的区域投放了凝固汽油之后¹²³返回了巴拿马的基地。在危地马拉工作的传教士说，他们目睹了凝固汽油突袭造成的后果。

美国在战后时期参与反动战争的范围无法被真正地估测出来。有足够的信息表明其范围很广。虽然并非只有美国在使用武力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但其他任何国家在战后时期使用的军事力量，还不及美国以全力摧毁与其对峙的别国本土部队的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

有关这种反动干涉的总方针在肯尼迪当政期间几乎上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并蕴含在亨利·基辛格的“有限战争”原则之中。¹²⁴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对待有关国家政策或在纽伦堡提出（有时是被绕开）的一些一般性问题（与合法性和正义有关）的调查（在众多条约和国际协议中，

这些一般性问题虽然被涉及但很少被直接面对，并且通过越南的悲剧已被强加到了文明人的意识里），那么，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正是这种总方针。

（本文是向一次有关战争罪行专题的讨论会投稿的修改稿，主要内容基于泰尔福德·泰勒所著《纽伦堡与越南：美国的悲剧》[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原文发表在《耶鲁法律期刊》第80卷第1期 [*Yale Law Journal* 80,no. 7, June 1971]，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212—258页。）

外交政策与知识分子阶层⁽¹²⁵⁾

因此，我们对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一再干涉（隐秘的和公开的）、对越南人民的残忍袭击，更不用说宽宏地纵容几个完全依赖美国武装和贷款的恶劣上校废除希腊民主，⁽¹²⁶⁾似乎都只是偶然事件，或者只是失误。

——菲利普·拉夫⁽¹²⁷⁾，《纽约书评》，1967年10月12日

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个好办法就是从调查其国内社会结构入手：是谁制定了外交政策？这些人代表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获得权力的国内资源是什么？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断是：逐步被确立的政策将反映其设计者的特殊利益。我们忠实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自然而然的估测已经被相当普遍地实现了。我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不是这个普遍规则的例外——这一观点在某次有趣的知识分子动议中被称为“激进的批评”，之后我还会谈到这次动议。

只要留意一下常识还有历史记载，就会得出第二个合乎情理的估测：在每个社会都会涌现出宣传者阶层，他们竭力伪饰显而易见之事、隐瞒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把完全善意的、据说能指引国家政策的神秘目标和意图编成网络。这个宣传体系的典型观点是，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代理机构，而不是其中的特殊团体，它受某些理想和原则的指引，而这些理想和原则都是高尚的。有时候，因为过失、糟糕的领导水平或历史上的复杂状况和讽刺性现象，这些理想会遭受挫败。但任何恐怖行动、任何残暴行径都会被辩解为不幸地（有时或是悲剧性地）背离了国家的

意图。还有一个次要的观点是：国家并不是一个主动的代理机构，而是在其安全或秩序和稳定受到可怕而恶劣的外部势力威胁时才做出反应。

再重申一下，美国不是这个普遍规则的例外。如果算作例外的话，其独特之处也在于这一事实：知识分子们往往急于宣扬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并把发生的一切辩解为“悲剧性的错误”或莫名其妙地背离了我们深切信仰的理想。在这个方面，至少在工业民主国家中，美国也许与众不同。在越战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总有像悉尼·胡克⁽¹²⁸⁾那样的人对“不幸意外丧生”或“军事行动中未曾意料到的后果”这些说法¹²⁹不屑一顾。当时，B-52轰炸机在人口密集的湄公河三角洲进行着系统的地毯式轰炸，或者还有其他类似的被亚瑟·施莱辛格称为“我们表达国际善意的总计划”（指美国1954年的对越政策）行动。¹³⁰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里有个典型的实例。《纽约时报》自由派评论员威廉·V. 香农⁽¹³¹⁾解释了我们如何“在努力行善事时不断地远离了道德资源，堕落到伪善和自以为是的地步”。¹³²有几句传递了这种意味：

25年来，美国在第三世界一直致力于行善事、鼓励政治自由和提倡社会正义。但在我们历来与之结为朋友并担当其保护者的拉丁美洲，在我们做出最痛苦的牺牲并失去我们的年轻人和财富的亚洲，我们的各种关系竟然大多是一再导致悲伤、浪费和悲剧……的根源。因此，通过经济援助和训练反游击队的军事团队，我们一直怀着最佳动机干涉着〔拉丁美洲〕。但结果证明，只有仁慈、智商和努力是不够的。智利的情况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央情报局〔怀着最佳动机〕干涉了这里的复杂局势，把美国牵扯进一个令人意外的故事结局中——一个实施酷刑的、可怕的军事独裁政权毁掉了我们一直努力保护的自由和各种自由主义制度。

说了诸如此类的话，他还总结道，我们必须恪守雷茵霍尔德·尼布尔⁽¹³³⁾的警告：“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甚至是最正义之士，能很好地实现上帝的意图”——连美国这种正义、无私和仁慈的典范也无法做到，它长期以来是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朋友和保护者，在此前的25年间为印度支那的农民们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因此，我们在试图“推行我们的道德理想”时，必须更加克制自己，否则就会陷入各种“讽刺性悖论”中，因为我们努力实现上帝的意图就会导致意外的故事结局。

这些话如果在20年前被写出来，会显得很无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阶层的大部分人对国家宣传体系如此卑鄙地屈从是很典型的，却几乎被人们视而不见。情况即使不是这样，这些话出现在1974年9月⁽¹³⁴⁾，也会（或者也许会）令人难以置信。

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越战期间形成了敌对关系。例如，我们读到的是“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自越战以后逐渐认为，美国动用其权力是不道德的”，一种新的“意见聚集在[新的]目标周围——废除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力”。¹³⁵这纯属虚构，类似于相信媒体已成为与国家对立的“令人瞩目的国家权力的新来源”。¹³⁶实际上，通过战争以及在战争之后，除了一些例外情况，¹³⁷国家媒体都恰到好处地屈从了国家的宣传体系，这与我们对大公司的预测大抵一致。当有理性的帝国主义者决定对越南这个企业必须进行限制或清算时，或者像水门事件那一幕一样，当与权力有关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国家媒体才发出批评的声音。¹³⁸

谈到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确形成了一种表达清晰的、有原则的反战立场（主要在学生中间形成），却从未超越重重限制的束缚。相反，更常见的是幻想。任何意识形态管控有所削弱的迹象都会吓住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他们的反应会歇斯底里、夸张不已。反对发展战略性武器新倡议的批评家通常因为他们“呼吁单方面裁军”而受到谴责。相应地，从早些年间的强烈干涉退回到“实用主义”立场的呼吁已经变成了“废除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力”的要求。¹³⁹

在评论基辛格的外交手腕及其引起的反响时，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¹⁴⁰⁾叙述了占主导作用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一种典型说法：

“均势”（balance-of-power）方法只要管用就可以被接受。更具体地说，尽管越战还在继续（特别是，尽管结局未定或皆大欢喜的可能性都会有），基辛格的外交手段就已博得了普遍的赞许。但在越南的惨败显示出美国已放弃无私支持好人的传统政策，也表明美国的决策者们代表着坏人的利益在这场游戏中用尽了肮脏伎俩。¹⁴¹

请留意一下这种奇特的推理：我们的客户失手时就变成了“坏人”，我们的伎俩失败时就变得“肮脏”。谈到我们所说的“传统政策”时，克拉夫特的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谈到基辛格在南越维护美国附庸政权的企图——基辛格公然违背1973年《巴黎协定》的做法竟然广受支持，直到很多事件表明他无法得逞为止——时，他的评论也很准确。¹⁴²

在一项富有启示性的、有关公众对越战态度的研究中，布鲁斯·安德

鲁斯⁽¹⁴³⁾探讨了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这一事实：“地位较低的团体”比其他人士更不愿意支持政府的政策。¹⁴⁴他提出，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对政治的关注不多，鲜少受媒体的干预，也就没受到过1950年代期间冷战号召的巨大冲击，最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误打误撞地形成了反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评述很贴切。要逃脱可怕的美国宣传机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逃脱服务于国家宣传体系的“正规教育”和“媒体干预”，第二条是努力挑选散落在宣传大潮中的事实，同时搜寻对大众而言不合适的“奇特”消息——不用说，这是极少数人才用的方法。

谈到知识分子，有时我们也许会用前面引述的三边委员会⁽¹⁴⁵⁾的术语来区分“技术官僚型和以政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和“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¹⁴⁶国内的技术官僚型和以政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是好人，他们让整个体制得以运作，也不会提出恼人的问题。如果他们反对政府的政策，也会像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精英”那样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这么做。他们偶尔提出的政治异见是“政治的硬分析”，而不是那些提出反对政策进程的原则之人所奉行的“道德主义”或“梦幻般的乌托邦主义”。¹⁴⁷至于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诋毁领导者、挑战权威、揭露现有机构并使其丧失合法地位”，按照三边委员会学者的判断来看，他们造成了“对民主政府的威胁，这种威胁至少有可能和过去的贵族集团、法西斯运动和共产党所造成的威胁一样严重”。目前大部分有关1960年代“多事之秋”的叙述都是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的变形说法，有关这个时期的精彩“历史”正在被创造，也许会被未来一代“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曝光。

三边委员会的观点有个常见的变形说法：“美国对民主的信奉正在被（通常来自政治光谱中的自由派和左派的）这些分析破坏，分析者坚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考虑民主是毫无作用的。”¹⁴⁸实际上，能找到的一个充分理由——通常绝非来自左派——是，“只有在其（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紧密连为一体的）民主概念受到共产主义〔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像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温和改革〕威胁的时候，〔美国〕才被迫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去捍卫民主”或直接进行干涉：“它对许多右翼政变进行干涉时并未引起什么严重的疑问，这一〔反共产主义的〕政策通常也从中得益。”¹⁴⁹难道就是他们准确描述的这些分析或事实“破坏了美国对民主的信奉”，或者愈加揭示出这种信奉是多么肤浅吗？对于持国家主权论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这些分析可能正确与否都无关紧要，但它们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挑战了现存的权威结构”和“那些在教化年轻人时扮演着重

要角色的机构”的有效性——这些都是三边委员会理论家们的术语，对他们来说，像“真理”和“诚信”这样的范畴简直与主题毫不相干。¹⁵⁰

我们可以把效力于国家的“世俗神职人员”¹⁵¹分为两类。首先，是彻头彻尾的宣传者；站在他们身旁的是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考虑政策所针对的一切目的和利益问题，只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工作，以其“实用主义”和不受“意识形态”（这个字眼通常用来指背离国家宗教教义的原则）玷污为荣。在这两类人当中，后者也许在灌输顺从态度和使公众“社会化”方面更有成效。

这一点也许与个人经历有关。与许多从事写作和参与反对国家政策行动的人一样，我经常应加拿大、西欧、日本、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之邀对时事或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但没有收到来自美国的邀请。在美国，时事评论只让专家来做，他们很少背离太过狭隘的意识形态领域。亨利·基辛格曾准确地评论道，在我们的“专家时代”，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的选民——就是那些从普遍持有的观点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他们高水平地详细阐明选民的共识，最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专家”。¹⁵²在学术职业中，有很多办法确保专家们一直是“负责任的”，尽管这种控制系统在1960年代的确受到了部分威胁。尽管美国媒体（也许部分是出于天真）无疑几乎都转向了专家崇拜，要发表持有异见的分析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些分析被表达出来，就会被清楚地标上“持异见的观点”，而不是什么毫无热情的、难懂的政治分析。这是工业民主国家内部“美国例外主义”的又一个例子。

让我们回到主题：实际上，美国已不再像其他国家那样投身于表达国际善意的计划了。况且，把这个国家（并连带国家目的）说成是国际事务代理机构简直是故弄玄虚。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其外交政策由有限的几个集团制定并实施，这些集团从国内资源中获得了权力——他们以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掌控国内经济（包括对军事化的国家部门）中获得了权力。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国际事务相关的高级顾问和决策者的位置被牢牢掌握在大公司、银行、投资公司和一些迎合公司利益的律师事务所的代表¹⁵³以及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些知识分子也对那些拥有并管理着国内社会基础机构的人唯命是从，这些基础机构无异于管理着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私人帝国，很少打着公共受托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之名，甚至对民主控制也不屑一顾。

在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内部，有效的“国家目的”大体上会

被那些控制着中央经济机构的人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为其发表伪装言辞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内之事。某个亚瑟·施莱辛格大概可以毫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在卡特当政期间，“人权正替代自主决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价值观”。¹⁵⁴在这些声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技术官僚型和受政策主导的知识分子对集权国家的“思想控制”（我们恰当地给出这种说法）所做出的贡献。在集权国家，顺从不是靠强大的影响力而是靠武力来实现的。我们的制度当然是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可以被独裁者采用，假如他们更聪明一些的话。它把高效灌输与认为这个社会的确“开放”的印象结合起来，与国家宗教保持一致的声明也不会立即被当成宣传造势而置之不理。

应当注意的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仅在于表达异见的观点不会遭到国家暴力的碾压（通常如此；不过，可以参见注释(138)），而且在于有提出询问和表达的自由，这一点甚至与其他工业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独特的。美国没有《官方机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也没有其他地区才有的限制重重的诽谤法。前几年美国颁布了一部重要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但这种相对较高的内部自由度只能突出知识分子的变节，他们无法辩护说，自己屈从于国家宗教是受武力或获取信息的限制所迫。

很多有关“国家利益”的文章都试图掩盖基本的社会事实。例如，看一看汉斯·摩根索的作品，他很有见地地写了大量有关该话题的文章。在最近一次陈述其观点的场合，他声称，以合理外交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利益“不是由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党派偏见来界定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数据强加给所有用理性才能处理外交政策的人”。然后，他举例引述了诸如支持韩国、遏制中国和维护门罗主义等美国所承担的责任。他继续评论说：“集中的私人权力自内战以来实际上就统治着美国，已经抵抗了一切控制企图，更不用说如何消解它们并让自己牢牢地抓住政治决策的杠杆。”（《新共和》，1977年1月22日）毫无疑问，的确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期望被真正清楚地表达或追求的“国家利益”，只是理性才能被运用到客观数据上的结果呢？还是具体阶级利益的表达呢？显然是后者。认真地调查摩根索引述的事实，就会发现，我们的期望全都被实现了。美国人的真正利益绝不是靠这些做法来增强的：“遏制中国”（中国到底往哪里扩张了呢？），打击韩国1940年代晚期的民众武装并支持随后建立的一连串独裁政权，确保拉丁美洲一直服从于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这才是我们在现代时期维护门罗主义或西奥多·罗斯福推论得出

的门罗主义的真正意义，也使得在“长期的作恶行径或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大体松散的无效状态”下行使“国际警察权力”成为美国作为“文明国家”的职责（参见Connell-Smith，注释(148)）。

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私人权力集中”的利益，已经通过这种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被增强了。这同样适用于普遍情况。以物理方式得出外交政策是不受阶级斗争影响的客观数据，这种想法令人难以置信。

或者看一看沃尔特·迪安·伯纳姆⁽¹⁵⁵⁾近来在三边委员会期刊上发表的分析。¹⁵⁶他指出，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从内部和外部提升主导生产模式的基本利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需求”。这种说法有误导性。这些基本功能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要，而是出自具体的社会成因。况且，“主导生产模式”并没有什么利益，参与其中的个体或团体才有利益，通常还是冲突性利益，仅靠争辩无法解决其中的差异。既然那些管理着这种体制的人也在有效地控制着国家机器，被追求的“基本利益”就会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历史依据或逻辑依据的假设是：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参加主导生产模式、给主人或管理者出卖劳务的那些人的利益一致。

掩盖社会现实的一个标准而有效的方法是，认为事实比“以价值为中心的”批评家提出的“简单化理论”所陈述的内容更加复杂。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事实总是比我们能给出的任何描述更为复杂。面对实证研究的偶然性，我们可以采取几种途径：（1）我们可以放弃努力；（2）我们可以试着细致入微地记录许多事实，这种做法尽管提供了情况，实际上却退回到了第一种途径；（3）我们可以按照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推理性探究方式，试图得出一些在合理范围内有解释力的原则，并期待至少能解释主要的效应。采用第三种即推理性的途径，我们总会受到认为事实更加复杂的这种批评；如果推理的话，我们又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又无关紧要。有启发性的是，在想到官方敌人的行为时，我们很容易采取一种推理立场。例如，苏联人入侵阿富汗肯定涉及各种复杂性，超出了对当代苏联国际行为缜密分析中已介绍的内容，肯定也超出了媒体的权威报道。例如，自1973年以来，主要的游击队组织似乎就在阿富汗进行破坏性行动，他们在巴基斯坦支持下试图动摇阿富汗政权并使其接受巴基斯坦的边界要求（有个观点认为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参见劳伦斯·利夫舒尔茨在1981年1月30日《远东经济评论》上的文章 [Lawrence Lifschultz,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30, 1981] ）。然而，这类事实不会阻碍我们去关注主要问题，即苏联

人的入侵，尽管一些人民委员（commissar）可能抱怨说，我们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怀着最高尚的目标维护秩序的大国所面临的困难。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伪装，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射性反应。那些采用退行性途径的人着手为这一事实——对外交政策（例如，跨国公司）感兴趣的精英集团试图动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或指导外交政策、在国家行政部门担任要职、发表地缘政治分析并制订具体的计划确保商业运行的良好环境等——提供资料证明时，提出了一套“共谋论”。人们也许用同样的逻辑说，通用电气的分析家们断定其管理者努力把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无私地尽力满足公众的需求），用的正是共谋论。也许商业宣传者实际上就站在这个立场。一旦某种分析被标上了“共谋论”，就沦落到相信地球是平的的狂热分子和其他怪人的圈子里，而实际的权力、决策和全球规划体系则安然无恙，不会受到仔细的审视。

一个相关的说法是，对意识形态体系的批判性分析是一种偏执症。¹⁵⁷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任何社会看到处理外交事务时普遍存在的、系统的偏见都不会令人惊奇：（能够被制止的）国家罪行被忽略或轻描淡写了，而聚光灯照射的是（令人无能为力的）官方敌人的罪行。在前一种情况中，证据标准必须与物质标准相匹配；在后一种情况中，可以凭空捏造。在极端情况下，苏联新闻界完全淡忘了国家罪行，而大力宣传像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这样的事实。设想一下，有人为美国的预期模式提供材料证明。这明显揭示出一种极端的偏执症形式。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此行事都是不公平的、荒谬可笑的：希望媒体能找到目击者在《世界报》上叙述美国在老挝北部的轰炸（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或发现西哈努克的某次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新闻界谴责1969年3月对红色高棉农民的轰炸（况且，他没有具体说是“B-52”轰炸机，因此镇压是合法的），或发现西哈努克政府随后发布了有关美国和在美国支持下对中立柬埔寨进行轰炸的白皮书，或在里斯本发现了东帝汶难民；抑或能探究美国的政策与拉美的全国恐怖、饥饿和奴役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中，基准线甚至更加令人迷惑。有人建议采取依赖证据的常规标准，因此就变成了一类“为暴行道歉的人”“捍卫河内荣誉的人”等。强调事实更为重要的建议被轻易地变成了另外一种服务于宣传者的形式。走在游行队伍里并不能让自尊心感到满足。因此，参加了仪式性谴责官方敌人的那些人必须显示出，他们与维护敌人的强大力量在勇敢地做斗争。但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甚至在微小的范围内），必须要捏造一些出来。如果手头没什么资料，那些对事实稍加关切的人也可以。既有的体制让人们对于官方敌人的（真实的或未经证实的）罪行随意撒谎，并隐

瞒了自己的国家曾系统地参与了暴行、镇压或侵略，理由就是：事实比容易情绪化的、天真的评论家们所认为的还要复杂（假如能找出某个邪恶的或误入歧途的人为政策负责，导致对体制的批评发生了转向，就可以有例外）。考虑到那些不接受标准原则——例如，“美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的人几乎接触不到普通听众，考虑到在争论方式或可信证据方面对那些教义纯正度更高的人要求不多，这场闹剧演得相当好。这是一个非常优雅和有效的制度。

在准备采取推理性途径的同时，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即刻便面对一些来自战争废墟的世界的突出特点。其中，主要的特点是，相较于其他工业社会（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国家），美国的权力拥有强大的优势。在战争期间，大部分工业国家都遭到破坏或严重的毁坏，但美国的工业生产却迅速地扩大。况且，美国很快成为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内部资源、自然优势和规模无人能及，社会凝聚力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动用其强大的实力来组织全球体系是再自然不过了。无需争议的是，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指导原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确很有争议性。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原则。

我们应该在哪里才能发现对这些原则的阐释呢？在集权社会，这样做会有很多问题，但在这方面，美国的确很开明。有关在战后世界建设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们所形成的战后世界视野，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证明。

有一个公认的文献来源是“二战”期间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的一系列备忘录。项目成员包括政府高级规划专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与政府、大公司和私人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外交政策精英”代表。¹⁵⁸这些备忘录涉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各种〕要求，它提出要无可争议地掌握世界政权”，最重要的是“迅速实现彻底扩充军备的计划”（1940年）。在“二战”初期的几年，人们以为一部分世界可能会被德国控制。因此，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出“一个为美国在非德国世界获得军事和经济优势的综合政策”，包括“确保限制外国行使主权”（外国行使主权“对关乎美国和西半球安全 and 经济繁荣的世界区域造成了威胁”）的计划（之前或之后的美国政策〔比如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恰好体现了对“西半球的繁荣”的关注；对限制美国资本和获取资源的君主特权〔imperial prerogatives〕的抵制常被学术界当作证据来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反帝制”责任的主导）。在规划者的地缘政治分析中，这些

将为美国的繁荣（包括西半球、大英帝国和远东）效力的地区被称为自然、完整的经济统一体。

英国的抱负对美国在非德国世界的霸权造成了威胁。战争中的偶发事件限制了英国的这些抱负，而美国政府利用英国的付出推进了整个进程。租借援助被限制在严格范围内：这足以支持战时的英国，却不够让其维持君主特权地位。¹⁵⁹在共同抵抗德国的背景下，美国 and 英国之间有一场微战争。当然，英国处于抗德战争的前线，更准确地说，打击纳粹德国的重担落在了俄罗斯人肩上，¹⁶⁰但目前让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英美联盟上。在联盟内部的这种冲突中，美国的利益成功地取代了英国在拉美的传统市场，在中东则部分成功地取代了英国，尤其在被视为“战略力量的巨大来源和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物质奖励之一”（用国防部的话来说）的沙特阿拉伯。¹⁶¹我后来会谈到这一问题，但我们先继续剖析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规划性文件。

在外交委员会的讨论中，以美国为首的非日耳曼集团被冠以“大区域”的称呼。实际上，由美国主导的大区域只是次优（second-best）选择。1941年6月，有人解释说：“集团并未把大区域看得比全球经济更有吸引力，也没有把它当作称心如意的替代品。”大区域被理解为一个可以被最好地扩展到全球经济的核心或模型。人们很快意识到，随着纳粹德国的节节失利，至少西欧会加入到大区域。参与外交委员会讨论的人意识到，“不再会有过去那样的大英帝国了……美国可能会取而代之”。有人坦率地说，美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之后对世界性的解决方案形成一种内心观点，使我们能够强加自己的条款，也许类似于一种美式和平（pax-Americana）”。还有人反驳说，“美国安全利益”这一概念必须被扩大，涵盖那些“对美国控制世界有战略必要性”的地区。有一个普遍性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与美国经济的健全程度密切相关。美国有权使用大区域的资源，必须组织好这些资源才能保证美国经济结构和整体健全度，并且不会改变其内在结构。

在涉及原生资源的1944年4月国务院备忘录《美国的石油政策》中，“有权使用资源”这一想法被绝妙地表达了出来。¹⁶²该文件解释说，美国公司在各地必须拥有同等的权限，但别人不能这样做。美国在西半球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¹⁶³这一地位必须被保持，尽管美国在世界各地已拥有各种控制力。该政策“将涉及如何保持目前获得的绝对地位，并因此保持警惕，保护美国手中现有的特许权，同时坚决主张保证美国公司在新区拥有平等机会的门户开放原则”。这公正地描述了“门户开放”原

这一切都与大区域规划的诸多概念相一致，也符合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美国保有对西半球石油资源的支配地位，而它在中东的石油占有份额也在迅速上升。¹⁶⁵直到1954年，英国还控制着伊朗的石油。但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政变让伊朗国王复位之后，美国强行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允许美国公司拥有伊朗40%的石油份额。¹⁶⁶同样，在远东，“不允许被（美军）占领的日本重建已被盟军炮火毁坏的炼油设施。广泛适用于日本石油产业的这一政策主要归咎于如下事实：在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石油局中，大部分职员是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孚公司暂时离职而来的”。后来，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在控制日本能源资源上占有主导地位。“在同盟国的占领下，日本政府无力封锁这种商业联系。”¹⁶⁷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例如，1947年，美国动用某些法律手段把法国的势力从沙特阿拉伯驱逐了出去，并宣称，由于希特勒占领了法国，法国公司就成为“敌人”。因此，有关分割前奥斯曼帝国石油的1928年《红线协定》也被废除（见TNCW以及注释(163)）。美国采用各种手段把英国的势力从沙特阿拉伯排除了出去。也就是说，美国公司表达了其担忧（“英国人也许能让伊本·沙特⁽¹⁶⁸⁾或其继任者设法剥夺他们的特许权并将其转给英国人”）（海军部副部长威廉·布利特 [William Bullitt] ），并“告知罗斯福政府，美国直接为沙特总统提供租借帮助，是避免美国在阿拉伯的特许权落入英国人之手的唯一办法”。当时，总统就体贴地向租借项目（Lend-Lease）管理人发布了如下指示：“为使您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提供租借援助，我特此认为防卫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防卫而言至关重要”——他并没有讲明防范的是谁，尽管愤世嫉俗之人会说，美国心照不宣地认同阿美石油公司⁽¹⁶⁹⁾的特许权与“国家利益”一词的实际用法相一致。租借项目经国会授权用于支持反对纳粹的“民主协约国”。罗斯福政府也以其他方式支持美国公司反对其英国对手，通过援助（在租借项目下，沙特阿拉伯接受了1亿美元的援助，包括稀缺的建筑材料）或政府的直接干预（MNOC，第36—37页）。

顺便提到的是，请回想一下伊朗人在1950年代初萌发尝试由自己控制石油的这种奇特想法时发生了什么。在一次石油公司的抵制行动之后，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获得了成功，终止了抵制行动，并建立了沙阿（Shah）⁽¹⁷⁰⁾政权。沙阿政权成为美国有力的附庸，它大量从美国购进武器镇压阿拉伯半岛的叛乱活动，伊朗人民当然也被沙阿的突发奇想所摆布。

这场政变也产生了其他有益的后果。埃克森（其前身公司）担心，除非“问题得以解决”，否则苏联会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份额，这样就会在国际市场倾销伊朗石油，导致价格下跌（*MNOC*，第67页）。但政变消除了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威胁。

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政变结束了伊朗的民主尝试，导致英国势力被美国取代，在我们这里都被看作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当伊朗和由美国政府组织的石油财团签订协约时，《纽约时报》的社论（1954年8月6日）评价说，这“的确是好消息”；“尽管有关伊朗石油的争论对于各方来说代价惨重，但如果从中吸取教训，也许最终会证明事情值得一做”。然后，社论详细列出了以下重要教训：

拥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国家现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这种代价必须由他们当中执迷于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某个人来承担。希望伊朗的经历会阻止其他国家摩萨台们的崛起太不切实际，但这种经验至少会加强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者的统治。

比如说沙阿。《纽约时报》带着典型的统治阶级的辛辣口吻继续说“西方也必须学习伊朗的教训”，必须总结出“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伙伴关系必须是西方工业国家与其他一些欧洲和北美之外、工业化程度不高但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关系”。对那些过去享有极大特权并与西方保持伙伴关系的不发达国家而言，这种说法肯定十分励志。

在《纽约时报》看来，此次事件带来的“代价”并不包括伊朗民众所承受的痛苦，却包括给共产主义分子带来的宣传机会。共产主义分子会以恶毒的方式谴责整个事件以及如下事实：“在英国的某些阶层中会出现这种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在财团中以美国石油公司的形象出现——再次把英国挤出了历史的堡垒。”此处暗示，这种指责或美国“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显然荒谬至极，不值一评，是一种一贯基于国家宗教原则而非事实分析的结论。尽管《纽约时报》的粗鄙评述也许非同寻常，为中情局的成就所带来的“示范性效果”欢呼雀跃也很独特。但在随后几年的越南问题上，这种主题却毫不罕见。

但让我们回到外交委员会的全球规划。这一全球规划为组织大区域（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全球）拟定了计划，把其变成完整的经济体系，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无需重新大做调整就能生存的“活动空间”（elbow room），即无需改变权力、财富、所有权和控制的分配。

对大区域规划清楚描述的备忘录仔细区分了原则与宣传。在1941年中期，备忘录提到“为了宣传的目的对战争目标声明所做的解释，不同于对界定真正国家利益的声明的解释”。这里还有进一步的建议：

假如对战争目标进行声明，似乎仅仅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关，而对世界其他国家毫无益处，并且会遭到纳粹的出尔反尔。这些目标还会增强美国和大英帝国最反动的因素。应当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不仅是欧洲人，还有亚洲人、非洲人和拉美人。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数月之后，《大西洋宪章》被公布，这些参与者肯定如释重负。

外交委员会的研究在之后几年间扩展到对世界大部分区域的前景和计划的分析。就当地进展状况而言，东南亚部分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外交委员会研究小组发布的分析，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和五角大楼文件目前提供的其他材料（这是有关帝国主义规划的设计和实施的重要档案记录）十分相近。¹⁷¹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通常涉及了共同的利益和同一批人。基本的主题是，必须把东南亚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保证满足美国经济的需要和日本的特殊需要。假如在大区域这个美式和平的重要框架下，不准日本接触东南亚市场和资源，也许会促使日本再次开始独立进程或涌入西方市场。这些原则在1950年代被牢固地树立起来，指导着美国干预和后来直接入侵的进程，而越南人和伊朗人一样，“执迷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法领会复杂的“大区域”概念和与工业化西方国家伙伴关系的益处。

我一直评述的资料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档案来源，由执行这一政策的人们编写而成。我们也许会问，如何从学术角度看待这类资料。答案很简单：它被忽略了。舒普（Shoup）和明特（Minter）的书似乎首次研究了这些记录。美国学者理直气壮地抱怨说，俄罗斯人拒绝发布档案资料，因而为理解其政策演变造成了重重障碍。另一个正当的抱怨是，美国学者回避接触为研究美国政策的形成提供更多洞见的档案记录，我认为这一事实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被解释：档案记录和历史记录本身一样，与国家宗教原则并不一致。

顺便说一下，也许要注意的是，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高层政策规划记录的五角大楼文件也难逃同样的命运。这种记录也被忽视了，甚至经常被歪曲。的确有大量有关美国对越政策的学术研究，一些研究大量地使用了五角大楼的文件资料。然而，主要的关注点在1960年代。然后，

我们对官场内斗、政治压力等进行了详细的微观分析，完全无视很久以前就设定的总框架，这个总框架也从未遭到只知道应用10至20年前精心创建的帝国主义原则的那些人的挑战。这是个遮蔽社会现实的绝妙办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涉及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档案记录上转移开，而一贯被忽视的基本文档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些指导原则。

因篇幅所限，我无法再做详细的评述，但有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想一想专门研究印度支那问题最富批判性、最独立的美国学者之一威廉·S.特雷（William S. Turley）对几本书所做的综述。¹⁷²他讨论了两种“美国制定越南政策时的普遍形象”：“泥沼假设”（quagmire hypothesis），即“认为介入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可能后果时所做的渐进性决策的结果”；还有“对美国政策陷入僵局的诠释，即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历届政府需做出最低限度的必要之事避免输掉战争”。他评述的书由罗伯特·L.加卢奇（Robert L. Galluci）著，¹⁷³书中认为这两种形象过于简单，试图运用一种官僚过程模式（bureaucratic process model）得出更复杂的诠释。特雷指出，五角大楼的文件提供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重要证据。

实际上，五角大楼的文件为另一个不同的假设提供了大量证据。该假设沉寂于学术文献之中而无人提及，即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刻意运用了达成部分共识的帝国主义规划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普遍关注度不够的196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以前就被创立了。这个假设在五角大楼的文件和其他地方都被广泛地记载，但档案记录从未像在被评述的书、评述或一般学术研究中被如此提及。无论文档内容如何，所提到的假设并不适合在礼貌的同伴之间讨论。它甚至都不是一个要被拒绝的对立性观点。¹⁷⁴

我不想暗示说，学者拒绝考虑所讨论的假设或大量证明该假设的文献时，就是不诚实的。只是在他们所受的训练或通常能找到的文献中，没有什么能让这个假设被人理解。这反映了教育体制在“社会化”方面的成功，是三边委员会分析家所说的“在教导年轻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制度”的成功。有些看法，无论多么自然而然、有理有据，甚至都没有被想到，或者即使被注意到了，也被嗤之以鼻。背离共识的人一般在媒体或学术界的前途都不太光明。对学术研究的最终颠覆是体制化的，而不是个体的。在有组织的宗教的历史中，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大学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些年轻学者“很难相处”“太咄咄逼人”“选题品味不高”“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以其他方式违反了通常把学术研究与令人不悦的挑战分割开的职业标准。¹⁷⁵各种意识形态学科

(ideological disciplines) 尤其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

假如想认真了解美国政策的演变，必须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像外交委员会研究和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主要档案来源，并辅以诸多补充证据。也许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上面引述的还算与基本档案记录相关的分析是不正确的，甚至在其提出的诠释中有严重的错误。然而，值得注意和特别之处在于，美国的学术研究一直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只是忽略了与公认观点不一致的档案记录。

看看最后这个在学术研究中回避核心问题的例子。让我们再回到我们所假设的那个擅长推理的观察者。他试图分辨出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些主要因素，并思考一些让他立即印象深刻的事实。

“二战”以来，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出现了集中决策的持续进程，当然是就外交政策而言。其次，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阶段内，出现了国内经济集中化的趋势。况且，由于公司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巨大影响力，这两个过程紧密相关。最后，战后时期的海外投资、市场营销和资源开采大大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经济的掌管者在外交事务中的利益。用以证明的引述是：“据估计，到1970年为止，美国国外业务收入占全国公司税后总利润的20%—25%，的确是一笔可观的巨额数字。”¹⁷⁶基本事实无可争议，但它们也许为调查研究提出了某种假设：公司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也许影响力还很大。学术研究如何面对这种问题？

政治学家丹尼斯·M·雷 (Dennis M. Ray) 在之前引述的有关跨国企业的那卷书中 (罕见地) 讨论了这个问题。¹⁷⁷他评论说：“我们实际上对公司在美国外交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学术研究“澄清了国会、新闻界、科学家和像兰德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对外交政策进程的影响力。然而，公司对外交政策进程的影响仍然神秘莫测”。

这种“神秘”是否多少是因为分辨公司角色本身绝非易事呢？公司角色与科学家和新闻界对外交政策的强大影响有所不同。但并非如此。雷指出，问题神秘莫测是因为它被有条不紊地回避了：

我搜索了有关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知名文献，结果显示，在大约200本书中，不到5%的书偶尔关注了一下公司在美国外交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类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在社会真空中被制定出来的，由政府决策的精密机器来保护国家利益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在国际

关系、现行外交政策和公司影响力的领域内的权威著作中，并未承认这一点。

请注意，雷只局限于“知名文献”。他排除了自己所称的“鼓吹性”文献，这种文献包括两类：公司行政管理者和商学院教授的声明，以及“激进的、通常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这种文献中，尤其是后一类，主要讨论公司在外交政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况且，当雷回到话题本身时，就发现已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正确的。他评论说：“商业之外的利益集团（假如有的话）很少对外交政策的广泛领域产生普遍的影响。”他还引述了提出这一问题的“知名文献”中的一部著作。雷相信，假如学者“开始审视这个问题”，他们会发现这些事实。

简而言之，假如学者开始研究该问题，他们会发现在“知名文献”之外已被讨论和记述多年的老生常谈所蕴含的真理，和人们根据这些基本的、重要的有关美国社会的事实（和早期关注的事实一样）所可能预想的一样。

有趣的是，雷从未探究过“知名”学术研究中这种奇怪的失误原因何在。实际上，答案并非模棱两可。假如我们有兴趣仔细调查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无需去看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研究，我们就会确切地知道为何如此。当我们在美国发现类似情况时，不采用同样的标准是毫无道理的，尽管这里的机制完全不同——主动颠覆学术研究，而不是屈服于外部势力。

此外，想想雷对那些研究重大主题的人的态度，他也给出了明显的、一直在重申的答案：在他看来，他们不是可敬的学者，而是在全力“鼓吹”。而谨慎避谈对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影响的学术界主流，并未在这种有趣的忽略中丧失其“可敬度”，他似乎认为他们并未全力地“鼓吹”。

关注我所描述的现象的人类学家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我们在此面对的是一种禁忌形式、一种根深蒂固的逃避某个可怕问题的迷信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私人经济势力如何在美国社会起作用的问题。在充当世俗神职人员的学者中，这个问题只能被小声地提起。那些严肃地提及这个问题的人就不再“可敬”了。外交历史学家盖蒂斯·史密斯（Gaddis Smith）在对威廉·阿普曼·威廉斯⁽¹⁷⁸⁾和加布里尔·柯尔克⁽¹⁷⁹⁾的近作进行评述时表示，他们“本质上是小册子作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不会囚禁那些违背深厚文化禁忌的人，或对他们处以火刑。但他们必须被当作危险的激进分子，不适合放在神职人员当中。这种反应是正当的。提出可怕的问题就是开启一种可能性：负责“教化年轻人”的制度和其他宣传制度会染上最危险的瘟疫——洞察力和理解力。意识到事实的存在会威胁到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处于由多元神秘论、对正直仁慈的领导者的忠诚和普遍的迷信信仰精心编制而成的网络的保护之中。

一种意识形态结构要对某个统治阶级而言有用，就必须掩盖这个阶级动用权力的做法，要么否认事实，更简单地是忽略事实——或者把这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表现为普遍利益，那么这个阶级的代表为了普遍利益而制定社会政策，就会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雷指出，外交政策决策者和商人以同样角度看待世界并不出人意料：“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影响力的现象，因为国家目的实际上也许等同于商业目标。”这个说法近乎赘述（tautology），使“国家利益”一词摆脱了它特有的神秘用法。

除了神职人员的队伍之外，有关“小册子作家”如何鼓吹的社会非主流文献也清楚地记录了事实，“小册子作家”也广泛地、通常还相当睿智地使用了相关的档案来源。在这里，人们意识到的是，“国家目的”概念只是故弄玄虚的一种手段，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经常相互冲突的目标可以用术语构想出来，不只是用那些掌管私营经济的人指定的词汇。但大学、学术界、大众媒体和社会总体上都小心翼翼地与被高度教化的社会中这些危险的异端观点绝缘。这个被高度教化的社会通常被描述为“实用的”和“非意识形态的”，这最终变成了讽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盛行集权控制和逼迫的丑陋形式时，这一切就更加有趣了。

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一战”后曾在短暂存在的巴伐利亚革命政府⁽¹⁸¹⁾工作过。他提到革命政府审查资产阶级新闻舆论标志着“公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开始”。¹⁸²他的观点是，宣传工具和发表观点的工具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掌管的表达方式破坏了发表观点的自由。¹⁸³显然，人们无法接受的观点是，国家审查就是解释统治阶级的知识仆人为何歪曲和欺骗的答案。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也不能假装认为，当社会和文化禁忌使公众无法意识到并无法审视政策的形成过程时，他们从任何严肃意义上讲还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实际上，商业报刊报道社会事实有时的确比学术研究更加诚实。例

如，看看《商业周刊》（1975年4月7日）对美国在越南失利的反应。编辑们担心，“美国公司自‘二战’结束以来得以兴旺发展的国际经济结构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还继续解释道：

因最初受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美元的推动，美国企业靠海外订单兴旺发展，尽管期间面临冷战、殖民主义结束，以及好战甚至反资本主义的新国家的诞生。无论事态发展如何不利，美国势力的保护伞总是能遏制这种局面……跨国企业的崛起正是这种政治框架的经济表现形式。

但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势，“这种适用于商业运行的稳定的世界秩序正在崩塌”。这里没什么和我们“做善事”以及“推动我们道德理想”的不懈努力有关。他们继续解释国会的一意孤行如何破坏了我们的努力。我们试图说服欧洲协约国支持我们“石油最低价”的想法以及如下观念：随着“美国外交政策在全球的瓦解”，特别是“如果日本无法继续把其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我们对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就会衰微。除非重建一种新的“两党外交政策”（即一党制国家），否则也许就“不可能保持一种成功的国际经济框架”。

然而，一年之后，事情有所好转，“好像西方的未来再次被掌握在美国手中，在更小的范围上是在西德手中”。美国的石油价格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¹⁸⁴《商业周刊》的编辑们强调说，“目前的世界走势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性地位”，结果“华盛顿将比1960年代初期之后拥有更多的自由去操纵外交经济政策的制定”。¹⁸⁵简而言之，大区域再次成功地形成了，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乐观显得为时过早。

在政府官员的声明中，偶尔也有一线光明。例如，看一下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弗兰克·M.柯芬（Frank M. Coffin）概述“国际开发署项目目标”时的声明：

我们最广泛的基本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它并非只为发展而发展……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为国内私营项目和企业开创最大限度的机会，并保证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受到欢迎并得到善待……在欠发达国家扶植生机勃勃的、不断扩展的私营部门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国内私营项目和管理以及外部投资都很重要……从政治上讲，强大的、不断前进的私营工商业界为稳定、负责的美国政府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也为反对共产主义信条提供了内置检测。¹⁸⁶

另一个“内置检测”是反暴动，正如柯芬继续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国际开发署内部当然有一个公共安全项目，也许过度简单化地讲，就是设法把各个国家武装起来，使其在干预行动中使用民事警察，这样他们就不必过度依赖军队”。这的确是过度简单化的解释。多年来，成千上万的拉美人和亚洲人从他们“与西方的伙伴关系”这一特殊要素中获益。¹⁸⁷不用说，这一切都因为有关我们的援助项目如何寻求“伙伴关系”等辞令而变得愈加有趣——与寻求“支配权”的苏联人和中国人相比的话。极为欠缺的是对援助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来支持这种说法。

尽管注意到商业报刊偶尔发出的诚实亮点，我也不想暗示说商人就不用太多的学术研究术语。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此前和之后的几年间也许可以马上重复地使用它，甚至直到如今也可以使用：

你会伸出手指控诉，抛出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么海地和多米尼哥呢？还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国家呢？”的确，我们往这些国家派过军队。很遗憾的是，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在执行我们的计划时，我们的确在判断和方法上犯了一些错误。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就像政府和其代理人惯常所做的那样笨手笨脚地前行，尤其（在当前讨论的情况下）当所要执行的任务非比寻常、突如其来，既没有提供指导的传统做法也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专门实施之时。（顺便提一下，缺乏这样的人员恰恰证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对帝国主义所思甚少。）

但测试是在我反过来问你们的问题的答案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去压迫和剥削、去把这些地区加到我们的领地上吗？或者我们去终结根深蒂固的暴政统治、恶行和骚动，建立良好有序的政府和法规、推动进步、建立稳定的条件并为所牵涉的人们建立（拥有这些条件之后的）繁荣基础吗？”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的目的在于获得后面这些东西。适度地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的确撤退了，或者会撤退。我们留下了，或者会留下一些人去收税或合理使用税收，但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本着剥削或压迫的本质，就像根据信托契约委任了一个人，也不是本着剥削和压迫的本质一样。¹⁸⁸

讨论美国如何着手推动进步、繁荣，终结海地、多米尼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拉美其他地方（“我们历来与之结为朋友并担当其保护者”，）的暴政和恶行，可能毫无必要。在这些时候，在仅有的事实面前

不起作用的原则很容易与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相比较。这些表态与越战结束时新闻界权威人士的胡说八道十分相似：尽管充满错误和判断失误，美国的干涉是“光荣的”；“好的突发奇想渐渐地被变成了糟糕的政策”；给人留下“美国无论如何要为东南亚的大屠杀负责的”印象是不公平的；我们“做善事的冲动”变成了“灾难性的错误”等。¹⁸⁹尤其特别的是，国家宗教再次在仅有的事实证据面前岿然不动，在国家领土的血腥征服之后延续了超过80年的帝国主义侵略。

我一直在讨论长久以来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主题，但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主题，即创建大区域的尝试。大区域是一种适应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主要代表的公司利益的全球经济。与这种主导责任相应而生的举措就是反复依赖军事力量。这当然只是最显而易见、最有效果的方法——美国1960年初对阿连德⁽¹⁹⁰⁾统治下的智利或巴西的政策说明还有更典型、更好的步骤。但军事力量是维护大区域的最终武器。在美国历史上，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

《外交事务》编辑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论了此事。他列数了美国在1945年之前的159次海外武装干涉。他补充说，自从“二战”以来，“我们在韩国、印度支那、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使用了军事力量”。然后，他引述不同的原因说明我们为何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害怕资源稀缺、在乎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影响范围和其他地区的“区域权力平衡”，最终是美国“对人权和拥护自由、多元民主制度的关注”。¹⁹¹

回想一下我所引述的情况，或其他没有被引述的干涉实例：伊朗、古巴、危地马拉、智利。其中哪个实例是美国出于对人权和拥护自由、多元民主制度的关注而发动的干涉？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一本正经地说出如此荒唐之言并被认真地对待，一直是一件极为有趣而重要的事情。

蔡斯（部分正确地）指出，美国人民一直支持激进的干涉外交政策。成因之一是带有美国式仁慈和国际善意的意识形态，正如他自己所列举的那样。我引述了一些例子证明这种原则框架是如何支配着大众媒体、时事杂志还有学者。大部分例子证明，为了原则纯洁性的利益，事实是如何被忽略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连最直接、最明显的自相矛盾也未给世俗神职人员们带来特别的问题，他们很少能达到与神学人员对应的精深程度。作为例证，请看看蔡斯的另一篇文章，他回到了同样的主题。¹⁹²蔡斯在文章中讨论了“美国经验”的“讽刺和歧义”。“美国经验”指“道德关怀”，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精神”，尽管“我们已经发现，

追求正义有时会导致与我们预想相反的后果，以至于我们所宣称的理想有时是为了隐藏（不让我们自己知道，而不是不让别人知道）更阴暗、更复杂的动机”。他总结说：“经验本应教会我们的是，我们无法总是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动机。”可是他并未讨论为避免产生这种理解力而建立起来的周密的欺骗制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讨论了特殊事例，例如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肯定地说，“我们决定寻求稳定”。为了证明这句话，他的确提出：“我们努力让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失去稳定性。”即使在一连串的句子中，他所表达的直接的自相矛盾¹⁹³也不足以提出有关“我们自己的动机”的问题。相反，这个例子也落入了“讽刺”范畴。

这个范畴以最惊人的方式掩盖了意识形态学科中的现实。最后还有一个例子，我认为它的来源算是最有启示性的。诺尔曼·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针对冷战愚蠢行径的批评家，或多或少算是乔治·凯南⁽¹⁹⁴⁾类型的现实主义者（我要引用的研究也是有关凯南的¹⁹⁵）。格雷布纳认同的传统看法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受“威尔逊和平和自决原则”的指引。“美国的外交语言”中多次“提及原则”的做法表明，美国在20世纪并非“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提及原则时当然缺乏真正的帝国主义侵略强国的辞令。“传统的美国困境”在于这种错觉：即使“其敌手有精力或决心”，但“国家总是确信，它会看到敌人的最终垮台和正义与自由的虚幻世界的创立”。他坚决地认定，“美国自1950年后与苏联和中國大陸的一切基本关系都依靠这一假设”。正是这种“美国理想主义”造成了战后时期的诸多问题。

放下这些基本原则之后，格雷布纳继续研究了正在实施的外交政策中的一些特殊实例。然后，他做出如下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普遍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自决原则。在亚洲和非洲，它有过些许成功的机会，也在毫无机会成功的‘铁竹幕’（Iron and Bamboo curtains）⁽¹⁹⁶⁾之后推进过这种成功。”

想一想其中的逻辑。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遍原则：美国遵循了威尔逊的自决原则。然后，调查一下具体的实例，我们就发现，该原则在能使用的地方没有被使用；在不能使用的地方（在敌人那里）被鼓吹（他们的鼓吹表明，我们没有侵略，也不是帝国主义）。结论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遍观点一经检验就失效了。但普遍原则还在生效。实际上，格雷布纳接着感叹说：“这个自私自利地寻求国际事务秩序的国家，无法承受一个动荡的世界所表达的感激之情。”

用相似的逻辑，物理学家可能会形成一个普遍假设，对它进行验证，然后发现它在每个具体事例中都遭到了反驳，就得出结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与原则所预见的相反，但原则还在生效。这个例子说明了像学术史和政治学这种意识形态学科与那些被期望达到理性、知性标准的学科之间的区别。

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完全是因为谈到的历史学家是较早批评冷战原则的学者。他以凯南式的方式评价说，美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然而，“错误”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中性范畴。要想产生错误就要安全地守在这一主要教条的边界之内：美国只是对外部挑战做出回应，其政策并未反映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

这种讨论到此已经相当抽象了。我一直不想纠缠于对那些无力还击之人所进行的军事干预政策的人为后果，或为了确保大区域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就是那些合理地假想未来还会继续执行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体制改变，甚至连印度支那战争中某些专业领域提出的批评也被歪曲和制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一切从错误的角度看上去如何。80年前，一位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写道：菲律宾“已经接受了战争裁决。战争是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尤其是将其对手藐视为异族或下等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发动的战争。然而，菲律宾人接受了战争，他们完全明白战争带来的恐怖和他们会被迫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牺牲”。¹⁹⁷ 会被回想起来的是，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无私的领导人只是试图“完成上帝在历史中的意图”。连詹姆斯·蔡斯都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与私利在一起的还有“道德意图”，“我们很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种道德辩护。美国军队在那里犯下的暴行十分恐怖，因为他们发动的是零宽恕战争，不抓战俘，却烧毁了村庄并经常射杀无辜的成人与儿童”¹⁹⁸。

人们也许认为，越战之后再深究此事是毫无必要的。遗憾的是，这种推想是错误的。卡特总统在一次有关人权的发言中解释说，我们对越南问心无愧，不承担什么责任，因为“毁坏是相互的”。¹⁹⁹ 当时，美国新闻界对此毫无评论也无低声抗议。那个“悲剧性错误”的历史如今正在被重写着，让印度支那人民变成了反面角色。柬埔寨在1975年5月“马亚圭斯”号事件时已遭受美国恐怖的践踏，在对这片土地进行的最后一次暴力和谋杀行动中，当福特和基辛格派出轰炸机时，连肯尼迪参议员（他是真正关心美国越战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后果的几个参议员之一）都认为这么说是对的：“总统坚决而成功的行动毫无疑问是对民族精神的必要鼓舞，他值得我们真挚的支持。”²⁰⁰ 全世界都接到了消息——就好像有必

要通知似的——世界上最残暴的国家还没有因其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而声明放弃使用武力，至少在其受害者毫无抵御之力的时候。

这种模式此后还在继续。想一想1976年8月在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发生的事情：在目前仍尚有争议的情况下，两个美国士兵因正要砍掉一棵树而被朝鲜军队杀死。⁽²⁰¹⁾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美方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朝鲜人冷血地杀了他们。美军后来砍掉了这棵树，也彰显了实力，包括B-52轰炸机执行的一次飞行。威廉·比彻（William Beecher）对此次事件进行了重要的报道，他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前助理部长，现在是一名外交通讯记者。他写道，原本计划让B-52轰炸机“在仅距板门店十英里的韩国轰炸范围内投下大约7万吨炸弹……但消息灵通人士说，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决定，投放炸弹太过挑衅性，也许会引发好斗的朝鲜人的军事反应”。²⁰²

让我们假设7万吨这个数字（是轰炸广岛的三倍多）弄错了。但为什么猛烈轰炸离板门店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似乎就对“好斗的朝鲜人”来说“富有挑衅性”？也许因为他们仍然记着25年前发生的事情，美国空军当时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土地，几乎没剩下任何攻击目标。空军的一项研究是有关“针对所有共产主义世界（尤其针对朝鲜的共产分子）空中力量的实际教训”，而这个“教训”在停战协议签署之前一个月就被传达了出来。本着只相信美国这边所讲的故事的原则，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些事件在该项研究中是如何被官方解释的：

1953年5月13日，美国空军F-84战斗轰炸机向朝鲜的咸兴南道德山（Toksang）灌溉水坝连续发动了三轮突然袭击。在海拔300英尺，他们用装载的高性能炸药进行了低空水平轰炸，攻击填料结实的水库土坝。随即爆发了山洪，席卷水库下方27英里内的山谷，倾泻而下的洪水彻底摧毁了大段南北交通要道以及通往前线的供给路线。对德山的打击和其他对慈山（Chasan）、九原家（Kuwonga）、龟城（Kusong）和德城（Toksang）的类似袭击是20多个被定为可能袭击目标的水坝中的5个。水坝从所有重要的敌人供给路线逆向而上，为朝鲜的水稻生产提供了75%的受控供水。这些打击成为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空中行动之一，但大部分都被新闻界、军事观察员和喜欢引人注目但意义不大的行动性事件的新闻评论员所忽略。他们让匆忙赶到他们新闻和广播中心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委员高声向全世界说出最严厉的、充满仇恨的慷慨陈词，这

这些话将出自随后三年战争期间的共产主义宣传机器。

在打击目标系统时，美国空军猛烈攻击了敌人甲冑的两个敏感环节——敌人供应前线部队的能力和为其军队生产粮食的能力。对联军指挥部而言，突破灌溉水坝意味着破坏敌人的交通和供给路线。但对共产党而言，击垮水坝主要意味着破坏了他们的主食——大米。西方人很难想象失去这种主要的粮食产品对亚洲的可怕含义——饥荒和慢性死亡。几个世纪以来，“大米饥荒”是东方的慢性灾难，比致命的瘟疫还要可怕。因此，当炸弹落在五个灌溉水坝上时，人们表现出愤怒、狂暴并公开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²⁰³

请记住，这并非引自共产分子黑色宣传，而是引自美国空军的官方研究。

尽管朝鲜人一向好斗，也无法理解这次壮观的空袭行动的美妙之处，也许至今还觉得猛烈轰炸“富有挑衅性”。因此，原本的计划被取消了。

仅在美国空军成功地带来饥荒和慢性死亡的几年之后，他们又在东南亚如法炮制。那场战争结束了，在大肆破坏和屠杀之后，美国坚持对“马亚圭斯”号事件中无还手之力的柬埔寨显示武力。西哈努克城遭到轰炸，但原计划中的B-52战斗机轰炸被取消了。《新共和》杂志评论说，由于“可预见的国内和国际反应”和可能对“马亚圭斯”号船员产生的不利影响，此次取消很明智——但并不是因为它会引起另一场对柬埔寨人的大屠杀。²⁰⁴一年之后，美国飞机差不多对韩国实施了同样猛烈的轰炸，给好斗的朝鲜人留下了印象。美国人民继续支持激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也如此显示。而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阶层一如既往地敦促我们忘记过去的“错误”和“错算”，再次开始行动，把我们的道德理想灌输给邪恶、忘恩负义的世界。在军事插曲、其他战后岁月中的干涉和大区域规划的意识形态框架背后，体制结构都完好无损，很少受到公众的挑战，有效地免除了民众监督或部分程度上的学术分析。我们只能合情合理地总结说，《外交关系》的编辑是十分正确的，他预测到军事干涉会继续，其他通过“去稳定化”加强“稳定性”以及对威胁要脱离大区域的运动进行遏制和摧毁的努力也会继续。正是这种威胁，无论被称作“共产主义”或别的什么，让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凭借武力（如果必要的话）和更多巧妙的方式（如果足够的话）去遏制、去破坏。知识分子阶层则用我

们无私投身于原则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故事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

（本文最早出现在《“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 Spokesman,1978] , 后来重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2003] , 第86—114页。)

美国与东帝汶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东帝汶？许多美国人甚至未曾听说过这个遥远的小地方。关注的原因有两个，每个都相当充分。第一个原因是，东帝汶曾经是且现在仍是大屠杀和苦难之地。全世界发生着许多可怕的事情，不由我们掌控。我们尽可悲叹不已，却无能为力。东帝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而更为重要。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直接插手已令我们血染双手。第二个原因是，只要想一想自1975年以后发生在东帝汶的事情，我们就能了解一些有关自身、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体制的重要信息。如果我们看到事实时厌恶所发现的一切——如果认真地看待，人人都会感到惊愕——我们可以努力改变当前的做法以及造成可怕的苦难和屠杀的体制结构。既然我们把自己视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就有责任为这些目标投入精力。东帝汶的近代史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确定政策时考虑的因素以及我们的意识形态体系运作的方式。

以下事实简单明了。²⁰⁵东帝汶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帝汶岛的西半边是荷兰殖民地，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成为其领土。1974年葡萄牙革命之后，在东帝汶出现了几个政治党派，其中有两个党派受到较多的民众支持，它们分别是帝汶民主联盟（UDT）⁽²⁰⁶⁾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²⁰⁷⁾。1975年8月，帝汶民主联盟发动了政变，该政变受到印尼的支持，并有可能是在其煽动下进行的。政变导致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有两三千人被杀害。9月初，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获胜。东帝汶向国外观察员开放，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澳大利亚救援组织的代表、记者和其他人。他们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并对国内民众支持度、农业改革的开明措施以及扫盲计划等正在进行的项目印象深刻。澳大利亚著名的东帝汶研究专家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把当时的东帝汶独立革

命阵线称为“大众天主教派”。我们下面要谈到此后的种种说法，就此而言，上述事实意义重大。

除了印尼在该地区边境进行军事袭击和海上轰炸之外，帝汶岛当时还算太平。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9月获胜以后，印尼军队便开始进行军事骚扰，其中一次突袭使五名澳大利亚记者丧生。这是一次清楚明了的警告，告诫国外人士印尼军方不想让任何人“观察”其正在谋划的行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要求葡萄牙为其去殖民化进程负责，并呼吁其他国家派遣观察员，但毫无回应。东帝汶革命阵线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国际支持，就在1975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12月7日，印尼发动了全面入侵行动，攻占了东帝汶首都帝力（Dili）。在这场袭击发生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刚刚离开雅加达。毫无疑问，美国知道这次即将发生的入侵行动，并明确给予认可。在杰克·安德森⁽²⁰⁸⁾的采访中，福特勉强承认了部分事实，但声称对确切的情况一无所知。²⁰⁹

入侵的印尼军队90%都使用美军武器。在国会听证会上，政府代表证实，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应，美国曾下达过长达六个月的武器禁令，但这个禁令是秘密执行的，连印尼都不曾知晓。在“武器禁令”期间，武器不断地流向印尼军队，实际上还有新武器的供应，包括用于镇压叛乱的武器。这些事实被康奈尔大学的印尼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披露之后，美国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承认。入侵行动血腥而残忍。随后，印尼的侵略扩展到帝汶地区的其他地方。在1977—1978年间，印尼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包括大规模轰炸、强制人口迁移、破坏村庄和庄稼，以及现代军队用于镇压抵抗群众的所有常用手段。这些暴行的具体程度无法评定，部分原因是印尼拒绝接受外部观察员进入，其原因可想而知。在1979之前，连国际红十字会也被排斥在外，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但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而证据十分充分，这些证据来自难民、偷送的信件、教会方面的消息、在有人引导下得以短暂参观的个别记者以及印尼官方。假如西方人不知道这些事实，一定是因为有人做出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很有可能的是，战前近70万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死于印尼入侵所造成的公然屠杀或饥饿，剩下的人大多被赶入由军方管理的集中营，他们也许遭受了类似的命运，除非受到正规监督的国际援助大规模地到来。大约四年之后，救援官员才被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入该地区，他们认为整个局势堪比1979年的柬埔寨。在这两件事上，国际反响略有不同。

美国政府自始至终都为此次大屠杀提供了军事和外交援助。到1977年末，印尼的武器供应已经耗尽，人权委员会⁽²¹⁰⁾竟然迅速增加了军备供应，印尼得以进行凶残的侵略活动，使东帝汶沦为像柬埔寨那样的境地。²¹¹美国的盟友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援助。

与其他不结盟国家一样，联合国曾多次谴责印尼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在东帝汶行使自决权。但西方成功地阻拦了所有重要的举措。印尼入侵之后，联合国立即召开大会，但无法有效地采取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P.莫尼翰⁽²¹²⁾在回忆录中解释了缘由：“美国希望事态的发展如其所愿，并不断地致力于此。国务院由衷地希望，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联合国都无能为力。我被授予这项任务，并相当成功地执行了下去。”²¹³

莫尼翰大使大概知道其成功的本质是什么。他引述了由印尼军方任命的临时政府副主席在1976年2月做出的估测：“内战爆发之后已有6万人被杀害”，——请回想一下仅在内战期间就有两到三千人被杀害——“这占总人口的10%，几乎与苏联在‘二战’中伤亡的人口比例相同”。这样说来，他实际上在为其“成功”协助开展屠杀而邀功（而他将这场屠杀比作纳粹的侵略结果），且不说此后不断增加的遇害者人数。

莫尼翰在联合国面对美国强大的第三世界敌人时表现英勇，这令人钦佩。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沾沾自喜却未被觉察到。²¹⁴

莫尼翰大使继续评论说，到1976年3月为止，印尼的入侵肯定是成功的，因为“这个话题自入侵之后在新闻界和联合国就从未出现过”。这件事的确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了，尽管并未在联合国销声匿迹，联合国一直在定期谴责印尼的侵略行为。美国 and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四年中拉下缄默的幕布，却无法显示出印尼军队的成功，尽管这块幕布确实有力地证明了西方宣传体系的有效性。²¹⁵

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佯装对东帝汶发生的事件所知甚少，这明显是无稽之谈。要不然就是政府代表在每个阶段都声称，虽然可能遗憾过去有点做过了头，但现在局势平静，明智而又人道的做法是承认印尼政府的控制。比如，美国政府在1977年国会听证会上就持这种立场。当时，印尼恰巧在准备1977—1978年的屠杀式入侵，而人权委员会也加快了用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武器供应。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不仅没有包括大量暴行的充分证据，而且竟然假装没有这回事。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提供的一份报告算是典型的政府声明。²¹⁶这份报告讨论了所谓的改善之后的印尼人权记录——奥威尔的学

生或许会对这一事实感兴趣：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在关于友国的政府“人权”报告中，记录总是显示“改善”。我们从1979年11月的报告中得知：

印度尼西亚于1979年12月攻占东帝汶，这里之前为葡属帝汶。此次攻占可能是改善趋势中的一个例外，但各方的对立观点和非印尼人无法进入帝汶都使人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查清从1975年12月持续到1976年3月的惨烈战斗中死亡的人数。最近，来自帝汶的报道表明，帝汶已部分地回到常态，尽管帝汶人实现真正自决的前景很黯淡。

只要美国政府继续执行支持印尼恐怖行径的政策，并否认存在这种恐怖行径，只要媒体忠实地自我克制而不暴露事实，后一个结论肯定是对的。这份报告的典型之处不仅在于它声称事态目前终于有所好转（自始至终都在辩解），而且还在于它没有能够承认，人们对1976年3月之后那段时期也产生了疑问。

我们听一听目击者的证词，情形又会略有不同。例如，列奥纳多·维也拉·德里格（Leoneto Vieira do Rego）神父的证词。他是一位63岁的葡萄牙教士，在山中负隅抵抗三年，最终因疟疾和饥饿于1979年1月向印尼军队投降。经过囚禁和审问之后，他在6月得以回到葡萄牙。他叙述了所看到的一切，之后在美国以外的各国新闻中被报道。这份政府报告被公布后不久，列奥纳多神父就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²¹⁷采访笔录被透漏给了《波士顿环球报》。²¹⁸列奥纳多神父说，在1976年间，他所生活的山区以及大多数人（包括从帝力逃过来的人）所生活的山区一切正常：

除了主要城镇，住在内陆的人并未感觉到战争。食物绰绰有余，这是一种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生活。1977年初，问题发生了。对整个帝汶岛开始了全面的轰炸。从那时起，出现了死亡、疾病、绝望。轰炸的第二阶段从1977年末直至1979年初，出动了更多的现代化飞机。轰炸进行到投放燃烧弹的阶段。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还可以活下去。全面投放燃烧弹导致了大屠杀和饥荒……我们看到末日来临了。人们无法种庄稼。在奔向保护区途经一个又一个村落时，我亲眼目睹了轰炸造成的大屠杀和死于饥饿的人们。1979年，人们开始投降，因为别无选择。一旦有人死亡，其他人就开始放弃了。

据列奥纳多神父估计，在四年战争期间有20万人死去。

面对这一切，《纽约时报》最后写下了这句话：

他说，1978年的轰炸和一步步摧毁农田的行动旨在使岛民因挨饿而屈服。²¹⁹

不能忘记的是，列奥纳多神父所叙述的1977—1979年间的入侵行为和这段时期以及此后很多人所说的入侵行为，都与人权委员会的武器供应猛增是同时发生的。

难民们陆续叙述着大规模的暴行。到了1979年，一些国外救援力量来到该地区，但其活动分布大部分在印尼军队的控制之下。伦敦《观察家报》（*Observer*）从里斯本发出一篇报道说：“在前葡属殖民地的救援工作仅由四个国外观察员监督”，并声称“据到达葡萄牙的难民所述，供应给受饥荒打击的东帝汶的食物和药品正在被分给印尼部队和店主”。

²²⁰该报道继续写道：

“我们呼吁世界上幸存的人们，只要他们还有一丝人权观念，就请保证救援物品直接送到我们的人民那里”，一位难民说道。他宁愿匿名，因为他的家人还在东帝汶……难民们坚持认为，东帝汶还有饥荒，而且与其他报道相反的是，印度尼西亚与帝汶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仍在帝汶岛东部的山区进行。他们声称，印度尼西亚部队用逮捕、折磨和就地处决的方式对当地人实施恐怖控制。他们叙述了当局如何操控来访记者的参观行程。帝汶人声称，军队和战争物资都被挪走，造成安宁的假象。一位妇女说，她看到当地军人墓地上的十字架被挪走。当局控制严密，会通知其在救援营地的“代表们”，把身着便衣的军官安插在群众中。东帝汶不断出现的关于腐败和违背人权的证据已开始被泄露，大有把此事放在外交攻势之中心位置的危险。葡萄牙和美国尤其被牵涉其中。

然而，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两国牵涉其中的方式迥异。葡萄牙，尤其是其新的保守政府，正在寻求获得国际支持，使帝汶人免受最终的毁灭，并迫使印尼撤军。美国政府则试图阻止持续增加的曝光事实，确保印尼控制着在美国支持下的袭击之后苦难重重的幸存者。

1979年12月，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戴维·瓦茨（David Watts）从东帝汶帝力发来一篇有关一次受印尼军队监督的行程的报道。他讲述了

红十字会成功的救援行动，拯救了成千上万“处于饿死边缘”的人。“其他人也会死去，但忍受着邪恶的饥荒政策的无辜受害者至少得到了帮助。在鲜为人知的东帝汶战争中，印尼武装部队在打击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和平民的同时，实施了该饥荒政策，战争自1975年起就在全世界的视野之外进行着。”瓦茨有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受害者的说法很可靠，他的以下叙述也同样可靠：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印尼入侵之后就撤回了山区，“ [带着] 大约10万低地帝汶岛人，有的是其亲属，有的是被‘拉拢’加入这场抵抗运动的，通过种庄稼为其提供支持”。瓦茨的说法也许来自同样的消息渠道，即带他参观的向导。

瓦茨继续写道：

印尼的武装力量通过空中和海上巡逻，使东帝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绝开来，阻止外界援助去接触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平民百姓经常被迫四处逃离。原先居住在低地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河谷周围的几处肥沃之地，甚至连居住在高地的人也无法继续自己火耨刀耕的农业生活。人们沦落到偷窃的地步，能偷就偷。据一位印尼红十字会官员说，人们得不到食物供应时就以树叶、老鼠、死狗为食。他们只吃死狗，因为他们的泛灵信仰不准他们杀生。

但对于山上的人来说，真正的危机发生在1977—1978年间。印尼军队厌倦了毫无结果的战事，在帝汶岛东部发动了一场大扫荡，根除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余部。他们动用了空投伞兵以及北美罗克韦尔公司的“野马”反暴乱侦察攻击机在全岛作战，断绝独立革命阵线部队的藏身之处和食品供应……在岛上东半部地区，随处可见似乎遭到野马战机投放凝固汽油弹袭击的证据。山区的形势令人们绝望已极，他们开始大批逃往低地，寻找食物和住所。²²¹

瓦茨和他的美国同事一样，对于美国的角色缄口不言，除了谈到1979年美国为其余人提供援助之外。瓦茨还对新闻界的角色缄口不言，美国新闻界确保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但在此期间如果能唤起公众意见也许就能结束这些暴行。

在漫长而血腥的四年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美国媒体都紧跟着美国政府的宣传路线。1975年间，媒体大幅报道东帝汶，显示了对这个前葡萄牙帝国去殖民化运动的关注。1975年末，《纽约时报》报

道了印尼的“特别限制”（remarkable restraint），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记者却发布了有关印尼海军轰炸帝汶岛城镇和在边界进行军事袭击的目击报道。在8—9月的内战之后，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率先进入东帝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长篇报道，他拒绝接受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暴行的指控，认为暴行乃印尼和其他宣传机构所为。他的报道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过编辑之后的控诉更加准确，《新闻周刊》当时也依据《纽约时报》的叙述对此做了报道。印尼入侵东帝汶以后，在美国支持下的印尼进行的袭击越来越广，越来越残暴，美国对这些行动的报道却迅速减少，几乎为零（除了美国政府和印尼零星的宣传资料之外）。有关帝汶难民的信息被小心地避开，这与共产党镇压下的难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纽约时报》驻东南亚的通讯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亨利·凯姆（Henry Kamm）屈尊提到战事激烈的东帝汶时，他并未依据难民、神父或其他无数可得到的消息来源。相反，他采访了印尼的将军，仰仗其权威陈述了如下“事实”：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逼迫”帝汶人民在他们的“控制”下生活，虽然这批人现在正在逃往由印尼控制的区域。²²²凯姆叙述了1980年他在东帝汶的四天行程，并告诉读者有30万帝汶人“因持续内战流离失所，并与侵略者不断地进行斗争”——除了1975年8月以来美国和印尼的宣传资料以及西方新闻界的“新栏目”以外，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内战。他写道：1978年印尼入侵打破了“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对东帝汶人的控制”，独立革命阵线“至少到1977年还控制着众多人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独立革命阵线也许已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些结论以及有关独立革命阵线野蛮行径的报道，都基于印尼当局、帝汶通敌者的证据，也基于据他所说受现行印尼军方威胁的帝汶人的证据，他们说的话显然毫无意义。²²³

直到1979年末，真相才逐渐地显露，甚至连美国新闻界也这么做。一些国会议员，特别是艾奥瓦州的汤姆·哈金（Tom Harkin），开始意识到媒体所隐藏的事实本质何在。1979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坦诚的社论，而詹姆斯·马克汉姆（James Markham）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里斯本的帝汶难民的报道。²²⁴尽管仍有大量的歪曲，新闻界开始披露一些过去四年中得到的消息，²²⁵而美国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通常会被忽略或轻描淡写。

我们不能过度强调媒体和意见报刊的行为在这些年间有多重要。列奥纳多神父和其他许多人所描述的事件以及现在最终被广泛承认的可怕结果，是美国政府的直接责任，其西方盟友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负有直接的责任。相应地，如果美国不再直接支持印尼，这些丑陋行径也许已经

（甚至现在也能）被终止。

美国政府一直支持印尼军队，并非因为它乐见屠杀和饥荒，而是因为帝汶人的命运相比更高的目标而言简直微不足道。1965年，印尼军队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导致约50万至100万人死于屠杀，大多数人是无地的农民，自此以后印尼就成为无价的盟友。²²⁶军事统治者向西方劫掠者打开国门，唯一的阻碍是我们在雅加达的朋友的贪婪和腐败。在这个也许很富裕的国家，随着它成为“投资者的天堂”，许多人却深受苦难——甚至除了大屠杀之外，对那些持欣赏态度的西方观众来说，大屠杀显示出“正当的”反共产主义资质。²²⁷鉴于这些最主要的考虑，人权委员会将像其前任那样向印尼输送武器，使其在东帝汶达到目的，并想方设法去掩盖真相。

当我们看到教化体系开始瓦解时所发生的事情，就会明白欺骗的严重性。无论体制如何运行，个人都不愿支持近乎大屠杀的行为。随着真相逐渐地显露，一些国会成员和越来越多的民众群体开始要求终结这些暴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尽管缺乏充分的国际监督，加之印尼军方的腐败，有多少物资能被送达需要的人之手仍然十分可疑，但有一些救援物资被送达了帝汶。这是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对美国政府施压，让其停止向印尼供应所要求的军需。国际势力也可以被组织起来敦促印尼撤军，这样其余的帝汶人也许就有机会实现他们长期以来寻求的自决权。

有关东帝汶的消息现在逐渐地公之于众，有趣的是看一看媒体对这一事实如何反应。在《民族周刊》（*Nation*）——这是美国唯一一家就1975至1979年间的帝汶岛发表过一篇严肃文章的期刊²²⁸——上，兰古斯⁽²²⁹⁾对关注帝汶不屑一顾，他的独特评论如下：“假如全球新闻界突然在帝汶会合，也不会改善一个柬埔寨人的命运。”²³⁰这种评论非常的不理性，乍一听令人惊讶，但假设只是另一个家伙对柬埔寨犯下了值得关注的罪行，这种情绪就容易被理解了。在《华盛顿新闻评论》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理查德·瓦莱里亚尼（Richard Valeriani）和亚洲专家兼外国通讯记者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讨论了1980年1月下旬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有关东帝汶的报道。²³¹瓦莱里亚尼说，他已读过这篇报道，虽然“我不关心帝汶”。卡诺甚至没读这篇报道，他说：“我没时间……也没什么关系；这和我无关。”他们的看法是，《纽约时报》过于大幅报道这一无关紧要的事实：发生在帝汶的屠杀堪比在柬埔寨的屠杀，帝汶人因美国政策的直接影响已沦落到泰国—柬埔寨边界悲苦难民

所处的境地。《纽约时报》在这些细节上浪费时间是失职的，但在其他方面却不算失职，例如几天前（1980年1月20日）在周日刊用整个首页和25页的篇幅报道了迪斯·普兰⁽²³²⁾在柬埔寨的可怕经历，扼要地重述了已获大量媒体关注的事件。

他们的反应并不独特。《纽约时报》驻联合国通讯员伯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拒绝参加1979年10月关于东帝汶新闻发布会的邀请，其理由是，该问题“相当晦涩”。实际上，他在联合国辩论中也一言未发，辩论包括帝汶难民和其他人有关持续暴行的证词以及美国为此应负的责任。²³³看看那些天他发表的文章就明白，这些事件的确微不足道，够不上《纽约时报》的门槛。因此，诺西特写了满满一页专栏，披露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事实：斐济政府驻南黎巴嫩代表团没有收到报酬；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道，提到围绕联合国文件少了一个不置可否的逗号而进行的争论²³⁴——尽管这样一来，他的报道会被视为直接针对联合国的嘲讽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其第三世界的成员国，这场嘲讽活动始于联合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归入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之列或他人所称的“民主”之列。因此，这篇有关缺少逗号的讽刺性报道与媒体对第三世界各国所起的作用集体噤声的行为珠联璧合，而正是第三世界各国才促使联合国认定美国支持帝汶屠杀的事实。

面对近来媒体镇压的溃败，最有趣的反应或许来自《华尔街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有关该话题的社论。²³⁵《华尔街日报》注意到，“过去几周以来，形成了有关东帝汶”的“一场有趣的运动”。它提到，可能有1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并补充道：“有人说，这很可疑，听上去像在柬埔寨。对我们的说法是：印尼是我们的盟友，也是我们的石油供应国，印尼实施暴行时用的却是美国武器。”但《日报》继续写道，这一指控“与其说是关于帝汶，不如说是关于美国政治思维的一些多样性”。有两点因素能彻底区分柬埔寨和帝汶。第一点是，美国正在向帝汶输送救援物资，印尼人“无论多么地不情愿、多么地不妥善”，仍然在接纳食品援助，而“假如苏联为自己和盟国也这么做的话，柬埔寨人的状况会好得多”。编辑们忽略了这一事实：苏联在美国之前向饥饿的柬埔寨人提供了食品，而且似乎数量巨大，他们还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据国际救援工作人员的说法），没人在接受苏联援助时觉得勉强。但是关键性的区别在于：

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美国还有任何能力决定像帝汶局势那样的结果，这就在自欺欺人。这个地方所遭受的暴行丝毫

不令人惊讶，它标志着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秩序；谈论美国势力的邪恶行径很有可能加速这种分崩离析的进程，而绝非遏制它。那些担心为这些混乱付出人力成本的人，倒可以正视一下这种关联。

这段说理令人印象深刻。编辑们试图告诉我们，当美国提供的战机在摧毁村庄、毁坏庄稼、屠杀山区群落并把他们驱赶到集中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事实理解为“分崩离析中的世界秩序的标志”，而不是美国有意采取行动的后果。如果美国真要停止促使印尼实施这些政策的军事和外交支持，恐怖局势甚至会加重。有人会好奇，《真理报》

（*Pravda*）为苏联支持厄立特里亚的埃塞俄比亚战争而辩护时，是否达到了这种思想高度。

取笑《华尔街日报》很容易，但这样会忽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过去几个月中稍微暴露一下美国支持下的印尼暴行，就已令印尼军方、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日报》所代表的企业界感到恐惧，他们都想拿民众性命偷偷地玩游戏。这个信息一清二楚。通过有效地施压于美国政府，迫使它放弃那些可怕的政策，并继续努力把事实向更广大的民众公布，我们就能实质性地帮助东帝汶人民生存下去。付出相对较少的努力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若有这种机会，实属珍贵。但若放过这种机会，就是罪过。

（本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58—369页。）

“特殊关系”的起源

一、支持层面：外交、物质、意识形态

在国际事务和美国文化中，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这种独特性在联合国最近的投票中也体现了出来。例如，1982年1月26日，只有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公布的决议投了否决票，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同时撤出贝鲁特。由于该计划“明显想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²³⁶⁾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存在下去”，对美国政府而言

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前景。²³⁷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呼吁结束黎巴嫩以及黎—以边境敌对局势的决议，该决议最终以两票“否”和无弃权票被通过。在早些时候，美国否决了一项其他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安理会决议，该决议谴责以色列对早先呼吁其撤军的要求不予理会。²³⁸实际上，这种模式已成常态。

更具体地说，这种特殊关系表现在美国多年以来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层面。援助的具体规模不得而知，因为大都以各种方式被隐瞒了起来。在1967年之前，也就是“特殊关系”成熟之前，以色列从美国获得的人均援助在所有被援助国中是最高的。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专家纳达福·萨夫兰（Nadav Safran）评论这一事实时也指出，这相当于一笔前所未有的、从海外转向以色列的可观资本，几乎是以色列投资的全部资金，这也是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无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模式的原因。²³⁹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最近的援助相当于给每个以色列人每年约1 000美元。就连公布于众的数字也相当惊人。²⁴⁰从1978至1982年的财政年间，以色列获得了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军事援助的48%，经济援助的35%。在1983年这一财政年，里根政府要求从81亿美元援助预算中拨出近25亿美元支援以色列，其中直接拨付的有5亿美元，还有12亿美元以低息贷给以色列。²⁴¹此外，还有定期免除贷款的模式，以特殊折扣价提供武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更不用说还有免税的“慈善”捐献（实际上，是强征税），这笔钱被动用之后还要我们交税去还。²⁴²美国参议院最著名的自由民主党人、加利福尼亚州的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不满足于这种从美国纳税人获取援助资金的方式，他“提议修正海外援助法案，构建以下原则：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将不少于以色列给美国的还贷”。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评论说，这是一个包揽“所有以色列贷款及其未来贷款”的承诺。²⁴³

这一切都发生在黎巴嫩战争之前。有关海外援助的投票则发生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当时黎巴嫩南部被大面积地摧毁，贝鲁特遭受残酷的围攻和轰炸，还发生了9月大屠杀。作为对里根根据其和平提议（已被以色列拒绝接受）请求暂停修建定居点的回应，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迅速地扩张了定居点。基于这些事件，国会唯一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要以接受总统提议、在已然是现象级援助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地增加援助（这被称为“对以色列采取的强硬方式”）的方式来“惩罚”以色列？²⁴⁴还是像参议院和大多数自由派所要求的那样，采取温和路线、进一步增加总统要求的援助涨幅？幸运的是，训练有素的新闻界把这场特殊表演的滑稽之处隐瞒了起来。毋庸赘言，这则有关总统和国会方面支

持以色列近期行动的消息一点儿也不好笑。

应当指出的是，在理论上以色列对美国援助的动用是有所限制的（例如，集束炸弹只能用于自卫；发展资金不能用于以色列已承认的边境以外，也就是1967年6月之前的边境）。但美方小心行事，确保不会引发这些限制，尽管非法使用武器偶尔会引起责难或造成武器运输暂时中断，这些后果也会被大加报道。至于禁止将美国的资金用于美国官方认为是非法的、阻碍和平（即越过1967年6月之前的边境）的定居点和发展项目这一点，却从未被强制地执行过。而援助项目则被规划得无法被强制实行。据伊恩·拉斯提克⁽²⁴⁵⁾说，“相比许多其他援助关系，我们资助以色列的项目缺乏具体的说明”。国务院官员或项目援助官员从未“被派去监督以色列政府如何使用我们的资金”。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援助埃及的项目（埃及是自戴维营谈判以来接受美国非军事援助最多的一个国家），做个比较。该项目由一个125人的办公室进行周密的监督。许多知情的埃及人对该项目严加指责，声称该项目代表的是美国的优先权益而非埃及的优先权益，资助的是美国船只和顾问带来的进口物资，同时由安排在埃及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支付少部分成本。他们注意到美国对私营机构的倚重，这些机构“从中西部农民那里购买小麦，而种在埃及的小麦只需一半价格”（据一位前国际开发署主任说），此外还注意到美国对埃及社会总体上的渗透程度，有人认为这对埃及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²⁴⁶

这些例子说明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外交和物质支持。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此相伴的是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社会的本质和阿以冲突的大量错觉。自1967年起，在美国讨论这些问题已经十分困难或不可能了，因为美国发起了一场极为有效的运动，对那些敢于质疑公认准则的人进行诽谤、辱骂，有时还公然说谎。²⁴⁷以色列的鸽派人士常常对此表示哀叹，他们在以色列受过类似的对待。他们发觉，因缺乏美国国内的支持，他们在以色列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受人尊敬的马蒂亚胡·佩莱德

（Mattityahu Peled）将军说，“近乎崩溃的状态”和以“盲目爱国主义和狭隘心态”支持以色列最极端保守的政策，造成了“再次刺激以色列采取强硬的、不妥协姿态的危险”。²⁴⁸以色列著名记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研究历史学家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把“对美国犹太人的偏见”视为目前“美国—巴勒斯坦对话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话的主要障碍，没有这个障碍，就不会那么困难而艰辛地推进和平进程”。²⁴⁹我认为，这些以色列作家关注美国犹太人的作用，未免太过狭隘了。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的犹太人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国土报》（*Ha'aretz*，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纽约时报》）一位特派记者的话，他说：“你们美国的犹太人、你们这些自由派、热爱民主的人，你们不敢质问政府的行为，就是在支持政府在这里搞破坏。”他指的是发生在梅纳赫姆·米尔森（Menahem Milson）教授和阿里埃勒·沙龙⁽²⁵⁰⁾将军于1981年11月倡导的“平民政府”（civilian administration）领导下被占领土上的镇压浪潮。²⁵¹他进一步解释了贝京⁽²⁵²⁾和沙龙的计划：“使用一切非法手段”，把大批阿拉伯人驱离西岸，尤其是领导者和具有领导潜质的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你们让恐怖分子把炸弹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市长的车上，把定居者和一些阿拉伯内奸武装起来，让他们在阿拉伯城镇胡作非为，为抢夺财产进行屠杀，并不针对民众。一些阿拉伯人已被定居点的居民杀死。人们知道凶手是谁，但警察根本束手无策，他们接到了命令。面对这些违反以色列法律和违背犹太人道德的行为，你们的借口是什么呢？

他补充说，定居点居民是“遵守更高法则的、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听拉比的话去做事。至少有一位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²⁵³⁾的拉比写道，摧毁亚马力人 [Amalek，指非犹太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戒律 [mitzvah，宗教义务]”。²⁵⁴这位《国土报》记者又说，在他的日志中“有一份满是恐怖故事的文档，是从西岸执行占领任务回来的士兵向我们讲述的。我们提到他们时可以用笼统的说法——我们可以痛斥毁掉年轻人品格和自尊的占领行动——但我们无法刊登细节，因为军队审查制度包括服现役军人的行为”。²⁵⁵根据以色列报纸上公布的事，你可以想象这份文档包含了哪些内容。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的是，在以色列希伯来文报纸上可以自由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和记录的事，在美国报纸上基本被排斥在外。这样一来，要付账单的人大都蒙在鼓里，不清楚自己为何事付钱，或者不清楚以色列内部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辩。下面还有许多例子。

已经有人不断意识到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给以色列带来的危险，这些危险导致该地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并不断地产生爆发更大规模、或许是全球化的战争的威胁。

二、致使因素

1. 国内压力集团及其利益

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常常被归咎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美国犹太社区对政治生活和左右意见方面的影响。²⁵⁶虽然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在两个主要方面上却并非全面：第一，它低估了“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范围；第二，它高估了政治压力集团在决策时所起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因素。

首先，赛斯·提尔曼（Seth Tillman）所谓的“以色列游说团”比美国犹太人社区要大得多，它包括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多数派、工会领导人、²⁵⁷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²⁵⁸支持强大国家机构的“保守派”人士（他们认为国家机构适于在国内进行由国家引导的高科技废料生产 [也就是军事生产]，在国外开展军事威胁和冒险主义行动），还包括那些（分布于这几类人之间的）狂热无情的各行各业的勇士。在以色列，这些人形成的关系受到欢迎，并且不只受到右翼的欢迎。因此，在1973年的战争之后，著名的鸽派人士、即将成为工党总理的伊扎克·拉宾⁽²⁵⁹⁾就不再赞同此前为达成政治和解而采取的举措了。⁽²⁶⁰⁾他敦促以色列应当“争取时间”，并希望“我们后来会发觉自己处在更好的境况之中：美国可能会对苏联采取更有侵略性的立场……”²⁶¹

许多美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些因素。在1980年12月，他们当中一些人在美国的犹太报纸上声称：“在犹太人和道德多数派之间，存在着比犹太人和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之间更多的潜在共同利益。”（《犹太周刊》[*Jewish Week*]）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前主席、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管雅克·托兹纳（Jacques Torczyner）写道：“首先，我们要得出结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天然同盟是右翼反动派，而非自由主义者。”²⁶²他对后者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误以为自由主义者并未加入冷战共识，而实际上他们却在不断地促成并帮助维护冷战共识。此外，更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左派与和平主义团体，除了无关紧要的一些人之外，都普遍极力地支持以色列（这和许多无端的指责正好相反），有些人甚至更狂热。他们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换在别处一定会大加指责。同样，下面也会举出一些实例。

在最近一项有关“真正的美国反犹太主义”研究中，有一个与拉宾的观点类似的有趣表达。其研究者是内森（Nathan）和露丝·佩尔马特（Ruth Perlmutter）。内森是圣约之子会美国反毁谤联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的全国主任，露丝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美国的反毁谤联盟被视为公民自由意志组织，这曾经是个当之无愧的名声。现在，它通过诋毁评论家（包括未通过其忠诚测试的以色列人）、散播那些通常流传在未署名小册子中的所谓“信息”等技巧，主要致力于阻止人们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评性讨论。²⁶³在以色列，反毁谤联盟被非正式地说成是以色列宣传机构在美国的“主要支柱之一”。赛斯·提尔曼称其为“以色列游说团”的一部分。我们再看看它的公开表现。²⁶⁴以色列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梅厄·派尔（Meir Pail）先前是以色列国防军（IDF）⁽²⁶⁵⁾军官训练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位以色列鸽派人士。当他说起“果尔达·梅厄⁽²⁶⁶⁾和工党如何破坏犹太复国运动原有框架之内的多元化和争论”时，他也许想到的是反毁谤联盟。他说，他们在模仿“约瑟夫·斯大林对待全世界共产党的方式”，后者的利益会“屈服于……苏联的权力利益之下”；“以色列政权也与此类似”，因为它已经“破坏了保持异见和质疑的过程”，这从（据他说）果尔达·梅厄的工党政府就开始了。²⁶⁷反诽谤联盟变成了身不由己的傀儡。

佩尔马特夫妇所引述的研究表明，反犹太主义在美国“一度恶贯昭昭”，如今也无人支持歧视犹太人的行为；也许有人不喜欢犹太人，持反犹太人的态度等，但种族团体和宗教团体总体上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那么，什么是依然猖狂、实际上也许比以前更危险的“真正的反犹太主义”呢？真正的反犹太主义最终取决于“化剑为犁的炼金师，即拥护恐怖的巴解组织并处于同时代的越南调解人⁽²⁶⁸⁾……”的行动。²⁶⁹佩尔马特夫妇担心的是，“如今战争的名声不好，媒体又太喜欢和平主题……”，他们关注“由左派发出的指责促成我们双方交战的诽谤以及近来……对美国国防预算进行的抨击……”。“除了石油之外，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比起当前危及犹太人的对抗性未来，和平会更好，即使它因非正义而带有缺陷。”相似的是，犹太人的利益“在这十年受到了国内外左翼人士”的威胁，因为他们进行示威反对并斥责美国干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犹太人的利益之所以受威胁，是因为中美洲的独裁者一向与以色列交好，双方对这种友谊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佩尔马特夫妇并未提及这些事实，这倒可以解释索摩查的受害者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将军为何不是以色列的朋友。这并非由于反犹太主义，而是确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军队炫耀自己曾在以色列受训并获得支持，被军队用以色列的武器屠杀或折磨的农民不可能与以色列为友。据佩尔马特夫妇说，像基督教全国教会理事会这样的团体也威胁到了犹太人的利益，理事会号召以色列“把巴解组织纳入中东和平谈判之中”。“为左翼辩

解的人和为右翼辩解的人一样，经常把反犹太主义或对犹太人利益的默然态度合理化，认为这只是暂时阶段。”但是犹太人应该更清楚。

自始至终的争论都在于，以色列的利益——已被默认为不承认巴勒斯坦权利的、抗拒阿拉伯国家的大以色列的利益——就是“犹太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像两位作者设想的那样，任何人如果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或以其他方式倡导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政策，用斯大林早些年来说法来讲，都是“在客观上”反对犹太人。

比起传统的反犹太分子，那些“不够顽固的”人现在将犹太人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他们鼓吹和平，批评美国的干涉主义，反对残忍的暴君和虐待者等。这才是“真正的反犹太主义”并且极其危险。因此，美国反诽谤联盟也就此开展了工作。²⁷⁰

也许可以指出的是，凭借对“反犹太主义”（或者就犹太人而言还有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指责，让批评以色列的评论家缄默，这是普遍采取且经常有效的方法。即使连颇受尊敬的以色列工党外交官阿巴·埃班（Abba Eban，被认为是鸽派领导人）也会写道：“与非犹太人世界对话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证明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人们普遍认为二者都是针对以色列国政策的批评）毫无区别”，而犹太批评家（尤其提到斯通和我）“对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基本的……负疚感”。同样，欧文·豪⁽²⁷¹⁾几乎不加论证就把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危险状态归咎于“对石油的刻意操控”，还引用了这句“酸腐的格言：在心灵最暖之处，仍有一块犹太人的冰冷之地”。这样一来，就毫无必要考虑他所支持的工党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说，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还在进行着众人皆知并受到严厉指责的残酷占领²⁷²。²⁷³

佩尔马特夫妇嘲笑那些“批评以色列但同时又幻想反击反犹太主义的”人，但他俩的评论也的确不够坦诚。这是一种标准策略。在其著名的有关前以色列国时期的研究中，克里斯托弗·赛克斯⁽²⁷⁴⁾对这种策略的渊源（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新阶段”）追溯至大卫·本·古理安⁽²⁷⁵⁾，后者对英国法庭暗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参与1943年军火贩卖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自此以后，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²⁷⁶然而，这种策略主要在1967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才被修炼成一门高级艺术，并愈演愈烈，因为它所辩护的政策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

在犹太人社区中，一向被要求并被普遍实现的一致“支持以色列”的局面令以色列的鸽派大失所望，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种“支持”严重地削弱了他们为更改残酷的、自我毁灭的政府政策所做的努力。在美国的

犹太人社区中，甚至还进行了一场有关批评以色列政策是否合理的生动辩论。也许更令人惊奇的是，没人意识到这场辩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批评以色列是不合理的这一立场得到诸如埃利·威塞尔⁽²⁷⁷⁾这样的人的维护。他说：

我支持以色列——句号。我认同以色列——句号。我不在以色列，也从不攻击、批评以色列。

有关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的政策，威塞尔也无法做出评论：

要做什么、如何去做，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缺乏信息和知识要素……你必须处在权力位置才能获得所有的信息……我没有那种信息，所以我不知道……²⁷⁸

除了有关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记录，很难再找到类似的国家崇拜立场了。威塞尔在美国被视为反法西斯主义评论家，也被尊崇为不朽的圣人。

在维护不宜在以色列境外批评以色列这一教条时，人们普遍给出的理由是：只有面临种种危险和问题的人才有权发表批评，而不是隔岸观火的人。按照类似的逻辑，美国人批评巴解组织、阿拉伯国家或苏联都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可以拓展得更广一些：向以色列提供大量的资助，把以色列捧上天，同时诽谤其敌人，尤其是已被其征服的敌国，这样做是合理的，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但对我们慷慨捐赠财物如何使用提出批评，这就不合理了。

2. 美国的战略利益

当我们回到主题，谈及犹太人对政治和意见的影响时，就严重低估了所谓的“支持以色列”的范围。转到第二点就是，这种观点高估了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任何压力集团都不会控制表达公众意见的渠道，或在制定政策上保留持续的影响力，除非其目的与拥有实权的精英阶层接近。这些精英阶层在利益或（有关共同利益的）策略性判断方面并不一致；在一些问题上（比如目前这个问题），他们常有分歧。然而，进一步的观察会表明以下评价是正确的：“美国对自身在中东的政治—战略利益的构想在不断变化着。在这种背景中，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演变主要由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来决定。²⁷⁹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相关的历史背景。

尽管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但如果假设以色列代表着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那就错了。相反，美国的主要利益在于该地区的能源储备，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国务院1945年的分析报告把沙特阿拉伯描述为“……巨大的战略资源宝库，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物质奖赏之一”。²⁸⁰美国致力于赢得并保留这个奖赏。自“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公理几乎就是，这些能源储备应当归美国控制。这个主题的最新变体是，石油美元应当通过军事采购、建筑项目、银行储蓄、国债投资等渠道大量地流入美国。面对各种威胁，美国有必要捍卫这一主要利益。

（1）对美国控制中东石油的威胁

在修辞层面，必须“捍卫”中东并使其免受威胁的对象大体上被设想为苏联。的确，美国不会容忍苏联威胁要在中东石油生产或分配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举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现实考虑——这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专家们尚未相信自己编织的满足其他需求的幻想。²⁸¹实际上，苏联一直就很犹豫是否要入侵已认定的美国势力范围。

这种模式早在冷战时期就形成了。1947年，美国在希腊组织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叛乱运动。英国在纳粹退出希腊之后进入希腊，强制实行保皇派和前纳粹合作者的统治，镇压雅典的反纳粹抵抗。丘吉尔对英国军队的命令是：“就当你们身处一座已被征服的城市里，而当地正发生着叛乱。”²⁸²由英国强行扶植的政府实施着镇压，并且十分腐败，反而激起了人们的抵抗。英国的实力因“二战”而大大削弱，无法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接手了这项摧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民和工人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任务，同时又让其偏爱之人留位继任，比如处于法西斯青年运动背景下的保罗（Paul）国王和弗雷德里卡（Frederika）王后，还有内政部长马夫罗米查利斯（Mavromichalis），他被美国情报机关视为前纳粹的合作者并被委任负责内部安全。有些参议员发觉这一切很难符合杜鲁门主义的说法，即支持“各个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镇压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反镇压运动则势头高涨。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对这些参议员解释说：“我们不得不通过这个法西斯政府进行工作，这个政府是偶然产生的。”²⁸³

反镇压的努力绝非小事一桩：在随后的战争中，有16万希腊人被杀害，有80万希腊人成为难民。美国的“天赋使命”为其托付了一项任务：消灭那些林肯·麦克维（Lincoln MacVeagh）大使⁽²⁸⁴⁾所说的“搞破坏的社会势力”。他们植根于暗中“成长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性”之中，美国大使馆代办卡尔·蓝钦（Karl Rankin）把他们称为“一种外来的、颠覆性的

影响”，对他们不应该“宽宏仁慈”，除非等到“这个国家成功地重新确立统治”并且“土匪起义被镇压”之后（这是大使的说法，是美国文件中的标准表达，和苏联文件中提到阿富汗一样）。美国的“天赋使命”及其法西斯客户（当然还有富人和后来的美国公司，他们是真正的受益者）代表了希腊“当地人”，与被阶级意识颠覆的农民和工人形成的“外来”影响不同。

美国的“天赋使命”极其野蛮地开展了清算阶级敌人的任务，这对英国人来说有点过头，在这些程序上英国人无法体现绅士风度；从另一个具有英国影响力和实力的前哨被换掉，英国人也很不开心。随着美国“天赋使命”的极力鼓舞和直接参与，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运往监狱岛，在那里被虐待或被处决（或者幸运的话，只是“重新受教育”）。联盟遭到破坏，甚至连温和的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分子也被镇压，而美国则无耻地操纵了选举流程，确保选对的人赢得选举。因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是阴暗的。十年之后，“在1959至1963年间，几乎三分之一的希腊劳动力移民海外，去寻找更满意的工作”。²⁸⁵ 1967年的法西斯政变显然又是美国在背后撑腰，其根源还是同样的事件。

这场反镇压运动的一个主动动力是对中东石油的关注。在1947年3月12日宣布杜鲁门主义的演讲中，杜鲁门总统说：“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明白，如果希腊落入叛乱者手中，“整个中东很可能会混乱不堪”。1948年2月，一份中情局的研究警告说，倘若叛乱者取得胜利，美国将面临“可能丧失中东的石油资源（中东石油占世界石油储备的40%）”的危险。

²⁸⁶为了替美国干涉辩护，就捏造出有来自苏联的威胁，但却缺乏事实基础；斯大林试图控制希腊游击队，他知道美国不会容忍失去中东这个前哨（也就是希腊），也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前景：在铁托的影响力之下可能存在一个巴尔干共产主义同盟。这也不是从以下事实得出的：这种威胁是捏造出来的，某些规划界人士不会相信；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一样，人们很容易相信那些便于相信的事。来自苏联的威胁被夸张了，这应当被理解为冷战体系起作用的一个早期事例，每个超级大国都利用这个体系来发掘其劲敌的威胁（借用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²⁸⁷⁾ 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大撒旦”），为在自己领域内试图采取的行动寻求支持。

希腊反镇压运动在军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获得了成功，为美国未来的政治决策留下了印记。自那时起，就不断出现有关苏联企图控制

中东石油、苏联向海湾地区推进等说法。但没有任何实例表明，苏联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冒险发动核战争——因为这将是可能发生的后果。

对于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威胁，这是由欧洲造成的。²⁸⁸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成功地取代了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取代了英国，部分靠谋划，部分只是权力平衡的反映。²⁸⁹受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政变在1953年恢复了伊朗的沙阿政权，其结果之一是把伊朗40%的石油从英国人手中转移到了美国人手中。这一事实引发了《纽约时报》编辑的关注。他们认为，某些被误导的英国阶层也许相信“美‘帝国主义’……再次把英国从历史要塞上挤走了”。同时，编辑们欢呼道：“拥有丰富资源的欠发达国家现在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代价惨重，必须由其中的某个成员以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偿还。”²⁹⁰后来的事件表明，这个实实在在的教训的确代价惨重，偿还仍在继续；其他许多国家自此之后被迫学到了同样的教训。

对欧洲在该地区的参与，所受到的关注从未中断过。美国强烈反对英国和法国重新在该地区确立影响力的企图，两国在1956年（联手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区；把三种势力从埃及领土上赶走，美国功不可没，虽然来自苏联的威胁也起到了作用。亨利·基辛格在他1973年“欧洲之年”的讲话中警告说，要警惕由欧洲主导的、包括中东和北非的贸易集团带来的危害，美国可能被排除在外。后来，他在一次私人会面上透露，1973年之后其外交手段的一个基本要点是“确保欧洲人和日本人不参与中东外交”。²⁹¹美国之后反对“欧洲—阿拉伯对话”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如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包括当今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例如韩国）为在石油生产所带来的财富中分得一杯羹而相互竞争，这成为愈加紧要之事。

（2）来自当地的威胁：作为战略资产的以色列

必须“捍卫”该地区并使其免受的第三种威胁，来自当地：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渐趋成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以关系肯定不够稳定，华盛顿似乎一度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缔结亲近关系，后者得到过美国中情局的些许支持。这些前景似乎令人不安，以色列因而在埃及组织了恐怖小组，对美国的军事驻地发动攻击（也包括埃及的公共设施），试图让埃及和美国产生嫌隙，希望这些行动会被归咎于埃及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²⁹²

然而，自1950年代晚期起，美国政府逐渐接受了以色列的观点：强

大的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可以作为抵挡本土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威胁美国利益的屏障，前者可能会得到苏联的支持。一份最近解密的195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指出，反对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逻辑推论”是“支持以色列，把它作为近东唯一的亲西方的强大势力”。²⁹³同时，以色列与土耳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缔结了秘密协议。据大卫·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说，这份“外围协议”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促成且“持久有效”。²⁹⁴在整个1960年代，美国情报人员将以色列视为抵抗纳赛尔的压力（纳赛尔对海湾石油生产国施压，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苏联影响力的屏障。这一结论因以色列1968年大获全胜而更加确凿，以色列迅速地攻占了西奈半岛、加沙、西岸和戈兰高地。攻占戈兰高地发生在违背停火协议的行动之后，而那次行动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的命令，并未告知总理或总参谋长。²⁹⁵

以色列认为自己是“战略资产”的观点再次从以色列的举措中得以证实。以色列要阻止叙利亚去帮助1970年9月被约旦屠杀的巴勒斯坦人，当时美国还无法直接干预这种被视为威胁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客户的行为。以色列的贡献使美国的援助大幅增加。在1970年代，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和沙阿统治下的伊朗能够保护美国对海湾石油生产地区的控制。沙阿下台后，以色列作为服务于美国势力的中东斯巴达，吸引了更多的美国支持。

同时，以色列不仅帮助美国避开了对罗德西亚和南非的援助禁令，还动用了中情局提供的大量秘密资金——支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²⁹⁶⁾、乌干达的伊迪·阿明⁽²⁹⁷⁾、扎伊尔的蒙博托⁽²⁹⁸⁾、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²⁹⁹⁾以及不同时期的其他人³⁰⁰——帮助美国渗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³⁰¹最近，以色列还帮助美国为其中美洲的客户提供了许多顾问以及军事和技术援助。美国与以色列、南非、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南美南锥地区⁽³⁰²⁾的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不断结盟十分明显，对美国势力的主要人物来说已是诱人的前景。³⁰³如今，以色列无疑已被视为精心打造的美国基地和包围中东石油生产地区的快速部署部队（Rapid Deployment Force）后备系统的关键部分。³⁰⁴这些事件非常重要，值得多加重视，但我无法在此详述。

若非通常所理解的以色列在地理政治中的角色——主要在中东，但也在其他地区——很难说美国各种亲以色列的游说团在制定政策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者很难说佩莱德和以色列其他鸽派所谴责的舆论氛

国会得以构建和维持。相应地，这种舆论氛围很有可能会受到损害，如果以色列逐渐被视为是对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利益——要维持其对中东能源储备和石油美元流通的控制权——的威胁而非支持的话。

在美国掌握实权的人大多支持这种视以色列为“战略资产”的概念。这一立场在内部政策争论中总是胜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扶助。但该立场并非没有受到过挑战。也有一些强大的势力喜欢长期有可能性的和平政治解决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及此事。

迈克尔·克拉雷（Michael Klare）建议说，可以有效地区分“普鲁士人”和“做交易者”。“普鲁士人”提倡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达到预想的政策目的，“做交易者”怀有同样的目的，但认为和平手段会更有效。³⁰⁵这是战略性的评估，双方立场可以因此而转换。直观地估算，可以准确地说，“普鲁士人”支持作为“战略资产”的以色列，而“做交易者”则寻求某种政治和解。这一点在很多亲以色列的宣传中已得到间接的承认。例如，有一则由很多名人（包括在其他语境中的鸽派）签名的《纽约时报》整版广告，标题为“相信以色列，使美国更强大”，广告号召组建亲以色列的政治压力集团（National PAC，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³⁰⁶⁾）。为了支持自己的广告，他们写道：“……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受到威胁，在那里立足还需要数月时间。如果有以色列作为盟友，则只需数天。”同样，国际安全中心主任约瑟夫·彻巴（Joseph Churba）抱怨说：“以色列左派”不赞赏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许多他们这个级别的人，和美国左派这个级别的人一样，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论在萨尔瓦多还是在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任何一方都不应充当国际警察”——那么，根据前面所讨论的由反诽谤联盟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信条来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左派正在促成反犹太主义，“威胁到了犹太人的利益”。那些理解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人和彻巴一样，认为“西方势力”应当“被有效地用来缓和苏联和激进冒险主义”，³⁰⁷而美国 and 以色列应该在萨尔瓦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充当国际警察。

在上面两种情况中，都有“普鲁士人”的真实声音。

有关以色列的“加利利和平”行动（入侵黎巴嫩）⁽³⁰⁸⁾是否加强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并总体上服务于美国这一方，在这种争论中也隐含了相同的区分。《新共和》杂志认为的确如此，从而说明该行动是正当的。其他人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托马斯·弗里德曼⁽³⁰⁹⁾在对阿拉伯人的意见进行广泛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不仅在黎巴嫩失去了对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的尊重 [据一位黎巴嫩政治学家解释

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受以色列袭击的受害者，即使连被围困的阿拉伯首都受到‘民众运动’的捍卫时」，而且在中东也失去了对美国的尊重。”这是因为“美国不可信”的想法（据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负责人说），也因为美国把以色列当作“美国政策的工具”才支持以色列。一位科威特高级官员对广为流传的意见做出回应，他说：“你们丧失了最紧要的一部分——在人道主义层面而言。无论阿拉伯世界把美国当作道德权威对其怀有多少敬意，这些敬意都已经消失了。”³¹⁰

在这场争论中，谁对谁错？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双方都是对的。那些嘲笑“人道主义层面”和“道德权威”概念的人可以貌似有道理地认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美国用武力和暴力统治该地区的能力，入侵黎巴嫩至少在短期内促成了这一目的。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会从同样的证据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3）附带业务

入侵黎巴嫩之后，以色列马上转而强调自己作为“战略资产”的地位，通过改善与其非洲和拉美盟友（它们也是美国的盟友，这并非偶然）的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中情局庇护下，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1960年代与扎伊尔重新恢复关系，访问了扎伊尔将军蒙博托，并告诉他，除了直接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以色列会通过它对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影响力来帮助扎伊尔，这将有助于改善 [扎伊尔的] 形象”。³¹¹这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因为这种腐败、残暴的独裁者形象并非登峰造极。蒙博托抱怨说：“在美国，[扎伊尔] 主要的对手是国会中的犹太成员。”沙米尔的反应则令人欣慰：“犹太人也批评我们。”他继续解释说：“有了以色列集团的合作和美国犹太人提供的资金，就有可能帮助扎伊尔”，也就是从军事上、物质上和形象提升方面提供帮助。蒙博托将军非常高兴的是，以色列军官同法国、中国顾问一起提供军事训练（特别是给他的总统护卫队）。1983年1月，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访问了扎伊尔并达成一项协议，协议约定以色列军事顾问将重建扎伊尔的武装力量。据合众社（UPI）报道，沙龙“把今天以色列对扎伊尔的新武器援助和军事援助协议解释为，迈向提高以色列在非洲影响力的一步”。沙龙进一步说，该项目（必须是秘密的）将“有助于以色列的武器和设备出口”，并会引领其他非洲国家向以色列寻求军事援助。

³¹²

早在几周前，沙龙还访问了洪都拉斯，“与这个对我们的国防建设表示感兴趣的友好国家缔结关系”。以色列电台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帮助洪

都拉斯组建了中美洲最强大的空军，并指出“沙龙之行引发的问题是：以色列是否可以作为美国在洪都拉斯的代理人？”“也有报道说，以色列顾问已经帮助洪都拉斯训练飞行员。”³¹³洪都拉斯“高级军事机关”声称，新签订的以色列—洪都拉斯协议涉及精密的喷气式战斗机、坦克和加利尔突击步枪（Galil assault rifles）（这是中美洲的国家恐怖分子的标准配置），还有对军官、部队、飞行员的训练，或许还有导弹。沙龙的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空军司令和国防部总司长，他们也“被给予通常只对来访国家元首才有的全面待遇”。一位政府官员说，沙龙的访问比里根前不久的访问“更加积极”，因为沙龙“向我们出售了武器”，而“里根只是老生常谈，还解释说国会不让他做更多的事”。以色列鸽派人士感叹说，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内势力会阻碍以色列“做更多的事”。“这次秘而不宣的访问和军事协议突出了以色列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危机重重的中美洲是美国的武器中间人和代理人。”同时，在危地马拉，总参谋长马里奥·洛佩兹·富恩特斯（Mario Lopez Fuentes）认为里奥斯·蒙特总统不够强硬，他还抱怨美国干涉人权。他说，“我们想要的是拥有自由”；“他暗示说，如果美国与以色列等其他盟友持有相似的态度，那最好不过了。”³¹⁴

以色列在中美洲的业务相当丰富，包括（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现在显然还包括哥斯达黎加，因为自从路易斯·阿尔贝托·蒙赫⁽³¹⁵⁾于1982年2月当选之后，哥斯达黎加就开始向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靠拢。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武装部队的贡献相当大：对危地马拉而言，是因为通过美国干预而就任的军事政权发现很难抵御持续高涨的叛乱，而国会的人权限制又妨碍美国对这些大肆屠杀者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对于洪都拉斯而言，是因为里根愈加明显地煽动混乱和冲突，支持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索摩查国民卫队突袭尼加拉瓜，他们利用受美国训练多年的手段在尼加拉瓜搞折磨和迫害。³¹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战争之前，美国曾希望雇佣阿根廷新纳粹分子达成这一目的，并提高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成效。不过，也许需要一个更可靠的客户兼盟友来做代理人。

查尔斯·梅克林（Charles Maechling）曾领导美国反叛乱行动并帮助约翰逊和肯尼迪总统制订了1961—1966年国内防御计划，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把在拉丁美洲受美国训练的人员说成“无异于‘二战’后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的战争犯”，³¹⁷并补充说：“对于领导过征讨纳粹罪行的美国来说，支持海因里希·希姆莱灭绝营的做法就是一种暴行。”³¹⁸除了是暴行之外，这种支持也因国会立法而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在支持那些使用希姆莱灭绝营做法的国家的过程中，以色

列在整个1970年代的“贡献”尤为重要，如今则更为重要。

国会人权运动（常常被误认为是美国总统发起的）是“越南综合征”的反映，“越南综合征”是一种越战以后折磨着很多人的恐怖疾病，其可怕症状在于对美国在全世界如何使用权力的反思和对折磨、谋杀、侵略和压迫的关注。人们以为这种疾病已被治愈，但民众对里根重新使用肯尼迪式反叛乱行动的反应表明，这种乐观的态度为时过早，而以色列的助力或许比以前更受欢迎。有人曾偶然提到，美国一向反对以色列在拉丁美洲的冒险行动（例如，卡特就反对以色列对索摩查提供援助），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本来就可以组织它不赞成的干预行为，有时也这么做过，但不在尼加拉瓜。甚至在美国的天然盟友——尼加拉瓜的商业团体——都转而反对索摩查之后，美国人权局实际上还在支持着索摩查的血腥统治，直至其倒台。

以色列的业务已经越过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扩展到亚洲。例如，有一次，当以色列的武器在东帝汶屠杀中用尽时，以色列向印尼提供了美国产的喷气式飞机。美国人权局为圆满完成屠杀任务尽力提供所需军备时，还不愿意大张旗鼓，或许是害怕新闻界会不参与此次屠杀共谋。³¹⁹以色列媒体说的是“第五世界”——以色列、南非、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一个由专门开发先进武器（包括核武器、导弹等）、技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的新联盟。³²⁰

由于里根煽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境的企图以及沙龙对洪都拉斯的访问，以色列的干系愈加明显，并引起了一些官方的拒绝，《纽约时报》也及时如实报道了此事。莱斯利·格尔伯（Leslie Gelb）指出，以色列“正在扩大它作为中美洲主要武器供应方的军事训练任务和角色”，他还写道：“从种种迹象来看，不像其他众人〔美国人、巴解组织、古巴人、东德人〕那样，以色列人不在那儿，也不是东西对抗形式的参与者或者进行了革命或反革命阴谋。”这些“迹象”竟然成为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大致说法，但他们没人“说以色列在中美洲遵照华盛顿的嘱咐，或在像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帮助美国解围。人权局因为滥用民权，已被禁止向危地马拉提供军事援助”。人们自然会期待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公开宣布这些安排，因此，他们没有这样做倒足以证明这种谣言没什么大不了。一位国务院官员评论道：“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乐意他们帮我们解围”，例如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但我不会说我们和以色列人都已明白要做什么”。³²¹鉴于共同的理念和利益，煞费苦心地“明白”似乎不必要，更不用说美以在包括军事本身、军事工业、情报、外交等各个层面

的紧密关系。

引人注意的是，格尔伯当然在设想，尽管以色列可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毫无疑问是向美国权力提供服务的利益之一），这对（比如像）古巴来说却未必如此。古巴肯定毫无理由地感到遭受威胁，因此也不会试图通过支持友好的政府来摆脱自身的“孤立状态”（他说，不会像以色列那样）。有人可能期望格尔伯也许对此事表示敏感。格尔伯是“五角大楼文件”研究工作组负责人，该研究涉及惊人的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20年时间里，美国情报机关彻底地被冷战宣传洗脑而无法想象北越（南）人可能受他们自己认定的利益所驱使，而不只是苏联或中国的听差。³²²

三、美国的自由主义以及对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普鲁士人”这一观点已在国内政策争论中最终胜出。但事情却更加复杂。在受佩莱德将军谴责的以色列政策建立起“盲目沙文主义的、狭隘的”支持的过程中，美国的自由主义引领了方向。在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反对全世界的那一天，民主党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完全同情以色列近来袭击黎巴嫩的声明，在描述‘双方在黎巴嫩丧生的全体人员’时仅仅表示了遗憾”。相比之下，欧共体外交部长“严厉谴责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新一轮入侵”，称其“明目张胆地违反了最根本的人权准则和国际法”，并继续说，这种“非正当行为”会“引发广义上的战争”。³²³这绝不是孤立性事件。

实际上，《纽约时报》当天（6月27日）头版十分清楚地概括了美国的“特殊关系”。有三个相邻的专栏。第一个是威廉·法瑞尔（William Farrell）发自贝鲁特的报道，他叙述了以色列最新轰炸的后果：拥挤的墓地，人被埋在集体坟墓中，医院急需供应，四处堆满垃圾，臭不可闻，尸体在成吨的碎石下腐烂，建筑物成了断壁残垣，停尸房的冷库已被装满，尸体堆在医院的地上，几位医生全力治疗被集束炸弹和磷光弹炸伤的受害者，以色列截获的红十字会药品，被炸毁的医院，被以色列炮击中断的外科手术等。第二个专栏是本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发自纽约的报道，讲述了美国如何阻拦联合国制止此次屠杀的行动，因为巴解组织会作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势力”被保留下来。第三个专栏是亚当·克莱默（Adam Clymer）发自费城的报道，是关于民主党全国会议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给予的同情性支持。这三个头版报道彼此挨着，有些精确地抓住了“特殊关系”的本质——即使没有加上社论也是如此。

美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非常同情以色列，但随着以色列显示出军事实力，其态度在1967年发生了明显的积极转变。不久之后，以色列首席军事指挥官就明确表示，以色列已经不受严重的军事威胁，并很有信心期望迅速获胜，所谓对以色列生存产生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³²⁴但该事实在美国被压制了下去，美国支持的愿景是以色列的大卫对抗阿拉伯的歌利亚⁽³²⁵⁾。³²⁶这样做使自由人道主义者可以向该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给予同情和支持，因为后者已从击败敌人转向镇压沦为其控制之下的势力，而领头的将军们则解释说，必要的话，以色列能在一周内征服所有的地区，从喀土穆到巴格达再到阿尔及利亚（阿里埃勒·沙龙）。³²⁷

以色列如此展示其军事实力，令其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声望高涨，这一事实令人关注。大部分的关注来自美国国内，尤其关注的是美国无法击败印度支那的当地抵抗，这是合情合理的。以色列的闪电式胜利本应是对公开倡导暴力实现国家目的的激励，这并不令人惊讶。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此事的立场上有许多假象。如今，人们有时已忘记这些知识分子在1967年是多么大力地支持美国干预印度支那（更确切地说是入侵），并且不断地这么做，尽管他们很多人逐渐反对这样冒险，原因和迫使商界做出同样判断的原因一样：成本太高，与可能获得的益处不成比例——这是个“实际的”反对立场，而非原则性的反对立场，这与对官方敌人的掠夺行径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例如，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之下，和平运动的中坚力量出于讲原则的原因反对两种情况下的入侵；在随后重写历史时，这些事实都被掩盖了。）因此，对以色列有效而成功地使用武力的呼吁实际上十分宽泛。为了显示这样做的正确性，人们说要把摩西·达扬送到越南，也只是半开玩笑罢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人们总是忧心忡忡地看待对权威的挑战，构想出有关越共、毛主义分子、蓄着胡子的古巴革命者、闹事的学生、黑豹党人、阿拉伯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势力——或许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的恐怖画面。他们正在图谋动摇我们这个掌握特权和统治的世界的基础。以色列展示了如何正确地对待突然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许多感到恐惧的、倡导摆清自己位置之人的效忠。对某些人来说，以色列所显示的军事势力赢得了公开的钦佩和尊重，而其他人则隐藏了这种感受，反而在被以色列果断镇压的势力面前用激将法谈论到，据说以色列不堪一击。还有一些人被有影响力的“‘大卫和歌利亚’传奇”所欺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件事的趋势很容易被预测，而且有助于解释为何随着以色列显示出挥舞铁拳的能力，人们会流露出“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自1967年开始，随着有效地利用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自我厌恶”的道德武器，质疑以色列政策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沉寂了。在欧洲和以色列国内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已被有效地从美国的议程上清除。以色列、以色列的敌人和受害者、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形成了一幅画面，只在有限的部分与现实相像。在197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慢慢地改变。而在被占领土米尔森—沙龙政权统治下以及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在美国只是被部分地报道了一下）的背景下，改变则更为显著。这对宣传者的天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通过展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色列赢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这也为

有效地对付国内持异见者提供了武器。有人竭尽所能地想证明，新左派支持阿拉伯恐怖主义和对以色列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视事实的行为（文献记录清楚地表明，新左派通常支持以色列鸽派）。³²⁸

有趣的是，当前采用的迎接新挑战的办法之一是，广泛向媒体扩散早年用在新左派头上的欺骗性批评。现在也一直有人抱怨说，媒体对第三世界反抗西方势力的革命斗争怀有反射性的同情态度，它们受这种同情态度的驱使对以色列怀有敌意，也受到了巴解组织的有害影响。由于有确凿的证据，这一切听起来十分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对处在20世纪宣传体系的“学生”来说，为了防止人们表达出最低程度上的公正态度而做出努力（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1页的作者注，下面还有更多的例子）并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不会令他们惊奇。就像早年间也不会令人惊奇的是，有人成功地编造出这样一幅图景：正因为巴解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欧文·豪的见解之一），新左派才支持它而蔑视以色列。³²⁹我们毕竟生活在奥威尔的时代。

也许有人可以提供一种令人同情的心理诠释。对于那些习惯于几乎完全把控清晰观点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的把控稍微被威胁或削弱一下，他们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将要终结，就像一个被过度宠溺的孩子第一次受到斥责那样做出反应。这才产生了对媒体的悲叹，说媒体对巴解组织抱有反射性的同情态度、对以色列怀着难以改变的憎恨，比如在媒体偶尔报道以色列轰炸医院或殴打手无寸铁的囚徒时。或者，这种现象就是一种极权思想的表达：任何对“支持以色列”（包括各种各样受到允许的“批判性支持”）这一正统范围的背离都是难以容忍的冒犯。因此，把微小的背离说成是完全背离，也不算夸张。

作为例证（还有许多例证），请看一看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American Professo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这是一个资金充裕的组织，他们关注中东和平就像共产党关心阿富汗的和平一样——于1983年3月向其15位地区主席和众多校园代表发送的一份时事通讯。这份通讯警告说，在“阿拉伯那边”有一个“有组织的、被集中控制的信息计划”，这与任何代表“以色列立场”的事物都不同。令教授们产生这种关注的是“一群被领着穿过大学环形路……要表达阿拉伯观点的演讲者”，他们所做的演讲更多地带有宣传意味，而不是在教导。“按照发言频率和恶意程度排序，这些演说家是：哈特姆·侯赛因尼⁽³³⁰⁾、爱德华·萨义德⁽³³¹⁾、诺姆·乔姆斯基、法瓦兹·图尔基⁽³³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³³³⁾、

詹姆斯·佐格比⁽³³⁴⁾、哈桑·拉曼⁽³³⁵⁾、克里斯·基亚路⁽³³⁶⁾医生、伊斯雷尔·沙拉克⁽³³⁷⁾和盖尔·布莱斯堡⁽³³⁸⁾。”任何观察过这幅美国图景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恶毒的人物在美国几乎完全控制着对中东的讨论权。实际上，从未有人听过“以色列的观点”，虽然这份时事通讯补充说：“毋庸置疑的是，有许多人拥护以色列的立场”，而且只要有机会这么做，他们就会发声。这种“有组织的、被集中控制的信息计划”的妄想观念，或认为这些发声者是其组成部分，或他们“展现了阿拉伯的观点”的想法，都有些道理。³³⁹即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切在美国只是具有边缘效果的现象，无法与庞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宣传体系相比较。这种组织——单个说来肯定令“阿拉伯那边”相形见绌——是该宣传体系中的微小组成。但被吓住的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的小人物们或许对这一切全盘皆信。也许他们明白这项“信息计划”及其代理人实际上并未与大众传媒或舆论杂志接触过，但他们正确地注意到，阻止这些人对这所或那所大学发出的邀请不做回应是毫无办法的，这正是美国体系中尚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黎巴嫩入侵的推进，蓄意歪曲事实将以色列置于不利视角的人员名单越来越长，包括欧洲媒体、许多美国媒体和电视、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救援机构、美国外交官，实际上包括除了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被挑选并经人陪同参观以色列之后回来的美国人之外的所有人。以色列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利亚胡·本—埃里萨尔（Eliahu Ben-Elissar）表达了一种整体基调，在反诽谤联盟的会议上赢得了“最多的掌声”，他当时说：“我们被攻击、批评，声名受到玷污……我不想指责全世界都是反犹太主义，但如何解释这种暴力的突发呢？”³⁴⁰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表达了类似的、被广泛认同的看法：

今天，我们站在与全世界对立的竞技场上。以色列人是人口少且被孤立的民族，却在与全世界对抗。³⁴¹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可怕事件”，“无疑”是反犹太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几天前的黎巴嫩战争或者贝鲁特大屠杀。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引人注意的事情中的一些细节。

事实真相是，以色列已被授予不受主流报纸和学术批评的唯一豁免权，这与它独特的作为接纳其他形式的美国支持的受益者角色相一致。我们已经见过许多例子，下面将会有更多的例子。本章早先提到的两个例子就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豁免权：以色列对埃及的美国设施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的恐怖袭击（即拉冯事件⁽³⁴²⁾），还有准确辨认无误之后使用

火箭弹、航炮、凝固汽油弹和机关枪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自由”号（*Liberty*）进行的袭击，显然都经过预谋，在此次“海军20世纪‘和平时期’最血腥的国际事件”中有34名船员死亡、75名船员受伤³⁴³。在这两起事件中，媒体和学术界的普遍反应是沉默或者不实的陈述。无论在当时或从现在回顾来看，两起事件均未作为糟糕的恐怖主义或暴力行为被载入史册。关于轰炸埃及事件，为《纽约时报》写稿的以色列小说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在一篇倍受好评的、有关“前贝京”时代“美好的以色列”的文章中，拐弯抹角地把这些恐怖行径称为“某些以色列冒险主义者的情报行动”，这是标准的解释。³⁴⁴不但媒体回避谈论袭击“自由”号的性质，连美国政府和海军调查委员会也回避谈及此事，尽管高层人士毫不怀疑地认定官方报告不过是在粉饰。例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托马斯·H.莫雷尔（Thomas H. Moorer）说，此次袭击“不可能”像官方声称的那样“认错了目标”。³⁴⁵

人们是否能想象，任何国家都可以对美国的军事驻地进行恐怖轰炸，或攻击美国舰艇导致100人死亡或受伤而全然不受惩罚，甚至多年以来不受批评吗？很有可能的是，在主流意见的光谱中，某个国家（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多年来还被视为受到“很高的道德目的”的指引³⁴⁶，而这个国家的敌人却被剥夺了人性、遭受着鄙视。为了保留想要的错觉，历史被重构了。

（本文最早出现在《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扩充版,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9]，第9—37页。）

规划全球霸权

“二战”结束时，在一次有关我们应当如何消除和瓦解所有由其他势力（尤其是英国人）控制的区域体系，并保持和扩展我们自己的区域体系的讨论中，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阐明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看法（1945年5月）。关于拉丁美洲，他私下解释说：“我认为，在这边（即拉丁美洲）拥有我们的小片区域，这种要求不算过分，该区域也从未干扰过任何人。”³⁴⁷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的官员们已为受美国控制和受其他势力控制之间的区别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关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委任统治计划

（这被丘吉尔视为吞并的幌子），艾毕·福塔斯⁽³⁴⁸⁾解释说：“我们接管了马里亚纳群岛并加强了当地的防卫，这样做不仅是基于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权利，也是出于我们对世界安全所尽的部分义务……提出这些保留条件是为了世界安全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对我们有益的事也会对全世界有益。”³⁴⁹对于如此假设，美国的官员和理论家们自然推崇备至，很多行动也就变得合法了。

与史汀生的观点相一致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自1945年到1946年初都坚持认为，非美国力量必须被排除在西半球以外，西半球“是一个明确的军事实体，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其完整性是保障我们安全的根本性先决条件”。³⁵⁰ 1947年1月，陆军部长帕特森（Patterson）进一步说，拉丁美洲的资源对美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任何全国紧急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战争潜力……”。帕特森对门罗主义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与威尔逊的推论相一致：门罗主义意味着“我们不仅拒绝忍受外国的殖民、控制或国外政治制度向我们的半球延伸，也对出现在这块大陆上的国外意识形态、商业剥削、卡特尔（cartel）组织或其他已扩大的非半球影响征兆保持警惕”。美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安全且友好的毗邻南方的侧翼，不被敌人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渗透所困扰”。其主要的关注点不是苏联，而是欧洲，包括英国向智利和厄瓜多尔、瑞典向阿根廷、法国向阿根廷和巴西出售武器。

自1945年1月起，战争和海军部门的军方和文职官员就争论不休，想要拥有全面的美军基地系统，缩减一切国外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并在综合军事援助计划下由美国来训练拉丁美洲的军官、向拉丁美洲提供武器。在为“我们这边从未干扰过任何人的小片区域”制订这些计划的同时，美国无意允许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拥有类似的权利，当然也不会允许苏联这么做。事实上，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反对这些针对拉丁美洲的计划，因为拉丁美洲可能会妨碍美国在其他地方的计划（他认为它们更为重要），尤其在希腊和土耳其，它们是“我们的前哨”——在苏联边界上。苏联远比美国更加严肃地关切安全问题。这些“前哨”也将支持美国在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施展抱负，中东地区拥有无人能及的能源储备，随后都将转入美国手中。

美国是如何制订计划的，对诸如此类的大量材料（很多材料被列为机密，最近才被解密）进行评论时，莱弗勒指出，在采取这些举措时，美国的官员们“口头应承着联合国，同时担心西半球的地区协议对苏联在欧洲的行动和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产生冲击”。这正是困扰史汀生的问

题：在废除其他所有区域体系（尤其是英国和苏联的区域体系）的同时，如何扩展我们自己的区域体系？欧洲也有着同样的问题。在欧洲，苏联淡定地恪守美国 and 英国对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地区的单边接管，随后把这种做法当作自己野蛮接管东欧的样板，这在西方引起了愤怒——愤怒实属正当，但也不乏伪善。³⁵¹

在“二战”期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详细地阐明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该概念为凯南简要陈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我之前引用过外交委员会有关隐瞒作战目的和“活动空间”的想法。这些高级别的会议在1939—1945年召开，为战后时期制订了大量的计划。会议的要点在于详述美国“在提议自己应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的这个世界里”都有哪些要求。到了1940年代初，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会在战争中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脱颖而出，并开启一段时期，它在这段时期内将成为“世界秩序体系中的霸权力量”，此话出自30年后的某个精英集团。³⁵²该集团提出了“大区域”概念，“大区域”被认为是一个从属于美国经济需求的地区。正如一位成员所说的那样，大区域是“为了控制世界在战略上必需的”一个地区。某项地缘政治分析总结说，大区域必须包括西半球、远东和前大英帝国，然后被瓦解并处于美国的渗透和控制之下——在大多数文献中，这是一种被称为“反帝国主义”的做法。

随着战争继续进行，西欧以及中东产油地区会加入这个大区域变得显而易见。美国对中东产油地区的控制继续扩大，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和英国付出了代价，这个过程在战后仍在继续。美国为特定地区制订了具体的计划，为大区域提供了制度结构，这被视为一种可以被延伸的核心或模式，最好面向全球体系。³⁵³我们应当在这种语境中去理解凯南的提议。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和其他政府文件常常紧跟战时策划者们的建议，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利益，通常也是同样的人。它们也遵循了凯南提出的原则。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48/1号文件提到：“尽管美国谨慎地避免为提高亚洲生活水平而承担责任，但美国的利益在于增强这些国家的能力，使其保持……维护政治稳定必备的经济条件。”因此，按照凯南的告诫，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当“被理想化的口号所阻碍”，尽管经济上的援助会在我们想从中得到点什么的时候随时待命。

当然，这并不是提议我们应当帮助甚至允许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去实现经济健全和政治稳定；相反，美国国务院1948年9月发布的政策声

明解释说：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共产党人胡志明是印度支那最强大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物，任何建议驱逐他的措施都是结果未卜的权宜之计”。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很显然，为了追求第五种自由³⁵⁴，我们必须设法驱逐他。³⁵⁵在他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并非像想象中那样。相反，“稳定”是顺从的代称。《外交事务》编辑詹姆斯·蔡斯引用了“我们试图破坏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的稳定”，来证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寻求稳定”所做的努力。熟悉美国意识形态话语特殊术语的人 would 认为这并非自相矛盾。³⁵⁶在奥威尔时代，为了稳定去搞破坏完全说得通。这个问题被指出时，就被置于主流评论（也包括许多学术研究）的“反讽”名义之下。^{（357）}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48/1号文件对常规性解释做了进一步的详述，这种常规性解释是在有关美国参与法国对印度支那战争（之后美国接管了那场战争）那段时期的秘密文件中被发现的。这种可以直接拓展到拉丁美洲的推理值得我们注意。尽管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都提到了越南的资源，但印度支那本身并非主要的关注点。相反，其重要性来自多米诺理论的语境。该理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用在需要恐吓公众的时候，它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去那里阻止他们，他们会登陆加利福尼亚，抢走我们的一切。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之时，林登·约翰逊总统说：

全世界有30亿人，我们只有2亿人。我们在人数上以15比1的比例被压倒。如果武力使用得当，他们会席卷美国，抢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约翰逊在阿拉斯加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要面临任何侵略者或敌人的造访，我宁愿这种侵略发生在距此10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不在安克雷奇^{（358）}这里”。他当时指的是越南人对驻越美军发起的攻击。因此，正如他20年前曾警告的那样，我们必须保持军事实力，尤其是空中力量。“如果没有出色的空中力量，美国就成了束手束脚、饱受扼制的巨人；无能为力且轻易就会沦为任何拿着小折刀的黄种矮人的猎物。”³⁵⁹

如果我们在抵御第三世界敌手的压倒性力量时不直接采取行动，用尼克松总统后来宣布入侵柬埔寨时的话来说，我们会成为“可怜、无助的巨人”。这种想法是美国政治话语中的老生常谈，让人想起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孩子因为没有拥有一切而号啕大哭——尽管为了使其形象更加准确，我们要把一个暴风突击队^{（360）}交给这个孩子掌控。

这个多米诺理论的说法无疑在某种意识水平上会被人相信，并以通俗的方式表达了对维持“差异”（disparity）的忧虑。在林登·约翰逊表达对“黄种矮人”的惧怕之时，凯南用更加深奥的术语概括了这种“差异”。然而，如果事态持续发酵并且必须修改政策，这种粗糙的多米诺理论通常就会被轻蔑地摒弃。不过，还有一种更合理的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很少被质疑，相当合情合理，是有效的说法；用计划者的术语来说，我们不妨称其为“烂苹果理论”。迪安·艾奇逊简要地说明了烂苹果理论。当时他捏造了一系列惊人的谎言，比如声称苏联在1947年2月向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了原本不情愿的国会领导人支持杜鲁门主义，他在回忆录中也自豪地引述了这次事件；“就像木桶中的苹果被一只烂苹果传染了一样，希腊的腐败会传染给伊朗甚至东边的所有国家”，并会“传染”给受共产党参与民主政治“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乃至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³⁶¹自此之后，这种狡猾且玩世不恭地援引一个捏造的“苏联威胁论”、为阻止“传染”蔓延所采取的措施铺平道路的方式，开始被大力地效仿。

自始至终，主要的担忧在于：如果木桶中有一个烂苹果，“腐烂就会蔓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的“腐烂”，会妨碍第五种自由。这也许具有示范性作用。再引用一个实例。据基辛格的助手们回忆，相比古巴的卡斯特罗，基辛格更担心的是智利的阿连德，因为“阿连德是拉丁美洲民主社会改革中活生生的例子”，他在民主进程中的成功可能让拉丁美洲“脱离”像欧洲那样的影响。而即便是在议会民主制之内运作的欧洲共产主义，还是会“令他感到恐慌”。基辛格害怕阿连德的成功会给意大利选民传送错误的信息。基辛格用惯用的意象说，智利这个“有感染力的例子”不仅会“传染”拉丁美洲，还会影响到南欧。³⁶²不久，我们也许就发现大区域开始被侵蚀了。

这些担忧是持续的。1964年，中央情报局警告说，“南半球的其他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古巴所进行的近乎全盘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任何成功的迹象都会对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国家主义势头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也会损害第五种自由。³⁶³因此，必须发动大的恐怖战争来终止这种成功的出现，包括多次企图刺杀卡斯特罗、轰炸石化和其他设施、击沉渔船、炮轰旅店、毒害农作物和家畜、摧毁民用飞行航线等。

我们可能会察觉到，这一切不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因为美国和其同伙都是犯罪嫌疑人。事实上，西方宣传的主题是，共产主义集团不受恐怖主义行动的影响，这成为他们要对这种现代灾难负责的确凿证

据。例如，沃尔特·拉克尔⁽³⁶⁴⁾写道，提倡这一概念并大获好评的克莱尔·斯特林⁽³⁶⁵⁾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即恐怖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民主或相对民主的国家”；为了给出这种“多国恐怖主义”的例子，他提到了西撒哈拉的波利萨里奥⁽³⁶⁶⁾（它保卫领土的行为被视为恐怖主义，因为它打击的是美国的盟友摩洛哥的控制），还有“一些中美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这个语境说明，他指的是游击队力量，而不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两个国家显然和摩洛哥一样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也是美国的附庸国，从定义来看就不可能参与恐怖主义。同样，伦敦的《经济学人》在评论斯特林的《恐怖网络》（*Terror Network*）时智慧地说，“恐怖分子对苏联控制下的政权从未有过任何行动企图。”很多人也随之附和，但这个观点如今在有关该话题的学术话语中已是陈词滥调。³⁶⁷在现实世界中，古巴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对象，恐怖分子简单地认为打击古巴就能排除是美国对尼加拉瓜发动了“代理人战争”（proxy war）。

我们再回到烂苹果理论。1959年，国务院警告说，“我们在远东面临的根本危险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补充说，“共产主义中国在过去10年中实现的经济迅速增长，令该地区各个国家极为震惊，向自由世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还对北越和朝鲜表达了类似的恐惧，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延缓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³⁶⁸

更大的隐忧是日本，像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说，它是“超级多米诺”。人们意识到日本将再次成为“亚洲工厂”，但需要获得原材料和市场。因此，我们必须保证日本的获得渠道，这样整个地区才会被纳入大区域，而不是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日本只是其工业中心，美国也许会被排除在外；对这种前景的考虑是导致美日战争复杂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因素。但令人害怕的是，印度支那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对贫困的亚洲人有意义，也许会把腐烂从东南亚扩散到南亚，让日本和独立于大区域以外的国家集团联合起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融入苏联集团。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组成员在1949年的报告中敦促说，华盛顿应当“在原材料供应方〔东南亚〕和制成品供应方日本、西欧、印度之间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至于“东南亚地区有可能开始起到作为日本和西欧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的主要作用”。³⁶⁹在这种背景下，越南作为烂苹果获得了价值，对美国规划者而言，它原本没有这种价值。

这种思想不是美国规划者们的原创，例如，在美国革命中也存在着

类似的担忧。在门罗主义被公布的几天前，俄国沙皇曾警告说：

太多的例子表明，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会被距离和物质障碍阻隔。它漂洋过海，经常以其典型的所有破坏性征兆出现在各个地方，那里甚至没有直接的联络，也没有任何接近的关系使我们可能有机会去理解它。法国人知道用什么设施和速度，可以把革命从美国带到欧洲。

梅特涅⁽³⁷⁰⁾担心门罗主义会“给煽动叛乱的信徒带来新的力量，并重新激起每个阴谋者的勇气。如果这股邪恶的理论和恶毒的例子蔓延至全美洲，我们的宗教和政治制度、我们政府的道德力量，以及使欧洲免于分崩离析的保守制度会怎样呢？”一位沙皇的外交官警告说：“我们必须努力阻止或推迟这场可怕的革命，首先要拯救和加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这部分也许会避开邪恶原则的传染和入侵”，也就是“共和主义和人民自治的恶毒理论”。³⁷¹

梅特涅和沙皇的现代继承人被类似的恐惧所激励，甚至使用了类似的修辞——对基辛格来说，也许他完全清楚这一点——美国接替了19世纪沙皇的角色，充当“文明”的捍卫者，反对黄种人和那些狂妄自负以至于威胁到“差异”的其他人。

需要顺带指出的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实现了主要目标：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把越南战争称为美国的“失败”，但这是错误的。随着战争在1960年代晚期达到最残暴的地步，这一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暴力摧毁使印度支那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如果它曾是榜样的话。印度支那能存活下来就很幸运了。在过去10年中，美国采取了严厉残酷的措施，以确保能维持所取得的部分胜利。³⁷²同时，借助摧毁南越、随后摧毁大部分印度支那所形成的“盾牌”保护，美国通过支持印尼发动1965年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使成千上万没有土地的农民丧生）大力地扶植第二道防线（这种进展被西方自由主义者当作为越战辩护的证据而大受赞赏），也为1972年给菲律宾强加一个拉丁美洲式恐怖—酷刑政府提供了支持。

美国进攻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带来了一个更加有效的结果：确保了北越的控制地位。相当清楚的一点就是，到1970年为止，如果不是更早的话，“通过动用其掌控的大量暴力和恐怖资源”，美国也许能摧毁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和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力量，由此“形成一种北越必然会控制印度支那的形势，因为不存在其他可行的社会形式”。³⁷³美国野蛮

行径的可预见性后果在回顾性论证中经常被引述，这也许是另一次能给奥威尔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识形态的胜利。要注意的是，这种成就是早先所讨论的方法的特殊实例：当征服行动失利时，便努力鼓励对方同化到苏联集团，以此将进一步的敌对行为正当化，并降低独立和成功“传染”给他人的威胁。

美国的暴力行径还取得了另一项卓著的成就：动用最残酷的力量，确保对那些有能力从极其野蛮、极具破坏力的进攻中幸存的人们实施控制。一旦家园和家人被残忍的侵略者摧毁，人们会采取某种表达愤怒甚至趋于残酷的方式。对于这一事实，西方人声称无从理解，进而有效地压制住对自己在那些并非纷乱复杂的处境中所作所为的记忆。³⁷⁴然后，他们还能引述那些人的可怕行径，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攻击进行辩护。有了温顺的知识分子阶层和举止得当的意识形态机构，西方的宣传鼓动部门（Agitprop）就能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果。

美国想用同样的方式打赢它对尼加拉瓜的战争。美国必须先强迫尼加拉瓜依靠苏联，来证明自己必须对其发动进攻，惩罚它违背了第五种自由。如果这次进攻未能成功地使这个国家恢复到像海地或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的幸福状态，或索摩查家族统治的幸福状态，那么美国至少必须确保那里无法进行成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决不允许有一个烂苹果沾染木桶。对于拥有像美国这样实力的强大国家而言，在与这些敌手的冲突中很难被击败，也几乎不会被击败，尽管对于那些拥有远大抱负和目标的人来说，没有实现最高目标就会被想当然地看作巨大的失败，也进一步证明我们是受“黄种矮人”摆布的可怜、无助的巨人。

各种原则和假设之间基本不变的共同纽带联系经常被内化到缺乏意识知觉（conscious awareness）的地步，它们可以解释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个奇怪特点：在一些对美国并无经济或者战略利益的国家，像老挝或格林纳达，一旦发生危及“稳定”的事，就能令美国狂躁不安。以格林纳达为例，毕肖普⁽³⁷⁵⁾政府1979年当权之后，美国就立刻表现出敌对情绪。有人严正指出，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一污点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杰出的军界人物和评论家发出严正声明，认为格林纳达在苏联袭击西欧的一次事件中对航运航道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格林纳达发现一根苏联的牙签，整座岛就会被炸毁，这也是基于一种可能性很小的假设：这场战争要持续够长的时间，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地球另一面的老挝，也许是更引人注目的例子。老挝实际上在1958年举行了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尽管美国曾花费大力气去颠覆此次选举。

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法游击队巴特寮主导的联盟赢得了此次选举。该政府随即在支持“亲西方中立派”的美国颠覆下被推翻，很快又被右翼军事力量所取代，但其反动和腐败的程度之深甚至令亲美团体都选择站在巴特寮一边，此举也受到苏联和中国支持。到1961年为止，由美国组织的高地部落军队（由于受美国的颠覆和侵略调遣，最终被彻底消灭）还在受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前法国通敌者的领导下继续作战。在整个60年代，巴特寮控制的地区遭受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很快就被柬埔寨的轰炸程度所赶超），轰炸旨在“摧毁其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话来说）。美国政府承认，此次轰炸与南越或柬埔寨的战争无关。这在美国宣传鼓动部门被称为“秘密轰炸”——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指的是众人皆知却被媒体掩盖的美国侵略，后来用于指责政府中偏离美国路线的邪恶之人。在柬埔寨也是如此，直至今日也隐瞒着这一事实。此次袭击针对的是一个遍布村庄的国家，还有那些甚至不知道有老挝这个国家的人们，其目的是要结束一场温和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该运动在老挝北部实施了一些改革并发动了群众。³⁷⁶

为什么像格林纳达和老挝这样的“强国”会激起美国的狂躁情绪？安全论实在太愚蠢，不值得考虑，而且肯定也不是这种情况：按照第五种自由的原则，它们的资源太珍贵以致美国不能失去它们。相反，要注意的是多米诺效应。根据烂苹果理论，国家越弱小，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就变得越危险。假如连一个边缘化的、贫瘠的国家也能开始利用自身有限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也能根据国内人民需求实施发展计划，那么其他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这种传染病可能会传播并感染别人，第五种自由可能很快就在至关重要的地方受到威胁。

（本文最早出现在《扭转局势：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5]，第62—73页。）

刻意的忽视及其使用

20世纪以可怕的罪行和大国的种种策略而结束。人们普遍称赞这些策略开启了令人瞩目的人类事务“新时代”，其特征是前所未有地重视人权和高尚原则。“自吹自擂”的风气在范围和性质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展示了千禧年式的华丽辞藻，也体现了西方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向

民众作出的特别保证：“新时代”十分真实，并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塞尔维亚，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托尼·布莱尔宣称，“新一代划出了界线”，他们要为“价值观”而战，为“新国际主义”而战，“新国际主义不再容忍对所有种族的残酷镇压”，而“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将无处可逃”。瓦茨拉夫·哈维尔⁽³⁷⁷⁾断言说，北约发动了史上第一场以“原则和价值观”为名的战争，这标志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终结”，民族国家不再是“每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其最高的世俗价值所达到的巅峰状态”。“一代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文明的演变最终使人们意识到，人类比国家更重要。”³⁷⁸

在“立志结束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理想新世界”的指引（其英国伙伴也随之加入）下，新一代的人将施行善举。在《外交事务》的封面文章中，一位在维护人权方面卓有成就的法学学者解释道，“开明的国家”最终摆脱了“束手束脚的老规矩”和世界秩序旧观念的束缚，在他们“认为武力是正义”之时也许会使用武力。他们惩戒了世界上各种“桀骜不驯、顽固懒散、穷凶极恶”和“秩序混乱”的势力，也要遵守自己打造的“现代正义观”，其高尚的意图“一目了然”，无需任何证据来说明。³⁷⁹获得开明国家俱乐部即他们通常所自称的“国际社会”会员资格的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近些年每有需要之时，“改变方向”的说法就会被搬出来。过去和现在的做法都是无趣的老生常谈，在“改变方向”这一原则下也许会行不通。

鲍勃·戴维斯（Bob Davis）在《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克林顿总统称赞北约部队在马其顿取得了开创新时代的成果，并“提出了克林顿军事干预主张”。这种主张“相当于说：独裁者要当心”。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有人对无辜的平民穷追不舍，因其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要杀害全部平民，我们就有权制止他们，我们也会去制止他们”；“在我们能改变的地方，我们必须努力，科索沃显然就处于这种情况”。总统向全国人民解释说：“直接转移目光，有时并非是一种取舍”；“我们无法对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桩悲剧做出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为别人做点什么”。³⁸⁰

在新时代到来之前，克林顿的“新威尔逊主义”让观察者们相信，美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高尚阶段”，尽管有人一开始就看到了危险并警告说，“让理想主义几乎牢牢地控制着外交政策”，我们可能会在服务他人时忽略自身的利益。戴维斯提到，克林顿于1999

年“开放地接纳了人道主义干预”，也令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外交政策专家深感不安。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将这种做法轻蔑地称为“把外交政策当作社会工作”，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减轻这些顾虑，克林顿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强调了这一事实：“发生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种族清洗不能成为干预的理由。在科索沃，美国的国家利益危在旦夕：干预“关乎提高北约的威信和确保科索沃难民不会涌向邻国”。在北约轰炸开始后不久，难民的确涌向了邻国，并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于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提高北约的威信”。³⁸¹

华盛顿的官方说法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一致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Henry Shelton）在2000年1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篇战争概要，其中重申了华盛顿的官方说法。美国和北约有三个基本利益：“确保东欧的稳定”“阻止种族清洗”和“确保北约的威信”。布莱尔首相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³⁸²

底线是我们不能输。假如我们输了，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在战略目标上的失败，也许还有道德目的方面的失败——我们将对北约的威信造成毁灭性打击，全世界也因此会变得动荡不安。

让我们放下后来对政府立场更为仔细的审视，问一问“国际社会”以外的世界是如何理解北约力图确保其安全的做法的。对这一问题的见地来自2000年4月召开的、代表全世界80%人口的77国集团南方国家首脑峰会。在哈瓦那召开的这次会议意义非凡，这是77国集团（现在有133个国家）第一次国家首脑级的会面，会前不久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召开外交部长峰会以做准备。他们公布了《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宣布“我们拒绝接受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并拒绝其他形式的胁迫（峰会也认为这是一种带着新伪装的传统帝国主义），包括在西方意识形态中被称为“全球化”的、以公司为主导的国际一体化的特别形式。³⁸³

南方国家中最受尊重的人也发言谴责了北约的行动原则。纳尔逊·曼德拉2000年4月访问英国时“谴责[英国]政府和美国一同忽视了其他国家，并充当‘国际警察’，挑起了国际争端”，还说“他憎恶英美的所作所为，他们凌驾于联合国之上横行霸道，对伊拉克和科索沃发起了军事行动”。“曼德拉先生说，比起非洲目前发生的一切，如此藐视国际惯例的

行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用曼德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非洲发生的一切更加严重——特别是美国 and 英国。我这么说是很恰当的。”³⁸⁴

此前一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遭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强烈谴责，甚至在最忠诚地依附于华盛顿的附庸国里，备受尊重的战略分析家也对该行动深表怀疑。阿莫斯·吉勒博阿⁽³⁸⁵⁾把北约披着熟悉的“道德正义伪装”退回“殖民时代”称为对“全世界的威胁”，并警告说这样会导致出于威慑考虑而广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人则把此次轰炸看作在认为合适之时动用武力的先例。军事历史学家泽夫·希夫（Ze’ev Schiff）评论道，如果有必要动武的话，“北约对科索沃做什么，以色列也会对黎巴嫩那么做”；以色列尤其以科索沃为先例，正在为大规模的快速空战重新调整军队。接受美国援助的第二大对象国在半官方媒体和其他场合也表达了相似的态度。³⁸⁶

在众多的东欧异见者中，瓦茨拉夫·哈维尔在西方世界眼中是个性最鲜明的一位，他接纳并欣赏西方领导人高尚的道德目的。很久以前，尤其在1990年，他就名列西方国家最喜欢人物的首位。当时，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令评论家们起立鼓掌并热情欢呼。哈维尔夸赞其听众是“自由卫士”，他们“理解源自权力的责任”，评论家们为此深受感动。几周前，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国家恐怖主义分子刚从美国重新受训回来，他们在另一场由“自由卫士”督导的恐怖事件中杀害了六名重要的拉美知识分子异见者，再次显现出这种责任感。如果把这种情形反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拉美知识分子异见者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上的类似表现会做出什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做出的反应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被出口过去。³⁸⁷

曾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分子异见者，他在说话正确的时候备受尊重。但在1999年就不是这回事了。他看待新时代的方式和南方首脑峰会、曼德拉以及其他不在启蒙圈子里的人是一样的：

侵略者已经把联合国踢到了一边，开启了一个唯力量是从的新时代。人们对北约旨在保护科索沃人这一点上不应该抱有幻想。假如保护受压迫者是他们真正的考虑，他们也许应当一直保护——例如——受苦受难的库尔德人

——说“例如”是因为这只是一个事例，尽管是相当突出的一例。³⁸⁸

索尔仁尼琴一直“被许多人视为发出国家良知之声”的人，他在谴责

俄罗斯政府的腐败时因其“优雅而理智的风格”受人崇敬。³⁸⁹但当他对新时代做出错误的解读时就并非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待他的态度与对待南方首脑峰会以及其他尚未看到希望的人是一样的。

不受欢迎的世界舆论尽管很少被报道出来，却受到越来越多敏锐的分析家的密切关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评论道，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坚定了印度拥有核武器的决心”，以此来震慑美国的暴力行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在许多国家眼中”——他指的是大多数国家，美国“正在变成流氓超级大国”，被视为“对他们社会的单一外部威胁”。他引用了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这位外交官说：“人们只有在美国才能读到有关全世界渴望由美国来领导的文章”，但“人们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是有关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的文章”。亨廷顿暗示，这一切将导致反对势力的联合。据查尔默斯·约翰逊⁽³⁹⁰⁾回忆，五年前，发现一个疑似朝鲜核武库的消息被公布后不久，“日本便把美国称为‘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其次是俄罗斯，当时还有朝鲜”。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战略分析家、前北约行动策划专家迈克尔·麦格韦尔（Michael MccGwire）写道：

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政治—军事联盟，它使自己集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为一身……声称会代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了强制执行其集体决定而打算忽略联合国、绕开国际法。全世界看到了一个遵从道德辞令的组织，在对真理克扣俭省方面与同类别的其他组织不相上下；这是一个拥有无可匹敌的杀戮、摧残和毁灭能力的西方国家集团，他们的限制只在于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勇士”置于危险的境地。

从可获得的信息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评价。³⁹¹

全世界整体上似乎不会对新一代人的英勇行为和道德目的过分关注，也不会因为这一代人通过树立北约的信誉维护世界安全而安心。如果认为各种迹象是有关联的话，我们倒可以问一问对于新时代的评价哪一种更为可信：是自吹自擂、展望未来的自我形象呢？还是外界那些能看出“大体上相同”的人所持有的怀疑论呢？

这个问题应当被认真地审视，至少应当被那些关注可能的未来的人、被那些感觉受道德自明之理束缚的人认真地审视。其中有几点也许特别中肯：

（1）人们要对自己选择的行动（或不做出行动）所造成的预期后

果负责，这种责任会扩展到为自己的国家选择政策，连政治共同体也允许他们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2）责任通过特权得以加强，也通过带来相对免罚权和某种效度的行动机会得以加强。

（3）为了让人们认真对待有关高尚原则的声明，必须先把这些原则用在自己身上，并不只用在官方敌人或现行政治文化中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其他人身上。

让我们假设这些常理都是真的。然而，很难被忽视的事实是：在全部历史和几乎所有社会中，这些常理一般在被违背时才受到尊重。那么，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便是，是否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似乎相信的那样，这种熟悉的模式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会再次出现？或者，是否像新一代人及其崇拜者所宣称的那样，一个新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

很快就能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探究多久才做一次？又能做得多么仔细呢？据我所知，很少能这样，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需要探究，甚至连这样做也被看作是不光彩的。

如何继续这种探究是显而易见的。要确定谁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是为新时代喝彩的人还是为怀疑论喝彩的人，我们应当观察一下新一代如何在这个“我们能够带来改变”并因此“必须努力”（这是克林顿在提出“克林顿主义”时用的措辞）的世界中应对各种环境。

因此，让我们想一想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种种措施。有一个准则就是国际援助：世界上最富有、最有特权的国家通过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国家肯定能“带来改变”。政治领导层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所提供的援助创下了工业国家最吝啬的纪录，即使我们把其中占了大头的部分，即向富国（以色列）和埃及（因其与以色列的关系）提供的援助也算上。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纪录每况愈下。2000年6月在议会通过的《涉外援助法案》“仅向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提供了7 500万美元的援助，远远少于政府2.52亿美元的援助要求”，这是一笔可耻的微薄援助。³⁹²相比之下，该法案向哥伦比亚军队提供了13亿美元的援助，我们回头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无需什么程序，按照这个准则就能证实持怀疑论者的评价，不会有什么争议。

或许，这条准则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毫不相干，我们暂且先不谈它，先看下一条天然标准：军事援助和对暴行的反应。土耳其是克林顿时期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³⁹³它是索尔仁尼琴口中1

500万“悲惨的库尔德人”的家园。这倒是个适合展开讨论的地方。

正当我们热情高涨地投身于原则和价值观之时，北约于1999年4月纪念其成立50周年。这不是一次庆典，相反，这是一个笼罩在科索沃残暴行径和种族清洗阴影下的阴郁场合。人们都认同的是，开明国家所打造的“现代正义观”不允许这种恐怖行径靠近北约的边界。只有在北约的边界之内，才会容忍大规模的暴行和种族清洗，我们还有责任加快其进程。我们绝不能只是“袖手旁观，坐视别国民众受到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谋杀”，也要做出必要的努力，以确保杀戮达到适当的恐怖和摧毁级别，同时用激光般的目光盯住官方敌人的恶劣行径。

在北约的周年纪念仪式上，与会者和评论家们需要相当有修养，才能“不去注意到”1990年代最恶劣的种族清洗也发生在北约内部，例如土耳其的东南部；况且，这些大规模暴行依靠的是大量的西方武器，绝大部分武器都来自美国。土耳其的暴行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时，约80%的武器都由美国提供。土耳其作为美国的战略同盟和军事前哨，在“二战”后一直得到大量的美国武器。武器运输在1984年急剧上升，因为土耳其对受其压迫的、可怜的库尔德人发动了军事行动。在1990年代，土耳其的军事、警备和准军事行动在强度和暴力程度上都有所增加，相应增加的还有暴力行径、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训练。据通讯记者乔纳森·兰德尔（Jonathan Randal）说，土耳其在1994年创下了两项纪录：1994年是“对库尔德各省镇压最严重的一年”，土耳其在这一年也成为“美国军事设备最大的进口商和（因而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商”，其中还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所有装备最终都用于对付库尔德人”，同时美国还与土耳其军方及其军事工业开展了广泛的共同生产和其他合作。单在1997年，由克林顿政府提供的武器就超过了1950至1983年之间的武器供应总和。³⁹⁴

多亏了美国的重型武器、军事训练和外交支持，土耳其得以镇压了库尔德人的抵抗，造成上万人的死亡，200万至300万人沦为难民，3500个村庄被摧毁（比遭北约轰炸后科索沃所遭受的后果严重七倍）。

在这种情况下，划定责任并非难事。自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之日起，对库尔德人和要求正义的土耳其人的镇压就骇人听闻。很多可信的消息渠道都大量记载了镇压叛乱的残酷战争。对于“立志结束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理想新世界”所作的贡献，也并非无人质疑。或许只是无法找到哪怕稍许合理的借口，来解释实际上对这些叛乱“暴行”所进行的镇压以及华盛顿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³⁹⁵

在仅有的几次真相被捅出来的场合，人们的惯常反应却是，“美国没能保护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这与它自称要保护科索沃人的意愿不符”（用托马斯·库什曼⁽³⁹⁶⁾的话来说）。或者，在阿耶·奈尔⁽³⁹⁷⁾看来，美国“容忍了”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迫害。³⁹⁸这些令人遗憾的失误说明，我们有时“言行不一”并且“转移视线”——根据开明国家领导人以与上面引述类似的方式发出的一致论调来说，这是因为我们制止非正义之事的能力有限。

这些回应异常尖锐地拒绝了早先提到的道德上的自明之理，对他们应当负有直接责任的重大暴行进行了玩世不恭的辩护。在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华盛顿没有“转移视线”。华盛顿和其盟友一样“盯着那里”，一看到有事发生就果断采取行动加剧暴行，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尤其如此。美国并非“没有保护库尔德人”或“容忍了”对他们的迫害，俄罗斯也并非“没有保护”格罗兹尼（Grozny）人或“容忍了”对他们的迫害。新一代领导人划出界线，刻意把尽可能多的枪支交到杀手和施虐者手中——不只是枪支，还有喷气式飞机、坦克、武装直升机等所有最先进的恐怖武器——有时候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武器转送违反了国会法令。

这样做绝无防御性目的，与冷战也毫无关系。这也不会让人大惊小怪，其他地方在冷战期间亦是如此。我们仔细观察历史事件和国内规划记录就能得知这一点，尽管大国对峙一直是背景，也为诉诸武力、恐怖和经济战提供了有用的借口。况且，指责“言行不一”需要有证据，不能单靠断定。不能只是声明，而是有必要显示出其他行动也具有人道主义目的，这是历史上每次动用武力时几乎都要采取的姿态。

蒂姆·贾达⁽³⁹⁹⁾在对科索沃冲突的报道中做出了更为实际的解释：“西方国家也许同情库尔德人的处境”，或者还同情遭俄罗斯轰炸的车臣受害者，“但现实政治意味着他们不愿或不能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们”。⁴⁰⁰就车臣人而言，帮助他们可能会导致大战。就库尔德人而言，帮助他们会干扰美国的权力利益。于是，我们没法帮助他们，反而必须要参与压制他们的暴行；负责的知识分子必须隐藏真相，以沉默、辩护和欺骗遮掩，同时称赞其领导人和自己对“原则与价值观”的全力以赴。

受美国 - 土耳其袭击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库尔德首府迪亚巴克尔（Dyirbakir）北部的通杰利省（Tunceli）。在那里，三分之一的村庄被毁，由美国提供的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烧毁了大量农田。土耳其的某位部长于1994年坦言道：“通杰利省的恐怖就是国家恐怖。”据他说，被烧毁的村庄和恐怖行径已迫使两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甚至没有帐篷可

住。2000年4月1日，约10 000名土耳其士兵对这片地区开始了新一轮扫荡，同时还有5 000至7 000名士兵驾驶武装直升机进入伊拉克并再次袭击那里的库尔德人，而且是在受美国空军保护的、使库尔德人免受（一时）犯错误的压迫者迫害的“禁飞区”内进行的。⁴⁰¹

让我们回忆一下，北约在塞尔维亚“作战是因为正义之士无法对国家主使下系统地杀戮他人的行为袖手旁观”（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来说）。而在托尼·布莱尔看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在推行“一种新的国际主义，他们不再容忍对所有种族进行的残酷压迫”，而是令“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无处可逃”。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有人盯上无辜的平民百姓，因其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要将其全部杀害，我们就有权制止他们，也会制止他们。”但制止我们狂热地加入“在国家主使下的系统杀戮”和“对所有种族进行的残酷压迫”却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也无需躲藏；他们反而被受教育阶层盛赞，后者对其所作所为散发出的“神圣光芒”和自我激励的高尚理想惊叹不已。

此外，“正义之士”需要理解的是，在的大力扶助下，北约的权力不仅被用来压迫和恐吓自己的百姓，还要用来随意入侵其他国家。这种特权同样适用于非北约附庸国，尤其是以色列。以色列违反安理会决议占领南黎巴嫩长达22年，但得到了美国的授权和帮助。以色列在此期间杀害了上万人，不断迫使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并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2000年初又故伎重演，而以色列一直从美国获得武器和支持。尽管美国的信息体系倾向于不同的说法，以色列内部和人权组织都认为，这一切实际上与自卫无关。⁴⁰²

2000年6月，以色列最终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黎巴嫩的抵抗力量驱逐了出去。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向联合国（UNIFIL⁽⁴⁰³⁾）核查员提供1.5亿美元，用于确保南黎巴嫩的安全并促进被破坏地区的重建。该决议以110票赞成、2票反对被通过。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反对票，因为决议要求以色列向联合国支付约128万美元，以补偿以色列1996年入侵黎巴嫩时对联合国某营地的袭击，此事当时导致100多名在此避难的平民死亡。⁴⁰⁴

有人高度赞扬西方实施恐怖所取得的成就。2000年4月1日，土耳其刚刚在其东南部地区和边境以外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就在美国与土耳其理事会会议的某次节日活动上发言，这次活动欢声笑语、掌声不断。科恩称赞土耳其参加了在塞尔维亚进行的人

道主义轰炸，并宣布土耳其将参与五角大楼先进联合攻击战斗机⁽⁴⁰⁵⁾的研发，就像土耳其和美国正在共同生产的F-16s战斗机一样。土耳其在受到美国许可的种族清洗行动和其他暴行中一直有效地使用了这款战斗机——在北约境内使用，并非在其边境地带。“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我们不仅身处其中，而且担任着为民众服务的职位。”科恩继续说道，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已进入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而且“那里有许多我们可以利用的创新机会”，其标志是美国和土耳其的喷气式战斗机计划，这会“让土耳其和其亲密的以色列盟友一起成为建设安全、稳定的中东最前线的领导者”。

此后不久，据朱迪思·米勒⁽⁴⁰⁶⁾报道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政府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的年度报告”。在阐释“强硬的反恐措施加上与非恐怖主义反对派团体的对话”如何能克服暴力和暴行产生的麻烦时，该报告特别称赞了土耳其的“正面经验”，丝毫没有愧疚之意。⁴⁰⁷

第一个实例研究有力地证实了怀疑论者对于新时代的评价，也许还让人们激励我们的“道德目的”产生了某种见地，用托尼·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对人们犯下的不义之事就发生在欧盟的门口，我们有能力制止和扭转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这么做。”⁴⁰⁸布莱尔指的不是英国政府及其盟国帮助在北约内部进行的正当的恐怖和种族清洗，而是指北约轰炸下的、由其官方敌人施行的暴行。

1999年，土耳其不再是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对象国，哥伦比亚取而代之。⁴⁰⁹于是，我们便有了第二个自然而然的实例研究，探究各种针对新时代的选择性评价。

在整个1990年代，哥伦比亚是西半球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也是西半球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和培训的主要国家，这两种情况长期相互关联。⁴¹⁰哥伦比亚接受的援助超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接受的援助总和，从1998至1999年就增长了三倍。随着美国向“哥伦比亚计划”捐助75亿美元提供给波哥大（而据《华尔街日报》说，波哥大“接受了美国人的很多训练”），援助总额按计划还会急剧增长。据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说，该计划用英文写成。哥伦比亚计划要求美国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其他国家将资助社会、经济和人权项目。军事部分已在1999年内落实，并拓展了早先的项目；其他计划还在暂时搁置中。⁴¹¹

在排序上的变化反映出如下事实：土耳其在1990年代进行的种族清洗行动和暴行大部分都取得了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华盛顿的

附庸国哥伦比亚的国家恐怖还远未达到目标，尽管每年约有3 000起政治谋杀，还造成了30万名难民（现在这个总人数也许接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口仅次于苏丹和安哥拉而位居世界第三位。1985年，哥伦比亚曾允许在传统的精英分权体制之外存在另一个政党。该政党很快就被“消灭”了，有3 500多名党员“被杀害或消失”，⁴¹²其中包括总统候选人、市长和其他人。这一壮举并未玷污哥伦比亚在华盛顿那里的民主证书。

准军事部队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与受美国援助和训练的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一起贩卖毒品。这些武装分子与美国势力联系紧密并接受美方的资助和训练；根据哥伦比亚政府和主要的人权组织（哥伦比亚法学家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资料，死亡率在1999年上升了近20%；这一数据是因为准军事部队从1995年占46%上升到1998年占80%，1999年还在持续增长。国务院在历年的人权报告中都确认了这种普遍状况。1999年的报告总结道，“安全部队主动与准军事组织成员沆瀣一气”，而“政府军继续犯下大量的严重罪行，包括法外杀人，情况大体与1998年相似”。当时，国务院通过可靠消息确定80%的暴行都是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所为。

1999年上半年期间，随着哥伦比亚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武器最多的国家，屠杀数超过了每天一次。据哥伦比亚和国际人权组织称，从1999年6至8月，有2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美国不断增加军事援助的借口是毒品战争。出于一些实质性的原因，很少有称职的观察家对此信以为真。除了貌似合理的问题之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借口基于一个明显的、几乎未经质疑的预设：美国有权在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和发动化学生物战，根除它不喜欢的“庄稼”，而“现代正义观”或许不会授权哥伦比亚——或泰国、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在北卡罗来纳州如法炮制，去消灭更为致命的“毒药”，这些国家在贸易制裁的威胁之下被迫接受了（加之宣传攻势）这一事实，并付出了千百个人的生命。

第二个实例分析和第一个实例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新时代和早先的时代相似，连熟悉的“道德正义的外衣”也一样。

让我们转向第三个例子，这也许是最清楚的测试用例，可以评价各种互不相容的有关新时代的诠释。

当哥伦比亚取代土耳其成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对象国、美国

和英国为了达到自己的道德目的准备轰炸塞尔维亚之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种景象是20世纪晚期最糟糕的人权灾难之一：1999年，东帝汶遭受了新的暴行，暴行之极端使其在关注新时代的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和主权限制问题上与科索沃齐名。

东帝汶遭受的现代悲剧始于1975年12月。当时，印尼入侵并占领了这个已宣布独立的前葡萄牙殖民地，之后便消灭了它。入侵导致约20万人被屠杀，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造成大量的破坏、虐待和恐怖，这一切在1999年又故伎重演。为了确定1999年这第二个主要例子如何对有关新时代的各种互不相容的诠释产生影响，我们想确定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描述这些事情。

2000年1月那一期《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回顾了1999年发生的事件，并给出了标准的西方说法：对东帝汶的暴行发生在科索沃事件六个月以后，即1999年8月30日东帝汶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后，然而，

与发生在东帝汶事件六个月之前的科索沃事件不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主张对东帝汶进行有力的军事干预。抱有这种勉强态度显然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拥有强大的军队，这种干预很可能会遭到其近邻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且相关国家认为印度尼西亚将赞同组成多国部队，这无论如何会很快实现。⁴¹³

这种表述的确十分标准。要近乎随意地再选一个例子，可以看一看威廉·肖克罗斯⁽⁴¹⁴⁾最近对世界上三种“仁慈力量”——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自由民主制国家——和由“主导1990年代的军事头目”组成的“邪恶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萨达姆·侯赛因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是“最突出的两位军事头目”。⁴¹⁵有一些地区“处于西方的关注目光之下，例如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而“其他地区因我们不感兴趣而默默无闻”。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从科索沃到东帝汶”，反映出作者对1999年这两次主要危机中的事件的理解顺序：“在两种情况中，国际社会被迫要面对一次在部分程度上因自身疏忽而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必须决定准备付出多大代价去更正它。”

许多评论家把对科索沃的干预视为向东帝汶派出维和部队的先例。因此，即使是批评北约轰炸的人士也赞同派驻维和部队的效果不错。有人指出：“美国过去不想当‘世界警察’，现在更不想这样，去为属于世界的东帝汶牺牲美国的资源和人命”，美国维和部队响应美国倡议进入“印

这一切几乎站不住脚。假如利己主义不受批评式反思的影响，而道德上的自明之理又徘徊于思想意识边缘，一些行为规范可能会大行其道。已被确定的事情真相让我们对这些行为规范所知甚多。

东帝汶的人道主义灾难，绝不是自由民主制国家“疏忽的产物”，实质上是它们的创新，前面讨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印尼在1975年入侵东帝汶时，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武器和外交支持，在1978年暴行达到近乎种族灭绝的地步时还在故伎重演，在由罪人之处实施的暴力镇压恶果累累之时也继续这样。这位罪人在肖克罗斯的“仁慈力量”中位居前列，常常被赞誉为“本心善良”的“温和派”——用克林顿政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类人”——直到他1997年不受管束，不得而被抛弃。1978年，苏哈托对东帝汶的屠杀使得民愤鼎沸，英国和法国等其他强国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在愈演愈烈的1999年人道主义灾难直至8月30日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后才结束的整个过程中，美、英从未停止过支持和参与。东帝汶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仅仅因为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实际上授权了印尼违背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庭的裁决去进行征服。

在标准说法中，事件的顺序被关键性地颠倒了。对东帝汶的最新一波暴行始于1998年11月。在全民公投决定独立之前，1999年暴行的程度已超过北约轰炸前的科索沃，这是用来比较的相关标准。况且，不胜枚举的公开信息显示，如果民众不屈从于印尼的恐怖，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澳大利亚、当然还有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知晓更多的消息。然而，新一代领导人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甚至在全民公投前采取联合军事演习，并反对采取任何行动威慑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想到的进一步暴行。即使在8月30日的全民公投之后，美国还坚持认为，印尼必须保持对被其非法占领领土的控制，但其军队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把75万人（85%的人口）逐出了家园。

无论人们怎么看待科索沃，它也不可能仅因时机问题成为对东帝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更重要的是，人道主义干预并未发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干预”（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也不可能发生过“干预”，即使只是因为没有主权的问题。甚至连澳大利亚这个直接从法律意义上承认印尼消灭东帝汶的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联合开采东帝汶的石油颇感兴趣），都在1999年1月宣布放弃其立场。印尼的主权堪比纳粹德国在被占领的欧洲的主权，而其权利仅仅依靠大国批准在这块葡萄牙管理的领土上进行侵略和屠杀，这是联合国的责任。

苏联在“二战”期间进入西欧和诺曼底登陆都不算是干预；印尼军队撤出后，由澳大利亚主导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更不能算作干预。甚至没有什么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尽管至少对澳大利亚而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其民众而言，在有可能严肃地谈到人道主义意图时，人道主义干预只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澳大利亚民众曾尖锐地批评其政府在受害者伤亡人数于1999年上半年攀升之时无所作为。

在标准说法中，有一点是正确的：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张军事干预。这十分合乎情理，因为无论要终止1999年的暴行或之前几十年的恐怖，都毫无理由设想要采取任何形式的“干预”，也毫无必要实施制裁或轰炸雅加达。甚至连美国暗示要在1999年9月中旬撤军都足以向印尼的将领们表明，游戏结束了。但凡有过意愿去干预竭尽全力为西方势力和特权服务的“邪恶势力”的所作所为，这一结果在很久以前可能就以类似的方式实现了。

刚刚引述的用于区分科索沃和东帝汶的标准理由不太令人信服。塞尔维亚“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别国从未想过侵略它并把轰炸机控制在安全距离以内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与塞尔维亚军队不同的是，印尼军队十分依赖美国，正如1999年9月中旬所显示的那样，是克林顿最终发出指示要求印尼中止行动。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的轰炸，但对美国及其盟国却毫无威慑力。在9月中旬之前，人们并不指望印尼会“同意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仅仅因为“有关国家”对此结果表示不感兴趣（并且印尼坚决反对）。对于在恐怖不断升级的前几个月中进行的非武力“干预”，华盛顿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在公投之后暴行最激烈之时，华盛顿依然坚持其反对立场。

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官理查德·巴特勒⁽⁴¹⁷⁾简要地概括了美国的原则，他把从“美国高级分析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传达给本国人：美国将以自己理解的利益行事；其他国家若非得到某种权力利益，也要承受负担并准备付出代价。⁴¹⁸正如东帝汶事件戏剧性地展示的那样，这似乎是一种对开明的、奉行高尚原则的新时代现实的合理解释，为我们又增添了一个信息丰富的研究实例。

新时代的主要原则之一便是，为了捍卫人权，可以忽视主权；也就是说，“开明的国家”可以忽视主权，其他国家不能这样做。因此，美、英怀着所谓牵制萨达姆·侯赛因的意图，赋予自己进行军事战和经济战的权利，却从未想过授权伊朗入侵伊拉克并推翻其暴君，尽管伊朗深受由美、英支持的伊拉克入侵之苦。如果以诚实之人严肃做事的方式去维护

这条所宣称的原则，该原则也有优点，或者也会有优点。但行事者的局限之处已让这种可能性大打折扣。发生在1999年的两个主要事例已足以打消任何多余的妄想。

在开明国家的操作原则下，印尼因对东帝汶无中生有的“主权”诉求赢得了极大的尊重。这些国家坚信，必须对印尼委以维护安全的责任，而他们却进行着另一种恐怖统治。至于科索沃，美国和其盟国都要求它必须受塞尔维亚的统治，也许它们害怕出现一个“更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北约坚持要在塞尔维亚行使的主权，却被它后来维护人权的宣称所取代，而东帝汶不一样。在那里，无主权取代了人权方面的一切考量，北约的领导人 also 肆意违反着人权。

新时代的确令人迷乱。

理查德·巴特勒所描述的现实在1999年4月的东帝汶展露了出来，那是新时代繁荣的巅峰时刻。当时，由美、英武装和训练的部队进行的屠杀会定期发生，一些特殊事件在澳大利亚尤其受到广泛报道。8月6日——碰巧在这天刊登了有关新克林顿主义的报道，新克林顿主义要“制止”对“无辜的平民百姓”的杀戮，假如这样做“在我们的能力之内”的话——东帝汶教会说，根据北约的消息，有3 000至5 000人在1999年被杀害，是北约轰炸之前那年科索沃各方总共被杀害人数的两倍。杀戮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在西方支持的印尼入侵下，东帝汶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在东帝汶，并未发生过什么主动的战争，也不存在什么被有国外基地的游击队接管大片领土的事，更没人抱着会招致暴力性报复（这可能导致西方军事干预）的公开目的去袭击警察和平民。小规模抵抗部队被困在与世隔绝的山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各种暴行几乎都是占领军及其议会同僚所为，当然也是其国外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所为。24年来一直如此。在所有这些方面，科索沃的形势都有所不同。

开明国家的原则和价值观在1999年的东帝汶确定的结论，和在每天都不止发生一场屠杀的土耳其与哥伦比亚所确定的结论一样：支持刽子手。1月15日发生在科索沃拉卡克村（Racak）（有45人被杀）的一起屠杀也被报道了出来。据说该事件引起了西方人道主义者的恐慌，他们认为必须在十周之后轰炸南斯拉夫，有人预测结果也许会导致暴行急剧升级，事实的确如此。⁴¹⁹

这些例子只是造成各种自我陶醉环境的部分样本。西方领导人众口一词、洋洋自得地陶醉于新时代，打着“国际社会”的名号全力实现其“道

德目的”——不辞辛劳、毫不相干地站在反对立场。不顾科索沃的具体事实，对同时本应被强调之事保持沉默或进行欺骗，让这些领导人的表现更加轻而易举，仿佛他们还怀着我们起初提到的道德自明之理一样。

与对新时代互不相容的评价直接相关的测试用例就是我们刚才简要评述的那些事情：当今时代的严重暴行——或者用国家暴力的护教者青睐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无法保护”受害者时所“容忍”的暴行。只要撤走决定性的直接参与力量，也许就能轻而易举地减轻或终止这些暴行。然而，他们偏好的测试用例是车臣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优势是，可以把现阶段的罪行推卸给其他人）。所产生的唯一问题只是关系到我们对他人罪行的反应，这是一个更加舒适的立场。

有关这种情况，最极端的例子便是非洲的战争。先不谈相关的史实，与之前评论的例子不同的是，非洲的暴行并未得到新一代领导人的支持。华盛顿对非洲的态度被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和外交家理查德·巴特勒高度概述为：援助恐怖行为的受害者毫无可以想见的收益，因此也不必回应（除了运送武器、为冲突火上浇油之外）。1999年2月，轰炸塞尔维亚的计划进行到了最后阶段，西方外交官把克林顿在非洲的政策描述为“由非洲去解决自己的危机”。欧洲和联合国的外交官说：“美国积极反对联合国采取有可能制止一些非洲战事的维和行动。”据联合国高级非洲特使说，克林顿拒绝为刚果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微薄的资金援助，这“捣毁”了联合国的计划。塞拉利昂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97年，“华盛顿拖延讨论英国提出的派遣维和人员的提议”，面对不断升级的恐怖按兵不动。2000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要求对无法控制暴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官员说：“克林顿政府除了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持之外不会做出军事预算。”这后来被证明是一种欺诈。克林顿提供了飞机，但只是为了收取高价。“华盛顿提供了设备支持，比如其他国家使用的飞机，但‘美国的供应通常比商业价格高出三倍’”，安南说，“华盛顿不会往地面派遣任何一名美国军官。”联合国付不起商业价格，因为美国拒绝支付欠款。⁴²⁰

结论再次相同。怀疑论者以一种国际事务中难得的清晰度，在对新时代的评价中轻易获胜。尽管这也没带来什么可能的效果（因为负责的知识分子编织了牢不可破的蚕茧），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容忍”了别人的罪行，可以接着谴责自己没能对其做出正确的反应。这样一来，正好说明我们一直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则，并愿意承认自身最严重的不足。

尽管基本的考虑会让轰炸塞尔维亚之后的胜利主义情绪停歇下来，但为何做出开战决定的问题仍然未被解答，其合理性问题亦是如此。很有可能的是，的确有一种“不一致性”，尽管不是为政府辩护的文本中提到的那一类：在科索沃的特殊情况中，新一代领导人也许违反了标准的操作程序，像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怀着“道德目的”行事，热情有余，但理由不足。

正如众人所指出的那样，官方理由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在2000年1月重申了这一点，主要的动力因素是：

- (1) “确保东欧的稳定”；
- (2) “阻止种族清洗”；
- (3) “确保北约的信誉”。

但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却解释说，单凭第二个原因是不够的。在第一、第三个原因中，“国家利益”是成败关键。

第三个原因一直被坚持不懈地推行着，能够正确理解的话它也有长处：“北约的信誉”就意味着“美国的信誉”；世界上“不守秩序”的国家必须要清楚的是，假如他们不在意华盛顿主人的命令就会付出何种代价。⁴²¹第一个原因——“确保稳定”——貌似合理，但要正确地理解术语：不是按字面意义而是按原则性意义去理解。正确的理解就是，如果某个地区被纳入由美国统治的全球体系，并服务于经美国同意的利益、由合适的权力中心负责，那么就是“稳定的”。

从字面意义而非原则性意义上讲，东欧在克里姆林宫统治之下算是稳定的。从原则性意义上讲，由雅加达统治的地区在1965年趋于稳定。当时，在一场卢旺达式的屠杀之后，美国在印尼强行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这场屠杀摧毁了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深厚的印尼共产党⁽⁴²²⁾。该党此前“不仅是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革命党，也是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维护现存体制内贫苦大众利益的组织”，它“通过积极维护……贫苦百姓的利益”在农民阶层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印尼共产党不可能局限于“普通的民主手段”，这一顾虑是华盛顿在1958年发动秘密战争瓦解印尼的主要原因。在秘密战争失败之后，华盛顿转而支持旨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军队。⁴²³正是这个原因，加之印尼共产党的亲中（国）立场，印尼成了“不稳定”局面的源头。鉴于印尼“对该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1999年9月印尼暴力袭击升级时，美国再次如此解释道），就不难

理解美、英为何加入此后1965年屠杀暴行的恶人之流。

同样，华盛顿必须强行在危地马拉建立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政权，因为国防部官员曾警告说，危地马拉的首届民主政府“已日益威胁到洪都拉斯和萨尔多瓦的稳定”。稳定的原则性意义受到了威胁，因为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它那帮助工人和农民在与上层阶级和外国大公司的斗争中获胜的宏观社会计划，对于遭受同样情况的中美洲邻国人民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实施了40年的恐怖之后，再也没有类似的计划，危地马拉不再是对稳定的威胁。从原则意义上讲，甚至有可能为了“稳定”而制造“不稳定”，这并不矛盾。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致力于让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不稳定”，因为据一位重要的外交事务分析家评论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寻求稳定”。⁴²⁴

从原则性意义上理解术语，就会合理地认为，“确保东欧的稳定”和“确保北约的信誉”一样，都是轰炸的目标所在。

第二个官方理由——“阻止种族清洗”——在科索沃战争中几乎毫无可信之处，其中些许可信之处也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消息来源所提供的大量证据而消失殆尽。科恩和谢尔顿对第二个理由做出阐释之后肯定地说，在轰炸之前，“贝尔格莱德政权在科索沃的残酷镇压[已]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假如对其残暴行径不加制止，米洛舍维奇的计划，即他所说的‘马蹄铁行动’（Operation Horseshoe），会使更多的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和死亡”。在1999年3月24日轰炸之前，米洛舍维奇“最终确定了这项野蛮的计划”。3月21日，即科索沃核查团（KVM⁽⁴²⁵⁾）监察员撤离的前一天，塞族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袭击”，“名为‘马蹄铁行动’”。科恩数月前曾在国会上做证说，“我们现在回顾往事就会明白，他实施了马蹄铁行动，并决定就此实现其目标，他认为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比如一周左右”，若不是轰炸阻止了其计划的话。⁴²⁶

许多渊博的评论员援引“马蹄铁行动”，认为这是轰炸的理由。单举一例来说，布鲁金斯学会⁽⁴²⁷⁾高级研究员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和迈克尔·欧汉隆（Michael O’Hanlon）在政府内外都曾有与巴尔干问题相关的工作经验，他们在1998年末写道：“米洛舍维奇批准了马蹄铁计划，这是一项把平民永久逐出科索沃省、重新控制该省的计划。”因此，目前“科索沃的问题还无法与一旦北约不进行干预就会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⁴²⁸

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北约轰炸之后，暴行和种族清洗迅速升级。但这本身可作为对轰炸行动的谴责，而非辩解。至于其他事实，尚

存在几个问题。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北约和其他西方消息渠道提供的大量文件并未提供有关塞尔维亚在监察员撤离之后发动袭击的有力证据，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在轰炸开始之后立即采取了种族清洗行动。但我们回头看看这件事就注意到：撤离监察员显然是在为军事进攻做准备，即使此后塞尔维亚发动了袭击，也无法证明不顾塞尔维亚官方的反对而撤离监察员（尽管这是轰炸前一天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没被主流媒体报道过）⁴²⁹以及即刻宣布发动的军事进攻都是正当的。

另一个问题与计划和实施之间的区别有关。大国及其附庸国的应急计划，就我们所知的部分，实在令人吃惊；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应急计划肯定更加糟糕。⁴³⁰米洛舍维奇针对科索沃实施的“恶毒不堪”的计划很少受人质疑，甚至查不到互联网记录。这好比人们几乎可以确信的是，以色列已经制订了驱逐部分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如果伊朗或叙利亚严惩威胁要发动轰炸和入侵，以色列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几乎无人质疑的还有：1999年3月，在处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和受其控制的军事联盟不断煞有介事地威胁要进行轰炸和入侵的情况下，塞尔维亚军队准备在科索沃实施这些计划。从计划成形和准备到做出决定，过程十分漫长。最终的决定是：如果计划者不屈从于军事袭击，就要实施这些计划。这样就引发了计划的实施，回顾来看，这种特别的逻辑倒证明袭击是对的。

可以恰当地说：“毫无疑问，种族清洗在北约轰炸前就经过系统的计划”；如果这一切在各种情况中不属实，将是令人震惊的。但“西方情报机关确定〔种族清洗〕在北越第一次空袭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是在监察员撤离之前——这种说法需要有证据支撑，假如证据必须有效的。话。⁴³¹也必须解释一下华盛顿为何没有在已发布的大量资料中将证据公之于众，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一点。

有关“马蹄铁行动”，还有许多疑问。据国防部长科恩说，这一行动据称在轰炸开始两周以后被德国当局发现，也是“事后”得知，因此并非轰炸的动因。奇怪的是，轰炸开始一个月以后，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被问及马蹄铁行动时表示对此并不知情，还对媒体说有关该行动的一切计划“从未告知于我”。⁴³²已退役的德国将军海因茨·路克怀（Heinz Loquai）现供职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⁴³³），他在一本新书中说：“该计划捏造自保加利亚情报机关的日常报告”，并且“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这种行动”。据德国的新闻周报《周刊》（Die Woche）报道，所谓的计划就是“保加利亚情报机关对塞

尔维亚在此次战争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致分析”。周报又说：“作为北约消息证据被公之于世的地图来自德国国防军总部”，而保加利亚的情报“断定塞族军队的目标是摧毁科索沃解放军，而不是像此后[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和北约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为了驱赶所有阿尔巴尼亚人”。路克怀也声称，德国国防部“甚至杜撰了‘马蹄铁’这个名称”。他还指出“德国的说法有一个基本缺陷：把行动称作‘Potcova’，这是一个表示马蹄铁的克罗地亚语词”，却没有用塞尔维亚语的“Potkovica”。路克怀的书大受德国媒体的欢迎，德国媒体也批评了沙尔平的“宣传性谎言”(例如，把轰炸前据说有2万名士兵的塞尔维亚军队人数夸大，翻倍成4万名)及其逃避指控的行径。⁴³⁴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克拉克将军对“阻止种族清洗”的计划也一无所知。3月24日轰炸开始时，他反复、坚定并颇有说服力地告诉媒体，塞尔维亚的残忍暴行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轰炸后果。后来，他又解释说，北约的军事行动并非意在阻止“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或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发动战争。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消息来源使克拉克将军的判断显得十分合理。此后，美国国务院、北约、科索沃观察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其他西方独立的消息来源公布了大量的文件，大部分是为了证明北约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我发现这出乎意料地证实了克拉克将军的分析。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件无法证实这一想法：暴行在3月20日科索沃观察团的监察员撤离之后迅速地升级，这与我当时看来颇为自然的预期相反。

有关北约政策决定的预期效果的推论与其高尚的立场并不一致。因此，轰炸期间和此后被三番五次强调的更合理的解释是，轰炸的目标在于“阻止贝尔格莱德”通过马蹄铁行动“把阿族人逐出科索沃”——轰炸显然加速了驱逐行径(或者据国防部长说，是有关轰炸的实质性宣告。这与华盛顿的官方记载相反，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一点)。军事指挥官对此目标一无所知并极力否认，就像他不知道马蹄铁行动一样。同样，认为空战无效的评论家们推断说：“空中力量未能阻止这场促使西方领导人最先采取行动的种族清洗。”这违背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无论人们对所采取的行动有何评判，这番话至少貌似条理清楚。历史学家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在有关此次战争的一本广受赞誉的书中未经论证便断定说，美国及其盟国采取行动只是出于“利他主义”和“道德热情”，并找到了“一种在世界政治中运用权力的新途径”，因为他们对用轰炸“把100多万科索沃人逐出家乡的行为做出反应”是为了让这些“人免受‘可怕的痛苦或死亡’”。他把那些被驱逐的人说成是轰炸的预期后果。国际事务

和安全专家阿兰·库普曼（Alan Kuperman）写道，在东帝汶和科索沃，“来自经济制裁或轰炸的威胁已激起悲剧性的反弹”，而“西方干预得太晚，无法阻止蔓延的暴行”。在科索沃，轰炸威胁没有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阻止蔓延的暴行”，但轰炸威胁是在暴行之前，如果要相信官方文件的话，轰炸本身也在暴行之前发生。在东帝汶，西方的行径没有“激起悲剧性的反弹”。他们不建议动用武力，甚至连威胁使用制裁的决定也一直拖延到暴行肆虐之时。从该术语的所有重要意义上来看，都不存在“西方干预”。⁴³⁵

我们得到两个貌似合理的轰炸理由：确保“稳定”和“北约的信誉”，要从原则性意义上理解这两个理由。

现存的官方理由显然无法支持如下观点：新一代在科索沃事件中寻求的是“道德目的”。何况还有更多有关新时代的真知灼见。因此，我们找到了其他的观点。此前指出的一点是，科索沃战争是六个月之后对东帝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先例。即使这样想是对的，显然也无法证实轰炸的正义性。但鉴于该观点毫无根据，我们也只能提出学术性的疑问。

关于西方在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动机，目前普遍的说法是：西方因其在波斯尼亚的失败而感到羞耻。福阿德·阿加米⁽⁴³⁶⁾断言说，是北约选择进行轰炸。

北约不顾民意调查员、现实主义者和坚信“地缘经济学”占首要地位之人在控诉正义战争时给出的建议，像此前干预波斯尼亚一样，带着目睹过的羞耻和在巴尔干这面镜子中见到的自我形象，插手了科索沃。

在阿耶·奈尔看来，“鼓舞着”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倡导者”的事实是，“许多曾供职于政府和尚在政府工作的人决心不让科索沃重演”在波斯尼亚所发生的一切。⁴³⁷

上述观点不加论证就被陈述为不言自明之理，沿袭了为国家暴力辩护的规范。这些观点也不承认当时或之后由官方给出的理由。此外，尽管它们是为主张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倡导者”辩护而提出的，实际上却是对他们的严厉控诉，也是对西方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严厉控诉。根据上述解释，西方彻底违背了道德上的自明之理，为其在“巴尔干这面镜子”中的形象感到羞耻，但也只为自己对他人罪行反应不当而歉疚，而不为其他镜子中的自我形象感到羞耻。我们可以对西方在其他镜

子中的罪行追本溯源，例如在此前讨论的例子中，西方并未像奈尔和其他人想看到的那样去“容忍”暴行，而是积极地投身其中加速了暴行。此外，就这种解读而言，尽管主导原则和价值观要求人们决意不再重复官方敌人犯下的罪行，但对我们重复犯下类似的或更恶劣的罪行却只字不提，这样就使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主动方和支持他们的“许多人”丝毫不考虑这些原则和价值观，甚至都回想不起来。

由于科索沃和东帝汶同时出现在1999年的公众话语中，后者才能为这些结论提供特别突出的实例。因此，必须要强调的是，早些年发生在东帝汶的大屠杀（至少）可以与南斯拉夫早年间残酷的战争暴行相提并论。后者被貌似合理地归咎为米洛舍维奇所为，但无需考虑复杂因素，就很容易确定应该由哪一方负责。如果赞同科索沃正在“重演波斯尼亚事件”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当真这么想，那么他们应该不停地呼吁在1999年初轰炸雅加达（实际上是呼吁华盛顿和伦敦），以至于“不要重蹈”印尼、美国和英国在过去25年间对东帝汶犯下的罪行。当新一代领导人拒绝采取这种光荣的进程时，这些倡导者就应该领导诚实的人民亲自去做，也许还会加入本·拉登的组织。如果我们认为科索沃正在“重演波斯尼亚事件”这一观点不只是国家暴力的辩护词，就会直接得出上述结论。

除了令人惊讶的、自说自话的控诉和缺乏证据伪饰之外，这一观点肯定是公开表达的对国家暴力最有力的辩护之一。根据该原则，如果不动用武力可能会导致打击目标实施暴行的话（在打击之后，也许是对此做出回应，打击目标的确像预想的那样这么做了），那么动用武力就是正当的。按照这个标准，有了受教育阶层的欢呼呐喊，暴力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

要逃避因倡导对科索沃产生“人道主义干预”而产生的后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坚信北约本应直接入侵，而不用轰炸。这样说很容易，也许会被认真地考虑，前提是当时或事后要提出合理化提议，除了重要的后勤问题和其他问题之外，还要考虑到入侵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从美国军事原则的角度）。⁴³⁸人们枉费心思也找不出这样做的理由，显然连所能要求达到的最低程度都做不到，即倡导使用武力的人，无论所宣称的意图是什么，都必须承受沉重的证据负担。

另一种有用的辩护模式就是，制造并驳斥反对轰炸的荒唐论调，忽略那些切实提出的观点。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推给无名“左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观点，说他们认为美国因其不光彩的过往而无权干预。考虑一个国家的干预权时应考虑其过往，是另一种连故作严肃之人都承认

的不明之理。但那种认为因不光彩的过往就自动作废干预权力的观点也不合理，因此也很容易被驳斥。这种做法只能再次被理解为一种默认形式，意识到自身无法承受为动用武力而辩护的负担——这种负担总是很沉重，虽然在原则上并非不可逾越，忠实的和平主义者除外。

当我们仔细审视有人为引用一个实例所做的零星努力时，上述结论会变得更加清晰。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也有一些例子。通讯记者伊恩·威廉姆斯（Ian Williams）写道，爱德华·萨义德和我“查看了西方在巴勒斯坦、东帝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不作为的记载，从而推断针对科索沃的所有行动并非出于良好的动机，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他没有引用萨义德的任何原话，只引了我的一句陈述，而且毫不相干，就想证明上述控诉和他对这种“极端的神学态度”和“政治光谱中左派分子身上常见”的“道德化说教要素”的嘲笑立场。⁴³⁹哪怕草草读一下我写的内容也会一目了然并确信我的立场无疑是恰恰相反的，在评述几个取得良好效果的军事干预的例子时也是这样，不管行为发起者的过往多么丑陋不堪，也可以说这些干预是正当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姆斯如何轻易地落入为国家暴力辩护的常见模式。我和萨义德没有查看西方在他所提到的情况中的“不作为的记载”，而是查看了富有决定性的行动记载，这一事实显然无法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吸收。话又说回来，合理的结论就是他们无法承受辩护的负担。

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出，前捷克异见者、现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特别调查员吉瑞·迪恩斯·特比尔（Jiri Dienstbier）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叙述得很准确。“轰炸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说道，“只是让现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产生了新问题”。或者还有迈克尔·麦格韦尔所做的证实性评价，“尽管塞族军队显然已成为进行中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工具，北约由来已久的开战愿望无疑是主要原因”，把“轰炸称为‘人道主义干预’”的说法是“十分怪异的”：

没人会质疑潜在的良好意图，但难免质疑的是，大部分道德说辞、妖魔化言论和开创一种基于价值和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声明，都是一种否定形式，用于向我们所有人掩盖这一令人不悦的事实：领导人及其民众必须接受这些意外后果所带来的耻辱——这样一来，塞尔维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平民伤亡人数

实际上只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⁴⁴⁰

麦格韦尔的评论对“意图”一事有所保留，似乎是很现实的。“意外后

果”一词所模糊的事实是：这些后果曾被预想过，即使不像北约指挥官起初觉察的那样“完全可测”（用麦格韦尔引用的话来说）。况且，“没人会质疑潜在的良好意图”，事实绝非如此。这些意图肯定受到麦格韦尔所说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的质疑，他也是如此强调的（见第321页）。在对过去和现在的做法记载充分的背景之下（包括刚刚为评价对新时代的矛盾性诠释所回顾的关键性测试用例），坚定不移地相信良好的意图，这也十分可疑。

大体上讲，我们很难发现大国行事前后不一致，或者实质上指导着政策的原则和价值有何矛盾。对那些不愿被时而称为做出“刻意的忽视”的人来说，上述现象不足为奇。⁴⁴¹

（本文最早出现于《划线的新一代：科索沃、东帝汶和西方的标准》[*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Verso, 2000]，第1—47页。）

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用几句老生常谈开场。我们生活在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世界，这不是什么令人激动的说法。世界总是有多重维度和各种复杂情况，但近些年来，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言简意赅地讲（但也不能太过简要），冲突的参与方之一是集权中心，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权力中心，都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则是全球民众。用老套的话来讲，这种冲突也许可以被称为“阶级斗争”。

集权国家不懈地追逐战争，并且非常自发地这么做。政府文件和商业世界的出版物表明，这些国家大多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派，其价值观当然也是颠倒的。他们也很恐惧——实际上已倒退到17世纪的英格兰。他们意识到这种统治体系十分脆弱，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管束大众。他们疯狂地追求着这些方式，近几年追求的就是犯罪、毒品、恐怖主义等。借口变来变去，政策岿然不动。有时，政策还在延续，借口却变了，这就很有戏剧性，真需要花点力气去回想，比如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他们自然会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其议程，“9·11”就是典型的实例。危机使得对恐惧和担心的利用成为可能，要求敌人必须屈服、顺从、沉默和涣散，而掌权者却利用机会之窗变本加厉地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依社会情况而异。在更残暴的国家，镇压和恐怖会进一步升级；在民众能争取到更多自由的社会，他们施行着严加管束的措施，把

财富和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我们很容易就能举出过去数月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例子。

他们的受害者一定会抵制这些可以预测的、利用危机的做法，也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关注着既往不变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日益严重的军国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对民主和自由的广泛打击——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

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恰好象征着当前的冲突。用美国国家媒体的话来说，“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场聚会，到场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富人和名人”“世界各地的奇才”“政府领袖兼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长兼牧师、政客兼学者”，他们将“深思熟虑”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头等问题”。举一些实例来说，比如，“您如何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注入道德价值？”或者以“告诉我您吃什么”为题的小组讨论，讨论由“纽约美食界之王”主持，他那些优雅的餐厅很快会“挤满论坛参与者”。媒体也提到，在巴西有一个“反论坛”，预计有5万人参加，他们是“聚在一起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怪人”。人们可以从某张照片了解到更多情况，照片上是一个遮着脸的邋遢之人，他在一堵墙上写着“世界杀手”（world killers）。

正如所说的那样，这些怪人在自己的“狂欢节”上扔石头、乱涂乱画、就各种无聊话题又唱又跳，至少在美国无人提及这些话题：投资、贸易、金融构架、人权、民主、可持续性发展、巴西 - 非洲关系、《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s on Trade Services [GATS]）以及其他边缘性问题。他们没有对“头等问题”进行“深思熟虑”；这是留给参加纽约达沃斯论坛的奇才们做的事。

据我推测，幼稚的说法标志着一种理所应得的不安全感。

参加“反论坛”的怪人被认为是在“反对全球化”，但我们应该对这种宣传不屑一顾。“全球化”意味着国际一体化。头脑清醒之人不会“反对全球化”。这对工人运动和左翼组织来说应当一清二楚；在其历史上，“国际化”一词并不新鲜。事实上，“世界社会论坛”以最令人激动和最有前景的方式实现了左翼组织和群众运动自现代诞生时就抱有的希望——真正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将奉行关乎人民需求和利益的全球化政策，而不是非法集中权力的政策。这些人当然要将“全球化”一词据为己有，用在自己那套有关国际一体化的独特说法上，只关乎自己的利益，而民众的利益是附带的。这一术语被如此滑稽地使用，那些尽量在清楚、正确地

追求着全球化的人就被称为“反全球化”，而且被嘲笑为是想回到石器时代、祸害穷人的原始主义者，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谩骂之词。

达沃斯奇才们谦虚地自称为“国际社会”，但我个人更喜欢世界著名商业期刊《金融时报》的用语：“宇宙的主人”。既然这些主人声称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我们就希望他们遵循亚当·斯密为他们的行为所做的描述，尽管他只是把这些崇拜者称为“人类的主人”——在实施太空计划以前用的就是这个说法。

斯密指的是他那个年代的“首席政策设计师”，即英国的商人和制造商。他们很确定自己的利益“受到了特别关注”，无论对其他人（包括英国人）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不管在国内或国外，他们都奉行“人类主人的卑鄙箴言”：“一切为己、不为他人”。今天的主人们仍遵守着同样的“卑鄙箴言”，我们对此并不诧异。至少他们是试着这么做的，尽管有时会受到一些怪人的阻挠，这些怪人就是“巨兽”——借用美国民主的开国元勋的话来说。开国元勋指的是那些难以控制的、不明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富有的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的民众，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在制宪会议辩论中也是如此解释的。

我之后会讨论这些问题，现在先讲讲与其紧密相关的、在该会议上直接讨论的话题：“没有战争的世界”。我们无法信心满满地谈论人类事务，但有时也未尝不可。例如，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说，世界将不再有战争，或者世界将不复存在——至少也是有人类居住的世界，还分布着其他生物，不只有细菌和甲壳虫。理由很简单：人类发明了各种自我毁灭的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手段，而且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险些就用它们。况且，文明世界的领导人只消读一读本国情报机关和受人尊敬的战略分析家（包括许多强烈支持毁灭性竞争的人）所写的报告，也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目前还在全力以赴地加强着这些生存威胁。更为不妙的是，制订和实施这些计划的理由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主流框架中合情合理，这使得生存排在了“霸权”之后。“霸权”是这些计划的倡导者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坦言要这么做。

将来很有可能发生争夺水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战争，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战争不得不与一种强加的民族—国家体制有关，后者是一种非自然的，尤其由暴力构成的社会形态。这也是欧洲在数世纪以来成为世界上最野蛮和最残忍的地区，同时还征服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原因。欧洲在其形式上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竭力在被征服地区强力推行国家体制，这是当前发生的许多冲突的

根源。互相残杀是欧洲的嗜好，这不得不在1945年被叫停，因为他们意识到下一次玩游戏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我们还能相当自信地预测出另外一件事，超级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原因在于，假如这一预测最终是错误的，我们身边没有人会顾得上告知我们。

此外，在富有而强大的社会内部进行的民众行动主义（activism）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有权有势的人”无法再发动类似长期侵略的行为，这在以前都是备选方案，就像美国在40年前进攻南越一样，在民众发起大量抗议之前就让更多地区支离破碎。广泛反对大规模的侵略和屠杀是1960年代骚动带来的诸多文明化影响之一，在意识形态系统内被重构为不愿接受军队伤亡的情绪（“越南综合征”）。这也是里根主义者不愿采取肯尼迪—约翰逊模式直接入侵中美洲而必须诉诸国家恐怖主义的原因。美国陆军美洲学院自豪地描述了其战绩：他们发动了打击“解放神学”的战争。同样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对1989年即将就任的“布什一世”政府所做的情报评论，评论警告说，在打击“更加弱小的敌人”——这也是唯一能对抗的那类敌人——的冲突中，美国必须“坚决而迅速地打败他们”，否则这场战役就会失去明知薄弱的“政治支持”。此后的战争都遵循了这一模式，而抗议和异见的规模持续扩大。因此，出现了一些性质混杂的变化。

旧的借口消散之后，又会捏造出新的借口来控制巨兽，但传统的政策还在继续，只是适应了新的环境。20年前，这一切就一清二楚了。我们不难发觉，对手苏联面临着内部问题，也许不再构成确定的威胁。这也是20年前里根政府宣布美国的外交政策将聚焦“针对恐怖的战争”——尤其在中美洲和中东——的部分原因。这些地方是“卑鄙的文明反对者”扩散灾难的主要源头，他们“处在现代社会却退回到野蛮状态”，里根政府中的温和派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这样解释道。他还警告说，暴力就是解决办法，可以避免“像国际法庭和联合国这些进行外部调解的乌托邦式的法律方式”。我们不必犹豫地思考傀儡政府和雇佣军——借用更时新的词来说，即“邪恶轴心”——是如何在这两个地区和其他地方发动战争的。

有趣的是，以几乎相同的话语再次宣战之后的数月间，也就是“9·11”事件之后，这一切被彻底忘却了，甚至连带如下事实：美国因其国际恐怖主义受到国际法庭和安理会（其决议被否决）的谴责，但做出的反应却是迅速升级已被勒令终止的恐怖袭击；或者还有这一事实：在再次宣布的反恐战争中负责军事和外交部分的人，就是战争第一阶段

期间在中美洲和中东实施恐怖暴行的主要人物。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就是在对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受教育阶层的教养和顺从表达真正的尊敬。

这样的猜测不会有错：“针对恐怖的战争”来年将再次成为干涉和暴行的借口，不单美国会这样做；车臣只是其中一例。在拉丁美洲，没有必要犹豫不决地思考这预示着什么；在巴西当然也是这样。巴西是肯尼迪政府之后镇压浪潮席卷拉丁美洲的首要目标，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拉美军队的任务自此从“防卫南半球”转向维护“内部安全”——这是委婉语，代指对国内民众发动的国家恐怖。这种情况还会大规模地持续下去，尤其在哥伦比亚。1990年代，哥伦比亚在违反人权方面位居南半球首位，至今还是美国武器和军事训练的主要接受国，这与主流学术界记载的一贯模式一致。

在1980年代第一阶段期间以及再次宣战的过去几个月以来，“针对恐怖”的战争当然是大量文献的焦点。当时和现在的大量评论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即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恐怖”。我们反而听到的是，这是一个恼人且复杂的问题。这是不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就有一些直接的定义。有个简单的定义认为，恐怖就是“处心积虑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来获得本质上属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标……”这个定义看似十分正确，却无法被使用，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把官方政策定义为“反叛乱”或“低强度冲突”；另一个原因是，它得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早就一清二楚，无需评述，尽管已被高效地压制了下去。

找到一个能排除最显著实例的有关“恐怖”的定义，确实是一个恼人且复杂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用他们对我们实施的恐怖来定义“恐怖”。审视一下有关恐怖的学术文献、媒体和面向知识分子的期刊就会发现，这种用法几乎没有例外，并且稍有偏差就会引起盛怒。此外，这种做法也许是普遍的：南美的将军们正在保护其民众免受“来自外部的恐怖”，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纳粹在被占领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例外，我还没有发现。

让我们回到“全球化”以及它与战争威胁（或许是终结战）之间的联系。

宇宙的主人们所设计的全球化说法受到精英们的广泛支持，这毫不奇怪，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这样——《华尔街日报》更坦率地称其为“自由投资协定”。这些问题很少被报道，重要的信息直接被压制了下去。例如，十年后，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美国工人运动的立场和国会研究

局技术评价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给出的一致结论，还必须要排除持异见的参考资料才能被报道。这些问题不在选举政治的议程之内，也有合理的理由。主人们十分清楚，如果提供了信息，公众就会持反对立场。然而，他们相互之间谈话时却十分开明。因此，几年前，国会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之下，未经讨论也未告知民众，就拒绝将“快速通道”立法权授予要实施国际经济协议的总统班子，国会也投了“赞同”票（或者，理论上是“反对”票）。像持有精英观点的其他各界一样，《华尔街日报》因无法削弱民主而忧心忡忡。但这说明的问题是，反对这些斯大林式措施的人拥有着“最终武器”，即普通大众，因此民众必须被蒙在鼓里。这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更加民主的社会中，不能在这里轻易地囚禁或暗杀持异见者，不像在萨尔瓦多、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等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主要国家那样，我在这里只列出了新近的这些世界冠军（以色列和埃及除外）。

人们也许会问，公众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为何多年来一直在高涨？在一个已达到空前繁荣、人们以为自己处于“神话经济”（尤其在美国）的时代，这似乎很奇怪。一年前，安东尼·路易斯⁽⁴⁴²⁾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在整个1990年代都享受着“美国——乃至世界——最强盛的经济繁荣”。他依然恪守规矩，避开了可接受的政治光谱中最左端的立场。要承认还存在不足：有些人在经济奇迹中被甩在了后面，而我们这些好心人必须要做些什么。这些不足反映出一个深刻而令人不安的困境：与“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发展和繁荣相伴而生的是日益加深的平等，有人缺乏享受馈赠和良机的技能。

这幅图景是如此深入人心，人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它与现实并不相似，现实就是贯穿整个经济奇迹、众人皆知的种种事实。直到1990年代末短暂的经济小繁荣时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依然难以弥补早期的经济萧条或下滑），“兴旺的90年代”人均增长率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直持平，但比所谓“全球化”之前的战后头25年人均增长率低得多，更远低于战时水平，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当时处于半计划经济阶段。那么，传统的图景怎么会和无可争议的事实大相径庭呢？答案本身很简单。对于社会的一小部分而言，1990年代的确是伟大的经济繁荣期。该部分恰巧包括那些给别人传喜讯的人。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是不诚实之人，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所说的话。他们一直从自己撰文的期刊上读着这些与个人经历相符的话。对于他们在编辑办公室、员工俱乐部、奇才们出席的精英会议及其吃饭的雅致餐馆里遇到的人来说，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是世界不同而已。

让我们迅速看一下更长时间跨度内的记载。国际经济一体化（即“国际化”的一个方面，从该词的中性意义来看）在“一战”前迅速加强，在“一战”期间有所停滞或下降，“二战”之后有所恢复，现在又大幅度地达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细微的结构则更加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化在“一战”前更为广泛，其中一例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的基础，尽管他的现代崇拜者们并不这样认为。在其他程度上，全球化现在更加广泛：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不仅只有此例——便是前所未有的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这种区分反映了宇宙主人们偏好的全球化说法的某些主要特征：甚至在规范之外的某种程度上，资本优先，人无足轻重。

墨西哥边境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是征服的结果，和其他边境一样都是人为所致。出于各种社会经济原因，该边境已被双方渗透。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克林顿为阻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该边境军事化。这很有必要，因为《北美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大多数想逃离的民众来说，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经济奇迹”。在这些年里，已经自由的资本流动与所谓的“贸易”一起进一步加速，目前三分之二的贸易都由私人独裁者集中控制，而实施《北美贸易协定》以前只有二分之一。这是原则性决定下的“贸易”。据我所知，《北美贸易协定》对实际贸易的影响还没有被调查过。

一个衡量全球化更加技术性的标准是全球化市场的聚合，实行单一物价和工资。这一切显然尚未发生。至少就收入而言，相反的情况可能更接近实际。尽管要具体取决于全球化如何被衡量，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内和国外的不平等已经在加剧，可能还会继续加剧。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专家共同参与下，美国情报机构近来发布了一份展望2015年的报告。他们期待“全球化”能如期推进：“全球化变革将困难重重，具体表现为长期的金融波动性和日益增大的经济鸿沟。”这说明技术意义上的聚合和全球化更少，但原则性意义上的全球化更多。金融波动暗示着依旧更慢的增长率以及更多的危机和贫困。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发现宇宙的主人们所意味的“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战争可能性之间有一种清晰的关联。军事规划者们怀揣同样的预期，并坦白地解释说，大幅扩张军事力量的背后就带有这些期望。即使在“9·11”以前，美国的军事开支就超过了其盟国和对手的总和。美国利用打击恐怖迅速增加经费，令私人经济中的关键部门欣喜不已。最可怕的是太空军事化计划；这也是在“打击恐怖”的借口下进行的扩张。

在克林顿时期的文件中公开解释了这些计划背后的理由。一个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之间拉大的差距，差距还会继续增大，这与经济理论相悖，但与现实相符。“穷人”即全球的“巨兽”可能会有破坏力，为了专业术语上被称为“稳定”的利益，必须要控制他们，意思是使其顺从主人的命令。这需要暴力手段，而且“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已为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繁荣承担了责任”，就必须遥遥领先。我引用的是外交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Gerald Haines）于20世纪40年代在某项学术研究中描述美国规划时所说的话，他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历史学家。绝对掌握常规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够，有必要拓展新的边疆：实现太空军事化，摧毁目前遵守的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联合国大会觉察到这种意图，曾几次重申该协定；美国拒绝参与其中，相当于置身事外。在过去一年间，华盛顿在联合国裁军大会上阻挠了有关该问题的谈判——这一切几乎没有被报道出来，还是惯常的那些理由。让民众知道可能终结唯一的“更高智商的”生物实验的计划，这是不明智的。

有目共睹的是，这些计划有利于军工业，但我们应当牢记这是有误导性的说法。在现代历史中，军事系统被用作使成本和风险社会化的手段，同时使利润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新经济”是富有动力和创新力的美国国家经济的自然结果。生物科学方面的公共开支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聪明的右翼分子明白，经济前沿要仰仗这些公共计划。在“生物恐怖主义”的借口之下要计划巨额开支，正如在俄罗斯人要打过来的借口之下欺骗公众为新经济买单那样——或在苏联人倒台之后，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复杂度”为要挟，当时的党派方针在1990年节奏准确地风向突转，几乎没有一字评论。这是国家安全豁免权为何也是国际经济协议部分内容的原因：协议不帮助海地，但允许美国经济在面向穷人的严厉市场纪律以及面向富人的保姆式国家的传统原则下增长——尽管不是什么好词，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该原则有几百年的历史，还会让古典自由主义者蒙羞。

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公共开支大都是值得的。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但很清楚的是，主人们担心为民主的选择留有空间，向公众隐瞒了一切，但参与者却一清二楚。

通过太空军事化跨越暴力的最后一道边界，这类计划被伪装为“导弹防御”。但关注历史的人都明白，一听到“防御”一词，我们想到的应当是“侵犯”。现在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们坦率地表明了目标：为确保“全球

统治”和“霸权”。官方文件重点强调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投资”并控制“穷人”。在当今就需要统治太空，正如那些早期最强大的国家建立陆军和海军“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一样。我们意识到，这些新的计划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美国已遥遥领先。众所周知，国际协议能阻止这些计划。但我已经提到过，霸权是高于生存的价值观，这是自古以来盛行于强国的一种道德算法。改变在于赌注更高，甚至奇高无比。

此处的相关观点是：期望原则性意义上的“全球化”取得成功，这是实施以太空为借口、动用即时性大规模杀伤性侵略武器计划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回到“全球化”和1960年代“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时期。

自“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实施至1970年代的管制汇率和控制资本流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还有该体系被废除之后的阶段。第二个阶段被称为“全球化”，与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第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第二阶段的是实施标准宏观经济措施之后产生的明显恶化趋势：经济增长率、生产力、资本投资，甚至还有世界贸易；为了保护货币而大量积累的非生产性储备；加剧的金融波动以及其他恶果。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不遵从规则的东亚国家。就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写道，东亚国家不信奉“市场指导怎么做最好”的“宗教”。他后来离任了（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相反，严格遵从规则的地方结果却更糟，例如拉丁美洲，那里发生的事实已众人皆知。一年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秘书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也承认了这些事实。他评论道，“应许之地是海市蜃楼”；1980年代的增长率远远低于第一阶段“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下30年的增长率。他还强调说，遵循规则和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也适用于全世界。

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深奥而令人烦恼的困境：由于一些人缺乏技能，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增长和空前繁荣造成了不平等。其实没有什么困境，因为迅速增长和繁荣是一个神话。

许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自由化是导致第二阶段恶果的主要因

素。但经济是一件复杂的事，很难被人们透彻理解，进行因果关联时必须谨慎。但资本自由化的后果是相当清楚的：民主被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定者对此十分了解。他们就资本监管缔结协议的原因之一是，允许政府实施具有广泛民众支持的社会民主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产生了所谓的“虚拟参议院”，对政府决策拥有“否决权”，并极大地限制了政策选择。政府面对的是“双重选举身份”：投票者和对政府政策“时刻投票表决的”投机者（我引用了金融系统的专门研究）。即使在富有的国家，谋取私利的选举身份也占上风。

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全球化”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类似后果。社会经济决策日益转向令人费解的权力集中，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此乃宣传用语，并非描述性词汇）的重要特征。他们大概未经民众讨论，就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策划着如何进一步对民主进行打击。众所周知，“服务”一词指落入民主选项竞技场的任何事情：健康、教育、福利、邮政及其他通讯方式、水及其他资源等。把这些服务转入私人手中就算“贸易”，这毫无实际意义，但这个词已被剥夺了原意，倒可以扩展到这个滑稽的用法上。

去年（2001年）4月在魁北克爆发的针对美洲国家峰会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是由一年前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狂热分子们发起的，在部分程度上针对的是将《服务贸易总协定》秘密地强行纳入设想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的企图。这些抗议将北美和南美的广大选民团结在一起，他们强烈反对这个显然是由贸易部长们和公司决策者们关起门来策划的事情。

抗议的确像通常那样被报道了出来：狂热分子们乱扔石块，干扰了思考大事的奇才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关心的问题被隐瞒了起来。例如，《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安东尼·狄巴马（Anthony DePalma）写道，即使在西雅图会议之后，“公众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推进商品贸易的尝试也并无异议”。实际上，《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多年来公众关心的主要问题。在其他情况下，这番话也不算是欺骗。狄巴马对狂热分子的了解肯定局限于经媒体过滤的信息。新闻界宁愿报道有人（也许是警察安插的奸细）“乱扔石块”，也严禁披露激进分子们严肃关注的问题，这是其业界铁律。

在4月举行的峰会上，避免让公众得知消息的重要性被戏剧性地展示了出来。美国每间编辑室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两份研究报告，等待时机在峰会前发布。一份来自“人权观察”组织，另一份来自华盛顿经济政策

研究院，两个组织绝非无名之辈。两份研究报告都深入调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该协定在峰会上被誉为是伟大的胜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模型。报告的标题打出布什和其他领导人对该协定的赞誉，把它当作福音真理来接受。但两份研究报告几乎一直被压存，原因很容易理解。人权观察组织分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工权利的影响，发现三个参与国的劳工权利均因此受到损害。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则更加全面，它包含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劳动者影响的详细分析，由对这三个国家有所研究的专家写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罕见的，对所有参与国的大多数民众都造成了损害的协定。

对墨西哥的影响尤其严重，特别是其南部地区。1980年代墨西哥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薪资迅速减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情况继续恶化。受薪工人的收入下降了24%，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下降了40%，迅速增加的失业工人也加剧了这种影响。尽管外国投资在增长，总投资却在下降，因为经济已转向外国跨国公司手中。最低工资收入人群丧失了50%的购买力。制造业在衰退，经济发展停滞，或许已经逆转。少部分人变得十分富有，外国投资者开始兴旺发达起来。

这些研究证实了商业报刊和学术研究所说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尽管墨西哥经济经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的迅速下滑，又在1990年代晚期迅速增长，但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增长了两倍，甚至连在外资装配厂工作的人也失去了购买力。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研究小组的一份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发现，经济实力高度集中，而墨西哥的小公司无法获得融资，工人从传统农业中流失，劳力密集型部门（农业和轻工业）无法在国际上与教条体系内所谓的“自由企业”竞争。农业处于劣势的原因仍然存在于：农民无法与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抗衡，这种影响在全世界并不鲜见。

上述大部分情况都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评者所预言过，其中包括被压制的技术评价处和劳工运动研究。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无论大多数批评者多么希望城乡人口比能迅速地提高，在这方面他们是错误的。该情况并未发生。原因似乎是，城市的条件也在恶化，很多人从城市又逃往美国。侥幸跨过边境的人——很多人失败了——在美国收入很低，没有福利，条件艰苦。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研究指出，协定的影响是摧毁了墨西哥的民生和社区，改善了“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继续由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农业工人的穷困所补贴的”美国经济。

这些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体要付出的

代价，经济学家们普遍决定不要评估这些代价。但即使按照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代价也相当惨重。

他们不允许这一切令峰会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颂扬蒙尘。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和激进组织联系起来，大部分人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获知一二。自由的新闻媒体谨慎地保护着民众，不让他们知道事实，很多人觉得自己有点像失败者，未能参与庆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繁荣。

来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数据很富有启示性，但我要跳过细节，概括描述一下这幅图景，当然还有些许不同和已强调过的种种例外。如果我们脱离标准经济措施来看，情况则更加糟糕。一个代价是军事规划家逻辑中隐含的生存的威胁，之前已经说过。还有其他的代价。举例来说，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报道，精神健康严重紊乱是“世界性流行病”，通常与工作压力有关，工业国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他们总结说，更宏观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在美国，“全球化”使得“工作稳定性消失”、工人压力增大、工作负担变重。这是“全球化”造成的代价吗？从某一点上看，这是全球化最富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当艾伦·格林斯潘⁽⁴⁴³⁾用“卓越斐然”来称赞美国经济的表现时，他特别强调工作不稳定性是褒义的，这使得雇主的成本得以降低。世界银行也这样认为，并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有个“坏名声……成了压低工资和逼走工人的委婉语”，然而，“这对世界各地来说都很有必要……最重大的改革不仅要打破社会福利和劳动合同之间的约束，还涉及解除劳动力流动性和工资弹性所受到的限制”。

简而言之，从主流观点来看，逼走工人、压低工资、削减津贴都大大有助于经济健康。

不受管制的贸易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益处。许多（也许是大部分）“贸易”受到各种手段的集中管理：子公司转让、战略联盟、业务外包以及其他方式。广阔的贸易区对公司有利，让公司对当地和该国社会担负的责任更少。这加强了定期减少劳动收入份额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在美国，1990年代是战后第一个收入分配大量从劳动力转向资本所有者手中的时期。

贸易的成本广泛而难以衡量：能源补贴、资源折耗以及其他难以计量的外部因素。贸易也有优势，尽管有必要对此保持某种谨慎的态度。广受称道的是，贸易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选择变少了，包括能更改相对优势（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发展”）的选择。选择和发展本身就是价

值：它们被大量的成本所削弱。如果强迫200年前的美国殖民地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新英格兰地区会继续保持鱼类出口而绝非纺织品生产的相对优势，纺织品生产只有通过实行高关税禁止英国产品（这反映出英国对印度的态度）才得以幸存。钢铁业和其他产业也一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尤其在实行高度贸易保护主义的里根年代——甚至连国有经济部门也可以不顾。有关这一切的说法很多。大部分说法都掩藏在经济核算的可选方式之中，而经济史学家和技术史学家对此并不陌生。

大家这时都能觉察出，游戏规则可能会加剧对穷人的不利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禁止使用每个富有国家为达到目前的发展状态曾使用过的机制，却为富有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其中包括专利制度。该制度阻止以新颖的方式进行革新和发展，并允许公司实体通过垄断产品价格聚敛巨额利润，而这些产品通常靠大量的公共赋税才得以开发。

在传统机制的现代版本中，全球半数人口都在接受着有效的破产管理，其经济政策由华盛顿的专家们控制。但即使在富有的国家，民主也因决策权从政府转向私人专政而受到攻击，政府也许对公众还有所反应，而私人专政则没有这些弱点。在当前情况下，诸如“信任民众”或“国家最小化”等愤世嫉俗的口号都不主张加强大众控制。他们把决策从政府转入他人之手，但不是“民众”：更确切地说，是集体法人实体的管理，该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对公众负责，但在内部结构上高度集权，这与一个世纪以前的保守派在反对“美国公司化”时提出的控诉如出一辙。

拉美问题专家和民意调查机构多年来的观察显示，形式民主在拉美的扩展总是伴随着人们对民主的幻想逐渐消逝。分析家们评论说，这些都是持续进行的“可怕趋势”，并指出“经济财富下降”与对民主制度“缺乏信任”之间存在关联（《金融时报》）。阿蒂略·波隆⁽⁴⁴⁴⁾数年前就指出，拉美民主化新浪潮碰巧遭遇了破坏有效民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美国也是如此。公众高呼2000年11月的选举被“窃取”了，但令人颇为惊讶的是，公众似乎对此并不介怀。民意调查也给出了可能的原因，即发现四分之三的民众在选举前夕就认为选举过程几乎是个闹剧。这是竞选捐助人、政党领袖和公共关系产业参与的游戏，他们精心打造候选人，让他们说出“一切设法让自己当选的话”，即使浅显易懂人们也很难相信。在大部分问题上，公民无法辨别候选人的立场，这并非因为他们很愚蠢或不想去辨别，而是公关产业实在太卖力。哈佛大学一项对政治

态度进行跟踪调查的项目发现，“公众感觉无能为力的比例十分惊人”，一半人声称像他们这样的人对政府毫无影响力或影响力甚微，这种比例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急速上升。

公众与（经济、政治、知识）精英持不同意见的问题主要与经济政策有关，而且未被放在议事日程上。不足为奇的是，商业社会大多支持由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被称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投资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不向公众负责的人手中的手段。更不足为奇的是，巨兽通常无端地遭到反对，甚至对关键性事实也一无所知，有人向他们小心隐瞒了这些事实。由此可见，这些问题与政治竞选不相称，也没有出现在2000年11月选举的主流报道中。比如，人们很难找到有关即将到来的美洲国家峰会与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涉及公众主要关心问题的话题讨论。选民被引导去关心公关产业所谓的“个人品质”，而不是“问题”。在投票的半数人口中，意识到自身阶级利益至关重要的人尤其偏向富有的候选人，他们会为这种利益投票：压倒性地投票支持两个商业政党中更反对改革的那一派。但普通民众以其他方式分散投票，结果在数据统计上出现了平局。在工薪阶层中，像枪支拥有权和“宗教虔诚度”等非经济问题是主要因素，因此人们通常会投票反对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显然假定自己也没什么选择。

所剩不多的民主被构建为商品选择权。商业领袖们一直在阐释向民众强加“徒劳无用哲学”和“缺乏生活目的”⁽⁴⁴⁵⁾的必要性，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构成时尚消费的、更肤浅的事情上”。人们从小被这种宣传灌输，此后也许就接受了自己无趣而盲从的生活，忘却了还能掌控个人事务的有趣想法。他们也许把自己的命运抛给了那些奇才，还有那些在政治领域中服务于权力和行使权力、自诩为“聪明的少数人”。

从该角度来看（即尤其盛行于20世纪的精英观点的传统角度），2000年11月的选举并未显示出美国民主的缺陷，反而显示了其胜利。笼统地讲，为在北半球和其他地方取得胜利的民主欢呼是正当的，尽管民众也许不这样认为。

强行建立这种制度的斗争有多种形式。只要存在着高度集中的有效决策权，这种斗争就不会停息，并且会永不停息。唯一合理的期望是，主人们会利用随之出现的一切机遇——目前是民众面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和痛苦。这对西方社会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了新技术以后，它丧失了对暴力的实际垄断，仅仅保留着庞大的主体。

但我们毫无必要接受这些规则。那些关注全球命运和世界人民命运的人一定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对以投资者权利为主的“全球化”的民众斗争大多出现在南方，对挂虑且防备着的宇宙主人们而言，他们的言辞（某种程度上还有做法）已经受到了影响。这些群众运动在规模、选民范围和国际团结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举行的会议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例证。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掌握在民众手中，我们很难对成败难料的事情做过高的估计。

（本文为2002年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 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稿，2002年5月29日发表在网站ZNet上；后来重印在《当务之急》 [C.P. Otero, ed., *Radical Priorities*, 3rd ed. Oakland: AK Press, 2003] ，第319—332页。）

反思“9·11”

人们普遍认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全球进入了“恐怖时代”，一切都将有所不同。“恐怖时代”是几位耶鲁大学学者及其同行所著的一本学术论文集的标题，他们认为炭疽病毒的攻击更加令人不安。

毫无疑问，“9·11”暴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遗憾地讲，不是因其规模，而是因为被选中的是无辜的受害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经意识到，因为有了新技术，工业大国可能会丧失对暴力的实际垄断，只保留着庞大的实体。人们可能未曾预想到实现期望的具体方式，但这些期望都被实现了。欧洲及其旁系国家在现代史上头一次在本土遭受了它们通常在其他地方才实施的暴行。历史何其相似，无需多做评论。尽管西方社会可能选择忘记历史，受害者却不会这么做。传统模式被突然打断，“9·11”必然被定性为历史事件，造成的反响也绝对意义非凡。

有几个即刻产生的关键性问题：

- （1）谁应该对此负责？
- （2）原因何在？
- （3）什么是正确的反应？
- （4）产生了哪些长期后果？

对于问题（1），貌似合理的假设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担负罪责的一方。对于他们的了解，无人能与中央情报局相比。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盟国的对应情报机关从许多国家招募宗教激进分子，并将他们组织成一支军事和恐怖力量，他们不是在帮助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入侵（这也许是个合理的目标），而是出于正常的国家原因，这给圣战分子掌权之后的阿富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自从这些组织关系网在20年前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以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紧密地跟进他们所取得的其他成绩，尤其在1993年某次野心勃勃的恐怖行动企图引爆世贸中心和其他众多目标之后，这种跟进更加密切。然而，尽管进行了史上最严密的国际情报调查，却很难找到有关“9·11”嫌犯的证据。轰炸发生八个月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国会做证时也只能说，美国情报机关现在“相信”，虽然阴谋在其他地方被策划和实施，但密谋是在阿富汗。而在炭疽病毒袭击的源头被定位到美国政府的武器实验室后很久，这一袭击仍未得到确认。这些迹象表明，将来要应对以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恐怖行动可能会有多困难。然而，尽管证据不足，可以假定有关“9·11”事件的初期结论是正确的。

再来看看问题（2）。学术界对恐怖分子的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也与恐怖分子过去20年的行径相符。

至少对于那些希望减少进一步发生类似性质罪行可能性的人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产生恐怖组织的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甚至在鄙夷和惧怕它们的人当中促成了对其所传递的部分信息的莫大同情和理解。用乔治·布什那句哀伤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并且答案也不难找。45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成员就讨论了他所谓的阿拉伯世界“憎恨我们的行动”，仇恨“并非来自政府而是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出的基本原因是，人们意识到美国支持那些阻碍民主和发展的腐败而残暴的政府，并且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其在近东石油的利益”。《华尔街日报》在“9·11”事件之后调查了富裕的西化穆斯林的态度，结论也是这样。这些富人现在对涉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与伊拉克的美国政策感到愤怒。

评论员通常喜欢更加令人宽慰的答案：他们的愤怒源自对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热爱民主的憎恶，还源自他们早在很多世纪以前就衰败的文化、他们无法参与“全球化”形式（他们现在乐于参与其中）以及其他类似的不足之处。也许这听上去更加令人宽慰，但却不够明智。

问题（3）中正确的反应又如何呢？答案无疑是有争议的，但至少

这种反应要达到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具体地说，假如某个行动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对别人来说也是正确的；假如在别人看来是错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错的。拒绝这一标准的人简单地宣称，行动的正当性是由权力决定的；因而可以在任何关于行为适当性和对错与否的讨论中忽略这些行动。人们也许会问，假如采取这个简单的准则，在关于问题（3）的评论浪潮（关于“正义战争”的争论等）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举几个毫无争议的实例来说明。40年前，古巴领导人曾成功地抵抗了由美国主导的侵略，打破了后者的“良好”局面。肯尼迪总统曾命令说：必须把“地球上的恐怖”全都惩罚给古巴，最终消灭其领导人。恐怖严重至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20年前，里根总统又发动了针对尼加拉瓜的恐怖战争，实施了野蛮的暴行和大规模的破坏，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去，乡村被摧毁，或许再难以复原。国际法庭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一次被美国否决的决议中）谴责了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但没人会相信，古巴或尼加拉瓜能在华盛顿或纽约引爆炸弹或刺杀美国的政治领导人。直到现在，种种实例都能信手拈来，不用再添加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因此，那些接受基本道德标准的人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显示出美英轰炸阿富汗人是正当的。总统在轰炸之初便宣布了战争的官方目的，即迫使阿富汗人移交被美国怀疑犯有残暴罪行的人；或是几周后宣布的战争目的，即推翻其统治者。

关于对恐怖暴行做出恰当的反应，同样的道德标准需要更具有细微差别的提议。受人尊敬的英裔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提出“进行由联合国组织的警察行动……反对犯罪预谋，其成员应被追捕并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公平审判；假如发现有罪，就应给出适当的判决”（《卫报》《外交事务》）。这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我们也许会问，人们对普遍推行该提议的建议会做何反应？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提出这种建议，可能会引起愤慨和恐惧。

对于通过“先发制人”打击可疑威胁的“布什主义”，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布什主义不是新事物。高层策划者们大多是里根政府的留任者，他们认为轰炸利比亚从《联合国宪章》来看是正当的“抵抗未来袭击的自我防御”。克林顿的规划者们建议采取“预先回应”（包括首先进行核打击）。克林顿主义早有先例。然而，大胆地断言拥有这种权利却很新奇，威胁针对的是谁，也不是什么秘密。政府和评论家都高声、清楚地强调说，他们要把该主义用于伊拉克。因此，普遍性的基本

标准似乎可以证明伊拉克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恐怖行动是正当的。当然，没人会接受这一结论。再者说，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基本的道德原则，就会出现明显的问题，那些倡导或容忍“预先回应”原则备选方案的人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该备选方案赋予那些足够强大的人动用它的权利，而几乎不用顾及全世界的想法。寻找证据的负担变得沉重，因为每当倡导或容忍以暴力威胁或动用暴力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驳斥这种简单的论点：他人邪恶，我本善良。这种有用的原则实际上能击败任何论点。评论分析和诸多学术研究表明，它们通常都基于这一未经论证就被断定的关键原则。偶尔会有一些被激怒的家伙试图拿近现代历史上的记载来对抗这一核心原则，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通过观察人们的反应，以及为阻止人们陷入这种异端观点而设置的一系列有趣的障碍，我们可以对现行文化规范了解得更多。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当代权力中心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文化的发明。然而，它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尤其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我们身在何处、未来会怎么样的人来说。

让我们简要地看一看最后一个关注点，即问题（4）。

从长期来看，我怀疑“9·11”罪行会加速目前已有的趋势，此前提到的布什主义就是例证。正如当时即刻预测的那样，全世界政府都把“9·11”事件当作一个机会窗口，制订或升级了严酷的镇压计划。俄罗斯急切地加入了“反恐联盟”，希望肯定它在车臣的行径，结果如愿以偿。中国基于类似原因也欣然加入了该联盟。土耳其是最先为美国新阶段“反恐战争”增援军队的国家，其总理解释说，这是出于感谢美国为土耳其打击受其残酷镇压的库尔德人所做的贡献。土耳其发动的战役极为残忍，并主要依赖大量的美式武器。因在这些实行国家恐怖的战役中成绩斐然（包括在可怕的1990年代实施的一些恶劣暴行），土耳其受到了美国的高度赞扬，作为奖赏被授权驻军喀布尔，保护其免受恐怖打击。这个提供军事援助、外交和意识形态支持的超级大国还为土耳其的新近暴行提供了资金。以色列意识到，在美国更为坚实的支持下，它甚至能更残忍地镇压巴勒斯坦人。全世界许多地方也是如此。

更民主的国家，包括美国，制定了强制管束国内民众的措施，还在“打击恐怖”的伪装下利用恐惧气氛和对“爱国精神”的要求制定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实际上的意思是：“你们都闭嘴，我要无情地实施自己的议程。”为了服务于狭隘的、已超越常规范围而掌控政府的公司利益，布什政府利用此次机会推进了对大多数民众和未来几代人的侵犯。

简而言之，最初的预测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有一个主要的后果是，美国第一次在中亚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十分重要，使美国跨国公司在当今控制该地区可观资源的“伟大游戏”之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也完成了对海湾地区世界主要能源资源的包围。以海湾地区为目标的美国军事基地系统从太平洋延伸至亚速尔群岛，但在阿富汗战争以前，最近、最可靠的基地远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由于形势得以改观，进行武力干预（假如被认为是恰当的话）会得到极大的便利。

布什政府把“反恐战争”的新阶段看作一次机遇，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其业已呈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并继续使用其他方法确保其全球统治。他们的“反恐战争”在很多方面复制了里根政府20年前所宣布的“反恐战”。政府的思路被高级官员清楚地讲了出来。沙特王子阿卜杜拉（Prince Abdullah）于4月访问美国时，曾敦促美国政府更多地关注阿拉伯国家对其大力支持以色列恐怖镇压的反应。实际上，他被告知，美国并不在乎他或其他阿拉伯人的想法。据《纽约时报》报道，某位高官解释道，“假如他认为我们在沙漠风暴(446)中很强大，我们如今还要强大十倍。这会让他多少明白我们在阿富汗是如何展示我们的实力的”。一位国防部高级分析家做出了简单的解释：别人会“因我们的强硬而尊重我们，并且不会招惹我们”。这种立场也有许多历史先例，但它在“9·11”事件之后的世界中获得了新的力量。

我们没有内部资料，但可以合理地设想以下结果就是轰炸阿富汗的主要目标：警告全世界，假如有人越界的话，美国能做什么。轰炸塞尔维亚也是出于相似的原因，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北约的信誉”（布莱尔和克林顿是如此解释的），但并非指挪威或意大利的信誉，而是美国及其主要军事附属国的信誉。这是治国之道和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共同主题，经过历史的充分证明也有一定的道理。

毋庸赘述，在我看来，国际社会的基本问题和过去一样，但在某些情况中，“9·11”事件肯定带来了改变，并蕴含着不那么有趣的深刻启示。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2年8月的《瑞典晚报》[Aftonbladet]上，后来被重印在《9·11》[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第2版，第119—128页。）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2001年，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家巴鲁克·吉姆林（Baruch Kimmerling）说：“我们所恐惧的事情已成为现实。”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正在“退回到迷信的部落制……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是一场“邪恶的殖民”战争。⁴⁴⁷在2002年春以色列进攻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之后，吉姆林的同事泽尔夫·施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写道：“在以色列的殖民地……人命不值钱。”领导人在“真正管理殖民地治安时已不再羞于谈及战争，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白人警察管制贫困的黑人社区的情形”。⁴⁴⁸双方都强调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退回到部落制的“民族体”（ethnonational groups）之间不存在对称性。冲突集中出现在那些遭受残酷的军事占领长达35年的地区。侵略者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在全球性超级大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下采取行动。百姓们势单力孤，无力反抗，许多人在凄惨的难民营里勉强度日。他们正遭受着一种甚至更残忍的、在“邪恶的殖民”战争中才常见的恐怖，为了报复，他们也在实施着可怕的暴行。

奥斯陆的“和平进程”⁽⁴⁴⁹⁾改变了占领的模式，却没有改变基本概念。在加入埃胡德·巴拉克⁽⁴⁵⁰⁾政府前不久，历史学家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写道：“奥斯陆协议建立在新殖民主义和个人生活永远依赖于他人的基础之上。”⁴⁵¹不久，什洛莫就成为2000年夏在戴维营达成的美以提议的设计者，这些提议也遵守了这种依赖性条件，并受到美国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巴勒斯坦人及其邪恶的领导者因会谈失败和随后发生的暴力冲突受到了责难。正如吉姆林和其他所有严肃评论员所说的那样，这一切完全是“欺骗行为”。⁴⁵²

的确，克林顿 - 巴拉克提议向班图斯坦式（Bantustan-style）的解决方案⁽⁴⁵³⁾又迈进了几步。在戴维营和谈之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200多个分散的区域内。克林顿—巴拉克提议确实给出了改进办法：将这些区域合并为三个受以色列控制的行政区，实际上相互隔离，并且与第四区隔离。第四区是东耶路撒冷的一小片区域，是巴勒斯坦人在该地区的生活和交通中心。在第五区，即加沙地带，除了身处此地的人们还要继续处于事实上的监禁之外，结果尚不明朗。从美国主流媒体那里无法获得有关这些协议的地图和细节，这也情有可原。

美国将继续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无人会对此表示真正的怀疑。因此，了解这种作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被内部所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陈述了鸽派的观点，并赞扬总统发表的“具有开创性的演讲”和他所阐述的“正在出现的前景”。鸽派的首要原则是立刻“结束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停止建立犹太人居住区，然后将其退还，并协商划定新的边界”，就此结束占领并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假如结束巴勒斯坦的恐怖行动，美国会鼓励以色列人“更加认真地考虑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以全面的和平和承认以色列来换取以色列的撤军”。但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合法的外交伙伴”。⁴⁵⁴

现实世界与这种自私自利的描绘相去甚远。这种描绘复制的是1980年代，当时美国和以色列都在极力逃避巴解组织关于协商和政治解决的要求，坚决提出以下要求：不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不承认“另外一个巴勒斯坦国”（约旦已经是一个巴勒斯坦国），“除非遵照（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指导方针，否则犹太地（Judea）、撒玛利亚（Sarmaria）和加沙的状态不得改变”。⁴⁵⁵像以前一样，这一切未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公布，与此同时，评论家们谴责巴勒斯坦人醉心于恐怖活动，破坏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人道主义努力。

在现实世界中，“正在出现的前景”的主要障碍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美国单方面的抵制主义立场（rejectionism）。2002年3月的“历史性提议”毫无新意，它只是重申了1976年1月安理会决议的基本条例。该决议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包括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欧洲和苏联集团，事实上是得到了每位相关成员的支持。这项提议遭到了以色列的反对和美国的否决，因此在历史上被否决了。安理会决议呼吁政治解决国际公认的边界问题，“通过适当的安排……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的、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对联合国第242条决议的修正（美国的官方解释也是这样），也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此后，来自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和欧洲的各类倡议都遭到美国的阻拦，在公众舆论中大部分都遭到压制和否认。

不足为奇的是，占领的指导原则是进行无尽的、可耻的羞辱，加之折磨、恐怖、破坏财产、被迫迁移和再定居、占领基本的资源（关键是水）。当然，这些都需要美国在克林顿—巴拉克当政时期给予决定性的支持。在政府过渡时期，以色列媒体说：“巴拉克政府给沙龙政府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自从阿里埃勒·沙龙于1992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前）担任建设和住房部部长以来，在这些地区所建房屋的数量最多。”建

这些定居点的资金由美国纳税人提供，他们被美国领导人有关“前景”和“宽宏”的胡编乱造所欺骗，也被像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这样已丧失“我们的信任”的恐怖分子，或许还有一些对其罪行反应过激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所打击。

至于阿拉法特应当如何重获我们的信任，克林顿在任期间负责该地区事务的国务院官员爱德华·沃克（Edward Walker）简要地做出了解释。狡猾的阿拉法特必须明确地宣布：“我们把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交给美国。”而这一想法其实已经使这场损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动持续长达30年。⁴⁵⁶

较为严肃的评论则承认，此次“历史性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重申了1981年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计划⁽⁴⁵⁷⁾。人们通常认为，该计划遭到破坏是因为阿拉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事实恰恰相反。1981年计划是被以色列的反应所破坏的，甚至连以色列的主流媒体也谴责其反应“近乎疯狂”。西蒙·佩雷斯⁽⁴⁵⁸⁾警告说，法赫德计划“对以色列的存在造成了威胁”。哈伊姆·赫尔佐克⁽⁴⁵⁹⁾总统控诉说，法赫德计划的“真正发起者”是巴解组织，甚至比他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时巴解组织“筹划”的1976年1月安理会决议更加极端。⁴⁶⁰这些论断并不真实（尽管巴解组织曾公开表示支持这两个计划），但都表明，在美国持久而坚定的支持下，以色列的鸽派人士极度惧怕政治解决。

当时的根本问题和现在一样，都能追溯到华盛顿。华盛顿一直以来支持以色列拒绝在广泛的国际共识下进行政治解决，而“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中主要重申的就是政治解决。

当前美国对于抵制主义所做的修正是有策略性的，迄今为止也是微小的。由于进攻伊拉克的计划受到威胁，美国同意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不延误地”从新占领的地区撤离。根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解释，“不延误地”就是“尽快”之意。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将会“立刻”中止，但以色列人35年前就已开始的更极端的恐怖活动还能继续下去。以色列马上加快了攻势，鲍威尔则说：“听闻总理说要加快行动，我感到很高兴。”⁴⁶¹很多人怀疑说，鲍威尔的以色列之行被推迟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美国也允许联合国通过决议，呼吁考虑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⁴⁶²这种紧随其后的姿态大受赞扬，却无法与40年前南非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实现了建立由黑人管理的国家的“设想”。这些由黑人管理的国家至少与美国和以色列一直为被占领地区所规

划的新殖民依附状态（neocolonial dependency）一样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

与此同时，通过为以色列提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手段，包括新近运送美国军械库中最先进的直升机，美国在继续“增进恐怖”（借用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来说）。⁴⁶³

华盛顿极力增进恐怖的行为在2001年12月再次被证明，当时，美国否决了一项安理会决议。这项决议要求执行米歇尔计划和派遣国际监视员监督减少暴力行为，这是公认最有效的方式，却遭到以色列的反对和华盛顿的一贯阻挠。⁴⁶⁴此次否决发生在21天的“平静”期之内，期间只有1名以色列士兵和2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包括11名儿童），而以色列16次入侵巴勒斯坦控制区。⁴⁶⁵在投否决票的10天前，美国曾抵制并从中破坏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再次得出结论认为，《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因而美国和以色列在那里的所作所为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简而言之，是一种“战争罪行”。会议明确宣称由美国资助的以色列人定居点是非法的，并谴责了“非法地、为所欲为地进行的……肆意屠杀、折磨、非法驱逐、任意剥夺要求公正和按常规进行审讯的权利、大规模地破坏和挪用财产”的行为。⁴⁶⁶作为缔约国，美国有义务根据庄严的条约来控诉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包括自己的领导人。但这一切都无人问津。

美国并未公开撤回它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的承认，或对以色列作为“入侵国”所犯下的暴行的谴责（例如，老乔治·布什任联合国大使时就承认以色列是“入侵国”）。2000年10月，安理会重申就此事所达成的共识，“要求入侵国以色列严格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和责任”。⁴⁶⁷投票结果是14：0。克林顿投了弃权票，他大概不想否决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核心原则，尤其考虑到颁布该法律时的背景：正式宣布纳粹的暴力行为是犯罪。所有这一切很快就被抛诸脑后，这再一次“增进了恐怖”。

在允许人们讨论这些事情并得以理解其深意之前，号召“美国参与和平进程”是毫无意义的，采取建设性行动的前景也会黯淡无光。

（本文最早出现在《中东幻象》[*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第227—232页。）

帝国大战略

到2002年秋为止，位居全球议程首位的，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所宣布的通过威胁或动用军事力量维护其霸权地位的企图，这是它占据主导优势的权力领域。用国家安全战略的官方说法来讲就是，“我们的军队强大无比，会令我们的潜在对手放弃其为超越或比肩美国力量而进行的军队建设”。⁴⁶⁸

著名国际事务专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把这种宣言称作“大战略”，它“始于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的根本性保证，使美国在这种世界中没有同辈竞争者”。这也是一种状态，它将“永远存在，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能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保护者和执行者的地位”。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方式使自我防御的国际准则——被庄严地记载在《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中——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更笼统地讲，该原则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认为它们“价值不大”。伊肯伯里接着写道：“新的帝国大战略把美国展现为一个修正派（revisionist）国家，它力求将其暂时享有的优势转化为受其操纵的世界秩序”，迫使其他国家想方设法地“应对、削弱、牵制和报复美国的强权”。该战略预示着“全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和分裂，而美国也不太安全”，⁴⁶⁹这也是精通外交政策的精英分子们广泛认同的观点。

一、推行霸权

帝国大战略主张美国任意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权利：是预防性的，而不是先发制人的。⁴⁷⁰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尚在国际法框架之内。因此，如果侦查到从格林纳达军事基地（这是里根政府在1983年的凭空想象）起飞的俄罗斯轰炸机正在靠近美国并带有明显的轰炸意图，那么依据对《联合国宪章》的合理解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摧毁轰炸机甚至格林纳达基地是情有可原的。古巴、尼加拉瓜和其他许多国家多年来在遭受美国袭击时，本可以使用同样的权利，尽管处于弱势的国家行使其权利肯定是不理智的。但无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正当理由是什么，都不适用于预防性战争，尤其在这个概念被当前热衷于此类战争的狂热分子如此解释的时候：动用军事力量去消除假想中或编造出的威胁。最后，连“预防性”一词都显得过于仁慈。

预防性战争属于战争罪的范畴。如果它确实意味着“某国的时代已来临”，⁴⁷¹那么全世界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初，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肯尼迪顾问的亚瑟·施莱辛格写道：

总统在某日采取了“预期自我防御”政策，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在珍珠港的所作所为极为相似。当时的美国总统说，那一天臭名昭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言极是，但如今臭名昭著的是美国人自己。⁴⁷²

他接着写道：“‘9·11’事件之后全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之心，已经被对其骄傲自大和崇尚武力的厌恶情绪所替代。”即使在一些与美国交好的国家，公众也认为布什“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侯赛因更大”。国际法专家理查德·福尔克认为，无可回避的是，伊拉克战争是“一种反和平罪，和幸存的德国领导人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控告、起诉和惩罚的罪行一样”。⁴⁷³

一些大战略的捍卫者也意识到该战略践踏了国际法，但他们看不出这般做法有何大碍。法律学者迈克尔·格伦农（Michael Glennon）写道，国际法的整体框架只是“空话”，“使武力统治服从于法治的伟大尝试”应该被存放在历史的垃圾箱里。对于那个能为实现自身目的而采取新的非传统规则的国家，这是一种便捷的立场。因为该国家在暴力手段上

的开支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支总和，并且面对全世界近乎异口同声地反对，它还在开发毁灭性武器方面开辟着危险的新路。证明这个体系只是“空话”的证据十分直白：华盛顿“明确表示，它要尽其所能维护其优势地位”，还“宣称它将不理睬”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看法，而且更明确地宣布，“它不会再受制约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条例的约束”。论证到此结束（QED⁽⁴⁷⁴⁾）。于是，规则“瓦解”了，“整个建筑也坍塌了”。格伦农总结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是“开明国家”的领导者，因此“必须反对遏制其动用武力的[一切做法]”。⁴⁷⁵

开明的领导者也在随心所欲地改变着规则。当占领伊拉克的军队并未发现据称能证明其侵略合理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政府的立场从“完全确定”伊拉克拥有杀伤性武器的规模以至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转变为认定美国的指控“因发现可能用于武器制造的设备而合乎情理”。一些高级官员建议“对‘预防性战争’这一争议性概念加以完善”，使华盛顿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拥有大量致命武器的国家”。这种修改“反而表明，政府会打击企图和有能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对政权”。⁴⁷⁶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但心怀不轨之人才能看出别人的企图。因此，完善版的大战略有效地赋予了华盛顿任意发动侵略的权利。最显著的后果是，据说能为侵略辩护的论据瓦解了，诉诸武力的标杆也被降低了。

帝国大战略的目标是阻止任何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威望”的挑战出现。这些话并非引自迪克·切尼⁽⁴⁷⁷⁾或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⁴⁷⁸⁾，也并非出自其他制定2002年9月国家安全战略的民族主义反动派之口。相反，这些话是受人尊敬的自由派元老政治家迪安·艾奇逊在1963年说的。他在为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辩护。艾奇逊十分清楚的是，华盛顿进行的旨在造成“政权更替”的国际恐怖主义战争，是造成全世界在几个月前接近核战争的重要因素，该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解决之后又立即重新展开。但他还是教导美国国际法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说，当美国回应对其“实力、地位和威望”的挑战时，不要弄出“法律问题”。

艾奇逊的原则随后被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里根政府所援引。当时，里根政府拒绝接受国际法庭对其攻打尼加拉瓜的裁决，无视法庭让其停止罪行的命令，接着还否决了两项支持法庭判决并号召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安理会决议。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法尔（Abraham

Sofaer) 解释说：“不能指望我们的观点”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同，“这些大多数国家经常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反对美国”。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保留决定权”，确定哪些事情“主要属于美国的国内裁决”——在这里就是指国际法庭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进攻尼加拉瓜的行为；用非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⁴⁷⁹

在里根—布什时期（即现任华盛顿官员首次掌权的时候），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蔑视尤为明目张胆。他们的继任者继续表明，美国有权“在必要时单方面”采取行动，包括“单方面动用军事力量”来捍卫自身的重要利益，比如“确保畅通无阻地占有重要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性资源”。⁴⁸⁰但这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姿态。

2002年9月帝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可以追溯至“二战”早期。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高层规划者和分析家就断定，在战后世界中，美国将力图“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力”，确保对可能干预其全球设计的国家“限制行使主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确保达到这些目标的“首要条件”是“迅速实现重整军备的计划”。这是“实现美国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整体政策”的核心部分，而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当时，这些雄心都局限于“非德国的世界”，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个包括西半球、前大英帝国和远东的“大区域”被组织了起来。当德国明显要战败时，这些计划便被加以扩展，尽可能地包括了亚欧大陆的众多地区。⁴⁸¹

在这里很难作为样本的种种先例，却揭示了这种规划光谱的狭窄范围。政策源自一贯十分稳定的国内权力体系框架。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而约翰·杜威⁽⁴⁸²⁾将政治描述为“被大财阀投射在社会中的阴影”也不算夸张。国家政策应当力图建立一个世界体系，任由美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不容忍任何对手或威胁，这是自然而然的。⁴⁸³一个重要的结论便是，保持警惕并阻止任何寻求独立发展的举动，独立发展可能是一种“传染别人的病毒”（用规划者的话来说）。这是战后史的首要主题，常常隐藏在冷战时期的薄弱借口之中，这些借口也常常被超级大国的对手用在更狭义的领域。

全球管理的基本使命从战后早期一直持续至今，其中包括：将其他全球性权力中心纳入由美国管理的“秩序总框架”内；保持对世界能源供给的控制权；阻止无法接受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克服在敌人领土内出现的“民主危机”。这些使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过渡期：1970年左右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变化；超级大国的敌手在20年后又恢复了类似其传统的半殖民地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

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在“9·11”事件时达到巅峰。多年来，美国不断地完善和调整战略以应对这些变化，暴力手段不断升级，把我们这个濒危物种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然而，2002年9月公布的帝国大战略无疑敲响了警钟。艾奇逊和索法尔正在描述政策方针，而且是在精英圈子的内部。他们的立场只有专家或看过表达异见的文献的读者才知晓。其他情况可能会被当成是对修昔底德的名言所做的世俗而聪明的重述——“大国做想做之事，小国接受必须接受之事”。相比之下，切尼 - 拉姆斯菲尔德 - 鲍威尔⁽⁴⁸⁴⁾及其同僚们却公开宣布了一项更加极端的政策，该政策要在必要时依靠武力获得永久的世界霸权。他们故意说给别人听，然后立即采取行动昭告天下，证明他们的话果真如此。这是最大的不同。

二、国际法的新规范

帝国大战略的宣布被人们正确地理解为国际事务中的不祥之举。然而，一个超级大国公布其官方政策是不够的，它必须采取示范行动加以推进，把该政策树立为国际法的新规范。知名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会清醒地解释道，法律是灵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工具，因此新规范现在也能用作行动指南。于是，当新的帝国战略被公布时，他们就开始敲响战鼓，召唤民众对攻打伊拉克的热情。与此同时，中期选举活动也开始了。这种已被特别指出的关联，我们应当牢记在心。

预防性战争的对象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 (1) 必须毫无防御能力。
- (2) 必须足够重要，值得大费周折。
- (3) 必须有办法将其刻画为极恶势力和危及我们生存的临近威胁。

伊拉克具备全部特点。前两个条件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也容易解决。我们只需重申布什、布莱尔及其同僚慷慨激昂的演说即可：独裁者“[为了]支配、恐吓或进攻，正在配备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他“已在所有村庄使用了武器——使成千上万的子民死去、失明或致畸……如果这不算邪恶，那么‘邪恶’一词便毫无意义”。⁴⁸⁵

总统在2003年1月国情咨文演讲中进行的激烈谴责的确听起来像是真的。当然，助长邪恶势力之人难逃惩罚，其中包括满口高尚之词的演

讲者及其同僚，他们明知极恶之人的罪行，却长期支持着他。我们惊讶地看到，他们一边描述着邪恶势力的极端罪行，一边又如此轻易地隐瞒这些重要的话：“我们的帮助还在继续，因为我们无所谓。”当邪恶势力真正犯了第一桩罪、在1990年违背（也许是误解）准则入侵科威特时，赞扬和支持就变成了谴责。惩罚是十分严厉的，但针对的是百姓。然而，独裁者却毫发无损地逃脱了，其势力在昔日朋友强加的制裁制度下进一步地增强了。

当时间临近，直至2002年9月展示预防性战争新规则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⁴⁸⁶⁾警告说，下一个证明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的证据也许就是蘑菇云了——很可能出现在纽约。侯赛因的邻居们，包括以色列情报局在内，没有理会这些后来被联合国核查员质疑的指控，但美国政府仍在如此宣称。从宣传攻势开始的时刻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声明缺乏可信度。“一位有20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美国政府人士在华盛顿说过，‘这届政府为了推行其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什么谎言都说得出口……’”他暗示说，华盛顿反对核查，因为它担心什么也查不出来。两位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还说，总统有关伊拉克威胁的主张“应当被视为恐吓美国人去支持战争的明显企图”。这是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美国政府仍然拒绝为其1990年发表的声明提供证据，这些声明说在沙特阿拉伯边境集结了大批伊拉克军队。这是发动1991年战争的首要原因。这些声明立刻被一家调查此事的报纸揭穿，但并未产生任何影响。⁴⁸⁷

不管有没有证据，总统及其同僚发出了严重警告，认为萨达姆对美国及其邻国造成了可怕的威胁，并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有瓜葛。这大体暗指萨达姆与“9·11”袭击有关。政府发动的轰炸式媒体宣传取得了成效。在几周之内，约60%的美国人逐渐断定萨达姆·侯赛因“是美国的直接威胁”，必须在自我防御时除掉他。截至3月，几乎50%的美国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本人与“9·11”袭击有关，劫持者中也有伊拉克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与上述想法紧密相关。⁴⁸⁸

在国外，国际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公共外交……失败透顶”，但“在国内，它却相当成功地把伊拉克战争和9月11日的创伤联系了起来……近90%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政权正在帮助和教唆那些计划在未来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政治分析家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评论说，大部分美国人都被“一种宣传计划所欺骗了……就其系统性的谎言来说，在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几乎没有能与其相提并论的”。⁴⁸⁹ 2002年9月的宣传活动也足以让政府在中期选举中凭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

持，选民们因惧怕民主的敌人而放下了当前的顾虑，簇拥到权力之伞的下面。

公共外交与国会一起，即刻施展了它的魔力。10月，国会授予总统开战的权力，以“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抵御来自伊拉克的持续威胁”。这个特殊的脚本似曾相识。1985年，里根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是每年要重新宣布的），因为“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非同寻常的威胁”。2002年，美国人再次心惊胆战，而这一回面对的是伊拉克。

2003年5月1日，总统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为“持续六周的战争奏响了一段有力的里根式终曲”，这再次展示了国内公共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总统直率地宣称（毫不顾及国内的质疑），他“消灭了基地组织”，赢得了“反恐战争的胜利”。⁴⁹⁰无关紧要的是：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他其实是萨达姆的死敌）之间存在所谓的关联并无可信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称职的观察员们驳回。同样无关紧要的是众所周知的入侵伊拉克与恐怖威胁之间唯一的联系：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入侵加剧了威胁，也使基地组织成员迅速增加，这看上去是“‘反恐战争’中的重大挫败”。⁴⁹¹

宣传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战后。在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懈努力失败之后，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过20%的人认为伊拉克在战争中使用过这些武器。⁴⁹²这些也许就是经过多年大力宣传之后容易惧怕任何事情的人的反应，那种宣传通过激起恐慌来驯服民众这头“巨兽”。

“有力的里根式终曲”这一说法可能是指里根的得意声明，他说美国在克服格林纳达制造的恐怖威胁之后“挺直了脊梁”。机敏的评论家们补充说，布什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精心筹划的表演标志着“他2004年连任竞选活动的开始”，白宫希望“竞选活动尽可能围绕着国家安全主题展开，其主旨内容是如何除掉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种信息，正式的竞选活动开幕式一直推迟至2004年9月中旬。如此一来，在纽约召开的共和党大会就能歌颂这位战时领袖，像对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他独自一人就能让美国人免受“9·11”事件的重演。共和党的主要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解释说，选举活动的重点是“伊拉克战役，而不是伊拉克战争”。这是“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罗夫]对此十分清楚，也许会感到意外”，它“会延续到2004年的选举日”，⁴⁹³甚至肯定会超过这个时间。

到2002年9月为止，美国已经具备树立国际法新规范的三大必要因素：伊拉克毫无防御能力、地位举足轻重，而且是危及我们生存的临近威胁。事情总有可能出错，但对入侵者来说至少不可能这样。双方实力悬殊，一定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任何人道主义结果都会被推到萨达姆·侯赛因头上。假如结果不尽人意，他们不会被调查，线索也会消失不见，至少如果往事可以为鉴的话就是如此。获胜者不会调查自己的罪行，外界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一原则很少有例外：比如，人们不知道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中死亡人数达几百万左右。“二战”后的战争罪行审判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操作定义很直接：是敌人而非盟军犯下的罪行才被称为罪行。例如，摧毁城市平民聚集地就不包括在内。在之后的审判中也使用了这一原则，但仅限于战败的敌人或被任意侮蔑的其他人。

宣布入侵伊拉克取得成功以后，人们所公认的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动机是将帝国大战略树立为新规范：据《纽约时报》报道，“将[国家安全战略]公之于众标志着伊拉克将会是首次测试，而不是最后一个”。“伊拉克成了进行这项先发制人政策实验的培养皿。”某位高级官员还说：既然已经建立了规范，“一旦有必要，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通过先发制人来行使自我防御的权利”。哈佛大学远东历史学家罗杰·欧文（Roger Owen）评论道：“世界其他国家充分意识到[在伊拉克的]全部做法具有示范性质。”人民和政府必须把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从基于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角度转变为基于与华盛顿议程一致的角度”。他们正在被武力展示所教导，放下“对国家利益的严肃考虑”，去支持反映“美国目标”的做法。⁴⁹⁴

出于在世界各国眼中“维持可信度”而展示实力的需要，美国可能会打破伊拉克战争中的平衡。《金融时报》对该规划进行评论时，将开战决定追溯至2002年12月中旬，即伊拉克向联合国递交军备宣言之后。“某位与联合国安理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士在12月8日该宣言被公布时说道：‘有一种白宫在被嘲笑的感觉。’一位拙劣的独裁者在嘲讽总统，在白宫内部激起了愤怒。自那一刻之后，就没有外交解决的希望了。”⁴⁹⁵在军队部署就位的同时，接着便上演了蛊惑人心的外交剧目。

随着大战略被正式宣告和实施，预防性战争的新标准就在该规范中找到了位置。美国可能发现还可以将此诉诸更棘手的情况。有许多诱人的可能性：伊朗、叙利亚、安第斯山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超级大国”能否被美国震慑和遏制。

建立规范的模式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只有把控武器、心怀信念的那些人才有权将其需求强加给全世界。广受好评的、终结了上一个千年的“规范革命”是有关权力特权的富有启示性的例子。历经几次错误的尝试，1990年代成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凭借美国及其盟国的勇气和利他主义精神，出于“人道主义”进行干涉的新权利得以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索沃和东帝汶这两颗王冠上的宝石。尤其在杰出的权威人士看来，对科索沃的轰炸就是未经安理会授权而确立的动用武力的规范。

简单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1990年代被视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而不是1970年代？自“二战”以来，有两次诉诸武力的主要事件，在备受争议的自我防御中确实终止了恐怖罪行：印度于1971年入侵东巴基斯坦，结束了大屠杀和其他恐怖活动；越南于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结束了肆虐1978年的波尔布特暴行。在西方的庇护之下，1990年代并未出现稍许类似的事情。因此，不了解惯例的人会质疑为何“新规范”在1970年代不如在1990年代这样受认可，倒也情有可原。

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但原因似乎十分清楚。终止了大量暴行的干预事件是由错误的人实施的。更糟糕的是，在两次事件中，美国坚决反对干预，要立即惩罚入侵者，尤其是越南，还实施了比以前更严苛的制裁，而美国 and 英国却对被推翻的红色高棉提供了直接援助。由此可见，1970年代不可能成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十年，当时也无法树立新的规范。

1949年，在国际审判法院最早的一批裁定中，有一项全票通过的表明确阐述了重要的见解：

法庭只会将所谓的干预权视为一种武力政策的体现，它曾在过去导致了严重滥用武力的情况，而无论国际组织有何缺陷，它都不能在国际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从事情的本质来看，[干预]只会被最强大的国家所拥有，也许还会轻易地歪曲“伸张正义”的行为。⁴⁹⁶

当西方列强和知识分子们沾沾自喜、以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确立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新规范时，世界其他国家却对此另有看法。看一看他们如何反应，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例如，托尼·布莱尔多次提到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的官方理由：不采取轰炸“会给北约的信誉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全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加危险”。但让北越如此牵挂的目标人群似

乎并未被维护信誉的需要深深打动，他们被这些需要维护信誉的国家压迫了几个世纪。例如，纳尔逊·曼德拉曾谴责布莱尔，认为他在1998年进攻伊拉克以及后一年进攻塞尔维亚时曾“和美国一起无视其他国家，扮作‘世界警察’，掀起了国际动乱”。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从独立起就开始从几世纪以来受英国统治的严重影响中逐步康复——中，克林顿 - 布莱尔为维护北约信誉、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而作出的努力并未得到赞赏，但也一直没听到过印度官方和媒体的谴责。甚至在以色列这个最杰出的附庸国中，克林顿 - 布莱尔及其国内崇拜者的装模作样也遭到主要军事和政治分析家的嘲弄，他们认为这是披着熟悉的“道德正义外衣”退回到老式的“炮舰外交”，并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危害”。⁴⁹⁷

另一个消息来源可能就是不结盟运动，参加2000年4月南方峰会的是占世界人口近80%的各国政府。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会议，也是国家首脑级别最高的第一次会议。各国首脑除了对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规划发表了详尽且深入的批判性分析，还坚决反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该立场在2003年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峰会上被重申，而且还是同样的话语。⁴⁹⁸也许他们熟知历史、熟知这条艰难之路，无法从高调的辞藻中感到安慰，他们几百年来也听够了“人道主义干涉”。

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被授权为适当的行为树立规范——为他们自己，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权力有时也被授予可靠的附庸国。因此，以色列的罪行得到了许可，以此确立了规范。例如，它定期对嫌疑分子进行“有目标的杀害”，这被错误之人实施就叫“恐怖主义暴行”。2003年5月，两位重要的以色列人权律师提供了一份从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阿克萨群众起义⁽⁴⁹⁹⁾期间“由以色列安全部队执行的详尽的清除和计划暗杀名单”。通过官方和半官方记录，他们发现以色列至少进行了175次清除行动——每五天一次——杀害了236人，其中有156人被怀疑有罪。“我们要痛苦万分地说”，两位律师写道，“这种广泛而持久的、有目标的清除政策近乎反人类罪”。⁵⁰⁰

他们的判断不太准确。清除是错误之人犯下的罪行，如果说令人遗憾的话，这是由附庸国采取的正当的自卫行为，它甚至为授权此次行动的、“名为‘伙伴’的主事人”确立了规范。⁵⁰¹“主事人”自己也利用以色列的先例，动用导弹暗杀了一名在也门的恐怖嫌疑人（连带五名碰巧在他身边的人）⁽⁵⁰²⁾，并大获好评。这次袭击“时机恰好，[是一份]10月的惊喜……在中期选举前夕送给了时运最佳的在职者”，并让他“品味一下将

关于确立新规范，还有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例子就是1981年6月以色列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此次袭击最初遭到了批评，被认为违反了国际法。后来，在萨达姆·侯赛因于1990年8月从美国的好友变为仇敌之后，人们对轰炸奥西拉克的反应才有所改变。那曾是一项（轻微）罪行，现在被当作光荣的规范，因阻止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核武器计划而得到了高度赞扬。

然而，树立该规范也必须逃避一些难以忽略的事实。1981年轰炸过后不久，著名核物理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对奥西拉克现场进行了核查。他总结道，正如以色列所控诉的那样，与以色列迪莫纳（Dimona）核反应堆（据报道，它已经生产了数百个核武器）不同，被炸毁的设施不适合生产钚。他的结论得到了伊拉克核物理学家伊玛德·卡杜里（Imad Khadduri）的支持，卡杜里在轰炸之前曾负责反应堆的实验工作，后来逃离了伊拉克。他也说奥希拉克反应堆不适合生产钚，尽管在1981年以色列爆炸事件发生以后，伊拉克“坚定决心要全速加快武器化进程”。据卡杜里估计，若不是因为此次轰炸而大幅加快了项目进程，伊拉克原本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获得所需数量的武器级材料。“以色列的行动增强了阿拉伯人生产核武器的决心”，肯尼斯·沃尔兹⁽⁵⁰⁴⁾总结道，“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阻止伊拉克的核事业，还为伊拉克进行核项目获得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⁵⁰⁵

不论事实如何，由于十年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色列于1981年确立的规范现在得以实施。就算1981年的轰炸确实加速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并未损害新规范，关于违反国际法的老观念而诉诸武力所带来的后果，也没给人们留下什么教训。必须抛弃那些老观念，既然对它们不屑一顾的主事人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都是“空话”。今后，美国和依附于它的以色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颇受美国青睐的国家）会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使用该规范。

三、法治

大战略延伸到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美国政府利用“9·11”恐怖暴行的机会来约束本国民众。“9·11”事件后，布什政府获得并实施了把民众（包括美国公民）认定为“敌方参战人员”或“恐怖嫌疑分子”的权利，不经指控或不让与律师或家人见面就对他们实行监禁，

人们经常质疑他们是否与恐怖有关。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白宫认定其“反恐战争”成功地结束，其实是遥遥无期。以阿什克罗夫特⁽⁵⁰⁶⁾为首的司法部认为，“如果你认定什么人是敌方参战人员，显然就要监禁他们，禁止与家人或辩护律师见面，这是最基本的”。行政当局的这些声明部分地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法庭规定“战时总统能够无限期地扣押在战场上俘获的、充当敌方参战人员的美国公民，并禁止他与律师接触”。⁵⁰⁷

在华盛顿政府的关塔那摩（仍是被美国占领的古巴部分地区）监狱，“敌方参战人员”所遭受的对待引起了人权组织和其他人的强烈抗议，甚至还包括司法部监察长。他递交了一份严厉的报告，司法部却置之不理。占领伊拉克以后，很快就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囚犯也遭受着类似的对待。说得平和一些，他们像“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阿富汗人和其他囚犯一样，被堵住嘴巴、被捆绑、被罩上头套、遭到毒打——这种对待方式在国际法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红十字会强烈抗议美国指挥官拒绝他们会见战犯和被捕公民，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⁵⁰⁸况且，指认过程十分随意。华盛顿也承认，敌方参战人员可以是美国选定攻击的任何人，无需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⁵⁰⁹

司法部的思路在一项名为“2003年加强国内安全法案”的秘密计划中表露无遗，该计划被透露给了公共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写道，此次“对公民自由发起的新打击”极大地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这破坏了宪法赋予的权利，授权政府去剥夺那些向首席检察官黑名单上的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人的公民权，即使被告人不知道该组织上了黑名单。“给一个穆斯林慈善机构捐了几美元，而这个机构被阿什克罗夫特认定为恐怖组织，”巴尔金写道，“你也许就会在下一趟遣送出国的飞机上了。”该计划声称，“无需从言语看出公民要放弃国籍的意向，从行为就可以推断”。这是由首席检察官来推断的，我们必须忠实地尊重他的判断。该计划实际上还被类比为麦卡锡主义最黑暗的日子，但这些新说法都太过极端。这项计划未经法庭授权就扩大了监视权、允许秘密逮捕，并进一步使国家免受公民监督，这对布什二世政权中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巴尔金的结论是，“为了对美国人的生活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届政府不惜侵犯任何一项民权，甚至是珍贵的公民权”。⁵¹⁰

据说，在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有一尊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这是他的朋友托尼·布莱尔送的礼物。关于这些话题，丘吉尔有话要说：

未经合乎法律的指控就把一个人扔进监狱，尤其剥夺他被

国人审判的权利，这种行政权力是最可憎的，它也是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的基础。⁵¹¹

布什政府所要求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这些可憎的做法。1943年，为了告知众人 and 防患于未然，丘吉尔对滥用行政权力发出了警告。当时，英国正面对着史上最残忍的屠杀机器，有可能会遭到毁灭。也许，司法部的人会思量一下这个人的看法——他们的领导每天都面对着他的雕像呢。

四、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一篇述评里提到，帝国大战略有效地摈弃了“作为政策首要目标的国际法法治”的原则，还指出国家安全战略中根本没有提到国际法，也没有提到《联合国宪章》。“自‘二战’以后，法治重于武力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这在新战略中销声匿迹了。“扩大法治范围、让弱者发言并约束强者”的国际组织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从现在开始，要由武力来统治，而美国在恰当的时机动用武力。分析家们的结论是，该战略会增强“美国的敌人采取行动的动力，对其感同身受的恫吓报以更多的仇恨”。他们会寻求“廉价而简单的方式，去利用美国的弱点”，而美国弱点又太多。布什政府的规划者对此事欠缺考虑，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也能看出：国家安全战略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加强武装控制，而政府对此又不屑一顾。⁵¹²两名国际事务专家在该学院的期刊上撰文，把“应对扩大化的对抗而非寻求政治和解”的计划称为“本身就是在挑衅”。他们警告说，“美国为了获得决定性国家优势而积极进行军事对抗的公然承诺”具有巨大的风险。⁵¹³即使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许多人对此也持相同意见。

该学会对美国政策中法律重于武力的评价还需要进行严格的核定。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强国的标准做法，通常选择将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将此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国家利益”是专门术语，用来指处于决策位置的国家部门的特殊利益。对英美来说，这种不言自明之理和亚当·斯密一样年代久远。亚当·斯密强烈谴责英国的“商人和制造商”，认为他们“迄今为止都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要确保自身利益受到“特别关照”，无论这会给他人（包括其“野蛮的不公正行为”的海外受害者和英国人民）带来多么“痛苦的”影响。⁵¹⁴不言自明之理总是有办法像真理。

1992年，曾任职于里根—布什政府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⁵¹⁵⁾充分表达了精英人士对联合国的主要看法：联合国“作为美国单边主义的工具是相当管用的，它也的确是未来实现单边主义的主要机制”。他的预测是准确的，也许因为该预测基于联合国成立初期以来的一贯做法。当时的世界形势必然使联合国几乎沦为美国权力的工具。这个组织备受尊重，尽管精英们在随后的几年中对它渐无好感。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大体上与殖民化的过程一致，殖民化为“大多数人的专制”打开了一扇小窗，也就是为集权中心（商业报纸称其为“宇宙主宰们”）掌管的“真正的世界政府”）外围发展起来的“公司”打开了一扇小窗。⁵¹⁶

当联合国在精英们考虑的问题上无法用作“美国单边主义的工具”时，它便会被摒弃。在众多例子中，有一例就是关于投否决票的记录。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在对安理会决议投出反对票方面遥遥领先，涉及的议题很广，甚至包括那些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的决议。英国位居第二，法国和俄罗斯（苏联）远居其后。甚至连该记录都会因以下事实而有失公正：华盛顿掌握大权，经常迫使安理会削弱美国所反对的决议或者把重要的事情完全排除在议程之外。若要举一个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由华盛顿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

萨达姆·侯赛因未能完全遵守安理会的诸多决议而受到了合理的谴责，但美国违反了同样的决议受到的非议却更少。最重要的是第68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安理会确定伊拉克遵守决议之后停止制裁，并进一步销毁中东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发射系统（第14条，这个数字也代指以色列）。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第14条规定，这一条款就被排除出讨论范围了。

老布什总统及其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当即宣布，美国拒绝接受第687号决议中的重要条件，甚至禁止“放宽制裁，只要萨达姆·侯赛因在位一天”。克林顿延续了这一立场。其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1994年写道，伊拉克遵守决议“不足以作为解除禁运的理由”，这就像迪利普·希罗⁽⁵¹⁷⁾指出的那样“单边地改变了规则”。⁵¹⁸华盛顿动用了联合国核查员（UNSCOM⁽⁵¹⁹⁾）监视伊拉克，这也破坏了核查活动。在克林顿和布莱尔1998年12月下令轰炸伊拉克之后，伊拉克无视联合国的决定终止了核查活动。核查得出的可能性结果只有双方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私下知晓。然而，自始至终可以明显看出的是，通过国际核查员解除武装并非美英的目的，这两个好战的国家也不会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

一些评论员指出，以色列带头违反了决议。美国支持下的土耳其和摩洛哥所违反的安理会决议不比伊拉克少。这些决议必然牵涉到相当重要的事宜：侵略、几十年军事占领期间的残暴做法、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按美国的法律来看，就是战争罪）以及其他比未彻底解除武装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关伊拉克的决议也涉及国内镇压，萨达姆·侯赛因在这方面的记录令人发指，但（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侧面问题，因为现任华盛顿官员对萨达姆的支持远远超出其最严重的罪行和对伊朗的战争。与以色列有关的决议不归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七章提到可能进行武力威胁）的范围之内，但这种提案当即会被美国否决。

否决造成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有关伊拉克未彻底遵守安理会决议的讨论中并未提及。很明显，如果伊拉克拥有否决权，它也许不会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同样很明显的是，任何有关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大讨论应该把否决这种最极端的不服从形式考虑在内。然而，否决这种做法总是被排除在外，原因就是我们要很快得出的结论。

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期间，否决问题并未完全被忽视。法国扬言要否决联合国的宣战举动，却遭到了严厉的谴责。2003年3月16日，布什向安理会发出最后通牒时，本着一贯求真的态度声称：“他们说要否决任何让萨达姆承担责任的决议。”法国的不义行径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众人议论纷纷，要采取行动惩罚这个不服从来自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镇（Crawford）⁽⁵²⁰⁾命令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人威胁要投否决票只是一个丑闻，它显示出“外交的失败”和联合国的狼狈表现。举个几乎信手拈来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勒克（Edward Luck）说：“如果弱小国家设法利用否决权、言论和公众呼吁，把安理会变成制衡美国权力的论坛，它们就会损害其合法性和可信性。”⁵²¹世界第一强国动辄行使否决权的做法通常会被忽视或低调处理，偶尔也被称赞展示了华盛顿严阵以待的原则性立场，但没人会担心这损害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因此，我们对以下情况也不应有什么惊讶的理由：2002年10月，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我们不需要安理会”，如果它“想参与事务，就必须授予我们相似的权力”，就像国会那样，授予我们任意动用武力的权力。这一立场得到了总统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认可。鲍威尔还补充说，“显然，安理会总是可以放弃，再进行其他的讨论”，但“我们有权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华盛顿同意向安理会递交一份决议（即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但这无疑表明其做法毫无意义可言。外交通讯员评

论说：“无论外交辞令是什么，布什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侯赛因先生不想合作，他就把该决议视为打击伊拉克所需的全部权力。”“尽管华盛顿将与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进行协商，但它认为没必要获得其同意。”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也附和着鲍威尔解释说：“联合国可以召开会议并进行讨论，但我们不必获得其许可。”⁵²²

几个月之后，当鲍威尔向安理会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开战时，他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宣布]迫使其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庄严尊重”。据国际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坚信，鲍威尔的简短发言不应被理解成某种为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而争取支持的不懈努力”。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不会就第二个决议进行协商，因为没有必要……假如安理会其他成员想跟上我们，我们也许会稍做停留，在虚线上签字”，但仅此而已。⁵²³全世界都注意到，华盛顿会随意动用武力；当总统摆出选项时，这个争执不下的团体就会“跟上来”参与该事业，或者就承受落在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并因此“与恐怖分子为伍”的那些人头上的后果。

随后在亚速尔群岛美军基地召开的高峰会议上，布什和布莱尔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蔑视。西班牙首相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José Maria Aznar）也参加了此次峰会。美英领导人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了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做出让步，否则没有你们那毫无意义的正式批准，我们也会进攻伊拉克并强加我们所选的政权，关键在于我们会这样做，无论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家人是否离开伊拉克。布什宣称，我们的进攻是合法的，因为无论有没有萨达姆，受伊拉克威胁的“美国拥有使用武力确保国家安全的主权”。联合国却与此无关，因为它“没有履行其责任”，即听从华盛顿的命令。即使全世界强烈反对，美国也会“实现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⁵²⁴

华盛顿还煞费苦心确保其完全空洞的官方宣言让全世界人民一目了然。在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声明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伊拉克政权是否已按照第1441号决议的要求完全并且无条件地解除了武装？”他又立即明确表示，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并宣称“当涉及我们的安全问题时，我们无需获得任何人的许可”。联合国核查和安理会审议因而成为一场闹剧，甚至连经过证实遵守决议的情况也无关紧要了。早在几天前，布什就宣布该“简单问题”的答案毫无意义：即使萨达姆完全解除了武装，甚至和其同伙一起消失，美国也会像在亚速尔群岛峰会上强调的那样建立起它所选择的政权。⁵²⁵

事实上，已有记录表明总统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有所忽视。早在几个

月前，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就告知媒体，“无论是否有核查员，美国的政策都是政权更替”；“政权更替”并不意味着换上受伊拉克人欢迎的政权，而是征服者强加的称为“民主的”政权，这是标准做法；甚至连苏联也扶植过“人民民主政权”。后来随着战争结束，弗莱舍又给那个“简单的问题”恢复了重要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所在”。当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时，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宣称，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解除武装，“我们就允许保留伊拉克政府”，因此，“简单的问题”就是解除武装。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说法全是废话，英国不会支持布什以他的理由发动战争，除非英国表明它会按美国的吩咐行事。⁵²⁶

与此同时，科林·鲍威尔的话却与总统宣称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控制伊拉克的发言相互矛盾：“问题仅仅在于，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做出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决策，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销毁其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简而言之就是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其他问题。”这又回到五天前及次日被总统否认的“简单问题”。鲍威尔在入侵伊始就回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伊拉克“遭受进攻是因为它违背了1991年投降协议中规定的‘国际义务’，该协议要求伊拉克公开并解除其危险武器”。⁵²⁷因此，所声称的其他事情全都无关紧要了：美国将单方面决定核查员不得进行工作，而1991年协议赋予美国诉诸武力的权利，这与协议的明确措辞截然相反。

选定日子和观众，目标就是“自由”与“民主”，这不仅是为了伊拉克，也是为了这一地区，这是一个“崇高的梦想”。其中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我们会按我们的选择行事，手头上什么借口都给得出。你们要么选择“跟上来”，要么就是其他情况。

没有解释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为何在2002年9月以后变得如此严重？而此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已接受的共识是：“如果他们的确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也无法使用，因为任何想使用这些武器的企图都会招来灭国之灾。”⁵²⁸

对“与我们为敌”所进行的惩罚是严厉的，“跟上”我们并保持“相关”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美国的高级官员被派往安理会成员国，去“敦促其领导人在伊拉克问题上投票赞成美国，要么就要冒着‘付出沉重代价’的风险”。这对那些“没有在安理会获得席位、难获关注的”小国来说，可不是什么不值一提的忧虑。墨西哥外交官试图向美国特使解释

说“绝大多数”民众都“反对战争”，但这种请愿被视为无稽之谈。⁵²⁹

对于那些“迫于民众压力而接受民主 [并且] 现在要对民众有所回应”的国家来说，又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对民主形式较真的结果可能是遭到经济上的扼杀。相比之下，“鲍威尔先生表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会从中得到好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弗莱舍同时又“极力否认”布什正在为换取别国的投票支持提出补偿，这“在记者团中引起哄然大笑”。⁵³⁰

对听从命令的报偿不仅是经济上的好处，还能得到授权加快实施恐怖暴行。据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布什的交情极深，他获得“外交首肯领导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分子，这一举动在美国及中东的一些分析家看来会破坏美国的长远利益”。对于华盛顿支持国家恐怖主义，有人也许想出了一些其他理由。为了表明这些担忧“毫不相干”，某个穆斯林慈善组织的头目被指控向车臣人（他们拒绝俄罗斯残酷的军事占领）提供资金，在联邦法庭上被判刑，这与给普京开绿灯是类似的。该组织的头目还被指控向波斯尼亚提供了购买救护车的资金；这样说来，显然在该罪行发生的同时，克林顿正在派飞机把探查基地组织和真主党的特工运送到波斯尼亚，以支持作战中的亲美一方。⁵³¹

土耳其也受到类似的引诱：巨额的经济支持和进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权利。值得称赞的是，土耳其并未完全屈服，给西方上了一堂民主课，结果令其大怒，国务卿鲍威尔当即严肃地宣布，立刻对其错误行径进行惩罚。⁵³²

“外交辞令”是说给那些愿意受骗的人听的，就像安理会成员国表面上支持由美国发起的第1441号决议一样。这种支持实际上就是顺从，签署国明白所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本应受到严肃对待的法律体系中，被迫默许是无效的。然而，在国际事务中，这样做就被奉为外交手段。

在伊拉克战争以后，联合国再次变得“毫不相干”，因为它“为伊拉克制定的复杂的贸易制度”给美国公司带来了种种问题，这些美国公司在美军统治伊拉克时就拿到了合同。事实上，这一复杂的贸易制度是美国强行实施的制裁制度的一部分，除了英国以外无人对此表示支持。但这个制度现在很碍事。因此，用某位“同盟外交官”的话来说，美国想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到 [安理会] 这里来是因为我们愿意来，而不是因为非来不可。’”。各国外交官都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在控制伊拉克石油、建立继任政府方面应被给予多大的自由”。华盛顿要求获得自由。其他国家、美国绝大多数民众和（据我们所知的情况）伊拉克人都愿意“扩

大联合国在那里的监督权”，在此框架内不仅使伊拉克国内事务恢复正常，也使“伊拉克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恢复正常”。⁵³³

在种种理由和借口转换之间，有一个原则始终不变：如果可行的话，美国必须最终有效地控制伊拉克，如果可行，必须要在民主的某种掩护下进行。

在美国唯一的主要对手垮台之后，其“帝国野心”会扩展到全世界，这一点不足为奇。毋庸置疑，美国有无数位前任这么做，但他们的下场回想起来不太令人愉快。然而，当前的形势有所不同。一个国家掌控着近乎垄断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史上绝无此事，这愈加成为人们格外审视其做法和行事原则的原因。

五、精英阶层的担忧

在精英圈子中，很多人担心“美国的帝国野心”甚至会对本国民众造成严重的威胁。当布什政府宣布美国是“修正派国家”并试图永久地统治世界时，他们的担心又加剧了。有人认为，该政府在“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导下“对自身和人类构成了威胁”，那些民族主义分子的目标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单边统治世界”。⁵³⁴主流政治光谱中的许多人对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冒险主义和傲慢自大感到惊愕，后者已经重获他们在1980年代行使的权力，只是现在所受的外部限制更少。

这些担忧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克林顿时期，著名政治分析专家塞繆尔·亨廷顿就评论道，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被视为]对其社会构成的唯一、最大的外部威胁”。时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会长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警告说：“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眼中，当今最大的流氓国家就是美国。”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都期望结成联盟，与怀有威胁企图的流氓超级大国抗衡。⁵³⁵

在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分子中，几位领军人物曾指出，美国的帝国野心针对的潜在目标国家不可能坐以待毙。肯尼斯·沃尔兹写道，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威慑才能牵制美国”，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威慑美国的唯一方式”。沃尔兹总结说，华盛顿的政策因此正在造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扩散趋势随着美国逐渐废除控制使用武力的国际机制在加剧。当布什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时候，这些警告又被重申。据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说，这些警告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其他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阻止美国干预方面是必要的”。另一位著名专家警告说，“预防性战争的总体战略”可能会“大大刺激其他国家使用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对“美国滥用权力”造成威慑。许多人曾指出，该战略可能会推动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塞利格·哈里森⁽⁵³⁶⁾评论说：“毋庸置疑，朝鲜从伊拉克得到的教训就是，它需要核威慑。”⁵³⁷

在2002年临近尾声之际，华盛顿给全世界上了不光彩的一课：如果你们想保护好自己免受我们的威胁，你们最好效仿朝鲜，对我们进行可靠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常规做法是：将大炮瞄准非军事化区附近的首尔和美军部队。我们会热情高涨地进攻伊拉克，因为我们知道它已满目疮痍、无力抵御。但无论朝鲜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却不是

一个合适的进攻目标，尽管它有着更糟糕的独裁统治并且更加危险。这种教训再生动不过了。

还有另一种担忧是“第二超级大国”，即公共舆论。不仅是政治领导人的“修正主义”史无前例，民众对它的反对也是如此。伊拉克常常被拿来与越南做比较。人们质疑道：“抗议和表达异见的传统在哪儿？”这表明历史记录已被有效地清除，过去40多年间，在许多阶层中发生的公众意识变化毫无意义。有一个富有启示性的准确比较：1962年，美国还没有发生过民众抗议，尽管那一年肯尼迪政府宣布要派美国空军轰炸南越，并启动计划，将几百万人驱赶到类似集中营的地方，还要发动化学战毁坏庄稼和地表植被。直到几年之后，在成百上千个部队被派出、人口聚集区被密集轰炸摧毁、侵略蔓延到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之后，民众抗议才发展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当抗议活动日益壮大时，言辞激烈的反共军事历史学家、印度支那专家伯纳德·法尔警告说，“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实体……越南遭受着灭亡的危险”，因为“在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对如此大面积的区域打击的情况下，乡村几乎消失了”。⁵³⁸

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年之后的2002年，在正式发动战争之前爆发了一场态度坚定、原则鲜明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若不是对伊朗怀着恐惧和错误的认识（这是美国战前抵抗运动独有的特点），美国战前抵抗运动也许和其他地方的规模一样大。这反映了多年以来的一种稳定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容忍入侵和种种暴行。这种趋势是诸多变化中的一个。

领导层十分清楚这些变化。到1968年，政府对民众的畏惧逐步加深，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继续向越南派兵，是否“有足够的军力来镇压民众骚乱”。国防部担心，进一步在越南部署军队会有“引发规模空前的国内危机”的风险。⁵³⁹里根政府起初想在中美洲实行肯尼迪的南越模式，但民众的反应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甚至会危及和破坏政策议程中更重要的计划，政府只好退让并转而进行秘密的恐怖行动——“秘密”意味着或多或少对公众有所隐瞒。老布什1989年就任时，民众反应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一任政府通常会委托情报机构做一份有关世界局势的综述报告。这些综述报告都是保密的，但1989年有一篇关于“美国对付弱小敌手之案例”的文章被外泄。分析家们在文中建议，美国必须“坚决、迅速地击败他们”。出现任何其他结果都会“令人尴尬”，而且可能会“削弱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也明白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本来也少得可怜。⁵⁴⁰

我们不再身处1960年代，当时的人会容忍持续多年残酷而具有毁灭性的战争，不做公然抗议。过去40年里的激进运动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开启民智的重要影响。如今，攻击弱小对手的唯一方式是开展宣传攻势，将对手描述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或也许进行着种族屠杀，乐观地认为军事行动几乎不会发展为真正的战争。

精英阶层的担忧还涉及布什政府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影响。全世界大多数民众都反对布什政府的战争计划和好战姿态。世界经济论坛于2003年1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表明，这正是公众对领导者信任度普遍下滑的主要因素。该调查显示，只有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明显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信任，接下来是精神或宗教领袖，之后是西欧领导人和经济管理者，紧随其后的是公司主管。远远落在后面垫底的是美国领导人。⁵⁴¹

在这个民意调查公布一周以后，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但却毫无往年的盛况。媒体指出，“气氛十分压抑”，对于“大人物们”来说，这不再是一次“全球聚会”。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建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了最紧要的原因：“伊拉克将是所有讨论的主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鲍威尔的助手在他发言前提醒说，达沃斯的气氛“糟糕透了”。“在这次有2 000多名公司主管、政治家和学者出席的聚会中，世界各国抵抗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声浪达到了顶峰。”抵抗之声没有被鲍威尔释放的“严苛的新信息”所压倒：用鲍威尔的话来说，即使身后无人跟随，“我们也深感有需要我们主导的事情”。“即使别人不准备加入我们，我们也会采取行动。”⁵⁴²

此次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建立信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鲍威尔在演说中强调，美国拥有在其选择的时间和以其选择的方式“采取军事行动的主权”。他进一步说，可以确定，没有谁会“信任萨达姆及其政权”，这话没错，尽管他在评论中没有提及一些不受信任的领导人。鲍威尔还向听众保证，萨达姆·侯赛因的武器“是为了恐吓伊拉克的邻国”，但并未解释这些邻国为何没有感受到威胁。⁵⁴³尽管伊拉克的邻国也鄙视萨达姆这个杀人成性的暴君，它们“和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一样对华盛顿感到不解：伊拉克最终不过是个小国，其财富和武力已被国际社会强加的限制削弱不少，华盛顿为什么对它如此地执着和恐惧？”它们明白制裁给民众造成的可怕影响，也知道伊拉克是该地区中最弱小的国家：其经济和军事开支只是科威特（其人口只有伊拉克人口的十分之一）的零头，甚至远低于其他周边国家。⁵⁴⁴出于这些以及其他种

种原因，这些邻国多年来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一直改善着与伊拉克的关系。它们像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一样，“深知如今的伊拉克对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更不要说对美国了”，而“再反驳说并非如此就是不诚实的表现”。⁵⁴⁵

到开会碰头为止，达沃斯的“大人物们”已经听过太多有关“建立信任”的坏消息。一份加拿大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只有21%的人认为是基地组织，17%的人选了伊拉克，14%的人选了朝鲜”。尽管也有事实证明，美国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公众形象赞同率已经提升到72%，在西欧还在明显下滑。一份由《时代周刊》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发现，超过80%的欧洲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即使出于某种实质性的因素，这些数据会有错误，但它们十分生动。一份有关美英与伊拉克开战的动因的同期国际民意调查也凸显了上述数据的重要性。⁵⁴⁶

《华盛顿邮报》在其头条新闻中指出，“从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发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且令人担忧”。“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较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美国总统布什是对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胁者。”他们还引用了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这场辩论不是关于伊拉克的”。“令全世界真正担忧的是我们的权力，还有所感受到的美国政府野蛮、自大和专断的行为。”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前方有危险？全世界视布什总统为威胁”。三周以后，《新闻周刊》外交事务高级编辑在封面报道中也警告说，全球争论的焦点不是萨达姆，“是关于美国和它在新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伊拉克战争，即使取得成功，也许解决了伊拉克的问题，它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全世界人民最担忧的是生活在由一个国家——美国——所塑造和主宰的世界，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怀疑和恐惧越来越深”。⁵⁴⁷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深切同情和鼎力支持，乔治·布什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的问法是错的，正确的问题却没有被提出来。但不出一年，政府就成功地给出了答案：“布什先生，是因为你和你的同僚，还有你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继续这样做，你们所引发的恐惧和仇恨也许会蔓延到你们所羞辱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证据很难被忽视。对奥萨马·本·拉登来说，这也许是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的胜利。

六、刻意的忽视

隐藏在帝国大战略背后的基本假设正是威尔逊理想主义⁽⁵⁴⁸⁾的指导原则：我们——至少是产生领导者并为其提供建议的阶层——是好人，甚至是高尚之人。人们常常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基本假设做出解释，因为道理显而易见。因此，尽管我们的干预在执行时有不妥之处，其意图是必要而正义的。用威尔逊的话来说，我们拥有“崇高的理想”，致力于维护“稳定和正义”。于是，再自然不过的是威尔逊为征服菲律宾做辩解时所写的话，“尽管我们是利他主义者，也必须推进我们的利益；其他国家必须要注意保持距离，更不要试图妨碍我们”。这样说也就很自然了。

549

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当代版本中，有一种指导原则“界定了政治辩论所发生的范围”，这是一种广泛的共识，只排除了左右两派“窘迫的残余分子”，并且“十分权威，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挑战”。该原则就是“美国是历史的先锋”：“历史有明确的方向和终点。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最能理解和彰显历史的目标。”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是在实现历史目标，其成就在于获得共同利益（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因此，除了有点滑稽之外，对其进行经验论式的评价是没必要的。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根植于威尔逊理想主义并从克林顿传到了小布什，即在“必须永久保持并向全球推行军事优势”的指导下，“美国必须完成的使命是做历史的先驱，改变全球秩序，以此永久地维持其统治地位”。⁵⁵⁰

由于美国对历史目标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展示方式，它才被赋予权利（实际上是肩负义务），按照其领导者所决定的那样为所有人的利益而行事，无论别人是否理解。和其高贵的先驱英国（现在是小伙伴）一样，美国不应在实现历史最高目标时踌躇不前，即使因愚蠢和心怀仇恨之人“恶语相加而受阻”。据美国最著名的倡导者说，其先驱在全球统治时也是如此。⁵⁵¹

为了平息可能出现的疑虑，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理解力：是“上天召喚美国人”来完成改变全球秩序的任务，即“最近几位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无论是哪个党派）所坚守的……威尔逊主义的传统”。他们的前任、在其他地方与其处于同等位置的人以及被他们斥责的敌人也都在坚守着这个传统，只不过被要求改变了名称而已。⁵⁵²但为了让我们确信强者是在“崇高的理想”和“利他主义”驱动下寻求“稳定和正义”，我们必须接受一种被称为“刻意的忽略”的姿态。这是一位批评家在抨击1980年代中美洲发生的可怕暴行时提出的说法，而当时支持这些暴行的领导人又一次在华盛顿掌权。⁵⁵³采取这种姿态不仅能让把过去扫除干净、承认最好的意图也难免有污点，而且随着近来人道主义干涉新准则的推行，我

们还能继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进入了“散发着神圣光芒”的“高尚的阶段”。历史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向我们保证说，华盛顿“在冷战之后进行的干预行为总体上都是高尚的，但也有敷衍了事的时候；他们敷衍了事是因为他们行为高尚”。我们也许太过于神圣了：头脑更清醒的人警告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授权理想主义成为外交政策的唯一指引”。我们因而在为他人倾心奉献时会忽视自身的合法利益。⁵⁵⁴

不知为何，欧洲人无法理解美国领导人那种独特的理想主义。怎么会这样呢？理想主义是最基本的道理。马克斯·布特⁽⁵⁵⁵⁾给出了答案。欧洲“常常受贪婪驱使”，而“冷嘲热讽的欧洲人”无法理解赋予美国外交政策活力的“理想主义天性”：“200年之后，欧洲人依然不明白是什么让美国持续运转。”欧洲人难以根除的冷嘲热讽态度使其认为华盛顿动机卑劣，他们无法满怀热情地加入美国的崇高事业。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欧洲的问题在于它深受“妄想的、阴谋论的反美思想”的影响，并“到了一种极端狂热的地步”，尽管有幸还有像贝卢斯科尼⁽⁵⁵⁶⁾和阿斯纳尔这样的一些人能勇敢地抵制这种思想。⁵⁵⁷

毋庸置疑，布特和卡根无意间正在剽窃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有关人道主义干预的经典文章。密尔在文中敦促英国积极开展干预事业，具体地说就是要攻占印度更多的领土。密尔解释说，尽管英国会遭受欧洲大陆的“恶语相加”，它必须继续这项崇高的事业。密尔只字未提的是：这样一来，英国会进一步给印度带来致命打击，并扩展所需的近乎垄断的鸦片生产，凭借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借助其强大的毒品贩运公司在更广范围内维持帝国体系。当时的英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引发“恶语相加”的根源。密尔写道，欧洲人反而“在煽动人们对我们的憎恶”，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英国的确是“世界上少有的国家”，是一个只“服务于他人”的伟大国家。如果“野蛮国家的侵略迫使英国发动战争并赢得了胜利”，英国也会无私地承担着代价，并“与整个人类友好、平等地分享胜利的果实”，其中包括那些野蛮的国家。英国征服和摧毁这些国家也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尽管如此，英国仍致力于维护和平。在密尔看来，英国不仅举世无双，而且近乎完美，它没有“侵略的念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英国的政策“无可挑剔且值得赞颂”。尽管英国也被那些愤世嫉俗、可能过于偏执的欧洲人所误解（这让人感到悲哀），它却是现在这个“致力于消除不人道行为的理想主义新世界”在19世纪的化身，在纯粹的利他主义精神驱使下，一心投身于最崇高的“原则

和价值观”。⁵⁵⁸当密尔写此篇文章时，英国正犯下一些在其帝国统治中最严重的罪行。很难想出还有哪位知识分子比密尔更著名、更令人尊重；或者说，很难想出比这更恬不知耻的、为这些可怕罪行开脱的辩词了。当布特和卡根举例解释马克思的格言“悲剧重演就成了闹剧”的时候，上述事实也许能引发一些思考。我们还应当记住的是，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行径甚至更为可怕，与之相符的花言巧语也毫不逊色。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开化行动就得到了密尔的赞同，与此同时法国战争部长则宣布“要消灭那里的土著居民”。⁵⁵⁹

卡根的“反美主义”概念虽说过于传统，但也值得反思。在类似的宣告中，“反美”这样的词及其变体表达（“仇恨美国”等）经常被用来攻击那些批评国家政策的人，他们也许崇尚并尊重美国、美国文化及其成就，的确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然而，说他们“仇恨美国”、是“反美主义者”都是基于一个默认的假设：该社会与人民要与国家权力保持一致。这种说法直接源自极权主义词汇。在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人犯有“反苏维埃”罪。批评巴西军事独裁的人也许会被贴上“反巴西”的标签。对于信奉自由与民主的人来说，这些态度令人难以想象。在罗马或米兰，若批评贝卢斯科尼政策的人被指控为“反意大利”，这只会引起嘲笑。不过在墨索里尼时期，这个罪名也许就成立了。

记住这一点很有用：无论我们转向何处，与诉诸武力如影随形的从来不乏高尚的理想。与“威尔逊传统”相关的说法可能因其崇高而令人激动，但也应该看看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而不仅仅停留在花言巧语上。例如，已提到的威尔逊号召进攻菲律宾；或作为总统，他对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使两国满目疮痍；或是被沃尔特·拉菲伯尔⁽⁵⁶⁰⁾视为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它规定在其权力范围内，“只对美国的石油利益做出让步”。⁵⁶¹

那些最凶残的独裁者也是这么做的。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庇护科威特，科威特过后却采取了损害伊拉克经济的行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警告科威特，有可能对其做法进行报复。但萨达姆向全世界保证，他不要“永无休止的战争，而想要永久的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⁵⁶²1938年，罗斯福总统的心腹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称赞与纳粹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认为这也许会产生一个“建立在公正和法律之上的新世界秩序”。不久，他们就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将该协定推进了一步。但希特勒的解释是，他们“满怀最真诚的愿望服务于居住在该地区的人民的真正利益，维护德国人民和捷克人民的民族个性，进一

步推进和平和所有人的社会福利”。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被解放民众”的关心也很崇高。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企图也是这样，它“做出牺牲”为受苦受难的民众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还有什么比日本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更令人“动容”的呢？⁵⁶³

干预行为在战后照例会被宣称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或出于自我防御，因此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内容。例如，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的残酷入侵，苏联律师为此辩护说，这是应匈牙利政府要求而进行的一种“防御性反应，用以应对在国外资金援助下匈牙利境内以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为目的的颠覆性活动和武装团伙”；或者，貌似具有相对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美国几年之后对南越的进攻，发起“联合自我防御”抵御南越人的“内部侵略行为”和“来自其内部的攻击”（这两种说法分别出自阿德莱·史蒂文森和约翰·F.肯尼迪之口）。⁵⁶⁴

无论这些声明有多么荒诞不经，我们也不必假设说它们都虚伪不堪。人们经常在内部文件中发现同样的言辞，显然也毫无理由去遮遮掩掩。例如，斯大林的外交官们说：“为了创建真正的民主国家，有必要借助一些外部压力……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因为民主政府是取得长久和平的主要保障之一。”⁵⁶⁵

其他人也对此表示赞同，他们的话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敦促说：

看到当地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时，我们不应有所犹豫。这并不不可耻……如果一个自由主义政府放任松散并被共产主义分子渗透，最好还是让一个强硬的政府来当权。

在这种情形下，乔治·凯南向美国驻拉美大使简要告知，他们有必要受“保护我们的原料”这一实用主义想法的主导——我们的原料，无论它们在哪里，我们都必须保留固有的“获取权”，如有必要就按照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征服。⁵⁶⁶这一切都需要大剂量的刻意忽视，与对权力的忠心耿耿，从而抹去在建立和维持“强权政府”时给人们造成恶果的记忆。让民众相信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呼吁，也需要这种天分，但这种呼吁是为动用武力而辩护；审视一下历史和文献记录就会发现，这种借口很少在哪个国家站得住脚。

这几个例子表明，连最严苛、最无耻的措施常常也伴随着带有高尚意图的声明。认真审视这些声明，就能用托马斯·杰斐逊对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形势的观察来概括：

我们不相信波拿巴仅仅为了海洋的自由而战，也不相信英国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而战。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把其他国家的权力、财富和资源据为己有。⁵⁶⁷

一个世纪以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⁵⁶⁸⁾（此人显然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也不抱有什么幻想）十分鄙夷地评论说，“英国人、意大利人或法国人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接受国际联盟的授权”，只要有“使其有利可图”的“煤矿、油田、多产的田地或铁路”。这些“无私的政府”宣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们必须接受授权；“他们将通过管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富饶地区尽一份力。”兰辛对这些声明的恰当评价“十分直白，把它说出来都近乎是辱骂”。⁵⁶⁹

的确，其他人公开宣布其高尚意图就是明目张胆。但对于自己来说，标准就不同了。

人们可以选择性地相信国内的政治领导人，采取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之一汉斯·摩根索所谴责的立场，即“我们无条件地屈从于当权者”，这是历史上大部分知识分子经常采取的立场。⁵⁷⁰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带有高尚意图的声明是可以被预测的，因此，它们没有什么信息含量（即便从这个词的专业术语意义来看）。对于那些真正有兴趣了解世界的人，无论他们在评价本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还是官方敌人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都会采取同样的标准。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这种有关理性和诚实的基本做法有多少会管用？

应当补充的是，受教育阶层偶尔也会背离屈从权力的普遍立场。可以从两个国家那里找到一些重要的当前例证：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美国的军事援助使其得以维持残酷而专制的政权。在土耳其，著名作家、记者、学者、出版商等人面对着（有时是忍受着）旷日持久的重罚，他们不仅抗议暴行和严苛的法律，还定期进行非暴力不合作抵抗。在哥伦比亚（这个世界上暴力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勇敢的牧师、学者、人权主义和工会积极分子等人随时面临着被暗杀的威胁。⁵⁷¹他们的行动应当让其西方同行感到谦卑和羞愧，若不是有人刻意地忽视而掩盖了真相，极大地助长了持续进行的罪行，这些行动会让其西方同行感到谦卑和羞愧。

（本文最早出现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New York: Owl Books, 2004]，第11

《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后记

熟知历史的人不会感到惊讶，伴随美国日益增长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是救世主式使命的宣告——为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民主。权力体系就高尚意图发出的宣告，很少是全盘捏造的，在上述情况下亦是如此。在某些条件下，民主的各种形式的确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如那位致力于“民主推进”（democratic promotion）的杰出学者兼倡导者所总结的那样，我们在海外找到了“强有力的持续路线”：民主是可以被接受的，当且仅当它与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托马斯·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 ）。稍加修订，这一原理在国内也行得通。

政治光谱中的鸽派极端自由主义者有时会坦率地承认决策者所处的基本困境，例如卡特总统的拉美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他解释了美国政府为何必须支持凶残腐败的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并且在那样做被证明行不通的时候，至少也努力保住了经过美国训练的国民警卫队，即使他们一直在“以一个国家通常对待敌人的残暴”屠杀民众，共杀死了大约4万人。原因是令人熟悉的：“美国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但也不想让事态发展失控。美国想让尼加拉瓜独立行事，除了当这样做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的时候。”⁵⁷²

布什政府的规划者们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他们想让伊拉克人“独立行事，除了这样做不利地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之外”。因此，伊拉克必须主权独立且民主，但要在一定限度之内。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伊拉克构建为顺服的附庸国，类似于中美洲的传统秩序那样。在总的层面上，这种模式并不陌生，并达到了体制结构的另一个极端。克里姆林宫摆出铁拳的架势，就能维系受其国内政治和军事力量控制的卫星国，即使处在战争期间，德国对其占领的欧洲亦是如此，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也是这样。意大利法西斯在北非进行类似的种族屠杀时也获得了相似的成果，并且无损于它在西方世界中的正面形象，也许还激励了希特勒。在类似问题上，传统的帝国主义体系和新殖民体系显示出诸多变化。⁵⁷³

尽管如已评述的那样，在伊拉克实现传统目标具备极其有利的条件，结果却出乎意料地艰难。在入侵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如何把适当的

独立与牢牢的控制相结合的明显困境，因为民众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迫使侵略者接受了更多超出预期的关于伊拉克的倡议。这一结果导致了一个噩梦般的前景：一个或多或少民主且有主权的伊拉克，在一个包括伊朗、什叶派伊拉克以及可能还有邻近受什叶派控制的沙特阿拉伯地区的松散的什叶派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控制着世界大部分石油并独立于华盛顿之外。

形势也许会更加糟糕。伊朗可能对欧洲摆脱美国控制而转向东方已不抱希望。研究这些话题的前沿专家塞利格·哈里森谈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背景。他说道：“伊朗和欧盟之间的核谈判建立在欧盟受美国阻碍之后未能遵守的协议基础之上。”这个协议是，伊朗会暂停铀浓缩，而欧盟将提供安全保证。联合声明的语言“毫无歧义。其中提到，‘一个双方都表示赞同的协议’不仅会为伊朗核计划提供‘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这样的‘客观保证’，也‘同样会提供对安全问题的坚决承诺’”。⁵⁷⁴

“安全问题”一词略微含蓄地指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的威胁，以及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一个经常被援引的范例是以色列1981年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进行的轰炸，这似乎推动了萨达姆开始进行核武器计划，也再次证明暴力会引发暴力。华盛顿肯定明白，任何针对伊朗实施的类似计划都会导致直接暴力。颇具影响力的什叶派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⁵⁷⁵⁾某次访问德黑兰时警告说，他的民兵会在伊朗受攻击时保护伊朗。《华盛顿邮报》评论道：“这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信号之一，表明伊拉克会成为任何西方与伊朗冲突的战场，同时助长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势力——或者也许包括经过美国训练的、以什叶派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当地同情伊朗的美国军队较量。”萨德尔集团在2005年12月选举中获得了实质性结果⁽⁵⁷⁶⁾，也许很快会成为伊拉克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它有意识地学习了其他成功的伊斯兰组织的模式，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并把依靠基层社会组织坚决抵抗军事占领和服务贫苦百姓结合了起来。⁵⁷⁷

华盛顿不愿地区安全问题得到考虑，这不是新鲜事。在与伊拉克对峙的过程中也反复出现过这种情况。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是一个背景，华盛顿禁止在讨论国际问题时触及该话题。除此之外潜藏的是哈里森所正确描述的“全球不扩散核武器体制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而“逐渐停止使用核武器”，还有华盛顿对此义务的正式拒绝。⁵⁷⁸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拒绝被华盛顿胁迫，这是美国的规划者们日

益惧怕中国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伊朗石油都出口到中国，中国也在向伊朗提供武器，这也许被视为一种对美国威胁的震慑。令华盛顿倍感不悦的事实是：“中沙关系进展迅速”，这包括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中国拥有其石油开采权。到2005年为止，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7%。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石油勘探和修建大型炼油厂的协议（埃克森公司也是合作伙伴）。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访问北京，有望签署中沙谅解备忘录并呼吁“两国在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上增加合作”。⁵⁷⁹

印度分析家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评论道，伊朗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成为被中国和俄罗斯逐步视为绝对必要的亚洲能源安全网的一个形成中的实质性枢纽，打破西方对世界能源供应的控制并保障亚洲的大工业革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有可能加入，也许还有日本。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印度如何反应。印度拒绝了美国要求其退出与伊朗签署的石油管道计划的施压。另一方面，印度又和美国与欧盟一起投票赞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反伊朗决议，变得和它们一样伪善，因为印度所拒绝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似乎至今在伊朗被很大程度上地遵守着。阿罕默德说，在伊朗要终止200亿美元石油协议的威胁之下，印度也许暗中改变了立场。华盛顿后来警告印度，如果印度不按美国的要求行事，它“与美国的核武器协议可能被废除”。这引发了印度外交部长的严厉反驳以及美国大使馆对该警告闪烁其词的掩饰。⁵⁸⁰

印度也有其他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或情愿加入正在形成的、更加独立的亚洲集团，与中东石油生产国的联系日趋紧密。《印度教徒报》（Hindu）的责任编辑在一系列翔实的评论中说道：“如果21世纪是‘亚洲世纪’，就必须结束亚洲在能源领域的被动性。”尽管亚洲“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却仍然依赖“该地区之外的制度、贸易框架和武装力量来与自己进行贸易”，这是来自帝国主义时代的令自身衰败的遗产。关键在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他指出，中国和印度在2005年“令全球分析家迷惑不解，他们把两国在从第三国获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时被过分夸大的对抗，变成了新的、可能改变全球能源市场基本动力学的伙伴关系”。2006年在北京签署的协议“为印度与中国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油气勘探和生产上的合作开辟了道路，这种伙伴关系最终可能改变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本均衡局面”。几个月前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会议上，印度“展示了其宏伟的、贯通全亚洲的224亿美元泛亚洲天然气网和石油安全管道系统”，从西伯利亚穿越中亚直到中东能源巨头，还包括

消费国。此外，亚洲国家“拥有价值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处多以美元估量，谨慎地讲应该有多币种形式。已在考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形成用欧元进行交易的亚洲石油市场，这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权力平衡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该编辑继续说道，美国“把印度视为崛起的亚洲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并“通过晃动核武器‘胡萝卜’和与自己结盟获得世界权力地位的承诺，积极地尝试把新德里从创立新的区域建构的任务中引开”。他警告说，如果要想让亚洲计划获得成功，“印度就必须抵御这些诱惑”。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上，这是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制衡美国势力向原苏联控制的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组织。据常驻莫斯科通讯员弗雷德·威尔（Fred Weir）报道，该组织现在“正迅速地朝一个区域性安全集团发展，可能很快会吸纳诸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员”，也许正成为一个“抗衡北约的欧亚军事联盟”。⁵⁸¹

欧洲和亚洲也许会变得更加独立，这一前景自“二战”以来就严重困扰着美国的规划者们。随着三极秩序（tripolar order）的持续发展，以及新的南南交流、欧洲与中国日益加强的合作，规划者们的这些担忧已显著增长。⁵⁸²

美国的情报部门已在计划的是，在借由传统原因控制中东石油的同时，美国自身将主要依赖于更加稳定的大西洋盆地的资源（西非、西半球）。控制中东石油现在绝非确凿之事，这些期望也受西半球的发展所威胁，使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倍加孤立的布什政府的政策加速了西半球的发展。布什政府甚至成功地孤立了加拿大，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报道说，由于华盛顿拒绝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利于加拿大的决议，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且敌对”，而“部分结果是，加拿大正努力与中国建立关系；一些官员还说，可能会把其贸易的一大部分（尤其是石油）从美国转向中国”。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说，几年之后，加拿大现在向美国输送的石油可能有四分之一会送往中国。对华盛顿能源政策的进一步打击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西半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已与中国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并计划将更多的石油销往中国，这是为减少对与其公开敌对的美国政府的依赖所做的部分努力。拉丁美洲普遍在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和其他关系，尽管有一些挫折，但很有可能继续扩展，尤其像巴西和智利这样的原材料出口国更是如此。⁵⁸³

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更为紧密，彼此依赖着对方的相对优势。委

内瑞拉提供低成本的石油，古巴则组织教育和健康项目，输送成千上万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员、教师和医生，去最贫困和最被忽视的地区工作，就像他们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古巴和委内瑞拉的项目正扩展到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在委内瑞拉的资金资助下，古巴的医生在那些地方为上万人提供医护服务。这被称作“行动奇迹”，牙买加大使向古巴讲述时称之为“一体化和南南合作的典范”，并在占多数的贫困人口中激发了很高的热情。古巴的医疗援助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欢迎。2005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地震是近几年最可怕的悲剧之一。除了巨大的伤亡之外，无数不知名的幸存者不得不在缺乏住所、食物或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度过严酷的冬天。我们需要看看东南亚的报纸，上面写道：“古巴已向巴基斯坦派出最大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团队”，并承担了一切费用（也许用的是委内瑞拉的资金），穆沙拉夫总统对古巴医疗队的“气概和关爱”表达了“深切的谢意”。据报道，这些医疗队包括1 000多名训练有素的人员，44%是女性，他们一直在边远的山村工作。在西方支援队撤走之后，他们“在冰冻的天气里身处异域文化，还住着帐篷”，建立了19个野战医院，每12个小时轮岗工作。⁵⁸⁴

一些分析家暗示，古巴和委内瑞拉可能联合了起来，这是迈向拉丁美洲继续一体化为集团、更加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步。委内瑞拉已加入了“南共市”（Mercosur）⁽⁵⁸⁵⁾、南美关税联盟（South American customs union），这一举措被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称为该贸易集团发展中的“里程碑”，被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誉为开启“我们一体化的新篇章”。独立专家们说：“让委内瑞拉加入该集团开阔了其地缘政治视野，最终把‘南共市’扩展到了南美地区的其他地方。”在庆祝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的某次会议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我们不能让该组织完全变成一个经济项目，为精英和跨国公司服务。”这直接影射了由美国发起的、已引起公众强烈反对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or the Americas）。委内瑞拉也向阿根廷提供了燃油，帮助它抵御能源危机，并购买了阿根廷2005年所发行债券的近三分之一。这是进行地区合作的重要部分，使这些国家免任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20多年来它们因遵循其规则而饱受灾难性后果。在宣布阿根廷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差不多1万亿美元而永久地从该组织中解脱出来的决定时，基什内尔总统说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国家而言是那些造成阿根廷人民贫困和痛苦的政策推行者和媒介”。完全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阿根廷，从该组织造成的灾难

中有效地恢复了过来。 586

随着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当选玻利维亚总统，独立的区域一体化脚步又向前迈进了。莫拉莱斯是第一位从本土多数派中选出的总统。他很快与委内瑞拉达成能源协定。《金融时报》报道说：玻利维亚天然气储量丰富，在南美仅次于委内瑞拉，这些协定“有望巩固即将进行的玻利维亚经济和能源方面的彻底改革”。莫拉莱斯还致力于逆转玻利维亚严格执行了25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使其人均国民收入比执行之初更低。只有民众的不满迫使政府放弃这些政策时，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持才会中断。当年，政府听从世界银行的建议使水业私有化并“调整价格”——顺便提一下，就是剥夺穷人用水——时，情况也是如此。 587

华盛顿所说的委内瑞拉的“颠覆”也延伸到了美国。也许这促使美国继续拓展布什2005年3月发布的“遏制”委内瑞拉的政策。2005年11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些议员写信给“九家石油大公司，信上说：因冬季取暖费可能大大增加，我们希望你们从创纪录的利润中捐出一些，帮助低收入人群支付这些费用”。他们只收到一个公司的回复，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希戈（CITGO）公司。希戈愿为波士顿的低收入居民提供低价燃油，之后再向其他地方提供。美国国务院回复说，查韦斯这么做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且“有点类似于古巴政府向美国的贫困青年提供古巴医学院助学金的做法”。这与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诚挚的利他主义帮助不一样。我们不清楚的是，接受方是否能领会到这些微妙之处。他们获得了“[由希戈公司提供]给马萨诸塞州当地慈善组织和45 000个低收入家庭的1 200万加仑折扣价家用取暖油”。据向“流浪者收容所、食物供应处和低收入住房群体”发放低价燃油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说，取暖油被分发给那些面临着上涨了30%至50%油价的穷人，燃料援助“资金严重不足，因此这种做法给了人们一剂强心针，否则他们无法挨过冬天”。他还说：“我希望这么做会对美国的石油公司形成‘一种友好的挑战’——据说它们最近获得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这能让它们用意外之财帮助贫困家庭过冬。”显然，这是徒劳无望的。 588

尽管中美洲主要受里根主义暴行和恐怖的管制，这一半球的其他国家却正在摆脱控制，尤其是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的这片地区。这里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所树立的典型（poster child），直到它们的经济在被强加的政策之下崩溃。该地区很多政府的立场都是中立偏左。本土居民愈加活跃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

尔这两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他们或希望由本国控制石油和天然气，或在一些情况下反对共同生产。很多当地人显然不明白自己的生活、社会和文化为何要受到干扰或破坏，以便纽约人可以在交通大堵塞时坐在SUV里。有些人甚至要求在南美洲建立一个“印第安国”。同时，进行中的经济一体化正在扭转可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拉美精英和经济都与帝国势力相关联，但相互之间却毫无关联。随着日益增加的、更广范围内的南南交流，这些进展受到民间组织的极大影响，民间组织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全球正义运动中正走到一起。这些运动被荒谬地称为“反全球化”，因为它们支持惠顾人民利益而非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利益的全球化。即使除去布什政府的策划者带来的破坏，出于诸多原因，美国的全球控制体系仍十分脆弱。

一个结果便是，布什政府奉行的拒绝民主的传统政策面临着新的困难。布什的策划者们在2002年从委内瑞拉沮丧地意识到，用军事政变和国际恐怖主义去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以其他方式坚持“强有力的持续路线”。我们在伊拉克已经看到，群体性非暴力抵抗运动已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允许进行他们设法避免的选举。之后，他们通过为政府最合意的候选人提供可观的利益、驱逐独立媒体从而颠覆选举的尝试也失败了。华盛顿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尽管遭到占领当局的反对，伊拉克的劳工运动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种形势类似于“二战”之后的欧洲和日本，美国和英国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独立的劳工运动。就像国内目前的情况一样，出于类似的原因，有组织的工人从根本上会有助于有民众参与的民主运行。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扣留食物、支持法西斯警察，现在不再使用了。现在也不可能依靠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AIFLD）⁽⁵⁸⁹⁾这种劳工官僚机构去协助破坏工会。如今，美国的一些工会一直在支持着伊拉克工人，正如他们在哥伦比亚所做的那样，而在哥伦比亚被谋杀的工会活动家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至少，工会现在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地方获得了支持，而华盛顿继续为伊拉克政府提供大量资金，应当对此负大部分的责任。

590

在巴勒斯坦出现的选举问题和在伊拉克的有很大相似之处。正如已讨论的那样，布什政府拒绝举行选举，直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去世时，他们意识到错的人选可能会赢才允许选举。阿拉法特去世之后，政府同意举行选举，希望它所中意的巴勒斯坦当局的候选人取得胜利。为了推进这个结果，华盛顿采取了和在伊拉克时几乎一样的颠覆模式，以前也经常如此。华盛顿把美国国际开发署当作“隐形管道”，努力“在关键性选举

前夕提高巴勒斯坦当局的支持人数，执政党在选举中面对来自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严重挑战”，并花费近200万美元“在本周选举前的十几个快速项目，用于支持执政的法塔赫派别在选民中的形象”。在美国或任何西方国家，有这种外国干涉的迹象都会毁了候选人，但根深蒂固的帝国思维会让这种常规措施在其他地方合法化。然而，颠覆选举的尝试再次高调地失败了。⁵⁹¹

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现在必须适应以某种方式（尽管不能完全）与接近其反对立场的宗教激进党派相处，至少如果哈马斯像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打算在国际边境线无限期停火的话。但美国和以色列反而坚持认为，以色列必须接管西岸大部分地区（以及被遗忘的戈兰高地）。哈马斯拒绝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反映了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存在的权利”——这在国际事务中是个陌生的概念；墨西哥接受美国的存在，但并不接受美国通过征服在几乎半个墨西哥获得抽象的“存在的权利”。哈马斯“摧毁以色列”的正式立场，使其处于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处境。美国和以色列曾正式宣布，在哈马斯部分地放松其极端主义立场之前的几年内（以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方式），不可能存在“另外的巴勒斯坦国家”（除了约旦之外）。尽管哈马斯没有这样说，但如果他们同意犹太人可以待在目前以色列的零散地区，而在巴勒斯坦修建大的聚居地和基础设施项目并接管宝贵的土地和资源，有效地把以色列分解成无法独立存在的小片地区，几乎相互分离，也与一些将同样允许犹太人居住的耶路撒冷小片地区相分离，这样也不足为奇。他们也许同意把这些支离破碎的地方称作“一个国家”。如果做出这些提议，我们会立即认为这几乎回到了纳粹主义。这是一个也许能引起思考的事实。如果做出这些提议，哈马斯的立场基本上像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五年内逐渐容忍了某种无力的“国家状态”之后的立场。把哈马斯描述为激进的、极端的、暴力的，或是一种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种公正的政治清算，都是公平的。但采取这种姿态的组织并非仅此一家。

在其他地方，破坏民主的传统方式也取得了成功。在海地，布什政府最喜欢的“民主建设小组——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不懈地扶植反对阿里斯蒂德（Aristide）总统的努力，并受益于对急需援助的扣留，而原因充其量只是可疑。当阿里斯蒂德看起来可能要赢得真正的选举时，华盛顿和反对派就选择撤出，这是破坏那些正走向“错误”结局的选举的标准伎俩：1984年的尼加拉瓜和2005年12月的委内瑞拉就是令人熟悉的例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军事政变、驱逐总统以及大大超过民选政府的恐怖和暴力统治。⁵⁹²

美国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强有力的持续（continuity）路线，这再次表明它和其他强大的国家十分相似。它追求国内主导人群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并附以献身最高价值的巧言辞令。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理智之人何很少关注领导人有关高尚意图的宣言或其追随者的赞誉之词的原因。

我们通常听说，挑剔的评论家抱怨有错的事情，却不提出解决办法。对这种指责的准确解释是：“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法，但我不喜欢。”除了令人熟悉的、有关应对生存层面危机的提议，人们已经给美国提出了一些建议：（1）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庭的审判权；（2）签署并执行京都议定书；（3）让联合国在国际危机中占主导地位；（4）依靠外交和经济措施而非军事措施来应对恐怖；（5）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常规解释；（6）放弃安理会的否决权，像《独立宣言》所说的，要有“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即使遭到权力中心的反对；（7）大力削减军事支出并大力增加社会支出。对于信仰民主的人来说，这些建议很保守：它们似乎是美国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压倒性多数。而这些建议与公共政策彻底相反。确切地说，我们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公众意见并无信心，因为民主还有另一个缺陷：这些话题很少进入公众讨论的领域，无人知晓基本的事实。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公众因此被大大地剥夺了形成思考意见的机会。

另一个保守的建议是，事实、逻辑和基本的道德原则都应当受到重视。不辞辛苦地遵守该建议的人很快会被引导着放弃所熟悉原则的好的部分，尽管重复利己的颂歌肯定更为轻松。这些简单的真理带着我们走得更远，得出了更具体、更详细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它们开辟了实施这些答案的道路，也就是机会。如果我们能从信条和所强加的幻象的镣铐中解放自己，机会就握在我们手中。

尽管思想体系试图引出消极、绝望和失望是很自然的，现实却并非如此。近年来，对正义和自由的不懈探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留下了能从高于过去的平面来推进的遗产。教育和组织的机会很丰富。和过去一样，权利不太可能由仁慈的当局授予，也无法通过断断续续的行动获得，例如参加几次示威，或在个人化的、四年一次的被描绘为“民主政治”的华丽盛典上推动操纵杆。这些任务一直和过去一样，要求每天为运行中的民主文化去创造基础，部分程度上也是再创造。在这种民主文化中，公众在确定政策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不仅在那个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外的政治舞台上，还在原则上将其排除在外的关键性的经济舞

台上（起到了作用）。有很多方式推进了国内民主并将其带入新的维度。机会很充足，没有抓住机会可能会对国家、世界和后辈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最早出现在《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New York: Owl Books, 2007]，第251—263页。）

- (1) 指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Chicago:Quadrangle Books, 1970)。本文主要由乔姆斯基围绕泰勒这本书的讨论展开，下文来自该书的引述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 (3) 即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 1892—1954)，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941—1954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任美国的总检察官。
- 2 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29.
- 4 我们不清楚泰勒是否知晓美国轰炸北越的范围，其他的评论员并不知晓。例如，尼尔·希汉 (Neil Sheehan) 写道：“尽管北越民众可能不相信，但美国在北部地区只是有意地轰炸了军事目标，工业目标十分有限，与既得的军事利益相比还要考虑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 希汉在此文中评论的33本书都提出过相反的证据，但他并未解释自己为何对其置之不理。从我对河内周围地区有限的观察来看，我和北越民众一样“不相信”。假如希汉走在清廉县 (Phu Ly) 或清化省 (Thanh Hoa) 的废墟中，我想他不会“不相信”，更不用说离河内较远受轰炸更严重的地区。然而，尽管对北越的轰炸规模较大，从密集程度和破坏程度上仍不及对南越和老挝的轰炸。
- (5) 即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Chester William Nimitz, 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二战”期间任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
- (6) 指纽伦堡审判中，对卡尔·邓尼茨 (Karl Dönitz) 关于发起无限制潜艇战的指控，最后邓尼茨的罪名虽然成立却并未因无限制潜艇战获刑，其间美军上将尼米兹提供了美军对日本使用类似做法的证词。邓尼茨在“二战”开始时任德国潜艇部队指挥官，后担任海军总司令。1945年5月1日，据希特勒遗嘱，邓尼茨接任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5月8日，邓尼茨代表纳粹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 7 拉达宾诺德·巴尔 (Radhabinod Pal) 法官在东京说过，投放原子弹超过了东京审判中指控的任何一项罪行。参见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Calcutta: Sanyal & Co., 1953), 621。相关文章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168—169) 一书中被引用。但巴尔并未提出要起诉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而泰勒认为，轰炸长崎至少算是战争罪 (第143页)。
- 8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79; 联合国大会,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uppl. 12 (A/1316), 1950, 11, 后收入Herbert W. Briggs, ed., *The Law of Nations: Cases, Documents and Notes*, 2nd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2)。
- 9 有人也许会质疑纽伦堡和联合国两个宪章是否地位相当。我在此不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但正如下文所说，在我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彻底地违反了这两个宪章就是有力的实例。

最近发布的五角大楼文件似乎会大大有助于克服泰勒所引述和 (在我看来) 过高估量的“证据问题”困难。这些文件的有趣特征之一是，它们很好地证实了比如弗兰兹·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等人就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在《越南政治局

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Boston: Beacon, 1966]) 一书中的解读。文件记录显示, 向公众开放的证据足以断定美国的方针政策。这些文件可能会提供直接证据, 以证明发动侵略扩张战争和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解决争端规定的同谋行为。参见《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第1章。

- 10 我们不太清楚泰勒如今是否仍然接受这一评价。
- 11 美国在1966年1月才正式向安理会递交越南问题的报告(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vol. 21, suppl. January—March [S/7105], 1966, 105)。此前, 美国要求安理会考虑1964年8月的(据称) 东京湾事件(*Official Records*, vol. 19, suppl. July—September [S/5849], 1964, 135) , 并在北越和南越轰炸迅速升级之后于1965年2月递交了报告(*Official Records*, vol. 20, suppl. January—March [S/6174], 1965, 43)。参见“*The Legality of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fense of Vietna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54 (1966) , 后来被收入 Richard A. Falk, ed., *The Vietnam War and International Law*, 583, 590 (此后引为 *Falk—Vietnam*)。美国的直接军事参与始于1961年至1962年。
- (12) 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 , 1930—) , 美国国际法专家、作家、学者, 2008年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任期六年。
- (14) 托马斯·J.法若尔(Thomas J. Farer , 1935—) , 美国学者、民主问题和国际研究专家、作家, 曾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丹佛大学。
- 13 Richard A. Falk,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Vietnam: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Moore,” *Yale Law Journal* 76 (1967): 1051, 1130 n. 80 , 后被收入 *Falk—Vietnam*, 445, 480 n. 80。
- 15 Thomas J. Farer,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A Modest Proposal,” *Columbia Law Review* 67 (1967): 266, 271 , 后来被收入 *Falk—Vietnam*, 509 , 514。
- 16 Robert Scigliano, *South Vietnam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64), 145. 希里亚诺(Scigliano) 是密歇根大学越南顾问组的成员。
- 17 例如, 参见George McT. Kahin and John W.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Dial Press, 1967), 137。
- 18 Bernard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1961), 346。
- 19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62; October 17, 1962. 这30%的数据中不包括直升机飞行。到1964年初, 美国在越南有248架直升飞机, 年底增加到327架。参见V. S.G. Sharp and W. C.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As of 30 June 1968), 85 (1968)。相比之下, 法国直到1954年4月在印度支那才有十多架作战直升飞机(Fall, *Street Without Joy*, 242)。
- 20 Robert Shaplen, *The Lost Revolution*, 170ff. 直到1968年, 才发现湄公河三角洲有来自北越的人。弗莱彻·普劳蒂(Fletcher Prouty) 上校(已退役) 证实, 美国在1960年代初轰炸了金瓯半岛的平民, 他本人当时负责联络中央情报局和空军

(“Review of the War,”WNET-TV, Channel 13, New York, February 15,1971)。记者们也证实美国在1960年代初对越南乡村发动了空袭。马尔科姆·布朗 (Malcolm Browne, 自1961年起任美联社通讯员) 描述了他去过的小村庄, 它们在美军空袭中被凝固汽油弹和重磅炸弹击中; “毫无疑问, 后果让人难以直视。遗憾的是, 越共修建的掩体很巧妙, 除了被空投的炸弹或凝固汽油弹直接击中的人, 其余几乎毫发未损。但村民们的棚屋被炸平, 平民死亡人数普遍居多。在一些地方, 烧焦的儿童和婴儿尸体被堆在夷为废墟的市场中央, 场面令人唏嘘”(*The New Face of Wa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118)。美方指挥官和文职官员显然都知道这些情况。要想找到最明显的证据, 只消看看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为布朗的书所写的序言, 当时正是洛奇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的两届任期之间。需要指出的是, 东京法庭判定, 如果内阁成员知晓战俘待遇的情况而不辞职, 则犯下有关战俘待遇的战争罪。有关此次法庭裁决的选段, 见Erwin Knoll and Judith N. McFadden, eds., *War Crimes and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195。

- (21) 理查德·特里加斯基 (Richard Tregaskis, 1916—1973),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 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都担任过战地记者。
- 22 Richard , Tregaskis, *Vietnam Dia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 108.
- 23 Donald Robinson, “America’s Air Guerrillas—Will They Stop Future Vietnams?”*Parade*, supplement to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31, 1971. 根据该叙述, 1970年11月, 特种作战部队突袭了北越山西 (Son Tay) 附近已被离弃的战俘营。
- 24 甚至连近乎美国政府宣传者的道格拉斯·派克也承认, 民族解放阵线是南越唯一“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而且在1964年晚期, 受美国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可能考虑与民族解放阵线结为联盟, 以免“鲸鱼吞了鲦鱼”(*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 110, 361-362)。在其他地方, 派克也估测过, 1963年“也许一半南越人至少暗中支持民族解放阵线”(*War, Peace, and the Viet Cong*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69], 6)。当然, 一个大国建立为其干预喝彩的政府并非难事。例如,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也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官方认可的”代表大会, 在会议召开时为1968年苏联人入侵“欢呼鼓掌”(*Boston Globe*, Reuters, May 26,1971)。
- 25 在这种情况下, 我指的是美国在南越建立的政权在其支持下拒绝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选举规定。同样, 巴特寮在1958年老挝选举中意外获胜时(在美国千方百计为右翼买通选举之后), 美国在推翻这个联合政府过程中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见Len Ackland, “No Place for Neutralism: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Laos,” in Nina S. Adams and Alfred W. McCoy, eds., *Laos: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Jonathan Mirsky and Stephen Stonefield, “The United States in Laos,”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leden, eds., *America’s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253-323。还可参见该书第2章第1节。

- 26 这是否“绝对是法律”还值得怀疑。
- 27 引自Leo Goodstadt, “Might and Righ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0, 1971, 22。顾汝德（Goodstadt, 英国经济学家, 1989—1997年任港英当局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曾出版过数本有关中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政治趋势的著作。——译者注）评论说:“武力对毛来说一直都是第二个最佳选择。”
- 28 Pike, *Viet Cong*, 91—92。派克随后又说:“武装战争是受越南共和国政府逼迫的必要行动;民族解放阵线为了生存必须反击。”(第101页)
- (29) 长征 (Truong Chinh, 1909—1988), 又名邓春区, 越南政治家、越共领袖, 也是作家、诗人、理论家。
- 30 Truong Chinh, *La résistance vaincra*, cited in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2-373 (见法尔翻译的部分)。
- 31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2-373。
- (32) 即威廉·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 美国第25任总统, 在任期间发动了美西战争, 1901年9月6日遇刺身亡。
- 33 有关日本在1930年代防卫性和理想主义的公然动机, 见《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第2章, 第176—177、179—184、189—190、193—202页的参考资料。
- 34 在这方面, 美国的天真之处在于衡量一切是否超越了我们英国盟军的所作所为。例如, 《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本一贯保持冷静的期刊——的每周专栏匿名作家(据猜测是编辑本人)写道:“对眼界开阔之人显而易见的是, 无论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结果如何, 该行动本着最理想的动机和最好的意图……[想要]声称美国进入越南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原因……显然是胡说八道。”(“旅行者的故事”[“Traveller's Tales”]专栏,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0, 1971) 可以想见的是, 人们会认为, 尽管反面证据很充分, 美国仍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国家。但坚信这种可疑的判断只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表现。这位专栏作家也显示了与“坚定的”学者相对应的《评论》杂志的中立立场:他写道, 《评论》因此也不会犹豫是否“要批评它认为[美国]战略或政策中错误的地方”, 或犹豫是否要发表“对越共暴行的猛烈攻击”。这的确很客观。这位专栏作家也以自己的“睿智”为荣, 因为他“所发表的其中一次社论试图为参与美莱村屠杀的部队博得同情和理解”, 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他所指责的美国和平运动几乎一贯采取同样的立场, 不会以自身的“睿智”为荣, 尽管它可以把战场上的士兵行为和远离威胁的设计者的谋略区分开来。
- 35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3。请注意此书写于1960年代早期, 泰勒当时“支持美国干预越南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去制止侵略行为的”(第206页)。该书出版三年之后,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说, 越共和北越民众“在整个南越地区……出于所有的实际目的……在行动时没有动用任何带轮子的车辆”。见参议员普罗科姆迈尔 (Proxmire) 的陈述, Senator Proxmire,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77 (April 5, 1971), S4585。
- 36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378。

- 37 见1970年1月12日《渥太华公民》(*Ottawa Citizen*) 日报的采访。据一位在广义省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在1967年(即美莱村屠杀的前一年)的估计,在那里,大约70%的平民战争死亡是由美国及其盟军的轰炸造成的——也就是说,在或多或少受美国控制的、受害者还能被送往镇医院的地区。引用和参考的资料,见乔姆斯基著《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第284页,以及《与亚洲作战》(*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第270—271页。
- 38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71. 此处指越南退伍军人罗纳德·L·瑞登奥尔(Ronald L. Ridenhour), 在屠杀发生一年后他向国防部长汇报揭露了此事。该事件与其他许多未被承认和讨论的事件一起引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注意。1968年6月15日,具体细节在巴黎被披露,但并未受到西方媒体的重视。相关合理而尖锐的报道,参见Erich Wulff, “Le Crime de Song My: Avec les felicitations du commandant en chef,” *Africasia* [Paris], April 26-May 9, 1971。伍尔夫(Wulff)是一名曾在越南工作长达六年的西德内科医生,1967年在罗素法庭就“新‘奥拉杜尔和利迪策’(分别指“二战”期间德军在法国奥拉杜尔村[Ouradours]和捷克斯洛伐克利迪策村[Lidices]进行的屠杀。——译者注)”出庭做证,其证词在“*A Doctor Reports from South Vietnam—Testimony by Erich Wulff*, ”in John Duffett, ed., *Against the Crime of Sile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 中有所记录。
- 39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71; *Boston Globe*, May 10, 1971. 德勒姆斯委员会的听证会内容此后由Vintage Books出版社出版(Citizens’ Commission of Inquiry, *The Dellums Committee Hearings on War Crimes in Vietnam*)。
- (43) 越战中由美军和南越军队联合进行的一次作战行动,以行动指挥官的故乡——堪萨斯州章克申城(Junction City)——命名。
- 40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77 (1971), E2826-2900. 1972年由Beacon出版社出版(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eds., *The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 41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72.
- 42 见奥普顿(E. Opton) 的陈述, in Knoll and McFadden, *War Crimes*, 114。
- (44) 原文中的“gook”一词是美式英语中对东方人的蔑称,尤指东南亚人,也是越战中的美军俚语词汇,特指越南人或北越士兵。
- 45 R. W. Apple, “Calley: The Real Guilt,” *New Statesman*, April 2, 1971, 449. 美军指挥部也深知,早期的人口移除行动具有强制性。夏普(Sharp) 和威斯特摩兰写道,1962年3月的第一次哈姆雷特战略村计划“涉及强制性重新安置农民,无论他们多么强烈地依恋祖祖辈辈耕种的田地”(《越战报告》[*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79])。这个报告大部分在系统地为自身行为辩护。我认为,除了美国军事行动的细节之外,若不逐一确认这些辩护,该报告就不可信。
- 46 Apple, “Calley: The Real Guilt,” 34.
- (48) 尼尔·希汉(Neil Sheehan, 1936—2021), 1971年任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期间曾获得有关越战的保密文件,后来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美军在越战中的罪行。
- 47 这个偶然听到的解释显然很荒谬,即使我们认为对其最早的解释来自Samuel P. 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5, no. 4

(1968)。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农村大规模轰炸升级之前。但如果说数百万吨炸药和上万平方英里落叶的影响无法被提前预测到的话（这很难让人信服），那么到1968年中期也肯定已经知晓了。倡导在南越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高级顾问约翰·保罗·万尼（John Paul Vann）中校（已退役）也坚持这种不顾他人死活的虚伪说法（见下列出处，第232—233页）。《新闻周刊》（*Newsweek*，1969年1月20日）引用了他的话：“我们无意间碰到了解决游击队战争的方法——城市化。”（引自L.A. G. Moss and Z. M. Shalizi,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Indochina,” in Jonathan S. Grandt et al., eds., *Cambodia: The Widening War in Indochin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192）

49 Sheehan,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

50 这个偶然听到的解释显然很荒谬，即使我们认为对其最早的解释来自Samuel P. 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5, no. 4 (1968)。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对印度支那农村大规模轰炸升级之前。但如果说数百万吨炸药和上万平方英里落叶的影响无法被提前预测到的话（这很难让人信服），那么到1968年中期也肯定已经知晓了。倡导在南越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高级顾问约翰·保罗·万尼（John Paul Vann）中校（已退役）也坚持这种不顾他人死活的虚伪说法（见下列出处，第232—233页）。《新闻周刊》（*Newsweek*，1969年1月20日）引用了他的话：“我们无意间碰到了解决游击队战争的方法——城市化。”（引自L.A. G. Moss and Z. M. Shalizi,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Indochina,” in Jonathan S. Grandt et al., eds., *Cambodia: The Widening War in Indochina*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1], 192）。

51 Sheehan, “Should We Have War Crimes Trials?”

52 *New York Times*, April 6, 1971. 引文和大部分所引用的材料均来自该报道。

53 Fall, *Street Without Joy*.

54 也许有人认为，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总统无法让越南遍布美国军队以避免使用破坏性的火力。但请回想一下，法国人从未往越南派过兵，在印度支那全境也许只部署了70 000人的法国本土部队。有关法国军事实力的资料，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4。即使不算独一无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已非同寻常，因为公众一度愿意容忍政府部署大量征募的部队，去打一场实质上的殖民地战争。

55 Ngo Vinh Long, “Leaf Abscission,” in Barry Weisberg, ed., *Ecocide in Indochina* (San Francisco: Canfield Press, 1970), 54. 朗（Long）提到，当时的破坏是为了把人们逼进战略村。

在*Thoi-Ba Ga*（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出版的越南学生期刊）上，朗写道，根据西贡报纸*Tin Sang*在1970年11月12日的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农业委员会主席声称，美国的化学落叶剂毁坏了南越大约60%的农作物。西贡日报《南国火炬报》（*Duoc Nha Nam*）1971年3月9日这一期的报道说，1970年南越从美国进口了150万吨大米。据朗估计，这些大米足以养活500万人。然而，记者和其他人士只描述了四处蔓延的饥饿和饥荒（*Thoi-Ba Ga*, March-April 1971, 6）。

《洛杉矶时报》记者布莱斯·纳尔逊（Bryce Nelson）曾是《科学》（*Science*）杂志的记者，他写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未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四个月期间（1970年9至12月）有90人因使用被除草剂污染的喷水和饮用水而死亡（《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 1971年1月28日]）。一位曾在南越工作四年的国际志愿服务者（IVS worker）谈到在芹苴省（Can Tho）和太宁省（Tay Ninh）“多次遇到”庄稼被毁的农民。他还说，在太宁省医院见到“四肢和脸部被磷严重烧伤的”病人，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医院里“一个个受到可怕伤害而毁容的孩子”（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Roger Montgome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71）。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10。

56 Arthur Westing, “Poisoning Plants for Peace,” *Friends Journal* 16 (1970). 正文中引用的数据来自这篇文章以及下面注释2所引用的文章。

57 Arthur Westing, “Ecocide in Indochina,” *Natural History*, March 1971.

58 Ngo Vinh Long, “Leaf Abscission,” in Barry Weisberg, ed., *Ecocide in Indochina* (San Francisco: Canfield Press, 1970), 54. 朗（Long）提到，当时的破坏是为了把人们逼进战略村。

在*Thoi-Ba Ga*（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出版的越南学生期刊）上，朗写道，根据西贡报纸*Tin Sang*在1970年11月12日的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农业委员会主席声称，美国的化学落叶剂毁坏了南越大约60%的农作物。西贡日报《南国火炬报》（*Duoc Nha Nam*）1971年3月9日这一期的报道说，1970年南越从美国进口了150万吨大米。据朗估计，这些大米足以养活500万人。然而，记者和其他人士只描述了四处蔓延的饥饿和饥荒（*Thoi-Ba Ga*, March-April 1971, 6）。

《洛杉矶时报》记者布莱斯·纳尔逊（Bryce Nelson）曾是《科学》（*Science*）杂志的记者，他写道，在美国科学促进会除草剂评估委员会未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四个月期间（1970年9至12月）有90人因使用被除草剂污染的喷水和饮用水而死亡（《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 1971年1月28日]）。一位曾在南越工作四年的国际志愿服务者（IVS worker）谈到在芹苴省（Can Tho）和太宁省（Tay Ninh）“多次遇到”庄稼被毁的农民。他还说，在太宁省医院见到“四肢和脸部被磷严重烧伤的”病人，还有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医院里“一个个受到可怕伤害而毁容的孩子”（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Roger Montgome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71）。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note 10。

(59) 巴特寮（Pathet Lao，直译“老挝国”）是由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0年成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组织，于1975年夺取老挝政权并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特寮与越共关系紧密，狭义上可看作是老挝共产主义武装。

60 Richard Dudman, *Forty Days with the Enemy*, 69.

61 见*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71; *Boston Globe*, April 16, 1971; *Boston Globe*, April 23, 1971. 另见*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17 (February 18, 1971), formal testimony of Representative McCloskey, H794-800. 还可参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2, section 1.

(64) 指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 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

元帅，纳粹党的二号头目。

- 62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17 (1971), H796. 在1968年大规模空战升级之前，就有对广义省和广信省（Quang Tin）的类似报道（Jonathan Schell, *The Military Half*）。
- 63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Field Manual FM 27-10 (1956), 18, par. 37.
- 65 该陈述来自威斯康星大学法学教授、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前法律总顾问乔治·布恩。参见George Bunn, “The Broad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inued Use of Herbicides in Southeast Asia,” AAAS Annual Meeting, December 29, 1970。油印版。
- 66 William A. Nighswonger, *Rural Pacification in Vietnam*.
- 67 更多讨论见Jeffrey Race, “How They Won,” *Asian Survey*, August 1970; Robert L. Sansom, *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雷斯（Race）在美国陆军服役时曾任西贡南部隆安省区长顾问，而桑塞姆（Sansom）是美国空军上尉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到过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地区的非共产分子的记者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见关注亚洲问题委员会所引用的雅克·多扬（Jacques Doyon）的报告《印度支那的故事》（*The Indochina 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第36页。另见Katsuichi Honda,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nd Vietnam: A Voice from the Villagers*（这是作者的文章汇编，由他本人翻译并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转录）。还可参见乔姆斯基著《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215中的参考资料。关于难民眼中的巴特寮行动计划，见亚当斯（Adams）和麦科伊（McCoy）合著《老挝》第451—459页（Adams and McCoy, *Laos*, 451-459）中的逐字采访稿和乔姆斯基著《与亚洲作战》第239页。还可参见Mark Selden, “People’s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Selden and Friedman, *America’s Asia*（此前已提到），第2章第1部分。
- (68) 罗伯特·沙泼林（Robert Shaplen, 1917—1988），美国知名记者、作家、亚洲问题学者，曾任《新闻周刊》《纽约客》等杂志的记者。
- 69 Robert Shaplen, “The Challenge Ahea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9, no. 4 (1970—1971)。
- 70 一些讨论和更多的参考文献见Edward S. 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Philadelphia: Pilgrim Press, 1970), chap. 2。在当时，一切已真相大白。具体实例参见R. W. Lindholm, ed.,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71 见道格拉斯·派克对民族解放阵线诉诸暴力的评论，前文所引著作第219页，更详细的分析参见Jeffrey Race, *War Comes to Long 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73) 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在越南春节期间对南越大城市发动的进攻，此次行动虽未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但部分地实现了前者的战略目标。此役战罢，受国内政

治环境影响，美国调整了对越政策，“春节攻势”也被很多人视作越战的转折点。

(74) 唐·奥伯道夫 (Don Oberdorfer, 1931—2015)，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朝鲜问题专家。

72 要估量其相对规模，见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75 Don Oberdorfer, *Te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201.

76 奥伯道夫的信息来源之一是莱恩·阿克兰未发表的《顺化》(“Hue”)一文。可以想见，其他人在肆意玩弄着数字游戏。唐纳德·柯克 (Donald Kirk) 是一位消息灵通的通讯记者，他报道说：“美军把北越人赶出要塞之前……经过28天的巷战，当时大约有4 000人被杀害。”(*Chicago Tribune*, May 4, 1972) 这暗示着有4 000人被北越人杀害。罗伯特·汤普森爵士 (Sir Robert Thompson) 声称，共产分子杀害了5 700个人，“据截获的文件记录，他们对这些数字自鸣得意，只是抱怨说当时没杀够”(*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72)。从未见过这种文件，甚至连“截获的文件”也不存在。1969年11月美莱村事件被公之于世之后，这些文件很快就神秘地出现了，据称是被“错放 [在某地] ”达一年半之久。威廉·萨克斯比 (William Saxbe) 议员估计有多达7 000人被“北越人”杀害，远远超过这次战斗中因各种原因被杀害的总人数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3, 1972)。

(79) 理查德·韦斯特 (Richard West, 1930—2015)，英国记者、作家，作品内容涉及非洲、越南、拉美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情况。

77 奥伯道夫顺带提到美莱村“大约有100个平民”被杀，他说自己参照的是Seymour Hersh, *My Lai 4*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而该书估计的人数是400到500人。

78 Oriana Fallaci, “Working Up to Killing,” *Washington Monthly*, February 1972.

80 Richard West, *New Statesman*, January 28, 1972.

81 Philip Jones Griffiths, *Vietnam Inc.*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137. 格里菲斯在书中提供了顺化战役的照片。有关两次屠杀的讨论和参考文献，包括前文未标明的参考文献，参见本人著 *At War with Asia*, 295-296和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82 更多讨论见Jeffrey Race, “How They Won,” *Asian Survey*, August 1970; Robert L. Sansom, *The Economics of Insurgency in the Mekong Delta of Vietn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雷斯 (Race) 在美国陆军服役时曾任西贡南部隆安省区长顾问，而桑塞姆 (Sansom) 是美国空军上尉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到过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地区的非共产分子的记者们提供了大量证据。见关注亚洲问题委员会所引用的雅克·多扬 (Jacques Doyon) 的报告《印度支那的故事》(*The Indochina 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第36页。另见Katsuichi Honda,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nd Vietnam: A Voice from the Villagers* (这是作者的文章汇编，由他本人翻译并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转录)。还可参见乔姆斯基著《因为国家》第1章注释215中的参考资料。关于难民眼中的巴特寮行动计划，见亚当斯 (Adams) 和麦科伊 (McCoy) 合著《老挝》第451—459页 (Adams and McCoy, *Laos*, 451-459) 中的逐字采访稿和乔姆

斯基著《与亚洲作战》第239页。还可参见Mark Selden,“ People’s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Selden and Friedman, *America’s Asia*（此前已提到），第2章第1部分。

- 83 该报告在我拿到的备份中没有标题，万尼在1971年私下将其交给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克斯·凯里（Alex Carey），后者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见凯里所写的附有详细资料的小册子《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暴行》（*Australi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1-19）（日期不详），其中描述了他称之为“我们漂向希特勒和盖世太保的标准”。
- 84 一些讨论和更多的参考文献见Edward S. 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Philadelphia: Pilgrim Press, 1970), chap. 2。在当时，一切已真相大白。具体实例参见R. W. Lindholm, ed.,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85 Robert W.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 on Insurgency in South Vietn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他指的是1965年2月美国对南部的彻底入侵和轰炸升级。
- 86 Robert W.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 on Insurgency in South Vietn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回想一下理查德·福尔克在此前提到的出处第216页有关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要素的统治权的评论。
- 87 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应该提到的是，尽管这些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严重的结果一清二楚之后还抱着保守态度，他们也没有把自己与美国的政策隔离开来。*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62; October 17, 1962。这30%的数据中不包括直升机飞行。到1964年初，美国在越南有248架直升飞机，年底增加到327架。参见V. S.G. Sharp and W. C. Westmoreland, *Report on the War in Vietnam* (As of 30 June 1968), 85 (1968)。相比之下，法国直到1954年4月在印度支那才有十多架作战直升飞机（Fall, *Street Without Joy*, 242）。
- 88 凤凰计划“旨在使越共的秘密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保持中立，很多人认为这是瓦解其叛乱能力的关键所在”（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中立化”是“刺杀或俘获”的官样说法。对“被中立”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美国副大使、负责调解的主要官员威廉·W. 科尔比（William W. Colby）在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作证说：1969年有近20 000人“被中立”，其中6 187人被杀害。相比之下，西贡政府声称，有4 619名平民在1969年被“敌人”杀害。在凤凰计划中死去的人当然只占美军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军联合杀害的平民中的一小部分。在南越工作过的前国际志愿服务者、后来担任兰德公司团队组长和分析员的莱恩·阿克兰（Len Ackland）指出，凤凰计划是用来俘获或谋杀平民的，即“为民族解放阵线政党服务的人，有收税员、职员、邮递员等”。参考文献和更多记录，见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301-302；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46-47。还可参见前面科默的文章出处第91—93、161页。
- 89 该报告在我拿到的备份中没有标题，万尼在1971年私下将其交给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克斯·凯里（Alex Carey），后者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见凯里所写的附有详细资料的小册子《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暴行》（*Australi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1-19) (日期不详), 其中描述了他称之为“我们漂向希特勒和盖世太保的标准”。

- 90 后半句话是美国政治用语中的代码性术语, 指由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来统治南越。民族解放阵线1972年的政治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忽视了, 甚至被镇压, 但促成了美国对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进行中立化行动。也许有人认为, 这是个骗局, 但美国是否单方面有权因疑心而动用军事力量却不得而知。
- (91) 理查德·古德温 (Richard Goodwin, 1931—2018), 美国作家、经济学家, 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及演讲稿撰写人。
- 92 有一种难以表达的观点是, 南越必须受由美国强行建立的非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此处是对该观点的另一种解释。古德温对此一清二楚, 并在该书中解释说, 即使在当时, 也完全是国内叛乱。
- 93 Richard Goodwin, *Triumph or Trage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38. 其他相关观点的表述, 见乔姆斯基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中的引文和参考文献, 尤其是第3章“撤退的逻辑”(“The Logic of Withdrawal”), 第221—294页。
- 94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71.
- 95 *New York Times*, 凤凰计划“旨在使越共的秘密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保持中立, 很多人认为这是瓦解其叛乱能力的关键所在”(Komer, “Impact of Pacification”)。“中立化”是“刺杀或俘获”的官样说法。对“被中立”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美国副大使、负责调解的主要官员威廉·W. 科尔比 (William W. Colby) 在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做证说: 1969年有近20 000人“被中立”, 其中6 187人被杀害。相比之下, 西贡政府声称, 有4 619名平民在1969年被“敌人”杀害。在凤凰计划中死去的人当然只占美军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军联合杀害的平民中的一小部分。在南越工作过的前国际志愿服务者、后来担任兰德公司团队组长和分析员的莱恩·阿克兰 (Len Ackland) 指出, 凤凰计划是用来俘获或谋杀平民的, 即“为民族解放阵线政党服务的人, 有收税员、职员、邮递员等”。参考文献和更多记录, 见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301-302; Herman, *Atrocities in Vietnam*, 46-47。还可参见前面科默的文章出处第91—93、161页。与威廉·科尔比有关的内容。
- (97) 比里·帕依荣 (Pridi Phanomyong, 1900—1983), 又名“銮巴立”, 中文名“陈家乐”, 泰国政治家。1946年任泰国总理, 1949年领导政变失败后一直侨居中国, 1970年移居法国。
- (98) 全称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 96 1937年10月, 曼努埃尔·奎松 (Manuel Quezon) 总统指出, 尽管“富人能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在地里耕田或在工厂里劳动的男男女女们, 比起他们在西班牙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宽裕不了多少……美国35年的统治给人带来的只有失望, 有时还有绝望……”(G. E. Tayl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4], 22)。泰勒还补充了许多信息以确认这一判断, 并总结说, 到1930年代为止, “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许比美国占领之前还要糟糕”(第85页)。1950年的贝尔 (Bell) 报告也显示, 收入不平等日益明

显，而人均生活标准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第137页）。

在菲律宾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任务组组长韦斯里·D.哈勒德森（Wesley D. Haraldson）在1967年4月25日众议院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做证说，农民的平均条件“在过去50年里并无改变……在过去十年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哈勒德森的话引自Hernando J. Abaya, *The Untold Philippine Story* [Quezon City: Malaya Books, 1967]，360）。

- 99 Phi-Van, “The Peasants (Dan Que),” appendix to Ngo Vinh Long, *Before the August Revolution*.
- 100 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
- (101) 切斯特·库珀（Chester Cooper，1917—2005），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助手，负责亚洲事务。
- 102 Chester Cooper, *The Lost Crusade* (New York: Dodd, Mead, 1970), 276-277. 此处被库珀着重强调。
- 103 细节见Theodore Draper, *Abuse of Pow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7), 73-82. 德雷珀（Draper）对政府有关北越军队进入南越的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无人对此表示回应。政府内部耸人听闻的矛盾说法本身就足以使政府给出的证据难以令人相信。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回想一下，在开始对北越进行常规轰炸两个月以后，在为了“报复”一起也许并未发生的事件而首次轰炸北越战略目标的八个半月之后，据说才在南越发现了北越的这个营。政府有关北越入侵老挝和柬埔寨的说法也不再令人信服。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2.
- (105) I. F. 斯通（I. F. Stone，1907—1989），美国犹太裔调查记者、作家。
- 104 Cooper, *Lost Crusade*, 264-265.
- 106 I. F. Stone, “A Reply to the White Paper,” *I. F. Stone’s Weekly*, March 8, 1965.
- 107 “根据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自1961年2月28日起，南越被记录在案的违反行为有154次，北越只有一次。”（Scigliano, *South Vietnam*, 154）希里亚诺（Scigliano）认为，北越有条件表现得“更加激烈和狡猾”，但“在北越，ICC [国际监督委员会] 小组比在南越……更无法履行其职责”（第155页）。但一份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报告说，“正如前文段落所示，双方与委员会的合作程度不一样。尽管委员会在北越遭遇了困难，主要的困难还是在南越。”（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Six Interim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n Vietnam*, Cmnd, No.31, 26-31）又重印在Marvin E. Gettleman, ed.,

Viet Nam: History, Documents and Opinions(Greenwich, CT: Fawcett Publications, 1965), 170-172. 北越和南越根据《日内瓦协议》应遵守的义务见Daniel G. Partan, “Legal Aspects of the Vietnam Conflict,” in *Falk-Vietnam*, 201, 209-216。

- 108 Bernard Fall, 242-243, 281-282. 若需要进一步确认, 见Joseph Zasloff, *Political Motivation of the Viet Cong* RAND Memorandum RM-4703-2-ISA/ARPA (May 1968), 124. 我们从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得知, 这些行动始于1954年。
- 109 参见Lawyers Committee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Vietnam and International Law* (Flanders, NJ: O'Hare, 1967)。还可参见Falk—*Vietnam*中的几篇文章。在泰勒的书之后所做的最新研究是William L. Standard, *Aggression: Our Asian Dis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可参见第1章第3、4节(第5、6小分节)。
- 110 泰勒唯一一次提到该问题是在这个不同的语境中:“我们把成千上万的部队派往南越、轰炸北越并挺进柬埔寨时,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和希特勒及其将领那样也犯了发动侵略战争罪……?”(第13页)这个问题就没有下文了。
- (111) 托马斯·M. 弗兰克(Thomas M. Franck, 1931—2009), 犹太裔律师、法学和国际法专家, 先后在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生活。
- 112 Thomas M. 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 (4)? Or: Changing Norms Governing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4, n. 4 (1970)。
- (114) 吴丹(U Thant, 1909—1974), 1962—1972年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在任职期间曾调解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印巴争端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 113 Bernard Fall, *Last Reflections on a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276。
- 115 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4)?”
- (117) 指1958年底古巴革命前的亲美古巴独裁政府, 其领导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曾通过军事政变执掌大权。
- 116 有关这种可能性的最新讨论见Walter Goldste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Next Vietna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 no. 1 (1971)。
- 118 George W. Grayson, J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0, 1971. 格雷森(Grayson)是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政府学副教授、拉美政治和革命理论专家。
- 119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有关国防部拨款的听证会, 1963年, 引自M. Klare, “The Pentagon’s Counterinsurgency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NACLA Newsletter* 4, no. 9 (1971)。
- 120 马尔科姆·布朗早在1964年也提出过完全相同的观点(*The New Face of War*, xi)。
- 121 Gall,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 他指出,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被选出的现任危地马拉总统, 其政府是该国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政府, 1971年初杀害了许多人, 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共产分子的反对

派成员。

- 122 Gall, "Guerrilla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71. , Donald Robinson, "America's Air Guerrillas—Will They Stop Future Vietnams ? " *Parade*, supplement to *Boston Sunday Globe*, January 31, 1971. 根据该叙述, 1970年11月, 特种作战部队突袭了北越山西 (Son Tay) 附近已被离弃的战俘营。顺带提一下的是, 这些作战行动是遍及全球的。
- 123 Marcel Neidergang, "Violence et terreur," *Le Monde*, January 19, 1968.
- 124 尤其参见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1961), 57-98。基辛格在大国冲突的框架内讨论了“有限战争策略”。但假如我们自问在哪里打了这些“有限战争”, 回答该问题的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实际上, 每个超级大国都会把自己维护其帝国内霸权地位的做法, 解释为保护其某种原则 (自由、社会主义) 不受对手的侵犯。从这方面看, 冷战是服务于超级大国领导地位的绝妙宣传手段, 它动员了各自大量的民众, 背后却是昂贵而危险的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行动。具体实例请参见弗兰克所写的文章《是谁杀死了第2条第4款?》(Franck, "Who Killed Article 2 (4) ?") 以及基辛格该书第1章第5节。
- (125) 此处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ntelligentsia”, 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总称, 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 后来也指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个英文单词“intellectual”指受过教育并反抗社会既有标准的知识分子个体,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 但这个词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 更偏重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及其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知识分子阶层”或“知识分子群体”和“知识分子”分别与这两个英文单词相对应, 含义略有不同。
- (126) 指1967年4月21日发生在希腊的军事政变。希腊陆军准将斯泰利亚诺斯·帕塔科斯 (Stylianos Pattakos) 和两名上校乔治·帕帕多普洛斯 (George Papadopoulos) 以及尼可拉斯·马卡瑞佐斯 (Nikolaos Makarezos) 等人夺取了政权, 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
- (127) 菲利普·拉夫 (Philip Rahv, 1908—1973),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 是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 (128) 悉尼·胡克 (Sydney Hook, 1902—1989),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 早年信仰共产主义, 后来成为反对极权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批评家。
- (131) 威廉·V. 香农 (William V. Shannon, 1927—1988),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 1977—1981年任美国驻爱尔兰大使。
- 129 有关参考资料和更多的评论, 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一书。另外, 可参看“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的研究和支持, 是美国国防部的智库。——译者注) 执行委员会主席、国际救援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利奥·彻恩 (Leo Cherne) 对南越难民的描述: “近来, 又有70多万名难民逃离了受越共控制的乡村, 他们在逃离行动之后选择了住进南越提供的简陋避难所。” (“Why We Can't Withdraw,” *Saturday Review*, December 18, 1965) 有关美国当时和后来 (实际上

是从1962年开始)迫使大批人沦落为难民的计划,见《因为国家》,还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Spokesman, 1978)第5章。举例来说,当彻恩写出有关难民逃脱越共控制地一事时,某项受政府资助的研究就解释说,美国的空袭和炮火轰炸迫使村民们“迁到了免受这些袭击的地方……无论他们对越南共和国政府[美国的附庸政府]的态度如何”。毫无疑问,苏联的某个彻恩现在也能写出难民们如何逃往喀布尔的简陋避难所,如何试图逃脱那些控制着乡村的、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凶残的恐怖分子。

为了表明不会限制批评性意见,彻恩补充说:“南越人只是要求让他们自己平静地克服”越南政府的不足,即“其不稳定的局势、民主机构的不完善之处以及不合适的经济和社会规划”。为了公平起见,他的苏联对手现在也可以解释一下,阿富汗人民又是如何只要求让他们自己平静地克服本国的类似问题,而他们的国家正在挣扎之中,受到苏联的仁慈保护才免遭侵略。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断言没有引起恐惧、愤怒乃至评论就被接受的程度是一个公平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巴枯宁把“国家崇拜”看作知识分子弊病的正确程度。

130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66.

132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8, 1974.来自自由派学者的类似例子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注释33。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举。

(133)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之一,也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134) 指前面提到的威廉·V. 香农于1974年9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言论。此处暗指越战失利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削弱,但知识分子阶层依然站在国家宣传体系那边。

135 Peter L. Berger, “When Two Elites Meet,” *Washington Post*, April 18, 1976, 翻印自*Commentary*, March 1976.

136 Samuel P. Huntington, in M. J. Crozier, S. P. Huntington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还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注释34。

137 关于一些具体的例子,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和4章;大量的文献和讨论,见N. Chomsky and E.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2 vol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138 见乔姆斯基的文章《对水门事件的质疑》(“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1973); 乔姆斯基写的社论*More*, December 1975; 为N. Blackstock, ed., *COINTELPRO*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所写的序言。

(140) 约瑟夫·卡拉夫特(Joseph Kraft, 1924—1986), 美国专栏作家,曾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供稿。

139 关于知识分子阶层反越战的狭隘性,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有关

对批评学生运动和拒绝加入群众反战立场的尖锐评论，见Julius Jacobson, “In Defense of the Young,” *New Politics*, June 1970.

- 141 *Boston Globe*, October 18, 1976. 这种讨论有不同的说法也很常见。回想一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引述了《新共和》杂志编辑马丁·派雷兹（Martin Peretz）的评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溃败在史册上会被记录为‘最丑陋的国家罪行’。”（1977年6月11日）派雷兹为目前创造的历史新篇章又贡献了有趣的一笔。他说，他所评述的这本书明确阐述了一个相当独立的立场——毫无保留地反对和平运动，并认为“有可能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从而暗示“和平运动”是反对政治解决的。当然，站在任何一方的人都会支持政治解决，只是说法不同：关键在于，应该允许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一贯认为这是南越唯一具有群众基础的武装力量——分享（并以此假设会主导）对南越的治理吗？“和平运动”——就这个主体被外界所认定的程度而言——赞同在这些条款基础上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因为如果受美国支持的集团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参与的联盟，“鲸鱼就会吞掉小鲈鱼”（这是政府专家道格拉斯·派克的生动说法）。美国政府决心阻止一切这样的政治解决，直至其犯下丑陋的失败罪行为止。派雷兹认为，美国停止政治解决也是有罪的。他的观点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可以充分理解其意义所在。
- (143) 布鲁斯·安德鲁斯（Bruce Andrews, 1948— ），美国诗人、公共关系及政治学专家，曾任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
- (145) 作者在第2章注释(136)中也提到了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该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非政府性的国际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由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的学者和政经要人组成。
- 142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和6章。
- 144 Bruce Andrews, *Public Constraint and American Policy in Vietnam*, SAGE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ries, vol. 4, 1976. 请注意，安德鲁斯解释说，这些事实有点模糊不清，这种反对立场大多都是“要么赢，要么出局”的类型。
- 146 见第2章注释(136)所引 *Crisis of Democracy*。也可参看《“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 147 有关以这些方式进行的凭空猜想，见Sandy Vogelsang, *The Long Dark Night of the Sou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148 Nathan Glazer, “American Jews and Israel: The Last Support,” *Interchange*, November 1976.
- 149 Gordon Connell-Smith,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Oxford: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6), 343.
- 150 看一看亨利·基辛格对“政治家”特征的描述：“他们依据实用性来判断各种想法，而不依据其‘真实性’。”“真实性”一词被加上了引号，反映出基辛格对这个概念的轻蔑态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抱怨太难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风格”打交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本质……是这样的观点：诸如社会结构、经济进

程，尤其是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都比政治家的个人信念重要……苏联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不会让他们欣然接受有关善意的声明。”我们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参见“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Norton, 1969)。

在几页之后，基辛格便指出“当代国际秩序中最深刻的问题”：不是肤浅之人一直考虑的饥饿、战争、压迫或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争论围绕着两种政策风格之间的“基本区别”和一个“哲学视角的分歧”。这个“哲学视角的分歧”把“深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从不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文化中分离了出去，这些文化现在仍然相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几乎完全是‘内在的’”。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6章。

- 151 这个术语被用在Isaiah Berlin, “The Bent Twig,”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上下文表明的是，作者主要想到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俯首帖耳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一个恰当却不太普遍的用法。
- 152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专家”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专家指那些在权威面前卑躬屈膝的人，无论真相可能是什么——或者像基辛格说的那种“真实性”（看一看亨利·基辛格对“政治家”特征的描述：“他们依据实用性来判断各种想法，而不依据其‘真实性’。”“真实性”一词被加上了引号，反映出基辛格对这个概念的轻蔑态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抱怨太难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风格”打交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本质……是这样的观点：诸如社会结构、经济进程，尤其是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都比政治家的个人信念重要……苏联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不会让他们欣然接受有关善意的声明。”我们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参见“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Norton, 1969)。在几页之后，基辛格便指出“当代国际秩序中最深刻的问题”：不是肤浅之人一直考虑的饥饿、战争、压迫或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争论围绕着两种政策风格之间的“基本区别”和一个“哲学视角的分歧”。这个“哲学视角的分歧”把“深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从不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文化中分离了出去，这些文化现在仍然相信“现实世界对于观察者而言几乎完全是‘内在的’”。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6章。)。
- 153 在第2章注释(150)引述的文章中，基辛格评论道：“法律和商业……为美国领导集团的核心提供了装备。”从目前来看，他是对的。但是有哪些律师呢？那些为黑人民权辩护的律师吗？显然不是。反而，大部分是那些与公司利益挂钩的律师。又有哪些商人呢？杂货店店主吗？显然是“商业精英”。基辛格补充说，他们的特殊才能就是他们“操控已知事实的能力”——这是他们与那些还要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工匠和农民所共有的一种能力。抛却这个特别的困惑，基辛格小心绕开的事实是，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掌控在拥有个人权力的人手中。一些意识形态专家则更加直率，比如亨廷顿。他（在《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中）写道：“杜鲁门已经能够依靠相当少数的华尔街律师和银行家来管理国家”，尽管他也担心这些快乐时光会很快结束，因为其他集团已经“动员并组织起来”推动自身利益而导致了“民主的危机”。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 154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第82页。

(155) 沃尔特·迪安·伯纳姆 (Walter Dean Burnham, 1930—)，美国政治理论家，擅长对选举结果和选民调查做量化分析。

156 *Triologue*, Fall 1976.

157 例如，里昂·维瑟提尔 (Leon Wieseltier) 说，我的政治著作“是左派偏执症的丰碑，主要为了表明这个国家的新闻界是‘受国家支持的宣传体系’；乔姆斯基所写的有关柬埔寨屠杀的内容，还没有他抨击让·拉库蒂尔 (Jean Lacouture) 错误地引用屠杀受害者的人数时表现得那么愤怒”（《新共和》，1981年9月23日）。一转向事实，所谓的“引用”简直是胡编乱造。其次，以下这段总结性的话准确地说明了我对拉库蒂尔进行“抨击”的本质：“看一下评论期刊就会明白，在西方被当作知识分子话语的部分，包括政治讨论，更正错误确实很少见。拉库蒂尔脱离了一般的规范，值得赞许。我们认为，他的更正是不正确的，并与其表达的一些结论不符。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误读并不是罪——不犯错误的评论很少，只有发现错误时公布更正的内容才是正确的。”（*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2, 377）相比之下，我们把红色高棉的“暴行记录”描述为“大量的、常常令人恐惧的”等。

维瑟提尔的确认为，新闻界的一些批评并非偏执症：“有一件丑闻，那就是[媒体]报道中东时提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道德和政治名望。”美国新闻界的每位读者都会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心知肚明。

既然我“对拉库蒂尔进行的抨击”呈现出自身的神秘色彩，讲点有关事实的话就够了（细节参见同上出处）。1977年初，拉库蒂尔在《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和《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对方济·蓬绍德（François Ponchaud，法国天主教神父，1965—1975年在柬埔寨传教，先后发表文章和著作揭露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柬埔寨的种族屠杀和践踏人权行为。——译者注）所著的《柬埔寨公元零年》（*Cambodge année zéro*）的评述，后来作为对蓬绍德作品的权威解读被新闻界大量地引用。我读过这本书，发觉拉库蒂尔在评述中引述该书的部分几乎都不太准确。有关维瑟提尔暗示的情况，拉库蒂尔声称，红色高棉“自夸”说杀害了大约200万人。他显然基于蓬绍德的估计：80万人在战争中被杀害，约120万人因各种原因死亡。我私下给拉库蒂尔写了一封信，指出一连串这样的错误并建议他公布更正的信息。拉库蒂尔在《纽约书评》上（但未在法国）公布了一部分的更正信息，还反问我“该政权杀害几万或十几万卑鄙之徒”是否如此关系重大（他原本说的是“自夸”说杀害了200万人）。在《国家》（*Nation*）杂志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赫尔曼（E. S. Herman）和我把蓬绍德的书推荐为“严肃而有价值的读物”，并强调他“严肃地陈述了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有关红色高棉野蛮对待他们的情况”；我们也回应了拉库蒂尔的反问并声明说，我们认为事实至关重要，而估算死亡人数时100或1 000这样的数差才无关紧要。我们还指出，对死亡人数的估算普遍不一致，无论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46年在香港创刊，曾是亚洲一流的商业新闻周刊。——译者注）（“可能上万人”被杀害）还是拉库蒂尔原先所说的200万人的数字。我们还补充说，我们没有资格断定哪种估算是对的，但拉库蒂尔自己在几个月之间从宣称的杀害200万人变成了可能上万人被杀。接着，国际新闻界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欺骗和信口雌黄的行动，宣称我在否认波尔布特的罪行；一些新闻媒体（包括《新共和》，曾多次）拒绝我做出答复

的正当权利。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其著作美国版的前言中，蓬绍德引用了我对该书的称赞，并转而称赞我在有关柬埔寨（实际上包括波尔布特时期发生的一切）的文章里所显示的“负责任的态度和精准的思维”。在同一天的全球版作者前言中，这些话被删去并换上了这席话：我“严厉地批评了”他的书，还宣称没有发生什么“屠杀”，并强调人们应依赖该政权“精心筛选的官方声明”而不要听什么难民证词——蓬绍德十分清楚，这些都是谎言。对比一下不在其他地方发行的同期美国版和不在美国发行的全球版。蓬绍德在全球版中的说法被多次地重复之后，实际上又被传回美国，在这里，他的说法和对这种欺骗的曝光一样，都被忽略了。美国不是一个能审视过往记录的地方，但过往记录却带来了耐人寻味的领悟，让我们体察到大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对以下这种奇特观点的态度：即使众口一词地谴责官方敌人时，也要尽量地坚守真相。

- 158 接下来有关战争—和平研究项目的评论依据Laurence H. Shoup, “Shaping the Postwar World,” *Insurgent Sociologist* 5, no. 3 (Spring 1975), 其中有关于随后出现的引文的详细参考资料。还可以参考的重要研究有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据我所知，这是该项目的第一个严肃研究，于1977年初公布，除了威廉·邦迪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期刊（*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7）上例行公事似的谴责之外，并未引起任何反响。
- 159 参见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和David P. Calleo and Benjamin M. Rowland, *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据我所知，柯尔克是第一位认真调查该问题的历史学家。卡里奥和罗兰总结道：“战争已经耗尽了英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负责。”
- 160 有关西方政策如何或是否有意促成这种结果的问题，争议颇多。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德国建筑师，在纳粹统治期间任第三帝国军备部长、建筑总监。——译者注）回忆了希特勒和西方国家直接合作的“唯一一次实例”，即安排把被希腊小岛附近的英国舰队拦截的德国军队转移到苏联前线，这使英国（而非苏联）得以占领了萨洛尼卡（Salonika）。参见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Avon Books, 1971), 509。
- 161 参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注释4。
- 162 参见之前所引用的柯尔克，第302页。
- 163 当时以及之后许多年里，西半球都不是主要的生产区。直到1968年，北美在石油生产上才超过中东。参见John Blair, *The Control of O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 164 有关为扩大美国石油公司的势力应如何应用或废除该原则的讨论，见1975年1月2日美国参议院递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跨国石油公司与美国的外交政策》（*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下文简称为“MNOC”）（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 165 参见Michael Tanzer, *The Energy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尤其是作者关于把其他国家转变为石油经济的各种手段的讨论。还可参见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168) 伊本·沙特 (Ibn Saud, 1880—1953), 沙特阿拉伯第一任国王。

166 该计划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加给石油公司的, 自然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这是几个实例中的一例, 揭露了美国政府如何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利益而不顾公司系统中主要部门的局部短期利益。相关的讨论,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

据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中东协调员说, 美国占有的40%份额被分配给五个美国大公司, 并说服每家公司给美国的独立公司让出1%用于“窗口装饰”(MNOC, 71)。应当记住的是, 不久之前, 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建议下, 杜鲁门总统因“国家安全”叫停了对该石油卡特尔的大陪审团调查。他们建议说, “本着一切实际目的, 美国的石油经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也许还会反过来补充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公司的长期利益指导。

167 Yoshio Tsurumi, “Japan,” in “The Oil Crisis: In Perspective,” *Daedalus*, Fall 1975. 谈到战前时期, 这位作者还对“美国式传奇”(即“如果不是彻底敌对的关系的话, 政府和美国商界一直公平来往、互相不支配彼此”)做出了评论——Revi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1976。应当注意的是, 在前一条注释引述的情况中, 也许偶尔会发生局部的冲突, 因为既然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广义上的代理机构, 政府也许与某些特别部门考虑的不一樣。

(169) 即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简称“Saudi Aramco”, 即阿美石油公司。

(170) 沙阿 (Shah), 亦译为“沙”, 波斯语中对皇帝或国王的称呼。1953年8月19日, 在英美情报机关的策动下, 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 (Mohammad Mosaddegh), 由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Mohammed Reza Pahlavi) 主政, 直至1979年2月被推翻。

171 有关这些备忘录内容的评论, 见Richard B. Du Boff, “Business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N. Chomsky and H.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收录于《格拉韦尔 [Gravel] 参议员版: 五角大楼文件》第5卷 (Boston: Beacon, 1972)。有关五角大楼文件如何有助于理解美国帝国主义规划的更多讨论, 见同一卷中John Dower, “The Superdomino in Postwar Asia”以及我的《因为国家》一书, 尤其是第31—66页。

172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1976.

173 Robert L. Galluci, *Neither Peace nor Honor: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Military Policy in Vietna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对“军事政策”的限制很严格; 有关美国干涉越南的基本决策过程, 未见任何讨论。

174 主要由于学生运动的影响, 很难彻底忽略所谓的激进批评, 尽管 (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 对美国和其他强国一样行为处事的假设应被视为特别的“激进”, 缘何如此倒也不那么显而易见。实际上, 一些发表的文章试图谈论激进的批评。据我所知, 最严肃的著作是Robert W. Tucker, *The Radical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有关那些能完全摧毁他 (和别人) 的分析的事实和逻辑上的严重错误, 见《因为国家》。有关对“激进

的批评”评论文献的精辟讨论，见Stephen Shalom,“Economic Interest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未出版，改编自作者在波士顿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US-Philippine Relations: 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1976)。在五角大楼文件研究项目负责人莱斯利·H.盖尔布（Leslie H. Gelb）的研究（与Richard K. Betts 合著，*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中，有一个关于回避和曲解“激进的批评”的有趣例子。他一开始概述了九种“在越战文献中提出的对美国干涉的广泛解释”。前两个是“理想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后一种据说是我的解释；有关评论，见《因为国家》，第63—65页）。盖尔布接着解释为何这些“刻板的模式失败”，包括前两个解释，尤其是第二个。他毫不歪曲地陈述的第二个解释也是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地方记载的一个观点，他却有条不紊地忽略了这一事实。有趣的是，他的缺陷分析涵盖了前两个解释之外的所有理论，这两个解释在该缺陷分析中被忽略，之后也是如此。与所说的这种“刻板模式”的失败有些许关联的评论是：“但无论这些解释如何组合，它们都更适合作为对美国原本为何干涉和出兵越南这一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对干涉过程、作战策略和越战结束策略的分析。”即使这样陈述也是错误的。事实上，盖尔布对五角大楼文件研究中所记录的、其书中所忽略的“激进的批评”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策略演变，也为尼克松—基辛格在败局中力挽狂澜的努力，甚至为扩大和维护美国巨大（即使是部分）的胜利（即摧毁印度支那，成功地改变了在其他地方可能被效法而顺利发展的、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战后政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3章）。但即使假设盖尔布的评论很精准，请注意其中的暗示。有关美国政策缘由的研究被认为离题太远、毫不相关，我们必须关注该政策如何被执行。当盖尔布提到“鸽派”时，他只关注那些认为美国会失败的“悲观主义者”，盖尔布说他们“未被忽视”，这表明“系统还在运转”。唯一能被严肃对待的有关美国政策的分析，是那些试图解释为何“美国在越南失利”的分析，而不是那些拒绝接受美国有权成功这一假设的分析。

有些人认为，关注法国人的情感和法国在欧洲的角色，在美国制定早期政策中举足轻重。盖尔布也是其中一人。但这也许是个小因素，档案记录清楚地显示，有关远东的帝国主义策略更加重要。盖尔布并未意识到后一种因素，却毫无证据地把它曲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倒置”，“经济利益被用来为政治利益打掩护”。可以用以下事实就能轻易地解释为何上一种观点大行其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高深的”理论）：它对国家宗教的威胁，不及五角大楼文件大量细节中披露的实际规划记录对国家宗教的威胁那么大。

即使在为实现不同目标的策略的细小问题上，他所使用的档案证据也需要被仔细地调查。例如，讨论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后果时，他没有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反应（NSC 5429/2，1954年8月20日）。我们也能找到很好的理由。如果我们看看这份档案的内容，它记录了美国为应对严重的威胁（即印度支那可能迎来和平）所采取的颠覆和侵略东亚的计划。见《因为国家》，第100—101页（还有后面的第140页）。有趣的是，正如《因为国家》所强调的那样，该档案甚至被五角大楼的文件研究严重地曲解了。

- 176 Lawrence B. Kraus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September 1972.
- 177 Ray, "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178)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1921—1990), 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研究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 (179) 加布里尔·柯尔克 (Gabriel Kolko, 1933—2014),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冷战研究专家。
- 180 Gaddis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Vill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10, 1976.
- (181) 指巴伐利亚无产阶级于1919年4月13日宣布成立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后来遭到反革命军队镇压之后于当年5月以失败告终。
- 182 引自Charles B. Maurer, *Call to Revolu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4.
- 183 这是商业报刊无法不意识到的事实, 尽管商人们不断地抱怨凭自己的“讯息”很难接触到公众意见。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章。
- 184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11章。
- 185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usiness Week*, March 29, 1976.
- 186 *Winning the Cold War: The U. S. Ideological Offensive*,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88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Part VIII, U. 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 January 15 and 16, 196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953-954.
- 187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 国际开发署训练的警察是最恶劣的虐待者和凶手。萨尔瓦多就是最新的例子。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序言。被美国人训练过的军队很擅于镇压和屠杀。就这个话题, 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I以及这里引述的参考文献。

只举一个例子。想一想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发起的一次攻击导致“乡村上万人死去, 怀疑窝藏游击队的村子全部都被摧毁”。据村民们描述, 发生过“空袭、即时处决和严加拷打……很多人相信, 正在进行的由美国支持的‘农民战争’项目 [受到国际开发署的大力资助] 实际上是在掩盖北部的反游击队活动”, 这些军事行动正在北部进行。此外, “大约85%的国民警卫队负责人在尼加拉瓜的反游击队战争中直接受到美国的培训”。尼加拉瓜是“唯一一个把军事学院每年的毕业班全部送去参加一整年训练的国家”, 他们就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陆军学校受训。见Stephen Kinzer, "Nicaragua,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New Republic*, April 9, 1977。在一封神父的来信中, 尼加拉瓜七位主要的天主教高级教士谴责了主导这个国家的“残暴的恐怖气氛”。见Jean-Claude Buher, "Les droits de l'homme en Amérique centra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y 1977。连通常

很荒谬的国务院《人权报告》(*Human Rights Reports*) 都承认, 尼加拉瓜也许有一些问题(主要由于受古巴支持的游击队活动), 当然也完全忽略了美国的作用。参见1977年3月美国参议院递交给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外援助小组委员会的《人权报告》(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有关这些报告的讨论, 见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I。

188 Otto H. Kahn, *The My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4. 这是美国商人委员会的出版物, 原本是1924年12月30日在由工业民主联盟组织的有关美国帝国主义主题的会上所做的发言, 该部分的题目是“政治或军事帝国主义的主张”(“The Allegation of Political or Military Imperialism”)。

189 有关参考资料, 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章。

(190) 即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 智利社会主义政治家, 1970年当选总统, 1973年在军事政变中遇害。

191 James Chace, “American Interven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76.

(194)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 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1947年, 凯南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美国应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 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

192 Chace, “How ‘Moral’ Can We Get ? ” *New York Times*, May 22, 1977.

193 当然, 也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把这些说法看成是对美国政治分析辞令中“稳定”一词真正含义的证明。

195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1945-60*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1962).

(196) “铁幕”指苏联和东欧在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所建立的障碍及彼此的隔绝; “竹幕”是铁幕在亚洲的扩展, 指在冷战期间东亚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 的势力范围。作者此处把两个术语合二为一。

197 Sixto Lopez, “The Philippine Problem: A Proposition for a Solution,” *The Outlook*, April 13, 1901.

198 “How ‘Moral’ Can We Get ? ”其中“经常”一词用得有些轻描淡写。

(201) 当时, 美军在“共同警备区”(韩方一侧) 要砍掉一棵阻挡联军观测站的白杨树。后来, 朝鲜士兵到场, 在争执中将美方两名军官砍死。该事件导致驻韩美军专门制订了作战计划, 并从本土调来了轰炸机。

199 1977年3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 发言刊载于3月25日的《纽约时报》。

200 在本特利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Boston Globe*, May 18, 1975。见第5篇《重铸历史》。

202 William Beecher, “US show of force impressed N. Korea,” *Boston Globe*, September 3, 1976.

203 Quarterly Review Staff Study, “The Attack on the Irrigation Dams in North Korea,” *Air Universities Quarterly Review* 6, no. 4 (Winter 1953—1954). 也可参见

Robert Frank Futrell,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61), 623-624。

204 John Osborne, *New Republic*, June 7, 1975. 有关这位勇敢维护国家荣誉之人的更多思想，见《“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章。

205 有关此前直至1978年这段时期的文件和更多的详情，见Chomsky and E. S. Herma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vol. 1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chap. 2, section 4.4 , 还有此处引用的参考文献。也可参见Arnold Kohen andJohn Taylor, *An Act of Genocide*, TAPOL, U.K. (1979) ; 获取地址是the East Tim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Box 363, Clinton Station, Syracuse, NY 13201。

(206) 全称为“União Democrática Timorense”，葡萄牙语。

(207) 全称为“Frente Revolucionária de Timor-Leste Independente”，葡萄牙语。

(208) 杰克·安德森 (Jack Anderson , 1922—1905) ，美国报纸专栏作家，1972年获得普利策奖。

209 Jack Anderso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 1979. 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空军上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说：“我认为，从根本上看这就是一件承认现实的事情。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合理的选择……没有理由与印尼人为敌……东帝汶是一个无法独立生存的实体。”参见Daniel Southerland , “U.S. role in plight of Timor: an issue that won’t go awa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6, 1980。

美国官员反复地强调，美国并不清楚在帝汶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显然一贯如此，这仅是托词。参看前面所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 (E. S. Herman) 著作的相关部分以及该书后记。安德森指出，1975年9月19日的一份美国机密情报汇报了这次遭“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顽强抵抗”的印尼的侵袭。另一篇报告谈到，印尼将领“对苏哈托总统在葡属帝汶问题上的懈怠态度已失去了耐心，并……对其施压，使其批准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12月3日的一份情报提到，“印尼文职政府的高级官员已做出决定，认为对印尼来说，解决葡属帝汶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发动公开的进攻”。另一份报告则警告福特和基辛格，苏哈托会在他们访问雅加达时提出帝汶问题，并“试图博得（福特的）同情”。福特对此次入侵表示了“默许”，而他告诉安德森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站在印尼的立场上”。实际上，美国无疑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局势。

(210) 即东帝汶人权委员会 (East Timor Human Rights Committee) ，详情见本文注释1。

211 福特政府和后来的卡特政府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仅为大屠杀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对如何使用美国军备不加限制，这显然违反了要求美国武器仅用于防御性目的的1958年美—印尼双边武器协定。来自政府的证人戴维·肯尼 (David Kenny) 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道：“只要我们给予印尼军事支持，我们就不会告诉他们该在何处动用或不动用。我们至今都没这样做过。” (《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

委员会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听证会》，众议院第96届国会和会议，1980年，第193页）肯尼当时是美国国务院国会关系办公室人权立法管理官员（原文这样说），也是印尼研究专家。从1975至1979年，美国对印尼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大部分在卡特政府宣布加快武器输送之后提供。见Scot Si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nocide in East Tim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1, no. 1 (1981)。

(212) 丹尼尔·P. 莫尼翰 (Daniel P. Moynihan, 1927—2003)，美国政治家、社会学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驻印度大使。

213 Daniel P. Moynihan with Suzanne Weaver, *A Dangerous Pla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214 也并非无人作出努力。1980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时任参议员莫尼翰（他很厚颜无耻）针对联合国诚信委员会发言的报道。《纽约时报》报道说：“莫尼翰参议员所针对的发言的会议旨在评估联合国的方向，在会上公布了一份由100多名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签署的声明，他们谴责这个世界组织‘不再是社会公正、人权和国家平等的守护者’。声明指出，该组织‘被不相干的政治阴谋所侵害’，并‘有成为反和平力量的危险’。”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印尼入侵东帝汶的社论，说此次入侵导致“十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个国家“就像柬埔寨一样……已等同于饥荒和难民”。“美国给予了一些紧急援助”，社论写道，“但华盛顿的作用不太光彩”。华盛顿的实际作用并未详加叙述；社论的题目是“印尼之辱”。我写了一封信，就其中的失察以及这篇社论与某人发言之间的有趣关联加以评论，说此人以贬损联合国无法有效地阻止屠杀而自傲，同时又因其“被不相干的政治阴谋所侵害”而谴责它有反和平的危险。这封信没有被发表。

联合国诚信委员会关注的当然不是帝汶，而是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获得权利，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联合国的主要罪过。喜欢滑稽场面的人可以看一看1980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以色列游说团，他们在业余时间是一个人权组织，谴责联合国“对库尔德人、柏柏尔人和数百万困在柬埔寨、越南和帝汶的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保持沉默”。尽管美国新闻界有效地掩盖了美国阻止联合国抗议的企图，也闭口不提联合国的抗议，联合国对帝汶并未保持沉默（我们对此尤为关注）。莫尼翰意外地成为把这则广告投放在《纽约时报》上的那个组织的大英雄（该组织是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被以色列新闻界称为在美国宣传以色列的“中流砥柱之一”；本尼·兰多 [Beni Landau]，《国土报》[*Ha'aretz*]，1981年7月28日)。“一九八四”到来了。

谈及联合国对柬埔寨和越南保持沉默，也许并非暗指美国对这些地区肆意蹂躏的那段时期。一位国务院官员显然记得莫尼翰，他承认说，我们在帝汶的政策“并非友善的疏忽，而是恶意的疏忽”（Southerland, 见此前注释所引述的文章——尽管也许不能把美国输送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及其运用不相干的政治阴谋积极侵害联合国的努力准确地称为“疏忽”）。

215 更多细节见前面引述过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美国“侵害”联合国的行为显

然不局限于莫尼翰之辈的“政治阴谋”。在印尼入侵东帝汶几周以后，联合国曾派出一支探寻真相的代表团，但印尼用诸如对代表团原计划到达的区域进行轰炸等伎俩阻止其到达该地区。杰克·安德森（《华盛顿邮报》，1979年11月8日）依据美国的情报文件报道了美国所做的帮助。印尼当局一度考虑击沉载有联合国观察员的护卫舰。“美国情报机构得知了这个离奇的计划，但把这个消息深埋于文件之中，并未向联合国代表团警告说他们的船会受到鱼雷的袭击。”

21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uman Rights and U. S. Foreign Assistance*, Report for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1979), 144.

217 Kathleen Teltsch, “Timor Priest, Charging Genocide, Seeks U. S. Hel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79.

218 Robert Levey, “Power play cripples E. Timor,” *Boston Globe*, January 20, 1980.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职业记者所做的最准确、最全面的报道。丹尼尔·萨瑟兰（Daniel Southerland）也报道了列奥纳多神父的证词，见Daniel Southerland, “East Timor’s agony rivals that of Cambodia,” *Christen Science Monitor*, international edition, December 17, 1979. 该报道引述了神父的叙述：“印尼人动用步兵部队发动了残酷的进攻，还动用了美国提供的武装侦察机OV-10‘野马’（Bronco）。他们把人们集中在村庄和再安置中心。他们偷拿了至少一部分救济食物并将其出售。”

萨瑟兰提到：“列奥纳多神父也许会很乐意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没人邀请他去作证，这也许会冒犯印尼人，当然也会重新引发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争论。”他所说的是12月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重新引发”争论的说法有点误导性，因为争论并非主流，几乎不受美国媒体关注。还可参见Daniel Southerland, “East Timor: plight worse than Cambodia?” *Christe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6, 1979.

219 见前面所引述的特尔奇（Teltsch）的文章。然而，列奥纳多神父的证词的确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强硬的社论（《非正义的东帝汶战争》[“An Unjust War in East Timor”]，1979年12月24日），这是它首次谴责这场始于1975年的战争。社论指出：“虽然大多数镇压性武器由美国制造，华盛顿却出于常见的实用主义原因绝口不谈自己的关注程度……美国对于东帝汶的沉默，与对于柬埔寨的愤慨形成奇特的对比；两个地区都遭受了很大的苦难。”然而，这种对比并不奇怪；柬埔寨的苦难可以归咎于官方的敌人，而帝汶的苦难需由美国负责，这种对比因而是可以预见的。该社论正确地指出：“美国人只是逐渐地意识到，印尼对遥远的东帝汶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却并未解释美国支持下的屠杀持续了四年之久而美国人并未觉察的原因。

220 Jimmy Burns, “Indonesian troops ‘taking supplies for the starving,’” *Observer*, January 20, 1980.

221 David Watts, “Relief is reaching East Timor but thousands have already died from Indonesian starvation policy,” *The Times* (London), December 14, 1979.

222 具体参考资料以及进一步讨论，见此前所引用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

223 Henry Kamm, “War-Ravaged Timor Struggles Back from Abys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80. 凯姆（时任《纽约时报》通讯记者，1978年因报道印度支那难民状况而获得普利策奖。——译者注）写道：“来自雅加达印尼军情处的本尼·曼迪拉卡（Benny Mandalika）少校总是在场，无论是对普通民众还是对帝汶裔印尼长官做采访，他都做了记录，并经常堂而皇之地看看记者做的笔记。被问起为何如此行事时，他解释道：‘我必须陪着你，这样你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上司告诉我，你们去哪里，我都陪着。如果你采访街上的人，你也许会得到错误的信息。’”

凯姆评论道，印尼的侵吞和绥靖过程“一直被双方具有偏向性的宣传所掩盖”，他认定，能够说出“双方都给人们施加压力，他们野蛮地发动战争，使许多人逃亡”的就是“最不具偏向性的消息提供者”，但并未解释依据是什么。例如，为什么列奥纳多神父不是“最不具偏向性的消息提供者之一”？或者为什么不是其他很多反对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难民、天主教神父以及那些私下传递申诉迫使印尼终止屠杀的写信者？《泰晤士报》驻东南亚的通讯记者们多年来有意地忽略了这些写信者，现在仍然如此。这些信息提供方并未宣称，战争暴行由双方平摊。鉴于兵力范围和印尼对平民所发动的袭击的本质，这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凯姆所表现出的公正，并不比他早年间对印尼将领们的说法鹦鹉学舌般的重述更令人信服。他所提到的“双方具有偏向性的宣传”也并未传递这一事实：进行偏向性宣传的一方，即美国政府，完全控制了媒体报道，而媒体报道的内容通常被自由媒体也呈现为客观事实。更多的细节见前面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

与凯姆的文章一起出现的还有一则一页长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广告，并附有其主席利奥·彻恩的签名。这则广告呼吁人们采取行动，迫使越南人及其苏联支持者允许将援助送抵柬埔寨：“除了扩大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目前需要的是发出愤慨的高声呐喊，让越南和苏联听到。如果说莫斯科和河内的人民对来自全世界的意见不为所动，这不是真的。他们会因羞耻而采取行动。如果他们做不到，至少我们会努力。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让他们逍遥法外。”与此同时，在柬埔寨，国际救援官员碰巧一直在坚称，越南人和他们在柬埔寨设立的政权正在竭尽所能地治理被毁坏地区的饥荒。

有关彻恩对难民的关心，见TNCW第2章注释1。

224 James M. Markham, “Refugees from East Timor Report Famine Situa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80. 马克汉姆报道了自1979年末以来的难民证词，东帝汶的华裔设法行贿逃出那里，其中一个人用这些词进行叙述：“人人都想走。这是一片邪恶之地。”他们不愿意说得太多，“因为害怕印尼人对自己的家人打击报复，他们想用钱换回家人的自由”。他们说起过毒打、处决、大批人死于饥饿、印尼官员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转移、折磨和人口失踪、强制使用印尼国籍、“看起来是小型美国‘野马’侦察攻击机”所进行的定期轰炸，还有许多印尼伤亡者“被直升机运往帝力的军队医院”。有个人把帝力说成是“恐怖的世界”。与里斯本的其他难民一样，大部分帝汶难民似乎不关心政治。一个“面相粗犷的男子”说，他被“游击队带到了山区，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帝汶民主联盟的成员”，而“他的情绪似乎更多地受抓获他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成员的影响，而不是受印尼人的影响”。

之前，美国记者小心谨慎地回避谈到里斯本的难民，或至少是他们有关帝汶的证词（参阅前面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有一次，为了克服新闻界无法报道难民证词的问题，帝汶难民被关注该问题的私人团体带到了美国。例如，四位难民（其中三位是马克汉姆的消息提供者）于1980年1月中旬被带到了美国，和几家主要报纸的编辑见面，但据我所知，他们的证词根本没有出现在美国新闻里。这些做法使得查找或留心难民证词的工作一筹莫展。有人也许说，新闻界应对“预先挑选的”难民保持怀疑的态度。如果新闻界没有谨慎地避免自己去挑选难民的话，这个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为避免让帝汶难民提供那些无法接受、不受欢迎的信息，新闻界一直在模仿国务院的做法。见TNCW第372页。

225 见前面所引述的文章以及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在《乡村之音》（*Village Voice*）中的许多重要报道和评论。还可参见“Another Cambodia, with Uncle Sam in a supporting role,” *New Republic*, November 3, 1979。这篇文章大体上是准确的，还有编辑莫顿·康德拉克（Morton Kondracke）的签名。另外还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East Timor—the other famine,” December 18, 1979。该社论呼吁“倾注同情”，却完全忽略了美国在导致它所叙述的恐怖中起到的作用。

226 有关西方对此次屠杀的反应，见TNCW第372—373页。

227 有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见前面所引述的乔姆斯基与赫尔曼的著作第4章第1节。

(229) A. J. 兰古斯（A. J. Langguth, 1933—2014），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教育家、战争研究专家。

(232) 迪斯·普兰（Dith Pran, 1942—2008），柬埔寨大屠杀的难民和幸存者，后成为摄影记者、作家。

228 Arnold Kohen, “The Cruel Case of Indonesia,” *Nation*, November 26, 1977.

230 A. J. Langguth, review of Chomsky and Herman, op. cit., *Nation*, February 16, 1980.

231 “The New Foreign Correspondence,”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 March 1980.

233 尤其见弗朗斯科·马利亚·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Maria Fernandes）神父和阿波利纳里奥·古特雷斯（Apolinario Guterres）神父提交的声明，他们都是天主教教士，“代表着葡萄牙的东帝汶难民委员会”。他们说自己“被印尼人强迫离开帝汶，因为我们代表在西帝汶的东帝汶人向雅加达的皇家荷兰大使递交了申诉，要求他帮助把这些人疏散到葡萄牙”。他们详细地叙述了印尼人在帝汶的暴行，印尼人在西帝汶处死了很多难民。为防止难民前往葡萄牙，印尼人遵从荷兰大使的安排，于1976年5月把7 000难民从西帝汶驱逐至东帝汶等。他们说：“我们说的是大屠杀”，并断定“印尼的密集轰炸战和滥杀一直未曾减弱过”，而成千上万帝汶人被禁止出境，“我国大多数人未曾得到任何帮助，因为他们无法到达救助营地，尤其因为印尼官员大范围的贪污”。国际红十字会项目的一半预算花在给帝汶全境运送救援物资的直升机上。他们评论道：“这些钱会直接进入印尼政府。印尼有飞机和直升机（多亏了美国）来杀害我们的人民，但帮助他们的直升机却为了获利而必须

租用。”

还可参见费尔南德斯神父在1980年6月10日的证词，session of the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ubcommittee on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Agencies, Part 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这在美国新闻中也未曾播出。费尔南德斯神父在此声称，有30万帝汶人可能在此次入侵中丧生。见“Accounts of Repression in East Timor Contradict U.S. View in House Inquiry,” Reute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3, 1980.

234 Bernard D. Nossit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November 12, 1979.

235 “Cambodia and Timor,” editorial,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1980.

(236) 全称为“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237 Bernard D. Nossiter,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2.

238 *Boston Globe*, June 27; June 9, 1982.

239 Nadav Safran, *Israel: The Embattled A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576, 110. 这是一项尽量以同情的角度解读以色列的研究。有关讨论见TNCW第13章。

240 审计总署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告知国会，美国的实际援助也许比公布于众的数字高出60%之多。这是审计总署对美国向以色列的援助进行详细的调查之后得出的初步结果。“有关审计总署的调查有多少能被公布于众的主要问题明年 [1983] 会有进展。”James McCartney,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August 25, 1982.

241 G. Neal Lendenmann, “The Struggle in Congress over Aid Levels to Israel,” *American-Arab Affairs*, Winter 1982—1983 (see chap. 4, note 60, *Fateful Triangle*); *Boston Globe*, September 26, 1982.

242 若要评估美国援助的实际程度，见Thomas Stauff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9, 1981. 若需详细的官方报道，见Yosef Priel, *Davar*, December 10, 1982; Ignacio Klich, *South*, February 1983.

243 Bernard Weinraub,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82.

244 “Senate OK’s foreign aid plan with \$2.6b for Israel,” *Washington Post—Boston Globe*, December 18, 1982.

(245) 伊恩·拉斯提克 (Ian Lustick, 1949—)，美国政治学专家、中东现代史和中东政治专家。

246 Ian S. Lustick, “Israeli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 Amanda Mitchison, “Gift horses,” *New Statesman*, February 4, 1983.

247 以色列情报机关显然是如此行事的。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项报告，中情局的作用

之一是获取“数据让西方反以色列的团体噤声”，同时采取“阴谋破坏、准军事化和心理战计划，例如人身攻击或黑色宣传（指别有用心地、策略性地传播谎言——译者注）”。“几乎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犹太人社区，都有大力支持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同情者，这些联手关系经过精心的培养，成为消息、欺骗性素材、宣传和其他目的的渠道。”“为了抵消反对力量，他们也试图安插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见“Israel: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reprinted in *Counterspy*, May-June 1982. 这是美国记者从伊朗带回的一份文件，美国大使馆被伊朗人占领之后记者们被放回了美国。鉴于当时的情况，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尽管文件本身的特点以及随后有关它的讨论也可以证实。以色列摩萨德（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中央情报局）的前领导人伊赛尔·哈雷尔（Isser Harel）承认了该文件的真实性，但却谴责它“反犹太人”“一边倒且带有恶意”“浅薄”，这说明在写这篇报道的1979年那段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有“改写历史”的倾向。参见Yuval Elizur, *Boston Globe*, February 5, 1982，他引用了《晚报》（*Ma'ariv*，以色列希伯来文日报。——译者注）上的采访。

248 General (Res.) Mattityahu Peled, *New Outlook* (Tel Aviv), May/June 1975. 马蒂亚胡·佩莱德将军在此讲述了他的美国之行。

249 这是《新展望》（*New Outlook*）杂志的编辑西姆哈·弗拉潘于197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后来被中东和平基金会（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会长小莫尔·索普（Merle Thorpe, Jr.）在1981年12月16日第97届国会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和中东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所引述（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第143页。

(250)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1928—2014），以色列军官、政治家。沙龙参加过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多次战争，1981年起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多个政府要职，并指挥了第五次中东战争。沙龙于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直至2006年1月因中风而无法继续履职。

(252) 即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3），以色列政治家，曾在1977—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253) *Gush Emunim*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信仰者集团”。该集团自20世纪末在以色列崛起，是具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团体。

251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5章第5—8节。

254 见上面出处的第4章。

255 Jessie Lurie, *Jewish Post & Opinion*, May 28, 1982.

256 有关他所说的“以色列游说团”的政治影响力，见Seth Tillm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提尔曼（Tillman）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尤其关注中东情况。

257 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写道：“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主席索尔·蔡金

(Sol Chaikin) 的话说, 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Solidarity movement)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 (Victor Gotbaum, 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 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 “我们无法为 [兼并格兰高地] 辩解, 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 很多工人领袖发觉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 (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 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 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258 见Stephen Zunes, “Strange Bedfellows,” *Progressive*, November 1981。他指出, 对以色列的热情支持与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恰好结合在一起。也可参见Richard Bernstein, “Evangelicals Strengthening Bonds With Jew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83以及J.A. James, “Friends in need,”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0, 1983。它们讨论了美国政治中“福音派支持的潜在重要性”及其所掌控的媒体的“强大基础设施”, 还有其中可发掘的巨大财富。《话报》(Davar) 报道说, “在以色列和美国创立并由基督教极端分子赞助的”圣殿山基金 (Temple Mount Fund) 打算向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捐赠几千万美元 (1983年1月23日 [*Israleft News Service*])。以色列新教福音派联盟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可能更加明显, 这种推测十分合理, 在以色列也有人这么说。他们沿袭了危地马拉的模式, 那里的里奥斯·蒙特 (Rios Montt) 政权 (该政权的残暴野蛮甚至超过其前任) 受新教福音派运动的支持, 听从以色列的建议并接受其提供的物资。见TNCW, 第315页及参考文献。也可见第2章注释(247)引用的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该研究称: “以色列人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准军事的行动计划, 尤其在非洲。”里昂·哈达尔在其有关美国工会领导人的报道中提到: 这些领导人尤其“对以色列成功地与第三世界 (尤其在非洲) 联手抵抗苏联的影响印象深刻”——“抵抗苏联的影响”是拒绝使用民族主义各种多余形式时常用的代码。美国的工会官僚应该乐意看到支持蒙博托等人, 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惊奇。里昂·哈达尔 (Leon Hadar, 《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 写道: “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 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 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 主席索尔·蔡金 (Sol Chaikin) 的话说, 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Solidarity movement)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 (Victor Gotbaum, 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 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 “我们无法为 [兼并格兰高地] 辩解, 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 很多工人领袖发觉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 (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 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 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259) 伊扎克·拉宾 (Yitzhak Rabin, 1922—1995), 以色列政治家、军事家, 1974

—1977年出任以色列总理，1992年再次出任总理，1995年被刺杀身亡。

(260) 此处指1973年9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意识到和平谈判的重要性。他在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后积极通过谈判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

261 引自Amnon Kapeliouk, *Israel: la fin des mythes* (Paris: Albin Michel, 1975, 219)。这位优秀的以色列记者写的这本书是有关1967—1973年以色列政府（工党）政策的最佳报道。有人接洽多家美国出版社要求发行英文版，但没有一家愿意这么做。

262 引自Zunes, “Strange bedfellows”。

(265) 全称为“Israel Defense Forces”。

(266)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 1898—1978），以色列女政治家，1969—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

263 参见*Pro-Arab Propaganda in America: Vehicles and Voices: a Handboo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1983); Thomas Mountain, “Campus anti-Zionism,” *Focus*(Brandeis University), February 1983（感谢反毁谤联盟承认这些都是“事实”）；还有在全国各大学传阅的印刷品和小册子，尤其是那些出处不明的资料，分发它们的学生通常以为这些材料都是反诽谤联盟的。

264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第284—285页。

267 Benny Landau, *Ha'arets*, July 28, 1981; Tillm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65; Jolanta Benal, Interview with Meir Pail, *Win*, March 1, 1983.

(268) 原文用Vietnam vintage指越战以后的越南人。

269 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在美国，有很多“巴解组织的拥护者”，甚至连新闻界都是“亲巴解组织的”（《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见第1页的作者注）。也许连巴解组织的支持者也这样认为。当找到例证时，通常发现这些“拥护者”是批评巴解组织的评论家（苛刻的评论家），但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拥有同样的人权和民族权利。

(271) 欧文·豪（Irving Howe, 1920—1993），美国著名犹太裔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主要人物。

270 Nathan and Ruth Ann Perlmutter, *The Real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Arbor House, 1982, 72, 111, 116, 136, 133-134, 159, 125, 231)。该书也包括对以色列政策批评家的各种诋毁和对其观点的歪曲。身处这些圈子的人大致会预想到是这样，但也不会做更多的评价。

(274) 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 1907—1984），英国作家，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

(275) 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以色列政治家、以色列第一位总理，其在任时间为1948—1953和1955—1963年。

272 也许可以指出的是，对于关注这些事实的人而言，“对石油的刻意操控”似乎也是

个轻易的借口（而这种“酸腐的格言”却很少有人评论）。例如，可以参看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乔恩·金奇（Jon Kimche）的评论，他谈到工党政府在使用“石油做武器”之前，其公然的欺骗行径和拒绝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态度是如何将友好的非洲国家排斥在外的。参见Jon Kimche, *There Could Have Been Peace* (New York: Dial Press, 1973), 310-311。

- 273 Abba Eban, *Congress Bi-Weekly*, March 30, 1973; 1972年7月31日发表的演讲；Irving Howe,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About Israel: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73。
- 276 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s to Israel: 1917—194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7。
- (277)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美国犹太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8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 278 Interview, *Jewish Post & Opinion*, November 19, 1982. 采访者戴尔·V·米勒（Dale V. Miller）十分准确地、似乎有所褒扬地把他的立场解释为，批评“范围”是“以色列人唯一的权力”。有关威塞尔对贝鲁特9月大屠杀的态度。
- 279 Safran, *Israel*, 571。
- 280 引自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42。
- 281 有关这一点的讨论，见我的文章“What directions for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 in Michael Albert and David Dellinger, eds., *Beyond Surviva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Disarmament Movement*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 282 引自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188；出自Winston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53), 249。更多近期的讨论，见Lawrence S.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柯尔克夫妇的两册书（引自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242。）对了解一般的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此后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作品，包括在我看来能基本证实他们的分析的大量文献记录，尽管记录中的事实很少被人承认。既然他们没有遵守已被认可的陈规，提到他们的贡献也被视为违背学术伦理。
- (284) 即当时的美国驻希腊大使。
- 283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19, 88。
- 285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 149, 154, 296；要看到广泛的评论和资料，见同一出处。
- (287) 即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1979年伊朗革命后被奉为政治和精神领袖。
- 286 Wittner,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80, 232。

- 288 而且新近以来，日本于1982年取代美国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头号贸易伙伴，也是波斯湾大部分其他石油生产国的第一或第二位供应商。尽管如此，中东还是“美国唯一的海外市场，在过去几年中成长迅速”。参见William O. Beem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30, 1983。
- 289 讨论见TNCW，第2章和第11章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 290 《纽约时报》，1954年8月6日；更多引用及评论，见TNCW，第99页。
- 291 引自TNCW，第457页，转引自MERIP Reports，1981年5月；另见《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 of Palestine Studies*），1981年春季刊。消息来自一则备忘录，获得渠道符合美国信息自由法。
- 292 主管这些行动的官员、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Pinhas Lavon）成为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社会主义工会）的秘书长。据受人尊敬的以色列记者内厄姆·巴尔尼亚（Nahum Barnea）说，拉冯发出的命令比那些导致埃及恐怖行动的命令要“严厉得多”，包括企图“在加沙地带和非军事区的水源中投毒”（《话报》，1979年1月26日）。他并未说明这些所谓的命令是否已被执行。
- 直接负责这些行动的人是阿弗里尔·阿德（Avri el-Ad），他在《荣耀坠落》（*Decline of Honor*, Chicago: Regnery, 1976）一书中叙述了这些行动。见Livia Rokach, *Israel's Sacred Terrorism* (Belmont: AAUG, 1981)，其中有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首相有关这些事件以及当时最高层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日记节选。有关随后的政治—军事危机（拉冯事件），见Yoram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 Israeli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这是一项打破许多错觉的重要研究。
- 293 “Issues Arising Ou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这是1958年1月2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5801/1号文件中的评论，解密日期为1981年12月10日）。
- (296)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1930—1974年为埃塞俄比亚皇帝，1974年政变后退位。
- (297) 伊迪·阿明（Idi Amin，1925—2003），自1976年起任乌干达终身总统，1979年流亡海外。
- 294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261-262.
- 295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James Ennes, *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Richard K. 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June 1978，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后来还有鱼雷艇]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这种解释实属温和。

(298) 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ésé Seko, 1930—1997), 自1965年起任扎伊尔总统, 1997年流亡海外。

(299) 让—贝德尔·博卡萨 (Jean-Bédél Bokassa, 1921—1996), 自1966年起任中非共和国总统, 1979年流亡海外。

300 见TNCW, 第315页及参考文献。也可见第2章注释(247)引用的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该研究称:“以色列人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准军事的行动计划, 尤其在非洲。”里昂·哈达尔在其有关美国工会领导人的报道中提到: 这些领导人尤其“对以色列成功地与第三世界 (尤其在非洲) 联手抵抗苏联的影响印象深刻”——“抵抗苏联的影响”是拒绝使用民族主义各种多余形式时常用的代码。美国的工会官僚应该乐意看到支持蒙博托等人, 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惊奇。里昂·哈达尔 (Leon Hadar, 《国家报》专栏作家。——译者注) 写道: “除了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之外, 工人运动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力量。”无论其成员怎样想, 对工会官员来说的确如此。哈达尔引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 主席索尔·蔡金 (Sol Chaikin) 的话说, 蔡金谴责里根甘愿“‘出卖’以色列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Solidarity movement) ……以安抚其大企业界的朋友”。维克多·戈特鲍姆 (Victor Gotbaum, 美国工人领袖。——译者注) 探讨了以色列支持者所面临的由贝京政府及其“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决定所造成的问题: “我们无法为 [兼并格兰高地] 辩解, 所以我们宁愿保持沉默”; 很多工人领袖觉得自己“把对以色列的爱从与贝京的关系中抽离了出来” (戈特鲍姆)。参见Leon Hadar, “Labour of Love,” *Jerusalem Post*, March 2, 1982。这种辞令自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获得托洛茨基“重要支持”的巅峰岁月之后就少有耳闻。然而, 在关注以色列的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却仍然十分普遍。一些例子可参见TNCW第10章, 下面还会提到更多例子。

301 UPI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Boston Globe*, May 16, 1982。全句是, “商务部透露说, 尽管在对抗游击队的艰苦战争中实行贸易禁运, 美国制造的直升机和零部件还是从以色列运到了罗德西亚 (如今的津巴布韦)”。以色列工党的刊物引用南非军工负责人的话说, 以色列的“技术帮助南非躲避了因其种族政策而被施行的武器禁运” (《话报》, 1982年12月17日)。《以色列日报》 (*Yediot Ahronot*) 引述《伦敦泰晤士报》 (*London Times*) 写道: 通过从以色列人手中转送和维修法国的武器, “以色列的技工正在帮助南非躲避法国武器禁运” (1981年10月29日)。拉宾的工党政府于1970年代中期与南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至今仍然温馨。正如工商部长吉东·帕特 (Gidon Pat) 近期在普利陀利亚所说的那样, “以色列和南非是世界上仅有的30个民主国家中的两个”。同样, 约阿夫·卡尔尼 (Yoav Karni) 报道说, 工党的伽得·亚克维 (Gad Yaakovi) 在以色列的“电视访谈中赞扬了与南非的经济和‘其他’ (也就是军事) 关系”。亚克维还说, 如果他在英国、荷兰或瑞典说出类似的话, 也许会失去他在社会民主党中的成员资格, 尽管他的话在以色列工党内部并未造成麻烦。参见Yoav Karni, “Dr. Shekel and Mr. Apartheid,” *Yediot Ahronot*, March 13, 1983。

关于以色列与南非的广泛关系, 包括军事及其他关系, 见TNCW第293—294页及引用的参考文献; Israel Shahak, *Israel's Global Role* (Belmont: AAUG, 1982); Benjamin Beit-Hallahmi, “South Africa and Israel's Strategy of Survival,” *New*

Outlook (Tel Aviv), April/May 1977; Beit-Hallahmi“, Israel and South Africa 1977-1982: Business as Usual—and More,”*New Outlook*, March 1983，文中有更多关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对南非表现出热情的细节，双方通过以色列安排将南非的货物转运到欧洲和美国，以避免抵制等（尽管工党想隐瞒此事）；Uri Dan“，The Angolan Battlefield,”*Monitin*, January 1982; Carole Collins,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January 22, 1982; 还有其他许多参考来源。

(302) “南锥地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指南美洲南段的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和地区。

303 见TNCW第290—291页及引用的参考文献；Shahak, *Israel's Global Role*; Ignacio Klich,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1982, February 1983; *Washington Report on the Hemisphere*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June 29, 1982;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August 6, September 24, December 17, 24, 1982; *El Pais*（西班牙），March 8-10, 1983；Steve Goldfield, Jane Hunter, and Paul Glickman, *In These Times*, April 13, 1983; 还有其他许多参考来源。最近有报道称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拜特阿尔法集体农庄（Kibbutz Beit Alpha [Mapam]）向智利军队提供了军备（《国土报》，1983年1月7日）。以色列尤其是危地马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经济学人》，1982年4月3日），它帮助美国政府逃避国会的武器禁令，而以色列的军事顾问也十分活跃。对恐怖大屠杀负有责任的危地马拉新政权成功地获取了权力，它将此归功于以色列顾问；其前任政府，即残忍的卢卡斯-加西亚（Lucas Garcia）政权，曾公开表达它对以色列的敬意，视其为“楷模”（见第290页）。有关里奥斯-蒙特政权所达到的残暴新高度，见Allan Nairn, “The Guns of Guatemala,”*New Republic*, April 11, 1983（同时要忽略与以色列的干系，该杂志几乎不讨论这一点）。见本杰明·拜特—哈拉米（Benjamin Beit-Hallahmi）未发表的论文《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军事政权的支持》（“Israel's support for Guatemala's military regimes”），文中的消息来自以色列媒体，还有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我们再回头看看更多的细节问题。关于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理武器供应国面向第三世界各个‘热点地区’”销售武器，见SOUTH, April 1982。武器销售现在占以色列工业出口的三分之一（*Davar Hashavua*, August 27, 1982）。

304 见Michael Klare, in Leila Meo, ed., *U.S Strategy in the Gulf* (Belmont, MA: AAUG, 1981)。

(306) 全称为“N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305 Michael Klare, *Beyond the “Vietnam Syndrom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81)。

(308)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被以色列人称为“加利利和平”（Peace for Galilee）行动，而阿拉伯人则认为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

(309)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1953—），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307 Advertisemen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82；Joseph Churba, lett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1982. 还可见Joseph J. Rose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Israel,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 关于美以关系的文件, 1982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在华盛顿经官方注册的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

310 Thomas L. Friedman, "After Lebanon: The Arab World in Crisi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1982.2

311 蒙博托并非唯一一位有这种想法或被建议如此行事的残暴独裁者。伊梅尔达·马科斯 (Imelda Marcos) 一直是她丈夫的“国际宣传者”, 在1981年12月29日接受左翼刊物《警戒报》(*Al-Harmishmar*) (属于Mapam, 即以以色列统一工人党。——译者注) 采访时, 她解释了他们利用与以色列的关系改善和美国犹太人影响力的意图是“改善在美国媒体中被抹黑的 [菲律宾独裁领导人] 形象, 并改变他们在美国国会不受欢迎的状况”。记者利昂·哈达尔在做评论时谈到了以色列官员的意见, 他们认为, 拥有“负面形象”的其他第三世界独裁者对用这种方法获得美国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很感兴趣, 加强以色列在第三世界的作用是以色列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所获得的优势之一。

312 Tamar Golan, *Ma'ariv*, December 1, 1982; Reuters, *Boston Globe*, January 20, 1983; UP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83.

313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1982.

(315) 路易斯·阿尔贝托·蒙赫 (Luis Alberto Monge, 1925—2016), 1963—1966年任哥斯达黎加首任驻以色列大使, 1982—1986年任哥斯达黎加总统。

314 Susan Morg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4, 1982; "Guatemala: Rightists on the warpath,"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March 4, 1983.

316 最近的诸多事例之一见Marlise Sim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1982。文中引用了美国天主教传教士的话, 他们说: “袭击者们近来不断折磨、摧残抓获的农民和桑蒂诺民主解放阵线 (即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是危地马拉的左翼政党, 于1979年推翻了统治危地马拉长达45年的索摩查家族。——译者注) 的支持者, 制造了与过去一样的恐怖。”同时还提供了例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全美洲美国陆军学院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 受训。

317 梅克林指出, 美国广泛而直接地参与拉美的国家恐怖主义始于肯尼迪政府时期, 当时拉美的军事任务从“半球化防御”转向“内部安全”, 也就是对自己人发动战争。在整个拉丁美洲, 效果都是灾难性的。就影响力而言, 肯尼迪派自由主义者所做的1961年决定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在美国人们却对它知之甚少。

318 Charles Maechling Jr., "The Murderous Mind of the Latin Military,"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8, 1982.

319 见TNCW第429页、第13章及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320 Yoav Karni, "The secret alliance of the 'Fifth World',"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22, 1981. 见TNCW第292—293页。

321 Leslie H. Gelb, "Israel Said to Step Up Latin Role, Offering Arms Seized in

Lebanon,"*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82.

- 322 相关引用和讨论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51)。
- 323 Adam Clymer,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82. 全文见*Le Monde*, June 1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1, 1982。
- 324 相关参考文献见John Cooley, *Green March, Black September* (London: Frank Cass, 1973), 161-162; Chomsky,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140。
- (325) 据《圣经》记载，歌利亚是勇猛的非利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其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了以色列，并成为著名的大卫王。
- 326 美国媒体似乎忽略了以色列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这一重要讨论，除了约翰·库尔利 (John Cooley) 1972年7月17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报道。有关他所说的“围绕以色列诞生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的讨论，见Simha F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9), 317-318。
- 327 Yediot Ahronot, July 26, 1973; 见*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142。
- 328 见Chomsky, "Israel and the New Left," in Mordecai S. Chertoff, ed., *The New Left and the Jews* (New York: Pitman, 1971); 还有*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第5章，其中包括对欧文·豪、西摩·马丁·利普赛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美国知名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等方面的社会学研究。——译者注) 和其他人的一些重要文章进行的讨论。见第5章，下面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 329 见上述注释中有关此事和其他例证的参考文献，我在展现所有参考文献时均不假借证据或理性论据。当目标不在被认可的共识范围之内时，我总是采取这种立场。
- (330) 哈特姆·侯赛因尼 (Hatem Hussaini)，出生于耶路撒冷，后在黎巴嫩、埃及、美国等国生活和工作，曾在华盛顿成立巴勒斯坦信息交流中心 (Palestine Information Center)，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
- (331) 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巴勒斯坦立国主义的积极分子，以提出东方主义著称。
- (332) 法瓦兹·图尔基 (Fawaz Turki)，巴勒斯坦诗人、散文家，曾流亡世界各地。
- (333)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Stokely Carmichael, 1941—1998)，美国民权运动活动家，后来转而支持“黑豹党”，成为“黑人权力”发起人。
- (334) 詹姆斯·佐格比 (James Zogby, 1945—)，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创立者及主席。
- (335) 哈桑·拉曼 (Hassan Rahman, 1944—)，1994—2005年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美国大使。

- (336) 克里斯·基亚路 (Chris Giannou, 1949—), 加拿大籍希腊裔战伤外科医生, 1996—2006年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席外科医生。
- (337) 伊斯雷尔·沙哈克 (Israel Shahak, 1933—2001),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教授、以色列人权及公民权联盟主席。
- (338) 盖尔·布莱斯堡 (Gail Pressberg), “美国即刻和平” (Americans for Peace Now) 组织高级政策顾问, 一直致力于中东发展、和平和能源等问题。
- 339 他们中间还有一直严厉批评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人, 比如恶毒程度排序中的第三个人以及其他。但这份名单中无人达到以色列政府宣传体系中核定的奴性标准, 因此他们也许被某人认为是“支持阿拉伯的”, 这些人把这当作标准来区分“教导”和“宣传”。必须明确指出的是, 我有关该话题的每个发言实际上都经过了某个小型学生或教职人员小组整理。任何熟悉美国的明智之人当然无需被告知就会明白这一点。
- (342) 1954年前后, 以色列特工在埃及策划了一连串恐怖活动, 活动失败之后多名相关人士被拘捕, 最终导致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下台。
- 340 *Jewish Post & Opinion*, November 5, 1982.
- 341 耶路撒冷国内电视台, 1982年9月24日。他的讲话重印于 *The Beirut Massacre* (New York: Claremo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1982), 来源是美国政府对外广播新闻处 (FBIS)。
- 343 理查德·史密思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有迹象表明, 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 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 James Ennes, *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 Richard K. 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June 1978, 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 [后来还有鱼雷艇] 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 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 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 这种解释实属温和。)。他指出, 近年来与之可比的只有日本1937年袭击美国炮艇“帕奈”号 (Panay), 其中有三人死亡。在个人和政府层面, 以色列“出奇麻木的”态度与日本随之而来的更多反应形成了对比。他的结论是: 国家之间无朋友, 只有利益。但他忽略的事实是, 日本无法依靠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掩盖这一事件, 以色列却正确地、理所应当地把这视为一种特权。
- 344 Amos Oz, “Has Israel Altered Its Visio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1982。有关学术界对这些事件的错误表述以及涉及萨夫兰著《以色列》(Israel) 的部分, 见 *TNCW* 第331页。
- 345 媒体对这些事实的罕见记录参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派记者在1982年6月4日发表的文章; 还有 Cecilia Blalock, Amos Oz, “Has Israel Altered Its Visio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1982, 1982年6月22日; Philip Geyelin, *Washington Post*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June 20, 1982)。关于这些事件

及掩盖性报道，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Delacorte, 1978), 315-316; Peri, *Between Battles and Ballots*. 有迹象表明，以色列袭击美国“自由”号间谍船，是出于对美国可能发现此次攻击计划的考虑。见James Ennes, *Assault on the Liber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也可参见Richard K. Smith,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June 1978, 他叙述了“以色列飞行员[后来还有鱼雷艇]如何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庞大的、缓慢移动且毫无防备的‘自由’号”。这艘船被准确无误地辨认了出来。一切都遵照“以色列战争计划的重要部分”，也就是“使外国势力蒙在鼓里”，这样会避免“超级大国在可能获取他们认为对以色列未来安全很有必要的区域之前施压停火”。鉴于停火的事实和可能被提出的一些“安全”问题，这种解释实属温和。；还有Anthony Pearson, *Conspiracy of Silence* (New York: Quartet, 1978) 以及James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346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第5页引自《时代周刊》的话，《时代周刊》被认为对以色列持批评的态度。

(348) 艾毕·福塔斯 (Abe Fortas, 1910—1982)，于1965—196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347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471.

349 William Roge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481.

350 这句话以及随后的话都出自梅尔文·莱弗勒 (Melvyn Leffler, 冷战史学家，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译者注) 的一项富有启示性的研究，即Melvyn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AHR Foru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84.

351 Kolko, *Politics of War*.

352 Samuel Huntington, in M. J. Crozier, S.P. Huntington, and J.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这是三边委员会的报告。有关该委员会，见Holly Sklar, ed., *Trilateralis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0) and 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353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见TNCW的简要评论。见Robert Schulzinger, *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此处记述了一段更浅显的常规历史，略去了舒普 (Shoup) 和敏特 (Minter) 所讨论的关键性材料，却引用了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 谴责他们有“选择性”的“官方驳斥”(《外交事务》，1977年10月)。邦迪和舒尔辛格 (Schulzinger) 都不加分析地摒除了舒普和米特的研究，认为其偏执的视野堪比极右派 (Far Right)。他们的重要研究被忽略了。标准的历史也忽略了凯南在此处引述的立场，连他的回忆录也是如此。有关战争时期和战后早期，尤其请参见Kolko, *Politics of War*；Gabriel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这是两部对大型文献资料有创造性贡献的著作。

- (357) 第五种自由 (the Fifth Freedom) 的说法是从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并被纳入《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四大自由 (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延伸而来的, 是一种非官方说法。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掠夺、剥削、支配以及为确保已有特权得到保障和推进而采取任何方式行动的自由”, 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真正奉行的自由。
- 354 有关参考文献及讨论, 见Noam 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V。
- 355 James Chace, “How ‘Moral’ Can We Ge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77.
- 356 见TNCW第2章。
- (358) 安克雷奇 (Anchorage) 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南部, 是该州最大的城市。
- (360) 暴风突击队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银河帝国的精锐突击队。
- 359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1996年11月1日、11月2日的演讲;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6, Book II (Washington, 1967) 563, 568; *Congressional Record*, March 15, 1948, House, 2883。
- 361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219. 有关更多拓展性的讨论, 见TNCW第195—196页。
- (364) 沃尔特·拉克尔 (Walter Laqueur, 1920—2018), 美国历史学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 (365) 克莱尔·斯特林 (Claire Sterling, 1919—1995), 美国作家、记者, 主要关注犯罪、政治刺杀和恐怖主义。
- (366) Polisario, 即波利萨里奥阵线, 1973年5月10日正式成立, 目标是反抗西班牙对西撒哈拉地区的控制。
- 362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1983), 270, quoting Roger Morris; Morton Halperin et al., *The Lawless State* (New York: Penguin, 1976), 17, citing Hers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1974.
- 363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3), 157.
- 367 Walter Laqueur,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9, 1981; *Economist*, September 19, 1981. 关于美军基地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对古巴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 见Herman, *Real Terror Network*, TNCW和所引述的来源。斯特林倍受赞誉的寓言可能部分基于中央情报局编造的一份文件, 该文件用于测试叛逃者的诚实度, 然后通过贩卖“情报泄漏”植入功能的低劣网络进行传播。见Alexander Cockburn, *Nation*, August 17, 1985。
- 368 *For Reasons of State*, 31-37, 引述了《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 中的资料。
- (370)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 (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 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 1821—1848年任奥地利帝国首相。

- 369 迈克尔·沙勒 (Michael Schaller) 引用了1949年4月总结PPS 51号文件的会议记录, 见Michael Schaller, "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 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82; 该研究还建议, 应当允许“它们经济发展的某种多元化”。有关该话题更完整的陈述, 见Schaller; 约翰·道尔 (John Dower) 和理查德·杜·博夫 (Richard Du Boff) 的文章见Chomsky and Howard Zinn, eds., *Critical Essays*, vol. 5 of the *Pentagon Papers* (Boston: Beacon, 1972); *For Reasons of State*, chap. 1, V.
- 371 Perkins, I, 131, 167, 176—177. 最后一句话是珀金斯 (Perkins) 对欧洲政治家“广为流传的, 不, 几乎是普遍观点”的总结。
- 372 见*For Reasons of State*, 3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II; TNCW; Joel Charny and John Spragens, *Obstacles to Recovery in Vietnam and Kampuchea: U.S. Embargo of Humanitarian Aid*, Boston: Oxfam America, 1984)。
- 373 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286.
- 374 关于这一点, 参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II, 2.2。
- (375) 即毛里斯·毕肖普 (Maurice Bishop, 1944—1983), 格林纳达政治家, 1979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任格林纳达首相。
- 376 有关该问题, 见*At War with Asia*; *For Reasons of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II; 还有其他资料。
- (377) 瓦茨拉夫·哈维尔 (Vaclav Havel, 1936—2011), 捷克作家、剧作家, 1989—199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1991—2003年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 378 Tony Blair, in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Newsweek*, April 19, 1999; Vaclav Havel, "Kosovo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1999.
- 379 Michael Wines, "Two Views of Inhumanity Split the World, Even in Victory,"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lead article, June 13, 1999; Michael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9.
- 380 Bob Davis, "Cop of the World? Clinton Pledges U.S. Power Against Ethnic Cleansing, but His Aides Hedg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1999.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A Just and Necessary War," *New York Times*, May 23; April 1, speech at Norfolk Air Sta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99.
- 381 Sebastian Mallaby, "Uneasy Partners," *New York Book Review*, September 21, 1997. 托马斯·弗里德曼引用了政府高级决策者的话, 见*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92。在此前引述的文献中, 戴维斯也是这样解释桑迪·伯格在某次访谈中的话。
- 382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to Congress, *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 January 31, 2000. Tony Blair, Alan Little, "Moral Combat: NATO

At War,” BBC2 Special, March 12, 2000.

- 383 见4月10—14日发表的《77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宣言》。有关背景信息，见《第三世界的复兴》（*Third World Resurgence*）杂志（马来西亚槟城），2000年第117期。
- (385) 阿莫斯·吉勒博阿（Amos Gilboa，1939—2020），以色列情报专家、作家，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任职。
- 384 Anthony Sampson, “Mandela accuses ‘policeman’ Britain,” *Guardian*, April 5, 2000.
- 386 Schiff, Amnon Barzilai, *Ha’aretz*, April 5, 2000. 有关印度、以色列和埃及的反应，见Noam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chap. 6。
- 387 有关此类事件，见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和*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以下简称“NMH”）。
- 388 Noam Chomsky, *Deterring Dem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和*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以下简称“NMH”）。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和下面的评论。
- 389 Andrew Kramer, “Putin following Yeltsin’s misguided policies, Solzhenitsyn says,” AP,*Boston Globe*, May 17, 2000.
- (390) 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31—2010），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东亚问题专家。
- 391 John Mearsheimer, “India Needs The Bomb,” *New York Times* op-ed, March 24, 2000;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59. Michael MccGwire, “Why did we bomb Belgrad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76. 1, January 2000.
- 392 Christopher Marquis, “Bankrolling Colombia’s War on Drugs,”*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00, 最后一段。
- 393 Tamar Gabelnick, William Hartung, and Jennifer Washburn, *Arming Repression: U.S.Arms Sales to Turkey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World Policy Institute and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1999). 有关其他信息，见NMH。有关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见Adam Isacson and Joy Olson, *Just the Facts: 1999 Edition* (Washington: Latin America Working Group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1999)。在此处以及下文中，均未包括常年处于前列的以色列和埃及，它们分属另一个类别。排名参照的具体核算因素（援助金额、销售额、培训、共同生产、联合演习等）以财政年度为准，并且是定性化的决定。
- 394 参见上一个注释。Jonathan Randal, *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My*

- 395 有关这些事件及其透过原则棱镜所折射的结果，见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有关其最新信息，见 *Rogue Stat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第5章。
- (396) 托马斯·库什曼 (Thomas Cushman, 1959—)，美国卫斯理学院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人权与自由问题。
- (397) 阿耶·奈尔 (Aryeh Neier, 1937—)，美国人权活动家，曾长期担任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执行主席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全国主席。
- 398 Thomas Cushman, edit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Human Rights Review*, January-March 2000; Aryeh Neier, “Inconvenient Facts,” *Dissent*, spring 2000. 两种情况都是对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所评述的受美国支持的土耳其暴行的反应。
- (399) 蒂姆·贾达 (Tim Judah, 1962—)，英国《经济人》杂志的记者和政治分析家，主要关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问题。
- 400 Tim Judah, *Kosovo: War and Reve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8.
- 401 Ferit Demer, Reuters, datelined Tunceli, Turkey, April 1; Chris Morris, *Guardian* (London), April 3, 2000. AP,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 2000.
- (403) 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 402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据黎巴嫩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称，自1982年以来有25 000人被杀害；1982年入侵造成的伤亡人数估计有20 000。
- (405) 联合攻击战斗机 (Joint Strike Fighter, 简称JSF) 是美国在1990年代启动的重大军用飞机研制和采购项目。为应对未来联合作战的机动性需求和高性能战斗机所造成的财政压力，JSF项目通过共用生产线、通用子系统和共用部件等方式，以较为经济的成本生产出能满足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盟友需求的多用途攻击战斗机。
- (406) 朱迪思·米勒 (Judith Miller, 1948—)，美国新闻记者、评论员，曾为《纽约时报》工作。
- 404 “Israel, US vote against funding for UN force in Lebanon,” AP Worldstream, June 15; Marilyn Henry, “Israel, US angered by Kana clause in UN peacekeeping package,” *Jerusalem Post*, June 18, 2000. 关于入侵时的情况，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相关文献，包括断定炮击联合国营地属蓄意行为的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和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见 Shifra Stern, *Israel's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and the Qana Massacre*, ms., April-May 1996.

- 407 Federal News Service, Department of Defense Briefing, Secretary William Cohen, “Turkey’s Importance to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rand Hyatt Hotel, Washington DC, March 31; Charles Aldinger, “U.S. praises key NATO ally Turkey,” Reuters, March 31, 2000. Judith Miller, “South Asia Called Major Terror Hub in a Survey by U.S.,”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0, lead story.
- 408 Little, 见此前引述的出处。
- 409 参见上一个注释。Jonathan Randal, *After Such Knowledge, What Forgiveness: My Encounters with Kurdist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 410 见Lars Shoultz,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 1981 ; 舒尔茨 (Schoultz) 是主要研究拉美人权和美国拉美政策的作家。关于更多有助于解释这些原因的证实性和调查性内容, 见经济学家爱德华·赫尔曼的研究, 即Chomsky and H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79), vol. I. chap.2.1.1, and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2), 126ff. 请注意, 这些评论早于里根时期发表, 该调查在当时被认为是多此一举。
- 411 Carla Anne Robbins, “How Bogota Wooed Washington to Open New War on Cocain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00. 有关随后的消息和进一步的信息及讨论, 见*Rogue States*, chap. 5.
- 412 Rafael Pardo, “Colombia’s Two-Front Wa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0. 游击队支持的政党因暗杀解体时, 帕拉多 (Pardo) 是时任政府和和平谈判特别顾问和国防部长。
- (414) 威廉·肖克罗斯 (William Shawcross, 1946—), 英国作家、评论家, 英国慈善委员会主席。
- 413 Sean Murphy,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此后简称为“*AJIL*”) 94, no. 1 (January 2000).
- 415 William Shawcross, *Deliver Us from Evil: Peacekeepers, Warlords and a World of Endless Conflic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26ff. 肖克罗斯认为这幅景象是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Strobe Talbott) 描述的, 但不加限定就被采纳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马克斯·布特 (Max Boot) 在一篇批评性述评中称赞肖克罗斯有所“进步”, 说他在深陷于批评“美国袭击柬埔寨的北越基地”(这是广为认可的对柬埔寨平民的称呼)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0) 之后能逐步意识到美国是“仁慈的力量”。
- 416 《新闻周刊》外交通讯记者Michael Hirsh, “The Fall! Gu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9.
- (417) 理查德·巴特勒 (Richard Butler, 1942—), 1992—1997年任澳大利亚驻联合国裁军事务代表, 1997—1998年任联合国削减伊拉克武器特别委员会主席。
- 418 Richard Butler, “East Timor: Principle v. Reality,” *The Eye* (Australia), 7-20,

1999.

- 419 有关拉卡克村屠杀的报道和证据，见Edward Herman and David Peterson, “CNN:Selling Nato’s War Globally,” in Philip Hammond and Edward Herman, eds., *Degraded Capability: 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 (London: Pluto, 2000)。
- 420 参见Colum Lynch, “US seen leaving Africa to solve its own crisis,” *Boston Globe*, February 19, 1999。另见John Donnelly and Joe Lauria, “UN peace efforts on trial in Africa; Annan angry as U.S. holds to limits on military role,” *Boston Globe*, May 11; Barbara Crossette, “U.N. Chief Faults Reluctance of U.S. To Help in Africa,”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00。
- 421 有关高层规划者和政策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信誉”概念及其性质、范围，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 第6章。
- (422) 印尼共产党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 成立于1920年5月，前身是1914年建立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
- 423 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成功之处，见Harold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351, 155 (这是标准的消息来源)。另见*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第2章, “Green Light for War Crimes”及其所引述的内容。
- (425) 全称为“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
- 424 Piero Gleijeses, *Shat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5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65. *Foreign Affairs* editor James Chac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77.
- (427)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创建于1916年，总部在美国华盛顿，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营利组织，被普遍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 426 见前文第318页的注释1；威廉·科恩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有关科索沃行动的听证会上的证词，October, 1999, Federal News Agency。
- 428 Ivo Daalder and Michael O’Hanlon, “Without the air war, things could have been wors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April 3, 2000.
- 429 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第22页以及本书 (此处指本文出处*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本文下同。——译者注) 第3章。
- 430 见*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of Kosovo*第6章以及本书第3章。
- 431 Michael Ignatieff, “What is war for? And should we have done it?” *National Post*(Canada), April 18, 2000. 还有从他的书《虚拟战争》(*Virtual War*) 中选出的他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Robert Skidelsky) 通信的大段节选。
- (433) 全称为“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 432 “Panorama: War Room,” BBC, April 19, 1999.

- 434 John Goetz and Tom Walker, "Serbian ethnic cleansing scare was a fake, says general," *Sunday Times*, April 2, 2000. Franziska Augstein, "Im Kosovo war es ander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March 25; *Die Woche*, March 24; *Der Spiegel*, March 17; *Sueddeutsche Zeitung*, April 4; *Le Monde*, April 11, 2000. Heinz Loquai, *Der Kosovo-Konflikt: Wege in einen vermeidbaren Krieg*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2000).
- (436) 福阿德·阿加米 (Fouad Ajami, 1945—2014), 美籍阿拉伯裔学者、评论家和作家, 中东问题专家。
- 435 Ruth Wedgwood, "NATO's Campaign in Yugoslavia," *AJIL* 93, no. 4 (October 1999), 这是为轰炸所做的法律辩护; Donald Byman and Matthew Waxman (兰德公司), "Kosovo and the Great Air Power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4 (Spring 2000); David Fromkin, *Kosovo Cross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Alan Kuperman, "Rwanda in Retrospec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更多例子, 见NMH以及本书第3章。
- 437 Fouad Ajami, "Wars and Rumors of War,"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ne 11 2000; Aryeh Neier, 见上面所引述的出处和其他诸多来源。正如所指出的那样, 奈尔的观点是, 忽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而坚持实际上已被提出的理由并继续这么做, 对他来说是“不诚实的”(见NMH)。
- 438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 吉尔伯特勋爵 (Lord Gilbert) 是英国级别第二高的国防采购大臣, 他通常负责情报工作。在国防特别委员会做证时, 他对如下建议表示嘲笑: 北约在1999年9月之前本应发动入侵。他还对委员会说“在9月之前对科索沃发动地面入侵也许是可行的, 但应在今年 [2000年] 9月, 而不是去年9月之前”。参见Patrick Wintour, "War strategy ridiculed," *Guardian*, July 21, 2000。
- 439 Ian Williams, "Left Behind: American Socialists, Human Rights, and Kosovo," *Human Rights Review* 1-2 (January-March 2000)。
- 440 Jiri Dienstbier,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March 25; Naomi Koppel, "Ground Troops Urged for Yugoslavia," AP Online, March 29, 2000; Elizabeth Sullivan, "A Threatening Thaw in the Balkans," *Cleveland Plain Dealer*, April 3; Laura Coffey, *Prague Post*, March 29, 2000。麦格韦尔, 见上述所引用的出处。迪恩斯特比尔是捷克重要的异见者,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曾被监禁, 之后成为共产党政府解散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 441 Donald Fox and Michael Glennon,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Rights Law Group and the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April 1985。他们指的是国务院逃避承认萨尔瓦多受到美国支持实施了国家恐怖。
- (442) 安东尼·路易斯 (Anthony Lewis, 1927—2013), 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记者, 曾两次获普利策奖。
- (443) 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1926—), 1987—2006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
- (444) 阿蒂略·波隆 (Atilio Borón, 1943—) 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拉美社

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

- (445) “徒劳无用的哲学” (philosophy of futility) 一词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营销学教授保罗·尼斯托姆 (Paul Nystrom) 于1928年提出, 用以描述新工业时代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保罗认为西方社会的商业化使人们很容易感到厌倦, 而脱离了传统宗教、哲学标准的人若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人生观, 可能就会凭“徒劳无用的哲学”行事。这些人一般缺乏生活目的, 消费趣味也很狭隘, 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时尚占主导地位的较表面的事物上。
- (446) 沙漠风暴 (Desert Storm) 指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起的军事行动。
- 447 Baruch Kimmerling, “Preparing for the War of His Choosing,” *Ha’aretz*, July 12, 2001. 网络资源见 www.palestinemonitor.org/israelipoli/preparing_for_the_war_of_his_cho.htm。
- 448 Ze’ev Sternhell, “Balata Has Fallen,” *Ha’aretz*, March 7, 2002.
- (449) 1993年, 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直接和谈, 签订《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 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 (450) 埃胡德·巴拉克 (Ehud Barak, 1942—), 以色列工党主席, 曾先后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长、总理、教育部长、国防部长。
- (453) “班图斯坦”由“班图”(在一些班图语中表示“人民”之意)和“斯坦”(在波斯语中表示“国家”或“区域”之意)合成, 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 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的“黑人家园制度”。南非政府为黑人划出保留地, 造成黑人已在“自己国土”上管理自己的假象。
- 451 Shlomo Ben-Ami, *Makom Lekulam* [A Place for All] (Jerusalem: Hakibbutz Hameuchad, 1987). 引自Efraim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A Peace of Markets or a Peace of Flag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7, nos.1-2 (2002)。
- 452 Kimmerling, 见此前引用的出处。
- 454 “Moving Pas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02.
- 455 这是以色列政府于1989年5月15日批准的一项和平倡议的原文 (即佩雷斯—沙米尔联合计划 [Peres-Shamir coalition plan], 老布什总统在讨论1989年12月的贝克计划 [Baker Plan] 时对该计划表示赞同)。有关该和平倡议的非正式译本, 见本人著作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1-232; 另见 <http://domino.un.org/UNISPAL.NSF/bdd57d15a29f428d85256c3800701fc4/2fa32a5884d90dc985256282007942fa!OpenDocument>。
- 456 John Donnelly and Charles A. Radin, “Powell’s Trip Is Called A Way to Buy Time for Sharon Sweep,” *Boston Globe*, April 9, 2002, A1.
- (457) 1981年, 沙特阿拉伯法赫德·阿卜杜拉—阿齐兹王子 (Fahd Abdul-Aziz, 1982年成为沙特国王) 提出了有关中东和平的八点建议, 被称为“法赫德计划” (Fahad

Plan)。该计划建议让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国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 (458) 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1923—2016)，以色列前总统 (2014—2017年在任)，历任以色列总理、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职务，曾在199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 (459) 哈伊姆·赫尔佐克 (Chaim Herzog, 1918—1997)，曾任以色列情报部长，1975年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983—1993年间任以色列总统。
- 460 见《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1999年修订版，第75页。
- 461 Patrick E. Tyler, “Arab Ministers Announce Support for Arafat,” *New York Times*, April 7, 2002, section 1, 17; Agence France-Presse, “Israeli Troops Keep Up Offensive as Powell Starts Regional Tour,” April 8, 2002; Toby Harnden, “It is When, Not If, the Withdrawal Will Start,” *Daily Telegraph* (London), April 8, 2002; Robert Fisk, “Mr. Powell Must See for Himself What Israel Inflicted on Jenin,” *The Independent* (London), April 14, 2002, 25.
- 462 Melissa Radler, “UN Security Council Endorses Vision of Palestinian State,” *Jerusalem Post*, March 14, 2002.
- 463 见 *Middle East Illusions* 第8章，更多细节见我作为 Roane Carey, ed., *The New Intifada* (New York: Verso, 2001) 所写的序言。此部分的内容也重印于 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2)。
- 464 Fiona Fleck, “114 States Condemn Israelis,” *Daily Telegraph* (London), December 6, 2001; Herb Keinon, “Geneva Parley Delegates Blast Israel,”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6, 2001.
- 465 Graham Usher, “Ending the Phony Cease-Fir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anuary 25, 2002, 4.
- 466 Geoffrey Aronson, ed.,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12,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2); Ian William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1, 2001; Judy Dempsey and Frances Williams, “EU Seeks to Reassert Mideast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6, 2001, 7.
- 467 Francis A. Boyle,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ink* (American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 35, no. 1 (January-March 2002): 1-13. (在线获取全文：www.ameu.org/uploads/vol35_issue1_2002.pdf。)
- 468 白宫，*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发布于2002年9月17日。
- 469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 470 有关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区别，见 Carl Kaysen, Steven Miller, Martin Malin, William Nordhaus, and John Steinbruner, *War with Iraq* (Cambridge, M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2)。

- 471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 (474) 在数学证明或哲学说理的末尾，通常会用拉丁文缩略形式“QED”或“Q.E.D”（全称为“*quod erat demonstrandum*”）代表证明的结束。
- 472 Arthur Schlesinger,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3, 2003.
- 473 Richard Falk, *Frontline* (India) 20, no.8 (April 12-25, 2003).
- (477) 即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 1941—），美国政治家、商人，2001—2009年间任美国副总统。
- (47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1932—2021），美国政治家、军事战略家，曾在1975—1997、2001—2005年任美国国防部长。
- 475 Michael Glenn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and May-June 1999.
- 476 Danna Milbank, *Washington Post*, June 1, 2003. Guy Dinmore, James Harding, and Cathy Newman, *Financial Times*, May 3-4, 2003.
- 479 Dean Aches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13/14(1963). Abraham Sofa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urrent Policy*, no. 769 (December 1985). 艾奇逊特指的是美国的经济战，但他无疑对国际恐怖主义也有所了解。
- 480 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发言；William Cohen,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 (482)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
- 481 Memorandum of the 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 Laurence Shoup and William Minster, *Imperial Brain Tru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130ff.
- 483 在这方面言辞激烈的观点见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84) 鲍威尔指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1937—），美国军人、政治家，1989—1993年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01—2005年任美国国务卿。
- (486)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 1954—），美国政治家，2001年起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5—2009年任美国国务卿。
- 485 乔治·W.布什的国情咨文演讲，文字稿登载于《纽约时报》（2003年1月29日）。
- 487 Condoleezza Rice, interview with Wolf Blitzer, CNN, September 8, 2002. Scott Peter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6, 2002. 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 《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对依据所谓卫星图像的1990年声明进行了调查。专家们分析了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之后一无所获。该调查遭到了驳斥，现在也是这样。有关“一

- 些事实 [变得] 如何不那么真实”的评述，见Peter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有关独立的确认证据，见Peter Zimmerma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4, 2003。
- 488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TIPP poll ,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4, 2003. Linda Feldman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4, 2003. Jim Rutenberg and Robin Ton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 489 Edward Alden, *Financial Times*, March 21, 2003; Anatol Lieve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y 8, 2003.
- 490 参见Elisabeth Bumiller,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3 ; 乔治·W.布什讲话的文字稿见《纽约时报》(2003年5月2日)。
- 491 参见 Jason Burke, *Sunday Observer*, May 18, 2003 , 第211页。
- 492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 (PIPA) , 新闻稿 , 2003年6月4日。
- 493 Jeanne Cummings and Greg Hit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 2003; Francis Cline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03. 这是罗夫在此所做的强调。
- 494 David Sanger and Steven Weisman,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3; Roger Owen, *Al-Ahram Weekly*, April 3, 2003.
- 495 Comment and Analysis, *Financial Times*, May 27, 2003.
- 496 国际法庭，科孚海峡案（法律理据），1949年4月9日的审判。
- 497 见本人所著*New Military Humanism*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 498 见本人所著*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New York: Verso, 2000) , 第4页及之后几页。不结盟运动声明，吉隆坡，2003年2月25日。
- (499) 即2000年9月爆发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因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进入了耶路撒冷老城的争议地区圣殿山而引起了巴以双方的流血事件。巴勒斯坦人认为沙龙及其武装护卫的到访是对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冒犯，此事件以及后续冲突被巴勒斯坦人称为阿克萨群众起义 (al-Aqsa Intifada)。这次冲突也被称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色列视其为恐怖主义活动。
- (502) 此处是指2002年11月4日美国动用无人机向也门的一辆越野车发射导弹，导致一名基地组织嫌疑人 and 五名手下死亡。在本文下一句中被说成了10月发生的事情。
- 500 Aryeh Dayan, *Ha'aretz*, May 21, 2003.
- 501 Amir Oren, *Ha'aretz*, November 29, 2002.
- 503 Suzanne Nossel, *Fletcher Forum*, Winter-Spring 2003.
- (504) 肯尼斯·沃尔兹 (Kenneth Waltz , 1924—2013) , 美国政治理论家、国际关系理论家。
- 505 Richard Wilson, *Nature* 302, no. 31 (March 1981). Michael Janse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anuary 10, 2003. Imad Khadduri, *Uncritical Mass*, memoir (manuscript), 2003.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Norton, 1995), 18-19.

- (506) 即约翰·戴维·阿什克罗夫特 (John David Ashcroft , 1942—) , 美国政治家 , 2001—2005年间任美国司法部部长。
- 507 Neely Tucke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 2002; Neil Lewi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03.
- 508 Ed Vulliamy, *Sunday Observer*, May 25, 2003.
- 509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200.
- 510 Jack Balki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3, 2003, and *Newsday*, February 17, 2003. Nat Hentoff, *Progressive*, April 2003.
- 511 Winston Churchill cited by A.W.B. Simps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d of Empire: Britain and the Genesis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5.
- 512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Michael Krep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February 2003.
- (515)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 1952—) , 日裔美籍学者、政治学和国际问题专家 , 曾是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成员。
- 513 John Steinbruner and Jeffrey Lewis, *Daedalus*, fall 2002.
- 514 Chomsky, *Year 501*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2), 第1章。
- 516 James Morgan, *Financial Times*, April 25-26, 1992.其中提到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新帝国时代”中的其他组织。Guy de Jonquièr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01. Fukuyama , 转引自Mark Curtis , *The Ambiguities of Power* (London: Zed, 1995), 183。
- (517) 迪利普·希罗 (Dilip Hiro) , 印度裔作家、记者、评论员 , 主要关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政治问题 , 现居伦敦。
- (519) 即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 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ssions”。
- 518 Bush and Baker , 转引自Sam Hussein, *Counterpunch*, March 8, 2003。Dilip Hiro, *Iraq: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Nation Books, 2002), 102-103。
- (520) 布什总统的故乡和常住地。
- 521 Edward Luck,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 522 Elisabeth Bumiller and Carl Hul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02. Colin Powell , 转引自Julia Prest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02。David Sanger and Julia Prest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2. Andrew Card , 转引自Doug Sanders, *Toronto Globe and Mail*, November 11, 2002。
- 523 Mark Turner and Roula Khalaf,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03.
- 524 David Sanger and Warren Hog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3. Michael

Gordon,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3.

- 525 摘自乔治·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3。Felicity Barringer and Davud Sang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3.
- 526 Alison Mitchell and David Sang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02. Ari Fleischer, 转引自Christopher Adams and Mark Huband, *Financial Times*, April 12-13, 2003。Jack Straw, 转引自David Sanger and Felicity Barringer,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03。
- 527 “In Powell’s Words: Saddam Hussein Remains Guilty,”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3. Weisman,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 528 Condoleezza Ric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转引自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请注意, “9-11”事件对这些风险评估没有影响。
- 529 Dafna Linzer, AP, *Boston Globe*, February 24, 2003.
- 530 Guy Dinmore and Mark Turne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2, 2003. Jeanne Cummings and Robert Block,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6, 2003.
- 531 Geneive Abdo, “US Offers Incentives for Backing on Iraq,” *Boston Globe*, February 13, 2003. Eric Lichtblau, “Charity Leaders Accepts a Deal in a Terror Ca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03. 参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208。
- 532 Richard Boudreaux and John Hendren,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5, 2003.
- 533 Neil King and Jess Bravi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5, 2003. 关于此处所指的美国的态度, 见国际政策态度项目于2003年4月18—22日进行的民意调查。关于伊拉克的态度, 见由人权医师组织副主任苏珊娜·西尔金 (Susannah Sirkin) 陈述的该组织所做的民意调查报告, 据说有85%的人希望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 (Lett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03)。
- 534 John Ikenberr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Anatol Lieve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3, 2003.
- (536) 塞利格·哈里森 (Selig Harrison, 1927—2016), 美国学者、记者, 以研究南亚与东亚政治事务见长。
- 535 Samuel Huntingt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Robert Jervi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1.
- 537 Kenneth Waltz in Kim Booth and Tim Dunne, eds., *Worlds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Plagrove Macmillan, 2002). Steven Miller in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Jack Synder,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3. Selig Harrison,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03.
- 538 Bernard Fall, *Last Reflections on a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 539 有关对《五角大楼文件》最终材料的评述, 见Chomsky, *For Reasons of State*,

25 , 末尾谈到了这一点。

540 Maureen Dow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91.

541 World Economic Forum press release, January 14, 2003. Guy de Jonquièr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5, 2003.

542 Alan Cowel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3; Mark Landl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03. Marc Champion, David Cloud, and Carla Anne Robbin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7, 2003.

543 Foreign Desk, “Powell on Iraq: ‘We Reserve Our Sovereign Right to Take Military Act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3.

544 Kaysen et al., *War with Iraq*.

545 Hans von Sponeck, *Guardian*, July 22, 2003.

546 Ken War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1, 2003. 有关国际民意调查, 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第5章。

(548) 威尔逊理想主义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 具体参见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的演说。

547 Glenn Kessler and Mike Allen, *Washington Post Weekly*, March 3, 2003. Fareed Zakaria, *Newsweek*, March 24, 2003.

549 见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 1, note 6. *Atlantic Monthly*, 1901, 转引自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42。

550 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215ff. 这里是他所做的强调。

55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21, ed. John 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见*Hegemony or Survival*, 44-45。英国对其继任者高贵身份的态度略有不同; 见*Hegemony or Survival*, 149。

(555) 马克斯·布特 (Max Boot, 1969—), 俄罗斯裔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国家安全问题专家, 曾为多家报纸供稿。

552 Andrew Bacevich,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553 Michael Glenn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0, 1986.

554 Sebastian Mallab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September 21, 1997.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195. 政府高级政策制定者的话转引自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92。

(556)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 1936—), 意大利政治家, 传媒大亨, 中右翼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创始人, 曾四度担任意大利总理。

557 Boo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03. Robert Kagan, *Washington Post*

- 558 有关密尔的文章及其写作背景，见本人所著的《窥探未来的深渊》（*Peering into the Abyss of the Future*）。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犯下的罪行令很多英国人感到震惊，其中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见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chap. 7, note 52。
- 559 Henri Alleg, *La Guerre d'Algérie*. 转引自Yousef Bedjaoui, Abbas Aroua, and Méiziane Ait-Larbi, eds., *An Inquiry into the Algerian Massacres* (Plan-les-Quates [Genève]: Hoggar, 1999)。
- (560) 沃尔特·拉斐伯尔（Walter LaFeber, 1933—2021），美国历史学家，是“新左派”外交史学或“修正派”史学的主要人物之一。
- 561 Walter 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3), 50ff., 75ff。
- 562 Mohammad-Mahmoud Mohamedou, *Iraq and the Second Gulf War* (San Francisco: Austin & Winfield, 1998), 123。
- 563 David Schmitz, *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Japan Envisions a ‘New Order’ in Asia, 1938”（又登载于Dennis Merrill and Thomas Paterson, eds.,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 Since 1914*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0]）。
- 564 有关苏联律师，见Sean Murph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有关肯尼迪政府的观点，见Chomsky, *Rethinking Camelot*。
- 565 Ivan Maisky, January 1944, 转引自Vladimir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Working Paper no. 13, July 1995)。
- 566 引自Lafeber, *Inevitable Revolutions*。参见Robert Tucker, *Commentary*, January 1975。
- 567 引自墨西哥历史学家José Fuentes Mares，出自Cecil Robinson, ed. and trans., *The View from Chapultepec: Mexican Writers on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160。
- (568) 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 1864—1928），美国法学家、律师、政治家，1915—1920年间任美国国务卿。
- 569 引自William Stivers, *Supremacy and Oi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570 Morgenthau,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4, 1970。
- 571 见人权观察和赦免的定期国际报告；在诸多相关著作中，可参看Javier Girado, *Colombia: The Genocide Democracy*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6)和Garry Leech, *Killing Peace: Colombia's Conflict and the Failure of U.S. Intervention* (New York: Information Network of the Americas, 2002)。

- 572 Robert Pastor,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icaragu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此处强调是作者所为。
- 573 Ali Abdullatif Ahmida, *Forgotten Voice: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London: Routledge, 2005).
- (575) 穆克塔达·萨德尔 (Muqtada al-Sadr, 1973—), 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什叶派武装组织“马赫迪军”领袖。
- (576) 以萨德尔为首的“萨德尔运动”组织在此次选举中赢得议会275个席位中的30个, 而伊拉克总理所在的党仅获13个席位。
- 574 Selig Harris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8, 2006.
- 577 Ellen Knickmeyer and Omar Fekeiki,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06. Charles Levins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30, 2006. 有关奥西拉克,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25.
- 578 见Chomsky, *Failed Stat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77以及 *Hegemony or Surviv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157-158.
- 579 Anthony Bubalo,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6, 2005. Shai Oster,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3, 2006.
- 580 Aijaz Ahmad, *Frontline* (India), October 6, 2005. Katrin Bennho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5, 2004. Victor Mallet and Guy Dinmor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7, 2005. Daniel Dombey et al.,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6, 2006. David Sanger and Elaine Sciolino,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6.
- 581 Siddharth Varadarajan, *Hindu*, January 24, 2006; *Hindu*, January 25, 200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5, 2006. Fred Wei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26, 2005. “Declaration of Heads of Member-Stat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Kazakhstan, Kyrgyz Republic, Tajikistan, Uzbekistan), July 5, 2005, Astana, Kazakhstan; *World Affairs* (New Delhi), Autumn 2005.
- 582 相关背景介绍, 见 *Hegemony or Survival*, 第6章。
- 583 国家情报委员会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 *Global Trends*. Joel Brinkle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05. Dan Molinski,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4, 2005. 布什的政策甚至排挤了长久以来支持美国的澳大利亚。一份2005年的调查发现,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造成的外部威胁”是主要并受到同等关注的问题, 而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要注意中国。只有58%的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正面的, 而对新西兰有正面看法的人占94%, 对英国占86%, 对日本占84%, 对中国占69%”。一半人支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赞同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Tom Allard and Louise Williams,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9, 2005.
- (585) 全称为西班牙语的“Mercado Común del Sur”, 即南方共同市场, 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随后提到的南美关税联盟也属于该组织。

- 584 Marc Frank,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1, 2005. John Cherian, *Frontline* (印度), December 30, 2005, 引自巴基斯坦主要的日报《黎明报》(Dawn)。
- 586 Gwynne Dyer, *Guardian*, October 25, 2005. Adam Thomso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1, 2005. 另见经济学家、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主任马克·维斯布洛特 (Mark Wiesbrot) 在该中心2006年1月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 587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3, 2005. Diego Cevallos, ISP, December 19, 2005. Weisbrot, CEPR release, January 28, 2006. 更多有关水问题的内容, 见William Blum, *Rogue State*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0), 77-78。
- 588 Andy Webb-Vidal, *Financial Times*, March 13, 2005. Justin Blum,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05. Michael Levenson and Susan Milligan, *Boston Monitor*, November 20, 2005。
- (589) 全称为“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 590 David Bacon, *Z Magazine*, January 2006;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October 2005。
- 591 Scott Wilson and Glenn Kessler,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 2006. Steven Erlang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6。
- 592 Walt Bogdanich and Jenny Nordber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6. 见《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与践踏民主》第4章注释14的参考文献和第154页。Gregory Wilpert, 发表在Znet的评论 (Znet是美国的在线新闻网站, 有很多左翼自由社会主义学者在该网站发表时事评论。——译者注), 2005年12月。

第三部分 语言与心智

评B.F.斯金纳著《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by B. F. Skinner. (The Century Psychology Series.), pp. viii, 478,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7.

—

许多语言学家和关注语言的哲学家都曾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朝一日可以纳入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提供的框架之内，而那些棘手的调查领域（尤其是涉及意义的领域）也会由此得以开拓，并收获硕果。《言语行为》这册书^①首次大规模地尝试把言语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的主要方面纳入行为主义框架，理应受到密切的重视，情况也定会如此。斯金纳以其对动物行为研究的贡献而闻名，本文所评论的这本书是他20余年来从事言语行为研究的成果，其早期版本流传甚广，许多心理学著作曾多次引述其中的主要观点。

该书研究的是对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进行“功能分析”的问题。斯金纳所谓的“功能分析”，是指辨识控制言语行为的变量（variable），并详述这些变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某种言语反应（verbal response）。此外，这些控制变量还需使用“刺激”（stimulus）、“强化”（reinforcement）、“剥夺”（deprivation）等概念进行彻底的描述，而这些概念在动物实验中已被解释得相当清楚。换言之，该书旨在通过观察和操纵说话人的物质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提出一种预测和控制言语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认为，动物行为实验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能让我们比较乐观地研究言语行为的功能分析问题，因为“给予言语行为特性的基本过程和关系，现在已经一清二楚……出乎意料的是，[此类动物实验研究的]结果已不再受物种的限制。近期研究表明，这些方法无须大做改动就能用于人类行为研究”（第3页）。²

斯金纳的方案和主张似乎十分大胆且令人瞩目，关键要看清其中的缘由。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把功能分析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也不是因为

他只研究“可观察量”（observables），即输入—输出关系。令人诧异的是，他对研究行为可观察量的方法会加以特殊限制，尤其是他所谓的描述行为致因（causation of behavior）的“功能”，竟然具有极其简单的性质。人们自然会以为，预测复杂有机体（或机器）的行为，除了需要有关外部刺激的信息，还需要有关有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并了解有机体如何处理输入信息和组织个体行为的方式。有机体的这些特性通常是内在结构、由基因决定的成熟过程和过往经验共同造成的复杂产物。既然缺乏神经生理学的独立证据，那么，关于有机体结构的推论显然是基于对行为和外部事件的观察。然而，估测外部因素和内部结构在决定行为时哪个相对更为重要，会对语言行为研究（或其他行为研究）的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对从动物行为研究得出的、将会被视为有相关性或有启发作用的类推（analogy）类型产生重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任何要分析行为致因的人都会考虑现有的唯一数据（如果缺乏神经生理学的独立证据的话），即对有机体所得的输入及其现场反应的记录，并按照输入历史尝试去描述能规定现场反应的功能。这样做，只不过把自己要研究的问题解释清楚而已。斯金纳经常提出以这种方式解释某个研究问题，并为之辩护，好像其他研究者持有异议似的。但是，如果认同这个研究问题的合理性，就没有争论的余地。有机体对学习和执行（performance）有着“特殊的贡献”，有人认为这种贡献很重要，有人认为不重要，其分歧与该贡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也与必须准确说明该贡献的观察和研究类型有关。如果有机体的贡献很复杂，即使是以一个大致的方式来预测行为，唯一的希望是用比较间接的研究方法，先开始研究行为本身的详细性质和相关有机体的特殊能力。

斯金纳的观点是：包括现场刺激和强化历史（尤其是强化刺激的频率 [frequency]、安排 [arrangement] 和抑制 [withholding]）的外部因素是绝对重要的，而有关这些现象的实验研究所显示的普遍原则，已为理解言语行为的复杂性打下了基础。他信心十足地一再声称，说话者的贡献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对言语行为的准确预测只需对一些外部因素的详细描述，而他在低等生物的实验中已经把这些因素区分出来了。

然而，仔细研读该书（及其所依据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令人惊讶的主张并未经过合理论证。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强化理论家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见解，虽然十分真实，却只能以最笼统、最肤浅的方式应用于复杂的人类行为；凭着想象就尝试用这些术语来讨论语言行

为，难免会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这些考虑因素的特性目前还无法被准确地表示出来，它们无疑是经得起科学研究检验的。斯金纳的研究最广泛地尝试了把涉及更高级智能的人类行为纳入严谨的行为主义模式之内，许多心理学家，还有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被这种行为主义模式所吸引。因此，只是详细的文献佐证就足以令人产生兴趣。但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无法解释言语行为，如此重大的失误说明那些未被考虑在内的因素有多么的重要，也显示出众人对言语行为这种非常复杂的现象所知甚少。

斯金纳的论述之所以十分有力，是因为举出了广泛而丰富的例子，并就这些例子提出了功能分析。要评价其研究成功与否，以及他对言语行为的基本假设正确与否，唯一的方法就是仔细核查这些例子，确定他做功能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有什么确切的性质。本篇书评的第二部分描述了斯金纳最初解释这些概念时所依据的实验环境，第三和第四部分讨论了“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基本概念，第六至第十部分讨论了他专门为描述言语行为想出的新的描述方法。在第五部分，我们讨论了他从实验室得出的基本主张的情况，许多心理学家都根据该基本主张提出了对言语行为的类比推测。最后一部分（第十一部分）要讨论一些方法，进一步的语言学研究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在澄清上述某些问题时有所进展。

二

尽管斯金纳在书中没有直接陈述其实验研究，我们单从他的行为描述总框架中也能了解情况。斯金纳把动物的反应分成两类：一类是应答性行为（respondents），这完全是由某些特别刺激引发的反射反应（reflex responses）；另一类是操作性行为（operants），这是自发性反应（emitted responses），找不出明显的刺激。斯金纳主要关心的是操作性行为。在他的实验安排中，主要有一只箱子，箱子一侧装有一个杠杆。按动这个杠杆，一团食物就会掉进盘子里（按动杠杆的次数被记录下来）。一只老鼠被放进箱子，它很快就会按动杠杆，食物被发放出来并掉入盘中。这种由按动杠杆所致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使按动杠杆这一操作性行为的强度（strength）增加了。那团食物被称为强化物（reinforcer），而这件事被称为强化事件（reinforcing event）。斯金纳根据消退（extinction）期间的反应频率（即最后一次强化之后以及回到预先条件作用的频率之前）来界定操作性行为的强度。

假设食物的发放以灯亮为条件，那么老鼠只在灯亮时跑来按动杠杆，这叫刺激辨别（stimulus discrimination），这种反应叫作可辨别操作性行为（discriminated operant），而灯是发出反应的契机（occasion），这与应答性行为中由刺激引出的反应不同。³假如这套装置的设计要求只对某种性质（例如持续按动杠杆的时间）的按动杠杆行为发放食物，那么老鼠会按要求来按动杠杆，这个过程叫作反应分化（response differentiation）。通过一步步略微改变反应被强化的条件，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奇妙地规定老鼠或鸽子的反应。这样，通过连续渐进的过程就能产生相当复杂的行为。

如果一种刺激不断地与已有强化作用的刺激相关联，这个刺激也会具有强化作用，被称为二级强化物（secondary reinforcer）。与许多当代行为主义学者一样，斯金纳认为金钱、赞许等是具有强化作用的二级强化物，因为它们与食物等有关联。⁴二级强化物与各种各样的初级强化物（primary reinforcer）发生关联，就能够被泛化（generalized）。

另一种对按动杠杆这类操作性行为的频率造成影响的变量是驱力（drive）。斯金纳根据剥夺的时间长度从可操作性方面解释了这个概念。《有机体的行为》是他的一本主要科学著作，该书研究了剥夺食物和条件作用对健康的成年老鼠按动杠杆的反应强度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斯金纳对动物行为研究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就是调查了各种不同方式的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影响，这在《有机体的行为》中有所陈述，并在最近与费尔斯特（Ferster）合著的《强化程式》（*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还调查了鸽子啄食这种操作性行为）。斯金纳提到动物行为研究近期的新进展时，想到的显然就是这些研究。⁵

在按动杠杆实验和其他范围受限的类似实验中，“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概念被解释得比较清楚。然而，我们必须先应对一些困难，才能把这些概念加以引申并运用到真实生活的行为之中。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有机体能够对某个具体事件（physical event）做出反应（react），这个具体事件是否要被称为在给定场合下的刺激，或仅是有机体实际上产生反应的一个事件而已。相应地，我们还必须确定，行为的任一部分是否要叫作“反应”，还是仅指按规则与刺激相联系的那部分行为。这类问题让实验心理学家陷入了困境。如果他们接受广义的定义，把任何影响有机体的具体事件都当成刺激，并把有机体行为的任一部分都当成反应，那么他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证明行为有规律可循。

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只能认定，注意力（attention）、定势（set）、意志（volition）和突发（caprice）这些没有被解释清楚的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实际行为。如果我们接受了更狭义的定义，那么根据定义，行为就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行为包括各种反应的话）。但这一事实意义不大，因为动物的大部分动作并不能简单地算作行为。因此，心理学家要么承认行为没有规律（或者承认目前还无法证明，但对发展中的科学而言，这样承认根本无伤大雅），要么把注意力放在行为有规律可循的有限领域（例如，有充足的控制措施，有老鼠按动杠杆；对斯金纳而言，被观察的行为有规律，就间接说明这个实验做得好）。

在这两条路中，斯金纳并没有坚持不懈地沿着其中一条走下去。他把实验结果当作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系统具有科学性，还把类推猜测（analogic guesses，这是对实验室术语进行的隐喻性引申）当作证据，证明其行为体系的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这是严谨的科学理论且适用范围广阔。而事实上，描述真实生活和描述实验室行为所用的词汇也许只是同形异义词（homonyms），最多在意思上大体相近。为了证实这个判断，本篇书评必须要说清楚的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看（其中，描述性系统中的词汇和斯金纳定义中给出的术语意义有些相似之处），这本书几乎没有涵盖语言行为的各个方面；按照隐喻意义来看，该书还不如研究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那么有科学性，也没有那么清晰和详细。⁶

三

让我们先看看斯金纳是如何使用“刺激”和“反应”这两个概念的。在《有机体的行为》（第9页）中，他只考虑了这两个术语的狭义定义。只要环境的一部分和行为的一部分是有规律地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与它们相关的“动态法则”（dynamic laws）显示出平稳的再现曲线，它们分别叫作“刺激”（包括诱发刺激、可辨别刺激或强化刺激）和“反应”。显然，如此定义的刺激和反应在人类日常行为中并非随处可见。⁷面对现有的证据，我们可以继续坚持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抛开它们的客观性即可。对斯金纳来说，“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的典型例子就是听了一段音乐后说出“Mozart”（“莫扎特”），或者看到一幅油画说出“Dutch”（“荷兰[画派]的”）的反应。这些反应被断定为受该物体或事件“极微妙的属性的控制”（第108页）。假设我们没有说“荷兰的”，而是说“和壁纸的颜色

不协调”“我以为你喜欢抽象派油画”“以前从未见过这幅画”“挂歪了”“挂得太低了”“很美”“很难看”“还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去野营吗？”，或者看到一幅画会说出脑海中闪现的任何想法（用斯金纳的话来说，就是有足够强度的任何其他反应），斯金纳也只能说，这些反应每个都受该物体的一些其他刺激属性的控制。我们看到一把红色的椅子说出“red”（“红的”），这个反应受redness（红色）这个刺激控制。如果我们说“chair”（“椅子”），这个反应就受chairness（椅子性）^⑧的诸多属性（对于斯金纳来说，这些属性就是物体）的控制（第110页），其他反应也是这个道理。这种办法简单而空洞。既然属性可以任由人们发问（我们所能找出的属性，与我们语言中非同义词的描述性表达一样多，不管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根据斯金纳的功能分析，我们辨识出控制刺激（controlling stimuli）就能解释更广泛的一类反应。然而，这样使用“刺激”一词就丧失了一切客观性。刺激不再是外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们被赶回有机体的内部。我们听到反应才辨别刺激。从这些比比皆是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谈“刺激控制”只是打了个幌子，其实已全身而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心理学那里。我们无法根据说话人所处环境中的刺激来预测其言语行为，因为只有在他做出反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前的刺激是什么。况且，斯金纳声称，与传统体系不同，他的体系允许对言语行为进行实际控制。^⑨但我们无法控制一个人做出反应的那个物体的属性，除非在完全人为的情况下。因此，斯金纳的这番话是十分错误的。

斯金纳关于“刺激控制”的其他例子，就更加故弄玄虚了。比如说，他认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在“特定的人或物（作为控制刺激）的控制”下产生的反应（第113页）。我经常说“Eisenhower”（“艾森豪威尔”）和“Moscow”（“莫斯科”）这样的词，我想它们应该是专有名词，但我从未被与其对应的对象“刺激”过。这一事实怎么能和斯金纳的定义一致呢？假设我提到一位不在场的朋友的名字，这能够作为实例来说明该专有名词是受那位朋友（作为刺激）的控制吗？在书中其他地方，斯金纳又说，刺激控制反应，因为刺激在场时，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更高。但当说话人和叫这个名字的人面对面时，说话人讲出全名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况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场的人的名字怎么就变成了专有名词呢？相似的问题层出不穷。这里的“控制”一词，似乎只是对传统词汇“指示”（denote）或“指称”（refer）的误导性解释义（paraphrase）。就说话人而言，指称关系“只是具有特定属性的刺激在场时，说话人发出某种形式的反应的可能性”（第115页）。如果我们按

照字面意思理解“在场”“刺激”和“可能性”这些词，上述论断肯定是不对的。很多例子都说明，斯金纳不想让别人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些词，他说某个反应受作为“刺激”的某种情景或事态“控制”时也是这样。因此，“a needle in a haystack”（“大海捞针”）这个表达“可能作为一个语言单位被某种情景控制”（第116页）；词性相同的所有词汇，比如所有的形容词，都受刺激的一系列细微属性的控制（第121页）；“‘The boy runs a store’（‘这个男孩开了一家店’）这个句子受一种极其复杂的刺激情景控制”（第335页）；“‘He is not at all well’（‘他身体不适’）可能是受某种事态控制的一个正常反应，而这个事态也可以控制‘He is ailing’（‘他生病了’）这个反应”（第325页）；一位外交使节观察到国外发生的事件，回国后进行汇报时，其汇报受“远距离刺激的控制”（第416页）；“This is war”（“这就是战争”）这句陈述可能是对某种“混乱的国际形势”的反应（第441页）；过去时后缀-ed受“刺激的细微属性——即我们所说的过去行为——的控制”（第121页）；同样，在“The boy runs”中，-s受到“现时性”这种情景特征的控制（第332页）。“刺激控制”这个概念与按压杠杆实验有点相关（或者说还保持着一点客观性），但该概念并未得到任何特征描述，也就无法涵盖众多此类例子。比如说，在这些例子中，“起控制作用的刺激”甚至不必接触到做出反应的有机体。

现在，让我们看看斯金纳是如何使用“反应”这一概念的。辨识言语行为中的单位当然是语言学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很有可能的是，实验心理学家应该会急人所需，扫除系统辨识过程中遗留的诸多困难。斯金纳意识到辨识言语行为单位这一问题的基本特性（第20页），但又满足于模糊且主观的答案，这种答案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言语行为单位即操作性言语行为（verbal operant）的定义是：一类具有可辨识形式的反应，在功能上与一个甚至更多的控制变量有关。在具体情况中，决定哪些是控制变量，出现了多少个这种单位，或在整个反应中各单位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斯金纳并未提出任何方法。他也没有试图规定，对于两个事件被当成同一个操作性行为的不同例子，在形式上或“控制”上必须有多少相似性或何种相似性。简单地讲，对于任何为行为描述提出方法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他也没给出答案。斯金纳满足于他所谓的“外推法”（extrapolation），把从实验室得来的“操作性行为”这一概念推及言语领域。在典型的斯金纳式实验中，辨识行为单位不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他命令式地规定，行为单位就是所记录的某次鸟儿啄食或某次老鼠按压杠杆，而这种操作性行为频率的系统性变化及其消退抵抗，

都被作为剥夺和强化的程序安排（多团食物）功能来研究。因此，操作性行为是根据特定的实验程序而定义的。这样做完全有道理，也得出了很多有趣的结果。然而，谈及把“操作性行为”概念外推到日常言语行为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外推法”让我们无法证明，对“言语行为总库”（verbal repertoire）中的单位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斯金纳把“反应强度”（response strength）当作基本数据，也就是其功能分析的基本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在按压杠杆的实验中，反应强度是按消退期间发出行为的频率来确定的。斯金纳辩解道¹⁰，“只有这种数据在显著地变化着，并且是在与‘学习过程’相关的条件下朝预期方向显著地变化着”。在本文所评述的书中，反应强度的定义是“发出反应的可能性”（第22页）。这个定义令人欣慰，倒也算客观。但细看一下，这种印象就很快消失了。在斯金纳的书中，“可能性”这个术语的意思含糊不清。¹¹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明每个变量[对反应强度]所起的作用时，我们的证据只是基于对频率的观察”（第28页）。同时，用频率来衡量强度似乎很有误导性，因为（比如）他又说反应的频率可能“主要归结于控制变量出现的频率”（第27页）。如果我们接受斯金纳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给定情景中发生的行为由相关的控制变量“完全决定”（第175和228页），那么就会弄不明白，反应频率如何能归因于控制变量出现频率以外的要素。况且，尽管证明每个变量有助于反应强度的证据只是基于对频率的观察，斯金纳却说：“我们有关强度的概念基于好几种证据”（第22页），尤其是这些证据（第22—28页）：反应的发出（尤其在特别情况下）、能级（重音）、音高、反应的速度和延后、书写中的字体大小等、紧接的重复，还有最后一个相关但又有误导性的因素——总体频率。

当然，斯金纳承认，上述衡量标准不会产生共变（co-vary），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音高、重音、音长和重叠可能有内在的语言功能。¹²但他认为这些矛盾因素不太重要，因为他提出的表示强度的那些因素在同一文化中“众人皆知”（第27页）。比如，“要是有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件获奖艺术作品，我们惊叹道：‘太美了！’，这件艺术作品的主人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反应的速度和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为给主人留下印象，大声、高声、毫不迟疑地尖声连喊“太美了！”（被称作“高强度反应”），效果似乎也不会特别明显。默默地看着那幅画（长时间不出声），然后轻声细语地说“很美”（按照斯金纳的定义属于低反应强度），也许和发出惊叹的效果一样。

我认为，从斯金纳对反应强度（即功能分析的“基础数据”）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他对可能性概念的“外推”，实际上是决定把带有客观性积极内涵含义的“可能性”一词用作覆盖性词语（cover term），来替换“兴趣”“意向”“信仰”等学术地位较低的词汇。斯金纳使用“可能性”和“强度”这些术语的方式也完全证实上述理解是对的。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斯金纳把证实某条科学论断的过程定义为“产生了增加该论断可能性的附加变量（additional variable）”（第425页），更笼统地说，是增加该论断强度的过程（第425—429页）。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话，那么就要估测科学论断的确认程度，仅仅依据宣布论断时的音量、音高和频率就行，而且增加其确认程度的通常做法会是（比如）把机关枪对准一大群人，让他们大声说出这个论断。要说明此处斯金纳可能想到了什么的更好办法是，看看他对进化论这个例子如何被确证的描述。“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学科中，基于言语反应的几种解释使这一组言语反应⁽¹³⁾.....似乎更加合理，并得以加强。”（第427页）我们无疑会把这种语境中的“强度”和“可能性”这些术语理解为是对“确证的信念”（justified belief）或“有理由的可断定性”（warranted assertability），或其他此类常见词语的代称。当我们读到“有效行动的频率反之可以说明我们所谓的听话人‘相信’什么”（第88页），或“我们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话，这种相信同样也是一种我们试图就别人所提供的言语刺激做出行动的功能，或者等同于我们这样的意向”（第160页），大概都会有类似的解释空间。¹⁴

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斯金纳用“刺激”“控制”“反应”和“强度”这些术语，证明了上面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总结论是正确的。这些术语被用于真实的数据，这表明我们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描述行为的常用词汇的替代性字眼。这些字眼与描述实验室实验的同形异义词毫无关系。对这些术语的改动自然也没给常见的“心灵主义”描述法增添什么客观性。

四

从对老鼠按压杠杆实验的描述中借用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是“强化”。这个概念也产生了上述类似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斯金纳在《有机体的行为》中说，“强化的进行是指呈现与刺激或反应在时间上有关的某种刺激。强化刺激是指能产生最终[强度]变化的刺激。这里并无循环论证：有些刺激产生了这种变化，有些没有，于是被分为强化刺激和非强化刺激”（第62页）。要研究强化进程，该定义完全恰当。¹⁵但

在讨论日常行为时，这个定义就毫无用处，除非我们能说出强化刺激（及其强化时的情景和条件）的特征。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条基本原则（即斯金纳所谓的“条件作用法则”[law of conditioning]，即效果律[law of effect]）的情况吧。斯金纳写道，“假如操作性反应发生之后存在强化刺激，强度就会提高”（《有机体的行为》，第21页）。因为已经有了“强化”的定义，这条法则就是内容上的赘述（tautology）。¹⁶在斯金纳看来，学习只是反应强度上的变化。¹⁷认为强化的存在是学习和行为持续的充分条件，这种说法很空洞，但根据描述强化物类别（及适当的情景）的方式来看，主张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些道理。斯金纳的确清楚地表明，依他所见，强化是语言学习和成人不断产生言语反应的必要条件。¹⁸但在我所评述的书中，斯金纳所用的“强化”一词意思松散，使得再探究他之前的主张对错与否都毫无意义。仔细观察斯金纳所谓的“强化”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强化物必须是可辨别的刺激这一要求甚至都没被认真对待过。实际上，如此使用“强化”一词的结果是，连强化是语言学习和成人不断产生言语反应的必要条件这个论断也是空洞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些“强化”的例子。首先，我们发觉，斯金纳喜欢谈论自动自我强化（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例如，他写道，“一个人自言自语……是因为他受到了强化”（第163页）；“孩子模仿飞机、有轨电车的声音，他就被自动强化了……”（第164页）；“幼儿园里的孩子听到‘他人话语’中的声音，说了出来，他就自动强化了自己富有探索性的言语行为”（第58页）；“说话人也是娴熟的听话人，他‘知道自己何时正确地回应了某个反应’，因此受到了强化”（第68页）；思考（thinking）是“自动影响行动者的行为，也是强化，因为确实起到了强化作用”（第438页；那么割破手指应该是强化，也是思考的例子）；“言语幻想无论明显或不明显，对说话人兼听话人来说都是自动强化。就像音乐家演奏或创作他听到后受强化的曲调，或者像艺术家画出从视觉上强化他的东西。因此，有言语幻想的说话人说出他听到后受强化的话，或写出他阅读后受强化的想法”（第439页）；同样，解决问题时的考虑和自圆其说的过程都是自动自我强化（第442—443页）。我们也可以通过发出这样的言语行为强化某人（既然厌恶刺激[aversive stimulations]已被排除，见第167页），通过不发出言语行为（保持沉默并加以注意，见第199页），或通过将来的一些场合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强化他（斯金纳在第152页写道，“[说话人的]行为强度，主要取决于听话人对某种事态将做出的行为”；斯金纳认为，这是“交流”或“让听话人知情”的普遍情况）。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强

化发生时，说话人并不在场，就像“艺术家……被其作品给……他人带来的影响所强化”（第224页），或者像作家受到这种事实的强化——他的“言语行为会延续几个世纪，或者同时被成千上万的听众或读者接受。作家可能不会经常或立即被强化，但他的净强化量可能很强大”（第206页；这说明他的行为“强度”极大）。一个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行为具有强化作用：批评或报告坏消息伤害了别人，或者发表实验结果推翻对方的理论（第154页）；描述一旦发生可能有强化作用的环境（第165页）；避免重复（第222页）；尽管没人提到也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或从孩子的牙牙学语中听到事实上不存在的词（第259页）；说明或加强有重要辨别作用的刺激的效果（第416页）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强化”概念完全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主观含义。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后发现，即使一个人根本不发出反应也会被强化，起强化作用的“刺激”不必对“被强化的人”产生影响，甚至无须存在（想象一下或者希望它存在就够了）。我们读到，一个人弹奏自己想弹奏的音乐（第165页），说想说的话（第165页），思考想思考的问题（第238—239页），读想读的书（第163页）等，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强化作用，或者我们写书或把事实告诉别人，是因为我们被自己所期望的读者或听众的最终行为强化了。此时，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强化”这一术语仅具有仪式化的功能。“X被Y（刺激、事态、事件等）强化”是“X需要Y”“X喜欢Y”“X希望Y属于这种情况”等说法的覆盖性表达。引用“强化”这一术语为依据并无解释力，任何以为这个代称能把希望、喜好等描述得十分清晰且客观的想法，都是严重的错觉。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就是混淆了被替代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旦我们认识到使用“强化”的随意性，许多引人注目的评论——比如这句话：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行为“完全受强化的偶联（contingencies）控制”（第150页）——就失去了最初的效果。人们对心理学家的期望是，针对常用词汇中对日常行为所做的随意且不正规的描述，他们借助从细致的实验和观察中得来的概念，多少能证明如何对这些描述加以解释或澄清，或者如何用更好的体系来代替。从实验室借来的术语，在使用时还带有日常词汇的模糊含义，仅仅修改术语是毫无臆想之中的趣味性可言的。

斯金纳声称，一切言语行为的习得和“强度”的维持都要通过强化。这个主张似乎很空洞，因为他的“强化”概念内容模糊不清，只是作为覆盖性词汇而包含了与言语行为的习得和维持相关的所有因素，不管这些因素能否被发现。¹⁹斯金纳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一词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巴甫洛夫条件作用和操作性条件作用都是心理学家进行真

正理解的过程。但人类的语言教学则不然。斯金纳认为语言教学和传递信息是受条件作用的事情（第357—366页），但这毫无道理。如果把“条件作用”一词加以引申，包括语言教学和传递信息的过程，那么斯金纳的这一主张是对的。但如此修改术语，就去掉了该词原先相对清晰而客观的特性，我们就会对这些过程一无所知。如果仅按字面意思使用“条件作用”，我们就明白斯金纳的主张是错的。同样，当我们说“表述结构（predication）的作用是便于把反应从一个术语转成另外一个术语，或者从一个物体转到另外一个物体”（第361页）时，我们并未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Whales are mammals”（“鲸鱼是哺乳动物”）这个表述结构在何种意义上是真的呢？或者，我们先来举斯金纳的例子。“The telephone is out of order”（“电话坏了”）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是，通过简单的条件作用过程，先前受“out of order”这个刺激控制的行为，现在受“telephone”（或电话本身）这个刺激的控制（第362页）。这样说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例子中，条件作用的规律是什么？而且抽象地说，哪种行为受控于“out of order”这个刺激呢？依据这句话所断言的物体和听话人目前的动机状态等，所做出的行为也可能各种各样：也许是勃然大怒，也许是高兴；也许把这个东西修好，也许把它扔掉；也许不再用它，也许照常使用（比如，看看是不是真的坏了）等。谈论该实例中的“条件作用”或“使先前可能存在的行为受控于新的刺激”，不过是拿科学来戏弄罢了。另见第491页注释2。

五

认为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是，言语社区对强化相倚关系做出的细致安排，这一主张在书中很多地方以各种形式出现。²⁰既然这不是基于实际观察，而是基于对低等有机体所做的实验研究而作出的类推，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一隐含性论断在实验心理学中的状态是什么。关于强化，最常见的特征描述（即斯金纳曾明确表示拒绝的特征描述）与驱力减降（drive reduction）有关。不管实际上学到了什么，只要以某种方式明确驱力，这种特征描述就有实质性依据。假如推断出有驱力是基于发生了学习行为这一事实，那么主张学习必须经过强化的说法，又和斯金纳框架中的主张一样空洞。大量文献已经讨论了是否没有驱力减降也能学习的问题（即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布洛杰特（Blodgett）的“经典”实验表明，没有给予奖励就在迷宫中认路的老鼠（与没有在迷宫中认路的控制组相比），一旦有了食物奖励，迷路的次

数就明显下降，这说明即使没有饥饿驱力的减降，老鼠也已弄清迷宫的结构。主张驱力减降的理论家运用探究性驱力反驳说，在发放奖励之前，探究性驱力已经减降了。他们还声称，在发放食物奖励之前，就能注意到老鼠走错路的次数已略有减少了。按照相似的设计，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却得出矛盾的结果。²¹但研究者很少怀疑这种现象。希尔加德（Hilgard）在对学习理论的综述中²²总结道：“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情况下，潜在学习还是有凭有据的。”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表明，新鲜而多样的刺激能引起老鼠的好奇心，促使它（用视觉）识别路径，实际上是去学习（因为给它两个刺激，一个是新的刺激，一个是旧的刺激，老鼠会注意新的那个）；²³老鼠会选择通往复杂迷宫的单选择迷宫，能跑过去就是它们唯一的奖励；²⁴猴子能学会辨别实物，并保持高效率的表现，而视觉探索（从窗口望出去达30秒）是它们唯一的奖励；²⁵也许更突出的是，猴子和猿猴会解决相当复杂的操作问题，而这些问题就设置在它们的笼子里。它们把探索和操作当作激励，去解决那些辨识性问题。²⁶在这些案例中，解决问题显然就是奖励。强化理论家如果要说明这些实验结果，就必须承认存在着好奇心驱力、探索驱力和操作驱力，或考虑一下习得驱力²⁷。除了在这些案例中发生了学习行为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存在着习得驱力。

关于驱力减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人们已提出各种其他证据进行挑战。有人拿从感觉到感觉的条件作用（sensory-sensory conditioning）研究得出的结果，来证明学习过程中没有发生驱力减降。²⁸奥尔兹（Olds）通过大脑的直接刺激记录了强化，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奖励无须满足生理需求，也无须取消驱力刺激。²⁹在这一点上，动物学家长期以来观察的印刻（imprinting）现象尤为有趣。特别是鸟类最为复杂的一些行为模式，与其在重要的幼鸟期经常接触的实物和动物有关。³⁰动物先天具有在某方面学习的倾向，通常在原先的学习完成很久之后，也会对某些种类的模式和实物做出适当的反应，而印刻就是证明这种内在倾向的最有力证据。因此，印刻是没有奖励的学习，但行为的最终模式因强化而得以改进。在某些情况中，鸣禽学会那些典型的鸣叫声，也是一种印刻。索普介绍了其研究并证实，“鸣禽在幼鸟期就学到普通鸣叫的一些特点，以后就能唱出各种完整的曲调”。³¹近年来，印刻现象在实验室条件以及人工控制下被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³²

在日常经验中，以下这种普遍现象肯定屡见不鲜。我们能认出自己不太注意的人和地方。我们查书找资料，对其中一些东西无所不通，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反驳强化理论，或出于无聊，或出于好奇。从事研究的人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集中精力花很长时间兴奋地写一篇将来无人会看的文章，或者解决一个别人认为不重要的问题，也未带来预想的奖赏，只是证实了一个普遍观点——研究者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老鼠和猴子也是这样不为奖赏，这一事实很有趣，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能证明这一点也很重要。事实上，研究上述种种行为，有着独特而积极的意义，远胜于这些研究在质疑没有驱力减降就不可能发生学习这一主张时所产生的附带意义。完全有可能的是，在这个被拓宽的领域内，从动物行为研究中获得的见解可以与言语行为这类复杂的活动产生某种关联，而强化理论至今未能显示出这种关联。无论如何，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如果不考虑行为的最终变化而把强化看作是可辨识的东西，很难理解有人竟声称强化是学习的必要条件。

同样，孩子是通过无意中观察、模仿大人和其他小孩才习得了大量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这似乎毋庸置疑³³。孩子只是通过成人“无微不至的爱护”来学习语言，由大人通过细致而有差别的强化来形成其言语总库，这却并非事实，虽然这种“爱护”可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传统。大家都会观察到，父母是移民的孩子很快从大街上其他孩子那里学会了第二语言，并且讲得十分流利，连最后的音位变体都不会出错。孩子对这些微妙之处都习以为常，而无论父母的学习动机有多强，无论他们练习多久，都无法学会。从电视、阅读、听大人讲话等过程中，孩子可以学会大部分词汇并“感觉”到句子结构。即使很小的孩子，尚未学会少量组成新话语的词汇总库，也可以很快学说一个词，不用父母努力教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到了后期，孩子还能构建和理解全新的话语，这些句子对他的语言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成年人读报纸时，肯定会遇到大量没见过的句子，单从结构上看，这些句子和他以前听到的句子迥然不同，但他会把它们当成句子来理解，还能发现细微的书写错误或打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刺激泛化”（stimulus generalization），不过是用新名称来留住老神话罢了。孩子和成人的这些能力表明，肯定有一些基本过程在起作用，而且完全不受来自环境“反馈”（feedback）的支配。斯金纳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是，通过有差别的强化缓慢而小心地形成言语行为是绝对必要的。对此，我一直没找到什么证据。如果强化理论真的要求假定有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那么我们似乎最好把它当成对强化论的归谬论证。斯金纳说，由言语社区建立的强化相倚关系是维持言语

行为强度的唯一因素，我很难找出该主张的依据（或者找到什么内容）。言语行为“强度”的来源何在，目前还完全是个谜。毫无疑问，强化具有重大的作用，但许多动机因素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就人类而言，我们对这些动机因素仍然一无所知。

就语言习得而言，似乎很清楚的是，强化、无意中的观察、天然的好奇心（加之喜爱模仿的强烈倾向）都是重要因素。孩子会概括、假设，会用各种非常特别的、显然极为复杂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种独特的能力也是重要因素。我们还无法描述这些方式，或者还没弄懂，也许大部分是先天就有，或通过学习或神经系统的成熟才发展起来。对于这些因素在语言习得中如何运作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一概不知。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是必要的，而不是基于对小部分我们恰好感兴趣的实验文献得出教条且相当武断的主张。

天生的结构、个人的成熟以及学习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某种熟练或复杂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这很难确定。我们只要想想这些，就会发现斯金纳的上述主张是多么没有意义。³⁴举例来说，³⁵未离巢的画眉幼鸟，起初听到巢穴有响动，就把嘴张开；后来，如果有大小、形状或与其相对位置不同的实物靠近，它便张开嘴。在这个后期阶段，幼鸟的反应是针对与亲鸟头部相似的刺激物的那部分发出的，是一个可以被精确描写的、复杂的刺激组合体。知道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发展出推理性的学习理论，说画眉幼鸟的一系列行为模式也许是从区别性强化的过程发展而来的。训练老鼠，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但我们似乎还有证据表明，这些对相当复杂的“符号刺激”产生的反应是先天决定的，无须学习也会成熟起来。我们不能低估这个显然存在的可能性。孩子模仿新词，也可以与之相比。让我们看看这种情况。起初，我们可能发现孩子模仿得大致相同。后来，我们发现孩子重复得当然不太准确（也就是说，不是在模拟，这本身就是个有趣的事实），但孩子把构成所学语言音位结构的那些发音特征重新组合成非常复杂的形式，并说了出来。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推测性的解释来说明，如果通过对强化偶然性进行精心安排也能得到这种结果。但也有可能的是，孩子从复杂的声音输入中选出与这些音位相关的特征，这种能力主要不是靠强化，而是靠先天决定的成熟过程发展而来的。如果这样是正确的，那么只说明行为的发展和成因，而不考虑有机体的结构，将无法让人们理解行为的实际过程是什么。

人们常说，决定语言习得特征的最主要因素肯定是经验，而不是以

某种方式处理信息的先天能力，因为儿童在什么样的社区生活，就会说那个社区的语言。但这种说法很肤浅。只要我们一直进行推测，就不难设想到这种可能性：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到了如此程度——只要有一些被观察到的汉语句子输入，它就能（用看似异常复杂且突然的归纳法）产出汉语语法的“规则”；只要有一些被观察到的英语句子输入，它就能（也许用一模一样的归纳法）产出英语语法的规则；或只要看到被观察到的术语运用于某些实例中，它就能自动预测，这种用法可以扩展到与这些实例有复杂关系的一类实例中去。如果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推测也并非毫无道理或异想天开，也不是不可能进行研究。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神经结构能以特定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但观察最终行为可以让我们假设都有哪些方式。可是就此而言，即便是能够把最简单的学习类型解释清楚的结构，也同样没被调查清楚。³⁶

这一节的简短讨论，概括起来似乎是，对于环境中的“反馈”和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有机体的独立作用”，哪个相对重要一些，现在既无实证证据也无已知观点来证明任何论断。

六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斯金纳为描述言语行为而发展出的体系。这个体系基于“刺激”“反应”和“强化”这些概念，那么，我们可以从前面几节总结出，这个体系是模糊且随意的。然而，由于第一部分提到的原因，我认为应当仔细地看一下，仅用这些术语拼凑的分析是多么不着边际，而且该体系解释言语行为事实的方式是多么没有功效。

首先看一看“言语行为”这个术语本身。它指“通过他人的传递而被强化的行为”（第2页）。这个定义显然太宽泛了，什么都会包括在“言语行为”里。例如，老鼠在斯金纳的盒子中按压杠杆、孩子刷牙、拳击手在对手面前退败、技工修理汽车等。但从这个意义上讲，到底有多少日常语言行为能算作“言语行为”，也很有问题。也许像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日常语言行为能算作言语行为，假如“被强化”这个词有什么实在意义的话。“言语行为”的定义后来变得精细一些，是因为有了这个附加规定：起强化作用的人（即听话人）的传递性反应（mediating response）“正是为了强化说话人的行为，本身必须受到条件限制”（第225页，斜体字是斯金纳原文的格式）。这还是包括了上述例子，如果我们假定做实验的心理学家、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拳击手的对手和付费修车的顾客的行为都是经过适当培训的结果，况且这样假定

也不无道理。但定义一旦变得精细，原先那个定义涵盖的某些言语行为中有意义的部分就被排除了。比如，假设我穿过马路时，听到有人说“当心车”，就会跳开。也不能说，就是为了强化说话人的行为，我这一跳（用斯金纳的话来说，就是传递性强化反应）就受到条件限制（也就是说，我跳开是因为受过训练）。对于更多此类实例，情况也是如此。斯金纳的论断是，有了这个精细化的定义，“我们就把论题范围缩小到传统意义上的言语领域”（第225页），此话似乎大错特错。

七

斯金纳给言语操作性反应分类，是依据它们与可辨别刺激、强化和其他言语反应的“功能”关系。祈令（mand）是“一种言语操作性反应。其中，反应被某种典型的结果强化，因而处于剥夺或厌恶刺激相关条件的功能控制之下”（第35页）。这个定义意味着问题、命令等都被包括进来。定义中的每个术语都产生了一堆问题。像“Pass the Salt”（“把盐递过来”）这样的祈令是一种类型的反应，但我们靠观察反应的形式无法辨别它是否属于这一类反应（斯金纳对此很清楚），只能通过辨别控制变量。这通常又无法做到。在按压杠杆的实验中，“剥夺”是根据不让动物进食或喝水的时间长短来定义的。可是在目前的语境下，“剥夺”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斯金纳没有试着描述确定剥夺相关条件的方法，不管“受控制的”反应是什么。告诉我们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实验者的操作来描述（第32页），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我们根据过了多少时间来定义“剥夺”，那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各种剥夺的状态。³⁷我们好像必须认定，剥夺的相关条件（比如说）就是缺盐，因为事实上说话人要求把盐递给他（使这个祈令成立的在座者起到了强化作用，也面临缺盐的情况）^{（38）}。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祈令受有关剥夺的控制的这一论断是空洞的，我们（与斯金纳的意图相反）完全依据形式把反应辨识为祈令。上述定义中的“相关”一词掩盖了一些严重的复杂情况。

谈到“Pass the Salt”这个祈令，尽管“剥夺”一词在功能分析上毫无用处，但在这里也并非格格不入。可是，假如说话人说“Give me the book”（“把这本书给我”），“Take me for a ride”（“让我搭你的车出门”），或者“Let me fix it”（“让我来修这个东西”），哪些剥夺才能和这些祈令联系在一起呢？我们怎么确定或衡量相关的剥夺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和以往一样得出结论，要么“剥夺”这个概念最多与极少一部分言语行为有关，要么“X受Y的剥夺”这个说法只是“X需要

Y”的奇特改述，这样容易误导别人，并带有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客观性内涵。

“厌恶控制”（aversive control）这个概念也被混淆了。斯金纳想用这个概念覆盖威胁、打人等行为（第33页）。他简单地描述了厌恶刺激如何起作用的方式。如果说话人曾经受过适当的强化（比如，在某个反应之后，就不再有这种伤害的威胁。先前有过随后受伤害的事，这就是有条件的厌恶刺激），那么听到威胁（之前先是威胁随后就是伤害）时，他会做出适当的反应。从这个描述似乎可以推断，除非说话人曾被杀害过，否则他就不会正确应对“Your money or your life”（“要钱还是要命”）（第38页）这个祈令。可是，即使有一套更仔细的分析，能消除描述厌恶控制机制的困难，对辨别操作性反应行为也会毫无用处，个中原因和我们讨论剥夺时提到的类似。

那么，似乎在大部分情况下，用斯金纳的术语都无法确定某个反应是不是某个祈令的情况。和上面的定义一样，用斯金纳体系的术语来谈论祈令的典型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况且，即使我们能把这个体系扩展开来，使祈令能够被辨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们大部分人还没那么幸运，能让我们的要求、命令、建议等被典型地强化（它们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强度”）。因此，斯金纳没有把这些反应当作祈令。事实上，斯金纳还归纳出一类“神奇的祈令”（第48—49页），用来包括“那些无法被解释的祈令，说明它们曾经有过特定效果或者在相似场合中有过类似效果”（这句话中的“曾经”这个词应该就是“典型的”）。在这些伪祈令中，“说话人只是描述了合乎某个剥夺状态或厌恶刺激的强化”。换句话说，依据我们所理解的“强化”和“剥夺”的意思，说话人要求他想要的东西。斯金纳说，“说话人似乎根据旧的祈令，类推出了新的祈令”，这番话对我们也毫无帮助。

斯金纳认为，新的描述体系比传统的更好，“因为它的术语是根据实验操作来定义的”（第45页）。我们再次明白，这是一种错觉。他只指出了按压杠杆的速率与剥夺食物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但“X想要Y”的这一陈述还没讲清楚。把“X想要Y”换成“X被剥夺了Y”，也没给行为描述增添任何客观性。对于祈令分析新方法的优点，斯金纳进一步说，它为要求、命令等传统分类提供了客观基础（第38—41页）。传统分类的依据是说话人的意图。然而，斯金纳坚持认为，意图可以被约简为强化的偶然性条件，以及相应地，我们能够根据听话人的强化行为解释传统的分类。这样，疑问就是祈令，它“规定了言语行动，听话人的行为允许我们

把祈令分为要求、命令或祈祷”（第39页）。如果“听话人被单独促使去强化说话人”，这就是要求；如果“听话人的行为通过减少威胁得到强化”，这就是命令；如果祈令“通过产生感情倾向而促进强化”，这就是祈祷。如果听话人传递了说话人的强化，并因传递的结果受到了积极的强化，这就是建议。如果“听话人实施了说话人规定的行为，而避免了厌恶刺激”，这就是警告，如此等等。如果斯金纳用英语对应的意义来使用“要求”“命令”等这些词，上面的话都是错的。“疑问”一词不包括命令。“Please pass the salt”（“请把盐递过来”）是请求（却不是疑问），不管听话人是否碰巧愿意这么做。听到请求的人不一定都有积极的回应。命令不被服从，也还是命令。说话人因为感到有暗示的威胁或想象会有威胁，就回答了疑问，该疑问也不会变成命令。并非一切劝告都是好的劝告，没有被听从的劝告仍然是劝告。同样，警告可能也有误导性。谨慎听从也许会引起厌恶刺激，不听从也可能有积极的强化作用。简而言之，这一整套分类都是毫不相干的。只需稍加思忖，基于某个听话人的行为或倾向是无法区分请求、命令、劝告的。基于所有听话人的典型行为，我们也做不到。有些劝告从未被听从，或许总是坏的劝告，等等，其他祈令也是如此。斯金纳明确表示对传统分类分析十分满意，这非常令人迷惑。

八

祈令是与之之前刺激没有特定关系的操作性反应。相反，因物知觉语（tact）是指“言语操作反应，其中某个形式的反应被某个实物、事件，或者实物、实践的属性所诱发（至少被增强）”（第81页）。本文第三部分中讨论刺激控制的例子都是因物知觉语。“刺激控制”的意思含混不清，所以因物知觉语也变得有些神秘。然而，因物知觉语是“最重要的言语操作反应”，更仔细地调查这一概念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言语社区要在儿童心里“树立”因物知觉语呢？也就是说，父亲或母亲在树立因物知觉语时是如何被强化的呢？对于父母的这一行为，基本的解释是，与环境的接触扩大这一事实使父母受到强化（第85—86页）。用斯金纳的例子来说，孩子后来能在电话里叫父母接电话。（这样，我们就很难明白，孩子是怎么习得这些因物知觉语的，因为父母先前没有适当的强化。）同理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引导孩子学走路，是为了他以后能送报纸赚钱。同样，父母在孩子那里创立“回声总库”（echoic repertoire）（比如说音位系

统)，这样会更容易教会他新词汇，扩展孩子的词汇最终也会有利于父母。“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我们解释有强化作用的说话人的行为，是指他控制自己所强化的说话人的可能性有所提高。”（第56页）也许这为父母引导孩子走路的行为提供了解释：孩子走路能力增强时，父母也因其对孩子的控制能力改善而受到强化。在这些解释中，潜藏着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父母想控制孩子或增强孩子自身行动的可能性，比起想看着孩子发展并发挥其能力，或多或少要更科学。毫无疑问，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论点。

现在看一下解释听话人对因物知觉语的反应的问题。例如，假设B听到A说“fox”（“狐狸”）并做出合理的反应，他会环顾四周，跑开，拿枪瞄准等。我们如何解释B的行为？华生⁽³⁹⁾和伯特兰·罗素对此做过分析，斯金纳曾正确地给予了驳斥，但他的分析也同样不恰当。他说（第87—88页）：我们假设（1）“B曾在某种契机受到fox（狐狸）的刺激，看到狐狸之后会环顾四周”；（2）“听话人目前‘想看见狐狸’，因此，一看到狐狸就采取行动的愿望很强，由狐狸提供的刺激就起到强化作用”。然后，B就采取适当的行为，因为“所听到的狐狸这个刺激是个契机，扭头和环顾四周之后，通常是看见狐狸的强化”，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分辨性操作反应。这个解释没有说服力。B也许从未见过狐狸，现在也毫无兴趣见到狐狸，但也会对“狐狸”这个刺激做出恰当的反应。⁴⁰两种假设都没有实现时，既然也可能发生同样的行为，那么肯定有其他的机制在此起作用。

斯金纳多次提到，他根据刺激控制来分析因物觉知语，比传统上根据指称（reference）和意义（meaning）来分析更进一步。这并不正确。斯金纳的分析和传统分析基本一样，只是用词没有传统分析那么谨慎。他的分析与传统分析的唯一区别在于，传统分析把外延（指称）和内涵（意义）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斯金纳根据“刺激控制”这个模糊概念不加区分地代替了这两个词。在某种传统说法中，一个描述词被认为是指示一组实体以及暗指或指明一个实体必须具有或实现的某个性质或条件。⁴¹这样，“vertebrate”（“脊椎动物”或“脊椎的”）一词指（指称或证实了）脊椎动物，并暗指“有脊柱”的特性或此类的东西。这种被暗示的定义性质叫词汇的意义。两个术语可能指称相同，但意思不同。有心脏的生物才是脊椎动物，显然这是对的。如果这样，那么“creature with a heart”（“有心脏的生物”）就是指脊椎动物，并且规定了“有心脏”这一特性。但这可能有和脊柱是不同的特性（或不同的普遍条件）。因此，“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heart”被认为意思不一样。这个分

析并非是错误的（对其中的一个意义而言），但它的诸多不足常常被指出来。⁴²主要问题在于，是否两个描述性词汇具有同样的特征，还没有找到好的确定方法。⁴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指同样的物体还不够。人们也许会说，“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spine”（“有脊柱的生物”）性质相同（和“有心脏的生物”的性质有区别）。如果我们问起为什么是这样，唯一的答案似乎是，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因此，“特性”这个概念似乎受到语言的约束，诉诸“定义性的特性”很难把意义和同义词问题解释清楚。

斯金纳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解释，这从他因物知觉语定义为受某个实物或事件的性质（刺激）控制的反应就能看出。我们发现，“控制”一词没有实际含义，也许最好被理解为“指示”或“暗指”或二者的代称。接受“刺激控制”这一新说法的唯一后果就是，指称与意义之间的重要区别变模糊了，没有产生什么新的客观性。刺激控制反应是由反应本身决定的，没有什么单独、客观的辨识方法（见前面第三部分）。因此，当斯金纳把“同义关系”定义为“同一个刺激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的情况时，我们无法反对。对同一物体，先后会产生“chair”和“red”的反应，它们不是同义词，因为据说刺激不同。“vertebrate”和“creature with a spine”这两个反应会被当作同义词，因为它们受所研究物体的相同性质的控制。用更传统却不失科学性的话来说，它们诱发了相同的概念。同样，词的隐喻引申被解释为是由于“刺激性质的控制，而这些性质尽管在强化时存在，但没有进入言语社区所尊重的偶然性”（第92页；即传统上所说的偶然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我们没有对传统解释提出异议，就不能反对斯金纳的观点。正如我们可能根据控制刺激的复杂性质来解释听到一段音乐时说“Mozart”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同样毫不费力地解释，为什么没有太阳，还会说出类似在“Juliet is [like] the sun”（“朱丽叶像太阳”）中的反应“sun”（“太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注意到朱丽叶和太阳有共性，至少它们对说话者的影响是一样的。”（第93页）既然任何两个物体都可能有许多共性，我们能确认的是，解释“A is like B”（“A像B”）这种形式的反应时我们不会感到迷惑，无论A是什么，B是什么。但很清楚的是，斯金纳反复地声称，他的解释比传统解释更简单、更科学，事实上这没有什么依据。

个人刺激（即布隆菲尔德 [Bloomfield] 所说的“移位言语”）控制下的因物知觉语构成了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类别（第130—146页），不仅包括像“familiar”（熟悉的）和“beautiful”（美丽的）的反应，也包括指过去的、潜在的或未来事件或行为的言语反应。例如，“There was an

elephant at the zoo”（“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这个反应“必须被理解是对目前刺激的反应，包括说话者自己在内的事件”（第143页）。⁴⁴如果我们现在问自己，现实生活中哪些因物知觉语是对当前现实外界刺激的反应（或描述），我们就能明白个人刺激起着多大的作用。在幼儿园之外，只有很少一部分言语行为有“This is red”（“这是红色的”）和“There is a man”（“有一个人”）这样的话。“功能分析”必须求助于模糊的内在刺激，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功能分析比传统说法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多不了多少。

先行言语刺激控制下的反应，被斯金纳分成与因物知觉语不同的一类，叫作“回声反应”（echoic response）。这种反应“生成的声音模式与刺激的声音模式类似”（第55页），只包括直接模仿的例子。⁴⁵斯金纳并未试图解释，为什么孩子的回声反应与父亲用低音说出的刺激相似。尽管对此没有清楚的陈述，但斯金纳似乎不接受音位学家在这方面的解释，他也没提出其他看法。回声总库的形成完全是因为有差别性的强化。在斯金纳看来，说话人只是做了言语社区所要求他做的，言语社区坚持的精确程度会决定总库的要素，无论这些要素是什么（也不一定是音素）。“言语社区不要求准确对应的话，回声总库可能就不严谨，也无法成功地应用到新模式中。”与这些论断似乎明显冲突的是，一个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准确地学会了第二语言或方言，却几乎没有关于准确度这种熟悉的现象的讨论。斯金纳并未引用人类学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如果言语社区不要求准确对等，就不会产生有效的音位系统（前面引用的那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对文字刺激（阅读）做出的言语反应被称为“文本行为”。

对言语刺激做出的其他言语反应叫“言内操作反应”（intraverbal operants）。斯金纳提供的范例是，听到刺激“two plus two”（“二加二”）的反应是“four”（“四”），或听到刺激“capital of France”（“法国的首都”）的反应是“Paris”（“巴黎”）。用简单的条件作用就能解释对刺激“two plus two”做出的反应“four”，⁴⁶但言内操作反应在下列情况中毫无意义：我们发现这个概念被拓展到包括了大部分历史事件或许多科学事实（第72、129页），所有的词汇联想和“突发奇想”（第73—76页），一切翻译和替代解释（第77页），叙述看到、听到或记忆中的事情（第315页），还有总体上说来的大部分科学、数学和文学作品。显然，这种解释适用于学生，适当的练习之后，他就能对“capital of France”做出“Paris”的反应。可是，学生还能对下列问题做出明智的猜测：“What is the seat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法国政府所在地在哪里？”）“... the source of the literary dialect？”（“文学语言的来源是什么？”）“... the chief target of the German blitzkrieg？”（“德国闪电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等，或者他还能证明一条新定理，翻译一篇新文章，又或者第一次或以一种新方式去解释一段话。

对斯金纳来说，“让别人明白一个观点”，和你一样看待问题，或者理解事情的复杂状态（例如，困难的政治形势或数学证据），这些都只是增强听话人已有行为强度的问题。⁴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有较高智慧的科学或哲学文章为例”，但“可能被归结为回声反应、文本反应或言内操作反应的补充部分”，斯金纳认为这“更加令人感到奇怪”（第269页）。同样，这话听上去不觉得荒谬，只是因为“强度”和“言内操作反应”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如果我们只按字面意思使用这些词，理解一句话显然不等于高声（高反应强度）喊出这句话。这样就无法根据言语反应配合情况进行明智而有说服力的论辩。⁴⁸

十

最后一类操作性反应叫作“自我暗示语”（autoclitics），包括断言、否定、定量（quantification）、反应的定质（qualification）、句子结构以及“极其复杂的言语思维的操控”。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受说话人其他行为诱发或对说话人其他行为起作用的行为”（第313页）。那么，自我暗示语就是对已有反应的反应，或正如我们在阅读斯金纳书中那一节所发现的，是对隐性的、初发的或潜在的言语行为的反应。自我暗示语的表达有：“I recall”（“我记得”），“I imagine”（“我料想”），“for example”（“例如”），“assume”（“假设”），“let X equal ...”（“假设X等于.....”），还有各种否定语、表述和肯定中的is，以及all、some、if、then这些词；一般来说，除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外，还包括其他所有词素（morpheme），以及词序、安排等语法过程。斯金纳在这一节中，没有一句话不严加修改就能为人所接受。我们只举一个例子，看看斯金纳怎么解释“All swans are white”（“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句话中的自我暗示语“all”（第329页）。显然，我们无法假设，“all”（“所有”）是对“all swans”（“所有的天鹅”）这个刺激的因物知觉语。因此，斯金纳建议，我们应该把“all”作为自我暗示语，修饰“Swans are white”（“天鹅是白色的”）整个句子。“All”可以看作相当于“always”（“总是”），或“always it is possible to say”（“总是有可能这么说”）。但请注意，被修饰句“Swans are white”和“All swans are white”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况且，如果按字面意思把“all”翻译成“always”也不对。可以说“Swans are green”（“天鹅是绿色的”），也可以说“Swans are white”（“天鹅是白色的”），但不可能永远说两者中的任何一句（例如，你在说别的话或在睡觉，就不能说出其中一句

话)。也许斯金纳的意思是，这句话可以换成“X is white is true, for each swan X”（“对于每只天鹅X来说，X是白色为真”）。但在斯金纳的体系中不能这么说，因为他的体系不谈“true”（真实性）的问题。

斯金纳把语法和句法解释为自我暗示的过程（第13章），这与众所周知的传统说法的主要区别是，他用“控制”或“诱发”这些伪科学术语取代了“指称”这个传统术语。因此，在“The boy runs”（“这个男孩跑步”）中，“runs”末尾的s是受“情景的微妙性质”控制的因物知觉语，因为“跑的性质是一项活动，而不是物体或物体的性质”。⁴⁹（那么假定在“The attempt fails”[“尝试失败了”]，“The difficulty remains”[“困难还存在着”]，“His anxiety increases”[“他的焦虑增加了”]等这些句子中，我们也必须说，s表示被描述为“attempt”的对象，在实施“failing”的活动等。）但在“the boy's gun”中，s表示领属（假定在“the boy's arrival”[“男孩的到来”]，“... story”[“男孩的故事”]，“... age”[“男孩的年龄”]等中，s也表示领属），并且受“情景的关系”控制（第336页）。在“The boy runs the store”中，这种“词序的关系自我暗示语”（且不论把一系列反应的顺序叫作对这些反应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意思）受“极其复杂的刺激情境”的控制，“也就是说，男孩在经营着这个商店”（第335页）。在“the hat and the shoe”（“帽子和鞋子”）中，“and”（“和”）受“成对”（pair）性质的控制。在“the dog went through the hedge”（“这条狗穿过了篱笆”）中，“through”（“穿过”）受“正在穿过的狗和篱笆的关系”控制（第342页）。总体而言，名词由物体引发，动词由动作引发，如此等等。

斯金纳认为，句子是在一个框架中的一系列主要反应（名词、动词、形容词）（第346页）。如果我们关注Sam rented a leaky boat（山姆租了一条漏水的船）这一事实，对这个场景的粗略反应（raw response）是rent（租）、boat（船）、leak（漏）、Sam（山姆）。描述这些反应的自我暗示语（包括词序）表达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增加了一道程序叫“造句”，最后得出一个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这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这种选择是任意的。认为句子由放在语法框架中的词项构成，这是传统哲学和传统语言学的观点。斯金纳只是添加了不太合理的假设，认为在造句的内部过程中，先选择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再加以排列、修饰等，这些都是由对这些内部活动的自向反应来完成的。⁵⁰

这样看待句子，无论用自我暗示语、虚词表达，或用语法形位、词汇形态表达，都是不恰当的。“Sheep provide wool”（“绵羊供给羊

毛”)没有(有形的)框架,但再怎么调换词序,也无法组成另一个英语句子。“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愤怒地睡觉思想绿色的无色的”)和“friendly young dogs seem harmless”(“友好的小狗似乎不会伤人”)这两个序列的框架相同,但只有一个是英语句子(同样,也只有一个序列倒过来念还是一个句子)。(51)“Struggling artists can be a nuisance”(“努力的艺术家可能令人讨厌”)和“marking papers can be a nuisance”(“批改试卷可能令人讨厌”)的框架是相同的,但句子结构不同,只要把两个序列中的can be用is或are代替就一清二楚了。(52)还有其他许多相似的同样简单的例子。显然,在句子结构中,不只是在语法框架中插入词项,还涉及更多的过程。不考虑深层过程就研究语言的方法,无法成功地描述真实的语言行为。

十一

斯金纳在其描写体系中介绍的主要概念,上文都已经讨论过。逐一讨论这些概念是为了表明,在斯金纳的每个实例中,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他所说的那些术语,他的描写并未涉及言语行为的任何方面;如果按比喻义来理解,他的描写对传统说法没有任何改进。这样一引申,那些从实验心理学借来的术语就失去了客观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日常语言的模糊意义。斯金纳只用了很少一部分术语来做代称,许多重要的区别就看不清楚了。我认为,这样分析证明了前面第一部分的观点,也就是说,抹杀说话人和学习者的单独作用(斯金纳认为这个结果很重要,参看第311—312页),只能以抹杀描写体系的全部意义为代价,结果,描写体系只能粗糙地草草运行,对最基本的问题也无法提供答案。(53)斯金纳所思考的问题尚显稚嫩,并且毫无解决希望。在对言语行为的特性了解得更多之前,探究言语行为的致因是徒劳的。况且,还没更好地了解所习得的东西就考虑习得过程,这也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要想真正研究语言行为,肯定很快就意识到,陈述一个既能界定其研究范围,又不会太琐碎或完全超出目前理解和技巧之外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斯金纳把功能分析选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留给自己一个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任务。在一篇十分有趣且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里,(54)K. S. 拉什利含蓄地提出一类问题,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要研究这些问题就会成果丰硕,而这些问题不过是斯金纳所关注的问题的初始阶段。和其他认真考虑数据的人一样,拉什利看出,构成并说出话语不只是把受外界刺激和言内联想

(intraverbal association) 控制的一系列反应串联起来，话语的句法组织也不是由其有形结构本身以简单的方式直接地表现出来。他做过各种观察才得出结论认为，句法结构是“强加在出现的具体行动上的被概括的模式”，“对句子结构和其他运动序列 (motor sequences) 的考虑会显示……在明显表达的序列背后，还有许多综合过程 (integrative processes)，这些过程只能从它们活动的最终结果来推断”。他还评论说，在某个话语的实际构成中确定使用什么“选择机制” (“selective mechanisms”) 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当代语言学还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些综合过程、外加模式和选择机制，至少能把彻底描写这些东西当作一项任务。把语言L的语法设想为一种机制，能列举出语言L的所有句子，就好像演绎理论列举出一系列定理那样，这样做也不无道理（按照“语法”一词的这个意义，它还包括音系学）。此外，语言理论被视为对这些语法形式性质的研究，通过精确的描述，这种宽泛的语言理论能提出一种统一的方法，通过一个句子的生成过程来确定结构描述，从而让人们充分了解到这个句子是如何被使用 and 理解的。简而言之，从被合理描述的语法中，应该有可能得出强加在构成话语特定行为之上的完整过程和概括模式。对于具有正确形式的语法，其规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任选的，一类是必需的。在生成话语的过程中，只用那些必需的规则。那么，可以把语法的任选规则看作是产生某个话语过程中的选择机制。说明这些完整过程和选择机制的任务并非无关紧要，也不是无从调查的。这种研究的结果正如拉什利所说的那样，可以成为心理学和神经学的独立兴趣（反之，心理学和神经学对于这种研究来说也颇具趣味）。这种研究即使很成功，也无法回答对意义和行为致因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但肯定不会与这些问题毫无关联。况且，一切有关语言使用的研究都倚靠“语义泛化”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隐藏着复杂性和特殊推理结构，与句法学研究或展示的复杂性和特殊推理结构毫无两样。句法研究的结果具有普遍性，因而对意义理论中的简化法可能是一个修正。

当然，说话人、听话人和语言学习者的行为构成了一切语言研究的真实数据。——列举句子之后，就能确定对每个句子进行有意义的结构描写，该语法的构造本身无法说明这种真实的行为，也只是抽象地描述了掌握语言的人的能力，他能区分哪些句子是合理的，理解新句子的意思（不是全部理解），并注意到一些歧义等。这些能力都很特别。我们不时地读到和听到新的词汇序列，把它们当作句子来理解。很容易证明的是，我们接受并理解为句子的那些新事件与我们凭借简单的形式（或

语义、或统计）相似性概念或语法框架一致性所熟知的句子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泛化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我们把新的项目当作句子，不是因为它单纯地与某个熟悉的项目匹配，而是因为它是由每个人以某种方式或形式内化的语法而生成的。我们部分地理解了一个新句子，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能确定从这个语法得出该句子的过程。

假设我们能构建出具备上述性质的语法，那么我们会描写并研究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假定，说话人和听话人已具备语法所抽象描述的能力。说话人的任务就是挑选一系列相协调的任选规则。如果我们从语法研究中得知说话人有什么选择，这些选择相互协调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我们就能有意义地去调查让说话人做出一个或多个选择的因素。听话人（或读者）必须根据所接触的话语来决定构建该话语的任选规则是什么。必须承认的是，人类这么做的能力远胜于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语言的儿童根据自己对句子和不是句子的那些表达的观察（也就是说，通过所处的言语社区的改正），就能为自己构建语法。研究实际观察到的说话人的能力，即如何区分句子和非句子，发现歧义等，显然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语法是极其复杂和抽象的，而且儿童已经能出色地（至少从形式来看）进行理论构建。况且，这项任务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做到，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凭借智力上的高低。任何学习理论都应该正视这些事实。

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儿童能构建极为复杂的机制而生成一系列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是他听过的），成人也能很快确定某个项目是否（如果是这样，又是如何）由这个机制生成，这个机制具有抽象演绎理论的许多性质。但这似乎是对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的表现进行的一个公平描述。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们就能预测，并直接解释说话人、听话人和学习者的实际行为，而不预先了解语法结构，这样做可能成效有限。必须把语法当作说话人和听话人行为的组成部分，而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行为就像拉什利所说的那样，是从最终的具体行动推断出来的。所有正常的孩子非常迅速地习得极为复杂的相应语法这一事实表明，人类或许生来如此，对未知性质和复杂事物有数据处理或“构成假说”的能力。⁵⁵研究语言结构最终也许会为这个问题带来认识。目前，人们还不能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但原则上有可能研究的议题是：确定信息处理（构建假说）系统的内在结构必须是什么，才能使它从某个时间内的某个数据中形成某种语言的语法。无论如何，试图抹杀说话人的作用而形成的“心理主义”描写系统，最终混淆了重要的传统概念的区别。

同样，不愿研究儿童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只能肤浅地解释语言习得，把大量未经分析的作用归咎于所谓的“泛化”步骤，而“泛化”实际上包括该过程中一切有趣的东西。如果语言研究如此局限，言语行为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不清楚的，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谜。

（本文最初发表在《语言》[*Language*] 第35卷第1期 [1959年1—3月]，第26—58页。）

《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序

认为语言是基于一个确定如何解释无限多句子的规则系统，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一百多年前，威廉·冯·洪堡就在其著名的普通语言学言中合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想法（Humboldt, 1836, 《论语言》[*On Language*]），尽管很少有人去研究他的导言。⁽⁵⁶⁾他认为，语言是“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其语法必须去描写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过程。语言使用的这种“创造性”方面，在语言与心智唯理主义哲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而洪堡的上述观点就是这种关注的产物（见乔姆斯基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 1964] 中的讨论）。不仅如此，就“生成语法”这一术语的当代意义而言，连帕尼尼（Panini）的语法似乎也可以说成是零碎的“生成语法”。

尽管如此，主要在过去几年中，现代语言学领域做出了颇有实质性的努力，为具体语言构建了明确的生成语法，并对其结果进行了探索。关于如何适当地构成生成语法理论，如何正确地描写已被深入研究的语言，人们展开了十分广泛的讨论和争辩，这都不足为奇。现在所能提出的相关语言理论或就此所说的英语语法的结论都是尝试性的，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应当对此一清二楚。（只要想一想语言现象多么地丰富，无论何种有见地的阐释都难免受阻，这就足够了。）但似乎也有一些相当具有实质性的结论，仍然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尤为突出的是，虽然关于转换语法理论的适当形式还存在诸多疑问，在我看来，转换语法已在任何实证充分的生成语法中牢固地确立了中心地位。

在研究转换语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这本专著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探索性研究。全书把转化语法预先假定为讨论的总框架。此处所讨论的是应当如何阐述这一理论。本研究还探讨了处于转换语法研究边缘的问题。对于一些问题，我会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我的讨论更多的只是提出问题，考虑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做出任何确定的结

论。

（本文最早出现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 第v—vii页。 ）

方法论初阶

第一部分 作为语言能力理论的生成语法

本文将谈及句法理论和英语句法中的各种话题，对其中少数话题会稍加详述，还有几个则浅尝辄止，对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做彻底的讨论。全文将涉及生成语法的句法部分（syntactic component），即涉及一些规则，这些规则详细说明了起句法作用的最小单位（即formatives，构形成分）组成的结构完整的语符列，并赋予这些语符列以及在某些方面结构不完整的语符列各种结构信息。

总框架在许多地方都介绍过，本研究将在该框架内进行。了解本研究的前提是，大致熟悉参考文献中列出的理论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我将在本章简略地考察一些主要的背景假设（background assumptions），并不做认真的尝试去证实它们，只是想将其概要整理清楚。

语言理论主要关注处于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中的人，他们是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精通本社区的语言。在实际行为中运用其语言知识时，他们不受类似记忆限制、分心、注意力和兴趣转移、错误（偶然性的或典型性的）等与语法无关的条件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似乎一直是现代普通语言学奠基人的立场，也从未有人提出过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更改它。为了研究实际的语言运用，我们必须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说话人—听话人的潜在语言能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方面看，语言研究与调查其他复杂现象的实证研究并无区别。

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能力（competence，即说话人—听话人对自己语言的知识）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即在具体情景中对语言的实际使用）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只有在上一段所说的理想情况下，语言运用才能直接反映语言能力。在对自然话语（natural speech）的录音中，会有许多说错了重来的情况，还有不符合语法规则以及中途改变主意等情况。对语言学家和学习语言的儿童来说，问题是要从语言运用的

数据中确定基本的规则系统，而说话人——听话人已掌握了这个系统，并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使用了它。因此，从专业术语的意义上讲，语言理论是心灵主义的，因为它涉及如何找出作为实际行为基础的心理现实（mental reality）。⁵⁷所观察到的语言使用，或者假想的回应倾向、习惯等，都可能为这种心理现实提供证据，但肯定无法构成语言学的实际主题，如果语言学还算是一门严肃的学科的话。我这里提到的区别与索绪尔的语言 - 言语（langue-parole）有关，但必须放弃他的“语言”概念，那仅仅是各种项目的系统总录（inventory），倒应该回到洪堡的想法，他把潜在的语言能力看作是生成过程的一个系统。⁵⁸

一种语言的语法旨在描写理想的说话人 - 听话人内在的语言能力。而且，如果这种语法是十分明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种语法不是依赖有理解力的读者的智力，而是对读者的作用进行明确的分析——我们就（有些冗余地）称其为“生成语法”。

一部完全合乎需要的语法必须给无限多的句子中的每一句都配以结构描写，这种结构描写显示出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是如何理解这个句子的。这是描写语言学的传统问题，而且传统语法为句子的结构描写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尽管传统语法明显具有价值，它们仍有缺陷，并未把所关注的语言的基本规律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在句法层面尤为清楚，传统语法或结构语法只是对具体例子进行分类，并未在任何有意义的范围内达到系统阐释生成规则的阶段。对现有的最好的语法所做的分析会迅速地揭示出，这是一个原则缺陷，而不只是实证详细与否或逻辑准确与否的问题。然而，似乎很明显的是，探索这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的尝试，可以从研究各种传统语法所呈现的这种结构信息开始，还可以从研究这些语法中所展现的语言过程（不管有多么不拘形式地展现出来）开始，这样做最为有利。⁵⁹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的局限之处。尽管这些语法也许完整、明确地列出了例外和不规则的情况，它们仅为规则而多产的（productive）句法过程提供例子和线索。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例如，詹姆斯·比蒂⁽⁶⁰⁾说道：

因此，语言在这个方面与人相似。尽管各有独特之处，由此能把各种语言区分开，但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每一种语言的独特之处在各自的语法和词典中得到解释。所有语言共同拥有的那些东西，或对每一种语言都很有必要的那些东西，是在一门科学中探讨的，有人把这门科学叫作“普遍语法”或“哲

稍早些时候，杜马尔赛⁽⁶²⁾是这样解释普遍语法和具体语法的：

在语法中，有一些适用于所有语言的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被称为“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所评述的方面有：发出的语音，作为这些语音的符号的字母，词的性质，以及为表达某个意思词应该被排列或结尾的不同方式。除了这些普遍性的观察结果之外，还有一些观察结果只适用于某一种语言，因此形成了每种语言的具体语法。 ⁶³

此外，在传统的语法理论之内，人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所有语言共有的特性之一就是其“创造性”的方面。因此，语言的基本性质就是，为表达无限多的想法和在无限种新情景中做出恰当反应提供方法。 ⁶⁴而且，特定语言的语法要靠普遍语法来补充。普遍语法包含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并表达出由来已久的种种规则，而这些规则因其普遍性从语法中被省略了。因此，一部语法只是详细讨论例外和不规则现象，也是十分合理的。只有受到普遍语法的补充时，一种语言的语法才能完整地描述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

但现代语言学尚未明确地承认，如果为了做到描写充分性，是否有必要用普遍语法来补充一种语言的“具体语法”。事实上，现代语言学拒绝对普遍语法做研究，因为这样会误导他人。正如我们前面所注意到的，现代语言学从未尝试去研究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因此，也无人就结构主义语法基本的描写不充分性提出任何解决方法。

传统语法（具体语法或普遍语法）未能准确地陈述构成句子和解释句子的规律性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普遍认为存在一种由词序反映出的“思想的自然次序”。因此，形成句子的规则其实不属于语法，而是属于研究“思想次序”的某个其他学科。比如，《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宣称，除了修辞格以外，词的次序遵循着“与我们思想的自然表达”一致的“自然次序”。 ⁶⁵结果是，除了省略、倒装等决定语言修辞用法的规则之外，几乎不用制定什么语法规则。与之类似的观点以许多形式和变体出现。再举一个例子，狄德罗⁽⁶⁶⁾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主要讨论词序如何反映观点同时发生和连续排列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认为，法语在词序与思想观点的次序相对应的程度上，在所有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 ⁶⁷因此，“无论古代语言或现代语言中的词序是什么，作家的头脑总是遵循着法语句法所教导的次序”⁶⁸；“我

们用法语说这些事情，就像人的头脑被迫用其写作时使用的语言考虑这些事情一样”。⁶⁹狄德罗继续总结说：“我们的语言远比其他语言有优势、很实用，而不是徒有其表。”⁷⁰他前后逻辑一致，令人称道。因此，法语适用于科学，而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在文科中更有优势”。此外，

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会选择法语，而……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人更偏爱古代语言和我们邻国的语言……在社交界和哲学界应该说法语，而在讲台上和戏剧里应该说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如果我们的语言将来再次出现在地球上，它应该是真理的语言；而……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的语言是讲述寓言和虚构情节的语言。法语用来教导、启发和说服别人；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英语是用来劝说、感动和欺骗别人的语言：对人民大众说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而在圣人面前要讲法语。⁷¹

无论如何，既然词序由语言之外的因素决定，就没有必要用具体语法或普遍语法来描写词序。因此，我们具备原则性的理由把对句法过程的明确说明从语法中排除出去。值得注意的是，对语言结构持有的天真看法直至现代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例如，索绪尔对一系列表达对应一系列杂乱的概念的描述，或把语言使用的共同特性仅仅说成是对词和词组的使用问题。⁷²

但传统语法的这种描写不充分性的根本原因更多是技术上的。尽管大家都明白语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创造性的”，但直到最近才获得表达递归过程系统的技术手段。实际上，只是在近30年里，我们才从研究数学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语言如何能做到“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洪堡语）。既然已经有了这些洞见，就有可能回到传统语言学领域曾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上，就有可能尝试对语言的“创造性”过程做出明确的阐释。简而言之，就生成语法的全面研究而言，不会有技术上的障碍。

现在再回到主题上来。所谓“生成语法”，我仅指一套规则系统，这套系统以某种明确、清晰的方式把结构描写分配给句子。显然，每位说一种语言的人都已经掌握并内化了一种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表达了他对所说语言的知识。这并不是说，他意识到这种语法规则，或甚至能够变得意识到这种语法规则，或他对这门语言的直觉知识的陈述就一定是准确的。任何有趣的生成语法多半都会涉及各种心智过程，这些心智过程

已远远超过实际意识甚至潜在意识的层面。此外，十分明显的是，说话人对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能力的讲述和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因此，一部生成语法试图弄清楚的是，说话人实际懂得的是什么，而不是他就自己的知识可能讲述的内容。同样，有关视觉感知的理论会试图解释一个人真正看到了什么，还会解释决定这一点的机制，而不是对他所看到的东西和为什么看到它的陈述，尽管这些陈述可能为该理论提供有用的、（实际上也是）令人信服的证据。

为了避免连续的误解，也许值得重申的是，一部生成语法并不是一个说话人或听话人的模式。生成语法试图用尽可能最中性的词汇来描述语言知识的特点，这种语言知识为说话人—听话人的实际语言使用提供了基础。我们谈到一部语法用某种结构描写生成了一个句子时，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这部语法把这种结构描写分配到这个句子。我们说一个句子与某部生成语法有某种派生关系时，并不是说，说话人或听话人可能以某种实际或有效的方式构建了这种派生关系。这些问题都属于语言使用的理论，即语言运用理论。毫无疑问，语言使用的合理模式会把表达说话人—听话人语言知识的生成语法作为基本部分纳入其中，但这种生成语法本身并未规定知觉模式或言语生成模式的性质或功能作用。⁷³

就这个问题的质疑一直持续不断，这表明术语变化也许可以规范化。然而，我认为，“生成语法”这一表达是完全恰当的。因此，我一直在用这个术语。“生成”（generate）一词在此表达的是逻辑上的意思，尤其是在波斯特⁽⁷⁴⁾的合成系统（combinatorial systems）理论中的意思，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此外，“生成”似乎是对洪堡的“erzeugen”一词最恰当的翻译。他经常使用“erzeugen”，似乎基本就是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既然在逻辑学和语言学理论的传统中，“生成”一词的用法得到了认可，我也看不出有何理由要修改术语。

（本文最初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方法论初阶”的第一部分 [Part 1, “Methodological Preliminaries”, i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3—9页。）

语言与自由

当受邀谈一谈“语言与自由”这个话题时，我感到既困惑又好奇。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致力于语言研究，在该领域找个话题讨论一下并非难事。关于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谈资甚多，因为在20世纪中期我们和其他人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本次讲座题目的棘手之处在于把两者连接起来。语言与自由以何种方式才会相互关联？

作为铺垫，请允许我先谈谈当代语言研究，仅为一己之见。语言与语言使用的诸多方面都会引出有趣的问题，但依我看，迄今为止只有几个问题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具体地说，我们最富见地的发现是在形式语法结构方面。熟悉某种语言的人习得了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即术语所说的“生成语法”），它们用某种方式把音和义联系起来。就这种语法的特性而言，有许多论据充分（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有启发性）的假设，并涉及多种语言。此外，人们对“普遍语法”的兴趣历久弥新。对于人类能通过常规方式学习的各种语言，“普遍语法”如今被当作是解释其普遍属性的理论。在这个方面，也的确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一话题非常重要。把普遍语法看作对某种基本心智官能的研究，这很恰当。因此，特别有趣的是发现（我认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普遍语法有着十分丰富、抽象、受限的原则，并能用来有原则地解释不同的现象。从我们理解力当前所处的阶段来看，假如语言要为调查人类的其他问题提供一个跳板，我们就得把注意力转到语言的这些方面。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些方面已经被充分、合理地理解清楚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对语言形式属性的研究以消极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某种天性：该研究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我们对心智特性的理解尚有局限之处，那些心智特性显然是人类特有的，并且必须以亲近的（也许仍然很隐秘的）方式进入到人类的文化成就中去。

在寻找出发点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段时期，人们当时可能相信的是：“把自由变成哲学要旨的思想已经把人类的精神从其所有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比起早期的革命，为科学的方方面面都指出了更强大的新方向。”⁷⁵在这段话中，“革命”一词带有很多联想含义，因为谢林⁽⁷⁶⁾也声称说：“人生来就要采取行动，而不是胡思乱想”；当他写出“时间逐渐向更高尚的人类宣告精神上的自由，不想忍受人们因失去枷锁而悔恨涕零”时，我们听到了18世纪晚期自由

意志主义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回音。谢林写道：“一切哲学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自由。”当人们努力挣扎摆脱枷锁、反抗已丧失合法性的政府、建立更人性化和更民主的社会机制之时，这些话就具有意义和紧迫性。正是在这种时刻，哲学家才被迫去探索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局限之处，他们也许会和谢林一起总结道：就人类自我而言，“其本质就是自由”；就哲学而言，“哲学的至高位置恰恰在于，它把一切寄托于人类的自由”。

我们再次处于这样的时刻。革命的萌芽正遍布所谓的第三世界，把大众从对传统权威的麻木和顺从中唤醒。有些人认为，工业社会很成熟，也适合变革——我指的不仅仅是新左派的代表。⁷⁷

来自变革的威胁会导致镇压和反动，其迹象以不同的形式在法国、苏联、美国清晰可见——尤其是在我们会面的城市里。那么，我们当然应从理论上考虑人类自由的问题，充满兴趣且严谨地关注更早期的思想，当时的古代社会体制遭到了批评性分析和持续的攻击。只要我们记住谢林的警告，人生来就不只是胡思乱想，也要采取行动，这就合乎情理且十分恰当了。

卢梭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 1755）是18世纪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有关自由和奴役的研究之一。从很多方面讲，这是一本革命著作。卢梭在书中试图“叙述了不平等的起源和进展、政治社会的建立和流弊，这些事物是尽量以仅凭理性的知识就可以从人类本性中推究出来的为限”。⁽⁷⁸⁾这篇论文最早是递交给第戎科学院参加征文比赛的。卢梭的结论令人震惊，乃至比赛评委拒绝读完全文。⁷⁹在文中，卢梭不仅质疑个人对财产和财富的控制，还质疑几乎每种社会机制的合法性，说它们“只是建立在不确定的、不正当的权利之上的……强取豪夺的行为……都是用暴力得来，也能被人用暴力夺去，[富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的”。即使凭自己的勤劳获得的财产也无法落个“更好的名头”。对于这一主张，人们也许会反驳说：“有无数同胞，因为缺乏你所拥有的过多的东西而死亡、而受苦，难道你不知道吗？在人类公有的生活资料中，你把超过维持你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部分据为己有，就应该取得全人类明示的和一致的同意，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

卢梭认为，公民社会不过是富人保证其掠夺的一个阴谋。富人虚伪地号召其邻居要“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的、人人都须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强者和弱者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

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济”。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⁸⁰⁾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些法律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的权利。⁽⁸¹⁾依照这些论据，穷人和弱者都被引诱了，“大家都前去迎接他们的枷锁，相信它可以保障他们的自由……”。因此，社会和法律“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地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政府难免走向专制权力，这是“他们腐化的结果和终极点”。这种权力“按它的性质来说就是不合法的”，新的革命必须

使政府全部解散或使其更接近合法的机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

在目前的关联中，有趣的是，卢梭“仅凭理性”得出结论时所遵循的路径始于他对人性的想法。他想“按自然形成的人”去理解人类。只有从人性中才能推断出自然权利的原则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在精神不平等的起源上，在政治组织的真实基础和组织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上，以及千百种其他与此相类似、既重要而又未经加以阐明的问题上，都是呈现着无数困难的；这种对原始人、对原始人的真实需要以及他的义务的基本原理的研究，同时也是解决那些困难的唯一好方法。

为了确定人性，卢梭继而把人与动物进行比较。人是“聪明的、自由的……唯一被赋予理性的动物”，动物则“缺乏理性和自由”。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动物无非是一部精巧的机器，自然给这部机器一些感官，使它自己活动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切企图毁灭它或干扰它的东西实行自卫。在人体这部机器上，我恰恰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有这样一个差别：在禽兽的动作中，自然支配一切，而人则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行为决定取舍。因此，禽兽虽在对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违背自然给它规定的规则，而人则往往虽对自己有害也会违背这种规则……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

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因为，物理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毋宁说选择力方面以及对于这种力的意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能用力学的规律来解释。

人性的本质因而就是人的自由和人对其自由的意识。因此，卢梭可以说：“法学家们既然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⁸²

擅长诡辩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想办法掩盖的事实是，人类最基本、最明确的财产就是自由。“他们因为看到一些人耐心忍受奴役，便认为人们有一种忍受奴役的天然倾向。他们没有想到，自由也和天真与美德一样，人们只有在亲自享受的时候才感觉到它们的价值，一旦丧失了它们，便也丧失了对于它们的兴趣。”接着，卢梭反问道：“自由既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如果为了取媚于一个残暴的或疯狂的主人，竟毫无保留地抛弃他所有天赋中最宝贵的天赋，竟屈从主人的意旨去犯造物主禁止我们去犯的一切罪恶，这是不是使人类的天性堕落，把自己置于完全受本能支配的那些禽兽水平上？”在过去几年中，许多拒服兵役的美国抵抗者们用相似的口吻问过这个问题，许多从20世纪西方文明的灾难中刚刚恢复过来的人也这样问过，这可悲地证实了卢梭的判断：

由此便产生了那些震撼自然和违反理性的民族战争、残杀和报复，以及那些竟把杀人流血的荣誉列为美德的可怕偏见。最正直的人也学会了把扼杀同类当作自己的一种义务。我们终于看到成千成万的人自相残杀，而他们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一天的战斗中所屠杀的人，在占领一座城市时所造成的恐怖，比在自然状态中整个地球上许多世纪内所杀害的人和所造成的恐怖还要多得多。

从“一切自由民族为抵抗压迫而做出的惊人事迹”中，卢梭为自己的看法找到了证据：争取自由是人类的基本属性，只有当人享受到自由才能感觉到自由的价值。的确，一个放弃自由人生活的人

只是不断地夸耀他们在枷锁下所享受的和平和安宁……但是，当我看到其他人宁肯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生命来保存他们这项唯一的财产——也就是丧失了这项财产的人那么藐视的财产——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一些野

兽，因憎恨束缚向牢笼栏杆撞坏了头的时候；当我看到成千成万的赤裸裸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淫逸生活，只为保存他们的独立自主而甘冒饥饿、炮火、刀剑和死亡的危险的时候，我感到讨论“自由”的问题，并不是奴隶们的事情。

40年之后，康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他无法接受的主张是：某些人（例如，某个地主的农奴）“还不够成熟，不能拥有自由”。

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这个假设，就无法获得自由；人若没有得到自由，就不可能为自由而变成熟。人必须自由，才能学会如何自由地、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能力。起初的尝试肯定是艰难的，所造成的事态比之前受外界权威支配和保护的状态更令人痛苦、更危险。然而，只有通过个人经验，一个人才能获得理性，人必须要自由地去体验……认为自由对那些受他人控制的人而言毫无价值，人有权永远拒绝自由，接受这种原理就是侵犯了上帝的权利，上帝创造的人类是自由的。⁸³

这番话在上下文中尤为有趣。康德在为恐怖时期⁽⁸⁴⁾的法国大革命辩护，他反对有些人认为的大革命表明民众还无法享有自由权利的说法。康德的评论具有现实相关性。理性的人不会赞同使用暴力和恐怖。尤其是大革命之后的国家，在落入残忍的独裁政府手中后，其恐怖统治不止一次达到了难以描述的野蛮地步。当逆来顺受的百姓起来反抗压迫者，或迈出向自由和社会重建的第一步时，会发生暴力行为，但有理性之人或仁爱之人不会过快地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现在，请让我回到卢梭对已确立的权威（无论是政治权利或者是财富）之合法性的反驳。显然，他的论述一直采取的是令人熟悉的笛卡尔模式，唯独无法以物理原理来解释人。从另一方面讲，野兽只是一架精巧的、受自然法则指挥的机器。人拥有自由并意识到自由，这使其与野兽机器区分开来。尽管机械解释的原理能说明知觉乃至思维如何合成，在这方面“人与野兽只是程度不同”，但却无法说明人类的特性。

对笛卡尔及其追随者（例如，科尔德穆瓦⁽⁸⁵⁾）而言，表明另外一个生物体具有思维并因此不受机械解释的限制，唯一确凿的迹象是以正常的、有创造力的人类方式去使用其语言，这种语言使用不受可识别的刺激控制，是新奇的、有创新的、与各种情景相适恰和连贯的，并且引发我们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新想法。⁸⁶对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来说，反思一下就显然知道，人人都有心智，即本质为思维的东西，人类创造性地使用

语言反映了思想与概念的自由。当我们找到证据表明，另外一种生物体也能以这种自由的、有创造力的方式使用语言时，我们会认为它也和我们一起拥有心智。从类似的假设（即有关机械解释的内在局限性，以及它无法解释人的自由和人对自由的意识）开始，卢梭继而从不同程度上批评了剥夺人的基本自由属性的独裁机构。

若是我们把这些思考综合起来，也许会在语言与自由之间建立有趣的联系。从其本质属性和使用方式上看，语言提供了基本的标准，使人们确定另外一个生物体是否拥有人类心智、拥有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人类能力，以及拥有不受压迫政权外部束缚的人的基本自由需求。此外，我们也许会从对语言及其使用的详细研究进展到对人类心智更深层、更具体的理解。我们以这种模式前行时，也许会进一步研究人性的其他方面。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从理论上找出合理的社会秩序基础，就必须正确地构想这些方面。

我会再来探讨这一问题。我想先继续追溯卢梭对该问题的思考。卢梭在几个方面背离了笛卡尔传统，他把“人类所具有的特性”定义为人“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借助于环境的影响，这种能力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整个人类之中”。据我所知，有关通过文化传播进行自我完善和完善人类种群的能力，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未曾用类似的术语讨论过。然而，我认为，卢梭的评论也许把笛卡尔的传统扩展到了未被探索的领域，而不是对其否认或拒绝。有这种想法并不矛盾：心智的限制性属性是长期演变的人类天性的基础，而人类天性在其所限定的领域内发展；或者说，心智的这些属性使自我完善更有可能发生；又或者说，人类天性中的基本属性使人意识到自由，给其机会创造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式，使实现自由、多样化和个人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最大化。套用个算数推论来说，整数不会因其无法包括一切有理数就不能成为无穷集合。可以类推的是，认为心智的内在属性限制人的发展，也不是否认人具有“自我完善”的无限能力。我想讨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反之亦然：如果没有一个受形式约束的系统，就没有创造性的行为；尤其是如果没有心智的内在限制属性，只能“产生行为”，但没有自我完善的创造性行为。此外，卢梭关注自我完善的演化性质，促使我们回头从另一个角度去关注人类语言。人类语言似乎超越了各种最基本的形式，是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前提，也是卢梭所说的完善人类自身的前提。

卢梭认为，“尽管语言器官是人生来就有的，但语言本身却不是与生

俱来的”。在这一说法和典型的笛卡尔观点之间，我尚未发现矛盾之处。典型的笛卡尔观点是：天生的能力是“受禀赋影响的”（dispositional），是引导我们在外部刺激的特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产生想法（特别是先天观念）的能力，但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不受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顺着我们的思路发展下去的能力。那么，语言也是人天生就有的，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而已。这是理性主义语言学家最重要的（我认为也是最根本的）见解，但在很大程度上，在18世纪及此后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影响下，这种见解却被置之不理。⁸⁷

卢梭详细地讨论了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自己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此，

如果说人们为了学习思维而需要语言，那么，他们为了发现语言的艺术则更需要先知道如何思维……因此，关于这种传达思想和建立精神联系的艺术，我们几乎不能做出一些可以说得过去的猜测；语言这一崇高的艺术距离它的起源已经那么远……

他认为，“概括的观念只有借助于词才能输入人的心灵中，而理解概括的观念则必须通过词句”。这一事实使缺失理性的动物无法形成这些观念或者获得“依存于这种观念的完善化能力”。因此，卢梭无法构想出“我们那些新文法学家开始扩大他们的观念和概括他们的那些词”所依据的方法，或者找到“表达人类的一切思想”的方法——“数字、抽象的词、过去时和动词的各种时态、小品词、句法、命题的连接、推理以及形成言词的全部逻辑”。他并未思考人类完善化的后期阶段，“当人类的观念逐渐扩展和增多时，并且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来往时，他们便想制定更多的符号和一种更广泛的语言”。但他必须放弃（尽管很不乐意）“这样一个难题：已经形成的社会对于语言的建立，抑或是已经发明了的语言对于社会的建立，这二者，哪一个是最为必要呢？”

笛卡尔的追随者们斩开了“戈尔迪之结”⁽⁸⁸⁾。他们假定有某个物种特有的属性，这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性原理”的第二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完全决定动物行为的“机械原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历史演变过程中语言的起源。确切地讲，人类的天性从本质上看就一目了然：没有从身体到心灵的通道。我们可以用更流行的术语重新阐释这个观点，推断可能发生过戏剧性突变之后产生了智力特性。据我们所知，这些智力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拥有语言（就人类而言）就是这些特性最明显的

表征。⁸⁹假如这是正确的（因为至少最先接近事实），语言研究就有望为人类天性的研究提供一个切入口或模型，为得出更广泛的人类天性理论提供依据。

为了总结这些历史性的观点，我想转而谈谈（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⁹⁰）这个时代最具启发性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威廉·冯·洪堡。一方面，洪堡是最渊博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家；另一方面，他是竭力主张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的早期倡导者。他的主要哲学概念是“教育”（*Bildung*），正如伯罗⁹¹所说的那样，“他指的是最全面、最丰富、最和谐地发挥个人、社会或人类的潜能”。⁹²洪堡自己的思想也许是一个例证。据我所知，尽管他并未直接把自己的语言观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思想联系起来，但二者的发展显然遵循了一个共同依据，即促成任一方面的人性概念。密尔⁹³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把洪堡对其思想的“主导原则”的阐释——“人类极为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必要和至高无上的价值”——奉为格言。对于自己关于极权国家的评论，洪堡总结道：“怀着对人性固有尊严的由衷尊敬以及对有利于这种尊严的自由的由衷尊敬，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活力无限。”简单讲，这种有关人类天性的概念如下所述：

人类的真正目标，或一成不变地受理智支配并且未被短暂的暧昧欲望所表明的真正目标，是把自己的力量以最高、最和谐的方式发展为完整、持续的整体。自由是可能完成这种发展要求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但还要有另外一个要素——的确与自由紧密相关，即各种情境。⁹⁴

同卢梭和康德一样，洪堡认为

没有什么比自由本身更能促进自由的成熟。也许这条真理不会被那些常常以不成熟为借口继续忍受压抑的人所接受。但在我看来，恰恰应依据人性坚定地遵循这条真理。无法争取自由只是源自缺乏智慧和道德力量。提高这种力量是弥补这种缺乏的唯一途径，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行使力量，这是唤起自发行动的自由的自由的前提。不过显然，放开背负人感受不到的束缚，我们不能把这叫作给予自由。但无论人类怎样被自然所忽略、受环境影响而堕落，就压迫人类的一切束缚来说，情况未必如此。当自由的感觉从人们心底被唤醒，让我们把束缚一个一个解开，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加速发展。

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人，“也许理所应当地被怀疑为误解人性并希望把人变成机器”。

人类从根本上是有创造力、有洞察力和自我完善的生物：“去探究、去创造，这些是一切人类追求或多或少直接围绕的中心。”但思想自由和启蒙并不只属于精英阶层。洪堡再次呼应卢梭说：“人性中的某些堕落之处，在于那种拒绝让任何人拥有成为人的权利的想法。”然后，他对“自由和启蒙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持乐观态度。但是“一切道德文化只直接来自人的精神生活，只在人性中才能被激发，而绝不是由外部人工装置产生的……理解力的培养与人的其他官能一样，通常由人自身的活动、独创性或如何使用他人发现的方法来完成的……”，那么，教育必须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最好为个人提供丰富的、有挑战性的环境使其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严格地讲，即使一门语言也是无法被教会，而是“从内心被唤醒——人们只是提供了一条线索使其自我发展”。我想，也许洪堡会发现自己和杜威在教育方面的想法很契合。他也可能会欣赏近年来对一些观念所做的革命性拓展，例如拉丁美洲激进天主教徒们所关心的“意识觉醒”，和其他第三世界革命者一样，“把被动的、受剥削的更底层阶级转变为有意识地掌握自己命运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人”。⁹⁵我确信，他也许会赞同他们对学校的批评：

（学校）更重视传播知识，而不重视从其他价值观中培养批判性精神。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制度旨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并非去改变它们。⁹⁶

但洪堡对自发性的关注远远超越狭义上的教育实践，并涉及劳动和剥削的问题。前面引用的有关通过自发行为培养理解力的话还有下文：

……人类从未把自己所拥有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比起享受果实的无精打采的酒色之徒，照管花园的工人也许是更加真实意义上的主人……鉴于这种考虑，⁹⁷似乎所有农民和手工艺人都可以被抬高为艺术家，也就是说，因劳动本身而热爱劳动的人运用自己可塑的天才和发明技巧改进劳动，从而培养了自己的智能，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高贵并提高和改进了自己的娱乐。因此，人类可能会因那些尽管有内在美却常常使其堕落的东西变得高尚……但自由无疑仍是必要条件。没有自由，即使是最适合个体人性的追求也无法成功地产生如此有益的影响。无论何事，若非源自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或仅因受指示和引导所为，就不会进入人的存在，而是与他的真实本性格格不入。他做这件事的时候缺乏真正的能量，而只是带有机器的准确性。

如果人单纯以机械的方式行事，而不以自身兴趣、能量和力量决定的方式对外界的要求或指示做出反应，“我们可能敬佩他的所作所为，但会轻视他本人”。⁹⁸

基于这种想法，洪堡提出有关国家角色的观点，认为国家试图“使人成为服务于它的专制目的的工具，忽略了其个体的目的”。他的信条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强烈反对除了最基本形式之外，国家对个人或社会生活的一切干预。

在18世纪90年代的文章中，洪堡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还没有任何概念。于是他也没有过度关注私人权力。

但当我们认识到（同时还要把理论和实践区分开来）个体的人的影响因素因竞争、财富的消耗甚至死亡有可能减弱并枯竭时，认识到这些偶发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我们国家时，仍然要面对这个原则：后者不会干预任何与安全毫不相干的事情……

洪堡谈到了个体公民境遇中最本质的平等，当然还不知道“个体的人”这个概念在公司资本主义时代会以什么方式逐渐被重新阐释。他未曾预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面前，喊着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口号的民主和喊着人的权利高于人本身的自由主义双双触礁”。⁹⁹他也未曾预见的是，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维护人类生存、防止自然环境破坏，国家干预是绝对必要的——我可以乐观地说。举例来看，正如卡尔·波兰尼⁽¹⁰⁰⁾已经指出的那样，自我调节的市场“若不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便无法存活太久；它会真正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芜”。¹⁰¹洪堡没有预见到劳动的商品属性这一后果，即这一准则（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商品无法决定自身在哪里可供出售、为何种目的被使用、以多少价格转手、应该怎样被消费或毁掉。”但既然如此，商品就是一种人类生活。因此，没有太多必要通过社会保护来限制传统自由市场的非理性摧毁式运作。洪堡尚未理解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使某种束缚形式持续存在了下去，早在1767年，西蒙·兰盖⁽¹⁰²⁾就表明这种束缚比奴隶制还恶劣。

由于无法靠其他方式过活，我们的农场工人被迫在田里劳

作，却不能品尝收获的果实；我们的石匠被迫建造房屋，却无法亲自入住。需要（want）⁽¹⁰³⁾把他们拽进市场，等候主顾施恩雇佣他们；需要迫使他们跪倒在富人面前，求得准许令其致富……镇压奴隶制对这个富人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你会说，他解脱了。哎！那才是他的不幸。对主人来说，奴隶很珍贵，因为他在奴隶身上开支了不少。但雇佣手艺人的骄奢淫逸之徒在手艺人身上毫无花费。……据说，这些手艺人没有主人。他们倒有个主人，也是最恐怖、最专横的主人，就是需求（need）。正是需求使他们陷入最残忍的依存关系中。¹⁰⁴

在有关束缚的这个想法中，如果有什么辱没人性的部分，就必须寄希望于一种新的解放，即傅立叶的“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历史解放阶段”，通过消除劳动的商品属性、停止雇佣劳动制（wage slavery）⁽¹⁰⁵⁾和对商业、工业、金融机构进行民主管理，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人。¹⁰⁶

也许洪堡是接受这些结论的。他的确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干预是合理的，假如“自由会摧毁某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但是自由，甚至连生存本身都不可想象）”。确切地讲，这些条件是指在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情况。不管怎样，他对官僚主义和专制国家的批评很有说服力地预先警示了现代历史最阴暗的一些方面，而其评论的基础可以运用到比他想象中更广泛的强权制度。

尽管洪堡表达了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他并不是卢梭风格的原始个人主义者。卢梭赞颂野蛮人“生活在自我之中”，不需要像“社会的人”那样，“总是生活在自我之外，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单凭别人的判断……感知自我的存在”。¹⁰⁷洪堡的见解则不同：

……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和论据的大意可以归纳为：尽管他们会打破人类社会的所有桎梏，他们还会尝试找到尽可能多的新的社会束缚。孤立的人并不比受束缚的人更有能力发展自己。

因此，他希望有一个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没有国家或其他专制机构的高压，自由人能创造、探究并获得自身能力的最高发展——他远远超越所处的时代，展现出可能适宜工业社会下一个阶段的无政府主义眼光。我们也许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届时这些千头万绪都会被归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这种社会形式今天几乎不存在，但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各种要素所在：西方民主中对已达到最高形式的个人权利的保障（尽

管难免存在着可悲的瑕疵)；以色列的基布兹⁽¹⁰⁸⁾；南斯拉夫所尝试的工人议会；唤起大众意识并促成重新参与社会进程的努力（这是第三世界革命的基本要素），与无理的极权统治不协调地共存着。

一个与人类天性有关的相似概念成为洪堡语言研究的基础。语言是自由创造的过程，其规则和原理是固定的，但运用生成原理的方式是自由的、多种多样的。词的释义和使用也涉及自由创造的过程。语言的普通用法和语言习得取决于洪堡所说的语言的固定形式，即一个根植于人类思维天性的生成过程的系统，它会约束却并不决定正常智能的自由创造，或（更高或更有创造力层面上的）伟大作家或思想家的自由创造。一方面，洪堡属于柏拉图学派，坚持认为学习是一种回忆，思维在经验的刺激下提取自身的内部资源，并遵循自身所决定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也是个浪漫主义者，认同文化的多样性，认为有创造力的天才在精神贡献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这其中毫无矛盾，就好像美学理论坚持认为天才的个人作品会受限于原则和规则也毫无矛盾一样。对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正常地、有创造力地使用语言最能体现另一种心智的存在，并意味着存在一套系统或规则以及某种生成原则。理性主义语法学家们试图确定和详细说明这些东西，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许多现代评论家感觉到以下想法前后不一致：自由创造发生在约束系统之内（实际上，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而管辖原则完全被弄错了。当然，除非他们指的是谢林所说的有松散的比喻义的“矛盾”。谢林写道：“如果必要性和自由之间不存在矛盾，哲学和每一个更高贵的精神追求就都会沦为灭亡，这种灭亡尤其发生在那种矛盾毫无用武之地的科学领域。”如果必要性与自由之间、规则 and 选择之间缺乏这种张力，就完全不可能产生创造力、交流和有意义的行为。

我很详尽地讨论了这些传统思想，并非出于对古物的兴趣，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想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也很有价值，它们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走下去会受益的路线。因对未来社会的远见和对其特性的直接价值判断，社会行为必定会变得生机勃勃，这些判断必定来自某种有关人类天性的概念。人的行为和其创造性的活动（物质的、心智的和社会的）揭示了其天性，通过研究人类天性，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经验性的基础。我们也许已经到达了某个历史时刻，是有可能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社会的时刻：自然形成的社会束缚取代了专制机构的枷锁，并且是从我引用的洪堡的话所表达的意义和随后几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传统被更加全面阐释的意义上思考。¹⁰⁹

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复杂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技术，并允许进行广泛的民主实践，促成了某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如今这些限度正在收紧，必须要克服它们。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并不适用于20世纪中期，它不能满足只能用集体名词表达的人类需求，其关于“竞争的人”的概念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看，也是反人类的、难以容忍的。“竞争的人”只会把财富和权力最大化，把自己置于市场关系、剥削和外部权威之中。取代这种制度的绝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从美国演化而来的军事化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化、中央集权式的福利国家也无法作为人类生存的目标而被认可。镇压性的机构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物质和文化的匮乏。但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机构却导致了这种匮乏并使之持续下去，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科技把人们从必须从事的专门的、低级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也许大体上为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如果我们愿意创建这样一个秩序的话）提供了基础，而这种社会秩序是基于自由人的联合和民主控制之上的。

对未来的社会秩序的远见反过来又基于人类天性的概念。假如人真正具有彻底的、无限的可塑性，而没有内在的思维结构和某种文化或社会属性的内在需求，那么就会成为受国家权力机关、公司管理者、技术官僚或中央委员会“塑造行为”影响的合适人选。对人类有些信心的人会期望一切绝非如此，他们试图确定是什么内在的人类特性，为自由社会中的智力发展、道德意识的增长、文化成就和参与度提供了框架。从一定程度上以类似的方式来看，就好像古典传统论及艺术天才如何在规则框架内行事，但又在某些方面挑战了这个规则框架。我们对此处谈及的事情领悟甚少。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这些事情，就必须坚决彻底地背离现代社会行为科学的一些思想。¹¹⁰

在这里，也同样如此。我认为我已做了简要回顾的传统是有所裨益的。我观察到，关注人类特殊性和潜力的人不断地被引导着去思考语言属性问题。我认为，语言研究能够给理解受规则制约的行为带来些许启示，也为在至少部分反映人类心智组织内在属性的规则系统框架之内进行自由而创新的行为提供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似乎合理的是，把当代语言研究看作从某些方面对洪堡语言形式概念的一种回归：一个根植于心智内在属性的生成过程系统，但允许（用洪堡的话来说）用有限方式进行无限的使用。语言不能被描述为一个行为组织的系统。相反，为了理解语言如何被使用，我们必须对洪堡的抽象语言形式（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这种语言形式的生成语法）有所发现。学习一门语言就是要为自己构建这种抽象的系统，当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只有当语言学家

和心理学家对懂得这门语言的人所掌握的系统属性有了一定把握，他们才能继续研究语言使用和习得。此外，我认为似乎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支持这一实证性主张：只有心智被赋予我们目前暂时详细描述某些具体属性，我们才能在特定的时间和接触条件下习得上述系统。如果我们从概念上把自己限制在研究行为及其组织，以及它如何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发展，我们就必然会忽略语言与心智的这些特征。原则上，研究人类心理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可以设想的是，我们也许能以这种方式发展出一种社会科学，这种科学以具有可靠实证根据的、关乎人类天性的命题为基础。正如我们能小有成就地研究人类可获得的各种语言那样，我们也许能尝试研究艺术表达的各种形式，或就此研究人类所能设想的科学知识，甚至还有人类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各种伦理系统和社会结构（就人类的内在能力和需求而言）。也许我们可以进而预设出一个“社会组织”概念，在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条件下，它会极大地鼓励和关照人类的重要需求（若果真如此的话）——自发的主动性、有创造力的工作、团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我不想夸大（但我的确这样做了）语言研究的作用。语言是目前最便于做研究的人类智慧的产物。有一种深厚的传统曾把语言看作是心智的一面“镜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思想的确是真知灼见。

就“语言与自由”这一话题，我和讨论伊始时一样心存迷惑，但也一样兴趣盎然。在我那些粗略的推理言论中，总有些大的漏洞，以至于你们可能会质疑，除掉隐喻和无端的猜测之外还留下些什么。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我认为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对人类和社会的了解进展甚微，甚至对可以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未能清楚地解释。但我认为，也有一些十分稳固的立足点。我愿意相信，专门研究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例如人类语言），也许会对将作为社会行为工具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所贡献。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必须强调，社会行为不能等待某个牢固建立的有关人类和社会的理论，后者的有效性也不能由我们的期望和道德判断来决定。推测和行动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尽力前行，这样，假以时日，理论探索才会为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提供有力的指引，而这种斗争永不停歇，虽常有不顺，却充满希望。

（本文是1970年1月8—9日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大学自由与人文科学研讨会”上所做的讲座，后来发表在托马斯·R·戈尔曼 [Thomas

R. Gorman] 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 也被刊登在 *Abraxas* 第1季第1期 [1970] 和 *ThriQuarterly* 第23—24期 [1972] 。本文提到的一些话题在本人所著《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一书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 第387—408页。)

展望未来：心智研究的前景

我的讲座从语言研究中出现的四个中心问题开始：

- (1) 当我们能够说并理解一种语言时，我们都知些什么？
- (2) 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 (3) 我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知识的？
- (4) 涉及这种知识的表征、获得和使用的物理机制有哪些？

第一个问题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问题。我们对问题(1)的答案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继续探讨问题(2)、(3)和(4)。

对问题(1)的回答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在完成该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构建一种语法，即用来描述某一特定语言如何为每个语言表达式指派具体的心理表征，确定其形式和意义的一种理论。第二项任务更为艰巨，需要我们做出真正的解释。为了完成该任务，我们试图创建一种普遍语法理论，一种有关构成人类语言机能固定不变的原则和与之相关的变异参数的理论。通过以某种方式设定参数，我们实际上能推导出特定语言。此外，有了满足普遍语法原则的词库和以特定方式设定的参数，我们就能从普遍语法的原则中派生出这些语言中句子的结构表征，从而解释它们为何具有现在的形式和意义。

问题(2)是语言研究中出现的柏拉图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直到我们成功地创建普遍语法的理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也会涉及其他因素，例如设定参数的机制。在其他领域中也存在柏拉图问题的其他特殊情况，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未能明确的参数值的过程，用我

先前提到的意象来说，就是设定网络运转开关的过程。此外，语言学习者必须发现该语言的词项及其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个为既存概念寻找标签的问题，这种结论令人惊讶并且貌似不可理喻，然而本质上看来却是对的。

语言学习并非真正是儿童才做的事情；它是发生在处于某种恰当环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适当的营养和环境刺激下，孩子的身体会以预先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这并非说与环境的本质毫不相干。环境决定了普遍语法参数的设置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语言。早期的视觉环境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决定了对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受体密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和身体成长一样，在语言习得中，富有刺激的环境与缺乏刺激的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和身体成长的其他方面一样，语言习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类共同禀赋的能力有可能繁荣地发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这取决于它们成长的条件。

这种观点也许更加普遍。不应把教学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帮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这是一种理应受到重视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传统见解。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明白，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远不及成功地引起学生天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自我探索的兴趣这般重要。学生被动学到的东西很快会被忘记。学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被激发以后，他们自己发现的东西不仅会被记住，而且会为今后的探索、调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贡献打下基础。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民众享有有意义、有建设性地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的机会，包括他们当前的社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一个把大范围的关键性决策排除在民众管理之外的社会，或者一个仅仅给予民众机会让其批准由那些掌控私人社会和国家的精英群体所做的决策的统治制度，很难配得上“民主”一词。

问题（3）包括两个方面：感知和产出。那么，我们想知道，已习得一门语言的人在理解他听到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时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些讲座中我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提到产出这个方面，即我所称的笛卡尔问题，这是从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后者是一种寻常却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一个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人而言，必须由心智 / 大脑决定其语音形式和词语，然后运用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值投射出该表达式的结构表征，确定其各个部分如何关联。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然而，笛卡尔问题带来了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其他问题。

至于问题（4），我还没有讲。探讨该问题主要是将来的任务。进行这种探讨的部分问题在于，出于伦理原因，我们不会考虑把人当作实验对象。我们无法容忍以动物实验的合理方式（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人进行实验研究。因此，我们不会将儿童置于受控环境中，观察他们在不同实验设计的条件下学习了哪种语言。我们也不允许研究人员在人脑中置入电极来调查大脑内部运行情况，或通过手术切除部分大脑来确定会产生何种影响，但对除了人之外的实验对象通常会这么做。研究人员仅限于进行“自然实验”，如损伤、疾病等。试图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现人脑机制是异常困难的。

就心智 / 大脑的其他系统而言，例如人的视觉系统，对其他生物体（猫、猴子等）的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信息，因为这些物种的视觉系统显然十分相似。但就我们所知，语言机能是人类独有的。想通过对其他动物大脑机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 / 大脑机能，几乎没有可能。

与上一代人毫无异议地所接受的那些答案相比，我们今天就这四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或者在我看来，至少是我们今天应当会给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就提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我们也许会给出下列答案：语言是一种习惯系统，是一种通过训练和条件限制获得的行为习惯系统。该行为的任何创新方面都是“类推”的结果。其中的物理机制本质上与接球和其他技巧行为涉及的一样。柏拉图问题未曾受到认可，被当作细枝末节而不予考虑。人们一般认为，语言“被过度地学习”；问题在于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何需要大量经验和训练才能获得这些简单技能。至于笛卡尔问题，也未曾曾在学术圈、应用学科和整个知识界中受到认可。

关注到这些事实，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想法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无可救药。必须抛却这些想法，因为它们毫无价值。我们只好回到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一些广受认可的、毋庸置疑却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类似观点。实际上，假如我们有兴趣找出这些神秘观点如何、为何获得被赋予的尊重感，以及它们是怎样逐步控制知识领域和掌握话语权的，我们就应该转到这个方向上来。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值得探讨，但在此我不打算这么做，只是之后会稍做评论。

让我们回到笛卡尔问题，即我此前所说的如何以惯常的创造性方式使用语言的问题。请注意，我在此关注的并非具有真正美学价值的语言使用，也不是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出色的文体学家作品中所谓的真正创造性。相反，我考虑的是更世俗的东西，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语言使用。它具有鲜活的特性，不受外部刺激和内部状态的控制，与情景切合

并能激起听者进行恰当的思考。该问题的由来值得关注。

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心智 - 身体 (mind-body) 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后来所谓的“其他心智的问题”。笛卡尔提出宇宙机械论，这对当时的物理学是个重要的贡献。他深信，在我们经验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实际上都能用他的机械概念——用通过直接接触而相互作用的物体（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接触机械论”）——来解释。他试图用这些术语解释一切，从天体运动到动物行为，乃至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感知。他显然认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上几乎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在自己的总体概念上添加细节而已。但并非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能适用于该框架。他指出，最显著的例外就是我此前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笛卡尔认为，这完全超越了机械论概念的范围。

每个人通过内省都能觉察到自己拥有心智，心智的属性与构成物质世界的物体明显不同。现在假设我想确定另一种生物是否也有心智。笛卡尔主义者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进行某种实验项目，用以确定该生物体是否显示出人类行为的明显特征，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最易于研究。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假如把鹦鹉的器官以某种形态置于给定的刺激环境中，鹦鹉“说”的话是被严格确定好的（否则就可能信口胡言）。但与我们一样具有心智的生物体就不是这样，实验应该能揭示这一事实。当时人们提出要做许多具体测试。假如这些测试让我们相信该生物体具有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那么怀疑它不具有像我们一样的心智就毫无道理了。

我此前曾提到，更笼统地讲，该问题在于“机器”是在固定的环境条件下被迫以某种方式运转，其零部件也以某种方式组装，而人在这些情况下只是“受诱导或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行事。人也许经常或总是受诱导或倾向于做某事，但我们内心都明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选择余地很广。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其他人也是这样。笛卡尔主义者（十分准确地）得出结论，被迫与只是受诱导和倾向之间的差别很大。即使没有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这种区别也是关键性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械术语准确地描述人类行为，但这不是对人类基本特征和人类行为根源的真实描述。

为了说明机械论无法解释的关于世界的事实，有必要找到某种超机械论的原则，我们姑且称之为“创造性原则”。笛卡尔主义者认为，该原则属于心智，心智是与得到机械论解释的身体完全分离的“第二物质”。笛卡尔本人写过长篇著作论述机械世界的原理。本来最后一卷是关于心

智的，但据说在得知伽利略面对宗教裁判所时被迫宣布放弃自己对物质世界的信念之后，笛卡尔就毁掉了这篇完整著作中的这一部分。在他保存下来的著作中，笛卡尔暗示，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的本质，“尽管我们如此在乎我们自身的自由和中立（而缺乏严格的界定），以至于我们没有比这理解得更通透的事情了”，而且“我们从内心体验和感知到自身存在的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物本质出发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就怀疑该问题，这就很荒谬了”。

对笛卡尔主义者而言，心智是单一的物质，与身体不同。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猜测和辩论都是关于这两种物质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心智的决定如何可能导致身体的行动。没有“动物心智”这回事，因为动物只是机器而已，听从机械的解释。人类心智这一概念构思不可能和其他种类的心智或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种人类心智区分开来。生物要么是人类，要么是非人类；不存在“人类性质的不同程度”，除了外在的身体方面，人类没有基本的变异。正如哲学家哈里·布萊肯⁽¹¹¹⁾所指出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在这种二元论观念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心智是一种“能用于所有突发情况的普遍工具”。请注意，该主张与笛卡尔认为的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本质的观点不一致。认为心智具有内在局限的结论肯定是正确的；心智是一种“普遍工具”这一观点可能来自某些先辈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语言机能和其他认知系统都在适用于各项智力任务的“一般学习机制”范围之内。

近些年间，笛卡尔用来检验是否存在其他心智的测试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的测试，现在被称为“图灵测试”，用以确定机器（例如一台程序化计算机）是否具有智力行为。⁽¹¹²⁾我们把图灵测试用在一个装置上，向它提出一系列问题并看看它的回应是否能骗过观察者，让他以为是另一个人正在回答。用笛卡尔的话来说，这种测试可以检测该装置是否和我们一样具有心智。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些观点？笛卡尔的观点绝非荒谬，也不可被轻易忽视。假如机械原理的确不足以解释某些现象，那么我们必须寻求这些原理之外的东西去解释。至此，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我们不必接受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该思想假定有一种“第二物质”，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缺乏组成部分或相互作用的子部分的“思想物质”（*res cogitans*, 即精神实体），即解释“意识整体性”和不朽灵魂的意识宝座。

这一切都无法令人满意，也没有对提出的任何问题给出真正的答案。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十分严肃。正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因为我们想不出解决事实的方法就否认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未免太荒唐。

观察笛卡尔心智 - 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问题说法的走向，这是很有趣的。只要我们对身体具有确定的概念，就能合理地提出心智 - 身体问题。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确定而不变的概念，就无法追问某些现象是否在该概念范围之外。笛卡尔主义者根据其接触机械论提出了相当确定的“身体”概念，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常识性的理解。因此，他们能合理地阐释心智 - 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的问题。也有人试图为进一步发展“心智”概念做了重要的工作，包括17世纪英国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做的研究，他们探究了感觉和认知的范畴和原理，其研究路数后来被康德继续拓展，并在20世纪格式塔心理学中又被重新发现。

另一条发展路线是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普通和哲学语法”（用我们的术语讲就是“科学语法”），尤其在其早期深受笛卡尔概念的影响。这些对普遍语法的探究旨在揭示语言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与思维的一般原则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按照传统的表达来说，语言是“心智的镜子”。出于种种原因——有些合理，有些并不合理——这些探究被轻视和放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20或30年前才再次独立地焕发生机，但所使用的术语截然不同，也并未借助任何二元论的假设。

看着笛卡尔的身体和心智概念如何进入社会思维，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突出的是让 - 雅克·卢梭基于严格的笛卡尔“身体”和“心智”概念的自由意志观点。因为拥有心智的人与机器（包括动物）截然不同——卢梭这样认为，也因为心智的属性远胜于机械的确定性，所以对人类自由的一切侵害都是非法的，必须要直面并加以克服。尽管这种想法后来的发展摒弃了笛卡尔的框架，但它的起源与这些古典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

此后几年间，笛卡尔的“第二物质”概念大体上被抛弃，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遭到了反驳的并非心智理论（人们也许会说该理论不够清楚，很难被确认或反驳）。相反，笛卡尔的身体概念是被17世纪的物理学所反驳的，尤其是在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艾萨克·牛顿的书里。牛顿证明，天体运动无法用笛卡尔的接触机械论原理来解释，必须要抛弃笛卡尔的“身体”概念。在牛顿的框架中，一个物体向另外一个物体未经接触就施加了“力”，这是一种“有距离的行为”。不管这种力是什么，都不

在笛卡尔接触机械论的框架之内。牛顿本人发现这一结论不够有说服力。他有时把地心引力称为“神秘的力量”，并表明自己的理论只是对物质世界中的事件做出了数学描述，并没有对其做出真正的“哲学”（用现代术语来说即“科学”）解释。直至19世纪晚期，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必须用机械术语或准机械术语来给出真正的解释。另一些人，较为突出的是化学家、哲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¹¹³⁾，认为物体本身具有超出接触机械论局限的能力，具体讲就是吸引其他物体的属性，但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属性。不看随后的发展的话，人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笛卡尔的“身体”概念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出现的“身体”概念是什么呢？答案是，没有什么清楚而确定的“身体”概念。如果我们所能构建的物质世界最佳理论包括各种力、没有质量的微粒和其他可能冒犯笛卡尔主义者“科学常识”的实体，那也只能这样：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就是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身体的世界（world of body）的属性。这些是初步结论，适合经验假设，但经不起批评，因为它们超越了某种先验的“身体”概念。不再有什么确定的“身体”概念，相反，物质世界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样子，为了给出解释性理论，它必须具有我们所假想的一切属性。任何给出真正解释并被纳入物理学核心概念的可以被理解的理论，都是物质世界理论的一部分，是我们对身体做出的解释的一部分。假如我们在某个领域有这样的理论，我们会努力将其纳入物理学的核心概念中去，也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会修正这些概念。在人类心理学研究中，假如我们得出有关某种认知机能（例如语言机能）的理论，并发现这种机能具有某些属性，我们就会努力去发现表现这些属性的大脑机制，并用物理学解释它们——同时要保留物理学概念也许不得不被修正的开放性，就像笛卡尔接触机械论概念必须被修正以解释天体运动一样，也和牛顿时代以来自然科学演变过程中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

简而言之，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体”概念。更确切地说，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其属性有待被发现，对于所谓的“身体”，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界定。因此，甚至无法形成心智 - 身体问题。该问题也无法得以解决，因为没有清楚的陈述方式。除非有人提出确定的“身体”概念，否则我们不能质问有些现象是否超出了该概念的界限。同样，我们不能提出关于其他心智的问题。我们可以（我认为也应该）继续使用心灵主义术语，正如我在讨论心理表征和心理运作（在心理运算的过程中形成、修正它们）时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调查“第二物质”的属性，这与以某种神秘方式、也许通过神力的介入跟另一个身体相互作用的身体

是截然不同的。相反，我们正在从抽象层面研究物质世界的属性，无论对错，我们都相信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构建一种真正的解释性理论，一种洞悉我们所关注现象本质的理论。实际上，与其说这些现象本身具有真正的知识乐趣，不如说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心智更深层运作的途径。最后，我们希望该研究被纳入主流自然科学，就像基因研究或原子价研究以及化学元素属性被纳入了更基础的科学一样。然而，我们意识到，和过去一样，这些基础科学也许后来又必须被修正或拓展，为复杂体系的抽象理论（如人类心智）提供基础。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真正的解释性理论，用这些发现去探究具有这些理论所概括的属性的物理机制。无论这种探究走向何处，都在“身体”范围之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只是抛却了可能区别于其他概念的整个“身体”概念，用理性探究的方法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即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无论其属性最终多么不同寻常。

心智 - 身体问题仍然是争议不断并值得思考的主题。从这方面看，该问题仍然是鲜活的。但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在某些根本性方面并不连贯。和笛卡尔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缺乏确切的“身体”概念。因此，我们想知道一些现象是否在身体研究范围之外并属于另一种心智研究，这些也都不清楚。

回想一下笛卡尔论证存在第二物质（即精神实体）的逻辑。他用接触机械论定义“身体”之后，认为某些现象不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就需要一些新原理。既然有了他的形而上学学说，就必然会假定有第二物质。他的逻辑基本上很完善，实际上和牛顿的逻辑差不多；牛顿当时证明了笛卡尔的接触机械论无法充分解释天体运动，因此就不得不提出地心引力这一新原理。笛卡尔和牛顿学说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对物体行为提出了真正的解释性理论。对于笛卡尔认为的不在机械论解释范围之内的语言使用创造性方面的属性，笛卡尔理论并未对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法。因此，牛顿的概念逐渐成为后辈科学家的“科学常识”，而笛卡尔的思想则被冷落了。

现在再回到笛卡尔问题，请注意该问题依然存在，并未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解决。我们依然无法说明看似是事实的道理，甚至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必做自己“受引导和倾向于”做的事情。然而，假如我们做了受引导和倾向于做的事情，自由选择要素就会参与进来。尽管通常已有太多的思考和透彻的分析，我感觉这个问题并未被解决，仍处于笛卡尔最初提出该问题的阶段。为什么

会这样呢？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没有人想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很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只有这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性是笛卡尔提出的：该问题非我们的智力所能及。

我们研究其他生物体时会发现，它们的能力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正如老鼠可以很好地完成某些事。假设我们建一个径向迷宫，这个实验设计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延伸出车轮辐条似的径直道路。假设每条路径的尽头都放着盛有一粒食物的容器。被置于中心的老鼠很快就能学会以最快的效率找到食物，并且每条路径只跑一趟。即使固定食物容器、旋转装置，让老鼠不得不多次通过同一条路径，情况依然如此。这种成就绝非易事，它要求老鼠具有相当敏锐的空间概念感知。从另一方面讲，老鼠显然无法学会走涉及顺序概念（例如向右转两次，再向左转两次）的迷宫。肯定也没有老鼠能学会走与质数对应的每个选择点要求向右转、其他地方向左转的迷宫，这么说就是在第2、3、5、7、11等选择点向右转。人类大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会有难度，也需要点自觉的算术知识。抛开个例不谈，老鼠（鸽子和猴子等）显然拥有范围和界限都很明确的固定能力。

这一点是合乎逻辑的。假如某个动物有能力很好地完成某些任务，这些能力在其他任务中也会失败。假如我们清楚这些能力是什么，就能设计出该动物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一个动物有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幸运的，因为这意味着它有能力解决某些其他问题。这种区分也许在于容易或艰难，也许在于某种可能性与实际上的不可能性。但这种区分必须作为逻辑问题而存在。区分的本质就是事实，这些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

此外，一种生物体能解决的问题对另一种生物体来说就极为困难或不可能，例如，我们很容易就能设计出一种解决“质数迷宫”的装置，无需费力或过多尝试就能立即解决，即把答案嵌入机械本身。但该装置无法应对我们看来更为简单的迷宫。生物体并不是按照一个序列排列的，有些生物体比其他生物体“更聪明”，只是能够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它们反而在有能力应对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上有所不同。某种黄蜂或鸽子天生就能找到回巢的路，人天生却不是这样，也无法很快或根本无法完成类似的任务。并不是说黄蜂或鸽子比人“更聪明”，而是它们由生物属性决定的能力不同。况且，问题简单或困难并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也许有可能提出有关难度的“绝对概念”，用于数学计算理论的特定目的。但

该概念是否能引起心理学或生物学的兴趣尚不清楚，至少在目前语境下尚不清楚，因为对于生物体行为而言，重要的是其特殊构置和由这种特殊构置决定的问题难度的排列。

我们认定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明显具备解决某些问题的能力，自然也缺乏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要么受现有时间、记忆等限制难以解决，要么在原则上实际已超越了人类的智力范围。人类心智不可能是笛卡尔说的那种“能用于所有突发情况的普遍工具”。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如此普遍的工具，在所有突发情况中都会应用得同样糟糕。我们无法成功地解决任何问题。

就语言来说，从已说明的意义上讲，语言机能是一种物理机制，具备某些确定属性，不具备其他一些属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是普遍语法理论试图阐明和描述的属性，让人类心智能习得某种特征奇异的特定类型的语言。正是这些属性把其他有可能学习的语言当作语言机能“不可学习的”语言加以排除。人们也许用心智的其他机能逐渐理解了这种非人类语言，其方式与人类了解有关物质世界本质的许多情形一样，通过几代人进行受控研究和实验的艰辛过程，加之个人天赋的介入（无论这意味着什么）。类似的其他语言也许超出了人类思维可能的界限。就我们所能发现的语言机能属性而言，可以构建“不可学习的语言”，即语言机能无法习得的语言，因为语言机能在每个点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对语言本质做出错误的猜测。就我们所能发现的心智的其他属性而言，可以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构建唯有通过努力才能习得的语言，或者也许根本无法做到，我们还可以设计特别困难或无法解决的其他任务。

这一切都毫无神秘感可言。我说到的大多是逻辑问题。人类心智的各种机能具有特定范围和限度都是事实，原则上经得起人们的探究，除非它们超越了人类心智的范围。我们有一天或许会发现人类心智是如此构建的，而某些我们可以解释的问题不可能靠人类的智力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对某种构造不同的智力来说十分“简单”，就像质数迷宫对于设计用来解决该问题的装置来言，也许是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一样。

这一切在有关身体成长的研究中都十分清楚。人肯定会长出胳膊和腿，而不是翅膀。缺乏足够的营养或处于其他方面有缺陷的环境中，胚胎也许不会长出胳膊和腿，但环境的变化不会让它长出翅膀。假如身体成长仅仅反映出环境属性，我们就会是无定形的生物，各不相同，体力也极为有限。既然我们的生物秉性是错综复杂而高度具体的，那么我们

生长的方式反映的不是物质环境的属性，而是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成长为拥有具体物理属性的复杂生物体，在基本属性上彼此相似，适合完成某些任务，但不是所有任务——例如，能走路但不能飞。环境与成长绝非无关。相反，成长被环境以多种方式激发，并受环境因素刺激，或者假如缺乏必要因素，还会延缓或畸化。但大部分情况是以预先决定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很幸运，我们不能变成鸟，因为这是依据我们能够成为人类的事实。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心智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确实也必须如此。由此可见，我们能轻松地应对某些问题——例如学习人类语言——而常用的绝对说法中既不“更难”也不“更简单”的其他问题，是我们无法触及的，有些永远也够不着。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很幸运。

让我们再回到笛卡尔问题。无法顺利地解决该问题，甚至无法对其提出合理想法的原因，可能是它超出了人的智力范围。就我们能力的本质而言，该问题要么“太难”，要么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限度。我们有理由怀疑情况也许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对人的智力或该问题的确切属性所知不多。我们可以设计出解释严格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理论。但这些概念似乎不切合笛卡尔问题，也许我们也无法找到相关的概念。来自火星的某个科学家的心智和我们不同，他可能会认为该问题无关紧要，也不明白人为何好像没找到显而易见的解决方式。这位观察家也许对地球上每个孩子习得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在他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需要神力介入，因为语言机能的要素不在其概念范围之内。

艺术也是如此。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所遵循的准则和原理，只是部分上服从了人的选择，另一部分则反映了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能从某部有创造力的作品中体会到深厚的情绪——愉悦、痛苦、激动等，虽然人们大都不知道为何如此以及何至于此。但正是心智能力，为我们开启了这些可能性，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甚至永远地排除了某些可能性。艺术创造的局限之处应该是件快乐的事，而不是伤感的事，因为所说明的事实是，我们获得美学体验的领域十分广阔。

道德评判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其基础何在，但我们很少怀疑它不是根植于基本的人性。我们发觉一些事情是对的，另一些事情是错的，这不可能仅是惯例问题。儿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长，就习得了道德评判的标准和原则。这一切是基于有限的证据而获得的，但它们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且通常十分精准。情况虽然不总是这样，却通常如此：

人们发现或确信自己对某件事的评判是错的，因为其评判与其本人的内化性原则不符。道德论调不总是毫无意义、只是“我认为这样”和“你认为那样”的问题。某种范围广阔、结果通常准确的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仅仅是受社会环境“塑造”和“控制”的结果。比如语言这种情况，环境太贫瘠、太不确定，就无法给孩子提供这种内容丰富、应用广泛的系统。我们对这件事所知甚少，就只好多思考，但这么想肯定是有道理的：孩子所习得的道德和伦理系统大多依靠天生的人类官能。和在语言、视觉等情况一样，环境是相关的。因此，我们会发现个体间和文化间的偏差。但肯定有一种共同基础，根植于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文明进程也许能给这个问题带来启示。不久前，奴隶制被认为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尊重的。奴隶主尤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相反会将其视为个人崇高道德价值的证明。况且，虽然我们现在认为他们的论调在道德上是荒谬的，他们的论点在当时并不荒谬。因此，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奴隶主能够并且的确强调，假如你拥有一台机器，你对它很可能比只是租借来的更加爱护。同样，比起只是雇佣人力满足个人当前目的的资本家，奴隶主可能更加爱护自己的财产。那么，奴隶制比“雇佣劳动制”显示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即使这种观点未必荒唐透顶，头脑清醒之人现在也不会接受。随着文明的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奴隶制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随着我们逐渐更好地理解了根植于我们内在本质的道德价值，也许可以期盼这样一天的到来：雇佣劳动制和为了生存而受人雇佣的需求也能从类似的角度被看待。

我们许多人在一生中已经体验到类似的事情。就在几年前，性别歧视问题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直到现在也没被解决，但至少已经得到了承认，人们也普遍认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道德意识上的改变，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们意识到奴隶制是对人类尊严无可容忍的冒犯那样。这不仅是一种改变，更是一种进步，是朝着理解我们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进步。

只要文明存在，这些发现也许不会终止。一个真正体面、诚实的人总会努力地发现各种侵犯人权的压迫、等级制度、统治和权力形式。一些形式被克服之后，之前不属于我们意识觉悟一部分的其他形式就会被揭露出来。我们因而开始更好地理解，在我们的内在本性中我们是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和成为怎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乐观的观点，找出明显能反驳它的历史证据也许并不难，但从这种视角来思考我们的历史和前景也许并非不现实。道德思考和论

述可能不会止于这些思考，这些思考反而能使其丰富和充实。

我提到卢梭从笛卡尔身心原则中衍生出了自由意志论观点。这些思想在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但仍处于对基本人性的假设框架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深受威廉·冯·洪堡的影响，洪堡恰巧也是语言学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直到现在才受到重视。在洪堡的自由意志社会理论中，人能够在自我控制下与其他人团结一致地开展创造性工作，这是一项根植于“人类本质”的基本人权。洪堡认为，假如一个人在外部指导和控制下造出某件漂亮的东西，我们会欣赏他所做的事情，但会鄙视他本人——他就是一台机器，并非健全的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其社会思想的基础），正是以这些为根据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根据决定某些基本人权（主要是工人管理生产、生产性质和条件的权利）的“物种属性”也提出过这些观点。巴枯宁认为，人具有“自由本能”，侵犯这一人性的基本特征是非法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传统就是从这些说法发展而来的，只是在现今社会以最有限的方式被实现。但在我看来，它们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抓住了基本人性和理应受人类意识感知的道德准则的关键性特征，并反映了这些属性。

我们也许注意到，任何社会生活中的契约形式都基于对人性的假设，只是通常比较隐晦而已。亚当·斯密认为，人天生就会“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他以这一点和其他类似的假设为根据，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我刚才简要说明的思想线索基于不同的人性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假设某人决定接受现状或努力改变现状，无论靠改革还是革命。若不是出于恐惧、贪心或其他放弃道德责任的形式，就会基于对人来说什么是好的、正确的信念（显性的或隐性的），以特定方式做出这种决定，因而最终还是基于对基本人性的假设。很难说会有其他情况。那么，有待发现的事情尚存真相，这是一项富有智力挑战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该任务要去揭示事物真相，就具有了深刻的人性含义。

我们仍然处于思辨的状态，再回到人类认知研究中也许更易于进行科学探究的领域去看看。人类知识史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科学家已经能够在某些领域内构建颇具深度的理论大厦，而另一些问题依然和上千年前提出时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我们对语言习得的原理性解释去探究这件事，也许会有有一定的价值。让我们回忆一下要点。给天生具有人类语言机能的儿童提供一些数据之后，他会构建一门语言，同时使用这些数据设定语言机能的参数。这门语言从而对无限范围

内的语言表达提供了具体的解释。

假定我们以类似的方式思考理论构建。作为人类生物禀赋的一部分，科学家也具有某种概念装置、阐释问题的某些方式、某种可理解和解释的概念等。我们把这些称为“科学构建能力”。和其他情况一样，它也许还包括隐性的资源，只有在生活突发事件和经验许可的情况下才会被识别和使用，因此对这种禀赋的运用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我们假定它是固定不变的，和语言机能一样。这种科学构建能力有某些背景假设做补充，并取决于当前科学理解的状态。它以此为补充，对与其相关的说法提出质疑，或利用自身资源提出质疑，这绝非琐碎的任务。然后，科学构建能力试图构建理论解释，对这种质疑做出回应，其自身的内在标准会确定是否成功地完成了该任务。如果是这样，背景假设可能会变化，这时科学构建能力就准备应对其他问题，也许会提出它要继续解决的其他问题。为了接近解决问题和理论构建的真实环境，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但让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原理解释。

就语言来说，它具有某种作为人类心智核心要素的机能。这种机能以确定模式下意识的快速运转，超越了意识限制，以人类共有的方式，最终产生了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知识系统，即某一种语言。对解决问题和理论构建而言，没有这么特定的东西。虽然值得强调的是，拥有共同背景假设的人通常都能理解别人提出的理论并进行评估，即使他们没有亲自构建并且可能不具备这么做的特殊能力，但我们面对的问题多种多样，而面对这些问题的人也更是千差万别。

在大部分情况下，科学构建能力面对质疑时并未做出有用的反应。大部分质疑都令人不解。有时也产生了少数易懂的理论。科学构建能力可以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实验过程去评估这些理论。产生的理论有时也许接近真理，游离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可以通过实验精炼的潜在知识。有关世界的真理和人类的科学构建能力在某个时刻的产物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这就产生了科学。请注意，假如科学构建能力作为人类生物禀赋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碰巧产生了与有关世界的真理或多或少切合的结果，这也只是偶然的运气而已。

有人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美国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提出的科学构建解释与此前概括的说法类似，他也是这样认为的。皮尔士的观点是，通过正常的自然选择过程，我们的智能进化到能够应对经验世界中的问题。但这个观点不太令人信服。我们可以想像，黑猩猩天生怕蛇，因为

没有这一遗传确定特性的黑猩猩都没能幸存并繁衍，但我们无法断定人类出于类似原因而具备发现量子理论的能力。形成进化历程的经验没有为科学所面对的问题提出启示，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也并不是进化过程中的因素。我们不能借助这一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¹¹⁴⁾来解释我们的思想和有关世界的真理如何汇合。相反，发生这种（部分的）汇合似乎多属幸运的意外。

人类的科学构建能力与其他生物系统一样，具有其范围和界限，这是必然之事。我们要相信的是，无论科学构建能力如何得到足够的背景信息做补充，有些问题还是会超越这些界限。笛卡尔问题也许就在其列。这至少不会令人惊讶，而且目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理由。

人们可以想象的是，通过研究科学史和以人为对象的实验，我们可以对人的科学构建能力的性质有所了解。假如是这样，对于我们能和不能用科学构建能力资源和科学方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

顺带提一下，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我们所面临的全部问题都最好以这些方式解决。因此，很有可能——人们会猜想完全可能——的是，我们从小说中对人类生活和个性的了解总会多于来自科学心理学的了解。科学构建能力只是我们心智禀赋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能运用的地方使用这种能力，幸运的是我们不会受其限制。

沿着我们的探究路线进行的语言研究，能够为人类认知研究的其他方面提供一种有用的模式吗？常见的方法路径应该也适用于别处，但如果我们发现语言机能的组成要素至关重要地渗入了其他领域，那就会感到诧异了。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在语言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那就是视觉研究。在此，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人类视觉机能的属性是什么？我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可能用具有相似能力的其他生物体进行实验，我们也可以对相关物理机制略有了解。在此，我们还发现，视觉机能具有特定的明确属性，而且某些变异的可能性取决于视觉经验，例如水平线受体和垂直线受体的密集度。有关这方面的实验表明，该机能发展到成熟状态要经历一些关键期。其特定功能必须在整个成熟过程的某段时间内得以发展，否则就无法正常发展或者完全无法发展。在这些关键期内，必须要有某些视觉经验去激发其发展，例如婴幼儿期的模式化刺激。视觉系统在很多方面和语言机能有着关键性的区别，比如它不会产生知识系统，严格地说是一个处理系统。可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二者又有某些相似之处。

正如语言机能一样，人类的视觉系统遵循着某些原则。近年来发现的原则之一是某种“刚性原则”（rigidity principle）。在许多情况下，眼—脑将看到的東西理解为运动中的刚性物体。因此，假如我手里拿着一个平面图形，比如是圆形的，我把它朝着与你视线垂直的方向展示，你会看到一个圆形。如果我把它旋转90度给你看，直到圆形消失不见，你看到的还是一个圆形在旋转。你的眼睛所接受的视觉信息与以下结论一致：你看到一个平面图形渐渐缩小、变形，最后变成一条线消失了。但在多数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刚体平面图在旋转。因为其构造方式，眼—脑就把这种解释应用于所看到的物体。这样也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了该物体的生理原理。

再看一个例子。假设你看着一端有一个点的电视屏幕。假如这个点消失了，屏幕的另一端出现了另一个大小、形状和颜色相同的点。假如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和距离，你会“看到”一个点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这种现象被称为“表观运动”（apparent motion）。表观运动的性质是相当显著的。因此，假如一条横线出现在屏幕中间，重复做这个实验的话，你会在适当条件下“看到”那个点从屏幕一端移到了另一端，不是沿直线移动而是绕着这个障碍移动。假如消失的点是红色的，出现的点是蓝色的，你会看到一个红点在屏幕上移动，在某一个位置变成了蓝色，然后继续抵达终点。在其他各种情况下，都是这样。这一切现象都反映了视觉机制的结构。

其他生物体的视觉机制运作方式则不同。因此，大约在25年前进行的一系列经典实验已证明，青蛙的眼睛实际上被设计用来“看到”活动的苍蝇。如果有某种类似活动的苍蝇的移动，眼——脑就会看到，但落在视线内的死苍蝇就不会触发视觉机制，也不会被看到。在这里我们又了解了各种生理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原则被认为可以与语言机制的原则相提并论。当然，这些原则完全不同。语言机制并不包括刚性原则或支配表观运动的原则，而视觉官能不包括约束理论、格理论、结构依存等原则。这两套系统运行方式迥异，并不足为奇。

对其他认知领域的了解表明，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虽然人们所知甚少而无法确定。用专业术语来讲，心智好似模块，由具有各自属性的独立系统组成。当然，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想象到的种种事物进行描述——有时可以这么做。因而还存在着某些核心系统，但我们对其所知甚少。

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确实也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包括语言，都被认为是我们生物天赋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经验过程中既不是通过学习，更不是通过训练获得。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他们宁愿相信人是受环境塑造的，而不是按照在重要方面预先设定的方式发展的。我此前提过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观点，即语言、我们的信仰与知识以及总体文化的其他方面都取决于经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典型观点就是，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由其生物本性决定的。当然，物理属性并非如此，例如长有胳膊而不是翅膀，或者大约在某个年龄经历青春期的这些特性。但知识生活、社会生活和总体文化生活被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种标准观点让马克思的个人思想精髓丧失了价值，原因已被简要地说明过了，让我们暂时放下不谈。这一点毫无疑问被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奉为一种学说观。几个世纪以来，在英美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传统都抱着类似的观念。按照这种经验主义传统，人们认为，心智的构造源于一些简单的关联性操作。这些操作以邻近、现象相似性等为基础，并且可以在一种能力——从一组有限的实例扩展到更大一组同类实例的归纳能力——的影响下得到扩展。这些资源之后能满足一切知识成就，包括语言学习和其他很多东西。

在这一系列学说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但相似点更加突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尽管大家普遍相信它们，并且确实将其认定为学说真理，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它们。实际上，正如我在这些讲座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只要关注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驳倒这些学说。假如这些学说还蕴含真理的话，人类将会变成悲惨的生物，他们能力极为有限、互不相同，只能成为某种偶然经验的映射体。我此前谈到身体成长时就提出过该观点，在知识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当某个学说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对知识想象力进行如此有力的控制，而它又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在每一点上都与证据相矛盾，对此我们就要公平地问一问，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抱持这些信念？为什么知识分子如此沉迷于人类受环境塑造而不受其本质决定的信念？

环境主义在早年间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学说。它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天生的自然地位：主人、仆人、奴隶等。的确，如果人们没有天生赋予的东西，那么他们在禀赋上是平等的：大家都一样痛苦和不幸。无论该观点曾经多么的有吸引力，如今都很难被当真。实际上，它在当时就颇受质疑。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与其对立的传

统二元论具有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它假定人类本质上的统一性以及在任何这些方面没有明显的内在差别。

如今，环境主义的这些论点常在有关种族、智商等方面的争论中被人们听到。同样属实的是，假如人类没有受生物性决定的智能天赋，那么智商（这是受社会决定的属性）和种族、性别等其他任何东西都毫不相干。再者，即使动机可以被理解，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其观点。让我们暂时假定种族和智商是界定明确的属性，并假设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也许某个种族的人，平均而言，可能比另一个种族的人智商稍微高一些。首先请注意，这个结论也许在本质上就不会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在两个随机选择的特性之间发现相关性，这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有人碰巧对这个古怪而又无意义的问题感兴趣，那么研究界定更清楚的属性，例如指甲的长度和眼睛的颜色，也许会更有意义。因此，探索的兴趣必然在社会领域。但显然在此处，只有对那些认为每个人应该被当作某个范畴（种族、性别等）的例子来对待，而不是他本身的人来说，探索才有趣。对于没有经受过这些紊乱的人来说，某类人的智商平均值是这样或那样都毫无意义。假设我们想探究是否身高与从事高等数学的能力有些许相关，这是否意味着不应鼓励低于某一身高值的人学习高等数学？或者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展示出学习高等数学的天赋和兴趣就加以鼓励？显然是后者，尽管结果可能是高个子的人最终走上这条路的比例略高一些。既然我们没有患上“身高主义”这种社会疾病，就没人对该问题感兴趣。

人们在由其生物性决定的素质上肯定有所差别。如果不是这样，细想之下这个世界可能会很恐怖。但是，除了对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类似人群之外，发现这些素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会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也毫无社会意义可言。认为种族和智商之间存在相关性的人以及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在助长种族主义和其他的混乱现象，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产生影响；除了对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之类的人，影响并不存在。

逐个审视上述例子，我们很难接受认为环境主义在某些方面是“进步的”，从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学说的观点。此外，这个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该问题是事实而不是学说。事实问题无法用意识形态信念来解决。正如我一贯论述的那样，我们应当庆幸环境主义被彻底地误解了，但真理和谬误问题没有因我们偏好一种或另一种探究结果而被解决。

尽管事实问题没有被学说信仰解决，有时研究一下意识形态信仰和

科学信念之间的关系也颇有意义。在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例子中，这一点尤其贴切。在该事例中，知识界人士面对相当明显的事实和逻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广泛、热切而专注地坚信着事实。这些环境主义思想为何对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尤其在当代——并不完全是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是书写历史的人，我们应当在所谓的“历史教训”方面保持谨慎。我们发现所呈现的历史是为自己服务的，这不足为奇，事实的确如此。因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他们绝对独立、诚实、捍卫崇高价值、反抗统治和权威等。真实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知识分子通常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理者，为权力而服务，并大力通过掌控自称为其领导的群众运动来为自己谋取权力。对实施统治和操控的人来说，非常有用的一点是要相信人并无内在道德和智力本性，他们只是受国家、私人管理者和理论家的塑造——当然，他们也能分辨好与坏。关注人的内在本性为操控和统治设下了道德障碍，尤其是在这一本性与我曾简要评述的自由意志论一致的时候。根据这些观点，人权根植于人性，逼迫人做奴隶、工资的奴隶、权力的仆人，并服务于统治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受到管制和操控，这些都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我十分怀疑这些有关环境主义的观点具有惊人吸引力的猜测是否真实。

人们有时争论说，即使我们根据生物天赋成功地解释了人类语言和其他人类能力的属性，仍然一无所获，因为还没有解释生物属性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只是被转移了，并没有被解决。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观点。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证明鸟不是通过学习长出了翅膀而是自然长出的，因为它的遗传基因决定了其构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没有获得任何解释。问题被转移了，因为并未解释遗传基因是如何进化的。在每个事例中都会有新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解决了某个问题，又产生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得知鸟是因为遗传天赋，而不是靠学习长出翅膀，或得知人经历青春期是因为他们被设定为这样，而不是观察别人之后决定要这样做，这时候如果争辩说我们仍然一无所获，也许是荒唐的。的确，我们尚需解释语言的进化、翅膀的进化等。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但属于另一个研究领域。

这个问题今天能够得以解决吗？事实上，人们对这些事情所知有限。进化论为许多事情提供了信息，但迄今为止对这种性质的问题提及甚少。与其说答案来自自然选择理论，不如说来自分子生物学，来自对

何种物质系统在地球生物条件下得以发展及其为何发展的最终物理原理研究。当然不能假设每种特性都是专门选择而来的。在语言或翅膀这样的系统实例中，要想象出可能促成其产生的选择过程并非易事。例如，发育未全的翅膀不能“用于”运动，甚至更像障碍。那么，为何这个器官要在其进化早期阶段就生长了呢？

在某些情况下，器官生长似乎是为了一个目的，当它们在进化过程中长成某个样子，就会用于不同目的，这时自然选择过程就可能为了这些目的而进一步完善它们。经证实，昆虫翅膀的演化就是这个模式。昆虫有热度调换的问题，发育未全的翅膀可以满足这个功能。当翅膀长到一定大小，就不怎么用于这个目的，而是开始用于飞行，这时翅膀就最终长成了。也许人的认知能力有时也以类似的方式在演变。

以人的数字机能为例。儿童具有习得数字系统的能力。他们能学会数数字，还知道可以不断地累加数字。他们也能很快地习得算术运算的技巧。如果孩子不知道可以不断地累加数字，就不会知道这一事实。相反，教给他数字1、2、3等一直到数字 n ，他会以为就是这样而已。这种能力和语言能力一样，似乎超出了在其他方面很聪明的类人猿的智力范围。顺便说一句，人们曾经以为可以教鸟计数。因此，研究表明，一些鸟能够被教会这样做，如果给它们四个点，那么它们能在按直线排列的第四个容器中找到食物。该任务可以扩展到包括七个物体，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鸟能计数。但该结论并不正确。数字系统最基本的属性是，数字序列是无限的，你总能无限地累加下去。鸟可能有一定的能力，把一定的物体按排列搭配，但这与数字机能无关。计数能力不是“大致上相同”的能力，而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能力。

数字机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无法相信它经过专门选择的。如今仍存在并未使用该机能的文化；其语言不包含构建无限多数字词的方法，处在这些文化中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可以计数。但他们肯定有这种能力。置身于适当环境中的成年人能迅速地学会计数和做算术，而来自这样一个部落的儿童在技术社会中长大，也能和其他人一样成为工程师或物理学家。这种能力是有的，只是潜藏着。

实际上，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中，这种能力都是潜藏的、未被利用的。用进化论的说法来看，只是在近些年，当人类进化达到了现阶段，数字机能才得以显现。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不是说能计数的人，或者能解决算术或数字理论问题的人，才能生存并繁衍更多的后代，使这种能力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相反，它是作为其他东西的副产品发展

起来的，当情况需要它时就会供人使用。

在这一点上，人们只能猜想，但数字机能很可能是作为语言机能的副产品而发展的。语言机能的特征非同寻常，或许在生物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它具有“无穷离散”的属性。简而言之，每个句子都有固定数量的词：1、2、3、47、83个等。而一个句子能包含多少个词，原则上并没有限制。动物界已知的其他系统则截然不同。所以说，类人猿的呼叫系统是有限的，有固定的数量，比如说40个。另一方面，所谓的“蜜蜂语言”是无限的，但却不具有离散性。蜜蜂用某种形式的动作表示花与蜂巢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动作越多。原则上在两个信号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信号，用来表示前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能做出分辨。有人也许争辩说，这个系统甚至比人类语言“更丰富”，因为从某种明确的数学意义上讲，它含有“更多的信号”。但这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是基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称其为“语言”不过是用误导人的比喻。

人类语言具有非同寻常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无限离散性，人的数字机能也是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人的数字机能本质上当作人类语言的一种“抽象”，保留了无限离散的机制并去除了语言的其他特征。假如是这样，倒可以解释这一事实：尽管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未被加以利用，人的数字机能还是存在的。

依然存在的是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这里仅有一些猜想，似乎并无说服力。也许在某个久远的时期，发生了某种变化，产生了无限离散性，或许是出于与细胞生物学有关的原因，需要从目前尚不了解的物理机制属性去解释。没有这种能力，或许有可能“思考思想”，其性质会有所限制，但有了这种能力，同一个概念装置就得以从构建新思想和诸如涉及它们的推理等运算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表达和交流这些思想。在这一点上，进化压力也许进一步塑造了这种能力的发展，至少部分上是这样。十分有可能的是，该能力进化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反映出，适用于一定复杂性的大脑的物理法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在我看来，这大致上就是如今的情况。在某些特殊领域中，例如语言和视觉研究方面，人们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进展。但目前许多问题都在我们的智力把控范围之外，也许永远也无法理解。

《最简方案》导言

本书的撰写由两个相关问题而引发： (1) 人类语言机能 (language faculty) ⁽¹¹⁵⁾ 应被期望满足哪些一般性条件？ (2) 在这些条件之外不存在任何特殊结构时，语言机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这些条件决定？第一个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 (A) 就语言机能在心智或大脑认知系统序列中的位置而言，它要满足哪些条件？ (B) 就具有某种独立说服力的、对概念自然性的一般性考虑（即简单性、经济性、对称性和非冗余性等）而言，语言机能要满足哪些条件？

问题 (B) 不够准确，但并非言之无物。正如理性探索通常所做的那样，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可以在此提供指导原则。既然这些思考能被解释清楚并具有说服力，我们就可以质疑是否存在一个以某种形式来满足它们的特定系统。相比之下，问题 (A) 的答案较为明确，尽管依据目前对语言和相关认知系统的理解，人们只能推测出部分答案。

问题 (2) 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此而言，语言有点像“一个完美的系统”，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很好地满足了外部限制条件。语言学理论的最简方案力求探究这些可能性。

朝着该目标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会使一个不太普通的生物学问题变得更加深入：像人类语言这样的系统如何在心智或大脑中产生，或就此而言，这种系统如何在似乎无法找到类似人类语言基本属性的有机世界中产生？这个问题有时被当作认知科学的危机。这些关注是恰当的，但放错了位置；它们主要是生物学和脑科学的问题。就目前的认识来看，生物学和脑科学并没有为看似十分确定的、有关语言的结论提供任何基础。¹¹⁶在我看来，此处恰好能更广泛地引发进行详细的、技术性语言研究的兴趣。

最简方案和其1950年代初的先期理论有一些共同的、潜在的事实假设。尽管随着进一步的探究，这些假设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一个假设是：人类心智或大脑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机能，专门掌管语言并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尽管该假设的正确性不明显，却似乎合情合理。在此，我会继续采用这一假设并提供进一步的实证论点：语言机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储存信息的认知系统，还有提取信息并以不同

方式使用信息的各种运用系统。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认知系统。

假设运用系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特定性，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亦是如此。但通常会假设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不会具体到特定的语言：语言机能的组成部分不会像认知系统那样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最简单的假设，也是被公认为正确的假设，尽管可能也有错误。我明白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所以会继续坚持这一想法，同时假设语言变异会受认知系统的限制。

我也借用了早期研究中的假设：认知系统凭借语言表征的不同层次从该概念的技术意义上与运用系统相互作用。¹¹⁷另一个更具体的假设是：认知系统只与两个“外部”系统相互作用：发声 - 感知系统（A-P，即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和概念 - 意向系统（C-I，即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于是，有两个接口层面：处于发声 - 感知接口的语音形式（PF，即Phonetic Form）和处于概念 - 意向接口的逻辑形式（LF，即Logical Form）。这种“双重接口”的属性是对传统上把语言描述为有意义的语音系统的一种表述方式，该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尽管被普遍地采纳，或至少被默认，这些关于语言机能内部结构和它在心智 / 大脑其他系统中位置的设想却一点都不明晰。即使在总体框架中，认为发声和感知涉及同样接口表征的看法仍存在争议，按某种根本性的方式可以被论证为不正确。¹¹⁸与概念 - 意向接口相关的问题则更加晦涩且鲜为人知。我会遵守这些相当传统的假设，只是在此指出，假如它们后来是正确的，甚至是部分正确的，都将是令人震惊且有趣的发现。

大约在15年前，当原则 - 参数模型（P & P,即principles-and-parameters model）形成时，指引最简方案产生的主要问题也逐渐成为焦点。回顾一下最新发展也许有助于了解这些问题的背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说法精简扼要，并得益于“后见之明”。

早期的生成语法面临两个直接的问题：找出一种解释特定语言现象的方法（“描写充分性”）以及解释这些有关事实的知识是如何出现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头脑中的（“解释充分性”）。尽管当时鲜少有人接受这种研究方案，但该研究激活了对一个深厚传统的关切，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或许是这种传统的最后一个主要代表人物。¹¹⁹叶斯柏森意识到，语言结构通过对话语经验的抽象化“在说话人头脑中形成”，产生了一种有关“它们的结构的概念”。这一概念“非常明确地指导

他组成自己的句子”，尤其对说话人和听话人而言是全新的“自由表达”。

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的这些属性设定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目标：清楚地解释这种“结构概念”和其产生“自由表达”所依赖的程序，并解释这种概念如何出现在说话人的头脑之中——这些分别是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问题。要实现对某种特定语言L的描写充分性，L理论（其语法）必须描述语言机能所达到的状态，或至少描述这种状态的某些方面。要实现解释充分性，语言理论必须描述语言机能所达到的初始状态，并表明它如何将经验映射到这种状态。叶斯柏森进一步认为，只有“涉及句法”，我们才能期待“所有人类言语定会有共同之处”；尽管“从未有人梦想过普遍形态（universal morphology）的存在”，但可能存在一种“普遍（或一般）语法”，这也许是该范围内对语言机能初始状态更深远的一种描述。这种想法也在近期的研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鸣。

到了现代，这些传统的关注点有的被行为主义潮流所取代，有的被各种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这完全缩小了探究范围，但为有可能回到传统（且必定有效的）关注点的进一步未来探究极大地拓展了资料库。要解决这些关注点，需要更好地理解一个事实，套用一个经典说法就是：语言涉及“对有限方式的无限运用”。形式科学的进展提供了这一理解，使我们有建设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变得可行。生成语法可以被看作一种被长期遗忘的对语言与心智研究的关注和形式科学所提供的新的理解之间的交汇点。

探究这些问题的最初尝试很快就表明，传统的语法和词汇研究并没有描述（更不用说解释）即使是那些被研究得最充分的语言的最基本事实。相反，他们会为已具备语言和具体语言隐含知识的读者提供暗示，而所探究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必要的隐含知识无需反思就可以轻易获得，传统语法和词典似乎涵盖了宽泛的语言素材。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当我们试着说清楚理所当然的东西——语言机能的本质及其在特定情况下的状态——时，上述一切都是错觉。

这并非语言研究特有的情况。尤其当问题被表述得更加尖锐时，人们发现甚至连最基本的现象都没有被注意到，而看似简单、有说服力的直觉性描述根本不充分。假如我们深信苹果落在地上是因为那是它该落的地方，就不会产生严肃的力学。人们深信提出问题的传统规则，或深信最详尽的词典中的词条（其中没有一本词典去描述这些语言客体的简单属性）时，情况亦是如此。

承认语言现象无疑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

性的目标之间产生了张力。显然，为了达到解释充分性，有关初始状态的理论只能允许有限的变异：特定语言必须先于经验被大致通晓。普遍语法（UG，即Universal Grammar）所允许的选项（options）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经验必须足以用某种方式使这些选项固定下来，并形成语言机能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各种表达及其音与义的各种不同且复杂的序列；甚至连最粗略的观察也能揭示出将语言使用者的知识与经验数据分隔开来的鸿沟。但随着生成体系在对不同语言追求描写充分性的过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不断地充实，解释充分性的目标便退缩得越来越远。当我们竭力为不同语言设定具体规则系统时，其间发现的大量现象使问题更加严重。

这种张力确定了早期生成语法的研究方案，至少是该领域内令我关注的趋势。自1960年代初开始，该研究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从为特定语言所设立的复杂规则系统中抽象出普遍原则，并留下简单的、在其运作时受这些普遍原则限制的规则。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减少了具体语言属性的多样性，从而有助于达到解释充分性。这些步骤也会产生更简单、更自然的理论，为最终的最简方法奠定基础。并不是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最终会产生一种“更丑陋的”、更丰富且更复杂的普遍语法，减少了允许范围内的多样性，从而有助于实现解释充分性这一主要的实证性目标。然而，实际上，两种情况最终是相互助力、齐头并进的。其中一个实例涉及冗余原则，就会有重合的实证性内容。我们已反复发现，这些原则被错误地设定，必须被不冗余的原则替代。这种发现已成规律，有必要去除冗余已成为探究中的工作原则。这个过程也是生物学体系的一个非凡属性。

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了原则 - 参数模型。¹²⁰这是对几千年来丰富的语言探究传统的彻底背离，其程度远甚于可能被看作对传统关注的问题和对其解决途径进行复兴的早期生成语法（这也许是早期生成语法通常与传统语法学家更契合而不投合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原因）。相比之下，原则 - 参数方法认为，传统的基本思路未经太大改动就被纳入早期生成语法，在原则上是有误导性的，尤其是这一思路：语言由形成语法构式（关系从句、被动式等）的规则组成。原则 - 参数方法认为，语言没有任何类似意义上的规则，除了人为分类，也没有具有理论意义的语法构式。存在普遍原则和一套有关它们如何应用（参数）的有限的选项序列，但不存在适用于特定语言的规则，也不存在语言内部或跨语言的传统类型的语法构式。

我们假设，对每一种特定语言来说，认知系统都包括一个计算系统（CS，即computational system）和一个词库（lexicon）。词库规定计算系统选定并用以组合形成语言表达的要素——我们假设是（语音形式，逻辑形式）组对。词库应毫无冗余地、以某种优化形式仅提供计算系统要求的信息，排除一切通过普遍语法原则或所研究语言的属性可预测得到的信息。词库中的所有词项几乎都属于实义范畴（*substantive categories*）¹²¹，我们认为它们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分词，暂不论有关其本质及相互关系的诸多重要问题。我们将把其他范畴称作“功能”[范畴]（*functional*）（时态、补语化成分等），该术语无需一开始就力求准确，我们会逐步使之完善。

在原则 - 参数方法中，语言类型和语言变异问题与之前的形式有所不同。语言差异和类型应归为对参数值的选择。一个主要的研究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选项是什么，并出现在哪些语言组成部分中。有一个说法是，参数仅限于形式特征，在接口处未被清楚地解释。¹²²还有一个更坚决的说法是，参数仅限于功能范畴的形式特征。¹²³可以认为，这些观点部分表达了叶斯柏森有关句法 - 形态分离的直觉。我会假设这一切或许是正确的，但不想对此过于确定，因为在我看来，所知甚少时就不要冒险做出强硬的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习得被解释为以可允许的某种方式确定初始状态参数的过程。参数设定的某个具体选择从技术意义上决定了一种与我们有关的语言：一种I语言¹²⁴，I被理解为“内部的”（internal）、“个体的”（individual）以及“内涵性的”（intensional）。

以这种方式在原则 - 参数模型中阐述问题，显然在把语言描述为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缺陷。我们很难期望后者¹²⁵是初始状态在参数值确定之后的实例体现。相反，语言机能的状态是不同经验的某种附带性产物，其本身并无任何有趣之处，自然界中大量的其他现象亦是如此（这也是科学家为何做实验而不直接记录自然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假如我们希望理解语言机能的属性，应该需要更多实质性的理想化描述，¹²⁶但有限的理想化描述造成的误解和混淆无所不在，现在追求它也许毫无益处。应当指出的是，理想化是一个对仅有的、能把握现实的合理方法的误导性说法。

原则 - 参数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大胆的推理，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假设。然而，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基本假设似乎合情合理，并提出了解决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之间张力的自然方法。实际

上，这种对传统的背离为应对解释充分性的关键性问题带来了第一线希望，该问题曾因过于困难一直被搁置一旁。早期的生成语法研究只找到了一种评价标准，在适合普遍语法规定形式并与相关语料一致的某个语言的各种理论（语法）中进行选择。此外，除了“可行性”（feasibility）这种尚欠准确的概念似乎也别无他法。¹²⁷但假如像有关内化语言的这种原则 - 参数概念是准确的（这抓住了在语言运用、习得、社会互动等研究中所预设的语言概念的重要本质），那么就能严肃地提出解释充分性的问题。这成为一个关于决定有限多个普遍参数值如何被经验设定的问题，无论如何也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至少能被建设性地探索的问题。

假如这些想法的思路是正确的话，人类语言和有限的词汇变化就有一种单一的运算系统 C_{HL} 。语言变异本质上有形态特性，包括运算系统中哪些部分被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种关键性问题，该话题也被让—罗杰·威尔格诺德⁽¹²⁸⁾的抽象格理论以及黄正德⁽¹²⁹⁾对有类型差异的疑问词及相关结构的研究推到了前沿。

这种对原则 - 参数方法的描述夸大了情况。只要有能决定具体选择的数据，各种语言都会有更多的变异。变异出现在这样几个领域：一个是音系学的外围部分，另一个是“索绪尔的任意性”，即词库中实词部分的音 - 义组对。我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也不谈其他似乎与此处关注的语言运算属性关系不大的问题，也就是那些似乎没有进入 C_{HL} 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语义场的多变性、从普遍语法提供的词库中进行的選擇以及涉及词项和其他认知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

和生成语法早期的说法一样，迄今为止对原则 - 参数模型的阐释让人们从各种类型不同的语言中发现并至少了解了大量新的实证材料。可以明确提出的问题和所涉及的实证事实，在深度和种类上都是全新的。这本身就是充满希望的、令人鼓舞的进展。

随着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之间的张力有所减弱，并且至少后者已成为主要议题，当前的任务愈加艰巨而有趣。主要任务是要表明，语言现象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虚假的、附带性的现象，是固定原则在略微不同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则 - 参数方法引起的视角转换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简单性考量如何进入语法理论的问题。正如在生成语法最早的研究中讨论的那样，这些考量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一种不精确但也不空洞的进行普遍理性探究的简单性概念，必须与在内化语言（I语言）中进行选择的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衡量清楚地区分开来。¹³⁰前

一个简单性概念和语言研究毫无关系，但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概念是普遍语法的组成部分，也是确定经验与内化语言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过程；其地位类似于物理常量。在早期研究中，内部化概念在所提议的语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内化语言”）中以评价程序的形式进行选择，与规则系统所允许的格式保持一致。原则 - 参数方法为超越那种有限但重要的目标并探索解释充分性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没有评估程序，就没有早期意义上的内部化“简单性”概念。

然而，十分相似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次是以从推导式中进行选择的经济性考量的形式出现，排除了那些理论内部化意义上并非最优的考量。外部化的“简单性”概念保持不变，即使不精确也一如既往地运作。

这时又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即最简方案的问题。语言有多么“完美”呢？人们可以预想到，至少在词库的形态 - 形式（morphological-formal）特征中，以及由处于发声—感知接口的条件所引发的语言方面上，存在着“不完美之处”。主要问题在于，语言机能的这些组成部分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完全背离了事实上的概念必要性，以至于运算系统 C_{HL} 不仅独一无二且在某种有趣的意义上来说是最优化的。从不同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力求确定，在将具体结构归于语言机能的道路上，证据能带我们走得多远，同时要求仔细分析每一次对“完美”的背离并提供充分的理据。

朝着这种进一步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给问题（A）和（B）的答案带来了巨大的描写负担，包括：接口条件的影响；对有关内部一致的一般性考虑的具体阐释；概念天然性；外部意义上的“简单性”之类的东西，等等。在任何原则 - 参数理论中都存在的实证性负担现在变得愈加严重。

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也极为有趣。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今至少能提出这些问题，甚至在某些领域的探索上取得一定的成功。如果按照这些方法所做的最新思考接近准确的话，语言研究和相关学科就会有一个丰富而令人激动的未来……

（本文最早出现在《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第1—11页。）

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

语言研究是系统性探究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历史成就硕果累累，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印度和古希腊。换个角度来看，语言研究又很年轻。当今的研究主体在40年前才初具雏形，一些主要的传统思想在那时重焕生机并被重新建构，为后来卓有成就的探究开辟了道路。

理所应当的是，这么多年来，语言早该散发出这种吸引力。人类的语言机能似乎是真正的“物种属性”，几乎无出例外，其他物种也没有明显的相似属性。也许在昆虫那里能找到最接近的相似属性，但又隔着10亿年的进化历程。笛卡尔认为，能用语言符号自由地表达所形成的思想标志着“人与动物”或与机器的“真正区别”。如今，我们找不到任何严肃的理由挑战其看法，无论我们所谓的“机器”是指促使17、18世纪的人产生幻想的自动装置（automata），还是指对现今思维和想象力产生刺激的东西。

此外，语言机能已关键性地进入了人类的生活、思维和互动的各个方面。语言机能在这一事实面前功不可没：人类单在生物界就拥有历史、文化演变和一切复杂而丰富的多样性，甚至是生物学上的成功（从技术意义上讲，人类的数量十分庞大）。火星上的科学家在观察地球上各种古怪的行为时，可能会被这种看似十分独特的智能组织（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形式的出现和价值所震撼。甚至更加自然而然的是，这个充满神秘性的话题本来就能激发一些人的好奇心，如果他们想了解自己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所具有的本性和所处的位置。

人类语言基于一种基本的属性，这种属性在生物学上似乎也是独一无二的：离散的无限性（discrete infinity），⁽¹³¹⁾其最纯粹的形式可以用自然数1、2、3……来显示。儿童不会学习这种属性；除非大脑已拥有这些基本原则，否则任何数据也无法提供这些原则。同样，儿童不必学习的是，有三个词和四个词组成的句子，但没有三个半词组成的句子，儿童也不用知道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总是有可能造出有一定形式和意义的更复杂的句子。这些知识肯定作为我们生物禀赋（biological endowment）的一部分，通过“自然的创作之手”（大卫·休谟语）传递给了我们。¹³²

这种属性引起了伽利略的兴趣。他认为，发现“用24个小符号⁽¹³³⁾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最私密的想法”的方式是全人类最伟大的发明。¹³⁴该发

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反映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语言具有离散的无限性。不久以后，波尔 - 罗瓦雅尔语法（Port Royal Grammar）的作者们(135)也被这种“非凡的发明”所震撼，即用几十个发音构建出让我们向别人展示自己所思所想的无限多种表达的方式。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发明，但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是“非凡的”，尽管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实际上对其一无所知。

科学家把视觉系统、免疫系统或循环系统说成是身体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机能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语言器官”。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话，器官就不是能从身体摘除而使剩下的部位完好无损的东西。它是一个结构更复杂的子系统。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具有显著特点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作用来彻底了解这种复杂性。对语言机能的研究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

我们进一步假设，语言器官和其他器官一样，其基本特性在于基因的传达。探究这一切如何发生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调查由基因决定的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我们可以把初始状态看成一种“语言习得机制”(136)，以经验为“输入”，以产出语言为“输出”，而“输出”在心智或大脑中有内在的表示。输出和输入都可以被检验：我们可以研究经验历程和所习得的语言的属性。以这种方式获知的东西让我们对周旋于二者之间的初始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初始状态是人类共有的：假如我的孩子在东京长大，他们和那里的孩子一样会说日语。这意味着有关日语的数据与我们对英语的初始状态的假设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建立初始状态理论必须满足的实证性条件，也有可能提出一些语言生物学（biology of language）的问题：基因是如何决定初始状态的？参与初始状态及其呈现的后期状态的大脑机制有哪些？即使对于更简单的、有可能进行直接实验的系统，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在可探究的范围之内。

我一直概述的方法与语言机能有关，即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和它所呈现的其他状态。假设彼得的语言器官处于L状态。我们可以认为L就是彼得的“内化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当我在这里提到语言的时候，就是指我所说的这个意思。照此理解的话，语言类似于“我们说话和理解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传统的语言观念。

我们把传统术语置于新的框架之中，把彼得的语言理论称作其语言的“语法”。彼得的语言能决定无限多个表达式，每一种表达式都有各自

的语音和意义。用术语来讲，彼得的语言“生成”（generates）了其语言的表达式。因此，他的语言理论叫作“生成语法”（a generative grammar）。每一种表达式都是各种属性的集合体，并向彼得的语言运用系统（他的发音器官、思想组织模式等）发出“指示”（instructions）。彼得凭借自己的语言和处在恰当位置的相关语言运用系统，能充分了解表达式的语音和意义，还具有相应的能力去解读所听到的内容、表达自我思想并以其他各种方式使用语言。

生成语法产生于通常所说的1950年代的“认知革命”背景中，它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要素。无论“革命”一词是否恰当，都产生了一次重要的视角变化：从对行为及其产物（例如文本）的研究转向了对参与思维和行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认知视角不把行为及其产物当作探究目标，而是当作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为心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证据，也许为这些机制在实施行为和解读经验时如何操作提供了方法。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焦点的属性和模式找到了自身位置，但只是作为现象，需要和其他无数属性和模式一起从生成表达式的内在机制方面得以诠释。这是“心灵主义的”的方法，但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它涉及“世界的心智方面”，连同其机械、化学、视觉和其他方面，主要研究自然界的真正客体——大脑，还有大脑的状态及其功能，并因此把心智研究推向与生物科学的最终融合。

此次“认知革命”更新并改变了我们或可称为17、18世纪“第一次认知革命”的许多见解、成就和困惑，而17、18世纪的第一次革命也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当时所认定的是，语言涉及“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威廉·冯·洪堡语），但这一洞见只能以有限的方式被拓展，因为基本思想依然模糊不清。到了20世纪中期，形式科学的进展以鲜明的形式提出适恰的概念，有可能更精确地描述产生语言表达式的计算原则，并因此捕捉到“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的想法。其他进展也为传统问题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并带来更大的成功希望。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已经成就卓越。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让人们对语言本质和多样性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也打消了很多成见。某些话题，特别是对语音系统的研究，受到了20世纪结构语言学的极大推动。

很快开展的生成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表明，即使在那些被充分研究的语言中，以前的研究对基本属性却视而不见，连最综合的传统语法和词典也只是浮光掠影。假如其目标是帮助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找到单词

的规定意义和读音，或大致知道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是相当正确的。但假如我们的目标是了解语言机能和它所呈现的状态，我们就无法默然预设“读者的智商”。相反，这才是探究的对象。

语言习得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仔细看一下对表达式的诠释就很快会明白，在最初阶段，儿童知道的东西比经验所提供的更多。即使对简单词也是如此。在语言增长的高峰期，儿童以每小时一个词的速度习得单词，尽管是在满是歧义的条件下去进行的十分有限的语言接触。理解单词的方式细微而复杂，远远超出任何词典所能企及的范围，尽管这只是研究的开始。当我们跳出简单词之外，甚至会得出更戏剧化的结论。语言习得通常更像器官的成长，是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尽管环境显然至关重要，初始状态却预先决定了普遍的发展过程和所出现的现象的基本特征。但初始状态是人类共有的。那么，各种语言肯定以其本质属性乃至精密细节被铸入了同一个模具中。火星上的科学家可以合理地总结说，只有一种人类语言，只是在边缘处有些差异而已。

随着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更详细地研究语言，逐渐清楚的是，语言的多样性被彻底低估了，其复杂性和受语言机能初始状态决定的程度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是表象。

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虽然似是而非却无可辩驳。它们以鲜明的形式提出了现代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说明所有语言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的变异（variation）而同时又忠实地带着各自看似多样的音和义的复杂属性？真正的人类语言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一种特定语言的语法，只要完整、精确地描述出语言的属性以及说话人所知道的事情，就满足了描写充分性这一条件。要满足解释充分性的条件，语言理论必须要显示出，每种特定的语言是如何在由经验设定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下从一致的初始状态中得出的。这样才能从更深入的层面上解释语言的属性。

在两种研究任务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张力。追求描写充分性似乎会导致更复杂、更多样的规则系统，而追求解释充分性则要求语言结构恒定不变，除非处在边缘状态。正是这种张力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研究的准则。消解张力的自然而然的办法就是挑战延续到早期生成语法的传统假设，即语言是一个复杂的规则系统，每个系统都是具体语言和语法结构所特有的：印地语的关系从句、斯瓦希里的动词短语、日语的被动式等都有构成规则。对解释充分性的思考说明，这种假设不可能是正

确的。

核心问题在于找出规则系统的普遍属性，将其归结为语言机能本身，并希望剩余的部分会更简单、更一致。大约在50年前，这些努力凝结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比更早期的生成语法还要背离传统。这种一直被称为“原则和参数”（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的方法彻底摒弃了“规则”和“语法结构”的概念：不存在印地语的关系从句、斯瓦希里语的动词短语、日语的被动式等构成规则。我们所熟悉的语法结构被当作分类制品（taxonomic artifacts），对非正式的描写也许有用，但并没有理论地位，其地位类似于“陆栖哺乳动物”或“家养宠物”的地位。规则被分解为语言机能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了表达式的属性。

我们可以把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视为一个连接着开关盒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由语言原则（the principles of language）构成，而开关是由经验（experience）决定的选项。把开关调到一边，就是斯瓦希里语；把开关调到另外一边，就是日语。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类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开关的一种具体设定，用术语来说就是参数设定。如果这个研究方案成功的话，我们确实应该能从某种设定选择中推导出斯瓦希里语，从另外一种设定选择中推导出日语等人类所能习得的各种语言。语言习得的实证条件所要求的是，要基于儿童所得到的有限信息的基础来设定开关。需要注意的是，开关设定中的微小改变在输出过程中会产生极为明显的变化，因为影响效果会在系统中扩散。这些是一切真正的理论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捕捉的普遍的语言属性。当然，这是一个方案，还不是成品。初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以其目前的形式成立；更不必说的是，我们无法确定整个方法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一项研究方案，它已大获成功，使人们对类型学广阔范围内各种语言的实证性探究急剧增多，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也提供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答案。习得、语言处理、病理学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新的形式，并取得了成果。此外，无论该方案的结果如何，它表明了语言理论如何可以满足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这类冲突性的条件，至少第一次提供了有关真正的语言理论的概要。

这个研究方案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阐明原则与参数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并扩展框架使之包括语言及其使用的其他方面。尽管我们对很多东西不明就里，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考虑到（或者也许找到了）一些更深远的有关语言设计（design of language）的新问题。尤

其是，我们可以问一问：这种设计到底有多好？鉴于语言机能必须满足的条件，语言到底有多接近一位超级工程师构建的样子？

这些问题必须更加清晰，也有一些继续实施的方式。语言机能处于更广阔的心智或大脑构架之中。它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并强加了语言被使用就必须满足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些条件看作“可读性条件”（legibility conditions），意思是其他系统必须能“阅读”语言的表达式，并运用它们给思想和行动发出“指示”。例如，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s）必须能读懂与声音相关的指示，也就是语言产生的“语音表达”（phonetic representations）。发音和感知器官有特定的设计，使其能够解读某些语音属性，而不是别的属性。这些系统因而把可读性条件强加给语言机能的生成过程，这样就必须为表达式提供正确的语音形式。对于使用语言机能资源的概念系统和其他系统，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具有内在的属性，这就要求语言生成的表达式有某些“语义表达”，而不是其他的表达。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被与语言相互作用的外部系统所强加的可读性条件而言，语言在何种程度上算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直到近些年也无法严肃地提出来，甚至无法合理地明确表达出来。现在，似乎可以这样做了，甚至也有迹象表明，语言机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乎“完美”；若果真如此，这就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

逐渐被称为“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的尝试探索了这些问题。对这个方案做出肯定的判断实在还为时过早。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些问题现在可以被有利地提上日程，大有希望能获得早期结果。我想就这些想法和前景说几句，然后再回到留在这些视野中的一些问题。

最简方案要求我们仔细审视传统的假设。最值得尊敬的假设就是，语言有声音和意义。按目前的术语来说，这个假设就被自然地转换为以下论点：语言机能把心智或大脑的其他系统置于两个“接口层面”，一个与声音相关，另外一个与意义有关。语言生成的某个表达式包括一个感觉运动系统能辨认的语音表达，还有一个有关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和其他系统能辨认的语义表达。

有一个关于是否存在接口层面之外的层面的问题：语言内部是否存在一些层面，尤其是现代研究中推断的深层结构和浅层结构的层面？¹³⁷最简方案试图表明，从这些层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也可以从接口处的可读性条件入手去理解或更好地理解：对那些了解技术文献的

人来说，这意味着使用投射原则、约束理论、格理论、链条件等。

我们也试图表明，唯一的运算操作是在那些有关接口属性最薄弱的假设中不可避免的运算操作。有一个这样的假设是，存在一些类似单词的单位：外部系统必须能诠释“Peter”（“彼得”）和“tall”（“高”）这种词。另一种假设是，这些词组成了更大的表达式，例如“Peter is tall”（“彼得很高”）。第三种假设是，这些词有音和义的属性：开始说“Peter”时双唇是闭合的，这个词也用来指人。因此，语言涉及三种要素：

- （1）音和义的属性，称作“特征”（features）；
- （2）由这些属性组合成的词，称作“词项”（lexical items）；
- （3）由这些“原子”单位构成的复杂表达式。

由此可知，生成表达式的运算系统有两种基本操作：第一种把特征组合成词项，第二种从那些已构成的、以词项为起点的客体中形成更大的句法客体（syntactic objects）。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第一种操作看作一系列的词项。用传统的术语来说，这一系列（可以叫作“词库”）是由“例外”构成的，即由语言机能提供的音—义的任意结合以及从屈折音变属性中做出的具体选择，语言机能决定了我们如何表示名词和动词是复数还是单数，如何表示名词有主格和受格等。这些屈折音变特征竟然在运算中起着核心作用。

最优的设计也不会在运算中产生出新的特征。应该没有什么指示符号（indices）、短语单位（phrasal units）或标杆层面（bar level）（因而也没有短语结构规则或X标杆理论）。¹³⁸我们也试图表明，除了由可读性条件强加或由运算本身以某种自然方式引入的结构关系之外，没有产生其他的结构关系。在第一种范畴中，我们有语音层面邻接性（adjacency）这样的属性，还有语义层面的论元—结构（argument-structure）和量词—变项（quantifier-variable）关系。在第二种范畴中，我们有特征之间的局部关系和在运算过程中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句法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连接其中一个句法客体和另外一个句法客体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成分统领（c-command）关系；塞缪尔·爱泼斯坦（Samuel Epstein）¹³⁹指出，这是一个在整个语言设计中起着核心作用，也被视为十分不自然的观念，尽管从该角度来看，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显得一目了然。但我们排除了表达式派生内部的管辖和约束关系以及各种其他关系和相互作用。

熟悉新近研究的人会很清楚，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相反的结论。更糟糕的是，一个有关原则与参数框架内的研究及其相当瞩目的成就的核心假设是，我刚才提出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正如可能预料的那样，语言在这些方面是非常“不完美的”。因此，要表明这种设置⁽¹⁴⁰⁾和不必要的描写技术一样可以被去除掉，这绝非一项小任务；假如卸掉这种“累赘”（excess baggage），描写和解释的力度得以扩展，那就更好。然而，我认为，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这些之前似乎毫无可能性的结论至少现在看似是合理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语言显然有所不同，但我们想知道何以至此。有一个方面在于选择某种范围内不同的语音。另一个方面在于音与义的任意结合。这些方面都很简明，我们无需受到羁绊。更有趣的事实是，语言的屈折音变系统是不同的，例如格系统。我们发现，拉丁语的这些系统是相当丰富的，梵文或芬兰语更是如此，但英语的屈折音变系统最少，而汉语则没有。抑或看上去是这样的。对解释充分性的思考表明，在这里，表象也许有误导性；实际上，近年来的研究¹⁴¹表明，这些屈折音变系统没有表层形式看起来那么变化多样。例如，汉语和英语也许和拉丁语一样有格系统，但其语音实现有所不同。此外，语言变体似乎大部分都能被还原为屈折音变系统的属性。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语言变异就发生在词库的一个有限的部分。

可读性条件在组成词项的特征中强加了一个三向式的划分：

（1）在语义接口被诠释的语义特征；

（2）在语音接口被诠释的语音特征；

（3）在其中一个接口处未被诠释的特征。在完美设计的语言中，每个特征都属于语音或语义方面，而不仅是一个找准位置或方便运算的设置。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未被诠释的形式特征。这个要求似乎太强硬了。像结构格（structural case）这种原型形式特征（例如，拉丁语的主格和受格）在语义接口得不到诠释，在语音层面也不必表达出来。在屈折音变系统内，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在句法运算中，似乎还有第二种更引人注目的语言设计上的不完美，至少是很明显的一种不完美。作为语言普遍方面的“移位属性”（displacement property）：短语被诠释得好像处于表达式的不同位置，而表达式中有时又出现了相似的词项，可以从自然的局部关系方面被诠释。以“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克林顿似乎已经当

选”)这个句子为例,我们明白“elect”(“选举”)和“Clinton”(“克林顿”)的关系,就像我们明白这两个词在句子“It seems that they elected Clinton”(“他们好像选了克林顿”)中的局部关系一样:用传统术语来说,“Clinton”是“elect”的直接宾语,尽管它被“移位”到“seems”的主语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主语和动词在屈折音变特征上一致,但并无语义关系;主语的语义关系针对的是远处的动词“elect”。⁽¹⁴²⁾

现在,我们得出两种“不完美”: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和移位属性。以最优设计的假设为依据,我们期望两种不完美能关联起来,似乎出现了这种情况: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就是执行移位属性的机制。

移位属性从未成为用于特殊目的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符号系统按隐喻用法被叫作“语言”或“形式语言”,如“算术语言”“计算语言”或“科学语言”。这些系统没有屈折音变系统,因而就没有未被诠释的特征。移位和屈折音变是人类语言的特殊属性;当符号系统用作其他目的时,人类语言的很多属性都被忽略了,这也许会把心智或大脑结构强加给人类语言的可读性条件弃之不顾。

人类语言的移位属性通过语法转换或其他某种机制表达出来,但它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表达出来。语言为何应该具有该属性,这是一个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却无法解决的有趣问题。我怀疑部分原因在于以浅层结构诠释的方式所描写的现象,很多现象在传统语法中都很常见:话题-述题(topic-comment)、具体性(specificity)、新旧信息以及我们甚至在移动位置上发现的施事力(agentive force)等。如果是正确的,那么移位属性的确受到可读性条件的强迫:它被我们的思维系统从外部强加的诠释要求所推动,我们的思维系统也有这些特别的属性(有关语言使用的研究也证实是这样)。这些问题目前以有趣的方式被研究着,我在此无法详述。

从生成语法的起源来看,可以假设有两种运算操作:

- (1) 形成更大的、由词项构成的句法客体的短语结构规则;
- (2) 表达移位属性的转换规则。

两种操作都有传统根源,但我们很快会发现它们与所猜想的情况大相径庭,并具有不受质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案曾试图表明,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是表象,两种规则都可以被还原成更简单的形式。有关短语结构规则多样性的问题,“完美的”解决办法便是彻底消除它们,支持不可还原的操作,拿出两个已成形的客体,把一个客体附加给另外一

个客体，构成只具有附加目标属性的更大的客体。我们把这种操作叫作“合并”（Merge）。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最优的运算程序会包括合并运算和创建移位属性的其他运算，即转换运算或某种对应的运算。这两种平行操作的后一种做法试图把转换成分还原成最简形式；尽管和短语结构规则不一样，但转换成分似乎是不可消除的。最终结果得出的推论是：对一组核心现象而言，只有一种移动运算（operation Move），就是基本上可以把任何成分移动到任何位置而没有具体到语言或特定结构的属性。移动如何应用由与特定参数选择相互作用的普遍原则来决定，而特定参数选择是决定特定语言的开关设置。合并运算拿出两个区别性的客体X和Y，把Y附加给X。而移动运算单独拿出客体X和属于X一部分的客体Y，把Y合并到X。

下一个问题要证明的是，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无法被诠释的特征就是执行移位属性的机制，运算系统中两种主要的不完美就变成了一种。如果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移位属性最终被外部思维系统强加的可读性条件所推动，那么，不完美的地方就被彻底消除了，语言设计最终是最优的：要求未被诠释的特征作为一种机制去满足由心智或大脑的普遍构架所强加的可读性条件。

这种合并的方式十分简单，但有条理地做出解释却远远超出了这些描述的范围。一个基本的直觉性想法是，必须抹除未被诠释的特征才能满足结构条件，而抹除的做法要求能进行抹除的干扰特征（offending feature）和匹配特征（matching feature）之间存在局部关系。因为与语义诠释的方式有关，这两个特征一向相隔甚远。例如，在“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这个句子中，语义诠释要求“elect”和“Clinton”必须以短语“elect Clinton”的形式存在局部关系，这种结构才能被正确地诠释，似乎这个句子本来就是“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Clinton”。句子的主要动词“seems”具有不可被诠释的屈折音变特征：单数 / 第三人称 / 阳性，这些属性都未给句意添加额外的内容，因为它们已被与动词一致的名词短语表达了出来，在这里也无法被消除。因此，“seems”的这些干扰特征必须在局部关系中被抹除，这是传统的描写类别“主谓一致”（agreement）的直白说法。为了得到这个结果，与动词保持主谓一致的短语“Clinton”被附加上了主要动词“seems”的干扰特征，后者在局部匹配中被抹除了。但短语“Clinton”现在被移位了。

请注意，只有“Clinton”的特征被附加了；感觉运动系统无法“发

出”或“听到”与所属的短语分离的孤立特征，因为与该系统有关，所以整个短语都移动了。然而，如果感觉运动系统因某种原因未被激活，只有特征聚集在一起，形成诸如“an unpopular candidate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一位不得人心的候选人似乎当选了”）这样的句子，经过显性移位，我们会得出“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an unpopular candidate”这种形式的句子。其中，相隔较远的短语“an unpopular candidate”与动词“seems”保持主谓一致，这意味着其特征已被吸附到与“seems”的局部关系之中，而该短语的其他部分依然保留。感觉运动系统未被激活的事实被称作“隐性移动”（covert movement），是一种带有有趣属性的显现。在很多语言中（例如，西班牙语）都有这样的句子。英语也有，尽管出于其他原因必须引入语义空成分（empty element）“there”而产生句子“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 an unpopular candidate”；也出于一些有趣的原因，必须进行语序倒装，因此得出“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an unpopular candidate elected”。这些属性来自在语言中普遍生效的参数的特定选择，它们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表层不同的复合现象。在我们观察的情况中，一切都还原为简单的事实：未被诠释的形式特征在与匹配特征的局部关系中必须被抹除，同时产生在接口处进行语义诠释所要求的移位属性。

在这段简要的描述中，有许多人在挥动着手臂。⁽¹⁴³⁾填补空白就会看到相当有趣的画面。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存在着很多研究分支，但继续前行就会把我们带到这些评论范围之外。

最后，我想简单提一下有关内在主义语言研究（internalist study of language）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关的其他问题。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长话短说。假设“book”（“书”）是彼得的词库中的一个词。这个词是语音属性和语义属性的复合体。感觉运动系统使用语音属性来发音和感知，把它们与外部事件联系起来，例如分子运动。当彼得谈论世界并诠释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时，其他心智系统使用了这个词的语义属性。

有关如何在语音方面取得进展，并无进一步的争议。但在语义方面，有很大的分歧。在我看来，以经验为主的研究是以其研究语音的方式（像音系学和语音学那样）来对待语义问题的。它们试图找到“book”一词的语义属性：它是名词而非动词，用来指制品而不是像水那样的物质或像健康那样的抽象概念等。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属性是“book”词义的一部分还是与该词关联的概念的一部分？以目前的了解来看，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辨别这些说法，但也许有一天会发掘出一个

实证性的问题。不管怎样，词项“book”的一些内在特征决定了之前提到的诠释模式。

我们研究语言使用后发现，对词的诠释是从物质构成（material constitution）、设计（design）、预期使用和特别使用（intended and characteristic use）、构成作用（institutional role）等方面进行的。根据这些属性，事物被识别并被指派给与决定发音的语音特征同等的范畴（我认为是语义特征）。语言使用以不同的方式关照着这些语义特征。假设图书馆有两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彼得拿了一本，约翰拿了另外一本。彼得和约翰拿的是同一本书还是不同的书呢？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词项的物质因素，他们拿的是不同的书；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其抽象成分，他们拿的是同一本书。就像我们说出“the book that he is planning will weigh at least five pounds if he ever writes it”（“他计划要写的书如果真的写出来的话至少重五英镑”）或“his book is in every store in the country”（“他写的书在全国的每个书店都有卖的”）时，可以同时关注物质因素和抽象因素。同样，我们可以把门刷成白色并穿过“它”，用代词“它”笼统地指门的形状和地面。我们可以说，“the bank was blown up after it raised the interest rate”（“银行提高利率之后被炸毁了”）或“it raised the rate to keep from being blown up”（“为了避免被炸毁，它提高了利率”）。这里的代词“it”和“being blown up”的主语“空语类”（empty category）都同时接纳了物质因素和机构因素。

有关这些问题的事实通常十分清楚，但并非微不足道。因此，不能独立指称的成分，甚至连最受制约的成分，都遵循着一些区别，但又忽略了其他的区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有趣的方式对待不同类型的词。可以用很多方式对这些属性进行研究：语言习得、语言的共性、被发明的形式等。我们所发现的结论令人惊讶且复杂难懂，不足为奇的是，它们先于任何证据之前就被知晓，因此是语言共有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先验原因让人预料到人类语言会有这些属性；火星语可能不一样。科学和数学的符号系统肯定是不同的。没人会知道，人类语言的特定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生化法则的结果，而这些法则适用于具有大脑一般特征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仍处于遥远视野内的问题。

17、18世纪的哲学以有趣的方式找到了解决类似条件下语义表达的途径，通常采取休谟的原则：“我们赋予事物的身份”仅仅是依赖于人类的理解力建立起来的“虚构形式”。¹⁴⁴休谟的结论似乎十分合理。我桌子上的书并未凭借其内在构成就拥有这些奇特的属性；相反，它通过人们

思考的方式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词的意思拥有了这些属性。词的语义属性是用心智资源所提供的视角去思考世界和谈论世界，而不是以语音理解（phonetic interpretation）所呈现出来的操作方式去这样做。

现代语言哲学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它问的是一个词指示了什么，并给出各种答案。但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意义。“书”的例子很典型。当彼得和约翰从图书馆拿出相同的书时，如果问的是“Tolstoy's *War and Peace*”（“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个表达指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毫无意义了。答案取决于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说话时如何使用语义特征。一般来说，一个词，甚至是最简单的词，都不会跳出世界的实体或我们“信仰空间”的实体。有关这些问题的传统假设在我看来是很可疑的。

我曾提到过，现代生成语法试图解决传统上踊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笛卡尔的这一观点：人与其他生物或机器的“真正区别”¹⁴⁵在于他们用被日常语言使用清楚地说明的方式来行事的能力。这种能力无需任何有限的限制，受内在状态的影响但不由其决定，与情景相称但不因其而生，连贯一致并引发听话人可能想表达的想法等。我持续讨论的研究目标是发掘这种常规做法中的一些因素，但也只是一些而已。

生成语法试图发现人们所使用的各种机制，从而有助于研究它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创新的方式被使用。它们如何被使用是吸引笛卡尔哲学信徒们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他们一样神秘，尽管现在我们对牵涉的机制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这个方面，语言研究又很像对其他器官的研究。对视觉和运动系统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大脑把零散的刺激诠释为一个立方体以及手臂伸向桌上的一本书所凭借的机制。但这些科学分支没有提出人怎样才决定看一下桌子上的书或把它拿起来的问题，也没有对视觉或运动系统的使用提出推断，或连其他推断也为数甚微。正是在语言使用中突显出来的这些能力，才是传统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对17世纪的笛卡尔而言，它们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高贵的东西”，并且全部“真正地属于”我们。在笛卡尔之前的半个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医生胡安·瓦尔特（Juan Huarte）评述说，人类的日常理解力和行动所具有的这种“生成机能”是“野兽和植物”¹⁴⁶所没有的，尽管它是一种没有真正运用创造性想象力的低级理解形式。连这种低级形式都不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围之内，除了我们对其机制有所研究之外。

在一些领域（包括语言）中，对上述这些机制的了解近年来收获颇

丰。现在所能面对的问题十分困难且富有挑战性，但在我们称作“科学”的人类探究形式范围之外，仍有诸多谜团。假如我们把人类视为有机世界的一部分，上述结论就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或许也不会令我们感到不安。

（本文最早出现在《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第3—18页。）

语言与大脑

讨论该话题的恰当方式是，回顾语言与大脑的基本原理，并展示它们是如何被统一起来的，也许是以65年前化学与物理学结合的模式，或以数年之后把生物学的部分内容纳入该复合体的模式。但我无意尝试解释这一过程。关于这个话题，我能自信地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并非起初就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去探讨它。尽管信心不足，我仍然认为^[147]，可以公平地讲，目前的理解没能为统一脑科学和有关更高级的心智机能（其中包括语言）的科学奠定基础，而在通往看似遥远的目标的途中也许有许多惊喜——假如我提到的经典范例的确是现实模型的话，该目标本身并不足为奇。

这种对眼前愿景持些许怀疑态度的评价与两个普遍但对立的观点不同。第一个观点认为，怀疑论是毫无根据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大错特错的，因为甚至没有出现统一的问题。在研究心智的心理学里没有出现心智问题，因为该话题不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采取的立场是界定“心智的计算机模型”；¹⁴⁸在语言里也没有出现心智问题，因为语言是额外的人类客体，这是心智和语言哲学主流的一致看法，神经科学和动物行为学的杰出人物也提出过这种看法。至少，这些话似乎暗示的就是这样，而意向也许有所不同。我将回到时下一些著名的例子。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认为，怀疑论是毫无根据的，但的确存在统一的问题。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统一的前景近在眼前，会取代笛卡尔的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直接给出这种乐观评价的是进化论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他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近出版的有关大脑的书中总结了这种艺术状态，似乎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研究者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谈起对大脑 - 心智问题的未来解决方案。”¹⁴⁹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表达了类似的自信，包括著名人物做出的已解决大脑 - 心智问题

的宣称。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几种有关统一问题的观点：

(1) 毫无疑问的是：语言和更高级的心智机能通常都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

(2) 它们原则上属于生物学，而任何有关人类思维及其表达的研究或人类行为与互动的研究都以此假设为基础，至少默认是这样。

接下来，类别(2)有两种变体：(A)统一近在眼前；(B)目前我们还看不出生物学的这些部分如何相互关联，并且怀疑也许错过了一些基本的见地。

在我看来，最后一种观点(2B)看似最为合理。我将试图说明其中的原因，并试图描述出在对这些话题进行细致而综合的概述时应当提到的某个部分。

我将选出三个观点作为此次讨论的框架，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合理的，长久以来亦是如此。我会引用权威科学家的普遍说法，但不是我本人在过去几年里所说的话。

第一个观点来自神经科学家弗农·蒙卡斯尔⁽¹⁵⁰⁾，他介绍了我所提到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研究。他认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文集以及该领域普遍的指导性主题是“心理之事(things mental)，其实就是心智(minds)，是大脑的显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尽管“这些显现没有被视为是不可还原的，但却是由控制低级事件之间相互作用的原则产生的——我们还无法了解这些原则”。

第二个观点与方法论有关。马克·豪泽⁽¹⁵¹⁾在其综合性研究《交际的进化》(*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¹⁵²一书中清楚地陈述了这一观点。他跟随廷伯根的观点评论说，我们应当采取四种视角来研究“动物世界的交际，包括人类语言”。要了解某种性状(trait)，我们应当：

(1) 找到实施这种性状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这是机械视角。

(2) 找出基因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也能从心理或生理层面进行研究，这是个体发生视角。

(3) 找到这种性状的“适应性后果”，即它对生存和生殖的影响，这是功能视角。

(4) 揭开“物种进化史，从而能从遗传特性的角度评价该性状”，

这是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第三个观点由认知神经科学家格里斯泰尔（C. R. Gallistel）提出，¹⁵³即“学习模组的观点”（modular view of learning），他认为这是“当今神经科学的规范”。根据该观点，大脑包括“专门器官”，这些器官运用其计算特性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极端不利的环境”之外都能轻易地完成。这些专门器官的成长（growth）和发展（有时也称作“学习”）是引起和促成发展的内部导向过程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语言器官也是这样一种人脑的构成部分。

用改编自更早期用法的传统术语来说，语言器官就是语言机能（FL⁽¹⁵⁴⁾）；语言机能初始状态的理论（即对基因的表述）就是普遍语法（UG）；状态本身是内在语言，简称“语言”。当然，初始状态不像其他器官（比如视觉系统）那样在出生时就显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三个观点（我认为它们都很合理，但有一定的限定条件），从第一个开始：“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

这一观点受到广泛的认同，即便还饱受争议，也常常被视为当今时代与众不同且激动人心的贡献。在过去几年中，该观点被提出时总是被称为“惊人的假设”，“认为心智现象纯属自然并由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导致的大胆主张”以及“人类的心智容量实际上就是人类大脑的容量”；或被称为心智哲学中“激进的新观点”，它也许最后会终结笛卡尔的二元论，尽管一些人仍然认为身体与心智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

这幅景象是有误导性的，了解为何如此会颇有益处。这不是新的观点，也不应当有争议，而原因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很清楚了。该观点显然在18世纪就被提出，并出于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在当时是富有争议的，因为冒犯了宗教教义。直至1750年，大卫·休谟把思想随意地描述为“大脑小小的跳动”。¹⁵⁵几年之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进一步阐释了该观点：“感觉或知觉以及思维能力”是“某种有组织的物质系统”的属性；“被称作心智的”属性通常是“人类神经系统”和大脑“有机结构的结果”。这等同于蒙卡斯尔所说的“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普里斯特利当然无法说出这种属性是如何发生的，两百年之后的我们也不会做得更好。

我认为，从现代科学早期显现属性论点兴起的过程中，以及从20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统一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而进行发展的方式中，

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目前有关心智和大脑的争论与有关原子、分子、化学结构和反应以及相关物质的争论何其相似，后面这些争论直到20世纪依然活跃不休，在我认为的很有启示性的方式上也是相似的。

18世纪显现属性论点（近年来又重新活跃）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始于伽利略的现代科学革命基于以下观点：世界是一台庞大的机器，主要由一位工匠构建，它是一个令17、18世纪的人着迷的由钟表和自动装置（automata）构成的复杂形式，和近年来计算机带给思维和想象力的刺激一样。正如艾伦·图灵六年前所证明的那样，更换工件（artifacts）对基本问题带来的后果是有限的。这一被称作“机械论哲学”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经验论和方法论。与事实有关的观点必定与世界的属性有关：世界是一台由相互作用的部件构成的机器。与方法论有关的观点必定与可理解性有关：真正的理解需要一种机械模式，一种工匠才能构建的装置。

这种伽利略式的可理解模式的推论是：当机械构造不起作用时，也无法进行理解。因此，当伽利略逐渐因机械解释显然不够恰当而感到沮丧时，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永远不会彻底地理解“自然界的单一效应”。相比之下，笛卡尔要乐观得多。他认为，他能证明自然界的大部分现象能用机械术语来解释：不仅是人类社会之外的有机和非有机世界，还有更大程度上的人类生理、感觉、直觉和行动。当这些人类功能以思想（thought）为中介，机械解释的局限性就被弥补了。思想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拥有物，它基于一种不受机械解释限制的原则：一种以意志和选择行为为基础的“创造性”原则，而意志和选择行为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高贵的东西”和“真正属于我们的”一切（笛卡尔语）。人类只是“被激发和倾向于”以某些方式行事，而不是“被迫的”（或随意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人类不像机器——也就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对笛卡尔理论信奉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语言的常规使用：人类可以用新奇的、不受拘束的方式表达其思想，这些方式受身体状态的限制却不受其决定，与情景相称却不由其导致，并引发了他人本可以用类似方式表达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特征”。

值得牢记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些结论是正确的。

以这些说法为依据，笛卡尔派科学家开发出各种实验程序用以确定其他一些生物是否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心智，它们是过去半个世纪之内重焕生机的图灵测试的更详尽的版本，然而姑且不论图灵给出的明确警

告，重焕生机的过程中并未产生关键性的逻辑谬误。我先不谈这个有趣的话题。¹⁵⁶依据同样的说法，笛卡尔能够系统地阐释一个相对清晰的心智 - 身体问题：在创建了两种自然原则（机械原则和心智原则）之后，我们可以问一问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也是17世纪科学的主要问题。但该问题不会留存太久。众所周知的是，当牛顿极为沮丧地表明不仅心智而且连自然中的一切（甚至连最简单的地球和行星运动）都不在机械论哲学的范畴之内时，整个景象都坍塌了。现代科学史奠基人之一亚历山大·柯瓦雷⁽¹⁵⁷⁾指出，牛顿证明了“纯粹的物质物理学或机械物理学是不可能存在的”。¹⁵⁸因此，自然界没有达到促使现代科学革命充满活力的可理解性标准。正如柯瓦雷对此事的看法那样，我们必须接受“在科学体系内允许存在由经验论强加给我们的莫名其妙的‘事实’”。

牛顿认为自己对机械主义的反驳是“荒谬之事”，但他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找到其他方式。与他同时代或之后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做不到。之后的发现又产生了更多的“荒谬之事”。没有什么能削弱大卫·休谟这一评判的说服力：通过反驳不证自明的机械论哲学，牛顿“把自然的最终秘密恢复到它们曾经保有的和以后会保有的那种晦涩难懂的状态”。

一个世纪之后，弗里德里希·朗格⁽¹⁵⁹⁾在其著名的唯物主义史⁽¹⁶⁰⁾中指出，牛顿有效地摧毁了可理解性的标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期望以及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家们自此“让自己习惯了力的抽象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习惯了一种游移于处在抽象化和具体理解之间的神秘晦涩地带的概念”。这是唯物主义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从17世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所信奉的各种原理中去除了唯物主义原理的残余思想，并剥夺了它们的重要价值。

方法论和经验论的观点都被瓦解了，再也不会被重新组合起来。

在方法论方面，可理解性的标准被大大地削弱了。激发现代科学革命的标准被抛弃了：目标变成了理论的可理解性，而不是世界的可理解性——这是极大的不同，也许某一天这将成为认知科学的话题。正如卓越的牛顿研究学者伯纳德·科恩⁽¹⁶¹⁾对此事的看法那样，这些改变“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认为目标在于“不是要寻求最终的解释”（这些解释根植于在我们看来不证自明的原则之中），而是要找到我们所能提供的对经验和实验现象的最佳理论描述。通常，遵循常识性的理解并非理性探究的标准。

在事实方面，不再有什么“身体”概念、“物质”概念或“物理的”概念。只有这个拥有不同特征的世界：机械的、电磁的、化学的、光学

的、有机的、心智的——这些类别不是以先验方式来界定或划分的，而是为了方便起见（除了一时方便之外，没人会问起生命是在化学范畴之内还是在生物学范畴之内）。在建设性探究的每个转换领域中，人们可以尝试发展出可理解性的解释理论并将其统一起来，但只是到此为止。

进行探究工作的科学家很明白新的探究局限。18世纪的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¹⁶²⁾评论说：“化学亲和性必须被接纳为第一原则，我们对其无法解释，就像牛顿无法解释引力一样。让我们把对亲和性法则的解释推迟，直至我们像牛顿建立有关引力法则那样建立起一个原理体系。”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化学着手建立起一个丰富的原理体系；“其胜利不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而是从刚刚出现的物理科学中单独获得。”一位有影响力的化学历史学家如此评论说。¹⁶³实际上，并未发现还原论的基础。莱纳斯·鲍林⁽¹⁶⁴⁾最终在65年前取得的胜利就是统一，而不是还原。为了与基础化学统一，物理学必须经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要彻底脱离“物理”的常识性概念：像海森堡⁽¹⁶⁵⁾所说的那样，¹⁶⁶物理学必须从“直观图片”中“解脱”出来，放弃“对世界的设想”。从17世纪科学革命的意义上说，这又大大地跨越了可理解性。

早期的现代科学革命也产生了我们可以得当称呼的“第一次认知革命”，也许这也是认知科学唯一值得带有“革命”名号的阶段。笛卡尔的机械论为后来形成的神经生理学奠定了基础。17、18世纪的思想家们也产生了丰富的、有启示性的有关感知、语言和思维的想法，这些想法自此后被重新发现，有时也仅仅是部分地被重新发现。心理学缺乏与身体相关的概念，当时只能并且现在也只能跟随化学的路径。除了约翰·洛克⁽¹⁶⁷⁾的神学框架，我们对他谨慎的推断的确别无选择，这在后来被称为“洛克建议”：上帝也许会选择“为物质再添加一种思维机制”；同样，上帝“把我们无法设想运动所能产生的效果附加给了运动”——特别是相隔一定距离之内的引力属性，这是隐秘属性的再生。许多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都这样认为（而牛顿只是表示部分赞同）。

在这种语境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显现属性观点，其形式各异：

18世纪时的观点是，“感觉或知觉以及思维能力”是“某种有组织的物质系统”的属性；“被称作心智的”属性通常是大脑和“人类神经系统”的“有机结构的结果”。

一个世纪之后，达尔文反问道，“作为大脑分泌物的思维”为什么应当被认为“比重力这一物质属性更加精彩”？¹⁶⁸

今天，对大脑的研究基于这一论点：“心理之事，其实就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

显现属性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不变，也不应存有争议：在后牛顿世界（post-Newtonian world）中，很难想出一种变通方法。

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只能试着为世界的不同特征构建“原理体系”（bodies of doctrine），并试图统一它们，他们也意识到世界不像现代科学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被我们所理解，目标在于统一，而不是还原。科学史清楚地表明，我们永远无法猜到前方有何惊喜。

要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笛卡尔的二元论曾经是合理的科学观点，但三个世纪之前就消失了。此后就没有争论过任何心智 - 身体问题。这一观点的消失并非因为笛卡尔的心智观点有缺陷，而是因为“身体”概念随着牛顿对机械论哲学的摧毁也被瓦解了。人们如今嘲笑有关心智推断的“笛卡尔错误”，即他那“在机械中的幽灵”⁽¹⁶⁹⁾，这很正常。但他们却误解了所发生的一切：牛顿赶走了机器；幽灵安然无恙。两位当代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和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最近写了《物质神话》（*The Matter Myth*）一书，他们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把去除机器归因于新的量子分析。这的确又是一次抨击，但“物质神话”在250年前就被驳倒了，当时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也很清楚这一事实，自那之后，这也成为标准科学史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更加年轻的20世纪认知科学，我认为需要密切关注的是，1930年代毫无改变的化学和迅速改进的物理学被统一了起来，但之前发生了什么？统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这样做也很有益处。在统一之后，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化学和生物学的统一。这是发生真正还原的事例，但只是发生在创立伊始的物理化学领域之内；同一拨人中的一些人也参与了该过程，特别是鲍林。这种真正的还原有时让人产生了乐观的期望：世界的心智特征将被还原为像现代脑科学那样的学科。也许会这样，也许不会。无论怎样，科学史都没有为其提供任何信心充足的理由。真正的还原在科学史上不是如此常见，不必把它自动假设为未来所发生之事的模型。

更有启发性的是统一之前发生的事情。在统一之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通常认为，化学只是一种计算方法，是一种组织（有时是预测）化学反应结果的方式。在20世纪早些时候，人们也是如此看待分子的。庞

加莱⁽¹⁷⁰⁾嘲笑气体分子理论不仅是一种计算模式的想法；他说，人们误入歧途是因为太熟悉桌球游戏。认为化学与真实事物无关的原因在于，没人知道如何把化学还原为物理学。1929年，伯特兰·罗素——他对科学所知甚多——指出，化学定律“目前无法被还原为物理定律”。¹⁷¹这是对的，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误导性。“目前”一词最终被放错了位置。之后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从根本上）修改物理学属性和定律的概念才能发生还原。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有关化学真实性的争论基于根本性的误解。从我们拥有的这些概念的唯一意义上来讲，化学是“真实的”，并且“关乎世界”：它是人类智力所能构建的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最佳构想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

几年前关于化学的争论，从很多方面与心智哲学和如今的认知科学相呼应，还有理论化学（这当然是硬科学），并与核心物理合并在一起难辨彼此。它不像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那样处于科学理解的边缘，后者一直尝试研究更复杂、被人们了解不多的系统。这些有关化学的新近争论及其无法预料的结果对脑科学和认知科学都会富有启示性。它们表明，对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主要不受生物科学中可能发现的任何事物的影响）的心智计算机模式进行思考是错误的，或者对柏拉图式或其他非生物学的语言构想（对其不利的是，也隔离了重要证据）进行思考是错误的，或者如此认为也是错误的：心智和物理的关系不是可还原性而是更缺乏说服力的概念随附性（supervenience）——任何心理事件或状态的变化都蕴含着一种“物理变化”，然而不会逆向成立，除此之外没有更具体的说法了。有关被统一之前的化学的争论可以用这些话重新表述：那些否认化学真实性的人也许认为，化学属性随附在物理属性上，却无法还原为物理属性。这也是一种错误，因为尚未发现正确的物理属性。而真正的物理属性被发现时，再谈随附性又未免多余，于是我们就转向了统一。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在研究世界的心智特征中是合情合理的。

总体上讲，我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接受后牛顿时期科学家的建议以及牛顿对此事的建议，并争取使用我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术语去构建“原理体系”，不受世界必须如何（我们知道并非以这种方式）这种常识性规定的束缚，也不受这一事实的困扰：就一般科学理解而言，我们也许不得不“推迟描述原则”，最终也许不适合统一任务，300年来的情况普遍都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由于这些原因，有关这些话题的很多讨

论都被误导了，也许被严重误导了。

在统一之前的化学和目前的认知科学之间还有其他值得铭记的相似之处。“化学的胜利”为最终重建物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方针，它们提供了核心物理必须满足的条件。同样，对蜜蜂交际的发现也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在有关细胞的一些未来描述中得到满足。在两种情况中，都有一条双向道路：物理学的发现限制了可能的化学模式，就像基础生物学的发现要限制昆虫行为的模式一样。

在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中也有我们熟知的推论，例如被大卫·马尔⁽¹⁷²⁾所强调的计算、算法和实现（implementation）理论的问题。或者还有埃里克·坎德尔⁽¹⁷³⁾对海蜗牛的学习进行的研究，他试图“把实验心理学家从抽象层面上提出的想法转化为神经元术语”，从而显示出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如何“开始汇合产生学习研究的新视角”。¹⁷⁴这一切都很合理，尽管科学的具体进程会让我们警惕这种可能性：也许无法发生汇合，因为少了什么——只有我们发现少在哪里才能知晓少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讨论起初提到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心理之事，其实就是心智，是大脑的显现属性”这一指导性原则。这看似正确，却近乎老生常谈，种种原因已被达尔文和一个世纪之前的知名科学家所知晓，并从牛顿对“荒谬之事”（然而却是真实之事）的发现中得出。

让我们转向第二个观点：方法论问题。引用马克·豪泽在《交际的进化》中的说法就是：为了描述某种性状，我们必须采取廷伯根的动物行为学方法及其四种视角，也就是（1）机械视角，（2）个体发生视角，（3）适应后果视角，（4）进化史视角。

和其他人一样，对于豪泽而言，人类语言就是“圣杯”⁽¹⁷⁵⁾：如果我们从这四个视角研究语言，目标就是要表明，语言是如何被理解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被理解。对于更简单的系统，情况应该也是这样。举一个动物世界的独特例子——蜜蜂的“舞蹈语言”。根据标准（尽管有争议）的描述，蜜蜂的舞蹈语言似乎与人类语言有些表面相似性：具有无限的范围和“位移指涉”（displaced reference）——这是一种交流有关感知领域之外的事物信息的能力。蜜蜂的大脑和草籽一样大小，有不到100万个神经元；有一些相关物种的交流模式是不同的；对侵入性实验（invasive experiment）并无任何限制。但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尤其是生理学和进化问题。

豪泽对这个话题进行综述时，没有讨论机械论，一些启示性说法似乎也十分奇特。例如，数学家或生物学家芭芭拉·希普曼⁽¹⁷⁶⁾的理论是，蜜蜂的舞蹈基于其在三维空间中绘制六维拓扑空间（topological space）的能力，或许凭借了某种“夸克探测器”。¹⁷⁷豪泽只说了几句主要解释进化的话。他所综述的其他情况也是如此。例如鸣禽，它们是“发展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尽管还没有关于选择的“令人信服脚本”——甚至连不令人信服的脚本也没有。

那么，我们应当不会感到惊讶的是，在无比困难的人类语言中，生理机械结构和动植物种类史问题依然如此神秘。

更仔细地观察豪泽的研究，就会得出某种启示，豪泽和其他人设定的目标是多么遥远——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我们应该现实地看待自己相对于该目标所处的位置。首先，书的题目有误导性：该书并不是关于只被短暂提起的交际进化话题。相反，它是一个多物种的交际对比研究。《自然》杂志封套所引用的德里克·毕克顿⁽¹⁷⁸⁾的综述评论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还有该书推测“未来方向”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题目实际上是“交际比较”；对进化未做任何推测，进化是另一回事。更普遍的是，豪泽和其他人所描述的自然选择记录最终却成为关于有机体如何完好地适应其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的叙述。事实通常引人注目且富有启示性，却无法构成进化史；相反，由事实提出的问题，要靠学进化论的学者去解决。

其次，豪泽指出，这种交际比较的综合研究“与正式的语言研究无关”（我认为他言过其词）。这不是小问题，他所说的“正式的语言研究”包括动物行为学方法前两个视角的心理学方面：（1）语言的机械结构；（2）机械结构的个体发育。与心理方面无关的部分也与生理方面无关，因为任何对生理方面产生影响的部分会给心理方面施加条件。因此，廷伯根所推荐的方法的前两个视角在人类语言这里实际上被抛弃了。出于相似的原因，对比研究可能在同样意义上与有关蜜蜂交流的当代探究是“无关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描写语言学”的一个丰富、详细的变体。这似乎是个合理的结论：我们在描写层面上已对具体物种所知甚多，如昆虫、鸟、猴子和其他物种。但从一般性描述中所获甚少。

然而，与人类语言“无关”则更加意味深长。原因在于——豪泽也如此评论说——语言没有被恰当地视为一个交际系统。语言是表达思维的系统，这就有所不同了。它当然能用来交际，和人们可以做任何事一样，例如走路姿势、穿衣风格或发型。但就“交际”一词的使用意义而

言，交际不是语言的功能，对理解语言的功能和性质甚至毫无特别价值。豪泽引用了萨摩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妙语：“如果只有在有可说之事时才说话……人类很快会失去语言的使用。”豪泽的观点看似相当准确，且不论语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自己的这一事实：对成人来说是“内部语言”（inner speech），对儿童来说是自言自语。况且，无论有关可能或不可能构成人类语言的选择过程的猜测有什么长处，这些猜测都不会主要依赖于这一想法：语言系统是某种交际模式的自然结果。人们可以想出同样值得赞赏（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说法，涉及由一系列促进思维设计和阐释的小突变（mutations）所带来的优势；也许甚至不那么想入非非，因为毫无必要去假设在这一组中平行地发生突变——我并非在此提出这种或那种说法。一旦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以及在所知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对可能发生了什么的极为可信的说法都会运气不佳，这类记载十分丰富。

在同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豪泽的“交际信息分类”（交配、生存、辨别呼叫者）中甚至没有出现人类语言。语言肯定能用于警告性呼叫、辨别说话人等，但用这些术语去研究语言的功能纯属误导。

相关的困难在于，豪泽把功能视角局限于“适应性解决方法”（adaptive solutions）。这大大限制了进化研究，进化研究是达尔文极力强调的要点，目前已获得了更充分的理解。实际上，豪泽接连引述了没有适应性功能的性状实例，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实例只出现在人为的场景中而毫无自然界的对应情况。

这些事情很少被讨论，我引述的也是只言片语。但这些话表明我们必须思考此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假如我们要认真考虑动物行为学视角的话——当然我们理应如此，因此我也坚信并坚持探讨了40年。¹⁷⁹豪泽对进一步探究人类语言进化的推测使这种神秘性更加突出。他提到两个熟悉的基本问题：有必要解释（1）词库的大爆发和（2）生成无限个有意义话语的递归系统。对于后者，还没有提出什么推测。对于（1），豪泽说，在动物王国尚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包括他自己专长的方面（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他评论说，词库爆发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内在的模仿能力，他发觉这种能力与动物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他只能找到唯一可能的例外：受过训练的猩猩。豪泽的结论是：“必须具有人类环境的某些特征才能让猩猩有模仿的能力。”若果真如此，这似乎暗示出这种能力并非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尽管豪泽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在研究进化时受限于适应性选择。至于人类模仿能力的起源，

他指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许永远无法发现它何时（或因而如何）出现在人类进化中。

此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豪泽严重低估了人类的用词语指涉在其基本结构属性和功能属性上是如何不同于其他物种所发出的罕见“指涉性信号”（referential signals）的情况，这些物种也包括猴子（也许是一些猩猩，尽管他说证据还不确定）。这远非位移指涉和不受场景约束（situation-free）的指涉的问题。他也过度夸大了所显示的情况。因此，豪泽引述了达尔文的一些谨慎猜测并写道：有关“人类语言进化”，“我们因而得出两个重要的启示”——“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和非人类 - 动物的交际形式最重要的环节在于能否表达情感状态”。同样，史蒂芬·平克⁽¹⁸⁰⁾“表明达尔文对语言进化的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因为自然选择是唯一能解释诸如语言这种性状的复杂设计特征的机理”（强调是我添加的）。假如有什么东西能表明人类语言的进化，或我们从有关这个话题的推测中能“获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非比寻常，更不用说还有更多可引述的不同凡响的主张。当然，并未发生如此惊人的事情。谨慎的推测和自信的宣告不能说明什么，我们最多知道的是，也许可以走一条实用之路。也许如此。

撇开这点不谈，除了给予性阅读⁽¹⁸¹⁾之外，那些假定已被证明的结论意义不大。毫无争议的是，自然选择在由自然法则（历史 / 生态偶然性）确定的选择空间之内运作，就这些因素在所发生的一切中起到的作用发出预先宣称，这纯属教条主义。无论我们正在考虑的是自然界中的斐波那契数列⁽¹⁸²⁾、人类语言或生物世界的其他东西，情况都是如此。被“表明”或“令人信服地主张”的是，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自然选择被貌似合理地视为进化的主要因素，而且无人（在豪泽认为的圈子中）对此表示质疑。有关他何以确定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坚持认为的“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人类语言的设计特征”，他只字未提（在要求赋予这种主张一定意义的给予性阅读原则下，这显然是不对的）。在普遍认同的自然选择假设和其他进化机理之外，人们还试图找出了发生了什么，无论是研究眼睛、长颈鹿的脖子、中耳的骨骼、哺乳动物的视觉系统、人类语言或者其他部分。自信的宣称不会和证明或有说服力的论证混为一谈。

尽管我设想豪泽会否认这一点，但我认为，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实际结论与其哈佛同事、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¹⁸³⁾的极端怀疑论并无多大不同。勒沃汀强有力地总结说，认知进化超出了当代科学的范

所宣称的目标遥不可及，导致了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看法：例如，为了语言交际的目的，“人类的大脑、声道和语言似乎共同进化过”。豪泽借用了神经科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的“语言和大脑共同进化”概念。¹⁸⁵迪肯认为，当研究语言及其个体发生（即动物行为学方法的前两个视角）的学者采用了神经科学的标准方法时，他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试图发现受基因决定的心智 - 大脑的成分及其在经验和成熟中所经历的状态改变。他们忽略了一个更有希望的选择：“对语言学习的额外支持”，除了经验数据之外，“既不在于儿童的大脑也不在于父母或老师的大脑，而在于大脑之外的语言本身”。语言和具体语言是人体之外的存在，具有极强的“能力.....根据人类宿主而进化和适应”。这些产物不仅在人体之外，显然也在生物世界之外。

这些奇怪的存在是什么？它们来自何处？除了知道它们已发展到纳入了被错误地归因于大脑的语言属性之外，它们是什么还未被解释清楚。它们的起源依然神秘莫测，尽管“世界上的语言”一旦以某种方式出现，就通过自然选择完成“一直在人脑之外进行的快速适应”而“自发地进化”。这些语言因而“越来越好地适应于人类”，就好像人们熟悉的共同进化周期中的寄生物与宿主，或者是猎物和捕食者。迪肯指出，也许病毒提供了最好的类比。我们还得出了有关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的解释：它们“自发、独立地出现在每一种正在进化的语言中.....它们是语言进化的聚合性特征”，就像鲨鱼和海豚的背鳍一样。通过快速的自然选择而自发地进化并获得语言普遍属性之后，这些人体之外的产物中有一个附着在我新英格兰的孙女那里，还有一个附着在待在尼加拉瓜时的她那里——实际上，她感染了这些神秘病毒中的两个。通过研究经验与大脑内在结构的相互影响，在这些或其他一切实例中寻求对结果的解释，这是错误的。相反，真正的寄生物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附着在特定共同体的寄主那里（借用迪肯描述自然科学普通假设的话，就是靠“魔术师的戏法”），从而产生特定语言的知识。

当然，迪肯也承认，幼儿“本来就愿意学习人类语言”，并在“选择构成语言基础的规则时带有强烈的偏好”。在甚至无法学会基础算术的时候，他们几年之内就习得了“相当复杂的规则系统和丰富的词汇”。因此，“人类大脑具有某种特殊的東西，使我们即使在最低限度之内不付出巨大努力、不接受富有远见的训练，也能轻松地做到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按照我们对待自然的其他方面（例如视觉系统）那样对待这

些倾向和大脑的特殊结构，这是错误的。没有人会提出，昆虫和哺乳动物的视觉器官通过迅速的自然选择而自发地进化，现在附着于寄主身上，从而产生了蜜蜂和猴子的视觉能力；或者，蜜蜂的摇摆舞或黑长尾猴的叫声是生物体之外共同进化的寄生物，为宿主提供了能力。但是在人类语言这一特别实例中，我们不会采取自然科学的常规过程而试图确定“倾向”、“特别结构”及其在大脑机制中实现的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语言共同进化的生物体之外的存在会从现场消失）。

既然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实例中，生物体之外的“病毒”已进化到以正确的方式附着于寄主，我们就不必认为孩子顶多需要“一般性学习理论”。一旦我们克服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犯下的惊人失误，就会发现的确如此。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没有认识到的是，世界上的语言——实际上是目前还未被说出的、可能存在的语言——也许在大脑之外自发地进化了，通过自然选择逐渐“体现出儿童心智的倾向”。

我认为，迪肯的提议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认为儿童只不过需要一种“一般性学习理论”就能获得语言和其他认知状态的看法，只能通过英勇的举动来证实。这是起初介绍的第三个框架性观点的基本要点，我们直接回到了这里。同样的结论被异常丰富的先天性假设和模块化假设以及依旧独特的先天结构假设所证实。前者被嵌入到经常被错误地呈现为非结构化的一般性学习理论的实践尝试中，而后者成为以直接带有极端模块化（extreme modularity）的进化论猜想脚本为基础的方法。¹⁸⁶

迪肯认为，唯一的真正问题是“象征指涉”（symbolic reference）。如果我们用进化论术语解释这一问题，其他问题就会以某种方式一目了然。我们不讨论其他问题如何一目了然。但这也许无关紧要，因为“象征指涉”也完全是个谜，部分原因是我们无法注意到它在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属性。

我一直在引用，因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种无法识别的“语言学”（包括我的观点）的描述不会促进理解力。这种描述带有模糊的暗指，甚至很难猜到误解的缘由可能是什么（有时也很容易，例如，对专业意义上的术语的误解，比如“语言能力”[competence]）。不管其意义可能会是什么，结论似乎都是，研究大脑从而发现人类语言的本质是一个错误；相反，语言研究必须涉及与人类共同进化并以某种方式与其“搭连”的生物体之外的存在。知名的进化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对这些看法大加赞赏，但我不明白为何如此。认真审视一下这些看法，它们在禁止千百年来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理性探究程序的同时，似乎把标准的

科学问题重塑为十足的谜团，将其置于被理解的希望之外。

回到认为我们应采取动物行为学方法的方法论观点上。原则上这是有道理的，但所采取的方式引出很多问题。据我看来，重新呼吁采取40年前“行为科学”评论文献中提倡的这种方法，是让我们停留在过去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研究由基因决定的大脑要素（也许不止大脑），它作用于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及其所达到的状态（不同的语言），我们还可以研究状态改变发生时所依赖的过程（语言习得）。我们可以尝试发现心理和生理的机制与原则，将其合并起来形成标准的科学问题。这些探究组成了动物行为学方法的前两个视角：机械和个体发生研究。转向第三个视角，即功能视角，如果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语言，可以研究达到特定状态的人如何使用语言，尽管这过于局限于对生存和生殖所产生的影响。第四个视角，即动植物进化史视角，充其量似乎是个遥远的前景，似乎并未受到交际对比研究的推动，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

让我们最后转向我所提到的第三个观点，引用格里斯泰尔的话：一个实质性观点，在所有动物中，学习是以专门的机制为基础，即以具体方式“学习的本能”；或廷伯根所说的“天生的学习能力”。¹⁸⁷这些“学习机制”可以被视为“大脑内的器官，[也]是神经回路，其结构促使它们履行着某种计算”，因为除了“极其不利的环境”之外它们或多或少条件反射式地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语言习得是本能的，并基于专门的“语言器官”。这种“模块化的学习观点”被格里斯泰尔视为“现今神经科学的规范”。他认为，这个框架包括一切被透彻理解的东西，包括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因为它是真实的现象。“想象除了所有这些有问题特定性的学习机制之外还存在一种通用目的学习机制……就像试图想象一个通用目的器官的结构，这个器官处理着肝、肾、心脏和肺等适应性特化器官不会处理的问题”，或者一个“解决感觉问题的通用目的感觉器官”，用于处理眼睛、耳朵和其他特化感觉器官无法应对的情况。在生物学里，人们对此了解不多：“机制适应特化在生物学的每个分析层面以及每种功能中无所不在并且显而易见，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生物学机制的普遍原理而给予关注。”于是，“奇怪而真实的是，过去和现代大部分对学习进行理论化的过程”完全背离了生物体研究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格里斯泰尔认为这是个错误。

据我所知，格里斯泰尔推荐的方法很合理。在语言这种特殊情况中，我认为这种方法将被所有实质性探究所采纳，至少被默然采纳，甚至在遭到强烈否认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得出这一结论：人类生物禀赋

的一部分是专门的“语言器官”，即语言机能（FL）。其初始状态是表达基因，相当于人类视觉系统的初期阶段，它似乎接近于人类共同的拥有物。因此，某个儿童在合适的条件下会习得任何语言，甚至在严重匮乏之下和在“不利的环境”中。在经验的触发和塑造效果下以及内部确定的成熟过程中，初始状态会发生改变，产生似乎在几个阶段得以稳固的后期状态，并最终在青春期稳定下来。我们可以把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视为把经验映射到语言所达到的状态的设置，即一种“语言习得装置”（LAD^[188]）。这种语言习得装置的存在有时富有争议性，不过这只是（对等的）假设：有一个解释儿童语言发展的专用“语言模块”，与解释其宠物小猫的模块有所不同（或是黑猩猩，或其他动物），即使经验大致相同。连最极端的“激进行为主义”推测都预设（至少心照不宣地），儿童能以某种方式把语言材料从周围其他混淆中区分出来，这样就假定了语言机能的存在（相当于语言习得机制）；¹⁸⁹随着对语言习得的讨论越来越具有实质性，它转向了有关语言器官的假设，这些假设更加丰富并具有领域特定性，也不会跳出我的知识范围。这样的讨论包括习得具有丰富而复杂语义结构的词项，甚至习得最简单的词项。在有限的证据里都可以找到有关这些属性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在各种语言中会大体一样。据我所知，也的确如此。

尽管再一次没有把对语言使用的探究局限于适应性后果，我们在这里还是转向动物行为学方法前三个视角内的实质性问题：生存和生殖。我们可以探究语言表达的根本属性及其表达的思想，以及有时是交际有时是对世界进行思考或谈话的用法。在这一点上，比较动物研究肯定值得关注。有关不同物种的“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人们已经做过重要的研究。几年前，格里斯泰尔介绍了一篇有关该话题的评论文章的概略，他认为表征在动物行为和认知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处的“表征”被理解为同型性（isomorphism），是一种处于心智 - 大脑过程和“这些过程使动物行为适应的环境的某个方面”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例如，蚂蚁通过气味辨别其同类的尸体。⁽¹⁹⁰⁾ ¹⁹¹这些结构是否或如何与人类的心智世界相关，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就语言来说，它们与所谓的“语音”（phonetic）或“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相关。

如上所述，从我认为正确的生物语言学观点（在实质性研究中也被默认）来看，我们可以把某种具体语言L视为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语言L是一个生成无限表达的递归程序。每个表达都可以被视为心智 - 大脑的其他系统的信息集合。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假设认为，信息分为两类，语音和语义信息；信息分别被感觉运动系统和概念 - 意向

系统所使用——为了给人们了解不多的事物命名，后者可以称作“思维系统”（systems of thought）。这也许是严重的过度简化，但还是让我们遵循常规。那么，每个表达就是包括两套信息的内在客体：语音和语义。这些信息集合被称为“表征”，即语音和语义表征，但在表征和环境的各个方面之间没有什么同型性。从任何实用意义上讲，内在符号和所表征的事物之间不存在配对。

这在发音方面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语音表征的一个要素——例如我的语言中有一个内在要素/ba/——指出世界上的一个事物，即发音是BA的东西。这样说不算错，但不会是有益的举动，人们也从来不会这样做。相反，声学和发音语音学试图了解感觉运动系统如何使用语言表征中的信息发出各种声音并解读它们，这绝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人们可以把语音表征看作一组针对感觉运动系统的指令，但内在表征的一个特定要素与外部世界的某类事件并没有配对，也可能是某种基于分子运动的结构。在我看来，同样的结论用在意义方面也是合适的。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了解到，连最简单的词都包括各种不同的信息：有关物质构成、设计和预期用途、起源、格式塔⁽¹⁹²⁾和因果属性以及更多的信息。在17、18世纪的认知革命中，这些话题被深入地探究过，尽管很多研究——甚至包括已被充分研究的从霍布斯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除了历史学者之外依然鲜为人知。这些结论还适用于简单的可数名词和集体名词——“河流”（river）、“房子”（house）、“树”（tree）、“水”（water），还有人名和地名，即“最纯粹的指涉词”（代词、空语类），等等；当我们转向带有关系结构的要素（动词、时态和体……）时，这些属性就更加错综复杂，当然等我们继续接触更复杂的表达时情况愈加如此。至于这些复杂的知识系统多早就在个体发生（ontogenesis）中产生作用，便不得而知了。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和立体视觉能力或具体的运动规划种类一样，基本要素是与生俱来的生物禀赋的一部分，用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的术语来说，它们在语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特殊性。

在动物世界的其他部分似乎没有类似的情况，即使在最简单的层面上。毫无疑问，词库的大规模爆发和符号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是人类语言的关键性成分。但产生模仿或符号—事物对应并不能带我们走得很远，甚至连这几步都有可能误入歧途。当我们转向表征的组织 and 生成时，类推在最表层之外很快就失败了。

语言的这些属性一经审视便很快明了，这并不是说它们经过深入研

究或充分了解，并未如此。我们跨出一步会发现令人迷惑的其他属性。表达成分，用标准术语来说就是它们的特征（features），必须被获得这些表达的系统所解读；处于与感觉运动和思维系统接口处的表征包括了能被解读的特征。因此，人们也许会期待这些进入运算的特征应当能被解读，就像设计完备的人工符号系统一样：元数学的形式系统、计算机语言等。但自然语言并非如此，在语音方面，也许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最关键的一种情况与无法获得语义解释的屈折音变特征有关：结构格（主格、宾格），或类似单复数一致的特征（在名词中是可解读的，但在动词或形容词中不能）。这些事实在表层形式中不明显，却被合理地证实了。过去20年间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些带有不可被解读特征的系统在语言中十分相似，尽管其外在表现在相当系统的方面有所不同；语言所具有的大量类型多样性被简化为这种相当狭窄的语言次成分。那么，有可能的是，语言器官的递归运算系统与可能词项的基本结构都是固定且确定的，这也是一种基因表达。语言机能的具体状态，即特定的内部语言，取决于对高度结构化的可能词项的选择，以及对局限于不可解读的屈折音变特征及其表现的参数的确定。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糟糕的初步近似（first approximation），或许更甚之。

同样的不可解读特征似乎可以牵涉到自然语言无所不在的移位属性。该术语所指的事实是：通常在某个位置被说出的短语，被解读为好像在其他某个位置还有相似的表达。例如，被动结构的移位主语被解读为好像处于宾语位置，与指派给它语义角色的动词有局部关系。位移性的语义属性很有趣。思维的外部系统（对语言机能而言是外部，而对心智 - 大脑而言是内部）可能要求语言机能必须与这些属性一起生成将被正确解读的表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不可解读的特征也许是实现移位属性的机制，甚至可能是满足由外部强加给语言机能的条件的最佳机制。如果是这样，那么移位属性和不可解读的特征都不是语言机能的“不完美之处”和“设计缺陷”（当然，此处用的是“设计”一词的比喻义）。这些思考以及其他思考都提出了更多有关最佳设计的普遍问题：语言机能可以是一种连接它被嵌入的心智 - 大脑系统所强加的条件和感觉运动以及思维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法吗？

只有在近几年人们才严肃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在相当好地理解语言机能的固定原理，产生我们明知必然十分表层的——尽管表面上，鉴于语言习得的实证条件——丰富的类型多样性的受限选项之前，人们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尽管这种理解肯定显得十分片面并且初级，但在过去

20年间也迅速地提升了。现在，人们似乎可以严肃地提出最佳设计的问题，有时会得到答案。此外，认为语言也许是在重要方面连接条件的最佳解决方法的这种想法，似乎比几年前看上去合理得多。既然如此，就产生了有关心智理论、大脑设计和自然法则在复杂器官进化中所起的作用的有趣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化论基础阶段，以及最早由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和艾伦·图灵进行的、直到近年来还处在边缘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可以想见的是，更早些时候所讨论的、全面的动物行为学方法也许会通过这些术语变得充实，尽管这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更加遥远的还有推动了经典心智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这是与情景切合的行动和由情景引起的行动之间的区别，也是被“迫使”以某些方式做事和只是被“激发和倾向于”这么做之间的区别。一般来说，就是有关“动物身体上的肢体如何受意志的控制而行动”的问题，这是牛顿在其综述中所说的话，综述回顾了尚未被解决的谜团，包括肢体相互作用的原因、电引力和电斥力以及按照科学革命的标准依然难以理解的基本问题。

在一些领域，对心智 - 大脑成分的探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对于新科技的未来，对于大量有待对世界的心智层面及其显现进行探索的振奋人心的研究充满热情，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我们思维的某个角落，保留着早期现代科学的伟大人物（伽利略、牛顿、休谟和其他人）有关“依然会存在的自然终极秘密”的“模糊性”的评判，这并非是个糟糕的想法，也许原因就在于富有好奇心的、甚至也能独自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类的生物禀赋，甚至人能独自思考这些问题。

（本文最早出现在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主编的《论自然与语言》[*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61—91页。）

(1) 《言语行为》是“世纪心理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

2 对于近年来动物行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将其应用于人类复杂行为的做法，斯金纳满怀信心，但似乎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在许多最近发表的作品中，坚定的行为主义者普遍对这些成就的范围持怀疑论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见埃斯蒂斯（W. Estes）等人在 *Modern Learning The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上发表的文章；B. F. Bugelski, *Psychology of Learning*, New York: Holt, 1956; S. Koch,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58, Lincoln, 1956; W. S. Verplanck, “Learned and Innate Behavior,” *Psychology Review* 52

(1955): 139。哈洛 (H. Harlow) 的观点也许是最强硬的, 在《老鼠、猴子、人和动机》(“Mice, Monkeys, Men and Motives,” *Psychology Review* 60 [1953]: 26-32) 一文中, 他断言: “我们可以找到很有说服力的实例来证明这一看法: 在过去15年间所研究的心理学问题, 其重要性早已大打折扣, 就好比一条负加速曲线正在接近另一条完全无关紧要的渐近线一样。”廷伯根 (N. Tinbergen, 英籍荷兰行为学家, 于197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是用另一种方法研究动物行为 (即比较动物行为学 [comparative ethology]) 的代表性人物, 他对有关“功能分析”的讨论总结评论道: “现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 行为致因比过去的概括中所假设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有一些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作用于复杂的神经中枢系统。再者, 我们掌握的事实显然是支离破碎的。”参见 *The Study of Instin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74。

- 3 在《有机体的行为》(*Behavior of Organisms*,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38) 一书中, 斯金纳评论说: “尽管受条件限制的操作性行为是反应与某个强化相互关联的结果, 但它与在反应发生之前的辨别性刺激相互关联几乎是普遍规则。”(第178—179页) 甚至连已发出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由某种“原动力”(originating force) 产生的(第51页)。在操作性行为的情况下, 这种“原动力”不受实验控制。对诱发性刺激 (eliciting stimuli)、辨别性刺激和“原动力”的区分从未被清楚地解释过, 在个体内在事件被看作辨别性刺激的时候, 就变得更加模糊(见下一条注释)。
- 4 在一项著名实验中, 黑猩猩被教会完成复杂任务并获得报偿 (token), 报偿因为与食物相关而得到强化成为二级强化物。根据该范例, 金钱、赞许、名望等实际上对人类行为有着激励作用, 但这一看法并未得以证明, 也不一定是合理的。行为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心理学家对此表示怀疑 (H. F. Harlow, M. K. Harlow, and D. R. Meyer,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0 (1950): 228-234, 以及后来由哈洛发起的调查研究。哈洛一直认为, 用基于生理学的驱力和自我平衡的需求状态, 来解释灵长类动物动机的持久性和学习的快速性, 这是不够的。他在很多文章中指出, 对灵长类动物来说, 比起饥饿或类似情况, 好奇心、玩乐、探究和操作通常是更有效的驱力, 它们并未显示出已获得任何内驱力的特点。赫布 (D. O. Hebb) 也提供了行为证据和神经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 对高等动物而言, 工作、风险、猜谜、智力活动、适度恐惧以及挫败等都有着积极的吸引力 (D. O. Hebb, “Drives and the CNS,” *Psychological Review* 62 [1955]: 243-254)。他得出结论说: “我们无须找到可能性不大的迂回方法去解释人们为何为了金钱而工作, 孩子们为何无忧无虑地学习, 人们为何讨厌无所事事。”)。正如人类行为的大多数方面那样, 二级强化物的证据十分零碎、矛盾、复杂, 几乎任何观点都能得到某些支持。
- 5 上面所引用的斯金纳关于其基本结论具有普遍性的话, 要从他设定的实验限制角度来理解。从深层含义来看, 假如语言中的基本程序都能被充分理解且不受物种的限制为真的话, 只有人类拥有语言就太离奇了。除了一些零散的观察 (参见斯金纳的文章 “A Case History in Scientific Method”, *American Psychology* 11 [1956]: 221-233), 斯金纳显然把其主张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 在特殊剥夺条件下和在不同的强化时间安排中, 老鼠按压杠杆和鸽子啄食都会导致性

质相似的结果。人们很快会质疑，斯金纳的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这些事实，而
这些事实或多或少只是人为的现象，根据“平稳的动态特性曲线”（smooth
dynamic curves）可以追溯到实验设计和“刺激”及“反应”的定义（参见下文）。
从研究按压杠杆等这些简单的反应就“外推”（extrapolate）到复杂行为，这种尝
试本身就有风险，这些风险应当显而易见，也常常受到评论（例如哈洛，参见此
前注释中所引用的他的原话）。即使是最简单的结果，其普遍性也会受到严厉的
质疑。有关这点见M. E. Bitterman, J. Wodinsky, and D. K. Candland, “Some
Comparative Psych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71 (1958):
94-110。其作者表明，用老鼠和鱼来解决有比较性的初级问题在性质上有着重要
的差别。

6 斯克列文（M. Scriven）在“A Study of Radical Behaviorism”（in H. Fiegl and M.
Scriven, ed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Foundations of
Science & the Concepts of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一文中，结合斯金纳所思考的一个不同方面进行了类
推论证。还可参见弗弗朗克（W. S. Verplanck）在《现代学习理论》（*Modern
Learning Theory*）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从整体上讨论了给出恰当的“刺激”和“反
应”定义的困难所在。弗弗朗克总结说，按斯金纳对“刺激”一词的理解来看，若没
有所导致的行为，刺激在客观上是无法辨识的，也是无法操控的。他总结得相当
正确。他还清楚地讨论了斯金纳体系中的其他诸多方面，并评论说很多所谓的“行
为法则”是无法被验证的，还有一些则范围有限，而斯金纳的“规律性关
系”（lawful relation）概念的特征十分随意且令人费解，同时他还指出斯金纳所
积累的实验数据的重要性。

7 在《有机体的行为》中，斯金纳显然愿意接受这一后果。他坚持认为（第41—42
页），只有确定了刺激和反应的定义属性，然后用实验证明其相互关联性，而其
中的动态变化也被证明是有规律的，那么才能正确地去描写在常用词汇中随意描
写的表达。因此，在描述孩子躲避一只狗的时候，“借助‘狗’（dogness，指狗的抽
象含义或狗的各种属性。——译者注）或‘躲藏’（hidingness，指躲藏这个动作的
名词形式，也指其名词化属性。——译者注）的基本属性，并假设它们本来就为
人所知，这样抬高常用词汇的地位还是不够的”。但我们会清楚地看出，斯金纳在
本文所评论的书巾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8) 此处是指椅子的抽象含义或椅子的各种属性。

9 这一点从第253页开始以及书中其他地方也被反复提起过。斯金纳在此展示了他如何
引出“pencil”（铅笔）这个反应，把这当作例子给我们示范如何能出色地使用从这
本书中得出的概念。他建议，最有效的办法是给受试者说“Please say
pencil”（“请说‘铅笔’”）（大概用“令人厌恶的刺激”[比如，拿枪顶住他的脑袋]
就会大大提高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也要“确定手边没有其他铅笔或书写工具，
然后递给受试者一沓画素描的纸，画出一幅可辨别的猫就给他奖励”。背景音一直
在说“pencil”（“铅笔”）或“pen and ...”（“钢笔和……”），也是有用的；还有提
示受试者读出“pencil”或“pen and ...”的标记；或者把一支“大个头的铅笔放在看得
清楚的、特别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受试者极有可能会说
出“pencil”。“在这个范例中，可用的技巧都被举例说明了。”在该书的其他地方，

行为理论对人类行为进行实际控制的这些帮助也被充分地说明了，就像斯金纳为我们展示（第113—114页）如何引出“red”（“红色”）这个反应一样（此处的建议设计为，在受试者面前拿出一个红色的物体说：“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公平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也有一些把“操作性条件作用”（operant conditioning，也译作“操作性条件反射”或“操作性条件制约”。——译者注）应用于人类行为控制的重要做法。各种实验表明，如果实验人员在受试者说出一个复数名词后说“对”或“好”，受试者说出的复数名词的数量（举例来说）将会增加（同样，对某个问题的积极态度、有某种内容的故事等，也是如此；见L. Krasner, “Studies of the Conditioning of Verb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5 [1958]，文中有关于几十个此类实验的调查，大部分结果都是肯定的）。颇为有趣的是，受试者通常并未意识到这个过程，这为研究正常的言语行为带来何种见地尚不清楚。然而，这是运用斯金纳的范例得出的肯定的、出乎预期结果的例子。

- 10 “Are Theories of Learning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Review* 57 (1950): 193-216.
- 11 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在《学习理论是必要的吗？》（“Are Theories of Learning Necessary?”）一文中，斯金纳讨论了如何把其行为分析扩展到实验环境中的问题。但在实验环境中，反应速率是唯一的有效数据，不可能对频率进行观察。他的回答是，“‘可能性’这一概念经常被外推到无法进行频率分析的实例中。在行为领域中，我们设置了把频率当作数据的情景，但在分析或解释无法受这种分析影响的行为类型的实例时，我们使用了‘可能性’概念”（第199页）。当然，也有些可能性的构想并不基于频率，但我没见过这些构想有多少能应用于斯金纳所思考的例子。我也没见过解释上述被引用段落的方法，只见过表示使用“可能性”一词描述行为的尝试，却全然不考虑“可能性”概念是否相关。
- 12 幸运的是，“在英语中，这没产生什么困难”，因为（比如）“相对音高（relative pitch level）……并不重要”（第25页）。斯金纳并未提到有关英语中相对音高的功能以及其他语调特征的诸多研究。
- (13) 此处指进化论学说。
- 14 与“频率”相比，“倾向”一词的模糊语义让后一句引语没有像前一句引语那样出现明显的错误。然而，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引申。如果“倾向”指的是其普通义，那么这句话显然是错误的。有人也许坚信这样的断言：木星有四个卫星，索福克勒斯的许多戏剧都已经不可挽回地消失了，1 000万年之后地球会烧焦等，而他们根本无意对这些言语刺激有所行动。当然，通过把“行动倾向”解释为以某些方式回答问题的倾向和在动机支配下说出信以为真的倾向，我们可能会把斯金纳的断言变成毫无启发意义的真理。
- 15 但应当补充的是，总体上不是刺激在强化，而是特定情景语境中的刺激在强化。某个事件或物体通过实验设计，也许在强化、惩罚或未被注意到。因为斯金纳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的、非常简单的实验设计中，他就不必加上这一限定条件，这个限定条件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达。然而，如果他希望把自己的描写系统扩展到一般行为，当然就很有必要这么做。
- 16 这一点经常被提到。

- 17 参见《学习理论是必要的吗？》，第199页。在其他地方，斯金纳也建议，“学习”这一表达应仅限于复杂的情况，但他并未具体描述这些情况的特征。
- 18 “孩子相对不成规则的发声有选择性地被强化后，逐渐带有在某个言语社区产生合适效果的形式，这时他就习得了言语行为”（第31页）。“不同的强化形成了一切言语形式，当预先的刺激偶然发生，强化就要对其导致的控制负责……行为的的有效性、可能性或强度依赖于强化是否真正持续，也要看程式安排是什么。”（第203—204页）在其他地方，斯金纳也经常这么说。
- 19 此处关于强化程式安排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具体地说，我们如何确定，根据何种程式安排才能像思考或言语幻想中那样“安排”隐性强化呢？或者，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因素（沉默、言语以及对所交流的信息即将做出的合理反应）的程式安排是什么呢？
- 20 参见米勒和多拉德著《社会学习与模仿》（N. Miller and J. Dollard, *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 New Haven: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1941），第82—83页，其中谈到了“缜密的训练”，他们认为这对孩子学习词汇意义和句型很有必要。在莫瑞尔著《学习理论与人格动力》（O. H. Mowrer, *Learning Theory and Personality Dynamics*,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0）的第23章中，对语言如何可以被习得进行推测性描述时，莫瑞尔含蓄地提过相同的概念。实际上，该观点似乎很普遍。
- 21 关于该文献的综述和分析，参见D. Thistlethwaite, “A Critical Review of Latent Learning and Related Experiments,” *Psychology Bulletin* 48 (1951): 97-129. 在《现代学习理论》发表的文章中，麦科克代尔（K. MacCorquodale）和米尔（P. E. Meehl）站在驱力减降理论的立场，认真、周全地分析了潜在学习的资料，（像他们指出的那样）结果却不尽人意。索普（W. H. Thorpe）从动物行为学家的角度做了文献综述，还增加了返巢导航（homing）和地形学方向的资料（*Learning and Instinct in Animals* [Cambridge: Methuen, 1956]）。
- 22 E. R. Hilgard, *Theory of Learning*,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6), 214.
- 23 D. E. Berlyne, “Novelty and Curiosity as Determinants of Exploratory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1950): 68-80; id., “Perceptual Curiosity in the Ra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8 (1955): 238-246; W.R. Thompson and L. M. Solomon, “Spontaneous Pattern Discrimination in the Ra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7 (1954): 104-107.
- 24 K. C. Montgomery, “The Role of the Exploratory Drive in Lear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7 (1954): 60-63. 该期刊的许多其他文章都力图证明，探究行为是一种由外界新奇刺激引起的相对独立的主要驱力。
- 25 R. A. Butler,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by Rhesus Monkeys to Visual-Exploration Motiv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6 (1953): 95-98. 后来的实验表明，比起迅速消失的导出驱力（derived drive），这种“驱力”是非

常持久的。

- 26 H. F. Harlow, M. K. Harlow, and D. R. Meyer,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0 (1950): 228-234, 以及后来由哈洛发起的调查研究。哈洛一直认为,用基于生理学的驱力和自我平衡的需求状态,来解释灵长类动物动机的持久性和学习的快速性,这是不够的。他在很多文章中指出,对灵长类动物来说,比起饥饿或类似情况,好奇心、玩乐、探究和操作通常是更有效的驱力,它们并未显示出已获得任何内驱力的特点。赫布(D. O. Hebb)也提供了行为证据和神经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对高等动物而言,工作、风险、猜谜、智力活动、适度恐惧以及挫败等都有着积极的吸引力(D. O. Hebb, "Drives and the CNS," *Psychological Review* 62 [1955]: 243-254)。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无须找到可能性不大的迂回方法去解释人们为何为了金钱而工作,孩子们为何无忧无虑地学习,人们为何讨厌无所事事。"

在一篇简短的说明文章中,丹尼斯(W. Dennis) ("Early Recognition of the Manipulative Drive in Monkeys," *British 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 3 [1955]: 71-72) 让读者注意到这一事实:早期研究者(Romanes, 1882; Thorndike, 1901)的观念基本不受学习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确注意到猴子的内在动机性行为。当然,丹尼斯也断定,哈洛进行实验时才开始从这方面观察猴子。他引用了罗曼斯(G. J. Romanes)的话(*Animal Intelligence* [1882]): "这种动物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也是与其他动物最不同的特征就是:毫无倦怠的探究精神。"在类推研究过程中,可靠的发现使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对早期研究中的重要见地视而不见。在近期的结构语言学中,类推研究倒很常见。

- 27 因此,布朗(J. S. Brown)对哈洛在《关于动机的当前理论与研究》(*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53)中的文章进行评论时说:"可能在(哈洛所引述实验的)每个实例中,聪明的驱力减降理论家都能发现恐惧、不安全感、挫败或诸如此类的某个片段,他认为这种片段被减降了,因此也起到了强化作用。"(第53页)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燃素学说理论家或以太理论家。

- 28 参见H. G. Birch and M. E. Bitterman, "Reinforcement and Learning: The Proces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Psychology Review* 56 (1949): 292-308。

- 29 参见其文章 "A Physiological Study of Reward," in D. C. McClelland, ed., *Studies in Motivation*, 134-143,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5。

- 30 见索普之前被引用的文献,尤其在第115—118、337—376页,他出色地探讨了该现象,其看法主要通过洛伦茨(K. Lorenz)的著作而被熟知(见*Der Kumpan in der Umwelt des Vogels*, 部分内容重印于C. H. Schiller, ed., *English Translation in Instinctive Behavior*, 83-128,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7)。

- 31 见之前所引述的著作,第372页。

- 32 参见J. Jaynes, "Imprinting: Interaction of Learned and Innate Behavi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nd Psychiatry* 49 (1956): 201-206。作者在文中总结道:"实验证明,在没有可观测的奖励时,这种鸟类的幼鸟跟着移动的刺激物体,

比起其他物体，它们很快就更加喜欢这个物体。”

33 当然，这一事实极有可能被纳入斯金纳的框架之中。比如，孩子看到大人用梳子，即使没人教他，他也试着用梳子梳梳自己的头发。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解释为，孩子做出这个行为是因为他发现这样做有强化作用，或是因为像正在“强化”的大人那样做而产生了强化（参见第164页）。同样，对于其他任何行为，也可以给出自动的解释。似乎一开始就很奇怪的是，斯金纳如此倚重“强化”概念，却几乎不关注潜在学习和相关话题的文献。在其文章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提及这一点。同样，《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6）似乎是唯一深受斯金纳学说影响而写成的著作，其作者凯勒（F. S. Keller）和肖恩菲尔德（W. N. Schoenfeld）在书中把潜在学习的文献一句带过，称其“无关紧要”，只能“让基本原则更加晦涩，而没有阐明它”（效果律，第41页）。但处在斯金纳的情况中，这种忽略倒相当合适。对驱力减降者或认为“强化”概念有一些实质含义的其他人来说，这些实验和观察很重要（常常也有些令人尴尬）。但按斯金纳对该词意义的理解，这些结果或其他所能想到的结果都无法对这一主张提出质疑，即强化对行为习得和保持都是最本质的。行为肯定有一些相伴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能把它们叫作“强化”。

34 廷伯根（见前面所引述的著作第6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方面做了评述，讨论了成熟在低等有机体的复杂运动模式（例如飞行、游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还有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学习的先天倾向”的影响。另参见席勒（Schiller）著《本能行为》（*Instinctive Behavior*），第285—288页，其中讨论了在黑猩猩显然经过思考的行为中渐趋成熟的运动模式的作用。

勒纳伯格的讨论（E. H. Lenneberg, *Language, Evolution, and Purposive Behavior*, [本文写作时——译者注]未出版）则十分有趣，他提到生物结构在语言习得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忽略这种可能性的诸多危险。

35 选自廷伯根（见前面的引用）所引述的诸多例子（此例在第85页）。

36 参见K. S. Lashley, “In Search of the Engram,” *Symposium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4 (1950): 454-482。斯佩里（R. Sperry, “On the Neural Basis of the Conditioned Response,” *British 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 3 [1955]: 41-44）认为，要解释拉什利（Lashley）和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自己所引用的其他事实，就有必要假设甚至在简单条件作用中也有高水平的大脑活动。他说，对于受条件限制的反应的“潜在神经机制，我们至今还未看到令人满意的图景”。

37 况且，除了最简单的情况，说话人的动机在强度上与剥夺的时间相对应。一个明显的反例是赫布（Hebb）所说的“盐焗坚果现象”（salted-nut phenomenon）（D.O. Hebb,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49], 199）。当我们认为“剥夺”与生理驱力无关时，困难当然就更加严峻。

(38) 言下之意是，如果大家不需要盐，桌子上就没必要放一瓶盐。

(39) 此处指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 1878—1958）。

- 40 就像即使没有什么匹配的言语刺激和行为刺激，他也可能对“The volcano is erupting”（“火山在喷发”）或“There’s a homicidal mania in the next room”（“隔壁房间有个杀人狂”）这些话产生恰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一样。斯金纳对语言中的巴甫洛夫式条件控制的讨论（第154页）同样也无法令人信服。
- 41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1854). 卡纳普 (R. Carnap) 最近在《自然语言的意义和同义关系》(“Meaning and Synonymy in Natural Languages,” *Philosophical Studies* 6 [1955] : 33-47) 一文中重新做出解释，把对说话人X来说谓词“Q”的意思（内涵）定义为“宾语为X愿意把谓词‘Q’归因于y而必须实现的普遍条件。一个表达的内涵含义通常被认为构成了其认知意义，而不是情感意义”，而情感意义主要是对这个表达的情感反应。
- 无论这是不是研究意义的最佳方式，很清楚的是，外延、内涵意义以及情感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有关意义的实证研究中，这些区别通常被混淆了，此后也有很多混淆。因此，奥斯古德 (C. E. Osgood) 给自己的任务是要解释这一事实：一个刺激逐渐变成另一个刺激的符号（餐馆碗碟收拾工 [busser] 变成了食物的符号，一个词就变成了一个物体的符号）。对于语言符号而言，这显然是外延问题。但他实际上为了量化和衡量意义而发展出来的方法（参见Osgood, G. J. Suci and P. H. Tannenbaum,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7] ）只能应用于情感意义。比如，假设A非常厌恶希特勒和科学，认为二者都非常强大且“活跃”，而B和A一样不喜欢希特勒，但很喜欢科学，尽管他认为科学毫无作用而且不太重要。那么，A可能在语义差别量表上给“希特勒”和“科学”都赋予同样的位置，而B会和A一样给“希特勒”同样的位置，但会把“科学”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但A认为，“希特勒”和“科学”不是同义词，或它们的指称不一样，而A和B可能恰恰就“科学”的认知意义达成一致。显然，这里所衡量的是对事物（词汇的情感意义）的态度。奥斯古德的解释逐渐从外延移到认知意义，又移到情感意义。毫无疑问，产生混淆的事实是：“意义”这个术语有三个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见J. B. Carroll对Osgood, Suci和Tannenbaum的著作所写的书评（*Language* 35: 1, January-March 1959）。
- 42 最清楚的当属奎因 (W. V. Quine)。见*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43 古德曼 (N. Goodman) 在《相似的意义》(“On Likeness of Meaning,” *Analysis* 10 [1949] : 1-7) 一文中提出了根据指称来描述同义词特征的方法。古德曼还在《关于意义的一些差异》(“On Some Differences About Meaning,” *Analysis* 13 [1953] : 90-96) 一文中讨论了这样做所面临的困难。卡纳普（前面已引述）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第六部分），但措辞有些错误，因为他没有说明只使用了外延（指称）概念这一事实。
- 44 通常，这里所讨论的例子都没有被很好地运用，而所提出的分析法的成功也被夸大了。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很容易看出，所提出的分析虽然总是有些客观性，但并不等于被分析的表达。只举一例来说，“I am looking for my glasses”（“我正在找我的眼镜”）这个反应当然与提出的替代解释不一致，“当我过去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眼镜，然后就不再找了”，或“出现了这些情况：我愿意发出任何曾导致我发现眼镜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我现在所做的看（即找眼镜——译者

注)的行为”。有人也许是第一次找自己的眼镜；或者有人找眼镜和找手表发出的行为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用斯金纳的替代解释来说，“I am looking for my glasses”和“I am looking for my watch”（“我在找我的手表”）是对等的。用这种浅显的方式无法解决有关目的性的复杂问题。

- 45 但斯金纳极力否认人类（或鹦鹉）有模仿的先天能力或倾向。他仅有的论据是，无人能证明阅读是先天倾向，但阅读和回声反应有相似的“动态属性”（dynamic properties）。这种相似点却只能说明斯金纳的描述类别比较粗略。

至于鹦鹉，斯金纳认为，它们没有天生的模仿能力，只是受成功的模仿的强化（第59页）。很难从斯金纳使用的“强化”一词中看出什么区别，因为任何本能行为都可以说受到了强化。例如，如果科学家说一种鸟本能地用某种方式筑巢，我们就可以用斯金纳的术语（对等地）说，这种鸟本能地受这种筑巢方式的强化。因此，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对“强化”这个动词的惯常介绍也毫无意义。在合理的分类中，强化是有点道理的，但一旦“强化”的意思很具体，在有能力的观察者所说的实例中，就很难看出有多少实例能经得起分析。参见之前所引用的索普，第353—354页；K. Lorenz, *King Solomon's Ring*, New York: Crowell, 1952, 85-88；甚至还有莫瑞尔，他引用了一个实例试图说明模仿是如何通过二级强化产生的，见此此前所引著作的第694页。莫瑞尔显然相信该实例是对的，但这很难是正确的。用二次强化来解释幼儿的模仿是最不合理的。

- 46 尽管连这个可能都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范例，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孩子知道如何从1数到100，也能像乘法表的各项一样用这些数字组成 10×10 的矩阵。

- 47 同样，“一部文学作品的普遍性是指有多少潜在的读者会说同样的主题”（第275页；也就是说，最“普及”的是成语和问候语词典）；如果说话人说出了我们想要说出的话，他就是在“刺激”（第272页）等。

- 48 同样，想一想斯金纳的这个争论（第362—365页）：交流知识或事实知识只是说话人选择做出新反应的过程。在这里，对动物实验的类推尤其显得薄弱。我们训练老鼠实施某个行为时，把这个行为看作是给老鼠的总库加了一个反应，这也说得通。但谈到人类交流，很难给这个术语附加个什么意思。如果A给B发出信息（对B来说是新信息），说“The railroads face collapse”（“铁路公司面临倒闭”），从哪个意义上说“The railroads face collapse”这个反应只是现在说给B的，而不是之前说过？B之前可能说过（不知这个是否属实），也明白这是一个句子（与“Collapse face railroads the”比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假设该反应在强度上有所增加，不管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例如，B可能对这个事实不感兴趣，或者他不想让这一事实众人皆知）。我们怎样才能既描述“提供反应”的概念，又不至于把斯金纳对“给予知识”的解释弄得微不足道，这还不清楚。

- 49 第332页。但在下一页，在同样的例子中的s表明“被描述为‘男孩’的对象具有跑步的属性”。我们很快就发现很难保持概念框架的一致性。

- 50 也许有人认为反过来才是对的。对犹豫停顿的研究表明，在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大的类别之前都会发生犹豫停顿；这一发现通常被如此描述：停顿发生在不确定情况最大的地方或信息最多的地方。犹豫显示正在进行造句（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似乎只在“语法框架”之后才选择“重要的反应”。参见奥斯特古德未发表的论文；F. Goldman-Eisler, “Speech Analysis and Mental Processes,” *Language and Speech* 1 (1958), 67。

(51) 作者的意思是，把“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这个序列倒着念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才算句子。

(52) 前一个句子中的can be可以改成are，但不能改成is，而后一句中的can be可以改成is，但不能改成are。

53 例如，言语行为的真实单位实际上是什么？在何种条件下，某个具体事件才能获得关注（称为“刺激”）或称为“强化物”？我们怎样才能确定在某个实例中是什么刺激在控制？刺激何时才是“相似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对汽车或台球说“Stop”[“停”]是因为它们和有强化作用的人十分相似，这毫无趣味可言。）

使用“相似的”和“概括”这样未经分析的概念尤其令人不安，因为这表明使用者明显对学习的每个有意义的方面缺乏兴趣，或者对在新场景中的语言使用缺乏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通过概括学习的，或者说新的话语和场景在某种方式上与熟悉的话语和场景是相似的，没人对此表示怀疑。唯一值得认真感兴趣的事情是特定的“相似性”。显然，斯金纳对此不感兴趣。凯勒和肖恩菲尔德（参见前面所引述的部分）继续把（他们所辨识的）这些概念纳入其斯金纳式的“现代客观心理学”，并确定当“我们对两个刺激的反应相同”时，两个刺激是相似的（第124页；但“相同的反应”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任何合理的解释中，这种界定都把他们的“概括原则”（第116页）变成了赘述。这种界定显然对语言学习研究或在合适的情景中构建新的反应都帮助不大。

54 “The Problem of Serial Order in Behavior,” in L. A. Jeffress, ed., *Hixon Symposium on Cereb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1961).

55 这毫无神秘之处。复杂的先天行为模式和先天“以某些方式学习的倾向”已在低等生物中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许多心理学家更愿意相信，这种生物学结构不会对高等生物习得复杂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我还没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态度。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强调，有必要认真研究有机体所具有的策略，这些策略被看作是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参见J. S. Bruner, J. J. Goodnow, and G. A. Austin, *A Study of Thinking* [New York: Wiley, 1956]）；A. Newell, J. C. Shaw, and H. A. Simon,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Human Problem Solv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958]: 151-166）；如果关于人类学习性质还有什么有意义的说法的话，就是这些了。这些策略大部分是先天的，或者由早期学习过程发展而来的，但我们还所知甚少。（但可参见H. F. Harlow, “The Formation of Learning S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59 [1949]: 51—56，以及许多后来的文章，其中把学习性质的明显转换视为早期训练的结果；还有赫布的《行为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第109页起。）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关于本节所提到的话题的讨论，参见之前所引述的勒纳伯格（Lenneberg）的著作以及里斯（R. B. Lees）对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的书评（参见*Language* 33 [1957]: 406-407）。

(56) 此处提到的导言是指洪堡为其三卷本著作《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Ü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 1836—1839年出版) 所写的导言《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篇幅长达300多页, 被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该导言英文版题目为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简称 *On Language*。

57 以这种方式来接受传统的心灵主义, 并不是接受了布隆菲尔德的“心灵主义”与“机械主义”相对立的二分法。心理主义语言学只是一种理论语言学, 它把语言运用当作数据(还有其他数据, 比如内省提供的数据) 来确定语言能力, 并把语言能力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这种传统意义上来看, 心灵主义者不必假设他所研究的心智现实可能有什么生理基础, 尤其不必否认这种基础的存在。反之, 人们会认为, 心灵主义研究最终对神经生理机制研究而言最有价值, 因为只有它才关注如何从理论上确定神经生理机制必然显示的特性, 以及这些机制必然执行的功能。

事实上, 在语言学中, 心灵主义与反心灵主义相对立的问题显然只关乎目标和兴趣, 与真伪或有无道理可言的问题无关。在这种毫无根据的争论中至少牵扯了三个问题: (1) 二元论(dualism)——作为语言运用基础的规则是否以非物质手段表述? (2) 行为主义(behaviorism)——语言运用的数据是否囊括了语言学家感兴趣的领域? 或者语言学家是否还关心其他事实, 尤其是那些作为行为基础的更深层系统的事实? (3) 内省主义(introspectionism)——人们是否该用内省数据试着去探究这些基础系统的特性? 布隆菲尔德无端抨击的正是上述二元论的立场。行为主义的立场不是一个值得论证的问题, 它只是一种对理论和解释缺乏兴趣的表达。例如, 特瓦德尔(W. F. Twaddell)在对萨丕尔(Sapir)心灵主义音系学的批评(*On Defining the Phoneme. Language Monograph No. 16, 1935*, 部分内容重印于 M. Joos, ed., *Reading in Linguistics* [Washington: 1957])中就吧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萨丕尔把语言资料提供者的反应和评论, 用作证明对某种音系要素抽象系统的心理现实产生影响的证据。对特瓦德尔来说, 整个规划毫无意义, 因为他感兴趣的是行为本身, “[行为] 对从事语言研究的学徒来说唾手可得, 尽管在形式上还不太集中”。颇具特点的是, 对语言学理论缺乏兴趣还体现在把“理论”一词局限于“对数据的总结”的主张(例如特瓦德尔的文章, 或者还有近期的例子, 比如狄克逊[R. W. Dixon] 的《语言科学与逻辑》[*Linguistic Science and Logic*,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3]。尽管该书对各种“理论”的探讨十分模糊, 人们难免对其所思所想有另外的解读)。从通常意义上讲, 这种对理论的兴趣缺失是由某些想法(例如严格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 或强有力的证实主义[verificationism])促成的, 这些想法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中略微讨论过, 但很快就在1930年代早期被摒弃了。无论如何, 问题(2)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问题。只有在人们不承认问题(2)的行为主义局限时, 才会有问题(3)。为了保持方法论的纯粹性, 就坚持认为不应当考虑语言材料提供者(通常是语言学家自己)的内省判断, 这在目前看来就是判定语言研究毫无成果。很难想象对此可能给出什么理由。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进一步的讨论见 J. Katz, “Mentalism in Linguistics,” *Language* 40 (1964), 124-137。

58 相关讨论见N. Chomsky,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4。其早期版本发表于《语言结构——语言哲学选读》(J. A. Fodor and J. J. 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这是一篇扩充修改稿,原文是在1962年马萨诸塞州剑桥举办的第九届语言学家国际大会“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第九届语言学家大会论文集》(H. Lunt, ed.,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Congress of Linguists*,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4) 该小组会议的部分中。

59 这一点近来已被几位欧洲语言学家所否定(例如狄克逊[Dixon]的《语言科学与逻辑》[*Linguistic Science and Logic*]; 乌伦贝克的“转换理论评价”[E. M. Uhlenbeck, “An Appraisal of Transformation Theory,” *Lingua* 12, 1963, 1-18]; 乌伦贝克在“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上的讨论[见Lunt, *Proceedings*, 981-983])。但他们没有说出对传统语法持怀疑态度的理由。在我看来,似乎当前可得到的任何证据,都说明传统观点大体在所及范围内是基本正确的,而别人提出的创新是完全不合理的。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乌伦贝克的说法。他认为“the man saw the boy”(“那个人看到了那个男孩子”)的成分分析是[the man saw][the boy](“[那个人看到了][那个男孩子]”),这个说法大概也暗示出,在[the man put][it into the box](“[那个人放][它进盒子里]”),[the man aimed][it at John](“[那个人把……瞄准][它对着约翰]”),[the man persuaded][Bill that it was unlikely](“[那个人说服][比尔这不可能]”)等句子中,成分分析也是如此表示的。有许多考虑与确定成分结构有关(C. Lancelot, A. Arnaud, et al.,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据我所知,这些考虑毫无例外地证实了与乌伦贝克的说法相悖的传统分析,对此提出的唯一论据就是,乌伦贝克的说法是“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参看乌伦贝克在“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小组会上的论述,以及当时的讨论。至于狄克逊对传统语法的反对态度,他既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也没有拿出任何反对的论据(除了正确地观察到,传统语法“长久以来被职业语言学家宣告为无用”,但这个观察与本问题无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什么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了。

(60) 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 1735—1803), 苏格兰诗人、哲学家。

(62) 杜马尔赛(Du Marsais, 1676—1756), 法国语法学家、哲学家。

61 J. Beattie, *Theory of Language*, London: A. Stahan, 1788.

63 C. Ch. Du Marsais, *Les véritabl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 (1729); 关于该手稿的具体写作年代, 见G. Sahlin, *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et son rôle dans l'évolution de la grammaire génér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28。引自Sahlin, 29-30。

64 更多相关探讨, 参见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65 C. Lancelot, A. Arnaud, et al.,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

(66)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 《百科全书》

主编。

- 67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 ; 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1875.
- 68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 ; 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90.
- 69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 ; 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1.
- 70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 ; 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2.
- 71 D. Diderot, *Lettre sur les Sourds et Muets*, 1751 ; 引用页码出自J. Assézat,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 vol. 1, Paris: Garnier Freres, 371-372.
- 72 例如, G. Ryle,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ical Review* 62 (1953), 167-186.
- (74) 即埃米尔·L. 波斯特 (Emile L. Post, 1897—1954), 美国数学家、逻辑学家。
- 73 各种说明这个观点的尝试, 见N.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 Co., 1957; H. A. Gleaso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lson, 1961; G. A. Miller and N. Chomsky, "Finitary Models of Language Users," in R. D. Luce, R. Rush, and E. Galanter, eds.,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vol. 2, New York: Wiley, 1963, ch. 13, 419-492; 以及其他诸多著述。
- (76) 此处指弗里德里希·谢林 (Friedrich Schelling, 1775—1854),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唯心主义哲学家, 也是教育家。
- 75 F. W. J. Schelling,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Human Freedom*.
- (78) 本文卢梭引文的译文参照了李常山的译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少数细节有所改动, 特此说明。
- 77 例如, 见诺姆·乔姆斯基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0) 第6章第308—309页中所引述的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 的话。
- 79 见马斯特斯 (R. D. Masters) 在其所编的《第一篇论文和第二篇论文》(让·雅克·卢梭著)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4) 中的序言。
- (80) 阿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81) 法朗士的原话为: “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 法律同时禁止富人和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一块面包。”
- 82 比较一下一个世纪之后蒲鲁东所说的话: “不必用更多的讨论来证明, 剥夺一个人的思想、愿望和人格的权力是一种生杀之权; 使一个人成为奴隶就等于杀死他。”
- (84) 又称“雅各宾专政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 雅各宾派 (激进主义派) 执政后实行了恐怖政策, 将有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 有数千人遭到杀害。

- (85) 即热劳·德·科尔德穆瓦 (Géraud de Cordemoy),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律师。
- 83 引自莱宁 (Lehning) 主编、巴枯宁著《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Etatism et anarchie*) 编者注50, 转引自P. Scherecher, “Kan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Etranger*, September-December 1939.
- 86 乔姆斯基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和《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中都讨论了该问题。
- 87 引自莱宁 (Lehning) 主编、巴枯宁著《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Etatism et anarchie*) 编者注50, 转引自P. Scherecher, “Kant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Etranger*, September-December 1939。另见乔姆斯基所著《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第1章第8节。
- (88) “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 一词出自古希腊神话, 意为复杂而难解的结。相传, 被宣布为弗里吉亚 (在今安纳托利亚高原) 国王的戈尔迪阿斯 (Gordias) 出于感激, 命人将他的牛车献给萨巴最俄斯 (Sabazios, 希腊人视之为宙斯), 用绳子系在柱子上, 并打了一个死结, 一直无人能解。有神谕说能打开结的人注定会主宰亚细亚,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里时, 用剑斩开了死结。此后, “斩开戈尔迪之结”经常被用来比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 通过找到一种使问题的约束变得没有意义的方法来轻松解决的做法, 也可指干脆利索地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关于亚历山大大帝解开这个结的方式, 在学界尚存一定争议。
- (91) J. W. 伯罗 (J. W. Burrow, 1935—2009), 英国历史学家, 以研究思想史著称。
- 89 相关讨论, 见E. H. Lenneberg,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1967);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E. A. Drewe, G. Ettlinger, A. D. Milner, and R. E. Passingham,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on Man and Monkey,”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London, 未发表的草稿, 1969; P. H. Lieberman, “Primate Vocalizations and Human Linguistic Ability,”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44, no. 6 (1968)。
- 90 见前面所引用的书和乔姆斯基《当前语言学理论的一些问题》(Noam Chomsky,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The Hague: Mouton, 1969)。
- 92 随后的引用很多来自伯罗在其所编的洪堡著作《国家行为的局限》(*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中的序言。
- (93) 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19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 94 对比一下前面引用的康德的话。康德的文章发表于1793年, 洪堡的文章写于1791—1792年, 但他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内容而并非全部。见伯罗在《国家行为的局限》中对洪堡的介绍。

- 95 Thomas G. Sanders,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48, no. 2 (1970).
- 96 Thomas G. Sanders,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据说这段资料来自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 的观点, 类似的批评在西方学生运动中较为普遍, 例如米切尔·科恩 (Mitchell Cohen) 和丹尼斯·黑尔 (Dennis Hale) 主编的《新左派学生》(*The New Student Left*) 第3章。
- 97 也就是说, 一个人“在其生活方式与其性格和谐一致时”(即他的行动来自内驱力 [inner impulse] 的时候)“才能最成熟、最优雅地圆满完成自己的活动”。
- 98 后一段引用来自洪堡对法国1791年宪法的评论, 部分内容见Marianna Cowan, ed., *Humanist Without Portfolio*,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中的英译本。
- 99 Rudolf Rucker,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在《国家主义与文化》(*Nationalism and Culture*, 1947) 一书中, 洛克把洪堡称为天赋人权和反极权国家思想“在德国最杰出的代表”。他把卢梭看作极权思想的先行者, 但仅针对《社会契约论》而言, 他并未讨论更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伯罗认为, 洪堡的文章遥遥领先于“19世纪平民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理论”, 并显示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迹象。其他评论另见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注释 51。
- (100)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1886—1964), 匈牙利经济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 1934年起先后在英国、美国的大学任教。波兰尼反对传统的经济学思想, 强调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提出了崭新的分析视角。
- (102) 西蒙·兰盖 (Simon Linguet, 1736—1794), 法国律师、记者, 因宣扬保守政治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处死。
- (103) 此处的“want”一词还有缺乏、贫穷之意。
- 10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5).
- (105) 也译作“工资奴隶制”或“薪水奴隶制”。
- 104 引自Paul Mattick, "Worker's Control," in Priscilla Long, ed., *The New Left*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377。
- 106 引自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Boston: Beacon, 1985), 19。
- (108) 基布兹 (Kibbutzim) 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或集体农庄, 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高科技产业, 其目标是建立乌托邦社区, 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
- 107 但卢梭一面藐视“靠众多尊贵之人才能维持的宪法……尽管受尽他们的呵护, 却总是从中产生出比表象优势更多的灾难”, 另一面却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丧失“质朴”的人, 无法“失去法律和首领而生活”, 只能“尊重”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神圣枷锁”, “谨慎地遵守法律并服从起草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

- 109 见第3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诠释》。
- 110 见第3篇关于《因为国家》的讨论，其中提到各种行为科学的欺诈性主张。
- (111) 哈利·布莱肯 (Harry Bracken, 1926—2011)，美国哲学家、笛卡尔研究专家，也是乔姆斯基的朋友，持反越战立场。
- (112) 图灵测试由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在1950年代提出。在测试中，被测者与测试人被隔开，由测试人通过装置连续提问。经过多次测试，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不能确定作出回答的被测者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智能。
- (113)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英国化学家，以发现氧气而著称。
- (114) 来自拉丁语，直译为机械降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角色有难时，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收场。形式上由幕后人员用类似起吊机的装置将饰演神的演员载送至舞台上空实现。
- (115) 也称为“语言官能”。
- 116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见N. Chomsky, “Bare Phrase Structure,”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994),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MIT, to appear in H. Campos and P. Kempchinsky, eds.,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Carlos Otero*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以及G. Webelhuth, ed., *Government and Binding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Oxford: Blackwell, 1995); N. Chomsky, “Naturalism and Dualism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 (1994): 181-209，此处还参照了Edelman,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埃德尔曼 (Edelman) 认为，对一般的认知科学（无论是计算认知、连接认知或其他认知）来说，这种危机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很严重的。
- 117 主要改编自N. Chomsky,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Plenum, 1975)，并节选自该书1955年手稿的1956年修订稿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完成。
- 118 “发声” (articulatory) 一词过于狭隘，因为它表示语言机能具有模态特定性 (modality-specific)，与发音器官有着特别的关系。过去多年中对手势语的研究推翻了这一传统的假设。我会继续使用这个术语，但不会暗示输出系统的特殊性，只注重口语的情况。
- 119 相关讨论见N. Chomsky,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s* (Amsterdam: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77) 第1章。
- 120 其中一种形成过程，见N.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1981)。
- (121) 也称“功能语类”。
- 122 这里的解释 (interpret) 当然是从理论内部化的意义上来理解。从更松散的非正

式意义上讲，各种解释由语言机能指派给所有对象，包括语言片段、胡言乱语、其他语言中的表达，也可能是非语言的噪音。

(125) 即语言机能的一种状态 (a stat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

123 见H. Borer, *Parametric Syntax* (Dordrecht: Foris, 1984); N. Fukui, “A Theory of Category Proj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 1986), 修订版为*Theory of Projection in Syntax*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1995),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 N. Fukui, “Deriv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Japanese: A Case Study in Parametric Syntax,” *English Linguistics* 5 (1998), 249-270。

124 见N.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New York: Praeger, 1986)。(此处指内化语言。——译者注)

126 因此，我们所说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即使在同质言语社区个人方言的理想化状态下，也反映出一种诺曼征服、邻近日耳曼语地区、巴斯语的底层基础以及其他无法被严肃地当作语言机能属性的因素。在进行如此显而易见的推理的同时，很难想象，作为自然界的真实客体，语言机能的属性在任何所观察的系统中都能被实例化。类似的假设在有机体研究中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128) 让—罗杰·威尔格诺德 (Jean-Roger Vergnaud, 1945—2011)，法裔美国语言学家、生成语法学家。1988年起任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系学和句法学等。

(129) 即黄正德 (James Huang, 1948—)，华裔美国语言学家。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理论、句法 - 语义接口和汉语语言学等。

127 见N.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130 见N. Chomsky,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第4章。

(131) 指语言单位可以进行无限的重复、并列、内嵌等操作，形成多种语言表达式，传达人类最复杂、最细微的意义与思想。

(133) 指古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有24个表音符号。

(135) 即法国语言学家、神学家安托万·阿尔诺 (Antoine Arnauld, 1612—1694) 和天主教詹森派修士、语法学家克劳德·朗斯洛 (Claude Lancelot, 1615—1695)，两人曾以波尔 - 罗瓦雅尔修道院为据点进行语言研究和写作。他们合著的《普遍唯理语法》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or General and Rational Grammar*) 又名《波尔 - 罗瓦雅尔语法》。

132 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L. A. Selby-Bigge, 3rd ed., rev. by P. H. 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48, 1975), 108, sec. 85.

134 Galileo Galilei, *Dialogues on the Great World Systems*, trans. Thomas Salusbury (1632, 1661).

- (136)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 也译为“语言获得装置”。
- 137 例如, 见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65);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1981); Chomsky,*Knowledge of Language* (New York: Praeger, 1986)。
- 138 见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140) 此处指语言中不完美的设计。
- 139 Samuel Epstein, “UN-principled Syntax and the Derivat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Samuel Epstein and Norbert Hornstein, eds., *Working Minimalis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9)。
- 141 Noam Chomsky, *Minimalist Program*; Chomsky,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ms., MIT, 1998.
- (142) 此处指在“Clinton seems to have been elected”这个句子中。
- (143) 指高涨的研究热情。
- 144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 A. Selby-Bigge, 2nd ed., rev. by P. H.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40, 1748), sec. 27.
- 145 René Descartes, letter (to Morus), in R. M. Eaton, ed., *Descartes Selections* (1649,1927)。
- 146 Juan Huarte, *Examen de Ingenios*, trans. Bellamy (1575, 1698), 3; 还可参见Noam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 (147) 作者用了“suspect”一词, 意为“怀疑、料想、认为”。因此, 下文提到这种态度时用了“怀疑”或“怀疑论”的说法。
- 148 Ned Block, “The Computer Model of the Mind,” in D. N. Osherson and E. E. Smith. eds.,*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vol.3, *Think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149 “The Brain,” *Daedalus*, Spring 1998.
- (150) 弗农·蒙卡斯尔 (Vernon Mountcastle , 1918—2015) , 被称作“美国神经科学之父”, 以发现大脑皮层的柱状构造而著称。
- (151) 马克·豪泽 (Mark Hauser , 1959—) , 英文姓名也拼作“Marc Hauser”, 是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动物认知与人类行为研究专家。
- 152 Mark Hauser,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 (154) 即faculty of language。
- 153 C. R. Gallistel, “Neurons and Memory,” in M. S. Gazzaniga, ed., *Conversation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The Replacement of General-Purpose Learning Modules with Adaptively Specialized Learning Modules,” in M. S. Gazzaniga, e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2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 155 David Hum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ed. Martin Bell (New York: Penguin, 1990).
- (157) 亚历山大·柯瓦雷 (Alexander Koyré, 1892—1964), 法国籍俄罗斯裔哲学家, 主要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 156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Cognition,” welcoming address for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MIT, July 1990, in D. Johnson and C. Emeling, eds., *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omsky, “Language and Nature,” *Mind* 104, no. 413 (January 1995): 1-61, 重印于 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更多未在此处引述的资料, 见最后这一本合集。
- 158 Alexandre Koyré,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59) 弗里德里希·朗格 (Friedrich Lange, 1828—1875), 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早期新康德主义的代表。
- (160) 应指出版于1866年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对其当代意义的批判》(*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一书。
- (161) 伯纳德·科恩 (Bernard Cohen, 1914—2003), 美国科学史专家, 以科学史和牛顿研究见长。
- (162) 约瑟夫·布莱克 (Joseph Black, 1728—1799), 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创造了定量化学分析方法。
- (164) 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1901—1994), 美国化学家, 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之一。
- (165) 即维尔纳·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 德国物理学家,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 163 Arnold Thackray, *Atoms and Pow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66 引自 Gerald Holton, “On the Art of Scientific Imagination,” *Daedalus*, Spring 1996, 183-208。
- (167)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英国哲学家、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是启蒙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和自由主义者。
- 168 引自 V. S. Ramachandran and Sandra Blakeslee, *Phantoms in the Brain*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8)。
- (169) 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 1900—1976) 在《心的概念》一书中认为, 笛卡尔对身体与心灵的理解就像“机器中的幽灵”一样——身体像机器一样外显而机械地服从于物理法则, 而心灵则内隐在身体中自由地活动。

- (170) 儒勒—亨利·庞加莱 (Jules-Henri Poincaré, 1854—1912), 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及科学哲学家, 被公认为相对论的理论先驱。
- 171 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atter* (Leipzig: B. G. Teubner, 1929).
- (172) 大卫·马尔 (David Marr, 1945—1980), 英国神经系统学家、生理学家, 计算神经学的创始人。
- (173) 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 1929—), 奥地利裔美国神经系统学家, 2000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175) 据说圣杯 (Holy Grail) 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饮葡萄酒的用具, 因而有许多有关寻找圣杯的故事。圣杯也用来指“无处寻觅的珍宝”或“努力想得到却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
- 174 R. D. Hawkins and E. R. Kandel, “Is There a Cell-Biological Alphabet for Simple Forms of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91 (1984): 376-391.
- (176) 芭芭拉·希普曼 (Barbara Shipman) 现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数学系。希普曼后来因无法证明自己的推论放弃了该理论。
- (178) 德里克·毕克顿 (Derek Bickerton, 1926—2018), 美国语言学家, 是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界的先锋人物, 尝试从脑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 177 Adam Frank, “Quantum Honeybees,” *Discover* 80 (November 1997).
- 179 Noam Chomsky,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Language* 35, no. 1 (1959): 26-57.
- (180) 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 1954—),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语言学家, 任教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
- (181) charitable reading, 指能够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内容的阅读。
- (182) 即黄金分割数列, 因数学家斐波那契以兔子繁殖为例子引入, 也称作“兔子数列”。
- (183) 理查德·勒沃汀 (Richard Lewontin, 1929—),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数学家、基因学家和社会评论家, 哈佛大学动物学和生物学教授。
- 184 R. C. Lewontin,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 vol. 3, ed. Daniel N. Osherson and Edward E. Smi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229-246.
- 185 Terrence Deacon,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New York: Norton, 1998).
- 186 关于目前对这些话题的讨论, 尤其参见 Jerry Fodor, *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Scope and Limits of Computation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Gary Marcus, “Can Connectionism Save Constructivism?” *Cognition* 66 (1998): 153-182.
- 187 见 Chomsky,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更多有关语言的一般性讨论, 见 Chomsk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5)。

(188) 即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189 这个很少得到公认的假设并非微不足道，关于这点请参见Fodor,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

(190) 通常认为蚂蚁死后身体会发出气味，是吸引其同伴搬运尸体的信号。

191 C. R. Gallistel, ed. *Animal Cognition, Cognition*, special issue, 37, no. 1-2 (1990).

(192) “格式塔”(gestalt)是认知心理学术语，在德语中是“整体”或“形状”的意思，也可译为“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

致谢

感谢André Schiffrin, Ellen Adler, Colin Robinson, Marc Favreau, Sarah Fan, The New Press, Dao Tran, Sean Petty, Brenda Coughlin, James Peck, dix!和Sara Bershtel。也感谢许多曾帮助编辑和出版这些文章的人以及许可将其收入这本合集的人。

版权许可说明

第1篇是在哈佛大学演讲的修改稿，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页。诺姆·乔姆斯基1969和2002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2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67年12月7日），本章内容翻印自《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67—385页。诺姆·乔姆斯基1969和2002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3篇是为丹尼尔·盖林著《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所写的序言的修改稿。略加改动之后，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0年5月21日），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70—386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4篇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3年9月20日），第3—8页。《纽约书评》1973年版权。承蒙《纽约书评》许可使用。

第5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144—164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戴安·乔姆斯基（Diane Chomsky）和哈里·乔姆斯基（Harry Chomsky）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6篇最早出现在《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9), 第21—43页。诺姆·乔姆斯基1989年版权。承蒙House of Anansi, 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7篇是向一次有关战争罪行专题的讨论会投稿的修改稿，主要内容基于泰尔福德·泰勒著《纽伦堡与越南：美国的悲剧》(*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原文发表在《耶鲁法律期刊》第80卷第7期(1971年6月)，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212—258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8篇最早出现在《“人权”与美国的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 Spokesman, 1978)，后来重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86—114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9篇最早出现在《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Towards a New Cold War: U. 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58—369页。诺姆·乔姆斯基1982年版权以及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10篇最早出现在《决定性的三角关系：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3; 扩充版,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9)，第9—37页。诺姆·乔姆斯基1983和1999年版权。承蒙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11篇最早出现在《扭转局势：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5)，第62—73页。诺姆·乔姆斯基1985和1987年版权。承蒙South End Press和Pluto Press许可使用。

第12篇最早出现在《划线的新一代：科索沃、东帝汶和西方的标准》（*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Verso, 2000），第1—47页。诺姆·乔姆斯基2000年版权。承蒙作者本人许可使用。

第13篇为2002年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稿，2002年5月29日发表在网站ZNet上；后来重印在《当务之急》（C. P. Otero, ed., *Radical Priorities*, 3rd ed., Oakland: AK Press, 2003），第319—332页。诺姆·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AK Press许可使用。

第14篇最初发表在2002年8月的《瑞典晚报》（*Aftonbladet*）上，后来被重印在《9·11》（*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第2版，第119—128页。诺姆·乔姆斯基2002年版权。承蒙Seven Stories Press许可使用。

第15篇最早出现在《中东幻象》（*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第227—232页。诺姆·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许可使用。

第16篇最早出现在《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3; New York: Owl Books, 2004），第11—49页。阿维瓦·乔姆斯基、戴安·乔姆斯基和哈里·乔姆斯基2003年版权。承蒙Henry Holt, Inc.许可使用。

第17篇最早出现在《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New York: Owl Books, 2007），第251—263页。受指定委托的乔姆斯基孙辈2006年版权。承蒙Henry Holt, Inc.许可使用。

第18篇最初发表在《语言》（*Language*）第35卷第1期（1959年1—3月），第26—58页。1959年版权。承蒙美国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许可使用。

第19篇最早出现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第v—vii页。麻省理工学院196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0篇最初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方法论初阶”的第一部分 , 第3—9页。麻省理工学院196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1篇是1970年1月8—9日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大学自由与人文科学研讨会”上所做的讲座 , 后来发表在托马斯·R. 戈尔曼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中 , 还被刊登在 *Abraxas* 第1季第1期 (1970年) 和 *ThriQuarterly* 第23—24期 (1972年) 。本章内容重印自《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 第387—408页。诺姆·乔姆斯基1973和2003年版权。承蒙The New Press许可使用。

第22篇最初发表在《语言与知识问题：马那瓜演讲录》(*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 第133—170页。麻省理工学院1988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3篇最早出现在《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第1—11页。麻省理工学院1995年版权。承蒙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4篇最早出现在《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第3—18页。戴安·乔姆斯基2000年版权 (不可撤销信托) 。承蒙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使用。

第25篇最早出现在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主编的《论自然与语言》(*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第61—91页。诺姆·乔姆斯基、亚德里安娜·贝勒提和路奇·瑞兹2002年版权。承蒙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使用。

诺姆·乔姆斯基主要作品目录

(截至2007年)

1951. “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3. “Systems of Syntactic Analysis.”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8, no. 3 (September).

1954. Review of *Modern Hebrew* by E. Reiger. *Language* 30: no. 1 (January-March).

1955. “Logical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ir Linguistic Relevance.” *Language* 31, nos. 12 (January-March).

1955.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Manuscript (microfilm). Reprint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955. “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5. “Semantic Considerations in Grammar.” Monograph no. 8.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Reprints, Berlin and New York, 1985;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1958. “Linguistics, Logic, Psychology, and Computers.”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ch).

1959. Review of *Verbal Behavior* by B. F. Skinner. *Language* 35, no. 1 (January-March).

1961.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 on Generative Grammar.” *Word* 17, no. 2 (August).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Reprint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 20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68. With Morris Hall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 Row. Repri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1968. "Vietnam: A Symptom of the Crisis in America." *Folio* 6, no. 2 (Spring-Summer).

1969. Review of *No More Vietnams*, edited by R. M. Pfeiff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

1969.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1969. "Some Tasks for the Left." *Liberation* 14, nos. 56 (August-September).

1969.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lfare-Warfare State." In *The New Left: A Collection of Essays*, ed. Patricia Long.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0.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Oakland, CA: AK Press, 2005.

1970. "A Visit to Lao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no. 2 (July 23).

1970. "In North Vietna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no. 3 (August 13).

1970. *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70.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71. *Chomsky: Selected Readings*, ed. J. P. B. Allen and Paul Van Bur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68. *Language and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Expande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1972. *Studies on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The Hague:Mouton.

1972. "The Pentagon Papers as Propaganda and as History." In *The Pentagon Papers*, vol. 5, eds. Noam Chomsky and Howard Zinn.Boston: Beacon.

1973. "Endgame: The Tactics of Peace in Vietnam." *Ramparts* 11,no. 10 (April): 25-28, 5-60.

1973. With Edward S. Herman.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Bloodbaths in Fact and Propaganda*, Module no. 57. Andover,MA: Warner Modular Publications.

1973. "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no.4 (September 20).

1974.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Middle East Illusions* below.)

1975.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On Language* below.)

1976. "Conditions on Rules of Grammar." *Linguistic Analysis* 2, no. 4.

1977. "Human Rights: A New Excuse for U.S. Interventions." *Seven Days* 1, no. 8 (May 23).

1977. "Workers Councils: Not Just a Slice of the Pie, But a Hand in Making It." *Seven Days* 1, no. 10 (June 20).

1977. "Why American Business Supports Third World Fascism."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Fall).

1977.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Elsevier North-Holland.

1978.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tingham:Spokesman Books.

1978. "Against Apologetics for Israeli Expansionism." *New Politics*

1978.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See *On Language* below.)

1978.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s." Review of *Just and Unjust Wars* by Michael Walzer. *Inquiry* (April 17).

1979. "The Hidden War in East Timor." *Resist*, January-February.

1979. With Edward S.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 Fascism*, vol. 1. *After the Cataclysm: Postwar Indochin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Ideology*, vol. 2.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0.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Repri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Reprint,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3.

1981. "Resurgent America: On Reagan's Foreign Policy." *Our Generation* 14, no. 4 (Summer).

1981.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m and Fun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1981. *Radical Priorities*, ed. Carlos P. Otero.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Expanded ed., Oakland, CA: AK Press, 2003.

1982. *Towards a New C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eprinted as *Towards a New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from Vietnam to Reagan*.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1982.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Fateful Triangle: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lestinians*.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Expanded ed., Cambridge, MA:South End Press, 1999.

1984. *Modula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Mind*. San Dieg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rimes by victims are called terrorism." In *These Times*, July 24-August 6.

1985. "Dominoes." *Granta* 15 (Spring).

1985. *Turning the Tide: U.S. Interven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Expanded ed.,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8;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6. "The Soviet Union vs. Socialism." *Our Generation* 7, no.2(Spring/Summer).

1986. *Barri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Visions of Righteousness." *Cultural Critique*, no. 3 (Spring).

1986. "Middle East Terrorism and the US Ideological System." *Race and Class* 28, no.1.

1986. *Pirates and Emperor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Claremo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Brattleboro, VT: Amana Books;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7. (See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below.)

1987. *On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7.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The Chomsky Reader*, ed. James Peck.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The Culture of Terrorism*.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88.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 Carlos P. Otero.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Expanded ed., Oakland, CA: AK Press, 2004.

1988. "Scenes from the Uprising." *Z Magazine*, July/August.

1988.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 Turning Point ?" *Z Magazine*, May.

1988. With Edward S. Herman.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Expanded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1989.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0. "The Dawn, So Far, Is in the East." *Nation*. 250, no.4 (January 29).

1991. *On U.S. Gulf Policy*.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1. 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1.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mage and Reality." In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ed. Alexander George, 1238. Oxford: Polity Press.

1991.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Robert Freid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The New World Order*.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6. 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1. *Deterring Democracy*. New York: Verso. Expanded ed., London: Vintage, 1992;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1991.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no. 10. Westfield, NJ: Open Media. Expanded 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2.

1992. "'What We Say Goes':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 *Collateral Damage: The "New World Order" at Home and Abroad*, ed. Cynthia Peter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2. "Language and Mind: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alk given at the Commemorative Lecture Meeting, 1988 Kyoto Prizes, Kyoto, November 11, 1988. In *Kyoto Prizes and Inamori Grants*,

1988.Kyoto: Inamori Foundation.

1992.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Cambridge, MA: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Reprinted in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ds.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1992. *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 Berkeley: Odonian Press.

1992. With David Barsamian. *Chronicles of Dissent*.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3. "The Masters of Mankind." *Nation*. March 29.

1993. *Enter a World That Is Truly Surreal: President Clinton's Sudden,Use of International Violence*. Westfield, NJ: Open Media.

1993. "On US Gulf Policy." In *Open Fire: The 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 Anthology*, eds. Greg Ruggiero and Stuart Sahulka.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Letters from Lexington: Reflections on Propaganda*. Monroe,ME: Common Courage Press; Toronto, ON: Between the Lines.Expanded ed.,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1993.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Rethinking Camelot: JFK, the Vietnam War, and U.S.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Language and Thought*. Wakefield, RI: Moyer Bell.

1993.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Prosperous Few and the Restless Many*. Berkeley, CA: Odonian Press.

1994.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oston Review* 18, no. 6 (December 1993-January 1994).

1994.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panded e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4. With David Barsamian. *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Monroe, ME:Common Courage Press.

1994. With David Barsamian. *Secrets, Lies and Democracy*. Berkeley,CA: Odonian Press.

1995. "Rollback." In *The New American Crisis: Radical Analyses of the Problems Facing America Today*, eds. Greg Ruggiero and Stuart Sahulk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Memories." *Z Magazine*, July/August.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With David Barsamian. *Class Warfa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6. "'Consent without Consent':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44, no. 4.

1996. *Powers and Prospect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St. Leonards,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1996. "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 of Denmark." Review of *In Retrospect* by Robert McNamara. In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 3(Summer).

1997.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On Language: Chomsky's Classic Works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in One Volum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With David Barsamian. *The Common Good*. Monroe, ME:Odonian Press.

1998. "Power in the Global Arena." *New Left Review* 230 (July/August).

1999. *The Umbrella of U.S. Power: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U.S. Policy*.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1999.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Monroe,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With Heinz Dieterich. *Latin America: From Colo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Melbourne: Ocean Press.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9, no. 3.

1999. "Domestic Terrorism: Notes on the State System of Oppression." *New Political Science* 21, no. 3.

2000. "US Iraq Policy: Motives and Consequences." In *Iraq Under Siege: The Deadly Impact of Sanctions and War*, ed. Anthony Arnone.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Cambridge,MA: South End Press.

2000.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Kosovo, 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Chomsky on MisEducation*, edited by Donaldo Macedo. 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ed. Nirmalangshu Mukherji,Bibudhendra Narayan Patnaik, and Rama Kant Agnihotr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ith David Barsamian. *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Conversations with Noam Chomsky*.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1. "Elections 2000." *Z Magazine*, January.

2001. "Update: Elections." *Z Magazine*, February.

2001. *9-11*, ed. Greg Ruggiero.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Expanded ed.,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2002. *Understanding Power: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eds. Peter R. Mitchell and John Schoeffe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s. Adriana Belletti and Luigi Rizz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th W. Tecumseh Fitch and Marc D. Hauser.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 " *Science* 298 (November 22).

2002.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3. *Power and Terror: Post-9/11 Talks and Interviews*, eds. John Junkerman and Takei Masakazu.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Chomsky o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ed. Carlos P. Otero.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3. *Middle East Illus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Expanded ed., New York: Owl Books, 2004.

2003.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 Revisited: Discussions with Riny Huybregts, Henk van Riemsdijk, Naoki Fukui and Mihoko Zushi*.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4. "Turing on the 'Imitation Game.'" In *The Turing Test*, ed. Stuart Shieb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Linguistics Inquiry* 36, no. 1 (Winter).

2005. "What We Know: On the Universals of Language and Rights." *Boston Review* 30, nos. 34 (Summer).

2005. With W. Tecumseh Fitch and Marc D. Hau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larif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Cognition* 97, no. 2 (September).

2005.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Open Media.

2005. *Chomsky on Anarchism*. Oakland: AK Press.

2005. *Imperial Ambitions: Conversations of the Post-9/11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Paperback ed., New York: Owl Books, 2007.

2006. "Latin America at the Tipping Poi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no. 46 (March/ April).

2006. "On Phases." In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ds.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and Maria-Luisa Zubizarret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With Gilbert Achcar. *Perilous Power: The Middle East and U.S. Foreign Policy: Dialogues on Terror, Democracy, War and Justice*, ed. Stephen R. Shalo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Intervention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With Ervand Abrahamian, David Barsamian, and Nahid Mozaffari. *Targeting Ira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Inside Lebanon: Journey to a Shattered Land with Noam and Carol Chomsky*, ed. Assaf Kfo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7. With David Barsamian. *What We Say Goes: Conversations on U.S. Power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索引

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国王 Abdullah,king of Saudi Arabia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阿富汗 Afghanistan

苏联入侵 Soviet invasion of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阿根廷 Argenti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d IMF

新纳粹分子 neo-Nazis in

与贸易集团 and trading blocs

阿罕默德，阿吉兹 Ahmad, Aijaz

阿加米，福阿德 Ajami, Fouad

阿克兰，莱恩 Ackland, Len

阿拉伯联盟 Arab League

阿拉法特，亚西尔 Arafat, Yasser

阿里斯蒂德，让 - 贝特朗 Aristide, Jean-Bertrand

阿连德，萨尔瓦多 Allende, Salvador

阿美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 Aramco, in Saudi Arabia

阿明，伊迪 Amin, Idi

阿普尔，R.W. Apple, R.W.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与获取伊朗石油 and access to Iranian oil

在阿塞拜疆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阿什克罗夫特，约翰 Ashcroft, John

阿斯纳尔，何塞·马利亚 Aznar, José Maria

埃班，阿巴 Eban, Abba

埃尔斯伯格，丹尼尔 Ellsberg, Daniel

埃及 Egypt

英国在埃及的利益 British interests in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拉冯事件 Lavon affair in

美国对埃及的援助 U.S. aid to

埃克森石油公司 Exxon Mobil

埃利希曼，约翰 Ehrlichman, John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与厄立特里亚 and Eritre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意大利 and Italy

埃塞俄比亚战争 war in

艾布拉姆斯，小克莱顿 Abrams, Creighton W., Jr.

艾尔索普，约瑟夫 Alsop, Joseph

艾奇逊，迪安 Acheson, Dean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威尔政府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与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 and Arab hatred of U.S.

在冷战中的艾森豪威尔政府 in Cold War

艾希曼，卡尔·阿道夫 Eichmann, Karl Adolf

爱泼斯坦，塞缪尔 Epstein, Samuel

安德鲁斯，布鲁斯 Andrews, Bruce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杰克 Anderson, Jack

安德森，特里 Anderson, Terry

安第斯山地区 Andean region

安南，科菲 Annan, Kofi

奥伯道夫，唐 Oberdorfer, Don

奥坎波，何塞·安东尼奥 Ocampo, José Antonio

奥尼尔，托马斯·菲利普“提普”O'Neill, Thomas p. “Tip”

奥斯本，约翰 Osborne, John

奥斯陆和平协议 Oslo peace agreements

奥威尔，乔治 Orwell, George

奥兹，阿摩斯 Oz, Amos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巴蒂斯塔，富尔亨西奥 Batista, Fulgencio

巴尔金，杰克 Balkin, Jack

巴尔，拉达宾诺德 Pal, Radhabinod

巴尔尼亚，内厄姆 Barnea, Nahum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枯宁，米哈伊尔 Bakunin, Michael

巴拉克，埃胡德 Barak, Ehud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勒斯坦选举 elections in

在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Hama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约旦 and Jordan

巴勒斯坦的权利 rights of

与联合国投票 and UN votes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巴黎协定》(1973年) Paris Agreements(1973)

巴列维, 礼萨·沙阿 Pahlavi, Reza Shah

巴甫洛夫的条件作用 Pavlovian conditioning

巴特勒, 理查德 Butler, Richard

巴西 Brazil

与中国 and China

美国对巴西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柏拉图 Plato

邦迪, 麦克乔治 Bundy, McGeorge

邦迪, 威廉 Bundy, William

保罗, 威廉 Paul, William

保罗, 希腊国王 Paul, king of Greece

鲍林, 查理 Bohlen, Charles

鲍林, 莱纳斯 Pauling, Linus

鲍威尔, 科林 Powell, Colin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北约 NATO

北约的信誉 credibility of

与东欧的稳定 and Eastern Europe stability

成立50周年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轰炸塞尔维亚 Serbia bombed by

在土耳其 in Turkey

北约部队在马其顿 Macedonia, NATO troops in

北越 North Vietnam

抵抗北越的集体自卫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gainst

北越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of

北越的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of

北越寻求谈判 negotiations sought by

美国轰炸北越 U.S. bombing of

另见“越战” *see also* Vietnam War

贝尔，丹尼尔 Bell, Daniel

贝尔纳斯，詹姆斯 F. Byrnes, James F.

贝京，梅纳赫姆 Begin, Menachem

贝克三世，詹姆斯 Baker, James A.

贝卢斯科尼，西尔维奥 Berlusconi, Silvio

本 - 阿米，什洛莫 Ben-Ami, Shlomo

本 - 埃里萨尔，埃利亚胡 Ben-Elissar, Eliahu

本 - 古理安，大卫 Ben-Gurion, David

本·拉登，奥萨马 bin Laden, Osama

本·拉登组织 bin Laden network

比彻，威廉 Beecher, William

比蒂，詹姆斯 Beattie, James

必需规则 obligatory rules

毕克顿，德里克 Bickerton, Derek

《波茨坦协定》 Potsdam agreements

波德霍雷茨，诺曼 Podhoretz, Norman

波顿，威廉 Borden, William

波尔 - 罗瓦雅尔语法 Port Royal Grammar

波尔布特 Pol Pot

波尔，乔治 Ball, George

波兰尼，卡尔 Polanyi, Karl

波兰拖网渔船“卡尔玛”号事件 Poland, *Kalmar* trawler incident

波隆，阿蒂略 Borón, Atilio

波拿巴，拿破仑 Bonaparte, Napoleon

《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波斯尼亚 Bosnia

波斯特 Post, E. L.

玻利维亚 Bolivia

剥夺，斯金纳的术语 deprivation, Skinner's use of term

伯格，桑迪 Berger, Sandy

伯利 Berle, A. A.

伯罗 Burrow, J. W.

伯尼斯，爱德华 Bernays, Edward

勃列日涅夫主义 Brezhnev doctrine

博卡萨，让 - 贝德尔 Bokassa, Jean-Bédel

布伯，马丁 Buber, Martin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

布莱尔，托尼 Blair, Tony

和小布什 and G. W. Bush

和伊拉克 and Iraq

和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and NATO's bombing of Serbia

和北约的信誉 and NATO's credibility

布莱克，约瑟夫 Black, Joseph

布莱斯堡，盖尔 Pressberg, Gail

布朗，马尔科姆 Browne, Malcolm

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阶段 Bretton Woods economic phase

布莱肯，哈里 Bracken, Harry

布利特，威廉 Bullitt, William

布林克利，乔尔 Brinkley, Joel

布隆菲尔德，莱纳德 Bloomfield, Leonard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洛杰特 Blodgett, H. C.

布什，乔治 W. Bush, George W.

统治世界的目标 aim to rule the world

与布莱尔 and Blair

践踏民权 civil rights stomped on by

信任度下滑 decline of trust in

与伊朗 and Iran

与伊拉克 and Iraq

狭隘的公司利益观 narrow corporate interests of

与国家安全战略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宣传成果 propaganda output of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国情咨文（2003年）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2003)

与恐怖主义 and terrorism

与美国被孤立 and U.S. isolation

作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as threat to world peace

布什，乔治·H. W. Bush, George H. W.

老布什政府 administration of

与民意 and public opinion

任联合国大使 as UN ambassador

布特，马克斯 Boot, Max

财产 property

废除财产 abolishing

无政府主义与财产 anarchism vs.

财产权 right of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蔡斯，詹姆斯 Chace, James

参数设定 parameter setting

操作性条件作用 operant conditioning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behavior

操作性行为 operants

车臣 Chechnya

彻巴，约瑟夫 Churba, Joseph

彻恩，利奥 Cherne, Leo

成熟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s of growth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s

可辨别操作性行为 discriminated

回声操作性行为 echoic

言内操作性行为 intraverbal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操作性言语行为 verbal

操作性言语行为 verbal operant

作为操作性言语行为的因物知觉语 tact as

术语的使用 use of term

查韦斯，乌戈 Chávez, Hugo

长崎 Nagasaki

长征 Truong Chinh

朝鲜 Korea

非军事区 demilitarized zone (DMZ) in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of

核能力 nuclear capability of

美国空军有关朝鲜的报告（1953年）USAF report on (1953)

美国干涉朝鲜（1945年）U.S.intervention in (1945)

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成熟期与语言运用 maturation, and performance

橙剂 Agent Orange

创造力、创造性 creativity

与大脑 and brain

与选择 and choices

与语言 and language

创造性原则 creative principle

刺激 stimulus

新鲜、多样的刺激 novelty and variety in

强化刺激 reinforcing

与反应 and response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刺激辨别，斯金纳的术语使用 stimulus discrimination, Skinner's use of term

刺激泛化 stimulus generalization

刺激控制 stimulus control

先行刺激控制 prior

与因物知觉语 and tacts

刺激（作用）stimulation

厌恶性刺激（作用）aversive

刺激（作用）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达德曼，理查德 Dudman, Richard

达尔德，伊沃 Daalder, Ivo

达尔文，查尔斯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进化论 Darwinian evolution

达扬，摩西 Dayan, Moshe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bsence of

用于震慑美国力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s deterrent against U.S.
powers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 inspections for

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意图 intention to develop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广泛使用 proliferation of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宣传 propaganda about

大脑 brain

与认知科学 and cognitive sciences

与交际 / 交流 and communication

另见“语言” *see also* language

与创造性 and creativity

大脑的显现属性 emergent properties of

与进化 and evolution

有关大脑的功能视角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与可理解性 and intelligibility

与语言 and language

大脑的学习机制 learning mechanisms of

有关大脑的机械解释 mechanical explanation of

有关大脑的方法论观点 methodological thesis of

与心智 - 物体问题 and mind-body problem

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 neuro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of

有关大脑的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in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作为大脑产物的思维 thought as product of

大区域 Grand Area

在亚洲 in Asia

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大区域的规划 CFR planning for

侵蚀大区域 erosion of

将美国的道德原则灌输给忘恩负义的世界 instilling U.S. moral principles in an ungrateful world

动用军事力量维护大区域 military force for preservation of

在大区域内竞争的其他国家 other nations competing in

重建大区域 reconstitution of

美国获取大区域的资源 U.S. access to resources of

与美国经济 and U.S. economy

与控制世界 and world control

大屠杀 Holocaust

大西洋盆地资源 Atlantic Basin resources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ii,

大众媒体 mass media

对大众媒体的约束 constraints on

大众媒体中的公司寡头垄断 corporate oligopoly in

与专家崇拜 and cult of expertise

大众媒体的民主模式 democratic models of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美国干涉国外大众媒体 foreign, U.S.intervention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以工人为导向的大众媒体 labor-oriented

大众媒体中的宣传 propaganda in

与公共关系产业 and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由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体 state-controlled

被大众媒体隐瞒的实情 stories concealed by

被大众媒体忽略的事实 stories ignored by

大众媒体中的思想控制 thought control in

大众媒体的恶意 viciousness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戴高乐，夏尔 de Gaulle, Charles

戴林格，戴夫 Dellinger, Dave

戴维斯，保罗 Davies, Paul

戴维斯，鲍勃 Davis, Bob

戴维营提议 Camp David proposals

导弹防御 missile defense

道德多数派 Moral Majority

道尔，约翰 Dower, John

德国 Germany

德国的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德国好人” “good Germans”

慕尼黑类比 Munich analogy

纳粹 Nazi

“一战”后 post-World War I

重新武装德国、扩充军备 rearmament of

德国统一 unification of

与“二战” and World War II

德克努瓦，雅克 Decornoy, Jacques

德勒姆斯，罗纳德 Dellums, Ronald

德米扬鲁克，约翰 Demjanjuk, John

德维莱尔，菲利普 Devillers, Philippe

德耶格，R. J. de Jaegher, R. J.

狄巴马，安东尼 DePalma, Anthony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迪恩斯特比尔，吉瑞 Dienstbier, Jiri

迪戈加西亚岛 Diego Garcia

迪肯，特伦斯 Deacon, Terrence

笛卡尔，勒内 Descartes, René

与接触机械论 and contact mechanics

与自由选择 and free choice

与语言产出（笛卡尔问题） and language production (Descartes's problem)

宇宙机械论 mechan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与心智 - 物体问题（二元论）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dualism)

论人性 on nature of man

论唯理主义 on rationalism iii,

与第二物质 and second substance (*res cogitans*)

笛卡尔模式，见“勒内·笛卡尔”Cartesian model, see Descartes, René

抵抗 resistance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抵抗 as civil disobedience

抵抗形式 forms of

国际抗议日（1965年） International Days of Protest (1965)

作为道德责任 as moral responsibility

抵抗政府官方声明 to official government statements

和平示威（1967年） peace demonstrations (1967)

抵抗的目的 purposes of

从异见到抵抗的转变 transition from dissent to

从抵抗转为暴力 transition to violence

抵抗的圈子扩大 widening circle of

抵抗征兵运动 draft resistance

地心引力 gravitational force

帝国大战略，见“国家安全战略”imperial grand strategy, *se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帝汶解放运动 Timorese Liberation Move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 aerial bombing in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比comparisons with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文献证据documentary evidence in

与犹太人大屠杀 and Holocaust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人的素质leadership quality in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in

与纽伦堡，见“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see* Nuremberg Tribunal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的军火ordnance expended in

与珍珠港 and Pearl Harbor

战后国际秩序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 postwar U.S.foreign policy

第二物质 second substance

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的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在第三世界建立民主 democracy building in

第三世界的思想家 ideologists of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in

与不结盟运动 and nonaligned movement

第三世界的革命游击战 revolutionary guerrilla warfare in

第三世界的革命 revolution in

第三世界的技术 technology in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进入第三世界 U.S. access to

与美国的坦诚 and U.S. sincerity

美国以武力向第三世界推行其意愿 U.S. will imposed by force on

第五世界 Fifth World

第五种自由 Fifth Freedom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克里尔委员会 Creel Commission

战后反共产主义 postwar anti-Communism

战后的巴伐利亚postwar Bavaria

电视 television

德桑蒂兰，迭戈·阿巴德 Santillán, Diego Abad de

定势和注意力 set, and attention

定义，术语的使用 definition, uses of term

东帝汶 East Timor

毁坏东帝汶的庄稼 crop destruction in

与印度尼西亚 and Indonesia

媒体对东帝汶问题的沉默和偏袒media silence and slant on

东帝汶的石油 oil in

东帝汶的政党 political parties in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 as Portuguese colony

来自东帝汶的难民 refugees from

东帝汶寻求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 sought by

与主权 and sovereignty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军事援助 and U.S. military aid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Fretilin party, East Timor

冬日士兵调查团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动机 motivation

作为动机的新鲜、多样的刺激 novelty and variety of stimulus as

作为动机的强化 reinforcement as

动态法则 dynamic laws

动物行为 animal behavior

应用于人类的动物行为 applicability to humans

间歇强化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effects of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on

动物行为中被区分的外部因素 external factors isolated in

动物行为的印刻 imprinting of

动物行为中的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 in

动物行为的机械原理 mechanical principle of

与心智 - 物体思考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动物行为的范围和局限 scope and limitations of

动植物演化史 phylogenesis

《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杜恩，詹姆斯 Dunn, James

杜勒斯，约翰·福斯特 Dulles, John Foster

杜鲁门政府 Truman administration

与商业 and business

在冷战期间 in Cold War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杜马尔赛 Du Marsais, C. Ch.

杜威，约翰 Dewey, John

对符号刺激的反应 sign stimuli, responses to

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 to Monroe Doctrine

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 Wilson corollary to Monroe Doctrine

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1993年）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 on
(1993)

对输入 - 输出关系的研究 input-output relations, study of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俄国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俄罗斯 / 苏联 Russia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s in

与中欧 and Central Europe

与车臣 and Chechnya

与帝国 and empire

支持下的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supported by

与北约 and NATO

清洗运动 purges in

“红色官僚” “red bureaucracy” of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与“二战” and World War II

另见“苏联” *see also* Soviet Union

厄瓜多尔 Ecuador

厄立特里亚 Eritrea

遏制，全球政策 containment, global policy of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二级强化物”，斯金纳用语“secondary reinforcer,”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发声 - 感知系统 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

发声，术语使用 articularity, use of term

法伯，迈克尔 Ferber, Michael

法尔，伯纳德 Fall, Bernard

关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看法 on UN Charter, article

关于越南的看法 on Vietnam

法国 France

与阿尔及利亚 and Algeria

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帝国 and empire

与印度支那 and Indochina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恐怖统治 Reign of Terror in

与沙特阿拉伯 and Saudi Arabia

（法兰西）第二帝国 Second Empire of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支持美国革命 support in American Revolution

与否决联合国决议 and UN vetoes

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法赫德计划（1981）Fahd Plan (1981)

法瑞尔，威廉 Farrell, William

法若尔，托马斯 Farer, Thomas J.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崇拜 fascism, state-worship of

反诽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反恐战争” “war on terror”

与生物恐怖 and bioterror

与国内选举 and domestic elections

在“反恐战争”中被削弱的国内自由 domestic freedoms curtailed in

与太空军事化 and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反恐战争”中的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 in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反馈 feedback

反叛乱的官方政策 counterinsurgency, official policy of

反应 response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

反应的频率 frequency of

与刺激 and stimulus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反应分化”，斯金纳的用语 “response differentiation,”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反应强度”，斯金纳的用语 “response strength,” Skinner’s use of phrase

泛化、概括 generalization

方法论观点 methodological thesis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另见“抵抗” *see also* resistance

非洲 Africa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美国的非洲政策 U.S. policies in

菲律宾 Philippines

来自菲律宾的船民 boat people from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斐波那契数列 Fibonacci series

索绪尔，费尔迪南·德 Saussure, Ferdinand de

菲舍尔，阿道夫 Fischer, Adolph

佛朗哥，弗朗西斯科 Franco, Francisco

弗拉潘，西姆哈 Flapan, Simha

弗莱舍，阿里 Fleischer, Ari

弗兰克尔，麦克斯 Frankel, Max

弗兰克，托马斯 Franck, Thomas M.

法兰士，阿纳托尔 France, Anatole

费尔南德斯，弗朗斯科·马利亚 Fernandes, Father Francisco Maria

弗雷德里卡王后（希腊） Frederika, Queen (Greece)

弗里德曼，托马斯 Friedman, Thomas

弗罗姆金，戴维 Fromkin, David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福尔克，理查德 Falk, Richard

福克兰群岛战争 Falklands war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 pluralistic society of

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 scholar-experts on

福山，弗朗西斯 Fukuyama, Francis

福塔斯，艾毕 Fortas, Abe

福特，杰拉尔德 Ford, Gerald R.

福特政府与东帝汶 Ford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Timor

傅立叶，夏尔 Fourier, Charles

富布莱特，威廉 Fulbright, J. William

盖尔布，莱斯利 Gelb, Leslie

盖林，丹尼尔：Guérin, Daniel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观点 on Spanish revolution

概念 - 意向系统 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

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 Haymarket riots (1886)

刚果 Congo

联合国维和人员 UN peacekeepers i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刚性原则 rigidity principle

冈萨雷斯，豪尔赫·纳波莱昂 Gonzales, Jorge Napoleón

戈德堡，阿瑟 Goldberg, Arthur

戈德曼，弗朗西斯科 Goldman, Francisco

戈林，赫尔曼 Goering, Hermann

哥伦比亚 Colombia

非暴力抵抗或公民的不服从运动 civil disobedience in

工人或劳工 labor in

毒品贩卖 narco-trafficking in

难民 refugees in

美国的军事援助 U.S. military aid to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作为民主模范 as model democracy

革命 revolution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与审查 and censorship

革命的蔓延 contagion of

民主要素 democratic elements in

与自由 and freedom

工业社会的革命 in industrial society

与不平等 and inequality

民族革命 nationalist

规范革命 normative

人民战争 people's wars

卢梭论革命 Rousseau on

社会革命 social

自发的革命行动 spontaneous action of

第三世界革命 in Third World

术语用法 uses of term

民族解放战争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see also* specific nations

格伦农，迈克尔 Glennon, Michael

格雷布纳，诺尔曼 Graebner, Norman

格里宾，约翰 Gribbin, John

格里菲斯，菲利普·琼斯 Griffiths, Philip Jones

格里斯泰尔，C. R. Gallistel, C. R.

格林斯潘，艾伦 Greenspan, Alan

格林威，大卫 Greenway, David

格式塔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

格特茨曼，伯纳德 Gwertzman, Bernard

各种科学的统一 sciences, unification of

工人管理运动 workers' control movement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公共廉政中心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与干草市场暴乱（1886年） and Haymarket riots (1886)

与“五一”节 and May Day

与麦卡锡主义 and McCarthyism

战后对共产党的打击 postwar attacks on

红色恐慌 Red Scare

古巴 Cuba

猪湾 Bay of Pigs

冷战中的古巴 in Cold War

对古巴的大量资本馈赠 massive capital gifts to

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i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与委内瑞拉 and Venezuela

古巴导弹危机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德曼，米切尔 Goodman, Mitchell

古德温，理查德 Goodwin, Richard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iii,

古特雷斯，阿波利纳里奥 Guterres, Father Apolinario

关塔那摩监狱 Guantánamo prison camp

《官方机密法》 Official Secrets Act

广岛 Hiroshima

国会研究服务局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国际安全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被迫默许 coerced acquiescence in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敌方对国际法置之不理 disregarded by the enemy

与《日内瓦公约》 and Geneva Conventions

大国干涉 and great-power intervention

作为“空话”的国际法 as “hot air”

对国际法不一致的使用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与正义 and justice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üez* incident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新规范 new norms of

与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Tribunal

认可帝国主义行为的国际法 as ratification of imperialist practice

与美国的帝国大战略 and U.S.imperial grand strategy

有效性 validity of

与对越南的战争罪 and war crimes in Vietnam

与侵略战争 and wars of aggression

毫无道德力量的国际法 as without moral force

国际审判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法庭 World Court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国际共和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国际红十字会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关塔那摩监狱 and Guantánamo prison camp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监督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国际救援委员会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国际抗议日（1965年） International Days of Protest (1965)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国际政策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48/1号文件 NSC 48/1

68号文件 NSC 68

5429/2号文件 NSC 5429/2

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外交政策精英所担忧的问题 concerns of foreign policy elite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忽视的国内公民自由 domestic civil liberties
disregarded in

作为预防性战争实验的国家安全战略 as experiment in preventive
war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刻意忽视 intentional ignorance in

国家安全战略中国际法的新规范 new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官方说法 official rhetoric of

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永久性统治世界 permanent global rule as
aim of

与联合国 and UN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推行美国霸权 U.S.hegemony enforced in

《国家的起源和作用》（保罗）, *The State,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
(Paul)

《国家卫报》 *National Guardian*

《国家行为的局限》（洪堡） *Limits of State Action* (Humboldt)

《国家与革命》（列宁）， *State and Revolution* (Lenin)

《国土报》 *Ha'aretz*

哈达尔，里昂 Hadar, Leon

哈金，汤姆 Harkin, Tom

哈里森，塞利格 Harrison, Selig

哈里斯，泽里格 Harris, Zellig iii

哈维尔，瓦茨拉夫 Havel, Vaclav

海德格尔，马丁 Heidegger, Martin

海地 Haiti

海恩斯，杰拉尔德 Haines, Gerald

海森堡，维尔纳 Heisenberg, Werner

海湾战争（

海蜗牛的学习 marine snails, learning in

海牙大会（1907年） Hague Convention(1907)

韩国民航客机KAL 007号航班 KAL 007

汉弗莱，休伯特 Humphrey, Hubert H.

汉密尔顿，李 Hamilton, Lee

豪，欧文 Howe, Irving

豪泽，马克 Hauser, Mark

和平基金会 Fund for Peace

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 Citizens Committee for Peace with Freedom

和平运动 peace movement

河内，见“北越” Hanoi, *see* North Vietnam

赫尔，科德尔 Hull, Cordell

赫尔曼 Herman, E. S.

赫尔佐克，哈伊姆 Herzog, Haim

亨德森，奥兰 Henderson, Oran

亨廷顿，塞缪尔 Huntington, Samuel

轰炸利比亚 Libya, bombing of

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红色恐慌 Red Scare

《红线协定》（1928年）Red Line agreement (1928)

洪堡，威廉·冯 Humboldt, Wilhelm von

关于教育（人类潜能的发展）的观点 on *Bildung* (development of human potential)

关于人性的观点 on human nature

关于语言生成的观点 on language generation (*erzeugen*)

语言“对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language “makes 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ans”

《国家行为的局限》 *Limits of State Action*

关于私人权力的观点 on private power

关于国家角色的观点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洪都拉斯 Honduras

侯赛因尼，哈特姆 Hussaini, Hatem

侯赛因，萨达姆 Hussein, Saddam

G. W.布什与萨达姆对比 G.W. Bush compared with

与伊朗 and Iran

与科威特 and Kuwait

与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and Osirak nuclear reactor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宣传 and U.S. propaganda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忽视 ignorance

与非洲的战争 and African wars

与对哥伦比亚的援助 and Colombian aid

与东帝汶种族屠杀 and East Timor genocide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道德自明之理 of moral truisms

与北约轰炸 and NATO bombing

新时代的忽视 new era in

与土耳其的种族清洗 and Turkey's ethnic cleansing

美国帝国大战略的忽视 in U.S.imperial grand strategy

胡克，悉尼 Hook, Sidney

胡普斯，汤森德 Hoopes, Townsend

胡志明 Ho Chi Minh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华生，约翰 Watson, John B.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环境主义 environmentalism

黄晋发 Huynh Tan Phat

黄正德 Huang, James

回声操作性反应，术语使用 echoic operant, use of term

回声总库 echoic repertoire

霍尔斯特，威廉 Holst, Willem

霍夫，杰瑞 Hough, Jerry

霍华德，迈克尔 Howard, Michael

机器 machines

智力行为 intelligent behavior of

术语的使用 use of term

机械和铸造工人联合会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Foundry
workers' Union

机械主义与心灵主义 mechanism vs. mentalism

基地组织 Al-Qaeda

吉勒博阿，阿莫斯 Gilboa, Amos

基什内尔，内斯托尔 Kirchner, Néstor

基辛格，亨利 Kissinger, Henry A.

关于“专家时代”的评论 on the “age of the expert”

关于民主的看法 on democracy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关于对外政策和个人权力的看法 on foreign policy and private
power

关于国际秩序的看法 on international order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uez incident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of

关于政治家特点的描述 on statesmanship

关于动用武力的看法 on use of force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基亚路，克里斯 Giannou, Chris

激进批评 radical critique

吉姆林，巴鲁克 Kimmerling, Baruch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记数能力 number faculty

技术 technology

政府对技术的补贴 government subsidy of

不涉及价值的技术 value-free

技术评价处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

加卢奇，罗伯特 Galluci, Robert

加拿大 Canada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不信任美国 U.S. distrusted by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加西亚，卢卡斯 Garcia, Lucas

贾达，蒂姆 Judah, Tim

柬埔寨 Cambodia

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uez* incident

在柬埔寨参与行动中失踪的人或士兵 MIAs in

民愤，公众对柬埔寨问题的愤慨 public indignation over

难民 refugees in

苏联的援助 Soviet aid to

泰国雇佣兵 Thai mercenaries in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轰炸柬埔寨 U.S. bombing of

美国在柬埔寨的化学战 U.S. chemical warfare in

美国的军事入侵 U.S. military aggression in

美国的颠覆性活动 U.S. subversive activities in

越南入侵 Vietnamese invasion of

有关柬埔寨的白皮书 white Book of

伽利略·伽利雷 Galileo Galilei

交流、交际 communication

与大脑 and brain

比较（交流、交际） comparative

交流、交际的进化 evolution of

人或人类，见“语言” human, *see* language

其他物种的交流、交际 in other species

接触机械论 contact mechanics

杰弗逊，托马斯 Jefferson, Thomas

杰克逊，罗伯特 Jackson, Robert H.

杰维斯，罗伯特 Jervis, Robert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金奇，乔恩 Kimche, Jon

津恩，霍华德 Zinn, Howard

进化 evolution

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s

经济政策研究院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经验论 empirical thesis

句法 - 形态分离 syntax-morphology divide

句法理论 syntax, theory of

句子结构 sentence structure

与语法规则 and rules of grammar

斯金纳有关句子结构的观点 Skinner's view of

卡杜里，伊玛德 Khadduri, Imad

卡恩，赫尔曼，《论热核战争》 Kahn, Herman, *On Thermonuclear War*

卡德，安德鲁 Card, Andrew

“卡尔玛”号（波兰拖网渔船） *Kalmar*(Polish trawler)

卡尔尼，约阿夫 Karni, Yoav

卡根，罗伯特 Kagan, Robert

卡里什，唐纳德 Kalish, Donald

卡利中尉，威廉 Calley, William L.

卡罗瑟斯，托马斯 Carothers, Thomas

卡迈克尔，斯托克利 Carmichael, Stokely

卡诺，斯坦利 Karnow, Stanley

卡佩柳克，阿姆农 Kapeliouk, Amnon

卡斯特罗，菲德尔 Castro, Fidel

卡特，吉米 Carter, Jimmy

卡特政府 Carter administratio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对人权的关注 human rights as focus in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Keynesian economic policies

凯姆，亨利 Kamm, Henry

凯南，乔治 Kennan, George

坎德尔，埃里克 Kandel, Eric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康纳利，约翰 Connally, John B.

康特里曼，爱德华 Countryman, Edward

柯尔克，加布里尔 Kolko, Gabriel

柯芬，弗兰克 Coffin, Frank M.

柯克，唐纳德 Kirk, Donald

柯伦，詹姆斯 Curran, James

柯瓦雷，亚历山大 Koyré, Alexander

科恩，伯纳德 Cohen, I. Bernard

科恩，乔舒亚 Cohen, Joshua

科恩，威廉 Cohen, William

科尔比，威廉 Colby, William

科芬，威廉·斯隆 Coffin, William Sloane

科默，罗伯特·W. Komer, Robert W.

科索沃 Kosovo

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Albanian population in

科索沃的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in

媒体的关注 media attention to

北约轰炸科索沃 NATO bombing of

“马蹄铁行动” Operation Horseshoe in

作为先例 as precedent

来自科索沃的难民 refugees from

和塞尔维亚 and Serbia

科索沃核查团 Kosovo Verification Mission (KVM)

科索沃解放军 Kosovo Liberation Army

科威特 Kuwait

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构建能力 science-forming capacity

科学信念与意识形态信仰 scientific-beliefs vs.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可辨别操作性行为”，斯金纳用语“discriminated operant,”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可观察量，术语使用 observables, use of term

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

“可能性”，斯金纳的术语 “probability,” Skinner’s use of term

克拉夫特，约瑟夫 Kraft, Joseph

克拉克，韦斯利 Clark, Wesley

克拉雷，迈克尔 Klare, Michael

克利奥（历史女神） Clio (goddess of history)

克莱默，亚当 Clymer, Adam

克莱因迪恩斯特，理查德 Kleindienst, Richard

克兰斯顿，艾伦 Cranston, Alan

克里尔委员会 Creel Commission

克里斯托弗，沃伦 Christopher, Warren M.

克里斯托，欧文 Kristol, Irving

克利福德，克拉克 Clifford, Clark

克林顿，比尔 Clinton, Bill

与波斯尼亚 and Bosnia

与前南斯拉夫 and former Yugoslavi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与北约 and NATO

克林顿政府 Clinton administration

非洲政策 African policies of

援助土耳其 aid to Turkey from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刻意忽视 intentional ignorance of

与预先回应 and preemptive response

与联合国 and UN

克林顿主义 Clinton Doctrine

克罗赛特，巴巴拉 Crossette, Barbara

肯德尔，沃尔特 Kendall, Walter

肯尼，戴维 Kenney, David

肯尼迪，爱德华·“泰德” Kennedy, Edward “Ted”

肯尼迪，约翰 Kennedy, John F.

肯尼迪政府 Kennedy administration

与猪湾 and Bay of Pigs

肯尼迪政府的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 activities of

肯尼迪政府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拉美政策 Latin American policies of

新边疆 New Frontier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恐怖主义 terrorism

控制 control

厌恶（控制）aversive

术语的使用 uses of term

控制变量 variables, controlling

库珀，切斯特 Cooper, Chester

科尔德穆瓦，热罗德 Cordemoy, Géraud de

库普曼，阿兰 Kuperman, Alan

库什曼，托马斯 Cushman, Thomas

库什曼，约翰 Cushman, John H.

“快速行动”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奎松，曼努埃尔 Quezon, Manuel

拉宾，伊扎克 Rabin, Yitzhak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安第斯山地区 Andean region

与中国 and Chin

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 Cold War in

共产主义 Communism in

民主 democracy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门罗主义 and Monroe Doctrine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行动奇迹” Operation Miracle in

激进天主教徒 radical Catholics of

地区协议 regional agreements in

法治 rule of law in

社会改革 social reform in

在拉丁美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in

与美国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policy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s in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拉菲伯尔，沃尔特 LaFeber, Walter

拉冯，平哈斯 Lavon, Pinhas

拉夫，菲利普 Rahv, Philip

拉福莱特委员会 La Follette Committee

拉库蒂尔，让 Lacouture, Jean

拉曼，哈桑 Rahman, Hassan

拉斯提克，伊恩 Lustick, Ian

腊斯克，迪安 Rusk, Dean

莱弗勒，梅尔文 Leffler, Melvyn

莱利维尔德，约瑟夫 Lelyveld, Joseph

莱斯蒙席 Rice, Monsignor

赖斯顿，詹姆斯 Reston, James

赖斯，康多莉扎 Rice, Condoleezza

兰道尔，卡尔 Landauer, Carl

兰德尔，乔纳森 Randal, Jonathan

兰盖，西蒙 Linguet, Simon

兰古斯 Langguth, A. J.

兰辛，罗伯特 Lansing, Robert

蓝钦，卡尔 Rankin, Karl

“烂苹果理论” “rotten apple theory”

朗格，弗里德里希 Lange, Friedrich

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劳动 labor

与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and AIFLD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劳动 in capitalist democracy

作为商品 as commodity

与剥削 and exploitation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free circulation of

自由从事的劳动 freely undertaken

与工作不稳定性 and job insecurity

与媒体 and media

与战后反共产主义思想 and postwar anti-Communism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减少劳动收入份额 reduced share of income for

与社会主义 and socialism

与团结 and solidarity

专业化 specialization of

罢工 strikes

工人管理运动 workers' control movement

与工作压力 and workplace stress

老鼠的界限 rats, limitations of

老挝 Laos

老挝共产党 Communists in

对老挝的军事入侵 military aggression in

石缸平原 Plain of Jars in

老挝的泰国雇佣军 Thai mercenaries in

老挝模式 Laotian model

尼加拉瓜《新闻报》 La Prensa,Nicaragua

拉克尔，沃尔特 Laqueur, Walter

拉什利 Lashley, K. S.

勒克，爱德华 Luck, Edward

勒梅，柯蒂斯 LeMay, Curtis

勒莫恩，詹姆斯 LeMoyne, James

勒沃汀，理查德 Lewontin, Richard

雷，丹尼斯 Ray, Dennis M.

冷战 Cold War

冷战中的亚洲 in Asia

冷战中的中欧 in Central Europe

交流受阻 communication blocked in

遏制 containment in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in

与希腊 and Greece

冷战中的共产主义问题 issue of Communism in

在拉丁美洲 in Latin America

冷战中避免的谈判 negotiations avoided in

与战后国际秩序 and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冷战中宣传 propaganda in

“回退策略” “rollback strategy” in

“烂苹果理论” “rotten apple theory” in

离散的无限性 discrete infinity

黎巴嫩 Lebanon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 invasion of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的干涉 U.S. intervention in

李普曼，沃尔特 Lippmann, Walter

里奥斯·蒙特，何塞·埃弗拉因 Rios Montt, José Efraín

里根，罗纳德 Reagan, Ronald

论邪恶帝国 on Evil Empire

论法律日 on Law Day

里根政府 Reagan administration

藐视国际法 contempt for international law in

与经济 and the economy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与越战代价 and Vietnam War costs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理论构建 theory construction

理想化 idealization

理想主义 ideal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利夫舒尔茨，劳伦斯 Lifschultz, Lawrence

联邦调查局 FBI

越战期间联邦调查局的活动 activities during Vietnam War

联邦调查局的创立 establishment of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与非洲 and Africa

《联合国宪章》 Charter of

裁军大会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前南斯拉夫 and former Yugoslavia

与人权 and human rights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黎巴嫩 and Lebanon

与“马亚圭斯”号事件 and *Mayaguez* incident

与《外层空间条约》 and Outer Space Treaty

与巴勒斯坦获得权利 and Palestinian rights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and PLO

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度 public trust in

与第三世界 and Third World

美国因其恐怖主义行为受到联合国的谴责 U.S. condemned for terrorism by

美国未向联合国支付欠款 U.S. debt unpaid to

美国无视联合国 U.S. disregard of

在联合国投否决票的记录 veto record in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联合国诚信委员会 Committee for United Nations Integrity

量子物理学 quantum physics

维也拉·德里格，列奥纳多神父 Vieira do Rego, Father Leoneto

列宁 Lenin, V. I.

列宁主义 Leninism

列文，阿纳托尔 Lieven, Anatol

林彪 Lin Piao

林道赫姆，理查德 Lindholm, Richard

灵魂 soul

灵魂不朽 immortality of

灵魂的内在生命 inner life of

刘易斯，安东尼 Lewis, Anthony

卢梭论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Rousseau on

卢梭，让 - 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论不平等》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自由主义思想 libertarian ideas of

关于人性的观点 on the nature of man

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 on origin of language

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观点 on rational social order

关于理智的观点 on reason

关于自我完善的观点 on self-perfection

霍梅尼，鲁霍拉·阿亚图拉 Khomeini, Ayatollah Ruhollah

路克怀，海因茨 Loquai, Heinz

蒙赫，路易斯·阿尔贝托 Monge, Luis Alberto

卢拉·达席尔瓦，路易斯·伊纳西奥 Lula da Silva, Luiz Inácio

伦敦海军条约（1930年） London Naval Treaty (1930)

伦斯，西德尼 Lens, Sidney

《论不平等》（卢梭）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Rousseau)

《论热核战争》(卡恩) *OnThermonuclear War* (Kahn)

《论自由》(密尔) *On Liberty* (Mill)

罗宾逊, 唐纳德 Robinson, Donald

罗伯森, 沃尔特 Robertson, Walter

罗伯特, 查尔默斯 Roberts, Chalmers

罗德西亚 Rhodesia

罗夫, 卡尔 Rove, Karl

罗杰斯, 乔尔 Rogers, Joel

罗梅罗, 大主教奥斯卡 Romero, Archbishop Oscar

罗森堡, 阿瑟 Rosenberg, Arthur

罗森堡, 艾瑟尔和罗森堡, 朱利叶斯 Rosenberg, Ethel and Julius

罗斯福, 富兰克林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 西奥多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政府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罗斯托, 华尔特 Rostow, Walt

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看法 on development of Third World

关于游击战的看法 on guerrilla warfare

关于伊朗的看法 on Iran

关于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看法 on U.S.Asian policies

关于越战的看法 on Vietnam War

罗斯托, 尤金 Rostow, Eugene

罗素, 伯特兰 Russell, Bertrand

逻辑学 Logic

洛克, 鲁多夫 Rocker, Rudolf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洛奇, 亨利·卡伯特 Lodge, Henry Cabot

洛威尔, 罗伯特 Lowell, Robert

马德里议会 (1931年) Madrid Congress(1931)

马尔 , 大卫 Marr, David

马尔 , 罗伯特 Meagher, Robert

马夫罗米查利斯 , 佩特罗斯 Mavromichalis, Petros

马科斯 , 伊梅尔达 Marcos, Imelda

马克汉姆 , 詹姆斯 Markham, James

马克思 , 卡尔 Marx, Karl

作为历史和社会产物的人 humans as products of history and
society

论巴黎公社 on Paris Commune

异化劳动理论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关于作为闹剧的悲剧 on tragedy as farce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马里奥·洛佩兹·富恩特斯 Lopez Fuentes, Mario

马洛昆·罗哈斯 , 克莱门特 MarroquinRojas, Clemente

马斯基 , 埃德蒙 Muskie, Edmund

马斯特 Muste, A. J.

“马蹄铁行动” Operation Horseshoe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马亚圭斯”号事件 Mayagüez incident

麦格罗里 , 玛丽 McGrory, Mary

麦格韦尔 , 迈克尔 MccGwire, Michael

麦金利 , 威廉 McKinley, William

麦卡锡 , 约瑟夫 McCarthy, Joseph

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

麦凯恩 , 约翰 McCain, John

麦克阿瑟 , 道格拉斯 MacArthur, Douglas

麦克德谟特，约翰 McDermott, John

麦克罗斯基，保罗 McCloskey, Paul

麦克纳马拉，罗伯特 McNamara, Robert S.

麦克诺顿，约翰 McNaughton, John

麦克唐纳，德怀特 Macdonald, Dwight

麦克维，林肯 MacVeagh, Lincoln

曼德尔鲍姆，迈克尔 Mandelbaum, Michael

曼德拉，纳尔逊 Mandela, Nelson

曼迪拉卡，本尼 Mandalika, Benny

曼斯菲尔德，迈克 Mansfield, Mike

毛姆，萨摩塞特 Maugham, Somerset

毛泽东 Mao Tse-tung

贸易 trade

成本和收益 costs and benefits of

关税保护 tariff protection of

梅厄，果尔达 Meir, Golda

梅尔兹，查尔斯 Merz, Charles

梅克林，查尔斯 Maechling, Charles

梅勒，诺曼 Mailer, Norman

梅特涅，克莱门斯·冯 Metternich, Klemens von

媒体，见“大众媒体”；特定媒体 media, *see* mass media; *specific media*

美国 United States

与反美主义思想 and anti-Americanism

被忽视的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 disregarded in

因其恐怖主义受到谴责 condemned for terrorism

扩张主义 expansionism of

涉外援助、国际援助 foreign aid

外国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

与全球竞争 and global competition

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Administration

干涉主义传统 interventionist tradition of

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 military aid from

军事开支 military expenditures of

“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of

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ry Strategy of

与《外层空间条约》 and Outer Space Treaty

2000年总统选举 presidential election(2000)

作为流氓超级大国 as rogue superpower

对今后行动的建议 suggestions for furure action

以控制世界为目标 world control as aim of

《美国的石油政策》（1944年）“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美国方式” “American way”

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 U.S. intervention in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

美国革命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国际法学会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国际法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争取中东和平教授组织 American Professo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APPME)

美国军舰“文森尼斯”号 USS Vincennes

美国军舰“亚伯拉罕·林肯”号 USS Abraham Lincoln

美国军舰“自由”号 USS Liberty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United States Army Field Manual*

美国难民委员会 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美国内战，战后的权力集中 Civil War,U.S., postwar power concentrations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Grenada, U.S.invasion of

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 U.S.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美国战争罪公民调查委员会 Citizens'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United States War Crimes

美西战争 Spanish-American War

美学理论 aesthetic theory

美洲国家峰会 Summit of the Americas

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AIFLD

美洲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

“门户开放原则” Open Door principle

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 to

对门罗主义的威尔逊推论 Wilson corollary to

蒙博托·塞塞·塞科 Mobutu Sese Seko

蒙卡斯尔，弗农 Mountcastle, Vernon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 Mikoyan, Anastas Ivanovich

米尔森，梅纳赫姆 Milson, Menachem

米尔斯海默，约翰 Mearsheimer, John

米勒，史蒂文 Miller, Steven

米勒，朱迪思 Miller, Judith

米洛舍维奇，斯洛博丹 Milosevic Slobodan

米歇尔计划 (2001年) Mitchell Plan(2001)

密尔 , 约翰·斯图尔特 Mill, John Stuart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 o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主 democracy

可被接受的民主形式 acceptable forms of

资本主义民主 capitalist

民主中的商品选择 choice among commodities in

民主的“危机” “crisis” of

对民主的厌恶 distaste for

在民主中形成的社会政策 form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作为自由相互协定的民主 as free mutual agreements

民主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guarante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民主的局限 limitations of

作为开放社会的民主 as open society

民主中的民众控制 people's control in

民主中的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y in

民主中的工人角色 role of labor in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民族周刊》 *Nation*

模仿 imitation

通过模仿进行学习 learning by

与强化 and reinforcement

模拟与模仿 mimicry vs. imitation

摩根索 , 汉斯 Morgenthau, Hans

摩洛哥 Morocco

莫尔 , 查尔斯 Mohr, Charles

莫拉莱斯，埃沃 Morales, Evo

莫雷尔，托马斯 Moorer, Thomas H.

莫尼翰，丹尼尔·帕特里克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墨索里尼，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墨西哥 Mexico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and

与美国的边境 U.S. border with

慕尼黑类比 Munich, analogy of

穆勒，罗伯特 Mueller, Robert

穆沙拉夫，佩尔韦兹 Musharraf, Pervez

纳粹 Nazis

纳粹暴行 atrocities of

与纳粹进行比较 comparisons with

纳尔逊，布莱斯 Nelson, Bryce

奈尔，阿耶 Neier, Aryeh

奈斯旺格，威廉 Nighswonger, William

南方峰会（2000年） South Summit(2000)

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 Mercosur

《南方首脑会议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South Summit

南非 South Africa

对南非的援助 aid to

种族隔离时代 apartheid era in

与武器开发 and weapons development

南京大屠杀 Nanking, rape of

纳赛尔，迦玛尔·阿卜杜尔 Nasser, Gamal Abdel

南美，见“拉丁美洲” South America, see Latin America

南越 South Vietnam

吴庭艳政权 Diem regime in

“自由轰炸区”“ free bombing zones”in

南越的越南共和国 GVN in

无力竞争 inability to compete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 in

南越人民革命党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PRP) in

阮文绍政权 Thieu regime in

美国干涉南越内部事务 U.S.intervention in domestic affairs of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U.S. military action in

作为美国军事基地 as U.S. military base

美国支持南越 U.S. support of

另见“越战” *see also* Vietnam War

能解决问题的心智机能 problem solving,mental faculty for

尼布尔，雷茵霍尔德 Niebuhr, Reinhold

尼茨，保罗 Nitze, Paul

尼加拉瓜 Nicaragua

选举 election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美国的政策 and U.S. policy

尼克松，理查德 Nixon, Richard M.

“敌人名单” “enemies list” of

与外交政策 and foreign policy

与弹劾 and impeachment

与总统权力 and presidential powers

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of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水门事件 and Watergate

尼米兹，切斯特 Nimitz, Chester W.

鸟鸣、鸣叫曲调 birds, songs of

牛顿，艾萨克 Newton, Isaac

纽伦堡审判 Nuremberg Tribunal

与反人类罪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由获胜者进行评判的纽伦堡审判 as judgment of victors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秘密文件 secret files of

对空袭保持沉默 silence of, on aerial bombardment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战争罪 and war crimes

与侵略战争 and wars of aggression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关于布尔什维克 on Bolsheviks

关于东帝汶 on East Timor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关于拉丁美洲 on Latin America

与麦卡锡 and McCarthy

关于中东石油 on Middle East oil

关于越战 on Vietnam War

关于水门事件 on Watergate

农业 agriculture

资本密集型 capital-intensive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nd NAFTA

奴隶制 Slavery

诺西特，伯纳德 Nossiter, Bernard

欧汉隆，迈克尔 O'Hanlon, Michael

欧盟 European Union (EU)

与中国 and China

与伊朗 and Iran

欧文，罗杰 Owen, Roger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帕克森，弗雷德里克 Paxson, Frederic

帕尼尼 Panini

帕依荣，比里 Phanomyong, Pridi

帕斯特，罗伯特 Pastor, Robert

帕特，吉东 Pat, Gidon

帕特森，罗伯特 Patterson, Robert P.

派尔，梅厄 Pail, Meir

派克，道格拉斯 Pike, Douglas

派克，吉姆 Peck, Jim

潘涅库克，安东 Pannekoek, Anton

庞加莱，儒勒 - 亨利 Poincaré, Jules-Henri

佩尔马特，内森和佩尔马特，露丝 Perlmutter, Nathan and Ruth

佩莱德，马蒂亚胡 Peled, Mattityahu

佩雷斯，西蒙 Peres, Shimon

佩卢蒂埃，费尔南德 Pelloutier, Fernand

皮尔士，查尔斯 Peirce, Charles

贫富差距 wealth gap

平克，史蒂文 Pinker, Steven

平托，豪尔赫 Pinto, Jorge

珀西，查尔斯 Percy, Charles

蒲鲁东，皮埃尔 - 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普京，弗拉基米尔 Putin, Vladimir

普劳蒂，弗莱切 Prouty, Fletcher

普里斯特利，约瑟夫 Priestley, Joseph

普林茨，查尔斯 Printz, Charles

77国集团 G-77

齐姆，格雷斯 Ziem, Grace

祈令 mands

祈令形式 forms of

伪祈令 pseudo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iii,

“契机”，斯金纳的术语 “occasion,” Skinner's use of term

前南斯拉夫 Yugoslavia, former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见“北约”NATO bombing of, *see* NATO

联合国特别调查员 UN Special Investigator for

工人议会 workers' councils in

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

强度 strength

强化强度 in reinforcement

斯金纳的术语使用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 reinforcement

自动自我强化 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

突发情况 contingencies of

有差别的强化 differential

与模仿 and imitation

重要性 importance of

与意图 and intention

间歇强化 intermittent

语言习得中的强化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强化中的强度 strength in

强化理论 theories of

术语使用 uses of term

《强化程式》（费尔斯特和斯金纳） 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
(Ferster and Skinner)

强化刺激，斯金纳的术语 reinforcing stimulus,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事件，斯金纳的术语 reinforcing event, Skinner's use of term

强化物 reinforcer

初级强化物 primary

二级强化物 secondary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乔姆斯基，艾弗拉姆·诺姆 Chomsky, Avram Noam

激进主义思想 activism of v,

作品基本主题 basic themes in work of i-v

生平背景 birth and background of v, iv

影响 influence of iv

乔姆斯基，威廉（父） Chomsky, William (father) ii

情感意义 emotive meaning

丘吉尔，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驱力减降 drive reduction

全国教会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一战”以前的全球化 before World War I

与自由贸易协定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国际经济一体化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与工作不稳定性 and job insecurity

与资本自由化 and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与战争可能性 and likelihood of war

“宇宙的主人”与全球化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and

与太空军事化 and militarism of space

与国家安全豁免权 and national security exemptions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neoliberal

民众反对全球化 public opposition to

全球化中的短期投机性资本 short-term speculative capital in

与稳定 and stability

真正的全球化计划 true program of

与美国的商业利益 and U.S. commercial interests

与贫富悬殊 and wealth gap

饶戴维 Rowe, David N.

人权 human rights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人、人类 humans

人类的创造性选择 creative choices of

发展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s of growth

与环境主义 and environmentalism

人类的限度 limitations of

心智发展 mental development of

道德评判 moral judgment of

计数能力 number faculty of

作为自然界一部分 as part of natural world

身体成长 physical growth of

人类的视觉官能 visual faculty of

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认知进化 cognition, evolution of

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

任选规则 optional rules

日本 Japan

与中国 and China

来自日本的竞争 competition from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in

与帝国 and empire

日本的能源 energy resources in

与大区域 and Grand Area

与中东 and Middle East

以新秩序为目标 New Order as goal of

与太平洋战争 and Pacific war

与珍珠港 and Pearl Harbor

《日内瓦协议》 Geneva Accords

入侵苏伊士运河（1956年） Suez invasion (1956)

阮庆将军 Khanh, General

阮文绍 Nguyen Van Thieu

瑞登奥尔，罗纳德 Ridenhour, Ronald L.

萨达特，安瓦尔 Sadat, Anwar

萨德尔，穆克塔达，Sadr, Muqtada al-

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选举 election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报纸 newspapers in

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萨尔瓦多的《人民纪事报》 *La Crónica*, El Salvador

萨夫兰，纳达福 Safran, Nadav

萨拉戈萨议会（1936年） Saragossa Congress (1936)

萨义德，爱德华 Said, Edward

塞尔维亚 Serbia

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in

与科索沃 and Kosovo

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NATO bombing of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塞拉西，海尔 Haile Selassie

赛明顿，斯图尔特 Symington, Stuart

三边委员会 Trilateral Commission

沙哈克，伊斯雷尔 Shahak, Israel

沙尔平，鲁道夫 Scharping, Rudolf

沙龙，阿里埃勒 Sharon, Ariel

沙米尔，伊扎克 Shamir, Yitzhak

沙漠风暴行动 Desert Storm

沙泼林，罗伯特 Shaplen, Robert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英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 British interest in

与中国 and China

沙特阿拉伯法赫德计划 Fahd Plan of

法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 French interest in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日本 and Japan

沙特阿拉伯石油 oil in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 U.S.influence in

沙特，伊本 Ibn Saud

山下奉文将军 Yamashita, General

《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社会秩序观 vision of

社会主义 socialism

与无政府主义 and anarchism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 Engels's vision of

与劳动 and labor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革命社会主义 revolutionary

洛克尔的社会主义观 Rocker's vision of

国家 state

社会主义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涉外援助法案》（2000） Foreign Aid Bill (2000)

身体 body

身体的概念 concept of

与接触机械论 and contact mechanics

心智 - 身体问题 mind-body problem

身体的物理世界 physical world of

神经生理学 neurophysiology

神力介入 divine intervention

“神奇的祈令”，斯金纳用语 “magical mands,” Skinner’s use of phrase

生物恐怖主义 bioterrorism

圣约之子会 B’nai Brith

施莱辛格，亚瑟：Schlesinger, Arthur

关于猪湾事件的看法 on Bay of Pigs

关于人权的看法 on human rights

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看法 on U.S.invasion of Iraq

关于越战的看法 on Vietnam War

施佩尔，阿尔伯特 Speer, Albert

施特恩赫尔，泽尔夫 Sternhell, Ze’ev

施瓦布，克劳斯 Schwab, Klaus

石油 oil

亚洲能源安全网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东帝汶石油 in East Timor

伊朗石油 in Iran

中东石油 in Middle East

“美国的石油政策”（1944年）“Petroleum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石油价格 price of

《红线协定》（1928年）Red Line agreement (1928)

沙特石油 in Saudi Arabia

美国控制石油的要求 U.S. quest for control of

委内瑞拉石油 in Venezuela

食品换和平 Food for Peace

史迪威，约瑟夫 Stilwell, Joseph

史蒂文森，阿德莱 Stevenson, Adlai E.

史密斯，盖蒂斯 Smith, Gaddis

史密斯，理查德 Smith, Richard

史汀生，亨利 Stimson, Henry L.

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 Davos meeting of

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民意调查 public poll of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讲话（2002年）World Social Forum (WSF),
opening address (2002)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与玻利维亚 and Bolivia

与东亚 and East Asia

与印度 and India

与劳动力市场 and labor market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视觉研究 vision, study of

舒尔茨，乔治 Shultz, George

舒奇，奥古斯丁 Souchy, Augustin

水门（事件）Watergate

思想控制 thought control

思想物质 thinking substance

斯伯克，本杰明 Spock, Benjamin

斯大林，约瑟夫 Stalin, Joseph

斯大林主义 Stalinism

斯蒂格利兹，约瑟夫 Stiglitz, Joseph E.

斯金纳 Skinner, B. F.

《有机体的行为》 *Behavior of Organisms*

斯金纳的实验限制 experimental limitations of

斯金纳的外推法 extrapolation by

结果不一致 inconsistency of results

斯金纳术语使用不一致 inconsistent use of terms by

斯金纳的解释空间 latitude of interpretation by

关于条件作用法则的观点 on law of conditioning

有关学习的观点 on learning

《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斯考克罗夫特，布伦特 Scowcroft, Brent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斯特劳，杰克 Straw, Jack

斯特劳特，理查德 Strout, Richard

斯特林，克莱尔 Sterling, Claire

斯通，I. F. Stone, I. F.

苏哈托 Suharto

苏联 Soviet Union

被苏联侵略的阿富汗 Afghanistan invaded by

在冷战期间的苏联 in Cold War

苏联解体 collapse of

苏联在东欧 in Eastern Europe

作为“邪恶帝国”的苏联 as “Evil Empire”

与国际秩序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绥靖的危险 appeasement, danger of

随附性 supervenience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 Solzhenitsyn, Alexander

索法尔，亚伯拉罕 Sofaer, Abraham

索摩查·德瓦伊莱，安纳斯塔西奥 Somoza Debayle, Anastasio

索普，W. H. Thorpe, W. H.

索绪尔的任意性 Saussurean arbitrariness

太空军事化 space, militarization of

泰国军事政变 Thailand, military coup in

泰勒，麦克斯韦尔 Taylor, Maxwell

泰勒，泰尔福德 Taylor, Telford

关于侵略战争的看法 on aggressive war

与纽伦堡标准对越战的适用性 and applicability of Nuremberg standards to Vietnam War

关于越战成因的看法 on causation of Vietnam War

关于越战合法性的看法 on legitimacy of Vietnam War

与纽伦堡审判 and Nuremberg Tribunal

关于知识分子阶层责任的看法 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lligentsia

与纽伦堡对空袭表示的沉默 and “silence of Nuremberg” on aerial warfare

关于战争罪的看法 on war crimes

汤普森，达西 Thompson, D'Arcy

特雷，威廉 Turley, William S.

特里加斯基斯，理查德 Tregaskis, Richard

特鲁希略·莫利纳，拉斐尔·莱昂尼达斯 Trujillo Molina, Rafael Leónidas

提尔曼，赛斯 Tillman, Seth

天然的好奇心 inquisitiveness, natural

条件作用 conditioning

条件作用法则 law of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巴普洛夫的条件作用 Pavlovian

从感觉到感觉的条件作用 sensory-sensory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条件作用法则 law of conditioning

廷伯根，尼古拉斯 Tinbergen, Nikolaas

通过观察进行学习 observation, learning by

通过教育进行的自我实现 education, self-fulfillment via

“同义关系”，斯金纳的术语使用“synonymy,” Skinner's use of term

统一 unification

语言上的统一 of language

各种科学的统一 of sciences

图尔基，法瓦兹 Turki, Fawaz

图灵，艾伦 Turing, Alan

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TRB专栏（理查德·斯特劳特） TRB(Richard Strout)

土耳其 Turkey

冷战期间的土耳其 Cold War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在土耳其被屠杀的库尔德人 Kurds decimated in

在土耳其的北约基地 NATO bases in

与北约轰炸塞尔维亚 and NATO bombing of Serbia

与联合国 and UN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 U.S.military aid to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德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兹纳，雅克 Torczyner, Jacques

瓦茨，戴维 Watts, David

瓦尔特，胡安 Huarte, Juan

瓦莱里亚尼，理查德 Valeriani, Richard

外交关系委员会，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War and Peace Studies Project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in Africa

外交政策中的权力集中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关注 concern for democracy in

与共谋论 and conspiracy theory

公司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corporate influence on

国家罪行与官方敌人的罪行 crimes of the state vs. crimes of
official enemies

与国内社会结构 and domestic social structure

对外交政策的实证研究 empirical inquiry into

行政决策 executive decision making

与大区域规划，见“大区域” and Grand Area planning, see Grand
Area

与知识分子阶层 and intelligentsia

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见“拉丁美洲” in Latin America, see Latin
America

与军事化国家部门 and militarized state sector

与国家目的 and national purpose

与石油，见“石油” and oil, *see* oil

“二战”后 post-World War II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与国家审查 and state censorship

对不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对越南的外交政策，见“越南”和“越战” in Vietnam, *see*
Vietnam; Vietnam War

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原则 Wilsonian principles of

《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 Outer Space Treaty (1967)

万内马，阿勒耶 Vennema, Alje

万尼，约翰·保罗 Vann, John Paul

万斯，塞勒斯 Vance, Cyrus

危地马拉 Guatemala

土地改革 agrarian reform in

1954年被入侵 invasion of (1954)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威尔，弗雷德 Weir, Fred

威尔格诺德，让 - 罗杰 Vergnaud, Jean-Roger

威尔逊，E. O. Wilson, E. O.

威尔逊，达格玛 Wilson, Dagmar

威尔逊的和平原则 Wilsonian peace principle

威尔逊，理查德 Wilson, Richard

威尔逊，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威廉斯，威廉·阿普曼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威廉姆森，查德 Williamson, Richard

威廉姆斯，伊恩 Williams, Ian

威塞尔，埃利 Wiesel, Elie

威斯特摩兰，威廉 Westmoreland, William

威斯汀，亚瑟 Westing, Arthur

韦斯特，理查德 West, Richard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韦尔斯，萨姆纳 Welles, Sumner

维瑟提尔，里昂 Wieseltier, Leon

委内瑞拉 Venezuela

与古巴 and Cuba

选举 elections in

与南方共同市场 and Mercosur

委内瑞拉石油 oil in

与地区协议 and regional agreements

美国未能推翻委内瑞拉政府 U.S.failure to overthrow government
in

温特，罗杰 Winter, Roger

文本行为 textual behavior

“稳定”，术语使用 “stability,” use of term

沃尔夫，查尔斯 Wolf, Charles

伯纳姆，沃尔特·迪安 Burnham, Walter Dean

沃尔兹，肯尼斯 Waltz, Kenneth

沃克，爱德华 Walker, Edward

沃森，托马斯 Watson, Thomas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anarchosyndicalists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作为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as anti-capitalist

与布尔什维克 and Bolsheviks

摧毁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义de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in

盖林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Guérin on

19世纪与20世纪的无政府主义 of nineteenth vs. twentieth century

与“红色官僚主义” and “red bureaucracy”

无政府主义的恢复 rehabilitation of

与革命 and revolution

与社会主义 and socialism

无政府主义中的工人管理 worker control in

吴丹 U Thant

吴庭艳 Ngo Dinh Diem

五角大楼文件 Pentagon Papers

“五一”节 May Day

西班牙革命 Spanish Revolution

西班牙内战 Spanish Civil War

西非 West Africa

西贡，见“南越” Saigon, *see* South Vietnam

西蒙诺夫斯基，艾尔西 Simonofsky,Elsie ii

希尔加德，E. R. Hilgard, E. R.

希尔斯曼，罗杰 Hilsman, Roger

希夫，泽夫 Schiff, Ze'ev

希戈公司 CITGO

希汉，尼尔 Sheehan, Neil

希腊 Greece

英美干涉希腊 British and U.S.interventions in

冷战中的希腊 Cold War in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在希腊的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in

在希腊的美国公司 U.S. corporations in

希罗，迪利普 Hiro, Dilip

希姆莱，海因里希 Himmler, Heinrich

希普曼，芭芭拉 Shipman, Barbara

希特勒，阿道夫 Hitler, Adolf

“9·11”袭击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炭疽病毒攻击 and anthrax attacks

与美国公民的民权 and civil rights of U.S. citizens

“9·11”袭击的无辜受害者 innocent victims of

“9·11”袭击的长期后果 longer-term consequences of

对“9·11”袭击的正确反应 proper reactions to

由“9·11”袭击产生的问题 questions arising from

“9·11”袭击的原因 reasons for

“9·11”袭击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for

与美国的军事主义 and U.S. militarism

与“恐怖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与机会之窗 and window of opportunity

夏里特，摩西 Sharett, Moshe

显现论 emergence thesis

相似性 similarity

香农，威廉 Shannon, William V.

象征指涉 symbolic reference

肖クロス，威廉 Shawcross, William

效果律 law of effect

谢尔顿，亨利 Shelton, Henry

谢林 , 托马斯 Schelling, Thomas

谢斯起义 (1786年) Shays's Rebellion(1786)

心灵主义 mentalism

心灵主义描述 mentalistic description

心智 - 大脑思考 mind-brain considerations

心智 - 身体思考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心智 mind

传统的心智理论 classical theory of

关于心智的经验主义传统 empiricist tradition of

心智模块 modularity of

新柏拉图主义者 Neoplatonists

“新边疆” New Frontier

《新共和》 *New Republic*

新时代 new era

《新闻周刊》 *Newsweek*

新政 New Deal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新左派 New Left

《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行动奇迹” Operation Miracle

行为 behavior

与注意力 and attention

行为的性质 characteristics of

行为的认知视角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有机体对行为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控制变量 controlling variables of

研究定义 definitions in study of

涉及的因素 factors involved in

辨识单位 identifying the unit of

心智 - 身体方面 mind-body aspects of

行为观察 observation of

操作性行为 operant

行为模式 patterns of

行为预测 prediction of

行为强化 reinforcement of

产生行为 shaping of

斯金纳的行为描述框架 Skinner's framework for description of

行为的刺激（作用） stimulation of

文本行为 textual

无法被验证的行为法则 untestable laws of

言语的，见“语言行为” verbal, *see* verbal behavior

行为心理学 behaviorist psychology

行为心理学中的术语定义 definitions of terms in

与人类心智机能 and human mental faculties

与语言 and language

性别歧视 sexism

匈牙利 Hungary

休谟，大卫 Hume, David

休斯，斯图尔特 Hughes, Stuart

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叙利亚 Syria

学生运动 student movement

学习 learning

有机体对学习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驱力减降 drive reduction in

依据经验学习 by experience

一般性学习理论 general theory of

与模仿 and imitation

学习中的信息处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先天的学习倾向 innate dispositions toward

潜在学习 latent

模块化的学习观点 modular view of

学习动机 motivation for

依据观察的学习 by observation

学习中的强化 reinforcement in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亚克维，伽得 Yaakovi, Gad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洲Asia

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 in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in

大区域原则 Grand Area principles in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民族主义革命 nationalist revolutions in

亚洲的“新秩序” “new order” in

大米饥荒 rice famines in

与“烂苹果理论” and “rotten apple theory”

亚洲的安全 security of,

在亚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in

在亚洲的美国军事基地 U.S. military bases in

美国对亚洲政策 U.S. policies in

亚洲能源安全网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复杂性 complexity of

控制变量 controlling variables of

对言语行为的功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of

对言语行为的预测 prediction of

斯金纳对言语行为的描写体系 Skinner's system for description of

言语行为的单位 unit of

《言语行为》（斯金纳） *Verbal Behavior*(Skinner)

“盐焗坚果现象” “salted-nutphenomenon”

“厌恶控制”，斯金纳的用语 “aversive control,” Skinner's use of phrase

叶斯柏森，奥托 Jespersen, Otto

伊肯伯里，约翰 Ikenberry, John

伊拉克 Iraq

作为实验品 as experiment

与伊朗 and Iran

在伊拉克受到袭击的库尔德人 Kurds attacked in

入侵科威特 Kuwait invaded by

劳工运动 labor movement

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奥西拉克核反应堆 Osirak nuclear reactor in

与预防性战争 and preventive war

与民意 and public opinion

与“9·11”袭击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 and WEF meeting, Davos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nd WMD

伊朗 Iran

与中国 and China

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伊朗政变 CIA-backed coup in

冷战中的伊朗 Cold War in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核能力 nuclear capability of

伊朗石油 oil in

与预防性战争 and preventive war

与地区安全 and regional security

美国袭击伊朗 U.S. attacks on

美国的安全问题 U.S. security issues in

伊朗的沙阿政权，见“巴列维，礼萨·沙阿” Shah of Iran, see
Pahlavi, Reza Shah

伊斯兰教 Islam

以色列 Israel

与非洲 and Africa

阿以冲突 Arab-Israeli conflict(s)

与亚洲 and Asia

以色列的审查制度 censorship in

与反人道罪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以色列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David and Goliath” legend of

迪莫纳核反应堆 Dimona nuclear reactor

对以色列的外国援助 foreign aid to

入侵黎巴嫩 invasion of Lebanon

与伊朗 and Iran

基布兹 kibbutzim of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媒体对以色列的报道 media coverage of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被占领地区 occupied territories

与巴勒斯坦 and Palestine

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and PLO

以色列激进民族主义分子 radical nationalism in

与“存在的权利” and “right to exist”

以色列的附带业务 subsidiary services of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对美国设施进行的恐怖袭击 terrorist attacks on U.S. facilities by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援助以色列 U.S. aid to

与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 and U.S. “Israeli lobby”

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U.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美国在以色列的战略利益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犹太复国主义者 and Zionists

义务兵役 selective service

异化问题 alienation, problems of

意大利 Italy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与北非 and North Africa

“一战”后 post-World War I

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终结 end of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 Marxist analysis of

术语使用 use of term

意识整体性 unity of consciousness

意义 meaning

认知意义与情感意义 cognitive vs.emotive

斯金纳的术语 Skinner's use of term

意志与行为 volition, and behavior

“因物知觉语”，斯金纳的术语使用“tacts,” Skinner's use of term

音位系统 phonemic systems

音系学 phonology

印度 India

与亚洲能源安全网 and Asian Energy Security Grid

英国攻占印度 British conquest of

与中国 and China

印度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入侵东巴基斯坦 invasion of East Pakistan

印度的核武器 nuclear weapons of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人权记录 human rights record of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军事政变 military coup in

作为美国的附庸国 as U.S. client

印度支那 Indochina

法国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战争 French war in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in

与“烂苹果理论” and “rotten apple theory”

美国干预印度支那 U.S. intervention in

另见“柬埔寨”；“老挝”；“越南”；“越战” *see also* Cambodia;

Laos;Vietnam; Vietnam War

印刻 imprinting

“应答性行为”，斯金纳的术语“respondents,” Skinner’s use of term

英国 Britain

与阿富汗 and Afghanistan

英国的议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in

与东帝汶 and East Timor

与帝国 and empire

英国革命（17世纪） English revolution (17th century)

调查自由 freedom of inquiry in

与自由贸易 and free trade

与希腊 and Greece

与印度 and India

与伊拉克 and Iraq

与红色高棉 and Khmer Rouge

与租借援助 and Lend-Lease aid

与中东石油 and Middle East oil

与苏伊士运河 and Suez

与“二战” and World WarII

英国共产党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用动物行为学方法研究语言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由经验设定的边界条件 experience,boundary conditions set by

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犹豫停顿 hesitation pauses

有差别的强化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有关朝鲜的美国空军报告（1953年） Air Force, U.S., report on Korea
(1953)

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1965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Vietnam(1965)

《有机体的行为》（斯金纳） *Behavior of Organisms* (Skinner)

与事实有关的论点 factual thesis

宇宙机械论 mechan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语法 grammar

与认知革命 and cognitive revolution

与语言能力 and competence

语法构建 construction of

功能范畴 functional categories of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语法的不充分 inadequacies of

局限 limitations of

具体（语法） particular

规则 rules of

科学语法 scientific

结构主义语法 structuralist

实义范畴 substantive categories of

系统 systems of

转换规则 transformational rules of

类型不同的结构 typologically varied constructions

普遍语法 universal

语言 language

抽象格理论 abstract case theory

习得 acquisition of

与类推 and analogy

发声 - 感知系统 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

基本属性 basic properties of

与行为心理学 and behaviorist psychology

遗传的语言天赋、作为生物天赋的语言 biological endowment of

语言中的成分统领 c-command in

与认知革命 and cognitive revolution

与交际或交流 and communication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in

概念 - 意向系统 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

概念自然性 conceptual naturalness in

创造性过程 creative processes of

语言的笛卡尔问题 Descartes's problem of

描写充分性 descriptive adequacy of

离散无限性 discrete infinity of

移位属性 dislocation property of

移位属性 displacement property of

语言要素 elements of

用动物行为学方法研究语言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语言的进化 evolution of

解释充分性 explanatory adequacy of

相关的外部世界 external world related to

修辞用法 figurative use of

与自由 and freedom

自由表达 free expression of

功能视角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所满足的一般条件 general conditions satisfied by

基因因素 genetic aspects of

与人的大脑 and human brain

与人的认知 and human cognition

人拥有语言 human possession of

洪堡论语言 Humboldt on

与观念 and ideas

内化语言 I-language

作为语言属性的屈折音变 inflection as property of

内部语言 inner speech

语言的接口层面 interface levels of

内化语言 internalized

可读性条件 legibility conditions of

词库 lexicon of

机制 mechanisms of

与心智 - 身体思考 and mind-body considerations

最简方案 Minimalist Program of

作为心智的镜子 as mirror of the mind

语言的个体发生 ontogenesis of

起源 origin of

作为输出的语言 as output

语言中的参数设定 parameter setting in

语言的完美性 perfectibility of

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of

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音系学和语音学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of

动植物演化史视角 phylogenetic perspective of

原则与参数模式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P&P) model

语言的产出 production of

语言属性 properties of

冗余原则 redundant principles of

语义属性 semantic properties of

语言研究 study of

与随附性 and supervenience

象征指涉 symbolic reference in

与句法 and syntax

句法 - 形态的分离 syntax-morphology divide in

作为思维表达系统 as system for expressing thought

理论构建 theory construction of

理论内部化的简单性 theory-internal measure of simplicity

语言上的统一 unification of

“不可学习的” “unlearnable”

语言的使用 uses of

语言变异 variations in

语言的原则与参数模式 principles-and-parameters (P&P) model of language

语言机能 language faculty

结构 architecture of

不完美之处 imperfections of

初始状态 initial state of

接口层面 interface levels of

作为语言器官 as language organ

语言习得装置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

语言学 linguistics

创造性过程 creative processes of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与普遍语法 and universal grammar

语言学理论 linguistic theory

语言运用 performance

有机体对语言运用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the organism to

天生的结构 inborn structure in

语言运用 of language

与成熟 and maturation

语音表征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约旦与巴勒斯坦 Jordan, and Palestine

约翰斯敦钢铁厂罢工 (1937年) Johnstown steel strike (1937)

《论自由》 *On Liberty*

约翰逊, 查尔默斯 Johnson, Chalmers

约翰逊, 林登 Johnson, Lyndon B.

与拉丁美洲 and Latin America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越共 Vietcong

对越共的军事袭击 military attacks on

人数 numbers of

针对越共的绥靖计划 pacification program for

政治结构 political structure of

民众支持 popular support of

美国拒绝承认越共 U.S. refusal to recognize

越南 Vietnam

入侵柬埔寨 Cambodia invaded by

联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of

毁坏越南的庄稼 crop destruction in

政府 government of

民族主义运动 nationalist movement of

与联合国 and UN

统一 unification of

美国援助越南 U.S. aid to

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

“越南综合征” “Vietnam syndrome”

越战 Vietnam War

越战的可能性结局 alternative endings in

反战抗议 antiwar protests iv,

越战暴行 atrocities in

与中国 and China

1972年圣诞节轰炸 Christmas bombing (1972)

成本、代价 costs of

与信任隔阂 and credibility gap

与反和平罪 and crimes against peace

未知的死亡人数 death toll unknown in

与多米诺理论 and domino theory

关于越战的政府宣传 government propaganda about

被重写的越战史 history of rewritten

顺化屠杀 Hue massacre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建和省屠杀 Kien Hoa massacre

得不到民众支持的越战 lack of popular support for

越战的教训 lessons of

“马亚圭斯”号事件 *Mayagüez* incident

失踪的人或士兵 MIAs in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美莱村屠杀 My Lai massacre

民族解放阵线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 in

适用于越战的纽伦堡标准 Nuremberg standards applied to

章克申城行动 Operation Junction City

“快速行动” Operation Speedy Express

和谈 peace negotiations in

与五角大楼文件 and Pentagon Papers

普魁村屠杀 Phuqui massacre

有关越战的“泥沼假设” “quagmire hypothesis” about

难民 refugees of

知识分子在越战期间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作为革命人民战争 as revolutionary people's war

秘密文件 secret files of

美山屠杀 Son My massacre

春节攻势 Tet offensive

与联合国 and UN

美国在越战期间的轰炸 U.S. bombing in

与美国经济 and U.S. economy

美国升级越战 U.S. escalation of

美国在越战中失败 U.S. failure in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国的目标 U.S. goals in

作为“美国实验室” as U.S. “laboratory”

与美国政治 and U.S. politics

美国拒绝对越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U.S. refusal to permit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美国退出越战 U.S. withdrawal from

越战中的战争罪 war crimes in

越战白皮书 White Paper on

冬日士兵调查团 Winter Soldier Investigation

造句，语法 composition, grammatical

《增强国内安全法案》（2003） Domestic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2003)

扎伊尔 Zaire

詹宁斯，弗朗西斯 Jennings, Francis

战争 war

打击更加弱小的敌人的战争 against much weaker enemies

侵略战争 aggressive

与生物恐怖 and bioterror

摧毁世界的能力 capability of global destruction

阶级 class

集权与战争 concentrated power and

欧洲的战争 European

战争可能性 likelihood of

民族 - 国家之间的战争 between nation-states

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代理人战争 proxy

民众反对战争 public opposition to

战争罪 war crimes

与军事上的必要性 and military necessity

与纽伦堡 and Nuremberg

战争罪的操作性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属于战争罪的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 as

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 in Vietnam

战争罪责 war guilt

珍珠港 Pearl Harbor

真相 truth

不顾真相 disregard for

学说与真相 doctrine vs

历史视角上的真相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与谎言 and lies

与宣传 and propaganda

寻找真相 search for

真主党 Hezbollah

政府 governments

无政府主义者解散政府 anarchist dismantling of

政府的专权 arbitrary power of

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镇压性的政府 repressive

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 CREEP(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

知识分子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学术圈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in academic circles

对亚洲（问题） in Asia

在冷战期间 in Cold War

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 in 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ideology

建立民主（机构） in democracy building

全球事务中的“专家知识” and“expert knowledge” in world affairs

揭露谎言 to expose lies

在外交政策中 in foreign policy

与伊朗Iran and

与以色列 Israel and

在肯尼迪政府中 in Kennedy administration

与大众媒体 mass media vs.

“以政策为中心”和“以价值观为中心” “policy-oriented” vs. “value-oriented”

在抗议活动中 in protest movements

道出真相 to speak the truth

与对权力的屈从 and subordination to power

揭露宣传（真相） to uncover propaganda

在不发达国家 in underdeveloped world

与动用武力 and use of force

与美国的扩张主义 U.S. expansionism and

与美国的“权力意志” and U.S. “will to power”

与越战 Vietnam War and

在贫富悬殊情况下 in wealth gap

书写历史 to write history

智利 Chile

与中国 and China

与以色列 and Israel

美国对智利的政策 U.S. policies in

中东 Middle East

阿以冲突 Arab-Israeli conflict

阿拉伯民主主义情绪 Arab nationalism in

沙漠风暴行动 Desert Storm in

石油 oil in

和平谈判 peace negotiations for

美国快速部署部队 U.S.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另见各个国家索引 *see also specific nations*

中国 China

与智利 and Chile

与冷战 and Cold War

中国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 in

中国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与欧盟 and EU

与印度 and India

与伊朗 and Iran

日本侵略中国 Japanese aggression in

在中国的传教士 missionaries in

与石油 and oil

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 opium wars in

与沙特阿拉伯 and Saudi Arabia

与越战 and Vietnam War

与反恐战争 and “war on terror”

“中国事件” “China incident”

中立 neutralization

南越的中立立场 of South Vietnam

术语使用 use of term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团结运动 solidarity movement in

另见“拉丁美洲” *see also* Latin America

中央情报局 CIA

在柬埔寨 in Cambodia

在伊朗 in Iran

在老挝 in Laos

种族主义 racism

重庆大轰炸 Chungking, bombing of

猪湾 Bay of Pigs

注意力和行为 attention, and behavior

专家崇拜 expert, cult of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无政府主义与资本主义 anarchism vs.

与竞争 and competition

公司（资本主义） corporate

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投资者权利 investor rights in

局限 limitations of

宏观经济措施 macroeconomic measures

与军事化国家 and militarized state

掠夺式的（资本主义） predatory

与生产 and production

国家 state

与技术 and technology

不受约束的 unrestrained

与雇佣劳动 and wage labor

资本主义民主 capitalist democracy

劳工 labor in

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 resource constraint and demand constraint in

稳定 stability of

自动自我强化 automatic self-reinforcement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自我暗示语 autoclitics

自我实现 self-fulfillment

自我完善能力 self-perfection, faculty of

自由 freedom

自由意识 consciousness of

必要性与自由的矛盾 contradiction of necessity and

与语言 and language

自由的成熟 maturity of

与哲学 and philosophy

自由问题 problems of

与财产 and property

卢梭论自由 Rousseau on

精神自由 of the spirit

思想自由 of thought

自由的价值 value of

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libertarian socialism

宗教原教旨主义与以色列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Israel

租借项目 Lend-Lease

佐格比，詹姆斯 Zogby, James

作为“第二超级大国”的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 as “second superpower”

作为祈令的命令 commands, as mands

作为祈令的祈祷 prayer, as mand

美国总统制 presidency, U.S.

不受法律限制 a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law

权力集中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与弹劾 and impeachment

作为祈令的问题 questions, as mands

作为祈令的要求或请求 requests, as mands

译后记

诺姆·乔姆斯基是当今学术界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既是富有独创探索精神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又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异见者、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派代表。早在1990年代，他就成了健在的论文被引次数最多的人。乔姆斯基所获称号无数，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知识分子之一”“美国人的良心”“永远的异见者”“真正的人民英雄”等。当然，他也招致过无数非议，有人指责他狂妄自大、哗众取宠，受其笔伐的政客也公开回击。然而，迄今为止，任何质疑和打击乔姆斯基的尝试似乎都很难与他的理论和知识体系相匹敌，尤其无法超越其浩瀚翔实的引证、敏锐超脱的思维和热情不倦的斗志。2010年8月，乔姆斯基到访我国，受邀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世界秩序勾勒：持续与变化”的演讲，得到了国内学界的热情欢迎。

本书英文版以发表和出版时间为顺序，收录了乔姆斯基在1959—2007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演讲文稿、著作序言和章节等内容。为便于读者阅读，中文版调整了篇目的呈现方式，分别以“知识分子的责任：异见与抗争”“论美国政治与外交”和“语言与心智”为主题，将全书划作三个部分，更加凸显乔姆斯基在政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贡献。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内容均涉及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内政外交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乔姆斯基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交织在一起，并非泾渭分明。在第三部分，尤其在《语言与自由》一文中，乔姆斯基将语言研究与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不只局限于语言学理论。这种内在联系无疑也是对乔姆斯基思想的某种隐性注解：他的一致性从来都是基于对人类天性和潜质的探索，尤其是对人类正义的追求。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和其他霸权政府的批评一向不吝言辞，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戳穿谎言、说出真理的洞察力以海量的文献、史实、事实和数据为支撑，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推导结论或验证宣认，堪称学术典范。他无情揭穿现代媒体操控言语制造幻想的伎俩，时刻追索当权者所犯下的罪责，拷问盲从者的良心并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本书谈论越南战争的章节甚多，最打动人心之处当属乔姆斯基字里行间为几百万无辜的越南平民百姓发出的声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一词的英文“intellectual”以名词和形容词形式在原著中多次出现，究其内

涵自然无法与“知识”或“知道”完全对等。在我看来，“intellectual”一词强调个人乃至群体经过不懈地智力投入，通过阅读、思考、讨论和实践最终达到的理性状态，或指这样的人或群体。到此境界，其实并不容易。而从这种意义上看，乔姆斯基完全值得“知识分子”的称号。

本书于2015—2018年断续翻译完成，几经波折和等待，终获佳音。可以说，译一书，晓知人情和学问。乔姆斯基塑造了与他千万里之遥的我。他的语言风格自成一统，逻辑严丝合缝，句型层级复杂，反讽曲折巧妙，绝非“优美流畅”等词所能概括。无论作为译者还是读者，在阅读乔姆斯基时，恐怕都需充分调集智力和知识储备，久思推敲，吃力感在所难免。在翻译过程中，我无数次锤炼对英语语言机制的认知，求教解惑时获得了许多同事、朋友、学生乃至家人的支持，备感温暖，惜无法逐一致谢，将会常记此情。译文的缺陷和不足，皆归于我，也恳请读者指正。本书的两位编辑贾忠贤和曹迪辉，分别是80后和90后年轻人，他们的文字功底和职业素养远在我之上。每每交流，我都惊叹于年轻一代受益于国家发展的全面提升，这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本书的巨大体量和深邃思想在过去数年中不断挑战、磨砺着我的耐力、智力和精神世界，训导我凡事要从不足、不够的当下条件开始，相信自己、与自己对话，打通所学、常思不怠。

2020年夏秋之际，我拿起书稿校对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社会形势和个人生活都经受了巨大挑战。九十余岁的乔姆斯基仍就疫情、世界形势乃至语言研究接受采访或参加在线研讨，强调政府和个人在面对困境时所承担的责任。在重读书稿和有幸聆听乔姆斯基发言时，我无数次深切感受到他所传递的力量，正如安东尼·阿诺夫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乔姆斯基的言语所具有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这是一种永久的、希望的力量。

李 梅

2021年夏

虹口

羌

在汉藏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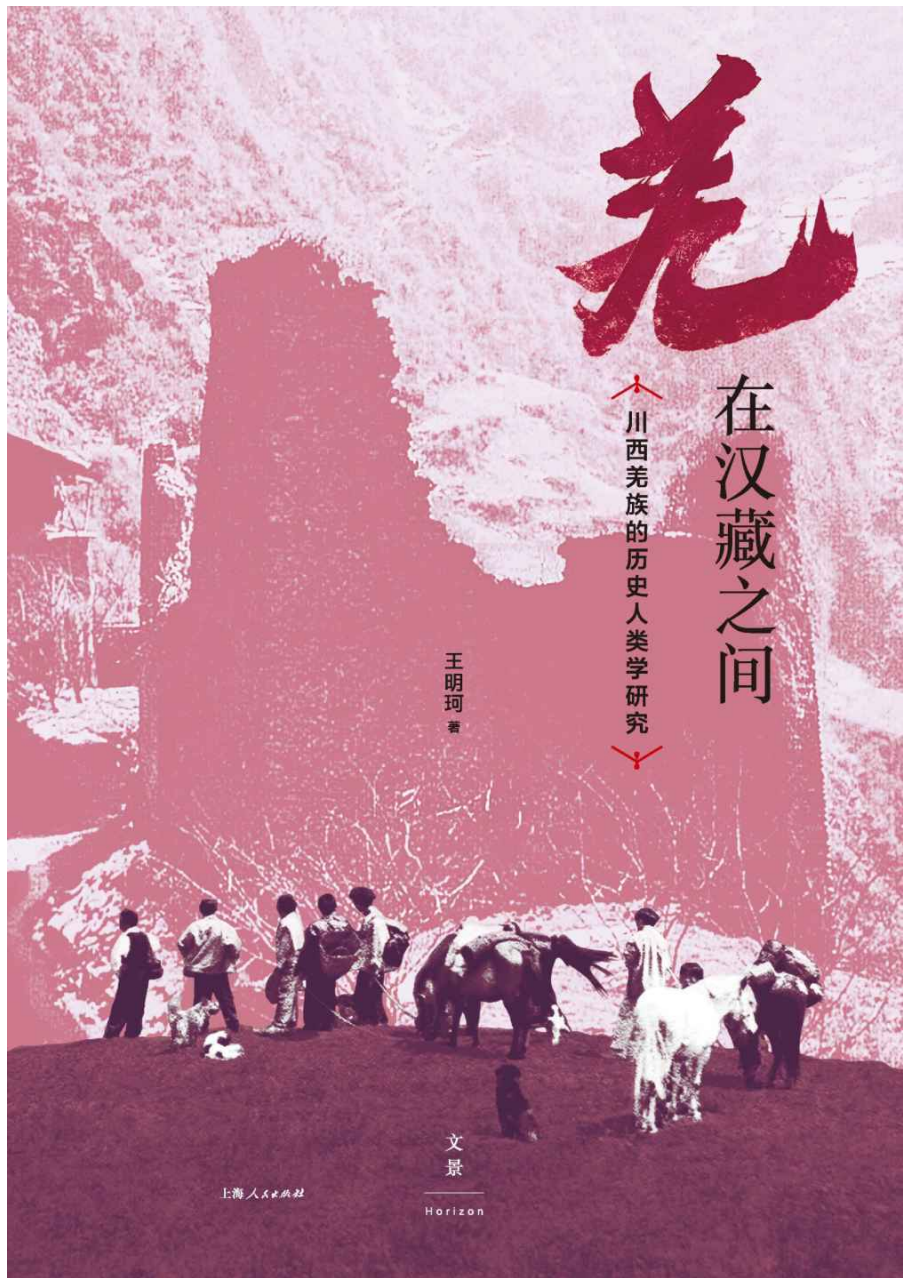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王明珂
著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羌在汉藏之间

人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人

王明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 王明珂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279-1

I．①羌… II．①王… III．①羌族-民族历史-研究-四川②羌族-民族文化-研究-四川 IV．①K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58020号

书 名：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作 者：王明珂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279-1/K·3124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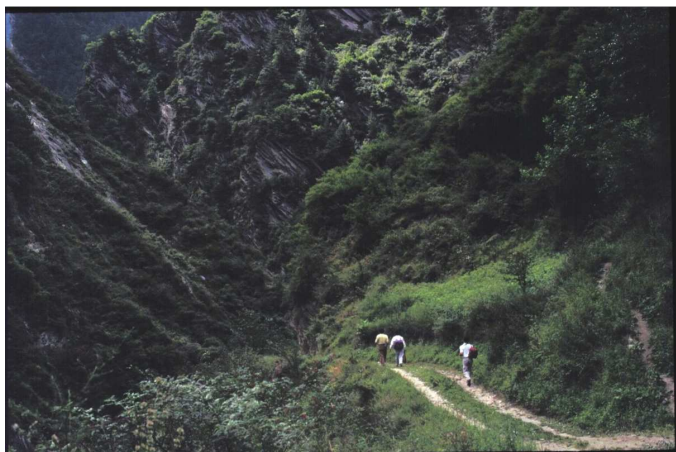
关注“世纪文景”





彩图1.1 沟中的世界

岷江上游的大小支流都称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图为由诺窝寨俯瞰茂县三龙沟（编者按：本书彩图分为五组，以阿拉伯数字排序，主题依次为环境、生计、社会、文化与田野；如无特殊说明，均为作者所摄）



彩图1.2 走入“桃花源”

缘溪行进入理县蒲溪沟，沟中生活艰辛，实非桃花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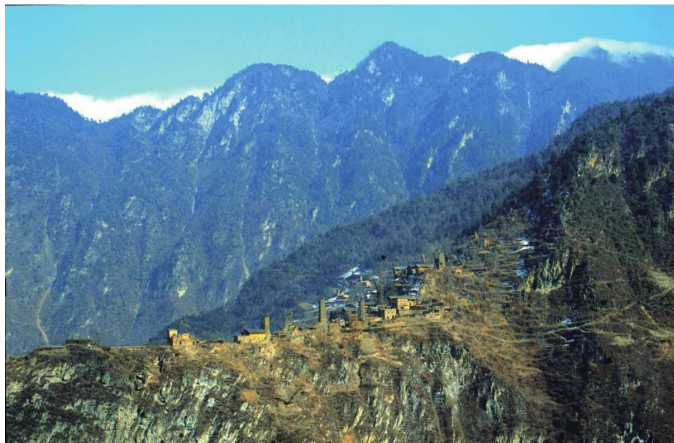
彩图1.3 山腰上的村寨

过去河坝没人住，村寨一般均坐落在半山腰上。图为茂县永和沟甘木若寨



彩图1.4 环境危机

寨子上方为连捡柴都不允许的神树林，此为保障环境安全的信仰。图中茂县水磨沟鲤鱼寨、赖子寨等村寨上方浓眉状的密林便为神树林



彩图1.5 资源竞争

过去各沟、各村寨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激烈。图为茂县黑虎沟沿山脊构建的村寨房屋、碉楼，位置绝险



彩图1.6 沟周边的山林

沟的上方为可以取木材、挖药、打猎、放牧的山林。图为松潘埃期沟的山林



彩图2.1 山区农业

沟中传统农业特色是尽量种植多样作物，以降低一家人的生计风险。图为松潘埃期沟的北哈寨，右后方高山为格日囊措山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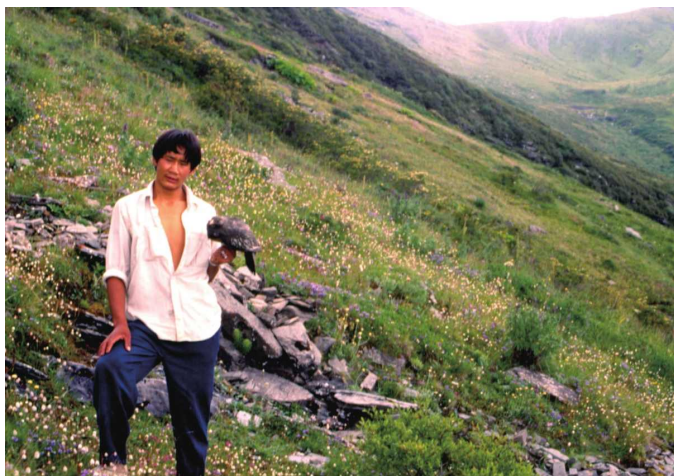
彩图2.2 村寨周边的农地

由农田到山林各村寨都有其地盘，不得越界。图中所见为理县蒲溪沟传说中三弟兄祖先建立的三个老寨子中的两个



彩图2.3 山上放牦牛

羌族在高山上放养牦牛及马，让它们自己觅食、生养及抵抗熊、狼，主人偶尔上山照看。图为松潘埃期沟山上的牦牛



彩图2.4 猎野鸡

过去羌族青壮年人经常入山采药、捡菌子、打猎与探顾牛马



彩图2.5 高山顶坡草原

接近山顶的缓坡因常积雪而无森林，夏季遍地铺满野花野草；这是采药及放牦牛的地方。图为埃期沟的高山草场



彩图2.6 进城做买卖

山间村寨的人常进城卖农产、山产，并买一些日用品



彩图3.1 藏化的羌族

羌族传统服饰一方面反映其深受汉、藏影响，一方面反映本地各村寨间的区分。图为盛装参加婚礼的埃期沟妇女



彩图3.2 服饰反映人群区分

各地羌族妇女头帕有别。黑虎沟妇女传统戴白帕子，据称是为保卫家园牺牲的黑虎将军戴孝；白帕外的花帕是创新流行



彩图3.3 服饰反映世代区分

小女孩及年长妇人穿着无特别讲究，年轻与中年妇女则需穿着有本寨本沟特色的服饰。图为茂县牛尾巴寨两代妇女



彩图3.4 服饰反映性别区分

图为茂县永和沟一家庭照。男人老中少三代皆穿着与汉人无别，只有女人穿着传统服饰



彩图3.5 汉化的羌族

深度汉化的北川羌族，无论男女老幼穿着都与汉人无异。图为北川小坝乡内外沟一羌族家庭



彩图3.6 说羌语的藏族

由语言学观点，黑水人说的话为羌语，但由于宗教等因素黑水人被识别为藏族。图中黑水妇女服饰与赤不苏、围城等地羌族服饰类似



彩图4.1 山神

山神是地盘的保护神。山上以石头堆起的塔子是山神的标志，也是资源界线的标志；往来的人在上面插一根树枝敬神，表示尊重地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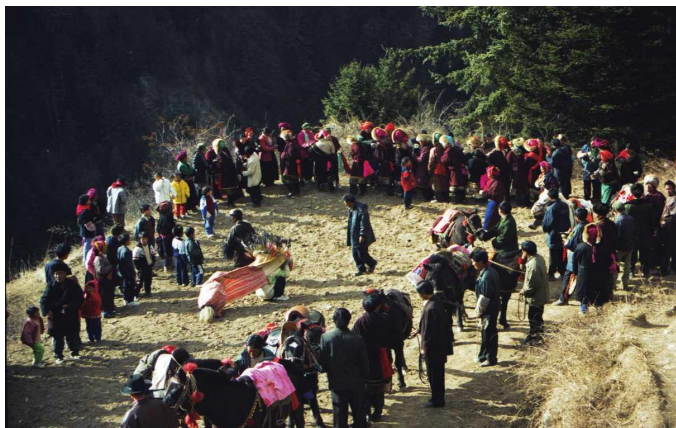
彩图4.2 铁三脚

火塘上安放的铁三脚为炊煮锅具的支架，具宗教上的神圣涵意，如保一家平安的灶神。图为永和沟坐在火塘及铁三脚旁的老夫妇



彩图4.3 保家卫土的文化

图为牛尾巴寨大年初七的人过年仪式。此仪式表现本寨青壮男人抵御外敌的决心



彩图4.4 婚礼

无论娶妻或男子上门,都让家族得以延续。图为埃期沟的迎亲仪式



彩图4.5 碉楼

防卫性的碉楼普遍见于岷江及大渡河上游，显示此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人群资源竞争之剧烈。图为黑虎沟二给米寨的石碉楼群



彩图4.6 村寨石屋

砌石为屋为古老的本地建筑传统；房屋窗口小，墙上有对外放枪的孔，反映过去资源竞争下之暴力。图为汶川羌族的村寨石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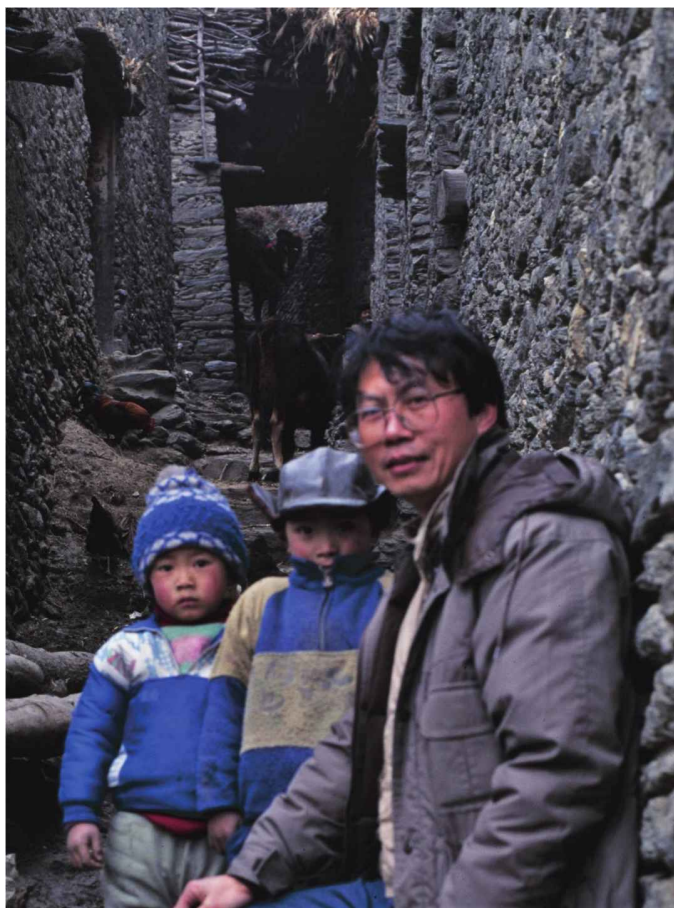
彩图5.1 田野考察

图为1995作者初入埃期沟时之田野工作照



彩图5.2 田野访谈

访谈是重要田野方法。什么样的问题、场合及气氛，都需要考察者精心思考、经营及调整。图为作者在小黑水知木林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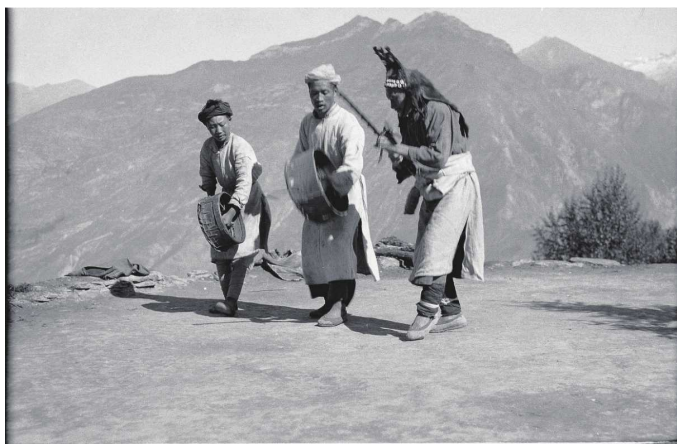
彩图5.3 田野知识

田野所得一方面是对他者“村寨”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借此认识自身所处“村寨”。图为作者和带他进入一村寨的两位小向导



彩图5.4 多点田野

相对于在一地长期“蹲点”的田野，多点田野在不同地点间移动观察，由差异中产生认知。图为作者在较汉化的北川村落中访谈



彩图5.5 1940年代端公

过去汉化羌区的端公（释比）为替人祈福、除病、消灾的巫师，其术深受川西民间道教影响。图为史语所前辈学者摄于汶川



彩图5.6 1940年代喝咂酒的羌民

羌族常在宗教、节庆及日常欢聚中老少依序饮咂酒——一种未经蒸馏的杂粮酒。
图为史语所前辈学者摄于汶川

目 录

2021年版自序

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

序

前言

文本与田野说明

社会篇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人群

第二章 村寨与城镇生活

第三章 族群认同与区分

第四章 结构下的情感与行为

历史篇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

第七章 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

第八章 羌族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

文化篇

第九章 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

第十章 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参考书目

谢词

2008年版追记

图表目录

- 图一 羌族地区简图
- 图二 沟内与沟外的世界
- 图三 埃期村寨与其守护神
- 图四 绵簏村寨与其守护神
- 图五 茂县三龙沟村寨
- 图六 大小黑水地区
- 图七 茂县黑水河下游及黑虎沟
- 图八 茂县永和沟与水磨沟
- 图九 杂谷脑河流域
- 图十 北川地区简图
- 图十一 典范历史中羌族的迁徙分布
- 图十二 商至汉晋间华夏边缘变迁
- 图十三 汉代以后羌人概念的萎缩与重现
- 图十四 北川小坝内外沟弟兄祖先空间分布
- 图十五 松潘小姓沟埃期村弟兄祖先空间分布
- 图十六 经文《息》中端公请神空间范围
- 图十七 端公经文中英雄征程与游历路线图
- 图十八 “羌戈大战”故事中战后羌族九兄弟分布

彩图目录

彩图1.1 沟中的世界

彩图1.2 走入“桃花源”

彩图1.3 山腰上的村寨

彩图1.4 环境危机

彩图1.5 资源竞争

彩图1.6 沟周边的山林

彩图2.1 山区农业

彩图2.2 村寨周边的农地

彩图2.3 山上放牦牛

彩图2.4 猎野鸡

彩图2.5 高山顶坡草原

彩图2.6 进城做买卖

彩图3.1 藏化的羌族

彩图3.2 服饰反映人群区分

彩图3.3 服饰反映世代区分

彩图3.4 服饰反映性别区分

彩图3.5 汉化的羌族

彩图3.6 说羌语的藏族

彩图4.1 山神

彩图4.2 铁三脚

彩图4.3 保家卫土的文化

彩图4.4 婚礼

彩图4.5 碉楼

彩图4.6 村寨石屋

彩图5.1 田野考察

彩图5.2 田野访谈

彩图5.3 田野知识

彩图5.4 多点田野

彩图5.5 1940年代端公

彩图5.6 1940年代喝咂酒的羌民

2021年版自序

1994到2003年间，我多次到青藏高原东缘之川西岷江上游，在当地羌、藏族村寨中进行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我研究的主题是本地人的族群认同与其历史记忆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近半世纪来的变迁。在田野考察中，我一方面观察这儿各地村寨人群的社会与生活习俗，另一方面探询及记录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前者是情境，后者是文本；我探寻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及其意义。随着由一条沟到另一条沟的多点田野考察，我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情境与文本联结之中；观察社会情境变化如何造成文本（社会记忆）的相应改变，借此，我对本地社会情境及其变迁有较深入的了解。最后这些对羌族的了解，也改变我对自身熟悉的知识体系之了解。这看来颇具体系的调查研究方法，并非我在田野进行前已有的妥善规划，而是随着田野进行而逐渐成形。

在此新序中，首先我将说明作为本书基础的田野工作，以及相关的知识逻辑之形成过程。其次，我将说明本书完成后至今，2021年，我基于此的一些延续性研究，也借此说明本书及相关田野的重要性。

田野工作

我的田野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边“耍”边进行。四川话“耍”就是玩，玩得任性且高兴。那些年每到暑期（有时也在寒假期间）我与两三个羌族朋友就背起背包，一起往各个沟中走，翻山、越梁、上寨子。在村寨里，我们的活动很轻松愉快；到处串门子、喝酒、聊天（四川话说摆条），没有严肃的学术话语。除了几个后来愈来愈熟的地方（松潘埃溪沟、茂县永和沟、北川内外沟），我们在寨子里一般只停留约4—6天，然后转到邻近寨子或另一条沟。我与寨子里主人家的闲聊，经常是由庄稼、牛羊到本地年节习俗，无所不谈。大约进行了两年后，一些田野方法及该探问的重要主题逐渐有了聚焦。通常到了一个寨子，首先我会故意卖弄自己在邻近村寨听得的本地知识，让主人惊讶地表示“喔，你都晓得的嘛”。然后随着聊天主题的开展，当主人说“这个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此时我便认真追问及思考这些“不一样”之处。

如此经常移动于多点之间的田野调查方法，我并非得于当时在人类学界已有实例的多点田野（multi-sites fieldwork），而是受到口述历史

中一个简单概念的启发：历史有多元的声音（history has many voices）。以及得于社会记忆研究中的一基本法则：个人记忆深受其社会身份认同影响（we are what we remember）。也因此，我不仅移动于不同的田野点，在同一村寨中，我的采访也移动于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职业等背景的个别村民之间。

从田野一开始，我便在访谈间尽可能地进行录音。这是受到当时吸引我的几个学术传统——口述历史、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之影响。这三个学术传统，概括分别属于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也是我的一种研究倾向：我紧紧跟随、探究的并非某一学科范准或其中的某些理论，而是某一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因此从不回避跨越学科藩篱。我的田野录音刚开始很随意，并无特定主题。后来，弟兄祖先历史、毒药猫故事、山神信仰以及大禹、周仓等本地英雄祖先记忆等等，成为我访谈录音的主题。在田野中发掘有意义的问题，然后针对它们搜集资料，这是很花时间但十分重要的工作。如何让受访人同意录音，并对录音毫无戒心，这对从事质性访谈的田野工作者是一难题。我克服此难题时用了一点小心机。通常我先拿出笔记本与笔，逐字逐句记录村民说的话，为此不停打断他们的陈述，要他们一再重说。等到村民对于故事说不下去而感到有些不耐烦时，我再提出录音请求，通常这时他们会欣然同意。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录的主要都是神话传说与历史，而非“当前”较敏感的人际关系等议题。

对人们的口述记忆作录音，相对于凭着调查者之听闻、回忆及文字表述可能产生的误差，自然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然而更重要的是，录音以及事后将它们转为文字，让口述记忆成为一种可供细腻分析的文本。它们与本地社会情境相对应；如我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弟兄祖先历史”口述文本，它们与村寨社会中各人群彼此合作、区分及对抗的人类生态情境相对应。如此，我们对一社会的了解不仅是依赖“深度参与观察”（deep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得之经验与记忆（传统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而是另有文本可资参照。更具意义的是，当我们在比较各地所述的同一神话故事或历史时，文本中的细微差异反映地域间的社会情境差异——这是我在多点田野中的体悟。

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多点田野也是对“典范”的反思。人们常为典范概念所拘；以民族研究来说，典范的民族、社会与文化，都经常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知识概念。当我最初进入羌族地区做调查研究时，情况便是如此；包围我的各方信息是，哪些是羌族的特色文化，哪儿的

羌族文化最正宗，哪儿的羌族传统社会保存最好，以及哪些人最懂得羌族文化。如果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我可能选择一“典范的”（标准的）羌族村寨，进行一两年人类学家称为“蹲点”的参与观察，本地耆老也无疑是我最佳的访谈对象。然而，各地羌族的多元性让我很快便深深体会到前述“历史有多元的声音”之说。因此我不只在多个田野地点之间转移，在同一田野点的寨子里，我的访谈对象也转移于不同性别、世代、教育与政治权力背景的个人之间。同时，我的田野也在当代社会与历史文献间转移。后者便是“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提及“羌”的战国或汉代文献，可被视为文献作者关于“羌”的社会记忆，借着分析这些文本，我们可以了解与之对应的古代社会情境。

《羌在汉藏之间》之后

《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一反思性研究的前半部，它的后半部则是我在2006年出版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在羌族研究中我说明，流传在羌族各地的多种弟兄祖先故事事实为一种本土“历史”、一种集体记忆。它们产生于各村寨人群既合作又彼此区分、对抗的社会情境之中，也反过头来强化这样的社会情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因此相信而不怀疑这样的“历史”。我指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心性，我称之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让人们不断创作、讲述并相信这样以“从前有几个弟兄到这里来”为起点的历史。如此，《羌在汉藏之间》之研究可说是“化奇特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的工作。

了解这种对我们（集中化、阶序化的所谓文明社会人群）而言相当陌生、奇特的“历史”之后，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说明，我们熟悉且深信不疑的“历史”，一种以英雄祖先事迹为起始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心性——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产物。英雄祖先历史对应的是权力集中化、财富与社会地位阶序化的现实情境。同样地，生活在被这种“历史”创造的社会现实之中，我们因此也不怀疑这样的“历史”。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我说明在东周时期华夏形成的时代社会情境下，黄帝、炎帝、颡顼等人物如何成为凝聚华夏的英雄历史中的始祖，后来又如何发展为黄帝后裔及炎黄子孙等历史人群概念。我也说明，在汉晋时期华夏边缘扩张的情境下，中原史家如何创作一些黄帝后裔的英雄历史，如箕子奔于朝鲜、太伯奔吴、庄蹻王滇以及戎人无弋爰剑奔于西羌的历史，用来说明华夏边缘人群的华夏血缘。这即是“将熟悉的视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也就是基于与前同一思考

逻辑与方法，来分析与我们熟悉的知识，如此让我们对自己原深信不疑的知识产生一些反思性认知。

我在2009年出版了《游牧者的抉择》，此书沿承自《羌在汉藏之间》的是人类生态的概念。羌族的每一条沟（溪谷）都是一小型人类生态圈。在特殊环境中，人们利用环境以行其经济生业，因生业活动中的环境资源分配、竞争，人们结为各种社会群体，并以文化来规范众人的行为和价值观，让环境、生业与社会得以维持及稳定发展。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我由人类生态角度比较汉代中国北方三种游牧社会人群：西羌、匈奴与鲜卑。他们生存活动的地理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有不同的游牧经济与辅助性生业，并以不同的社会组织来支持其经济生业，也因此各自有配合其生业与社会的文化与道德习俗。以中国汉晋时期的匈奴、西羌与鲜卑为例，观察、分析他们为何与汉帝国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以及产生性质有异的历史事件（表相），思考背后存在的人类生态（本相）差异。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于《羌在汉藏之间》的多点田野；文献记载、历史事件与我们在田野所见现象相同，皆为某种社会情境本相下的表征、表相。因此移动在多个表征与本相间的考察，有如移动一个凹凸镜来观察多个物体；由观察、比较镜面上的表相变化，我们可以对镜下物体（本相）有较多的认识。

由《羌在汉藏之间》到《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游牧者的抉择》，在研究写作中我一直检讨着自己的学术思路。因而在这些著作完成后，我对于文本、表征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逐渐具体化。我在2015年出版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便是试图将这样的研究方法系统而简洁地介绍给学术界及一般大众。本书的要旨是，我们生活在表相化的世界里，难以认识身边事物之本相，因此对许多社会现实缺乏反思性认识，自然也无反应；为突破此认知麻痹，本书提出一些认知概念、分析方法与研究策略，以期让我们能进一步认识隐于文本与表征之后的社会现实本相。这本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概念与实例，仍来自于《羌在汉藏之间》及相关田野工作。譬如“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来自于我对羌族村寨中流行的弟兄祖先历史（文本）与村寨社会（情境）的认知；“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亦有对应关系，这也是得于我对羌族之弟兄祖先历史心性（文本结构）与对等分享和竞争之人类生态（情境结构）的认知。

近年来我进行两项彼此相关的研究：人类原初社群与其历史变迁，以及原初社群中人们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可以说，它们都是《羌

在汉藏之间》的延伸性研究。原初社群指的是一种人们的血缘与空间群体认同相迭合的社群（邻人便是亲人）；这概念的原型是《羌在汉藏之间》中所描述的去羌族村寨社会。我认为，这样的人类社群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极普遍的一种社会结群模式，而至今它们仍普遍见于全球各地人类社会，或存在人们的理想之中。关于人类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的研究，则是我对羌族“毒药猫”传说与相关社会现实的延伸。过去在狭隘的村寨人群认同下，人们集体猜疑及闲言寨子里的一二女子为毒药猫，以化解他们对外患（敌人或灾难）及内忧（内部矛盾或冲突）的恐惧。猜疑并施暴于“替罪羊”，在古今全球人类社会都是普遍现象，也是社会人群集体暴力的一种重要根源。近代初期鼠疫流行之阴影下欧洲的猎巫风潮，便是个著名的例子。在我写这篇序言的当下，正值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之时；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天天见于各个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各人群间，这也见证了我们时时都生活在“田野”之中。

自1994年我第一次踏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至今已过了27个年头。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一直受惠于当年的田野考察。或者，由两方面来说，我一直未曾离开过羌族田野。一是，那一段田野考察经验，让我得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周遭世界（包括阅读历史文献），因而从此生活在田野之中。另一则是，我愈来愈认识自己在羌族田野所见人文现象的宏观意义，因此它们至今仍引领着我继续探索其在全球性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进上的意义。最后我也借此告诉读者们，人类社会本身是一本最丰富而值得我们不断深入“阅读”的书。

2008年版自序：化陌生为熟悉

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还提及一个重要观念：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¹这本我在2003年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对以上费孝通先生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羌在其间所扮角色——所作的一种反思性注解与补充。

自在的民族应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以这样的民族实体来看历史上的羌族，过去许多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叙之甚详。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以此而言，“羌人”原来并非一群人的自称，而是如费孝通所说，是中原人对西方一些牧民的统称²。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羌人也曾经经历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这本书主旨之一便是说明在历史上“羌人”成为“羌族”的过程。

然而，本书更大的研究企图是通过“羌”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如此研究宏图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羌”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部牧羊人或西部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部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羌人”概念的转变，便也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部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书繁体版出版以来，通过书评、论文及面对面讨论，我从学界朋友、读者中都得到许多宝贵的评论指教。有些学术自省已反映在我后续的著作中。然而此简体版，除了少部分文字修饰外，基本上并没有增删。这样做是为了将本书作为我个人学术思路发展的一阶段标志。因此

读者对此书常有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我在此做一些解释说明。

首先，由于我在著作中常用华夏边缘一词，因此有些读者认为我还是由核心来看边缘，而非站在土著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边缘观点。这应是一个误解。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所重建的华夏边缘观点之羌族史是一个两面刃；它解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变迁，也解释自觉的羌族形成之历史过程。此并非是站在核心来看边缘，而是阐述核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此外，我对许多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分析，呈现本土观点的“历史”与历史心性，同时也借此对我们（中国或世界各主要文字文明中人）自身之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有反思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去核心、典范观点的“历史”认知。总之，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对于来自欧美或其他文明核心之学者而言，我认为所谓土著观点并非只是以学术理论建构一套土著之社会观、世界观或人观，而是学者是否能由此土著观点中认识自身之核心偏见（学术的与文化的），以及此偏见如何造成“他者”（土著）。

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

再次，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大量引用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词汇及理论，在羌族田野中我也没有探询西方历史人类学者在南太平洋或东非洲田野里所提出的热门问题。对此我的解释为，本书讨论华夏历史记忆反映的族群边缘变迁，分析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及相关社会情境，讨论人如何践行、夸耀、攀附、批评文化习俗，如此之微观社会过程又如何造成历史变迁。我认为，这些对社会、文化与历史之间错杂关系的讨论，以及关于符号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情境与历史变迁之探索，也是我所认识的“historical anthropology”以及更广泛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议题。以中文之“历史人类学”来说，在中国此一田野中我们应有特殊的学术与现实关怀，表现在可能不见于西方“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用词、问题、理论取向等方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常面对一种质疑：它是否解构了历史上的羌族，以至于可能解构羌族史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一体性。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前面我已提及，反思性研究与解构性研究有基本的不同。简单地说，我认为当前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相对于过去华夏帝国之格局而言，在东亚历史上为一进步与较合理的人类资源共享体系³。在此基本认识上，我期望本书所提供之反思性历史、社会与文化知识，能让此体系之现代性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并期望此理解能促进体系之自我调整与进步。《羌在汉藏之间》，书名已表达了如此旨趣。古华夏与今之汉族皆认为“羌”为我族之一部分但为我族边缘，古之吐蕃与今之藏族也都将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各族群视为我族的一部分，但也视之为我族边缘。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原有一个模糊的、汉藏共有的边缘；如此能更有力地说明汉藏难以分割之关系。在另一方面，也因着这样的知识，大汉族主义者与大藏族主义者都应反思，历史上两个核心都曾歧视羌或朵康之人，至今本地的羌族与藏族仍居于汉藏之边缘。

以历史上自在的羌人来说，许多以此为主体的历史研究，说明古代许多羌人融入了今日之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西南民族之中，以此强调羌人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历史贡献。我所提出的华夏边缘观点下的历史，也承认如此结果——古代许多被视为羌的人群，成为汉族、藏族、彝族及西南民族之一部分。最后，今日居于川西北之羌族，我认为其历史文化资产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对于了解中华民族一体性最有启发的部分，并非以上那些历史，而是其“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此心性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炎黄为弟兄”之说。在今日，它也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互称“弟兄民族”此一话语之深层社会文化根源。

-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28页。
- 3 这个观点见于本书结语之中。在李亦园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中，他特别提及本书之此一观点，并由东亚之人类生态与资源共享角度赞同此一观点。

序

我与本书作者王明珂先生应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学术研究成长于1970年代以前，所以我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应是属于“客观文化特征”派的；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成长于1970年代以后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显是偏于“主观认同”派的。因此，朋友们与同行们，无论是与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一两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为王先生这本明显是解构文化特征论的《羌在汉藏之间》的著作写序，想必会为我捏一把冷汗。不过我自己倒是心平气和，而且十分高兴，愿意为这一本难得兼具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的当代“典范”大著作推介。

其实，我早已读过王明珂先生先前的一本著作《华夏边缘》，很能理解他的论点，而且很欣赏他能挑选“羌族”这个例子来发挥他的理论分析，所以也曾设法支持他在“羌族”中进行更长久的田野工作。如今他又把更丰富的实地研究资料组织起来写成本书，把他的族群边缘理论借羌族的“历史”演变铺陈得淋漓尽致，使人读来不但兴趣盎然，不忍释手，而且每读完一章都会引起不断的反思与联想。这也就是本书最大的特点，能让背景不一样的人也乐于阅读。

王先生在本书一开始就说明这是一本以“族群边缘理论”来探讨分析所谓“羌族”的历史民族志，他从古代中原的汉族与西方各民族长久互动的历程入手，通过人类族群之间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所产生的认同与区分现象的辩解，以及“文化展演”过程的促进，再加上对当代国族主义形成的剖析，从而对今日所谓“羌族”的出现有极精彩的论述，同时也对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提出一种全新而将引起更多反思与争论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首先，王先生认为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当代的“羌族”，其实经过了三个步骤：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部异族的统称，他们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较后代又因为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也就是所谓族群的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第二步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传统的“羌族文化”或“氐羌文化”遂被建构成为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则是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

以后，他们自己也在文化交竞展演的过程中创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型来。这种族群的形成虽然复杂而曲折，但作者却能利用他从1994年至2002年连续九年间长久而详细的田野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探索，很巧妙而动人地把“羌族”人飘移、模糊而至于“定型”的故事刻画得丝丝入扣，其间他利用了很多有趣而深刻的例子来衬托复杂的现象，例如他的“毒药猫理论”、“羊脑壳”与“牛脑壳”故事、“弟兄故事”与“祖先英雄”传说，以及所谓“一截骂一截”的现象等等，都能引起读者的会心一笑。作者这些详尽的田野资料不但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也使我们自认为是田野老手的人类学家至为折服，尽管作者一再自谦说他并非是一个人类学家。

作者在本书中除努力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志”作剖释外，另一重要的目标则是借“羌族”的形成过程之分析进而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等概念作“族群理论”的探讨与解构。很明显，作者是一位较近于所谓“近代建构论”的学者，所以在他的观念中“中华民族”实是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的自我想象建构的产物，因此他说：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族主义”、相关的民族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随着欧美列强的势力传入中国。忧心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并深恐“我族”在“物竞天择”之下步黑种人与红种人受人统治之后尘，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国族主义”概念与民主改革思想，极力呼吁“我族”应团结以自立、自强。这个“我族”，首先，特别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结合“中国人”（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成“中华民族”的我群认识，逐渐成为晚清与民国初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

又说：

“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近三十年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说明无论“族群”或“民族”，皆非客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基于此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常受到质疑。一个人群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有内部差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有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出，也有新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入。究竟是什么“民族实体”在历史中延续？“历史实体论”在学术上的缺失，主要在于将“文

本”与“表征”当作“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与“民族志事实”（ethnographical truth），忽略了“历史文本”的社会记忆本质以及“文化表征”的展演本质——也就是忽略了两者之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情境。

对于这样的论点，国族主义的支持者以及民族实体论者必然不大愿意接受。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审慎阅读作者在全书中精细、不厌其烦地反复辨析与论述，应该会使你对“民族”“族群”等概念有较宽广且较具弹性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做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有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他人分类”又可分为行政分类或政治分类、学者分类与他族分类等等，而“自我分类”则可因本身身份之不同，譬如知识分子、权力掌握者或是一般民众而异，更可因空间与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以兰屿或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那种孤立的小岛而言，人群的分类与认同不论是“自我”或“他人”的，都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文化特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或者无形的深层价值判断、宇宙观等等，也是会有较长久的连续性存在。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所以王明珂先生这本书正可提供读者一个回顾反思长久存在的“我族”或“他族”观念的有利架构范式，譬如说在传说中与“羌人”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却没有像“羌人”那样成为华夏边缘领域飘移不定的族群，而在历史上却成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因为南方没有一个较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于华南地理环境所致，即是根据本书作者的方法再加探讨发展的另一个华夏少数民族互动的范例？

然而本书作者也不是一位“近代建构论”的绝对支持者。他认清楚建构论者至少有两大缺失，其一是他们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他们也忽略了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的历史整合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甚而成为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因此，作者撰写本书的最终企图实际上是要更进一步超越建构者的立场，而以人类资源分配、竞争以至于共享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并求在平心探讨中达到现实的关怀与族群关系伦理价值受到尊重与强调的境界。所以他说：

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以及此种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因此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个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我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相信这样的历史民族志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共商怎样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

又说：

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说是此地区漫长历程中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欲建立一纯汉国族国家之蓝图，并不是好的选择。同样地，欧亚大陆之东、西两半部有如下差别——西方为沿大西洋岸之少数富强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则为常卷入宗教、种族与经济资源战争及内部性别、阶级与族群迫害频传的各国、各族；东岸则为一“多元一体”的中国，以经济补助来减缓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秩序。我们不认为，欧亚大陆西半部的体制，优于东半部中国国族下的体制。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批判、解构历史实体论，同时也不为近代建构论所囿限，而实际上是超越了两者的境界，进而从未来世界族群和谐平等共处的观点来“筹谋改进或规划更理想的人类资源共享环境”，这是何等开阔的胸怀！同时他更指出欧亚大陆东西两半的体制未必是西欧优于东亚，西方大西洋沿岸虽有讲究人权、自由的富国，但其内陆则常卷入宗教与资源竞争的迫害与争斗之中；然而东亚却能以“多元一体”的国族主义理想，以经济支持及行政力量来减轻内陆的贫困与匮乏，并维持族群的秩序。假如以不具文化偏见的立场论，东亚的体制实有其长远发展的意义。很显然这样的思考方式对于西欧习惯于一国一族体制的学者来说，甚而对于谋求更公平境界的“全球化”人士而言，应该都是可以促进他们反思与筹谋的典范思考。

触及东西文化体系的差异，不免使我想起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东西文明“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创见。张先生以这对观念来说明

新石器时代进入金属器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之东西文化的差别。所谓“延续性”与“断裂性”是指很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指金属器发明之后生产工具的变化而言。西方文化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代表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ian）文化，苏美尔的金属器发明应用在农业的生产工具上，而与较早期用石器于生产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工具性质的利用上是一种断裂；但在中国，金属青铜器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夏末商初起用之时，是用在政治与宗教仪式上，而生产工具则仍沿用原有的石、木、骨、蚌等，所以说是一种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关系也同时表现在人际关系、文字的应用、城乡关系、财富累积与集中、权力的获得以至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上¹。要立刻以张先生的这种“延续性”与“断裂性”文化传统差别的说法与上述本书所强调的东西族群关系模式的差异勾连起来，也许较不易理解，但是假如把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致中和宇宙观”模式的论证，或称“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的寻求，对自然、对人群、对自我三层面的和谐均衡的理想境界来对比说明，也许就较易于理解在东亚大陆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融合自然、人群，甚至超自然于一体，而企图共同分享资源与文化经验的传统在不断“延续”之中²，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当前“多元一体”国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吧。总之，作者在本书中的种种论述确能引起许多学术的反思与共鸣，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推荐的特点。希望读者能从本书的阅读中不仅欣赏作者的细腻论述与宽广的理论架构，同时也能借此对族群关系脉络有更多的反思与体认。

李亦园

2003年1月20日

草于台北南港

- 1 参看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第1—8页。
- 2 参见李亦园：《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载乔建、潘乃谷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前言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地说，这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本书不只是描述羌族，中国大地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更主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本书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最后，基于这些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我对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有30万人，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58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59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目前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乃至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诺、阿昌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而羌族民众也为此非常自豪。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30万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历史”。

我以加引号的“历史”来与历史作区分。历史是指过去真正发生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而“历史”则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在本书中，我将一再探索历史过程与“历史”建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以此而言，本书之作近于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在历史人类学中，如西佛曼与格里福（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所言，研究的焦点可分为两大主题：（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d the present）；（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¹在本书中，我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什么“历史”被不同的群体建构，来诠释、理解当今羌族，以及对羌的“历史”建构与再建构，如何造成并改变历史上的“羌人”与“华夏”。

在本书中，不只是对“历史”，我也将对“民族”与“文化”提出一些新见解。如果对“民族”“历史”与“文化”抱持着传统的定义，那么我可能写出一部可与“中国民族史”接轨的“羌族史”，我的田野资料也能写出一本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之一的“羌族民族志”。然而，读者将发现，在本书中我不断地检讨、解构与再建构我们对“民族”（以及族群、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些既有概念。近年来，在解构“民族”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之风下，学者常指出许多所谓的“传统”事实上是近代的创造，而“民族”则是近代国族主义风潮下知识精英们的想象群体²。我基本上同意这些看法。然而这些“创造”与“想象”的近代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创造”与“想象”过程与此过程中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更重要的相关的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都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这样的探索必然超出“近代”与“历史”的范围，而须兼及更早的历史与历史记忆以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对传统“民族”“历史”以及“文化”概念的质疑，曾使我，一个历史学者，在历史文献中穷究羌族历史15年之后，又走向近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近八年来，我几度前往羌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或翻山越岭探访各深沟村寨中的住民，或在汶川、茂县、理县等山间城镇中与当地知识分子交谈，目的都在探索“羌族”对本民族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看法。田野经验让我鲜活地观察、体验到“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与社会区分体系，以及此中涉及的许多个人与群体之利益与权力关系。此知识解构了我自身原有的各种文化与学术偏见。然后，借此反省，我重新阅读历史文献——由一种“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的角度，考察这些作为“社会记忆”的文化与历史书写遗存，探索其背后个人或群体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篇”，主要在介绍本书的主体——羌族，描述他们的地理分布、环境与聚落形态、资源竞争与分享体系，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与区分等等。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本书有关羌族历史与文化探讨的“民族志”基础。然而，基本上我不是一位人类学者或民族学者，我也难以写出一部当代人类学或古典民族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一位研究族群现象的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历史与族群的问题，所有关于羌族体质、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生活的观察与探讨，都被纳入历史与族群的关怀与思考脉络之中。

这种关怀与思考，源于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论争议。一个较传统的“民族”概念，经常将民族视为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等客观特征的人群。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民族概念，在许多学术研究中仍被奉为圭臬；更不用说，在一般民众中这样的观点更是普遍。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探讨，由于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人的贡献³，基本上在1970年代以后就远离了以客观特征界定民族的研究传统，而着重于族群主观认同的形成与变迁。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学者们曾争辩，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便是“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与“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之争。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他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

19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化解了“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的争论。人们以共同的起源“历史”来仿真人类最基本的“手足之情”，这便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由来。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新建构，因此族群认同可能发生变迁。⁴无论如何，族群认同背后的政治权谋（politics）与历史（history）因素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也顺应当代人类学的一般发展倾向。⁵

认同（identity）与区分（distinction）是本书“社会篇”的主题。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区分则是相反的，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可以说，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区分与延续。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了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了族群界线。因而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与探讨的不只是狭义的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本质”（ethnicity），而更是在一层层“边界”（boundaries）包围中人们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

关于人类社会“区分”的问题，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界有一个研究传统，其中包括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诺贝特·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等著名学者的研究。⁶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区分以及相关的品味、生活习俗、歧视、仇恨与暴力的研究,被大多数“族群本质”研究者忽略了。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学者们研究的是一社会中不同阶级、性别或新旧住民等亲近群体间的区分,而非“族群”或种族区分。在本书中我由羌族“毒药猫”传说与信仰来说明,“区分”不只是存在于各家族、村寨间;每一个人都是与外界有区分的孤立个体,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与可能有敌意的邻人与亲属之中。人们并不经常能够或愿意理性地分辨外在威胁与敌意是来自哪一层“边界”之外。因此与邻人、亲人的矛盾和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的“异族”身上;相反地,对远方“异族”的仇恨与恐惧,也可能投射到对身边邻人与亲人的猜疑与歧视上。所有敌意与仇恨的转嫁、迁怒,强化层层边界以凝聚各层次的人群。我由此建立一种“毒药猫理论”,以诠释人类之族群认同以及相关敌对、歧视与集体暴力现象的社会根源,并以此补充基拉尔哈德等人“代罪羔羊理论”之不足。

本书第二部分是“历史篇”。“社会篇”所描述的羌族,事实上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我认为,唯有了解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造成当今羌族,我们才能全面地了解羌族。不但是今之羌族,也包括古代羌人;不但是羌人与羌族,我们也能因此了解华夏与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羌族研究,也是我所谓的“华夏边缘”研究。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历史知识中,羌族是一个居于华夏西部的异族。这个民族几经迁徙、繁衍,并与周遭民族融合而形成许多新民族。以这样的羌族史,来说明部分汉族、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源流。在这样的民族史中,民族被认为是一有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并在历史中延续、成长、消亡。然而,类似的“民族史”在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之学者眼中,却只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的集体想象与建构。后现代的中国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便在于解构这样的“历史”。究竟,羌族是历史的产物,或是“历史”的产品?

对此,我的看法是:当前之羌族为历史之产品,也是“历史”之造物。不仅如此,他们也是历史与“历史”的创造者。国族主义下的“历史”想象创造当代羌族,并凝聚羌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晚清以前中国文献中对“羌”的记载都毫无意义。“羌”的称号,存在于商人、华夏或中国人之历史记忆中至少有三千年之久。由这些人群对“羌”的描述与记忆中,我们可以探索华夏或中国人西方族群边缘的本质及其变迁。也就是说,由于“族群边缘”观点,近代国族主义下汉族对羌族之历史与文化建

构，反映出汉族对其族群边缘的重新塑造。相同地，历史上中国人对“羌”的描述，也反映当时中国人对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刻画，被华夏想象、刻画的“羌人”，也以行动缔造历史以及想象、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所强调的羌族史不仅是汉族西方族群边缘的历史，也是藏族的东方族群边缘历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氏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边缘的历史。在这历史中，“民族”是一群人的主观想象与建构，想象与建构我群的共同祖源与历史，以凝聚“同质化”的族群以及想象、建构他群的祖源与历史，以刻画“异质化”的族群边缘。如此，一个个由“历史记忆”所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彼此合作、妥协、对抗，并运用策略与权力影响彼此的历史记忆，因此产生新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在我所发掘与重建的历史中，传统“民族史”中的历史主体“羌族”似乎并不存在。的确，没有一个那样的“民族”在历史中延续。当代羌族与羌族认同，为上述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历史之最新阶段产物。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羌人”并不存在。历史上被华夏称作“羌”的人群，世代生息于华夏西部“漂移的族群边缘”上，他们的后裔因此散在今日之羌、汉、藏、彝及其他民族之中。我们也不能说，当今羌族只是被动地接受主体民族所给予的“历史”才成为羌族；或是说，在成为羌族之前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群。当代羌族的本土“历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英雄祖先历史”，另一类是“弟兄祖先故事”。在英雄祖先历史中，他们或借由“过去”来呈现自身的边缘弱势形象（如愚笨的蛮子），或借由“过去”来塑造足以为傲的我族形象（如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多起源于一个“羌族”英雄祖先——如周仓、樊梨花或大禹。

在羌族中，另有一种“历史”——弟兄祖先故事。它们以“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分别建立自己的寨子……”诸如此类的“历史”，来说明几个寨子的村民起源与彼此之祖源关系。我称之为一种“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它们以“共同起源”强化族群成员间如兄弟手足般之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中国西南各民族传说中或世界各地民族传说中，这一类“弟兄祖先故事”都非常普遍。只是在我们的知识分类系统里，它们被归类为传说或神话，“英雄祖先历史”才被认为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这种偏见，忽略了“英雄祖先历史”也被用来凝聚“同胞手足”之情（同时也被用来将人群阶序等差化），它们也是

一种根基历史。事实上，“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之产物。借此，在本书中我也将探讨历史心性的问题。

本书第三部分为“文化篇”。过去许多学者皆将“传统文化”视为一民族在历史传承中所得之祖先遗产。然而当代学者却倾向于相信，所谓“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知识分子的主观想象与创造。前者的看法，固然是受误于国族主义下以客观体质、语言、文化特征来界定的民族概念；后者，则忽略了近代“历史”“文化”创造的古代基础以及“创造”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过程。

在本书中，我由三个角度来解读文献中有关“羌人文化”的描述。在事实（fact）层面，一段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可能反映出当时被称为“羌”的人群之真实习俗。在叙事（narrative）层面，这些有偏见的选择性异文化描述，可能反映华夏自身的文化与认同特质。在习行与展演（practice & performance）层面，历史上华夏对异文化之排斥描述（无论是否真实），在歧视、夸耀与模仿等文化展演作用下，促成“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与历史记忆而成为华夏。“羌人文化”便如此，永远在一个不断建构与变迁的过程中。这样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也造成今日之羌族与羌族文化。在此“文化史”中延续与变迁的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在核心与边缘族群关系下的文化展演、夸耀与模仿过程。或者说，在此历史中延续与变迁的是各种核心与边缘群体间的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之文化表征。

将“文化”视为通过各种媒介的展演，我们才能见着“文化”动态的一面，并超越“客观文化现象”与“主观文化建构”之对立。客观文化在展演中被人们主观认知、批评与模仿，由此塑造或改变人们的认同；个人的主观认同，也通过文化展演而社会化、客体化。

在田野研究中，我曾得到许多羌族朋友的帮忙。而我，一位解构“典范历史文化”的学者，在构思本书时最感到不安的便是：如果他们的民族自尊与骄傲建立在这些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知识之上，那么，是否我的著作会伤害到他们的民族认同与感情？然而，我希望读者与我的羌族朋友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发现我并非只是解构“羌族史”或“中国民族史”，而是在更广阔、更具诠释力的认知体系上，重新建构一个关于“羌”的历史或历史民族志知识。这个新的历史与历史民族志，可以让我们对于“羌族”“汉族”“藏族”或“中国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而，本书之论述必须置于“华夏边缘”历史中，才能完整呈现我对

于羌族与中国民族的见解。事实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在1997年出版之《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之延续与补充。在前书中，我首先提出一个华夏“边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构想，然后以此说明华夏边缘的出现及其漂移、扩张与变迁过程，以及解释在资源竞争与各层次权力争衡背景下，华夏边缘之扩张与变迁如何借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进行。本书便是以汉、藏之间的古今羌人与羌族为例，说明一个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因此这不只是一个“羌族”的历史，也是“藏族边缘”与“汉族边缘”的历史；这不只是“外夷”或“少数民族”的历史，它也是华夏与中国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近20年来，在“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之历史与民族学研究中，流行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我且称之为“历史实体论”，第二种则是“近代建构论”。“历史实体论”者主张，中国民族是在历史上延续之实体，其中包括一历史悠长的核心汉族及许多在历史中起落兴衰，并与汉族互动、融合的边疆少数民族。此解释模式几乎被所有中国历史与民族学者所采纳。相关的“历史”，便是典范中国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近年来，有些受“创造传统”（invented tradition）与“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等研究影响的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物。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政治威权下的民族分类与相关历史建构，将许多原外于中国的大小非汉族群归纳、划分成一个个“少数民族”⁷。在族群政治立场上，上述两类学者也常针锋相对：前者常指责西方学者试图破坏中国之民族团结，后者则指责大汉族主义学者借着“历史”控制甚至“欺压”少数民族。

我认为近代建构论有许多值得修正与补充之处。其主要缺失有二：其一，研究者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研究者也因此忽略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历史”常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或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近代建构论者的这两个缺失，原为历史实体论者所长。但遗憾的是，历史实体论者所主张的延续性历史，是在某种中心主义下（如男性、士大夫或华夏中心主义）之选择性历史记忆建构。因此它的“现实关怀”——如安边、治边与化夷等等——也常流于政治干涉、掌控与文化排斥。

在本书中，我所建立的民族史知识，是一个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或“汉藏边缘历史”。借由这个历史以及它残留在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我来说明历史上漂移的、模糊的华夏边缘“羌人”，如何转化为具有汉、藏、彝及许多西南民族间之桥梁性

质的“羌族”。“羌人”与“羌族”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边缘”——他们与青藏高原东缘的一些部落、村寨人群是华夏之族群边缘，也是吐蕃与藏族的族群边缘。在此，历史是延续的，但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在此，“羌族”的历史或被解体为华夏与藏族边缘变迁史，“羌族”本土文化或也被描述为易变的、多元的、模糊的。然而就是这些历史主体的变迁与不确定性以及文化之模糊性，说明在中国西部与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汉与非汉之间，原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它才转化成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族群界线。这样的知识，不同于“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主张，其目的并不在于争辩或解答“中国少数民族”或“中国民族”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羌族”或“中国民族”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物。

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以及此种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譬如，在当代羌族认同形成之前，本地各沟各寨人群常在相互排斥、仇杀之中，对此老一辈羌族人记忆犹新。如今他们常说：“这都是由于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原来是一个民族。”这些话可以让我们深思：若非是有更好的族群关系理想，我们何须解构这些“知识”、这个“民族”？的确，由传统华夏边缘的“蛮夷”蜕变为“少数民族”，人群间的排斥与暴力已消除不少。然而作为“少数民族”之羌族，仍处在现代化的边缘。因此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个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我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相信这样的历史民族志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如何才可能共商怎样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

如此兼及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他者描述书写传统，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史记》之四夷列传中。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此传统结合外来之社会科学，曾化为历史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与边政研究等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传统。这些“边缘书写”，曾造成华夏边缘与此边缘的历史变化。在本书中，我以结合历史记忆、历史事实与历史心性之长程历史研究为经，以人类资源生态与社会认同区分体系为纬，共同构成一种历史民族志研究。从某一角度来说，它仍是结合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书写。但“社会”（或民族）、“历史”与“文化”在此研究中都有新的理解

与诠释，描述分析他者并非为了创造、刻画我群边缘，而是为了检讨与认识自我。无论如何，这是我近十年来在羌族研究中所获得，也是我在中华民族研究中由“解构”到“重新建构”的自我反省与尝试。

- 1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有关族群理论的发展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章“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及第二章“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 4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Eugene E. R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年，第119—140页。
- 5 George E. Marcus &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34-39.
- 6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1966;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7 Stevan Harrell,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N.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文本与田野说明

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在本书中都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或“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context）之互映，而“表征、再现”则是强调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下产生的表相。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texts in context）；情境也赖文本来呈现与活化（context in texts）。或者说，文本是某种社会本相的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这样的社会本相，也赖各种形式的表征，包含狭义的文本来呈现（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譬如，在一篇历史文献中，作者称羌为三苗的后代，一位羌族说羌族是周仓的后代，一位羌族妇女穿着“传统服饰”；然而，对我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从中，我探索的并非羌人是否真为三苗或周仓的后代，或何者为羌族传统服饰，而是它们背后的社会情境或社会现实。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使得古代华夏认为羌为三苗之后，使得当代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以及使得羌族妇女须穿着“传统服饰”。

由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说，所有当代所见关于羌族的文化、民族与历史现象，对我而言也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它们是由历史上一连串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将这些古今历史事实视为“文本”或“再现／表征”，我期望了解的是其背后的历史民族志情境，一种在人群间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

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都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又因性质及研究旨趣不同，各学科在此一方面也各自发展。相较于语言学与比较文学来说，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文本分析有较宽松的理解，同一学科中学者的做法也有相当差异。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无论如何，强调文本分析的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确有一些共识。

首先，文本分析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或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事实”的“模拟法”（analogy）。虽然“模拟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similarity）的智性活动中，我们经常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经验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

深植于社会文化与现实利益之中。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以建构一个熟悉的、利己的知识体系。相对地，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断裂的现象被忽略，此忽略也使得部分社会人群或“他者”落入社会边缘。因而，基于后现代的学术醒觉，学者们尝试由近代建构的“文本”中找寻一些多元、边缘、异常的现象，并分析其意义。

其次，由于以上的认知，学者们之文本分析切入点经常不是“熟悉与相似”，而是相反的，文本中或文本间所呈现的荒谬、断裂、矛盾、失忆、模糊、挫折；这不只是文本生产者在文本中所流露的，也是阅读者（研究者）所感受的。¹学者所从事的“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²或“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³，多少都与此研究取向相关。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或者我们的理性与一段时间、空间距离外的“古代”“土著”世界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异时代或异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

再次，通过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们希望了解其所反映的（reflective）“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及其所映照的（reflexive）我们所熟悉、信赖的“文化”与“历史”之本质。我认为，从文本所呈现的断裂、模糊与异例之探索中，文本所反映的与其所映照的知识可相互增长，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己身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情境中，了解另一个社会或另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最后，将文献史料、口述资料与文化展演都当作一种“文本”，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于其背后的社会脉络情境与个人情感，以及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此社会情境与个人情感，在我的研究中特别是指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和相关的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之认同与区分，以及在此认同与区分下个人的情感流露与行为。

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genre）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通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

基本上，我思考、分析文本的方式是借着一种考古学的器物遗存隐

喻。考古学者将器物遗存视为在一选材、制造、使用、废弃过程下之产物。我认为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同样地，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保存的过程而形成。面对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思考：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人、物、时间、空间等的指涉与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究竟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达成什么目的；作者或他人如何操弄、使用此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他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的争论与制衡中，这个记忆如何得以被保存、推广或被修正、废弃。对我而言，这并非是一种文本分析的公式。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我对文本的理解与分析常循此脉络进行。

本书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两种“田野”。首先，是我由1994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1994年夏，我由西安经陇西一路进入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再由陕南进入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循着历史上的羌人之迹，观察他们生活的山川环境，并接洽、安排以后的田野学术活动。此后，我在1995、1996、1998、2000、2001、2002年之寒暑期，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作田野调查。在这段累计约有11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中，我曾在三处作多次的停留访问，这三地是松潘小姓沟、茂县永和沟与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它们分别代表西北方藏化程度最高的，中间以及东方汉化程度最高的羌族地区。此外，我也短暂访问其他各沟村寨，每次在一村寨只停留约5—7日；或在一两年后，再度访问这些村寨。如此做法是由于我所进行的研究需要倾听羌族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多元声音”，因此我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元，并能涵括各种“边缘”。在此研究需求下，我的田野考察地区包括：茂县的永和沟、水磨沟、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牛尾巴，汶川县的羌锋，理县的蒲溪沟、薛城，黑水县的麻窝、黑水与知木林，松潘县的小姓沟，北川县的小坝、片口、青片等地以及以上各县的县城。受访的对象，包括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之羌族民众。

在田野中，除了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外，我最重要的活动是问村民一些简单的问题，并作口述录音。这些问题或主题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我对当地之历史与民族志的了解，另一方面，它们来自于相关的族群与记忆理论。我对羌族的认识，主要便是通过这些经过设计的主题与问题，以及羌族民众与我在这些主题与问题下之对话所产生的文本。譬如，其中一组重要问题是：“这儿的人是从哪来的？”问题中的“人群”由家庭、家族、一寨的人、一沟中的人群到羌族等等。事实

上，我所问的便是本地人记忆中的各种“起源历史”。在获得这些“起源历史”后，我分析其中某些语言符号的隐喻及一些关键主题如何被构述。

这些录音口述数据中的对话，都是以当地四川西北方言，当地人所称的“汉话”，来进行采访与应答。“汉话”是羌族与邻近藏族地区最普遍通行的语言，这一方面是“汉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乡谈话”（所谓羌语）在各地羌族间难以沟通。几乎所有的羌族与邻近藏族都会说“汉话”，但相当高比例的羌族人不会说当地的“乡谈话”。可以说，羌族以语言符号组构的文化与知识体系，原来就是以“汉话”来理解、表述的，或以“乡谈话”与“汉话”相互传译、混合的文化与知识体系。这也是羌族与许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族群特质之一。因此以“汉话”采访所得资料，可以适当地代表当地的本土观点。相反地，坚持以“原住民语言”来了解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传统，在“羌族”这样的人群社会中不但无法进行，而且也容易导致将一“民族”范准化、刻板化。

所有的田野录音都转录为汉字。基于我对口述资料之社会记忆本质的认识，我认为研究者在回忆、删削一段报告人的“口述”时，很难避免本身各种主观偏见所造成的误差。这便是为何我以录音来记录口述记忆，并将它们逐字、逐句转为文字。因此，本书所引的口述资料或有语法混乱、文句不衔接现象，或引文中会出现些罕见的语词，我都尽量附注说明。大量引用这些口述录音资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我认为这样的民族志表述、书写，可以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本地人与作者，或本地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介文化认知场域。在此场域中，作者与读者因认识本土社会文化，而认识我们己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相反地，认识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可帮助我们认识本土之社会与文化。

本书所涉及的另一“田野”，是在文献中所作的“田野”。我将各种文献，当作是报告人以文字展现的社会记忆，或如前所述，一种文本与表征。无论是汉晋时期华夏对西羌的历史与文化描述，或是近代历史与民族学者对羌族历史与文化的论著，或是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对本族历史、文化的书写，都被视为在某种社会情境下人们对“他者”或“我群”的选择与建构性描述。古今华夏或中国人以及羌族，这些书写主体自身之认同及认同变迁，反映在他们对“我群”与“我群边缘”的描述与论辩之中。因此通过这些文献，首先，我们得以分析、探讨文字记载中的人、事、时、地、物所交织而成的历史与社会“事实”；其次，产生这些文字社会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情境”——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体系与相关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此“情境”在历史中的延续与变迁；最后，结合对文本在

现实社会中作为一种“论域”（discourse）的人类学田野观察，我们可以探讨这些古今文本如何成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记忆，被人们夸耀、争论、否定、修饰、复制，进而影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及其变迁。

- 1 这也就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言：“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个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知道自己已触及到某些东西。由一个文献最晦涩的一面着手，我们或可以揭露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以这样的思考途径，甚至可能进入一个陌生而美妙的世界。”见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5。
- 2 R.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ter 6-9.
- 3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Scott Michaelsen & David E. Johnson eds.,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Elazar Barkan & Marie-Denise Shelton eds., *Borders, Exiles, Diaspor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社会篇

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介绍当前的羌族——他们的生活环境、生计活动、社会认同与区分，以及相关的恐惧、爱恨与情感世界。这样的描述，有如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的确，以下四章是一个以各种“认同与区分”为主题的羌族民族志。我所称的“认同与区分”（identity and distinction），有如人类学民族志中所称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s）；我所讨论的内涵，如家庭、家族、村落等，也部分与之重叠。对于社会组织，人类学者着重于研究各种“组织”的功能、结构以及其在神话、物与仪式中的象征表达。然而，由认同与区分的角度，我特别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身份认同，他（她）们与各层次外在人群的边界区分以及造成此认同与区分的资源环境与权力关系背景。

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生存动机”是人类一切社会与文化活动的根基。人们结为各种群体，来争夺、分配并垄断特定的生存资源，此为人类社会各种“认同与区分”的主要背景之一。在生存资源匮乏的羌族地区，自然更是如此。首先，我在第一章中介绍羌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简单介绍居住在此的羌族——他们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征。羌族所居的地理环境——一个个深藏在高山深谷中的“沟”，是造成各个孤立村寨的主要背景，也因此造成各沟、各村寨居民在语言、体质与文化上的分歧现象。在我的描述中读者将发现，并没有统一的或典型的羌族语言与羌族文化。在第二章中，我更深入地介绍各地羌族的生存环境。许多学者常以最偏远、原始的村落为田野对象，来描述一个所谓“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构成。相反地，在这一章中我将说明，羌族不只是居住在村寨中，其中部分也住在小街市与城镇里。即使是住在深山村寨中的羌族，他们也与一层层外在世界有相当接触。在生计活动中，资源竞争与分享造成各种人群社会之空间区分。在这些空间中，人们体验到各层次的认同、区分与相关权力关系，因此塑造了他们心目中远／近、熟悉／陌生、亲切／敌对的社会空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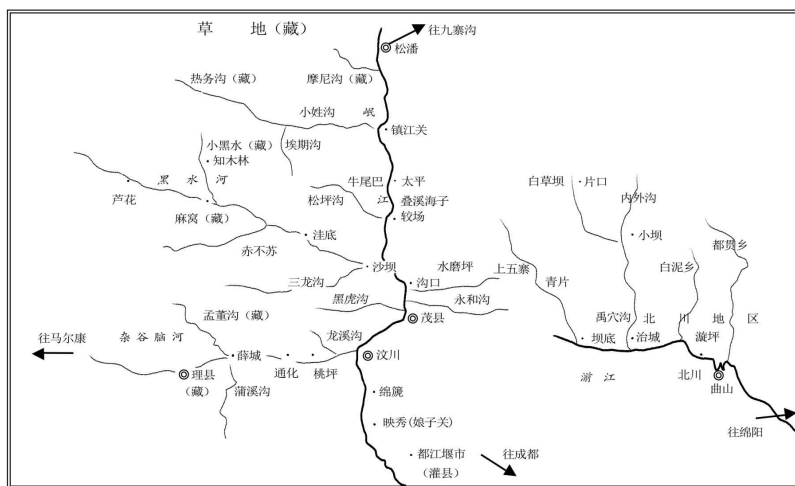
第三章，进入本书的重要主题——认同与区分。族群认同是本章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其他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如阶级、性别、城乡人群等，将置于族群认同现象中探讨。“族群”在本书中除了作为英文“ethnic group”的中文译词外，还有一更广泛的指涉意义——指所有

以共同血缘或拟血缘记忆来凝聚之人类社会群体。因而由家庭、家族、宗族，共祖之部落、村落人群，到民族、国族等等，都是广义的“族群”。在这一章中，我将介绍本地资源竞争与分配背景下的各层次族群认同体系。“区分”，也就是为限定可分享特定资源的人群而践行的社会边界维持。由于内部激烈的资源竞争，各地羌族特别在意彼此间的边界区分，这也解释了他们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与延续。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了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族群界线。在“本村寨人”认同之上，当地有一种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表现在“尔玛”（我族人）此一族群自称概念上。本章也由本地人的“尔玛”“赤部”（蛮子）与“而”（汉人）之概念以及它们在近半世纪来的变迁，说明本地的族群或民族认同及其变迁。

对个人而言，“区分”是一种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性的身体边界维持。维持此一层层的边界，以期身体不受病痛与外力侵害，以期家庭、寨子、村子之“身体”不受邻人或外来侵犯。在第四章中，我以流行于羌族间的“毒药猫传说”与相关文化、事件与记忆为例，说明村寨居民在上述的认同与区分体系下的情感、爱憎与相关行为，以及个人经验、情感与行为又如何强化各种社会区分结构。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人群

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数在30万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另外，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乡镇人口被识别为羌族。在这一地区（图一），岷江、湔江及其支流切过青藏高原边缘，造成高山深谷。这种高山间的深谷，当地羌族以汉语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



图一 羌族地区简图

往松潘、九寨沟的公路沿着岷江干流北去，途经汶川、茂县一带，路两旁所见皆为已开发的山田，或只是光秃秃的荒山，林木绝少。离开沿岷江的主要公路往各支流去，仍然看不见大片的森林。只有深入山沟之中，或攀上高山背面，才有大片的林木。这是近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过度砍伐的结果。理县、黑水、松潘等地原来更以森林资源丰富著称，但近年来森林覆盖区也在急速减缩之中。自1998年以来，中国在岷江上游实施“退耕还林”，森林砍伐已全面禁止。

完整的森林多分布在海拔2500—4000米的山区，主要由松木林构成，松林下盛产各种菌菇类植物。如松潘小姓沟中所能采集到的食用菌类，以当地的汉话来说便有：杨柳菌、獐子菌、刷把菌、鸡蛋菌、羊肚菌、白松菌、白桦菌、草菌、黄连菌、羊角菌、乌鸦菌、鸡菌、猴头菇、蘑菇、草菇、香菇、金针菇、野木耳、马屁包等等。整个山区除林

木、菌菇之外，还盛产各种药材。冬虫夏草、大黄、天麻、羌活、川贝、川芎、当归、党参等等，都是本地特产。在过去，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除了目前作为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金丝猴与牛羚外，还有三种熊（马熊、棕熊、黑熊），两种豹子（土豹子与金钱豹），以及小熊猫、豹猫、獐子、麂子、鹿、狼、豺狗、野猪、土猪子等等。如今也因为滥猎、盗猎，动物少了很多。田间、林中与高山草原上，又盛产各种野禽。经常可猎得的野鸡便有贝母鸡、杨角鸡、石板鸡、聒聒鸡、马鸡、松鸡、坨坨鸡、金鸡等等。

森林上方近山棱的缓坡，高度约在海拔3500—4500米之间。由于高寒，冬季积雪，树林只呈零散、小区域分布。然而到了夏季，由于日晒充足而成为丰盛的草场，这儿是羌族放养牦牛与马的地方。森林下方，高度约在2000—3000米的山腰缓坡处，被人们辟成梯状山田，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近河谷的河坝，海拔高度约在1000—2500米之间，则有宽广而日照较好的可耕地，这儿由于交通方便，近年来多成为经济作物的产区。

总之，本地自然环境上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山田、森林、草场构成丰富经济资源，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阻隔，交通困难，这又使得沟中的村寨居民成为相当孤立的人群。唯近年来，由于沿河谷的公路开发，各地的羌族往来较密切，他们多余的农林产品也因此有机会对外运销。

北川的地理环境与岷江上游地区有些不同。这儿的山区海拔高度较低，山区林木以混合林为主。北方接近松潘或南坪的地区，有较丰富的林木；也由于较接近汉区，本地的开发历史较早。除了出产一些药材与出外打工之外，本地村民几乎全赖农业生产。但与岷江上游地区相比，本地与成都平原的来往较密切、频繁。

一、各行政区简介

汶川 由都江堰市（灌县）过青城大桥入山，车行约一小时便到达汶川县南端的漩口与映秀镇。映秀旧称娘子关。许多羌族人都认为，过去映秀与漩口都是羌族分布的地方，但目前这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汉族。由此沿岷江北行，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即到达汶川的绵虬乡。这儿号称是“西羌第一村”——阿坝州最南端的羌族村寨在此。汶川旧县城在

绵麓、羌锋一带，清代的瓦寺土司在附近镇守。今之汶川县城——威州镇，还在北去车行半小时之处。汶川县城是羌族的文化中心，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与阿坝师范专科学校都在此。因此威州镇也是羌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本土研究与推广中心之一。

汶川县有汉族、羌族、藏族与回族。据1985年的人口统计，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61.88%，羌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6.18%，藏族约占11%，回族仅占0.8%。目前羌族人口可能已占汶川总人口的40%。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1980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地方干部与公职人员由少数民族担任。事实上，羌族主要分布在县北，岷江、杂谷脑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龙溪、克枯、雁门、绵麓等地，是汶川羌族村寨的主要分布地。这些地区的羌族，更因为长久以来接近汉人地区，受汉文化影响相当深。目前绝大部分岷江东岸的村寨居民，已普遍将汉语当作母语，本土语言消失殆尽。

理县 由汶川沿岷江支流杂谷脑河西行，便逐渐进入理县地区。理县也是汉、羌、藏与回族混居的地方。嘉绒藏族在此人口最多，最具社会、政治优势。理县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嘉绒藏族（旧称西番）贸易的孔道重镇，而今又是西去阿坝州政府马尔康之大道上的中间要镇。因此，理县羌族长期以来受嘉绒藏族与汉族双重影响。在这儿，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东，西边便是嘉绒藏族的居住地。桃坪、通化、薛城附近各沟，都是羌族村寨的分布地区，其中蒲溪沟是最深入大山中的一条沟。

通化、薛城一带的羌族，常自豪于他们过去与嘉绒人同为“五屯”之民¹，有事时受清政府调度出征。本地羌族各村寨在清代有的属于五屯中之“九子屯”。相较于北岸各沟的羌族村寨居民来说，蒲溪沟羌族受嘉绒藏族的影响较少。如薛城、通化附近羌族戴头巾的方式——“搭帕子”——与嘉绒藏族相似，而蒲溪沟羌族妇女则是“包帕子”²。

茂县 由汶川县城沿岷江北去，不久便进入茂县。茂县，目前是羌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也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羌族地区。岷江东岸有南星、石鼓、永和沟、水磨沟、石大关、叠溪、太平等沟与聚落，西岸有牟托、刁林、黑虎沟、松坪沟、杨柳沟、牛尾巴等，这些都是羌族村寨聚集之地。沿岷江支流黑水河，又有三龙、洼底、曲谷、维城等沟。向东越过土地岭梁子，湍江水系的土门乡也属茂县的行政管辖范围。茂县县城，本地人称之为凤仪，也是羌族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之一。比起威州镇来说，这儿更具少数民族色彩：街道上常见进城销货、购物身着民族服饰之羌族妇女。在凤仪北方不远的两河口，黑水河在此由西方汇入岷江。至少由清代以来，当地人便称凤仪、两河口以北地区为北路；此地以南，岷江东岸各沟为东路，岷江西岸各沟与黑水河流域则是西路。

一般而言，岷江东岸各沟及沿江的河坝地区生活条件较佳。愈往西、往北，愈山高谷深，寨子常坐落在很高的山上。由谷底河坝走到寨子，常需在陡峭的山道攀爬二至四个小时。由于高寒与土地贫瘠，居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在这儿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由东向西、由南往北，都呈现由汉至藏（嘉绒）的过渡现象。愈靠东方、南方的村寨，愈受汉文化的影响；愈往西、往北去，便愈多嘉绒藏文化因素。可以说，如果在文化上羌族是汉、藏间的过渡，那么茂县最西方的曲谷、维城与最北面的牛尾巴与双泉等地羌族，便是羌、藏间的过渡类型。他们许多文化与宗教习俗，都深受黑水与松潘藏族影响。茂县最东边的土门乡羌族，则已完全汉化，在清代时，此地与许多东路村寨都曾被官府划为“汉民里”。

由曲谷越过瓦钵梁子，便进入黑水县藏族村寨地区。黑水县东半部的藏族，以汉语自称“藏族”，然而以母语却自称“尔勒玛”，此与曲谷、三龙各地羌族的自称类似。

北川 由茂县越过土地岭梁子，经土门往东下河谷，便进入岷江流域的北川县。比起岷江上游的阿坝州，这儿山岭的海拔高度较低，河谷盆地较宽。成片的大森林几乎不见，只在西北角的小寨子沟一带有较完整的森林。岷江有四条重要支流：青片河、白草河、白泥河与都坝河。同样地，愈往上游去的山区村落生活较苦，愈往下游村落生活较宽裕。往西北去，还可见一些非汉本土文化遗迹；往东南，则所见与川西汉人聚落无异。目前羌族村落主要分布在西北半部的青片河、白草河两岸及其支流地区。过去在明、清时期，这一带居住的是以“好为乱”著称的青片羌与白草羌。然而到20世纪中期，本地居民几乎都自称是汉人。当前的北川羌族，大多是在1980年代中，经由民族识别、登记而成为羌族的。据本地民族干部称，目前羌族约占北川总人口的40%。

北川的旧县城在治城，附近有著名的“禹穴沟”。新县城向东移至曲山镇。由于明、清以来移入大量逃难、垦荒的汉人，因此当地居民的汉化程度相当深。到1950年代，原住民语言、文化早已完全消失，只有青

片河流域最西方的上五寨还保留一点本土文化残痕。1980年代以来，北川羌族努力与茂县等地羌族交流，学习本民族文化。

松潘 县城附近的海拔高度约在2700米左右。当地居民有藏、汉、羌、回等民族。一般而言，汉族与回族居城，藏族与羌族居乡。羌族人口只占松潘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分布在松潘南部的镇江关、小姓沟与双泉一带。镇江关由于位于沿岷江的大道上，因此附近羌族居民大多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在许多离公路较近的村寨中，本土语言已消失殆尽，居民之间只通行汉语。小姓沟北岸各小沟，是热务藏族村寨分布之地。南岸则多为羌族所居，著名的有尔边三寨（大尔边、小尔边、朱耳边）与埃期沟各寨。小姓沟中各村寨居民，特别是埃期与大尔边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浅，受藏文化影响较深。松潘最南端的双泉沟羌族，位置接近茂县杨柳沟与牛尾巴，这几处的羌族在语言、文化上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献中，这一带村寨住民都被称作“生番”或“杨柳番羌”。

镇江关与小姓沟一带因接近松潘高原，河谷海拔高度已相当高，因此相对看来四周的山还不如茂县、汶川一带的山势来得壮伟。由于地理上属高寒地带，一般而言，农业生产不如汶川、茂县等地。然而部分地区森林植被却保存得很好，因此当地的羌族可由森林中得到部分收入，以补农业之缺。唯过去数十年来，因过度砍伐，森林受到很大的破坏。

二、语言、体质外貌与文化表征：谁是羌族？

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羌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希望在本书一开始，可以给读者们一个概括的羌族印象。譬如，这个民族的人长得如何，他们说什么话，他们有何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这些对我而言有些困难。我们常认为一个民族自然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或体质特征——这是在一种典范的民族概念下人们对“民族”的刻板印象。无论如何，在语言、体质或文化表征上，各地羌族都有些差异。羌族，像是汉、藏间的变色光谱，愈往东南，那儿的羌族便愈像汉族；愈往西北，当地的羌族就愈像藏族。

语言 在羌族地区最常听见的共同语言是一种汉语川西方言——他们称之为“汉话”。另外有一种本土语言，本地人称为“乡谈话”。由于各地口音差别很大，因此“乡谈话”只能通行于很小范围的人群内——通常

是一条沟之中。西路与北路各沟、各村寨的羌族，许多人都能说乡谈话与汉话。岷江东路各村寨羌族，几乎都只能说汉话。北川地区大部分的羌族，在他们祖父那一代说的便都是汉话了。目前只在青片上五寨地区，有少部分老人还记得一些本地土语词汇。住在城镇中的羌族，一般都说汉话；知识分子还能说普通话。有些村寨中说的乡谈话，还夹杂大量的汉语词汇。只有离公路较远的深沟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说乡谈话的地区。

所谓“乡谈话”，也就是语言学分类下的“羌语”，其中包括许多彼此沟通困难的地方方言。这些羌语方言，从某些语言学者的观点，又分为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这两个方言群，又各分为五个地方土语。³事实上，在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说的：“我们的话走不远；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话，有时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说话都不一样。”正因为以乡谈话沟通有困难，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时，说的都是汉话。东路羌族经常自豪于他们能说很好的汉话。甚至他们认为汉话是“不需要学就会的语言”，而乡谈话却需要学。相反，西路与北路的羌族虽然说起汉话来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却能说一些邻近的藏族方言。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沟的羌族能说一口热务藏语；许多理县羌族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过去，语言的使用在这儿似乎也与社会阶级有关。由于嘉绒藏族土司在西路与北路较具势力，“嘉绒话”在他们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官方语言。因此从前西路、北路说“羌语”的土司头人，通常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较靠近汉区的东路地区，自然“汉话”是过去头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除了地域性语言差别外，男女的语言使用也有不同。与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汉话（或藏话）说得要好得多。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常接触外界，所以其他语言说不好。即使在乡谈话上，他（她）们也认为男人的词汇多而灵活，女人的语言则保守而较具地方特色。所谓男子的羌语词汇多而灵活，显然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汉语、藏语与邻近羌族方言的借词。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间的语言似乎也有些差别。理县蒲溪沟的一个中年人曾告诉我，当地许多老年人用的词汇现在已完全不用了。更普遍的是，保留“古语”较多的羌族端公唱词，目前绝大多数的本地羌族人都听不懂。

体质特征 在体质特征上，羌族也呈现由汉到藏的中间过渡形态。人们常以体质特征来界定一个民族，而羌族的例子却说明，“体质”在区别族群或民族上有其限制。譬如，一般认为与汉族相比较，藏族的鼻子

较大，皮肤较黑，身材较高。如此说来，北川地区的羌族在体质外观上与汉族全然无异。在岷江上游地区，一般来说，则是靠近嘉绒藏族的西路、北路各村寨人群具有较多嘉绒藏族体质特征，而东路各村寨羌族则看来与汉族无异。这中间的羌族，则呈现由邻近人群间细微差异所构成的由汉到藏之连续变化。

所谓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尽然是客观存在的、依遗传学逻辑延续与散播的一些身体内外特征。一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当这样的“体质特征”想象与建构，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时，它影响个人的审美观与婚配对象选择，也因此多少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1920年代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的英籍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曾指出羌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后代。他指出，由羌族人的体质上也可看出这个族群的渊源。⁴由陶然士所著书中的照片看来，的确部分本地人的鼻子较一般汉族的高大。我不知道陶然士是否刻意选择他心目中“典型的羌民”作为样本证据，或是否当年土著的鼻子的确比较高。然而近五十年来，当羌族成为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时，羌族的体质成分多少有些改变。首先，本地许多原自称汉人者，现在都宣称祖先为羌族，因此也被识别为羌族，如此便产生许多体质与汉人无异或差别不大的“羌族”。这些茂县东路与北川的羌族，普遍认为羌族是古华夏民族的一支，所以羌族与汉族“应该”在体质上没有差别。其次，许多西路、北路接近藏区的羌族都说，在过去并没有羌、藏间的区分；在民族识别、划分后，“说多了就有区别了”。也因此，过去他们与上游村寨人群结亲很普遍，但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他们与被识别为藏族的上游人群间的婚姻就少多了。羌族的例子显示，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有时是个别学者或社会的集体想象与选择。在此，涉及西方传教士、汉人或土著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我群与他群之典范体质或体质区分的想象。而当这些认同与典范体质想象影响人们婚配对象的选择时，自然也影响到一个族群的体质特征。

文化特征 虽然在体质上很难看出羌族与汉族的区分，然而许多羌族或外来者皆认为，羌族妇女服饰鲜明表达了羌民族特色。当前羌族的确可以由村寨妇女身上鲜明的服饰分辨出来。但村寨中的羌族男人、城镇中的羌族男女以及所有北川的羌族，穿着都与邻近汉人平民无异。“服饰”可以说是个人或一个人群“身体”的延伸；通过此延伸部分，个人或人群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因此服饰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性身体建构。在本书中我将对此现象作进一步探讨，

并说明为何只是村寨妇女，而不是所有的羌族皆穿着本民族服饰。

再者，学者综合各地羌族妇女服饰之“相似性”，以建构一整体的“羌族妇女服饰”概念。然而，对各地羌族来说，一地有一地的服饰特色，一村有一村的穿着特点；简言之，愈往南、往东，便愈受汉文化影响，愈往西、往北，便愈受藏文化影响。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重要的是邻近村寨与地区人群在服饰上的“相异性”。

在其他文化表征上，同样地，靠近藏区的羌族有许多藏族特色，靠近汉区的则吸收大量汉族特色。如在宗教信仰上，北路羌族所供奉的诸神中有许多藏传佛教神祇，东南部的羌族信仰中则多玉皇、观音、东岳等汉文化中诸神。由于“藏化”与“汉化”程度各个沟与地区皆不同，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文化能代表典型的羌族文化。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将所谓“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分剔除，以找寻、呈现典型的“羌族文化”。事实上，在许多羌族研究学者的探索下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的强调、宣传下，一些羌族文化特色如羌历年、锅庄舞、羌族刺绣、神树林信仰、山神信仰以及端公文化、禹文化等等，都逐渐为人所知。在本书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羌族调查者也曾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色，但他们却困惑于究竟哪些是汉文化或藏文化因素，哪些才是羌文化因素？是早期调查者之学养不如今之学者，或是“羌族文化”在近半个世纪来曾发生许多变化？在本书文化篇中我会详细说明。

在以上这些有关羌族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一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常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因此，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这也证实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族群研究者的普遍认识——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被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究竟谁（who）是羌族？我认为这问题过于简化了人类的族群认同现象。在本书中，我将探讨、说明他（她）们为何（why）宣称自己是或被认为是羌族，他（她）们如何（how）成为羌族，以及如何表现或宣称自己是羌族。这样的羌族描述，必然涉及人类生态、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社会阶序与权力关系以及“历史”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说明了羌族社会以及羌族如何在历史与“历史”中得其民族生命后，我们会再回到“羌族文化”这一主题。

1 乾隆十七年，清废除杂谷土司苍旺之后，在本地实行屯兵制。以本地五个大寨子为首，置五屯，统一调动诸寨兵员，此五屯为杂谷脑屯、乾堡屯、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

- 2 搭帕子是将折成方块状的布置于头上，再以布条或假发固定；包帕子则是直接以长布巾缠头。
- 3 孙宏开：《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第177—178页。
- 4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pp.36-37.

第二章 村寨与城镇生活

在一种刻板化的土著意象下，学者经常选择描述一偏远地区的土著聚落生活，如此刻画一个自然、典型与结构性的“他者”社会及其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社会人群的研究，自然有其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资料视为“某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时，便可能面临两种质难：一是，在知识上，为何对此“部分”的认知可以代表“全体”？二是，在社会伦理上，是否如此的“土著意象”产生于某种族群或文化中心主义偏见，因而此种书写是否又强化了族群或文化核心与边缘间的不对等关系？

以羌族来说，当前大多数羌族皆居住在山上的村寨中。然而并非所有羌族皆如此，当今部分羌族居住在威州、茂县、曲山等城镇以及许多大小不等的小镇、街市。我也不认为居乡的是典型的羌族。随着城、乡与国家的经济、文化、行政紧密结合，城外村寨居民之羌族认同才逐渐鲜明。因此村寨与城镇的社会背景以及羌族民众在其间的生计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了解羌族都非常重要。

一、村寨聚落

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部分建在河谷台地上的村寨。据村民说，人们过去住在更高的山上，后来才渐渐搬到现在的山腰来住。他们在山上打猎、采药时，还常见到此种高山村落废墟。

一条有溪流蜿蜒其间的峡谷，在本地人们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建在沟两岸的半山坡上。进入一条沟，通常需先走过跨越干流溪谷的吊桥，然后沿着盘绕山腰上的小径进入支流所出的沟中。深入沟中之后，两边山上的村寨远远映入眼帘。村寨的海拔依地理状况、生产条件而有差距。在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如茂县东路的永和与水磨坪，村寨离河坝较近；由河坝只需走5—10分钟就进入村寨中了。这些地区通常有较宽广的河阶地，被开发来种花椒、苹果。在资源匮乏地区，如茂县的三龙、曲谷，理县的蒲溪沟等地，寨子常坐落在需走上2—4小时的高山上。到了这里，人们自然想问：为何人要住在这儿？主要原因便是资源匮乏。匮乏使得人们必须走入深谷高山，以利用各种边缘资源。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也使得他们较愿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不过，

由于目前治安较好，安全无虞，所以许多有办法的村民都搬到河坝居住，或在河坝弄一块地耕作。因此目前到处都有了河坝村落。

最大的村寨——汶川的罗卜寨——约有两百户人；最小的村寨约只有三五户人。三五十至七八十户的村寨，可能是最普遍的了。在理县、汶川、茂县地区，羌族村寨最特殊的景观便是，山坡上一片连接在一起的石砌房子，有些还有残留的石碉楼。石碉楼是一种石砌的四角、六角或八角塔状高楼，高约20—30米。碉楼最密集的地区是黑虎，反映了明清时期“黑虎羌番”与中央朝廷间的激烈战争。无论由聚落地形选择，或聚集成片的房子，或由石碉楼来看，羌族村寨的防卫功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也说明了为何从前没有河坝村寨。他们认为住在河坝会经常遭抢，非常不安全。据说，过去住在河坝的大多是外来的汉人。因此直到现在，许多高山村寨的人还瞧不起河坝的人（新近搬下去的除外），认为他们“根根”不好（有汉人的血缘）。

茂县北路太平附近山上的牛尾巴塞，村寨中各房屋间的距离较宽，集结如城的聚落不见了。到了松潘小姓沟，屋与屋间的距离更大，房屋多为木、泥结构建筑。可见在过去，这里村寨聚落间的关系比较舒缓。无论在理县、茂县或松潘，村寨中的房屋大多为三层建筑；下层关牲畜，中层住人，上层通常只有一小间敬菩萨的经堂或储藏间，其余空间则是泥铺的屋顶平台，作为曝晒粮食之用。各层楼之间以一种独木梯上下。在北川地区，村落多坐落在河坝或低山腰上。说这儿的羌族“居村”而非“居寨”，主要是因为这儿没有阿坝州那种连接成片的石砌房屋，所见只是汉式村落。房屋也与一般川西汉式农舍建筑无异。主屋由瓦顶与竹木墙构成，有雕花的窗牖；猪舍与柴房在主屋之外。

一条河有干流、支流，同一溪流又有上游、下游，因此村寨所在的沟又有内沟、外沟、上沟、下沟与沟口之分。因此同居于内沟的几个村间的关系，自然比他们与外沟各村间的关系来得亲密。但无论如何，孤立是村寨生活的主要特色。尤其在过去，沟与沟之间村民往来绝少，这与各沟民众间的资源划分与竞争有关。在下一节中我会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村与寨的区别在当地是相当模糊的，因此现在羌族民众多喜欢用行政区划名称，如大队、小队或组。大队相当于村，小队或组相当于寨。然而这些地方行政划分，与当地的人群划分概念又不尽相同。譬如，为了行政方便而将两个邻近寨子合成一组，因此同一组里还经常还分大寨子、小寨子或上寨、下寨。有些羌族知识分子以行政村（组）与自然村（寨）来区分两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羌族各个乡有多少村或

多少组，但总共有多少本土观念中的“寨子”，恐怕不容易统计出来。主要困难便是我们不清楚，根据当地人的观点，每个组内部究竟可分成几个“寨子”。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此种村寨聚落。岷江流经松潘的镇江关时，一条支流热务河从西方汇入。这条支流所流经的沟，前段称作小姓沟，后段为红土区或称热务沟。小姓沟中又有几条支流汇入热务河，其中一条是埃溪。埃溪所流经的沟，称埃溪沟或埃期沟。这条小沟中只有一个村，埃期村。村中有三个寨子，分别称为一组、二组、三组。有些较深长的沟中，村寨结构就复杂多了。如茂县的黑虎沟，目前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二根米”、二大队“蒿紫关”、三大队“耕读百吉”、四大队“爬地五坡”。在当地人观念中，一大队又分为“二根米”与“鹰嘴河台”，与其他几个大队共称“黑虎五族”。每一大队中又分几个小队，每一小队中又包括几个寨子。如，二大队“蒿紫关”分为三个小队，其中的二小队中又有王氏寨、白石寨、和尚村、上村、板凳寨等等。在后面我将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村寨结构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相关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体系。

二、村寨中的经济生活

在村寨中，各地羌族或有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但“多元化”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多元化不仅表现在农作物的种类上，也表现在多种的生计手段上。他们农、牧兼营，还在大山上的森林中采集药材、菇菌与狩猎。农闲时，男人还要到外地打工赚钱。这是人们对当地边缘的、垂直差异大的自然环境所作的适应。

农业是羌族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在春秋两季农忙季节，男女老少都参加农业活动。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事由女子担任。一般来说，村寨居民的农业传统倾向于种植多样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麦（玉蜀黍）、斧豆、洋芋、燕麦、青稞、豌豆、洋根以及蔬菜类的白菜、萝卜、油菜、甜菜、莴苣、菠菜、青菜、葱等等。由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有差异，照顾方法也不同，因此村寨中的妇女几乎终年都在田中忙碌。近年来，花椒、苹果、梨、李子、桃、大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为羌族地区带来不少财富。因此一些靠近岷江大道交通较便利的村寨民众，都纷纷将日晒较好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特别是已成为当地特产的花椒与苹果。然而，几乎所有种花椒、苹果的村寨居民，仍然种植许多粮食与蔬菜作物，很少人成为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民。许多年轻

一辈的人已不满足于这种农业传统。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抱怨他们的母亲在这方面的“顽固”：怎么说她们也不肯多拨一些田出来，种市场价格好的作物。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尤其如此。

然而，这是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生计取向（subsistence-oriented）的农业，一是市场取向（market-oriented）的农业。前者之经济动机主要为“减少生活风险”，后者之经济动机则是“追求最大利益”。老一辈的村寨农民，或高山深沟中的村寨农民，他们的农业生产以家庭生计安全与最小风险为主要考虑。因此，种植多种作物最能符合此目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险，使得当季的作物可能颗粒无收。然而只要有几种作物收成好，一家的生计便能得到保障。相反地，在此“最大利益”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交通困难，多余的产物很难运出去供应市场。再者，在村寨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所谓“富有”只不过是柴火、粮食与猪膘储积多一些而已。然而像这样的家庭，村民们也期望他们慷慨。而对别人慷慨也是一种“避免风险”的农村道德¹；对亲友、邻人慷慨，在急需时也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过去在高山深沟村寨中，除了少部分经营鸦片生意的头人较富有之外，各个家庭在经济上是相当“平等”的。

19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部分村民也有了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动机与机会。虽然如前所言，他们仍不敢完全放弃传统农业，但经营经济作物与其他事业的确让他们比别人更富有。这些头脑精明、敢于创新的农民，也就是各个成功的“农村个体户”。除了储积大量的柴火、粮食与猪膘外，如今财富的新象征是以卫星天线接收的电视机。现在各个羌族山间村寨的新景象便是：很远就看见几个白色“锅盖”——他们对卫星天线的称呼——立在一片灰蒙蒙的村寨屋顶上。

无论是传统农业或是加入经济作物的农业，人力是家庭经济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倾向于传统农业的村寨中，家庭的贫富差距通常只是家庭发展阶段与相对成员多寡的反映。一个年轻的家庭，如一对夫妻带着一两个尚年幼的孩子，由于人手不足常是最穷困的家庭。相对地，如果子女都已成年，而家长又有能力将已婚的儿子、媳妇与女婿系在家庭内，掌握这些人力的分工与运用，便是较富有的家庭。然而，这样的延伸家庭通常无法维持长久，在一段时间后便分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家庭财富分散。就这样，一个寨子里的各个家庭，在经济上得以维持某种程度的平等。

无论如何，自1999年以来，由于在此之前长江中、下游年年水患，由国家筹划的“退耕还林”逐渐在羌族地区全面推行。原来分配给各家庭

的田地不准再耕作，在五年内由国家按亩发给补偿金。各家只能在一小块田地上种一点自己食用的蔬菜、杂粮与果树。这样的发展状况，在未来几年必定对于羌族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很大的改变。

人力多寡与家庭财富有密切关联，主要原因是：虽然农业获利不多，但这儿却有多元的资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获得它们。菌菇，对于邻近森林保存完好的村寨民众而言是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产一些贵重菌种如羊肚菌、香菌（松茸）的地区。如果当年价钱好，一个家庭在一季中常常可以由此得到500—3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一般的菌子、木耳，近年来由于黄龙、九寨沟观光事业的兴盛，也有多颇商人收购。养羊，是另一项家庭副业。然而羊不能放得太远，怕被偷或被野兽侵害，也不能放得太近，怕它们损害作物。所以放羊需要耗用一些人力。有六七岁以上的孩子或老年人的家庭，才有多余的人力去采菌菇与放羊。又如，每个家庭都养有几头猪，喂猪得每天割猪草，这也是妇女与小孩的事。在松潘地区，我曾看过小孩“牧猪”，带猪在村寨附近山上吃一种带谷粒的野草。据当地人说，过去在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代初），这种野生谷粒养活不少人。一般来说，猪只供家庭消费而不卖出。每年在过年的前几天，每家都要杀三五头猪。一小部分在过年时食用，大部分都挂在屋中烟熏、风干。由猪背上揭下的长条形肥猪肉，猪膘，更代表一家的财富。这种风干的猪膘，几乎每家屋梁上都挂有七八条到数十条不等。

打猎与采药是青壮年人的事，这通常需要进入山中一星期或更久的时间。当前由于滥猎，动物少了很多。因此打猎只能当作是好玩，猎得的多为野兔与各种野鸡。挖药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岷江上游羌区盛产羌活、大黄、天麻、川贝、虫草等药材。羌族村寨居民对植物的认识与敏锐相当惊人，显示药材在其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经常能以本地话（或汉话）指认数百种山中植物。我也曾注意到，陪同我到他处村寨去的羌族朋友，经常询问当地人某种他们没见过的植物之名称及特色。

七月初，挖药的青年人便带了干粮结伴上山。在林子里搭一个草棚，人就睡在里面。草棚外筑个土窑；有些药材就地烤干了才带下山去。每隔五天或一个星期，家里的人便上山替他们送粮食，顺便将挖得的药材（或菌菇、猎物）带回寨子。夏天在大山林子里，采药人以呼啸来彼此联络，也借此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人在采药以及这些采药人是不是“本地人”。各村寨有各自的挖药地盘，不能随便到别人的山上挖药。

然而作为分水岭的大山，却是个界线模糊的地带。也就是在这里，经常发生村寨间因挖药发生的纠纷与斗殴。

在大山上放养马与牦牛，也是一项很好的家庭副业。早些时候，放养方式还是让它们在高山上去觅食、生养，对抗熊、豹、豺狼。只有在需要时，村民才到高山上去牵牛下来耕田，或牵马下来驮粮。牛马养得多的家庭，一年如能卖个几头，则可为家中带来不少收益。目前一头牦牛约可卖到2000元人民币。在过去，这些马、牛几乎不需人照管。后来，偷牛盗马的人多了，因此几家的牛马常养在一起，各家轮流派人隔数天便上山查看一次。有十来岁孩子的家庭，比较有多余的人力在夏天上山挖药，或照顾山上的牛马。同样，高山牧场也依各沟、各村寨划分地盘，放牧、捡柴都不可随便越界。“退耕还林”之后，在2001年夏季的探访中，我发现埃期各寨村民在山上处处设下木栅，以防止其他村寨的牛马越界。目前村寨的牛马，几乎天天都需要年轻人上山看顾。可见在农业资源断绝之后，牧业资源的争夺在村民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夏天，成年男子通常都要出外做获利更多的事。这些事——如修路、砌房子、伐木、挖井、卖药材——他们统称为“找钱”。大多数人只在阿坝州内找这些赚钱的机会，少部分人到成都平原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谋生。到了九月，他们才纷纷回到寨子，帮忙田里的事。以石块砌房子，是羌族与黑水藏族最擅长的手艺，寨子里的房子都是如此建造的。汉化较深地区的村民通常已失去这项手艺，因此常需要深山村寨的人替他们建造这种房子。近年来由于九寨沟观光成为当地的重要资源，因此拓宽公路与路况维修，为沿线羌族民众增加不少工作机会。

“找钱”常常是相当辛苦的事。以农闲时多余的劳力换现金，而所得的钱与付出的劳力相比，以外来者的观点，可说是相当不经济的。譬如我见过一些深沟中的村寨年轻人，他（她）们找钱的方式是背木墩子出去卖钱。天没亮就起床上山，上午近11点到达“板场”——可以伐木的深山老林，将砍下的大树削成木墩子。有时用背的，有时顺山沟滑下去，回到村寨里已是下午五六点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再背起重约七八十公斤的木墩子走出沟去，约在正午时才抵达沟口。将木头卖给商人，然后再走回村寨，到家时经常天色已暗。如此两天的工作，所得卖木头的钱大约是三四十元人民币。然而，“经济”在此社会中有不同的理解：“找钱”主要并非为得到最大利益，而是使得生活更有保障。

男人“找钱”也有轻松的一面。在山上挖金、伐木或挖药的人常聚在一起“摆条”（聊天）、喝酒，这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到松潘或茂县卖农

产品或药材的男人，更经常到处遇到熟人，一起吃饭饮酒，到处走走串串。然而，也就是“找钱”以及在这过程中与外界的交往，使得男人所能接触到的外在世界比女人所能接触的远为宽广，也使得男人从外界带回来的“知识”，不断地改变村寨认同的本质。

对于一些有头脑的村民，赚钱的门路就更多了。他们有些人包下地方道路工程，然后低价雇用本地人修路，赚取相当利润。有些人买辆小卡车，每天沟内、沟外与城镇间跑几趟，替沟中村民解决交通与农产品运输的问题，也为自己赚得不少金钱与声名。更多的村寨居民，划出大部分的地来种苹果与花椒，只是这一部分，一年常有3000—8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收入。每年七八月间，汶川、茂县等山中城镇便成为花椒、苹果、桃、李子等经济作物的批发零售市场。许多农民也经常自己担着花椒、水果到市场上贩卖。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也使得山中城镇的商业繁荣起来。近十年来汶川、茂县开设了许多饭店、招待所，以容纳路过的观光客。当地的水果、药材、手工艺品与“民族文化”也成为观光商品。由以上描述可知，在这岷江上游山区原来就存在多元化的资源，在市场经济逐渐活络以及观光事业带来的新商机下，城镇与村寨居民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如此，家庭人力与个人才干，成为经济上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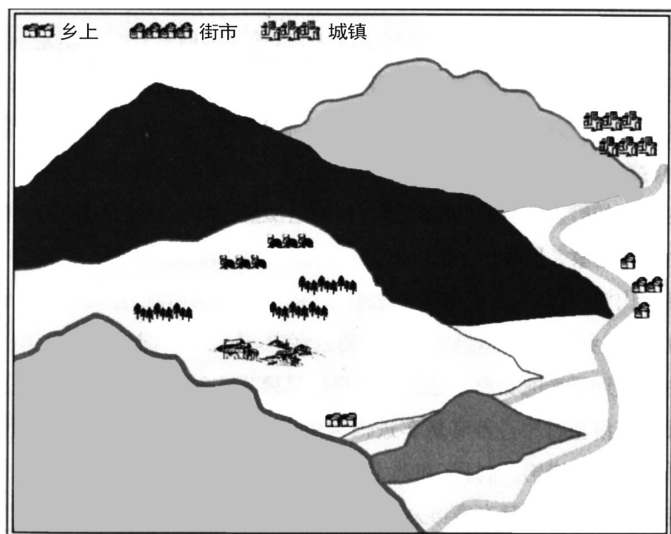
总之，村寨环境的特色是，一方面沟中垂直分布的资源提供人们多元的生活所需，使得“沟”成为一个个相当自足的生态区；另一方面，沟与沟之间因高山隔阻，交通困难，使得沟中村寨居民相当孤立。羌族村寨居民便在此有相当封闭性的环境中，在半山上种植多种作物，在住家附近养猪，在更高的森林中采药材、菌菇与打猎，在林地间隙牧羊，并在森林上方高山草场上放养马与牦牛。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家庭都是独立且有相当程度自足性的经济体。由粮食、蔬菜到腊肉，以至于黄酒，一般而言都可以自给自足。即使处于阴山或高寒地区的村寨，农业生产欠佳，村民们也有机会由其他生业中得到补偿。

近年来羌族村寨的资源环境产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森林砍伐被全面取缔，狩猎用的土枪被禁止使用；退耕还林，也切断了他们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公路开发、岷江上游广修水电站以及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业，也带来许多新工作机会，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也产生许多新资源。这些都使传统村寨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变化是，由于资本化的商品产销与消费动机，他们的经济生活与村寨外的世界愈来愈密切。譬如，村寨居民们开始关心“中日贸易谈判”，因为其直接影响

当地高等菌菇的收购价格。尽管如此，一方面多元化地追求生存资源，一方面严格划分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这两个原则却没有改变。

三、城镇、街市与乡上

近年来，许多羌族并不住在村寨里，因此也脱离前述的经济生活。他们住在交通较方便而有商业、行政等机能的地方。在羌族地区，这种地方大约可分为三级：城镇、街市以及乡上（见图二）。



图二 沟内与沟外的世界

可称之为城镇的几乎都是县城，如茂县的凤仪镇、汶川县的威州镇、理县的杂谷脑、松潘县的松潘城与北川的曲山镇等等。由于主要公路线沿着岷江、杂谷脑河、湍江修建，因此城镇也都位居沿河的交通要冲点上。各地县城是羌族地区的商业、文教与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村寨羌族认识其他羌、藏、回族，并因此认识自身民族属性的地方。许多羌族居民在此或任职于政府机构，或经营商铺、摆摊贩卖，或从事劳力工作与服务业。近城镇的村寨居民，更经常在早晨挑农产品到城镇上卖。尤其到了夏季花椒成熟的季节，汶川与茂汶县城都是著名的花椒集散市场。近年来，九寨沟、黄龙、红原草地等旅游区的开发，也为公路沿线的汶川、茂县与松潘带来丰富的商机。为了吸引观光客及凝聚民族认同，各县城中也经常举行各种羌族民族庆典与展览活动。

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茂县到松潘间有沟口、

渭门、太平、镇江关，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这些坐落在沿河交通线上的街市，长度由两三百米到不足一百米，通常有些卖日用百货的商店，几家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通常有一所小学。街市是邻近几条沟的村寨居民会面与交易的地方，也是往来客货车司机、旅客打尖休息之处。附近村寨中的男人，闲着没事都喜欢到街市上逛逛，找朋友聊天，也借此得知外界发生的一些事。同城镇一样，街市也是各民族混居的地方。

在高山深沟之中，乡政府所在之河坝（溪流旁的河阶地）一般称作“乡上”。在这儿，除了乡政府之外，经常还有一两家食堂，几家小卖铺与村的供销社以及几家由山上迁下来的农户。这样的农户如果聚集成村，便称为河坝村，乡政府经常便设在河坝村中。若有班车进入沟中，这儿通常也是班车的起点与终点站。从外面带货进沟的村民，在此下车后，便背着货继续沿着溪谷走上山。乡政府与村寨居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地方的乡长、书记，经常下乡组织开会、宣达解释政令、扶贫、救灾或解决纠纷，村寨居民也常常到乡上办事治公。因此“乡上”是同一沟中各村寨居民交往会面之处。他们经常能在此遇到相熟的朋友，一同在小饭馆或杂货店中喝酒、摆条（闲聊）。乡上通常也有小学，但一般认为其水平比不上街市的小学，所以少数有办法的村寨民众，便把小孩送到外面街市的小学就读。然而，乡上的小学又比深沟高山村寨中的“乡村小学”来得好，因此许多村寨居民都让他们的子女到乡上就读。这些孩子上学、放学，经常需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

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由1980年代初开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所居各县中，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住在城镇、街市与乡上的羌族民众，有些在地方政府各单位担任工人、司机、工友与厨司等劳动职务。其中更有一部分任职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下产生的各种公职，如各级自治政府领导、干部、民族学校老师以及各级党委、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一部分民众，便是以后将常在本书中出现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所以能生存于村寨之外的环境中，主要是由于他们作为国家与羌族民间桥梁的身份。对村寨民众而言，他们是国家的代言人；对国家而言，他们又是羌族人民的代言人。作为国家之代言人，他们必须熟知汉文知识体系，了解本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与当前局势。一方面，他们在追求个人与本民族利益时，能顾及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国家或整体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部分也来自他们是本土民族文化的诠释者与

代言者，因此他们也必须掌握本民族知识。然而，无论是汉语语言文化知识还是本土知识，他们都不仅是学习者和推广者，同时也是选择、诠释与创造者。

显然，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州的城镇中，“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项可分享、争取的资源，不只是因此产生的政府公职和较优厚的经济、文教、观光开发建设经费，也包括较优越的生育与子女就学机会。于是在此资源匮乏的整体环境中，城镇中“少数民族”此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低风险的生存空间。以公职人员的薪水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比不上许多勤奋致富的村寨农民。然而，村寨中的父母们却竞相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期望子女未来能成为民族干部。这不只是因为村寨生活苦，他们希望下一代能脱离每天爬坡上下寨子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追求最低风险的经济考量下，成为民族干部是一种较“经济”的生计方式。然而城镇中“少数民族干部”此一领域资源也相当有限，因此形成另一种资源分配与竞争场域。教育是进入此一场域的重要关口，如何将小孩送入城镇中的学校，特别是进入培养民族师资与干部的民族师范学校，成为羌族间一种激烈的竞争。每年暑假，许多羌族家长都在为孩子的就学奔走、请托。就此而言，城镇中的羌族自然占了许多优势。

进入少数民族公职此一领域后，各地区之少数民族干部间也有激烈的资源竞争。资源竞争不只是关乎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也关乎群体的权力与利益。

城镇与村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羌族”。因此，在许多生活层面上，两者都维持微妙的密切关系。城镇中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村寨就学、工作，因此大多无法说“乡谈话”，汉话（川西方言）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在穿着上，他们也与一般汉人无别。然而，他们都认为“典型的羌族”是村寨中那些说“乡谈话”、穿着羌族服饰的人（特别是妇女）。他们欣赏、记录、研究这些羌族文化，并引以为豪。对于村寨民众而言，这些居住在城镇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却是相当值得称羡的对象。他们从城镇中人那儿得到新知识（包括民族知识）以及学习新的物质享受。村寨的人进城时，常送他们一些自家生产的腊肉与农产作礼品，而城里的人则帮助这些同乡与城中的各种机构打交道。

四、邻近城镇：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几个邻近或就在羌族地区边缘的城市，虽然居住其中的羌族不多，但它们与羌族的日常生活及历史经验有密切关系。这些城镇主要是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松潘与马尔康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松潘在羌族分布的北缘，马尔康在西边。清末至民国初年，松潘是在“西番”包围下的边防重镇。目前松潘是往九寨沟旅途中最接近目的地的市镇之一。有些茂县北路羌族会到这儿做些小买卖，或在当地旅游饭店中工作。因此在北路羌族心目中，松潘有特殊意义，松潘人与他们的关系亲近。至于茂县南路及汶川的羌族，特别是老一辈的羌族，则认为松潘是个危险的地方。

马尔康，是今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在老一辈羌族心目中，它是代表过去一些强大的嘉绒土司的政治核心地。然而在羌族地区城镇中，他们却常接触到马尔康来的人或听到有关马尔康的事。自然马尔康来的人，或“州里来的人”，多为州政府官员。对羌族民众来说，他们代表一种政治、社会但非文化上的优势群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尔康州政府是一个联合羌、藏的“本地少数民族”象征，代表在此空间藏、羌之间紧密而又友好的关系。

灌县（今都江堰市）是成都平原进入岷江上游山区的入口城市。这个充满神话的古城也是汉文化进入岷江上游的入口。因此与灌县有关的神话传说，如李冰、孽龙、二郎神等等，也都流行在岷江上游，特别是在汶川、理县与茂县南路和东路等较为汉化的羌族之间。灌县在老一辈羌族人的观念中或在本地传说中，是汉人与“我族”的势力交界点。这应是由于灌县是羌族人进入汉区的第一个大城。无论在今日、清代或更早，灌县与岷江上游居民的经济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岷江上游山里的人，经常季节性赴成都平原打零工赚钱。不仅当今羌族如此，据汉晋中国文献记载，当时已有本地“夷人”如此。灌县的都江堰，自古以来便需要大量的淘沙工人，至少在近百年来，岷江上游村寨居民为此提供了相当的劳力。如今，灌县仍是许多羌族心目中“找钱”最理想的地方。对于许多经济情况良好的羌族，灌县成为他们消费享受现代化最方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此买到各种新型电器，上高级餐厅享受美食。甚至不少羌族在此买房置产，搬来城中居住。羌族父母常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阿坝州，他们认为男孩到外地工作才有发展，女子嫁到州外才不会吃苦。而离阿坝州最近的灌县，则是这些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工作、成家地点。许多州内的退休干部，也选择在灌县置产度其余生。因此，羌族人多少都有些亲友、熟人住在灌县。

成都是四川省府所在，又是远比灌县来得繁荣的大都市。因此在羌族人民心目中，这儿是比马尔康更高层的政治权威中心。岷江上游村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成都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也反映成都过去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羌族人偶尔需要到成都购买在灌县不易买到的货物，或在此卖出一些土产，或只是访友、逛街。无论如何，成都对他们而言代表富裕、现代化，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羌族为了做生意搬到成都居住。他们几乎都聚集在成都西门一带；到成都买卖货物或逛街的州内人，也常只在西门一带活动。成都的西门是由阿坝州进入成都的门户，长途车的终点便在西门车站。在成都，他们常自称“州里的人”，只要是州里的人，无论是藏族、羌族，都感到彼此亲切些。

马尔康与成都，这两个对许多羌族而言的邻近异地城市，分别代表他们心目中两个异文化空间——马尔康代表嘉绒藏族，成都代表汉人，羌族则居于两者之间。羌族同时也居于松潘与灌县之间。但相反地，不同地区的羌族分别对这两个城市有亲近感。对于北路羌族而言，松潘是藏、羌不分你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家都是质朴的少数民族。对许多南部羌族而言，灌县则是古羌文化（或大禹文化）分布的重要据点，他们甚至认为，灌县过去是羌族的地方。在地理空间上，马尔康与羌族地区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而成都也远在灌县往南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松潘与灌县则与羌族地区同在一条沿岷江的交通干道上。自然，后二者与羌族地区在地理交通上较密切。但羌族对此四个城市之爱憎，反映的也是羌族认同的特质，以及此认同下一种文化或认同上的空间距离。

各地方的村寨羌族与城镇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即使在同一寨中，各个村民与外界城镇的关系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北川与汶川各村寨的民众和城镇的关系较密切；松潘与茂县西路各沟村寨民众，则进城的机会较少。无论在何处，年轻一代的人总比老年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跑得比较远。男人则比女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走得远些。许多老年羌族男人，一生中没到过灌县、成都；有些老年女性，更是一生很少出过本村寨所坐落的山沟。由于街市、城镇与邻近城市有不同层次的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因此目前有世代、性别、地域、城乡有别的羌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文化认知差异。

1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5-34.

第三章 族群认同与区分

在上述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态下，羌族人结为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以共同保护、分享与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这些社会群体及其间的区分，有些是在国家的民族分类与行政划分下造成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羌族认同、北川人认同以及羌族与藏族、彝族间的区分，或北川人与茂县人、汶川人间的区分。有些则沿承当地原有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本沟、本寨人的认同以及他们与其他各沟各寨人群间的区分。认同与区分，也包括在一社会中由于分工和资源分配而产生的阶级认同与区分，以及男女性别和不同世代间之认同与区分。

在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有许多是以“血缘”来凝聚我群并排斥异己的。此“血缘”关系可能为真实，也可能为人们的想象或虚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相信”彼此有如此的亲近关系。借此，他们共同享有、保护与争取生存资源；同时也借此忘却或将人群内部的性别、世代、地域与阶级区分所造成的不平等合理化。由于人们的居处空间有远近，资源共享关系有深浅，因此这样的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也有大小、亲疏之分。我们通常称此种群体中较低阶、小型的为“家庭”“家族”或“宗族”，较高阶的大型群体为“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ethnos）。“民族/国族”（nation/nationality）则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经由文化、语言与历史之调查、分类，并经由国家权力识别、认可而产生的“民族”。在本文中，我以“族群”泛称所有这一类以血缘记忆凝聚的人类社会群体。

在羌族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所有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群认同与区分。然而，由于居住空间、社会结构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因此羌族民众之间——如城镇的人与村寨居民间——并没有完全相同的社会认同与区分概念。无论如何，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所凝聚的群体都是最重要的。由于多居于高山深沟之中，迁移、交通相对困难，他们相互激烈竞争限定空间中的生存资源。因此各层次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之认同与区分和资源的分享与竞争有密切且明显的关联。当地一句俗谚“山分梁子水分亲”，说明了这个现象。以下我将由最基本的血缘与拟血缘人群单位“家庭”谈起，然后由小渐大、由近及远，最后论及羌族与中华民族等群体的认同。

一、婚姻与家庭

在岷江上游山区，最普遍的家庭便是所谓的父系核心家庭。几乎少有例外，结婚后的男子，立即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家屋与独立的家户。最小的儿子通常最后会继承老家与父亲遗留的产业。本家族或本寨土地不足以支持一个新家庭时，男子便经常到邻近村寨或沟中缺乏男性劳力的家庭去“上门”（入赘婚）。偶尔也有例外的情形：多半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独断的父亲，运用各种手腕将已婚的儿子，甚至女儿、女婿，都系在家庭内不准分家。此情形经常造成许多怨恨，在经过一些家内纠纷后，子女们还是分家各自成户。

然而，说到“我们这家人”时，村寨居民常将父亲（或祖父）的弟兄们所建立的家庭也包括在内。在村寨中，父辈或祖辈有弟兄关系的几个家庭经常紧邻而居，彼此记得共同的血缘关系，平时往来紧密，在经济上、劳力上相互支持。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汉族所称的“堂兄弟姊妹”间，事实上是以“兄弟姊妹”相称。以此而言，以“父系核心家庭”形容羌族的家庭结构，似乎又有些简略。虽然如此，在这样的“家”中，各家户不一定经常相处融洽。由于土地匮乏，分产常造成弟兄、叔侄、堂弟兄间公开或潜在的紧张与对立。日常紧密的往来，也容易造成许多摩擦与口角。虽然多半不严重，但这却是经常、持久性的人与人间的冲突。

婚姻扩大一个家庭的亲属范围。然而在沟中孤立的村寨环境里，羌族一般不愿意女儿嫁到远地去，非不得已也不愿意娶远方的女子。许多地区民众皆认为，同寨的人都是一个“根根”（来自同一祖先），因此嫁娶必须在邻近村寨找对象。在规模较大又包含有几个汉姓“家门”的寨子中，本寨各“家门”（同一汉姓的人群）间可以行嫁娶；在无汉姓的地区，寨中各“家族”（祭同一地盘神或祖先神的人群）之间也可以行嫁娶。不过，大部分地方的习俗还是倾向于在本寨之外找婚嫁对象。无论如何，女儿不要嫁得太远是重要原则，如汶川羌锋一带的羌族习俗，在嫁女儿时母亲常唱道：“我没有将你嫁到远地去，你只是嫁到猪叫、狗叫听得到的地方。”婚姻的另一个原则是：女子往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寨或地区嫁。高山村寨地区的人，经常是往下游的村寨嫁；身处乡上或街市，便是往州内城镇或州外的汉族地区嫁。许多嫁女儿的父母亲说，这样做是希望女儿可以少吃点苦。对于娶媳妇的家庭而言，他们却认为上游村寨来的女人比较能吃苦耐劳，不像下游村寨女人那样好吃懒做。对于双方来说，亲家都是在需要借粮或避灾时，一个可以救急避险的地方。然而在平日农忙时，一个家庭也常要求出嫁的女儿与女婿回来帮忙。这究

竟是否为本地的一种“传统”，事实上是有争论的。这也是造成亲家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一位羌族男性是父系家庭成员的一分子，但同时他也受到母系与上辈母系亲属的保护与约束。茂县黑虎沟的一位老年人曾对我说：

男有舅家，女有娘家。水有来源树有根；树有千枝万叶落叶归根。归根就是舅家与娘家。舅家管你孝顺父母，持家呀横向是由舅家管，红白事舅家是主宾。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嫁女子也好，给儿子娶亲也好，我先要认爸爸妈妈。因为有我爸爸妈妈才会有我。有我爸爸的妈妈，才有我爸爸妈妈，有我爸爸妈妈才有我。办喜事时，舅家的桌上酒菜要多给几碗，酒要高档一点的。死了人，（不管）他的舅家是谁，要先通知他舅家。舅家的人没来，没人能替死的人穿衣裳。舅家的人来验尸，看是不是死得正常。看了过后才能安棺材。

母舅虽然在名义上是家庭之外的人，但家庭中许多大小事情都有母舅参与。因此他们常说“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在羌族婚丧习俗中，大母舅（父亲的母亲的弟兄）、小母舅（母亲的弟兄）都有相应的地位与权威。通常大母舅在仪式上有崇高的地位，但在实际家庭事务中，小母舅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对于父权或家庭的主体性而言，母舅代表一种制衡的、外来的干涉力量。在本地家庭生活中，对个人而言，这种外来的支持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在家族或家庭中有兄弟叔侄关系的人群，常借着这些外来力量相互对抗。在一个人死亡时，首先得通知母舅。母舅要“验尸”，证明死因无可疑之处，然后丧礼才能进行。由此仪式，亦可见家族内部弟兄叔侄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村寨里的每一家庭中，表面上是以父系家族为主体，而事实上处处潜在另一制衡的、敌对的力量——这是外面嫁来的女子所带来的力量。

这种家庭内部潜在的和父系家族相制衡与敌对的力量，也表现在村寨家庭中与“铁三脚”有关的信仰之中。“铁三脚”是主屋内火塘上的三脚铁架，三足支撑着上端一个环状铁架。火塘与铁三脚位在屋中靠神龛的一角。据文献资料及今日老年人的解释，铁三脚的三个脚，代表家内三种神——火神、祖宗神与媳妇神，其意义是神、祖先与大、小母舅共治一个家。前面我们曾提及，无论在婚丧等大事及在平日家中小孩的管教或家庭纠纷上，大、小母舅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关铁三脚的信仰及其象征，也说明在一个家庭中母舅拥有可与父系家族权威分庭抗礼的地位。

二、家族

除了以父祖辈弟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庭”外，在更大的范围里，“家族”凝聚更多的家庭。由于普遍“汉化”，因此目前在绝大多数羌族村寨中民众皆有汉姓。有些家庭甚至宣称可以依字辈排行，追溯至五代或十代之前的祖先。因此，以同一汉姓（或异姓）宣称彼此有同一祖源的“汉姓家族”，在此非常普遍。汉文化沾染程度最深的北川，尤其如此。以下是一位北川小坝乡内外沟羌族口述的家族记忆。他说：

听我祖祖说，就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当时是张、刘、王三姓人到小坝来。过来时是三弟兄。当时喊察詹的爷爷就说，你坐在那儿吧。当时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就改了姓。刘、王、龙，改成龙，就是三条沟。一个沟就是杉树林，那是刘家。另一个是内外沟，当时是龙家。其次一个就争议比较大，现在说是王家。这三个沟，所以现在说刘、王、龙不通亲；三兄弟过来的……

几个同姓或不同姓的家庭，宣称彼此为同一“家族”，这在羌族村寨中非常普遍。以上北川小坝乡人的口述，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样的共同祖源（三弟兄）记忆，将目前往来紧密的三个沟的居民联系在一起。小坝乡的这例子中，此家族由过去的“刘、王、张”三姓，变为今日“刘、王、龙”三姓；这也显示家族之构组成分，可能经由“家族记忆”的变迁而改变。这位内外沟人也承认，王家究竟是不是这三弟兄的后代，是有争议的。

北川青片乡的一位中年人也说，当地乔家出于最早的两个弟兄：

我们乔家的家谱说，两弟兄打猎来到这儿。看到气候好，野猪挖出来的土看来也很好，就把帽子、帕子上的一点青稞撒下，说明年青稞熟时来看哪边先黄。结果这边熟得还要早些，于是搬来这里。两兄弟原在一起，后来分成两个地方。现在还有分是老大的，还是老二的后代；我们是老大的后代。老人还说原来有四弟兄，事实上来的是老三、老四，其他兄弟在茂县。

此乔姓家族的两大支系，因此以祖先的弟兄关系将彼此系在一起。理县蒲溪沟休溪寨的一位王姓老人也说，本地几个王姓家族是出于外地来的五弟兄。他告诉我：

我们王家是湖广填四川时到这来的。在灌县那一个石堰场，先迁到四川灌县石堰场。湖广哪里就不知道了。五弟兄到这里来，生了五弟兄，分成五大房，我们还有家谱。

这位蒲溪沟人与上面的小坝内外沟人，都提及祖先来自湖广。“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普遍存在于四川人心中的历史记忆。民间流传的故事说，当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得只剩一条街的人，现在的四川人都是从湖广绑着迁来的移民，他们所来自的地方都是“湖北麻城孝感”。不只是许多较为汉化地区的羌族宣称祖先来自湖广，在四川的汉族中这种祖源记忆更是普遍。从前或许真的有一些移民从湖北麻城孝感来到四川¹，但以目前此祖源记忆在四川人中普遍的程度来说，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其中大多都是虚构的家族起源记忆。

无汉姓的羌族村寨绝少。我所见的，只在松潘小姓沟中。在这样的村寨中，则有同祭一个家神的“家族”；以本地话称，便是“巴个”。以下是小姓沟中一对父子的说法：

（子）我们的家族神是“察那跟顶西”，只有两家。我们并没有很直接的亲戚关系，只是共一个神。不仅家族神如此，在三组那儿，一个组一个团团；它是跟着地域那样划，而不是跟亲戚划，就是“巴个”。他们那一个“巴个”，整个一下（按：“一下”就是全部的意思），都是一个神；一个坪坪那（按：“坪坪”指山边上的平台地），“巴个”。那有好几个这样的神。亲属关系，最初是一家人分的，分下来时间再长，还是一个神分下来的。分到那，都供这个神。还有就是，我们上头那家，原来他们房子在那儿，这时我们是一家人。他们搬到那去后，就是另一家子的神了，就供两个神。因为人是这过去的，但占了别人的地方，也要供别人的神。二组，这家跟嘴嘴上（按：指山势转弯而突出的地方）那家是一个神。这家从底下来这占了房子，所以他都要敬。这房子卖给他们的，照道理他们是要敬这神的。我父亲是红土那来上门的。

（父）我是上门的。我们的神有三十几家——我们家的神“主搭卡哈”——跟这里一模一样。我到这来就是这的人了，敬这的菩萨。

一个寨子经常包括几个“家族”，此种“家族”借着各成员家庭对神龛上家神的崇拜来凝聚与延续。然而我们不能由单纯的亲属关系与祖先崇拜来理解它。兄弟分家时，以分香火的方式延续家神崇拜固然普遍，然而由上面的口述资料可见，由于家神也是家的地盘神，因此在某地盘上

建屋或迁入某地，而开始祭某家神的情形也是常见的。在上述北川小坝的例子中，不同汉姓的家族，可以因祖先的弟兄关系而结成一大家族。在松潘小姓沟这个例子中，血缘不同的各家庭也可以祭同一家神，而成为一“家族”。它们都说明，我们难以汉人的“家族”概念，来理解羌族所谓的“家族”。在不同地域的羌族之间，“家族”概念也有相当的差异。

无汉姓的“家族”似乎在较“藏化”的北路与西路羌族和在邻近的藏族中较普遍。²如以上小姓沟的例子中，这位父亲便是由红土来的藏族；他说在红土那儿也有这样的“家神”。由于无汉姓的羌族村寨太少，我只能以邻近小姓沟的黑水人——所谓“说羌语的藏族”——的口述资料来作说明。以下是一位黑水知木林人（小黑水藏族）的口述：

村子有一百二十三户，四个小组。虽然不是姓，但都有神龛上的名字；同一个根根的人。死了一个人的时候都要以弟兄为准，至少一个寨子有三户，同一个弟兄传下来的。

以上他说的话，有些不完整。他的意思是，村上有四个寨，每个寨中都有些家族，以神龛上的神名为家族名。同家族的人，出于同一血缘。寨中各个家族，由于他们的祖先是兄弟，因此寨中任何一个人死亡，各家族都要派人来参加丧礼。以下这一位黑水麻窝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

家族存在。我们家族十多户是一个家族，“阿察克”；九户河坝，山上十多户，以前是一个组。有些家，山上有地，河坝也有地，这说明以前是一家。“阿察克”怎来的不知道；都是一个菩萨，就是神龛³的名字。一个寨子才有“塔子”，家族没有“塔子”。我们有更大的，就像是中华民族分成许多民族，我们有更大的家族，分成几个小族。家族不一样，但搞丧事大家要一起搞。一个家族，常几弟兄分开了，就分成几个家族。

这两个黑水的例子，以及前引松潘的例子，显示这种“家族”在村寨中少则只有两三户，多则十多户。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家族常被认为是“一位弟兄”传下来的。因此几位始祖弟兄间的“弟兄关系”，又把村寨中几个他们的“后代家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上述麻窝报告人所称的“更大的家族”。

在有些地区，汉姓家族仍有本土的“家族”名称。如茂县黑虎沟的王家，以“乡谈话”来称呼就是“瓦渣”；张家，就是“殊木喜”。然而这是不

是原来家神的名称则不清楚。无论如何，这显示本地家族在接受汉姓之后，便成了有汉姓的家族。在某些这样的汉姓家族中，家神信仰仍然存在。以下理县蒲溪沟人的口述，便显示这样的例子。

孟姓在这有八家，其他姓王的最多，再有是姓徐的。姓孟的有七八代了，我们徐家十多代了，崇庆县出来的。那儿有一个徐家寨，人太多了就分出来了……王家是外头进来的。徐、孟、余三姓安家时是三弟兄，原来是一个姓，现在三姓都不准打亲家。原来是三弟兄分家下来的，祖坟都相同的，到这儿来分家的。孟家也是外头，崇庆县过来的。王家不是，他们来得早。开坛时就唱“阿就”“王塔”；“阿就”是姓王的，“王塔”是三姓。

羌族与邻近藏族在开酒坛祭神时，要先请各家族与各方之神。在上例中，“阿就”是王姓家族的“家神”，“王塔”则是徐、孟、余三姓家族的“家神”。因此以“汉话”来说，徐、孟、余是三个“家族”。然而在“乡谈话”中，他们都属于“王塔”家族。由此例可看出，有些本地的汉姓家族，可能是本地家族由于冠汉姓与“假借祖源记忆”（如祖先由川西崇庆迁来）而形成。也有可能是，外来的汉人在本地某家族地盘上建家业而开始祭祀本地家族的家神。

无论是祭同一家神的“家族”，或是以同姓或“异姓同根”相联系的几个“家族”，它们都常由“同一弟兄传下来的”或“祖先的弟兄关系”来凝聚彼此。成员们彼此互称“家门”，也就是所谓“同一根根的人”。因此同一“家族”的人不能通婚，死后葬在同一火坟或墓地。丧礼是强化这种人群聚合的经常性场合。更重要的是，同一“家族”的人可共享或分享属于本家族的草场、林场，也共同保护此资源。因此，一个“家族”的人不宜多（分享资源的人）也不宜少（保护资源的人）。在此生态因素下，失忆与重构家族记忆的情形自然非常普遍。在有些例子中，报告人清楚地知道，两姓或三姓是为了强大势力而结为“家门”；为了凝聚，他们也想象彼此有共同血缘而不内婚。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汉化的羌族地区，重组家族可由改变弟兄祖先的“历史”来达成；在较藏化的地区，此则由改变奉祀的“家神”来达成。虽然在松潘小姓沟与黑水等地，人们也说各“家族”是由几个弟兄分家而来，但他们一般都说不出这一段弟兄分家的过去“历史”。改变“历史”，在上述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常要经过一番争议。改变“家族神”，在松潘小姓沟则是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如在迁入其他家族的地盘后，从此要

祭当地的家神。无论是改变“历史”或改变“家族神”，都是企图将人们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在同一秩序中——此也显示所谓的“家族”在本地概念中不只是个“血缘群体”，而是结合血缘与地缘的群体。

三、村寨与其守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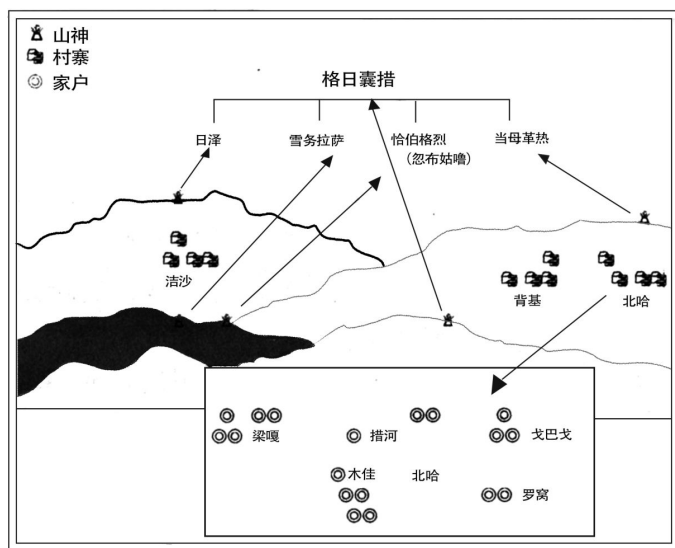
几个家族集中居住的聚落，在此地普遍以汉语称作“寨子”；几个寨子，又组成“村”。同寨与同村的人，构成在家族之上更大范围的认同群体。由于许多寨子主要由一个家族（同姓或异姓）构成，或者一个大寨子内部依家族又分为几个小寨子，在这些情形下“本家族”与“本寨”的概念都是相通的。

一般而言，民众大多认为同寨或同村的人也是祭同一山神或庙子的人群。山神信仰流行在羌族与邻近藏族之中；祭汉人佛道神祇的庙子，则流行在较汉化的羌族间。然而由于汉化普遍，绝大多数羌族地区都有庙子信仰，反而相当多的羌族地区无山神信仰。山神的具体标志，便是寨子附近山上堆栈的小石堆，当地人以汉语称之为“塔子”，以“乡谈话”来说便是“喇色”（各地有不同的发音）。庙子，则是一般川西乡间所见的大小寺庙，其中供奉的皆是玉皇、观音、川主、牛王、东岳等汉人信仰中的神祇。事实上，寨、村不只是如此单纯的二级社会结构；祭同一山神或庙子的，也不尽然是同一寨或村的人。其中蕴含相当复杂的人群认同与区分，表现在相关的山神与庙子信仰以及村寨人群的“祖先来源”记忆。

在居住较松散的松潘小姓沟，寨中同家族的几户人家在居住空间上较接近而形成一个个的圈子，如同寨中之寨。如前面曾提及的小姓沟埃期村，共有三个组（队）。一组与二组同在阴山面，聚落相近；三组在阳山面，与前二者隔着山沟。一组的人自称是“背基”人，二组的人自称“北哈”人，三组的人自称“洁沙”的人。在汉语中，他们认为“背基”“北哈”“洁沙”都是“寨”。这三个寨子的人，对外都自称是“美兹不”人，以汉语来说就是埃期村人。然而，在寨子中还有更小的“寨子”。如二组是由“北哈”与“梁嘎”两个人群单位构成。“梁嘎”约有五户人。“北哈”中又分“木佳”“措河”“戈巴戈”“罗窝”等“寨”，每一“寨”只有二至六户人家（见图三）。这是由大而小，分裂性村寨结构中最小的族群认同单位。无论如何，对村民来说，这些传统的人群区分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只是涉及一些神话传说，更涉及自然资源的划分。以下是该村一位二组（队）老

人的口述：

我们二队，上五家供一个菩萨，叫“当母革热”。二队与一队共的菩萨叫“忽布姑噜”和“恰伯格烈”。三个队共有的菩萨，就是“格日囊措”。与大尔边、小尔边没有共有的菩萨。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么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现在没这样做了。庙会是小姓沟所有人在一起庆祝的，就是龙头寺的庙会，一个乡的庙会，在大尔边的口子上。



图三 埃期村寨与其守护神

与二组比邻的一组，一位老人提到本地山神，他说：

我们一组的是“雪务”。大菩萨，那就是一转啰；那便就是两个组的菩萨，“雪务”喇撒。菩萨保护界线里的人，有近的界线，有远的界线；有近的菩萨，有远的菩萨。塔子有具体的名字。一、二、三组共同的菩萨就是“格日囊措”。再大的菩萨就是“雪宝顶”——“都如”，那是包括所有藏族、羌族，整个松潘县的菩萨。敬酒以前都要敬“都如”“和卓都如”。

由以上埃期村人的口述中可知，当地二组（队）的上五家，也就是“梁嘎”，自己有一个山神菩萨。二组中的“北哈”与一组，有共同的山

神菩萨。一组与三组，二组与三组间，没有共同的山神。三个组共同的山神则是“格日囊措”。在更大认同范围里，因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诸神体系之中。⁴譬如，“龙头寺”庙会（藏传佛教）凝聚所有小姓沟中的羌族、藏族村寨民众。“雪宝顶”菩萨（藏传佛教与山神的混合）信仰，则凝聚小姓沟与松潘附近各沟的羌、藏族。这样的村寨认同与区分体系，除了以层层的山神祭祀来表达外，也由说明一群人共同来源的“历史”来强化。如同凝聚与区分各“家族”的“历史”一样，凝聚并区分各村寨人群共同起源记忆的，也经常是一些“弟兄祖先故事”。

北川白草河上游的片口，是明代“白草羌”的大本营，当地一位杨姓的羌族对我说起本家族的由来：

最早搬来的杨家，搬到来寿，那里长的树，杉树，把那开垦出来。原来还分上寨子、中寨子、下寨子……那还有三棵大柏树，三棵长在一起。说是杨家来时是三弟兄，为了纪念他们来，就种了三棵柏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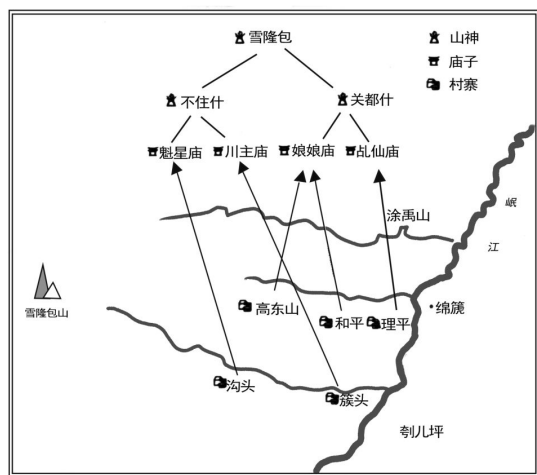
三个杨姓弟兄建立三个寨子，这是各寨子的共同起源，同时也是寨中人群的共同起源记忆。关于“弟兄故事”在凝聚人群认同上的意义以及它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间的关系，是本书第二部分历史篇中的主要论题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再回到与人类社会认同、区分相关的神明信仰问题上。在较汉化的羌族地区，山神信仰与“庙子”祭祀并存，或为庙子所取代，然而“神明”在认同与区分上的重要性却没有改变。一位汶川绵虬的人告诉我：

我们那有三个村，理平、簇头、沟头三个村。庙子有川主庙。簇头是川主庙，沟头是魁星庙，理平是乩仙庙……我们的山神叫“不住什”，沟头跟我们一样。理平和高东山还是一样，他们在一匹山上，“关都什”。我们这边是“不住什”。我们地点分开在，但都在一匹山上。簇头、沟头祭的是一样的山神，不同时间，各祭各的。求雨的时候，禹王庙和山王庙，三个寨子都要去。雪隆包，我们那沟里五个寨子都祭雪隆包。

在上述绵虬的例子中，理平、簇头、沟头是属于同一村落群的三个村子。在“庙子”的祭祀上，三个村子各祭各的。然而在“山神”祭祀上，簇头、沟头共祭一个山神，而理平与另一村落“高东山”共祭一个山神。在更大的范围里，理平、簇头、沟头共同祭禹王庙（求雨）与山王庙。绵虬沟中五个村子，共同祭祀的则是“雪隆包”山神（见图四）。由此例

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套信仰系统所凝聚与划分的人群不尽相同。在共同起源记忆上，簇头村有一老传说：过去有八弟兄来此插杖分业，建立八个老寨子，目前只剩下理平、簇头、沟头三个寨子。这个弟兄故事，与前述小姓沟埃期村的弟兄故事相同，解释“寨子”与寨中之人的来源。



图四 绵麓村寨与其守护神

在羌族地区，“汉化”迹象之一便是“同姓家族”认同超越或取代“村寨”认同，有时这也表现在山神信仰上。茂县永和沟甘木若村的一位老者，对我说本村各家的来源：

最早是小寨子李家……然后我们白家就从那高头下来。谢家是赖平、土门那过来的，时间没得好久，道光手头。居住不了，就到这来，来这开亲。谢、白二姓一个祖坟，以前是一个火坟。敬山神就各是各的，白家一个山神，谢家一个山神，李家一个山神，徐家一个山神，都在高山上。

在甘木若村内，大寨子与小寨子同坐落在一面山上，相隔只有百来米。两个寨子的人平时往来密切。小寨子主要是由李、谢、徐三姓家族构成，大寨子主要是白、谢二姓家族。在此，山神信仰不是以“寨子”为区分，而是以“姓”为别，一姓便祭一个山神。然而在“庙子”祭祀上，则川主庙、地母娘娘庙、牛王庙都是大家共同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白虎山观音庙是永和沟各村寨人群共同祭拜之处。渭门云顶山因果祖师庙，则是永和沟与水磨沟等地所有村寨民众，包括沟口、渭门等地从前被认为是汉人的村寨民众，共同赶庙会的地方。在这些地区，如松潘小姓沟

那样一层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的山神不见了。通常各寨、各姓人们只祭一个山神；较大范围人群的凝聚，便依赖大小不等的“庙子”。

茂县水磨坪也是类似的例子。水磨坪有五个寨：二木若、水若、二里、里鱼、赖子。水若主要家族为吴、何两姓，都是由赖子寨搬来的，据称最早迁来的是两弟兄。水若景家的人，则自称是由二里搬下来的。里鱼寨的主要家族是王、马两姓。一个水若的吴姓居民告诉我当地祭山王菩萨的习俗。他说：

祭山神，山王菩萨，正月就要去……赖子寨跟我们一个山王菩萨，景家跟二里一个山王菩萨，水磨坪一部分人跟朱家坪的合一个山王菩萨。里鱼他们自己一个山王菩萨。没有五个组合起来的山王菩萨。合在一起的就是东岳庙。

显然，在此由于同姓的家族血缘记忆，使得“一个寨子一个山神”的传统无法维持。水若是个近河坝的新寨子，或因此，村民们很清楚寨中许多家族不是同一个来源。

茂县黑虎沟，也是“山神”与“庙子”两套信仰并存的地方。一位“二根米”的老人告诉我，黑虎一大队分为“二根米”与“鹰嘴河”，这两“族”与蔼紫关、耕读百吉、爬地五坡，合称“黑虎五族”。根据这位老人的说法，在本地，各家族或各寨皆有山神，各大队也各有自己的山神，又有大家共同的山神，都称“喇色”。他说：

“喇色”，就是土地菩萨。房子顶顶上中间有个“喇色”，顶顶上一个白石头。修房子，房子中间要有“喇色”。正月十五那天，整个旗子（按：准备个旗子），每户都有。每个寨子也有“喇色”，那是家族的，三个家族就三个“喇色”，各祭各的。不一定是家族，一个寨子几户祭一个“喇色”也可以。

他将“喇色”当作“土地菩萨”，显然是受汉人信仰的影响。祭拜汉人信仰中各神祇的“庙子”，也流行在黑虎地区。这位老人又告诉我，在黑虎五族中每一“族”都有自己的庙子。鹰嘴河台祭的是川主庙，二根米祭的是黑虎将军，蔼紫关人祭龙王，耕读百吉祭的是王爷，爬地五坡祭马王。全黑虎沟的人共同祭祀的则是“天台大庙子”，里面祭的是“西藏的那些佛爷，有释迦牟尼，有观音，有玉皇，有元始天尊”。在“二根米”的庙子中，各家族还各有不同的神。如一位本地人说：

二根米，三个团团（按：三群人之意）。我们庙子，大庙子中间有三尊神。中间是龙王，这是黑虎将军，这是土主。任、余二姓上寨是土主；中寨就是严、王二姓，分的是龙王；下寨是黑虎将军。分了的。为什么分呢？赶会的嘛（按：大家赴庙会）。七月七土主会，六月十三龙王会，四月四日将军会。地界也这样分。这菩萨背后，朝这方向是中寨的；这菩萨背后是我们的；这菩萨背后是他们的。放羊、砍草都不能侵犯的。各大队各大队之间，就更不能过去。

上引黑虎的口述资料中，鲜明地透露了山神或庙子信仰的重要社会功能——为了资源竞争、划分而产生的族群认同与区分。黑虎人在当地一直以强悍著称，主要生态因素便是资源匮乏。因而他们以一层层“山神”与“庙子”，严格划分彼此的资源界线。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及羌族地区严格的资源分配与分享体系。山神与庙子信仰，便反映并强化了此体系。家庭、家族、寨子，或几个寨子聚成的村子，或几个村或寨所构成的一条沟的人，都是一层层分享、保护共同资源的人群。寨子有本寨的草山（放牧之处）、林场（伐木之处），村子有几个寨子共同的草山、林场，都界线分明。各寨各村的山神菩萨与各种庙子，也就是这些界线的维护者。一位小姓沟的老人，对“山神菩萨”做了如下最恰当的诠释：

山界，我的土地是从那里到那里。山界界长，其他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祖祖辈辈，几千年、几万年留下来，这个不能忘，这个山坡是怎么传下来的。为什么要敬他？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有近的界线，有远的界线；有近的菩萨，有远的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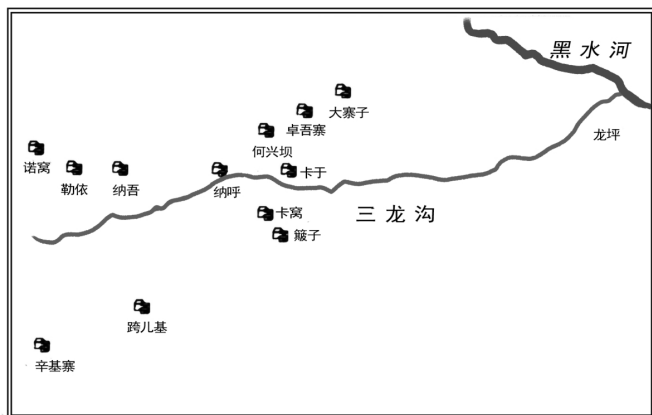
一层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的“神”，佑护各范畴人群的土地及其资源。定期的祭庙子或山神活动，可说是凝聚人群认同与强化人群区分的集体活动。在祭山神活动中，村寨里每一可分享资源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都须派代表参加。在岷江上游地区，许多地方过去都有一习俗：在祭山神或拜庙子时要“点名”。每一家庭若有人参与，就在木头上作一刻记。缺席的家庭，会受到罚酒食或罚款的处置。因此无论是在“藏化”影响下将山神纳入藏传佛教诸神体系，或在“汉化”影响下混合山神与庙子，各地羌族的山神与庙子信仰都是在强化各个村寨与家族的认同与区分，以及确认每一家庭在本家族、本寨、本村与本沟资源共享体系中的地位。

四、“羊脑壳”与“牛脑壳”

在当前的羌、藏族地区，过去曾有一种认同与区分体系，“羊脑壳”与“牛脑壳”或者说“羊部落”与“牛部落”，现在几乎已消逝殆尽。这种认同与区分和目前藏族、羌族的认同与区分关系不大，或毫无关联。以下是一位茂县三龙乡老年人对于“羊部落”与“牛部落”的口述：

三龙乡分两个乡。卡窝、簸子、雕花、纳呼、卡于，这归理县管，那边归得迟（按：此指归官府管，也就是指古代改土归流），归理县管。我们这队最早是部落时代，这边属牛部，那边是羊部。牛是哥哥，兄弟；我们归大朝早些（按：大朝便是指中央朝廷）。我们牛部，大的范围宽得很。我们唱酒歌从松潘唱下来；先唱松潘，再唱黑水。据老年人讲是两弟兄，我们比那边牧场宽些，那边窄闭点，两个人就住在这一带。两兄弟，弟弟过黑水河查看地盘，后来就安一部分人往那迁。过后，兄弟安排好了，就来邀他哥过去，过去看他的地盘，就要跟他哥分家。他哥哥不干，弟弟想独霸一方。哥哥不干，弟弟跟他的人就把哥哥打了一顿。哥跑回来，不服，又把他兄弟弄过来，说我跟你分，结果又把弟弟砸了一顿。现在我们老人还说，先头赢的是“招合”赢。捶打了（按：打架了），那我们就分开。那边就是羊部，这边就是牛部。白溪那以下，我们都喊“招合部”，我们这就是“瓦合部”，以黑水河为界。

由以上口述，我们只知道三龙乡南岸各村寨的人曾以“牛部”自称，以别于“黑水河”北岸的“羊部”各村落⁵。目前在三龙沟（见图五）知道这种区分的人极少，很难搜集到进一步的资料。



图五 茂县三龙沟村寨

在茂县北部信奉藏传佛教的羌族高山村寨中，同样知道此区分的人不多。但由以下这位太平牛尾巴寨老人的口述中，可知这似乎是两个宗教支派之分。

“察”就是敬羊脑壳，“拨”就是敬牛脑壳；我们这敬的是牛脑壳……杨柳沟那都是羊脑壳了。譬如，明天我们跳甲（按：指在仪式中穿盔甲跳舞），吼的都不同；还有耍的龙等：他们是盘龙一个拐拐，我们是阴基龙，两个拐拐好像蛇一样。

在最西北方的羌族村寨——松潘小姓沟，老一辈的人则大多还记得此种区分。这儿的羌族“藏化”程度，又较茂县牛尾巴寨的羌族为甚。也就是说，此地居民受藏传佛教或本教的影响更深。当地人告诉我，羊部落与牛部落的确是藏传佛教的两个支派。不仅如此，羊部落与牛部落之间相当敌对。如一个小姓沟老人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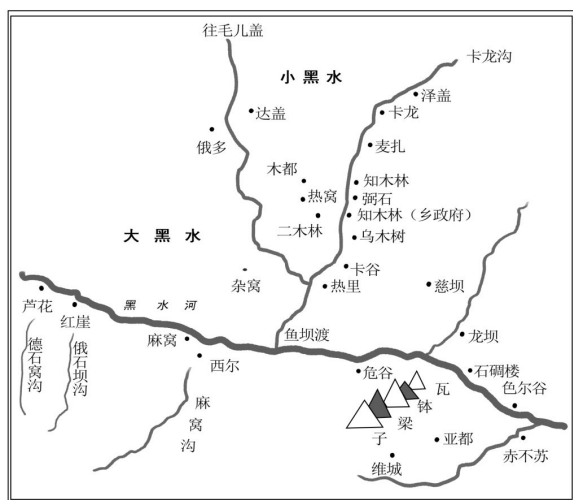
大河的那一边是属羊。那时一个寨子、一个寨子是属牛或属羊的。我们属羊的，那个叉叉是尖的，属牛的那个是平的⁶。以前是两个部落，还打仗，这都听说过。这都是老年人前头的前头了。修房子的时候呢，还是各修各的。那个牛部落，全是圆木，都是圆的；羊部落的木头都是片出来的。民族都有这习惯，汉族没有。藏族也有这习惯，分牛、羊头。宗教习惯上有“麦尼”、有“麦兹”，各是各的。

以前，小姓沟这一带“牛部落”与“羊部落”的认同与区分，超越“日麦”（相当于他处羌族所称的“尔玛”）与“赤部”间的区隔。在小姓沟，有几位从邻近红土（目前属藏族地区）来到埃期村寨上门（入赘）的老人。他们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原来的村寨与这儿同属于“羊部落”，所以来此避灾荒而落户定居。在民族分类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藏族”，知道埃期是羌族村寨。

关于“牛部落”与“羊部落”，我在羌族地区搜集的口述资料所见大约如此。由清代到近现代的地方志与民族调查资料中，也罕见相关记载。然而在黑水（见图六），特别是在知木林（小黑水）藏族地区，我得到较多的口述资料。在此，这种社会区分就更明晰了。黑水知木林地区，一个老者对我解释“羊头、牛头”。他说：

从南坪那迁来的是羊头人。十八个寨子羊头，牛头十九个寨子。两个组织，不是教派，像是部落。很不和好，连砍树子都要说“砍谁的脑

壳”——砍牛脑壳，砍羊脑壳。“尔勒灭”就是民族，不分羊头、牛头；“尔勒灭”指所有黑水人。



图六 大小黑水地区

黑水是阿坝州最穷困的地区之一，知木林又是黑水县最穷的地方。或因激烈的资源竞争，使得“牛头”“羊头”各寨间经常暴力相向。另一个知木林老人对此描述得更详细。这个“羊部落”的人说：

我们是“察合基”，羊部落，就是“麦兹”。“博合基”就是牛部落；牛脑壳是“麦尼”。乌木树、热石多、卡谷、卡龙镇，都是“察合基”。杀了羊之后，就把羊脑壳在房子顶顶上搁到。“博合基”，牛部落，晴朗、知木林乡、杂窝，他们比我们多一两个寨子。我们两边也打。一个土官管的都一样；高阳平（按：1940年代当地著名土官）管的杂窝乡是“博合基”。风俗习惯、唱歌都不一样，喝酒、死了人都不一样，念的菩萨不一样。松潘是“麦兹”，没有牛脑壳，只有个别地区有牛脑壳。牛部落与羊部落的根根不一样。我常骂那些人牛脑壳不像牛脑壳，羊脑壳不像羊脑壳。我们根根就是乌木树，“尔勒灭”的根根是乌木树……

根据这位老人的说法，在房屋上放个羊头颅，是羊部落的符号。我在黑水地区废屋旧墙垣上，也曾发现白石镶嵌的牛头形象。他说的“根根不一样”，其意便是说两个群体的“血缘”不一样。关于两个群体间的冲突以及各群体内部的“拟血缘关系”，一位过去属“牛部落”的知木林老人有如下说明：

我们知木林乡有几个寨子是“察合基”，我们是“博合基”。我们知木林乡，卡谷、乌木树、位都、热里，这些是“察合基”。我们“博合基”是，大黑水来说，红崖、麻窝、施过和博作，我们是弟兄一样，还有西尔、弼石、二木林、木都、格基，这是“博合基”，这都是兄弟一样。这是分起在的，他们整我们，我们整他们的。原来土官还有老百姓，这是分开在的；我们弟兄之间分家一样的，过去是这样的，他们是“察合基”，我们是“博合基”。“察合基”是心不好的人，人到那儿去，用火烧、烤起。“博合基”不是这样的人。

这位老人用“弟兄”来指“牛部落”各村寨间的感情；同时他又以“分家的弟兄”，来形容“牛部落”与“羊部落”间的敌对关系。在历史篇中，我将说明这两种“弟兄”隐喻。

在黑水河主流“说羌语的藏族”地区，部分老人也记得过去有“羊脑壳”与“牛脑壳”之分。如一位维谷藏族说：

知木林是羊脑壳，松潘管的。我们是牛脑壳，理县管的。理县土司是皇帝管的。麻窝、芦花也是牛脑壳。我们牛脑壳的人老实。两边话不对，过去两边是不打亲家的。那边的娃儿凶……理县是牛脑壳，赤不苏这边是牛脑壳，河对面都是羊脑壳。这是老年人吹的，我还不晓得。

在这位老人的记忆中，所有小黑水人都是“羊脑壳”，黑水河主流沿岸村寨无论属理县或黑水，无论是今日之麻窝藏族或赤不苏羌族，都是“牛脑壳”。但是，一位麻窝藏族则说麻窝人是“羊脑壳”。以下是这位老人的说法：

我们是“察合基”，“博合基”是松潘那的。以前在晴朗那边的草坪上“察合基”“博合基”比赛，比摔跤。讲话有差别，吃的也有差别，穿的也有差别。“察合基”一个根根，“博合基”一个根根。小黑水那是“博合基”，松潘那是“博合基”。

由此口述得知，在他心目中，敌方的“牛部落”主要是小黑水人与松潘人。

以上资料看来，只有小黑水老人们还记得哪些是“察合基”村寨，哪些是“博合基”村寨以及过去的敌对与纠纷。而且，根据小黑水与小姓沟报告人的说法，“察合基”村寨与“博合基”村寨常是错落交杂分布的。然

而，自称属于“牛脑壳”的黑水维古报告人，却认为小黑水人都是“羊脑壳”；自称属“羊脑壳”的麻窝报告人，则认为小黑水人都是“牛脑壳”（博合基）。这种矛盾应是由于麻窝与维谷都在大黑水地区（赤不苏以上之黑水河主流），而大黑水人一向排斥而又畏惧小黑水人。所以过去“羊脑壳”与“牛脑壳”之区分与双方之暴力冲突，现在被想象为他们与小黑水人间的区分与敌意。“羊脑壳”与“牛脑壳”目前被用来区分邻近的敌对人群，类似现象也存在于此记忆逐渐消逝的羌族地区。譬如，前面三龙的老人称“河那边人”为“掐合部”；小姓沟人则认为“大河那一边的人”都是“羊部落”；牛尾巴寨的报告人，则认为邻近的杨柳沟人都是“羊脑壳”。

更重要的是，以上许多报告人都称“羊脑壳”与“牛脑壳”的“根根”不一样。显然在当地，由于部落对立、冲突而造成的社会结群中，人们也想象此“群”成员彼此有血缘关系，以此增强“族群”内部的认同与凝聚，并以“不同根根”来与敌对的群体作区分。

五、“尔玛”“汉人”与“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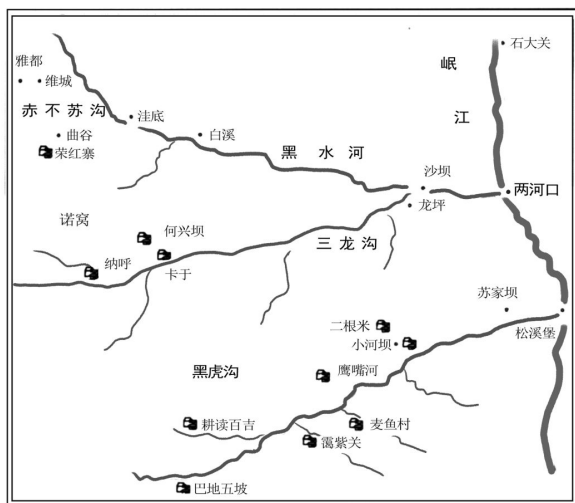
村寨之外，在同一沟或邻近几条沟中的人群也以血缘关系相结合，成为一个认同群体，并与本群体外的人群有所区分。由上节举例中可以看出，这样较大范围的认同群体，常共同祭较高阶的“山神”或较大的庙子。这样的认同人群，以当地“乡谈话”来说便是“尔玛”——我们的人。“尔玛”所涵括的人群范围，在1950年代以前并不太宽。

现在许多羌族或汉族，包括研究羌族的学者，都认为“尔玛”就是“羌族”。这大致上是不错的，然而却不表示在过去“尔玛”一直就等于“羌族”。我们不能忽略，“尔玛”此一族群自称词在各地有不同的发音，在理县念作“尔玛”，茂县东路大致发音如“玛”，茂县西路赤不苏一带称“日昧”，在松潘小姓沟念成“日麦”，在黑水地区则发音如“尔勒灭”。因此，当前将“尔玛”当作“羌族”，是羌族在认同下或在民族知识之下，有意忽略这个自称词在各地发音之不同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由于地理隔阻以及“沟”在人类经济生态上的自足性，被称作“羌族”或“羌民”的人群在认识自己是羌族之前，并没有一个涵括目前全体羌族的族群认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自我族称”（autonym）；“尔玛”（或类似的发音）只代表很有限范围中的人群，通常只是一条沟中的人。当地的一句俗话，“一截骂一截”，可以说明过去“尔玛”认同所表现的族群体系。

以下我从不同地区举例说明。

茂县西路黑水河流域 岷江之西的支流黑水河，在中、下游的维城到沙坝间有许多支流山沟，各个沟中都有一群群的寨子（见图七）。这儿许多老一辈村民都说，从前“尔咪”（或类似发音）指本沟各寨的人。沿河以上各沟各寨的人都是“赤部”或“识别”，沿河以下各沟各寨的人都是“而”，“而”则是汉人。由于每一个区域的人群都认为只有本地人是“尔咪”，因此自称“尔咪”而称下游三龙人为“而”的洼底人，在自称“尔咪”的三龙人眼里则是“赤部”，在同样自称“尔咪”的上游曲谷人眼中则是“而”。这就是他们现在常笑谈的，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概况。一位茂县三龙沟的老人，回忆过去的情形，说：

解放前我们很少出去，老一辈的沙坝那都没去过的多。去过的也只有一次、两次。以前这几个寨子：诺窝、勒依、辛基，跟曲谷的是一起的，在一个大山上打猎。我们自己称“尔咪”，外面的都是“而”；纳呼下面就是“而”了。一截讲一截。龙坪以下说我们是“识别”。以前“尔咪”小，以下是“而”。以前二大队何兴坝的人不准上来用这草场，他们就叫我们阿巴上房，有骂人的意思，又怕我们。



图七 茂县黑水河下游及黑虎沟

一位茂县曲谷地区村寨出身的羌族，曾是接受大学教育的本地知识分子，他的新旧“民族”知识间的矛盾，表现在他下面的话中。

我们那称羌族是“尔咪”。我们的话跟三龙讲得比较通。跟黑水下一截也讲得通。“尔咪”的范围，在我们那就是说，朝下就是汉族，朝上就是藏族。我们一直有汉族、羌族、藏族的分法。藏族就叫“识别”。是这样的，三龙人认为我们是“识别”，我们又认为黑水人是“识别”，黑水人又认为他们是“尔咪”，黑水县以上的才是“识别”。不会推很远。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藏族在上面，汉族在下面。到1970年代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很多人只说自己是民族，或以“尔咪”来指所有的民族。

这位曲谷羌族知识分子说，他们“一直有汉族、羌族、藏族的分法”，事实上他指的是“而”“尔咪”与“识别”之分。只是在目前的民族分类概念中，他将此三者分别对等于汉族、羌族与藏族，并有了固定的民族疆界。但他也知道并承认，过去他们被三龙人视为“识别”。这位曲谷人的年龄不超过四十岁，可见此种旧“尔咪”概念仍普遍存在于中年以上的村寨民众心中。虽然现在许多羌族都说“尔咪”就是羌族，但深沟高山的村寨居民仍普遍保有上述狭隘的“尔咪”观念。他们常说：“底下那些人哪是羌族？他们过去还常骂我们是蛮子呢！”

茂县西路黑虎沟 茂县西路的黑虎沟在黑水河之南，沟中黑虎各村寨居民在曲谷、三龙人眼中便是“下游的汉人”。黑虎各村寨深处山谷之中，对外交通只能沿着陡狭绝险的山道。与许多羌族地区相同，这样的环境是造成他们狭隘孤立族群认同的原因之一。这儿的人自称“莫儿”（读如mer）；称黑水河流域的人为“费儿”（读如ferh）；称岷江东岸的人则为“而”，其意为“汉人”。以下是一位黑虎沟老人对“莫儿”的看法。

“莫儿”就是羌族。这地头生长的都是“莫儿”，黑虎的都是“莫儿”。曲谷的人我们喊“费儿”，黑水宝；实际上曲谷还是羌族。以前，底下的我们都喊“而”了。沟口那的人，我们都喊“而”。只有我们黑虎的人是“莫儿”。

他口中的“黑水宝”，便是指黑水的“蛮子”。由此口述可知，过去在他心目中上游的曲谷人与下游的沟口人都不是“莫儿”，只有黑虎沟的人是“莫儿”。另一个老人说得更明白：

黑虎族，乡谈话就是“莫儿”。“莫儿”就是本地人，就是羌族，特别是黑虎的人。赤不苏的人，当时虽然是一个民族但来往少，所以称他们

为“费儿”；“费儿”就是蛮子，其实都是一个民族。汉族咱喊呢，就喊“而”。不懂这个语言的都喊“而”；其实有些是羌族，只是把自己的语言弄掉了，以后就退化了，一直都说汉话。所以这儿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汉人了，是“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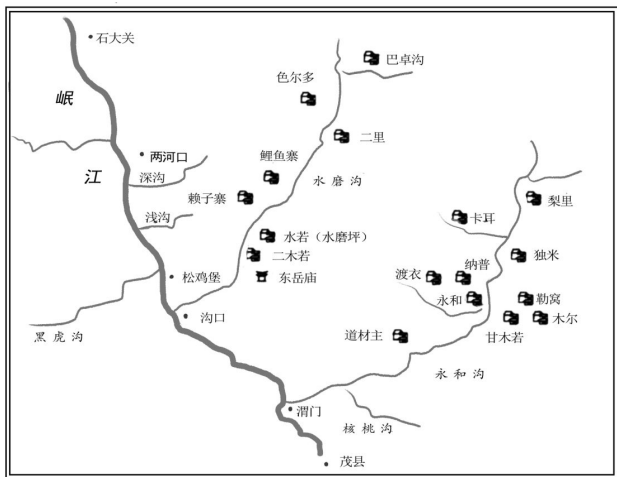
他直称黑虎沟的人为“黑虎族”，这也显示“莫儿”认同是一种由拟血缘联系所造成的“族群”。以上前两位黑虎老人的口述，一方面显示口述者过去狭隘的“莫儿”认同，一方面也显示在新的民族、语言知识下他们将“莫儿”对等于“羌族”，并对“莫儿”或羌族的范围有了新的体认。下面这位黑虎老人的话中，则表露过去狭隘“莫儿”认同背后的资源竞争背景。

旧社会时不准外面人来，三龙那的人来要弄死。当时争山争草场。我们喊他们“费儿”，蛮子。以前沙坝上都称蛮子。以前认为他们跟黑水人很像。关键是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吃酥油的。

在这位黑虎老人的口述中，我们可以体会本地过去紧张的族群关系以及在此族群关系中人们对“异己”的恐惧。

茂县东路 岷江东岸永和沟与水磨沟（见图八）之村寨民众，在过去也大多认为自身是“莫儿”，但“莫儿”的范围也不大。譬如，深处永和沟中之永和、道材主等村寨以及深处水磨沟内的水磨坪诸村寨居民，他们心目中“莫儿”大约是指“沟内的人”。两条沟与岷江大道相接的地方，分别是沟口与渭门。沟口与渭门的人，在沟内的“莫儿”看来便是“而”，就是汉族；更不用说，由此以下到茂县县城的人，也都是“而”了。西路的黑虎，与黑水河流域三龙、洼底各村寨与北路牛尾巴、杨柳沟各村寨的人，则被他们称作“费儿”——蛮子。一位永和村老人，回想过去大家相互歧视的情况，说：

黑水人我们称蛮子，松潘的是“费儿”，黑水人是“费儿”，赤不苏人更是“费儿”，三龙人也是“费儿”。茂县人，就是“而”了。渭门的人骂我们蛮子，说我们是高山蛮，我们就骂他们下河蛮。解放后就不敢了。茂县的人也骂我们蛮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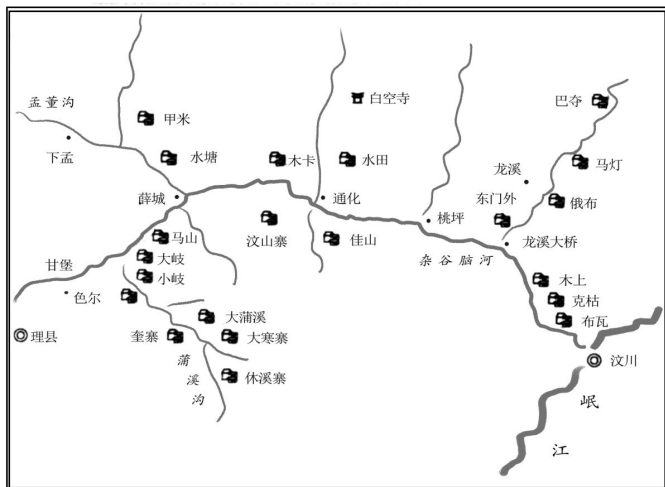
图八 茂县永和沟与水磨沟

过去水磨坪人也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当地老人，对我描述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情形。他说：

羌族以前好打战，就是“莫儿”；“羌族”这两个字，在解放后才晓得。他们以前叫我们蛮子。走拢沟口，就被骂蛮子了；沟口的走拢茂县，又被骂蛮子。一截骂一截。我们就骂他们“而诉嘎”。

老一辈的人，普遍还记得过去认为“莫儿”便是“说这一口话的人”。学者们常强调，在人们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中，语言是个重要因素。的确如此。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这“语言”却不是语言学家所认知的“羌语”，而是当地人主观上认为能沟通的“乡谈话”。在前面我曾提及，在这儿各地“乡谈话”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何在过去“莫儿”这一人群认同范畴相当狭隘。或者是，由于狭隘的“莫儿”认同，一方面使各区域人群之间因缺乏沟通而产生语言分歧，一方面也因主观偏见，使得他们不愿去仔细听“他人”在说什么。⁷

理县地区 沿杂谷脑河流域（见图九）的理县桃坪、薛城一带，有几条北岸的大沟，沟中村寨居民都自称“尔玛”。在前面我们曾提及，过去他们与当地嘉绒人同属“五屯”，因此是清代边防军的一部分。老一辈的人颇以此自负，并瞧不起“打仗时只能背被子”的蒲溪沟人。因此在他们过去的观念中，“尔玛”只是五屯中非嘉绒的那些村寨人群，不包括南岸蒲溪沟中的“尔玛尼”，也不包括大阳山以北的三龙人与曲谷人。



图九 杂谷脑河流域

我们羌族的话走不远，只有五屯听得懂……“尔玛”，脑袋笨一点的，住在山上的。以前羌人怕被冲走，所以住在高山上。

我们几个大队，穿长衣服的，住山上的人是“尔玛”。三龙那的人，那儿是黑水，我们称“阿啰”“鲁哇”。“鲁哇”是不讲理的人，我们不称他们“赤部”。我们跟茂县那的人话不一样，族不一样，没有称他们“尔玛”。我们喊他们后面的人“鲁哇”。

在蒲溪沟，当地人也自称“尔玛”。老一辈人犹记得，从前以为“羌族”（尔玛）只分布到沟口，主要指蒲溪十寨（前五寨、后五寨）的人。五屯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嘉绒人。

无论是在杂谷脑河北岸或南岸，由于狭隘的“尔玛”认同，过去谈婚嫁时当地人很在乎对方家族是否“根子纯净”。所谓“根子纯净”便是说，没有汉人或藏人的根根。从前沟与沟之间，沟里上游与下游村寨之间，阳山或阴山村寨之间，人们都常闲言对方“根子不纯”，因此可以“打亲家”（结亲）的范围相当狭隘。然而，目前桃坪、通化、薛城以及汶川龙溪等地的杂谷脑河南北两岸各沟村寨中，许多家族都宣称祖先来自湖广或川西崇庆、彭州等地。这似乎与他们强调自身为“根子纯净”的本地人有些矛盾。他们的解释经常是，川西各县与“湖广”过去都是古羌人所居的地方，因此从这些地方来的人群乃是正统“羌族”。

黑水藏族地区 黑水各族群，目前在中国民族分类中都被定为藏族。但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黑水东部各沟自称“尔勒灭”的人群与茂县

西路的羌族类似。因此由黑水人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过去此种狭隘“我族”概念的普遍性。在黑水自称“尔勒灭”的人群，称西方使用嘉绒语的人群为“赤部”，称北方说安多藏语的人群为“识别”。然而并非除此之外都被他们视为“尔勒灭”，而且他们对“识别”“赤部”的界定，也有些模糊。如，以下这位知木林（小黑水）人，便认为麻窝的人都是“赤部”。他说：

我们自己喊“尔勒灭”。麻窝的人是“赤部”——吃荞子馍馍的人。松潘的人是“识别”。赤不苏的是“而日咪”，我们说他们藏不藏，汉不汉。茂县、汶川的也是“而日咪”。

麻窝、芦花与知木林人所说的话在语言学分类上都属于羌语。但知木林人总将麻窝、芦花等大黑水地区的人，视为与嘉绒藏族类似的“赤部”。上述知木林人口中的“而日咪”，便是赤不苏的羌族。赤不苏人紧邻黑水地区，为最西方的羌族村寨。过去他们在其他下游村寨人群眼中，是毫无疑问的“赤部”；他们看下游的村寨人群，则都是“汉人”。然而在黑水人眼里，他们则是“像汉人的非汉人”。

在黑水河主流，东自维古西到芦花之间，各沟村寨人群也都自称“尔勒灭”（口音有别）。然而在过去，与“羌族”的情况相同，这些“说羌语的藏族”各地方族群彼此也不相互认同。自称“尔勒灭”的一人群，称上游村寨人群为“日基部”，称下游村寨人群为“日疏部”。一名17岁的红崖女孩，至今仍有这样的区分概念。她说：

我们喊讲草地语言的是“识别”，有些喊“赤部”，马尔康那儿的喊“赤部”。有时候他们说的“识别”和“赤部”是一样的，分得不清楚。维古那的人，我们称“日疏部”；底下的人都是“日疏部”。反正是我们底下的，都喊“日疏部”。这边的人（按：芦花的人）喊我们红崖的人叫“日疏部”。我们红崖的人喊维古的“日疏部”。维古那底下的人，喊我们高头的人就是“日基部”。一截喊一截，有一点互相骂的意思。维古的人骂我们吃猪食的，我们骂底下的人吃竹子杆杆的——骂他们熊猫……以前我们认为只有黑水这儿的人是“尔勒灭”，茂县一带的是“达妈”。直到沙石多都是“尔勒灭”。进了羌文班，我才知道羌族的范围很广。以前我以为茂县附近都是汉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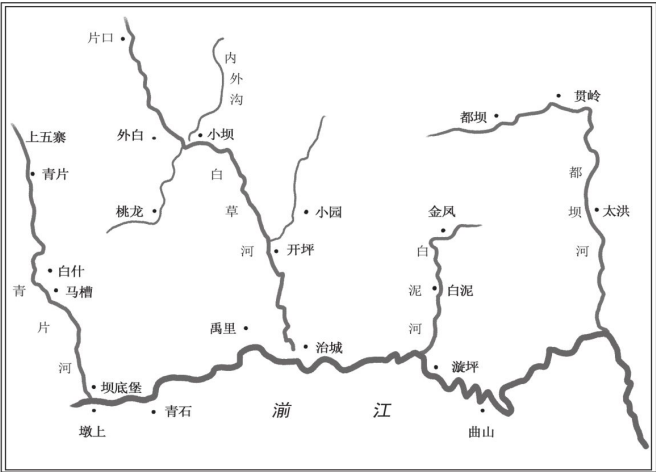
如此，西方红崖的人称下游维古的人为“日疏部”，更西方的芦花人

则称红崖的人为“日疏部”。维古的人则称红崖人为“日基部”，红崖人则称上游芦花人为“日基部”。介于红崖与维古间的麻窝人，则认为由红崖到麻窝都是“尔勒玛”；芦花人是“日基部”，而“日疏部”则是维古与石雕楼的人。

再者，所有芦花、红崖、麻窝、维谷等大黑水人，称小黑水人为“俄落部”；小黑水人则称大黑水人为“赤部”。而小黑水人与大黑水人，大致都认为黑水河下游赤不苏、洼底、三龙、黑虎各沟村寨人群——也就是目前的西路羌族——或是“而”（汉人），或是“啞”或“而日咪”（汉人不像汉人、民族不像民族的人）。由黑水人的“啞”或“而日咪”人群概念中，可知在过去他们也没有“羌族”概念。他们只是认为，在他们与“汉人”之间，有一些不像“汉人”又不像“我们”的人群。⁸

今日绝大多数黑水与小黑水人都认为，“尔勒灭”就是藏族——包括大黑水由芦花到色尔古、石雕楼的人以及小黑水人。黑水人与小黑水人都坚决认为，“尔勒灭”与下游的“啞”或“而”不同。上述黑水女孩将“尔勒灭”视为“羌族”的看法则属例外，显然由于她在汶川的民族学校羌文班就读，因此接受了羌族老师们的看法。目前在知晓语言学家的羌、藏语分类后，羌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黑水人讲的是羌语。

北川地区 北川（见图十）的情况与上述地区有别。由于深度汉化，在20世纪前半叶时，这儿的人都自称汉人。然而，“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却仍然存在。



图十 北川地区简图

在明清时期中国文献之中，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村落人群都被称作“羌”，事实上在本地族群关系中，过去这一带的汉人将所有“非汉人”都称作“蛮子”。然而，“汉人”与“非汉人”的区分在此非常模糊。1950年代以前，青片河与白草河流域每一村落人群都认为本村是汉人村落，而认为上游皆是“非汉人”村落。白草河中游的小坝乡，一位羌族农民说：

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才改为羌族，以前都是汉。当时，五十年代一次大移民嘛，外来的人都叫我们山蛮子，我们也用一些词回敬。五十年代初，也有一些人报藏族，但又不会说藏话，所以没承认。到八十年代才被认到。被叫山蛮子时，也没人说自己是羌族，但我们许多人跟茂县那有亲戚关系。他们被认得早。

我们这没听过什么“尔玛”。我们北川的人，听过一些年老的说，几弟兄分家，分到北川这，就是这的人了。

显然，过去他们自称“汉人”，但在下游村寨人群眼中，他们则是“蛮子”。北川最西北边缘的青片河流域，在过去，本地原住民更被认为是“蛮子”。但在青片河域，仍是一截骂一截，大家都把“蛮子”这称号推给上游的人。最上游的上五寨人，已无更上游的人可以让他们骂了，只好说，西北方松潘的人才是“蛮子”。以下是一位青片上五寨老人的话：

你来问蛮子在哪里，我就说，蛮子还在里头。我们不会承认；承认了你就会整我们。

由以上的口述可以知道，在过去这儿不但没有藏族、羌族之分，甚至汉与非汉之分都是模糊的。在1950年代，许多当地人（如上述青片上五寨的老人）都曾自称“藏族”。如今虽然他们都将自己登记为羌族，然而许多人仍认为本家族为汉族，或说有“汉人的根根”，说自己的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这里落户的。他们也常闲言闲语，说同村某些家族或上游村落的人群以前是“蛮子”，或有“蛮子的根根”。

以上便是至今犹存于当地中老年人记忆里的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此族群体系中，“蛮子”“汉人”与“尔玛”并没有一个客观的、限定的族群界线。在一小区域人群的“尔玛”认同中，人们都认为本族群在“蛮子”与“汉人”的包围中。事实上，此种狭隘的“尔玛”认同，如今仍存在于羌族民众心中。民族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分界在何处？民族

认同与地域认同的分别何在？羌族的例子可以回答更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内部与外部间的界线如何形成？以及为何我们有民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并区分二者？在后面我将讨论此问题。

最后，关于“尔玛”的“历史”问题。村民们通常知道家族或村寨的来源（如几弟兄从外地来此安家立业），但他们常说不出“尔玛”的共同来源。或者在有些人心目中，“尔玛”的来源主要就是造成家族或村寨起源的那些古老的“弟兄祖先故事”。因此他们常说：“我们这个族，是尔玛的主要民族。”虽然说不出涵盖所有“尔玛”的族源历史⁹，他们仍认为“尔玛”为有同一根根（血缘）的人群。特别是在婚配对象的选择上，如果祖先有“尔玛”范围之外的人，这些男女便被认为是“根根不好”。相信彼此有共同血源，却没有共同的“族源历史”，这可能是由于究竟哪些人是“尔玛”，在同一村寨中人们都没有一定的看法，这涉及每一个人不同的知识、记忆与经验。在“村寨”的人群范畴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容易形成共同的知识与记忆体系，以及在此体系中个人的类似经验。然而超出“村寨”之外，每个人的知识、记忆与经验便有较大的差异。

无论如何，在传统上，“尔玛”是岷江上游人群以血缘关系凝聚的最大“我群”范畴。因此后来在接触到“羌族”此一概念后，他们便把“尔玛”等同于“羌族”。

六、“尔玛”与羌族

当前无论是在村寨或在城镇居民中，都普遍存在着“羌族”认同。无论在主观的自我意识上，或在文化表征上，羌族都与汉族、藏族有鲜明的区分——截然不同于过去岷江上游地区“尔玛”与“赤部”“而”之间，以及北川地区“汉人”与“蛮子”间的模糊区分。羌族认同的形成及其本质，涉及华夏主体与其边缘之间长期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以及相关的文化选择与创造，这些都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历史篇”，与第三部分“文化篇”中说明。在本节中，我只描述、解释当前此“民族”认同对各种不同背景羌族的意义，以及羌族的族群边界——他们心目中羌族与藏、彝、汉之间的区分。

现在羌族民众普遍都以“尔玛”等同于“羌族”。大多数城镇羌族知识分子，都以川西汉语方言将这词念作“尔玛”，不论他们原来在“乡谈话”中念作“日麦”“玛”“莫儿”或“尔昧”。“尔玛”普遍在各种场合代表羌族，如羌族地区出产的一种酒被取名为“尔玛酒”，介绍羌族民俗的文献

被题名为“尔玛风情”。而且，所有羌族人都知道“尔玛”的人群地理范围：南至汶川的绵虢，西至理县东部与茂县赤不苏，北到松潘的镇江关、小姓沟一带，东到北川。至于过去狭隘的“尔玛”观念，则被人们视为昨日之非。岷江上游羌族如今普遍认为过去因知识浅薄以及交通不发达，所以才以为“尔玛”只是一小撮人群，北川的羌族则认为，因过去的民族歧视，所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汉人，忘了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尔玛”。然而许多人也承认，在过去他们没听过“羌族”，如一位茂县永和沟的老人说：“羌族，事实上都是他们安的；羌族、藏族、彝族，我们这些人安不来这些姓名，只晓得莫儿。”以下这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人的一段话，更道出民族识别在基层民间的情形。他说：

解放初，茂县的人登记是羌族，我们很多人都登记藏族。我们还觉得很奇怪：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要登记羌族？我们责怪他们，他们也责怪我们。后来看，羌族还是对的。我们那儿人口普查，有很多这些问题。有人不准登记成羌族，才登记汉族。从前许多人违心变成汉族的，（现在）都要有文献才准登记羌族。

我引这些口述资料，并非为了说明近代的民族识别不正确；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明过去汉、藏之间有一个模糊的族群、文化与认同边缘。事实上，相当于“羌族”的“尔玛”观念，并未完全取代过去较狭隘的“尔玛”观念。目前“尔玛”在人们心中常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含义，哪一层次含义比较重要，在不同世代，居城与居乡以及不同地区的羌族群众间都有些差别。即使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尔玛”也常因当时所处情境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意义。

一般来说，城镇羌族民众的“羌民族认同”较村寨民众来得强烈。这自然是由于在前者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有较多机会接触藏族、汉族与回族以及相关的民族知识，并在接触、认识“他族”与民族知识之中，产生本民族的认同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在城镇的“少数民族”资源领域中，竞争者是以“民族”为单位来划分的：如学校中藏族学生入学名额多少、羌族名额多少，或政府各部门官员与各种会议地方代表中藏、羌、汉、回各占多少名额。这也使得特别依赖此资源的城镇羌族知识分子，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以不同世代的人来说，青年与中年一辈的羌族，比老年人有更强烈的羌族认同。以性别来说，男人的羌族认同又比女人来得强烈。主要原因是，显然比起老年人来，新一世代的羌族所接触的外在世界与知识较广；比起女人，男人所接触的外在世界与

知识也来得广些。

在地域之分上，北川羌族无论是居城居乡，可能比其他地区的羌族更热衷于强调本民族认同。首先，这是由于北川羌族受汉文化影响比他处羌族都来得深远，他们较能娴熟地掌握、吸收汉文知识，也因此容易接受汉文传播的民族知识。其次，由汉语文知识中，他们得知过去本地土著有青片羌、白草羌，后来经明代将领何卿血腥镇压及在民族歧视下，本地居民皆自称汉人以免遭迫害，这个悲情历史，使得他们更珍惜、重视目前得以恢复的少数民族身份。¹⁰最后，北川与绝大多数羌族所居的阿坝州分属不同水系，在深度汉化下北川的本土文化大量失去，因此北川人可以说处于羌族的边缘位置。此边缘位置与相关认同危机，使得北川羌族更需要强调本身的羌族认同。

由口述记忆与相关文献，我们知道这样的羌族认同主要是在1950年代之后才逐渐产生的。许多本地人愿将自己登记为羌族，甚至争取成为羌族，无疑归功于国家在消除民族歧视上的努力，在经济、教育各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逐步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带来的大量公职就业机会。在成为羌族之后，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鼓舞激励下以及在与其它民族的往来关系中，1980年代以来羌族的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意识高涨。如今人们宣称自己是羌族，不只是为了可分享少数民族待遇与资源，也是认同于一个伟大的、可自豪的民族群体。对于如此羌族的特性，他们常由本民族与邻近其他民族间的区分来表述。

羌族与藏、彝、回、汉之区分

像所有的民族或族群一样，羌族认同经常由其“族群边缘”来刻画、衬托。族群边缘表现在人们刻意演示的文化表征上，也表现在人们主观上对“他族”的描述以及他族与我族区分的看法上。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被称作羌族的人逐渐由民族知识中知道哪些地方的人是羌族，也因此知道邻近哪些地方的人不是羌族——他们是藏族、汉族、回族与彝族。这些外族刻画“羌族”的边缘。事实上这些异族，特别是藏族与汉族，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全新的概念。他们将过去的“赤部”“识别”“费儿”或“蛮子”等概念转变为“藏族”，将“而”转变为“汉族”。因此，藏族便是上游生活条件差的人群；汉族则是下游占好地方的、较文明的人群。不同的只是，由于“羌族”（尔玛）范围扩大与确立，以“藏族”与“汉族”来划定的“羌族”边缘相对地往外推移。

羌族民众最常流露他们对紧邻的汉族、回族与藏族的看法。这经常

有相当分歧，视当时的状况以及视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定。在许多村寨居民的观念中，有时他们觉得本民族与藏族较接近，与汉族较疏远。如一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的老人说：

客边就是“而”，我们是“莫儿”。一句话，就是羊子不跟狗打伙。“而”狡猾，“莫儿”性格直爽。松潘、黑水的人来跟我们摆条，都比较亲切些。

这位老人在访谈中一直自称“藏族”。这是因为，过去他认为被骂成“蛮子”的都是“藏族”，所以他也是藏族。后来在地方民族干部的解说与协助下，他才将自己改登记为羌族。由于上五寨人以前很受下游“汉人”的歧视，自然他觉得藏族要亲切些。

一位理县薛城水塘村的羌族，也认为藏族与羌族较亲近。他说：

羌族做官的与汉族做官的争，争不过他们，文字都被烧了。羌族打战只会猛冲猛打，没计划。把金砖、官印、银子挂在崖上，纪念以前有印，很富裕。羌族是从草地那逃来的，逃出来几个，在这儿安家。羌、藏从前是面对面的，对汉族是背对的，所以藏族对羌族好。

薛城水塘村羌族所居住的山沟，上游内沟部分便是嘉绒藏族村寨。这儿的羌、藏族多少都会说一些对方的语言。这应是他们认为藏族与羌族是“面对面的”原因之一。

部分羌族人认为藏、羌较接近，是由于他们认为，相较于汉族而言，藏族、羌族都较笨、直率且落后，都是老实、落后的“民族”。但相反地，许多羌族民众又认为，相较于藏族或彝族而言，本民族是进步的、比较聪明的。从这一角度，他们认为本民族与藏族、彝族比较远，而与汉族比较接近。这种进步与落后的区分观念，最常表现在他们主观认定的“卫生”程度之上。如一位茂县雅都人所言：

羌族挨着汉族近，所以我们比彝族进步。从卫生上，比较卫生、比较进步。彝族跟汉族不接近，所以不进步……

羌族人有时觉得他们与藏族接近些，有时又觉得自己与汉族接近些，这也显示他们的羌、藏、汉等民族概念与过去的“尔玛”“赤部”与“而”等人群区分概念类似。在自称“尔玛”时，他们也知道本地人有

些“赤部”或“而”的特质，因此被他处人视为“赤部”“蛮子”或“而”。这使得他们的认同与区分可以摇摆于汉、藏之间。与此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本民族与回族之间，在文化习俗上几无任何共通之处。

在“共同的起源”上，羌族村寨民众多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亲近，这是因为在当前流行的历史与民族知识下，藏、彝与羌都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后裔。因此羌族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常表现在他们将本民族视为历史上一个“广大羌族”的起源与核心，而藏族、彝族则为古羌人支裔、边缘。此主干与分支之别，也表现他们心目中羌族优于他族的地位。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中，已指出此种包含者与被包含者（整体与部分）关系所形成人群阶序（hierarchy）现象。¹¹

“历史知识”也告诉他们，羌族与汉族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同是古华夏的一部分。一位北川羌族知识分子说：

彝族是羌族的后代，藏族也是羌族的后代。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以前很强大，后来分成十几种民族。云南那的白族、普米、纳西、景颇，都跟羌族同一个祖宗。华夏族就是，华就是汉，夏就是羌，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华夏就是汉羌。

因此同样地，“历史”使得羌族可以摆荡于汉、藏（与彝）之间，他们认为本民族与汉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认为自身与藏族、彝族原出于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历史”也造成羌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区分。对于人口与地域在少数民族或中华民族中皆占比很小的羌族来说，一个悠久的、伟大的“历史”是他们认同本民族以及自我区别于他族的主要社会记忆。

至于回族，羌族认为他们与回族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历史起源关系。

“尔玛”、汉族与中华民族

羌族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接近而他们与汉族有较大的差别。目前当地的羌族与藏族民众，普遍以“民族”来称所有的少数民族，以此相对于“汉族”。因此如今在有些村寨民众心目中，“尔玛”更广泛的定义便是指所有的“民族”。

一位松潘小姓沟的羌族老人曾对我说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说，汉人与“民族”分地盘，相约各自在所占的土地上作记号。“民族”结草作记

号，汉人则在石上刻字作记号。后来汉人放了一把火，把“民族”作的记号都烧了，只剩石上的刻字，所以好的土地都归了汉人。他又说：

民族都在山包包上，平坝汉族占到了。还有呢，树子都这样打疙瘩。汉族怪了，都是刻字，在石头上刻字作记号。汉族就是，我们两个分家就是，烧火。过后一烧，民族那个都烧掉了，没得根据；汉族那个，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写的字。汉族占了平坝，民族占了高山。民族就是羌族。不只是羌族，所有的民族。用羌语讲这故事，民族就是“日麦”，在这里“日麦”包括所有民族。回族不是“日麦”，藏族、彝族都是“日麦”。

在此“日麦”（尔玛）就是“民族”（少数民族），也就是“住在山上的人”。由于回族都住在城中或街市上，因此他不认为回族是“民族”之一。这位小姓沟老人所说的，汉人有文字，“民族”没有文字，这便是原住民心目中“民族”与汉人的重要的区分之一，也是他们心目中“民族”所以处于弱势的原因，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故事。

茂县雅都是最接近黑水的一个羌族乡。在一位雅都羌族老人记忆中，“尔昧”也曾包括当地所有的非汉人。他对我说：

“尔昧”包括得比较多，羌族是“尔昧”，藏族也喊“尔昧”。“尔昧”就是民族，汉人是“而”。彝族说不来我们的话，他们不是“尔昧”。黑水的也是“尔昧”，就是少数民族。四土的人是赤部，他们说的话我们不懂。草地的人是识别。北川那我们一般称他们“而”，就是汉族。“尔昧”里面还能分“识别”和我们。赤不苏地方的人还是称“尔昧”。羌族是解放之后读书了才知道的，以前凡是不是汉族就是“尔昧”。

有一次，一位松潘小姓沟的年轻人跟我说，他在书上看到台湾也有“日麦”。在他心目中，“日麦”作为少数民族或山上的人之总称，其范围可以超越中国大陆。将“尔玛”扩大为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或包含世界上所有住在山上的人，这样的观念只存在于比较偏远地区的羌族民众心中。上面提及的松潘小姓沟与茂县雅都，都是最偏远、边缘的羌族地区。

最后，在更高的层次上，羌族一般皆自豪于他们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各种传播媒体逐渐由城镇、街市进入村寨之中后，他们聚集在电视前观看、讨论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中的表现，或坐在

火塘边谈论国际政治局势。这些社会记忆，都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认同。城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在历史上，他们自豪于羌族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古老华夏；在文化上，他们自豪于羌族为仍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带来许多外国客人，由于电视让他们接触到中国之外的世界，羌族民众的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认同意识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以上便是由家庭、家族、村寨、不同层次的“尔玛”以及中华民族所构成的当地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样的体系事实上不是静态的，它因时转移变迁。譬如，过去的“牛脑壳”与“羊脑壳”认同区分概念，目前在大部分的羌族中已消失殆尽。现在的羌族、中华民族等认同以及相关的各民族区分概念，50年前在当地并不存在，或至少是罕为人知的。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将探讨羌族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及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这便是我所称的“民族化”过程。

在本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本地人“民族化”成为羌族之前，这儿在族群认同上最显著的现象便是孤立的区域性“尔玛”认同，以及相对应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这样的族群现象，在族群理论研究上或在“汉化”问题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

七、“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

在人类学的族群现象研究中，学者们经常提到一种同心圆式的认同结构，以此解释“视情况而定的族群认同”（situational ethnicity）。这样的结构，也见于羌族由家庭到“尔玛”一层层的认同体系。同心圆的核心是“自我”或本人所属的最小家庭单位，外围则是一层层由亲而疏的本家族人、本寨人、本村人、本沟人以及“尔玛”等等。然而，羌族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同心圆的最外层边缘，也就是“族群”的边缘，可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说。人类学者曾指出，“族群自称”常是最有效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符记，有共同称号的为同一族群，以别于使用不同自称的人群。¹²这大致是不错的。但在羌族的例子中，在过去狭隘的“尔玛”观念下，人们常不在意邻近“他族人”的自称为何，或刻意强调我族与邻近异己的细微差异。

在狭隘的“尔玛”观念下，所有上游的村寨人群都是“赤部”或“费儿”，也就是蛮子；所有下游的人群都是“而”，汉人。于是，大致说来，每一沟中的人群都有三种身份——自称的“尔玛”、上游人所称的“汉

人”、下游人所称的“蛮子”。以整个大区域来说，我们看到的便是“一截骂一截”的族群结构。而以外来者的眼光看来，这每一“截”的村寨人群在经济生产、聚落形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十分类似。因此，为何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建立在彼此认同上的“民族”，便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深究的问题。

首先，虽然彼此有许多相似，然而认为上游的人群是“蛮子”、下游的人群是“汉人”，这并非只是他们毫无客观根据的主观想象。事实上，每一“截”与“截”之间的确有些不同，这些不同，主要是受来自西方、北方的藏传佛教以及来自东方、南方的汉文化影响所致。我们暂且以“汉化”与“藏化”来形容这两种文化倾向。以整个羌族地区来说，“藏化”影响在极西部与北部地区最深，由此向东南方递减；“汉化”影响则在南方与东方最强，由此向西北递减。¹³

以山神信仰而言，在西北方松潘小姓沟附近，山神菩萨被列入藏传佛教阶序化菩萨系统之中。由此往东或往南各村寨，藏传佛教的菩萨逐渐消失，人们只祭拜各级山神菩萨与“庙子”中的观音、玉皇、东岳等汉人神祇。再往东往南，在汶川、理县等地村寨中，汉人神祇信仰取代了各级山神，各村寨最多只祭拜一个山神；凝聚较大范围人群的则是大小不等的“庙子”。在最东方的北川，则山神信仰完全消失，只有佛、道的神祇与寺庙。¹⁴以与藏传佛教有关的“羊脑壳”与“牛脑壳”认同来说，这种认同与区分完全不见于阿坝州南部与东部以及北川羌族之中，却曾流行于北路、西路羌族之中。

以家族而言，东南方村寨居民都有汉姓，以此人们隶属于各个家族，这些汉姓家族没有“乡谈话”中的家族名称。往西北方去，或往深山村寨去，则居民同时属于一“本土家族”与“汉姓家族”；有汉姓，也有“乡谈话”中的姓。最西北方的小姓沟，则只存在“本土家族”；此地居民们没有汉姓。以凝聚村寨认同的“弟兄祖先故事”来说，在松潘小姓沟与茂县北路、西路羌族及在黑水藏族中，人们记忆里造成村寨起源的“弟兄”都没有名字，也大多不知来源。往南、往东各村寨，则人们记忆中最早到来的祖先都是有汉姓的“弟兄”。在更汉化的地区如北川，则许多家族记忆中的起源“弟兄”都来自川西的崇庆、安邑，或更普遍的“湖广”或“湖北麻城孝感”。

以语言的使用来说，黑水地区说“羌语”的村寨人群，目前已被划分为藏族，他们也认同于藏族；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也能说嘉绒藏语。松潘小姓沟的羌族，除了说“乡谈话”（羌语）外，也能说些热务藏语或

松潘的安多藏语。自此往东、往南，只有高山深沟的羌族村寨是完全使用“乡谈话”的地方，一般村寨使用的“乡谈话”中夹杂许多汉语。在更汉化的羌族中，如近主要公路的东路各村寨与北川的羌族，汉话则成为唯一的日常语言。相反地，虽然大致上所有的羌族都能说汉话，但最西方与最北方的羌族，如赤不苏与小姓沟等地羌族，汉话说得较差，口音很重。东南方羌族所说的汉话，便是地道“四川话”了。

在经济生活上，一般来说，愈往东南的下游地区经济愈宽裕，愈往北、往西，则由于高寒所以愈是生活贫苦。所以这儿的人普遍认为，上游的人群又穷、又脏、又凶，下游的人较宽裕但狡猾。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经济人类学的解释。在整个岷江上游的羌、藏族地区，愈往东部、南部，汉人主导之市场经济的影响愈强。因此在社会交换关系上，在村寨内部人们仍基于无私或公平、互助原则，分配、分享共有资源，此即人类学者所称的“一般性相互关系”（generalized reciprocity）与“平等互惠关系”（balanced reciprocity）。¹⁵但在对外的商业交换上，则基于私利原则，以期付出极少得利最多，因此人与人之间你欺我虞——此即所谓的“负面互欺关系”（negative reciprocity）。愈往西、往北去，在各村寨内仍是基于无私或公平、互惠原则的资源分配、分享。然而由于高寒阴冷、资源匮乏，因此对外常进行另一形式的“负面相互关系”——那便是只获取不付出的偷盗与抢劫。至于在商业交换上，一方面由于这儿离市场较远、交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可供交易的资源匮乏，因此较不普遍。即使有，也因他们不熟悉汉语及交易规则，而常常吃亏上当。因此，在岷江上游地区，至今许多山中村寨人群仍认为，愈上游的人愈蛮横，愈下游的人愈狡猾。

由以上说明可知，所有羌族地区的文化差异，都呈现出“汉”与“藏”间一截一截的连续过渡变化。这样的现象，自然是由于长期以来，本地人群处于“汉”“藏”两大文化系统之间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岷江上游地区，文化上的“汉化”与“藏化”并没有造成客观存在的“汉民族”与“藏民族”，只造成人们主观认定的“汉人”与“蛮子”。因此在一地域人群眼里，本地人群在“汉人”与“蛮子”包围之中，如此更强化了他们狭隘的“尔玛”认同。“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就是根植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在北川地区，“汉化”不仅改变了本土语言、文化与宗教，也影响当地村寨人群的族群身份认同——至少在晚清到20世纪前半叶，当地人可能都已自称“汉人”了。虽然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毫无疑问的“汉人”。

因为如前所言，下游村落人群仍称他们为“蛮子”或“熟蛮子”。这个例子也说明，无论是以祖源、族名与认同感来宣称一种族群身份，都不一定能毫无疑问地得到此族群身份。成为族群成员，还需该族群内部人群以失忆与建构新记忆来彼此认同。过去北川“汉”与“非汉人”之间的族群边界，也显示传统华夏边缘与民族化后的汉族边缘在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种模糊的族群边缘，后者是鲜明的民族边界。在过去模糊的华夏边缘中，人们以“蛮子”来污称同村其他家族或邻近村落人群，嘲弄他们的“蛮子”习俗，并在日常生活上实践并夸耀自身的汉文化习俗，这是有汉人认同危机者宣称及展示汉人身份的一种策略，正是此种邻近人群间一截截的歧视与夸耀，推动了“汉化”过程。

此种传统的“模糊华夏边缘”，似乎并非存在于所有华夏周边，而是在文献记载中有“生番”“熟番”之分的地区。或者，反过来说，此种由“汉化”而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族群现象，曾使得中国文献书写者将这些边缘人群区别为“生番”“熟番”。因此这些有“生番”“熟番”之分的地方，也是“汉化”或汉人形成过程发生的关键地区。虽然都是“一截骂一截”，然而在北川，被视为“蛮子”者都自称“汉人”；在岷江上游，被视为“蛮子”或“汉人”者都自称“尔玛”。它们间的差异，或表现在此“华夏边缘”进行的汉化过程之不同阶段；倘若如此，若无后来的“羌族化”发展，岷江上游各沟人群终将如1960年代以前北川村寨人群一样自称“汉人”。或者，若两者间的差异是地域性经济与文化生态差异的反映，则即使无后来的“羌族化”，岷江上游各沟人群仍将维持各自的小区域“尔玛”认同。由一些历史记载的文化生态现象看来，我倾向于相信后者。在本书历史篇与文化篇中，我会对此作说明。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各沟各寨间的客观文化差异，并非是造成岷江上游各沟中孤立的“尔玛”认同的主要原因。研究族群现象的人类学者，早已放弃以客观文化因素异同来定义一个“族群”¹⁶，羌族的例子支持这样的看法。文化异同的确有客观存在，然而人们觉得“那些人的语言、体质、文化与我们的类似”或“那些人的语言、体质、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却是相当主观的。这些主观的看法，以及因之而生的文化选择、创造、诠释与演示，才与族群认同有密切关联。对此，“民族化”后的羌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过去孤立的“尔玛”认同中，村寨人群一方面注意他人与本地人间的社会文化（及语言）差异，一方面也刻意表现本地特色以强调差异。相反地，当前在羌族认同下，过去视彼此为蛮子、汉人的“尔玛”，如今有意忽略“内部”之语言、文化差异，或共同选择、创造相同的“羌文化”以凝聚本民族认同。

岷江上游地区过去此种“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族群认同研究上对我们有更重要的启示。过去族群研究的重点，曾在于各族群或民族间的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或相关的族群边界之维持与变迁。¹⁷而后，学者们也注意到在族群或民族认同下，被隐藏、利用或转移之阶级、性别、地域等人群认同与区分。¹⁸无论如何，这些研究中所讨论的，似乎皆是被明确分类的社会群体，而多少皆忽略了挑动或产生族群情绪与情感的本土情境（local context）。在此，“本土情境”并非指造成族群区分的资源环境、政治背景、迁徙殖民等等，而是指上述背景所造成之微观的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人际关系往来，以及相关行为与表征。在此情境中，人们认同与区分的是身边亲近的“同胞”与“异己”，而认同与区分的边缘可能是相当模糊的。如，对过去各个沟内孤立的“尔玛”来说，有敌意或危险的“汉人”或“蛮子”可能就近在身边。进一步探讨此种孤立的“尔玛”认同，我们必须脱离“结构”的层次而探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爱憎情感，以及基于此情感的行为实践（practice），以及个人的情感与行为如何受社会（特别是认同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形成、塑造或改变社会的认同结构。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 1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 2 在本文中我将常提到“藏化”与“藏族”，因此必须说明我对这两个词的看法。所谓“藏化”是指在宗教、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受吐蕃与藏传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些现象。“藏族”则是指在中国近代国家之民族分类上，被视为也自称为“藏族”的那些人。这样的定义是由于，我认为，目前所谓的“藏族”与“藏族文化”是自吐蕃时期以来逐渐发展，并在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族”概念下，被人们集体建构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在此历史过程中，参与此民族与文化建构的不只是吐蕃或自称“番”的人群，更包括汉人以及介于“汉”“藏”两者之间的人群。
- 3 神龛，在羌族地区相当普遍，其位置在主屋内的最右角。在较藏化的西路与北路部分村寨的家户中，神龛代表家神；神没有形象，也没有刻祖先名字的牌位，只放置一簇“神箭”。在东路与杂谷脑河地区，有些家户的神龛上有天神（或玉皇）、灶神与“某氏门宗”，有些则以一块“天地君亲师”木牌包括一切神祇。
- 4 此现象在黑水地区尤为明显。黑水地区村寨人群在开酒坛敬菩萨的时候，先从西藏最大的菩萨念下来，直到究我伦木初，然后念黑水最大的山神：欧塔基、欧塔迷、欧塔拉，最后念本寨山神及本家族神。
- 5 以上口述中，“黑水河”可能指的是三龙沟；而“他们”指沟北的诺窝、勒依等高山村寨之人。
- 6 所谓尖的、平的，指的是神龛上“神箭”尾端的形制。
- 7 相反地，当今日羌族知道这些说不同“乡谈话”的人群，实际上都是说“羌语”的“羌民族”之后，他们会非常仔细地听他处羌族的“乡谈”在说什么。偶然听懂了几句，

或几个词，他们便以此印证目前一个普遍的想法——大家原来说的是同样的语言。研究民族或族群的学者常强调，“语言”在区分民族或族群上的功能。对于民族语言，他们常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在语言学逻辑下建构的“语言”。然而，我不认为这样的“语言”与民族或族群间有截然相对应的关系。羌族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族群认同中，事实上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知，反映该族群当前的本质。

- 8 目前岷江上游的各原住民族群，普遍以“民族”一词来称“非汉族群”。“咪”是人的意思，又引申为“不是汉人的人群”，或如今在大黑水地区“咪”更狭隘定义便是“藏族”。黑水人提及的“而日咪”，以他们的汉话来说，便是“汉族不像汉族、民族不像民族的人”。
- 9 这是指村寨居民心目中旧有的“尔玛”观念，而非相当于“羌族”的“尔玛”。至于相当于“羌族”的“尔玛”，羌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自然能说出他们的共同来源——也就是各种版本的“羌族史”。
- 10 但我们无法排除或相当肯定，有不少的北川羌族其父系或父母双方原来便是汉人，但此“悲情历史”对他们而言仍是重要的过去。
- 11 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complete revised Englis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239-245.
- 12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965), pp. 1215-1218.
- 13 我将“藏化”与“汉化”置于引号中，这是由于藏化、汉化常被认知为习藏人或汉人之语言、文化、服饰因而成为藏人或汉人的过程。在后面我将说明，文化上完全“汉化”的人群，不一定自称“汉人”；或者他们自称为汉人，但不一定被他人视为汉人。因此“藏化”与“汉化”在此只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
- 14 有关岷江上游地区村寨人群的宗教信仰及其地域特性，请参阅本书第九章。
- 15 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193-196.
- 16 有关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发展，请参考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一章。
- 17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Leo A. Despres,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1975; John Rex, *Race Rela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Anya Peterson Royce, *Ethnic Identity: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8 Christopher McAll, *Class, Ethnic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第四章 结构下的情感与行为

由前面的描述分析中我们知道，生活在此青藏高原东缘山区的人们，结为各种血缘或拟血缘“族群”。每一种人类“族群”之间，如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间以及村寨与村寨、沟与沟的村民之间，在资源划分上都界线分明。匮乏，无论是生计上或是心理上的资源匮乏，以及因此造成的资源划分与竞争，是许多社会认同与区分的主要背景。在这样的认同与区分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上一章中所提及的，岷江上游各沟之间“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一条沟的小世界中，人们以“尔玛”认同为核心，以上、下游的“蛮子”与“汉人”为我族边缘。这种现象在岷江支流的黑水河流域尤为明显。

在这一章中，我将更深入地分析此族群体系中人们的情感、爱憎与行为。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羌族认同普遍被接受之后，各沟之间“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基本上在逐渐改变之中。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岷江上游社会，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我引用此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以及访问一些村寨中的老人，来重建这一段过去。由于有些自然与人类生态并未改变，因而与此族群体系相关的一些传说、习俗与观念，至今仍保存在村寨居民之言谈与行为之中。其次，我之所以重建这个“过去”是因为，一方面它可以凸显本地区在“民族化”之后族群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这“过去”中的一些现象，忠实且清晰地反映人类在“族群”生活中的爱憎、恐惧、仇恨与暴力的根源。以此而言，本章不只是分析“过去”与“他者”，也借此了解“现在”与“我们”。

一、村寨生活中的“我族”与“他族”

在上一章中，我曾描述村寨民众的“尔玛”概念。在他们心目中，“尔玛”不是“赤部”，也不是“而”。岷江上游村寨中的老一辈人常认为，“赤部”是吃生肉、酥油的人，是拜喇嘛的人，汉话说不好的人；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相较于“而”与“尔玛”来说，“赤部”比较笨。“而”便是汉人。村寨中的老年人认为，汉人聪明，但整体来说，汉人比较有文化。如此，介于“赤部”与“而”之间的“尔玛”，便自认为是老实、有点笨，但又不像“赤部”那么笨的人，是说“乡谈话”也能说“汉话”的人。

他们过去对“蛮子”与“汉人”的反感或恐惧，来自活生生的日常经

验。据当地民众说，过去治安很不好。上游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寨居民，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赤部”“费儿”或“蛮子”，时常结伙到下游村寨偷盗牛羊，甚至公然拦路抢夺杀人。

下游较汉化村寨中有些地霸、无赖，勾结乱军、汉匪、帮会，也经常沿河坝的地区勒索抢劫或强奸妇女。清末以来引进鸦片种植，更使得治安恶化，地方政府完全无力维持秩序¹。沟中村寨民众，常需外出到邻近的街市、城镇做小买卖，经常是一走出沟，便被下游村寨或街市居民骂作“蛮子”。在与这些地方的人交易时，“里头出来的人”经常吃亏上当。因此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外来的汉人商贾，或是邻近村寨的“汉人”，都是些狡诈的人。然而，欺骗、偷窃、强夺之所以在这地区如此普遍，也因为资源匮乏。

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造成沟中村寨民众对外界的恐惧与敌意。对外界的疑惧与防范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从村寨的聚落形态来看，在半山或高山上数十到上百座石砌的房子紧密地连成一片，中间只有狭窄的通道，这便是羌族与邻近藏族村寨的一般形式。村寨内，屋墙上只有很小的窗子，外面开口小，里面开口大，如此便于防御且能得到较多的光线。寨中建有高大耸立如烟囟的碉楼，有时高达30米，作为瞭望与防卫之用。此种聚落与房屋构筑形态，也说明了过去此地人群经常以暴力相侵伐。在上一章，我所引的当今羌族的口述记录，有些也流露他们记忆中过去的暴力，以及人们对此暴力世界的恐惧。

沟中居民对外在世界的恐惧和因此而造成的孤立，也导致各沟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分歧。在此地区，经常隔座大山的邻近两条沟，沟中民众所说的“乡谈话”不同；有时在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上寨与下寨居民间，所说的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各沟、各村寨的宗教信仰与年节习俗以及妇女的穿着等等，也都有些差异。因此他们常说，本地是“三里不同腔，五里不同俗”。“区分”（distinction）在此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它并不只是文化表征上的客观存在现象，也是人们主观上借由各种文化表征与仪式所强调的区分。村寨民众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习俗或特点”，并批评、描述“他们的习俗与特点”，以表达我群认同及“我们”与“他们”间的区分。“区分”可以是具体可被观察的现象，如送葬时棺木在前行进还是在后跟随，或过年期间每一日的特殊风俗与仪式，或妇女衣饰上的细微差别；也可以是如“我们较常洗澡，他们不常洗澡”，“他们爱整衣服，吃得却像猪一样”等较主观的看法。无论如何，他们都经常谈论“我群”与“他群”的不同，也经常刻意实践、表现这些不

同。

在当地过去的族群关系中，被上游人群视为“汉人”，对于大多数的“尔玛”而言，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无论如何，他们自豪于自己汉话说得好，也知道本地庙子里拜的是汉人的菩萨。相反地，由于清末或更早以来，当地村寨民众多少都接受了一些汉人中心主义下的文化价值，他们对于被视为“蛮子”感到非常痛心与耻辱。所以一方面他们骂上游村寨人群为蛮子，说他们偷人、抢人、脏、淫乱，另一方面则强调自身的清洁与纯净。更重要的是，“不乱搞性关系”被认为是本族群的重要道德特色。他们说，一个男人绝不应该在异性面前说粗口（脏话）或放屁；只有男人在一起时可以，有女人在时绝对不能。如果不小心犯了，他们说“羞都可以把你羞死”。女人更应避免在都是男人的场合逗留。女人的言行更保守，甚至直视男子都被认为是不应该的。

在这样一个对“外人”的观念下，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脏、淫乱的“蛮子”并不只是远方某一特定异族，而是由邻近村寨开始向外延展的层层相扣的人群——由可能受“蛮子”血统或习俗污染的邻人、邻近村寨的人，直到西边毫无疑问的“蛮子”黑水人，以及“蛮子”中最凶狠的黑水知木林一带的小黑水人。这自然是“一截骂一截”族群体系下的一些现象，但它或许也反映人类“族群认同”中较隐晦的一面。

二、村寨中的邻人与女人

“族群”认同常让我们忽略人类社会其他的“区分”，如性别、阶级、世代、地域间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认同与区分，常与“族群”之认同与区分纠结在一起。“族群”认同与区分，常以性别、阶级与地域群体之阶序差别为隐喻，以映照“我族”与“异族”间的优劣区分。在强化“我族”与“异族”的区分中，同时也强化并遮掩群体内部性别、阶级与地域人群间的不平等。我们在岷江上游社会中，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现象。过去在本地村寨社会中，不存在严重的社会阶级区分，但性别以及各有领域之家庭、家族与村寨居民之区分，则是很明显的。以下我将说明，这些社会区分与“尔玛”族群区分间的微妙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村寨里的各家庭、家族与寨子。邻近的寨子间或同寨中不同家族、家庭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虽然在一条沟中，人们经常宣称各寨民众的祖先有“弟兄关系”，但“弟兄关系”中所蕴含的一方面是人群间的联合，另一方面则是人群间的竞争与对抗（详见本书第

七章)。邻近寨子间有草场、田地与林子相衔接，它们各自有山神菩萨也有联合的庙会或山神祭祀，而且邻近村寨各家户间常有婚姻关系，因此或为了争地盘，或为了在山神会或庙会中夸耀势力，或为了儿女婚姻与家庭纠纷，邻近村寨间经常存在着紧张与敌对关系。虽然很少引起严重的暴力，但这却是更普遍的、通过多种文化与生活细节来表达的人群间冲突。有一次，在小姓沟埃期村，我与二组的朋友将要去参加半公里外一组的一场婚礼。下午两点多，二组的小伙子们告诉我，他们决定不去了。因为他们原先想舞狮为邻村朋友的婚礼热闹一下，但对方传话来说，担心二组的狮子会分食一组舞狮者可能得到的红包。这些愤愤不平及不愉快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傍晚，后来便自然消解。晚上所有二组的小伙子们都去邻村喝酒、跳舞。

在我们的认同与区分经验中，我们能很清楚地辨别“家族”“地域”与“族群”等认同，我们属于王姓家族或李姓家族，我们是台北人或成都人，我们是“外省人”或“客家人”。通常我们都不会将亲属、同宗、邻里、同乡等人群认同与民族或族群认同相混淆。我们不会说，我们王家这民族，或我们北京人这民族。甚至我们有时还分得清民族与族群，因此我们不说“外省人这民族”。然而，在许多羌族村寨居民的观念中却非如此。我举个例子。我先前曾提到茂县黑虎的“黑虎五族”，五族中的“葛紫关”又分三个小队；其中的二小队中，又有王氏寨、白石寨、和尚村、上村、板凳寨等。以下是一位王氏寨的人对“民族”的看法：

我们高头叫王氏寨，也是我们葛紫关的主要民族。所以说，王氏寨也就是葛紫关取的名字。也就是过去，端公村、和尚村、白石村；我们王氏寨就是葛紫关总称。王氏寨这一族，王家人原来很多，原有二十四家人：“板得甲”为首十二家，“北杂”十二家人——挨到王氏寨的，他们也姓王。他们很早以前，四五代以前都是一个族。一个氏族，就像两弟兄分家一样。这个族，是葛紫关这个村的主要民族……这边十二家，那边十二家，一家一家地病，二十四家人病死得只剩两家。一边剩一家，我们“板得甲”剩一家。最后这两家人生活比较脑火（按：困难之意），我们还剩一家，那边只剩一个独根。我们就把“北杂”那一家，现在还在，把他喊来……一起住。这个族，在葛紫关主要是他们。

我们可以细细体会这一段口述。在这段口述中，可能让我们感到讶异的是，这个只有两家人的人群也自认为是一个“族”，或自称是“葛紫关”的主要“民族”。这并非由于这位黑虎老人“汉话”说得不好；在他祖父

那一辈，许多人便能说汉话，甚至已能读汉文古籍了。我们该思考的是，我们的“讶异”从何而来。

社会环境不同，造成两个不同的认知体系差距，也因此让我们在接触异文化概念时有如此讶异。我们所处的社会，与所有“文明的”人类社会一样，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来建立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也与所有人类社会一样，血缘联系，无论真实还是虚构，都是凝聚群体最有力的因素。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各次群体的血缘、空间与资源共享关系，经常缺乏一致的远近亲疏逻辑。“邻人”指与我们居住空间相近，但与我们不必有血缘关系，也不必然有紧密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的人群。“同乡”指与我们有共同地理起源的人群，但缺乏血缘关系以及资源分配、分享关系。尽管如此，“邻人”与“同乡”关系，都可能被强化以追求个人或群体之利益。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家族”成员则是在血缘、居住空间与资源上关系皆密切的人群。

在超乎家族的“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ethnos）认同中，我们也想象广大地域中的一群人，在血缘、空间与资源共享关系上皆有密切关系；“他族”便是在血缘、空间与资源共享关系上，皆与“我族”成员距离较远的人群。由此可见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与情感，仿真“家庭”或“家族”此亲属群体的认同与情感。由此亦可见在我们的观念中，“本民族的人”与“邻人”“同乡”“家族”群体间为何有区分——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家族成员经常不共居的社会，一个人们经常移动的社会，这也是将“拟血缘关系”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国族认同”的社会。更重要的，这是以文字历史记忆刻画各种认同与区分的社会。

然而过去，在许多岷江上游深沟中的村寨社会里，一村寨中的男性成员生于斯、长于斯，不常迁离村寨。解释本地人由来的“弟兄祖先故事”也倾向于“遗忘”所有的迁徙。在村寨中，血缘关系密切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在居住空间上也较接近；他们共有特定的家族山林资源，因此他们也有较密切的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往上一层，同寨之人在居住空间上较家族成员间之距离远，彼此的血缘关系也较家族成员间之血缘疏；在资源分配、共享关系上，同寨居民间的关系也不如家族内紧密。再往上一层，同处一沟的“尔玛”各村寨民众，也认为彼此有血缘、空间与资源共享关系，但同沟人的这些关系，又要比村寨内各次群体间的关系来得疏远。也就是说，家庭、家族、村寨的人、尔玛，都是同一血缘、地缘与资源共享逻辑之下集结而成的大小不等的人群。血缘愈接近的人群，他们的空间距离也愈近，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也愈密切。这便是为

何，当他们由汉语中习得“族”或“民族”这样有“共祖群体”意涵之名词时，他们将之用来指称所有家族、村寨、尔玛乃至于中华民族等人群。同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常以结构性的“弟兄祖先故事”，来解释由家族到民族等各不同层次“族群”的由来。因为“族”的概念可由“尔玛”延续到“家族”，所以“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便不只是在各个“尔玛”之间，也存在于“尔玛”之内。在这样的认同与区分体系中，所谓的“外族人”可能就是他们数十米外的邻居。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比“文明社会的人”更敌视邻人；我们都对“亲近的外人”多少有些敌意。

至于性别区分与族群区分间的关系，前面说到村寨民众心目中的“蛮子”时，我曾提及，这儿的人们常认为“蛮子”脏、乱搞性关系；相反地，“尔玛”便是纯净的人。这样的观念，影响并反映在村寨男人心目中“女人”的某些负面隐喻上。

岷江上游村寨中的家庭与家族，是以男性成员为核心主体的“族群”。这样的“族群”是一个个孤立在“他者”之间的人群。成员们相信彼此有同一根根（血缘），并遵守不内婚的原则。因此女人，无论是由外面嫁来的，或将要嫁到外面去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外人”。这一地区流行的嫁娶模式是，女人往经济情况较好的下游村寨或沟里嫁；同时，这也是为了避免“下嫁”到可能有“蛮子根根”的地方。于是许多女人不只来自“外地”，还经常来自上游或生活条件较差的邻近村寨。由于他们在主观上认为，愈上游地区的人群愈野蛮、不讲卫生，任何由外地特别是上游地区或生活条件较差的邻近村寨嫁来的女人，都被认为可能沾染了“蛮子”的血统或习俗。也因此，在孤立的村寨人群认同中，她们被认为是不洁的。当地有一句骂人的俗语，“蛮娘汉老子”，便反映了这个嫁娶模式及人们主观上对这些由外嫁来的女性之忧虑与怀疑。

显然，由于民众的“我族”（家族、村寨或沟中的族群）认同，女人成为深恐“我族”血统被“蛮子”污染的代罪羔羊。在岷江上游与邻近地区村寨中，妇女常被视为不洁与恶魔的象征²，如一位北川羌族所言：

1950年代以前包括初期，我们那还有信那个以白为善、以黑为恶、以红为喜、以蓝为天。男的可以包白帕子，女的就只能包黑帕子：就是，女的是恶魔转来的。

在岷江上游，在祭神树林或祭山的仪式中，女性都不能上山参加活动，因为怕“污”了神明。一些流行于羌族地区的神话中，也将海子（高山湖池）之迁移，归因于被某个女人污了。女子身上所系的绣花腰带，

被认为是可以消解女人身上的毒与魔的神圣对象。在一个家庭、家族或寨子里，人们常认为由外面嫁入的女人，可能为本寨或本家带来血统或习俗上的污染。因此在结亲的谈判过程中，对方的“根根好不好”是男女双方最关怀的事。而吹嘘自己根根好的人，主要是双方的“舅舅”。一位小黑水知木林的老人曾告诉我过去在谈婚事时舅舅的地位，以及舅舅该说的一些话。他说：

结婚的时候说，主要是舅舅，他带的东西最多，他也最有权说话，别人没权说。如我是掌门人，舅舅，来的人态度不好，我就发脾气。如果舅舅发了脾气，什么都弄不好，还要打架。上去我不是“识别”（按：指草地藏族）的根子，没有“识别”的味道。下去不是汉族。我是“尔勒灭”，是神龛上的名字那个根根。下去成都皇帝的簿子上有我的名字，上去“识别”草地头人那也有我的刻刻……舅舅还要吹自己多富裕。养的猪看不到肾脏，油太多了；庄稼后的石头桩桩都看不到。没有回敬是狗，没有回话是哑巴，所以今天我要说两句。就是这样，语言说得很深沉。

黑水瓦钵梁子的老人也说，当地谈婚事很重“根根”：

比如说一般订婚，男方的人到女方，双方就摆（按：谈天或吹嘘之意），我们的根根好，你不相信可以去寨子问。现在还是这样。根根好，就是实实在在的本地人。以前是帮人的、上门的（按：入赘的人）、讨口的（按：乞丐）就不好。老年人还是喜欢讲这些。外面来安家的也不好。还有本地的放有毒药的“德识格别”也不好。放毒的与毒药猫是一回事。遇到了，吃了饭要着（按：遭殃之意）。像这样的家，女子都没人要，只有嫁远一点。

由“舅舅”来吹嘘自家的“根根好”，也可看出他们认为家族血统纯净之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外面嫁入的女人（母亲、妻子与媳妇）。虽然同村几个寨子常宣称是“几弟兄”的后代。然而，即使在同一寨子内人们仍经常谈论谁家的根子纯净，谁家有“蛮子”的根根，也就是以纯净与污秽来区分我群与他群。

在如此的社会文化下，以及在汉人鄙夷“蛮子乱搞性关系”之族群歧视下，女人成为男人主观建构的“性洁癖”与“根根干净”的潜在威胁。性方面的纯洁，谨守伦理与男女之防，则为广义“洁净”的代表；洁净与不洁成为“我们”（本家族、本寨、尔玛）与“他们”（外来的人、蛮子）间

的重要分野。这说明了为何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洁净”与“污秽”，往往与女人或性的洁与不洁相关。然而这并不是过去“尔玛”社会中的特异风俗。由于女人在人类社会中普遍的边缘地位，因而在族群中心主义之下，“女人”于各种隐喻中（如弱者、污秽者、攀附依赖者）被用来影射“异族”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类社会中的“区分”尚不只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而与他人有所区分。孤立的个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含义便是：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自我防范的；另一方面为了应付资源竞争的需要与外界之侵害，个人又必须与他人结为群体，以克服孤立带来之不利与恐惧。因此对个人而言，“区分”是一种生物性的、心理的，也是社会的边界维持。维持此一层层的边界，以期身体不受病害、外力侵害，以期家庭、寨子、村子不受邻人或外敌侵犯。“区分”也为了强化或凝聚一个族群的内部“身体”；超过个人生物性的身体边界之外，人们仍想象在社会边界内的“本族群”为一个有共同“身体”的群体。这种族群身体想象，一方面表现在将“族群”拟人化，一方面表现于族群成员的共同血缘想象。

在人们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许多可预期与不可预期的灾难与外敌，经常侵犯这些一层层的“身体”。然而对个人来说，他（她）并不经常能或愿意，理性分辨外在威胁与敌意是在哪一层“边界”之外。因此与邻人的矛盾与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的“异族”身上；个人身体的不适，也可能因此迁怒于亲近的家人。而所有敌意与仇恨的转嫁、迁怒，有强化一层层“边界”以凝聚“身体”的功能。为了凝聚群体，对远方“异己”的仇恨，或对外来灾难与敌人之恐惧，可能转嫁于邻近“异己”身上；或相反地，与群体中邻近的“异己”之摩擦冲突，可能转化为对远方“异己”的憎厌。如此，远方经验与邻近经验相互援引增长。而为了不使群体因内部的相互仇恨、猜忌而溃散，被迁怒、怪罪的内部异己，常只是群体中部分的人——所谓的“代罪羔羊”。

三、社会规范、污秽与代罪羔羊

人类群体间被选择、创造或被想象的“族群边界”以及因此造成的相互歧视、敌意与暴力，是许多社会科学的“族群”或“国族”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国族与族群现象研究者，已注意到国族或族群关系中隐含的性别、阶级及各种拟血缘次群体间的区分³。

欧美学界另有一项研究传统，那便是对较小的社会群体内或较亲近人群间的敌对、冲突与相关“边界”之研究。1960年代，埃利亚斯已注意到一种普遍的人群对抗与冲突模式：非常相似或亲近的两个群体，一方认为自身是本地人（established），而认为另一群体为外来者（outsiders）。本地人常强调某些当地文化或生活习俗上的“规范”（norms），并认为这是外人所缺并难以模仿的。由于外来者是此种“规范”的潜在破坏者，因而本地人又认为他们是污秽不洁的⁴。他在一个相对而言，相当小且人群间同构型高的社区中作这样的研究，因而能够在人类社会分群上有此独到的见解。这种划分非常相近人群间的“规范”，在布迪厄对人类社会分群的研究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他对于社会“品味”（taste）的研究，更让我们了解这种人类社会分群边界“规范”的特质及其如何形成与被操弄。他指出，社会认同建立在“区分”（distinction）之上，而通过创造、操弄生活品味的“区分”，一个人借以敌视最亲近也因此最有威胁的另一群体。⁵

基拉尔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与“魔性替身”（monstrous double）之说⁶，更深入说明此种非常相似的或亲近人群间的相互模仿与敌对。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此种亲近人群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社会骚乱时一个或少数社会边缘人成为“代罪羔羊”，以消除社会紧张并凝聚人群，此即为他的“代罪羔羊理论”。⁷这种亲近群体内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以及“代罪羔羊”现象，在许多社会文化中的“家族”群体里最能显现出来。譬如，人类学者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有关污染与女性社会角色的研究中也曾指出，在以男性为家族主体的社会中，由于嫁入的女人破坏男性家族之内外“边界”，因而被认为是“有污染的”。⁸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中，女人在许多信仰与仪式里都被认为是“污秽的”，以及为何在家族纠纷中媳妇常成为“代罪羔羊”。

虽然以上学者所研究的人群“区分”，有些是小镇中的老居民与新居民的区分，有些是同一地各社会阶层人群间的区分，有些是家庭或家族中核心（男性）与边缘（女性）的区分，但这种亲近人群间的敌对模式，常被扩大而见于人群间的种族或族群关系之中。我认为，对于研究族群或民族现象的学者，这一类的研究有可借鉴之处。相反地，族群研究者对于族群冲突、对立的研究成果，对于思考亲近社会群体间之区分问题也有相当助益。

譬如，以上我所描述的村寨居民心目中对“族”或“民族”的概念，以及他们与“外族”之区分，都显示所谓“异族”不只是远方某一特定人群，

而是由邻近家族、村寨开始向外延展、层层相扣的人群。这也说明为何人们对邻近或亲近人群的猜疑与敌意，经常与他们对远方“异类”的猜疑与敌意互为表里。此种猜疑与敌意，使得人们觉得个人与群体“身体”需要保护——防范污秽、不洁经由各种媒体侵犯此“身体”。而群体中的“外人”或边缘人，如女人，则常被认为是带来不洁、不幸的媒介。在岷江上游各沟各村寨中，以细微的差异来造成人群的区隔，明确地表现在语言、服饰与其他文化和生活习俗之上。外来女性在语言、服饰与生活细节上，破坏、污染本地人的“规范”；她所来自的群体——母舅家，同时也是邻近另一家族——常试图干涉、改变本地人的“规范”。如此在本地人群中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与紧张。此种亲近之人所带来的污染威胁，与他们过去所感受远方“蛮子”“汉人”所带来的污染威胁，常相互增长。因此在传述“神话”“历史”与人们的“过去经验”中，人们常将女性异类化、带罪化或污化，以表达对一层层外在世界的敌意与恐惧。特别是在岷江上游村寨社会中，性关系的、道德的与身体的洁净是一个重要社会规范，以划分我群与“蛮子”和“汉人”。而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常被众人认为是村寨中此种规范的潜在破坏者，因此她们被认为是有毒的、有污染的。在岷江上游各村寨中，这种女人被称作“毒药猫”。

以下我将由流行于岷江上游的“毒药猫”传说，来说明村寨民众如何以少数女人为“代罪羔羊”，以消除社会内部骚乱，表达对外在敌人的恐惧与憎厌，并因此强化群体认同。

四、岷江上游村寨中的毒药猫

岷江上游村寨中普遍流传“毒药猫”的说法。在民众的心目中，“毒药猫”是一种会变化及害人的人，几乎都是女人。她们或变成动物害人，或以指甲施毒害人。受害者则是村寨中的小孩或男人。一个村寨中，哪个人或哪些人是“毒药猫”，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如今许多老年人都认为，过去村寨中毒药猫多，现在已少了；或者说过去毒药猫较凶，现在的毒药猫毒性较轻。因此，目前在许多村寨中，“毒药猫”只是过去的传说，尽管它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感情与行为。但在过去，每个寨子都有“毒药猫”，这便不只是一个故事或神话，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经验、记忆，因此也深深影响村寨内外人群的互动关系。

无论如何，人们常将村寨中一些莫知来由的疾疫与意外灾难归罪于毒药猫。对毒药猫的恐惧，使得家或寨子成为人们在夜间寻求保护的城

垒；没有绝对必要，人们都不愿在夜间离开家或寨子。毒药猫女人又被认为是有毒、污秽与淫乱的。因此对于讲求道德与血缘“纯净”的村寨男人来说，这些毒药猫女人除了可怕之外，也是险恶可憎的。虽然人们畏惧、厌恶毒药猫，但他们又认为“无毒不成寨”（寨子里没有毒药猫也不好）。

根据一般说法，毒药猫白天与常人无异，到了晚上，躯体睡在家中，灵魂就变成某种动物四处害人。据说，每只毒药猫都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各种动物的毛。当晚上毒药猫要出去害人时，就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到什么动物的毛就变成哪种动物。然后，将走夜路的人吓得摔到悬崖下面去。以下是茂县赤不苏一位中年人所说的一段村寨往事。

我们寨子有一家，在大集体时有两个人，要去开会。寨子上有个毒药猫王子，变一个白马，跟寨子上一匹白马一样的。这两个人，一个胆小，一个胆大。他们觉得有白马跟着，知道是毒药猫。胆大的就说：“我躲在石包包（按：突出的岩石）这儿，你去把它吆上来。”结果马一过来，躲在坎子上的那个人吆喝一声，马就掉下去死了。他们两个商量，明天我们很早起来看，如果死的是寨子里的马，我们就都不要开腔；如果不是，就是毒药猫了。第二天，他们来看，结果没有死马，但寨子里有一个人病了。他们说，整了毒药猫的人一去，那个毒药猫就会吐血死掉，所以一般是不去的。但这两个是村干部，不去也不行。他们就去看看。那毒药猫的家人把她抬到医院去，在半路上就遇到那两个村干部，那个人就吐血死了。为了这事，到现在两家的关系还僵得很。

一位松潘小姓沟的中年人，曾告诉我一个当地有关“毒药猫”的故事。

一个男子在河边推磨，推水磨。来了一个毒药猫，她说：“你一个人在这推磨最怕啥子？”毒药猫问他。他说：“我最怕驴子，进来呀呀叫，我最害怕。”后来毒药猫就变一只驴子来了。磨房门一开，就阿阿叫。这个人就把驴子勒到，就把粮食托在高头，骑上，一打，就往包包上（按：指山崖头上）登上去。走到半路她累到了，就唤。走到屋里，他把几个儿子喊起来，说：“我捡了一只驴子，你们给它喂点草。”他儿子们给她草她不吃。他们就说：“爸爸驴儿不吃草。”他说：“不吃就给它饿着。”五点鸡叫，她就说：“你把我放了吧，我屋里头娃娃要哭，要喂奶。”他才跑下去，把她放了。

就像以上故事一样，大多数毒药猫变动物的故事中，最后被修理的都是毒药猫。而修理毒药猫的人，则是她们自己的丈夫，或本村中的青壮男子。在村寨民众心目中，毒药猫主要都是女子。至于男人会不会变成毒药猫，各人说法不一。⁹毒药猫与女人间的关系，明确表现在传说中毒药猫的传承或训练上——传说中毒药猫都是由母亲传授给女儿。以下是一位黑虎沟老人的口述，代表此种普遍的看法。

毒药猫女的、男的都有，但女的要凶些，狡猾些。只要走得起路，她母亲就教她。没得人的时候，把她喊来，把火笼烧起，做馍馍的熬盘搁在上面，把女子也放在上面，毛毛也搁在熬盘高头，要她打滚。滚打了，拿啥子毛变啥子。教她，一般都是母亲教，父亲不教。技术上指正她。一直长大，就变成毒药猫。男的也有，很少，男的不遗传。

以上口述说明，毒药猫不仅在母女间传承，与此传承相关的火笼、灶边与锅盘，也都是与女性有关的场域与器具。在较汉化的地区，毒药猫又被认为与灶神有密切关系。据黑虎沟的一位老者称：

灶神菩萨是毒药猫的祖先。他们两个最要好，他也是个毒药王。她有个小口袋，放的有麻雀毛、老鼠毛、豹子毛、牲口毛、牛毛都装得有。他们说，她的口袋就藏在火笼底下，灶神菩萨替她管。她阴着掏出来，一打开口袋，打个滚，拿到啥子毛就变啥子。拿到老鼠毛就变老鼠，晚上就扰人，把人甩下坎，把你吃了。真正把人吃的还没看到过，只是几扰几扰的把你吓死，或把你吓出病来。

同是家中的女人，毒药猫却无法将法术传给媳妇。相反地，许多有关毒药猫的故事，述说毒药猫母亲如何想要害自己的儿子，却总被媳妇揭穿而使得毒药猫受惩罚。或说，婆婆如何想将毒药的技术传给媳妇而不成。¹⁰下面是一位赤不苏人所说的故事。

据说有一个儿子，结了一个爱人，当时还没有小孩。母亲在家煮饭，让儿子与媳妇出去耕地。正是春耕季节，要播种。晚上媳妇被她母亲施的毒药猫法术吓到了。她就跳到柜子里躲起来。在我们羌区说，面柜子是毒药猫的交通工具，像马、车一样。那天晚上那媳妇蹿到柜子里去时，那老人婆恰恰又是毒药猫王子。毒药猫王子，就是那一天晚上，四面八方的毒药都要来她这，来受训或接受任务之类的。她骑起面柜子出发。她开会的地点，所有的毒药猫都来了。他们掷骰子。那老人婆

——那毒药猫王子输了，要拿出很多酒肉来赔偿损失。媳妇就躲在柜子里听老人婆说些啥子。老人婆宣布：“明天午时，我既然输了，我就要按我们的制度，把我的娃儿拿出来给你们吃……”媳妇听到，吓得昏了。因为他们感情相当深。第二天，他们在田里休息时，她滴了眼泪，滴在她爱人脸上，他才发现她在流泪。他问她：“今天是咱个事？”要说，对方是她爱人的母亲；不说，他的爱人又会被害死。她忍了又忍，眼泪不住地流。最后在他的催促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爱人。他爱人听了说：“我有办法。”他说，即使是亲生母亲也不认了。在他们做田做到一半时，他的母亲就来了，带来牛草与馍馍，要他们吃午饭。那妈妈要去喂牛吃草。儿子要母亲吃饭，他自己拿牛草给牛吃。牛吃了的确眼睛红了。那儿子就把牛鼻索拉一拉，牛退到崖边，就被他杀了推下崖去。牛一死，他母亲回家，也死在门槛上。

有些人说，毒药猫只害自己的儿子，不敢害自己的丈夫。另有人则说，毒药猫喜欢害自己最亲近的人，主要是自己的丈夫与儿子。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毒药猫绝对不加害自己的弟兄。而且，毒药猫在东窗事发后，经常是由她的父母或弟兄领回去——回到自己的娘家去。如下面这位黑虎人所说的：

那天晚上，他婆娘一睡就喊不醒。他就早有准备，洒了草木灰。半夜他听到响，起来看，一个猫脚印子从门槛上过。他就跟着去到那地方。那些毒药猫在那叽里呱啦，她们那种语言有些听不懂，很吓人。王子，人指甲衣服穿起，野鸡翎子插起。那男人吓得溜了回去。结果，半夜从天窗上，先一个人脚杆甩下来，一下，又有一个人手杆甩下来。他把它藏了，假装睡觉。后来他婆娘也回来，打个滚又变成人。到了那天，他婆娘的爸爸妈妈来了，他招待他们坐在那烤火。那男子就从床底下把人的手杆、脚杆拿出来。“你们看你们女儿干的安逸，昨天从天窗甩下来的人手杆、脚杆，你们看咋办？”她的父母就说：“要她改。”怎么改呢？要她到九条大河去洗，把她洗干净，所有的毒都洗完。这婆娘就被她父母逼到大河去洗，已洗了八条河了。最后一条时，天上就喊下了：“那姑娘不要洗了，洗不得了，再洗毒药猫要断根。”好像她有代表性一样，断根了，人间的瘟疫流行，人更不得安全。

在此所谓毒药猫之“毒”，似乎又是一种具体的毒药，其毒性或污染性可以借河水洗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故事都是说“无毒不成寨”：一方面解释为何到现在还有毒药猫，只是比从前少很多；一方面又

说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瘟疫，一个寨子中有毒药猫存在是必要的。

与毒药猫有关的是会从指甲放毒的女人。事实上，毒药猫与“从指甲放毒的女人”之间的区分相当模糊。有人认为，毒药猫有两种：一种从指甲放毒，一种专变动物害人。因为指甲上放毒的人是借由食物传毒，而烹煮食物又是女人的事，所以人们都认为这种放毒的“毒人”全是女人。再者，变动物的毒药猫多是年轻的女人，许多本地人说，通常还是些漂亮的女子。相反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指甲上放毒的是老年女性。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当毒药猫年老时，她们的毒就逐渐消退，到后来就只剩指甲里的一点毒了。

五、女性与猫：区分的破坏者

与“毒药猫”类似的“毒女故事”，在人类社会中也并不少见。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经常认为部分女人是“狐狸精”“女巫”或是“放蛊的女人”。研究“女巫”或“女人污染力”的学者，曾由各种角度指出这些偏见的社会根源。

毒药猫故事的叙事情节与含义，一方面与西方“女巫”传说所反映的社会与两性关系类似；另一方面，它又与某些社会（如中国与印度）妇女在宗教仪式、社会上具“污染力”的角色相关。然而，在欧洲或美国新英格兰，无论女巫是否作恶害人，或是否曾存在一个巫术传统，各种民间、政治与宗教团体的确曾对“女巫”施加暴力。¹¹在岷江上游地区，“毒药猫”只是村寨人群间的闲言闲语——没有任何关于女人巫术传统的证据¹²，群众也没有对她们施加严重的群体暴力。人类学者曾以生产方式、婚姻的社会功能与父系家族继嗣等，来解释印度与中国妇女在社会与宗教仪式上“污染力”的由来。¹³然而无论在生产方式、婚姻或家族方面，岷江上游的羌族（与部分藏族）都有不同于中国内地和印度的相关社会背景。¹⁴虽然如此，“女巫”或“具污染力的女人”有一相同的背景值得注意。无论是由于追求宗教的纯净或家族的纯净，女人都被视为外来者与潜在的污染者。因此在一个社会发生骚乱，如瘟疫、不明的死亡、外来挫折与群体内部纠纷之时，女人常成为代罪羔羊，以克服恐惧与凝聚群体。

人们对不明瘟疫与死亡的恐惧，女人对社会的“污染”，以部分人作为群体之“代罪羔羊”等等——在西方神话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中都有些探讨。法国学者基拉尔曾由神话研究提出一个“代罪羔羊”理论，以

解释人类社会中的暴力与宗教仪式起源。他认为“暴力”以及用“代罪羔羊”遏止暴力，这是人类社会的一项特质，也是许多宗教与牺牲仪式的根源。这样的观点首先见于其1972年之著作《暴力与圣祭》（*La Violence et le sacré*）。他指出，在一社会各亲近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由于彼此相似而破坏了重要的区分，造成人与人之间或诸人群之间的紧张、冲突与暴力，以暴易暴造成社会冲突无法遏止。人们解决此社会紧张之途，通常便是集体施暴于一“代罪羔羊”，如此社会群体的和谐与团结可得到保障。许多人类社会的神话与仪式，便是反映或重复这起始的“杀戮代罪羔羊事件”。¹⁵

“亲近群体间的敌意与猜疑”此一主题，也曾被英国历史学者布里格斯（Robin Briggs）用来诠释欧洲中世纪末“猎女巫”的历史。在这本社会史经典著作中，作者一反简单的经济、宗教、政治等背景解释，而指出邻里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敌意与猜忌，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挫折、恐惧与不安，才是“猎女巫”的主要背景。¹⁶简单地说，所谓“女巫”是被她们的邻人检举密告而成为被怪罪的目标，也是由于其邻人的证词而使其入罪。关于亲近群体间的敌意与由此产生的社会区分，以及破坏此社会区分者被认为是有毒的，这一类的探讨更常见于社会学或人类学著作之中。¹⁷许多研究都指出，女人，或由于其边缘的社会角色，或由于其破坏重要的社会区分（家内的与家外的），常被视为污染的、有毒的，因而被怀疑与一些灾难与不幸有关。

由以上有关“毒药猫”的口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叙事中的一些主题——如人睡着后灵魂出去作恶，如毒药猫在夜间乘橱柜飞行，如集体宴聚吃人肉，如毒药猫多为女人——都与欧美女巫传说有相似的地方。这印证着前述历史学者布里格斯的卓见：世界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女巫的神话信仰，此反映着人类社会中某种普遍特质，一种解决邻里人群间紧张与冲突之道。¹⁸然而，毒药猫故事内涵也有许多与欧美女巫传说不同之处，而这些，只有从当地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得到解读。

毒药猫传说中受害者的不幸遭遇，显示整个故事产生的主要背景之一是某种社会的扰攘不安，或因此带来的恐惧。某种无法预期、解释，然而又经常发生的骚动不安，如流行疾疫与莫名的食物中毒、山中突来的怪风或落石，或无法解释的失足落崖，或人们突然受到动物（特别是家牛）的袭击。岷江上游，我曾在前面介绍过，是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地区。在这儿，山中突来的暴风雪，险峭的山路，可能侵袭人类的老熊、豹子与野猪，野性发作的家牛，有毒的野菜、菌子与水源和外地

传来的瘟疫，等等，都可能造成村寨居民的意外伤亡。然而，由于他们垂直利用山间各种资源的混合经济，使得他们不得不时时接触这些危险。毒药猫故事一方面被用来解释这些不幸的根源，一方面借着述说如何“整”毒药猫，来诠释、解除或期望解除这些不幸。女人在这些传说中，或在人们想象的事件中，则成为“代罪羔羊”。

由村寨居民的口述可知，他们认为毒药猫与村寨中的女性有密切关系。在传承上，毒药猫由母亲传给女儿。毒药猫的训练是在熬盘上、火塘或灶边。她的夜间飞行工具是灶边的橱柜。毒药猫又与灶神同一国，或说灶神是毒药猫的祖先。这些女性的日常工作场域与用具，以及与女性有关的神或神性象征，都显示毒药猫与女性的密切关系。再者，一般人皆认为毒药猫大多年轻貌美，特别是能变动物的毒药猫。有些人指出，毒药猫女子的眼睛特别迷人，有时她们能通过眼睛放毒。年岁渐老，就只能从指甲放毒。显然毒药猫的“毒性”与其女性特质，或她对男性的性吸引力成正比。因此，毒药猫传说与相关信仰习俗的社会意义，与“女人”在村寨社会中的地位及因此衍生的隐喻，都有密切的关系。

女人在村寨中的地位及在村寨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隐喻，简单地说便是在以男性家族为主的村寨中，媳妇或将为他人媳妇者都是“外人”；她们不但是外人，而且对父系家族的男性成员而言，也是最亲近的“外人”。有些人在讲述亲身经历的毒药猫事件时，常强调这些女子是由外面嫁来的。如以下这位赤不苏人所说：

一个寨子有时不只一个毒药猫。那些外村来的女子，我们本寨的一般来说不结亲，一般都是外村来的。一个寨可能原来就是一个血缘，毒药猫都是从其他寨子来的。

女人一方面是家中的一分子或家中的边缘人，另一方面她们也是家内潜在的敌人——就像是火神与灶神一样。在本地传说中，灶神经常向天神传话告密；女人也常将家中的事告诉她的弟兄，也就是对父系家族成员而言的“舅舅”。事实上，一句羌族地区的俗谚——“天上的雷公，地上的舅舅”——也将舅舅比为具威权的天神。舅舅在羌族地区，如前所言，是与父系家族力量相制衡的一股力量。妇女经常引进其弟兄的力量，来干涉儿女的管教、嫁娶与分产等问题。当地人的说法是，舅舅在这些方面有无上的权威。因此在家中大事的决策上，父权与舅权时有冲突。如此，女人不但是外来者，而且她们是引进“舅权”的外来者。在各种毒药猫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种关系。譬如，人们相信毒药猫连自

己的儿子都要加害，甚至专挑自己的儿子以供其他毒药猫飨宴之用，但决不害自己的弟兄。在一些流传普遍的故事中，最后被揭穿的毒药猫，会被她的父母或弟兄领回娘家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他们认为妻子与媳妇永远站在她们娘家弟兄的一方，而她们的娘家弟兄——儿子或孙子的舅舅——永远争着操纵他们的外甥。诉说毒药猫如何害自己的儿子，反映的是一个人站在父系家族观点上，对舅权与姻亲的敌意与疑虑。而舅舅与姻亲通常属于同一沟中的其他家族，或邻近上游沟中的家族。

在“毒药猫”叙事中，这些女人与动物的关系，特别是她们与猫的关系，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各种羌语方言中，“毒药猫”的发音大约是“du”或“der”，原意是“毒人”。但所有的人在说相关故事时，都以汉语称此为“毒药猫”，甚至许多人不晓得“毒药猫”在乡谈话（羌语）中要如何说。在毒药猫故事中，女人最常变的动物就是猫和牛。羌族与邻近藏族在日常生活中与动物有紧密的关系。其中，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是两个被区分的范畴——家内的与外面的、温驯的与野蛮的。然而，“猫”在各方面都是这种“区分”的破坏者。无论是家猫或野猫（豹猫），它们都住在村寨中或附近，伺机偷食家里养的鸡。而且，猫在人类驯养动物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被人类驯养的主要是“群栖性动物”，而猫则是人类驯养动物中极罕见的非群栖性动物。¹⁹它们与人类之“家”的关系也若即若离。²⁰由猫的非群栖属性以及它们与人类之“家”的疏离关系，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猫从来没有被人类“驯养”过——它们（家猫）只是与人们生活在同一领域空间之中。

无论如何，猫打破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间的区分，就如女人打破本地人与外地人间的区分一样。因此，猫常被认为是“毒药猫”化身的动物，女人则被认为是毒药猫的本体。²¹无论是女人或猫，在人们心目中她（他）们一方面是家内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她（他）们又都不完全属于这个家，或是家中潜藏的破坏者。特别是，猫在夜间活动，猫眼被认为有特别的魔力，猫与家若即若离的关系，猫个性的阴柔，都使得它更符合社会赋予“有潜在危险性的女人”的象征含义。或也因此，在欧洲的女巫传闻与信仰中，猫也常与女巫有密切的关联。猫与女人在本地人心目中这种“既非内人，亦非外人”的性质，也是如基拉尔所称，被当作“代罪羔羊”者的社会特质之一。²²

六、“内部毒药猫”与“外在毒药猫”

村寨民众认为，毒药猫并不只是一个一个的有毒女人，她们又属于一个邪恶的群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故事中的毒药猫群体在一起定期开会、欢宴，并决定下一个受害者。研究欧洲女巫的学者们也曾注意到，在民间信仰里“女巫们的夜间聚会”（*sabbat*）是一个重要主题；在调查与审判女巫的过程中，此事被再三询问。²³对于“女巫们的夜间聚会”，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认为这是农村巫师（*benandanti*）祈丰收祭仪被曲解而成；贝格斯则认为这是一种反丰收仪式的想象。²⁴由他们所举出的女巫告解供词中可以看出，作物收成（以及农村中的贫富对立）的确是个重要主题。²⁵然而，在羌族的毒药猫传说中却没有这些主题。因为农业在他们多元经济生态中并没有如此绝对的重要性，而且村寨中也没有明显的贫富之分。因此我认为，女巫告解词、传说或毒药猫神话传说中的“夜间聚会”，其文本细节固然反映各个社会或时代的特质。然而“邪恶的女人在夜间聚集”此一主题，同时出现在欧美之“女巫”与羌族之“毒药猫”传说中，此反映的应是更普遍的人类社会心态——也就是人们对各种敌对的邪恶势力或外在人群的恐惧。

布里格斯对“女巫”的诠释值得我们重视。他认为，邻里关系密切的农村社会，是许多女巫传说产生的主要背景；各种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使得邻人彼此敌对、猜疑与监视，也使得他们共同推出作为代罪羔羊的“女巫”。由羌族的自然生态与社会背景，我们可以了解此种邻近人群间的敌意与猜忌如何产生，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妇女被怀疑、怪罪而成为所有灾难与不幸的代罪羔羊。然而，毒药猫或女巫“群体”在夜间的聚会以及聚会中的恐怖活动，显示出“毒药猫”也是一股强大邪恶、污秽势力的代表。因此借着打击“毒药猫”，乡民所欲消除的恐惧不安，不只是收成不好或人畜的疫疾伤亡，更是外在人群与外在世界可能带来的污染、毒化与伤害。

在岷江上游村寨民众心里或潜意识中，“毒药猫群体”可能代表许多不同层次的“外人”——舅舅群体（其他家族）、邻村的人以及“蛮子”。而本地人狭隘的我族认同，又使得这些不同层次的“外人”借着“蛮子”而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本寨其他家族可能有“蛮子”血统；邻村或邻沟有“蛮子”根根的人群更多；更远方，便是些野蛮程度不等的“蛮子”。我们可以称这些外在人群为村寨民众心目中的“外在毒药猫”。

这一层层“外在毒药猫”与村寨内“毒药猫”的关联，以及各层次“外在毒药猫”之间的关联，都是相当明显的。在前面我曾提及村寨民众对“族”的概念——以“族”广泛指称我们所谓的地域群体（邻人、乡

亲)、血缘群体(家庭、家族)、拟血缘群体(民族)。在如此广泛的“族”的概念下,家族、同寨的人、沟中的人都是一层层的“我族”;另一方面,其他家族、邻寨的人、邻沟的人,也是一层层的“外族”。因此,虽然女人都是由邻近家族、邻寨、邻沟嫁来,但在村寨民众心目中或潜意之中,她们多少都是“外族”。

前面我曾提及,村寨居民所谓“根根干净”(血缘纯净)或“不乱搞性关系”的观念,这也可以说明“内在毒药猫”与“外在毒药猫”之间的密切关系。保持家族“根根”的洁净,是本地人婚姻关系中的重要考虑因素。由“母舅”来吹嘘这个家族的根根好,也显示民众认为“不好的根根”可能由女方带来。“根根不好的那家”,在许多民众的心目中便是指有“蛮子”与汉人的根根、有麻风病根根,或有毒药猫根根的家庭。当地一句人们相互咒骂的话,“蛮娘汉老子”,也透露了民众对村寨内各家族“母系”可能有“蛮子根根”的怀疑。虽然“汉老子”——父亲是汉人——也是骂人的话,但人们一般不太在乎承认或宣称祖先来自汉区。骂别人有“蛮娘”,则严重得多,这是由于他们普遍认为一切污秽的、淫乱的、有毒的,都来自上游的“蛮子”。因此在谈亲时强调“根根干净”,也说明了“外来女人”与“外在蛮子”之间的关联。

女人的不洁与污染力,不只是因为他们可能带来“蛮子”根子,她们对男人的性吸引力也可能为本地带来污染——乱搞性关系而使本地“蛮化”。这也说明为何在村寨民众心中,毒药猫经常是年轻貌美的妇女,她们到了老年时毒性也随之消退。如一位黑虎沟的老人所言:

以前不敢说,她听了很不高兴,但群众都知道她是。通常情况下还是长得很漂亮,老了就不那么厉害了,就不那么猖狂了。二十几、三十最猖狂。现在还有人忌讳,但不能说,没得证据嘛。晚上很多人还是不敢走夜路。

在前面我也曾提及,“讲究男女之防”与“乱搞性关系”是民众主观建构的“尔玛”与“蛮子”之区分。毒药猫故事中常出现的场景,一群男女毒药猫一起喝酒、宴乐、吃人肉。在许多村寨居民心目中,上游“蛮子”也经常男女杂处喝酒、宴乐;“尔玛”则是女人不能与男人们一起喝酒,跳锅庄舞都要男女分开来跳。这些都显示毒药猫影射着人们对外在“蛮子”的恐惧与仇恨。

民众以“污染的”或“有毒的”,来表达他们对外界人群的恐惧与敌意。这外界人群或“外族”,包括有可能被沾染毒性的邻人直到远方的“蛮

子”。因此他们担心邻近家族或邻寨的女人可能带有“蛮子”血统，他们也以“母亲或祖母是蛮子”来咒骂邻近的人。寨子里的人常悄悄警告我，到了上面的寨子或上游地区去不要喝他们的水，或说不能吃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水和食物有毒”。甚至在同一寨内，人们也常闲言闲语——哪一家或哪一地区的水“很硬”，喝了要胀肚子。

总之，使女人普遍蒙上“不洁”之名的，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我族”认同；一种强调血统与道德洁净的，以洁净与不洁区分我群与他群的家族、村寨与尔玛认同。由于女人是“最亲近的外人”，她们打破村寨人群与外界的区分，打破洁与不洁间的区分，因而被视为是不洁、危险与有毒的。她们是群体内部的、被经常谈论的毒药猫；尽管真正被指控或闲言为毒药猫的只是寨中一两位女子。无论如何，谈论这些故事的人，内心深处潜伏着对一层层外在异族世界的恐惧与敌意——由邻近家族、邻村、邻沟直到远方的“蛮子”。

指控或闲言村寨中少数妇女为“异类”，是以她们作为所有村寨妇女及其隐喻的“代罪羔羊”，以避免将所有村寨妇女视为“毒物”。但在村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一般妇女也加入闲言、咒骂毒药猫的行列。她们不明白，事实上她们也是毒药猫的隐喻之一，参与咒骂毒药猫更注定了她们在村寨中的边缘地位。无论如何，咒骂毒药猫以及通过毒药猫层层“他者”指涉，可以强化一个村寨人群的认同（包括一般妇女）。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人们讨厌、怨恨毒药猫，但又认为村寨中没有毒药猫也不行。

七、无毒不成寨

在前面那位黑虎羌族所讲的毒药猫故事中，最后天神阻止悔改的毒药猫完全洗去毒性，怕她“洗断了根”。类似的说法普遍存在于毒药猫传说中。相信毒药猫的村寨百姓，也普遍认为“无毒不成寨”——村里没有毒药猫也不好。为何如此？他们说不出道理来，或有不同的说法。如一位北川青片老人说：

我们说，无毒不成寨；每个都有。没毒药猫，寨子里的水都要闹人，水都不能吃。怕她，但没有她就不好。

讲完毒药猫改过自新的故事后，上述那位黑虎沟老人解释道：

有一种瘟神——鬼，只有毒药猫镇压他。一种魔鬼害人，毒药猫没了，害人的瘟神与魔鬼就要猖狂。所以没有毒药猫不得行。就洗了八条河，就没洗了。听说以前毒药猫很多，就那一次洗了后，现在少了，但是还有。毒药猫也是一种毒，无毒不成寨，以毒攻毒，一个克一个。

根据某些村寨居民的观点，似乎不能没有毒药猫是由于他们对更严重的魔鬼、毒或瘟疫的畏惧。如果人们意识中对毒药猫的恐惧，来自他们对邻近家族或邻近村寨的敌意，那么这些比毒药猫更严重的毒或瘟疫，应代表着村寨居民对于更远方的、更野蛮的、更污秽的人群的畏惧。“一截骂一截”的认同背景是造成“无毒不成寨”这种信念的基础。在此种孤立的村寨生活中，与外村寨的人通婚，特别是娶上游生活较落后村寨的女子，对本寨而言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期望——期望因为亲家村寨与更上游村寨人群间的关系，而使本村寨不受上游“蛮子”侵扰。毒药猫所代表的“外人”或“外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毒性轻微且可被控制或应付的。接受这些“毒”，可以避免或防止更严重而无法控制的瘟疫与魔鬼。另一方面，毒药猫的存在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此“外人”之闲言闲语，可强化村寨居民（包括非毒药猫的女人）的凝聚。这种必要的被人们创造、想象的“内忧”，存在于各种范围的“认同”群体之中。

由此两层意义来看，“无毒不成寨”的含义几乎便是“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只是凝聚村寨成员所赖的“内忧”与“外患”，与“蛮子”的野蛮和污秽一样，它们未必是主观想象，也未必是客观事实。对于“本寨”或“本国”的认同，使得一个人群经常以神话与“历史”强化本群体与外在世界人群间的区分，以及本群体内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间的区分。这些以神话或“历史”所强化的区分，同时也导引村寨人群的文化展演和他们对“外人”及本群内“毒药猫”的敌对行为。于是，体现人群区分的文化展演与敌对行为成为客观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正如在当前国际政治中，有些政治人物经常提醒其民众国家所面临的“内忧”与“外患”，此“内忧”与“外患”经常是一种集体想象。然而，当敌意通过各种文化演示与集体行为影响双方的互动时，内忧、外患也渐成为真实。借此，国家得以团结其主体成员，此即“无内忧外患国恒亡”以及“无毒不成寨”的内在意义。

羌族“毒药猫”的例子说明，人们对许多外界“异人群”的敌意，常反射到他们对本群体内或边缘相当亲近的“他者”身上。相反地，人们对于本群体内或群体边缘相当亲近或近似的“他者”之疑虑，也常强化他们对于外界相关“异人群”的“异类感”与疑虑。如此，在主要群体内或边缘的弱势“他者”，特别容易成为该群体成员化解外界强势“他者”所造成的压

力与恐惧的“代罪羔羊”。“内部毒药猫”与“外在毒药猫”相生相承，这是人类社会凝聚认同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许多族群矛盾与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现象可以在世界许多族群冲突的例子中得到印证。这可说是人类社会的严重不幸，也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八、经验、历史与神话

本章所举的“毒药猫”口述资料，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有些似乎可归类为“神话”，另一些则是人们认为村寨中过去曾发生的“历史”，或某人对亲历事件的“经验”。现在经常使用汉语的羌族，他们对神话、历史与经验的概念区分与我们无别。对于神话传说，他们常说那是“条”，“条”在当地四川方言中指随便谈谈的话，真假不必当真。“历史”，他们认为这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如果有人怀疑，他们会认真地争辩说：“那不是条哟！”至于个人“经验”，他们则更清楚地说明，这是亲身经历的。“神话”“历史”与“经验”各有其特色，然而此三者又非截然分开，在口述中它们常交错出现并相互影响。以下我借着有关“毒药猫”的一些口述资料，来说明一些可能被我们归类为“神话”“历史”或“经验”之叙事（narratives）的一些特质，并探讨它们如何形成与互相影响，以及在经由各种媒介的传述中，它们如何成为由个人到社会、由情感到结构的中间桥梁。

被归为第一类的毒药猫故事，我们称之为“神话”。神话作为一种学术用语，它的定义仍有分歧。我认为，“神话”的含义必须置于它与其他社会记忆范畴——如“历史”与“经验”——的相互关系背景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了解。当人们在述说这一类的“神话”故事时，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神话传说——所谓的“条”。没有人将之当作真正发生过的事。在故事中，毒药猫或乘橱柜飞行，或由袋中摸出动物毛变成动物，或聚在一起宴乐吃人；毒药猫王子身穿人指甲做的衣服，头插野鸡翎；毒药猫在九条大河洗掉毒性等等。说故事的人回忆他听过的故事情节与伴随的虚构图像，并插入自己的想象与描述；故事中的各种场景与图像，如毒药猫的聚会、人的残肢、母亲在熬盘上教女儿变动物等等，成为故事的主轴图像。这些故事的叙事中没有确定的时间与地点。作为主轴的图像，而非时间、空间，控制着故事情节的记忆与传播。在讲述中，讲述者随时加入自己的意见与评论，并将自己当作事情发生时的目击者，详细描述细节；或将自己作为当事者，以第一人称代表故事中的人物发言。因为这只是讲故事，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些虚拟与添饰。这一

类故事不多，但传播的范围很广、很普遍。变动物的毒药猫，是这类故事的主角。

第二类毒药猫叙事，是村民们所相信的“过去曾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心目中的“历史”，一种以口述传递的本土历史。这类故事的讲述，通常由“我们寨子里有一个人”或“某某寨有一个人”开始。然后便是这些人遇到一些奇怪或不幸的事之经过。如一位黑水双溜索的人所说：

毒药猫的传说有，我们喊“毒射甚”。他们摆，女孩子会变成猫还是什么的。希尔一个人是裁缝，有一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有。后来又有人声音，是谁都听得出来。后来他就把门打开了。毒药猫说：“今天一定要把他吃了。”就把他拖出去到路边。后来另一户人家出来解手，毒药猫才把他放了。后来那房子就甩在那了。

在这些作为“历史”的叙事中，有特定的人物与事件，或也有特定的地点与时间。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当地社会记忆中真实的人物（某寨某人或某有姓名的人），或线性时间上的某一点，或作为过去遗存的现实存在之物，都被用来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如在上例中，人们经验中熟悉的地名（希尔）与职业（裁缝），被用来特殊化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使听者觉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也使他们相信此事是真实存在的。最后，现在仍存在的废弃房子，被用来进一步强调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这一类作为“历史”的故事，它的社会功能在于以人们相信的“真实过去”，来合理化一些本土知识。叙事中特定的人物、地点或物，是使整个述说“真实”的关键；相反地，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却无法得到证实。因此，只要它们被当作“过去真正发生的事”，述说者便需以特定人物、地点或事物来维系与传递此社会记忆。在述说中，旁观者与当事者的立场较少，或不见于叙述之中，因为这种主观见解可能破坏叙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一类“历史”中的主角，主要也是变动物的毒药猫。

第三类叙事，是述说者个人的经验与记忆。如下面北川小坝人的个人经验回忆，他说：

以前毒药猫的传说，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个小弟弟，小时候我七八岁，常背着他玩。一个老婆婆拉他的手，逗他玩。回来就不好了，当时是急惊风，现在说就是肺炎。后来就死了，人家说就是那老太婆害死

的。听说她一个竹筒筒里什么毛都有，她摸到什么就变什么，她害有仇的或是最亲近的。

一位茂县赤不苏中年人也曾告诉我一段他的经验。

我一个嬢嬢，她一个女婿去帮忙。晚上回来遇到一个牛，就跟那牛扭来扭去打，把那牛甩到坎子下去了。他跑回来，后来几个舅舅跑去看，牛没看到，地上有扭打的印子。回来那嬢嬢就病了。送到成都去医都没医好，就死了。我妹妹也着过一次。肚子胀，吼。我妈妈去向那毒药猫说：娃儿肚子胀，啥子原因呢？你能不能给她想个办法。去跟她打招呼，后来才好。

以上两人所陈述的过去经验，都难以说明真与毒药猫有关。事实上，是社会流传的“神话”与大家所相信的“史实”，为人们经历外在世界提供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夜间奇怪的声音、家畜的异常行为，或人们遭受疾病或死亡，都在此文化心理结构中得到解释。所谓“经验”，事实上是通过文化所获得，并经过文化包装的个人对外界之印象与记忆。²⁶它们作为一种个人记忆，由于在各种公共场合中被讲述，而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它们更强化了当地与毒死猫有关的文化心理结构。此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 C. Bartlett）所称之为“心理构图”（schema）。²⁷“区分”与“认同”是此“心理构图”的核心。在这些叙事中，人物、时间、地点与事件（人得病或死亡）或许都是真实的，人们只是建构（或虚构）事件与毒药猫之间的关系。在讲述中，讲述者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描述，讲述者本身的存在是故事真实性与说服力的主轴。目前许多人认为“女人会变成动物害人”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多数人在讲这一类的自身经验时，所说的都是“指甲放毒的老女人”。

对于神话、历史与个人之经验记忆，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都十分感兴趣。历史学者常在口述“神话”中，探索某些历史事实或社会现实的残留²⁸，或由个人口述记忆中重建近代历史与社会²⁹。人类学者或文化研究学者，也经常探讨神话中是否含有历史真实，或神话是否由一个真实的过去事件所引发³⁰；争论历史事实是否通过神话而形成一种影响历史发展的结构，或是文化结构创造神话与历史事实³¹；或与西方接触的历史经验，如何在土著社会中通过神话、历史等不同社会意识模式与文类而再现³²。在这些研究与争论中，学者们常探讨、定义哪些是神话，哪些

是历史，哪些是个人经验。然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神话、“历史”与个人经验记忆，都是一些经由口述或文字传递的社会记忆。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情境中被流传的“文本”，在一个社会里它们呈动态存在，通过语言、文字的文化符号含义以及其特定的叙事结构，影响人们的个人经验建构，强化相关的社会情境与此社会情境中人们的集体行为，因而造成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如此新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缔造新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通过社会化的书写、讲述也影响神话、历史叙事中语言文字符号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

譬如在有关毒药猫的叙事中，邻近家族、村寨间的冲突与对立，婚姻产生的父权与舅权冲突，对外在“蛮子”世界的敌意与仇恨，以及对疾疫与意外死亡的恐惧等等，都是产生这些神话、历史与个人经验记忆“文本”（text）的“情境”（context）。在因疾疫与意外死亡所造成的社会骚乱中，外村寨嫁来的少数女人被异类化而成为代罪羔羊，背负所有疾病与死亡的罪，然后在叙事中被杀死或被赶回娘家。在讲述说这些神话、“历史”或个人经验时，通过如“猫”“牛”“女人”“吃人肉”等语词在本地社会文化中的符号含义，通过叙事中的图像、场景的象征意义，“文本”通过各种叙事模式将语言化为更深沉的文化符号，影响人们的历史记忆建构与个人对外界事物的经验。如此，人们企图消解的不只是对一个疾疫或死亡事件的恐惧，也希望借此疏解对一层层外在敌对势力的恐惧。同时在此“文本”叙事中，相关“情境”得到强化。“情境”影响个人经验建构与此社会情境中人们的集体行为，如他们与邻近家族、邻寨、邻沟人群的摩擦冲突事件，如他们联合邻近各寨抵抗上游“蛮子”进犯或惩其罪行的事件。

许多羌族朋友都曾对我说起他们自小受毒药猫故事折磨的经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坐在火塘边听毒药猫及其他故事，这是村寨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毒药猫”让小孩子不敢出去上厕所，长大后不敢走夜路。然而，对我，一个村寨外的听故事者来说，这些故事并不特别恐怖。因此这也让我相信，恐怖并非完全来自故事情节，而是来自故事情节与当地社会情境的结合。“文本”之意义，在于“文本”与“情境”的相互诠释，文本产生于情境中（texts in context），情境也在文本中浮现（context in texts）。若将文本视为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情境则为社会现实“本相”（reality），此正如布迪厄所称的“本相的外在表征”（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以及“表征下的现实本相”（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³³。

一个人在此“情境”中成长，不断从中得到社会文化所赋予之各种身份，并认知各种社会区分。他们逐渐学习分辨不同层次的“我们”与“他们”；他们是异类、不洁的、危险的、有毒的。于是，无论是女人、动物、疾病、不洁，在语言中都逐渐被赋予更深层的文化含义。对一个成年男子而言，所有对外界的敌意与恐惧、父权与舅权的冲突、强调洁净所致的性压抑，都投射在村寨成员的疾疫与意外死亡所造成的骚乱之上，而外村寨来的少数女人则成为代罪羔羊。个人在此文化心理结构中，经历到周遭发生的诡异或不幸事件，也在此心理结构中将之合理化而成为个人的经验与记忆。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也就是其戏剧化情节符合内在社会文化结构（或神话模式）的例子，人、物、时、地被特化且被广泛传播，成为大家相信的“历史”。在诉说这些个人的“经验”，或村寨中流传的“历史”，或有关毒药猫的“神话”时，他们疏解各种的社会紧张，凝聚村寨或家族认同，并再度强化各层次的社会区分。一个人在成长中，由听故事者渐成为说故事者；“情境”也因此得以传递下去。

九、“现在毒药猫少多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有很大的社会、政治变迁，也因此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毒药猫”叙事所依恃的“情境”。在民族识别、分类使得“尔玛”成为羌族之后，由于知道过去邻近的“蛮子”与“汉人”其实都是羌族，“大家原来是一个民族”，邻近村寨与各沟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因此减缓了许多。过去较远的“蛮子”，也成为今之“藏族”，由于新的历史知识告诉他们，藏族也是古羌族的后裔，因此他们认为“藏族”也不必是可怕的异类。新的生活经验是，在国家力量所维系的秩序下，所有的族群歧视都被禁止；在新的资源分配、分享体系下，各沟各寨之间也不再严重的武装暴力冲突。在州政府经常举办的各种庆典活动中，羌族与藏族更一起展现本地少数民族风情。在社会治安上，出外做买卖，除了偶尔遇上一些小偷小劫外，基本上安全无虞。更由于交通开发，人们与外界的联系更广，改变了孤立的“尔玛”对外界的恐惧。由于有较多外出工作及受教育的机会，女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改善。从前封闭的嫁娶模式，除了高山深沟村寨外，一般都有相当改变。疾病方面如今在卫生与医疗知识宣导下，人们知道那些流行疾疫与更普遍的“胀肚子”是鼠疫、结核症、热病等等，也知道可以通过不食生水、避免接触病人与消灭蚊蝇等方法来防治。这些社会情境的改变，影响“毒药猫”的各种叙事

文本。简单地说，人们普遍觉得，过去毒药猫多，现在则是少了；或者说，过去毒药猫比较凶，现在则不那么厉害。

相关的民族、历史与科学新知，偶尔仍被个人用以强化原来的社会文化结构，但大多数人会借此重新塑造个人的经验与记忆。人们不太争论“神话”，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讲述中可以随时“添醋加油”或赋予新的诠释。相反地，他们争论、讨论共同的“经验记忆”与“历史”，在这过程中“过去的真实性”卷入世代、知识与权势的阶序关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历史”被重新诠释，而“神话”也因其构成的人、物与事等词汇的文化意涵被修正而有新的意义。或者，神话因失去其社会情境而逐渐失去其流动力。

但这不是说，新知识使得人们不再以“毒药猫”为代罪羔羊，来消除社会紧张与压力。新的“理性”并没有完全让人们从毒药猫故事所反映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中醒觉。只是，人们在另一种认同典范下寻找新的“代罪羔羊”。一个羌族知识分子曾对我说：“毒药猫大部分都是女的，这是民族内部的一种分裂。”这句话的含义是，既然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民族，就不应该如此歧视内部的个别成员或次群体。原来根植于村寨认同结构的有毒的、污染的、不洁的、野蛮的“毒药猫”概念，被置于新的民族分类架构之中。同时，在各沟之中，虽然目前其居民都自称羌族，但各家族、村寨之间的资源共享、分配关系并未改变，家族、村寨与邻近各沟之间仍不断有些小冲突摩擦——这说明了为何人们认为，虽然少了很多，但至今毒药猫还没有断根。

毒药猫不仅在羌族中不容易“断根”，在所谓的“文明世界”中也从来没有“断根”过。从更一般性的意义来说，“毒药猫故事”不止广布于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间，它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人群间；无论是在土著，或是现代都市人之间。这便是为何在许多社会中，女人、弱势群体与社会边缘人常被视为有毒的、污染的、潜在的叛徒或破坏者。在社会动荡骚乱之时，他们常成为代罪羔羊。这也说明了人类似乎一直生活在群体各自建构的“村寨”之中。孤立（区分与边界）让我们畏惧外在世界，我们也共同建构或想象内部边缘的毒药猫（内忧）或外在的毒药猫（外患）来孤立自己。当外面的毒药猫对一个群体造成威胁与恐慌时，内部或邻近的毒药猫将成为代罪羔羊；与内部毒药猫间持续的、经常的敌对，也投射在对外界敌人的敌意与敌对行为上。这些“区分”与敌对行为，相对地也引起被区分者与受敌对者的人群“区分”概念与相应的行为。于是，在各自强调区分的文化心理下，这些内忧、外患也成为客观现实与历史

事实。因此，“无毒不成寨”的一般性社会含义便是：一个社会人群赖其边缘的维持而凝聚，而此边缘的形成及其本质与变迁，永远摆荡在历史想象与历史事实之间。

- 1 前述黎光明以生命为此作了另一见证。1946年他在靖化（金川）县长任内，设计铲除盘据当地的袍哥首领杜铁樵。当晚袍哥党羽便包围县府，黎被乱刀杀害并曝尸数日。事见阿坝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第2604—2605页。
- 2 人们认为女人“不洁”，其理由是多样性的，在不同地区，女人的不洁或有不同的解释。譬如，在接近城镇较汉化的地区，女人的不洁经常与生产和经血联系在一起；当地女人在各种日常生活与祭祀仪式上的禁忌，与川西汉人之习俗没有太大差别。有关汉人社会中女人——父系家族中的外来者与潜在破坏者——与不洁、污染、鬼的关联，学者们已有很好的研究。见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69-291; Robert P. Weller, “Bandits, Beggars, and Ghosts: The Failure of State Control Over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2 (1985), pp. 46-61.
- 3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65;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 6 对“mimetic desire”与“monstrous double”，以及布迪厄所称的“distinction”或埃利亚斯所称的“established”和“outsiders”，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说明。中古以来的中国士大夫传统，强调文人生活品味与对文人用具的雅玩。这是由于在宋代及此后，新兴商业家族跻身城市上层社会之中。他们盖豪宅、购置典雅家具，甚至玩古董字画，以完全模仿传统的士大夫生活，此即“mimetic desire”。而士大夫（旧士族）对这些新暴发户、外来者或“monstrous double”的排斥，便表现在玩弄、定义“品味”上。他们在著述中描述一些难以捉摸的生活品味，并传述一些笑话以嘲弄暴发户没有品味，或讥讽商人“污染”文人生活格调。借此，文人士大夫强化一个社会阶级难以穿透的“边缘”。
- 7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8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 9 我在田野中所听到的毒药猫故事，几乎都是关于女性毒药猫的。我只听说过一则有

关男性毒药猫的事，而这男性毒药猫是一外地来上门（入赘）的男子。

- 1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故事集》，出版地不详，1989，第484页。
- 11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6.
- 12 相反地，在当地男人中却存在一些传统的咒语、巫术，那便是端公与做索子的人。前者是羌族宗教信仰、生命祭仪的主事者，驱邪去灾除病的专家，以及神话、历史的讲述与诠释者；后者则是设陷阱并辅以巫术（如黑山法）捕猎的猎者。他们中都有些巫术与咒语师徒相传。
- 13 Nur Yalman, "On the Purity of Women in the Castes of Ceylon and Malab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93.1, 1963, pp. 25-58; 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69-291.
- 14 如人类学者曾指出，中国与印度的家庭组织、女人地位与财产继承之特色及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人群在此方面之不同，关键便是前者是以男人劳力为主的犁耕农业，后者是以女人劳力为主的锄耕农业。相关研究见E. Boserup,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70; Jack Goody,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在羌族与邻近行农业的藏族地区，虽农忙时男人也负担相当的农事，但基本上是女人管“粮食生产”的事；以此而言，印度与中国内地农业与相关社会特色与本地区有相当的差别。
- 15 在《替罪羊》（*Le Bouc émissaire*, 1982；英译书名*The Scapegoat*, 1986）一书及一篇长文中，基拉尔综合自己过去的看法，进一步以此解释人类社会的神话、宗教与相关仪式的起源。他举例分析这一类神话的共同特质：（1）社会的扰动；（2）某外来者常先被当作拯救者，然后成了代罪羔羊；（3）民众对之施以集体暴力；（4）外来英雄被杀或被逐回原地；（5）使之重生；（6）圆满的结局——他们成为神或神圣的祖先。基拉尔的理论曾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重视与讨论。本文中的“毒药猫神话”与基拉尔所论及的“代罪羔羊神话”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被视为代罪羔羊者的一些社会特质。然而，毒药猫从未被当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们之死也不是由于“集体暴力”；死后也没有重生，更没有被神化或祖先化。因此，我无法同意基拉尔以此探讨人类社会一般性宗教起源问题。以上相关著作，见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 Scapegoat*, trans. by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nerative Scapegoating" and "Discussion", in Robert G. Hamerton-Kelly ed.,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3-105, 106-148.
- 16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 17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 18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 3.
- 19 Roy Robinson, "Cat," in Ian L. Mason ed.,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p. 217.
- 20 许多人家都有养了多年的猫突然不告而别的经验。离家在外的“野猫”无论在都市、乡村也似乎都适应良好。近年来台湾到处都见到一些病态、落魄的“丧家之犬”，而我们从来见不到这样的“丧家之猫”。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猫原来与人类的“家”就是若即若离的。
- 21 另一个经常成为毒药猫化身的动物则是牛。羌族地区的家牛主要是牦牛、犏牛及少数黄牛。在一年大多时间里它们都被放养在大山里，只在春耕时几只较温驯的被牵下来耕田。由于牛群整年在山中自行觅食、生养，对抗豹、狼与熊，因此一般来说这些牛野性相当强，家牛野性发作触伤主人的事经常发生。因此，本地的牛也是一种打破驯养与野生、村寨内与村寨外区分的动物。
- 22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pp.269-273.
- 23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pp. 99-14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p.38-56.
- 24 Carlo Ginzburg, *The Night Battles*, pp. 22-2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 40.
- 25 Robin Briggs, *Witches & Neighbors*, pp.41-42.
- 26 F. C.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有关F. C. Bartlett等学者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以及集体记忆与人类社会认同的关系，请参考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85—91页。
- 27 Bartlett, *Remembering*, pp.199-200.
- 28 Joseph Miller ed., *The African Past Speaks*, Hamden, CT: Archon, 1980; Roy Willis, *A State in the Making: Myth,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Ufip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Irwin, *Liptako Speaks: History from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9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0 René Girard, "Generative Scapegoating" and "Discussion", in Robert G. Hamerton-Kelly ed.,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73-105, 106-148; Renato Rosalso, "Anthropological Commentary," in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1 Marshall D.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Gananath Obeyesekere,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2 Jonathan D. Hill, "Introduction: Myth and Histor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Terence Turner, "Ethnoethnohistory: Myth and History in Native South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Contact with Western Societ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pp. 235-281.
- 33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pp. 482-484.

历史篇

在第三章中，我介绍、分析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各层次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这些认同区分概念，目前不同地区、世代、性别之羌族民众对其认知有别；无论如何，“民族化”为本地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谓“民族化”，我是指近代“民族”概念下的民族分类与识别以及因此产生的民族自觉过程。在“民族化”之下，现在本地民众普遍知道自身为“羌族”，也大概知道其他还有哪些地方的人是“羌族”以及哪些人是“汉族”与“藏族”。过去模糊的、相对的“赤部”“尔玛”与“而”的概念，如今分别等于他们民族知识中的“藏族”“羌族”与“汉族”。而且，现在乡间民众常自我解嘲说，过去是因为知识封闭，不知道大家都是羌族，所以才会“一截骂一截”。所谓“知识”，也就是创造羌族与羌族认同的知识；它们主要是一种“民族历史知识”与“民族文化知识”。在以下的“历史篇”中，我将介绍这些民族历史知识，并说明造成此“历史”的历史过程。我也将介绍本土观点的“历史”，以及以上两者的合流——民族化下本土观点的“历史”。最后，由各种的“历史”与历史，我将说明当前“羌在汉藏之间”此族群特质的由来。

近十年来，在许多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历史”与人群认同间的关系都受到相当瞩目。在族群本质研究中，“历史”、社会记忆或人间一种共同起源想象，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认同的根本情感源头。¹在“国族主义”研究中，学者也注意到“历史”建构与“国族”意识间的关系。²在过去著作中，我也曾以社会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变迁，来说明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与工具性本质。以族群认同的根基性而言，我认为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感情产生自仿真同胞手足的同源情感；它的工具性便在于，此种“同源”记忆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与操弄之中，因而“起源”也被修饰、改变与遗忘，以应和环境变迁。³这说明为何在许多强化族群或民族认同的社会回忆活动中，人们经常在追溯、寻索、创造及争论“共同起源”。由这样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前文我对岷江上游村寨社会的介绍中，已涉及了一些“历史”问题——凝聚各村寨人群或村寨中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故事”，便是以“同胞手足”来强化根基情感的“历史”。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如阶级、族群与国族）之中；我们因此熟悉相关的正确“历史”，也常常经验到“历史事

实”如何被一再争论与重新书写。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然而，在与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相关的“历史”研究中，或在通过“历史”对人类社会认同的探讨中，“历史”都被理解为一种被选择、想象或虚构的社会记忆。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近年来常见于文化或社会史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社会记忆研究取向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及历史人类学之中。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是人们如何在“现在”中建构“过去”，也探索“过去”如何造成“现在”。⁴后一研究中的“过去”，不只是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以及因社会记忆之展演而重塑的，各个时代、社会阶层人群的历史经验、历史心性或历史文化结构。⁵

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传说”的界线究竟何在？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历史”的叙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神话”？⁶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意识，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方式？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⁷，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年来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与时间意识⁸，部分口述历史学者也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采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与叙事模式⁹，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何选择这些“边缘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借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

因此对于“羌族历史”的探索有多重意义。首先近代国族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民族”或“国族”概念以及相关的新学术工具。在此种新的民族概念与新学术之下，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建立中华民族此一国族概念；同时也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将传统中国四裔人群纳入此国族之内。在以下第五章中，我将介绍这个典范“羌族史”以及此“历史”的建构过程。当今羌族，便是由此“历史”得其民族生命。近年来，许多西方学界的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或说明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民族传统”的创造过程，或解

释在国族主义风潮下许多“民族”如何被建构¹⁰。在这一层次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羌族的例子也支持这些“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的观点。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说，晚清以来的“羌族”与“羌族历史”建构，只是两千多年来“华夏”不断建构其西方族群边缘过程的最新阶段，或许还不是最后阶段。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张，当西边原被称作羌的人群由于“失忆”而成为华夏之后，更西边的人群便被华夏称作羌。如此，华夏的羌人概念也就不断向西推移。到了汉代，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一狭长羌人地带——这便是汉晋时期的华夏西边族群边缘。¹¹在本书中，我延续上述研究，说明隋唐及此后“羌人地带”上的许多人群，如何被汉人重新归类为“番”或“夷”，因此造成“羌人地带”在唐代之后逐渐萎缩。20世纪上半叶，便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上，“番”被划分为藏族，“夷”被划分为彝族，而被认定为羌族的只有四川阿坝州东南与北川的部分人群。在第六章中，我将说明此一绵长的历史过程。由这一层次来说，前述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史研究者，对“民族”或“传统”的理解显然有不足之处；他们都忽略了当代“民族”与“传统”之形成，有其近代之前的历史与历史记忆背景。

最后，羌族也被自己所选择、创造与润饰的“历史”所塑造。他们有本土的“历史心性”，在第七章中，我将从这种本土“历史”中探索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此“另类历史”，也让我们可借以了解中国传统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接触民族概念与以汉文传递的历史知识之后，在“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的转化糅合下，羌族知识分子选择、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建立羌族认同。第八章将说明这个过程。

- 1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Harold R. Isaacs,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15-143.
- 2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1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174-20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7-50.
- 3 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第125—126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 4 M.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977.12, pp.278-292;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有关结合口述记忆、文本与展演研究，见Stuart H. Blackburn,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Dwight Fletcher Reynolds,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历史心性、相关文类与文本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夸耀、展演与攀附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分3本，2002年，第583—624页。
- 6 相关讨论见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 7 如法国历史学者Jacques Le Goff有关中古欧洲社会之心性及其变迁之历史研究。见其所著*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8 Renato Rosalzo, *Ilog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Janet Hoskins,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9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 11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羌”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忆。近代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先秦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较晚更丰富的史料记载，来建构由商代绵延至近代的“羌族史”。这样的“历史”说明了“羌族”的起源、分布与迁徙，以及更重要的，他们与中华民族下各民族间的关系。这样的“羌族史”，也就是我所称国族主义观点下的“典范历史”（master history）。然而，这些创作“羌族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受一些新西方思潮模塑之外，本身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与诠释者。以下，我先介绍典范的羌族史及其意义。而后，我将在近代国族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此“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种对于“近现代”的解构。

一、典范的羌族史

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但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通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根据这些典范的“羌族史”，羌族的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有“羌”，他们是商人的西方敌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¹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卜辞也记载，被俘的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作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²

由于“羌”与“姜”在文字上的相似，殷商之羌人又被认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之族有关。³在基于“神话学”的古华夏研究中，这一族群被认为出于传说中的姜姓“大岳”或炎帝神农氏（姜姓）；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也就是申、吕、齐、许等姜姓之国的统治家族。⁴如此，姜姓或羌人被认为是一古代民族集团，所谓“神农集团”或“姜炎集团”，他们

的文化特征是一种与羊有关的岳神信仰。学者们又认为，随着羌人的迁徙，羌人的岳神信仰也散布四方，这便是中国四方“五岳”之说的由来。⁵“姜炎集团”由西往东迁，与“黄帝集团”发生接触、争战，最后两族融合——这是许多研究早期“华夏”形成历史之学者的普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根据中国上古典籍《国语》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因此有些学者将炎帝与黄帝视为同一民族集团，即“炎黄”集团，与“风僊”和“苗蛮”集团相对。⁶另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始祖大禹，据记载他“生于西羌”，有些学者也因此及其他证据认为夏民族为羌人。⁷

周人与姜姓之族或羌人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姬姓周人的祖源为“姜嫄”；在周克商的战争中，有姜姓部族或羌参与⁸；西周时，周王又常娶姜姓族女子为妻。因此学者皆认为“羌”或“姜姓族”是周人的西方盟友。或者说，姬出于姜姓之族，或两者原是一大族下的两个支族。⁹周克商之后，有功的“姜姓族”因被分封于东方而东迁，这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的申、吕、齐、许四国。留在渭水流域的姜姓族，主要是“西申”之国，后来勾结犬戎发动变乱，逼使周王东迁，结束了历史上的西周。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因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¹⁰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隔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¹¹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¹²

据中国史籍记载以及学者之研究，河湟羌人受迫于秦人的军事压力，继续大规模地远距离迁徙。向西发展的发羌、唐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往西北迁到新疆天山南麓的一支，成为“婼羌”。更有大量的羌人向西南迁徙，成为岷江上游的羌人。¹³甘肃东部与青海东部的河湟羌人，在汉代造成严重的“羌乱”。汉以进

剿、移民、屯兵等种种手段对付羌人，却由于汉将部分受降羌人部落迁于内地郡县，使得战祸延烧到渭水流域各郡县。对羌人的战争军费付出过巨，西北诸郡又因战祸凋敝，此为造成汉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学者认为，由汉到南北朝时期，羌人不断内迁，如此虽造成许多动乱，也因此造成民族之融合。汉化程度高的南安羌人姚氏，在南北朝时期曾建立一中国式的朝廷“后秦”。

唐代崛起于西方的“吐蕃”，据学者研究，其得名由于“发羌”¹⁴；其所并吞的苏毗、羊同以及党项、白兰、白狗等人群，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也都是“羌人”。由于接受并传播藏传佛教的吐蕃，被认为是当今藏族的直接祖先，因此羌人也被认为是藏族形成的重要成分。¹⁵9世纪末，吐蕃陷入衰乱，党项羌崛起，建立西夏王国。这是一个仿效唐宋制度建立的王国，13世纪为蒙古帝国所灭。自唐宋以来，陕西渭水流域羌人逐渐融入汉族，而甘青河湟地区与川西北的羌人，也分别融入汉族、蒙古族与藏族之中。最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及附近北川地区有羌、羌番或“羌民”存在。¹⁶岷江上游汶川、理县一带的“羌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终于被识别认定为“羌族”。

以上“羌族历史”之建构，除了基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之外，学者们也尝试由考古学、语言学上寻求支持。如甘青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火烧沟类型、诺木洪文化、辛店文化与安国类型文化，以及新疆的战国时期火葬墓，都曾被认为是羌人文化的遗存。除了这些考古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及所跨时代，与前述历史上的羌人活动时、空相契合外，主要的证据是随葬的牛、羊骨与少量的火葬遗存。¹⁷考古学者也宣称，有些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渭水流域姜姓族与羌的关联，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便是邹衡的相关考古研究。他由关中地区先周文化中存在的两种鬲——分裆鬲与联裆鬲——来印证文献中的姬姓族与姜姓族。联裆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分裆鬲来自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姜姓族由西往东迁，姬姓族由东向西迁，两种考古文化交融于渭水中游一带。¹⁸许倬云与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也认为，先周族原先活动在山西、陕西北方高地，吸收光社文化与草原居民的文化。在古公亶父时，他们又迁至泾水上游，定居于岐山并与姜姓结盟。此时期羌族文化遗存，表现在寺洼与安国文化之中。¹⁹1980年代陕西扶风县刘家的辛店文化墓葬发掘，使学者对于从考古上证明羌与姜的关系更具信心。由于辛店文化与历史记载中的西羌地理分布部分重叠，墓地普遍随葬石头之习俗与文献中羌人崇拜白石的记载一致，又由于死者头部的双联小铜泡

可能是发卡，反映了文献记载羌人披发的习俗，因此发掘者称之为姜戎（姜姓羌族）墓葬。²⁰

在语言学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来国族主义下的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之结构建立语言学框架。羌语，成为此框架中汉藏语系之藏缅语族下，羌语支语言的一部分。²¹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如此一层层由大而小之语言涵括结构，与民族学者所称的中华民族→藏族与部分西南民族→氐羌系民族→羌族，此一层层由广而狭的民族结构相互呼应。西方著名中国古代史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也认为，姜姓族与姬姓周人都是羌的一部分，也就是戎的一部分。他根据《左传》所载姜戎君长之语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以及东汉时记录的川西某羌部之“白狼歌”为一种藏缅语（Tibeto-Burman），因而认为羌是藏缅语民族。²²

20世纪初以来，中、西学者进入岷江流域做民族调查研究。1950年代，更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也在此展开。1970年代以来，西南考古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更引起学者对古代川边“民族走廊”之民族移动的兴趣。结合这些新的民族、语言与考古资料，许多学者认为，古代羌人或氐羌沿着川藏边界的民族走廊南移，便造成后来的彝族、白族、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藏族以及羌族等“藏缅语系民族”。²³1980年代以来，研究羌族史的学者也用羌族本土资料来说明羌族历史。汶川、理县附近的羌族间流传着“阿爸白苟与羌戈大战”传说，其内容称羌人由西北迁来此地，与土著戈基人发生争战的经过。历史学者认为，这个神话传说是岷江上游之羌由青海迁来，或更大范围氐羌系民族南迁历史之残存本土证据。²⁴

二、近代国族主义下之民族与中华民族

我们应如何看待以上的“典范羌族史”？这个“典范历史”的形成，不只是涉及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如日本的白川静、加拿大的蒲立本，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学两大巨擘傅斯年与顾颉刚，也涉及一些新知识如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与神话分析等等。是否这些学科严格的学术逻辑以及上述学者个人的才学，可以让我们完全信赖这个“羌族历史”的真实性？我并非完全怀疑或否定前人的研究；以上许多研究至今仍是经典之作，也厘清了许多古代史实。我所怀疑的主要是：这些史实是否可以串联成一线性历史，而一个“民族”在此历史中绵延三千年之久？基于对“民

族本质”（ethnicity）的人类学体认，以及对于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民族历史”的历史学了解，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这个“羌族史”的真实性以及其建构过程与意义。

典范民族史中的主体——民族

在探讨典范的“羌族史”之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历史的“主体”，也就是在此历史时间中延续的“民族”，究竟是什么？为何我们认为这些散布于广大土地之上，绵延三千余年的人群是一个“民族”——“羌族”？在本章中，我不愿涉及太多有关族群理论（ethnicity theory）的探讨。我曾以羌族与华夏为例，由族群理论探讨什么是一个“民族”。²⁵本书第一部分对羌族社会与认同的描述与分析，也表现了我对“民族”（或族群）与“历史”的看法。以下，我将在这些基础的探讨典范“羌族史”。

对于许多中国历史学者而言，他们相信跨越广大时空中的许多边远人群皆为羌族，其主要理由便是：在中国史料上这些人群都被记录为“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许多古代中国文献的文本中，“羌”“羌戎”“羌燹”“氐羌”都是华夏或汉人对异族的泛称。至于这些被称为“羌”的人群之自我称号，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很少，有些更被误认为是羌人各部落名称。然而，许多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研究都指出，“共同的自我称号”在构成族群认同上有相当的重要性。²⁶不只如此，由前面我对过去岷江上游村寨中“尔玛”认同的介绍，可看出所谓“共同的自我称号”是相当主观的认定；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在主观上被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尔玛”。在“羌族史”上，显然被称作“羌”的人群只有从华夏那儿才知道自身被称作“羌”；而在族群生活中，只有“羌”成为一种认同与区分的社会现实之情况，他们中才会产生“羌”的族群认同。这就像是，东汉时陇西地区的“东羌”，南北朝至唐代关中一些羌村中的“羌人”，以及当代“羌族”等等。对于近代岷江上游的村寨居民来说，在四五十年以前，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羌”这个称号，自然也没有基于此的共同“羌族认同”。那么，我们为何相信在交通更困难的时代，在汉人历史记忆的传播更有限的时代，如此广大时空中的人会同认为他们都是“羌”呢？

较认真的学者考虑到“民族”是一个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产、宗教信仰文化特征等的人群，他们也以此来思考历史上的“羌族”。因此，他们努力在文献、考古与民族学资料上印证这个“羌族”在广大时空中的存在与延续。部分考古遗存中的火葬以及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火葬

之俗，被认为是文献中“羌人火葬”的反映。当代岷江上游村寨居民有“白石”崇拜，因此有些随葬白石头的墓葬被认为是古“羌人”遗存。当代羌族中有一种祭司，汉语称“端公”。有学者认为这是羌人的“鬼主”，又将中国古史文献中的“鬼方”等同于“西羌”，如此将周之“鬼方”、汉代之“西羌”与今日之“羌族”联系在一起。²⁷在语言上，由于今日羌族与藏族都属“藏缅语族”，汉代川西一带“白狼羌”留下的“白狼歌”也被认为属藏缅语，而春秋时之“姜戎氏”又称戎与华夏“语言不达”，这些都被用来证明“羌”为一有共同语言特征的人群。²⁸在经济生产与宗教信仰上，中国古籍称羌为“西戎牧羊人也”之记载，羌字由羊、人所构成，与姜姓有关之“大岳”也被认为与羊神信仰有关。再者，某些甘青西藏考古遗存中的羊骨，以及当代羌族身穿的“羊皮袄”、端公的“羊皮鼓”，都被拿来印证一个在经济与宗教生活上与羊关系密切的“羌”族之存在及其历史延续性。

在如此的民族历史建构中，联结不同时间、空间之羌人的则是“民族迁移”。在“民族集团说”中，徐旭生认为华夏集团的炎帝氏族居于陕西，其中一部分在西周之前便已顺渭水、黄河东迁到河南、山东等地。²⁹蒙文通认为，姜戎诸国原在周之西北，在西周灭亡后，他们逐步南迁或东迁——这是整个西戎东迁潮流的一部分。³⁰白川静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羌（或戎），为了逃避列国压迫，移向陕西、甘肃山地；后来又受迫于秦，西逾陇山，进入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这就是汉代的西羌。³¹顾颉刚认为羌戎原住在西方山岳地带，一部分很早就往东面迁徙，三四千年来逐渐同化在汉文化里；元明以后，部分往西南方迁徙成为藏族。³²冉光荣等人也有类似的想法：羌人一波波地东迁而融入汉族中，往西南迁的则发展成为当今之羌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³³事实上，这些证据与诠释，都无法充分证明一个广大绵延的羌族之存在。关于“共同的羌族文化”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延续性之关系，我将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

以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产、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来界定、追溯“羌族”，这种民族研究最基本的错误是，原来“民族”（或族群）便不是以客观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来界定的人群。³⁴近二三十年来，许多人类族群认同的研究都指出，族群成员间的彼此认同与因此产生的根基情感，以及此认同与情感产生的资源竞争、分享背景，在族群的形成与维持上相当重要。有此共同利益与根基情感，在受到外来刺激时，同一民族或族群之人才可能产生共同的行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过去曾流行一时的所谓“民族集团说”——由一些神话传说以及区域性考古文化特征建构一个个庞大的“姜炎民族”“苗蛮民族”等等——的谬误之处。当

代岷江上游村寨居民在成为“羌族”之前“一截骂一截”的认同体系，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在三代之前是不是可能存在这些庞大的“民族”？

然而，如此涉及许多学科的、影响深远的“民族”想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样的思想与社会背景下，许多前辈学者建构了“民族”以及相关“历史”？以下我将说明，近代中国“羌族史”书写者如何因自身认同的变迁而重新书写“历史”，以建构此认同主体（中国国族）的边缘（少数民族）。

主体变迁：国族主义下的“中华民族”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族主义”、相关的“民族”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随着欧美列强的势力传入中国。忧心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并深恐“我族”在“物竞天择”之下步黑种人与红种人受人统治之后尘，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国族主义”概念与民主改革思想，极力呼吁“我族”应团结以自立、自强。这个“我族”，首先，特别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我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结合“中国人”（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成“中华民族”的我群认识，逐渐成为晚清与民国初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这个国族的建构，主要赖建立这个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记忆”以及建构新的“华夏边缘”来完成。“羌族史”便是“共同祖源记忆”的一部分，而作为少数民族的“羌族”也是新“华夏边缘”之一。

研究国族主义与族群本质的学者常提及，作为一种共同起源记忆的“历史”，是建构当今各“国族”或“民族”的重要角色。³⁵同样地，在中国国族主义的滋长过程中，“历史”也是建构民族认同的主要动力。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明，晚清知识分子如何假借“启蒙历史”（Enlightenment History）来建构“中华民族”：“历史”一方面说明目前这民族的“现代性”，一方面强调民族的团结与凝聚。

³⁶

在所有凝聚人群的“历史”中，解释人群共同起源的“历史”最为重要。“共同起源”，无论是祖先、起源地或一个原始事件，都能凝聚人群。在中国，找寻、建立一个共同的始祖，是清末民初“造国族”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近代史学者沈松桥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过去的皇统符号——黄帝，在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集体建构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在当时的集体认知过程中，有两个争议主题

值得注意：其一，有些边疆民族如满、蒙等，是否为黄帝子孙；其二，如黄帝是所有汉人与满、蒙等非汉的共同祖先，那么是否黄帝的嫡传——汉族——比其他支裔优越³⁷。这些争议，鲜活地说明了国族（或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共同纪念一“起源”，以强化群体成员间的根基情感；修饰、确认国族群体的边界；然后，阶序化群体内部之次群体。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经过清末以来的营造国族运动，建国领袖们坚信这个新国家是由“中华民族”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在国族主义影响下，以及在列强对东亚鲸吞蚕食的威胁下，中国知识与政治领袖们将“中华民族”建立为一不仅包括汉、满、蒙，也包括南方与西南各非汉族群的国族。国族主义之下，传统“中国”与其边缘“四裔”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建构与核心“汉族”相对应的边缘“少数民族”，以使“中华民族”这概念更具体，并让原为夷狄华夏的“中华民族”成员产生一体感。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有开创中国近代史学之功的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揭示历史研究的主要旨趣。³⁸

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由此看来，梁氏心目中的历史研究，便是当今学者心目中的“民族史”。我们知道梁启超是晚清至民初建构“中华民族”之灵魂人物，这说明了“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重要性，并表现出国族主义下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质。

由民国成立到1949年，民国政府之政学界领袖们大多只注意5个少数民族：满、蒙、回、藏与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非汉族群被忽略，或被整个概括在“苗”之中。许多西南非汉族群在生活习俗上与汉人相似，又被认为或自认为与汉族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时中国之国家民族政策鼓励他们汉化。³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一体性，对于民族问题采取更积极的政策。首先，国家宣示保障民族平等，致力于消除民族歧

视，并逐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接着，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大规模推展。直到1979年，总共有55个少数民族被识别，并得到国家承认。岷江上游及邻近地区的“羌民”，便如此成为“羌族”。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为何此一人口寥寥可数，其“民族文化”又夹杂于汉、藏之间的人群，得以被识别为“羌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由清末到民国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国族“历史”建构说起。

三、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

晚清与民初知识分子高谈中国民族、种族时，他们主要是由历史文献来探寻、争辩哪些是我族，哪些非我族。虽然他们也提及肤色、体质、语言等问题，然而在那中国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初萌的时代，学者们很难认真从“科学”角度思考民族分类问题。这是他们的探讨多限于历史文献的原因之一。以下我将说明，典范羌族史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者是以历史上的“羌”或“氐羌”为主体的“羌族史”研究，后者则是以当代“羌族”为主体而回溯其历史的羌族史研究。这前后两个阶段的研究，大致以1950年代为分野。以相对应的中国民族政策来说，前者与“五族共和”或中华民族之融合相呼应，后者则与少数民族识别、分类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相配合。

以羌、氐羌为主体的“羌族史”

虽然明清以来，中国边陲描述已成为一类“民族志”的书写传统，然而在清末民初时，绝大多数传统儒者对边裔人群的认知，仍停留在历史上“四方蛮夷”的阶段。清末民初的大儒章太炎便基于此概念，将中国边缘诸族群分为四类。

在章氏著名的《序种姓》一文中，他称大幕（漠）南北的游牧人群为“犬种”的狄，东北各非汉族群为“豹种”的貉，南方瓯越之东、滇交趾之南各族群为“蛇种”的蛮。唯对西方“河湟之间驱牛羊而食湟酪”的人群，他称之为“牧羊人”——羌。⁴⁰显然，他视北方、南方、东北的非汉族群如“非人”的犬虫之类，而独视羌为“人”。他又认为，这些北方、南方、东北的族类“其化皆晚，其性皆犷”，因此“不能予以华夏之名”；然而，西方之羌又是例外。如此的看法，并非建立在其民族志知识之上，而是奠基于其传统中国文史知识与记忆之中。

章太炎心目中华夏与异族之区分，以及“羌”在此区分中的特殊地

位，表现在他“中夏之族”的概念上。基于文史典籍记忆，他认为“中夏之族”便是黄帝、神农之族裔。他指出，这一族人起于西方“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之间”。此一广大西方人群的北方边缘有“羌”，南方边缘则有“髳”（苗），也就是说“中夏之族”为“西域、羌、髳所合也”。由他的举证内容可知，中国文献记忆中大禹兴于西羌，神农为姜姓，以及在文字上羌与姜的相似性，都使得他将“羌”视为“中夏之族”。他认为，羌就是姜，姜姓神农所统领的地域有西域、青海与陇西。因此他又称：“卫藏与西域三十六国皆犹有顺理之性，则神农、黄帝所不能外，亦其种类相似。”由此可见，章氏把“卫藏与西域”诸地人群纳入华夏之中，是由于他认为这些边疆人群与“羌”有密切关联。无论如何，虽然一方面历史上与“羌”有关的族群都被章太炎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今之“羌”或西域、卫藏之民与华夏只是“种类相似”——他将之比喻为：如艾之与蒿，橘之与枳——虽同种，然而还是有差别的。⁴¹

1905年，年轻的革命派人士刘师培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志》。在序言中，他说期望借此书“唤醒中华种族”。与许多革命党知识分子相同，这时他心目中的中华种族只是“汉族”。在此书中，他指出东周时之外患来自四种不同种类之异族，其中之一便是“氏羌种族”。此族原为西方“犬戎”，东移后成为分布在河南、山西一带的骊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等。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又视氏羌种族为西藏族的一支。此西藏族在西汉时蔓延到青海、河西等地，包括著名的冉駹与白马氏。因此，东汉时的氏羌入侵中原，也被他视为西藏族的东侵。无论如何，他也指出周之戎狄、汉之氏羌，后来都“风俗刑政卒与汉族相融”而混合在汉族之内。⁴²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章太炎将“卫藏”视为华夏同种，或是刘师培强调汉族与西藏族之不同，他们所建构的“羌”或“氏羌”种族，都是联结“华夏”（或汉族）与西方回疆、青海、康藏各地族群的中间桥梁。如此居于广大华夏西部边缘的模糊位置，使得“羌”或“氏羌”在后来的“中国民族史”中，得以发挥类似黏着剂的功能。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研究，更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普遍出现的羌、羌人与氏羌等，自然也引起学者们相当的研究兴趣。如前面提及的，有关甲骨文中之羌、羌族与姜姓之族的关系、姜姓炎帝与古代诸“民族集团说”、羌族与藏族之关系等等问题，都在此时成为学者们研究探索的对象。今之学者可能将这些研究纳入冷门的“民族史”范畴；然而，前面我曾引述梁启超所揭示的“历史研究旨趣”，以此来看，这“民族史”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却是历史研究的主干。

枝榧既备，树亦成形。到了1930、1940年代，中华民族之历史结构已规模初具，此时出现许多名为“中国民族史”之综合性著作。关于“羌”或“氐羌”的琐碎研究，在此时也凝结为较完整的体系——有关一个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在这些名为“中国民族史”的著作中，“羌”或“氐羌”皆代表一古代重要民族或民族集团，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与古华夏相征战，另一方面又不断融入华夏，因此其后代目前广布于汉、藏与许多西南民族之中。譬如，王桐龄认为氐、羌与戎都是西藏民族的一支；戎在周秦时同化于汉，氐、羌也在魏晋南北朝时加入汉人血统之中。⁴³又如，林惠祥认为“氐羌系”为藏族来源之一，春秋时为西戎，其与华夏族杂居者皆同化为华夏。这一民族在汉代为羌，宋时为西夏，明代为西番诸卫，清时为唐古特族；另有一部分为氐羌，与回族杂居西北；一部分为西南夷，与罗罗、缅甸族及僂掸族相近。⁴⁴同样地，两位作者皆以羌或氐羌来联结汉、藏，或联结汉、藏及各西南、西北之非汉族群。

在如此的历史建构中，将姜、羌或氐羌民族的共同族源溯及姜姓炎帝（神农）尤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传说中，炎帝有两种身份：在有些文献中，他曾与黄帝争战而败于后者之手⁴⁵；在另一些文献中他却又是黄帝的兄弟⁴⁶。在前面我们曾提及，黄帝曾在晚清的国族建构中被尊为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共同祖先。之后，在许多民族史书写中，被黄帝击败的“弟兄”——炎帝——成为许多非汉族群的祖先，特别是与氐羌有关的族群之共祖。“炎黄子孙”成为包括所有汉与非汉的中华民族的代名词。由于前述炎帝与黄帝间的双重关系，因此“炎黄子孙”也有双重历史隐喻：一方面强调各民族间的“弟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则区分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的后裔。

虽然羌或氐羌已广受历史学者的注意，然而此时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此一民族只是与今之汉族、藏族或西南民族有关的一个历史人群概念。很少人认真思考当代哪些人是“羌族”或“氐羌”，甚至于学者们很少使用“羌族”这一族称；即使提及“羌族”，究竟这是指当代何处的非汉民族，学者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如，林惠祥认为羌族即当时青海的唐古特族（Tanguts）。⁴⁷吕思勉则以为，当代羌族主要在青海、康藏、川西北及云南维西、中甸一带。⁴⁸更令人讶异的是，即使文献的探讨已触及当代川西北的“羌”，学者们的兴趣仍在历史之中。1930、1940年代有关“大禹”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例子。

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历史学者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在此时此

地，大禹与西羌的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焦点。“禹生于石纽”“大禹兴于西羌”以及“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等说勃然而兴。⁴⁹虽然学者皆认为大禹出生的“石纽”或“汶山郡”在北川或岷江上游的汶川，而当时这些地区的山居土著在文献中都被称作“羌”或“羌民”，但却少有学者因此深入研究大禹和羌民的关系。这是由于虽然讨论大禹和羌人的关系成一时风尚，但重点并非大禹和当时川西北“羌民”的关联，而是华夏的“起源”问题。在对日战争的挫折中，借着“华夏起源于四川”的历史想象，中国知识分子隐喻民族之复兴也可寄望于此。

这个例子说明，此时“羌”或“氐羌”只是一历史人群概念，很少有学者将此与岷江上游的土著“羌民”联系在一起，甚至可能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知道“羌民”的存在。早年进入岷江上游“羌民”地区做语言调查的学者闻宥，曾有此感慨：

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以一早见于先秦文献之族类，亘数千年，历无数之移徙混合，卒未灭绝，而并世竟无知之者，斯真学林之憾事已。⁵⁰

这段话显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已有一“亘数千年”的羌族，然而相对的，他们对羌的“民族知识”仍然浅薄。1940年代，典范的民族分类与历史知识尚未完成，另有一例可以为证。当时华西协会大学的秦学圣，曾随西方学者到岷江上游做调查——调查他认为应在岷江上游的“苗族”。⁵¹这个观念，与现在民族识别划分后的苗族居地相去甚远。这些都显示，在民国之初二三十年的民族史建构中，学者并非追溯一个已存在之“羌族”的历史，而是在有关“羌”的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建构历史上的“羌族”，这也说明了为何早期进行“羌民”田野调查的大多是西方学者或传教士。

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约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然士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了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⁵²虽然他的历史建构大多引自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学者关于羌或氐羌的历史研究是为了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陶然士则是为建立一民族历史。

由于他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他更进一步将这支民族的

历史追溯至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⁵³这样的结论，显然来自他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观念以及在那个时代深受演化论、传播论影响的民族学（ethnology）。在演化论的思考模式下，他以“一神教”作为人类宗教演化、进步的极致阶段。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观念之下，他显然认为此文明边缘人群有如此进步的宗教，是因为这些人为“西方文明者”失落的后裔。⁵⁴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陶然士之外，其他西方学者（或传教士）也曾将中国西南边疆许多族群当作是“印欧种”“以色列种”或其他西迁的西亚种族。⁵⁵

由1925到1948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也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做调查。除了考察羌族文化外，他也追溯羌民的历史。他参考中国历史学者的著作，建立一悠久绵长的羌民历史。不同的是，他驳斥陶然士所称“羌民为东迁以色列人后裔”之说。他指出，羌民的宗教并非一神教。他更明白指出，当时有些羌民自称“古以色列人后裔”，乃受陶然士影响所致。⁵⁶

陶然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其历史。他们和1930至1940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主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以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典范的当今“羌民”。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文化篇”中说明。无论如何，他们的调查成果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也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已从文献中逐渐建构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中，“羌”或“氏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羌或氏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联，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黏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氏羌民族遗裔中，此时仍被称为“羌”的族群。他们像一个活的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及语言学分类的帮助下，这个民族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排除历史上被他族同化的“羌”，而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作“羌民”的族群。关于“羌民”如何成为“羌族”，在后面我将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著名前辈学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

史上不断迁移，融入他族或形成新民族。如此“羌族史”，不仅将由商代至今的“羌”联系起来，并将许多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根据他们与羌或氐羌的关系——与汉族联系在一起。如，马长寿在其《氐与羌》一书的绪论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至今仍为羌族。⁵⁷因此，他认为：

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羌族史的重要性，任乃强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之序言中，有更清楚的说明：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我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族有关。因而，研究羌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团结工作都极为重要。

由于此时“羌族”已为一少数民族的具体指称，此一阶段的羌族史书写，多少都提及当前川西北的羌族。这个被认为有自身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被当作是历史上“羌族”的活化石证据。羌族之现实存在，赖“历史”而得到合理的诠释；“历史”也由于羌族之存在而被人们信赖。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与此相关的模糊历史人群概念，如“氐羌种族”“藏族”“氐羌族系”等等，多被“羌族”取代。虽然如此，上述顾、马、任等前辈学者所书写的羌族史，仍然承继前一阶段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历史上”的羌族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之关系，而对于当前的羌族则着墨甚少。

同时，在1980年代，岷江上游羌族的本土历史神话，羌戈大战故事，引起部分学者们的注意。⁵⁸这个流行于理县、汶川一带的故事，讲述一个族群如何自西北南迁，至岷江上游与当地土著戈基人发生战争，得胜后成为“尔玛”并分别到各地建立村寨。这个民间传说，被学者视为北方羌人南迁之真实历史反映。理县、汶川一带出土的石棺葬，当地人

认为是“戈基人”的墓。石棺葬中的甘青文化因素，被学者诠释为一波波羌人南迁的考古学证据。此种糅合本地传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羌族史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冉光荣、李绍明与周锡银等人所著的《羌族史》。这可以说是典范羌族史的极致，也是典范羌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这本书出版后，再也没有如此完整、全面的“羌族史”出现了。

在这一本《羌族史》的正文之前，刊载了多张照片，显示茂汶羌族自治县羌族的房屋聚落、生产活动、文化特色与历史古迹。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炎帝、大禹、商周时期的羌人，一直写到唐宋时期的羌人，最后归结于羌和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系。下篇介绍岷江上游的羌族，由石棺葬与羌戈大战传说来印证西北羌人的南迁，然后探讨宋明以来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最后两章，主要介绍当前羌族的习俗、宗教与文艺、科技，书后并附载羌语方言分类、人口数量与分布。因此，从整部书的结构看来，上篇可以说是清末民国以来历史学者与本书作者们精湛研究的集结；下篇则是被前一阶段羌族史书写者全然忽略的“本土历史”。以“历史”所表露的族群本质来说，上篇表现的是在中华民族体系中的羌族，下篇则表现存在于本土特质中的羌族。这都显示，作者们将书作为“当前羌族”的历史。在此“历史”中，羌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造就当前中华民族中的“羌族”；当前中华民族中“羌族”之存在，也促成这部羌族史的书写与完成。也就是说，当前羌族的存在及其族群本质与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承。

在冉、李、周氏《羌族史》之《后记》中，作者们的一段话也说明了此“历史”与“民族”的部分特质：

对于本书之征求意见稿，国内民族、历史、考古、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政府更在干部群众中组织讨论，得到了羌族人民的各界代表，特别是老红军战士何玉龙、苏星、马福寿，以及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王泰昌等同志的热情关怀和肯定。

这一段简短的文本中，披露了清末民国以来一个“民族”形成的三个面向，或者说，三个重要的“情境”。第一，在民族、考古、语言等新学术工具与新的历史书写下，“民族”得到其客观的典范特征。第二，典范的学术知识被转化为民族常识，“民族”得以建立在土著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与主观认同之上。第三，所谓土著观点，经常不是所有土著的观点，而是土著群体内部分人士所决定的“土著观点”。

由早年的刘师培、章太炎到当代的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这些学者在研究、书写羌族历史时，心中都未必必要建构“羌族”。然而，在学术传承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对羌族历史之研究、书写被主流社会认为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因此成为学术典范。“羌族史研究”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为何在清末民初一度代表“新史学”主要内涵的“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形成之后，悄悄退出了历史研究的主流。

但这整个华夏或中国边缘的再建构，只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可以说是此历史过程的创造者。因此在新的时代氛围下，他们毫无选择地投身于一个中国边缘的再塑造工程之中。在下一章里，我将说明这个长程的华夏边缘建构历史。

- 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81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77—80页；[日]白川静：《羌族考》，载《甲骨金文学论丛（第九册）》，油印本，1958，第45页；[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台北：鼎文书局，1975，第404、423页。
- 2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120页。
- 3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上海：右文社，1919；傅斯年：《姜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1930年第1期，第130—135页。
- 4 [日]森安太郎：《皇帝的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王孝廉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9，第149—174页；[日]白川静：《羌族考》，第四、五、六章；印顺法师：《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台北：华冈出版公司，1975。
- 5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载《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日]白川静：《羌之岳神崇拜》，见《羌族考》，第四章。
- 6 徐旭生：《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载《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 7 徐中舒：《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68—75页。
- 8 中国民俗传说中，姜太公佐助武王伐纣之事，便是此历史记载的民间版本。
- 9 傅斯年：《姜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第1—54页。
- 10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20—125页。
- 1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31页。

- 12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第47页。
- 13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第47页；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 14 姚薇元：《藏族考源》，《边政公论》1944年第1期。
- 15 安应民：《吐蕃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第1—21页。
- 16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第191—204页。
- 17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第95—96页；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第143页。
- 18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第297—356页。
- 19 Choyun Hsu &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3-67.
- 20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6—29页。
- 21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2），1941，第58—190页；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孙宏开：《试论“邛笮”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 22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19-421.
- 23 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载《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第738—756页；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饶宗颐：《西南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6本第1分，1974，第180—182页。
- 24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第20期，第8—16页；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第207—210页。
- 2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 26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pp. 1215-1218.
- 27 饶宗颐：《西南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1分，第188—189页。
- 28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

- 29 徐旭生：《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载《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 30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15页。
- 31 [日]白川静：《羌族考》，第132—133页。
- 32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7—152页。
- 33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
- 34 关于族群理论中关于“族群”定义的探讨及相关研究，请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一、二章。
- 35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Richard H. Thompson,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Eugene E. Ro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 36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27-30.
- 37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第28期，1997，第1—77页。
- 3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 39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9-60.
- 40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第1—2页。
- 41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第1—9页。
- 42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05初版，1962重印。
- 43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第96页。
- 44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13—14页。
- 45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 46 《国语》卷十，《晋语四》。
- 47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142页。
- 48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4、286—287页。
- 49 陈志良：《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33—42页；罗香林：《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43—63页。

- 50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中国文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2），第60页。
- 51 见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iii。中国古文献中有舜“迁三苗于三危”，而许多学者相信“三危”在青海南部到川西北一带；显然，这便是秦学圣到岷江上游探索苗族源流的基础。
- 52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Ltd., 1920, pp.4-14.
- 53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 54 “找寻失散的祖先后裔”，是指在文明程度与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人类社会接触中，优势人群认为此劣势人群为本群体之分支，而产生的一种历史建构与想象。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
- 55 泰勒（Griffith Taylor）：《人种地理学》，台北：中华书局，1960；P. H. Stevenson, “The Chinese-Tibetan Borderland and Its People,” *China Journal* 6, pp. 4-6; T. Cook, “The Independent Lolo of Southwest Szechw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8, pp. 70-81.
- 5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98-101.
- 57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页。
- 58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第10辑，第8—16页。

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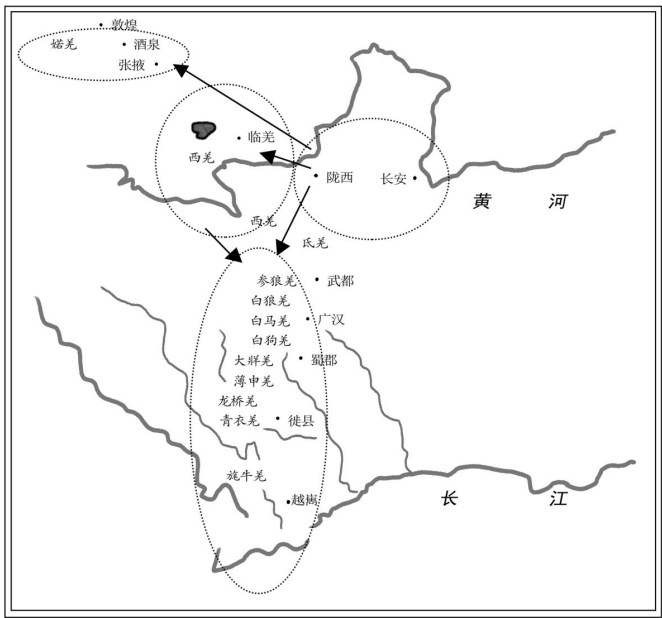
典范羌族史是一种“历史”，一种国族主义下的时代产物。如今，在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启示下，我们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建构性，也因此能“解构”此种“历史”。然而，这并不表示典范历史的研究、书写是错误的；当代解构各种过去“历史”与神话的学者，有时也不比这些前辈学者高明。许多现代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都证明学者们常常由一个谬误中挣脱后，又陷入另一个谬误之中。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从解构他者或古人中，认识到群体认同对于人类认知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解构一个国族认同下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新的国族认同下（或其他的主体认同下）建构另一种“历史”。

研究近代国族主义的学者们更有一种普遍见解，认为当代各“民族”（或国族）全然是近现代产物，产生于近现代的历史建构与文化创造之中。这样的看法忽略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是群栖动物，而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们使用各种的文化符号（与相关记忆）来强化“群体认同”。以文字书写历史合理化一血缘群体之凝聚及其领域资源，在世界许多古文明中也很常见。以近代“羌族史”之研究、书写来说，当书写之主体（华夏）成为“中国民族”之核心族群时，在新的“中国民族”概念下，他们重新建构、定义羌族；是否“羌族史”的主要建构者与被建构者——汉族与羌族，全然是近代产物？或者，是否造就当代中国民族与羌族的“历史”，只是些被建构的历史想象而非真正的历史？我不认为如此。我也不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以解构近代形成的“历史”为满足。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的是：如果“典范羌族史”中的羌族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延续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历史中延续？或者，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羌族与“典范羌族史”？在这一章中，我将由“华夏边缘观点”来说明“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解释“羌族”与“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本质；通过这样的历史，我也将探讨历史延续性的问题。

关于从“边缘观点”探索华夏的形成与变迁，在我从前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有详细的探讨。简略地说，这个新的研究取向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对“族群”（包含民族）的了解与界定上，强调由族群成员所相信或争论的“我族边缘”（哪些人是异族）来认识一族群的本质；着重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以及配合与造成此变迁的历史记忆建构与再建构过程，以及影响资源分

配、竞争与历史建构的群体内外权力关系。因此，在历史文献上，边缘研究强调族群的社会记忆本质，以探索留下此记忆的社会情境；在考古与民族志资料上，注重人类资源竞争、分配体系与其生态环境背景，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以及认同与区分体系下的文化表征与展演；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中了解一个社会的多元本质、模糊边缘、权力关系与历史变迁。

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这一章中我将重新探讨、建构一个“羌族史”——事实上这是“羌”的历史，也是华夏之西方异族概念的观念历史。我将说明，“羌”作为一个华夏边缘，华夏心目中“西方那些异族”，如何在“华夏”的成长中不断向西漂移，以及这个华夏边缘在近代以来的变迁——由“蛮夷”成为少数民族。这样的“羌”的历史，事实上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变迁的历史，也是我所谓“华夏边缘观点”的历史。



图十一 典范历史中羌族的迁徙分布

一、商至汉代华夏之羌人概念变迁

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曾说明由商代至汉代华夏的“羌人”概念变迁。在本书中，我先对此一历史过程略作叙述。

“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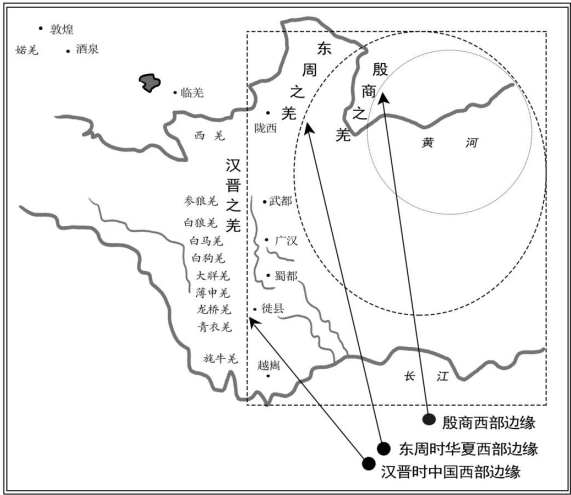
元前13世纪)。由甲骨资料，我们知道商人称西方某一区域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其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他们在商人眼中是敌对的西方人群，也是被视为“非人”的异族。公元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结合西方各部族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人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大约在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也在这时期，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如此，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指传闻中西方一异族。文献中或说他们行“火葬”，或说他们“无君”，其实都在强调这些西方人的异类性；这些异族的地理分布，“在秦之西”。然而“氐羌”似乎只是偏好以神话传说为隐喻的战国思想家们的西方异族想象；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

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往西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到适于开垦种植的地方。由于对西方人群的认识愈来愈深，“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两种西方异人群。陇西附近，在秦与汉初也被称作“羌中”。

由西汉初年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西北一路，汉帝国势力在汉武帝时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有了“羌谷水”与“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到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在汉昭帝到汉宣帝时期，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到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由于与河湟土著的战争，中原人对于此处的“羌人”有更多的描述与了解，因此“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中原王朝百姓心目中典型的“羌

人”。最后，在西南方，秦朝与西汉前期中原王朝之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湍氐道”“旬氐道”等地名被用来称呼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的“边缘”，由于“氐羌”之关联，这里部分人群也被称作“羌”了。

以上“羌”或“氐羌”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变迁，表现了华夏形成过程中华夏之西方族群地理边缘的变化（见图十二）。在商人的我族认同中，西方异族主要位于陕晋豫之交。在西周时人的我族概念中，这个西部族群边缘大约向西推进到陕西宝鸡之西不远的地方。战国至秦，由于秦人的华夏化，这个边缘又向西推移到陇西、洮河一带。西汉武帝及其后，“羌”的概念一度随河西纳入中国而往西北迁移，造成历史学者所称的河西与天山南路之羌。¹无论如何，东汉与河湟羌人之间绵长的血腥战争，使得河湟土著成为中原王朝心目中典型的羌人；这个概念，后来又因《后汉书·西羌传》之作而强化。因此，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由商到汉代之“羌”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异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历史，或“华夏边缘”变迁的历史。²



图十二 商至汉晋间华夏边缘变迁

前面提及此历史过程中的商人、周人、秦人与华夏，这里有必要对这些人群之族群本质作一些说明。过去学者们，包括我自己，常将之视为民族，或直书为商民族、周民族、华夏族等而不加诠释，这至少都失之简略。如果“民族”是一群有相同主观“认同”，并相信彼此有共同“起源”的人群，那么显然商人、周人、秦人与汉代华夏“民族”只是指在各个政治、经济体中的社会上层阶级。我们只需阅读《史记》世家、本纪中

各国之“历史”便知，那只是些上层领导者的家族“历史”；以黄帝、颡顼等圣王记忆来凝聚的，只是战国以来的帝王贵胄与汉晋时期的豪门世族而已。汉晋之后，通过家族谱系记忆书写，才有愈来愈多的社会中下层“百姓”成为炎黄子孙。³总而言之，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都在一延续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古之“周人”“华夏”与当代意义的“羌族”或“中国民族”是有差别的。

二、华夏边缘羌人地带之形成：东汉晚期至魏晋

汉代中国对西南蜀郡的开发、移民，以及蜀地的华夏化，使得东汉魏晋时期华夏（包括蜀人）心目中之羌人的指称范围逐渐由河湟向南方山岳地区延伸，涵盖秦汉时被称作“氐”的人群，以及在此之西的青藏高原东缘各地域人群。这些地区，也就是蜀地的西方边缘。相反地，由河西往西域漂移的羌人概念失去主流位置，后来的史料记载中很少称这地区的人群为羌。无论如何，东汉（25—220年）到魏晋时期（221—419年）被称作“羌”的人群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少数也分布在北部边缘。此带状区域包括：天山南路附近、青海东北部（河湟）以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等地。特定的部落名或地名，有时被用来分别不同支系的“羌”，如此便形成一个由北而南狭长的“羌人地带”（图十二）。

此地带的最北方，天山南路有焞羌。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有不同“种落”的西羌，其东部洮河流域至陇西间也有许多羌人。在此之南，甘肃南部的武都附近，也就是白龙江上游一带，有白狼羌、参狼羌。再往南去，汉代广汉郡之西有白马羌，约在今文县、平武一带。更往南，汉代蜀郡之西有白狗羌、大牂夷种羌、龙桥等六种羌及薄申等八种羌，这些族落大概都在成都平原以西的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一带。再往南，沈黎郡之西有青衣羌，约在今四川西南部的雅安、芦山一带。在羌人地带的最南方，越巂郡附近有旄牛羌，其位置可能在四川汉源、西昌一带，或及于云南北部边缘。在此地带之南，便是汉魏晋中原人所称的“南中”，当地土著多被称作“夷”。因此在交接地带的“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或有可能，魏晋时中原人以“旄牛羌”与“旄牛夷”指不同的人群。

在此“羌人地带”上，汉与魏晋时期的中原人也以其他族称来称特定族群。如在天山南路，除了羌之外还有“胡”或“羌胡”；在甘肃南部与四川北部，有些人群被称作“氐”；在四川南部与云南北部，有更广泛的异

族称号“夷”或“獫狁”。无论如何，“羌”与“羌胡”这些人群称号，后来逐渐在天山南路消失。华夏对这些异族称号在特定地区之人群指涉，如在甘南、川北的氐与羌，或在川滇间的羌与夷、羌与獫狁，似乎都并不统一。譬如，白马羌有时也被称作白马氐，大群与牦牛等羌有时则被称作“夷”。当时文献中又有“氐羌”“巴氐”“羌夷”或“羌獫狁”这样的混称。这些都显示，“羌”是一个使用广泛的西方异族称号。而且，虽然与其他族称概念有些重叠——其北方有胡、西北与西方有氐、其南有夷——但如此更凸显此“羌人地带”的大致范围。

由商代到东汉，作为“华夏边缘”的“羌人”概念由豫西、晋南逐步西移，所过之处的人群都成了华夏，终于在汉魏晋时它移到青藏高原的东缘。如果我们将汉代的河湟羌、参狼羌、白马羌、大群夷种、龙桥、薄申等羌与牦牛羌，由北至南连成一道线，这条线便是汉代以“羌”的异族概念来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缘。这个成于东汉魏晋时的西部“华夏边缘”，也是汉人的西部族群边缘。今日汉族分布地区的西缘与此“羌人地带”仍大致吻合。这显示“华夏认同”的扩张，在东汉魏晋时达到它的西方边缘。此后，在这边缘地带上，“汉化”仍在部分地区进行。但由于吐蕃与藏传佛教东渐，与此相关的文化与族群认同也由西东进。于是，青藏高原的东缘成为一个模糊的华夏边缘，或汉、藏边缘。在此地带，谁是华夏或非华夏，谁是“播巴”（Bod pa）⁴或汉，或者什么是正确的历史，都经常在人们的争辩之中。

三、羌人带的萎缩：汉化、番化与夷化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420—907年），一些比较具规模的政治体，如宕昌、邓至、党项、吐谷浑等等，出现在中国西疆“羌人地带”上。在中国文献记载中，这些大小政治集团下的部落民众主要是“羌人”或称“诸羌”。宕昌、邓至约在甘肃南部的临洮至四川北部的松潘、北川之间。吐谷浑势力强盛时，东部统有今兰州以南至松潘间，往西统有黄河上游与青海湖附近。党项兴起于宕昌、邓至被灭之后，位置在吐谷浑之南，领有宕昌旧地及于岷江上游。其南，则是被称为西山八国的诸羌部落；此大致便是今日羌族地区及大、小金川、黑水等地（见图十三）。

个地方部落酋长手中。这些地方豪酋多自称是过去吐蕃贵族或将领之后裔，这或是真实的，或是虚构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吐蕃传下来的佛教（被称作藏传佛教）在元、明时期在这一地带的传播广泛而深入，造成此广大地区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接受此佛教文化的土著头领，也可能因此虚构、攀附吐蕃祖源。无论如何，由于广泛“吐蕃化”所造成的文化现象，使得宋代（960—1279年）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羌人地带上的人群被泛称为“番”。这个称号有两种含义：一为吐蕃遗民；二为“蛮子”。从此，对中原王朝来说，吐蕃化的异族也就是更“蛮化”的异族。不仅对汉人如此，对羌人地带东缘较汉化的人群亦然；这儿的住民在经济、社会生产上与汉人关系密切，因此吐蕃的犯边掠夺，被他们视为野蛮的暴行。吐蕃带来的战祸以及因此造成本地民众（或边缘汉人）与汉人的共同受难记忆，应是加速其汉化的重要因素。战争中的迁徙流离，更有助于前者之“蛮夷”身份被自身以及汉人共同遗忘。

可以说，吐蕃王国的兴起与向东扩张以及因此与唐朝沿着羌人地带发生的冲突，还有他们对此地人群带来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彻底改变了中原人对这个地带上异族的概念。即使大致来说，青藏高原东缘仍是汉与非汉的边界，但由这时起，中原人很少称这地带上的异族为“羌”，而开始称他们为“番”。这个变化也表现在一个地名上——唐代青海西宁附近的“临番城”，便坐落在离汉代“临羌城”不远的地方。“羌”与“番”都是指异族，但他们在中古中原人心目有不同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两者背后的历史记忆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羌”代表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太多的历史记忆——如三苗、姜姓大禹和神农——可以将“羌”与中原华夏族群联系在一起。而相反地，“番”代表严格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唐朝与吐蕃间长期战争中的挫折，强化了唐人心中“番”的异类性。当愈来愈多西方“吐蕃化”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番”或“西番”时，过去以“羌”这个异族概念作为划分的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一种较模糊的华夏边缘，便逐渐被“番”这个更严峻的异族概念所取代。

除了“番化”之外，另外两种情况也使得“羌人地带”在唐代以后日见萎缩。一是此地带上部分人群的完全“汉化”；二是此地南部人群的“夷化”。“汉化”发生在此地带东北端与东部边缘，过去曾被宕昌、党项羌与西夏统治的部分地区，也就是甘南、川北与青海东部一带。⁶早在汉代，朝廷已往洮河流域与河湟地区屯兵、移民，并将部分“羌人”部落内徙。东汉“羌乱”时期，也有大量“羌人”移往关中地区。移往关中的“羌人”，在唐宋时期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战争中的人口流徙，也使得临洮、陇

西、天水、武都一带的“羌人”与“汉人”在血统与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混合。西夏统治下的民众，有许多便是如此的“汉人”或“羌人”。在西夏王国糅合汉文化的本土化政策下，许多原来被视为羌的部民，因“西夏化”而有了更多的汉文化特质。西夏衰亡后，今兰州、临洮、岷县、武都、文县、平武、北川一线以西的各部落人群，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氏”或“番”。⁷在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常有他们“作乱”的记载。明代在此置岷州卫与洮州卫，以镇压羌人。在此线之东原为氏、羌、汉混居的甘南、川北地区，宋代以来则成为汉人所居之州县。明代在此的行政设置是“府”——巩昌府，这显示本地人群此时已被视为中原编户了。所谓“汉化”，并非简单地指“成为汉人”，而是指一个接受、展演或强调汉人习俗，最终宣称祖先为汉人的过程。但宣称祖先及自身为汉人，在华夏边缘不一定因此被他人视为汉人。在此地，“汉化”是由东往西渐进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汉与非汉之间直到民国时期仍无明确的边界，在后面，我将深入说明这一点。

在“羌人地带”中部，完全的“汉化”发生在四川西部的芦山、雅安一带（约当今雅安地区）。居于此地及西至康定之间的非汉族群，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被中原人称作“青衣羌”。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沈黎郡设了两个都尉：青衣都尉治理汉民，牦牛都尉治羌人。可见当时雅安、芦山一带住民，至少有部分已是中原编户之民了。唐代时，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贸易，这儿都是唐朝与吐蕃往来的孔道。大量军民商贾来此经营、定居，使得这一带居民与汉人有更多的接触。在这样的接触中，汉人与非汉人群基本上相安共存。唐代在此设雅州卢山郡与黎州洪源郡，又在此两州各设二十余羁縻州，授非汉领袖为都督、刺史等官衔，任其世袭。唐武后时，曾计划以武力讨伐“雅州生羌”，以借道袭击吐蕃。但陈子昂反对此议，他的理由是“雅州边羌未尝一日为盗”。因此他认为不应侵扰他们，而引起北方“西山诸羌”的叛乱。此种相安关系，应部分归功于当地的贸易孔道位置，汉与非汉都能从中各蒙其利。此种密切往来关系，也使得许多本地部族上层人物逐渐汉化。如当时邛崃附近有“三王蛮”，据《新唐书》记载，其为“苻都夷、白马氏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为长，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⁸可见，当时本地部分非汉土著头领已有了汉姓。

宋代放弃对越嶲之南与大渡河以西之地的经营，这使得宋朝可以更有效地掌控雅州、黎州地区，也可能因此让此界之内较“汉化”的民众，觉得自身不同于南方、西方“蛮夷”。据宋代文献记录，此时黎州附近还有“青羌”与“弥羌”，时来掠夺中原边村，或与中原进行茶马贸易。⁹更远

方的异族，雅、黎两州南方与西方的非汉族群，在宋代多被中原人称为“蛮”或“番”。元明时期在这些难以直接管辖的地区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安抚使司”，任用当地土著豪首为安抚使，以间接控制其地其民，这便是“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后来又增置“天全六番招讨使”。明代时，这一带的土司都有汉姓，如天全高氏长期袭封“天全六番招讨使”之职。清雍正时期，以天全六番土司“贪残不法”而改土归流。据当时文献称，“蛮夷渐被声教，衣冠文物俨如内地”。于是“汉民”所居之地，渐由此西向，逼近康定地区。¹⁰

至于羌人地带的“夷化”，是指此地带部分土著族群在中原人心中逐渐不再是“羌”，而成为“夷”或“蛮夷”。这主要发生在此地带的南端，也就是前述雅、黎等州的南方，今之大、小凉山地区及丽江一带。前面我曾提及，汉代以来“羌人地带”形成后，此地带最南端的人群被称作“旄牛羌”，其位置大约是在四川南部雅、黎等州以南，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西北部边缘。“旄牛羌”也被称作“旄牛夷”，这是由于汉代时，中原人曾泛称西南边疆异族为“西南夷”。在唐代文献中，这些西南住民多被称作“蛮”；然而冕宁至西昌一带的嵩州，此时仍被视为“羌州”。¹¹唐宋时期，南诏（738—902年）与大理（937—1252年）王国在云南地区相继兴起，唐宋王朝逐渐失去对旧时之越嵩或嵩州的控制。南诏向北发展据有今西昌地区时，曾将大量南方的“乌蛮”与“白蛮”移来西昌以北至汉源之间，以便于统治此地。¹²南诏与大理等政权的出现，使得中原人对西南本土人群有较多的了解。在宋代，“蛮夷”与“羌”成为中原人心中西南、西部两大异族类别。两大范畴之交叠处，便在岷江上游一带。《宋史·蛮夷列传》记载：“冉駹，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白马氏，在汉为武都郡，今阶州、文州，盖羌类也。”由此，以及《宋史》其他相关记载看来，此时官方书写者观念中的“西南蛮夷”往北可包括岷江上游茂州、威州等地的非汉住民。他们观念中的“羌”，则是指青海东部、甘南、川北一带的非汉人群；此一异族范畴的最南端，也涵括了茂州、威州等地的山间居民。

明、清时期，描述四川南部与云南地区“异族”的官方文书与私人笔记渐丰。这可以说，中原人注意并描绘其西南族群边缘的历史过程从此进入一新阶段。在这些新的异域与异族书写中，中原人将许多西南族群称作“夷”“蛮”“爨”或“僰”。羌人地带南端，原“旄牛羌”所据之地的非汉族群，在明、清时期不再被中原人称作“羌”，而被称为“蛮”或“夷”。略北，雅安、芦山一带住民也不被称作“羌”，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汉民，只有一小部分受土司管辖的，在中原记录中被称作“番”或“蛮”“夷”。再往

北，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山区民众，则有时被称作“蛮”“夷”，有时被称作“羌”。在明、清时期中原人心中，岷江上游诸人群之“异类性”介于“蛮夷”与“羌”之间，此也显示这些文献书写者意识中的“西南蛮夷”之北方边缘所在。

羌人地带南端的非汉族群由“羌”变成“夷”，或“蛮夷”，这个改变也显示他们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异类性逐渐增强。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此一近代地理人群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变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原士人描述西南边疆的著作中，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汉源（地在雅安地区南缘）以南的非汉人群与地理；对于汉源以北，包括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的异族，这一类的异文化描述非常少见。这或也显示，此时雅安地区与岷江上游土著文化，对中原异地游历者而言已缺乏“异类性”，因而他们对此也缺乏描述兴趣。

华夏心目中羌人地带的萎缩过程，大约始于唐代，至明、清时期而完成。《明史·西域传》称：“西蕃，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可见当时部分学者犹记得，此时之“西蕃”即过去的“西羌”。羌人地带萎缩后，清代文献显示，时人心目中最后的羌人只在岷江上游与北川间。如清代张澍之《蜀典》中记载：

《汉书·西羌传》，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又云羌无弋爰剑子孙各自为种，即武都、参狼、广汉、白马、汶山、冉駹、巴中板楯，今松潘、茂州诸夷也。¹³

由此记载可见，在张澍心目中汉代西羌遗民只是当时的“松潘、茂州诸夷”。这也说明，在羌人地带上大多数的非汉人群成为中原人心目中的“番”“夷”与“汉”之后，在明、清时期，只剩下岷江上游茂汶到松潘以及北川西部地区的部分村寨人群¹⁴，仍被中原人称作“羌”。或严格地说，特别是在清代，只有极少部分的中原人仍“知道”岷江上游有羌人存在。

四、羌人带上最后的“羌人”

14到19世纪，虽然在少数例子里“羌戎”与“诸羌”被用来泛称青藏高原东缘的非汉人群，但一般来说，汉人对此地带异族最普遍的称号是“番”以及“蛮”与“夷”。“番”指此地带北部、西部之人群，“蛮”与“夷”主

要指此地带东部雅安地区以南的人群。岷江上游地区，可说是“番”与“蛮”“夷”的中间地带。在上一节中，我已说明羌人地带上大多数地区的人群，如何逐渐在中原人心中自“羌”这个范畴中脱离。明、清时期，所有被泛称作“番”“蛮”与“夷”的人群中，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土著仍经常被中原人称作“羌”“羌人”或“羌民”。以下我将进一步解释，为何岷江上游及北川地区的土著为部分中原人心目中的最后“羌人”。

岷江上游地区 首先，我们先看看岷江上游的汶川到松潘一带。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此为“冉駹”之地。冉駹之地的土著，据司马迁记载有“六夷、七羌、九氐”。西汉初年，文献中“羌”的概念虽然还很模糊，但主要指陇西或更西方的人群是可以确定的。因此，以冉駹的位置而言，“羌”主要是指此北方的人群。“氐”在西汉时主要是指陇西之南，甘南、川北的武都、文县、平武，也就是在冉駹的东方与东北方一带的本地人群。这一范畴的人群，在汉晋时人心中类似“羌”，但比羌人更华夏化。至于西汉时的“夷”，由于汉代“西南夷”中的主要人群是滇与夜郎等，因此相对于冉駹的位置来说，绝大多数的“夷”在其南方。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冉駹”之地的族群分布特色，在西汉时的中原观察者看来，本地处在中原人异族分类体系中三种人群的交错地带。因此，司马迁称本地土著有“六夷、七羌、九氐”。这个记载，不见得表示司马迁基于某种严格的族群划分标准，将本地人群分为3种22类，但至少它表达在此氐、羌、夷的中间地带，族群“种类繁多”。成书较晚的《华阳国志》也记载，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同样也是说，本地人群种类很多。

到了唐代，“羌人地带”在中原熟悉边事者心目中已形成，汶川到松潘一带本地居民，因而被称作“羌”。松、茂等州，也都被归类为“羌州”。当时文献所称的“西山诸羌”，主要便是指这一带的本土人群，特别是其中的哥邻、白狗、逋祖、南水等羌。¹⁵这些诸羌部落夹处唐与吐蕃之间，吐蕃势盛则依附吐蕃，吐蕃势衰则附唐。虽然《旧唐书》中记载了这“西山八国”，并称其领袖为“国王”，然而并不表示这一带只有八个“国”，也不表示这些“国”是中央化、阶层化的“国家”。从同一时代其他文献看来，这儿还有许多的羌人部落，《隋书》称它们“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因此，所谓西山八国应只是其中较大的或与中原有直接来往的部落。

北宋时，岷江上游非汉人群被称作“蛮”或“夷”，在《宋史》列传中

被置于“蛮夷”类。这主要是由于宋朝与西夏的长期战争与对峙，而西夏势力所及大约是汉代河湟、陇西羌人之域，因此使得当时中原人心目中的“羌”或“羌族”，专指受西夏控制的、宋夏战争区中河、洮、岷、阶、文等州（约今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非汉人群。也因此，《宋史》中称茂州、汶川非汉人群为“蛮”“夷”，称离此不远的阶州、文州土著为“羌”。¹⁶然而《宋史》作者在回顾历史时，称包含茂、汶、阶、文等地的西南地区都是“古羌夷之地”。显然，时人心目中“古羌夷”的范围比当时的“羌人”分布地要广。宋末，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释文中也称：“白狗国至唐犹存，盖生羌也。”可见，宋代习边事者虽称岷江上游异族为蛮、夷，以别于北方的羌，然而在历史记忆中，他们仍认为此地之异族过去是“羌”。

元代岷江上游的茂州、威州、通化，都归“宣政院”管辖。元之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也就是掌管原吐蕃之境及“吐蕃化”的人群。所谓“吐蕃化”的人群，主要指接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人群。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宋、元以来青藏高原东缘各部落人群的统治家族，常自称是吐蕃王族或将领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元朝统治下，此种祖源宣告应相当普遍。无论如何，元朝将茂州、威州、通化划归“宣政院”管辖的意义是：唐代以来逐渐由西方入侵此地的吐蕃文化，被当政者认知并强化而表现在行政空间划分上。然而这并不是说，一千多年来的汉文化影响就此消失，而是它们在新的文化视野中被忽略。因此，元朝政权覆亡后，明代政府在此面对的便是混合着汉、吐蕃与本土文化的一些人群。

在明代中原人眼里，岷江上游人群在文化与认同上的复杂与不明确性，表现在当时文献对当地非汉族群的称呼上。如前所言，当时中原人将原“羌人地带”上大多数地区的异族都通称作“番”或“西番”，岷江上游土著也不例外。如《明史》记载，“黑虎五砦（寨）番反”，“乌都、鹧鸪诸番亦叛”。¹⁷平乱将领之一朱纨，曾写下一篇《茂边纪事》诗文。文中叙事部分，称今茂县深沟、浅沟、浑水沟各寨民众为“番”。然而诗中“山椒归马赋平羌”“委质羌酋累乞盟”等文句，则显示在作者的历史记忆中，仍无法忘怀本地与“羌”的关联。¹⁸在《明史·四川土司传》中，有些地方称白石、罗打鼓诸寨生“番”、黑水生“番”为乱，有些地方则称松州“羌”、松潘“羌民”作乱，更有将土著称作“番羌”的例子。¹⁹在《明实录》中，同一地的土著或称作“羌”或称作“番”的例子更是普遍。无论如何，此时在熟习边事者心目中，“羌民”与“番”之间似乎有一模糊区分——居住在灌县至松潘间，接近城镇汉化程度较高的编户之民，常被称

作“羌民”；叠溪、松潘、黑水等地汉化程度低且常生事的村寨人群，则被称作“生番”或“番羌”。²⁰

由明至清，因着政治权力在本地的稳固与深入，进入岷江上游的外地移民也愈来愈多。他们或是聚居城中的地方政府文武官员、商贾与工匠，或是深入山中垦荒的难民。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文书、文物、建筑、口述——为本地带来许多汉文化与历史记忆。明代宣德年间，茂州城中初次有学校建立。后来虽有毁有迁，此官方学堂一直延续到清代。除了教育城中汉人子弟外，官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也是奉祭至圣先师孔子的场所——所谓“学必有庙”。学校与孔庙则是朝廷礼仪教化的标志。有了官学，自然也有生员学额。起初，学校生员皆是汉人。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也准“羌民”应试入学。

除了汉移民之外，清代本地愈来愈多的“汉民”，是由原来的“羌民”转变而来的。如茂州明代时只有四个“汉民里”，清代道光年间扩大为九个“汉民里”。至于这些“汉民里”是如何出现的，地方志中有些记载。如“新民里”的建置是在乾隆年代。据记载，当时茂州营所属的“踏花”等18寨，寨民“恳请输赋承役”，因此他们被编为“新民里”。²¹道光年间，类似的事再度发生；茂州之大姓、小姓、大黑水、小黑水、松坪等地共58寨要求内属。主其事的官员在对朝廷的报告中称：

各寨夷民等环跪吁求，佥称伊等久慕天朝声教。言语、衣服悉与汉民相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是以一心向化，愿作盛世良民。

无论如何，这58寨被纳入茂州管辖，编入汉民里甲之中，“新编户口考试等事悉与汉民一体”。这便是《茂州志》中所载的“新编四里寨落”的由来。

这些官方户籍上所承认的“汉民”，是否就此成为汉人？对这个问题我无法作截然的答复。因为，对近代岷江上游人群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与了解，松动了传统上我们对于“汉人”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于汉与非汉区分的刻板印象，甚至足以挑战我们在各种族群理论中对“族群”的认知。首先，一些近城镇或官道的村寨居民，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悉与汉民相同”，至少在各种社会记忆可追溯的清末至民国此一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村寨中许多家族，还都自称祖先是来自“湖广”或川西平原的汉人。清代以来的确有不少逃荒的汉人进入村寨，他们为这些村寨所注入的不只是汉人血液，更重要的是可被假借的汉人家族起源记忆。因此，这里许多家族起源的“历史事实”，是一个永远的谜。

然而，即使在客观文化特征、主观认同与本土历史记忆上，他们都是“汉人”，但在清代城镇居民眼里，村寨居民还是“蛮子”。距离城镇与官道较远的村寨人群，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清代以来在此形成的族群体系，使得一群群自称“尔玛”的人被上游村寨人群视为“汉人”而被下游村寨人群视为“蛮子”，如此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族群歧视。而这些村寨，有些属于“汉民里”，有些属“羌民里”。村寨居民在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生活与年节习俗等各方面，都受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此，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汉人”？汉与非汉的界线在何处？

不仅汉与非汉之间的界线模糊，被视为非汉人的“羌民”与“番民”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如，今日理县与松潘都有部分村寨被识别为羌族村寨，但在清末民初时，这些地方似乎没有“羌民”。成书于清末的《直隶理番厅志》中记载，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一带，“汉民”只住在一线官道之中，其他地区民众都被称作“番”；所谓前番、后番、新番、旧番，只是指他们地理位置与归服朝廷的先后之别而已。而且以修撰者的汉人观点，比起理番的杂谷、梭磨诸番而言，威州、茂州的非汉人群为“熟番”。²²我们再由修《松潘县志》者的观点来看，当时松潘七十二土司之族属，在本书中被分为“西番种类”与“博俅种类”两种——也不见有“羌民”种类。²³这部县志由清末修至民国十三年（1924）而完成，可代表此一时期熟悉松潘边事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松潘境内也有“羌民”。显然，“羌民”是在茂州、威州较为人知的一个人群概念。特别重要的是，在茂州有些村里被划分为“羌民里”，并著之于地方志之中，而其他地区并无这样的例子。“羌民里”使得文献记忆与一些真实存在的“人”（一种身体记忆）结合在一起。这个复合社会记忆，是后来“羌族”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范畴的关键。

北川地区 汉晋羌人带上的北川地区，也是当时“冉駹”的一部分，在行政上属汶山郡，广柔县是此一地区中心。《华阳国志》中称，广柔有一地名为石纽，为大禹所生之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谓禹神”。这是有关当地土著的最早记录。然而，这些被称作“夷”的土著，似乎与汉人同样信奉“大禹”。

公元6世纪，南齐在此设北部都尉。梁武帝时又改北部都尉为北部郡。北周于北部郡置北川县。7世纪，唐朝又分北川县之地置石泉县，两县均属茂州，后来北川并入石泉。7世纪后半叶，吐蕃大规模东侵，此时北川地区也陷于吐蕃。整个8世纪，北川都陷在唐与吐蕃拉锯式的

战争之中。直到9世纪初，唐才重新掌握北川。在这段时间中，北川北部白草河流域和西部青片河流域村寨人群，与吐蕃属部在血统、文化与族源记忆上产生相当的混合、假借。这一结果也反映在宋、明时期本地的行政区划与族群关系上。11世纪，北宋政府将石泉县划归绵州，属益州路，而白草河、青片河流域则属威、茂军使与松州管辖。这个行政划分暗示着当时石泉县大多地区人民已成为汉人编户，而白草河、青片河流域的土著仍被视为“番羌”。

在明代，白草河流域之住民被称作“白草番”，有时也称羌或番羌。如此番、羌不分，部分原因可能为此时本地人多信奉藏传佛教，在族源上也常自称与吐蕃贵裔有关。《明史》称，“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云。”“松、茂、叠溪所辖白草坝等寨，番羌聚众五百人，越龙州境剽掠。白草番者，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²⁴这时所称的“白草番”也包括青片河流域的村寨民众。青片河上游向西翻过山梁，与茂县东路各沟来往尚称方便；青片河上游往西北去，可与茂县杨柳沟、松潘小姓沟等地往来。因此明代青片、白草“羌番”，常与茂县、松潘等地之“羌番”互通声气，彼此奥援。

整个15世纪明代北川地区都不安宁。根据文献记载，白草、青片“羌番”时时生乱。此时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北川地区，朝廷军卫城堡的设置深入青片、白草、都坝等河与湔江中上游，这应是“羌番为乱”的真正原因。16世纪前半叶，明将领何卿受命至石泉主持边事。这是改变北川地区的一个历史关键。他是一位手段强硬的军事长才，到任后强力镇压当地的“羌番”之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547年的走马岭战役。此时起兵为乱的“羌番”颇有组织，有总兵、将军等职，可见此时“白草羌番”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无论如何，各寨联军在走马岭（白草河上游的小坝乡一带）被全部歼灭。何卿的部队又乘胜追击，攻破村寨40多个，捣毁碉房4800多座。

此战役之后，除了一些小盗小劫外，当地“羌番”生乱的事很少。相反，中原文献中记载了许多“羌番”如何成为汉人之事。首先，许多土著在被征服后，要求成为编户之民，每年对官府“输纳认粮”。道光《北川县志》云：“在何都督、王巡抚大创之后，青片、白草碉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目前在青片河、白草河，一般所见的也都是汉式聚落，而非累石而成的村寨。“聚落”外观，是一种视觉媒介的社会记忆。因此村寨外观的改变，也加速了居民的汉化。后来，愈来愈多的“羌

番”有了汉姓，延师教子读书之风盛行，百姓也普遍祭祀“白马将军”（何卿）——这些都使得白草、青片河流域的非汉土著文化与认同逐渐消失。这些“文化”变迁及其与北川人之族群认同的关联，将在本书第九章中作详细说明。

在《民国北川县志》中有一个戏剧性典故，体现白草河流域居民的认同变迁。据载，道光时有白草坝番刘某，自幼喜读书，期望由科考入仕。到了应试之日，试官却以其为番民，不准他参加考试。刘某说，自己一直住在汉界之内，有界碑可查。试官答应次日前往勘界。这位刘姓白草番民连夜将原在白草河中游大鱼口之界碑，背到上游与松潘交界处的那纳（山口）。因此在勘碑后，刘某得到应试资格。²⁵“刘自元移碑”的故事在民国时期之北川地方文献中被“重述”，由汉人观点隐喻北川“羌番”如何爱慕、攀附汉人文化，以及由非汉土著观点表现被视为番民或“蛮子”者如何利用、玩弄族群边界，以解脱被“范定”的劣势社会身份。故事也隐喻着汉与非汉族群边界的近代变迁。传述这故事的人，便是在第三章中我所描述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关系下之北川白草、青片流域居民。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自称“汉人”，但被下游村落与城镇人群称作“蛮子”。因而在这故事中，隐含了多重的认同主体隐喻以及“族群边界变迁”隐喻。²⁶

总之，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只有远在青片河最上游的上五寨等地居民，由于居处僻远又与茂县、松潘的村寨居民往来较多，因此在聚落建筑、服饰、风俗上还保留一些本土特色，而且在认同上也无法摆脱“蛮子”身份。然而，汉化的影响仍然深入此处，到20世纪中叶，只有少数老年人能说一点不完整的本土语言。²⁷

五、民国时期民族调查者所发现的羌民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与“藏族”之间的分野，并不是一直都很明确，而是有一个由模糊而渐清晰的过程，这也就是我所称的“民族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外来人士——如本国边政官员、西方学者和传教士、从事西方新学术研究之本国学者——与城中的本地知识分子，带着新的“民族”与“文化”概念，深入观察并描述村寨居民。他们因而获得对本地村寨居民之新知，包括分类命名及其历史与文化。这些新知通过文献、口述等社会记忆媒介，成为一种民族常识，影响官方对岷江上游人群的识别与分类，也影响本地人的自我认同。由于此时“汉

人”与本地知识分子已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化洗礼（特别是国族主义），因此这个羌族化、藏族化与汉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在这一节中，我将说明清末到民国的二三十年间，羌民成为羌族以及羌族与汉族、藏族之分逐渐清晰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及的几部地方志，其中部分内容便代表清末民初时期边政官员及地方士绅对岷江上游人群的认识。由西番种类、獐獐种类、羌民等称号看来，他们可能比过去任何正史编撰者与异域游记作者，更能深入了解本地非汉人群。但这些基于本地汉人生活经验的了解，仍无法摆脱许多偏见。无论如何，中国地方志修撰有其因承关系，后志都常在前人所编志书或所遗资料的基础上作编修。茂州、汶川、松潘、理县等地之方志也不例外。1920至1930年代，这些志书上所表现的族群分类观念，在当时民族调查者眼中已算是落伍了。

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及1915年前后在羌民地区传教及作民俗调查的陶然士。他根据自己的西方“民族学”知识，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与汉人及土著的口述，以及根据他在此多年的观察，得到对当地人群的认识与相关族群分类概念。在其1920年出版的有关羌族的书中，他认为川西的民族有羌、□□、戎、西番；在1937年出版的另一著作中，他将戎改为嘉绒，又加入黑水、瓦寺等民族。由此可以看出，那时学者们对“民族”分类的看法很混乱，且与今日有相当不同。

当时羌族的范围，据陶然士描述，主要是在汶川、理番、威州、茂州、叠溪、松潘，少部分在龙安府，还有部分有待考察的羌族分布于甘南、川北。²⁸他还指出，武都的羌人已经汉化，川滇之交的越嶲羌人也很衰微。²⁹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羌”的概念。他也根据亲身观察，来区别“羌民”与其他民族之不同。譬如，他指出以“戎人”（嘉绒）为主体的理番五屯中“九子屯”为羌民。³⁰此认知显示他对当地语言、服饰及其他文化表征有些了解。然而，这些各地人群之文化区分固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存在一个以语言、体质、文化来界定的“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驱使他寻找、研究、强调“羌民”与“戎”或“汉人”之不同。³¹无论如何，陶然士及其羌民助手的传教与民族调查活动，不仅使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得知本地有“羌族”存在以及那些是“羌族文化”，也让许多土著知道自己是“羌族”——因此在客观文化与主观认同上都使“羌族”这一范畴逐渐具体化。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进入岷江上游驻军屯殖，并建立“屯殖督办署”。他们留下了一份尚未完成的，名为《松、

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的资料。³²由这份资料看来，“屯殖督办署”为一集军事、民政与经济开发于一身的机构。这些军方或受军方委托的调查者，显然在某些方面比“地方志”编撰者更能深入了解土著社会，而且在资料搜集与书写体例上，他们并不需因循从前的方志。因此，这份资料虽然简略，却保留了一些关于本地社会的深层信息，如关系当地权力结构的各土司间的历史恩怨与婚姻关系。更重要的是，此资料中所呈现的民族分类概念以及此民族分类概念与目前民族区分间的“落差”，是探索“民族化”过程的关键。

调查资料中“户口”一节中记载，屯区中的“民族”有汉族、回族、羌人、夷人、归流夷人与西番人。有趣的是，在同一节里的“各民族众寡比较图”中，则分为土著汉人、客籍汉人、回人、归流夷人、羌人与西番。而且在随后的“民情异同一览表”中，对于以上各“种族”的性情及职业都有描述。这种民族分类，与目前我们所熟悉的岷江上游民族分类——汉、羌、藏、回——有相当差别。那么，究竟“土著汉人”“归流夷人”或“羌人”等指的是当今那些人的祖先？我们可以从资料所记载各种族的民情、职业、风俗，与其分布区域等信息来探究。

在做此分析探索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资料中“民情异同一览表”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客籍汉人“性情不一，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等等。从今日我们的民族知识来说，以主观的“民情”及易变的“职业”来描述各个民族，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由各种“客观学术”所建立的民族语言、体质、文化等分类资料尚不可得，书写者采用本土汉人观点来描述各个“民族”，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事。由我在田野采访中所得的认识，也说明以上这些对各“民族”的描述，是过去曾存在或目前仍流行于当地汉族、羌族中一种对“异族”的刻板印象。由此，以及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此调查资料与当今民族分类之异同。

首先，汉人被分为两种：土著汉人与客籍汉人。客籍汉人，本资料记载，以“安岳、绵竹、灌县、北川、安县等地人为多”，他们“多营商业，间以手工为业”。这些人是由外移入的汉人，较无疑问。资料中称土著汉人“质朴、怠惰，多务业农”，原文并有“浑厚”“性喜洁”等语，后来被编撰者删去。当今只有绵麓以南有汉人的农村聚落；绵麓及自此以北的汶川、茂县农民，皆为羌族或藏族。而且，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及，老实、质朴与洁净，都是当今许多羌族自我宣称与展现的本质特征。

其次，调查资料中称羌人，“性质尚良，概以农牧为业”，“以茂县西

路与松潘东路为多”。“性质尚良”应是指，以资料书写者之观点来说，他们的性情本质处于较剽悍的西番与质朴的土著汉人、归流夷人之间。由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这指的是当今部分羌族的祖先，特别是住在岷江西岸各沟（茂县西路）与松潘官道沿线（松潘东路），过去不属于土司管辖的村寨人群。至于过去受土司管辖的村寨民众，则大多被视为“归流夷人”。“以茂县西路与松潘东路为多”之语也显示，当今汶川与理县大多数羌族之祖先，过去因被当作“土著汉人”，因而不包括在这资料里的“羌人”之中。

“性质诚朴，多以农牧为业”的“归流夷人”，其分布以“松潘东路与茂县为多”。也就是说，他们与羌人一样的以农牧为业，但似乎在汉人眼中其性情比羌人还要良善。然而，由于调查资料曾提及“夷人”使用番文、番语，因此“夷人”之称又说明汉人调查者认为他们与“番人”，也就是今日的藏族，关系较近。岷江上游各土司常自称是吐蕃名门后裔，“嘉绒藏语”又是土司间的共同语言，可能因此在改土归流后，其子民被称作“归流夷人”。事实上，各土司的子民不一定是说嘉绒语的土著，譬如，瓦寺土司之属民便有“土民”与“羌民”之分。再者，如今茂县并无说嘉绒语的村寨。因此所谓“归流夷人”，至少在茂县的这一部分，应该也是今日羌族的祖先，也就是过去长宁、静州等土司之属民。

西番兼指务农的嘉绒藏族（又称熟番）与游牧的草地藏族（又称生番），而“强悍好胜，职业不一”的回人便是今日之回族，这些都较无疑问。在“风俗”一节中，此资料又有对各族群特色的简单描述：

汉人多从内地移住，礼仪习尚与内地无大差别。回人亦由各地移来，仍保持其宗教信仰，类皆勤俭浑朴。夷人风俗则与内地悬殊，习汉文汉语者少，多用番文（即藏文），语言亦用番语，即唐古特语。然以地方不同，则各有土音，于是有西番话、鸦绒话等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羌人”与“归流夷人”的语言及文化无只字片言的介绍。这应是由于，当时的“羌人”与“归流夷人”汉化程度相当深，以至于调查者难以描绘其民族特色。在后面有关“羌族文化”的篇章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民族调查者在找寻“羌文化”上的困顿与挫折。

1920年代末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等人，至松潘、汶川一带作民俗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西番与杂谷民族。对于羌民，报告中记载，“不仅汶川境内有他们的人，

在茂县、理番、石泉、安县各处，他们的人也不少”。他们又指出，西番与土民都是“西藏民族的一支”，其语言是“西藏话的方言”，只是土民大多已完全汉化。报告中对杂谷人描述较少，只称“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种吗，还是和土民同种，我们不敢断定，我们权当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暂给他们一个杂谷民族的名称”。由以上黎光明等人对岷江上游各民族的描述，可以看出因为“语言”，某些族群已被他们划为“西藏民族”的一部分。事实上，此时尚无人对这地区的土著语言作研究、分类；所谓“语言”，不过是黎光明等人的主观认知而已。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民族分类概念中，今天大部分理县羌族的祖先被排除在“羌民”之外。

1930至1940年代，有些学者与团体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进行各种学术考察。其中，美籍学者葛维汉对此地区人群做了较深入的民族学研究。由他的著作看来，当时他心目中羌民的分布，是由今茂县叠溪到汶川之索桥，主要是在岷江流域与杂谷脑河流域。这个“羌民”分布范畴，与当今羌族分布相比，并未将茂县叠溪以北地区与松潘东南的村寨人群包含在内，也未包含北川地区之羌族。再者，葛维汉似乎也没有将黑水河流域的村寨人群视为羌民。事实上，葛维汉虽认定“羌”是一个民族，但他注意到在语言、文化上羌民深受汉人的影响。因此他指出，羌民是一个逐渐被汉人吸纳的民族。即便如此，他心目中的“羌民”，主要只是岷江与杂谷脑河流域较汉化的人群而已。

葛维汉在其著作中，曾感叹羌民研究的难处。他说：

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乐于供给一些虚构不实、投询问者所好的回答，以及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别，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难。

他的感叹应是由于他在做调查时，有些羌民告诉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认为，这是本地人受陶然士教导，而他们又敬重陶然士而不愿拂其意的结果。他的感叹也是由于，他注意到各地羌民的语言、风俗习惯有相当差异，此违反其“一民族应有其共同语言、文化与历史”之民族学常识。特别是，他认为历史造就这个民族，而土著自身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这个“民族”概念，与相关的“历史”概念，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同信念。19世纪末自西方传入的国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民族”概念，此时在中、西知识分子间已成为一种常识。因而此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目标便是找寻一民族典型之体质、语言、文化；察觉其中有混杂、混淆等种种困难时，便以文化假借（borrow）、涵化（acculturation）等来

解释此混杂现象，以还原一个民族固有的体质、语言、文化特色。

1930至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民族考察的中国学术群体或个别学者，包括受教育部委派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及语言学者闻宥、民族学者胡鉴民等。同样地，“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调查成员们也困惑于“羌民”文化的混杂性。因此在语言范畴等同于民族范畴的概念下，他们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他途可准”。他们的确也作了些初步的语言调查。于是在他们心目中，羌族不只包括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羌民”，也包括黑水河上游麻窝一带的村寨人群（今为藏族）。³³

胡鉴民心目中的羌民范围，只分布在理番、茂县、汶川一带。在他看来，当时的“羌民”文化是羌人文化与汉人、戎人文化的综合体。他认为，当前羌民的文化混杂性，说明此民族曾经历一个长期的迁徙过程。他提及体质学、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但他并非以此界定“羌族”的范围，而是以这些学科来说明“羌民”与“西藏民族”间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学者闻宥已证明羌语为藏语之一支；他自己则由历史上氐羌民族的迁徙及其经济形式，与“文化人类学”之“文化区”观点，将羌民归入大西藏文化区之内。³⁴

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汶川、理县一带做调查，其报告中还包括麻窝、芦花的人。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他指出，“汉藏语族（Sino-Tibetan）之研究，在今日尚极幼稚”，因此他希望了解此语族中各系、各支间的关系。他注意到“羌语”的重要性——“惟在川甘之交，别有藏缅系之一支名羌语，不第为生存之活语，且保存若干极古之特征。”³⁵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无论如何，他认为《石泉县志·輿地志》所附“番译”是羌语以及他将黑水芦花等地语言视为羌语，对于寻找“羌族边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³⁶闻宥的羌族语言调查，虽然未及于他心目中所有岷江上游的羌人聚落范围，但无论如何，“羌族”之存在及其分布范围，逐渐有了所谓客观、科学的依据。

至此，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学者的研究与描述下，“羌民”或“羌族”已成为一毫无疑问的“民族”范畴，剩下的工作只是通过更精密的语言、文化调查与分类，来确立羌族的边界而已。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文化篇”中说明。

六、华夏边缘的本质及其变迁

综合本章之讨论，我们可以简述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如下。在华夏逐渐形成过程中，华夏心目中“羌”的异族概念，随着愈来愈多的西方族群融入华夏而持续向西迁移，最终移至青藏高原的东缘，这是汉晋时期汉人或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唐代，吐蕃王国兴起与东侵，以及其宗教、文化的持续影响，使得愈来愈多的西方异族被汉人称作“番”“蛮”，华夏心目中的“羌人地带”逐渐萎缩。在明清时期，“番”与“蛮夷”成为汉与非汉间截然分明的族群边界；早先以“羌”为代表的模糊华夏边缘，只存在于岷江上游与北川之间。清末以来，在包含华夏或汉族与其边缘四裔的中国国族（中华民族）建构蓝图中，岷江上游的“羌民”与其他旧羌人地带上的各非汉族群，成为国族边缘之少数民族。最后，在近代以来之历史、体质、语言、文化调查研究下，“羌族”终成为一个有具体内涵与边缘的民族范畴；在本土知识分子对我族历史文化的學習、探索与展示推广中，羌族也得到基于主观认同的民族生命。

以上是我由华夏边缘观点所重建的“羌的历史”。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它的主体为何？它与前一章所分析、解构的国族主义之下的“羌族史”有何不同？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对于当前作为少数民族的羌族，以及汉族或中华民族，有何新的理解？显然，这个历史中的主体，不是一个在时空中迁徙、繁衍、绵延的“非汉民族”，而是一个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概念。这个异族概念——羌，随着华夏与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往来互动而变迁。因而，在此历史中延续的，也是一个核心与边缘人群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历史中，华夏与其“边缘”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羌族形成过程的历史，也是许多华夏与藏族形成过程的历史，因此由“华夏边缘”之历史，我们也可以对羌族、藏族与汉族（华夏）之族群本质有一基于历史人类学的新了解。

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由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历史与文化书写，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行动来体现与达成。有关羌人文化和历史的书写与再书写，被“羌人”阅读，因此也影响这些边缘人群的自我认同。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华夏便不断书写边疆人群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华夷关系。由此角度来说，当前“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是这个书写传统的最新阶段，也造成一新的华夏边缘——羌族。如此，边缘观点下的“羌的历史”显然不同于说明“羌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典范羌族史，但这并不表示“羌族”不存在于历史之中。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羌人”，数千年来在华夏西部边缘为生存奋斗。他们在中原王朝与吐蕃、西夏、南诏的战争之间挣扎，为了生存，他们接受、选择、建构各种版本的“历史”，因此他们有些成为汉人移民的后裔，有些成为吐蕃贵族的后

人。最后，在古代中国汉、藏（吐蕃）政治与文化的扩张、挤压之下，只有岷江上游与北川西北一隅深度汉化但又被视为“蛮夷”的羌民，成为汉与“番”之间最后的模糊边缘。在近代中国国族主义发展下，羌族作为一少数民族而存在，“羌族史”的建构可说是华夏边缘的一新规划。在此新边缘规划中，过去“羌人地带”这条华夏边缘，仍是划分藏族、彝族、羌族与汉族间的界线。然而在这条线上，“羌族”及“典范羌族史”是一道门；通过这道门，汉族与藏、彝等民族可以联系在中华民族之中。

当代民族识别与分类，在过去的“羌人地带”上，基本上沿承着汉人心目中羌、番、夷的区分概念。在此地带上去被称为“番”的，其后裔大多被归类为“藏族”，成为460万藏族中最东边的一部分。在此地带的南端，过去被称作“夷”的人群，其后裔如今被识别为“彝族”，成为660万彝族最北边的一部分。而“羌民”成为羌族，人数仅约20万，且不见于别处。羌族人数虽少，但前述“典范羌族史”说明，汉族、藏族、彝族及许多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谓氏羌系民族）中都有羌族的成分，因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中的兄弟民族。羌族成为了汉、藏、彝与广大“西南氏羌系民族”间的黏合剂。羌族也颇以此自豪，他们常说，我们羌族是藏族、彝族的祖先，或说羌族是比汉族更古老的华夏族。“典范羌族史”虽然可发挥民族团结的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这“历史”也借由书写民族间的战争、征服、驱逐、迁徙，来将当前国族结构中的核心与边缘区分合理化。

无论如何，羌族的确是个重要的民族；重要的是“羌”这个族名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以及此记忆所蕴含的历史过程。经由“羌人地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了解华夏与西部异族之间曾有一个漂移的、模糊的族群边界。由华夏边缘观点的历史来看，发生在边缘的战争、仇恨固然都是事实，然而华夏边缘有地理上的漂移，相关的文化表征与人群认同也都因时变化。可以说数千年来，此核心与边缘一直在调整、谋求相处之道。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岷江上游村寨人群并非仅为华夏边缘。自唐代以来另一个核心——吐蕃与其佛教文化——曾将它的边缘由西向东推移，在明、清时也将部分岷江上游人群变成其边缘。再者，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又企图将这些羌民变成另一个边缘——以色列人的后裔、基督教文明人群的边缘。造成在20世纪的前半叶，有些羌民自称是吐蕃后裔，有些自称是以色列人后裔，有些自称是汉人或羌人后裔。因此，羌族成为新的华夏边缘，还经历了一种边缘论述覆盖另

外两种边缘论述的过程。无论如何，相较于华夏的历史论述来说，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核心与藏传佛教文化核心的历史论述相当微弱。这也是为何岷江上游“羌民”今日未成为藏族，也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东亚以色列民族的原因。³⁷

在这一章中，我所述的是一个华夏边缘观点的“羌的历史”。事实上，在此历史中有一个关键尚未被提及，即历史上“羌人”的自我认同与本土历史记忆。在本章中，除了略述清代以来北川羌人之认同变迁外，我并未对此多作说明。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中国历史上“羌人”之本土认同与其本土历史记忆资料。虽然如此，由近百年来的地方文献、学者们的田野采访以及今日羌族之记忆，至少我们可以重建20世纪上半叶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居民之自我认同、历史记忆及其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外人赋予的历史记忆。他们有自身的历史记忆，同时也采借、修饰来自外界的历史记忆。过去华夏对异族的历史与文化书写只流传在华夏之间，以强调“蛮夷”的异类本质。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如今“羌族史”书写不只是为了让汉族阅读，也为了让羌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阅读。国家教育与各种传播媒体（包括民族学者），将民族知识传入各个村寨之中。当羌族阅读各种核心群体建构的“羌族史”，并从中得知其民族生命与认同之后，他们也开始写自己的“历史”。这个过程涉及人群间许多神话、历史与文化的争辩、修订与建构。

- 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36—137页。
- 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八章。
- 3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第583—624页。
- 4 “播巴”是卫藏各族群最大范畴的共同自称词。
- 5 如《新唐书》中记载，吐谷浑“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 6 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79—190页。
- 7 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73页。
- 8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
- 9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 10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5-12；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00—101页。

- 11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
- 12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一》。
- 13 （清）张澎：《蜀典》卷一，《堪輿类》。
- 14 北川之青片地区，在明清时期曾隶属茂州、松潘厅或叠溪营管辖。
- 15 冉光荣等：《羌族史》，第174—179页。
- 16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四》。
- 17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一》。
- 18 （明）朱纨：《茂边纪事》，《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 19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一》。
- 20 《明实录》卷一三八二、一三八九、一四三三、一四三六、一四三九。
- 21 （清）杨迦恻：《茂州志·里甲》。
- 22 （清）吴羹梅修，（清）周祚峰纂：《直隶理番厅志》卷四，《边防夷俗》。
- 23 由寨名及地理位置追探，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大姓云昌寨土司”与“珙竹寺寨土司”属下有許多村寨民众，其后裔现在说的是“羌语”，也是“羌族”。
- 24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一》。
- 25 杨钧衡等修：《民国北川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第524—525页。
- 26 相反地，当前羌族知识分子重述这些故事，是借此记忆证明北川人原来就是“少数民族”。
- 27 上五寨等地残存的这一点“羌番”根子，在后来北川之羌族认同“恢复”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过程详后。
- 28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5.
- 29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p.20.
- 30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3.
- 31 譬如他说，土著宣称他们的语言不同于“戎人”（Rong）与“藏人”（Tibetan）的语言；见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5。但据我的田野调查，老一辈“尔玛”过去只是认为，他们的语言与“赤部”或“识别”不同；他们心目中并没有羌族、戎人或藏人的概念。而“赤部”与“识别”虽主要指今之嘉绒藏族、黑水藏族与草地藏族，但也经常包括今日“羌族”的祖先。见本书第三章有关“尔玛认同”的说明。
- 32 本文所引为手书稿本，《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汶川县志办公室藏；另有一修改后的版本，见张雪崖：《松理懋茂汶屯殖区现状》，《开发西北》第2卷第4期，1934，第19—39页。
- 33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

- 34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43—44页。
- 35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期，第58页。
- 36 虽然黑水芦花以东人群后来被识别为“藏族”，但其语言在语言学上仍被认为是“羌语”。
- 37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西方学者或传教士都曾欲将“羌民”变成西方人的后裔，或者所有汉人学者都强调“羌民”与汉族间的亲近关系。至少，葛维汉曾反驳陶然士以羌民为以色列人后裔之说，而胡鉴民从经济生态角度，则认为羌民是在西藏民族文化圈内。

第七章 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异族本土观点历史的资料极少。这些少数的“土著历史”，又常在汉文化的历史理性下，或经记录、书写者的转译、修饰而扭曲，或被归类为“神话传说”而受忽略。然而，这些“不真实的历史”或“神话传说”并非没有研究价值。对于一族群所宣称的共同起源，我们不只是想知道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更想由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历史记忆）与表述，也就是由历史叙事（narrative）与文类（genre）中了解造成这些记忆与表述的社会与历史本相（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认真思考、探索“土著文化”的学者，也常陷于一种学术想象之中——想象、寻找与建构一全然不受外界影响的土著社会。成书于战国时的《国语》，记载了一段一位被华夏认为是“戎”的异族领袖所说的话。这位“姜戎氏”说：秦惠公说，我们这些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如果此记载确实，这显示当时的秦人或华夏曾建构戎人的族源，并将此记忆播入与他们往来密切的戎人之中。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土历史”？接受、融会外来历史知识后，土著所相信的历史是否还算是本土历史？对此，我的观点是：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或纯粹的“土著”，也没有不变的、单一的、可免于外界影响的“本土历史”。在与外界接触中，“本土历史”有其变易与多样性，也因此造成一个族群本质的不断变迁，其内部各次群体间的结构特质也不断变化。

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戈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地后，由于一些神迹而使得土著臣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象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进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¹。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²《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羌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段历史叙事说明了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

传统之一。

我们不清楚历史上有多少被称作“羌”的人群曾接受这些历史记忆。但至少魏晋时期，许多迁入关中的羌人豪酋家族自称是“黄帝之裔”而非“炎帝之裔”。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³钳耳家族，自称祖源为“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⁴。另一关中羌人巨姓——党姓家族，也自称是夏后氏之后。⁵无论是大禹之后、高阳氏之后、夏后氏之后、有虞氏之后或某位周王子之后，在文献所蕴含之社会记忆中都是黄帝有熊氏之后裔。这些例子显示，以上羌人世家大族都假借一些华夏历史，刻意忽略一些华夏历史，并遗忘本土历史记忆，以将自己变成黄帝后裔。他们借此成为华夏的一分子，也造成前章所述的华夏边缘的漂移与变迁。

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在接受“羌人”这个称号而自称“羌人”，或假借华夏祖源而自称“汉人”之前，他们的本土认同体系为何？以及什么样的“本土历史”支持这样的本土认同体系？什么样的新“本土历史”，使“羌人”新的本土认同体系合理化？由于古史中羌人自身记忆缺乏，除了前引汉晋时期关中羌人世族的例子外，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羌人地带上的最后羌人”——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村寨人群——之本土历史记忆与认同及其变迁，在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被华夏视为“羌人”者，在成为“羌人”之前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体系，及“羌人”如何接受、选择与糅合外来知识以建立新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以及这些新、旧历史记忆所隐喻的族群本质及其变迁。这些“本土历史”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历史”？

关于后一问题，我先作一些说明。有悠久文字历史书写传统的人群，譬如中国人，其历史书写传统是足以自傲的文化财产。中国人有一种历史心性，及因此产生之历史概念，借此，人们相信某些“过去”是真实的、重要的。也根据此种历史心性与历史概念，人们认为许多落后人群没有“历史”，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述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神话与传说”。然而，如果思考汉代以来中国之“正史”书写以及近代“民族史”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历史建构中，“过去”被选择、修饰与遗忘的痕迹。我们可以说，真实的“过去”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然而人类社会对“历史”的记忆与描述，却是有特殊社会意义的建构。此种社会意义主要在于表现一个群体的本质及其内部区分（文化史），凝聚一个群体的团结并阶序化各次群体（民族史），诠释群体存在的周遭世界并合理化人在自

然界中的地位（自然史）。以此而言，许多被我们视为神话与传说的“过去”叙事，在某些社会人群中也有同样的功能。因此，当谈到“本土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书写传统之社会人群的本土记忆时，我们对“历史”应有更宽广的定义。

一、根基历史

由前面两章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典范的“羌族史”与“中国史”都可以被视为一些凝聚族群的集体记忆。“历史”，特别是与人群“共同起源”有关的历史——如对中国而言的“黄帝”——在强化族群感情上具有特殊的魔力。⁶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们，以“同胞”或以英语“弟兄姊妹”（brothers and sisters）相称，这显示人类的族群或民族，是仿真最小、最亲近之亲属群体——出于同一母亲的群体——的一种社会结群。因此，“共同起源”的历史记忆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仿真并唤起族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我们可称之为“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这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在本书社会篇中，我曾介绍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人群在成为羌族之前的族群认同体系——以家庭、家族与村寨或沟中人群为主体的“尔玛”认同。在本章中，我将要说明的便是支持此族群认同体系的“本土历史”，它也是一种以“人们的共同起源”来凝聚族群的根基历史。这种根基历史，主要以一种“弟兄祖先故事”的叙事形式来表现。

二、村寨中的弟兄祖先故事

本书第三章介绍了羌族的村寨结构与相关的认同、区分。我曾提及，在这一地区凝聚一个家族、村寨与各沟人群的“过去”，经常是一些“弟兄祖先故事”。弟兄祖先故事的基本形式为：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他们就是几个人群（家族、寨子与沟中人群）的祖先。在此种叙事中，共同的祖先（过去几个弟兄之一）凝聚一个人群；几个人群又因为相信彼此的祖先有“弟兄关系”，因此也凝聚在血缘关系之中。以下我举一些各地的例子，来介绍这些“弟兄祖先故事”以及它们间的表述差异，并分析、说明此模式与表述差异背后的社会情境。

北川小坝乡 在所有当今羌族中，北川羌族的汉化程度最深。甚至

于由他们所宣称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再思考究竟应如何定义“羌族”。关于祖先的来源，在北川的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最流行的说法便是：几个兄弟从外地来，后来便分成当地几个有汉姓的家族。如以下白草河小坝乡内外沟一位中年人所言：

1. 我们老家是从白羊迁出来的，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姓董的、姓王的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内沟的人三分之一是从白羊出来的。上沟原来没人，羌族喜欢砍地，烧了开荒。看到了冒烟子，亲戚都来了。人多了，也不怕野猪、猴子来吃粮食。其他的都是逃荒由外地来的。我听过原有五个兄弟从松潘毛儿盖那过来，五个人各占一个地盘，我记不清楚了。

白羊在北川的北方，目前其本地族群被识别为藏族。松潘毛儿盖，目前也是藏族地区。无论是说本家族来自白羊，或本地人起源于毛儿盖，都是在强调本家族的“少数民族”本质。在以上口述中，强调本家族来自“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此所显示的情境，便是近年来北川羌族知识分子强烈的羌族认同。小坝乡的内外沟共有五个村。这位中年人并未说明，“从松潘毛儿盖过来的五弟兄”是否便是这五个村的始祖。相反地，他认为除了姓董、姓王的以外，本地其他家族都是“逃荒由外地来的”。外地逃荒来的，指的是川西汉人。

由于明、清以来的汉人移民潮以及因此带来的深度汉化影响，许多北川山间的汉姓家族都宣称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此地的。如另一位小坝乡杉树林人所述的家族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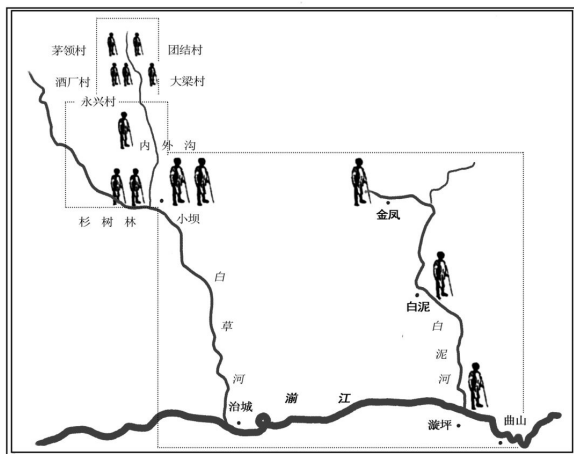
2. 小坝乡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特别我们刘家在小坝乡，最早，听我祖祖说，就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当时是张、刘、王三姓人到小坝来，过来时是三弟兄。当时喊察詹的爷爷就说，你坐在那儿吧。当时三弟兄就不可能通婚，所以就改了姓。刘、王、龙，改成龙，就是三条沟。一个沟就是杉树林，那是刘家。另一个是内外沟，当时是龙家。其次一个就争议比较大，现在说是王家。这三个沟，所以现在说刘、王、龙不通亲。三弟兄过来的……

小坝乡的杉树林，位于内外沟的沟口。一方面，本地居民与内外沟各村民众往来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对外接触、联系方便，因此本地居民比起上游内外沟村民，更有汉人特质与汉族祖源记忆。说本家族是“湖

广填四川”时来的，这在整个青片、白草河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家族史记忆。这位中年人口述中的“三弟兄”，其“后裔”分布在内外沟、杉树林等地，包括了小坝乡的所有主要地区。他提及了一个有争议的“弟兄祖先”，他说，现在大家认为这是王家的祖先。这个口述显示，本地过去的“历史”或家族记忆，常常在人们的争论中。“王家”在当地是大姓。因此，将王家纳入这个族源记忆，可能将此“三弟兄后代”之范围由内外沟扩及更广大的地区。下面是一位内外沟王姓中年人所说的本家族来源，也是一则“弟兄祖先故事”：

3. 我们是湖广孝感过来的，五弟兄过来，五个都姓王，主要在漩坪、金凤、白泥、小坝。这五个兄弟，两个到小坝：一个在团结上寨，一个在这里。我们祖爷是行医的，我们家还保留个药王菩萨。过来五辈了，这是五辈以前的事了。他们都不是湖广过来的，因为只有我们一家在七月十四过七月半。他们也说是湖广过来的，但他们跟我们过七月半不一样。

这位内外沟人与前面例1那位内外沟人同村。这位报告人所属的“王家”，就是前面例1内外沟人所说的“王家”，也是例2杉树林人所称刘、王、龙“三弟兄”中的“王家”。但例3这位王家的人，并不认为本家族祖先为来自松潘白羊或毛儿盖的五弟兄之一，或是来自湖广的刘、龙、王三弟兄之一，而说是来自湖广孝感的王姓“五弟兄”之一。这五弟兄来此，两个在小坝，另外三个分散在漩坪、金凤、白泥等邻近乡镇（见图十四）。这个祖源记忆，强调内外沟两个王姓家族的一体性，也强调内外沟王姓家族与邻近乡镇王姓家族的同源关系。同时，不接受前两位小坝乡人的王家祖源论述也显示，他不认为内外沟或小坝的几个主要家族有共祖关系。



图十四 北川小坝内外沟弟兄祖先空间分布

以上这三段“家族史”论述，显示出几个有趣并值得深思的现象。首先，三个小坝乡人口述中的本家族历史，都是以几个“弟兄祖先”为起始，如此他们不只是讲述本家族的来源，也讲述与本家族有弟兄祖先关系的邻近家族之来源。其次，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王家”的来源，但说法都不同。显示在当地这种“历史”相当分歧、多元，各家族、各村的人说法不同，同一村中的人也常说法不一。再次，“家族史”在此似乎与个人的“认同”或当时他所要强调的“认同”有关：例1中的内外沟人，强调内外沟几个主要家族祖先有弟兄关系；例2之杉树林人，强调小坝乡几个主要家族间的血缘关系。以上两者，都将“血缘认同”与“地缘认同”结合在一起。有亲近地缘关系的几个家族，借由祖先的弟兄关系可成为“一家人”。然而在例3这位王家人所说的家族史中，强调的则是“血缘认同”——王家的人不与本地其他各姓家族共祖，而只与本地或远方的王姓家族共祖。如此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这些本地家族记忆是如此的分歧、多元。

最后，在以上几个“弟兄祖先故事”中，这些家族（或本地人）或说是从“湖广”来的，或说从松潘的白羊、毛儿盖等“正宗少数民族地区”来。此分歧、多元的记忆表现出北川羌族认同之特质：一方面，他们自豪于本地人之汉化和家族的父亲系汉人祖源，以摆脱“少数民族”在主流社会中之负面形象；另一方面，在努力争取羌族认同的情况下，并在土著文化尽失所产生的文化与认同危机感之下，他们又必须强调自身的少数民族“根源”。此分歧、多元的记忆也表现了北川地区所经之历史过程，这便是在前一章中我所提及的，华夏边缘观点的“羌之历史”。经此历史过程，清代以来本地白草、青片居民一直徘徊在汉与非汉之间。

茂县永和沟 由北川青片乡西向越过土地岭梁子，便是岷江流域的茂县永和乡。该乡所在的永和沟，是由东往西流入岷江的一条支流。乡政府所在的永和村，是个靠近河坝（河谷台地）的村子。这个村目前包括四个组（寨），其中二组又分为上、下寨（其本土名分别为“瓦达”与“嘎劳”）。永和村各寨中也流传着兄弟故事。据一位二组下寨的老人说：

4. 我们是搬来的。老家是渡基。那边地硬得很，一般的娃儿不说话，哑巴。一个传说，背到这个梁子这，听到老鸦叫，学老鸦叫就会说话了。过来时就只有我们那一组人。走到那，老鸦叫了，娃儿就说话了。这边几个组几乎都是那来的。这儿原来没有人，根根是这样扎的。渡基是高山，两弟兄，大哥在渡基，兄弟到这来。现在又搬一些人回去了。原来那已没有人住了。垮博（一组）跟这里的人（二组下寨）是从那来的。

“垮博”的一位老太太，也曾对我说过类似的“历史”：

5. 我们一组也说是渡基那迁过来的。我们也说走到金个基那个梁梁，小孩听到老鸦叫就学老鸦叫，听到狗叫就学狗叫……他们说上寨是大哥，就是得牛脑壳。一队得的啥子？三组是得牛尾巴，道材主得的是牛皮子。他们现在骂三组，就是骂你们是牛尾巴。道材主被骂夏巴，夏巴就是牛皮子。上、下寨都是二组，我们得牛脑壳。

以上二组下寨老人（例4）认为，一组与二组的人同出一源，他们与渡基的人是“两兄弟”的后代。然而现在村民们的看法，大致如那位“垮博”老太太（例5）所说的“三弟兄故事”：“三弟兄”来到这儿，得牛头的到二组上寨去，得牛身子的到一组，得牛尾巴的到四组（勒窝）或三组（甘木若）。一组与二组下寨的人，则由二组上寨分迁出来。或说，得牛皮的到“道材主”，这是最邻近永和的另一村。关于最早的“三弟兄”究竟是哪些人的祖先，一位八十余岁的一组老人对此有不同的记忆。他说，这“三弟兄”分别到一组与二组的上、下寨，也就是当地人称的“河坝三村”。一组得牛尾巴，二组上寨得牛头。他的说法，与二组下寨老人（例4）的说法虽有些不同，但都在强调一组与二组居民间的密切血缘关系。除了这两位老人外，其他我访问过的村民，都相信“三弟兄”的后代是所有四个组的人。

这样的祖源记忆差异，也许由于不同世代村民的“我族”概念有别。过去一组、二组村民（河坝三村）是相当孤立的“族群”，那时“弟兄祖先故事”用来强调这两个组、三个寨子人群间的血缘关系。近数十年来永和沟各村寨人群间的冲突减少，包含四个组的“村”级行政划分又扩大了河坝三村民众的认同范围，村民们便将“三弟兄祖先”扩大为永和村四个组民众的共同祖先。一组与二组的人，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如此，认同圈虽扩大了，但一组与二组的人仍宣称彼此有特别紧密的同源关系。

虽然同样以“弟兄祖先故事”诉说人群的共同祖源与人群间的血缘区分，但永和与前面北川小坝乡的弟兄祖先故事有几个重要差异。首先，小坝乡的弟兄祖先故事说明的是几个“家族”的起源，永和的弟兄祖先故事说的则是几个“村寨人群”的起源。其次，小坝的弟兄祖先故事只说明本地“部分”家族的起源，而非解释“全部”本地家族的共同起源，他们认为本地各家族来此有先后之别。永和的弟兄祖先故事，无论是解释“一组与二组人”的起源，还是永和村四个组村民的起源，都是“全部”本地人的共同起源。

这些“差异”显示两地有不同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此情境、脉络主要指他们与汉人及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两地村落人群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深浅有别，因此造成他们在族群认同上的差异。如本书第三章中所言，过去他们虽然都被“汉人”称作“蛮子”，北川白草、青片的山村居民常自称本家族为自“湖广”迁来的汉人，而茂县永和的村寨居民们则坚持“莫儿”认同，以此区别于他们心目中狡猾的“汉人”与野蛮的“蛮子”。以上两地“弟兄祖先故事”之叙事差异，表现“汉化”此一文化与社会过程中的重要变化——由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族群（村寨）认同，转变为血缘与地缘逐渐分离的族群（以姓为别的家族）认同，因而解释全部本地人来源的“历史”转变为解释部分本地人来源的“历史”。在本章后面，我将再回到这一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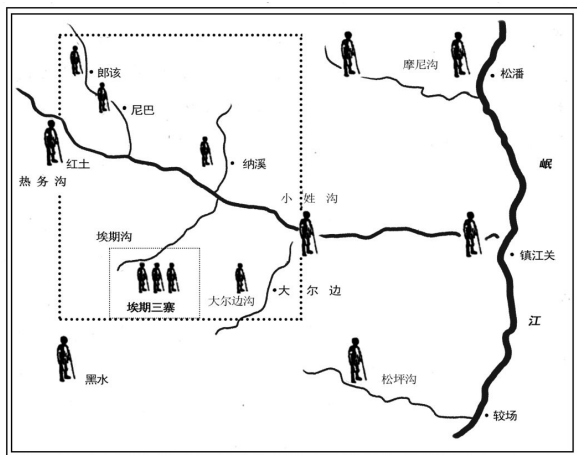
最后，尽管弟兄祖先都是来自外地，小坝人的弟兄祖先之来处，无论是有汉人族源隐喻的“湖广”还是有少数民族暗示的“松潘”，常表露其“民族”归属含义。在永和的“弟兄祖先故事”中，人们所来之地只是一个生活环境较差的地方，并没有“民族”指涉含义。此种差异所反映的情境是，对北川青片、白草村落居民而言，“民族认同”是当前一敏感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松潘小姓沟 在前面我多次提及小姓沟。这儿的羌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羌族。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住屋形式以及服饰穿着上，都与附近的热务藏族相似。我所采访的小沟——埃期沟，又是小姓沟中最深入大山的一个羌族山沟。当地村寨居民的汉化程度，又比小姓沟中其他村寨的人群低。这儿的村民，除了少数出外读书的年轻人外，大多没有汉姓。这个村目前由三个组，背基（一组）、北哈（二组）、洁沙（三组）所构成；二组又分成北哈与梁嘎两个小寨。这里流传着几种不同的“弟兄祖先故事”。以下是一位二组中年人的口述，这是最普遍流传的一种记忆版本：

6. 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么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

在这故事中，老二与老三关系格外亲密；不只住在同一边，死了也葬在一起。目前三组在阳山面（早晨晒得到太阳），一组与二组两寨坐落在阴山面。这个兄弟故事所显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也表现于三个组敬菩萨的习俗上。如我在第三章所介绍的，三个组都各有山神菩萨；二组下寨（北哈）又与一组共敬两个菩萨——“忽布姑噜”与“恰伯格烈”；三个组又共同敬“格日囊措”山神，这是一个以各村寨都能眺见的大山为代表的山神。据村民说，因为一、二组同一个菩萨，所以常联合起来和三组的人打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的茂县永和、北川小坝或其他地区，“弟兄祖先故事”只保存在部分老人的记忆中。然而在埃期沟，即使是十来岁的小孩都知道这三弟兄的故事。

埃期沟中还流传其他一些“弟兄祖先故事”（见图十五），如以下一位老人所说的“七弟兄故事”。



图十五 松潘小姓沟埃期村弟兄祖先空间分布

7. 高头来的七弟兄。从那七弟兄，有些安在大尔边，有些朱尔边、纳溪、郎该、尼巴，是这样分出来的。他们是在这个啥子朝代打散的，跑到这儿来。原来这儿没有人，没有人，这下子七弟兄到这儿；只来三弟兄，还有四弟兄是纳溪安了一个，大尔边，还有尼巴那安了一块，是这样分出来的。还有一个兄弟，我还都记不到。

纳溪、郎该、尼巴，都在热务河北岸各沟中，与南岸的埃期沟正面对。目前该地村寨人群都被识别为“藏族”。大尔边与朱尔边⁷，则是埃期沟右邻一条大沟中的两个主要村落。目前该地居民的民族成分与埃期沟居民相同，都是羌族。因此，这“七弟兄故事”是以祖先的弟兄关系，来说明这几个邻近山沟村寨藏、羌居民间的密切血缘关系。另外，我还听说一个“九弟兄故事”，比起上述的“七弟兄故事”，这个弟兄祖先故事在当地较普遍为人所知。一个埃期一组的老人，对我说过这个故事。他首先提到上述的“三弟兄”，然后想起，这三弟兄是九弟兄中的一部分：

8. 一组的人，以前是三弟兄来的。以前这没得人，三弟兄是从底下上来的。上来坐在月眉子那个墩墩上。又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就是；不是三弟兄喔，那是九弟兄，九弟兄占了那地方。三弟兄打伙在这条沟。还有两弟兄打伙在那条沟，大尔边。还有两弟兄打伙在大河正沟，热务区。九弟兄是黄巢，秦朝还是黄巢？秦朝杀人八百万，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就躲不脱了，就走到这儿。一家九弟兄就到这儿来了，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

大河正沟或热务区，指的是埃期沟左邻热务藏族各沟各村。因此，这个“九弟兄祖先故事”说明更大范围人群的祖先弟兄关系。九弟兄中，事实上这位老人只提到七弟兄的去处：三个到埃期，两个到大尔边，两个到热务。“两个到大尔边”指的是大尔边沟中的两个大村——大尔边与朱尔边。这个九弟兄故事，扩大了埃期居民以三弟兄故事来凝聚的族群认同。这“族群”所蕴含的人群范围，打破了目前藏、羌民族边界，这一点相当值得注意。许多本地人说，以前这儿虽然有语言上的不同，但并没有所谓羌、藏区分。在前面我也曾提及，过去除了各家族、寨、村、沟等人群区分外，本地社会区分主要在于“牛部落”与“羊部落”。埃期的确有些老年人是由热务嫁过来的女子或来此上门入赘的男子。这个“九弟兄祖先故事”，也说明过去在此地“羌、藏区分”是相当模糊的。无论如何，以上这“九弟兄祖先故事”与例7之“七弟兄祖先故事”一样，传述并不普遍；或者这些都是在民族分类后，逐渐消逝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我曾听说另一个“七弟兄祖先故事”，出自一位小姓沟老人之口。

9. 七弟兄，黑水有一个，松坪沟一个，红土一个，小姓有一个，旄牛沟有一个，松潘有一个，镇江关有一个。五个在附近，迁出去两个：一个在黑水，一个在茂县。

这“七弟兄”所至的地区，以目前的民族与语言分类知识来说，包括有红土人（热务藏族）、小姓沟人（藏族、羌族）、松坪沟人（羌族）、镇江关人（汉化的羌族、藏族与汉族、回族）、松潘人（以汉族、藏族、回族为主）、摩尼沟人（藏族）与黑水人（说“羌语”的藏族）。在此弟兄故事记忆中，由于小姓沟所有村寨居民是其中一个弟兄的后代，因此“小姓沟人”认同得到强化。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七弟兄祖先故事”强调一个以小姓沟为核心，跨越茂县、黑水、松潘三县，包含许多村寨与城镇藏、羌族群的人群认同（不包括回族与汉族）。这个人群范围，也就是小姓沟人经常能接触到的和他们共同祭“雪宝顶”山神菩萨的人群。这则故事在埃期沟并不流行。说故事的老人原是埃期沟人，后来移出来，住在大河（小姓沟）边上的一个小街市上。他的听闻、见识都比故乡埃期沟人来得广，这应与他能得知或创造此“七弟兄祖先故事”有些关联。

小姓沟埃期村居民的“弟兄祖先故事”，祖先有弟兄关系的各“族群”或指一寨的居民（如埃期一组），或指同一沟中的居民（如大尔边），或一大区域的藏、羌民众（如镇江关）；无论如何，指的都是一

地“所有的人”。从另一角度来说，许多人在口述这些故事时，都强调在这些“弟兄”到来之前，本地原来没有人。这样的叙事，自然使得“弟兄祖先故事”成为解释“全部”本地人来源的历史。这样的“弟兄祖先故事”，其另一层意义便是：在本地人观念中，地缘关系亲近的人群也有较亲近的血缘关系。

理县杂谷脑河流域 杂谷脑河流域的理县，县城中美、藏杂居。羌族村寨分布在县城东边甘堡以下，往上游去，便都是四土人（嘉绒藏族）的聚落。本地羌族常自称是“五屯的人”，借此他们强调与嘉绒藏族间的紧密关系。⁸本地羌族在服饰、宗教信仰上，也都多少受嘉绒藏族影响。另一方面，沿杂谷脑河的大道是入藏或进入川北草地的一条孔道，自古以来便有官府驻防，后来又有许多汉人来此经商。因此这儿的羌族与藏族都有汉姓，汉语（四川话）和汉文化习俗也很普遍。但除了接近河坝的村寨居民外，一般很少有人称本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时来的。这儿的村寨中，也经常有“弟兄祖先故事”。以下是一位增头寨妇女的口述：

10. 我婆家的邹，是三弟兄到增头，约十二代，分成三家邹。有一个祠堂，有一个宗支簿，人哪里来、哪里去。后来几个小孩子造反派把它砸了。以前的墓碑好看，有石狮子，还刻了字，人哪里来、哪里去都有……姓邹的三弟兄，不知是哪一个分到铁甲，哪一个铁盔。银人这个根根没有人了，盔甲这支人多。

在此比较汉化的地区，与北川的情形相同，“弟兄祖先故事”中各“族群”成为一个个的“家族”或“家支”，此“历史”只说明本地部分家族的来源，而非全体本地人的来源。

除了村寨中各姓家族的“弟兄祖先故事”外，本地还流传另一种兄弟故事。以下是薛城附近村寨一中年男子的说法：

11. 白哈哈、白羲羲、白郎郎，他们是三弟兄，出生在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古羌贵族。但听说周围有很多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就把家财卖了，带了财富离家，沿途救济，最后就在白空寺住下来。白空寺就是天彭山顶。三弟兄，一在白空寺，一在铁林寺，老么白郎郎在天元寺。他们没有后代，他们当菩萨去了，没有后代。

虽然他认为这三位菩萨弟兄没有后代，但他们的弟兄关系仍将他们

的各地村寨信徒联系在一起。然而，村寨里的人大多只知道“白空老祖”，而不知这三弟兄的故事。这个记忆，近年来似乎是通过本地知识分子所刊写之《理县文史资料》流传。这份《理县文史资料》记载：

羌寨古庙白空寺 据民间流传，通化西山村天盆山顶的白空寺、桃坪增头寨的铁林寺、牛山村的天元寺，这三寺的菩萨是天仙星宿降生于人世间的，投生于黄河上游，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水草茂盛的草地古羌贵族人家（此地与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接壤）。这三弟兄取名：大哥白羲羲，二哥白哈哈，三弟白郎郎，他们长大成人后，常做善事，慈悲为怀。……他们分路各自携带着家里的珍珠宝玉、金银珊瑚，雇佣着数人，赶着牛、羊，以游牧形式，沿途为受苦受难的民众救灾解难，颇得青海、甘肃、西藏、云南和岷江上游等地人民的尊敬。

这个文献，可以视为部分理县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它还是以“弟兄祖先故事”来呈现几个“起源”之间的血缘关系。但“起源”所凝聚的是各地“信徒”，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各“族群”。其次，前面小姓沟或永和沟之“弟兄祖先故事”中，那些弟兄始祖都没有名字与事迹，而理县故事中的“三弟兄”则是有名有姓、有神圣事迹的人物。再次，这三弟兄来自黄河上游一个“与青海、西藏、云南、四川接壤”的地方，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这样一个四省接壤的地方。但这样的地理空间想象，正符合我在前一章中所称的“羌人地带”，也就是典范羌族史中的“氏羌系民族”分布地区。

过去本地著名的大庙白空寺，奉祀“白空老祖”及玉皇、雷神、普贤与各村寨之神等等，因而是当地嘉绒藏族、“尔玛”（羌族）、汉人共同朝拜的庙子。理县东部通化、桃坪一带，也是汉、嘉绒与“尔玛”文化交汇之处。显然，本地藏、羌族知识分子宣扬此“三弟兄故事”，一方面是借此强调理县东部各藏、羌村寨人群的一体性；另一方面，通过此叙事将“理县之羌、藏族”置于广大“氏羌系民族”的核心地位。

理县蒲溪沟 理县蒲溪沟各村寨人群，从前在杂谷脑河地区是最受歧视的。河对面各村寨中自称“尔玛”的羌族人，称这儿的人为“尔玛尼”（*rmani*），以现代汉语来说就是“黑羌族”。阳山面的羌族以他们的地较好，过去又属于可被土司征调作战的“五屯”之一，因此相当轻视“作战时只能背被子的尔玛尼”。过去他们宁愿与同属“五屯”的四土人结亲，而不愿与这儿的人结亲。他们认为，蒲溪沟的人许多都是外来的汉人，

而蒲溪沟的人也常自称他们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或是崇庆州来的；来此的又经常是“几个弟兄”。以下是一位休溪寨王姓中年人的家族史记忆：

12. 我们王家是湖广填四川时到这来的。在灌县那一个石堰场，先迁到四川灌县石堰场。湖广那里就不知道了。五弟兄到这里来，生了五弟兄，分成五大房，我们还有家谱。湖广那里我不清楚，家谱上有记……这几个寨子的形成，听说是原没有枪，是用箭。箭打到哪里，就在哪里住。几个兄弟分家时，箭打到哪，就在哪住。这三个弟兄不知从哪来的，一个是蒲溪大寒寨，河坝的老鸦寨，还有色尔，这三个是最早的。传说是这样。

这位中年人说的“五弟兄祖先故事”，解释休溪王家五大房的由来。他父亲所说的与此有些差别：由湖北麻城孝感来的是三弟兄，其中之一迁到灌县石堰场，然后他的后代有五弟兄来到蒲溪的休溪寨。我曾抄录这一王家的家谱，这是一个号称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世居于四川省中部资阳与简东的王姓家族族谱（里面找不到这五弟兄或三弟兄的痕迹，也找不到与休溪王家的任何关联）。

这位中年人说的“三弟兄祖先故事”，解释蒲溪沟最早三个寨子的来源。现在本地人都认为，蒲溪五寨是由最早的蒲溪、老鸦、色尔三寨分出的，因此“三弟兄祖先故事”也说明蒲溪各寨的共同来源。但说到家族的来源，则几乎村寨中所有的人都说祖先是外地来的汉人。在此，人们似乎把地域空间（村寨）的起源与“族群”（家族）的起源分离开来。

三、根基历史的内在结构

以上这些“弟兄祖先故事”广泛分布在岷江上游与北川的羌族村寨之中。它们与一些其他形式的叙事——如“历史”“传说”等——构成人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相对于“历史”，目前“弟兄祖先故事”在各地羌族社会中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有些地区，它仍是人人耳熟能详并深信的“过去”，“历史”毫不重要；在另一些地区，“历史”成为最真实的过去，这些“弟兄祖先故事”只是少数中老年人记忆中的过去传说而已。

一个认真探索“史实”的历史学者，不会认为上述羌族村寨居民们所说的那些“过去”是曾发生的“史实”。显然在这些故事中，“过去”随着一群人（或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范畴而改变。由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观点，我将之视为一种“根基历史”，它也是一种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有类似功能的社会历史记忆。“根基历史”，以共同的血缘传承关系，凝聚一个人群（族群或民族）。《史记》中溯及夏的始祖为“弃”，商的始祖为“契”，周人始祖为“后稷”，此种追溯族群起源至一位英雄祖先的历史叙事，都是一种“根基历史”。然而，大多数人不会怀疑这些以英雄祖先为起始的“历史”之真实性。为何如此？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心性”影响我们如何区分、判断何者为可信的历史叙事。以下我将由“根基历史”的内在元素、结构来说明，无论是以英雄圣王祖先或是以几个弟兄祖先为起始的“过去”叙事，都是一种“根基历史”。而后，由“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祖先故事”的内在差异，我将说明此两种根基历史是不同的社会情境与“历史心性”的产物。

19世纪一位英国律师亨利·梅因（Henry S. Maine）写了一部名为《古代法》（*Ancient Law*）的书。书中主题是社会中的亲属血缘、领域主权与此二者的延续传承。⁹社会律法维系一社会的整合与延续，因此亨利·梅因通过律法对于人类社会下了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事实上，人们也通过“根基历史”来建构、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在追溯群体起源的“根基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亨利·梅因所提及的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这便是“根基历史”叙事的主要结构元素。以“过去”（祖先）之血缘、地缘关系的流转，说明“现在”此人群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为何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他们中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权力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由此检视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脱不开这些根基历史的叙事模式。我们再看看“弟兄祖先故事”。其叙事中有共同的起源与血缘联系（起始几个弟兄），有空间领域及其区分（弟兄到这儿来，并分居各地），有血缘与地缘领域的延续与传承（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占居各地的人群）——我们为何不认为它是一种“根基历史”？事实上，“弟兄祖先故事”与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中的“根基历史”不同之处只在于：“弟兄祖先故事”中没有量化的时间，没有英雄与事件，以及“起源”是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圣王。可以说，它们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形式。

认识到“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根基历史，我们才可能察觉，人们普遍信赖的“英雄祖先历史”也只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形式而已。进一步，我们可以分析“弟兄祖先故事”背后的社会情境，及其与“英雄祖先历史”所本之社会情境间的差别，以及“汉化”影响下之“弟兄祖先故事”叙事变化

所反映的新情境。“根基历史”中的几个基本要素，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

血缘：弟兄关系中的“族群”隐喻

首先，“弟兄祖先故事”中的血缘起始是“几个弟兄”，而非他们的“父亲”。这样的我族血缘隐喻，自然是将“女性”排除在外，或将她们视为男性主体社会的附庸。这一点，“弟兄祖先故事”与大多数的“英雄祖先历史”并没有差别。其次，“几个弟兄始祖”也表示，事实上在此有两种血缘关系：一种是个别弟兄始祖与其子嗣的父子垂直血缘联系（lineal attachments），另一种是兄弟始祖间的平行血缘联系（parallel attachments）。在“英雄祖先历史”中，主要强调的则是父子间的直系血缘联系，即使此“直系嫡传”有其他兄弟存在，这也是“旁支”联系（collateral attachments），而非一种平行、对等的结合关系。

“弟兄祖先故事”中这样的血缘隐喻与当地村寨社会的一些特质有关。女性，在此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成为“边缘人”（见本书第四章），这也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的特质。此外，寨中各家族，一沟中各村寨或一地区之各沟人群，基本上都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分享、竞争地域性资源。在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中，我已说明本地村寨中的资源环境以及人们为分配、分享本地资源所形成的各种认同与区分。这样的情境，也反映在“弟兄祖先故事”中的三种“弟兄”社会关系隐喻上。此三种弟兄关系隐喻是：“团结”“区分”与“对抗”。

首先，弟兄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同胞、弟兄或弟兄姊妹，是系于根基性情感的最基本“族群”。在羌族村寨的现实生活中，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其家长有弟兄关系的几个家庭。他们往来频繁，平日相扶持。若非如此，在村寨中便成为大家谈论、批评的对象。在有些地区，村寨中还流行结“异姓家门”。两个或三个家族结为一体，在婚丧习俗上遵循同一个家族内应遵循的原则。在采访中，我常听到村寨民众说起异姓家门：“我们感情像弟兄一样。”结异姓家门的理由，民众非常清楚——为了壮大寨子，大家团结免受人欺侮。因此他们也很清楚，这原是不同的根根（血缘）的人群。更普遍的例子是，人们说，几个兄弟到此地来发展，他们成为几个不同姓家族的祖先。人们认为这些“异姓”家族，事实上就是同一根根的“家门”。在资源关系上，祖先有弟兄关系的几个家庭、家族与村寨，共同维护、分享本地的资源。

其次，弟兄关系也显示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间的区分——“亲兄

弟，明算账”。弟兄们结婚后分家，在当地是普遍的家庭发展原则。在上引所有故事中，几弟兄都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落户，这是当前各人群区分的“根源”。在现实生活中，以弟兄祖先记忆相联系的几个家族或寨子，也以“某一弟兄的后代”来彼此划分——老大的后代或老二的后代。此种区分还经常以一些物质或文化符号来强化，如划分谁是“分得牛脑壳的弟兄之后代”，谁是“分得牛尾巴的弟兄之后代”（前引口述例5）；又如谁的祖先分到铁甲，谁的祖先分到铁盔（前引口述例10）。此种团结合作中又有区分的人际关系，与当地经济生态中的资源分配和分享相契合。各个家庭、家族有自己的田地，各村寨与沟也都有各自的牧场、林场。

复次，在区分之中，弟兄关系也隐含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关系。这种弟兄间（或其所影射的亲近人群间）的敌对关系，在世界各文化中都相当普遍。研究神话与《圣经》的学者，曾指出《圣经》中几组敌对的弟兄——该隐（Cain）与亚伯（Abel）、雅各（Jacob）与以扫（Esau）——并指出其所隐喻之人类亲近群体间的敌对。¹⁰在中国神话或古史传说中也并不乏这类例子，如舜与象、黄帝与炎帝。羌族民间也流传一些坏哥哥如何在分家后欺侮弟弟的故事。虽然报告人大多强调自家弟兄间的情感如何好，但他们也常闲话他人或前人一些弟兄阋墙的事。如以下一位茂县永和沟甘木若村的中年人所说：

我们白家就这样分开，四弟兄，老大那里呀，老二又那里呀，老三又到那，幺弟兄又到那，都是这样说的。这四弟兄原来都是一家人，他们的子孙分开来……四弟兄那时是很强的，后来就落败了。白家祖先留下的只有一家子。四弟兄分家不平，拿刀砍中柱子。

由于分家后的弟兄经常有些纠纷，因此敌对的“弟兄”隐喻常被用在更大范围人群的敌对关系上。如一位小黑水老人解释过去当地“牛脑壳与羊脑壳”之敌对时，他说：“这是分歧在的；他们整我们，我们整他们的。……我们弟兄之间分家一样的。”一位茂县三龙沟的老人则认为，当前以黑水河为界的“羊部落”与“牛部落”是两个敌对弟兄的后代。¹¹

为何“同一根根”平时又有密切往来的“弟兄”，在当地（以及世界其他人群社会中）经常暗示着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间的敌对情绪与行为？法国学者基拉尔以相互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与异类替身（monstrous double）等心理因素，来解释此种以敌对弟兄关系为隐喻的人类社会敌意与暴力的根源。¹²模仿欲望在他的解释中，不一定是为了真的需求欲望，而是因为一方有需求欲望，所以另方便模仿对方的

欲望；在模仿中，对方成为自己的异类替身。对羌族地区的“弟兄”而言，相同的欲望却相当现实：他们都期望能从父亲那里分得土地、房屋以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在此资源匮乏地区，弟兄们分得的田业总是不足，总有几个弟兄要另谋出路——或到别的家族或寨子去“上门”，或到外地开荒、打工。因此分家分产时造成的争端，或过后个人的失败与挫折，都容易造成弟兄间的敌意。此种“弟兄”间的敌意，也经常见于宣称祖先有弟兄关系的邻近村寨间。为了争草场、林场或在祭山会或庙会中各自夸耀势力，或为了婚姻纠纷，邻近村寨间常存在普遍的紧张与敌对。

无论如何，前述有合作、区分与敌对关系的个人或人群，是一个个对等或平等的单位——由于在叙事中没有“父亲”与“嫡子”，在“弟兄关系”中也没有主干与分支之别。在一寨子中，组成寨子的是一个一个弟兄分家后建立的家庭。在祭山、祭庙子或丧葬仪式中，每一家庭都必须有代表参加。更大范围的人群关系上也如此。邻近寨子间有竞争、夸耀，各个寨子有大有小，然而在相互关系上却是对等的。虽然大寨子可能欺侮邻近的弱小寨子，但即使在1950年代以前，也没有一个寨子能掌握或统治另一个寨子。因此当人们说“我们像弟兄一样”或“我们像弟兄分家一样”时，无论指的是人群间的团结还是敌对，都表示各人群单位间的对等关系。这种平等或对等特质，也表现在村寨中共同议事的传统上。寨中或几个寨子间，常有一片被称作“议事坪”的小块平地。据称在过去，村寨大事常由寨中各家庭、家族代表在此共商解决。

由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弟兄祖先故事”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生态与社会意义。这些“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根基历史”，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经济社会关系上对等的，在生计上既合作又竞争的人群。现实生活中弟兄之间的手足之情，被延伸为寨与寨、村与村人群之间的情感与合作关系。同时，现实生活中分家后弟兄们各自建立的独立家庭，与彼此的对立竞争也投射在由“弟兄祖先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寨与寨、沟与沟人群间的紧张敌对关系上。寨、村与沟间人群单位的独立平等（egalitarian）特质，以及他们之间层层分化的合作与对立关系（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cooperation），与当地社会强调“几弟兄”记忆（而非一个祖先记忆）是一致的。

地缘：弟兄祖先故事中的“领域”隐喻

在地缘或空间关系上，不同地区的弟兄祖先故事各有特色，表现不

同的社会情境与造成此情境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所有弟兄祖先故事都说，人是从外地来的。这些外地，最常听到的地名在阿坝州有茂县、杨柳沟、松潘（包含草地与黑水）等，在州外的四川省有崇庆、安岳、灌县等，更广泛的地区，则有湖广（湖北麻城孝感）、甘肃、青海、四川、黄河流域等。以上每一地名，结合与之有关的历史记忆，都代表本地人群一种空间上的起源认同。譬如，黄河流域代表作为“炎帝后代”之羌族的起源。青海或甘肃经常与“历史上西北一个强大、好战的羌族”或“游牧的羌族”等记忆联系在一起。湖广或四川、灌县、崇庆，代表本家族的汉人或四川人根源。草地或黑水代表本族群与粗犷勇武的藏族有共同起源。茂县、白羊、杨柳沟、呷竹寺等，则表示起源为“道地的本地羌族”。无论如何，上述地名都出于汉人之地理、行政与民族空间概念；相关历史记忆，也与汉人之历史记忆有关。只有极少数的地区，如松潘小姓沟埃期村，故事中“弟兄”祖先的空间起源为“不详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也是汉化程度最低的羌族地区。

在弟兄祖先故事中，诸弟兄来到此地后，又分别落居在不同的空间。这又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第一种，弟兄祖先们到一地分家后，分别占居不同的空间，这几个空间领域构成的整体空间，现在分别为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所占居；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目前在此空间分享、分配与竞争所有的领域资源。因而，在此“弟兄祖先故事”下，当前各“族群”间的血缘亲疏、空间远近与资源共享与竞争之关系紧弛，都在同一逻辑中成正比。血缘关系愈近的人群，居住距离也愈近，其资源共享与竞争之关系也愈紧张。讲述这一类故事的典型地区，是松潘小姓沟埃期村。如前引口述（例6—9），无论是三弟兄、七弟兄或九弟兄故事，由过去到现在，“我群”全在一整体空间之中。在这样的故事里，汉人的地理与历史概念相当模糊，或全然不见。¹³

第二种空间叙事，故事中“弟兄祖先”分别落居在不同的空间，这几个领域或其整体空间，目前并非全为这些“弟兄祖先之后裔”所占居。这一类弟兄祖先故事流行的地区，可以理县、北川等较“汉化”地区的为代表，其中的“族群”单位几乎都是汉姓“家族”。这一类的“弟兄祖先故事”，经常并非诠释本地“全部”家族的来源，而是诠释“部分”家族的起源。因此，本地各人群（家族）间的血缘亲疏、空间远近与资源竞争关系紧弛，没有一致的逻辑关系。在这样的地区中，事实上是多种“弟兄祖先故事”，分别诉说了本地各家族或几个家族的由来及其与外界的血源联系。因而在本地，通过这些故事中的空间、血缘（以及时间）表述，人们区分谁是先来者、后到者，以及区分他们与外在世界人群不同的“同胞

血缘”联系——他们的根源是“华夏”“汉人”“羌族”或“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当一个家族宣称其祖先来自“黄河流域”“崇庆州”，或宣称祖先有些弟兄在“湖广”“松潘”时，他所期望分享的不是这些地名所代表的空间资源，而是此地名所隐喻的“族群身份”资源。当然，此类弟兄祖先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是汉人历史记忆与地理概念。

弟兄祖先故事中的“时间”隐喻

所谓历史，是在“时间”中延续、变迁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现象。这是一种“历史时间”，一种相对于个人生命时间（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与自然时间（一日一年之自然循环）之外的社会时间概念——表现在大多是超乎个人经验的社会人群与宇宙世界的起始、发展与延续之上。在弟兄祖先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历史时间”概念。

首先，有些人讲述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历史时间是由一“过去”与“当代”两段构成。“几个弟兄到这儿，分别建立几个寨子”，此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然后，“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几个村寨的居民”。如此，“过去”与“当代”之间虽有延续，但中间是空虚的时间。如此的历史时间概念，流行在汉化程度低的羌族地区，如松潘埃期沟。在这样的故事中，“过去”造就“现在”，“过去”诠释“现在”。其中，时间是不可计量的，是非线性的。因此，不同的“弟兄祖先故事”，可用来解释不同范畴本地“族群”的由来，它们的发生不必有时间先后逻辑关系。

在大部分早已接触汉文化的地区，特别是在“汉姓家族”认同流行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被置于线性历史时间架构里。譬如，弟兄祖先迁来时，是“湖广填四川的时代”、“过去在青海被打散的时候”、“在何卿平番乱的时代”、明代或清代。这个“历史时间”与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量化的、线性的时间，是在选择一些有意义的“过去”来诠释“现在”。这样的弟兄祖先故事，一方面解释并强化当前本寨、本沟或本家族的人群认同。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与无法回头的历史，那个起点——“湖广填四川”“青海被打散”“何卿平番乱”——也解释了作为“住在山上的人”或少数民族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

在相关的“中国历史”记忆普及于岷江上游村寨之前，第一类“弟兄祖先故事”可能是最流行、最普遍的社会记忆。因为这与本土语言中“时间”与“过去”的概念相契合。在本土语言中，有相当多的词汇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以及一日一年的自然循环与人的作息時間。但超出个人生命及家族生命（两代或三代）之外，时间（所谓的历史时间）概念

便非常模糊，词汇也变得贫乏。在茂县黑虎沟，人们以“gaitonpu”形容很早的时候，大致可译作“过去”。如果要强调更早的时候，则是“gaitonpu gaitonpu”，“过去的过去”。在松潘小姓沟，“zege”便是“从前”，若要讲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便说“zege zege”，“在从前的从前”。在记忆所及的“过去”，本地人常以“红军过境的年代”或“涨大水的年代”来表示。叠溪地震与海子溃决发生在1933年，红军过境发生在1935年，因此也就是泛指1930年代左右，或国民党统治的年代。在此之前的年代，似乎都属于“gaitonpu”或“zege”的年代。红军过境与涨大水的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是自身记忆所及或父祖辈口述中的“过去”。“gaitonpu”或“zege”时期所发生的事，则是一些介于虚幻与真实间的事（包括所有的神话传说）以及过去结构性重复发生的事（如弟兄分家、村寨间的战争、动物吃人等等）。因此，以“gaitonpu”或“zege”来表达的历史时间，是同质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时间。如果要表达绝对的线性历史时间，只有使用汉语及汉人历史记忆中的时间概念了。

四、“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弟兄祖先故事”有根基历史中所有的必要因素——血缘、地缘与时间（延续性）。弟兄祖先故事之叙事将这些因素串在一起而产生特殊的社会意义与力量，以强化某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因此，我认为“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一样，都是根基历史；他们是不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

伟大的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曾提到有一些民间流传的口述故事“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相信文字书写的“历史”是过去曾发生的史实记录。许多较传统的西方历史学者也认为，有些落后的民族没有历史。如果我们只将以文字书写、保存的“历史”当作历史，或以自身文化所定义的“历史”为历史，自然会产生以上的看法。然而，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对“历史”有更宽广的看法。“真实的过去”是时空中许多大小人、事、物的总和，然而人们所记录的或经常回顾的“历史”，却是有选择性的、经过再组合的，甚至是被创造的“过去”。而且，由社会记忆观点，人们以多种不同的记忆媒介来记忆或回忆“历史”，文字只是这许多社会记忆工具之一。因此在没有文字的人群中，人们也有传述、保存自身“历史”的方式，自然也有自身观点的“历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我们或许不认为那是一种“历史”。

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接近西方学者所谓的“史性”（historicity）与“历史心态”（historical mentality），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它产生于特定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历史心性，一群人以其特有的方式集体想象什么是重要的过去（历史建构）；通过历史心性及历史建构，一群人集体实践或缔造对其而言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创造历史事实）。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建构与历史事实，强化或改变各种人群认同与区分（同时或也造成历史心性的改变），借此一群人得以适应当地生态与社会环境及其变迁。由我在羌族地区所搜集的弟兄祖先故事，我们可以察觉，“弟兄祖先故事”似乎在本地是一种“历史”建构模式，不断产生新的“弟兄祖先故事”。由此，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历史心性”，我们生活在汉文字文明圈中的人，或在“文明世界”中的人，经常以“英雄祖先历史”模式来建构“历史”。司马迁所立下的文类典范（genre），在传统上被称为“纪传体”，也因为此文类是以“英雄祖先”传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

以下，我以松潘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为例，来说明“历史”“历史心性”及社会情境的交错关系。为了凸显此“历史心性”的特质，或凸显华夏之“历史心性”特质，我以一则古代华夏心目中典范的“羌族史”——成于汉晋之际的《后汉书·西羌传》——来与之作对照、比较。

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与《西羌传》的叙事比较

在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中，当今一村寨人群的血缘全都传自一位“弟兄祖先”，一沟中几个邻近村寨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的几个弟兄。此血缘及其区分，便一直延续至今。在故事中，内部人群没有血缘上的主干与分支。由于此“历史”中没有战争、征服、篡夺与迁徙等事件，因此当前本群体中也没有血缘上的先来与后到者、征服与被征服者之别。历史时间只由“遥远的过去”与“近现代”构成，“遥远的过去”是没有质量的时间——没有比较好的或比较坏的时代，也没有可计量的年代；没有线性的历史时间（朝代更迭），也没有连续循环的历史时间（治乱替生）。由于没有量化、线性的历史时间，所以几个诠释不同范畴人群认同的弟兄祖先故事可以并存而不矛盾。

在《西羌传》中则是，作者先提及西羌出于古代四凶之一的“三苗”，他们是姜姓族的别支，其国原在南岳。在舜流放“四凶”的时候，他们被驱赶到“河关西南”，黄河上游之地（河首）。后来该篇又提及，羌

人无弋爰剑，一位曾为秦人奴隶的戎人，因避秦人追捕，而逃入河湟西羌之中。在此，因种种神迹，他被当地羌人奉为首领，他的后裔便成为许多河湟羌部落的酋豪家族。后来又因秦国的军事压力，爰剑子孙分散四方，其中一个孙子“印”率众迁往西南，他的后裔又成为许多西南羌部的豪酋家族。因此，在《西羌传》中，事实上包括了三个“英雄祖先历史”：一是三苗与其后裔（所有羌人）的历史；二是无弋爰剑与其后裔（所有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三是印与其后裔（西南羌人豪酋家族）的历史。

在《西羌传》的历史叙事中，“西羌”血缘的起点是“英雄祖先”——“三苗”“无弋爰剑”或“印”。这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始于一些没有名字的弟兄始祖。同时，在《西羌传》的英雄祖先历史中，一般西羌民众的血缘来自较早的“三苗”；西羌诸豪酋家族的血缘，则来自后来进入河湟的戎人“无弋爰剑”；处于河湟南方的白马羌、广汉羌（西南夷之羌）的血缘又来自无弋爰剑之孙“印”，爰剑后裔的分支。如此，这些以时间差距构成的“历史”，在西羌内部用以划分原始土著（三苗之后）与外来的开化者（无弋爰剑的后裔），也因此区分被统治者（三苗之后）与统治者（无弋爰剑的后裔），同时也在羌人地域部落间用以区分主干（河湟之羌）与分支（西南夷之羌）。因为有先来者、后到者，又有主干、分支，因此在“英雄祖先历史”中必须有量化的、线性的时间。此又不同于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在以弟兄祖先起始的“历史”中，人群血缘没有主干、分支之别，没有阶级之别，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别。

就地理空间的起源与延续而言，在《西羌传》中，“南岳”（三苗所居）与中原北方（戎人所居）是空间的起点。然后在叙事中，因着羌人（或戎人）被击败或向外征服等缘由，地理空间不断转变，最后终于到达汉晋时期羌人所居的青藏高原东缘之地。因此，“历史”合理化为“西羌”居于华夏西方空间边缘，以及由于西南诸羌部落在空间与血缘上都是河湟羌的“分支”，所以他们又是整个西方羌人的边缘。相对地，在松潘埃期沟之“弟兄祖先故事”中，空间源起常是“几个弟兄到这儿来”，他们自何处来不清楚。由于没有外来的空间“起点”，自然没有由外地到本地的“迁徙”。或者说，空间的起点便是本地，到这儿来之后，便弟兄各据一方。此地理空间及其区分，便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迁徙，没有吞并征服，因此也没有地理上的核心与边缘。有好的（如山阳）与坏的（如山阴）空间之别，但没有核心与边缘空间之别。

最后，由形式上看来，《西羌传》与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两种历史叙事最明显的差别在于繁、简不同。由于“英雄祖先历史”中有地缘、空间上的转变，有血缘上的融合、分化，这些都赖叙事将一些事件、地理、人物记忆安排在线性、量化的历史时间之中。“弟兄祖先故事”则由于地缘与血缘关系由始至终未变，因此其中也很少涉及事件、人物与地理。“弟兄祖先故事”作为一种简化的根基历史，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们无需繁杂的记忆术（如文字）来掌握此种“历史”，因此记忆与诠释“历史”难以成为一种政治、社会权力下部分人的专利；或反过来说，在此平等自主的社会中，人们不需要记忆复杂的“过去”，也毋须以文字来操弄“历史”。

“弟兄祖先故事”的社会生态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说，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流行在“平等自主”（egalitarian）社会中的“历史”。在此社会中，历史记忆所强化的是小范围的、内部较平等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而非广土众民、内部阶序化的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这样的“历史”由当地特殊的人类生态与社会环境所造成，它也维系当地特殊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情境。这也就是本书第二、三章所介绍的，本地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故事本身的“弟兄祖先关系”，呈现并强化邻近社会人群（寨、村与沟中人群）间的认同与区分。在一条沟中，这样几个村寨人群各自划分沟中的资源，也共同保护沟中的资源。除了女性成为边缘弱势者之外，这是一个基本上平等的社会，任何的社会阶序化与权力集中化都是不必要或是有害的。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如某些寨子灭绝，或新的寨子从老寨子分出来，在此种历史心性下“过去”很容易被遗忘。原来的弟兄祖先故事被修正，当前几个寨子又是传自于几个同时到来的弟兄祖先，以维持寨与寨间的凝聚与对等关系。

“口耳相传”是此历史心性下的主要社会记忆传递方式。在一社会人群中，经常传述着不同版本的弟兄祖先故事；不同版本，记述范畴不同的人群认同。由社会记忆观点可知，尽管文字历史记忆同样有失忆与虚构，然而它们与口述历史记忆仍有相当差别。口述由于不需特殊文字书写知识，因此是普遍的；由于普遍所以不易被权力掌控或典范化，因此它常是多元的。由于它是多元的、普遍的，因此它更容易使“现在”不断地被新的弟兄祖先故事合理化。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媒介，是当地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产物，也最能够维护与调节当地传统的人群认同与资源分配、分享体系。

以“弟兄祖先故事”为代表的根基历史，最初流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彼此接触的，个人或群体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以父系继嗣或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群体之中（如一个小沟中各村寨人群）。尽管在细节上有争论，但这是一个群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众历史”。“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弟兄”，隐喻着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人们倾向于以“内向式的”（inward）各群体间的合作、分享与竞争来解决生存资源问题。而“英雄祖先历史”中的“英雄”，在资源关系上则是一种“外向式的”（outward）历史隐喻，隐喻着资源之不足，可借由“英雄”的向外开拓征服来解决。

随着人类社会不同形式与程度的复杂化、中央化（centralization）与阶层化（stratification）发展，“弟兄祖先故事”逐渐被其他历史心性下的“历史”所取代或压抑。首先，在社会中央化之后，并非这些弟兄，而是弟兄们的父亲——一位英雄圣王，成为历史的起始。无论历史重复着一个个英雄圣王及其子孙的兴亡（循环历史），或是英雄圣王及其子孙万世一系的历史（线性历史），其“起源”都是一位英雄圣王。同时，在社会因政治、经济、宗教而分工化、阶层化之后，历史记载的不再是该群体所有人的“共同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他们是皇室、贵族、世家，或是宗教与商业领袖。政治、宗教与商业活动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成为强化或争论地域、族群与社会阶层化关系的符号。特别是英雄征程与殖民之空间记忆、相关的英雄祖先血缘记忆，被组织在线性、量化与价值化的时间内，以区分并强化当前各人群在资源体系内之核心与边缘地位。

无论如何，在当前绝大多数的羌族村寨中，“弟兄祖先故事”都被认为是“只有老年人在摆（谈）”的故事，而且北川地区流行的“弟兄祖先故事”，已成为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北川的弟兄祖先故事，其中相当一部分“弟兄祖先”已有名有姓，个人化特质使得他们具备“英雄祖先”的雏形。他们来自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湖广、河南或崇庆州，因而此历史中也有空间的迁徙——或为了逃荒、开拓，或被迫移民。这些因素都不见于松潘埃期沟的“弟兄祖先故事”。更重要的是，在松潘埃期沟，“弟兄祖先故事”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族群共同起源，在此之外，缺乏其他“历史”。然而，北川的“弟兄祖先故事”只解释“家族”此一族群的由来，而“家族史”只是一个主流历史（中国史）的部分与分支而已。在作为“家族史”的弟兄祖先故事中，本地家族之血缘可与远方本家族人群联系在一起。此种外在的血缘关系，使得本地各家族的血缘优劣有别。又由于在历史时间概念中，各个家族来到本地的时间有先后，所以在本地又有老

家族与新移民之别。因此，各人群间的血缘距离、空间距离与资源共享、竞争关系距离，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渐脱离。

作为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如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所言，“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它是由多重版本、多重的声音杂沓交奏而成。但不仅如此，“弟兄祖先故事”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是：此多重的“历史”，各有其特殊的结构性韵律。此种结构性韵律，便是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我们可以说，历史叙事是一种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再现”（representation），此“再现”在特定“历史心性”下被建构，并在特定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下得其叙事细节。“历史心性”深入人心的结构性力量，通过历史记忆与叙事，反映、强化或修饰相关的社会情境与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在此，我所称的社会情境或社会本相，主要是指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在内外力影响下，当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发生变化时，人们或在其“历史心性”下创造、修改“历史”，或通过叙事符号变更而根本改变其“历史心性”以创造或接受新的“历史”。这些在近代以来都曾发生在羌族村寨民众之间。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不只是羌族有“弟兄祖先故事”这样的历史记忆、叙事与心性，这样的“历史”，也曾流行或仍存在于许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中。如在1930年代，民族调查者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居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¹⁴

又如，1940年代在西南考察的庄学本，也曾记录夷族（彝族）文书中的一个夷族祖先来源之说：

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过后，老三乔姆石奇独活。乔姆石奇的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以竹筒在火中烧出爆烈声，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e（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汉语）。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番、汉三族的祖先。¹⁵

部分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的祖先起源故事；傈僳族中也

有傜、汉、彝为三弟兄的说法。¹⁶虽然我并未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查研究，但上述例子说明，当部分西南族群被汉人分类而“民族化”之初（约1930—1940年代），他们以“弟兄祖先故事”来合理化他们心目中的新族群关系。这或由于他们也具有“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因而以新的“历史”来强调各族群间的区分与对等。在汉人底层民间社会，以口述传承的家族史记忆中，“弟兄祖先故事”也并不少见。因此，毫无疑问，岷江上游“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本土“历史”，但却不是羌族所特有的本土“历史”。更何況，在下一章中我将说明，强化与凝聚羌族认同的“历史”，主要是外来的“英雄祖先历史”而非“弟兄祖先故事”。

- 1 所谓“化夷传说”，我认为是指一种历史记忆与叙事——在此记忆与叙事中，一位由本地迁往异域的人，在该地被土著奉为神或王。或者，在土著接受此种“历史”之后，他们相信“一位由外地来的人在本地被奉为神或王，开创本地文明”。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55—287页。
- 2 《后汉书》记载，周武王封商王子箕子于朝鲜，于是箕子教土著种田、养蚕，并以礼义法条来教化约束他们。《史记》记载，春秋时居于东南之吴国王室，其始祖是周的一位王子，太伯；他因让位而由渭水流域奔逃到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此教化土著荆蛮。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 3 《晋书》卷一一六，载记第十六《姚弋仲》。
- 4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2页。
- 5 （清）吴士鉴：《晋书斟注》卷一一六，载记第十六，引《元和姓纂》。
- 6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关探讨》，《语言暨语言学》2001年第2卷第1期，第261—267页。
- 7 在茂县太平牛尾巴寨，有部分老人则说，大尔边、朱尔边与小尔边——所谓“尔边三寨”——是由牛尾巴寨迁出的三弟兄所建立的。
- 8 有关理县杂谷脑河流域的羌族，请参考本书第一、二章之相关说明。
- 9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first published in 1861,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86.
- 10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1-63.
- 11 有关牛部落与羊部落之口述资料与分析，见本书第三章。
- 12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pp. 143-168.
- 13 如口述资料例8，“黄巢”“秦朝”对这位老人来说，不只是时代指涉模糊，朝代名与人名之分也是不清楚的。

- 14 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上海：新亚细亚学会，1932，第332页。
- 15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第152—155页。
- 16 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僳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6，第179—181页。

第八章 羌族认同与英雄祖先历史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及过去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一截骂一截”的族群认同体系。我也说明在此狭隘的本村寨、本沟认同之中，凝聚及区分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记忆经常是一些“弟兄祖先故事”，这是一种本土历史。在本章中，我将介绍另一种本土历史，即本地人在“羌族”认同下所相信的或建构的本民族的“过去”。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记忆的背景是一种超越村寨与沟的“羌族”认同，而且这种历史记忆多少都与“英雄祖先”有些关系。

“羌族”的概念，在本地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我的田野采访中，绝大多数的村寨居民说，在1960年代之前他们没有听过“羌族”这个称呼，或者并不清楚哪些人是“羌族”。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即使作为羌民研究的中外学者，对羌民或羌族的范围认知也不一致。无论如何，进入岷江上游的西方传教士、民族调查者、民国政府地方军政官员，都带来一些新的民族知识。来自各文化核心（西藏、中原与西方）的信息，在岷江上游地区各土司、头人、端公、喇嘛间流传，因此他们逐渐知道自身是一个“民族”——羌民、羌族或西番、藏族。同时他们也被告知一些本民族的历史——炎帝与三苗子孙、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吐蕃王族之后。

这种本土的“羌民”或“羌族”认同，或一种以“借”“热”“尔玛”等自称族名来表述的我族认同，早期只流传在少部分本地民众之间。他们是一些较有机会接触外来知识的“本土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这些“本土知识分子”主要是能读汉文的土官、村寨长老与头领、端公以及本地基督徒领袖们。他们都因对“外界”与“过去”有丰富的知识而为村寨居民所敬重，他们也因为有知识而掌握权力，得以将自己的知识与诠释推广流传。更重要的是，由于与外界的接触，他们心目中的“我族”范围已不限于本村寨或本沟的人群。

一、20世纪上半叶羌族认同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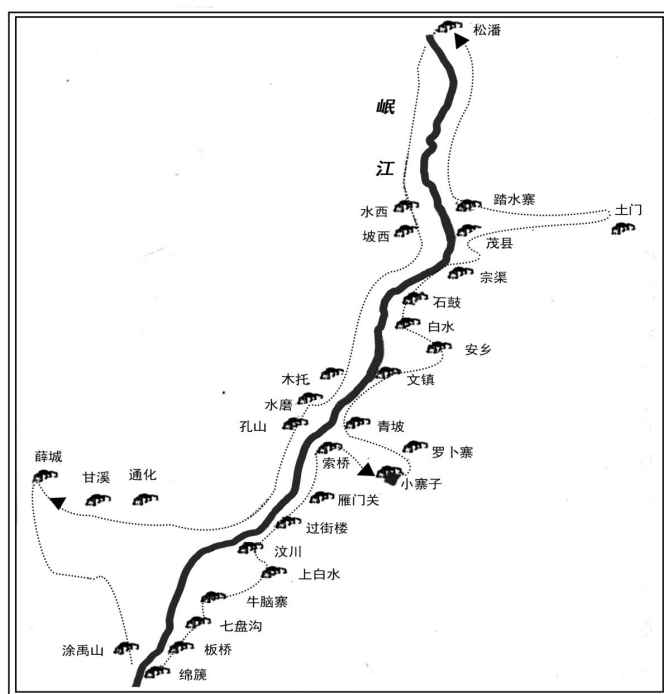
在岷江上游今为羌族分布的地域内，20世纪上半叶时，少数村寨在名义上仍属当地土司管辖，而绝大多数的村寨都由地方官府直接治理。土司、土舍及其后裔此时也许因家世受村寨民众敬重，但已无实质权

威。反倒是村寨中一些家道殷足、与外界关系良好并能读书识字的村民，自然成为本地的头领人物。这些头领因常接触官方、军方代表及有较多机会出远门，因此对外界事物有丰富的了解。而且，他们也是本地居民中少数可能听过或知晓“羌民”这一族称的人。但我们不知道，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土司或头领人物是否有尝试凝聚各沟、各寨“羌民”为一体的举止或言论。岷江上游各沟、各寨居民，在近代曾多次规模或大或小地结合在一起，攻打官府据点松潘城、叠溪营，或与执行“扫烟”的川军作战。这些集体行动，多少能强化相对于“大朝”（中央政府）之人的我族认同。然而，这种各沟、各寨间的短暂军事结合，一时难以改变本地“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因此也难以建构一体的“我族”认同。本地头领人物与土司们在推动“羌民”或“羌族”认同上少有建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本来就是汉人。无论如何，我们很难找到当年土司与地方头领们所留下的有关其“我族意识”的文字或口传记忆，这方面的社会记忆只部分保存在口述或书写形式的“端公经文”之中。

端公是村寨中为人驱邪去病的巫师以及本土“历史”（或神话）的讲述与诠释者，因此也算是地方上的头领人物。他们所施的法术，如打太平保护、踩钹头、过红锅等，都是川西道教道士们常施的法术。他们所念的咒语有雪山咒、化水咒等等，也是汉人道教产物。因此在端公的养成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便是习汉字、读汉文书。“端公”可以说是汉与本土宗教文化的混合产物；“端公文化”最流行的地区，也是本地较汉化的地区。他们的经文一般分为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目前已知的端公经文，都是在1980年代由硕果仅存的几位老端公口述，经他人记录、转译而成。经文中涉及许多天地开辟、人类形成、本地人的由来等等之叙事，以及请神、驱邪之成套法语、咒语。在过去，法力神通而受敬重的端公，常受邀到各地去作法解难。可以说，在1950年代以前，端公是许多村寨居民认知“过去”以及“外界”的主要媒介之一。

端公对“外界”的知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周遭诸寨神、山神的认识。他们在作法事时，常需演唱经文，将附近各寨、各沟、各地的寨神或山神都请来受祀。端公之外的村寨长者，也经常主持祭典时唱“开坛词”，但他们请神的范围，一般只围绕在本寨、本沟附近。相较而言，端公请神的范围要远得多。这个受邀神明的分布范围，可说是他们心目中较亲近的或有往来互动的人群地域；邀请“他方”神明，也表示知道并尊重各方人群的资源与势力范围。我们以汶川县雁门乡端公的口述经文《息》与《箴》来看，受邀的各地寨神、山神，主要密集分布

在北到茂县之凤仪（今茂县县城附近），南到汶川绵麓的岷江主道之间（见图十六）。此外几个零星的神祇居于北方的松潘，西方的理县薛城、通化与茂县东方的土门。¹受邀诸神分布之核心区（由茂县凤仪到汶川绵麓），事实上便是当今汉化程度较高的羌族的分布区。受邀诸神分布之外围边缘，松潘、通化与绵麓，大致也是当今羌族分布的北方、西方与南方极限。此请神的空间范围，表现了这些端公心目中一个熟悉世界的范围或者“我族”分布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松潘，西方的通化、薛城与南方的绵麓，都是本地历史悠久的中原驻军关隘重镇所在；松潘、薛城的西方与北方，都是所谓“生番”之地，绵麓以南则是“汉地”。因此，在《息》与《箴》之中，端公请神到这些地方为止，也表露端公心目中这个较熟悉的、在某种秩序中的人群特质，汉人文化与政治权力所维系的政治文化秩序，毫无疑问是这个地域人群的特质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汉人”。因此，他们心目中完整的汉区（如东面的北川，与绵麓以南）以及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地区人群（如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人群），都被排除在此一人群范围之外。



图十六 经文《息》中端公请神空间范围

在另一种经文《必格纽》中，雁门的端公先唱天神木比塔帮助“羌人”打败戈人，而后“羌人”迁居各地安居的经过。为了谢天神，经文颂

道，“乐善寨首”往南去买猪敬神。在经文中，他沿岷江而下，经雁门、威州、绵篴、娘子岭（映秀）、灌县、郫县、成都等地，这些地方的“寨首”都请他代为买猪（见图十七）。最后他向成都寨主“珍美基”买得了猪。²经文中所称的“寨首”或“寨主”，事实上便是各地的地盘神。现在我们已不容易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寨神便是它本土的寨神，有多少只是雁门端公的想象与创造。然而至少各方受邀神祇或沿途“寨首”的地理分布，代表这些有知识的端公心目中与自身较亲近的人群范围，或代表他们心目中一层层地理远近、关系亲疏不同的外在世界。显然，这样有远近、亲疏关系的人群是沿岷江河分布的，这也就是一层层汉化程度不同的人群。经文《必格纽》中提到的“冉駹府”与“汶山郡”³，显示出创作这经文的端公具有一些汉文古籍中的知识。“往成都去买猪敬神”，也隐喻着这些端公们在文化与族群认同上，特别注意“我族”与南方的或汉文化世界间的关系。



图十七 端公经文中英雄征程与游历路线图

汶川龙溪沟属岷江西岸的杂谷脑河流域，与黑水河流域的三龙沟只隔着一座大山。龙溪沟端公唱《阿补齐雅》，经文中所请的各地盘神与

寨神，只是在龙溪沟二十三寨范围之内。另外，他们唱《苦巴米亚》请铁神的经文中，运铁、分铁的路线及范围，则沿岷江由松潘到成都，然后转回头，运送到龙溪沟、三龙沟各村寨。“铁”在此代表一种外来文明，分铁的地域与人群范围，也就是在此地可分享此文明的地域人群范围。此“文明”由成都、郫县、灌县一路传来，分散到与前述汶川县雁门之端公“请神”范围相类似的地域人群中；只是龙溪沟村寨居民，把邻近黑水河的三龙沟也涵括在此地域人群内。同样地，北川不在此送铁、分铁范围内。三龙沟以上的黑水河流域各村寨，也不在分享此“文明”的区域人群之内。

以上的端公经文，都透露出一些对于“我族”本质的想象。此种想象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探索——探索我族的边缘所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族”的西方、北方与东方边缘是毫无疑问的：西方黑水河流域、北方松潘以上、东方的北川地区，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西番”“蛮子”，便是“汉人”。因此“我族”边缘的探索，便集中在沿岷江河往南的地区。灌县是由成都平原进入山区的入口城镇，在本书第二章中我曾介绍过，从古至今这城市都与岷江上游山区居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山里的人经常季节性地赴成都平原打零工赚钱。灌县一带的民间信仰与传说，也流行在岷江上游地区。在前面所引端公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成都”在原住民心目中是汉人的地方，但“灌县”却大致在汉与非汉的边缘。

如前所言，以上各地端公经文的采集时间大约都在1980年代。当时这些端公都已年过古稀，而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作法事念经，因而对此的记忆可能有些缺漏。在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采集、编译者主观删削整理的雕凿之痕。⁴无论如何，由20世纪上半叶留下的一篇本土记忆我们可以确知，当时部分本地人认为“本族”的地盘曾经到达灌县。这种本土记忆见于葛维汉在1940年代所作的采访，其中记载了离今汶川县城不远的一位克枯寨居民的说法：

很久以前，有两个民族——支拉（Tzu La）与戈拉（Gu La）。他们间发生战争，戈拉被打败了（戈拉是羌，支拉是汉人的古名）⁵。羌长程迁徙，到此地之前走了一年又数月。途中他们使用牛皮做的圆舟渡河。其中一条船漏了，经书也打湿了。当经书放在太阳下晒时，羊子来把它们吃了。因此羌人今日没有文字，经书内容只能靠一代一代口传下来。当羌人到了中国西部时，朝廷正在与戎打仗。戎被打败，退到杂谷脑。朝廷的军队也退到灌县休息，使得灌县到杂谷脑之间空了下来，于是羌人来占了这地方。那时羌人有绵羊、山羊，也种麦，但是就没有玉

米。乾隆时，瓦寺部落从西藏的瓦寺厂来，帮朝廷打羌人，打了十二年。危关一场大战，一个人从山顶下到河边，没有被人看到。羌人就败了，瓦寺因此得到现驻地作为赏赐，在羌人与汉人之间。⁶

我们不知道上文中的“羌人”（书中原文为Ch'iang）是这位1940年代报告人所用的词还是葛维汉套用的译词。无论如何，这位本地人认为，因战败而迁来岷江上游的“戈拉”，曾分布在灌县与杂谷脑之间。瓦寺部落来了之后，这一族人才退缩到今汶川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附近）之间。这个范围，大约是理县与汶川羌族的分布范围。北方的茂县、松潘，西方黑水河流域与东方的北川等地村寨居民都未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戈拉”过去曾分布在灌县此一说法。虽然《必格纽》与《阿补齐雅》中，请神或买铁所涉及的地域都到郫县、成都，然而在本地人心目中，郫县、成都是汉人所居，有的人且认为汉人的皇帝在成都。灌县则在当时本土的我族想象中，成为我族的边缘。

英雄征程记

我族想象须通过“历史”来完成。20世纪上半叶岷江上游村寨知识分子如何建构一种“历史”，来说明“灌县”及其他地方为我族之域？在“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下，他们或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将灌县及其他地区都视为“弟兄祖先”分居立业的地方。稍晚，在1980年代，羌族知识分子的确有如此的历史建构，后面我将说明。在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本地知识分子——端公，曾试图以一种“英雄征程”故事或历史，来说明这个“我族”范围。

前面所提及的经文《必格纽》“乐善寨首”往南到成都去买猪，这经文中已有“英雄游历”的意味了。20世纪前半叶，在流传的民间故事与端公经文中，更有一些述说“英雄征程”的叙事。灌县，在这些叙事中，则是本地人曾攻打过的地方。有一部流传甚广的端公经文《赤吉格补》，述说一个松潘的孤儿——赤吉，曾率羌兵打到灌县、成都。⁷在这一部经文中，赤吉率兵由松潘而下，经过宗渠、石鼓、南兴、木托、汶川、绵篾、娘子关、灌县等地，都与各地“寨首”有些接触。赤吉向他们解释出兵缘由，因而未被阻拦。这个路线也就是端公请各地寨神的路线。经文中描述英雄过“灌县”（六谷多）的情形为：“瞬间来到六谷多，西门原是蛮城地，兵马到达寨首惊，忙问赤吉欲何往，何故兴师到此间。赤吉耐心说缘由，兵马到此无别事，报仇开到川西坝。”⁸然后，赤吉到了川西坝的“郫县”（国涅比亚街），便与当地寨主打了起来。此经文中，在“灌

县”，与上游其他地友一样，赤吉可以经由解说出兵缘由而得通过。并且，经文中说灌县“西门本是蛮城地”。这些都显示，在这个英雄征程历史中，灌县是“我族”分布的边缘。三龙沟流传的“路育支”英雄故事中，此英雄也曾打到灌县，然后回转来到牛尾巴与三龙一带。

端公经文中最为学者所知的，可能是一般称作“羌戈大战”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各版本都不同程度地有“英雄征程记”或“弟兄故事”的痕迹。《羌族故事集》中著录了汶川端公所唱的《戈拉智拿》，也就是“羌戈大战”故事。⁹首段说：

传说木比塔有三个儿子，大儿在黑罗山牛场放神牛，二儿在黄猴坡马场放神马，三儿在汶川放神羊。有一年魔兵和戈基人伙到一起，一同来打羌人。不知打了多少年，羌兵败了。这一年木姐珠与斗安珠被木比塔封为地皇氏，派到汶山一带放羊。木姐珠与斗安珠生有九子。大儿叫构；二儿名叫恶；三儿名叫烧当；四女儿名叫至；五儿名叫格南；六儿名叫黑羊；七儿名叫白羊；八儿名叫吉；九儿名叫尚当。九子也封为人皇，九兄弟继续与魔兵和戈基人打仗。

事实上，端公唱词中这个“我族”都不称作“羌”，因各地口音而称作“借”“热”或“智拿”。上引文中的“羌人”，是演唱者将之译为现代汉语的用词。由“地皇”“人皇”等神话人名与古地名“汶山”等等，可见唱此经文的端公颇受汉文典籍影响。经文中的九兄弟，据文献记载，就是“羌人”的祖先。经文又述说“羌人”如何得到天神的帮助，打败戈基人。战后，天神木比塔要“羌人”有功战士到各地去立寨定居务农。经文唱道：

他又叫有战功的士兵各处立地务农。高羊坪羌，恶石坝羌，石碉楼羌，维谷羌，龙坝王沟羌，龙坪沙坝羌，三溪十八羌，大小二姓羌，黑虎羌，松溪羌，北路松坪沟羌，太平石台羌，沟口羌，东路坝底羌，白石雁门羌，南路别立五崖寨羌，罗山斗簇羌，汶川萝卜羌，木托水磨羌，孔山羌，九枯六里羌，卜周木上羌，大门歇格羌，牛罗二山羌，西山桃坪羌，蒲溪甘普羌，干溪通化羌，二岭羌，岭岗羌，白石羌，山羌，黄花羌，牛脑羌。从此，羌人定居务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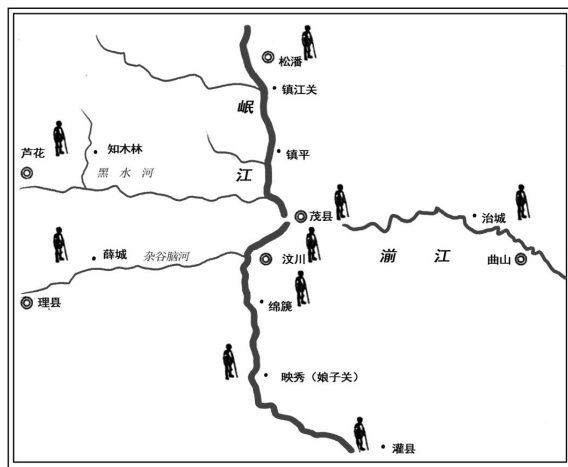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羌”的范围，先由黑水河上游一路数下来，包括了今日部分黑水县东部的黑水藏族，赤不苏至沙坝的羌族，松坪沟、黑虎沟等地羌族，以上都是居于岷江以西的村寨人群。再则，北方由茂县太平而

下，直到汶川，这是沿岷江干流的一些羌族村寨。最后，九枯六里羌到干溪通化羌，都是指杂谷脑河流域的村寨人群。以此范围来看，这得胜的“我族”几乎包括了所有今日说“羌语”的地区，包括部分目前“说羌语的黑水藏族”，然而北川地区村寨人群未包含在内。这个“我族”范围，又与1950年代初民族调查所知的“羌族”范围大致雷同。这项由当时的西南民族学院调查所得的“羌族”范围，与现在的羌族范围相比，少了北川羌族，却多了黑水县东部的村寨人群。上述经文中提及的“高羊平羌”，应是指1940—1950年代黑水最大土司头人高阳平所管的各沟人群，这也证明这个叙事基本上延续或保留了1950年代左右的社会记忆。无论如何，在这版本故事中的“英雄”，是与魔兵作战的“九兄弟”或是天神，“英雄征程”的叙事并不明显。

我们再看看另一版本的“羌戈大战”——这是羌族知识分子罗世泽在雁门采集端公唱词并转译而成的版本。这也是目前最广为学者及羌族知识分子所知的版本。这篇唱词先说羌族原住在“岷山草原”，后来因魔兵从北来，使得“羌族兄弟九支人，魔兵冲散各逃生”。大哥阿巴白构率众到补朵山（原注称这是青海、四川间的山），南下到热兹草原（原注称在松潘附近）居住。后来与“日补坝”（原注称在茂汶境内）的戈基人发生战争。后来经天神帮助打败戈基人之后，阿巴白构分派他的九个儿子分别到各地去立寨。这“九弟兄”及他们所分驻的地域如下：

大儿合巴基，进驻格溜（茂汶县）大草原；二儿洗查基，进驻热兹（松潘县）花果山；三儿楚门基，进驻夸渣（汶川县）好山川；四儿楚立基，进驻波洗（理县薛城）防敌犯；五儿木勒基，进驻兹巴（黑水县）开草山；六儿格日基，进驻喀苏（绵虬）把民安；七儿固依基，进驻尾尼（娘子岭）辟草原；八儿娃则基，进驻罗和（灌县）守边关；九儿尔国基，进驻巨达（北川）防戈人。

以上羌语地名之后的括号内，是我根据罗世泽的注释而加入的当今对应地名。与前一版本“羌人有功战士到各地立寨”的范围相比，这个羌族“九弟兄”分布之地更辽阔（见图十八）；前者中的各沟、各寨，在此也变为与当前行政区单位一一对应的地名。而且，如前所言，其他版本中这个“我族”或被译者转写为“羌”，但从未被记录作“尔玛”。然而，在罗世泽的译文中，则多处出现“尔玛”以及“尔玛人的子孙啊”如此诉诸民族感情的句子，处处都在显示，这个版本是“尔玛”或羌族认同下的产物。罗世泽自身也是羌族，因而这个版本流露出1980年代一个羌族知识



图十八 “羌戈大战”故事中战后羌族九兄弟分布

以上罗世泽版本中“尔玛”九弟兄分驻的范围，也透露一些重要信息。它除了正好包括当前五个有羌族分布的县（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加川）外，还包括黑水、映秀、灌县、绵虬等地。其中绵虬是汶川的旧县城所在。黑水，由于当地主要族群的语言，在语言学分类上被认为是“羌语”，因此在这种语言学常识普及后，羌族知识分子多认为黑水人应该是羌族。娘子关（映秀）与灌县，则是在当前羌族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过去应为羌族分布的地区。此种“历史知识”的渊源之一，便是端公唱词中所建构的知识，如唱词中常提及的，娘子关与灌县的“寨子”与“寨首”以及过去羌族曾打到这些地方等等之记忆。因此，罗世泽所称羌族“九弟兄”立寨的范围，也就是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集其民族、语言与历史知识所建构的“羌族”范围。也因此，这个“羌戈大战”及其中的“九弟兄故事”，是目前羌族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一个版本。1980年代以来，许多羌族人皆认为灌口二郎神是羌族，其父，秦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自然也被当作羌族。这些都让他们视灌县为古羌人之地。道教传说中，位于灌县的“炼罗鬼国”，近年来被部分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是羌人的“炼罗古国”，他们还为此组织了研究会。¹⁰

更重要的是罗世泽版的“羌戈大战”故事，可以说是“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祖先故事”的混合版。故事中，最早从“岷山草原”逃出的是“兄弟九支人”；最后，得胜而分居各地的也是“九弟兄”。不同的是，故事中出现了英雄“阿巴白构”，有外地的空间起源与随后的迁徙，也有战争过程，最后那“九弟兄”也有了一个英雄父亲，这些都是“英雄祖先历

史”所有，而“弟兄祖先故事”所缺的因素。

基于以上资料与相关讨论，一个“羌族”我族意识的本土塑造过程似乎隐约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我族”原称作“借”“热”或“智拿”。建构这种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端公，或者说，端公是许多本土知识分子之代言人。支持此我族意识的“历史”是一种由“请各方神明”经文发展而来的“英雄征历记”叙事。通过“英雄征历记”，他们解释或探索我族的内涵与边缘。虽然，这个跨越各寨、各沟与各地区的“我族”范围在不同的端公经文中并不一致，但很明显地，这个“我族”不是“汉”，更不是“蛮子”或“西番”。这些近代早期“本土知识分子”端公（或包括头人们），与1980年代以后掌握本土知识权力的“羌族知识分子”相比，似乎更有汉文化倾向。因此，在他们的经文中，请神的方向是往南方下行，英雄游历或征程也是向着南方，而灌县则是“蛮”与汉的分界。

与这些本土“我族”概念建构并行的是西方与中国学者的“羌族”民族调查。这项民族调查在1950年代后更积极进行，为民族识别铺路。在1980年代许多北川人成为“羌族”后，“羌族”的地理分布范畴便大致确立了。这个范畴，与端公经文中所见的“我族”范畴相比，最明显的差别是纳入了北川西部、北部各乡村落以及黑水河流域瓦钵梁子以下各沟，但并未包括绵虬以南的岷江沿岸地区，灌县当然也远在此范畴之外。过去那些端公心目中“我族”的核心，是汶川、茂县、理县等沿岷江边较汉化的村寨地区，这也是端公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但在1980年代以来的“羌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地道的羌族反而是黑水河流域各深沟中的羌族，这些地区，也是许多“羌族知识分子”的老家。这个发展或许也说明了罗世泽版本“羌戈大战”文本的内在情境——新的本土知识分子带来“弟兄祖先故事”历史心性，承继“端公文化”中的我族想象，并吸纳汉人所赋予的语言学、民族学与历史学知识。在如此的混合知识与强烈的“羌族”认同下，他们建立起一个混合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故事的叙事。在此叙事中，他们一方面承认本民族是一个“在北方被打败而南迁”的民族，一个战败英雄的后裔；另一方面，在历史、语言与民族知识和想象下，他们以“九兄弟故事”来建构一个扩大的我族想象群体。

本土知识分子

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本地建构“我族”认同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其实，不只是岷江上游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本土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指在本地被认为较有学问的人。因此这其中

应包括两种因素：一是“知识”，二是被群体接受的“知识权力”。这两者又常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本地人而言，一个人会比他人有更丰富的知识，此知识多来自“外地”。外来知识在此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区，无论其是否“真实”，都挟带强有力的政治与文化威权。本土知识分子也因接触、掌握此种知识，得以借此建立自己在本族群中的威权。近代早期的“端公”，便因为熟知许多外来的汉人宗教文化知识，因而掌握了本土知识权力。

民国以来，新知识与新政治、文化权力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这些新的知识，包括国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及相关的语言、体质、历史与民族知识。新政治、文化权力，除了由传统中原王朝政权转化而成的“中华民国”及其地方政府与边防军势力外，还包括英、法、美、日等殖民强权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霸权。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中外民族调查者，都带着这样的新知，并挟其所依持的政治与文化优势权力，进入他们心目中的“羌民”或“羌族”地区。他们的“羌民”或“羌族”概念以及相关的历史与民族志知识，对于他们的本地报告人、助手、翻译与提供协助的长老，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前面我曾提及的英籍传教士陶然士，他对“羌民”族源、历史、文化的看法以及“羌民”与汉人、嘉绒的民族区分，都曾通过他的传教活动以及受他影响的“羌族知识分子”，传播到部分“羌民”之中。

汶川木上寨的苟平山，便是这样一位羌族知识分子。他是陶然士的助手及好友，曾受过汉文教育，本身也曾是一位“端公”。他写过一篇公开信宣扬基督教。以仅见的英文译本来看，其名似乎为《告大羌族同胞书：献羊子之始末》。这篇文告开头的一段是¹¹：

各地村寨的羌族同胞朋友们，我们住在汉人与藏族之间。西邻戎人，东与汉地接壤。我们欲和戎人沟通，有语言上的困难。我们不能读藏文书，我们也不信喇嘛教。即使我们与汉人很有来往，也总有些困难……如今，美国圣经教会的陶然士先生游遍汶川、理番、茂州，他发现各村寨献羊子的习俗与《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雷同……

由此文看来，他自陶然士或汉人知识分子处得到“羌族”（或羌民）这样的民族概念。而且，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两个民族范畴——汉人与戎人（或藏族）。这篇文告似乎曾流传在理县、汶川一带；当然，主要是在陶然士所称的“羌民”之间。在我作田野调查的期间（1995—2002年），有些羌族知识分子仍耳闻过去曾有人写过一篇《告羌族同胞

书》，来宣传羌族团结。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是一篇宣扬基督教，及宣称羌族是以色列人后裔的文告。只有一位理县蒲溪沟的老者曾说，他小时候听过“羌族是犹太人后代”的说法：

羌族有人说是犹太人吧！是读过书的人摆的。羌族穿云云鞋，上面绣的花，带波浪式的，所以说羌族是外国过来的。这是茂县、汶川一带的人说的。这是没什么根据的。

显然，这个“犹太人族源”现在被当作是相当荒谬的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积极推动各种少数民族政策，其基础是民族识别与分类。民族识别、分类的基础，则是民族史与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历史与民族志知识，通过国家教育深入村寨群众之中，如此也强化了民族识别与区分下之族群体系。从此，本地人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受汉人关注，也受本土知识分子关注。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更重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此时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培养的羌族知识分子，成了新一代的本土知识分子，并开始涉身本民族事务。许多本土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偏远山间村寨，出于民族认同，他们热衷于学习并研究本民族历史。这些羌族知识分子所知道的“羌族史”，主要也就是我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典范羌族史”；对此历史所知多寡深浅，因各人教育背景与社会背景不同而有别。然而，他们不只是学习代表社会主流之学者所写的“羌族史”，他们也在本土记忆如端公经文与地方传说中，找寻可与典范历史相衔接的轨迹。他们相互讨论、辩驳，并在言谈间、在文字上，表达他们对本民族历史的看法。

村寨民众，特别是老一辈的人，对“典范羌族史”的认知就相当贫乏了。然而，在中老年的村寨民众间，常流传另一些“过去”。这些“过去”常涉及中原的历史或传说人物以及相关时间、空间与事件，混杂“典范羌族史”中的一些缩节、片段内容。这些“过去”，广义而言，可以说也是一些“历史记忆”。无论它们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不能否认的是，它们与“历史”有相同的功能——以“过去”来解释“这些山里的人”或“羌族”的本质以及当前的族群状态与地位。再者，我们无法截然划分羌族知识分子所知的“羌族史”与村寨民众对“过去”的记忆。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当代羌族知识分子都出身村寨，过去听来的神话、传说，影响他们对本民族的看法，因此也影响他们的历史建构。由这些历史或神话的“过去”之中，他们建构“我族形象”。

在本章以下几节中，我将以采访所得之羌族口述记忆材料，说明本

地群众心目中的我族形象。这些通过各种历史论述来表达的我族形象，主要便是：“愚笨的蛮子”、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最古老的华夏、被打败的羌族等。无论哪一种历史论述，大都与汉人社会历史记忆中的“英雄祖先”相关。此外，我也将介绍一些与汉人社会历史记忆关联较少的本地“神话”“传说”，并探讨它们在羌族认同之本土建构上的意义。

二、老实的“蛮子”：周仓与孟获的子民

在羌族民众间，包括所谓知识分子，最普遍的自我形象就是“我们比较老实”或“比较笨”。他们不只认为“本民族比较笨”，而是所有的“民族”（指少数民族）都如此。在村寨民众心中比较普遍存在此种本民族的劣势意象，因此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在村寨中也比较流行。在理县、茂县等地区，特别是茂县雁门一带，普遍流行一个“周仓背石塞雁门”的故事。雁门关附近有一块巨大岩石，上面有类似手印的纹路。据说是当年“周仓背石塞雁门”留下的痕迹。以下是一则汶川龙溪人的口述：

征西时，一个关口，周仓塞雁门。周仓原来有意把雁门关塞了，不准汉人进来。他气力大，如果把雁门塞了，汉人要来剥削羌族的经济财产就困难了；你通不到。雁门是多大一个洞子，洞子用石头一塞就过来不到。所以周仓看到外面的人对羌族人民剥削太厉害，他就想把洞子塞了，让汉人过来不到。于是在周仓坪那有个大石包，好像有个房子大，现在还在，手抠到的、背背的地方印子还在。他背起的时候，统治阶级察觉了。周仓在晚上塞雁门，怕别人知道。统治阶级察觉了，就装鸡叫。这个鸡叫，周仓就想今天塞不成了，干脆把石头撂了。

他所谓的“统治阶级”，指的便是“汉人”。在许多人的说法中，欺骗周仓的是关羽，或观音。对本地人来说，两者都是汉地的代表或守护神，没有多大差别。一位理县蒲溪沟的羌族对我说：

周仓背石塞雁门，不是三国的周仓，不知是哪里的周仓。观音聪明些，周仓气力大，笨一些。周仓背起石头，打赌天亮背上去。观音菩萨就学鸡叫，周仓就把石头放下来了。

理县薛城的一位村寨居民也说：

听说周仓是羌族，塞龙门。他跟汉人争，汉人文字行，周仓气力

行。他用石头塞雁门。你文字凶，我用石头可以把雁门塞住，你还凶不凶？这是争地界的意思，争羌族的名誉地位。

在北路羌族以及黑水藏族的传说中，周仓成为与观音打赌而受欺骗的神。如一位黑水维古的藏族说：

我们黑水这个民族多得很。维古人是全国都有。四川每一寸土地都是黑水人多。有个周仓，有个观音菩萨。四川地方以前没人住；周仓是民族的菩萨，观音是全国的菩萨，四川人是他管的。周仓是男的，观音是女的。周仓老实得很。周仓说我得行，观音说她得行。根本是观音菩萨得行。两个人分地盘，观音菩萨用一个钻子、一个锤锤，晚上去、白天去，在石头上刻字。周仓在草上打疙瘩作记号。观音说，我们走到那去看，是我的还是你的。结果烧了一把火，周仓的草疙瘩都被烧掉了。地都是观音的。所以民族就到山上来了，观音就到四川。这些过去都有人说，是不是真的你们去翻书嘛，书上记得有。现在说那些的人都没得了。

黑水知木林的一位老人，也曾对我说：

周仓是西方的一个王子，青海、西康都是周仓管。他原和诸葛亮在一起。他跟诸葛亮打赌，一个县一个县的打赌。灌县。谁能把麦草甩到河对面，谁就赢灌县。周仓有点笨，用干麦草甩，就甩到河里去了。诸葛亮用口水把麦草弄湿，就甩过去了。灌县就被他拿走了。又赌灌县上的一个县。打马蝇子，诸葛亮用指头按下去把马蝇子按死，周仓用拳头打，把马蝇子没打到，又输了。又拿了一个县走。又打赌，有一个崖子，射箭，打到崖子上赢没打到算输。诸葛亮派人去把自己的箭插上去，把周仓的箭拿走。就又输了。这样汶川以下都被拿走了。周仓塞雁门，不准下面的人上来，背一个石头要去塞雁门。鸡叫了，他就把石头放下来了，结果雁门也没塞到。

藏族话就像是王子。格萨尔王，就是西番的民族，就是汉族说的周仓。

在这位小黑水藏族心目中，周仓为本民族的神——这个“本民族”自然指是藏族，或过去所称的“西番”。他又将周仓说成是本地传说中的“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流传于青海经川边到云南广大非汉族群中，是一则描述英雄四方征伐的史诗故事。目前此故事流传地区的各族群，大多

被划分、识别为“藏族”，因此这也被视为“藏族史诗”。无论是周仓背石塞雁门或他与观音打赌的故事，周仓都被说成是有力气、没头脑以及十分老实的人物。他也因此失败而造成其后裔目前较劣势的地位。相反地，汉地的代表或守护神（观音或关羽）则被认为聪明、有文化而又狡猾，因此其后裔现在占了较好的地盘。人们以这些“过去”来诠释当今的族群状态，并解释为何现在羌族地区有那么多的汉人。

无论是在民间故事，还是在相关图像上，周仓的形象都是面貌丑恶、肌肉结实的夯汉，这也是较汉化的羌族地区民众所认知的周仓形象。因此，接受此一人物作为本民族祖先，也是接受古代汉族赋予少数民族的一种刻板、丑化的“蛮子”意象。相对地，在汉化程度较低的黑水地区，许多村寨民众心目中的周仓则是格萨尔王，这并非是被丑化的“蛮子”，而是勇武善战的我族英雄。

中国民间三国传说中的孟获，是另一个被视为羌族祖先的人物。在有关孟获的传说中，同样是因为他被汉人欺骗，而使得其后裔羌族住在山上。以下是一位茂县三龙人的说法：

孟获是羌族的首领。七擒七放之后，诸葛亮不肯跟他见面，他就自己惭愧了。诸葛亮就早有准备，就准备四支箭，合得起的。他就说，你让我一箭之地好了。那时他在成都。结果这一箭是假的，箭被带到理县打箭炉崖高头去插。这就都归大朝了。孟获看了说，我怎能这样让的呢？诸葛亮说，高官你尽管去做。他听成“高山上你尽管去住”。所以房子尽修在高山上，所以灌县就这样变成大朝的。打箭炉以上就是羌族了，以前藏族、羌族原是一回事。

孟获在中国民俗传说中的形象，也是面貌狰狞、肌肉结实的“蛮子”。这一类受汉人欺骗的“历史故事”或“神话”，在羌族中非常多而普遍。这说明了长久以来他们对“汉人”的看法。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汉人”欺凌“非汉土著”所造成的结果。在前面我曾说明，在过去村寨居民心目中的“汉人”，乡谈话中所称的“而”，是指下游的村寨或城镇人群。因此歧视他们的“汉人”，自身也受到下游村寨人群的歧视。这些受汉人欺骗的故事，在过去曾表达他们孤立的村寨认同。在当前汉族、少数民族的区分概念下，它们又被用来解释少数民族的现实处境——住在边缘山区的一些人群。

三、汉族的拯救者：李冰与樊梨花的后代

周仓被羌族人视为祖先或神，事实上还有其他意义。在中国民俗故事中，周仓与关羽有主从关系，周仓永远手捧关羽的刀，忠心耿耿地站在后者身边。这个形象符合许多羌族人民心目中“我们是汉人的忠实帮手”此一自我意象。一位汶川龙溪羌族说：

周仓是三国时，东汉末期的人。那时威州雁门关有一个洞子。周仓这个人气力大，有勇无谋，他跟关云长在一起的。据说他是个本地人。西京，三国时代，孔明刘备征西的时候，周仓这个人温厚、老实力气又大。刘备征西蜀的时候，在我们西北征战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人，气力很大。关云长是个文武都行的人，就把他收了，给他一些照顾。周仓就对关云长怎说就怎么听，就怎么干。

羌族这个我族形象，也通过其他“英雄祖先”来表达；这些“英雄祖先”与相关“历史”，又都出自汉族的历史记忆。作为汉人的守护者或拯救者的羌族祖先，有传说中的大禹、秦代的李冰以及民间故事中的唐代女将樊梨花等等。

大禹和李冰，都是以治水著称的英雄。现在羌族普遍认为，大禹和李冰是羌族祖先，因此也将羌族视为汉族的拯救者。特别是汶川一带的羌族知识分子，以当地的“大禹文化”为荣；“治水”便是他们引以为荣的禹文化之一。其缘由是，自古以来岷江上游山间居民便长于砌石筑屋、筑墙，过去他们常到川西平原打工，凿井、筑堤是他们常担任的工作。因此，现在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治水”是承袭自大禹、李冰的本民族文化之一。如一位汶川羌族知识分子，在对我介绍本地的引水灌溉文化后，说：

大禹走了，大禹的水文化仍然存在；羌族一直在疏导岷江。1933年叠溪海子形成，威、理、茂三县羌民还完成了第一期的疏导工程。听说李冰都是羌族，利用羌人的水利技术去修都江堰。

樊梨花的故事，流传在松潘、镇江关到茂县太平、较场一带。过去这一带的杨柳羌、牛尾巴羌、大姓小姓羌等等，都是以“好作乱”著名的“番羌”。明清时期，朝廷在此建立许多军堡，以维护由汶川到松潘之间岷江交通主线的畅通。因此，大道沿线成为汉化较深的羌族地区。只有深入沟中的羌寨还流行“乡谈话”，其他地方“羌族”说的都是汉话。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说，樊梨花是古代羌族头人，这儿的羌族人是樊

梨花的后代。他们说，镇江关就是樊江关或寒江关；较场是樊梨花当年练兵、校兵的地方。当地一个突起的土台，本地人称作“点将台”，被认为是樊梨花受封为将的地方。这些记忆显然是从汉人通俗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中得来。《薛丁山征西》的主要内容是：唐代西番哈迷国造反，由薛仁贵率领的唐军推进到“寒江关”时受阻于番兵。后来寒江关守将之女樊梨花，爱上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并表示希望与之成婚，而薛丁山却几度反悔赖婚。最后由于军情紧急，在皇帝派遣的大臣的调解下，两人尽释前嫌，缔结连理。于是，幸赖武艺高强的樊梨花之助，唐军终于击败西番。

这个故事的主题——土著女子爱上来自文明核心的男人——在族群关系中可代表一种典范类型，常出现在世界各种“核心”与“边缘”的文化接触之中。在美国，这便是民俗传说与电影《风中奇缘》

（*Pocahontas*）以及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的基模，在中国，这也表现在一首名叫《愿嫁汉家郎》的民俗歌曲中。然而，同样类型的故事，在羌族的本土理解中却有不同意义。他们以这故事来说明或强化“羌族是汉族的拯救者”此一自我意象，并以“平乱者”与“叛乱者”划分羌族（樊梨花的后代）与藏族（西番之后）间的族群界线。镇江关一带是羌族分布的北界，在此羌族聚落常与藏族聚落相错。镇平、较场一带村寨，过去更常受西方松坪沟人与黑水人的威胁。

不仅是镇江关、较场一带的羌族如此，可以说所有羌族（主要是指男人）都认为本民族在历史上一直为汉族的拯救者或支持者。因此除了上述大禹、李冰、樊梨花等古代人物与事迹外，他们也常说近代羌族人民如何前往广东抗击英法联军的事。一位出身汶川羌族的羌族知识分子，更明白地对我说：

羌族不愿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对中央政府一直是很拥护的。羌不谋华，拥护皇帝，不搞分裂。国家有危险时，羌族就出来。现在在海南岛还有一个羌族的寨子。我估计是在清代，抗英吗，还是郑成功？调了羌兵去打荷兰人。我们那流传曾去打荷兰人，弄不好就是那些羌兵在海南岛定居的。后来我又听说，羌族打过廓尔喀。在国家统一上，羌族是有贡献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与民族团结知识，是造成此种本民族意象的背景之一。然而就此解释“羌不谋华”，也可能失之浅薄。在前面我曾说明，“羌”自古以来便是华夏的一个西部“边缘”，一个模糊的、移

动的边缘。近代被称作“羌”的人群之所以能留驻在此模糊的族群边界上，便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从未组成如吐蕃、西夏、南诏那样的王国。反过来说，组成吐蕃、西夏、南诏等王国的“羌”，后来都自华夏心目中“羌”的范畴里被剔除。由于没有文字，他们也无法运用文字政治将一些社会记忆传播出去，成为更大范围人群的共同记忆，使之延续传递。也因此，羌族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得到“羌不谋华”此一自我形象。

四、古老的华夏：大禹子孙

对于羌族知识分子来说，大禹不只是一个对汉族有贡献的羌族祖先，而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夏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而建立夏朝的大禹又是羌族，因此羌族必定是中华民族中的核心民族，或说是最古老的华夏。也因此，在当前羌族认同中，“大禹”被羌族知识分子集体回忆得最多，也引起很多的争议。

首先，我们必须回顾汉人历史记忆中“大禹”与“羌”之间的关联。从战国至汉代，部分华夏知识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们以这社会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极端的例子，以说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事功，而不在于其出生何处或出生于何种社会背景。至于“禹生于西羌”是否为历史事实，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便非常重要了。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大禹出生于蜀之“西羌”，建构为一“历史事实”。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对“禹生于西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此书记载：汶山郡广柔地区有个地方称“石纽”，“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¹²。这个地方，在更晚的文献中就成了禹母生大禹的“剖儿坪”。我们不清楚，晋代蜀地的“夷人”是否真的祭祀大禹。然而，20世纪前半叶，至少在较汉化的北川地区，由于被称为“蛮子”的村寨人群都自称“汉人”，所以他们也祭禹王庙。

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华夏西部边缘的新华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强调大禹是当地“蛮夷”的祖先，而是借着“大禹出生于此”，来洗刷本地的华夏边陲或“蛮夷之邦”特质。也就是说，近代之前“禹兴西羌”之华夏空间记忆是边地汉人宣称“华夏认同”的符号，也是被视为“蛮子”的人群

借以遗忘本身非汉祖源的符号。在如此的历史记忆背景下，20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有“剐儿坪”“石纽”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迹。而所有大禹故事流传与大禹遗迹所在的地区，都是当地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也就是长久以来作为华夏政治与军事羁縻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如，汶川地区之“禹迹”在旧县城绵虬附近；理县之“石纽”在清代县治以东的通化附近；北川的“禹穴沟”，在清代旧县城治城附近；茂县的禹乡村，在旧县城凤仪附近。这些旧县城，也是传统汉人在此边陲施行教化的中心。这些都说明，“大禹之迹”与当地汉人羁縻与教化活动有密切关系。

当“羌族”在民族识别与相关历史建构中得其民族生命，而各地许多过去已汉化并宣称是汉人的人群也被识别或要求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他们仍宣称自己是“大禹子孙”。只是此时在他们心目中，“大禹子孙”的含义已转变为“羌族”。一位北川小坝乡民说：

大禹，我实实在在说，前头几年我们的确不晓得，只知道有一个禹里沟。这是早就知道的。大禹治水，也是很早就知道的。现在通过宣传，大禹是羌族祖先比较清楚。但是我们跟汶川还有争论。

羌族有此种历史记忆，除了上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背景之外，更重要的缘由是“羌族”被认为，因此也自认为是与汉族有密切且悠久历史血缘关系的民族。“大禹子孙”最符合这样的历史形象。以下这一则茂县黑虎沟人的口述，表达此一看法：

夏禹王，就是夏朝发展的根根，恐怕还是羌族。从历史看来，大禹治水。当时有水患，历史上有洪水滔天。暴雨一下，涨起来，水没有河道，最后夏禹王疏通河道。十三年中七次过家门而不入，所以说我们羌族人民对于建设国家是有贡献的。

对于大禹是羌族祖先，各地羌族知识分子都是同意的，但对于大禹究竟出生在何处，却有很多争议。如前所言，“禹生于汶山郡”这一记忆，使所有华夏西部边缘的汉人据点都有“大禹出生于此”的社会记忆。于是，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普遍成为羌族后，大家便争论究竟大禹出生在何处。以下几则口述，表达各地羌族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首先是一位理县蒲溪沟人的说法：

说大禹，是羌族人都感到自豪。通化的石纽山，那儿还叫汶山寨，

有些人说大禹是通化人。汶川人说大禹是汶川人；北川人说他是北川人。

理县通化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指出，理县通化、北川与茂县都有“本地为大禹故里”的证据。他说：

通化山上一个石刻上写着，所以理县也在争。北川现在好像物证比较多；大禹纪念馆花了八十多万。茂县也有，车站下来一点就是禹乡村，他也有禹穴。

的确，目前在这争论中，较占上风的是北川。因此四川省政府拨款兴建的“大禹纪念馆”，便建在北川治城。事实上，“大禹故里”之争还不只是在川西北的羌族地区；出身北川小坝乡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告诉我，陕西也有一石泉县在争“大禹故里”之名。

这石泉县有些争论。陕西那一个石泉县，说是禹王生在陕西石泉县。我们这禹穴沟，禹是出生在我们这的；李太白还在这写了一个“禹穴”，这就北川争赢了，政府有些优待。以前江油是龙安府，考文武秀才北川要多录取两名，就是优待圣人生的地方。但是汶川现在还在争。

在这位北川知识分子口中，我们可以知道“大禹故里”不只为本地人带来足以自豪的乡土认同，也带来些实质利益。一位汶川羌族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也深知“大禹故里”附带的好处。他说：

北川现在纯粹是吹的，他那儿既没有羌族，又没有羌语，又没有寨子。现在他吹起过后，绵阳专区就会给他钱。大禹是他们说起的，事实上，根本找不到像这边禹文化的痕迹。我们这儿除了大禹的痕迹外，端公所跳的舞步，经中央舞蹈专家鉴定是禹步舞。北川也没有。

由上引口述记忆，可以看出“大禹”在各地羌族中受重视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们间对于“大禹出生地”的争论。羌族为大禹子孙，那么“大禹出生地”的羌族自然是禹裔嫡传。因此这个争议，也就是攸关“谁是本民族核心”的争议。目前关于“大禹故里”的争论，主要在汶川与北川两地羌族知识分子之间。而这两地，是所有羌族地区中民众汉化程度最深的地区。相反地，大禹传说几乎完全不见于过去被认为是“生番”所居的地区，如茂县叠溪以北的牛尾巴（羌族），以西的小姓沟、松坪沟等地

（羌族），或三龙以西的赤不苏（羌族）及大、小黑水地区（藏族）。

北川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的“大禹故里”之争，也表现出一些我们所深信的“历史”之形成过程及其政治背景。这些年，北川县积极组织“大禹研究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邀集学者鉴定“大禹故里”及有关地理古迹。如一位北川知识分子所说的：

大禹的遗迹在这儿有洗儿池、剽儿坪、采药亭。剽儿坪那山包包上一个人坐过的屁股的痕迹都有，这是禹母生大禹的地方。下来到洗儿池洗儿，在一个瀑布下头，石头终年是红的，所以看来水是红的。采药亭是附近的山上，这是大禹小时候随禹母采药歇息的地方。望崇山是鲧治水久久不归，禹母每天登上去望夫归的地方。关于这问题，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姒教授都来了。他，大禹的一百四十二代后裔，他在这也做了学术报告。另外浙江大禹死的地方，他们的专家也来这考察，也认为大禹出生在这地方。至于禹母生禹时是否真的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屁股印，姒教授说，大抵古代伟人的事迹都不免带些神话色彩。于是就这样被大家认可了。关于大禹，大禹是最早的羌族。史书一直记载这是神禹故里，北川的人就是神禹的后代。全国的大禹研讨会都在北川开，每年一次。1991年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大禹研讨会，学术界的。现在都认可了，没得争了。他生在这里，治水在中原，死在绍兴那儿。他本身是古代的羌族。

凡此种种，为北川争得了“大禹故里”的正统地位。而北川之所以能积极进行此事，一方面由于北川属经济较富裕的绵阳地区，且为绵阳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可得到较多的经济援助。再者，北川地区汉化得早且彻底，这意味着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比起其他地区羌族知识分子而言，更有能力掌握古汉文典籍资料的运用与诠释。如以下一位北川羌族知识分子的口述：

从古到今，历代文人名士都认可了大禹生在石泉：四川省石泉县（北川县），九龙山下石纽禹穴沟。现在里头还留有很多遗址。清朝乾隆年间，石泉的县令叫姜炳章，他写了一个《禹穴考》，就写了：“石纽盘盘摩青天，剽儿坪上血石鲜，古传神禹降生此，至今溪水生红烟。”这对那个禹穴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在这以前呢，就是明代的文人杨升庵（杨慎），新都人，他的这个《禹王庙记》。宋代石泉的大夫计有功写的《禹庙记》。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手书的“禹穴”二字。这在以前有颜

真卿篆刻的“禹穴”。

言谈中将各种汉文资料信手拈来，有此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北川之外的羌族中并不多见。有趣的是，清代石泉县令姜炳章以其卓越文采留下数篇歌颂大禹的诗文，其目的显然是“愿将花雨洗蛮风”¹³——以描述华夏圣兴之域，将北川塑造为文明教化之区。如今他留下的诗文，却成为强化“大禹为羌族祖先”的重要社会记忆之一。

北川羌族，尤其是北川新旧县城曲山、治城的羌族，特别热衷于以“大禹”来强调他们的羌族认同。目前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流域，唯独北川羌族在湔江流域。这个族群分布的地理边缘位置，加上深度汉化造成本土语言、文化尽失，使得北川羌族时时觉得自身远离本民族“核心”。因此，“大禹故里之争”不只是为了争取观光资源与文化建设经费而已，更重要的是争取本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北川在这场关于“过去”的战争中之所以得胜，以及有关大禹故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相当清楚的——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出版支持北川为大禹故里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等。我并非以此指责北川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近现代许多“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知这并非是北川羌族的专擅，而是在国族主义或某种本土认同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五、过去很强大后来被打败的羌族

无论是在羌族知识分子或是村寨民众之中，最普遍的羌族历史记忆便是，羌族原来是很强大的民族，被打败后分散四方，一部分人就被赶到这山里来。以下是一位北川小坝乡人的说法：

我看了一些资料后，1991年我在茂汶出差，我问他们这羌族究竟是从哪来的。他们说，羌族是从青海来的。游牧、打仗，羌族人好战。打打打，就像忽必烈、成吉思汗一样，只顾打，不巩固阵地，于是打过的地方都被别人占了，回不去。羌族就消失得差不多了。所有少数民族：回、彝、藏、羌都是住在高山上、高原地区，汉族住得较好。

以上的记忆，显然得自于文字资料以及本地人的口耳相传。茂县赤不苏出身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也说，他从学校里得到类似的历史记忆：

以前西南民院的那老师讲羌族的来历，我们觉得藏族人也多，汉族更多，为什么要讲羌族？他说，羌族以前很强、很好战。被打散了，就一部分到藏族地区，一部分到西南的彝族地区，都是羌族流浪到那，才改变了族别。另一部分就流窜到阿坝州的茂县、理县，就是现在的羌族。我们下课后，彝族的同学不安逸（注：不服气），藏族的同学也不安逸。羌族人那么一点，还说我们是羌族来的。我们还去问老师。老师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这个历史记忆，显然是典范羌族史的“普及版”。由以上口述资料可知，通过学校教育以及羌族知识分子间的言谈，这种历史记忆不断地被传播、推广。但传播、推广此历史记忆的群体，更主要的是广大的羌族民众。不是被授予、告知一个历史记忆，本地民众便一定会接受。他们听过许多关于本民族的过去，但对此“历史”特别津津乐道。因为在民族识别与划分之后，一个事实便是：羌族人口只有二十万，夹在人口由五六百万到十二亿的藏、彝、汉三大民族之间。在民族知识普及之后，许多“羌族”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何这个民族住在山上？为何这民族只有这一些人，且分散在各个山沟沟里？汉族学者从汉人历史记忆中建构的“羌族史”，对本地人而言，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中，所有的人物与史事枝节都不重要，重要的历史记忆只是“羌族过去是个强大的民族”，借此他们可以强化本民族的自信心，而且“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可解释目前羌族分散居住在各山、各沟此一现实。

更重要的是，“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此一记忆，不但让他们认为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民族皆是羌人后裔，也让他们在更广大的世界中寻找、想象期望中的、足以为傲的羌族同胞。一位出身汶川龙溪的羌族知识分子，便曾在以下言谈中表达如此的民族自傲：

羌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嘛，在炎黄以后形成华夏民族，羌族是重要的部分。形成许多部落后，争地盘。又因为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没有团结起来，在战乱中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他们就结起来与羌族作战，打了很多代，七八代。打分散了，云南、贵州、越南、缅甸、柬埔寨，听说都有羌族。

目前，在这样广泛的羌族想象中，他们常谈论一些传闻中逃到国外去的“羌族”；这些想象中的“羌族”在缅甸、菲律宾、欧洲等等地方。事实上，有些村寨民众将所有“山上的人”都当作是“尔玛”。因此当他们在

一些书报上看到世界各地山区土著的介绍时，便认为那些人都是“尔玛”——羌族。

另外，近年来他们最常谈论的“逃到国外去的羌族”便是日本人。几乎在所有羌族乡，尤其是深入山中的村寨，都可以找到此种社会记忆。如一位北川青片的羌族民众所言：

日本人也有来北川这做研究……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羌族，所以对羌族有兴趣。他们说，他们与彝族特别接近，彝族的祖先就追溯到羌族。

茂县赤不苏的一位羌族，也曾提及日本人到赤不苏做研究，以及日本人与羌族间的关系。他说：

我们那最近也听说过日本跟羌族的关系。他们说，日本有一个地方的人跟我们赤不苏的人说的是一样的话。还有日本人到我们那去调查，在找他们的祖先。现在学术界就断定了日本人是西南一支民族；彝族就认为日本人是他们的后代。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话像日本话一样。

一位理县蒲溪沟的民众，认为日本话与羌语很相似，他也提及日本学者到蒲溪来研究羌族。他说：

头几年还有日本人来研究，专来研究这事。日本那女的，端公老儿对那日本女人对话。很多话都很相像，都是一回事。他跟我摆过；火钳，日本说啥，我们说啥。日本对一些东西的喊法，跟我们很像。日本人都来研究了几次了。我们还有一种“阿得华”，只有老年人会说。“阿得华”，古老羌语，跟日本话就说得拢，现在的羌语说不拢。

以上青片、蒲溪沟、赤不苏、小姓沟，都是当前最偏远的羌族地区。这也显示这种社会记忆无远弗届。无论从语言、历史与文化来说，都没有充分证据可说明羌族与日本人有族源或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历史记忆之形成，由以上口述看来，部分因素可能是在与一些日本研究者、访客的接触中，本地人获得、解读或误读到如此信息。但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某种社会情境，使得羌族民众乐于接受此信息。这个社会情境便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省区、各单位都在努力争取日资与中日合作，以开发各种经济与文化资源。各种经济、文化性质的日本访问团，常成为中国媒体与官方的贵宾。另外，在市场经济倾向的消

费市场上，日本产品在中国成为现代科技神话的化身；日益依赖各种电器产品，并极力追求现代化的羌族民众，也深受此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自然羌族民众很乐于找到如此的“逃散的羌族”¹⁴。

在过去一篇有关“太伯奔吴”的论著中，我曾说明在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不对等的族群文化互动关系与现实利益的考虑下，春秋时的华夏如何经由“寻回失落的祖先后裔”来接纳江南句吴的人，以及句吴的领导家族如何经由“寻回被遗忘的祖先”而改变其土著认同。¹⁵在羌族的例子里，他们努力“寻找失散的羌族后裔”，同样是因为某种族群中心主义心态。但这并不是一种优势族群的扩张性我族历史想象。相反，这是一种住在山中的少数民族对于自身的孤立与人口劣势感到不安与自惭，而期以“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羌族”来自我满足。

六、流传羌族中的两种神话传说

以上羌族的口述记忆，其中多少皆夹杂着中原历史或野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也穿插许多中原的时间、地理名称。这些记忆的主轴，都在于说明羌族与汉族的本质或两者间的关系。羌族中也普遍流传另一些“过去”，它们与汉文化关系不深或根本没有关系。在本地，它们被完全视为“神话传说”——以本地汉话来说，便是“条”或“壳子”；讲述这些，便是“摆条”或“吹壳子”。以下我将介绍两则这样的神话传说。

伏羲姊妹制人烟

第一则是“两姊妹成婚”或“伏羲姊妹制人烟”故事。以下是松潘小姓沟一位羌族老人说的故事：

“东巴协日”一个菩萨，他管人间。我们活在他的地球上。伏羲姊妹（按：姊妹即兄妹）制人烟，是这样产生人。这故事汉族有汉族的说法，民族有民族的说法。民族说，伏羲姊妹制人烟。铁腐朽了，海子从地下浮上来。两姊妹在耕地；姐姐会听鸦鹊。一个鸦鹊在叫：“你赶快把牛杀了，人蹢到牛皮子口袋里去。”鸦鹊这样说：“动作快一点。”一下子，洪水滔天，牛皮子口袋浮来浮去，浮在高山。地上人一个都没有。今天晚上放九个月亮，不得行。明天放九个太阳，水就消下去了。两姊妹就在山上，一看，人都没了。姐姐出了点子：“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就拿一个手磨子。男放左、女放右，如果活得成人，你放你的，我放我的，如果牢起，我们就做人种；如果没有就算了。”后来牢起了。就

生了一个血团团。这下子，弟弟哥就剁了到处甩。第二天到处都是人烟。

北川青片乡的一位老人也曾告诉我，这两姊妹成婚的“造人”故事。他说：

关于造人的故事，我们那说曾经有两姊妹，结为夫妻。两人商议用手磨子，从山上放下去，合在一起就结合。后来他们生了一个血团团。把它剁碎到处撒，于是到处都有人了。天上一个女子下凡，我们这喊“母姐”，茂县喊“木姐珠”。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她跟一个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结合在一起。这儿就有人了。

对于人类的来源或本地各沟人群的来源，茂县永和沟的一个老人也说：

人是咋个来的？他们说是伏羲姊妹制人烟。相当有技术的制下来的。人又要说话，又要骂人、打捶（按：打架），是制得好。推豆腐的手磨子，背到山上滚下来。如果两个磨子合起来，就可以成亲。后来真的合在一起了。就成婚，生了一个肉团团。他们用刀子把它划开，爬到高山上，对每个沟沟，这甩一团，那甩一团。第二天这也冒烟烟，那也冒烟烟。这是我听到说人根是这样来的。

我认为这个“造人”的故事，其重点不在以共同来源凝聚一群人；相反地，它诠释为何有散居各地的村寨人群。这个故事流传得相当广，所有的羌族地区——由相当汉化的北川到深度藏化的松潘——都有流传，内容也大同小异。然而，到了黑水地区，这个传说便少有人知了。嘉绒藏族与草地藏族中，似乎也不流行说这一类的故事。虽然我还未做过全面调查，根据我看过的资料及一些少数民族与田野调查者的说法，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在许多中国西南民族之中。¹⁶在当前中国民族分类下，羌族是“西南民族”最西北边缘的一群人，而这个传说似乎也流传到此为止。或许可以说，“伏羲姊妹制人烟”传说是较汉化的中国西南各族群的一个共同记忆。

木姐珠与斗安珠

第二则故事是“木姐珠与斗安珠”。这是述说一位天上的仙女，如何与一只地上的猴子成婚，并为人类带来五谷与牲畜的故事。以下是一位

关于人的来源，最早的主要是在端公唱词中，它其中有一段木姐唱词。这唱词就是：还愿、祭天、打太平保护都要唱这一段。它的内容是说，天上的仙女到人间来洗麻布，以前的神仙跟我们羌族一样穿麻布衣服。凡间一个猴子躲在旁边看。她们把手腕上的金银箍箍拿下来，搁在旁边。猴子就把首饰挂在杨柳树高头。仙女洗完了衣服，找不到首饰，后来发现在水里头，就过（按：过即用）手去捞。看得见，捞不到。猴子躲在一边笑，说：我知道首饰在哪里。仙女怕掉了首饰回去受责罚，就说，你拿给我吧。猴子说可以，但有些条件。第一，你要带我到天上去耍（按：耍即玩乐）；第二，你要许配给我。仙女答应了……这是最重要的唱词。他们生下的小孩就是羌族。

经文说道，这人猴通过种种试炼后，终于与这位仙女，即天神木比塔的小女儿成婚。婚后，两人来到凡间生儿育女，同时也带来了作物与家畜。木比塔，在许多村寨居民的观念里，也就是玉皇。那个凡间的猴子，有些人说就是“孙悟空”。但有些人说，他是半人半猴，或者只说是一个凡人。这个故事原来流传有多广，并不太清楚。目前在理县、汶川一带村寨之中，还有不少村民知道这故事。茂县西路（岷江西岸各支流）各沟的村寨民众，则大多没听过这故事。松潘一带村寨中的羌族，也没听过这故事。1980年代以来，在羌族文化的本土研究风潮下，“木姐珠与斗安珠”被采集、翻译，并以汉文出现在各种《羌族民间故事集》与《羌族文学》等出版物之中。于是，反倒是各县城中的羌族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汉文书籍与彼此的谈论，对这故事皆耳熟能详。对羌族知识分子而言，这故事诠释“羌族”的由来以及本地农牧资源（五谷、牲畜）的由来——这是它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虽然茂县、松潘等地羌族很少听过“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但“人是猴子变来的”却在是寨民众间普遍的看法。也有人说，人是猴子和一位仙女生的。我们很难判定，这是现代“人类进化”知识所造成的印象。因为愈往西、往北去，如在黑水藏族与热务藏族中，这样的说法就愈普遍；然而以汉文与国家教育所传播的现代知识，却是由东向西递减的。我们知道，古代汉文文献《北史》中便称党项羌、宕昌、白狼等为猕猴种。藏族文书《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书中，也有祖先为猕猴与岩魔女所生的传说。直到当代，藏族知识分子在藏族起源的争论上，仍经常以“猕猴种”之说，来反对“羌族说”。由“人是猴子变来的”这说法愈往西

去愈流行，以及前面我曾说明，羌族地区之“藏文化”成分由东往西渐增，我认为羌族“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代表由西方藏区传来的一种“我族起源传说”，这也是此种“猕猴生人”传说流布的东方边缘。

无论如何，在现代羌族认同中，“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的主轴并不是“猴子变人”，而是羌族天神“木比塔”。这位“天神”，如前所言，在许多村寨百姓心目中一直是“玉皇”。然而在20世纪前20年，英籍传教士陶然士曾告诉本地人，“木比塔”便是《圣经》中的“上帝”；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一支后裔，也就是羌民的祖先，将“上帝”信仰带来东方。¹⁷目前，在羌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木比塔”已完完全全是整个羌族的神，但东南部村寨民众仍普遍认为这便是“玉皇”，而西北部如松潘小姓沟、茂县牛尾巴等地村寨民众则对此一无所知。当然，早已没有人认为“木比塔”是基督教的上帝了。

“伏羲姊妹制人烟”与“木姐珠与斗安珠”，这两种传说为“人类起源”神话的一部分。“伏羲姊妹制人烟”中的“兄妹成亲做人”主题，流传在大西南地区，岷江上游是其分布之北界。“木姐珠与斗安珠”中的“猴子变人”主题，则流传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岷江上游是其东界。在这两则传说中，又有伏羲、玉皇等汉人古圣神明概念，显示这也是汉文化西方边缘的产物。因而由“伏羲姊妹制人烟”与“木姐珠与斗安珠”这两则流传本地的故事，可见岷江上游村寨人群文化的混杂性和其所居之多重边缘位置——他们处在藏文化圈边缘、汉文化圈边缘以及混糅多种文化之西南土著文化边缘。

七、羌族认同及其本土历史记忆

在本章中，我先尝试说明羌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很难说本土羌族认同自何时开始出现。这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愈来愈多的人知道本族群叫“羌族”，愈来愈多的人知道当前羌族的范围，愈来愈多的人愿将自己登记为羌族。此过程或有更早的渊源，但主要的变化大约是从20世纪初到1980年代。以上的口述记录，都是我在1995—2002年之间搜集的，它们表现了羌族认同形成后之社会记忆。然而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小时候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尽管他们也说当时没听过“羌族”这名称。我们可以仔细体会以下这一位茂县三龙沟老人的说法：

大禹，我们房子尖尖上一个缺缺上面一个白石头，就是祭大禹的。

以前那石头上有鱼尾的形状。那说，羌族落难，是在哪里？那时候要被灭掉时，天神下了一个冰山，就把大朝（按：指中原王朝）隔到了。跨了些白石头，就把大朝隔了，跨了一个白石山。祭大禹跟白石头就是这样……这是老年人讲的，用汉话讲。那些老人讲，是有一个秩序的；说大禹在茂汶县石鼓、南兴这出生的。以前羌族要拢（按：拢，达到之意）灌县地头，灌县以上就是羌族的故乡。那时不知道羌族。羌族是解放后才说羌族、藏族。大禹说是“日麦”的能人。

这一段口述记忆，可说是周仓背石塞雁门、大禹、天神、白石与“英雄征历传说”等主题的混合记忆。它也显示，在“羌族”尚未成为我族称号前，已出现一个超越村寨与沟中“尔玛”认同的“大尔玛”概念（一般所称的“尔玛”，在三龙土语中作“日麦”）。许多讲述“羌戈大战故事”的老人们都说，打败戈人的“借”“热”或“智拿”，在战胜后便成了“尔玛”。在这位三龙沟老人的“大尔玛”历史意识中，大禹已成了本族的伟大祖先，灌县则是本族最强大时的地理极限。这些也就是我在本章分析端公经文所见的岷江上游“羌民”地区早期的“我族”意识，一个在地理空间与文化上都倾向于“汉”的我族意识。由此亦可见罗世泽版本的《羌戈大战》及其民族地理注释和“羌族为大禹子孙”等社会记忆，并非只是1980年代羌族认同下的我族想象。由端公唱词和这一段三龙老人的口述记忆，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样的我族想象在20世纪前半叶或更早便已在形成之中。

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通过历史、文化论述的羌族本质建构，似乎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是强调大禹子孙与大禹文化的“古老华夏”羌族建构；二是强调天神木比塔、祭山神、白石崇拜、“木姐珠与斗安珠”等非汉本土特色的“少数民族”羌族建构。在前一条路线上，热心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较汉化地区或城镇的老一辈羌族退休公教职工。在后一条路线上，热心推动者主要是来自村寨的中年辈现职民族干部或教师。前一路线，便是我在本章开始时所提及的20世纪上半叶，本地以“灌县”为我族空间边缘，以“借”或“热”为族群自称的我族想象之延续。推动者为退休的公教干部，也与过去的“端公”一样，具有阅读汉文古籍的能力；所以事实上，汉文古籍知识是他们建构本族认同的主要素材。后一路线则是1980年代以来在国家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空间下，以“尔玛”为本族自称，并强调有别于汉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推动者是现职民族干部或教师，大多来自偏远山区村寨。他们约在1960—1970年代受国家培育，因而获得一些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的典范化、普及化知识。他们由外来民族调查者的羌族语言、历史、文化描述中认识“羌

族”，他们也在偏远山区村寨中找寻有别于汉、藏的特有羌族文化。因而，从某一角度来说，他们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少数民族化”之羌族建构。此两条路线，“古老的华夏”与“少数民族”，或并行或交叠但并不相斥。此两种羌族知识分子，也并非截然分开，在同一人身上常有此两种特质。

这两条路线的本土历史文化建构，塑造了当今羌族及其族群本质。虽居于汉藏边缘，他们不只是消极接受由各种文化核心传来的“历史”，他们也选择、修饰这些外来知识，以与自身原有的记忆相结合。以上羌族社会历史记忆中所呈现的愚笨的蛮子、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最古老的华夏（大禹子孙）、过去很强大后来被打败的羌族等本族历史形象，表现出他们作为边缘少数民族的许多无奈、卑屈，以及期望与骄傲。借此他们接受自身边缘弱势者的形象，同时塑造一些值得自负的我族形象；他们将自身建构为少数民族，同时强调此“少数”为“多数”的一部分，且比后者更古老。以上这些现象，不只是见于羌族，也见与彝族、纳西族等中国西南民族之中。¹⁸

羌族不仅是本土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物。在本书第六章中，我曾说明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羌人”一直是华夏与其西部边缘人群间动态关系之产物。因而当华夏主体成为近现代之“汉民族”时，新的华夏边缘“羌族”也随之产生。历史上的“羌”是一个汉与非汉之间模糊的华夏边缘。在此历史中被创造的羌族，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蕴含了多元的历史与文化建构力。

许多熟悉典范历史的读者，习知“历史”与“神话传说”区分的读者，或认为本章所提及的羌族“本土历史”只是一些地方传说与神话，它们中历史事实的成分很少。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在羌族认同下“本土历史”之虚构性，也见于其他国族或民族认同下的“典范历史”之中。此羌族“本土历史”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外群体权力关系，也一如我们在当代较“学术性的”历史建构中所见。因而与其分辨何者较真实，何者较具“学术性”，我们不如认真思考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的本质，以及认同与社会记忆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记忆中与群体认同关系最密切的“历史”——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事。对“历史”采取广义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如何在一个社会特有的“历史心性”下被建构，以及历史与社会现实如何强化或改变人们的历史心性和历史记忆。

1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146—150页。

- 2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5—156页。
- 3 这两个词都出自古籍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等书。此译词出自演唱经文的端公袁正祺，见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46页。
- 4 如一本《羌族故事集》的编者称，该书中所录之《戈拉智拿》这篇经文，是概括所有不同版本之异同写成的。见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故事集》，出版地不详，1989，第26—28页。
- 5 括号内文字应为葛维汉对此所作的解说。
- 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pp.7-8.原文为英文，此段引文为本书作者译。
- 7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0—155页；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北川县政府民宗委编，李明整理：《迟》，载《羌族民间长诗选》，1994，第137—162页。
- 8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1页。
- 9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立地根源》，载《羌族故事集》，第26—27页。
- 10 近年来许多羌族知识分子乐于谈论、研究“烁罗古国”。他们认为这个羌人建立的古国就在灌县。见周发贤、王长益：《“烁罗古国”初解》，《西羌文化》创刊号，1996，第26—28页。这本刊物是一本代表羌族知识分子本土声音的刊物。
- 11 我没有见过这篇文告的中文原文，但葛维汉曾将它译为英文，引在他的书中。以下是我根据葛维汉的英文译本，再转译为中文的版本。
- 12 《华阳国志·蜀志》，顾广圻校注引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
- 13 “愿将花雨洗蛮风”为姜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花雨”一词是以佛说法诸天雨花赞叹之典故来影射文明教化。该文被收录于道光《石泉县志》卷十，《艺文志》。
- 14 此社会历史记忆不只传布在羌族之中。据许多中国西南民族田野研究者告诉我，“与日本人同一根根”之说，也流传在畚、苗、傜、彝、景颇、纳西等民族之中。
- 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255—287页。
- 16 在较南方的各族群中，故事大多是说两兄妹躲在“葫芦”里逃过大洪水。
- 17 请参阅本书第五章与第九章，陶然士对羌民历史与文化的见解，在此两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 18 如彝族刘尧汉等人有关彝族文化的研究，可与羌族之大禹文化研究相比拟，代表“古老华夏”或“比华夏更古老”之我族建构路线。我们也见到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在另一路线上寻找、建构与强调彝族“非汉少数民族文化”之努力。这也见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普遍特质，“汉”与“非汉”在此难以作截然划分。

文化篇

羌族文化也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感兴趣的主题。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由文献与遗物探索古代羌族文化面貌。民族学者则在田野调查中观察与描述当代羌族文化。部分学者更结合历史、考古与当前民族学资料，说明羌族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证明此民族实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其间，“文化”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有多种意义。“文化”呈现一群人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演化论观点。“文化”展露一群人的迁徙，某种精神或物质性人为创作的空间传播，这是传播论观点。“文化”又显示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这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在国族主义下，通过这些不同观点之论述，近代学者有关羌族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在社会发展上不如华夏、在历史上不断被击败而迁徙、当前仍借其“民族文化传统”以维系其社会特殊性的羌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学者探索、争辩的对象，也是当前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信赖与自豪，以及不断被他们修饰与创新的文化符号。

上述这些“学术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文化建构，近二十年来受到新一代学者的重视。在后现代主义学术潮流中，“民族文化传统”被认为是新的建构与发明。学者在世界众多例子中发现，许多“传统”并非真的很古老，而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以凝聚国族的“创新发明”（invention）。如此论述，与“想象的国族群体”论述是一体两面。当代国族或国族之下的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者的集体想象产物；强化此群体想象及凝聚其成员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这一方面的研究，让长期惑于“国族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了新的面貌，更让学者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看法。然而，此国族（或民族）形成之“想象创造论”亦有其不足之处。在历史方面，这是一种“近代主义”，强调近代变迁而忽略“近代”在长期历史上的意义，也因此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文化方面，“传统创造论”着重于分析、呈现人们所宣称的“传统文化”之近代创构，而忽略近代文化建构实乃一长程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忽略了推动此文化建构过程的历史与社会情境。

在本书历史篇中，我已说明“羌”在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和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在“文化篇”，我将探讨一些与历史或“历史”有关的

羌族文化问题，我认为，“历史”和“文化”都是一些历史与社会本相的表征。在本书中，此种历史与社会本相，便是在历史上延续与变迁的古华夏边缘，及其所蕴含的各层次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人群关系。

首先，在第九章中，我将说明中国文献与考古所见之古代“羌人”文化面貌，以及20世纪前半叶民族学者所描述的岷江上游羌民文化。我们不一定能“重建”古代羌人的文化面貌，然而却可能在学者对“羌文化”的描述与探索中，分析“描述者”（如范晔、姜炳章、陶然士、胡鉴民等人）在描述“他者”时的特殊兴趣与偏见，以了解这些描述者自身的族群与文化认同。我们也可以观察，在描述者与被描述者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力差距下，人们（描述者）对他者（被描述者）“文化”之贬抑、污化，及对自身文化的夸耀，如何造成他者之文化模仿与攀附。这些文化过程，曾造成了以“羌”表述的华夏边缘之变迁。

羌族文化，不只是由文化权力核心之“描述者”对“他者”之文化描述来界定，更经由本地人自身的文化建构来完成。在第十章中，我将介绍当代羌族传统文化的本土建构背景与过程。这不只是涉及一个“民族”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文化，更涉及各层次的族群、阶级、城乡、地域人群间之区分以及在造成并强化这些区分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下，人们对“我族文化”的夸耀、选择、争论与界定。

无论是古代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或是被称为“羌”的人群之文化表征，或当代羌族的文化建构，“文化”都不只是一些客观的、结构性的或在历史时间中绵延不变的生活习俗。它们是通过文字、口述、身体与各种物象的“展演”，被人们践行、观看、批评、模仿、夸耀与修饰，以强化或改变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游移在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之利害抉择中的个人，也经常因此改变其文化表征、展演，并改变文化表征对自身与他者而言之指涉意义。所有这些过程，并非经常发生在文化、族群、地理与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间，而是发生在较亲近或常有接触的群体之间。人群间相互的文化歧视、夸耀与攀附，在这些地区形成一个模糊的古华夏边缘——在此，谁是“汉”、谁是“蛮夷”或“少数民族”？以及何者是“汉文化”或“土著文化”，都是模糊与经常被争辩的。就是这些发生在小地域间、亲近人群间的微观文化过程，造成我所称的华夏边缘变迁。因此当代羌族文化形成的近代过程，只是一个更长远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此长远历史过程中，延续的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人群关系。

第九章 古羌人文化：事实、叙事与展演

在田野研究中，一位社会人类学者如何观察、解读他所研究的人群社会，也就说明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态度。对研究古代人群社会的历史学者而言，如何阅读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同样表现学者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看法。因此在这一章，分析有关羌族的一些考古与文献材料之前，我先说明自己将如何看待这些借以探索“过去”的素材，同时也表达我对“民族文化”的见解。

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对“四方蛮夷”之奇风异俗描述，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阅读、分析这些文献记录。首先，事实（facts）：它们反映被描述者（非华夏）客观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表征。其次，叙事（narratives）：它们反映描述者（华夏）因自身的文化与认同特质，而产生的对异文化之主观描述与偏见。再次，展演（performance）：此种叙事（无论是否真实）被个人或社会刻意展示、演出，被华夏与非华夏阅读、评论，而成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记忆，因而在文化的污化（对于异族文化）、夸耀（对于我族文化）与模仿（弱势者对于优势者）等展演行动下，推进华夏化过程（非华夏成为华夏的过程）。这三种对文献的阅读与分析角度，也反映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几种不同旨趣——客观文化描述及溯源；文化描述所反映之士著（包括人类学者）观点及其社会意义，以及权力关系下的文化展演与相关文化过程。

在考古遗存方面，同样地，首先它们可能反映古代某人群客观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表征。在此“事实”层面，我们可以借考古遗存，了解当时人的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或者，新一代考古学者将“遗存”视为在某种文化认同与行为过程下的残遗物（residues）或刻意存留物。因此借考古遗存所得知的是，古人的行为过程及其主观的文化偏好。其次，在“叙事”层面，一古代“民族文化”的考古遗存及其诠释，是当代考古学者在某种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下的刻意设计发掘与建构。由此“民族文化”的考古发现与诠释中，除了“过去的事实”之外，我们得以分析考古学者个人与其所属社会的文化认同。最后在“展演”层面，考古遗存被发掘、诠释与展示，它们被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不同的社会人群观看，并得到各种新诠释与争论，我们可借此了解人们如何通过“物”及其所指涉的“过去”，来建构我群（或他群）的本质及各种核心与边缘区分。

一、社会记忆中的古羌人文化

在典范的羌族史研究中，学者将“羌族”视为在历史中绵延的民族实体。因此某些“文化特征”，特别是能贯连古今的文化特征，如火葬、白石崇拜、邛笼（石碉楼）、牧羊以及与羊相关的宗教信仰等等，都被视为典型的羌族文化。学者们认为，这些文化特征在历史中的绵延，显示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绵延。其空间分布及变迁，也代表一个民族的空间分布及其迁徙、变迁。

由文字的构成来说，无疑，“羌”字由“羊”与“人”两部分构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羌，西戎羊种。”同时代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中也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我们知道，在商代，“羌”就被用来称呼一些西方晋、陕、豫之交的人群。战国思想家也以“氐羌”来称陇西或其更西方的人群。因此，汉代学者以西方“牧羊人”来理解“羌”，只是延续一个自商代以来的西方异族概念。在经济生态、宗教信仰或族源传说上可能与羊有关的西方人群，在东方商人眼中是异类，因而造出这个“羌”字来称呼他们。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西方牧羊的，或其信仰、族源传说与羊有关的人群，便都是同一民族。无论如何，“羌”是商人与后来的华夏对异人群的称号。

由考古资料来看，齐家文化之后，在青海东部及邻近陕甘一带，一种依赖牧羊的经济方式迅速传播。公元前1700至前600年的辛店与卡约文化遗存中，大量羊骨取代了猪骨，显示此种人类经济生态上的变迁。汉代河湟西羌的牧羊业，是他们游牧经济的一部分。这在中原文献中有很多相关记载。许多学者将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等遗存，甚至更早的齐家文化遗存，都当作是古羌人遗存。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在考古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知道，游牧经济中的人类活动，常在地表只留下少而浅的遗痕，这可以解释为何汉代河湟西羌的遗存没有被发现。同时这也说明，汉代西羌的游牧经济与有农具、居址的齐家、辛店和寺洼文化先民之经济生活有相当差距。以经济生活来说，辛店、寺洼先民与汉代西羌之间不但缺乏延续性，相反地，辛店、寺洼文化的结束，以及汉代西羌考古上的空白，显示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甘青地区古人群在经济生活上有重大变迁。农具、猪骨与居址皆罕见的卡约文化，他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可能与汉代西羌类似。卡约文化只有墓葬遗存，也就是说，只要此墓葬习俗改变，卡约文化人群后裔的文化遗存便很容易在考古学上消失。

学者常强调当代羌族的牧羊业以及羊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来说明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的后裔。当前岷江上游的羌族虽然也普遍养羊，但一般而言，羊在其经济生产中并不十分重要。他们不是游牧人群，他们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为农业。主要的家庭人力和最好的土地资源都用在农业上。农闲时，青壮男子出外打工、采药也是经济来源之一。以牧业来说，放养在高山上的马与牦牛，才是一个家庭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否养羊，或养多少羊，在于一个家庭中是否有多余的人力，特别是小孩与老人（详见本书第二章）。

有些学者以与“羊”有关的宗教信仰，来强调古今羌族之民族延续性。¹此说认为周代的姜姓族——羌族的一支——有“大岳”崇拜，这是一种羊神信仰。今日羌族宗教中，也有许多与羊有关的用具与活动，如端公作法用的“羊皮鼓”，以及杀羊献祭等习俗。然而对羌族而言，羊只是向山神或天神还愿的祭品，“羊”本身在当地文化中并没有任何神性象征。总而言之，羊普遍存在于各种人类经济生态中，也被普遍用于各种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里。如果不论“表征”（羊）所依附的“情境”，而只以“表征”间的相似性来说明一文化人群的范围及其历史延续性是不恰当的。

关于火葬习俗，早在战国时期人们便注意到西方有些人群是行火葬的。《吕氏春秋》与《荀子》中记载西方有“氐羌”，据载，这种人被掳获时，他们不担忧自己成为俘虏，只担心死去无法行火葬。《列子》中则称此行火葬之人群为秦之西的义渠之国。以上这些“氐羌”或“义渠”，以战国时期的地理及异族概念来说，大约是在陇西至洮河流域，或至宁夏固原一带。在考古学上，学者也在寺洼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火葬习俗，因而认为此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与氐羌民族的关系”²。但火葬并不是寺洼文化先民唯一的葬俗，在另一方面，青海东部被认为是羌人遗存的辛店、卡约文化中，都没有发现火葬习俗。

对于行土葬并崇尚慎终追远的古代华夏来说，火焚亲人遗体是大逆人伦的事。在他们眼中，此也印证了“蛮夷”之蛮夷性。因此如果某些非汉土著普遍有火葬的习俗，华夏应不会忽略对此“异类文化”的描述。汉代活跃在河湟地区的西羌，《后汉书·西羌传》对他们的社会与习俗有许多记载，然而并没有提到“火葬”。魏晋南北朝时，活动在陇西至洮河一带的宕昌羌，是否有火葬之俗也相当可疑。中国文献描述宕昌羌的习俗，也未提及“火葬”。《旧唐书·党项传》称，党项“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后来重修的《新唐书》，对于党项文化习俗的描述沿袭前书，但将

此句删除，这有可能是《新唐书》作者们基于其认知所做的修改。无论如何，所谓“党项羌”实包括党项此一政治势力下的许多族群部落。此广大人群之地方族群间、各社会阶层间，都可能有不同的葬法，包括土葬、火葬、水葬与天葬。³

在岷江上游地区，汉晋时期便有土著行火葬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称当时的冉駹夷“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半个世纪之前或更早，岷江上游“羌民”及北川“青片、白草番”也普遍流行火葬。每个村寨都有本村寨的火坟；在较汉化地区，则各汉姓家族分别有本家族的火坟。⁴我们很难断定，此羌族火葬习俗与战国时氐羌之火葬是否有直接关联。至少，学者普遍认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南迁之古羌人遗存的，是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此一当地古文化人群主要是葬于石棺的。被认为是南迁“氐羌系民族”之一的“嘉良夷”，也是今日羌族近邻嘉绒藏族（旧称西番）之前身；《隋书》对其葬俗的描述显示，至少嘉良夷社会上层流行的是土葬。无论如何，近代岷江上游与北川村寨民众的火葬习俗，有可能直接沿承汉晋时期同一地区“冉駹”的旧习，也可能受唐代以来逐渐东进的吐蕃及其佛教文化影响。信奉藏传佛教并与今之羌族比邻或错居的嘉绒藏族，近代以来行火葬、天葬或水葬。火葬是几种葬法中最普遍的，近代羌族之火葬习俗可能与此有关。

在羌族的“白石崇拜”方面，近代以前古代文献从未提及羌人有此宗教习俗。学者将之视为一种羌族文化传统，是由于近现代羌族在屋顶上放置白石以象征各种神，流传的“羌戈大战故事”中又有羌族借着白石打败敌人之情节。基于此，相关的文化特征在考古遗存上被学者寻找出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遗存中，学者发现当时人有在墓葬中放置白石的习俗。此习俗更被上溯至临洮寺洼文化墓葬中的“砾石”⁵。因而“白石崇拜”被建构成一种羌族文化传统，以印证羌族南迁此一“历史事实”。但有些研究与论述，却被学者忽略了。首先，当代有在屋上置白石习俗的人群与羌族并不完全重叠，部分嘉绒藏族与黑水藏族也有此习俗，而在部分羌族中却无此习俗。其次，在寺洼文化与石棺葬文化中，均只有部分墓葬有“白石”或“砾石”。再次，当代羌族将代表各种神的白石置于住家墙上或屋顶上，这与古代寺洼文化及石棺葬人群在墓葬中置石头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我们不知道，上述考古墓葬遗存中的石头，对行此葬俗的人来说有何种意义。

无论如何，虽然由西周至近代，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曾出现火葬，以及与羊有关的经济与宗教活动，或与白石、砾石有关的宗

教和墓葬习俗，表现在文献、考古遗存与口述记忆之中。然而这些只说明了被华夏或汉人视为“羌”的人群或曾有过这些文化与习俗，但我们无法以这些客观文化现象，来证明历史上“羌族”的存在与延续。更何况，这些客观文化现象在时间、空间分布上常有断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地区、任何时代的“羌人”都有这些习俗。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有些关于“羌人”的文化习俗较为普遍，这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一种生态性的或文化生态性的人群文化共性及其延续。譬如，“牧羊”在整个青藏高原及其东缘地区的人类经济生态上都有其重要性，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与羊有关的宗教习俗。又如，古代文献常称羌人各部落无法统合，或无法产生一统各部的君王。⁶这显示在特定环境与经济生态下，青藏高原东缘各农业与游牧人群的“分片式社会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这是历史上被华夏称作“羌”的西部人群的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共同特质，然而此“共性”并不足以证明他们有统一的、延续性的我族认同。

关于岷江上游高山纵谷地区，早在公元5世纪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作者描述当地“冉駹夷”之生活及文化习俗有下列要点：族群部落繁多；社会上层人物通汉文；土著冬则入蜀为佣；行火葬；住石砌的房子并有石碉楼（邛笼）；种麦，养牦牛、马与羊，出产药材等等。这些都与近现代羌族没有多大差别。是否这个文献证明一个历史事实：至少由古代岷江上游的“冉駹夷”到今日之当地羌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延续的民族？我认为此古代文献与近现代民族志资料所显示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延续性”，仍在于一种人群经济生态、社会结构，与相关汉与非汉关系的延续。此种历史延续性，经由一复杂的近代过程后，才造成今日建立在主观认同上的羌族。

二、古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

我们可以由另一个角度——汉人对异文化的观察、描述与展演——来看汉人文献对“羌人”社会与文化的记载。我曾说明，以“羌”这个异族概念为代表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到了东汉魏晋时期向西扩张至华夏的生态边缘。这也解释了为何青藏高原东缘的人群，当时都被汉人称作“羌”。由此角度看来，这些人群之所以成为“羌”，一方面因他们生存于特殊的环境生态中，而有一些经济与社会特质；另一方面汉人观察到这些特质，刻意描绘这些特质，而将这些“异类”人群归纳为“羌”，以强调华夏的族群边缘。

描绘边缘异族的异类性，也就是由刻画“边缘”来描述自我。华夏对西部“羌人”文化最早的描述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这可代表后汉至魏晋时期中原人士对这些“西方异族”的看法。此文献对于当时羌人的代表——河湟之羌，有如下描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鰥寡，种类繁多。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堪耐寒苦，同之禽兽。⁷

对羌人的文化描述，如“所居无常”“以产牧为业”“氏族无定”“不立君长”“妻后母釐嫂”“以力为雄”等等，也是汉人对我族边缘的描述——汉人借此宣称自身定居务农，重家族关系及亲属伦理，有君臣长幼之序，举止行为系于礼法。在我族文化中心主义下，这些对“异族及其异类文化”的文字描述，以及此等描述通过文字、口述、图像与行为等之“展演”，强化古代华夏或汉人的文化认同。相反地，对被称作羌的土著而言，在与汉人的接触中认识到自身的“蛮夷”身份，如此常造成他们对汉人“血缘”（族源历史）与“文化”的攀附、模仿。

对于“展演”，在此须作进一步的诠释。文化展演不一定是通过文字，华夏赋予“异族”的形象也通过日常对话、图像以及华夏对“蛮夷”的肢体行为来展演。在汉人的文化展演影响下，他们避免展露自身的文化习俗以免受到侮辱，并学习、模仿汉人的文化展演。终于成为汉人或其他汉人眼中的“熟番”。

在此文化过程中，东汉以来进入关中的羌人，到了魏晋隋唐时，基本上在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上已与一般北方汉人无异⁸。居于政治社会上层之羌人，在此文化与族群认同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陕西南安羌人领袖，建立后秦的姚姓家族，据文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也就是舜帝的后代。在文化展演上，姚萇在位之时，立太学，礼遇先贤后裔及年高德劭的百姓。其子姚兴更以奖掖儒学、提倡佛法、尊崇孝道等方式来攀附、夸耀汉文化。经由这些文化展演，姚氏家族期望洗脱他们的戎狄身份。

到了南北朝后期及隋唐时期，文献中所描述的“羌人文化”，主要是以洮河之东、渭水之南的宕昌与党项等羌人为对象。此时宕昌“羌人”之文化与生活习俗，据《北史》记载：

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赋役。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产，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⁹

《北史》中关于党项羌的生活习俗描述与此类似，只是添加了在当地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亲戚不悲哭，年少的死者亲人才为他悲哭。《新唐书》的相关记载也大致如此。《北史》与《新唐书》所描述的“羌人”，与较早见于《后汉书》的羌人，事实上是不同地理区域的非汉人群：前者在甘南之洮河至白龙江一带，后者在青海河湟一带。但汉人所记载的土著风俗，如国无法令、妻继母寡嫂、不能相统等等，仍是不变的。

宋、元以来，“羌”这个异族称号所指称的人群范围逐渐缩小、模糊，因此汉人对青海东部及甘肃南部之“羌”文化描述，也相对地减少或完全消失。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曾说明，这是汉人观点的异族“藏化”（番化）或“汉化”的结果。在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只有北川地区与岷江上游的部分土著人群，在文献中被称为“羌”，他们也同时被记载为“番”或“蛮”。到了20世纪初，北川的“羌”大都成了“汉人”，或自称是“汉人”了。

三、文化夸耀与模仿：北川羌人的例子

基于丰富的地方史料，我们对于明、清时期北川“羌人”的汉化过程，以及此过程中汉人对“异族文化”的描述与展示，有较清楚地了解。北川青片河与白草河流域的羌人，在16世纪时以强悍著称，文献多次记载“青片羌”“白草羌”四出劫掠之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总兵何卿与张时彻等，率军征伐白草、青片。明朝军队一路毁碉拆寨，并在走马岭一役彻底消灭了白草羌的主力。在战争过程中，青片、白草各村寨受到很大的创伤。从此，他们失去了反抗明朝的意图。¹⁰

关于本地非汉族群的文化习俗，道光四川《石泉县志》中记录了一些白草居民“番俗”，如立石插小幡当作家神，使用铁三脚，以及当时已废去的火葬等等，这些都与岷江上游“羌族”的习俗相似。该志也记载了当地民众的“汉化”——“迩来通汉语者几半。白草之番日染华风，延师课读，间有知书识字者”。无论如何，此时（清道光年间），白草河流域之

民还被县志编撰者称为“番”。道光《石泉县志》记载，当时在白草河东有番民1,647户，河西1,577户，男女共有18,384口。到了1932年，在新编的《民国北川县志》中，已无对青片、白草“番民”与“番俗”的描述。而且在人口统计中，该志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北川承粮户有94,398口，另有河东、河西、青片等“番民”19,522口。但提及宣统年的承粮户时，只总称共有58,462口，并未将青片、白草与其他地区分别开来。由此亦可见，清末民初时青片、白草地区之汉与非汉的区分逐渐模糊。

造成此“汉化”过程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此问题。一些中西学者，批评“汉化”概念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而不愿使用这一词语。的确，过去许多研究过于简化族群文化现象，并以客观文化变迁来论述“汉化”问题，因此也让文化与认同偏见影响学者自身对此现象的观察与了解。然而，反对“汉化”此一用词的学者，也并未深入探讨与“汉化”有关的文化、历史与认同问题。我认为，如此并无助于了解相关的文化与认同现象。我所称的“文化角度”，此“文化”并非指客观的文化特征，亦非全然指主观建构与认知的文化，而是在展演中被夸耀、欣赏、争论、修饰与模仿的文化。在此文化过程中，所有本地人与外来者皆参与文化展演；然而，由于社会权力与记忆媒介的掌握与运用，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展演还是通过“知识分子”完成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包括朝廷派驻地方的“父母官”，也包括本土社会头领们。

清廷派驻北川的历任地方官吏，留下社会记忆最丰富的便是乾隆时的姜炳章。在姜炳章及其他北川县令眼中，北川羌人本土文化是鄙陋或违反人伦的，因此他们努力使本地民众脱离一些野蛮陋习。譬如，姜炳章曾劝本地人放弃火葬习俗。道光时的北川地方官，也曾下令禁止民众卜祷山水之神及杀牛治病的习俗。姜炳章对于非汉土著文化的鄙视，以及此种鄙视通过语言、文字所造成的展演、夸耀，表现在他留下的一首《白草歌》中。在此文中，他描写自己下乡探访的情形：

唧嚶杂嘈难为听，唤译译来为予说。东邻父丧焚父骨，西邻杀牛疗痼疾，南邻持筹儿为奴，北邻负债女离室。愿将花雨洗蛮风，忍将吾民千三尺。纷纷父老皆点头，赭汗津津额头流。人类虽殊人性侔，何但朝鲜风俗化箕畴。¹¹

这篇诗歌，表达了一位汉人士大夫边疆官员对“非我族类”之语言、文化的轻视，及其对汉文化的自负与夸耀，也表达了他希望在此成就

如“箕子教化朝鲜”般的功业。虽然由各方面记载看来，姜炳章是一位文章、政事均佳的学者官员，也是一位爱民的好地方官，但显然他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偏见。以汉文化教化土著，“愿将花雨洗蛮风”，是他以及历史上许多边疆官吏的共同使命。而在不对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下，他们对异文化的叙事成为流动与被展示的社会记忆，使得许多非汉土著逐渐以自身文化为耻。

姜炳章以汉文化所作的文化夸耀，主要表现在他对本地“大禹”历史文化记忆的表彰上。他重修本地的“禹王庙”，建“神禹故里坊”，又作《重建夏禹王庙记》《禹穴考》《石纽歌》等文章，以宣扬大禹之功，强调石泉（北川旧称）为圣人大禹所生之地。显然，他是以大禹记忆来强化一种以“圣兴之域”为荣的“北川人认同”。后来，这些姜氏的诗文都被收录在历代石泉及北川地方志中，并得以流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纽歌》与前述《白草歌》中，姜炳章都提及他在白草乡间欣然见到读书习文的学子，并对这些学子亲自指点一二。在事实层面，我们不清楚在清乾隆年间，北川白草河流域延师教子读汉文经书之风有多兴盛，我们更不知道大禹是否真的生在北川。然而在叙事层面，这显示在一位汉人士大夫心目中，“神禹故里”及“读圣贤书”“读书应考”是本地作为文明教化之域的重要象征¹²。最后，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在展演层面，通过各种文化媒介（包括姜氏的诗文）的展示、夸耀与模仿演示，影响并造成一些社会现实——到20世纪上半叶，本地人普遍自称汉人，读汉文书，并以北川为大禹故里为荣。

此种汉人对汉文化的夸耀，也表现在一则有关土著羌人得姓由来的文献叙事上。这个记载，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武功录》，后又见于清代各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这故事大意是说，原来本地土著没有汉姓，也没有戴帽子的习俗。一位地方官，李茂元，召集各家代表前来。事先将许多汉姓写在一些帽子上，然后将这些帽子一一赐给这些羌人代表。羌人因此便有了汉姓。道光《石泉县志》对此记载为：

俗囚首无冠，茂元具汉官易其姓名书冠间。届日启军门，铙吹数部，树鼓、大钲，令诸番鱼鳞入。羌闻鼓钲，望见汉冠及朱杆彩旗，皆大喜。举足盘跳舞欢呼震天。茂元出汉冠冠诸羌。诸羌跪起，各互视其首。踊跃东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谢。¹³

这戏剧性的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即使“诸番”因此得着汉姓，也无法使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汉人。使得非汉土著或其后人宣称自己是“汉

人”的，是这故事中所显示的“情境”——在本地汉与土著间的社会阶序差距，及因此差距而产生的文化夸耀与模仿。在此故事之叙事中，汉人对土著展示与夸耀自身的文化（如对土著展示汉官威仪），以及土著对汉文化的模仿、攀附，跃然文字之间。这正说明了为何在晚清民国时期，当地有汉姓的家族都相信他们是外来汉人移民的后裔，没有人愿意承认祖先是上述故事中被赐姓的土著。

另一种文化展演，也是一种历史记忆展演，为北川人的“白马将军”之祀。在何卿平定白草羌之乱后，他成为被本地汉人崇拜的英雄。走马岭一役后，何卿调离其久任之川西防务。嘉靖十七年（1538年），何卿的部属及当地汉人士绅，为了感谢何平乱之功，在坝底堡附近建“何公生祠”，以便大家朝夕瞻仰。此后北川各地陆续建造“何公祠”，又称“走马庙”或“白马将军庙”，何卿也就是走马将军或白马将军。道光《石泉县志》中，不但在记军事之志文中详细记载何卿的功业，而且在《艺文志》中更保留多篇歌颂其功业的诗文及何卿本人的书奏。这只不过是一种通过文字的“夸耀”，更重要的是将之神圣化、民俗化，而通过民间祭祀的文化夸耀，走马将军或白马将军之祀，成为北川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信仰，此信仰甚至深入流行于白草河流域过去“羌番”所居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位于白草河走马岭的“走马庙”里面仍供奉着何卿像。¹⁴祭祀何卿，也是一种宣称汉人认同的方式，此时白草河一带，感戴何卿拯救百姓于羌番劫难之中村民，当然是自称“汉人”的村民。

地方志中姜炳章等人留下的诗文，对番民文化的描述，对汉、番关系之纪事，以及有关何卿功业之记载，都成为一些不断被重述的社会记忆，进一步边缘化本地非汉族群及其文化，使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此类社会记忆的北川“番民”，逐渐学习、攀附汉人文化。到了道光时期，《石泉县志》称此地“乃两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吏斯土者，随时训迪之，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到了民国政府时期，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虽然仍被下游的人称作“蛮子”，但是几乎所有北川的山间村落人群都自称是“汉人”了。

四、近代羌文化探索与书写

在历史篇中我曾说明，汉晋时期的“羌人带”如何在汉与吐蕃两个政治力量的交逼下逐渐萎缩。“羌人带”上各地人群逐步“吐蕃化”或“汉化”，到了清末民初，只有岷江上游部分非汉土著仍被内地人称作“羌

民”。由当时的“羌民”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历史过程的残痕——汉与吐蕃间的一个模糊文化边缘。“吐蕃化”或“汉化”，不只是指凭借吐蕃之政治、军事扩张与藏传佛教传播，或中原之政治军事扩张与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客观风俗文化变迁，更指的是此种客观风俗文化变迁，在“汉人”与“非汉土著”心目中所造成的族群意象区分。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羌民”只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区——在汉人心目中，这些人群没有完全成为“西番”或“藏族”，但又不像是“汉人”¹⁵。

在“历史篇”中我也曾说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旧记忆基础上，建构包含汉族及传统华夏边缘的中国国族。因此在民国肇造之初，探究这些国族边缘地区究竟有哪些“民族”，以及厘清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紧密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刻不容缓的使命。此时羌族史之研究，已说明这是了解汉、藏、彝，以及许多西南民族之间族源关系的桥梁。因此岷江上游“羌族”文化探索有特殊意义，它不只是有助于识别“少数民族”，更可借此民族“活化石”见证、凝结汉与广大西方、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

此种学术研究，在今日看来多少皆有在“我族想象”下建构国族的含义。然而在那个时代，通过新学术的我族想象与建构，并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擅。同样地，基于国族主义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另一种我群想象，以及对世界各“原始民族”（primitive peoples）的研究兴趣，也曾使得许多西方学者与探险者深入中国边缘高山丛林中探访“原始民族”，有时，他们也建构、想象这些“高贵的野蛮人”¹⁶与西方人种、文明之间的关联。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深入中国西南地区探访、描述各族群的不只是中国民族学者，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民族学者、传教士与探险者。

相较于过去华夏对于羌人文化的简单描述，20世纪上半叶之学者们对于“羌民”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则丰富得多。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国族主义与“民族”概念，以及相关新学术逐渐普及的时代。由于“民族”被视为一群有共同血统、语言与文化的人群，因此中西学者对“民族”的研究，经常由这些“特征”入手。在各种文化特征中，最受他们瞩目的便是土著的服饰、饮食和语言。

如此思考民族文化特征，恐怕不只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产物，而来自更基本、普遍的人类社会分群法则——人们常借由“身体”及“语言”来体察并强调个人的社会存在与特性，以及我群与他群间的认同与区分。与人们的认同与区分有关的“身体”，不只是指我们生物性体质外观（皮

肤、头发等），由于族群认同区分常存在于体质外观没有差别的人群之间，因此人类常以“文化”来修饰、想象我族或异族的“身体”。此文化认知、实践与想象中的“身体”，包括“外在身体”，如修饰的身体外观（刺青、凿齿等习俗）与延伸的身体特质（服饰与肢体动作语言等等），以及“内在的身体”，也就是由食物与其他因素造成的身体特质。“外在身体”是一种文化认知与实践之产物。“内在的身体”，特别是由“食物”造成之身体，除了认知与实践之外，常常只是一种想象。如中国古文献《礼记》中，叙述四方之民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¹⁷

这个记载显示，《礼记》认为“中国”人与“夷、戎、蛮、狄”之区分，表现在由发式、服饰、文身等所造成的“外在身体”，以及由食物所造成的“内在身体”之上。又如《周书》记载，一位派驻边疆的中国官员刘璠与其妻，顺应当地羌人习俗，并以“食麦、衣皮”来描述他们所从的异族习俗。¹⁸

语言，在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可以由语言的两项功能——沟通（communication）与掩蔽（concealment）来说明。一方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同一族群的人经常往来沟通，使得可沟通彼此意念的共同语言能持续存在此人群之中，也因此强化彼此之我群认同。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一种区分与掩蔽的工具。不经常往来沟通，或双方有意避免往来的族群，刻意发展对彼此而言可遮隐意念、隔阻沟通的语言，因而造成并维持彼此在认同上的区分。或者，在语言的沟通与掩蔽双重意义下，对话者以最狭小范围的共同语言，来强调、凝聚彼此亲近的一体感。两种语言究竟是“可沟通的”或是“闭塞、难以沟通的”，并非只受语言客观的结构同异影响，也经常受人们主观认同影响。因此，人类普遍以此客观与主观之“语言”同异，来认知并区分“我群”与“他群”。

1920至1940年代，少数学者进入岷江上游尝试探索“羌民”文化。在他们的调查与描述中，本土服饰、饮食习惯和语言是重要的文化项目。然而，他们留下的资料显示，当时这种羌民文化的探寻工作似乎充满了挫折、模糊、争论与想象。

19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然士在岷江中上游“羌民”地区传教。他

深爱他的教民，也对他们的文化习俗及其来源深感兴趣。在第五章中我曾提及，由于将“羌民”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因此他认为这个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羌民”的各种文化特征，被他引来证明这个观点——今之“羌民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古代传统的延续，借此他证实羌民为“古以色列人后裔”。

在对羌民服饰的描述中，他特别强调当地人所穿的白色长衫。他说，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制衣服，而且他推测过去“曾经全都如此”。¹⁹他认为尚白、洁净，以及以白为善，这都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因此衣着尚白的羌民也应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还有，关于当时羌民普遍穿着的羊毛织物，毡织褂褂，他称：“一种古代的编织工艺，仍用于制作床毯、毡帽、腰带与粗绒带，此种绒带被用于绑腿与做成衣服。”²⁰显然，他将之视为古代西亚服饰传统的残余。又如，陶然士指出有些地区羌民妇女配银环为头饰、耳饰，而在巴勒斯坦地区Ramallah妇女头上也有佩戴银币饰的习俗。²¹在食物方面，他称羌民吃燕麦、大麦与玉米制的烤饼，以及饮“咂酒”。他引《圣经》中的记载，说明古犹太人也吃这种饼，以及饮类似的“酸酒”。在语言方面，他无法证明当时羌民的语言与犹太语有何关联，但他说，羌民“已遗忘了他们的语言，失去了原始卷稿，他们目前说的是双语：汉语和一种与藏语、嘉绒语同源的语言”²²。显然，陶然士所说的“羌民文化和其原有语言”，实为根据他自己选择性的观察加上一些历史想象而成。他遥想，过去有一典范的羌民文化、语言，一种出于以色列原乡的典型语言和文化，目前所见，是此典型文化变迁后的残余。这样的想象与建构，在其著作中通过叙事之用字遣词（narratives），强烈地表露与展现出来。²³

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位加拿大学者葛维汉，约在1925—1948年间，也来到岷江上游地区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与生物标本。他对当时羌民的服饰有更详细的描述：

羌民一般穿着未染的麻布衣服，白色的或接近白色的，因为那是自然的颜色……男女都缠绑腿……男女都包头巾……暗羊毛较暖的衣物在冷天穿着。第三种，通常是无袖的，由动物皮制成，毛留在皮衣上。有些羌民穿由汉人那买来的棉衣……在有些地区，最好的男女麻衫由颈到腰有蓝布边，在这些简单的蓝布边上，绣上白色简单的星星、花朵及几何图案。男人与女人都系衣带。一般都是白色麻布，但在汶川与理番则有彩色精致图案的腰带。证据显示，汶川的羌民采借此种腰带自瓦寺，而理番的羌民采借自邻近的嘉绒。因为其他地区的羌民都没有做或佩这

样的带子，但在瓦寺或嘉绒中却被普遍佩带……羌民妇女有时学汉人的绣花图案，绣在她们的衣袖或围裙上。²⁴

由葛维汉对羌民服饰的描述看来，他相信有一个羌民服饰文化——原料与色泽均质朴是其特色，在这一点上他与陶然士所见略同。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文化是本土的，而非移自中东。他们所见更大的不同是，陶然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建构一个纯粹的以色列文化之东方遗存。葛维汉则注意到此文化有相当区域性差异，如原来质朴的羌民服饰在特定地区或有各种“加工”（刺绣与花腰带）。他将此种文化差异归因于汉与嘉绒两方面的文化影响。在饮食方面，他以羌民日常食物来自种植、采集、狩猎，来强调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习俗，来强调羌民的汉化。

在羌民的语言方面，同样地，他指出不同地区的羌语有很大区别。他说，羌民是他曾接触过的族群中语言分歧最大的一个。虽然体验到羌民语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他接受当时中国语言学家闻宥的意见，认为“羌语”是一种古老的藏缅语，因此羌民是黄种人的藏缅语支民族之一。²⁵他也提及由于“汉化”影响，许多地方的羌语正在消失之中。

早在1928年，任职于刚成立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与其友人王元辉结伴到岷江上游地区做民俗考察。他们对羌民的风俗习惯，有如下的综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为同化的痕迹，有好些风俗习惯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谁同化于谁。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体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客观文化特征”，来区分羌民与土民（由藏族地区移来之瓦寺土司属民）。甚至，对于目前被认为是“羌族”文化标志的缠头帕习俗，黎光明等人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²⁶在他们看来，羌民、土民与汉人至少在服饰文化上差别不大。1930年代，曾到川康边疆游历的庄学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记载：“此地的汉、羌与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他进一步解释：“这还是纪念孔明死时的丧服。”²⁷被陶然士视为有近东特色的羌民毡织褂褂，事实上在当时也不是羌民所独有的。194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汶川县志》中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

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²⁸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瓦寺土司属民。

在1940年代初，一个名为“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考察队伍，也在川西地区做调查。前述加拿大学者葛维汉任副团长，该团之工作成果后来结集为《川西调查记》一书。同样地，调查者也认为羌人的服饰朴素，并无特色。该书称：

羌人服饰，无论男女，并无特别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饰观，无从知其为羌人。惟其衣料多用自种自织之胡麻布为之，工作时及无典礼时均服麻织布，访客及盛典始穿绵织及绸衣。男衣长衫，女衫较短，只及膝。男女腰间喜束带，理番县境多麻织带，汶川多毛织花带，此条显系学自汶川瓦寺土司之俗，因瓦寺土司系于明代迁来之藏人也。衣饰之素浅，与其娱乐之少，同为不解之心理象征，羌人女子之衣服除绵布及绸衣，用半寸宽之蓝布镶边外，别无任何装饰，凡色彩均属暗色。麻布衣裤即属素白，亦不沿边，男子衣饰之素浅，更无论矣。男女更有一无面山羊皮背心，棕色羊毛长背心，以御寒避雨之衣……女子无论老幼，均穿耳环，形式同内地，亦有悬大圈银耳环者，此显受藏人之风。²⁹

以上调查者对于羌人服饰的描述，显示出他们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们可以分辨其中哪些因素是受“藏人”影响，哪些是受“内地”（汉人）影响，但对于羌人服饰，则描述为“素浅”“无特别形式可言”。关于羌民的音乐歌舞，他们的描述为：“其固有音乐仅山歌，而歌调颇少，特具风格，非传自戎人西番，即来自内地。”至于羌人的语言，调查者也察觉他们的语言复杂，含有许多外来语。他们称，有时差别之大，甚至可当作另一系统的语言。³⁰

早期进入岷江上游做调查的中国学者中，胡鉴民可能是最具“学术性”的调查者。他努力发掘羌民“固有的”或“传统的”文化。在服饰方面，他认为以羊毛与麻为原料所制的衣服，是羌民传统工艺。至于较精致的绣花鞋与织花带，他怀疑这是受汉文化或藏文化影响的产物。在饮食方面，他认为“做慢慢”是羌民的传统方法，并指出“慢慢入火烤当然是原始的办法”；由蔑笼蒸馒头，则被他视为土著汉化的结果。³¹显然，胡鉴民心目中有相当明显的“民族文化进化观”，羌民在此进化阶梯上是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质朴、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为羌民的传统。这种见解也表现在他对羌民饮酒习俗的看法上。他说，羌民“像许多浅演民族一样，嗜酒之癖甚深”。浅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较浅的民族。无论如何，对

胡鉴民来说，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满了挫折。他承认，“在现在羌民所有的许多工艺与发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汉化或番化、嘉绒化而来，已颇不容易。”³²

关于20世纪前半叶羌民的文化，特别是服饰，我们有另一种史料——前述陶然士、葛维汉以及黎光明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一些当时羌民的照片。稍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等人，进入羌民地区做调查期间也留下一些照片影像资料。根据以上中西学者对于羌民文化之描述，并参照当时照片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羌民服饰的确非常素朴，且呈现出由东面汉文化到西面嘉绒文化间的多元过渡变化。虽然所见之文化、语言现象略同³³，学者们对于所见何者为“羌人语言、文化”却有不同的看法。陶然士信心十足地描述一羌民文化，因为他相信“羌民”为一特殊的种族（race）——东迁的以色列人后裔。他又认为，羌人原应有来自近东的语言及文字，但在历史迁徙过程中丢失了。葛维汉除描绘羌民文化外，更试图分辨其中何者为受汉及嘉绒文化影响之产物，无论如何，他认为羌民是一族群。也就是说，陶然士期望以“民族迁徙”来说明一“种族”的来源；葛维汉则期望以“传统文化”来描绘一个“族群”的原型。

当时汉人学者们也期望找到传统的或典型的“羌民文化”，然而他们对于文化上的“羌民”却感到非常困惑。《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认为，“羌人”之文化现象均与内地汉人相若，即使有差别也只是枝节而已。在体认到界定羌人文化的困难后，他们的结论是：“羌人之辩（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它途可准。”³⁴困惑于羌民混杂文化特性的胡鉴民，也从“羌语”的语言类属中，得到他对“羌族文化”分类属性的信心。他指出：

到了现在，体质、语言与文化已成为人类学上并重的三大研究。中国西南民族中，氏羌与西藏民族在体质方面的关系尚未闻有何试探。在语言学方面，则已有专家证明，羌语确为藏语之一支别（华西大学闻宥教授数年前执鞭国立四川大学时，即开始做是项比较的研究）。这一点学术上的收获，可以给研究民族文化者极大的帮忙。因为由文化区的观点观察，现在的羌族文化亦可归入西藏文化区，与语言学上的收获互相发明。

显然，语言学家终不负这些民族文化研究者所望。闻宥的羌语研究成果——羌语是汉藏语族中之藏缅语支（Tibeto-Burman）的一部分

——广为民族研究者引用。对许多学者来说，此民族语言知识不仅提供一个界定羌族的科学方法，而且由“汉藏语系”至“藏缅语族”到“羌语支”，由广至狭的阶序包含关系亦暗示了羌族与更大范围民族间的关系——说“羌语”的羌族，为使用“羌语支”语言的“氏羌系民族”之一部分；“氏羌系民族”又是“藏缅语族”的一部分，“藏缅语”则是“汉藏语系”下的一部分。

五、近代羌民文化探索：宗教信仰

20世纪上半叶的羌民或羌族研究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主题。这个研究兴趣，部分来自两种动机。其一是，对于有传教士身份的西方研究者而言，他们原本对人类“宗教”便很感兴趣。他们探索、描述本地的“原始宗教”，比较这些“非理性的”宗教在人类宗教信仰演化发展上的位阶，或尝试追溯其来源。其二是，在各种探索边缘的文化中心主义下，边缘少数民族或“原始土著”被居于政治文化优势的学者想象为落伍的、演化程度较浅的族群——文化落后的重要迹象之一，便是其日常生活仍深受宗教力量掌控。许多汉人与西方学者，因此特别关注这些“原始民族”的宗教。也因此，在陶然士、葛维汉与胡鉴民等人有关羌民的著作中，土著宗教都是描述重点，“宗教”也都标示在这些著作的书名或篇名上。

陶然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几乎都与《圣经》记载或在西亚地区仍然可见的一些宗教习俗相关。他相信在此“蛮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塔或阿爸齐，是对上帝耶和华的信仰。他又称，因为羌民多住在高山上，这最高的上帝天父还有一个名字：“山神”。为了支持这样的看法，他举出一些宗教文化上的证据。譬如，羌民尚白；他认为白代表宗教与道德上的洁净，这与古犹太人的信仰习俗相同。又如，他提及羌民不拜偶像，如同遵守《十诫》的犹太人，只以白纸与白石来代表神。又如，羌民在高山上进行的祭仪，相关的“神树林”信仰、山上以石头堆成的“祭坛”，都被他视为与古犹太宗教传统有关，或是有其《圣经》记载根源的习俗。他又认为，羌民相信上帝是毫无瑕疵的，而人则是带罪的。人要接近上帝必须先除去罪，因此上帝派遣带罪的使者到世间帮助人们除罪。在他的著作中，陶然士费心描述羌民“端公”及他们所主持祭山杀羊子的“还愿”活动，“端公”也就是他所称的除罪使者，“还愿”是除罪救赎之习俗。³⁵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及，当时一位陶然士的当地好友兼传教助手——汶川木上寨的苟平山，

他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也帮着陶然士宣扬“羌民原本是上帝子民，以色列人后裔”之说。在他所写的《告大羌族同胞书：献羊子始末》中，他称听了陶然士的解释及读了《旧约圣经》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羌民对天神献羊子与古代以色列人的献祭同出一源。³⁶

十多年后，约在1930—1940年代，当葛维汉到岷江上游考察时，他发现许多羌民都自称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并说他们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华”。葛维汉在他有关羌族的著作中驳斥这种说法，并指出羌民是多神信仰者，以色列后裔之说是受陶然士及其羌民助手的误导。对于羌民的宗教，葛维汉明确指出，羌民并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们自己的神外，羌民还信邻近其他民族的神。他指出，当地天神“Mu-bya-sei”（木巴舍，即木比塔）在几个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村寨，又被称作“阿爸齐”，暗示着这是羌民接受陶然士等传教士“天父”之说的结果。他也注意到，由于受汉人道教影响，羌民更普遍地将“木巴舍”等同于“玉皇”。葛维汉自己则认为，“木巴舍”的意思相当于“天”。“天”是古代周人的神，在历史上羌族（姜姓之族）又是周人的盟友。³⁷显然在此诠释中，葛维汉视当代羌民为商周之羌或姜姓之族的后裔。对他而言，羌民对“天”的信仰，证实此民族的历史延续性。

为了反驳陶然士的“羌民为一神教信徒”之说，他指出，羌民家中大多祭五种主神。供奉那些神，以及各个神的名字，各地皆有不同。另外，羌民家中一般还祭十二个次级的小神，同样也是各地有异。除了各家中所祭的神外，每个村寨与地区都有当地的神。因此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羌民有多少地名与寨名，就有多少的神。当然，他也不认为白石代表唯一的天神。他指出，白石在许多地方都被当作各种地方神祇的代表。甚至在汶川的克枯寨，白石被部分人视为谷神，却被另一些人视为仓颉神。他又指出，汉人的神如川主、玉皇、关圣人、观音、武昌、梅山、土地等等，被羌民视为自己的神。他特别提及在蒲溪沟，羌民祭司“端公”以服装分为红、白两种。红端公拜孙悟空、沙和尚，擅长于驱魔除病、消灾还愿；白端公拜西天佛祖，长于求子、祈雨，祭山求五谷丰收。³⁸

因此陶然士所谓“上帝派遣来除罪的使徒”、羌民宗教的核心人物端公，似乎也深受汉、藏文化影响而缺乏其“本土”特性。或者，所谓“羌民宗教”与“羌民”一样，只是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一个模糊的、混杂的边缘。葛维汉在其著作中曾提到理番（今理县）的白空寺，他描述这庙中祭三尊“白石神”（以三块大白石为代表），守庙的是三个汉人道士，前

来奉祭的有羌民、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人³⁹——这也显示所谓“羌族宗教”的多元混杂性。

早期注意羌民宗教的中国学者有胡鉴民。他认为，羌族文化在物质生活与社会制度方面汉化较深，邻近“西番”与“嘉戎”者，也有番化或嘉绒化的情形。因此他特别看重羌族的宗教信仰。他说：“羌族的一切文化宝藏——巫术、仪式、历史、传说、民族神话与歌舞等等，犹常在巫师与长老领导之下，热烈地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着。”⁴⁰因此他将之视为羌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关于羌族宗教，首先，他认为“羌族”是个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还在灵气崇拜与拜物的阶段”。因此他驳斥羌族信仰为一神教之说。其次，他指出白石崇拜源于一则羌族传说，也就是羌人由外地迁来与本地葛人（戈基人）打仗的故事。他认为，羌族所信仰的并非白石本身，而是天地、树林、火神等等。他也提及，羌族事实上信许多的神，有供奉在屋顶上以数块白石为代表的神，有供在室内大致为十二尊的神。他举例说明，这些神在各地都有不同。这些大大小小的神祇中，多少都夹杂着汉人佛道或民间信仰中的神，如关老爷、姜子牙、土地、灶神、财神等等。汉化更深的，家中只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同时，他注意到各个地方的羌族都有其地方神，每个寨也有其地方神⁴¹。羌族的宗教信仰，一方面清楚显示羌族宗教不是一神教，一方面也显示各地的诸神信仰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此，他的看法与葛维汉是相同的。

他又指出，羌族有巫师与巫术，这“与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一样”。他特别强调羌族巫师“端公”是其精神领袖。他描述传说中端公的种种神通，称“这样的魔术在原始宗教学上称为模拟魔术”，是“根据一种初民心理而成立的”。最后，他以图腾主义来解释羌族传说与宗教习为。他认为羌族是以羊为图腾的民族。羌族自称rmee，发音如“咩”，他指出，这是羊图腾民族以模仿羊叫的声音为族名。此外，所有羌族仪式与日常行为中用到羊或羊毛之处，也被他引为羌族以羊为图腾的证据。⁴²这显然由于在他的文史知识中，“羌”字是以羊、人两部分构成，文献又称羌为“牧羊人”。总之，对胡鉴民来说，在夹杂许多汉、番因素的羌族文化中，宗教信仰一方面能证实羌族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又说明羌族文化的“落后性”或“原始性”。如其所言：“氏羌之名早见于殷商之际，以如此悠久历史之民族，而其信仰尚停滞在如此原始的阶段，这是很令人怀疑的。”事实上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文明进步观，以及国族主义下的核心与边缘族群区分，使得胡氏“发现”羌族宗教的原始性。

以上三位中西学者，皆因自身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而对被观察的人群有些偏见。他们所见的是同一个宗教文化现象，但在主观文化偏见下，各人之“经验”认知不同。在基督教文化中心主义偏见下，陶然士所认知的羌民是高贵的一神教信徒，他们的信仰与习俗中保存了许多古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在汉族中心主义偏见下，胡鉴民所认知的羌族是落后的、原始的灵气崇拜与拜物者——虽然历史悠久，但演化程度远不如汉人。葛维汉接受中国学者所建构的“羌族史”（姜姓族与周人对天的信仰），因而将羌民对“天”的信仰，视为此一民族长期受汉化与藏化影响下的古老文化残余。

六、在差异体系中寻找相似

排除各个学者之文化偏见，20世纪上半叶岷江上游村寨居民的宗教信仰究竟如何呢？近代岷江上游各地的诸神体系与相关信仰，有部分一直被保存、实践着，有些保存于老一辈村寨民众记忆中，或保存于文献与残存的庙宇建筑之中。无论如何，通过各种记忆媒介，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情况。简单地讲，在岷江上游地区，“山神”是最普遍的一种宗教信仰。一般而言，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山神。几个邻近的寨子又有共同的山神。在更大范围内，几条沟的人则有更大的共同山神。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由下而上的一级级山神，佑护由内而外一圈圈的村寨人群及其资源。我在第三章说明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时，曾介绍过这个信仰体系。

愈靠西方、北方的村寨，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愈深，各村寨的山神被纳入藏传佛教诸神体系之中。最北方的羌族村寨松潘小姓沟埃期村，可代表这种较藏化的村寨。如前所言，当地几个寨子各有山神菩萨，部分二组的“家族”与一组的人也有共同的山神，三个寨子又共同祭拜山神“格日囊措”。龙头寺庙会（藏传佛教）凝聚所有小姓沟中的羌族、藏族。最后，松潘的“雪宝顶”山神菩萨（藏传佛教与山神的混合），又凝聚小姓沟与附近各沟的羌、藏族。更藏化的地区，小姓沟西南方的黑水，当地村寨人群在开酒坛敬菩萨的时候，从西藏最大的菩萨念下来，释巴迦莫、色气独历格瓦、究我伦木初；然后念黑水最大的山神，欧塔基、欧塔迷、欧塔拉；最后念本寨山神及本家族神的名字。这些说“羌语”的黑水人，如前所言，在民族分类识别中目前为藏族。

在靠东方、南方的汶川、理县一带，各级山神逐渐被各种汉人“庙

子”取代。庙子中供奉的是玉皇、观音、东岳、川主、牛王、二郎等汉人信仰中的神祇。一层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的山神体系消失，人们只祭本社群的山神，山神之上则是各级“庙子”。如我在第三章所举的例子：茂县永和沟甘木若村的大寨子与小寨子，这两寨中李、谢、徐、白四个汉姓家族各祭各的山神。两个寨子的人共同祭的则是川主庙、地母娘娘庙与牛王庙。他们与永和沟其他村寨的人共同祭拜白虎山观音庙（佛教）或渭门云顶山因果祖师庙（道教）。

在较汉化的理县、汶川两县村寨人群中，除了山神与各种道教、佛教神祇外，还曾流行天神木比塔信仰。前面曾提及的“羌戈大战”故事，帮助羌人打败戈人的便是这位天神。在“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中，他便是木姐珠的天神父亲。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本地巫师“端公”的经文中，在许多场合诵唱出来。巫师“端公”本身相当受汉人道教文化影响，他们的法术有烧红锅、走钹头、打太平保护等，他们所念的咒语有雪山咒、化水咒，这些都显示他们与道教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说这故事时，端公们常把木比塔解释作“玉皇大帝”。村寨民众与端公受同样的道教文化影响，因此他们也常把天神木比塔等同于“玉皇”；木比塔故事中的那只人猴，则被认为是“孙悟空”，这故事中也有藏文化因素。以“猕猴变人”为主题的人类起源神话，不但出现在许多藏传佛教经典中，也流传在当今或历史上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人群之中。紧邻羌族的嘉绒藏族与黑水藏族中，便流行着猴子变人的人类起源故事。部分受汉、藏两种宗教文化影响的村寨居民认为，“木比塔”是管天上的“西方佛爷”，“玉皇”则是管地上的天神。

由此可知，葛维汉与胡鉴民都曾观察到并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事实：各地“羌民”或“羌族”的语言、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都有很大的地方性差异。一个简单的叙述方式便是：愈靠东方、南方的人群愈受汉文化影响，愈靠西方、北方的人群愈受藏文化影响，而各个邻近的村寨或沟之间，都保持些微的文化“区分”。对于这样一个混杂的文化现象，葛维汉、陶然士与胡鉴民的共同努力，是期望将“羌民文化”由汉、藏文化影响中剥离出来。在“民族”概念下，在学者们各自所相信的“羌人历史”引导下，他们努力找寻各地“羌民”的文化相似性，或由遥远的时间（历史）与空间（偏远山寨）资料中建构“羌民文化”的原型，借此恢复与重建“羌族”。此种研究之学术合理性值得怀疑。毕竟，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建立在主观认同上的“羌民”或“羌族”，而每一村寨、沟或地区的人群，都认为本族群是夹杂在“蛮子”与“汉人”间的“尔玛”。因此，这些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文化，在族群关系上所代表的是以各个“尔玛”认同为主体

的“区分”体系，而非代表一个受汉化、藏化影响的羌族“认同”体系。

20世纪上半叶的中西学者们，无论是强调羌民文化的独特性，或困惑于它的混杂与模糊，他们的学术探索都基于一个概念：“民族”是有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与文化的人群。他们认为，这些体质、语言与文化特质，随着民族在历史中的延续而传承，在此传承过程中，一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发生假借、变迁。因此，这些田野调查者都希望找到羌民文化的体质、语言与文化“原型”——无论是在遥远的过去，或在遥远的群山之间——来界定“羌族”的范围及其本质。事实上，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羌人文化“原型”。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岷江上游的汉、藏之间，只存在一个在主观认同与客观文化上的模糊边缘。在这个模糊的族群边缘上，不只是“羌族”或“羌民”之范畴混沌不清，“藏族文化”与“藏族认同”的东部边缘也有待被界定，事实上，此时“汉族”的西部边缘也在调整之中，因此使得这些探索充满了挫折与不确定性。

七、异文化书写中的华夏边缘建构与再建构

在这一章中，我介绍了一些“古羌人文化”或近代之前的“传统羌人文化”。以历史事实来说，无疑它们中有部分是过去曾被一些“羌人”实践的文化习俗。但这些文化习俗，无论它们在时空分布中是延续、相似的，或是断裂、歧义的，都不能说明“羌族”族群范畴的存在与延续。也就是说，在本章所述的“羌人文化史”中，并没有一个在此历史中延续的“民族”主体。然而，这并非是说，前面所记的只是些彼此毫无关系的片段文化描述。事实上，由本章的分析可知，羌人文化史的延续性可以由社会记忆的叙事与展演两方面来理解。

由“叙事”的层面来说，由于我们所知的羌文化几乎都赖汉文史料，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汉人描述他们心目中某西方异族文化的历史，这也是汉人描绘其西方族群文化边缘的历史，在此历史中延续、变迁的是华夏或汉人的西方族群文化边缘。《后汉书·西羌传》中有关羌人历史与文化习俗的描述，显示此文献的成章与出现时代，也就是华夏（或汉人）西部族群边缘初步成型的时代。唐末之后，汉人对“羌人文化”的描述鲜少，反映了在吐蕃兴起及其文化影响东渐之后，以“羌”为代表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萎缩。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探索岷江上游羌民文化的学术活动，亦应视为华夏重新描绘、建构其族群（或民族）边缘的尝试。而西方学者如陶然士等的“羌民文化以色列根源说”，也可被

视为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下的“我族”东方边缘建构活动之一。于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汉晋以来的华夏西部边缘——“羌人地带”在岷江上游的残余——在各种文化势力交逼下，同时成为汉、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边缘”。也因此，“天神”木比塔被诠释为玉皇大帝、西方佛祖以及上帝耶和華。

相对于汉晋时期华夏对于“羌人”的文化描述，近代学者对于“羌族”之文化描述不仅仅内容繁复，而且与前者有本质上的差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疆异族文化描述，主要是塑造华夏的“异化边缘”。因此诸如“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或“妻寡母釐嫂”等语辞，常重复用于描述不同时空之异族。近代受“民族主义”与“民族学”影响之中国学者，他们对中国“边疆民族”的描述则有不同旨趣。首先，在1920—1940年代间，从前西南“蛮荒瘴疠”之地，此时已成为国族不可分的西南边疆。然而在当时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边疆描述中，当地“非汉族群”仍被学者视为“异化边缘”，只是这“异化的华夏边缘”如今有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等工具来强化。其次，为了呈现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为了民族政策的规划与实践，识别西南边疆究竟有哪些“民族”，实属必要。也就是说，此时的边疆民族描述，不只是刻画汉与非汉之间的边界，也须识别、刻画各个少数民族间的边界。

由文化“展演”的层面来说，在本章所述“文化史”中延续的，是一个核心与边缘的族群关系。核心指的是华夏，边缘指被华夏称为“羌”的族群；族群关系则是指两者之间通过文化贬抑、夸耀与模仿、附和所进行的文化互动。此文化描述通过文字、口述、图像与行动的展演，强化华夏心目中“羌人”的劣势地位。在地方层次或在华夏边缘，此异族意象让常与华夏接触的“羌人”感到自身的劣势。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羌人”通常被称作“蛮子”。而相对地，自称“汉人”的华夏，在此华夏认同边缘也常夸耀、展示自身的文化习俗。在同时接触此种文化夸耀下，许多“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而终于采借华夏家族历史记忆而自称“汉人”。这样的文化过程，曾使得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缘持续向西迁移。汉晋时期陇西、关中一带被称作“羌”的人群，其后裔在隋唐之际都成了华夏。唐宋时期甘南一带土著还被华夏称作“羌人”，到了明清时期这儿也成了汉人之域。明代北川白草、青片河流域的“羌人”，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时也都消失了。

除了因“汉化”而被排除于华夏心目中的“羌人”范畴外，某些地区的“羌人”也因“吐蕃化”而脱离此范畴。宋代以后，许多原被华夏称

作“羌”的区域人群，都被华夏视为“番”或“蛮”。吐蕃政治、宗教力量所造成的文化夸耀，也曾使许多“羌人地带”上的人群因模仿、接受藏传佛教与吐蕃文化，而成为华夏心目中的“番”。如北川的白草“羌”，在部分明、清时期文献上也被称作白草“番”，并称他们是“吐蕃赞普之遗种”，他们的风俗也被称为“番俗”。⁴³唐、宋之后，原“羌人地带”的土著在华夏心目中成为“番”，同时汉人对“番俗”的描述，在许多地区逐渐取代了“羌俗”描述。在本书第六章中我曾提及，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番”代表比“羌”更严格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划分。因此在文化描述上以“番”代“羌”，也显示中古之后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变化。

以此看来，近代中国民族学者探索岷江上游的“羌民文化”，并将其其中一些因素理解为更大范围的“氏羌系民族”共同文化遗产，⁴⁴这些学术探求及其成果所造成的文化展演，则成为另一次华夏边缘变迁的重要转折点。首先，这些探索活动以及学者们对羌民文化的描述（包括汉、羌、藏间的区分），强化了“羌族”这一概念——羌族，一个有共同体质、语言和文化的民族，逐渐成为汉人知识分子的民族常识。通过文化描述，特别是通过对宗教活动的描述，羌族也被建构成一个迷信且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在胡鉴民的著作中，我们看见作者经常以浅演、原始等词，来形容羌民宗教与其他文化特征。⁴⁵他对羌族宗教及生活习俗“原始性”的描述，通过文字传播，成为一种被展示的社会记忆。此社会记忆被当时的汉人知识分子阅读、获知，逐渐形成他们心目中的“羌族”意象。尽管如此，相较于过去华夏对“蛮夷”的文化描述，新学术下的“羌族”文化书写被描述成有特色的、鲜明的或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今许多“羌族”皆乐于展演他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下一章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其次，一个由汉代到明清逐渐萎缩的华夏边缘，或在华夏心目中渐被“番”取代的西方族群边界，在近代被重新发掘、描述，其意义是华夏通过羌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再现与重组，模糊化其西方或西南族群边缘，特别是其与“藏族”间的族群边缘，如此，汉与各族群共聚为一中华民族。没有任何人——无论是民族学者胡鉴民或语言学者闻宥——在建构中华民族的意图下，刻意发掘、再现“羌族文化”。而是我们由华夏边缘的长程历史变迁来看，“羌人文化”通过“汉人”与“羌人”的文化展演，成为一种不断被改变的社会记忆。此社会记忆由于被选择、利用或遗忘，而不断改变着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

胡鉴民与闻宥等人，虽然受近代西方学术（如民族学、体质学、语

言学等)与“民族”概念影响,但他们仍是中国历史文化下的产物。他们与《后汉书·西羌传》的作者一样,不自觉地投身于塑造中国边缘的长程工作中。

- 1 [日]白川静:《羌族考》,《甲骨金文学论丛(第九册)》,1958年。
- 2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第71—133页。
- 3 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第285—287页。
- 4 (清)杨迦悖:《茂州志》卷一,《风俗》;(清)赵德林等修:《石泉县志》卷二,《风俗》。
- 5 沈仲常:《从考古资料看羌族的白石崇拜遗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59—61页;冉光荣等:《羌族史》,第206页。
- 6 如《后汉书·西羌传》称其“无相长一”;《新唐书·党项传》称党项各部“不能相统”;或如《隋书·附国传》,称当地人群中“无大君长”。
- 7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 8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69—88页。
- 9 《北史》卷九六,《党项传》。
- 10 北川羌人与明朝的战争过程,见本书第六章。
- 11 道光《石泉县志》卷十,《艺文志》。本段大意为:“土著叽喳嘈杂的话很难懂,翻译者为我道来,才知是有人火烧父亲遗体,有人杀牛治病,有人将儿女卖了……我为这些很烦恼忧心,希望能以文明教化洗掉这些野蛮风俗。父老们听了我的话,都惭愧得额头冒汗,也纷纷点头赞同。人之种类虽不同,人性却是一样的,哪一天这儿也可以变成如箕子教化下的朝鲜一样呢?”
- 12 在清代本地人观念中,是否得读书应科举,成为汉与蛮之间的族群边界指针。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与相关的蛮、汉区分概念,也表现在《民国北川县志》中一则故老遗闻“刘自元移碑”之中。关于此故事及其隐喻,见本书第六章。
- 13 道光《石泉县志》卷五,《武备志三》。
- 14 到了1980年代,羌族认同抬头,许多白草河流域原来自称汉人的民众,皆更改族属并自称“羌族”。这时此地羌族村民间才有了争论——究竟走马庙祭的是何卿,还是羌族起义英雄?有些人认为,“走马将军”是受何卿屠戮的羌族头领,“白马将军”则是何卿,本地的“走马庙”祭拜的自然还是“走马”而非“白马”。
- 15 请参阅本书第六章中“羌人带的萎缩:汉化、番化与夷化”一节。
- 16 “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一词,是当代西方学者用以形容早期民族学者、探险者对“原始民族”的一种肤浅想象,想象他们的“原始”代表当代人已失去的“纯真”。在此处,我用这个词,指当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东方某些“原始人群”为上帝的信徒,他们是古代迁徙来此的“古以色列人后裔”。事实上,在部分欧美人士及群体中,此种想象一直延续至今。

- 17 《礼记》卷一三，《王制篇》。
- 18 《周书》卷四二，《刘璠传》。
- 19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p.39.
- 20 应是指毳织品。
- 21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pp. 36-40.
- 22 Ibid., p.17.
- 23 如前面所引的，他称羌民“仍”穿白色麻制衣服，称他们“目前”说的是双语，都是使用叙事手法，来建构、强化其对“过去”之想象。
- 24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20-21.上引文中的“瓦寺”是指汶川附近瓦寺土司之属民。
- 25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9.
- 26 黎光明、王元辉：《獐獐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载《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之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未刊手稿，1929，第44页。
- 27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37页。
- 28 祝世德等修：《汶川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版，1944，第304页。
- 29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第23页。
- 30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第25页。
- 31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39—40页。
- 32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39页。
- 33 此处关系着田野选择的问题，也就是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者选择哪些地区的人群做调查来呈现“羌民”或“羌人”的文化。陶然士与葛维汉的调查主要都集中在今汶川、理县附近，特别是龙溪沟与杂谷脑河沿线各村寨“羌民”。《川西调查记》的调查者，虽然走过茂县及黑水河沿线诸地，但他们所报道的主要也是杂谷脑河沿线村寨与汶川萝卜寨（罗卜寨）等地的“羌人”。另外，1940年代胡鉴民在描述羌民的经济与工艺时，偶提及茂县东路与西路等寨，但详尽的描述都集中在杂谷脑河沿线各村寨。显然，上世纪前半叶学者所描述的典型“羌人”或“羌民”，都是杂谷脑河流域以及汶川附近各村寨的居民。这应是他们对土著服饰的描述基本类似的原因之一。
- 34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第25页。
- 35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pp. 78-94.
- 36 此信之中文版已不见，然葛维汉曾将之译为英文载于其书中。本文所引，为葛维汉书中之英文版转译而来。见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98-100.

- 37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45-46.
- 38 Ibid., pp.46-53.
- 39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50.
- 40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194页。
- 41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195—200页。
- 42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1，引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第211—216页。
- 43 由于我对藏学没有研究，也未尝深入藏区作田野调查，因此这一波由西而来的文化展演及其过程，只是基于我的“华夏边缘”之说，以及我在黑水、理县、茂县、松潘、北川等藏、羌族地区所见而得。北川的青片番与白草番便是一个案例。
- 44 这是指“白石崇拜”“与羊有关的信仰”“石碉楼”“铁三角”等等。近数十年来，这些分布较广的文化因素，常被学者视为“氐羌系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 45 类似对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原始性”的描述，在当时汉人的论述中非常流行。边疆非汉民族的文化“原始性”，又被认为是一些“古老的”文化残余。如1930年代曾在岷江上游地区游历的庄学本，曾描述他所见“戎人”（嘉绒）的习俗如下：“他们男子的衣服还是古式的大领衣……古语说‘披发左衽，夷狄之服’，这样衣冠不正的右袒，也许是古时西戎遗传的服制吧？……在他们渴望我的时候，多用古礼，双膝一屈，打一个扞……‘礼失而求诸野’，在此地发现西戎是古礼之邦。”见庄学本：《羌戎考察记》，第84—85页。

第十章 当代羌族认同下的文化再造

近代羌民或羌族文化探索与由此产生的文化描述，作为一种被夸耀、展示的社会记忆，不只对汉人知识分子展示，也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展示，因此影响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自我认知。葛维汉在解释为何羌民会让陶然士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时曾指出，“他们为了讨好外来访客，而常答以虚构不实之事”。的确，无论在人类学或是口述历史的田野采访中，报告人常揣摩调查访问者的角色、态度及其意图，以选择适当的陈述来响应。¹但是，当本土知识分子苟平山宣称“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及上帝信徒时”，他不一定是用虚构不实的陈述以取悦陶然士，很可能他被陶然士的“知识展演”说服，而真的相信如此。

学者或其所代表的政治或文化主体，挟其知识与政治、经济优势与“土著”（natives）接触时，他们所带来的外来知识对于“土著知识分子”而言，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与“土著知识分子”的本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此，“土著”自然指的是相对于优势外来族群而言的本地人；“土著知识分子”则是指他们中由文化接触获得新知而被众人认为有知识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也因此常成为外来学者的报告人、助手与好友，或成为外来政治文化机构的本地代表。无论如何，他们是与外在世界常有接触的本地人。与外在世界的接触所带入的外来“物”与“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使他们对本土事物有优越的诠释权，使他们成为“土著知识分子”。然而也因为与外界的联系，使他们比其他本地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在此情境下，苟平山接受了一个“西方”祖源，并让部分羌民也深信他们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无论如何，这只是近代羌族民族化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总而言之，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国族建构中，“羌族历史”已成为联结汉、藏与广大西南氏羌系民族的桥梁；在“羌族文化及语言”的探索中，也曾尝试描述此民族“活化石”的范围。因此在民族识别下，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在各种有关羌民或羌族历史文化论述的交竞展演中，岷江上游民众也学习、选择或被教导而建构起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在内部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下，相互争辩，竞相展示“典型的”我族历史与文化。在第七章与第八章中，我曾介绍当今羌族的本土历史记忆。在这一章，我将介绍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羌族本土文化建构。

一、羌族本土文化建构的背景

羌族本土文化建构与展示的主体为“羌族”，因此我们先得注意20世纪下半叶许多民众成为“羌族”的背景。上一章我谈到胡鉴民与葛维汉曾致力于探索“典型的”羌民文化，但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在他们探索“典范的”羌民文化时，他们也强化了这个典范的“羌民”概念。在此概念下，他们对羌民的记录、描述，都被以后之学者选择性地用来使这个民族概念更明晰。这个早期在岷江上游人群间探索“典范羌族”的努力，便是将该人群“民族化”或“少数民族化”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说，胡鉴民以及许多同时代学者的工作，为后来半世纪的羌族本土文化建构提供了两种背景：一是“羌族”此一民族实体概念及典范化的羌族文化、语言概念，使得“羌族”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分类中，得以成为一个被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二是他们所搜集、描述与探讨的“羌民文化”，成为被“羌族”选择、修饰与展演的本民族文化素材。1920—1940年代只是“民族化”的起始，在1949年之后这项工作更积极地进行下去。相关工作包括民族调查、研究、识别、分类与民族政策的推行等等。在民族识别与民族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羌族的范围，借着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的描述而大致有了明确的边界。这些描述，通过文字与口传历史的刊行流传，也成为有关羌族的社会记忆。

然而，许多“羌族”并非由于国家的民族划分、识别而成为“羌族”。事实上，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居民大多有丰富的父系汉人家族记忆，足以让他们采借以成为“汉人”。他们之所以选择部分记忆，多为母系祖源记忆，以将自己登记为“羌族”，自有当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执行民族平等与消除民族歧视的政策，的确让许多非汉族群，或被视为“蛮子”的“汉人”，不再受羞辱、欺侮。稍后渐进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岷江上游与北川等资源匮乏的边缘地区，更使得本地人——包括从前许多自称汉人，而称上游村寨人群为“蛮子”的人群——有意愿承认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或攀附少数民族身份。由于受各种政治运动影响，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放宽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从某种角度而言，意味着大量的地方公职将由当地少数民族来竞争、分享。同时进行的个体化经济与国家的边区经济开发，都使得原来经济落后的岷江上游地区充满了新的资源。从这时开始，本地的少数民族认同得到鼓励与舒张。

1950年代以来受国家培养的当地少数民族或汉族知识分子，此时成为建立羌族认同的尖兵。这些作为文化桥梁的“羌族知识分子”值得我们

注意，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共产党员与国家干部。更重要的是，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掌握各种以汉文传递的知识，因此他们能成为“知识分子”。一方面，相对于羌族村寨民众而言，这些知识分子所以能掌握诠释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权力，乃由于他们能掌握汉文的典籍与知识，能从中习得由国家认可的民族认同与区分体系。也由于他们熟悉国家的政策与运作，能兼顾国家、中华民族与本民族之整体利益，因而国家授予他们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家或整体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部分也来自他们的本土民族文化诠释者与代言者角色。

这些新羌族知识分子，取代了20世纪上半叶本地的端公、土官、地方头领及基督徒领袖等之旧“知识分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当地新旧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差别，他们都靠与外在世界接触所得的外来“物”与“知识”，来增进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本土事务的诠释权。也因为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比其他民众更深切感受到本族群的弱势与边缘性，因而致力于选择或建构一个荣耀的起源（历史）与足可夸耀的本民族文化。与当年的苟平山一样，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刻意虚构他们的历史文化，他们只是被说服，或选择性地接受一些足以自傲的历史文化。

就在如此的知识与权力背景下，汉人对于“羌人”或“羌族”历史文化的记录与描述，成为羌族知识分子建构与认识自身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源泉。同时，为了在内部划分核心与边缘，带着地域认同的各县、各乡羌族知识分子，也彼此争夺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诠释权。²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羌族知识分子便积极加入羌族文化的采访、研究与宣示、推广之中。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1980年代之后，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进入当地自治政府体系与当地文教事业单位；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自治政府乐于强化、推广本地少数民族文化与认同。在少数民族意识普遍增强的潮流之下³，许多羌族“传统文化”被恢复、建构与推广。以下我就语言与文字、端公与祭山会、羌历年与锅庄舞、饮食文化与服饰等方面，介绍当前所见所闻的羌族文化。

二、羌族文化再造：语言、文字

对于羌族民众而言，在羌族认同上最大的困惑可能来自语言——他们难以用“羌语”（乡谈话）和其他地区使用“羌语”的人群沟通。尤其是关于“民族”的刻板知识已告诉他们，“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语言、文化等

等的人群。过去他们对“尔玛”的定义，也常是“说我们同样这一口话的人”。如今“尔玛”被扩大理解为“羌族”，然而却包括了许多彼此不能通话的人群。羌族民众对此有不同的对应与解释方法。通常的解释是，人住得分隔（因为被打散了），语言就慢慢变了。这意味着原本有一种共同的“羌语”，因此他们也常努力尝试，以了解其他地区羌族所说的“乡谈话”。

但羌族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此。1989年起，在四川省民族委员会的羌族干部主持下，一项羌族语文创制计划开始进行。北川、理县、茂县、汶川、松潘等地羌族知识分子代表被推荐出来，集中在汶川、茂县等地接受语言学的基础训练。往后几年间，他们分组下乡调查，搜集羌族各地方言、土语。经过开会讨论与研究之后，最后决定以“曲谷方言”为标准羌语。“曲谷”是民族划分下羌族的最西方边缘，也是一般而言“汉化”较浅的地区。⁴选定“曲谷方言”为标准羌语后，以此制定拉丁拼音的羌族文字，并编辑相关的《羌语词典》。为了推广标准化的羌语文，汶川的威州师范学校建立“羌文班”，培训标准羌语文师资。同时在羌语文的创制过程中，这些羌族知识分子也致力于羌族文化的搜集、研究与推广。

虽然如此，推行标准化的羌语显然不易。近年威州师范学校的羌文班已停止招生。主要原因应是，当地普遍以“汉话”（川西方言）作为各地人群间的“共同语”至少已有百年历史，而由于各村寨、各个沟的认同与区分机制，也让他们不易改变原有的“乡谈话”。⁵况且各沟各寨羌族与外界接触渐多之后，使用“汉话”的机会更普遍，因而“乡谈话”仍在持续流失之中。无论如何，共同本土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虽然缺乏成效，但这些活动作为一种“展演”，推广了“共同羌语”此一观念，在凝聚羌族认同上仍有相当意义。虽然，以乡谈话沟通还是有困难，但羌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各地乡谈话是一种共同的羌族母语。

三、羌历年与锅庄舞

目前羌族年节“羌历年”和在各种公私庆祝场合常见的锅庄舞，都被认为是羌族文化的重要标记。“羌历年”是否为羌族传统新年，在当今羌族中仍有争议。在陶然士与胡鉴民的著作中，都曾提及羌民的新年是在阴历十月初一，主要活动是杀牛羊还愿。⁶然而在葛维汉的书中，他以汶川、理县之间的和平寨、木上寨等地习俗为例指出，“还愿”或在六月初

一，或八月初一，或十月初一，各寨间没有统一的日期。而且，他并未将此节日视为羌民的年节。“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在《川西调查记》一书中所记载的羌民岁时节日，有过年、清明、端午、中秋等；本地人“过年”与汉人习俗相同，是在阴历正月。

据陶然士、胡鉴民所记载，在十月一日“过年”的是汶川与理县东部的“羌民”。根据我的采访及相关文献，所谓羌历年在这些地区原称作“牛王会”，或与汉人年节的“冬至”相混，因此也称作“过小年”。“牛王会”或拜牛王菩萨的习俗，在各地有不同的举行时间，有不同的仪式，甚至有不同的节庆意义。在农业较重的汶川和理县东部地区，这相当于一种答谢神恩（还愿）的秋收节。然而在茂县西路的赤不苏，牧业远较汶、理地区为重，只有养牛羊较多的家庭祭牛王菩萨。也就是说，愈往北路与西路去，“牛王会”的节日意义就愈淡化，或根本没有。无论是冬至过小年，或是牛王会，显然都是与汉人民间信仰相关的习俗，它们的流行也与土著汉化程度相对应。陶然士曾在其著作中提醒读者，勿受汉化土著误导而将羌民年节认作是汉人的“牛王会”。⁷这显示，他也曾听到当地民众说，十月初一是“牛王会”。无论如何，他与胡鉴民心目中都认定有一纯粹的羌族文化，因此将十月初一这日视为羌民最重要的节日，并排除其与汉人习俗“牛王会”的关联。事实上，无论20世纪上半叶或是今日，在所有当前羌族地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便是“过大年”——与汉族一样过阴历年。过年时，吃年夜饭、祭祖、舞龙舞狮等等，也与汉族大体相同。更重要的是，在“羌语”中根本没有“月分”与“年”的概念，自然也没有所谓的“羌历年”了。⁸

无论如何，“过大年”被认为是汉人习俗，因此在羌族文化建构中“牛王会”逐渐成了“羌历年”。地方自治政府在推行“羌历年”上扮演主要角色。1988年茂县举办全羌族的“羌历年”庆祝活动。次年，庆典在汶川县举办，1990年由理县举办，1991年由北川县接着举办。“羌历年”成为羌族新年的详细过程，我们并不清楚。胡鉴民等人对羌民“过年”习俗的描述，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各地羌族民众大多明白，过去并没有“羌历年”的习俗，他们常将之归于某一有关“羌族”的重要鼓吹或推动。如一位北川青片乡的羌族老人所言：

现在这十月初一，在理县那几个寨子调查的，而且他们也叫过小年，不知为何弄成羌历年。现在茂县的人还问，怎么把个十月初一变成羌历年。我说，我还要问你们呢。八七年在成都的那些羌族，何玉龙，一个老红军，每一县派一些人去跟他们过羌年十月初一，后来就成了传

统了。八八年在茂县，八九年在汶川，九〇年在理县，九一年在北川；就这样形成了。现在老百姓对这也反感，他们认为不是十月初一。

松潘小姓沟的一位羌族，对此有另一种诠释，他说：

后来茂汶弄一个羌族自治县，就有了羌历年。羌历年是好多号？这是后来才成立的，成立了三年、四年了吧。跳舞、唱歌、咂黄酒。

在许多羌族的记忆中，羌历年不仅不是一项旧传统，相反，他们的言谈中常出现“开始过羌历年的时候”这一时间坐标。这个时间起点坐标，代表一个新的开始——较好的经济生活、较多的观光客、经常举办的羌族歌舞表演。

羌历年庆典中最重要的活动便是“跳锅庄”表演。“跳锅庄”，又称“沙朗”，是一种团体歌舞，目前被认为是阿坝州藏、羌族共有的一种地方文化。但许多地方的民众都说，当地过去没有这传统，这是近年来年轻人由外面学回来的。在茂县牛尾寨的新年庆典中，我也曾观察到当年轻人跳着“锅庄”时，老年人聚在一起跳“尼萨”。据称，这是本地过去的传统歌舞。一位当地老年人说：

锅庄有。以前我们跳的是尼萨，尼萨日北，就是不跳脚，只是转圈圈。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像对诗一样，跳舞根据跳那个。解放过后，他们参加工作的带回来的（锅庄）；以前不兴跳，不会。沙朗的歌词，锅庄的意思不晓得，尼萨的意思知道。沙朗原来不是羌族舞，只是现在进化了，一些文人吧，编出来的。尼萨有，过年有过年的内容，全部是羌族语言来对的（按：来唱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地区几乎也没有任何羌族民众知道“锅庄”的歌词内容。“锅庄”似乎是由西边（目前的嘉绒地区与黑水地区）传来的歌舞；过去愈往东边，此种传统愈弱或根本没有。在20世纪上半叶，葛维汉与《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已观察到这个文化现象。当时羌民的锅庄歌舞并不普遍，有此习俗的只是紧靠着“西番”或嘉绒藏族的羌民。因此他们指出，羌民的锅庄歌舞学自“西番”或嘉绒藏族。⁹在有此传统的羌族地区，据老年人说，过去一地有一地的锅庄，皆有不同之处。自称“尔勒玛”的黑水藏族有些老人也说，过去他们跳两种沙朗——“赤部沙朗”与“尔勒玛沙朗”，前者指的是由上游地区传来的沙朗，后者是“我们的沙朗”。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过去“尔玛”或“尔勒玛”只代表一小区域

人群的认同，而“赤部”与“尔玛”间的边界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此“锅庄”歌舞的确是由西向东传播，但葛维汉与《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称此为嘉绒或西番文化，并不十分正确。

自1989年以来，在阿坝州政府与其下各县政府的倡导下，典型的羌族锅庄与藏族锅庄分别被编成几套，并推广到各地民众之间。各县城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是热心的推广者。如今，锅庄歌舞经常在羌族地区各种公私庆宴如婚礼、运动会或羌历年中表演，成为当地旅游活动的重要展演项目，也成为羌族年轻男女日常农闲时的娱乐。如今对羌族而言，它不仅是本民族的文化象征，也是阿坝州包括藏、羌少数民族文化与团结的象征。

四、羌族妇女服饰

在羌历年庆典或旅游活动中，一群年轻的羌族女孩穿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跳锅庄，总是众人围观的焦点。不仅在公共演出场合，羌族少女穿着此种色彩丰富、图案繁复的服饰，在村寨的日常生活中，妇女们也经常穿着“民族服饰”。此羌族妇女服饰的共同特色，主要表现在年轻妇女色泽艳丽的长衫上。颜色多为红、绿、桃红或天蓝，在领与袖边加上一段绣花布边。羌族妇女多有包头帕的习俗，但各地有不同的包缠法，最大的差别是“搭帕子”与“包帕子”的区分：前者流行在邻近嘉绒或黑水藏族的羌区，如赤不苏与理县，后者流行在其他羌族地区。包帕子的方式，在三龙沟、黑虎沟、蒲溪沟、永和沟等地都有相当差别，甚至在一个沟中，相邻村寨间都有细微的区分。鞋子、领夹与围腰上的绣花，也被视为当前羌族传统服饰的重要特色之一。西路与北路羌族的绣花，以几何图案的“十字绣”为多，东路则流行以花朵图案为主的“刺绣”。汶川一带村寨由于刺绣精致，还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羌绣之乡”。¹⁰

羌族自治州县文化单位中的羌、藏与汉族知识分子，曾编辑出版名为《中国四川羌族装饰图案集》的图册。他们在这本书中，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安排与诠释，强调羌族服饰在多样分歧中的同一性。事实上，从村寨民众的观点，妇女的头帕、围腰、腰带、花边等，一个村有一个村的特点，一个沟有一个沟的特点；有时一座山的上、下寨之间，一条沟的阴山与阳山面村寨之间，妇女服饰上都有些微小的差别。这些微小的差别可能不会引起他人注意，但在当地民众间却有非常重要的区分意

义。¹¹无论如何，目前穿着这色彩艳丽而又多变化的“传统羌族服饰”的，几乎都是高山、深沟村寨中的妇女。

因此，这些服饰特征中有哪些是“传统的”——至少是从20世纪上半叶延续而来——值得探究。在上一章中我曾提到，20世纪前半叶，陶然士、葛维汉、胡鉴民与《川西调查记》的作者们所描述的“羌民”服饰，经常是形式素朴、色彩单调的。葛维汉与胡鉴民都曾注意到，在衣鞋上绣花的习俗在较汉化或藏化（嘉绒化）的地区更流行，因此他们怀疑羌民是由邻近的汉族或嘉绒藏族那儿习得绣花的习俗。此外，我也在上一章中提及，在1929年，黎光明记载道：“以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1934年中国旅行家庄学本也认为，“此地的汉羌和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当时包头帕的本地人也包括男子。20世纪上半叶的调查者曾提及，羌人无论男女皆戴头巾、扎绑腿。

显然，不同于过去的素朴，现代羌族村寨妇女服饰在色彩上非常炫丽，衣裙上的图案多而复杂。近几十年来，妇女服饰逐步特殊化从而表现出民族与地域特色，相反，无论在村寨或在城镇，羌族男性服饰却朝中性化、一般化与现代化发展。从服饰上我们看不出各地羌族男子有何不同，也看不出羌族男子与汉人有何差别。至于羌族妇女服饰上的地域性差异，倒是像葛维汉、胡鉴民所描述的那样，直到今日仍存在这一现象。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近现代“民族化过程”中羌族妇女服饰的变化。¹²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从典范模式的文化定义（normative mode of culture）来理解“民族服饰”，而是强调此“文化”形成的过程（process）与情境（context）。简单地说，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概念中有两大因素：团结（民族化）与进步（现代化）。¹³除了以共同“起源”团结、凝聚民族成员之外，还强调或追求该民族的“进步”与“现代化”。此种二元特性，使得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有相互矛盾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传统文化”促成民族团结因此值得强调、推广；一方面“传统文化”又有落后之处而须被改革或回避。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爱憎以及民族内部的核心与边缘区分，于是，以中华民族而言，汉族不愿穿着“传统民族服饰”而自豪于少数民族皆穿着“传统民族服饰”。此隐喻着汉族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落后。在羌族之中，城镇羌族知识分子本身不穿“传统民族服饰”，但他们自豪于村寨中的羌族仍穿着本民族服饰。同时，羌族城镇居民也认为自身较现代化、较进步，而乡下人要保守、落伍些。在羌族村

寨中，男性也不穿本民族传统服饰，但他们自傲于“本地女人都还穿本民族传统服饰”。村寨中的男人也认为，男人见的世面较多、较进步，女人较封闭、保守。于是，羌族村寨女性在强化各种社会区分的核心与边缘权力关系下，成为“传统”的承载者。¹⁴

然而这并不是说，当前羌族的“传统民族服饰”现象全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创造发明。造成此文化现象的一些关键因素——汉与非汉间的区分、男性与女性间的区分、城市居民与乡民间的区分——在中国历史中已有长期的延续。在本地沟与沟间的区分、寨与寨间的区分，也根植于当地特有的地理资源环境与相应的人群生态中。因此为了与外面的汉人世界接触，男人常穿着汉装；为了维持本地各寨、各沟间的必要区分，不常出门的或居于边缘弱势地位的妇女们，则须穿着有本地特色的服饰。这些肯定都不是国族主义流行之后才兴起的文化现象。从更基本的方面来说，人类群体常以文化建构之“身体”作为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古今中外皆然。服饰作为个人身体的延伸，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文化建构的群体“身体”，此也肯定不是国族主义下的建构。因此，学者将当代“传统民族服饰”视为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发明创造时，¹⁵显然忽略了此种文化现象更长远的历史背景，忽略了当地的人群生态背景，忽略了人类结群与区分下的一种普世性心理特质。

五、饮食文化：北川的例子

在前面我曾提及，人们常借由身体——“内在身体”与“外在身体”——来体察并强调个人的社会存在与特性，以及与他人或他人群间的区分。内在身体，主要指实质的或想象的内在身体特质，特别是想象中由我群或他群的“食物”所造成的身体特质。

作为族群内在身体象征的我群食物，不只是被人们主观的认知、建构，更被人们在饮食行为上实践、展演。当我第一次到北川访问时，一位受访的羌族知识分子提到羌族最有特色的食物——荞面馍馍。第二天清晨，他特地做了一些送到我住的地方，对此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一本有关北川县“大禹”的论文集中，我读到一位参加北川举办的“大禹研讨会”的学者回忆主人对与会学者的热情招待情景。他称：“治城区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上最受欢迎的却是荞凉面、荞面、蕨根面、豆腐等山区产品。”¹⁶在北川小坝乡的田野采访中，我也听到以下的说法：

山后面的人是“下巴子”。这就在民族中，无形当中，就是一个民族的鸿沟；一个民族，另一个民族，就是那种。这个，从生活习俗上来讲，与外头这坝区也有些不同。这个生活，吃的受自然条件限制，吃荞面、玉米；那么下面，就吃的是白米、小麦。

然而在过去，当大多数北川人都自称汉人时，“吃荞麦的人”也就是“蛮子”的代名词。在前面第三章中，我曾提及20世纪上半叶北川地区的族群体系——大家都自称“汉人”，却认为住在上游的都是“蛮子”。事实上，由于地形、气候及植物特性等因素，由下游到上游，荞麦、玉米在各地村民农产中的比例逐渐增高，其间并没有截然的划分点。道光《石泉县志》也记载，当时的番民“种春秋二荞，与汉民同”。也就是说，相邻两地区其居民主食并没有明显区别。因此以“食物”作为汉与非汉的区分，只是人们主观的异己想象与建构。此种主观的异己想象，使得嘲笑上游居民是“吃荞麦的蛮子”的人，自己也被下游的人认作是“吃荞麦的蛮子”。由于大家都多少吃些荞麦，于是在青片河、白草河流域所有的“汉人”都有族群认同上的危机感。此种借由“食物”来表达的族群区分，及其所蕴含的族群歧视，也表现在北川的一则民间故事《荞子与麦子》上：

麦子很瞧不起荞子，理由是它的面粉太黑。而荞子却说，我虽黑一点，但一年收两季，还在屋头过年哩，而你麦子一年只收一季，还在坡上过年。把麦子气得肚皮上裂了一道口子。¹⁷

上述《荞子与麦子》故事，可被视为一种被流传的“文本”（text）或文化“表征”（representation），其背后的社会情境（context）或本相（reality）便是：在过去，被认为是吃荞子的“蛮子”，深受自称是吃麦子的“汉人”歧视。这故事被收录在《北川羌族资料选集》之中。在故事之后，编者（北川羌族知识分子）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羌族视荞麦为本民族谷神，从而存有对其偏爱的心理。”事实上，我们从这故事中无法得到此结论。编者对此故事作如此诠释，反而凸显此诠释文本背后之情境——许多北川人由过去被侮辱的“蛮子”成为今日骄傲的“羌族”后，“荞麦”成为本民族的文化符号。

由1980年代中期起，愈来愈多的北川人恢复了“羌族”认同。由于北川的原住民文化早已丧失殆尽，因此在强烈的羌族认同与认同危机下，当地知识分子特别热心于选择与展演他们的“羌族文化”。在这一波本土

文化运动中，过去“蛮子的食物”荞面，成了羌民族食物之表征。这个故事被出版、诠释，以及在地方政府的餐宴中荞凉面、荞面受到特别的介绍与瞩目，羌族朋友向我推介荞面馍馍等等，都可视作一种文化展演。通过此种展演，客观的物质文化得到强化或表达主观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也因此影响他们主观上对特定食物的喜好。

六、天神、白石信仰、端公与祭山会

前面我曾提及，20世纪上半叶羌民文化调查者的研究焦点主要为羌民宗教。在羌民宗教中，天神、白石信仰、端公与祭山会又是他们描述的重点。我也曾提及，此时“天神”的性质在学者间有许多争论，土著对他也有不同的看法——将之视为上帝耶和华、玉皇、木比塔，或全然不知。相对应地，陶然士认为白石代表唯一的天神；葛维汉、胡鉴民则指出，白石代表许多不同的神。巫师端公的经典与施法，在绝大多数教学者的描述中都大量掺杂着道教文化。端公经文有些以汉语念，有些以“乡谈话”念。以“乡谈话”念的经文，有些部分只有端公自己能解，或有些连端公自己也不能理解了。这些都说明，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些“本土文化”已逐渐在消逝或改变之中。

1950年代以后，“宗教”逐渐没落，庙子被捣毁，端公施法被禁止。到了1980年代，能够说唱经文的端公所剩无几。在此以口述记忆传递文化的社会中，端公便是本土文化的记忆者与传述者。因此端公的消失，也就代表本土文化的逐渐消逝。还因为，“无神论”在社会教育的推广下，普及于民众之间，及至今日，老一辈的羌族受访者在谈起过去本地的宗教习俗时，经常说“那些都是过去的封建迷信了”。只在部分村寨中，特别是在偏远山区的村寨中，祭神树林或祭山神活动还是每年进行。

到了1980年代中期，部分羌族宗教文化有逐渐恢复的趋势。在羌族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两三位年长端公的“唱词”被录音保存，并部分译成汉文流传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流传较广的，便是与天神、白石信仰有密切关联的“羌戈大战”故事，以及述说人类起源的“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羌戈大战”故事，由于历史学者指出它反映古羌人由北方南迁此一“历史事实”，诠释了羌族的由来，因此使得这个故事得到羌族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天神木比塔之女木姐珠与一凡间人猴斗安珠成婚的故事，解释了更普遍的人类起源。通过各种《羌族民间故事集》的出版，

这两则故事以及天神木比塔，逐渐广为羌族人所知。如今木比塔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上帝耶和华，而是所有羌族的天神——护佑羌人战胜敌人的天神；白石则是这位天神的象征。然而在广大的茂县与松潘地区村寨中，人们仍然很少听过木比塔。对他们而言，白石仍代表多种的神，天上最大的神仍是玉皇或西方佛祖；反而是城镇中的羌族，或能读汉文的羌族知识分子，才熟知羌族天神的故事。

在另一种本土羌族文化建构下，“端公”别有意义。近年来，一些羌族知识分子热衷于“禹文化”研究。¹⁸他们认为，大禹文化表现在端公的法事上。端公作法时所跳的就是“禹步舞”；端公作“索卦”，就是根据大禹所作的“连山易”。但毕竟，能建构与传述此种“大禹文化”的只是少数老年羌族知识分子。因此，这样的“大禹文化”在民间流传并不广泛。但“大禹”是古老的羌族祖先，这一记忆却普遍流传在羌族之间。在本书第九章中，我曾说明，姜炳章等北川地方官员，曾以大禹记忆来强化一种以“圣兴之域”为荣的“北川人认同”；此“北川人认同”，也是一种汉人认同。在第八章中，我也说明了“大禹子孙”在当代羌族认同上的意义——大禹及其子孙，在北川如何由“汉人”成为“羌族”，以及北川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对于“大禹出生地”的争论，在此不再赘述。

祭山会活动，在许多羌族村寨中都是一种中断而难恢复的传统，只有少数村寨一直维持此宗教活动。一般来说，愈远离城镇与交通干线的村寨，愈容易或愈有必要维持此传统祭山活动。¹⁹因此以整个羌族地区而言，西方、北方的深山村寨民众较重视祭山会活动。祭山神的传统是，即使在同一沟中各寨都是各祭各的山神，各寨祭山日期与仪式过程也不同。邻近的嘉绒与黑水藏族亦如此。这也反映，“祭山神菩萨”是一种本地村寨传统，而不只是一种羌族传统。近年来，在本土与外来羌族文化研究者的鼓励与安排下，以及在恢复羌族文化及发展观光的动机下，某些村寨曾盛大举行祭山活动。这些活动常吸引大量的观光客、记者、学者与邻近居民参与。介绍这些羌族祭山活动的文字与图像，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尤其出现在羌族知识分子编辑出版的有关羌族文化的书刊中，更增强了祭山神（或祭神树林）为羌族代表性宗教活动此一意象。

在过去，绝大多数羌族地区都曾流行“庙会”活动。前面我曾说明，在许多羌族地区“庙子”替代山神，也承继了“山神”维持各村寨资源界线的象征意义。因此，19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村寨也尝试重建“文革”时期被打烂的“庙子”，恢复庙会活动。

七、文化展演

以上我在描述锅庄歌舞、饮食、服饰与宗教活动等羌族文化时，都提到“文化展演”此一概念，对此我必须多作说明。过去研究民族的学者们，在一种范准模式的文化理解下，常将“民族文化”视为一人群间的客观文化表征。由一群人之“共同文化”所呈现的相似性，来强调该人群的“一体性”。同时，当前人群之文化，与历史上某人群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又使此文化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学者以此强调该人群的历史“延续性”。人群的文化一体性与该群体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则被认为是构成一个“民族”的要件之一。这样的看法，无法解释所谓“一体”文化下的差异以及文化传统的变迁，也就是忽略了“文化”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各次群体间的变化。另一个研究传统，社会人类学者的研究，曾注意“文化”的功能与结构；这是功能—结构模式的文化理解（functional-structural mode of culture）。在此理解模式下，学者并不在意一“民族”的范围、边缘或其历史渊源，而致力于了解某制度文化在一社群中的功能，它与其他社会制度、经济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反映的整体社会与文化结构（或普遍性的人类社会与文化结构法则）。这样的研究取向，被当代学者批评为忽略了文化或制度的本土含义，以及其背后的“历史”（history）与“权力关系”（politics）。

在现象学与相应的“土著观点”下，学者们开始注意“文化”如何被土著主观的认知、诠释与建构，这是现象学模式的文化理解（phenomenological mode of culture）。与此相应的是强调群体成员主观认同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在此类研究中，“文化”或被视为无助于界定族群边界的“客观文化特征”集结而被忽略，²⁰或被视为强化族群“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的社会禀赋（givens）而强调其在群体中的主观象征意义²¹；或被视为可被想象、操弄与创造的“传统”而注意与此种文化创造背后的群体认同或认同变迁（如国族主义下的国族与民族认同）²²。这样的理解模式，忽略了在一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动态与主体性，也忽略了个人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与整体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差异与关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本地人”常不同意彼此的观点；对于同一种文化习俗，“本地人”的演示、理解与诠释常不一致。所谓“共同文化”，无论如何皆难免涉及该社会中的两性、世代与阶级等社会阶序性权力关系。因此将这些羌族文化视作一种“文化展演”，或可弥补将之视为“客观文化现象”与“主观文化建构”之不足。

将“文化”视为一种文化展演，我们才能看见“文化”动态的一面，以

及“文化”如何在本土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呈现与变迁。文化展演在两种动态中进行。其一是，现实社会中的动态——它在各社会群体与个人，以及群体内外人群对社会历史记忆的选择、诠释与争论中形成与展现。其二是，历史动态——文化展演在历史变迁中产生，同时它又强化或改变群体内外人群的社会历史记忆，因此造成文化与社会的历史变迁。我所谓的“展演”，略同于人类学家所称的“performance”。然而，虽然许多人类学者在概念上以此指称相当广泛的人类集体文化行为，但实际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与宗教仪式、戏剧音乐、社会剧、运动竞技等等有特定舞台、演出者、观众的社会活动上。²³当我将羌族文化视为一种“文化展演”时，“展演”有更广泛的意义。它的舞台可能是各种社会生活场域，演出者与观众的角色是变动的、可互调的，它可以是当事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化言行（如某种语言腔调、餐桌礼仪、打招呼的方式等）都是在做各种的“展演”。因此，“展演”又略等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称的“习行”（practice）。展演、行为展现所赖及其所支持的“认同与区分体系”，也与布迪厄所称的“习性结构”（habitus）的含义有相当重叠。²⁴

文化展演，必然涉及展演主题、展演者、观众、场域与展演媒介。更重要的，这些展演被个人或群体观看、诠释、获知，并产生意义。以当前羌族文化为例，简单地说，展示物是服饰、饮食、白石崇拜、羌语、端公文化等等。展示者是村寨妇女、羌族知识分子、老端公或所有的羌族民众。观众则是各种背景的羌族、汉族、藏族、回族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展演的场域或在村寨与城镇的日常生活之中，或在茂县、马尔康、北京的表演舞台上，或在汶川、北川举行的有关羌族文化的研讨会及相关活动上，或在羌族地方自治政府及文化团体出版的刊物上。展演的媒介则是自然或人为的创造物，人们的身体，或由身体产生的语言、文字与肢体动作等等。以社会权力关系来说，展演，不只是谁在展演，还涉及谁刻意将谁作为展示品来演出；不只是在何种场域舞台，还在于谁创造的场域舞台；不只是谁是观众，更重要的是谁招引观众。最后，通过展演，“文化”对展演者与观众产生意义，重点不只在于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更在于谁在诠释及争论意义。在此，造成文化展演的和由文化展演产生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社会现实本相，一种情境，也是一种多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通过人们的展演、观看与诠释，文化反映、强化和改变这一社会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或反映、强化与改变相关的社会情境与历史记忆。所谓多层次的认同与区分体系，我是指，譬如，区别于汉族的少数民族认同、区别于城镇人的农村人认

同、区别于男性的女性认同、区别于老年人的年轻世代认同，以及相对于其他地区羌族的北川、茂县等羌族认同，等等。

以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区分来说，在近代民族化过程之后，在汉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而过去的“蛮夷”成为边缘少数民族之后，少数民族有信心并受鼓励展现他们的民族特色。羌族的服饰、饮食、锅庄民族舞蹈、山神、天神与白石崇拜等等，也在此潮流下通过身体、文字与图像展演出来——借此展现羌族认同，及羌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区分。对汉族来说，鼓励羌族文化展演有其他意义。这也就是，过去华夏曾以描述边缘之奇风异俗、奇山异水与其人之凶桀不驯，来刻画“华夏边缘”；而今之汉族，则以古老的、有特色的、擅于歌舞的“少数民族文化”，来描述此国族一体性下的新“华夏边缘”。

在所有这些文化展演中，“服饰”具有特殊意义，作为个人身体延伸，它被转化为“民族身体”以表达其民族特色。穿着具民族特色服饰的少数民族，也是对汉族而言的“异质化边缘”。这种以“服饰”来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借着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以刻画汉族边缘的展示、演出，常表现在各个国家级大型会议与庆典场合中：如在各少数民族代表穿着本民族服饰的团体照上，借着身体与服饰，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图像被展示出来。同时借民族服饰展演，少数民族（着传统民族服饰者）与汉族（着现代化的西装或便服者）间之区分，或各少数民族彼此间的区分，也得到彰显。1980年代以来各种媒体传播工具逐渐普及，这种民族舞蹈或服饰展演所表现的民族认同与区分，通过各种竞赛演出、民族画册与民族知识书刊的发行，以及1990年代以来的电视转播，成为塑造各族人民（特别是城镇居民与知识分子）我族认同的重要集体记忆。

羌族不只居于中国或中华民族的边缘，他们在四川省与阿坝州中也居于边缘地位。各种政治、社会的优势群体都参与创造羌族文化的展演舞台，以刻画不同的边缘。仅以汶川县而言，从1957至1985年，代表羌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团体，共受邀参加了99次在马尔康（州政府所在）、成都（四川省会）、北京（国家首都）举行的各种竞赛演出。²⁵对羌族人民来说，虽然他们皆有感于本民族的边缘性，但通过“文化展演”，他们表达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骄傲，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展演相互竞争、夸耀。

羌族文化不只是在马尔康、成都、北京等优势群体所创造的场域中展演。在羌族地区，羌族知识分子通过地方政府机构，也创造出各种羌

族文化的展演场域。各县之文化馆、史志办公室与学校，或举办各种节庆歌舞表演、竞赛，或编辑出版各种有关羌族文化的刊物，或修建文化展览馆或文化古迹观光点。在这些场域中，各县、各区羌族的文化展演形成一种竞争。他们争论何处的端公文化保存得最好，何处的羌族传统服饰最地道，何处的村寨建筑最有本民族特色，以及何处是大禹文化的发迹地——种种展演与争论，都是为了界定本民族中孰为核心、孰为边缘。文化展演者，也是观赏者，同时也是文化诠释者。

近年来，由于九寨沟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而往九寨沟的主要公路又穿过羌族地区。于是在发展经济与民族认同双重动机下，地方政府与商人共同创造展示场域，将村寨民众（特别是妇女）、顶上有白石的建筑与以端公为主角的宗教活动等作为展示物，吸引各种观众——国外观光客、内地观光客与本地汉、藏、回与羌族。而羌族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观光资源”，乃由于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展演与观赏中，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中的认同与区分得以强化。对汉族观赏者而言，观赏古老、落后、乡间、迷信、少数独特的“羌族文化”，强化他们概念中汉族的现代、进步、都市、理性与多数主流地位。对羌族观赏者而言，观赏传统、灿烂的本民族文化展演以及观察到外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强化他们心目中羌族古老、神秘、坚守传统不随波逐流的我族意象。因此，借着文化展演，主观的认同与区分为客观的文化符号，展现在各个被历史与文论知识典范化，而又被各种利益与个别经验孤立疏离化的人群与个人面前，成为提醒、强化或修正他们各种认同与区分体系的现实经验。此被强化或修正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又引导着他们通过日常生活言行所实践的“展演”。

羌族知识分子也邀请外来专家、学者、观光客进入村寨之中，在此创造另一种文化展演场域。在此，展演者是村寨的人，特别是穿着本地传统服饰的妇女。对村寨居民来说，文化展演强化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信心：本地妇女服饰最传统，本地的碉楼与村寨建筑最有特色，本地的羌语最道地，本地的白石信仰保存最好——因此能吸引外人远道而来。同时，这些“外人”（包括居城的羌族知识分子）也进行另一种文化展演：他们先进的照相机、摄像机，现代化的穿着与手表、皮鞋等配饰，以及“有文化的”谈吐、“具学术性的”羌族文化讨论与诠释，都对本地人形成一种夸耀性的展演。因此在文化展演与观察中，村寨与城镇的羌族一方面在“保持传统”与“随波逐流”上，一方面在“落后”与“进步”上，区分本地人与外地人。于是，文化的夸耀、区别与模仿、附和同时进行。城镇知识分子以乡民来展现本民族文化，自身却模仿、追求现代风尚；乡

民中的男人，以本村寨与村寨中的妇女来展现本地民族文化，自身也模仿城镇中或大都会的文化风尚。

在村寨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展演”通过各寨、各村羌族民众的衣食起居、季节性生产活动、宗教祭仪等不断进行。譬如，在茂县牛尾巴寨正月初七“人过年”的仪式中，文化展演表现于年轻女子荡秋千、年轻男子舞龙、村中长老开酒坛请神、男女环绕跳锅庄舞（此时部分老妇人跳尼萨），以及男人仪式性的演示出征、战争过程与胜利归来，妇女倒酒敬战士等等场景。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文化展演也表现在不同性别、世代村民的服饰上。在这样的文化展演中，展演者本身也是观众；在展演与观看中，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区分——少数民族与汉族、本寨与他寨、男性与女性，以及各个世代人群之间——得到强化或被赋予新的意义。

许多羌族文化展演，除了通过日常生活与各种仪式性场合外，也展现在文字与言谈之中。在本土文化早已丧失的北川尤其如此。如一位北川知识分子告诉我：

我们曲山的羌族干部，家里羌族的服饰都是全的。现在人们都在穿外国时兴的服装，我们羌族自古以来在服饰上就不追风赶浪，其他少数民族也是一样……现在在民族服饰上我们有恢复的趋势；西方的技术可以学，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不能改。

如此在日常言谈中，对本地或本民族文化的夸耀与展演，以及相对地对外地或他族文化习俗的批评与讥讽，不断地在亲近人群间进行。在这些日常言谈中，两组相对的心理因素——“竞争、夸耀”与“摹仿、附和”——使得“文化典范”不断地被定义、凝聚，也不断地被创新。如在日常生活里，羌族男子或女子，城镇的人或农村的人，常聚集闲话家常，话题随着人、事、时、地之情景而有不同。他们或讨论什么是好看而又恰当的穿着，什么是道地的锅庄舞，描述邻近的羌族或藏族妇女服饰如何，或评说藏族或汉族的婚姻习俗、家庭伦理，或嘲弄外地观光客的口音。在这些包含讨论、批评、嘲笑的闲话中，各种社会群体（世代、两性、区域、民族、城乡）的文化特色得以建立、延续或修正，而与其他对应群体间的“区分”也被强化。

1990年代出版的《羌族研究》与《西羌文化》两种刊物，为本土羌族文化展演提供了文字场域。然而，这两种刊物均难以正常地持续出刊。在这期间，北川县政府及其所属文教单位，却连续出版了许多有关

羌族与大禹文化的专著、论文集与资料选集，这反映了在文字场域的文化展演上，北川羌族知识分子较专擅而且领先于其他地区羌族。在这些文字场域中，展演者（作者与编者）不限于羌族或某地的羌族，更包括汉族、藏族与日本学者。被展示、夸耀的羌族文化，主要包括山神、神林、端公与白石信仰，以及碉楼与砌石文化、饮食服饰、婚丧习俗和大禹文化等等。观赏者（读者）主要是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仔细地阅读，热切地讨论。如此，典范的羌族文化不断被强化，也不断得到新的内涵。“竞争、夸耀”与“摹仿、附和”仍是此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譬如，以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一方面“摹仿、附和”汉族学者与茂县羌族知识分子所展示的羌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以“北川为大禹出生地”及本地的“大禹文化”来自我夸耀，并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竞争大禹文化的核心地位。在此争议与展演中，事实上，两地羌族知识分子都通过“大禹”来攀附他们心目中的“古老华夏文化”。

- 1 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第34卷第3期，1996，第155页。
- 2 这主要表现在北川与汶川知识分子对于“大禹故里”的争执上。在大家皆认为羌族是大禹子孙的认知下，两地知识分子都认为本地为大禹的出生地。关于这场族群内部的历史记忆之争，请参考本书第八章。
- 3 许多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都注意到1980年代以来的变化；请参考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造成此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应是多重的，而且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以羌族地区来说，除了我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结为一社会群体（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落实）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应是：在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资源竞争中，强调民族认同也就是强调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相对于汉族地区（沿海地区除外）而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更开阔的开发空间，因此这或许是造成民族意识增强的因素之一。
- 4 更西方的黑水，其居民说的仍是语言学者所称的“羌语”；1950年代初的调查中，他们也被视为“羌族”。然而后来可能是为了尊重民族意愿，在民族划分上他们成为“藏族”。
- 5 许多羌族中老年人，目前对于“汉话”与“乡谈话”的看法是：“汉话”不用学就会，但“乡谈话”倒需要学才会。这可以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母语”？
- 6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 29；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58—59页。
- 7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35.
- 8 在羌语中，一年只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暖的日子，约当春夏；一为冷的日子，约当秋冬。

- 9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32;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第24页。
- 10 汶川县人民政府:《大熊猫的故乡:中国汶川》,1997。
- 11 如近年来茂县渭门一带村寨年轻妇女,开始用较长的头巾布层层盘绕成饼状头帕,这种风俗只影响到邻近永和的道材主村,然而永和其他村寨则讥之为“锅盔”(一种烤大饼)。这种村寨间妇女服饰上细微的差异永远存在,也不不断地被创造。
- 12 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4分,1998,第841—885页。
- 13 这便是杜赞奇在其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下的线性历史一方面强调自古以来历史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强调传统与现代间的断裂。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25-29.
- 14 印度学者Partha Chatterjee对印度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曾指出民族主义的二元特性及其与女性的关系——在国族主义下,人们区别以物质、进步、西方、男性为代表的“世界”,与以精神、传统、本土与女性为符号的“家”。因此,中产阶级新女性在国族主义新父权之下,被期望穿着特定的服饰及保持其他传统,以背负代表本土的精神与民族主体性。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的二元特性下,当男人走向“世界”时,他们要求女人留在“家”中。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0-130.
- 15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研究文集》,北川: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出版,1991,第158页。
- 17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1,第170页。
- 18 此种热潮由各种羌族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可见,几乎所有的羌族历史文化刊物中,都有关于大禹的文章。北川羌族还出版了《大禹研究文集》及《大禹史料汇编》等专著。在北川与汶川县城,大禹也常成为许多店招与广告牌上的主题。
- 19 这是由于愈远离城镇与交通干线的村寨,居民愈依赖本地沟中的资源,因此愈有必要借山神祭祀来维持各沟各寨间的“山界”。有关山神与人类资源分配之关系,见本书第三章。
- 20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pp. 1215-1230;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 2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ela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lso, Chap.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22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3 Richard Schechner and Willa Appel,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0; Victor Turne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7.
- 2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5 汶川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汶川县志》，1992，第695页。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氏、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

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

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

一、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

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

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

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

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性，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

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

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

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最后，晚清到1980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

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

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

上述两种“典范羌人历史”书写之间，相隔了近1700年之久。这显示，以“羌人”来表述的“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经历了两大阶段变化。第一阶段，此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形成于后汉魏晋之间，《西羌传》描述、表达此族群边界。在此文献中，华夏想象、描述这些西部异族是被华夏圣王“舜”驱逐到边区的“三苗”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其豪酋家族又是中原去的一个逃奴“无弋爰剑”的后裔。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羌族史”叙事中，羌族是炎帝、共工的后代，其后裔除了羌族之外，目前还广布于汉、藏、彝与所有西南氏羌系民族之中。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知识之助，各民族间的紧密历史关系被建立起来。由这些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对“羌”的历史叙事来看，三苗之后的羌人，是华夏心目中的“夷狄”；炎帝之后的羌族，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对古之华夏来说，“夷狄”是在边界外的异族。对今之汉族来说，“少数民族”是国家主权、疆界内的边缘族群与兄弟民族。

如学者所言：“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¹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

二、另类“历史”

无论是三苗的后代、炎帝的后代，都是一位“英雄祖先”的后裔，而且至少由汉代以来，华夏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我们的历史”或“他们的历史”，都起始于一位英雄祖先。

中古时期，吐蕃的政治、文化力量向东发展，扩及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在吐蕃及后来的藏人学者眼中，这一带的部落人群也是相当野蛮的异族。古藏文文书中记载青藏高原东缘各古代部族起源；许多文献作者皆认为，这些边缘部族与吐蕃诸部，都是最早的“四个或六个弟兄”之后裔；其中，一个“小弟或坏家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²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古代中原人来说，青藏高原东缘的部落人群都是其“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藏地学者与汉地学者却分别以“弟兄祖先”与“英雄祖先”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建构有关“异人群”来源的历史。这便是在本书中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之别。

在特定“历史心性”下，人们以同一模式建构“根基历史”，以规范理想中的族群关系与相关的资源共享、分配体系。羌族，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认识“历史”的绝佳案例。流行在羌族村寨间的“弟兄祖先故事”，说明在人类资源竞争背景下，“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弟兄祖先故事”也告诉我们，“英雄祖先历史”并非是唯一的“历史”。它也告诉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群都以“历史”来分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新移民的后裔。在北川、理县等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中或出现这些弟兄的父亲，或提及弟兄们在汉人地理空间中的迁徙，或有了中国历史中的线性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只是“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中国历史）的小分支。于是，本地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来此有先后，并来自不同的地理空间；“历史”中的时间、空间区分，也强化了人群（家族）间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这些微观研究案例，也鲜明地表现“汉化”如何借历史记忆（叙事）与相关文类、心性的改变来进行。

近代羌族的形成，在本土历史建构上主要还是“英雄祖先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端公经文中的英雄故事、一些“英雄游历记”或“英雄征程记”，似乎暗示我们一个由“弟兄祖先故事”或其他“历史”，转变为“英雄祖先历史”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叙事。它可能是古华夏的《穆天子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与康藏各族群的《格萨尔传》等英雄史诗

的前身。借着由“英雄征程记”逐渐发展为“英雄祖先历史”，人类社会由孤立、平等的小区域社群，逐渐演变为中央化、阶序化的大型族群与政治体。无论如何，这些近代早期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以“英雄征程记”建构的“我族”想象，在并未完成之前，便为另一些“英雄祖先历史”的流传所阻断。在本地人心目中，大禹、周仓、樊梨花等“祖先”都可以作为一种“起源”，以说明本地人的族群本质。汉文字记忆的力量，汉文化的优势地位，都使他们认为大禹、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真实可信。更具力量的是“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与流传。从此，端公经文中的故事成为“宗教神话”，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典范历史”中的羌族，是炎帝之后，是被华夏英雄圣王“黄帝”打败的英雄之后裔。

然而，若与炎帝和大禹相比，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较热衷于从事以大禹为羌族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居关中的羌人，攀附黄帝后裔为其祖源，而忽略中国史籍记载“羌为姜姓炎帝后”一样，古今“羌人”“羌族”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承认自身是“失败者”的后裔。即使承认本族是炎帝后裔，当今羌族知识分子还会更强调另一个古老的华夏记忆——《国语》中称炎、黄为弟兄。所以他们认为，羌族与汉族是兄弟；因炎帝在前，所以羌族还是大哥。在有关“大禹”出生地的历史争论中，本书的例子也说明“历史”如何在本族群中被争论，并成为争夺孰为本族群核心、孰为本族群边缘的符号资源（symbolic capitals）。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大禹遗迹存在于作为本地汉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显示“大禹”曾是推动华夏边缘西移的历史符记。在近代羌族的民族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本地较汉化的人群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大禹”被他们攀附为羌族祖先。由“大禹”之符号意义在此华夏边缘的变迁，也显示两千余年来此华夏边缘的变迁及其近代质变。

另一个本土历史建构，便是1980年代羌族知识分子对端公经文“羌戈大战”的再书写与诠释。首发其端的是汉人历史学者将“羌戈大战”视为一段真实历史的本土记忆残余——这便是羌人在西北被汉帝国打败而南迁的“历史”。羌族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历史”。但他们更有意义的建构是：认为战胜戈人的英雄“阿爸白苟”有九子，这九兄弟被分派到各地区立寨，而成为当今以及想象中的羌族之由来。这个我族血缘与地理人群想象，也就是九弟兄及其所占居之地，包含了早期端公“英雄征历记”中的历史空间想象、当代语言学知识所提供的人群语言空间想象，以及当前民族知识与行政区划中的我族政治空间想象。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

这个版本的羌戈大战故事是“弟兄故事”与“英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混合产物。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当前羌族知识分子心目中之羌族本质与理想中的羌族范围。更具意义的是，这样的我族建构，具体而微地反映近代“民族建构”的一重要特色——语言学、历史学与民族学（以及考古学、体质学），使得我族建构有了更多可资“运用”的工具。

三、历史与“历史”下的近代产物

中古时期，西进的华夏族群与文化边缘和东进的吐蕃或藏传佛教文化边缘，在青藏高原的东缘交会；这个历史，以及在此历史影响下华夏对异族的族群分类，所产生的各种“历史”与“文化”建构、展示与论述，造就了清末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便是在本书中我所介绍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

在此，我们接触到的是“汉化”或“族群认同与变迁过程”的问题。羌族社会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以及对相关“历史”与“文化”的人类学探索，为“汉化”或“汉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具体、细致的例证。“汉化”并非是如许多学者所言，华夏如大海能容，“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的结果；“汉化”也不是百夷爱慕华夏文化所致。“汉化”的符记或过程，也不是借着习汉语、服中原衣冠或与华夏婚媾等语言、文化与血缘的改变来完成。由华夏边缘的历史以及近代岷江上游与北川土著的历史民族志看来，我认为“汉化”应被视为华夏起源与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者，描述此现象较有涵容性的名词应是“华夏化”。

“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告诉我们，首先，华夏化非但不是华夏认同的宽容性所致，相反地，是古代“华夏”对“蛮夷”的歧视推动整个“华夏化”过程。其次，更重要的是，“华夏化”过程并非发生在文化、社会身份可截然区分的“华夏”与“蛮夷”之间，而是发生在文化、生活习俗与社会身份皆十分近似的人群之间。在华夏化过程进行的地区，究竟谁是“汉人”，谁是非汉，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再次，除了政府力量的涉入外，邻近人群间、社会阶级间以及两性间的本地资源分配、分享体系，是“华夏化”认同变迁产生的主要背景。以下，我将更深入地解释这些现象。

我们略回顾本书中曾提及的，近代北川之白草、青片住民如何成为汉人或华夏的过程。明代本地居民接受朝廷统治后，汉人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汉文化与历史记忆逐渐深入白草、青片河上游村寨间。清末与民国时期，此地形成一个模糊的汉与非汉边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汉人，

却认为上游村寨人群都是“蛮子”。通过一端（自称汉人者）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的展示与夸耀，以及另一端（被视为“蛮子”者）的模仿与攀附，明、清以来愈来愈多的北川人自称为“汉人”。他们除了强调本家族为来自“湖广”之某姓家族外，都以祭拜大禹来攀附汉人认同。然而，自称“汉人”并辱骂上游“蛮子”者，仍被下游或城镇的人视为“蛮子”。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认同与文化变迁过程，借着邻近人群间的“模仿、攀附”与相对的“区别、夸耀”进行。

攀附，产生于一种模仿欲望；攀附者希望借由模仿而获得某种身份、利益与安全保障。此有如生物界的拟态（mimesis），许多动物以模仿他者或它物，以逃避侵害。攀附动机又相当于基拉尔所称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在亲近且敌对之个人或群体之间，由于追求较优越的存在地位（being）而产生一方对另一方之模仿。³文化与族群身份的攀附欲望，产生于攀附者与被攀附者间被创造、想象或建构的社会与文化差距。或由于中国古代在政治上对“蛮夷”地区的征服、统治，或由于汉人对边缘“蛮夷”之身体、文化习俗与历史的轻视，皆可能造成劣势者之攀附动机。与模仿、攀附相对的是，因恐惧对方的“模仿、攀附”而产生的“反模仿、攀附”——也就是，自称“汉人”者以自身文化向“蛮夷”所作的展演与夸耀，借此造成“我群”与“异己”间的“区分”。这类似于布迪厄所称的，在社会阶级人群间定义、夸耀与操弄“品味”，以造成社会区分（distinction）的策略。⁴在族群现象中，受品评的不只是生活习俗中的“品味”，也包括“起源历史”、伦理道德等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岷江上游与北川，许多“汉人”夸耀自身的优越祖源、规矩的生活习俗与典范的人伦道德，并嘲弄或想象“蛮子”低劣的祖源及一些奇风异俗，并以此来区分孰为核心孰为边缘，孰为征服统治者后裔，孰为被征服者或受统治者之后裔。

以上所提及的“汉人”与“蛮夷”，并非是社会空间距离很远的人群，他们可能住在邻近的上、下游村落中，甚至可能生活在同一村落中。布迪厄所称以评价品味所造成的社会区分，以及基拉尔所称的模仿欲望，也都发生在社会中彼此亲近或常有接触的群体之间。在此边缘地区，“汉人”与“蛮子”间的社会文化差距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也不一定非常鲜明。的确，通过“文化”与“历史”论述进行的人群间的相互歧视、夸耀与攀附，也并非经常发生在文化、族群、地理与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如华夏与非华夏、土族与乡民）之间。相反地，它们常发生在较亲近的群体之间而形成一连串相互歧视、夸耀与模仿、攀附的链状反应。这些亲近群体间的界线相当模糊。界线模糊，使得一方有认同危机，因而以夸耀

来造成区分或强调区分。另一方则因不堪受歧视，或在文化夸耀的熏染下，接受一种文化与历史价值观（什么是高尚的文化，什么是高贵的祖先源流），而爱慕、欣赏夸耀者之文化，因而以模仿、攀附来改变族群认同，以逃避歧视与迫害。此种由一截截相互模仿、歧视所造成的“模糊的华夏边缘”，在汉人知识分子的观察描述中，经常便是有“熟番、生番”之分之地区。这些地区，是“华夏起源”之一关键地区；这些过程，也是“华夏形成”之一重要过程。

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岷江上游村寨社会。在一村寨人群内，人们主观意识上的“族群”之别，常存在于头人与其子民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邻近家族之间。土官、头人们强调其“汉人”祖源，展演其汉人士绅文化习俗，并歧视、污化其子民的血源与文化习俗。男人则怀疑由外嫁入之女子的“根根”不洁，担忧其可能带来的“蛮子”习俗污染本地规范。在本书第四章，我说明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过去女人常被认为有“蛮子”血统，或有“毒药猫”及其他魔性遗传。如此，村寨中的女人，或某一个女人，成为人们心目中或潜意识中“蛮子”的化身。因而村寨民众心目中的“蛮子”，是远方的“异己”，是邻近上游村寨的“异己”，也可能是本寨中其血缘遭蛮子污染的“异己”。最后，在一个以男性成员为核心的家庭中，一个男性最亲近的“异己”便是家中的女人。虽然在岷江上游的羌、藏族中，人们普遍相信女人有“魔性”或是有“污染力”，但他们一般不会怪罪或歧视家中女性。于是少数村寨中的妇女被众人（包括其他女性）视为“毒药猫”，成为村民们对一层层外在“异己”之恐惧与敌意的代罪羔羊。

与村民们对一层层“外人”的恐惧与敌意相反，村民们心目中的“我族”概念，又由“家族”向外一层层延伸，及于包括一个沟或数个沟人群的“尔玛”；近数十年来，此“我族”范畴更扩及于“羌族”与“中华民族”。这样由内而外一层层的我族概念，也表现在凝聚一层层人群的各种弟兄祖先故事之上。因而，“同胞”与“异类”并非是两个截然划分的群体；同胞也是异类，异类也可以成为同胞。因彼此的亲近与相似关系，“弟兄”隐喻着基于同胞情感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同胞过于相似与亲近，“弟兄”也隐喻着彼此间的敌意与威胁。

以上这些论述，也说明了为何在本书中，我将“族群”扩大指称各层次的血缘与拟血缘之认同群体，并着重于分析其各层次“边界”（boundaries）的性质，强调一层层内外“边界”间的互映、互动关系。在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学者指出，近十多年来有些研究者之研

究重点转向于“认同”或“国族主义”，而离弃原来的“族群本质”（ethnicity）概念，其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族群本质”未能涵括多样性的群体间互动关系。⁵的确，不仅如此，在对一特定社会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将“亲属”“族群”或“民族”这些名词概念化，以指称特定的人类血缘或拟血缘群体。然而岷江上游的例子却说明，学者所认知的“亲属”“族群”与“民族”等概念，对许多村寨居民而言，却没有明显的区别，而“我族”与“异类”也没有绝对区分。是否岷江上游村寨居民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心性，造成此现象？从某种程度而言，的确如此。但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人们也常无法在意识或潜意识中截然分辨“我族”与“异类”，分辨我们对亲人、同胞、敌人的爱与恨。因此与亲近人群间的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异族”身上；从远方“异族”得到的挫折与恐惧，也可能迁怒于亲近人群，这便是为何“代罪羔羊现象”或“毒药猫现象”在这世界上如此普遍的原因。

四、华夏边缘的省思：人类生态观点

以上无论是典范历史（羌族史）与民族（羌族、中华民族），或是“弟兄祖先故事”、另类历史与各沟居民之“尔玛”认同，这些“历史”与“人类社会分群”的存在与变迁，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人类生态背景——人类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住在沟中世界里的羌族，在这一点上，也给了我们珍贵的启示。

在一条沟中，为了分享与竞争生存资源，他们以弟兄祖先之“历史”，来凝聚并区分沟内的各层次“族群”。“弟兄关系”隐喻着人群间的合作、区分与对抗，但无论如何，在此历史记忆下，本地人群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后裔之别，也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区分——大家都分别是几个同时到来的弟兄祖先之后代。没有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因“历史”而拥有或宣称有资源分配上较优越的地位。

我们以此人类生态观点，回顾华夏边缘历史。以“弟兄祖先故事”为表述的历史，似乎曾普遍存在于华夏及其边缘部分区域人群间。中国古史记载中，“弟兄祖先故事”之遗痕随处可见。如，我们在《国语》中可发现黄帝、炎帝为两弟兄的说法，⁶可见当时（东周时期）仍有些知识精英希望以“弟兄关系”，而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来联结黄帝与炎帝后裔诸国。然而也在此时及稍晚，各种“英雄祖先”论述流行于华夏诸国之间，黄帝逐渐得到特殊的“始祖”地位；比他更早的炎帝，则在大多数

先秦文献中被视为被黄帝击败之古帝王。到了汉晋时期，当华夏边缘扩及青藏高原边缘时，被纳入此边缘而成为华夏的巴蜀人，曾经仍以一“九弟兄故事”将本地统治家族与中原华夏凝聚在一起。⁷

尽管如此，西汉初年司马迁所撰《史记》，为中国历史书写立下了典范。这典范历史便是“英雄祖先历史”——《史记》之本纪、世家诸篇中，一国一族之统治阶层皆源于其“英雄祖先”。也就是说，《史记》不仅总结战国末至汉初以来多元并陈的黄帝论述，使黄帝成为华夏（严格地说只是华夏统治阶层）之共祖，它也创造了一个以“英雄祖先”为骨干的“文类”，即所谓“正史”。从此，“历史”与司马迁所称“其言不雅驯”之神话传说分离。⁸从此，“弟兄祖先故事”在历史中失去其位置，而成为乡野传说。线性或循环的历史，以英雄圣王为起始的历史，以记录、回忆社会中部分人之活动为主的历史，成为“正史”。如前述汉晋时期华夏边缘的巴蜀之人，他们更信赖的“历史”，从此便为以“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为起始的“历史”。⁹因而“历史”不仅区分华夏与非华夏（人与域），更在华夏之域间区分何为黄帝嫡传所辖，何地为黄帝支庶所封，何地为黄帝及其后裔所征服；在华夏之人中区分，谁（统治家族）由其黄帝血胤而成为华夏，谁（黎民）又因“教化”而成为华夏。借此种种区分，华夏成为一阶序化的资源共享、分配与竞争体系。虽然如此，以“弟兄关系”凝聚人群的历史心性，仍存在于各种“少数民族传说”以及汉人乡民社会口传家族谱系之中。

在华夏边缘人群间，首先接受或攀附华夏“英雄祖先”的常是其上层统治者。借此，他们强化了在本地资源分配上的优越地位。春秋时，吴、越、楚、秦等华夏边缘诸国统治者，皆得到黄帝后裔之“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魏晋南北朝时，关中的羌人世族大姓，也常自称是黄帝后裔“有虞氏”“夏后氏”的后代，因而也成为华夏。明、清以来许多中国西南地区土司，常自称其祖籍为“南京”或“湖广”，并通过其汉姓家族谱系中的“姓氏源流”，直接或间接成为“黄帝子孙”，因而也以此祖先“历史”将其子民变为华夏征服者的后裔。其子民也经常由于采用汉姓，而由汉人之“万姓源流”记忆中获得其华夏祖先。可以说，在“华夏边缘”的发展中，由于采纳华夏之“英雄祖先历史”，使得越来越多的边缘人群与空间，被纳入“华夏”此一资源共享、分配体系里。在此体系内，“英雄祖先历史”与其他历史论述，又进一步阶序化内部（性别、地域、阶级、职业）人群之资源共享、分配。

“华夏边缘”的西向扩张，在东汉、魏晋时基本上已达到华夏经济生态与社会结构所能存在的地理极限。从此，华夏不只是以武力维护、封闭此边缘，也经描述边缘空间（蛮荒瘴疠之地）、边缘人群（蛮夷贪戾之人）之异类性（the sense of otherness）来强化此边缘。中古以来中原王朝的边防策略，大致便是在“羌人地带”置下一连串军堡与重兵，防御“吐蕃”或“西番”的侵扰。由岷江上游而下至雅安地区，或更下及云南北部，此一线经常便是华夏帝国的西疆防卫线。由于华夏强力维护、垄断华夏资源，青藏高原东缘（大致为康藏地区）之山间各部落、村寨人群，便只能在内部争夺有限的山谷、草地资源，或在华夏的封贡制度下以顺服来换得华夏之赐予。除了吐蕃时期外，历史上青藏高原东缘人群较难结为大型政治军事体，以胁迫、进犯手段向华夏争夺资源。此与北疆各游牧部族常聚为大型游牧帝国以威胁、掠夺中原，有相当的不同。相对应的是，“英雄祖先历史”也流行在北方游牧地区；在青藏高原之东缘，“弟兄祖先故事”才是各族群历史记忆的蓝本。

“英雄祖先历史”代表一种以对外扩张、对内阶级分化，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之产物。“弟兄祖先故事”则代表一种以对内分配、争夺，来解决资源问题的历史心性产品。因此“弟兄关系”并非本地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符记。相反地，由于资源极端匮乏，宣称有弟兄祖源关系的各个族群以及他们与邻近的“蛮子”和“汉人”，经常陷在无止境的相互掠夺与仇杀之中。

五、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由“蛮夷”到“少数民族”

了解以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历史的人类生态意义后，我们对近代此华夏边缘之“少数民族化”也可以有新的理解。首先，当代包括汉与非汉的“中华民族”，在清末中国国族建构中并非是唯一被考虑的方案，革命党的精英们，曾主张建立一纯汉族的国族国家。而后，因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封贡制度下之“藩属”，或受中国直接、间接管辖之边区土地与资源，表现其侵夺野心与觊觎行动。在此刺激与竞争下，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起包括传统“华夏”与其“边缘”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概念下，如今传统“中国”与其“边缘”合而为一；过去界线模糊的“边疆”（frontiers）及其上的异族，成为界线明确之国家“边界”（boundary）内的少数民族。

近代“氏羌系民族”论述与典范“羌族史”，以及羌族成为中国少数民

族之一，都可视作此西部华夏边缘再造的表征，也是一长程华夏边缘历史之近代产物。在近代国族主义下，中古以来由于吐蕃崛起而逐渐消逝的华夏边缘，汉晋时的“羌人地带”，以及更早的商至汉代以羌为异族符记的“漂移的华夏边缘”，被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建构。语言学、体质学、考古学、民族学与近代史学，都被用来补缀缝合此一民族及其历史。于是，中古以来被“番”之异族概念严峻化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如今又被“羌族”“氏羌系民族”等概念与“历史”糅化、模糊化。虽然在民族识别、划分后，有藏族、羌族、彝族等等之别。但通过“羌族”与“氏羌系民族”之历史、语言与血缘（体质）建构，藏、彝与西南各氏羌系民族间及其与汉族之间，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过去华夏心目中的“蛮夷”，从此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这个转变，在人类资源生态上有相当的意义；可以说是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之资源分配、分享体系的一次再调整。以本书所述之华夏西部边缘来说，近两千年来由于华夏强力维护其西方资源边界以及本地特有的地理生态，曾造成青藏高原东缘地带人群间普遍的冲突与暴力；这些现象，在“民族化”后都显著减少。当地老人们常对我描述过去的血腥暴力与人们对此的恐惧。他们说：“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民族。”在当代羌族认同下，“民族感情”化解了各沟各寨人群间，或过去“蛮子”“尔玛”与“汉人”间的暴力冲突。今日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不再是狡猾的“汉人”、贪狠的“蛮子”或一小撮孤立的“尔玛”，而成为骄傲的羌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优惠与补助，也部分弥补了核心与边缘间的经济差距。

六、中国民族的再思考

在本书前言中，我曾提及有关“中国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两种当代历史论述——“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在此，基于本书对“中国民族”的看法，我们可以对这两种学说提出一些综合评述，以及再思考有关“中国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学术与现实等问题。

我们可以由两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是在学术上，学者们所主张的“民族”与“历史”，在知识上是否正确或充分？二是在伦理上，他们所建构的“民族”与“历史”知识，是否有助于造成或促进资源平等、共享与社会和谐。在学术方面，“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近三十年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说明无论“族群”或“民族”，皆非客

观的体质、语言与文化所能界定。基于此民族定义所建立的“民族史”，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也因此常受到质疑。¹⁰一个人群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有内部差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有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出，也有新的血缘、文化、语言与“认同”的移入。究竟是什么“民族实体”在历史中延续？“历史实体论”在学术上的缺失，主要在于将“文本”与“表征”当作“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与“民族志事实”（ethnographical truth），忽略了“历史文本”的社会记忆本质以及“文化表征”的展演本质——也就是忽略了两者的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情境。最后，由于对人类族群现象缺乏批判性认知，因此在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学术建构中，新知识也难以反映族群现象本质，无法映照研究者自身的文化与认同偏见。由于研究者无法认识自身的政治、文化主体性偏见，因而其民族史与民族文化建构，进一步边缘化“他者”。也因此，在伦理方面，“历史实体论”下的典范“中国民族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缺乏对现实的反思与纠误能力。

后现代主义下的“近代建构论”在对“民族”或“国族”的看法上，强调它们与“族群”之区分，认为后者是自然形成的，前者是近代国族主义下之产物，是近代国族知识精英们的想象与建构。这样的看法则未见无论是族群、民族、国族，都是广义人类“族群”现象的一部分；由人类生态观点来看，家族、族群、民族、国族，都涉及资源分配与竞争以及相关权力关系下的“历史”建构。也因此，在对历史的看法上，“近代建构论”者只注意近代国族建构之历史与“历史”，而忽略近代建构之古代基础，以及此长程历史变迁中“近代建构”之人类生态意义。此外，与“历史实体论”相同，“近代建构论”也忽略了历史演变中发生在各种“边缘”的细微过程以及此过程造成的“边缘”变迁历史。

在伦理与人文价值上，无可否认的是，“近代建构论”者在解构“国族神话”对抗“大汉族沙文主义”，凸显当前少数民族之边缘地位等方面，的确有其贡献。但只见其近，不见其远，也使得此种论述只有解构而缺乏长程、全面的历史省思。譬如，“近代建构论”者只指出近代“中国国族”中的核心与边缘族群间的不平等，而未见在“中国国族”成立之前，由于华夏坚守其资源边界而造成沿此边缘发生的长期战争与冲突。亦未见及，被排斥在华夏边缘之外的各人群，由于资源匮乏而经常发生族群间的相互仇杀与掠夺，以及人群社会内部因资源争夺而产生的阶级、性别间之剥削与暴力。

在本书中，我由华夏边缘历史来了解羌族，以及由羌人与羌族来了

解华夏边缘历史。一方面，当代羌族的确是国族主义下的近代建构。另一方面，羌族之存在，自有其近代以前之历史基础或延续性。但在此历史中延续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发生在华夏边缘人群间，多层次社会区分（性别、地域、阶级、政治与文化）与相关权力关系下的族群过程。更重要的是，长程人类生态观点的华夏边缘历史，可以让我们反思中国近代国族建构之人类生态意义，了解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处境以及筹谋改进或规划更理想的人类资源共享环境。

以此观点来说，周代以来至汉晋时期华夏之域与华夏之人的扩张与发展，以及此后至清末华夏边界的维持，都以被排除在此边界外的“异族”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而成为“中华民族”，可说是此地区漫长历程中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欲建立一纯汉国族国家之蓝图，并不是好的选择。同样地，欧亚大陆之东、西两半部有如下差别——西方为沿大西洋岸之少数富强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则为常卷入宗教、种族与经济资源战争及内部性别、阶级与族群迫害频传的各国、各族；东岸则为一“多元一体”的中国，以经济补助来减缓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秩序。我们不认为，欧亚大陆西半部的体制，优于东半部中国国族下的体制。

至此，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了解，本书不只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民族志，更重要的，它也是一部华夏或华夏边缘的历史与民族志。华夏或中国人此一群体，因其边缘的推移、变迁而成长变化；而华夏边缘的推移、变迁，也蕴含了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体系的变化。可以说，“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创造，有其历史与“历史”基础。无论是当前的羌族、汉族或中华民族，都是历史的创造物，同时这些人群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 1 Terence Turner, "Ethno-Ethnohistory: Myth and History in Native South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Contact with Western Societ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2-274.
- 2 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第29页。
- 3 见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1977, pp. 143-168；在本书的例子中，比较优越的“存在”便是一种认同，一种由社会所公认之优越血缘所带来的身份认同。

- 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1979.
- 5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6, pp. 134-143.
- 6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 7 《华阳国志·蜀志》：“《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圉。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圉，圉中之国则巴蜀矣。”
- 8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第583—624页。
- 9 《华阳国志》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有关《华阳国志》中两种历史心性下的“巴蜀统治君王家族起源”叙事之分析，见拙文《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
- 10 Malcolm Chapman, *The Cel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yth*,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2; Edwin Ardener,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Vestiges of Creation’,” in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参考书目

一、古籍文献

- 《礼记》，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
- 《左传》，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 《国语》，《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1981。
- 《山海经》，毕氏岩灵山馆校本，台北：启业书局，1977。
- （汉）司马迁：《史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 （汉）班固：《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 （晋）陈寿：《三国志》，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 （晋）常璩：《华阳国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 （南朝）范晔：《后汉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
- （唐）房玄龄等：《晋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 （唐）李延寿：《北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1。
- （唐）魏徵：《隋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3。
- （唐）林宝：《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
- （后晋）刘昫：《旧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
-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
- （元）脱脱等：《宋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 （清）张廷玉等：《明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 《明实录》，黄彰健校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成都：巴蜀书社，1993。
- （明）朱纨：《茂边纪事》，《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4。

(清)杨迦悻等编：《茂州志》，1831。

(清)赵德林等修：《石泉县志》，1834。

(清)吴羹梅、周祚峯修纂：《直隶理番厅志》，1866。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世本》，《丛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5。

二、中日文参考书目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成都：民族出版社，1994。

安应民：《吐蕃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白川静：《羌族考》，《甲骨金文学论丛（第九册）》，油印本，1958。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1。

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北川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92。

陈志良：《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33—42页。

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译，台北：鼎文书局，1975。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傅崇矩、徐湘等修纂：《松潘县志》，木刻本，1924。

傅斯年：《姜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1分，第130—135页。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7—152页。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

- 胡鉴民：《羌族之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论丛》，1941，采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第34—60页。
- 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上海：新亚细亚学会，1932。
-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
- 黎光明、王元辉：《獐獐子，汶川的土民，汶川的羌民》，《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之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未刊手稿，1929。
- 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5。
- 李绍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载《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第738—756页。
-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李亦园：《汉化、土著化或社会演化：从婚姻、居住与妇女看汉人与少数民族之关系》，载黄应贵、叶春荣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7，第35—62页。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第20期，第8—16页。
-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05初版，1962重印。
- 卢丁、工藤元男主编：《羌族历史文化研究》，载《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研究报告之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34初版，1996重印。
- 罗香林：《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第43—63页。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

马长寿：《氏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第1—54页。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饶宗颐：《西南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46本第3分，第180—182页。

森安太郎：《皇帝的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王孝廉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9。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第16—29页。

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第28，1997，第1—77页。

沈仲常：《从考古资料看羌族的白石崇拜遗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59—61页。

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故事集》，出版地不详，1989。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研究文集》，出版地不详，1991。

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署：《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查》，出版信息不详。

松冈正子：『チセソ族と四川チベシトチ族』，东京：ゆまに书房，2000。

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孙宏开：《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第53—61页。
-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 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第285—287页。
-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
-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第583—624页。
- 王明珂：《起源的魔力及相关探讨》，《语言暨语言学》第2卷第1期，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1，第261—267页。
- 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3分，1998，第841—885页。
- 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思与言》1996年第34卷第3期，第155页，
-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台北：华世出版社，1943初版，1977重印。
-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2），1941，第58—90页。
-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第71—133页。
-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 徐中舒：《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载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 杨钧衡、黄尚毅等修纂：《民国北川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 姚薇元：《藏族考源》，《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期。

印顺法师：《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台北：华冈出版公司，1975。

张茂桂：《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

章炳麟：《检论·序种姓》，上海：右文社，1919。

周发贤、王长益：《“烁罗古国”初解》，《西羌文化》创刊号，1996，第26—28页。

祝世德等修：《汶川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版，1944。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

邹衡：《论先周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三、西文参考书目

Ahern, Emily M.,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anks, Marcu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6.

Barkan, Elazar & Marie-Denise Shelton eds., *Borders, Exiles, Diaspor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th, Fredrik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Bayly, C. A., "The Origins of Swadeshi (Home Industry): Cloth and

- Indian Society, 1700—1930”, chap.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lackburn, Stuart H.,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 Bloch, M.,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2, 1977, pp. 278-292.
- Boserup, E.,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70.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4.
-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riggs, Robin, *Witches & Neighbo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6.
- Chapman, Malcolm, *The Cel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yth*,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2.
- Chartier, Rog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 Chatterjee, Partha,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ook, T., “The Independent Lolo of Southwest Szechw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8, 1936, pp.70-81.
- Crossley, Pamela,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 Darnton, Rober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Despres, Leo A.,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1975.
- Diamond, N., “Defining the Miao,”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Douglas, Mary,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Dumont, Louis,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complete revised Englis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Elias, Norbert,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65, 1994.
- Ginzburg, Carlo,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Girard, René, "Generative Scapegoating," and "Discussion," in Robert G. Hamerton-Kelly ed.,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3-105, 106-148.
- Girard, René, *The Scapegoat*, trans. by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irard, René,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ladney, Dru C.,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ladney, Dru C.,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1, 1994, pp. 92-123.
- Godelier, Maurice & Marilyn Strathern ed., *Big Men and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s of Power in Mela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oody, Jack,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mestic Dom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ould, R. A.,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Graham, David C.,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 Harrell, Stevan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Harrell, Stevan,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Hill, Jonathan D.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Hobsbawm, Eric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oskins, Janet,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Hsu, Cho-yun &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Irwin, Paul, *Liptako Speaks: History from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Isaacs, Harold R.,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eyes, Charles ed., "Towards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3, 1976, pp.202-213.
- Le Goff, Jacques, *History and Memory*, trans. by Steven Rendall & Elizabeth Cla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Le Goff, Jacques, *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itzinger, Ralph A.,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ine, Henry S.,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USA: Dorset Press, 1986.
- Mcall, Christopher, *Class, Ethnic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ichaelsen, Scott & David E. Johnson eds.,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 Miller, Joseph ed., *The African Past Speaks*, Hamden, CT: Archon, 1980.
- Moerman, Michael,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965, pp.1215-1230.
- Nagata, J., "What is a Malay? Situational Sele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 Plural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 2, 1974, pp. 331-350.
- Obeyesekere, Gananath,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chap.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s.,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Pulleyblank, E. G.,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Rappaport, Joanne,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ex, John, *Race Rela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Reynolds, Dwight Fletcher,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inson, Roy, "Cat , " in Ian L. Mason ed.,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Roosens, Eugene E.,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Rosaldo, Renato, "Anthropological Commentary," in Robert G. Hamerton Kelly ed., *Violent Orig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Rosaldo, Renato, *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yce, Anya Peterson, *Ethnic Identity: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Sahlins, Marshall D.,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Sahlins, Marshall D.,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Sahlins, Marshall D.,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Schechner, Richard and Willa Appel,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cott, James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ilverman, Marily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mith, Anthony 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 Stevenson, P. H., "The Chinese-Tibetan Borderland and Its People," *China Journal* 6.4, pp. 180-188, 6.5, pp. 234-242, 6.6, pp. 297-312, 1927.
- Thompson, Paul,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Thompson, Richard H.,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 Tonkin, Elizabeth,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 Torrance, Thomas,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 Torrance, Thomas,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Ltd., 1920.
- Turner, Terence, "Ethno-Ethnohistory: Myth and History in Native South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Contact with Western Society," in 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Turner, Victo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7.
- Weller, Robert P., Bandits, Beggars and Ghosts: The Failure of State Control Over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Taiwa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2, 1985, pp. 46-61.
- White, Geoffrey M., *Identity Through History: Living Stories in a Solomon Islands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illis, Roy, *A State in the Making: Myth,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Ufip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 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Yalman, Nur, "On the Purity of Women in the Castes of Ceylon and Malab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93. 1, 1963, pp. 25-58.

谢词

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各地、各沟的羌族。若非他们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保存与展现其驳杂特性，我不可能认识这一段历史与相关族群现象。我也要感谢他们让我了解自己——当我们的历史心性不断创造一些“历史”来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新移民时，羌族与许多西南民族以“弟兄祖先故事”提醒我们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我群与他群关系的存在。我更要感谢我的羌族朋友们。近八年来，他们陪着我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到处翻山越梁上寨子。靠着他们的热诚帮忙以及他们的社会人际关系，我才得以完成这些探访研究。

本书中有些章节内容与议题，其原始构想曾在各种学术会议或期刊上发表，在此过程中得到许多批评指教。在此我要感谢相关的学界朋友，特别是与我同在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潘英海、何翠萍、谢世忠等教授，以及历史、社会与人类学界的黄应贵、张茂桂、王汎森、王道还、沈松桥等教授。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国族主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议题上，在论学间，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近十年来，我以历史学者涉足于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中，我要感谢许多台湾人类学朋友的指正；特别是，感谢李亦园教授对我有关“华夏边缘”研究的鼓励与支持。

与本书相关的田野调查工作，除了得到我所服务的“中研院”支持外，也受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国科会”等的支持。在此，我对上述机构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本书之初稿大部分是在我1998—1999年访问加州大学（UCLA）之期间完成；我要感谢加州大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在此期间给我生活上的协助，以及多年来在学术上对我的指教与鼓励。

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师，前“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是他首先带领我到羌族研究此领域。1987—1992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叶山（Robin Yates），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J. Tambiah），杜磊（Dru C. Gradney）等教授，都对我日后的学术发展有相当启发，我万分感激他们的教导。我怀念并感谢先师张光直先生，他的学问与学者风范是我永远仰慕与追随的对象。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与妻子。为了从事田野调查，我有五年未回老家过年，我要感谢母亲对此的宽容。我的妻子清沼，近年来也因此常在寒暑期独自照料我们三个顽皮的儿子，我感谢她的辛劳；同时，我也感谢她给我的精神支持，她相信我在从事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在研究上的重要支柱。

2008年版追记

正在中华书局即将印行本书简体中文版之际，汶川大地震之噩耗传来，举世同悲。几天来，我忙于上网及以电话打探灾情，并在网上提供我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北川，正是我多年来无数次进行田野考察的地区，希望能对救灾有所帮助。然而，我的绵薄之力，无法阻止惨剧的发生和延续。对我而言，如此熟悉的地方、亲近的民众，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是最让我为“学术”与“学者”感到可悲的。

如今，我的老友或成为灾民，或尚无信息，广大山间村寨受灾情况还不知晓，此时本书在大陆出版，更加剧了我心中的悲痛。希望这本书能让世人多了解羌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存在对世界有着极大的贡献。十几年前我初入羌族地区时，一回与羌族朋友们在汶川聚饮，酒酣耳热之际，我突发豪语：“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换来羌族朋友们热切回应：“大家为羌族干杯！”这几天，这样的声音时时在耳边响起。

哀恸之际，不能尽言，谨此哀悼所有汶川大地震中的受难者。

王明珂

书于2008.5.20

王莽

和他的

时代

张向荣 著

新王莽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 张向荣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203-6

I. ①祥... II. ①张... III. ①王莽（约前45-23）- 传记 IV.

①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30988号

书 名：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作 者：张向荣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頔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203-6/K·309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北京行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独家出版、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制、转载。

目 录

引子：皇帝之死

第一章 汉室

-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二、汉家自有制度
-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 一、仓促之夜
-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第三章 王氏

-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 二、大司马王莽
- 三、王莽的沉浮
- 四、拨乱反正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 一、吕宽大案
-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第五章 经师

- 一、驯服君主
- 二、今古之争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 二、始建国传亿年
- 三、改制与王制

第七章 天下

- 一、奇怪的战争
-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 三、再造危局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 二、第一家庭
- 三、登仙——！

四、反虜王莽安在？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世系图

参考书目

后记与致谢

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

像往常一样，长安城正在宵禁。按照汉律，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¹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绝无闲杂人等。虽是温热的夏季，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

此时，一个从长乐宫，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格外引人注目。知晓了他的身份，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太皇太后的侄子、新都侯王莽。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但在六年前被免职，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一年多以前，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眼下正赋闲在家。

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尽快收拾准备，立即赶去未央宫。

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汉家天下的心脏。

王莽虽属外戚贵族，但在外朝也就是“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因此除非皇帝召见，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刚刚，皇帝晏驾了！²

王莽的震惊，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这位名讳刘欣，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王莽四十四岁，皇帝才二十五岁，只要他活着，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倘若有，安排谁继承帝位？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是吉是凶？……

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未央宫。

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二十三岁宠臣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³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的意思。

说完不久，刘欣就晏驾了。他没有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理说，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天下没了皇帝，她的资格最为尊贵，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

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

后人把董贤看作古代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之一，刘欣的情人，典型的“佞幸”。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为刘欣所爱慕。刘欣即位两年后，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此后，两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⁴），定襄郡⁵发生了一件灾异，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汉书》后来认为，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头衔包括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

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刘欣可未必这么看。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二来，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这句话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⁶，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⁷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丰盛。⁸

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在当时，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德性”。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其实，汉朝的合法性危机，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那是距刘欣晏驾七十七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霍光掌权时期。泰山、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与此同时，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也立了起来，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是五个字的谶语：

公孙病已立。⁹

此时，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¹⁰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是位儒家人物。他根据《春秋》推断：这些灾异意味着“王者易姓告代”“匹夫为天子”¹¹，也就是要改朝换代；鉴于“汉家尧后”，汉室是尧的后代，所以汉昭帝应

该主动退位，禅让给舜的后代“公孙氏”。

霍光见此，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¹²，将眭弘杀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一方面，汉昭帝死，昌邑王被废，霍光改立汉宣帝。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又是汉武帝的曾孙，正好符合“公孙病已”的谶语。所以，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有报答之意。

但另一方面，这次预言被证实，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涌动在朝野之间。其实，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¹³，因为推演族谱，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

于是，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日食等灾异，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略略统计一下，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事实上，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生根发芽。

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孙子汉成帝时期，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¹⁴。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在这一“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下，扮演“历史偶然性”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并非

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谁是主人，有何教训、有何经验，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

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

注释：

- 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198页，法律出版社，2010。
按照捕律，官吏不得夜闯民宅捉拿嫌犯，如发生，嫌犯有权反抗，官吏则会被追究责任。以前有句老话“夜闯民宅，非奸即盗”，观念与此相同。
- 2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哀帝崩……太皇太后……遣使者驰召莽”，中华书局，1962。
- 3 《后汉书·张步传》，第500页，中华书局，1965。
- 4 公历和古代历法并非绝对对应，年数对照取约数，后文同。
- 5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 6 《汉书·董贤传》，第3738页。
- 7 《汉书·董贤传》，第3738页。
- 8 《汉书·地理志》，第1609页；总数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统计取约数，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14。
- 9 《汉书·眭弘传》，第3153页。
- 10 符节令，隶属少府。孟祥才认为是“符节县令，符节，今四川合江”，见《王莽传》，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16。此说误，西汉时该地称“符”，王莽改名为“符信”，东汉建武间始改名为“符节”。
- 11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3、3154页。
- 12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第3154页。
- 13 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4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第一章 汉室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羨，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¹

1. 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²，刘邦刚刚在蕲西³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忼慨伤怀，泣数行下”。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游子悲故乡”，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

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⁴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⁵，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⁶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⁷。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

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却嫉贤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吾能用之”，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⁸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⁹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¹⁰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

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¹¹，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 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酈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¹²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

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¹³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入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¹⁴，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¹⁵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

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¹⁶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畏高帝、吕太后威”。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世，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¹⁷，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为天下第一”¹⁸。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悉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轹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¹⁹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

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

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²⁰。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²¹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

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²²。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²³，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私奸服舍”，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²⁴，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²⁵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²⁶。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

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愆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²⁷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

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²⁸。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

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²⁹。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³⁰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

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再以后，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县，汉初那横跨数郡的大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刘彻对列侯们也颇有所图。刘彻时代，汉初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祖辈的交情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细察这些遍布全国的列侯领地，刘彻发现，列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而是租税。特别是汉初的侯国领地，因为当时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所以虽然只有一县之地，但面积很大，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这就意味着，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著名的酌金案发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八月，刘彻主持宗庙祭祀，向宗庙献酒。按照惯例，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非常严肃，但因定期举行，礼仪已成套路，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形式的例行公事，对献金的成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他小题大做，罗织成罪，以酌金成色不足的罪名，一次性褫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占全部列侯的一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有20位被夺爵；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有10位被夺爵；而从地域看，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畿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因此，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³¹。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半生在发动战争，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但是，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待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³²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

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注释：

- 1 这一节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 公元前196年冬。此时汉仍以每年十月为岁首。
- 3 今安徽宿县附近。
- 4 刘邦生年，《史记》《汉书》均未载，后人有两说：一说为公元前256年，一说为公元前247年。佐竹靖彦认为两个年龄都不准确，主张刘邦、项羽年龄相仿，见氏著《刘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备一说。此处姑采《史记集解》说，定在公元前256年。
- 5 即使按照刘邦出生于前247年来算，“战国四君子”也有两人和刘邦是同时代人。
- 6 秦始皇虽然姓嬴，名政，但是在当时，人们对男性贵族习惯称氏而不称名，所以今天大家习惯的“嬴政”，在当时应该是“赵政”，政的家族是赵氏。刘邦不是贵族。
- 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 8 《史记·高祖本纪》，第381页，中华书局，1959。
- 9 阿部幸信：《“统治系统”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 10 《殷芸小说》卷一，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按：本书中多次使用笔记小说，有些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虽然内容荒诞不经，但能反映古人的思想观念，如后文讲董仲舒时使用的《幽明录》等。特此说明。
- 11 徐复观：《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载《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 13 李开元认为，汉朝的“朝”，来自当时诸侯负有向汉廷“奉朝请”的义务，所以“汉朝”在当时不是指天下，而仅指汉中央及统辖的领土。这与后代使用汉朝、唐朝、清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同上引书。
- 14 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引大庭脩说，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第70页。
- 15 简1~2.133，转引自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载《地不爱宝》，第144页，中华书局，2011。
- 16 《汉书·文帝纪》，第106页。
- 17 《汉书·文帝纪》，第106页。
- 18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 19 《汉书·文帝纪》，第115页。
- 20 刘邦封刘肥为齐王的时候，“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见《汉书·高五王传》，第1987页。
- 21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4页。
- 2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第219页。
- 23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6页。
- 24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 25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 26 《汉书·晁错传》，第2300页。
- 27 《汉书·荆燕吴传》，第1907页。
- 28 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 29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256页。
- 30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0页。
- 31 以上关于酌金案的动机、数据，据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中编第六、七章和下编第六章。
- 32 《汉书·武帝纪》，第173页。

二、汉家自有制度

5. 黄老与秦制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很是长寿，从被立为皇后到去世整整有五十二年，几乎贯穿了西汉的前期。她年轻时是吕后的宫女，去世时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人瑞。

窦氏特别喜好和尊崇黄老之术，可能是深受吕后影响，更可能是因为她那个年代的汉朝上层人士大都如此。她虽不干涉朝政，但逼着儿子汉景帝学习黄老之术，这种狂热仍然对政局产生了影响。

一天，两位大臣在景帝面前争论一个问题：

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个或者说一类历史事件是什么性质？

儒学经师、博士辕固生认为是正义革命；尊崇黄老法家之术的黄生认为是犯上作乱。

两人争执不下，辕固生最后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汤武是犯上作乱，那么高皇帝诛秦称帝也是犯上作乱？

这句话令黄生没法回答，也令景帝感到警惕，于是禁止今后讨论这个问题。辕固生的好斗、直言，很快就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她就把辕固生召到面前，询问如何评价黄老之书。辕固生明知皇太后好黄老，却傲慢地说：“此家人言耳。”意思是说黄老之书是给仆人家奴看的，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著。窦太后大怒，勒令他去野猪圈里和野猪搏斗。野猪不是家猪，对已经老胳膊老腿儿的辕固生来说，无异于猛兽。看来窦太后是要置他于死地。

景帝觉得，辕固生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就选了把锋利的兵器给他。辕固生的行动和他的性格一样，毫不怯弱。下场后，他一下子刺中野猪心脏将其杀死。窦太后亲见这一幕，沉默不语，只好把他放了。

还有一件事，武帝刘彻刚即位，兴冲冲地准备制礼作乐，策免了先帝旧臣，令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武安侯田蚡出任太尉，由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这三位外朝实权人物都是支持儒学的。同时，九卿之一的郎中令也由申培公的另一名弟子王臧担任，郎中令就是后世的光禄勋，掌管皇宫侍卫、禁卫军和举贤良事务，是皇帝近臣。

在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的运作下，儒学的势头突飞猛进，朝廷甚至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突然有一天，窦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了——从东宫来到未央宫，向刘彻举证赵绾、

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

汉室的太后轻易不到未央宫，到就是干预大事，甚至临朝称制。刘彻还年轻，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大理议罪，双双自杀。刘彻首次制礼作乐的行动以失败草草收场。

窦太后所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直接原因，但根本在于她对黄老之术的笃信。从刘邦立国到刘彻，黄老的势力如此之强。那么是否可以说，黄老之术就是这一阶段汉朝的“建国”之道，或者说是汉朝的“德性”呢？

恐怕不能。

黄老之术，清静无为，后人有时误判成不干涉民间的活动，以为是西方经济学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清静无为”主要说的是不增饰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并不是说不干涉。政府原来怎么治理，现在还是怎么治理。汉朝继承的是秦制，早在刘邦初入咸阳、子婴投降的时候，汉王国就在萧何的帮助下继承了秦制，像“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只是临时性措施，而且刘邦很快就撤出了咸阳，约法三章并没有长期实施。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¹。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²。

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所以，黄老之术并不是汉初皇室主动构建的“建国”之道，而是他们不得不延续秦制的无奈之选。刘邦欣赏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名言，但究竟拿什么治天下，刘邦并没有答案。

这就是说，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多世纪里，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而秦制总的来说就是三条：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

律法是秦制的根本，法家恨不得连每个人每天每顿饭吃几口都立法，所以形成了庞大的法条。这些律法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在根子上不是一回事。秦制的律法是一种“刑名之学”，世界上任何事，只要它被命名了，就得做到“名实相符”，就需要有律法来规定怎么达到名实相符。比如说，世界上存在“砍树”这件事，那就得有律法来规定怎么砍树，推而广之，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事都得有律法，才能把天下人都“管”起来。而这种名实相符的基础一旦被破坏了，那么社会就不稳固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并不仅是权臣排斥异己，更是“破坏了名实相应的法律基础”³，秦制的国家机器也就逐渐失效。汉朝延续了这种“刑名之学”的观念，也沿用了秦帝国的大量律法，比如规定“焚书”的著名的《挟书律》，就直到汉惠帝刘盈时期才被废除。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⁴，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⁵，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⁶。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⁷，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⁸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⁹，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黄老，内主申韩”¹⁰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缙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¹¹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缙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缙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¹²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诏书里引用《诗经》仿佛开了一扇门，射入一道光，哪怕是不经意的一道光，也足以照亮一段新的路程，为汉朝的“建国”指出了道路。当

然，“废除肉刑”在名义上是非常正面、非常仁慈的举措，但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君王的考量之内。

汉文帝到底是如何废除肉刑的？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戴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¹³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确实如此！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民之父母”的承诺，表明皇室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修改秦代遗留下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其中确有荒诞之处，《汉书》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¹⁴就是说，废除肉刑，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时，还没挨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其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缢杀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怨于鞭笞的可怕威力，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修改法律规定“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修改法律：“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儿；竹片的把儿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笞臀”。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毋得更人”，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

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即便如此，《刑法志》仍然说“酷吏犹以为威”¹⁵，说明鞭笞始终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¹⁶老百姓甚至想要恢复肉刑了！

肉刑最终并没有恢复，汉文帝赢得了仁慈的美名，缇萦赢得了孝顺的褒赏，淳于意赢得了完整的身体。但在当时，这个事件恐怕主要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

儒家的“王道”，就这样淫浸着帝国的“霸道”，而王霸之道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的君主所瞩目的问题。

7．汉武帝初建汉道

在后来被命名为元封元年的前一年冬天，汉武帝刘彻亲自勒兵十万向北方边境进发。但这次他并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去泰山封禅，展示武力是封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结束了朔方巡狩，又稍稍折回到桥山¹⁷附近的黄帝陵祭祀，刘彻问随从：“听说黄帝不死，现在却有冢，为什么？”

有人答道，黄帝确实不死，已经升天了，这里的陵埋的是他的衣冠。

刘彻的这个问题，透露了他此次去泰山封禅的重要目的：像黄帝一样长生不老、升天成仙。

几年前，汾阴¹⁸的后土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只宝鼎，这个祥瑞令刘彻认为，汉家封禅的时机已经成熟。宝鼎出现了一只，用大臣的话说，意味着“一统”。刘彻即位以后至宝鼎出土之前，他几乎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文治武功，汉家确实成为“一统”的帝国了。既然功业完成得差不多，自己也老了，加上连年战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¹⁹，就该考虑帝国偃武修文和自己长生不老的事情了。

封禅之事，古已有之，“封”是在泰山顶上封土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一座名叫梁父的山或其他小山上取土祭祀地神。“封禅”并未专属于后代哪个学术派别。在刘彻的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很重视封禅。儒家把泰山封禅看作天子的特权，“王者易姓受命”，封禅就意味着统治得到了上天的许可，当然前提是封禅者真的具有王者的功业；而

术士会把封禅看作人与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径。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封禅已经很多年没有施行过，始皇帝封禅过，再之前就渺茫不可确认了。所以，封和禅分别怎么操作？用什么礼仪？一时无从知晓。刘彻召集儒生和方士研究了好几年，眼下封禅在即，仍然莫衷一是。刘彻把封禅的礼器给儒生们看，儒生们纷纷说不合古制，但要问应该怎么搞呢，他们又说不出，而且翻遍了儒经也没有创制出新的礼仪。

刘彻很不耐烦，事实上，他对儒学没有研究的兴趣，也不关心细节。这次封禅，他的打算是既能效仿黄帝，上与天通，实现将来升天成仙的梦想；又要按照儒家的礼仪来做这件事，从而展示汉家受命于天。至于这两者如何协调，刘彻并不在意，领导的特权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至于如何实现那是下面的事情。

离开长安后，刘彻又东巡大海，次年四月终于抵达泰山脚下。而那些儒生和方士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封禅礼仪。刘彻决定不再等待，就分别按照在甘泉²⁰祭祀太一和在汾阴祭祀后土的礼仪行封、禅之礼。其间，他单独与宠爱的霍嬭一同登上泰山，霍嬭是霍去病的儿子，此时只有十岁，在父亲死后袭爵冠军侯。两人在山上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霍嬭不久之后突然暴病而死²¹。总之，封禅泰山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刘彻得意扬扬地在泰山封禅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在洛阳病危。刚刚游历天下回到长安的司马迁火速赶到父亲病榻之前，才知道父亲竟然是因为没能跟随刘彻参加封禅而激愤发病。

封禅泰山连基本的礼仪都没有搞清楚，至于令司马谈激愤至此吗？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吐露了缘由。原来，司马家族从周代就担任太史，“典天官事”，“天官事”可以理解为“占星术”，因为古代把星图的星宿看成是天官，通过占星可以察知人间政事，也能通晓历法的秘密。

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神职人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担负着协助天子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重要使命²²，进一步说，是辅助天子受命于天的“专业人士”。现在汉家终于封禅，意味着天下将会“更始”，也就是重新开始，这才是真正的建国大业。按照太史的职责，司马谈理应参与，甚至陪同天子登山，引导天子观象授时。结果连跟随的资格都没有，这说明太史令这一职责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虽然重要但不再由太史令垄断，皇帝本人说了就算。

于是，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但是，汉家的“建国”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国度，刘彻对儒家的态度在封禅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尽致。连不喜儒家的汲黯，也曾当面对刘彻说：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²³

一个“内多欲”，一个“外施仁义”，精准勾勒出刘彻的个性。“内多欲”，可以理解为刘彻就是始皇帝，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对待臣下杀伐决断，毫不留情。用人也不拘来路，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²⁴，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同时，刘彻确实有“外施仁义”的一面，他愿意抬举儒家来掩饰自己“内多欲”，所以才会在刚登基时的就要搞改制、建明堂，虽然被窦太后阻拦，但专门养儒生的“五经博士”已经正式设立。后来，按照公孙弘的建议，他又建立了中央太学，令郡国选拔优秀子弟到博士那里“委培”，“结业”后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选拔地方上的儒学人才担任重要地区官员的属员等。总之，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²⁵。

最重要的，当然是封禅。

封禅之后，刘彻心满意足地回到长安。

司马迁安葬父亲后，心事重重地回到长安，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

刘彻很快召见了司马迁，并交给他一个非凡的使命——制定新的历法。封禅之后，时间重新开始，就需要新的历法、新的正朔、新的服色。这令司马迁振奋起来，决意在制定历法上为太史的职责赢回荣誉。不到一年，在司马迁和具有天文历法才能的术士的努力下，《太初历》

制定了。

这一年本是元封七年，正在实行的是秦制的《颛顼历》，原本是秦尚为列国之时使用的地方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统一六国后颁行天下，成为当时的“公历”，因此被汉朝所沿用。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²⁶；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汉道”，意味着汉朝的“建国”大业终于摸清了方向。

8 . 以洪范察变

巫蛊之乱，刘彻将卫皇后家几近灭族，太子、儿媳、公主及皇孙全部死难。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和太子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死伤枕藉，天下震怖。

这期间，宁阳²⁷侯国的儒生夏侯胜却在故乡平静地读书问学，他主要修习《尚书》，最先跟随同族长辈、有名的经师夏侯始昌学《洪范五行传》²⁸和说灾异的方法。董仲舒死后，夏侯始昌作为名儒进入了刘彻的视野。正如刘彻对儒家一贯的态度，他表面上重视，但并不会把经师们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董仲舒只是个王国相，夏侯始昌则被拜为昌邑王刘髡的太傅。

昌邑²⁹是个好地方，四面通衢，物阜民丰。刘髡是刘彻和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一时为刘彻所宠爱，所以才被封到这里。太子死后，刘彻在世的儿子们，刘弗陵只有三岁，成年的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俱不为刘彻所喜，刘髡就在舅舅李广利和舅舅的姻亲刘屈氂的支持下，对太子之位有了念想。

此时的刘彻，渐渐从巫蛊之乱的暴虐杀戮中缓了过来。如今他后悔了，他理应明白，自己的丰功伟绩是以死了无数人为代价的，正应该由忠厚的太子来改弦更张。现在，自己已风烛残年，汉朝该如何渡过这个危局？

他开始怀念冤死的太子，一个在高皇帝庙供奉寝殿祭祀的郎官田千

秋，因为率先给太子说情，被一下子提拔为大鸿胪。他专门修建了思子宫寄托哀思，忌恨当初曾帮他镇压太子兵变的人，包括刘屈氂。

于是又一场屠杀开始了，刘屈氂被腰斩，他与李广利曾密谋帮助刘髡成为太子的事情也暴露了。此时李广利正出征匈奴，听说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朝廷拘押，一时手足无措，战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李广利被灭族，刘髡的储君之梦也成了泡影，在刘弗陵即位前夕以壮年之龄去世。考虑到刘彻为了避免刘弗陵被母族挟制而不惜处死他的母亲钩弋夫人，刘髡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给后人留下了谜团。

这场宫廷变故平息后，大臣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刘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按照皇帝以往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新晋宠臣大鸿胪田千秋与长宠未衰的大司农³⁰桑弘羊一同上书，认为李广利新败，需要巩固西域，防备匈奴，提议继续征发内地士卒，在车师国以西千里之遥的轮台屯田。屯田不只是种地，还要设置都尉、疏通沟渠、修筑亭燧，是一个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

若在以往，这是符合刘彻胃口的。但刘彻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下了一道很长的诏书，反思了过去一段时间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颇有悔过之意。诏书的最后说：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³¹

热衷于开边拓土的刘彻竟然说当今的要务是禁止苛政，不要随便征税，鼓励农民耕种，愿意养马的可以抵消徭役，边疆的安全只要保持现状不要松弛即可。随后，刘彻开始安排后事，外朝，提升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政府首脑以“富民”二字封之，其意味不可谓不长³²。田千秋终于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以及对自己的真正期许；内朝，由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担任大将军大司马，以内朝大臣的身份领衔辅佐刘弗陵。

不久，刘彻死去。

昌邑王国靠近曲阜，儒学氛围比较浓厚。基于夏侯始昌的关系，夏侯胜与昌邑王家可能有些联系，所以也可能对这些宫廷内幕乃至刘彻的风格有所耳闻。目睹了刘彻这些年来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的帝业，身为儒家经师，他对刘彻的评价不会高。

无独有偶，霍光被刘彻委以首席辅佐的重任，也忠于刘彻，但霍光

仅有政客的气质，达不到刘彻的思想高度，也就难以理解刘彻的政策。刘弗陵——汉昭帝即位后，霍光掌权下的朝廷虽然给刘彻立了宗庙，但并没有尊庙号。汉朝仍然只有刘邦、刘恒的宗庙有庙号，分别是太祖和太宗。刘彻只得到了一个“武”的谥号，不得不说，刘彻给帝国留下的创伤太深了。霍光淡化对刘彻的尊崇，也符合刘彻晚年政策转向的意图。

不过，已经成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仍然希望延续旧政策，包括盐铁专卖、对匈奴用兵等。桑弘羊精于理财，热衷为国求利，是刘彻的“好学生”。现在他与霍光同为辅政大臣，两人不可避免地在政策主张和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矛盾。

霍光对儒家没有兴趣，但政敌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桑弘羊主霸道，那就拉拢讲王道的儒生。在儒家看来，国家垄断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当然会反对。当年公孙弘设太学、选儒生入仕，积累几十年，效应显现，儒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于是霍光躲在幕后，让丞相田千秋出面召开了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从郡国选举了六十多位贤良文学也就是经生儒士，到长安与桑弘羊辩论。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论辩，桑弘羊遭到不小的挫折，他所主张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都被取消，霍光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正是在这一时期，夏侯胜被汉廷征为博士，又担任光禄大夫。他日益感觉到，刘彻造成的严重后果，必定使推崇儒家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此时儒家还不足以抗衡霸道，中央的权臣里也没有儒臣，但力量正在快速滋长，必将从霸道的装饰品向真正的王道突破。促使他有这个想法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惊险大事：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名男子进了长安城。他乘坐着黄牛车，打着画有龙蛇的黄旗，身穿黄衣，头盖黄巾，一看就非凡俗人等。果然，他熟门熟路地直抵未央宫北阙，对宫门负责传递信息的官员说：“我是卫太子。”

卫太子？汉武帝的儿子卫太子不是早在十年前的巫蛊之乱里就死了吗？

消息火速传到宫内，霍光、汉昭帝都很疑惑和紧张，毕竟卫太子死在外地，一般人都没见过尸体。民间出于同情，一直流传着卫太子还活着、理应由卫太子继承皇位的谣言。这事儿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后果会很严重，影响到汉昭帝的合法性。

十年前那场政变死的人太多太多了，长安的市民谁不记得呢，消息

不胫而走，数万市民聚集到北阙围观。诏令下达，一面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及以上俸禄的官员去辨认，一面让负责长安戒备的右将军勒兵在旁，防止事变。由此可见，汉昭帝、霍光可能也拿不准卫太子到底死没死。

那黄衣男人对全城的骚动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发表意见或表达诉求。来到现场辨认的丞相御史等公卿官员，看见他如此平静，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那些曾经见过卫太子的人，此时也不敢言说是非。十年过去了，谁敢说自己的记忆准确无误呢？

此刻的气氛极为恐怖，可能，有人振臂一呼，臣民们就把黄衣男人抬进未央宫为皇帝；可能，右将军一声令下，虎狼军士们大开杀戒；可能，支持黄衣人和支持汉昭帝的官民混战在一起……

正在此时，京兆尹隽不疑终于赶到，他来自齐地的渤海郡，靠通晓《春秋》而被选为郡文学，后来被汉武帝的绣衣使者，也就是王莽的曾祖父王贺的同僚暴胜之赏识，得以重用，一路升迁至京兆尹。

隽不疑挤进人群，二话没说，直接喝令左右将黄衣人拿下。

围观的官民大惊，有人悄声对隽不疑说，“是不是真的卫太子还不知道呢，先别急，少安毋躁。”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夏侯胜是博士，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³³

就是说，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术，登上公卿高位佩戴青绶紫绶，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陵八岁即位，二十岁就晏驾了，身后没有子嗣。在霍光的支持下，汉廷迎昌邑王刘贺，也就是刘髡的儿子即位。夏侯胜与昌邑王家有过旧缘，见到刘贺带到长安的旧臣里不乏儒学之士，比如刘贺的师傅就是研治《诗经》的王式，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夏侯胜发现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霍光表面神情自若，但瞒不过夏侯胜的眼睛。或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胜注意到，刘贺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贺的矛盾，王式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诫刘贺。夏侯胜虽然与昌邑王家有些渊源，但毕竟不是近臣，他也想提醒刘贺注意，恰好刘贺乘车出行，夏侯胜冲到御辇前，大声说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³⁴

这句话体现的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天气久阴不下雨，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陛下难道没有察觉，还要到处跑吗？

刘贺非常生气，说这是妖言，下令将夏侯胜拘押。但刘贺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昌邑国的时候，曾连续见到灾异，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无头，脖子以下像是人；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还有一次是大鸟飞集王宫里，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因为他正和心腹、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夏侯胜如何得知？既然不是自己，那只能是张安世泄密了。霍光赶紧去见张安世，责怪他嘴巴不严。张安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纳闷，就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却说，不是从哪里听来的，而是按照《洪范五行传》，天气久阴不雨，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世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还包括了天人合一、灾异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两人都认为，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与张安世果断出手，废掉了刘贺。因为刘贺一直没

去高帝庙告庙，从程序上看，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当然，霍光也没有资格废立，宣布废掉刘贺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刘贺被废，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王式因为曾拿“三百篇当谏书”，用《诗经》劝谏刘贺，从而逃过一死。其实，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贺，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³⁵

汉朝的帝位兜兜转转，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据的家中。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虽然人在民间，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霍光等人将刘病已迎入皇宫尊立为帝，刘病已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询。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可见儒术是何等重要，正是帝王所需。霍光就令夏侯胜以《尚书》教育皇太后，升为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9. 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询即汉宣帝刚即位时，压力也非常大。鉴于刘贺被废，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处处小心，如芒在背。他是刘据的孙子，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据公开平反，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询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胥从刘彻时期就念叨帝位，他养了个女巫，诅咒汉昭帝，汉昭帝果然早死；又诅咒刘贺，刘贺果然被废。听说刘询即位，大为不爽，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³⁶

所以，刘询有必要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

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³⁷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爽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³⁸

“霸道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³⁹。

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 1 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 2 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 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 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 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

亡了秦政权。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 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 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 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 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
- 13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 14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 15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 16 《后汉书·崔寔列传》，第1729页。
- 17 今山西曲沃一带。
- 18 今陕西韩城附近。
- 19 《汉书·五行志》，第1427页。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户口减半，并不是人口减半，而是考虑了脱籍、逃亡，以及武帝时期地方官的虚报。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 20 今陕西淳化附近。
- 21 霍嬭之死很可疑，他是否为献祭被杀，因文献无存，无从探求真相。
- 22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 23 《史记·汲郑列传》，第3106页。
- 24 《史记·龟策列传序》，第3224页。
- 25 王葆玆：《西汉经学源流》，第138页。
- 26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辛德勇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

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没有特殊的“更始”含义。

- 27 今山东泰安宁阳。
- 28 陈侃理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作，见氏著《儒学、数学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9 今山东菏泽巨野一带，当时属于通衢。今山东潍坊仍辖昌邑县，与西汉的昌邑并非一地。
- 30 桑弘羊此时因故从大司农被短暂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空缺，桑弘羊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 31 《汉书·西域传》，第3914页。
- 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2015年12月）第6期。
- 33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9页。
- 34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5页。
- 35 也有一种可能性，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邑王旧臣，比如王吉、龚遂，已主动投向霍光。西嶋定生持此说，见氏著《秦汉帝国》，第321页。
- 36 《汉书·武五子传》，第2761页。
- 37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
- 38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 39 吕思勉《秦汉史》第152页：“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此说太过理想化，霸王之道，不会区分民与吏，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爽，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爽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爽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爽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¹，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爽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爽却忧心忡忡，每次都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爽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饥，或人相食”，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齐地人相食”。²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白蛾群飞蔽日”……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爽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爽却沉痛地答道：

亦极乱耳！尚何道！³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

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⁴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⁵；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爽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⁶。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爽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爽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⁷，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⁸，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⁹，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粉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¹⁰。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¹¹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¹²。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骝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

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骃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骃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骃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¹³，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¹⁴，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

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¹⁵，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讖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讖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讖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¹⁶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讖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讖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¹⁷；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

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动手，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¹⁸，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¹⁹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

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 . 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²⁰。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怨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²¹，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

两人喝着酒，慢慢都醉了，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那亭长估计自以为地方官，比宗室“牛”，就辱骂刘子张。子张也大怒，趁着酒劲，拔剑就把亭长刺死了。

当时的社会风气遵循儒家今文经学的“大复仇”，“大”的意思是“尊崇”，就是尊崇那些对杀死自己父兄的人“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

刘子张杀人之后，竟然逃过了官府的追究，所以极有可能是舂陵侯帮忙脱罪。但是，在“大复仇”观念的驱使下，亭长的儿子却没打算放过

他。亭长被杀时，儿子还年幼，一晃十几年过去，亭长的儿子已经成年，就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前来复仇，杀死了刘子张的弟弟刘骞。

亭长的儿子为什么杀刘子张的弟弟而不是刘子张本人，这一点史书未载。但杀了刘骞，复仇的“接力棒”就到了刘骞儿子那里。刘骞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显，一个叫刘赐，兄弟二人下定决心再复仇，就结交宾客，准备对亭长一家大干一场。结果，事情暴露，刘显被抓。

被抓倒不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刘显突然在狱中死了。

刘显兄弟好歹也是宗室，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很可能是亭长那边使了什么手段，而且，十几年前刘子张杀人可以脱罪，十几年后宗室在监狱里却死了，看来是宗室的地位在持续下坠。刘赐悲愤不已，就和刘显的儿子刘信一同变卖田宅，散尽家财，招纳亡命徒，进入新一轮复仇。

与此同时，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也因为堂弟刘显之死而愤怒，况且，这个仇恨是自己的父亲当年酿下的，不能袖手旁观。他性格和父亲相似，也喜欢结交宾客。于是，一场由刘子张的儿子刘玄、侄子刘赐、侄孙刘信为主导的针对“乡干部”的复仇行动开始酝酿。

为了笼络人心，刘玄以好酒厚待宾客。有一天正在家中聚会喝酒，乡里负责治安的游徼登门，刘玄连忙请他一同喝酒。这些宾客其实都是流氓亡命徒，素日都是和官吏对抗的，看见游徼迟来，有一个喝醉的宾客就唱起歌来：

朝亨²²两都尉

游徼后来

用调羹味！

都尉的官职比游徼大，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早上煮了两个（官大的）都尉，（官小的）游徼来得晚，拿来给汤调味！”

游徼一听，勃然大怒，把这宾客绑了起来暴打数百下，还扬言要追究刘玄的责任，特别是为什么要养宾客，有什么图谋？

刘玄觉得不妙，就赶紧跑到平林县外祖家躲了起来。游徼等官吏不依不饶，把刘子张抓到了监狱里。眼看事情要闹大，为免夜长梦多，刘赐和刘信干脆自己行动，同宾客一起找到亭长的家，先杀人后点火，把亭长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全家都杀了。杀人之后，刘赐、刘信叔侄二人随

即亡命。刘玄为了救父亲，只得诈死，发丧回舂陵，官府这才把刘子张放了出来。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当然，这些宗室也并非个个都像“黑社会”，刘子张爷爷的弟弟一支，就在按部就班地走普通士大夫的道路。这一支比刘子张离舂陵侯的嫡系更远，其中和刘子张平辈的是在汝南郡当南顿县令的刘钦，可惜刘钦死得早，留下三个女儿以及长子刘纁、次子刘仲²³和三子刘秀。刘纁成年后颇有大志，刘秀由叔叔刘良抚养。刘秀名字的来源，据说是他出生时有嘉禾九穗，故而得名，但多半是因为“秀”在当时只是普通而常见的名字罢了。

就在刘子张一家“大复仇”的时候，刘秀渐渐长大，此时王莽已经称帝，但不妨碍刘良把刘秀送到长安入太学，跟随中大夫徐子威学习《尚书》，看起来他们不仅对汉朝灭亡没有抵触，还要努力进入新朝的体制中。当然，进入新朝的刘姓宗室，特别是刘秀这样的边缘支庶，经济已经日渐拮据，他只能和一个姓韩的同学凑钱买头驴，把驴租出去，用租金交学费。

宗室们要么与基层小吏“打成一片”，要么逐渐成为新朝的普通臣民，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若不是后来王莽重大决策接连失误，若不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令天下疲惫，若不是突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关东流民，若不是连南阳郡这样富庶的地方也出现饥荒，连刘秀这样上过太学的人也不得不贩卖粮食，这些宗室将会在历史中慢慢消逝。

汉哀帝死后，继任的汉平帝、刘婴虽然贵为皇帝、皇太子，但其实已经和刘玄、刘秀等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等到灾民揭竿而起，叛乱四处点燃，沉默的宗室们陡然发现，自己

身上的“刘”字，是非常不错的招牌。刘玄、刘縯们这才打出消失了十几年的汉朝旗号，营造出“人心思汉”的悲情气氛；逃亡多年的刘赐、刘信们才纷纷露面并返回故乡；前途无望的刘秀们才会加入兄长的队伍。

但眼下这个时候，这些号称帝系的宗室们，只不过是些在乡村里和亭长斗殴的底层豪杰，或是循例读书力争到“体制内”谋个职位的儒生。从汉廷中央向下看，这类宗室的声音是沉默的。要不是后来刘玄成了推翻王莽的更始皇帝，要不是刘秀中兴了汉室，这些基层治安案件和买驴贩粮之类的杂事压根儿不会被史书记载下来。

史书只会盯着王者。

注释：

- 1 疏广、严彭祖都是公羊博士胡毋子都的再传弟子，同出一师；夏侯胜、夏侯建都传《洪范五行传》；萧望之世传《齐诗》。当然，刘爽也接受过鲁学的教育，和齐学比起来，鲁学没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神学内容。但他鲁学老师就不那么有名了，比如张游卿以谏大夫的身份教过他《鲁诗》，张氏是前面提到过的昌邑王的老师王式的弟子或徒孙，但张氏本人无论是名气还是官职均与夏侯胜等无法相比。《后汉书》里还记载高嘉也教过刘爽《鲁诗》，此人连事迹都没有留下。
- 2 《汉书·元帝纪》，第280、282页。
- 3 《汉书·京房传》，第3162页。
- 4 《汉书·韦贤传》，第3130页。
- 5 汉惠帝应该只在长安有庙，而汉文帝则在各郡国都立庙；汉武帝在长安有庙，在他巡游过的郡国有庙。
- 6 《汉书·韦贤传》，第3116页。
- 7 三种类别的概括，见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第五章。
- 8 袷，就是合。袷祭涉及的立庙、毁庙等制度较为复杂，此处简略概括，姑不赘言。
- 9 史皇孙是汉宣帝的父亲，但没有当过皇帝，所以袷祭的时候可能不会摆进去。
- 10 这里说的五帝，和逐渐形成的“三皇五帝”的五帝颇有不同，是秦地本土神祇。而刘邦选择黑帝，是为了继承秦的“水德”，因为水德尚

黑。

- 11 东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八神是今天山东地界的八个神，包括天、地、阴、阳、日、月、兵和四时；房中大概是房子的神，堂上大概是门神灶神一类。
- 12 此事不载正史，见《西京杂记（外五种）》卷二，第19页。
- 13 《汉书·礼乐志》。
- 14 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汉成帝“绥和改制”具有强烈的实际意义，但考虑到汉成帝很快去世，这一改制在当时应该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 1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
- 16 《汉书·谷永传》，第3467页。
- 17 居延汉简有“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的简文。转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
- 18 有观点甚至认为，这场改制是刘欣的帝王权术。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一文推断，刘欣故意开启此次改制，又故意在一个月后以改制无效果的名义取消改制，目的就是证明儒家关于汉室中衰的讖言是错误的；见《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此说缺乏足够史料支持，但刘欣从头至尾把控改制的看法是妥帖的。
- 1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10页。
- 2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32页。
- 21 刘子张年轻时，当时的舂陵侯可能是刘敞的父亲刘仁。
- 22 亨，即烹。
- 23 刘仲应是没有留下姓名，刘仲就是刘家老二的意思。

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

王者德泽

旁流四表

则白雉见

——《春秋感精符》

一、仓促之夜¹

1．政治的决断时刻

再受命的努力失败后，不久刘欣就死了。

回到刘欣之死的那天晚上……

守着皇帝的遗体，拿着传国玉玺和绶带，董贤握有了至高权力的象征，成了此时此刻未央宫里最具权势的人。他对自己下一步的使命或许有所领悟。这是他封锁消息，不愿意让太皇太后出来主持局面的原因。

更何况，他身上那一串头衔，各个都掌握着重要权力：

高安侯是爵位，说明董贤是汉朝的上层贵族，有食邑，能世袭。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首先得成为太子，或是被封侯封王。当年汉宣帝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承大统，就是先被封为阳武侯，当天即以阳武侯的身份登基。

大司马，原是西汉初期和丞相、御史大夫并称的太尉，后来改名为大司马；最初是内朝加官，汉成帝时期改为正式的外朝官、“三公”之一，汉廷名义上掌管军事的最高文官。在刘欣的前任成帝、元帝时期，大司马“全权”代表汉帝处理实际政务，权力极大。

卫将军，是掌握部分军权特别是禁军的将领，这意味着董贤拥有调动长安城军队的权力。

领尚书事，并非官职，而是指董贤拥有管理“尚书”的职权。汉朝的尚书，不是后来三省六部制下“尚书侍郎”的政府部级长官，而是类似于“中办秘书”的内廷吏员，职位虽低，却是皇帝身边人，能够亲身参与

政事并代表皇帝传达命令，“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所以，外朝的高官如果不能“领尚书事”，权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董贤的这个差事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决策中枢事务，代表皇帝发号施令。

还有，此时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基本都是董贤的人：昭仪董氏，是董贤的妹妹；父亲董恭是卫尉，掌管着未央宫宫内和宫门的保卫；内弟是执金吾，掌管着未央宫宫外的保卫，这些都是中枢要职。此外，董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许多郎、曹之类的朝廷中级官员的位置。可以说，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由此看来，刘欣对董贤确实有肉欲的欢喜，是“真爱”。既然刘姓天命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把天下禅让给最爱的人，不好吗？

总之，在刘欣晏驾后的这个夏夜，董贤凭借玉玺、职位和家族实力，成了未央宫暂时的主人。他还封锁着刘欣的死讯，把握着先机。

既然消息被封锁，王氏姑侄是如何知道的呢？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皇帝之死显然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刘欣活着的时候，像一个陀螺的中心，维持着他身边各种利益集团、私人恩怨、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一旦身死，这个平衡不复存在，变成一团混沌。

董贤如果确有政治品质，就应该意识到身为先帝宠臣，自己早就是各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绝无超脱的可能。因此，在宫车晏驾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儿之前，他应该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以领尚书事的便利封锁消息、发号施令，以左将军之命密调军队，以大司马的身份召集并稳定外朝大臣，捕杀王莽，软禁王政君，即使不成功，历史也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但他似乎并不具备政治品质，也没有政治能力，既不缜密，也很延宕。他都没有留意到，此时围在刘欣遗体身边的，有一个姓王的人。

王闳是王莽的叔伯兄弟，也是刘欣的旧知。因此，王氏家族虽然失势，他依然被提拔为中常侍，成为刘欣的侍从。王闳是汉室忠臣，曾经专门向刘欣上书谏诤不要宠信董贤²。刘欣在宴会上说要禅让给董贤时，

群臣震惊而不敢言，唯独王闳站出来，说了一番“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天子无戏言”的道理，使刘欣非常难堪，董贤更觉惶恐。

王闳不是大人物，但拥有董贤不具备的政治品质，他觉察到刘欣有把天下交付给董贤的意图，果断做了一件事：

悄悄去长乐宫禀报姑妈太皇太后。

按汉代的“两宫”制度，皇帝与皇太后分居未央宫和长乐宫，俗称西宫东宫。皇太后一般不去西宫，皇帝应定期去东宫朝见。一旦皇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就意味着有重大事件。

得知皇帝晏驾，王政君一面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未央宫，一面马上派人去王莽的宅第，让王莽迅速准备进宫。

于是，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夜，太皇太后迅速驾到未央宫，在宣德殿扎下分庭抗礼的阵势，令董贤措手不及。局势逐渐变得明朗了。

有太皇太后为后盾，王闳持剑走到董贤面前，不无威胁地呵斥道：

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³

王闳太咄咄逼人了，竟然说出“待祸至”这样透露杀机的话。

从王闳的呵斥中，可以知道在这宝贵的决断时刻里，董贤什么都没有做：没有挂印称帝，没有以大司马的名义召集群臣廷议新皇帝的选拔，也没有号啕大哭以表达忠臣和爱人的痴情。他只是拿着玉玺和绶带，毫无作为，拖延迟钝，直至王政君到来。

事实上，即使如此，董贤仍然可以借助传国玉玺和皇帝遗言怒斥王闳胆敢带剑入宫，令士兵将其拿下。未央宫里都是自己的族人，囚禁王政君也并非不可能。

但缺乏政治能力的董贤竟然乖乖地“跪授玺绶”，放弃了一切行动，将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王闳，再转呈太皇太后。

董贤大概觉得自己既没露篡逆之心，也没有夺权之实，何罪之有呢，将玉玺交出去能够保一家老小平安。他哪里知道，王闳把这团政治的混沌劈开之后，黑与白、是与非、敌与友也就分清楚了。董贤如果想保自家平安，又不去铲除敌人，那全家的安危就只能视敌人是否宽容

了。

《左传》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况且董贤所怀的不是什么别的璧，而是传国玉玺。

董贤虽然失去了传国玉玺，但爵位官职都还在，未央宫里遍布董氏族人，太皇太后绝不会感到安全，于是召见了董贤。

在未央宫前殿东厢，老练的王政君满怀关心地询问董贤，如今皇帝晏驾，你作为大司马，是主心骨，下一步怎么办？特别是丧事打算怎么办理？

董贤“内忧，不能对”⁴，心乱如麻，说不出所以然来，加之太皇太后是国母，他按照礼节摘下冠冕，向王政君表达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歉意。

这正中王政君下怀，她语含尊重地说，王莽以前也是大司马，曾经办理过汉成帝的丧事，有经验，“吾令莽佐君”⁵。一个“佐”字，令缺乏经验的董贤或许觉得如释重负，也无法拒绝，马上“顿首幸甚”⁶，一边行礼一边说“那太好了”。

于是，王政君立刻将早已准备多时的王莽请入未央宫。

王莽一入未央宫，犹如池龙入海。

2. 乏味的政变

夜未央。

比董贤更加熟悉未央宫权力机制的王莽，入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废掉董贤所有的合法权力，哪怕董贤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权力。合法的权力需要合法的方式去废除，王莽按照程序，找了一个尚书弹劾董贤。

弹劾的理由是现成的：皇帝病危期间，董贤身为大司马，没有亲自照料皇帝的病情。

换言之，皇帝因病晏驾，董贤负有领导责任。

有了弹劾，就得有回应。王政君下令禁止董贤出入未央宫司马门，司马门是未央宫四面的门，这意味着董贤被剥夺了出入未央宫的权限，他那“领尚书事”的差事也就失效了。与此同时，王政君还为王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⁷

她让王莽接管了董贤大司马卫将军的职权，把持了兵权、代表未央宫接受百官奏事之权、未央宫内的安保权。那些在内外朝担任大小职务的董氏族人，也一并被罢免驱逐。

至此，董贤掌握的政治资源只剩下一个于事无补的高安侯和空有头衔的大司马。他本来只是一只猫，不是老虎，现在猫指甲也被拔了个精光。

董贤不知所措，“诣阙，免冠，徒跣谢”⁸，脱去冠冕和鞋子，在王政君面前光脚求饶。

仅仅几个时辰，一场可能剑拔弩张实则平淡无奇的政变就这样以王氏家族的胜利告终。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敌人，王氏家族没有显示出怜悯，而是马不停蹄地彻底消灭。这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惯性，也因为王氏家族对刘欣实在恨之入骨，刘欣的宠臣又怎么会被放过呢。

董贤求饶后，王莽立刻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他大司马一职，册书写道：

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⁹

罢免三公总需要合适的理由，董贤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司马在满朝元老们看来，不过是刘欣的一只宠物。所以除了前面几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的泛泛而谈外，根本不需要什么实际的理由，政变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令人乏味。“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就是说董贤还是一个孩子啊！

董贤接受了册书，把大司马印绶交给了汉廷使者，乖乖地回到位于北阙的居所。

北阙可不是长安的普通地段。中国古代的首都与现代不同，简单地说，那是皇宫以及为皇宫服务的建筑的组合。北阙是最靠近未央宫、由高官贵戚居住的一片聚居区，被称作“北阙甲第”。而董贤的房子，算是豪宅中的豪宅了。

刘欣生前曾经命令专门给皇帝造宫殿的将作大匠给董贤修宅子，有趣的是，这位将作大匠是刚刚提拔的董贤的岳父。据说，这幢房子“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绋锦”¹⁰，“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

灵水怪。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¹¹，拥有宛如皇宫一般的层层华殿，墙壁柱子上画着烟云缭绕，有的柱子和门槛用丝绸锦缎包裹，面积也大得很。

就是在这幢豪宅里，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天，董贤和妻子自杀了。

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想尽快息事宁人，避免灾祸。董贤父亲董恭连夜将董贤夫妇下葬。董贤确实具有连夜下葬的硬件条件，因为刘欣早就在自己的帝陵旁边给董贤挖好了陪葬墓。当然，这坟墓也与北阙的豪宅一样奢华，“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累恩甚盛”¹²，竟然使用诸侯王以上才会使用的黄肠题凑，而且盘桓数里，地上建筑也很庞大。

但王莽连死人都不放过。

王莽显示出他性格中细致又多疑的一面：怀疑董贤诈死。还没有正式职务，只是作为皇帝后事主持人的王莽，立刻派人挖开董贤的坟墓，看埋进去的是不是本人。确认无误后，王莽这才向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大司徒孔光报告发掘结果，倒是让后人一窥董贤坟墓的奢华：

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¹³

“至尊无以加”，再次显示出刘欣对董贤成为继承人的寄托。可惜，这种寄托连地下也无法实现了。董贤的尸体被剥光衣服，草草埋在监狱里。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等人全部流放到合浦，当时的合浦靠海，在西汉是遥远的边境。

董贤的家人被流放那几天，长安的平民们纷纷聚集到董贤的豪宅，一边假装哭泣，一边趁乱盗取财物。为什么？只看一个数据就知——董贤的家产被朝廷变卖了43亿钱。

董氏家族自此从长安的舞台上消失了。

此后不久，董贤从前照顾过的大司马府的小吏，名叫朱诩，从大司马府主动辞职，自费购买棺木衣服，到监狱里挖出董贤的尸体，穿衣入棺埋葬。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之举。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仅不会怪罪，偶尔还会对这类人进行表彰，以显示掌权者的大度和对一种私人忠义的弘扬。

但王莽听说后勃然大怒，找了个罪名杀了朱诩。

这一举动颇显不近人情。董贤究竟何罪之有？或者说王莽对董贤的刻骨之恨从何而来？

3．太阳似乎照常升起

刘欣晏驾第二天，六月己未（公元前1年8月16日），太阳照常升起。

长安和往常一样，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城内也是熙熙攘攘。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多是长安城的居民，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往西北方向走的，多是商贾和游客，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这天，未央宫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之所以高，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天下人来到长安，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宏气势所震慑。

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渡过，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再平淡无奇的政变也是仓促而紧张的。王政君、王莽姑侄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早上，群臣毕至，内外咸集，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太皇太后临朝，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未央宫前殿。

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在皇帝突然死去、刘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是王氏家族挽救了国祚，保卫皇室安全，渡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

面对群臣，王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第一，重新担任大司马，合法掌握朝政；第二，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第三，处理刘欣的丧事，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欣议谥号，尽快将其下葬。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权变措施。太皇太后于是下诏：

公卿举可大司马者。¹⁴

这里的公、卿，应不是泛指，而是禄位达到“卿”以上的官员。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确属众望所归。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王政君也就敢公开选拔。

此诏书一下，“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¹⁵。有孔光带头，“举朝皆举莽”¹⁶，这是王氏家族乐见的局面。

孔光，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元帝的时候就已入仕，现在六十多岁了。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是汉朝政府的首脑。孔光在元帝、成帝期间，仗义敢言，仕途几经起伏，名声一直很好，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虚与委蛇。

例如哀帝时期，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刘欣拜董贤为大司马之后，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是名义上的同僚，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为了抬举董贤，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试探朝野反应。孔光则揣摩上意，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看见董贤的车来了，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地迎接，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不像是和同僚交往，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

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但孔光当年能够曲意奉承董贤，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这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对方为大司马。何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大司空，位列三公，与公孙禄又是朋友。互相举荐，是因为两人商量过：

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¹⁷

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他俩宣称：以往吕后、霍光、上官桀父子等外戚秉政时，国家都一度陷入危亡。现在成帝、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说明外戚势力太过强大。当前又在选立皇帝，就不该再让外戚来当大司马，而应“亲疏相错”，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戚的大臣来担任，才是为国之道。

单看这段史料，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要么是昧于时势。其实都不然，从与王莽的交往看，他俩确实属于公忠体国的大臣。

比如何武，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资历很深，几经宦海

沉浮，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后转任前将军。王莽曾辗转请何武举荐他为太常，何武没答应。多年以后，何武被王莽逼迫自杀。公孙禄，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但在廷议时当众批评王莽，被逐出朝堂。

何武和公孙禄的举动，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汉书》记录下这件事情，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政的先知。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反对者不是没有，却是少数。

尤为难堪的当数王政君。

六月庚申（公元前1年8月17日），她索性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不顾忌她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而何武、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了大司马的职位，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刘欣晏驾一个月后的七月，王莽选择了时年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汉平帝。

箕子幼小，颇有人认为这是王政君、王莽姑侄俩特意遴选的傀儡皇帝。但大概率并非如此，选择箕子是按照皇位继承顺序来的。

前番曾说，汉成帝、刘欣都没有子嗣。那么皇位继承人只能从汉元帝的后代里寻找。汉元帝有三个儿子，嫡子是汉成帝，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定陶恭王的儿子就是刘欣；另一个妃子冯昭仪所生的是中山孝王，中山孝王的儿子就是箕子。

刘欣和刘箕子按照辈分是兄弟，照理说不应“兄终弟及”，但汉元帝的后代里已经没有再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了。后来，王莽进一步向朝野说明，箕子所继承的是汉成帝，而不是刘欣，在祭祀上更加视刘欣不存在。

箕子从中山王升格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应该入朝，他的舅舅应该担任大司马等重要职位，就像刘欣即位时那样。但恰恰考虑到刘欣即位后封赏本家外戚，把王氏家族一脚踢开，王氏家族做了充分准备。

王莽的做法是：中山王升格为皇帝，王位空缺，就另选了一位宗室刘成都当中山王，代替箕子奉祀中山孝王。这样的话，朝廷就有理由继续封箕子的母亲为中山王太后，令她留在中山国，不得来到长安当皇太后。

九月，距离刘欣晏驾整整六十四天，箕子正式即皇帝位。当日大赦

天下。箕子孤身入朝为帝，母亲舅舅都不在身边，形成了王政君临朝、王莽执政的局面。这将是汉朝残存岁月的基本政治格局。

自此，王莽可以从容清理朝廷上的异己。他对何武、公孙禄以及刘欣时期上位的外戚、新贵等罗织定罪，但并不出面弹劾，而是力捧主持外朝的孔光，拜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让孔光按程序奏请王政君处置。

王莽在幕后，孔光在台前，王政君“秉公办事”，朝廷气氛为之一变，王氏家族牢牢把控了汉廷大权。

至此，前朝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只剩下给刘欣议谥号了。刘欣的遗体已经停放了两个多月，确实需要抓紧下葬，而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把谥号书写在谥册上放入帝陵随葬。

按照汉制，帝王崩殂后，要由新皇帝和大臣一起议谥。鉴于一是刘欣在位期间王氏家族吃尽了苦头；二是刘欣宠信董贤，屡杀重臣，大臣们对他颇有非议；三是新皇帝并非刘欣的子嗣，又是个孩子，刘欣的谥号可想而知。

和后世谥号的虚饰相比，西汉皇帝的谥号和庙号大都会比较认真地议定，也相对符合皇帝生前的行为。庙号只有足够资格的皇帝才配拥有，此时只有开国皇帝刘邦、以旁支身份承继大统的汉文帝刘恒、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刘彻拥有庙号，连平息了“七国之乱”的汉景帝和号称中兴的汉宣帝都没有庙号，所以刘欣不可能有庙号简直是一定的。多年以后，王莽给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均立了宗庙并追认庙号，唯独越过了刘欣，切齿之恨昭然若揭。

至于谥号，高皇帝以来几个皇帝的谥号都不错，按照顺序依次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唯独到了刘欣，谥号被定为“哀”。

这个“哀”字着实扎眼。

严格来说，“哀”倒不算恶谥，而是中谥。谥法里说：“恭仁短折曰哀”，主要表达一种追思哀悼之情，也符合刘欣短命的实际。但刘欣的“欣”字恰恰是“喜”的意思，以“哀”志“喜”，总归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汉哀帝下葬后，至少表面看来，汉朝空前的政治危机已被王莽化解。很多臣民发自内心认为，若非王莽在决断时刻处置了董贤，并择立

新帝，还有谁能稳定这个政局呢？

注释：

- 1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
- 2 《汉纪》卷二十九，第513页，中华书局，2002。
- 3 《后汉书·张步传》，第500页。
- 4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 5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 6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 8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 9 《汉书·董贤传》，第3739页。
- 10 《汉书·董贤传》，第3733—3734页。
- 11 《西京杂记》卷四“董贤宠遇过盛”，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31页。
- 12 《汉书·董贤传》，第3734页；罽毼，音浮思，和门阙配合使用的屏风。
- 13 《汉书·董贤传》，第3740页。
- 14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 15 《汉书·王莽传》，第4044页。
- 16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 17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二、安汉公是什么称号

4．千年周公今又来

箕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年。

西汉自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年号怎么取、几年改元等一直比较

有规律。新皇帝即位的年号，一般都会体现“开始”的意思，箕子的“元始”也不例外，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王莽的雄心壮志。

就在元始元年春天的正月，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的祥瑞。

有一支据说来自极为遥远之地的蛮夷，自称“越裳氏”，在益州牧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朝贡，并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

雉，大概就是野山鸡之类的大鸟。不过在当时人的眼中，雉和凤凰似乎区别不大。当这三只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出现，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因为，雉的出现本身就是祥瑞，《春秋纬·感精符》里说：“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意思是说，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雉的是什么人了。

越裳氏，据后人考证，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遥远到需要经过“重译”也就是若干次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成王时期，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成王，而是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¹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

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²。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³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

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 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⁴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周朝的“周”，是因为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开创基业，因此国号为周。⁵而周公的“周”，也是因为他“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⁶，所以包含了国号的意思。

周公的“公”，是因为他乃王室执政大臣，所以尊称为“公”，也可能是周地的公爵⁷。周公封在鲁，但他始终没去⁸，而鲁国是侯国，所以“公”与鲁国没有直接关系。

“安汉公”正是要模仿“周公”的称号。此时的汉朝，还没有施行“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所以安汉公的“公”是尊称，“安汉”则包含了汉的国号，简单地说就是与“周公”相伴的“汉公”，鉴于王莽的功德，加上一个“安”字，所以是“安汉公”。

汉朝的皇帝为“汉皇”“汉天子”，刘邦在称帝之前是“汉王”，那么“汉公”的称号有多么尊贵，可想而知。

尊号的规格如此之高，王莽前后推辞了六次，先是婉拒，宣称安汉的功绩是大家的，可以封孔光，不必封我。群臣坚持未果，就抬出王政君下诏，王莽索性称病不上班。为表示公平，王政君下诏封了孔光等四个大臣，已封侯的“升职”，未封侯的封侯，但王莽仍然不上班。无奈，王政君只好直接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并听取群臣的呼吁，把萧何的旧居赐给了王莽。

赐萧何的旧居，也是尊崇的一大手段。萧何在刘氏皇族的叙述里，不仅是高皇帝的宰相，而且是刘氏的恩人。汉景帝称他“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就是说萧何与高皇帝共造基业，堪称合伙人；汉武帝离汉初那么多年了，还说“朕报萧相国德”⁹。所以，萧何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仍然葆有爵位的人，中间世系几次断绝，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封，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对于汉廷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¹⁰

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王莽在两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今人尚且颇觉感动，何况古人？

对此，王政君下诏答复：那就暂不封赏，但对王莽的日常俸禄赏赐加倍，等待天下家给人足时再赏。

由此亦可知，当时人们谈起“百姓家给”，似乎不是“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之类的终极理想，而是不久之后就能看到的场景。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还给天下人带来即将实现万世太平的期望。再加上“谦让”，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戴。

后人习惯于把王莽当安汉公视作“篡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怕是一种后见之明。在当时，仿效周公说明王莽向善、有理想有道德，引起的是赞美。须知，霍光宣称受汉武帝的遗命秉政，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拿出了一幅“周公负成王”的画。霍光说这是汉武帝所赐，以证明自己是

受命照顾年幼的汉昭帝，承担周公之责。尽管上官桀等人当时就称这幅画是霍光伪造，后世史学家也颇多怀疑，但没有证据。而且，霍光并没有篡夺汉朝的皇位，背负成王的周公也就不可能和篡权沾上边儿。

同理，在王莽被群臣上安汉公的尊号时，群臣所能想到的，近是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远是周公辅佐成王的传说，朝野基本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即使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王莽有取而代之的嫌疑，也只能说是大势所趋、时代使命，难说是王莽的主观意图。

有一个小小的波澜，被不起眼地记录在史书里：汉哀帝下葬后，陵墓称义陵，按照当时“前殿后寝”的制度，陵墓旁边有祭祀的前殿，也有供亡灵休憩的寝殿。王莽成为安汉公后一个月，义陵的陵寝令，也就是管理汉哀帝陵墓的官员，急忙报告了一个惊悚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汉哀帝的衣冠还在寝殿的盒子里放着，第二天早上，那衣冠自己跑到床上来了！

王莽对此十分惊讶，马上安排祭祀以最高规格的太牢，试图平息亡灵的愤怒。

汉室的亡灵怎能不愤怒？刘氏筭路蓝缕，劬劳功业，贤君辈出，怎么就走到需要外戚来“安”的地步？

注释：

- 1 《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二章，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第172页，中华书局，2020。
- 2 《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尽心下》：“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五百年后，约略等于王莽秉政之时。
- 3 《汉书·王莽传》，第4046页。
- 4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 5 《史记·周本纪》正义“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第111页。
- 6 《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注，第1515页。
- 7 周公的“公”，可能既是采邑在王畿之内的“周”的公爵，又是作为周王室执政大臣的尊称。
- 8 以往有学者认为，周公次子世代继承周公之位；长子伯禽封鲁，所

以鲁国的开国封君是伯禽。但是《史记》等明言周公封鲁，且以欧洲封建制度为参照，一个贵族可以同时拥有国王、公爵、侯爵等多个称号，所以周公封鲁依然较为可信。

9 两引见《汉书·萧何传》，第2012—2013页。

10 《汉书·王莽传》，第4048页。

第三章 王氏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

坏决高都，连境外杜

土山渐台，像西白虎

——汉成帝时歌谣

一、王氏之兴自凤始

1. “种马”王禁的一生

魏郡元城县¹的王禁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但他因为好色，与众妻妾生养了十二个成年子女。于是，这个刚从外地搬迁到元城县的基层官吏家庭，在一代人之内膨胀成足以颉颃皇族的大家族。

王禁出生在汉武帝年间，年轻时曾到长安学习法律并踏入仕途，在廷尉府担任廷尉史。当年李斯“焚书”之后，严禁私学，想要入仕的人只能“以吏为师”，除了法律条文之外什么也不许学²。通过学习律法条文入仕，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汉朝。

在廷尉府这个兼有司法和审判职能的中央机关里，廷尉史是一个普通但很有前途的低级官员。王禁如果想上进，可以效仿他的前辈杜周，只要不怕得罪皇亲权贵，亦不怕杀人，穷治几个大案要案，那么从廷尉史一路升到廷尉乃至御史大夫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王禁不同，他对此并不看重，很快就告别仕途返回家乡。元城县在当时是黄河渡口，属于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理应不错。

《汉书》说：

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³

就是说，他有更大的志向，因此对仕途并不看重，也就不需要在外人面前当道德君子，好酒好色，多娶侧室。这里的“大志”指什么，史书没有交代，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比做官更有吸引力的宏大志向，大概是延年益寿、长乐未央、服食升仙之类。

西汉时的庄园已经很舒适了，在这富庶的地方，筑起连片的房屋，装饰红色的漆器，架起漆屏风，悬挂丝绸帷帐，用精美的博山炉熏香，吃的喝的都由庄园生产，奴婢日夜服侍，这样的日子难道不舒服吗？

于是王禁生了又生，有四女八男成年，考虑到当时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水平，堪称奇迹。

魏郡的李亲是王禁的前妻。这十二个子女里仅有次女王政君、长子王凤、三子王崇由她所生。据说，李亲对丈夫娶了如此多的妾感到不满，就像其他汉朝女人一样，与王禁离婚，改嫁河内郡的苟宾。《汉书》称她“妒”，实在是对女性尤其是西汉的女性缺乏体谅。况且，当时妇女改嫁十分平常，尤为典型的是汉景帝的皇后王娡，已经在民间嫁人且生育一女后，又改嫁时为皇太子的汉景帝，最终生育了汉武帝刘彻。

改嫁之风如此，妒与不妒，有什么可讥议的呢。

不过，在这桩汉代基层县域的寻常婚姻里，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祥瑞：李亲在怀王政君时，梦见有月亮进入自己怀里。

这件事情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合理的解释是王政君贵为天下母之后，李亲自己说的。考虑到汉朝百姓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梦见月亮这件事应该不是杜撰。

月是太阴，也就是太阳的配偶。史书把这件祥瑞记录下来，梦见月亮就成了后妃的祥瑞。

在此之前，西汉的皇后们在微贱时多少都会有一些接近祥瑞的事，有的仅仅是相面或望气，比如汉文帝的母亲薄皇后，相士见了她说“能生天子”；比如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幸河间时，有术士“望气”说当地有奇女，汉武帝才将她找来。有的只是巧合，比如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原本是皇宫宫女，被吕后选中赐给诸侯王，窦氏想分配到赵国，因为离家近，就特意和管事的宦官打了招呼，结果宦官忘了，把她分到了代国，窦氏被迫去了代国，却阴差阳错成了代王的妻子，而代王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所以，李亲梦见月亮而生王政君这件奇事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与之相似，传说王政君小时候在家纺织，有只白色的燕子衔着一枚指头大的白石从她头顶飞过，巧了，那石头正好掉进她的纺织筐里。王政君拿起石头，石头“啪”的一声裂为两半，上面写着“母天地”三个字。

王政君觉得这块石头很宝贝，就好生收着，把它叫作“天玺”。好像

是上天给她的命运盖了一个印戳⁴。

另一件事情则有些诡谲。

王禁不是魏郡的土著，他的父亲王贺原本是济南郡东平陵⁵人，距离魏郡有250公里左右。汉武帝时，王贺算是个有些名气的人物，因为曾担当汉武帝的绣衣直指御史。绣衣御史，顾名思义，就是穿着“绣衣”以表示身份特殊的按察执法人员，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在西汉，绣衣御史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他们不是常设官员，但拥有皇帝亲授机宜的荣耀和对所巡察地区大小官吏生杀予夺的特权，是皇帝用来恐吓臣下、可以不走法律程序而杀戮的特务人员，属于那类极不受欢迎的专制工具。

王贺的同僚暴胜之在担任绣衣御史期间，执法极其严格，对郡守级别的地方最高长官“二千石”及以下官吏毫不心软，稍有过错即斩杀，“连坐”的士民也不放过，“大部至斩万余人”⁶。汉武帝时期据说全国户口减半，除了战争、饥荒和逃亡，动辄斩杀万余人的案件当存一份“功劳”。

王贺的风格却完全相反，对当地的官吏能放一马就放一马，以至于放纵得太多，被认为不称职而免官。王贺对此并不以为然，说了一句：

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兴乎！⁷

挽救千人生命的功德，就能让后世子孙封侯。佛教兴盛之前，这种祸福神鬼的思想已经很普遍，也是汉朝人笃信祥瑞或灾异的观念基础。而王贺认为自己至少救了万余条命，封侯岂足道哉？

王贺免官；暴胜之升官，后来官至御史大夫，在“巫蛊之乱”时因一桩小事被汉武帝逼迫自杀。

需要留意的是，王贺所按察的地区恰恰就是魏郡。他的这种执法方式，当然会在当地赢得口碑。所以，王贺在故乡东平陵与人结怨后，就会想到举家搬迁至魏郡以躲避灾祸。

于是，王贺搬迁到魏郡元城县的委粟里，还担任了“三老”。委粟里，顾名思义，是“堆放粮食的闾里”，可能就是粮仓所在的社区。既然所居是县城社区，王贺又曾经是中央官员，推测他所担任的三老也应该是地位更高的县三老而非乡三老⁸，成为元城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西汉的三老往往由德高望重且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担任，王贺作为一个外来户，居然担任三老，颇能说明他在魏郡确实比较得民心，已经是魏郡人民的“老朋友”。

王贺的搬迁属于脱籍迁徙，在当时，一般百姓根本无法自由迁徙，王贺多半利用了他中央和魏郡的人脉⁹。

诡谲之事就发生在元城县。

元城县有个人叫“建公”，这个名字听起来应是本地有声望的“父老”，他对王贺说：春秋时，元城属于晋国。有天，附近的沙麓山忽然崩了，晋国的史官就认为，沙麓山的崩坏是因为“阴胜于阳”，预示着从山崩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这里将有圣女兴起。

这番话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春秋·僖公十四年》的确记载了“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的事情。

鲁僖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46年，往后数六百四十五年，真巧，正好是汉哀帝晏驾这一年。

从后世角度看，把沙麓山崩与王政君成为圣女勾连起来，时间跨度过于精准，显然是事后的伪造。而且西汉之时，大家对《春秋》最为尊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对沙麓山崩的解释，认为是齐桓公将死，宋襄公将败，由诸侯主持天下大业的“霸道”将出现危机，丝毫没有提到什么阴阳、圣女之类，甚至连晋国的史官也没提到。《穀梁传》也是如此。

这就是此事的诡谲之处。多年以后，王莽已经改朝换代，以“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为尊号的王政君去世。王莽让他的老朋友、大文豪扬雄做了一篇谀文，其中一句是：

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¹⁰。

只提到两个祥瑞，也就是王政君的母亲梦到月亮和沙麓山崩这两件事。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眼中，这两件事是真真切切发生，且奠定了王政君成为圣女基础的祥瑞。后人信与不信，又有何意义呢？

要进入王氏家族的历史世界，就得先进入汉朝普通人的观念世界。

对汉朝人来说，祥瑞就是上天显现的神迹，既然王政君能够从一名民女成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直至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那么她崛起的这个事实就一定会有祥瑞，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明没有找到或是缺乏对神迹的敏感。

2. 幸运的王政君

李亲为王禁生完三个子女后，就改嫁了。

没有母亲的言传身教，王政君的性格也与母亲不同，她“婉顺得妇人道”¹¹，性格柔软、温和，是那类对丈夫言听计从、比较缺乏个性的女人。长大之后，王禁开始考虑女儿的婚嫁问题，但诡异的是，他把王政君先后许嫁给两个男人，其中一位还是诸侯王¹²，但这两个男人都在迎娶之前突然去世。

无独有偶，汉宣帝晚年的皇后王氏，也就是王政君的婆婆，年轻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故久不行”¹³，每次许嫁，许给谁谁死，直到后来汉宣帝将她召入后宫。这里需要多说一句，此王皇后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两人郡望不同，也没有血缘关系。

汉朝的人均寿命不高，死人很常见，所以一个女人许嫁的男人接连死去，似乎也不是非常奇怪。但考虑到有的女人日后嫁给了皇帝，那么接连死去的男人就成了这个女人被上天别有眷顾的证明。

王禁感到很奇怪，恰好他有个熟人会看相，叫“南宫大有”，就邀他给王政君相面。南宫大有仔细相了一下，神秘地说：

贵为天下母¹⁴。

在班固笔下，南宫大有只说“当大贵，不可言”¹⁵；到了王充笔下，则明说“贵为天下母”。知道女儿未来尊贵的命运，王禁才关注到性格柔顺的王政君，开始教她读书、写字、鼓琴。

等到她十八岁时，经由魏郡都尉，正式送入掖庭，但“为家人子”¹⁶，仅仅是一名宫女。在汉朝，普通人家把女儿送进宫以谋求全家富贵的事情很多，但女孩子们绝大多数要么老死宫中，要么人老色衰出宫嫁人，能够飞黄腾达的凤毛麟角。

谁都知道，没有王政君，王莽就不可能走到历史前台。王莽再有能耐，再勤奋刻苦，儒学素养再高，也比不上姑妈恰好嫁给了皇帝这件事。与那些可怕的后宫争斗相比，王政君却仅凭幸运，顺利成为天下母。其幸运之大、之多、之重，令人不得不相信上天的确会降下祥瑞。

入宫之初，王政君只是个后宫的宫女，既没有绝色美貌，也没有出众才能，与太子更无任何理由建立关系。

说到太子刘奭，他现在正宠爱着司马良娣。

刘奭性格柔弱。父亲汉宣帝是一位经历传奇的雄主，对这个儿子并

不满意。但刘爽的生母许皇后是汉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妻子，两人同舟共济，感情极好。许皇后后来被霍光家族毒死，汉宣帝十分悲伤，对他俩唯一的儿子刘爽也就多了一份容忍。

司马良娣之不幸，恰如王政君之幸运。

司马良娣宠信未衰，忽然得病将死，死之前，她告诉太子，自己的死并非天命，而是太子其他的妾嫉妒她，诅咒她死。司马良娣一去世，太子极度恼火，闷闷不乐，喜怒无常，乃至发起病来。他相信司马良娣的话，把怒气播迁到其他妾身上，一个人也不见，更别说“造人”了。

汉宣帝却需要太子“造人”，就令王皇后从后宫挑一些宫女送给太子，以表示安慰。

王皇后大概以自己作为挑选标准，不必太美貌太精明。“婉顺得妇人道”的王政君幸运地进入皇后的视线。皇后一共挑了五名宫女。不久，太子来朝见皇后，皇后就让这五个人上来，坐在太子面前，又悄悄叮嘱自己的侍从女官长“长御”观察太子喜欢哪个。

太子哪个都不喜欢，他仍然喜欢死去的司马良娣，而且尤其不喜欢别人为他挑选的女人。

但那毕竟是皇后，太子只得勉强说：“这里面的一个就行吧。”

这里面离太子最近的人，那天恰恰穿了一件红色緋边的衣服，显得与众不同。长御就以为太子选中了她。

她就是王政君。

于是，王政君一不留神就从一名普通宫女，变成了皇太子的娣妾。

更幸运的是，皇太子的后宫有娣妾不下十人，时间久的已经被太子“幸”了七八年，却一个生儿子的也没有。王政君被送入皇太子宫后，皇太子只幸了她一次，马上有孕，生下来就是儿子。汉宣帝盼孙子盼了很久，因此格外喜欢这个皇孙，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亲昵地称他是“太孙”¹⁷，常常带在身边，俨然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意思了。

汉朝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皇帝的儿子成了太子，母亲不论何种出身，必然为皇后。王政君有了儿子，必然成为太子妃。她的父亲王禁再次被召至长安，任丞相少史。这虽是个低级官吏，但王禁在这个职位上等待的不是丞相府的升迁，而是女儿的蜕变。

王政君生子后第三年，汉宣帝因为前几年新丰县出现了黄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祥瑞，就改元为黄龙元年。也是在这一年，未央宫里下处的一只母鸡长出了公鸡的羽毛，虽然不能像公鸡那样打鸣，但有公鸡的模样。

就在黄龙元年，汉宣帝崩，皇太子刘奭即位，即汉元帝。他即位后，改元为初元元年，无独有偶，丞相府史家一只母鸡的毛色也渐渐变成了公鸡，与一年前的那只鸡不同，这只鸡已经能够打鸣了。

王禁恰恰就是丞相少史。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母鸡变成公鸡，正是王氏崛起和刘氏衰落的征象。王政君还是太子妃时，那只鸡只有雄鸡之形却不能打鸣。等到汉元帝即位，二十二岁的王政君先被封为婕妤，三天后又被立为皇后，这时候出现的鸡就不仅有其形，而且能打鸣，与公鸡无异了。

短短几年时间，王政君就从一个县域富户家庭的平民女子，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一跃成了皇后。

牝鸡为雄，此汉家之灾异，却是王氏之祥瑞。王氏家族作为外戚正式登台。

身为皇后父亲，王禁是王氏家族名义上的首要人物，按照对待外戚的惯例，他被封为阳平侯。阳平离元成县不远，可以看作对他的优待。继而“加特进”，这是汉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加官，又叫“特进侯”，属于爵位系统，没有实权，但等级“位次三公”，这里的“次”不是“次于”而是视同、等同的意思，就是说级别等同于“三公”，是稀少的尊位。

此外，他从魏郡来到长安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拖家带口，一大帮王氏家族成员赶来享受外戚理应得到的荣华富贵。

例如，他的弟弟王弘被提拔为长乐卫尉，担任长乐宫的保安负责人。

长乐宫一向由皇太后居住，此时的皇太后是曾经的王皇后，当年正是她将王政君送入太子宫，如今已经成为王政君的婆婆。为了区分这两位同为王氏且前后相继的“王皇后”，后人把王政君的婆婆称为邛成太后。

前面说过，汉朝非常讲究“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邛成太后并不得汉宣帝的宠爱，但她性格温和，家族势力很弱，又没有儿子。汉宣帝立她为后，是相信她能照顾好他的儿子们。事实的确如此，邛成太后看到

汉元帝顺利登基，就很知趣地不问外事。她一直活到汉成帝时期，位极尊，也有几名家族成员封侯，但在诸外戚中并不起眼。此时的王政君才二十二岁，家族势力同样弱小，以王政君的性格，考虑到当年的恩情，她与这位婆婆应相处甚笃。王政君让自己的亲叔叔王弘担任长乐卫尉，负责邛成太后的安全，也应是出自恩情而非监视。邛成太后去世后，王政君很悲伤地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质共修之义，恩结于心。¹⁸

“奉质共修，恩结于心”，婆媳之间这八个字蛮令人感动。也正因为这位婆婆的超脱，才给了王政君极大的活动空间。

但此时的王政君柔顺、善良、年轻，从未显示出过硬的政治素养，又不得汉元帝宠爱。她真的是王氏家族的灵魂人物吗？真的是后世王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

3．遇见贵人

汉元帝时期的政坛，几乎没有王氏家族什么事儿。

朝堂之上，外戚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领衔，大臣以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倚重，内廷有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把持。这三拨儿才是汉元帝时期的主要势力。

就外戚来说，史家、许家、王翁须家¹⁹根基都很深厚，且与刘氏皇族有着特殊的亲情。

简单回溯一下，汉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乱”，太子刘据及妻子史良娣、刘据的儿子史皇孙及妻子王翁须全部死难，只有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尚在襁褓，幸免于难，蒙祖母史家倾力照管方才长大。汉宣帝在民间时娶妻许氏，同甘共苦，感情深挚。汉宣帝登基后，妻子许氏不幸死于霍光妻子之手；母亲王翁须因为出身微贱，家人已不知所踪，直到登基四五年之后，汉宣帝才寻找到外祖母和两个舅舅。种种患难与共，使汉宣帝即位后刻意提高了史家、许家、王翁须家的地位，几家外戚迅速壮大，就势力的强弱来说，史家最强，许家次之，王翁须家又次之。

汉元帝时期，史家的代表人物史高、王翁须家的王接、许家的代表人物许嘉，先后出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汉元帝还请许嘉把女儿嫁给太

子刘骃，嫁过去后听说小两口十分恩爱，汉元帝倍感欣慰，觉得十分告慰早逝的母亲许氏，立刻吩咐左右上酒为他庆贺。

此时，作为汉元帝妻族的王氏家族还十分弱小。王政君本人虽然贵为皇后，但汉元帝几乎不再临幸她；她的父亲王禁虽然位列特进，名誉很高，但并无实权；叔叔王弘仅是一名小小的长乐卫尉；只有在王禁去世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继承了王禁阳平侯的爵位，并担任卫尉、侍中，得以常在皇帝身边，王氏家族才稍微有一些起色。而王莽，在汉元帝时期才出生。

此时，王氏家族不仅弱小，还要战战兢兢，以免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地位。

考虑到太子家弱，汉元帝指示了一位亲近大臣来照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史高的儿子史丹。史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担任侍从，十余年来朝夕相伴，至今还常常陪着皇帝出行。汉元帝的意图是：

上以丹旧臣，皇考外属，亲信之，诏丹护太子家。

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幸运，王氏家族竟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最具权势的外戚史家的支持。要知道，王政君唯一的王牌就是太子刘骃，只要顺利熬到刘骃即位，那么按照惯例，旧的外戚会退出政坛，王氏家族就可以施展拳脚了。史丹的出现，无疑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但世事难料，偏偏此时汉元帝有了废太子之心。

一旦刘骃被废，王氏家族不仅现在的地位岌岌可危，恐怕还要被逐出长安，甚至性命难保。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还在刘骃。刘骃早年因为“宽博谨慎”²⁰还颇得父亲欢心，长大后，却“幸酒，乐燕乐”²¹，汉元帝逐渐认为他能力不足，难以担当帝王大任。到元帝晚年，刘骃更是做出一件令父亲极为恼怒的事情。

汉元帝的小弟弟中山哀王刘竟和刘骃年龄差不多，这叔侄二人自小一起长大，按理说感情不错。中山哀王去世后²²，汉元帝十分哀痛，刘骃来吊唁，却面无哀戚。这一下子就惹怒了汉元帝，他说了句为后世历代帝王所警醒的话：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人之心，是没有资格为帝王的，这不仅是汉元帝所信奉的儒道，也的确是真正的伟大帝王所具有的基本品质。汉元帝说这句话，很明显有了废太子之意。

太子变成一个耽于酒乐又冷漠无亲情的人，王政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王政君“柔顺”的性格推测，她对太子应是极为溺爱的。

幸好史丹在场，他马上免冠上谏，替太子打圆场：这事儿不怪太子，是我看见陛下您过于哀痛，所以太子刚才觐见之前，我私下里让他千万不要在陛下您面前哭泣，以免让陛下更伤心。臣该死。

这番话效果非常好，不仅替太子开脱，还把太子包装得很仁孝。史丹果真是王氏的贵人。

但刘骜的太子地位依然岌岌可危，因为竞争者已经出现。

汉元帝有三个儿子，除了太子刘骜，还有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刘康，冯昭仪的儿子中山王刘兴。儿子多了，做父亲的心中总会有一些偏爱，这是人之常情。汉元帝从来没有对王政君有过很深的感情，登基后又格外宠爱傅昭仪，母亲的无宠多少会影响到儿子的地位。

傅昭仪虽然比皇后等级低，但她在汉元帝为太子时就嫁了过去，人又比王政君精明，善于笼络人，连后宫的宫女仆人都很喜欢她，常常为她酹酒，祝她长寿。这与傅昭仪自幼就在皇宫里生活有关，她很小的时候就服侍在上官太后身边，而上官太后是汉武帝的儿媳，霍光的外孙女，六岁就成了汉昭帝的皇后，历经昭帝、昌邑王、宣帝，一直活到汉元帝时期。

有这样的资历，傅昭仪怎么会看得起王政君呢？

与傅昭仪同样受宠的还有冯昭仪。有一次，汉元帝带着傅昭仪、冯昭仪等人去看斗兽表演，这种游玩之事当然不会带王政君了。突然，有只熊跑出了圈，攀着围栏要出来，虽然一时没有危险，但傅昭仪等人吓得四散而逃，唯独冯昭仪站在熊的面前，挡住汉元帝。侍卫一拥而上将熊格杀。汉元帝非常感动，更加宠爱冯昭仪。因为这件事，傅昭仪还十分嫉恨冯昭仪。

傅、冯二人受宠如此，又都生了儿子，刘骜的位置越发不稳固了。

此外，汉元帝热爱音乐，擅长书法，鼓琴吹箫，作曲唱歌，无不精

通。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也是多才多艺，擅长音乐。汉元帝对定陶王越看越喜欢，“坐则侧席，行则同辇”²⁴，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王政君、王凤和刘骝对此看在眼里，却无计可施。

竟宁元年（约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入膏肓。但陪在他身边的并不是皇后和太子，而是傅昭仪和定陶王母子。汉元帝更是多次向身边的侍从询问，当年汉景帝废太子立胶东王刘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就使内廷和外臣都看出了汉元帝的废立之心。

王政君对这样的局面有何应对吗？

束手无策。

要不是她哥哥王凤担任卫尉、侍中，目睹或听说这些事情，王政君都未必知道。

王凤、皇后和太子都急得没有办法。这时候，贵人史丹再次出现。

作为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比皇后更有资格侍奉皇帝的疾病。终于等到皇帝独处，史丹直接觐见、顿首、伏跪、哭泣，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皇太子已经立了十余年，老百姓人尽皆知，天下归心。我见到最近定陶王受宠太过分，外边到处都是谣言，说陛下要废太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拼死力争，我第一个先死，给公卿大臣做表率！

这话很有威胁性吗？并没有，更像是恃宠撒娇。作为十分了解汉元帝的宠臣，史丹抓住了汉元帝性格柔弱、缺乏主见、为人仁厚的特点，故意说了这番话。被臣下点破心事，汉元帝大感失措，既不好意思，也颇觉没面子，只好矢口否认，说：我这几天情绪不佳，太子和两个王都还小，我很念着他们，所以会常常与定陶王相见。但你说的废太子这事儿，绝对没有！皇后为人谨慎，先帝生前又特别疼爱太子，我岂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你这番话，很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汉元帝不仅没有认真考虑废立太子的事情，被宠臣这么一激，反而被牵着鼻子走了。史丹看到目的已经达到，表演得更加热烈，他继续说：原来没有这回事啊！我真是太愚蠢啦，都是误听了那些小人的谣言，我罪当死！

汉元帝见史丹如此给自己台阶下，也就顺势告诉史丹：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你要好好辅佐太子，不要令我失望！

于是，在史丹的一番操作下，原本要废掉太子的汉元帝，竟然巩固了太子的地位。

与此同时，王翁须家族的重臣、汉宣帝的表兄弟、时任右将军的王商也支持太子。于是，汉元帝时期三家最重要的外戚里，史、王两家明确支持太子即位，许家又是太子的岳父。太子的地位终于稳固了。

第二年，汉元帝就晏驾了，太子刘骥即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太子废立风波中，王政君没有表现出任何强有力的政治能力，她甚至险些为溺爱太子付出惨重的代价。将她送上皇太后尊位的，是史丹及其代表的旧外戚势力。而史家之所以支持王氏家族，当是看准了王政君的柔顺，与之结盟能够在太子即位后继续保持原有地位，毕竟史家与现任皇帝的血缘越来越远。

史丹也是个“种马”，有二十名成年子女，其中九个儿子均任职朝廷，后代“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余人”，这笔投资真可谓划算之极。

4．善良的王政君

汉元帝当了十六年皇帝，晏驾之前，交代太子刘骥和王政君，日后要善待弟弟们，特别是他喜爱的定陶王。汉元帝在西汉诸帝里品德相对最为宽厚，也是西汉第一位主动遵循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在他治下，西汉的政治气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简言之，就是儒风越来越醇，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灾异和祥瑞越来越关注，易代改姓的观念基础逐渐形成。

太子刘骥即位，即日后的汉成帝。原来的皇太后邛成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她仍像从前一样知趣地不问政事；三十八岁的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果然成了“天下母”。

旧的外戚如史家、许家、王翁须家，势力仍然不可小觑，许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车骑将军许嘉，从汉元帝时期就担任大司马，成帝即位后仍然占据这个职位。按照惯例，王氏家族的“族长”阳平侯王凤，以大将军的身份也担任大司马、领尚书事，而且借着新皇帝即位，封邑增加了五千户。

朝廷里同时出现了两个大司马。

王政君的同母弟、光禄大夫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有万户之多。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则同日被赐爵为关内侯。除了王莽的父亲王曼因为已经去世没能封侯外，王莽剩余七子全部为侯。王莽此时才十三岁，封侯没他什么事儿。

关内侯，是西汉二十等爵制里仅次于列侯的爵位，一般没有食邑。对大多数西汉上层人士来说，一辈子能达到的最高爵位也就是关内侯了；但对于拥有勋烈军功或是身为皇亲国戚的人，关内侯只是步入列侯行列、成为货真价实的贵族的第一步。

王氏家族一朝之间成为显贵，但这在西汉是惯例。因为对现任皇帝母族的尊崇是汉朝“孝治天下”的表现。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幸运，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她：

幸运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宽仁的丈夫，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于享乐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权力掌握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人手中，对这个人及汉朝来说都是致命的隐患。

但在此时，王政君和满朝公卿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恪守妇人之道、善良仁爱的皇太后。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揣测。王政君与她被称为“妒”的母亲很不一样，她忠实执行了丈夫的临终叮嘱，对定陶王极为优待，并不为当年太子险些由定陶王取而代之的事情而挟嫌报复，相反，“赏赐十倍于他王”²⁵；汉成帝在母亲影响下，对这位当年有意无意的帝位竞争者也没有猜忌之心，更是在多年之后将皇帝大位传给了定陶王的儿子刘欣。比起后世为了皇位大开杀戒或是累世报复的情形，仅从这一点看，王政君确实善良仁爱。

她自己也十分孝顺。母亲李亲改嫁给苟宾后，生了一个儿子叫苟参，不久苟宾死，李亲成了寡妇。当时王政君刚刚当皇后，就要求父亲王禁必须把前妻接回家；成帝即位后，王政君又要求汉成帝比照汉武帝给自己同母异父的舅舅田蚡的待遇，给苟参封侯，尽管这个请求被汉成帝以不合礼法的理由拒绝了，但苟参还是担任了侍中、水衡都尉，成为可以出入禁省的官员。

她对家人充满亲情，而且血缘越近的家人越亲。汉成帝登基五年后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已经官至诸吏散骑的安成侯王崇去世，留下遗腹子王奉世继承侯爵。对这位亲弟弟的死，王政君十分难过，想必在儿子面前也时常流露。于是到了河平二年，汉成帝为了安慰母亲，把剩下的几个舅舅同日封为列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因为同天受封，被世人称为“五侯”。这个大手笔在汉廷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但十分符合王政君对家人的态度。事实上，后来王莽得以封侯，也与王政君亲近家人的习惯有关。

至于她在后世最被人诟病的纵容王氏家族擅权这件事，站在王政君的立场来看，她是在关心娘家人，对娘家人一定要照顾好，哪怕引起舆论非议也在所不惜。而照顾好娘家人，其实就是在凶险的政治旋涡中保护自己的儿子，保护刘氏的祭祀不灭。王政君只不过是尽可能利用西汉的外戚体制而已，假如没有王莽，王氏家族的擅权比不上吕后、霍光。

所以，王政君确实是恪守妇道、为人善良，同时也缺乏政治头脑和能力的一个女人。一方面，她并没有为王氏家族的崛起做太多具体的事情。面对根基牢固的外戚勋旧、虎视眈眈的文臣武将、遍布全国的皇室成员，入场博弈的并不是王政君而是王凤。另一方面，恰恰是她这种发自内心却昧于政治是非的善良，为王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成为天下改姓的共谋。

多年以后，班彪为王政君写下赞语，其中最后一句是“妇人之仁”²⁶，这句话放在后世属于政治不正确，但在当时却颇为准确。

5. 王凤的基业

汉成帝即位十个月后，长安突然刮起一场沙尘暴。

长安一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茂林修竹，扶荔宫里种着荔枝、橄榄、香蕉、柑橘、龙眼等许多奇珍异草，大雨常常一下就是十几天，刮起如此干燥的沙尘暴实在非常奇怪²⁷。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大风从西北刮来，卷起浓密细腻黄色尘雾。整整一天，长安内外都笼罩在昏暗的黄土里。黄土阻挡了百姓的视线，更遮蔽了往日照临下土的阳光。黄沙蔽日，这个灾异的喻意太明显了：是什么人，遮挡了皇帝的光芒？

次日，沙尘暴停了。迎着晨光起床的长安居民发现，城里到处覆满了黄土，就像被上天均匀地撒过一样。大家马上用水清洗，又使得路上变得泥泞不洁，往日宏伟整洁的长安城变得脏兮兮。

作为新皇帝，汉成帝的执政热情正在兴头上，对这场灾异感到惶恐，他参考先帝的做法，向群臣咨询上天要通过这场沙尘暴来说什么。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毫不含糊，把矛头指向地位未稳的王氏家族：

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²⁸

意思很直接：高皇帝说过，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现在皇太后的兄弟仅因为外戚的身份就封侯，有违高皇帝定下的规矩，所以上天降下灾异。

其实，对“非功臣不侯”的原则，西汉的帝王们并没有特别严格地遵守，但帝王想要给人封侯，多少还是要做一些立功的表面文章，比如汉武帝为了给李广利封侯，不惜成本让他攻伐匈奴以获得军功；汉哀帝为了给董贤封侯，正好赶上东平王获罪，就令董贤参与到案件的审判中，以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来给董贤封侯。

此时，王氏兄弟已经有两个列侯、五个关内侯，数量太多，表面文章也没有做，当然会引起朝廷的非议。杨兴和驷胜的意见，得到了很多响应。

上天的灾异和朝廷的不满，给王凤带来巨大压力，这是他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不过，皇帝刚刚即位，正需要母舅的帮助和扶持，大臣们的攻讦很难得到皇帝的支持。王凤看到这一点，在幕僚的帮助下，以退为进，主动把这次“天地赤黄之异”揽在自己身上，上书汉成帝请求辞职，并特意叮嘱皇帝“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²⁹，要皇帝顺应上天的意思，亲自处理朝廷政务。

果然，汉成帝一想到今后要事必躬亲，就觉得不太舒服。而且，此次灾异即使是因为王氏家族封侯，那与王凤本人辅政还是两回事。王凤任职大司马大将军才几个月，尚无功无过，怎么能因为这场灾异令王凤去职呢？何况此时还有一位大司马许嘉呢，怎么能只盯着王凤？王凤如果走了，又有谁可以信任并辅佐自己呢？他可是亲舅舅啊。

汉成帝拒绝了王凤的辞职申请，把灾异揽在了自己身上，让王凤专

心辅政。皇帝如此大度，臣下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一场风波偃旗息鼓。倒是王凤，从他后来做的事情看，他可能自此意识到了身处权力中心的危机感。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出现，几年后，汉成帝以黄金二百斤、赏赐“特进侯”的待遇，策免了另一位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从此，王凤成了唯一的大司马，也就具备了擅权的基础。权力的“高处不胜寒”，使王凤不得不动起来。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正是这三件事情，决定了王氏家族的崛起。

第一，确保皇帝不会脱离他的掌控。

汉成帝自从当太子时就喜欢饮酒宴乐，如今更加沉溺于此。既然委任王凤来专权，成帝就很少过问政事了，有时候即使与王凤意见相左，也会谦让。建始年间³⁰，汉成帝的左右向他推荐一个叫刘歆的年轻人，是高皇帝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人，大儒刘向的小儿子，精通儒学，做事靠谱，是难得的人才。汉成帝把他召来，一聊，果然很欣赏，就打算把他留在身边，而且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这一时期的中常侍不是正式官员，而是加在侍郎身上的加官。西汉的宫禁里，有许多类似皇帝秘书的职务，地位有高有低，中常侍是其中地位比较高的，不仅出入禁中，还给皇帝当顾问，参与政事，只有才能优异的士人可以担当，甚至还要美姿容，形象好，因此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清要之职。

已经准备正式任命了，汉成帝的左右却说，“还没请示大将军呢”，汉成帝以为这区区小事，不必告知。此时，令他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左右叩头争之。

这个史书里不起眼的描述，足以刻画出王凤已经把皇帝身边的人都搞成了自己人，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汉成帝告诉王凤，王凤居然不同意，而汉成帝也就算了，只好转而任命刘歆为比中常侍地位低的黄门郎，总算把他留在了身边。王凤不会允许一个陌生的刘歆插进来，这很容易理解，但汉成帝居然束手无策，

王凤之专权可见一斑。至于王凤的理由，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歆尚不是侍郎，不能破例加官中常侍。³¹

王凤的这个决策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几年后的阳朔年间³²，“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³³，刘歆和王莽成了同事，刘歆颇得王莽的欣赏，两人就此相熟、结交，为日后的亲密合作埋下了伏笔。

第二，扫除异己。

权力的争夺是普遍存在的，但权力争夺的性质却各不相同。在一种情况下，权力争夺源于路线不同，是对“国家往何处去”有相异的想法。例如汉景帝时期对藩国是绥靖还是削弱，汉昭帝时期对盐铁酿酒是官营还是民营，汉宣帝时期是专任儒教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等等，这样的权力斗争，不论结局如何，所解决的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属于真正的政治斗争，无论胜败，都是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但在多数情况下，权力争夺仅仅是由于掌权者拓展权力边界时遭遇了挑战，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不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这类权力斗争只是纯粹的争权夺利，不属于政治斗争，落败者未必值得同情，胜出者也不过是权臣而已。

王凤属于后者，他不是政治世家出身，没有政治抱负，也非自郡县升迁，史书称“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³⁴，说明他不具备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素质，但他并不缺乏争权夺利的能力。

王凤在大事决策上倚仗杜钦。杜钦出身政治世家，祖父杜周和父亲杜延年都曾任御史大夫。杜钦却不喜做官，曾在王凤的大将军府短暂担任闲职，随即因故辞职。此后，杜钦一直以私人身份为王凤出谋划策。杜钦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与王凤在权术上的精明强干形成了极好的搭配。王凤担任大司马十一年，几次大的危机都有杜钦的协助。

汉成帝建始三年（约公元前30年）秋天，关中一带连着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不断有郡国大雨的消息被报告到未央宫。山谷积水，水出山谷，酿成水灾，淹死的士民已达四千多人。长安城地势较高，一时没有受到影响。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宫中君臣倍感毛骨悚然的事情。

隶属少府、负责禁苑的“钩盾署”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这简直太可怕了，因为在宫禁里突然出现童女，是极为不祥的征兆。据说，周幽王时有红衣童女突然出现，唱着“檿³⁵弧箕服，实亡周国”的歌谣，意思是“那卖桑木做的弓，背箕草织的箭袋的人，将灭亡周

国哟”，西周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汉宫里发现的小女孩，经查询只有九岁，是渭河边的民女，但她偏偏名字叫“陈持弓”，也有一个“弓”！一个童女竟然能从城外穿梭至未央宫却没有人看见，这种神秘的预示令人感到恐惧。正在此时，城内又纷纷传言洪水马上就要淹到长安了，老百姓惊慌失措，四散奔走，造成严重的踩踏事故，城中一片混乱。

汉成帝接到报告，马上赶到未央宫前殿，也就是汉朝皇宫最重要的宫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此时洪水未至，出于谨慎，王凤建议皇太后、皇帝及后宫先坐到船上避难，普通官民则到城墙上躲水。群臣纷纷赞同。此时，一位老臣徐徐说道：“自古就算是无道之国，也没听说过大水能大到漫过城墙的。现在天下太平，怎么可能一天之内突然就发洪水了呢？一定是谣言。还是别让官民上城墙了，反而会制造混乱。”

这位老臣就是左将军、乐昌侯王商。

乐昌侯王商³⁶与王政君不是一个“王”。他是汉宣帝母亲王翁须弟弟的儿子，汉宣帝的表弟，汉元帝的表叔，论辈分，汉成帝该称呼他为“表叔祖父”，对他一向尊重。汉元帝晚年，王商曾经和史丹共同力保太子即位，对汉成帝是有恩的。

既是老臣，又对皇帝有恩，汉成帝就没听王凤的意见，王凤也不好力争。过了一段时间，洪水始终不见到来，城中渐渐安定，再查问，果然是谣言。汉成帝非常高兴，狠狠夸了乐昌侯不愧是持重老臣。

王凤与王商本无私人矛盾，亦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但这件事让王凤的威望颇为受损，他“大惭，自恨失言”³⁷，后悔决策不周。事实上，王凤的决策只是缺乏经验，算不上不合理。但王商的谏议被采纳，使王凤探知到自己权力的边界。

这年冬天，外朝首领、乐安侯、丞相匡衡利用地图的不精确私自扩大封邑，被免为庶人。以“凿壁借光”留名青史的匡衡因为这个缘故被免，实属讽刺。建始四年（约公元前29年）三月，乐昌侯王商凭借德高望重的地位，拜为丞相。

王商以外戚任三公，权倾朝野，丞相一当就是五年。

王凤不愿得罪丞相，但丞相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期间，琅邪郡连续发生自然灾害，丞相按照惯例派部属纠察琅邪太守的责任。可巧，琅

邪太守杨彤是王凤的亲家。王凤觉得自己好歹也是大司马大将军，就去找丞相相关说，“灾异这种事，非人力所能避免，杨彤为官向来谨慎，能不能放过他。”王商根本不听，上奏申请罢免杨彤。

但这个申请被汉成帝压下了，汉成帝当然知道杨彤是谁。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但王凤终于明白，权力是此消彼长的，要保护自己，就得扩大权力，拓展权力的边界。他开始行动，私下里查访王商的过失，果然发现王商私生活比较混乱，一是和父亲的女婢通奸，二是他的妹妹淫乱，情夫突然被杀，后台很可能是王商。王凤就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捅到了汉成帝那里。

汉成帝觉得，私生活是私生活，不足以拿到台面上作为大臣不称职的依据，不希望处置王商。王凤力争，汉成帝再次服软，允许司隶去查丞相。

恰好，此时发生了一次日食。

形势骤然紧张。

王商发现王凤在攻击自己，觉察到了危险。在此之前，王政君曾问过他，想把他的女儿纳入后宫给汉成帝为妃。王商对此没有兴趣，而且女儿又在生病，就婉拒了。现在，他为此后悔不迭，假如有女儿在宫中为后援，哪有现在这样势单力薄？他打听到汉成帝正宠幸李婕妤，就找到李婕妤家，想把女儿再次送进宫。

此时，有个叫张匡的太中大夫，觉察到高层权力斗争的迹象，想从中渔利。太中大夫在中央品级不高，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属官，只有千石俸禄，与另一个名字相似但却是九卿之一、俸禄二千石的“中大夫”不是一回事。

张匡看到丞相被查，又有日食，马上上书控告王商。汉成帝派史丹去听张匡的意见。张匡抓住机会，极言王商是大恶人。说日食的原因是丞相作威作福，作恶多端，不仅私生活混乱，而且先拒绝皇太后，又托李婕妤送女儿进宫，心机险恶。

心机险恶的明明是张匡，他把这些宫廷之内、外戚之间的私事上纲上线，把王商说成盘踞朝廷任人唯亲的大奸臣：

丞相商作威作福……无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宠，身位三公，宗族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诸曹，给事禁门内，连昏诸侯王，权

宠至盛……宗族权势，合货巨万计，私奴以千数……视事五年，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甚亏损盛德，有鼎折足之凶。³⁸

张匡说，王商宗族势力太强大了，封为列侯的、担任郡守级别高官的、出入禁省在皇帝身边的家族成员比比皆是，而且与诸侯王结亲，财力雄厚，违规蓄养奴婢过千。他当这五年丞相对百姓是大灾难。张匡还颇为贴心地为汉成帝出主意：陛下还很年轻，即位以来还没有杀过大臣立威，而且一直没生出子嗣，这都是朝中有国贼。所以，只要杀了王商一人，“则海内震动，百奸之路塞矣”³⁹，天下就会好起来。

张匡的做法，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小人的嘴脸。王商家族的确权势很大，但从未威胁过皇权。汉成帝了解王商，也能鉴识张匡，因此下制书说：

弗治。⁴⁰

张匡不敢再说，王凤就出手了。他反复要求汉成帝对这件事有个交代。最终，汉成帝免了王商的丞相职务，但心里很不痛快，也没有给王商治罪。

这一年是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王商免相三日之后吐血去世，朝廷给了一个“戾”的恶谥，他的亲族里凡是有侍中、中常侍等加官能够出入禁省、宿卫皇帝的人，全部被撵到外朝当吏员。王商的儿子虽然袭爵乐昌侯，但这支源于汉宣帝母族、一度势力强大的外戚就此没落。王商的儿子在王莽执政时期被杀。

接任王商为丞相的是张禹。

张禹是一代大儒，汉成帝的老师，但他为人软弱胆怯，汉成帝即位后，任命他为给事中、领尚书事，让他出入禁省并参与重大决策。张禹竟然畏惧与他同领尚书事的王凤，几次上书辞职。汉成帝没有同意，还在王商罢相后封他为安昌侯，拜为丞相。

一个都不敢和王凤同领尚书事的人担任丞相，王凤也会满意吧。很有可能这个决策就是王凤做的。

王商死后，旧的三大外戚势力基本不再对王氏家族构成威胁了。史家一直是王氏家族的盟友，满足于在王氏家族秉政之下长保富贵；许家已经大不如从前，前大司马、平恩侯许嘉已经去世，其后代没有什么建

树，唯一可说的是许嘉的女儿许皇后。汉成帝与许皇后早年一度感情甚好，但许皇后始终没有子嗣，加上连年日食，一些人如谷永、杜钦为避免把日食指向王凤，故意说日食是因为许皇后。许皇后渐渐恩弛宠衰。

外戚的威胁渐渐排除，诸侯王的隐忧渐渐浮现。

阳朔年间，定陶王刘康来朝见皇帝，王政君和汉成帝非常高兴。按照礼法，朝见完毕后，诸侯王必须尽快归国，不得滞留长安。但因为有汉元帝临终的托付，以及汉成帝与兄弟感情甚好，就下令让刘康留在长安陪伴他。

一时间，刘康住在长安的定陶国邸，也就是“定陶驻京办”，但每天进宫与皇帝朝夕相伴。对这位曾经差点当了太子的异母兄弟，汉成帝并不介意，证明汉成帝很讲亲情，而刘康也一定颇为善解人意，博得汉元帝、汉成帝和王政君的喜欢。

兄弟相悌，多么符合汉朝“以孝治国”的理念啊。但王凤却不这样认为，他担心的是，如果汉成帝突然病重，又没有子嗣，很可能把皇位直接传给身边的刘康，这会令自己十分被动，无法从容安排朝廷的权力格局。

灾异适时到来，又一场日食发生了。

王凤抓住这个机会上谏，称这次日食正是定陶王滞留长安不归导致的。

在当时浓厚的儒学风气里，日食是“阴盛之象”，但应在哪件事什么人身上，不同的儒学派别会有不同答案。谷永把日食说成许皇后的问题，王凤把日食推在定陶王身上，都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外戚擅权，也讲得通。

然而没有人站出来，汉成帝也只得相信日食确实由定陶王引起，不得不令刘康归国，兄弟两人泣涕作别。

王商罢相身死和定陶王被迫归国这两件事，展示了王凤在弄权方面的才能，也自然会激起朝廷里一些士大夫的不满。

京兆尹王章刚直敢言，成语“牛衣对泣”说的就是他。王章早年穷困潦倒，生病了连被子都没有，只能披着给牛盖的蓑衣，他的妻子激励他说，“长安城里比你尊贵的人，没有一个比你强的，你应该奋发图强，哭什么呢！”王章受此激励，终于入仕。汉元帝时期，他敢于攻击弄权的宦官石显，终被免官。汉成帝时期复起，又被王凤推荐担任京兆尹。

但是，当了京兆尹的王章并不买王凤的账，在给汉成帝的上书中，指出这些灾异都是因为王凤，并为王商和定陶王鸣冤。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王凤不是说王商私生活有问题吗，你王凤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汉成帝无子嗣，王凤把自己一个妾的妹妹张美人送入宫。王章揭秘，这个张美人当时已经许嫁了，把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送给天子，到底什么意思？

上书写成，王章的妻子看到后坚决不同意，说，“人要知足，你忘了当年你我‘牛衣对泣’的境遇了吗？”

王章说，“你们女人知道什么。”

汉成帝本来就对王商之死和定陶王回国倍感愧疚，听了王章的话，大为感动，决定罢免王凤大司马之职，让王章推荐继任人选。王章推荐了汉元帝冯昭仪的弟弟，时为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虽为外戚，但名满天下，既是精通《诗经》的儒士，又是十八岁出任县令的治才，其政绩、声誉和政治素养远非王凤可比。王章的推荐确实出自公心。汉成帝也很高兴，打算用冯野王来代替王凤。

万万没想到，隔墙有耳，汉成帝与王章的这番打算被泄露了。王政君的叔叔长乐卫尉王弘的儿子王音，也就是王凤和王政君的堂弟，此时正在禁省当侍中，听到了这些话。王音正愁没机会向王凤表功呢，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凤。

王凤恐惧万分，不知所措。

幸好有杜钦。杜钦根据汉成帝优柔寡断的性格，和对母亲王政君言听计从的惯例，判断此事不必太担心。于是，王凤故伎重演，先称病不上朝，回家休假，造成朝廷政事停摆的局面，然后上疏汉成帝请求辞职。在杜钦的指导下，王凤的辞呈声泪俱下，摧心断肠，堪称典范。他陈述了必须辞职的三点理由：

天下阴阳不调，常发生灾害，这是因为担任大司马不称职，“此臣一当退也”；日食这桩大灾异，必须应在我身上，“此臣二当退也”；我久病连年，尸位素餐，力不从心，“此臣三当退也”。

然后就是一番哭诉，说身体已病入膏肓，非辞职不可云云。

这个辞呈一上，汉成帝果然被感动得不轻，王政君看了之后哭得吃不下饭去。汉成帝马上把与王章的约定抛到脑后，坚决不允许王凤辞职。事实上，王凤这次是真的恐惧，一度真想就此辞职保命，但杜钦却

劝他万万不可，这个权力一旦交出去，可就自身难保了。

王凤恍然大悟，马上接受了汉成帝的挽留。王章事实上被汉成帝“出卖”，他很快遭到弹劾，理由是推荐冯野王属于“阿附诸侯”，揭张美人的事情“非所宜言”，不合体统。王章被下狱，罪名定为“大逆”，死于狱中，妻子和女儿等家人被流放到广西合浦⁴¹。

冯野王听说后，被这无妄之灾吓得病倒了。但王凤连他也不放过，罗织罪名要免冯野王的官。杜钦很仰慕冯野王，向王凤求情，然而王凤对这件事却不再听从，最终冯野王被免官，几年后去世。

以前没有特别被王凤重视的堂弟王音，因为这个事件于第二年也就是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被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上卿，成了王凤属意的接班人。

至此，勋旧外戚、诸侯王、敢于挑战他的外朝大臣，均被王凤以权术一一击败。王氏家族终于全面掌权，后生子弟也开始占据朝廷内外的许多职位。公卿士大夫见识到王氏家族的实力，或是自保，或是投靠。王凤虽然机心弄巧，心狠手辣，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对底下的官员不乏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雅量，除了杜钦，成帝一朝的不少名臣如陈咸、朱博、陈汤等，都是被王凤所擢拔重用，包括向王凤发难的王章。

在这个过程中，王政君除了以母亲的身份对汉成帝施加影响，没有真正参与到权力争夺中，在对待定陶王的事情上可能还跟王凤的想法相左。总之，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政君为核心，但真正为其创立基业的是王凤。

6. 建构世系

王凤没有对皇帝撒谎，他的确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权力虽然稳固了，但身后怎么办？王凤要确保至少汉成帝在位期间，权力能够始终掌握在王氏子弟手中。可叹自家兄弟里，同父同母的兄弟成安侯王崇死了，异母弟里年龄最大的王曼也死了，目前还活着的都是异母弟弟，按年龄排序，分别是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立、曲阳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时。此外，还有叔叔家的堂弟王音，但尚未封侯。

按照齿序，应该由王谭来接大司马的班。但是，王谭与王凤感情一般，而且王谭为人很有性格，不奉承王凤。所以，王谭虽有能力，但王

凤不会让王谭接班。

至于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在王凤眼里既缺乏历练，能力平庸，又奢侈腐败，不足以成事。王凤留意的是在与王章对抗中精明强干的堂弟王音，他宁可舍弃同父的弟弟们，选择对自己恭顺如父的堂弟王音。

王音之后呢？更长远地说，自己这一代人都去世后，下一代呢？王氏家族的下一代们大多数年纪还小，而且一味竞逐奢侈，斗鸡走马，筑豪宅，养姬妾，成了纨绔子弟。年龄大些的，王谭的几个儿子王仁、王闳还不错，严谨认真，可惜性格都随他们的父亲，对王凤并不奉承，桀骜难驯。

倒是有两个人，年龄已二十几岁，也都很懂事。一个是外甥淳于长，人很聪明，现在是黄门郎，与皇帝关系甚好；再一个是侄子王莽，人很严谨，还没有出仕。这两个人在王凤患病期间，都是时时服侍，亲尝药汤，日夜不休。特别是王莽，恨不能一刻不离，连月没时间换衣服，蓬头垢面，堪称纯孝。

在病榻之前，王莽和淳于长进入了王凤的视野，成为王氏家族下一代的种子选手。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秋，王凤病笃，汉成帝和王政君分别到王凤府邸看望。在给汉成帝的遗言里，王凤一是极言王谭不可用，二是死保王音足以接班，三是下一代里有几个不错的，如王莽、淳于长等，请皇帝和皇太后留意照顾。这三件事，汉成帝和王政君一一照办了。王凤辅政十一年去世，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王音越过几位堂兄接替了大司马职位，两年后他被封为安阳侯，至此，王氏家族除了早死的王曼，已经有列侯八人，而且有两个已经传到第二代。⁴²

又八年之后的永始二年（约公元前14年），平庸但谨饬的王音去世；王氏家族“弹药”充足，继续由家族男性出任大司马，接替王音的是成都侯、卫将军王商；王商辅政四年后去世；接替的是曲阳侯、骠骑将军王根。在这期间，王莽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的父亲王曼被追封为新都哀侯，这个爵位实际上就是给王莽的。王根辅政五年退休，王凤这一代至此已没有年富力强的人，所以王根推荐了时为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王莽接任大司马。

王氏家族的权势贯穿了汉成帝全部在位时期，能实现这一点，前提是汉朝的外戚体制，根源是皇太后王政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为

王氏家族巩固基础、扫平障碍、铺好道路的是王凤。如果没有王凤，以王政君的仁慈性格，恐怕求为邛成太后而不可得。王凤给王政君铺好了路，她只要不断地从王氏家族里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大司马，就能牢牢把握政权。

《汉书》有云：

王氏之兴自凤始。

经过王凤诸兄弟叔侄的努力，王氏家族逐渐成为比肩刘氏皇族的超级家族。但这还不够，多年以后，王莽还要构建更为久远和庞大的家族谱系，把王氏家族追溯到尧舜禹时期，乃至传说。

在王莽的构建中，王氏家族是黄帝的后代、舜帝的后人。

舜又不“姓王”，王莽凭什么这么说？

上古的姓、氏情况非常复杂，较为切近的说法，姓基于血缘关系，氏基于地域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⁴³，同一姓下根据分封的地点、居住的环境、担任的官职等，可以有不同的氏，改氏也很常见⁴⁴。所以同一姓下有很多氏，氏名相同的未必属同姓。舜的后代在西周被封在陈国，这一支就以陈为氏了。春秋时期，陈国的一名公子陈完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至战国时期以田为氏⁴⁵，并逐渐代替了姜姓齐国的公族，被周天子封为齐国国君，也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田氏齐国亡于秦。秦末，田氏齐国的一些旧王族纷起称王，至项羽时期，其中一位叫田安的被项羽封为济北王。可惜田安只当了一年的王，就被同族田荣所杀。

从舜到田安的这段世系，根据现有史料可以勾连。而王莽所构建的世系，就是从田安开始：

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⁴⁶

也就是说，田安死于战乱，但因为他是王族，所以他的家人被齐人叫作“王家”，就以王为氏了。等到田安的孙子王遂出世，已经是汉朝的文景年间了。王遂的儿子就是从高平陵迁至元城县的王贺。

这段世系来自《汉书》。但《汉书》还说“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本曰”⁴⁷云云，就是提醒大家，这是王莽自己说的。

细思之，从舜帝到田安之间的世系即使再可靠，也不能保证后面的

世系是可靠的。从情理上说，田安被杀，战乱凶险，田安的家人为了避祸而隐姓埋名改为王氏，倒也讲得通，但很难想象逃难避祸的家族还能大摇大摆地被人称为“王家”；高祖九年刘邦曾根据大臣娄敬的建议，把包括齐国诸田氏在内的原六国贵族后代，大举迁徙到关中。王氏家族如果真的是田安的后人，又广为当地人知晓，怎么能逃过呢？⁴⁸所以这个世系很有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有“田氏改王”这回事，那么从汉初到汉末两百年间，改姓、冒认之类的事情也无从对证。王氏家族从高平陵跋涉250公里，迁徙到魏郡，正是改姓或冒认的绝好时机。换言之，王氏家族无可争议的谱系其实就到王贺这个魏郡的始迁祖。

几乎可以肯定，王莽与舜之间的谱系是后来构建的。这是因为，西汉晚期，刘姓已经被认定为尧的后代，而只有将王氏的谱系追溯到舜，才能按照“尧禅让给舜”的方式，由王氏来代替刘氏。

王凤对实权的掌控与王莽对世系的构建，一前一后，共同缔造了一个履历完整、大权在握的黄金家族。王政君就是这之间的纽带。

注释：

- 1 今河北大名县。
- 2 当然，占卜之类不在被禁之列。
- 3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 4 《西京杂记（外五种）》卷四，第34页。
- 5 今济南章丘一带。
- 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 7 《汉书·元后传》，第4014页。
- 8 张金光教授认为，王贺是郡三老，理由是他担任三老后，有“魏郡人德之”的记载。但考虑到魏郡的治所是邺而非元城，还是认为王贺为县三老较稳妥。
- 9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140页。
- 10 《汉书·元后传》，第4035页。
- 11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 12 《汉书》说王政君许嫁的是汉宣帝儿子东平王，但东平王封王的时

间要晚于王政君入太子宫的时间，所以不确；《论衡·偶会篇》则说是赵王。黄晖认为当时的几个赵王在年龄和卒年方面也对不上，推测是平干王，见《论衡校释》，第105页，中华书局，1990。无论是哪个王，都不影响行文，所以文中未明确说明。

- 13 《汉书·外戚传》，第3969页。
- 14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
- 15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 16 《汉书·元后传》，第4015页。
- 17 《论衡校释·骨相篇》第115页载王政君“生子君上”，与《汉书》载刘骃“字太孙”不同，刘盼遂认为“太孙”乃“宣帝宠异成帝之词”，可从。
- 18 《汉书·外戚传》，第3970页。
- 19 这一时期姓王的重要人物太多了，重名的也不少，为了区别，这里以“王翁须家”指代汉宣帝的母族王氏家族。而专以“王氏家族”来指王政君家族。
- 20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
- 21 《汉书·成帝纪》，第301页；《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 22 刘竟死后，这一世系绝嗣，国除。后来汉元帝把自己的儿子刘兴封为中山王。
- 23 《汉书·史丹传》，第3376页。
- 24 《汉书·元后传》，第4016页。
- 25 《汉书·元后传》，第4019页。
- 26 《汉书·元后传》，第4036页。
- 27 西汉时期的西安一带，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比现在湿润温暖，能够生长今天的亚热带甚至热带植物，犀牛、熊等也出没在山林里。据竺可桢等人研究，当时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后的第三个温暖期”。
- 28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 29 《汉书·元后传》，第4017页。

- 30 汉成帝第一个年号，约前32—前29年。
- 31 《汉书·刘歆传》载刘歆入仕的起步是黄门郎，所以他在此之前尚未有其他职务。主张只有侍郎才能加官中常侍，并推测刘歆是任命中常侍未果才转任黄门郎，见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 32 汉成帝第三个年号，约前24—前21年。
- 33 《汉书·刘歆传》，第1972页。
- 34 《资治通鉴·成帝纪》，第976页，中华书局，精装版，2012。
- 35 𦣻，音同眼。
- 36 王凤的弟弟成都侯也叫王商，不过此时王凤的弟弟尚未封为列侯，两人主要活动有先后，不至于相混。但为了便于阅读，文中有时候使用乐昌侯、丞相等来进一步区分。
- 37 《汉书·王商传》，第3370页。
- 38 《汉书·王商传》，第3372—3373页。
- 39 《汉书·王商传》，第3373页。
- 40 《汉书·王商传》，第3374页。
- 41 《汉书·王章传》交代了王章这位颇有性格的妻子的结局：多年后，王凤已死，王凤的弟弟王商为大司马，将王章的妻子家人赦免，允许回乡。王章的家人在广西靠采珍珠积聚了百万家财，回到故乡，赎回故居，是流放者里罕见的一幕。
- 42 王凤死后，儿子襄成袭爵阳平侯；王崇死后，儿子王奉世袭爵成安侯。
- 43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 44 因为氏比较实用，血缘又越来越远，所以姓的意义变小，氏日益重要，慢慢地姓氏就成了一回事。
- 45 上古之时，“陈”“田”的声母是一样的，所以两字发音相似，一声之转；中古时期，“陈”的声母分出，发音才迥然不同。顾炎武认为，陈完奔齐后并没有改为田氏，而是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后人才改，从之。

46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7 《汉书·元后传》，第4013页。

48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注释八，第3页，正中书局，1977。

二、大司马王莽

7．轻烟散入五侯家

汉成帝初登基的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祭祀他曾祖父史皇孙的“皇曾祖悼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正月”最重要。汉成帝布政伊始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异，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¹，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这么密集的灾异说明汉成帝本人失德。那么问题来了，是在哪个方面失德？这些灾异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²。

譬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源自后宫。后来，汉成帝废许皇后立赵飞燕，以及再以后的赵合德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来自权臣，权臣是谁？对王氏家族来说，权臣就是丞相王商；对京兆尹王章来说，权臣就是王凤。灾异，成了权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异的根源在哪里，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汉成帝废掉许皇后，罢免了丞相，但灾异并没有减少。考虑到终汉成帝一世，大司马一职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时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异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等人，王氏家族气势日炽。朝廷内，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外，王氏子弟竞逐奢侈，积聚了大量财富，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奴婢仆人不下千数，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竟然敢求汉成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他还凿通长安城墙，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湖上行船悠悠，船上张设帷帐、羽盖，一边行船，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那都是些婉转悠扬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成帝来王商家，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引水，十分恼火。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出入都不容易，还敢凿城墙？但汉成帝看在母亲分儿上，咽下了这口气。

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很多都是罪犯。有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在前，现任的司隶校尉、京兆尹都不敢管。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曰：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³。

说的是最过分的曲阳侯王根，为了让居所更豪华，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杜里”之间的墙⁴。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此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王政君见到兄弟

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愤懑之情见于策上。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⁵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⁶那样了。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⁷？

王氏家族既有这样的权势，又得皇帝的溺宠，被视为灾异的来源就很自然了。

一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权势，一边是朝野所指的灾异，按照目前的外戚体制，一旦新的皇帝登基，王氏家族该怎么办？

8. 青年才俊王莽

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约公元前45年）的王莽，就在这样一种微妙的氛围里渐渐成长起来。汉成帝即位那年，昭君刚刚出塞，王莽是才十三岁的少年，他比汉成帝小约六岁，是汉成帝多如牛毛的姑舅表弟之一，并不为皇帝所瞩目。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政君异母弟弟里最年长的，死得最早，没有赶上封侯，留下的王永、王莽兄弟俩也就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当然，王莽家也谈不上贫困，但比起五侯之家，差距还是相当悬殊的。长子王永最先出仕，在禁省里给尚书的某个曹官当属吏，娶妻生子后，竟然也死

了。

王莽初通人事，就要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人。

若要领会到天命的微言大义，就必须修习儒学，探讨人事与天命之间的深奥秘密。譬如，五德终始，如何去推算？灾异祥瑞，如何去解释？制礼作乐，如何开太平？三代之治，如何去实现？圣人立法，如何去落实？孟子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自孔子获麟，已经差不多五百年了，谁能成为下一个圣人？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缙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其实，王氏家族在灾异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儒学。外戚是汉朝体制的产物，是附庸于皇室的特殊贵族，不用很麻烦就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气质上与同样依附汉家传统而非儒家教化的“文法吏”⁸，也就是行政官僚更为接近。但与以往的外戚相比，王氏家族开始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不仅“上诸舅皆修经书，任政事”⁹，连子弟们也——

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¹⁰

或是

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¹¹

王氏家族竟然开始读经了，养贤了！而且还“争名”，攀比着交结门客。甚至，一个门客进了五侯中这家的门，就不能进另一家的门。

这折射出西汉晚期的时代风貌已经与以往不同，即使是王氏家族这样的外戚也会主动接近普通的士大夫和贤人¹²。在这个时代，能够称得上“贤”的不会是汉初那种鸡鸣狗盗、行侠亡命之徒，只能是儒生，或者说以儒生为主。

王莽比这些同龄人更激进，他不只在儒衣儒冠上做标榜，而是诚心向学，把自己变成儒生。这在外戚中并不常见，因为修习儒学是入仕的渠道，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仕，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进一步看，王莽没有拜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公羊学等今文经学博士为师¹³，而是拜沛郡的陈参¹⁴为师学习《礼经》。陈参可能是一位未入仕但很有名气的民间学者。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于是，凭借外戚兼儒生的身段，王莽也主动和贤人名流交往，这是弥补自家穷困，无力养贤疏财，间接实现自己抱负的办法。

从后来王莽在朝廷中受到的赞誉来推测，王莽所交往的人多为名士，比如：长乐少府戴崇，是经学家张禹的学生；侍中金涉，是汉成帝禁省中的近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汤。

陈汤，就是汉元帝时期奉命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西域副校尉。因为是私自的军事行动，这件能封列侯的壮举在汉廷并没有得到鼓励，人也仅仅受赐关内侯。但他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在后世家喻户晓。后来，几经宦海沉浮的陈汤被王凤看中，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出入禁省，并帮助王凤打理幕府的军事事务，是名声在外且与王氏家族交好的名流。

此外，王莽的朋友里还有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的几个兄弟——班伯、班旌、班稚，其中班伯最为王凤欣赏，不过此时正在外出仕。王莽的年龄介于班旌和班稚之间，就把班旌当兄长，把班稚当弟弟，关系尤为密切。班氏家族是世家，文学与功业均十足称道。班旌去世时，王莽已经今非昔比，但却“修绋麻，赙赠甚厚”，就是按照五服的丧仪为班旌服丧三个月，并赠送了大量车马布帛，超越了朋友的情分。班稚与王莽关系最好，多年以后，班稚的孙子班固将为王莽写下历史上的第一篇传记。

这些或以中级官员的职位出仕，或能频繁出入禁省，或出身显赫世家，同时又因儒学或战功享有清誉的一时名流，能够接受二十岁出头的王莽为友，固然有王莽属于王氏家族一员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是引以为同道，将王莽视为年少有为、卓异俊茂之士。

这些，是其他王氏子弟以及王莽的姑舅表亲淳于长之流所不具备的，也是王莽独树一帜的地方。当然，也不是所有名士都领王莽的情，比如王音的红人毋将隆。

王莽在外以儒生身份与名士交游，在家中则恪守儒道，谨奉寡母和寡嫂，倾力照顾侄子。对那些拜官封侯的叔叔辈，王莽深知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百般尊敬，即使入不了叔父们的眼睛也不妨，这种孝道也为王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为王曼去世较早，王政君就把王曼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兄弟媳妇接到长乐宫，名义上是一处做伴解闷，实则是同情照顾。这就让王莽格外多了一些与王政君接触的机会，他至孝至悌、勤学守礼的事情，也一件件为王政君所知悉。

于是到了阳朔三年（约公元前21年），王凤病重，王莽和淳于长两兄弟在病榻前极力照顾，让王凤对这一甥一侄都颇有好感。临死前，王凤把王莽和淳于长一并推荐给王政君和汉成帝。对淳于长，王政君和汉成帝都很熟悉，特别是汉成帝向来宠爱这位姨表兄弟；对王莽，王政君终于把眼前这个因为照顾病患而蓬头垢面、伤痛欲绝的年轻人，和平时来东宫里向母亲和她自己问安服侍的侄子对应了起来。

在王政君心中，估计常常会有“可惜他父亲死得太早”之类的触动。

王凤八月一死，车骑将军王音九月继任大司马。王莽就在这期间被拜为黄门郎，可以出入禁省，成为汉成帝的一名低级侍从。而淳于长则从黄门郎拜为列校尉诸曹，随即升迁为水衡都尉、加官侍中，成为汉成帝的高级侍从，很快又升至卫尉，统领未央宫卫士，负责皇帝安保，位列九卿，其受宠信和眷遇的程度远超王莽。

王莽在黄门郎的职位上也没有待很久，但他仍然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结识了同为黄门郎的几位才俊。扬雄比王莽大八岁，文赋很得皇帝的喜爱，他不拘礼法，不奉承权贵，亦不进取仕途，满足于做皇帝的文学侍从；刘歆比王莽约大六岁，因为王凤的阻挠在黄门郎的位置上已经待了许多年。不过，这倒是给了他与王莽交好的机遇。二人都认为，儒学的确是挽救天下危亡、建立理想国的法宝，所以必须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改革；同时，也都对此时占据着朝廷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博士们不能实

质性推动改革，只会是一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而感到不满。

在侍奉皇帝的间隙，他们就这类问题由浅入深，不知道谈论了多少次。直到王莽升迁为射声校尉，统领一支几百人的皇家“弓箭手”部队，从此步入“二千石”的序列，成为一名汉廷的中级官员，此时王莽才二十四五岁。

比起同为黄门郎的扬雄和刘歆，年纪更小的王莽、淳于长能迅速在仕途上精进，这显然得益于外戚的身份，外戚有时候比刘歆的皇族后裔还管用。

没有史料告诉后人，刚入仕时的王莽想些什么，做了什么。但从他后来的行动看，青年时期的王莽应已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在儒学的指引下，他的理想渐渐成型；置身灾异的氛围里，他的目光也逐渐超拔于同辈的王氏家族第二代，甚至超过他的叔辈。王莽意识到，必须超越王氏家族的家族利益，追求更高远、更宏大的目标。有朝一日，即使王氏家族还被认为是灾异的来源，但他王莽本人不是。

9. 新都侯王莽

一晃六年过去，到了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也已步入而立之年。

这年刚开春，未央宫接到报告，说北海沿岸的渔民发现了四条大鱼，“长六丈，高一丈”，西汉的一丈大约是2.3米，也就是说有四条长约14米、高2.3米的大鱼在北海游弋。

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外臣僚不由想起了已故今文经学大师京房的话：

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¹⁵

这个消息令皇帝很郁闷。本来，皇帝在这一年是有一番打算的，即位十六年来，灾异始终不断，一直没有子嗣，自许皇后被废，皇后的位置已经空了两年。他决定进行一次特殊的改元，立一个新的皇后，试图消除灾异的影响。

自汉武帝后期年号制度逐渐成熟以来，一般只在皇帝登基的年号中才会有“始”“初”这样的字眼儿，例如汉昭帝的始元、汉宣帝的本始、汉元帝的初元，以及汉成帝的建始。所以，汉成帝决定在即位十六年时破例改元为“永始”，有一种天下更始、消除天命转移压力的迫切寄托。

结果，刚改元就出现了大鱼，这个灾异令人不免要问：谁是邪人？谁是贤人？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因为此时宫廷内外，正在为皇帝要立赵飞燕为皇后一事议论纷纷。

王凤还活着的时候，当时的许皇后与王凤不睦。久而久之，许皇后恩衰失宠，随着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入宫，许皇后终于在一次颇为可疑的宫廷诅咒事件里被废。虽然貌似事出有因，但时人大都同情许皇后，厌恶赵飞燕。

所以，听说赵飞燕要被立为皇后，大家会觉得这大鱼就是冲着赵飞燕来的，纷纷反对。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皇太后；大臣们则分为两派，赞同和反对的争论非常激烈。汉朝虽然皇权专制，但和后世相比，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面对众多反对意见，汉成帝寸步难行。

淳于长很聪明，他私下里为立赵后这件事找王政君说项，一面打听姨妈为什么反对，一面试图说服姨妈同意。问来问去，总算弄明白了，原来王政君嫌弃赵飞燕出身歌女，身份低微。

淳于长把这个内情告诉了皇帝。四月初夏，汉成帝把赵飞燕的父亲赵临封为阳城侯，算是解决了她出身低微的问题；接着处置了反对的大臣，外廷里激烈的异见逐渐平息；在淳于长的斡旋下，王政君最终点了头。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想起春天时北海的那四条大鱼，一定会认为新出现的外戚赵飞燕家族，就是灾异的应验。

或许是为了平衡炙手可热的赵氏，王政君越发想起王莽。她不断和几个主要的兄弟王谭、王商等聊起死去的王曼，夸赞王莽如何年轻有为。王商等人心领神会，也在皇帝面前不遗余力地赞扬王莽能力出众、品性高尚。王商干脆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要把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来封王莽为侯。

见到王商这一非比寻常的姿态，王莽所交接的那些朝中名士如戴崇、陈汤等人也纷纷行动。他们比王商更了解王莽的志向与为人，说给皇帝的理由也就更加充分和动听。汉成帝知道自己立后的打算已经得到母亲及一干舅舅的支持，也愿意顺水推舟，做这个人情，况且王莽的确是表兄弟里难得的谦虚、谨饬的儒者，重用一下王莽不是不可以。

永始元年五月，汉成帝追封王莽的父亲王曼为新都侯，谥号

为“哀”。新都，并不是“崭新”和“都城”的意思。新，指的是南阳郡的新野；都，指的是新野的都乡。南阳郡靠近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新都这个地方还算是块宝地。但距离长安有四百多公里，亦不算近。三十岁的王莽随即以继承亡父爵位的方式，成为第二代新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个食邑算是中等水平，但王莽从此迈入贵族行列，不再是王氏家族的边缘人。

多年以后，即将成为天子的王莽会认为，他所开创的崭新的王朝“新朝”，不仅意味着“除旧布新”，而且早在自己袭爵新都侯时就有了征兆，这不啻为一个大大的祥瑞。

他的官职也从射声校尉升迁为骑都尉，成为皇帝禁军羽林军的统军将领之一，同时兼任光禄大夫，这两个职位俸禄不算太高，但王莽还有一个侍中的加官，成为皇帝近身的高级侍从。王莽虽然还没有位列九卿，但侍中的加官、新都侯的爵位，已经让他可以和淳于长平起平坐，甚至还高了一点，毕竟淳于长还没有封侯。

安抚了王氏家族，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六月正式立赵飞燕为皇后，进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为昭仪，大赦天下，舆论为之哗然。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想起春天的那四条大鱼，但没人将大鱼和王莽联系在一起。灾异，渐渐从王氏家族转到赵氏家族。

10．表兄弟淳于长

女主人有了皇后的身份，名正言顺，未央宫里比从前更热闹了。

在两宫之间长袖善舞的淳于长越发炙手可热。王政君信任他，汉成帝宠爱他，赵飞燕感激他。终于，汉成帝找了个牵强的理由把淳于长封为关内侯。至此，王氏家族一度令人叹为观止的“五侯”已经翻倍为瞠目结舌的“十侯”，也就是王政君全部八个兄弟都是列侯，加上堂弟安阳侯王音和外甥淳于长，王氏家族称得上汉朝开国以来的超级家族。

许多人认为，属于王氏家族一员且备受两宫宠信的淳于长是未来大司马的热门人选，争相交接贿赂。淳于长来者不拒，拿钱办事决不含糊，依附他的人越来越多。淳于长内结权贵，外交诸侯，与一些恶霸豪强也打得火热。皇帝对这些不知是蒙在鼓里，还是不以为然，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进一步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使他进入列侯序列。似乎皇帝也已经将淳于长当作大司马的后备人选。

淳于长的轻薄为贤人所不齿，在正直之士的眼中，淳于长就是倖幸，怎么堪当大司马重任？

况且，王氏家族放着一个现成的王莽，至少道德上无可挑剔。世界上大多数人富贵之后就高高在上，志得意满，比如淳于长。可王莽封侯之后，比从前更加礼贤下士，更加谦卑。和淳于长一样，王莽也交接卿相大夫，但不一样的是，他从不交接那些趋炎附势之人，而是名士学者。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儒士贤者，不惜散尽钱财进行接济，愿意来他门下当宾客的，饮食衣冠车马全包，很有当年萧相国、公孙丞相¹⁶的风范。

而在家族内部，淳于长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太后这两位贵戚，他翅膀硬了之后对舅舅们也不那么放在眼里了。昔日像侍奉父亲一样对待王凤的淳于长，再也不会去侍奉同样患病的现任大司马王根。王莽不然，他封侯之后照样去侍奉王根，还把母亲从长乐宫接了回来，亲自奉养；又倾力照管亡兄的儿子王光。儒家讲究“孝悌”，兄长去世了，为兄长的儿子负责就是最大的悌。

王莽把王光送到太学学习，拜太学博士为师。为了让博士们照顾好他，王莽常常去太学探望老师，每次去都要沐浴、备车马，携带羊肉和酒，礼节隆重，一丝不苟。去了之后，还要喊上王光的同学，有时赠送礼物，有时慰劳饮食。别的不说，这种尊师重教的姿态在外戚里就很难能可贵。

此时，王光和王莽的大儿子王宇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因为王光略小，按照儒家礼仪，家长应先为兄长聘妻，再为弟弟聘妻。但王莽别出心裁，他同时为王光和王宇聘妻，还特意把“纳妇”的环节安排在同一天。这样，从王莽和亡兄的关系来说，显示了对亡兄的“悌”；从王宇和王光这对叔伯兄弟的关系来说，也没有违背王光对王宇的“悌”，足见王莽的细心周到。叔叔为侄子做到这个分儿上，世人再挑剔也说不出什么来。

两个年轻人“纳妇”这天，王莽的府邸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前来道贺的宾客络绎不绝，这里面有王氏子弟，也有时贤名流。宴席开始，钟鼓响了起来，虽说王莽向来节俭，又多散家财，但毕竟也是列侯之家，饮食洁净，漆器精美，觥筹交错，座上客满，樽中不空，王莽是家长，坐在宴席最显眼的位置。

于这欢腾极乐之时，一名仆人匆匆赶来，在王莽耳畔絮语。远处的

宾客看见仆人面色凝重，王莽频频点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靠近王莽的宾客则隐约听见“太夫人该服药了”的话。众人疑惑之间，王莽已经起身，向众人行礼致歉，说了一番“暂时告退，稍候再来，恕罪恕罪”的话。须臾之间，宾客们都知道王莽去服侍母亲服药了。不一会儿，王莽回来，宴饮如常，但整个婚礼期间，王莽几次退下亲侍母亲服药。

众目睽睽之下，众人无不叹服。儿女结婚，不忘老娘，王莽果真孝顺，都愿意把这些事情传言出去。

对母亲孝，对亡兄悌，如果把这些行为都说成他沽名钓誉，那就太苛刻、太不公平了。

王莽的道德声誉日隆，在位的人赏识他，在野的人佩服他，朝野都把他当作汉廷未来的顶梁柱。王莽又是外戚，的确很有可能成为政坛未来的明星。比起在任的王商、王根等庸碌之辈和声名狼藉的淳于长，具备“儒家理想人格”的王莽怎么看都是更好的大司马人选。

王莽的好友也会向他表达这个意思：为天下着想，为了儒家的理想，王莽要敢于想象并争取未来担任大司马，从而辅助皇帝开启良政善制。王莽的野心，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期逐渐生发的。目睹叔辈的平庸和淳于长的佞幸，回顾自己在学术上的勤奋与道德上的实践，当仁不让才是哲人应有的选择。

淳于长不可能不注意到王莽这个姨表兄弟，但未必认为他是一个威胁。一来，王莽是君子，君子是不会害人的；二来，自己和王莽本不是一路人，走的是不同路线，王莽在朝野的声誉再高，也未必比得上自己八面玲珑，结交权贵。都是外戚，但论私交，王莽比不上淳于长和皇室的情谊，而将来谁能当上大司马，是皇太后和皇帝说了算。

王莽算什么呢？有次淳于长路遇王莽的母亲，也就是他的舅妈，按照礼仪，淳于长应该行礼致意。但淳于长当着舅妈的面上车走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在汉朝，亲戚之间的这种无礼近乎羞辱。

王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可王莽算什么呢？他知道了又怎样？

而且，淳于长近来又有了新的刺激，令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他偷娶了一位美貌的小妾名叫许嬿，这个女人非同寻常，她是汉成帝废皇后许后的姐姐，曾是龙额侯韩宝的夫人。韩宝的祖父的兄长就是当年汉武帝极为宠爱的韩嫣。韩宝死后，许嬿寡居，不甘寂寞，与淳于

长私通，最后干脆偷偷嫁给淳于长。之所以说是“偷”，是因为这桩“婚姻”私下里进行，没有经过正当的婚姻仪式，而且两人是私通在前，娶亲在后。

听说了这层关系，废居长定宫的许皇后动了心思。

自从被废之后，当年煊赫一时的许氏家族已经没落。男性成员承袭的平恩侯爵位虽然还在，但人被“遣就国”¹⁷，从长安的核心圈子被排斥出去。内外朝的势利小人们都不愿与许家有什么瓜葛。不过，事情近来略有转机，汉成帝可怜祖母许家，让平恩侯返回了长安。许后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再努力一把，哪怕当个婕妤也好过现在的处境。她知道淳于长是皇帝面前的红人，连立赵飞燕为皇后这样“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搞定，于是就拿出毕生积蓄，通过姐姐许嬿托淳于长去求皇帝。

淳于长与汉成帝朝夕相伴，知道皇帝宠爱着赵氏姐妹，特别是赵合德，所以许后设想的事情绝无可能，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他一边让许嬿捎信给许后，欺骗她说，皇帝不只是一要封她为婕妤，还要立她为左皇后，与赵皇后分庭抗礼。一边在信里对许后进行露骨的调情。许后想到自己虽然被废，但仍然是皇帝的女人，因此备感侮辱，但又有求于淳于长，而且“左皇后”的名分实在太诱人了，只能隐忍不发，依旧拿出钱财贿赂他。

淳于长好色，家中姬妾美女多得很，但与前任皇后调情，而且是才名冠绝后宫的许后，这种滋味是天下任何女人都无法给予的，这里面有爱慕，但更多的是刺激。至于其中包含的对皇帝的悖慢和侮辱，以及这种行为的大逆之罪，淳于长不说，许后姐妹不说，皇帝也就无从知晓。

淳于长以好色名誉扫地，王莽就不得不在女色上压抑自己。这段时间，王莽也偷偷买了一个美女，还没怎么着呢，马上就引来舆论的不满。作为君子、哲人，你王莽怎么能好色呢？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王莽的性格里有一种激烈气质，听到这种非议，他索性不要这个美女了，立刻把她送给朋友、后将军朱博，并说：“后将军还没有后代，我听说这个姑娘挺能生的¹⁸，所以特意买来送给后将军传宗接代。”言下之意，我王莽不好色。

班固后来说，这是“匿情求名”¹⁹，也就是隐藏真实意图以求名誉，实在虚伪。

但与淳于长调戏皇后比起来，王莽这件事简直小到不值一提。他就

算是真的买个美女，又能说明什么呢？王莽封侯已经六七年了，班固凭着还是王莽朋友的后人，在这六七年的漫长时间里竟然找不出其他的案例来批评王莽，恰恰证明王莽在这一时期的谨慎和谦虚。

但这件事透露了王莽极度在乎舆论和民意，面对非议不能淡然处之，不惜以极端、激烈的举动来自证清白。这绝非圣哲处世之道。当然，这种性格目前还影响不到他的仕途和理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格之于哲人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11．新任大司马王莽

到了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曲阳侯、大司马王根的病越发沉重，经常无法到大司马府视事，只能在家中卧床休息。

他打算病退。

王根就是当年因为“赤墀青琐”僭越皇室规格而被汉成帝怒斥的舅舅，无论是辅政能力还是道德人品，均无足称道，凭的是王凤奠定的政治基础和尚且稳定的外朝政局而任职至今。眼下，与王凤病重时候的情形已大不相同，王凤有许多兄弟可以从容安排身后事，王根却已近乎孤家寡人。王根最小的弟弟王逢时去年刚刚去世，王氏家族这一辈里还活着的男性只有王根和红阳侯王立，但王立是公认的荒淫无能、见钱眼开的废物，所以下一任大司马不能让王立接任。

那么，就只能从下一辈里选。王根分析，目前来看，只有外甥、定陵侯淳于长和侄子、新都侯王莽可以胜任，两人都是王氏家族成员，年龄相仿，淳于长聪明能干，王莽品行高尚；淳于长乖巧伶俐，颇得皇太后和皇帝的喜爱，推荐淳于长，皇太后和皇帝都会称心；王莽谨饬严肃，常来侍奉自己，如果推荐王莽，他应该能对自己保持忠诚。

王根拿不定主意。

淳于长觉得不需要王根拿主意，他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是从前那个没有爵位的黄门郎，而是位列九卿的定陵侯，不必再像当年侍奉王凤那样，屈尊去侍奉王根。他判断，自己有皇太后和皇帝的支持，王根卸任后，只要王立不来捣乱，应该会轮到自己出任大司马，所以紧要的事情是琢磨一下当了大司马后的人事安排，免得上任时手忙脚乱。

王莽觉得，自己有哲人之能，又精通礼乐，但如果顾忌礼让，不去争夺大司马这个位置，而让王立、淳于长这样的蠢货、佞幸来做，究竟

是对还是错呢？当年孔子不也是周游列国，以求被用吗？孟子遍干诸侯，不也是当仁不让吗？如果怕别人批评自己贪图高位就不去争，反而让淳于长上位，这才是虚荣吧。

儒家是允许“权变”的。

在王根身边侍奉时，听王根的意思，似乎还没有下决心安排后面的事情。要不要主动一下呢？

终于，王莽对天下的责任心和对地位的渴望，战胜了个人的道德心。他在侍奉王根时，直截了当地向王根告知了淳于长的事情：“淳于长看到您一直生病，反而很高兴，因为您之后就轮到他接任您的职位了，所以他不仅不来看望您，甚至开始公开大搞封官许愿。”

王根不是深思熟虑之人，听到这话勃然大怒，训斥王莽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知道将军您的意图啊，我哪里敢张嘴？”王莽吓得不轻。

“赶紧去告诉东宫的皇太后吧。”王根说。

见到王政君后，王莽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淳于长的事情和盘托出，包括淳于长偷娶许嬿、见到自己母亲失礼以及封官许愿等等。

王政君听了大怒：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过分？！你去禀报皇帝吧。

有了王政君的意旨，王莽把这些事又向汉成帝说了一番。

汉成帝知道淳于长一向比较放荡，但没想到这个平时和自己一处玩闹的兄弟居然这么不守规矩，就勒令淳于长“遣就国”，回定陵国反省。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成帝确实很宠信淳于长，没有治罪的打算，让他回定陵国更像是暂避风头。

但这件事情仍然造成汉廷政治的动荡，因为淳于长已经炙手可热许多年，他这么一走，到底是彻底失势，还是暂时躲避，外边的人是不知晓的。红阳侯王立听说后觉得比较痛快，因为早年王根接任大司马时，他就听说是淳于长讲过对自己不利的话，导致自己没能接任大司马。

王立决定狠狠地羞辱淳于长一番，他令儿子王融去拜访即将“遣就国”的淳于长。王融当然不是酹酒挥别、送君千里，而是转达父亲的意思，淳于长既然要离开长安，可以把马车留下，供王立享用。

汉成帝常常躲在淳于长的马车里，微服私访，纵情享乐，想必这套马车一定是珠光宝气，非同一般。王融向淳于长索要马车，既是落井下

石，也是真心眼馋。

淳于长完全不在意马车，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节骨眼上遭受到政治攻击，而且是王莽告的状，真没想到王莽也想要当大司马。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翻盘，正愁没办法呢，王立送上门来了。

马车？

他立刻把这套马车送给了王立，还加码多送了些珍宝。要求只有一个：请舅舅王立替自己在汉成帝面前关说，是王莽要当大司马，所以故意陷害自己。

王立收了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再也不嫉恨淳于长了。他找了个机会，向汉成帝说淳于长人还不错，“遣就国”的惩罚太过了，王莽倒是问题很多。汉成帝对几个舅舅再熟悉不过，王立是个蠢材人尽皆知，居然敢插手这么复杂的宫廷斗争，谁借给他的胆量？而且，王立和淳于长以前关系很差，现在王立为淳于长美言，这其中定有自己不知的秘密。

我要知道是什么秘密。

汉成帝下令彻查王立。

王立害怕了，逼迫儿子王融自杀，以灭口。

弄巧成拙，汉成帝疑心或者说好奇心更大了，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能让儿子自杀呢？原本觉得淳于长折腾不出什么大事的汉成帝，想法彻底变了，他令廷尉把淳于长抓回来严加审讯，务必找出他与王立在背后谋划了什么阴谋诡计。在皇帝的默许下，廷尉下了狠手，淳于长受不住，主动交代了与许皇后的事。

是的，我许诺帮助立许皇后为左皇后。

是的，我曾调戏过许皇后。

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的淳于长，反而率先受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事，那么许皇后也逃不过。汉成帝见到自己的表兄弟不仅飞扬跋扈，还和自己的“前妻”眉来眼去，实在无法容忍，只能杀掉淳于长。

许皇后也不能留。汉成帝安排孔光持诏书赐给许皇后毒药，令其自杀。

王立不仅没捞到好处，也被迫“遣就国”。

一场风云变幻，王莽扫除了王立和淳于长两个潜在的竞争者，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司马人选。王根很快辞职，并推荐王莽代替自己。

王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职位，一跃而接任大司马之职，时年三十八岁，在当时属于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王氏家族整体利益来看，第二代顺利接棒，走到了历史前台。

但在王莽看来，是自己的“权变”避免了帝国被佞幸掌权，挽救了汉朝。所以，一定要努力辅佐刘氏皇族，使得天下归仁、礼乐复兴。

如今灾异频现，天下危亡，若没有自己，还能靠谁呢？

注释：

- 1 仅统计《汉书·成帝纪》。
- 2 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 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452页，中华书局，2007；《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两书所引歌谣略异。
- 4 外杜，《水经注》引作“五杜”。颜师古引李奇，以“外杜”为长安城内外杜里。高都，一说为高都水，一说为高都里，后者较为妥帖，可从。
- 5 薄昭是被汉文帝逼迫自杀的。
- 6 田蚡死后，汉武帝听说田蚡有“谋反”的事迹，就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意思是倘若田蚡没死，就会被族诛。
- 7 吕思勉：“盖上无诛赏，则下不得不依附权门以自固。”见《秦汉史》，第162页。
- 8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 9 《汉书·谷永传》，第3455页。
- 10 《汉书·元后传》，第4024页。
- 11 《汉书·楼护传》，第3707页。
- 1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 13 此处为推测，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另外从王莽和刘歆的关系看，刘歆和太常博士们不是一路的。
- 14 陈参事迹，史书不载，其经学的家法和师法也不详，有人认为他是西汉大臣陈咸的儿子，陈咸的确有子名参，但陈氏是律法世家，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 15 《汉书·五行志》，第1431页。
- 16 萧何、公孙弘都有过为国招揽贤才的举动。
- 17 “遣就国”就是“遣送回封国”，这是对贵族的一种待遇，表面上看，并不是多么严重的治罪，但实际上是对贵族实权的惩罚性剥夺。因为，在中央统治稳固时期，政治资源几乎都在首都。首都犹如抽水机，把地方的人才、财富统统抽取到皇室之所在，所以，如果一位曾经执政的大臣被“遣就国”，意味着他被迫回到封国，不能随意踏出国界，更不能擅自进入首都，形同软禁。鉴于汉朝的侯国视同于县，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被“遣就国”的列侯还会遭受实际掌握侯国政权的国相或是侯国上一级郡守的监视。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 18 《汉书·王莽传》，第4040页：“此儿种宜子。”
- 19 《汉书·王莽传》，第4041页。

三、王莽的沉浮

12．王莽的宏大志业

汉成帝元延四年（约公元前9年），有个在长安消失很久的女人再次露面了。

这年春天，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叔侄二人按照礼仪入长安朝见天子。刘兴，汉元帝冯昭仪的儿子，汉成帝的异母弟弟；刘欣，汉元帝傅昭仪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此时的汉成帝已经绝了生育的希望，就想从这两位诸侯王里选一个立为太子。

就在两王朝见期间，陪同刘欣一起来长安的祖母——汉元帝昭仪傅氏，如今的定陶王太后——突然秘密拜访了大司马王根。她带来丰厚的礼物，只说了一件事：听说皇帝要立外藩为太子，希望王根以大司马、帝舅之尊，择机在皇帝面前推荐定陶王刘欣。

傅昭仪——王根还是习惯这么称呼她——虽然年岁已高，在长安的露面还是引起不少老臣和旧戚的注意。毕竟，傅昭仪与王政君不同，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

王根还记得，汉元帝在世时，一度想废掉时为太子的汉成帝，改立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也就是刘欣的父亲。汉元帝弥留之际，陪伴身边的也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换言之，傅昭仪差点成了皇太后。傅昭仪此次

来请托，看得出她仍然为当年的事情愤懑不平。

如果昔日傅昭仪当了皇太后，不必说王根，整个王氏家族都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但王根还是应允了傅昭仪的请求，因为他知道，一旦汉成帝晏驾，新的皇帝必定会带来新外戚。为了长保王氏家族的禄位，立自己推荐的人为太子当然再好不过。傅昭仪能够屈尊来示好，将来即使傅氏成了新贵，也会感激自己吧。

但王根一定不知道，向来精明能干的傅昭仪，并不只在他身上下注，她同样秘密拜访了赵飞燕皇后、赵合德昭仪，向这两位皇帝的枕边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托。王根也没有深入琢磨，傅昭仪为什么不去求皇太后王政君。

汉成帝本人已属意刘欣，王根、赵氏姐妹也推荐刘欣，廷议也认为应该过继侄子而非“立弟”才符合儒家祭祀的昭穆顺序，总之，拐过年来二月，刘欣顺利被立为太子。实际上就是把刘欣过继给了汉成帝。根据儒家礼仪，今后刘欣就是汉成帝的儿子，所以皇帝下诏，命令傅昭仪和刘欣的母亲丁姬都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官邸，不能随意与太子见面。换言之，傅昭仪和丁姬都还是定陶王的亲眷，而刘欣已经是皇族，礼仪上的身份超越了血缘上的关系。

令人感喟的是，王政君再次展现出她的仁厚善良，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对定陶王一系照顾有加。她向皇帝建议，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汉成帝不同意，理由是这不合礼法。王政君认为：“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允许祖母看望太子，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汉成帝想了想，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王政君的仁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后来，口碑较坏的淳于长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公认具有宰辅之德的王莽被推荐为大司马，种种举动，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异的来源。

在灾异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廷，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皇帝身体健康，选立的太子刘欣举止稳重，雅好文辞，皇室安宁；外廷丞相翟方进，是著名的儒学学者，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踌躇满志，名义上是“辅政”，但皇帝沉湎享乐，实际上等同于“执政”，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当了大司马，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外朝的官员，内廷的近侍，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搞搞“夫人外交”。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一进王莽家门，就看见一位荆钗麻裙的老妇前来迎接，她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并未在意，直到被迎进屋内，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比起王莽叔叔们的骄奢淫逸，节俭总归不是坏事。而且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因为他上任后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为了招揽人才，几乎散尽了封邑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钱都花到为国揽才上了，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汉成帝也感觉到王莽当政后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他的心情越发向好。看起来，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觉察到一丝不同：

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

此奴仆发现，皇家马厩里有一匹马长角了，这个灾异说明有人将要“害上”！当时王莽执政，气象一新，什么人会害上？后宫？宰相？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月，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荧惑守

心”¹而被迫自杀。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皇家马厩里的灾异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三月丙戌（公元前7年4月17日），皇帝睡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辞行的楚王和梁王；又因为翟方进死后，丞相之位空缺，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连夜阅看了拜相的赞词。

这天夜里，安静平和，皇帝睡得很好。

拂晓，皇帝苏醒。像往常一样，在内臣的服侍下，他穿上袴与袜，又拿起外衣，忽然手拿不住外衣，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当天就晏驾了²。

13．四家外戚一时登场

皇帝晏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政君听说儿子晏驾的消息，极度悲痛。这些年来，她努力为儿子分忧：国家政事由王氏家族主持；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皇帝晏驾的消息刚公布，内外臣僚骚动起来。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得知皇帝毫无征兆的死亡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政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她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印绶，接任丞相。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孔光大为悲痛，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³。

她还命令王莽领衔，御史、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严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诏令一下，赵合德昭仪立刻自杀。

赵昭仪一死，追查大行皇帝晏驾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了。群臣知道，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所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而赵昭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湎酒色负责，她的自杀是咎

由自取。赵昭仪的死，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人知道赵昭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皇帝已经晏驾，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接任丞相得以迅速稳定。所以，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例如，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氏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王莽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那些对汉元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礼仪⁴，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公元前7年5月7日），在王莽朗诵策文的威严声音里，刘欣于汉成帝灵柩前正式受皇帝印绶，继皇帝位；随后，刘欣又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告令群臣，宣布大赦天下，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未央宫里山呼万岁，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吉服，换上先帝大丧期间的丧服，簇拥着刘欣去高皇帝庙拜谒。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⁵

不过，刘欣此时才19岁，颇为清楚昌邑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羽翼尚未丰满之时，避免锋芒毕露。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

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刘欣一方面下了罢乐府、放宫人、限名田、限奴婢、例行节约等一系列诏令，向天下显示新气象；另一方面，在内廷，他密集赏罚，借力打力，集中处理外戚问题。从这些举动来看，刘欣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紊。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传统⁶，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竞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惨；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弋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这是刘欣的宿命：

他是汉成帝的侄子，但他的父亲与成帝非同母所生，所以他与成帝的母族并无血缘关系，与成帝的妻族更没有；他自己又带来了祖母和母

亲两家。偏偏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和他的祖母傅太后都很长寿，关系又差。这就出现了四家外戚同时聚集的局面。

一是汉成帝的母族王氏家族，太皇太后王政君是核心，有贤哲王莽担任大司马，曾帮助刘欣被立为太子的前任大司马王根也在长安病养，列侯众多，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二是汉成帝的妻族赵氏家族，皇太后赵飞燕是核心，虽然赵合德已经自杀，但赵飞燕安全“退休”，家族中也有一位列侯⁷；

三是刘欣的祖母傅氏家族，定陶傅太后是核心，刘欣的妻子也出自傅氏，家族男丁兴旺；

四是刘欣的母族丁氏，定陶丁太后是核心，丁氏家族也有颇多男丁。

傅氏和丁氏两个家族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飞扬跋扈的傅太后。刘欣正式即位之前的第五天，天色呈现出深黄的土色，傅太后打破常规，授意刘欣封丁后的兄弟、国舅丁明为阳安侯，封妻子傅氏的父亲、傅太后的堂弟傅晏为孔乡侯，引起朝野震惊。谏大夫杨宣上书批评，说了一句话：

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⁸

王氏家族在王莽这一代已经恢复名誉，但大臣们始终不忘当年一日封五侯的往事，时不时要提出来警示一下皇帝。但是应注意到，杨宣的这句话也意味着灾异从王氏家族转移到丁、傅外戚身上了。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戚手中，如霍光、王凤，他反而很难动手。恰恰是外戚云集的极端局面，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例，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围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14．王莽被免职

前朝权贵王氏家族成了刘欣施政的第一个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刘欣只用三个月就轻松解除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时间虽短，却又显得那么漫长；结局早定，过程又让人觉得颇为和谐。

刘欣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能力。

四月丙午，刘欣即位当天就按照惯例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王政君的尊位更上一层楼，但她与皇帝无血缘关系，又是隔代的“祖母级”，权力已被架空，只留名誉上的至尊地位；对赵飞燕来说，“皇太后”意味着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渡过了宫廷政治里权力更替的最难关，已无性命之忧。

刘欣的生母丁后和祖母傅太后也一定驾临了即位典礼。但她们的身份仍然是定陶王的亲眷，住在长安的定陶王邸。此时此刻，为孙子刘欣继位付出大量心血的傅太后，心里在想什么呢？

熟悉外戚传统，也与傅太后是旧相识的王政君，非常识趣也十分高姿态地做了两件事。第一，她命令王莽辞职，把大司马的位置让给新的外戚。王政君这么做显得很大度，颇有“至尊”的胸怀，也显出一种熟习旧例的汉宫旧主姿态。第二，她下了一道诏令，指示傅太后和丁姬都可以每十天到未央宫里看望皇帝。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同样展示出她仁慈的风采，也是对皇帝的示好。

辞职这样的大事，王莽应该早就与王政君商量过，所以他立刻遵照王政君的诏令上书称病请辞。

刘欣治国理政的权力地图里确实没有王氏家族的位置，但当年王根支持刘欣为太子，而且王政君地位和威望都很高，王莽又是名重内外的贤哲，还有很多内外臣僚也都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所以不能在即位的第一个月就更换掉他。刘欣的权力目前还需要王政君和王莽的声誉来增饰。

于是他给王莽下诏，内有“诚嘉与君同心合意”的话，表示要与王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他还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这两位“三公”、自己的老师左将军师丹、负责未央宫保卫的新贵外戚卫尉傅喜，也就是刘欣当前重用的人，一同去见王政君，转达了皇帝极为谦恭的意见：

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⁹

就是说王莽不来上班，皇帝就不上朝。

这句话确实非常有诚意，王政君就吩咐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

刘欣做出的谦逊姿态很容易理解，不立刻将王莽解职本来就是他的既定策略。但是，也应看到刘欣是努力在儒家礼仪和亲戚伦理的框架内进行决策，不想搞得腥风血雨，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

与此同时，刘欣对王政君允许母亲丁姬到未央宫看望自己的示好也有了反应，他下诏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廷议傅太后在长安城内怎么住的问题。

孔光对傅太后比较了解，不愿意傅太后和皇帝住得太近干扰政事，就建议住在较远的筑宫；何武可能慑于傅太后的强势，或是有意讨好皇帝，建议住北宫。北宫在未央宫的东北，且有“紫房复道”相通，也就是空中走廊。皇帝果然同意何武的建议。而傅太后也真如孔光所料，住北宫后，每天通过复道到未央宫，怂恿皇帝尽快解决她的名分问题，抓紧让傅氏家族封侯掌权。

刘欣即位还没出四月，宫廷局面已翻天覆地。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

高昌侯董宏第一个上书，以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为例，认为同时尊两个太后是有先例的。傅太后现在只是定陶王太后，但作为皇帝祖母，也应有尊号。当然为了与“太皇太后”有所区分，可上尊号为“帝太后”。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他的生母是夏姬，在吕不韦的运作下，他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即位后，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夏姬为夏太后。这就是董宏上书的主要依据。

但是，在汉朝人眼中，秦朝极为特殊。汉朝本来就是“诛暴秦”“斩白帝之子”而建立的，不久前大家还在皇帝的登基典礼上见过这把“斩蛇剑”。在儒家的话语中，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秦代表着残暴，汉代表着文明。特别是在今文经学里，秦朝的“德”犹如历法里的“闰”，不纳入五德终始，汉朝人认为自己接续的是周朝。

此外，秦庄襄王这件事由吕不韦运作，在后世眼中也不正当，充满着宫廷秽乱和阴谋诡计。堂而皇之比附汉廷皇帝，岂不是羞辱？

于是，王莽、师丹激烈反对董宏的主张，认为刘欣既然早就被立为汉成帝的太子，就已经不是诸侯王的身份，更不宜拿已经灭亡的暴秦来寻求依据，要求严惩董宏。

这番交锋发生在王莽首次辞职被留任之后。刘欣刚刚挽留了王莽，多少要表现出纳谏的态度。把问题抛出来的董宏，也早就做好了被牺牲的准备，他被收走高昌侯印绶，废为庶人。

刘欣对董宏的处理如此严厉，既展示自己在舆论前的谦逊，也突出王氏家族的霸道，还故意激怒了傅太后。果然，傅太后勃然大怒，更加频繁地通过复道来宫里找刘欣索要“尊号”，刘欣把这个难题故意抛给王政君，请她以“至尊”身份来定夺。这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局面：

刘欣支持王莽，处理董宏，也没有给傅太后上尊号，向王氏家族表示了谦逊；王政君和王莽不愿意尊傅太后，但皇帝这么谦逊，他们不得不后退一步，把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傅太后的儿子定陶恭王追认为“恭皇”。

藩王承继大统带来的名分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后世亦屡见不鲜¹⁰。刘欣的处理显示了他的老道。

此时，王莽已经明显感觉到时代变了，作为内廷首领的大司马说话也不那么管用了，他硬着头皮处理政事，这段时间多少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向皇帝举荐了老朋友刘歆。

五月，刘欣按照惯例封妻子傅氏为皇后，同时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有趣的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赵钦也在此时被封为新成侯。

五月的内廷，王、赵、傅、丁四个家族一时齐备，四位太后各有一套服务自己的班底，纷纷扰扰，蔚为大观。普通人家四世同堂尚且产生各种矛盾，何况皇家？最跋扈的傅太后“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姬”¹¹，敢当着王政君的面称呼她为老太婆、老妈子，其情形可想而知。努力维持王政君身份地位的，内廷里也只剩王莽了。

这些矛盾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场宴会中爆发¹²。

刘欣在未央宫举行登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会，王政君、傅太后均出席。少府的内者令负责布置，把傅太后的帷幄设在王政君旁边，也就是并尊的意思。王莽见到后，极为不悦，斥责内者令说：

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¹³

把已经被尊为恭皇太后的傅太后斥之为“藩妾”，也难怪傅太后会称王政君为“老姬”，两事不知道哪个在先，但关系之剑拔弩张，略见一斑。

王莽是大司马，内者令只是少府属官，是内廷的低级官员，竟然不事先向王莽问清楚，说明王莽的权力已经式微。但大司马已经开了口，内者令也只能把傅太后的帷幄另外设坐。此事大大激怒了傅太后，她拒

绝参加此次宴会，并对王莽深恶痛绝。

傅太后不来赴宴，一场宴会不欢而散。皇帝如何表现，史书没有记载，但一定很不高兴。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七月，王莽第二次申请辞职。

王莽在权势日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别无选择，他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将来迟早要被罢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如果不这么做，对元后就是不孝，对傅太后就是谄媚，那么他备受众人褒扬的德行就会大为消减。

从四月首次请辞被留任，到七月第二次请辞，三个月时间说长不短，宴会之事王莽处置不妥亦有责任。皇帝因此欣然允准，为了抚慰王莽，特别是照顾王政君的脸面，刘欣给了王莽极高的退休地位和赏赐：

黄金五百斤——这是钱；安车驷马——这是“专车”，是历来给功勋老臣退休的待遇，安车即矮车，乘客可以坐在车里，而当时的车很多是站立其中的；中黄门为莽家给使——从内省拨一个侍从驻在王莽家中服务；十日一赐餐——皇帝每十天请王莽吃一次“未央宫外卖”；益封莽三百五十户——增加封邑，也就增加了王莽的年收入；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退休后的“行政待遇”，王莽仍然有权出入禁省，与在任大臣同列时位次等同于三公，每个月的朔望两天可以上朝，见皇帝时可以行三公之礼；车驾乘绿车从——绿车是皇孙之车，皇帝出行时允许王莽乘绿车随从。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次王莽“罢就第”，人仍然在长安家中，说明不是以罪免，不必“遣就国”，没有远离政治中心。

在赏赐王莽的同时，王氏家族的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以及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同时增加了封邑。整个朝廷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气氛，王莽的主动辞职，皇帝的优容赏赐，也传递出儒家伦理所推崇的谦让之道。刘欣成功地和平处理了王氏家族势力。

而且，空出来的大司马职位，刘欣也并没有给外戚担任，而是让自己的老师师丹担任。

王莽当了不到一年大司马就被罢免，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是心有不甘，是坦然平静地接受，还是准备东山再起？这些都有可能，但考虑到当时刘欣正富于春秋，且傅、丁两家不乏男性；而王政君六十四岁，已是超长寿命，所以王莽最可能的心理是坦然接受这一命运，回

到砥砺名节、激扬声誉的道路上，并争取在朝廷中担任个其他职务就心满意足了。

15．王莽被逐出长安

昔年汉宣帝厚葬霍光后，就逐渐剥夺霍氏家族的权力，最终将其族灭。这大概给了刘欣不少启示。

仅仅在王莽等人增加封邑一个多月后，司隶解光突然上奏弹劾曲阳侯王根和成都侯王况！措辞非常严厉，把王氏家族前番的种种不法之事都翻了出来。细看这份奏折，贪污敛财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僭越。

宅邸的装饰僭越，前面汉成帝微服私访时曾被气得不轻的“赤墀青琐”再次被提及；排场的规格僭越，王根让自己的家奴穿战甲持弓弩，陈列如军人；权力的范围僭越，王氏家族把近亲故吏送到禁省担任尚书，欺上瞒下，垄断皇帝视听，还违禁交接诸侯，败坏国家制度；私生活上也僭越，王根公然把皇宫的女乐官娶到自家唱歌跳舞，王况更大胆，聘娶掖庭的贵人也就是先帝的嫔妃为妻。

解光是谁？

解光是一个小人物。他得以史书留名，要从“司隶”这一官职说起。司隶校尉是《周礼》上记载的官职名称，掌管监察巡察。汉朝时，汉武帝第一次设立，手下还有兵，因此称“司隶校尉”算是实至名归¹⁴。后来渐渐不再掌兵，成为专门的监察官员，至汉成帝时被撤销。

有趣的是，刘欣即位后在官僚机构上做的第一个调整，就是恢复这个职务，将其定为大司空也就是原来的御史大夫手下的监察官，秩比二千石。因为不再掌兵，所以改名为“司隶”，当然有时候大家还是俗称“司隶校尉”¹⁵。

刘欣设置这一新职位是有意图的，解光因为“明经、通灾异”为其所注意，被任命为首任司隶。所以，解光的劾奏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授意。王莽名誉极好，已经荣休，王政君和王莽对这份不涉及自己的奏折想必不敢有意见；而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被“拉清单”了。

解光弹劾的结果是，刚增加了封邑的王根，因为立刘欣为太子时说过好话，所以仅被“遣就国”；王况是前任大司马王商之子，被免为庶人；凡是由王根、王况举荐在内廷担任近臣的人一概逐出。

王氏家族到此地步，基本上算是退出刘欣一朝的权力场了。王莽担

任特进、给事中，可以通过列席廷议了解朝廷事务，但没有决策权；内廷的近臣里，还剩下王去疾和王闳¹⁶，这兄弟二人是王谭之子，前面已经说过王谭与王凤关系很差，一直是王氏家族的另类。

不管怎样，刘欣的目标并不是要灭掉王氏家族，而是在合法框架下消除外戚过重的权势。转眼到了次年正月，刘欣正式改元建平（公元前6年），大赦天下。

司隶解光又站了出来，这一次，他弹劾的是赵氏家族，而且也是汉成帝时期的旧事。

这桩旧事，可能在汉廷已经广为人知，不然解光何以知之？此即赵氏姐妹暗害汉成帝其他妃嫔所生子嗣、致使汉成帝绝嗣之事。解光认为，谋害皇帝后裔这样的事情罪大恶极，要遭天谴，结果凶手的家族不仅没有被惩治，还当了皇太后，封了侯。建议重治赵家。

议郎耿育随即上书，委婉地谈了另一番道理：赵氏家族这件事的确非常恶劣，但是皇家的龌龊事情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出去，有污皇室声誉。而且，比起赵太后当年主张立您为太子这样光辉灿烂彪炳日月的大事，别的事再恶劣也是次要的。

耿育其实是告诉刘欣，如果不是赵氏姐妹害的汉成帝绝嗣，哪里轮到你来当皇帝呢？所以做事不要太绝。

刘欣本来也没想把事做绝，他将赵飞燕的弟弟新成侯赵钦和赵飞燕的侄子咸阳侯赵祈免为庶人，赵氏家族只有这两位列侯，夺爵之后，家族就败落了。但是赵飞燕本人因为帮助过刘欣，得到了傅太后的厚待。

解光上奏的结果，就是赵氏外戚硕果仅存的皇太后赵飞燕被傅、丁外戚收编。王氏家族则被进一步孤立，成为傅、丁、赵三家的对立面。

在朝廷打击王氏家族时，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要求王氏家族名下的田地，只要不是用作墓园的都无偿分给贫民耕种，这明显是一种身段柔软的反抗。王政君以“至尊”身份来收买民心，表现仁慈，刘欣未必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在官吏和平民眼中，以往骄奢淫逸的王氏家族已经改弦更张，倒是傅氏家族变得咄咄逼人。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侮辱，路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人同情地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打击了王、赵两家，刘欣并不是要为傅、丁两家腾地方。他频繁更换大司马，师丹之后，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和丁氏家族的丁明先后出任大司马，每人在职的时间都不太长。可以说，在董贤崛起之前，大司马的职位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具有权势，更像是慰劳外戚的顾问之职而非辅政的权臣。

傅太后也没有像当年王政君那样，把大司马当作外戚牢牢把控朝政的关键，而是将精力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挟怨报复上。刘欣的即位给了傅太后一抒胸臆的机会，将她多年来压抑的愤懑之情肆意释放，造成刘欣执政前期非常不雅观的内廷形象，反而衬托出王氏家族的正当性。

傅太后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早在汉元帝时期，她与冯昭仪一时俱为皇帝宠妃，王政君是一个连失宠都谈不上，属于“无宠”的皇后。而且，傅太后的儿子也很为汉元帝喜欢。但就算如此，最终大位仍然由王政君的儿子继承。多年来，傅太后一直作为定陶王的亲眷待在外藩，受定陶国相的辖制，也不得不经年累月地向汉成帝母子朝请、进献。她宠爱的儿子定陶王很早就去世了，这势必增加了她的压抑和痛苦。如今，孙子荣登大宝，她没有理由继续压抑自己了。

然而，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但她复仇的心性却很剧烈。斥退王莽，打击王政君，拉拢赵飞燕之后，她把精力放在一桩与国事、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的私事上——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如今的中山王冯太后。

冯太后冯媛家世显赫，人人都熟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多年前，汉元帝曾带着冯、傅去“皇家动物园”看猛兽，一头熊突然爬出笼子，攀上围栏，傅昭仪吓得落荒而逃。冯昭仪却挺身而出挡在皇帝面前。这一壮举令汉元帝感动万千，也令傅昭仪终生嫉恨。

现在的冯太后并不太关心中央的皇位更迭，把精力放在照管孙子刘箕子身上。因为箕子身体不好，冯太后多次到庙里祈福。刘欣听说后，派遣近臣、一个名叫张由的谒者去中山国慰问，还带了医生。但张由据说有点神经病，私自逃回长安，于是被弹劾。张由害怕担责，就诬告说冯太后在中山国诅咒刘欣和傅太后。

这件事情很可疑，因为张由是谒者，级别虽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主殿上时节威仪”，很难相信皇帝会选择一个神经病担任谒者。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傅太后收买了他，让他找冯太后的茬儿。

不管怎样，张由既已告状，朝廷就不得不查。先派御史丁玄去查，抓了冯家一家子，却毫无所得；又增派一个叫史立的中谒者令去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以大刑严审冯太后及其家人，死者数十人，终于有人受不住只得供认冯太后诅咒皇帝，阴谋弑君，目的是立中山王为帝。冯太后当然不承认，史立逼迫说：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¹⁷

冯太后一下子明白了，对左右人说：这事只有汉元帝和傅太后知道，你史立如何晓得？可见，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于是，她不再申冤，饮药自杀。她的弟弟宜乡侯也不得不自杀。最终，案子由经办人史立、丁玄署名，由冀州牧毋将隆领衔署名上报汉廷。

朝中有人对这个案子颇为不满。曾当过三年京兆尹、现任司隶的重臣孙宝就站出来要求重审，惹得傅太后暴怒，大骂刘欣“帝置司隶，主使察我”，胳膊肘向外拐，刘欣只好将孙宝下狱；尚书仆射唐林站出来为孙宝争辩，刘欣反而更加恼火，认为两人“朋党比周”，将唐林贬谪到敦煌。所幸大司马傅喜以傅氏家族成员的身份站出来力争，孙宝才被放出来。而那个据说是神经病的张由竟然因此事被封为关内侯，史立升迁为中太仆。强行将此案的影响压了下去。

冯太后一案对刘欣的前期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这段时期发生的灾异，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擅权和强势。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异来源了。

冯太后作为诸侯王太后，并未参与中央宫廷政治，也不构成傅、丁两家的威胁。傅太后却将她作为眼中钉拔之后快，其原因史书没有明言。这并不难理解，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很多就是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却放过政敌王政君，本末倒置，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一案期间，掌管宫廷侍卫的郎中令冷褒、内廷侍从黄门郎段

犹站了出来，这两位都是刘欣的近臣，他们上书提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恭皇太后”“恭皇后”，都是来自“定陶恭皇”，而定陶只是一个王国，与其帝国外戚的身份不符，建议制定和皇族相称的礼仪，并给定陶恭皇在长安建立宗庙。

此时的“三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全都反对，师丹在上一次董宏提议时就反对，傅喜作为傅氏家族成员也反对，可想而知傅太后何其不得臣僚士大夫的欢心。

刘欣可能迫于傅太后的压力，但更可能是出于消除外戚专权、防止大臣挟制的长远目标，在京兆尹朱博的配合下，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师丹高乐侯的爵位被褫夺，改为关内侯，朱博顶替他为大司空。朱博紧接着向傅喜和孔光发难，傅喜被免大司马，“遣就国”，离开了长安；孔光最惨，罢免丞相，收走博山侯印绶，免为庶人。

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朱博的提议¹⁸，刘欣正式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和王政君并列为至尊；丁太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傅、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

朱博则趁机上位为丞相。

朱博，就是多年前王莽送女人给他的那位将军。当时，他默默接受了这个女人，替王莽消弭了讥议。而今，朱博却上蹿下跳，死心塌地与傅太后结党。不久，他和御史大夫¹⁹赵玄共同上奏弹劾已不担任官职的师丹和王莽。理由是，当年师丹、王莽拒绝董宏尊傅太后的行为是错误的，应当将师丹、王莽都免为庶人。

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
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²⁰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

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²¹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²²。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伋、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²³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²⁴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

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

从新都侯宅邸的阙下走过，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议论，更多的是自豪，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他谦逊知礼，深沉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棺车，好事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²⁵

新都侯面色凝重，悲痛万分，这可是丧子之痛，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先是从孔休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再以后，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内廷与外朝都知道王莽次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也令许多人感喟。

说起来，事情非常简单，起因于王获为琐事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没错，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从张家山出土汉简的情况看，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到了王莽的时代，主人擅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都会被法律追究，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徭役，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所以，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一等，缺乏人身自由，被主人颐指气使、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特殊情况下，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像卫青这样由皇室成员蓄养的奴婢，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必属犯罪，会受到处罚，更会受到舆

论谴责，但还不至于偿命。在这种氛围里，王荩杀死奴婢被王莽严厉切责是很自然的，但王荩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谁都看得出，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可从人情考虑，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荩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儒家对此态度鲜明，“仁者，爱人”，如何对待奴婢，是苛刻还是宽容，显示着一位士大夫的德性高低。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父子关系至为亲密，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²⁶

故事很简单：叶公告诉孔子，自己的故乡楚国有位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他，这是合乎道德的。孔子却说，我们家乡的风俗不同，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父亲帮儿子隐瞒，儿子帮父亲隐瞒，这才是道德。

这就叫作“父子相隐”²⁷。在西汉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而不是相互举报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儿子告发父亲犯罪，不仅不会被看作“大义灭亲”，还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恶行而被处死。

汉宣帝在位时期曾下诏，把这个原则说得明明白白：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²⁸

意思很感人：父子、夫妇之情都是天性，要彼此诚爱，虽死不渝。因

此，如果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要追究包庇者的责任；倒过来，长辈包庇晚辈也是如此，除非罪犯是“殊死”的大罪比如谋反之类，但这也需要请示中央司法部门定夺。

从孔子所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过渡到“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在西汉已经是朝野共识，违背这个原则会被看作不道德的。

无独有偶，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个叫作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佣人，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路遇苏格拉底，被截住聊了很久，聊的话题也很相似：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虔敬吗？²⁹

古希腊的事情这里就不深究了，总之“亲亲相隐”是古代东西方都非常重视且态度相似的伦理难题。王莽作为儒学中人，逼死儿子，岂不是违反了容隐的大原则？

这件事，亦当是孔休对王莽彻底幻灭的重要事件。当然，王获是自杀的，并不是王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换言之，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³⁰。

在这种视野里，除了了解王莽的人，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沽名钓誉，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斥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以至于“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³¹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刘欣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董贤已经成为刘欣的宠臣，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受宠远不及董贤，外戚权势不出后宫。刘欣已基本恢复了武、宣二帝的权力，外戚无论姓傅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

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32。

传到长安后，这些流民在里巷仟佰里聚集，唱歌跳舞，行巫术，念咒语，集体祭祀一个叫作“西王母”的神灵，据说可以长生不老，这一“群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刘欣得知后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场灾异散发着末世气息，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即将大乱的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旱导致了流民，有的如杜邺则认为是傅、丁两家权势过盛。

又过几个月，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异，刘欣不敢怠慢，循例下诏称此次日食“厥咎不远，在余一人”，有罪己之意，并大赦天下，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³³，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荐举措施，自汉文帝时期施行。天下有事的时候，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谏议。说到皇帝心坎上的，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名臣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護、宋崇给刘欣上书，借日食为王莽鸣不平，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王莽最大的仇敌、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欣一边审视着这封奏疏，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送上的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一个失势的外戚、书呆子，召回长安，既能消除灾异的影响，又能为自己赢得声誉，还给了王政君面子，何乐而不为？

刘欣很快就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政君，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³⁴的新都国，王莽从面色肃然的孔休手中接过诏令，感慨涕零，匆忙收拾一番，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 1 按照天文学推算，这个月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黄一农认为，翟方进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刘次沅认为，这个月的天象是“荧惑守太微，犯东上相”，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凶象，见《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 2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可能是脑溢血。
- 3 确有个别观点认为汉成帝是自杀，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却在立太子、内廷任用王莽为大司马、外廷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时间上仓促，行为上却很从容，所以怀疑是自杀。但缺乏史料支持，聊备一说。
- 4 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欣即位的礼仪安排，参考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 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赞语：“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这个评价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粉饰虚夸，但从汉哀帝的行为来看，这个评价应是当时人的看法，符合实际，不宜以成败和后世眼光来评判。
- 6 这里使用“外戚传统”而较少使用“外戚制度”，因为外戚是基于情感、礼仪的亲亲关系，平民也有外戚，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情的纠葛和爱恨，不宜使用生硬冰冷的“制度”来将其抽象。这一点，在外戚与皇帝的关系上最为明显。
- 7 后面又增加一位列侯。
- 8 《汉书·五行志》，第1450页。
- 9 以上两引俱见《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 10 例如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一脉相承。
- 11 《汉书·外戚传》，第4002页。
- 12 《汉书·王莽传》在描述这件事情时，紧跟着董宏上书一事，说“后日”云云。但据《汉书》，董宏上书在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之前，而

《哀帝纪》明言此事在四月，因此董宏上书及被免一事亦应在四月；同时，王莽被免大司马是在七月丁卯，且紧承未央宫宴会事件。所以，《王莽传》里的“后日”云云，并非“后天”，而是“后来”之意。

- 13 《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 14 校尉是武职的名称。
- 15 《汉书》等皆称之为司隶校尉，其实这个官职是司隶。
- 16 王去疾在刘欣为太子时就为侍臣，所以关系不错。王闳是后来才进入内廷的。
- 17 《汉书·外戚传》，第4006页。
- 18 《汉书·师丹传》，第3509页。
- 19 汉成帝绥和改制，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汉哀帝刘欣在建平二年又改回御史大夫，这段政事恰好发生在改名期间。四年后，刘欣又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 20 《汉书·朱博传》，第3400页。
- 21 今山东菏泽一带。
- 22 邢义田：《秦汉皇帝与圣人》，见氏著《天下一家》，中华书局，2011。
- 23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 24 “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不是疾病“神经病”，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显然，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 25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第4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26 《论语·子路》。
- 27 对此论题的研究，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集大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8 《汉书·宣帝纪》，第251页。
- 29 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

印书馆，1999。

- 30 这应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班固在《汉书》中重述了这个事件，将其引导为王莽的虚伪残忍，缺乏人性，这是基于王莽败亡之后的追溯，应与这个事件发生时的舆论不太一样。
- 31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 32 连锁信的案例，见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27页，注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33 《汉书·哀帝纪》，第343页。
- 34 自长安至新都，约500公里。

四、拨乱反正

18．王莽四处碰壁

王莽与长安睽违三年，进城后，形容枯槁但仪礼齐备地拜见了姑妈王政君。其情其景史书无载，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伦隔绝一向是大悲大痛之事，家庭成员的某一次远离很大概率就是死别，所以不难想象姑侄二人重见之时的悲欣交集。

王政君可能会安慰王莽：你人能回来就好，过几天平阿侯王仁也会回来¹。如今王氏家族虽然百事凋零，但人丁还算兴旺，不管怎样天下是刘氏的，王氏只要努力维系住富贵的局面，能善终就行，不必再折腾了。

王莽知道，现在王氏家族里还能出入禁省的，只有担任侍中的堂弟成都侯王邑，以及王谭的儿子王闳、王去疾，后面这两位和王莽关系一般。

与在新都国时一样，回到长安的王莽仍然闭门不出。他已四十五岁，在汉朝已属老人；刘欣才二十几岁，年富力强。以当时情形推测，王莽会死在刘欣前面，重返政坛的希望渺茫。因此，很难想象此时王莽有当天子的念想。

侍中、成都侯王邑则频频造访堂兄王莽的宅邸，他是汉成帝时期大司马王商的儿子，为人果断，富于冒险精神，也有些军事才干。此外，王邑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极为服膺王莽，甚至是崇拜。多年以后，王

邑将成为新朝的顶梁柱，数次挽救王莽于危亡之中；也将在昆阳大战中败给刘秀，最终与王莽一同死于非命。

王邑分析，王莽出仕的障碍主要是没有重量级人物的举荐，虽然有一批儒学人士和朝野名流极力呼吁王莽复出，但这类舆论只会增加皇帝对王莽的疑窦。因此唯一能借助的力量就是王政君，这个面子刘欣总是会给。但王政君已经表示过王氏家族的目标是善终，王莽很扎眼，不必再出仕。所以，她不太可能为王莽求情。

身为侍中，王邑发现刘欣与王政君之间几乎没什么直接往来。除了重大礼仪的需要甚至很少见面。他自告奋勇，对刘欣谎称是转达太皇太后的意图，希望王莽能恢复特进、给事中的职位待遇，从而可以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有资格出入禁中。

班固后来记录说：

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²

王邑敢假冒王政君的名义向皇帝为王莽求官，有两个条件：一是确信王政君不会帮忙，因为王政君如果能帮忙，王邑断不会走这步险棋；二是确信刘欣不会怀疑和追问，但事实相反，刘欣听说后，专程去见了王政君表示同意，王政君却说对此毫不知情。

所以，刘欣应是识破了王邑的意图，故意告诉王政君，让她自己处理。亲侄子假冒自己的旨意，令王政君陷入两难，不处理是徇私枉法，处理又于心不忍，只得屈尊向刘欣道歉，请求宽恕王邑。王邑矫旨欺君是可以视作谋反的，如果刘欣就此杀了他，能显示帝国法制的威严，但赦免他却更能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刘欣要的本不是王邑和王莽的生命，而是借此让王政君难堪，彰显自己的权力，所以他赦免了王邑，没有剥夺其爵位，只是将他逐出禁省，贬谪到西部边境做了属国都尉，这是一个职能与郡太守相似的官职，主要负责管理边境的少数民族事务，是个苦差事。

王邑被逐，说明刘欣不想起用王莽，但王莽依然幻想着重返政坛。他或许认为，这件事情主要坏在王邑“矫旨”上，而且索要的是恢复特进和给事中的待遇。如果能光明正大地担任普通的公卿职位，皇帝未必不会答应。

等了很久，王莽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他担任大司马时期的大司空、

泛乡侯何武，在刘欣即位后一度被免，但在董贤的举荐下，近来重新担任了御史大夫。此时，恰好太常一职空了出来。太常掌管宗庙祭祀、典礼，管理博士，犹如现代的教育部和文化部，是尊贵的清要之职，被视为九卿之首。王莽觉得这个职位太适合自己不过了，论资历，自己是列侯、前任大司马；论素质，自己少年时治过礼经，是儒学学者。他私下里去找何武，请何武举荐自己担任太常。

何武自汉宣帝时入仕，以谨慎守法著称，他曾被刘欣下诏策免，刚刚通过董贤的关系重返政坛，对这位少年天子翻云覆雨的手腕有所领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皇帝对王氏家族的极端不信任，人尽皆知，何武决不会举荐王莽以贾祸，于是果断拒绝。

王莽不能理解何武的顾忌，对这位旧日同僚十分失望，甚至心存嫉恨。毋庸讳言，王莽对重返仕途极度饥渴，甚至到了看不清局势的地步。但这恰恰说明，在当时，王莽应该还没有当周公当皇帝的深谋远虑，反而有些政治不成熟；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刘欣，愿意被刘欣所用。

他只想要一个契合自己身份、志向的位置，而不是取而代之。

几个月后，刘欣晏驾了。

19．王莽重掌权力

刘欣之死造成汉廷中枢的权力真空，王政君成为礼仪上的至尊，这几年里，朝野尊重她，怀念她，盼望她，所以才会支持她对王莽的支持。王莽重返汉廷，迅速处置已成死棋的董贤，稳定了未央宫，一举成为汉朝事实上的掌权者。

王莽的回京和刘欣的暴死太过戏剧性，总有人猜测王莽是不是私下里暗害了刘欣³。但史料并没有明确线索，而且从王莽请托何武来看，并不可可能，这只是一次巧合。

王莽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对自己产生了新的期许，萌发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上天不惜让皇帝死去，是要告诉我什么答案？

直接的答案，就是皇帝做错了。

因此，王莽决定拨乱反正，一举扭转刘欣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从刘欣晏驾到九月箕子即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王莽有条不紊但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事业，赢得了崭新的政治资本。

第一，逼迫董贤自杀，将董贤家人流放。董贤的德不配位使得王莽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许，被视为拨乱反正的首要事务。

第二，荡平赵氏、傅氏、丁氏等外戚势力。

刘欣死后，外戚们迎来新一轮动荡。刘欣生前没有给予傅、丁两家的男性外戚以足够大的权力，只给了他们爵位的尊荣。王莽迅速接管朝廷后，宫廷内外的赵、傅、丁三家外戚权力化为乌有，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皇太后赵飞燕首当其冲，她是王政君的儿媳妇。汉成帝期间，赵飞燕与王政君还谈不上是政敌。但汉哀帝对赵氏家族又拉又打，将赵飞燕的兄弟从列侯废为庶人并流放到辽西，同时尊赵飞燕为皇太后，使得赵飞燕不得不站在皇帝和傅、丁一边，成了王氏家族的敌人。

因此，王莽重提赵氏姐妹残害汉成帝子嗣的旧事，由王政君下诏说她“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褫去皇太后尊号，称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这个惩罚乍看不太重，实则是废除赵飞燕名义上汉哀帝母亲的资格，好比剥夺她的一部分“政治权利”。

如果赵飞燕就此自杀，或许尚能以汉成帝皇后的名义下葬。但赵飞燕默默接受了这一切，也没有自杀，于是一个月后，王莽再次推动王政君下诏，把赵飞燕和汉成帝的夫妻关系也否定了：“皇后……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⁴赵飞燕被废为庶人。

赵飞燕接到诏令就自杀了，赵氏家族覆灭。

与此同时，傅、丁氏家族已预料到大祸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前番已经死去，死人备极哀荣，活人日子就难了。王莽先是推动司法部门举奏傅、丁两家的种种不法之事，借此把两家男性成员的官爵一律免去，丁氏家族被逐回原籍；继而褫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分别贬为“定陶共王母”和“丁姬”，这意味着她们降回了诸侯外戚的身份，不再属于皇族。活着的人里，一度颇有权势且打击过王莽的孔乡侯傅晏一家被流放，其他宗族成员也被逐回原籍。傅晏的女儿、汉哀帝的皇后傅氏，作为傅氏家族剩余具有皇族身份的女性，当然免不了祸端，她在王莽刚刚重掌政权后就被王政君下诏退居桂宫，实则等候发落，最终与赵飞燕同时被废为庶人，也同时自杀。

此外，傅、丁两太后虽被褫夺尊号，却是怀抱着“皇太太后”“帝太后”印绶下葬的，傅太后还以“孝元傅皇后”的名义和汉元帝合葬在渭陵。

在人人相信神鬼、相信生与死的世界没太大区别的汉朝人看来，“拨乱反正”还未能泽及地下世界。

五年后的一天，王莽提出必须掘开两太后的坟墓，取出不合礼法及身份的印绶销毁；傅太后须迁葬定陶，本来就葬在定陶的丁太后应重新下葬，回归其定陶恭王母亲和夫人的名分。

王政君一开始觉得这个建议有些骇然，毕竟人已经死了。王莽坚持认为极有必要，王政君勉强同意，就交代迁葬时在旧棺上新做一套椁，用太牢这样隆重的祭品来祭祀，敬重鬼神，以免作祟。

得了应允，王莽马上派人去渭陵和定陶挖坟，去掉高规格的梓宫，改为普通的木棺；去掉金缕玉衣，改为诸侯妻妾的衣服，二十天就把两座山给平了。王莽还在原址围上荆棘，以为后世警戒。打开傅太后棺椁的时候，据说臭味蔓延数里，史书特意记下来这个味道，仿佛表达对傅太后生前跋扈的不满和嘲笑。

丁太后生前没怎么作恶，这次被傅太后连累，班固似乎略觉哀婉，在他笔下，丁太后的墓被平后，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⁵。

数千只燕子飞来，遮天蔽日，衔土填在丁太后被平的旧坟上，不知是一场灾异还是祥瑞……

傅、丁两家彻底败落，硕果仅存的是前任大司马、曾经回护过王莽且被傅太后和汉哀帝都不太信任的高武侯傅喜。王莽对待傅喜，犹如昔年汉哀帝对待赵飞燕，一面打击其家族，一面宽恕其本人，王莽对傅喜的评价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当时傅喜还在封国。王莽将他召回长安，赐以特进、奉朝请，也就是给予列席中央廷议的待遇。董贤的旧居被赏赐给傅喜居住，更具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从王莽对傅喜的称赞不难看出，他的褒扬固然有惺惺作态之处，也确实有真心赏识、愿意拉拢的意图。只是傅喜眼见自己家族沦落为王氏家族的附庸，与其战战兢兢地在王莽羽翼下苟活，不如早些退出旋涡避祸。经过多次请求，傅喜最终平安返回封地，寂寞而终。

至于当时依附傅、丁两家的大臣，比如最早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高昌侯董宏，虽然人死了，但他袭爵的儿子董武被夺爵废为庶人；后来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郎中令冷褒、黄门郎段犹，统统被流放到合浦海边；还有太师、大司徒、扶德侯马宫，曾以光禄勋的身份支持傅太后议谥，虽是王莽好友，照样被免去太师、大司徒官职，“遣就第”，闭门思过。

彻底的拨乱反正为王莽赢得了荣誉，但是笃信鬼神的人们从王莽“挖寡妇坟”的行为里隐隐觉得，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是不是性格过于激烈和绝对？他这么做，距离圣人更近了吗，还是反而缺少了一丝人情味？

第三件事，为冯太后平反。

为死人平反，是政治成本低但收效佳的行为。冯太后被傅太后污蔑致死，但她的孙子箕子已经成了新皇帝，平反昭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冯氏家族在上次的灾难中死了十七个人，没剩什么人了，平反对冯家意义不大。

但是可以惩治那些逢迎傅太后助纣为虐的官员。污蔑冯太后的张由，现在是关内侯；逼死冯太后的史立，现在是中太仆；参与此事的丁玄，现在是泰山太守，这三个人是小人。而著名的贤能之臣毋将隆，因为当时担任冀州牧对辖内的中山国有监察之权，所以依例在上报案件时署了名，也在被惩治之列。他们全部被免官、流放合浦。班固曾交代过毋将隆和王莽的一段隐情：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⁶

意思是说王莽因为早年毋将隆对他不甚热络，所以现在公报私仇。这种细腻绵密确乎是王莽的性格。但与王莽关系深厚的马宫也被王莽劾奏，说明毋将隆之事未必如班固的诛心。在冯太后一案上，毋将隆身为州牧号称贤臣，却从未如孙宝、唐林那般仗义执言，说起来难辞其咎。

事实上，对自己的亲人、熟人，处置起来一样毫不手软，才是王莽赢得荣誉的常见手法，何况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箕子的母亲卫后虽然被王莽和王政君责令不得至长安，但在为冯太后平反的过程中，卫氏与王氏家族逐渐熟悉。王莽的儿子王宇与卫后的兄弟也就是箕子的舅舅卫宝交好，两人书信不断，宛如蜜月期。而这却为日后的另一桩大案埋下了隐患。

第四，清除王氏家族里名誉较差或桀骜难驯的内部成员。

红阳侯王立是当年声名赫赫的“五侯”之一，不过他在王政君的几个兄弟里资质最差，行为毫不检点，抢占民田，奢侈糜烂，贪财苛酷，不一而足。在《汉书》许多人的传记里，时不时就能看到王立的不法行为。特别是王莽与淳于长争夺大司马，王立见钱眼开，反复无常，毫无政治头脑，更令王莽对这位叔父印象深刻。

眼下，王立也已经从封地返回长安，王氏再度掌权，他故态复萌，蠢蠢欲动，常常去长乐宫找姐姐闲聊。王政君与他本不算亲，但现在他是仅剩的弟弟了，感情慢慢加深。

王莽对此有些警惕，因为他既了解王政君心慈耳顺，又知道王立喜欢胡说八道，所以怕王立发挥坏影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氏家族好不容易摆脱了灾异的笼罩，成为拨乱反正的功臣，可不能让王立把这大好局面给破坏掉。朝臣看到王立，会不会又想起汉成帝的旧事？万一此时再来一次日食、地震，会不会又引起经师博士们上书言说王氏家族势力过大？

王莽决议把王立撵回封国。他安排孔光向皇帝上奏，指出王立有两大罪状：

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⁷

这封奏疏耐人寻味。第一个罪状还好，是王立与淳于长勾结的旧事；关键是第二桩罪状透露了一个隐情：汉哀帝死后，王立曾经主张，未央宫里有宫女叫杨寄，为汉哀帝生了个私生子，应该把这个孩子立为太子继位。

汉廷后宫，秘帷重重，皇帝是唯一生理意义上的男性，宫女怀孕生子，理论上肯定是皇帝的。这个杨寄不知道何时被临幸过，所以生了个儿子。但是汉廷并没有私生子合法继位的先例。当年汉惠帝刘盈生前所立的太子即位后被吕后废掉，吕后找出宫女所生的一个私生子扶上帝位，后人称之为“少帝”。司马迁所谓吕后“本纪”，其实是这两位小皇帝在君临天下。后来吕氏败落，大臣们说少帝并非刘盈的亲儿子，将其杀害，再由大臣遴选诸侯王即位。王立的建议和少帝的情况相似。有此不成功、不合法的先例，王立的建议看来是被当场否决了。

但王莽对此很恼火，他极为痛恨刘欣，如果让刘欣的儿子即位，将来皇帝长大了，岂不是又要来一轮新的“拨乱反正”，也让王莽失去了拥立之功。这两点对王莽、对王氏家族都没有什么好处。王立的建议，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孔光的奏疏一上，王政君不同意，不想让硕果仅存的弟弟离开长安。王莽劝告她说，现在天下是您代理幼主执政，形势既微妙又危险，

人言可畏，努力向天下表示公正，尚且担心天下人不从，现在顾念姐弟私情，不听大臣建议，万一引起群臣议论怎么办？王立形象不好，何必让他在长安招惹是非？而且不过是让他回封国嘛，权宜之计，将来有机会再召回来就是了。这才说服了王政君。

从王立的行为和王莽的担心来看，王莽这番话确实是老成人之言，未必像班固所评价的“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⁸，就是说王莽害怕王立通过王政君阻挠自己随心所欲。王立又不是什么公忠体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担心他闯祸，还能有什么呢？

同样被班固认为是“素刚直”、使王莽忌惮的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被遣就国。史料中没有记录原因，但王仁一门的的确都是刚直仗义之士，与王莽不甚同心，王莽当是顾忌王仁桀骜难驯，故而将他遣就国。

多年以后，王立、王仁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但至少在目前，王莽只需要将他们撵出长安。这是王氏家族自我清洗、重塑形象的努力。在朝野看来，王氏家族敢于剜自己身上的肉，实在是大公无私，哪个外戚能比呢？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戚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雉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就权势而言，王凤、王莽并不比吕后、霍光强大，而且外戚们有来有去，能上能下，汉哀帝轻而易举夺回皇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注释：

- 1 平阿，在今江苏高邮与安徽天长交界一带，距离长安较王莽的封地远，所以理应比王莽晚到。
- 2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 3 侯旭东说：“哀帝暴亡是否与王莽有关，不无疑问。”见氏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4 《汉书·外戚传》，第3999页，所引诏书有删减。
- 5 《汉书·外戚传》，第4004页。
- 6 《汉书·毋将隆传》，第3265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 8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第四章 居摄元年春正月：摄皇帝

井水溢

灭灶烟

灌玉堂

流金门

——汉元帝时童谣

一、吕宽大案

1. 孤独的汉平帝

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身着礼服，孤身从中山国出发，准备继承汉哀帝留下的皇位——成为汉平帝。车驾快要抵达长安时，他留意到祖先的陵墓，如山一般高大，但并不寂寞，因为这些帝陵的脚下已经形成县邑聚落，人烟稠密。过灊桥时，他的随从告诉他，紧挨着灊桥的帝陵是太宗文皇帝的陵墓灊陵。一百八十年前，汉文帝也是以诸侯王的身分，从封国来到长安即位为皇帝。

这些“家史”箕子并不陌生，但他毕竟只是孩童。他是否知道，当年汉文帝是抱着出生入死的决心奔赴长安的，因此才会带着舅舅薄昭和多名亲信，并在住进未央宫的当晚就让亲信们接管了皇宫的保卫，又在局势稳定后的第二年把母亲薄太后接进长安。

而箕子身边只有几名随从。祖母冯太后一家在汉哀帝时期被诛灭，虽然王莽“拨乱反正”，已给冯太后平反，王氏家族和箕子一家暂时处在蜜月期，但王莽怨于汉哀帝的教训，箕子的母亲卫氏、舅舅、朝夕相处的姐妹以及王国的官员都被勒令留在中山国。他不得不依靠马车外面的那两个陌生人：车骑将军王舜和大鸿胪左咸。

此刻，箕子不知道他已经与母亲永别，也不知道自己将在五年之后死去。《汉书》最后一篇“帝纪”末尾的赞语，前八个字概括了箕子的帝王生涯：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

箕子登基后，形同傀儡。

后宫里的王政君，名义上地位至尊，但在王莽劝慰下，除了“封爵”这一事务外，不再过问其他政事。

朝廷在原来的三公之外，完善了新的制度安排——四辅，形成了“四辅三公制”。四辅即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这四名高官，性质属于内朝官；三公还是原来的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性质属于外朝官¹。这样，内外政事分别由“四辅三公”平决，表面上看这采取的还是“集体决策”。

但大权当然由王莽掌握。因为他一身兼有四辅的太傅和三公的大司马之职，内外两任，权力牢牢抓在手里。而且四辅三公虽然各司其职，但用人这种大事必须由王莽亲自处理。班固尤其注意到，以王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²。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也就是“发难”“挑事儿”；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之义。

所谓“为人后”，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箕子的“外家”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原来，基于“为人后”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同时还给卫宝、卫玄赐爵关内侯，把箕子的三个妹妹分别封君，食邑两千户，这些丰厚的赏赐有一个条件：卫氏家族要安心留在中山国当“国戚”，不要幻想到长安去当“皇亲”。

如此一番操作，从礼仪上看对卫氏家族竟然“两全其美”，物质方面也比较丰厚，但唯独把真正基于血缘的人伦之情、母子之情剔除了。

消息颁布后，大臣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偏偏冒出来一个年轻人叫申屠刚，他身份低微，仅是右扶风的功曹，相当于今天首都一个区政府的中层官员。按理说他没有什么资格给皇帝进谏，因为恰好赶上日食，王莽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允许上书，申屠刚这才有机会写了一封对策，要求让卫氏家族来长安，不仅人要来，还要有官做，特别是未央宫的保卫应

该让卫氏家族来承担，要提防朝廷里的“霍光”也就是王莽。其中有一句话尤其显眼：

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³

申屠刚点出汉代宫廷制度的一个传统：外戚和官僚要“亲疏相错”，彼此制衡。显然，他是把卫氏家族看作“亲”，而把王莽看作“疏”。

这封对策让王莽大为恼火，要不是因为这是应诏对策，言者无罪，王莽估计会杀掉申屠刚。这次只是斥责他“违背大义”，免职打发回家了。王莽当然忌讳这篇对策，但说申屠刚“违背大义”也是讲得通的，这个大义就是“为人后”之义，王氏家族是箕子“父亲”汉成帝的母族，是货真价实的“外家”，当然是“亲”，怎么能说是“疏”呢！

申屠刚的下一场出场，已经是刘秀的大臣。为了阻止刘秀出游玩乐，他用头去顶刘秀马车的轮子，刘秀吓得打道回府。

这位申屠刚倒是一以贯之。

2．再摘令瓜稀

没人为卫氏说话，中山国的后宫一片哀号。

陌生人刘成都的到来，令卫太后母子团聚的愿望落空，她整日以泪洗面，身边的随从、卫氏的亲眷，无不感到难过。

特别是卫宝，他和王莽的长子王宇关系不错，两人常常有书信来往。他本来很感激王莽为冯太后平反，但委实想不通为什么把卫氏家族防得如此严密。正在此时，王宇秘密派人送来一封书信。

身为安汉公长子，王宇身边聚集了一批人。有些自然是趋炎附势之徒，但也不乏一时才俊。其中，有两人最得王宇信任：其一是师傅吴章，当时的儒学名家，太学博士，治《尚书》，弟子千余人，对王宇影响非常大；另一个是妻子吕焉的哥哥吕宽，尤为王宇所信赖。

王宇很想帮助卫氏家族，他并不赞同父亲，又不敢当面说，就把吴章和吕宽找来商量，已经怀有身孕的吕焉也坐在一旁。看着吕焉日渐隆起的腹部，王宇颇能理解卫太后思念儿子的深情。几个人坐而论道，认为王莽的根本依据是“为人后”之义，所以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让卫太

后修书谢恩，主动向王莽剖白对“为人后”这一儒家伦理的深刻理解和无比认同，在思想上坚定地和王莽站在一起，以感化王莽。

王宇给卫宝的密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卫太后欣然同意，立刻上书谢恩，信中既批评了丁、傅两家的大逆不道，也引经据典地恭维了王莽。王莽看到上书之后确实十分高兴，但他认为卫太后如此深明大义，那就更不必回到长安，让箕子专心为汉成帝之“后”就够了。为示表彰，王莽给卫太后增加了封邑七千户，赐黄金百斤，中山国的官员也涨了俸禄。

这个结果令卫家和王宇都很意外。卫太后再上书谢恩，王莽就不理会了。卫太后在家难受地哭。王宇只好再找吴章和吕宽来商量。这一次，吴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他认为王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吴）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异之。⁴

这句话非常重要。吴章是王宇的师傅，对王莽应当比较了解。他的这句话，应能代表近臣对王莽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可谏”，说明王莽极端固执，一意孤行，难以沟通，王宇之所以不敢直接劝诫父亲，想必是“知父莫如子”，说了也没用；“好鬼神”，说明王莽极其相信灾异和祥瑞，而且是真信。

所以，吴章的法子就是，让吕宽弄些动物的鲜血，趁夜泼洒到王莽家的大门上。第二天王莽发现，一定会十分惊惧，视为灾异，循例向博士们问询其中的含义。届时，吴章会站出来，将其解释为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这种异象。

听上去倒是天衣无缝。

没想到，吕宽深更半夜“洒狗血”时被当场发现，他立刻逃之夭夭。王莽迅速查明真相，把王宇、吴章都抓了起来。

吕宽连夜狂逃，一直逃到广汉郡⁵。广汉郡太守楼护是入了《汉书·游侠传》的人物，豪侠仗义，和吕宽的父亲有旧。吕宽去拜见了楼护，但没敢提“洒狗血”这件事，几天之后，朝廷捉拿吕宽的诏令到了广汉，偏偏楼护早在汉成帝时期就是王氏家族的好朋友，权衡了两边的私情孰轻孰重，这位“游侠”将吕宽拿下送至长安。

诅咒、厌镇、巫蛊，是历代宫廷政变里常见的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都是因为巫蛊诅咒被废；至为惨烈的当属汉武帝

晚年的“巫蛊之变”，杀掉和逼死了卫皇后、皇太子、皇孙以及他们的妻妾，只剩一个孤零零的重孙汉宣帝。所以，“诅咒”是宫廷中至为危险的秘密游戏，一旦暴露，血流必定成河。

案子的结果十分悲惨。吕宽很快被杀，全家流放合浦；王宇应该会想起被父亲逼迫自杀的弟弟王获，知道自己一定性命难保，在被抓之前就饮药自杀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怀孕的妻子吕焉，也被王莽下令在生下孩子之后杀死。

出谋划策的吴章死得最惨，先被腰斩，又被分尸。如前所述，吴章是太学博士，《尚书》名家，学生很多，这些学生都被王莽归为吴章一党予以禁锢，一律不得入仕。那些还想当官的学生只好改名换姓。

卫氏家族当然无法免祸，包括卫宝、卫玄在内的整个家族几乎被诛杀殆尽，只有卫太后凭皇帝生母的身份暂时保命；卫宝的女儿嫁给了中山王刘成都，也保住了性命，但被免为庶人，流放合浦。

卫氏家族是与几代皇室成员联姻的老贵族，卫太后的父亲卫子豪曾担任卫尉，是皇帝近臣；卫子豪的妹妹是汉宣帝的婕妤，长女是汉元帝的婕妤，幼女嫁给了汉元帝的儿子中山孝王，就是箕子的母亲卫太后。卫氏家族自此凋零，未来哪怕箕子真的成年亲政了，也没有了母族“外家”，王莽彻底终结了西汉外戚“轮流执政”的传统。

我们不禁要问，王宇究竟为什么铁了心要帮助卫氏家族呢？仅仅是私人友情吗？班固揣测说：

恐帝长大后见怨。⁶

就是说，王宇担心以后箕子成年，王莽去世，自己会被清算。就像霍光去世时备极哀荣，但他的家族却被汉宣帝诛杀，殷鉴不远。此外，王宇都不敢直接向王莽进言，考虑到王莽的性格，王宇的行为还透露了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透露了王莽的家庭状况。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尤其是常年用政治伦理、儒家教条来约束家人的行为，且毫无通融的余地。所以，王宇应当备受折磨，精神十分疲惫，他愿意推动王莽善待卫后，也可视为一种对父亲的反叛。

王莽有四个儿子（不含私生子）和一个侄子，至此，长子和次子均死在了自己手里。

七百多年后的一首诗，大概可以表达王宇临死之前的心情：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

3．一堂思想政治课

吕宽案的余波远不止于此，或者说不是余波，而是刚刚开始.....

未央宫前殿里，太皇太后、皇帝在倾听王莽上奏。同列的朝臣们大多数还没搞清楚状况，毕竟这个案子一半是安汉公家事，一半是小皇帝家事，应该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王莽上奏说，儿子王宇好比是在周武王死后叛乱的管公、蔡公，周公对这两位兄弟“一放一诛”，而自己诛杀了违反“为人后”之义的儿子，两件事性质相同，“臣不敢隐其诛”⁷。

在甄邯的安排下，王政君下诏对王莽处理吕宽案的做法予以肯定，说这是“不以亲亲害尊尊”⁸，能牺牲亲情来维护大义，但诏书里最后一句话才最为重要，令那些一开始还以为和自己没关系的朝臣嗅到一丝血腥味：

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治平。⁹

只要能够维护国本，开启天下太平，就允许开杀戒。从当时汉廷运转的机制看，这道诏书应该是王莽的意图。接下来，他将把吕宽案从一个孤立的宫廷政变推向一场广泛而残酷的思想政治斗争。

话说汉朝的上层社会，包括皇族、王族、列侯、高级官僚，总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多人彼此认识、相互联姻，哪怕两个人并无交往，他们的圈子也有交集。涉及上层人士的案件，审理者如果想扩大惩治范围，很容易罗织罪名。从卫氏家族的“朋友圈”入手，可以把许多人罗织进来，哪怕没有参与吕宽案甚至不认识吕宽的人，都有可能被株连。

一番腥风血雨.....

皇族里，汉元帝最小的妹妹、年逾花甲的敬武公主被迫饮药自杀。她是王政君的小姑子，但从前和丁、傅家族关系密切，对王莽当政也有

些怨言。她牵连进来的理由，是亡夫的前妻的儿子薛况是吕宽的朋友。

王族里，梁王刘立与卫氏家族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王氏家族里，王莽的叔叔红阳侯王立和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在这次案件中被迫自杀。史书没有说明他俩究竟与吕宽案有何关联，他俩人也不在长安，但既然被牵连进来，猜测应该与王宇有些书信往来。对自己的亲戚毫不手软，是王莽仿效周公“诛管蔡”的拿手好戏。

大臣里，王莽新账旧账一起算。泛乡侯何武在汉哀帝时期不帮助王莽求官，乐昌侯王安的父亲王商在汉成帝时期和王莽不睦，边境名将辛庆忌的三个儿子不肯依附甄丰甄邯，名臣鲍宣与辛氏兄弟有过交往，都在此案中牵连而死。

案子持续一年多，死了一百多达官显贵，天下震怖。

王莽为什么要株连如此多的人？班固说王莽“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¹⁰，即通过吕宽案排斥异己，扫除巩固权力的障碍，这当然讲得通。像何武、辛庆忌的儿子、鲍宣等，要么早就被“遣就国”，要么在边疆当将领，不可能与吕宽案有关，他们都是因为不被王莽所容而自杀或被杀。

但是，吕宽案更深的意义并不只是排斥异己。

王莽虽然身为安汉公，朝廷大权在握，实际上对他不满的大有人在，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都是皇族，敢于外露反莽情绪，那么不敢外露的不知道有多少；从王氏家族内部看，王立、王仁、王宇、吕宽，也都对王莽不满。从内到外，一个反莽的格局已经隐隐出现。

王莽如此敏感，焉能嗅不出？他能借着吕宽案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凭的是儒家“为人后”的大义：皇帝箕子是汉成帝的“儿子”，王氏是汉成帝的母族，所以王莽秉政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谁反对王莽，谁就是乖离大义，就是道德上的大罪，即使亲生儿子也不可饶恕。

吕宽案进行到这个阶段，中外臣僚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原来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王莽针对汉朝上层社会的一次“整风”运动。朝臣见识到王莽捍卫的不仅是权力，更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

果不其然，案子过去没多久，臣僚喘息未定，王莽忽然召集公卿、将军、侍中等内外大臣在未央宫集会，由据说很懂礼仪的少府宗伯凤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讲解“为人后”之义。

在座的大臣们战战兢兢，其中有两位远房兄弟：一位是秭侯金当，汉武帝时期名臣金日磾次子之孙，当年金日磾把秭侯的爵位传给了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王莽当安汉公之后，让金当继承了这个爵位。另一位是京兆尹、都成侯金钦，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后代，和金当的情况类似，爵位是祖父金安上的，金安上把爵位传给了长子，长子死后绝嗣“国除”，爵位取消，同样是在王莽安排下，金安上四子的儿子金钦继承了这个爵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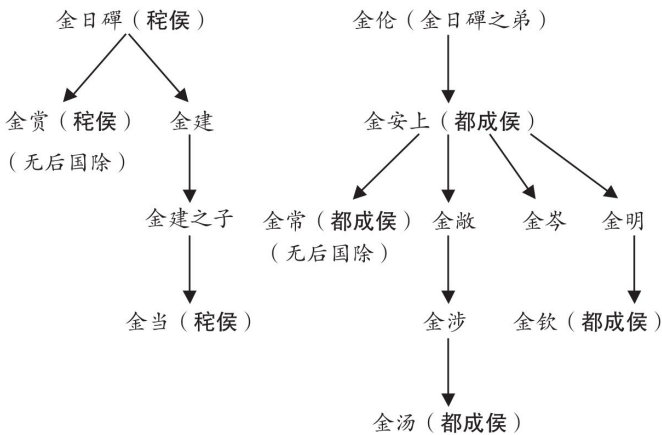


图4.1 金日磾家族世系简图

简而言之，金当继承的是祖父的大哥的爵位，金钦继承的是大伯父的爵位，都不是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王莽让他们继承爵位，是希望他们履行“为人后”之义。

孰料，金钦身为京兆尹、皇帝伴读，自认是重臣，在“课堂”上“谈感想”时，说了另外一番话，大意是：金当的爵位虽然是从祖父的大哥那里来的，但最初是曾祖父的爵位，所以这个不属于“为人后”，金当应该为亲生父亲和祖父立家庙祭祀，祖父的大哥属于“故国君”，找家臣来祭祀就行了。

这番话一出，正好被一旁的甄邯听见，他当庭站出来，淋漓尽致发挥了“主击断”的才能，大声斥责金钦：今天大家来这里“上课”是来领会“为人后”之义的，你却在这里教唆金当为亲生父祖立庙，而不为礼仪上的祖先立庙，分明是你也只想给自己的父亲立庙，公然对抗公序良

俗。甄邯用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伦理上宣判了金钦的死刑：

进退异言，颇惑众心，乱国大纲，开祸乱原，诬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¹¹

这一番指控，把“听课”的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不就是几句闲聊吗？不就是立庙祭祀吗？至于要把金钦往“乱国”“诬祖”“大不敬”的罪名上靠吗？

没错，这就是王莽的意图，他立刻将金钦交付廷议讨论如何处置，大家谁敢不说有罪？很快金钦就被诏狱传唤，按照汉朝“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被诏狱传唤的大臣很多会自杀避辱，金钦随即自杀。甄邯则因为“实名举报”增加了千户的封邑。

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大度，“对事不对人”，又让金钦二伯父的孙子金汤¹²继承都成侯爵位。此时金钦刚死，金家弥漫着恐惧和不知所措。看到突如其来的印绶，金汤并没有多少兴奋，反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唯恐进了自家的门而被打成“不明为人后之义”的大罪。

此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金当安然无恙，主要是因为金当的母亲是王莽的姨妈，两人是姨表兄弟。

有了金钦的先例，汉廷官员无不恐惧，因为仪礼的过失会被看成道德的罪愆。王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份“成果”推广到民间。

杀掉儿子，王莽内心还是很痛苦的，只是在他所维护的大义面前，需要隐忍。于是，他亲手撰写八篇《诫子书》，颁行天下，由学官教授，其“教学重点”等同《孝经》，天下谁能背诵这八篇书，名字就会被列入官簿，将来举孝廉、选人才时优先录用。这种做法在后世一些皇帝那里比较常见，比如朱元璋、康熙、雍正，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王莽是第一个，他以极大的虔诚和想象力，将君主的“德位统一”从孔子的理想变成了某种“现实”。

至此，吕宽案已演变成直达汉朝最基层的思想运动。

王莽将“为人后”这种儒家政治理想不仅付诸公共事务，也推进家庭和私人领域，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只是，原本从私人 and 家庭中自然萌发的这一儒家伦理，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被反过来强制灌输到家庭和私人领域时，味道还一样吗？

吕宽案期间，有个年轻人叫作逢萌，从北海郡¹³来到长安太学学

习，恰好目睹了血流成河的场景。他发现，在儒家纲纪的名义下，王莽所做的反而是杀害皇族、杀害亲人，杀害儿子等违反“三纲”的勾当，还得到了天下人的赞赏。这就说明天下道德已经沦丧，大乱将至。于是他把冠冕挂在长安城青门上，表示信仰破灭，回了北海老家，带着家属乘船经海路去了辽东避祸。走之前，他留下一句话给友人：

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¹⁴

注释：

- 1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见《文史》2018年第4期。
- 2 《汉书·王莽传》。班固用“爪牙”“腹心”等形容词来描绘王莽的权力小圈子时，肯定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范晔在《后汉书》里描述东汉大将军窦宪权倾朝野时，也是“以联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 3 《后汉书·申屠刚列传》，第1012页。
- 4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5 今四川境内。
- 6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8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9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5页。
- 11 《汉书·金日磾传》，第2965页。
- 12 《汉书·功臣表》中作“金杨”。
- 13 今山东潍坊。
- 14 《后汉书·逢萌列传》，第2759页。

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4．被歌颂的少女

身为一名汉朝的贵族少女，王氏——我们姑且这样称呼王莽身份贵重的长女——自幼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权倾朝野，又是儒士，持家甚严，带给她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性格：

为人婉嫕有节操。¹

婉嫕，说明她很文静；有节操，说明她深受儒家影响，颇识大体。元始三年（公元3年），她十二岁，隐约就知道自己会嫁给皇帝，但随后目睹了兄嫂以及未来的姑家²全都被自己父亲杀死。最后，十三岁的她还要欢天喜地地嫁给这个孤儿皇帝，并母仪天下。

古往今来，没有人问过她，这段时间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心里又是何种滋味？在被立为皇后的前夜，她是否安然入眠？

早在吕宽案爆发之前，王莽已经在考虑箕子的婚姻问题了。皇帝的婚姻意味着新的外戚，所以汉朝在立后这件事情上，总是“亲上加亲”。出现权臣时，权臣会从本家族里选择女子，比如上官桀把孙女嫁给汉昭帝，霍光把女儿嫁给汉宣帝；没有权臣的时候，皇帝则免不了被安排外家的女子，比如汉景帝做太子时就被母亲薄太后安排了薄皇后，汉哀帝也早被祖母傅太后安排了傅皇后。

至于箕子，母族卫氏家族已经覆灭，王氏家族既是外戚，又是权臣，选择王氏当皇后没有悬念。元始三年春，王莽觉得权力已经比较稳固，对应“周代”³的各项改革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箕子的婚姻也属于王莽改革的一大关节，必须用心谋划。

未央宫里，王莽对箕子婚姻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他认为，汉朝自从汉成帝开始，连续两代帝王没有子嗣，归根到底是没有选好皇后。汉成帝的许皇后搞巫蛊，赵皇后出身歌女；汉哀帝的傅皇后是傅氏家族成员，都不具备当皇后的资格。应当按照儒家的规范，遵礼节来聘请符合关雎之德的女子。在上奏中，王莽有一句话颇为有趣：

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⁴

王莽为皇后的选择划了一个范围。所谓“二王后”，是商周二王的后裔，这是今文经学“通三统”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新朝代要继续维持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以示“批判地继承”。秦朝是闰，不被算在内，那么就是商周两朝；“周公、孔子”，则是儒家最重要的先王或先师；至于列侯，则

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汉朝的贵族阶层，而且是留在长安的上层贵族。

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商周也好，周公孔子也好，并不是什么“古人”，而是和汉朝密切相关、紧密接续的“近人”。打个比方，在21世纪，如果某个爱新觉罗氏（比如启功先生）上了新闻，大家并不会感到好笑，反而觉得蛮亲切；但如果有人自称是宋朝赵家的后裔，别人听到估计会哈哈一笑。汉朝的士民能够欣然接受王莽效仿周公而居摄、而称帝，与对商、周、孔圣这种并不陌生且很熟悉亲切的感觉有关。

总之，王莽的上奏得到了准许，朝廷开始轰轰烈烈地海选少女。这期间，吕宽之案爆发，但并未影响选后。第一批少女的名字、履历报上来，不少是王氏家族的成员。王莽的女儿也在其中。其实，王莽并不担心自己的女儿落选，他琢磨的是怎么做一番推脱谦让，以使这个过程更加符合他的身份和做派。

于是，他上奏谦称自己的女儿品貌材质都一般，就不参加选后了。

王政君见奏，并未多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说：“王氏家族的女儿是朕的外戚，就不选了。”

如此看来，王莽的确没有和王政君商议“演双簧”，所以王政君才误以为王莽真的要退出选后。

听说王莽的女儿要退出，长安城里下至平民百姓，中到太学诸生，上到普通官吏，天天上书呼吁，每天聚集在未央宫附近的有千余人；朝中，公卿大夫们也纷纷进言，要求非安汉公之女当皇后不可。王莽派人去劝退这些请愿的士民，反而越劝越多，王政君这才明白王莽的意图，迅速下诏：既然是朝野的公意，那就直接选王莽的女儿吧！

天上人间，一个少女这样被歌颂，只是因为王莽才让婚事如此闹哄哄。

这些请愿有王莽及其同党授意的因素，但能调动起如此庞大的民意，并不纯粹出于蛊惑。考察21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云集，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

5. 汉平帝娶妻

西汉的世俗世界里，连空气都是铺张扬厉、嫌贫爱富的。

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宫殿名称，只会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连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果太穷很有可能被上司劝退，因为昂贵的车马需要自备⁵。镜子上，人们刻下“富且昌”“家大富”“宜侯王”“位至三公”之类的字眼；瓦当上，人们烧出“富贵万岁”“千万岁富贵宜子孙”之类的字样；汉印里，留下了“孙贵”“王富”“周常富”之类的名字；最直白的是有个铜洗，上面有五个字：“日入百千万”！⁶倘若人们看到大街上数十辆装饰繁复的豪华马车排成一列，缓缓行进，大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围观。

围观什么呢？结婚！

围观帷幔里的新妇容貌如何，围观马车两边骑马和步行的奴仆多不多，围观乐声喧天、热闹非凡的排场。富人围观，琢磨这个排场大概耗费多少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要赶超过去；穷人围观，则自惭形秽，为弄不起这样的排场而深以为耻。⁷

那些淡泊名利、勤俭节约的事迹并不是没有，但委实不符合汉朝一般臣民的观念，所以只能记在史书里当作楷模。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在这种风气下，再加上儒家最为重视婚丧嫁娶，所以婚礼日渐变得复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一样都不能少，一次婚礼铺排下来的花费，即使中产之家也不堪重负。

平民尚且如此，皇帝娶亲，安汉公嫁女，其豪奢可想而知。王莽嫁女的婚礼，是由王莽的好友刘歆制定的。

为王氏“纳采”（提亲）的，是长乐少府夏侯藩、宗正刘宏、少府宗伯凤、尚书令平晏，其中刘宏是皇家宗室的管理者，宗伯凤精熟礼仪，平晏是为王莽掌管机要的心腹。

提亲时会“问名”，然后“纳吉”，拿姑娘的名字占卜吉凶。占卜由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刘氏宗庙后进行，结果不用问，当然是大吉。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纳征”，也就是俗称的“聘”了。古往今来，

无论老百姓还是士大夫，下多少聘礼，怎么看待聘礼，是众多婚姻在缔结之前最惊险的一环。

皇帝要以怎样的聘礼，来聘安汉公的女儿呢？

此时，宗室、信乡侯刘佟上书，讲了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周天子要娶纪国的女儿为后，但纪国只是一个子爵，是五等爵制里较低的爵位，因此周天子先将纪国国君升为侯爵，才正式下聘。刘佟的意思是，新都侯的侯国，与未来皇后父亲的身份不符。

怎么才能符合呢？汉廷讨论之后认为，古代天子的岳父要有百里封国才符合，所以应该把新都国补足百里，增加封地。换言之，皇帝的聘礼之一就是增加封国的土地。

这个提议被王莽谦虚地拒绝了，一句“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⁸，颇显深明大义。但是，未来安汉公成为皇帝的岳父，和他相关的礼仪怎么弄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刘佟的上书埋下了一线伏笔。

除了封地还有金钱，按照汉朝的惯例，聘皇后要黄金二万斤，折合钱两个亿。王莽仍然推辞，说钱太多了，只要四千万，而且这四千万也只接受七百万为聘礼，剩余的三千三百万平均分给十一户陪嫁的家庭，每户分三百万。

群臣见王莽如此谦逊，要求朝廷再给王莽增加两千三百万的聘礼，合成三千万。王莽接受了，但又从中拿出一千万分给了同族的贫寒之家，最终的聘礼只有两千万，是以往聘皇后的十分之一。

一场充满谦让、慷慨、仁爱之情的“纳征”总算结束了。目前来看，王莽所期望的东西绝非金钱。在他的人生取舍里，钱属于可以被“舍”的那部分。

婚礼剩下的步骤就很简单了。“请期”就是确定婚礼日期，字面上的意思是男方需要征求女方对成婚日期的建议，实际上男方把良辰吉日通告女方即可，但出于谦逊称之为“请期”。汉家把日期定在次年春天，元始四年的二月丁未（公元4年3月16日）。

一晃，吕宽案人头落地，皇帝大婚的日子也到了，汉廷派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左将军孙建、右将军甄邯、光禄大夫刘歆，陪同皇帝乘坐法驾，“亲迎”皇后于安汉公的宅邸，并带来皇后的印玺、绶带、礼服。在充满皇家威仪的严肃和婚礼的喜庆气氛里，皇帝带着他从未谋面的妻子返回未央宫。此时，未央宫前殿里群臣济济，衣冠赫赫，皇帝和

皇后就位，众臣依次行礼。

皇帝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把王莽的封邑增加到方圆百里，对操办此次婚事的各色人员进行赏赐。又过三个月，皇后祭祀刘氏宗庙，完成了这场西汉皇朝最后一次立后的典礼。

至于汉平帝在想什么，是想念孤身一人不得入京的母亲？是想念被诛戮殆尽余者流放的卫氏亲族？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眼，这个尚未谋面就与自己结下滔天仇恨的妻子是何面孔？谁都无从得知。

到了这年秋天，皇后王氏第一次有了“子孙瑞”。这不是怀孕，而是月经，古人认为这是“阴道通”。王莽为此非常高兴，下令再次开通子午道，以成祥瑞。子午道是从巴蜀到长安的通道之一，地势险峻，通而复阻，王莽凿通子午道不仅意味着他笃信此类天人感应，而且看得出他十分希望王皇后能够诞下子孙。

注释：

- 1 《汉书》；瘕，音同易。
- 2 婆家。
- 3 加引号，是因为这是王莽所理解的周代。
- 4 《汉书·王莽传》，第4051页；这句话里的“适”不是适龄，而是“嫡”，即正妻所生。
- 5 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见氏著《地不爱宝》，第155页，中华书局，2011。
- 6 以上汉印、瓦当、镜铭、铜洗等内容，俱采自王子今：《秦汉人的富贵追求》，见《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按是文所引资料，未区分西汉东汉，但西汉更丰富。
- 7 王符《潜夫论·浮侈》：“富贵嫁娶，车駟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飧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见《潜夫论笺校正》，第130页，中华书局，1985。
- 8 《汉书·王莽传》，第4052页；共，同供。

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6. 王莽会梦见周公吗？

汉平帝元始二年（约公元1年）。

越雋郡，一个位于益州西南边缘的偏僻地区，向长安报来一次祥瑞，说是江中有黄龙出现。

这个消息让安汉公颇为振奋。一年多来，他苦苦等不来祥瑞，反而经历了两次日食、一次陨石。其间虽然有“去京师三万里”¹的黄支国进献了珍贵的犀牛，但这事儿与元始初年越裳氏献雉性质差不多，缺乏新意。

黄龙就不一样了。

不仅“龙”比“雉”要罕见，关键是“黄”色。

这就说明，“尧后火德”的说法此时已经非常流行。所谓“尧后火德”，简单来说就是认为汉朝的刘姓是尧的后代，属火德，尚红；按照“五德终始”推算，接下来继承尧的是舜，属土德，尚黄。

黄龙现身，意思不言而喻了。

唯王莽马首是瞻的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闻此，说这又是王莽颀颀周公的明证，要告祀宗庙。很有要借这个祥瑞大做文章的意思。

没想到，大司农孙宝站出来反对。孙宝是位老臣，汉哀帝时期触怒傅太后被免为庶人²。王莽掌权后将他擢拔，大概把他当成自己人。孙宝既没有说祥瑞是假的，也没有评价王莽该不该告祀宗庙，而是别开一层意思：当年周公和召公都是圣贤，尚且有分歧，如今还没有风调雨顺、家给人足，安汉公每说一件事，大家都唯唯诺诺的，恐怕不好吧。

孙宝很快就被排除出王莽的权力圈。他当时正好派人迎接母亲入京赡养，自己都七十岁了，母亲估计得年逾九十。老人家路上病了，孙宝就把母亲暂留弟弟家休息，先把妻子和儿女接了回去。这件事马上被弹劾，罪名是不孝。孙宝一看，知道这是罗织罪名，不再争辩，当场承认弹劾属实，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孙宝于是被免职回家，但他的话让这次祥瑞没了下文。

这说明，在元始二年初，“黄龙”所蕴含的改朝换代含义仍然令朝野警惕。安汉公已经是汉廷最尊贵的名号了，已经是对汉朝现有官僚体系、爵位制度的突破了，想更上一层楼，朝野同意不同意？会不会有改朝换代之嫌？况且安汉公上面已经没有“楼”了，如何“更上”？

这就需要想象力了。

在西汉，上至太皇太后，下到普通臣民，头脑里还没有“皇帝轮流坐”的观念，毕竟在此之前统共没有几次改朝换代。高皇帝是第一个平民帝王，但他是尧的后代，斩白蛇诛暴秦，是“五德循环”的必然结果，继承的是周代王化。所以，要设想汉朝的灭亡，谁都没有“历史经验”，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胆子。

这就好比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人已经勘破君主制的衰败，但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制度；晚清的大臣出使西洋，亲眼看到君主立宪和议会辩论，也只会将其理解为“垂拱而治”“明堂议政”。

所以，当“安汉公上面还能有什么？”“汉朝可不可以改朝换代？”之类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莽的脑海时，他所能借助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只能从商周时期寻找。

元始二年夏，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班固认为这是王莽的意图，不管怎样，这道诏令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

皇帝年在襁褓，未任亲政……是以孔子见南子，周公居摄，盖权时也……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³

意思就是现在皇帝年幼，没有亲政，安汉公履行的是周公的职责，等皇帝成年也要效仿周公还政给皇帝，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就说明，此时朝野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安汉公看作周公了。

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说明孔子一度经常梦见周公。

安汉公是否也会梦见周公？哪怕是白日梦？

在安汉公的梦里，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公，他有身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的封君；有德行，制礼作乐，建立“周制”，是孔子眼中的先师；有功业，在周武王死后平定叛乱，“诛管蔡”⁴，四夷宾服，海晏河清；有位子，他在周成王幼年时担任摄政，而且据说曾实打实地南面称王；有祥瑞，周公治理天下，祥瑞频出，意味着他的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

王莽从周公这里看见的，并不仅仅是尊号，还有身份、德行、功业、位子、祥瑞。目前“安汉公”无法涵盖这些内容，要想继续升格，只有继续模仿周公。

身份，王莽可以自诩为舜帝后代，汉元帝妻族，汉成帝母族，但比

起周公与周王室是同姓，异姓外戚是一道难过的坎儿。而功业、德行、祥瑞、天命，也都需要逐项证明自己。

此外，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比如：汉家自有制度，从来没有过“居摄”，凭什么才敢发明出这一机制？周公居摄到底是什么样子？传说中的伊尹摄政又是什么样子？汉朝的居摄是什么“官”什么“爵”？是比照诸侯王还是比照大将军，还是更高？

再比如，高皇帝早就有约在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归属的“宪制”约定。当年吕后一死，大臣们就是靠这条约定铲除诸吕及其王国的。因为王仅次于皇帝，王莽无法称王，该如何跨过这道“宪制”约定？

还有，居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贤能、合法性，才可以摄政？人们凭什么支持他？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王莽已经牢牢掌权——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宪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

7．黄龙与土德

“黄龙”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德行”。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的功臣如周勃、樊噲、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衍，理由是“箕子”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酈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衍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比，比照、参考，略低

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确属仁政，而且覆盖面很宽，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未必能够完全兑现，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

当然作秀也是有的，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姑侄二人“一唱一和”，颇觉讽刺。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8. 宰衡是什么官儿？

元始三年，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一时顾不上其他。

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廷议皇帝婚事时，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虽然被王莽婉拒，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

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算不上重臣，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和九卿差不多。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比孔光更得信任，他担任大司徒司直，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在陈崇的授意下，替他写了一封奏疏，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赞美颂扬极为直白，情感极为充沛，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周公并列的圣人，是一篇漂亮、高明、肉麻的文章。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

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汉书》中，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

收获了如此人望？

但历史地看，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周公是有功业的，那王莽的功业呢？这篇奏疏的功用，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面汉朝的“宪制”并予以突破，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所以，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行动纲领、路径图。

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不妨盘点一下：

其一，讨伐淳于长，这是堪比“周公诛管蔡”的功劳；其二，汉哀帝时期，敢于和傅、丁叫板，被赶回封邑，这是堪比伍子胥、屈原被流放的荣誉；其三，哀帝死后，一夜之间罢斥董贤，并迅速选立新皇帝，使动荡的朝局稳定下来，这是堪比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的功绩；其四，被赐号安汉公时，女儿被纳入选后范围时，谦虚不受赏赐，这是堪比舜帝、申包胥、晏婴“功成不受赏”的品德；其五，赐号安汉公以来，勤俭节约，发展教育，兴灭继绝，赈济贫穷，还亲自掌管选人用人之大事，堪比古往今来的名臣贤相……

奏疏深情地感慨道，安汉公一个人就集尧舜禹三代的功绩，简直是奇迹。如此宏伟的业绩，不比周公逊色，却没有得到和周公一样的赏赐，这不是国家之福，不是臣民之幸，也对不起千秋万代啊！

奏疏读到这里，陈崇的建议呼之欲出：王莽就是当代的周公，所以应该享受周公的待遇，那周公的待遇有哪些？

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非特止此，六子皆封⁵。

这一段不太好理解，关键处很简单，就是周朝对周公：第一，封邑突破了“公侯百里”的限制，达到七百里，而且鲁国的国君被赋予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郊望”，郊祀上帝和祭祀山川，而郊祀上帝是天子之礼；第二，周公受过隆重的赏锡，超过九锡；第三，鲁国是周朝货真价实的“自治”侯国，不是汉朝有名无实的诸侯国。

周公如此，安汉公也应如此。但这会不会违反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训呢？奏疏对这个敏感问题首次做了清晰的回应，尝试突破这一“宪制”：

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⁶

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怎么变通？

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数——户八万八千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⁷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⁸。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的“冒死”“昧死”之类，这种待遇可以说很尊显了。

第二，宰衡的位秩是“上公”。西汉的位、爵制度很复杂，爵指的是从王、列侯到民间的二十等爵；位就是《汉书》里常见的“公卿大夫”⁹，有点类似后世的“行政级别”，其中最高的是“上公”。“上公”最多封侯，不会超越诸侯王。王莽此时的爵仍然是列侯，宰衡属于“上公”之“位”。

第三，宰衡享受特殊的礼仪待遇。出门时，前后各有大车十乘，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都得随从护卫；母亲赐号功显君，两个儿子王安、王临分别赐爵褒新侯、赏都侯。宣布王莽为宰衡当天，太皇太后亲自来到未央宫前殿行拜官礼。王莽模仿周公跪在前，两个儿子跪在后。这些待遇可谓殊厚。

第四，宰衡不可世袭。依王莽的性格和做派，他对宰衡的待遇再三推辞、谦虚礼让。太师孔光劝服太皇太后不要理会王莽的推辞，直接赏赐就完事儿，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宰衡之官不可世及”¹⁰，言外之意就是说宰衡虽然权力大，但不是世袭官职，所以不必担心擅权。孔光向王政君说这番话，怎么看都像是与虎谋皮，但也不排除对汉朝忠心耿耿但又无力制衡王莽的孔光，是希望限制王莽的权力。

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¹¹

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¹²；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袷祭。

前面曾说过¹³，袷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袷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

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袷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¹⁴。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¹⁵。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¹⁶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奏上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¹⁷，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¹⁸，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

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¹⁹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²⁰。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像其中的“衮冕”是古代帝王的衣帽，“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分别是天子春秋巡时乘坐的车马，“朱户”也是天子之礼；“弓矢”则意味着有专征伐的特权；“宗、祝、卜、史官”是负责祭祀的人员，虎贲是侍卫亲兵。²¹

太皇太后的策书里有一句话：

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汉公。……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²²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嗇夫”，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

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23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 1 《汉书·平帝纪》应劭注，第352页。
- 2 见第四章第15小节。
- 3 《汉书·王莽传》，第4050页。
- 4 管、蔡分别是周公的兄和弟，武王灭商之后，被周武王委派在商朝旧地。按照《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来管、蔡不满，就和商纣的儿子武庚一同叛乱，后来被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二叔，一杀一放。但是，这段历史较为复杂，如据清华简：管、蔡及霍叔是作为三监被委派到商朝旧地的，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引发了管、蔡的流言，但是这种周王室内部的矛盾被武庚所利用，商朝遗民叛乱，杀掉管、蔡、霍叔“三监”，然后才有周公东征平叛之事。先不论哪条更符合历史，对西汉人来说，可能《史记》关于诛管、蔡的记录是时人的普遍认知，所以王莽才会按照“大义灭亲”的模式来模仿。
- 5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 6 《汉书·王莽传》，第4062页。
- 7 但现在更多认为，“皇帝”来源于“煌煌上帝”，就是光明之帝的意思，不是取“三皇五帝”二字组成。此外，还有皇取“泰皇”之说。一些先秦古籍里已经有“皇帝”这个词，参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见氏著《天下一家》。但是，不排除在西汉时，普通人就是认为从古代的诸皇诸帝各取一字。
- 8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 9 《汉书》里常说“公卿大夫”，这里的“公”是“位”，和官职里统说的“三公”不是一个概念。
- 10 《汉书·王莽传》，第4067页。
- 11 《汉书·王莽传》，第4068页。
-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0页：“四年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 13 第二章第三节。
- 14 《后汉书·刘敞列传》，第561页。
- 15 《汉书·王莽传》，第4071页。
- 16 《汉书·王莽传》，第4069页。
- 17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 18 《汉书·王莽传》，第4072页。
- 19 《后汉书·张纯列传》，第1193页。
- 20 王莽所受九锡，按《汉书·王莽传》：“受绿綬衮冕衣裳，珕璋璜璚，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冑一具；柅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第4075页）
- 21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六章，学苑出版社，2005。
- 22 《汉书·王莽传》，第4075页。
- 2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见第五章注9。

四、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

陈崇回来了？王莽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自从去年春天，他派遣王恽、陈崇等八人担任绣衣使者，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以来，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这期间，王莽任宰衡、受九锡，主要是王舜和刘歆等人具体操办，按照陈崇的“路线图”进行。王莽对陈崇很信任也很欣赏，之所以舍得让陈崇离开长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是因为“采风”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派出去的八个人，只有七个人陆续回到长安。绣衣使者之一、中散大夫谯玄走到半路上听说王莽当了宰衡、受了九锡，干脆改名换姓逃之夭夭了。

而回来的七个人里，王莽曾经的小兄弟，班氏家族的班稚，没有采集到任何祥瑞和歌颂的歌谣，令王莽十分不悦。

正式召见他们的时候，王莽看见跟在其他人身后的是几个健壮的随从抬着成捆的简牍，他稍稍放心了。

除了班稚，其他人依次进言，说得都差不多：天下已经风俗齐同，没有一处不沐浴着安汉公的教化。商业风气清正，市场里“市无二价”，商家童叟无欺；人人谦虚礼让，“官无狱讼”，官府没人打官司了，郡县的监狱都空了；城市里没有小偷，农村里没有饥民，路不拾遗，男女异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大治，祥瑞多得数不清，人人都在歌颂当代圣人。

至于证据，使者身后那两千多片、近百捆的简牍就是，他们踏遍天下郡国，深入乡村间里，搜集来的谣曲、歌诗、祥瑞，足足有三万多字。虽然这三万字史书无载，但公元1980年考古人员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发现了一百多枚被火烧过的木简，记录了诸如“嘉禾、灵芝并见”“五枝合为一心”“葛根下有铜”“礼乐长常甘露下”等各种各样的祥瑞，还有“瑞十二”“瑞五十九”之类的数字，大概是祥瑞的编号，这些很可能就是陈崇等人采风归来所献。¹

采风获得祥瑞，就意味着王莽执政，各地风俗淳美、天下太平。

就像《诗经》里的“国风”，儒家会认为，通过“采风”能够看出一个地方的风俗，也能知道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是明主还是昏君，民风是淳朴还是浇薄。而“采风”这件事，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做，孟子说“王者之迹

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隐含的意思就是，唯有王者兴起，才会在普天下“采风”。

所以，王莽并不单是陈崇搜寻赞美自己的祥瑞歌谣，以备不时之需，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王者之行。陈崇等人证明了天下已经大治，其重要性不亚于帮助王莽当宰衡、受九锡。

绣衣使者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来的谣曲，不能说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对王莽的歌颂都是虚伪的。汉朝人尚普遍信鬼神，笃信王莽之“圣”并不奇怪。当然，这些谣曲估计也经过加工甚至是伪造，就像后世的贵族诗人们写“乐府”、填“曲子词”，宫廷乐师从民间搜罗曲调加工成皇家乐舞，性质都差不多。陈崇等人只要能证明天下大治就行了。

王莽的预期基本达到，对班稚的所作所为也就不那么恼怒。再加上王政君求情，班稚自己上书请罪，主动要去给汉成帝守陵，王莽也就应允了。

海内大治还不够，还要看周边的“四夷”，四夷未能宾服，说明王化之业尚未完成。

南边，有元始元年的越裳氏献雉、元始二年的黄支国献犀牛；东边，有东夷王献宝，此事史书未有详细记录，猜测可能是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之国或日本倭国遣使贡献；北边，则是匈奴在元始二、三年的示好。

西汉的持续军事打击，使匈奴早已四分五裂。汉元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娶了王昭君，成为汉朝藩属，与汉廷关系一直不错；汉成帝时期，“虽远必诛”的陈汤击杀了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北匈奴一蹶不振。到了安汉公时期，大家提起匈奴，默认的就是南匈奴。

在王莽安排下，元始二年秋，匈奴把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派回汉朝服侍太皇太后，令太皇太后十分高兴。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按照匈奴风俗，嫁给了他的儿子，生下的女儿就是须卜居次云。“须卜”³，是这位公主丈夫的名字，“居次”是公主的意思，“云”是名字。王昭君是汉元帝的宫人，与太皇太后也算是故人，如今她的女儿从匈奴千里迢迢回来侍奉，说明地处“腥膻之地”的匈奴也沐浴在华夏文明的“孝道”之中，这无疑王莽的泽化。

巧合的是，这一年，西域的车师后王和驻扎在当地的汉朝戊己校尉发生了冲突，另一个“去胡来国”的国王和西域都护也出现了矛盾，两个

国王都逃往南匈奴。按照昔年汉宣帝和匈奴的约定，汉人逃到匈奴，匈奴不能庇护，但这个约定不约束第三国的人。于是匈奴打算庇护两王，并遣使向汉廷求情。

王莽发现这是一个立威的好机会，他非但不接受单于的求情，还废除了汉宣帝的约定，令立新约——不仅是汉朝臣民，西域凡是接受了汉朝册封的诸国臣民逃入匈奴，匈奴皆不能纳。汉朝的老朋友单于对此颇为不满，虽然顺从地答应了，但与王莽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重新确立与匈奴的约定，更加严苛地约束西域诸国，树立威信，巩固边疆，在汉朝看来王莽确实做得不赖。同时，王莽还软硬兼施，让单于给汉朝上书，说把自己的名字“囊知牙斯”改为单名“知”，以符合汉朝推行的“讥二名”，从当时单于王族成员的名字“咸”“乐”“助”“舆”来看，他们也都改成了单名。这份上书令王莽更觉荣耀，成为他“怀柔远人”的王化之举。

到了元始四年，四夷之中只剩下西边没有动静。王莽派中郎将平宪以重金贿赂西羌部落，怂恿他们求为汉朝附庸。平宪的游说非常成功，回朝时带来了好消息。据说这些住在青海湖附近的羌族部落，有一万两千多人向慕王化，愿意把青海湖和附近的盐池献给汉朝，把水草丰茂的地方留给汉朝人，自己去偏远险阻的地方充当汉朝藩篱。平宪奏报说，当问起为什么要如此慷慨时，羌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么说的：

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蠶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⁴

陈崇等人采风回来的“三万言”史书一字未提，是因为不说也知道是什么；羌人的话却被悉数记录，是因为实在太假了，这哪里是游牧部落酋长的口吻，分明出自熟谙祥瑞的汉人手笔。有理由推测，“采风”的三万言也无非是这些内容：五谷有祥瑞，有的苗长到一丈多长，有的一株竿上长三个穗，有的没播种自己长出来了；天上降下甘露，地上喷出酒泉，凤凰、神雀都来了。总之，汉朝有安汉公这四年里，羌族没病没灾，当然愿意当汉朝的藩属。

此事又令王莽大喜，不费一兵一卒，西羌内附，终于达到了东西南北四夷宾服的盛况，说明安汉公的德泽已经溢出华夏，遍布四夷。王莽

高兴地上奏说，现在汉家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唯独没有西海郡，那就把羌人的献地设为西海郡，让汉民移民过去开发，对归附的羌人设置官吏担当统领。

匈奴改名与西羌内附都有些名实不符。一来，匈奴的人名、单于的王号，均有汉文译名，把“囊知牙斯”改成“知”，只是汉名的自娱自乐，意义不大；二来，西羌此时主要还是游牧民族，少有农业，逐水草而居，土地献与不献只是个形式，向汉朝称臣，则既能得到汉朝官方的保护，又能拿到一笔财富，对自己的传统习惯也没有影响，很是划算。

“四夷”外交事务从来不是纯粹的外事，那些与外国真正相关的实质事务，臣民一般是看不到的；能让普通臣民看到的所谓外事，目的多半是应对国内的民意，匈奴、西羌与汉廷心照不宣、两边满意。

不过，因为青海湖是咸水湖，盐池附近是盐碱地，从事农业开垦比较困难，没人愿意移民到西海郡。王莽新增加五十条律法，把触犯律法的上万名犯人强行迁徙过去。这件事，已经与陈崇所说的“官无狱讼”“犯者象刑”相违背了，《汉书》在这里写下四个字：

民始怨矣。⁵

这是王莽执政以来，史书中第一次明显出现臣民对他不满的声音。那些不慎触犯律条、不得不迁徙到蛮荒之地的臣民里，可能就有王莽的拥趸。班固的一个“始”字，颇有微言大义。

总之，元始五年的秋天，一名普通的汉朝臣民特别是长安市民，看到的是海内大治、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安汉公制礼作乐，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也已经基本实现——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

但对汉朝人而言，历史当然不会终结，而是循环。

此时，又有一个宗室、泉陵侯刘庆站了出来，不知是出于“大公无私”还是抢先献媚的目的，向汉廷上奏。此奏一公布，满朝文武齐声赞同，历史果然没有终结，历史循环的关口到了！

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⁶

异世同符，安汉公要行天子事，周公居摄的“圣迹”再现了！

11 . 汉平帝之死

刘庆奏请王莽居摄的话音刚落，冬天的夜空就出现了一次很凶的天象：荧惑入月中。

荧惑就是火星，也是最凶的星，它无论出现在星宿的哪个方位，都会给人间特别是朝廷和皇室带来灾难。“荧惑入月中”，是火星划过月亮表面，星占家们普遍认为是皇宫中将要发生祸事，甚至可能危及皇帝。

果然，没多久，皇帝病了。

汉平帝刘衍还在襁褓之中时就体弱多病；所以他的祖母冯太后才会为他祝祷祛病，也因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祸。即位之后，刘衍尽管享受着天下最好的物质生活，但身体一直都不好。这一次，他的病来势汹汹，不可小觑。

这反倒又给了王莽一个模仿周公的良机：周武王生病时，周公曾经在先祖面前祈祷，许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并把册文藏在“金縢之匮”，也就是用金属带子封存的柜子里；周成王时，周公摄政、东征，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所以周成王也对周公有些怀疑。当时发生了灾异，雷电大风并起，君臣十分恐惧，周成王只好打开金縢之匮，发现了周公要代替武王去死的册文，再一问知晓内情的史官，才知道周公还叮嘱过此事千万不要说出去。周成王大受震动，对周公的疑虑也尽数打消。

王莽如法炮制，也做了一个要代替刘衍去死的册文，跑去南郊祭天的泰畤那里许愿，也藏在一个“金縢之匮”里，放在未央宫前殿，并要求知晓的人一概不许说。

不幸的是，王莽的祈祷没有用。到了十二月，刘衍就晏驾了。

这是汉成帝以来连续第三个没有子嗣就驾崩的皇帝了。一时间朝野震动，不过，所震动的与其说是皇帝之死，不如说是感慨汉朝的天命已尽，连上天都不再护佑了。

也有一些人心存疑问，特别是身在郡国的那些忠于汉室的官员，他们会追问：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即将“加元服”也就是亲政的前夕？为什么刚刚有人上书请安汉公居摄，皇帝就死了？……这些疑问的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王莽。

据史书记载，最早指控王莽鸩杀刘衍的是后来拉起反莽大旗的东郡太守翟义，但翟义人不在长安，他只能是听说。唐朝的颜师古说，刘衍

年纪越来越大，为着母亲卫太后一家被杀而怨恨王莽，所以王莽在腊日呈上例行的椒酒，酒中放毒，鸩杀了刘衍。颜师古的证言里，时间、动机、方式都完整清楚，说明他一定是看了一些传世的史料。

但是，刘衍大概率是病死的，不像是被王莽所谋杀。

一来，现有的证据均不足。首要的就是，《汉书》没有说刘衍是被谋杀的，这是距离刘衍驾崩时间最近的史料，班氏家族与王氏家族和皇室均有密切关系，相比而言《汉书》的记录最可靠。班固连汉成帝因为女宠而无嗣这样的事都直言不讳，没有理由讳言刘衍之死。而颜师古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即使他能看到一些流传的史料，但一件事情连班固都只字不提，六百年后的人却说得一清二楚宛如亲见，反而不可靠。

二来，王莽没有必要弑君。弑君这种事，自汉朝立国以来尚未有过，昌邑王也只是被霍光放逐监视。王莽身为安汉公，他的一大合法性来源，就是稳定了西汉晚期皇室青黄不接、摇摇欲坠的局面，弑君的话就会“被打脸”，动摇甚至毁掉他的根基。而且，在刘衍去世之前，王莽已经着手居摄的安排，刘衍活着不会影响居摄，死了反倒打乱计划。此外，王莽在皇后有“子孙瑞”时十分高兴，复通子午道，也可以证明王莽还想着为刘衍留下子嗣，没有弑君的意图。

三来，这个时代的汉朝人，观念上更相信儒家所设想的“五德终始”，天命到头自当转移，弑君与否并不必要。当然，不可否认刘衍如果活着，王莽迟早面临归政的那一天。但即使如此，王莽也会让刘衍像他的继嗣刘婴那样，令其退位即可，实在不必冒着巨大风险弑君。

不过，刘衍在五年的傀儡生涯中，母族尽诛，妻子是王莽女儿，拖着病弱的躯体孤苦伶仃，想必是气短畏缩，无法刚健有为的。从刘衍死后王莽以朝廷名义所下的诏书就能看出，刘衍“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⁷，就是一犯病就抽风说不出话来，所以他的病死，王莽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弥补这种责任，王莽令朝廷里六百石以上官员都得服丧三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子要像对父亲一样为皇帝之死服丧三年，后世王朝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一直效仿；王莽又迅速为刘衍追加了元服，将其按照成年天子下葬；还给刘衍立了庙，庙号为“元宗”，让一个十四岁就夭折的儿皇帝承受如此宏大的庙号，显示出汉代严格的立庙制度已渐渐颓坏。那个曾经为汉武帝是否有资格立庙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汉朝，确实显得气数将尽了。

12．假皇帝王莽

未央宫依旧巍峨，朝霞夕阳如血，长安人流如昨。

时隔五年，王政君、王莽姑侄二人再一次面临为汉朝选定皇帝的局面。如今，汉元帝的世系已绝嗣，只能向上追到汉宣帝。按照辈分和父子相继的原则，刘衍是汉宣帝的曾孙，王莽认为只能从汉宣帝的玄孙辈里找，这批人年纪都不大。王莽选了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理由第一就是辈分不乱，第二是占卜大吉。实际上是因为刘婴年纪最小。

帝位悬置期间，王莽日夜不息地往来于未央宫、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以及自己的安汉公宅邸之间，同时操持着刘衍的葬礼、刘衍皇陵的施工、刘婴的迎立等朝廷大事，忙得不可开交。似乎把刘庆那封关于居摄的奏疏抛到了脑后。

一个真正的祥瑞，不早不晚，在刘婴即位之前出现了……

汉平帝期间，王莽把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这“三辅”一分为二，取名为前辉光、后丞烈。前辉光谢嚣上奏，说辖属的武功县县长孟通在疏浚水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写着一行红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⁸

这个祥瑞简直令人兴奋到窒息，因为这是第一次有符命声称王莽应当做皇帝。也真是巧，如今天下确实还没有皇帝。刘婴虽然被选为汉平帝的继嗣，但尚未举行典礼，也没有告庙，离正式成为大汉皇帝还有关键好几步呢。所以，这则符命直接要求王莽为皇帝，将置刘婴于何地？

这不由得令人回忆起眭弘的悲剧命运⁹，但王莽见到丹书之后，却率领群臣郑重禀报王政君。

王政君已经七十六岁，不问政事多年，眼见的都是侄子制礼作乐，汉朝天下太平的景象。此前，她支持王莽主要是确保王氏家族掌权，虽然王莽的权力已经与帝王无二，安汉公、宰衡、赐九锡哪个拎出来都喧宾夺主，但这类事周公都做过，王莽当然也可以做。她的心理大概是：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你操纵的、安排的，也隐约觉得你可能走得太远，但毕竟是自家人，办事又稳妥，那就由着你吧。

直到她看到这块白石，如梦初醒，断然否决：

后人常说王政君姑侄二人一唱一和，欺世盗名，但至少这件事不像。因为她“下意识”说出了“诬罔天下”的真话，揭示出她知道这是骗术，而且非常意外。所以，她理解王莽有成圣人的大志，但她毕竟是汉朝的太皇太后，确实没有想象过王莽要当皇帝。

王莽很可能就是想趁着汉家天下暂时没有皇帝的机会，直接登上帝位的。但太皇太后不允许，他只好央王舜去跟太皇太后解释，把这个符命“圆”成另一番意思：

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¹¹

就是说，这则符命所说的“安汉公为皇帝”，不是当真的皇帝，而是假的皇帝，只是摄政的意思。这样一说，太皇太后就同意了，在王莽的安排下，她下诏对这个符命进行了“官方权威”解读：

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具礼仪奏。¹²

对太皇太后来说，她是把王莽限制在了摄政的范围内，至于具体怎么操作，由群臣商议；但对王莽来说，这仍然是一次进取。太皇太后的诏令赋予了摄政以合法性，特别是“如周公故事”，留下了宽敞的制度空间。

很快，群臣就把摄政的安排上奏太皇太后，这是一份极具冲击力的奏文，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儒经证明周公的摄政并不是“顾命大臣”的角色，而是穿天子冠冕、践天子之位的“假王”！

……说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由是言之，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

《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

看看这些记录：“周公服天子之冕”“发号施令，常称王命”“践天子位”“假

王莅政”“居天子位”……就牵涉一段非同寻常的“暗历史”：

周公到底当没当过周的天子？

13．摄皇帝王莽

周公，怎么可能当天子呢？

但是，从《尚书》中的一些记录，到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再到21世纪的清华简，都隐约透露出周公居摄可能另有真相。

事实上，关于周公居摄一直就有多种说法在流传：有的说周公从武王死后就执政称王，成王成年后归政；有的说周公摄政，但名义上称王；有的说周公只是摄政，名义上也没有称王；还有的说周公是在东征时称王，返回时成王才即位……不一而足。

但流传最广的仍是周公顾命大臣的形象，而非称王。这主要是王莽失败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对于周公摄政十分敏感警惕，着重塑造这种形象；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即使是普通人也不敢想象周公会做出“篡权”之类的事了。这构成了广为人知的“显历史”。

其实，考虑周代的政治观念、运行机制、宗法制度，周公即使南面称王，在当时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篡逆之举，顶多引来召公、管叔、蔡叔等一时的流言。处于封建制度兴盛期的周，并没有后世“一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对权力的超高垄断性。此外，儒学最早萌发于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此儒经里的周公形象一定会受到影响。总之，从现有的文献看，周公居摄称王可能性相当高。¹⁴

周公摄政的真相已经晦暗难明，“文献不足征”，“显历史”与“暗历史”并存，都是猜测。但关键的是，此时的西汉君臣怎么理解周公居摄，群臣的奏议是公诸朝廷的重要文件，所以里面提到的周公称王不会是随意伪造。换言之，不论这段“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只要西汉晚期的朝野上下都相信周公居摄可以“践祚称天子”，对王莽来说就足够了。

既然太皇太后已经下诏“如周公故事”，王莽居摄的安排也就很容易操作了：

第一，朝政。王莽也要践祚，穿天子冠冕，南面朝群臣，听政事。

第二，出行。王莽的车出行时，要有警备，百姓要自称“臣妾”。

第三，祭祀。要像天子一样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

群神。祭文的赞辞，要称王莽为“假皇帝”。

第四，日常礼仪。臣民要在正式场合称王莽为“摄皇帝”¹⁵，王莽自称“予”，处理政务要像皇帝的诏书一样称“制”；只有见到太皇太后、皇太后时才恢复臣下的礼节。

第五，封国。王莽在自己的封国内，想怎么发号施令都行，一切比照诸侯王。

第六，改元。明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这是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位的皇帝，而有“摄政”。“居摄”不仅绕过了“诸侯王”，而且参照周公“假王”新造了“假皇帝”的称谓，也就是代理皇帝。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

至此，汉朝旧的“宪制”已经全部被摧毁。此时，假如有人回头想想五年前汉哀帝还在位时，再对比一下眼前，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不知不觉间，一步跟着一步，汉朝竟然名存实亡了。但人们没有感到亡国的苦痛或悲慨，因为“周公”已经应许了未来……

注释：

- 1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见《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2 日比野丈夫认为，此东夷王献宝“一定是倭国使者”所为，未知何据，见《秦汉帝国》，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3 《匈奴传》提到这位公主的名号时，一处为“须卜居次云”，另一处为“伊墨居次云”，“须卜”和“伊墨”是同一匈奴语的不同汉译。
- 4 《汉书·王莽传》，第4077页。
- 5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 6 《汉书·王莽传》，第4078页。
- 7 《汉书·平帝纪》，第360页。

- 8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 9 见本书第一章。
- 10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 11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填，镇的通假字。
-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 13 《汉书·王莽传》，第4080页。
- 14 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见《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 15 假皇帝和摄皇帝的区分，见下一章。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14．永远无法即位的刘婴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王莽以天子之礼，依次在南郊祭祀天帝，在东郊迎春，在明堂行大射礼。完成这一系列祭祀礼仪之后，王莽设置了“柱下五史”，效仿先秦时君主的御史，侍奉一旁记录自己的言行。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刘婴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皇太子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刘婴没有登基，还只是汉平帝刘衎的皇太子。但此时刘衎已死，王莽只是“假皇帝”和“摄皇帝”，那么“皇帝”是谁呢？

没有。此时的天下没有皇帝。

不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在后世看来相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朝野的震动。为什么？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还要告庙祭祖。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昌邑王还没有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不是合法皇帝。

刘婴既没有祭天，也没有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王莽是王氏，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但他却在南郊祭天，这就透露了王莽摄政的真义所在：

“祭祀天帝”，意味着王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兆民的还是刘氏皇族。换言之，“天子”和“皇帝”是两个身份，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皇帝，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¹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祈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²。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事到如今，祥瑞越来越多，王莽已经祭天了，皇帝还是刘氏的，将来怎么办？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当皇帝，合法性从何而来？

假如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关口，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至少也会有所言说。可惜，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舞台上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显现的，是儒经对历史的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应许未来，而且能够阐释历史。经与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尤为重要。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是皇太子，但被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

简单来说，还是因为王莽对周公的模仿。《尚书》曾载，周公东征的时候，管蔡诸叔放出流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就是周成王，王莽不会放过这个细节，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

他年龄幼小的描述³，也是给刘婴的“官方称呼”，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王莽就会怎样对待刘婴。

此真可谓“孺子可教”也。

15．刘崇起义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四月消息已传遍天下。

各地的刘姓宗室，算起来有十多万⁴，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无不惊讶于天下没有皇帝这一制度安排，但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他们的态度可能在暗暗分化，有人紧张观望，有人不问世事，有人唯恐失去禄位，当然也有人忧心忡忡、悲观不已。

宗室的众多分支里，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世系流长，子孙众多，在这同一个世系下，既有起兵反莽又有请求王莽称帝的宗室成员，建立东汉的刘秀也属于这一世系，可谓集汉末宗室之大成。

安众侯刘崇是长沙定王世系之一，封地位于南阳郡。有趣的是，刘崇的封地安众侯国、王莽最初的封地新都侯国，以及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国，三地相去并不遥远。安众国与新都国几乎挨着，在王莽赐九锡之后，新都国拓展了边境，与安众国可能接壤。这种现实压力，或许是刘崇对王莽摄政反应极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刘崇本人没有实权，就把安众国实际的主政者、国相张绍喊来商议。

张绍的从弟恰恰就是为王莽制定“路线图”的张竦，这兄弟俩看起来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刘崇才敢把张绍招来密谋大事。刘崇的态度非常明确：王莽摄政，刘氏必危。

但是，天下包括宗室几乎没有反对王莽的声音。刘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认为，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因此：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⁵

在刘婴成为傀儡储君之后，刘氏皇族其实是知耻的，刘崇的心态在宗室中应该并不鲜见。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刘崇和张绍的策略是首先攻下南阳郡的首府宛城，宛城是富庶的中原大都，属于当时的“一线城市”，如果能以宛城为据点，则大事可期。所以，他和张绍只带了一百多人就起兵了，这个规模在当时恐怕与山贼差不多，他们原以为从安众国到宛城的路上，各处刘姓诸侯一定应者云集，队伍会迅速壮大，但不幸的是，刘崇猜中了宗室“知耻”的心态，却高估了宗室“后勇”的决心。

南阳郡没有任何其他刘姓王侯响应，包括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家族。这一年，舂陵侯家族支属里有十个岁左右的名叫刘秀的孩童，还在认真读书，准备有朝一日到长安太学学习。刘崇的壮烈之举，似乎对这个家族没有影响。

刘崇带着一百多人攻打宛城，其结果可想而知。宛城位于盆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又是郡守治所，戒备森严，兵力充足。刘崇等人连宛城的大门都没攻进去就遭诛灭，刘崇、张绍等人全部死难。

不仅如此，他们的家族也迅速遭遇灭顶之灾，据说“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⁶，上到百岁老人，下到懵懂孩童，一律被斩首示众，连头上耳畔的首饰都没来得及取下，其状极惨。

近亲遭际如此，远亲也惶惶不可终日。这毕竟是王莽掌权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叛乱，影响很大。舂陵侯刘敞虽然没直接牵连，但与安众侯同属长沙定王世系，而且前几年参加王莽主持的袷祭时和刘崇很谈得来，所以感到很恐惧。他思来想去，觉得已故前任丞相翟方进的长子、高陵侯翟宣通经明义，沉稳谨慎，是个君子⁷，将来不会惹麻烦，就想方设法为儿子娶了翟宣的女儿翟习为媳妇，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刘崇的族叔刘嘉、张绍的从弟张竦，也吓得魂飞魄散。为了保命，刘嘉和张竦马上求见王莽，以自首的名义请罪，王莽赦免了他们。都知道张竦是文章高手，那篇劝王莽当周公的文章尤其壮丽，刘嘉于是恳求张竦再来一篇，为自己卷入这场震怖天下的谋反案进行辩白。

这又是一篇极为成功的奏文，张竦一个人就有两篇文章因王莽而“流传千古”，简直可以称为王莽的知己了。班固将全文录在史书中，目的当是羞辱和批判。但不得不说，这篇奏文的确言说了汉末广大沉默的宗室的另一种心声，不能一概斥之为阿谀奉承。

张竦奏文其实就写了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颂扬王莽“存亡续废”。认为王莽恢复了大量绝嗣或被废

的刘氏王侯的爵位，因此是在扶植刘氏宗室，是对汉廷中央自文景以来不断打压宗室支脉的反拨。“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⁸天下是个人都知道王莽恢复了那么多刘氏家族的财产地位，你竟然还谋反？

第二件事，批判刘崇不识好歹，是大祸害，罪不容诛。张竦在这里用了一串最严重的词汇来描绘刘崇：

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

是我个人的仇人，刘氏宗亲的仇人，国家的叛逆者，天下的大祸害。因此，不能只是批判就完事儿，张竦建议还要铲平刘崇的宫殿房屋，将其挖成大坑，灌满污水，以起到诅咒镇压的作用。

这一颂一批，王莽极为高兴。这篇奏疏是以刘嘉的名义呈递的，所以王莽觉得刘嘉如此大公无私，不顾刘姓私亲，与自己同仇敌忾，实属“应合古制，忠孝著焉”，就封刘嘉为帅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赐爵关内侯。张竦连着写下两篇“好文章”，到此终于被封为淑德侯。这两个爵号都是“令称”，不知道食邑在哪里。此外，南阳郡派去毁坏刘崇宫室灌上污水的官吏百姓，也受到封赏。以至于长安市民特意作了两句歌谣来讽刺：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⁹

伯松是张竦的字。长安市民难以理解，“文字材料”写得好，不仅自己能封侯，连被捉刀的人都能封侯。

王莽每扩大一步权力，都会留意刘氏宗室的反应，刘嘉无疑为观望的宗室做了表率，而张竦提出的“毁房子、挖池子、灌脏水”的做法合乎王莽一贯的口味，王莽相信这种方式能够恐吓到蠢蠢欲动的宗室。所以，他下令今后凡是造反的一概这么做。给刘嘉、张竦封侯的考量就在于此。

刘崇的叛乱虽然规模小得可怜，却给了王莽极好的借口，群臣向太皇太后提出，刘崇之所以敢起兵，是因为王莽权力还太轻。五月，王政君下诏允许王莽朝见自己时也可以称“假皇帝”，而在以前王莽面对她要执臣下之礼。这意味着他的代理身份更加牢固。

16. 翟义起义

居摄二年（公元7年），前任南郡太守、高陵侯翟宣在长安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授学生上，毕竟他是经学家、前任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素有家学，主要治《春秋穀梁传》和《左氏传》。

前几日，春陵侯刘敞遣人为子求婚，给他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事务。他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不过，近来几天颇不平静，晚上他常常听到奇怪的哭声，若是凝神细听，又辨别不出哭声从哪里传来。这一天，翟宣又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堂屋授徒，忽然觉察到中庭院子里养的雁——古人说的雁，其实就是鹅¹⁰——受惊而起，他和几名学生赶忙去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不知从哪里钻来的野狗，已经把数十只大鹅的头都咬掉了，而狗早就跑出门，不知所踪。

联想到近来奇怪的夜哭，又看到院子里血肉模糊的断头鹅尸，翟宣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告诉后母说，弟弟东郡太守翟义一向倜傥不羁，恐怕要闯祸，这几天的灾异就是征兆，请太夫人回娘家，与翟家断绝关系，躲避不可预测的灾害。

太夫人不听，这倒不是她不相信灾异，而是她在翟家多年，又是丞相夫人，岂能自己避害而舍弃亲人呢。

过了几个月，翟宣与刘敞两家的婚事热热闹闹办完了，女儿翟习也欢天喜地地嫁入刘家，大家似乎忘记了家中的怪事。

但仅仅二十几天后，一个震惊的消息同时传到翟宣和刘敞的耳朵里：东郡太守翟义在关东起兵反莽，并且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刘匡的师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俨然已经自立朝廷。大军集结十万，浩浩荡荡西进。

和消息几乎同时到来的是士兵，留在长安的翟宣和后母及家族近亲二十四人、刘敞刚过门的儿媳妇翟习，以及刘敞的儿子、刘信的儿子都迅速被捉拿系狱。原本想寻找依托避祸的刘敞，竟卷入了比刘崇更严重的叛乱中。

翟义虽然不是宗室，但与宗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一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他就认为王莽必然代汉，但“宗室衰弱，外无强蕃”，而自己是丞相之子，世受汉恩，所以有义务讨伐王莽。

从翟义以往做事的风格和翟宣对他的评价看，他确实是一个手段凌厉、敢想敢做、有侠义之风的人。此次起兵，他酝酿已久。东郡¹¹位于关东，治所在濮阳，辖内有严乡侯国、武平侯国，隔壁是东平王国。这几个国的王侯都属东平王世系。前任东平王刘云在汉哀帝时，被哀帝从宗室里“抓典型”给杀了。现在的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都是刘云的儿子，现在的东平王刘匡是刘信的儿子，总之，这几位王侯同样激愤于王莽居摄，又与翟义同在一个地区，关系密切，所以此次起兵其实是东平王世系宗室的反莽，如果成功，东平王世系就有可能入主汉廷。

起兵之前，翟义和刘信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密使频繁往来于濮阳和东平国的无盐¹²；东郡人王孙庆有勇有谋，通兵法，但此时人在长安。翟义以东郡太守的名义，说王孙庆犯了重罪，将其“捉”回东郡，委以重任。在王孙庆的参谋下，起兵之日定在了居摄二年九月“都试日”当天。

都试日，就是上级给下级考核政绩的日子。翟义召集了东郡辖内各县长令、侯国相。等这些官员一到齐，翟义就宣布了起兵的消息。

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的场景，但班固却记下了“斩观令”¹³的事，可知当天东郡的这些下级官吏们并不都愿意跟随翟义起兵，而观县的县令很可能站出来反对，所以被翟义斩杀。其他官吏见此，无论内心怎么想，也就不得不跟着起兵了。

翟义立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文臣武将多是东郡和东平国的官吏和中尉，军官主要来自两地的官兵车骑，士兵还包括临时招募的勇毅之士。翟义撰写了一篇檄文，送至天下郡国，历数王莽篡位之罪，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两年前，汉平帝是被王莽毒死的。

这个消息未必可信，但在当时不啻为惊天大事，同情刘氏的、反对王莽的、存有异议的各色人等，纷纷加入翟义的大军。从东平国南下到相邻的山阳郡，已聚集了十万人。

翟义和刘信能够迅速纠集一只庞大的军队，除了他有组织有谋划，还与西汉的地理格局、与西汉前期的历史有关。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翟义也是循此先例，与关东诸侯西进叩

关。

王莽听说后，大为惊惧，这不同于刘崇的乌合之众，而是由宗室和勋贵联手，举关东兵力试图复现诛灭诸吕旧事的军事叛乱。所以，他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面模仿周公，抱着刘婴主持廷议，显出一副为刘氏操劳国事的姿态。

王莽的军事调遣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兵分两类。前一类由七位将军统领，火速集结，主动攻击翟义。这七位将军的组成也颇有意思，其中有“四辅”之一、担当“爪牙”的孙建，有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刘氏宗室刘宏。七将军的兵员组成也颇有意思：

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¹⁴

令七将军自己任命关西人为军官，统率关东士卒，这说明刘信和翟义的起兵确有关东和关中矛盾的因素。

后一类则是防守兵力，王莽抓的几个点也比较内行，分别是关中的咽喉函谷关、关中和东南部的锁钥武关，这两处算是防守的前线；随后在关中层层设防，包括长安附近的霸上和和平观，最后是长安城自身的设防。

此外，王莽还令王舜、甄丰昼夜在殿中巡逻，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其实，函谷关在汉武帝时期向东移过，已经不是当年齐王刘襄叩关的旧关。这使得关中更具纵深优势，关东更难取胜。完成了军事布置，王莽怀抱刘婴，感到周公“诛管蔡”的历史复现了——周公摄政，管蔡挟持武庚叛乱，现在翟义同样挟持刘信作乱，周公当年都十分担心，何况我王莽呢？

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历史复现”的希冀也很常见。例如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今人如此，何况古人？周公“圣史”的逼真复现令王莽在忧惧中获得了强大的自信。他模仿《周书》作了一篇《大诰》，承诺将来一定会“复子明辟”，就是还政给刘婴的意思，也是“复辟”一词的本义。《大诰》由大夫桓谭等人向天下颁行谕告，这等于是向天下重申不会取刘氏而代之的承诺，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此后没有宗室响应刘信。

七将军的“闪电战”也十分凌厉。翟义九月份起兵，队伍达到十万，但却迁延迟钝，始终没有西进，而是停留在东郡南部的陈留郡一带，不断消耗着粮草辎重和将士们一鼓作气的劲头。结果，七将军迅速出函谷关，直接找到翟义和刘信的主力进行决战，在陈留郡的菑县¹⁵，也就是当年成就齐桓公霸业的“葵丘之盟”的葵丘，一战击破翟义军队，武平侯刘璜被斩首，刘信的两个儿子谷乡侯刘章、德广侯刘鲋被捕杀，翟义、刘信等人率领残兵向西南方向退守淮阳国的圉县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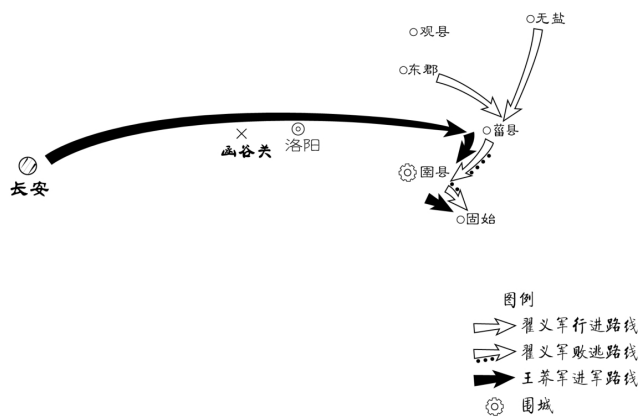


图4.2 翟义军与王莽军交战简图

七将军大捷的消息被火速报告给王莽，王莽心中石头已然落地。他放下怀中的刘婴，也放下了最开始的宽容——在翟义、刘信起兵之初，王莽抓了他们的亲人，但只是关在监狱而没有加害。现在，见大局已定，他下令将翟义的母亲、翟宣和女儿翟习以及亲属二十四人在长安闹市十字路口全部处以磔刑，即分尸，并将尸块暴于街头。

行刑那天，天气和煦，层层叠叠围观的人群里，不时传来受难者的惨叫。临死时，翟宣终于明白，几个月前家中那恐怖的夜哭之声就是自己亲人的哭泣，而那被野狗咬掉的数十只大鹅的脑袋，就是自己亲人的首级。

王莽在实施酷刑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在给七将军的诏书里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行刑的经过，并掩饰不住喜悦地说：“天气和清，可谓当

矣”¹⁷。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将士封了五十五个列侯，并大赦天下。

受到激励，七将军的军队对翟义和刘信紧追不舍，在十二月将围城团团包围，很快攻破。翟义与刘信丢下残兵，“化妆”逃亡。在围城往南不远的淮阳国固始县，翟义被捕，并很快在淮阳国的治所陈县被处以磔刑，分尸后暴尸。而刘信始终没有被抓到，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可能死于乱军，即使侥幸逃脱也应该没有活到东汉。另一位叛乱高层王孙庆也没有抓到。

一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叛乱竟然只用了三个月、打了两场较大的战役就失败了。史书没有记载翟义和刘信为何在关外迁延日久，其原因已经随着叛乱高层领导人的死难而成了秘密。若以事后之明看，要么是在西进路线上发生分歧，要么是缺少军事经验，未能制定并执行稳妥而迅猛的战略。

但不管怎样，王莽代汉之前最大的一场叛乱就此平息。

不久之后，王莽按照刘崇的先例，将翟义的宅邸毁坏、挖坑、灌上污水；把翟义的父亲翟方进及翟氏先祖在汝南郡的坟墓扒开，焚烧棺槨，夷灭三族，一般夷三族是不杀孩子的，但翟氏家族则被斩草除根，不留子孙。全部斩首后，尸体被推到一个大坑里，放上断肠草等毒物，以诅咒其灵魂也不得安宁¹⁸。

这次胜利刺激了王莽的自信，使得他和他的心腹们更加坚信天命已经转移，天不再护佑刘氏，从而加快了由假皇帝向真皇帝的跃进。

宗室们则基本上断绝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残念，有些宗室甚至比一般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格外懂得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

比如春陵侯刘歆庆幸自己被王莽当成安抚刘氏宗室的典型，虽然牵扯进翟义的叛乱，但不仅全身而退，把儿子刘祉也从监狱里救了回来。父子俩本就以忠厚谨慎著称，自此更加战战兢兢。

比如清河纲王世系的新乡侯刘佟，在王莽嫁女时站出来请求增加王莽的封邑。王莽大为感动，即位之后将刘佟赐姓为王。

泉陵侯¹⁹刘庆，封地位于荒蛮的零陵郡，刘崇和他同属长沙定王世系，只是刘崇的祖辈迁到富庶的南阳，从此两家就渐行渐远了。刘庆在汉宣帝末年嗣爵，如今年龄不小，阅尽沧桑，在王莽赐九锡时第一个公开主张王莽居摄，可惜他死得早，王莽即位后断绝了刘庆之子继承的爵

位。

此外，广饶侯刘京、讨伐刘信的七将军之一的刘宏，也都抓住了好机会，在王莽即位前夕向王莽报祥瑞，请求王莽即位为真皇帝。还有被王莽安排给汉平帝父亲为继嗣的中山王刘成都、鄱乡侯刘闵、明德侯刘龚²⁰，以及找张竦捉刀的刘嘉，先后上书颂扬王莽，都被赐姓为王。

宗室尚且如此，何况大臣？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殉国”现象，在西汉末年几乎没有。由此可见王莽之感召，人心之更替，天命之转移，殆非无权无势无兵无财的宗室所能撼动。

至少在这一时期，后世所谓的“人心思汉”是不存在的。²¹

翟义、刘信失败后一年……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这些尸体已经白骨化，成为恐怖的尸山。路人所见是骷髅的幽深眼窝和骨殖的惨白颜色，所嗅是血腥腐臭的气味。王莽还令人对其封土，“方六丈，高六尺”，再覆盖上荆棘，旁边竖起一块高一丈六尺的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鲵”²²。“鲸鲵”是古代作恶的大鱼，在这里和反虏、逆贼并列。

之所以在这三个城市，是因为翟义和刘信等人在无盐密谋，从濮阳起兵，在围城失败。制作恐怖的京观，就是要恐吓这几个城市的士民，也恐吓其他的宗室。

筑京观，的确古已有之，《左传》中就有记载。王莽主张复古，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京观更多的是上古祭祀与战争风俗的残酷遗存，并不是主张仁义的儒家题中应有之义。王莽儒生出身，却筑起中土久未出现的京观，在当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想而知。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难道说，儒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吗？

注释：

- 1 天子三玺和皇帝三玺的详细解说，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65页。
- 2 通过考察《尚书·金縢》篇的微言大义，区分周公面对上天和祖先的不同，以解释“周公称王”问题，见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其他讨论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一书。
- 3 王慎行认为，《尚书》里把周成王称为“孺子”，未必意味着年幼，把“孺子”等同为襁褓婴孩，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见氏著《周公摄政称王质疑》“成王年幼辨”，载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但是，显然王莽就是把孺子当作婴孩来使用的。
-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第18页。
- 5 《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 6 《汉书·王莽传》，第4084页，张竦替刘嘉写的奏书。
- 7 《汉书·翟方进传》，第3424页，翟宣“明经笃行，君子人也”。
- 8 奏章见《汉书·王莽传》，第4083—4085页。
- 9 《汉书·王莽传》，第4086页。
- 10 《汉书·翟方进传》，第3438页：“群雁数十”；案《说文解字》：“雁，鹅也”。
- 11 郡治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辖区还包括今山东聊城一带。
- 1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
- 13 《汉书·翟义传》，第3426页。
- 14 《汉书·翟义传》，第3427页。
- 15 今河南民权县一带。
- 16 今河南杞县一带。
- 17 《汉书·翟义传》，第3436页。
- 18 传说有一首诗《平陵东》是纪念翟义的，但难以详考，也无法断定诗歌是否为翟义之死的隐喻。姑且录在此处备读者参考：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

黄犊。

19 也称众陵侯。

20 据沈展如《新莽全书》，此人疑刘立改名。

21 吕思勉说，“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此言恰当；但吕思勉为证成此言，强调“翟义非正人，其起兵非必为汉”，却并无根据。见《秦汉史》，第202页。

2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

第五章 经师

刘氏去，王氏持

天下安宁乐可喜

井田平贫广其志

——新莽时期镜铭

一、驯服君主

1. 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¹；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²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³。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逵、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

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宫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谏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⁴。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2. 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

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⁵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⁶。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⁸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

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⁹，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谏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¹⁰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¹¹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¹²。

“知当世之要务”，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¹³，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¹⁴。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 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

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¹⁵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¹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

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赋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要依仗的儒学领袖吗？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¹⁷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¹⁸，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 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¹⁹）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轅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²⁰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²¹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²²。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²³，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²⁴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是拓宽人才的来源²⁵。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話，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²⁶，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 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

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江都是吴国故地，离皇帝太远，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他仍然恃帝兄之威，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

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用意很明显了，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扶摇直上，也不是不可能。庆幸的是，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搞“天气预报”很有一套，求雨止雨，无不灵验。

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就是后来的左冯翊，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分量可是完全不同。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向刘彻力谏，刘彻根本不听。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因为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也就是诙谐博学，很容易相处，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到了刘彻面前，他察言观色，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不忠”。

“不忠”，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佞臣的意思了。但是，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他向刘彻表达心迹，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27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

论有余”，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被刘彻大大加赞扬。主父偃也自恃受宠，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令皇帝、卫青都倍感欣慰；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致燕王自杀，燕国绝嗣而废除，一时朝野震动，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这些都是皇帝家事，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以免惹上祸端，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不久，江都王刘非突然给刘彻上了一封奏书，请求赋予他兵权，他要北上帮助皇帝去攻打匈奴。此事令正在大力削藩的刘彻不太高兴，他当然拒绝了刘非的请求，可能也认为董仲舒的相国不太称职，就把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

被召回的董仲舒，成了一个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不仅废相的名声不好听，品秩也从真二千石降到比二千石。当董仲舒以中大夫的身份进入郎中令官署时，中大夫主父偃、朱买臣等皆以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同僚。

回到汉廷的董仲舒，渐渐看到一个与当年不一样的、更真实的公孙弘。这是一个与叔孙通很相似，以儒学取媚帝王、缺乏刚毅之气的公孙弘，是被九十多岁的齐学宿儒辕固生斥为“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²⁸的公孙弘，也是一个被朝中公认的贤臣如汲黯所排斥的公孙弘，他身为皇帝宠臣，却对皇帝那些有违君德的言行很少规劝，也没有建议皇帝更化改制。

另一方面，主父偃也把董仲舒视为敌手。他没有料到，一个失职的废相，回到中央后竟然频频被皇帝召见，又是问前年夏天的下霜、五月的地震，又是问去年七月的大风，又是问今年夏天的大旱和蝗灾。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主父偃可能更担心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儒家，一旦联成声气，会给

他的仕途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去董仲舒家，趁主人还没来的时机，刻意翻找书案，窃取了董仲舒的《灾异说》，书中记录的正是董仲舒当年任太常博士时向刘彻奏对辽东高庙和高祖便殿起火时的原稿，其中“阳失节，火灾出”等文字历历在册。

主父偃将此书奏明皇帝，刘彻御览后，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阳失节”就是说，那两次起火的原因在于皇帝。刘彻相信灾异，但对借灾异批评皇帝是高度警惕的，他召集太常博士和弟子们都来讨论。儒生们到了未央宫，主父偃把简册给博士和弟子传阅。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是朝廷里说灾异的后起之秀，对此颇有发言权，他指出简册里有“阳失节”的话，尤为大逆不道，认为说灾异者当死。主父偃对吕步舒称道了一番，又听了其他人的意见，召见就结束了。

几天后，廷尉的虎狼之士闯进董仲舒宅邸，将董仲舒逮入廷尉狱。一头雾水的董仲舒在狱中颇受了些苦，直到吕步舒哭着来探监，董仲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觉得这次难逃一死。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改制。他虽然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一整套方案，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也没有其他的大臣支持，更不必说驯服君王了。在牢狱之灾中，更能深味儒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力。

廷尉尚未审理董仲舒的案子，一道诏令下来，董仲舒免死，不知道是刘彻的恩赐还是公孙弘的相助。董仲舒回家后，来不及给自己压惊，第一件事是把书案上所有言说灾异的简帛拿到庭院里一把火烧了。

阴阳灾异，确属天道，泄露天道，性命难保，今后还是只在心中说灾异吧。

劫后余生的董仲舒彻底沉寂了，公孙弘却可能在主父偃对董仲舒的陷害里，觉察到自身的危险。公孙弘深知更化改制绝非一人之功，眼下最要紧的是防范主父偃。换言之，先清除掉敌人，且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情。

这下一步，就是人，要有一大批且源源不断的儒生进入朝廷做官。虽然朝廷举贤良已经十几年，但举贤良并不是稳定和常态的入仕渠道，人数也不多。没有人，无论是清除政敌还是劝谏皇帝，都难以成功。昔年赵主父之败，今日主父偃之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很快，公孙弘就听到皇帝拜主父偃为齐王国相的消息。主父偃就是临淄人，他这些年刻意收集了不少齐王淫秽失节的内幕，可能是有什么

前因要报复，把这些内幕一股脑捅到刘彻那里，刘彻这才拜他为齐国相。如果他在齐国再次掀起大案，比照当年处理燕王的案子，回来后很可能升任御史大夫。到那时，公孙弘就将屈居主父偃之下，性命或将难保。所以，公孙弘要加快升迁的脚步。

主父偃离开长安之前，也颇做了些准备，他授意同僚中大夫朱买臣，两人一内一外，戮力维持局面。到了齐国，主父偃先是羞辱亲朋故旧，以报复当年他们对自己的蔑视、忽视、鄙视。不几日，又让手下人试探齐王。“先问问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主父偃吩咐，他的想法是循序渐进，先让手下人从一件事问起，让齐王摸不清虚实多寡，自己再去和齐王理论，如此一进一退，不怕齐王不服。

大概与此同时，主父偃得到消息，公孙弘被拜为御史大夫。他感到了压力，迫不及待要与齐王摊牌，希望把齐王的案子办得漂漂亮亮，再加上手中还握着赵王的把柄，回到长安后可以与公孙弘一搏。

但主父偃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手下询问完齐王之后，齐王大概是担心遭受燕王一样身死国灭的命运，当晚就自杀了。

齐王之死打乱了主父偃的设想，自杀意味着齐王还没有审判就死了，案子就黄了。再加上赵王因为有把柄在主父偃手中，更要借齐王自杀一事做文章。主父偃决定即刻动身返回长安向皇帝解释。不过，流言比快马更快，主父偃人还没到，皇帝已经为齐王自杀之事震怒，以为是主父偃逼齐王自杀的，再加上赵王怂恿。主父偃刚入函谷关就被拿下。

齐王之死既是国事，又是皇帝家事，刘彻召丞相、平棘侯薛泽，御史大夫公孙弘，以及新任廷尉张汤来议事。张汤也担任过太中大夫，与主父偃、朱买臣、赵禹同列。不过，张汤与赵禹都是入仕多年的大臣，彼此交好；而主父偃与朱买臣是刘彻提拔的新贵，彼此相合。张汤与主父偃关系未必密切。此番主父偃下廷尉，廉洁苛刻的张汤客观地指出，主父偃确实未曾逼迫齐王自杀，不过，赵王等人举证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和卖官已经查实，所以主父偃应按照贪污罪处死。

丞相、平棘侯薛泽一向忠厚，主张暂时留主父偃一条命，刘彻也觉得主父偃很有才干，不太想杀他。而此时，公孙弘说了一句话：

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²⁹

这句话并不容易理解，但刘彻马上明白了。公孙弘的意思是，齐王自杀

无后，齐国就被废除了，齐地改为郡县，版图纳入汉境，这从利益上看不是坏事。但是从儒家伦理看，天下人就会觉得皇帝太狠毒了，已经占有四海，却为了得到齐国的土地，不惜派主父偃逼迫亲人自杀，夺取亲人的土地。所以，天下人会在背后骂皇帝自私无情冷酷，不是仁义之君。所以，只有杀主父偃才能告诉天下人：看，皇帝并不想这样，是主父偃辜负了皇帝。

刘彻对公孙弘的建议非常满意，他甚至不满足于杀掉主父偃。公孙弘、张汤分明只听得刘彻的玉音放送：

“主父偃族诛。”

6. 董仲舒之惑（四）

主父偃的确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入仕的，拚得残生尽日欢，此身虽死又何妨？但他万万没想到，搭上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家族成员的性命。

主父偃一死，朝廷的气氛似乎轻松了许多。但董仲舒仍然恐惧，他虽然厌恶主父偃，但族诛的酷刑令他畏惧。他的困惑与日俱增：面对一位喜怒无常、极端残酷的君主，儒学如何去驯服，又怎能驯服得住呢？他日益感到自己的经术毫无意义。讽刺的是，皇帝派吾丘寿王、张汤来向自己问道，他们来修习儒道，真不知道修成什么样子呢！

董仲舒还困惑于公孙弘，自从张汤向他讲了主父偃之死的缘由，他惊异于公孙弘确实是通儒术的，只是这儒术之用超乎自己的想象。昔年刘彻向董仲舒问灾异的时候，董仲舒也建议皇帝诛杀诸侯和外戚，但那并没有实际所指³⁰，而且确乎是灾异本身的预测。公孙弘却能将儒术翻云覆雨成精妙手段，还饰以仁义，这对儒术是福是祸？

又是十月，新的一年到来。

十一月，温弱的平棘侯薛泽罢相，御史大夫公孙弘拜相。

这是有汉以来第一个没有封侯的丞相，朝臣还没来得及议论合不合旧例，拜相当日，皇帝就以平津六百五十户封公孙弘为平津侯，此时公孙弘大约74岁。此后直到东汉，凡拜丞相必先封侯成为惯例。

尤为重要的是，公孙弘是作为一介儒者而非功臣或是外戚走到封侯拜相这一步的，这对天下的示范效应，要远远高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苦口婆心宣讲的大道理。

当了丞相之后的公孙弘会干什么呢？董仲舒不敢去想，他应该并不乐见一个曲学阿世的儒生，成为新一代的汉家儒宗。

不久之后，公孙弘先是引董仲舒和另一个修鲁学的瑕丘江公辩论，力推董仲舒的齐学更胜一筹，齐学在汉廷的地位更加巩固；但接着，公孙弘又举荐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的王国相。

表面来看，这是一次重用，但董仲舒经历过上次牢狱之灾和担任江都王相之后，已经能看清这是一个“杀局”。胶西王也是刘彻之兄，“七国之乱”后封王，“为人贼戾”，“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³¹。人很聪明，你向他进谏一句，他有十句回你，而且说得更冠冕堂皇。胶西王最有名的事情，就是这些年凡是给他当相的，总会被他找出理由治死罪，实在找不出瑕疵的，就被毒死，总之有去无回。

王命难违，董仲舒只得东行。

见了胶西王，董仲舒没想到大王非常恭敬谦卑，一切皆依礼，但董仲舒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连一个诸侯王都无法驯服，想以儒学驯服皇帝从而变革天下，更是绝对不可能的。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貌似圣王，实为暴君，这样的皇帝是三代以来的第一个，是帝国时代孕育出的典型君主，与尧舜文武、秦皇高祖有着本质不同。辅佐刘彻这样的“雄才大略”，恐怕只有公孙弘才能胜任。

董仲舒终于想明白：公孙弘刻薄残忍，但未必是针对自己，而是面对刘彻不得不如此，他杀主父偃，贬斥汲黯，把自己撵到胶西，种种行径，目的是为了驱除异己，垄断皇帝的信任，从而可以放手做一番事业。

如今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公孙弘年老体衰，时日无多，不出所料的话，势必该有些作为了。

想到这里，董仲舒赶忙掌灯备刀笔，给公孙弘写了一封书。在这封短短的信里，董仲舒一共说了五次“仲舒叩头死罪”。当然，“死罪”在汉代是一个常用的谦辞，但反复说了五次，董仲舒只想传达一个意思：我服输。

特别是这么一句话：

仲舒愚陋，经术浅薄，所识褊陋，不能赞扬万分，君侯所弃捐。³²

一代儒宗都服输了，公孙弘见到这封书一定很高兴，他可能会想：老匹夫终于想明白了，也是真害怕了，不枉我把他发配到胶西王那里去。

那么，董仲舒在书信里提到的建议当然可以考虑了，那就是希望公孙丞相能效仿萧何，打开求贤之门，尽快让儒家垄断仕途，这与公孙弘的政见相同。公孙弘已经驯服了儒宗董仲舒，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把丞相官邸的东墙凿开，加盖了一幢新的建筑物，名曰“东阁”，在这里他招纳各类贤人名士，如果有特别出色的，就推荐给刘彻。

更重要的是，公孙弘彻底变革了汉代的文官制度。他推动刘彻下诏：

第一，以儒家原则建立中央太学。

第二，为博士配置弟子五十人，由太常选拔，以前的博士自己收弟子，此后博士弟子们由国家选拔配备，就像今天的“公费研究生”；同时，令各郡国层层选拔优秀子弟到太常博士处委培。“毕业”后经过考核，分送到中央担任“文学、掌故”等官员，优秀的可直接担任郎中。

第三，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优秀的担任左右内史等京畿地区官员的属员，较一般的也担任各郡太守的属员。

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保证儒生被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中低级的官吏行列，随着这些人的正常升迁，汉代朝野的儒家官员甚至高官将会越来越多。

这正是董仲舒曾经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³³，也是公孙弘了不起的作为。

董仲舒七十岁那年，允许他返回长安的诏令到了，不知道是皇帝记起了他，还是公孙弘见到那封信后决定放过他。

辞别胶西王，董仲舒松了一口气，或许胶西王也松了一口气。

返回长安的路上，正值冬季，一路上都在下大雪。雪势之大，是皇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经过的郡县，总有贫民被冻死。董仲舒知道，这灾异预示着将会掀起可怕的大狱，但他再也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向皇帝上书，求皇帝准许他致仕。

皇帝答应了，又令张汤登门向董仲舒学习如何以儒术来审案。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从这一点上说，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公孙弘也有《公孙弘》十篇，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每个字值百金³⁴。

他们两人的差别，是作为经师拥有的政治德性不同。

故园仍在，木繁草长。董仲舒想起昔日“三年不窥园”的往事，想起汉景帝时，他还算年轻，有一日，天朗气清，他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来者脱履登堂，风姿绰约，令他精神一振。主客交拜行礼，分别在席上坐下。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此人并不苟且，仪态颇为大方，谈吐十分不俗。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更是多有相契之处。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又颇觉可疑，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若非曾经同门共学、朝夕相处，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然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

日光依然灿烂，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

客人忽然说：“噢，要下雨了。”

董仲舒一怔，恍然大悟，笑着对客人说：“我晓得了！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鼯鼠！”

那人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仓皇跳出前厅，不知去向。³⁵

而现在，他每晚都到园子里，仰首观天象变幻，个中玄机只有自己能够领会。不久，他听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两王皆自杀。而主持这次谋反大案审理的，正是当年险些害他被杀的高足吕步舒和时常求教的廷尉张汤。吕步舒和张汤以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为蓝本，审理两王之案，最终有万人死在这场大案中。印证了上年冬日大雨雪所的寓意。

夜观天象，他还发现北极星旁的三颗星突然有一颗变得极暗，这预示着三公中有一人即将死去。而此时，御史大夫李蔡刚刚被免，太尉一直空缺，三公中唯有丞相公孙弘在任。果然第二年公孙弘薨于任上。

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

他或许能理解，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

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的道理，都深深融入公羊学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³⁶

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然无法赞赏公孙弘。理解，但决不赞赏，不是因为两人命运殊途，而是董仲舒仍然深深陷落在政治的困惑里。进入帝国时代的儒学，从理想上看必须驯服帝王，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吗？逐渐“经学化”的儒学，随着地位的升高，将来还有动力去批判驯服帝王吗？

多年以后，刘向、刘歆父子争论董仲舒的地位，父亲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儿子刘歆却很不以为然，认为充其量只是“群儒首”。从董仲舒的毕生事业来看，刘歆所言不虚，他的确没有什么王佐之才；但倘若以理想主义来观，董仲舒岂又只是儒生之首？假如董仲舒遇上王莽，该会怎样？

注释：

- 1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 2 即汉朝的大鸿胪。
- 3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语，第3097页。
- 4 《汉书·王莽传》和《艺文志》里记载的这些“任课老师”略有不同，可能是前后的任职老师有变动。
- 5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 6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 7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见《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中华书局，1985。
- 8 尽管被坑的很多都是方士，但其实方士、儒生，在彼时使用的是相似的话语。
- 9 法家理想的君主的确是专制的，但也是最知法懂法、依照律法严格执法的君主，是法的典范，是首席大“法”官和首席执法官。但如何培养教育这样的君主，以及君主不守法怎么办，法家也没有有效措施。
- 10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 11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 12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4页。
- 13 《史记·叔孙通列传》，第2726页。“希”，观望。
- 14 《汉书·叔孙通传》，第2131页。
- 15 《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 16 陈启云认为，卫綰的这次上奏，仅指这一次举贤良罢申韩纵横之言。见氏著《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第1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但即便举贤良都是儒生，其他派别仍然有别的入仕渠道。
- 17 《汉书·儒林传》，第3608页。
- 18 《汉书·窦婴传》，第2379页。
- 19 建元是刘彻后来追补的年号。
- 20 《汉书·五行志》，第1329页。董仲舒的草稿并没有保留，这里是从他对其他火灾的推演中摘出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义理。
- 21 《高庙园灾对》，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影印版，见“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zh>）。
- 22 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建元元年）还是第一次改元之初（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历代有争议，近来还有“元光五年说”。因文献不足征，这里取元光元年。
- 23 陈苏镇先生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天人三策甚至不知董仲舒曾参加对策”，见《〈春秋〉与“汉道”》，第226页。但司马迁未在董仲舒传里记录这些，未必是不知，更有可能是未取，觉得不重要、不需要。司马迁问学董仲舒，焉能不知？
- 24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3页。
- 25 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第三章。
- 26 今扬州。
- 27 《汉书·公孙弘传》，第2619页。
- 28 《汉书·儒林传》，第3612页。
- 29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2页。

- 30 也有认为董仲舒指的是田蚡和淮南王，但这可能是后人知道田蚡之死，淮南王谋反的后见。
- 31 《汉书·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 32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 33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只是“发之”，具体实施，董子并无权力。
- 34 《汉书·艺文志》，《西京杂记》卷三，第27页。
- 35 刘义庆：《幽明录》；此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董子之形象。
- 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43页。

二、今古之争

7. 盖宽饶之死

董仲舒最后以寿终，家族滋繁茂盛，还得到迁徙茂陵的礼遇。如今长安附近的卫星城已经是繁华富贵的辐辏之地，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迁徙帝陵不再是汉廷消除关东巨族势力的举措，倒像是对臣子的褒赏，当然这并不全是董仲舒的声誉所致，而是他的子孙因为修习儒学都当了大官，这要拜公孙弘所赐。

魏郡的盖宽饶也是如此，他受益于公孙弘为儒生划定的轨道，先因为明习儒经在魏郡任“郡文学”，主要负责一郡的教育工作；又通过举孝廉、举方正，在汉宣帝时期升迁到汉朝中央担任郎中令的属官谏大夫，负责宫门事宜。盖宽饶为人刻板刚正，特别擅长用儒学的原则来处理行政问题，是那种敢把本本上的“规章制度”甩到顶头上司面前、坚决不给上司干私活的人。汉宣帝倒是欣赏他，人尽其才，把他提拔到司隶校尉的位置上，查举弹劾官员和王侯外戚。

董仲舒指明了方向，公孙弘铺好了路，要想当官，就要修习儒学，所以夏侯胜告诉他的学生，只要儒学水平高，当官就跟从地上拾草一样容易。但是，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盖宽饶不太听这一套，他觉得自己只要廉洁奉公，别人就无可指摘，因此他当司隶校尉期间，长安内外的大小官员贵戚都怕他，长安风气为之一清。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并非弄权之臣，在汉宣帝微末时有恩于皇帝，因此备受尊崇信任。有一次，许广汉搬新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等一众官员都来庆贺，但盖宽饶就不去。

许广汉屈尊请他，他才去。一到许家，许广汉亲自斟酒敬他，盖宽饶说了一句很扫兴的话：

无多酌我，我乃酒狂。

少给我倒酒，我喝了会耍酒疯——丞相魏相听见后笑着说：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¹

次公是盖宽饶的字。您不喝酒都像疯子，何必靠酒？——魏相和盖宽饶的人生轨迹相似，他是凭通晓《易》经，亦先在郡内做官，再通过举贤良进入汉朝。魏相既通儒经，又擅长以律法治理地方，还特别重视汉朝的传统，治政时有意收集整理了汉朝名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的言论，给汉宣帝作参考。他这种既有儒学素养又重视汉朝传统的风格，很得汉宣帝欣赏。

魏相此话一出，在座的趋炎附势之徒立刻把鄙夷的目光投向盖宽饶，以示“划清界限”。酒喝得差不多了，音乐歌舞起来了，主管长信宫事务的长信少府，名叫檀长卿，步入舞池，模仿猴子逗起狗来，大家都笑了。盖宽饶十分不悦，仰头看着新房叹气说：“真漂亮啊！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

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²：

“以《禹贡》治河。”《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³

“以《洪范》察变。”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⁴，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梟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虽然用了一个“弑”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⁵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

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⁶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 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

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

假如汉元帝真的成为儒家“圣王”，后面可能就没有王莽的机会了。

萧望之、周堪特意选拔了通经的宗室成员、散骑谏大夫刘向加官“给事中”，顾问皇帝左右。早在石渠阁会议期间，萧望之就注意到当时仅为“待诏”的刘向，特意安排他参加会议。汉武帝宠臣金日磾的侄孙金敞当时担任侍中，也加入萧望之的阵营。四人同声连气，大胆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天下，一时声望煊赫，势力大增。

这就触犯了弘恭、石显的利益，也令原本领衔辅佐的史高很是不满。史高于是与弘恭、石显结为同盟，互为表里。萧望之不是按照儒家原则来辅佐皇帝吗？史高等人就拿汉朝的传统做法来告诫皇帝，刻意与萧望之对抗。

萧望之对此心知肚明，决定要拔掉弘恭、石显这两枚钉子，把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

但汉元帝不仅没有斥退弘恭、石显，反而把刘向调离禁中，改任宗正。宗正是负责皇室内务的官员，刘向从谏大夫升为宗正，当然是提拔，但也失去了“给事中”的加官。萧望之的努力换来的，是自己阵营的被打压。

班固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愿意在用人机制上动作太大。但合理猜测，汉宣帝知道儿子好儒、柔弱，会给儿子传授心法，教导过他中书令等职位要用信得过的宦官，不能让儒臣把控。毕竟宦官位卑，纯然是皇帝的附属物，便于控制。若内外朝均由儒臣担任，那“霸王道杂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挫败萧望之的努力，他们继续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会稽郡的郑朋此时冒了出来，这个小人物人品不佳，但很有眼光，趁机上疏批评史高等外戚之罪过，就此进入萧望之和周堪的视野。一经接交，郑朋极力吹捧萧望之是当代的周公，天下人心向往之；又提醒说萧望之已经年逾六十，再不有所作为就来不及了。

但处事严正的萧望之不久后发现，郑朋此人行为不端，搬弄是非，于是不再搭理。郑朋果然是小人，立刻投靠到史高的阵营，反过来向史高说萧望之、周堪的不是，至于前面批评史高的事情，郑朋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哪里知道这些（关内的）事情嘛。”

原本是暗流涌动、并未激化的矛盾，被区区一个郑朋搅成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郑朋的政治水平不低。总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史高、弘恭、石显也就不再敷衍，先行下手，让郑朋向汉元帝告发萧望之等人，皇帝大概不知道弘恭在里面的角色，按照程序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掉进了圈套。

问完之后，弘恭、石显正式报告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为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实属有罪，建议“请谒者召致廷尉”⁷。

这里有个细节，史书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于是准奏。后来有事召周堪、刘向来见，才被告知他们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于是惊讶地问：“不是说只让廷尉询问吗？赶紧把人放出来！”

但是，汉元帝久为太子，父亲又是一个极重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连“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都不知道？这个细节颇为奇怪。

而且，萧望之等人虽被放了出来，并没有说罪名是错的。对萧望之，是赦免其罪，罢免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刘向则被免为庶人。那个小人郑朋被任命为黄门郎，进入了汉朝仕途的车道。

更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汉元帝赐爵萧望之为关内侯，重新给

了“给事中”的加官和其他待遇，史书说，这是“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⁸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让萧望之当丞相。听起来不错，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

萧望之的儿子给皇帝上书为父亲鸣冤。

鸣冤这种事很正常，但汉元帝却将此事下有司，由相关部门讨论，假如他真的要任命萧望之为丞相，对这封上书应该低调处理，他反而小题大做，这是很奇怪的。果然，讨论的结果就是萧望之身为大臣，不思悔改，还教唆儿子上书鸣冤，这是不敬，提请逮捕萧望之。

汉元帝就问弘恭、石显，“萧太傅为人刚正，恐怕不肯折辱吧。”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真的逮捕，萧望之可能会自杀。

弘恭等人安慰说：“人命最重，萧太傅的罪都是言语上的小罪，他肯定不会做傻事。”

汉元帝于是批准了逮捕萧望之的命令。

身为中书令，弘恭、石显马上起草敕令，并命令执金吾即刻发骑兵，火速赶赴京外杜陵，包围萧望之的宅邸，一副气势汹汹、要办大案的样子。果然，萧望之见此情景，就觉得要完，起意自杀。他的夫人劝阻了一番，觉得皇帝不至于此；但他的学生朱云恰在宅中，他是一个比萧望之更刚直的人，反过来劝老师自裁。朱云说了什么史书未载，猜测朱云可能认为，皇帝三番五次折辱老师，那么自杀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表明帝师、儒者的尊严，也是向皇帝宣示对他的失望。

在骑兵的包围里，萧望之服毒自杀。这距离汉元帝即位才两年。

消息传到汉元帝那里，正是饭点，皇帝大惊失色，连忙挥手不吃饭，拍着手哭个不停：“我就说过萧太傅不会进牢狱，你们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场面极为哀恸。

在班固的笔下，汉元帝是一个稀里糊涂、优柔寡断，不小心让老师死于非命的角色。但千载之下，我们不妨猜测更可能的真相：汉元帝先是假装不知道“召致廷尉”是下狱的意思，从而将萧望之免职；又故意放风说任命他为丞相，接着就他儿子上书大做文章，将其下狱，言外之意是他咎由自取；下狱之前，又假装爱护询问，对宦官调兵这样的大事假装不知道，直到人死之后，又假装怪罪身边人，怪罪之后却不惩罚；尘埃落定，对萧望之上书的儿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令其承爵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萧望之的坟墓拜祭，以笼络人心。种种操作，是一

套清除政敌的组合拳，精明无比，哪里有一丝糊涂？班固所记，可能的确发生过，那就得承认汉元帝太会演戏了，不枉班彪评价他“多才艺，善史书”⁹。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¹⁰，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¹¹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 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持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¹²，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

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¹³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

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¹⁴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秘之”，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¹⁵。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¹⁶，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¹⁷，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¹⁸。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

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¹⁹。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是否被立为学官。

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

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

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讖、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

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讖、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²⁰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

²¹。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

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其他的“小伙伴”呢？

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讖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讖、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学较远的古文学。但他相信王莽将会建立不世之功，一心一意跟随王莽。

他们的友谊不论多寡，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若即若离地维系着……

11．刘歆要“解放思想”

绥和二年，汉成帝猝死，哀帝刘欣即位，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

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²²，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

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²³，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刘歆也属于第三种，皇帝知道他儒学修养高，是宗室里难得的学问家，才把他放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让他有时间再次牵头整理汉廷藏

书，继续刘向没有完成的志业。

和刘歆一起在天禄阁校书的，还有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这两位也颇受汉哀帝信任，也都有侍中的加官。论学术，刘歆更胜一筹，在刘歆的影响下，他俩也对刘歆整理后的《左传》产生了兴趣。

刘歆的备受信任和王莽的逐渐失宠形成了对照。三公里丞相是孔光，大司空是何武，何武也通古文学。汉哀帝即位后势必要调整三公，王莽首当其冲，不久被免大司马之职，接替王莽的是皇帝当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师丹。

师丹也是儒臣，博士出身，匡衡的学生，专治今文经学的《诗经》学，年纪已经很大了。令王莽稍显安慰的是，他与师丹关系不错。师丹任大司马辅政后，向皇帝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三代之治的基础是井田制，汉朝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应该仿照井田制予以限制。

这项建议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他令孔光、何武等人一起讨论，最后下了“限田令”，要求达官贵人们所占的土地不能超过三十顷。

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

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入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件：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

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

汉哀帝料到反响会很强烈，就为刘歆开脱，试图平息舆论。皇帝发话，大家嘴上也就不说了。但是刘歆等三人彻底得罪了师丹、龚胜，以十四博士为首的儒生们当然与刘歆“割席”。原本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优哉游哉、每日进宫到天禄阁校书的刘歆，发现未央宫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从这些人特别是权臣的眼神里，甚至感觉到了杀机。

出于恐惧，刘歆等三人向皇帝恳请离开长安躲避祸端，就像当年贾谊那样。皇帝同意了。

于是刘歆被外放为河内太守²⁴，西汉的河内郡靠近京畿，地位重要且经济发达，是一处不错的地方。结果，大臣们继续大做文章，说宗室不能在这样的战略要地担任太守，因为有谋反的可能；刘歆只好被迫去更远的地方，先任五原太守²⁵，这是与匈奴交界的北方边境；又任涿郡太守²⁶，也近乎边境。几年之内，刘歆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得不称病免官回到长安。病愈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安排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是安置当时内迁或投降的外族的地方，也是边境，刘歆眼看就要绝望了。

房凤、王龚略好些。房凤任九江太守，王龚为弘农太守。

王莽眼睁睁看着刘歆黯然离开长安。扬雄呢，学术与文学的名声虽然越来越大，但依然只是黄门郎，置身时局之外；桓谭也因为支持刘歆而备受儒生排挤，只是他人微言轻，还够不上被刻意打压的资格，为了自保，桓谭与汉哀帝外戚傅氏、丁氏乃至后来的董贤主动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久，王莽被遣就国，也离开了长安。

12．好朋友一辈子

王莽从新都国返回长安不到一年，汉哀帝刘欣崩殂，在六月的仓促之夜，王莽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掌权者。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忙碌中，王莽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本来要出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刘歆，在王莽的建议下，被王政君留了下来，任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为中垒校尉。长安的卫戍部队主要是北军，北军里设有中垒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等武官，而中垒校尉除了自己带兵，还管着其他的校尉，可见王莽在初掌政权的过渡时期对刘歆的重视。

当然，刘歆的强项是学术。拐过年来，汉平帝即位，王莽的政敌也基本被铲除干净。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刘歆就被任命为羲和，这是王莽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文历法。此后刘歆继续升迁，兼任多个官职，全面加入王莽的核心集团，成为王莽制礼作乐、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扬雄也注意到老同事王莽的归来，但他和从前一样，不主动交接奉承。他继续做着黄门郎的差事，而且，这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贫病而死，他不得不往来于长安和故乡蜀郡之间，跋山涉水，叹息哀痛，对朝廷的局势也更加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留意着王莽，在《法言》里留下了他对这一时期王莽的赞颂：“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²⁷

桓谭还担任着郎官，内心仍然坚定追慕着王莽。但是，哀帝在位这几年，他和王莽的死敌丁、傅两家以及董贤的良好关系，王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桓谭没有奢望能够像刘歆那样迅速飞黄腾达。他已经三十七岁，性格日渐沉稳，在和王莽的密切程度上，甚至不如那些已成为王莽核心圈子的后来者，比如追随父亲刘歆的刘棻、擅长解说符命的崔发、深具谋略的陈崇。

几位旧日朋友——如果能勉强称为朋友的话——道路渐渐不同，但关于儒家改制，对于致太平的愿望，却始终未变。而且，改制的希望也不约而同聚焦在王莽的身上。

什么是改制？

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²⁸。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²⁹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³⁰，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倒是“文”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

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³¹，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没有土地的实封，“附城”就是附庸，“明告里”不是实指的

地方，而是褒扬桓谭能够“明白告诉天下人”。

这也是桓谭与王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

连置身事外的扬雄也发挥着作用，他帮助王莽立了《乐经》博士，还在王莽变更官名、重订九州时，写下饱含赞美之词的《州箴》和《官箴》进行歌颂。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但是，关于禅让这件事，从儒家角度看，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质孰先孰后的问题。

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刘歆等人或许对王莽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厌恶谶纬符命的桓谭也终于感受到与王莽的隔阂。但是，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路成为常态，今后

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而在这个过程中，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儒生经师们想到：王莽的天下能坐久吗？他万一失败了呢？如果他失败了，儒家这整套的政治理想还有第二次付诸实践的机会吗？

注释：

- 1 以上，《汉书·盖宽饶传》，第3245页。
- 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0页，中华书局，1959。
- 3 《汉书·沟洫志》，第1697页。
- 4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4页。
- 5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 6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 7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6页。
- 8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7页。
- 9 《汉书·元帝纪》，第298页。
- 10 弘恭在萧望之死后不久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直至汉成帝即位后才失势。
- 11 《汉书·元帝纪》，第299页。
- 12 所以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张侯论”诞生之前的《论语》版本残简，就引起了强烈关注。
- 13 《汉书·翟方进传》，第3417页。
- 1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 15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第1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 16 刘歆生卒年不详，从他活动的时间上下限看，与王莽年龄相仿。
- 17 陈侃理：班固《五行志序》全袭刘歆之说，后代《五行志》也相继沿用，影响深远。见《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30页。

- 18 对扬雄到长安入仕的时间，史书记载前后矛盾，亦有错讹，历来各家争议颇多。鉴于可靠文献不足，这里采纪国泰之说，见《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 19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见《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 20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9页。不过，古文经所倚重的《周礼》大概是战国时期形成，其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设计是对战国时期新的官僚体制的反应，不是真正的周代礼制，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当然，对笃信古文的汉儒来说，《周礼》就是周代礼制。
- 21 儒家经学的今古文问题非常复杂，自古特别是近代以来，经过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周予同等学者的努力，再加上百年来现代学术研究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有了很深的理解，但至今还不能说有“标准答案”。鉴此，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目的，这里仅能对今古文经学的问题做极简、极笼统的描述。
- 22 《汉书·刘歆传》说他迁“奉车光禄大夫”，《房凤传》称“奉车都尉刘歆”，可能刘歆像当年霍光一样，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 23 三种分类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第1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24 今河南北部。
- 25 今内蒙古包头一带。
- 26 今河北衡水一带。
- 27 扬雄：《法言·孝至》，见《法言义疏》，第559页，中华书局，1987。
- 28 刘小枫主持译事，取《荀子》篇名，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
- 29 《汉书·食货志》，第1137页。
- 30 《汉书·贡禹传》，第3075页。
- 31 孙少华：《桓谭年谱》，第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

黄帝初祖，德币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

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时期铜嘉量铭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1. 服丧风波

居摄三年（公元8年）。

这年一开始就地震，不过，摄皇帝王莽并不以为然。因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翟义叛乱即将结束。年前，他刚刚收到宠臣南乡侯、司威¹、前线监军陈崇的一封上书，不仅告诉他消灭翟义军队的好消息，而且看起来翟义叛乱像是一场天命已定的祥瑞。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

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豫知成败，感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仍破；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

陈崇对王莽的称呼，说明摄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这封信透露了王莽受命的意义：居摄元年王莽祭天，昭示天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从此王莽就能够和天命互动感应了。他思考，能影响天地之气；他说话，能改变天地物理；他施政，能实现王化。所以，陈崇把王莽讨翟义的诏书出炉的时间和翟义叛乱被镇压的时间一对比，“神奇地”发现，王莽还在构思诏书时，翟义已经露出败象；诏书写好之日，正是翟义兵败之时；收到诏书的时候，翟义就被杀了。

所以，平叛这件事压根不是我等官兵之力，而是陛下一个人的功劳！翟义之乱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王莽能够和上天同呼吸共命运的祥瑞啊！

陈崇受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早期为王莽设计上位“路线图”，到说出这样一番天人感应的肺腑之言，谁心里不美滋滋的。

不久，陈崇和将士们凯旋长安，围观的市民可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目睹汉军的胜利归来。

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置酒劳军²，将士们欢饮庆贺，期待着朝廷的褒赏。

陈崇是监军，了解战事经过，就被要求考定军功，以便行赏。论功行赏本属常事，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王莽等人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乎礼的，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应该取消³，改为周朝的五等爵制⁴。

其实周代爵制十分复杂，但当时王莽和他的一些儒学顾问认为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封殷（孔子）、周的后裔为公，所以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是朝野共识，王莽只是继续推行而已。这些将士们功高的封为侯、伯，次等的封为子、男，而不再称列侯，二十等爵制里的关内侯也改称“附城”，取附庸之意。

五等爵制的实施，意外惹出一个问题：王莽的宗法身份。

王莽是摄皇帝、假皇帝，那么他原来的新都侯爵位如何处理？安汉公的公国又该怎么安排？

安汉公是尊称，与摄皇帝倒不妨碍，就好比周公称“假王”，也仍然是“公”。新都侯的爵位就不同了，这是王莽从父亲王曼手中继承的，意味着王莽是新都侯国社稷的继承者。但他现在又是汉家社稷的看护者，一个人同时为两种规格、两个姓氏的两个社稷行使宗法权，很怪异也很别扭。

况且，五等爵制的施行，让王莽的两个儿子都从原来的列侯进位成了公爵，侄子王光也被封为侯爵。王莽怎么还能当新都侯爵呢？

幸好有周公的先例！周公封鲁，长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鲁国是侯国，但不妨碍周公的身份。

所以，王莽把长孙搬了出来，就是在吕宽大案里死于非命的王宇和吕焉之子王宗，继承新都侯爵位。这就意味着，王莽退出了新都侯国的宗法义务，让王宗成为王曼这一支的继承人。王莽的儿子则是自己宗法上的继承人。

这个问题刚应付过去，王莽的母亲又去世了。老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王莽怎么为母亲服丧？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⁵。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父母去世，乃人事之至哀，孝子要服最重的丧服，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班固在这里给了王莽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极为致命的描述：

（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⁶

说王莽的心思不在表达哀痛，而是忙于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服制。

儒家丧服礼仪俱在，难道说为父母服丧的服制还需要讨论吗？

对王莽来说，需要！就像他刚刚把新都侯的爵位让给了长孙，说明他在宗法上不把自己当作王曼的儿子，所以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给母亲服丧。

当然，这与王莽是否真的悲伤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未可全信。

但班固的指责，至少说明王莽要通过服制来重新定义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和汉家、王氏在宗法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周公不曾遇到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成员，而王莽是外戚。

几年前，王莽曾因“为人后”的伦理大义，诛灭了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新城侯金钦只是说了几句有违“为人后”之义的话，就被斥责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自杀了结。

如今轮到王莽自己了。一方面，他应该是愿意承汉室之后的，这意

味着他离真皇帝更近；但另一方面，若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之义，他就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孝子之丧，但他早年是凭孝敬母嫂才声名鹊起，如果操作不好，将会人格破产，名誉扫地。

孝敬之声和奉祀之礼仪，令王莽陷入了矛盾。

而且，王莽凭什么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有什么依据呢？

刘歆站了出来。

刘歆与众多博士儒生讨论了王莽的服丧之礼，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承汉室之后。其中关节是：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居摄，太皇太后是汉室的“天下母”，有资格让王莽“奉汉大宗之后”⁷；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宗法上要“奉共养太皇太后”⁸，这就构成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关系。

按照《仪礼》，父亲去世，孝子要服最重的“斩衰”。父在，母亲去世，要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若父亲先已去世，母亲又去世，服“齐衰”可以到三年。假如一户人家有正妻生的嫡子，有妾生的庶子：嫡子死了，庶子继承家业。当庶子的生母去世，因为庶子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庶子只能为生母服亲戚里最轻的“缌麻”。

“缌麻”有多轻？一个人为外孙、外甥服丧就服“缌麻”。比“缌麻”还轻一等的只剩下给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

如果王莽是普通士大夫，为母亲服三年“齐衰”并无疑问。但王莽既然奉了汉室的大宗，那就不同了。照刘歆的看法，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丧，因为他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服“缌麻”，非常之轻。而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要作为宗子为曾祖母服丧三年。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无独有偶，就在王莽母亲的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王莽的侄子、衍功侯王光请托执金吾窦况，让窦况帮助他杀人。此事被陈崇查实，凭陈崇和王莽的密切关系，陈崇大概先向王莽请示并征得了同意，然后才公诸天下。案子一经公开，王光、窦况非常恐惧，王光的母亲也就是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了一番话：

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⁹

意思是，王光啊，你觉得你和王莽的两个儿子比起来，谁与王莽更亲？

王莽当年侍奉寡嫂，照顾侄子，为王光娶亲，赢得了时人的赞赏。可王光母亲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绝望，可知这些年来，王莽的家人对他的习惯、心态已经心知肚明，知道王莽一定会为了公义、正义的外在形象而不惜牺牲家人。

王光母子随即自杀。

当年的寡母、寡嫂、侄子，如今都在王莽公义的外表下，或是礼仪被放弃，或是生命被牺牲。人情毕竟是人情，王莽为母亲只服最低的丧服，逼死寡嫂侄子，朝野之人对此必定会有腹诽，王莽也应该有所感觉：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子明辟”，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2．与皇帝一步之遥

翟义叛乱平息后，长安和京畿一带平静了许多。

和七国之乱、汉武帝开边战争比起来，这次叛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地方上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也并不直接影响天下辐辏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不多时，进出长安的人流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官员、商贾、使者、平民、太学生们络绎不绝，向天下展示着帝国承平百年的繁华，也显露出将要开万世之太平的新气象。

只是，这繁华与汉室几乎无关。这是汉室的末世，也是帝国的涅槃。

各地的祥瑞多如牛毛，报祥瑞的使者接踵而至，诸如灵芝、珍禽、奇树之类，未央宫里负责记录的官员已经见怪不怪，多数也不再向上司报告，整理后直接归档。其中有些竹简的下一面世，将是两千年以后。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齐郡境内有个广饶侯国，广饶¹⁰侯刘京是宗室，他的一封上书引起

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¹¹，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¹²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¹³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¹⁴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¹⁵。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¹⁶，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¹⁷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¹⁸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遥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

可使代我后者？”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¹⁹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远，对禅让是不避讳的。

到后来，禅让一度变得敏感。汉宣帝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了讽谏汉宣帝不要重用宦官，在封事中语气激愤地说了些和禅让沾边的话，就被迫自杀了。再后来，随着五德终始之说的流行，人们开始坚信天命转移、易姓换代，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独有，禅让这才不那么敏感。

所以，王莽应该早就考虑过禅让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禅让需要由一个帝王来让，而此时汉家并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尚未告庙的皇太子刘婴，所以即使汉家要禅让给王莽，谁来禅呢？

按照五德相生来推演，汉家德衰，天命已经转移，但终究需要一个合法的仪式或者说动作来实现人间权力的更替。

王莽决定采取的动作是改元。他令人去兰台查阅汉哀帝几年前改元“太初元将”时候的档案，找到夏贺良等人当年为汉室“再受命”时制作的讖书，决定仿照汉哀帝的做法，改元为“初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万物更始、源本复初的纪元，强调今后再无“摄皇帝”，而是“假皇帝”的时代了。

这表明，王莽至此没有找到“即真”的办法，离“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无论如何就是跨不过去。

王莽已经技穷。

表6.1 王莽代汉前夕日程表

体例： 1. 公元纪年 2. 年号及旧历纪年 3. 干支日、节气 4. 事件	公元8年12月24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初八 辛亥 * 此时是汉历，建寅，以夏历一月为岁首	公元8年12月25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初九 壬子。冬至 * 巴郡石牛被送来未央宫前殿	公元8年12月26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初十 癸丑	公元8年12月27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一 甲寅	公元8年12月28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二 乙卯	公元8年12月29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三 丙辰
公元8年12月30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四 丁巳	公元8年12月31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五 戊午 * 雍石文送至未央宫前殿	公元9年1月1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六 己未	公元9年1月2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七 庚申	公元9年1月3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八 辛酉	公元9年1月4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十九 壬戌	公元9年1月5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二十 癸亥
公元9年1月6日 居摄三年十一月廿一 甲子 * 王莽向王政君报告上述符命，将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	公元9年1月7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二 乙丑 * 汉廷颁布改元通告 * 袁帝知道消息后开始行动 * 推刘期门郎张光在这天谋划劫持王莽	公元9年1月8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三 丙寅 * 袁帝、袁帝将神位符命送至高祖庙 * 庙中官员立刻报告王莽 * 侍郎王野见白衣人	公元9年1月9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四 丁卯：丁，属火，汉是火德；卯，“阴”姓中有卯字。意味着这是刘氏最后一日 * 公卿议设野日的符命 * 前殿石牛说话，要求王莽尽快登基	公元9年1月10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五 戊辰。值定，大吉 * 王莽到高祖庙正式受禅称帝 * 自下月改年号、正朔	公元9年1月11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六 己巳	公元9年1月12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七 庚午
公元9年1月13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八 辛未	公元9年1月14日 初始元年十一月廿九 壬申 西汉最后一天	公元9年1月15日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癸酉 * 新朝改正朔，行殷历，建丑，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 * 新朝正式开始 * 自石牛至长安至此22天	公元9年1月16日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二 甲戌	……		

3．河出图，洛出书

汉朝这次改元“初始”，并不是说从下一年才开始，而是把已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号的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也就是说改元的第二天就已经是初始元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这一日，负责宫廷警卫的武官期门郎张充和其他六人，决意要劫持王莽。但在举事之前被发觉，六人随即被杀。据说张充他们打算立汉宣帝的曾孙楚王刘纡为帝。楚王这一支的确有些特殊，刘纡的父亲刘衍有三兄弟，分别是大宗刘文和刘衍、刘勋。刘勋被封为广戚侯，而皇太子刘婴就是刘勋的孙子。也就是说，刘纡是皇太子刘婴的堂叔。所以，张充等人预谋劫持王莽，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考虑的。

这件案子的蹊跷之处在于，以往王莽会抓住一丝端倪就大做文章，穷治到底。这次却不同，他只是处死了张充，没有继续追究楚王。当然，刘纡远在楚国，应该没有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但更大的可能是，这几天王莽非常忙碌，心思都在“即真”上，对这件事也就顾不上了。

也是在这一日，朝廷正式颁布改元初始的法令。长安的士民近水楼台，最早知晓了这一消息。

广汉郡梓潼县人哀章，这一天也在长安，他很可能是太学生或是博士弟子，对儒经、符命、讖纬等都很熟悉。和他一起“学问长安”²⁰的人里，哀章是一个格外热衷言说五德终始、天下大势，颇有些预言家风范的人。

这样的人也擅长投机。

早在三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哀章就窥破了王莽的心事。他精心制作了两个铜匱，也就是铜匣子，一个里面放了“图”，一个放了“书”，这是模仿《周易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些“图”“书”应是写在木简上，放在铜匱之中，还按照汉朝当时书信的格式加上盖子，用绳子捆结实，填上封泥，最后在封泥上盖上书检²¹。在一般的书信邮寄中，书检就相当于信封，上面印着寄信人的印章等署名信息。

哀章所作的铜匱封检，大抵也会遵循这种惯例。其中，放“图”的那个封检，署了一句话：

天帝行玺金匱图。

放“书”的那个封检署的是：

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²²

这两个封检署名，细究大有深意。

首先，两个封检都是“行玺”。在汉朝特别是中后期，皇帝有六玺，其中“皇帝行玺”是用在任命诸侯王的场合。那么，天帝行玺、赤帝行玺，也就是比照人间皇帝分封诸侯，以天帝的身份任命人间的帝王。这证明哀章对汉朝的玺章制度比较了解。

其次，汉朝奠基最重要的事之一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书”的封检明确说，“赤帝”通过给刘邦“行玺”，给“黄帝”以策书，也就是刘邦以赤帝之子的身份给黄帝的后代转达册封之书，这就描述了禅让的逻辑。

哀章制作好铜匱之后，并没有急于拿出来，而是等待、观望。一年又一年，哀章看着王莽制礼作乐卓有成效，又多次平叛牢固掌权，统治基础一天天坚实起来。他相信王莽迟早有称帝的一天。

于是，当哀章听说齐郡神井、巴郡石牛等祥瑞和符命的时候，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初始”年号颁布后，哀章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做了些准备。在新年号颁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丙寅日黄昏时分，他终于走出家门。

行人多半会注意到，这个人身穿形制奇特的黄色衣服，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铜匣子，顺着安门大街向南走。走到长乐宫的西南方向，那里坐落着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宗庙，也就是高庙²³。

高庙是宫廷重地，戒备森严。哀章虽然有备而来，还是被挡在了外面。他告诉守卫，此番来到高庙，是要代天帝和赤帝传递符命。

守卫连忙向长官高庙仆射报告，仆射不敢怠慢，亲自出门拜接铜匱，先请哀章在庙中等待，然后火速去未央宫禀报王莽。

王莽正在接见侍郎王盱²⁴。据王盱所说，他刚刚在未央宫前殿大门外，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色单衣，方形领子上挂着红色装饰，头戴小冠，站在前殿外面对他说：“今日上天同其颜色，将天下人民托付给皇帝。”王盱觉得奇怪，紧走十几步要去看个究竟，结果那白衣人倏而不见了。

这件祥瑞与广饶侯刘京所转述的亭长辛当的梦话都是孤证，空口无凭，很可能是王盱自己的行为。

正在此时，高庙仆射赶到了。王莽听说这两只铜匱是由黄衣人送到高庙，封检上的文字又是如此震撼，马上召集近臣前来拆封。众目睽睽之下，铜匱的封检被打开，一“图”一“书”，至此大白：

那“图”，绘制的是尧后火德、舜后土德的五德循环和汉朝“三七之厄”的术数推演²⁵；那“书”则明说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太后也要遵循此天命：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²⁶

这句话至为重要，是汉高帝刘邦根据天帝和赤帝的运命，将国家禅让给新朝皇帝。如此，王莽所纠结的难题迎刃而解——不一定非得是活着的人禅让，死去的人也可以。而且，请刘氏的高皇帝亲自禅让，说服力更强。

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鬼神的世界本就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汉墓，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墓里连马桶都有。刘邦的肉身虽然湮灭，但神灵依然活在人间。祭祀刘邦的高帝庙，每个月都由礼官把刘邦生前的衣冠从庙寝请出来，巡游一番，送到庙里，仿佛刘邦仍在享受人间的风景。所以，请刘邦禅让给王莽，说得过去。

此外，“图”“书”中还说王莽有大臣十一人，除了现在高高在位的八个人外，还有哀章自己，以及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既有“王氏兴盛”的彩头，又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人名，相当于20世纪末的王伟、王军之类，查访的余地很大。

上天的符命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明白，王莽仍然按部就班地表示，兹事体大，需要廷议，现在天色已晚，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另外，为表示诚惶诚恐，王莽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吃不睡，直到此事完结。

4. 王莽受禅！

次日，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四，丁卯日。

丁卯不是个普通的日子。

丁，属火，汉是火德；卯，“劉”姓中有一个卯字。王莽一宿没睡，这天一早就举行廷议，特意请了汉宗室、忠孝侯刘宏召集公卿来讨论。同时，王莽还将“图”“书”送至王政君面前。

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仅仅在十五天之前，巴郡的石牛才运到；仅仅在三天前，王莽还承诺将来还政给子婴，现在就要在前朝和后宫同时摊牌，讨论禅让的大事了。而上一次禅让天下，是发生在舜帝禅让给大禹之时。²⁷

未央宫前殿人声鼎沸，公卿们聚集在前不久巴郡运来的石牛旁边各抒己见。他们虽然对这一天有所准备，但真要决策议定了，反而出现了议而不决的胶着局面。

另一边，王政君见到符命后，大惊失色，特别是策书里明说皇太后也要执行，简直像是特意告诉她似的。她三天前刚批准了改元的建议，以为自己八十老朽可以过几年安稳日子，万没想到目睹这样的符命。

她告诉王莽的使者，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自己是汉家的太皇太后，不会允许汉家在自己手中终结。

此时哀章可能仍然留在高庙中，耐心地倾听刻漏滴答，等待着天命的告白。

一个千古疑问——这件事，是哀章自己独立所为，还是王莽的授意安排？

若说是王莽授意，不是没有可能：其一，丁卯日意味着汉朝天命的终结，第二天王莽就受禅了，说明这个日子先已定好，王莽提前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其二，策书明确说出“新皇帝”三个字，但此时王莽还没有建立“新朝”，哀章如何事先得知？其三，策书里还格外提出皇太后也要执行，说明有人告诉哀章，王政君虽然支持王莽居摄，但却是称帝的最

大障碍，所以要以符命来辖制。因此，说王莽授意哀章是有可能的。

不过，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更大。哀章既然能自制符命，对丁卯这样的日子保持敏感很自然；而“新朝”的名称和皇太后的意图，在当时恐怕已不是秘密，王莽崛起于新都侯，儒家强调“新命”，已经在汉家天下流传了很多年。

而且，王莽始终没有主动提出禅让的方案，也没有解决皇帝缺位的汉朝怎么禅让的难题，一直在“假皇帝”的身份上绕圈，还从兰台里寻找汉哀帝“再受命”的旧档。从改元“初始”到哀章献符，前后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此仓促，实在不像是早有授意和预谋。此外，哀章在策书中窜入自己和王盛、王兴的名字，是哀章自己打的小算盘。因此，此事由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极大。²⁸

既然是哀章的个人行为，这件事就棘手了：倘若王莽早有安排，那么公卿廷议不会迟迟不决。这种胶着令王莽感到焦虑。他既担心公卿们的迟疑演变成普遍反对，也害怕王政君突然出面阻止。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祥瑞发生了——那巴郡石牛突然说起了人话：

趣（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²⁹

就是说，赶紧催促新皇帝到高帝庙受命，别耽误了！

决断，是最重要的政治能力之一。石牛说人话太过荒诞，一定是王莽所造，但这证明了王莽要在丁卯这天彻底解决问题的决断。丁卯是王莽认定的受命之日，决不能更改。他下令侍从做好准备，吩咐刘歆等人马上商定礼仪，起草诏书，确定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事项，明日他将正式到高帝庙受禅。

第二天，戊辰日。

王莽又是一宿没睡，也没有进食，但他神采奕奕，看不出憔悴的样子。当然，他也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庄重严肃的修治仪仗，登上马车，缓缓来到高庙。高庙的诸多礼官以及哀章都已在等候。

高庙礼官已提前拿到图和策书。

高庙的大殿里、汉太祖的灵位前，清庙之乐，钟鸣铿锵。从前，汉家皇帝登基，都要来这里拜谒高帝之灵，寓意继承祖先的祖产，从高帝手中获得统治天下的许可。

今日不同了。礼官以高帝之灵的名义，将图和策书正式交付给王

莽，表示高帝刘邦已亲自禅位给他，标志着汉朝落下帷幕。最后，礼官又给王莽加上帝王冠冕，表示王莽接受了禅让。

禅让大礼尽管十分庄重，但很仓促。禅让完成后，王莽从高庙先去了长乐宫拜谒王政君，他要去拿汉朝的传国玉玺。

当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屯兵霸上。已经去了帝号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并奉上始皇帝的玉玺。刘邦一直保留着这块玺，既没有上交给当时的楚怀王，也没有给后来的西楚霸王，即位后，就将始皇玺作为汉朝的传国玺世世留存。后人有言传国玺是由著名的和氏璧所雕凿，此言不确，因为“璧”的形制是圆形中孔的薄片，无法凿成厚重的玉玺。汉朝的传国玺应是秦皇所制。汉平帝崩，刘婴为皇太子，汉朝没有皇帝，传国玺就被保管在王政君手里。

王莽索要传国玺，被王政君断然拒绝。

王政君此时应该还没有从禅让的巨大冲击中缓过来，她可能会想起刚给汉宣帝当儿媳妇的时候，汉朝还如日中天，坚不可摧，甚至是永恒的。而现在，终结这个伟大皇朝的竟然是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侄子。她深知王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支持，而且是主动支持，但在这最后时刻，她又颇觉后悔。这种掌握着政治大权但缺乏政治品质和决断力之人的心态，大概就是班彪所说的“妇人之仁”³⁰吧。

既然被拒绝，姑侄二人此番见面应是不欢而散，王政君不愿分享王莽称帝的喜悦。王莽也暂时顾不上安抚姑妈，因为他马上要赶回未央宫前殿，发布他受禅后的第一道诏书，为新皇朝拉开帷幕。

丁卯受命，戊辰受禅，这两个日子都是特意选取的。丁卯寓意着刘氏天命终结；戊辰这天恰逢“直定”³¹，是祭祀的吉日³²。

就在这一天，据说天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来佛反手为“五行山”，将一只大闹天宫的神猴压在了山下的一个“石匣”里。³³

严格来说，这一天仍然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服帝王冠冕，把刘歆等人连夜拟定的诏书通告天下：

去掉汉号，天下定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改正朔，新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汉武帝在太初元年确定的以一月为正月的正朔不再使用；四天以后的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将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四天以后，王莽就要开国了。

注释：

- 1 观风俗归来后，陈崇被从大司徒司直提拔为司威，封列侯。
- 2 参加的将士也包括这时期讨伐西海羌及镇压其他叛乱的人员。
- 3 但普通百姓的民爵没有取消，出土的新莽时期简牍里，仍然有不少民人拥有爵位。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 4 后世一般认为，周朝并未实行过整齐的五等爵制，而是一种复杂的“内外服制”。简单地说，外服是周王畿之外的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负责在周王畿之外特别是边疆拱卫王室，侯的地位最高，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等。内服则是王畿之内的贵族，其中的公，是王室执政大臣或年长者的尊称，如周公；伯，主要是王室低一规格的执政卿士或家族的嫡长子，如郑伯。此外，前朝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如商的后代宋公、夏的后代杞公。子，则一般是族长、宗子，如楚国是蛮夷，其君长虽然自称王，但被周称为楚子、荆子。这些名号并不都是爵位。

同时，这些名号还分为内称和外称、生称和死称、自称和他称等等，复杂得很。周公被称为“公”，是因为他是周王的执政且在内服有采邑，但他的封地鲁国属于外服，所以鲁国的君主称“鲁侯”，但鲁国人会尊称鲁侯为公，《春秋》里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都是“公”，诸侯死了也常被称为公。诸如此类。

春秋时期，周王迁都，礼崩乐坏，内外服的体系被打破，这些原来性质各自不同的贵族名号就被时代挟裹，渐渐混为一谈：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王室贵族，蛮夷的君主，夏商的后代，都顶着原本不同内涵的公侯伯子男的称号在中原纵横驰骋。后人难以搞清这些称号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都是爵位，就构建起一套爵制。到了战国，连孟子也会讲“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不得不承认“其详不可得闻也”。历史之晦暗难明，孟子尚且不免，何况王莽？参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及其他现代考古学成果。

- 5 孟子爱用禽兽这个词，但并不是后世骂人的话，而是强调非人、不合乎人性。
- 6 《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 8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 9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 10 广饶，今山东东营广饶一带。
- 11 《汉书·王子侯表》里没有“广饶侯刘京”，叫刘京的有蒲领侯、武陶侯，广饶侯的世系里没有记录刘京。《王子侯表》序言写道：“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因此，这个广饶侯刘京应是王莽所立，所以班书未载。
- 12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 13 《说文解字》：“亭有楼。”根据当时的亭制，猜测亭长应该住在亭的楼上，楼下可能是办事场所。
- 14 今四川渠县一带。
- 15 始建国元年秋，王莽令人在全国颁布符命，有“福应十二”，其中“九以玄龙石”，应该就是雍石。因为据《汉书》“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的记载，雍县的这块石头是没有被运到长安的，到未央宫前殿的是石头上的“文”。“文”如果指文字的话，《汉书》当有记载，但没有记载，所以可能是图案。
- 16 见表6.1，从冬至迎石牛到王莽正式称帝，仅有17天，到始建国元年仅有22天。
- 17 《汉书·王莽传》，第4094页。
- 18 鲁隐公摄政，后为鲁桓公所杀，所以才称之为“隐”。
- 19 《汉书·文帝纪》，第111页。
- 20 《汉书·王莽传》，第4095页：“哀章学问长安”。
- 21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六章第二节注17附图，第140页。
- 22 《汉书·王莽传》作“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并说“某者，高皇帝名也”。就是说，这里的“某”是刘邦的名字。班固是后汉人，出于避讳，写作“某”。但哀章是以赤帝的名义作书，即使此封检是哀章伪作，也应以赤帝的身份署检，不必为刘邦避讳，所以这里的“某”应当直言刘邦的名字“邦”。（第4095页）
- 23 据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 24 王盱见白衣人当在改元之后、哀章献策之前。
- 25 “图”上究竟是什么，史书未载，此为推测。
- 26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
- 27 春秋战国期间也有个别诸侯禅让侯王之位，尧舜古史，晦暗难明，这里描述的是王莽及时人的观念。
- 28 孟祥才《王莽传》第172页也认为此事是哀章所为，理由是王莽的登基诏书是急就章，可备一说。
- 29 《汉书·王莽传》，第4113页：“大神石人谈曰”云云，并没有明言是巴郡石牛。但王莽运到前殿的只有巴郡石牛和雍的石文，而且，石头具备了动物的形状，“人谈”才可信，没有动物形体五官的石头怎么能开口呢？所以这里的大神石应该就是巴郡石牛。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第四章第一节也有其他论证，可参。
- 30 古人以“妇人”来表达褒贬，显然是一种性别上的污蔑，不符合当代价值观，特此声明。
- 31 古老的建除术，用来占卜吉凶。战国竹简已完整记录了建除十二神名称，有学者主张建除名称可以追溯至商。在日历上注明每日建除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 32 云梦睡虎地、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均有“定日……祝祠”等记录，说明这天宜祭祀等重大活动。
- 33 《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问：“是什么老猿？”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自王莽开国到唐朝肇始，大概是六百多年。

二、始建国传亿年

5. 传国玉玺

新朝还有四天就要开国，传国玺却还在王政君手里。

前番碰了壁，王莽便不好再出面，他让堂弟王舜去索要。王舜和父亲王音相似，为人谨饬温厚，深受王政君信任，也被王莽引为腹心。

王舜硬着头皮去见姑妈。王政君这次一改往日的亲切，破口大骂道：“你们父子、王氏宗族，都是靠着汉家才富贵累世，不报答就算了，还趁着刘氏凋零之危，夺取其国。真是猪狗不如！天下怎么会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既然你们照着金匮的符命，当什么新朝皇帝，正朔服制都要变，那就去自己刻一个新玉玺，流传万代嘛，何必非要汉家这亡国之玺？不吉利！我是汉家老寡妇，旦暮之间就老死了，正打算拿这块玉玺陪葬呢！你们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一边痛骂，一边痛哭，八旬老人这番姿态，委实令人同情。旁边的女官们也垂头哭泣。王舜被骂得惊心动魄，眼泪早已止不住，俯身在地上哭。一向庄严祥和的长乐宫里竟然哭声一片。

过了一会儿，王政君的情绪平复了一些，王舜这才抬起头，噙着泪眼，对王政君说：“这事儿我们都和他说过，没用。王莽是一定要得到传国玺的，太后难道真能不给吗？”

王舜这话说得颇有些隐晦，似乎暗示说王莽巧取不得就会豪夺。王政君骂也骂了，她所不能承受的矛盾，是又希望王氏家族永葆富贵，又不想承担颠覆夫家的罪名。所以听到王舜这么说，她确实担心这事儿闹下去也不好收场，对于自己在王莽称帝上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她很清楚。于是她吩咐取出传国玺，但还是不想好好给出去，竟然扔在了王舜面前的地上，说：“我已经老了，还能寿终正寝，你们兄弟就等着被族灭吧！”

总想着左右逢源，这也不情愿，那也不情愿，但最后这也不得不做，那也不得不做；总拖着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幻想着问题会自己消失，直到面临不得不决断的时刻，却已丧失决断的主动权，只能被动选择。王政君的这种优柔寡断，根源于她缺乏政治品质，不能辨识立场，也就没法理解政治的困境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因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

拿到玉玺，抚摸着被王政君摔去的一个角，王莽依然欣喜若狂，吩咐在未央宫沧池的渐台置酒狂欢。渐台是沧池中的一座高台，多年以后，王莽将在这里被杀死。

王莽也在思考元年正月朔日正式登基的礼仪。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关

节，王政君是汉室的太皇太后，又是王氏的“老祖宗”，那么入了新朝，王政君怎么安排？是继续保持逊政汉室成员的身份，还是成为新室的成员？如果是后者，那王政君的身份是什么？上什么尊号？

别的王公贵族无论怎么安排，时间上都来得及。唯独王政君，非得一开国就得有说法且说清楚才行，不然会影响汉新易代的合法性。不过，前番因为传国玺的事情，王政君正在生气，很难劝她接受新的尊号。

王氏家族不论远近亲疏，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宗室，无不欢喜雀跃。其中有一个叫王谏的远支疏属，想趁着新朝成立的机会谄媚王莽，就上书说：“汉朝已终结，太皇太后不宜称现在的尊号，应当去掉汉号。”这个建议非常及时，正对王莽的心思，他见到这封上书，忽然有了主意。

王莽即刻亲自乘车到长乐宫，把王谏的上书给王政君看。王政君余怒未消，看到这个建议，更加不满，冷冷地说了一句话：

此言是也！

这是一句反讽¹，王政君估计王莽接下来就要借题发挥，准备去掉自己的汉家尊号，她想好了决不答应。

没想到，王莽却比她更生气，说：

此悖德之臣也，罪当诛！

王莽居然说王谏是不道德的大臣，而且该判死罪。王政君十分吃惊，不知道王莽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莽回到未央宫，公开指责王谏悖德。

群臣也糊涂了，这马上就要开国，传国玺都拿到了，王莽为什么还要维护王政君的汉家尊号？

有个叫张永的人看出了端倪——王莽当然要废掉王政君的汉家尊号，但不希望世人觉得是他主动做的。王谏上书，王莽是批还是不批？这件事和王莽受禅一样，都得是迫不得已而做，是天意才行。张永很快献上一块铜壁，上面依稀写着一行符命：“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²。王莽见此大喜，下诏群臣说：这行文字不是人工刻画，而是自然

形成的；文母，意味着太皇太后将是永远的“新朝之母”。这是天命，不敢不接受。

王政君见此符命，不知道是真的相信，还是顺水推舟，总之接受了新的尊号。

给王政君的新印玺马上被制作出来，张永因为这个功劳被封为子爵，爵号为“贡符”。王谏却被迫服毒而死，他的死是因为妄议尊号，还是因为上书所言的事情太过直白，揭露了王莽的真实意图而令王莽备感冒犯，恐怕不言而喻。

6．时间的开始与历史的终结

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

未央宫。

公侯贵族和公卿士大夫们挤满了前殿，凡是有资格上殿的几乎都来了。大殿正中，坐着的是汉室的皇太子刘婴，快四周岁了。他的身后是负责保育的宦官中傅；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这一老一小很少同时来前殿，此番场景并不多见。

王莽立在殿下，神色肃穆，冠冕堂皇。

时辰一到，王莽在礼官的引领下，走在公侯卿士的最前面，手捧“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印玺绶带，恭敬地呈献给王政君，以替换原来带着“汉”号的旧印玺。

王政君接受了。作为汉室最尊贵的一员，她认可了符命，也认可了汉室的终结和新室的肇兴。

接下来，王莽以新朝皇帝的名义，正式宣读给刘婴的策书，这封模仿《尚书》的策书成为后世禅让诏书或策书的模板，也告知了新朝对汉室的安置方案：

皇族被降杀一等，按理应该降为王。但因为周王是天子，追慕周朝的王莽认为汉朝“诸侯王”的设置不符合周政，把王爵一概取消，皇帝下面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汉朝的诸侯王全部降格为公爵。

刘婴被封为定安公爵，享万户采邑，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天子千里，公侯百里，所以定安公国也是方圆百里。今后，刘婴可以在定安公国继续采取汉朝的正朔、服色，立汉朝宗庙以祭祀。而且，世袭的定安

公爵不是新朝的“下属”，而是“永为新室宾”³，就是说新朝对定安公待以客礼。史书没有记载王莽是怎么对定安公待以宾客之道的，从后世禅君往往拥有“上书不称臣”“以天子礼祭祀”“载天子旌旗”等礼仪上的特殊礼遇来看，对刘婴也可能有类似安排。

这与从前汉廷封商、周的后裔为公是同样的性质，都是基于儒学“通三统”的主张。汉朝的三统是商、周、汉；新朝已经建立，三统就成了周、汉、新。商朝后裔的封爵退出“三统”之列。所以，除了定安公刘婴外，周的所谓后裔姬党，曾被汉室封为卫公，现在改封章平公，同样是“新室宾”。商的所谓后裔孔弘，曾被汉室封为宋公，现在退出“宾”的序列，降格改封为章昭侯。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安置完刘婴，王莽让汉平帝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女儿继续留在汉室，号定安太后。

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上殿，满脸泪水，唏嘘感慨，一幅迫不得已的样子，紧紧攥着刘婴的手，显得用情极深。刘婴懵懂而紧张地站了起来，听王莽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今天我却迫于天命，不能遂了我还政于你的心意啊！”

刘婴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应该觉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早点结束。他的眼睛望向服侍他的中傅，中傅见王莽话已说完，上前牵着刘婴的手，缓缓走下大殿，随后领着他转身面向已经在大殿坐定的王莽，施了臣下之礼。

汉朝自此终结。

新朝自始建国。

“始建国”这个年号并不简单。汉朝自从汉武帝太初改制，正式启用年号纪年⁴，古代皇朝从此进入定期改元的年号时代。

但“始建国”不太一样，这个年号模仿了“始皇帝”，意思是新朝在这年创建，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纪元，此后就是始建国二年、三年、四年……就像始皇帝所设想的秦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而不绝，王莽也打算“始建国”亿年也不完⁵。这种做法，更类似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公元

纪元。至少在始建国元年，王莽并没有考虑过以后要定期改元。

始建国，寄托着王氏家族永恒继承的信念，也意味着纯正的儒家天下从此开始，今后再也不会改变。时间开始了，历史已经终结⁶。

这一刻，王莽五十四岁。

“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些停留在旧时代里的名词，也要全部改变。例如新的“九卿”设置里，大司农改为羲和，因为这是传说中的日神，更是《尚书》里的历官，而太阳和历法关乎农业的好坏；大理，曾叫廷尉，掌刑狱，改成作士，因为《尚书》载“咎繇（皋陶）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也都出自《尚书》⁷。地方上的官名也一并更改，如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为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把长安改称常安；把未央宫改称寿成室，其中的前殿改称王路堂；把王政君所居住的长乐宫改称常乐室。不过，为了叙事的便利，下文除特殊地方，常安仍写作长安。

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⁸。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把公车门、司马门一共四个宫门改称王路门，门内设置了三个标志物：进善之旌，非谤之木，敢谏之鼓。就是允许人们到王路四门反映情况，包括建议、批评以及告状。还派了四位谏大夫常坐在王路门下“接访”，犹如后世的“信访部门”。

名称的变化固然只是形式，但会给臣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一切真的都变了，而且越变越好。

刘婴也在其中，他倾听着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布，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虽然他被封为定安公，但他永远抵达不了他的领地。王莽已经把长安城里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居住；又把大鸿胪的府邸改为定安公第，这才是刘婴实际居住——不，被软禁的地方。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

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⁹，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此刻，始作俑者王莽已经与刘婴相“揖别”。殿中的公卿百官纷纷垂泪感叹，也不知是因为见证了历史，还是追悼汉朝的灭亡，抑或可怜这个四岁的男童，或是感动于王莽的伟大。

7．安置刘氏宗室

还是这一天，王莽在大封群臣、为地方州牧郡守晋爵的同时，专门对刘氏宗亲下了一道诏令：

诸刘为郡守，皆徙为谏大夫。¹⁰

所有担任郡守“实职”的刘姓宗亲，全部改为谏大夫。郡守是二千石的高官，集地方大权于一身，昔年东郡太守翟义仅以一郡之地起兵，就掀起不小波澜。谏大夫只是一个六百石的中低层官员，而且没有治权。所以，王莽这一条措施足以消除刘氏宗亲的实质威胁。

在当时人的历史视野里，还从来没有过处置庞大前朝宗亲的先例。秦没有分封，地方上没有宗亲；周是缓缓颓败的，也不涉及类似问题。王莽开了先例，他对刘氏宗亲的态度，总的来说复杂而含混——心存不安，着意打压，又故作宽容。

撤掉所有刘姓的郡守，解除地方上可能的威胁，就是他着意打压的表现。

但王莽对汉室宗庙表达了极高的敬意。

他下诏说：我是在高帝庙里、高皇帝的灵前受禅，这个恩情绝对不能忘。今后，虽然汉室的宗庙祭祀降格到定安公国，但毕竟汉帝陵都在京师附近，长安城内现有的陵园、庙寝等，继续保留和祭祀。我每年九月还要亲自到高、元、成、平这四个庙里祭祀。以往由汉宗正管理的宗室人员，改由京兆大尹管理，不得降低原有待遇，各地的州牧主官，要多慰问，免得有人趁着禅代之机欺负他们。

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礼仪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王莽的时代是帝制初期，人们还残留着三代以来的观念，把曾经的皇族或王族看作古圣王的后裔，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也就没有屠杀的念头。再就是到了帝制末期，清帝退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是国民而非敌寇，也不会杀戮¹¹，所以民国政府也对清室予以优待。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能优待前朝的屈指可数。曹魏受禅后，参照王莽的做法安置汉献帝，还算宽容。南朝齐与梁、隋与唐，皇室凭着还是亲戚，仍然不吝杀戮。其余大都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如朱温对唐皇室近支的屠杀，清初对明宗室的追杀，已是常态。能够多少在政策上相对优待的，也就是赵宋对后周了。

此外，王莽笃信灾异、祥瑞、符命、讖纬、厌胜之类，除了上述安排，在剥夺实权和保持待遇之外，他格外关注另一个点——汉朝的象征之物，包括能够唤起人们旧日记忆的物品。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曾主持一次货币制度改革，铸造了两种刀币，一种是契刀，面值五百个五铢钱；一种是金错刀，面值五千个五铢钱，这金错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错金货币，很是精美。但是，始建国之后，王莽却说，“劉”这个字里，有“卯金刀”，刀币就是“金刀”，于是把刀币废除了。

至于“卯”，汉朝人习惯佩戴一种饰品叫作“刚卯”，最早大概是桃木所制以辟邪，后来用白玉、象牙、黄金之类来做。西汉后期，“刚卯”常常和形制相似的“严卯”凑成一对佩戴，用来辟邪驱鬼，“刚卯”主要用来防病，“严卯”用来祛病。王莽认为“卯”字对新朝不吉，从此禁止佩戴。

这种象征物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在政治文化中屡见不鲜，清朝的文字狱仍然遵循这种逻辑。把政治予以象征化，也的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泛政治化的倾向。

所以，到了东汉，中兴的刘氏皇族不仅恢复了“双卯”，还要求大臣必须佩戴。这与王莽的禁止佩戴是一体两面。

尽管如此，大多数刘氏宗亲对王莽的安排应是满意的，作为“前朝余孽”，不仅没有被清算，而且待遇不减，足以被笼络。但仍有极少数刘氏贵族心怀不满。这一年的四月，原汉胶东王子、徐乡侯刘快，纠集了数千人在当地¹²起兵。

刘快的兄长刘殷是继任的胶东王，封邑在即墨。王莽即位后，他刚

刚被降格为扶崇公爵，封邑没有变化。刘快很可能在起兵前找兄长商量过，但刘殷没有同意。所以，刘快起兵后竟然先攻打即墨，这大概因为即墨是胶东的大城，又是刘氏封国，打下来可以扩充势力。结果，刘殷紧闭城门，而且亲自向驻在即墨的新朝官员自首。即墨的官民对刘快的义兵也很不欢迎，将其击败。

刘快逃到琅琊郡的长广县¹³后可能就被杀了，叛乱很快平息。

王莽知道后很是欣慰，只捕杀了刘快的近亲，其他人概不追究，给平叛的死难者发放抚恤金，每人万钱之多。刘殷因为忠诚，公国被扩充到方圆百里、食邑万户，规格和定安公国一样。

真定国的宗室刘都等人也密谋发兵，尚未起事被发觉，参与者悉数被杀。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宗室也先后起兵，无一例外都迅速失败，成为刘氏宗亲武力反莽的夕阳残照、零散星光。

作为一个阶层和势力的刘氏宗亲，对王莽确实已没有直接威胁。绝大多数臣民对汉朝的灭亡也没有多少哀伤痛惜，“人心思汉”在这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但是，打着刘氏旗号、别有企图的人，反而多了起来。

就在刘快起兵失败不久，长安城的大街上，有个疯女人在街头大声喊：

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¹⁴

她就像被刘邦附身一样，喊的是要王莽速归还我国，不然，到了九月必然弄死你。她一边走一边喊，哪里人多去哪里，很快就被官家发现捉拿，事情也迅速禀报给了王莽。

一番审讯，只知道这个疯女人名字叫“碧”，既没人指使也没有“必杀汝”的能力，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疯子。但王莽靠祥瑞起家，尤为忌惮灾异，他心中大概会想，这不就是灾异吗？因此很不愉快，杀掉了这个女人。查办这个案子的掌寇大夫陈成引咎辞职。

这件事情令王莽开始反思对刘氏宗亲的政策，元年初，为了保证政权交替顺利，新朝给予了刘氏优待，一年来，新朝政权已经很稳，民心民意也在王莽这里，那么有些优待可以收回了，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消除刘氏宗亲的威胁，更重要的是避免有人总是拿刘氏和汉室做文章。

汉室宗亲里，原来的诸侯王们最为显眼，他们现在都是公爵，地位

很高，也就容易被利用或是蛊惑。这些人总数不多，大概是二十二个，打击一下也不会引起刘氏宗亲的反弹。王莽就逼迫刘氏公爵主动献出印绶，放弃爵位，自愿为民。

果然，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初，这二十几个曾经的王，除了广阳王刘嘉、鲁王刘闵和中山王刘成都，因献过符命神瑞被封为新朝的侯爵，其他诸王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与此同时，王莽对周边的藩属国也进行降格，把西域、西南的国王们降为侯，收回了汉朝册封匈奴的“玺”，换成“章”，导致周边各国对新朝的叛乱，原本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礼仪上的冲突而终结，战争开始了。

在西域，情况尤其复杂。西域都护但钦紧张地盯着西域诸国与匈奴的暗通款曲，他的都护司马刚刚在一场冲突中受伤，匈奴的进攻是迟早的事。偏偏这时，另一位西域高官戊己校尉刁护病了，西域局势开始动荡。这年九月辛巳日¹⁵，刁护的属官校尉史陈良、终带，以及属下司马丞韩玄、左曲侯任商担心匈奴大举进攻，抱怨王莽的政策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干脆趁机杀掉了刁护及其亲属，叛逃到匈奴。陈良、终带被匈奴委任为乌贲都尉。

值得注意的是，陈良等人叛乱的旗号是“废汉大将军”，意思大概是“汉朝虽然没了但我们还是汉朝的将军”。这就引起了新朝的关注。

又过两个月，十一月的一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乘车在长安城内行驶。熟悉的人都知道，孙建早在王莽当大司马时就被倚为“爪牙”，恩宠始终不衰，是王莽最信任的人。突然，孙建的车驾被一名男子拦住，孙建还以为是有何大事禀报，没想到拦车的人神色高傲，并不是来报告，而是通知孙建，说自己是汉成帝小妾的儿子，名叫刘子舆，还说：

刘氏当复，趣空宫。¹⁶

扬言恢复刘氏天下，由他来继承，尽快把未央宫空出来！

孙建当即收系这个“刘子舆”，一查，只是长安城普通居民，姓武，人称武仲，类似于后世说的“武二郎”。

此人和去年在闹市叫喊的女子“碧”一样，大概也是疯子，但此人更令王莽忧虑。汉成帝没有子嗣，这恰恰给了那些冒充子嗣的人以良机。

伪继承人这种事，从秦末的“诈称公子扶苏”到汉昭帝时的“伪卫太子”，并不鲜见，每次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古代没有DNA检测技术，自称的继承人如果被广泛承认，假的也是真的；不被承认，真的也会是假的。例如，汉宣帝的血统在史书中被记录得极其详细，反而会让后世怀疑这是事后的弥缝，因为汉宣帝的祖父刘据死时才37岁，古代结婚生育早，养孙子不是不可能，但这血统犹如藕丝，实在太细。再比如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历史上有多个伪皇太子，其中的伪季米特里一世还成功加冕，当了近一年的沙皇。

在孙建的建议下，王莽决意继续降低刘氏宗族的地位，彻底消除汉朝痕迹。

他把长安城内的汉宗庙全部罢祀。高皇帝是新朝的“禅君”，最为特殊，就依据“通三统”将灵位移至明堂祭祀；汉元帝和王政君夫妇一体，可以比照祭祀；汉成帝是王莽的表兄弟，汉平帝是王莽的女婿，这两位不必专为宗庙祭祀。

他还把所有刘氏的侯爵全部废除，按照实际的封邑户数，该是子、男爵就封子、男爵，其中凡是在官府里担任官吏的，不论大小，都免职回家等待分配。

不过，曾经献过符命或是参加过平叛战争的三十二个刘姓宗族及其同宗，保留了原有爵位，前提是改姓为王。例外中的例外是刘歆，他现在是王莽的亲家，女儿刘歆¹⁷嫁给了王莽的儿子王临，所以不宜改姓，以免违背“同姓不婚”的惯例。

刘姓宗室的安置，王莽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至此才告完成。

这些事情，王政君应该不太清楚。因为，自从始建国之后，她的身边除了服侍人员，几乎没有刘氏家族的成员能够像从前那样凭通籍出入长乐宫了。

当然，这些政策的变动对大多数早已降为普通臣民的刘姓宗室后裔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比如刘秀，他这一年刚刚五岁，对发生的一切还茫然无知。

8．扩大的王氏宗室

龙首原上，北辰星下，汉宫已经换了新主。

寿成室的王路堂和其他宫殿，都被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和谐的黄色

调已和昨日汉家的红色不同。王莽从座位上起身，注视着附身在大殿之下的两个儿子、六个孙子，想着妻子此刻正在后宫，盛装等待承接皇后印绶的消息，他的心情应该是愉悦的。

他们将从汉朝的贵族变成新朝的皇室。

但是，新朝“第一家族”的成员们，可能并不会为新身份而喜悦。

王莽的妻子王氏是汉朝宜春侯王咸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她为王莽生了四个儿子，在被奉上皇后玺绶的时候，会不会思考儿子们的命运？长子王宇在吕宽大案中自杀，次子王获在王莽遣就国时自杀，如今只剩下两个。她常常以泪洗面，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

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顺位，应该立老三王安。但王安被封为新嘉辟。辟，是国君、君主的古称，《尚书》里常见，就是“复辟”里的辟。王莽找出这个周代旧称，用来封建新朝次于皇帝、高于公爵的爵位，以替代汉朝的“王”。

为什么不立王安？虽说有符命的考虑¹⁸，但史书说王安“颇荒忽”¹⁹，这当是主要原因。但他究竟有多糊涂、多么不中用，才能让王莽放弃他呢？想来，面对两位亲兄长和一位堂兄的自杀，王安要么是精神受到刺激而疯癫，要么是佯狂而自保，总之不能或不愿意当这个皇太子。

妻儿如此，女儿如何？

曾经的汉平帝皇后，如今的定安太后，也不买王莽的账。王莽称帝是建立在她丈夫汉平帝之死上面的，她就不可能对王莽的即位欢呼雀跃了。当王莽为了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把她的名号改为“黄皇室主”，意思是新朝公主，希望她再嫁时，这更加惹怒了女儿。她坚持与刘氏的关系，与王莽日益疏远。

其他的皇室成员，比如死去的王宇有六个儿子，都被封为公爵，但他们年龄都还小。此外，王莽还有私生子和私生女，但现在不便于让他们站出来。

皇室如此不振，对皇帝来说就不太妙了。

刘氏虽然衰落，但涵养两百年，根基十分深厚。上层，有刘歆这样的新朝贵族；中下层，即使没有爵位和官职，即使沦为编户齐民，也属于豪杰、富户、太学生。相比起来，王氏宗族在地方上几乎没有势力。

这是王莽的隐忧。

宗族枝繁叶茂，统治会更稳固。在皇室凄凉的气氛里，王莽能依仗的就是王氏大家族的成员了。他按照五服的次序，和他最近的“齐衰”封为侯爵，其次“大功”封为伯爵，再依次为子爵、男爵，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他权力圈子之内的亲属成为顶级显贵，如堂兄弟、汉安阳侯王舜封为安新公，位列四辅，勋位属于最高的上公；堂兄弟、汉成都侯王邑封为隆新公，位列三公。他俩是新朝立国功臣，自与一般亲属不同。

早在汉平帝时期，朝中已经遍是王氏子弟，这些被封爵的王氏宗亲，应该有不少一直是郎、尚书、侍中之类的中朝内臣，或是曹、掾、史等外朝吏员。但从九卿、郡守之类的实权官职看，王氏宗族的人并不多。

宗族的繁衍需要时间，王莽等不及，他决定扩大宗亲的范围。王莽既然认舜帝为始祖，而同为舜帝后代的除了王姓还有姚、妫²⁰、陈、田四姓氏，王莽就下令纳入同族，“名籍于秩宗，皆以为宗室”²¹。这就把宗室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例如，他的心腹陈崇就因为姓陈，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王莽的“远亲”，不仅被封为统睦侯，还作为西周所封陈国的后裔，在家中设置陈国的祭祀。当然，没有足够的爵位可以分配，但五姓可以世代免除赋税徭役。这个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地方上和乡村里。

政治的核心就是划分敌友，王莽这个举措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笼络了地方势力，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对遍布天下的刘氏宗族形成抵抗。

不仅扩大宗室的范围，王莽还要把所有古圣王的后裔都拉到一个阵营里。

在始建国的第一天，他已经下诏，把黄帝、少昊、颡顼、帝喾、尧、舜、禹、皋陶、伊尹等古圣王的后裔封为级别不等的贵族，当然，这些“后裔”只是观念上的，未必与古人真有什么血缘关系，有些古圣王只是传说。但在当时，圣王谱系被普遍相信。王莽把圣王谱系从黄帝延长到刘氏、王氏。这样不仅又拉拢一批人，而且抬高了王氏家族的地位，意味着王氏家族也迈入圣王家族之列。

王莽耗尽心机，绞尽脑汁，使宗族势力看上去强大了许多，但这可能是虚胖。因为多年以后，王莽穷途末路时，除了真正的家人，四姓宗室并没有赶来救援，也没有哪个圣王的后裔陪他殉葬。这是因为，王莽

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士大夫们。这些人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聚拢。

9．一朝天子一朝臣

后人言：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此时此刻，站在朝廷上的官员都是昨日的汉臣，他们不仅没有被“洗牌”的担心，反而满怀论功行赏的期待。因为，正是他们把王莽送上了帝位。大殿里，他们满面肃穆，眼神交汇时，彼此显出会意的神色；他们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多了两三个陌生面孔，照理说今日来到王路堂的都是高官重臣，本不应有陌生面孔出现，但这种疑惑很快就被堂上的皇帝所吸引……

他们的君主，他们的皇帝，眼珠微微外凸，双眼因为连日劳累充满血丝，但声音仍然很洪亮，只是有些嘶哑。他挺胸抬头，俯视众人，即使坐着也显得神气高贵，只见他向左右示意，侍从连忙把一样东西恭敬地呈了上来。

王莽也十分恭敬地将这样东西放在面前的御案上，原来，就是几天前哀章送到汉高帝庙的铜匱。当然，在王莽的口中，它已经被叫作金匱了。他轻轻打开，拿出符命，众人蓦地想了起来，前几天受禅公布符命，上面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

熟悉王莽的人知道，既然符命上写了，那这十一个人必将组成新朝的施政班底。他们的名字已非秘密，众人关心的，一是这些人谁居内朝谁在外朝，官职爵位谁高谁低，权力分配孰多孰寡；二是符命里提到的王兴和王盛，又是何许人也。

早在安汉公时，王莽就搭建了自己的权力班底，当时是“四辅三公”。内朝四辅，分别是太傅王莽、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外朝三公，是大司马王莽、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王崇。王莽一身兼二任，权力最大。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圈子，“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从安汉公通向皇帝的路上，这些人都曾立下不小的功劳。

现在，这些功臣理应被犒赏。

皇帝以摄政时期的“四辅三公制”为基础，正式建立了新朝的执政班

底，后人称为“十一公爵制”²²。但人选公布后，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谓十一公爵，就是内朝的四辅、外朝的三公、军事的四将，都是公爵，人数是金匱符命上写的十一人。

四辅位上公，地位最高，是皇帝的内辅。四辅最具神性，分别与四岳、星宿、天象挂钩，协理阴阳天道，整整齐齐宛如天官（见下表）。这其中：

太师，对应着岁星也就是木星，方位是东，主面貌庄敬（肃），协理雨水适度，不要太涝，主青阳之光，观察日影以建立日晷；

太傅，对应着荧惑也就是火星，方位是南，主洞察明哲（哲，即哲），协理暑气适度，不要太热，主红赤之光，研究声调以制定音律；

国师，对应着太白也就是金星，方位是西，主言语服从（艾），协调阳燥适度，不要太旱，主白色之光，权衡轻重大小以确立度量衡；

国将，对应着辰星也就是水星，方位是北，主耳聪精明（谋），协理阴寒适度，不要太冷，主青黑之光，推定星辰行度以规定漏刻。

題名錄

安泰保險有限公司

就緒繼繼來嬰

嘉靖癸丑歲仲夏月

美籍華裔新章

由此看来，“四辅”就是皇帝的辅佐，在皇帝身边协理阴阳四季寒暑，制定的是关乎时间、音律、度量衡、星象等皇朝最基本的制度，调和宇宙的秩序，带有五行、五色、方位、占星术相关的神秘色彩。这显示，新朝的皇帝和秦汉的皇帝有些不同，带有更多神性和神秘色彩。

四辅的人选，和旧四辅相比，除了皇帝本人和已死的孔光外，王舜留任，升格为太师；平晏本来就是皇帝心腹，新进为太傅。但大家万万没想到，曾经的四辅之一、少傅甄丰却被踢了出去，那个献符命的平民哀章居然一步登天位列其中。

甄丰想必极为不悦。但他或许还留着期望——四辅负责内朝，那么外朝理应有自己的份儿。果然，接下来宣布的是“三公”，的确是外朝的主官，且同样与天象挂钩（见下表）：

大司马，对应月亮，属刑杀，如皇帝左腿，要达到武功的祥瑞，主

管天文，负责敬授民时，努力农事，以求丰收；

大司徒，对应太阳，属德恕，如皇帝右臂，要达到文治的祥瑞，主管人道，负责教化育民，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大司空，对应北斗，属正义，如皇帝内心，要达到河图洛书那样的太平祥瑞，主管地理，负责治理水土，葆养山川，繁殖鸟兽草木。

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制

三公九卿制

三公各“分管”三个卿，大司马辖司允、纳言、作士，大司徒辖司直、典乐、秩宗，大司空辖司若、予虞、共工，合起来正好是九卿。每个卿又置三个大夫，每个大夫下面又置三个元士。

这就构成一套极为对称且符合术数之美，但也令人颇觉僵硬的政府机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由此看来，三公是政府机构的首脑，在外朝抓具体工作，调和的是人间的秩序，其神性弱于四辅。如果比拟的话，四辅相当于西汉的大司马，承皇帝之意居内朝辅政；三公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居外朝施政。

三公的名单里，甄邯、王邑本是皇帝心腹，王寻是新进的宠臣，但竟然还是没有甄丰！看到兄弟甄邯位列其中，甄丰更感到很不舒服。但眼下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认真聆听后面的人事安排，十一公爵的四将也随之公布：

更始将军：广新公甄丰；

轻车将军：奉新公王兴；

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

前将军：崇新公王盛。

甄丰终于等到了自己，虽然位于四将之首，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被排挤出四辅三公外，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王兴和王盛。

大典开始之前，甄丰等旧臣已经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几张陌生面孔，模样倒是周正，有福相。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其中就有王兴和王盛。

因为这两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符命最初公布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谁。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没错，王盛是商贩，王兴是小吏，但符命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够预知未来。两人容貌非凡，有贵人之相。所以，谁敢说他俩将来不会成为新朝的中流砥柱呢？

而且，王莽还将孙女王妨嫁给了王兴，想来这位王兴应该器宇不凡。

甄丰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命运吧。他对和王兴、王盛同在四将之列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可能会后悔，当初那么努力帮助王莽，并未设想过他会取汉帝而代之。当然，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但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遭到了羞辱。

后面宣读的人事安排，甄丰渐渐充耳不闻了……

这天是新朝开国第一天，对官爵的安排本身就有论功行赏之意。皇帝安排好中央的官爵体系，把各级官职按照儒经进行了更名，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曾经，在翟义等人叛乱时能够坚定站在王莽一边、积极参与平叛的州牧郡守，如今得到了报偿，担任州牧的都封为男爵，郡守封为附城。

甚至早在汉成帝时期提携帮助过他的人，如当时的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闾、上谷都尉阳并等，虽然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儿子一律封为男爵。

王莽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一个久未出现的名字：孔休。孔休是他被赶回新都国时的国相。王莽派人寻找孔休，诚恳地邀请他来担当国师，但孔休闭门称病，使者连面都没见上。王莽没有怨恨，只是倍觉惋惜。

一个不忘旧情的领导者，不仅会赢得故人的尊敬，也会俘获现在下属的心。至于他对甄丰为什么如此处理，史料缺乏，很难猜测。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

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王莽居摄期间，对祭祀、明堂等制度已经基本改革完毕，货币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改革成果帮助他收获了臣民和舆论的支持。

现在，新朝要继续推行货币改革，还要尽快启动限制奴婢数量、恢复井田制、改革专卖制度等能够一举解决贫富分化、地位差别的一揽子措施。新朝，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皇朝、新的帝王、新的国号，更具备着永恒、终极的意义。

一旦改革完成，社会上一切不正义都将不存在，历史将终结，进入太平世。

从皇帝到平民，都对这个前景心怀憧憬。

以往只在经书里记载的太平世，就要在圣王的治理下启幕了。

注释：

- 1 颜师古说：恚怼之辞也。
- 2 王谏、张永事见《汉书·元后传》，第4033页。
- 3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 4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 5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鄆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鄆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 6 胡风、福山。
- 7 王莽参用今古文。
- 8 林剑鸣：《秦汉史》，第6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9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
- 10 《汉书·王莽传》，第4101页。
- 11 当然，民国对清室的优待也有复杂背景，如以优待换取退位等。
- 12 徐乡，今山东黄县附近。
- 13 今山东莱阳、平度附近。
- 14 《汉书·王莽传》，第4118页。
- 15 公元10年9月15日。

- 16 《汉书·王莽传》，第4119页。
- 17 愠，音同音。
- 18 王莽说，居摄时，见到过有符命称王临为洛阳之主，而洛阳是天下之正中，所以预示王临为太子。王莽早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符命，也可能是王莽迁都的提前安排。
- 19 《汉书·王莽传》，第4099页。
- 20 音同归。
- 21 《汉书·王莽传》，第4106页。秩宗，即汉太常。
- 22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

三、改制与王制

10．抵制资本（一）

始建国元年四月，原汉朝的徐乡侯刘快谋反。

消息从胶东送到了长安，王莽并不紧张，对受禅之后可能会发生小规模叛乱，他早有心理准备。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权力在手中牢牢握着，这些叛乱只是新朝的癣疥之疾。而真正可能影响新朝的稳固，需要他下功夫做的事情，是继续推进改制。

推进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称帝之前给天下、给神祇许下的承诺。上天颁布符命给他，朝野的臣民拥戴他，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从而建立太平世，恢复尧舜的三代之治。

皇帝把刘快谋反的竹简拿到一边，不再理会，转而拿起另一份竹简。这是皇帝昔日被罢免大司马之职时，继任者师丹给汉哀帝上的一封奏疏，那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设法井田，然后治乃可平。¹

汉世创造了宏伟的基业，但却因为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致丢掉江山。所以新朝一定要解决，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²。王莽思忖，师丹的这封奏疏当年确实颁布了，但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一来，汉哀帝带头不遵守，他让官民限田，自己却一次就划给董贤

两千顷田产。二来，限田令虽然下达并重申了多次，但是大家百般抵制，敷衍塞责，汉哀帝一死，就不了了之。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当宰衡的时候，也曾重订过奴婢田宅制度，但当时没有订出细则，也没有专意去推广。

现在已经是新朝，新朝新气象，皇帝决不会重蹈汉哀帝的覆辙。

与之相关的是奴婢问题，如果儒家只用一个字概括自己，那一定是“仁”。仁者爱人，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董仲舒就曾经建议禁止主人擅杀奴婢，说明任意杀害奴婢并不鲜见。而且，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本上有关联，一个人土地被兼并了，就会不得不卖身当奴婢。因此，倘若将田地平均分配，施行井田制，奴婢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况且，王莽曾因为儿子杀了一个奴婢而迫其自杀。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帜。

很快，王莽就在国师刘歆等人的协助下，正式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属令”。

依王莽细致缜密的风格，这套“王田私属令”应该有详细的“操作规程”³，估计会包括怎么确定田地的优劣分等，怎么计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积，何种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类，不太可能只是几句话。但这些史书未载，班固只提到三点：

第一，天下的土地叫作“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禁止买卖；

第二，男丁不满八口，但占田超过“一井”也就是九百亩的，要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家族的亲戚和邻居；以前没有田地的，可以分给土地；

第三，如果胆敢非议法令，迷惑众人导致无法施行的，要流放到边境。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⁴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同时，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导致“田连阡陌”。总之，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从孙阳的

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而张邠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委实不高。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⁵。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藪，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皇帝上奏，说：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⁶

泉，就是货币；泉府，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刘歆认为，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平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买不到的人，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儒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不能只求利，要禁止百姓发不义之财。

姑且不论刘歆所说的“泉府之官”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但刘歆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该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11．抵制资本（二）

刘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到新朝末年，皇帝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筭”。

筭，就是“管”；六筭，指的是六种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印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筭）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⁷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这三种最容易理解，就是由朝廷官办专营酒、盐、铁。要知道，酒、盐、铁是任何人的必需品，因此利润很高，实施国家专卖，朝廷就能获得一大笔财政收入。但问题来了：盐铁专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施行

过，而且儒家不正是把盐铁专卖看作当时的恶政吗？汉昭帝的时候举行盐铁会议，儒家不是猛烈抨击并废止了盐铁制度吗？怎么到了这里，反而成了儒家的改制大政，要实施了呢？

逻辑正在刘歆所说的“理财”二字上。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而是反对以图利为目标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⁸，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就是说，诸侯之家，宁可有贪污的家臣，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

所以，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总之，儒家理财学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部门”和“国家主义”都很警惕。

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所谓名山大泽，山未必“名”，泽未必“大”，这里的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近山水的地方，老百姓不必专意于耕种，去山里采山珍，到海里捞海味，就能养活自己，再卖一把还能赚钱。所以在皇帝眼里，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宝藏，这些人不通过耕种就能获利，也是不公平的，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所以也要管起来，向这部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所谓名山大泽的征税，到后来拓展到几乎全部的工商部门：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⁹

总之，凡是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王莽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才是王莽的目的。

第五，五均赊贷。

五均赊贷，虽然放在一起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均，就是平衡物价，王莽把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进行物价管制。之所以叫作五均，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合起来就是五均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西蜀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东越的玳瑁，几乎随处可见，就更不必说丝绸、漆器、铜镜之类了。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改成“五均司市师”，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为属官。“交易丞”，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也就是物价平衡；“钱府丞”管理“赊贷”，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句，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¹⁰。

五均和赊贷虽然是两码事，但彼此补充，调剂工商金融，以求既能

支持农民农业，又平衡收入。事实上，五均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有些相似，但与盐铁专卖一样，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钱币铜冶，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制度，这是六笼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

汉室货币制度的确立，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¹¹

金融虽然稳定，但并不能解决贫富的问题。

早在居摄期间，王莽就启动了币制改制，延续了儒家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的精神。不过，他当时没有贡禹那么激进，他更在意的是恢复上古时期的货币形制。居摄二年（公元7年），朝廷发行了两种刀币、一种大泉，面值都很高，但含铜量并不高，比如大泉重十二铢，面值是“五十”铢，这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水平不相称。这倒还好，关键是他同时下令，列侯以下不准持有黄金，要主动到官府兑换铜钱。

史书称，王莽并没有履行承诺，只收了黄金，却拖着不给兑换铜钱。这个记载倘若真实，就很有意思了。当时王莽尚未称帝，还在收买人心，所以他这么做，收买的是什么人的心？

没有黄金的人的心，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的心。

因此，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所收的人又是“列侯以下”，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贾了，所以目的仍然是抑制贫富分化。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

到了始建国元年，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废除了会令人想起“刘”字的“刀币”，也禁用了五铢钱，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

第一步，发行了新的重一铢、面值为“直一”的小泉，和居摄期间发行的重十二铢面值为“五十”的大泉并行。试行一年，发现不太好用，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铢钱。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大泉的面值又过大，就好比只发行了1元钱和100元钱的两种货币，用起来当然不方便。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面值不便的目的，到了始建国二年，皇帝启动了第二步，这次的动作很大，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统称“宝货”：

五物，就是金、银、铜、龟、贝这五种铸币的材料。

六名，就是有黄金、银货、龟宝、布货、贝货、泉货六个币种，细看来，其中的布货、泉货都是由铜铸造，所以“五物”才有“六名”。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太过复杂，就不抄录了。只说其中的龟宝、贝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显然，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如果他目不识丁，不认识上面的面值，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若是不幸收到贝货和龟宝，还要找尺子量一量才放心。这样的货币，不必说流通，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

一段时间以后，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就废止了龟宝、贝货、布货，只留下金银，以及面值为“一”的小泉和面值“五十”的大泉。换句话说，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宝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其影响大概也有限。而且，到始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14年），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订改制，这次终于简单了，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一是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一是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二十五”。

其实，这个面值为一、重五铢的“货泉”，就是原来的五铢钱，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较大的混乱，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

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周礼》的框架下，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也是后世所谓“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他会成功吗？

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刘歆、扬雄、桓谭等人，都充满了希望。

12．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¹³，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¹⁴。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

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¹⁵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¹⁶。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¹⁷

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但实话说，比起西汉动辄族诛、牵连万人、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委实不甚突出，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王莽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盐铁酒的专卖和名山大泽的征税，运行最为成功。这几项改制一直到王莽覆灭前的始建国地皇三年才取消，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而从王莽覆灭后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也的确确实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质量不高，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那些仅仅挖几棵山珍、打几网鱼、四处游方看病看风水的社会底层，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要被征税，尽管数额不大，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儒家的初心被悬置。

剩下的第三类，五均赊贷，最有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溃败。

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信贷、定价的位置，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结果很有可能是，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养了一群蛀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士”来监督。有趣的是，他着意从富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士”，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富商。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贾，一面又选拔富商来监督？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善于理财的先例，既然是财金经济的改制，选拔“技术官僚”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弘羊的政治品质，而是迅速腐化下去，他们的“专业技术”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广大吏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而是动辄得咎，苦不堪言。

有些人，可能想到了记忆里并不遥远的汉武帝；

还有些人，则可能想到了记忆里遥远的秦始皇。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制经济思维，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注释：

- 1 《汉书·食货志》，第1142页。
- 2 历史上的井田制到底是什么，怎么实施的，尚未有公认答案。但这不妨碍后来人如王莽“想象”井田制的模样。
- 3 《汉书·王莽传》：“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第4111页）这里的“制度”应该是这道法令的具体内容，但详情已不可知。
- 4 按照孟子的说法，井田制不仅是土地制度，还是一种邻里宗族的社区制度。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王莽施行的就是井田制。
- 5 吕思勉：《秦汉史·总论》，第1页。
- 6 《汉书·食货志》，第1179页。
- 7 《汉书·食货志》，第1183页。
- 8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9 《汉书·食货志》，第1181页。
- 10 《汉书·食货志》说年息10%，《王莽传》说月息3%，两者有差别。苏诚鉴认为是前者，见《“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筭”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林剑鸣认为应是最高利息和最低利息的区别，见《秦汉史》，第658页。实际上，以今天银行利率情况推断，各地经济水平不同，利率、息差都会不同，所以林剑鸣说应更近实际。
- 1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12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次改革。考虑到两次时间挨得很近，且始建国元年主要是废除刀币和五铢钱的政治行为，因此将其与始建国二年

的币制改制合为一次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从行政的习惯来看，也可以把前面的一次视为“试点”。

- 13 何休。
- 14 侯家驹：《周礼研究·序言》，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转引自李若晖：《久旷大仪》，第188页。
- 15 智囊见《后汉书·鲁恭列传》，第873页；鲁匡封折威侯，见《新莽简辑证》，第5页。
- 16 始建国四年，王莽已经允许王田买卖，王田制实际上即已失效，但法令直到地皇三年才被全部废除。
- 17 《汉书·王莽传》，第4112页。

第七章 天下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合古篇》

一、奇怪的战争

1. 一枚印章引发的反叛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底，王莽派出的十二队五威将帅，已经陆续抵达“天下”的边界。

其中前往北方的一队，是由五威将王骏率领，手下五个五威帅分别是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他们已完成向新朝臣民颁行符命的任务，接下来，要将符命颁给匈奴，并把匈奴手中汉朝册封的印玺更换成新朝的印章。

时值冬季，又是北方，天寒地冻。五威将帅们为了显示新朝威德，仪仗服饰，繁盛不减。但王骏心中仍不免有些担心，生怕此行有辱使命。

他的担心，来自六年前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3年），当时王莽强迫匈奴废除了与汉宣帝“汉人逃入匈奴，匈奴不受；匈奴逃入汉朝，汉朝不受”的约定，重订新约，要求不仅汉人，包括乌孙、乌桓及西域佩汉朝印绶的各国居民，只要逃入匈奴，匈奴都不得接受。这对匈奴显然不平等。当时从长安赴匈奴颁布新约的，正是时任中郎将的王骏和副校尉甄阜。

他们会记得，当时乌珠留单于虽然接受了新约，但双方并不愉快。这次出使匈奴，颁符命应该比较顺利，但把“匈奴单于玺”换成“新匈奴单于章”，将乌珠留单于身份大大降低，恐怕就不容易办到了。

五威将帅一行抵达匈奴王庭，乌珠留单于接见了并不陌生的王骏。按照王莽的授意，这次给单于的金帛远多于以往汉朝的赐予，气氛变得缓和亲切，王骏这才告诉单于，如今汉朝已经禅让给新朝，皇帝也换

了，所以，以前汉朝的赐印也得相应换成新朝的。

单于对中原的局势应该是关心的。自汉宣帝以来，汉匈之间基本上没有战事。匈奴的内战倒是持续了很久，汉朝逐渐介入匈奴内争，杀北匈奴的郅支单于，帮助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还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呼韩邪仰慕汉朝，看到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都有“孝”字，就令今后新单于即位，名号里也要加上“若鞮”的字眼，意思是“孝”。乌珠留若鞮单于是呼韩邪的儿子，对汉朝怀德，当年为了配合王莽，特意把名字改成“知”。新约的事情虽然不愉快，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双方的关系。

正因为这种坦然，乌珠留单于在草原上拜受了新朝的诏书，正要解下旧印交给王骏，一旁的左姑夕侯——名字叫“苏”——拦住他说，“还没见到新印文，最好先别给”。苏的担心，恰恰是王骏的担心。乌珠留果然没有交出旧印。王骏由于心里有鬼，也就没有坚持。

接受诏书的仪式结束，大家进入穹庐开始盛大的宴会。烤羊饮酒，唱歌跳舞，宾主双方又热络起来。大家互相敬酒，等乌珠留给使者们敬酒时，王骏趁机提出，该把旧印给我们啦。乌珠留单于已经有了醉意，表现得非常坦荡，说了一个字：“诺”。就准备解下旧印。旁边的苏看到，再次提醒，“还没见到新印文，先别给。”单于大概是饮酒的缘故，说，“印文怎么会变呢！”就解下来给了王骏，接过新印绶，看也没看就佩戴上了。

王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双方饮酒吃肉，喝到半夜。

回到使者的住处，五威右帅陈饶说，“刚才，姑夕侯几次怀疑印文会变，单于险些不把旧印给我们。现在一旦发现印文确实有变，一定会来索要旧印，到时候，你给还是不给？得而复失，那就有辱使命了，不如砸碎旧印，以绝祸根。”

大家一听，颇有道理，但是把旧印砸碎了，万一惹出事端，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没人作声。

陈饶是燕赵人士，做事彪悍，二话不说，自己拿起斧子就把旧印砸坏了。

就为这种担当，陈饶后来被王莽拜为大将军，封威德子爵。

第二天，单于果然派右骨都侯，名字是“须卜当”，前来索要旧印。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他夫妇俩是匈奴里面的“建制派”，对汉朝

忠心耿耿。他很生气：“汉印是玺，而且没有‘汉’这个字，说明匈奴不隶属汉朝，汉朝尊重大单于为北方的首领；现在新印叫‘章’，前面又有‘新’字，这是把匈奴当成你们的诸侯了！我们要拿回旧印！”

王骏等人就把砸坏的旧印拿出来，故作镇定又假装傲慢地说：“旧印已坏，单于要奉天命，遵循新室的制度。”

须卜当回去禀报乌珠留单于，单于无奈，考虑到这次接受的金银布帛特别多，就暂时作罢，派遣弟弟右贤王带着牛羊等谢礼，跟随五威将帅返回长安致谢。

一行人走到单于另一个弟弟、匈奴左犁汗王——名字叫“咸”——的地界，发现了许多乌桓人。按照当初和匈奴的新约，匈奴不能受降乌桓人，就勒令匈奴把乌桓人退回去。

这件事成了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乌珠留单于想到过去的种种，想到匈奴连劫掠一些乌桓的人口都不行，决定不再对新朝服软。不是要把乌桓人送回去吗？行啊，单于派遣十余人，率领兵马万骑，以护送乌桓人回故乡的名义，屯兵朔方郡¹边境。

兵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中原与匈奴多年的和平关系，在始建国元年年底终结。

与此同时，在西域诸国，在西南的钩町等国，五威将帅们同步更换了他们的印绶，将他们的王号降为侯，诸国心中也颇不满。匈奴在朔方屯兵的消息传来后，诸国嗅到一些特别的味道。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的儿子甄寻制造符命，怂恿皇帝拜甄丰为右伯。右伯居西，兼治西域。甄丰有到西域“调研”的打算，消息传至，诸国并不欢喜，因为这意味着繁重的接待任务。

从车师国分出的车师后国对此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戊己校尉就在附近屯田。戊己校尉是仅次于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的高官，也是负责屯田的武官。甄丰如果来，必定会到车师后国。

车师后王²就和大臣抱怨，按照惯例，要提供牛羊粮食，还要担当向导、翻译。但整个邦国也就一千户，三四千人口，去年五威将帅来宣符命时，尽力接待都达不到要求，如果是甄丰这样的高官前来，那国家就算掏空也没法完成接待任务。

车师后王的想法是，不如干脆逃到匈奴去吧。

大概是身边有耳目，他的这个打算虽然并没有实际行动，却被戊己

校尉刁护探知。刁护把车师后王招来询问，王不敢不说实话。但没想到刁护丝毫不留情面，给王戴上刑具，押送至西域都护府发落。

车师后国虽然小，但人家好歹也是王。尚没有叛乱的实情就如此羞辱，实在没必要。囚车离开时，许多居民哭着送别，因为他们了解中原的习惯，他们的王怕是回不来了。

果然，囚车一到，西域都护但钦立即斩杀车师后王。

王的兄长听说后，悲愤交加，带领国中两千多居民和大量牲口，举国投降匈奴。

单于正在为前番的事情恼火，见此情景，偏要违反约定，不仅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的投降，还派兵和王兄一起，返回车师地区。这里还有车师国分出的另一个小国车师后成国。九月，匈奴攻杀了后成国的首领“后成长”，还击伤了西域都护司马。

匈奴来势汹汹，祸不单行的是刁护赶巧又病了，为了防备匈奴进攻，他派遣属官校尉史陈良屯兵桓且谷，另一名属官校尉史终带负责粮草，司马丞韩玄和左曲候任商分别带兵守卫。但万万没想到，陈良、终带等四人觉得形势不妙，西域很可能在匈奴的压力下背叛，到那时，孤悬西域的他们必将死于战事。再加上他们对王莽的登基颇有不满，就谎称匈奴来袭，率领三四百军士冲入戊己校尉府，将刁护及全部男性亲属杀光，挟裹着女眷儿童以及其他驻扎此地的官吏及家属两千多人，打出“废汉大将军”的旗号，向北逃入匈奴。

陈良、终带被委任为匈奴的乌贲都尉³，就住在乌珠留单于那里，常常陪单于饮酒吃肉，颇得信任。

匈奴屯兵朔方的挑衅和陈良等人的叛乱，令王莽不得不正视边境问题。他大概没有想到，只是更换一枚印章，竟然前前后后惹出这么多麻烦。他并不认为将“四夷”降格有什么错，新朝自己都取消了王号，按照五等爵制，皇子只是公爵，很多高官也只是侯爵，西域的城邦有些还不如中原的县大，降为侯有何不妥？

何况他们都是“蛮夷”！

儒家今文经学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异内外”，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意思是说，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夷狄，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个“新”字，本意并不是要高你一

头，而是文明的新朝要拉野蛮的匈奴一起奔向文明嘛。换言之，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本身就是新朝改制的一个重要关节。

其实，早在汉宣帝时期，汉廷就争论过对匈奴的礼仪。当时呼韩邪单于来朝，丞相黄霸等人也根据“异内外”的原则，主张以诸侯王礼仪对待匈奴，位次在诸侯王下。太傅萧望之站出来，据理力争，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二：第一，匈奴虽然现在关系好，但本质上是“敌国”，也就是独立国家，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朝见位次应在诸侯王上，双方的关系本质上是“羁縻之谊”，即笼络而非实际控制；第二，如果把匈奴当臣属，现在双方关系好还可以维持，但保不齐以后关系变差不来朝见了，那就是叛臣，天子必须得讨伐，反而被动，打输了政治后果更严重，打赢了也会劳民伤财。以兄弟之国待之，将来关系差了也没有讨伐的压力，反而更能凸显华夏比蛮夷要文明。

萧望之的观点确属老成人之言，因此被汉宣帝采纳。王莽实际上是推翻了这种政策，回到当时被否决的意见上去了。

于是，萧望之的预言不幸言中。匈奴的兵马已经到来，北方边境持续几十年的安定已经被打破，有些百姓开始逃亡内地。西域也出现不稳的征象，西域都护但钦已经上书提醒，匈奴南将军⁴有可能入侵西域。

2. 不平静的草原

王莽不得不做准备。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底，王莽分别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对匈奴正式展开攻势。

政治层面，他下诏赞扬呼韩邪单于“累世忠孝，保塞守徼”，现在与匈奴关系恶化，责任都在他的儿子乌珠留单于。因此，将乌珠留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罪当死。诏令还说，草原上有十五个呼韩邪的子孙，要把草原分成十五份，封给这十五个子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匈奴版本的“推恩令”，显示王莽对匈奴内斗的传统、匈奴和汉朝交往的历史是相当熟悉的。匈奴并非帝国，也没有中原那种册立太子的继承人制度，以往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大致各占一半⁵，因此每当新的单于上位，他的兄弟、叔伯们仍自有地盘和兵马，常常爆发内斗。王莽抛开乌珠留单于，以财产引诱贿赂其他匈奴贵族，看上去是分而治之的好办法。

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正如萧望之所说，匈奴实际上是独立的异国，用这种“干涉内政”的策略，俨然把匈奴当成给自己看家护院的藩属，只会更加激怒匈奴。

军事层面，王莽展示了大手笔，颇有效仿汉武帝的姿态。汉家承平数十年，财政方面很宽裕，新朝有足够的储备发动一场对匈奴的全面战争。他委派宠臣、立国将军孙建为“总司令”，选拔了十二位将领，分成六路，每路两员大将，屯驻的地点，最东边的是渔阳⁶，最西边的是张掖⁷，中间绵延今天的河北、内蒙古，遍及整个北方边境。这十二位将军里，有前番出使的王骏，有后来官至国师的苗⁸，有新朝名将严尤⁸，还有当年教授皇帝《左传》的陈钦，一时群贤毕至。

而军队，既有来自郡国的调拨，也有招募赎罪的囚徒。他们从全国各地辗转赶到这六路驻守的地点。粮食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王莽的计划是，先抵达前线的军人就地驻扎，待凑够三十万人，储备下三百天的干粮之后，六路大军就从十条路线同时进攻，一举把乌珠留单于赶到更北方，然后正式在草原上分立十五单于，一劳永逸解决北方问题。

显然，仅仅凑够人数和粮食，就不是一朝一夕、三五个月能做到的事情。自此，从江淮海边到北方前线，驿道上的兵士、押送粮草的官吏、传送消息的使者，络绎不绝，绵延几千里，吏民抛家舍业，苦不堪言；而已经到达边境驻地的军将，却没有仗打，边境寒冷，条件艰苦，放纵的军士们开始骚扰那些本就日益窘迫的百姓。

一时间，北方边境和驿道周边的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或是当了流民，或是当了土匪。王莽有所耳闻，先派尚书大夫赵并到前线劳军，并担任田禾将军，在北原郡⁹的前线主持屯田，以减轻粮草压力；还派遣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在边境郡县督查，结果这些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反倒与驻军合伙欺行霸市、鱼肉百姓。

在古代，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一切给军事让位。而军事一旦优先，军人侵扰是难免的事。

大兵集结期间，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领兵马万骑，携带很多珍宝，进至云中郡边境，放出消息，看看能不能诱出呼韩邪单于的子孙们。

果然，乌珠留单于的异母弟弟，前面曾经和新朝打过交道的右犁汗王“咸”带着儿子“登”，和另一个异母弟弟“助”，出现了。

按照王莽的意思，咸被立为孝单于，助被立为顺单于，两个人都被赐予黄金。《汉书》在描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词“胁拜”，似乎是强迫他们接受的。但强迫难以说通，大概是相互之间有什么交易吧。随后，助、登两人跟随新朝大军返回长安，大概有人质的意思。

回到长安后，王莽很高兴，这似乎证明了他的计划很高超，就封蔺苞为宣威公，拜虎牙将军；封戴级为扬威公，拜虎贲将军，并安置好登、助两个匈奴人。不久，顺单于助病死，皇帝让登袭为顺单于。

皇帝养着顺单于，是想着日后平定草原，好把他分封过去。

但咸得了“孝单于”的名号后，大概觉得两国交战在即，此举颇为不妥，就回到匈奴王庭，向乌珠留单于请罪，辩解自己是被迫接受的。单于很恼火，可能也不相信他的话，把他贬为“于栗置支侯”，这是匈奴一个低贱的官，以示惩罚。听说助、登还去了长安，单于愤愤地说：“先单于所受的是汉宣帝的恩，今天的天子不是宣帝子孙，凭什么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单于拒绝承认新朝有权继承汉朝，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对汉朝忘恩负义。

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王莽的军队还在北方集结时，单于为了报复，派遣左骨都侯等人率军进入云中郡，对官吏和百姓大加杀掠。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匈奴入寇成了常态，左右部都尉、各种封号的王，频频侵入边疆郡县，规模大的上万人，中等的数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在潮水般的侵袭中，雁门郡、朔方郡的太守、都尉先后战死，被掠去北方的吏民牲畜财产不可胜数，边境仿佛回到汉武帝初年。

形势危急，屯驻在渔阳的讨秽将军严尤有些着急了，他给王莽上书，提出打这种仗，吃的是财政和粮草，应该速战速决，节省民力，他愿意带领一支军队深入草原，以雷霆之势重创匈奴。

王莽自有想法，没有理会。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新朝这边，大军持续集结；匈奴那边，骑兵不断袭扰，但双方始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这奇怪的局面下，云中郡受到的袭扰最频繁。而驻屯云中郡的是王莽以前的老师陈钦。他抓了些匈奴俘虏，一审讯，发现他们属于王莽前番自以为引诱成功的孝单于咸的另一个儿子。

王莽接到报告后很生气，为了报复咸，就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特意在他会见外国使臣和首领时，于长安市场上公开斩杀了咸的儿子，顺单于登。登的随从，大概是匈奴的一些小贵族，也一齐死难。

这个消息暂时没有传到咸的耳朵里。因为现在的边境已经从从前不同了，南北双方音讯隔绝。有些人还记得，自汉宣帝以来，北方多年没有战争，人口滋生，遍地牛马。而现在，路边常常见到无人收殓的尸体，草丛里露出白骨……

3．高句丽的反叛

在屯驻军的东线，不仅有从内地赶来的军队，也有一支高句丽的军队。

高句丽位于辽东一带，地界挨着匈奴，所以也被征发。需要指出的是，高句丽是扶余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与今天的朝鲜、韩国更没有关系。

这些高句丽军人士气低落，不愿意与匈奴交战，大多成了逃兵，有些还成了贼寇。始建国年间，辽西大尹（即辽西太守）田谭清剿失败，本人被杀。州郡把情况报上来，认为这应该由高句丽侯，名字叫“骆”¹⁰承担责任。高句丽原来是王国，这里称为侯，应该是始建国元年五威将帅颁符命时给降格了。王莽很生气，令屯驻在东线的严尤去惩处。

严尤又上了一封书，大意是，逃兵犯法，国君怎么可能有直接责任？建议让州郡做好安抚工作就可以了。现在正在备战匈奴，把罪归在侯骆身上，就把事闹大了，万一高句丽也反了，怎么办？

王莽又没有听从。严尤无奈，只好勒兵进入高句丽地界，把侯骆引诱出来，果断斩杀，并把首级送至长安。王莽大悦，封严尤为武建伯。为了表示对高句丽的惩罚，还下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一高一下，是故意选的反义词。

然而，事实被严尤不幸说中，高句丽虽然没有正式叛乱，但自此不断滋扰东北边境，渐渐脱离了与新朝以往的关系。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西域突然爆发叛乱。以焉耆为首的几个西域国家攻杀了西域都护但钦，宫廷为之震动。早在汉成帝时期，但钦颇得王莽伯父王凤赏识，在汉平帝时期出任西域都护，至殉职前已在西域任职十二年。虽然史书上事迹不多，但从他杀车师后王的举动看，他在西域的风格可能是立威大于施恩，因此颇为西域诸国忌惮，他的被杀并不意外。

不过，但钦之死的根本原因是新朝大军陈兵北境，对西域相应减少

了关照。同时，匈奴对新朝的不断侵袭，对西域产生了外部压力，促使西域叛乱。但钦是新朝驻西域最高长官，他被攻杀意味着新朝对西域已经失控。

一时间，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王莽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既不进攻，也不撤防，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更多的流民出现，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推行井田、六筦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对此王莽不会不知道。当始建国五年草原上传来乌珠留单于去世的消息，王莽终于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更大的利好是，右骨都侯须卜当执掌了匈奴实权。前面曾说，他是王昭君的长女女婿，须卜居次云的丈夫。这对夫妇以及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都是匈奴内部的“建制派”，主张与中原和平共处。须卜当用事，没有立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而是“兄终弟及”，立了乌珠留单于的一个弟弟。

新单于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孝单于咸，即位后号“乌累若鞮单于”。

在须卜当夫妇推动下，乌累单于一改和新朝对抗的政策，转而主动向王莽提出和亲。

第二年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匈奴派人到边境提出要见和亲侯王歙，也就是王昭君的侄子。王莽很高兴，派遣王歙和他弟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此行肩负了好几项重大使命：

第一，祝贺新单于即位，赐黄金衣被和布帛。如果单于高兴地接受，双方将结束长达四年的奇怪战争。

第二，向新单于索要几年前从西域逃过去的陈良、终带等人。他们杀害了戊己校尉刁护全家，是新朝的罪犯。把他们送还新朝，不仅符合道义，也是双方休战的回赠礼。

第三，商议和亲事宜。

王昭君的两个侄子抵达匈奴王庭后，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本来也是匈奴的亲戚。在须卜当夫妇的运作下，出使整体上很顺利。唯一的插曲就是乌累单于询问起自己的儿子，顺单于登现在过得怎么样。

王歙和王飒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两年前登已经被王莽下令斩杀，乌

累单于竟还一无所知。

王歙担心实话实说会影响此次出使的主要任务，就撒谎说登在长安一切都好。

乌累单于这才情愿把陈良、终带以及当时参与杀害刁护的人都交了出来，一共二十七人。这些人都是乌珠留单于的贵客，新官不理旧账，新单于不再庇护他们了。

一路上，乌累单于还派人专程护送两位新朝使者和陈良等人的槛车。到了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打算好好发落一下陈良等人。这段时间，他正在根据儒经创造新的刑名，《周易》的“离”卦有“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的爻辞，皇帝就把“焚如、死如、弃如”作为新的刑罚的名称，比如“焚如”就是火刑，“弃如”就是弃市。

《周礼》说过，“凡杀其亲者焚之”¹¹，陈良是叛国，和杀亲没什么两样，因此定为“焚如”。

趁着匈奴使者还没有走，王莽在城北设了刑场，邀请匈奴使者以及城内的官吏、居民前来观看。众目睽睽之下，陈良等人被用火活活烧死。虽然这个刑罚有儒经为依据，但又是一次虐杀。匈奴使者大为惊恐，他们不免会想，乌累单于的儿子登，到底还活着吗？

始建国天凤元年，新朝和匈奴终于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前期，王莽委派谏大夫如普到北方前线巡察，回来之后的报告里写道，边境饥荒，居民“人相食”，军人苦不堪言，建议罢兵。这年二月，益州“蛮夷”也发动叛乱，益州大尹被杀。

王莽不得不承认，原先的政策确实骑虎难下。重重压力下，他以匈奴和亲为契机，下令停止屯兵，撤回将领，只在边境设置了以国防为主的游击都尉，同时派兵去益州平叛。

奇怪的战争似乎结束了。

4．没有结局的战争

天渐渐高，云渐渐远，偶尔见到一只鹰击破长天，使者们就知道中原已远，草原已近。

离开长安之前，使者们悄悄打听了登的消息。使者的车马一到单于王庭，就向乌累单于如实描述了陈良等人被烧死的情形，并且禀报这个

噩耗：单于的儿子登连同随从，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新朝公开斩杀。上次来的新朝使者欺骗了大家。

单于又伤心又怨恨，他虽然已经答应和新朝息兵，但儿子之死促使他继续派兵滋扰新朝边境。果然，新朝觉察到匈奴并没有履行约定，就派使者来询问，乌累单于一脸无奈：“这都是乌桓和匈奴的一些刁民干的，就好比你们中原的流民和盗贼，我刚即位，威信尚浅，难以禁止啊。不过请放心，我会尽力铲除！”

从边境报来的消息中，王莽辨识出这些入寇的匈奴兵强马壮，绝非盗贼，也就知道乌累单于在敷衍他。于是他又下令恢复边境屯兵，刚刚平息的边境烽火又燃烧起来。

王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匈奴如此言而无信。直到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乌累单于派遣使者前来索要儿子登的遗体，他才明白前因后果。为了表示诚意，他决定向单于表达一个意思，当时杀害登并非自己的责任，而是因为将军陈钦的谗言。

王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陈钦逮捕。陈钦与王莽有师生之谊，忠心耿耿，被捕时很是疑惑，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王莽要改善与匈奴的关系，拿自己当替罪羊了。愤恨不已的陈钦在狱中自杀。

这就更成全了王莽，他盛殓登的遗骨，精选了善于言辞的儒生王咸为使者，带着陈钦已死的消息和更加丰厚的资财出使匈奴。为了显示新朝仍然是匈奴的宗主国，王莽在实质上向单于输诚的时候，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条是要求匈奴进贡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并归还掠夺的新朝人口；二是要求乌累单于掘开乌珠留单于之墓鞭尸。

这显然不合情理，但王咸能言善辩，据理力争，把王莽的要求一一摆出必须执行的道理，单于都说不过他。当然，说不过不代表真的会执行。此后，乌累单于依然连年侵扰新朝边境，王莽苦不堪言。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泾河的一处河岸塌方，把泾河堵住了，泾河水改道向北流去，沿岸的居民大受灾害。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巡察。王邑去了一看，塌方的地方恰好是甘泉长平馆的西岸，涉及行宫的损害，就不能说是般的水灾，而要考虑以灾异报告皇帝。王邑是最了解皇帝的，他不敢报灾异，而是说这符合谶纬《河图》所说的“以土填（镇）水”之意，是匈奴将要灭亡的祥瑞。

既然是祥瑞，王路堂里，群臣一片庆贺之声。

王莽也会心，大概是觉得王邑“讲政治”吧，就派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领兵出击匈奴。当然，现在是奇怪战争，二位将军并没有出境，抵达边境后就地屯驻。

虽然王莽一直没有进攻，但准备工作更加繁忙，奇怪战争也就更奇怪了。他大量招募男丁、死囚、吏民家奴，号称“猪突豨勇”，这个奇怪的称呼看似是精锐奇兵，实则准备让亡命之徒当炮灰。军费膨胀得厉害，王莽新增了财产税，也就是把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贡献出来。军马也不足，就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凡佩戴黄绶的比二百石以上官员，都要养军马，官阶越高的越要多养。

最奇怪的是，他还征召有特异功能的人帮助攻打匈奴，选上后能够越级做官。于是全国有上万人报名，有的自称渡河不需要舟楫；有的自称有药方，三军服药后可以不吃粮食；有的自称会飞，一日千里，可以去匈奴侦察敌情。

会飞？这也太奇怪了。王莽饶有兴趣地把他请来试飞。只见此人穿上用大鸟羽毛编织的翅膀，头上身上也都插满羽毛，浑身用带子缠结实，就开始飞。不知道他是从多高的地方起飞，总之据说是飞了几百步掉了下来。皇帝一看，这肯定飞不到草原嘛，不免失落，但一想古代有千金买马骨的寓言¹²，为了吸引真正的奇能异士，依然封赏了这位飞人。

奇怪战争期间，匈奴的频繁骚扰和新朝的屯驻不出，使得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在西域，诸国被匈奴日益强大的压力所震慑，陆续背叛新朝，投入匈奴的怀抱。为了挽救西域，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晚些时候，王莽选派五威将王骏，带领新任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进入西域，尝试恢复但钦的事业。

王骏是前锋，又有和匈奴打交道的经验，他的军队主要是征发自莎车、龟兹的七千西域兵士。进入西域后，各国纷纷出迎。王骏发现，上次杀害西域都护但钦的焉耆也投降了，寻思找个机会攻杀焉耆，给但钦复仇，就命令戊己校尉郭钦另外带一支军队，以备万一。但万万没想到，焉耆是诈降，还没等王骏动手，焉耆的伏兵已经先发制人，杀死了王骏。

等戊己校尉郭钦赶来，焉耆等国的军队主力已经撤走，只剩下打扫战场的老弱和辎重。郭钦对这些老弱病残杀戮一番，挽回些许颜面。西域都护李崇收拢剩余军队，收缩势力范围，在龟兹驻扎。

知道王骏死难的消息，王莽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行动实质上失败了，但依然对郭钦大加褒赏，封为“酈胡子”，子是子爵，“酈胡”是彻底剿灭胡人的意思。这个爵号显示了王莽的内心独白：必须彻底剿灭四夷。

不过这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从这一年起，郭钦、李崇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杳无音信。新朝彻底失去了西域。

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乌累单于去世，弟弟呼都单于即位，匈奴和新朝终于又等来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新单于表现得很亲善，特意派了两名使者到长安，这使者不是外人，一人是须卜当夫妇的长子，名字叫“奢”，一人是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就是说，两位使者都是王昭君的外孙，其诚意可见。

接见完使者，王莽却没有立刻答应与匈奴改善关系。他有了上次乌累单于反复无常的教训，觉得呼都单于也难以信任。要想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还是要靠战争，并且单于一定得是自己人。

皇帝召集廷议，讲了自己的设想：匈奴贵族里，真正心向中原的只有一个人——须卜当。所以，新朝应该把须卜当养在长安，立为单于，然后大军出击攻破呼都单于，再送须卜当过去即位，从此边境永宁。

此时，严尤已经升任大司马。他当廷提出反对，理由是：须卜当在匈奴是很重要的人物，控制着匈奴右部，他控制的地方从来不侵扰边境，并且单于一有动静就给我们报信，好比高级间谍。如果把他安置在长安，那和一个普通的胡人有何区别？比较利弊，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

王莽不听。

随后，新朝以奢的名义，邀请奢的父母也就是须卜当夫妇来到边境。新朝派去的说客是王歙。史书说，王歙“以兵迫胁”须卜当夫妇到长安。此颇为可疑，很难想象王昭君的侄子会用军队迫使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而且王歙是由奢陪同前往边境的。更可能是王歙和奢赞同皇帝的策略，并劝说须卜当夫妇同意，鉴于这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决策，夫妇俩并没有马上同意，内部可能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以至于夫妇俩的次子没有一同去长安，而是掉头返回匈奴。但最终，须卜当夫妇跟随王歙和儿子奢抵达长安。

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王莽倒是火速履行承诺，封须卜当为须卜单于，封奢为后安公爵，对父子二人极为尊宠。后来，须卜当去世，奢继承单于之位，更受尊宠，还娶了王莽的私生女。

按理说，走完这一步，王莽应该派大军横扫北境了。

王莽的确指派严尤与廉丹这两位名将出征，号“二征将军”。廉丹是刚刚从西南边境战场上赶回来的，虽然打过几场胜仗，但终于未能平息益州的叛乱，整个西南边境的局势与北部、西部一样，已经糜烂难收。

严尤和廉丹的出兵，需要整个北方战线的全面配合，毕竟奇怪战争已经持续快十年，就为了这次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如此漫长的边境战线是很难调度的，不是这里军队没准备好，就是那里粮草又不足。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勒令全国每个郡缴纳百万谷帛给前线，但军事行动仍然没启动。延宕之际，内地的叛乱也起来了，关东的流民号称赤眉¹³，开始攻城略地。

呼都单于见自己的使者去示好，非但没有换来什么利益，反而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须卜单于，其恼怒可想而知。须卜当走后，他原本负责的匈奴右部换成了单于的人，于是整个北方战线从东到西，都在遭受匈奴的袭击。

边境的流民逃到内地，发现内地也开始动荡。

然而王莽始终不愿意与匈奴息兵，严尤几次上谏都不听。直到最后一次，严尤力争征伐匈奴已经不是新朝的首要任务，当下应该关注关东的赤眉军。但恰恰是这句话惹怒了皇帝，他立刻免去严尤的大司马之职，还把匈奴问题的责任推给严尤：匈奴不绝，盗贼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听从我的诏命！

离开了大司马的职位，离开了对匈奴作战的任务，严尤是否会想起，早在形势尚好之时，他曾经给皇帝的一封上书。

在那封上书里他提出，自古以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没有上策。周代，把他们撵出边境，属中策；汉武帝兵连祸结三十年，虽然将其打服，但内耗严重，属下策；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但御敌功效不大，是无策。

而王莽打的奇怪战争，比无策更差，把全国的兵粮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大量粮草被消耗；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吃住艰苦，瘟疫流行，士气耗尽，还骚扰百姓；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吏民，还占用本可以耕

种的牛马。做了这么多准备，却不打仗，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¹⁴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赢，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但王莽是否具备汉武帝的能力，并拥有他的幸运呢？

奢和他的母亲云一定知道答案。王昭君的这位女儿和外孙，一直留在长安等待有朝一日去北方即位，直到新朝灭亡之时，死于乱军之中。

注释：

1 长安北方，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段。

- 2 此时，车师后王应该已被王莽降格为侯，但史书依然记为王，这里也继续称之为王。
- 3 《西域传》称乌贲都尉；《匈奴传》称乌桓都将军。两者可能是匈奴同一职事的不同译名。
- 4 匈奴没有南将军，应该也是匈奴职事的汉译。
- 5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见《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该文对匈奴继承情况做了统计。
- 6 今昌平、密云。
- 7 今甘肃张掖。
- 8 严尤，姓庄名尤，《汉书》中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尤。为了叙事方便，本书仍以严尤称之。
- 9 今内蒙古包头附近。
- 10 高句丽侯驩的身份，目前尚未有公认的说法。这里倾向于认为驩就是被降为侯的高句丽国王。可参考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驩的几个问题》，见《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 11 此处得到《周易》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谷继明兄指导。
- 12 吕思勉：《秦汉史》，第186页。
- 13 此时尚未有赤眉的名号，这里为了叙事便利而使用。
- 14 《汉书·王莽传》，第4104页。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5．严密的五威系统

始建国元年冬天，统睦侯陈崇终于收到皇帝的策书，成为新朝第一任五威司命。在新朝的五威系统中，与负责宣传的“五威将帅”、负责安保的“五威将军”比起来，五威司命体系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权力最大的。

陈崇出任这个职位，显示了王莽的知人善任。在汉朝，陈崇就以丞相司直的身份替王莽监视丞相孔光，还充任绣衣使者赴各地采风，所从事的都是需要既懂政治又擅长刺探的差使。而五威司命的职责，正是“司

上公以下”¹，也就是监督上公四辅以下的各级官员，监督的内容有六条，分别是“不用命者，大奸猾者，铸伪金钱者，骄奢逾制者，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²。也就是抗命不遵、貌尊实奸、私铸钱币、骄奢逾制、泄露秘密、私相授受，全部围绕皇帝个人权力的维护，显示出他对群臣的高度警惕。在这套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里，陈崇虽只是侯爵，但犹如最高检察官，拥有强悍的权力。

五威司命的设置，令人想起明朝的特务机构。古代中国的历史，皇权是逐渐加强的，到明清臻于顶峰。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副皇帝”³，正式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到明朝取消宰相，再到清朝，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新朝虽然很古早，但搞出这套“五威司命”和“五威将帅”确实超前，这一部分因为，儒家怨于春秋时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的时代状况，因此格外讲究“尊尊”；另外还因为王莽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一个心胸坦荡的人登上帝位尚且免不了多疑，何况王莽呢。他很清楚，自己登上帝位之前是权臣，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王莽的策略是，对高官极度苛刻，不分给实权，越是高官功臣越要找碴儿打压；对小吏常施恩惠，时而以帝王之尊为小吏撑腰；对中生代则予以笼络，着力提拔那些敢于为他充当爪牙的人。史书说：

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⁴

摸清了王莽这一心态，孔仁、赵博、费兴等中生代官员就因为敢于向大臣发难而颇得皇帝信任，升职也很快。特别是孔仁，继陈崇、赵竑、苗昶之后就任五威司命，替皇帝身背威斗，权倾一时。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三月，发生了一次日食。

王莽严格按照儒家经说，只要有日食，一定得策免大臣。此时的大司马邈并不得不奉还大司马印绶。但王莽还一并以日食为借口，取消了太傅平晏的“领尚书事”。

平晏是“四辅”之一，最初可能只以为这是日食的权宜之举。不久之后，平晏带随从进宫议事，身为太傅，随从想必数量不少；但进宫时，却被守门的掖门仆射给拦住了，理由是平晏的随从超过了公卿进宫随从的规定人数。

大概这种事以前没发生过，所以平晏很生气，与仆射争吵了几句。

而仆射竟然无视他太傅的尊贵身份，对他出言不逊。平晏大怒，下令让太傅府的属官戊曹士将仆射抓起来。平晏心想，一个看门的胆敢教训太傅，先抓起来，和皇帝招呼一声再发落。

没想到，王莽知道后，居然调动执法，派了数百骑兵把平晏的太傅府团团包围，将戊曹士从府中抓了出来，立刻斩杀。

一个最高级的官员竟不能保护自己的下属，这对上司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平晏眼睁睁看着戊曹士血渐府门，都没有经过议罪的程序，这才明白，自己被取消“领尚书事”并不是走过场，而是王莽刻意打压。

平晏曾是汉哀帝的丞相，汉平帝的尚书令，为王莽的掌权、嫁女、登基立下大功。经此折辱，平晏心领神会，不再过问政事，在地皇元年死去。

即使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堂弟、大司空王邑，皇帝有时候也颇不留情面。大概与平晏受辱同时，王邑的一个下属大司空士，要在晚上通过奉常亭。中国古代夜晚宵禁的制度直到宋朝才基本废除，所以晚上过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当年李广被免官，晚上喝酒，要通过灞陵亭，亭长喝醉了不让他过去。李广说，“我是卸任将军李广。”亭长却说，“现任将军都不行，何况卸任的？”

无独有偶，大司空士要通过的奉常亭的亭长也喝醉了，问都不问，当场拒绝。大司空士只好通报了自己的官职，但亭长仍然不允许，还反问，“你到底有没有通关的凭证？”

一个亭长竟然如此苛刻，大司空士一怒，就抽出马鞭打了亭长。这位亭长也毫不示弱，拔剑回击，欲将大司空士“斩杀”。剑光落下，血光飞溅，亭长一下子酒醒了，发觉闯了大祸，连夜逃亡。案发之后，郡县依法捉拿，亭长的家人觉得事出有因，就上书为亭长求情。

没想到，这封上书被皇帝看见了，他说，“这位亭长是奉公执法嘛，不要逮捕了。”

这并不是一出《列宁与卫兵》的故事，王莽也并非褒赏亭长执法严明，他的真实意图大概是“我赦免你”。就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辛德勒教导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却赦免了他，这才是权力”，皇帝赦免亭长，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此言一出，王邑心领神会。所幸那位大司空王莽并没有死，只是受伤。王邑狠狠斥责了他一番。

平晏和王邑这两件事，令新朝的高官们小心翼翼起来，不仅约束自己，也会约束下属。而中生代、新生代的官员、吏员们则颇为皇帝归心。

但中生代一旦成长为高官，也不免遭受王莽喜怒无常的折磨。孔仁出任五威司命后，成为皇帝的宠臣。等到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孔仁的妻子因牵连进王莽孙子孙女王宗和王妨的案子而自杀，孔仁倍感恐惧，生怕被连坐，急忙求见皇帝，免冠谢罪。皇帝一见他，果然通过尚书斥责说：

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⁵

孔仁一听，懵了，怎么不问妻子的事情，反倒责怪自己免冠？孔仁免冠，是表示引咎辞职，是请罪的态度。但王莽的意思是，你没有资格辞职，让你当五威司命，给你配备六马拉的乾文车，让你随身携带威节和威斗，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源于新朝威命的尊贵。

孔仁万万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出。“大不敬”是重罪，电光石火之间，孔仁应该感到一种要被杀的绝望。但王莽又下了一道诏令，赦免孔仁，重配一顶新冠。

这种忽而雷霆、忽而雨露的感受，想必会大大挫折孔仁的心理，也使他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得咎。

新朝立国之初，大家曾对皇帝根据符命任命高官颇为不满，造符命的哀章成了国将，守门的王兴成了轻车将军，卖饼的王盛成了前将军，大家一度在心里发出疑问：皇帝怎么能如此轻率荒唐？怎么会昧于识人？

事到如今，群臣逐渐明白过来，皇帝把这三个“阿猫阿狗”捧上高位，只是为了证明符命的正确，从而顺利登基而已，从未赋予他们实权，只是摆设、玩具。非但这三个人王莽不会用，就连真的立下大功的甄邯、甄丰、平晏，乃至刘歆，他都不用，“诸公皆轻贱”，杀甄丰，冷落甄邯和平晏，杀刘歆的儿女，将这些功臣们打压得个个有苦难言，晚景寂寞。

立国的“十一公”里，除了早早死去的王舜，王莽只对两个王氏家族

的亲戚王邑、王寻，以及军人孙建保持着信任。派到外地去的州牧，秩级等同于三公，也是高官，同样受到皇帝的监视。委派州牧，本是汉代已有过的制度，目的是监督一个州的事务，但王莽发现这些州牧因为地位太高，反而在纠举案件上懈怠，就增加了新职位叫州牧监副，秩级相当于元士，来行使纠举监察之责。

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既没有大举杀戮，也避免受其所制，还得到了中生代的拥护。多年以后，追随他逃到渐台的人里，有许多就是他拔擢的中生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驭人之术，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6．诸侯授爵的盛事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二月的一天，长安吏民像往常一样生活，路上行人悠然，不时有车马“轧轧”地驶过，车夫的帻巾被风吹起。高大的宫殿在地上投出巨大的影子，城墙上旗帜猎猎，城门口人马往来如织。天气虽然还显寒冷，但城市的繁华令空气里生出些暖意。

突然，长安各个城门被紧急关闭，数队步兵骑士沿路快速奔来，被驱散的行人纷纷躲避，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出来了。但是，人们又看不到尊贵的车驾，只看见军人们到处搜查，那些躲进屋子里的人照样被凶神一般的军人们盘查一番。

有些熟知掌故的人恍然大悟，这不是汉武帝时搞过的“大搜”吗？

汉武帝后期，愈加喜怒无常，时不时就会突然关闭城门，到处搜查，有时搜查奢侈逾制，有时搜查巫蛊诅咒。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令三辅的骑士们大搜长安城和上林苑，城门关闭了整整十五天！吏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据说有人因此饿死。

好在汉武帝崩后，这种事情也就绝迹了。没想到八十年后昨日重现，只不过不叫“大搜”，而叫“横搜”。街上的人们忙着逃命躲避，都不知道有哪些人、多少人在这次横搜中被逮捕，他们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吏民在担惊受怕和忍饥挨饿中熬了五天⁶，终于等到军士们退去，紧闭的城门缓缓开了。

他们看见皇帝的车辇仪仗从南门出城，凡是认得出的高官显贵、皇亲国戚，都跟在后面。这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这么多公侯出

席，而且皇帝要特意事先横搜一番呢？

长安南郊。

明堂内外，庄严肃穆，王莽身着礼服，一群侍从和礼官围绕着他，在他面前有一座五色土组成的坛。坛的下面，则是同样盛装礼服的新朝公卿。原来，这些人全部都是拥有新朝爵位的贵族，有两千三百多人。而今天的仪式，就是正式册命诸侯。

这一刻，贵族们已经等了四年，他们是皇帝的“基本盘”，新朝的精兵，是王莽最应该笼络的人。他们支持新朝，是因为新朝许诺要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不过，封建指的是“封土地、建诸侯”，他们早就被封爵成为诸侯，但土地却迟迟未封。

新朝的爵号基本上只是美称或包含寓意，像是荣誉称号，比如刘歆被封为嘉新公，“嘉新”是美称，很吉祥，但封地在哪里并没有体现。侯爵也一样，比如说符侯崔发，“说符”体现的是崔发最擅长的技能。同理，苗⁷被封为利苗侯，虽然确实有“利苗”这个地方，但作为爵号应该还是寓意“有利于农业”的意思，并非封地⁷。

这与汉朝不同。汉朝王侯们的爵号绝大多数体现着封国。诸侯王可以在封国里建立本家族的社稷；普通的列侯虽然不立社稷，但也能享用封国的食邑。因此，汉朝封爵第一件事就是勘验地图，确立国名，然后再进行授予印绶之类其他的礼仪。就连附城的前身“关内侯”，虽然没有封国，关内二字也体现着地理。

因此，新朝的贵族们绝大多数没有封国，例外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是早在汉朝就封爵并获得封国的人；一部分是王莽按照《诗经》国风的名号，建立了十几个公国，把自己的子孙们封了过去；此外还有子婴所封的定安国等。这些国的公爵们虽然有封国，但也都没有授茅土，有专门的部监或牧监来管理⁸。

新贵没有封国，食邑也就无从谈起。看到五色土坛，他们兴奋起来，因为汉朝的时候分封诸侯王，就是按照封国的方位，从对应的颜色中取出一小块土，用白茅包好赐给诸侯王，茅土要带到封国以建立社稷、宗庙，等等。

但汉朝只有诸侯王才有资格获得茅土，普通列侯只获得印绶和享受食邑⁹。王莽的封建改制比汉朝激进，他参酌古文经和今文经，“恢复”了他心目中的周代分封制，在附城以上，有五等爵制、三等封国。而且，

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诸侯，都可以被授予茅土。

如此说来，新朝的贵族们理应欢呼。这几年，王莽委派侍中、讲礼大夫孔秉负责勘验地图和户籍，还从州郡“借调”了一批精通地理的人来长安，在寿成室（未央宫）里专门辟出一座宫殿朱鸟堂，供孔秉等人校理。有些公侯已经多次跟着王莽到朱鸟堂视察过工作进展了。而且前不久，王莽刚刚重新划定了九州，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部监”，看来版图是确定清楚了。

仪式终于开始，礼官宣读起皇帝的诏书。但此时，有些站在前面的人隐约觉察到不妙。按照汉仪的经验，下一步要勘验地图，确立封国位置。今天来了两千多人，附城以上就有八百人，也就是八百个封国，那么绘制地图的竹简应该堆成了小山，但明堂之内只有五色土坛，没看见有地图。

后面的人听着诏书的侃侃而谈，说这次分封真正恢复了周代的圣治，第一等封国，是公爵封万户，地方百里；第二等，是侯爵和伯爵各封五千户，地方七十里；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各封两千五百户，地方五十里。连附城也有三十里的封地。加起来，这次分封了14个公爵、93个侯爵、21个伯爵、171个子爵、497个男爵，一共796人；此外还有附城1511人、有食邑的女性83人¹⁰。

如此宏大的分封，如此优厚的待遇，宣布后反而令贵族们感到不安，有人掐指一算，把天下所有的户口减去这次分封的户口，已经剩不下多少了，这还没算皇帝统治的国土。

诏书宣布完毕，礼官就按照爵位高低，把土包在白茅里授给诸侯，表示这就是未来封国的土地。接下来，就应该从五色土坛里取封国所在方位的土了，但一旁的王莽仿佛忘记了这回事。

为两千多人授茅土，不太可能都一个一个个来，爵位较低的可能一批批地授予，全部结束后，也已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诸侯们依然期盼着皇帝能够记起勘验地图这件事，没有地图就没有封国，这贵族的爵号就只是礼仪的摆设。

终于，皇帝玉音放送，谈起了地图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地图户口的勘验校理，工作量很大，到现在还没弄完，没法给大家确定封国，知道大家没有食邑，有些不担任官职的贵族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大家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每月几千钱的俸禄。

每个月才几千钱？

诸侯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场轰轰烈烈的分封大典，就在这沮丧、幻灭、上当受骗的气氛中结束。

没有食邑的租税，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没有官职的贵族为了生计，不得不自谋出路。京城曾有一次“舆情”，就是有位新贵不得不受雇于人去做工，令新朝的爵制颜面扫地。

王莽对此并非茫然无知，封国无法落实的原因不是地图勘验这一技术性问题，而是一旦付诸实施，中央政府就没法保证起码的财政收入，更别说赋予诸侯们以实际的治国之权了，只能先拖着。

这一拖又是五年。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六月，王莽又在明堂召集在京师的大小诸侯，再次举行授茅土的大典。

这次王莽显得很坦诚，直面上次分封没有授土的事情，说：“从始建国元年以来，我就在规划地理、考证经义以分封爵位，于今九年，终于确定了。今天，我亲自陈列茅土，告祭天神和祖先，正式给大家颁授封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养育臣民！封国在边境的，位于南方的，食邑不多，还可以从纳言掌货大夫那里领取俸禄，公爵一年八十万，侯爵伯爵一年四十万，子爵男爵一年二十万。”

比起五年前，不仅封国的事情明确了，连补贴的俸禄也空前增加。但是，这五年恰恰是新朝改制并不理想，与匈奴发生奇怪战争，经济形势变差的五年，哪来的财力支撑这次分封呢？

果然，封国也好，俸禄也罢，后面并没有认真执行，大多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爵来获得利禄以及封国的诸侯们，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如此，继续支持王莽的意义何在？

7．官僚体制的革新

晨光在宫殿的屋顶上折射出龙鳞般的光亮，王莽几乎又是一宿没睡。

有些年老的宫人会记得，当年未央宫寝殿的夜晚也是灯火通明，

成、哀皇帝饮酒作乐、彻夜不休，耳畔佩玉鸣鸾，眼前歌舞升平。现在未央宫换作了寿成室，寝殿的夜晚烛火依然。

但王莽却是在批阅堆积成山的简册。

宫人们会想，真不愧是新朝的皇帝，如此勤政，白天与大臣议政，晚上还要处理政务。但他们不知道，白天，王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赔上时间进宫，和皇帝搞“读书会”，早出晚归，经年累月，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务没有解决，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急务。与当代社会一样，这类事务虽然不是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只能越积越多，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晚上，王莽点灯熬油，宵衣旰食，的确勤勉。但很多事务并不重要，不是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他这么做，是吸取了自己曾架空汉帝的“历史教训”，刻意把大小事情揽过来，亲自研究、亲自处置，还刻意避开领机要的尚书们。他着意培养使用宦官，特别是财务、国库、粮食等要紧事宜，一概委派宦官管理。吏民的上书也都由宦官拆封送给他，不经尚书之手，怕尚书借此弄权或是泄露给外臣。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循例办理的工作，王莽也颇不放心，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大小事都要过问。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最后乱成一锅粥。

由此可见，不论是外朝的官僚，还是省内的宫官，王莽都不很信任。但种种迹象表明，不信任只是一方面，是权力斗争的浮沫。王莽的心态是觉得官僚们可有可无：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¹¹

意思就是：王莽觉得，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颁布了改制法令，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治的心态，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龃龉。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治，但不是说职官系统不发挥作用。《周礼》之所以改名为《周官》，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当然，事实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已经开始建立适合集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才创作出《周礼》，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总之，垂拱而治是儒家对周代宗法礼乐统治的想象与寄托，天子不必躬亲，但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及其体系。

但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况且，儒家早在贾谊那里就想给官职批量改名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也要给官僚机构改名，推动职官和爵位的融合，给地理行政区划改名，并设计新的俸禄制度。

刚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根据儒经改了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名称，例如河南太守改名为河南大尹；到始建国天凤元年，他又进一步更改郡守一级的官职名称，河南大尹又变成“保忠信卿”。

他还把行政职务和爵位挂钩，同为“太守”一级，由侯爵担任的叫“卒正”，伯爵叫“连率”，没爵位的叫“大尹”。这些有爵位的“太守”们甚至可以世袭官职。要知道，儒家讲究“讥世卿”，认为公卿大夫士关系到治民大事，应当任贤，不能世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而且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有的还反复改，改到四五次之多，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个别的大郡如陈留郡甚至被撤销。动作激烈且复杂，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一类是突出京畿的重要性，三辅的六个郡改为“六队”，长安周边的郡改为“六乡”，洛阳周边的郡改为“六郊”。新朝的国土从内到外形成了从高到低的礼法秩序。

一类是纪念符命和歌颂新朝，如把“符离”改成“符合”，“沛郡”改成“吾符”，后世出土的封泥里，也有不少带“符”字的地名；新朝的“新”字被加进许多地名，如“安汉”变成“安新”，“淮阳”变成“新平”等。

一类是表达美好吉祥，比如把“松兹”改成“诵善”，“敦煌”改成“敦德”，“曲阿”改成“风美”，“乌伤”改成“乌孝”等；有时常常用反义、同义

或是同音词来代替，比如“梓潼”改成“子同”，“安平”改成“安宁”，“东昏”改成“东明”，“无锡”改为“有锡”之类¹²。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视为荒谬之政。但是，改名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古人重视名学，讲究名实相符。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名背后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追求。新朝自认为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社会性质都变了，名字焉能不变？而且，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王莽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里、亭进行改名，只是还没实施¹³，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¹⁴，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很难落地：

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

“烦碎”二字意味着什么，大抵可以想象。不仅没能发挥激励作用，连起码的俸禄都发不下来，官吏们没钱养家，只能贪污受贿。

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王莽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管理经验丰富，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¹⁶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他坐在天下正中制礼作乐、发号施令，天下自动得到治理；各地的官僚、诸侯仿佛“神职人员”，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在这个图景里，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而不是变得混乱。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也不难理解。历史上，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社会就会立刻变好。但事实是，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古代更难。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法中央集权，只能委任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派出官僚治理。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内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行政体制的混乱，决策链条的断裂，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

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迟迟等不来回复，长年滞留于此。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召来服役的，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但这事儿没人管，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行政区大量改名，就得重新刻制印章，吏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还得在后面缀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

态。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按照常理，皇帝越是集权，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王莽虽然大权独揽，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很可能茫然无知。这可从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事略见一斑。

唐尊在汉末就是儒学名士，也是王莽最坚定的支持者。成为太傅之后，唐尊身着简朴的小袖短衣，出行时乘坐母马拉的柴车，居家时在干草上坐卧，吃饭时用瓦器当餐具，还把这些粗陋的餐具送给公卿，暗示他们也要勤俭。有时候，唐尊出行时看见男女并排走路，觉得有伤风化，就学着《尚书》里的“象刑”，把男女行人的衣服用红色涂抹一番，象征性地惩罚一下。

王莽听说后，大为宽慰，下诏让公卿们都向唐尊学习，把唐尊立为官僚的楷模，封为平化侯。

因为此事，后人常说王莽迂腐。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就是他眼中官僚应该具有的样子。

注释：

1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2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

4 《汉书·王莽传》，第4135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153页。

6 有说是横搜五次。但据汉武帝大搜十几日之情况推测，当是一次五天。

7 “附城”的情况较为复杂，如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汉书》明言

这是他曾担任使者、擅长“明告”（宣传）的意思。出土的新莽简里，有奉圣里、通耻里、墩讖里、仁勇里等，从字面看也是如此。但“里”是县下的行政区，与郡县性质不同。例如北京有“建国里”社区，既是存在的地区，也是美称。

- 8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 9 以上汉代诸侯王的册命礼仪，参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10 《汉书·王莽传》，第4129页。
- 11 《汉书·王莽传》，第4140页。
- 12 王莽显然把“无锡”的“无”字理解为“没有”，但无锡、乌伤等地名，应是吴越古老方言的音译。
- 13 孟祥才：《王莽传》，第219页。
- 14 孟祥才：《王莽传》，第225页。
- 15 《汉书·王莽传》，第4143页。
- 16 纸屋正和认为，王莽长年在京师，只有短暂的遣就国经历，因此“对地方一无所知”，“并没有处理行政实务的官员经验”，见氏著《汉代郡县制的展开》，第4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但考虑到王莽在称帝之前已总揽行政事务多年，且治理卓有成效，绝不可能如此。

三、再造危局

8. 谁是刘秀？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南阳郡舂陵白水乡，刘氏皇族的后裔刘秀正在勤勤恳恳地务农。他今年十九岁，在家族里被公认为忠厚内向。他的兄长刘縯任侠仗义，是“社会青年”，常常嘲笑刘秀热衷务农。

刘秀热爱务农，除了他性格上温厚安定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相对安定，有踏踏实实务农的条件。

这是新朝建立的第六年，几年来朝廷大张旗鼓地搞了许多改制，设王田、禁奴婢、搞六筭，特别是钱币改来改去，令大家倍觉不便。好

在，王田制已经在前两年取消；六筭虽然加重了务农的负担，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最令人恼火的钱币，也在今年改得简单易用多了。

这几天，朝廷新发行的“货泉”刚开始流通，本地人就纷纷说这个钱特别好，简直是给白水乡铸造的呢。刘秀也拿着一枚仔细看，这钱和以前汉朝的五铢钱很像，重量和形制都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字变了，确实，这“货泉”二字怎么看都像是“白水真人”四个字！“货”的篆书从右到左，好像“真人”；“泉”的篆书从上到下，好像“白水”。刘秀笃信谶语，虽然说不清楚“白水真人”有何寓意，但对这款新钱很是喜欢。



图7.1 货泉

刘秀小时候父母去世，一直是当过萧县令的叔父刘良照顾他。最近，叔父为他的前途所计，要他收拾行装，进长安，入太学，做太学生。当今天子最重儒学，将来要想入仕，非通经不可。刘秀也很希望出去看看，以前他去过的“大城市”主要是新野，对新野最有名的美女阴丽华心向往之，但倘若一直务农，娶阴丽华是绝无可能的。

从白水乡到长安城，从田间地头到太学，刘秀的视野大为开拓，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仅有务农的才能。他交际能力强，很快融入长安的“老乡会”，和南阳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请他们下榻在自己尚冠里的住处，了解信息，不懂就问；他头脑也很灵活，和同居的舍友凑钱买驴，租给别人赚钱交学费；他为人诚实厚道，有次去见老乡、同学朱祐，朱祐刚好要去上课，刘秀竟然一直等到他回来，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诸如此类。

他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有了变化。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出行，仪仗威严，就去围观，发出一句很有名的感慨：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¹

且不提刘秀此时的志向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娶个老家的美女而不是什么大明星，关键是这句话透露出，即使在始建国天凤年间，新朝的天下特别是关内还是比较稳定甚至热闹的。

当然，二十出头，身处京师，又是太学生，正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年龄。刘秀对朝廷政策兴趣浓厚，对社会问题也有比在家乡更切身的认识，在朋友同学里就像一个业余评论员：

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²

就是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朝廷的新消息，还为同学舍友分析解说。江湖上早就传言着纬书《赤伏符》里的一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刘秀的朋友说，“这说的是新朝的国师刘秀吧。”如前所述，新朝的国师刘秀，就是刘歆，他是在汉哀帝刘欣即位时出于避讳改名为刘秀的，不承想这条谶言流传甚广，连南阳的微末宗室刘秀也听说了。刘秀就开玩笑说：“咋就知道说的不是我呢？”引起哄堂大笑。³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朝廷重申六筦之令，监督和惩罚措施更严更重，触犯的人有可能被判死罪，很多人逃亡以躲避惩处，关东和荆州都出现了“盗贼”。

在关东，会稽一带出现了“瓜田仪”叛乱，从“瓜田”两字看，应是逃亡的农民；琅琊郡出现一支由吕母带领的叛军，吕母原是当地富户，因儿子被县宰冤杀，吕母散尽家财、购买兵器，招募亡命、以图报复。这种事在汉朝很常见，与六筦本没有直接关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竟然有百余人投奔吕母，而且不是以前那类游侠、歹徒，而是逃亡的贫穷少年。吕母于是自称将军，带领这些人攻进县治所，杀掉县宰，割下首级，祭奠儿子，大仇得报。这么大的动静已经不是一般的复仇行为，和叛乱几乎没有区别，吕母干脆带着这些人继续亡命，逐渐聚起万人之多。

王莽派使者去安抚。回来之后，一位使者禀报称：这些盗贼匪患，赦免了也没有意义，我们一走，他们又聚。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谋生，他们回答：法律禁令苛刻繁多，举手触禁；努力谋生，所得还不足以交税；就算宅在家里，邻居犯法自己还被连坐；所以，只能当土匪。

王莽一听，好像是在讽刺自己，大怒，立刻将使者免官。后面发言的使者们，见状纷纷说，“这些刁民应发兵剿灭”，“匪患不足为据，一定会自生自灭”。王莽这才受用。

不仅是使者，纳言冯常向王莽上谏，给六筦提意见，惹得王莽大怒，被免官；拟任的荆州牧费兴是王莽宠臣，临行前被问到任后如何治理，费兴推心置腹地讲，六筦与民争利，再加上连年旱灾，所以荆州的百姓才会逃到“绿林”里当“盗贼”，因此到任后不打算征剿，而是减轻赋税，借给耕牛和种子，根除问题，没想到王莽又不悦，当场免了费兴的荆州牧。

王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认为新朝的政策有问题，哪个时期没有盗贼呢？以前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不照样有吗？汉武帝时，天下都“户口减半”了，不照样渡过了难关吗？

这些朝堂之上的事情，太学里的刘秀不一定都清楚。但他应该能看见、听说和感知，到始建国天凤年间的最后一两年，天下特别是关东地区，连年出现大面积旱灾和蝗灾⁴，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价格飞涨，一斛粟米能卖到一斤黄金。

在不发达的古代，就算是丰年，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更别说吃饱。因此每逢天灾，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六筦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内地的饥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于是一并沦为啸聚山林的“盗贼”“匪患”。而此时，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恰好正在改制，郡县在改名和划界，俸禄纷扰未定，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基层官吏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到始建国地皇年间，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⁵

这是汉武帝之后，再一次出现户口减半的严重状况。当然，户口减半并不是说天下死了一半人口，这其中包括逃亡和服刑人员。汉武帝时期的户口减半，与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有关；但新朝，在战斗中死亡和被俘虏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因法令苛刻而获罪，饿死、病死以及大量逃亡才是主要原因。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一带，一支由王匡、王凤⁶、王常、马武等人领头的饥民逃入南方的绿林之中，汉水之上，距离刘秀的家乡不远；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底，吕母所在的琅琊郡，由樊崇等领头的饥民，也聚众劫掠，吕母的万余人马亦汇流其中。

这两支“盗贼”，分别就是日后著名的绿林兵和赤眉军。但现在，他们还和其他地区的流民一样，尚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只在地方郡县的视野里。

大概就在此时，刘秀返回了故乡。对于天下的种种变化，他还会继续观察、体悟。在故乡，已经二十五六岁的刘秀，沉稳的性格和游学长安的经历，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敞委托刘秀到长安帮他打个官司。

刘敞是汉朝时候的舂陵侯，翟义的兄长翟宣的亲家，汉末曾被牵连进翟义的叛乱，所幸后来他态度好，被王莽树为拥护他的典型。而此番诉讼，涉及始建国地皇元年十二月⁷之前他地租上的两万六千斛粮食和充抵草料的钱若干万。从这个事情看，首先，刘敞虽然没了爵位，但在新朝仍然过得比较舒服；其次，直到始建国地皇元年，舂陵一带仍然比较稳定，没有受到关东的影响和绿林的冲击；再次，选择刘秀帮他打官司，除了刘秀踏实能干、熟悉长安，关键是看不出他有造反的想法。

刘秀再次奔赴长安，拜谒时任大司马严尤。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宛城的一个人，据说严尤接待他们二人时，注意到刘秀“美须眉”，长得帅，因此只和刘秀一个人说话。刘秀给了严尤很深的印象。用不了几年，他俩将会在战场上再见。

9. 赤眉军的兴起

这次重返长安，刘秀在办事之余，惊讶地发现南郊正在大兴土木，被征发的人日夜在工地服役，每天都有人累病而死。

原来是修建九庙。

京师的执法们，正在穷治一起大案。巨鹿郡有人谋反，联络发动燕赵一带的军队起兵，事情被大司空王丹发觉，皇帝派三公亲自督办，案子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都被诛杀。

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刘秀返回了家乡，他敏锐地觉察到天

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这或是因为关内一直比较稳定。不过，到了始建国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⁸，关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呈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王莽并非没有危机感。起初，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任命所有的州牧为大将军，郡长官为偏将军，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在荆州，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两万人攻打绿林兵，结果被击败，数千人被杀，輜重全部损失。绿林兵乘胜回击，攻克数县，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同样是这年，樊崇和琅琊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合流，达到数万，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在姑幕县⁹，与前来征剿的冀平连率（即北海太守，冀平是从原北海郡分出的郡）田况遭遇，并击败田况军。此后，他们从琅琊郡辗转打到泰山，势力大盛，成为关东主要的反叛力量。

而在边境，王莽派国师和仲（即国师副手）曹放增兵西南，攻打句町国，同时继续从全国征发物资转运到北方边境，以备攻打匈奴。

如此四面开花，同时进行好几场战争，王莽应接不暇，不得不认真考虑根本解决叛乱、民变以及边疆战事的办法。他下令召集群臣，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开一个“擒贼战略座谈会”。

但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的群臣，都已熟悉王莽的习惯。会上没人敢说实话，却大谈叛贼是行尸走肉，很快就自生自灭。

这时，有一位故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当年汉哀帝死后曾与何武互相举荐为大司马的故汉左将军公孙禄。

公孙禄早在安汉公时期就被排斥出政坛，这反而使他在之后的诸多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考虑到他是前朝能臣，又担任过高级军职，这次廷议将他一并延请。公孙禄站出来，说了一番真心话：要想平息叛乱，只靠军事讨伐是不行的，根子在内政，因此，只要杀掉七个人，告慰天下，叛乱自会荡平。

哪七个人？

一，太史令宗宣，他胡乱解释天象，把凶说成吉，诳误朝廷；

二，太傅、平化侯唐尊，根本不懂政治，以虚伪的简朴博得名位，有害政务；

三，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六经，废毁师法，还把什么《周礼》伪经立在学官，导致天下学术败坏；

四、五，明学男张邠和地理侯孙阳，他们搞井田制，使百姓抛弃农耕；

六，羲和鲁匡，设立六筦，破坏工商业；

七，说符侯崔发，阿谀奉承，阻碍下情。

同时，还要停止和匈奴的对峙，尽快和亲，恢复和平。

王莽越听越不高兴，立刻吩咐虎贲进来，把公孙禄带出会场。公孙禄所说的，几乎涵盖了新朝改制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否定王莽，他焉能不生气？这场座谈会就此草草收场。

但是，细究公孙禄所说，有些也属于书生之见。宗宣、唐尊、刘歆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观念和学术，影响在上层而非社会；张邠、孙阳负责的王田制，早已停止实际运作，大概只留了个名目。这几位委实不必为新朝形势的败坏负主要责任。只有六筦之政、崔发的谄媚和与匈奴的对峙，比较在点上。

公孙禄这一番话，王莽虽怒，却听进去了。但是与匈奴的对峙，他已经错过了和亲的机会，骑虎难下，只能将错就错；其他人里，只有鲁匡可以借来为六筦塞责，就将鲁匡贬为五原卒正（即五原郡太守）。

但这已经于事无补，流民刚起来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喂饱肚子将其平息。例如樊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这些农夫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建立文号、旌旗、标志的意识，别说称帝夺权，连将军都不敢自称，领头的樊崇叫“三老”，其次是从事，都是基层官职的名称。他们的组织结构也简单，主要靠“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等基本伦理来约束。因为，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造反，而是：

常思岁熟得归乡里。¹⁰

就是不劫掠郡县、杀人抢劫，只是到处寻找食物填饱肚子，熬到下一茬粮食熟了，还得回家过日子。

有一次，樊崇军经过一处地方，当地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女，樊崇

军认为，惊扰了大孝之人会得罪鬼神，不仅没有劫掠，还给这位孝女留下了米肉。¹¹

如果这时朝廷能够调动粮草安抚，赦免其罪，鼓励他们回到家乡，那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王莽坚持镇压，而且从中央调派了太师羲仲（太师的副手）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发兵。这支政府军所到之处，侵扰百姓，消耗物资，郡县还要做好接待。仗还没怎么打，先把经过的郡县给破坏了一遍。

翼平连率田况吃了败仗后，吸取教训，了解樊崇军其实都是些农夫，只是人多难以击败，因此不再单纯依靠常备军，而是发动郡县里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发给武器，组织成民兵，各自负责本乡本土的保卫。

这一招果然见效，樊崇军游走到这些地界，觉得无利可图，就辗转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皇帝派来的“王师”景尚，竟然一不留神被樊崇军打死了。

看到田况的成效，听说了景尚之死，王莽若有所悟，委派田况兼领青州、徐州牧职权，但又不允许田况擅自征兵，又派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兵到关东征剿。

比起景尚、王党，王匡和廉丹的级别更高，王匡还是皇亲。田况争辩说，饥民太多，军队远道而来，人少兵疲，于事无补，而且接待高官，“郡县苦之，反甚于贼”¹²，最好把他们都请回去，由我来负责平叛，一定能平定。

田况的自信反而引起王莽不满，史书用了一个词“畏恶”¹³，细玩其意，既有对田况能力的畏惧，也有嫉妒和自卑。王莽于是派了个使者去接管田况的兵权，将田况召到长安授予职位，明升暗降。自此，樊崇军再无对手。

10．赤眉军的胜利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长安，宣平门外。

王莽正在雨中亲自祭祀路神，以饯别一支军队，为首的是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他们准备赴关东远征樊崇军。王匡是王音之孙、王舜之子，还很年轻；廉丹是新朝老将，廉颇后人，经验丰富，两人位高权重，带领十万大军出征，寄予了皇帝一举荡平关东的厚望。

此番出征，不仅有军事意图，还要兼顾赈灾。前些日子田况给皇帝的上书提到，洛阳以东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两千钱，来自关东郡县的报告上也惨痛地说“关东人相食”。因此，他们还要在关东打开粮仓，赈济饥民。

雨下得很大，把军人的衣服都淋湿了，给原本雄壮的出征仪式蒙上了一丝悲壮和不祥的色彩。有老人哀叹地说，“是为泣军！”¹⁴

但真正要哭泣的，其实是饥民。王莽虽然取消了山泽之禁，打猎捞鱼不用交税了，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更荒诞的是，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传授一种方法，据说把草木煮成酪能够充饥。

关东的饥民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出关的王匡、廉丹十万大军，又加重了关东的局势。正如田况所预料的，大军所过之处，比流民更甚。以至于关东有谚语说：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¹⁵

王匡比赤眉可怕，廉丹比王匡还可怕，这个链条透露了廉丹的残酷。但战争哪有不残酷的？这侧面反映了廉丹比王匡更像一名将军。自四月出征，王匡、廉丹到了定陶，还没有与樊崇军作战，皇帝的诏书先追了上来。

王莽斥责廉丹，“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¹⁶。这话说得很重，但其实就是催促廉丹尽快荡平关东，不要蒙上贪生怕死之名。

廉丹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但皇帝直接催促进兵，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诏书拿给自己的下属、将军掾冯衍看。冯衍是汉元帝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之孙，冯昭仪的孙子是汉平帝，算起来，冯衍和汉平帝是兄弟。因此，冯衍对王莽是很抵触的，看到诏书，就劝廉丹不要出战，而要拥兵于大郡，招降纳叛，以待时变。

廉丹不敢，大军继续前行，到了睢阳¹⁷，冯衍又一次劝说廉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延宕就没有机会了。

廉丹最终没有听从冯衍。他与王匡在冬天时抵达有盐亭，就是改名前的无盐县。这里已经被一名叫“索卢恢”的叛军占据。王匡、廉丹迅速将其攻克，斩首万余级，取得了一场大胜。

王莽很高兴，派中郎将劳军，将廉丹晋爵为平均公。王匡受到激

励，侦知有一支号称赤眉的队伍由董宪统领，驻扎在梁郡，就很想乘着士气高昂，一举击破。董宪其实和樊崇军没有直接关系，是自立的一支武装，只是以赤眉为号。廉丹却认为，刚打下无盐，士兵都很疲劳，应该休养一番，恢复士气。王匡不听，自己带兵出发攻打董宪。

见此情景，廉丹不得不紧随其后，在成昌县¹⁸，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匡、廉丹惊奇地发现，这些人之所以叫赤眉，是因为他们把眉毛染红了。而且，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一番激战，王匡、廉丹兵败。

王匡见状，主张尽快逃走。廉丹心里如何想已经不得而知，但面对一个冒进失败又没有担当的同僚，该是非常无奈吧。他派属吏把印玺、符节等重要的凭信都交给王匡，说：

小儿可走，吾不可！¹⁹

称王匡为“小儿”，有愤激指责的意思，但也可能是把王匡还当作孩子。而他不动的理由，想来该和王莽的那封诏书有关。廉丹交代完后事，带领残兵力战而死，果然实现了诏书里“捐身中野”的话。

廉丹的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位将军见到主帅阵亡，都说“廉公已死，吾谁为生？”²⁰纷纷骑马冲入赤眉军阵，全部战死。由此可见，廉丹的确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合格军人，既不辱没先祖廉颇，孙子廉范也能因为贤能仗义在东汉扬名天下。王莽派他出征，不无识人之明。

冯衍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侥幸逃出乱军，向河东逃命去了。

得知廉丹阵亡，十万大军只剩下王匡的残军，王莽悲痛不已。但他仍然不重视田况的忠告，继续选拔将领东征。这时，早就被他晾在一边的国将哀章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去东方支援。

哀章虽为四辅，手中却没有什权力，被认为是王莽最轻贱的人。而且他贪恋禄位，有贪赃徇私之事。王莽得知后，没有惩处他。正好当时给四辅配备副手，也就是太师羲仲、国师和仲、太傅羲叔，以及国将和叔。而这位国将和叔，名义上是哀章的副手，实际上是派来监视他。几年来，哀章在长安过得不舒服，想去关东立功，也躲避监视。

王莽同意了，令哀章带兵驰援王匡，又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带兵十万赶赴洛阳，很快就重建东方防线，但防线已经萎缩到洛阳

一线，再往东的地区，只有王匡和袁章的弱旅。赤眉军则从东海、琅琊诸郡，到楚、沛、汝南、颍川诸多郡县，四处转进，与各地郡县的政府军战斗，胜多败少。皇帝在东方战场彻底失败。

11．绿林兵的兴起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的一个夏日，宫人恐惧地向王莽禀报，从东方飞来了无数蝗虫，遮天蔽日，王路堂和其他宫殿楼阁上都爬满了，赶都赶不走。

这是典型的灾异，王莽再无能力将其“反转”，只好发动吏民捉蝗虫，捉到的有赏。他理应知道，如果关东的蝗虫已经飞到长安，那么关东的旱灾和饥荒也在日益逼近。

饥民为了躲避饥荒和东方的战事，也波浪一般地向西流动。按照以前不成文的惯例，每当关东出现大饥荒，关中总会接纳部分饥民入关觅食。

这次也不例外，入关的饥民累计达到数十万人，有些还涌入了京师。王莽没有排斥他们，还任命专门的“养贍官”赈灾。尽管《汉书》说赈灾的官员中饱私囊，负责京师赈灾的中黄门还欺骗王莽，但这十万饥民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大规模劫掠，说明王莽的赈灾总体有效，是他执政晚期不多的亮点。

刘秀家族所在的南阳郡也出现了旱灾，而关东的饥民恰好在此时往西迁移。荆州各郡县的豪杰地主官吏们大受震动，关东的形势坏到什么样子，他们是知道的。如果饥民振臂一呼，俨然就是另一个赤眉。刘秀家种的是水田²¹，情况好一些，但如果再涌入饥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当地凡是有条件有资源的，都会组织宗族成员防御，以备时变。

于是，这一年的荆州，渐渐出现三种不同的势力。

前番击败荆州牧的绿林兵，内部发生了瘟疫，死伤颇多，为避免“团灭”，绿林兵一分为二，向外转进。其中，王匡、王凤带人北向南阳郡，号“新市兵”；成丹、王常带人西向南郡²²，号“下江兵”。始建国地皇三年七月，新市兵进击南阳郡的随县²³，虽然没有攻下，但平林县人陈牧起兵响应，号称“平林兵”，正在逃亡的刘秀族兄刘玄此时加入平林兵并担任官职。至此，源出绿林兵的这三支队伍逐渐超越“盗贼”的规模，成为荆州最具活力的军队。

为了应对，王莽也做出军事部署，大致有三支力量。其中，最前线的是南阳郡本地军队，由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率领；南阳郡东边的豫州，司命大将军孔仁统领一军，以作纵深；主力由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率领。但是王莽却不给他俩兵符。因此，二人虽然号称主力，却无权调发军队，每次调动必须先请示王莽。严尤自认忠诚，对此感到寒心，和陈茂发牢骚说，“遣将不给兵符，这就好比猎犬被拴着，还被要求必须抓到猎物。”陈茂也有同感。

第三种势力，就是刘縯和刘秀的舂陵兵。

此时，刘秀曾经帮助打官司的故舂陵侯刘敞已经去世，刘縯等人在宗族里已经冒尖。刘敞的嫡子刘祉是翟义的妹夫，他为人敦厚，一直跟从刘縯。

起初，他们大概只是组织舂陵的刘氏宗族防备饥民，可能也防备来到南阳郡的绿林兵。但刘縯素有大志，见天下已有崩坏的迹象，开始密谋些事情，不巧泄露。刘秀唯恐被牵连，跑到南阳郡的新野躲避，往来于宛城贩卖粮食，由是结识了宛人李通。李通曾任新朝五威将军从事，后任巫县丞，在新朝的各类改制中利益受损。李通的父亲在长安，是刘歆的助手，精通天文，告诉儿子说图讖已经昭示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征象。

李通于是怂恿刘秀起事反莽，刘秀起初并不愿意。李通锲而不舍，反复游说。刘秀得知刘縯已准备在舂陵起事，最终答应了李通，约定在十月²⁴和李通在宛城起兵，与兄长呼应。

十月，武器准备停当，刘秀先和李通的弟弟李轶启程返回舂陵，留下李通在宛城负责起事。没想到，此事竟然泄露，李通在宛城的宗族六十四人被杀并在宛市焚尸，只有李通一人逃走，他在长安的父亲及其他亲属也一并被杀。刘祉在宛城的家人也全部被捕。

刘縯仍然按照计划于十月在舂陵正式起兵，以刘氏宗亲为主，有七八千人，号称柱天都部，这个名号很有趣，当年翟义起兵时就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

见此，一些不愿意起兵的刘氏宗亲吓得逃跑，生怕重蹈当年翟义灭族的覆辙。十一月，刘秀、李通等人先后到来，众人一看连刘秀这样浓眉大眼美髯须的人也身着战袍造反，便又放心了。

就此，刘縯带着二十八岁的弟弟刘秀正式起兵，打出了舂陵兵的旗号。²⁵

相比较而言，荆州的这三支势力里，春陵兵最弱。加之宛城起事的失败，春陵兵势单力薄，就派人找到新市兵、平林兵两支绿林队伍商议加入，最终三支军队合并，联军仍称绿林兵。这段故事，史书描述为新市兵和平林兵主动投奔春陵兵，显然是为了抬高刘秀而将情节扭曲了，这时的刘秀连匹马都没有，只能骑牛。

但也要承认，刘縯、刘秀等一批出身豪杰、知识水平高且具有前朝皇室血统的精英加入绿林兵，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绿林兵的战略格局。绿林兵很快就向西进发，一路过关斩将，连克新野、湖阳等县，进展顺利。刘秀作战勇敢，斩杀新野尉，终于有马可骑了。

初步胜利，却发生了一个插曲：分战利品时，大概是春陵宗族拿得太多，表现贪婪，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其他绿林兵一度想要攻杀春陵兵，幸好刘秀觉察，督促宗族把财物匀给别人，避免了一场内讧。这证明了刘秀的领导才能，但更反映了绿林兵并没有“人心思汉”，把春陵兵看作来投靠自己的弱旅，敌意颇深。

在这件事里，刘玄是何种态度，史书未载，但他早就加入平林兵，很可能没有站在同宗的立场上。这大概也是后来绿林兵立刘玄为帝，而不会选择刘縯的渊源之一。

避免了内讧的绿林兵继续前进，再克棘阳²⁶，兵临南阳郡首府宛城之下，并厉兵秣马准备攻打。早在王莽居摄时期，与春陵侯同属长沙王世系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也曾攻打宛城，但很快失败。时隔十六年，相似的形势再次出现。

宛城中驻守着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作为郡守一级的高官，他们手下的军队训练有素。绿林兵打算先进驻到棘阳与宛城中间一处叫“小长安”的聚落，但没想到刚到小长安，就迎面遇上甄阜和梁丘赐的军队，当天大雾弥漫，绿林兵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

特别是春陵兵，本来就不是职业军队，刘氏宗族包括女眷、儿童都在其中，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刘秀的二姐及三个女儿、兄长刘仲、叔父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

甄阜、梁丘赐乘此大胜，把监狱里刘祉的母亲妻儿等全部杀死，并图谋一举荡平绿林兵，就把辎重留在后方，率十万军队渡河，连河上的桥都断了，以示破釜沉舟之志。而绿林兵经此一役，元气大伤，想就此散伙，逃回山林。

对刘縯、刘秀来说，这决不可能接受。绿林兵来自山林，当然可以

复归山林，刘氏家族能去哪里呢？

一筹莫展之际，另一支绿林兵，即一度西去南郡的下江兵，被严尤、陈茂击败，辗转也来到南阳郡随县附近，经过整顿，势力复振。刘縯赶紧去联络，面对下江兵的首领王常，说了一番“人心思汉”的道理，竟然说动了王常。王常和下江兵其他首领商议，别人都觉得现在各自为主，何必受他人辖制，王常却坚信汉家将复兴，最终劝说下江兵合并到绿林大军，王常本人也与刘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

自此，绿林兵开始表现出某种“思汉”的特征，但细究其逻辑，作为情感的“思汉”仍然很微弱，但作为政治的“思汉”其价值终于被发掘。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思汉”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再没有什么比汉朝的旗帜最能体现反莽了。以复汉为号召，不仅能笼络人心、坚定同盟，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换言之，“思汉”本身并无政治意义，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因此，绿林兵这支源于流民的乌合之众，军事上重振旗鼓，更逐渐演进为时代舞台上参与角逐的政治力量。而当时在关东流窜的赤眉军虽然军事力量更强，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仍然属于“流寇”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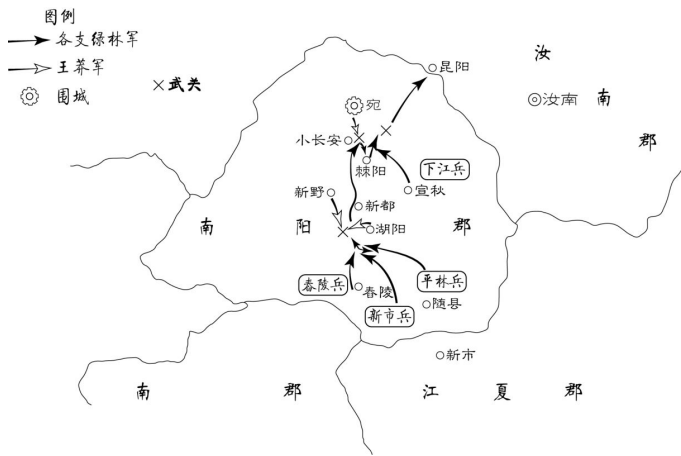


图7.2 绿林兵前期发展简图

十二月底，绿林兵侦知甄阜、梁丘赐把辎重留在了后方，抓住时机派军偷袭，在十二月最后一天夺取全部辎重。政府军军心大乱，还未有所行动，到第二天，也就是始建国地皇四年正月初一，绿林兵分两路总攻背水一战的政府军，将其杀得大败；甄阜、梁丘赐俱被斩杀。

得到消息的严尤、陈茂见形势危急，担心宛城空虚而被占领，迅速

向宛城开进。绿林兵也火速收拾战场，向宛城进发，双方在宛城南部的育阳交战，严尤、陈茂也被击败，仓皇逃走。

宛城中，仅剩棘阳令岑彭和前队贰（即南阳副太守）严说驻守，兵力不多，能依靠的只有险要的地形、坚固的城池和还算充足的粮草。

绿林兵主力将宛城团团围困，负责攻城的是刘縯。正是在宛城之下，刘縯给自己打出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

12．昆阳之战

比起刘玄当时号称“更始将军”，刘縯的“柱天大将军”俨然以天下顶梁柱自诩。绿林兵里的高级首领们，对此不可能没反应。

绿林兵既然有了复汉的政治意识，那么将其政治实体化是很必要的。而且，击败甄阜军之后，从各地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也具备了政治实体化的条件。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初一²⁷，在育阳附近的淯河岸边，绿林兵正式拥立刘玄为皇帝，改元为更始，这个年号既是因为刘玄曾担任更始将军，也寓意“重新开始”、重建汉朝的意思。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也就成了更始元年二月²⁸。

据史书说，刘玄是因为懦弱容易控制才被绿林兵立为皇帝的，在即位大典上，他紧张地满头冒汗，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绝不符合一个杀人全家、逃亡多年的歹徒形象。刘玄被拥立并不奇怪，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秀的声誉，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玄在绿林兵中的作用。但是，刘玄和刘縯、刘秀同属刘氏皇族后裔，在血统上没有区别；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縯兄弟，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彼此更信任；他在绿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縯，刘縯最为倚靠的舂陵兵损失惨重，没有和刘玄博弈的资本。因此，刘玄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更始即位，大封群臣，除了绿林诸首领外，刘縯被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封汉信侯；刘秀被拜为太常偏将军。这亦可说明，更始帝比较尊重刘縯，没有亏待他，刘秀此时也确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偏将军的职位已不算低。

不过，当时条件确实简陋，所拜官职也五花八门，比如李轶被拜为五威将军，这是新朝自创的名号，按理说不应被重建的汉朝使用。刘秀

连大印都没有，不知从哪里捡了一个“定武侯家丞印”，佩戴上朝。

天下有了两个皇帝。长安的皇帝大为惊恐，他花费毕生心血将汉朝抹去，成功做到十多年来几乎没人思念汉朝，起兵的多是“匪患”和“盗贼”。但从现在开始，汉朝重建，再造危局，他回到了原点，就像妖怪被打回原形，难道要从头开始吗？

更始帝令刘縯继续以主力围攻宛城，又遣一支军队向后方攻打新野；王常、王凤、刘秀则领兵北上，更始元年三月已占据颍川郡的昆阳、定陵、偃县²⁹，打开了通往洛阳的门户。

当然，局面并非无可挽回。王莽一方面继续下令在东方的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等人把牢东方战线，阻挡赤眉军西进；一方面派大司空王邑迅速赶赴洛阳，和司徒王寻尽快征集州郡属兵。元年五月，王邑、王寻带领所征各郡县的军队，南下至颍川和严尤、陈茂军会合，加上后勤人员，总兵力号称百万，其中已经集结的四十多万，王邑为主帅。

可以判断，王莽将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这支大军上，一场决战在两个皇帝之间酝酿着。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旌旗辐重，千里不绝”³⁰，其中还有一个巨人名叫巨毋霸。此人是始建国天凤末年，夙夜连率³¹韩博向王莽推荐的。韩博在上书中对巨人大加赞美，称他是上天所降，辅佐新朝，特别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愿陛下作大甲高车，赍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安天下！

这句话乍看没什么，但细读就会有些“阴阳怪气”“高级黑”，一个从民间得到的巨人，需要由皇帝建造大车，遣大将和虎贲百人迎接吗？而且，京师里门户太矮的，还要为了让巨人进来拆了重盖？一个巨人，就能达到恐吓四夷、安定天下的功效？

更何况，王莽的字是“巨君”，不就是巨人的意思吗？

王莽当时很不舒服，又没有理由发作，先把巨人接到长安附近养了起来，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韩博杀了。

而今，天下形势危急，王莽又想起这个巨人，令他一并出征。队伍里还有许多老虎、豹子、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及六十二家据说精通兵法的高人术士。后世，玩电脑游戏《魔兽争霸》，观电影《指环王》，

可以想象这支大军的样子：有黑压压的步兵、骑士，有科多兽、狼骑士，有法师、山丘巨人……

这样一支极富想象力的大军来到昆阳附近，更始军无不胆战心惊，纷纷就近躲进昆阳。王凤、王常、刘秀都在昆阳城中，他们站在城墙上眺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百万大军正在集结，旌旗遮天蔽日，赶来的队伍源源不断，根本看不见地平线在哪里³²。

气氛凝重之时，有人建议诸将放弃昆阳，分散突围，退回南阳。刘秀站出来说，现在敌军太过强大，如果大家合力防御，还能撑一下；倘若分散作战，后面就会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将起初大怒，诘问刘秀说得容易。但刘秀表现得比较沉稳，提出了他的策略：王常、王凤留在昆阳带领全部七八千兵马留守，而他本人带几个人冲出去搬救兵。

与此同时，昆阳城外，王邑军大营内，也为下一步的战略吵得不可开交。

主帅王邑主张迅速攻克昆阳，然后南下剿灭更始军。严尤不同意，他认为，昆阳虽小，但城池坚固，不是旦夕可以拿下的。称帝的刘玄才是大军的主要目标，所以大军应该绕过昆阳小城，迅速南下，趁着宛城还没有被更始占领，尽快剿灭更始政权，到时候昆阳自己就会投降。

严尤的策略确实是老将之言，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抓主要矛盾”。但王邑却不认同，他不是不同意尽快剿灭更始，而是没有把昆阳放在眼里。在他看来，百万大军横扫昆阳没有难度，“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³³听上去确实很文艺很过瘾，似乎也不耽误剿灭更始的时间安排。

而有些从昆阳城中叛逃到王邑军中的士兵，也向王邑等将帅讲了城里的事情，听说城内有刘秀在参谋方略，严尤倒是笑了，说：刘秀，就是几年前来找我打官司的那个须眉甚美的人吗？没想到是他呢。

确实是他。这天夜里，刘秀、李轶等十三人悄悄骑马从昆阳南门遁去，当时王邑军已经驻扎城外，尚未大举合围。第二天，王邑就下令将昆阳重重包围，建立的云车比城墙都高，可以俯瞰全城，同时挖掘地道，冲车撞门，箭矢如雨。

严尤见此，又提出异议，按照孙子兵法，穷寇不要追，围城留缺口，这样一方面避免敌军做困兽之斗，一方面可以故意放出一些敌军，

消耗守军力量，还能散播我军强大的消息，从而打击敌军士气。

不愧是曾智取高句丽的名将，但这经验之谈王邑依然不听。不仅如此，城中的王凤、王常已经顶不住了，派使者来乞求投降，王邑还是不许。站在王邑这边的还有同宗王寻，他们都觉得昆阳旦夕可破，不需要给对方投降的机会，等城破后还要痛快地屠城呢。

王凤、王常乞降被拒，彻底死心，纠集众人奋力守城，期待刘秀尽快赶来。刘秀也不负众望，马不停蹄跑到偃县、定陵，把当地能召集的军队全部征发，但即便如此，才几千人而已。听说刘縯还没把宛城攻破，刘秀深知形势危急，不敢耽搁，急率这几千人重返昆阳。六月初一，进发到距离王邑军四五里的地方陈兵列阵。

王邑当然不把救兵放在眼里，似乎怕肉不够吃，还下令各部军队一律不准轻举妄动，由王邑、王寻二人亲自率领万余兵马³⁴，上前与刘秀军对峙，遣数千人出战。刘秀也披挂上阵，斩首数十级，还带领部分兵马冲到昆阳城下，向城中送入使者，称刘縯已经攻克宛城，援兵马上就达。事实上，三天前宛城守将岑彭确实投降了，但刘秀尚不知晓，只是虚张声势以提高守军士气。刘秀还故意把宛城被攻占的假书信丢掉，让消息传到王邑军，以影响王邑军的士气。

面对大军，刘秀只能智取，他带领三千敢死队员，绕到昆阳城西的河流上，找准王邑、王寻所领中军的位置，犹如打蛇之七寸，直接冲入其中。王邑、王寻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而其他的军队因为王邑有令不准妄动，都驻足观望。电光石火之间，刘秀军已经斩杀王寻。昆阳城中的王常、王凤也趁机鼓噪而出，形成奇兵，呼声震天。突然又有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王邑军大感惊惶，迅速溃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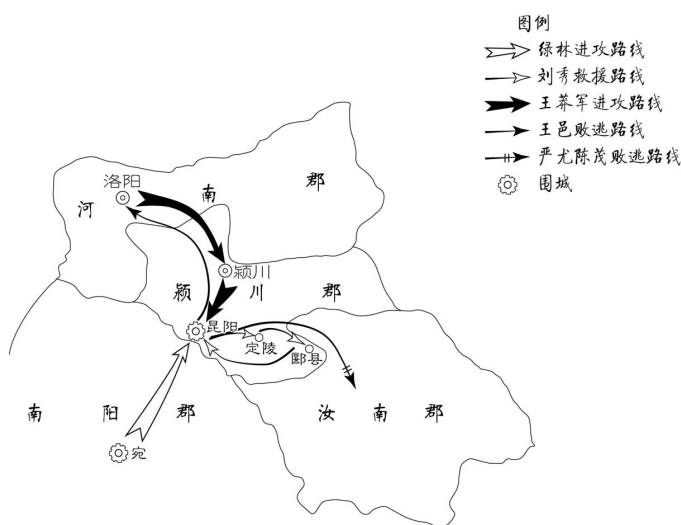


图7.3 昆阳大战形势简图

王邑军是征发各地郡县军队所组成，还有严尤、陈茂的颍川兵，本来就各有编制。换言之，王邑的大军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推测各郡县的军队也都是由各郡县自己指挥，一见主帅溃败，王寻被杀，诸军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各自郡县，因此才能溃败得如此迅速。

王邑的幸免，也是因为他身边的部队是从长安带来的亲兵，愿意护送他向北败退至洛阳。严尤、陈茂骑快马狼狈逃离，向东南方向奔汝南郡而去。

百万大军留下的辐重粮草、战车兵甲、珍宝钱财，刘秀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发到宛城支援更始帝，实在带不走的只得烧掉。那些虎狼猛兽，也或散或死。巨毋霸不知所踪，想必死在乱军之中。昆阳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秀乘胜继续在颍川郡攻城略地，屯在父城³⁵附近。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过程与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维也纳略有相似。当维也纳被土耳其人的炮轰、地道打得快要支撑不住时，波兰国王及时赶到，波兰王国那著名的三千名翼骑兵发起了传奇般的冲锋，将土耳其人击溃，不仅拯救了维也纳，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霸权。

战事的消息传到桓谭那里，他表示意料之中，对此评论说：

王翁……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咸无权智将帅之用……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³⁶

王莽，才是昆阳大战失利的根源，要承担领导责任。而刘秀是最大受益者，即使考虑到史书为赞美刘秀而有所夸张，也不能不承认，新朝的确在这场战斗中被歼灭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此战成为新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王莽大势已去的象征。刘秀一战成名，此战对他未来建立帝业功不可没。

但刘秀还没有享受完大战胜利的喜悦，就得到一个令他震惊且悲痛的消息：兄长刘縯被更始帝处死了。

13．长安攻城战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五月底，正当刘秀在昆阳鏖战，宛城守将岑彭投降。

宛城西通关中的门户武关，向北就是洛阳，战略意义非凡。

六月，更始帝开进宛城，随后获悉昆阳之战取胜，大为欢悦。从各处得来的消息，无不印证王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宛城，更始帝大封宗室诸侯，新情况下，老问题又冒了出来。

刘縯和舂陵兵在绿林兵中一直比较特殊，论政治实力并不强，但他与刘玄同属舂陵宗室后裔，因此有一部分人对刘縯非常支持，这就构成对刘玄的政治威胁，也影响着绿林系统的稳定。而围攻宛城和昆阳大捷，刘縯和刘秀这对亲兄弟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资源，使得原来暗流涌动的矛盾公开化了。

经过绿林首领的多次撺掇，更始帝最终借故杀掉刘縯，但保留了“柱天大将军”的名号，封给了李通。刘秀韬光养晦，向更始帝输诚认错，从而躲过一劫，并凭借昆阳大战之功获封武信侯，拜破虏大将军，逐渐取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縯之死避免了绿林兵内讧，维护了反莽的大局，也促成了刘秀下一阶段的自立。

昆阳战后，天下的形势日益清晰。

王莽大势已去。宫廷里发生了刘歆、王涉的未遂政变；留在青、徐一带作战的扬州牧李圣、司命大将军孔仁被赤眉军击败，李圣被杀，孔仁投降后又觉得对不起王莽，随即自杀。自此，洛阳以东除个别郡县外，已无新朝势力。

但是，王莽仍然占据着关中、洛阳等最重要的位置，困兽犹斗，他令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将东方的剩余军队撤回洛阳固守，又把逃到

洛阳的败军之将王邑召回长安担任大司马，组织政府，安排长安保卫战。虽然关中已经叛乱四起，但他仍能凭借皇帝之尊，使关中没有失控。

东方青州、徐州、兖州一带，赤眉军继续转进关东大地，他们实力强大但缺乏政治目标，是一支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

河北一带，反莽起兵蜂起，其中不乏自立为帝者。各路势力单独来看均不如更始政权强大，但要全部荡平难度不小。

中原豫州也有事变，前西汉钟武侯刘望起兵占据了汝南郡。从昆阳战场败退的严尤、陈茂，在路上打出汉朝旗号，自称汉将，正式背叛新朝。他俩逃到汝南，投奔刘望。刘望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亦属宗室，严尤、陈茂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水平都不低，不可等闲视之。

西北凉州，曾经担任国师刘歆属官的隗嚣，前番逃到故乡天水，见绿林兵起，新朝覆灭在即，起兵袭杀新朝的镇戎大尹（即天水郡太守），被推举为上将军。隗嚣专门从汉昭帝陵县平陵请来一位精通天文的高人，名叫方望，拜为军师。方望深信汉朝将复兴，劝他也打出复汉的旗号。隗嚣于是下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告天下各郡国”檄文，历数王莽的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随即发兵十万，攻杀安定大尹（即安定郡太守）、王莽堂弟王谭之子王向。凉州其余各郡敦煌、张掖、武威、酒泉、金城等向隗嚣投降。

更始君臣对形势的判断是，要建立帝业，就得稳住赤眉、吃掉河北，而前提是尽快推翻新朝，在其他宗室之前抢夺合法性，再来号令天下。

因此，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伐，由绿林兵的王匡带领攻打洛阳，洛阳驻军是王莽的太师将军王匡；一路西征，由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入关攻打京师。

更始帝留在宛城，以待洛阳、长安拿下，天下可定。

西征军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位于右队郡（即汉弘农郡）的武关。武关是关中地区的东南门户，多年以前，项羽和秦军在关中的东方门户函谷关外鏖战时，刘邦却从武关进入关中，直取咸阳。武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八月³⁷间，西征军还没有抵达武关，右队郡析县³⁸的邓晔、于匡已经在当地带领百余人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析县位于武关的东南侧，

属于武关防线外围，析县县宰的兵马也属于武关防卫的一部分。在邓、于二人的劝说下，析县宰投降，百余人一下子变成几千人。这支原属武关防卫的军队，掉头攻打武关，守卫武关的都尉朱萌不战而降，邓、于的军队进而扩充到两万多人。

这支由关内平民和新朝守军形成的义军，标志着天下彻底大乱，三辅之内的豪杰不断起兵，杀掉新朝官吏，自称汉将，改用更始年号。王莽已经沦为各路野生势力的猎物，谁先得到，谁就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邓、于军迅速在关内开辟去往长安的道路，北上顺利占领右队郡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攻克湖县³⁹。王莽见此，先是向天大哭一场，又拿出本打算保卫京师用的最后血本数万中军，由郭钦等九名将军号称“九虎”统领，向东与邓、于军交战，两军在华阴⁴⁰对峙。

这数万中军都是职业军人，战斗力应当是胜过邓、于的军队。但九虎的妻子儿女被王莽扣为人质，每个“虎”只拨给四千金，因此士气低落。而邓、于两将军也颇讲究战术，见九虎军声势不小，不敢强攻，就派于匡率领数千弓弩手，在华阴正东的风陵渡隔河挑战，佯为大军，吸引九虎注意力；邓晔亲率主力两万人，从南边绕到九虎的背后，以奇兵将九虎击溃。九虎之中，两个逃回长安请罪，被王莽勒令自杀；四个逃亡；剩下的郭钦等三虎向西退守京师仓。

因此，王莽在关中的守军、精锐，主要由关中的起兵而非更始帝的军队击溃。

此时，更始帝的西征军已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西征军合并。两军合力攻打京师仓，竟然没有打下。京师仓都不好攻克，长安当然更牢固。西征军觉得速战速决可能比较困难，决定让指挥部留在华阴准备攻打长安的器械，等待更始大军到来；同时派部将向西进发，先扫清长安周边的据点。

其中，曾担任弘农掾的王宪被任命为校尉，带领几百人绕过京师仓，北渡渭河，直到频阳⁴¹，一路招降纳叛，几百人越聚越多，进展顺利。偏将军韩臣则向西进至新丰，也就是当年鸿门宴发生地附近，遭遇了波水将军窦融的军队。

窦融可不是一般人，几乎参与了新朝所有的重要战争。早在王莽居摄时期，就在讨伐翟义的战斗中立功，以强弩将军司马的中级武职，被封为建武男爵⁴²；后来又跟随太师将军王匡到关东攻打赤眉，失败后返

回洛阳，又跟随大司空王邑——窦融的妹妹是王邑的妾——参加昆阳大战。失败后他仍然备受信任，此番被王邑推荐为波水将军。和九虎各自只得四千金不同，窦融获赐黄金千斤，俨然成了王莽最后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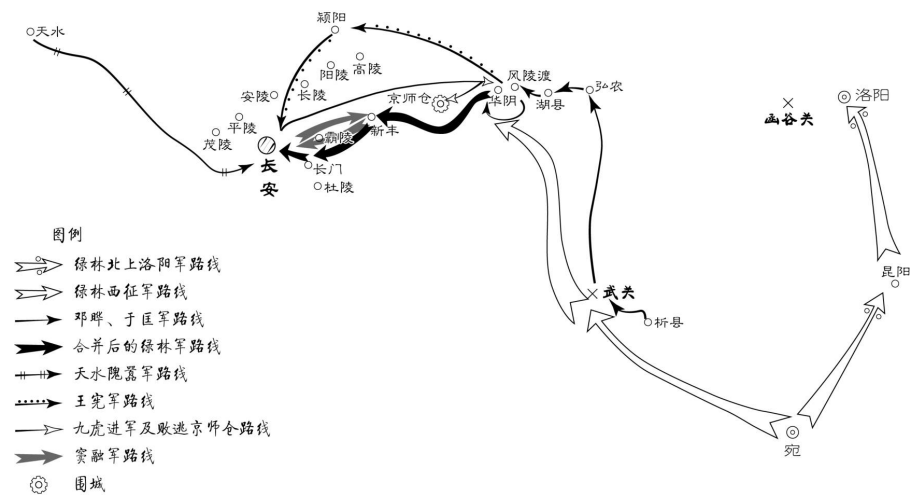


图7.4 王莽灭亡图

窦融军没有什么悬念就被韩臣军击败，向西逃去，韩臣军则紧追不放，竟然一直追过灞水，行军至长安东南侧的长门宫。这里北临汉文帝的霸陵，南临汉宣帝的杜陵，都已经是人口众多的陵县，换言之，已经进入广义上的长安，就好比今天进北京已至通州。见此，长安周边各县、陵的大姓、豪杰纷纷自称汉将，聚众而起。

八月底⁴³，包括邓晔、于匡军在内的更始军，三辅以内自立的汉将汉军，纷纷来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凉州派遣的天水兵也已在长安城下扎营，各路人马虽然都自称汉军，其实各怀心事，各自为战，争先恐后都想入城，就像争食猎物的狼群。

此时，长安的城防已经由越骑接管，每个城门大约有六百骑士守卫，加上剩余的其他军队，城中大概还有一至两万士兵。

九月⁴⁴初一，经过激战，城东北的宣平门首先被攻破。汉军蜂拥而入，逢人便杀；城中守军节节抵抗，将汉军阻击在未央宫北阙。战事很激烈，直到晚上才稍事停歇。

九月初二，既担心被乱军所杀，又想着趁乱博取利益的长安少年焚烧未央宫门，城中更加混乱。巷战期间，多数长安市民和商人应该是躲起来或者逃跑了，但也不乏一些亡命之徒加入汉军。天一亮，汉军们继

续作战，同时到处寻找王莽，各个官署早已空无一人。九月初三，汉军已搜寻到未央宫前殿，但遍寻王莽不在，有美人从躲藏的房中钻出来，说王莽逃到了沧池的渐台。

汉军纷纷奔向渐台。

至这天的下晡时分⁴⁵，汉军已经攻上渐台。

注释：

- 1 《后汉书·皇后纪》，第405页。
- 2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页，中华书局，2008。
- 3 《后汉书·邓晨列传》，第582页。
- 4 毕汉思认为，王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黄河数次决口并改道。其说经余英时《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反驳并不充分，见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第185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两汉书里确实没有提到此时有严重的黄河改道，但是对旱灾、蝗灾的描述很多。
- 5 《汉书·食货志》，第1185页。
- 6 王匡、王凤与王氏家族成员重名。这时期，主要有三个王匡：王音之孙、王舜之子王匡，官职为太师将军，后来在洛阳被更始军俘虏被杀；王莽的私生子王匡；以及绿林首领王匡。
- 7 此十二月，应是夏历，非新朝历，属于地皇元年初。因为严尤在地皇元年中已被解职。
- 8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 9 今山东安丘市附近。
- 10 《汉书·王莽传》，第4170页。
- 11 《后汉书·列女传》，第2783页。
- 12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 13 《汉书·王莽传》，第4173页。
- 14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按古代兵法灾异之说，下雨不沾衣才是泣军，是凶兆，沾衣是吉兆。《汉书》说“霑衣止”，“止”字可能指没有沾衣的意思；也可能只是实写大雨倾盆、淋湿衣服的状况。

况，无言外之意。

- 15 《汉书·王莽传》，第4175页。
- 16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962页。
- 17 今河南商丘一带。
- 18 今山东东平附近。
- 19 《汉书·王莽传》，第4177页。
- 20 《汉书·王莽传》，第4178页。
- 21 黄留珠：《刘秀传》，第16页，人民出版社，2003。
- 22 今湖北江陵一带。
- 23 今湖北随县一带。
- 24 夏历。
- 25 此事具体的发生顺序和时间，据黄留珠：《刘秀传》，第45页。
- 26 今河南省南阳南部。
- 27 夏历二月初一。
- 28 本章自此使用汉军视角，下文使用汉历。
- 29 分别是今河南省叶县、舞阳、偃城附近。
- 30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5页。
- 31 即今威海荣成一带，连率即太守。
- 32 可以想象《指环王2》中圣盔谷保卫战的影像表达。
- 33 《汉书·王莽传》，第4183页。
- 34 关于昆阳之战里王莽军的总数，史料记载不一。其中“百万”之说，应是当时莽军对外虚张声势，及后世史料为衬托刘秀的功绩而夸大。考虑到军队的集结人员和在途人员、战斗部队与后勤人员等不同口径，当是实际集结四十余万，加上在途及后勤人员近百万，但真正参与交战的仅有几万人。《论衡校释·恢国篇》第827页作“三万人”，刘盼遂认为“三”是“百”字之讹。
- 35 今河南省宝丰县附近。
- 36 《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3页。

- 37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 38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 39 今河南灵宝一带。
- 40 今陕西华阴附近。
- 41 今陕西富平附近。
- 42 一说宁武男。
- 43 夏历八月，新朝历九月。
- 44 夏历九月，新朝历十月。
- 45 大概是下午5时。

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

万岁壹纪……作民父母

退佞人姦轨……长壮不老

封亶泰山……新室昌□……

——新莽封禅玉牒残片¹

一、回首故人千里远

1. 剧秦美新

把目光溯回到新朝建国之初，那一天，崔发终于被封侯了。

崔发的祖父是昭宣时代的侍御史，父亲崔舒先后在四个郡当郡守，是当时颇为有名的能臣。崔发还记得，父亲带着一家人辗转任职，兜遍了半个汉家天下。所幸他的母亲师夫人能通经学和百家言，承担起教育他和弟弟崔篆的任务。兄弟俩的儒学素养都很高，崔篆在郡府担任郡文学，崔发则开设讲席，收徒授课。

命运的殊途正是从这里展开，不甘寂寞的崔发离开故郡，到长安投奔了王莽。作为汉朝的“官三代”，崔发为王莽解说符命，甘当爪牙，把各类神秘可怪的事情说成是汉家将亡、王氏将兴的朕兆。到了新朝，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被封为“说符侯”²。

“说符”这个爵号，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他的弟弟崔篆两次拒绝出仕王莽，但他们的母亲师夫人还是因为教子有方，得到了王莽的恩赏。皇帝亲自赐尊号“义成夫人”，赐金印紫绶，这是相当于三公的待遇；赐“文轩丹轂”，即高贵华美的车。崔氏家族成了新朝的显贵³。

崔发把符命作为博取高官厚禄的天梯，的确是抄了近路。

国师刘歆此时正忙于为新朝改制，不知是否留意到，皇帝越来越宠爱崔发。毕竟，刘歆精研沉思的是大经大法，本质上是借王莽来弘扬儒

家；而崔发擅长的是解说符命，意图用图谶来维护皇帝。二者品质截然不同。

孔子曾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至于一向厌恶符命和讖纬的桓谭也渐渐觉察出，王莽即位后对符命的笃信愈演愈烈。他于是日渐沉默⁴，亦不寻求飞黄腾达，往来于刘歆和扬雄之间，谈经论艺，记录时局，倒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

始建国元年，有可能是出于崔发的建议，王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符命为核心、直接听命于自己、执行特殊使命的新队伍。

虽然史无明文，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支新的队伍是存在的，其关键词就是“五威”二字。

新朝刚建国，在改正朔、易服色的同时，将使节所持的旄旛也就是旗子，颜色统一定为土德的黄色，署名统一为“新使五威节”，意思是：

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⁵

威命，就是与五行、五德、五帝相配的神圣意志，所以叫作五威。新朝的建立是根据皇天上帝之威命，“威”体现着神力和威力的强制性，“命”包含着符命和五德的必然性。这正是王莽建立这套编制的意图。

始建国元年秋天，王莽建立了“五威将帅”队伍，领头的是新朝大司空王邑的弟弟、掌威侯王奇。共分十二队，每队由五威将担任“队长”，“队员”是五名五威帅，加起来一队六人，共七十二人。他们分头奔赴天下，向新朝臣民以及四周各部蛮夷颁行符命，并将汉朝颁发的旧的印玺、绶带、头衔全部换成新的。

符命一共有四十二篇，总而言之，都是新朝得以兴起的征兆。其中最早的，是汉文帝时期曾经发现过黄龙的踪迹。当然后来的居多，例如王氏家族祖坟的木头柱子长了新叶、茂陵发现的带字石头、大风吹来的铜符帛书等等。

从这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夏，往东直到玄菟、乐浪⁶，往南直到益州、句町⁷，往西直到西域，往北到匈奴边境，人们时不时会在驿道上见到一群装束奇特、衣着艳丽的人：

他们乘坐的车都是由母马拉的，车厢上画着天文星图，乘车的人背后插着山鸡光彩夺目的长羽毛，摇摇晃晃，熠熠生辉⁸。领头的五威将手

里持节，号称“太乙之使”，其他五个人手里持幢，号称“五帝之使”。

这些人每到一处郡县，就召集臣民来听符命。其实，“太乙”就是“泰一”，“太乙五帝”合起来就是前面说的“皇天上帝”。他们来宣读讲解新朝的符命，就是在传达皇天上帝的威命。

因此，颁符命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符命是上天允许王莽称帝的证明，是同意新朝建立的“批复”。所以，皇帝必须让天下四夷都知道，五威将帅们的装束也必须彰显神性。

这种做法在后世逐渐被视同儿戏，并不常见，但在一些小说里颇能见到，比如《水浒传》里，宋江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其合法性来源于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而在《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即使当瓦岗寨的山大王也得靠天书。

多年以后，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也是向天下颁行《大义觉迷录》，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说到底，无论是汉、新这样的古老皇朝，还是明、清这样的近古帝国，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在“五威”的队伍里，“五威将帅”主要履行传播符命的职责，有点类似宣传队或理论干部。随后，皇帝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监察队伍，叫作“五威司命”，监督上公四辅以下各级官员。出任五威司命的，是皇帝一贯信任的统睦侯陈崇。

与此同时，皇帝还建立了“五威中城四关将军”的军事组织。与一般的军事组织不同，这套新组织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在天下最重要的五个地点设置将军，扼守险要：

五威前关将军守绕雷⁹，由明威侯王级出任；

五威后关将军守壶口，由尉睦侯王嘉出任；

五威左关将军守函谷关，由掌威侯王奇出任；

五威右关将军守成固，由怀羌子王福出任。

这四位将军扼守关内周边四个险要，而且全都是王氏家族成员。

最重要的五威中城将军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守卫京师的十二个城门，由崔发担任。这不仅源于王莽的信任，还因为五威中城将军的职能与符命相关：

由此，一支直接听命于皇帝，担负着宣传、理论、监督、安保等“政治安全工作”职能的特殊队伍，被逐渐组建起来。正如“威命”二字所喻示，这支队伍以符命为核心。

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是皇帝的灵魂，维护符命，就是维护皇帝。

扬雄一入新朝，改任中散大夫，也向皇帝献上一篇颂扬符命也就是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这篇名叫《剧秦美新》的文章，究竟是扬雄心甘情愿献写，还是以文豪的身份被授意所作，抑或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安，刻意撰文自保，后世已经无从知晓。但这篇文章在未央宫王路堂里被高声诵读的时候¹¹，没有人质疑文章本身的价值和逻辑。

剧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美新，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剧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戒》所描写的，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可是有个问题，汉朝呢？

扬雄并没有贬损汉朝，甚至还赞美汉朝能够废除秦政里最为苛刻的部分，扶持儒家复兴。但是，汉朝并不能彻底荡涤秦政，也不能全面建立儒家王制。因此，汉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只有过渡意义，被扬雄一笔带过。

就是说，新朝建立的前提并非汉朝，而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灾异频发，最终上天降下符命，由新朝代替。那些符命在扬雄的笔下呈现出奇异的风格：华丽、雍容、精致，但又神奇、诡异、隐晦。音韵铿锵，字字珠玑，以至于五百年后的刘勰也称赞说：“诤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¹²

平时，扬雄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孔子”。因为他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周易》作《太玄》。对此，有的人推崇，比如桓谭；但更多的人觉得他哪有资格与圣人同列。但在《剧秦美新》被诵读的这一刻，朝臣们却仿佛真的听见孔子和圣王的对话。

《剧秦美新》的最后，扬雄提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建议：既然受命，那就该封禅泰山了！

皇帝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宣布等改制差不多的时候就东巡封禅。

扬雄虽然并不热衷政治，但在这一刻，他终究把自己摆在了司马相如之于汉武帝的位置上。

2. 甄丰之死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新朝坐拥汉朝承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长安城，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长安城内，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辗转前来，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许多官僚和武将一辈子也挣不到，而献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符命的人如此之多，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彼此也会开玩笑说：“独无天帝除书乎？”¹³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帝给的天书呀？

曾经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经和野语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这种事情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淆乱天命，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颌首，对此他也很厌恶。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赵并负责这件事，从此以后，只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符命为准，民间严禁发现新的符命，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想必他们会懊恼为什么不早点献符命吧。

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¹⁴，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是从他俩而来。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¹⁵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

这个符命对王莽有没有好处呢？

把一大块土地分给两个功臣去治理，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称的只有一点，就是模仿周代这件事，凸显了王莽现在已经不是周公，而是天子。

王莽竟然对这个符命十分认可，欣然应允，当即就拜甄丰为右伯，还指示他尽快述职西行。皇帝的态度过于爽快，以至于后人疑心他是故意这么做，“看下一步甄丰父子如何动作”¹⁶，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甄丰父子发现事情进展如此顺利，就更加相信王莽对符命仍然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于是，很可能在甄丰默许的情况下，甄寻趁热打铁，又造了一条符命。这一条很不一般。

符命说，王莽的爱女黄皇室主应当配给甄寻为妻。

这多半是甄氏父子希望能像刘歆那样与皇帝结为姻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不排除甄寻对黄皇室主觊觎已久，确实爱慕有加。正史很少记载爱情，只能猜测。

甄氏父子认为这条符命也将很快得到皇帝的应允，却没想到王莽勃然大怒：

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¹⁷

王莽大概是在极度愤怒下脱口而出，因为他使用了“天下母”这个词。黄

皇室主的称号指新朝公主，“黄皇”是皇帝自称，“室主”有“在室”未嫁之意。¹⁸王莽的确希望女儿再嫁，不愿意她去当定安公国的太后，成为刘氏的家人。但是，盛怒之下，他透露了女儿之所以尊贵，恰是因为曾经当过汉室的皇后，所以是“天下母”。

如此尊贵的女儿，岂是甄寻能染指、意淫的？

王莽立刻下诏抓捕甄氏父子。

得到消息的甄寻火速逃亡，在方士的帮助下躲到了华山。

但甄丰是躲不掉的，只能自杀了事，这年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太傅平晏看起来没有被卷入此事。但甄丰的死，还是令王莽的功臣故旧十分震惊。毕竟甄丰曾经与他那样亲密。当然，有些人认为甄丰咎由自取，而且“四将”有了空缺……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3．刘歆的震怒

一年也很快过去。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逃亡到华山的甄寻被抓到了！他立刻被押解回京。审讯非常顺利，“左伯右伯”和“娶黄皇室主”这两个符命是谁造的，哪些人参与了，逃跑时谁帮过忙，还有哪些公卿宗亲知而不报，等等，甄寻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一场堪比当年吕宽案的大案再次掀起巨浪。

一时间，刘棻、刘泳、王奇、丁隆等人全部被捕。对这些人的审讯，又将嫌疑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卿、宗亲、列侯及以下抓了几百人。随着审讯的进展，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抖了出来：

甄氏父子的最终图谋是推翻王莽，让甄寻当天子。因为甄寻的手掌纹长成了“天子”两个字！

此事不知是实有其事，还是屈打成招。但“天子”二字无论是隶还是篆，线条都很简单，用掌纹附会这两个字并不难，读者不妨伸出双手看一下是否有此二字。

王莽要亲自验看，他命令肢解下甄寻的手臂送至面前，审视一番，

说：“这不是天子，是‘一大子’，也可能是‘一六子’，对，就是‘六’字，也就是‘戮’的意思。甄寻掌纹的意思，就是要戮死甄氏父子！”

王莽饶有兴趣地验看尸体手臂时，台下的官吏估计吓破了胆，古往今来，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君主这么做过。特别是以往与王莽接触不深、只看见他“周公”一面的大臣，终于慢慢发现，他们拥戴的这位帝王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神圣。

既然甄氏父子是谋反当死，那么通过审讯牵连的几百人，够格的也都被处死，审讯中发现新的嫌疑犯，“执法”（即汉朝廷尉）可不必请示直接抓人。治狱使者们四处出击，有几个直奔天禄阁而来。

天禄阁，现在仍然是新朝的皇家图书馆。几个使者虎狼一般冲进去，直奔阁楼上正在校书写作的扬雄。

扬雄当然知道甄寻大案，但万万没想到会和自己有什么干系。治狱使者要来拿他，他心想这下完了，大狱一起，没罪也难逃一死。万念俱灰之际，他冲到窗前，从阁楼上跳了下去。

使者们大惊，连忙下楼去看。

天禄阁虽是阁楼，但并不高，扬雄一把老骨头几乎摔死，但还是被救了过来。

鉴于扬雄是王莽旧交，他自杀这件事很快禀报给了王莽。王莽反而吃惊，他了解扬雄的为人，知道他绝无胆量和兴趣跟自己作对，问道：“扬雄向来不问政事，怎么也牵扯进来了？”

这一问才知道，仅仅是因为刘棻曾经跟随扬雄学习古文。刘棻被抓后，交代自己的行迹，就联系上了扬雄。

王莽见此，亲自下诏，此事与扬雄无关，不要再问他了。

扬雄虽然幸免于难，但在跳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曾写下《剧秦美新》？有没有想起自己对皇帝的赞美？不管他是否想到，京师的知情者们都还记得，很快，闾里流传起新的段子：

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¹⁹

大意就是：那个在赋里自称“爱清爱静、惟寂惟寞”²⁰的人，却是又要跳楼，又作符命哦。

扬雄虽然幸免，但由此可知，牵连被杀的人有很多都像他一样，只

是间接相关，实无谋反行迹。但王莽不会在意这些性命，因为他从这个案子身上又看到新的契机。

儒家的圣史里记录着尧舜对罪臣共工、欢兜、三苗、鲧的处置：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²¹

现在，王莽以圣王自比，当然也要仿效尧舜处置罪臣，甄氏父子就是新朝的罪臣。尽管此时刘棻、甄寻、丁隆都已被处死，但他还是下诏说：

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²²

完全模仿尧舜的做法。只是尧舜所流放的凶神并未取其性命，而王莽此番只能“皆驿车载其尸传致”²³，把这几位的尸体（甄寻的尸体可能还需要拼接）通过驿站运达四方来示众。

这场“新朝第一大案”到此终于画下了句号。

有些颇熟掌故的人会记得，当年王莽平翟义叛乱时，曾在路口要道用尸体堆起京观，这次又将几位叛臣的尸体予以展示，两者一以贯之，皇帝的心中究竟有何丘壑？为何如此残忍？

道理不难明白，王莽发起大案的动机主要还是符命。天下唯独他才有资格掌握符命、阐释符命、运用符命，符命像政权一样宝贵。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造作符命。甄氏父子玩弄符命，触犯了他的禁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有心想对功臣进行整肃，以免尾大不掉，而甄氏父子给了他机会。至于将此事粉饰成尧舜流放罪臣，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但是，这场大案真的令他更安全了吗？

最大的影响，是重创了王莽刚刚确定不久的执政班底，宣告新朝的权力只由皇帝一人把控，内辅、三公、四将都无法有效发挥行政作用。而且，被杀的人还有好几位忠诚的“后备干部”，刘棻、刘泳是刘歆之子，王奇是自己的堂弟。大案也令那些未被波及的大臣如平晏、甄邯等寻求自保，更加消沉于政治事务。总之，此案对王莽的损害应大于利益。

但最为震怒的是国师刘歆。

他的爱子刘棻、刘泳都死在这场大案里。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巨

大的伤痛。此事也令刘歆发现，自己的地位也是非常脆弱的，王莽根本不在乎两人曾经有过那么久的交情！他也无力挑战王莽，甚至连对儿子的悲哀都很难尽情表达。刘歆一定会后悔，当年王莽逼死王获、王宇的时候，怎么就没意识到，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爱惜的人，怎么可能会怜惜别人的儿子！

刘歆还会后悔的是，他越来越发现，新朝虽然凭儒家经义而建立，但此后，朝中大事除了几项改制措施还属于儒家范畴，真正左右朝局的是符命、升仙、五帝崇拜等。这些，与无论是强调天人感应的今文学，还是强调托古改制的古文学，都有了微妙的距离。

桓谭曾经当过甄丰的司空掾，这次幸运地未受波及。从此，他更加不信任王莽，而是往来于扬雄、刘歆之间，想来软语宽慰、唏嘘感叹是少不了的。不久之后，崔发因为不再兼任皇帝太子的“讲乐祭酒”，由桓谭接任，他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了。

至于其他臣民，步入新朝的热情被此案一头浇灭，那些热闹、欢乐、希望以及伴随新朝而来的道德感，忽然间少了许多。人们窃窃私语，有个待诏黄门的年轻人，擅长方术，尤精看相，别人问他王莽面相如何，他口无遮拦道：

鸱目、虎吻、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²⁴

鸱，有说鸱鹰，或猫头鹰，总之是恶鸟。他说王莽有恶鸟的眼睛、猛虎的嘴巴、豺狼的嗓音，所以喜好杀戮，将来也会死于非命。问他的人立刻举报，王莽将其诛杀并封赏了告密者。

但王莽内心却恐惧起来，他对相术也很相信。所以，虽然诛杀了此人，但不代表他的话是错的。他下令制作一扇精美的云母扇面，日常与文武官员议事就躲在扇面之后，除了亲近之人都看不到他的面庞。

王莽更神秘，也更脆弱了。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四辅之首的太师、安新公王舜去世。他是王莽的堂兄弟，汉朝大司马王音之子，当年就是他出面向王政君索要汉朝传国玉玺。翟义叛乱时，王舜和甄丰一同昼夜巡行殿中。他的去世，可能因为长久以来的病痛和甄丰之案的惊悚。但他维持住了王莽的信任，死后被比作齐太公姜子牙，两个儿子王延、王匡都被厚赏，备极哀荣²⁵。

默默死去的是大司马、承新公甄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甄邯去世，葬在金陵玄武湖附近，从汉末到新朝煊赫一时的甄氏家族从此沉寂。²⁶甄邯是三公之首，但其后人因为甄丰父子之事，似乎没有封赏。王莽很快就以宁始将军孔永为大司马，填补了甄邯的位置。

注释：

- 1 残片2001年出土于长安桂宫遗址，参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见《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 2 说符侯的“说”，是“悦”的意思；也有认为是“解说”之意。
- 3 《后汉书·崔骃列传》，第1704页。
- 4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56页：“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王莽居摄之际，桓谭鞍前马后，任谏大夫，担当使者传播《大诰》，受封明告里附城之爵，并未“默然无言”。此为正史隐讳粉饰之语。孙少华等将此事系于桓谭封爵后、王莽登基前，见《桓谭年谱》，第191页。桓谭的“默然无言”应是针对符命，当与新朝建立后王莽以符命封侯、投机分子争献符命相关，故而系于此。
- 5 《汉书·王莽传》，第4096页。
- 6 今朝鲜半岛。
- 7 今天的川、云、贵、广西一带。
- 8 《新莽全史》，第158页。
- 9 古代地名，大概位于今天陕西商洛境内，古代险要之地。
- 10 《汉书·王莽传》，第4116页。
- 11 《剧秦美新》只能根据其序言确定为扬雄入新朝所作，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因此其创作动机也难以确知。这里认同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之说，扬雄在刚进入新朝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更大。
- 12 《文心雕龙·封禅》，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3 《汉书·王莽传》，第4122页。
- 14 甄丰，字长伯。
- 15 《公羊传·隐公五年》。这里的陕，一说是郑。

- 16 孟祥才：《王莽传》，第268页。
- 17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 18 “室”也是因为新朝把汉朝的宫殿改名为室，如未央宫改为寿成室。
- 19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
- 20 扬雄：《解嘲》，见《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这个段子是用扬雄赋里的话来反讽。
- 21 《尚书·尧典》。
- 22 《汉书·王莽传》，第4123页。
- 23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 24 《汉书·王莽传》，第4124页。
- 25 《汉书·王莽传》第4126页说他并不乐见王莽称帝，因此“病悸”而死，此说不确。参孟祥才：《王莽传》，第248页。
- 26 据说三国时期的甄妃是其后代。

二、第一家庭

4．被伤害的女儿的一生

甄丰父子的大案，把黄皇室主又带回人们的视野。

这个案子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但她却成了焦点。她不断被提醒着自己的身份：黄皇室主，同时还是故汉的皇后，是“天下母”。这种撕裂令她倍感痛苦，因为她的教化使她发自内心忠于汉室。

她怨恨父亲让她失去了丈夫，怨恨父亲背叛汉室，称病从不去见他。

王莽忧心忡忡，这些年，他先后逼迫次子王获、长子王宇、侄子王光自杀，但对女儿，却显得格外慈爱和宽容。他虽然利用女儿，但从未残酷地对待她，相反还有些“怕”她，女儿一生气，他就缩回去，并不会因此而惩罚她。史书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爱女之情：

敬、惮、伤、哀。¹

特别是“敬、惮”二字，刻画了一个“女儿奴”的形象。许多家庭里，父亲往往对待儿子极为严格，对待女儿宠爱有加，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而且越是掌握权力的父亲越如此。王莽在儿子们身上看到的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亲情，对女儿的爱是他表达亲情的狭小出口。

但这并不能赢得女儿的亲近，相反，王莽对家人的残忍使女儿对受到独特的“宠爱”更觉痛苦。

王莽从甄寻的行径悟到一件事，就是女儿确实应该嫁人才会幸福，不然，还会有第二个甄寻。他想了想，有一个年轻人他比较满意。

那就是“四将”之一孙建的世子。孙建几乎是“四辅三公四将”里最得信任的人，较少涉足政事，专心负责军事。所以，皇帝令孙建世子带着医生，以给女儿看病的名义去拜访，希望女儿能一眼喜欢上这个年轻人。

当这个年轻人盛装出现在她面前，她一看就明白了他此行的意图，不由勃然大怒。她吩咐取来竹鞭，狠狠鞭笞起身边无辜的侍女；鞭笞了几下，再次发病，从此卧床不起。

孙建的世子被吓得不轻。王莽知道后，半晌无语，再也不敢提这样的事了。

王莽在第一家庭里的失败角色，可见一斑。他越在家庭之外尽显儒家圣王的风范，自诩为道德楷模，在家中就越是苛刻冷漠残忍。儿女们不亲近他，表面上畏惧，私下里憎恨，时刻都想冲破父亲的控制，冲出家庭的牢笼。

王莽是家庭的暴君，家人的仇人。

第一家庭里并无多少幸福可言，王莽唯一可以获得脉脉温情的家人，想来只有姑妈王政君。

但那也是他称帝之前的姑妈了。

一日，负责营造的官员禀报王莽，太皇太后的宗庙已经建好。按照王莽的诏令，她的丈夫汉元帝的高宗庙已经罢祀，所以她的宗庙是单独建造的，但高宗庙的前殿被改成太皇太后宗庙的“簪食堂”，待她千秋万岁后，这就是她的神灵歆享祭品的地方。

王莽很高兴，说，太皇太后还健在，就先不要叫作庙，簪食堂也先叫“长寿宫”吧。又问左右，太皇太后这段日子怎么样，是不是还常常乘车出游，四处游玩？

左右称是。

王莽于是下令择良辰吉日，在长寿宫置酒，为新庙落成贺喜，请王政君前来游玩饮酒作乐。

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向姑妈表示一番了。自从新朝建立，万象更新，事务多如牛毛，他仍然坚持定期到常乐室²拜见姑妈。他知道，汉室禅让，姑妈始终心怀怨恨，特别是强行索取玉玺还闹出了不愉快。但若没有姑妈，岂能有自己的今天？岂能有新朝的肇造？而且，太皇太后的威信始终不坠，堪称新朝的“吉祥物”、老祖宗，所以，想方设法要让她开心。

可惜，他越是努力取媚，王政君反而愈加不悦，不见他还好，见了更不高兴。刚建国时，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把内侍所穿的黑貂外衣改成黄貂，把伏日、腊日等祭祀的日期也改为新朝的正朔。但是有一天，他到常乐室拜见姑妈，惊讶地发现她正和侍从女官们祭祀饮酒，而且女官们仍然穿着汉制的黑貂。

但这天不是腊日呀？他按汉朝的正朔算了一下，竟然恰好是正腊，是祭祀的日子。原来，太皇太后在自己的宫廷里仍然遵循着汉朝正朔，以示念念不忘。

王莽感到懊丧，又无法干涉，只能默默忍受。这次建成宗庙和长寿宫，等于提前告诉姑妈她身后将会以何种规格被祭祀，在深信鬼神的时代，这是一种大孝。

果然，王政君听到消息后，露出难得的喜悦神色。既定的日子到了，皇帝早已经安排妥当，长寿宫修饰崭新，案上饌食精洁，台下舞乐齐备。太皇太后的车驾一停，王莽亲自接引。王政君兴致勃勃地踏入长寿宫，抬头看见文栋绣柱，墙壁散发出香气，脸色确实很高兴。

忽然，她停住脚步，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她问，这长寿宫莫非是高宗庙的前殿？你们是把元帝庙罢祀，“砸了重新装修”，布置成所谓的长寿宫？

王莽承认了。

王政君大惊失色，当场泣不成声，说道：“这是汉家宗庙，都有神灵，为什么要破坏！假如鬼神无知，那你给我立庙有何用？假如鬼神有知，知道我是高宗的妻妾，却辱没了先帝庙堂，摆设吃喝，该会怎么看我啊？”

王政君的气愤在于，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尊汉元帝为高宗，并亲口向她许诺，待她去世后以汉家礼仪配祀高宗庙。现在新朝建立，高宗庙废毁，那么即便把自己捧为至尊，却和丈夫已无关系，怎能不伤心！

一场欢宴不欢而散。

王政君对身边的人感慨说：“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佑乎！”³

但对王莽而言，即使侮慢神灵，那也是汉家神灵，与自家无关。汉家神灵确实也没能护佑王政君多久，到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二月，八十四岁的王政君去世。这个年龄在21世纪也属于高寿了。

遵照王政君遗愿，她与丈夫汉元帝合葬渭陵。但依新朝法度，她是新室文母，不必是汉家媳妇，因此王莽下令以汉元帝配食她的宗庙，并在她和元帝的坟墓之间凿了一道沟，以示区隔。

扬雄又被委任一道重要任务，为王政君作诔文。这篇四字诔文虽然回忆了王政君的一生，实际上是颂扬王莽，因为王政君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博选大智”⁴，选中了王莽。

王政君的去世，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这几十年，她尽享荣华高寿，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她在汉元帝那里固然不得宠，但得到了尊重，所以终生爱着汉元帝，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比起当时的女性，她无疑是幸运的。

但她该不该为汉朝的覆灭负责？她是不是王莽的同谋？

很难给出直白的定论。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王政君长年居于皇室至尊地位，但极度缺乏决断力，她优柔寡断，总是延宕。她昔日面对董贤的果决，只因为董贤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敌人和外人，而王莽是亲戚和同盟。面对王莽从安汉公到宰衡，到居摄，到假皇帝，到真皇帝，她本应从萌芽状态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将会抵达何方，但她似是而非地拖延到最后一刻，直至不得不交出印玺。此后，

她接受了新室的尊号，又深情追忆汉室，这未必是虚伪，而正是她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就不必苛责了，更不必诋毁她的性别。

她安葬之后，悲伤的皇帝称要服丧三年，预定的封禅之事暂缓，已经造好的封禅玉牒等礼器先存放在桂宫。

她安葬之后十年，新朝覆灭。

5．三摘尚自可

始建国五年，王政君去世不久，一则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很快传遍长安。其实早在皇帝登基前，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

定帝德，国洛阳。⁵

其实，新朝定都洛阳与其说是符命的要求，不如说是王莽的心愿。因为当时人们相信洛阳位于天下正中，而首都必须设在正中才正确。多年以后，刘秀拿着上面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都城设在了洛阳。

但当前，长安的居民对此颇为不安，居民们不想营造屋宅，甚至有人把自家都拆了。王莽很不高兴，下诏禁止毁坏首都，并透露了迁都洛阳的日期是“始建国八年”⁶。

这说明至少当下，始建国五年，王莽还没有改元的打算。

但到了十一月，天上突然出现彗星，二十多天后才消失。忧虑的王莽想起上一年夏天，有红云从东南方升起，弥漫天际；再上一年有蝗灾，还有从池阳县报上来的灾异，说是当地出现了许多小矮人的影子，身长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过了几天才消失。

当然，也想起了刚去世的王政君。

灾异给新朝的灿烂光辉蒙上阴影，王莽对“始建国”的年号发生了动摇。这个年号已经用了五年，按照汉朝的惯例，每五年或六年会定期改元，以示更始。王莽也想改元，但又舍不得“始建国传亿年”的信念。

根据这个信念，新朝将会存在万亿年，而且只有一个年号：始建国。

但第二年，他还是改元了，改为“始建国天凤”。这就把改元和继续沿用“始建国”的意图统一了起来。“始建国天凤”的“元年”官方不称“元”，而称为“一年”⁷，以示这不是旧有意义的改元，“始建国天凤一年”，很可能其断句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而非“始建国天凤·一年”。而“天凤”很可能指的是上一年出现的彗星，王莽把作为灾异的彗星解释成了作为祥瑞的凤凰⁸，实在是费了苦心。

改元之后，王莽中止了给王政君的服丧，宣布要在一年之内去东西南北四方巡狩，东巡封禅，北巡迁都洛阳。有趣的是，他这次准备“自费”出行，由朝廷准备干粮，一路上不接受各地的供给。

这听上去很节俭，但紧靠自己带的干粮一年之内走遍天下四方，委实不可行，足见他对实际地理缺乏起码的了解。群臣不想折腾，连连劝阻，他终究改了主意，决定到“始建国天凤七年”再封禅吧。

可到了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第一家庭又出事了。

皇帝的元孙⁹、功崇公爵王宗，被人发现有谋反的嫌疑！

十五年前，王宗出生之前，父亲王宇因吕宽案被迫自杀；出生之后，母亲吕焉立刻被杀。王宗虽然贵为新朝公爵、皇帝之孙，却生下来就是孤儿，而且是祖父让他成了孤儿。

可想而知，王宗长大后，怎么可能会亲近祖父，况且那老头儿也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他多方打听，点滴拼起自己的身世，偷偷和被放逐到合浦的母家吕氏家族联络。这不仅是他寻求成长，也是获取一些亲情的机会。

王宗是元孙，当年王莽母亲功显君去世时，他作为宗子服丧，因此在第一家庭里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会想，如果父亲王宇不死，自己肯定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在浓厚的符命氛围里，他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类似符命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幅自画像。

但在画里，他穿着天子衣冠。

他还刻制了三个印章，一个写的是“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¹⁰，“冠存己”，应是指皇冠传给自己；“夏处南山臧薄冰”，臧就是藏，可能与某种祥瑞有关。另外两个印章意图更加明显，分别是“肃圣宝继”和“德封昌图”，都含有继承圣体、以德获封之意。自画像也好，印章也好，虽然确实有谋反的嫌疑，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少年的冲动，“中二

病”，属于可大可小的事情。

但连同这些罪证被发觉的，还有王宗和舅舅吕氏家族的往来通信。

见到这些证据，王莽表现得愤怒而伤痛，元孙竟然想着谋求祖父的皇位。他下令严加审讯。

王宗知道后，并不辩解，也不求情，即刻自杀。这大概是他从父母、舅舅、叔父、堂叔父之死中得到的经验。

知道孙子自杀，王莽还不满意，下诏把死了的孙子批判一番，斥责他已经当了公爵还不满足，窥视神器，自取灭亡。将王宗贬为伯爵下葬，谥号为“繆”，取错谬乖张之意。

王宗之死，令第一家庭陷入新的恐惧和悲悼。

最恐惧的应是王宗的亲姐姐王妨，她是卫将军、奉新公王兴的夫人。对这个夫君她大概不太满意，因为王兴就是那个凭着符命从城门令史提拔为“四将”的幸运儿。所以，王妨与婆婆的关系很差。

彼时，家庭关系出现问题，家人之间互相诅咒，搞厌胜之术很恶劣，但很常见，上到皇宫下到民间莫不如此。王妨有个女友，是王莽亲信、五威司命孔仁^[1]的妻子，在其影响下，王妨诅咒过婆婆。王宗出事之后，王妨势必受到一些调查，看看是否参与了“谋反”。王妨很担心诅咒婆婆的事情被揭出来，这可不孝的大罪，若被王莽知道，估计难逃一死。为保平安，王妨把知晓这件事的婢女杀了灭口。结果，反而是杀人这件事被发觉了。

这下，杀人、诅咒都被审讯出来，王莽令人责问孙女，也责问王兴治家无方，结果王妨、王兴夫妇被迫自杀。孔仁的妻子是诅咒的参与者，也自杀了。

王兴稀里糊涂飞黄腾达，稀里糊涂死于非命，他在死之前，是后悔被符命选中，还是后悔没享受够高官厚爵呢？

王莽不会在意这些，他很快就拜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填补王兴身后的空白。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弟，故汉曲阳侯、大司马王根之子。当年，王莽就是被王根推荐担任大司马，提拔王涉是他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看着第三代家庭成员照样逃脱不了自杀的命运，王皇后又害怕又难过，她本来已有病症，加上思念死去的两个亲生儿子，哀怜死去的孙子孙女，整日以泪洗面。时间一久，她的眼睛渐渐看不见了。

王莽就让皇太子王临住进宫里奉养母亲。母子二人，私下里会有一番话说，也应该会谈及对王莽的怨恨。皇后有一位侍女，名叫原碧，想来颇有姿色，因为王莽曾经临幸过她。这段时间里，原碧也与王临朝夕相处，两人竟然生出了情愫，彼此相通不说，还山盟海誓起来。

太子与母后的侍女私通，表面上似乎不算太出格，毕竟侍女不是皇帝的侍妾。但是，理论上后宫的女性都属于皇帝，太子染指是很危险的叛逆行为。更何况原碧曾经被皇帝临幸。王临对原碧的喜爱和对父皇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恨意更深，生出了弑父的可怕念头。

更可怕的是，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原碧。

6. 摘绝抱蔓归

始建国天凤的年号并没有给新朝带来起色，光日食就又出现两次，还有地震、暴雪、关东的饥荒，以及饥荒带来的一群把眉毛刷成红色的流民。王莽并非全不知情，相反，他很有危机感，于是在刘歆的帮助下，令太史官推历推到三万六千岁。这有点像后代的“万年历”，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查看日历，而是重申新朝国祚将会绵延无限。

他已经忘记前几年还打算在“始建国天凤七年”巡狩，新的推历中重新规定，今后在“始建国”之名不变的前提下，每六年一改元，三万六千年所需要六千个年号，都得提前定下来。

马上又需要新的年号了，曾经的“始建国天凤七年”现在变成“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寄托了皇帝的美好愿望。

这年七月的一天，忽然起了大风。

这场大风烈度极高，在王路堂（未央宫前殿）大殿里的人们听得头顶上瓦片纷飞、怪声四起，突然，西厢那边“哗啦”一声巨响。众人连忙去查看，发现大风竟然吹塌了王路堂的西厢宫殿，后阁的更衣室是朝臣朝见时更衣的地方，也被吹塌。侍从、守卫、官员们不顾大风猛烈，赶紧去救灾，早已有人去向王莽禀报，场面乱作一团。

这边还在慌乱中，又听见宫城里面昭宁堂的方向传来“咔嚓”一声，随即又是一阵巨响。熟悉的人马上知道，昭宁堂池子的东南侧有棵大榆树，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大风把榆树吹倒，大树又压垮了不知什么建筑。

风停之后发现，大树砸到了东阁，压塌了东永巷的西墙。

这场灾异直指皇朝的心脏部位，王莽惊恐万分。他亲自研究这场灾异的原因，一定要找到真相。

在十天后的诏书里，王莽对这番灾异终于有了正式的解释：国初，王临之所以被封为太子，是因为居摄期间，有符命立他为“统义阳王”，以洛阳¹²为封国。鉴于符命说新朝会迁都洛阳，所以王临才能以第四子的身份，迈过兄长王安，成为皇太子。前些日子，王临来王路堂朝见，暂居西厢的宫殿和后阁更衣室；近日皇后生病，王临住在宫里照顾，他的妃妾暂住东永巷。看，这次大风摧毁的恰好就是这几处宫殿。这就说明，王临有兄长而为太子，名不正言不顺。自我即位以来，阴阳不谐，风雨不调，到处灾异，蛮夷猾夏，一切都是因为立太子这件事名不正。因此，为了天下福祉，将王临改封为统义阳王，王安立为新迁王，两人都去封地，新朝暂时不立太子。

一场令满朝君臣心慌意乱的大风，被皇帝引到自己的家事上，继而剥夺了王临的太子之位。这一方面，是皇帝向来积极主导灾异的诠释权，擅长把灾异解释成祥瑞；另一方面，很可能他对王临不够满意，动了废太子的心思。当然，他应该并不知道王临在后宫与原碧私通的事情。但这封诏书一下，王临就要立刻去洛阳，他内心的疑虑、惶惑、恐惧，不言而喻。

到底为什么要废掉自己？是哪里做错了，还是被发现了什么？

八九月间，临行之前，王临和母后告别，当然也会与原碧相会，叮嘱一番。王临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刘歆的女儿刘愔。刘愔知道王临和原碧的事情，更知道王临弑父的打算，但是，作为被杀的刘棻和刘泳的姐妹，刘愔同样憎恨王莽。她似乎并不介意丈夫与原碧的私通，还支持他们弑君的计划。

受父亲刘歆影响，刘愔精通天文星象，她告诉丈夫，夜观天象，看到昴宿星团的白色星气，这说明不久之后，宫中将有“白衣会”，也就是重大丧事。¹³王临听了很是高兴。

到了洛阳，王临远离了权力中心，宫中的消息他两眼一抹黑。信息缺乏，人就会焦虑。此时，天下已经开始骚动，关东义兵蜂起，南边的南阳郡也不安宁。王临身居洛阳，肩负重任，心思却很难放在政事上，对原碧的思念和自己前景的恐慌占据了他的心灵。

长安不是没有消息，但总是坏消息。母后的病更加严重了，王临只好给母亲写信，既是宽慰，也发牢骚。但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母亲

已经失明，书札到手，必定是由身边的人朗读。而侍女们，却未必认识字……

王莽知道妻子病笃，探视陪伴的时间也增多了。王临的书札送到时，他正在妻子身边，见是儿子的信，很自然地拆开为皇后阅读，在问候思念的句子之外，有一句话赫然跳进他的眼睛：

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¹⁴

说得多么直白啊，老大、老二都是三十岁死的，我今年也三十了，实在是害怕，眼看轮到我了，却不知道什么死法！

王莽见到这句话大怒，他没有反思逼死子孙会给其他儿子带来何种影响，却怀疑王临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不久，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初，王皇后去世。

这位汉朝宜春侯的侯门女，一生驯顺丈夫而活，却没有收获多少天伦之乐，最终在丈夫杀害儿孙的巨大折磨中去世。她死在新朝即将覆灭之前，实属幸运。皇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白衣满宫禁，她被谥为孝睦皇后，葬在渭陵长寿园西，靠近王政君的墓地，意味着要在地下永远侍奉王政君，她的陵墓被叫作“亿年陵”，这是很具新朝特色的名称。

刘愔夜观天象的“白衣会”果然发生了。只可惜，不是皇帝，而是皇后。

因为那封书札，王莽严令王临待在洛阳，不得回到长安奔丧。他要弄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如此害怕。既然那封信是写给皇后的，不妨从皇后的身边人查起。

皇后下葬，王莽立刻对原碧等皇后的侍女、王临在长安的家人严刑拷讯。原碧想来是承受了重刑，最终交代了王临和她私通以及弑父的密谋。这可不是当年王宗所谓的谋反案可比：王宗只是青春期少年的叛逆和幻想，王临却是实打实要弑君弑父的伦理惨剧。

面对审讯结果，王莽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当年杀王获，杀王宇，都是由他来掌握主动权，并作为实践儒家经义、模仿周公的重要动作。而王临反过来要弑父，说明儿子不甘心束手待毙，宁可冒犯最重要的伦理也要求生。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他失去了把杀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

自信。相反，他秘密处理这件事。把参与审讯、知道王临弑父图谋的治狱使者、司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就地埋在监狱里。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大概能猜到什么，但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至于王临，王莽决不可能让他活着，就赐给毒药。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死的王临，终于做了一件王氏子孙人人都想做但从前不敢做的事情：不服从。

他不服从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父亲送来的毒药，而是以利器刺死了自己。仅存的王安、黄皇室主如果知道王临以自己的方式赴死，悲痛之余说不定还会嘉许呢。

灭口了知情人，逼死了儿子，王莽仍然要粉饰，说王临不遵循符命，在统义阳王的位置上没能得到上天护佑，以致夭折，实在可怜，谥号和王宗一样也是“繆”。

同时，他又指责亲家刘歆，说：

临本不知星，事从愠起。¹⁵

如此看来，王临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但没有牵连刘愠。可王莽觉得，如果把刘愠当成始作俑者，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可能会好受些。

刘歆没能保住爱女，刘愠也自杀了。

这是新朝建立后，刘歆失去的第三个子女，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就像当年的甄邯，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第一家庭的这场变故后，王莽好不容易成年的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颇荒忽”的王安了。

失去了母亲兄弟，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就在王临两口子死的这个月，王安病死。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¹⁶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不管怎么说，继承人终归是大事。王莽还有其他孙子，有侄子，噢，还有“遣就国”期间和三个侍女私生的四个儿女。他以刚去世的王安的名义，把这些私生儿女们也都接到长安。

但王莽没有再立太子。

其实，立与不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再有两年，他和他的皇朝就要覆灭了。

《汉书》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与皇后的侍女通，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内心压抑、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现在，第一家庭已经不存，他不顾内忧外患已使新朝摇摇欲坠，萌发了组建新的第一家庭的想法。

就在第一家庭四个成员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作阳成修的郎官，献上一条符命，说如今没有“天下母”，要再立皇后才行。天下都知道现在禁止献符命，但对这一条，王莽却欣然接受，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亲自授意。

朝野臣民，在天下已经兵连祸结之时，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一面兴奋地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访求淑女，准备立新的皇后。

这样的皇帝，真的是当年的儒生王莽？

注释：

1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2 即长乐宫。

3 《汉书·元后传》，第4034页。

- 4 《元后诔》，见《扬雄集校注》。
- 5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 6 《汉书·王莽传》，第4132页。
- 7 这一时期出土的简牍，年号基本是“始建国天凤”；第一年多是“始建国天凤一年”。见《新莽简辑证》。
- 8 新莽年号的考证及天凤与彗星的关系，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鄯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鄯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 9 王宇有六子，王宗排第四。但居摄期间，王宗奉新都侯为后，被称为长孙，可能他是王宇嫡子。
- 10 此印章意思费解，标点一作“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臧薄冰”。
- 11 孔仁大概是在陈崇、苗^诩之后担任五威司命。
- 12 洛阳在新朝改名义阳，本书为叙事便利，仍称洛阳。
- 13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 14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长孙，王宇字；中孙，王获字。中室，一说后宫，指皇后；一说王临自称。
-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5页。
- 16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74页，中华书局，1984。

三、登仙——！

7. 日渐癫狂

每个帝王都想长生不老，最谦虚的也想再活五百年。

但在新朝皇帝之前，真正求仙有所成就的，据传只有三位帝王：在昆仑山见过西王母的周穆王，在东海岸边见过天神的秦始皇，和在坟墓中羽化升仙的汉武帝¹。

始建国初年，方士苏乐向王莽上奏说：新朝是土德，尚黄，黄帝升仙了，所以新朝的皇帝也能。

这几年，王莽开始改制，他以为天下将会自然而然实现太平。那自己做什么呢？当然不能闲着，得搞搞研究：一要继续研究符命，牢牢把握符命的解释权；二要研究怎么成仙，人间大功告成，就要像秦皇汉武一样，登仙与黄帝、赤精等仙人同游了；三嘛，以前和刘歆一起为汉朝制礼作乐，今后要亲自给新朝制礼作乐了。

王莽按照苏乐的意思，耗费万金巨款，在宫中建了一座高台，名曰“八风台”。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因为“八风”意味着八音，而古代的音律实际上和天象、八卦都有着密切关系。

八风台建成后，王莽登台纵情享乐²，根据风向的不同，制作各色的饮药。还把鹤的骨髓、海龟的壳、犀牛的角等二十多种名贵珍奇煮成汁液，再选择五种颜色的粮食种子浸泡其中，按照颜色播种在殿中不同的方位，这就是升仙的秘诀。

不管是否管用，王莽先拜苏乐为黄门郎，专门负责升仙之术。从此以后，王莽虽然继续津津乐道儒家经术、制礼作乐，但也迷信鬼神淫祀、怪力乱神，不仅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河的各路神祇，连地方上的小神小仙也不会怠慢，前前后后建起一千七百多所祭坛。祭祀的时候，各类祭品有三千多种，还不乏大雁、锦鸡、麋鹿等珍禽。

王莽如此虔诚，但不仅没有升仙，到始建国天凤二年，一个令他极度忌讳的灾异报了上来：有人说在黄山宫³发现了一条死龙。

还是条黄色的死龙。

据说，当时有万人奔走围观，场面宏大。他们不纯粹是好奇，而是这几年改制、缴税的压力越来越大，边疆战事也连年不断，大家对王莽有怨言。围观黄龙死，潜台词就是盼望王莽去死。

这和当年秦始皇在位时，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写着“始皇帝死而地分”，是同类的灾异。所以，王莽坚持说这是谣言，命令搜查谣言的始作俑者，众多官吏使者搜寻多日，却没有找到源头。至于这条龙是不是真的，是别的动物尸体抑或的确是谣言，就无从知晓了。

雪上加霜的是，黄龙事件后不久，他最宠信、一度想结为亲家的立国将军孙建去世了。

王莽越是努力升仙，灾异反而越来越多。如果勾勒新朝的大势，始建国年间形势平稳，许多内外政策也才刚刚制定实施；但这些政策的后果，到始建国天凤年间开始显现，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绿林、赤眉等

义军就是在始建国天凤后期兴起的；到始建国地皇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昆阳大战失败后，即糜烂不可收拾。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初，关东连续降下大雨雪，导致这年秋天流民四起；七月，长安霸城门失火；刚灭了火，又出现日食。王莽只好策免大司马陈茂，换上孟建伯严尤。十月，王路堂的朱鸟门突然发出奇怪的声响，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守门的卫士、路过的官员惶惑不已，不知道这个灾异意味着什么。

王莽也百思不得其解。幸好崔发及时出面，说儒经记载，虞舜开四门以招纳四方聪明之士，所以朱鸟门发出声响是要新朝效仿舜帝，招纳四方才俊。崔发把灾异说成祥瑞，总算把这件事对付了过去。

灾异的层出不穷令王莽日益焦虑，正在此时，一位故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逃亡整整十年之久的王孙庆被抓到了。

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位翟义起兵时的高级参谋，当年他被翟义委以重任，但究竟在义军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外人一直无从知晓。翟义死难后，他下落不明，许多人以为他死在了乱军中，没想到竟然成功逃亡，改名换姓，直到十年后才被抓获。

王莽被灾异惹出的一腔怒火正无处发泄，见到这位故人，不禁回想起他踌躇满志、万民拥戴、祥瑞迭出、弹指间翟义军破人亡的美好往事。他打算好好借助这个故人，让朝野回忆起新朝奠基之前的天命和辉煌。

对待王孙庆，王莽不需要治狱使者。他下令让主管诊断的太医、负责器物制造的尚方，以及擅长屠宰的屠夫，一同前来。

太医精通人体脉络和五脏，尚方了解工具制造，屠夫擅长解剖，难道让他们审讯人犯？

不，王莽的兴趣是，在王孙庆的身体上探究一番人体的奥妙。

在古代，人的身体被看作一个小宇宙，五官、五脏、五窍都与天地季节四方有关系，而经脉更是玄妙。

屠夫先将王孙庆剥皮、解剖，太医仔细度量他的五脏，尚方则把竹子削成极细极长的竹针，一点一点插入王孙庆的经脉，观察竹针的走向，以判断经络的布局。

王莽严肃命令太医做好记录，说是将来可以治病。有人据此推测，王孙庆很有可能是被活体解剖。⁴不管推测是否为真，这种解剖方式一定会把人吓得心惊胆战。从将尸体垒成京观，到肢解甄寻的尸体，再到解剖人体，王莽一次比一次冲击着朝臣的想象力，他以往不为人知的阴郁内心，在这些残忍的虐杀中逐渐暴露，他那曾经伟岸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日益萎缩。

对王莽早有了解的桓谭，并不觉得意外，多年以后，他在《新论》里写道：

王翁之残死人，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⁵

王翁就是王莽。桓谭的话一针见血，王莽残虐尸体，就是给活人看，让活人感到恐怖。这种变态的内心，说明王莽对手中的权力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

到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因为前几年先后用兵西北、西南，边疆已陷入战事的泥沼，与西域的关系也彻底断绝；天下的反叛此起彼伏，号称“绿林”的队伍声势尤其浩大，新朝的形势越来越差。王莽勒令地方官或剿或抚，自己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要用老办法：厌胜。

按照当时的观念，对军队厌胜，就要采用北斗。从天象看，北斗星拱卫北极星，随着季节的变化，斗柄指向不同的方位，就好像居于北极星的天帝在指挥战斗。因此，军队出征之前要祭祀太一，祭祀所用的灵旗上绘有北斗星。斗柄指向哪里，就寓意哪里的敌军会被打败。

王莽曾铸造过类似北斗星的大铜勺，在大臣死后赐给他们。比如甄邯死时就下葬过一把，但那时主要是说北斗拱卫北极，所以赐给臣下。⁶但这次不同了，皇帝决心铸造一座厌胜敌军的“大勺子”。

这年八月，正是最热的时候，王莽亲自到长安城南郊主持铸造工作。文武百官、侍卫禁军浩浩荡荡跟着他。威斗以铜为主，但加入了五色石，大概是五种颜色的矿石，或是丹砂、白矾、雄黄之类。⁷总之，铸成了一个二尺五寸、大概50到60厘米长的合金铜斗，模样大概是像勺子，也可能像熨斗⁸。

王莽希望它具有荡涤敌军的威力，就命名为威斗。只要出门，司命孔仁就要背着威斗紧紧跟随。

威斗铸成那天，严寒突然来袭，在炎热的盛夏⁹夜晚，跟随王莽驻跸

在南郊简陋住处的百官人马，竟然有人和马被冻死了。

又是灾异！王莽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8．扬雄之死

听见大门被打开又关上，正在屋里和学生侯芭论学的扬雄只是愣了一下，继续谈起《太玄》和《法言》。

他知道不会有别的访客。自从那年险些在甄寻的案子里丢掉性命，他本就冷落的门庭就更无人造访了，只有一个人时不时带着酒菜前来问学，但比起眼前这位专心跟随他的钜鹿郡的侯芭，那个人只是来饮酒聊天，打发时间罢了。

那人登堂入室，屋门开了，扬雄和侯芭抬头一看，弄错了，竟然是国师公刘歆。

两人虽然曾是好友，但一个身居高位，一个沉沦下僚，很少交接。刘歆像今天这样亲自造访，更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彼此行礼后，刘歆环顾了一下扬雄的住处，除了几卷书，几个瓶瓶罐罐，堪称家徒四壁。刚刚在门口，他听见扬雄和侯芭在谈论《太玄》，于是开玩笑道：

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后人用覆瓿也。¹⁰

就是说，你何必这么苦呢！今天能捞利禄的学者，尚且搞不懂《易》，你还模仿《易》搞个《太玄》，将来谁会读呢？恐怕只能用来给酱坛子当盖子吧。

扬雄笑了笑没有接话。几个人又聊起别的事情。扬雄知道，刘歆的两个儿子被王莽所杀之后，已经不问政事。现在炙手可热的，要么是修仙的方士，要么是说符的新贵，要么是能打仗的将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刘歆，包括担任典乐大夫的桓谭，都已经过气。刘歆忽然登门造访，谈玄论易，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寂寞。

这是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就在这一年去世。

吊唁的人不算少，贵族的世子、大小的官吏，也颇有几位宠臣，比如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桓谭当然也在。王邑和严尤见到桓谭，问

道，你一直称道扬子云（扬雄，字子云）的大作，现在人死了，书能传世吗？

桓谭说：必传！只是我和你们一样，看不到那一天了。

侯芭给扬雄建了坟，服丧三年，桓谭为扬雄建了祠堂。

扬雄的去世，王莽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总之他没什么表示，他要赶在新的年号“始建国地皇”开始之前，把新朝的新礼乐制作完毕。年底，他带领群臣到南郊，齐聚明堂、太庙，郑重地向皇家祭祀献上这套新乐。

这是自长安建城以来，没有人听过的音乐，与昔日汉家宗庙音乐的巍巍清正很是不同。那乐声萦绕在城市上空，又是冬季，有人凝神倾听，说：

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¹¹

这是演奏给上天的庙堂音乐，是这个朝代的雅乐、正乐啊。自古以来，音乐和诗歌有一个共同点，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风貌，诗比历史更真实¹²，音乐何尝不是？

因此，音乐“清厉而哀”，政事也相匹配。

始建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正月，大赦天下。但同时下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指令，称现在战事紧张，军法从严，到年底之前，如果有人军队出征时奔跑吵闹，随时处死。

要知道，在古人的观念里，秋冬气候肃杀，所以才会在秋冬处死犯人，这是自有记忆以来始终未变的习俗，是对时令的一种遵循，好比春天就得耕种，不能误了农时。王莽此令一出，这年的春夏时节，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时而杀人。百姓见此，大为惊骇，恐惧万分，甚至道路以目。

但王莽不以为然，为了基业永固，他正打算修建新朝皇室宗族的九庙呢。因为有方士告诉他，现在宜大兴土木。尽管绿林、赤眉已经声势浩大，王莽还是在长安城南划出了百顷土地。

九月，他亲自到工地，“亲举筑三下”¹³，类似后代的奠基仪式，正式营造九庙。所谓“九庙”是礼制上的称呼，真正规划的宗庙不止九座。1950年代，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十二个建筑遗址，就是说九庙共有十二

座。按照顾颉刚的看法，其中有九座是皇帝之前的祖宗，剩下的三个，一个留给自己，两个留给后代。¹⁴

宠臣如崔发、张邯，对此很热心。崔发称规模一定要宏大才能宣示天下，要“万世之后无以复加”¹⁵，这句话明显是在模仿萧何。当年高皇帝远征归来，看见高大壮丽的未央宫，一度动怒，萧何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崔发模仿萧何，是一种很高级的恭维。

一些儒臣如侍中常侍、执法杜林，也热情地投入其中。多年以后，杜林将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参与修建九庙的实践经验，当上刘秀的大司空。

具体的建造就靠广大群众了，王莽从天下——他还能控制的地方——征来了工匠、画师，授意官吏百姓捐款捐粮集资，百姓捐助米六百斛以上授以郎官，郎吏则可以增加品秩，最高的赐爵至附城。听说朝廷要卖官鬻爵，一时间往来于长安的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为了加快工期，王莽不顾大雨，把长安西边的建章宫等十几所汉朝修建的宫殿拆除，把材料运到南郊。说来也奇怪，拆汉宫的时候，这场大雨连连绵绵下了六十多天。

人们传说，王莽不顺时令，拆毁宫殿，羞辱汉家，惹怒了汉家先帝。

似乎，沉寂已久的对故汉的思念又有了苗头。

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是王皇后、王临、王安等人去世的那段时间，魏成郡大尹府¹⁶的一个小吏跑到长安，向皇帝举报一份讖书，上面赫然写着：

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十一年当相攻。¹⁷

意思就是汉文帝正在地下召集军队，已经告知北边的匈奴、南方的越人，四年后，将会有刘氏从荆楚一带发兵复仇，恢复祖宗基业。

这一年还出现过汉宣帝的衣冠从宗庙的寝殿跑到正殿的怪事，据说衣服自己站在那里，就好像里面有人！再加上这条讖语，汉家先帝真的发怒了！

小吏还说，这些讖语是他的上司魏成大尹李焉让他抄写的。此番逃亡举报，只能随身带着一小部分简牍，而整部讖书有十几万字之多。不

仅包括汉文帝地下发兵这样的事，还对今后刘氏复兴给出了“时间表”，哪一年什么人发兵，哪一年星象有何种变化，连新朝主要大臣的命运吉凶以及生卒日期，都一一载明。

王莽听了大概会想，这岂止是讖书，还是造反的“战略规划”和“战犯名单”啊！于是赶紧逮捕李焉。经过审讯，是李焉信任的一个方士王况制作了这些讖语。王况告诉李焉，新朝成立以来，滥改货币，频繁征兵，四面打仗，百姓怨恨，因此汉家必定复兴，而李氏将成为汉家的辅佐。

处死李焉、王况后，王莽并不放心。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怪梦。长乐宫放倒的铜人有五个自己站了起来。虽然是梦，但他醒来后心有余悸。这些铜人突然站起来，寓意难道是汉朝复起？他又想起铜人身上刻着铭文，其中有一句是“皇帝初兼天下”，新朝已经定鼎十多年，显然不是“初兼”，所以，又有个皇帝要出现？

越想越不安，王莽立刻传唤尚方，令他派人去长乐宫，不管铜人是否站起来，身上“皇帝初兼天下”这六个字要凿掉。同时又让虎贲武士到汉高帝庙，拔剑向四面击打，使斧头砍坏门窗，用能辟邪的桃木煮汤洒到墙壁，再用红色的铁鞭鞭打墙壁；命令轻车校尉住在庙的正堂，中军北垒校尉住在寝殿。

种种措施，都是以方术来压制汉帝特别是刘邦的神祇。做了这些之后，王莽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他登仙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就询问身边的方士，八风台建造都十多年了，自己怎么还没有登仙？

没人告诉他，局势沦丧，八风台上祭祀用的珍禽已经很难得到，现在是用家鸡代替大雁、锦鸡，用田园犬代替麋鹿，怎么还能登仙？

于是有人提议，说黄帝登仙时，有“登仙华盖车”引路。王莽马上敕令修造，要赶在九庙落成前造好。这车子的华盖有九重，高八丈一尺¹⁸，骨架由黄金打造，盖伞是珍禽羽毛，有隐藏机关可以上下伸缩，很是华贵。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建成，仅其中的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就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他八个庙减半¹⁹。九庙雕金饰银，以铜为柱，穷极工巧，耗资数百万，征发修建的人死者过万。

如此宏大的工程落成，朝廷当然要举行盛大典礼，把皇室的祖先牌位请进九庙。

在百官的注视中，皇帝的銮驾缓缓出现，驶向九庙。为首的，正是

六匹马拉的“华盖登仙车”，三百名身穿黄衣黄帽的力士护卫着，车上有人击鼓，拉车的人根据节奏大声喊：“登仙——”

随后是十辆战车，再后面是王莽的銮驾，装饰也很奇异，套上的六匹马披着五色毛纺织成的龙纹衣，马头上戴着一只长三尺也就是60厘米长的假角，应是模仿麒麟。

百官们看了，小声说，这分明是出殡，哪像登仙呢？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注释：

- 1 《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武帝故事》，见《西京杂记（外五种）》。
- 2 《汉书·郊祀志下》“作乐其上”，按沈展如之说，“作乐”不仅是音乐，而是“各种游戏娱乐，耍乐，享乐以至于淫乐音乐等”，此说可从，见《新莽全史》，第370页。
- 3 今陕西兴平市一带。
- 4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380页。
- 5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4页，中华书局，2009。
- 6 见《金楼子·杂记下》，《龙溪精舍丛书》本，亦转引自《桓谭年谱》，第224页。年谱以为甄邯墓中出土的是威斗，但甄邯死在始建国四年，王莽铸威斗是在五年后的始建国天凤四年。如果记载属实，只能说陪葬的是类似北斗星的铜质器物。
- 7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 8 沈展如认为像熨斗。
- 9 新朝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八月约是夏历七月。
- 10 《汉书·扬雄传》，第3585页。
- 11 《汉书·王莽传》，第4155页。
- 12 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指的是“诗剧”。
- 13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 14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见《考古》1989年第3期。关于十二庙的用途，未有定论。
- 15 《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 16 即原来的魏郡；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守。
- 17 《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 18 八丈多高，大概二十米，或有夸张。
- 19 按此面积，太初祖庙每边长90多米，1950年代发掘的九庙遗址中，位于最南侧被认为是初祖庙遗址的边长是95米左右，差别不大，因此这个记录是可信的，由此推知，祖庙的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今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其他十一个宗庙边长减半，与考古发掘也差不多一致，都是50米左右。祖庙高度30多米，与今天安门城楼差不多高。参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

四、反虏王莽安在？

9．鄧恽的忠告

汝南郡的鄧恽¹，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说得更准确些，他颇像眭弘、盖宽饶等昭、宣时代理想主义儒者的继承人，既坚守今文经说的义理，又能凭借天象来占卜未来，还不屈从于世俗权力。他传习的是《韩诗》和《严氏春秋》，进入新朝之后，他最初可能也欢迎过新朝的诞生，但更存有观察的心态。

十余年来，他眼看着新朝从蓬勃繁荣走向硝烟四起，臣民从热烈拥戴走向叛乱不断，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王莽并非天命所寄托的儒家圣王。

到始建国地皇年间，汝南郡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案了。鄧恽夜观天象，终于发现了奥秘：镇星、岁星、荧惑，一同在天空“翼轸”的地方去而复来，“翼轸”对应着大地上荆楚的分野，而汉家出于楚地，因此这预示着汉家天命将会复兴，汉家必然再受命！

这样想着，鄧恽就离开汝南，西奔长安，给王莽上了一封书：

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

不免于窃位也。

这封上书的核心，就是请王莽退位。但细究鄧恽的逻辑，并不是说王莽得位不正，而是说当年他受禅汉室当皇帝，在当时是符合天命的，但现在新朝没能治理好天下，所以新的天命昭示刘氏将再受命，新室理应再禅让给刘氏。

鄧恽之所以是一个旧人物，正是因为这是西汉儒家关于政权如何更替的经典义理：天下治理不好，就要禅让给别人，不禅让就是窃位。窃位不等于篡位，因为皇位神器，上天所有，也就是公有，人无法篡天，只能私窃。

因此，鄧恽虽然认为汉家当再受命，但与前番李焉那种“人心思汉”的心态迥异。鄧恽并非思汉，而是向王莽指出，该你得位你可以得，该你退位你就得退，原因就是你没有治理好天下。这不是针对谁，而是政权和平转移的普适做法。

王莽见到上书，勃然大怒，因为这些话从根本撼动了新朝政权的法理基础，与一般的劝退不同。鄧恽被即刻下狱。有司议罪后表示，应以最严重的大逆论处。

但是，王莽犹豫了。

治狱的官吏看不明白不要紧，王莽却很清楚，杀掉鄧恽很简单，但鄧恽指出的问题既符合经义，又有天象为依据，令他难以驳斥。他更希望鄧恽收回那些话，这远比杀掉他更重要。

皇帝不惜纡尊降贵，派遣黄门近侍，偷偷去狱中和鄧恽谈判。王莽的条件很简单：请鄧恽自称犯了狂病，精神恍惚时说了些自己也不懂的狂话。皇帝将据此赦免他的大逆之罪。

没想到，鄧恽一听，瞪着眼大骂：我所说的都是天语圣言，你让我装成精神病，精神病能说得这样的圣言吗？

王莽无奈，只得将鄧恽继续关押，若再没辙，冬天就要处死他。王莽陷入两难，不杀他，说明自己害怕；杀他，说明自己心虚。好在不久他大赦天下，借机将鄧恽放出监狱。鄧恽立刻与同郡好友逃到南边的苍梧郡躲了起来。多年以后，他将继续成为令刘秀又敬又怕的臣子。

随着刘氏当复兴的讖语迅速流行，王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遭到挫败：

关东战场上，面对赤眉军，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景尚战死，他官居太师羲仲，即四辅之一太师的副手；冬天，成昌之战失败，更始将军廉丹战死，关东彻底失控。

荆州战场上，面对绿林兵，三年十月，严尤、陈茂虽然一度击破汉军，但到四年正月，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属正（即南阳郡都尉，一郡的最高武官）梁丘赐被斩杀，数万人覆没。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氏复兴终于成为现实：那个曾经和乡官斗殴而一度逃亡的刘玄，在战场上称帝，改元为更始元年，恢复汉朝正朔，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成了汉更始元年二月²。

现在天下有了两个皇帝，两个年号，两套正朔。当然，眼下胜负尚未分晓。王莽实力犹在，为了显示镇定，他决定再立皇后。

前番，他派出去征求淑女的使者们陆续返回，根据带回的淑女的画像、家庭状况，皇帝亲自选择了杜陵史氏的女儿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陪嫁的车马、奴婢、布帛、珍宝等，不计其数。皇后的父亲史谡被封为和平侯，拜为宁始将军，史谡的两个儿子都任侍中，成为皇帝的外戚。

史皇后估计年龄尚小，王莽快七十岁了。婚礼当天，大臣们被吓了一跳，王莽染黑了头发胡须，努力装出年轻的样子。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染发。

婚礼在三月举行，与当年嫁女比起来，这次匆忙了许多。当天大风袭击长安，城中屋瓦被吹落，有树木被折断。这本是凶兆，但被崔发等人一通解释，似乎也不是灾异而是祥瑞了。王莽努力把婚礼办得辉煌隆重，他亲自到王路堂前迎亲，礼数周备，册立皇后之时，还正式按照《周礼》确立了后宫的秩序，“任命”了一百二十个嫔妃，其中：和嫔、美御、和人，此三人的品秩等同公；嫔人九位，等同于卿；美人二十七位，等同于大夫；御人八十一位，等同于元士。

假如皇帝从这天开始，每两天临幸一位嫔妃，那么等他被杀也临幸不完一遍。

但他似乎并没有临幸的兴致，立皇后只是他昭示大权仍然在握、天命依然在我的姿态。婚礼之后，他与一名涿郡的方士，名叫昭君，每日在后宫研究实践方术。班固称他“纵欲乐焉”，与方士探讨纵欲话题，大概是实践房中术³吧。

不过，当汉朝的旗号重新打出，王莽仍然可以征求到不少淑女，史氏家族也愿意把女儿嫁到宫中，这就说明直到三月间，皇帝对关内的掌控依然有力，天下还有很多百姓仍然尊崇着王氏天子为合法皇帝，没有进入群雄逐鹿的乱局。至于刘秀，此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将军。

婚礼之后，王莽似乎神志清醒了些，他同时下了两道诏令，一是大赦天下，以求宽慰民心，缓解矛盾；二是盘点了他麾下的军队，要求将军们尽快荡平敌人。从盘点情况看，王莽确实还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关东战场，太师王匡率领中央军队及各州郡兵马，号称三十万大军，奋战在青州、徐州一线；颍川、南阳郡一线，还有前任大司马、纳言将军严尤等人率领的十万军队，南阳的郡治宛城也还没有被攻下。

军事形势尚未明朗，王莽仍然怀有信心。

四月，更始帝的军队围困宛城，前锋则进至颍川郡的昆阳、定陵，距离洛阳很近了。⁴接到战报，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在洛阳征集州郡属兵，南下和严尤等人在颍川郡的军队会合，加起来号称百万之众，图谋一举荡平更始帝的军队。

10．延宕的政变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六月，天气炎热，时不时一场大雨浇下来，提醒着暑日的肆虐。

在这胜负未分的胶着日子里，王莽的宫廷貌似平静，但中外臣僚的心态、思绪，已经不复从前。有的官员突然从朝廷上消失，有些派出去的使者再也不来复命，还时不时听说太学里的博士带着弟子一齐逃走。而且，受战事的影响，大部分贸易已经停滞，长安城繁华不再，一种大势已去的氛围萦绕在宫市上空。

王莽宠爱方士昭君，他的大臣也各有信任的方士。卫将军王涉是王莽亲信、表兄，今年已经七十岁左右。他与一个叫作西门君惠的方士素来交好。西门君惠也很擅长天文图讖，就对王涉说：“彗星扫过北辰正宫，说明刘氏将复兴，而且，新君是国师公的姓名。”

西门君惠胆敢和王涉吐露这样的预言，一来说明两人关系密切，且大家都信仰天象、图讖，天数大过亲情；二来说明，他早已知道连王涉这样的皇亲国戚，对新朝也没了信心。

王涉很是忧虑。一旦汉朝复兴，作为王氏重臣，他很害怕死于非

命。而且，七十岁的他子孙众多，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代计。但他只是个卫将军，势单力薄，还需要寻找同盟。

七月⁵，王莽举天下之力汇集的百万大军，在昆阳小城被更始军的太常偏将军刘秀击溃。司徒王寻战死，主帅王邑仅带出数千兵马退守洛阳，而进驻宛城的更始帝则大封群臣，政权更加有模有样。消息传来，关中震动，这意味着王莽已经丧失主力军，无力维持对关中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官员贵族，还是豪杰百姓，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关中局势开始动荡，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不断有人打出反新反莽的旗号。

王涉见此情形，加快了安排后路的步伐，他找到大司马董忠。

董忠早年行迹不详，在新朝被封为降符伯，和崔发的说符侯异曲同工，很可能也是因为符命获封。董忠此时正在中军北垒练兵，以备京师防务。昆阳大败后，他知道这点兵力已经无济于事。王涉所说的天象和谶语，他深信不疑，两人秘密敲定了发动军事政变的打算。

为了确保政变顺利，他们继续物色京师和皇宫内外拥有兵权的人。五官中郎将、伊休侯刘叠进入他们的视线。刘叠是皇帝近臣，加官侍中，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禁省，还负责宫殿宿卫。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刘歆。

而刘歆与皇帝渐行渐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考虑到王涉年事已高，董忠担当了主谋，他和王涉多次去找刘歆，故意在刘歆办公的国师殿里谈论星象的奥秘，以期引起刘歆的兴趣，试探他的态度。刘歆起初刻意回避，不理睬两人，直到等不及的王涉亲自去见刘歆，一见面就哭了：“我们诚心要与您合作，以保全大家的宗族，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刘歆大概会想，你王涉是王莽的堂兄，叫我如何相信？

王涉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抛弃堂弟：

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⁶

意思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从小身体就不好，母亲又是个酒鬼，我们自家都怀疑王莽不是王氏的后代。

王涉的话放到现代来看，实属无耻，在王莽政权稳固、分享高官厚禄时为何不说这些话？要背叛也不是不行，为何要污蔑人家母亲酒后乱

性与人通奸？但在当时，这番话的主要意图是令刘歆放心，论证王莽非王氏后代，将王氏与王莽撇开关系，也就解惑了为什么要背叛王莽。

王涉表明心迹，刘歆也放心了。这些年来，他对王莽的感情从尊敬到恐惧，再到仇恨。他只要一想到死去的儿子刘棻、刘泳和女儿刘愔，就恨不能为儿女复仇。

因此，刘歆对王涉的政变打算没有意见，只提出一点：刘叠是自己仅存的儿子，绝不能让他冒险参加政变。

董忠和王涉同意了，既然刘叠不参加，就还须另寻同盟。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司中，就是故汉的光禄勋，也负责宿卫宫廷；大赘，是新朝自创官职，有管理军队俸禄的职责。董忠应该是他的上级，就亲自找到孙伋，请他参与进来。

具体的安排大致是：大司马董忠掌握中军，卫将军王涉掌握宫廷守卫，司中孙伋掌握殿中宿卫。三人同时起事，劫持王莽，待大局稳定后投降更始帝。

应该说这个安排比较周到，但对何时起事，顶级星象大师刘歆有自己的意见：

当待太白星出，乃可。⁷

就是说，等太白星“出”就行动，因为太白星主兵：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⁸

太白星，就是金星。因为金星在地球轨道内侧，所以一般只能在黎明和黄昏看到它，但如果金星和太阳同时出没，被阳光掩盖，肉眼就看不见了。古人看见金星时，称之为“出”，看不见则称为“入”或者“伏”。刘歆精通星象，对太白星的出入规律颇为掌握，知道太白星不久将出，为了万无一失，他认为应在太白星出的时候发兵才稳。

董忠、王涉都是笃信星象之人，刘歆又是最顶尖的学者，就都同意了。

于是，政变虽然准备就绪，但却延宕未发。孙伋突然被几位高官、皇亲拉入这一图谋，诚惶诚恐，非常害怕。回到家后，吓得脸色都变

了，饭也吃不下。他妻子陈氏觉得奇怪，不免询问一番。孙伋一开始不说，最终还是告诉了她。

政变是大逆之罪，如果失败，孙氏、陈氏两家都会被捕杀。陈氏很害怕，就又告诉了弟弟陈邯。陈邯一听，何必为这些事情惹上杀身之祸呢？就直接找到姐夫孙伋，晓以利害，劝他要顾及家族，不要冲动。

七月，孙伋和陈邯一起告发了董忠等人的图谋。因为是董忠找的孙伋，所以在举报中，董忠被描述成主谋。王莽大惊，立刻派人分头去捉拿。

董忠正在讲武练兵，突然来了使者急召他进宫，他的属下护军王咸提醒道，久不发兵，是不是泄密了？不如斩杀使者，直接带兵杀进去。

由此可见，虽然是几位大臣的密谋，但政变至少已经部署到部分中层将官，也得到了这些军人的支持。所以，王莽确实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

但董忠没有听，大概觉得猝然发兵，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和王咸交代了一番，跟着使者进宫。走到禁省，他发现王涉、刘歆也都被召见，显然是泄密了。正想着，中常侍⁹鄧恽走了过来。对这个人，刘歆可不陌生，当年女儿刘愔被迫自杀，直接原因就是⁹鄧恽和刘愔“谈话”。而现在，这个爪牙又要故伎重演，前来斥责他们几个了。

果然，⁹鄧恽一开口，董忠等人就知道事情全部泄露，抵赖已无意义，就都认罪了。跟着过来执行逮捕的几个宫中内侍中黄门拔出剑来，准备押解他们，剑光肃杀，令气氛陡然紧张。董忠大概知道不免一死，恰好他是从中军那边过来，还带着佩剑，于是拔出剑来打算自杀。

因为气氛高度紧张，侍中王望一见董忠拔剑，还以为他要拒捕，高呼，大司马要反！中黄门本来就拔剑在手，听得一个“反”字，立刻冲上前将董忠格杀。血肉飞溅，在一旁的刘歆、王涉被吓得不轻。

宫外，王咸等人预感事情不妙，就带着中军兵马前来，正好听说大司马突然被几个中黄门所杀。在未闻王命的情况下，主官被宦官所杀，对军人是一种侮辱，大批军人涌到黄门郎执勤的衙署，纷纷拔剑张弩。一场已经被破获的政变，眼看有激发出兵变的危险。

惊险时刻，皇后的父亲，正在例行巡视郎署的宁始将军史谡，赶忙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大司马突发狂病才被诛杀，请大家不要紧张，放下兵器，回到军营。

宁始将军也是高级将领，他既然发话，大部分军人也就退去，一场危机解除了。

王莽知道董忠已死，鉴于他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反而成了政变主谋¹⁰，感到愤怒，下令虎贲们用“斩马剑”也就是尚方所制造的“尚方宝剑”，将他的尸体砍成尸块，盛在竹篮里，一边示众一边喊“反虏出”。这也是厌胜的做法，董忠的宗族成员就像当年翟义家族一样，被撒上浓醋、毒药、匕首、荆棘，全部活埋，以示最毒辣的诅咒，令其家族在地下也无法翻身。

但对于董忠的中军部下，王莽不敢追究，说他们都是被董忠蒙骗，全部赦免。

王涉、刘歆已经自杀。不知道刘歆在死之前，是否会担忧他仅剩的儿子也将被杀，是否会想着还有许多学术工作没有完成，是否后悔非要等“太白出”。当然，太白星出的时候，确实已经兵戈四起，刘歆没有说错，但那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一个是骨肉堂兄，一个是心腹旧臣，连他们都要谋反，王莽内心极度痛苦，也很忌讳，不敢让天下觉得自己众叛亲离，对他们的死秘而不宣，也没有扩大追究。特别是刘歆的儿子刘叠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证据参与，王莽显示了他罕见的宽容：免去刘叠五官中郎将，改为中散大夫。仅此而已。

西门君惠自然难逃一死，但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临刑那天，他对围观的人群——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他的好友桓谭——高声说道：

刘秀真汝主也。¹¹

国师公刘秀已经自杀，西门君惠是觉得还有一个刘秀呢，抑或不相信国师公真的死了呢？

几天后，有郎官在皇宫的钩盾土山上承露盘旁边，看见一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白头发老头。一晃，不见了。

郎官们私下里说，那就是国师公刘歆，他可能成仙了。

衍功侯王嘉是王莽自杀的侄子王光之子，擅长卜卦。王莽听说了这个老头的事情后，让王嘉给占一卦。王嘉占卜后，说，不吉，陛下要小心兵火啊。

王莽内心大概已是极度苍凉，苦笑着说：你个小孩儿懂什么呢，那

个老头啊，是我的皇祖父，就是成仙的王子侨，他现身是要来接我成仙呢……

11．长安保卫战

八月间，王莽听说，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谣言再次在民间传播。那就是当年翟义所说的他毒死汉平帝的事。

王路堂里，王莽大会群臣，把当日所写、曾藏在汉家宗庙的金滕策书找了出来，一边读，一边泣不成声，以表明决无杀害女婿平帝的心迹。群臣沉默着倾听。透过婆娑泪眼，皇帝发现，自从刘歆死后，朝廷里已经没有几个旧人了，他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桓谭也不见了，他因为与典乐争斗，两人都被免职，已经返回故乡沛县。

立国之初的“十一公”，如今“四辅”只剩下哀章，“三公”只剩下王邑，“四将”只剩下王盛。这三个人里，哀章贪吝，目前人在洛阳守城，未闻有什么战绩；王盛是卖饼出身，只有堂弟王邑是他硕果仅存的股肱。昆阳大战之败，虽然责任主要在王邑，但他的忠诚毋庸置疑。王莽下令把王邑召回长安，由他组建新的执政班底。

怕王邑误认为被召回是要追究昆阳失败的责任，王莽特地在诏令中谈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年老，嫡子都死了，打算把天下传给你。

王邑果然回来了。当然，不知是皇帝反悔，还是听了王邑对战争情况的报告后君臣兄弟二人已经无心于此，总之，并无皇帝立王邑为太子的下文。不过，王邑的确担当了新朝顶梁柱，他被拜为大司马，权势仅在皇帝之下。

他的班子里，大司徒是张邯，大司空是崔发，都是中生代里最受王莽信任的人。但他们二位擅长符命，缺乏政事经验。以前当过大司马的苗^𪗇代替了刘歆的位置，拜为国师；侯林被拜为卫将军。比起汉末新初的风流人物，这几位实属平庸之辈，并无公辅之能。

其实，平庸不平庸，亦已无济于事。去年造升仙车时，王莽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状态，但他至少还有自信。现在的他因为战事无可挽回，忧虑得连饭也吃不下，可他并没有积极谋划，而是每天喝酒吃鲍鱼，读兵法书，想从书中找到快速退兵的法子，困了连床也不沾，就在席子上凭几而眠。日常政务完全不理，遇到急事就用厌胜之法，比如破坏汉元帝、成帝陵殿中的君臣画像，给园陵的围墙泼墨，诸如此类。

但皇帝从未有过投降的打算。

这也是他以圣王自诩的宿命。

九月¹²，右队郡（即汉弘农郡）析县¹³的豪杰邓晔、于匡起兵，自称辅汉左右将军，守卫析县、武关的将领均不战而降，加入汉军，声势浩大。这支军队还没有和武关之外的更始军联合，就已经北上直取郡治，攻杀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再向西朝着长安进军。

王莽闻讯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无计可施。还好，又是崔发站了出来，说按照古文经学《周礼》和《左传》的记载，国有大灾难时，应该通过哭来厌胜。现在的局势，非人力能为，应该向天号咷大哭以自救！

王莽没法，他赶在汉军抵达长安之前，率领群臣到南郊，在明堂、辟雍和九庙之间，向天陈说自己获得符命以称帝的来龙去脉，并作了一千多字的告天策书，向天摆明自己的功劳。长叹说：上天既然让我受命，何不消灭各地的叛贼？上天如果认为我犯了错，何不用雷霆劈死我？他顿足捶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完后伏在地面上向天叩头。

不仅自己要哭，臣民也要从早哭到晚，朝廷熬制了免费粥，哭完了可以吃一点再接着哭。而那些哭得好、哭得妙，能边哭边诵读策文的人都被拜为郎。据说有五千多人因此成为郎官，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场面还是相当盛大的。

哭天，当然无法直接退兵，但这不能说完全荒唐，毕竟《左传》里确实记录着类似的事。在笃信天帝的时代，皇帝向天哭诉，也是向上天“请示汇报”，只要上天没有抛弃自己，那么再派出军队就一定能旗开得胜。

哭完后，王莽把最后的军队也就是数万中军拿了出来，拜了九位将军，名号里都有“虎”字，总称“九虎”，每个虎将拨给四千金以作激励。但王莽越发不信任别人，他曾委派四辅三公的七十二名属官为使者到各地传达敕令，结果他们一出长安就作鸟兽散，其中的大夫隗嚣跑到天水，马上起兵讨莽。有鉴于此，王莽就把九虎的妻子儿女都接到皇宫里“照顾”，作为人质。

九虎们一看如此不得信任，又一看王莽在禁省里还藏着六十万斤黄金，却只得到四千金，也都没了斗志。九虎在长安东北的华阴一带¹⁴迅速被邓晔击溃，中军精兵损失殆尽。

此时，更始军已经赶到武关。邓、于二人开关迎接，和更始帝的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率领的西征军会合，大军开到长安城下。隗嚣从天水派来的军队从西部开过来，长安被各路所属不同的军队围困，成为一座孤城。

王莽现在连南郊也去不了了，城里只有城门兵、越骑等部队。他大赦城中囚徒，每个人都发了武器，杀猪饮血为盟，让这些武装起来的囚徒们发誓，如果对新朝有二心，死后会遭报应。统率这支临时军队的是皇帝的岳父、宁始将军史丹。但这支军队一过了渭桥就四散逃走，一个人也没回来，不急于逃命的，反而用皇帝发给的武器把渭陵附近王莽妻子父祖城郊的坟墓都给掘了，棺材拖出来烧掉。

巍巍赫赫的九庙、明堂、辟雍等宗法祭祀建筑群，被付之一炬。

大火熊熊燃烧，照亮了长安城。

笃信儒学之人，对宗庙的焚毁最为忌讳，对先人灵柩遗体的受辱最感痛苦。王莽在宫墙上见到大火把多年来制礼作乐的丰功伟绩烧成灰烬，该作何感想？

他想的是守城门的士卒也不可信任，有人告诉他，这些士卒都是东方人。而敌人也多是来自东方过来的。他信任越骑¹⁵，就每个城门配一名校尉加六百越骑，以作最后的抵抗。

作为圣王，皇帝决不会投降。

十月¹⁶初一，经过激烈的保卫战，长安城东墙的春王门，也就是汉朝时期的宣平门被攻破。大司徒张邯正好在门内巡视督战，当场被杀。大司马王邑、王舜的儿子王巡、¹⁷王恽带兵节节抵抗。到了这天的日暮时分，城内各官邸已经空无一人，大小官员各自逃亡。

十月初二，城内有两个年轻人朱弟、张鱼，担心外兵进来抢劫或是屠城，就赶紧加入反莽的阵营。他们纠集了很多“首都青少年”，成群结队，纵火烧了皇宫的作室门，用斧子劈开敬法殿的小门，还大呼小叫，四处高喊：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¹⁷

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反虜。王莽在宫中听到这些话，想必惊恐而伤痛。但最可怕的还是大火。大火很快烧到黄皇室主所住的承明殿，公主的身边应该还有人在，并在事后回忆了她的最后时刻：火势越来越

大，那一刻终于到来，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何面目以见汉家！¹⁸

随即跳入火中而死。

王莽可能并不知道他最爱的嫡女已经去世，在侍从的帮助下，他逃到宣室殿，这是王路堂的正室，仍然有不少大臣和侍从跟着他。但火势继续蔓延，连前殿也没法待了。惊慌之中，他分明听见宫女们绝望地叫喊“怎么办！怎么办！”但他仍然不会投降，他大概会想起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所以要穿戴好圣王的装扮：身着苍青泛红色的衣服，佩戴着天子玺绶，手中握着不知何人所献的“虞帝匕首”。当然，还带着他的威斗。

皇帝忠诚的天文郎仍然恪守职责，在他身旁用“式盘”占卜时日。威斗和“式盘”可以结合起来用，就像传说中的“司南”，也是在方位盘上放置一个金属的勺子。皇帝坐在席子上威斗斗勺的位置，随着时辰推移，他把威斗的斗柄指向一个新的方位，以与天空中北斗斗柄的方位相一致，这意味着从这个方向来的汉军将会被自动消灭。他已经不再进食，大概也没有人送来饭菜，他很疲倦了，但仍然不会投降，他坚定地告诉身边的人：

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¹⁹

“天生德于予”，这本是孔子周游列国，在宋国被桓魋围困，险些被杀时告诫弟子的话。王莽自诩圣王，像孔子一样拥有天命，所以也绝不会被杀，眼前的困难也一定会过去。

十月初三，天刚亮，身边剩下的大臣把皇帝连扶带架，从宣室殿前殿出发，向西出白虎门。王舜的儿子、和新公王揖在门外备好了车马，大驾向沧池的渐台奔去。渐台是二十多丈的高台，上有建筑，从岸边过去只有一条路。当年王莽获得汉朝传国玉玺，得意非凡，就在这座渐台上摆酒庆贺。现在，他怀抱符命、威斗，颤巍巍登上了渐台，只希望池水能够阻挡敌军。

他毕竟也六十八岁了。

他坐在台上的亭阁里休息，环顾四周，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看见追随者正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估算了一下，还有千余人。他可能

会想起当年汉室禅让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追随汉帝，可见，自己确实有天命，人心并不思汉。

他也会看看，那些在新朝享受了高官厚禄的人有谁在。他没有看见最宠信的崔发，崔发不可能投降，一定像张邯那样殉难了吧；他看见的，王氏子弟有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侍中王睦，还有王巡、王揖；重臣里，有一直跟随自己的翟恢，有国师苗贽，有太傅唐尊，当年“十一公”里的王盛也在，他虽然只是卖饼出身，但真的是忠于自己啊！

王莽应该没有看见，王睦本来已经换好衣服准备逃跑，被父亲王邑喝令回来。现在，父子二人、王巡、翟恢在渐台下面带领残兵拿好弓箭，安排位置，准备死战；其他重臣则在台上陪着王莽。

整整一个白天，王莽终于可以不受打扰，也不必奔逃。他注视着渐台之下的战斗，时不时听见有人呼喊：

反虏王莽安在？

但他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是“圣王”，圣王是无惧的。他只是不明白，自当安汉公至今二十多年，尊儒改制、顺天应变，一贯勤勉政务、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且手握符命；但为什么登基之前就很顺利，登基之后越来越难，以致不可收拾呢？

12．圣王不降

已是暮秋，沧池畔树木萧瑟，寒潭凄清。若是鸟瞰，会觉得人宛如在天海之间，特别渺小，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汉武帝多年以前的那首《秋风辞》，虽然不是写于这里，但苍凉感是相似的：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舫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从渐台上远眺，风景犹在，物是人非，王莽确实老了。

对汉军来说，只要能活着冲进去，斩首夺旗，立下大功，这辈子就能荣华富贵，甚至历史留名，因此无不拼命奋战。从岸边通向渐台的路

只有一条，想必也很窄，汉军拥挤在一起，据说围了几百重之多。只有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才有机会顶上去且战且进。推测来说，这些人名为汉军，实际上不仅有军人，还有城中的市民、商贾、无赖，城外的贩夫、农人，等等。

渐台上下，新朝逃亡的官员、侍从加上仅存的士兵，大概还有千余人，继续在组织防御。汉军不断被台上射来的弓矢射杀。战斗依然异常激烈，直到下午，汉军终于觉得弓矢明显减少。台上逐渐弹尽粮绝，汉军逐渐冲到渐台之下，与王莽军短兵相接，把守军几乎全部杀死。

到了下午，这天的下哺时分，王莽看见汉军层层登台，攻了上来。

台上已经没有几个武将卫兵了，多数是躲避的文臣，他们还都佩戴着印绶，衣着华丽，却乱作一团，犹如待宰的羔羊。汉军毫无怜悯，挥刃向前，杀人之后还将印绶取下戴在身上。渐台上的建筑物里也有人在躲避，汉军冲入其中，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斩杀，一时血光四溅，一些尸体也从渐台掉进池水中。

屠杀期间，一名叫作公宾就的校尉忽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士兵身上佩戴的印绶不同寻常。公宾就曾经在大鸿胪手下担任过“大行治礼”的工作，对新朝的印绶很是熟悉。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平静地询问这个士兵，身上的印绶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士兵似乎缺乏敏感，他指了指渐台上的那幢建筑说，是从这个房子西北角一个他杀死的人身上剥下来的。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作杜吴的商人，还是一个叫作杜虞的屠夫²⁰，但这都不重要。公宾就很快跑进室内，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他虽然已经被褫去印绶，但身旁的威斗、衣服的颜色，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使他足以确认，这具尸体就是终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公宾就果断地斩下王莽的首级，拎在手里，大步走出室内。在渐台之上，他借着黄昏的残阳，向众人展示这个苍老、瞑目、须发花白的首级。

渐台上的众兵士霎时停下了战斗，但仅仅片刻，众人如梦初醒，蜂拥进入建筑物里去寻找那个无头的尸体，他们只为抢夺一块尸身，以证明自己也参与了对王莽的斩杀：

就是说，他们为了争夺王莽的一块尸体，几乎将其剥成肉泥，甚至为了争夺尸块而自相残杀的都有几十人。历史的相似并不惊人，多年以前，项羽自刎乌江后，汉军也曾这样抢夺过项羽的尸体：

王翳取其头，乱相蹂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²²

有理由推测，最初记录王莽之死的史家在回顾这一情形时，可能参考或联想到项羽的下场；也可能当时的军人确实会对这类大人物做出分尸求赏的举动，公宾就终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被更始帝封为滑侯。

王莽已死，汉军的杀戮也告一段落。这时候，他们才会在上司的督促下清理战场，令宫人或熟悉的人来辨认、检点被斩杀的尸体都是哪些人物。

渐台下躺着的主要是战死者，大司马王邑和他的儿子王睦、四将中的车骑将军王巡，以及翟恢，很快被辨认出来；渐台上被杀的主要是文臣近侍，有王舜的儿子王揖、国师苗、太傅唐尊、宠臣赵博、中常侍王参，以及卖饼的前将军王盛，他们都是王莽的殉葬者。

有些名宦高官可能也一同被杀，但或是尸体无法辨认，或是掉进水里尸骨无存，以至于无法肯定他们的结局。

有些皇亲国戚和重臣向汉军投降，包括王莽的岳父更始将军史谡，王舜的两个儿子安新公王延和说德侯王林，四将之一的立国将军赵闳，以及王莽最信任的大司空、说符侯崔发等，他们战战兢兢地等候发落。

汉末的皇太子刘婴也被从软禁的地方放了出来，他已经十九岁了，但几乎不会说话，不认识外界的事物，俨然痴儿。

更始军校尉王宪成为最早代表更始帝进入长安的汉军统帅，恍兮惚兮，他生出错觉，自称汉朝大将军，建立天子旌旗，住进王莽的后宫，俨然皇帝的做派。从他并无叛乱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大概率是被亲身经历改朝换代这件事冲昏了头脑。

三天之后的九月初六²³，邓晔、李松、申屠建等将军，以及更始帝的岳父、大司马赵萌接连进驻长安。波水将军窦融出现在队伍里，他已经投降赵萌，并赢得了赵萌的欣赏，后来还将成为东汉的大司空，开启东汉一朝赫赫有名的窦氏家族。阶下囚崔发惊奇地发现，申屠建竟然是他以前的学生，他大喜过望，觉得总算逃过一死。

诸将见到王宪僭越，随即将他逮捕斩首。

公宾就奉上的王莽头颅，想必此时已经腐败。诸将不敢怠慢，将这颗膨胀的头颅做一番防腐处理后装入匣子，加急送往宛城，更始帝要用这枚头颅向天下宣示自己赢得了天命。

没了王莽的天下并不平静，王者已逝，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注释：

- 1 恽，音同运。本文中邓恽的事迹，俱见《后汉书·邓恽列传》《后汉纪·邓恽传》。
- 2 本章是王莽视角，因此仍采用新历。
- 3 林剑鸣：《秦汉史》，第731页。
- 4 《汉书》称四月，《后汉书》称三月，即汉历三月，新历四月。
- 5 新历七月，汉历六月。
- 6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184页。
- 8 《汉书·天文志》，第1282页。
- 9 音同赤。
- 10 董忠被当作主谋，或者说董忠是实际上的主谋，是因为时人在描述这场政变时，或是把董忠放在最前，或是以董忠代指他人。见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 11 《后汉书·窦融列传》，第798页。
- 12 汉历八月，新历九月。
- 13 今河南西峡县一带。
- 14 两地相距大约100公里。
- 15 越骑，最初是来自越地的骑兵，这里指的应是能力超群的骑士，与越地未必有关。
- 16 新历十月，汉历九月；《后汉书》《后汉纪》均依汉历作九月。
- 17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 18 《汉书·外戚传》，第4011页。
- 19 《汉书·王莽传》，第4190页。
- 20 《汉书·王莽传》作“商人杜吴”，《东观汉记》作“杜虞”，吴、虞二字声音相近，应是一人；职业一说为屠夫，但商人、屠夫其实也可能是一个职业，即从事屠夫的商人。
- 21 《汉书·王莽传》，第4192页。
- 22 《汉书·项籍传》，第1820页。对王莽尸体的抢夺，“争相杀者数十人”，字面也可以解为“争着去砍杀的有数十人”。但若设想当时情景，以及类比项羽被杀情景，当理解为“因争夺相互残杀的有数十人”为妥。
- 23 王莽已死，此处为汉历九月。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丘制命

帝卯行

——《孝经援神契》

1

宛城。王莽死后数天，几名使者从长安赶到南阳太守府正堂。

更始帝正在便殿与宠姬韩夫人闲坐，使者们禀报了长安的消息，并捧出那个匣子。更始帝连忙令人打开给他验看，想来，那人头应当甚是恐怖，但更始帝却喜不自禁地说：

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¹

就是说，王莽若不称帝，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更始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而韩夫人笑道：“如果不称帝，哪有你的今天？”

看到这颗首级，更始帝觉得再无悬念，吩咐把首级悬挂在宛城的集市上。

宛城是“一线城市”，集市上人口众多，虽然前番刘縯围城时死了不少人，但更始帝的入驻当重新聚拢了人气。看见汉官把王莽的首级悬挂起来，众多吏民前来围观，从围观到唾骂，从唾骂到“提击”，直到有人撬开首级的嘴巴，割下王莽的舌头，并分而食之。

王莽确实令许多人受了苦，宛城又是新朝屠杀反叛者比较多的城市，远到居摄时期的刘崇、张绍家族，近到一年前的李通家族，所以宛城中有人格外痛恨王莽并不奇怪。但是，当年万众齐心将王莽送上帝王之位的人里，就没有宛城的居民吗？

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痛恨王莽并不稀奇，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

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王莽一死，那些固守城池的将领，搏杀拼命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抵抗的意义。例如王钦、郭钦据守的京师仓，始终没有被攻克，但他俩知道王莽死后也就投降了。出于对忠于职守的尊重，更始帝封二人为侯。

但也有人誓死不降，例如监管“曹国”的曹部监杜普、陈定郡太守沈意等人坚守城池，直到城破被杀。西汉灭亡之时，除了刘氏宗族外，只有一个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比西汉强多了。

现任东郡太守王闳是王莽的堂兄弟，听到王莽死后反而松了一口气。汉哀帝驾崩之夜，要不是他火速将消息报告王政君，王莽不会那么快就掌握朝政。但他们后来关系不睦，因为王闳希望王莽当霍光，安汉而非灭汉。新朝建立后，王闳的态度引起王莽的注意，被出为翟义的故官东郡太守，可能有敲打他的隐晦意思。王闳也害怕有一天会遭遇不测，随身携带毒药，常存自杀之志。

看见汉军兵临城下，王闳立刻举全郡投降，受到更始帝的信赖，被委任为琅琊太守。后来更始失败，王闳一度归在和刘秀争天下的刘永、张步一边，最后跟随张步投降刘秀，竟然保全了王氏他这一脉。

其他王莽近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更始元年九月，就在王莽的头颅悬挂于宛城时，王舜之子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他们被送到宛城，犹如给更始帝献俘，随即被杀。

洛阳拿下后，更始帝准备迁到洛阳，就派刘秀为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打扫一下宫室。还没动身，前番在昆阳大战中败逃到汝南郡的严尤、陈茂拥立刘望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汝南郡与南阳、洛阳都很近，算是“卧榻之侧”，更始帝派堂侄奋威大将军刘信向东挥师，刘望称帝仅十几天，就在汝南兵败，连同严尤、陈茂一并被杀。

十月初，更始帝带着朝廷抵达洛阳，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件大事：第一，处理好关东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赤眉军；第二，收服群雄蜂起的河北地区，当时有谚语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²，正是这个意思；第三，安排赴长安诸事宜，彻底恢复汉朝。

赤眉方面，更始帝很快派了使者到关东去招降，樊崇很有诚意，留下全部兵马，只带着二十几个首领跟使者到洛阳归顺。更始担心赤眉不好控制，没有给他们封王，而是封为列侯。东方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河北这边，更始帝的堂弟刘赐——他和更始帝属同一祖父——推荐让刚刚和阴丽华结婚的刘秀渡河去收服。更始帝经过一番权衡，在刘赐等人力劝之下，同意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去河北招降，不过没有兵马粮饷，只配了官属，刘秀需要自己去开拓。

但刘秀欣喜若狂。几个月来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此番虽然“单车临河北”，他却犹如猛虎入山，一去不返了。

就在刘秀离开洛阳的同一天，更始帝拜刘赐为丞相，启程去长安主持局面，修缮宫室，准备朝廷入关事宜。刘赐一到，发现长安破坏得并不严重，只有未央宫被火烧了，其他宫殿几乎完好，数千宫女、乐伎都还在，收拾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但长安的秩序委实不太安宁。

原来，崔发归降后，因为曾经教过申屠建《诗经》，这一个多月时常去找申屠建阐说符命，大谈汉家终究灭亡的征兆，暗示申屠建有所作为。崔发曾经通过说符从一名经师变为三公，应是想故伎重演。申屠建后来无法忍受，又怕惹上祸端，正好刘赐来到长安，就将此事告知，建议由刘赐出面解决。

刘赐迅速杀掉崔发，估计是担心局势不稳，把已经投降的史谡、王延、王林、赵闳等人一并杀了。至此，当年烜赫一时、“一门十侯”的王氏家族已近枝叶凋零。“十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长，阳平侯王凤，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涉因政变被王莽所杀；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逢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邑、孙子王睦死在淅台上；安阳侯王音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揖全部被杀。得以善终的，一是王谭的儿子王闳、王仁；另一个是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丹，曾和刘秀认识，因王立被王莽所杀，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但他早早战死，所幸留下儿子王泓到东汉被封为列侯。

当然，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支还很多。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终于抵达长安，下诏大赦，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志得意满的更始帝终于入主长安，据有了西汉诸帝们建造的宫殿，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要求他们归顺。天水的隗嚣见到使者，觉得天下大定，欣然要走，军师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但隗嚣不听，方望很失望，辞别而去。隗嚣到长安后，被拜为右将军，后升任御史大夫。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始帝一直关注着河北，看到刘秀招降纳叛，“业绩”出众，从光杆

司令起家，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拥有十万大军。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以免尾大不掉了。

2

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³，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春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⁴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

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鄯⁵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讖的微言大义：

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讖。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⁶。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⁷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

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3

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⁸，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讖、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漫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⁹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

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癭扬为主”¹⁰，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讖文误我”¹¹。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¹²，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讖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讖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讖语“孙咸征狄”，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讖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讖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讖。”¹³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讖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讖，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讖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讖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讖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¹⁴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讖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讖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

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¹⁵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轻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¹⁶。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4

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讖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

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¹⁷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

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
- 8 《后汉书·循吏列传》。
- 9 《廿二史札记校证》，第90页。
- 10 《后汉书·耿纯列传》。瘿，大脖子。
- 11 《后汉书·祭遵列传》，第739页。
- 12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 13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61页。
- 14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8页。
- 15 此时已升格更名为章陵县。
- 16 吕思勉：《秦汉史》。
- 17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¹

起迄时间（元）

西汉

刘邦称帝

（汉太祖）

前元9年—前8年

前元8年—前80年

（吕后）

前163年改元，未有年号

前元9年—前164年

（汉太宗）

前元6年—前57年

前149、前143两次改元，未有年号

前元5年—前50年

前元4年—前44年

前元4年—前41年

据辛德勇，汉武帝起初改元没有年号，至第五次改元之后，将之前的改元追记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第六次改元后不久追记为元封。前104年汉武帝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实行正式的年号制度，每四年一改元。晚年未及确定或追记年号即去世

前元3年—前12年

前元2年—前11年

前元1年—前11年

前元1年—前10年

前元1年—前10年

前元1年—前10年

前元1年—前10年

征和92年前89年

前89—前87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继位，后被废，汉宣帝即位

陵

元凤80年前75年

元凤78年

据辛德勇，本始年号一直使用到本始五年，霍光死后，宣帝亲政，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茂期病）

地节66年前66年

元康65年前62年

神爵61年前58年

五凤57年前54年

甘露58年前50年

黄龙49年

初元元年，王政君为皇后初元元年，王莽篡位

永始48年前39年

建始38年前34年

竟宁38年

永始元年，王莽袭新都侯绥和元年，王莽为大司马

河平38年前25年

阳朔29年前24年

鸿嘉20年前4年

永始16年前4年

元延5年前4年

绥和18年前2年

建平元年，刘秀生

建平元年5年

建平二年，刘欣改元太初

元将，以求再受命。旋即废除，恢复建平二年
太初元年

建平前5—前3四年

元寿12年前2年

刘欣死后王莽再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5年

元始元年，王莽为安汉公元始四年，王莽为宰衡

刘衍死后王莽居摄

居摄元年3年

（孺子）

初始元年

新莽

王莽以十二月为岁首，始建国元年正月即初始元年十二月
地皇四年十月初三，王莽被杀

始建国天凤元年——六年

始建国地皇元年——四年

更始

更始政权改正月为岁首，更始元年正月即更始元年
更始三年九月，刘玄退位

东汉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位

建武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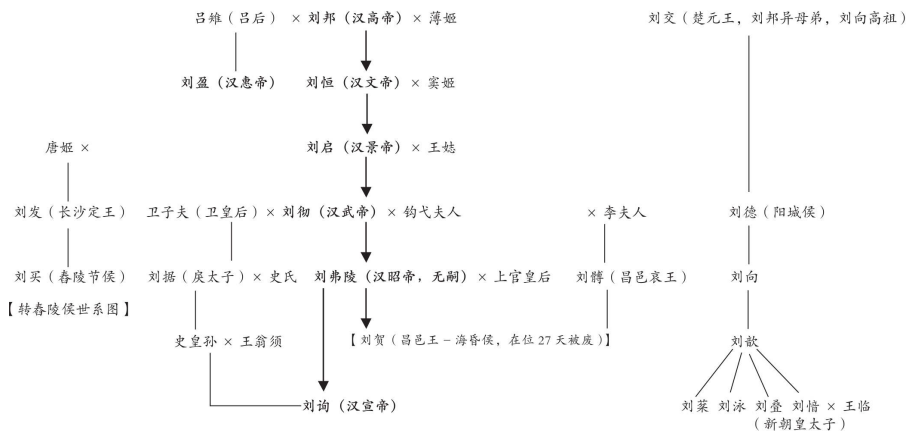
（汉世祖）

注释：

- 1 本表主要根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并采辛德勇《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成果，见氏著《建元与改元》第394页附录（中华书局，2013）。本书年号、年代、日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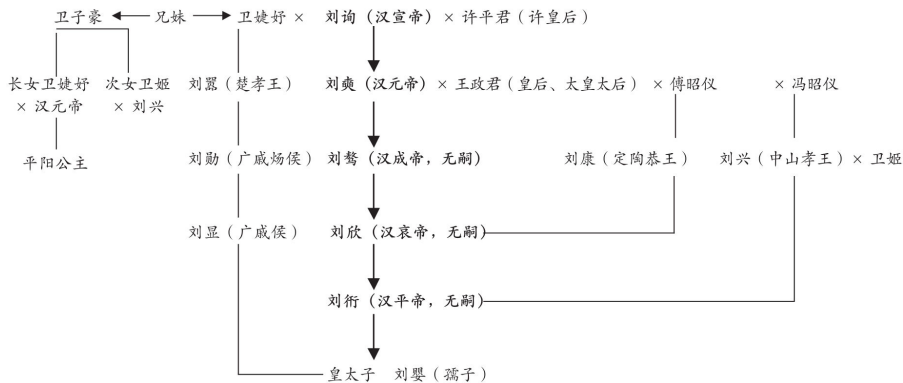
古今对应，主要依据《公历和农历日期对照查询》（https://ytliu0.github.io/ChineseCalendar/index_simp.html）。

世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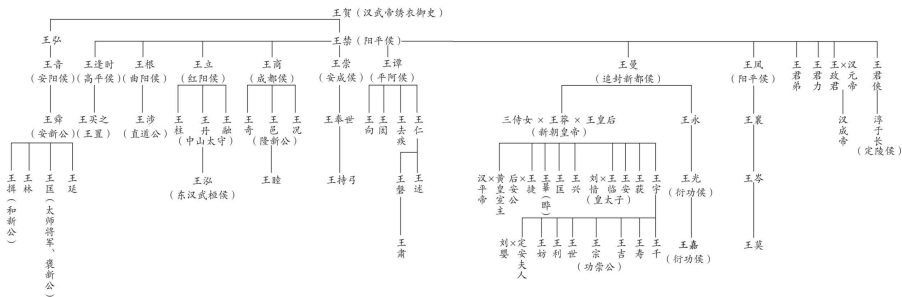


西汉皇室世系图（上）

注：×号指婚姻关系，带箭头的竖线指皇位的继承关系；不带箭头的竖线和折线指生育关系。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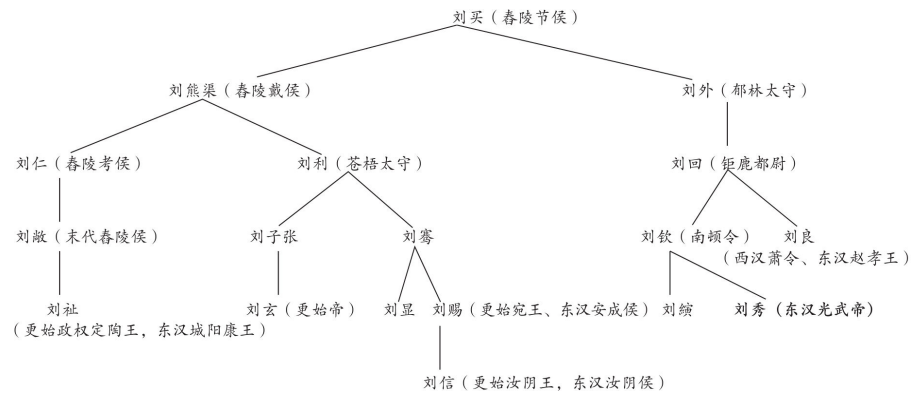
西汉皇室世系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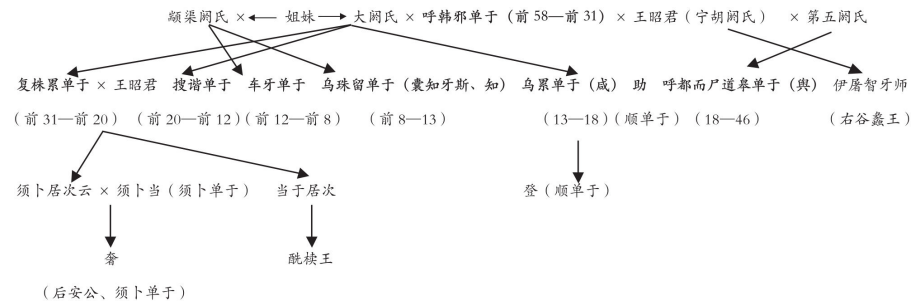
王氏家族世系图

注：

- 1. 王逢时之子，《汉书·元后传》作“王买之”，《外戚恩泽侯表》作“王置”，疑为一人。
- 2. 王舜之子王揖，《莽传》称王舜死后，“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但《外戚恩泽侯表》又有“公摄嗣，更号和新公”，《莽传》又有“和新公王揖”，疑王摄、王揖是同一人。又据《莽传》，安新公王延投降更始政权后被杀，和新公王揖与王莽同死于渐台上，因此王延、王揖非同一人。至于王舜的爵位继承的矛盾，疑王延继承的是安新公爵位，王揖继承的是王舜原来的安阳侯爵位并改为和新公。
- 3. 王莽私生女王捷的封号，据《莽传》为“睦逮任”；《匈奴传》载须卜当与云之子“奢”被封后安公，娶“睦逮任”，应即王捷，封号形近而误。



春陵侯家族世系图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家族世系图

参考书目

古籍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7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艺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江西府学刻本，2007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

班固等：《汉书》，中华书局，1962

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

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

荀悦、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2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5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02

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

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

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

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20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专著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齐鲁书社，1984

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史》，中华书局，2011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

《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

程政举：《汉代诉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1990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葛承雍：《王莽新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商务印书馆，2014

龚鹏程：《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8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

姜忠奎：《纬史论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

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文津出版社，2020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2016

罗建新：《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孟祥才：《王莽传》，人民出版社，2016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
-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2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4
- 《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 沈展如：《新莽全史》，正中书局，1977
-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孙少华：《桓谭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王葆玟：《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1994
- 王子今：《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社，2017
-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
-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华书局，2011
- 《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2011
-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徐景昭：《禅让、世袭及革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的君权传承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许倬云：《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
-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1943

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张树国：《楚骚·讖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朱腾：《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马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日）桥本敬造：《中国占星术的世界》，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

（日）日比野丈夫：《秦汉帝国：中国文明的历史（三）》，吴少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姗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日）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朱海滨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日）佐竹靖彦：《刘邦》，王勇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其他

刘翔平：《神经质人格（修订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

孙志新主编：《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图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美）巴巴拉·W.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中信出版社，201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99

（美）保罗·J.席尔瓦：《文思泉涌：如何克服学术写作拖延症》，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美）伯格、（美）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美）博格：《精准拉伸：疼痛消除和损伤预防的针对性练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6

（美）马克·克雷默、（美）温迪·考尔：《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英）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古希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华夏出版社，2007

《论僭政》，华夏出版社，2006

（荷兰）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

董涛：《王莽威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5期

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载《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牒校释》，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

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载《考古》1989年第3期

纪国泰：《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李大龙：《关于高句丽侯驎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第6期

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刘次沅：《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

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刘凯：《九锡渊源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苏诚鉴：《“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筮”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王国庆：《匈奴单于位继承初探》，载《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吴国武：《帝舜姓氏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徐冲：《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制”的演生》，载《文史》2018年第4期

阎步克：《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袁青：《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载《江汉学术》第33卷第5期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赵国华：《刘歆谋反事件考论》，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赵贞：《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统治系统”论的射程》，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记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无不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¹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讖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

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但关于客观史实、文学叙事这两点，不妨多说两句。

一是史料辩证的逻辑。打个比方，写作“历史非虚构”，就像下属给上级写调研报告。上级对这个题材或是有所了解，或是有些兴趣，但没有工夫去实地调研（研读原文、了解前沿成果），才需要派人去写调研报告。而下属在调研中，所闻所见未必都是真的，古书不见得都正确，有些是古人的偏见，有些是记录或流传的错误。因此下属还要多渠道去了解，包括历代学者的故识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辨析真伪，查漏补缺，最终还要给上级提出见解，以资参考。因此，呈献给“上级”读者的文本，需要有增值、有侧重、有态度。

二是文学叙事的逻辑。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谈学术写作，也拒绝向壁虚造，“历史非虚构”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思或者说“文心”。例如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方法论。事件、历史人物的话不可虚构，但不妨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努力，给读者以通俗有趣的阅读体验。

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常常是旁白念稿子，镜头放PPT，最多拍摄几段风景，现在一些纪录片则借助优秀的“服化道”，让演员扮演历史

人物，在精心复原的场景里演绎历史情节，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历史非虚构”写作也应如此，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他会吃穿住行，也会吟诗歌咏，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所以，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自己才疏学浅，尽管努力尝试呈现出一个适度、丰盈、有依据的文本，但距离这个目标或许还很远。因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在史实、文学、褒贬和见识之间腾挪转移，也一定会同时遭受到这四个方面的批评——坚信实证的朋友会批判一些情节处理得轻率或想象过度；喜爱通俗“发挥”的朋友会批评脑洞不够大；立场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很不赞同一些褒贬评价；拥有更高识见者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批评才是幸事，因此先提前接受下任何批评，努力改进，然后继续勇敢地去写吧！

最后是致谢时间：

首先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文景何晓涛先生、李頔女士及为本书从运作到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各位老师与朋友；感谢我的版权代理武新华、沙加之伦女士，本书得以找准切入点并付诸实践，源于我们在一次喝酒时的热烈交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等老师与朋友在一些疑难问题及稀见资料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凌文超副教授、我读书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蕾，好友高远致、王芳军、冯婧婧、李向品和李默伉俪等阅看了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邓安庆、左君宜、缪磊等很多朋友对我长久以来的热情鼓励，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当然书中的错谬，责任均在我。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陈壁生对我思想的启迪，感谢刘勃先生、陆大鹏兄、闵雪飞姐姐以及老领导王勇的支持鼓励，感谢2004年辞世的符郁给我播下的一粒种子。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写作，父母和岳父母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妻子在职场上的敬业勤奋不断激励我，三岁的女儿小白一见我写作就玩我

鼠标砸我键盘，迫使我提高效率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书稿。

大白

2021年7月20日

于北京白又白公社

注释：

- 1 葛承雍：《王莽新传》，第21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Robert

文景

Darnton

(美)

罗伯特·达恩顿

高毅、高煜译

"This book and especially its accompanying website bring to life some of the important intermediaries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book trade."

Christine Haynes,
H-France Review

A Literary

"[A] rich and textured account of how and what many French people were able to read in the decades before the upheaval of 1789." —Roxanne Panchasi, *New Books Network*

TOUR DE FRANCE



The World of Books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 （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高毅，高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 The World of Books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208-16666-0

I. ①法... II. ①罗...②高...③高... III. ①图书史—世界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3433号

书 名：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作 者：【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译 者：高毅 高煜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666-0/K·299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 : The World of Books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Robert Darnton

Copyright © Robert Darnton 2018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 The World of Books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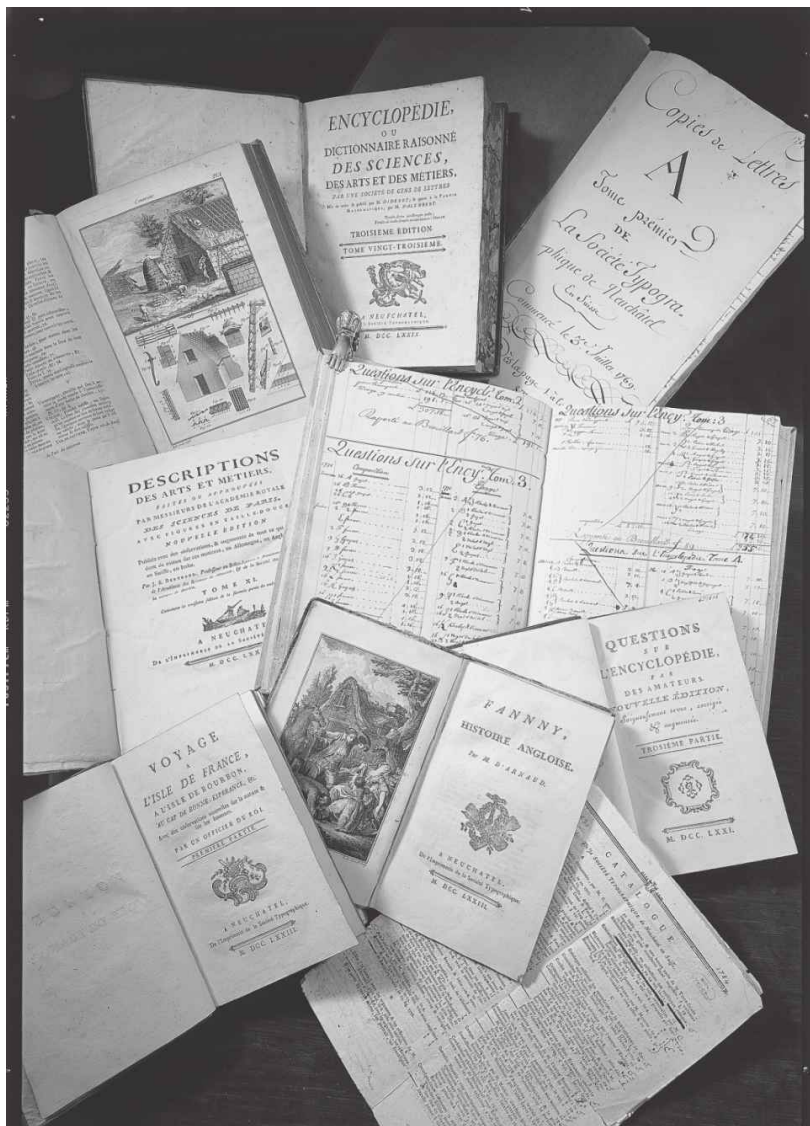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Horizon Media Co., Ltd.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ALL RIGHTS RESERVED.



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藏档案文献

目 录

引言 书籍世界【vii】

第一章 纳沙泰尔：出差的人【3】

第二章 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19】

第三章 隆勒索涅：评估书店【45】

第四章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55】

第五章 里昂：企业家与冒险家【67】

第六章 里昂：国内走私【81】

第七章 阿维尼翁：交换贸易【93】

第八章 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南部地区的艰难求生【109】

第九章 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西南地区的勉强维持【153】

第十章 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183】

第十一章 布卢瓦、奥尔良、第戎：法国中心地区的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215】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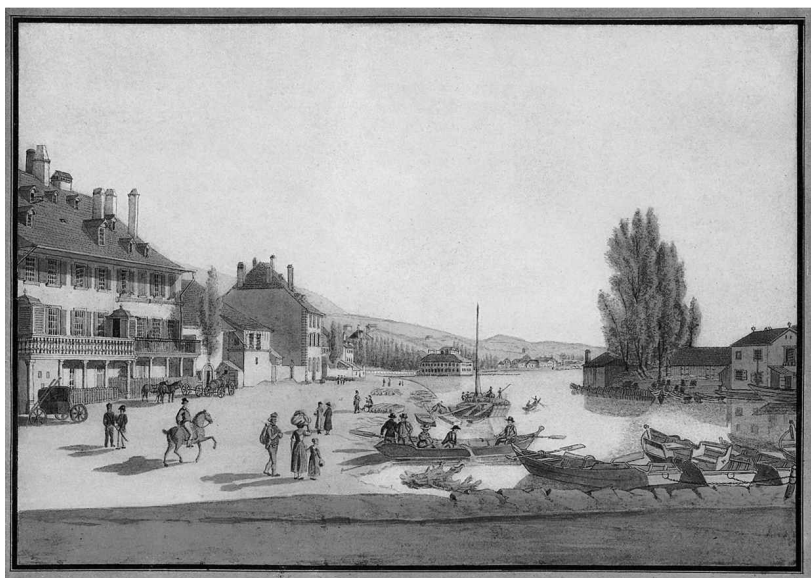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263】

结论 有生命的书籍【301】

致谢【307】

索引【335】

引言 书籍世界【vii】



纳沙泰尔出版社总部位于左侧的大楼中，面朝纳沙泰尔湖
湖港景色，弗雷德里克·威廉·莫里茨绘，约1820年。私人收藏

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变化无穷，极其丰富——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居住在法国的人多种多样。图书业作为一个经济系统，仍然陷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公司架构中：其中包括一个由印刷商和书商组成的行会，垄断了巴黎的书籍贸易；一套基于专卖权原则的版权制度雏形；一个负责书籍审查和解决业内纠纷的国家管理机构；一批负责执行图书贸易管理条例的检查官员——18世纪大约发布了3000条此类法令条例；而在波旁王朝这些摇摇欲坠、铺张浮华的机构之外，还有一大群以向读者推销图书为生的职业书商。

所有大城镇都有书商，而从业者也是形形色色。各省首府都有几位行业大佬控制着贸易。一些小人物就在他们周围做生意，靠着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对图书需求的增长来挣钱，并且在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严苛条件下艰难求生。在合法的图书销售体系的外缘，一些经销商聚在一起，尽其所能地勉强维持生计，通常服务于贸易的毛细管分销体系。除了这些职业书商，还有各类个体经营者从事小本图书生意。其中有一些小店主从政府那里买到了营业执照（*brevets de libraire*），【viii】从

而在市场上合法占得一席之地；有不求合法身份的地下经营者；有在集市上摆摊售书的流动商贩；有私下里兼卖图书的装订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贩，他们或者拉着马车走街串巷，或者徒步叫卖。这些杂凑的、衣冠不整的中间商（middle man）（其中也有女人，最能吃苦耐劳的往往是书贩的妻子或寡妇）在图书的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书籍史却很少关注他们。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例外，他们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发现他们都卖些什么书。哪些书被卖给了读者，读者又是如何阅读它们的，这个问题会引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涉及交往和意识形态酝酿的性质。我不打算在本书中直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想提供一种详尽的解释，要让读者了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图书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书籍是如何传播到法国社会之中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打算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外省的图书贸易上。法国的历史多是以巴黎为中心写就的，但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3%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巴黎，而绝大多数书籍是被外省人买走的。诚然，外省人的书籍供给有些是来自巴黎，但他们用国外出版的书籍来充实书架的情况更为常见；因为一本书一旦开始在首都出售，马上就会被国外印刷商盗印。“盗印”（piracy），通常被法国人称作“伪造”（*contrefaçon*），他们还用“剽窃者”和“盗贼”这些更尖刻的词汇来称呼伪造者。尽管这个词在18世纪使用很广泛，但它具有误导性，因为国外出版商的经营并不受法国国王授予的专卖权管辖。在王国内部，这些专卖权起到一种原始版权的作用。它们连同不太正式的被称作“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的授权一起，被授给经过书报审查官批准出版的书籍。而国外出版商可以重印法国的书籍，无须考虑专卖权，并且可以出版在法国永远通过不了审查的书籍。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尤其是纸张成本低，他们可以比法国的竞争对手更经济地出版这两类书籍。结果造成在法国边境以外，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生意也日益兴隆。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鲁塞尔，越过莱茵河延伸到瑞士，再往南延伸到当时为教皇属地的阿维尼翁，这些出版社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

【ix】这几十家出版社几乎出版了启蒙运动的所有著作，而且可以说，它们还出版了1750到1789年间在法国流通的大多数其他图书（除了专业教科书、祈祷书、福音书和宗教小册子外，各个领域的书籍都有）。它们通过一个广泛分布的图书发行体系征服了法国市场。有些发行体系是秘密的，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偷运走私是个大行当，但是大多数图书还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有中间商从中交易，牟取他们可以得到的任

何利润。

这个庞大而丰富多彩的书籍世界，一直不大为18世纪的法国政府所知晓，而且一直以来学界对它也不甚了了。书籍史家们通过查阅巴黎留下的法国政府档案，已经揭开了它的一些隐秘。^①不过，国家的视角始终有限。尽管政府设有“图书贸易管理署”（*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负责管理图书贸易的官员享有重要地位，却很少知道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其他城市“书商行会”（*Chambres syndicales*）的情况。要想全面了解整个体系，就必须依靠外省的档案，尤其要依靠国外出版商的文献来研究。不过，国外的文献也几乎完全散佚——只有一个例外：纳沙泰尔出版社（*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简作STN）的档案。这是瑞士的一家出版社，靠近法国东部边境，自己出版书籍，同时也在法国各地大量从事图书批发贸易。

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文件，加上从巴黎和外省可得到的档案材料，包含了几千封来自每个与图书行业有联系的人的信件，这些人包括作家、出版商、印刷商、纸商、铸字商、油墨制造商、偷运者、货车车夫、货栈主、旅行推销员、图书代理商、审稿人、读者，尤其是法国几乎所有市镇的书商。其中许多人出现在其他文献资料中，诸如破产文件和警察记录，使我们能够从多种视角去观察他们，从多个方面了解他们的经营活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几类文献，如账簿、货运记录、订货登记册、印刷厂工头的付款账本，则揭示了图书贸易其他方面的情况。把所有这些资料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整个行业作为一个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运转失灵，如何崩溃，又如何因为图书从业人员的努力恢复运转，使供应满足需求。

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所涉及的时段为1769年到1789年，【x】这个时期，法国对图书贸易的法律限制一直在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凡尔赛的内阁也时常更迭，它们源源不断地颁发法令，经常出台打击盗版的新举措，建立新的书商行会，扩大图书监管部门的职权，修改进口图书的检查规程，提高或降低纸税。纳沙泰尔出版社紧紧跟随所有这些进展，根据获得的情报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因而它的文件，再加上巴黎的档案材料，能反映出出版业游戏规则变动，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游戏的玩法。

然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浩如烟海，以致研究者会深陷其中，茫然无措。我从1965年开始研究它们。从那时起，我用十四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查阅了其中几乎全部五万封信件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账本中的补

充资料。这项工作时间拖得很久，但是并不艰苦。纳沙泰尔是汝拉山脚下的一座风光秀丽的小镇，俯瞰一片清澈的湖水，沿湖遍布葡萄园。

【xi】纳沙泰尔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我在此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和他们一起沿着汝拉山脊走过一个又一个高山夏季牧场，在他们家里享用了不计其数的美食，看着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五十余年里一起成长，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欢乐时光。在本书的致谢中，我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不过，我花费如此多的时光，从纳沙泰尔以及巴黎的相关档案中搜寻，也让我面临一个挑战，即怎样才能把这些资料处理得当。如果要把我在资料中碰到的所有人物的全部故事都讲出来，我的书就会多达许多卷。因此，我将精心挑选的大量文献资料和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传列在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上，网址为www.robertdarnton.org。读者如果想要继续对本书所提出的论题深入研究，可以去访问该网站，通过数字化的资源，找到自己的研究途径。有了这个网站，我就不必在本书中加入过多的注释了。不过网站不解答我安排叙事的方式——既能把主题的深奥一面讲清楚，又不会使读者丧失阅读的兴趣。我选择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呈献我的研究成果。我不作系统性的论述，而是决定跟随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销售代表穿越法国出差旅行的足迹，探讨他所遇到的图书贸易中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绘出一幅根据最丰富的档案资料得到的书业景象。

这位销售代表（*commis voyageur*，英国人喜欢用“commercial traveler”这个词，而美国人则常常偏爱“traveling salesman”）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位职员，29岁，名叫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Jean-François Favarger）。1778年7月5日，他骑上马，动身出差，历时五个月，穿越法国，访问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所有书店。他推销书籍，收账，安排货运，视察印刷厂，调查市场需求，评估生意规模，对一百多位书商的品质做出评价。11月份法瓦尔热回到纳沙泰尔时，他所了解的有关图书贸易的东西，比迄今为止任何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了解的都多。幸运的是，他用文字在纸上留下了他的踪迹，包含一本记载详尽的日志和大量内容翔实的信件，这些资料使得我们可以跟随他游遍法国，从而能够从街市的层面来研究图书贸易。另外，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还包含了法瓦尔热所遇到的书商们写下的几百封信件，以及从1769到1789年间所有与出版业有关的人的几千封信件。因此，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图书文化景观。

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看，【xii】相比于作为书库中伟大作家的鸿篇巨著来被研究时，当时的书籍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无意蔑视法

国人常用的说法“人与作品”（*l'homme et l'œuvre*）所表达的老式观点，尽管它在文学研究者中不再获得多少尊重。相反，我倒是从像巴尔扎克的《幻灭》（*Les Illusions perdues*）这样的杰作中找到了灵感，它为我正在试图根据档案资料重构的世界提供了一种虚拟的描述，一个在巴尔扎克出生（1799）十年前就土崩瓦解的世界。我的目的是从一位地位卑下的销售代表着手，探索图书从业人员所体验和理解的旧制度下的图书行业。这种方法绝不是文物研究，而是要从细微之处推断出宽泛的结论。它将处理有关出版的实施、图书的发行、图书市场的运作、书商作为文化中介人的作用，以及读者对书籍的需求等问题。最后我还想说明，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二十年中，市场上实际流转的是哪些书籍。尽管资料不全，我还是要提供一份回顾性的畅销书书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法国各地的人都喜欢哪些书籍。由于缺乏证据，我无法指明读者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所阅读的东西；但是我认为重现他们的消费方式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消费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考查一个曾经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基调。我了解书商们的生活，以及以把书籍卖给读者为生的中间商们的社会背景。在书籍史上，书商就算出现过，也只是像影子一样。但从一位销售代表的视角观察，并根据一家出版商的档案来研究，则会发现书商都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个体。他们形态各异，从行会理事和独霸一方的行业大佬，到旧式书商和地下小贩，莫不如此。

我们可以通过极其翔实的档案卷宗来跟踪某个人的职业轨迹。一个人在学徒期满之后，找到有嫁妆的女人结婚，自己开一家书店，进货建立库存，冒风险，使出计策赚钱，竭力摆脱破产，病倒，去世，生意留给儿子，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留给一位精明能干又有悟性的寡妇。另一份卷宗包含一位乡村小学校长的故事，他以卖书为副业，但挣到的钱几乎不够支付货款。他出租房屋，提供膳宿，还经营一个小葡萄园，

【xiii】临死时还希望下一季收获能够偿清一份待付的汇票，以保住他的名誉。还有一份卷宗塞满了一堆字据，字迹潦草难辨，拼写错误百出，反映出一位流动书贩的生意状况。他用一家小客栈的地址签署期票，因为他没有固定住所。只要马儿能跑，他就一直用马车载着图书去乡村赶集。要是牲口体力不支，或者他囊中羞涩，小客栈里就不会见到他的人影，那些期票也就成了到期不还的欠条，而地方官也把他当作流浪的投机商贩。这些卷宗向我们展示了两百多年前在书籍世界上演的一出出光怪陆离的人间喜剧，令人目不暇接。

所有这些卷宗都反映了又一个令巴尔扎克着迷的主题，即对财富的贪求。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料来源固有的偏重点，因为大多数卷宗都包含了商业信函，它们首先必须谈及利益得失。但是这些信函也传递出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特质和习俗——不仅仅是想要听到金币叮当作响的悦耳声音，在风险四伏的博弈中也需要信任，所有参与这种博弈的人都竞相避免被交易的诡计欺骗：这些诡计包括盗版、偷运、刺探情报、虚张声势、谋划假破产，以及秘密经营。

当然，这些诡计在19世纪大行其道，当时巴尔扎克就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其他时期和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就18世纪的图书贸易来说，这些做法还非常原始，这在许多卷宗中有明显反映。一名书商——或者一名出版商，一名流动书贩，一名偷运者，一名货运代理商——未能在到期日承兑一份汇票。其他票据变成了欠条。他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晃晃地行走，和最无情的债主们商谈，重新找到了立足点，后来又失足倒下，人也失踪了。邻居或收账的人写的信讲出了故事的结局：“钥匙塞在门底下了”；“当兵去了”；“去俄国了”；“坐船去美国打仗了”；“他的老婆、孩子正在教堂门前要饭呢”。我们不能把这些信当真。它们总会带有一种偏见，总要为一种利益说话，无法提供一种直接的对现实的看法。然而，它们带有的主观性，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主观性，表明了旧制度的一种极其重要的亚文化中，现实是如何被推想出来的。

此外，书商们的信件可以和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见证对照着读。【xiv】他的任务是评估沿途遇到的各家书商的品质和生意情况。因此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提供了连接大量故事的主线索。跟随他走遍法国地图上的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小村庄，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了解决图书领域的供需问题，无数人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从各方面作出努力的。

尽管法瓦尔热的故事带有“流浪者传奇”的色彩，但它还是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书籍史的范畴。我在叙述这个故事时，试图揭示它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并避免离题太远，以致偏向传记文学。不过，我在网站上列出了二十来篇传记，它们实际上可以当作18世纪书商们的肖像画廊。网站上还有法瓦尔热日志的副本、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书商们的信件，和有关他们所在城市的大量资料——人口、制造业、贸易、识字率、管理机构、文化机构、当时有关图书印刷和销售情况的报告，以及次要文献的参考书目。由于网站列入了如此之多的资料——所

有数字化的原始手稿，有关图书贸易监管的文献，还有过去四十五年我所写的几十篇文章——所以我试图使本书保持较短的篇幅。想要找到更多有关特定主题的资料读者，可以通过网站来查询，利用这些文献来阐发新的诠释，并质疑我的结论。

简而言之，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是独立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通过查询广博的资料库把故事继续讲下去。至少我希望它能给那些想探索18世纪法国书籍世界这个妙趣横生的主题的人带来乐趣。

在此我应对术语略作说明。因为旧制度的机构名称不易译成英语，所以我保留了许多机构的法语名称。“*Parlement*”指的是高等法院，它拥有一些政治权力，但和英国议会（*Parliament*）完全不同。“*Ferme générale*”（总包税所）是一个征收间接税、管理海关业务并为法国巡查边境的私营公司。“*Livres philosophiques*”（哲学书籍）是出版商和书商用来称呼图书贸易中的违禁书籍的词语。这类书籍可能含有诸如抨击基督教教义的激进哲学思想，【xv】不过也可能宣扬色情或煽动反叛，或者有揭露公众人物私生活的毁谤性内容。“*Acquits à caution*”（货物通运准单）是管理机构用来追踪图书货运的海关报税单。第二章将说明，偷运者或货运代理商必须找到快速办到货物通运准单的途径，以防止所运输的货物被没收。“*Chambres syndicales*”是外省城市书商行会的总部，是检查货物和处理（“*déchargés*”，即海关业务用语中的卸货）“货物通运准单”的地方。⁽²⁾

由于我不期望读者熟悉本书中出现的书名，或者对法语完全了解，因此在这些书名首次出现时，我在括号内给出了它们的译文。

(1) 我为撰写本书认真查阅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即阿斯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的巴士底狱档案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大套收藏品：阿尼松-迪佩隆收藏品（*Collection Anisson-Duperron*）和巴黎书商与印刷商行会文件。

(2) 在文中，这些法语名词将直接译为中文。——译者注

第一章 纳沙泰尔：出差的人【3】



1778年纳沙泰尔的面貌。它地处名为“勃艮第之坑”（*trou de Bourgogne*）的大山裂口当中，可以看到一条大道沿塔威山谷盘桓而上，通向蓬塔利耶（Pontarlier），那是法瓦尔热此行的第一站

油画，从克雷山望去的纳沙泰尔景色，戈尔茨绘，1826年。私人收藏

了解一位销售代表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他的开支账目。法瓦尔热的账目是以法国货币锂（*livres*）、苏（*sous*）和德尼（*deniers*）仔细计算的，出现在他的日志末尾。⁽¹⁾了解这些开支就是对他的旅程的预览。⁽²⁾

1778年7月3日，【4】在骑马上路两天前，他在纳沙泰尔北边16公里的家乡拉讷沃维尔（*La Neuveville*）请人把外套补好，花掉了1锂3苏。这外套很可能是骑马时穿的，布料结实，上过蜡，能防雨，和绅士们穿的那种装饰精美、有双排精制纽扣的礼服根本没法比。法瓦尔热必须抵御风雨的侵袭。在旅途的第一段行程中，天气对他来说还是很宜人的。但是在8月份，当他到达罗讷河谷下游时，酷热的阳光无情地倾泻而下，这件外套很可能就绑在鞍囊上了。法瓦尔热很少遇到雨水，连河床都是干的，直到9月6日他进入卡尔卡松，暴雨倾盆而至。从图卢兹（*Toulouse*）到拉罗谢尔（*La Rochelle*），雨水几乎没有停过。法瓦尔热不得不花10锂买了一顶新帽子。而且由于他受够了马鞍的摩擦，又不

得不花26锂买了一条新马裤，既当马裤穿，又当被子盖，让他能够捱过10月初开始的寒夜。那时道路已泥泞不堪，马一天要滑倒好几次。他开始习惯于牵着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徒步前行，而过远的路程导致他的靴子都被磨坏了，为了修鞋他又花掉3锂3苏。在朗格多克

（Languedoc），夏天的炎炎烈日晒得人汗流浹背；在普瓦图（Poitou），泥泞的秋天又令人瑟瑟发抖，因此法瓦尔热在路上也没有削减多少用度。当他到达一家乡村客栈时，他身上很可能已经臭气熏天。一路走来，他花钱洗衣却只有两次，一次在图卢兹，花了1锂10苏；一次在托南（Tonneins），1锂4苏——每次的花费大致相当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名印刷工人一天的工资。他随身带了一把猎刀和两只手枪，听说在去土伦（Toulon）的路上有拦路打劫的强盗之后，他还花了10苏让马赛（Marseille）的枪匠把它们好好规整了一番。

法瓦尔热本人不像拦路强盗，尽管他蓬头垢面，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当他要迈进城市大街上一家陈设齐全的书店时，他必须打扮得光鲜体面才行。于是，在到达里昂后，他买了一套带背心的西服，布料（轻薄棉质）和裁缝工钱共花了23锂4苏6德尼。对一个职员来说，这可是一大笔开销——占其年薪的5%——但还算不上奢侈。此外，一路上他两次购买了缎带（每次花费12苏），用来绑扎垂在脑后的发辫。他不是戴假发或佩剑的那种人。不过，他像许多旅行者那样，也拥有一块怀表，9月份还为修理它花了2锂8苏。【5】在交际场合，他要脱掉靴子改穿皮鞋，为此他在图卢兹花4锂10苏买了一双新鞋。法瓦尔热的开支账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勾勒某个两百年前身处社会下层的人。但是这种画像很快就变模糊了。我们不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不管怎样，对于这个年轻人的个性，我们还是可以形成某些概念的。他写信的风格直截了当，不加修饰，文法精准，书法优美，与一个职员的身份是相称的。法瓦尔热想必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但他不会尝试使用花里胡哨的修辞和文学性的用典，而他的上司，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有学问的文人，就会用这些来修饰他们的信函。法瓦尔热的信函就是商业信函，所以人们应该不会从中读到太多的言外之意。但是从这些信函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作风严谨，渴望取悦他人，工作勤奋，而且相当谦虚。法瓦尔热从街面上了解世界，用诚实的眼光观察它，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描述它，也就是说只用主语、动词、谓语来描述。他偶尔也表现出一点幽默。他说马赛的书籍检查官是一个“为了一餐饭会吃掉他的兄弟的人”，说尼姆（Nîmes）的一个叫比谢（Buchet）的书商是“一架模糊的照相机”。但是他不追求使用有文采的

语言，也难得采用图书贸易特有的口语用词——例如对于卢丹（Loudun）的一个叫马勒布（Malherbe）的非法书籍经销商，他恭维说：“他推销他的贝壳非常在行”（*Il sait fort bien vendre ses coquilles*）⁽³⁾。

法瓦尔热也许为人谦和，但并不轻易听劝。他和书商们艰难谈判，遇到欠账不还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起诉到法院。当图卢兹的经销商卡扎梅亚（Cazaméa，文献资料中常常只有姓氏，不出现全名）试图威逼他降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图书定价，接着大发脾气撕毁订单时，他依然坚持立场，毫不动摇。他对普瓦捷（Poitiers）书商行会理事福尔孔（Faulcon）印象不好，此人在城里昂首阔步地游荡，“为他的官职而趾高气扬”。他也不欣赏里昂（Lyon）的行业大佬们自命不凡的姿态，他们声称没空跟他谈判，其实他们整日里花天酒地，从不悉心照料他们的书店。在更靠近南方的城镇，书商们则属于另外一类，如阿维尼翁（Avignon）的尚博（Chambeau）和于泽斯（Uzès）的费利纳（Phéline），他们只会空谈，不干实事。在法瓦尔热写给出版社本部的报告中，这些懒散又饶舌的人得不到好评。当他遇到有人空谈、耍小聪明和懒惰无为，【6】尤其是在法国南方的客户中遇到这些情况时，他的信写得就像是突然遭遇了异域文明似的——不过也确实如此，因为在难以揣摩的法国人的世界中，他是一个优秀的瑞士人。

尽管法瓦尔热的信具有商业性质，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他观察那个世界的方法。信的语气并非完全商务式的，因为他跟他的老板很熟，能够跟他们说心里话。诚然，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他高，是一些家境富裕的、有学问的绅士，在纳沙泰尔这个小社会颇受尊重；所以他给他们写信时总是恭恭敬敬。而老板们对他也充分信任，他们在他年纪很轻时就雇用了他，并在店里培训他。他们委托他去处理一些棘手的谈判，期待他发回关于他所遇到的每家书商的秘密报告。因此，他对图书贸易中人为因素的即时评论，既是他自己的见解表达，也暗示了这些商人们的某些想法。他对小城镇的书商颇有好感，他们讨价还价时态度直率，条款合理就欣然接受，很少冒风险，付账及时，在街坊邻里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关于卡斯特尔（Castres）的皮埃尔·勒波蒂埃（Pierre le Portier），出版社就收到了一份报告，对他赞赏有加：“他的生意看上去做得不错，因为他店里的图书种类齐全。他看起来是个正派人，答应我马上就把订单寄到出版社本部。”经过一番对地方商人的打探，法瓦尔热把勒波蒂埃的信用等级评为“优秀”：“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地把货物托付给他。人们跟我说起他时都表示赞赏。尽管在小城镇书商卖盗版书都面

临重重障碍，但他的收益相当不错。”

没有多少书商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因为之前出差时，法瓦尔热就花了充分的时间四处打听这些店铺的状况，使自己克服了关于生意人道德品行的任何天真幼稚。他常常遇到无赖和骗子，像尼姆的比谢，把老婆的嫁妆偷偷挥霍殆尽，还有马赛的卡尔德塞格（Caldesaigues），在宣布破产后还试图用他的债务做秘密交易。虽然法瓦尔热谴责这样的行为，但他明白必须和有缺点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图书贸易存在庞大的非法经营部分。他对书商们的评论听来实事求是，没有冷嘲热讽，有批评，但并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在很罕见的情况下，他才表现得义愤填膺。例如布雷斯地区布尔格（Bourg-en-Bresse）的一位书商韦尔纳雷尔（Vernarel），从他巴黎的出版商那里订购了一批书，然后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一本要求盗印，法瓦尔热愤怒斥责：“什么德性！他把我在上封信中说到的那本书寄给我们，【7】难道他没想过良心的谴责吗？”

不过，通常法瓦尔热报告生意的实际情况，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包括有问题的部分或者非法贸易。他卖了大量色情书籍和反宗教书籍，不带感情色彩，把它们和所有内容粗俗的书籍都当作商品看待。书商们的态度也是这样。只有一次，法瓦尔热遇到一位与众不同的经销商，带着意识形态做生意。那次遭遇让他惊讶：“阿尔勒（Arles）的戈迪翁（Gaudion）品德高尚，但是人很古怪……当我跟他谈起《圣经》和《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时，他回答说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会传播这两种渎神的书，所有《百科全书》都提供给他了，但他肯定一本也不会卖。”

那本《圣经》在这位书商眼里之所以亵渎了上帝，是因为它是新教用的版本，评注中尽是异端邪说。法瓦尔热自己是虔诚的瑞士新教徒，当他进入罗讷河谷，深入法国天主教的核心地带时，他就进入了异域。快到马赛时，他便沮丧地发现，所有书店都关门了，因为那是圣母升天节前夕：“要塞和轮船此刻正在轰隆隆地放炮，向圣母玛利亚致敬。”这声音在新教徒听来有些怪怪的。在图卢兹，法瓦尔热被这种偏执震惊，他在那里和在马赛都被思想偏狭的书籍检查官拒之门外。1685年的南特敕令剥夺了新教徒包括财产继承权和合法结婚权在内的所有权利，在听到路易十六要恢复新教徒这些公民权利的传闻后，他期待外省的书商行会以同情的态度接受他。实际上也是如此，许多行会官员都答应，纳沙泰尔来的新教书籍运达时他们会装作没看见，同意放行。不过法瓦尔热还是觉得自己受到监视，因为他既是异教徒，又是国外出版商的代理

人。

这些特性相得益彰，因为16世纪传播新教书籍的地下渠道已经为两百年后的启蒙运动开辟了一条通道。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到让-雅克·卢梭，在新教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启蒙哲人们使激进思想蒙上了特殊的色彩；从阿姆斯特丹到日内瓦，新教出版商们为了把哲学书籍和新教书籍一起推向市场，利用了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大流散。法瓦尔热不是知识分子，【8】但他只是通过做生意就起到了启蒙运动参与者的作用。他的雇主把书籍提供给他去卖，他把《圣经》连同《百科全书》一道销售，好像它们是完全可以互相兼容的。而在18世纪书籍贸易的环境中，情况也确实如此。

尽管法瓦尔热对于哲学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在生意中从不表露出来。在他的书信和日志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显示他的个人信仰影响过他作为书籍推销员的活动。他只是以新教徒的身份出生，怀着新教思想旅行而已。这或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状态——这种方式让他和法国新教徒相处时感到舒心。他在和他同属一类的人当中从容自在，这类人努力工作，言谈直率，付账及时。诚然，这类人中也有少数无赖，像托南的牧师迪蒙（Dumont），把纳沙泰尔出版社运给他的《圣经》卖掉，却拒付货款。但是一般情况下法瓦尔热把新教教友当作异教地域中可以信任的人来依赖，尽管他们在这个地域仍然享受不到公民权利。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数百年来相互依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由于瑞士新教徒和法国新教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缘和友善关系，因此法瓦尔热有望在周游法国时获得帮助。他的日志里保留了一份胡格诺派牧师的名单，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胡格诺派教徒的热情款待。他们还让他带推荐信给本教派的其他教友，这样，在他试图和信仰天主教的书商结账时，以及从他们那里获取订单时，就可以利用事先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求得教友的帮助。在尼姆，他去听过杰出的新教领袖保罗·拉博（Paul Rabaut）的“沙漠”讲道，即在城外的旷野讲道，因为禁令规定胡格诺派教徒不得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公开礼拜。拉博和他的儿子，即后来的革命家让-保罗·拉博·圣太田（Saint-Etienne），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长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Frédéric-Samuel Ostervald）的朋友，他们向法瓦尔热提供了更多其他新教牧师的地址，便于他在随后的旅途中和他们联系。

他也受到曾经在纳沙泰尔念过书的新教平信徒的热情接待。1750年代，他们在寄宿学校学习，奥斯特瓦尔德亲自给他们上过算术和地理

课。不过，不应该把奥斯特瓦尔德和那种谦卑的乡村校长混为一谈。

【9】他是一位贵族，在地方政治中涉足很深，但他似乎也是一位能启发人心的教师和政治家。他的得意门生中有一位名叫让·朗松（Jean Ranson）的商人，曾在拉罗谢尔热情接待了法瓦尔热，还在一封信里描述了他们共度的时光。他写道，法瓦尔热“有着法国人中罕见的、可是在你们国家司空见惯的率直。我问他可曾在纳沙泰尔的中学读过书。没有，先生，他回答说，那是在拉法瓦日（La Favarge）的一所中学的农场，我正在犁地，奥斯特瓦尔德先生来了，让我跟他走，当他的职员，我这么就成了他的员工。”为测验法瓦尔热的社交能力，朗松问他会不会玩乐器。“啊，先生，他告诉我，别指望发现我有任何精通的本事。我确实什么都不会。”朗松在外省的上层有产者中没碰到过这样谦虚的人，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就喜欢那样的诚实。”⁽⁴⁾这是唯一留存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文件中的对于法瓦尔热的描述，但它证实了阅读法瓦尔热的信件后得出的印象，这是一名不爱出风头但能自力更生的年轻人。

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的一些私人交往。到达里昂时，法瓦尔热问候了本社的同事，“我和他们拥抱”，并请他们捎一封信给他姐姐。他所称的“同事先生”，指的是出版社的外国分支，是人员关系相当亲密的小天地，有三四个职员从事管理账目、库存和货运的工作，出版社的董事们则通过信函发号施令，监督印刷厂工作，车间里一般有二三十名工人操作印刷机。法瓦尔热跟其他职员的关系似乎也不错。从马尔芒德（Marmande）寄出的一封信的附言中，他特地问候了其中两人，主任会计亚伯兰·达维德·梅西耶（Abram David Mercier）和学徒施瓦茨（Schwartz），他在科尔马（Colmar）完成学习后，就是这两人帮他完善了对于图书贸易的了解。施瓦茨还在法瓦尔热的日志中留了一张字条，请法瓦尔热在到达科尔马时，“热情问候”他的朋友和家庭，尤其要问候他的中学老师比林先生（Monsieur Billing），他可以提供有关图宾根（Tübingen）和斯图加特（Stuttgart）的书商的资料。法瓦尔热从未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这张字条提供了人际网络，为他的生意打下基础。



“大罗谢特”（La Grande Rochette），亚伯兰·博塞·德吕兹（Abram Bosset de Luze）的宅第，1777年他入伙纳沙泰尔出版社，是董事之一。他是一位与白棉布制造业和银行业有联系的富商，负责出版社的财务。他宏伟的宅第与花园表明，这些在法国被鄙视为盗印者的出版商实则身份显赫

从南边看去的大罗谢特，泰奥菲尔·斯坦兰作，约1805年，水彩画。私人收藏

在另外一条附言中，法瓦尔热向奥斯特瓦尔德和让-埃利·贝特朗（Jean-Elie Bertrand）的夫人表达了敬意，让-埃利·贝特朗是奥斯特瓦尔德的女婿，任出版社董事。【10】他还问及他们的宠物狗：“小狗生病了吗？我昨天梦到它死了。”一个会梦到老板妻子的宠物的职员，绝不是个有二心的员工。法瓦尔热谈到出版社事务时，总是会用第一人称复数，甚至在他的私人日记里也是如此：“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出版社”。他在写给出版社本部的信里关于生意的谈论给人一种感觉，老板和职员在出版社里是融为一体的；本部——一般说来，就是奥斯特瓦尔德，负责通信联系——对他的福利显得很关心。当法瓦尔热离开他两年前曾经去过的里昂，踏入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奥斯特瓦尔德写信鼓励他：“祝你一路顺风！生意兴隆，并享受一段好时光。你要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为完成任务所作的努力，我们都会记在心里。”

18世纪独自上路旅行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如今很难想象。【11】法瓦尔热倒是从未遇到过必须拔出手枪的时刻，可是在离开阿维尼翁后，他染上了讨厌的疥疮——一种由螨虫钻进皮肤引起的皮肤病：“我某一天得给自己放一次血，某一天又得灌一下肠（可能是用灌肠剂）。这是我咨询外科医生得到的建议。”待到他自己的健康恢复了，马的身体却开始出

现问题。法瓦尔热和这匹马一起艰苦跋涉了几百公里，似乎对它依依不舍。他定期记录它的身体状况，当它在9月份暴风雨的猛烈袭击下开始发抖时，他还写信报告了他的担忧。而在纳沙泰尔，奥斯特瓦尔德回信道，“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的健康，而不是马的。”

带着感情看人与牲畜之间的关系是个错误。旅途中的生活是艰苦的。道路本身就很糟糕，除了直通巴黎的几条大道，其他的路都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⁵⁾在马背上度过了艰难的一天后，投宿的客栈也提供不了多少慰藉。饮食低劣，环境肮脏，这是旅行者最喜欢聊的话题，尤其是体验过英格兰的客栈的旅行者，如苏格兰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在法国南部各地，除了大城市，所有客栈都显得寒冷、潮湿、阴暗、压抑、灰尘遍布；客栈老板对人冷漠，又贪得无厌；店小二笨手笨脚，浑身肮脏，蔫头耷脑；马车夫怠惰懒散，迷迷糊糊，举止粗鲁。”英国农学家亚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国南部之旅和法瓦尔热的旅途差不多，说他在圣吉隆（Saint-Girons）住过的客栈是“一处最恶劣的场所，环境肮脏、害虫肆虐，老板厚颜无耻、欺诈成性，这些对旅客忍耐力的考验、对他们情绪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⁶⁾

几年之后，法瓦尔热离开出版社，出版社雇用了另一位旅行推销员雅各布·弗朗索瓦·博尔南（Jacob-François Bornand）。他在法国旅行多年，通常是乘坐马车，但日子过得比法瓦尔热还艰苦，无论是在途中（他曾因马车翻车而受伤），还是在书店。1784年，他从里昂写信道：“我发现这儿的人既没有诚意，也不体谅人……先生们，你们必须亲身经历过，才能知道在这里要做成事情有多难。我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无视你们利益的事情。要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怀疑这一点，那会逼得我绝望的。但是，我再说一遍，我实在想回家。”⁽⁷⁾巴黎的情况甚至更糟：“在这里，【12】必须得做的差事花费时间长，却不见成效，而且人们总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拖延时间，让生意变得令人厌恶，并且使我在这个城市的逗留成为迄今为止我最不愉快的经历。在此地，所到之处垃圾都堵到了门口，雨雪轮番下……冻得人受不了。”⁽⁸⁾

当然，销售代表们的经历虽然不同，但行使的职能都是一样的，而且在法国各地的图书贸易中都能发现他们。⁽⁹⁾18世纪末期的欧洲，没有哪一家大出版商不靠销售代表就能做成生意。每隔一两年，出版商就会挑选一名可靠的职员，派他出一趟差，规定他的任务，并根据业务的轻重缓急设定他的路线。可能只是一周的行程，到附近的城市解决账目上

的纠纷，或者从某个特定地区寻求新的纸张货源。要么可能得花几个月，路程非常遥远，涉及图书生意的所有方面，就像法瓦尔热的旅程。销售代表时常要在欧洲版图上纵横奔波。他们虽然是无名之辈，但是都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踪迹。例如，1777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出差巴黎，在同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讨论贸易时，列日（Liège）的克莱芒·普隆托（Clément Plomteux）告诉他们，他正准备派遣一位销售代表“周游法国”，推销《百科全书》。⁽¹⁰⁾这是通行的做法，他们实事求是地向出版社本部汇报。其他出版商也常常有这类销售代表为做生意而路过纳沙泰尔，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代理也时常在此地与他们不期而遇。在早前的一次出差中，法瓦尔热就曾发现，洛桑出版社的一位销售代表行程领先他几个城镇，于是捷足先登，抢占了萨伏依（Savoy）的图书需求。⁽¹¹⁾1778年，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竞争关系的出版商萨米埃尔·福什（Samuel Fauche）的销售代表在朗格多克跑生意时，法瓦尔热曾经尾随其后。福什的人卖的书很多都和法瓦尔热推销的一样，并且常常根据在书店间流传的报价单压价出售；但是他在每家书店泡的时间都更长一些，而且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在衰退。他受不住南方烈日的暴晒，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病倒了，因此法瓦尔热希望能抢到他前面去。与此同时，法瓦尔热在土伦遇到里昂的出版商约瑟夫·迪普兰（Joseph Duplain）的销售代表阿马布勒·勒鲁瓦（Amable Le Roy）。约瑟夫·迪普兰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四开版《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上是合作伙伴。勒鲁瓦在南部匆匆地转了一个远至波尔多（Bordeaux）的大圈，正在往其本部赶。他们在一个小客栈里巧遇，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晚，交流销售《百科全书》的故事。

这样的遭遇是家常便饭，因为销售代表们的巡回路线是相似的。
【13】在相同的书店结账走人，又在相同的客栈登记入住。尽管相互竞争，但彼此了解，也为了共同利益交换有关图书生意状况的情报。有些人可以指望得到晋升，因为他们是大书商的子弟，这些大书商逐渐开始起到现代意义上出版商的作用，即揣测新作品的出版商机，或是把印刷分包出去或是自己承印，同时还要集中精力做批发生意。不过，大多数销售代表要在出版业底层度过一生。年轻人要闯入此行业，得会写一手漂亮的字，受过扎实的中等教育（能读会写，还要有充分的算术基础来处理以锂、苏和德尼记录的账目），还要有依靠家庭和朋友建立的人脉关系。他们要和出版商签订一份任职合同，似乎通常为期三年。他们的日常职责是处理商业信函、记账、监督货栈发货，这让他熟悉了老板在法国出版商中的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在书商中的客户网络，而就瑞士的

这家大出版社而言，还有大部分欧洲的网络。随着市场需求增加，职员们便会去旅行推销，到几个城市或几个国家转一圈。借着出差，他们积累了知识——这类知识在18世纪的出版业中至关重要。它是实实在在的，且全部与人有关。一个聪明的销售代表能够了解到哪些书商濒临破产，哪些理事控制着书商行会，哪些审查官对盗版盯得最紧，哪些货运代理商知道最安全的运输途径，哪些货车车夫驾车不会陷入泥沼，尤其是，整个系统内哪些客户会承兑汇票。这样一位销售代表就能让出版商发财。偶尔他会想要跳槽，换一种薪酬高一些而且出差旅行不那么辛苦的工作。如果他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本——最佳的资本来源是娶到一位有丰厚嫁妆的妻子——他就可以自己开一家书店，或者当书商，或者从事其他生意。如果失败了，他便得像一些印刷工人那样，在法国奔波打工。

法瓦尔热的职业生涯似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尽管我们对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就职之前和之后的情况难以了解。⁽¹²⁾【14】他的卷宗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775年9月2日。当时他26岁，从日内瓦写信向出版社汇报，他正在那里跟当地的书商结账。他的雇主很可能对结果相当满意，因为在1776年8月，他们又派他出了一次长途差，到萨伏依、多菲内（Dauphiné）、里昂和勃艮第（Bourgogne）推销书籍，并和零售商建立关系。1777年，他到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瑞士西部短途出差，主要任务是寻找新的纸张货源。1778年，他进行了五个月的法国之旅，此即本书的主题。1782年3月和1783年2月，他为出版社出差两次。第一次是试图挽救在日内瓦进行的推销卢梭著作的投机生意，没有成功；第二次是和日内瓦的另一家出版商就雷纳尔（Raynal）《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deux Indes*，以下简称《哲学和政治史》）的版本重新谈价钱，然后从贝赞松（Besançon）重建一条走私通道，这趟任务也没有完成。随着经历的丰富和年龄的增长，法瓦尔热承担的职责越来越重要。当时，纳沙泰尔出版社已债务缠身。1784年出版社停发了一段时间的薪水，然后又在新的管理机制下进行了重组，以便在出售股份的同时，继续做较小规模的生意。那时纳沙泰尔出版社三位董事中的两位，亚伯兰·博塞·德吕兹和让-埃利·贝特朗已经去世。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继续任董事，但不是主要合伙人。他已经70岁了，而他在十来年前雇用的法瓦尔热也34岁了。法瓦尔热一边继续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工作，一边也投资他兄弟萨米埃尔（Samuel Favarger）在1776年创立的食品杂货生意。虽

然文献没有说明，但可以看得出，在1783年的某个时候，他离开了图书世界，与萨米埃尔共同经营食品杂货生意，成为专联合伙人。⁽¹³⁾

唯一一份实际展现法瓦尔热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雇佣条款的文献，是一份签订于1776年12月18日的合同，但令人失望的是，它并不确切。这份合同只是说，他要担任“销售代表”三年，1777年的薪酬为400纳沙泰尔法郎（相当于572法国锂），1778年为450法郎（643锂10苏），1779年为550法郎（786锂10苏），如果出版社对他的工作满意，还有6个金路易（144锂）的奖金。⁽¹⁴⁾因为他一离开农场——也就是他跟朗松说的那个“我正在犁地的中学农场”——就来到出版社任职，并接受了职业培训，所以合同没有必要详细说明他的职责。⁽¹⁵⁾【15】不过可幸的是，我们可以从接替他的人雅各布-弗朗索瓦·博尔南的卷宗中，比较清楚地了解到销售代表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

1769年，博尔南一听说有一家纳沙泰尔出版社，就马上跟它联系。他从洛桑写信，自荐要当职员为出版社服务，为它“处理信函以及货运，记账，并为印刷厂提供帮助”。⁽¹⁶⁾出版社当时还不能雇用他，但在1783年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大概就是为了接替法瓦尔热。8月26日他签订了一份合同，按合同规定他要工作三年，担任销售代表，年薪为840纳沙泰尔法郎（合1200锂），而且如果他和出版社“相互间都感到满意”，那么到第一年年终就会提薪。⁽¹⁷⁾这份薪水比法瓦尔热的高许多，大概是因为博尔南年纪大一些，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图书贸易部门接受和发运货物，管理相关账目，同时用空闲时间来做一般性的办公室工作，如处理信函和辅助记账”。合同还规定，出版社期望他能出差，将来要按照他和出版社的“互利”原则来协商每次差旅的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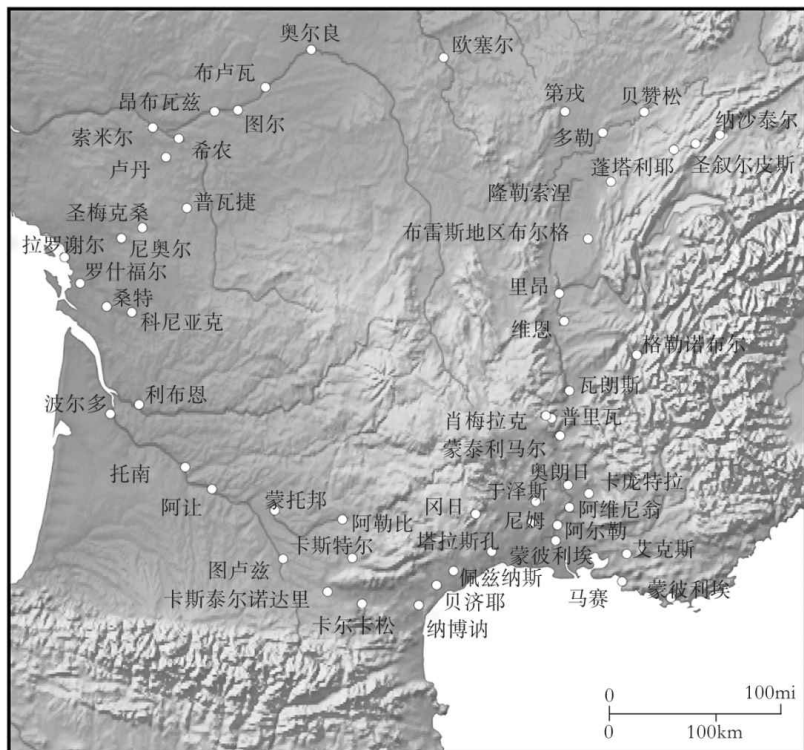
博尔南工作了六个月后，上述出差条款的意思就变得明晰了，因为当时他接到正式通知，要出一趟差，目的地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只是在他完成了经过瑞士法语区和法国东部的前段旅程后，出版社就撤销了这个任务。当时出版社正试图从濒临破产的状态恢复，并试图通过减持股份来使生意走上正轨。它向博尔南颁发了正式的授权委托书，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代表出版社进行谈判，而出版社仅在交易指南中向他提供谈判指导原则。如果是现金交易，也就是说，用可立即支付给持票人的汇票进行交易，他可以把常规书价降低30%，如果迫不得已，还可以降价35%。如果是其他交易，他可以接受期限为8至12个月的汇票，每提前一个月，还给予1%的折扣。他要随身携带一份图书目录，它将提供交易的指导原则，因为出版社在每种书的书名后面都标出了可以接受的最低

价格和存货册数。他还有权进行图书交换——拿出版社仓库里的书换其他出版商和批发商库存的书，【16】尽最大可能做成生意。在出版生意中，交换至关重要，如同指导手册所说：“交换不会是我们的一种负担；相反，它能增加存货的品种，有助于我们卖掉存货，因此能为我们带来利益，没有这类交易，是不可能指望获得这些收益的。不过，进行这种交易需要有洞察力和判断力，而这些能力博尔南先生都不缺。因此我们赋予他完全的自由来进行这项交易。”

书籍交换对出版商来说究竟为什么重要和有多么重要，这些我们后面再谈。这里只须说明一点，即任何商谈交换的人，都必须具备有关图书贸易的渊博知识。一位出版商，通过把他所拥有的大量图书换成他认为他可以卖掉的图书，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存货品种多样化，而且可以加快资金周转。但是，如果他对市场的需求判断失误，或者未能预见到意外发生——比如他弄来的图书可能被新的盗版抢了生意，或者这批图书的用纸可能比较便宜，质量低劣，那么他就倒大霉了。一位销售代表在这种交易中和在他的其他业务中一样，都必须是读者评估和市场评估的行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给博尔南的指示中规定，他要提供有关他所遇到的所有书商的情况汇报，尤其是尚未有过生意往来的书商。出版社需要有关他们的道德水准和财务状况的情报。总之，优秀的销售代表必须同时具备一些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调查记者（用现在的话说）的素质，此外还得是图书销售技巧方面的专家。

在法瓦尔热的例子中，指示写在他日志簿的前几十页上，规定了他出差的目的。和其他商务出差人员的日志一样，这些指示提供了旅行路线，以及在每一站处理出版社生意的行动计划。然而，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代表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具雄心的一次差旅活动，为此，规定指南精辟地概述了1778年的图书贸易状况。指示写了整整36页。一位职员——根据笔迹判断是施瓦茨——首先写下法瓦尔热出差路线沿途市镇的名字，列出出版社在各个市镇的通信联系人的名单。然后从这些通信联系人的卷宗中查询，把最关键的要点摘录下来，并把日志簿交给奥斯特瓦尔德，由他在条目之间的空白处添加说明。

【17】这些说明关注更难的问题，而且涉及范围非常广，奥斯特瓦尔德附上了另外一整套指示，其中显然还结合了另外两位董事博塞和贝特朗的附注，如要收的账和要为印刷厂订购的原材料等与他们有关的问题。所以到最后，这份指示就像古代那种被擦掉重写的羊皮纸卷：笔迹都叠加在一起，这儿添上几句，那儿又划掉几句，提及的事情和提醒注意的事项都挤在字里行间，页边空白处也写得满满当当。



法瓦尔热环法之行的沿途站点

哈佛大学图书馆制图部，斯科特·沃克绘。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显然，法瓦尔热要做的工作很多。大部分工作非常具体——和这个镇的一位客户结账，在那个镇结交一位行会代理人。其中也有和他前几次短途出差成功完成的任务一样的工作：与偷运者商谈货运安排，

【18】采购纸张，调查客户的信誉，以及常规的图书推销。但是这次遇到了市场供需的新情况。纳沙泰尔出版社为获得四开版《百科全书》这种皇皇巨著的市场份额而扩建了它的印刷厂，并且热切希望进行新的投机生意。市场对图书的需求似乎在扶摇直上，尤其是游记、小说、历史、某些自然科学等品类，以及被书商们称为“哲学书籍”等极端非法书籍。尽管出版社与法国所有大城市的书商都建立了联系，但它还想扩大发行网络，增加如今人们所称的“市场份额”。在指示的最后几页中，董事们概述了法瓦尔热出差的目的，并强调他要“收集有关所有书商的情报，尤其是你要去联系的新书商的情报，就所有销售条件达成明确的协议”。

纳沙泰尔出版社为法瓦尔热规划的出差路线，显示出它要征服新市场的雄心。他要穿过汝拉山脉被当地人叫作“勃艮第之坑”的裂隙，沿陡

峭的山道攀上塔威山谷，通过蓬塔利耶进入法国，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在里昂逗留，完成某些特定任务。在维恩

（Vienne）和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中途停留之后，他要沿罗讷河谷而下，跑完南边的所有书店。他要沿着南运河沿线的主要贸易路线从马赛到波尔多，然后北上到达拉罗谢尔，并继续向西通过普瓦捷和卢瓦尔河谷。接下来，尽管发生了出版社决定撤销本次旅途最后一段行程的事情，他还要经由蒙塔日（Montargis）、桑斯（Sens）和特鲁瓦（Troyes），前往书香浓郁的洛林（Lorraine）。在巴勒迪克（Bar-le-Duc）、凡尔登（Verdun）、梅斯（Metz）、南锡（Nancy）和吕内维尔（Lunéville），他可以期待收获丰富的订单。然后他会通过阿尔萨斯（Alsace）返回巴塞尔（Basel）和莱茵河。出版社的董事们就是这样，把战略据点设在莱茵河与罗讷河之间，盯着由这两条大河环抱着广阔市场，打着无限扩张生意的算盘。

- (1) 1锂值20苏，1苏值12德尼。这些是汇票和账目上使用的抽象单位，跟实际的硬币不符。法瓦尔热的钱袋里装的很可能是里亚（liards，1里亚值3德尼）和埃居（écus，1埃居值3锂）。他出门旅行似乎不太可能携带贵重的价值24锂的金路易（louis d'or），因为怕遇上拦路抢劫的强盗。如果必须用到大额钱款，他可以在某些城市里筹措，纳沙泰尔出版社与这些城市的钱庄老板和商人建立了信任关系。锂的购买力是不稳定的。1789年，巴黎一个普通工人的日薪是20到30苏，一个熟练泥瓦匠日薪约40苏。一块重4磅的面包通常要8到9苏，但在匮乏时期，价格会成倍上涨。见乔治·吕德（George Rudé），《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第21—22页。
- (2) 记载了法瓦尔热开支账目的日志见随本书一起创建的网站：www.robertdarnton.org。可以查询法文的手抄本和数字化的手稿复制品，也可以查询其英译本。本书后面几章的引文都出自网站上的复制文献，法文的手抄本和数字化的手稿复制品都有，搜索相关人名就能轻松查到。因为网站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而且容易查询，所以我会尽量减少本书的注释。
- (3) 意思是不值钱的东西吹得天花乱坠，卖大价钱。——译者注
- (4) “朗松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11月7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藏，纳沙泰尔，瑞士。网站上没有列出的文献的引文，将在注释中指明。除非另有说明，它们都出自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 (5) 归功于筑路劳役的强迫劳动，在1738到1780年间从外省到巴黎的主要道路的重建使旅行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法瓦尔热必须走横向的道路，路况依然很差。见居伊·阿尔贝洛（Guy Arbello），“18世纪中叶法国道路的巨变”（*La Grande mutation des routes de France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28（1973），第765—791页；和J.勒塔科努（J. Letacounoux），“18世纪法国的运输”（*Les Transport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现代和当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 (6) 引自亨利·塞 (Henri Sée), “亚瑟·扬眼中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小客栈” (Les Auberges français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d'après Arthur Young), 《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8 (1930), 第446、447和450页。
- (7) “博尔南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84年4月12日。
- (8) “博尔南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85年3月2日。
- (9) 我在二手文献中找到的唯一涉及18世纪销售代表或旅行推销员的参考资料, 是乔治·V·泰勒 (George V. Taylor) 的“关于18世纪法国的旅行推销员的说明” (Notes on Commercial Travel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商业史杂志》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 (1964), 第346—353页。不过, 在旧制度下, 根据当时一位名叫马尔兰的旅行推销员的回忆录, 在小客栈里和饭馆餐桌边, 这种人随处可见: “旅行推销员是一些什么人? 他们通常就是一些年轻人, 每年在王国的各个城市奔波, 为商业公司拉订单。” (引自阿尔贝·巴博 [Albert Babeau], 《文艺复兴到大革命时期在法国的旅行者》 [*Les Voyageurs en Franc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巴黎, 1885年初版; 日内瓦: Slatkine, 1970年重印, 第309页。) 后期的情况见比尔·贝尔 (Bill Bell), “‘书业先驱’: 19世纪早期的旅行推销员” (“Pioneers of Literature”: The Commercial Traveller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印刷业的阶段: 书籍的印制、销售和使用》 (*The Reach of Print: Making, Selling, and Using Books*), 彼得·伊萨克 (Peter Isaac) 和巴里·麦凯 (Barry McKay) 编, 温彻斯特和纽卡斯尔, 特拉华州: St. Paul's Bibliographies, 1998, 第121—154页。
- (10) “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从巴黎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77年4月4日。
- (11) “法瓦尔热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76年8月16日。
- (12) 1749年6月28日, 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出生于纳沙泰尔以北5公里以外的小镇圣布莱斯 (纳沙泰尔州档案馆, 纳沙泰尔民事档案, EC158)。他父亲名叫让-弗雷德里克·法瓦尔热, 他母亲婚前名叫安娜·巴尔布·夏特兰。公证处档案称他父亲是“有产者”, 表明他在纳沙泰尔市享有完全公民权, 档案还指出他像许多纳沙泰尔人一样, 在附近乡村拥有葡萄园, 不过没有提到他的职业 (州档案馆, F9, 公证人让-雅克·法瓦尔热记录, 1780年1月28日条目之一)。让-弗雷德里克·法瓦尔热认识奥斯特瓦尔德, 因为1786年他为奥斯特瓦尔德的一次金融业务当过见证人 (州档案馆, B656, 公证人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记录, 1786年6月24日条目之一)。因此, 他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介入, 在十多年前就说服了纳沙泰尔出版社雇用他的儿子。
- (13) 关于法瓦尔热后期生活的资料见本书第十三章和资料来源。
- (14) 该合同附在法瓦尔热1776年的出差日志之后, 见卷宗ms.1150 (译者按: ms, 手稿之意)。
- (15) 法瓦尔热很可能在青年时期某个时段做过耕地的活儿, 但他不是农民。上文提到, 他父亲拥有葡萄园, 而且是享有完全公民权的“有产者”——有别于社会底层

群体。

- (16) “博尔南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年8月20日。
- (17) 该合同和其他相关文献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博尔南卷宗ms.1124的后面。

第二章 蓬塔利耶：偷运和越境【19】



莱韦里耶尔（Les Verrières），木刻画，《真实的纳沙泰尔跛脚信差》（*Le Véritable messager boiteux de Neuchâtel*）^①插图，1856

法瓦尔热到达位于瑞法边境法国一侧的第一镇蓬塔利耶

（Pontarlier）后，给出版社本部发了一封急信。他没有预料到他出发后这么快就要写信，但是在进入法国时，他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当时他正在边境的瑞士一侧的圣叙尔皮斯（Saint-Sulpice）做短暂停留，为的是同默龙兄弟（Meuron frères）公司谈生意。这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常常受雇于纳沙泰尔出版社处理货物进入法国的第一段行程。不过这时候，出版社已经把大部分订单转给了在蓬塔利耶开展货运业务竞争的让-弗朗索瓦·皮翁（Jean-François Pion）。【20】而默龙兄弟中的一位在和法瓦尔热谈生意时，透露了一条重要情报：就在前不久，他们曾偷运五包各重500磅的八开版《百科全书》去法国。

要理解为什么法瓦尔热急匆匆地把这条情报通知纳沙泰尔，以及作为一种重要营生的“偷运”的本质，关键是要知道在18世纪人们是如何运输图书的。虽然有时出版商把书装在桶里或小板条箱中运输，但通常并不装订成书，而是以折帖形式叠放在一起，捆成货包发运。折帖是出版商估计排版和印刷费用的基本单位，有时在定价中也会用到。（一张八开纸，双面印，含16页文字，折叠后即为一个书帖，与其他书帖缝合起来就构成了一本书，装订的工作一般由零售商或者他的顾客来完成。）为了让运费更低一些，货包必须至少重50磅，常常重100磅以上。^②为

保护货包，先用几层干草包裹，外面再包上一层废折帖和包装纸。包好后用粗绳绑扎，外面涂上标记，以便识别，⁽³⁾然后装上马车。装车需要技巧，因为马车夫必须把货包码好，尽量减少跟绳索的摩擦，还要用油布把全部货物覆盖严实，防止雨雪渗入。书商经常抱怨因运输不当造成的损失，并要求供应商用库存中剩余的折帖更换损毁的折帖。⁽⁴⁾将五包500磅重的《百科全书》安全地运过边境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不仅是因为驾驭沉重的马车爬上塔威山谷（Val de Travers）非常困难——在泥泞的山路上用马鞭驱赶两到四匹马，实在不容易，一失足就可能车毁人亡——还因为这些书是非法的。

这些书的非法性与它们的文字所传播的非正统思想无关。到1778年，《百科全书》已不再像1750年代那样被法国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了。事实上，图书贸易管理署已经允许巴黎的一家出版商，夏尔·约瑟夫·庞库克（Charles-Joseph Panckoucke），发行一种新版本。他组织了出版联盟，其中就包括纳沙泰尔出版社，以一种相对便宜的四开本来印刷包括四卷补编在内的三十六卷正文，以及三卷图集。^{【21】}后来，由洛桑和伯尔尼的出版商组成的另一个联盟发起竞争，又把这种四开版正文复制成更便宜的八开版。于是，四开版的出版商和八开版的出版商对法国市场的争夺，在蓬塔利耶附近的瑞法边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商战。法瓦尔热在发现默龙兄弟跨境偷运过一车八开版的《百科全书》之后，便设法展开反击。但是，默龙兄弟的把戏究竟是怎么玩的呢？⁽⁵⁾

法瓦尔热使出浑身解数，要从与他在圣叙尔皮斯会面的默龙兄弟嘴里掏出答案，^{【22】}但是他所能得到的全部回答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真朋友，我们就知道怎样在需要的时候向他们伸出援手。”这个回答虽然隐晦，却显示了一种比找警察来截获竞争对手的《百科全书》更好的手段。它暗示了在法国边境实现某种突破的可能性——开辟直达巴黎和法国心脏地区其他地点的通道。在法瓦尔热到蓬塔利耶之前，边境控制和内陆腹地的检查一直迫使纳沙泰尔出版社通过里昂转运大部分图书，这要向南绕道，而不是直奔贝赞松、第戎和北方的销售点。尽管写了无数封信，采取了无数的计策，出版社作为货主还是未能实现它的首要目标：开辟一条直达巴黎盆地这个巨大市场的西北通道。

纳沙泰尔出版社是有不少路径可走的——沿莱茵河和罗讷河而下，以及各种陆地路线；里昂至巴黎的货运通道相对便宜而且高效。然而，纳沙泰尔人仍然需要一条西北通道，不仅仅为了节省运输的时间和费用，而且要增加偷运的业务。瞒过里昂管理当局偷运非法书籍的措施老

是失灵。走蓬塔利耶和第戎的地下通道，不仅能减轻里昂路线上偷运的压力，还可能成为直达遍及法国中部和北部渴求非法书籍的读者的主要手段。

虽然法瓦尔热几乎不需要别人提醒他注意这个当务之急，但奥斯特瓦尔德还是在法瓦尔热日志所记载的指示的首页上写出了这样的提示：到达蓬塔利耶时，他要向让-弗朗索瓦·皮翁探询让书籍货包闯过贝赞松管理当局的可能性，而且通常还要简略“收集边境和沿途其他地方的情报”。默龙在与法瓦尔热的谈话中不经意地透露了这个情报，他的公司在瑞法边境突破了禁止非法书籍的屏障。他在吹嘘默龙兄弟公司的专业水准，嘲笑纳沙泰尔出版社把业务交给它在边境另一侧的竞争对手。他情不自禁地向法瓦尔热吹嘘这个妙招，或许是想说服纳沙泰尔出版社放弃皮翁，把业务转给他们做。当然，默龙只是给出了暗示。他拒绝披露偷运路线，并拒绝说明让货物通过边境的方法。

法瓦尔热一到蓬塔利耶就去拜访了皮翁运输公司的总部。【23】他只找到正在看店的皮翁的儿子，皮翁自己去了贝赞松。小皮翁说他对非法的《百科全书》运输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注意到几份货物通运准单，即海关保税输出证，最近在第戎被处理过（卸了货），并且经由蓬塔利耶返回到位于边境村庄弗朗堡（Frambourg）的海关检查站。货物通运准单是总包税所用以控制进口的关键手段。总包税所是财政机构，权力很大，负责为王国收缴关税和货物税，拥有自己的民兵来执行政令。当一位货车车夫拉着一包书籍来到海关检查站（严格地说是*bureau d'entrée*，入境处）时，总包税所的官员便出具货物通运准单随货包一起运输，在一个指定的外省首府（*ville d'entrée*，入境城市）经过检查后，由书商行会的职员进行卸货。之后，货物就可以继续转运至其最终目的地，而车夫则需将附有卸货证（*certificat de décharge*）的货物通运准单返还给出具该单的海关检查站。（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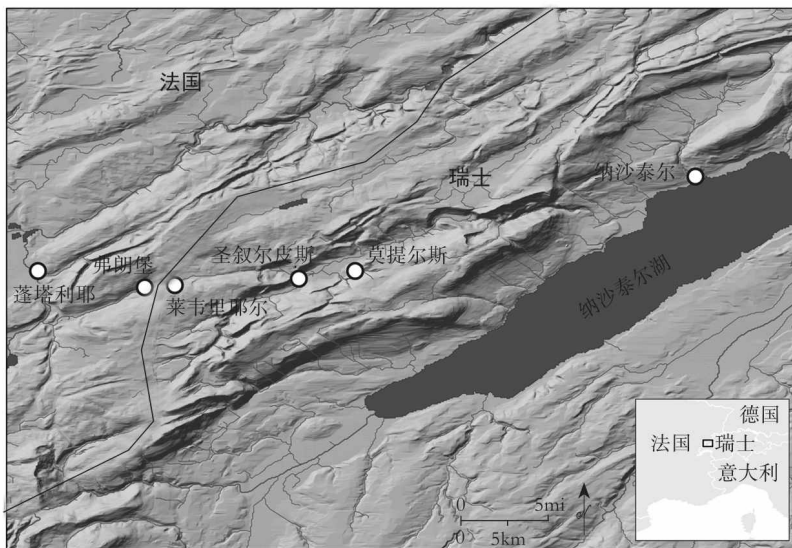
这套规程看上去也许只是日益官僚化的法国君主制所采用的繁文缛节，但是很多手续在执行时都很成问题。默龙兄弟不知以何种方式为非法的八开版《百科全书》取得了货物通运准单，而发行八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们则说服了第戎书商行会的理事，让-巴蒂斯特·卡佩尔（Jean-Baptiste Capel）用一份卸货证为他们扫除了障碍，从而开辟了八开版《百科全书》向订阅者合法发行的途径。法瓦尔热把整个情况汇报给出版社；出版社通知了庞库克；庞库克向政府负责管理图书贸易的部门报警；货物很快便遭没收。这是1770年代《百科全书》之战中关键

性的胜利，价值成千上万锂。而这也是对书籍监管制度的（临时性）突破，因为第戎书商行会并未被授权处理货物通运准单。卡佩尔偷偷谋划了此事，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乘胜而进，与他进行接触，希望他“为了钱也能为我们服务”。

这段由《百科全书》带来的插曲，说明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各类中介人从中插手，猖狂地从事把图书从一国转卖到另一国的活动。这些帮忙偷越边境的人（*passeur*）——偷运者及其各类同谋者——就住在边境地区，【24】而这些地区值得专门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价值，还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⁷⁾

瑞士和法国之间小小的边境检查站弗朗堡位于汝拉山脉的高处，法瓦尔热经过它时就踏入了外国领土，就得服从法国国王的权威，遵守法国的法律、习惯和宗教习俗，这些都使得该国的风情与瑞士迥然不同。不过，两国的地理风貌看上去也没什么两样。高耸的花岗岩峭壁下面，是覆盖着冷杉林的山坡和郁郁葱葱的深谷。村庄景象看起来也很相似，陡坡下的房屋沿着泥泞的山路鳞次栉比地排列，墙壁厚实坚固，屋顶铺着木瓦。村民们说着同样的法语，慢吞吞地，带着轻快的节奏，像唱歌一样。一切都显示出亲切随和的汝拉风情，一切却又各不相同。

不论边境线在地图上标得多么清晰，但在实地却是模糊不清的。对穿越边境的旅行者来说，没有明确的界线，一国与另一国的差别是从多方面渐变的，是地质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别。统治者常常试图用栅栏把本国与邻国隔开，但是入境处将旅行者带入过渡区，【25】就像在国际机场，一切事物看上去或多或少都一样，连检查护照的职员穿的制服都差不多。在过渡区域需要进行多项检查，物品以及人员都要检查，因为过境牵涉将此前遵守的一套规则换成另一套规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悬停状态，大部分规则可以被打破，或者至少可以被修改，因此边境区域有利于专门从事通关谈判的中介机构发展。这些中介人，不论是直接帮人偷越国境，抑或只是作为向导和货币兑换商，都给地理环境增添了人的因素。



18世纪瑞法边境图书贸易站点

哈佛大学图书馆制图部，斯科特·沃克绘

18世纪，在瑞士边境的许多地点，这类人数量激增，在塔威山谷尤其多，人们就是在此地不知不觉从瑞士跨进了法国。各种商品——不光是书籍，还有印花棉布、钟表和奶酪——都是通过弗朗堡运到法国消费者手中的。1778年，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Lamoignon de Malesherbes）巡视边境时，得知当地农民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瑞士人，全都在进行某种走私活动。他总结说，由于边境管控不严，又有利可图，这种走私活动比较容易，尤其是走私书籍：“两百本非法小册子的货包体积不大。在我看来，很容易夹在各种商品中用马车带过乡村过境。”⁽⁸⁾

法国掌权者要求对书籍特别关注，因为受到来自巴黎书商行会的压力，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盗版书和禁书的进口。为了支持巴黎的出版商，政府甚至对所有进口图书征收高额关税。税率是变化的，但在1772年，税率达到每英担28铤（严格地说，关税是20铤，每铤再加8苏的附加税），即在大多数情况下，约为货物价值的18%。走私者以曾经处理棉布的方式操作图书贸易，因为国家曾为保护国内的丝绸业而对棉布征收过高的关税。当然，图书走私还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危险，这种危险自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图书走私说白了就是一桩生意而已，是为满足读者需求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并且以多种形式发生。

最专业的走私形式是人们所称的“保险”。⁽⁹⁾承运人跟出版商签订合同，以规定的费用，保证将货物运过边境。【26】他们雇用当地农民做脚夫，把包裹从位于边境线上瑞士一侧的市镇搬运到位于法国一侧的地下仓库，货运代理商在那里把包裹合成大货包，运给法国各地的书商。如果脚夫被总包税所的边境巡逻队抓住，图书就会被没收，承保人就得按照提货单上定的批发价格赔偿出版商或他的客户。脚夫将会面临惩罚，最严厉的惩罚可能包括在其肩膀上烙上字母GAL（*galérien*的缩写，意思是船役囚犯），并判其在土伦监狱划船九年。

更常见的走私形式用到了一些技巧，让非法货物混入通过正常商业渠道运输的货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员工在给货物打包的时候，把禁书的折帖藏在包装底部，用干草覆盖，或者就把它们夹在合法书籍的折帖中，这种技巧被称作“配婚”（*marrying*）。（我发现过《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Fanny Hill: 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和《圣经》的配婚，无神论小册子和《诗篇》的配婚。）通常这种货包在边境是不受检查的。车夫把货车拉到边境检查站，如弗朗堡，海关人员——亦被称为税收员（*buraliste*）或财政员（*receveur*）——只会出具一份货物通运准单，而检查将由书商行会，如里昂的那种行会来进行。

这种形式的走私通常是成功的——而且危险性比“保险”形式的低，因为检查常常不过是对货包中最上面的几张折帖扫上一眼而已，如果检查员，即某位行会官员，跟纳沙泰尔出版社有生意往来，或者容易被收买，就更是如此。（不过，他身边也许有当地警察局的一位专门的图书检查员陪同。）为了防止货物在半路上被调包，边境海关人员会在货包外再捆上一根绳子，并打上铅封。在弗朗堡过境处，履行职能的方式有很多。有时，税收员只会出具一份货物通运准单，捆绳子、打铅封这些事情就让邻近市镇蓬塔利耶的另外一位海关人员代劳了，总包税所在那里也有一个办公处——或者，第二位税收员也会把这种琐事留给蓬塔利耶的（受纳沙泰尔出版社或另外某个出版商雇用的）货运代理商去做。

在这过程中，货运代理商（*commissinaire*）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手续费用中包含了一笔30苏的小费，用于“铅封、绳索和货物通运准单”；⁽¹⁰⁾而最关键的是，他承担了货物运输的责任。【27】他通常雇用车夫来完成下一段行程。他的名字出现在货包随附的提货单（*lettre de voiture*）上，而且他有处理货物通运准单的责任。车夫将铅封完好无损的货包交给书商行会检查后，就会得到附在货物通运准单上的卸货证，而在归途中，他（或者代他处理事务的货运代理商）就会将那些文件存

放在弗朗堡的海关人员处。一旦经过处理的货物通运准单被弗朗堡的税收员登记在册，这条法律回路就闭合了。可是，所有的手续和文书工作都是有可能出差错的。假如货物通运准单开具后，货物未能在通常为几个月的限定时间内送达，货运代理商就得支付一笔高昂的费用，有时竟高达2000铊。

所以，一包书籍，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过境运输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入境处延伸到进口图书的城市——就弗朗堡到里昂的情况而言，运输里程将近210千米——都算作过境，因为这包书籍只有通过了指定书商行会的检查，才算融入法国的经济。⁽¹¹⁾因为沿途经手人众多，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必须动员边境地区和法国内陆腹地的各类中介人。让-巴蒂斯特·卡佩尔就是其中一位。1776年法瓦尔热在第戎出差时，就已经摸清了他的情况。他在写给出版社的报告中，说卡佩尔是一位“有实力的”书商，还在行会中行使检查员的职能，而让人非常高兴的是，他检查货包时并未注意到非法书籍。

法瓦尔热在到达1778年旅程第一站蓬塔利耶后写道，他认为第戎比以往更有希望成为通往北部市场的通道。他建议出版社立即写信给第戎，请卡佩尔提供曾向洛桑和伯尔尼的竞争对手提供过的服务。本部——想必就是奥斯特瓦尔德——给法瓦尔热回信，指示他要如何充分利用他的发现。当出版社在纳沙泰尔劝说卡佩尔时，法瓦尔热却要调整他在里昂的谈判策略。当他和里昂的新货运代理商雅克·雷沃尔（Jacques Revol）打交道时，他将绝口不提卡佩尔，因为“我们的弓上弦越满，就越有劲”。

这些计策的结果令人失望。【28】卡佩尔拒绝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要他帮忙运送货物通过第戎的请求。尽管他有时乐意帮助瑞士的出版商，但是他不会冒险在法国抵御盗版书和禁书的防护网上开个大口子。法国当局最终还是设法截获了大量八开版的《百科全书》，致使洛桑和伯尔尼的出版商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求和，并放弃了法国市场。但纳沙泰尔出版社也未找到它梦寐以求的西北通道。

作为走私史上的一章，1778年发生在瑞法边境上的这个小插曲波澜不惊，也无秘密可言。但是它揭露了走私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它具备了普通的日常生意的性质。历史学家很难有机会探知走私活动的这一方面，因为他们过去必须依赖官方文献来研究，这些文献主要涉及对走私活动的打击，但走私者一般都能非常巧妙地掩盖他们的行踪，很少在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过，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文件中，帮忙偷越国

境的人却能公开露面，像是在做日常的例行工作的生意人，不像是一些铤而走险的人。因此，法瓦尔热在蓬塔利耶的逗留，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来论述实际进行过的各类图书偷运活动。要把这类活动理解为生意，重要的是考虑它们运作所受到的两个约束条件：边境地带的地形和可雇用人员的品质。



18世纪瑞法边境的书业据点
哈佛大学图书馆制图部，斯科特·沃克绘

汝拉山脉呈弧形，绵延360千米，最宽的地方约61千米，从莱茵河的德国领土延伸到法国的罗讷河谷。它不如东面的阿尔卑斯山宏伟壮丽，但是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形成一堵巍然耸立的高墙。双子峰查榭哈峰（Chasseral）和查榭龙峰（Chasseron）高达1607米，突兀地矗立在纳沙泰尔湖上，而汝拉山脉的最高峰内日峰（Neige）高约1720米，俯瞰着日内瓦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里，攀登这些山峰，是一次令人心

旷神怡的漫步。但是对18世纪收入菲薄、食不果腹的脚夫而言，在寒冬腊月背着沉重的书籍货包翻越这些山峰，却是一种严酷的考验。汝拉山脉由石灰岩和泥灰岩构成，山体褶皱形似手风琴，是受6600万年前突起的阿尔卑斯山脉挤压形成的崎岖不平的高地。褶皱从东北伸展到西南，被山谷分开。要由东向西徒步跨越它们，必须找到横向的裂谷，即“横谷”——从一条山谷到另一条山谷的通道。但是这些横谷大多并不容易通行，而最容易通行的地方，也是总包税所的巡逻队最常去巡查的地方。

纳沙泰尔出版社和瑞士法语区的其他出版商一样，【29】不断地探寻进入法国的新通道，根据情况需要来转移生意，并分散给不同的货运代理商去做。它通过巴塞尔把大量书籍运往北方市场，在那里由可靠的代理商吕克·普雷韦克（Luc Preiswerck）沿莱茵河继续运输。但是莱茵河上通行税太多；而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都没有进入法国的有效通道，因为阿尔萨斯与法国腹地市场的联系被重重的关税壁垒割断了。关税也损害了法国东部边境弗朗什-孔泰大区与“老法兰西”——从勃艮第开始往西，包括巴黎——之间的贸易。但是孔泰的关税比阿尔萨斯的低，【30】而且，书籍货包可以伪装成国内货物，贴上某种标签，标明是无关紧要的商品，如“服饰用品”。一旦通过此举使它们成功进入法国，就可以规避关税。⁽¹²⁾然而无论如何，要想打入法国的主流市场，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是得让书籍首先越过汝拉山脉。

首选路线是沿塔威山谷上行，越过弗朗堡的海关检查站，那里有一条横谷，抄近路穿过汝拉山脉法国地区的高原，便可通向蓬塔利耶。尽管地处高原，而且路况恶劣，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是通过它运送了数千本书籍。它们也许是不违禁的盗版书，也许是危险的“哲学书籍”，但都必须小心处理，并转运到“老法兰西”的发行点，尤其是里昂，它是从瑞士出发的南向和西向二级偷运通道的岔路口。

如果总包税所在弗朗堡的代理人不愿合作，或者是大雪和泥泞使塔威山谷无法通行，纳沙泰尔出版社通常会靠驶往洛桑和日内瓦的货车来运输。车夫可以在几个地点避开主路，并将货物交给货运代理商，货运代理商将货物存放好，直到找到往西行驶的货车，再将货物沿蜿蜒的山路拉到汝拉山中的一条通道上，那里的税收员已经被收买，或者是承保人找好了一条可以绕过海关检查站的小路。汝拉山脉南部的主要入境处有伊韦尔东（Yverdon）对面的茹涅（Jougne）、洛桑（Lausanne）对面的莫雷兹（Morez）、日内瓦对面的科隆日（Collonges）。洛桑和日内瓦的出版商都偏爱科隆日，那里有一条大路通向里昂，尽管他们也

一直在寻找通向巴黎的西北通道。他们雇用莱蒙湖上从乌希（Ouchy）到罗勒（Rolle）、尼翁（Nyon）和韦尔苏瓦（Versoix）的一些港口的货运代理商；这些代理商与丘陵和大山中的农民脚夫有联系，他们有时能在崎岖不平的地带开辟翻越唐德尔山、龙德山和科隆比德热克斯山的新路线。⁽¹³⁾

在这片高原上，货运代理商、货栈主、客栈老板、货车车夫、脚夫和承保人人数激增，地下贸易如火如荼。纳沙泰尔出版社与他们中的几十个人打交道，并挑拨他们之间竞争，不断探索新的运输通道和较低的价格。它作为出版商获得的成功，取决于它作为货主的能耐；而要在货运上取得成功，无论是通过合法渠道，还是走私，它都要建立并维持一个人脉网络，以及一套运输路线系统。人的因素至关重要。

例如，【31】货车车夫需要随机应变，而不只是光靠鞭打他们的马来通过关口。他们常常先要把非法货包丢在法国市镇郊区的小客栈里，再把主要货物带到海关栅栏处或镇中心。这种计策需要买通客栈老板，并且要计算好到达的时间，以便正好与处理下一段偷运的货运代理商的行动衔接起来。老练的车夫，如圣叙尔皮斯的让·埃比（Jean Heuby）和马丁兄弟（Martin frères），据说是塔威山谷一段最有本事的人，他们必定会遵守出版社的时间安排，遵循指定的方向。这些方向常常都指向里昂城外克鲁瓦鲁斯镇的一个中途停留点，那里有个叫“来三瓶”（Aux Trois Flacons）的小客栈，老板叫特维内（Tevenet），他们会在他警觉的注视下把书籍卸下来。但是，无论纳沙泰尔出版社怎样叮嘱货运代理商要挑选这样的车夫，它的货物还是经常被某些车夫损毁或送错地方。居塞（Guset）就是这样的车夫，他因为“无法原谅的疏忽大意”而臭名远扬。⁽¹⁴⁾

即便是货运生意在蓬塔利耶地区做得最大的让-弗朗索瓦·皮翁，也因为经常把事情搞砸而出名。有一次他把一桶德国泡菜错送给里昂的某个人，那人吃掉了泡菜致使错误无法挽回。还有一次，他把一包书籍送到了南特（Nantes），而不是雷恩（Rennes），两地相距约100公里。不过，他拥有一群上汝拉地区最好的马。他可以提供自己的车夫和三五匹马组成的马队，冬季还可以拉雪橇运输。他的竞争对手默龙兄弟和圣叙尔皮斯的约拿·菲利普（Jonas Phillipin），则是从当地农民那里租马——这些山民有着《旧约》人物的名字，如约拿·路易·马太（Jonas Louis Mathey）、以撒·博韦（Isaac Bovet）和亚伯拉罕·让雷韦特尔（Abram Jenrevetel）——但是春天就租不到了，因为这时马要犁地，

在“奶酪季节”（9至10月）也是如此。这时书籍的运输要让位给更吃香的当地土特产的运输。⁽¹⁵⁾在隆冬时节，山道上的积雪可能有近一米厚，农民都依偎在壁炉旁。如果陷在塔威山谷的雪地里，车夫有时就可能丢下马车不管，带着马挣扎着回家了。条件太艰苦，而且路上的状况难以预测，因此默龙兄弟无法承诺在规定的日期把货送到。时限是和合同上的惩罚条款挂钩的，它对某些种类的偷运活动至关重要，因为接续运输的代理商必须知道何时在市镇郊外的客栈与车夫碰面。皮翁每周一次派马车去纳沙泰尔，约定在15天内把书籍从纳沙泰尔运到里昂，【32】酬金为每英担4铤10苏，后来提高到5铤，而时限缩短为12天。他头脑可能有点迟钝，但是他有好马。默龙兄弟明显精明得多，却常常在和他争抢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时落败，因为他们必须在圣叙尔皮斯的公司总部把活儿分包出去。在皮翁的货车穿梭进出里昂时，他们却苦于没有好马，雇来的马车夫也不听使唤：“马车夫都能对我们发号施令呐。”⁽¹⁶⁾

这种竞争无所不在。例如在汝拉山脉北部，货运被位于莱蒙湖畔的尼翁的尼科尔和加利亚尔公司（Nicole et Galliard）控制。尼科尔和加利亚尔处理日内瓦出版商的贸易，如让-弗朗索瓦·巴松皮埃尔（Jean-François Bassompierre），当纳沙泰尔出版社与承保人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他们愿意为它提供帮助。但是他们自己不会偷运，对于纳沙泰尔的生意也不是志在必得：把书籍从纳沙泰尔运到里昂，每英担6铤，是他们出的最低价格。然而，他们以前有一位有事业心的职员，名叫让-雅克·蒙唐东（Jean-Jacques Montandon），1771年离开他们创立了自己的货运代理公司。在给其客户的一封通知信中，他解释说，在经过九年的辛苦工作和每年366铤的低薪后，他已经精通贸易的各个方面，可以提供优质服务。确实，他的前雇主认为他不忠诚。他们曾拒绝给他一部分的生意份额，然而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生意了，因为他已经获得有产者的权利。“只有君主才有权说，‘我要阻止一个人从事有利可图的行当，我要藐视人权，规定你不可在任何地方开业做生意来损害我的利益。’”一年366铤的收入无法养活他的家人，他写道。要不是他老婆帮助他，他已经破产了。至于他的前雇主，他们“就像主子一样指挥着他们的生意，而不是像一个职员……先生们，你们自己判断吧，我在40岁的年纪辞职开始自己做生意是不是错了。”⁽¹⁷⁾

这番话表露出他的事业心。不过，光有事业心并不能克服法国边境上的征税和海关监管体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回复蒙唐东的提议时，问他能不能像偷运白棉布那样绕过海关检查站偷运书籍。他试探过莫雷兹一个叫雅内（Janet）的税收员，“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是我的好朋友。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管税收的人，我不能给他太大压力”。⁽¹⁸⁾雅内不愿意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包不经过最起码的检查就通过他的检查站。

【33】所以蒙唐东试着找莫雷兹的另一个叫夏尔博内（Charbonnet）的朋友，他知道一条可绕过检查站的道，此外，他自己在欧索讷（Auxonne）的一个朋友，可以用伪造的海关铅封把货物一路运到法国腹地。此外，有位新的税收员刚刚来到莫雷兹，蒙唐东要去和他联系，“搞清楚他用哪只脚跳舞”。⁽¹⁹⁾遗憾的是，短时间内频频发生的棉布没收事件让海关官员警惕的神经紧绷起来，经过友好协商的书籍转运计划都泡了汤。蒙唐东到边境检查站走了一遭，未能在税收员中找到必需的合作者，于是他最终放弃了兼营偷运业务的尝试，但是在合法贸易上，他继续跟他的前雇主尼科尔和加利亚尔公司竞争，并获得了成功。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乌希的一位货运代理商奥利弗（Olive）身上。得益于当地一个朋友的帮忙，他开辟了通过蓬德博瓦桑的临时通道，后来由于海关官员警惕性的提高关闭了它。他还去争夺乌希最大的货运代理商塞克雷唐和德拉塞尔弗公司（Secrétan et De la Serve）的生意。该公司进行了反击，他们提醒纳沙泰尔出版社，公司吸纳了一位新合伙人，其妻子是纳沙泰尔人。这种理由有一定分量（尽管不如降价那么吸引人），因为贸易依赖信用，而这种信用在亲朋好友中最有效。所以商业信函中经常会提到私人关系。默龙在第戎（Dijon）有个朋友，是蜡烛制造商，名叫尼布拉（Nubla），他知道怎样让货物闯过行会的检查。贝特朗得知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书商孔特（Comte）有个兄弟在贝尔福（Belfort），此人在贝赞松有朋友，可以把书籍偷偷运进这个城市。另一条进入贝赞松的路线也开辟了，得益于一位名叫米亚沃（Millavaux）的杂货商，他帮助他的书商朋友夏尔-安托万·夏尔梅（Charles-Antoine Charmet）篡改货物通运准单，而夏尔梅又和喜好“哲学书籍”的地方行政长官是朋友。

简而言之，朋友关系能克服对手之间竞争的不利因素，而且人人都试图通过建立人脉来使天平朝自己倾斜。如果说正常贸易都要靠人脉，地下贸易则尤其需要发行网络上的所有结点都紧密牢固。默龙兄弟试图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偷运业务时就说过，“有朋友，一切都好办。”⁽²⁰⁾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和自己的客户要求优惠时也说，“有来有往，彼此双赢。”

然而，【34】出版商要源源不断地把禁书运进法国，必须依靠某种比商誉和临时筹划更实在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方法”，纳沙泰

尔出版社在和默龙兄弟商讨货运事宜时解释道。⁽²¹⁾那种方法就是上面提到的“保险”，而且自1783年6月12日以后，这种保险成了该出版社交易策略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时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le Comte de Vergennes）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所有进口图书在继续运往最终目的地之前，必须在巴黎书商行会接受检查。这条措施让外省的图书贸易陷入混乱。它不仅使运往巴黎以外地区的图书运输费用飙升，还授予巴黎书商行会以权力，使之可以从他们的天敌——国外盗版出版商——运来的每件货物中搜查盗版书。

面对这种形势，纳沙泰尔出版社从边境地区的通信联系人那里搜寻关于开展一种新型保险业务的可能性的情报。莱韦里耶尔的一位争强好胜的货运代理商弗朗索瓦·米肖（François Michaut），推荐了蓬塔利耶的一位名叫伊尼亚斯·费弗尔（Ignace Faivre）的书商，费弗尔最终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行了非常广泛的交易。他的卷宗值得详细探究，因为对于了解一个偷运者的职业生涯和作为保险生意进行的偷运活动来说，这是一项特别丰富的资料来源。

据米肖称，费弗尔最近雇了一个脚夫，和边境巡逻队的头儿关系很铁。适当给点贿赂，巡逻队就不会去找任何可疑的货物了，而费弗尔的车夫就能把整车的书籍从莱韦里耶尔拉到蓬塔利耶。可惜就是费用太高，不划算，是将货物从瑞士运到法国的正常价格的三倍多。不过，费弗尔也能雇到脚夫背着书籍货包半夜走山路；一旦他把书籍安全地运进他在蓬塔利耶的仓库，他就能把它们当作国内货物来运输了。

继续转运需要采取第二种计策。费弗尔要将包裹包成150磅以上的大货包，打上“*libri*”（书籍）的标记，在附在上面的运货单上签字，从而对货包里的货物负责，同时避免半路上被总包税所的巡逻人员检查的危险。当然，它们必须接受离最终目的地最近的书商行会官员的检查，不过费弗尔有路子规避这个难题；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从以往的经验了解到，【35】外省的书商行会为了让巴黎书商行会吃亏，也常常乐于跟外国供应商合作。

最大的困难是越境。走私任何货物脚夫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但那些被特别严令禁止的书籍——例如反宗教小册子《论三个骗子》（*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和诋毁宫廷的《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Anecdotes sur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除外，他们认为这些书籍太危险，不值得冒险。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够保证它交付运输的只是盗版书，并无违禁书籍，脚夫可以按每英担12铤的价钱运到蓬塔利耶

——而且一个关键的细节是，在踏上越境的山路之前，要在莱韦里耶尔的一家客栈免费喝一顿酒。米肖本人乐意帮忙，但他只作为货运代理商行事。组织运作的事，纳沙泰尔出版社要直接跟费弗尔达成协议。实际执行的时候，它要派一名职员到费弗尔店里，装作他的职员，以便协调偷运的运作。(22)

对纳沙泰尔的职员来说，费弗尔不需要介绍。他们已经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1771年1月，他们告诉巴黎的一家客户，说他是“一个很有心计、事业心强的人，但也只是做事有些诀窍而已”。(23)费弗尔先是在纳沙泰尔的图书贸易中从事某种职业——很可能是与福什家族有关，这家人似乎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他就在蓬塔利耶自己做书商。他早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的订单有意投机“哲学书籍”，尤其是霍尔巴赫

(Holbach)宣扬无神论的《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他订了几次货，还订了一些别的畅销禁书，如伏尔泰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梅西耶(Mercier)的《2440年》(*L'An deux mille quatre cent quarante*)和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1749年的小说《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的法文译本

《欢场女子》(*La Fille de joie*)。他是否在蓬塔利耶出售了许多这样的书籍？这似乎不太可能。费弗尔的信件中有好几处文字表明，他的顾客偏好祷告用书。(24)蓬塔利耶大约只有3000名居民，而且没有很重要的文化机构。人们的生计依靠法瑞贸易和纸张、木材、奶酪、铁这几样地方产品，还有强壮的孔泰马(Comtois horses)的销售。费弗尔的信表明，他把书卖给了第戎、贝赞松和南锡的其他书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能够向他们提供禁书。蓬塔利耶主要是他作为瑞士出版商和法国东部零售贸易之中间商的基地。【36】他的生意做得并不是很大。他常常光顾乡村集市，也常常在路上奔波，任何机会都不放过，而他夫人就在家照看店面。他不在家的时候，她还处理信件，似乎对记账和一般的贸易也很精通。



这张明信片大概出自1930年代，展现了走私者背着货包穿越瑞法边境的情景。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图中情形出于摆拍，但是它说明，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利用瑞士农民把书背到法国境内的秘密仓库之后，这个行当以强劲的势头持续了两百年

在整个1770年代，费弗尔的偷运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莱韦里耶尔一个名叫雅内的客栈老板在边境的瑞士一侧提供仓库，米肖帮他雇脚夫，贿赂海关官员。家族关系铺平了贝赞松尤其是蓬塔利耶的路子，在那里，总督的下属官员同意对费弗尔运到该城的所有货物装作没看见。自1771年9月，费弗尔开始偶尔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偷运书籍。尽管他不提供正式的保险服务，但是承诺安全交货：“不要为这些书担惊受怕……别担心，不会出任何事情。”他收费不贵——每英担12铢——而他付给脚夫的工资更少。【37】脚夫把书捆从雅内的客栈运到费弗尔在蓬塔利耶的秘密仓库，每天得25苏，相当于巴黎一个做粗活的工人一天的工资，此外还必须提供烈酒。最初，一捆书重109磅，一个人背太重了，脚夫们都不愿意干。最终他们说服费弗尔把书捆的重量减到60磅，如果山路积雪，还要减到50磅。如费弗尔所描述的，他们常去汝拉山区大峡谷中的客栈，而且除了少数可依赖的人，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费弗尔抱怨他得和一群“可怜的醉鬼”打交道，他们要钱太多，而且如果在雅内的客栈里灌多了酒，他们还会大叫大嚷地把要干的活儿都说出来。(25)据说总包税所在瑞士几个提供酒水的地点都安插了探子，于是费弗尔最终把在莱韦里耶尔的业务基地转移到一个叫蒙托东（Montaudon）的人的住所。他从来没有被逮住过。

但是他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偷运是他合法图书贸易之外的一种副业，却一直让他身陷债务。由于没钱承兑他给诸如纳沙泰尔出版社这样

的供应商的汇票，他和许多债主讨价还价争吵不休。1771年，他和贝赞松最大的书商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打了一场官司，也曾就其账上所欠余额跟纳沙泰尔出版社发生口角。出版社也威胁要起诉他，并且摊牌，拒绝发送九卷本《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的最后两卷，这是他订购好的，必须供应给顾客，否则他拿不到钱。

1772年，费弗尔宣布破产——把资产负债表存放在地方官处，中止偿还他的债务，同时和债主做交易，并且尽其所能继续做生意。纳沙泰尔出版社聘请了蓬塔利耶的一位律师把案子诉至法院，但是费弗尔不服。他写道，即便纳沙泰尔出版社赢了官司，追回的钱连支付法律费用也不够，因为他会通过上诉把案子一直拖下去。就像他在后来的信中评论的，“人们不该听律师和法律官员的，他们只是想赚钱，想把打官司的各方拖进迷宫一样的法律程序中，你永远看不到它的尽头。”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东西可供没收后付给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其他一些高估自己能力的边缘企业主一样，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被叫作“人财分离”的离婚，以便保住结婚时老婆带来的财产。【38】“她得到的判决结果也让我避免了债主对我的所有起诉”，他写信告诉纳沙泰尔出版社，“因为我没有多少家具和存货付给他们。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那样就不会冒丢掉我欠你们的全部债款的危险。”其实费弗尔的妻子仍在积极地打理他们的生意，甚至自己出差去推销。在输掉了当地法院的初审判决后，费弗尔真的上诉了；结果还真如他警告过的，纳沙泰尔出版社花掉了大量法律费用；十年后，他们最终还是实现了庭外和解。

1783年年中，法瓦尔热那次出差五年后，纳沙泰尔出版社准备和费弗尔恢复交往，因为他们需要他帮助偷运。韦尔热讷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给图书贸易造成了严重危机，以致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再能指望处处都和货运代理商进行筹划来进入法国市场。它需要一个专业承保人，即使他曾遭遇过破产，因此在1783年秋天，它又开始与费弗尔合作。经过几次尝试，他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并且于1784年1月23日和一位作为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代表路过蓬塔利耶的职员签订了正式合同。该合同的关键条款是：“我，签字人（伊尼亚斯·费弗尔），向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我将承运该出版社要发往莱韦里耶尔的弗朗索瓦·米肖先生的所有书籍货包，并在两个月内将货送至蓬塔利耶，保险费率为每英担15法铔。”

费弗尔要在蓬塔利耶租一个专用仓库存放货包，直到他找准时机以有他自己签名的运货单进行转运，以便货物在国内运输期间遇到困难时

他能负责。不过，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发运任何被明令禁止的书籍，除了它盗版（或扩版）的《艺术与工艺全书》（*Description des arts et métiers*），此书曾在法国政府那里遇到大麻烦（当局受到巴黎的原版出版商尼古拉·莱热·穆塔尔 [Nicolas-Léger Moutard] 鼓动），费弗尔同意以每英担18法铤的保险费率承运。纳沙泰尔出版社将雇用他作为货运代理商处理它的所有具备货物通运准单的正规货物，以便他一有机会就能利用合法货运来掩盖非法货运。要是书籍被没收了，他就得在一年内按全价赔偿。费弗尔的保险服务完全符合1772年纳沙泰尔出版社与一位名叫吉永的“承保人”之间的约定，那是一份为在克莱尔沃莱拉克附近的边境进行偷运而签订的合同。根据两份协定务实的语气判定，【39】它们具有一般走私生意的特点，至少是最专业的形式完成一项经过精心计算的事业。

不过，1783年的保险与1773年的保险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因为韦尔热讷在1783年发布的命令，意味着只把书籍偷运过法瑞边境是不够的。费弗尔还得采取措施对第二段运输行程实施保护，即从蓬塔利耶的仓库到外省的目的地的这段行程。如前面所提到的，他要把脚夫送交的书包捆成大货包，标上“*libri*”标记，填写运货单，签上他的大名，以便它们能作为国内货物运输，而不必根据货物通运准单转道巴黎。它们必须在里昂或贝赞松的书商行会通过检查，但是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帮助下，他在两个城市都找到了合作者来办理那种手续。到1783年底，他把保险业务的各个部分都组合了起来。然后的问题就是，一旦这个保险业务启动，它将怎样运作。

起先他发现难以找到认真可靠的脚夫，并且让他们相信纳沙泰尔出版社会自我限制，只经营盗版书，不经营禁书。（其实该出版社曾经不顾合同规定，利用费弗尔运过最危险的书籍。）最终，他向出版社保证，他招募到了一支可靠的脚夫队伍。他知道几条能绕过弗朗堡边境海关检查站的山路，而且在首次跨境尝试时，他还亲自陪同脚夫走了一趟。然后他开始收买当地的总包税所官员。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他说服了他们——花了一大笔钱，让他们对他的脚夫所拉的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可以放行60个货包，固定费用为8个金路易（合192铤）。遗憾的是，脚夫们也拼命地跟费弗尔要价。他们不接受每日25苏的固定运费，而是每英担要15铤，还要另加酒水。1783年末冬季来临时，他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说，“下雪之前，不论什么紧急的货你们都可以发给我。”所有这些安排都要花钱，他解释说：“我必须向这些脚夫提供酒，还要给那些跟我做了交易的人8个金路易。”这指的就是贿赂总包税所的

官员。“可是有那8个金路易，我可以运50到60个甚至更多货包了。”

所以费弗尔坚持要提高他自己分得的收益比率，这使他跟纳沙泰尔出版社谈判也很费劲，直到1784年2月才终于达成妥协。那时候，费弗尔正在为几家出版商搞偷运，包括洛桑和伯尔尼的出版商。由于在弗朗堡撒了那么多钱行贿，【40】因此他自己在那里接了几起越境走私生意，而且找到一种把运往外省的货藏在运往巴黎的货包中的新门道。

到4月份，关口上厚重的积雪融化了。但残雪也让跨越山路困难重重，脚夫们精疲力竭。他们一夜驮了6包货过境，第二夜又是6包，到月底又运了另外6包。山路仍然很难走，于是他们提出要求，货包还要再轻一点——一般只能重40磅，最多60磅。到5月末，积雪化尽，有些脚夫也不来了，因为他们要集中精力春耕。不过，费弗尔还是找到了足够的脚夫，维持到贝赞松、里昂、第戎、特鲁瓦和兰斯（Reims）的货运。尽管几乎每次都遇到困难，但这套系统尚能运转。

更确切地说，它一直运转到一场大事故来袭。1784年8月初，弗朗堡边境检查站的官员缴获了5包“哲学书籍”，其中有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煽动性的和宣扬色情的小册子。它们是福什长子和维特尔公司发运的，这是一家由萨米埃尔·福什的女婿热雷米·维特尔（Jérémie Witel）和他的长子若纳斯（Jonas Fauche）在纳沙泰尔创办的公司。在和父亲老福什发生争吵后，他们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并仿效他出版禁书。米拉波专门写作这类体裁的书。1775年，当他还被囚于茹堡（Château de Joux）这座坐落于高约922米的汝拉山峰上、俯视着弗朗堡附近边境的城堡中时，就让老福什出版了《论专制主义》（*Essai sur le despotisme*）。1782年和1783年，小福什和维特尔出版了他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Etat*）和《情色圣经》（*Errotika Biblion*）。但是他们的偷运活动出了岔子，这些书籍被发现，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弗朗堡的走私通道被堵住了。虽然费弗尔与此事无干，但他也哀叹：“许多人都抱怨，有些人甚至针对我，可是我跟这事毫无干系。”他还注意到，总包税所的官员现在“日夜都在警戒”。

费弗尔无计可施，只有暂停所有偷运活动。他的脚夫不愿跨境运任何东西，而且在莱韦里耶尔有密探和无赖，为了钱会出卖任何人。他认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存放在米肖于边境的瑞士一侧的莱韦里耶尔的仓库里并不安全，所以他命令手下把它们搬到一座山的山顶上找个地方藏起来。【41】货包在那里一直存放到10月，事态此时已平息下来，并且

他和总包税所的人员也达成了一份新协议。他还设法说服一些脚夫尝试跨境运输，主要是给他们灌更多的酒。有过量的酒壮胆，他们做起来就不难了；总包税所的人得到了更多的贿赂，也就不再盯着他了。于是到11月，这个系统又平稳地运作起来。

尽管如此，这个系统在夏季的崩溃使费弗尔的财务压力大增。他不能再回过头去和妻子分手这种骗人的把戏了。事实上，她像从前一样在他身旁辅佐他，为了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书商处理事务，她甚至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上路。面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催债，费弗尔恳求延长还债的期限：“脚夫们一直盯着我要钱呢。他们要我把工资提到每磅6德尼，还要考虑到我必须支付给那些帮我的人的其他款项，这样的话我就无利可图了，”他补充道，那些人指的是总包税所的人员。

有些贿赂是给弗朗堡海关检查站一个名叫圣安德烈（Saint André）的财政员和他的一个同事的，这个同事在蓬塔利耶附近总包税所的另一个办事处监督货运。费弗尔跟他们很熟。为了巴结他们，他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把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的六卷本小说《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Cécilia, ou mémoires d'une héritière*）的译本送给他们。纳沙泰尔出版社还另外给了一些好处，让圣安德烈免费订阅两份他们出版的《赫尔维西亚月刊》（*Journal Helvétique*）。如奥斯特瓦尔德在一封附信中所写的，这些赠品是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先生，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万分感谢您对于我们通过您的办事处发运的书籍，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几个月后，新的偷运系统有效地运作起来，费弗尔要了两本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的《论财政管理》（*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雅克·内克是瑞士银行家，1778到1781年间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费弗尔解释说，他需要一样合适的礼物，因为他不久后要和圣安德烈一起吃个饭。在蓬塔利耶-弗朗堡这个小世界，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们互相熟识，都读过许多这样的书，不管他们是卖书的，还是没收书的。

为了防备密探，也为了安抚跟米肖发生口角的脚夫，费弗尔把他在瑞士一侧的偷运业务从莱韦里耶尔转移到圣叙尔皮斯，让米肖的竞争对手默龙兄弟做他的新代理商。【42】而且在改进老系统的同时，又基于不同的路线设计了一个新的。它“安全、可靠”，而且能走装载量大的货车，但马匹必须强壮，因为这条路要翻过高山。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不用再把书捆成重50到60磅的货包，而是可以打成200到400磅的货包来发运。（此前，出版社有时故意忘记对书捆的重量加以限制，费弗尔在

1784年11月抗议过，“一个人不能背负110磅”。)现在，出版社可以恢复比较常规的货包了，而费弗尔没有脚夫也能运货。唯一的问题是积雪，1785年2月积雪厚达近一米，道路无法通行。“没有哪个马车夫敢驾雪橇走这些路”，费弗尔写道。高山道路要一直封到4月末，而在这期间，出版社的合法书籍和藏在有货物通运准单的货包中的盗版书籍，就从地势较低的地方运进法国。

纳沙泰尔出版社在经营后期，【43】许多货物通过皮翁发运，虽然皮翁仍然不愿作为承保人，但他收费较低。费弗尔曾打算处理该出版社的所有贸易，扮演货运代理商和承保人的双重角色，并且租了一间仓库存放大量指望偷运过境的书籍。他跟出版社签订的合同确实约定会把运到法国的一切货物都托付给他。他尤其需要处理具有货物通运准单的货包，因为他要利用它们掩藏为其他出版商运输的非法书籍。他在信里暗示，他像其他货运代理商，如里昂的雅克·雷沃尔一样，把禁书的包裹夹在当局容许的大货包中。由于他和海关人员关系好，可以在蓬塔利耶把货包重新包装后再打铅封；订了这批货的书商能找到办法把非法书籍抽出来，或者在书商行会接受检查时趁人不注意让它们通过。

费弗尔越来越气愤地抱怨纳沙泰尔出版社未能兑现合同的条款，出版社也反过来抱怨他的服务花的时间太长。他回答道，1784年一整年他都在为出版社辛辛苦苦地劳作，而在1785年初，也是因为雪太大他才被迫积压了一些货物没有发运。他争辩说，交易量不大的话，他的保险业务就不值得做了。他每年花33铔租了三年的仓库现在毫无用处。1785年8月15日，他写信说，如果出版社不支付剩余的租金，他就要撤销合同，不跟他们做生意了。

就在这时，纳沙泰尔出版社完全停止了向费弗尔发货。因为出版社自己也遇到了财政困难，已经开始大幅缩减出版业务。1786年1月，出版社结清了他的账户，他收到300铔的一小笔余款。我们从费弗尔的卷宗可以得知，在停止为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行偷运业务后，他作为书商的生意还在继续。尽管他老婆和他假离婚，但是还在和他一起经营，1780年代后期，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也陪着他们。很可能直到1789年，他还继续为其他出版商进行偷运或是通过“保险”业务，或是通过在海关检查站玩花招。

正如法瓦尔热是销售代表的典型一样，费弗尔可以被视作偷运者的原型。【44】他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生意人如何能够在几乎是无法无天的法国东部边境小山城里依靠图书贸易讨生活。1778年，法瓦尔热视

察出版社在法国边境的供货路线时，他的法国之行与那个在上汝拉地区发生的故事（以及其他几个故事）只有几天的交汇。在后面的各站点，他还有许多任务要去完成，而这些任务也将嵌入更多别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高度个人化的经历，然而所有这些故事又都联系着一个共同事业——在法国历史上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把书籍送到读者手里。

(1) 这是当地的年鉴。——译者注

(2) 王国管理运输的法令要求由货车运输的包裹至少重50磅。那时通用的法国磅合489.5克，约0.5千克。货运代理人以英担或公担为单位收费，约合45.4千克。货车车体结实，有四个轮子，由两匹以上的马拉着，常常能载5000磅。见勒塔科努，“18世纪法国的运输”，《现代和当代史杂志》，11（1908—1909），第97—114页。勒塔科努的资料可以从货运代理商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几百封信中得到证实，他们雇用车夫，并为费用讨价还价。

(3) 这种标记不是地址，而是一个缩写的表达符号，不仅涂写在货包上，也标在通知函和运货单上，用来通知货运代理商或书商，并用于记账。例如，标着“RP85”的货包，由纳沙泰尔出版社于1779年3月29日发运给蒙彼利埃的书商里戈·蓬斯，该包裹重200磅，是那年出版社发运的第85个货包（“代理账簿”[*Livre de commission*]，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ms.1019）。我在一篇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论文中发表过这些账簿和附随文献的照片，文章标题为“出版社与书商之间：书籍销售的诸个阶段”（*Entre l'éditeur et le libraire : les étapes des ventes*），刊于《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200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纳沙泰尔学术讨论会论文集》（*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1769-1789. Actes du colloque Neuchâtel 31 octobre au 2 novembre 2002*），罗伯特·达恩顿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纳沙泰尔：Attinger，2005，第365—369页。

(4) 为了能替换损坏的折帖，印刷商会增加印数，多印一些折帖，这些折帖被称作“夏佩隆”（译者按：*chaperon*，原意是在社交场合监护少女的年长女伴，如今这些多印的部分，多被称作“伸放纸”[*main de passe*]）。这额外多印的折帖数量不定，尽管印刷商的手册上说，通常在印刷时，每两令或一令纸（1000或500张折帖）的纸张加放量为25张：S.布拉尔（S. Boulard），《印刷手册》（*Le Manuel de l'imprimeur*），巴黎：Boulard，1791，第72页。这额外多印的折帖主要用来弥补印刷时产生的损坏，但是如果客户抱怨有破损，也可以用它们来弥补，破损常常是运输中搬运不当造成的。

(5) 这个事件的完整记述见我的专题论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或，简写版“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百科全书》之争”（*The Encyclopédie Wa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见robertdarnnton.org网站。

(6) 这种涉及货物通运准单的手续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图书贸易的数篇手稿中有提及，尤其是法文档案全宗（Fonds français）22079，no.140，“备忘录：关于书商行会的情况和在贝赞松建立书商行会的理由”（*Mémoire. Renseignements sur les*

chambres syndicales et les moyens d'en établir une à Besançon), 1773年6月11日; 和法文档案全宗22081, no.165, “1763年11月10日致萨尔蒂纳先生的备忘录”(Mémoire donné à M. de Sartine le 10 novembre 1763)。然而, 为再现它的实际运作情况, 我还参阅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货运代理商的信函。

- (7) 边境上的文化复杂性一直是人类学家最喜爱的主题, 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关注。可参阅如格雷格·丹宁(Greg Denning), 《岛屿与海滩, 关于一片寂静土地的论述: 马克萨斯群岛(1774—1880)》(*Islands and Beaches, Discourse on a Silent Land: Marquesas, 1774-1880*), 墨尔本: 墨尔本大学出版社, 1980; 以及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 《边境: 比利牛斯山脉中法国与西班牙的形成》(*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nes*),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9。
- (8) 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 《1778年夏季在纳沙泰尔山区的旅行》(*Voyages des montagnes neuchâteloises en été 1778*), 日内瓦: Slatkine, 2011, 第80页。
- (9) 更多叙述见本书网站“中间商和偷运者”(Middlemen and Smugglers)标题下面的文献和论文。对“保险”的经济分析, 连同对在另一条跨境通道偷运的详细研究, 可以在该标题下有关吉永(Guillon)的论文中找到。我的一些关于书籍偷运的早期出版物已普及到通俗文学领域, 有一部作品还把我描写作偷运者: “偷运者和中间商的一条运输途径为[非法]书籍的流传提供补给, 不限于咖啡馆和读书会。这种煽动性书籍的主要传播者中, 有一个叫罗伯特·达恩顿的, 是蒂永维尔的一个出版商。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合作, 这家出版社出版过报纸和毁谤性小册子。为了掩盖这种非法经营活动, 达恩顿也出版合法书籍, 诸如历书、宗教小册子和课本。”(安德烈·贝松[André Besson]: 《走私犯和税务官》[*Contrebandiers et gabelous*], 巴黎: France-Empire, 1989, 第207页, 引自多米尼克·瓦里[Dominique Varry], “探索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研究的新路径”[*Pour de nouvelles approches des archives de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刊于《达恩顿辩论会: 书籍与18世纪的革命》[*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海登·T.马森[Haydn T. Mason]编, 牛津: 伏尔泰基金会, 1998, 第235页。)
- (10) “默龙兄弟菲利普和法弗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81年2月13日, 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这个论述基于档案中默龙兄弟、让·弗朗索瓦·皮翁、弗朗索瓦·米肖、亨利·罗塞莱和伊尼亚斯·费弗尔的大量卷宗。费弗尔的信可在本书网站上查阅。
- (11) 在1777年修改规定以前, 法国只有以下几个城市的书商行会可以处理货物通运准单: 巴黎、里昂、鲁昂、斯特拉斯堡、南特、马赛、波尔多、梅斯、兰斯、亚眠、里尔和加来。
- (12) 弗朗什-孔泰像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 属于“被视为异邦的省份”, 因此, 货物经过它到中部和北部市场必须付过境外税。但阿尔萨斯和洛林征收的关税更高, 因为它们“被看作是真正外国的省份”。根据特殊约定, 里昂不会对“五大包税所辖区”(Cinq Grosses Fermes)内向北运输的货物征收关税。见J. F.博谢尔(J. F. Bocher), 《单一关税计划: 18世纪法国关税联盟运动研究》(*The Single Duty Project: A Study of the Movement for a French Customs Un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伦敦：Athlone，1964；和P. M.琼斯（P. M. Jones），《法国的改革与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1774—1791）》（*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774-179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 (13) 见我关于克莱尔沃莱拉克（Clairvaux-les-lacs）的“保险”业务的论文，《启蒙运动时期的书籍与越境运输》（*Books and Border Crossing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见即将为纪念罗兰·莫蒂埃（Roland Mortier）和雷蒙·特鲁松（Raymond Trousson）而出版的文集，也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
- (14) “默龙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6月26日。
- (15) “默龙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9月28日。
- (16) “默龙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4月22日。
- (17) “蒙唐东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9年7月16日。
- (18) “蒙唐东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1年8月28日。
- (19) “蒙唐东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1年9月3日。
- (20) “默龙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0年6月25日。
- (21)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默龙”，1776年4月9日。
- (22) “米肖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10月30日和1783年12月22日。
- (23)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赛扬和尼翁公司”，1771年1月17日。
- (24) “费费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2年7月27日。后文的记述大部分基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费弗尔的卷宗，可在本书网站上查阅。
- (25) “费费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10月4日。

第三章 隆勒索涅：评估书店【45】



这幅由莱奥纳尔·德弗朗斯（Léonard Defrance）绘制的油画展示了列日一家书店的外观，书店正面墙上贴满了宣传启蒙运动书籍的海报，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允许这些书籍在其领地自由传播。除了促进出版自由的启示，这幅油画还以展示书籍货包著名，货包堆在书店门前，每个货包上均有识别标记

德弗朗斯，《在密涅瓦的庇护下；约瑟夫二世有利于百科全书派的宽容政策》，inv 3550-13 ©第戎美术博物馆 / 弗朗索瓦·热（François Jay）

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是法瓦尔热在蓬塔利耶之后的第一站，那里没有什么生意可做。艰难地骑马越过汝拉高原后，他在一个客栈歇脚，这很可能是一个典型的虱子横行的旅舍，打着“步行者和骑马人家”（*On loge à pied et à cheval*）的幌子招徕旅客。隆勒索涅是一个小集镇，地处弗朗什-孔泰的穷乡僻壤，人口稀少，法瓦尔热在他的日志中记下：“隆勒索涅只有两家书商。一位叫德洛尔姆（Delhorme，印刷商兼书商），只卖他自己印刷的书。一位是加布里埃尔（Gabriel），是一个正派人，但是很穷。他的店只卖祷告用书之类，价格不到500锂。但我还是留下一份书目和《艺术与工艺全书》的简介给他。我们只能跟他用现金交易。”

这是一篇典型的法瓦尔热日记：简明，务实，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提到图书贸易中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方面，即地方市场的价值，

地方市场要满足人们对礼拜和祷告用书、教材、历书和诸如公告之类的应时印刷品的需要。^①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做这类印刷品生意，所以法瓦尔热把他在旅途中碰到的许多书商都当作不值得交往的对象。当他描述他们店里所卖的东西时，通常会用到“习俗用书”（*usages*）这个词，意指除神学著作之外的各类祷告用书和宗教小册子。他通常用一两句话把这些当地小书商排除在外：

格勒诺布尔：福尔是国王的印刷商，只印刷公告（*placards*）。他把他的股份卖给布雷特，而布雷特不做商业图书（*articles de librairie*）。

奥朗日：【46】奥朗日只有一个叫儒伊的，以制作假发为生，他卖宗教习俗用书（*livres d'usage*），不卖别的书。

塔拉斯孔（Tarascon）：科尔多内西和塔西寡妇合开一家商行，生意很有限。他们只卖宗教书籍。

尼姆：博默，这里的一个印刷商，佳，但他只印刷宗教书籍出售。

卡斯特尔：我见到了罗贝尔先生，一位神学博士、印刷商、书商。但是他只卖自己印刷的宗教书籍，所以跟他没有生意可做。

利布恩（Libourne）：莫兰……佳，但是他很少做生意。他只卖宗教书籍和几样别的东西。

布卢瓦（Blois）：夏尔和菲利贝尔·马松，印刷商，一起合作做生意，而且只印刷销售宗教书籍。

奥尔良：鲁佐寡妇，佳；但她只经营宗教书籍。佩德鲁，一般，在我们的书目上找到几种对他胃口的书，但是他只想用宗教书来换，他也只有一些宗教书。

法瓦尔热的这些印象，已由一项有关王国中所有印刷商和书商的调查所证实。这项调查是1764年由各总督及其下属官员开展的，在法瓦尔热这趟旅行的十多年以前。当问到印刷商印什么东西、书商卖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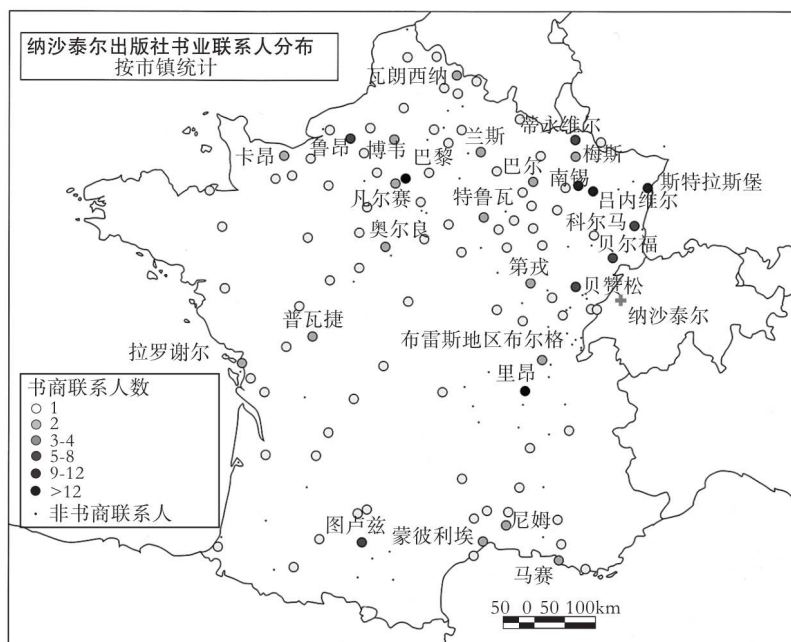
这个普通问题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普通小说和非虚构类作品，但是他们强调，真正流行的是宗教著作和当地人感兴趣的书籍。例如在布卢瓦的卢瓦尔镇，他们对皮埃尔-保罗·夏尔（Pierre-Paul Charles）和让-菲利贝尔·马松（Jean-Philbert Masson）的评价，与法瓦尔热所发现的情况就非常相似。他们详细注明这两位印刷商兼书商都“经营学校用的各类书籍、主教教区用的礼拜仪式书、课本、公职部门用的材料、海报、布告、葬礼通告，以及不时由国王授权印刷的书籍”。在奥尔良，当地总督注意到，“书商只经营贸易中常见的书籍，包括文学、宗教小册子和祈祷书。”⁽²⁾

纳沙泰尔出版社卖的是著作（*literature*）。这是一个综合性术语，包括多种体裁的书籍，但是不适合许多小书店进货出售。⁽³⁾【47】像隆勒索涅这样的小镇（人口6700），通常有一两家印刷商。他们承印教会机构的礼拜仪式用书、外省管理机构的通告、律师用的“事实陈述书”或案情摘要、商人用的汇票，以及各类应时印刷品，质量都很低劣。尤其是，就算他们有资格成为书商兼印刷商，常常也只卖自家店里出的印刷品。地方书商都经营同类的印刷品——主要是祷告书和与地方事务有关的小册子。他们的生意规模很小，纳沙泰尔出版社不想从他们那里寻求商机，而且他们又不印制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卖得最好的那类印刷品。该出版社的贸易流经法国主要商业渠道，却没有分流到广阔的地方市场。它融入了法国的文化潮流，这潮流能到达王国最偏僻的角落，但它却没有跟地方上的图书贸易建立连接，以使书籍广泛传播到各处。虽然如第十章将要说明的，有零售摊贩通过毛细管分销体系传播普通书籍，但是一个完整的图书市场要到19世纪后期才会出现。⁽⁴⁾

像隆勒索涅这样的地方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籍需求不旺，但法瓦尔热并不气馁。他认为这无所谓，并且把精力集中在有经营普通商业图书的书店的城镇。但他还是有必要采取某种尺度来评估一下这些书店。如上面的引文所示，他把这些书店分为三个基本类别：“佳”（博默、莫兰），“一般”（佩德鲁），“差”（德洛尔姆、儒伊），“差”的书店就不值得当作潜在客户了。⁽⁵⁾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它的账目和商函中就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虽然偶尔也使用其他词，如“有实力”“一般”和“无实力”。⁽⁶⁾18世纪欧洲各地的其他商人很可能都采用这种三分模式来评估顾客的信用。（到1850年代，为英国出版商工作的销售代表们把图书零售商分为四类，“佳”“一般”“可疑”和“差”，⁽⁷⁾就和法瓦尔热的分类差不多。）当他到达一个不熟悉的城镇时，如此粗略又主观的评估标准就不够用了。当涉及生意经营，“佳”或“一般”意味着什么？

法瓦尔热每到一个目的地，就要查阅《出版年鉴》（*Almanach de la librairie*），【48】这是一种贸易手册，于1777年首次出版，1778年又再次扩版发行，它列出了法国所有城镇的全部印刷商和书商。⁽⁸⁾法瓦尔热就用它作为安排访问的名录，并用作撰写关于他们的报告时的记分卡。例如，到达普瓦捷时，他根据出版《出版年鉴》去访问了菲利克斯·福尔孔，一位评价为“佳”的印刷商兼书商，但他又是当地书商行会的理事，自命清高，不会订购盗版书籍。居于第二位的是印刷商布罗（Braud），法瓦尔热在日志中也把他标记为“佳”，但他却不想订购任何图书。四位书商——博班、吉耶米诺、吉罗和若雷——在日志中都被标记为“一般”，《出版年鉴》中的其他人都被标记为“差”并划掉了。

不过，《出版年鉴》频频出错，⁽⁹⁾总之法瓦尔热在踏进一家店铺之前，需要比它所提供的更详实的指导性资料。他尽可能依赖写在日志开头的指示。例如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指示指导他去“见韦尔纳雷尔先生，获取更多有关他的偿付能力的信息”。而在马恩河畔沙隆（Châlons-sur-Marne），他应该当心松贝尔（Sombert）：“我们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品格和财富状况的差评。”但是指示涉及的范围有限，因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对几百英里以外的客户的诚信度了解甚少。法瓦尔热出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去获得这种了解，因此他必须依赖沿途的信息提供者。



此图显示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联系人、各类人员以及书商的分布密度，他们遍及法国各地。纳沙泰尔出版社几乎到处都有关系人，但是和书商们打交道时，它必须了

解哪些是“有实力”的，可以信赖。法瓦尔热出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获得这种情报

BPUN：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法国的书业联系人分布图

帮助最大的是雅克·弗朗索瓦·达纳尔（Jacques-François d'Arnal），他是纳沙泰尔出版社董事亚伯兰·博塞·德吕兹的女婿，是波马雷、里列和达纳尔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该公司是一家银行，负责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里昂的事务。达纳尔忠于博塞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利益。他的银行是法国和瑞士的新教金融家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生意遍及法国，尤其在南部。法瓦尔热一到里昂，便去拜访达纳尔；在离开之前，达纳尔帮助他优化了行程，为他提供了拜访沿途联系人的推荐信——多半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报告当地书商“实力”状况的商人。法瓦尔热还会依靠日志里列出的新教牧师和货运代理商，因为他们对当地的生意状况了如指掌。

法瓦尔热是通过一个个城镇地跑、一个个联系人地找来走遍法国的，因此他循的是一条条人文地理路线。对他来说，法国就是一张人员交往联系的网络。【49】当然，它也是在崎岖道路上长途跋涉所串起来的接连不断的风景。事实上，他发现奥斯特瓦尔德虽然是地理专家，却误以为到地处中央高原的城镇要60到80里格（*league*）^{（10）}，并且因此把勒皮和芒德这两个地方从他的行程中排除了。不过他头脑中的地图和作为其连结点的人际关系比物理的地形重要。就跟现在一样，那个时候的国家也是一种心理结构上的存在，而不只是由明确划分的边界确定的地形学实体。

由于有《年鉴》、出版社给他的指示、推荐信和机密简报，法瓦尔热到达一个不熟悉的市镇时，就知道怎样着手为出版社开展生意。在1778年出差期间，【50】他只有一次提到缺乏内线，那是在罗什福尔（Rochefort），他不得不依赖客栈老板提供的情报。他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有关书商的人品和财富状况的传闻，而且他知道如何根据店面的外观来评价生意的好坏，这是他在前几次出差时获得的本事。例如1776年，在他进行法国全境旅行两年前，法瓦尔热发了一个关于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的书商情况的报告，透露了许多他评估生意的方法：“洛朗差得很。鲁瓦耶先生（当地一位货运代理商）告诉我，把12苏交给洛朗保管一小时他都会不放心……莱斯皮纳的大部分生意是卖旧书，但至少他店里货品还算齐全。不过看他的声望算不上是有实力的……莫迪迭不在家。我给了他儿子一份书目和销售说明书，他告诉我他家很少做生意。他和他的店看上去都不如我跟你们说的有关莱斯

皮纳的情况，而且据说他们的实力都不强。据鲁瓦耶先生说，利瓦尼有实力；至少他的店面吸引人，且存货也不错。他有个读书会（*cabinet littéraire*），生活习惯似乎也比较朴素，做生意也比较有悟性。”⁽¹¹⁾

对像法瓦尔热这样的旅行推销员来说，评估书店的技能至关重要。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去盘问客栈老板，让书商们相互扯闲话，并用行话跟经销商聊，从而判断他的经营水平有多高。他们尤其重视书籍的品种和存货在书店的陈列。一个书店陈列布置有条不紊，备有能跟上时代的新书，就表明这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客户。反之，如果书店杂乱无章，就暗示汇票到期时有可能兑付不了。例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有一位名叫叙尔（Sûre）的书商，尽管享有相当高的声望，法瓦尔热也没有给他好评，因为他的存货中新近出版的书很少，这说明销售疲软。相反，卡斯特尔的勒波蒂埃却明明白白地被评为“佳”。“他的销售似乎很火爆，因为货架上的存货备得很齐全。他看上去是个正派人（*brave homme*）……我只听到人们说他的好话。”

财富状况当然也重要，因为纳沙泰尔出版社需要知道客户有没有能力付账。不过在法瓦尔热的评估中，其他品质具有相当大的分量。一个书商应该积极向上，即工作勤奋、精力充沛、事业心强。【51】科尼亚克（Cognac）的一位名叫德利耶（Deleys）的书商就是这样：“存货选得合适，像是一个挺有干劲的（*très actif*）年轻人。”在关于阿维尼翁的布歇的报告中，法瓦尔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有事业心，很殷实的一家。”家里不得有太多的孩子。在瓦朗斯（Valence）的书商中，奥雷尔（Aurel）评级最高，但是法瓦尔热记下：“他得养一大家子人，赚得又不多。这样是很难成功的。”欧塞尔（Auxerre）的博纳尔（Pierre Bonnard）看起来更有前途，因为他没有养家的负担：“他是个单身汉，图书也选得不错，我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honnête homme*）。”

法瓦尔热在他的日志和信件中常常用“*honnête homme*”这个说法来界定诚实、正派和值得信赖的品质。他从不滥用这两个词，因为做图书贸易的人中无赖太多，尤其在像里昂和波尔多这样的大城市，他发现在那些地方欺诈和背信已成主流风气。在阿维尼翁的众多书商中，只有两位印刷商兼书商——法布尔（Fabre）和博内（Bonnet）——被评为“诚实的”，有些较小的城市如阿普特（Apt），一个都没有：“我遇到一个从阿普特来的商人，他说他的城市里唯一一个书商叫索雷，他连6铤的信用都不会给他，而要砍掉一半，因为他既不守信用，也没有能力偿还。”马赛除了有几个诚实的人外，情况更糟。尽管那里有好多家书店，

法瓦尔热还是警告说，有三家书商值不到5个苏的信用，剩下的除了五家，丝毫不值得信任。

在法瓦尔热的评估中，“可信度”（*confidence*）是一个关键词。它既表示风险较小的信用对象，还包括广泛的道德品质，如值得信赖、可靠和勤勉。纳沙泰尔出版社对客户授予和撤销可信度要经过精心计算，因为它必须判断要把价值多少的书委托给客户去销售，以及要等多久才能收到货款。大多数款项以汇票形式支付，或者以另一种期票的形式支付，期票一般应在货物运到12个月后支付。但是书商常常以各种理由推迟邮寄期票：比如说货包中折帖有毁损，运输费用过高，因交货不及时增加了销售成本，另一版本的书以较低的价格问世，等等。书商甚至能找到更多理由避免在到期日支付期票。不过，关于书商的表现的传言散布得很快，【52】因此法瓦尔热不仅搜集了有关书商财富状况的情报，还搜集了他们支付账单记录的跟踪情报。例如在欧塞尔，他警告出版社要小心该镇的两位书商（包括博纳尔，尽管他总体上为人正直），因为他获知他们的“支付能力很差”。

可信度作为一种信用评价总是有升有降的，最有实力的书商除外，他们永远不会无力承兑汇票。要是一位实力不强的书商有太多同时到期的期票，他可能就会拿不出钱来，于是就不得不中止所有支付，这是一种形式的破产，可能会毁了他并致使他坐牢。如果他头脑灵活，他也可以设法与债权人就还款时间再达成一项协议，这常常需要付出利息，但有时也可获得减免。如果成交，书商就能继续做生意，小心翼翼经营，争取把债务还清，以便重新从体系内所有其他玩家的眼中赢回一些信任。法瓦尔热必须调查这种情况。例如图卢兹的尼古拉·埃蒂安·桑斯（Nicolas-Etienne Sens），一位实力不强但声誉好的书商，似乎就从四年前发生的破产中恢复过来了。但法瓦尔热从指示中得到警告，跟这人做生意风险仍然很高，不宜向他发货，除非付现金。卡扎梅亚，蒙托邦（Montauban）的一位已经宣布破产的书商，他的前景看起来更好些。当地商人对他褒奖有加，而且其他出版商也在给他发货。是否给予他信任，法瓦尔热让上司去做决定。布卢瓦的莱尔（Lair of Blois）不及时付款的次数太多，纳沙泰尔出版社就“撤销了对他的信任，他也承认这是他活该”。不过他允诺，如果出版社继续把剩下的几卷《百科全书》和《艺术与工艺全书》发给他，他会预付现金，因为他需要把已经卖给客户的这套书补齐。

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一家出版商兼批发商只做能坚守诚信原则的

贸易，而且所有客户都值得信任。但坚守诚信原则的贸易其实并不存在；尽管人性（这是法瓦尔热在跟人聊天时最爱谈论的话题）有缺陷，纳沙泰尔出版社仍需要扩大销售。同时它自己也有账要付。纸张需要很多投入，【53】至少占大部分书籍成本的一半，而且必须在印刷、销售和销售回款很久以前就要购进。每周六，印刷厂的工头就要给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发工资，给的是硬币。不时购入的新铅字也是一笔庞大的支出，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偶然性开支，以红字“零星开支”（*menus frais*）加在账上。财务压力必然存在，缓解这个压力只有靠销售，更确切地说，靠销售所得款。

印盗版书看起来可能是一条容易致富的路径。出版社重印已经得到市场认可的书籍，而后只需把它们提供给零售商即可。但是，如我们所知，图书贸易的性质——无处不在的风险，有实力的客户分布不均，债务人遇到困难，运输安排出问题，以及法国书籍管理当局的警惕——总有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资产负债推向崩溃的危险。法瓦尔热1778年出差时，已经学会了对书店进行专业评估，但他的任务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他推销书籍和收账的能力，而当他离开隆索勒涅赶赴下一站布雷斯特地区布尔格时，这两个任务尤其艰巨。

- (1) 当然，有几篇关于个别城镇和地区的印刷与图书贸易的详细研究，其中一些很久以前就发表过，还没有过时，例如让·凯尼亚尔（Jean Quéniart），《18世纪鲁昂的印刷厂和书店》（*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à Rouen au XVIIIe siècl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以及勒内·穆利纳斯（René Moulinas），《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L'Imprimerie, la librairie et la presse à Avignon au XVIIIe siècle*），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4。更近期的研究论著，尤见让·多米尼克·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鲁昂的出版业及其市场（约1600年——约1730年）》（*L'Édition rouennaise et ses marchés [vers 1600-vers 1730]*），巴黎：École des chartes，1998；以及克洛迪娜·亚当（Claudine Adam），《18世纪图卢兹的印刷商兼书商及其产品》（*Les Imprimeurs-libraires Toulousains et leur production au XVIIIe siècle*），图卢兹：图卢兹大学出版社，2015。其他次要文献列在www. robertdarnton.org网站上。自从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论17和18世纪的通俗文化：特鲁瓦的蓝皮丛书》（*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La bibliothèque bleue de Troyes*，巴黎：Stock，1964）发表以来，关于所谓通俗书籍如历书和畅销故事书的研究就一直很活跃。有关这项工作的一个相当晚近的例子，见利斯·安德里（Lise Andries）和热纳维埃夫·博莱默（Geneviève Bollème），《蓝皮丛书：沿街叫卖的书籍》（*La Bibliothèque bleue : Littérature de colportage*），巴黎：Robert Laffont，2003。关于宗教书籍贸易的一般情况，见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一种书籍的宗教（1640—1850）》（*Une Religion des livres [1640-1850]*），巴黎：Cerf，2003。

- (2) 1764年的调查报告可以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法文卷宗22184-85查到。里面的一些片段和相关文献复制后放在了robertdarnton.org网站上，列在法瓦尔热到访问过的城镇的部分。有关这个报告和图书贸易管理的综合讨论，见蒂埃里·里戈涅（Thierry Rigogne），《在国家与市场之间：18世纪法国的书籍出版和销售》（*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Printing and Booksell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牛津：伏尔泰基金会，2007。一本集中讨论印刷厂的类似著作是简·麦克劳德（Jane McLeod）的《特许忠诚：现代早期法国的印刷商、赞助人和国家》（*Licensing Loyalty: Printers, Patrons,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11。
- (3) 在法瓦尔热进行他的法国之行的时候，“literature”（文学）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开始逐步使用。1762年的标准版《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把“littérature”定义为“学识、学说”，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用法：“C'est un homme qui a beaucoup de littérature”（他是个学识丰富的人）。但是它又补充，“更严格地说，这个词涉及纯文学。”关于“letters”的传统概念和“literature”的浪漫概念之间的区别，见阿尔文·克南（Alvin Kernan），《印刷工艺、文学与塞缪尔·约翰逊》（*Printing Technology, Letters and Samuel Johns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第7页。这个词在图书贸易中使用的另一个例子，出现在法瓦尔热于1776年7月4日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关于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贝松的报告中：“贝松只经营他自己印刷的祈祷用书。当我把书目提供给他时，他说他不经营任何著作。”
- (4) 还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清晰地了解从古腾堡时代到现在法国和欧洲其余地区的图书市场。关于法国图书贸易最好的概述仍然是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编，《法国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四卷本，巴黎：Pomodis，1983—1986。
- (5) 法瓦尔热在日志和信函中到处都提到这种分类。例如，他在关于贝济耶的报告中写道，“巴尔比去世了。布斯凯完全不值得合作。拉勒芒去马赛了。剩下的就是奥代泽内寡妇母子和莫尔比永，据说都相当好。但是我认为必须把他们归为‘一般’这个等级。”
- (6) 在1776年8月11日的信中，纳沙泰尔出版社指示当时在里昂的法瓦尔热，按照潜在客户的“实力”来调整要授予他们的信用期限。给“实力强者”12个月的付款期限，给“实力一般者”6个月，对“实力弱者”则要求立即支付。要么付现金，要么以等值的实物支付。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其资产负债表中（ms.1042），把债务人分成三类：“评级为好的债务人”“评级为不可靠的债务人”和“评级为差的债务人”。在一本1774年的人员记事本（ms.1056）上，奥斯特瓦尔德写下关于80位书商的评论，并把他们分为以数字表示的等级。1级是最守信用的。例如：“3勒弗朗索瓦……阿尔让唐；1勒鲁瓦……卡昂；2老勒梅……布鲁塞尔。”这就是法瓦尔热在评估书商的生意时所采用的分级制。
- (7) 比尔·贝尔，“‘书业先驱’：19世纪早期的旅行推销员”，见《印刷业的阶段》，第125—126页。
- (8) 见1781年版的重印版，其中有热罗姆·韦克里斯（Jerome Vercruysse）关于初版

的介绍，见安托万·佩兰（Antoine Perrin），《出版年鉴》，欧贝勒：P. M. Gason，1984。

- (9) 例如，在关于卡斯泰尔诺达里镇的报告中，法瓦尔热写道，“我在卡斯泰尔诺达里镇见到了所谓的书商阿纳和塞列，年鉴把他们都搞错了，因为阿纳是个金匠，从不卖书，塞列是个卖布的，只顺带卖些祈祷用书。”
- (10) 旧长度单位，约合3英里或4.8千米。——编者注
- (11) “法瓦尔热从第戎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6年9月4日。

第四章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推销与收账

【55】



一辆四轮马车陷在汝拉高山上的雪地里。载书的货车不像载客的四轮马车，它往往需要三四匹马甚至五匹马才能通过大雪阻塞的山路

《拉绍德封冬天的邮车》（*Le Courrier de La Chaux-de-Fonds en hiver*），韦尔奈作，印度墨水画，1864年，瑞士PTT博物馆

1778年7月，当法瓦尔热骑马走出汝拉山，踏入布雷斯绿草茵茵的牧场时，他知道自己遇到大麻烦了。外省最大的书商，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最近宣布破产——这就是说，两位合伙人雅克·罗贝尔（Jacques Robert）和皮埃尔·戈蒂埃（Pierre Gauthier），中止了所有支付，包括一张最近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货的汇票。法瓦尔热来这里的任务就是收回那笔债款，并在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可能与债主们做的任何协商中捍卫本出版社利益。可是，如果出版社在这里最重要的客户退出了生意，法瓦尔热该怎么推销它的图书呢？

当地市场看起来并不兴旺。在1764年的政府调查中，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在文化地图上就是一个小点。它有两家书商，都被认为是“讲诚信的”，他们卖的主要是法律和宗教书籍。他们从不违反图书贸易的规则。这里不流通禁书，而且全省不再有其他书商。1777年的贸易年鉴证实了

那种印象，这似乎也不奇怪。直至今今天，许多人想到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时，头脑中出现的的第一件东西是鸡——肥阉鸡和母鸡，这是当地的特产。在18世纪，鸡和谷物、马、牛一起，是其经济的主打产品。布雷斯是农耕地区，地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有一些沼泽，但是到处都有诱人的景色。它的首府布尔格只有7000名居民。当地的有产者主要是附属于司法管辖区法院的律师和官员，他们会去听音乐会，【56】看戏，从1783年起还会去参加一个研究艺术和科学的小型学会。该城保持着相当活跃的文化生活，可是似乎并没有为图书——尤其是瑞士出版社热卖的那些书籍——的销售提供肥沃土壤。

在法瓦尔热旅行途经的所有城镇中，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是唯一一个拥有能让我们了解那些经常光顾书店的顾客的档案资料的城市。当然，法瓦尔热不和顾客直接打交道。他把书卖给书商，而由于这些书商了解那里的市场行情，他也得在专业层面上进行推销谈判。他会揣着销售说明书和列有300种书籍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最新书目，走进一家书店，要求跟店主商谈。他有时会遭到冷遇，比如在阿尔勒，该城唯一的书商戈迪翁就不愿跟瑞士出版商和他们的非正统出版物打交道。在像里昂和波尔多这样的大城市，图书贸易行业的大佬们也常常会冷落他。他们的行为举止告诉他，他们太自负，不屑于花时间跟其他公司的小职员商谈。如果将一份书目塞到他们手上，他们常常会把它搁在一边，然后请他空闲时再来，但是别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来，因为这顿饭可能要吃大半个下午。普通书商往往要客气些，但是要求很高。他们要研究样书和销售说明书，检查纸张和印刷的质量，^①并且对价格特别关心。纳沙泰尔出版社设置了标准批发价，几乎每种书都是一张折帖1苏。因此，一本由20张折帖组成的八开本的书，折好切开有320页，要向书商索价20苏，即1锂。懂行的书商研究一下各个出版商的书目，就可以了解当前大多数图书的价格。实际上，如后文将要说明的，出版批发商常常会竞售相同的图书；所以价格上的微小差别会在零售商中引起选择上的巨大差异。如果一位书商认为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从另一家供应商那里买到同样的书，他就可能要么跟法瓦尔热砍价，要么干脆让他走人。

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定价是不变的，但法瓦尔热还是有很大的谈判余地，因为销售条款和价格差不多重要。如果书商按标准价格订购12册书，常常会要求另外赠送一册。有人甚至订购6册也要求白送一册。

【57】还有人试图以实物来偿付部分账单——从他自己的存货中拿出一定数量的书给出版社——并且部分货款以期票支付，尽可能延长到期日的时限。许多人坚持要出版社承担把货运到里昂的费用，甚至承担让货

物绕过里昂书商行会运输的风险。在法瓦尔热的报告以及出版社从南部书商那里收到的信件中，“免费运至里昂”（*franco Lyon*）这个词被反复提到。在西部和卢瓦尔河谷，常常要求“免费运至奥尔良”。“最有实力的”——意思是偿还能力最强的——书商砍起价来也最狠。法瓦尔热发现想和尼姆的戈德（Michel Gaude）、拉罗谢尔的帕维（Pavie）、波尔多的贝尔热雷（Guillaume Bergeret）和奥尔良的勒图尔米（Letourmy）谈拢价钱特别难。至于于泽斯的一位有实力的书商费利纳，法瓦尔热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份订单，却未能说服他在谈判中让步：“我和他谈判最不成功。这就是最终结果了。他寸步不让。”

那么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买卖呢？早在1776年的出差中，法瓦尔热就已经认识了当地的书商。其中两位，孔特和贝松（Besson），图书生意做得不够大，不值得发展关系。第三位，韦尔纳雷尔，似乎很有实力：“存货品种很齐全，据说其人行为端正，付钱爽快。”纳沙泰尔出版社最终给他发了一些货，但它主要是跟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做生意，如上文提到的，该公司是布尔格最大的书商，但却没有在官方报告中出现，甚至在《出版年鉴》中都没有提及。为了评估状况，法瓦尔热找当地提供情报的人打听，发现这两位合伙人并非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对他们评价很差。尽管他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常常未能承兑期票。据说第一位（罗贝尔）行为不端。”⁽²⁾

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历史难以查明，但该公司仍有足够多的资料保留了下来，它们散落在档案中互不相干的角落里，能让人了解该公司运作的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该公司的故事还表明，在一个偏远外省的平静首府，书籍世界可能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符合惯例。在1772到1785年间，他们的合伙关系在不同时期分分合合，修修补补。尽管他们把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作为公司总部，【58】但他们也在许多外地城镇运营——从位于布尔格西南方45英里外的贝莱（Belley），直到之外弗朗什-孔泰东北角的贝尔福。⁽³⁾在旧制度之下，有分店网点的图书生意是不应该存在的。书商只允许在一个地方经营，受最近的书商行会管辖。但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仍能在他们能够找到顾客的任何地方设店，而且发现顾客需要的各类当代书籍，其中许多是非法的。

遗憾的是，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信函很少披露他们日常的生意情况。很显然他们把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当作公司基地（他们跟这里的市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有一位姓“罗贝尔”的，是总包税所的一名雇员，这层关系很有益），并用高档商品流动商贩（*marchands fora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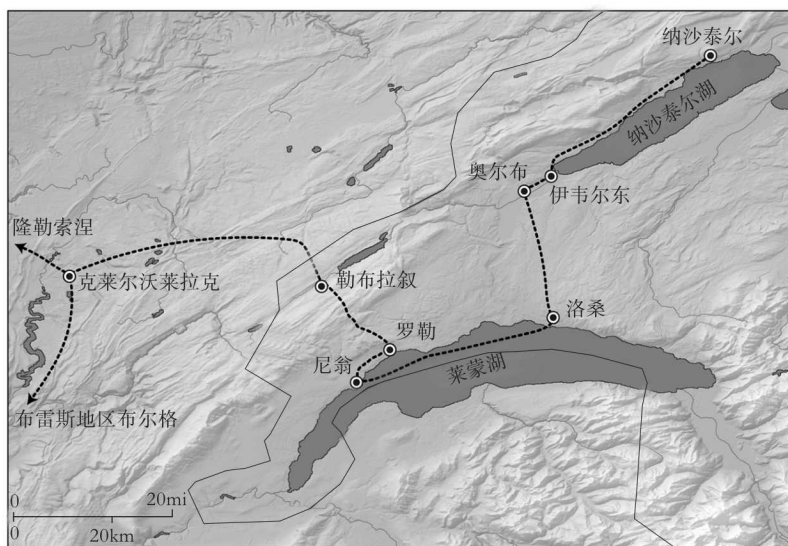
的方式，逐个城镇兜售图书。他们始终在路上奔波。他们常去弗朗什-孔泰，最远有时走到普隆比耶尔莱班（Plombières-les-Bains）（很可能是把书卖给在此泡温泉的上流社会的顾客）和斯特拉斯堡（为的是在该地举办的图书集市上做生意，那是法国东部最大的图书集市之一）。一封由雅克·罗贝尔寄自萨兰（Salins）的信中说，他一直在用货车拉着书走村串户。不过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不像流动商贩，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大到他们都应付不过来。在法瓦尔热1778年出差到达那里前不久，他们宣告破产。有关破产案裁决的文件表明，他们的存货价值55,230 锂，这些存货来自巴黎的19家批发商，以及里昂、日内瓦和纳沙泰尔的出版商。

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可以显示他们做生意的特点。第一封信，是罗贝尔1772年6月6日写自圣克洛德（Saint-Claude）的，涉及一桩地方事件，一件讼案。当地农民控告圣克洛德修道院，抱怨修道士向他们征收的领地税过重。为农民辩护的律师夏尔-加布里埃尔-弗雷德里克·克里斯坦（Charles-Gabriel-Frédéric Christin）把这件案子变成了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全面控诉，在一份由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里向公众舆论发出呼吁。小册子标题很长，叫作《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它的年谱，它的传说，它的契据，它的侵占行为，以及这片土地上居民的权利》（*Dissertation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bbaye de Saint-Claude, ses chroniques, ses légendes, ses chartes, ses usurpations, et sur les droits des habitants de cette terre*），认识克里斯坦的罗贝尔想要100本小册子；他还希望这第一笔交易能够发展成一种持久的生意关系，尤其是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将书籍安全运送过境的话。【59】他渴望订购“秘密书籍，如《中国间谍》（*L'Espion chinois*）、《女子学校》（*L'Académie des dames*）、《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Histoire de Dom B... , portier des Chartreux*）⁽⁴⁾、《梅萨丽娜：穿睡衣的修女》（*Messaline, La Religieuse en chemise*）和其他同类体裁的书”。这类书籍基本上都是色情书籍。（“色情”[pornography]这个词到19世纪才广泛传播。18世纪的书商一般用“淫秽”[scabreux]或“放纵”[libre]这些词来指称色情文学。）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印这类书，但是它能通过用自己出版的书和其他出版商交换来为他弄到这些书。很快，出版社与罗贝尔通信，讨论如何才能把这些小册子和其他各类书籍运给他。

罗贝尔建议采取“保险”系统的方式，也就是后来纳沙泰尔出版社跟蓬塔利耶的费弗尔做生意时所采取的方式，而且他找到了做这件事的合

适人选：在克莱尔沃莱拉克经营的老吉永（Guillon l'aîné）。克莱尔沃莱拉克是汝拉山上的一个村庄，在法国边境一侧，离日内瓦很近。

【60】⁽⁵⁾吉永能够雇到农民把书背到他在克莱尔沃的仓库，然后重新包装成国内货物，再转运到法国的目的地。罗贝尔写道，一旦确认这条供应路线是安全的，他们就可以做大批生意了。他已经发出了第二份订单，并要求出版社另外补充大量“哲学书籍和低俗小说”。其中包括12册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著作《自然的体系》，12册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乌托邦小说《2440年》和6册毁谤性书籍《身披甲冑的报人，或法国宫廷丑闻录》（*Le Gazetier cuirassé, ou anecdotes scandaleuses de la cour de France*）。



吉永在瑞法边境上经营的“保险”系统的路线

哈佛大学图书馆制图部，斯科特·沃克绘

第一批货物安全运到。罗贝尔订购了更多的书，“哲学书籍”较少，多是法律书籍，但是盗版的。他支付了货款，甚至还提议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从他在隆勒索涅的仓库运到索恩河畔沙隆。但是1773年，吉永的生意出了问题。他的通信联络遇到问题（信件得不到答复，货物送错地方），一支边境巡逻队逮住了一队偷运者，圣克洛德的主教还威胁把这些人送去当划船的苦工。直到1774年9月，罗贝尔才恢复订货。那时出版社已经开辟了经由里昂的运货路线，而且罗贝尔利用总包税所在边境巡逻的雇员，也可以获得从日内瓦郊区的小村庄梅兰（Meyrin）偷运的小货包。在其客户想要的各类书籍中，他注意到一本真实性可疑的

《路易十五回忆录》（*Mémoires de Louis XV*），那是谈论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种种丑闻的书，而当时这位国王去世才四个月：“马上发6册过来。”

随后三年，订货和运货继续进行，其间偶尔发生图书贸易中常见的纷争，如到货迟，折帖毁损，对账单中的借方以及支付方式的安排意见不一致之类。尽管有这些抱怨，双方关系似乎还很融洽。罗贝尔，还有戈蒂埃，经常在贝尔福经营，出差到纳沙泰尔就停下来，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贝尔福和隆勒索涅以及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为他们提供稳定的货源，直到1778年法瓦尔热访问时他们的生意破产为止。

纳沙泰尔出版社在1777年11月27日写给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信中首先表明，它为他们遇到的严重麻烦而担忧，抱怨对早前的信件没有回复，有份订单也没有付款。随后就是几个月的沉寂。然后，在1778年3月，【61】出版社得知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中止了他们的所有支付。1778年6月23日，罗贝尔向巴黎的商事法院（*Juges et consuls*）呈交了一份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出版社及其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聘用的律师看来，这个诉讼程序似乎非常不合法，因为该公司的所在地是布尔格。^⑥当律师威胁把该公司诉至当地的司法管辖区法庭时，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试图向出版社让步，提议偿还他们所欠的全部款项，但是要延期四年，而且不付利息。这不能接受，出版社回答道，没有利息就等于减掉五分之一的债务（四年期每年5%的利息）。面对布尔格的律师持续不断的压力，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最终还是全部付清了欠款。债务总额只有311锂，而且在布尔格办的这个案子只是主案件的一个附属，而主案件最终是在巴黎收场的。

1778年6月29日，巴黎的法院审理了债权人控诉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案子。虽然在留存下来的文件中没看到最终的裁决，但是它大概跟大多数破产案的裁决差不多——债权人很可能同意减免一部分债务，并按照一个长期的偿付计划来收剩余的债款，这个计划能让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继续做生意。幸好文件中包含了一份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让我们对这家外省书商的生意进行非常详细的观察。^⑦从这份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生意规模相当大。他们的债务达到58,618锂，资产达到70,905锂。资产负债情况看上去很不错，足能让债权人接受延期兑付尚未承兑的汇票，不必强迫该公司甩卖一切资产，并放弃他们的生意。资产包括该公司的图书存货，估价为55,230锂，以及客户欠款有15,675锂——这算不上一笔稳定的资产，因为未

收的债务常常就一直欠着了。

资产负债表的债务侧表明，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从19家巴黎出版商进货。这些出版商很多都是图书贸易中最重要的人物，如德赞、埃第安娜、赛扬、穆塔尔、纳庞、庞库克和迪多。剩下的货源是里昂的三家批发商和三家瑞士出版商：日内瓦的克拉默（Gabriel Cramer）和让-萨米埃尔·卡耶（Jean-Samuel Cailier），以及纳沙泰尔的萨米埃尔·福什（Samuel Fauche）。（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出现在债权人名单中，因为它的债务已在布尔格偿清。）巴黎债权人众多，可以解释为什么案子要在巴黎审理，【62】据说罗贝尔在巴黎圣日耳曼德佩福塞街还拥有住宅。不过最大额的欠款是欠里昂和瑞士的供应商的，该公司的大部分存货很可能就是他们提供的。

如资产负债表所示，图书存货有40多种——没有一种是非法书籍，大概是因为那种书籍在半公开的诉讼中不宜被提及。这份清单似乎不是该公司库房中所有存货的清单，因为它只提到有大量存货的书籍，通常在一百本以上。它很可能排除了临时购进的各类书籍以及“哲学书籍”。但是它显示出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所销售的图书种类的概貌。它们涵盖的领域很广：

文学和纯文学.....	9种
历史.....	7种
宗教.....	6种
法律.....	3种
科学和数学.....	3种
医学.....	2种
杂类.....	10种

大部分是严肃正经的多卷本书籍，如《法国法律准则》（*Maximes du droit français*，六卷本，估价12铤一套）、《罗林先生的简明古代史》（*Abrégé de l'histoire ancienne de Monsieur Rollin*，五卷本，估价10铤）和《法国戏剧集》（*Théâtre français*，十四卷本选集，估价48铤）。通俗图书不多，文学类书籍包括几套巨著：六卷本的莫里哀著作、十二卷本的卢梭著作，以及大众剧作家亚历克西·皮隆（Alexis Piron）的七卷本著作。

该公司的欠款人名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解零售商的

主顾都是些什么人。有33个名字在列。其中12人是书商，大多是小零售商，如蓬塔利耶的费弗尔和萨兰莱班的孔西代朗。其余是一些读者，都是在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流动兜售所到之处买书的人。例如“勒戈先生，隆勒索涅的律师”“雅凯先生，特雷武的检察官”“科利尼的帕里埃神父先生”“沃谢先生，蓬勒索涅的医生”和“莫罗先生，马孔镇议员”。【63】在他们的名字下面没有标注地址的一些人，很可能是布尔格的顾客。他们可以根据职业领域来辨识，分为以下几类：

法律.....	3人
宗教.....	2人
军官.....	3人
医药.....	2人
贸易（商人）.....	4人
行政官员.....	1人
“有产者”.....	1人

统计数字太小，无法据之得出普遍结论，但这些数字能给人们启发；而且值得人们去思索，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书籍传播的难得的机会，从中既可以看到书籍是怎样从出版商兼批发商向书商流转的，又可以看到书籍是怎样从书商手里分销出去的。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大部分顾客来自外省社会的中间阶层。军官很可能属于贵族，正如那位唯一欠了巨额债务的人，“维埃纳侯爵，军官.....1120锂”。其余的人属于一个混杂的精英阶层，在19世纪可以归为“显贵”一类。没有手工业者和工人。

1778年7月11日，当法瓦尔热到达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时，这个案子正在巴黎裁决。出版社指示他仔细注意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生意情况，但是他难以获得情报。他们的办公室除了一位职员外，没有其他人在，而这位职员不愿披露他们库存书籍的任何情况，甚至不愿给法瓦尔热一份他们的最新书目，只是提供了一份他们想用来抵债的10种书籍的清单。法瓦尔热拒绝这个交易。他也未能从当地商人口中打听到多少传言，就如他在信里所写的，“因为这里一切都被掩盖得严严实实”。他只听说，尽管中止了付款，该公司的生意总的来说还不坏。罗贝尔去巴黎和债权人谈判还债条款了，据说要么在延期四年之后全额支付，没有利息，要么就从公司存货中拿出书来赔偿。

破产法院的诉讼记录虽然没有写出确切的裁决条款，但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生意在1781年春天以前恢复得很好，【6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有他们之后寄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寄自贝尔福，有的寄自布尔格。该公司这两个分部的合作似乎不太紧密。1781年5月，在贝尔福的戈蒂埃要50册《路易十五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6月，在布尔格的罗贝尔抱怨说，同样的书他老早就订了，可是货到得太迟，结果很难卖。由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未能及时运到，他只好从别的供应商那里要了一些，卖了将近150册。随后三年，类似的信件——订单中夹杂着关于货运状况的投诉和评论——继续寄来。在谈论市场需求时，罗贝尔（信通常寄自布尔格）和戈蒂埃（信通常寄自贝尔福）都对《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Compte rendu au roi*）特别感兴趣，这是雅克·内克于1781年发表的为他作为财政总监所实施的政策的辩护，大量论战性的小册子也应运而生（见本书第十二章）。他们还对卢梭的著作特别感兴趣。戈蒂埃解释说，卢梭的著作是卖给他在贝尔福要塞的顾客的：“我们急需这些卢梭著作。这是给下个月就要调防（到另外一个要塞）的军官们的。”不过，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与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恢复大规模的生意。它曾经上过该公司的当，不怎么敢信任他们了。1784年9月，它拒签了一份大订单，之后就再没给他们发过货。

从推销和收账的观点看，法瓦尔热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逗留也许不算成功。但是，从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来看，他所收集到的情报揭示了很多有关外省城镇图书贸易的情况。而且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来信包含了大量订单，足以显示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生意的大致情况。^{（8）}

从这些订单可以看出，需求量最大的是克里斯坦的《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因为这本书和当地公众密切相关，它在法国其他地方就不畅销。内克的《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路易十五的私生活》，以及卢梭著作，在订购量极大的书籍中名列前茅。订单中没有出现的书籍，至少订数不多的书籍，是头几封信里提到的那种淫秽的“秘密书籍”。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也许储存了大量这类书籍，但很可能是从一些专门从事地下出版的人那里弄到的，这些人中有日内瓦的让·萨米埃尔·卡耶和纳沙泰尔的萨米埃尔·福什，他们是那个破产案的资产负债表里提到的一些有待偿还的大债主。【65】除了《路易十五的私生活》，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订购的畅销书中其他受到禁止的书籍都与启蒙运动有关，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马蒙泰尔（Marmontel）的哲学小说《贝利萨留》（*Bélisaire*），还有梅西耶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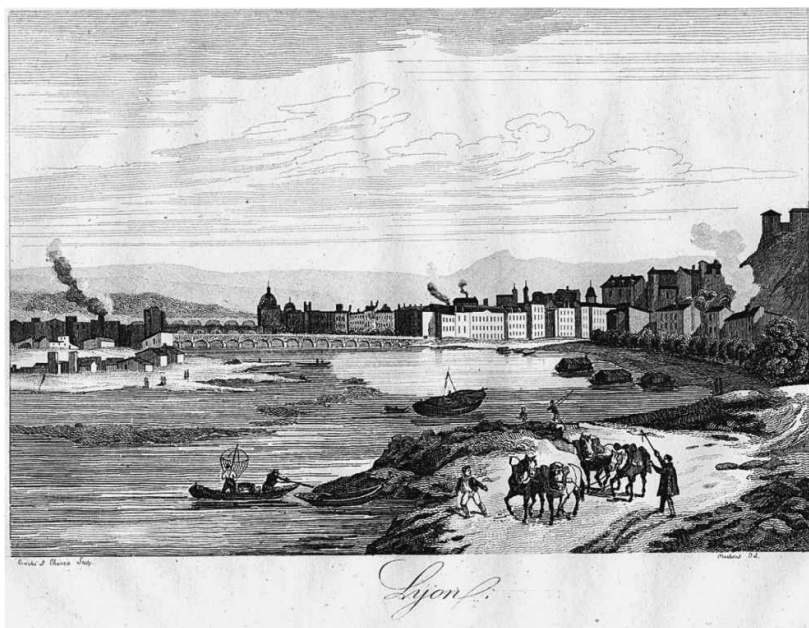
Paris），这是一部关于首都生活的充满卢梭式评论的随笔集。但是，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主要不是经营非法书籍。他们偏爱游记类书籍，如约翰·卢卡斯·尼坎普（Johan Lukas Niecamp）的《东印度群岛游记》（*Voyages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马丁·夏洛克（Martin Sherlock）的《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信笺》（*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和一些纯文学著作，如安托万-莱奥纳尔·托马（Antoine-Léonard Thomas）的《论不同世纪妇女的性格、道德观念和才智》（*Essai sur le caractère, le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雅克·德利尔（Jacques Delille）的《花园》（*Les Jardins*），以及一些儿童文学书籍，如让利斯伯爵夫人C.-S.-F.迪克雷斯特（C.-S.-F. Ducrest, comtesse de Genlis）的《美德年鉴，或供青少年使用的历史课本》（*Annales de la vertu, ou cours d'histoi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他们遵循一种普遍采用的策略，即订购的图书品种很多，但每种图书的订购数量很少，因为他们要使库存量与顾客的需求达到平衡。他们解释说，“我们能卖多少就订多少。”

法瓦尔热在余下的旅程中逐渐得知，这是外省书商们的典型经营策略。在行程的最初几个小镇，他为推销出版社的货物做了最大的努力。下一站是里昂，那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出版中心，他在那里将面对另外一系列任务。

- (1) 法瓦尔热报告说，尼姆的戈德父子公司“对我们出版的书所具有的品位、校对质量、一般样式都非常喜欢”。
- (2) “法瓦尔热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6年9月4日。韦尔纳雷尔和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在1764年的调查报告中都没有被提到。
- (3) 该公司的信件散见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五套卷宗中。由于信件中未提到合伙人的名字，因此难以确认他们的身份；不过在同时期，合伙人包括了雅克·罗贝尔和很可能是他兄弟的一个人，包括皮埃尔·戈蒂埃和他的一个兄弟，韦尔纳雷尔也是合伙人之一，1773年脱离该公司出来单干。在1773年7月3日的一封信中，韦尔纳雷尔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我与罗贝尔先生和戈蒂埃先生解除了合伙关系……罗贝尔先生和戈蒂埃先生不在布尔格了。罗贝尔先生在隆勒索涅，戈蒂埃先生在比热地区的贝莱”。1781年的《出版年鉴》把韦尔纳雷尔列在布尔格，把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列在贝莱，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地点。事实上，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的大部分生意继续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进行，同时又从许多地方订购书籍。贝尔福分部还经营纸张生意。1784年，公司把价值3000锂的存货图书卖给了安德烈·富尔（André Faure），此人身份既是该公司的职员，又是“股东”；而作为独立的书商，他至少经营到1788年（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拥有独立的卷宗）。关于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的详细讨论和从出版社档案中挑选出的文献，见 robertdarnton.org 网站有关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部分。

- (4) B是Bougre的缩写，意思是鸡奸者。——译者注
- (5) 有关吉永的业务详细讨论和文献，见robertdarnton.org网站的“中间商和偷运者”部分。
- (6)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司法执行官法庭的检察官雷德莱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7月31日。
- (7) 塞纳省档案馆，现在的巴黎省档案馆，破产案全宗，D.4B6。
- (8) 每种书和每份订单的全套统计数据可在robertdarnton.org网站上查询。

第五章 里昂：企业家与冒险家【67】



里昂，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Nouveau voyage pittoresque de la France*），巴黎，1817（汝拉省图书馆，以下简称BiCJ）

在小心翼翼地跨进里昂的书店以前，法瓦尔热仔细研读了出版社的董事们写在日志上的指示。他知道，他将不得不和出版业界一些最难讲话的客户谈判。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自中世纪以来就是重要的图书贸易中心，【68】里昂拥有大量以铅印文字为生的人——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装订商、铸字商、纸品商、货运代理商、走私者，和形形色色的投机商。大大小小的阴谋一直在这些企业家当中酝酿翻滚，而在1778年，有几场阴谋眼看就要浮出水面来了。

里昂图书贸易的突出特征是盗印。^①瑞士出版商就是想以这个城市为集散地，把廉价盗版书输往法国各地的市场。自16世纪早期起，书籍就通过日内瓦到里昂的主要道路涌入，而到18世纪，随着洛桑、伊韦尔东和纳沙泰尔等地的新出版社出现，里昂的图书流入量大大增加。伯尔尼和巴塞尔的出版商通常集中在北部通道上，而如前所述，纳沙泰尔出版社还试图通过贝赞松和第戎开辟通向巴黎的路径。但里昂依然是其通向法国市场最重要的出口。里昂不仅有非常便利的水陆交通，而且拥有

专业的经纪人，他们能让贸易，尤其是盗版书籍的贸易，变得更加便捷。

17世纪末巴黎书商行会在出版业确立了自己实质上的垄断地位，盗版贸易随之繁荣起来。⁽²⁾巴黎出版商在路易十四王朝中央集权政策的支持下，买断了大部分图书的专卖权，与国家合作监管图书贸易，致使外省的印刷业急剧萎缩，最后只能做当地的应时印刷品生意，而巴黎出版商还通过零售客户网络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市场。外省出版商无法和巴黎出版商竞争，只好去做盗版书贸易，而那些盗版书，有一些是他们自己印制的，但更多的进口自国外。到1750年，法国外省图书市场已经充斥着廉价的盗版书，而里昂的书商也和瑞士出版商结成了一张联合经营的网络。

在1777年8月30日发布的一系列法令中，国家试图改革图书贸易的规章制度（关键的政令要追溯到1618、1643、1686和1723年）。⁽³⁾改革通过限制巴黎出版商的垄断特权，使天平稍微朝外省书商倾斜，但最重要的是，它宣布了摧毁盗版书贸易的措施。政府承认，盗版书传播太广，以致许多书商的存货主要是由盗版书组成。如果没收所有盗版书，【69】就算可以做到，也必然会摧毁大量的生意，因此政府宽限了一段时间，让书商们清点持有的盗版书数量，并在离得最近的书商行会给图书打上标记，把它们合法化，再拿去卖。在限定的日期——这日期因地而异——过后，所有没有打上标记的盗版书都将被查缴没收。新的书商行会要和老的行会一起发起全国性行动，彻底消灭盗版。1777年法令能否有效实施在当时仍是个未知数，不仅是因为国家常常未能完成自己的改革目标，还因为图书贸易管理当局已被全国各地的抗议声浪淹没了。法瓦尔热此次出差的一个目的，就是评估新措施的实施效果，而这意味着要摸清里昂市场的脉搏。

里昂的合法市场被几个自己印制书籍的富裕出版商把持着，享受着特权的适当保护。但是，里昂的大多数书商都是靠盗版书过日子的，而且其中许多人还经营“哲学书籍”。他们之间存在着残酷竞争，组成的联盟时分时合，不断采取新策略来适应变化的处境因为他们必须应付经济的转型（里昂是重要的议付汇票中心），以及政府时常发布的法令。里昂书商在内斗的同时，也常常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外敌，即由凡尔赛宫改革者支持的巴黎书商行会。⁽⁴⁾

不过，旧制度下的出版史不能归结为巴黎书商与外省书商的相互对抗，或者是合法图书与盗版图书的冲突。书商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有些巴黎经销商也偷偷从低地国家和瑞士订购非法书籍。有些外省出版商自己印制盗版书，以低于外国供应商的价格出售。旧的联盟和阵营时常分崩离析，然后又聚集成新的联盟和阵营。里昂书商尤其狡猾，因而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角度，决不可对他们掉以轻心。

出版社的董事们通过做生意，也通过访问他们的书店，与里昂的书商打过多年交道。1773年，董事让·埃利·贝特朗在为一次商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对这些书商的特点分别做了简要描述，并写进了一个和法瓦尔热的旅行日志非常相似的本子。【70】⁽⁵⁾有的书商高深莫测，如J. M. 布里塞（J. M. Bruysset），是个“待人冷漠又狡诈的人”。有的高傲自大，“佩里斯兄弟（Périsse frères），机灵，有文人般的自负”。有几位怀有敌意，“布里塞-蓬蒂斯（Pierre Bruysset-Ponthus）是最不可能跟我们做生意的。”大多数书商都很尖刻，但是有一两位对打理自己的生意漫不经心，如贝尔纳·弗朗丹（Bernard Flandin），“你必须紧盯着他，他懒得出奇”。他们可能会摆架子，如让·马利·巴雷（Jean-Marrie Barret），“我觉得他讨厌我们”；要么他们会煞有介事地装大人物，如塞利耶（Cellier），“他除了租借我们的图书假扮书商外，啥也不是”。许多人不可信赖，也不能提供消息，如克洛德·马利·雅克诺（Claude-Marie Jacquenod）父子，“拜访一下他们就行了，别深谈”，贝特朗继续发出劝告。他们不讲诚信，常隐瞒他们生意的实情，还会像弗夫·雷吉亚（Veuve Réguillat）父子那样通过筹划破产来勾销债务，“什么也别跟他们说，除了布瓦·德拉图尔（Boy de la Tour）先生建议做的事”。德拉图尔是一位里昂商人，在1771年雷吉亚破产案的裁决中代表纳沙泰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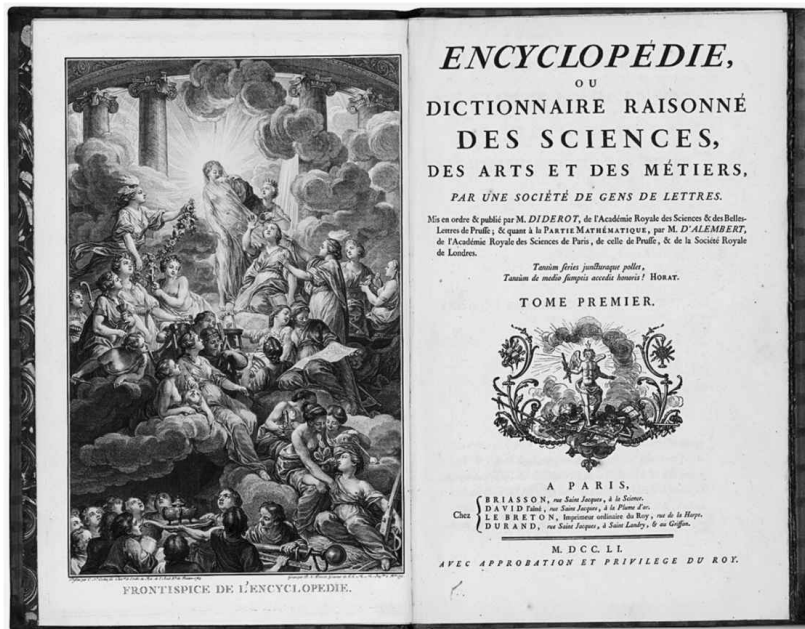
法瓦尔热在启程出差之前，反复阅读了出版社董事们记在他日志开头的指示。他在里昂收到他们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强调了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任何拜访之前，先要仔细重温一下涉及里昂的注意事项，这样在商谈时，对付他们就能胸有成竹，在所有事务上都要花费必要的充足时间。”指示还为法瓦尔热如何针对一个个书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⁶⁾

法瓦尔热的任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有关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四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中所占份额的谈判，一是做好通过里昂书商行会偷运图书的安排。

最棘手的任务涉及《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和组织这个投机生意的里昂书商约瑟夫·迪普兰（Joseph Duplain）。⁽⁷⁾本书第二章提到过，纳

沙泰尔出版社当时已经在和巴黎有实力的出版商夏尔·约瑟夫·庞库克合伙重印《百科全书》。庞库克买下了原版书的图集，这在他看来也就是买下了《百科全书》的版权。到此时，1750年代由《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丑闻已经平息，庞库克也已说服法国政府允许出新版。【71】但是，迪普兰这个鲁莽又无耻的企业主印制了粗劣的盗版并投向市场，从而击败了庞库克。最终，这一版本还发展成拥有36卷正文和3卷图集的四开版。起先，庞库克打算动员他在政府里的保护人下令清除法国市场上的四开版《百科全书》。可是这个版本卖得太好了，于是庞库克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最后决定不跟迪普兰斗争了，而是和他联合出版。

1777到1780年间，四开版《百科全书》如出版商所说出了三种“版本”（edition），但是他们所说的“版本”不符合现代书目学术语，现代术语要区分版本和“版前稿本”（states）。迪普兰开始印了4000套（实际是4400套，即每张折帖印8令16刀纸，因为要多印额外的折帖，以备弥补有缺陷或毁损的折帖之需）。随着订单雪片似飞来，他又把印数增加到6000套（实际是6150套，但是出版商们在信函中都采用约整数），并且重印了原版印数已经完成的折帖：所以在他的表述和印刷合同中就有了“两版”之说。【72】即使这样，大额订单仍在增加。因此，迪普兰、庞库克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达成共识，印刷“第三版”2000套（实际上每张折帖印4令15刀纸，即2375套）。最后，在考虑了损耗后，四开版的联合印制共达到8011整套。从盗版投机买卖开始的四开版《百科全书》，就变成了一项高达百万量级的巨大项目——它的赞助商们认为这是出版史上最赚钱的项目。



BPUN：《百科全书》扉页

对《百科全书》的需求依然非常强劲，以致里昂的两家书商，让-马利·巴雷和约瑟夫-叙尔皮斯·格拉比（Joseph-Sulpice Grabit），也仿效迪普兰，在1778年初翻印了他的盗版。为了证明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以一次2000套的印量印了6张折帖（48页四开本），并且告诉迪普兰，若要他们住手，需花27,000锂买断。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相当于一个印刷工一生的工资，但是经过非常痛苦的内心斗争，迪普兰同意支付这笔钱。三个盗印者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巴雷和格拉比交出了印好的折帖，迪普兰支付了勒索赎金。这是一个离奇的歪招，即便依照里昂书商的道德准则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庞库克后来所说（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作为迪普兰的合伙人，不得不对他们的生产能力大加赞赏）：“如果你无法打败盗印者，最好的策略就是跟他们达成交易。”

与此同时，洛桑和伯尔尼的两个盗印出版商也发起了一场类似的攻击。他们试图以八开的版式翻印四开版正文来突袭法国市场——这属于盗印盗版书，尽管庞库克继续拥有对原版《百科全书》的权利，因而对四开版《百科全书》也拥有一定的合法权利，但是法国政府是公开容许盗印的。在法瓦尔热出差法国之时，一场《百科全书》之战就在印制四开版和印制八开版的两组出版商之间爆发。他推销四开版的订阅，并在所到之处尽其所能阻挠八开版的销售。在第一站蓬塔利耶，他发现了八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商怎样越境偷运货物。如上所述，这个情报至

关重要，因为庞库克一获得这个情报，便向法国当局报警，致使大量货包被没收，八开版《百科全书》无利可图，而法国读者订阅它的热情也被浇灭了。1779年，八开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从法国市场撤退，【73】靠满足欧洲其他地方对廉价《百科全书》的需求生存了下来，最终在1780年1月通过签订一份协议，与四开版的出版联盟握手言和。

庞库克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抗击外部对手的同时，也特别担心联盟内部有人背叛，因为迪普兰的活动看上去越来越可疑了。他经营着整个项目，掌握着大部分秘密，拒绝报告他的详细账目。合伙人们开始搜集情报，要查证他们是不是正在遭受一场巨大的骗局。经过大量侦查工作，并经历了一连串纠纷，他们获得了证据，证明迪普兰至少贪污了48,000铊。1780年1月，在里昂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向他亮出了证据，这次会议变成了最后的清算。迪普兰百般抵赖，最终还是屈服了，同意给予全额补偿。整个事件并没有被公之于众，一直埋藏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里，直到近两个世纪才被曝光。

然而1778年7月，当法瓦尔热拜访迪普兰时，四开版《百科全书》投机生意的结局还无法预料。那时候，阴谋和对阴谋的反击还没有酿成危机，但是很明显，在《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中，每次风波的发生都会让大量财富濒临险境。法瓦尔热作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关注了整个事件，因为他深知必须对迪普兰的不老实保持警惕；同时还得集中精力关注本出版社的当务之急——获得更大份额的印刷业务。为了大规模生产《百科全书》，它已经把印刷厂的产能扩大了一倍，还雇了20名新工人，但是迪普兰把印刷业务分派给了日内瓦、格勒诺布尔、特雷武和里昂的印刷厂，它们共有53台印刷机的生产能力。按照他和其他出版四开版《百科全书》的合伙人订的合同，他要利用订阅费收入把印刷业务按照规定的费用比率分包出去。迪普兰把这些费用比率跟他实际付给印刷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额当作回扣私吞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不愿接受这么低的回报，因此迪普兰也就没有把大量印刷业务分包给它。法瓦尔热抵达里昂时，迪普兰只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三卷内容用于印刷，而且第三卷都已经印完了。如果迪普兰不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多印刷一卷的话（他很可能是想从回扣中获利），【74】出版社就得解雇工人，并且让它的仓库白白堆放花了很多钱买来的准备用于印刷的纸张。

纳沙泰尔出版社为贮存这些纸张支付了费用，指望在把印完的书交付里昂后，用所得收益来回笼资金。可是迪普兰在信中竟暗示，他要拒绝承兑他已经发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汇票，这张汇票是用来支付出版社

印刷前两卷《百科全书》的费用的，将在第三卷快印完的时候到期。作为拒绝承兑的借口，他指责纳沙泰尔出版社用纸质量差，交货也不及时。他在每一个环节都肆意刁难、讨价还价，由于三卷中每一卷都有这样的情况，结果36卷的“特别版”就增加了削减成本和完全投机

（outright speculation）的机会。法瓦尔热不能阻止迪普兰牟取暴利。他只是一个职员，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合伙人，也不是四开版《百科全书》出版联盟的成员；但是他能帮助雇主找到方法来止损和增加利润。

按照日志上的指示，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收集有关四开版《百科全书》项目总体状况的情报。因为迪普兰守口如瓶，不透露一点秘密，纳沙泰尔出版社对这个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了解甚少。“拜访迪普兰先生，弄清楚四开版《百科全书》印刷业务的目前状况；里昂和其他地方有多少印刷机在印；如果已经开始印第三版，印数是多少。了解情况时不要显得太急切。”日志上的指示就是这样行文的，不厌其详。法瓦尔热要聚精会神地聆听迪普兰所说的每句话，却又不得表露出纳沙泰尔出版社非常想多印几卷的意图。但是他应当辩明，本出版社印刷质量优良、用纸合宜、校对细心，同时还要强调本出版社扩大业务份额的一般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还专门为印刷《百科全书》扩建了印刷厂。

法瓦尔热准备投入战斗了。他在专门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与迪普兰之间往来账目的雅克-弗朗索瓦·达纳尔的陪同下，走进迪普兰的总部。之前就对《百科全书》出版事务做足了功课的达纳尔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当然，法瓦尔热也从给他的那些指示中，外加借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商业信函，对此事作过详细了解。他碰巧读到过迪普兰的一些充满敌意的信函，而且发现公司收到的所有信函都不曾有过他那样恶毒的语调。【75】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受到了迪普兰的热情接待。迪普兰表现得十分亲切。他称赞纳沙泰尔出版社最近的印刷质量很高，还突然主动提出要它多印一卷，印数可增至6000册。更有甚者，他还说他会把刚刚开始印制的第三版《百科全书》中的三卷派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去印。他甚至宣布，他要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名义把这一版推向市场，仿佛他们就是这一版的出版商。（前两个“版本”以日内瓦的让-莱奥纳尔·佩雷 [Jean-Léonard Pellet] 的名义出版，而迪普兰则藏在书名页上的假地址后面。）迪普兰希望靠这个花招来促销，因为有流言说，佩雷版错误百出，纸张质量也不好。

法瓦尔热不知道，迪普兰这出人意料的举动有两个更深层的原因。首先，他在计算四开版《百科全书》的卷数上犯了灾难性错误。印刷厂的一位工头向他保证，原本对开版的17卷正文，加上4卷对开版《补编》（在1776年和1777年出版的单独的项目），可以翻印成29卷四开版。实际上，这些内容要36卷才勉强容纳。按照订阅条款，每套书迪普兰（藏在表面上作为出版人的佩雷身后）只要负担344锂的费用，即29卷正文每卷10锂，3卷图集每卷18锂。依照每卷10锂的标准，增加7卷正文就要使每套的价格提高到414锂，可是迪普兰不能突破与订户签的合同所规定的限价。最终迪普兰靠耍花招化解了这个问题，他让订户负担增加的7卷中4卷的费用，却不作任何解释。这样，在第三版的销售说明书中，他宣布纳沙泰尔出版社将提供总价为384锂的36卷本，价格与前两个“版本”相同。这样一来，通过更换名义上的出版商，他就进一步撇清了责任。

其次，迪普兰的现金流转遇到了严重问题。他委托出去的印刷业务太多，因此往往印刷完毕的书到了，而订户应交的钱还没到。大部分订金是由以零售价卖给顾客的书商收取的。但书商收取应得款项需要时间，而且他们收到款后也不急于把它们付给迪普兰。所以他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兑付作为报酬付给印刷厂的汇票。【76】他已经向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出了支付前两个“版本”的第六卷和第十五卷总计2019锂的印刷费用的期票，可是他又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在到期日兑付。他还缺乏现金支付他派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的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的印刷费用，而这一卷马上就要印完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来说服纳沙泰尔出版社接受延缓兑付：他将多分派一些卷——包括前两个“版本”的第三十五卷和计划印制的第三版的其中几卷——来让它印刷，而且第三版还将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最后这个高调许诺是整个理由的精妙之处）。

迪普兰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往来信件中已经就这种安排达成了协议，而此时法瓦尔热正在骑马前往里昂的途中。所以在他出现在迪普兰的店里之前，一切都已经谈妥。当迪普兰通知他增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印刷业务份额，并提出把该出版社的名号印上第三个“特别版”的假封面这个诱人的条件时，法瓦尔热就明白了自己受到出乎意料的热情接待的原因。迪普兰没有能力承兑那张未兑付的汇票，而这个额外增加的印刷业务将作为对延期兑付的补偿。这个让步条件看似十分合理，因为迪普兰坦白地承认，他在里昂印刷一卷就能赚到1500锂的利润。再者，他还有理由证明，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像别的出版商，它是本项目的合作伙

伴，理应分担为应付生产急需做出支付上的调整时所产生的负担。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可以依赖达纳尔的支持，他能够在他的投资组合中安排汇票来把迪普兰债务的延期偿付包括进去。毕竟，达纳尔作为博塞的女婿，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是有家族关联的。

因此，与法瓦尔热预料的相反，他和这个后来在《百科全书》出版的故事中变成了大恶棍的人相处融洽。迪普兰让他确信，他已经消除了巴雷和格拉比盗印四开版的威胁，而法瓦尔热则告诉迪普兰，他发现洛桑和伯尔尼的盗印者已经把他们的八开版《百科全书》偷运到了法国。迪普兰听到这个消息似乎很高兴。“我们得赶快行动，”他喊道，“我来查他们的案子，当他们发现自己成了政府的通缉对象时，他们就要傻眼啦。”法瓦尔热在发回纳沙泰尔的报告中，承认他对迪普兰管理此项目的账目感到放心。【77】不过他向出版社本部的上司保证，他没有违背他们的指示：“感谢上帝，每件事我都是按你们的指示去做的，要是你们跟他待的时间和我跟他待的一样久，就会发现这事不容易。”

接下来的一周，法瓦尔热继续每天和迪普兰商讨《百科全书》事务。迪普兰印了一份关于第三版的销售说明书和一封通知函，请书商们为它募集订户。在法瓦尔热看来，两篇文本都可以接受， he 把它们寄回出版社，过后不久批准函就到了。销售说明书上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第三版的内容看上去尤其有吸引力，而且它强化了法瓦尔热作为《百科全书》推销员的作用。他把它的副本，连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以及该社出版的《圣经》和《艺术与工艺全书》的销售说明书，放进马背上的行囊中，在随后四个月里每到一处都要向人分发。不过，在重新踏上旅途之前，他在里昂还有更多的事务要办理。

法瓦尔热的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和书商聊行话来吸引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就盗印的最佳前景向出版社提出建议。盗印什么书最有赚头呢？纳沙泰尔出版社像靠近法国边境的其他十多家出版商一样，每天都面临这个问题。董事们只有依靠他们的直觉和从商业信函中收集来的情报，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销售代表则可以通过与书商们聊天时捕捉到的一些信息来补充这种情报。法瓦尔热获得的众多建议中的第一个，来自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韦尔纳雷尔。他鼓励纳沙泰尔出版社翻印刚刚在巴黎问世的书籍，《宾夕法尼亚法律和宪法，译自英文，并献给富兰克林博士》（*Les Lois et constitutions de Pennsylvanie, traduit de l'anglais et dédié au docteur Franklin*），它有可能吸引那些着迷于两年前在美国爆发的革命的读者。韦尔纳雷尔向法瓦尔热保证，该书的新版本一定会

畅销。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愿意印一版，他答应预付一份大订单，购买50册，甚至还提议由他来提供原版书。他从原版出版商那里订购了6册，可以寄一册给他们。在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本部后，法瓦尔热继续在随后的旅途中从书商们那里打探，里昂没人听到过这本书，也没人表露出丝毫兴趣。法瓦尔热到达格勒诺布尔时，【78】他发现该市最重要的书商布雷特的店里就摆着几册，但是卖不动。布雷特对它的质量评价不好：“它就是一个法律大杂烩而已。”直到到达马赛，法瓦尔热才再次听到有关《宾夕法尼亚法律和宪法》的情况。在那里，书商们对它的反映也是负面的，于是这项计划最终作罢。

里昂是搜集这类情报的最佳地点，可是法瓦尔热发现书商们都三缄其口。他们自己都在大量盗印书籍，而且1778年夏天，他们都对四开版《百科全书》的销量眼红。尽管如此，法瓦尔热还是设法探出一些消息。里昂最大胆的盗印商之一让-马利·巴雷卖不掉孔狄亚克（Condillac）的那套综合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六卷本《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Cours d'études pour l'instruction du prince de Parme*），因此他劝出版社放弃重印巴雷的版本。前景比较好的是里科博尼夫人（Mme Riccoboni）著作的翻印再版：“巴黎版的销路肯定好，一直有人在求购这书。”法瓦尔热在继续前行的途中还将收集到其他资讯。阿维尼翁的书商推荐《名人词典》（*Dictionnaire des grands hommes*）。奥尔良的勒图尔米建议印克洛德-约瑟夫·多拉（Claude-Joseph Dorat）的小说《欧拉丽书简》（*Les Lettres d'Eulalie*），而库雷-德维尔纳夫（Courret de Villeneuve）钟情于《小塔利亚的游戏与娱乐》（*Les Jeux et amusements de la petite Thalie*），一本给儿童看的书，“他说是一本很好的书——意思是卖得好。”

在谈论最有潜力的畅销书时，书商们最看好的是卢梭的《忏悔录》（*Confessions*）。关于存在这部书的传言，以及卢梭手稿中其他未发表著作的传言，在卢梭1778年6月2日去世后不久就开始广泛流传。8月，当法瓦尔热到达马赛时，他汇报说，人人都在向他打听《忏悔录》。“人们坚信有这本书，不在巴黎，但是可能在荷兰。那书可以印上3000册。我们如果能很快搞到它并通知我们所有的最佳客户，他们肯定全都会要，甚至会用现金支付。”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千方百计想搞到卢梭的手稿，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勉强接受销售其他出版商的盗版。与此同时，它还在继续依靠法瓦尔热和它的书商客户提供的情报来寻求其他门路。

法瓦尔热在里昂的使命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打探一下能否找人铸

造一副新铅字，【79】供出版社印刷第三版《百科全书》使用，以及跟几家纸品商讨价还价，为纸张供应做准备。他还拜访了里昂几乎全部38家书商，结账并签下新的订单。他们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不多，而是大量从日内瓦和洛桑进货，自己也生产许多盗版书。法瓦尔热还和瑞士的书商做了大量的图书交换。在他写给出版社的信中，有大量报告谈及他们提议的交换——用他们书籍存货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折帖数量相当的书籍，以及对书商及其生意状况的评论。在里昂进行这种评估尤为重要，如给他的指示中所强调的：“你要特别注意把根据你所能收集到的情报得知的有关书商的一切情况写下来。”法瓦尔热在描述时，关于里昂书商的评论仍然简明扼要且不带感情色彩。例如，他说雅克诺靠不住，像“一把双刃剑；我要十分小心不被他缠住”；弗朗丹很难讨价还价，而且是“一个能敏锐感知书的价值的人”；还有佩里斯兄弟，捉摸不透，“这些先生把牌揣在怀里不亮出来，但是他们承认，整个里昂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和四开版《百科全书》外，什么没有在印。”每位书商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大多数很难打交道：“我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但是你要是想找这些先生谈一谈，他们总是没时间听你的。好像他们都有个大帝国要忙着治理似的，其实他们做的生意一点都不大。”

法瓦尔热把这种低迷状态部分地归因于《百科全书》生意的兴旺，它把财力从其他图书的投机生意上吸走了：“无论是谁，如果能搞到钱每月或每年投资图书生意，都会投到四开版《百科全书》上。”但是主要问题是人们无法确切知道政府打击盗版图书贸易的情况。在盗版书上打标记的措施还没有开始执行。法瓦尔热走访书商行会时也没有察觉到人们有执行1777年法令的热情。7月15日，他写道：“昨天我在书商行会待了一下午，我看不出怎样处理打标记这种烂事可以避免可怕的混乱。”虽然他亲眼目睹了夹带盗版的路易十五的掌玺大臣亨利-弗朗索瓦·达盖索（Henri-François d'Aguesseau）著作的货包（不属于纳沙泰尔出版社）被没收的场面，【80】但是 he 对自己所受到的接待感到高兴：“我在这个掌握图书贸易生杀大权的审判庭见到了所有理事，他们对我还是挺有礼貌的。”

创业、启蒙、盗印、暴利——这么多因素聚集在里昂，使法瓦尔热延长了逗留时间。直到达成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找到一条能绕过书商行会这个“审判庭”的途径，他才能离开。

（1）关于盗印的总体情况，见弗朗索瓦·穆罗（François Moureau）编，《灰色出版业：书籍盗版（16—19世纪）》（*Les Presses grises : La Contrefaçon du livre*，

XVIIe-XIXe siècles), 巴黎: Aux amateurs de livres, 1988。国家完全知晓里昂盗版印成风。例见里昂图书贸易检查官克洛德·布尔热拉(Claude Bourgelat) 1760年1月致巴黎的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Joseph d'Hémery)的信, 巴黎国家图书馆, 法文全宗22080, no.101。在关于里昂及其书商和印刷商的研究中, 尤为重要的是多米尼克·瓦里(Dominique Varry)的文章, 他充分利用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以及里昂的资料来源, 例如:“地下发行: 纳沙泰尔出版社和里昂的出版社”(La Diffusion sous le manteau: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et les Lyonnais), 见《欧洲与书籍: 16—19世纪出版业批发交易的网络与做法》(L'Europe et le livre: Réseaux et pratiques du négoce de librairie XVIIe-XIXe siècles), 弗雷德里克·巴比埃(Frédéric Barbier)、萨比娜·朱拉蒂克(Sabine Juratic)和多米尼克·瓦里编, 巴黎: Klincksieck, 1996, 第309—332页;“里昂与纳沙泰尔之间的交换”(Les Échanges Lyon-Neuchâtel), 见《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 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和纳沙泰尔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纳沙泰尔, 200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1769-1789: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Bibliothèque publique et universitaire de Neuchâtel et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Neuchâtel, 31 octobre au 2 novembre 2002), 罗伯特·达恩顿和米歇尔·施吕普编, 纳沙泰尔: Attinger, 2005, 第491—518页;“18世纪里昂的出版从业者: 当‘忠诚的臣民’也是‘爱发牢骚的人’时”(Les Gens du livre à Lyon au XVIIIe siècle: Quand de 'loyaux sujets' sont aussi des 'maronneurs'), 见《中世纪末至1945年西北欧城市的人民》(Le Peuple des villes dans l'Europe du Nord-Ouest de la fin du Moyen-Age à 1945), 菲利普·吉涅(Philippe Guignet)编, 里尔: 西北欧历史研究中心, 夏尔·戴高乐大学, 2003, 卷2, 第229—242页;以及“对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新研究”, 刊于《达恩顿辩论会: 书籍与18世纪的革命》, 第235—249页。亦见路易·特雷纳尔(Louis Trenard), 《商业与文化: 18世纪里昂的出版业》(Commerce et culture: Le livre à Lyon au XVIIIe siècle), 里昂: Imp. Réunies, 1953;和罗杰·夏蒂埃, “书籍与空间: 出版业的贸易流通和文化地理”(Livre et espace: Circuits commerciaux et géographie culturelle de librairie), 《法国书籍史杂志》(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971年第1卷, 第77—103页。

- (2) 见亨利·让·马丁, 《17世纪巴黎的书籍、权力和社会(1598—1701)》(Livres,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日内瓦: Librairie Droz, 1969, 尤见第3卷, 第678—756页;亨利·让·马丁, “17世纪的巴黎出版业”(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e siècle), 见马丁, 《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书籍》(Le Livre français sous l'Ancien Régime), 巴黎: Promodis, 1987;让·凯尼亚尔, “外省的经济萧条”(L'Anémie provinciale), 见亨利·让·马丁和罗杰·夏蒂埃编, 《法国出版史》, 巴黎: Pomodis, 1984, 第2卷, 第282—293页。
- (3) 关于1777年8月30日法令, 见雷蒙德·伯恩(Raymond Birn), “观念的收益: 18世纪法国的图书专卖权”(The Profits of Ideas: Privilèges en Librairi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18世纪研究》(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 (1971), 第131—168页;安妮·博埃斯(Anne Boës)和罗伯特·L·道森(Robert L. Dawson), “盗版合法化与警察标记(1777)”(The Legitimation of

Contrefaçons and the Police Stamp 1777) , 《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230 (1985) , 第461—484页 ; 以及让娜·韦兰·福雷 (Jeanne Veyrin-Forrer) , “被扣押的书籍, 打上标记的书籍: 盗版书的巴黎印记” (Livres arrêtés, livres estampillés : Traces parisiennes de la contrefaçon) , 见弗朗索瓦·穆罗编, 《灰色出版业: 书籍盗版 (16—19世纪) 》, 第101—112页。

- (4) 由里昂书商牵头的外省书商反抗巴黎书商专卖权垄断的完整表达, 见“里昂、鲁昂、图卢兹、马赛和尼姆的书商与印刷商关于出版业专卖权及其延续的商议的陈情书” (Mémoire à consulter pour les libraires et imprimeurs de Lyon , Rouen , Toulouse , Marseille et Nîmes concernant les privilèges de librairie et continuations d'iceux) , 1776年10月15日, 见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文全宗22073, no.144。亦见“致国王及枢密院的大人们” (Au Roi et à nosseigneurs de son Conseil) , 此为一份里昂书商抗议巴黎书商出版业专卖权延续的请愿书, 未注明日期, 见法文全宗22073, no.141。
- (5) 贝特朗, “旅行记事本”, 1773, ms.1058。
- (6) 指示和日志文本有法文版和英文版, 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查阅。
- (7) 下面几段概述了我在《启蒙运动的生意: 百科全书出版史 (1775—1800) 》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9) 中详细探讨过的研究。

第六章 里昂：国内走私【81】



一辆载货的马车过桥

让-雅克·德布瓦西厄绘，《大石桥》（*Le Grand pont de pierre*）。哈佛艺术博物馆，贝林达·L.兰德爾的赠品，来自约翰·威特·兰德爾的收藏，R4166。哈佛大学影像部版权所有

法瓦尔热走访书商会与他此次里昂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有关，这个目的几乎与有关《百科全书》的谈判同等重要，即筹划偷运事宜。第二章解释过，纳沙泰尔出版社通过弗朗堡和蓬塔利耶或其他过境点发运货包，在这些地点由海关人员打上铅封，并签发货物通运准单。然后货运代理商把它们转运到里昂，让书商会进行检查。一旦他们完成了检查——检查的彻底程度由他们决定——理事就会签发一份卸货证，货车车夫把它连同货物通运准单一起返还边境检查站，作为货包中不含盗版书和禁书的证明。货运代理商，通常是蓬塔利耶的让-弗朗索瓦·皮翁，就作为返还经过卸货处理的货物通运准单的保证人，如果在某个最后期限内，货物通运准单未能返还，他就得支付巨额罚金。

尽管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工作，但是，假如书商会的检查员——有时也有警察陪同——不玩忽职守的话，作为反盗版书和禁书的杀手锏，这种制度运作还是相当有效的。当然，随着他们与外国供应商贸易的增

加，他们玩忽职守的程度往往也会增加。但是，串谋和非法运输绝非易事。书商行会的理事及其同行们会跟瑞士的出版商作对——或是为了优待某些出版商，打压另一些出版商；或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盗版书，抵御国外的竞争；或是为了推销正在被盗印的有特许权的版本；或是害怕被当作共犯受到惩罚；或仅仅是厌恶非法运营（这个情况很少见）。

【82】纳沙泰尔出版社虽然和法国外省的一些书商结成了联盟，但也无法仅靠他们的善意甚至贿赂，就能指望让货物通过书商行会。这需要专业性的协助。

在法瓦尔热到达里昂前不久，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聘用了雷沃尔，让他设法使货物能够顺利通过书商行会，并转运到遍及法国的各个目的地。出版社曾经从波尔多的一位客户那里获得情报，说雷沃尔有办法让货物完全避免检查。于是，它就对他进行了试探，转弯抹角地考察他的偷运能力，并用做大生意的前景来引诱他。^①像与费弗尔及边境上其他偷运者做的交易一样，出版社要求雷沃尔在他的业务中把“保险”包括进去，即保证偿还任何被没收书籍的价值。他在一封以“雷沃尔公司”署名的信中回答道，最近书商行会对图书贸易的监管变得非常严厉，因为政府指望它执行新的反盗版法令。他确实找到了一种规避检查的“可靠方法”，但是费神又费钱，因此，“再怎么节省，每英担也要花4到5铔”。他和迪普兰有关系，可以利用政府容许的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货包来藏匿禁书的折帖。这样，这部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著作，这部在1750年代曾因引起公愤而被禁止的书籍，就要在1770年代为新一波非法书籍的传播起到掩护作用了。

纳沙泰尔出版社回信说，雷沃尔的提议听起来不错，但是他能保证把货物送到它在法国各地的客户手上吗？如果行，它就付每英担4铔作为“保险费”。雷沃尔在答复时，避免使用“保险”这个词，但他承诺把货物运给出版社提到的那些位于蒙彼利埃、马赛、波尔多、卢丹和欧塞尔的书商。1778年6月，出版社向这些地点发出了首批货物。因为没有按雷沃尔的指导跟《百科全书》的货包一起发运，它们被延误了。不过雷沃尔还是答应关注在路上滞留的所有货物，利用出版社发给迪普兰的货包，让更多货物顺利通过书商行会：“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有安全的仓储设施；而且如果你们想利用《百科全书》带来的机会，【83】可以用一个货包来掩护四个其他货包——把这个货包放在其他货包的外侧或上部。”雷沃尔向出版社保证，用《百科全书》来做掩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它们蒙混过关。迪普兰雇请他来处理所有已经运到的新近印制的《百科全书》，而“书商行会很少去检查它们，就是检查，也没人会查到

里面，只查查表面。”

听起来雷沃尔确实有能力，见多识广，但是怎么才能信任他呢？他能提供保险吗？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完《百科全书》之后，他还能继续搞偷运吗？这些是法瓦尔热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法瓦尔热走访“雷沃尔公司”时，让他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只是雷沃尔和他妻子的夫妻店。“雷沃尔先生除了他妻子外再无伙伴，他在此地默默无闻。他是个年轻人，一点都不富裕，但胆子很大。他的确看起来很聪明，不过不应该太信任他。”这个自封的货运代理商常常自己开业做生意，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些人脉外，资产很少。雷沃尔的生意，显然是从充当迪普兰的发货人开始的，当时迪普兰需要人帮忙发运大批量的《百科全书》。他们曾经是同学，迪普兰的另一个助理阿马布勒-勒鲁瓦也是，而迪普兰想利用他的关系作为一条路径，来取代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正规货运代理商克洛代兄弟父子公司（Claudet frères et fils）。

克洛代公司是有实力、负责的货运代理商，最近两年在里昂顺利地打理着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但是在法国政府宣布新的反盗版措施后，他们不愿再冒风险了。法瓦尔热日志里的指示指导他和克洛代公司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把“雷沃尔公司”认作“我们的新货运代理商”。法瓦尔热要从雷沃尔那里获得怎样避免被不仅是里昂还有各地的书商行会没收货物的情报，而且要把所有细节都用文字记录下来，甚至必要的话，“一字不差地把口述内容听写出来，寄给我们”。

当法瓦尔热把雷沃尔引入有关走私活动的细节讨论时，他学到了许多有关这个具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业的知识。雷沃尔不愿承担“承保人”的责任，【84】他继续强调尽量利用《百科全书》来掩盖偷运的货物。但是即使没有《百科全书》的货包，他也有办法安排非法书籍的运输。货车车夫要在里昂郊区克鲁瓦鲁斯镇的一个指定地点，把运往巴黎和北方的货物卸下来。里昂的圣克莱尔港也有一个类似的地点，可作为运往南方的货物的中转站。雷沃尔会在这些地方把铅封破掉，打开货包，拿掉一些非法书籍，用合法书籍替换它们，把货包包扎好，再打上伪造的铅封。他的仓库一直保持着合法书籍的供应，他会小心翼翼地从中选择，使替换的书籍重量相同。提货单必须提到货物重量，因为反盗版有一种更进一步的措施，就是货物在书商行会接受检查时要进行称重。这样处理一下，经过伪装的货物通过书商行会就不难了，而雷沃尔再把非法书籍当作国内货物转运到目的地，一路上它们很少受到检查，

尤其是如果贴着“服饰用品”的标签。它们也许会在最终目的地附近的书商行会受到检查，这时雷沃尔在这些地方的货运代理商就会确保书籍安全无虞地运到客户手中。如果雷沃尔能收买一个检查员，他甚至无须在里昂进行任何这样的操作，就可以让货物通运准单获得卸货处理。那样，货物就可以先在蓬塔利耶等着，待时机合适就可以被直接运到目的地，而雷沃尔则可以通过邮件来操纵整个交易。他从未实际尝试这一方法，但不管怎样，重新对货包进行包装来掩人耳目，是他图书偷运最重要的手法之一。

雷沃尔把这套系统拼凑起来花了一些时间，而其运作的全部细节只有在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通信的过程中才逐渐披露出来，这些通信最后形成一包拥有125封信的卷宗。如果读者带着一种把偷运活动视作英雄行为的浪漫观点去读这些信，也许会感到震撼，但是据纳沙泰尔出版社从其他偷运者和中间人处收到的信件来看，这种活动似乎并不鲜见。对18世纪的出版商和书商来说，做生意少不了都要搞一些地下交易。纳沙泰尔出版社一开始向法国发运书籍，就需要找“承保人”，它和其中几位维持着稳定的通信联系。让·埃利·贝特朗1773年出差前在日志上写下他要做的事情时，【85】就记下了“承保人多，这些日子都无事可做”这句话，他计划在圣叙尔皮斯和莱韦里耶尔分别找一位“有实力的承保人”，把出版社的书籍越境运到蓬塔利耶。

然而，越境偷运只是延伸到法国各地的复杂进程中的第一步。如果能巧妙地瞒过书商行会的检查，那么盗版书甚至禁书的运输，都可以与合法书籍的运输汇合起来，而地下发行体系就将沿循正常的贸易路线。因此，对出版业来说，里昂作为连通瑞士和法国的交流中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既然里昂如此重要，纳沙泰尔出版社对自己在当地的代理商的关注，自然不亚于对在边境帮它偷运的代理商的关注。雷沃尔只是它在里昂的一长串货运代理商中最新的一位，这些代理商可以从克洛代公司追溯到安德烈·肖德利（André Schodelli）、让·肖布（Jean Schaub）和其他几位。每一位都身怀绝技。绍布有办法伪造货物通运准单，还能在里昂郊外拉吉约蒂耶尔的“来三瓶”客栈里把货卸下来，从而瞒过书商行会。肖德利在书商行会的理事中发展了保护人。克洛代也这样干，甚至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承保人，每英担要价6锂，包括30—40苏作为他的利润。但他的生意每次都泡了汤——要么是因为理事换了，要么是在一次检查中禁书不幸被查到，要么就是在某个关键节点上书商行会提高了警

惕。雷沃尔比纳沙泰尔出版社雇请的其他所有代理商都技高一筹，做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所以如何在发行系统的各个重要节点上实现偷运，他的卷宗披露的内容最为丰富。

雷沃尔在向法瓦尔热和纳沙泰尔出版社介绍了他的业务之后，就开始讨价还价地提条件了。他坚持说他不会作出承诺，除非出版社把所有货运业务都委托给他做，而不只是那些涉及非法书籍的业务——这意味着要把克洛代公司从出版社的生意中逐出去。他还要求出版社雇用能完全听他调遣的车夫。他们必须在离里昂郊区圣克莱尔半里格远的布塔里客栈卸下货物，然后将货物通运准单和卸货单交给雷沃尔本人，以便他能够提防这些伪造的文件出现纰漏。他考虑的主要危险是皮翁不称职，皮翁从蓬塔利耶派车夫出发，而且经常不给他们准确的指示，或者不用邮件（专业术语是“发货通知书”[*lettre d'avis*]）通知雷沃尔。

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了这些条件，【86】8月底，雷沃尔就把几个在里昂郊外的秘密仓库储放了一段时间的货包转运给了它的客户。他请出版社发运300或400磅的合法书籍给他，让他适当地储备一些材料，用来替代货包中的非法书籍。他警告说，皮翁对运输费用要价过高：将每英担货物从蓬塔利耶运到里昂，费用应该是3铤15苏，而不是皮翁所要的4铤10苏。雷沃尔自己的工作需要的时间和金钱比他预计的多，因为他必须把图书从他的仓库运到索恩河的对岸。“我们得把S66号货包拆开，重新包装成三个重量合适的小包裹，能让人背着走一里格马车不能走的小道，然后渡过索恩河，以便走上往罗阿讷或巴黎的大路。”他向出版社保证，做好了这些安排，货物就不会拖延得太久。

当然，这种服务需要费用，比雷沃尔预计的多，因为要靠“值得信赖的人”帮助，就意味着要付给他们钱。他声言，他要的每英担5铤的运费（不是出版社最初打算付的4铤）和他的花费刚刚相抵。他抱怨他真是一点钱都赚不到，必须马上修改条件，如果不改他就不干了。出版社的董事们知道，这种话不必当真，雷沃尔总是要找借口增加收费的，而且他的生意似乎在急速发展。他在为好几家瑞士出版商工作，其中包括伯尔尼出版社和纳沙泰尔的萨米埃尔·福什。1779年1月，他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说，“一切都很顺利”。随后四年，他让一个又一个货包通过了书商行会的检查，没有栽过大跟头。他的成功证明，的确能找到办法规避1777年法令提出的措施。

当然，小麻烦时常出现。运到马赛的货物有时会因罗讷河发大水而延误。雷沃尔在伪造货包铅封时偶尔也遇到过麻烦。布塔里客栈换了老

板后，他还得就仓库的租借重新谈判。当一些海关人员在里昂城外一里格半远的地方查到一辆运载走私平纹细布的马车时，发生了一件离奇事故。雷沃尔把一些非法书籍藏匿在平纹细布下面，尽管他让书籍顺利通过了书商行会的检查，【87】但它们还是连同昂贵的纺织品一起被没收了。交涉了好几个月才得到放行。随着生意的扩张，雷沃尔觉得需要雇用一位职员，可是此人后来竟卷走了他一张价值100锂的汇票。

其次，由于皮翁的失职还发生过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经常忘记写信向雷沃尔报告一车书籍即将运到，有时他又忘记指示车夫把图书卸在里昂城外指定的客栈。车夫稀里糊涂地把书运到了海关，又从那儿运到了书商行会，差点被没收。雷沃尔设法挽回了这车货，因为他在催促给源源不断的《百科全书》放行时给过书商行会理事好处费。又有一次，他挽救了一批盗版书，因为派来检查的理事“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几乎全是”。【88】雷沃尔留了一些钱作好处费以备应急之需，用贿赂来维持这种友情。但是他不能指望书商行会的理事们会放过需要检查的一切货物。相反，他还是要将货包用合法书籍掩盖并重新包装，打上伪造的铅封，发运给他们。在没有《百科全书》的掩护来转运非法书籍时，这种操作是他的通常做法，只要通讯靠得住，效果很好。里昂、蓬塔利耶和纳沙泰尔之间的邮路非常通畅。纳沙泰尔出版社定期把指示连同提货单的副本寄给雷沃尔，货运代理商用信提醒他什么时候他们从像蓬塔利耶这样的中继站转运了货物。走蓬塔利耶路线的费用比走日内瓦路线便宜，而且还快四五天。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个不利条件：皮翁不称职。

尽管皮翁有最好的马，要价也比边境地区的其他货运代理商低，但他总是会把事搞砸。他最糟糕的一次失误，按照雷沃尔1779年5月19日写的一封急信所说，是有十二个货包发运到里昂却没有通知他，被车夫直接拉到海关让书商行会检查。深更半夜里，雷沃尔动用了“强制手段”（他没说明什么），才终于使它们免于“失事”。他大为恼火。“皮翁先生就是个丧门星”，他在后面的信里写道。这封信描述了这场救援，把它说成是“一次最大胆的行动，以前这类行动从未成功过”。他声称事后皮翁发了一封信，企图掩饰自己的疏忽。雷沃尔还说，皮翁甚至连货物装车也装不好，致使许多折帖被雨水淋毁。后来出版社发了一封信严厉责备皮翁，连同雷沃尔信件副本一起寄给皮翁。皮翁回信否定了一切指控，并以一种伤了职业自尊心的调子为自己所提供的服务辩解：“除了通过信件外，我没有荣幸认识雷沃尔公司，但是，他们的信件副本使我觉得他们在试图捣乱，要不就是夸大事实，以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影

响。”^②出版社不相信皮翁的辩解，与他断绝了关系——至少断了几个月，但后来又不得不恢复和他的生意往来。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圣叙尔皮斯的默龙兄弟，找不到足够的马来定期运输货物。

雷沃尔惩罚了皮翁，他扣下一些从为皮翁运输其他货物的车夫手中收到的货物通运准单，它们已经过卸货处理，必须在某个日期返还弗朗堡的海关检查站，【89】不然在那上面签了名的皮翁就要支付2000锂的罚金。在就要到期之时，恼怒的皮翁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及雷沃尔都写了信，雷沃尔不以为然：“他是个骗子……他最懒得写信，通常是在货物运到8到15天后，我们才接到他的信，这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过雷沃尔最后还是及时返还了货物通运准单——插曲结束。这是一个小事件，但它表明雷沃尔和皮翁之间关系很紧张，这种紧张随时有可能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系，而走私活动要想成功，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1780年夏天，雷沃尔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关系达到信任和热诚的高峰。到6月份，他已经成功处理了大量货物，收到的运费累计高达1991锂。8月份的一次出差时，他路过纳沙泰尔，得到了出版社董事们的接见。从他随后写信的语调看，他们十分合得来。他们想必讨论了迪普兰在管理《百科全书》项目时表里不一和侵占挪用的行径，因为雷沃尔在回到里昂后写过一封信说，迪普兰夫人最近去世了：“这像是上天惩罚他对金钱的贪欲，他为了满足这个贪欲，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雷沃尔给奥斯特瓦尔德寄了一些巧克力，给奥斯特瓦尔德的女儿寄了一些样品布料，给博塞寄了一些葡萄酒。他偶尔还写信报告一下里昂正在盗印的图书。例如他在1781年1月写道，“格拉比正在印的《法国戏剧集》似乎颇受欢迎。”

然而，到1781年3月份，出版社开始抗议运输拖延和费用过高。尽管雷沃尔没有提高从出版社收取的费用，但是把渐渐增加的高额费用转移到了出版社的客户头上。客户们给出版社和雷沃尔都写了信，愤怒抗议。到1782年，客户经常投诉，以致雷沃尔对出版社抱怨道：“责怪的声音不绝于耳，一点正当理由都没有，真令人厌烦。”他责备出版社不理解他所冒的风险和日益增加的被没收的危险——不只是在里昂，而是在法国各地，要不是他能够动员所有主要路径沿线的代理人和“秘密朋友”，出版社原本会遭受严重损失。他很生气，以致声称准备放弃整个生意（不过人们肯定总是会体谅他信中的过激言辞）。纳沙泰尔出版社对于他为使货包免于检查而冒的风险没有一点概念。“我们赚的利润根本补偿不了我们为做这些事情所付出的艰辛和担心，【90】逮捕密札（关押

令)也许就是对我们的犒劳!”

1782年7月，这次争吵暂时平息。雷沃尔写道，由于采取了一些未详细说明了“新安排”，他可以瞒过警觉的法国政府，一方面降低了费用，一方面还提高了交货速度。他重组了公司，改名为雷沃尔和热斯特公司。显然，他有了合伙人。可是这个新策略并不奏效。1783年2月，雷沃尔在处理一大宗政治禁书货物时失手了，这些书籍包括米拉波的小册子《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两本政治毁谤书，即《路易十五大事记》(*Les Fastes de Louis XV*)和《被清除的间谍》(*L'Espion dévalisé*)。这些书都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发运的，但是造成的危机十分严重，出版社只得完全中止向他发货。雷沃尔病倒了，这场灾难让他生了“一场非常危险的病”，受尽折磨。法瓦尔热这时正在日内瓦出差，他写道，有传言说雷沃尔的损失高达上万锂：“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小事情。据信他可能撑不下去了……我们得做好里昂这条路线断掉的准备。”雷沃尔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恢复的无从查考，但蓬塔利耶至里昂的路线一直是断的，因为在1783年6月12日，法国政府发布了本书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个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必须接受巴黎书商行会检查，无论它们的最后目的地是哪里。

这件事情发生后，雷沃尔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终止了生意往来，而他们之间的通信就变成了有关结账的旷日持久的争论。雷沃尔声称出版社欠他服务费用2400锂；出版社坚持认为只欠1800锂；之后，他同意从自己拟的资产负债表中减掉300锂；最终在1784年7月，他们敲定为2100锂。雷沃尔又从这个总额中扣掉771锂，因为他的仓库里还保留了一些《百科全书》。这样，出版社最后需要付给雷沃尔1329锂，大约相当于一个干粗活的普通工人四年的工资。

从雷沃尔1784年7月4日写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信的全文值得一读：

你们应该清楚，这个数额根本不能对我们所遇到的麻烦、担心和仓储开销进行补偿。【91】它几乎不够偿还我们在试图加快运输你们的货包时，为了从压垮我们的失误中脱身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绝对是真实的——出于我们对勒巴内雷[奥斯特瓦尔德]的爱戴——我们曾经历过丧失自由、生命、健康、钱财和声誉的危险。

自由：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朋友从中斡旋，我们可能会被逮捕

密机关进牢房。

生命：我们曾经几次与海关人员狭路相逢，并且手持武器逼迫他们归还货箱（有一次他们扣住了你们出版社的十二箱货，要不是我们，它们就损失了，别指望能收回来）。

健康：多少月黑风高之夜，我们不顾天气恶劣，顶风冒雪，蹚过泛滥的河水，有时甚至踏着薄冰前行！

钱财：在各种紧要时刻，为了铺平运货的路子，为了避免被人告发，为了息事宁人，难道我们不要花很多钱吗？

声誉：因为我们落了个走私者的名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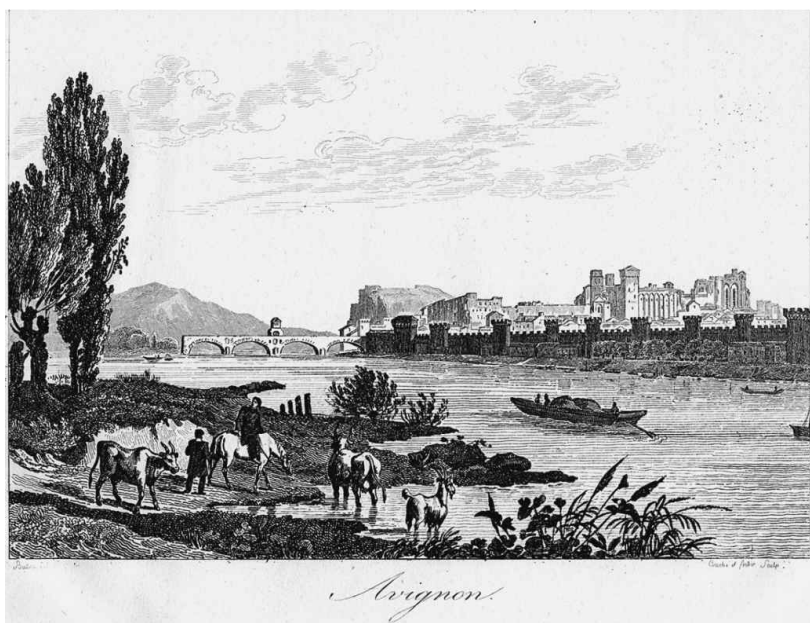
雷沃尔在1784年7月22日的信里重复了这种抱怨，并决定永远不再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工作。直到1788年1月29日，他才再次来信，对当时关于他是否会重操旧业的疑问做出答复。他写道，许多出版商曾经求他这么做，但是他拒绝了。受伤太深无法痊愈，他说，“您肯定还记得，我们经历过多少不幸啊，健康、声誉、损失的真金白银，还有刻骨铭心的痛苦。”他还确信，自己正在被人监视。

然而……雷沃尔又告诉他们，要是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够将货物运到马孔或者索恩河畔沙隆，他可以找到路子让货物顺利通过里昂。出版社没理这茬儿，但八个月后他又来信了，说他可以通过把货包伪装成运往阿维尼翁的过境货物来向国内运送。1788年11月，出版社发给他一个到阿维尼翁的货包，结果顺利通过，于是他又写信热切要求发更多的货。可他们的通信到这时就中断了，不久以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出版自由了，而一个在自由尚不可求的时代让读者可以拿到书的行业，也就此被摧毁了。

(1) 雷沃尔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以及相关背景资料，可在网站 robertdarnton.org 的“里昂”和“中间商和偷运者”标题下查阅。

(2) “皮翁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9年5月29日。

第七章 阿维尼翁：交换贸易【93】



阿维尼翁，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离开里昂，法瓦尔热奔赴繁荣兴旺的南方市场。他绕道去了格勒诺布尔，然后沿着罗纳河谷前行，自罗马时代以来，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不同于现在有大坝和水闸来维持稳定的水位，在18世纪，罗纳河是无拘无束的，随着季节更迭时而洪水泛滥，时而干涸见底。

【94】法瓦尔热无心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也不曾关注沿岸那些建筑恢弘的城镇，不过这些城镇的名字按照行程顺序依次出现在他的报告中：维恩、瓦朗斯、蒙泰利马尔（Montélimar）、奥朗日、阿维尼翁、阿尔勒、蒙彼利埃、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罗纳河东岸）、尼姆（罗纳河西岸），直到地中海边的马赛。对于一个手持《米其林指南》（*Guide Michelin*）或《蓝色指南》（*Guide Bleu*）来南法旅行的现代读者来说，这些名字会让他想到葡萄园、城堡、古罗马遗迹、罗马式教堂、有拱廊的街道，以及悬铃木荫蔽下的城市广场。法瓦尔热最关心的还是生意，报告只谈图书贸易，不过也提到了炎热的天气——此时正值酷热的8月——和他的坐骑，说他那匹马真不错，在吐着烈焰的太阳底下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谈到图书贸易时，法瓦尔热的话很多。当他于8月1日到达阿维尼翁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18世纪出版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方面，尽管这一点在今天几乎已经被忘却了。^①这就是“交换贸易”（*commerce d'échange*）——当时出版商之间的一种通行做法，即一家出版商拿自己印的图书和有合作关系的其他出版商进行等价交换。譬如说，一位出版商印了1000册书，他常常会拿出100册以上与其他出版商换一些书，想换什么可以根据他们的书目和商函来挑选。这种方法可以降低他的经营风险——比如他的书卖得不够好，不足以收回纸张和人力的成本；或者他的书销量因盗版书先打进市场而骤减——同时增加他手头的图书品种。通过交换，他建立起各类书籍存货的总书目，其中除了自己印制出版的图书外，还有以批发商身份销售的图书。

这些交易中没有货币易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金常常很难获取。出版商会在账簿中把这类交易记录在专门的“交换账户”上，记下每种书所包含的折帖数。交换一般是以折帖形式进行的，尽管这可能产生一个问题——由于排字密度和纸张质量的差异，相同版式的折帖价值往往是不一样的。有些出版商喜欢按批发价交换，但产生的问题更多，因为有时出版商们对同一种图书的市场价值评估并不一致。【95】本书第四章曾提到，纳沙泰尔出版社所有书籍的标准批发定价几乎都是每折帖1苏，这样，一卷典型的八开版20个折帖（320页）的图书就要花费客户20苏，即1铤。因此，无论是按批发价还是按折帖来进行交易，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策略都是始终一致的，不过它更喜欢按折帖来交易，因为它的交易伙伴一般都会高估他们存货的价值。

这种交换贸易是18世纪书业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缺乏文献，这种做法的使用程度无从估量。不过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表明，出版商之间交换图书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在瑞士出版商和阿维尼翁出版商之间。因为他们拿了非常多自印的书籍来作交换，出版商自然也就变成了批发商。他们持有庞大的存货，正如他们往来邮寄的书目中所标示的。而且因为交换如此广泛，几家书商销售同一版本的同一种书是常有的事，不论他们是否承印此书。当客户要订购某种存货中没有的书时，印刷商常常临时通过交换帮他弄到。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基于需求的图书库，由经常互相交换图书的出版商来调取。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贸易与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的贸易没有多大差异。这三家出版社常常携手来组成联盟，甚至共同盗印书籍，共担风险，分摊费用，分享利润。它们的书目每年至少要发布一次，内容很相似，而且它们在市场上也不会互相压价，因为它们在零售书商中都有自己的客户网。

不过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尤其在出版业的盗印这一块，所以出版商的敌人总比盟友多；而且如果在贸易中过分耍花招，盟友也会变成敌人。花招是防不胜防的。就拿交换折帖来说，一方可能提供纸质差的折帖，铅字有破损，行距设置得太大，这样劳动力的花费就会少一些。另一方也许会把畅销书从他提供用于交换的书籍中排除，或者可能把某种他正在印刷的书隐瞒起来，在把市场的需求大量吸走之后，再把它拿出来交换。“哲学书籍”比遭禁不太严厉的盗版书牵涉的风险更大，卖的价格也更高；因此通常以较高的比率进行交换，一般是一张折帖的“哲学书籍”换两张折帖的普通书籍。

法瓦尔热最初在出版社仓库和管理办公室里了解他的从业之道时，本该已经搜集了有关交换贸易的基本信息。【96】但是在他成为拥有有关其他出版商第一手资料的资深销售代表之前，出版社一直没有授权他进行实际交换贸易的谈判。谈判需要专门的技巧和判断力：你得先行刺探某家出版商的存货情况，评估他想交换的书籍的销售行情，了解他是否值得信赖，能否认真执行合同中他的那一部分条款（一个出版商总能找到办法对运输费用、毁损的折帖，以及交货迟延进行诡辩）。图书交换贸易需要非常高的职业悟性，因此通常只由最高层人员通过出版商之间的商业通信来进行。

借助于来自遍及欧洲的书商的信函，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对图书的供求行情有了一般的了解。但是他们无法知道另一家出版商是否对仓库中想卖而不想换的图书的信息秘而不宣，或者是否打算低价倾销从纳沙泰尔出版社弄到的书籍，从而使出版社的销售量下降，或者是否会拖延交换贸易中他自己那部分书籍的交货时间，以期能够抢先把他们两家都打算卖的这种书籍投放市场。一个出版商要想在这些交换中有效地耍手段，需要事先了解一些最活跃的贸易中心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内部情报。活跃的贸易中心主要是里昂和鲁昂这些外省首府城市，在这些地方，瑞士的几家出版社为了满足市场对廉价盗版法文书籍的需求，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而搜集这种情报没有人比销售代表更合适了，因为他可以在一个城市的各家书店串门拜访，捕捉传言，打探谁在印刷什么书这样的秘密。

这类侦查正是法瓦尔热法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要承担这样的使命，他首先得获取一些经验。1776年他代表出版社出过一次短差，让他经历了一次很重要的基本训练，因此我们需暂时把他1778年这趟旅行放下不表，先来了解一下两年前他是怎样掌握图书交换技巧的。^②他

的第一堂重要课程是1776年8月在洛桑上的。他在当地结识了让-皮埃尔·厄巴克（Jean-Pierre Heubach），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此人是一位大出版商，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合作伙伴。厄巴克向他透露，【97】里昂有一个名叫让-马利·巴雷的书商正在秘密盗印孔狄亚克的《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巴黎，1775，用的是假地址帕尔玛），这是一部启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根据业内传闻——这消息是经由一位意大利书商和洛桑的另一位出版商朱尔-亨利·波特（Jules-Henri Pott）辗转传到厄巴克耳朵里的——该版可能卖得好，但是也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其手稿已经在意大利被警察没收。法瓦尔热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本部，并记在了自己的日志里，以便在跟里昂的巴雷进行交换谈判时心里有数。

其间，他还嗅到了一本潜在畅销书的气息。那是关于第一次瓜分波兰这个热点话题的书，《瓜分波兰》（*Le Partage de la Pologne*，“伦敦”，1775），曾（错误地）被认为是腓特烈大帝所作。弗朗索瓦·格拉塞（François Grasset），这位经常跟纳沙泰尔出版社争吵的狡猾的（脾气也坏）洛桑出版商刚刚重印完这本书。法瓦尔热第一次拜访问他最近印了什么书时，他回答说“没印新书”。但是法瓦尔热还是很快知道了这本书的秘密重印（很可能是从一些工人或职员那里得知的，因为格拉塞总是跟他的雇员吵架），并马上找格拉塞要求交换100本。格拉塞不好拒绝，怕因此影响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关系，于是这事就成了。

为这次成功所鼓舞，法瓦尔热又打起了日内瓦盗印出版商们的主意。他找的第一个人是格拉塞的弟弟加布里埃尔（Gabriel Grasset），这位出版商和蔼有余但可信赖程度不足。小格拉塞以两张折帖换三张折帖这种有折扣的方式，用“哲学书籍”换了一些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他提供的书籍包括他当时正在印的哲学色情小说《哲学家泰蕾兹》（*Thérèse philosophe*）。更诱人的是，他告诉法瓦尔热，他很快就要出版三部伏尔泰的著作。伏尔泰就住在附近的费内（Ferney），常常把一些被他称作他的“小馅饼”的匿名小册子寄给像格拉塞这样的边缘出版商，而把他的比较重要的著作留给另一位日内瓦的加布里埃尔——人称“加布里埃尔天使”的克拉默。格拉塞不会泄露有关这些书的任何情报，甚至连书名都不会说。但是一次交换贸易会把欧洲这位最著名的作家更多的书引来，这样的前景让法瓦尔热垂涎：“它肯定卖得好。”法瓦尔热还发回了有关其他专营“哲学书籍”的出版商正准备印刷的书籍的消息。皮埃尔·加莱（Pierre Gallay）不久还要印两本色情书籍，雅克-邦雅曼·泰隆（Jacques-Benjamin Téron）正忙着出一部新版的《论精神》（*De l'esprit*），此书是爱尔维修（Helvétius）著名的反宗教论著，同时

还要出一个来自霍尔巴赫小圈子的更公开的无神论小册子《论偏见》（*Essai sur les préjugés*）。【98】法瓦尔热没有决定交换这些书籍，而只是将情报传回本部，让上司去定夺，这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新手，胆子不够大。

法瓦尔热每到一处都会探寻交换贸易的可能性，尤其在里昂，那是他在1776年访问的另一个重要的出版业中心。不过，日志本上的指示警告他，他在和里昂出版商谈判时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些出版商不仅内部长期勾心斗角，而且在瑞士出版商中挑拨离间，更换合作伙伴时招呼也不打。所以法瓦尔热行事十分谨慎，但是他又不能太胆小。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第一场小规模战斗他打赢了。他带着厄巴克提供的巴雷正在盗印孔狄亚克的《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这一情报，走进了巴雷的店铺。在他要求巴雷提供的交换书籍中，这本书占了很大的比例。巴雷十分诧异，同意用250册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各类书籍。然而糟糕的是，当法瓦尔热把纳沙泰尔出版社愿意拿出来交换的书籍的清单递给他时，巴雷注意到有一本该出版社刚刚印完的书不在清单上。他是从自己的线人那里得知这本书的，书名叫《教皇甘加内利书信集》

（*Correspondance du pape Ganganelli*），是一本了解教皇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XIV）的生平和时代的畅销书。这位教皇在1773年取缔了耶稣会，一年后便一命归西。他的书信使法国读者着迷，信中表达对耶稣会的压制曾经在法国引发激烈的论战。纳沙泰尔出版社本想靠销售它来换取现金，以使利润最大化，故把它排除在交换书目之外，但巴雷却要求也换给他100本。这样，就在法瓦尔热迫使巴雷拿出了他本不想拿出来交换的书的时候，巴雷也戳破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类似的小伎俩，而这样一来，法瓦尔热就很难拒绝巴雷的要求了。“这件事真让人窝心”，1776年8月他写信告诉本部，“可是他知道我们印了它，我不能否认啊。”尽管如此，这毕竟还是一桩互利的交易，而且最终还出现了一次转机，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尝到了更大甜头。法瓦尔热从出版社的信函中得知，兰斯的一家大书商于贝尔-马丁·卡赞（Hubert-Martin Cazin），正需要孔狄亚克的这部著作，数量还不少，而且坚持要纳沙泰尔出版社把货发给他在里昂的代理商——风险由纳沙泰尔出版社承担，并免除从纳沙泰尔到里昂的运费。于是法瓦尔热急忙写信给卡赞，把刚刚从巴雷那里弄到书的消息告诉了他，但绝口不提书的来源。【99】他不仅做成了一笔大买卖，还为出版社节省了一大笔运费，同时又向一个重要客户证明，他的服务是出色的。这次三角交易是交换贸易的典型，也是法瓦尔热的精彩业绩，他把给卡赞的信的副本寄回出版社本部，这样出版社

就有了关于这件事的记录，它证明法瓦尔热这位初出茅庐的销售代表还是挺能干的。

两年后，法瓦尔热到达阿维尼翁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直接和旧制度下最著名的盗印出版商谈判交换交易了。阿维尼翁就是盗印者的乐园。尽管在文化上属于法兰西，周围也都是法国领土，该城市却是效忠教皇的。在14世纪的政治动乱期间，教皇曾将阿维尼翁当作教廷所在地，后来教廷撤回到罗马，把该城事务留给一位由意大利人充任的教廷副使随意打理。在教皇的这块飞地上，法国图书享受的专卖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所以阿维尼翁的出版商可以随心所欲地翻印图书，并且以比原版低得多的价格卖给法国各地的顾客。1769年，阿维尼翁拥有22家书商和印刷商，以及40家生意兴隆的出版社——这对一个只有24,000名居民的城市来说，数量相当庞大。^③它的出版商的经营规模跟里昂和鲁昂的大出版社不相上下，而且和瑞士的盗印者有竞争关系。他们也和所有这些盗印者合作，这要看他们能从哪里发现最佳的赚钱机会。他们像瑞士人一样，尽量降低风险，并用自己的存货跟有伙伴关系的出版商做交换，以增加品种。和瑞士出版商交换书籍需要长途运输，但是通过罗讷河运输相对便宜：从里昂到阿维尼翁的运费是每英担40到50苏，而从阿维尼翁逆流运到里昂则需5锂（100苏）。^④

不过，在法瓦尔热到达阿维尼翁时，1777年法令已经预示了阿维尼翁盗印黄金时代的终结。阿维尼翁的出版商一边担忧新法规的长期后果，一边又希望利用好法令留出的那个短暂的机会，按法令规定的方法给盗版书打上标记，在法国进行推销。而要这样做，他们就必须让法国政府相信，他们实际上就是法国人，不是外国人。尽管教皇的使节及其全体意大利管理人员被安置在教皇宫，【100】但是这个城市和法国南部其他的外省首府基本上没有区别。老百姓都说普罗旺斯方言，靠地方贸易和制造业生活（丝绸业和出版业拥有5万工人）。精英阶层说法语，参与法国式文化生活——主要是在这座城市里的一所大学、一所学会、一座剧院以及一些沙龙、咖啡馆和书店里活动。实际上整座城市在1768年就属于法国了，当时克雷芒十四世取缔法国耶稣会引起了一场冲突，路易十五乘机吞并了阿维尼翁来向教皇施加压力。君主换代没有打断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生意，1774年阿维尼翁再次成为教皇飞地时生意也在照常进行。但是1777年法令规定在附近的尼姆新建一个书商行会。虽然一年后法瓦尔热到达阿维尼翁时，这个行会还没有开始运作，但它也许不久就要没收流出该市的盗版书了。而且要是法国图书贸易主管部门判定阿维尼翁人是外国人的话，他们的图书存货也就不会被打上可暂时

免于没收的标记。阿维尼翁的出版商可能永远都要像他们的纳沙泰尔同行们，只能靠偷运来经营了。但如果法国管理部门强制推行摧毁盗版贸易这个新政策，他们全都要倒霉。

这就是1778年法瓦尔热在阿维尼翁面临的局势。这时他每走访一家书商，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是被当作伙伴接受呢，还是被当作敌人——被当作一个出盗版书的出版社的竞争对手来对待。他的第一感觉是气馁。“我搞不清这里究竟在发生什么”，8月8日他写信给本部说，“因为我走到哪里都被人紧盯着。”该市最大的书商让·路易·尚博（Jean Louis Chambeau）接待他时“带着极度讽刺的神情”，其他书商也是冷冰冰的。不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和阿维尼翁人打了多年交道，法瓦尔热是有备而来的，他要做成一些交易。为了搞清自己的处境，他征求了弗夫·路易·布歇（Veuve Louis Bouchet）公司的建议。后者是经营丝绸贸易的商人，是帮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里昂融资的达纳尔公司推荐给他的。作为新教徒教友，他们值得信赖，而且他们向他如实地评价了阿维尼翁的每一家书商。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他拜访了其中的12家。他在日志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并加以说明时，用的是他一直使用的确定可信程度的方法，即把他们分别评级为“佳”“一般”和“差”。【101】他把得到“差”评的排除掉，只描述了那些可能愿意做交换贸易的书商。⁽⁵⁾下面是对一个评级为“一般”的书商的典型记述：

博内兄弟，一般，被认为很正直，这在阿维尼翁很少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下订单时不愿付现金。他们的图书有：布封先生全集的一个版本，十四卷，大八开，有许多插图；马西荣的布道书，十三卷，小十二开，两种书做得都不太差，愿意以正文一张折帖换一张折帖、插图一张折帖换两张折帖的方式交换50套莫里哀的著作、50套皮隆的著作、50套多拉的著作……这样的交换让我动心，因为可能有利可图。

日志上的这段说明写得很潦草，而包含在信函中的一个更完整的汇报，对1778年阿维尼翁的这种贸易进行了万花筒般的综述。不过要深入了解这种贸易的操作，还应该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查阅1771年到1787年这段时期出版商们的卷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雅克·加里冈（Jacques Garrigan）的卷宗。加里冈是一家生意相当红火的出版商，位于当地的工业中心。法瓦尔热把他评为“一般”，可能是低估了，因为加里冈属于一个杰出的书商兼印刷商家族；他是当地书商行会的理事；

而且，跟其他阿维尼翁人（譬如安托万·吉夏尔 [Antoine Guichard]）的信不同，他的信里看不到显示他财务状况不稳定的半点迹象。

法瓦尔热1778年到阿维尼翁之前，加里冈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从未做过生意。他们就建立关系进行商讨时，达成了做第一次交换贸易的协议，如果双方对交易的结果感到满意，将来大家就做贸易伙伴。这次的图书交换不是按折帖而是按批发价来进行。在加里冈的书单上，批发价变化相当大。纳沙泰尔出版社可能要承担将货运到里昂南出口通道的全部风险和运费，同样，加里冈要承担将货运到里昂正东南的维恩的全部风险和运费。加里冈提供了四种他已经印刷完毕的工具书，即《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意大利语老师》（*Maître italien*）、《家用词典》（*Dictionnaire domestique*）和《教士备忘录》（*Mémoires du clergé*）。他要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中选24种书来交换，其中包括多卷本版的戏剧集，如30套《亚历克西·皮隆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d'Alexis Piron*）、30套《莫里哀剧集》（*Œuvres de Molière*）；一些新教著作，如25册《大卫的诗篇》（*Psaumes de David*），【102】一些历史和游记类书籍，如25套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美洲史》（*Histoire de l'Amérique*）、12册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法兰西岛、波旁岛、好望角等地游记》（*Voyages à l'Isle de France, à l'Isle de Bourbon, au Cap de Bon Espérance, etc.*）；还有一种大众医学小册子，12册萨米埃尔·奥古斯特·蒂索（Samuel-Auguste Tissot）的《大众健康建议》（*Avis au peuple sur sa santé*）。纳沙泰尔出版社则要从他所提供的书籍中选取价值相当的书籍。

出版社放弃了这笔生意。但是在两年后的1780年9月，加里冈——或是他的儿子让·马利：信是让·马利执笔的，但签名时加注了“代我父亲”——又提议进行类似的交换，附带条件是双方都将货发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雅克·雷沃尔，各方承担各自的运费和风险。这次出版社同意了，发了价值894锂的书给雷沃尔，交换加里冈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词典上打了印记，表明已经根据1777年法令顺利通过了书商行会。雷沃尔怀疑那个印记是仿冒的，加里冈则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它们是合法的，于是雷沃尔就把它们送给里昂书商行会检查，以便能把它们转运到纳沙泰尔。但是检查员怀疑有假，扣留了它们。仿冒印记是比盗印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就像雷沃尔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那样：“如果事实确凿，加里冈就摊上大事了。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身上，他还可以侥幸逃脱，不会被判罚去作划船苦役。”印记最终被证

明是真的，交换成功。尽管雷沃尔仍然认为加里冈是个“不随和的客户，爱吵架的人”，但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是准备继续跟他做生意。

1781年6月，加里冈提议再次交换。他现在发现有必要讲明两个条件：纸张和铅字的质量必须标准一致（他不会接受用灰色调的纸印刷的任何东西），而且发货不得拖延（有时交换交易的一方会扣下自己的货物，以便能趁着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把同一种书卖给其他客户）。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了，并要求换得31套以上两卷本的《法兰西学院词典》，这是加里冈销量最稳的书籍，他以18铤的特价供货——通常的批发价是24铤。纳沙泰尔出版社还说要试着卖卖他的另外两种翻印的书籍，【103】一种是地理手册，是被称为沃吉昂神父（Abbé Vosgien）的让-巴蒂斯特-拉沃卡（Jean-Baptiste Ladvocat）的《袖珍地理词典》（*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portatif*），另一种是扩版的儿童教科书，弗里德里希-埃伯哈德-冯罗霍（Friedrich Eberhard von Rochow）的《供乡村小学用的儿童之友》（*L'Ami des enfants à l'usage des écoles de la campagne*）。一年后两种书均被列入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都很畅销。

由于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功进行了一些交换贸易，加里冈开始表示出对一些禁书的兴趣，尤其是雷纳尔关于世界史的激进论著《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此书最近在巴黎遭到了当局的封禁和焚烧，因此需求量很大。还有两种毁谤路易十五宫廷生活的图书：巴泰莱米-弗朗索瓦-约瑟夫-穆夫勒-当热维尔（Barthélemy-François-Joseph Moufle d'Angerville）的《路易十五的私生活》，和马蒂欧-皮当萨-德麦罗伯（Mathieu-François Pidansat de Mairobert）的《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L'Espion anglais,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ntre Milord All'eye et Milord All'ear*）。他还提到，他和萨米埃尔·福什有过交易，福什是纳沙泰尔出版社从前的贸易伙伴，在做自己的其他生意的同时也做过许多“哲学书籍”的贸易。这样的书在加里冈的存货中也许不占大部分，可是他急切地想要弄到它们。他在1782年9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询问一部性爱描写非常露骨的色情书籍：“你们能为我弄到《性爱狂》（*Foutromanie*）吗？”一般来说，阿维尼翁的出版商似乎只限于盗印合法书籍，然后用它们交换禁书，这些书是可以从瑞士出版商那里弄到的。

一直到1783年年中，交换贸易都在持续顺畅地进行，只是在1781年11月出过一次意外。雷沃尔因为生病，未能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含有交

换书籍的货包顺利通过里昂书商行会。它本来是会被没收的，幸好行会理事里有出版社的一个朋友，把它挽救了下来，退回给纳沙泰尔。不过，这次耽搁被加里冈看作一次严重违规，怒冲冲地写了封信严加斥责：“我等得不耐烦了，你们要按照协议命令雷沃尔把这个货包发给我；如果又耽搁了一次后还让我不满意，先生们，我就要让你们承担我发给你们的货物的全部费用了。我做交换贸易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我是出于信任才先将货发给你们的。不要让我为此后悔。”

这通脾气中的关键词是“信任”。【104】要使交换贸易成功，双方一达成协议就必须将交换的书籍发出去。一方如果拖延发货，把剩余的书籍卖掉，那么不等对方将交换得到的相同书籍投放市场，市场需求就已经被吸引到别处了。像加里冈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这种批发商，货物销售地许多都是相同的，尤其是在罗讷河谷地区和法国南部。几个区域性市场很大，足以吸收不同供应商的许多相同书籍，但是在盗印出版商中间，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推销他们的廉价盗版书。尽管他们有时会合作，但是没有互信基础，共谋是无法达成的，所以“信任”是整个图书贸易的关键。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解释了意外发生的原因后，加里冈恢复了交换贸易，并采用了更诚恳的语调。“我们彼此都要有这样的信任，避免货运耽搁”，1782年3月1日他写道。后来他写的信指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他最想要的是哪些书籍，和他所能提供的自印书籍。关注一下他们商谈的情况，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生意状况。加里冈也和其他出版商——尤其是纳沙泰尔的萨米埃尔·福什和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Jean Abram Nouffer）——交换图书，因此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交换贸易只能让我们部分地了解他的生意状况。^⑥不过，从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大体趋势。

1782年3月27日，加里冈提议用最后剩余的25册《法兰西学院词典》（他重印了几次，似乎一直有需求）、100册《供乡村小学用的儿童之友》和100册沃吉昂神父的《袖珍地理词典》，交换50册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6套莫里哀的著作、6套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著作和6套亚历克西·皮隆的著作。5月6日，他提议他那边加上30套安托万·萨巴蒂埃（Antoine Sabatier）的《法国文学三百年》（*Les Trois siècle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并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再提供如下著作：

30套伏尔泰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理性》（*La Raison par alphabet*）⁽⁷⁾；

20册夏尔·泰夫诺·德莫朗德（Charles Théveneau de Morande）的《身披甲胄的报人，或法国宫廷的丑闻》；

20册保罗·亨利·迪特里希·蒂里，【105】霍尔巴赫男爵的《健全的思想》（*Le Bon-sens*）；

12册夏尔·德雷兰库尔（Charles Drelincourt）的《忠魂的慰藉》（*Consolation de l'âme fidèle*）；

12册让·罗多尔夫·奥斯特瓦尔德（Jean-Rodolphe Ostervald）的《灵魂的食粮》（*La Nourriture de l'âme*）；

50册让·弗雷德里克·奥斯特瓦尔德（Jean-Frédéric Ostervald）的《圣史及教理书简易读本》（*Abrégé de l'histoire sainte et du catéchisme*）；

12册《虔诚祈祷书》（*Prières de piété*）；

12册菲利普·多德里奇（Philip Doddridge）的《真虔诚的开始与发展》（*Les Commencements et les progrès de la vraie piété*）；

6册《圣经的神学》（*Théologie de l'Ecriture sainte*）；

25册《诗篇》；

6册弗朗索瓦·雅克·迪朗（François-Jacques Durand）的《关于各种圣经文本的新布道文》（*Sermons nouveaux sur divers textes de l'Ecriture sainte*）。

在现代读者看来，这样把新教的虔诚与启蒙运动的反宗教混在一起也许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常常就在书商的订单中显现出来。阿维尼翁的另一位出版商，皮埃尔·约瑟夫·罗贝蒂（Pierre Joseph Roberty），进了500册《妓院或受到惩罚的蠢货》（*Le Bordel ou le Jean-foutre puni*），除此之外，又从另一家供应商那里订购了新教著作，他还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解释说，“只有这类新教书籍能诱使我拿自己的书去和你们交换。你们知道印这类书籍有多么危险，需要的费用有多么高。”⁽⁸⁾显然，加里冈是要把宗教书籍卖给法国南部的胡格诺派教徒，而把其他书籍卖给一些具有彻底的无神论思想的顾客。

这次交换贸易顺利达成了，没出意外，并且在1782年8月，双方同

意结清他们相互交换书籍的账目。结账之后，他们又开始商谈了。加里冈声称他正在印一本“新的好书”：《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它是交换贸易中为数不多的几种小说之一，如今仍然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尽管这部小说主要是在叙说不光彩的奸情，但它在18世纪并未遭到查禁。他还提供了雅克·德利尔的《花园》，一部吟诵自然之美的伤感诗集，以及一本让-克洛德·潘热隆（Jean-Claude Pingeron）的地理小册子《牙买加掠影》（*Description abrégée de la Jamaïque*）。

【106】他要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12套25卷版的卢梭著作、24册《忏悔录》、12册威廉·科克斯（William Coxe）描述俄国人扩张的《俄国人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新发现》（*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s Russes entre l'Asie et l'Amérique*），以及100多册《英国间谍》。完成这次交换后，加里冈写道，他特别想得到新版的雷纳尔《哲学和政治史》，另外还要增订《路易十五的私生活》和《英国间谍》。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在1783到1784年间曾与让·亚伯兰·努费合作出版雷纳尔的这部著作，但在1782年它通知加里冈，将不再加印自己的版本。10月4日他回信说：“真遗憾，你们不能提供《哲学和政治史》。为什么要放弃印这部书的机会呢？你们应该印呀，和《路易十五的私生活》一道印！每种我都要100套。”他甚至提议想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哲学和政治史》上投资：“我会投资500套的生产费用。”三周后他撤销了提议，因为他和另一家瑞士出版商交换到100套。

其间，加里冈正在出另一版《法兰西学院词典》，并在1783年3月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行了一轮新的交换贸易，价值543锂。加里冈提供181册《袖珍地理词典》，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出了下列图书：

6套《亚历克西·皮隆全集》；

13册《亚历克西·皮隆全集》的第八卷（《自由诗》单卷）；

12套《让-雅克·卢梭遗作集》（*Œuvres posthum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12册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

24册威廉·科克斯的《俄国人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新发现》；

12册埃梅·德瓦特尔（Emer de Vattel）的《国际法，或自然法原则》（*Le Droits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12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Claude-François Xavier

Millot) 的《从克洛维到路易十五的法国史纲要》(*Elément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Clovis jusqu'à Louis XV*) ;

12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英国史纲要》(*Eléments de l'histoire d'Angleterre*) ;

50册《梅西耶三剧集》(*Trois pièces de Mercier*) (可能是《维罗纳的墓地》[*Les Tombeaux de Vérone*]、《神圣联盟的覆灭》[*La Destruction de la Ligue*] 和《瓜德罗普岛的居民》[*L'Habitant de Guadeloupe*]) ;

24册皮埃尔-昂布鲁瓦兹·弗朗索瓦·肖德洛·德拉克洛 (Pierre-Ambroise-François Choderlos de Laclos) 的《危险关系》。

【107】[显然，加里冈因为卖完了他自己的版本，所以需要再进一些。]

这次交换成功了，尽管他抱怨，“跟货运代理商——尤其是和雷沃尔先生——打交道好麻烦，他让我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经过几年的互利交换后，两家出版商建立了牢固的互信。加里冈一直在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通报他正在印的书，也不时地建议它应该翻印哪些书。1783年3月，他怂恿它翻印詹姆斯·库克 (James Cook) 的《南极及世界环游记》(*Voyage au pôle austral et autour du monde*) ，“一本好书”。“我不想对你隐瞒我的意图，如果你们不做，我就要自己印十二开七卷本了。但是不得到你们同意我不会做这个决定。”

他们的交换贸易在1783年6月戛然而止，因为此时韦尔热讷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运到巴黎接受检查，而不是在外省的书商行会检查。因此，从纳沙泰尔运到阿维尼翁的图书要绕道巴黎，其费用就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了，而且巴黎的检查人员是外国盗印者的大敌，肯定会没收任何非法书籍。

纳沙泰尔出版社和加里冈之间的所有货运——以及该出版社与阿维尼翁的所有联系——都在1783年夏天停止了。两年后，加里冈写信说他很想恢复交换贸易，但是找不到办法来规避韦尔热讷的命令，这是他们中断联系的“致命原因”。在加里冈的倡议下，纳沙泰尔出版社考虑过利用日内瓦的巴尔德与芒热公司 (Barde, Manget et Cie.) 让货包绕过法国官员。然而巴尔德报告说，和纳沙泰尔的出版商一样，日内瓦的出版商也无法渗透进法国市场。

与此同时，阿维尼翁人在自己的边境也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1778年，他们就曾请求巴黎的图书贸易主管勒卡米·德内维尔（Le Camus de Néville）把他们当作法国人看待，法瓦尔热也曾报告说，他们指望他们的游说获得成功，“他们自信他们的盗版书能像在法国城市里一样被打上印记。他们把情况跟德内维尔先生陈述过，根据他们的报告，德内维尔先生也亲切地聆听过他们的意见。”尽管如此，法瓦尔热仍然看出，事情陷入了危机。【108】“因为阿维尼翁位于法国境内〔他们辩称〕，他们再也不能卖任何东西，这部分贸易会完全垮掉，他们全都要破产。其间他们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都在抢着盗印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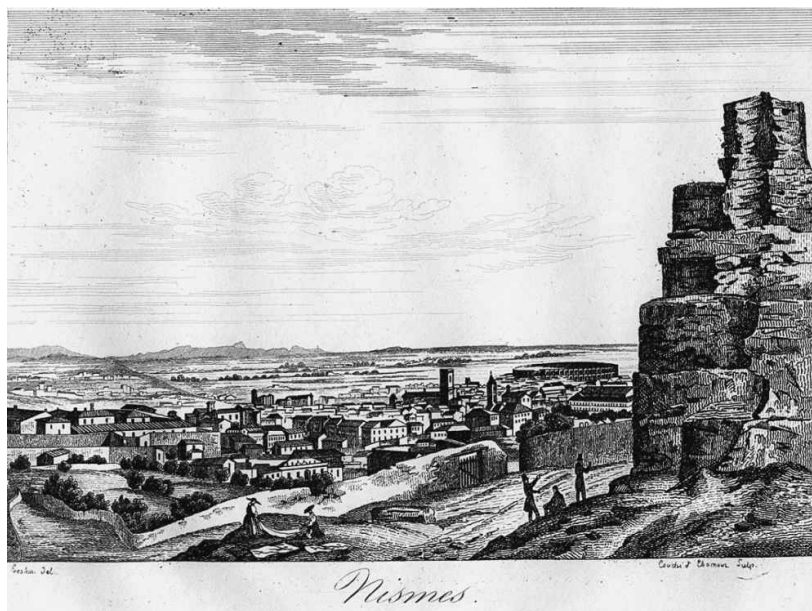
但是德内维尔完全知道，涌进法国的盗版书大部分是在阿维尼翁印刷的。他裁定阿维尼翁是外国领土，它出口的书籍将受到严格监控。1785年的法令要求尼姆的新书商行会检查阿维尼翁出口的每一件图书货包。没收的书籍大量增加。于是出版社一家接一家地破产倒闭。1786年，阿维尼翁只有25台印刷机在工作——还不到1760年盗印鼎盛时期60台的一半。^⑨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的盗印业已经寿终正寝。

- (1) 图书交换贸易吸引过关心近代早期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注意，但关于它的彻底研究是在对德国图书贸易进行的探讨中做出的。见约翰·戈尔德弗里德里希（Johann Goldfriedrich），《德国书籍销售史：受德国书商协会委托》（*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Im Auftrag des Börsenvereins der Deutschen Buchhändler*），莱比锡：Börsenverein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1908—1909，第2—3卷；以及赖因哈德·维特曼（Reinhard Wittmann），《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Ein Überblick*），慕尼黑：C. H. Beck，1991。在近代，印刷商兼书商常常带着满车新近印刷的书籍到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春季和秋季书市，从其他印刷商兼书商印刷的书籍中挑选图书进行交换，然后满载而归，换回的书籍品种繁多，足以构成书店的大部分存货，直到下一届书市再去寻觅新的图书。在18世纪末期，莱比锡的书商如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等改变了零售贸易，把它转变成独立于书市之外的现金交易。法国没有像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那样的书市，尽管博凯尔的集市也吸引了大量书商。不过我相信，交换——尤其是瑞士的出版商和阿维尼翁的出版商，及里昂这样的中心地区的批发商之间的交换——是19世纪前图书贸易的基本局面。
- (2) 我曾详细探讨法瓦尔热1776年的出差之行，见“一位出版商销售代表的旅行（1775—1776）”（*The Travels of a Publisher's Sales Rep, 1775-1776*），《书籍史》（*Book History*），20（2017），第111—125页。
- (3) 勒内·穆利纳斯（René Moulinas），《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L'Imprimerie, la librairie, et la presse à Avignon au XVIIIe siècle*），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4。法国政府完全知晓阿维尼翁的盗印情况，甚至从里昂书商那里获得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情报，如皮埃尔·布里塞-蓬蒂斯就曾于

1769年9月16日寄给监督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一份“关于盗版的备忘录”。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75，no.117。关于阿维尼翁及其出版商的更多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

- (4) 见“皮埃尔·约瑟夫·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1月16日；“弗夫·若利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11月22日。
- (5) 以下是法瓦尔热的说明的最贴近释义，尽管引用不是完全准确：“尚博：佳，但是难打交道；奥弗雷：一般，强调价格要低；迪比埃，一般，也许会买些《圣经》；法布尔：佳，喜欢书目上的某些书籍，也许会下测试性的订单；梅朗德：极佳，但是连书目都不看一眼；奥巴内尔：一般，他提议交换，但不值得做；尼埃尔：不错的印刷商，但不在店里；塞甘：也很好，愿意进行交换，但是他的书目上没有什么好书。”
- (6) 交换的全部细节可以从加里冈的信中了解，这些信以及关于阿维尼翁的其他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到。
- (7) 即《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译者注
- (8) “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2月8日。
- (9) 穆利纳斯，《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第259—260页。

第八章 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南部地区的艰难求生【109】



尼姆，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尼姆

法瓦尔热离开阿维尼翁后，事情进展还很顺利。他顶住了8月的酷热，马儿看起来也像离开纳沙泰尔时那样精神抖擞。他唯一的难题是讨厌的疥疮。【110】瘙痒难忍，通常还伴有红疹，甚至水疱，让他难受至极。如今人们患疥疮，涂抹扑灭司林乳膏就很容易治好，12个小时内就可以杀灭引起疥疮的螨虫，尽管瘙痒还要持续两到三周。可是法瓦尔热不得不依靠他那个时代的医学。他在尼姆看了外科医生后，决定遵从标准的疗法：“我将要一天给自己放一次血，次日再（服灌肠剂）通便。”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染上这种病的。现代的皮肤科医生把它归因于受到被褥、毛巾或室内装饰物上的螨虫感染。在18世纪，法国的客栈不像瑞士的客栈那么干净整洁，它们的肮脏闻名天下。就在法瓦尔热旅行的时代，有位法国旅行者就曾把它们形容为“地地道道的粪坑。任何饭食

都令人作呕。房屋、老板、老板娘、楼梯、房间、家具，一直到女佣，到处都是个德性。另外，床铺要多硬有多硬，床单最脏，都没洗干净，墙壁或壁炉上几乎总是涂得乱七八糟，不堪入目……肮脏是全法国的通病。”^①法瓦尔热没有抱怨法国客栈的条件差，但他很可能清除了床褥上的疥螨。疥螨通常活不过三天；所以（或许在经过多次抓挠之后）感染也消失了。至少他在后来的信中不再提了。

和以往一样，他也不提有关他所经过的城市的任何事情，除了书店——而更常见的是，他会提到城市缺少书店。根据法瓦尔热的报告以及他随身携带的《出版年鉴》可知，在阿维尼翁之后，罗讷河谷和法国南部海岸地区的书店少得出奇。^②虽然他到处找书店，但是在现今地图上所有看起来好像相当有名的小镇，如肖梅拉克（Chomérac）、普里瓦（Privas）、维维耶（Viviers）和卡庞特拉（Carpentras），都一家也找不到。蒙泰利马尔、阿普特、奥朗日（当地的“书商”实际上是一个假发制作商，卖书是他的副业，而且只卖做礼拜用的书）、于泽斯、塔拉斯孔这些城镇，各自都只有一家书商，而且每个书商的生意都做得很小，不可能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实际上，除了宗教书籍和一些应时印刷品外，别的他们都很少卖。虽然阿尔勒有两家书商，瓦朗斯有三家，艾克斯有四家，可法瓦尔热查看这些书店的存货时，除了在艾克斯四家书店中最大的那家由达维德兄弟开的店外，都没看到新近出版的书籍。达维德兄弟的书店实力较强，法瓦尔热评估时给了他们高分，

【111】尽管他们告诉他，他们的零售生意“太一般了，每样新书只能卖一两本”。

当法瓦尔热到达地中海地区，沿着这个盆地的边缘寻找贸易之路时，他发现这里的图书贸易也很不繁荣。土伦只有三家书商，调查后他确信他们卖的书大多是航海方面的。佩兹纳斯（Pézenas）和贝济耶（Béziers）也各有三家书商，其中佩兹纳斯的菲济耶（Fuzier）这家，在法瓦尔热看来前景最好。他已经募集到几个《百科全书》订户，要3套48卷版的伏尔泰著作，并保证还可以再要一些书，使货包凑足300到400磅。在贝济耶，弗夫·奥德泽内父子公司（Veuve Odezenes et fils）被评为“极佳”，已经订了6套《百科全书》，但法瓦尔热不指望他们再下任何订单。卡尔卡松的一家书商，雷蒙·埃里松（Raymond Hérisson），享有“极佳”的评价，但是生意规模不大，法瓦尔热无法从他那里弄到一份订单。其他大镇，如冈日（Ganges）、阿格德（Agde）、纳博讷（Narbonne）、洛代沃（Lodève），都是一家书店也没有。

所有这些地方景色都很优美，有中世纪的要塞、哥特式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等，但在法瓦尔热的日志里，除了对图书销售惨淡前景的忧心忡忡之外，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踪迹。然而，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就是尼姆、蒙彼利埃和马赛。对流行书籍的需求集中在这三个城市，有一些一流的书商控制着整个地区的贸易。纳沙泰尔出版社和所有这些书商都有大量交易，而他们各自的目标也是毫无二致，都是要竭尽所能去占领市场的最大份额，削减其他书商的份额。结果导致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全面竞争，这可以从法瓦尔热的报告和整个18世纪70、80年代书商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看出来。

法瓦尔热的首站是尼姆。由于两个基本因素——丝绸和新教徒，它的图书市场很红火。在18世纪中期，丝绸和其他纺织品制造业驱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该市人口众多的新教徒（在1778年的估计中，占其总人口数39,000的三分之一），消费了大量书籍，主要是《圣经》和宗教仪式用书，但也有启蒙运动的论著。新教是一种看重书籍的宗教，为启蒙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有利的场域。尼姆书商的信函揭示了那些文化潮流汇聚的途径。【112】尽管如此，和大多数其他外省中心城市的情况一样，只有几家书商的经营规模大到能够定期从国外出版商订货。其中最突出的有两家，米歇尔·戈德和比谢（文献没有提供他的名字），能让其他书商相形见绌。虽然提“经营规划”这个词可能不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实情，但是这两家书商的经营理念是截然相反的：戈德下订单和付账坚持着一种保守的策略，而比谢则敢想敢干，不惧风险。

当法瓦尔热走进戈德位于尼姆市中心大街上的书店时，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友善亲切的所在。新教书籍俯拾皆是。戈德本人很可能就是胡格诺派教徒，并且致力于满足胡格诺派教徒的需要。1771年起，他定期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寄信，从他的信函来看，这是一个冷静、严格、难以讨价还价的交易者，但在付账和结账时显得特别诚实。出版社的客户在接到货物后，一般都是用邮政汇票（或其他汇票）支付货款，这些汇票通常在12个月后到期。出版社在往来账户上记录每家客户积欠的债务，然后不时地通过与客户达成一项协议来结算。出版社会向客户寄一份本方记载的关于他借贷情况的报表，而客户也出一份他自己的报表（一份“逆向账目”[*contrecompte*]）。如果他的账和出版社的有任何出入，他们就要协商，达成一致后，他再寄一张期票来支付债款。然而，在开立新的账户之前，双方常常会因为账目不一致而卷入纷争，而这种纷争就能充分反映一个书商的素质和他的生意状况。例如，1772年，戈德在结账时纠正了出版社犯的几个错误，其中还包括一个对出版社不利

的错误。1774年，出版社认为抓住了他的一个错误，发信对他严加斥责，甚至因为在商量时话不投机，还扬言要控告他。但是戈德没有退让，理由是“我们的正直，对我们来说比世上所有威胁都重要”。结果证明戈德一直是对的，出版社也只好让步了。这种耿直给法瓦尔热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在其他很多书店里做交涉时感受不到的东西。在了解了当地的商人之后，法瓦尔热报告说，戈德父子一直享有无可挑剔的声望，建议开立新账户和他们做更多的生意。和戈德父子谈判很艰难，但是跟该市的其他所有书商比起来，他还是更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我很乐意再跟他们建立联系。他们是很友善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也许会因加尔文教派的团结意识而加强。

【113】法瓦尔热到尼姆不久，就去聆听胡格诺派最杰出的领袖保罗·拉博的“沙漠”讲道。1778年法瓦尔热到访时，新教徒已不再受迫害，但是他们对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所遭受的暴行仍然记忆犹新，敕令的废除剥夺了他们的所有公民权利，并引发了卡米撒起义和1702到1715年的内战。1745到1752年间，镇压措施恢复执行，拉博不得不躲藏起来，因为当局悬赏要他的脑袋。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主要合伙人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和他有私交，因此拉博和他的儿子，即后来在1789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让-保罗·拉博·圣太田，答应帮法瓦尔热促销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圣经》，还额外向他提供了一些胡格诺派牧师的地址，这些牧师将在他整个后续的旅途中，为他提供帮助，介绍客户。

戈德的信中出现的第一份订单是要105册《圣经》——加尔文教派版的《圣经》，其中增加了让-弗雷德里克·奥斯特瓦尔德（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的一个亲戚）的注释。它在法国是禁书，太危险了，不能经由里昂运输，因此戈德指导纳沙泰尔出版社经由陆路运到都灵（Turin），然后再运到尼斯和马赛，那里有他信赖的货运代理商。他没有被额外的运费吓住，又追加了100多册，此外还订购了大量品种丰富的世俗书籍，主要是六卷本的雷纳尔《哲学和政治史》。“此书非常畅销”，他写道。如果出版社能以最快的速度印制盗版，他就要订购50套。出版社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是它最大的失误之一，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戈德只好从一个胆子更大的盗印者那里弄来这些书。五个月后，由于出版社无法满足其他客户对这套书的需求，他还通过交换为客户提供了许多。

戈德如果认为一种书卖得火，就会毫不犹豫地订购50或100册。很

少有外省的书商能以这样的规模来经营，而且在整个1770年代，戈德的生意继续扩张。根据当时的资料，他的营业额高达600,000锂。^③这是一个家族生意：“戈德父子”（Gaude père et fils），1773年重组为“戈德父子和A.戈德公司”（Gaude père, fils et A. Gaude），1774年又重组为“戈德父子公司”（Gaude père, fils & Cie.）。【114】老戈德（米歇尔）在商业信函中继续以“我们”匿名称呼他们的公司，同时也披露了他的一些个人信息。在1774年10月18日的信中，他提到他儿子雅克最近结婚了，而在1781年8月22日的信中，他提到“桑斯，我的姻亲”——尼古拉-埃蒂安-桑斯，图卢兹的一位大书商，在订购图书时跟他合作。其他的信还提到他买了一幢大房子，建了一座新仓库。这些信都透露出生意欣欣向荣的气息，尽管也含有对1775年以后普遍的经济状况的大量抱怨。

戈德也出版自己的图书，主要是严肃书籍，都完全合法，如《公证人知识大全》（*La Science parfaite des notaires*）、《物理学词典》（*Dictionnaire de physique*）和《法国天主教教会史》（*Histoire de l'Eglise gallicane*）。他还利用博凯尔附近的图书集市把批发贸易做大，这个集市吸引了法国各地和欧洲很多地区的出版商和书商。因此戈德像阿维尼翁和瑞士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一样，用他自己印制的大部分书籍和包括许多瑞士出版社在内的出版商交换等价值的书籍。通过这种方式，他一边增加书店里可售图书的品种，一边建立起一个合作同盟。他下订单时优先考虑合作伙伴，其中除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有日内瓦的巴尔丹（Bardin）、洛桑的厄巴克和格拉塞，以及伯尔尼出版社。通常的做法是，他会用交换贸易来支付订单总价的一半，用汇票来支付另一半，汇票到期时，他就如实兑付。因为瑞士的出版商自己之间也进行交换，所以戈德如果想从他优先考虑的出版商那里要任何书籍，几乎都能弄到，而且，在供应图书的整个团体中，他可以把订单转给提供最佳条件的供应商，却不会被踢出这个团体。其实，他有时会从几家瑞士出版商那里订购同一种书籍，以便降低被没收或者运输拖延的风险。

纳沙泰尔出版社一开始就销售和货运条件与戈德进行谈判时，就学着了解他的谈判立场。他那一头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坚持要出版社让非法书籍（主要是新教书籍）经由安全但昂贵的都灵-尼斯路线运输。运过几次后，出版社提议用偷运过境的方法经由里昂将书籍运给他，“保险”比率为其价值的16%。【115】戈德把它砍到12%。后来保险系统遇到麻烦，出版社打算找一个可靠的货运代理商让它的书籍能够顺利通过里昂书商行会的检查。1773年7月，它宣称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近

期需要25册《圣经》和50册《诗篇》的戈德，把订货数量翻了一番。然而不幸的是，货物在瑞法边境滞留了，最后还是走了都灵路线。戈德抱怨这次耽搁，重申拒绝承担风险，并警告出版社说，法国政府非常严厉，把新教书籍看作最邪恶的、煽动性的和反宗教的书籍。他坚持说，如果出版社想和他做生意，就必须自己花钱让货物安全通过里昂。

随后四年，直到法瓦尔热到访尼姆，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在不断调整它在里昂的运营，而戈德也一直在订购书籍，尽管有些货运出差错。在出版社选定雷沃尔做它的里昂货运代理商后，路径似乎变通畅了，1778年他们的贸易得到了扩张。因此，当法瓦尔热走进戈德的书店时，他很希望做成一笔大交易。戈德当时想订购莫里哀、亚历克西·皮隆和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著作，这些书籍出版社都有存货。他自己则刚刚又出版了一版《法兰西学院词典》，销量稳定，书是给皮埃尔·博姆（Pierre Beaume）承印的，此人是尼姆的两家印刷商之一。戈德提议，他的订单费用，一半通过交换他的《法兰西学院词典》来支付，一半用通常的方式支付。不过，戈德和加里冈一样，要按照他为个别图书定的价格来交换，而不是以纳沙泰尔出版社喜欢的方式，按照折帖来交换。当法瓦尔热计算出要交换的书籍的相对价值时，他意识到如果依从戈德的提议，出版社会蒙受损失。而戈德则辩称，他能从其他经常与他进行交换的瑞士出版商那里弄到纳沙泰尔出版社所提供的书籍。如果不交换，他就不卖它的书了——这是法瓦尔热在和戈德谈判时遇到的分歧点。他找不到任何办法绕过它，结果只好在那个8月的日子里，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戈德的书店。随后五年，尽管出版社继续和戈德通信，却再也没有把他拉回正式的客户群。戈德从其他瑞士出版商那里弄到了他所要的书，包括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而在他停止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大订单之前很久，该出版社就已经将其大部分生意转向尼姆的另一家大书商比谢了。

浏览一下戈德的所有订单（可以把它们和法瓦尔热所拜访的其他书商的订单放在一起仔细研究，【116】这些都可以在本书对应的网站上查到），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教书籍构成了他生意的核心。在最常订购的书籍的书单中，排在前四位的是《诗篇》和《圣经》，以及克洛德·德朗日（Claude de Langes）的《旧约和新约史》（*Histoire du Vieux et du Nouveau Testament*）和达尼埃尔·德叙佩维埃尔（Daniel de Superville）的《真正的领受圣餐者》（*Le Vrai Communiant*）。戈德还订购了大量布道书，以及孔多塞赞同宗教宽容的论著《一个天主教徒对法国有关新教徒的法律的看法》（*Réflexions d'un Catholique sur les lois de France*）。

relatives aux Protestants)。启蒙运动的论著补充了戈德喜欢的宗教书籍，他从开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联系时起，就要求连同日内瓦版《圣经》一起，订购卢梭的著作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他的订单含有伏尔泰的几种论著，一起订购的还有3套48卷版的伏尔泰全集、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以及《危险关系》和其他各种书籍。戈德从来不要无神论书籍和非法的政治论著，订单中只出现一本毁谤宫廷的《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真实回忆录》(*Mémoires authentiques de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若是可以从他订购的那些种类繁多的书中发现一个大体模式的话，那就是：他选的书以新教书籍为主，辅以一些思想温和的书籍，如伏尔泰的著作这类启蒙图书。(4)

以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观点看，比谢类似于戈德。他做的生意，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规模都很大；他从许多供应商（主要是阿维尼翁和瑞士的供应商）处订货，自己也印几种书，通过交换来丰富图书品种；他主要经营同类图书——最重要的就是新教图书。他似乎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打开了大门。可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在给予比谢信任时太过轻率。经过五年的交易，他们终于发现他的房子是建在沙堆上的。1778年他的生意垮台，而随后他为了避免破产所作的努力，又暴露了一个貌似优秀但生意做过了头的书商的弱点。

比谢最初是在老吉永的推荐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联系的。吉永是偷运承保人，一直在博凯尔的图书集市上从书商中招徕客户。而从这个路子引进客户，对拥有图书贸易高档市场的生意是危险的。但是比谢很快就下订单购买新教书籍，【117】而纳沙泰尔出版社当然要抓住销售的机会。要是该出版社在发货前做过严格评估，它就会发现比谢早在十年前就曾因经营禁书而被禁止做图书贸易了。当时他的图书被当局没收，损失了600锂。(5)然而，不知何故，他竟然设法恢复了生意，还成为书商行会有完全资格的会员，而且他的生意在1770年代早期似乎发展得很快。当法瓦尔热于1778年8月到达尼姆时，他发现比谢拥有一幢价值20,000锂的住宅，并得知他曾鰥居过一段时间，最近又结婚了，而且从中获利颇丰。

比谢不像戈德，纳沙泰尔出版社和他就货运条款进行谈判时，议价不难。他最初的订单量就很大，其中包括几卷伏尔泰和莫里哀的著作，以及新教书籍。这些货都顺利地运到了他手里，直到1775年一件货物在里昂附近被扣。比谢为此次失误责备纳沙泰尔出版社，理由是他们把货包发了一个不能胜任的货运代理商，而不是他自己在里昂的货运代理

商加布里埃尔·雷尼奥（Gabriel Regnault）。不过，比谢对法国图书贸易管理人员佯称，他没有订购这些书籍，只是跟它们的转运有牵连，说服他们把书退回了纳沙泰尔——只有几种被严格禁止的书，如《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被没收。

这次意外发生后，比谢对禁书的兴趣越发浓厚了。他建议纳沙泰尔出版社印一版自己的《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印完后他还要购买500册，跟上回一样。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上钩。它很少印这种声誉不好的书，宁愿通过交换从印制它们的出版商那里弄一些来。印这种书的都是一些非主流的出版商，如日内瓦的让-萨米埃尔·卡耶、加布里埃尔·格拉塞和雅克·邦雅曼·泰隆。通过这些渠道，纳沙泰尔出版社也能提供大量的非法图书。从1774年年中到1778年春季，这些非法图书在比谢的订单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例如，在1776年9月5日，他订购了13册宣扬无神论的《揭开面纱的基督教》（*Le Christianisme dévoilé*）和26册《新约全书》。除了对新教书籍的稳定需求外，他的订单还包括了伏尔泰的许多论著、订数庞大的四开版《百科全书》，以及几种政治毁谤书籍，如《路易十五回忆录》和《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Mémoires de l'abbé Terray*）。【118】到1778年，从他订单的构成可以发现，他要冒更多的风险，而且付账也越发困难了。1777年12月，纳沙泰尔出版社拒绝了他以布瓦塞朗（Boisserand）之名开的一张期票。布瓦塞朗是罗阿讷的一个地下经销商，最近已为躲债而跑路了。1777年5月结账时，纳沙泰尔出版社发现，同一笔交易比谢在自己账上的贷方记了两次。在图书贸易中，会计差错偶尔会发生，但实力极强的书商——比如戈德父子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在法瓦尔热到访前几个月，纳沙泰尔出版社从比谢1778年5月4日的来信中得知，他已经暂停了所有支付。他的债务已高达30,012铔。他估算他的资产有53,026铔，不过这个数额包括了他对自己图书存货的估价（42,258铔，这数字未经证实），以及别人欠他的债款10,767铔。看起来要收回这些债务已不可能了，尤其是他的财务报告显示，他已经把12,412铔的债权作为亏损勾销了——那是他自1763年开始做生意以来别人久欠未还的债务。他说他总是以德报怨：造成这些亏损是因为“那些人不讲信用，而我却用君子之道待他们”。他还把问题归咎于当地经济不景气。不过他许诺，要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和他的其他债主一样，同意延长债务偿还期限，他就可能恢复他的生意；他会按5%的利息分期偿还债务，四年内全部还清。“我的提议是有诚意的，要是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我做我无法做到的事，就是要我彻底完蛋，而那

样的话我欠你们的债务也就跟着完蛋了。”

纳沙泰尔出版社不是第一次面对绝望的债务人的这种提议，知道这时决不能让步。它不想提升那些随时可能破产的商人的信用额度，而且它担心人们会在暗地里进行某种交易，让一些债主得利而让另一些债主吃亏。因此它答复比谢，只要他能找到值得信赖的人做他的赞助人，担保分期付款，就同意他的提议。比谢回答说其他债主都接受了他的条件，要是纳沙泰尔出版社把他告上法庭，可能使他破产，他就无法付清他的债务。如果给他四年期限，出版社就能够收回他所欠的所有款项，还带利息。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在信里向比谢表示难以接受，【119】一边又委托法瓦尔热，一旦探明尼姆的情况，就以出版社的名义进行谈判。他要查明比谢是否值得信赖，他生意的真实状况如何，并确定是否有任何可靠的人能为他的还债提供担保。

法瓦尔热拿着他先前在路上征得的几封推荐信，走访了一些商人和新教牧师。他的报告是很好的范例，说明了一位销售代表的收账职能，也说明了商人声誉的重要性。法瓦尔热咨询了最可靠的蒙托公司，这家公司告诉他，对比谢作出明确的评价很难，但是有很多评价是对他有利的。比谢很有事业心，做过大生意，在当前这场危机发生以前，他一般还是能按时付账的。他的第二次婚姻肯定能给他带来新的财富。在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依蒙托之见，比谢很可能会讲信用地偿还债务。可是新教社团的一位领袖拉博·圣太田的建议却正好相反。他警告纳沙泰尔出版社不要受比谢欺骗，不要接受长期偿还债务的计划，而应尽快收回所有能收到的现金，哪怕因此要勾销一部分债务也在所不惜。

掌握了这个矛盾的信息之后，法瓦尔热在格雷夫街比谢的书店里和他展开了交锋。法瓦尔热立即了解到，比谢没有现金，也没有人为他将来还债担保。然而，他的生意状况似乎也不是糟得一塌糊涂。当比谢像被逼到墙角的债务人一样出示他的账目时，法瓦尔热发现，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情况并不坏。而且从比谢的信函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许多债主——有巴黎的、里昂的、阿维尼翁的和瑞士的——都接受了四年限期的还债计划。法瓦尔热确信比谢没有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有过秘密交易。他们就清偿债务的所有可能性做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比谢争辩说，让他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去收别人欠他的债款，并通过销售赚钱，来还清他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全部债务：1,125 锂加上 5% 的利息，这是符合出版社的利益的。他已经承诺偿还其他债主共 20,000 锂了。“对一个外省书商来说，这是相当大的债务了”，法瓦尔热评价道。但比较让人担

心的是，有传言说比谢撒谎成性，显然没有把他危险的财务状况告诉他的新任妻子。

法瓦尔热没有当即拍板，【120】而是把事情留给纳沙泰尔的上司们去决定。他们想让比谢开出更好条件的尝试没有成功，最终在1778年9月同意了一个还款计划，要求比谢于1780年底还清他的债务。1779年2月，比谢恢复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他要了26册《圣经》，并计划预付款。虽然他承认他必须赢回他们的“信任”，他还是向纳沙泰尔出版社吹嘘说，他过去一直是行得正坐得稳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得过跟我的关系，你们公司都一定会从这个关系中受益。真诚和正直一直是我的为人之道，我决不会放弃它。”

比谢确实承兑了他还清债务的所有期票。他用他的存货图书开设了一个读书会作为他图书销售生意的补充；而且到1782年5月，他还自己印了一些书——主要是《论拼写》（*Traité d'orthographe*），并提议用它来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籍。虽然出版社没有同意跟他做这笔交换生意，但在随后两年里，它还是一直在为比谢的一些大订单供货。然而，1785年2月，他未能兑付355锂的还债期票，又要请求债主接受一个偿还计划，这次延长两年。事实上，如在1778年恳求通融一样，他一字不差地采用了同样的措辞：“我的提议是有诚意的，要是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我做我无法做到的事，就是要我彻底完蛋，而那这样的话我欠你们的债务也就跟着完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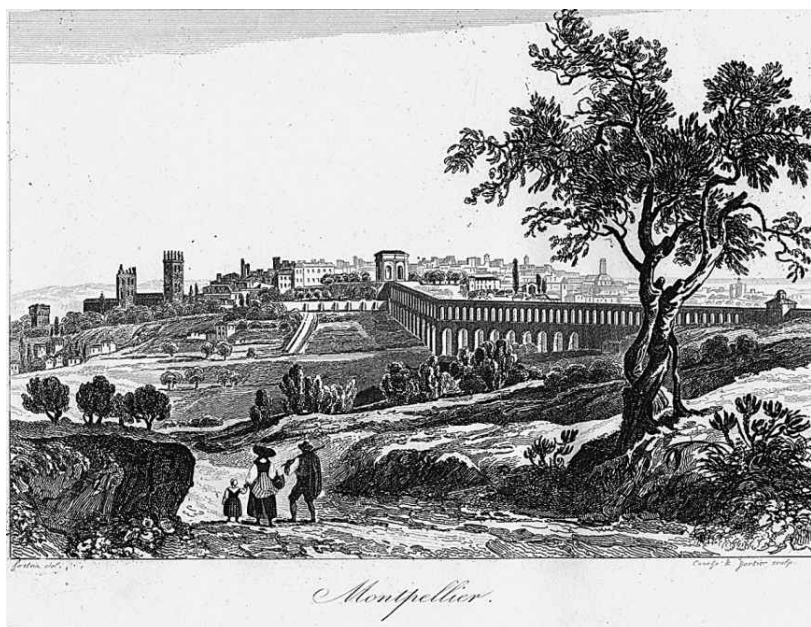
尽管这是老调重弹——其他各方债务人也听到了这种表达方式——纳沙泰尔出版社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考虑到比谢弄不到现金，它别无选择；他的债主如果把他逼得彻底破产了，那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总而言之，尼姆的一位商人就是这么建议的，但他还是认为这种还债计划只是一个“计策”，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债款这回是收不回去了。⁽⁶⁾三年后，比谢还欠着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钱。最后是在1788年4月，用一张240锂的本票和又一次图书交换计划，他才把账结清，这次是用他自己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诗篇》和新教论著《灵魂的食粮》。1788年10月，纳沙泰尔出版社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时，【121】他还在经营书店，管理着读书会，偶尔还出版书籍。

不过此时比谢已经沦为二流书商了。他在汇票上的签名不再被人当回事。一位专门从书商那里收账的商人兼银行家把他抛弃了，他还劝纳沙泰尔出版社也这样做：“比谢现在就是一个破落户，赚的钱仅够糊口。到处都有人在起诉他，可从他那里又得不到任何东西。”⁽⁷⁾

戈德和比谢之间的反差揭示了图书贸易中经营高端市场部分的书商出现的两种趋势。有些人规避了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的财务基础殷实，足能让他们防备不测，而另一些人则在追逐利润时自不量力，出具的汇票的金额超出了柜台销售所得。前者一般都会避免风险极大的图书，尽管他们店里也会存有大量的启蒙运动论著，并且十分依赖盗版书经营。后者也卖那些书籍，但是还卖一些只能藏在柜台底下的书籍，如无神论书籍和政治毁谤书籍。

蒙彼利埃

法瓦尔热到达蒙彼利埃时，他不再抱怨他的疥疮，却开始担心起他的马来。它老是因前蹄失控摔跤。法瓦尔热试着去纠正这种倾向，想不同办法为它钉蹄铁，可是可怜的马儿蹄子肿得太厉害，他只好采取给自己治病的法子来给马治病：放血（付兽医10苏）。“你要知道，我们更关心你的健康，而不是你的马的健康，”出版社本部的一封在蒙彼利埃等着法瓦尔热的信里这样说。从尼姆骑马到蒙彼利埃还是很轻松的；一旦到了那儿，人和马都可以歇息一些日子了。因为法瓦尔热和书店有许多生意要做，足够他忙几天的。



蒙彼利埃，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蒙彼利埃像尼姆一样，是一处繁荣的图书市场。其实这两座城市只

相距约56公里，有许多共同之处。1780年，尼姆有49,000名居民，八家书商，两家印刷商；蒙彼利埃有31,000名居民，九家书商，两家印刷商。两市都拥有大量新教徒人口，在中世纪，它们都曾享有一段商业繁荣时期。【122】虽然蒙彼利埃比尼姆小，却是朗格多克的行政首府。作为总督驻地，它拥有一所附有著名医学院的大学，以及几个高级法庭（不过不是省高等法院，它在图卢兹），有人数众多的官员、律师、教授和大专院校学生，此外，还有与大主教管辖区有关的神职人员，以及要塞里驻扎着的将士。在法瓦尔热到访时的蒙彼利埃，一个都市精英会经常光顾音乐会和剧院，出席所在学会的会议，订阅当地的报纸，也常去逛书店。

法瓦尔热检查了这些书店后，立即划掉了无足轻重的巴斯库（Bascou）和图尔内尔（Tournel）这两家。第三家是J. B.富尔（J. B. Faure），生意由寡妇贡蒂埃（Gonthier）继承管理，名声不错，但是不会下任何订单。第四家，亚伯拉罕·丰塔内尔（Abraham Fontanel），主要从事印刷业，卖书只是副业。第五家，塞扎里（Cézary），据说人很诚实，但是穷。两位印刷商，马泰尔（Martel）和皮科（Picot），他们的生意仅限于印制宗教小册子和应时印刷品。剩下的就是伊萨克·皮埃尔·里戈（Isaac-Pierre Rigaud），对外称里戈和蓬斯公司，【123】因为里戈吞并了阿尔贝·蓬斯（Albert Pons）的小生意，而蓬斯几乎就是一个旧货商。里戈给了法瓦尔热一份相当大的订单，法瓦尔热证实，出版社根据多年经历所掌握的情况不假：里戈还是像他们开始做生意时那样有实力。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里，里戈的信有99封，历时17年。这些信展现了一种经营模式，而这种经营模式在许多卷宗中都能见到。它表明了一位老牌书商是如何靠挤压竞争对手来控制一个外省首府的图书贸易的。里戈像尼姆的戈德一样，和他讨价还价很难，他躲避风险，眼睛紧盯着底线。虽然他千方百计挤压竞争者，但他从不口是心非，从不采用那些名声不好的商人常用的欺骗手段，那种人总会找借口逃避还债。供应商的服务每次出差错，里戈都要抗议一番，无论何时，一逮到机会就拼命压价，不过他一直按时付账。他是图书业最优品质的缩影：讲诚信，有实力。

关于里戈的最佳描述出现在1764年政府关于图书贸易的调查报告 中，在法瓦尔热到访的多年以前。根据关于朗格多克的报告，他是蒙彼利埃最重要的书商，表现突出，尽管没人能对他的财产做出准确评估。

有人估计他的财产有50,000锂或60,000锂，还有人说有150,000锂以上。之所以很难评估，是因为他的资产总跟他的生意相关，而不是实在的房地产，而且“他对于自己的事口风很紧”。根据报告记录，最重要的是他博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这位书商做生意天分很高。他是新教徒，为人诚实正直的名声，尽管他被指责传播大量新教书籍和其他禁书。但他在加入书商行会时出示过天主教领洗证明，而且从那时起，就已经在行使天主教徒的一些职责。”⁽⁸⁾

这个判断，从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的关于里戈与蒙彼利埃其他两位书商——塞扎里和丰塔内尔——的关系的报告里得到了证实。法瓦尔热在探听了当地人的意见后，对塞扎里做出了“很诚实”的评价，并从他那里转发了一份订单给出版社。这份订单含23种图书，多数都是拉丁文的医学论著，这肯定是为大学医学院的医生和学生准备的。其他书籍大部分是新教著作和历史书籍。

但是，【124】就在塞扎里可以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进一步发展生意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他的许多书都是从附近的阿维尼翁的印刷商那里进的，订了很多，能卖掉的却很少，结果货物积压得越来越多，发出汇票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却没有足够的现金兑付到期的汇票。阿维尼翁的三家出版商逼得紧，他说服其中一位名叫J.-J.尼埃尔（J.-J. Niel）的，从他的存货中选了一些书籍作为交换，以便勾销一笔1400锂的债务。从他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可知，尼埃尔选了一些最畅销的书，价值3000锂。他在信里还试图说服纳沙泰尔出版社延缓他兑付汇票的期限。后来情况急转直下，由于塞扎里拒绝交付那些书籍，尼埃尔便请来蒙彼利埃的法警查封了那些书籍，并运走了七箱，而塞扎里则躲了起来，以逃避进监狱。他母亲向法院申请查封书店，以免书店的存货再次被抢劫。塞扎里暗地里试图跟他的所有债主谈判。他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如果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就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所有债务。首先他需要从当局获得通行证，这样就可以将分期付款账单分发给通过他订阅《百科全书》的顾客。

为了就如何答复塞扎里的这一请求做出决定，纳沙泰尔出版社联系了蒙彼利埃的一位律师，还联系了当地一位名叫维亚拉尔（Vialars）的商人——此人是维亚拉尔父子与图隆公司的，一个新教徒，也是奥斯特瓦尔德的朋友。那位律师确认，尽管塞扎里仍然在躲藏，但他还是有能力还债的。他曾提交过一份资产负债表自行宣布破产，该负债表显示，他的债务是64,410锂，存货值42,668锂。他还拥有两处房产，总价

值30,000鎊。律師建議，給他充裕的時間，讓他恢復生意並以合理價格賣掉存貨，比強迫他倉促甩賣要好，那樣會使他破產，弄不到多少錢來還債。

1781年6月24日，塞扎里的債主或他們的代表在一起開了個會，討論合理的庭外和解方法。次日，塞扎里寫了一封信給納沙泰爾出版社匯報了會議結果。他解釋說，里戈給他的存貨估了價，現在正試圖說服其他債主逼他放棄生意。他唯一的生存機會，是債主能減掉他一半債務，然後給他六個月的時間來還清剩下的一半。“我是誠實的人，會嚴守信用，”他堅持說。【125】“我在这个世界的全部心願，就是夜以繼日地工作來清償欠你們的債務。”然而，塞扎里面臨着里戈這個強敵：“我非常痛苦地得知，本市某位先生（後面他指名道姓地提到里戈）利欲熏心，一心要置我於死地，為的是削減蒙彼利埃書商的數量，還想白白拿走我的書。他已經致信我的一些債主，勸他們不要接受這個安排。”

這是納沙泰爾出版社最後一次收到他的信。維亞拉爾後來報告說，債主們決定免除塞扎里的一半債務，並賣掉他的全部存貨來償還另一半。他們指定一位名叫呂克·比隆（Luc Biron）的代理商處置這些存貨，並在三年期限內付清它的估值。維亞拉爾懷疑比隆是里戈的代理人，但是納沙泰爾出版社沒有任何辦法來阻止這種安排。1784年3月，出版社收到了142鎊，是欠它的債務的一半。這時，里戈很可能按議價獲得了塞扎里的大部分存貨，那價格是他自己定的，然後塞扎里就從圖書貿易中銷聲匿跡了。^⑨

這場爭鬥不涉及個人恩怨。里戈只是要排擠掉一個競爭對手，而且如下面所說明的，他還會以同樣的辦法擠壓法瓦爾熱曾向出版社推薦過的另一位書商——亞伯拉罕·丰塔內爾。里戈在給納沙泰爾出版社的信中从不提及這些商戰，照舊只談圖書貿易，雖然在第一封信里他對奧斯特瓦爾德個人表達了問候。其實，正是里戈的信所表現出的這種嚴格務實的特征，使它們顯得有趣。它們揭示了一位成功的書商是如何協調供求關係，管理自己的生意的。里戈的訂貨單，一般都列有10到20種書籍，但每種只有寥寥數冊，這是為了能把個別圖書賣不完的风险降到最小，同時又確保貨物有足够的重量，使他付出的運費更便宜一些。他非常重視運費這個因素，重視程度超過了他在信中強調過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即速度。里戈像其他書商一樣，為了在市場上擊敗競爭對手，也要求能及時收到圖書，尤其是時下正在流行的書，即“新書”。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要求納沙泰爾出版社，如它的存貨中那些書籍不多，就推遲發運

所有货物，不要把其他书籍打成一个小包裹发货，【126】那样运费成本太高：“别向我们发运任何小包裹，运费太贵了。等到你们积累到足够的数量、达到一定的重量再发货吧。”

1778年8月里戈给法瓦尔热的订单显示了他进货方式的特点。该订单列有18种书籍，总共291册。⁽¹⁰⁾其中11种他分别订了2到4册，7种分别订了6册，只有一种订了12册：《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为青年教育和公用事业建立的各种机构的计划和法规》（*Les Plans et les statuts des différents établissements ordonnés par S.M. Impériale Cathérine II pour l'éducation de la jeunesse et l'utilité générale de son empire*）。限制每种书籍的订购册数，就能防止书籍卖不掉在库房积压。而如果他的客户一直需要某种书籍，他总会多订一些，按需求来调整供应量。

重复订购的模式反映了市场对某些书籍的持续需求，同时反映了里戈在货物储备上的保守态度。例如，1773年，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了盗版的巴居拉尔·达诺（Baculard d'Arnaud）的通俗言情小说《感情的考验》（*Epreuves du sentiment*），他订购了6册；然后追加订购如下：

1773年7月21日（首次订购）.....	6册
1773年9月20日.....	12册
1777年3月19日.....	2册
1777年9月26日.....	3册
1779年11月22日.....	4册

消遣小说的销售也符合一种类似的稳定而持续的需求模式，这可以从他订购里科博尼夫人、让利斯夫人和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著作的订单上反映出来。他重订次数最多的，即位列其最常订的“畅销书”书单（这些书单我已放到了网站上，和其他书商的“畅销书”书单放在一起）第一名的，是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乌托邦小说《2440年》。下面是此书那些年的订购情况：

1772年9月21日.....	12册
1773年9月29日.....	50册
1774年3月23日.....	12册
1774年10月14日.....	60册【127】
1775年8月16日.....	25册

1777年6月2日.....	20册
1779年11月22日.....	12册
1780年9月8日.....	13册
1780年9月13日.....	12册
1781年1月17日.....	12册
1783年11月7日.....	26册
总计.....	254册

要是里戈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册——书商们在择机“撞大运”（making a coup）时偶尔会这样做，而所谓“撞大运”，是当时书商们的一句行话，意思是找准时机下个大订单，从激增的需求中大赚一笔——这种投机就可以被看作某种赌博了。但是，在11年内反复订货，说明《2440年》这本书深受蒙彼利埃读者的喜爱——实际上在法国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

由里戈的订单可知，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所能提供的东西。里戈在一些信里注明，他一般都是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和新书销售说明中选择书籍。但是，有几次他也要求出版社为他弄一些存货中没有的书籍。他在信里提到这些书籍，并说他有許多供应商常常提出要为他提供这类书籍——用交换贸易的办法，这在第七章中解释过。里戈十分熟悉图书交换办法的运作，自己也利用他在蒙彼利埃印刷的医学书籍做过一些交换。因此他告诉纳沙泰尔出版社，不要把它在里昂、阿维尼翁和鲁昂弄到的任何书籍发运给他，他自己在这些地方已经做过多次交换贸易。如果个别图书纳沙泰尔出版社无法按时提供，里戈就从别处进，通常是找另一家瑞士的批发商兼出版商。他不让他们相互竞争，因为正如他所说，他不喜欢“砍价”。不过他有时也从几家供应商那里订购同一种书籍，以便有把握按时收到货品。他讨价还价时也很卖力。有时候，无论订购12册还是订购1册，他都会要求白送1册。他还要免费赠送书籍给他的个人图书馆。他一直在寻求低价购买畅销书籍，而且交货要最快，运费要最便宜。

无止境地追求廉价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质量问题——质量既涉及书籍的物理形态，也涉及它们的内容。【128】每当发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籍有缺陷时，里戈都会严厉批评。他痛恨纸张质量差，不仅仅是因为他那双专业的眼睛受不了，还因为不利于销售。在手工制造纸张的时

代，顾客对里戈在信中所强调的质量是在意的，这些质量包括纸张的白度、色调的均匀度、强度和重量。1769到1770年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印刷厂刚建起来，生产做工精良的书籍有困难，里戈对一些缺陷怨气冲天，譬如使用了老旧铅字，排字有错误，校对马虎，折帖组合有误，页边留得不合适，开本选得不对（他坚持《圣经》应该印成四开，而不是对开），等等。

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里戈都要检查一下书籍的物理质量：“不看一下就买是不谨慎的。”他常常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寄一两本书让他“试售”（*pour essai*）。对他来说，这种“试售”首先是一种测试市场需求的手段。如果这几册都卖不动，他就不再下订单了。虽然他好像特别擅长评估市场需求，但有时他也会失误。例如，有一本论及常用医疗方法负面作用的论战小册子，名叫《医学无政府状态，或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医学》（*L'Anarchie médicale, ou la médecine considérée comme nuisible à la société*），看上去在蒙彼利埃肯定畅销，因为医学院在该市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里戈曾经出版过在医学院引起争议的论著，并且专营医学书籍。得知有这本论著出版，他立即发了一份试售订单，“我们想订三四册《医学无政府状态》，把此书推广一下，如果卖得好，我们会下一份大订单。”然而这本书卖得并不好，所以他后来只加订了一次，而且只订了两册。

但里戈似乎也失手过一次，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受挫。事涉图书是《滑稽小说补编，或用作让·莫内传记的回忆录》（*Supplément au Roman comique, ou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a vie de Jean Monnet*），此书有关巴黎的剧院生活，但内容空洞无奇。他的首笔订单要了24册。显然是因为这些书卖得非常好，四个月后又订了100多册。但当这么一大批书延迟两个月后运到他手上时，他就有点后悔了：“我们终于收到了《让·莫内回忆录》，一本曾经那么吃香的书，现在却几乎无人问津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本杂编。【129】我搞不懂一本这样的书怎么会在有品位的人中间引起轰动。”他随后就再也没有订过一册，出版社的其他客户也不再订购了。

里戈要求出版社在他订购的图书中添加一些新的色情图书，想在主菜中撒上“一些调味料”。可是当出版社开始加进一些时下流行的小书时，他又不高兴了，说它们是一些“只适合小摊贩卖的书”。他喜欢有真材实料的书籍，包括多达数卷的几种，如保罗·弗朗索瓦·韦利（Paul-François Velly）的《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au règne de Louis XIV*)：“我们要试售两套韦利的《法国史》，十二开二十卷本，如果读者满意的话，我们再大量订购。”两年后他又订了两套；过了三年又订了四套。八套二十卷的著作，虽然是十二开的小书，却意味着比100本《滑稽小说补编》更大的投入。

根据里戈的订单对市场需求进行评估，关键是要考虑到开本和卷数以及订购数量之类的因素。根据他的订单列出的“畅销书”书单，《滑稽小说补编》排在第二位，尽管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看作畅销书；而《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根本没排上，虽然它最终占据了里戈一些顾客的书架的大量空间。考虑到这些特点，可以发现订货存在两种倾向：首先，对言情小说有需求，让利斯夫人、里科博尼夫人和巴居拉尔·达诺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对启蒙运动论著有需求，主要是梅西耶、孔多塞和伏尔泰的著作。

里戈生意的启蒙运动特点表现得比他的信函更明显。他订购了25册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无神论著作《自然的体系》，并且说，要是出版社能安全而及时地把货发运给他的话，他本来会要求订购100册的：“机会失掉了”，他遗憾地写道。他征集了大量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总共84个；并且在1779年11月得知卢梭的《忏悔录》在瑞士某地印刷时，他催促纳沙泰尔出版社给他发货，数量相当大。最后这本书他还是从另一家出版商那儿搞到的，【130】很可能是日内瓦出版社，1782年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卢梭去世后的第一版卢梭全集，包括《忏悔录》的第一部。之前的十年里，里戈订购过21套卢梭著作，版本从十一卷八开版到二十一卷十二开版不等。他批评道，有些单行本，如《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卖得并不太好，而且1782年卢梭的著作出得太多，市场已经泛滥饱和。

里戈对伏尔泰的书同样感兴趣，这也是因为它们具有销售潜力。1770年，纳沙泰尔出版社通知他，伏尔泰正在写一部巨著，即《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最终写了九卷，而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跟伏尔泰达成了出版协议。前文说过，伏尔泰这部书的纳沙泰尔出版社版，其实是日内瓦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克拉默出的原版书的盗版。伏尔泰更在意的是他的著作的传播，而不是想靠它们赚钱。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合作出版此书，是背着克拉默干的——也就是说，是伏尔泰在盗印自己的书，只是把文字随随便便修改一下就转发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不过这项秘密协议带来了无休止的纠葛和延宕。里戈一听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

知，便立即抓住机会要弄到样书。1770年8月，他订购了30套，9月又增订了50套。后来，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货发给他时，他大为恼火，抱怨伏尔泰以及出版社：“真让人惊讶，伏尔泰先生临到生涯完结时，还不能丢掉欺骗书商的习惯。如果所有这些小伎俩、欺诈和恶作剧都只归咎于玩弄它们的人倒也无所谓。但不幸的是，指责通常都是落到印刷商头上，甚至更多地是落到零售书商的头上。”

里戈不停地抱怨着，直到1772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卷书运达。他批评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版和克拉默版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对他的顾客来说可以忽略，可是他却因为耽搁失掉了销售时机。不过，也许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倒霉，因为1772年6月，他又订购了12套，1773年6月加订1套，1774年9月又订了2套，总数达到95套——对一部九卷本的著作来说，这是个骄人的数字了。

里戈的信中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表明，他觉得有义务把启蒙运动当作一桩事业，或者说他赞成它的理想。【131】他也许像其他新教徒一样，赞同伏尔泰的宽容和理性的价值标准，但是这从他的信中看不出来。信的主题就是钱。很偶尔地，他会在谈生意的时候作一些个人评论，显得他也是个明白人。他指出，图书生意“跟珠宝生意很像——也就是说，一旦一种式样过时了，怎么压价都卖不掉”。图书是奢侈品，“是一种消费缓慢的商品……图书不像肉和面包”。但里戈仍然尊重几种经典书籍，如莫里哀的书，他的书“无论何时何地，始终都会畅销”。他也关心同时代作家的命运，特别是那些畅销书作家，如梅西耶、兰盖，尤其是雷纳尔。1778年卢梭和伏尔泰两人都去世后，在书商的信函中，雷纳尔引发的评论比其他任何作家都多。1781年，里戈问纳沙泰尔出版社：老神父在他的《哲学和政治史》遭禁后被赶出法国，打算定居瑞士，还要娶“一个年轻可爱的瑞士姑娘”，这个传闻是真的吗？“你们肯定理解，从一般人到每个书商，都必定会关心这位名人的命运。”

里戈的信不谈政治问题，除非涉及政府的图书贸易政策。不过，他确实订购过一些攻击1771到1774年间莫普内阁的激进著作。几年间，掌玺大臣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坦·德莫普（René Nicolas Charles Augustin de Maupeou）改革了司法体系，摧毁了高等法院的政治权力，并激起了一波反政府的抗议浪潮。这些著作就是在路易十六1774年5月登上王位和莫普8月倒台后出版的政治毁谤书籍。当里戈得知《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

(Maupeouana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t familière du chancelier

Maupeou avec son cœur Sorhouet) 将于1775年4月发表，他立即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赶快发运100套给他。这套两卷本的讽刺作品销售得很快，以至于起初出版社从其他出版商那里都换不到，于是里戈转向别处订购。但是他顺利地出版社下了另一部类似且同样流行的著作的订单，即《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政体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Journal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opérée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par M. de Maupeou*)，他订了28套。【132】尽管这种政治书籍激烈攻击的目标是不复存在的政府，但是仍然被路易十六当局视为具有强烈煽动性——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版一些丑闻轶事以飨读者，就传播了一种概念，即波旁王朝已经退化为专制统治。里戈订购这些书籍时附带有条件，即出版社要承担全部风险。他“不承担风险”，这是他信中常用的词语。他不像那些边缘书商，从来不大量交易禁书。他卖过一些，如1764年监督官员在报告中所提到的，但是他自己不愿承受任何危险。不管他持什么政治观点，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做生意是非常保守的。

因为某些原因，1776年的卷宗里没有里戈的信。（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本上看，那一整年他都在和出版社做生意。）随后十年里，他的信表明他操心的事仍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在使劲地砍价，抱怨货运耽搁，强调规避风险。1777年法令生效后，他担心打击盗版的运动会在他和瑞士供应商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但是直到1779年该法令都没有认真实施，而且对他的生意似乎也没有约束力。1783年以后，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货开始减少，当时出版社的财务危机迫使它削减出版业务。而里戈在1780年代后期也遇到了日益严重的困境。1786年2月，他付清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份账单——和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一丝为难。1787年7月27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表明时局艰难：“我没有经常给你们下订单，这不是我的错，是读者的错，他们好像都不积极买书了。”这时候，读者都转而阅读报纸和小册子。从里戈的经历来看，图书贸易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

纳沙泰尔出版社在蒙彼利埃的另一家客户亚伯拉罕·丰塔内尔，是在里戈的阴影笼罩下做生意的，不过他的生意仍做得不小，在出版社的档案中也拥有可观的卷宗，而他的来信之所以有趣，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一位小零售商如何在地方市场边缘勉力谋生的叙述。

1772年8月，【133】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丰塔内尔的第一封信，当时他打算在芒德开办一个读书会。芒德地处遥远的洛特河谷上游，在

朗格多克-鲁西永的塞文山脉边上。这是新教的领地，丰塔内尔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胡格诺派关系人那里得到了它的书目。这位关系人名叫让-弗朗索瓦·马勒布，是卢丹的一位书商。丰特内尔是学美术和雕刻的，在图书生意上毫无经验。但是他想他可以进一些瑞士的廉价盗版书，开个书店，兼做读书会。他提出他可以把书目上的书各买两册，目的是卖一册，出借一册。研究了书目之后，他于9月订购了23种图书，大多涉及医学、农艺学和自然科学。一个月后，他通知出版社，他搬到了蒙彼利埃，指望在此地弄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作为书商来经营了。11月底，他订的第一批图书到货。虽然觉得运输费用昂贵，但他还是很满意，要继续订购。他尤其想要有关内科和外科的书籍，因为注意到它们在有医学院的蒙彼利埃卖得不错。

1773年5月，丰塔内尔的小书店开张了。同时他得知，从瑞士订购书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曾以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可以把给他的货物混在给里戈的货包中一道运输，这样最划算。可是里戈却把给丰塔内尔的货物扣了下来，结果耽误了销售；而且里戈在把货物送给丰特内尔之前，还抽掉了出版社的书目单，因为不想让他订更多的书籍。丰塔内尔只好放弃了跟里戈的合作关系，但这样一来他就遭遇到长途图书贸易的各种常见困难：发货时间太长，中间人收费太高，货物运到时常常损坏严重。此外，由于里戈施压，蒙彼利埃的装订商也拒绝帮丰塔内尔装订，而从纳沙泰尔运来的货包中，书籍的折帖往往松散零乱。因此丰塔内尔要求出版社对他采取不同于对别人的做法，就是把书装订好了再发运给他，而且在安排任何货运时，都要避免让他的货物落到里戈的手中。看着里戈把塞扎里搞垮，并且使其他书商边缘化，他为自己的生存感到担忧。然而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生意做大，【134】并渴望订购价值上千铢的图书，以便充分利用蒙彼利埃的市场，“在这里，新书，尤其是哲学书籍卖得相当好”。他在早期的一份订单中指定，“除了六册《自然的体系》、六册谢弗里耶（Chevrier）的《叫卖圣经的小贩》（*Le Colporteur*）、六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类似的书籍（即哲学书籍）每种都要订两三册。”

出版社无法接受丰塔内尔的条件，但是在1773年5月，它同意接受一种“保险”业务，就是如第二章所说明的，以货物价值的16%作担保将图书运过边境，如果被没收就提供赔偿。出版社提议支付4%的运费，并承担最远运到索恩河畔沙隆或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费用。丰塔内尔不干，要求出版社承担运至里昂的所有运费和风险。谈判在这一点上搁浅了，直到1775年1月才恢复，这时丰塔内尔付清了头几份订单的货款，

出版社同意支付到里昂的一半费用。3月，他下了一份大订单，指出特别要订购“你们叫作哲学书的书，和通常卖得最好的书”。后来他又决定从弗朗索瓦·格拉塞那里搞到这些禁书，格拉塞是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常常以比纳沙泰尔出版社低的价格抛售。尽管如此，从1775年12月丰塔内尔下的大订单来看，他还是从纳沙泰尔进了大量的货，其中包括品种广泛的图书，从历史和游记类书籍到小说和纯文学。“最近我开了一个以订阅为基础的读书会，这将给我机会向你们订购一定数量的优秀小说和其他文学书籍，”他解释说。

丰塔内尔的读书会似乎曾经是他生意的核心业务。它将顾客吸引到他的店里，而他就用库存的图书出租，并且出售它们。他还做起了印刷和绘画的副业。1778年法瓦尔热来出差时，对他的书店做了这样的评估：“丰塔内尔，一般。他的生意更多的是肖像画和印刷，而不是经营图书。”在1780年代早期，丰塔内尔主要就是靠这些副业生存的，所以尽管那时当地的图书贸易萎靡不振，他的生意还是撑了下来。由于获得了经营图书销售的营业执照，他现在已作为正式书商被列入《出版年鉴》，对未来抱有信心，如他在一封写给出版社的信中所指出的：“我的图书生意越做越大，其他的（书商）都不再干了，只剩下我跟里戈。

【135】这令他极度嫉恨，他就想独霸一方。他天天把对我的仇恨挂在脸上。”

然而，1781年8月，丰塔内尔未能付清一张660锂的汇票，到11月仍然无法弄到现金，当时他正在波尔多出差并且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妻子原来一直留在蒙彼利埃照管店面，这时只得前去照料他，而出版社也同意将还债期限延长到他身体恢复健康。身体康复后，他在蒙彼利埃恢复了对财务状况的控制，并继续订购图书。1782年5月，他报告说他的状况似乎前途光明。他资助建立了一所绘画和雕刻艺术专科学校，省里还奖励他一份年金，并授予他绘画赞助者和监护人的荣誉称号，“对我来说，这会让某些事情稍微方便一些”，他说道。从他的订单可知，他的存货品种非常丰富，包括新版的卢梭著作——对此书他要得尤其急切。到1782年底，他付清了他和出版社的往来账目上的全部到期汇票。

后来，命运的车轮再一次转到了对丰塔内尔不利的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从1783年起，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来信了。他或许像其他边缘零售书商一样，也陷入了“订得多，卖得少”的困境。1784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又一次向维亚拉尔父子和图隆公司求助，催收丰塔内尔积欠的1216锂债务——这对一个小书商来说可是一笔

相当大的金额。维亚拉尔跟他商谈了一个偿还计划，但丰塔内尔无法实现。按照维亚拉尔的说法，问题是丰塔内尔生意扩张得太快了：“我认为他做了力所不及的事。”随后两年里，“靠着恐吓和催逼”，维亚拉尔陆陆续续收回一些小额债款。维亚拉尔写道，把他告上法庭一点意思也没有，因为要是把他逼破产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明白，除了继续要求他分期支付，加大对他的威胁之外，没有什么办法。”⁽¹¹⁾ 1786年9月，还完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笔欠款后，丰塔内尔仍然背负着218锂的债务，而出版社已经停止向他发运书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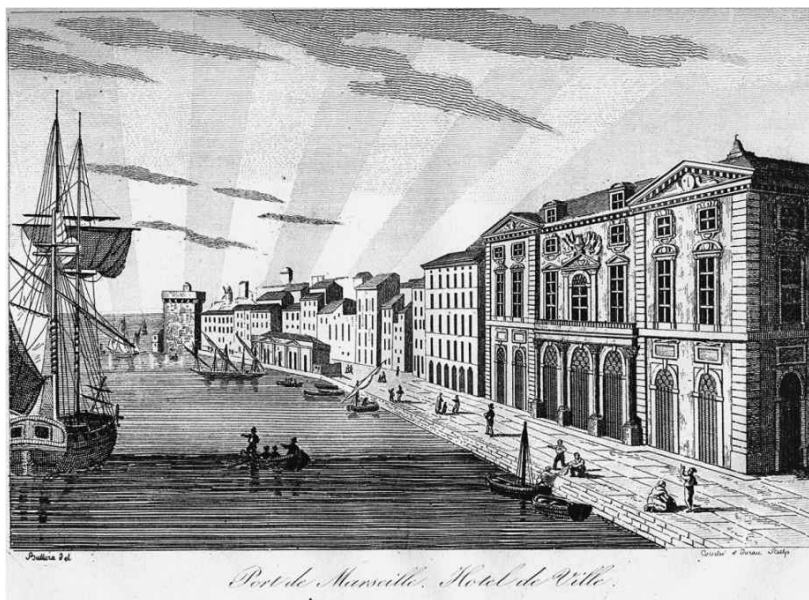
到那时为止，丰塔内尔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做了不少生意，可以让我们对他的生意状况有个大概的了解。他的订单反映出对卢梭著作的强烈需求，不论是早期版本的全集，还是死后出版的全集补编，包括《忏悔录》。【136】他的存货中有伏尔泰的许多著作，和几乎全部的“哲学书籍”，但是正如他在信中所解释的，他喜欢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订购这类图书，费用比纳沙泰尔出版社低。也如他在信中所提到的，他尤其需要医学书籍，如阿尔布雷赫特·范哈勒（Albrecht van Haller）和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的论著，以及萨米埃尔·奥古斯特·蒂索的通俗小册子《癫痫论》（*Traité d'épilepsie*）、《论文人保健》（*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手淫》（*L'Onanisme*）和《大众健康指南》。丰塔内尔订购的书籍中，最稀罕的要算巴纳贝·菲尔米昂·罗苏瓦（Barnabé-Firmian du Rosoi）的历史剧《亨利四世歌剧》（*Henri IV, drame lyrique*），这本书别的书商从未订过。像许多其他书商一样，丰塔内尔也喜欢经典作家如伊拉斯谟、塞万提斯、拉封丹和莫里哀的著作。他也需要品种繁多的各类新教书籍、教育方面的论著、历史书籍和小说，如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反复无常的不幸》（*Les Malheurs de l'inconstance*）和巴居拉尔·达诺的《情感的考验》。

这些书很可能在蒙彼利埃流传很广，而这要感谢丰塔内尔的读书会。可惜的是，他没有说明这个读书会是如何运作的，常去光顾的是哪些人。可以想象，当地要塞的军官和总督府的行政人员、大教堂的神父在精读丰塔内尔书店架子上的图书，翻阅他的雕刻画作品宣传册，交流对最新版的卢梭和伏尔泰著作的评价。法瓦尔热拜访丰塔内尔时，也许混入了这类顾客当中，尽管他对书店的气氛一字不提。丰塔内尔本人也说得很少；而当他大胆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时，都是作为一种自明之理来表达的，几乎是所有小书商都会说的典型的行话。“时局艰难啊”，他在一封信中说道；在另一封信中还说，“我干活是为了挣钱，不是要浪费钱。”

法瓦尔热经常听到这些套话，它们有许多变体，尤其是在他旅行的下一站马赛，他在那里见证了一种与蒙彼利埃的里戈和丰塔内尔之间的矛盾相似的冲突。在这个大型的外省中心城市，一种模式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贸易的中心区域，法瓦尔热几乎每到一处都会遇到一两位强势的书商，以及几位在边缘挣扎求生的经销商。

马赛【137】

新教徒落在了身后，地中海展现在眼前：法瓦尔热一到马赛就知道，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8月15日，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给出版社，这天是“圣母升天节”假日。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都不开门，要塞炮声隆隆，港口船只的鸣笛声不绝于耳，都在向圣母致敬。马赛（1780年人口约85,000）是法国第三大城市，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海港。地中海周边的人聚集于此，许多人身着各式各样的本地服装，蜂拥穿过马赛的街道，表现出在瑞士无法想象的狂热劲儿。当时有人描述马赛人“放浪形骸、生气勃勃，喜怒哀乐都无法自制。他们性情奔放，热血沸腾，脾气暴躁，遇火即着”。他还注意到人们普遍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纵情酒色”。^{〔12〕}诚然，这种描述符合当地的“风俗”，那是18世纪游记文学都会使用的标题，【138】内容全是些陈词滥调，其中有些至今还在流行。不过，这种描述也不全是废话，因为尽管夸大其词，它和文学市场还是有所关联的。



1764年，当地的总督报告说，有关书商和印刷商的全国调查一定不能放过马赛，因为非法书籍和小册子在这里泛滥成灾：“它们对宗教和道德造成了同样致命的破坏，并引发了无节制的舆论自由，这有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后果。”马赛有一个书商行会，负责检查所有进口书籍，但是总督指出，总有各类书籍瞒过检查员的眼睛，尤其是经由尼斯运输的书籍。他呼吁加强监管。⁽¹³⁾政府最终做出回应，派来一位非常严厉的图书贸易检查员，名叫皮埃尔·迪朗（Pierre Durand）——按照法瓦尔热的形容，他是一个为了让自己的盘子里有肉会把兄弟吃掉的人。⁽¹⁴⁾

鉴于这些情况，法瓦尔热专门下了一番功夫谋求让·伊斯纳尔（Jean Isnard）的帮助，此人是一位书商，可以帮助日内瓦和洛桑来的货物顺利通过书商行会，他同意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在法瓦尔热走访了马赛的19位书商后，伊斯纳尔获得了他的好评。尽管马赛的书商人数众多，但是大多被归为“一般”，或者干脆就是“差”。法瓦尔热在给出版社的报告中，做了这样一份简单的介绍：

阿莱芒（Allemand）：一个年轻人，继承了父亲的图书存货，但没有好好利用。名声差。最好别跟他做生意。

布瓦耶（Boyer）：不在，去美洲了。

阿贝（Abert）、尚邦（Chambon）、帕里斯（Paris）：都不值得信任。

鲁莱（Roulet）：一般，可以用现金交易。

泰纳（Taine）：佳，但只偶尔订购几类书籍，维持他的读书会，这是他的主要生意。

伊斯纳尔：极佳，但是要退休了，正在甩卖他的存货。

叙布和拉波特公司（Sube et Laporte）：极佳，而且有同情心；很快就会下订单。

卡尔德塞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下文）。

其他人都没有必要评价，无信任可言。

事实上，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马赛几乎只跟该市最大的书商让·莫西（Jean Mossy）做生意，莫西还兼营印刷和出版业务。【139】在出版

社的档案中，他的卷宗里有48封信，很值得一读。莫西不只谈论和生意直接相关的事，对各类主题也会随口加以评论，而且是用个人的语气。他给人的印象是唠叨、诙谐、狡诈、谨慎和坚韧——与出版社在法国北部的客户差异很大。而且，由于莫西常常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最新的出版物、作者，以及经济状况，因此，他的信可以被当作图书贸易以及旧制度时期最后二十年困扰马赛的市场萧条的实况播报。

莫西最初几封冗长的信中，有一封是1771年12月25日写下的，他在信里回避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要和他建立生意往来的提议。出版社声称能以低于他的法国供应商的价格供货，出的是标准价格，每张折帖只有1苏。由于法国政府刚刚开征纸税，每令（500张）20苏，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是用法国境外生产的纸印刷，所以具有无与伦比的价格优势。莫西在回信中指出，法国政府为了抵消国外纸张在成本上的不公平优势，也开始对进口图书征收很重的税：每英担60铤。他堂而皇之地宣告，不管怎样，他是不会去讨论这些财政上的考虑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我不会向你们隐瞒这个事实，我是一个优秀的法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决不愿意讨好可能伤害同胞的企业。”^{【15】}

这纯粹是一句空话。莫西接着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表示了祝贺，说它关于盗印布干维尔（Bougainville）的《世界环游记》（*Voyage autour du monde*）法文版的决策非常英明。在后来的信中他透露了一些信息，说他和国外的一些盗印出版商——包括在日内瓦、伊韦尔东和伯尔尼的瑞士出版社——有广泛的联系。他解释说，真正的困难在于，他与其他出版商的关系都是以交换贸易为基础的。通过和他们交换折帖，他获得了自己书店所需的普通版图书存货，同时使他自己出版的图书避免了积压的危险。他的零售生意不大，而他不愿意撇开现金交易；所以，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坚持要把书卖给他，而不是拿一部分来换他的书，他就不可能和它做生意。他承认，图书关税有可能掐断法国书商与国外供应商之间的所有贸易，【140】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道：“对此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叹气而已……患了重病，就要用猛药，虽然会伤身体，但是能救命啊。”然而，这种姿态使他的谈判立场更为强势：莫西愿意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但只能按他的条件，交换图书，而且要换新书。像其他成功书商一样，每种书籍他都只要几册，并且将各种门类的众多书籍凑成一个相当大的货包，从而节省运费。在某些情况下，他计划在订货之前就向顾客预售。最重要的是规避风险：“说到新版书，我不会操之过急。它们并非都能畅销；除非我了解它们，否则我不可能大量订购。我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的销售不错。此外，现在市场非常萧

条，尤其在这个城市，人们做事必须小心谨慎。”

这种营销策略是在法瓦尔热的日志中被评为“佳”和“有实力”的经销商的典型策略。然而各类商品在马赛都享有庞大的市场，莫西作为该市最大的书商，可以订购大量图书。1768年，他顶着其他印刷商的奋力阻挠，悍然侵入他们的领域，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厂。马赛当时总共只有三家印刷厂，而莫西向当局指出，根据1704年法令，马赛是可以拥有六家印刷厂的。到1771年，他雇用了60人，把他的书店和他在马赛兵工厂建的印刷厂联合起来经营。⁽¹⁶⁾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其他印刷商都只印制宗教书籍和行政机构要求的应时印刷品，而莫西跟他们不一样，他印普通版图书和商业性期刊《马赛广告报》（*Affiches de Marseille*），后者在1781年被他用更具雄心的《普罗旺斯报》（*Journal de Provence*）所取代。莫西还办了一个订阅处（*bureau de recette*），顾客可以在此订阅其他报刊。此外他还充当批发商，向马赛及周边地区的小书店供货。他集印刷商、出版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于一身，成了全省图书贸易界最富有、最显赫的人物。⁽¹⁷⁾

若仅从尚存的两份职业名录来看，马赛的图书贸易似乎是很兴旺的。1777年的《出版年鉴》列出了马赛的全部19家书商，而1781年的《出版年鉴》列出了14家。【141】但是正如书商人数波动所暗示的，这些零售商大多数做的都是小生意。“他们的名声都相当好，就是财力不足”，马赛的出版业仍然欠发达。⁽¹⁸⁾

为什么马赛的图书市场相对较弱——甚至比人口少得多的贝赞松和鲁昂还要弱呢？关键因素是该市的行政和法律体系相当薄弱。像贝赞松和鲁昂这样的外省首府都有高等法院、总督府，以及各类官方机构，其支撑者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阶层。邻近的艾克斯由于有高等法院和行政办事机构，因此招揽了许多省内的法律事务，而马赛不同，它从来只是个商业中心，主要依附于它的港口。当然，马赛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会热衷于买书吗？遗憾的是，法国各地的书商都很少在他们的信函中说明顾客的身份。就算这样做了——像提及《百科全书》的订户这样的例外情况⁽¹⁹⁾——他们所提到的更多是律师、医生、行政官员和教士，而不是生意人。但是这个证据太弱了，不能支持商业和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对图书没有需求这样一个普遍结论。此外，马赛的另一位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广泛生意往来的书商卡尔德塞格，其档案中有几句评论显示，马赛至少有一些商人会花钱买书，有时花钱还不少。卡尔德塞格在退出生意之前，征集了许多《百科全书》订

户。他在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标明了12位订户的身份，其中就包括一位步兵上尉、一位代理人、一位零售商和八位批发商。

莫西虽然没有标明顾客的职业，但是谈到他们一般的性格特征：“你们想必知道，读者最没有耐心，普罗旺斯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心急火燎的。”莫西的顾客要求送货迅速，而且要最新出版的色情书籍。因此可以预料，他经营了大量禁书。这类书籍在马赛很畅销，正如1764年的调查报告所提到的，像卡尔德塞格这样的边缘小书商，会在这部分图书生意上大肆投机。

然而莫西不做这种投机生意。确实，当他看到地下贸易有机会出现热销品时，他也会抓住机会，但他只在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才这样做。

【142】1774年，有关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政治危机的书籍开始问世，他订购了一些，但坚持要纳沙泰尔出版社让货物在最危险的里昂书商行会顺利过关。《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一书，基本位列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也是如此，他听说当局突袭巴黎某家书店没收了此书，就立刻订购了40套——巴黎的事件“将使此书在这一带非常畅销”。当新出版的书亮相市场，只有当他觉得肯定能迅速卖掉时，他才会抢购。如果不能马上供货，他也不会订购，哪怕是伏尔泰的著作也不要。实际上，他像尼姆的戈德一样，对伏尔泰的著作大量充斥市场很不满，它们不断被盗印，同时又修修补补，想方设法弄得像新著，实际上还是老内容。“我们做生意的技巧不是要弄到太多的存货，并尽快把它们处理掉……伏尔泰先生的新著作，除了首次问世的时候畅销，过后都卖不动，因为它们一直在一版接一版地微调。往里面添加两三篇（旧）文章就又变成了新书，而这种所谓的新书往往一直待在角落。”

简而言之，莫西做生意所遵照的策略基于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密切地跟踪市场需求，二是要规避风险。他预计能卖多少就订购多少，从不多订。“我必须根据我的销售来估算”，他如是说。他从不冒险下大订单，而是先要几册试试，如果卖得好，就再订。“只有知道了一种商品的价值，并且想到它很可能会成功之后，人们才能全力投入。”总之他一贯谨慎行事：“要是我们的经营不以谨慎为先导，那么很快就会出局。”

道理似乎很浅显，因为商业贸易就在于尽力使供求达到平衡。但是很少有书商能像莫西这样不懈地遵守这个原则，他们常常高估销售潜力，而他们的失算就会导致请求供应商推迟兑付汇票。莫西总能按时支付他的汇票。他也会视情况增加或减少订货，情况有经济方面的，也有

政治方面的。由于他在订货时还顺带说了那么多业内的事情——不像大多数书商，他们的信始终简明扼要——因此，他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提供了有关图书贸易状况变化的丰富信息。

他最初的来信中，【143】一连好几封都在强调应对进口图书关税的问题，并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供应路线。到1775年年中，关税取消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也让货包顺利通过了里昂书商行会。1777年，莫西雇请了自己的货运代理商鲁贝兄弟公司，该公司能在没有管理部门找麻烦的情况下把货运到马赛的店里。主要路线是从纳沙泰尔到蓬塔利耶、里昂和马赛，当时运作相当好，尽管有时运输要花两个月，而且费用高达货物价值的15%以上。然而，1776年底，皮埃尔·迪朗，那位被法瓦尔热形容为凶得要吃人的警察官员，开始担任书籍审查官。莫西后来把这一打压归于政府发动的消灭盗版运动的第一步，消灭盗版也是1777年法令的首要目的。正如法瓦尔热在里昂和阿维尼翁了解到的，参与图书贸易的每个人都在担心，政府将如何执行允许书商让书商行会在他们库存的盗版书上打上印记再卖掉的政策，并且将如何进行打击盗版的运动。

新法规在马赛和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未能有效实行，直到1778年春天。3月，莫西完全中止从国外供应商处订货，并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都无法恢复贸易，因为迪朗太严厉了，莫西说他是全法国最僵化死板的审查官之一。“货包都被翻得底朝天了，所以我决定暂停订货，直到这第一把火烧尽为止。我已经同意把我所有的盗版书都打上印记，现在正在操作当中。审查官天天到我店里来。可想而知，对我们的生意来说，这些日子可真不怎么好过。”

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全力重新打通了走私路线，他们还是停了一年没有向莫西发货。但即使如此，莫西仍然减少了订单，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使经济陷入低迷，图书贸易也颇受连累。莫西报告说，他在本地小零售商中的客户都不能按时支付汇票了，他还担心远方发生的事件给他造成的危险，因为他在加勒比地区有40,000铌的投资。

反盗版运动在马赛继续进行，严厉得无以复加，以致莫西担心他的信函会被拦截，甚至他的书也可能会在某次对书店的突袭中被没收。

【144】1782年6月，他耍了一个在图书贸易中相当常用的诡计：他发了一封假信，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停止发运所有不能在书商行会公开顺利过关的书籍。他留下这封信的副本放在文件夹里，作为他遵守政府法规的证据，然后又在一封密信中解释了这个计策，通过安全路线寄出。

他还指示出版社在它的下一封信中说，它们只是请他做货运代理商，把货物转运给意大利的客户，而且发几个要接受货物的意大利书商的姓名和地址，让出版社自己的假信也显得真实可信。

莫西靠这种诡计干了一年多。他坚持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写信时措辞要极其小心，把货物发给他时，要做得好像是要运给热那亚的格拉维耶（Gravier）或罗马的布夏尔（Bouchard）。因为鲁贝可以把货包从马赛港口安全地运给他，所以他主要关心的就是里昂了。出版社同意承担货运系统中这一段运输的风险。它主要依赖其最专业的偷运者雅克·雷沃尔，此人赢得了莫西的尊重，但是莫西担心里昂书商行会似乎对雷沃尔已经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被没收过几个货包。

随着这些安排最终开始顺利运作，货物也安全运达，莫西写信的口吻变得更加信任了。他只订购他觉得顾客肯定会买的图书，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品味，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对市场出现的图书的质量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他不喜欢的书籍。他轻蔑地表示亚历克西·皮隆有一版著作乏善可陈：“我认为作者名字很响，但书本身的内容并不怎么样，废话连篇。”他批评了皮埃尔·贝尔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与批判词典》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的一个糟糕版本，说它是一部“冗长乏味的狂想曲”。尽管他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反路易十五及其情妇们的政治毁谤书籍，但他对其中一些评价很差。他宣称，《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真实回忆录》“是一本实在不值得劳心费力去印刷的书”。

让莫西感兴趣的作者是那些在大革命前夕最广为人知的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当局的迫害。他也许纯粹是因为爱闲聊才收集有关他们的信息，【145】但是，通过专业秘密情报网收集信息确实是书商生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莫西常常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问询有关雷纳尔、梅西耶以及“声名太臭的兰盖”的报道——他指的是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y Linguet）这位喜好论战的记者。1780年，兰盖因蔑视法国政府被关进巴士底狱，后来叙述其这段经历的《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 1783）成了畅销书。卢梭于1778年去世后，生意圈内谈论的全是猜测《忏悔录》是否存在。莫西想成为最先拿到此书的人，“我们听到很多有关J.-J.卢梭这部遗著的消息……人们正在谈论他的生平，而这本书就是他的生平回忆录。有传闻说这本书现在正在瑞士印刷。人们当然会大量订购。”

最终莫西的书店成功地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版的卢梭著作，很可能是从日内瓦的出版社设法获得的。鉴于此，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中

没有卢梭的著作，订购书单中最显眼的仍是他经常提及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如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以及梅西耶的《巴黎图景》《2440年》和《我的睡帽》（*Mon bonnet de nuit*）。书单中也包含一些实用书籍：有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一本德语教材和《性病论》（*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还有几本经典，如《拉封丹寓言集》（*Fables de la Fontaine*）和《塞维涅夫人书简集》（*Lettres de Mme de Sévigné*），以及几部言情小说，如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奥利维耶神父（Abbé Olivier）的《倒霉的那不勒斯人的奇遇》（*Les Aventures de l'infortuné Napolitain*）和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伤感之旅》（*Voyage sentimental*）。莫西总能根据公众的需求精心选订图书。当然，他也会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进一些别的书，他还表示自己常常会从瑞士的几家出版社订购同样的书籍，以便有把握及时获得足够的供货。总之，从他做生意的方式所能了解到的一切都表明，他的订单可以为人们了解马赛人的阅读需求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南。

然而，根据莫西对于马赛公众情绪的评论可知，当时发生的事件，【146】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让人们失去了不少阅读的兴趣：“人们除了政治什么都不关心。”当战争终于在1783年底结束时，他期待生意会有所好转，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整个1780年代，他一直都在抱怨经济不景气。他试图利用公众对美洲的强烈兴趣出版《美洲贸易通论》（*Traité générale du commerce de l'Amérique*），还计划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挑选一些图书来交换50套。可是当出版社把它们推荐给自己的顾客时，却听到抱怨说此书早已出过，只是书名不同，叫作《美洲贸易论》（*Essai sur le commerce de l'Amérique*）。以新书名出版旧书，这是18世纪出版界众所周知的行业欺诈行为。在收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抗议信后，莫西支吾其辞，还反咬一口，对一些瑞士出版社更恶劣的“不正当行为”提出抗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认了他的产品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全新”。他让步了，降低了自己这些书的交换价值，希望和出版社还是“好朋友”。

在平息这场争吵之后，莫西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还必须应对另一个困难——也正是这个困难，最终将导致他们之间生意关系的终结。法国政府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送到巴黎书商行会检查，这预示着图书从纳沙泰尔运往马赛的费用将高得令人无法承受，同时货包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审查。莫西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向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出了警报，并指出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有点莫名其妙。图书贸

易的条规通常都是出自图书贸易管理署，由书商行会执行，但是6月12日的命令却是从外交部发出的，而且发给了总包税所。莫西有广泛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很注意时刻掌握本行业内部运作的情况，他终于明白了：法国政府这是要彻底摧毁非法图书贸易，而不只是打击盗版书，而且法国政府对外省的书商行会并不信任。外交部的这道命令看起来很危险，可能会切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经由里昂到马赛的运送通道，还可能给出版社在法国全境的货运带来重重障碍。

面对这种大灾变，纳沙泰尔出版社只好退回到传统的货运路线，即改走经由都灵和尼斯的这条更费钱的商道，并同意承担到都灵的运费，莫西在都灵有一个可靠的货运代理商。【147】他特别想弄到当时最畅销的禁书，如前面提到的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以及匿名作者的政治毁谤著作《英国间谍》。1784年，纳沙泰尔出版社设法运送了几个货包给他，但是都灵路线太长，费用也太高。1785年12月，莫西报告说，总包税所的人员正在没收所有经过尼斯的货物。如果出版社要把贸易继续做下去，就必须把货物送到里昂，从里昂起这些货物就可以作为国内货物安全运输了，只要它们能顺利通过里昂书商行会。但是，出版社未能做好必需的偷运安排，因为当时已经不能再指望雷沃尔提供服务了，于是1786年2月以后，它就停止了与莫西的通信联系。莫西在最后几封信中炫耀说，他仍然是马赛图书贸易的魁首，仍然在向别的国外出版商购书，不过对于未来的生意他并不看好：“我们非常清楚，图书贸易正受到极为严重的阻碍，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

在马赛书商的队伍中，莫西和卡尔德塞格分别位列首尾两端，有点像蒙彼利埃的里戈和塞扎里以及尼姆的戈德和比谢，只是卡尔德塞格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特别低下。他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做起了小生意，却是个生意场上的赌棍，最后还是输得倾家荡产。尽管他的卷宗比较薄，但辅以其他方面的资料，仍能展现当时图书贸易底层的一段风雨飘摇的生涯。

1777年，卡尔德塞格开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通信时，他甚至没被列入当年《出版年鉴》的书商名单中。在收到出版社的一份书目后，他要求将各类书籍发运给他，数量不要多。然后他在信的末尾指明了他最感兴趣的书籍：“我需要哲学书籍。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为我弄到。”如果出版社确定供货，他就要当时市场上名声最臭的14种禁书，包括色情书籍如《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反宗教书籍如《论三个骗

子》（三个“骗子”即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政治毁谤书《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等。

看书名就知道卡尔德塞格做的是非法图书生意。【148】莫西把“哲学书籍”当作调味料撒在他的订单中，而卡尔德塞格不同，他把它们当成本主菜。他也订购其他类型的图书：儿童故事书、消遣小说、颇受欢迎的博马舍（Beaumarchais）的《审判备忘录》（*Mémoires*），甚至公认的优秀作家如普芬道夫（Pufendorf）、比尔拉马基（Burlamaqui）、瓦特尔（Emer de Vattel）和马布里（Mably）的著作。但是他从来不要求出版社大量供货。在首次向他发货后不久，出版社就开始怀疑他的经济实力。

这批货物是通过弗朗什-孔泰和罗讷河谷的秘密通道运输的，经过将近四个月的磕磕绊绊，于1777年5月14日运达。首先是在蓬塔利耶被卡住——原因是出版社的货运代理商不给力，而不是边境上的困难；然后又被滞留里昂。当时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是克洛代，他在让货物通过书商行会的检查员这一关时遇到了大麻烦。当时正是监管异常严格的时期。克洛代发现，他必须把折帖弄乱，以便掩盖货包的内容，并且等待几周，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瞒过检查。当他把账单——每英担6铌的“保险费”——寄给卡尔德塞格时，他以为这笔钱算是稳赚到手了。然而卡尔德塞格却气咻咻地向出版社发出了抱怨。他写道，里昂的偷运业务糟透了——太草率，太慢，而且太贵。不过他对书籍本身还是很满意的。他还要订购，并且对纳沙泰尔出版社赞不绝口：“你们的信写得真是亲切感人，说真的，只有你们才能算是图书贸易界的顶尖人物。”

有经验的人也许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疑的恭维话，尤其是卡尔德塞格收到货后未能按照惯例寄出期票。他不按时寄期票还有个借口：书商常常会延时支付，要通过配帖完成了货物“验收”之后才能付款。这是个花时间的活儿，卡尔德塞格解释说，因为货包里的折帖是乱的。他进而询问，他的期票要在两年后到期，而不是一年后，出版社不能接受吗？出版社断然拒绝。有实力的书商也许会先就延期支付的问题商谈条件，之后再谈订货的事，但条件一旦谈妥以后是不能改变的。【149】对于出版社的拒绝，卡尔德塞格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答复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财力殷实的重要性。因此他让出版社放心，他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损害自己的信用，因此他要撤掉正打算寄出的订单。至于期票，待他从装订商那里取回图书后就会寄出来，而装订商这时正在做配帖。9月1日，在到货四个月后，卡尔德塞格终于寄出了468铌的期票，并宣布他

的账目已经结清。

但这时，出版社又开始担心期票到期时他不会承兑，因为就在卡尔德塞格从马赛打来保票的时候，克洛代从里昂发出了警告。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克洛代在马赛的一位联系人。他说卡尔德塞格就是“一个无赖，我们不会奉劝任何人相信他”。⁽²⁰⁾

克洛代知道如何评估危险的信号。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偷运者，经常跟小书商打交道，这些小书商就经常让出版商手里拿着期票却兑不了现，数额还很大。他警告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太轻易了。为了把问题讲清楚，他又寄了第二封信，转抄了他在马赛的一个朋友的信，该信全面描述了卡尔德塞格的品格，值得全文引述如下：⁽²¹⁾

卡尔德塞格先生在热纳先生的书店做了四五年店员。他摆出一副绅士派头，靠小恩小惠笼络朋友，在所有热闹的聚会上都要显摆显摆。热纳先生知道他自己没有资金，因此紧盯着他，还责骂他不忠……最终干脆把他解雇了。然后卡尔德塞格决定自己做生意，并且开始请求所有朋友掏钱帮助他，问张三要6个路易，问李四要4个路易，最终能要的都要到了。我们自己也被他骗走了450锂。经过一番艰难地讨要，直到去年2月，也就是在他把一个家具木匠的女儿娶到手后，他才还给了我们，他老婆的6000锂嫁妆几乎被他花了个精光。他岳父虽不是很有钱，倒也乐于助人，但是到关键时刻也不肯帮忙（卡尔德塞格）了。他大骂岳父不地道，说这桩婚事本来不是他要的。有鉴于此，超过6锂的钱我们都不借给他。

到这年年底，【150】纳沙泰尔出版社就看清了自己手里的这个客户是什么货色了。它停止向他发货，并不停地催款，因为除了他的许诺和所有没有兑付的期票，出版社什么也没有得到。1778年8月，法瓦尔热到达马赛时，他竭尽所能想把期票换成现金。期票很久以前就到期了，可是卡尔德塞格找各种借口来逃避付款，甚至在法瓦尔热到访他的书店时设法溜之大吉。法瓦尔热厌倦了和马赛这个“最明目张胆的骗子”过招，最后找了一位律师和当地的一位收账人。即便如此，他也只得得到150锂的头期款，还得带着另一张400锂的期票离开这个城市，而这张期票也只好悬滞了。他在日志中发泄了自己的沮丧，最后下结论说，“这个卡尔德塞格真是无赖，我们不应该再和他打任何交道。”

纳沙泰尔出版社永远得不到这400锂了。1779年2月，出版社得知卡尔德塞格抛下老婆和山一样的债务，人间蒸发了。7月份，他的一个

朋友寄来一封信，提出这样一套说辞：“卡尔德塞格逃到加的斯去了，不过他现在想回来恢复生意。如果债主们愿意减免85%的债务，他愿意努力工作把剩下的还清。他年纪轻，又勤奋，如果给他一点机会，他很想从头再来。”⁽²²⁾

9月，卡尔德塞格自己从一个无名藏身地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再次提起这件事情。他解释说，看到债务噌噌地往上涨，他吓坏了。投机生意损失了10,000锂，去蹲债务人监狱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所以他决定逃跑，带了两套西服、十二件衬衫和四板条箱书，他打算在加的斯把它们卖掉。他希望他老婆继续做生意，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仓库和价值19,000锂的图书，他以为债主们会把他积欠的债务减免一半。但是，就在他到达加的斯时，收到一个朋友的信说他老婆回娘家了，他岳父已经把他的财产全部搬走，说是要把他女儿剩下的嫁妆保住。朋友警告说，如果卡尔德塞格想避免他所有的货物被拍卖掉，最好乘头班船赶紧回来。他照做了，可是他到家时，拍卖已经完成，岳父还指责他携带四分之三的财产逃跑。在法庭上，他面对指控百口莫辩：“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可以靠原来生意剩下的东西从头再来。【151】危难之际他只希望纳沙泰尔出版社救救他，即免掉他85%的债务。他知道出版社得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报告，但他认为那些报告肯定言过其实了：“我的不幸是因为野心太大，而不是太浪费或太放纵造成的……我年轻，我会努力工作来偿还所有债务，有朝一日会恢复我的名誉，除非你们逼我背井离乡，死在安第斯群岛。”

这个吁求很可能没有多大的诚意。但卡尔德塞格很小心，没有附上回信地址。他不想冒因为赖债不还或者假破产而坐牢的风险。因此他建议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他通过朋友来偿还债务的计划。他的这个朋友名叫伊索阿尔（Isoard），曾给出版社写过几封信陈说卡尔德塞格的真诚，并证明大多数债主已经同意他只偿还15%的债务，毕竟这总比一分钱不还好。两个月后，卡尔德塞格在另一封信中又谈到这个话题。尽管他已经让许多债主同意了他的提议，但是他宣称，他会“按最秘密的方式”偿还纳沙泰尔出版社25%，而不是15%。

被逼到墙角的债务人有时会和部分债主达成秘密交易，以便征得他们对自己的某个再筹资计划的支持，这种支持会进一步赢得其他那些获利较少的债主的认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这种计谋心知肚明，不会轻易上当。它请马赛的一位商人查了一下情况，而该商人的调查结论是，卡尔德塞格所提议的结算方案，伊索阿尔连一个签名都不会提供。因此卡

尔德塞格的计划就像“一个诱骗债主上当的新套路，和他迄今为止的所有行为一样，毋容置疑证明他缺乏诚信”。⁽²³⁾

得到这个情报后，纳沙泰尔出版社对卡尔德塞格最后一封信的回应就毫不客气了。那封信出版社是在1780年1月收到的。卡尔德塞格在信中说，他急需一个答复，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出版社同不同意他的计划将决定他的命运，因为如果他得不到债主们足够的支持，他就不得不逃走，不管这对他名誉伤害有多大。“我爱自由甚于世上的所有荣誉，因为如果我迈出这一步，那我可以说，这都是被毫不宽容的债主们逼的。”出版社干脆没有理睬这封来信，后来他也就再无音信了。

- (1) 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吉贝尔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1775、1778、1784和1785年吉贝尔在法国和瑞士各地旅行纪事：遗作，由其遗孀发表》（*Voyage de Guibert dans diverses parties de la France et en Suisse, faits en 1775, 1778, 1784 et 1785 : Ouvrage posthume, publié par sa veuve*），巴黎，1806，第177—178页。
- (2) 一般来说，法瓦尔热提到的名字与1778年《出版年鉴》上书商的名字是相符的，尽管他常常发现《年鉴》有错误，而且名字的拼写前后不一致。《年鉴》最初于1777年以《作家与书商年鉴》（*Almanach de l'auteur et du libraire*）为名出版。1778年内容扩充，并以《书商年鉴》（*Almanach du libraire*）之名再版，1781年又以同名出了第三版。有关这些城镇及其书商的详细资料，见网站www.robertdarnton.org。有关该地区印刷和图书贸易的最出色的综合研究，仍属马德莱娜·旺特尔（Madeleine Ventre）的《旧制度最后时期朗格多克的印刷厂和书店》（*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en Languedoc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巴黎：Mouton，1958）。
- (3) 《法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批发商、船东和制造商通用年鉴》（*Almanach général des marchands, négociants, armateurs et fabricants de la France et de l'Europe et des autres parties du monde*），巴黎，1779，第353页。
- (4) 戈德和其他供应商的关系更具有冒险性，尤其是弗朗索瓦·格拉塞，此人大量经营禁书。1766年7月，巴黎图书贸易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奉命调查在阿维尼翁印刷并在博凯尔集市上销售的盗版书交易。经过一系列的突击搜查，他没收了47个货包的书籍。包括格拉塞发给戈德的两个货包，其中就含有精选的色情和反宗教的禁书，如《修道院的乐事》（*Les Délices du cloître*）、《缝补女马尔戈》（*Margot la ravaudeuse*）和《阿拉斯的蜡烛》（*Chandelle d'Arras*）（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98，no.30-48）。这是唯一的一次在警察档案中出现了戈德的名字。（博凯尔集市，尤其是1766年的突击搜查，需要深入研究。）
- (5) 1778年5月4日，比谢在一封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提供了有关这段插曲的细节。
- (6) “安德烈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5年2月21日。

- (7) “老巴蒂略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3月18日。
- (8)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185，f.22。
- (9) 这段叙述基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塞扎里的卷宗，ms.1132，ff. 267-273；维亚拉尔，ms.1228，ff.42-76；以及检察官希罗，ms.1135，ff. 219-220。
- (10) 里戈的所有订单，连同本书所研究的其他17位书商的订单，可以通过网站 robertdarnton.org 来研究。
- (11) “维亚拉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30日，1784年11月3日，1785年5月1日。
- (12) 雅克-安托万-迪洛尔（Jacques-Antoine Dulaure），《法国主要胜地概况》（*Description des principaux lieux de France*），巴黎，1789，第1卷，第96—97页。
- (13) 法国国家图书馆，mss. Fr. 22185，f.8。
- (14) 法瓦尔热的看法是从许多书商和货运代理商那里得来的，从他们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几封信中可以得到证实。见“阿莱芒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6月4日；“吉贝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6月9日。
- (15) 莫西的信像本书研究的所有18位书商的信一样，可以从网站 robertdarnton.org 上读到。我在翻译时，有几处是意译的，以便让意思表达清晰；引文有些长，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位书商关于自己生意的表白，是个不可多得的例子。
- (16) 马赛档案馆，FF.208-209。
- (17) 关于莫西的资料出自马赛档案馆，FF.208和209，由档案保管员伊莎贝尔·博诺（Isabelle Bonnot）在1986年1月29日的信中慷慨地提供。我还从詹姆斯·K·普林格尔（James K. Pringle）处获得了有关莫西家庭和马赛的政治的资料，他于198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演讲，题为“平静的冲突：马赛规划中的地主和商人（1750—1820）”（*The Quiet Conflict: Landlord and Merchant in Planning of Marseille, 1750-1820*）。
- (18) 法国国家图书馆，mss. Fr. 22185，f.8。
- (19) 见我关于《百科全书》传播的研究，《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Belknap，1979，第6章。
- (20) “克洛代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4月4日。
- (21) “克洛代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6月27日。
- (22) “德韦尔与比尼奥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9年2月19日。亦见1779年3月5日“克洛代致纳沙泰尔出版社”，和1779年7月15日“伊索阿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 (23) “德·韦尔与比尼奥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9年12月22日。

第九章 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西南地区的勉强维持【153】



图卢兹，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图卢兹

离开罗讷河三角洲地区后，法瓦尔热走过一连串风光优美的小镇，也产生了一连串的失望。没几个小镇有书店，即使有，生意也太小，不值得从像纳沙泰尔这么远的地方订货。【154】《百科全书》曾经在有些地方（如冈日、佩兹纳斯、贝济耶和卡尔卡松）卖得相当好；有几家书商（如佩兹纳斯的菲济耶、卡斯特尔的勒波蒂埃）被评为“佳”，并且答应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本部寄订单；不过，《出版年鉴》上出现的书商名单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里存在一个密集的经销商网络。例如，卡斯泰尔诺达里镇（Castelnaudary）列出的两位是小店主，只是作为副业卖几种书，主要是宗教礼拜仪式用书，而卡尔卡松的让·贝斯（Jean Besse），在疑似中风导致失声后，便不再做生意了。所以法瓦尔热对这些小镇都是一掠而过：佩兹纳斯，有着华丽的古建筑；贝济耶，它那14世纪的大教堂，在去纳博讷的路上老远就能望见；卡尔卡松，有要塞的

城市，矗立着53座巍峨壮观的塔楼。法瓦尔热也许品尝了佩兹纳斯的小馅饼（在卡斯泰尔诺达里下馆子，但他可能没尝到烩什锦这道菜，因为时令已经过了），不过，品尝菜肴和观赏风景这些内容是不会出现在他的日志中的。从马赛到图卢兹的旅行期间，他记下的唯一一条个人评论是有关气候的：下雨。在他到达卡尔卡松之前，就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但是他很开心，因为被炎炎烈日烧烤了那么久，人和马都快被烤焦了。9月11日或12日，法瓦尔热终于到达了一个有潜力的图书市场：图卢兹。

图卢兹（有54,000名居民）从各方面看都需要一个繁荣的图书市场——这个城市是从地中海到大西洋遍布法国西南部的各条通道上的一个战略要地；它在丰饶的产粮区具有商业中心的作用；它拥有一个高等法院、一所规模庞大的大学、两所学院，以及众多行政管理机构和宗教机构。然而，这里的图书贸易并非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繁荣。1764年的全面调查报告显示，该市的24家书商都很值得尊敬，但生意都不是很兴旺：“他们中没有人发大财，因为图书贸易在该市颇受限制。”^①

法瓦尔热在视察了图卢兹的书店后，把他们的生意不景气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地的书商行会执行法规过于严格，二是残酷的商业竞争。“没有什么比这家书商行会更死板了，而且是书商们自己把它弄成这样的，因为他们互相出卖，纷争和妒忌在他们中间非常盛行。”他举了一个装订商的例子，【155】此人征集了80到85个《百科全书》订户，不料竟被一些书商抢走了，理由是他做生意越界了。书商们普遍依赖廉价盗版书的销售，可是一发现他人卖盗版书的证据就马上揭发。而且，当书商行会开始执行1777年法令发布的反盗版措施时，这种揭发好像立即增多：“他们都害怕被抓住或被出卖。”而且他们都不能容忍销售新教书籍，尽管图卢兹有大量胡格诺派教徒。法瓦尔热得出结论，“必须说，这个城市是偏执的中心”。

法瓦尔热是在走访了该市的几乎所有23家书商，并和一位名叫肖鲁（Chaurou）的当地商人讨论了他们的生意之后，得出这些结论的。肖鲁还答应在纳沙泰尔出版社于此地遇到麻烦时，愿意代表它出面解决。法瓦尔热在给本部的报告中，按照他通常的评分方式，对每位书商做了简要的评价。最高评价给了安托万·拉波特（Antoine Laporte），“图卢兹书商中的翘楚，十分可靠”。他还推荐了弗朗索瓦·雷斯普朗迪（François Resplandy），他和拉波特合作从事货运安排：“他们是好朋友，都不属于互相出卖的那一帮人。”

最后，在视察了许多家书店并和书商们商议过之后，法瓦尔热发现结果令人失望：“对于像图卢兹这样的城市，我本该发给你们价值几千法郎的订单，而不是几百法郎的订单。”他寄出了拉波特和雷斯普朗迪的订单，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们在1778年的生意状况。拉波特要了一些正规书籍：历史书籍，有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Eléments d'histoire générale ancienne et moderne*）；两部小说，即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热泽内穆尔：戏剧小说》（*Jezennemours, roman dramatique*）和伏尔泰的《天真汉》（*L'Ingénu*）；以及一些流行的非虚构类作品，如纪尧姆·德圣维克多（Guillaume de Saint-Victor）的《接纳，或妇女共济会》（*L'Adoption, ou la maçonnerie des femmes*）和埃利·贝特朗的《勒泰弗农，或山中的日子》（*Le Thévenon, ou les journées de la montagne*）。就算货包落到了图卢兹图书贸易审查官（一个难说话的律师）手中，或落到书商行会检查货物的理事们手里，这些书也没有一种会惹出多大麻烦。不过拉波特不冒风险。他要求出版社把货包发运给里昂的雷沃尔，【156】指示他重新打包，伪装成纺织品货包——包装成运输装饰织物常用的方形货包，再转运给肖鲁。肖鲁已经同意担任出版社在图卢兹的货运代理商，他可以让货物不用通过书商行会直接送到书商的手中。

雷斯普朗迪的订单截然不同，风险要大得多。尽管其中也有几种正规书籍，如拉封丹的《寓言集》和罗伯逊的《美洲史》，主要的却是反宗教的启蒙运动书籍，如伏尔泰的《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和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以及大量色情书籍，其中许多是反神职人员的，如《修道院里的维纳斯》（*Vénus dans le cloître*）、《嘉布遣修士骄奢淫逸的生活》（*Vie voluptueuse des Capucins*）、《修女的风流韵事》（*Le Monialisme, histoire galante*）。它们要通过相同的秘密通道运输。实际上拉波特和雷斯普朗迪与法瓦尔热一起商谈过，打算将他们的图书装在一个货包里运输。然而事实证明这行不通，因为订货太多了。但是，这两人明显是伙伴关系——一位是著名经销商，维持着合法和貌似合法的交易，另一位是小零售商，由前者罩着做生意，销售最危险的书籍。如果一位顾客走进拉波特货色齐全的书店，就某些类别的图书——“色情书籍”“哲学书籍”——随口丢下几句话，拉波特就知道怎样去满足他的需要。

按照法瓦尔热的安排，货物能安全运抵图卢兹，但是时间长，运费贵。雷斯普朗迪抱怨时间拖得太久——三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让货物在雷沃尔的秘密仓库里蒙尘——尤其是费用，价值656锂的货物，运

费花了69铤。然而在法瓦尔热到访六个月后，他在1779年1月2日的信里又表示非常希望再和出版社做生意。他发现纳沙泰尔的书目里都是些“非常好的书”，而且他感到有办法应付其他书商的敌意。书商会按照1777年法令重组时，他的朋友拉波特当选了理事。但是雷斯普朗迪承兑期票有困难，因为里昂和巴黎的货币兑换商缺乏硬币。因此他向出版社提议，做些交换贸易，并提议按照他的定价提供如下书籍：

伏尔泰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理性》，两卷本.....3	铤
《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爾的故事》，两卷本，有图.....5	铤
《哲学家泰蕾兹》，两卷本，有图.....4	铤
【157】	
《尼农·德朗克洛生平与书简》（ <i>Vie et lettres de Ninon de Lenclos</i> ），三	
部.....24	苏
《自然之声》（ <i>Voix de la nature</i> ），五部.....30	苏
《蓬帕杜夫人书简集》（ <i>Lettres de Mme de Pompadour</i> ），两	
卷本...20	苏
《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两卷本，有肖像.....40	苏
《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两卷本.....40	苏

然而，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兴趣跟一个离得那么远的小经销商做交换，运输费用非常昂贵。而且雷斯普朗迪提供的书籍出版社都有，因为已经和日内瓦和洛桑的出版商做过交换。雷斯普朗迪的信证实了出版社已经了解的情况：对这类禁书的需求很普遍，但这并不是要和一位外省书商维持交换贸易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除非他的订货中大部分都是合法图书，即各类不违禁的书籍，哪怕是一些盗版书也行。

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图卢兹的其他书商做生意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拉波特第一次在法瓦尔热手上订了货后，就决定不再继续下订单了，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运输太慢，运费太贵。另一位书商，迪普莱克斯

(Dupleix)，则拒绝交易，除非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除销售外再另做一些交换贸易。其他两位，萨卡罗 (Sacareau) 和穆拉 (Moulas)，也要求做这样的交换贸易。在1777年9月2日的一封信中，他们解释说，最近他们的生意合并了，有大量存货需要处理。随信附带的书目含有125种图书，其中许多是启蒙哲人——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卢梭，尤其是伏尔泰——的著作，以及品种繁多的其他各类著作，包括一些新教和詹森教派的著作。但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主要生意是卖书，不是换书。另一位拥有大量存货的大经销商福雷 (Forest)，1772年曾试图与出版社建立关系，但没有成功。他很难说话，坚持要出版社承担全部运输费用，而且要接受以汇票支付，期限为18个月，甚至两年。出版社不愿接受这些条件，而福雷也不愿修改它们。他声称，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一些图书，他可以从布鲁塞尔的供应商那里弄到，价格相同，所以他决不会再从纳沙泰尔建一条供应线。马纳维 (Manavit) (被法瓦尔热描述为“极佳”，可是“条件困难”) 1781年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了12套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158】可是四年里他都没有付过一个子儿，甚至有两套直接拒付，借口是缺了一些折帖。

图卢兹唯一跟纳沙泰尔出版社做过大量生意的书商是尼古拉·埃蒂安·桑斯。1778年9月，法瓦尔热没有给他“极佳”的评价，因为这家在其商业信函中自称“桑斯公司”的商号，走近看似并不起眼。“桑斯的唯一合伙人就是他妻子。”桑斯在1774年曾宣告部分破产，也就是说，他中止了全部支付，同时说服债主给他足够时间来偿还债务。据一些向法瓦尔热提供信息的人说，他的生意恢复得相当好，可是他们仍然建议，除非他以现金支付，否则不应卖给他任何东西。

1776年10月，桑斯首次致函纳沙泰尔出版社。为了证明他财力稳健，他建议他们与里昂的几家书商以及他的姻亲——尼姆最大的书商米歇尔·戈德联系。他补充说，最近图书贸易严重衰退，他只好在做正常生意的同时兼做旧书生意，旧书是在私人图书馆出售时购买的。不过，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能承担将货物运到里昂的所有费用和风险，他看好与它做生意的前景。得到赞许的答复之后，他又写信说他特别想订购“你们能供应的所有哲学书籍和色情书籍”。他也希望交换书籍，并且举例说他的存货可以提供一两百册伏尔泰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 和一两百册最畅销的色情书籍《哲学家泰蕾兹》。

纳沙泰尔出版社答复说，它不愿做如此长途的交换，并且发了一份它能出售的“哲学书籍”书单。结果桑斯的首次订单就包含了很大一部分

极端非法的书籍。他还要求以期票形式错开支付的时间，期限为18个月到21个月不等，他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说他不得不给予他自己的客户长期信贷，“因为这个城市并不富裕”。出版社领教过从外省专营禁书的小经销商收账的困难，已经学会在收到用这种口吻写的信时要十分小心。【159】它答复说，桑斯必须让一位像戈德这样地位稳固的书商会签，也就是为他的期票（普通本票，有他的署名，票据抬头填写持票人）做担保。

桑斯不高兴了，回信说要是这样，他就撤销订单。“我们考虑了销售这种哲学书籍和其他这种性质的书籍的风险，所以改变主意，不想冒这种风险了，尤其是冒了这种风险还不让我们称心如意。”他还补充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几乎所有图书，他都能从别的供应商那里弄到。可是，图书在他发出撤销订单的威胁五周前就已经发运了。因此，他同意接受发给他的货，并提议用现金支付，以免出版社不放心——但要有6%的折扣，这是现金交易的惯例。

这个回答让纳沙泰尔出版社松了一口气，于是继续向桑斯供货，而桑斯则反过来继续试图说服它做交换贸易。他特别想把积压过多的《哲学家泰蕾兹》和《哲学通信》抛掉。在1777年11月4日从里昂发出的信中，他告诉纳沙泰尔出版社，他刚刚从巴黎到达里昂，很快就要去阿维尼翁，此行目的是补充存货。在巴黎时，他得知政府的法令过不了多久就要生效。因此他建议纳沙泰尔出版社赶紧发运大量盗版书给他，让他打上印记，趁着机会的窗口还没有关闭要抓紧时间利用。

虽然这个计划并未实现，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是退回到里昂做它的偷运经营，而桑斯则在他的合作伙伴拉波特到重组过的书商行会上任之后，得到了他的保护。到1778年9月，法瓦尔热估计条件已经成熟，出版社可以继续跟桑斯做生意了。但是，运输依然很困难。出版社1777年6月发出的一个货包，到11月才运到。桑斯终于在1779年放弃了从纳沙泰尔进货的企图。

他们的生意往来为期很短，而且没有涉及大量图书，因此桑斯的订单对他生意状况的反映也很有限。他肯定经营过大量非法书籍，其中有伏尔泰的著作和色情小说，如《哲学家泰蕾兹》，以及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的论战小册子，如《关于一元主义的哲学论文》（*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 monialisme*）和《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Lettre de M. Linguet à M. le comte de Vergennes*）。【160】他订购的大量书籍中还包括一些小说，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热泽

内穆尔：戏剧小说》和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爱情的牺牲》（*Les Sacrifices de l'amour*），以及一些旅行文学，如帕特里克·布赖登（Patrick Brydone）的《西西里和马耳他游记》（*Voyage en Sicile et en Malta*），还有新教著作，如各种版本的《诗篇》。

纳沙泰尔出版社与桑斯和图卢兹其他书商的关系，让人感到他们好像错失了一些机会。那里实际上有对各类图书的大量需求，尤其是对廉价盗版书的需求，但这些需求被书商之间的纷争抑制住了，而更重要的还是为远距离做生意的困难所阻碍。除了走私的风险、里昂图书贸易的“瓶颈状态”还有高昂的运费，纳沙泰尔出版社这家出版商兼批发商还得培养对客户的信任。它可以依赖当地的人脉关系，以及偶尔派遣像法瓦尔热这样的销售代表去走访，但也常常不得不根据信函里透露出的贫乏信息来作判断。

图卢兹档案的最后一份卷宗——“贝尔热公司”（Bergès et Cie.）卷宗，就有能说明存在这种困境的例证。1781年5月26日，贝尔热在写给出版社的信中说，他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了。他高兴地通知他们，自己刚刚在波尔多获得了一批弗夫·卡拉米（Veuve Calamy）的戏剧著作的存货。如所附的半页样张所示，印刷和纸张的质量都是令人满意的。他愿意以每英担30铤的包销价格卖掉这批书籍，免费运到里昂交货。他也提议交换书籍，并发了一份他可以弄到的书籍的目录，有医学书籍、教科书，以及大量禁书，如《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理性》和《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爾的故事》。如果出版社乐意购买这些书籍，他愿意按书名后面标出的价格优惠5%出售，并给予一年的付款期限。

纳沙泰尔出版社表示有意就这笔生意进行商谈，并且寄出了自己的书目。贝尔热回信附上了一份大订单，包含通俗作家的30种书籍，总价值864铤。在说到现在正在卖什么书，以及他可以从其他供应商那儿弄到些什么书时，他显示了自己在职场上的精明老到。例如，他指出，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正在销售他自己出版的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只卖24铤，含有地图，给25%的折扣，每订购12套还白送一套。贝尔热已经订购了50套——而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Mémoire au Roi sur l'établissement des administrations provinciales*），【161】他一本都不会订，因为“离此地不远就已经有人印了，而且此书在图卢兹已经泛滥，到处都是”。他在1781年6月23日的信中说，他在波尔多的生意做得和在图卢兹一样好，还说只要出版社“在条件上灵活些”，他乐意跟他们做生

意。“我们刚刚重印了我们的书目，已经把你们的一些书加了进去。我们的销售代表目前正在巴黎，下个月将去你们那里，他带着我们的书目，会给你们送一份看看。”

在确认贝尔热的订货时，出版社请求他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短期内很难把所有书备齐。其间它写信给图卢兹的商人肖鲁（他了解当地书商的支付能力），问他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否给予贝尔热“信任”，如果可以，信用额度为多少。肖鲁回信说，贝尔热的生意纯属子虚乌有。贝尔热曾经是萨卡罗和穆拉公司的职员，他在那里学会了贸易诈骗。后来他就诱骗出版商发货给他，并计划偷偷把它们卖掉。他的骗术已经被揭穿了，现在正东躲西藏呢：“这个年轻人一文不名，就算被逮住，你们托给他的任何货物很可能全都会打水漂。”

贝尔热这次行骗的尝试还是很漂亮的。他掌握了商业信函的所有样式，甚至学会了企业管理者在信末极其重要的“签名”（这些签名和起草信函的职员的正式笔迹总是不同的）。他拥有关于当前图书价格的准确信息。他知道如何就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进行谈判，也知道如何诱惑急于出售存货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但是他所有的一切——书目、销售代表、与其他商号的信函，以及他的公司本身，都是瞎编出来唬人的。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类似的骗局比比皆是，其中有些还曾经得逞过。18世纪的图书生意委实难做——在每个层级上，从出版商和他们的熟练印刷工，到书商和他们的店员，到处都如履薄冰。

法瓦尔热沿着加龙河从图卢兹走到波尔多时，他信件的主要话题不再是图书贸易了。他只提到五家书商：四家在蒙托邦，一家在阿让，其中只有蒙托邦的克罗西埃有可能成为纳沙泰尔出版社有潜力的客户。那段旅程中，他的马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注意力。

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约48公里，【162】道路泥泞，他的马一天摔倒四五次。当法瓦尔热准备离开蒙托邦时，他意识到马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它的脖子上有个肿大的淋巴结，鼻孔像着了火，还剧烈地咳嗽。当地一个兼做兽医的蹄铁匠认为，它的气管里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法瓦尔热决定赶往托南，他在那里有一个收账任务，因此他牵着马徒步前行。他一直走到了马尔芒德，走了近136公里。显然他在路上过了几夜（日志中没有说在哪儿睡觉，也许就裹着毯子睡在路边），因为马儿太虚弱了，不能走远路，又不愿吃东西。在马尔芒德，一个名叫巴利耶（Ballier）的关系人领他去找了另一位蹄铁匠，为马做了很长时间的昂贵（24锂）检查，并进行了治疗。诊断结果为“腺疫”（马的一种疾病，

症状是喉咙红肿），蹄铁匠把它归因于中暑。经过一天未详细说明的“治疗”，马儿饱餐了一顿麦麸和干草。法瓦尔热欣喜地看到它甚至恢复了一些“活泼劲儿”。可是晚上它又呕吐了一整夜，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毫无疑问，它太虚弱，不能再继续赶路了。于是法瓦尔热把它托付给蹄铁匠照料，自己租了一匹马前往16公里外的托南。⁽²⁾

到了那儿后，法瓦尔热就要直面一个难题：向一位名叫杜布瓦（Dubois）的牧师讨回646锂的欠账。这位牧师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了大量宗教书籍，卖给胡格诺派教友，却不愿付款，催债信一封接一封，他都置若罔闻。法瓦尔热得知，镇子里人人都称杜布瓦是个不可救药的“刁民”。于是他求助于一种保护制度，这是旧制度下解决债务纠纷的一条途径。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马尔芒德有一位关系人，他有个朋友，这位朋友又有一个亲戚属于当地最有权势的贵族世家——巴亚家族。当法瓦尔热出示了杜布瓦做生意不诚实的证据后，这个家族的族长巴亚·德苏布旺（Baillas de Soubvent），便为他提供“最高保护”，把杜布瓦召来要他解释自己的行为。按照法瓦尔热的描述，杜布瓦“浑身筛糠似的发抖”，根本不敢自辩，直接写了两张将在巴亚监督下兑付的期票，难题终于告解。这就是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

9月28日，【163】法瓦尔热回到马尔芒德，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马的病一点没有好转，反而在早前的肿块边上又生了第二个肿块。于是他让马儿接受了正规的兽医手术治疗，在18世纪，兽医的水平与其他医学分支大致相当。蹄铁匠用炽热的烙铁刺入两个肿块，手术费1锂10苏。这时，出版社写信给法瓦尔热，催他抓紧时间。本部需要他，他应该缩短行程，一些小镇就不要去了，赶在下雪之前回去。可是，带着一匹只能步行不能骑的马怎么快得了？他试图把它卖掉，却发现只能卖2路易（48锂），而买一匹马要花12路易（288锂）。还有就是，他发现自己舍不得离开它了，“我知道这马很不错的”。他希望在蹄铁匠的照料下它能恢复健康，于是决定租一辆马车去波尔多，办完事后再返回马尔芒德取马，然后骑着它直奔下一个主要站点拉罗谢尔。

波尔多

1778年10月1日，法瓦尔热到达波尔多。他应该会对这个大都市的景色印象深刻：港口两侧是昂热-雅克·加布里埃尔（Ange-Jacques Gabriel）壮观的新月形交易所广场，三年前才完工；维克多·路易大剧院仍在建设中；沿着宽阔的码头，排列着宏伟豪华的宅邸；林荫大道、广

场和连排房屋，其中大约5,000幢是自1700年起就有的——都在炫耀王国第四大城市（人口83,000）的新生财富。但是法瓦尔热无暇欣赏这些建筑。他立即投入了工作，试图从25家实力最雄厚的书商中弄到订单。



波尔多，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然而，令法瓦尔热懊恼的是，这些书商做生意的方式与他格格不入。他们对守约甚至比里昂人更随便，他们在餐桌上花的时间甚至更多，想在下午跟他们会面几乎不可能。法瓦尔热愿意在店里待着，要求见店主。而店主会出门，要么是因为忙，要么就是除了拿一份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164】其他什么都不愿做，只是含糊地答应说，一旦找到时间就会研究这个书目，然后再来谈生意。法瓦尔热返回店里三四趟，都被告知下趟再来。就算他最终逮住了店主，也很少能做成一笔交易，因为几乎所有书商都不了解1777年法令会如何实施，现在都不愿订货。法瓦尔热在给出版社的报告中抱怨，几天里他跑遍了整个城市，成效微乎其微。

把潜在的客户划分为通常的三类后，法瓦尔热排除了四家“差”的书商，以及一家装订商和一家纸品商，他们应该没有被列入《出版年鉴》。剩余的书商可以给予不同程度的信任，但是他们都对即将实施的打击盗版书的措施深感忧虑，故此时不敢从瑞士进货。只有一家，纪尧姆·贝尔热雷（Guillaume Bergeret），同意下订单。法瓦尔热把它的订

单抄在给出版社的信里：含19种书籍，有莫里哀的戏剧、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小说、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以及各种非虚构类文学书籍，没有一种是非法的。【165】但是贝尔热坚持要每6册送一册，而不是每12册送一册，因此法瓦尔热怀疑出版社的董事们是否会同意。他发现的另一位书商，也是唯一一位有前景的书商，是名叫罗克（Roques）的香水商，他愿意偷偷销售新教书籍。无可否认，波尔多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美国战争中断了它的贸易；一切基本上都处于严重停滞状态。

其实早在美国革命爆发几年前，这种不景气就已经开始了。1774年1月，夏皮兄弟公司（Chappuis frères）——属于“一般”书商——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它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支付货款。他们解释说市场已经饱和，还咬牙切齿地抱怨“目前的不景气，以及随之发生的消费匮乏。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一种贸易会像图书贸易这样不讨人喜欢，不值得做”。^③九个月后，他们宣布破产，但最终通过和债主们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恢复了生意。

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波尔多有高等法院、总督府、一所大学、一所学会、一座要塞，以及大西洋最大的海港，但这里却找不到纳沙泰尔出版社图书的销路。只是尽管如此，纳沙泰尔人还是和该市最大的书商贝尔热维持了12年的生意关系，他的信函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地图书市场需求的状况。

贝尔热的信表明他是图书贸易的老手。^④他从许多出版商兼批发商进货，在他们中间挑起纷争，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 he 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来源弄到同样的图书。在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交易当中，他讨价还价，尽可能把价格压到最低，但省下来的钱往往又被运输费用抵消了。实际上，货运环节的各个方面——路线、安排、耽搁，以及费用——就是他和出版社通信的主要话题。

1773年6月22日，他用一个很小的订单作为“试验订单”来测试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业务能力。他从出版社的最新书目中选择了几种书籍，并遗憾地指出书目里缺乏“哲学书籍”。法国政府刚刚对所有进口图书开征每英担28铤的关税。贝尔热愿意承担12%的“保险费”，通过跨境偷运来规避关税。但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和它的主要偷运者吉永已经陷入困境，【166】因此建议走日内瓦-都灵-尼斯路线，每英担运费16铤。它向贝尔热保证，倘若他在尼斯有可靠的货运代理商，这条路线是很通畅的。在回信中，出版社还附上一份手写的“哲学书籍”库存书目。

尽管贝尔热并不专营禁书，这份书目还是吊起了他的胃口。于是

他要求出版社在为他准备的货包中添加几册《袖珍本神学》（*Théologie portative*）、《哲学家泰蕾兹》，以及类似书籍。他愿意支付运输费用，但不愿支付偷运费用。出版社回答说，它最近开辟了一条经由里昂的偷运路线，在那里雇请了一位新的货运代理商来让货物通过书商行业的检查。因此，倘若他们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前景似乎一片光明。贝尔热雷不愿支付出版社对非法图书索取的费用，而出版社反过来也不愿降低价格，理由是：“我们注意到你订购的书籍中有几种被称为哲学书籍，我们存货中没有，但可以求助于我们的客户来供应。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警告你，由于可想而知的的原因，这些书籍售价要比其他书籍高……我们不能以和我们书目中其他书籍相同的价格把它们卖给你，因为我们自己必须花较高价格买进。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将试着以最可能接受的价格为你弄到。在我们这儿，这类书籍正大量增加。”

贝尔热雷最终同意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为他的订货所定的价格。出版社于1773年9月把货物发出，经由里昂顺利运达。贝尔热雷按时支付了货款，没有发生口角——不像实力较差的经销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常常要找些借口不彻底付清账单。1775年2月，他发出另一份大订单：60种图书，其中11种是“哲学书籍”。“哲学书籍”书名后面标注了x的，大都是地下贸易的畅销书，并且说明：“请你们把标注了x的书籍跟其他书籍用‘配婚’的方法合在一起装运。”所谓“配婚”，本书第二章解释过，就是把非法书籍的折帖嵌入合法书籍的折帖当中，这样货包在经受书商行会检查时就能蒙混过关。运往波尔多的货包大部分是在里昂接受检查的，出版社在那里的代理商保证，这些检查都是表面上做做样子。

货物这样运输很安全，就是时间要延长两个多月。【167】贝尔热雷抱怨运输服务缓慢，还抱怨出版社一些价格定得太高，但是也称赞他们的印刷质量好。实际上，他还委托它印刷了一本关于拼读的盗版教科书，作为自己投机项目的图书来销售。但是在1775年夏天，他和出版社的关系变差了。4月份，贝尔热雷订购了30套激进的政治论著《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第1—3卷。直到6月底，出版社才把书运到，而提供给他续篇第4、5两卷时花的时间更长，因为它瞒着贝尔热雷从里昂的一家经销商进货，而此人原本是对法国客户优惠的。贝尔热雷抱怨，他的竞争者由于直接从里昂进货，比他早三个月就收到了货。10月份，他警告出版社，这样一耽搁，可能让他失掉客户，而他也许不得不从别处找客户：“我必须彻底放弃订购你们的货了，尽管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你们将近三个月前就预告要运到的货物，到现在还没有要运到的迹象。你们必须明白，我不能这样做生意。”

出版社向他道歉，并尽其所能整顿了在里昂的经营活动，但是已经无法恢复跟贝尔热雷的大部分生意了。1776年和1777年，它只向他发了几次货，然后到1778年，也就是法瓦尔热到访的这一年，它又未能按时供应50套威廉·罗伯逊的四卷本《美洲史》，这部著作成为畅销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美国革命感兴趣。早在纳沙泰尔出版社从遥远的里昂得到相对便宜的盗版书很久以前，巴黎和鲁昂的版本就已经到达波尔多了。因此贝尔热雷撤销了订购，并发了另一封斥责信：“你们很清楚，如果人们不能趁着新书还新鲜时购进它们，那它们一般就会一直闲置在库房里了。”然而，法瓦尔热10月份到访时，他还是订购了12套罗伯逊的《美洲史》。人们对美国的兴趣还没有衰退，尽管战争对波尔多的贸易产生了全面的灾难性影响：“因为战争，商业变得如此萧条和衰败，以致本市的各种贸易都已经衰落。因此我也要减少订货了。”

随后的六年里，只要贝尔热雷察觉到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新书能吸引他的客户，他就还会继续下订单。

1781年，他订购了25套梅西耶的《巴黎图景》。【168】1782年，他要了100套梅西耶的《法国国王的肖像》（*Portraits des rois de France*），但是，在出版社跨境偷运货包遇到麻烦时，他就撤销了订货。1784年，他订购了12套纳沙泰尔出版社十卷本的雷纳尔《哲学和政治史》。不过，在1773年那么看好的贸易，却一直没有发展到双方想要达到的程度。供需之间相隔距离太远，障碍也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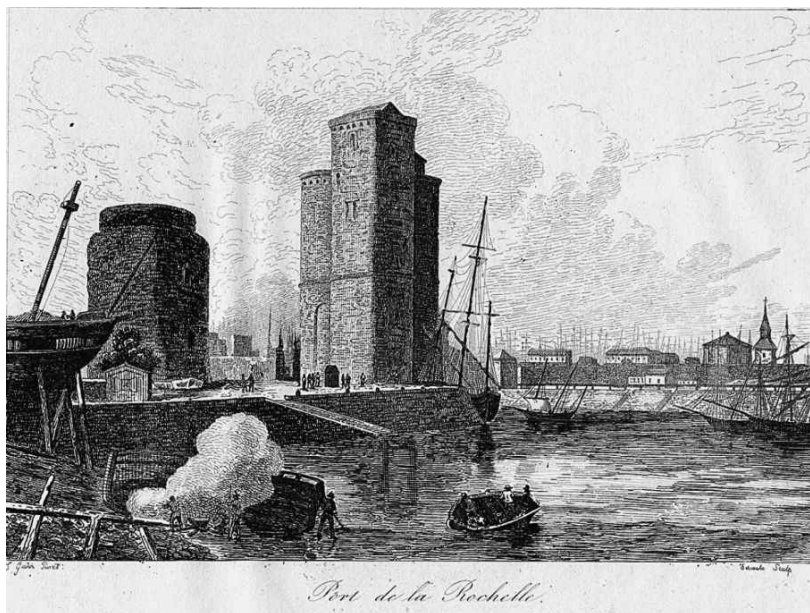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从贝尔热雷的订单还是可以了解到这家可能是波尔多最大的书店需求最多的书籍。贝尔热雷对遭到严禁的非法图书感兴趣，但也青睐教学书籍和实用书籍，如雷斯托（Pierre Restaut）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Abrégé d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蒂索的《大众健康建议》和莫潘（Maupin）的《葡萄酒酿造技艺》（*L'Art de faire le vin*）（这书在波尔多畅销不足为奇，莫潘写了许多关于葡萄栽培的书）。贝尔热雷还订购了大量儿童书籍：蒙热先生（M. Monget）的《婴幼儿道德小故事》（*Les Hochets moraux, ou contes pour la première enfance*），和一本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 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faire aimer la vertu*）。他的订单还包括大量历史书籍和游记，以及自称揭露了共济会秘密的书籍：J. J.勒弗朗索瓦·德拉朗德（J. J. le François de Lalande）的《共济会简史》（*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la franche-maçonnerie*），和

自称揭露了魔法秘密的书籍：P.-A.阿莱茨（P.-A. Alletz）的《现代阿尔伯特，或已经得到证实的合法秘诀汇编》（*L'Albert moderne, ou recueil de secrets éprouvés et licites*）。尽管贝尔热雷在信中表露出对伏尔泰和雷纳尔著作的兴趣，但是启蒙哲人的论著他订购得并不多。他的订单中名列首位的作家是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此人在当时法国的读者中相当走红，尽管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的订单中表现突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出版社在自己的书目里把他的作品放在了主打位置，同时也印刷了不少自己的版本。从订单中得到的统计数据还表明，读者对与路易十五统治后期的政治危机有关的政治毁谤书和论著有大量需求，尤其是《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总的来说，贝尔热雷的订单表明，人们对各类书籍都有广泛的需求——其中虽有一些色情图书，但大部分都类似于分类摆放在外省大型书店书架上的那些普通书籍。【169】

拉罗谢尔

法瓦尔热坐马车回到马尔芒德后，发现他的马病情大大好转，因而如释重负。但是前两周不停地下雨，山道崎岖，泥泞不堪，因此他一天行路不能超过7里格（约合24公里）。更糟糕的是，“这可怜的畜生仍然很虚弱，总要扑倒在地。”从利布恩到科尼亚克的道路非常湿滑，马蹄铁都松掉了，这段约116公里的路他走了4天——现在乘小汽车一个半钟头就到了。法瓦尔热的开支账上显示，他几次在蹄铁匠店停留，给马重新钉马掌（费用从1锂10苏到2锂不等）。他还买了一条鞭子（1锂10苏），可以看出，他不得不用暴力驱赶马儿行路。另一笔4锂的支出用来修补他的靴子，说明他步行走了许多路。【170】虽然他没有在信中抱怨，但这显然是一段艰难的跋涉。

沿途有些书店看上去前景不错，但没有一家拥有大客户。利布恩的一家经销商方丹（Fontaine）颇受推荐，因为他能规规矩矩承兑汇票，他说他很想跟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很快就会下订单。路易·德利耶是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桑特有一家陈设不错的书店，他也做了这样的承诺。罗什福尔的法耶（Faye），他的书店存货看上去相当好，也下了订单，其中包含广泛而丰富的各类书籍。接下来，法瓦尔热终于来到拉罗谢尔，受到了让·朗松的热情接待。朗松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曾师从奥斯特瓦尔德学习，他高兴地款待了这位来自遥远的汝拉地区加尔文教大本营的谦逊朴素的年轻人。然后，法瓦尔热冒着雨逐个走访了各家书店，他的马儿则留在马厩里休生养息。



拉罗谢尔，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拉罗谢尔以其港口和新教徒而闻名。当法瓦尔热于10月中旬抵达这里时，它的图书市场似乎也很景气。拉罗谢尔的商人是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迹的：对外出口纸张、纺织品和葡萄酒，从圣多明各（Saint Domingue）进口蔗糖，【171】从加拿大进口皮草，在非洲中途停留时还能做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为加勒比的种植园贩运奴隶。但拉罗谢尔从未经历过可以与波尔多和南特相媲美的繁荣。实际上，它的人口增长缓慢。1780年它只有16,200名居民，在法国所有城市中排第50位。1764年政府关于图书贸易的调查报告指出，拉罗谢尔只有两家书商和两家印刷商——数量太少，没有必要设立书商行会。地方官员负责监督审查他们的经营活动，也不需要花多大气力：“他们都是正派人”，他指出，“都很聪明，行为也很得体。他们的财富都是劳动所得，并且也不是很多。”^⑤



简陋的蹄铁匠店

让-雅克·德布瓦西厄，《蹄铁匠店》（*Farrier*）。哈佛艺术博物馆，贝林达·L.兰德尔的赠品，来自约翰·威特·兰德尔的收藏，R4105。哈佛大学影像部版权所有

法瓦尔热视察生意状况时，也发现他们的财富不是很多。自1764年以来，书商只增加了一家。第一家是潘蒂内尔（Pentinelle），属于评价最低的“差”一类。第二家是夏博索（Chaboceau），被评为“佳”，但是，他不想从老远的瑞士进货。剩下一家帕维，也是“佳”，是个很难打交道的客户，纳沙泰尔出版社自1772年开始和他做生意起就了解这一点。

这家商号的正式名称是帕维父子公司。帕维的次子写信最多，信中措辞倒是准确，但不时出现的拼写错误有点令人不舒服。他的第一封信写于1772年2月8日，暗示他们的书店迎合的是拉罗谢尔庞大的胡格诺派社群的需求——或许还暗示，新教教义导致他们对启蒙运动抱有同情。他询问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新教《圣经》和布道书的能力，也显示出对“像《自然的体系》这类哲学书籍”的兴趣。最近对进口图书征收的关税从每英担68铤降至28铤，“还是够高的，但已经比较客气，说得过去了”。帕维指望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像他的其他国外供应商一样，分担一些关税，但不知道哪条运输路线最好。经由尼斯和马赛货物运输很昂贵，所以他希望出版社能以合理的价格让货包顺利到达里昂。

帕维在随后的一封信里表明，如果可行的话，他准备订购两种新教宗教仪式书籍，另外还要订购12册梅西耶的《2440年》、10册《自然的体系》，质量要好。他知道新近出版的引起轰动的无神论专著《自然的体系》有四种版本：一种是印刷华丽的荷兰版，还有两种版本也可以接受，另有一种纸张低劣，他不会要。【172】（正如上文已经提到

的，纸张质量是会18世纪的读者满意的关键因素。)在4月25日的信中，帕维要求出版社，如果运输安全，费用又合理，就在货物中添加几种其他的图书。其中包括贝尔的《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些政治论著，如“刚刚问世的《蓬帕杜夫人书简集》，以及你们可能有的这类图书”。显然，帕维十分了解新近上市的书籍，而且订购其中被严禁的书籍也毫不犹豫。

随后两年里，帕维继续探测纳沙泰尔出版社供应图书的能力，多半是新教书籍，以及几种有关历史和游记方面的图书和各类哲学书籍。但是直到1776年3月，他才下了一份确定的订单，要通过里昂运到奥尔良，那里有他的一位货运代理商，可以把货物安全地转运到拉罗谢尔。订单包含了23种书籍，有些是出版社书目中的，有些他希望出版社能帮他从他其他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那里弄来。他在随后的订单中表明，他是根据——至少是部分地根据——客户的要求来选订图书的：“有人要以下图书，你们如果有就请发给我。”随后的12个月他都定期下订单，而出版社也都供货了，没有出任何纰漏，还承担了运至里昂的费用和风险。

到此时，出版社还向拉罗谢尔的一些个人小批量发运了部分货物。这些人均是小店主，包括让·朗松，他与奥斯特瓦尔德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为自己和朋友订购了一些书籍。帕维反对这种非正式的交易，因为这可能抢走他的市场：“这些朋友帮另一些朋友订购，这样一来，从朋友到朋友，整个城市都得到了供应，而书商的书就卖不掉积压下来了。请注意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必有口角。”其实，跟这些业外个人做的生意规模是不可能扩大的，不过帕维的反应表明了正规书商普遍的担忧，因为他们常常渴望经营禁书（只要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但讨厌不相干的人——摊贩、装订商和小店主——闯进来跟他们抢生意。

对帕维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关系发展妨碍最大的，是政府逐渐加码的针对盗版书和禁书的打击。【173】早在1776年夏天，帕维就已经发出了奥尔良书商行会可能要加强检查的警报。1777年，发给他的四批货物都闯过了这个危险的转运站，尽管他劝过出版社换一条安全一点的路线。出版社偏爱比较便宜的内陆水路，由索恩河顺流而下到里昂，穿过罗阿讷，然后再由卢瓦尔河顺流而下到奥尔良及法国西部各个市镇。帕维建议采取更直接的路线到利摩日（Limoges），这条路安全一些，但费用较高，因为要走山路，用骡子驮，货包重量不得超过150磅。

1778年，鉴于帕维的生意在衰退，出版社表示可以承担把货物运到奥尔良的费用和风险，而帕维在奥尔良有可靠的货运代理商。出版社强

调，这是它这一方做出的重大让步，“因为我们不得不向我们雇用的人支付优厚的报酬，这就要削去我们的一大块利润。”于是帕维就恢复了订货，订的主要是新教书籍和色情书籍，这些是他生意的主体部分。他也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订购同样的书籍，证明他是相当熟悉地下贸易情况的。1776年8月，他把纳沙泰尔出版社《欢场女子》的价格从36苏砍到30苏，把《神圣的传染》（*La Contagion sacrée*）从40苏砍到30苏。然而，1779年7月，出版社通知他，它不再为客户采购“哲学书籍”了。它在供应方和客户方那儿都遇到了许多麻烦，供应方是一些印刷这些书籍的小出版商，它和他们发生了纠纷，客户方则拒绝付款，且不愿分担因书籍被没收造成的损失。

而帕维的答复听起来太正经了，根本不像真话。他写道：“我很赞成你们从我的订单中除掉某些书籍。其实我正想写信跟你们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想囤一些好书，而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消灭那些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书——这些书太危险，尤其是若一些受教育程度低、分不清香花毒草的人读了它们的话。这样图书市场才能重振雄风。”和与莫西的通信情况一样，出版社有时会收到一些“假信”，满纸高风亮节，这是书商们想制造一些证明材料，当他们在政府那里遇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自证清白。然而，这时候图书贸易监管部门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没收盗版书，【174】而这正是帕维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交易的大头。1779年7月31日帕维写信称，1777年法令正在他所在的地区严格执行。所有提货单上都必须详细说明货物已经在书商行会通过检查，并重新包装，打上铅封。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有办法应对这个问题，帕维的其他瑞士供应商，包括萨米埃尔·福什以及他儿子的福什长子公司也能做到。但是运输费用在节节攀升。1779年12月，帕维抱怨他刚刚收到一个货包，价值169铤的书要36铤的运费。1780年8月，他结清了515铤5苏的账，而后近四年都没有再下过图书订单。

另一项打断贸易的管理措施是1783年的政令，要求所有从国外进口的书籍，无论其最终目的地是哪里，都要在巴黎书商行会接受检查。1784年2月21日，帕维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他已停止从瑞士订购书籍了：“目前从国外进货的困难想必已经重创了你们的销售，当局执行这项命令的严厉程度迫使我中断与你们各州的所有通信联系。”一个月后，他写信建议，在巴黎雇一位书商，让货物顺利通过书商行会，这样出版社应该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说他和巴黎的很多人都有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安排他自己难以处理。他会为秘密业务支付每英担10铤的费用和从纳沙泰尔到巴黎的运输费用，条件是出版社要承担所有风险。他特别想订购

50册《夏特勒公爵大人的私生活或辩护词》（*Vie privée ou apologie de Mgr. le duc de Chartres*），一本颇受欢迎的毁谤书。

到1784年9月，帕维放弃了对撤销1783年政令的指望，而纳沙泰尔出版社也放弃了招募代理商让货物混过巴黎书商行业的努力。它提升了把货物发往里昂的可能性，它在那里的代理商可以把货物重新包装，伪装成国内货物再转运到拉罗谢尔。但是这种业务的费用为每英担15锂。帕维现在想要订购梅西耶的新版《2440年》。然而，他计算了一下费用：偷运15锂，【175】运输25锂，总计每英担要花40锂，结果是每本书要比批发价多6到8苏。他宣称这是“难以接受”的。他强调说，里昂人就能把瑞士的书籍运给他；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应该也能做到，而且只用支付15锂偷运费的一半。

1784年10月24日，出版社回信说，这种安排行不通：“去里昂的路太危险，沿途的检查很严格，必须避开这些检查，也不能走奥尔良。因此只能从奥弗涅（Auvergne）和利穆赞（Limousin）走，可那要途经很多山间小道，很不好走。”虽然一年来帕维和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在商讨各种可能的办法——通过里昂偷运，用船沿莱茵河运到荷兰，在奥弗涅和利穆赞用骡子运输——但什么都落实不下来。1785年12月，他们结清了账目，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交易。

如帕维在信中说明的，他订购了大量新教书籍和“哲学书籍”。与其他外省书商相比，他的订单变化稍微小一些，这或许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订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禁书的缘故，至少开始时是这样。这些禁书或是出版社自己的存货，或是它通过交换从其他专营地下交易的出版商那里弄到的。在他订购最多的15种书籍中，排前三的是各种版本的《圣经》《诗篇》和一种《教义问答》，还有两种布道文集——是他在不同时机订购的九种布道书中的两种。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些布道书与那些如今被认为是色情作品的书籍同在一个书单上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这些色情作品包括《加尔默罗修会负责收发的修女的风流韵事，作为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一书的姊妹篇》（*Histoire galante de la tourière des Carmélites, ouvrage fait pour servir de pendant au Portier des Chartreux*）、《游荡的妓女，或玛德莱娜与朱莉的对话》（*La Putain errante, ou dialogue de Madeleine et Julie*）和《新女子学校》（*La Nouvelle Académie des dames*）。但是，在18世纪的书商眼里，卖给胡格诺派教徒的书籍的危险性并不亚于那些单纯的色情书，甚至不亚于那些带有反教权思想的色情书。帕维订购的其他书籍中，有许多也是其他

书商最喜欢订购的，主要是梅西耶的《2440年》和《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接纳，或妇女共济会》在其订购最多的书籍名单中排第五位，说明这时的法国读者普遍对共济会着迷。根据帕维订购书籍的模式来判断，他的客户对这本书的需求依然很旺盛。1776年3月16日，他订购了12册；1776年7月27日订购了39册；1779年1月19日订购了12册；1779年9月18日又订购了6册。【176】1776年3月16日，他还订购了12册《共济会的职责、规则或一般规章制度》（*Les Devoirs, statuts, ou règlements généraux des francs maçons*）。关于读者的其他阅读倾向，订单显示他们对政治论著的需求也很强烈，如约瑟夫·塞日（Joseph Saige）的《国民教义问答》（*Catéchisme du citoyen*）和米拉波伯爵的《论专制主义》就很好卖。而且其中启蒙运动的论著——从1770年就已经失去其震撼性价值的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到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帕维也为他的客户订购了一些淫秽书籍，像许多其他正规书商一样，如果能有可靠稳定的供应线，他还会向客户提供更刺激的淫秽书籍。

普瓦捷

法瓦尔热完成了在拉罗谢尔的生意后，不得不解决马的问题。天还在下雨；到普瓦捷有约133.5公里，【177】道路十分泥泞；而且他还得赶快，因为最近在拉罗谢尔收到出版社的信，催促他不要耽搁，走最直接的路线赶回本部。尽管情况不利，他决定让马再做一次努力。10月23日或24日，他到达56公里外的尼奥尔（Niort），在那里找到一家表现不错的书商（名叫埃利 [Elies]），他答应下一份订单。然后他冒着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走了至少25公里的路赶到圣梅克桑（Saint-Maixent），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位书商（布律内 [Brunet]）。但是从这里开始，马就几乎不能走了。当它最终蹒跚着到达普瓦捷（52公里以上）时，它的腿肿得太厉害，肿块都破裂了，露出深深的伤口。



普瓦捷，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法瓦尔热怀着深深的遗憾，决定把它卖掉，再买一匹壮实一些的马，但是他没把握如何在外国跟陌生的马贩子讨价还价。幸好他遇到一位瑞士同乡，从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来普瓦捷做生意的商人，并且还得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普瓦捷的一位主要客户米歇尔·樊尚·谢弗里耶（Michel-Vincent Chevrier）的帮助。最后，他谈成了一笔交易，比上次在马尔芒德谈的稍好：卖马得了4路易（96铔），花9路易（216铔）另买了一匹——比前一匹几乎高出一个手掌（10厘米），也强壮得多，6岁，并且“名声好”。“我很遗憾这笔损失”，他在给出版社的信中这样写道。想必这是指不得不买马所蒙受的钱财损失，但也可能是抛弃一匹朝夕相伴四个月并骑行了数百公里的马伤了他的心。即使在当今，据说一个旅行推销员也会对他的小汽车产生深厚的感情。

闯过普瓦捷的马市后，法瓦尔热勘察了该市的其他地方。尽管普瓦捷在现代观光者眼里魅力四射，但是在18世纪，它从旅行者那里得到的却是差评。他们抱怨它街道狭窄，路面高低不平，房屋破败不堪，一派落后的景象。它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增长停滞，维持在大约18,000人，“因为缺乏贸易，也因为天性懒惰，人们很贫穷”。^⑥普瓦捷其实是一个外省首府，有总督，也有一些重要的司法和行政管理机构。1778年，那里有12家书商，它们的营销对象是比较富裕的居民（这些人在大革命前的一般特点是“文雅、机智、懒散，而且不适合做生意”）^⑦，以及几个法院、当地驻军部队和一所大学（其法学院有200名学生）。

经过法瓦尔热的考察，大多数书商被评为“差”。【178】有四家被评为“一般”，但他们的生意不够大，不足以支持从瑞士进货的运输费用。一家是雅克·博班，1776年12月曾下过一份大订单，但纳沙泰尔出版社拒绝向他供货，因为不相信他有支付账单的能力。博班在普瓦捷法院里设了一个书摊，以满足律师的需求。根据1764年的图书贸易调查报告，他是个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小摊贩。他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写的信倒是清晰易读，但那很可能是他儿子写的，他儿子曾经违背他的意愿就任过神职，后来离职回家做生意。博班（或者是他儿子以他的名义）在一封信里坦率承认，“我不想用铺张的展示向任何人炫耀，我说我没有大量财产，决不会感到丢脸。”他最终同意用现金支付，纳沙泰尔出版社也就于1782年向他发了一趟货，其中各类书籍都有，就是没有非法书。可是这次货运花的时间太久，费用也太高，随后他就再也不继续订货了。

按照法瓦尔热的估计，只有两家书商有能力维持与出版社的生意往来。一家是菲利克斯·福尔孔，是当地书商行会的一位理事，家境殷实。法瓦尔热觉得他“性格古怪”，而且特别忠实于自己的理事角色，不会买任何盗版书。但另一家，米歇尔·樊尚·谢弗里耶，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答应为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帮助，让它的货包在书商行会接受检查时绕过福尔孔，而且如果他们能同意他的条件，他想继续扩展生意往来。努力达成互利的条件确实是出版社跟谢弗里耶之间通信的主题，这类通信从1772年6月就开始了。要把货物运到普瓦捷，出版社首先要应对图书进口关税，然后是偷运/保险系统的违法运作，最后是从里昂到奥尔良路途上的意外障碍。谢弗里耶似乎不在乎长途进货的困难——他提到过他曾从布永出版社订购图书——他在乎的是价格要实在。

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各类图书谢弗里耶都想要一点儿，包括手写的“哲学书籍”书目里列出的作品。尽管禁书只占他生意的一小部分，但他对它们的了解却非常专业。其实他也向出版社提供了一份自己的“哲学书籍”的“书目”。它精选了67种——比出版社提供的还多出了很多——按字母顺序列出，【179】但4种色情书籍除外，谢弗里耶把它们加在书单末尾，即《哲学家泰蕾兹》《女子学校》《梅萨丽娜，穿睡衣的修女》和《缝补女马尔戈》。除了这些色情图书，他的书单里还有当时可以印刷的门类齐全的反宗教书籍。其中许多得自秘密手稿，这些手稿在18世纪上半叶流传甚广，包括英国自然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亨利·圣约翰（即博林布鲁克子爵 [Henry S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 ）和托马斯·伍尔斯顿（Thomas Woolston）——的著作的译本，以及法国的论

著。和帕维的订单一样，这些论著包含伏尔泰的反教权主义著作和霍尔巴赫小圈子的无神论著作。谢弗里耶的头几封信里提到的图书，只有少数几种运到过普瓦捷，因为除非出版社建立一条直通到他的书店的安全路线，否则他不会承诺大批订购书籍。

1772年12月，他们进行了一次试验性货运，货包经由里昂运到，没有出差错，但是在路上走了五个月。谢弗里耶答应，如果出版社能够解决货运问题，他就会扩大双方的生意规模。实际上，为了垄断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他书店方圆百里内的生意，出版社印制的书籍，以及它的普通存货中通过交换得到的书籍，他都要求每订购12册白送一册。出版社还必须承担将货包运到里昂的费用和风险，但是他会多支付售价的4%作为这项服务的补偿——如果运到奥尔良，则可多支付5%，那儿有他的一个货运代理商，弗勒里寡妇（Widow Fleury），她能安全处理这些货包。出版社回复了一个反向提议，提出了稍微不同的条件，价格也有点高。谢弗里耶又以一个反向提议来应对，谈判持续了三个月，各方都修改了自己的条件来回应，费用计算细化到三分之一个百分点。⁽⁸⁾其间，谢弗里耶又下了一个订单。出版社把货物发运后不久，就给他开了一张见票即付的票据（*billet à présentation*），列出他累计欠下的债务：474里15苏，可在见到票据后10天内给付。

谢弗里耶拒不接受这张票据。他反对的理由是，货还没有到，出版社不应要求付款。如果货包运到奥尔良的弗勒里寡妇（她丈夫刚刚去世，于是她接管了家里的生意）的库房，他自己就要开给她一张期票，期限一年，额外还加10%用于弥补运输费和风险金。他警告出版社说，【180】没有它，他做生意也容易，因为它卖给他的书，他也能从布永和荷兰的供应商那里弄到，他和这两地的供应商做过大量生意。“如果我们停止一起做生意，我会感到遗憾，但要是条件于我不利，我宁愿一点生意都不做。”

这些谈判的每项细节都牵涉大额款项，因为谢弗里耶和纳沙泰尔出版社都指望做大规模的生意。对于谢弗里耶的反对意见，出版社抱歉未完成告知义务就把票据开给了他，但仍然坚持不修改条件——这倒不是因为不尊重他，而是因为出版社已经根据“计算这种实证之学”，对拟议的交易的各个方面都认真盘算过。谢弗里耶回答，他也很抱歉，但不会改变他的条件。“你们将失去一家优质客户，我本来是会帮你们卖许多书的，而且付款也不会有问题。”他同时抱怨说，出版社发运的两批货物，他都还没有收到。

原来它们是在路上耽搁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承保人”吉永没有能力把它们偷运过克莱尔沃莱拉克附近的边境。于是出版社被迫用骡子沿着通往利摩日的山路运送这两批货，这条路安全，但是迂回曲折。从纳沙泰尔出发后，分别花了11个月和9个月，直到1773年12月，它们才运到谢弗里耶手中。价值626锂19苏9德尼的货物，运费就花了160锂15苏。

谢弗里耶最后以高出书单所列10%的价格开出了期票，6个月后期，他还提议，如果出版社能免除运费和风险金把货物运到奥尔良，他就继续照这样付款。这个计划在1774年似乎可行，因为法国政府先是降低后来又取消了所有进口图书的关税，这项关税致使书价高得离谱。由于不再和税务检查官打交道，出版社现在就可以经由里昂运输货物，利用它自己的货运代理商来避免货物被里昂书商行会没收。他们与谢弗里耶的生意恢复了，并延续了18个月，尽管他始终在抱怨延误，还抱怨毁损——出版社仓库的工人若没有把货包包紧，折帖有时就会和绳索摩擦而被扯烂。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1775年年中。谢弗里耶发现，在45公里外的卢丹有一家经销商叫让·弗朗索瓦·马勒布，【181】正在以比他低的价格销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图书。马勒布无权从事图书贸易，因为他既没有加入书商行会，又没有购得营业执照。但是他却能从纳沙泰尔订购大量书籍，以低价来进行现金交易，主要是卖给小贩，由他们在整个普瓦图大区 and 卢瓦尔河谷地区沿街兜售。谢弗里耶和拉罗谢尔的帕维、奥尔良的库雷·德维尔纳夫以及该地区的其他主要书商一样，对这种行业外的人参与竞争愤愤不平。“马勒布先生如果是一位书商，我不会这么生气。但是你们必须承认，一个对图书贸易一窍不通的人，能在普瓦捷到处宣称，任何渴望阅读的个人都可以依靠他以每张折帖1苏的价格获得图书，这是说不过去的。”1778年10月，谢弗里耶和法瓦尔热谈生意时，他的气还没有消。尽管他向法瓦尔热下了订单，但是出版社仍然觉得他提出的条件——免运费和风险金运到奥尔良——不可接受。到1778年底，他们就停止了和他的生意往来。

尽管有这些困难，谢弗里耶订购的书籍也足以让我们来评估他的交易模式。如他在几封信中提到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图书，他也能从其他出版商兼批发商那里弄到，如布永出版社，他经常跟它做生意。他的信证实了法瓦尔热在里昂和阿维尼翁与书商们商讨时得知的情况：出版商之间进行广泛交换，就意味着可以从不同的供应商处弄到相同的

图书。谢弗里耶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的订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他是普瓦图两家最重要的书商之一，因此根据他的订单得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该省各地的图书需求情况。

像拉罗谢尔的帕维一样，谢弗里耶也要迎合当地胡格诺派教徒的需要。他卖了许多新教版本的《圣经》和《诗篇》。梅西耶的《2440年》在他订购最多的书籍的清单上排第二位，紧随其后的是卢梭的著作。谢弗里耶也订购了大量伏尔泰、雷纳尔和几位霍尔巴赫小圈子的作家的著作，尽管数量都不多。启蒙文学肯定在他的贸易中占有很大比例。历史书籍也很重要，因为他订购了保罗-弗朗索瓦·韦利的《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雅克·泰勒（Jacques Tailhe）的《罗林先生的简明古代史》和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182】谢弗里耶用一些宣扬色情的“哲学书籍”——如《缝补女马尔戈》——给他的订单添加调味料。但是他对消遣小说兴趣不大，尽管他也订购过里科博尼夫人的言情小说。总的说来，他喜欢经过检验已被证明是优秀的著作，如莫里哀的戏剧和雅克-克里斯托夫·瓦尔蒙·德博马尔（Jacques-Christophe Valmont de Bomare）的《博物志通用推理词典》（*Dictionnaire raisonné universel d'histoire naturelle*）。

从谢弗里耶的成功可知，他是熟谙图书市场的。他的书店地处普瓦捷主要大街——总督路（*rue de l'intendance*）上，让整个城市及大部分周边地区都能接触到当时流行的书籍。从图卢兹到普瓦捷，法瓦尔热一路上遇到的主要书商可以说都是如此。他们需要最新出版的图书和像历史与旅行这些领域的正规书籍，以及相当一部分“哲学书籍”。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已经走过了一半，他发现他所遇到的市场都有很强的同质性。书商们不仅要的图书种类一样，也都能从几家经营范围基本相同的出版商兼批发商那里弄到这些图书。然而，在法瓦尔热旅行的下一站，他见到了图书生意完全不同的方面：由无名的小经销商们进行的远离正规贸易渠道的图书销售。

- (1) 法国国家图书馆，mss. fr. 22185，f.176。关于图卢兹，见克洛迪娜·亚当，《18世纪图卢兹的印刷商兼书商及他们的产品》，图卢兹：勒米拉伊的图卢兹大学出版社，2015。
- (2) 当时有关马的兽医学观点，见克洛德·布尔热拉（Claude Bourgelat），《马医学原理，或关于马的知识及马医学的新准则》（*Éléments d'hippiatrique ou nouveaux principes sur la connaissance et sur la médecine de chevaux*）三卷本，里昂，1750—1753；关于马的历史地位的全面描述，见达尼埃尔·罗什（Daniel Roche），《16—19世纪西方的马术文化》（*La Culture équestre de l'Occident, XVIe-XIXe*

siècle) 三卷本, 巴黎: Fayard, 2008—2015。

- (3) “夏皮兄弟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74年1月22日。
- (4) 关于波尔多的书籍的次要文献, 已列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 我要对简·麦克劳德 (Jane McLeod) 的帮助表示感谢, 她在1982年6月30日的信中提供了有关贝尔热雷的资料。她在《特许忠诚: 现代法国早期的印刷商、赞助人和国家》 (*Licensing Loyalty: Printers, Patrons,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大学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2011) 中, 对贝尔热雷和其他波尔多书商进行了探讨, 尽管她研究的焦点是印刷商, 而不是书商。
- (5) 法国国家图书馆, mss. fr. 22185, f.100。
- (6) M.迪穆兰 (M. Dumoulin), 《地理, 或以财政区划分的法兰西王国概况》 (*La Géographi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u royaume de France divisé en ses généralités*), 巴黎: Leclerc, 1767, 第5卷, 第73页。
- (7) 雅克-安托万·迪洛尔, 《法国主要胜地概况》, 巴黎: Lejeu, 1789, 第41—48页。
- (8) 关于交换的详细叙述, 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关于谢弗里耶的论文及附随的信函, 文中说明了牵涉18世纪生意交易的计算和谈判的情况。

第十章 卢丹：沿街兜售与毛细管分销体系【183】



枫丹白露附近的独特路景

让-雅克·德布瓦西厄绘，《里昂路上枫丹白露森林的入口》（*Entrance to the Forest of Fontainebleau on the Road of Lyon*）。哈佛艺术博物馆 / 福格博物馆，伊丽莎白·R.西蒙斯小姐的赠品，M554。哈佛大学影像部版权所有

法瓦尔热从普瓦捷到卢丹一路很轻松，40公里的路程，不到一天就到了。他对新买的这匹马很满意，跑起来比以前那匹快得多。但是，乍看上去，卢丹几乎不值得逗留半天。它不具备拥有一个图书市场所需的条件，或者说，甚至任何其他商品的市场都不配拥有。当地的人口数量在低水平上徘徊，只有大约4000人。经济依赖当地的农业，辅以羊毛产品和皮货。它没有重要的教育和行政管理机构——只有一个总督的无薪特派员的办公处、一个小法庭，以及一所小学院。它和商路没有什么重要的连接，只有几条小路通向东北面的图尔和东南面的普瓦捷。而且它没有一家书商或印刷商。

然而，在1770到1786年间，卢丹却成为联结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和法国零售摊贩或集市商贩之间广泛生意网络的枢纽，这些商贩就在整个卢瓦尔河谷地区和周边各省兜售图书。它的偏僻实际上成了发展这种

贸易的优势，因为法国政府不想劳心费神对这么一个小镇的图书贸易进行监管。因此卢丹成了研究图书贸易毛细管分销体系的理想地点。

处在这个网络核心的企业主是让-弗朗索瓦·马勒布（Jean-François Malherbe）。他没有权利经销图书，因为他和书商行会没有关系，也没有营业执照。他的公开身份是货运代理商，可以经营各种货物。在1779年的贸易年鉴上，他被列为装货人，业务主要是农产品发货，也发运“各种书籍”，佣金为2%。【184】^①因此严格说来，他是公开以图书贸易为副业的，尽管他只是以货运调度员而不是书商的身份在年鉴上闪过。

马勒布的卷宗里留存的最早几封信中，有一些零散的参考资料表明他是个胡格诺派教徒，在瑞士有亲戚，创办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四位合伙人他都认识。他很可能在纳沙泰尔上过学（当时奥斯特瓦尔德、贝特朗和贝图正在那里办学），其间在萨米埃尔·福什家搭伙。他1770年3月10日写给福什的第一封信有许多私密内容，表明他和整个福什家族关系很密切。除了问候孩子们和共同的朋友之外，他委托福什把他旅居纳沙泰尔时遗落在那儿的怀表卖掉。当时马勒布就已经在尝试做货运代理生意了，但是做得不顺利，手头非常紧。其实这封信就是从圣梅克桑一处秘密地址写出的，1767年他破产了，怕因债务坐牢所以正在那儿藏身。

正当他的律师试图与他的债主谈判庭外和解之时，马勒布与他在加的斯的一个朋友开始小打小闹地做某种生意。倘若福什能帮他弄到一笔重要的资产，或许他还会和瑞士的朋友做生意：“帮我找一个带两到三万嫁妆的女朋友吧。我希望有更大的资本，但我父亲在世期间我不可能拿到多于一万到一万二的钱。这老头太喜欢享乐了。”他父亲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补充说，所以不能指望家里借钱给他，帮他恢复破产的生意。最可行的计划是把他散落在各处的资产归集到一起——无疑不能让债主知道——并再次开始收进出口商品的销售佣金。图书在他所考虑的商品中占有突出地位。“你们的《新约》和《诗篇》在我们普瓦图的农民中间很受欢迎。”1772年底，普瓦捷的一家法院终于结束了一场跟他的破产相关的讼案，让他恢复了在卢丹的生意。

之前不稳定的财务状况使马勒布看上去不像是个有前途的客户。但是，他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提到各种听上去对发展贸易有助益的行动，从而博得了纳沙泰尔的关系人的好感。例如他宣布要去参加胡格诺教派在“沙漠”中举行的室外讲道仪式，并在那里把宗教书籍推销给牧师和他们的教众。【185】他提议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征集《赫尔维西亚月刊》的订户。他认识普瓦捷、索米尔（Saumur）、图尔、昂热和南特的书

商，他试图拉他们做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他也和一些个体企业主有联系，如布卢瓦的一位名叫莱尔的小学校长、拉罗谢尔的一位商人德博尔德（Desbordes），以及罗阿讷的一位货运代理商布瓦塞朗，他们都非常想做图书投机生意。为了揽到订单，他在他的客户中散发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并在全卢瓦尔河谷地区出版的商业小报中，夹带该出版社的图书广告。马勒布明白，他的出路就在图书贸易。其实，他在破产前就曾经为萨米埃尔·福什和加布里埃尔·克拉默推销过图书。

但是，马勒布的主业是为各类商品的供应商转运货物，为他们安排销售并收取货款，以及推销地方产品，而销售图书只是副业，偶尔做做。他很想向瑞士客户供应“胡桃油、亚麻、大麻……我们的芫荽籽、茴芹、茴香、南瓜、鹅毛、鸭、家禽，我们的羊皮、羊皮纸、粗革等等”。他所有的信都冗长啰嗦，但都能给人同一个印象：他样样生意都做一点，而且乐意做任何生意。他赚取生计既靠他灵活的头脑，也靠经由通信网络广泛收集的信息。

由于马勒布有货运代理商的经验，他能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既涉及运输货物的最佳路线，也涉及防止货物被没收的最佳方法——无论是在法国边境，还是在王国内部的书商行会，这些路线和方法都很适用。他还发送有关偷运者“保险业务”的报告，并就保险费率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建议。当货运通道的某些路段发生阻塞，或者运费昂贵时，他就发送警告信息。他用这一封封信证明了自己在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开辟新书市场方面的价值。1773年底，他在索米尔的一家客栈设置了几间库房，还雇了一个工人把从卢瓦尔河沿线各地运到那里的货物辗转颠簸一路转运到罗阿讷港，而从里昂运来的货物也都是在这里卸货的。

用一连串的信证明了他的新生意大有希望之后，马勒布就开始提要求了。他问纳沙泰尔出版社能不能把各类图书发运一些给他，他可以作为存货，一有机会就委托别人把它们卖掉。出版社拒绝了。它像许多出版商兼批发商一样，不做这种委托的投机生意。【186】马勒布不甘罢休，又抛出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提议。他刚刚计划预售几种新教讲道书籍，出版社可以把货发给他，同时贷给他一小笔钱作为他充当中间人的报酬。1773年3月，他们就价格和运输路线达成协议。但是货物在边境被卡住了，他们只好分开打成两个包，各重190磅，用骡子驮运越过中央高原，从利摩日运到里昂。这趟货离开纳沙泰尔后走了10个月之久，最终到达卢丹时，价值250锂10苏的货物运费竟累计高达118锂10

苏——马勒布抱怨说，要是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听他的话沿卢瓦尔河运货，至少可节省30铌。

马勒布实际想做的生意的性质，在他1774年初的信里已有显示。1月7日，他写道，一个“零售摊贩”（*merchant peddler/colporteur*）找到他，交给他一长列书单，想要订货。零售摊贩有许多种。^②在大城市，他们通常都是在脖子上挂一个陈放商品的托盘沿街叫卖（这就是*colporteur*这个词的由来）。他们做这种买卖必须得到警察允许，而且要佩戴一个铜质徽章证明自己合法——至少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们常常干违法的事，也偷卖禁书。马勒布遇到的那些零售摊贩比皮鞋贩子要高一等，因为他们属于流动商贩一类，被称为集市商贩，他们驾着马车，载着品种丰富的图书，从一个市镇转到另一个市镇，走街串巷兜售，书籍是从瑞士和低地国家等地的出版社和批发商那里进的货。他们在集日期间设摊，为散居农村的顾客服务。他们中许多人来自诺曼底，主要来自库汤斯，那里有整个家族世代代就靠做零售摊贩维持生计。但是他们常常没有固定住址，无法派人上门催收未支付的汇票。他们因为常常不能支付货款而声名狼藉，所以得不到批发商信任。为了说服供应商给他们供货，他们通常付一部分现金，并留下一张期票，约定在确定的日期和地点结清账目——地点常常是一间客栈，【187】一般认为那儿就是他们的落脚点，但这地址常常人走屋空，成为债主们所说的“空中住址”（*domicile en l'air*）。

马勒布知道，沿街叫卖是一桩有风险的生意，但是那些找他的零售商贩在他看来却是一种可以指望的机会：“如果这个人对路子，他就能帮你们揽到许多生意，因为他是在城市之间做行商生意。”他在寄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夹了零售摊贩J.布莱索（J. Blaisot）的一封信。布莱索从出版社的书目中选了19种书籍，每种要12册，但马勒布说服他把订购册数限制在3到4册，不要让出版社冒大宗交易的风险。布莱索选书类似于正规书商——其中有各类书籍，包括一些历史作品、旅行游记、梅西耶的《2440年》，以及某一版本的卢梭著作。货物必须在奥尔良交付，运费和风险金由出版社承担，布莱索在奥尔良一家著名的货运代理商皮索和科涅公司（Pisseau et Cagnyé）的仓库取货。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他建议出版社与奥尔良一个有名望的书商库雷·德维尔纳夫联系，他和此人有大量生意往来。

1774年2月，马勒布写道，库雷和皮索都报告说，他们了解布莱索，这人时不时会买一些书，而且总能按时付款。因此他建议纳沙泰尔

出版社同意他的订货。它通过汝拉山的偷运者发运了货物，六周后布莱索在奥尔良安全地取到了货。他支付运费和风险金很爽快，尽管这些费用高达图书批发价的三分之一：价值91铤的货物付了30铤。四个月后又来到卢丹，把图书本身的款项付给了马勒布。看上去一切都表明，马勒布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开辟了一个新市场。

按照马勒布的评估，这个市场偏爱启蒙运动的书籍：“眼下唯一的潮流，就是那些反映新哲学家们观点的书籍，也只有这些书能畅销。”1774年，纳沙泰尔出版社感到迎合这个需求并不难，因为那时它已经能让货物顺利通过里昂了。在运输费用的计算上，马勒布主动提出了一个很专业的建议——实际上是提了一个一般性的模板来指导出版社的计算。它通常以每张折帖2苏的批发价格销售“哲学书籍”（两倍于他们销售盗版合法书籍的价格），【188】10张折帖就达到1铤（20苏）。10张折帖的重量略轻于5磅（以单位 *poids de marc* 计算）。这样，一个有1英担折帖的货包，包括包装材料在内，大约价值200铤。1英担书籍的货包从纳沙泰尔运到里昂的费用就可以这样计算：

从纳沙泰尔经由日内瓦运至里昂.....	10铤
日内瓦和里昂支付给车夫的追加报酬.....	1铤
在里昂委托偷运代理商的费用.....	2铤
其他各种费用.....	1铤
总计.....	14铤

价值200铤的1英担货物要14铤费用，即商品价值的7%。因此出版社应该能以这个批发价的合理百分率，免费而且无风险地把货物一直运到里昂交给客户。马勒布辩称，如果出版社按照这种算法来向它的车夫以及它在日内瓦和里昂的货运代理商布置任务，就可以防止费用任意上涨，而它在法国的客户也就不会抱怨它的服务不好了。

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种算法，这个计算说明了图书贸易职业人员考虑他们生意的思路。如他们所见，地下分销体系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它的主要问题是协调不易，以及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零售商贩不可靠。

正当纳沙泰尔出版社重新打通了经由里昂的路线时，零售商贩中间有传言说，马勒布在供货侧有了突破性进展。他向他们分发了纳沙泰尔

出版社的书目，包括手写的禁书书目（他曾经雇了一个抄写员抄了许多份），而他们也把卢丹纳入他们流动贩售的路线，希望能利用到来自纳沙泰尔的货源。1774年3月，马勒布再次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议，给他提供充足的书籍，让他建立一个“存货库”，以便他把它们分成小包卖给零售商贩，收取现金。每隔六个月马勒布寄给出版社一张销售款项的汇票，其中将扣除他的一小笔服务佣金。他见识过《蓬帕杜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Mme de Pompadour*）、《上帝与人》（*Dieu et les hommes*）和《现代的阿雷蒂诺》（*L'Arétin moderne*）在他所在地区过高的价格，一本要卖到6锂。他们即使把价格调低一些也能在这类非法图书上大赚一笔。

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当然不会把整个仓库的“哲学书籍”都供应给马勒布。【189】但是他们持续地按订单向他供货，这些订单来得越来越勤，非法书籍在其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很快，马勒布就从为自己捞钱的目的出发来订货了。他从出版社订货，卖给零售商贩，获取可观的利润。他不像纳沙泰尔的瑞士人，他在卢丹有优势，知道零售商贩们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对于他信任的商贩，他可以接受期票，对于他不熟识的商贩，则要求以现金预付高额定金。在某些情况下，他像和布莱索做交易一样，把他们的订单直接转给出版社，而这就为我们了解这些零售商贩的生意提供了些许机会。

例如在1774年6月，马勒布推荐了圣梅克桑的一个叫普朗凯（Planquais）的零售商贩，此人三个月前就拿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份手写书目，带回来一份有59种书籍的订单，其中大多数都是要两到四册。【190】普朗凯在他的顾客当中摸过底，显然料定他能从出版社订到足够装满半个马车的书籍。他的订单中有几种合法图书，如马蒙泰尔的《道德故事集》（*Contes moraux*）和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有卢梭的大量著作，如2册《爱弥儿》（*Emile*）、4册《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以及2套十五卷版的文集；另有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一些著作；还有一些粗俗的图书，如4册《哲学家泰蕾兹》、4册《教会的荣光》（*Lauriers ecclésiastiques*，意指教士们的艳遇），以及3册《阿拉斯的蜡烛》（世俗色情小说）。他甚至还订购了一册《叫卖圣经的小贩》，这是弗朗索瓦-安托万·谢弗里耶的一部讽刺作品。普朗凯自己身为零售商贩对这本书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的订单不过是一份从马勒布手中不加评价地选出的书单而已，或许也有普朗凯不会写字的原因。

两个月后，马勒布报告说，来找他的零售商贩越来越多了，他需要

更多的“哲学书籍”书目：“零售商贩们非常想搞到这类书。卖这些书比卖别的书赚钱多，因为他们给这种书定价随心所欲，可以按照人们对这类书的需求程度来调整。”到9月份，书目寄到，正好布莱索和普朗凯也来取他们新到的货，一道来的还有第三位零售商贩，马勒布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三人都下了大订单，全部是禁书。马勒布转递订单时附带了一个要求，即出版社得付给他2%的佣金和一些额外的酬劳，因为他为出版社揽到了客户。

然而出版社并没有酬谢他，而是要他先把出版社的账款收回来，然后才能处理这些新订单。马勒布回答说，那些零售商贩还在卖货的路上，要到1775年春天才能转回来，他也只能在那时跟他们结账；而布莱索已经从孔福朗（Confolens）和昂古莱姆（Angoulême）来信打听他的货了。让他失望会很可惜，让普朗凯失望也一样，马勒布补充说——尽管他或许可以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竞争对手萨米埃尔·福什那里进货来满足这两位零售商贩。福什是在1763年和公司吵了一架后离开的，然后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继续做图书买卖，销售了大量“哲学书籍”。这番争辩让纳沙泰尔出版社放弃了它的主张。可是当货物在1775年6月运到后，马勒布又来信说，他自上个秋季以来就没再见到过布莱索或普朗凯。有传言说他们都破产跑路了。的确，按其他一些零售商贩的说法，普朗凯已经放弃了流动兜售，躲到他的家乡诺曼底的某个地方去了，而布莱索是在朗格多克失踪的。【191】尽管如此，马勒布仍能找到替代人选；他本人的处境现在似乎也改善了，因为他父亲给了他一笔价值10,000到12,000锂的财产。他可以自行把普朗凯的货物买下来，卖给他新近结识的一些流动商贩。

他新近结识的那些流动商贩中，有一人名叫诺埃尔·吉尔（Noël Gille），看上去特别有前途。他常驻蒙塔日，1775年8月在卢丹摆摊卖了一周的货。马勒布很看好他，把一批价值一千锂的图书（大部分是“哲学书籍”）卖给了他。可是如下文所述，一年后诺埃尔·吉尔宣布破产。与此同时，纳沙泰尔出版社正在向普朗凯追讨一笔237锂的债款，那是他为一次发货寄来的汇票。出版社来圣梅克桑找他，发现他没有家庭住址。而马勒布带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普朗凯还拖欠拉罗谢尔的帕维1000锂债款，帕维试图把他逮起来，但也无法找到他。“人们怀疑他在科尼亚克呈交了他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已宣布破产）……一个在图尔做印刷生意、最近从我这里买了一些图书的商人说他认识这个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布莱索、普朗凯和吉尔属于同一类人，马勒布跟他们做生意定然会吃大亏。问题是他根本无法避免被他们卷进不能自拔的麻烦，那可是一张在市场、乡村集市和路边客栈的各个隐蔽结点彼此相联而成的债务网。他不在大街上的商号里购货，因此始终都是个中间人的角色，在图书贸易的国际商人和国内小贩之间牵线搭桥。“这些零售商贩都是些老赖，你有什么办法？”他哀叹道，“我卖给他们的东西并不多，但还是难免受他们的骗。现在诺埃尔·吉尔宣布破产了。他们几乎谁都没有诚信，而那些在固定地点经营的正规书商开价又太高，根本没法跟他们做生意。”

从1776年11月起，马勒布对那些零售商贩就再没什么好话了，尽管他禁不住总想跟他们做生意，偶尔还会屈服于这种诱惑：“零售商贩分布最广泛，从他们那里能赚到一些钱，只是他们人品太差，没有家，没有住址，其中四分之三都行过骗。”【192】1777年1月，他写信告诉纳沙泰尔出版社，他曾经把他们的一些书卖给“来自莫城市郊的某个凯讷（Quesne），绰号‘英国人’”，而此人已人间蒸发。另一个叫德尼·布亚尔（Denis Bouillard）的零售商贩也是这种情况。到了10月份，由于欠钱不还的债务人名单已经长得吓人，马勒布不得不雇请一位法警到诺曼底的库汤斯教区（许多零售商贩都是在那儿出生的）去抓他们，尽管他并不指望发现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已经在他们的家乡定居。似乎一点儿办法都没有，除非再次下决心撇开他们自己干，或者至少要他们订购货物时必须付现金。

马勒布虽然继续做着货运代理商的生意，但也成了书商，生意做得还挺大。他没有办法洗手不干，因为他在卢丹的仓库里积累了庞大的存货。所以当生意中的零售部分垮掉时，他就要试着另找销路。1777年春天，他的目光转向了“一个比零售商贩安全得多的新市场”——刚刚建国一年的美国市场。“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像形势所预示的那样成功独立了，那我们就将获得一个繁荣的贸易分市场。”随着美国人的前途越来越光明，他的想象力也被激发了起来：“我们乐意让美国商船进入我们的港口，并把我们的货物直接发往波士顿和其他目的地，我们的贸易将由此繁荣起来，而英国人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瓦然通（Waginsthon [编按：原文如此，指乔治·华盛顿]）将军似乎已经占了豪氏三兄弟（Howe brothers，即George Howe，Richard Howe和William Howe）和康华里（Charles Cornwallis）将军的上风。如果真是如此，美国人就将赢得这场战役，英国人则会被击溃……这场战争预示着政治事务中的一场前途有望的革命。”

然而“瓦然通”和世界政治并没有直接解决卢丹的图书贸易问题。在南特港停驻的船长们常常会载上少量货物在其他停靠港卖掉，做点私人投机生意。马勒布就用这种方法，借助一位朋友的影响力销掉了价值1200锂的图书。然后他憧憬着自己一边扩大从卢瓦尔河到沿海的贸易，一边等待新世界的开放；因为说实话，免费携带少量货物倒卖的船员比零售商贩要好些。“如果这种销路能产生更多的顾客，它就好比牵涉零售商贩的任何事情都更可靠，那些零售商贩无家无业，而且通常都是骗子。”

可这些前景到头来还是镜花水月。【193】马勒布被困在一个极小的零售生意圈子里，需求大，但是现金少或信用低。正规书商不愿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在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抗议，因为马勒布将它的图书降价销售，截走了他们的生意。

法瓦尔热1778年到访这个地区时，他从许多大书商那里都听到了这种情况：拉罗谢尔的帕维、尼奥尔的埃利和普瓦捷的谢弗里耶都这么说。在奥尔良，库雷-德维尔纳夫告诫纳沙泰尔出版社必须放弃马勒布。像他这样无照经营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他还专营非法书籍，这是会招灾惹祸的：“因为这类人销售许多反宗教、反道德、反政府的书籍，他们难免被人揭发，最终破产。”

然而马勒布从来没有被逮住。而且，法瓦尔热在卢丹和他详细商议后，还发了一份有利于他的报告：“收集了有关此人目前状况的情报后，我确信对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的行为举止得体而积极；他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一大笔财产，尽管他母亲每年养老要花1200锂；而且总的来讲，他销售商品头脑很灵活。在我看来，他非常机灵。”但是一个月前，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过老巴蒂略（Batilliot L'aîné）的一封信。老巴蒂略是巴黎一位专管图书贸易事务的银行家和收账人，他警告说：“就我所知，马勒布一文不值，你们要小心提防才是。”^③

马勒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散见于他信中的信息表明，他出身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且相当富裕的家庭，在卢丹附近拥有农用地，并且与南特的跨大西洋贸易有联系。在1777年6月28日的来信中，他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给予他信任，他说他父母已经同意他以11,500锂的价格出售他们所拥有的一幢房屋，以资助他的生意。他还拥有两块分成制租田，曾试图把它们卖掉来筹集资金。这个尝试没有成功，他写道，因为在美洲战争期间，海外贸易衰退，致使本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价格降到了不可接受的水平。他自己投资了咖啡和蔗糖贸易，他解释说，但是在太子港、开普敦和加的斯的债款无法收回来。【194】由于

无法筹措现金，他试图把咖啡运给纳沙泰尔出版社来偿还自己的一些债务。但出版社拒绝销掉他欠的巨额债款，因为发现他的咖啡没法喝。他设想的生意一个接一个都没能做好，结果马勒布只能越来越依赖父母。他在1778年他父亲去世前写的信中解释道：“奥斯特瓦尔德先生清楚地知道，我不富裕，我最好的一些生意设想仍在受父母的制约。”

在法瓦尔热1778年10月末到访之后，马勒布的生意起起落落的情况可以从他的来信中详察。这些信冗长啰嗦，书写也难看，不堪卒读。实际上出版社曾告诫过他，要恪守他们就每份订单达成的条件，“不要用冗长而晦涩的语句来烦我们”。不过，语言啰嗦倒也增加了马勒布来信的价值，因为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一个身处行业边缘的小经销商是如何经历图书生意中的各种偶然事件的；而且，由于马勒布个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都熟识，因此他谈起自己的处境都很随便实在，不像那些正规书商。

马勒布按时付款了四年，到1777年就不行了。这一年他的亏空已高达1494铌。1777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警告他，它不能再向他发货了，等收到他的货款再说，因为它授予他的“信用”只能到此为止。马勒布回信说没事儿，等他父亲去世后他就会得到一大笔遗产——好像这事马上就要发生似的。而这件令他开心的事就在1778年4月21日发生了。
(4)马勒布终于能够兑现一张未付的期票，并满怀希望地谈到他重振生意的前景，因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还有了让货物瞒过监管当局的新办法。

1779年初，在法瓦尔热到访几个月后，马勒布同意按六五折的价格订购纳沙泰尔出版社大部分“哲学书籍”的存货。这些货分成七个大货包于5月发出，9月份安全运达。账单高达3356铌，对当时的图书贸易来说算是巨款了。马勒布承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用期票分期偿还债务。可是当第一张848铌的期票在1780年3月到期时，他在巴黎的钱庄老板却拒绝承兑。

随后的六年里，马勒布的大多数来信都试图避谈、拖延或要求减免他的债务。【195】他有一连串数不清的理由：北美的战事全面破坏了商业贸易；缺乏硬币和汇票谈判艰难；运费上涨，尤其是在1777年法令颁布以后；还有，自己的销量下降了，而且卖出去的货款也难以收回。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随着自身财务压力的增大，它对马勒布陷于困境的同情心也少了。1780年5月，它拒绝让他重新制订一些款项的偿还计划。11月，他在巴黎的钱庄老板拒绝兑付另一

张期票，这次是408锂。马勒布声称这笔钱他要用莫城书商普律多姆（Prudlhomme）为他存入的资金来偿还——普律多姆是许多欠他钱不还的书商中的一位，这些欠款总计将近1500锂。雪上加霜的是，他也不能卖掉他继承的土地来筹钱，因为地价急剧下跌，而就算按便宜的价格出手，想买的人也弄不到足够的现金来买农用地。

1780年12月，出版社警告马勒布，他们已经放手让巴蒂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逼他还款，包括法律诉讼。巴蒂略是贸易界公认的恶犬，从欠债书商那里榨取资金的手段非常残酷。他的服务收费很高，这就又增添了马勒布账上日益增加的赤字，此外还有拒付期票的高额费用——拒付期票是一种法律手续，当债权人手持一张汇票在到期日要求支付时，债务人或其代理人（通常是一个钱庄老板，债务人可能把钱存放在他那里）拒绝承兑，就要履行这种手续。1781年2月，出版社通知马勒布，马上有一笔1318锂的期票到期，他最好把它付掉。

1781年3月3日，马勒布给债主们发了一封通知信，宣布他正面临破产，必须中止所有支付。他把资产负债表交与索米尔的一家商号即弗夫·布泰、达耶与迪皮公司（Veuve Boutet, Daillé et Dupuis）保管，并且在和通知信一起寄给他的主要债主的私人信件中，恳求最好是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他的案子。根据通知信所言，他的债务高达58,000锂，至少原则上可以用73,002锂的资产来抵偿。这些资产包括36,000锂的不动产（三块分成制租田、一座葡萄园，以及在卢丹的一幢房屋）和价值400锂的家具——“在我居住的房屋里，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庭，我和我妈一起吃饭，这可以消除大家对我可能因过日子大手大脚而导致破产的担心”。【196】其他财产包括别人欠马勒布的债务，但是其中许多是“可疑的”，而且他已经减免的更多——有25,785锂“被当作未偿债务减免，有些是无力偿还的人欠的”。资产负债表包含他作为货运代理商的所有交易，不只是他作为书商的经营活动。他估计仍然可以收回的债款在800到1000锂之间。但是他在一封专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请求宽恕，他对在不久的将来偿还债务不抱希望。“我再也不知道能相信谁了，我碰到这样的书商真倒霉。这些正规的书商付钱都难，或者根本就不付。零售商干脆就从我这儿偷。他们搞走了10,000锂。”土地价格下跌又使他无法卖掉农用地。他能够减少拖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债务的唯一办法，是和在南特的朋友协商，给出版社发运一些咖啡——或者卢丹附近出产的土特产，如胡桃油、蜡和蜂蜜。按他在通知信中说明的，他提议按年分期偿还，从1782年到1784年，每年偿还总额的三分之一。其间他会继续做生意，尽可能地迫使他自己的债务人还款。“这

是防止我破产，使你们避免损失的唯一办法，尽管近十年来我都在为此努力不懈地工作。”

1781年5月8日，纳沙泰尔出版社答复说，他们已经调查过他的境况，并且搜集了足够的信息，觉得要求他立刻还清债务是有道理的。不过它同意，如果他偿还了几个月前他拖欠未承兑的第一张价值1318锂的汇票，他们才会考虑延期。马勒布答复说，他做不到。他弄不到现金。他欠福什的钱比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还多，但福什好说话。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要诉诸法律，就会搞垮他，它也就收不到多少债款了。他是诚实正直的人，是生意环境不好让他深受其害。他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来还清一切债务，直到最后一个子儿。他会一如既往，继续戒除任何嗜好。“我勤奋地工作，不花钱买任何奢侈品，我没有结婚，一日三餐都是我妈供应的……我的自由，我的生意，都是拜我的朋友所赐。我所想要的一切就是为他们工作。”

6月，巴蒂略派了一名法警敲开了马勒布的门，要求他支付新开的1318锂的汇票，并另加一些费用。【197】马勒布不能支付。他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解释只是他弄不到现金。“一个人满怀善意却遭此苦难折磨，这太残酷了。”两周后，他在一封信中发出悲叹，听起来他真的是绝望了。巴蒂略没收了马勒布仓库里三个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图书货包，都没有拆开。它们估价1559锂。巴蒂略威胁说，他要拍卖它们，不管价格如何。“这些价值1559锂10苏的货，在卢丹卖不到300锂，而且你们也非常清楚这些货物的性质如何，它们是不能摆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我将要承担法律费用，给我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很可能会引来警察介入，没收我的书，搜查我的家——你们准备让我承担多大的痛苦啊？”

很难知道奥斯特瓦尔德和出版社的其他董事们读到这个恳求时有何感想。由于多年来收到了马勒布许多这种极其令人烦恼的信，他们也许已经不再相信他了。毕竟，他也可能是在诈骗。别的书商写的信看起来也很绝望；然后在面临破产时，他们有时（如马赛的卡尔德塞格）就试图在债主之间挑拨离间，为了换得优惠条件会秘密支付其中几位的债款，而把其余债主的债款支付推迟。巴蒂略的威胁可能是一种吓唬人的方法。但是，马勒布关于公开拍卖图书会产生负作用的理由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最终纳沙泰尔出版社警告他，不容许他在费用上和在给予的三年延期期限里，向任何别的债主（大概指福什）提供优惠。1781年7月，马勒布回信说，他如释重负，也感激不尽，并且寄了四份新的还债汇票，三年期限，利息3%。

即使这样，他还在继续讨价还价。纳沙泰尔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的这些汇票，坚持要三份数额大一些的期票，利息5%，分别在1782年、1783年和1784年到期。马勒布同意寄这些新汇票，但到期日要延长一年至1785年。1782年10月，他未能清偿与另一次交易有关的价值290铤的期票，并回避了出版社的质疑，寄出了一份替代的期票，又把日期往后推了推。随着三份大额期票的到期日渐渐临近，情况也在继续恶化。到1783年，巴蒂略也破产了，同时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的付款也遇到了麻烦，主要是因为它遇到了跟压垮马勒布一样的难题，而且程度更严重：书商们陷入了困境，无钱偿还出版社的债务。

1783年4月，【198】当三份期票中的第一份到期时，马勒布又未能承兑，他再一次寄出一份替代的期票，推迟了到期日。1784年5月，他没能支付第二份期票。这次，为抵御出版社的威胁，他试图让远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一个叫卡博舍（Caboche）的巴约勒（Bailleul）人来兑付一张500铤的票据。卡博舍拒绝承兑，然后就躲了起来——有传言说，他躲在瑞典的哥德堡（Gothenburg），但马勒布听说他很可能已经回到巴约勒，接受他刚刚去世的母亲和一个叔叔的遗产。马勒布的第三份期票在1785年也未能兑现，而这时他已不再佯称他还有未还清旧债的客户了。

然而他还在做图书生意。不再能够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货，他就改从布鲁塞尔和阿维尼翁进货。他也许在亲自兜售，因为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几封信里，他提到过去普瓦图和圣通日（Saintonge）卖货。他的最后几封信还是在抱怨同样的事情：债务未还清，搞不到现金，土地价格低。尽管出版社继续威胁要打官司，但其实没有什么招数来强迫他支付。他们很难说服法国的法院把本该被法国监管当局没收的图书的货款判给他们。“我们已厌烦这些讨人嫌的通信了”，1785年7月，出版社写道。这时马勒布仍然未能偿付那份以卡博舍名义开出的500铤的替代期票。为了表示他讲诚信，他发运了一些更劣质的咖啡和一些次等纺织品来抵债，出版社说会把它们卖掉，不管能卖得多少钱。他从来设法拿出现金，却又从来不停止表白他是正直诚实的人：“我不怕别人说我。我和我妈住在一起，生活俭朴。我爸死后，我妈就让我和她在一起吃。我没有家庭开支，我就是个单身汉。我的生活开支极少。我只在生意必需时才花钱——邮资和一些差旅费。”

1787年1月，马勒布去世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试图从他的遗产中弄一些补偿，但是它的代理人，普瓦捷的一位商人报告说希望不大，⁽⁵⁾而

且卢丹的一位客户也证实，马勒布的资产被一座债山埋掉了。三位律师花了23天整理他的文件和财物。他的图书存货处理得到5,202铌，显然总督的特派员对这些图书没有提出异议。【199】他的家具和其他财产可能卖得20,000铌，卢丹的这位客户报告说，但是这些都被60,000铌的债务冲掉了。^⑥纳沙泰尔出版社最终把马勒布从“不良债务人”的账上划掉了，损失了1,368铌15苏3德尼。

马勒布的订单反映了在毛细管分销体系中流通的书籍的种类，而从伴随这些订单的说明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评估市场对这类图书的需求的。他似乎非常了解市场，而且在巴黎有为他提供消息的人，其中一个名叫雅克-亨利-梅斯泰（Jacques-Henri Meister）的亲戚，是狄德罗的一个朋友和合作者。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和马勒布发生争吵之前，甚至还寻求过他的建议，应该盗印什么书籍。他推荐哲学家的著作和色情文学：“有传闻说，孔多塞先生有一部论著。还有一套黄色戏剧集，两卷本的，八开版，比我从你们那里进的好得多。《神妙圣事图，或揭开面纱的基督教》（*Tableaux des saints mystères ou Christianisme dévoilé*）正备受追捧。”

尽管马勒布在早期的信中曾暗示他要重点关注新教书籍，但是到1775年，他就变了调子，指出伏尔泰的新著“肯定有大量需求”，而有关信仰的书已经过剩，“宗教热情已大大冷却了”。他的许多信件都指出，读者对抨击路易十五及其大臣的政治毁谤书籍需求强烈。1775年11月4日，马勒布写道，《法国掌玺大臣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的新版本一定畅销。他的顾客常常要类似的书籍，这类书籍把政治抗议和毁谤性报道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像《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以及《身披甲冑的报人，或法国宫廷的丑闻轶事》这样的书。

除了对个别书籍的需求进行评估之外，马勒布对何为最流行的图书也有敏锐的意识。1776年12月，他要订购“一些最近八到十年间写作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书籍”。1779年11月，他指出对哲学家们著作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同时还诡异地伴随着对巫术书籍的需求，“你们有没有《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Politique naturelle, ou discours sur les vrais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霍尔巴赫小圈子的一部匿名论著），弗雷烈、布朗热、爱尔维修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荷兰版）的著作，以及《用称呼和咒语在几个城市和村庄验证过的小阿尔伯特的真实奥秘》（*Véritable secret du Petit Albert éprouvé*

dans plusieurs villes et villages avec appellation et conjuration)、《红龙》(Le Dragon rouge)、《大魔法书》(Grand grimoire)、《阿格里帕》(Agrippa)、《手册》(Enchérion)？后面的书很荒唐，但很受欢迎。”【200】到1781年底，当马勒布开始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他发现伏尔泰的著作销量有所下降，并发现他1779年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大量粗劣的“哲学书籍”很难卖掉：“这类图书不再流行了。”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黄色书籍还有人要：“写风流事的书仍然畅销。”

尽管马勒布对图书市场需求的评论与正规书商的评论没有太大差别，但他们在禁书上的侧重点则明显不同——因为他是零售商贩们的中介，所以他侧重的就是他们喜欢的那类图书。根据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作出的统计十分详尽，因为直到1785年，正如马勒布在信中所强调的，他的所有书籍都是从纳沙泰尔出版社及其以前的合作伙伴萨米埃尔·福什那里进的。（要更准确地反映马勒布的生意，统计数据只包含了他自己的订单，不包含他转递的零售商贩布莱索、普朗凯和吉尔向出版社下的订单；也不包括他在1779年2月下的大订单，那是出版社为了清仓而做的一次大甩卖，反映不了当时的市场需求。）

马勒布最常订购的书籍中，除了新教版的《圣经》《诗篇》和礼拜仪式用书外，最“畅销”的就是针对路易十五统治后期最著名人物的政治毁谤书籍。由此往后依次是：唯物主义哲学书籍，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爱尔维修的《论人》(De L'homme)；一些反教权的小说，如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壮烈而滑稽的诗，诗歌十八首》(La Pucelle d'Orléans, poème héroï-comique, en dix-huit chants)、亨利·约瑟夫·迪洛朗的《马太兄弟，或人类精神的大杂烩》(Le Comfère Mathieu, ou les bigarrures de l'esprit humain)；一些色情诗集，如《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Recueil de comédies et quelques chansons gaillardes)，一部匿名诗集；以及尼古拉·埃德默·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的色情小说《堕落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Le Paysan perversi, ou les dangers de la ville)。

马勒布热衷于卖打着“哲学书籍”幌子的各类非法图书，但这掩盖不了他也订购了许多完全合法的书籍的事实，尽管那些合法书籍都是盗版书。【201】在消遣小说中，他喜欢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松戏剧和诗歌，以及萨洛蒙·热斯内(Salomon Gessner)被译成法文的令人伤感的田园诗。他订购了总计127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这是一部十五卷的西方史纵览，而且他是重复订购

的，1775到1785年间共订购了8次。这种重复订购尤能说明问题，显示出市场对这种书籍一直有需求。马勒布订购了保罗-弗朗索瓦·韦利的二十卷本《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5次，订购了雅克-克里斯托夫·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十二卷本《博物志的推理与通用词典》8次，还4次订购了六卷本的孟德斯鸠的著作。

从马勒布订购书籍的总体模式可知，他和他的零售商贩所服务的读者，既需要内容实在的严肃书籍，也需要各类刺激性的毁谤书籍和反宗教书籍，这种模式还表明，激进书籍已经渗入图书贸易的最细微的渠道。

因为马勒布与零售商贩打的交道极为广泛，所以他的卷宗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时图书零售状况的切入点，而图书零售乃是旧制度下图书贸易中最隐蔽、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零售商贩常常在警察的档案中出现，但也只是闪现了一下——至多只有巴士底狱里的一次审问那么长，之后就不见了。如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数零售商贩（或称“赶集式的流动商贩”[*marchands forains*]，有时称“*foirins*”，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集市”[*foire*]，他们就在这种地方卖书）都是驾着马车走乡串户，时而走大路，时而拐进偏远的小道。他们在18世纪法国的“流动人口”中是瞬间兴起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位在几个资料来源中都出现过，那他的行踪就值得追寻了。我在资料中最常见到的，是在卢丹从马勒布那里进过一些货的流动商贩诺埃尔·吉尔，译名是“皮斯托尔”（*La Pistole*，皮斯托尔是一种外国硬币，或者表示一笔价值10锂的钱款，但也可以表示一种监狱，那里的囚犯额外花点钱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监禁条件）。

吉尔最早出现在警察档案中。^⑦1774年7月23日，巴黎负责监督图书贸易的老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发现吉尔在蒙塔日的玛德琳教堂后面摆摊售书，蒙塔日是外省的一个小型中心城镇，在奥尔良以东约70公里。

【202】戴梅里受命调查蒙塔日玛德琳集市上的可疑经营活动，很快就抓住了吉尔。他检查了书摊上陈列的八九百本书，从中找到了几种禁书，然后就召集当地的四个警察，把他的图书没收了，并把他押回住所——位于皮德朗康街的岳父家。在彻底搜查了屋里所有的柜子后，戴梅里又找到一些书，除了一本狄德罗的《不谨慎的小宝贝》（*Bijoux indiscrets*）之外都没有什么意思。他登上二楼，这里是吉尔和他妻子占据的一间俯瞰大街的小卧室，他妻子也从事图书生意。戴梅里命令他俩把衣袋掏空，搜集了几封信和收据。然后他要求查看他们的账本和信

函。据戴梅里后来审讯的报告，吉尔回答说“他不会写字，是他妻子和以补鞋为业的小舅子帮他写的……他没有纸，连笔或写字台都没有。”戴梅里指出，这听起来可疑，但他确实看到吉尔在审讯笔录末尾签名时有困难，而且字也写得很笨拙。之后他把吉尔送到当地拘留所，自己回客栈吃饭、睡觉，完成了这一天卓有成效的工作。

戴梅里研究了被没收的文件，于次日早上9点来到拘留所，要对吉尔进行一次彻底的审讯。审讯过程由书记员详细记录了下来，读起来和大多数审讯一样：一问一答，以过去时记录，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戴梅里在提问中想套吉尔的话，让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吉尔在回答时，则力图避免承认犯罪。下面是审讯记录大致内容的转述。

年龄？30。出生地？诺曼底库汤斯的蒙叙尔旺

（Montsurvent），补鞋匠的儿子。住址？岳父家。他岳父也是补鞋匠，但吉尔几乎总是不在家。身为一个零售商贩或流动商贩，他要赶集，跑市场。什么时候开始卖书的？12岁，沿街叫卖历书和通俗印刷品。六七年后，他效仿他的两个哥哥，开始卖普通图书，两个哥哥都是零售商贩。【203】其中一个在战争中失掉一只胳膊，因此每月有一皮斯托尔的抚恤金，弟弟诺埃尔的译名“皮斯托尔”就是这么继承的。这期间他的住处在哪？没有住处。四处奔波，走到哪就住在哪——诺曼底、法兰西岛、香槟、安茹——驾着马车拉着货。有什么权利当书商？“他认为自己就是书商，因为他卖书。”

这个回答是狡辩，吉尔完全明白。一个人要想从事图书生意，必须属于某个书商行会，或者拥有一个正式的营业执照。但是戴梅里没有追究这一点，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到货源这个关键问题上。吉尔说，他从巴黎进货，也从鲁昂的寡妇马许埃尔那里进货，从不进非法图书。

还有其他供应商吗？绝对没有。难道不记得一个叫亚当的人吗？嗯……记得，他曾经是马许埃尔寡妇的一个店员，但吉尔有一年没收到他的信了。撒谎！戴梅里在检查吉尔的信件时，发现了亚当几周前写的信。吉尔心虚地回答，那肯定是在他老婆的口袋里找到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亚当曾经自信地提议给他提供不道德的图书这怎么解释？嗯……吉尔拿到过几本《女子学校》（如今被认为是一本道地的色情图书）。把它们卖给谁了？“路过一个地方就卖给了当地的乡村牧师，也卖给各种各样的人。”

至此，吉尔的防线正在崩溃，而提问也开始击中要害。下面这一段以对话形式呈现，内容仍然紧贴原始文献。

戴梅里：你是不是也和别的书商做生意，但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吉尔：没有，除了和里昂的比松。

戴梅里：那为什么我在你的文件里发现那么多书商的信呢？譬如，这份书目是哪里来的？

吉尔：大概是里昂的伯努瓦·迪普兰或伯努瓦·庞蒂·布里塞送给我的吧。

戴梅里：不对，肯定是一个关系亲密的人给的，因为上方写着“我的书目要保密。”这个供应商是谁？

吉尔：也许我以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戴梅里：你是铁了心认定你没有和别的书商做任何生意？既不买他们的书，【204】也不把书卖给他们？

吉尔：我跟你说过我在巴黎、鲁昂和里昂的关系。除了去过几趟里尔和奥尔良，我只在那个地区做生意。

戴梅里：你撒谎。你的文件证明，你和日内瓦、布永、布尔日、图尔奈、列日，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做生意。

吉尔：我承认从布永的出版社进过一些历书和《不谨慎的小宝贝》，至于其他地方，我只跟装订商做生意。

戴梅里：什么？你在布尔日和枫丹白露装订书籍？你本来可以就在家附近做的，还能节省运费。你还有别的所谓的装订商吗？

吉尔：没有了。

戴梅里：好好想想。譬如在奥尔良？

吉尔：我记得在奥尔良装订过一些《蒙塔日习惯法》（*Coutûmes de Montargis*）。

戴梅里：你怎么解释这张说明？上面奥尔良的书商勒图尔米要把装订好的一种书发运给他，这书很可疑，因为他只用几个字母表示书名。

吉尔：那只是《基督教节日的模仿》（*Imitations des journées chrétiennes*）。

戴梅里：那勒图尔米在信里附的单独说明中说要你提供的另一种书是什么？

吉尔：那只是一种算术书和《基督教节日》。

戴梅里：你撒谎。不可能有人会在单独的说明上询问除禁书之外的任何事情。那马努里订购的标注为“三个天”“四个基督”的这些书籍，说解释参见单独的说明，这是些什么书？

吉尔：我不知道。

戴梅里非常清楚这里指的是两种宗教书籍，《天堂向所有人开放》（*Le Ciel ouvert à tous les hommes*）和《耶稣基督批判史》（*Histoire critique de Jésus Christ*），而且如那份文件的上下文所显示的，吉尔也清楚戴梅里分明知道那些是什么书。但是他俩继续这样你来我挡地打太极，直到戴梅里意识到他无法再从吉尔身上榨取更多情报为止。

【205】然后他就结束了审讯，把吉尔押回牢房，并写了一份报告给巴黎警察总监：

诺埃尔·吉尔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就从事图书买卖，到处流窜，与一些人的关系极其可疑……已故的寡妇马许埃尔和鲁昂的费朗先生从老远的地方向他提供受禁的和危险的书籍。鲁昂还有一个叫亚当的，向他提供各类不良图书，此人似乎也是一个最危险的家伙。诺埃尔·吉尔的信件证明，他和日内瓦、奥尔良和布尔日等地的非常可疑的图书货源有联系。

我想把盗版书问题撇开不谈，只说违背道德和反对宗教的书籍，这些是他生意的主要部分之一。这里有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他好像就在这些活动的中心。我十分肯定，他跟那些冒犯道德和信仰的书籍有牵连。

我让吉尔在所有文件上签上了他姓名的首字母，并且对他进行了一次本可以更深入的审讯。他对他在奥尔良的朋友的通信讳莫如深，即使是最近才寄来的他也说他忘记了，这解释不通。

你会发现，先生，我做了一切我能办到的事情。我觉得此人很值得关注。

吉尔坐了两个月的牢。获释后他又立刻驾起马车，继续售卖禁书。一年后，他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最初是由卢丹的马勒布供货的零售商贩，后来就成了出版社的客户，直接从纳沙泰尔订货。就像马勒布告诉出版社的那样，零售商贩总是铤而走险，大量参与图书生意中非法部分的经营，因为这一块利润最高。当然，他们常常付不了账，接受他们的期票必须小心。不过，吉尔成了家，在蒙塔日有了固定住址。1775年8月，他在卢丹逗留时，在市场上摆摊卖了一星期图书，这就给马勒布留下了印象。在吉尔赶着马车离开之后，马勒布就对他的实力做了调查，得到了关于他的“好评”。

三个月后，【206】当吉尔请马勒布帮忙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货时，他同意做中间人。他要求出版社开两份发票，一份按它的标准价格开，他自己留着，一份加价5%，他要交给吉尔，让他支付。这样他就可以偷偷从他的客户那里收取佣金。然而，他其实不必费神隐瞒，因为两周前吉尔就从枫丹白露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双方直接交易，理由是马勒布收取了“过高的佣金”。出版社拒绝了，它知道要小心对待零售商贩。但是出版社心想马勒布会当他们的收账人，便同意满足吉尔的订货，共21种书籍。其中除两种外，均是严令禁止的图书，而且吉尔要的数量很多：50册《自然的体系》、50册《社会的体系》、50册《奥尔良少女》、50册《健全的思想》、24册《自然政治论》、24套《爱尔维修著作集》、26套《法国掌玺大臣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24册《马太兄弟》、24册《放荡的帕纳塞斯》（*Parnasse libertin*）、12套《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12套《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12册《2440年》、12册《身披甲冑的报人》、12册《论自然》（*De la nature*）、12册《戴翁骑士的消遣活动》（*Les Loisirs du chevalier d'Eon*）、12册《白日的福音》（*L'Evangile du jour*）、12册《耶稣基督的神迹》（*Miracles de Jésus Christ*）和6册《中国间谍》。

货物安全运抵卢丹。吉尔于1776年4月取到货。他用现金付了头期款12路易（288锂），驾车离去，给人留下一个积极的正面印象。“吉尔先生在这儿待了三四天”，1776年4月24日，马勒布给出版社写信说。“他的马车满载而去，还有一个店员跟着。他的图书品种似乎很齐全。他付了我12路易，拿了价值300到400锂以上的图书……他像是可靠的人。除非他卖的许多禁书让他陷入大麻烦，我不信他会造成任何损失。”四个月後，吉尔破产了。

在吉尔的案子中，破产的形式是中止偿付所有债款，并将资产负债表存放于一个商事裁判法院（*juridiction consulaire*），该法院被授权与他的债主进行协商。⁽⁸⁾资产负债表显示，吉尔的借方高达28,874锂，他的贷方37,097锂，但后者包括别人欠他的债款24,097锂，主要是无法还款的“不良债务人”。面对无法控制的亏空，吉尔躲藏起来。他雇用了一个名叫厄斯塔什·布里昂（Eustache Briant）的人，他自称是“凡尔赛国王池塘的门房”。【207】他写了一份陈情书，向法院宣读，为吉尔的案子申辩。陈情书恳求延迟吉尔的债务支付，以便他能恢复生意，最后偿还债主。陈情书还要求法院发布一道命令（*lettre de cession*），防止债主把吉尔投进债务人监狱：“想到人身被监禁，他不寒而栗，而且让他非常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放弃生意，抛妻别子，出走避难，以免坐牢。”⁽⁹⁾

吉尔的处境有多绝望？资产负债表上的信息显示，如果债主没收了他的资产，他将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他拥有一辆货车、两匹马、马具和其他装备，价值1,000锂。他估计他的图书存货价值10,000锂，和外省的正规书商所拥有的相比并不多。而他妻子的财产，“床及被褥、家具、亚麻织物、服装、银餐具、镜子和其他物品”，总共值1,000锂。夫妇俩带孩子组成一个温饱小家，有一点点奢侈品，但是没有自己的住宅，寄居在吉尔的岳父家里。

资产负债表上列举的吉尔的债务人名单表明，他在由其他零售商贩和非正式的经销商组成的网络中经营，他们一边向顾客零售，一边在彼此之间买卖。名单列举了27位债务人，其中10位是流动商贩。其余的是图书摊主（*marchands libraires*），即有小店的书商，不过他们也经常沿街叫卖推销。这些人都未出现在书商年鉴里，所以大多数人可能都在法律规定的图书贸易之外活动。零售商贩身份模糊，主要从他们的债务上辨认。如莫雷尔（Morelle），欠725锂，“诺曼底的零售商贩”；皮耶（Pillait），欠933锂，“来自洛林”；还有两位也许属于由马勒布供货的零售商贩，后来没有付款就失踪了：安德烈·勒普朗凯（André le Planquer）（很可能是库汤斯的普朗凯家族出来的众多零售商贩之一，他欠了836锂），还有弗朗索瓦·凯内尔（François Quenelle）（欠475锂）。

资产负债表也能让人大致了解吉尔的那些欠了小额购书款的顾客是什么人。例如，当泰斯（Dantais），“阿图瓦的乡绅”；库尔泰斯（Courtaiis），“布洛奈的乡村助理牧师”；还有其他几位助理牧师。尽

管证据参差不齐，但牧师和显贵（富裕的有产者和一些贵族）似乎构成了顾客的主力。【208】和资产负债表一起存放的记载债务人的笔记本里提到的德拉布律雷里（De La Brûlerie），是茹瓦尼堡的领主，买了《曼特农夫人的书简和回忆录》（*Lettres et mémoires de Mme de Maintenon*）；迪萨伊（Dusaillly），住在讷穆尔的“市长”，买了《罗马革命》（*Révolution romaine*）；马里昂（Marian），默伦的夏特莱法院的推事，买了《庭讯日志》（*Journal des audiences*）；沙托勒纳尔（Châteaurenard）的一位教区牧师，买了《宗教颂词》（*Apologie de la religion*）；沙托勒纳尔还有一位律师，买了一本《法律词典》

（*Dictionnaire de droit*）和一本《优秀公证人》（*Parfait notaire*）。吉尔的顾客中有一些是专业人士，买了他们工作中用得着的书籍，但是证据太少，不能支持一般性结论。吉尔也许只让精英人物赊购书籍，而经常赶集的平头百姓，买书则要付现金。吉尔存放于商事裁判法院的文件绝口不提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进的禁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蒙塔日被抓之后，很可能学乖了，不再保留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证据。

最后，资产负债表的借方披露了供应商的名字：几家巴黎出版商和许多外省大量经营禁书的书商，这些书商也经常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他欠了鲁昂的马许埃尔4000锂，欠了里尔的亨利742锂，欠了敦刻尔克的布贝（Boubers）336锂，欠了凡尔赛的布莱索750锂，欠了奥尔良的库雷·德维尔纳夫1080锂，欠了马勒布1085锂。

吉尔是如何从债务负担下脱身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是逃脱了。他以蒙塔日的正规“书商”身份出现在1781年的《出版年鉴》中。（《出版年鉴》还提到埃尔的一位“诺埃尔·吉尔”，很可能是佛兰德斯的里斯河畔埃尔 [Aire-sur-la-Lys]。）而且他又重新出现在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文件中。在1779年7月30日的一封信中，他下了一份大订单，几乎全要“哲学书籍”，提出用现金或巴黎一家商号的汇票支付。

吉尔上次被逮捕时，告诉戴梅里他不会写字。实际上他是能够写信的，尽管笔迹幼稚，拼写也很拙劣，还是值得将其法文信件完整抄录如下（主要文本的译文附后），因为它反映出一个图书零售商贩对文字书写的掌握程度：

Monsieur

jeresus lhonneur delavotre an dat du courant je vous suit tres oblige de voux ofe de credit que vous aves biens voulut mefaire mais entansions ne

sent pons

dajete des merchandise accredite pour an peier des jroenteres jeme beaucoup mieux 【209】 a jete au contans pour le peu que jajete contant onmefai la remis de 12 a 15 pour sant de fasons que jevoi monbien efis de dime sit vous voulet trete avec moi vous pouve manvoier votre cathalo sur tout les livre [“filo”被删去] philosophique duquelle je pources vous faires eun debis au condisions que vous meranderrer les marchandise fran de porre jusqualion voicit monnadres est ches monsieur pierre tair alions roulier faubour de resse a lions ala quelle persone vous pouve anvoier mes balle e tire anranbourcemans il vous an refuserapons pour vous surte vous pouve luiecrire sitvous voulet manvoier dans la premier ball

[接着吉尔列出了23种禁书要纳沙泰尔出版社发运，所有书名都有严重的拼写错误。(10)]

Sit vous juge aprepa demepedier mademan je vous cert aublije demandanet avis evous oservere que cest au contant cit vous ne trouve pas la comodite a tire a vu sur le roulier vous pouve tire aus sur moi au je vous anverret une lette de change sur paris

Vous obligeres monsieur celui qui a lhonneur destre tres parfetmans votre serviteur noel gille

Demontargis le 30 juillet 1779

Vous manverret vouz propetus dant la bale

先生：

就在今日我收到了您的荣誉（授权），我万分感激您友好地授予我的信用，我的意图是根本不要赊购商品以便在我返回后付款。我很愿意用现金购买少量商品，如果我用现金支付可以给我12%到15%折扣的话，这样我可以看到我的好处，并且赚得利润。如果您想和我交易，您可以寄一份书目，尤其是哲学书籍的书目，我可以为您销售。条件是您可以将货物免费运到里昂，这是我的地址，是车夫皮埃尔·泰尔先生家在里昂的郊区的地址[？] 将我的货包交给此人并且收货款。他不会拒绝您，为了您的安全您可以写信给他，如果您想在发给我的第一个货包中……[之后为随信所附订货书单，而信的结尾如下：]

假如您决定把我订的货发给我合适那么如果您能发通知我并指出用现金支付我将感激不尽，【210】如果您觉得以这位车夫名义开立期票不方便，也可以以我的名义开立，我将把巴黎的汇票寄给您。

先生，您将施恩于有幸做您的最完美的仆人的诺埃尔·吉尔

1779年7月30日于蒙塔日

您可以将销售说明书夹在货包里寄给我

辨读这封信最好的方法是大声读它，倾听让人联想到笔在纸上胡写乱画发出的声音。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回信，一个职员在信的背后写道：“订货不予供应。”不管怎样，这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献。结合吉尔破产文件卷宗中的其他资料一起看，可看到他几乎什么书都卖。一有机会就卖一本每日祈祷书给某位助理牧师，或卖一本法律知识小册子给某位律师。但他卖的最多的还是“哲学书籍”。他的文字拼写和他所卖的书籍之间的差异，反映的就是图书贸易零售环节经销商的文化水准——在零售商贩的马车上，“heuvre de janjac le rousau”（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和“tereaise philosof”（《哲学家泰蕾兹》）就是堆在一起卖的。

由于缺乏吉尔这类底层人物的资料，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具有代表性。沿街兜售的穷小贩，跟那些被警察描述为“驾着马车在法国各地流窜”的流动商贩是很不一样的。至少在1776年的一段时间里，吉尔实际上拥有两匹马。虽然他和当补鞋匠的岳父住在一起，但毕竟还算有个落脚点，不像许多其他的流动商贩。他妻子还拥有一面镜子和一些银餐具。不过，吉尔总是在路上奔波，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总是背负着债务。他生活在社会边缘，风雨飘摇，生存境遇与警察档案中出现的其他一些零售商贩十分类似，他们也曾因为买卖禁书而留有案底。下面举两个例子：

勒隆：带着一辆车一匹马在乡下转了一个月。他通常待在莫城，在当地一家布列塔尼人开的小客栈里有个仓库，就在大市集的旁边……勒隆又胖又矮，走起路来步履坚实；头上盘绕着一圈棕色鬃发；着一件发白的外套。(11)

皮科：皮科身高5英尺2英寸（约160厘米），【211】金发碧眼，脸庞丰满，鼻子有点肥大，肩膀阔，脖子短，说诺曼底方言，

带点鼻音，走路步子沉重……皮科也在维莱尔科特雷和苏瓦松附近流窜，平时住在沙勒维尔一个织袜工家里。他有一匹马和一辆车。他还藏有许多来复枪和手枪。⁽¹²⁾

当他们出现在破产案文件中时，只是随便被称为“流动商贩”，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总是四处奔波，没有固定住址，如前面提到的，常常有个“空中住址”（*domiciles en l'air*）。为了争取到像马勒布这样的供应商供货，他们会用硬币付头期款，喜欢用几个金路易付现款；用客栈的地址开一张期票；而当它到期时，人又不见了踪影。他们相互之间也做买卖，因此圈子里也积欠债务，欠吉尔钱的零售商贩名单有一长溜儿，所附的地址都不固定：弗朗索瓦·凯内尔，“住在奥尔良的三王客栈”；约瑟夫·圣德尼（Joseph St. Denis），“住客栈老板维亚丹先生处，在布里的普罗万圣十字街”；让·圣德尼（Jean St. Denis），“住客栈老板布鲁耶处，在博韦的克莱蒙的海豚客栈”，J. B.勒让德（J. B. le Gendre），“住阿歇特夫人处，在马恩河畔沙隆附近的韦尔蒂的法兰西盾客栈”；罗贝尔·普朗凯（Robert Planquais），“住客栈老板芒让处，默伦的大图尔克客栈”；让·普朗凯（Jean Planquais），“住维亚丹先生处，在普罗万”；J. B.泰扎尔（J. B. Thezard），“住维亚丹先生处，在普罗万圣十字街”；比戈（Bigot），“住戈达尔先生处，在塞纳河畔维农的金狮子客栈”；约瑟夫·勒利埃弗尔（Joseph le Lièvre），“住客栈老板佩兰处，在布里的十字圣号客栈”；纪尧姆·迪博斯特（Guillaume Dubost），“住三王客栈，在诺曼底的莱桑德利”；米歇尔·加隆德（Michel Galonde），“住客栈老板杜塞先生处，在莱格勒的白十字客栈”；小皮埃尔（Pierre le Petit），“住客栈老板马雷夏尔先生处，皮卡底的巨鹿森林客栈”。⁽¹³⁾这些人留下的踪迹很少，但是在图书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就像血液里的红血球，把书籍传遍图书贸易的毛细血管分销体系。

最后一份证据也值得详细引用，就是由前面提到的“凡尔赛国王池塘的门房”厄斯塔什·布里昂呈交巴黎商事裁判法院的陈情书，此人除了在凡尔赛有职位外，还扮演着代笔人的角色。【212】⁽¹⁴⁾陈情书的目的是要靠描述流动商贩的艰难生活来为吉尔博得同情（下面的译文没有纠正代笔人的语法错误）：

诺埃尔·吉尔，流动书贩（*marchand foirin* [原文如此]），在法国四处奔波（*roulant par la France*），现住凡尔赛附近的大蒙特

勒伊：考虑到他所经历的亏损、灾祸、疾病和花销，以及因此在催收切实合法的欠款时遇到的困难，这意味着他无法偿还他欠所有债权人的钱，这就是为什么要草拟两份分别有关他的资产和借方账目的声明，后者表明了他所经历的亏损、灾祸、疾病和花费，这两份声明都要存放于巴黎商事裁判法官先生们的文书办公室和夏特莱法院的文书办公室……

然后陈情书一一列举了吉尔所遭受的“不幸”：

首先，身体差：

这位吉尔先生身患六种疾病，这些疾病差点要了他的命，有一种病致使他几乎卧床六个月……

其次是生意受挫：

这位吉尔先生在法国四处奔波从事书商生意，按照零售商贩的惯例，做这种生意花费相当高。鉴于货物的重量，以及为了完成销售需要在王国境内一个个城市之间运输往来，拥有马和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他决定买一辆车和几匹马，马车装上商品，然后出发做生意。他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销售上述商品。为了销售商品，他不得不长途奔波，因为批发商卖给他的货品价格过高……

坏天气：【213】

这位吉尔先生在路上遇到坏天气就要顶风冒雨，马车也会受损。他必须寻求帮助。在路上，在雨中，为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他不得不把商品货包装了卸，卸了再装。他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雨水淋坏了大量商品。在集市上还有一些损坏。

供应商敲诈：

批发商按极高的价格把商品卖给他，而为了卖掉它们，他又不得不削价，造成了亏损……

可怜的马：

马生病和受伤使他的生意停顿。他的生意中断了，失掉了销售额，而他又筹不到资金付给他的债主先生，这迫使他去求大额贷款，去商谈汇票，这些都要付高额利息……

牢狱之灾：

这位吉尔曾遇到被怀疑出售禁书的厄运，为此他被逮捕，投入监牢。他在监狱待了将近两个月。经过辩解，他重获自由……

他的悲叹一个接一个：供货耽搁致使损失惨重，运费飙升，邮资高得难以承担……零售生意的各个方面都出过岔子，而且都不是吉尔的过错所致。

法院似乎不太可能认为这些论据有说服力。七个月后，法院又接到同一位代笔人从同一个地址，并且以几乎一字不差的措辞，为另一位零售商贩写的陈情书。⁽¹⁵⁾没有一份文献可以当真。没有一份文献能让人对图书零售有清晰的了解。零售商贩只是短暂地出现在警察的报告、破产案文件、商业信函中，而且还很罕见地以他们自己的文字，以粗劣潦草的笔迹，出现在一张纸上。然而，在大革命爆发前的这些年里，他们却是在图书贸易最偏远的区域连接供需双方的媒介。

- (1) 《法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批发商、船东及制造商通用年鉴》，巴黎：l'Auteur，1779，第4卷，第174页。
- (2) 这个课题仍然很少有人涉猎，关于它的研究，可见洛朗斯·方丹（Laurence Fontaine），《旅行与回忆：19世纪瓦桑的流动商贩》（*Le Voyage et la mémoire : Colporteurs de l'Oisans au XIXe siècle*），里昂：里昂大学出版社，1984；安娜·索维（Anne Sauvy），“‘在法国四处奔波的流动书贩’，绰号叫皮斯托尔的诺埃尔·吉尔”（Noël Gille dit la Pistole 'marchand forain libraire roulant par la France'），《法国图书馆简报》（*Bulletin des bibliothèques de France*），1967年5月，第177—190页；让·多米尼克·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18世纪末的鲁昂和‘流动书贩’：拉弗夫·马许埃尔及其客户”（Rouen et les 'libraires forain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 La Veuve Machuel et ses correspondants [1768-1773]），《国立文献学院书库》（*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147（1989），第503—538页；和让·多米尼克·梅洛，“香槟地区的书商：18世纪末诺曼底的流动书贩”（*Libraires en Champagne : Les forains normands du livr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见《旅行书贩（1450—1830）：1997年5月23日和24日国立高等图书馆学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Le Livre voyageur [1450-1830] :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tenu à l'ENSSIB du 23 et 24 mai 1997*），巴黎，2000，第153—175页。
- (3) “老巴蒂略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2月18日。
- (4) 1987年1月16日，在寄自卢丹市政厅的一封信中，当地身份登记处的登记员慷慨地提供了资料。
- (5) “洛朗斯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7年3月18日和1787年6月17日。
- (6) “吕卡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7年7月26日。
- (7)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81，ff.357-368。

- (8) 以下叙述基于塞纳省档案馆（现巴黎省档案馆），破产案文件收藏品，D.4B6，第59号文件夹，第3773号卷宗。
- (9) 来源同前，日期为1776年8月14日的陈情书。
- (10) 从订单中以下书名可以看出吉尔的拼写水平：“*lette a un genit*”（霍尔巴赫的《给欧仁妮的十二封信》，“*Lettres à Eugénie*”），“*citemme delanature*”（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bibes de volterre*”（直译为伏尔泰的圣经，指其作品《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 de Voltaire*”），“*an faires detruï*”（霍尔巴赫的《地狱的毁灭》，“*L'Enfer détruit*”），“*teraise philosf*”（据说由阿尔让侯爵等所作的《哲学家泰蕾兹》，“*Thérèse philosophe*”），和“*heuvre de janjacle rousau*”（让-雅克·卢梭的著作，*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 (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96，f.493：约瑟夫·戴梅里的便笺，1764年12月15日。
- (12)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99，ff.43和45：一个探子致戴梅里的便笺，未注明日期。
- (13) 塞纳省档案馆，D.4B6，第59号文件夹，第3773号卷宗。
- (14) 塞纳省档案馆，D.4B6，第59号文件夹，第3773号卷宗。
- (15) 塞纳省档案馆，D.4B6，第62号文件夹，第3980号卷宗，为克洛德·勒内·萨比讷所写的陈情书，“*Marchand forain libraire roulant par la France*”，日期为1777年3月18日。

第十一章 布卢瓦、奥尔良、第戎：法国中心地区的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215】



布卢瓦，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布卢瓦

法瓦尔热仍在为他的好马开心，匆匆忙忙往家赶。他一路向东，穿过法国中部地区，沿途有最美丽的法国乡村风景。从卢丹到索米尔、希农（Chinon）、图尔、昂布瓦兹（Amboise）、布卢瓦、奥尔良和第戎，他行经葡萄园、牧场和矗立着城堡的河岸。可惜时下正值11月份，【216】寒意袭人。葡萄藤上的葡萄已被摘尽，许多城堡正在沦为废墟，而道路还是那样崎岖不平。法瓦尔热路过的风景会让人想起16世纪的辉煌荣耀，当时的卢瓦尔河谷是王国的中心。国王们把他们的宫廷从一个宫殿迁到另一个宫殿，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播开来。这些生活方式最终就认定为法兰西文明本身——礼仪、殷勤、优雅、崇尚美食美酒，以及对语言的驾驭，最后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瓦尔最伟大的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①然而，这种社交礼仪并没有延伸到精英之下的各社会阶层，或许对于法瓦尔热就很陌生。在拉罗谢尔他告诉过让·朗松，他什么艺术天赋都没有，当然也没有任何能

在有产者客厅里炫耀的优雅举止。从他的信件判断，他心心念念的事就是在开始下雪前赶回纳沙泰尔。⁽²⁾

虽然出版社要求法瓦尔热不要绕道，也不要没有生意前景的地方耽搁，但他仍然有许多书店要去走访。他发现卢瓦尔河沿途和罗讷河沿途一样，印刷商只卖自己印制的应时印刷品，而书商们卖的不外乎课本、每日祈祷书和宗教小册子。索米尔有一家印刷商和两家书商，没有一家值得重视，“因为该城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希农比索米尔还差，尽管有一家书商实力还行。图尔的前景稍微好些：有两家不错的书商，有一家（沃基耶·朗贝尔 [Vauquier Lambert]）还兼做印刷生意，还有三家被评为“差”的书商。更值得重视的是，图尔是勒图尔米三兄弟之一的总部所在地，这三兄弟是卢瓦尔河谷最有进取心的经销商。他们做得像一个联合企业，既流动销售，又各有一家书店。勒氏兄弟老二在布卢瓦经营，老三为兄弟俩订货，在奥尔良有个店，法瓦尔热打算去那里招揽他们的生意。看过图尔之后，他在昂布瓦兹短暂停留了一下，了解到该镇唯一一位名叫菲利普的书商，不过就是个零售商贩，“他不值得信任”。然后他就到了布卢瓦，而那里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麻烦事儿。

布卢瓦除了兼做零售商贩的勒氏兄弟老二外，其实就只有两家印刷商，皮埃尔-保罗-夏尔和菲利贝尔-约瑟夫-马松，他们把生意合并在一起，而且只卖宗教仪式用书和祈祷用书。⁽³⁾然而，由于另一位企业家的努力，布卢瓦已经成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条相当重要的销路，此人名叫康斯坦丁·莱尔（Constantin Lair），他像马勒布一样，做的不是正规的图书贸易。【217】以跟市场边缘的许多个体户同样的方式，⁽⁴⁾莱尔发现了靠满足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来赚钱的商机。他在自己家里储存和贩卖这些读者需要的书籍，不用担心远在普瓦捷和奥尔良的书商行会来检查。图书贸易只是莱尔从事的几种副业之一。他还是一位教师，并且兼做葡萄酒商和公寓老板，以艰苦拼搏来维持他的布卢瓦有产者阶层边缘的地位。在法瓦尔热于1778年11月到访时，纳沙泰尔出版社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莱尔第一次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联系是在1773年，他是在马勒布的建议下写的信。那时，马勒布为求得出版社的青睐，正试图寻找零售商卖他们的书。莱尔位于推荐名单之首，因为如马勒布在一封给奥斯特瓦尔德的信中所解释的，他在布卢瓦的显贵中间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在那里开辟一个市场有利可图。当莱尔开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通信时，自我介

绍为一名小学校长，还拥有一座大葡萄园，足能靠人们对卢瓦尔河谷葡萄酒的需求来牟利。他教英国学生学法语，他们就在他的公寓里吃饭住宿。他还教别的寄宿生其他课程（有一封信里他提出要把一份数学讲义的手稿卖给出版社）。由于“建了一幢宽敞而漂亮的房屋”，他也接待旅客和与地区法院有业务关系的人，这里的法院是1771年在掌玺大臣莫普重组司法体系期间建立的。他的信字体隽秀，看得出他文化程度相当高。莱尔还以自豪的语气告诉出版社，他建了一间漂亮的图书馆，有许多上流人士前来光顾，他们很喜欢这样“一个既有趣又雅致的社交圈”。为了迎合他们，他必须订购和销售图书。他从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供应商那里得到了书目，计划以订阅巴黎的报刊为补充，把他的藏书馆改成读书会。这种举动激起了正规书商兼印刷商的敌意，但是莱尔打算在巴黎弄一张执照，以获得在正规的书商行会体制外售书的权利，让他们无话可说。

莱尔在早期写给出版社的信中，说他做的小生意是一个爱书绅士的业余爱好。他强调自己“在品味上偏好文人学者，尊敬他们，并觉得他们的著作真的有价值，一直试图获取”。【218】他有意谈到《百科全书》的各种版本，并表露出对伏尔泰的钦佩之情：“伏尔泰先生无与伦比，那么大年纪还写下那么多著作，真是不可思议。”他向出版社下的订单包含大多数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还有一些更受欢迎的作家的著作，如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其论战小册子对他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文风犀利，主题也引人入胜。听起来莱尔本人并不像激进分子。他悲叹由于耶稣会被镇压，法国的教育质量下降了，而且他批评由伊韦尔东的福蒂内-巴泰勒米·德费利斯（Fortuné-Barthélemy de Félice）出版的新教版《百科全书》，说它有反天主教的偏见。

从1773年到1775年，莱尔在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图书越来越多，而他的信函中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他需要更多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他写道，因为它们“有实实在在的销路，能赚到钱”。他也要各类新版书——当前流行的有关时事性话题的著作、最近出的小说，以及粗俗图书。他许诺，如果出版社向他提供“小品图书，那些用和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轻浮举止相符，并与我们民族的天赋密切相连的艺术手法写的小玩意，那种我们时髦的少男少女热烈追求的轻松作品”，他可以为它开辟一个赚钱的市场。“有些人问我要情色小说，”他补充说，“你们经营这些书吗？”他的顾客不乏“有钱而且有好奇心的人”，他们向他下了预订单，要购买莫里哀、博林布鲁克、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有位顾客提出要求，图书要用上乘的荷兰纸印刷，用淡黄色小牛皮装订。也有人要特价

书，如廉价版的狄德罗《百科全书》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

从莱尔提及的关系人和顾客——一位法律教授，一位在大教堂任职的教士，以及葡萄酒农——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外省显贵的小圈子，尽管他也许确实强调了他们的财富和俗气，以便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留下深刻印象，并赢取它的信任。他写道，如果出版社相信他的付款意愿和能力，可以向他大量发运书籍，并接受他开出的期票或汇票，期限为12个月。通过销售这些书籍，莱尔可以积累足够的现金在到期日支付货款，或者，更可能的是，他可以在他的一位生意关系人的期票上背书之后交给出版社，【219】由于期票上的签名也是一种信用担保，所以出版社可以通过协商要求以现金兑付。

从莱尔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可以了解到典型的近代资本主义财务关系是如何在一个具体案例中运转的。一开始，从莱尔的支付情况判断，他似乎是“有实力的”。1773年12月，他用一笔来自巴黎的汇款支付了伊韦尔东版《百科全书》的252铤货款。而在支付这笔钱的同时，他又下了相当大的图书订单，包括几种启蒙运动的书籍，据他说已经安排好卖给当地的“业余爱好者”。这第二批货运到时，他写信说，他对版本的质量很满意，但是对运费不满，认为过高。但他还是又下了一份订单，提议对他从诺曼底的苹果酒商和白兰地酒商那里收到的期票进行背书，交给纳沙泰尔出版社，这些酒商到布卢瓦是来购买葡萄酒以弥补他们那儿的苹果歉收的。莱尔的葡萄收成很好，他打算买一张执照来扩大图书生意。

就在1774年初，莱尔的信开始出现一些征兆，预示了可能会出现无力偿还债款的麻烦。葡萄也许可以有助于图书生意，但它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正如他所说，当地经济完全依赖于葡萄酒和白兰地，这在当地是“决定现金充裕还是稀缺的唯一要素”。在16世纪，布卢瓦的宏伟城堡和王家宫廷参观还能把许多有钱人吸引过来，但是在18世纪，该市的人口增长在11,000人的水平上停滞不前，而且那里只有一所法院和一座要塞。纳沙泰尔出版社拒绝接受莱尔提供的由陌生的诺曼底酒商签名的期票，而他的汇款单在巴黎也遭到拒付。然后他换了一张期票，向出版社保证他有20,000铤可以在需要时自行支配。1774年全年他继续订货，数量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也更侧重于禁书，尤其是无神论书籍和色情书籍，如《自然的体系》和《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勒的故事》，那些拖欠了货款又来风险更高但获利较丰的图书生意上投机的经销商，往往就喜欢订购这类书籍。1774年11月，莱尔去了趟巴黎，

商谈书商执照购买事宜。(5)他到的正是时候，【220】看到了老巴黎高等法院的正式回归，取代了莫普改革时建立的法院。可这对他来说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恢复以前的司法体制意味着布卢瓦要失去它自己的莫普法院，而莱尔也就要失去来法院办事然后在他家膳宿的顾客了。

莱尔的生意从1775年开始走下坡路。6月份他的一张期票被拒付，11月份纳沙泰尔出版社开具一张直接要他付款的汇票，因为他的账目已经陷入严重赤字。这种汇票被称为*traite*，也作*billet à vue*（见票即付的汇票）——一种被认为向债务人出示他就会支付的票据，但是根据法律他也可以拒付，因为它不像期票（*promissory note*）或汇票（*bill of exchange*），上面没有债务人的签名。显然莱尔拒绝接受（在这点上也许缺少一些信函），而他的赤字在1776年和1777年继续扩大，这时出版社又发出了两张汇票，他还是没有支付。1777年6月，出版社宣称已经失去了耐心。它向他发出一份结账单和一张873锂的汇票，并威胁说如果拒付就要起诉他。莱尔试图用一份400锂的汇款作为首付款来搪塞，出版社把它记入他的账目，同时还坚持要收回剩余债款。“你滥用了我们的宽容，”出版社写道。它不会再接受他的任何汇票了，因为它们总是跳票，出版社准备把他告上法院。1778年2月，莱尔回信提了一大堆理由：信贷紧，去年收成太糟，还说女儿就要结婚了，他不得不把现金拿给她做嫁妆。出版社再次核算了他的欠款，共计486锂4苏，他又发出了总共300锂的三份期票，想把到期日推延到1779年。

出版社拒绝受骗。它说，纳沙泰尔的葡萄园收成也不好，但还债问题不应该由气候来决定，从而驳回了关于收成的喋喋不休的哀叹。它退回了他的期票，命令在巴黎的专门处理图书贸易坏账的收账人巴蒂略去收账，不行就提起诉讼。莱尔在1778年3月7日的一封信中恳求出版社发发慈悲。他没有打算欺骗它，他只是把钱花光了。出版社无奈又宽限了两个月，并开出两张汇票，每笔243锂2苏，分别在5月和6月到期。

5月到了，果然，第一张汇票莱尔就未能支付。【221】出版社怒不可遏地写了一封信。“你是铁了心要永远让我们恼火吗？”他为拒付辩解，声称结账单有错误，还说出版社发运的书籍折帖有破损。出版社驳回了这些拒绝承兑的借口，然后收到了一个妥协的答复。莱尔说，他为支付第二张汇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在9月中旬葡萄收获之前，他无法支付更多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今年葡萄预期收成很好。出版社仍然很生气，答复说它有一位销售代表就要到访布卢瓦，会催他还债。

就在这时，法瓦尔热到了。他立即去查留局待取的邮件，看看本部

是否寄出过有关莱尔账目目前状况的信息，但是一无所获，因此账目结算是不可能完成了。不过，法瓦尔热在莱尔兼做寄宿宿舍和学校的书店里和他正面交锋后，向出版社的董事们发出了一些好消息。莱尔的庄稼收成确实不赖，他言之凿凿地答应马上就会付款。他承认他是咎由自取，活该失去出版社的信任。他给法瓦尔热留下的印象也不错，以至于法瓦尔热能在信中这样评价他：莱尔“名声不错，值得尊重，他有一些资产，但是有三四桩生意效益差，还有三四种庄稼收成不好，使得他无法承兑部分生意款项的支付”。

几天后，莱尔发出一份180锂的期票，声称这应该能付清他的账款了。出版社接受了这张期票，尽管还有四个月才到期。但是它继续责备他拒付债务余款，以致不能最终把他的账结清。他们不会再接受任何理由，“庄稼收成的好坏不应妨碍结清账目”。

但这次出版社没有收到他的回信。1782年6月2日，莱尔的妻子来信告知，她丈夫刚刚去世了。出版社继续尝试结清账目，但是莱尔的遗孀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是怎么回事。根据它的一份报表，她欠了110锂8苏，而根据另一份报表，她又欠了374锂8苏。1785年1月，她认下了352锂8苏的债务，并发出了109锂6苏的分期支付期票，到期日推得很晚，请出版社多多包涵：“我求你们考虑一下我一个寡妇所处的困境，【222】我带着两次婚姻留下的孩子，我的丈夫又留给我一个烂摊子。”出版社回信说，它将把她的期票作为最终结算来接受——“鉴于你所处的窘况确实值得我们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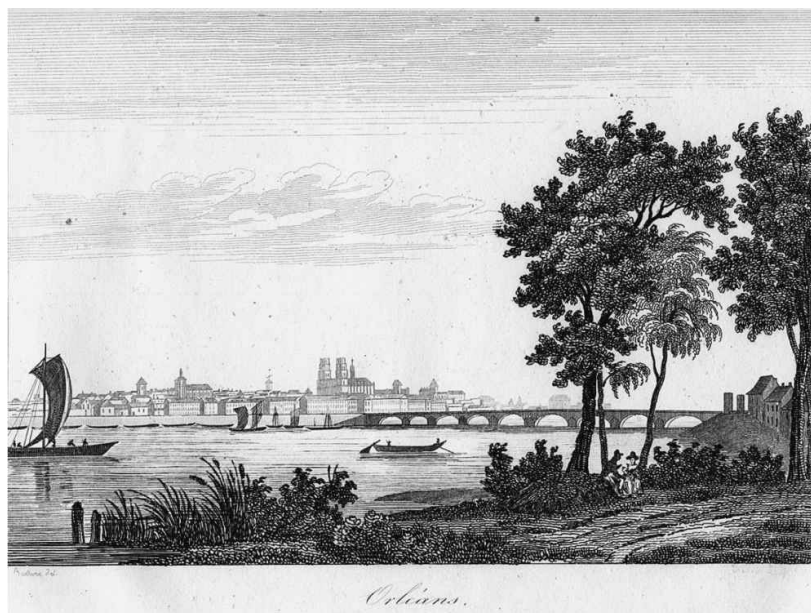
指望一夜暴富，过度下单，开空头期票，反过来指控对方，找借口，扯皮，结算，最后由一个寡妇来接手生意，并试图从“烂摊子”中榨取财富——莱尔的故事，就像纳沙泰尔出版社文献中的其他故事一样，表现出后来被巴尔扎克诊断为“幻灭”的综合征。

奥尔良

奥尔良不像布卢瓦，它在18世纪逐渐发展繁荣。由于地处卢瓦尔河最北边的拐弯处，奥尔良战略地位重要，控制着上下游以及法国中部地区与巴黎之间的贸易。它的人口从1700年的30,000人增长到1780年的39,000人，包括制糖厂和纺织厂雇用的许多工人。它有总督府，一个代表国王执法的辖区（*bailliage*）法院，以及各类文化机构——一所学会、一座剧院和一所拥有240名法律学生的大学，这些都有利于它的书

店生意。法瓦尔热1778年11月5日到访此地时，它拥有12家书店。

在法瓦尔热的信中，这些书商只以姓氏出现，他在走访时给了他们相当高的评分。尽管法瓦尔热避开了以对盗版书深恶痛绝著名的当地书商行会理事（雅各布），但是他跟副理事（米索 [Mussot] ）关系还是融洽的，此人答应瞒着雅各布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通过检查，还答应自己也要订他们的货。佩德鲁（Perdroux）办了一个读书会，他对法瓦尔热的图书样品吹毛求疵，但也不是恶语相加，因为他的生意大多是销售宗教书籍。鲁佐寡妇（Widow Rouzeau）和老舍维永（Chevillon l'aîné）两人都被评为“佳”，他们主要经营古典书籍，而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经营的当代书籍。经过仔细审查后，法瓦尔热发现其他几家被列入《出版年鉴》的书商“都不值得信任”。剩下的两位，其中一位是库雷·德维尔纳夫，另一位就是勒图尔米兄弟中的老三——法瓦尔热从进入卢瓦尔河谷地区起就一直在追寻他。



奥尔良，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当他最终和勒氏兄弟老三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见上面时，法瓦尔热希望能和他谈成一些赚钱的生意。【223】他从图尔和布卢瓦的另外两位勒氏兄弟那里得知，兄弟三人抱团经营，让-巴蒂斯特负责订货。可惜的是，法瓦尔热的到访不是时候，让-巴蒂斯特点次日要结婚，因此抽不出时间和他商谈书籍订货事宜。他们只匆匆讨论了汇票和出版社在最近的货运中犯的错误（出版社发了25册《济贫院颂》[*Eloges* de

l'Hôpital]，而不是他所订的《帕斯卡尔思想录》[*Pensées de Pascal*]）。于是法瓦尔热离开了书店——一家坐落于市中心马特鲁瓦广场、显然配备完善的店铺——虽然没有获得新订单，但是他心里有了底：勒图尔米正通过婚姻使其家族关系更深地融入奥尔良，他可以作为一家有实力的客户获得信任。

这种实力得来不易。勒氏兄弟从做零售商贩起家，沿街兜售木刻印刷品和廉价小册子。^⑥从不起眼的开端起家，他们的生意渐渐做大，通过联合经营打通了各类书籍的销售。兄弟三人各有各的存货，在周围的村镇建立自己的客户网络。【224】1779年，他们把共同的事业分成三个独立的生意，但让-巴蒂斯特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保证，他们会继续紧密合作，并且要出版社对他们三人都给予信任。

在1764年法国政府关于印刷和图书贸易的调查报告中，他们仨没有一人被提及。根据有关奥尔良的报告，当地的图书贸易似乎非常开放。未被授权的经销商遍布城乡，镇上官员对他们所卖的图书一无所知，如果无人检举，警察从不干预。1778年，政府试图加以控制，组织书商会来审查货物，没收非法书籍。正如法瓦尔热所指出的，新书商行会的头目雅各布打压盗版书籍特别严厉。调整了偷运系统之后，贸易有所恢复，但再未达到1778年以前的水平——因为那时盗版书和禁书很容易弄到，尤其是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在1760和1770年代，勒氏兄弟就是在那些地方开创了他们的生意，并且获得了显著成就。

遗憾的是，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的卷宗有许多空白，而且存留的信件对三兄弟走村串乡兜售图书的情况披露甚少。但是从让-巴蒂斯特的订单记录和出版社抄录在“信件副本”分类里的回信中，可以了解三兄弟卖的是些什么书。与奥尔良最著名的书商库雷·德维尔纳夫以及连戏剧书籍都不进的鲁佐寡妇不同，勒氏三兄弟大量经营非法书籍。

让-巴蒂斯特·勒图尔米早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的订单中就含有几种“哲学书籍”，随着订单一摞摞地堆积，禁书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出版社在货运记录中标明，它用“新出的哲学书籍”充塞要发运给他的货包，即使他没有订购这些书。大多数货物都顺利运抵，但在1775年12月，一个货包在瑞法边境的弗朗堡被截住了，因为通常容许这种货包不经检查就过关的海关官员这时接到了一个特别指令，要对货包进行搜查，看看是否夹带了煽动性的小册子。虽然在勒图尔米的货包没有发现这种小册子，但海关还是没收了20册《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和25册《路易十

五回忆录》。【225】勒图尔米同意赔偿一半损失，但是中止了订货，直到出版社担保无风险地将货物运到里昂给他。到1776年底，出版社把运货通道上的所有关节都打通了，勒图尔米这才在1777年2月25日下了一份特大订单。其中包含51种书籍，内容十分广泛，从言情小说和哲学论著到色情图书，还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想要出版社能够弄到的所有有关“上个朝代历史”的书籍，即关于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宫廷政治和生活的毁谤性书籍。如我们所知，自这位国王1774年逝世起，这些都是畅销书。

一个月后，勒图尔米又要了更多这类书籍，但是他指出图书贸易的行情已经变差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库雷·德维尔纳夫急需现金，正按跳楼价甩卖他的存货，这“大大挫伤了图书贸易”。但勒图尔米继续下大订单，还附带了一个匿名人士的提议，要出售一个“手稿收藏品——放荡和滑稽搞笑的诗歌”，供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这个“收藏品”包含21篇作品，有些诗很长，有数百行，如“为女士们带来快乐，一个用滑稽有趣的韵文写的故事，454行”，以及由臭名昭著的散文作品改编的诗歌，如“用滑稽有趣的韵文写的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爾的故事节略本，614行”。但纳沙泰尔出版社不出版这种东西，不过勒图尔米信中的提议和提到的其他东西表明，他知道经营地下图书市场的路子。

通过收集勒图尔米的订单，我们可以列出一份他经营的这部分图书生意——既有沿街兜售，也有铺面位置好的书店零售——的畅销书单。大多数书籍他通常都只要出版社发几册给他，大概是因为要防止库存过剩。书单上排第一的是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的《印加人，或秘鲁帝国的毁灭》（*Les Incas, ou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u Pérou*），勒图尔米订购了6次，总共118册。此书从一位杰出哲学家的视角，谴责了他所见到的西班牙帝国的征服者和传教士在美洲的暴行，尽管书中有反教会思想，但从未被法国政府禁止。勒图尔米按优惠条件订购，因为他买的是出版社印刷的盗版，比较便宜。【226】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是出版社的普通存货。其中大部分是色情图书：《少女学校》（*L'Ecole des filles*）、《风尘女》和《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色情与政治随意交杂是排在书单上部的那些书籍的普遍特征，如《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阿拉斯的蜡烛》和《土耳其人回忆录及他们在法国逗留时的风流韵事》（*Mémoires turcs avec l'histoire galante de leur séjour en France*）。书单中还包括了伏尔泰的三种著作和两种完全合法的（即使是盗版的）书籍：萨米埃尔-奥古斯特-安德烈-达维德·蒂索的《论上流社会人士的疾病》（*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gens du monde*）和让-雅克·拉特利奇的

喜剧《智慧局》(*Le Bureau d'esprit*)。勒图尔米订购的全部书籍的清单中，每种书都有一点儿，从霍尔巴赫男爵的无神论著作到布道文集和小说。和其他书商的订购书单相比，历史和游记类书籍相对较少，更令人惊奇的是，卢梭的著作竟然一本都没有。当然，勒图尔米也许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订过卢梭的著作，不过他做生意的一般宗旨似乎很清楚：集中在图书生意最危险也最赚钱的部分。

勒图尔米不像其他大量经营非法书籍的书商，他从来没有被抓住，而且从来不拖欠货款。1778年2月，即法瓦尔热到访前九个月，他支付了1180锂的书款——对一位外省经销商来说算是大额了。对于货物中的缺页和损坏部分，他和出版社有分歧，有时会在勒图尔米的账目结算上演变成争端。法国政府采取的不定期打压措施也使他与出版社的关系受累。1778年10月5日，奥尔良的新书商行会建立后，勒图尔米写信表示担忧他的生意会受到严重干扰，不只是在奥尔良，在他们兄弟三人沿途兜售的乡村也可能如此。但是出版社继续通过里昂的雅克·雷沃尔把货物运给他。1780年，他们的贸易往来渐渐衰微，并在随后几年中止了，很可能是因为出版社的财务困难迫使其从生意中风险较高的部分撤出，但也可能是因为一批价值348锂的货物所产生的纠纷。【227】勒图尔米声称他从未收到这批货，因此拒绝承兑出版社开出的要他付款的期票。他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出版社派去收账的一位当地商人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实力：“此人起先几乎一无所有，竟在大约十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以至于能做一番规模相当大的事业。他的这些大事业也都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成功，所以我们现在都认为他非常有实力。”⁽⁷⁾简言之，勒图尔米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从零售商贩蹿到正规书商上层的罕见例子。

勒图尔米的竞争对手路易·皮埃尔·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命运，正好和他相反。库雷起家时占尽天时地利，最后却以实质性的破产告终。他出身于一个与印刷业和图书销售业有着深远渊源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582年。⁽⁸⁾1772年，他接父亲的班当上了书商首领，而一年前，年仅21岁的他就获得了“国王印刷匠”的头衔。经营着一个拥有四台印刷机的印刷厂和一家位于奥尔良市中心米尼姆街（后来的国王街）的“永生书店”（*l'Immortalité*），这个家庭的许多成员都忙碌不已。根据1764年王国政府的调查，父亲库雷名望很高，工作努力，看起来也很富有。他的儿子们接班时，主事的似乎是大哥弗朗索瓦。一份1772年5月14日的印制通告和书目上有“库雷·德维尔纳夫兄弟”的签名，但这个日期之后的任

何信件都再没有提及弗朗索瓦。他们的姐姐嫁给了巴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出版商夏尔-约瑟夫·庞库克。路易-皮埃尔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几次提及他的姐夫，并且在他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了几卷庞库克的巨著《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在出版业界有比这更好的人脉的外省书商几乎不存在。



勒图尔米兄弟以印刷品零售商贩起家，卖的多半是他们自己委托印刷的粗制滥造的木刻作品，而且在大革命早期，他们继续经营如图所示的这类印刷品【228】

（译者按：这幅木刻作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幅宣传画，画中人物为“平等女神”，她手持天平秤和《人权宣言》，身边有象征民众武装的长矛、象征“人民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束棒和象征丰收的小神像，脚下的小红帽图案典型地反映了大革命的平民特质，而作品下方的标示“奥尔良勒图尔米公司制作”，则说明了勒图尔米兄弟在大革命

库雷有两份印制书目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他本人的卷宗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书店里卖的都是些什么书。第一份书目日期是1772年5月14日，列举了169种书籍，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宗教书籍——《圣经》，宗教论著，尤其是布道文——占支配地位。俗世书籍主要有词典、历史书籍，以及严肃的非小说类作品，涉及诸如植物学和医学之类的主题。在纯文学作品和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是17世纪的巨擘：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拉封丹、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费内隆（Fénelon）和波舒哀（Bossuet）。【229】启蒙哲人的著作只占书目的很小部分，尽管含有一些温和的著作，如伏尔泰的《亨利亚德》（*La Henriade*）、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笺》（*Lettres persanes*）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这些书籍有13种是库雷自己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宗教书籍，诸如《使徒书与福音书评注》（*Epîtres et évangiles avec des réflexions*）、《给基督徒的新年礼物》（*Etrennes du chrétien*）和《基督徒的日子》（*La Journée du chrétien*）。第二份书目是1774年5月的，包含38种书籍，大多数是库雷出版的，而且多是宗教书籍。《现代哲学家，或在理性法院被判有罪的无信仰者》（*Le Philosophe moderne, ou l'incrédule condamné au tribunal de la raison*）是几类书籍中正统调子的典型。库雷通过邮件把书目发送给其他书商和书商兼印刷商。在第二份书目附带的通告中，他自我介绍说是出版业界的一员。他声称，他印制的图书做工精良，一定好卖，书的价格可以面议，或者可以从对方的库存里挑选书来交换。

书商中间时常有这类书目流传。它们能提供关于某个出版商生意特点的有用信息，尽管在评估任何生意的可靠性时，专业人员会依赖通过贸易情报网获得的信息，也会依赖它们与所涉公司的直接通信来推测。库雷的信很像其他书商兼印刷商的信，只有一点不同：他的信写得漂亮，辞藻甚至过于华丽。他措辞非常用心。他对语言的关心——以及他使用语言的方式——在1774年5月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封信中表现突出：“如果我的几段诗——那是在闲暇时的作品，或许能有幸得蒙你们的纵溺，在贵社那极受大家喜爱的刊物上觅得一席之地，我会感到不胜荣幸。”换句话说，库雷不只是一位书商，还是一位诗人，他想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它的月刊上发表他的诗。

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赫尔维西亚月刊》是一份精心编辑的刊物，刊载纯文学随笔和像库雷投来的这类轻体诗。库雷也出版一种期刊，叫《奥尔良广告报》（*Affiches de l'Orléanais*），前身是他父亲的《奥尔良通告报》（*Annonces de l'Orléanais*），主要用于传播当地的广告。他提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交换刊物，【230】并让奥斯特瓦尔德确信，《赫尔维西亚月刊》应该扩大它在法国的知名度，这有利于法国文学的进步。虽然库雷写信用的是印刷商兼书商同行的语气，但是他的地位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地位相比要差一大截。1774年，奥斯特瓦尔德61岁，在纳沙泰尔享有学者和市民领袖的声望；纳沙泰尔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书籍，并且卖到了整个欧洲。而库雷当时才25岁，正试图扩大从其父亲那里接手的生意，同时想在奥尔良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当地的历史资料显示，库雷似乎积极参与了该城的文化生活。他是奥尔良皇家物理学会的创始会员，该学会后来发展成该城的学院。他对植物学兴趣浓厚，是当地植物园的资助者。他是一个共济会支部的积极成员，还写出了几大本诗歌和随笔，或许在一些沙龙和文学圈子里朗读过，之后自行出版。通读他的这些出版物，可以对一位自以为有文学天分的书商做出评估，同时提出一个有关书商作为文化中介的作用问题，即他们个人的品位和信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选择向读者提供的书籍？

库雷21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穴居人》（*Les Troglodites*），那是一部用古典的亚历山大格式诗歌体写下的五幕悲剧。1770年作品获得审查官批准，“在奥尔良的国王印刷匠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印刷厂”出版。如库雷在序言中所说的，他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获得基本灵感，打算证明“上帝保护美德，一个堕落的国家迟早会被具有优良道德的民族战胜”。这种美德的主题以更伤感的情绪出现在一部选集里，名为《用作儿童和青年读物续编的选集，或适合用来既让他们娱乐又启发他们向往美德的短篇故事选》（*Recueil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et les jeunes-gens, 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 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inspirer le goût de la vertu*, 1782）。库雷在解释选择这些故事所依据的理由时，强调了简朴、自然和儿童固有的天真无邪这些主题。另一部选集，《法国的阿那克雷翁，或用于社交场合的歌曲、浪漫曲、小抒情曲、叙事诗歌和诙谐语集》（*L'Anacréon français, ou recueil de chansons, romances, ariettes, vaudevilles, et à propos de sociétés*, 1780），具有库雷自己写作并显然在社交聚会上朗【231】读过的那种轻体诗的特色。它以一首为向“C夫人”献殷勤而作的

诗开篇，然后洋洋洒洒发展成两大卷，都是些空洞乏味、装模作样的诗句，他声称它们表现了法国人特有的“无拘无束的快乐”。

在一种卢梭式情感潮流的冲击下，库雷作品的俗气逐渐消退，如《论友谊，随后附上几首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即兴诗，其中结合了P夫人对日内瓦卢梭的亡灵表达的母亲般的感激之情》（*Discours sur l'amitié, suivi de quelques poésies fugitives, par M. Couret de Villeneuve, auxquelles on a réuni les Sentiments des reconnaissance d'une mère, adressés à l'ombre de Rousseau de Genève, par Madame P***, 1782*）。这本小书的主要部分是库雷在一次共济会聚会上的演说。他作为一名“完美的共济会会员”发言，祈求“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却根本不提基督教，并且声明平等原则是社会美德——“宽容、慈善、热爱祖国和邻居”——的基础。按照库雷的解释，这些观念绝不是抽象的，它们挑战了旧制度的等级秩序。他强调，贵族无权属于社会上层，而且任何主张拥有特权的贵族都只会遭到蔑视：“如果你没有个人功绩……我将把你看作栖息在世系树上的人，害怕会跌落尘埃。”附随的P夫人的随笔支持了这种主题思想。P夫人其实就是库雷的姐姐，出版商庞库克的夫人。她称赞卢梭是自然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捍卫者，尤其在家庭内部。然而，书以库雷最俗气的一首即兴诗结束，显得不伦不类：“在一个舞会上，递给……夫人一只橙子，上面写着，给最美丽的夫人，同时把这首诗献给她。”

他的这些出版作品中，没有任何独创的或不寻常的东西。它们表明，这是一位年轻写作者在涉猎互不相干的一些主题，并试图在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属于他的那个小角落中获得些许认可。这些作品与其他有抱负的作者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库雷自己出版并销售的。尽管有几位出版商，包括奥斯特瓦尔德，【232】偶尔也发表一部著作，但库雷是唯一一位一边经营着图书生意，一边又试图追求文学生涯的书商——至少在法国，这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德国的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尼古莱（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他们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获得了巨大成功。库雷的写作没有获得任何认可，但他写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据以了解他在当时相互冲突的种种文学思潮中的立场。他主动加盟了启蒙运动。他的思想观念明显源自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且他表达这些思想观念的方式好像还有点激进。

库雷选择在他店里销售的书籍时，会受到这些个人信念的影响吗？

从他印制的书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上面已经提到，他进的货以正统的宗教书籍和严肃的非虚构类书籍为主，掺杂了一些正规的文学书籍，主要是17世纪作家的著作。当然，库雷可能会偷偷销售非法书籍，也不会在他印刷的署有他名字的书目上列出非法书籍，只是他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的模式无法反映出这一点。这些订单上被归为激进的书籍很少。位列他的“畅销书”——统计数据显示的他最常订购的书——书单榜首的，是米约的通俗而规矩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接下来是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这套书当然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其中由狄德罗匿名撰写的片段。不过，库雷是在1781年该书被禁之前订购的，之后再也没有订过，而这时此书已成为地下市场的畅销书。书单上的其他书籍几乎都是实用性的——有关治病、养马和美发的小册子。库雷订购了数量较多的儿童读物，这些书是他编写自己的儿童故事集的范本。除了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单上唯一一本启蒙运动书籍是纳沙泰尔版的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卢梭的著作显然不在书单之上。

库雷订购书籍的总书单上——跟他的“畅销书”书单形成对比——有三种有关共济会的书，这可能反映了他个人的兴趣。总书单上还有一些伏尔泰的著作，有霍尔巴赫的激进论著《自然的体系》，和两本关于路易十五及其大臣的政治毁谤书籍。【233】然而，这些禁书像是打破了库雷只经营图书贸易中随处可见的、公开流行的书籍这一规则。启蒙运动书籍在他书店的架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比重很小。他的个人信念里有激进思想，但这对他向读者供应的图书没有什么影响。

库雷的生意作为商业经营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关系之后，他为了寻求获得稳定的供货——并让出版社对他建立起“信任”——连续不断地下小批量的订单，并按时支付货款。他必须克服所有从瑞士进货的外省书商都会遇到的障碍：运输费、延迟、像里昂书商行会这样的检查点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以及被他斥为“巴黎书商为防止盗版书销售和流通而施行的精心阻挠”。库雷卖了很多盗版书，所以听说政府要整顿图书贸易时，他深恐大难临头。以前，图书的进口在奥尔良不曾受过检查，但是1777年法令在该市建立了书商行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盗版书。库雷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他不想冒险，要停止从国外进口图书了。1778年1月，他证实新书商行会确实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严厉，因为它是在政府的密切监视下工作的。不过，五年后，他当上了副理事，不久又升任为理事。他许诺，在这个职位上，他有可能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打开方便之门。

库雷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所受到的最大限制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在1775年1月发出了多年来第一封抱怨图书贸易遇到困难时期的信，并且拒绝承兑出版社开给他的期票。他自己另开了一张期票，将到期日延后，并附上一份订单再要一些书。随后，期票和订单的交替一直持续了三年，伴随着拒绝承兑、关于到期日的争执，还有对库雷账目上尚欠余额的意见分歧。他们的交锋最终变得十分尖锐，以至于库雷在1779年7月25日的信中宣布，他要结清账目，停止向出版社订货了：“你们授予的信用太低，【234】你们的生意和我们的一样艰难，做事却缺乏弹性，这迫使我放弃这种联系，对我来说成效太差了。”

实际上，通信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到1787年6月，出版社的最后一封信表明，它还在催库雷偿还一笔233锂的旧债。虽然库雷的最后几封信散佚，但从出版社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出版社有关他账目的情况有异议。也许他对出版社缺乏弹性的抗议不无道理，但出版社与真正“有实力”的书商就不会陷入这种争端，那些书商为了捍卫自己的声誉——而且正如他们所说，捍卫他们的签名的荣誉——会及时付清货款。法瓦尔热1778年视察库雷的生意时就对他颇有微词：“库雷·德维尔纳夫虽然表面上光彩照人，但肯定属于平庸之辈。”库雷设法让他的生意支撑到了1789年；但随着大革命波及奥尔良，他的生意就垮了。他动身去了巴黎，在革命政府中谋到了一份负责监督印刷厂的工作。其间，勒图尔米兄弟继续做他们的生意，推销一些赞同第三等级事业的通俗印刷品——在1780年代为生存进行的全面竞争中，零售商贩兼书商们击败了这位书商兼作家。

第戎

法瓦尔热11月10日离开奥尔良，11月15日很晚才到达第戎，5天行路将近320公里。考虑到他半路上还停下来视察了欧塞尔的书店，这速度已是相当快了。马儿还能挺住，但马具已有磨损的迹象。法瓦尔热必须买一条新缰绳，马鞍也要重新整理一下，同时还要换一副马掌。欧塞尔只有两家书商，都因“付款很难”而出名。不过其中一家，皮埃尔·博纳尔，让法瓦尔热觉得是个诚实的人，有一间存货不错的书店，而且下了一份大订单，品种还不少。



第戎，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第戎拥有厚实的椭圆形城墙和四座大门，法瓦尔热通过其中之一入城。他沿着两旁种植了榆树和椴树的宽阔街道进入了市中心，那里坐落着一些书店。城里有众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屋顶上铺着绚丽多彩的瓦片，建设年代可追溯到15世纪勃艮第公爵的鼎盛时期。另外还有许多联排楼房，都是最晚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从一个出版商的角度看，【235】第戎的贸易似乎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平衡：葡萄酒桶运出去，书籍货包运进来。当然，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没有考虑到第戎经济的复杂性。除了葡萄酒，第戎还做小麦、纺织品、铁器和镜子等方面的生意。作为外省首府之一，第戎还是个图书贸易中心，因为它拥有门类齐全的各种机构，包括一所高等法院、一所间接税法院和一所审计法院、一座总督府、一所拥有大型法学院的大学，以及一所学会，它们都是书店的重要客源。书商数量从1764年的7家增加到1777年的10家，1781年又增加到12家。他们征集的《百科全书》订户数量非常多（152册，几乎是格勒诺布尔的两倍，而两城人口相同，都是20,000人）。该省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数比率比较高，成年男子可达到54%。读者们会订阅当地的通报（*affiches*），也会光顾读书会。所有这些迹象表明，第戎可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然而法瓦尔热没有在第戎的书店久留。【236】出版社已经命令他不要耽搁，他也需要在下雪前赶到汝拉山关口，以免大雪造成山路骑行

的困难。第戎城里的十家书商中他只考虑去两家看看，一家是让-巴蒂斯特·卡佩尔，一家是路易-尼古拉·弗朗坦（Louis-Nicolas Frantin），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潜在客户。他给了弗朗坦一份书目，但似乎觉得不会有任何成果，也确实没有；弗朗坦从未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写过信。出版社倒是收到过另外三家书商的几封信，他们是弗朗索瓦·德万特（François Desventes）、安托万·伯努瓦（Antoine Benoit）和让-巴蒂斯特·马伊（Jean-Baptiste Mailly）；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发展成客户。所以现在只有卡佩尔——他在市中心的圣让广场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一间书店——能帮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必须靠他来打进第戎这个似乎很有潜力的图书市场。

法瓦尔热认识卡佩尔。两年前，他在出差期间拜访过卡佩尔，并曾报告说，尽管卡佩尔是当地书商行会的头儿——抑或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特别想买禁书，并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它们：“第戎……卡佩尔先生是好书商之一。至少他的书店品种很全。他经营大量‘哲学书籍’……他是书商行会的检查员。我们经过茹涅（地处汝拉山脉通路上的一个小镇）的所有货包都是他经手。他对此没有顾忌，但是警告我在他的检查员任期结束后要小心。接任的人可能要差些。”

尽管前景不错，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做大。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供货路线上总会遇到麻烦——无论是在瑞法边境，还是在第戎本地。它需要在第戎有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帮它让货物顺利通关。第二章说明过，卡佩尔拒绝当它的代理商，尽管他有时愿意合作。该市最重要的货运代理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Veuve Rameau et fils）愿意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包——但是当 they 知道货包的内容时就放弃不干了。1777年3月18日，他们写信愤怒质问：“你们为什么把禁书发运到王国来？……我们再也不愿接收任何这样的货物了；如果有人发过来，我们就第一个要求把它们没收……因为我们不想卷入任何违背国王命令的活动……真令人吃惊，你们自己违犯国法，竟敢让我们以个人名义对任何失误负责。”⁽⁹⁾

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收到这样赤裸裸效忠体制的信，为应付警察【237】拦截而有意写的可公开的那种假信除外。弗夫·拉莫的言辞显然是认真的，它证明了国外出版商在运输系统的中间人中很容易找共谋的说法并不属实。

法瓦尔热1778年再次尝试安排到第戎的货运时，他撇开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转向雅克·尼布拉父子公司，他们是货运代理商，兼做制造蜡

烛的小生意。尼布拉同意接受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并设法让附随的货物通运准单得到处理（一个很棘手的活儿），尽管当地书商行会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因为第戎不是正式的口岸城市。这里的书商行会行事马虎草率。它的官员在三楼一个邋遢的房间开会，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租借大面积的存储空间来实施货物检查。⁽¹⁰⁾因此，书籍货物运到第戎后，通常先由当地海关官员拆封，然后送到大市场，和其他各类货物堆放在一起。根据与法瓦尔热协商作出的安排，尼布拉将从大市场取回货物，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拿掉出版社单独包在货包上部的所有禁书，然后请卡佩尔来检查。尽管卡佩尔作为理事肩负着责任，但他乐于为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方便。他发现没有非法书籍，就会对货物通运准单进行处理，这样尼布拉就可以把它寄回给瑞士边境的海关官员了。虽然重量在货物通运准单上有记载，但卡佩尔会忽略核实，所以没有迹象表明有书被拿掉了。如果货物就是发给他的，他就会把它带回书店。如果不是，尼布拉会把它转运给出版社的另一家客户，而且货包不会再有被检查的危险，因为它已属于国内货物了。法瓦尔热得知，这种方法对洛桑和日内瓦的出版商兼批发商来说很有效。当他离开该城时，一切似乎准备就绪，纳沙泰尔和第戎之间的图书贸易将有重大推进。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1778年12月，在法瓦尔热到访一个月后，尼布拉证实，他会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又警告纳沙泰尔出版社，**【238】**他不保证对任何失误负责，而且现在风险似乎很高，因为新理事上任替代了卡佩尔，他们宣称检查将十分严格。一年半以后，尼布拉放弃了货运代理商的生意，一门心思做蜡烛去了。他的引退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大损失，因为在第戎巍峨厚重的城墙内，出版社找不到任何人来照顾它的货物。⁽¹¹⁾

其间，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卡佩尔之间的生意徘徊不前。1777年2月，他们的生意好像有了些希望。奥斯特瓦尔德去巴黎出差，他在贝赞松乘上的马车，途中曾作短暂停留并拜访了卡佩尔。他显然说服了卡佩尔相信纳沙泰尔出版社是一个卓越的供应商，因为几天后，卡佩尔就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留给他的书目下了一份订单。订单包含36种书籍，种类十分广泛：游记文学、历史、儿童读物、小说和几种17世纪的古典著作（莫里哀和拉封丹的著作）。他还要求订一部政治毁谤著作《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尽管书目上没有，但他认为出版社可以提供。卡佩尔解释说，这份订单是一个尝试，作为他评估纳沙泰尔出版社图书存货的纸张和印刷质量的一个方法。他希望能由此发展出一些互利关系。

他在6月份以一个印刷商同行的身份写信说，他招募了一些愿意到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厂工作的工人。9月份他又下了一份订单，尽管第一批货由于跨境运输遇到麻烦延迟了。出版社在回信中问他是否愿意做承保人，让货物通过他的书商行会发运。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是因为风险很高：他解释说政府最近发了命令，书商行会在进行检查时要格外严格。出版社继续向卡佩尔求助，但他不予理睬，而到了这年年底，他似乎生气了。

虽然他的信总是写得很礼貌，而且文笔不错（他的受教育程度似乎比许多较小的书商高一些），但语气是冷淡的。1777年11月27日，他抱怨说，出版社的书一本都没有到货。他从出版社得到的信息和从它的中间人那里得到的相互矛盾，而且不得不白白支付邮资（在18世纪，信件邮费都得“到付”），令他恼火：“麻烦和耽搁令我十分气馁……我收到的纳沙泰尔来信，【239】有几封什么也不说，其他几封则宣布货到不了，这让每件事情看上去都像是一场滑稽剧，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

这些麻烦，许多是由1777年8月30日的法令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法令颁布已经三个月，卡佩尔还不曾见过它的文本，即使他是第戎书商行会的理事。他最终在11月看到了这个法令，还是一位朋友借给他的。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做出预告：这项立法不可能实施，因为巴黎书商曾对它的一些方面提出过抗议，会成功地予以阻击。不过尽管如此，第戎的书商们还是应该就他们的盗版书持有情况向政府发一份报告，并在年底前开始给它们打上标记。

1778年1月，卡佩尔终于收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批货物。可他整理货物时，却发现其中没有他订购的书籍。后来发现，这些货包原来是要发给多勒（Dôle）的名叫夏博（Chaboz）的书商。这次失误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运系统看起来似乎正逐渐失灵，但尽管发生了这种情况，卡佩尔还是要求出版社发给他6册《法国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耳的历史颂词》（*Eloge historique de Michel de L'Hospital, chancelier de France*），并且说，他还热切希望征集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2月，给卡佩尔的主要货物终于运到。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此后他们的生意可以稳步继续下去。

1778年7月，他写信说，政府法令在第戎仍然没有生效。他预料将有两位理事要来替换他，将来会如何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他不得而知。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但是他警告说，“我可不想让自己受到连

累。”这就是四个月后法瓦尔热到访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由于已经和尼布拉有过约定，法瓦尔热觉得和第戎的贸易有希望振兴。然而事与愿违，1778年12月，尼布拉报告说新理事上任了，决心没收所有非法货物。就在这时，卡佩尔停止了从纳沙泰尔订购书籍。

因为卡佩尔的订货数量从来都不大，所以根据这些订单做出的统计只能让人稍微了解一下1777年左右第戎的图书贸易情况。【240】卡佩尔需要一些教学用书，他订了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和尼古拉·安托万·维亚尔（Nicolas-Antoine Viard）的《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 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各12册，以及6册《算术，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L'Arithmétique ou le livre facile pour apprendre l'arithmétique de soi-même et sans maître*）。他还要了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和流行的、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Jeanne-Marie Leprine de Beaumont）的《儿童杂志，或一位聪明的女家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小學生的对话》（*Magasin des enfants, 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政治书籍则有激进的毁谤性书籍《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和马布里神父的理论著作《论立法或法律原则》（*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第戎的律师和高等法院官员在卡佩尔的书店里用指头翻阅这些书籍的场景，尽管他从未指明任何顾客的身份。他订了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颇受争议的《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但是后来他后悔了，因为它没有及时运到：“它已经不再流行了，我要降10苏把它们甩卖掉。”卡佩尔订的其他书籍种类广泛。外省经销商通常订购的就是这几类书籍，它们也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书籍所特有的，因为卡佩尔指出他从别的出版社进过同样的书籍，包括里昂和巴黎的出版社。他的卷宗证实了我们从其他书商的卷宗里获得的印象：在法国外省地区，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量都很大，但是这一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书籍难以运到书商手中。日内瓦和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也许比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更成功一些，而后者和第戎的交往，只是一个商机频失的故事。尽管法瓦尔热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也谈妥过几份合算的订单，但是他的法国中部之行是令人失望的。

（1）关于这个主题，见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作，尤其是《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修订版，牛津：Basil Blackwell，1994；和《宫

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 , 纽约 : Pantheon , 1983。

- (2) 与法瓦尔热不同, 18世纪的旅行者常常会对沿途的美丽景色进行评论。例如, 一个英国人在穿越布卢瓦附近的卢瓦尔河时, 就在她的日记(后来被译成法文)中写道:“我愿永不厌倦地赞美这个地区乡村, 对所见之景色将久久难以忘怀: 左边, 卢瓦尔河蜿蜒流淌, 沿岸散布着一丛丛绿树, 房屋掩映其间; 右边, 山坡上铺满了葡萄园。”见《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生活(1783—1786): 克拉多克夫人未发表的日记》(*La Vie français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1783-1786]* : *Journal inédit de Madame Cradock*), 巴黎: Perrin, 1911, 第298页。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在沿着法瓦尔热走过的、从索米尔到图尔之间的道路旅行时, 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禁不住去反复体味沿卢瓦尔河的路途带给我的乐趣; 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更光怪陆离的景色了。”见《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的法国之行(1781—1783)》(*Voyages en France de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1781-1783]*), 让·马尔尚(Jean Marchand) 编, 巴黎, 1928, 第196页。一位匿名的助理牧师对法瓦尔热法国南部之行沿途的风景和建筑也有类似的欣赏, 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读到:《从卢瓦尔河和索恩河畔到地中海和朗格多克及普罗旺斯海岸的旅行日记》(*Journal d'un voyage aux environs de la Loire et de la Saône jusqu'à la Mer Méditerranée et sur les côtes du Languedoc et de la Provence*), 亨利·迪朗通(Henri Duranton) 和克里斯蒂娜·洛韦涅-加尼埃尔(Christiane Lauvergnet-Gagnière) 编, 圣太田: 圣太田大学出版社, 1993, 第95—119页。
- (3) 见帕特里克·多比尼亚尔(Patrick Daubignard), 《布卢瓦的印刷商和书商(1554—1790)》(*Imprimeurs et libraires blésois [1554-1790]*), 布卢瓦: Les Ami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Blois , 1988。
- (4) 类似的企业主的例子, 见我关于特鲁瓦的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专题论文:“禁止的生意: 法国大革命前夕一名地下书商的生活”(*Trade in Taboo: The Life of a Clandestine Book Dealer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刊于《扩大的圈子: 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The Widening Circle: Essays on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保罗·J. 科辛(Paul J. Korshin) 编, 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6, 第11—83页。
- (5) 他大概成功获得了营业执照, 因为在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 他被列为布卢瓦的“书商”。
- (6) 亨利·埃利松(Henri Herluison), 《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et libraires d'Orléans*), 奥尔良, 1868, 第142页。
- (7) “弗夫·夏森格和小波帕伊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 1784年7月12日。
- (8) 见亨利·埃利松, 《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 第126—134页; 这篇关于库雷的文章是一位显然很熟悉他的同时代人写的, 见J. F. 米肖和L. G. 米肖(J. F. Michaud and L. G. Michaud), 《古今全传》(*Bi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 巴黎: 米肖兄弟, 1811—1862; 还有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手稿, “卢瓦雷传记文献”(*Bio-Bibliographie du Loiret*), 是卢瓦雷档案馆的居伊萨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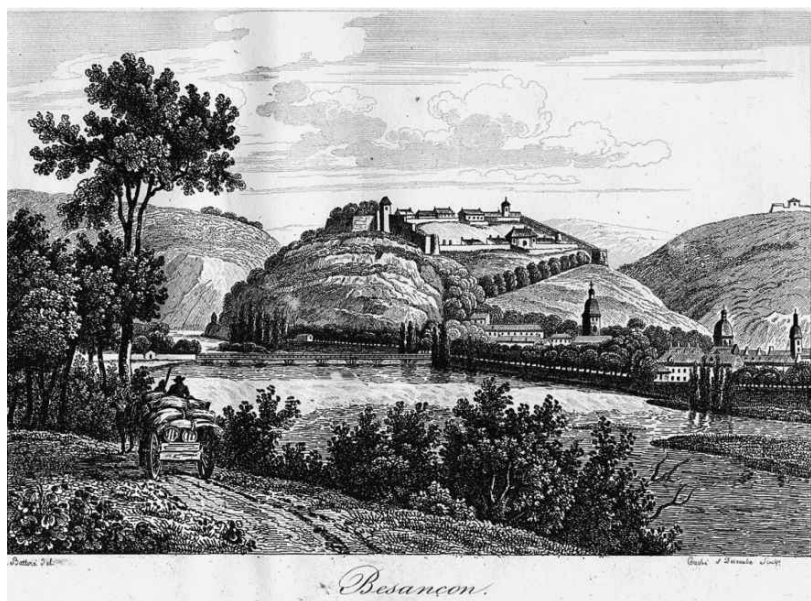
(Cuissard) 好心提供给我的。

(9) “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3月18日。

(10) 科多尔省档案馆，mss. C381-383。

(11) “尼布拉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12月29日、1780年1月13日、1780年5月2日。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 【241】



贝赞松，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任何人从第戎旅行到贝赞松（96公里）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地方，都知道景色变化是多么显著。草地取代了葡萄园，丘陵变成了高山，山谷两旁切成悬崖峭壁，幽深的谷底奔腾着湍急的溪流。我们想象不出法瓦尔热是如何穿越的，【242】这不只是因为他没有描述过，而且他在离开第戎后，就完全停止写信了（他很快就会回到纳沙泰尔，可以就最后一段旅程进行口头汇报）。他的日志显示，他在去贝赞松的途中穿过多勒，然后就沿这条路越过汝拉高原到达蓬塔利耶（62公里），接着从那儿沿着塔威山谷向下，回到纳沙泰尔（58公里）。法瓦尔热孤身一人，骑着马，顶着冬天的头几场暴风雪，跨过道路崎岖的山口。

到达贝赞松后，他便进入了自己熟悉的地域。不仅是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待过，而且因为该市的书商与汝拉山脉另一侧的纳沙泰尔供应商关系密切。贝赞松是一块图书消费的乐土。这里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率高，有一所高等法院以及其他几个法院，有总督府、众多行政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教育机构。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图书销售生

意在这里谁都可以做。没有书商行会，从事这种贸易不需要官方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开店，甚至都不需要从学徒干起，只要警察许可就行。报告指出，结果这里就有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图书经销商，他们受教育不够，缺乏资质。他们什么样的书都卖，包括很容易从瑞士弄到的禁书。到1781年，贝赞松有12家书商、4家书商兼印刷商上了《出版年鉴》，对一个有25,000人口的城市来说确实很多。

要了解贝赞松的图书市场，没有比大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及其妻子的信件更好的资料了。夫妻俩夫唱妇随一起打拼，1783年丈夫过世后，妻子把生意接过来继续做。从1759年到1788年，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联系，共写了179封信，涉及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了解外省书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¹⁾

夏尔-安托万1735年12月8日生于一个书商世家。⁽²⁾他的父亲是书商，弟弟让-菲利克斯是印刷商。根据1764年的报告，当时29岁的夏尔-安托万开的书店刚刚破产。五年后，他首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时，他是家族企业“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的成员，向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新印刷厂供应纸张和其他材料。“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也经营小规模的书生意，自1771年年底，他们开始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订单，从梅西耶的《2440年》开始。^{【243】}到1773年10月，夏尔-安托万在市中心的圣皮埃尔街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夏尔梅的信偶尔提到其他的一些供应商，他们大都住在洛桑和日内瓦，但这些信表明他总是喜欢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1782年9月6日，他写道，“我们喜欢和你们出版社做所有生意，我们对你们出版社心怀感激和尊重。”纳沙泰尔出版社之所以博得他的感激，是因为有段时间他重病卧床不起，出版社同意延缓结清他的账目。就在那时他和出版社的董事们有了私交。他常常去纳沙泰尔和他们当面商谈订货，也安排货运路线，包括在蓬塔利耶附近边境的偷运行动。这种访问导致一种近似友谊的关系，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看出来。尽管信件保持了商业信函流行的有条不紊的风格，但是语气渐渐变得亲切热情。1777年3月7日，夏尔梅写信给当时在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仅仅是让他们放心，纳沙泰尔的一切都很好。他刚刚访问了出版社本部，他们的妻子身体健康，极其“亲切、礼貌和热情”地接待了他。

由于有这些密切的关系，夏尔梅的信件具有其他大多数书商的商函所缺乏的一个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他订购图书的情况，还反映了他订货所采取的策略——他在进货时评估市场并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所采取

的方式。他做生意的指导原则是谨慎。他虽然订过一些禁书，但是只要感觉到有一丝风险，他就会停手，而且他经营的书籍大部分都不是违禁的。对于新版书，订购前他会先尝试读一遍，以便预测什么是能吸引顾客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先在他自己的顾客中进行预订，然后再向出版社订购，他很少大量订购某一种特定的书。“我把销售当作指南针，”他解释说，“我背离它是不可能没有危险的，这就是我不冒一丝风险的原因。”他在早期的信中把自己说成是“小零售商”，尽管法国政府1778年建立本地的书商行会后，他被选为最高官员（理事）。他规避风险，保守地估计市场需求，订购数量从不超过他认为能卖掉的数量。【244】按照夏尔梅夫人（Mme Charmet）所说，他的订货策略是“图书品种要多，而每种图书的数量要少”。

根据夏尔梅的订单作出的统计证实了这句话。尽管对于某种特定的书，他偶尔会为得到免费的1册而订了12册（这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最佳客户的优惠），但他通常都只订6册，如果发现卖得好，就会再订。例如，在订购让利斯夫人的《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这部曾经风靡于18世纪但如今已被遗忘的著作时，他从1779年12月到1787年4月，分八次订购了110册。像其他书商一样，为了节省运费，夏尔梅订购的图书品种都很多，以便使货包重量至少能达到50磅。典型的订单如1775年5月29日发给出版社的一份，包含了27种书籍，每种一般是2到6册。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当他觉得某种书籍需求量大时，他才冒险一开始就下大单——而后来又再次订购这种书籍一般就表明他先前的估计是正确的。1781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新书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据称有望成为畅销书。夏尔梅在5月30日订购了100册，6月29日订了50册，1783到1785年间，又在不同的日期订了17册。

对夏尔梅的订单逐月进行统计，就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外省首府的图书需求情况。内克的《备忘录》（增补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 Necker*]）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居于夏尔梅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随后就是一些从关于路易十五宫廷的毁谤性书籍中挑选的最受欢迎的书，尽管夏尔梅一般避免订购禁书。他喜欢哲学家观点温和的书籍：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以及《理性的历史颂歌》（*Eloge historique de la raison*），此外还有卢梭的《忏悔录》。他甚至很热切地想订购梅西耶的《巴黎图景》和马蒙泰尔的《印加人》。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体诗、戏剧和寓言在订单中也显得突出，此外还有雷纳尔的《哲学和

政治史》。(3)【245】而夏尔梅的全部订单表明，对历史书籍、游记、几部小说和一些科学书籍的需求相当可观。

这种一般的模式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大书商的订单中都能发现，虽然对个别书籍的需求各家书店会有所不同。夏尔梅的例子不一般的地方，是他在下订单的时候，还对书籍和作者进行评论。他和许多书商一样，抓住机会利用读者对凡尔赛宫廷内部生活的好奇来牟利，尽管他不会冒险，也不想让他的书店充斥粗俗的毁谤书籍。1775年9月30日，他写道：“如果你们邮寄给我……两本八开版的《路易十五回忆录》，让我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书，我将不甚感激。如果是本好书，并且有可能卖得好，我就订购100册。但是，如果它和《杜巴丽夫人轶事简编》（*Précis de Mme du Barry*）（有关路易十五的情妇的一种毁谤性传记）是一路货色，那订购12册就够了。”显然他觉得《路易十五回忆录》还不错，值得向他的读者推荐，因为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书发运给他时，他抱怨说：“我每天都因为《路易十五回忆录》被顾客吵得焦头烂额，这都怪我过早地跟他们提到这本书。”夏尔梅还认定《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是一本潜在的畅销书。但是这本书在出版商兼批发商一层需求就特别大，因此出版社无法充足供应。两周后，他们给他发了26册，但是他还要26册，抱怨说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弄到货了。缺货，出版社解释说，他们跟另一家出版商做过一笔交易，要按折扣价购买200册，但是此人违约了，为了赚快钱要留着自己卖。

根据夏尔梅的估计，通过市场对毁谤性书籍的需求来争夺利润的热情，在1781年后期开始减退。他劝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四卷本的新版《秘史》（*Chronique scandaleuse*），即《英国间谍》，即使它已经不再是抢手货。“这本书不错，但销量开始下降。25册对我来说足够了，这里已经卖了100册。但是《英国观察家》（*L'Observateur anglais*）、《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法国间谍》（*L'Espion français*），以及这最新的一本——都属于有关同一话题的著作，读者们已有充足的产品选择了。”

夏尔梅探测到读者对严肃政治书籍有需求，尤其是对与雅克·内克和他在1776到1781年间作为财政大臣所采取的措施有关的论战性书籍有需求。【246】他获得了100册内克关于国家财政的特别的公开报告《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这本书在1781年1月引发了论战。（对他在出版社的订单进行统计时没有看到这一项，因为是出版社通过和贝赞松的另

一位书商莱帕涅达成的交易间接发给他的。)内克写这篇报告是一波宣传攻势的一部分,旨在呼吁人们支持他的措施。他以官方授权的形式,出版了一个附有两幅地图的精美版本,而且为了促销,他把价格限制在3锂以下,同时命令严厉打击盗版。不出所料,包括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内的盗印者,立即开始出版竞争的版本,而且在内克于1781年5月19日被解职后爆发的论战期间,继续重印支持和反对他的小册子。当出版社在1781年5月提议供应大量《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时,夏尔梅立即下单订购100册,而且在这一年剩余的时期内,密切关注小册子发表的情况。他向出版社报告说,一本反内克的小册子,《卡拉乔利侯爵先生致达朗贝尔先生的信》(*Lettre de M. le Marquis de Carraccioli à M. d'Alembert*)以手稿形式流传,在贝赞松激起了广泛的兴趣。他建议他们赶快出一版,因为“此时正是销售它的好时机”。出版社照做了,他立即抢购了100册。他怂恿出版社重印其他小册子,包括《评论集》(*Les Commentaires*)和《一位朋友致内克先生的信》(*Lettre d'un ami à M. Necker*),以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相同的版式出版,以便两者可以一起售卖。1781年10月9日,出版社询问他内克三卷本著作集的低价重印版的出版前景,当时让-弗朗索瓦·巴松皮埃尔正在日内瓦印刷这部著作。夏尔梅劝止了,因为它在贝赞松市场上似乎已经饱和。出版社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但它向夏尔梅提供了19册《赞成和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显然是它通过交换从巴松皮埃尔处弄到的。

纳沙泰尔出版社要靠从夏尔梅和几位他们最信任的书商那里获得的情报来选择要盗印的书籍。例如,1781年6月,它为想盗印的两部著作征询了夏尔梅的意见:德利尔·德萨尔(Delisle de Sales)(笔名是让·巴蒂斯特·克洛德·伊索阿尔[Jean-Baptiste-Claude Isoard])的《自然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247】由于遭到法国政府禁止,这两部著作已经变成潜在的畅销书,正在许多地方重印。出版社问他,市场能否支持各出一种新版?夏尔梅劝说出版社放弃《自然的哲学》:“我认为随着总体上对所有哲学书籍的需求下降,市场对此书的需求也已经大大下降。过去一年时间里很少有人要买这些书。”但是雷纳尔的著作不一样,“至于出雷纳尔神父的新版的事,从你们的计划看,我觉得很好”。但直到几乎两年以后,出版社才出了自己版本的雷纳尔著作。其间,夏尔梅继续向纳沙泰尔的朋友们提供有关其他重印书籍的报告,尤其是1781年洛桑版的《哲学和政治史》。他还寄了几套给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及时在印刷厂开印,击败他

们的竞争者。1777年2月和3月，他们向他们提供了两部潜在的畅销书，《印加人》和非常受欢迎的博马舍的整套《审判备忘录》，这部著作记载了博马舍和路易-瓦朗坦·哥士曼打官司的经过，这场官司是在莫普1771年为取代巴黎高等法院而创立的高等法院里打的。

借助来自专业情报网的信息，夏尔梅还帮助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免遭贸易欺诈。1782年4月，他警告出版社，他们计划重印的《关于禁欲主义的哲学和历史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 célibat*）这本书，最近七个月来正在以另一个书名《教士的禁欲主义的危害》（*Les Inconvénients du célibat des prêtres*）销售，而且卖得非常好。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与马赛的莫西打交道时得知的情况一样，出版商有时会把书名页换掉，以新瓶装旧酒的方法销售旧书；而为了了解其他印刷厂的情况，他们还采取如今被称作商业间谍的做法。1784年7月，夏尔梅夫人警告纳沙泰尔人，他们的一个印刷工人正偷偷向里昂一家出版商提供他们正在印刷的原版梅西耶《我的睡帽》的折帖。

贝赞松的来信还会告诉他们，什么作家最吸引当地读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他们这些作者的身份。在1780年代，除了伏尔泰和卢梭，【248】还有三位作家尤其受欢迎：雷纳尔神父、米拉波伯爵和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在1781年遭禁，而雷纳尔的逃亡和声名鹊起，也使他的书成了畅销书。米拉波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强烈谴责国家权力的滥用，此书在纳沙泰尔由福什长子公司出版，在贝赞松特别受欢迎。米拉波就是从贝赞松附近的茹堡监狱逃出来，与一个老法官的妻子一起私奔的，也正是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夏尔梅夫人于1782年接手生意时，她恳求出版社赶在秋季高等法院开幕式之前，把《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米拉波的色情著作、后来以《名门浪子》（*Le Libertin de qualité*）之名重印的《我的转变》（*Ma Conversion*）发运给她。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涉及类似的主题，在这个拥有大量律师的城市也同样受欢迎。兰盖是律师出身的论战记者，在贝赞松拥有许多读者。夏尔梅说《兰盖先生致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在1777年6月的市场上是最热门的书籍：“能花25（译者按：原文如此，疑是2.5）路易谋得一本的人就算很幸运了……有些曾经卖到4到5路易。”三年后，夏尔梅夫人确信，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巴士底狱回忆录》运给她，她就能卖掉许多。她认为（她和她的已故丈夫一样，对市场需求的观察非常敏锐），卖得最好的是用“力量”（*force*）写的书，至少是在政治和时事的领域。她向出版社保证，杜尔哥（Turgot）的《遗作集》在1787年需求量大，就是因为“这

本书是用力量和能量写的”。出于同样原因，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书也卖得好——但不是他的所有书。他的《巴黎图景》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巴黎缩影》（*Réduction de Paris*）不行：“公众发现里面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对它不感兴趣，尽管用加工过的材料写的序言很有力。”

夏尔梅和他的妻子都没有详细描述过他们所谓的公众的性质，但散见于他们来信里的一些话仍能显示公众的一般特点。夏尔梅夫妇的大部分顾客很可能来自法学界。1777年5月，夏尔梅怂恿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法律论著，并且估计了它们在每个有高等法院的城市可以出售的册数。（巴黎和贝赞松各卖100册，位列榜首；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排最末，40册。）【249】1785年3月，夏尔梅夫人说她的顾客吵着要买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抨击法国律师团体的著作——《一位独立观察者就法国律师团体的腐败问题致律师公会》（*Un Indépendant à l'ordre des avocats sur la décadence du barreau en France*），原因就在于人们关心“我市律师团体的当前状况”。贝赞松的来信有几次提到一些具体的顾客，包括一位侯爵、一位治安官、一位大教堂的教士、一位省总保税所董事，还有四位军官。要塞驻军肯定占有很大销售额。1780年2月，夏尔梅写道，他不能再订购战争大臣克洛德-路易·德圣热尔曼（Claude-Louis de Saint-Germain）的回忆录了，因为北美的战争使驻军减员了。而且在1787年，夏尔梅夫人说，她不知道要订多少腓特烈二世（Frederich II）的著作，要等到她弄清楚此书出版时要塞里还有多少士兵才能确定。没有一封信提到图书在低层民众中的销量，不过，像许多外省书商一样，夏尔梅利用他的书店办了一个读书会，其成员花点小钱就可以看到他库存的图书。任何人跨进书店的门，都有可能碰到各类职业人员和上层人士，手艺人 and 工人除外。

夏尔梅的信函对于图书贸易的通讯和运输部门也有很多涉及。1778年以前，从瑞士运来的货包要在总包税所过关，然后在总督府接受检查。在1775年8月13日的一封信中，夏尔梅解释说，他参与了检查，收买了总督的雇员，于是他们只草草地翻看了一下货包上部的折帖。出版社把禁书放在货包底部，肯定就能安全地运到他手中。事实上，由于得到“总督府的特许”，夏尔梅还帮助出版社把书转运给法国各地的其他客户。有时他把出版社提供的伪造收据在官员眼前晃一下，他们就会让他接收货包，根本不做任何检查。若遇到禁书在途中被没收的情况，他甚至还能从中斡旋，让他们放行。1775年9月初，夏尔梅得知出版社发运的三个货包不久前在弗朗堡被扣住了。尽管这些货只是通过他转运给其他人的，他还是提议由他来解救：“我来用我的特殊门路让你们摆脱这个

麻烦……但是……我有必要保留这些门路，【250】以便在自己遇到急事时能用到。”

这三个货包的情况原本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其中含有米拉波的《论专制主义》，而法国政府正试图用不通知贝赞松总督而是向巴黎总包税所下特别命令的办法，来封杀此书。夏尔梅担心这件事处理不好，会使纳沙泰尔出版社将来不敢再把货物运给他，尤其是如果贝赞松税务所的雇员插手检查的话，这些人跟他在总督府的朋友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他们使坏，我就惨了”，1775年10月4日，他写道。“我将从他们的表现来判断[一个带有一些禁书的货包在运输途中]是否能顺利通过，而且紧接着我是否还能让其他货包通过……我反复表示我会竭尽全力。但是请理解，我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这封信所用的亲密口吻可以看出夏尔梅跟出版社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而信中对于谨慎的强调，则表达了他和纳沙泰尔人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看上去也许像个地下贸易的老手，但他从不大量经销禁书，他始终规避风险。

当三个被没收货包终于离开检查处时，夏尔梅报告说，这件事的后果会很严重。一些曾在这次货运中受到牵累的中间人会被罚款，数额多达2000锂，外加象征性的惩罚措施——一种“毁誉性的惩罚”和一次焚书行动，尽管焚书时会用一些没卖掉的合法书来替代禁书。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连累，最重要的是，他的自信还得到了总督的支持：“他是必须做出最终裁决的人。……既然有传言说它们是坏书，那就肯定要在总督法庭的中央举行一次焚书——这只是一要安慰一下某些白痴。……最好是用《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这是一本销路极差的书，以致夏尔梅认为应该让它化成纸浆）来替代它们。”为了扫除障碍，恢复贸易，他不得不求助于“有实惠的礼仪”——贿赂，其中包括两套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此书以摩洛哥皮做封面，有烫金字，他打算赠送给总督。

用别的书替代禁书进行公开焚烧的举措能得到总督的支持，【251】这表明到1775年，启蒙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法国当局的高层，但是总督的保护也没有扩大到能够容忍激进的政治书籍。夏尔梅相信，封杀《论专制主义》的企图是不久前当局对瑞士边境异常警惕的原因。因为米拉波曾经在纳沙泰尔让福什长子公司印过他的论著，所以来自纳沙泰尔的一切书籍都受到了怀疑。“不要试图从这里运《论专制主义》”，1775年12月7日夏尔梅警告说。“那样可能会给作者造成麻烦（因为人人都认识他），也会因为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干预给印刷商带来麻烦。政府这次是一定要采取坚决行动的了。……蓬塔利耶就

因此发生过一次大骚乱。”然而不幸的是，12月初，纳沙泰尔出版社又有八个货包在弗朗堡被扣住。夏尔梅利用总督的影响力，并进行了更多的贿赂，终于掰开了海关人员的手，放行了其中七个货包，这些海关人员接到过凡尔赛的内阁密令，提高了警惕。但是这次栽的大跟头也结束了夏尔梅作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运代理商的业务，直到1778年他当上贝赞松新书商行会的理事时，才有了新的机会。

根据1777年法令的要求，贝赞松创建了新书商行会，夏尔梅被选为理事，负责审查所有进口书籍，并扣留非法书籍。纳沙泰尔出版社一听到这个好消息，马上请他帮忙放行运往法国各地的货物。但是，他担心和他一起检查货包的一位警察会阻止他在处理货物通运准单时作弊，尤其是在他听到法国政府要求严格执行新法令之后。尽管和出版社关系亲密，他还是决定规避所有风险：“至于哲学方面的，我不再想去处理这一类的任何图书了。新的图书贸易管理当局将使我们寸步难行”，他在1778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宣布。出版社的恳求也没有使他心软，他拒绝将任何可疑书籍转运到别的地方。尽管如此，出版社还是不断提出要求他：能不能凭借他在第戎的人脉关系，帮他们开辟一条直通巴黎市场的销路？愿不愿意考虑以边境偷运者所出的每英担15铤的现行费率，【252】让货物在贝赞松混过关？而回答始终是不行。夏尔梅在自己的生意中继续经营一些非法书籍，但一如既往，他拒绝冒任何风险，而到了1783年，他就不再跟纳沙泰尔出版社做什么生意了。

就在这时，通信中的个人因素变得益发突出了。夏尔梅像许多外省书商一样，常常在路上奔波，向小镇上的零售商推销图书，视察供应线，和出版商兼批发商商谈。而夏尔梅夫人也像许多书商的妻子一样，在丈夫不在家时提笔写信。一般情况下，妻子写的信，文字水平会低一些，无论是拼写还是语法，因为女孩接受的教育比男孩少。但是，夏尔梅夫人能写一手好字，也完全掌握了句法，采用复杂的措辞也毫不含糊，甚至虚拟语气的过去时态也用得好。通读夏尔梅的卷宗，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应对变动不停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同时应对个人家庭的变故。和生意上的流水账一起，信中还不时提到夏尔梅的健康状况，一开始还是附带说说，后来就露出了急迫的情绪。

夏尔梅夫人第一次提到丈夫生病是在1781年9月25日，当时他刚出差回来，先后去见了瑞士的供应商和弗朗什-孔泰的客户。他恢复得很好，可以继续写信了，并且在随后12个月里继续出差。但是在1782年9

月6日，夏尔梅夫人报告说，一周前他出差回来，“病得很厉害，在旅途中突然发作。他想战胜疾病，但还是被它击倒了。他对自己照顾不周，一些药又没有效果，使病拖久了，成了沉痾痼疾。我希望他会痊愈，但是这肯定需要很长时间”。出版社写信表示同情，而在10月2日的一封信中，夏尔梅夫人回信说，情况似乎在好转：“我们都很快乐，只是受了一场惊吓，失去了一些时间。”然而，到11月3日，她丈夫的病再度复发，卧床不起了，再也照顾不了已经每况愈下的生意。出版社伸出援手，允许他们延缓偿付债款，还推荐了某种药物治疗方法，那是他们在贝赞松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提供的。11月15日，【253】夏尔梅夫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说她没有放弃希望，尽管夏尔梅已经卧床三个月，而医生们的预测也矛盾百出。她写道，出版社的宽宏大量，“让他对您和你们所有人都感激涕零。……此时此刻，他几乎连名字都不能签了”。六周后，1783年1月2日，夏尔梅去世了。⁽⁴⁾

到1月9日，夏尔梅夫人清算了财产，恢复了通信。她写信给出版社说将靠自己一人来做生意，并且会通过勤奋工作来还清积欠的债务。出版社不仅请她节哀，还在生意上正式给予她“信任”，再次延长她的偿债期限。从此时起，她的信显示，她又一心扑到了书店的生意上，又是了解顾客需求、订购书籍，又是疏通关系让货物通过检查，并提供有关跨境偷运书籍的风险的机密情报。

1783年的头几个月，夏尔梅夫人特别想从读者对米拉波的两部毁谤性著作——《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我的转变》——的需求中获利。她对它们的出版情况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复杂的故事，牵涉纳沙泰尔的福什家族的内部争斗。它们最初就是由福什家出版的，后来在洛桑被盗印，制造了一版廉价的重印本。她的所有书籍都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正如她保证的，它是她的“首选”货源。可是，出版社要把自己的货源从相互纠缠不清的瑞士出版商中分离开来也不容易。这些热销书籍在运到夏尔梅夫人手中之前，贝赞松的其他书商就已经设法抢在她前面进到货了，所以她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抢占市场。她希望在一本同样畅销的书上有好运气，即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日内瓦传来情报，说有一版正在洛桑印刷，她写道；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货运给她，它一定卖得好。

夏尔梅夫人紧盯着最新消息，而且像她丈夫以前所做的，把专门为由最密切的“信任”纽带联结起来的通信人所留下的内部情报传给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7月，她警告出版社，法国当局正计划取缔跟纳沙泰

尔之间的贸易，因为当局逮捕了米拉波著作在法国的发行人雅克·马莱（Jacques Mallet），【254】他在巴士底狱受审时，供出了纳沙泰尔出版业的全部情况。⁽⁵⁾正如第二章所言，福什长子公司这家出版商是一家不可信任的企业，它由萨米埃尔·福什的儿子若纳斯·福什创建，而萨米埃尔曾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创始合伙人。萨米埃尔在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合伙人发生争论后，另起炉灶，而若纳斯在和萨米埃尔争吵后也分道扬镳。纳沙泰尔的出版商之间的长期不和，让法国当局钻了空子，捣毁了供应链，因为这些出版商为了把书籍运到贝赞松，采取的是同一条穿过汝拉山脉的路线。如果一家出版商的货物被没收，其他所有出版商也就跟着遭殃。

出版商之间的争吵，偶尔的货物损失，都是还可以承受的风险。但是，1783年的命令改变了贸易的基础条件。这条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在巴黎书商行会通关。因此，从纳沙泰尔运往贝赞松的货物就得绕道，运费高得令人无法承受，除非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够找到一条实用的偷运路线。它始终未能找到这条路线，但还是设法给夏尔梅夫人运去了几批货。她抱怨说，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不如其他供应商，那些供应商莫名其妙地就能成功，至少是不定期地，打破常规把货送到。对于她来说，她拒绝冒任何风险。她报告说，市场对某些类书籍的需求居高不下，如涉及行政事务的书，会让与贝赞松高等法院有联系的律师和法官感兴趣。她还报告说，杜尔哥的遗作会畅销，而且非常希望弄一些腓特烈二世的著作，以及一本算术论著，这大概会受要塞里的炮兵军官欢迎。但是有个魔咒打破不了：生意很差。“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我的生意陷入了悲惨境地，”1785年7月17日她写信哀叹道。

这一点她不说纳沙泰尔出版社也知道。图书贸易衰退已经严重影响它的财务状况，到1783年底，它不得不中止支付未偿付的汇票。一群当地的投资人来提供援助，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内，出版社就在新领导班子管理下继续经营——缩小了规模，同时全力以赴消化堆积如山的库存。夏尔梅夫人得知它的困境后，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并重申她对出版社的“信任”，就像她遇到危机时它对她所做的一样：“在贸易局势发生大动荡时，你们也几乎不可能不受牵累。缺乏流动资金，【255】你们[过度]给予别人的信任，贸易阻滞，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你们难免要遭受严重损害。”

夏尔梅夫人的信所表露出的谨慎合作的语调，证实了她丈夫夏尔梅创立的生意的特征。他的顾客要什么，他就订购什么，主要是最熟悉的

销路稳定的几类书籍。只要他觉得他们有需求，又不冒风险，他也卖少量“哲学书籍”。地方官员会保护他，自己也乐得偶尔从他那里得到几本畅销书。但是，到夏尔梅担任新书商行会的理事时，风险因素增加了。1783年危机爆发后，他坚持谨慎行事的方针，而他去世后，他的遗孀继续奉行同样的方针。事实证明，尽管图书贸易如她所判定的在普遍衰退，但是她很精明，足能把生意维持下去，而且，当贝赞松经受大革命的荡涤时，她仍然在照料她的生意。

小莱帕涅（Lépagnez）^⑥是贝赞松第二位最重要的书商，并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贸易中占居第二位。出版社始终是偏袒夏尔梅的，因为他是它的长期伙伴，而且是该市的一流书商。然而，由于贝赞松是如此重要的图书市场，而市场的供应线又把它和纳沙泰尔绑得如此紧密，因此有必要对莱帕涅的生意做专门研究，尤其是因为莱帕涅经常要和法国管理当局过招。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依据游戏规则行事，但是只要能玩得转，他也会打破规则。

莱帕涅第一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是在1777年，正值四开版《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各地书商都抢着征集订户，莱帕涅把他们都甩在身后，他自己印制了征订表，散发征订说明书，在整个弗朗什-孔泰遍地搜罗顾客。最终他征集到390个订户，对一个人口稀少的省份来说，这数量相当可观。1779年12月，他不无骄傲地写道，他已经把市场需求都吸收殆尽了。“由于我把你们这390套四开版《百科全书》洒遍了我们这个小省，除掉零售商贩卖的那些，不可能找到还需要它的地方了。”

莱帕涅的成功为他开辟了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大生意的途径。到1777年，尽管夏尔梅还是出版社的首选书商，但是生意的发展进度放缓了，【256】而且他不愿征集《百科全书》的订户，因为据他解释，他宁愿避开那些困扰图书征订业务的一大堆麻烦，如收款问题、交货延迟、顾客不满意产生的各种投诉，其中许多投诉并非没有道理。四开版《百科全书》确实成了一桩争议不断的事业，任何书商都曾经碰到过，然而它也是最赚钱的事业。莱帕涅成为王国内最大的《百科全书》推销商，在贝赞松的13家书商当中，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其实夏尔梅也承认他犯了错误，忽视了市场对《百科全书》的需求。莱帕涅的成功使他非常担忧，以致在1777年6月，他请求出版社重新正式授予他“信任”。尽管夏尔梅仍然是出版社在贝赞松的首要客户，但在1778年，它也开始提高对莱帕涅的信用额度。

莱帕涅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头几封信几乎全是谈《百科全书》的事，但是到1778年，他帮助出版社促成了几批货物的运输，并向它报告了政府根据1777年法令整顿图书贸易的计划。1778年春季，在一次去巴黎出差期间，他试图了解该法令在贝赞松的实施方式。在5月11日写给出版社的信中，他报告说，负责图书贸易的官员勒卡米·德内维尔召见他讨论形势：“这次接见之后，这个官员对我有了好印象，他的门始终向我敞开。所以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人们可能会考虑到他说的话有很多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内维尔打算把他用作自己设立新书商行会的一个工具，似乎也是有可能的。而莱帕涅也反过来利用从内维尔那里得到的情报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邀宠。按照他的说法，他们达成了谅解；作为个人的好意，内维尔同意将新书商行会的建立推迟20到30天，以便让他有时间赶回贝赞松，把他自己的盗版书籍都打上印记。

莱帕涅传递这个内部情报不只是为了满足纳沙泰尔人的好奇心。他同时也敦促他们把盗版书尽可能多地发运给他，以便能在恩惠期结束之前，把这些书都打上印记——“机不可失啊”。由于行动快，并佯称这些书都是他库房里积存下来的，这样他就能让大量非法书籍披上合法外衣注入他的生意，不会冒任何风险。【257】这可能只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也有可能让他成为瑞士一家主要供应商的优惠客户；而且在书商行会建立后，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借助其他手段来进货。

纳沙泰尔出版社未能利用这个机会之窗——或许是因为当时出版《百科全书》太忙，但在1778年7月，它问是否还有可能发货过去让它们在新书商行会打上印记。莱帕涅回答说，太迟了，新的图书检查官不久前已到任，带来了建立书商行会的命令，而贝赞松高等法院预计就要在近期将这些命令注册，完成正式手续。莱帕涅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了规避一切风险的决定，但到1779年底，他又开始定期地向出版社订货了。他也从其他瑞士出版社进货，主要是从日内瓦出版社进货。日内瓦出版社卖给了他大量的卢梭著作，都是在卢梭逝世后出版的纪念性作品。

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做生意，一边逐渐确立了互信关系。其间，每当出版社的货物在贝赞松通关需要他帮忙时，他都随叫随到。1780年1月，他作为夏尔梅的副手，在书商行会里担任了一个官职。他和夏尔梅既竞争也合作，而根据莱帕涅的信判断，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些信大多只谈及订货和支付。他偶尔也就市场对个别书籍如罗齐耶神父（Abbé Rozier）《关于物理学、博物志和艺术的评论的导论》

(*Introduction aux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et sur les arts*) 的需求发表看法：“这是一本好书，它会畅销的。”在1780年的后几个月，他的调子变得越来越悲观。7月，他抱怨说图书市场开始衰退，他把它归咎于北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低迷。8月，他看上去更不开心了：“请不要认为我在这里做着大图书生意。我向你们发誓，过去这两年，除了《世界史》(*L'Histoire universelle*, 雷纳尔神父等人著)、《教会史》(*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约翰·洛伦茨·冯莫谢姆著)、法国天主教会的历史、旺斯版《圣经》、《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著作，什么书都卖不掉。”

几部畅销书的出现使衰退局势缓和了一些，这些畅销书谈的都是时事，如内克那个有争议的内阁。【258】纳沙泰尔出版社提议向莱帕涅提供1000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书在1781年3月正在印刷。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你提到的四开版，如果印得快的话，肯定非常畅销，因为我们从巴黎一本都搞不到，那里的人都把它抢光了。……不过我们接到命令，严厉禁止盗版。”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所能来掩饰盗版，它完全复制了巴黎版，但是未能精确复制地图，而且货也到得迟。莱帕涅抱怨交货迟，地图复制得也不精确，他断言这会给他招来欺诈的恶名。“我们在这里会被看作江湖骗子。……你们真害人。”因此他拒绝接受货物。他最终卖了几册，但是以出版社委托发行人的身份出售；出版社也没有反对，因为需求依然强劲，它很容易把书推销给其他客户。

莱帕涅原指望靠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大赚一笔，结果却更加让他失望。5月29日，出版社提议发400册《备忘录》让他和夏尔梅联合销售。然而，当出版社的信到达贝赞松时，莱帕涅正在巴黎出差。看店的店员擅自决定销售200册，并写信给莱帕涅说不久就要到货。莱帕涅便安排在巴黎销售它们；但当他回到贝赞松时，得知出版社已经把400册书都运给了夏尔梅。他以为出版社和夏尔梅在背地里做出安排，要把他挤出市场，于是给出版社写了封愤怒的抗议信。出版社为自己辩解说，它从未得到他打算销售200册的确认；于是互相指责的信就在贝赞松与纳沙泰尔之间来回传递了好几个星期，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

然而正如法国习语所说，“生意归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交易继续进行，而且莱帕涅，以及夏尔梅，都继续帮助出版社的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1781年11月，出版社请求他们协助，让一批被书商行会的检查官没收的新教版《圣经》获得放行。12月，他们请莱

帕涅转运一批梅西耶的《布莱港的哲学家》(*Le Philosophe du port-aubled*)，他答应了。【259】但是他在1782年1月写道，他不能再干这种事了，因为他作为书商行会官员的任期已经结束。不过他又补充说，夏尔梅还将继续担任两年多的理事。“我确信，他会尽其所能为你们服务，只要他不使自己受到牵累，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新的命令，现在要帮你们的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莱帕涅和夏尔梅之间尽管有商业竞争，但在贝赞松书商们面对新书商行会的刁难寻求自保的努力中，他们是通力合作的——而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把这个新书商行会直接拿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

一年后，1783年1月5日，莱帕涅写信说，他刚刚参加了夏尔梅的葬礼。信中他还用非常婉转的语气表示，他希望接替夏尔梅成为贝赞松最受纳沙泰尔出版社青睐的零售商。实际上如前所说，夏尔梅的遗孀在继续做生意，而且出版社也支持她，延长了一些债务的偿还期限。但是出版社继续与莱帕涅维持良好关系，而他也不得不再次同意帮他们发给其他书商的货物在书商行会通关。他可以确保不让它们受到检查，而且一旦通过就把它门转运给出版社在贝赞松的货运代理商阿道夫·韦尼(*Adolphe Veny*)，此人就在一个叫“三王”(*Aux Trois Rois*) 的客栈操作。韦尼声称他有70匹马可调用，而且能把货物运到凡尔赛(凡尔赛宫及其外围建筑当时是运往巴黎的非法图书的一个巨大集散地)，而不用经过第戎和特鲁瓦，那两个地方都是警察的前哨站，很危险。⁽⁷⁾

莱帕涅在1783年写的许多信谈的都是这项货运安排。一旦这些安排就绪，纳沙泰尔出版社就开始让他们的大宗生意流经贝赞松，希望利用莱帕涅-韦尼组合来开启整个法国北部的市场。法瓦尔热2月份到访贝赞松，答应以每个货包7锂10苏的价格为莱帕涅的服务付酬。到3月16日，莱帕涅已经让五个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可是韦尼却找不到马车夫来运货。尽管韦尼吹嘘他有马，可他跟马车夫谈不拢。他常常拒绝偿付他们的费用，因为根据莱帕涅的说法，韦尼自己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他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出版社听从莱帕涅的劝告，把生意转给了韦尼的一个竞争对手，一位名叫佩谢(*Péchey*) 的货运代理商，他答应偿付把货包从纳沙泰尔运过来的马车夫们的全部费用，并按固定价格把货包转运到法国北部的目的地。【260】⁽⁸⁾经过这番调整后，这个系统运行良好——直到1783年6月的灾难发生。

莱帕涅一听说政府下达了命令，要所有进口书籍都必须送巴黎书商行会检查，就赶紧写信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纳沙泰尔出版社。他解释

说，作为对他的特别照顾，弗朗什-孔泰总包税所的主管决定暂缓执行这道命令。这就让出版社有了经蓬塔利耶抢运一些货包到贝赞松的时间，而他可以在贝赞松让这些货包通过书商行会。就像1777年法令发布时的情况一样，莱帕涅想利用内部情报牟取一点短期利益，同时进一步讨好出版社。他就是个有空儿就钻、诡计多端的人，而且通常都能侥幸成功。

可是这次不行了。6月中旬，七个货包运到了贝赞松，但另一批货却遇到了大麻烦。出版社一位名叫费努耶（Fenouillet）的职员从纳沙泰尔一路跟随这批货，与此同时，莱帕涅也匆匆赶往蓬塔利耶跟他碰头，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惜事与愿违。因急于保障货包的安全，费努耶雇了个马车夫连夜把它们从蓬塔利耶拉到了贝赞松，没有履行通常的海关手续。按照正规的程序，费努耶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把货包交给海关官员，他们会把它们打上铅封，并附上一份货物通运准单，接着货物会在莱帕涅的帮助下通过贝赞松书商行会的检查，然后那个货物通运准单就会得到处理。让莱帕涅倒霉的是，这批货可以通过它的提货单来识别，原来的车夫在返回纳沙泰尔之前，已经把提货单交给了海关官员，而上面清楚地写着书籍是运给莱帕涅的。海关官员一发现货物在夜色掩护下被非法转运了，就立刻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去扣留。莱帕涅万分惊恐，感到自己就要被指控为走私共犯了。幸好那些货包碰巧没有夹带任何禁书，但饶是如此，这种欺诈行为也许仍足以毁掉他在当局眼中的形象。

在恐惧的阴云笼罩下，莱帕涅从蓬塔利耶一连写了三封绝望的信给出版社。他抱怨说，关于这次夜间非法运货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人尽皆知了。走在大街上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蓬塔利耶的海关领导已经给总包税所的六个办事处发了通知函，【261】不仅把莱帕涅说成是原定的收货人，还把他说成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欺诈案的共犯。出版社的那个白痴职员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更糟糕的是，莱帕涅在后面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已有几周时间不敢回贝赞松，因为担心一封逮捕他的密札就要发出。他预料政府至少会禁止他继续做书商生意。

出版社在回信中说，局势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他肯定是反应过度了。他立即回信说，出版社还没弄明白，这场危机有可能结束他的从商生涯，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让他觉得好像“我谈论的是教皇，您在回信中谈论的却是伊斯兰国家大臣的后宫”。幸好，夏尔梅和莱帕涅的一个店员设法用合法书籍换掉了货包中包含的两种盗版书。莱帕涅转危为安，恢复了生意，但他后来在信里强调，他决不再帮出版社处理货运

了。“我再也不做任何货运代理了，再也不以任何方式让自己受到牵连。我和灾祸擦肩而过，无论如何不能再以身犯险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只要[1783年6月12日的]严酷命令还在执行，我就不能跟你们下订单。”这条命令一直没有废止，所以莱帕涅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发来的书籍。

莱帕涅的全部订单所显示的他的一般贸易模式，跟他的信函的所有主题都是相符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在需求最大的书籍清单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人们对内克内阁的兴趣达到顶峰之际，莱帕涅为获得与之相关的书籍所做的努力。他还两次下单订购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他征集99个《百科全书》订户也是类似的趁热打铁之举。（其实，这99个订户是莱帕涅征集的360个订户的头一批，最终记在了四开版《百科全书》联营出版项目的账上，因而不代表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单边贸易，也就没有出现在他的“畅销书单”上。）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他的订货和其他外省书商的订货类似。他似乎并没有大量经营非法书籍，即使他情愿帮助出版社偷运，让它们在书商行会通关。他订购了一些词典、游记，以及有关像共济会和巫术这类主题的小册子。【262】一些启蒙哲人的名字——卢梭、伏尔泰和孔狄亚克——也出现在订单中，但他们的著作他要的都不多。相反，他喜欢流行小说和纯文学作品，如梅西耶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德利尔的诗，以及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

从莱帕涅的订单中只能看到他在较短时期内的生意情况。但他的卷宗中的资料为夏尔梅的卷宗中更广泛的资料提供了补充。把两位书商的资料结合起来，他们的订单和关于图书贸易的评说就给出了旧制度最后十年里一个外省首府书籍需求的全貌。信件的链条一直延伸到1788年10月。不过到那时，纳沙泰尔和贝赞松之间的通道已经停止了有效运作，法国大革命已开始聚集它的动能，书籍史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1)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夏尔梅的卷宗称他为“大”夏尔梅，没有给出他的名字。我首次发表关于他生意的叙述时，错误地假定他是让-菲利克斯·夏尔梅，在《出版年鉴》上被列为“印刷商兼书商”，而不是只被列为“书商”的夏尔-安托万·夏尔梅。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纽约：Norton，1996，第32—39页。贝赞松市档案馆的埃韦·勒科尔（Hervé le Corre）好心提供给我的资料显示，大夏尔梅是夏尔-安托万·夏尔梅。他的弟弟让-菲利克斯·夏尔梅是一位印刷商，根据1764年对印刷商和书商的调查报告，他印制宗教仪式用书、历书和贝赞松律师的法律简报（详情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贝赞松的资料）。让-菲利克斯在他的印刷厂出售自己的产品和其他材料，主要是宗教小册子。第三章说明过，外省的印刷商常常开

展零售的小生意，适合当地市场，但是不在通常的图书贸易中流通。尽管书籍史学家通常主要关注与启蒙运动有关的书籍和其他各类流行书籍，但是他们从不否认每日祈祷书、宗教书籍、年鉴、历书、廉价畅销故事书和其他所谓大众书籍的广泛传播。例如见罗贝尔·芒德鲁，《论17和18世纪的通俗文化》，巴黎：Stock，1964；利斯·安德里埃，《蓝皮丛书：沿街叫卖的书籍》，巴黎：Robert Laffont，2003；弗朗索瓦·菲雷及其他人（François Furet et al.）编，《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两卷本，巴黎：Mouton，1965，1970；和菲利普·马丁，《一种书籍的宗教（1640—1850）》，巴黎：Cerf，2003。西蒙·伯罗斯在一篇关于夏尔梅的文章中详述了这类宗教书籍，参阅“文化和书籍监管：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地下书籍、非法书籍和通俗读物”（*Culture and the Book Police : Clandestinity, Illegality, Popular Reading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ance*），2015年5月12日在H-France网站上发表，见www.h-france.net/rude/rudevolvi/BurrowsVol6.pdf。出于某种原因，伯罗斯把我关于夏尔梅的早期著作看作对一个胆大妄为、专营禁书的书商的“高度令人误解的”叙述，尽管几年前我在我的网站上发表过关于夏尔梅的论文，强调他是个谨慎的书商，他的生意中经营禁书的部分比重较小。伯罗斯的解释把夏尔梅说成是一个绝对专营宗教书籍的书商。然而，遗憾的是，他搞错了，他研究的对象是印刷商让·菲利克斯·夏尔梅，而不是书商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因此得出的结论与证据给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伯罗斯利用书商在为符合1777年8月法令把他们的盗版书籍打上印记时，官方对书店的检查记录，得出了不令人意外的结论，称让·菲利克斯经营大量宗教书籍。他发现我研究的对象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根本没有打上印记的存货书籍。此外，贝赞松唯一的另一位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大量生意往来的重要书商小莱帕涅，在他打了印记的存货书籍中，宗教书籍只占5%。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生意规模小的地方书商，其经营范围很小，仅限于卖些宗教图书和应时印刷品，流行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谓“普通版图书”[trade books]）的销售生意则由他们镇上大量订购书籍的一两位书商去做。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启蒙运动研究的普及与混乱”（*Diffusion and Confusion in Study of Enlightenment*），将由H-France网站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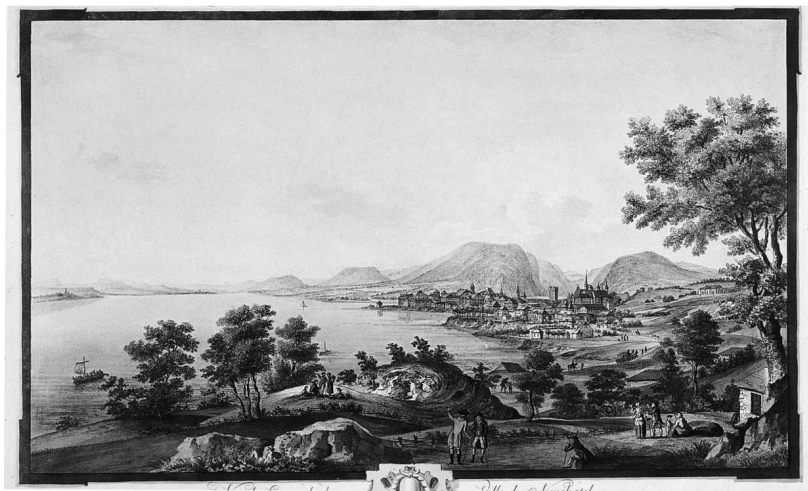
- (2) 贝赞松市档案馆，GG189，f.28。感谢埃韦·勒科尔把这份资料提供给我。
- (3) 实际上，如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与货运登记簿”显示，夏尔梅在访问出版社期间订购了更多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商在靠近纳沙泰尔的地方亲自下这种订单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出现在书商的信函中。遗憾的是，“订单与货运登记簿”只涵盖了1774年至1784年这一时期；而出于保持一致的原因，我只汇总了从书商的信得到的数据。因此，结果不完全符合夏尔梅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全部书籍。
- (4) 贝赞松市档案馆，GG237，f.2。埃韦·勒科尔提供的资料。
- (5) 马莱梅过书的手抄本以及他案件的背景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马莱的部分。
- (6) 莱帕涅在他信上的签名是“小莱帕涅”，没有名字。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列了两位名叫莱帕涅的书商，克洛德·约瑟夫和多米尼克，但是没有指明哪一位是弟

弟。

- (7) “韦尼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12月31日，而韦尼与出版社的合同签订日期为1782年2月4日，其中包含了所采取的货运路线的详细情况，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韦尼的卷宗。
- (8) “佩谢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3月14日。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

【263】



另一幅纳沙泰尔风景画

“纳沙泰尔湖和城市风景”，套色雕刻画，尼古劳斯·施普荣格林作，约1780年

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没有正式的终点线。他在1778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一天回到了纳沙泰尔，过程平淡无奇——没有仪式或庆典，只是有可能和出版社的职员们一起开个会，然后跟家人碰上几杯酒。我们已经花了五个月，天天跟在他后面，走过了1900多公里，而此时此刻还很难和他道别。不过，除了在其他一些地方散落的参考资料之外，档案文献到此就告罄了。

法瓦尔热对出版社的董事们做了个全面汇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他的三年任职合同将在一年后的1779年12月1日到期。届时，他很可能会得到6个路易（144铔）的红利，是出版社为他的良好业绩而发的奖金。如第一章指出的，1782年和1783年他为出版社出了两次短差，到1784年，出版社的档案中就没有他的信了。查询纳沙泰尔州的公证档案，我们发现了一些补充资料。1779年12月6日，法瓦尔热与位于纳沙泰尔以东30或80公里的伯尔尼州阿尔堡村的玛丽-伊丽莎白·阿福尔特（Marie-Elisabeth Affolter）结婚。让-弗朗索瓦的兄弟萨米埃尔也在那时结婚。在同时举办了婚礼之后，兄弟俩很可能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1782年12月13日，他们一起购置了一小块葡萄园，一年后

他们合作偿还了另一个兄弟路易的债务，路易是个钟表师傅。公证文件显示萨米埃尔在1782年是个“面包师傅”，但后来便以“食品杂货店老板”的身份出现了。他和让-弗朗索瓦曾在1776年7月13日联手做起食品杂货供应商的生意，同时让-弗朗索瓦也受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雇用。【264】为了支持生意，他们在1776年和1777年间陆续贷了一些款，最后的贷款总数是840锂。因此，很有可能就是在进行了这项生意投资之后，让-弗朗索瓦继续为出版社工作到1783年的某个时候，然后就做了他弟弟的专联合伙人。1784年9月28日，出版社写信给他们在里昂的前任货运代理商克洛代兄弟，说“法瓦尔热先生已经不在我们出版社了。他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公司名称是[S?]和J. F.法瓦尔热公司”。法瓦尔热在早期文献中出现时，名字后面没有附上“商人和老板”这样的职业名称——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纳沙泰尔市民阶层的成员，还不是一个有公民权的生意人。1795年，他花了72金路易（1728法国锂）购置了一块面积相当大的葡萄园，他的社会地位看来有所提升，有了一个“批发商亦即本市有产者”的头衔。179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到他时，他在繁华的洛皮塔尔大街拥有一幢房屋，价值6000锂。他有个儿子，也叫让-弗朗索瓦，出生于1780年9月26日。档案没有提到他何时去世。根据档案所披露的情况，法瓦尔热很可能就是利用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当职员时所获得的商业悟性，在纳沙泰尔中产阶级之中的某处创立了一段成功的商业生涯。⁽¹⁾

法瓦尔热的旅行既然已经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在送他踏上他的法国之行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书籍究竟有怎样的需求？正如沿途情况所示，仔细研究一下他所遇到的那些书商的生意，就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能够综合这些个案研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能不能反映总体的图书贸易状况？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这样的档案了。然而，尽管它们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它们提供的终究只能是一管之见。而其他的研究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没有完整可靠的原始史料，对19世纪以前欧洲任何地方的书籍出版发行情况进行统计，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英国，只有少量新出版的书籍在英国书商公会注册登记。在德国，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市的书目把大量流行书籍以及南方和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书籍都排除在外。而在法国，官方记录在好几个方面都有误导性。比如，要求获得图书专卖权的登记把所有未提交给审查官要求正式批准的书籍都排除掉了，【265】而提交上去请求其他类别的许可——“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经被审查官批准，但是没有正式

专卖权，而且出版地址通常是假的，让人觉得它们是在法国以外印刷的）和“官印许可”（*permissions de sceau*，允许出售，但是没有任何专卖权保证）——的书籍记录，并不指明实际印刷的是什么书，印数是多少，更不要说销量了。此外，在法国以外印刷而在王国内出售的书籍，其数量之庞大简直无法估计。我推测，在1769到1789年间，它们至少占据着图书发行量的半壁江山。(2)

为什么会占这么大的比例？审查官的批准和专卖权的授予，并不只是证明一本书不含冒犯宗教、国家、道德或某位要人的名望的内容，它还是国家对书籍的质量——包括书籍的风格、内容和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认可标志。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书报审查制度渐渐放松了。但是，即使想获得默认许可，也要花钱、花时间，费力费神。巴黎书商行会会员拥有全部现有专卖权中的大部分，【266】而国家也用警察行动强化着他们的垄断——不只是在巴黎，在远如马赛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法瓦尔热就发现那里的书籍检查官是个残酷的暴君。几位外省书商，包括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其中有的出版原版书，如马赛的莫西、尼姆的戈德、波尔多的贝尔热雷和奥尔良的库雷，有的则秘密地投机盗版，尤其是在里昂，胆大的约瑟夫·迪普兰就是在那里异军突起，突袭了巴黎书商的市场。1777年的改革有意要对图书贸易作出有利于外省书商的公平调整，并的确让外省书商有了重印专卖权已过期的书籍的权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出版业，而且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甚至在贝赞松的新书商行会都是如此，夏尔梅和莱帕涅在那里尽一切可能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书籍。在法国国内，巴黎书商行会仍然在一手遮天，直到大革命爆发。(3)

面对这些限制和费用，许多作家都宁愿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印刷他们的著作，如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是如此，我们从法瓦尔热的整个法国之行中看到，梅西耶的著作就像香喷喷的薄煎饼一样热销。这些外国出版商煞费苦心开发了一套在王国内销售的发行系统，利用像费弗尔和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让书籍绕过边境的海关官员和像里昂、尼姆和波尔多这些重要的发行中心的书商行会。这些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法国周围出现的外国出版社，印刷了启蒙运动的几乎全部著作，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审查的所有书籍。但是，他们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盗版，因此激怒了原版专卖权的拥有者，而他们几乎都是巴黎书商行会的书商。

（在1777年改革以前，作家不能自己售书，之后也很少有人这样做。）

与此相反，外省书商都是外国出版商的天然盟友，而这主要是经济

因素所致。他们能以低价弄到盗版书，而原版书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印刷，故价格较高。占印刷成本的一半或以上（取决于单次印数的多少）的纸张，在国外要便宜一些，而且盗版出版商不用购买作者的原稿就能大量印制廉价版本。【267】当然，他们要解决把书籍偷运到法国的的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圣叙尔皮斯的默龙兄弟和蓬塔利耶的费弗尔的关系，展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不过他们也可以在大多数书商行会里找一些书商当盟友，如贝赞松的莱帕涅和拉罗谢尔的帕维，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偶尔也会失误，但这个非法发行系统还是把相对便宜的盗版书提供给了法国外省各地的广大读者。这种基于盗版书和未经审查的书籍版本的出版业，在1750年就已经发展成一个重要产业，令王国的政府官员十分头疼，他们哀叹真金白银都流进了外国制造商的腰包。在连接供需方面，非法发行系统胜过了那套面向上层的、以巴黎为中心的和基于书商行会的发行系统。(4)

需求应如何估量呢？我通过汇编纳沙泰尔出版社文件中的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唯一一家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从那个时期起的全部档案的出版社。该出版社的文献资料以两种方式反映了市场对图书的需求：首先，通过从1769到1789年间寄自几乎法国所有城市的附带订单的信件；其次，通过各种账簿，出版社职员在上面记录了订单和为完成订单而发运的货物。我在研究助手的帮助下，经过最近15年的努力，挑选出纳沙泰尔出版社最重要的客户的样本，抄录他们的信件，根据他们的订单作出了汇总统计，添加了从图书贸易中间商的卷宗得来的副本，绘制了贸易路线图，提供了各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资料，并对所有原始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读者可以通过网站robertdarnton.org对这套资料进行详细研究。

然而，尽管资料非常翔实，但是它们几乎完全出自一个来源，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所以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家出版商的贸易能否充分反映读者对当时几乎所有法语书籍的需求。通向答案的途径又引出两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出版商如何出版书籍，书商又如何订购书籍？两个问题都涉及近代欧洲图书生意某些有别于当今出版业的关键方面。

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出原版书，除非作者自费委托。它重印——或者像原版出版商所说的“盗印”——那些已经畅销的书籍。在挑选这些书籍时，【268】它细心研究了市场，并根据它每天从庞大的通信网络获得的信息来选择。它也听取零售书商关于需要重印什么书的建议，这些

人是根据与个体顾客的接触时所获得的信息来评估需求的。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与书商聊过生意后，传回了许多有关畅销书及受欢迎的图书种类的建议。但是，从出版社的档案中可以收集到的有关需求的信息很多，而它的书籍重印记录只涉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出版社推销的书籍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了它的印刷机的产出。当它以通常1000册的印数印刷一版书籍时，一般要拿出很大一部分——100册以上——跟一家或多家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交换他们存货中的各类书籍，交换的册数相同。如第七章所解释的，交换通常按照交易所涉书籍的总折帖数来计算；出版社从交换伙伴那里选择书籍时，只挑选那些它认为会畅销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阿维尼翁的加里冈的交易，以及与马赛的莫西的交易，说明了这种换书贸易的运作方式，而且这些换书贸易的规模都很小，比不上该出版社与其他瑞士出版社之间进行的正规交易。瑞士出版社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因为各有各的发行网络。通过小心谨慎地发展图书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既实现了其存货的价值最大化和品种丰富化，同时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因为它不能确定自己印的书籍能否卖得掉，或者能否很快地卖掉以便让投资及时回笼。当一位书商订购一种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没有的书籍时，它常常会通过一次临时交易或折价购买，从洛桑、日内瓦、伯尔尼或巴塞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那里获取。因此瑞士的主要出版社所经营的出版业是和批发业分不开的，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之间的合作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共享一个庞大的书库，一个虚拟的、浮动的存货储备，供所有合作者各取所需。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的书目，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大同小异，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也经常说起，他们能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弄到相同的图书，不仅有瑞士的供应商，还有远在布永和列日的供应商。(5)

图书交换在这个出版体系中的重要性从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只有德国的情况例外——在那里，【269】直到18世纪末期，图书交换都被用作推销书籍的主要手段。(6)在瑞士，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它一直生机勃勃，并渗进了瑞士的出版社与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以及其他几个城市的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尽管运费高昂。当然，瑞士的批发商们也在争夺同一些零售商的生意。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就遇到过一些其他出版商的销售代表，他们也在同一条路线上奔波，而且他在一些城市——如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普瓦捷和奥尔良——了解到，这些城市各自都只有几家书商的书籍订购量能大到可以支付运输费用的程度。尽管如此，大多数外省市场都能消化几家供应商供应的货物，而且普遍存在的换书贸易，有利于各瑞士出版社之间发展联盟。他

们有时一起出版书籍，分担成本和风险。投机盗版书时，在需求枯竭之前抢在其他盗印者前面占领市场至关重要，这时联合出版就尤为有效。纳沙泰尔出版社曾一度与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缔结过正式条约，三家出版社合力有组织地大规模盗印书籍。⁽⁷⁾

有了换书和盗印这些做法，纳沙泰尔出版社就有了庞大而品种繁多的书籍储备，尽管在它的一般贸易格局中，有些书比其他书要重要一些。它销售自己印的书比销售通过交换弄到的书要多。它在商务信函中说明自己的生意时，会把它自己版本的书跟一般库存的书区别开，而且在账簿上是分开记录的，它自己出版的各种书都有单独的账目，而交换得到的书会统一记在交换账目（*compte d'échanges*，亦称*compte de changes*）上。在汇总统计书商的订单时，记住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这样就不至于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版本的书籍太多的权重。⁽⁸⁾于是统计基础就非常坚实了，足以支持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因为到1770年代中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整体存货规模越来越庞大。1773年它声称，“在法国上市的书籍中，没有什么重要书籍是我们不能提供的”。⁽⁹⁾ 1785年它的书目涵盖了700种书籍，而到了1787年，它仓库中储存的书籍品种已达1500种之多。

纳沙泰尔出版社供应的书籍范围广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书商们的订购方式。【270】当然，人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做法，但仔细研究了该出版社的商业信函之后我们仍能发现，批发贸易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交易：临时客户随意下的订单和常规客户下的稳定的订单。就像法瓦尔热总在他的马鞍袋里装着书目和销售说明书一样，纳沙泰尔出版社也会向数以百计的经销商散发它的货样信息。其中大多数经销商——或是为某种书籍所吸引，或是因好奇心驱使想测试一下新供应商的服务——都只订购了几种书籍，而且从未发展成正规的生意关系。他们会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大批量进货——因为那些供应商或是提供的条件更好，或是送货更快，又或是已经以多年的可靠服务赢得了零售商的青睐。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不失时机地与临时客户做交易，一边也建立起自己的正规客户网络，而这些客户就列在法瓦尔热的最重要联系人的名单上。他们的信函反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生意的常规流程中的一般倾向：零售商下订单是谨慎的。他们在向外国供应商订购之前，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顾客安排预售；而且他们不是向许多供应商广泛订货，而只同几家可靠的出版社进行交易。他们常常要等到攒够需求量之后，再把它们集中到一份订单上。而且，他们很少投机，一种书籍一次不会进大量的货，除非探测到这本书需求量会飙升。相反，他们各种书籍都订得少，那些持

续有销量的图书则会在之后的新订单中继续出现。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死后，他的遗孀接手继续他们在贝赞松的生意之后不久就解释说，“我丈夫的〔订货〕原则就是，书的品种要多，而每种的数量要少。”⁽¹⁰⁾在18世纪的图书贸易中，不存在退货的情况。（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如破产后对存货的清盘，图书可以委托出售，但那种安排跟现代意义上的退货做法不一样。）因此，书商订货时，一种书籍的数量很少会超过12册（有时订12册可以免费得到一册），并且会订购足够数量的品种，使货物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运费就便宜一些。

正如在出版社与货运代理商的信函中处处提到的，书籍不经装订，就以折帖形式打捆，然后包成货包来运输；装订通常由顾客自己安排，有时可由零售商包办。按照国家规定，货车车夫不承接低于50磅的货包，而且他们常常对大宗货物的运费打折。【271】少量货物以重量不足50磅的包裹发运，必须用四轮马车，运费要高得多。货车和四轮马车的区别在图书贸易中至关重要，因为与运输费用相比较，书籍本身的成本并不高。另外，在交货时，收货人通常必须以现金支付运费。书商们的信——尤其是絮絮叨叨的南方人，像马赛的莫西和阿维尼翁的布瓦塞朗——读起来就像是对运费永不休止的哀叹。

书商有时会在供应商之间挑起竞争，以便谋取最优惠的条件。但是，若个别出版商兼批发商能在偿付货款的方式上机动灵活，订货时能给予他们优先照顾，偶尔还能打点折扣，他们就会和他发展成特殊关系。因此书商们不是把生意分散给许多供应商去做，而是集中到他们可以信任的几家。信任（*confiance*）在图书贸易中是个关键词语（或许在早期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它出于防止欺骗的需要。企业主们可能会在远离受害者家乡的地方不断使用诡计，操纵贸易骗局。有些出版商会宣称他们正在重印某种书籍，目的仅仅是想打探一下需求是否足够大，出版这种版本是否合算，同时也让跟他们竞争的出版商们打消出版的念头。还有一些出版商把伪造的书名页加在旧的正文前面，把它们当作新书卖。而且他们常常利用货运在书商中厚此薄彼，这样一些书商就能够在同一地区其他书商尚未收到同种书籍之前占领市场需求。

然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会因滥用信任而遭受比零售商更大的损失，尤其是在图书贸易的隐蔽部分。像卢丹的马勒布这样的边缘经销商，一旦赢得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订单就一摞一摞地下，直到运走他们的大部分存货为止，然后却总是要找理由逃避承兑到期的汇票。⁽¹¹⁾另一方面，一些像贝赞松的夏尔梅这样谨慎诚实的零售商，也会向纳沙泰尔

出版社下大量的订单，因为他们宁愿从单独一家供应商那里进货，他们已和这家供应商打过多年交道，而且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时，这家供应商既可以信赖也会灵活处事。不管怎样，我们有可能通过这种订单的积聚，大致了解到一个经常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交易的书商的生意状况。

我强调这一点，【272】是因为它关涉编制统计数据的最佳方法这个关键问题。查阅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全部会计账簿（分为日记账 [*journals*]、流水账 [*brouillards*] 和主往来账簿 [*mains courantes*]，保存非常完好），并记录每种书籍销售给每个客户的数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1965年，当我开始结合出版社的信函来研究它的账簿时，我曾考虑过这种策略。它展示了跟踪法语书籍在欧洲各地的传播的某种可能性。但更仔细的考量显示，这样做的结果会产生误导。虽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与从莫斯科到那不勒斯、从布达佩斯到都柏林的各地书商都有通信往来，但大多数通信者都属于临时客户一类，他们的订单很少——常常只有一份，就像他们说的，“测试一下”而已。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说明书或书目上的几种书籍会吸引他们的眼球，他们也会为评估版本质量、运输费用，以及书籍运到他们手上所花的时间，进行一次测试性的订货。其中大多数人不再接着订购，因为他们发现，可以从另一家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或更快捷的服务——这家供应商通常距离他们更近，或跟他们有更紧密的信任关系。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在一大片地区，或者整个国家，只能卖掉几册特定的书籍，而仅凭他们好不容易卖掉的这区区几册书籍，是无法对该书的传播和订购此书的书商的生意加以典型说明的。把所有这些不正规的、时有时无的销售记录堆积到一起，企图从中归纳出书籍传播的普遍特点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很可惜，数据太贫瘠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得出有关像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英国和德国这些庞大市场的一般特征的结论。

拿一部著名畅销书为例来说。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在1759年初版后，又重印了许多次。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我们可以在欧洲地图上标出他们所卖的每一册，但是统计资料太琐碎，使这种地图说明不了什么问题。⁽¹²⁾出版社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书商卖了14册，而在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英国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一本都没卖掉。那么，人们能否就此作出结论，说俄国读者对《老实人》的需求比其他所有国家的读者合起来还大，并且说在1769到1789年间这本书在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绝迹了？当然不能，因为那些国家的书商会从其他出版商和批发商那里进货。【273】加布里埃尔·克拉默，伏尔泰著作的日内瓦出版商，在伊比利亚半岛就做过一次大生意，他或许在那里

卖掉了许多册《老实人》，不过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他的档案中幸存的资料只有他的“总账”，里面提到了他的客户，但是没有提到他们订购了什么书。⁽¹³⁾伏尔泰对柏林的文化生活有很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和腓特烈二世的关系；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那里没有卖掉一本《老实人》。到1769年，柏林以及全德国北部的图书市场，都受到改造了德国贸易的出版商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Philipp Erasmus Reich）的控制，⁽¹⁴⁾但是赖希从未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有过接触。实际上，很难查询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德国的销售情况，因为它面向德国的图书销售大多数都是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书市上进行的，然后就不知所踪了。⁽¹⁵⁾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不在书市上卖书，而是通过中间商，如巴塞尔的约翰·雅各布·弗利克（Johann Jacob Flick）和C. A.塞里尼（C. A. Serini），以及伯尔尼出版社和伯尔尼的伊曼纽尔·哈勒尔（Emmanuel Haller）。这些书籍的传播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没有留下痕迹。账簿上所反映的是该社与瑞士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广泛贸易，尤其是通过图书交换进行的贸易，那时瑞士出版社都在他们自己的贸易网络中做销售。那些至少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四分之一生意的书籍，都无法确定它们的最终走向。

研究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其最大市场法国的销售情况时，也会碰到许多上述的问题。尽管它曾努力开辟从西北地区进入巴黎地区的通道（见第二章），但它在巴黎从未做过大生意，那里的书商行会在警察的支持下，为消除来自国外专营盗版书的出版商的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外省经销商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相对便宜的价格所吸引，但他们常常只是下一份测试性的订单，检验一下该出版社版本的质量，以及它的供应线的效率，从来不做回头客。货运滞后和折帖大量损坏，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拒绝和它建立正常的生意关系。他们的名字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簿上出现过一两次，然后就看不到了。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络，但这个过程是不规则和不平衡的，使得一个城市的销售情况很难与其他城市作比较。实际上，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零售商联系所产生的销量，并不足以让人对他们的交易进行概述，哪怕是尝试性的概述。【274】只是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如四开版《百科全书》的销售，人们才可以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从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追踪一种书籍的传播情况。⁽¹⁶⁾而且不能撇开该出版社与日内瓦、洛桑、伯尔尼和巴塞尔的中间商的交易来追踪它的大部分销售情况。我发现结论令人失望是无法避免的：任何通过不加选择地把出版社所记录的每一项销售都计算在内来进行汇总统计的尝试，都是注定有缺陷的。有

人尝试遵循这种程序，写了一篇名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的作品挂到了网上，结果就犯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错误。尽管该作品含有一些有用的地图和书目资料，但它并没有成功地理清书籍的传播。⁽¹⁷⁾

我没有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所有交易堆砌在一起，而是选择了一种采样策略，并且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了起来。我发现，要估计一位书商的订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他的生意，必须对足量的订单进行汇总，并且阅读随订单一起寄的信件。只有通过对其仔细研究，我们才能重构销售的环境，限定销售范围的条件，以及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的性质。书商们写的信通常是事务性的，语言简明扼要；但在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展成可信赖的关系（基于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就常常会在订单中夹杂一些个人关于交易的评论和想法，如夏尔梅及其遗孀的例子。他们不再仅限于谈生意，于是商务信函就展现出了一幅法国外省生活的鲜活画面，因为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从书商生涯的不同阶段来跟踪他们——何时开店，何时击败竞争对手，何时遭遇经济危机，在一些案例里还包括他们何时被疾病压垮，甚至死亡。他们的街坊邻里和其他商人的来信还会使画面更加完整。因为这些信件充满了家常话——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读起来引人入胜。网站上有数百封这样的信件可供选读。如果把它们和统计资料放在一起研究，就可能会感觉到图书贸易好像已深深嵌入旧制度时期的社会秩序。

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卷宗能提供这样丰富的画面。我挑选了其中18份卷宗，并且在研究助手的帮助下，抄录了这些书商的所有信件，辨别了他们订购的书籍，并把每种书籍订购的册数和订单数量以及发生的日期一起列表呈现。【275】不论是私人住宅里不事张扬的经营（如布卢瓦的莱尔），还是拥有印刷厂的大型企业（如莫西在马赛兵工厂建立的公司），每家书商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18项个案研究都符合同一个一般性的模式。它们如实反映了法国外省广大地区对书籍的需求情况——从东部省份沿罗讷河谷向下，穿过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沿西海岸向上到卢瓦尔，沿卢瓦尔河谷到勃艮第，然后回头通过弗朗什-孔泰到纳沙泰尔。这就是法瓦尔热出差旅行走的路线，他的报告，不论是信函中的，还是日志中的，都可以用书商们自己的信函来补充。因此可以把1778年贸易的横向景观，同根据从1769年延伸到1789年的信件推断出来的纵向透视图进行比较。我研究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法国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各地）所有客户的卷宗，但是我没有把采样扩

大到法瓦尔热的旅行路线以外，而是决定集中于档案中这个文件最密集的部分。

通过把定量分析和对信函的鉴定性阅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书籍的销售以及需求的推论。18家书商的订单与他们实际收到的书籍几乎完美吻合，尽管出版社有时因为存货不足而未能供应某位客户订购的一些书籍。⁽¹⁸⁾然而，在那些情况下，书商们可以从其他瑞士出版商兼批发商那里获得那些漏掉的书籍，这些出版商兼批发商销售的书籍和纳沙泰尔出版社所销售的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通过频繁的交流而获得了那些书。因此，根据18家书商的订单作出的统计数据，可以用来估计书籍传播的程度，并且更准确地反映它们的市场需求。

这个论点就其本身而言也许是有说服力的，但它足以支撑合理的结论吗？我在提出这个论点时，对我刚刚描述的策略的缺陷心知肚明，因而我需要对一些潜在的反对意见做出答复。

在有些案例中，统计基础可能非常脆弱。18家书商样本中，布卢瓦的康斯坦丁·莱尔订购书籍数量最少——总共只有34种。他是小学校长兼葡萄酒商，【276】卖书是他的副业，但信函表明，他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进货都源自纳沙泰尔出版社。尽管他订货数量不多，我还是因此把他选作样本，用来说明一个边缘经销商在图书贸易零售部分的生意状况。大城市里资深的职业书商——例如蒙彼利埃的里戈和马赛莫西——定期向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交经过精心计划的订单，但他们也从像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等其他一些出版商兼批发商进货。为了对其他这些出版社的生意有一定概念，我研究了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他们的卷宗有些相当厚重，⁽¹⁹⁾出版商之间经常的通信交流和书籍交换表明，他们销售同类图书，而且许多都是同名的书。他们夹在信件中的书目也基本相同。像里戈、戈德和莫西就常常从两三家瑞士出版社进货，以便按时得到足够的供货，并通过把订单分散给几家供应商，来最大限度地降低书籍被没收的风险。

然而，如果因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的丰富性——它们确实丰富——就认为它足以展示瑞士所有出版社的贸易，那是不正确的。它们只含有三封来自重要的日内瓦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克拉默的信。克拉默不像纳沙泰尔出版社，他自己刷了大量原版书籍，尤其是伏尔泰的著作。他从未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紧密的联系，因为他厌恶盗印行为，尤其是纳沙泰尔出版社还背着他（并与伏尔泰合谋）重印过他出版的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一书。相似地，纳沙泰尔出版社也不和附

近的伊韦尔东的巴泰勒米·德费利斯进行广泛交易，很可能是因为他靠后者的《百科全书》删订增补版做生意，这个版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四开重印版《百科全书》（印于日内瓦、纳沙泰尔和里昂）上的投机生意有竞争关系。这套关于瑞士出版业的次要文献含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如果要做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些信息还是不够充分。⁽²⁰⁾

因此，其他瑞士出版商的生意可能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有相当大的差别，或者瑞士的图书贸易整体上可能具有与低地国家的图书贸易不同的特征——尽管很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在研究海牙的小皮埃尔·戈斯（Pierre Gosse）、布鲁塞尔的J. L.布贝、列日的克莱芒·普隆托和其他出版商寄到法国北部的信函时，发现它们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别。

【277】⁽²¹⁾当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去低地国家出差，拜访那里的出版商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受冷遇，因为在销售同类书籍的普遍竞争中，他们被视为对手。盗印之风在法国边境附近到处盛行，意味着有几十家出版商兼批发商在竞相满足同一个法国市场的需求。盗版书从荷兰经由鲁昂流进法国的过程，很可能与从瑞士经由里昂流入法国的过程非常相似。

我必须用“很可能”这个词来避免明确的肯定，因为我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要强调指出近代出版业与当今出版业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差别。当今的畅销书是由一家出版商印刷的，同样的书他要卖许多册，通常是通过大量重印，有时也通过出售平装书重印权。而在18世纪，畅销书是由许多出版商印刷的，有很多版次，每版印数都不大（通常大约1000册），而且在相同的时间内和相同的市场上销售。这就是为什么在图书馆里，同一种18世纪的书籍拥有那么多不同的版本。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统计提供了对纳沙泰尔出版社在法国的贸易的准确估量，尽管这些统计只是从它所收到的订单中抽取的样本。它们涵盖了1,145种书籍，即18家法国书商在1769到1789年间订购的书籍。这个样本能否反映法国图书贸易的总体情况，是另一个问题。每年法国新版图书的出版数量难以估计；但是，如果以专卖权和默认许可的申请记录（这方面原始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从来不提印数和销量，甚至不提专卖权申请书是否附有一个实际的图书版本）为依据，可知在1750年到1789年这40年间，书名的总数差不多达到了30,000种。每年问世的新版图书，数量在1767年后变化不大，大约为750种。

⁽²²⁾因此我们可以估计，纳沙泰尔出版社样本中的1,145种书籍，大约相

当于在该出版社存在的20年间于法国问世的合法新版书的8%。然而，原始史料的不一致——一方面是书商的订单，另一方面是出版许可申请书——让任何寻求精确的百分比和比例的计算企图都落了空。【278】我认为依靠图书贸易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做的计算更为可取。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决定要重印哪些书籍时，会对什么书能在整个市场上畅销作出评判；而书商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时，也会告知他们觉得什么书能在他们那里畅销。统计表上这1,145种书籍后面所附的数字不一定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写上的。它们代表着一些专业人员的评判，他们是以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

统计数据显示了1,145种书籍中每一种的需求量，并且粗略地提供了18家书商各自贸易情况的概貌。对它们进行整合，就可以得出一份“畅销书”书单——也就是对于各家书商及其整体在生意中需求量最大的书籍的明确显示。当然，如今的畅销书书单常常是有缺陷的，原因是订单采样方面的困难和缺乏；⁽²³⁾因此人们也不应指望两个半世纪前流传的书单有很高的精确度。我只能说我汇编的书单和表格提供了一个最好用的研究指南，引导他们了解1769到1789年间法国人在购书方面的一般倾向。

在对统计数据做综合评述之前，有必要考虑到三个额外的困难。首先，在这20年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发展不均衡，它得到的订货量忽大忽小。1771年之前，它在法国的生意没有发展；而在货物运到法国各地之后，它又不得不应付法国政府多变的管控措施：1772年对进口图书征收临时税；1777年8月30日法令发起打击盗版运动，以及1783年6月12日韦尔热讷向总包税所下达的命令，要求把进口图书交给巴黎书商行会检查，以期对它们进行控制。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它的偷运者的通信——从1772年的吉永到1778年的雷沃尔，再到1783年的费弗尔——表明它找到了克服前两个障碍的方法。但是，韦尔热讷的命令使它的供应线遭到彻底破坏。此外，根据出版社最值得信赖的客户——“有实力的”经销商如戈德、里戈、莫西、贝尔热雷和夏尔梅的证言，1770年代后期图书贸易开始普遍衰退。有关破产的内容出现在与法瓦尔热法国之行逗留地相关的众多故事中，说明了局【279】势的严峻。到1783年底，纳沙泰尔出版社自身就面临破产。它筹措了应急资金，缩减开支，并一门心思地甩卖存货，而不是以出版新书和图书交换来扩展生意。因此最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出自1771年到1784年这段时间，而涵盖旧制度时期最后五年的统计数据则可靠性略逊。

其次，根据纳沙泰尔出版社所收订单作出的统计中，一些书籍的权重比其他书籍更大。前面提到，书商常常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订购，但也凭借他们自己对于什么书会畅销的直觉，尤其是当他们从商务信函和期刊广告中得知有新书出版时。但是在提交订单时，他们通常选择纳沙泰尔出版社经常向法国各地的书商发送的书目上的书籍。书目上有的书会比上面没有的书容易获得更多的订单，正如出版社自己出版的书的权重会超过交换得到的各类书籍一样。分析统计数据时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而且在解释订单的地理分布时也可能遇到困难。如果马赛的一家书商要的书几乎和贝赞松的一家书商相同，这种类似性是由他们在订货时所查询的资料——不仅有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和销售说明书，还有邮寄的通知信，以及期刊上的广告——的共性造成的吗？抑或是因为在这两个城市，甚至在法国所有地方，比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买书的偏好都一样？我不知道，但我对大部分订单缺乏地方特色感到惊讶。当然特例确实存在，例如尼姆对新教书籍需求量大，医学论著在蒙彼利埃卖得好，关于葡萄栽培的书在波尔多很受欢迎。但是，在上层社会，各处都流行相同的喜好，至少在当代文学领域是这样，尽管地域文化有巨大的多样性。

最后，我得指出，统计数据表现出几点纳沙泰尔出版社独有的特征。尽管它不专营某一特殊类型的书籍，但它大量经销新教书籍，而且会利用胡格诺派的关系网把新教书籍推销到法国，【280】尤其是尼姆和拉罗谢尔这样的城市。它的存货中天主教书籍不多（尽管它曾一度提议为西多城的西多会修士们印刷每日祈祷书）。因此，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新教徒需要大量宗教仪式用书，但并不需要一般性的宗教著作。纳沙泰尔出版社不经营某些类书籍——如畅销故事书、历书、各种应时印刷品、职业手册和各种各样的课本。它销售大量游记和儿童图书，尽管它不专营这类书籍。绝对禁止的书籍，如无神论著作、色情小说和政治毁谤书，构成了它相当大的一部分生意，但它们也没有成为它的贸易特色。为了满足书商的需求，出版社会从一些小出版商——如日内瓦的雅克-邦雅曼·泰隆和加布里埃尔·格拉塞——处换到禁书，这些小出版商都是在图书贸易的最危险的（通常也是最赚钱的）领域做投机生意。纳沙泰尔出版社并不特别看重启蒙哲人的著作，尽管它也出过这些著作的自印版本，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和伏尔泰的《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它经营种类繁多的普通作品——今天那些被称作“书刊销售量排行居中”的著作——并且大量投资畅销书，或者他们认为可能卖得好的任何书籍。

启蒙运动书籍的传播是图书贸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它还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书商在订货时，出版商在选择要印刷和要交换的书籍时，个人的观点、品位或意识形态立场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决定。⁽²⁴⁾本书前面对书商的案例研究证明，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满足顾客的需求。法瓦尔热只遇到过一位书商，阿尔勒的戈迪翁，拒绝销售新教和启蒙运动的著作，因为他反对新教和启蒙运动。虽然书商们常常因为怕冒风险而避免订购“哲学书籍”，但他们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偏爱或讨厌某一类书籍。在这方面，库雷·德维尔纳夫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他自己出版的书证明他热爱启蒙运动的理想，但是他的订单却表明，他并不需要这些启蒙哲人的大部分著作。纳沙泰尔出版社董事们的情况可以更清晰地证明这一点。这些董事的原则、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与同时代的人并无本质的区别。【281】在读了他们的几千封信，研究了他们自己的著作（出版社的两位创始合伙人，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和他的女婿让-埃利·贝特朗，不仅做图书出版，自己还写书）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有教养的绅士，相对保守，是纳沙泰尔和瓦朗然典型的精英群体，这里自1707年起在普鲁士宗主权下实行自治。我能找到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资料都表明，他们的观点一般来说符合启蒙思想，但是他们并不利用自己的生意来促进启蒙运动，或者其他任何事业。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像他们在信中说的，钱是“万事之动力”。⁽²⁵⁾

他们并非总能成功。实际上，他们在1783年濒临破产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他们不善于使供应与需求相衔接。不过，他们的财务困难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尤其是韦尔热讷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因此，纳沙泰尔出版社从其客户那里得到的订单，即使未能得到满足，也是了解大革命前夕对法语书籍实际需求的最佳原始资料。我指出这种原始资料有缺陷，并不是要劝阻对于统计数据的研究，相反，我是要让这些统计数据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分析和批判。毕竟，在这种探索中，不仅对了解大革命前的法国来说，而且对书籍研究和总体的历史研究来说，都存在很多风险。

上述对概念和方法问题的讨论，旨在为统计资料的呈现开辟道路。下面的“畅销书”书单——希望这个措辞不致完全时代错置——展示了需求量最大的书籍。它把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排除在外，因为在统计资料里，它们的占比严重超出自出版社通过图书交换建立起来的总库存中的书籍。（当然，出版社在决定重印一本书时，首先就是以市场需

求为主要考量的，因此，网站上提供了第二份“畅销书”书单可供查询，其中包含出版社出版的书以及它库存中的各类书籍。）这份书单偏重于新教书籍（以方括号标出，以示区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该出版社的一种特色，而不是法国读者的整体需求。除了这一例外，书单列出了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籍。【282】每种图书后面附有一个数字，表示从样本中的所有订单统计得到的总册数；这个数字可以用来说明市场对该书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尽管它当然和实际发生的总册数不符。

[《大卫的诗篇》，2036]

马蒂欧·皮当萨·德麦罗伯的《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1001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24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691

雅克·内克的《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367

让·巴蒂斯特·路易·科克罗的《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财政总监：包含他的生平、他的行政管理、他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倒台》，324

马蒂欧·皮当萨·德麦罗伯和巴泰莱米·弗朗索瓦·约瑟夫·穆夫勒·当热维尔的《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294

纪尧姆·托马·弗朗索瓦·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236

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231

匿名作者的《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213

洛朗·埃蒂安·隆代的《皇家词典，或新法语和拉丁语词典：增补了最优雅地说这两种语言的方法：最优秀的作家的汇集，并以对法国人用拉丁语写作而言很方便和很有条理的顺序编纂》

(Apparat royal, ou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 et latin : Enrichi des façons de parler les plus élégantes en l'une et en l'autre langues : recueilli des meilleurs auteurs, et mis dans un ordre très-facile et très-méthodique pour la composition du françois en latin)，203

[让·弗雷德里克·奥斯特瓦尔德的《修改增补版洛桑慈善小学用简明圣史、教理问答》(*Abrégé de l'histoire sainte, et du*

catéchisme , retouché & augmenté pour l'usage des écoles de charité de Lausanne) , 200]

让-雅克·拉特利奇的《喜剧演员或休息厅，独幕散文喜剧》（*Les Comédiens ou Le Foyer , comédie en un acte et en prose*）, 200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即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壮烈而滑稽的诗，诗歌十八首》，200

匿名作者的《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196

[贝内迪克特·皮克泰的《每周各日及各种主题的祈祷文》（*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 【283】

et sur divers sujets）, 182]

[让-巴蒂斯特·勒努的《新教的古老与永恒》（*L'Antiquité et perpétuité de la religion protestante*）, 168]

巴泰莱米-弗朗索瓦·约瑟夫·穆夫勒·当热维尔的《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或他统治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轶事》，154

尼古拉·埃德默·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的《堕落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149

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的《论人，论他的智能与教育：爱尔维修死后出版的著作集》（*De l'homme ,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 et de son éducation : Ouvrage posthume d'Helvétius*）, 144

[埃利·贝特朗的《基督教会节日用布道文，继而用作关于新教道德的致辞》（*Sermons pour les fêtes de l'Eglise chrétienne ,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Discours sur la morale Evangélique*）, 143]

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孔多塞侯爵的《一位神学家致三个世纪文学词典的作者的信》（*Lettre d'un théologien à l'auteur du dictionnaire des Trois siècles littéraires*）, 143

[让-罗多尔夫·奥斯特瓦尔德的《灵魂的食粮，或用于每周各日、每年主要节日及各种有意义的主题的祈祷文集》（*La Nourriture de l'âme , ou recueil de 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pour les principales fêtes de l'année et sur différents sujets intéressants*）, 137]

让·雅克·卢梭的《让·雅克·卢梭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136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即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30

[达尼埃尔·德叙佩维埃尔的《真正的领受圣餐者，或论圣餐仪式和参加仪式的正确方法》（*Le Vrai Communiant, ou Traité de la Sainte Cène et des moyens d'y bien participer*），130]

保罗·亨利·迪特里希·蒂里，霍尔巴赫男爵的《揭开面纱的基督教，或检验基督教的原则和作用》（*Le Christianisme dévoilé, ou examen des princip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128

劳伦斯·斯特恩的《伤感之旅，斯特恩先生以约里克之名著，译自英文》（*Voyage sentimental, par M. Sterne sous le nom d'Yorick, traduit de l'anglais*），127

让·皮埃尔·贝朗热的《共和政体爱好者，或尼西亚斯和西尼尔信笺》（*Les Amants républicains, ou lettres de Nicias et Cynire*），127

亨利·约瑟夫·迪·洛朗的《马太兄弟，或人类精神的大杂烩》，124

萨米埃尔·奥古斯特·安德烈·达维德·蒂索的《大众健康建议》，119

这份书单，可以用那些在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出版书目订购清单，或该出版社与合作伙伴联合出版的书籍清单上位列前茅的书籍来补充。这些书籍包括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自印版售出161套，普通存货中售出236套，【284】这证明它确实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特别是当我们把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与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合作印刷的，多达十卷的版本，也考虑进来的话。在其他由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书商们最常订购的有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两种最流行的书籍，四卷本的《巴黎图景》（300套，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了其中274套，其他出版商的版本多达十二卷）和《我的睡帽》（233册）；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九卷本著作全集（320套）；保罗·亨利·迪特里希·蒂里，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体系》（306册）；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的《印加人，或秘鲁帝国的毁灭》（288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218套）。

这些书单看起来令人目眩，我们好像被吸入了一个无法操控的数据

旋涡当中。置身于数百份订购这1,145种书籍（涵盖了当时的全部著作）的订单中，如何才能把握住方向？仅仅把纳沙泰尔出版社最常规的客户最常订购的那几十种书籍列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这份畅销书的汇总统计，除了明显偏重新教著作——这些书籍只能迎合法国读者中占少数的胡格诺派教徒，从而被排除在了分析之外——还可能在几个方面给人留下误导性的印象。要更精细地了解市场对书籍的需求，就必须从一份份订单和一家家书商出发，对这1,145种书籍加以整体研究。在对材料进行过多次研读之后，我按照下面的标题（目的是使主要特点突出明确）把内容粗略地组织如下——而这些结论，任何人都能通过查阅 robertdarnton.org 网站上的主书单来批评指正。(26)

毁谤性书籍

畅销书单上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或者至少是一串对当今读者来说最生疏的书名——是抨击路易十五及其情妇和大臣的书籍。前面几章曾经说明这些书籍是在路易十五于1774年5月10日去世后不久出版的，也经常提到书商们都特别想订购它们，据说凡是对凡尔赛宫的隐秘回廊里发生的秘闻轶事十分好奇的读者，都会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285】它们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偷窥欲外，还有政治上的寓意，因为它们揭露了1715年到1774年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存在的权力腐败和滥用现象，并特别关注到1771年至1774年莫普内阁执政期间的政治危机——正是这一危机削弱了高等法院的权力，并使得君主政体在当时许多观察者看来像是暴政。这些被认为具有“毁谤性的”书籍，许多都是从秘密传单、歌谣和写在纸片上的流言中汲取材料写成的，这些东西1774年以前就在私下流传，后来被人回收利用，编成了戏说历史的故事。(27)

我第一次接触这些大多已被尘封的书籍时，曾经推断，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那些年里，它们是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28)但把它们放在所有其他订单的背景下做更仔细的研究后，我感到这个论断必须细化。卢丹的马勒布的订单特征明显，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比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任何客户都更热衷于专营禁书，并且订购过大量禁书——比很少在被禁书籍上冒险的正规书商所订的要多得多。实际上，与其他书商的生意模式相比，马勒布的生意模式看上去就像个另类，以至于我禁不住想把他从样本中排除掉。我之所以选择保留，是因为它代表了由大量零售商传播的书籍的种类，而且，如果我们要把毛细管分销体系和图书传播主渠道一样研究的话，就必须把他们的贸易考虑进来。但

是，马勒布的订单过于偏好禁书，这就使得市场上有关毁谤性书籍的需求状况失真。⁽²⁹⁾书商们总共订购了1001册《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他自己占了278册，此书位于“畅销书”书单榜首（除了各种版本的《诗篇》，那是卖给胡格诺派读者的）。他还订购了324套《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中的268套，以及294套《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中的110套。当然，这些书籍在更正规的书商如蒙彼利埃的里戈、马赛的莫西、波尔多的贝尔热雷和贝赞松的夏尔梅的订单中需求量也不小。但是还应该考虑另一个因素：订单的日期。所有与路易十五相关的毁谤性书籍，都是在1774年11月8日到1777年12月3日之间订购的（夏尔梅在1781年还下了一份大单订购《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是个例外）。大部分订单集中在1775年和1776年。【286】按照夏尔梅的说法，到1780年，市场对这种书籍的需求已大大减少。鉴于这条信息，我将放弃早前的解释，并提出一个更适度的结论：在1770年代中期，毁谤性书籍对法国读者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在1769年到1789年这整个时期，它并不在图书需求中占优势，而且在我的畅销书书单中它也稍显过多。

启蒙文学

启蒙哲人的书籍在畅销书清单上表现突出，而且，如果对全部1145种书籍进行整体研究，它们甚至会显得更重要。法国启蒙运动中有纵横交错的许多思潮，故而很难对众多著作公允评判。但是有两部著作位居书单顶端是当之无愧的。一部是梅西耶的乌托邦小说《2440年》，它使哲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得到普及，它的影响广泛而持久，书商们经常会下单回购它。另一部是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其中含有一些狄德罗撰写的内容，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启蒙运动主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纲要，而且从书商们的订单和它的版本数量来看，读者对它的需求长盛不衰，尤其在它被巴黎高等法院禁止，并于1781年5月29日被行刑人焚毁之后。

伏尔泰凭借其粗俗的反教权作品《奥尔良少女》和著名的《哲学通信》，卢梭凭借其各种版本的著作全集，双双顺理成章地占据畅销书榜的高位。如果进一步研究所有订单的总书单，我们会发现伏尔泰的影响力确实特别强。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容易就卖完了他出版的九卷本《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还收到了二三十份订购他的其他著作的订单，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小说、历史、诗歌、戏剧、随笔、杂集，以

及论战小册子——如此之多的订单汇在一起，足以表明伏尔泰体现的那种温和的启蒙思想迎合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需要。归纳起来，伏尔泰的启蒙思想有一套清晰的主题：一种对宽容、理性主义、反教权、自然神论以及正义和自由原则的不懈追求，这偏离了旧制度的主流价值观，但也并未直接挑战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或国王的权威。

卢梭1778年去世后，【287】纳沙泰尔出版社参与了抢夺他的《忏悔录》和其他未发表著作手稿的竞争，但均告失败。不过它还是设法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弄到了这些书，而且它的客户们都在翘首以盼。它接到过要98套卢梭的《遗作集》（*Oeuvres posthumes*）、129册《忏悔录》和136套各种版本的著作全集的订单。它也接到过只要4册《社会契约论》和6册《爱弥儿》的单行本的订单，尽管这两本书都收在卖得很快的著作集里。此外，订单里的其他著作——如梅西耶的著作和安托万·塞尔旺的《关于J.-J.卢梭的〈忏悔录〉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es Confessions de J.-J. Rousseau*）——也反映出了卢梭的影响力。

启蒙运动中更激进的无神论思潮在订单样本中占据着一个从属的但也很重要的地位。然而，这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由马勒布订购的书籍所造成的失真。他重金投资最偏激的“哲学书籍”。就爱尔维修的唯物论著作《论人》来说，总数144册中只有6册不是他订购的，所以我不认为它是真正的畅销书。畅销书单上另一本著作，霍尔巴赫的《揭开面纱的基督教》，总共128册，马勒布也订了50册。再拿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这唯一一部无神论著作来说，取样的订单中共计订购306册，其中马勒布就占了230册。一些杰出的书商，如里戈、帕维、罗贝尔、戈蒂埃和夏尔梅，都下过很多订单要后两本书，但这也并不足以说明彻底的无神论对法国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激烈反基督教的作品中，最直言不讳的共有16种，而且全是匿名的，出自霍尔巴赫男爵的小圈子。⁽³⁰⁾ 订单的总数看上去很可观，但就像《揭开面纱的基督教》的情况一样，很大一部分是专营这类书籍的马勒布订购的。如果从每种书籍的订数中减掉他订的数量，霍尔巴赫的著作被订购的总册数就降到了179，比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要少得多。⁽³¹⁾ 爱尔维修著作的订购册数中，马勒布的订单占大多数：除了《论人》，还有《论精神》和《论幸福》（*Le Bonheur*）。《论三个骗子》是爱尔维修最有名的反宗教小册子之一，这本书马勒布的订数稍少，50册中他订了16册。总的说来，这种过于激进的反基督教哲学，比起那些渗入了反教权主义的虚构作品和伏尔泰的著作来，【288】渗透力要小得多。

其他哲学家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孔多塞，他们的著作散见于订单中，数量都不多。孔狄亚克的《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值得专门一提，因为它包含的启蒙思想范围非常广泛，多达13卷，许多书商都曾经少量订购过，总共订了28套。被认为是“启蒙运动圣经”的《百科全书》，汇集的材料则要多得多，形成了一个36卷四开版的巨制。它是一部富丽堂皇的畅销书，但在上面那个书单中没有位置，因为对它的订单要交由一个国际出版联盟统一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作为这个联盟的一员，曾征集了大量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但它把这些订户都转到了这项合作出版事业的总部里昂。⁽³²⁾

像《百科全书》、孔狄亚克的《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这种多卷本的书籍，所需的投资比像梅西耶的《2440年》这种较薄的作品要大得多。在比较时，把篇幅和费用的差异考虑进去很重要。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个别哲学家的著作全集的订单，那么对于启蒙运动书籍的需求就会显得相当可观。前面提到，订单中卢梭著作的总订数是236套，其中在1778年卢梭死后出版的《遗作集》的订数是98套。孟德斯鸠著作的总订数为33套；狄德罗著作的总订数为25套；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的著作的总订数为56套。马蒙泰尔属于后一代哲学家，而且是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经营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成名的，而孟德斯鸠在该出版社创立14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当该社进入经营期时，市场对许多重要著作的需求或许已经饱和，于是他们的生意就偏重于当时流行的书籍了。对所有订购著作全集的订单进行分析⁽³³⁾后可发现，一个作家虽去世很久但读者对其著作的需求仍很强盛的例子有莫里哀，74套的总订数表明了他的人气不衰。但在当时流行作家著作全集的订单面前，这个订数就相形见绌了：《多拉先生著作全集》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M. Dorat*)，【289】总订数为331套；《里科博尼夫人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Madame Riccoboni*)，总订数为121套。克洛德·约瑟夫·多拉和被称为里科博尼夫人的玛丽·让娜·拉博拉·梅齐埃尔，以及弗朗索瓦·托马·玛丽·德·巴居拉尔·达诺，是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畅销书作者，尽管如今几乎已被人忘得干干净净。这种考量也适用于下面一类书籍。

一般虚构类作品

畅销书书单中含有几部小说，它们顶着数世纪审美趣味的变化幸存了下来，仍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尼古拉·埃德默·雷蒂

夫·德拉布雷托讷的色情小说《堕落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和劳伦斯·斯特恩的《伤感之旅》。斯特恩的作品有各种译本，在法国市场上表现不俗。如果把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的版本考虑在内，畅销书中还有两种著名小说，即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的《印加人，或秘鲁帝国的毁灭》和皮埃尔·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这些作家——拉克洛除外——还写下其他一些销量不错的小说，如马蒙泰尔的《贝利萨留》、雷蒂夫的《新阿贝拉尔》（*Le Nouvel Abélard*）和斯特恩的《绅士特里斯特拉姆·尚迪的生平与见解》（*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Tristram Shandy*）以及他的《约里克致伊莱扎的信》（*Lettres de Yorick à Eliza*），它们在所有订单的总书单上都有很大的数量。不过，跟言情小说比起来，它们的订数还是很小的，而言情小说的流行程度可以根据订购总量做出大致的评判：

巴居拉尔·达诺的《情感的考验》：150册

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145册

多拉的《反复无常的不幸》：115册

让利斯夫人的《阿代勒和泰奥多尔》（*Adèle et Théodore*）：
95册

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的《私生女》（*La Fille naturelle*）：88册

多拉的《爱情的牺牲》：82册

贝卡里夫人（笔名）的《范妮·斯平勒回忆录》（*Mémoires de Fanny Spingler*）：57册

这些统计数据只能粗略地反映需求量，因为从18家书商的订单上得来的数字只构成全部发行量的一个小样本。不过综合起来看，它们显示了读书界偏好的是，【290】言情和道德说教的故事、富有特色的浪漫阴谋、备受情感煎熬的女主人公和深深浅浅的感伤情调。最受热捧的是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其次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的“故事”（*contes*）——伏尔泰的作品主要在图书市场的非小说类走红。这些小说中有几种是以英国为背景的，或是采用了带英国口音的温情腔调。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没有订购大量翻译的理查森小说，⁽³⁴⁾不过他们常常要求订购戈德史密斯的《弗朗索瓦·维尔斯传》（*Histoire de François Wills*）。他们尤其喜欢里科博尼夫人表现英国女主人公个性的书信体小说《范妮·巴特勒小姐书简》（*Lettres de mistriss Fanni Butler*）、《朱丽

叶凯茨比夫人书简》(*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和《珍妮小姐传》(*Histoire de Miss Jenny*) , 这些作品都包含在她不同版本的选集里。书商们经常订购的中篇小说和故事集也是以言情和道德说教为特征的, 如马蒙泰尔的《道德故事集》和萨洛蒙·热斯内与狄德罗的《道德故事和新田园诗集》(*Contes moraux et nouvelles idylles*) , 而狄德罗就是理查森的热烈崇拜者。

在其他体裁的虚构类作品中, 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了大量的剧作, 它们几乎全是当代剧作家——莫里哀和作品销量不多的拉辛除外——的作品。需求量最大的是该社出版的卡罗琳·斯蒂芬妮·费利西泰·迪克雷斯特·德圣奥班(即让利斯伯爵夫人)的作品, 例如她的《社交剧》(*Théâtre de société*) 和《适用于青年人的戏剧》(*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 。相比较而言, 对《伏尔泰戏剧全集》(*Théâtre complet de Voltaire*) 的需求就不值一提了, 尽管读者可以从他版本众多的著作全集中接触到他的戏剧。博马舍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Le Barbier de Séville*) 在订单中拥有突出的位置(没有《费加罗的婚礼》[*Le Mariage de Figaro*] , 因为它发表于1785年, 而在此之前纳沙泰尔出版社的生意就已经开始缩减了), 梅西耶的两部剧作《路易十一之死》(*La Mort de Louis XI*) 和《醋贩子的独轮车》(*La Brouette du vinaigrier*) 也是如此。不过, 梅西耶其他由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制的多部剧作并没有吸引到大量订单, 尤其是远远比不上他的小说《热泽内穆尔》(他用该书的副标题将其定性为“戏剧小说”)。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销售诗作, 不过它收到了求购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和它出版的雅克·德利尔的《花园》的大量订单。另外, 它提供的文学作品还包括17世纪的古典文学和著作。需求量最大的是拉封丹的《寓言集》和《故事集》、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Sentences et maximes de morale*) 、贝尔的《历史与批判词典》, 以及伊拉斯谟的《愚人颂》(*L'Eloge de la folie*) 。由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专心经营当代著作, 【291】它接到的蒙田《随笔集》(*Essais*) 和帕斯卡《致外省人信札》(*Les Provinciales*) , 或法文版的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订单都很少, 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 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如今被称作色情文学的书籍。18世纪没有“色情文学”这个词, 尽管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有一本书的标题是《色情作品, 或一个正人君子关于一项为妓女订立法规的计划的看法》(*Le Pornographe, ou idées d'un honnête homme sur un projet de règlement pour les prostituées*) 。⁽³⁵⁾18世纪的叙事作品常常用哲学的、政治的,

尤其是反教权的主题来点缀色情的主旨，采用的手法如今似乎很罕见。色情描写贯穿于许多启蒙运动的伟大著作，如《波斯人信笺》《老实人》和《达朗贝尔的梦》（*Le Rêve de d'Alembert*）。淫秽诗歌出现在通俗作品集中，如《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和《淫荡诗集》（*La Lyre gaillarde*）。毁谤性书籍在企图展示大人物私生活的隐秘图景时，常有床第之事的描写。与这种捎带采用色情材料的情况相反，一部分“哲学书籍”却以公然诉诸色情描写而闻名。订购最多的图书包括：⁽³⁶⁾通常被认为是尼科洛·弗朗科（Niccolò Franco）写作的《游荡的妓女，或玛德莱娜与朱莉的对话》，米歇尔·米洛（Michel Milot）的《少女学校》；让·巴兰（Jean Barrin）的《修道院里的维纳斯》；约翰·克莱兰的《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的译本《欢场女子》，以及安娜·加布里埃尔·梅尼尔·德凯尔隆（Anne-Gabriel Meusnier de Querlon）的《加尔默罗修会负责收发的修女的风流韵事》。数量都太少，不能精确表明需求，它们也不能充分代表较老的畅销书的持久吸引力，如通常被认为是让·夏尔·热尔韦斯·德拉图什（Jean-Charles Gervaise de Latouche）写作的《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爾的故事》和尼古拉·肖里耶（Nicolas Chorier）的《女子学校》。色情文学，或大致类似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对说来并不重要，尤其是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生意中占大头的各类非虚构类作品相比，它们就更显得无足轻重了。

旅行文学

记述远途旅行的文学作品，对于18世纪的读者吸引力特别大，但从那以后起影响力就渐渐消退了。在那个全球性联系刚开始左右欧洲政治和经济事务进程的时代，游记文学所展示的异域风情令公众心驰神往。

【292】一些过去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民族和地域的发现，使詹姆斯·库克、路易·安托万·布干维尔伯爵和拉佩鲁兹伯爵让-弗朗索瓦·加罗（Jean-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 Peyrouse）等人的探险，至少像今天的航天报告一样扣人心弦——很可能还会大大超过航天报告，因为那些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每一次都是有人类积极参与的冒险活动。所有探险家都面临过超乎寻常的危险。其中最严重的危险是库克在他的旅行记述中所描绘的食人族和野蛮人，他自己就是在野蛮人手中壮烈牺牲的。拉佩鲁兹伯爵是在进行环球航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广袤海域的某处神秘失踪的，这趟旅行充斥着精彩纷呈的故事。在一次更早的环球旅行中，布干维尔偶遇了奇特的塔希提文明，他们随意不拘的性习俗

引起了公众极大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当它被狄德罗添油加醋地写进小说《布干维尔旅行游记补编》（*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之后。游记中还有许多与科学有关的重要内容：有涉及植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和航海技术的资料，还有许多涉及诸如地球经度测定之类的技术细节。在欧洲旅行的游记，有几种是英国人长途旅行的产物，常常以讨论艺术和建筑为特色。到中东和远东的旅行游记，更多的是详述当地人的奇风异俗，滋润着一种将要被确立为人类学的学问。这种在其中什么都能找到一些的书藉，为纳沙泰尔出版社赢来了大量订单。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大量提供的游记类书籍中，布干维尔的《世界环游记》（*Voyage autour du monde*）吸引的订单最多。库克的游记各种版本都卖得好，尽管出版社未能利用读者对它的第一波热情赚到钱。最常被订购的游记是该社出版的《西西里与马耳他游记》（*Voyage en Sicile et à Malte*），是帕特里克·布赖登的重要作品。其他最受欢迎的英国游记的译本有约翰·穆尔（John Moore）的《一个英国旅行家关于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信》（*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 sur la France, la Suisse, l'Allemagne et l'Italie*）和马丁·夏洛克的《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信笺》（*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订购最多的游记中，接下来依次是约翰·尼古拉斯·尼坎普的《东印度群岛游记》，雅克·亨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法兰西岛、波旁岛、好望角等地游记》，安德烈·塞扎尔·博尔迪耶（André-César Bordier）的《萨瓦冰川风光游记》（*Voyage pittoresque aux glaciers de Savoye*）以及G.-J.-H.-J.-B.勒让蒂·加莱西埃尔（Legentil de la Galaisière）的《印度洋航行记》（*Voyage dans les mers de l'Inde*），其中记述了他观察金星凌日的失败尝试，观察的目的是要测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293】在其他专门进行科学考察的游记中，需要提及的是俄国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格雷古瓦·德拉祖莫夫斯基（Grégoire de Razoumowsky）的《矿物学和物理学之行，从布鲁塞尔到洛桑》（*Voyage minéralogique et physique, de Bruxelles à Lausanne*）；而更有审美趣味的著作，则有大雕刻家夏尔·尼古拉·科尚（Charles-Nicolas Cochin）的《意大利之行，或关于在意大利主要城市所见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笔记汇编》（*Voyage d'Italie, ou recueil de notes sur les ouvrages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qu'on voit dan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Italie*）。

历史和地理类

游记类图书渐渐演变成历史和地理类图书，如皮埃尔·西蒙·帕拉（Pierre-Simon Pallas）的《各类学者旅行家在俄国和波斯一些地区的探索史》（*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faites par divers savants voyageurs dans plusieurs contrées de la Russie et de la Perse*），需求量不小。正规的地理学论著，如安东·弗里德里希·比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的《欧洲国家地理学和政治学知识入门》（*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ts de l'Europe*）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获得了不少订单，而与其相类似的，着力于广泛的主题是畅销历史书籍的特征。如最畅销的书籍之一，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就是因为在对许许多多的主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时融入了历史，才得以与承载启蒙思想的《百科全书》相媲美。

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过几种更具有严格历史学意义的著作，尤其是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著作。米约是一位多产的普及读物作家，在教士团体中一步步上升，直至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尽管他崇拜孟德斯鸠，但他并没有往他的普及作品中注入很多启蒙哲学。他的著作中得到订单最多的是九卷本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该书1775年由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然后又在1778年由该社和洛桑出版社合作重印。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米约的其他著作，如《英国史纲要》和《从克洛维到路易十五的法国史纲要》，获得的订单很少。另外有两部通史类著作需求量也很大，它们来自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总库存，是保罗·弗朗索瓦·韦利的《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以及《罗林先生的简明古代史》——查尔斯·罗林（Charles Rollin）《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的缩编版，后者出版社曾作为单独出版物发售过，但是数量不多。这些著作和米约的著作同属一类，代表着相当正统的历史观。但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另一种著作，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却属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294】这本书吃准了法国人对新生美洲共和国的痴迷心态，非常畅销。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英国史》（*Histoire d'Angleterre*）没有获得多少订单，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也是如此——《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不行，《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不行，《查理十二世传》（*Histoire de Charles XII*）也不行。只有他论战性的《巴黎高等法院史》（*Histoire du parlement de Paris*）抓到了数量可观的订单。纳沙泰尔出版社还收买了大量订单求购那些书写个别城市如波尔多和拉罗谢尔的历史的著作，以及写几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例如波兰的历史，因为它当时是时事新闻中的热点。历史书籍无疑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有很强的吸引力，

尤其是当它们被认为与游记和地理书籍中的相关议题有关时。那些议题，连同普通虚构类作品和启蒙运动论著一起，构成了最畅销作品的核心部分。但是，纳沙泰尔出版社还销售过种类繁多的其他书籍，如果我们要充分了解图书市场，也不该忽略它们。

科学和医学类

在18世纪，除了像物理学这样的例外，自然科学在学术世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像植物学和动物学这样的领域，都属于模糊不清的博物学的范畴。化学作为一个严密的学科正逐步浮现，但地质学依旧处在形成阶段，有关农艺学和酿酒学的大量文献则常常是以自助手册的形式出现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尤其是卷帙浩繁的医学文献，还在采用诸如“体液”（humors）和“元素”（elements）这些源自中世纪和古典时代的概念。考量这些属于科学史但缺乏今日科学写作所普遍强调的逻辑性和实验严谨性的作品，比研究任何其他类作品都更容易犯时代错误。

有些科学著作表达了启蒙思想的核心信念——绝对的理性力量可以消除偏见。瑞士牧师兼博物学家若纳斯·德热利厄（Jonas de Gélieu）的《一位有见识的人关于彗星及其回归的思考，或预防恐慌》（*Réflexions d'un homme de bon sens sur les comètes et sur leur retour, ou préservatif contre la peur*）即是如此，它是由皮埃尔·贝尔1682年的著作《关于彗星的产生原因的各种思考》（*Pensées diverses sur l'occasion de la comète*）衍生出来的。拉扎罗·斯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的著作传达了对实验方法论的尊重，【295】尽管这些著作与皮埃尔-约瑟夫·马凯（Pierre-Joseph Macquer）的《化学词典》（*Dictionnaire de chimie*）相比，吸引的订单不多。马凯是以提倡化学亲和力概念而出名的，有别于与安托万·拉瓦锡的更为严谨的化学理论。获得订单最多的科学著作是雅克-克里斯托夫·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博物志通用推理词典》，博马尔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与百科全书派关系密切。^{〔37〕}

在有关应用科学的书籍中，最畅销的是关于葡萄栽培的书，尤其是“农艺学家”莫潘（名字未知）的书。莫潘写了几十本小册子，^{〔38〕}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弗朗西斯·霍姆（Francis Home）较为严肃的论著《农业与植物起源》（*Les Principes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végétation*）相比，它们更受欢迎。医学书籍比其他任何科学分支的著作都卖得好，而在医学书籍中，获得订单最多的是萨米埃尔·奥古斯特·蒂

索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大众健康建议》。放血和灌肠依然是正规的治疗方法，就像法瓦尔热医治他的疥疮那样。但是这些在巴黎大学医学院里被奉若圭臬的传统医疗方法颇受非议，尤其是来自蒙彼利埃医学院的生机论学派的非议。纳沙泰尔出版社试图充分利用这些论争，出版了让-埃马纽埃尔·吉利贝尔的《医学无政府状态，或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医学》，然而并没有吸引到特别多的订单。其他需求较多的医学书籍中，妇科和性病的书籍颇受关注，⁽³⁹⁾兽医类书籍的订数不多。⁽⁴⁰⁾

词典、参考书和自助手册

大众科学类书籍和杂类参考书及相关书籍是重叠的。书商们订购过几种数学启蒙书籍，⁽⁴¹⁾而且他们喜欢诸如骑马、德语和书信之类多种科目的指导手册。⁽⁴²⁾关于读写的自助手册为学习拼写和语法提供实际指导，而较高级的手册还补充了关于礼仪和在高级社交场合如何注意行为举止的建议。⁽⁴³⁾订购的词典包括《法兰西学院词典》，这是纳沙泰尔出版社通过交换从法瓦尔热在阿维尼翁和尼姆遇到的出版商那里大量获得的。【296】它还源源不断地获得订购拉丁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词典的订单。当然，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最重要的首选参考书。而且，伏尔泰的许多论著由于是按字母顺序来编排内容的，也产生了可供读者当作资料汇编查阅的效果。资讯、使用说明和自我提升的书籍，都属于综合类书籍，市场需求量甚大。

儿童读物

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儿童书籍品种似乎多得惊人，它的客户订购也非常积极。这些书籍都效仿《爱弥儿》，用的是道德家的语气。但《爱弥儿》作为单行本卖得并不是太好，或许是因为它的市场已经饱和。最畅销的是一本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寓道德教育于简单的故事之中。专门写这类体裁的作家中，最突出的是两位女性，即斯蒂芬妮-费利西泰-迪克雷斯特-德圣奥班（让利斯伯爵夫人），和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她们使无处不在的多愁善感之风带上了贵族的情调。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过让利斯夫人的两种最畅销的书：四卷本的《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和《社交剧》。它出过一版勒普兰斯-德博蒙夫人的《儿童杂志》（*Magasin des enfants*），并收到了订购她的其他四种著作的大量订单。

(44)其他知名度较差的作家，如亚伯拉罕·特朗布莱（Abraham Tremblay），他们写的类似书籍也颇受欢迎。(45)如果把纳沙泰尔出版社存货不多的学校课本也算在内，(46)可以显示市场对儿童书籍的需求已经蔚然成风，这也许和人们总体上重视儿童教育的态度相符。(47)

法律和政治学理论类

虽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不经营一般被视为专业教科书的书籍，但它获得过许多订购政治和法律书籍的订单。它出版过三版埃梅·德瓦特尔的《国际法，或自然法原则》，这是一部正规的论述自然法和国际【297】关系的著作，需求量不小。其他两部关于自然法的著名论著也招来了订单，但是数量不多：一部是让·雅克·比尔拉马基的《自然法原理》（*Éléments du droit naturel*）——这是一部解释治国之道所依据的标准原则的著作，观点明确，而且被广泛利用；另一部是17世纪德国哲学家萨穆埃尔·冯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与国际法》（*Le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普芬道夫是早先由雨果·格劳秀斯阐发的自然法理论的主要解释者。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读这些著作了，但它们在18世纪对政治思想家，尤其是让·雅克·卢梭和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影响很大。尽管法瓦尔热在他所到之处几乎都能碰到对美国革命感兴趣的人，但是却没有发现市场对有关这场革命的书籍有多大需求，出版社只得到24份求购《在北美合众国统治下结盟的英国殖民地基本法汇编》（*Recueil des lois constitutives des colonies anglaises, confédérées sous la domination d'Etats-Unis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的订单。(48)但是书商们下了许多订单要亚当·斯密的《总体地有关殖民地和具体地有关英国人的片段》（*Fragments sur les colonies en général et sur celles des Anglais en particulier* [译者按：即《国富论》第四篇第七章]）。

在有关政治学的论著中，纳沙泰尔出版社接到的求购激进作品的订单数量大得惊人。这些作品包括霍尔巴赫的《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和《社会的体系，或道德学与政治学的自然原则》（*Système social,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49)从订单可以看出，对于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里的《论立法或法律原则》的需求很大。马布里是卢梭的朋友，他对私有财产的理论上的敌意，为他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中赢得了一个位置。市场对《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也有少量需求，它描述了一种原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一般认为是埃蒂安·加布里埃尔·摩莱里（Etienne-Gabriel Morelly）所著。米拉

波谴责专制政府的著作《论专制主义》吸引了不少订单，此书像塞萨尔·贝卡里亚（César Beccaria）关于犯罪学的论著《论轻罪与惩罚》（*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一样，是启蒙哲人们最喜欢的著作。刑法著作对开明的哲学探讨有帮助，故而也得到相当可观的订单，其中尤其受欢迎的，是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杰出的总检察官约瑟夫-米歇尔-安托万·塞尔旺那些主张改革的小册子。(50)

政治和时事类

直接与政治事务有关的书籍，纳沙泰尔出版社经营得不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涉及由雅克·内克发起的或关于他的论战的作品。内克于1778至1781年出任法国政府的财政总监。【298】如第十二章所述，纳沙泰尔出版社曾仓促应对，极力满足读者对由内克施政方针引发的论战的阅读需求，尽管它一种相关的小册子都没有印过。论战是内克用他自己的小册子——尤其是《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和《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挑起来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了求购这两个作品的大量订单，此外还有求购流行文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的少量订单。它还抓住了市场对另一场有政治含义的论战的阅读需求。这场论战源自博马舍与莫普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路易-瓦朗坦·哥士曼之间的官司，博马舍写下一系列备忘录来为自己辩护，都是些杰出的论战小册子，它借由对哥士曼的嘲讽，引导舆论转而反对莫普内阁，反对它通过摧毁老巴黎高等法院来削弱王权的企图。纳沙泰尔出版社库存中有关时事的著作，卖得很好。(51)另一位论战大师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的著作也是如此，尤其是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52)

其他具有政治含义的作品中，唯一以书的形式印刷的是时事新闻汇编，它涵盖了与时事有关的各类内容。有的含有很多关于国王侍臣和大臣的毁谤性材料，可以被算作最危险的“哲学书籍”中的毁谤性书籍，也即卡尔德塞格和马勒布之类边缘经销商最常订购的书籍。从市场对这类书籍的需求看，《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以及《身披甲胄的报人，或法国宫廷的丑闻轶事》表现突出。它们也聚焦于莫普内阁的权力滥用，而其他一些纪事性书籍则对性丑闻之类其他轶闻津津乐道。《丑闻录》（*Le Chronique scandaleuse*）是这类书籍的典型，不过订单不多。一些不入流的杂文集也比较好卖，其中充斥着小道传闻、丑化教权的奇闻轶事、女演员伤风败俗的行为，暴露了公

众人物的私生活，偶尔也抨击政府滥用职权。其中有亨利·约瑟夫·迪洛朗的《现代的阿雷蒂诺》和《阿拉斯的蜡烛》，所谓的间谍和外国观察家的报告如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的《中国间谍》，以及克洛德·戈达尔·道库尔（Claude Godard d'Aucourt）的《土耳其人回忆录及其在法国逗留时的风流韵事》。【299】《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是最长的汇编，也是最吸引历史学家注意的书，但是并没有从书商那里获得大量的订单。(53)

共济会和巫术相关书籍

最后一类，是一些已被现代读者抛得远远的书：披露共济会活动的书，和有关巫术施行法的书。共济会虽然起源于17世纪，但它在18世纪四处扩张，为一群渴望了解他们的秘密仪式和组织机构的大众读者所痴迷。有关共济会的书没有遭到图书贸易监管当局的严厉禁止，但它们的传播是不合法的，而也正因为它们是禁忌而具有一些吸引力。其中最经常得到订购的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克彭（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揭开共济会高层的最神秘的面纱》（*Les plus secrets mystères des hauts grades de la maçonnerie dévoilés*）、约瑟夫·热罗姆·德拉朗德的《共济会简史》和纪尧姆·德圣维克多的《接纳，或妇女共济会》。(54)

巫术的真相揭露和秘诀能引起广泛的好奇，所以相关的图书也有类似的吸引力。其中几种出自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艾尔伯特·麦格努斯（即大阿尔伯特）的所谓炼金术的著作，它们在新时代下被重新包装，并在像《大阿尔伯特》（*Le Grand Albert*）、《小阿尔伯特》（*Le Petit Albert*）这样的标题下被通俗化了。还有几种源自16世纪的博学家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纳沙泰尔出版社获得的订单中最常见的是蓬斯·奥古斯坦·阿莱茨的《现代阿尔伯特，或已经得到证实的合法秘诀汇编》和阿尔贝蒂·帕尔维（Alerti Parvi）的《小阿尔伯特合理而神秘的巫术神奇秘诀》（*Secrets merveilleux de la magie naturelle et cabalistique du Petit Albert*），以及匿名作者的《炼金术揭秘》（*Le Grand Œuvre dévoilé*）。

这就是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年图书市场需求的概况。拿起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布干维尔的游记、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或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博物志词典，您就会被带进另一个世界：存在于两百多年前的书籍世界。

- (1) 州档案馆：纳沙泰尔身份登记处，婚姻，EC158。州档案馆，公证登记册，F9和F10（让·雅克·法瓦尔热的登记表），1779年8月26日，1780年1月28日，1782年11月20日，1783年12月10日，1795年6月24日和1796年11月30日的交易记录。亦见B654登记册（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的登记表），1776年7月13日，1777年5月13日和1777年10月21日的交易记录。在纳沙泰尔地区，法瓦尔热是一个常见的姓，识别有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和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的文献并不容易。也许会发现一些额外的资料，但是我查阅了1769到1789年间最重要的公证人的登记表——西蒙·皮埃尔·安德烈·让·亨利·贝图、弗朗索瓦·博诺特、让·弗雷德里克·博塞、亚伯兰·布尔热瓦、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亨利·布雷盖、雅克·克洛蒂、达维德·科兰、萨米埃尔·蒙韦、皮埃尔·达维德·库尔瓦西耶、路易·弗雷德里克·迪普朗、让·雅克·法瓦尔热、纪尧姆·皮埃尔·伊韦诺瓦和纪尧姆·让南。1780年3月15日，当时正在去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警告说，法瓦尔热不应该让他自己生意上的利益干扰他为出版社所做的工作。
- (2) 关于对书籍的调查以及对19世纪以前法国的书籍生产估量的讨论，见我最初发表的论文，“18世纪法国的阅读、写作和出版：书籍社会学的一项案例研究”（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代达罗斯》（*Daedalus*）1971年冬季刊，第214—256页；此文在我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中重印，第167—208页。更多的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nton.org上的“书籍需求：货源和方法”（“Literary Demand: Source and Methods”）部分查阅。关于英国书商公会的登记不全，见D. F.麦肯齐（D. F. McKenzie），《创造意义：“思想的印刷机”和其他论文》（*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艾默斯特：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2002，第4章和第5章。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市书目的非代表性的方面，见赖因哈德·维特曼，“作为文学生活之镜的早期的书商杂志”（*Die frühen Buchhändlerzeitschriften als Spiegel des literarischen Lebens*），《书籍业历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13（1973），第614—932页；和赖因哈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慕尼黑：C. H. Beck，1991，第111页。
- (3) 我在《书籍审查官：国家如何塑造文学》（*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纽约：Norton，2014）中详述了这个论点。亦见雷蒙德·伯恩，《18世纪法国的王国书籍审查制度》（*Royal Censorship of Book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1777年8月30日法令，除了其他目的外，还试图改革早期的有利于法国书商行会的法律，而这些法令确实刺激了专卖权被废止的书籍的重印；但是，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能够证实它们在1777到1789年间使外省的出版业复苏。
- (4) 作为法国图书管理者关心经济的事例，见克雷蒂安·纪尧姆·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出版业备忘录》（*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罗杰·夏蒂埃编，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1994（原本本撰写于1759年），第85—86页。
- (5) 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包含大量其他瑞士出版商的书目，更多的书目可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查阅。尽管我经常查阅这些书

目，但我没有考虑对它们进行统计。一次系统性的研究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 (6) 见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第3章和第4章；和约翰·阿道夫·戈尔德弗里德里希，《从异族统治之初到新德意志帝国的书商协会改革的德国书籍销售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vom beginn der fremdherrschaft bis zur reform des Börsenvereins im neuen Deutschen Reiche*），莱比锡，1886-1909，第3卷。
- (7) 我在“盗版的技巧：18世纪出版业的一个关键要素”（*The Science of Piracy: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ublishing*）中更充分地阐述过这个论点，见《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12（2003），第3—29页。
- (8) 详细的统计数据可以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为了防止误导性的比较，在统计表中，纳沙泰尔出版社书籍的书名用彩色字体区分开，而需求最大的书籍的清单以两种形式列出：一份清单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和存货中的所有书籍，一份清单只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 (9)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卢加诺的阿斯托里”，1775年4月15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 (10) “夏尔梅夫人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16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 (11) 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这种书商中的一位代表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详细研究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见《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 (12) 这些批评尤其适合于西蒙·伯罗斯编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2012，在线发表于<http://fbtee.uws.edu.au>。
- (13) 见贾尔斯·巴伯（Giles Barber），“日内瓦的克拉默出版社及其在1755到1766年间在欧洲的贸易”（*The Cramers of Geneva and Their Trade in Europe Between 1755 and 1766*），《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30（1964），第377—413页；和乔治·博南（Georges Bonnant），“18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日内瓦出版业”（*La Librairie genevoise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au XVIIIe siècle*），《日内瓦》（*Genava*），9（1961），第104—124页。
- (14) 见戈尔德弗里德里希，《德国书籍销售史》，第3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
- (15) 见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eedman），《启蒙时期欧洲的无边界书籍：法国的世界主义和德国的图书市场》（*Books Without Borders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French Cosmopolitanism and German Literary Markets*），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第1章。
- (16) 见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 (17) 对该篇论文的详细批评，见我的短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

(1769—1794)”，《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2012年12月，<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 (18) 在被称作“代理账簿”的账簿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把订单记在登记簿的左边（反面）页，把货物记在右边（正面）页。相对的两页之间的差异表明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未能交齐订货。不过，在十八位书商的记录中，订单和销售量通常还是十分相符的。夏尔梅的记录有点特殊，数字存在出入，因为他有时出差到纳沙泰尔亲自下订单。所以他的信函以及根据他的信件汇总的统计数据中，就反映不出这些订单。
- (19) 有关其他瑞士出版商的卷宗含有来自伯尔尼出版社的631封信；来自洛桑出版社的223封信，另有其狡诈的经理让·皮埃尔·厄巴克独自写的151封信，以及他的同事让·皮埃尔·贝朗热的83封信；来自洛桑的弗朗索瓦·格拉塞的421封信；来自日内瓦的巴泰莱米·希罗尔的207封信；来自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的130封信；和来自巴塞尔的C. A. 塞里尼的75封信。
- (20) 这里不列出这个大主题的参考书目，但是读者可以去查阅两部集体著作中的大量参考资料：一部是让·达尼埃尔·康多 (Jean-Daniel Candaux) 和贝尔纳·莱斯卡泽 (Bernard Lescaze) 编的《日内瓦印刷业五百年》(Cinq siècles d'imprimerie genevoise)，日内瓦：历史与考古学会，1981；另一部是雅克·里什内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的《纳沙泰尔图书业的诸方面》(Aspects du livre neuchâtelois)，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1986。
- (21) 戈斯的卷宗有59封信，布贝的卷宗有35封信，普隆托的卷宗有15封信。
- (22) 见弗朗索瓦·菲雷，《18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出版业”》(“La librairi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18e siècle”)，载《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第1卷，巴黎：La Hay, Mouton & Co., 1965，第213—291页。1790年以前的四十年间有三千种新书问世，这个估计或许过高，因为许多对专卖权、官印许可和默认许可的申请，并不导致实际的出版物产生。另外，许多申请涉及的是专卖权已经过期的书籍的重印。至于临时的授权，如“简单允许”(simples tolérances)和“警察许可”(permissions de police)，则没有记录可查，但它们主要涉及应时印刷品。当然，所有官方记录都把非法书籍排除在外。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了大量不会得到国家许可的书籍，但是它盗印了更多的合法和准合法的书籍。它还销售在它创建之前就已经出版的书籍，不过，它的生意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新近出版的书籍上。
- (23) 《纽约时报》列出的畅销书单基于所选书商的重复订购，而不是基于实际销量，而尼尔森Bookscan的统计则依赖于所选零售商的条码销售数据。
- (24) 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是18世纪的书籍出版和贸易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见伊丽莎白·艾森斯坦 (Elizabeth Eisenstein)，《国外的文丐：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世界性出版业全貌》(Grub Street Abroad: Aspects of the French Cosmopolitan Press from the Age of Louis XIV to French Revolution)，牛津：Clarendon，1992。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我承认存在几位出版商专营启蒙运动的著作。见雷蒙德·伯恩，《皮埃尔·卢梭和布永的启蒙运动哲学家》(Pier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of Bouillon)，日内瓦：伏尔泰研究

所和博物馆，1964。

- (25) “博塞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4月1日，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博塞·德吕兹的卷宗。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股东们的传略，见《纳沙泰尔人传》（*Biographies neuchâtelaises*），米歇尔·施吕普编，第1卷（1996），第197—201页；和《启蒙运动时代纳沙泰尔的出版业：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罗伯特·达恩顿、雅克·里什内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纳沙泰尔：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2002，第67—70页。
- (26) 尽管我对下面所讨论的全部书籍在订单中的册数进行了统计，但是我决定在讨论它们时不把这些数字包括进去。那样做会给人一种表面上精确的印象，特别是当数字比较小时。因此，我把评论限制在对需求范围作出大体的说明。任何读者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到精确的数字。
- (27) 我在文章“博客，此时与彼时（250年前）”（*Blogging, Now and Then* [250 years ago] ）中说明了根据资料片段来拼凑书籍的过程，见《欧洲浪漫主义评论》（*European Romantic Review*），24（2013），第255—270页。
- (28) 我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纽约：Norton，1995）中最透彻地阐述了这个论点，该书仅限于讨论绝对非法的书籍，并未尝试描述图书贸易总体的特性。
- (29) 如第十章所说明的，纳沙泰尔出版社在进行“哲学书籍”清仓时，马勒布和它商定，以很低的折扣大量订购这类书籍。由于那份订单并不代表马勒布正常生意过程中的客户需求，因此没有纳入统计。
- (30) 由于霍尔巴赫及其朋友们的著作都是秘密发表的，因此很难对与这个团体有关的著作和作者进行辨别，团体成员并不都支持霍尔巴赫本人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见艾伦·科斯（Alan Kors），《霍尔巴赫小团体：巴黎的启蒙运动》（*D'Holbach's Coterie: An Enlightenment in Pari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
- (31) 在把马勒布的订购数量扣除，并把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自然的体系》排除之后，对霍尔巴赫派著作的需求可以排名如下：《揭开面纱的基督教》（订购总数为77册），《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44册），《神圣的传染》（*Contagion sacrée*，32册），《论宗教的残暴》（*De la Cruauté religieuse*，31册），以及《健全的思想》（23册）。其他霍尔巴赫派著作的订购都少于20册。
- (32) 纳沙泰尔出版社征集的订户列在总清单上，但他们是属于整个四开版项目的生意，如我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中所叙述过的。
- (33) 遗憾的是，订单并不始终如一地包含关于个别书籍的版本信息，如它所包含的卷数，而卷数常常因版本而异。某些情况下，这种信息可能由正规的传记提供，但是版本的识别牵涉太多的臆测，因此不能包括在根据订单汇总的统计数据中。
- (34) 唯一例外的是《新英格兰书简，或骑士格兰迪森传》（*Nouvelles lettres anglaises, ou histoire du chevalier Grandisson*），订购数量相当大。
- (35) 林恩·亨特（Lynn Hunt）编，《色情的发明：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1500—

1800)》(*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 纽约: Zone, 1993。我在早期著作《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纽约: Norton, 1996) 和它的姊妹篇《法国的地下书籍大全 (1769—1789) 》(*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 , 纽约: Norton, 1995) 中, 试图找出在法国官员看来, 和在书商的习惯做法上都算是绝对非法的全部书籍。这些书籍包括大量下流的毁谤性著作和有时含有激进的哲学和反宗教主题的淫秽著作。我把精力集中于这些鲜为人知的书籍, 并不是想用以描述18世纪书籍总体的特性。但是某些批评我的人误解了我的论点, 甚至荒诞地声称我主张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色情的’解释”(维维安·格鲁德 [Vivian Gruder] ,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前的王后与舆论” [The Question of Marie-Antoinette: The Queen and Public Opinion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 《法国史》[*French History*] , 16 [2001] , 第170页)。

- (36) 因为马勒布的订单含有数量众多且比例失调的色情书籍, 会让人对总需求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因此在这处计算中被略去, 就像早前关于毁谤性书籍和无神论书籍的讨论情况一样。
- (37) 纳沙泰尔出版社与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合作出版这部著作。由于它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出版物, 因此在统计中所占权重大于该社的一般存货书籍。不过, 对菲利普·罗多尔夫·维卡的《瓦尔蒙·德博马尔先生的博物志通用推理词典补编》(*Supplément au Dictionnaire raisonne universel d'histoire naturelle de M. Valmont de Bomare*) 的需求量也相当大。
- (38) 订单中出现的莫潘的四种著作中, 需求量最大的是《葡萄酒酿造技艺》。
- (39) 让-安德烈·韦内尔的《论待嫁姑娘的健康和医学教育》(*Essai sur la santé et sur l'éducation médicale des filles destinées au mariage*) 和皮埃尔·法布尔的《性病论》吸引了相当多的订单。
- (40) 例如, “骑士”阿皮尔 (他的名字未知) 的《马病的疗法》(*Recettes pour les maladies des chevaux*) 。
- (41) 例如,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数学教程》(*Cours de mathématiques*), 皮埃尔·塞内比埃的《算术论》(*Traité d'arithmétique*), 和弗朗索瓦·巴雷默的《算术, 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
- (42) 例如, 路易·夏尔·梅西耶·迪帕蒂·德克隆的《骑马的技艺》(*La Science et l'art de l'équitation*); 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谢德的《德语教师》(*Le Maître de la langue allemande*), 一本热销书; 以及勒内·米尔朗的《法庭新秘书, 包含养成书信文风的训练教程》(*Le Nouveau secrétaire de la cour, contenant une instruction pour se former dans le style épistolaire*) 。
- (43) 见尼古拉·安托万·维亚尔的简单教程《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 更高级的有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 和勒内·米尔朗的写作方法及技艺的指导, 《办公室新秘书, 包含关于各类主题的书信, 以及写好这些书信的方法; 法语客套语, 为人处世的箴言和建议》(*Le Nouveau secrétaire du cabinet, contenant des lettres sur différents sujets, avec la manière de les bien dresser ; les*

compliment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les maximes et conseils pour plaire et se conduire dans le monde)。

- (44) 《青少年杂志》(*Magasin des adolescents*)、《现代良师益友》(*Le Mentor modern*)、《年轻小姐新杂志》(*Nouveau magasin des jeunes demoiselles*)、《勒普兰斯·德博蒙夫人著作杂集》(*Œuvres mêlées de Mme Leprince de Beaumont*)。
- (45) 特朗布莱的《父亲教子指南》(*Instructions d'un père à ses enfants*)需求量不小。其他常被订购的书籍是让·路易·德孚克劳的《在自然秩序中培养成长的孩子》(*Les Enfants élevés dans l'ordre de la nature*)、蒙热先生(名字未知)的《婴幼儿道德小故事》和弗里德里希·埃伯哈德·冯罗霍的《供乡村小学用的儿童之友》。
- (46) 例如,雅各布·韦尔内的《简明通史:对开始学习历史的青年的指导》(*Abrégé d'histoire universelle: Pour la direction des jeunes gens qui commencent cette étude*)。
- (47) 有关这一十分热门的主题的最重要著作是菲利普·阿里埃的《儿童数百年:家庭生活的社会史》(*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纽约:Vintage, 1962;法文首版,1960。
- (48) 对《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的需求不大,这是科内利·德波弗的一部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所谓“劣性”的推测性著作。
- (49) 不过,订购这些书籍的大部分订单来自向市场供应“哲学书籍”的马勒布。
- (50) 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过许多订购塞尔旺口碑不错的著作《论刑事司法的管理》(*Discour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criminelle*)的订单,而且购买他的各类著作集(*Œuvres diverses*)的订单也不少。推崇塞尔旺的人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的革命家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他出钱请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他的《论刑法》(*Théorie des lois criminelles*),但是没有获得多大成功。保罗·里西的《关于刑事法学内容的评论》(*Observations sur des matières de jurisprudence criminelle*)卖得也不比它好。
- (51) 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的版本有书名为《卡隆·德博马舍先生的备忘录》(*Mémoires de M. Caron de Beaumachais*)的文集、《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隆·德博马舍先生的备忘录,附他的剧作集》(*Mémoires de M.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chais, suivis de ses œuvres de théâtre*)和《皮埃尔·奥古斯坦·加隆·德博马舍先生的备忘录续篇》(*Suite des Mémoires de M.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chais*)。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含有大量有关哥士曼及其著作的资料,值得未来研究者研究。
- (52) 对兰盖的《兰盖先生致韦尔热纳伯爵先生的信》和《关于一元主义的哲学论文》的需求量也很大。
- (53) 见克里斯托夫·卡弗(Christophe Cave)编,《批判的影响:〈秘密回忆录〉的文化幻想》(*Le Règne de la critique: L'Imaginaire culturel des Mémoires secrets*),巴黎:Honoré Champion, 2010。

(54) 在这类书籍中，获得大量订单的其他书籍还有《共济会的职责、规则或规章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叫拉蒂埃尔斯的人写的；加布里埃尔-路易-加拉布尔-佩罗的《被暴露的共济会》（*L'Ordre des Francs-Maçons trahi*），以及佩罗的《被揭露的共济会秘密》（*Les Secrets de l'ordre des Francs-Maçons dévoilés*）。附加著作如匿名者汇编的《共济会歌谣汇编》（*Recueil des chansons des francs-maçons*）也获得少量订单。

结论 有生命的书籍【301】

循着一位销售代表1778年巡游法国的旅程，我尝试说明当时的图书是怎样到达读者手中的；我还通过研究1769到1789年间书商们的通信，尝试说明这些图书具体是什么——也就是说，描述了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十年里在法国传播的图书的一般特征。这种书籍传播研究远不彻底，它忽略了被看作书籍传播方面最重要的内容：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反响。但我不怀疑研究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我把本书的调研工作限制在书籍史的一个方面，并从不同寻常的陌生视角加以审视——在街道上，载着图书的货车隆隆地碾过乡村；在书店内，书商们把书籍的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专心研究这些主题，就算无法回答两百多年前人们如何“消费”图书这个关键问题，也有可能提出有关书籍传播的一些可靠结论。书籍的生命经历（the lived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法文中的“*la littérature vécue*”——本质上是一个“阅读”的问题，而读者呢，很遗憾，他们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

读者散落在材料各处，常常足以让我们形成一个关于阅读群体的大致概念。从书商信件里的参考名单，和像罗贝尔和戈蒂埃的破产文件这样的特殊文献来看，读者是由社会上中层的不同群体混合组成的，其中有贵族、地方法官、行政官员、军官、牧师、律师、医生、商人、乡村的富裕地主，或许还有城镇里比较富裕的商人店主。【302】这些人读书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仍然是个谜。最近，一些重构阅读史的尝试已经获得了重要进展，但一直没有摆脱可用资料匮乏的困境。^①尽管档案资料中处处散落着提示性的页边注解、摘录簿、日志记录和其他文献，但它们不足以构成能够支持某种一般性解释的证据。我们只能做一些个案研究，其中许多做得很出色，但没有一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可以提供一条回到过去的明晰途径。

尽管我们没有解决读者如何读书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书。对书商生意的仔细研究，可以显示在每个城市的特定市场上什么书最受青睐。这些研究结果可以拼贴出一幅图书市场的全景图——甚至拼贴出一份回溯过往的畅销书单。当然，对这份书单也不必过于当真。它能为人们寻找需求量最大的书籍提供一般性的引导，但不是对每种书籍进行精确的排名，而且它关心的是当时市场上传播的著作，

而不是图书馆里多年积存的那种图书。读者偏爱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一百年前出版的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就失去了兴趣，更不必说所有源自古代的古典著作了，而正是这些书籍形成了受过教育的精英所承继的文化基础。宗教书籍，从每日祈祷书到神学小册子，也是许多读者的必读书。纳沙泰尔出版社主打新教书籍的销售，对天主教徒有吸引力的书卖得相对较少，然而，它的大多数客户很有可能也在某个时间读到过《效法基督》（*L'Imitation de Jésus-Christ*）——这本书自15世纪问世以来，已经出过两千多个版本。

不管估计有多么的粗略，有关图书数量的信息都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书商们的信函来补充。书商们一边订货，一边和纳沙泰尔出版社保持对话，谈论市场状况、有潜力的版本、有竞争力的新品、受推崇的作家、有关同行的闲言碎语，以及其他一切跟生意有关的话题。信息的流动是他们生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就他们连接供求关系的基本任务而言，这个因素极为关键。其他中间商也在各个连接点上发挥着作用。【303】书籍史应该为像费弗尔这样的偷运者、像皮翁这样的货车车夫、像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以及像法瓦尔热这样的销售代表保留一席之地。他们都在书籍传播体系中最模糊的地带谋生，都应该在关于书籍的生命经历的叙述中拥有位置。

书商的地位值得特别关注。尽管他们的生意规模和特征千差万别，但都可以用一种通用类型来描述。几家富裕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主宰着大城市周边地区的贸易。他们往往属于世袭的家族产业，与当地当权者相处得很好，而且很少冒险经营受严禁的书籍，尽管他们严重依赖盗版书的经营，但这在外省是普遍被容许的，即使在1777年法令执行以后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周围是一些较小的书商，这些人在零售贸易中艰难求生，在1770年代后期和1780年代，常常会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而破产。在图书贸易的外缘，一些个体商贩做着投机生意，出售他们认为有销路的任何图书，而零售商贩或流动商贩会越过法律的边界，沿街兜售各种图书，尤其是“哲学书籍”。这种普遍模式符合法瓦尔热逐个城镇评定书商的务实程度时所作的观察。这也是书商们自己在向国家提交的请愿中描述个人命运时的看法，当然，他们小心地把经营非法书籍的事统统略去不提。⁽²⁾

市场上很多书籍，甚至是大多数书籍，都是由边缘经销商售出的；因为对书籍的需求无处不在，单靠书商行会无法满足。书商行会缺乏执行国家法令的能力，而且常常与盗版书籍的贸易合作，而不是打击它。

除了在马赛和波尔多之类的大城市，外省的图书贸易一般得不到有效监管。像卢丹的马勒布和布卢瓦的莱尔这样的非法书商，他们的生意就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③他们主要是苦于资金不足，容易为经济衰退所拖累；同时他们也因总是想把投机生意扩大到自身的偿债能力无法承受的程度而遭受磨难。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很多人经营失败、血本无归，但他们有时也会东山再起，尤其是如果能够驾马拉车拼命干活，就像被称作“皮斯托尔”的诺埃尔·吉尔，“在法国四处奔波”。

【304】更常见的情况是，大祸临头时他们就逃之夭夭，如马塞的卡尔德塞格那样抛妻别子，或者如常言所说的，“把钥匙塞在门底下”，溜之大吉。

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书籍世界是一个移动的世界。就连正规的书商，如罗贝尔和戈蒂埃，偶尔也要驾着马车在路上奔波，来满足村镇居民对书籍的需求。对图书的需求一直在扩大，直到旧制度时期的最后十年；而这是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行会结构所无法满足的。正是为了满足需求，众多小企业主和中间商应运而生，他们在官方机构的边缘经营，常常要突破法律限制。到1770年，书籍的流通就已经溢出了那些曾经限制它的屏障。

那些试图操控书籍流通而常常被它卷走的图书贸易从业者，在18世纪法国的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故事属于最广义的书籍史。这些故事在19世纪早期依然存在，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巴尔扎克捕捉到，被写进了《幻灭》。但在巴尔扎克之前，要让书籍到达思想市场

（marketplace of ideas），就得上演整个一部人间喜剧。人物角色如何发挥作用，书籍世界怎样像情报通信系统那样运转，这是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故事引发了书籍需求的识别问题——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可以得到解答。当然，它还提出了更宏大的问题，关于书籍与革命的关系，关涉公共舆论和集体行动，都能引发无休止的辩论。这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我在本书里没有深究，因为随着书籍史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我决定只讨论在这个知识领域内可以解答的具体问题。

然而通过推测，我感到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渊源。关于书籍需求的统计表明，启蒙思想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当然，启蒙哲人们的著作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张力，但是如果非要选出一部最能证明启蒙思想普及情况的著作，那就非梅西耶的《2440年》莫属。这部顶级畅销书展现了一幅按卢梭式原则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与梅西耶另一部揭露当时社会秩序的残【305】酷不公

的畅销书《巴黎图景》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还想强调书商们的信函中经常提到的其他三位作家——雷纳尔、米拉波和兰盖——的知名度。在伏尔泰和卢梭去世后，这三位作家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把专制权力对普通法国人自由的威胁人格化了。政治毁谤书的最佳代表是《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主题，并把它跟顶层社会腐败堕落的画面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诽谤引起的共鸣，或许比不上那些喜爱像《感情的考验》这类小说和像《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这类儿童书籍的读者被引发的情感共鸣。有些最流行的书籍以伏尔泰的风格拔高并讥讽既定秩序，而伏尔泰自己的作品也频频出现在书商的订单中。然而，书籍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中的主调还是呼唤温情（*sensiblerie*）与美德。与时政有直接联系的书籍很少，有关内克内阁的论战作品除外。最畅销的书籍传达的不是明确的政治信息，而是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一般观点。在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中，这种观点的表达铿锵有力。这部皇皇巨著虽然写得混乱无序，充满了破绽和矛盾，却处处跃动着能量，而且大多表现为道德上的义愤填膺。这些书籍尽管五花八门，却都传达了一种灌注着隐藏信息的世界观：眼前的世界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另一种现实正在头脑中建构。随着书籍自1769年以来在商业渠道的传播，到1789年，思想即将变成行动。

那些把满足读者对书籍的需求当作生意的图书贸易从业者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为了一场革命铺垫道路。他们专心致志地忙着手头的生意，而当他们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又听起来似有所悟。身为出版商，奥斯特瓦尔德曾说道：“你只能相信你亲眼所见的和你五指所握的。”⁽⁴⁾身为书商，图尔的让-弗朗索瓦·比约（Jean-François Billaut）在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写道：“您肯定知道我们这里有句俗语或粗话……99个烤肉师傅富得流油，一个卖书的饿得要死。”⁽⁵⁾【306】他们所经历的书籍世界严酷无情，深深植根于旧制度，难以捱过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因此，这个世界最终幻灭了。

(1) 见罗杰·夏蒂埃和古列尔莫·卡瓦洛（Gulielmo Cavallo）编，《西方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这是一部出色的论文集，包含这个日益发展的研究领域许多其他出版物的参考资料。我自己为勾画这个领域的轮廓所做的尝试是“迈向阅读史的最初几步”（*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澳大利亚法国研究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23（1986），第5—30页；后又重印于《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纽约：Norton，1996，第9章。

- (2)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73，“里昂、鲁昂、图卢兹、马赛和尼姆的书商与印刷商关于出版业专卖权及其延续的商议的陈情书”，1776年10月15日：“他们[外省的书商]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那些自己印刷[书籍]或者让他人印刷，并在书商之间从事批发业务的书商。通过互相交换他们出版的书籍，他们拥有了品种齐全的存货来供应零售商。第二类由那些自己不印刷、光靠订购的书商组成。其中一些人住在小城市和集镇，他们再从那里向乡村扩散。……这最后一类还可以细分，区分为除了向读者零售外，还向极小乡镇的书商销售。……后者又把购买来的书籍卖给走村串乡的流动书贩，由他们卖到集市上和传教士家里。”
- (3) 莱尔最终通过购买“书商执照”成为合法经销商。我相信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从业者存在，尽管无法统计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不被列入《出版年鉴》这种管理档案，就像法瓦尔热所发现的，根据《出版年鉴》来了解书商的人数不准确。对于非法从业者的案例研究见我的专题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刊于《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 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 (4) “奥斯特瓦尔德从巴黎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2月20日。
- (5) “比约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6年9月29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ms.1122。

致谢【307】

我从1965年起一直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堆里工作，因此我要特别感谢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负责人。图书馆的负责人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从埃里克·贝尔图（Eric Berthoud）到雅克·里希内（Jacques Rychner）、米歇尔·施吕普（Michel Schlup）和蒂埃里·夏特兰（Thierry Chatelain），先是允许我不受限制地查阅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然后又帮助我用缩微胶卷拍摄、影印，将几百份文献数字化。我尤其想感谢米歇尔·施吕普，他提供了本书中的大多数插图，并邀请我参与创作图书馆出版的两部巨著：一是《启蒙运动时代纳沙泰尔的出版业：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L'Édition neuchâtelo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1769-1789]*，纳沙泰尔：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2002），一是《一家出版社在启蒙运动欧洲中的影响：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1789）》（*Le Rayonnement d'une maison d'édition dans l'Europe des Lumières :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1769-1789]*，纳沙泰尔：Attinger，2005）。莫里斯·德特里博莱（Maurice de Tribolet）引导我查阅纳沙泰尔州档案馆的迷宫般的公证文件，纳沙泰尔的其他朋友也以许多方式帮助我，包括提供住宿，这对一个预算很少但人数很多的家庭来说是个大难题。除了许多次短暂的访问外，我们在纳沙泰尔和周围的乡村度过了14个暑假和一个寒假。我对以下几位朋友充满感激之情：已故的夏利和莉莉安娜·居约（Charly and Liliane Guyot），1966年和1967年，【308】他们把公寓借给我的妻子苏珊和我住；雅克·里希内，他为我们沿湖的村庄寻找住处；雷米·舍雷（Rémy Scheurer），他把我们介绍给已故的安妮·古特克内希特（Annie Gutknecht），她在勒朗德龙，是我们深爱的女房东；莫里斯和尼古拉·德特里博莱，与我们分享他们在莫捷的城堡，里面全是18世纪的家具，而且充满了关于卢梭的记忆；菲利普和玛丽-安娜·马格拉（Philippe and Marie-Anne Marguerat），他们多次在坐落于葡萄园上方的家中为我们提供住宿；还有阿兰和安·罗贝尔（Alain and Ann Robert），无数次在他们的山边别墅里请我们吃饭。我们的朋友带着我们沿汝拉山脊远足，在高山牧场驻足吃饭，品尝乡村的火腿，若在秋天，就去吃红酒烧鹿肉。夏日里，雅克和安格丽·里希内与我们在图书馆外的湖边野餐。用游泳消耗掉我们吃的奶酪塔，然后雅克和我会一起去

档案馆，肩并肩地工作，他查阅印刷厂的记录，我查阅有关图书贸易的文件。米歇尔·施吕普和卡罗琳·卡拉默（Caroline Calame）带我们登山，体验“高人一等”（*gens du haut*）的感觉，并享受拉绍德封附近山村“农场餐厅”（*fermes-restaurants*）的乐趣。菲利普·马格拉帮我找到进入大学的路，让我作为客座教授教了一学期的课，并且常常回去演讲和参加学术会议。其他朋友也在别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他们接纳我和妻子进入他们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五十多年里，当我年复一年逐个卷宗地埋头查阅档案时，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们这些大人也变老了，一起分担忧伤，分享喜悦。本书——以及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的姊妹篇——就是这种经历的结晶，所以我要把它献给我在纳沙泰尔的朋友们，纪念逝者，亲善故友。我尤其想念雅克·里希内，当我完成终稿时，他却与世长辞了。

为了补充我在纳沙泰尔的研究，我还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查阅巴黎的档案，尤其是阿尼松-迪佩隆收藏（Collection Anisson-Duperron）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巴黎书商与印刷商行会的文件，还有阿斯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的巴士底狱的文件，以及其他各种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从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到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ël Jeanneney）和布鲁诺·拉辛（Bruno Racine），【309】对我的支持始终如一，我尤其还得到了他们的馆员的帮助，特别是让-多米尼克·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和雅克利娜·桑松（Jacqueline Sanson）。

纳沙泰尔和巴黎的原始资料来源太过丰富而广泛，靠一本书是无法让它们充分发挥价值的。因此，我决定把最重要的文献，连同地图、插画、论文和我此前刊发的部分文章一起，放到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网站 robertdarnton.org 上，这是我在2013年上线的网站。本书读者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查询更多的文献资料。网站上呈现的一切都是集体的劳动成果，转录所有数字化手稿、鉴定所有书籍、汇总统计数据，这些仅凭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过去二十年里，在这项事业的不同阶段，我都得到了研究生和助手们的协助，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长期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是埃莉萨·贝尔（Elissa Bell）、萨拉·本哈雷克（Sarah Benharrech）、马蒂娜·邦雅曼（Martine Benjamin）、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布里吉德·多尔西（Brigid Dorsey）、纳撒尼尔·海（Nathaniel Hay）、弗雷德里克·安德维尔迪（Frédéric Inderwildi）、米里亚姆·尼科利（Miriam Nicoli）、蒂埃里·里戈涅（Thierry Rigogne）、玛德莱娜·施瓦茨（Madeleine Schwartz）、詹妮弗·钱

(Jennifer Tsien) 和凯瑟琳·威特 (Catherine Witt) 。网站由罗伯特·利弗斯 (Robert Levers) 和阿里斯托斯·科亚尼斯 (Aristos Koyanis) 策划设计，他们得到了我的得力助手阿林·纳瓦罗 (Arlene Navarro) 的大力协助。哈佛图书馆制图部的斯科特·沃克 (Scott Walker) 提供了地图，这得益于他处理历史原始材料的专长。

我还要对普林斯顿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弗洛伦斯·A. 古尔德基金会 (Florence A. Gould Foundation) 表示感谢，他们支持本项目许多年。我尤其要感谢弗洛伦斯·A. 古尔德基金会主席约翰·R. 扬 (John R. Young) 和他已故的妻子玛丽。为了如期完成工作并履行职责，尤其是在我2007年到2015年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期间，我不得不中断这个项目的工作，而他们几次继续提供了援款。我在巴黎高等研究所 (Institute d'Etudes Avancées de Paris) 任研究员时，得到由法国国家科研署管理的法国国家基金，即“未来投资” (“Investissements d'avenir”) 计划的财政资助 (ANR-11-LABX-0027-01 Labex RFIEA +) ，完成了本书的最终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蒂莫西·本特 (Timothy Bent) 和伽利马尔出版社法文版的译者让-弗朗索瓦·塞内 (Jean-François Sené) ，他们为润色文字付出了长期的辛勤劳动。

索引【335】

插图和注释由页码后面的f和n来表示。页码为原著页码，即本书【】内数字。

Abert阿贝，138

Abrégé de l'histoire ancienne de Monsieur Rollin《罗林先生的简明古代史》（泰勒），62，181-182，293

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la franche-maçonnerie《共济会简史》（拉朗德），168，299

Abrégé de l'histoire sainte et du catéchisme《圣史及教理书简易读本》（奥斯特瓦尔德），105，282

Abrégé d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简明法语语法原理》（雷斯托），168，240，282

L'Académie des dames《女子学校》（肖里耶），59，179，203，291

*Acquits à caution*货物通运准单，xiii-xiv，23，26-27，38，42-43，81，84，88-89，252，260，314n5

Adèle et Théodore《阿代勒和泰奥多尔》（让利斯），289，296

L'Adoption, ou la maçonnerie des femmes《接纳，或妇女共济会》（圣维克多）155，175，299

Affiches de l'Orléanais《奥尔良广告报》，229

Affiches de Marseille《马赛广告报》，140

Affolter, Marie-Elisabeth阿福尔特，玛丽-伊丽莎白，263

Agde阿格德，111

Agrippa, Cornelius阿格里帕，科尼利厄斯，299

Aix-en-Provence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50，94，110

L'Albert moderne, ou recueil de secrets éprouvés et licites《现代阿尔伯特，或已经得到证实的合法秘诀汇编》（阿莱茨），168，299

Allemand阿莱芒，138

Alletz , P.-A.阿莱茨 , 蓬斯-奥古斯坦 , 168 , 299

Almanach de la librairie 《出版年鉴》 , 【336】 47-48 , 57 , 110 ,
134 , 140 , 154 , 164 , 208 , 222 , 242 , 217n3 , 320n2

Alsace阿尔萨斯 , 18 , 29-30

Les Amants républicains , ou lettres de Nicias et Cynire 《共和政体爱好者 , 或尼西亚斯和西尼尔信笺》 (贝朗热) , 283

Amboise昂布瓦兹 , 216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革命 , 165 , 167 , 249

L'Ami des enfants à l'usage des écoles de la campagne 《供乡村小学用的儿童之友》 (冯罗霍) , 103 , 104

L'Anacréon français , ou recueil de chansons , romances , ariettes vaudevilles , et à propos de sociétés 《法国的阿那克雷翁 , 或用于社交场合的歌曲、浪漫曲、小抒情曲、叙事诗歌和诙谐语集》 (库雷·德维尔纳夫) , 230-231

L'Anarchie médicale , ou la médecine considérée comme nuisible à la société 《医学无政府状态 , 或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医学》 (吉利贝尔) , 128 , 295

L'An deux mille quatre cent quarante 《2440年》 (梅西耶) , 35 , 60 ,
126-127 , 145 , 171 , 174 , 175 , 181 , 187 , 206 , 242-243 ,
282 , 286 , 288 , 304

Anecdotes sur la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 《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 ,
35 , 117 , 147 , 157 , 168 , 175 , 226 , 282 , 285 , 305

Annales de la vertu , ou cours d'histoi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 《美德年鉴 , 或供青少年使用的历史课本》 (让利斯) , 65 , 296

Annonces de l'Orléanais 《奥尔良通告报》 , 229

L'Antiquité et perpétuité de la religion protestante 《新教的古老与永恒》 (勒努) , 283

Antoine , Louis安托万 , 路易 , 292

Apologie de la religion 《宗教颂词》 , 208

Apparat royal , ou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 et latin 《皇家词典 , 或

新法语和拉丁语词典》（隆代），282

L'Arithmétique ou le livre facile pour apprendre l'arithmétique de soi-même et sans maître 《算术，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240

Arles阿尔勒，7，56，94，110

L'Arrétin moderne 《现代的阿雷蒂诺》（迪洛朗），188，298

L'Art de faire le vin 《葡萄酒酿造技艺》（莫潘），168，331n38

Aurel奥雷尔，51

Auxerre欧塞尔，51，234

Aux Trois Flacons来三瓶（客栈），31，85

Les Aventures de l'infortuné Napolitain 《倒霉的那不勒斯人的奇遇》（奥利维耶），145

Avignon阿维尼翁，51，93-108，93f

Avis au peuple sur sa santé 《大众健康建议》（蒂索），102，168，283，295

Baculard d'Arnaud，François-Thomas-Marie de巴居拉尔·达诺，弗朗索瓦·托马·玛丽·德，129，289

Epreuves du sentiment 《感情的考验》，126，136，289，305

Baillas de Soubvent巴亚·德苏布旺，162

Balzac巴尔扎克，xii

Les Illusions perdues 《幻灭》，304

Bankruptcy破产，52，55，61，191，195，206-207，278-279

Le Barbier de Séville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博马舍），290

Barde，Manget et Cie.巴尔德与芒热公司，107

Bardin巴尔丹，114

Bar-le-Duc巴勒迪克，18

Barret，Jean-Marie巴雷，让·马利，70，72，76，78，96，98

Barrin，Jean：*Vénus dans le cloître* 巴兰，让：《修道院里的维纳斯》，

Bascou巴斯库 , 122

Basel巴塞尔 , 18 , 29

Bassompierre , Jean-François巴松皮埃尔 , 让-弗朗索瓦 , 32 , 246

Batilliot l'aîné老巴蒂略 , 193 , 195 , 196-197

Bayle , Pierre贝尔 , 皮埃尔 , 7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历史与批判词典》 , 144 , 172 ,
290

Pensées diverses sur l'occasion de la comète 《关于彗星的产生原因的
各种思考》 , 【337】 294

Beaucaire博凯尔 , 114

Beaumarchais博马舍 , 148 , 298

Le Barbier de séville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 290

Mémoires 《审判备忘录》 , 247

Beaumont , Jeanne-Marie Leprince de博蒙 , 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 ,
296

*Magasin des enfants , 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 《儿童杂志 , 或一位聪明的女家
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小学生的对话》 , 240 , 296

Beccaria , César :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 贝卡里亚 , 塞扎尔 : 《论轻罪
与惩罚》 , 297

Beccary , Mme : *Mémoires de Fanny Spingler* 贝卡里夫人 : 《范妮·斯平
勒回忆录》 , 289

Bélisaire 《贝利萨留》 (马蒙泰尔) , 65 , 289

Benoit , Antoine伯努瓦 , 安托万 , 236

Bérenger , Jean-Pierre贝朗热 , 让-皮埃尔 , 328n19

Les Amants républicains , ou lettres de Nicias et Cynire 《共和政体爱
好者 , 或尼西亚斯和西尼尔信笺》 , 283

Bergeret , Guillaume贝尔热雷 , 纪尧姆 , 57 , 164-165 , 166 , 167 ,

Bergès et Cie.贝尔热公司 , 160-161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 Jacques-Henri : *Voyages à l'Isle de France , à l'Isle de Bourbon , au Cap de Bon Espérance , etc.*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 , 雅克-亨利 : 《法兰西岛、波旁岛、好望角等地游记》 , 102 , 292

Berne伯尔尼 , 21 , 72 ; 亦见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Berne

Bertrand , Elie贝特朗 , 埃利

Sermons pour les fêtes de l'Eglise chrétienne ,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discours sur la morale Evangélique 《基督教会节日用的布道文 , 继而用作关于新教道德的致辞》 , 283

Le Thévenon , ou les journées de la montagne 《勒泰弗农 , 或山中的日子》 , 155

Bertrand , Jean-Elie贝特朗 , 让-埃利 , 9 , 14 , 17 , 69-70 , 84-85 , 281

Besançon贝赞松 , 22 , 37 , 241-262 , 241f

Besse , Jean贝斯 , 让 , 154

Besson贝松 , 57

Bestseller lists畅销书单 , 126 , 281-284

Béziers贝济耶 , 111 , 154

Bible圣经 , 7 , 8 , 113 , 115 , 117 , 171 , 175 , 200 , 258

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 《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 (伏尔泰) , 156

Bijoux indiscrets 《不谨慎的小宝贝》 (狄德罗) , 202

Billaut , Jean-François比约 , 让-弗朗索瓦 , 305-306

Billing , M.比林先生 , 9

Biron , Luc比隆 , 吕克 , 125

Blacksmiths蹄铁匠 , 162-163 , 169-170 , 170f

Blaisot , J.布莱索 , 187 , 190 , 191 , 200 , 208

Blois布卢瓦, 46, 52, 215-222, 215f

Bobin, Jacques博班, 雅克, 48, 178

Boerhaave, Herman布尔哈弗, 赫尔曼, 136

Boisserand布瓦塞朗, 118, 185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博林布鲁克, 亨利·圣约翰, 子爵, 179, 218

Le Bonheur 《论幸福》(爱尔维修), 287

Bonnard, Pierre博纳尔, 皮埃尔, 51, 264

Bonnet博内, 51

Le Bon-sens 《健全的思想》(霍尔巴赫), 105

Book Trade Administration图书贸易管理署, 20

Bordeaux波尔多, 56, 57, 163-169, 164f

Le Bordel ou le Jean-foutre puni 《妓院或受到惩罚的蠢货》, 105

Border controls and inspections边境控制和检查, 22, 26-27, 35-36, 84-86, 266; 亦见Smuggling

Bordier, André-César: *Voyage pittoresque aux glaciers de Savoye* 博尔迪耶, 安德烈-塞扎尔: 《萨瓦冰川风光游记》, 292

Bornand, Jacob-François博尔南, 雅各布-弗朗索瓦, 11-12, 15-16

Bosset de Luze, Abram博塞·德吕兹, 亚伯兰, 10f, 14, 17, 48, 89

Bossuet波舒哀, 229

Boubers, J. L.布贝, 208, 276

Bouchet, Louis布歇, 路易, 51, 100

Bougainville布干维尔, 292

Voyage autour du monde 《世界环游记》, 139, 292

Bouillard, 【338】Denis布亚尔, 德尼, 192

Boulanger布朗热, 199

Bourgelat, Claude布尔热拉, 克洛德, 318n1

Bourg-en-Bresse布雷斯地区布尔格，18，48，55-66

Boutet，Veuve布泰，弗夫，195

Bovet，Isaac博韦，以撒，31

Boyer布瓦耶，138

Brette布雷特，77-78

Briant，Eustache布里昂，厄斯塔什，206-207，211-213

Bribes贿赂，收买，26，30，34，36，41，84，88，249-250

Brissot，Jacques-pierre布里索，雅克-皮埃尔

Théorie des lois criminelles《论刑法》，332n50

Un Indépendant à l'ordre des avocats sur la décadence du barreau en France《一位独立观察者就法国律师团体的腐败问题致律师公会》，249

La Brouette du vinaigrier《醋贩子的独轮车》（梅西耶），290

Brunet布律内，177

Bruysset，J. M.布里塞，70

Bruysset-Ponthus，Pierre布里塞-蓬蒂斯，皮埃尔，70，320n3

Brydone，Patrick：*Voyage en Sicile et à Malte*帕特里克，布赖登：《西西里与马耳他游记》，292

Buchet比谢，6，112，115-121

Le Bureau d'esprit《智慧局》（拉特利奇），226

Burgundy勃艮第，14

Burlamaqui，Jean-Jacques比尔拉马基，让-雅克，148

Éléments du droit naturel《自然法原理》，297

Burney，Fanny：*Cécilia，ou mémoires d'une héritière*伯尼，范妮：《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41，145，289

Burrows，Simon伯罗斯，西蒙，325n1

Büsching，Anton Friedrich：*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ts de l'Europe*比兴，安东·弗里德里

希：《欧洲国家地理学和政治学知识入门》，293

*Cabinet littéraire*读书会，50，120-121，133，134，136，217，222，
235，249

Caboche卡博舍，198

Cailler, Jean-Samuel卡耶，让-萨米埃尔，61，64，117

Calamy, Veuve卡拉米，弗夫，160

Caldesaigues卡尔德塞格，6，138，141，147-151，197，304

Canal du Midi南运河，18

Candide《老实人》（伏尔泰），272-273

Capel, Jean-Baptiste卡佩尔，让-巴蒂斯特，23，27，28，236，
238，239，240

Capillary distribution system毛细管分销体系，vii，183-213

Carcassonne卡尔卡松，111，154

Carpentras卡庞特拉，110

Castelnaudary卡斯泰尔诺达里，154

Catéchisme du citoyen《国民教义问答》（塞日），176

Catholics天主教徒，7，98，99-100，116，137-138

Cazaméa卡扎梅亚，5，52

Cazin, Hubert-Martin卡赞，于贝尔-马丹，98

Cécilia, ou mémoires d'une héritière《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
录》（伯尼），41，145，289

Cellier塞利耶，70

Censors审查官，230，265-267；亦见Forbidden books

Cervantes塞万提斯，136，291

Cézary塞扎里，122，123—125，133

Chaboceau夏博索，171

Châlons-sur-Marne马恩河畔沙隆，48

Chalon-sur-Saône索恩河畔沙隆, 50, 91

Chambeau, Jean Louis尚博, 让·路易, 5, 100

Chambon尚邦, 138

*Chambres syndicales*书商行会, xi

贝赞松书商行会, 251, 256-261, 266

由书商行会授权的书商, 58, 69

波尔多书商行会, 266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书商行会, 58

第戎书商行会, 237-238

里昂书商行会, 79, 81-88, 102-103, 142-144, 147, 166, 180-181, 266

马赛书商行会, 146

尼姆书商行会, 100, 108, 266

奥尔良书商行会, 217

巴黎书商行会, 90, 174

普瓦捷书商行会, 217

蓬塔利耶书商行会, 【339】23, 27, 33, 34, 39, 43

销售代表巡视书商行会, 7, 13, 17

偷运与书商行会, 23, 27, 143, 154-155, 224

Chandelle d'Arras《阿拉斯的蜡烛》(迪洛朗), 190, 226, 298

Chappuis frères夏皮兄弟, 165

Chabonnet夏尔博内, 33

Charles, Pierre-Paul夏尔, 皮埃尔-保罗, 46, 216

Charmet, Charles-Atoine夏尔梅, 夏尔-安托万, 33, 37, 242-253, 257, 259, 266, 270, 271, 285-286, 287, 324-325n1

Charmet, Jean-Félix夏尔梅, 让-菲利克斯, 242, 324-325n1

Charmet, Mme夏尔梅夫人, 244, 248-249, 252-255, 259, 261,

- Château de Joux茹堡, 248
- Chatelain, Anne Barbe夏特兰, 安娜·巴尔布, 312n11
- Chaurou肖鲁, 155, 156, 161
- Chevillon l'aîne老舍维永, 222
- Chevrier, François-Antoine : *Le Colporteur*谢弗里耶, 弗朗索瓦-安托万 : 《叫卖圣经的小贩》, 134, 190
- Chevrier, Michel-Vincent谢弗里耶, 米歇尔·樊尚, 177-182
- 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书籍, 65, 78, 103, 148, 168, 230, 232, 296; 亦见具体书名
- Chinon希农, 216
- Chirol, Barthélémy希罗尔, 巴泰莱米, 328n19
- Choderlos de Laclos, Pierre-Ambroise-François :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肖德洛·德拉克洛, 皮埃尔-昂布鲁瓦兹·弗朗索瓦 : 《危险关系》, 105, 107, 116, 262, 289
- Chomérac肖梅拉克, 110
- Chorier, Nicolas : *L'Académie des dames*肖里耶, 尼古拉 : 《女子学校》, 59, 179, 203, 291
- Le Christianisme dévoilé, ou examen des princip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揭开面纱的基督教, 或检验基督教的原则和作用》(霍尔巴赫), 117, 283, 287
- Christin, Charles-Gabriel-Frédéric克里斯坦, 夏尔-加布里埃尔·弗雷德里克, 58
- Dissertation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bbaye de Saint-Claude, ses chroniques, ses légendes, ses chartes, ses usurpations, et sur les droits des habitants de cette terre* 《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 它的年谱, 它的传说, 它的契据, 它的侵占行为, 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权利》, 64
- Le Ciel ouvert à tous les hommes* 《天堂向所有人开放》, 204
- Clairvaux-les-lacs克莱尔沃莱拉克, 59-60

- Claudet frères et fils 克洛代兄弟父子公司，83，85，148，149，264
- Cleland, John : *Fanny Hill* 克莱兰，约翰：《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35，173，291
- Clement XIV 克雷芒十四世（教皇），98，100
- Clothing 服装，4-5
- Cochin, Charles-Nicolas : *Voyage de l'Italie, ou recueil de notes sur les ouvrages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qu'on voit dan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Italie* 科尚，夏尔-尼古拉：《意大利之行，或关于在意大利主要城市所见到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笔记汇编》，293
- Code de la nature 《自然法典》（摩莱里），297
- Cognac 科尼亚克，51
-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著作全集》（卢梭），283
-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M. Dorat 《多拉先生著作全集》，288-289
- 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 Necker 《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内克），244，246，261，298
- Collins, Anthony 柯林斯，安东尼，179
- Collonges 科隆日，30
- Le Colporteur 《叫卖圣经的小贩》（谢弗里耶），134，190
- Les Comédiens ou Le Foyer, comédie en un acte et en prose 《喜剧演员或休息厅，独幕散文喜剧》（拉特利奇），282
- Les Commencements et les progrès de la vraie piété 《真虔诚的开始与发展》（多德里奇），105
- Les Comments and Lettre d'un ami à M. Necker 《评论集》和《一位朋友致内克先生的信》，246
- Commis voyageurs 销售代表，xi，11-14；亦见 Favarger, Jean-François
- Le Comfère Mathieu 《马太兄弟》（迪洛朗），200，206，283
- Compte rendu au roi 《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内克），64，246，

258 , 298

Comte孔特 , 33 , 57

Condillac孔狄亚克 , 262

Cours d'études pour l'instruction du prince de Parme 《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 , 78 , 97 , 98 , 288

Condorcet , 【340】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 marquis de孔多塞 , 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 , 侯爵 , 129 , 199 , 288

Lettre d'un théologien à l'auteur du dictionnaire des Trois siècles littéraires 《一位神学家致三个世纪文学词典的作者的信》 , 283

Réflexions d'un Catholique sur les lois de France relatives aux Protestants 《一个天主教徒对法国有关新教徒的法律的看法》 , 116

Confessions 《忏悔录》 (卢梭) , 78 , 106 , 129-130 , 135 , 145 , 244 , 287

Considérant孔西代朗 , 62

Consolation de l'âme fidèle 《忠魂的慰藉》 (德雷兰库尔) , 105

La Contagion sacrée 《神圣的传染》 , 173

Contes moraux 《道德故事》 (马蒙泰尔) , 190 , 290

Contes moraux et nouvelles idylles 《道德故事和新田园诗集》 (热斯内) , 290

Contraband走私 , 35 , 81-91 ; 亦见Forbidden books , Smuggling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论》 (卢梭) , 190 , 287

Cook , James库克 , 詹姆斯 , 292 *Voyage au pôle austral et autour du monde* 《南极及世界环游记》 , 107

Coquereau , Jean-Baptiste-Louis科克罗 , 让·巴蒂斯特·路易 , 282

Correspondance du pape Ganganeli 《教皇甘加内利书信集》 , 98

Couret de Villeneuve , Louis-Pierre库雷·德维尔纳夫 , 路易·皮埃尔 , 78 , 181 , 187 , 193 , 208 , 222 , 224 , 225 , 227-234 , 266 , 280

Discours sur l'amitié , suivi de quelque poésies fugitives , par M. Couret de Villeneuve ,

*auxquelles on a réuni les sentiments des reconnaissance d'une mère , adressés à l'ombre de Rousseau de Genève , par Madame P**** 《论友谊，随后附上几首库雷·德维尔纳夫所作的即兴诗，其中结合了P夫人对日内瓦卢梭的亡灵表达的一位母亲的感激之情》，231

Epîtres et évangiles avec des réflexions 《使徒书与福音书评注》，229

Etrennes du chrétien 《给基督徒的新年礼物》，229

La Journée du chrétien 《基督徒的日子》，229

L'Anacréon français , ou recueil de chansons , romances , ariettes vaudevilles , et à propos de sociétés 《法国的阿那克雷翁，或用于社交场合的歌曲、浪漫曲、小抒情曲、叙事诗歌和诙谐语集》，230-231

Recueil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et les jeunes-gens , 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 , 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inspirer le goût de la vertu 《用作儿童和青年读物续编的选集，或适合用来既让他们娱乐又启发他们向往美德的短篇故事选》，230

Les Troglodites 《穴居人》，230

Cours d'études pour l'instruction du prince de Parme 《指导帕尔默王子的基础课程》（孔狄亚克），78，97，98，288

Courtais库尔泰斯，207

Coxe , William :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s Russes entre l'Asie et l'Amérique* 科克斯，威廉：《俄国人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新发现》，106

Cramer , Gabriel 克拉默，加布里埃尔，61，97，130，185，273，276

Credit信用，6，18，51-52，149，317n6；亦见Debt collection

Crêt de la Neige 内日峰，28

Croix Rousse克鲁瓦鲁斯，【341】31，84

Crosihes克罗西埃，161

Customs海关，26-27，29，32-33；亦见*Acquits à caution*，Border controls and inspections

D'Aguesseau，Henri-François达格索，亨利-弗朗索瓦，79-80

Daillé et Dupuis达耶与迪皮公司，195

D'Angerville，Barthélemy-François-Joseph Moufle当热维尔，巴泰莱米-弗朗索瓦-约瑟夫·穆夫勒，282

Vie privée de Louis XV《路易十五的私生活》，64，65，103，106，245，283，285-286

Dantais当泰斯，207

D'Arnal，Jacques-François达纳尔，雅克-弗朗索瓦，48，74

D'Arnal et Cie.达纳尔公司，100

Darnton，Robert达恩顿，罗伯特，314n8

D'Aucourt，Claude Godard：*Mémoires turcs*道库尔，克洛德·戈达尔：《土耳其人回忆录》，226，298

Dauphiné多菲内，14

David frères达维德兄弟，110-111

De Boissieu，Jean-Jacques德布瓦西厄，让-雅克，87f，170f，189f

Debt collection收债，55，118-120，135，150-151，195-197，220-221

De Félice，Fortuné-Barthélemy德费利斯，福蒂内-巴泰勒米，218，276

Defrance，Léonard德弗朗斯，莱奥纳尔，21f

De Gelieu，Jonas：*Réflexions d'un homme de bon sens sur comètes et sur leur retour，ou Préservatif contre la peur*德热利厄，若纳斯：《一位有见识的人关于彗星及其回归的思考，或预防恐慌》，294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论财政管理》（内克），41

- 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论立法或法律原则》（马布里），240，297
- De Langes, Claude : *Histoire du Vieux et du Nouveau Testament* 德朗日，克洛德：《旧约和新约史》，116
- De l'esprit* 《论精神》（爱尔维修），97，134，287
- De l'homme* 《论人》（爱尔维修），200，283，287
- Delhorme 德洛尔姆，45
- Delille, Jacques 德利尔，雅克，262
- Les Jardins* 《花园》，65，105，290
- Delyes, Louis 德利耶，路易，51，170
- De Mairobert, Mathieu-François Pidansat : *L'Espion anglais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ntre Milord All'eye et Milord All'ear* 德麦罗伯，马蒂欧-弗朗索瓦·皮当萨：《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103，104，106，142，147，245，298
- De Morande, Charles Théveneau : *Le Gazetier cuirassé* 德莫朗德，夏尔·泰夫诺：《身披甲胄的报人》，60，104，199，206，298
- De Néville, Le Camus 德内维尔，勒卡米，107
- De Pauw, Cornelius :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德波弗，科内利：《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332n48
- Desaint 德赞，61
- De Sales, Delisle :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德萨尔，德利尔：《自然的哲学》，246-247
- Desbordes 德博尔德，185
-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 《论轻罪与惩罚》（贝卡里亚），297
- Description abrégée de la Jamaïque* 《牙买加掠影》（潘热隆），105-106
- Description des arts et métiers* 《艺术与工艺全书》，38，52，77
- 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Etat* 《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米拉波），40，90，248，253

De Superville, Daniel : *Le Vrai Communiant* 德叙佩维埃尔, 达尼埃尔 : 《真正的领受圣餐者》, 116, 283

Desventes, François 德万特, 弗朗索瓦, 236

Les Devoirs, statuts, ou règlements généraux des francs maçons 《共济会的职责、规则或规章制度》, 176

D'Hémery, Joseph 戴梅里, 约瑟夫, 201-205, 318n1, 321n4

Dictionnaire de chimie 《化学词典》(马凯), 295

Dictionnaire de droit 《法律词典》, 208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词典》, 101, 102, 104, 106, 115, 120, 295-296, 316n3

Dictionnaire de physique 《物理学词典》, 114

Dictionnaire des grands hommes 《名人词典》, 78

Dictionnaire domestique 《家用词典》, 【342】101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portatif 《袖珍地理词典》(沃吉昂), 103, 104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历史与批判词典》(贝尔), 144, 172, 290

Dictionnaire raisonné universel d'histoire naturelle 《博物志通用推理词典》(瓦尔蒙·德博马尔), 182, 201, 295

Diderot 狄德罗, 190, 199, 218, 232, 288

Bijoux indiscrets 《不谨慎的小宝贝》, 202

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 《布干维尔旅行游记补编》, 292

Didot 迪多, 61

Dieu et les hommes 《上帝与人》, 188

Dijon 第戎, 22, 27, 234-240, 235f

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 图书贸易管理署, 20

Discour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criminelle 《论刑事司法的管理》(塞尔旺), 332n50

*Discours sur l'amitié , suivi de quelque poésies fugitives , par M. Couret de Villeneuve , auxquelles on a réuni les sentiments des reconnaissance d'une mère , adressés à l'ombre de Rousseau de Genève , par Madame P**** 《论友谊，随后附上几首库雷·德维尔纳夫所作的即兴诗，其中结合了P夫人对日内瓦卢梭的亡灵表达的一位母亲的感激之情》（库雷·德维尔纳夫），231

Dissertation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bbaye de Saint-Claude 《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克里斯坦），58，64，250

Doddridge , Philip : *Les Commencements et les progrès de la vraie piété* 多德里奇，菲利普：《真虔诚的开始与发展》，105

Dorat , Claude-Joseph 多拉，克洛德-约瑟夫，104，115，126，164，201，244，284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M. Dorat 《多拉先生著作全集》，288-289

Les Lettres d'Eulalie 《欧拉丽书简》，78

Les Malheurs de l'inconstance 《反复无常的不幸》，136，289

Les Sacrifices de l'amour 《爱情的牺牲》，160，289

Le Dragon rouge 《红龙》，200

Le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 《自然法与国际法》（普芬道夫），297

Dubois 杜布瓦，162

Du Laurens , Henri-Joseph 迪洛朗，亨利-约瑟夫

La Chandelle d'Arras 《阿拉斯的蜡烛》，190，226，298

L'Arétin moderne 《现代的阿雷蒂诺》，298

Dumont 迪蒙，8

Duplain , Joseph 迪普兰，约瑟夫，12，70-76，82，83，89，266

Dupleix 迪普莱克斯，157

Durand , Pierre 迪朗，皮埃尔，138，143

Du Rosoi , Barnabé-Firmian : *Henri IV , drame lyrique* 迪罗苏瓦，巴纳贝-菲尔米昂：《亨利四世，歌剧》，136

Dusailly迪萨伊，208

L'Ecole des filles《少女学校》（米洛），226，291

Edict of Nantes（1685）南特敕令，7，113

Eléments de l'histoire d'Angleterre《英国史纲要》（米约），106，293

Eléments de l'histoire de France《法国史纲要》（米约），106，293

Eléments d'histoire générale ancienne et modernne《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米约），155，201，232，284，293

Éléments du droit naturel《自然法原理》（比尔拉马基），297

Elies埃利，177，193

L'Eloge de la folie《愚人颂》（伊拉斯谟），290

Eloge hitorique de la raison《理性的历史颂歌》（伏尔泰），244

Eloge historique de Michel de L'Hospital, chancelier de France《法国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尔历史颂词》，【343】239

Emile《爱弥儿》（卢梭），190，287

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7，8，12，18，20，22，23，28，52，70-71，71f，75-77，79，82-83，87，111，117，123，129，141，154，155，218，219，235，239，255-256，261，288，296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116，121，129，130，176，187，229，232，233，251，280，256-289；亦见具体的作家和哲学家

Epîtres et évangiles avec des réflexions《使徒书与福音书评注》（库雷·德维尔纳夫），229

Epreuves du sentiment《感情的考验》（巴居拉尔·达诺），126，136，289，305

Erasmus伊拉斯谟，136 *L'Eloge de la folie*《愚人颂》，290

Erotic literature色情书籍，59，97，173，175，182，291；亦见 Pornographic works，具体书名

Errotika Biblion《情色圣经》（米拉波），40

L'Espion anglais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ntre Milord All'eye et Milord

All'ear 《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
(德麦罗伯)，103，104，106，142，147，245，298

L'Espion chinois 《中国间谍》(古达尔)，59，206，298

L'Espion dévalisé 《被清除的间谍》，90

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 monialisme, Lettre de M. Linguet à M. le comte de Vergennes 《关于一元主义的哲学论文，兰盖先生致韦尔热纳伯爵先生的信》(兰盖)，159

Essais 《随笔集》(蒙田)，291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le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论不同世纪的妇女的性格、道德观念和才智》(托马)，65

Essai sur le commerce de l'Amérique 《美洲贸易论》，146

Essai sur le despotisme 《论专制主义》(米拉波)，40，176，250，251，297

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gens du monde 《论上流社会人士的疾病》(蒂索)，226

Essai sur les mœurs 《风俗论》(伏尔泰)，294

Essai sur les préjugés 《论偏见》，98

Estienne埃第安纳，61

Etrennes du chrétien 《给基督徒的新年礼物》(库雷·德维尔纳夫)，229

L'Evangile du jour 《白日的福音》，206

Exchanges by publisher 出版商的交换交易，16，57，79，93-108，115，127，157，268-269，319-320n1

Fables 《寓言集》(拉封丹)，145，156，290

Fabre法布尔，51

Faivre, Ignace 费弗尔，伊尼亚斯，34，35，36-44，59，62，267，278，303

Fake letters [*Lettres ostensibles*] 假信，144，173，237

Fanny Hill《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克莱兰），35，173，291

Les Fastes de Louis XV《路易十五大事记》，90

Fauche, Jonas福什，若纳斯，40，254

Fauche, Samuel福什，萨米埃尔，12，40，61，64，86，103，104，
174，184，185，190，196，200，254

Fauche fils aîné et Cie.福什长子公司，40，254

Fauche fils aîné et Witel福什长子和维特尔公司，40

Faulcon, Félix福尔孔，菲利克斯，5，48，178

Faure, André富尔，安德烈，318n3

Faure, J. B.富尔，122

Favarger, Jean-François法瓦尔热，让-弗朗索瓦在阿维尼翁，93-108

在贝赞松，241-262

出生与早年生平，312-313n11

在布卢瓦，215-222

在波尔多，163-169

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344】55-66

他的生意，263-264

他的服装，4-5

他收债，55-66，118-120，150

他的日志和信，xi-xii，xiii-xiv，3-4，311-312n2

在第戎，234-240

雇佣合同，14-18

在日内瓦，14

他的健康状况，11，12，109-110

他的马，121，161-162，169-170，176-177

在拉罗谢尔，169-176

在隆勒索涅，45-53

在卢丹，183-213

在里昂，67-92

旅行地图，17*f*

他的婚姻，263

在马赛，137-151

在蒙彼利埃，121-136

他进行谈判，5-6，56-57，99

在纳沙泰尔，3-18，263-264

在尼姆，109-121

在奥尔良，222-234

他的私人关系，9-10

在普瓦捷，176-182

在蓬塔利耶，19-44

他进行书店评估，49-50

在图卢兹，153-163

Favarger, Jean-Frédéric法瓦尔热，让-弗雷德里克，312-313n11

Favarger, Louis法瓦尔热，路易，263

Favarger, Samuel法瓦尔热，萨米埃尔，14，263-264

Faye法耶，170

Fénelon费内隆，229

Fenouiller费努耶，260

Ferney费内，97

Feudalism封建主义，58

La Fille de joie《欢场女子》，35，173，226，291

La Fille naturelle《私生女》（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289

Flandin, Bernard弗朗丹，贝尔纳，70，79

Fleury, Widow弗勒里寡妇，179

Flick , Johann Jacob弗利克 , 约翰·雅各布 , 273

Fontaine方丹 , 170

Fontanel , Abraham丰塔内尔 , 亚伯拉罕 , 122 , 123 , 125 , 132-136

Forbidden books禁书 , 35 , 38 , 43 , 65 , 81-91 , 134 , 138 , 147 ,
148 , 175 , 186 , 236 , 244 , 252 ; 亦见Smuggling , 具体书名

Fragments sur les colonies en général et sur celles des Anglais en particulier《总体地有关殖民地和具体地有关英国人的片段》(斯密) , 297

Frambourg弗朗堡 , 24 , 25 , 27 , 30 , 40

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 , 14 , 29 , 41 , 45 , 58 , 241 , 315n11

Franco , Niccolò : *La Putain errante , ou dialogue de Madeleine et Julie*
弗朗科 , 尼科洛 : 《游荡的妓女 , 或玛德莱娜与朱莉的对话》 ,
175 , 291

Frantin , Louis-Nicolas弗朗坦 , 路易-尼古拉 , 236

Frederich II腓特烈二世 , 249 , 254 , 273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 (1769—1794) 》(伯罗斯) , 274

Fréret弗雷烈 , 199

Fuzier菲济耶 , 111 , 154

Gabriel , Ange-Jacques加布里埃尔 , 昂热-雅克 , 45 , 163

Gallay , Pierre加莱 , 皮埃尔 , 97

Ganges冈日 , 111 , 154

Garrigan , Jacques加里冈 , 雅克 , 101 , 102 , 104 , 105 , 106 ,
107 , 268

Garrigan , Jean-Marie加里冈 , 让-马利 , 102

Gaude , Jacques戈德 , 雅克 , 114 , 266 , 276 , 321n4

Gaude , Michel戈德 , 米歇尔 , 57 , 112-116 , 158

Gaudion戈迪翁 , 7 , 56 , 280

Gauthier, Pierre戈蒂埃, 皮埃尔, 55, 60-61, 64, 317n3

Le Gazetier cuirassé《身披甲冑的报人》(德莫朗德), 60, 104, 199, 206, 298

Geneva日内瓦, 14, 73; 亦见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

Genlis, C.-S.-F. Ducrest, comtesse de让利斯, C.-S.-F.迪克雷斯特, 伯爵夫人126, 129, 262, 296

Adèle et Théodore《阿代勒和泰奥多尔》, 289, 296

Annales de la vertu, ou cours d'histoi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美德年鉴, 或供青少年使用的历史课本》, 65, 296

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 【345】244, 290, 296

Théâtre de société《社交剧》, 290, 296

Germany德国, 268-269, 273

Gervaise de Latouche, Jean-Charles热尔韦斯·德拉图什, 让-夏尔, 291

Gessner, Salomon热斯内, 萨洛蒙, 201

Contes moraux et nouvelles idylles《道德故事和新田园诗集》, 290

Gilibert, Jean-Emmanuel: *L'Anarchie médicale, ou la médecine considérée comme nuisible à la société*吉利贝尔, 让-埃马纽埃尔:《医学无政府状态, 或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医学》, 295

Gille, Noël吉尔, 诺埃尔, 191, 200, 201-213, 303-304

Giraud吉罗, 48

Goezman, Louis-Valentin哥士曼, 路易-瓦朗坦, 247, 298, 332n51

Goldsmith, Oliver: *Histoire de François Wills*戈德史密斯, 奥利韦:《弗朗索瓦·威尔斯传》, 290

Gonthier, Widow贡蒂埃寡妇, 122

Gosse, Pierre, Junior戈斯, 小皮埃尔, 276

Goudar, Ange: *L'Espion chinois*古达尔, 昂热:《中国间谍》, 59, 206, 298

Grabit , Joseph Sulpice格拉比 , 约瑟夫-叙尔皮斯 , 72 , 76 , 89

Le Grand Albert 《大阿尔伯特》 , 299

Grand grimoire 《大魔法书》 , 200

Le Grand œuvre dévoilé 《炼金术揭秘》 , 299

Grand Théâtre大剧院 (波尔多) , 163

Grasset , François格拉塞 , 弗朗索瓦 , 97 , 114 , 134 , 321n4 ,
328n19

Grasset , Gabriel格拉塞 , 加布里埃尔 , 97 , 117 , 280

Grenoble格勒诺布尔 , 73 , 77-78 , 93

Grotius , Hugo格劳秀斯 , 雨果 , 297

Guichard , Antoine吉夏尔 , 安托万 , 101

Guilleminot吉耶米诺 , 48

Guillon l'aîné老吉永 , 38-39 , 59-60 , 116 , 165 , 180 , 278

Guset居塞 , 31

Haller , Emmanuel哈勒尔 , 伊曼纽尔 , 273

Helvétius , Claude-Adrien爱尔维修 , 克洛德-阿德里安 , 157 , 199

Le Bonheur 《论幸福》 , 287

De l'esprit 《论精神》 , 97 , 114 , 287

De l'homme 《论人》 , 200 , 283 , 287

La Henride 《亨利亚德》 (伏尔泰) , 229 , 290

Henri IV , drame lyrique 《亨利四世 , 歌剧》 (罗苏瓦) , 136

Henry of Lille里尔的亨利 , 208

Hérisson , Raymond埃里松 , 雷蒙 , 111

Heubach , Jean-Pierre厄巴克 , 让-皮埃尔 , 96-97 , 114 , 328n9

Heuby , Jean埃比 , 让 , 31

Histoire critique de Jésus Christ 《耶稣基督批判史》 , 204

Histoire d'Angleterre 《英国史》（休谟），294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查理十二世传》（伏尔泰），294

Histoire de Dom B... , portier des Chartreux 《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59，147，156，160，219，225，291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au règne de Louis XIV 《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韦利），129，181，201，293

Histoire de François Wills 《弗朗索瓦·维尔斯传》（戈德史密斯），290

Histoire de l'Amérique 《美洲史》（罗伯逊），102，155，156，164，167，182，293

Histoire gallante de la tourière carmélites 《加尔默罗修会负责收发的修女的风流韵事》（梅尼尔·德凯尔隆），291

Histoire de l'Eglise gallicane 《法国天主教教会史》，114

Histoire de Miss Jenny 《珍妮小姐传》（里科博尼），290

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faites par divers savants voyageurs dans plusieurs contrées de la Russie et de la Perse 《各类学者旅行家在俄国和波斯一些地区探索史》（帕拉），293

Histoire du parlement de Paris 《巴黎高等法院史》（伏尔泰），294

Histoire du Vieux et du Nouveau Testament 《旧约和新约史》（德朗日），116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教会史》（冯莫谢姆），257

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deux Indes 《欧洲人东西印度公司的哲学和政治史》（雷纳尔），【346】14，103，106，113，116，131，145，147，157-158，160，168，218，232，244，247，248，250，284，286，288，293，299，305

Histoire romaine 《罗马史》（罗林），293

L'Histoire universelle 《世界史》（雷纳尔），257

Les Hochets moraux , ou contes pour la première enfance 《婴幼儿道德小故事》（蒙热），168

D'Holbach , Paul-Henri Dietrich Thiry , baron , 霍尔巴赫 , 保罗-亨利·迪特里希·蒂里 , 男爵 , 179 , 330n30

Le Bon-sens 《健全的思想》 , 105

Le Christianisme dévoilé , ou examen des princip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揭开面纱的基督教 , 或检验基督教的原则和作用》 , 283 , 287

Politique naturelle , ou discours sur les vrais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 《自然政治论 , 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 , 297

Système de la nature 《自然的体系》 , 35 , 60 , 65 , 129 , 134 , 156 , 171 , 176 , 200 , 206 , 219 , 232 , 280 , 284 , 287

Système social ,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社会的体系 , 或道德学与政治学的自然原则》 , 206 , 297

Home , Francis : *Les Principes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végétation* 霍姆 , 弗朗西斯 : 《农业与植物起源》 , 295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 , 7-8 , 105 , 112 , 155 , 171 , 175 , 181 , 184 , 284 ; 亦见 Protestant literature

Hume , David : *Histoire d'Angleterre* 休谟 , 大卫 : 《英国史》 , 294

Illegal book 非法书籍 ; 亦见 Forbidden books , Smuggling

Les Illusions perdues 《幻灭》 (巴尔扎克) , 304

Import duties 进口关税 , 25 , 139 , 143 , 165 , 171 , 181 ,

Les Incas , ou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u Pérou 《印加人 , 或秘鲁帝国的毁灭》 (马蒙泰尔) , 225 , 244 , 247 , 284 , 289

Les Inconvénients du célibat des prêtres 《教士的禁欲主义的危害》 , 247

L'Ingénu 《天真汉》 (伏尔泰) , 155

Innkeepers 客栈老板 , 30 , 50

Insurance 保险 , 25-26 , 34 , 38-39 , 43 , 59 , 82 , 114-115 , 134 , 178 , 185 , 187 , 314n8 ; 亦见 Smuggling

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ts de

l'Europe 《欧洲国家地理学和政治学知识入门》（比兴），293

Introduction aux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 ,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 et sur les arts 《关于物理学、博物志和艺术的评论的导论》（罗齐耶），257

Isnard , Jean 伊斯纳尔，让，138

Isoard , Jean-Baptiste-Claude 伊索阿尔，让-巴蒂斯特-克洛德，151，246

Jacquenod , Claude-Marie 雅克诺，克洛德-马利，70，79

Jacquet , M. 雅凯先生，62

Jannet 雅内，32，36

Les Jardins 《花园》（德利尔），65，105，290

Jenrevetel , Abram 让雷韦特尔，亚伯拉罕，31

Jesuits 耶稣会，98，100，218；亦见 Catholics

Les Jeux et amusements de la petite Thalie 《小塔利亚的游戏与娱乐》，78

Jezennemours , roman dramatique 《热泽内穆尔：戏剧小说》（梅西耶），155，160，290

Jonet 若雷，48

Jougne 茹涅，30，236

Journal de Provence 《普罗旺斯报》，140

Journal des audiences 《庭讯日志》，208

Journal Helvétique 《赫尔维西亚月刊》，41，185，229，230

Journal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opérée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par M. de Maupeou 《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131-132，167，199，206，282，285

La Journée du chrétien 《基督徒的日子》（库雷-德维尔纳夫），【347】229

Jura Mountains 汝拉山脉，18，24，28，29-30，42f，187，254

Knapen , 纳庞 , 61

Koeppen , Carl Friedrich : *Les Plus secrets mystères des hauts grades de la maçonnerie dévoilés* 克彭 , 卡尔·弗里德里希 : 《揭开共济会高层的最神秘的面纱》 , 299

Laboras de Mezieres , Marie-Jeanne 拉博拉·梅齐埃尔 , 玛丽-让娜 , 见 Riccoboni , Mme

La Brulerie , Lord 拉布律雷里 , 领主 , 208

Lac de Neuchâtel 纳沙泰尔湖 , 28

Lac Lemman 莱蒙湖 , 30 , 32

Ladvoct , Jean-Baptiste :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portatif* 拉沃卡 , 让-巴蒂斯特 : 《袖珍地理词典》 , 103 , 104

La Fontaine 拉封丹 , 136 , 229 *Fables* 《寓言集》 , 156 , 290

Lair , Constantin 莱尔 , 康斯坦丁 , 52 , 185 , 217-222 , 275 , 333n3

Lalande , J. J. le François de : *Abrégé de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拉朗德 , J. J. 勒弗朗索瓦·德 : 《共济会简史》 , 168 , 299

Lambert , Vauquier 朗贝尔 , 沃基耶 , 216

La Neuveville 拉讷沃维尔 , 4

La Peyrouse , Jean-François de Galaup , comte de 拉佩鲁兹 , 让-弗朗索瓦·德加罗 , 伯爵 , 292

Laporte , Antoine 拉波特 , 安托万 , 155 , 156 , 157 , 159

La Rochefoucauld , François duc de 拉罗什富科 , 弗朗索瓦 , 公爵 , 229 , 324n2 *Sentences et maximes de morale* 《道德箴言录》 , 290

La Rochelle 拉罗谢尔 , 57 , 169-176 , 169f

La Tour , Boy de 德拉图尔 , 布瓦 , 70

Laurens , Henri-Joseph du : *Le Compère Mathieu* 洛朗 , 亨利-约瑟夫·迪 : 《马太兄弟》 , 200 , 206 , 283

Lauriers ecclésiastique 《教会的荣光》 , 190

- Lausanne洛桑，21，30，72；亦见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Lausanne
-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 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faire aimer la vertu*《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168，232，240，282，296，305
- Legentil de la Galaisière，G.-J.-H.-J.-B.： *Voyage dans les mers de l'Inde* 勒让蒂·加莱西埃尔，G.-J.-H.-J.-B.：《印度洋航行记》，292
- Lépagniez莱帕涅，246，255-262，266
- Le Planquer，André勒普朗凯，安德烈，207
- Le Portier，Pierre勒波蒂埃，皮埃尔，6，50，154
- Le Puy勒皮，49
- Le Roy，Amable勒鲁瓦，阿马布勒，12，83
- Letourmy，Jean-Baptiste勒图尔米，让-巴蒂斯特，57，78，204，222-227
- Letourmy frères勒图尔米兄弟，216，222-223，224，234
- Lettre de M. le Marquis de Carraccioli à M. d'Alembert*《卡拉乔利侯爵先生致达朗贝尔先生的信》，246
- Lettre de M. Linguet à M. le comte de Vergennes*《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兰盖），240，248
- Lettre d'un théologien à l'auteur du dictionnaire des Trois siècles littéraires*《一位神学家致三个世纪文学词典的作者的信》（孔多塞），283
-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朱丽叶·凯茨比夫人书简》（里科博尼），290
- Lettres de mistriss Fanni Butler*《范妮·巴特勒小姐书简》（里科博尼），290
- Lettres de Mme de Pompadour*《蓬帕杜夫人书简集》，157，172，188
- Lettres de Mme de Sévigné*《塞维涅夫人书简集》，145
- Les Lettres d'Eulalie*《欧拉丽书简》（多拉），78

- Lettres de Yorick à Eliza* 《约里克致伊莱扎的信》（斯特恩），289
- 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 《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信笺》（夏洛克），65，292
- 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 sur la France*，【348】*la Suisse, l'Allemagne et l'Italie* 《一个英国旅行家关于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信》（穆尔），292
- Lettres et mémoires de Mme de Maintenon* 《曼特农夫人的书简和回忆录》，208
- Lettres ostensibles* [Fake letters] 假信，144，173，237
- Lettres persanes* 《波斯人信笺》（孟德斯鸠），229，230
- Lettres philosophiques* 《哲学通信》（伏尔泰），158，159，176，244，283，286
-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险关系》（肖德洛·拉克洛），105，107，116，262，289
- Libelous works* 毁谤性书籍，60，90，103，116-117，131，144，147，199，284-286；亦见Forbidden books，具体书名
- Le Libertin de qualité* 《名门浪子》（米拉波），248
- Libourne* 利布恩，170
- 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兰盖，西蒙-尼古拉-亨利，131，145，218，248
- 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 monachisme* 《关于修道制度的哲学论文》，159
- Lettre de M. Linguet à M. le comte de Vergennes* 《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240，248
- 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 《巴士底狱回忆录》，145，147，248，253，298
- Liturgical works* 宗教仪式用书，见Religious literature
- Livani* 利瓦尼，50
- Lodeve* 洛代沃，111

Les Lois et constitutions de Pennsylvanie , traduit de l'anglais et dédié au docteur Franklin 《宾夕法尼亚法律和宪法，译自英文，并献给富兰克林博士》，77-78

Les Loisirs du chevalier d'Eon 《戴翁骑士的消遣活动》，206

Lons-le-Saunier 隆勒索涅，45-53

Lorraine 洛林，18

Loudun 卢丹，133，183-213

Louis XV 路易十五，60，80，100，144，199，244，284-285

Louis XVI 路易十六，7，68，131-132

Louis，Victor 路易，维克多，163

Lunéville 吕内维尔，18

Lyon 里昂，18，22，30，56，67-92

La Lyre gaillarde 《淫荡诗集》，291

Mably，Gabriel Bonnot de 马布里，加布里埃尔·博诺·德，148 *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论立法或法律原则》，240，297

Machuel，Widow 马许埃尔寡妇，202，205，208

Ma conversion 《我的转变》（米拉波），248，253

Macquer，Pierre-Joseph： *Dictionnaire de chimie* 马凯，皮埃尔-约瑟夫：《化学词典》，295

Magasin des enfants，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 《儿童杂志，或一位聪明的女家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的小学生的对话》（博蒙），240，296

Magnus，Albertus 麦格努斯，艾尔伯图斯，299

Mailly，Jean-Baptiste 马伊，让-巴蒂斯特，236

Maître italien 《意大利语老师》，101

Malesherbes，Lamoignon de 马勒泽布，拉穆瓦尼翁·德，25

Malherbe，Jean-François 马勒布，让-弗朗索瓦，133，180-201，205-206，207，208，217，287，330n29，331n36

- Les Malheurs de l'inconstance* 《反复无常的不幸》（多拉），136，289
- Manavit马纳维，157-158
- Map of Favarger's tour法瓦尔热旅行地图，17f
- Marchands forains* 流动商贩，183，186，187，191，201-203，210-213，303；亦见具体个人
- Margot la ravaudeuse* 《缝补女马尔戈》，179，182
- Marmande马尔芒德，162，163
- Marmontel，Jean-François马蒙泰尔，让-弗朗索瓦，288
- Bélisaire* 《贝利萨留》，65，289
- Contes moraux* 《道德故事集》，190，290
- Les Incas, ou la destruction de l'empire du Pérou* 《印加人，或秘鲁帝国的毁灭》，225，244，247，284，289
- Marseille马赛，【349】51，137-151，137f
- Martel马泰尔，122
- Martin frères马丹兄弟，31
- Massif central中央高原，49，186
- Masson，Jean-Philibert马松，让-菲利贝尔，46
- Masson，Philibert- Joseph马松，菲利贝尔-约瑟夫，46
- Mathey，Jonas Louis马太，约拿·路易，31
- Maupoeu，Rene Nicolas Charles augustin de莫普，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坦·德，131，247，298
- Maupeouana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t familière du chancelier Maupeou avec son cœur Sorhouet* 《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131，199，206
- Maupin莫潘，295
- L'Art de faire le vin* 《葡萄酒酿造技艺》，168，331n38
- Maximes du droit français* 《法国法律准则》，62
- Meister，Jacques-Henri梅斯泰，雅克·亨利，199

Mémoire au roi sur l'établissement des administrations provinciales 《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160-161，244，246，248，261，282，298

Mémoires 《审判备忘录》（博马舍），247

Mémoires authentiques de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 《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真实回忆录》，116，144

Mémoires de Fanny Spingler 《范妮·斯平勒回忆录》（贝卡里），289

Mémoires de l'abbé Terray 《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117-118，157，238，240，282，285

Mémoires de Louis XV 《路易十五回忆录》，60，117，225，245

Mémoires du clergé 《教士备忘录》，101

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 《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298-299

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 《巴士底狱回忆录》（兰盖），145，147，248，253，268

Mémoires turcs avec l'histoire gallante de leur séjour en France 《土耳其人回忆录及他们在法国逗留时的风流韵事》（道库尔），226，298

Mende 芒德，49

Mercier, Abram David 梅西耶，亚伯兰·达维德，9

Mercier, Louis Sebastien 梅西耶，路易·塞巴斯蒂安，106，129，131，145，168，262，266

L'An deux mille quatre cent quarante 《2440年》，35，60，126-127，145，171，174，175，181，187，206，242-243，282，286，288，304

La Brouette du vinaigrier 《醋贩子的独轮车》，290

Jezennemours, roman dramatique 《热泽内穆尔：戏剧小说》，155，160，290

Mon bonnet de nuit 《我的睡帽》，145，247，284

La Mort de Louis XI 《路易十一之死》，290

Le Philosophe du port-au-bled 《布莱港的哲学家》, 258

Portraits des rois de France 《法国国王的肖像》, 168

Réduction de Paris 《巴黎缩影》, 248

Tableau de Paris 《巴黎图景》, 65, 116, 142, 145, 147, 168, 244, 248, 284, 305

Messaline, La Religieuse en chemise 《梅萨丽娜：穿睡衣的修女》, 59

Metz梅斯, 18

Meuron frères默龙兄弟, 19-20, 21-22, 31, 33, 41, 88, 267

Meusnier de Querlon, Anne-Gabriel : *Histoire gallante de la tourière carmélites* 梅尼尔·德凯尔隆, 安娜-加布里埃尔 : 《加尔默罗修会负责收发的修女的风流韵事》, 291

Meyrin梅兰, 60

Michaut, François米肖, 弗朗索瓦, 34, 35, 36, 38, 40

Millavaux米亚沃, 33

Millot, Claude-François Xavier米约, 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 293

Eléments de l'histoire d'Angleterre 《英国史纲要》, 106, 293

Elément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法国史纲要》, 106, 293

Eléments d'histoire générale ancienne et moderne 《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 155, 201, 232, 284, 293

Milot, Michel : *L'Ecole des filles* 米洛, 米歇尔 : 《少女学校》, 226, 291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米拉波, 奥诺莱·加里布埃尔·里凯蒂, 伯爵, 40, 248

Des lettres de cachet et des prisons d'Etat 《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 40, 90, 248, 253

Errotika Biblion 《情色圣经》, 【350】40

Essai sur le despotisme 《论专制主义》, 40, 176, 250, 297

Le Libertin de qualité 《名门浪子》, 248

Ma conversion 《我的转变》, 248, 253

Miracles de Jé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神迹》, 206

Molière 莫里哀, 62, 104, 115, 117, 131, 136, 164, 182, 218, 288

Mon bonnet de nuit 《我的睡帽》(梅西耶), 145, 247, 284

Monget, M. : *Les Hochets moraux, ou contes pour la première enfance*
蒙热先生: 《婴幼儿道德小故事》, 168

Le Monialisme, histoire galante 《修女的风流韵事》, 156

Montaigne : *Essais* 蒙田: 《随笔集》, 291

Montandon, Jean-Jacques 蒙唐东, 让-雅克, 32, 33

Montargis 蒙塔日, 18

Montauban 蒙托邦, 52, 161

Montaud et compagnie 蒙托公司, 119

Montaudon 蒙托东, 37

Montélimar 蒙泰利马尔, 94, 110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157, 201, 288

Lettres persanes 《波斯人信笺》, 229, 230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94, 121-136, 122f

Moore, John : *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 sur la France, la Suisse, l'Allemagne et l'Italie* 穆尔, 约翰: 《一个英国旅行家关于法国、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信》, 292

Moreau, M. 莫罗先生, 62

Morelle 莫雷尔, 207

Morelly, Etienne-Gabriel : *Code de la nature* 摩莱里, 埃蒂安-加布里埃尔: 《自然法典》, 297

Morez 莫雷兹, 30, 33

La Mort de Louis XI 《路易十一之死》(梅西耶), 290

Mossy, Jean 莫西, 让, 138-147, 247, 266, 268, 276

Moutard, Nicolas-Léger穆塔尔, 尼古拉-莱热, 38, 61

Mussot米索, 222

Nancy, 南锡, 18

Narbonne, 纳博讷, 111

Necker, Jacques, 内克, 雅克, 245-246, 257-258, 297-298

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 Necker 《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 244, 246, 261, 298

Compte rendu au roi 《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 64, 246, 258, 298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论财政管理》, 41

Mémoire au roi sur l'établissement des administrations provinciale 《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 160-161, 244, 246, 258, 261, 282, 298

Neuchâtel纳沙泰尔, 3-18, 3f, 19f, 263-299, 265f; 亦见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Néville, Le Camus de内维尔, 勒卡米-德, 256

Nicolai, Christoph Fiedrich尼古莱, 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 232

Nicole et Galliard尼科尔和加利亚尔公司, 32, 33

Niecamp, Johan Lucas: *Voyages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 尼坎普, 约翰·卢卡斯: 《东印度群岛游记》, 65, 292

Niel, J.-J.尼埃尔, 123

Nimes尼姆, 57, 94, 109-121, 109f

Niort尼奥尔, 177, 193

Nouffer, Jean Abram努费, 让·亚伯兰, 104, 106, 160, 284, 328n19

La Nourriture de l'âme, ou recueil de 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pour les principales fêtes de l'année et sur différents sujets intéressants 《灵魂的食粮, 或用于每周各日、每年主要节日及各种有意义的主题的祈祷文集》(奥斯特瓦尔德), 105, 120, 283

Le Nouvel Abelard 《新阿贝拉尔》（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289

La Nouvelle Académie des dames 《新女子学校》，175

La Nouvelle Héloïse 《新爱洛伊丝》（卢梭），229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s Russes entre l'Asie et l'Amérique 《俄国人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新发现》（科克斯），106

Nubla, Jacques 尼布拉, 雅克, 33, 237-238, 239

Nyon 尼翁, 32

Observations sur des matières de jurisprudence criminelle 《关于刑事法学内容的评论》（里西），【351】332n50

Œuvres complètes d'Alexis Piron 《亚历克西斯·皮隆全集》，101

Œuvres de Molière 《莫里哀剧集》，101

Œuvres posthumes 《遗作集》（杜尔哥），254

Œuvres 《著作全集》（皮隆），106

Œuvres posthumes 《遗作集》（卢梭），287, 288

Olive 奥利弗, 33

Olivier, abbé : *Les Aventures de l'infortuné Napolitain* 奥利维耶神父：
《倒霉的那不勒斯人的奇遇》，145

Orange 奥朗日, 94, 110

Orléans 奥尔良, 46, 57, 173, 222-234, 223f

Ostervald, Frédéric-Samuel 奥斯特瓦尔德, 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
8-9, 10, 11, 14, 16-17, 22, 41, 49, 89, 91, 113, 125,
197, 230, 281

Ostervald, Jean-Frédéric 奥斯特瓦尔德, 让-弗雷德里克, 113

Abrégé de l'histoire sainte et du catéchisme 《圣史及教理书简易读本》，
105, 282

Ostervald, Jean-Rodolphe : *La Nourriture de l'âme, ou recueil de 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pour les principales fêtes de l'année et sur différents sujets intéressants* 奥斯特瓦尔德, 让-罗多尔

夫：《灵魂的食粮，或用于每周各日、每年主要节日及各种有意义的主题的祈祷文集》，105，120，283

Ouchy乌希，33

Pacotilleurs免费携带少量货物倒卖的船员，192

Parier, M. l'abbé帕里埃神父先生，62

Pallas, Pierre-Simon : *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faites par divers savants voyageurs dans plusieurs contrées de la Russie et de la Perse*帕拉，皮埃尔-西蒙：《各类学者旅行家在俄国和波斯一些地区探索史》，293

Panckouke, Charles-Joseph庞库克，夏尔-约瑟夫，20，23，61，70-72，73，227

Paper quality纸张质量，128，266-267

Parfait notaire《优秀公证人》，208

Parnasse libertin《放荡的帕纳塞斯》，206

Le Partage de la Pologne《瓜分波兰》，97

Parvi, Alerti : *Secrets merveilleux de la magie naturelle et cabalistique du Petit Albert*帕尔维，阿尔贝蒂：《小阿尔伯特合理而神秘的巫术神奇秘诀》，299

Pascal : *Les Provinciales*帕斯卡：《致外省人信札》，291

Pavie帕维，57，171-176，191，193，287

Le Paysan perversi ou les dangers de la ville《堕落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200，283，289

Péchéy佩谢，259

Peddlers零售摊贩，见*Marchands forains*

Pellet, Jean-Léonard佩雷，让-莱奥纳尔，75

Pensées diverses sur l'occasion de la comète《关于彗星的产生原因的各种思考》（贝尔），294

Pentinelle潘蒂内尔，171

Perdroux佩德鲁 , 222

Périsse frères佩里斯兄弟 , 70 , 79

Le Petit Albert 《小阿尔伯特》 , 299

Pézenas佩兹纳斯 , 111 , 154

Phéline费利纳 , 5 , 57

Phillipin , Jonas菲利潘 , 约拿 , 31

Le Philosophe moderne , ou l'incrédule condamné au tribunal de la raison 《现代哲学家 , 或在理性法院被判有罪的无信仰者》 , 229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自然的哲学》 (德萨尔) , 246-247

Le Philosophe du port-au-bleu 《布莱港的哲学家》 (梅西耶) , 258

Picot皮科 , 122

Pictet , Bénédicte : *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 et sur divers sujets* 皮克泰 , 贝内迪克特 : 《每周各日的及各种主题的祈祷文》 , 283 Pillait皮耶 , 207

Pingeron , Jean-Claude : *Description abrégée de la Jamaïque* 潘热隆 , 让-克洛德 : 《牙买加掠影》 , 105-106

Pion , Jean-François皮翁 , 让-弗朗索瓦 , 19 , 22-23 , 31 , 32 , 43 , 81 , 85 , 86 , 87 , 88 , 89 , 303

Piracy盗版 , viii , 67-80 , 318n1 ; 亦见Forbidden books , Smuggling

Piron , 【352】Alexis皮隆 , 亚历克西斯 , 62 , 104 , 115 *Œuvres* 《著作集》 , 106

Pisseau et Cognyé皮索和科涅公司 , 187

Planquais普朗凯 , 189-190 , 191 , 200 , 207

Les Plans et les statuts des différents établissements ordonnés par S.M. Impériale Cathérine II pour l'éducation de la jeunesse et l'utilité générale de son empire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为青年教育和公用事业建立的各种机构的计划和法规》 , 126

Plombières-les-Bains普隆比耶尔莱班 , 58

Plomteux , Clément普隆托 , 克莱芒 , 12 , 276

Les plus secrets mystères des hauts grades de la maçonnerie dévoilés 《揭开共济会高层的最神秘的面纱》（克彭），299

Poitiers普瓦捷，48，176-182，176f

Politique naturelle, ou discours sur les vrais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 《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霍尔巴赫），297

Pomaret, Rilliet, d'Arnal & Compagnie波马雷、里列和达纳尔公司，48

Pons, Albert蓬斯，阿尔贝，123

Pontarlier蓬塔利耶，18，19-44，242

Le pornographe, ou idées d'un honnête homme sur un projet de règlement pour les prostituées 《色情作品，或一个正人君子关于一项为妓女订立法规的计划的看法》（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291

Pornographic works色情书籍，147，156，158，179，226，248，291；亦见Erotic literature，具体书名

Porte de Saint-Claire圣克莱尔港，84

Porters脚夫，25-28，30，34-36，39-42

Portraits des rois de France 《法国国王的肖像》（梅西耶），168

Pott, Jules-Henri波特，朱尔-亨利，97

Preiswerck, Luc普雷韦克，吕克，29

Prières de piété 《虔诚祈祷书》，105

Prièr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et sur divers sujets 《每周各日的及各种主题的祈祷文》（皮克泰），283

Les Principes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végétation 《农业与植物起源》（霍姆），295

Privas普里瓦，110

Protestant literature新教书籍，7-8，111-112，113，116，117，121，131，133，136，157，165，171，173，175，181，199，279；亦见Huguenots，具体书名

Les Provinciales 《致外省人信札》（帕斯卡），291

Prudlhomme 普律多姆，195

Psaumes de David 《大卫的诗篇》，101-102，105，115，282

La Pucelle d'Orléans, poème héroï-comique, en dix-huit chants 《奥尔良少女，壮烈而滑稽的诗，诗歌十八首》（伏尔泰），200，206，282，286

Pufendorf, Samuel von 普芬道夫，萨穆埃尔·冯，148

Le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 《自然法与国际法》，297

La Putain errante 《游荡的妓女》（弗朗科），175，291

Quenelle, François 凯内尔，弗朗索瓦，207

Quesne 凯讷，192

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 《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伏尔泰），35，37，130，206，232，276，280，286

Rabaut, Paul 拉博，保罗，8，113，119

Rabaut Saint-Etienne, Jean-Paul 拉博·圣太田，让-保罗，8，113

Rabelais, François 拉伯雷，弗朗索瓦，216

Racine 拉辛，229

La Raison par alphabet 《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理性》（伏尔泰），104，156，160

Ranson, Jean 朗松，让，9，170，216

Raynal, Guillaume-Thomas-François 雷纳尔，纪尧姆-托马-弗朗索瓦，131，145，168，181，248

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deux Indes 《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14，103，106，113，116，131，145，147，157-158，160，168，218，232，244，247，248，250，284，286，288，293，299，305

L'Histoire universelle 《世界史》，257

Razoumowsky , Grégoire de : *Voyage minéralogique et physique , de Bruxelles à Lausanne*拉祖莫夫斯基 , 格雷古瓦·德 : 《矿物学和物理学之行 , 从布鲁塞尔到洛桑》 , 293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 et historique sur le célibat 《关于禁欲主义的哲学和历史研究》 , 【353】247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 (德波弗) , 332n48

Recueil de comédies et quelques chansons gaillardes 《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 , 200 , 224 , 226 , 282 , 291

Recueil des lois constitutives des colonies anglaises , confédérées sous la domination d'Etats-Unis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在北美合众国统治下结盟的英国殖民地基本法汇编》 , 297

Recueil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et les jeunes-gens , 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 , 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inspirer le goût de la vertu 《用作儿童和青年读物续编的选集 , 或适合用来既让他们娱乐又启发他们向往美德的短篇故事选》 (库雷·德维尔纳夫) , 230

Réduction de Paris 《巴黎缩影》 (梅西耶) , 248

Réflexions d'un Catholique sur les lois de France relatives aux Protestants 《一个天主教徒对法国有关新教徒的法律的看法》 (孔多塞) , 116

Réflexions sur les Confessions de J.-J. Rousseau 《关于J.-J.卢梭的〈忏悔录〉的思考》 (塞尔旺) , 287

Regault , Gabriel勒戈 , 加布里埃尔 , 62 , 117

Réguiilat , Veuve雷吉亚 , 弗夫 , 70

Reich , Philipp Erasmus赖希 , 菲利普·伊拉斯谟 , 273 , 320n1

La Religieuse en chemise 《穿睡衣的修女》 , 179

Religious literature宗教书籍 , 45-47 , 110 , 111-112 , 122 , 227 ; 亦见Protestant literature , 具体书名

Renoult , Jean-Baptiste : *L'Antiquité et perpétuité de la religion protestante*勒努 , 让·巴蒂斯特 : 《新教的古老与永恒》 , 283

- Resplandy, François雷斯普朗迪, 弗朗索瓦, 155, 156, 157
- Restaut, Pierre : *Abrégé des principes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雷斯托, 皮埃尔: 《简明法语语法原理》, 168, 240, 282
- Restif de La Bretonne, Nicolas-Edme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 尼古拉-埃德默
- La Fille naturelle* 《私生女》, 289
- Le Nouvel Abelard* 《新阿贝拉尔》, 289
- Le Paysan perversi ou les dangers de la ville* 《堕落的农民, 或城市的危险》, 200, 283, 289
- Le Pornographe, ou idées d'un honnête homme sur un projet de règlement pour les prostituées* 《色情作品, 或一个正人君子关于一项为妓女订立法规的计划的看法》, 291
- Revol, Geste et Compagnie雷沃尔和热斯特公司, 90
- Revol, Jacques雷沃尔, 雅克, 27, 43, 82-91, 102-103, 107, 115, 144, 147, 226, 278
- Révolution romaine* 《罗马革命》, 208
- Rhine River莱茵河, 18, 22, 29
- Rhône River罗讷河, 18, 22, 86
- Riccoboni, Mme里科博尼夫人, 126, 129, 190, 289, 299
- Histoire de Miss Jenny* 《珍妮小姐传》, 290
- Lettres de Milady Juliette Catesby* 《朱丽叶·凯茨比夫人书简》, 290
- Lettres de mistriss Fanni Butler* 《范妮·巴特勒小姐书简》, 290
- Richardson, Samuel理查森, 塞缪尔, 232, 290
- Rigaud, Isaac-Pierre里戈, 伊萨克·皮埃尔, 122-132, 276, 287
- Rigaud, Pons & Compagnie里戈、蓬斯公司, 122-123
- Risi, Paolo : *Observations sur des matières de jurisprudence criminelle*里西, 保罗: 《关于刑事法学内容的评论》, 332n50
- Roanne罗阿讷, 185

- Robert , Jacques 罗贝尔 , 雅克 , 55 , 58-64 , 317n3
- Robert et Gauthier 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 , 55 , 57-65 , 287 , 304 , 317-318n3
- Robertson , William : *Histoire de l'Amérique* 罗伯逊 , 威廉 : 《美洲史》 , 102 , 155 , 156 , 164 , 167 , 182 , 293
- Roberty , Pierre Joseph 罗贝蒂 , 皮埃尔-约瑟夫 , 105
- Rochefort 罗什福尔 , 50 , 170
- Rollin , Charles : *Histoire romaine* 罗林 , 查尔斯 : 《罗马史》 , 293
- Rondet , 【354】 Laurent-Etienne : *Apparat royal , ou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 et latin* 隆代 , 洛朗-埃蒂安 : 《皇家词典 , 或新法语和拉丁语词典》 , 282
- Roques 罗克 , 165
- Roubert frères 鲁贝兄弟公司 , 143 , 144
- Roulet 鲁莱 , 138
- Rousseau , Jean-Jacques 卢梭 , 让-雅克 , 7 , 14 , 62 , 64 , 116 , 131 , 136 , 157 , 187 , 210 , 218 , 231 , 247 , 262 , 286 , 297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让-雅克·卢梭著作全集》 , 283
Confessions 《忏悔录》 , 78 , 106 , 129-130 , 135 , 145 , 244 , 287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论》 , 190 , 287
Emile 《爱弥儿》 , 190 , 287
La Nouvelle Héloïse 《新爱洛伊丝》 , 229
Œuvres posthumes 《遗作集》 , 287 , 288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卢梭评判让-雅克 : 对话录》 , 130
- Rouzeau , Widow 鲁佐寡妇 , 222 , 224
- Royer , M. 鲁瓦耶先生 , 50
- Rozier , abbé : *Introduction aux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 ,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 et sur les arts* 罗齐耶神父 : 《关于物理学、博物

志和艺术的评论的导论》，257

Rutledge, Jean-Jacques拉特利奇，让-雅克

Le Bureau d'esprit《智慧局》，226

Les Comédiens ou Le Foyer, comédie en un acte et en prose《喜剧演员或休息厅，独幕散文喜剧》，282

Sabatier, Antoine : *Les Trois siècle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萨巴蒂埃，安托万：《法国文学三百年》，104

Sacareau et Moulas萨卡罗和穆拉公司，161

Les Sacrifices de l'amour《爱情的牺牲》（多拉），160，289

Saige, Joseph : *Catéchisme du citoyen*塞日，约瑟夫：《国民教义问答》，176

Saillant赛扬，61

Saint André圣安德烈，41

Saint-Claude Abbey圣克洛德修道院，58，60

Saint-Germain, Claude-Louis de圣热尔曼，克洛德-路易·德，249

Saint-Girons圣吉隆，11

St. John, Henry圣约翰，亨利，179

Saint-Maixant圣梅克桑，177

Saint-Sulpice圣叙尔皮斯，19，21-22，85

Saint-Victor, Guillaume de : *L'Adoption, ou la maçonnerie des femmes*圣维克多，纪尧姆·德：《接纳，或妇女共济会》，155，175，299

Sales reps销售代表，xi，11-14；亦见Favarger, Jean-François

Salins-les-Bains萨兰莱班，62

Saumur索米尔，185，216

Savoy萨伏依，14

Scabies疥疮，11，109-110

Schaub, Jean肖布，让，85

Schodelli , André肖德利 , 安德烈 , 85

Schwartz施瓦茨 (学徒) , 9 , 16

La Science parfaite des notaires 《公证人知识大全》 , 114

Secrétan et De la Serve塞克雷唐和德拉塞尔弗公司 , 33

Secrets merveilleux de la magie naturelle et cabalistique du Petit Albert 《小阿尔伯特合理而神秘的巫术神奇秘诀》 (帕尔维) , 299

Sens , Nicolas-Etienne桑斯 , 尼古拉·埃蒂安 , 52 , 114 , 158-160

Sentences et maximes de morale 《道德箴言录》 (拉罗什富科) , 290

Serini , C.A.塞里尼 , 273 , 328n19

Sermons pour les fêtes de l'Eglise chrétienne ,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discours sur la morale Evangélique 《基督教会节日用的布道文 , 继而用作关于新教道德的致辞》 (贝特朗) , 283

Servan , Antoine塞尔旺 , 安托万 , 297

Discour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criminelle 《论刑事司法的管理》 , 332n50

Réflexions sur les Confessions de J.-J. Rousseau 《关于J.-J.卢梭的〈忏悔录〉的思考》 , 287

Shaftesbury , Antony Ashley-Cooper , Earl of沙夫茨伯里 ,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 伯爵 , 199

Shakespeare , William莎士比亚 , 威廉 , 291

Sherlock , Martin : *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夏洛克 , 马丁 : 《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信笺》 , 65 , 292

Shipping agents货运代理商 , 19-20 , 26-27 , 30 , 33 , 184 , 185 , 259 ; 亦见具体个人

Shipping costs运输费用 , 【355】125-126 , 134 , 174 , 233 , 244 , 269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路易十四时代》 (伏尔泰) , 294

Smith , Adam : *Fragments sur les colonies en général et sur celles des Anglais en particulier*斯密 , 亚当 : 《总体地有关殖民地和具体地有

Smollett, Tobias 斯摩莱特，托比亚斯，11

Smuggling 偷运，走私，14，20-39，36f，278；亦见Forbidden books，Insurance

Société royale de physique d'Orléans 奥尔良皇家物理学会，230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Berne 伯尔尼出版社，86，95，268，269，276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Bouillon 布永出版社，181，204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 日内瓦出版社，130，145，257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Lausanne 洛桑出版社，12，95，268，269，276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纳沙泰尔出版社，ix-x，xf；亦见Favarger，Jean-François

阿维尼翁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93-108

贝赞松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241-262

布卢瓦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215-222

波尔多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63-169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55-66

毛细管分销体系，vii，183-213

书目，56，77，127，147，164，185，270，279

通信人，48-49，49f

收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55，118-120，135，150-151，195-197，220-221

第戎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234-240

交换方针，93-108

拉罗谢尔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69-176

隆勒索涅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45-53

卢丹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83-213

里昂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67-92

马赛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37-151

蒙彼利埃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21-136

纳沙泰尔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3-18，263-264

尼姆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09-121

奥尔良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222-234

普瓦捷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76-182

蓬塔利耶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9-44

纳沙泰尔出版社价格表，5-6，56

把书籍出口到法国的策略，24-44

图卢兹书商与纳沙泰尔出版社，153-163

Sombert松贝尔，48

Spallanzani，Lazzaro斯帕兰扎尼，拉扎罗，294

Sterne，Laurence斯特恩，劳伦斯

Lettres de Yorick à Eliza 《约里克致伊莱扎的信》，289

Le Vie et les opinions de Tristram Shandy 《绅士特里斯特拉姆·尚迪的生平与见解》，289

Voyage sentimental 《伤感之旅》，145，283，289

STN纳沙泰尔出版社，见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29

Sube et Laporte叙布和拉波特公司，138

Supplément au Roman comique，ou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a vie de Jean Monnet 《滑稽小说补编，或用作让·莫内传记的回忆录》，128，129

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 《布干维尔旅行游记补编》（狄德罗），292

Sûre叙尔，50

Système de la nature 《自然的体系》（霍尔巴赫），35，60，65，

129 , 134 , 156 , 171 , 176 , 200 , 206 , 219 , 232 , 280 ,
284 , 287

Système social ,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社会的体系，或道德学与政治学的自然原则》（霍尔巴赫），206，297

Tableau de Paris 《巴黎图景》（梅西耶），65，116，142，145，
147，168，244，248，284，305

Tableaux des saints mystères ou Christianisme dévoilé 《神妙圣事图，或揭开面纱的基督教》，199

Tailhe , 【356】 Jacques : *Abrégé de l'histoire ancienne de Monsieur Rollin* 泰勒，雅克：《罗林先生的简明古代史》，181-182

Taine 泰纳，138

Tarascon 塔拉斯孔，110

Téron , Jacques-Benjamin 泰隆，雅克-邦雅曼，97，117，280

Tevenet 特维内，31

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 《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让利斯），244，290，296

Théâtre de société 《社交剧》（让利斯），290，296

Théâtre français 《法国戏剧集》，62，89

Théologie de l'Ecriture sainte 《圣经的神学》，105

Théologie portative 《袖珍本神学》，166

Théorie des lois criminelles 《论刑法》（布里索），332n50

Thérèse philosophe 《哲学家泰蕾兹》，97，157，158，159，166，
179，190，210

Le Thévenon ou les journées de la montagne 《勒泰弗农，或山中的日子》（贝特朗），155

Thomas , Antoine-Léonard :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 le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 托马，安托万-莱奥纳尔：《论不同世纪的妇女的性格、道德观念和才智》，65

Tissot , Samuel-Auguste-André-David 蒂索，萨米埃尔-奥古斯特-安德

烈-达维德

Avis au peuple sur sa santé 《大众健康建议》, 102, 168, 283, 295

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 《论文人保健》, 136

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gens du monde 《论上流社会人士的疾病》, 226

Traité d'épilepsie 《癫痫论》, 136

L'Onanisme 《手淫》, 136

Toland, John 托兰, 约翰, 179

Toulon 土伦, 111

Toulouse 图卢兹, 153-163, 153f

Tournel 图尔内尔, 122

Tours 图尔, 216

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 《性病论》, 145

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 《论三个骗子》, 35, 147, 287

Traité d'orthographe 《论拼写》, 120

Traité générale du commerce de l'Amérique 《美洲贸易通论》, 146

Transport costs 运输费用, 见Shipping costs

Traval literature 旅行文学, 138, 245, 291-293; 亦见具体书名

Tremblay, Abraham 特伦布莱, 亚伯拉罕, 296

Tévoux 特雷武, 73

Les Troglodites 《穴居人》(库雷·德维尔纳夫), 230

Les Trois siècle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法国文学三百年》(萨巴蒂埃), 104

Troyes 特鲁瓦, 18

Turgot 杜尔哥, 248

Œuvres posthumes 《遗作集》, 254

Turin都灵，146-147

Un Indépendant à l'ordre des avocats sur la décadence du barreau en France 《一位独立观察者就法国律师团体的腐败问题致律师公会》
(布里索)，249

Uzès于泽斯，57，110

Val de Travers塔威山谷，【357】30，31，242

Valence瓦朗斯，51，94，110

Valmont de Bomare, Jacques-Christophe : *Dictionnaire raisonné universel d'histoire naturelle* 瓦尔蒙·德博马尔，雅克-克里斯托夫：
《博物志通用推理词典》，182，201，295

Van Haller, Albrecht范哈勒，阿尔布雷赫特，136

Vattel, Emer de瓦特尔，埃梅·德，148

Le Droits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国际法，或自然
法原则》，106，296-297

Vauchet, M.沃谢先生，62

Velly, Paul-François :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au règne de Louis XIV* 韦利，保罗-弗朗索瓦：《从
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129，181，201，
293

Vénus dans le cloître 《修道院里的维纳斯》(巴兰)，156，291

Veny, Adolphe韦尼，阿道夫，259

Verdun凡尔登，18

Vergennes韦尔热讷，107

*Véritable secret du petit Albert éprouvé dans plusieurs villes et villages avec
appellation et conjuration* 《用称呼和咒语在几个城市和村庄验证过
的小阿尔伯特的真实奥秘》，199-200

Vernareil韦尔纳雷尔，6，48，57，77，317n3

Les Verrières莱韦里耶尔，19f，34，37，40，85

Veuve Louis Bouchet et Cie.弗夫·路易·布歇公司，100

Veuve Odezenes et fils弗夫·奥德泽内父子公司，111

Veuve Rameau et fils弗夫·拉莫父子公司，236-237

Veuve Réguillat et fils弗夫·雷吉亚父子公司，70

Vialars , Père , fils et Thouron维亚拉尔父子和图隆公司，123，125，
135

Viard , Nicolas-Antoine : *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 , 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 : 维亚尔，尼古拉-安托万：《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240

Le Vie et les opinions de Tristram Shandy 《绅士特里斯特拉姆·尚迪的生平与见解》（斯特恩），289

Vie et lettres de Ninon de Lenclos 《尼农·德朗克洛生平与书简》，157

Vienne维恩，94

Vie privée de Louis XV 《路易十五的私生活》（当热维尔），64，65，
103，106，245，283，286-286

Vie privée ou apologie de Mgr. le duc de Chartres 《夏特勒公爵大人的私生活或辩护词》，174

Vie voluptueuse des Capucins 《嘉布遣修士的骄奢淫逸的生活》，156

Viviers维维耶，110

Voix de la nature 《自然之声》，157

Voltaire伏尔泰，97，111，117，129，136，142，157，159，168，
181，190，200，218，247，262

La Bible enfin expliquée 《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156

Candide 《老实人》，272-273

Eloge hitorique de la raison 《理性的历史颂歌》，244

Essai sur les mœurs 《风俗论》，294

La Henride 《亨利亚德》，229，290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查理十二世传》，294

Histoire du parlement de Paris 《巴黎高等法院史》，294

L'Ingénu 《天真汉》, 155

Lettres philosophiques 《哲学通信》, 158, 159, 176, 244, 283, 286

La Pucelle d'Orléans, poème héroï-comique, en dix-huit chants 《奥尔良少女, 壮烈而滑稽的诗, 诗歌十八首》, 200, 206, 282, 286

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 《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 35, 37, 130, 206, 232, 276, 280, 286

La Raison par alphabet 《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理性》, 104, 156, 160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路易十四时代》, 294

Von Mosheim, Johann Lorenz :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冯莫谢姆, 约翰·洛伦茨 : 《教会史》, 257

Von Rochow, Friedrich Eberhard : *L'Ami des enfants à l'usage des écoles de la campagne* 冯罗霍, 弗里德里希·埃伯哈德 : 《供乡村小学用的儿童之友》, 103, 104

Vosgien, 【358】abbé :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portatif* 沃吉昂神父 : 《袖珍地理词典》, 103, 104

Voyages à l'Isle de France, à l'Isle de Bourbon, au Cap de Bon Espérance, etc. 《法兰西岛、波旁岛、好望角等地游记》(德圣皮埃尔), 102, 292

Voyage au pôle austral et autour du monde 《南极及世界环游记》(库克), 107

Voyage autour du monde 《世界环游记》(布干维尔), 139, 292

Voyage dans les mers de l'Inde 《印度洋航行记》(加莱西埃尔), 292

Voyage de l'Italie, ou recueil de notes sur les ouvrages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qu'on voit dan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Italie 《意大利之行, 或关于在意大利主要城市所见到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笔记汇编》(科尚), 293

Voyage en Sicile et à Malte 《西西里与马耳他游记》(布赖登), 292

- Voyage minéralogique et physique , de Bruxelles à Lausanne* 《矿物学和物理学之行，从布鲁塞尔到洛桑》（拉祖莫夫斯基），293
- Voyage pittoresque aux glaciers de Savoye* 《萨瓦冰川风光游记》（博尔迪耶），292
- Voyages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 《东印度群岛游记》（尼坎普），65，292
- Voyage sentimental* 《伤感之旅》（斯特恩），145，283，289
- Le Vrai Communiant* 《真正的领受圣餐者》（德叙佩维埃尔），116，283
- 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 , 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 《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维亚尔），240
- Wagon drivers 货车车夫，30-31
- Witel , Jérémie 维特尔，热雷米，40
- Wollston , Thomas 伍尔斯顿，托马斯，179
- Young , Arthur 扬，亚瑟，11
- Yverdon 伊韦尔东，30

普 莱 希 特 哲 学 史 ①

Philosophieren ist das Schärfen unserer Instrumente des Denkens in der Hoffnung, die begrenzte Zeit unseres Daseins ein wenig bewusster zu erleben. Und sei es auch nur, um zu verstehen, was wir nicht verstehen.

认识世界

ERKENNE
DIE
WELT

中
世
纪
哲
学
古
代
与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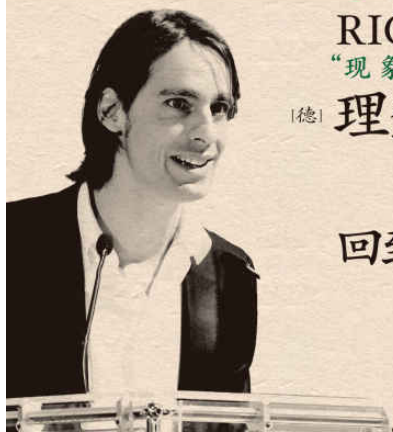
RICHARD DAVID PRECHT

“现象级”公共哲学家 | 百万级畅销作家

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回到生活，
回到历史现场，回到社会中，
讲述哲学问题探讨史

陈嘉映、刘擎、许知远——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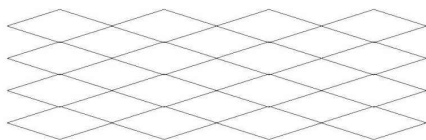
普 莱 希 特 哲 学 史 ①

认识世界

ERKENNE
DIE
WELT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古代与中世纪哲学



RICHARD DAVID PRECHT

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著 王俊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 / （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著；王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普莱希特哲学史）

书名原文：Erkenne die Welt: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and 1: Antike und Mittelalter

ISBN 978-7-208-16751-3

I．①认… II．①理…②王… III．①哲学史—世界 IV．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1867号

书 名：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

作 者：【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译 者：王俊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薛宇杰 李 頔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751-3/B·150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Original title:

Erkenne die Welt -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and 1: Antike
und Mittelalter) by

Richard David Precht

Original title: ERKENNE DIE WELT by Richard David Precht

© 2015 by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Verlagsgrupp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Random
House Verlagsgruppe GmbH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导言【11】

雅典学园【21】

古代哲学

从前在爱奥尼亚……【37】

西方大地的日食

第一位哲学家？

古老的故事

遥望宇宙【50】

信仰制造者【55】

神话的力量【58】

万物的尺度【63】

罪责与债务

金钱的本质

毕达哥拉斯

权力集团

赫拉克利特

巴门尼德

人的本性【90】

逻各斯所在

转世的灵魂

失落的天堂

灵魂的材料

温和的灵魂

一切皆为质料！

流浪汉、他的弟子与雅典公共秩序【118】

苏格拉底之谜

民主之路

实用哲学家

受到危害的秩序

公共审判【136】

柏拉图【140】

脚本真人秀

表象与存在【149】

贵族改善世界

可靠的知识可能吗？

蜡版与鸽子

柏拉图的神话【163】

世界之非本真化

洞穴图

金钱还是荣誉？柏拉图的国家【180】

对社会的不满

整理灵魂！

理想国

对国家中的婚姻、家庭与私有制的抨击

马格尼西亚，或通往那里的路

事物的秩序【210】

世界灵魂；一窥柏拉图的宇宙

暗中敌手

上天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

“存在”意味着什么？

自然的秩序

宇宙、猴子、人类

有死的灵魂，不朽的精神【244】

适合的道德【248】

道德动物学

德 性

品性的统一性

幸福，以哲学的方式生活

在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之间

女人、奴隶与野蛮人

家庭经济与金融经济

避世者与怀疑者【279】

被管理的世界

嬉皮士与挑衅者【284】

“此后”的一代

怀疑论与怀疑

随意的隐秘魅力【293】

错误生活中的正确生活【298】

无限的世界，冷漠的诸神

快乐伦理

自我管理

斯多亚派【312】

程序化的世界【318】

做最好的自己！

自然本能与道德要求

合法化与赋魅【334】

一种新精神的征兆

新兴大都会

罗马的崛起，雅典的遗产

变革者的转变

怀疑天命

摩西，所有哲学家的老师！

变得神圣！

柏拉图式城邦中少数人的沉思【366】

奥古斯丁或上帝之恩典【373】

耶稣、保罗、基督教及其早期门徒

新宗教的形成

怀疑、阅读与虚构的经历

债与罪

时间、意识、爱、启悟

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

罗马的覆灭与慰藉

中世纪哲学

在教会的阴影下【415】

修道士、教皇、圣人

南北方国家的建立

爱留根纳，或自由意志【426】

逻辑与信仰

上帝可以证明吗？

阿伯拉尔

玫瑰之名

创世的意义与目的【450】

亚里士多德归来！

基督教的时间，物理学的空间

阿尔伯特

托马斯【467】

新的上帝存在证明

世界的祛魅【475】

对技术的赞美

意识决定存在
意志与个体性
奥卡姆剃刀
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在我们身上思考的质料

诸神的黄昏【506】

权力的阴暗面
统治的合法性
万物静止【515】
被统治者的权利【520】
人身上的神性
新的坐标

附录

注释

选读文献

致谢

人物索引

内容索引

图片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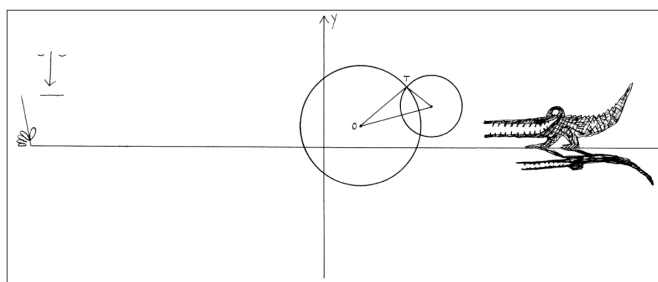
译后记

献给科隆那些处事老练、富有教养的伊朗出租车司机

宇宙由故事构成，而非原子。

——穆里尔·鲁凯泽（Muriel Rukeyser）

导言【11】*



很高兴你拿起这本书。或许你还不知道，你将由此开启一段多么漫长而奇妙的哲学之旅。你如果打算沿着适才踏上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将会步入变化多端的思想风景之中：从西方哲学的发源地美丽的小亚细亚海岸，一直到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和书斋、教堂和大学。接下来的几卷将带领你穿过整个欧洲，直到你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将局限于西方哲学，虽然如我们所知，像波斯、中国、印度及其他文化也有自己重要的哲学史。但如果要书写这些哲学史，则须对其文化有非常准确的认识，并掌握他们的语言。此外，这样一项工程极易变得漫无尽头。即便仅限于西方，设法不让读者在浩瀚的资料中丢失全貌，亦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这里，我不会对你的诸多问题做出肯定或确切的回答。【12】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是开放的问题，而每一个回答又会立即引发新的问题。伟大的法国怀疑论者及人文主义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说过：“令我们感到幸福的是享受，而不是占有。”这句话总是适用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哲学史中多样的思想、观念、论证以及推论的人。研究智慧的思想，描述它，理解它，然后进一步思考，这是一项令人享受的精神活动。阅读是与他人的大脑一道思考，而领悟读到的内容则是与自我持续的对话。吸引人的，是这一前景，即能够比之前更加明达地思考世界。

你手中的这部哲学史不是辞典或者百科全书，它也不是关于重要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词典和百科全书并不罕见，很多工具书也非常不错。此外还有无数关于哲学史的整体描绘，其中不少相当出色。然而尽管所有这些作品都想要超越时间的限制，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从其时代的视角

来考察哲学史。比如在19世纪初，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还能够相信，哲学是一条上升的路线，在他自己的工作中实现完满的终结。而黑格尔的年轻对手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已然愤怒地批评这样一种被彻底诠释的哲学史了。阅读一段被完全评定了的历史，就像“吃别人咀嚼过的食物”。

之后的哲学史家比黑格尔更为谨慎。他们放弃了依据自己的兴趣对历史做完美的整体构思。【13】但是，认为哲学史是向真理持续迈进的历史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直至20世纪的进程中，这种乐观主义才渐渐对于我们变得陌生。哲学思想的前进并不必然意味着真理的揭示与明了。今天在我们看来，真理这个概念在很多方面就已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在某些地方更聪明，但也因此绝不是智慧的。或许用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话来说：“我们在前行中迷失！”

书写哲学史的一个特别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今天已经争论得足够频繁的那个问题，即，哲学到底是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哲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也就是那些语言逻辑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毋宁有些类似于思想技艺，即一种技艺，它思考美丽而又睿智的语句。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因为在这两种彼此争论的见解背后隐藏着差异极大的观点，即在哲学中究竟隐含或应当隐含多少科学或自由风格。哲学论证的说服力在逻辑上是否类似于自然科学？或者哲学是更为审美化的，像艺术一样？

这二者都有其论据以及传统。在它们的创立者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看来，哲学是关于正确生活的追问。为了过这样一种生活，我必须懂得很多。而我只有通过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并由此为“真”的观点，才能获得确切的知识。因此，在古典传统中，哲学有些类似于关于知识的科学。亚里士多德将逻辑推论引进哲学并借此建立了科学思考的前提。直至19世纪，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追随这两位伟大的希腊哲人，将他们的专业视为科学或者凌驾于所有其他学科之上的超科学。【14】所有其他特殊科学都栖居于哲学这片屋檐下，哲学应当协助它们——由此才能正确地理解哲学自身。

其中一种情况是，到黑格尔时代为止的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怀有如下出发点，即存在唯一一种哲学，就如同也存在唯一一种数学和唯一一种物理学一样。黑格尔在这种程度上书写哲学史——那基本是最早的哲学史作之一，即仿佛这栋思想建筑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上。整个建筑的黏合

剂是被称为理性的建筑材料。由此，康德（Immanuel Kant）与黑格尔等伟大的哲学家相信，理性也是超时间的、客观的。因此，哲学家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以理性的方式洞悉世界，以此促使永恒的真理大白于天下。

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对唯一一种哲学和唯一一种理性的这种信仰已变得陌生。最晚是在20世纪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唯一一种理性并不存在。康德所说的“理性的普遍源泉”，已经挥发成众多个别的发源地。如果谁要努力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理性，也只能在字面上实践。他不仅得遵从一种逻辑，还要遵循一种语法。并且他要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受文化的限制和浸染。而只要人们愿意，哲学应当成为科学的要求也能在这些变化的迹象中得以保持。只是哲学现在已不再是关于知识的科学，而是关于那些符合逻辑或者不合逻辑的命题的科学，通过这些命题人们确立起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诚然，这样的一门科学不再解释，而只是描述。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分析哲学在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之后所走的道路。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哲学思想是思想的艺术。它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脱颖而出。叔本华，还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怀着冲天之怒摧毁了对唯一一种理性的信仰以及所有建基于其上的哲学。【15】在19世纪的进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处理的是世界观，而非世界建筑（Weltgebäuden）。哲学家不再是认识这个世界，而是向它投去极富主观性的目光。他权衡，评价，争论，使问题尖锐化，并且面对世界和生活强调一种特别伦理学的或者美学的立场。与此同时，在艺术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艺术也不再呈现客观的可见之物，而是使主观之物可见。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用文学的笔触精心构思，试图以美学的方式让读者沉浸其中。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中我们就已遇到同样的情形，即以散文式的代替科学式的。卢梭（Rousseau）、狄德罗（Diderot）或者伏尔泰（Voltaire）不囿于体系思考，他们创造了思想雕塑、思想形象或者“哲学论断”（Philosopheme），以取代原先的那些哲学。就如艺术形成了很多风格和主义，那些世界观哲学也与此相似。人们不再建造一座大楼，而是凸显一种思想风格，而世界观就成了标志。这种传统沿袭至今，尤其是在其发源地法国。

将哲学视作科学还是思想的艺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会对这一问题形成大相径庭的观点，即研究哲学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

的。在分析哲学家看来，研究哲学史是相当多余的。如前文所提到的，分析哲学家将他们的职业视为一门科学，是可以与那些具体科学相类比的。而众所周知，这些具体科学深入聚焦于当下的问题与知识状况。一个将要成为医生的人为什么要学习一堆医学史？大概除了自牛顿以来一直还具有适用性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外，【16】一位物理学家还必须了解多少文艺复兴时期或者巴洛克时期物理学的谬误和推论？

以这样一种观点看来，哲学史也呈现为理论和假说的集合，这与今天影响广泛的语言分析式哲学研究之情形不再完全吻合。我在大学期间对哲学史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并不乐意成为史学家，而是想“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不想埋首于哲学文献中的各色历史，而是要探寻超越时间的真理：历史是辩证的进程吗？人们能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人权吗？是否存在诸如真理或者正义之类的东西，它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否一以贯之？

教授们研究这些宏伟的问题，但一般而言大多时候都只触及边缘。德国大学的课程表上有大量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的讲授课和研讨课，这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看起来，在这里历史明确支配着当下。由此人们可以推断，很多教授显然不持这一观点，即认为在哲学史中，先贤的哲学会随着一位新的思想者的出现而消亡，变得毫无意义。“哲学”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以文化的方式保存超越时代之价值的行为。哲学学习者首先应该琢磨透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掌握哲学知识。

我的方式是要对两种要求均加以考虑。这本书不是哲学，也非简单地就是哲学史。借用康德的表述，它是“关于哲学的哲思历史”（*philosophierend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此外它要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并且披上大段故事叙述的外衣。【17】一方面，所讲述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时代背景中加以介绍和讨论。如果没有政治、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提示，很多思想和观念就会显得很深奥。哲学家的生平不会在书中从头到尾地展示。哲学思想并不是从真空中形成的，也不是在后人与先贤之间进行讨论的空间中产生的。比如说，古希腊并非仅仅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产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其间。不如说，人们的生活和思考受到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哲学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其中。

与此相反，对于历史状况和时代基调的单纯陈述的确无法令读者满意。几乎所有古代世界的问题都仍是我们的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真理？是否有正义？如果有，它如何可能？生命是否有意义？人在

自然和宇宙中居于何种地位？是否有上帝？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对人类历史的反思。如果人们想要恰当地评价这些反思，就必须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将过去哲学家的观点分类、评价并区分其优劣。因此，正是在这个发展交汇点上，过去的理论总是反复与今天的思想发生关联。

此外，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中，即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视为某个特定的哲学流派或者思想学派的代表。然而如前文提到的，按照他们的自我理解，绝非如此。他们不像后来的哲学家那样，努力强化自己的标签、自己的历史身份，而是围绕世界整体而努力。【18】柏拉图既不属于柏拉图学派，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笛卡尔不为笛卡尔主义锻枪铸剑，而是为探索这个世界费心劳力，别无他选。对于一部哲学史的作者而言，这就意味着，要万分谨慎地避免对历史做出归类、贴上标签。那种分类编目的做法常常极为轻易地就掩盖了他真正想要揭示的东西。

每一段历史描述中最困难的问题始终是选择与评价。鉴于整个写作计划的篇幅限制，这一计划将分为多卷。这样一部哲学史是不完美的，并且它也不想完美！相反，我总是一再地决定挑选特定的视角。书写历史意味着选择并置入关联之中。而这些评价自然是高度主观的，哪怕评价的意图并非如此。任何一种普遍化对事实的个体性而言都是不公平的，对于思想和理念的个体性也是如此。因此，在此呈现的哲学史仅仅是一种（eine）哲学史。就如同所有其他的历史一样，它不可避免地有所粗疏、忽略。

对于这段哲学史最重要的认识兴趣，也不在于对所有重要的哲学家进行尽可能完整的阐明。没人知道到底谁才是最重要的哲学家，这就是问题的开始。因此有这样的哲学家，由于他们时至今日在哲学史中还保持着重要性，因此看起来很重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哲学家，他们曾经一度对哲学很重要，但是今天很少受到关注。还有一些哲学家和讨论，在古代哲学史上仅受少许关注，但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很有启发性并且极为有趣。还有，人们尤其应该想到那些在他们的时代完全无足轻重的哲学家，比如叔本华，以及尼采。【19】后者今天被看作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他巨大的声望是在死后才获得的。而一些哲学家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时代精神曾赋予他们巨大的重要性，但是今天他们已失去影响力。我们又该如何对待那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家，比如马克思（Karl Marx）、弗雷格或者卢曼（Niklas

Luhmann)，按照他们的自我理解，他们根本不是哲学家。

这种情况就要求，哲学史不能完全按照编年的方式讲述那些被选出的哲学家。一些个别问题总是会被着重加以评价和说明。而这整部著作可被视为一种连载小说，它谈及的是那些始终同样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其常新的时代外衣。

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历史”总是一次令人棘手的冒险。人们过于仓促，就像那些游客，他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滩上、在豪华度假村的栅栏后度假，而后声称已经认识了这个国家。因而最终人们应当谦虚道，他们并没有书写哲学史，而只是在传承的狭小道路上留下一个新的脚印，这个传承形成了那样一些图景，时至今日我们将之与那些时代对应起来。

亲爱的读者们，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哲学向你呈现的并非只是知识领域甚或“专业”，那么这部哲学史的任务就算达成了。因为所有哲学最终都不只是专业知识的获取。在20世纪之前，大部分伟大的思想家都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行动。”这种行动让我们对生活和共同生活中经常出现疑问的假设和断言更为敏感。你的目标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唯一一种真理（*die Wahrheit*）。【20】热爱真理的人不会吹嘘自己占有了真理！你的目标是扩展我们思考和生活的范围。做哲学是对我们思考工具的磨砺，其寄希望于，我们能稍微更自觉地体验到我们存在的有限时间。而这可能只是为了，去理解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

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科隆，2015年7月

* 方括号内数字为德文原版页码，全书同。

雅典学园【21】

哲学的非现实魔法



雅典的一个美丽夏日，天空是地中海般的蓝色，飘着少许云彩。阳光照进由四扇拱门隔开的富丽堂皇的大厅。58位古希腊人在这座教学大楼的小台阶上或站着，或蹲坐着，或蜷伏着，或斜躺着，他们在从事所有职业中最美好的一种：哲学思考！

他们以或明显或细微的姿势，讨论、沉思、写作或计算，构思与争辩。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到钦佩、惊讶、好奇、疑问、怀疑以及深深的沉思。这就是那张关于什么是哲学以及哲学家如何从事哲学的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别无第二幅。

这幅没有名字的画是一幅壁画，它挂在梵蒂冈宫廷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的私人居室中。当然，我们相信所有人都知道这幅画所展示的内容以及它被称作什么：《雅典学园》。【22】它的创作者拉斐尔（Raffaello）在1509—1511年间完成了这幅作品，却未给其命名。直到一百多年后，意大利的画界同仁伽斯帕雷·切利奥（Gaspare Celio）才给了这幅画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

拉斐尔27岁时，他像一颗闪耀的明星从艺术氛围浓厚的佛罗伦萨来到了罗马。他第一次为教皇工作，是为一座新建住宅三楼的房间绘制壁画。这是一份来自最高级别的委托，也有着最高的要求。尤利乌斯二世在历史上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称作“吸血鬼”，这位冷酷无情、生性好战的教会之主一步步确立了罗马教廷的权威。究竟是为为什么，这位圣座之上的暴君要在他的私人居室内挂一幅有关哲学的画作？

这项任务非常棘手。拉斐尔对哲学知之甚少，他是一位画家，而绘画是一项精致的手工技艺。人们向其他画师学习绘画，但并不在学院里研究绘画。拉斐尔要绘画的房间原先乃是计划用来做尤利乌斯二世规模浩大的私人图书馆。后来这个房间被更名为签字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将在此进行审判。拉斐尔在墙壁上的绘画涉及的其他主题有神学、法律、德性和美的艺术。世界上的所有知识与诗艺都将在此房间内交汇，共同彰显教皇的自我价值观念和教廷的要求，即，使一切相互统一。

然而，哲学适合这里吗？这里所聚集的任何一位古希腊哲学家都不信仰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但在教皇的神学家们看来，古代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并无冲突。佛罗伦萨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和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将柏拉图主义变得令宫廷得以接受，甚至入了教廷的法眼。由此人们怀着强烈的意愿并且毫不顾及其哲学上的缺陷完成了以下任务：将柏拉图视作基督教的前驱，【23】完美地将其与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Plotin）归为一类，并与摩西（Moses）和耶稣（Jesus）一道排入同一个族谱中。

据说拉斐尔在壁画上忠实地画下了这一切。画的中央出现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仿佛两个具有神圣风格的超人形象。在一幅晚些的尼德兰版画中，人们甚至还赋予他们圣像的光环，并且将之运用到彼得（Petrus）和保罗（Paulus）身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是其他卓越的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跪在左前方，正在一本书上书写，第欧根尼（Diogenes）倚靠在台阶上，欧几里得（Euklid）（或是阿基米德 [Archimedes]？）在右前方摆弄着圆规，鼻子小而翘的苏格拉底（Sokrates）穿着橄榄绿的长袍，正在和一位长发论战者打着手势。

为了把58个人物一一辨认出来，那些艺术史家，主要是19世纪的艺术史家费尽了心机。然而，他们所有猜测仅仅是推断而已。事实上，我们只能再辨识出另外三位，而他们根本不是古希腊哲学家！位于前面穿深色衣服者，通常被认为是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那位，却有着拉斐尔的重要竞争者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容貌。而拉斐尔自己也处于画的右前部边缘处。他戴着深色头巾，有一副苍白的天使般的面孔，站在他的助手、穿白色衣服的索多玛（Sodoma）身旁。

把同时代的人偷偷放到历史题材的画中去，这一做法在文艺复兴以

及之前的中世纪都司空见惯。即使柏拉图也并非是完全按照他那座古代最有名的半身雕塑所展现的样子画的。同时代人很容易在他的容貌上看到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面容。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难想象，因为随着达·芬奇年龄的增长，他的形象风格很像古希腊哲学家。然而达·芬奇只是从视觉上看更像柏拉图，他的哲学偶像则是亚里士多德。

拉斐尔画了一个仿佛是寻常可见的哲学家群体，【24】就像一位恰巧站在旁边、置身事外的访客一定能感知到的情形那样。这幅画直到16世纪初还是完全新鲜的。总的来说，如果哲学要在画上被永久保留，它通常要以女性形象来比喻。与此相反，拉斐尔却已然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段生动叙事，它出自柏拉图的对话《普罗泰戈拉篇》

（*Protagoras*）：

我们进到里头，看见普罗泰戈拉在柱廊下来回散步，而走在其身旁的，一边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伯利克里之子帕拉卢斯——也就是卡里亚的同母异父兄弟、格劳孔之子卡尔米德；而另一边是伯利克里的另一个儿子克珊西普，远处是菲罗美鲁之子腓力庇得，还有门德的安提谟鲁……而那些紧随其后、听他们交谈的人好像大部分是外邦人，也有一些本地人围在这个圈子里。普罗泰戈拉吸引了他所经过的各个城邦的人，用奥菲斯一样美妙的声音迷惑他们，而人们也像是被符咒镇住了似的跟着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地望着这群人，发现他们小心地留意不让自己的脚步超过到普罗泰戈拉的前面。当普罗泰戈拉和那些在他左右的人转身的时候，后边的听众马上分开，让出路来，秩序井然，每一次都像是画一个圆圈，按照最美妙的秩序重新在后面占据他们各自的位置。^[1]

接下来，对普罗泰戈拉为数众多的听众的描写并没有结束。出现了一幅位于富丽堂皇的大厅内的巨大舞台图景，舞台中央站着那位哲学家。这个场景绝对带有讽刺意味，因为柏拉图并不喜欢普罗泰戈拉。对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狂热被煽动起来，仅仅是为了彰显这位名人的虚荣心，而他却被他的听众高估了。

在这里，柏拉图的对话展现的所有场景被拉斐尔当作样板使用，【25】并出于其他目的进行改动，这几乎不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年轻的画家既不会希腊语也不会拉丁语。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艺术史家们猜测，这幅壁画背后一定有一位精神指导者，就是梵蒂冈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维泰博的埃吉迪乌斯（Aegidius von Viterbo）。埃吉迪乌斯是

当时最出色的柏拉图研究专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普罗泰戈拉篇》。只有在他或者类似学者的帮助下，拉斐尔才能如此大规模地模仿大量古代人的外形和特征，然后把想象中的希腊人投射到梵蒂冈的墙壁上。

然而恰好是这个哲学真空地带，造就了我们哲学的普遍印象，除此之外当今再无第二幅画作能有如此影响。正如在拉斐尔那里，哲学总是像永恒的仙境、思想的圣地。求真的沉思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地在此之中碰撞交织，如同成对的蜻蜓。《雅典学园》中的哲学家与科学家彼此之间可能有上百年的时间差距，但在这里看起来并没有违和感。其实画中的许多人物不可能同时、同地地出现。观察者像是亲身参与了这个场景，尽管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这同样不妨碍画作的完成。

或许，正是如此神圣的非现实化，使得这幅画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魅力；借助人物和观念，一张根本与历史无关的历史画作揭示了它的历史背景。这些人物和观念在象征与假装的真实之间来回闪烁。如果不是1527年罗马大劫掠（Sacco di Roma）后，雇佣兵在掠夺中毁坏了壁画，这些人物今天还会在哲思着……

然而，如果离开画面的想象，对我们来说，古代哲学往往比乍一看起来更难理解。【26】一方面，哲学与我们非常亲近并且是当下在场的。在演说中最常被引用的“民主的摇篮”就存在于此。绝大部分哲学中的关键术语，例如灵魂（*psyché*）、理念（*idea*）、实践（*pragma*）、政治（*politeia*）以及其他很多词语，在字典中再次出现，比如心理学（*Psychologie*）、观念（*Idee*）、实用主义（*Pragmatismus*）、政治学（*Politik*）。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化通常看起来就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延续，可能甚至是逻辑上的推进，其间历经了基督教中世纪的更新。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古代哲学的理解。从今天的角度出发去看，古代哲学是我们西方思想的源头，西方思想的多样的延续是我们所熟悉的。但与此相反，对于爱奥尼亚、意大利南部和雅典哲学家而言，他们的哲学活动不是2500年之久的成就史以及问题史的起源。他们之中没有人把自己当作先驱或者前辈。他们也从未对此下过判断，即出自他们思想的某些内容——无论其是明白可信的，还是闪烁模糊的——要被当作“永恒”的哲学观念，而另外一些内容则不是。赫拉克利特真的有用短句“一切皆流”来总结他的哲学吗，就像后来有些人想把这个句子提炼成他思想的精髓那样？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好像在两种分离的意识状态中体现出不一致，有

时是“物理学家”，有时则又是“先知”，果真如此？因为我们不知道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什么。“理念论”真的是柏拉图思想的中心组成部分，还是仅仅对于柏拉图主义来说是这样？

人们可能并没有感到足够惊奇，我们竟有来自古希腊的如此多样的文字证据。即便不是原稿，而是存在于中世纪的手稿中，也是如此。保存这些文本的方式通常是晦暗不明且含糊不清的。手稿是以何种频率被誊抄在莎草纸或者羊皮纸上，携带上旅途，并且不被异见者发现，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它们有所知？另一方面，【27】有多少古希腊的文献遭遇了火灾、毁坏以及被基督教的审查员有意摧毁？

我们今天还保有的是这样一些文本，它们在两千多年中显然十分被看重，并且一直运气不错。常常是偶然的不可见之手，把一些文本留传了下来，而另一些却没有。根据公元500年之前古代图书馆所留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可以辨认出古希腊以及罗马世界大约3000位古代作者的姓名！不过到今天，只有400人为我们留下了著作。据说单单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公元前47年就已拥有50万至70万件卷轴。其中的绝大部分永远消失了。

可以估计，古代的非基督教文献中只有千分之一留传下来，也就是只有大约3000个章节。图书馆目录中出现的大约150位古希腊世界的悲剧诗人中，我们今天仅仅还有其中三位的几部作品。早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家，我们同样只有残篇。尽管普罗泰戈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声名显赫，但他传说中卷帙浩繁的著作遗失了。因此，最后他是借由经柏拉图流传的一个命题进入哲学史的。我们可以认真地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关于斯宾诺莎（Spinoza）、卢梭、康德、黑格尔、萨特（Sartre）或者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被化约为一个单独的命题，那我们会形成如何怪异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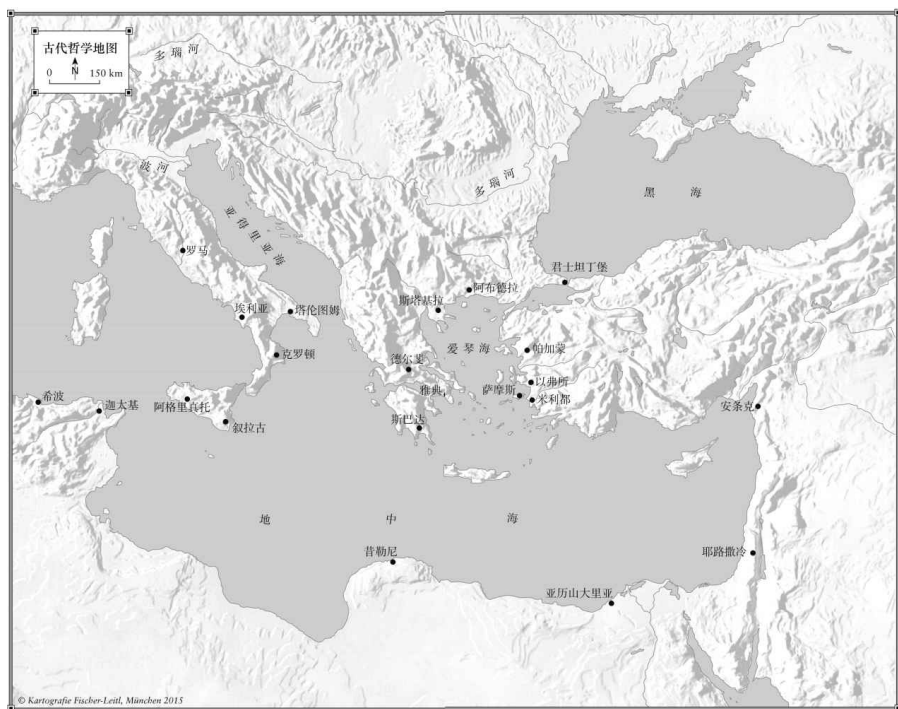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拥有几乎所有柏拉图的对话录，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争论，这些对话根本上在讨论什么。“真正的”柏拉图是否最终根本没有藏匿在他的学园对话中，而是在他“未成文的学说”中？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却相反，恰好是他的那些决定不予发表的文本留传了下来，即其讲座的记录。【28】反倒是亚里士多德公开发表的那些东西，几乎全部都遗失了。关于其他很多希腊哲学家，我们常常只有残篇以及后世的总结。除了个别特例（如普罗提诺），那数百年间几乎没有一位哲学家得到完整的再现。这一情况在中世纪看来也没什么根本的不同。留传下来的内容丰富或完整的著作，比贫乏与不完整的罕见得多。

当一部哲学史的作者在选择人物和内容并以有趣的方式描述时，主观性就会愈加强烈。本书第一卷的重点将大致放在那些引人入胜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自然哲学的问题上。另外一些内容，比如逻辑领域，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会忽略，因为这对于大多数读者并不易懂。因此我谈柏拉图时集中在认识论和伦理学，其他某些有趣的内容我会一笔带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只有部分被涉及，出于叙述编排的原因，我将在第二卷补充论述他的《政治学》。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普罗克洛斯（Proklos）以及辛普里丘（Simplikios）被舍弃了。同样，我也没有详细谈论像奥利金（Origines）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Clemens von Alexandria）这些教父。在中世纪，这种情况的思想家还包括赫拉巴努斯·毛罗斯（Hrabanus Maurus）、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von Sankt Viktor）、彼得·约翰·奥利维（Petrus Johannes Olivi）、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拉蒙·鲁尔（Ramon Llull）肯定也谈得过少。此外，我把很多神学的讨论舍弃了，例如那些关于三位一体学说或者隆巴（Petrus Lombardus）的语录评注的讨论。对于不同学者的复杂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后续问题，我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不过，问题不单单在选择上。在写作古代和中世纪哲学时，没有人能够纵览他所写的时代。《雅典学园》误导我们看到的那种一览无余的清晰性，我们在研究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过程中从没有获得过。而当我们从远处向哲学的这些开端投去带有情感色彩的目光时，【29】这种情感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里找不到任何倚靠。因此，让我们从西方哲学不那么思想化（ideell），而是非常人性化的（menschlich）起源处开始我们的旅程吧。且要从这样一些人开始，这些人不幸地在地后世被冠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称呼，因此仿佛他们的思想“还不是”伟大的思想，尽管对他们自身而言当然绝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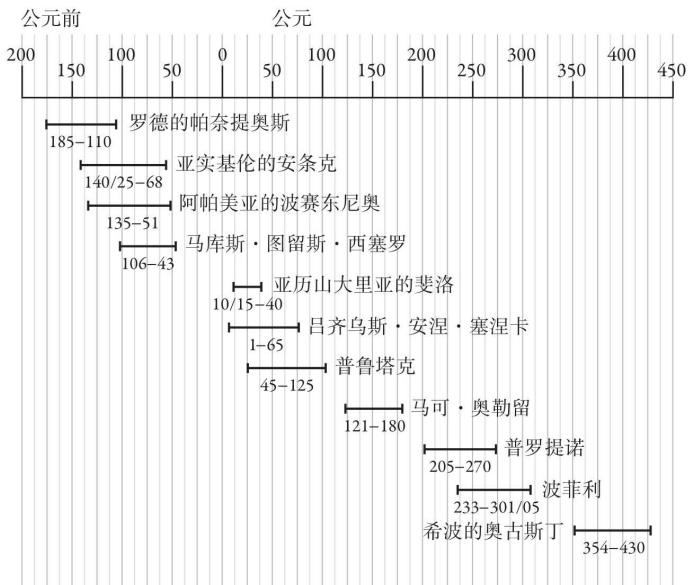
古代哲学

PHILOSOPHIE DER ANT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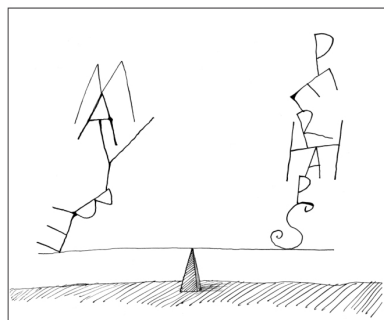
古代哲学家时间表





从前在爱奥尼亚……【37】

西方大地的日食——第一位哲学家？——古老的故事——遥望宇宙——
信仰制造者——神话的力量



西方大地的日食

西方哲学诞生于今天土耳其5月的一个美好夜晚吗？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在米利都这座城市中的某一处，柏树、橄榄树或是葡萄藤下？抑或是在地中海初夏热气退却的空气中缺水的树木下？这一夜，大西洋小亚细亚的上空出现了日全食。六分钟以后喧闹过去，但它的后果是惊人的。互相敌对的米底人和吕底亚人的军队面对着诸神的介入，在战役中放下了武器，结束了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唯独一个人未受这一切影响：智者，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von Milet）。因为，他已经预先精确计算出这次日食，并公布出来，这是一个传奇。

记录这件事的编年史作者生活在另一个世纪。【38】他记载了之后一百年的大事件：他就是古希腊历史之父，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 von Halikarnassos）。据说泰勒斯计算出日食的时间，但希罗多德并没有指明精确的日期，而仅只是年份。^[2]关于泰勒斯预言的第二处来源更为可疑。它来自3世纪，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八百多年。古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收集了所有他能够找到的故事和逸闻。他写道：“有些作者”指出，泰勒斯——

被描述为第一位天文学家，预言了日食，确定了至日。他最早确定了从至日到至日的黄道，之后还得出太阳直径和月亮直径分别

与各自的运行轨道之比为1:720。他第一个计算出每月的最后一天是“第三十天”，还探究了一些自然理论问题。^[3]

这位被之后的编年史家笃信具有如此伟大的天文学开拓性成就的泰勒斯，究竟是谁？我们关于泰勒斯生平几乎所有的了解，都要归功于第欧根尼·拉尔修，一个由于不可靠而声名狼藉的来源。据说，泰勒斯出生于公元前624年。他也许出身米利都的贵族家庭，又或许是一个迁居至米利都的腓尼基人。这座城市位于爱琴海边的一个海角之上，拥有四个港口，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了一段多舛的历史。来自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成功迁移到这里，海地特人曾占领这个城市，吕底亚人也曾把手伸向这里——这个城市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毁。而泰勒斯生活在米利都的鼎盛时期。载着油、羊毛和服饰的商船从崎岖的小亚细亚沿海，驶向今日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叙利亚和埃及。而七十多个殖民地使米利都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重要的权力中心之一。

我们今天并不清楚，在这个贸易中心，【39】泰勒斯所扮演的究竟是何种角色。关于泰勒斯的真相是，我们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真相。他所写的文本没有任何一篇留传下来，而关于他的思想，我们也几乎没有比亚里士多德写下的简短总结更多的东西了。据说他作为一位工程师，曾使一条河流改道。可能他确实根据自然法则解释了尼罗河的洪水，计算出金字塔的高度。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泰勒斯还插手了政治。据说他建议爱奥尼亚人在爱奥尼亚的中心，即提奥斯，成立一个辐射诸多城邦的政府所在地，以便为这些地区建立一个共有的权力中心。

按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看法，泰勒斯位于古希腊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开端之处；他是一个没有名师指导的自学者，曾在埃及停留进行研究。据说他从那里带回了几何学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学说。无论如何，他关于自然的知识看起来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日食预言，光靠从埃及带回的天文学知识一定是不够的。而即便他对巴比伦人的天文观察有所知晓，但在公元前6世纪，没有人可以预言日食的时间，更别说是地点。甚至连太阳年的确切长度也无从知晓。

今天仍有历史学家认为，泰勒斯所谓的预言只是胡说一通，不知怎么碰巧了而已。这些历史学家实在不能对如下情形表示满意，即后人很显然想通过一个天文学奇迹为泰勒斯增添光彩。很明显，类似的自然科学奇迹也会被说成是他的追随者所为。这样人们就从对地震和陨石撞击的预言中看到了某种计算，【40】即便在21世纪这种计算也不可能达到

精确。

为什么自古希腊以来，关于泰勒斯预言的神话对哲学史如此重要？也许仅仅是因为它非常适合那个时代。它刻画了人和时代的形象，这个时代准备拒绝信仰和迷信，去认识真正的自然法则。如果泰勒斯预言了日食，这就意味着，日食是自然事件。与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它可以被智慧的自然研究者认识并且计算出来。独立的学者取代了占星家和预言家，他不再进行苦思冥想，而是朴实、客观、理性地洞察自然及其法则——他是第一位理性主义者。事实上，这就是哲学史家对泰勒斯和爱奥尼亚哲学所描绘的图景。因此，关于泰勒斯预言的说法，并不在于它是真实的，而在于它表明了一种对于自然的看法和一种对于世界的态度，我们更乐于将它与爱奥尼亚自然哲学联系起来：它是自然科学的起源，甚至也许总的来说，是科学思想的起源，因此这是西方的诞生时刻。

第一位哲学家？

在进一步思考西方世界是否发端于一场日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将目光短暂地投向那个被像泰勒斯这样的希腊人视为家的生活世界。“希腊人”（*graecus*）这个概念已经具有一些误导性，因为它出自罗马人之口，也就是说，来自一个晚得多的时代。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今天希腊国土上，【41】公元前7和前6世纪的居民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与之相反，存在着许多彼此相对独立的、小规模的城市邦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米利都。大部分人口并非生活在城市中，而是生活在种植葡萄和培植橄榄树与无花果的乡村，他们是自给自足者。人们在贫瘠薄产的土地上开垦灌木林，填平沼泽，创造出新的耕地。此外，人们还饲养绵羊和山羊。它们是所有家畜中最易饲养的，能一直攀爬到粗粝的山脉顶端。只有贵族才有能力养牛，并使用他们的草场来培育马匹。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扩张，而小农的土地则在缩小。尽管如此，占有一定统治区域的强权君主仍未出现。崎岖的山脉、大海与数量众多的岛屿阻碍了一个大国的形成。相反，这种地理条件造就了许多拥有单一、分散社会的小国家。

然而在这些社会中，泰勒斯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蕴含重大变革的时代。地中海东部繁荣的贸易使米利都之类的城市不得不建造商船。他们从农业人口变成一股海上力量。为了保护船队和殖民地，人们建造了越

来越大的战船，那是拥有三排划手座的高弦船。这就出现了新的职业阶层，自然研究者（*physikoi*）、技术专家与工程师，泰勒斯就属此类。他们的任务是在道路、防御工事和港口改进基础设施。人民在富足的条件下成长，要得到供给，就必须确保供水。在很多地区君主政体被推翻，贵族一步步扩张权力。米利都也有很多贵族家庭。他们强烈反对独裁暴君、单一种族，或是反对吕底亚人和波斯人，以捍卫他们的财产。与他们的情况相反，没有土地的人口数量正在增长。他们作为打工者在那些小国家与港口之间迁徙。【42】这就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而妇女和奴隶承担了繁重的劳作。

社会、经济以及军事问题日益显著，宣告了一个喧嚣时代的到来。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从来都不是。）在这个背景下流传的那些关于泰勒斯的广为人知的逸事，都是由古代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阐述的。这两位的故事多少透露出“哲学家”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故事特别带有吹捧的色彩。这个故事作为实例，证明了哲学理性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的智慧和具体的实用性。当人们——

由于泰勒斯的贫困而指责他，认为哲学似乎毫无用处时，据说泰勒斯凭借他的天文学知识预测了橄榄将要丰收，尚在冬天就用他手头为数不多的钱作为订金，以无人竞争的低价租下了米利都和希俄斯所有的榨油机。当（收获）时节到来、一时间需要大量榨油机时，泰勒斯就以很高的价格出租他的榨油机，因此如其所愿，他以这种方式大赚了一笔：这证明了，对于哲学家来说，变得富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他们有意愿。但实际上这从来不是他们所意愿的。【4】

也许，这一逸事更多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是谦逊的全能者的看法，而非那位历史上的智者泰勒斯。这个故事直至今天依然让人觉得有趣，是因为面对直接的经济上的成功，我们的世界对哲学学识的轻视依然如故。显然，古代哲学家已经不得不为他们明显无用的职业做辩护。【43】在备受推崇的古希腊精神生活中，这个情况糟糕地呈现出一种略显庸俗的图景。

关于泰勒斯精通经营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作家汉斯·沃尔施莱格（Hans Wollschläger），他花费了七年时间翻译乔伊斯（James Joyce）的代表作《尤利西斯》（*Ulysses*）。因为感觉到这项要求极高的工作在社会上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他曾经铿锵有力地说道：“您得相信：能给全世界带来美妙艺术的人，也有能力经营一家布丁工厂。”^[5]由此他想说，任何一个像他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创造力和智慧的人，只要他想，就能够在这个可鄙的世界中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当我与沃尔施莱格谈及此事时——他是一个高度敏感且些许腼腆的男人，问他是否真的相信他做企业家或者经理人能够成功，略加迟疑之后他说道：“坦率地说，也许不能……！”

相应地，柏拉图关于智慧的泰勒斯行事的故事则有些不留情面：

相传泰勒斯在进行天文学观察、抬头仰望星辰时，不慎落入井中，受到一位机智伶俐的色雷斯女仆的嘲笑，说他费尽心机地想知道天上的事，但却对眼前和脚下的东西一无所知。^[6]

柏拉图所说的逸事听起来如此简单，却令哲学史家大伤脑筋。因为与亚里士多德视泰勒斯为无所不能的专家的伟大故事不同，在这里，这位哲学家令人失望地溜走了，像傻瓜和笨蛋一样。如何理解色雷斯女仆的嘲笑？显而易见这是对脱离生活的理论家的嘲笑，他从未成功地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当然此后的哲学家仍然在寻找这样那样的途径，来对此事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人们通过仰望天空才能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真正的位置，并且认识那些自然法则，【44】借助于这些知识才能建造出像水井这样的实用之物。因此色雷斯女仆的嘲笑是愚蠢的。但是人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修正这个故事，才能认识到，这并非警告哲学家在思考全宇宙时不要忘记脚下的土地。

我们应当承认，即使在古希腊也仅只有极少数的人致力于自然法则的解密或者探寻关于宇宙的思辨理论。生活不是仙境（正如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 以讽刺的口吻所写的那样）。对世界的哲学观察历来都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局外人之事。

泰勒斯的理论能够代表他所处时代的一般想法吗？这些理论中最著名的一条是，泰勒斯将水视为一切生命之源。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写道：

泰勒斯说水 (*hydor*) 为……本原 (*arché*)。因此他认为大地也漂浮在水上。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也许是由于看到万物都由潮湿的东西来滋养，就是热自身也由此生成，并以它来维持其生存。事物所由之生成的东西，就是万物的本原。如果这是泰勒斯观

点的原因之一，那么如下情况则是另外一个原因：一切事物的种子都具有潮湿的特性，而水是那些潮湿东西的本性的原则。^[7]

在亚里士多德按照他自己的品味所给出的他的先驱们的总谱系图中，泰勒斯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据说他是将所有自然现象归因于唯一起源的第一人。而将水视为一切生命和存在之根源的观点，则要比泰勒斯古老得多。亚里士多德也知道这一点。他了解“远古时代”的看法，关于大海、河流与所有水井之父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神话，他的妻子忒提斯（Thetis）是“世界生成的创造者”。诗人荷马（Homer）与阿尔克曼（Alkman）讲述了关于他们的故事。而历史学家今天则注意到更为古老的原始材料。【45】巴比伦的创世神话中就有元水（Urwasser），它比世界更为古老，更确切地说就是阿卜苏（Apsu）的淡水和迪亚马特（Tiamat）的海水。埃及人的创世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希伯来人那里也有，在巴比伦囚禁时期，他们遵循着万物之主的神话，让神之灵先于万物漂浮在“水面之上”。

尤其让人吃惊的并不是泰勒斯视水为一切生命之源的观点，而是亚里士多德赋予这个命题一个转折，为其添加了一个全新的特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泰勒斯不仅认为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的，而且认为万物自始至终都是由水构成的。这更具独创性，如果这真是泰勒斯的观点的话。

但是尚不清楚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重述的是否真的是泰勒斯的观点，而不是来自瑞吉翁的希庞（Hippon von Rhegion）的观点。后者大约比泰勒斯晚150年，他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曾宣称，泰勒斯将水规定为第一原则和第一实体（*arché*）。

水是基础之物，是不变之物吗？其他万物，如空气、土地、植物、动物和人皆由此产生，是这样的吗？根据我们今天所知，生物是有生命的——而空气、土地以及水本身则不是生物！这些是如何被归到一起的？哪些特质可能使泰勒斯相信水是一切质料的质料？如果水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么是什么使它处于运动之中？如何理解生成与变化？为什么水不是单纯地保持为水本身，而是形成了整个宇宙？

关于这些问题没有完满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对此也保持沉默。尽管他告诉我们：“泰勒斯相信，万物皆充塞着诸神。”^[8]但是在这里诸神所意味的是什么——到底是具体的诸神的形象，或者只是一个普遍的赋予万物灵魂者，亚里士多德并未透露。后一种情况看起来更有可能。

【46】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泰勒斯应该是把磁铁石视为“被赋予灵魂的”，因为它们拥有移动铁的力量。^[9]如果磁铁拥有灵魂（*psyché*），那为什么赋予自然以形式的水却没有呢？或许是因为，水本身就是支配万物的灵魂材料，它自我赋形并自我运动？泰勒斯信仰神话中的诸神吗？他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认为万物皆有灵？或者他是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第一个唯物主义者，只承认自然力量，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物？

古老的故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提问：在泰勒斯的时代，希腊人相信什么？人们相信哪些传说与传统？为什么？

实际上存在着一些文本，帮助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居民在世界中理解自身，即便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阅读它们，而其中的内容仍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被人知晓。最重要的文本是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s*）——这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荷马的多行叙事诗是包括罗马帝国时期在内的古代最畅销的书。虽然今天没有人知道，荷马到底是谁，以及所有归于他名下的文本是否真的出自他之手——对古希腊人来说这些叙事诗意义非常。尽管希腊人从《伊利亚特》以及稍微没那么流行的《奥德赛》（*Odyssee*）中了解的真实历史并不多——那是一场很久之前关于亚细亚城邦特洛伊的战争，但是这些诗歌长久以来向人们解释了世界。

一个完整的宇宙在关于诸神与英雄的史诗中展开。富有、高贵且有权力的人成为礼仪、习俗与道德的榜样。这些叙事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希腊远比人们在公元前8世纪发现它时更为光芒四射、

【47】繁荣富有。国王和英雄决定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他们也受到友谊、忠诚与荣誉的约束。同时，他们也常常是自负、无节制与冲动的，是一个高傲的高贵种族，对赌赛、战争、通奸和撞坏船只有着强烈的癖好。挤满诸神的奥林匹斯山被归为他们的地盘，这些神的行为举止与荷马笔下人世间的英雄几无区别。他们熟知人性之事。宙斯的天空中与阿伽门农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几乎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还有第二个来源有助于希腊人形成关于世界的复杂想象。那就是赫西俄德（Hesiod）的诗歌。在他的代表作说教诗《工作与时日》（*Werke und Tage*）与《神谱》（*Theogonie*）中，希腊居民获得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解释。《神谱》向人们讲述了所有他们必须知道的事，其目的是为了理解天空

与时间、大地与水、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以及最后，他们自己到底从何而来。赫西俄德查阅了所有神的形象，包括他们的来历与功能，从原初神卡奥斯（*Chaos*）、盖亚（*Gaia*）、塔耳塔洛斯（*Tartaros*）、厄洛斯（*Eros*）、厄瑞玻斯（*Erebos*）、倪克斯（*Nyx*），直至他那个时代的诸神。那些在赫西俄德之前的遥远时代就在许多模糊的故事中叙述过的东西，现在获得了一个独特的造型与固定的系统。

与此相反，《工作与时日》呈现的戏剧性更弱。人类的朋友与唤醒者普罗米修斯的传说就是从《神谱》中节选出来的。《神谱》中提到的潘多拉也再次出现，在这里打开了她著名的盒子，所有的恶习与人们的邪恶品质从中逃逸出来。与那些关于世界生成的消遣性的性与犯罪的故事不同，《工作与时日》讲述了关于那个世界时代极其悲伤的终曲。

【48】从光芒四射的黄金时代，历经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与英雄时代，直至贫乏的黑铁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当下。也是从赫西俄德那里，希腊人知晓了把世界划分为正义与罪孽（*Hybris*）的王国。更重要的是许多对于农民的忠告，有很多实践性的指导，应当如何利用牲畜，如何播种土地，以及如何为寒冷的冬日做准备。如果说今天的史学家能有这样一幅图景，看到当时许多小农的艰辛生活是如何展开的，那首先就是通过赫西俄德。如果说《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理解闲散状态下与战争期间的贵族阶层的伦理学不可或缺的来源，那么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则提供了一种渺小而艰辛劳作的人们的伦理学之类的东西。

对于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居民来说，神话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部分。这里有的不仅是荷马与赫西俄德系统地精心构思的神话，还有整个生活都贯穿着宗教的故事、传说与阐释。平常的日子和日常活动是由礼俗和礼拜、预言、祭礼和宗教节日所安排的。在神话中，人们找到了日常生活的依靠；那些必要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帮助他们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如此看来，诗人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威。诗人向他们解释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告诉他们，要按照哪些规矩去生活。

然而，在这一点上所有历史学家的看法都一致，奇特的、极为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在这个通过神话被确立起来的充斥着橄榄树、葡萄园、山羊岩画和繁荣的商业城市的世界中，生成了第二条思想线索——所谓的“逻各斯”（*logos*）。按照这个词的意义，逻各斯意味着“言说”“口头传达”“语词”或“句子”，以及一些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事件”“定义”“计算”或“尊重”。然而，即使有这些多重含义，

今天人们谈及希腊的逻各斯时，我们很容易说出，【49】在这里所谈的是什么：对于世界的“理性化”渗透的尝试。

这第二条思想线索究竟是何时开始以及为何开始，我们无法确切地知晓。泰勒斯例子说明，全新的“逻各斯式地”理解世界的开端并不简单。我们几乎没有出自那个时代的文本，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后世的判断。无论如何，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了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并没有或者只是附带地以神秘化的方式解释自然现象，而毋宁说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或是“理性的”方式。这一思想被提及，它至少不带有诸神的指示、华丽的故事或者无从检验的传统，而解释了自然的一些部分。

然而，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与试图将这种不同的思想形式的出现解释为神话的尝试，其本身就常常是神话式的。可以想想关于泰勒斯预言的传说，或者想想自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关于“希腊奇迹”的说法。此外，在翻译那些少数留存下来的早先受自然主义启发的思想家的论著时，我们也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他们的概念与我们的不同，这并非简单地因为他们的观念世界与我们今天的不一致。对此我们更多的是猜测，而不是知晓，即在公元前6世纪的地中海东北部地区，一种思想的迹象被刻在文本中，我们称之为“理性的”或“逻各斯的”。这种思想至少在其最初的萌芽阶段，试图努力纯粹通过理智的力量去洞悉那个无偏见的自然。抽象的、仿佛具有神性的原则取代了旧有的诸神。这种思想推动了以后被称为“科学”的东西的出现。当然从公元前6世纪到“科学”还有漫长的路……

遥望宇宙【50】

是否有一种宇宙“正义”，一种宇宙中力量的平衡？这种观点从最古老的时代直至今日，总能在来自米利都的哲学命题中被找到。据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产生和消逝，都“按照其义务”而实现，“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法规，它们承担了由于其不正义而产生的相互间的赎罪和忏悔”。^[10]

这些话语的作者是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von Milet），人们都说他是接近泰勒斯的人。对一些人来说，他是第一位“哲学家”，因为相比泰勒斯，我们更确定地知道，他是从抽象原则出发解释自然的。他大概出生于公元前610/609年前后，据说与泰勒斯一样死于公元前546年前后。还有，我们大多数关于阿那克西曼德的认识

都来自亚里士多德。在那里，他还履行着戏剧式的角色：那些人基于所选择的各自不同的质料或者原初实体来解释自然，直到最后亚里士多德出现并且阐释了真正的联系，而阿那克西曼德是这些人所构成的小型的理想历史中的一部分。

类似于泰勒斯那里的水的东西，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却没有具体的实体，而是完全非物质化的，即无定（*apeiron*）。这个词的含义有点类似于“无边界的一无穷之物”。无定的反物质是一切存有之物，它不可预计地延伸，是不死且不可被摧毁的。而且这种永恒的本原本身并不处于静止状态中，而是在其中处处有彼此冲突的力量汹涌澎湃，试图让自身取得优势：火、水、风和气——或者更抽象的：热、潮湿、冷和干燥，它们在宇宙中彼此缠斗，就像大地上季节的转换一样。但是自然的法则就像一位不可见的伟大法官，总是不断地导向一种平衡。大火过后灰烬留存下来，水变干涸，寒冷重又变成温暖，等等。【51】因为，谁如果延伸得太远，就会从其他物质那里受到遏制，相当于“惩罚”。只有转化是稳定的，这是宇宙保持稳固的原因。

这表明，关于自然力量之平衡的核心概念并非来源于技术或是自然观察——而是来源于司法判决！正义女神（Dike）是宙斯纯洁的女儿，也是正义的化身，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说她居住在希腊，在那里作为抽象的宇宙正义守护着世界的和谐。她是绝对的平衡原则，阿那克西曼德将这个原则从社会领域扩展到宇宙中。

从人类世界到宇宙正义的转换是极其令人惊讶的。因为世界平衡的形成与人格化的神并无关系。越来越明显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那种作为“理性的”，而非由偏见所造成的关于“正义”的观念，根本上还处于萌芽阶段。这与实际的司法判决完全没有关系。然而，阿那克西曼德看起来似乎拥有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学说，这种学说囊括了整个存在。据此，所有的物理事件从内在意义上看是确定的，并且遵从严格的规范。宇宙的物理原则与道德原则是同一的——这个观念我们在随后的哲学史中会再次遇到。在18世纪初期，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称之为神正论（Theodizee）。

阿那克西曼德接受一个唯一的世界，还是他仅仅将我们的世界视为位于无定内部的众多世界中的一个？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他只为我们的世界构想了一种具体的宇宙起源学说。按照他的构想，冷—湿之气在起源时向内聚集在一起，而热—干之气则被向外挤压，就像一个火圈环绕着冷—湿之气——这是对物理学中惯性原理的最初觉察。火焰包

围冷—湿之气就好像树皮包住树干一样。【52】冷—湿之气被火焰包围，就开始变干蒸发。水雾和气团向外扩展，把火圈冲散了。它们形成三个互相包围的火轮，被暗沉的气体笼罩着，就像被轮毂包围的自行车内胎一样。而轮毂内侧出现了微小的开口，火苗从中窜出来。我们从这些小孔中看到的微小火苗，在最内部的环形中呈现为星星，在外部第二圈中呈现为月亮，在最外部的环形中呈现为太阳。如果堵住第二圈与第三圈的小孔，我们就看到了日食或月食。

陆地是原初冷—湿之气的残留。它自由浮动着，与三个圈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距离。它的形状就像是柱子的基座。它的宽度是高度的三倍。海洋则是未被火圈烤干的剩余的湿气。阳光照射在陆地上使之蒸发，而湿气则以雨的形式重又落回到陆地上。风也来自蒸发的湿气，日月交替同样如此。

生物学家很重视阿那克西曼德，乃是由于他的宇宙起源学说中包含了一种思想，可以称之为“演化式的”。动物和人类究竟从何而来？他通过共同起源学说来解释这一问题。所有生物最初都来自海洋，从湿气中产生。早期的人类也起源于水。人类最初是类似鱼的生物，长有多刺的壳，成年时壳才脱落，来到干燥的陆地上。阿那克西曼德不认为人类是逐步从鱼类发展而来的，就像今天的演化论所宣称的那样。相反他认为，在早期，每个单个的人都从鱼的阶段脱落刺壳进入人的阶段，——这个过程对之后的人类来说很明显不再是必需的，【53】因为到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时代，一般的人显而易见地不再像鱼那样在海洋中诞生了。但无论如何，他将海洋视为一切生命的起源，并且认为，自然孕育的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

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群体中的第三位是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他出生于公元前585年前后，大概比阿那克西曼德晚25年。据推测他逝世于公元前528—前524年之间。后来的编年史作者将他描述为阿那克西曼德年轻的“同伴”。关于阿那克西美尼的原始文献情况和他的前辈一样糟糕。我们知道，他应当写了一部书，但也只有其中几行留传下来。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三位伟大的米利都人中的最后一位相信，阿那克西曼德说过的那种无定，不可能由非质料组成。因为从某种非质料之物中无法发展出质料。在阿那克西美尼看来，无定的原初质料是气（*aer*）。当气凝聚在一起，就会转化成水，而通过更强的凝聚就会转化成陆地与石头。与之相反，气被稀释就会变成火：“阿那克西美尼将

聚合的与凝聚的物质解释为冷，相反将稀释的与松散的……解释为暖”，希腊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如此说道。^[11]阿那克西美尼设想，物质并非永远静止，而是可以自我转化。神的领域也并非存在于原初质料之外，而是同样由气组成。它可以转换为另一种方式，这意味着气本身才是神圣的。正是因此它才具有这种力量，从其自身出发将自身变成其他事物，比如变成火或者水。人的灵魂也是由这种自我构形的气组成的，这一点阿那克西曼德已有过推测。“就像我们的灵魂掌控着我们一样，”阿那克西美尼说道，“气也与此类似，囊括了整个宇宙的气息与气。”^[12]

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大地是一个短的圆柱体，【54】而到阿那克西美尼那里则变成了圆盘状的。大地与那些同样平坦的天体星辰一样，飘浮在空气中。就如巴比伦人古老的宇宙起源学说所言，大地之上的天空成拱形的半球。群星、月亮和太阳围绕着大地旋转。当太阳在晚上躲进大地圆盘边缘北部的高山之后，大地就变得黑暗了。

随着阿那克西美尼的离世，米利都早期自然哲学的传承就终结了。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三位被提及的所谓自然研究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思考过世界的形成、原则和本性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那些我们熟知的米利都哲学思考的终结，是与这座城市的日渐衰落共同发生的。公元前6世纪，在这座城市伟大的地理学家赫卡泰奥斯（Hekataios）的地图上，米利都被看作已知世界的中心，而至公元前494年，它则遭遇了灾难。公元前541年，波斯人占领了小亚细亚，却放过了米利都。公元前499年，米利都发动了“爱奥尼亚起义”，试图抵抗至今为止相当友好的占领军。随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eios I）占领了米利都，摧毁了这座城市并流放了大量米利都居民。雅典的悲剧诗人佛律尼科斯（Phrynichos）基于这段历史写下剧本《米利都的陷落》（*Die Einnahme von Milet*），还为此付出了1000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的罚款，因为他胆敢将这段不幸的故事带上舞台。尽管很快就被重建，但这座城市再也没能接续它过去的伟大时代。尽管熬过了战争，但那些惩罚性的后果却逐渐沉积下来。作为权力的傀儡，这座城市成了雅典人的属国，随后成了斯巴达人的属国，随后又一次落入了波斯人之手，接着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后来成了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的一部分。

信仰制造者【55】

世界上的科学研究发端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吗？过去许多历史学家是这么断言的。他们在流传下来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话语中看到了逻各斯的开端，对世界进行理性化和“合理化”渗透的开始。从米利都出发，这个世界踏上了一路凯旋的前行之路并继续拓展，直至形成我们今天以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

然而这一论断并不可靠。因为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米利都人最初的观点究竟是怎样的。作为繁忙的商业大都市，米利都与腓尼基人、吕底亚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巴比伦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就坦率地承认，“数学技艺（科学）最早是在埃及诞生的”，“因为那里的神职人员有闲暇”。^[13]天文学研究在埃及，更多的是在巴比伦进行，这两个国家的天文学远远领先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因此从15世纪至17世纪，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欧洲思想家都承认，哲学并非产生于希腊诸城邦，而应产生于近东的荒漠以及北欧的树林——通过金字塔牧师和巫师们。

在米利都人关于自然的思考中，从今日的视角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方式”看起来也并非全新之物。而在希腊有一种情形，有助于以有效的方式寻求世界的本原与原则：缺少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宗教！尽管在希腊世界所有地区，人们都熟知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并由此熟知那一套固定的诸神谱系。但是就像他们所信奉的那样，不同区域之间的人们所实行的风俗和祭礼，是可以完全不同的。^{【56】}每个神都有其固定的祭祀地点，有些神在某一地区所具有的意义比在其他地区要大得多。在阿卡迪亚、色萨利以及克里特岛上有着重要宗教意义的东西，在米利都就未必如此。在这些地区人们自己也会挑选最喜欢的神祇，称其为庭院神和房屋女神。希腊人是信仰的制造者，他们的创造力几乎是漫无边际的。不像在埃及或者巴比伦，希腊没有严格的神职人员等级。没有人以超地区的层次监督人们以何种方式敬神，以及人们是如何以宗教的方式看待世界的。这也可以解释，对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而言，他们是否以及如何将诸神编进他们的宇宙起源学说，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就他们的自然哲学的创造性方面而言，这有助于解放思想。

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希腊人是最初的研究者与解释世界者，所做的乃是“仅仅出于其自身的意愿”去获取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他忘了补充说明，他是从哪里如此确切地知道这一点的。因为关于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形成那些关于世界的见解的背景，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个通过本原和宇宙起源来解释世界的尝试背后，也

隐藏了一个与无目的的知识完全不同的意图。比如说，对不可解释之物进行解释，由此人们就会在宇宙中感受到更大的安全感。这样自然哲学就有了与之前的宗教相似的功能。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断言，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解释世界的尝试就是严格符合逻辑的。换句话说，我们将之与可信性或多或少的“思辨”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只知道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几个句子，但至少这二人将他们的思想以书面形式记录在作品中了。在公元前6世纪，只有极少数的希腊人掌握了书面语言。【57】字母书写并不是希腊人的发明，而是来源于腓尼基人。他们发明字母书写主要是为了商业贸易。那些与腓尼基人保持着活跃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接受了腓尼基人的字母并将之进一步发展。

新的希腊文字具有一系列优点。它比腓尼基文字更易学，更不用说比起埃及的象形文字。此外，相对而言，人们可以用希腊文字与音节更好地表达抽象概念，形容词和动词更容易名词化。从事后来看，这也构成了哲学和科学出现的前提条件，尽管这并非此事的原本意义。古希腊文字漫长的发展史至少对于当今的欧洲影响深远。从“控制论”（Kybernetik）到“虚拟空间”（Cyberspace）再到“思想空间”（Noosphäre），这些数字时代的概念，也都披着希腊的外衣。

米利都哲学家没有以今天意义上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几乎所有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关于世界、行星和恒星的产生与特性所说的，都不是观察和测量的结果——在今天看来这是胡闹。崭新的并不是知识，而是视角。显然，这一视角将事物视为它本身，而不只是美好而多彩的故事。诸如“本原”和“宇宙”这样的概念出现了，在随后的思想中再也没被放弃。宇宙看起来并非静止，而是处于持续的运动之中。强大的力量在其中产生作用，并且遵循着超时间的规则。这些洞见是神话终结的开端吗？理性的胜利前行之路的开端是与神话思维针锋相对的吗？

神话的力量【58】

想象一下，你的一位好友遭遇了一场致命的车祸。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车辆打滑后翻车，你的朋友因此死亡。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所措，恐慌且极为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位熟人给了你一个解释。他说道，轮胎会爆胎，这是十分“正常

的”。他很可能会这样向你解释，是轮胎内压太低，或者是诸如玻璃碎片或钉子这样的外物扎入轮胎中。轮辋也可能是坏的，那么爆胎这件事就完全是“合逻辑的”。他继续向你解释说，从统计学上看，每行驶20万公里就会有轮胎爆胎。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对这些解释根本不关心。相反，你认为在这种情形中这些“理性化的”论据和解释是冷酷无情的。萦绕在你头脑中的是诸如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不幸的事故偏偏要发生在我朋友身上？”“为什么这段路他不坐火车，而他通常总是乘火车的？”“为什么晴空万里的命运就如此残酷无情地被关上了门？”

在这一情形下，你的熟人给出的逻辑——技术化的解释对你毫无用处。你甚至好像受到了干扰。因为，对“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于“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对世界合乎逻辑的观察并非世界本身；那位熟人的解释就是对世界合乎逻辑的观察。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不会严肃地得出如下观念，即将逻各斯的世界看作世界本身。相反，如果一个人想始终坚持从根本上以逻辑的方式和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他很快就会出问题。整个生活领域看上去完全摆脱了逻辑方式的渗透：爱情、友谊、艺术、梦的世界，还有宗教。【59】然而，一般恰好是在这些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与价值的东西。使我们的生活有价值且值得珍重的，并非那些我们认识或者想要认识的东西，而是那些我们感触、预感、希望和信仰的东西。我们知道，在爱情中没有东西是合乎逻辑的。从“我爱你！”这个句子中无法得出如下命题：“那么你也爱我！”而是，我们通过眼神与信号、暗示与推测、假设与猜度曲折前行。任何一个理论，如果想要用逻辑规则（或者最新的生物化学分析）来解开这些感情的线团，都会导致谬误。

与知识一样，信仰也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者经常共同形成最为奇特的组合。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某物，尽管我们实际上对它认知得更多。“我当然不相信鬼魂，”以前曾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向我说道，“但是我害怕它们！”出于类似的原因，尽管许多人知道星座根本是瞎扯，但是仍然相信那里“有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与此相反，人们也会处于如下境况：他们知晓某物，却不真正相信它。几乎每一个欧洲人对人类现在与未来的灾难都有所知：工业国家对资源毫不留情的开采，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和社会灾难。虽然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但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如此生活，尽管我们本应当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消费需求。是的，这

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为何却不相信它。我们更愿意信这句科隆格言：“就如过往一样，总是会有出路的。”

知识与信仰，理性与神话思维，解释与构建意义，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任何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根本上“更好”。这毫无疑问服务于另一种需求。【60】自然科学的解释具有与道德价值或政治信念完全不同的功能。通过不断强化的理性与逻辑的思考，人们可能会变得机灵，但不会变得智慧。这里缺少了另外一半，可以称之为情感教育（*éducation sentimentale*），一种内心的智慧，或者用一个优美的旧式语词来说：“内心塑造”。

这些思考有助于理解早期希腊哲学对西方历史的意义。因为从一切现象看，我们已发现，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那里，神话的与逻辑的思维也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恰好是从这种混合中，在古希腊诞生了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那种“对智慧的爱”。因此哲学的形成并不像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是与神话思维逐步脱离的过程。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尝试：使神话与逻辑彼此协调——在其中找到一种对自然及其发展过程的解释，这种解释是“理性化”且不带有宗教偏见的，并且满足了对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在这个意义上，整部哲学史就横跨关于内心的诗歌与关于关联性的散文这两个部分。因为在西方哲学的漫长历史中，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重点出发去尝试以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却也没有放弃建立意义与价值的要求。到了20世纪，一种新的方向才由分析哲学建立起来，这一方向非常明确地放弃了意义赋予，并且想要将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哲学任务的内容转化为科学。但即使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是逻辑的和理性的。只要是由人类而非电脑来从事，它们就被人类的意图所支配，【61】并且依赖于偶然事件、虚荣心、实现手段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开启的，并不是用逻辑取代神话。但是逻辑作为第二种思维方式大概逐步参与到神话思维之中——并且首先在这样一种不同的思想产生的地方就是如此。很显然，这一“合理的”解释遭遇了巨大的缺陷。荷马与赫西俄德已不再能为公元前6世纪的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在市场中正确理解“商品”，并且将需求（*Bedürfnisse*）与需要（*Bedarf*）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什么？或是人们应当如何对待流动劳工，他们应当得到怎样的报酬？他们也未曾经历过，如何抽干沼泽、建造高架渠，如何对待其他文化，如何建立殖民

地、组织以及合法地保护贸易，或是如何在城市中有效地控制贫困。恰好是在技术、自然科学、商业贸易、法律和政治等这些新领域中，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逻各斯渐渐地介入，即尝试对某些事物进行逻辑和理性的解释或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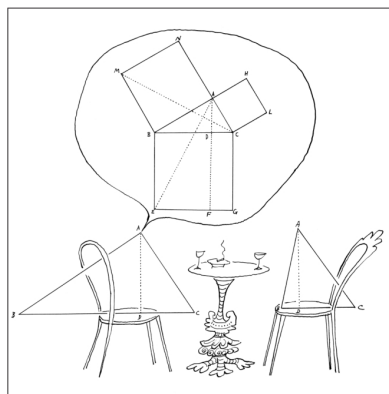
私人生活所涉及的内容，逻各斯则几乎完全无法介入。尽管在城市国家，即城邦（*polis*）中的共同生活经常被置于理性规则的视角下观察，但是私人的家业，即家政（*oikos*），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这一视角触及。在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家政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留给女性、奴隶与孩子的。相反，城邦的公共世界则是男人的事情。一边是经济的与私人的，另一边是理念的与政治的，这二者的分离是如此分明，以至于人们将一边视为女人的本性，而将另一边视为男人的本性。【62】逻各斯进入城邦世界越多，它所固定下来的所谓男人与女人本性上的差异就越大。一边是抽象的、理念的和理性的，另一边是具体的、物质的与非理性的。这种分裂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后果，我们会在后续部分进一步探讨。

但即使是在男人那里，古希腊世界也没有转化为逻辑学家的圈子。在城邦中，人们一如既往地从事祭祀、礼拜，过宗教节日，在要做出重要决断时去询问德尔斐的神谕。对日食与月食的恐惧也没有因传说中泰勒斯的计算而从世界上消除。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说道，尽管面临着叙拉古失败的威胁，但是雅典军队在公元前413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坚持了下来，是因为很多士兵有对月食的恐惧。它被猜测为“诸神的信号”，使得起义破产，而对于尼西阿斯（Nikias）统帅和他的军团而言，则是以一场军事灾难结束的。

除了神话和迷信历经千百年还能继续存在之外，在蓬勃发展的贸易城市与乡村腹地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哲学文本是来自于乡村地区的，那里也没有开创性的发明或发现。很显然，希腊许多地区的农民并没有面对那些问题，即那些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贸易中心、在雅典和科林斯引发的一种新思维方式的问题，这种新思维方式与旧有思维方式并行。因此“希腊奇迹”并非发生在所有地区，而是仅仅在几个地方。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是某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锁反应，这些发展使“希腊奇迹”成为可能。造成社会和思想之巨大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钱！

万物的尺度【63】

罪责与债务——金钱的本质——毕达哥拉斯——权力集团——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



罪责与债务

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类生活世界中最大的革命是什么？它既不是新科学思想的初现端倪，也不是古希腊人发明的字母，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欲望对象，我们称之为“金钱”！金钱改变了一切：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权利与地位、道德、权力关系、理智与思想。同样，哲学史也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史息息相关。

硬币不是希腊人发明的。传闻是腓尼基人首先发明了硬币，但是如诗人内斯特罗伊（Nestroy）所言，他们发明的硬币很少。事实上，铸造第一批硬币的功绩要归于手握小亚细亚政权的吕底亚人，【64】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征服了米利都人。

在此之前，大约在公元前650—前600年间，吕底亚人就开始使用硬币。一开始他们用一些形状各异的金银合金小碎块当作硬币，并称之为 *Elektron*（发光的太阳）。虽然吕底亚人的前人阿律阿铁斯二世（Alyattes II.）已先开始铸造硬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经济的起源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Kroisos，约前595—前546）有关。他所拥有的硬币数量多到难以置信，而阿塔纽斯（Atarneus）和帕加蒙（Pergamon）之间的金矿所提供的补给似乎又无穷无尽。在很短的时

间内，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硬币成了当时东地中海地区的通行货币。大约在同一时期，米利都人也开始铸造*Elektron*。很多爱琴海周围的城邦也都紧随其后。约公元前550年，埃吉纳人铸造了第一批银币，很快科林斯人和雅典人也跟上了。

不能低估硬币在古希腊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短短几十年内，货币经济改变了贸易方式、社会等级、战争形势以及流传下来的道德观念。一窥《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世界，我们就明确地领略到，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并不追求金钱——那个时代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追求荣耀（*timé*），即名望和荣誉。生活如意、英勇无畏、声名远扬、高朋满座、牛羊成群、奇珍异宝，这些才被当作值得追求的生活目标。在这个世界，成熟的商业贸易还未出现，有的只是面对面的交换。公元前7世纪左右，【65】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第一块银碎块（*obolous*）看起来并没有让当时的社会秩序改变太多。因为人们继续用物品来支付，家畜是最常见的支付手段，其中牛最贵。公元前7世纪，当贵族扩张其统治力量并强征越来越多的土地时，爱琴海沿岸的农民陷入了沉重的债役。

负债人的困境不能再糟。公元前700年的债务法是无情甚至残暴的。陷入债务等同于道德和经济犯罪。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将“罪责”（*Schuld*）与“债务”（*Schulden*）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个时代的物品如何变更它的拥有者呢？通过抢夺、交换或者赠送。

后两种物品拥有者变更的方式尤其有趣。一个农民借给另一个农民一些牛，因为后者的牛在瘟疫中死了，按照惯例，借入方之后还给借出方的牛要比他在困境中借到的多。因为出借是出于自愿和慷慨，而归还则是义务。为了对这种不平等进行道德上的粉饰，赫西俄德建议，除了所借之物，借入方应该多给借出方一些东西以示感谢。当借出方原则上期待获得比借出之物更多的回报时，这种起初的善意行为演变成了一种险恶的关系。对于借出方，他出借时的友好姿态成就了一桩好生意。他成为债权人，而借入方则成为债务人。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包含附加物在内的债务时，他就不得不继续负债。为了防止债务人对债务法的滥用，债务法赋予了债权人代理权。债务人必须将自己及其所有资产抵押给债权人，并且他的家眷也与其一起承担债务，这意味着债权人可以使债务人及其家眷变成他的奴隶。

这种“债务”的古代观念尤为糟糕之处在于，【66】借债不被当作主观行为来看待。谁借了债，谁就会被人谴责。他的不当行为会被看作一

种人神共愤的客观罪责，同时也使他整个人具有负罪的属性。并且负罪之人的罪责作为原罪和原债，会连带给他的家眷。

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小农阶级对贵族大地主的负债危机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也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及其周边地区的状况。与米利都相比，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还不强大。而这个处于上升期的城邦面临即将爆发的内战。社会矛盾主要因债役而加剧升级。数以千计的贫农变成了奴隶和罪犯。他们生活和心灵的困境对于城邦来说是沉重且危险的。

当时的情形如此紧迫，以至于身为执政官的梭伦（Solon，约前640—约前560）废除了现存所有的债务关系。他曾如此申诉，“抵押凭证石（Pfandsteine）给大地母亲这黑黝黝的土地戴上了枷锁。”（尽管在阿卡提还从未发现过公元前6世纪的抵押凭证石。）据史料记载，他下令将田野上、耕地里以及葡萄园内的抵押凭证石都拔除掉。梭伦抨击贵族的贪得无厌，他将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成为奴隶的债务人重获自由，并且要回了曾经的财产。从那时开始，任何债务人都无须再害怕他自己或者家亲眷属的生命会成为债务的抵押品。然而，梭伦拒绝了小农阶级平等划分土地的要求。曾经的财产分配依旧保持不变，只是债务游戏因友好的法令而中止了。

雅典城邦的政治秩序也发生了同样的变革。【67】根据梭伦的改革法令，一位雅典公民的影响力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这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经济上的成就。在公元前6世纪初（具体的改革时间还存在争议）的雅典，货币还没有出现，而粮油酒的储备以及战马和重步兵装备的数量是贵族们沿用的衡量财富的标准。新的秩序伴随金权政治（Timokratie）的概念意义非凡地走进了历史：德高望重者的统治！名望和财产具有同等的价值。旧贵族词语“荣誉”（timé）的含义悄然发生了变化。拥有财富之人是具有荣誉的人，具有荣誉之人则一定拥有财富。这个公式铭刻在梭伦的改革事业中。财富更多的人，具有更为“可敬的”政治影响力，财富越少的人影响力也相应越小。而这是一种迄今为止还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根本变化的社会情形……

金钱的本质

梭伦改革五十年后，当货币出现，一些人通过放贷谋取利润、另一些人则陷入债务危机的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乍一看，货币确实是一

种实用的发明。它的出现极大方便了贸易中的支付往来。人们现在能够更好地计算罚款和各种费用，缴纳税收和贡品，支付雇佣兵军饷。人们在攻占的领地上以金钱的形式长期征税，而不是抢夺和破坏。银行家的职业出现了，兑换所设立了，人们开始投资和储蓄，用金钱衡量货物，发行信贷和贷款，打响争夺金矿和银矿的战争。【68】

然而，这种表面的变化还不能解释货币经济如何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人的意识。对此，必须从哲学的视角对金钱的本质审视一番。一个彩绘花瓶与一座金色动物雕塑之间的交换，意味着人们重视它们作为物品的价值。尽管可以被当作支付手段，但这仅仅是它们的次要功能。相反，一枚硬币被当作“钱”，这意味着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只体现在它唯一的功能中，即支付手段。它并不是一个自身具有价值的物品，而仅仅被当作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钱作为一种抽象事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自然界中，抽象事物就如同气体的脊椎动物那样几乎不存在。

当两个孩子如货币出现之前人们交换物品一样互相交换玩具时，他们的玩具消防车和足球就不仅仅具有物质性价值。它们的价值更在于：拥有它们对两个小孩而言意味着什么，比如美好的回忆、赠予玩具车或球的父母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样的原因是绝对不可交换的。与此相反，去商店里买玩具车或球并不涉及上述这些个人因素。金钱以及货币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是从人情世界中抽离出来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人被隔离出来的地方。金钱在交换过程中并不被当作一个有价值的物品，而仅仅被看作一种抽象符号。当一种文化所使用的抽象符号越多，它在智性上的要求就会越高。比如，事物的价值关系必须按比例进行评估，而事物预期的价值增减也必须得到精确的计算。下一年什么会变贵，葡萄酒还是粮食？在不同的征兆下，【69】什么是更好的生意和有利可图的投资？

金钱就其本质而言是无特性的，它不涉及任何道德和习俗、文化传统或伦理价值。一切人们可以视为“商品”的东西，都可以与其他商品进行比较，并且通过第三方——金钱来衡量。在金钱统治的地方，一切都可以物化。金钱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就是价格，换言之，金钱数量的多少。正如19世纪的马克思和齐美尔（Georg Simmel）所强调的，钱是世界上唯一以数量决定质量的东西。因为金钱的道德逻辑即好与坏的区别惊人地简单：钱多则好，钱少则差。人们很少严肃地质疑这种道德逻辑。这种观点看上去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并未引起讨论。

金钱这一新奇而又无情的客观性，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开始在古希腊城邦中引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慢慢地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们仍然希望拥有更多的不动产、耕地、家畜和珍宝。但跟地产和家庭动产不同，金钱要求扩张和流转。不流转，它就会失去价值，这不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古代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此以后能够也必须精确核算自己的盈利。那些以前不能被个人支配的大型资产现在也可以被纳入核算范围。熟练地与金钱打交道，不以智慧，而以一些新的能力为前提，如诡计多端、八面玲珑、肆无忌惮——这些都算不上聪明，而是狡猾。

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变革之中，希腊的每个城邦都面临着问题与挑战。据说，古希腊的传奇人物，【70】斯达巴的立法者吕库尔戈（Lykurg）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曾试图禁止所有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而这就犹如尝试用打气筒改变风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贸易往来都通过硬币支付。广场（Agora）作为公民集会与公开辩论的著名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商业广场。在这里，城邦的生活与政治空间融入了以精确计算为核心的新思想。从此开始，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在“理性的”宪法以及司法的合理限度问题上相互启发，共同增益。探讨的方向则是把事物抽象化、客观化，然后找到合适的标准来测量和计算它们。而谁想要进行测量和估算，就必须拥有大量关于数字和计算的抽象知识。

毕达哥拉斯

当第一批数学家看到自己能够用数字对大自然进行测量计算时，心中必定涌现出一种崇高感。他们完成一次计算或者解开一个等式时，也一定体验过无比的欢喜和满足。世界第一次敞开了它的褶皱面，自然的神秘逻辑以及它的法则规律也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有一个人，作为数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和载入史册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心中必定产生过这样的情愫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豪感，他就是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他因一个数学公式为今天黑板前的学生们所熟知。这个公式，如许多其他公式一样，与他紧密相关，但并不来自他。同时，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名人，尽管关于他的传说应该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

毕达哥拉斯出生于约公元前570年的萨摩斯，【71】那正是米利都

的泰勒斯与阿那克西曼德的学说盛行的时期。大约40岁时，他决心离开这个小亚细亚海岸线上的小岛。但这并不让人吃惊。当人们问古希腊哪个统治者是最大的无赖，尽管这一称号会有很多候选人，但最佳人选毫无疑问是萨摩斯岛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krates）——一位投机主义的僭主。他在埃及和波斯这两个大国之间玩弄权势，谋取私利。残害手足，强取豪夺，背信弃义，诡计多端，贪得无厌，以及爱财如命，这是史书对他的描述。但真正让波利克拉特斯的劣迹为后人所知的是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叙事诗《波利克拉特斯的戒指》（*Der Ring des Polykrates*），以及他与毕达哥拉斯之间的冲突，当然毕达哥拉斯比波利克拉特斯伟大。

公元前538年波利克拉特斯上台时，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必定产生冲突。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530年左右离开萨摩斯岛，前往南意大利的一个富裕城市克罗顿。南意大利的城市类似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业中心。它们沿着崎岖的海岸线同东西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毕达哥拉斯在希腊人长期居住的卡拉布里亚地区以社团形式建立了一个哲学学派。很快他便成了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参与到城邦政治的领导中，周围也聚集了不少门生。

他的学说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一些人来说，他是精神导师、宗教领袖，致力于一种秘传哲学。对于其他人而言，毕达哥拉斯是一位冷静的天才，他对数学、自然科学、音乐理论以及逻辑思维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2】一些人并不把归功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看作他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视他为理性思考的先驱，因为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位不从实际经验而从理论概念出发理解现实的人。

而毕达哥拉斯的拥护者如何看待他呢？他们只是钦佩他，还是直接敬奉他为非凡之人？所有相关史料记载都来源于很晚的时代，主要来自古罗马。人们无法确定这些内容是出自大师本身还是他的弟子或其身后的拥护者。因而历史学家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拼凑出他们笔下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确实致力于算术与几何学，尽管对于现代人来说，他的学说建立在一种非科学的方法上。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学定律是由玄妙逻辑与象征关系所构成的神秘宇宙的一部分。对于那些首先将毕达哥拉斯视为一位富有洞察力的自然科学家的粉丝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然而，那些将毕达哥拉斯奉为精神导师的信徒，则竭力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研究打上“秘教”的烙印。

公元前6世纪，一位思想家在像克罗顿这样的贸易广场上研究数字

和数学，这并不令人惊奇。尽管可能显得有些神秘兮兮，但对数字的哲学研究却与生活实践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公元前4世纪，来自塔伦图姆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os）写道，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哲学“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他则提升了尺寸和重量的测量精度。毕达哥拉斯和他的拥护者积极地参与到城邦的日常事务中。在那个时代，政治家、商人、数学家、哲学家之间的界限还不那么明晰。【73】

毫无疑问，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数学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数字和货币一样，也非常抽象。它的质同样也是数。虽然4种季节有别于4位传教士和4名步兵，但是数字4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所有东西的数量都可以通过数字表达，而这跟它们的质完全无关。与货币经济并行并与其紧密联系，对数字的研究开始将人类生活量化。数字（*arithmos*）的研究成为数学。人们用数学测量时间，如同以几何划分空间那样。尽管被归于毕达哥拉斯的名言“一切即数”实际上是在更晚时问世的，但至少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们对此早有敏锐的认识。

他们尤其注重十进制的应用。十进制的优势是让人们可以直接用手指进行计算。在古埃及这种方法已经得以运用。毕达哥拉斯或他的弟子却将此变成一种神秘的学问。1, 2, 3, 4, 相加就是10，它是最大的非组合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其当作神圣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数字10支配着整个宇宙，并根据数学法则赋予它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中同时看到了质。他们认为，偶数是阴性和无限的，奇数则是阳性和有限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到底是将数学变成了宗教，还是把宗教变成了数学呢？如果我们认识到，在毕达哥拉斯的那个时代，这两个世界还没有严格区分开来的话，我们的疑惑或许会减轻。赋予数学法则这样的理性知识以宇宙秩序的内涵，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74】相反，如果像现代人一样将数学与宗教完全区分开，这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来说会显得有点陌生。在那个时代，天文学与占星术密不可分，同样，化学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炼金术联系在一起。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将它们当作神秘的技艺而不是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很可能是从埃及和巴比伦带回了他的学说，他曾在这两地游学。在这两大高度发展的文明中，研究数学与天文学的首先是神职人员。因而它们跟宗教与神话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巴比伦人和埃及人早已知道直角三角形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关于毕达哥拉斯用数学公式证明了这一发现的说法还纯粹是猜测。同样，毕达哥拉斯对于天文学的贡

献也不那么明确，因为历史上并没有具体的细节说明。但对思想原创性的强调是很晚近的事情，它在飞速进步的工业与服务社会，才以专利和版权的方式被重视起来。

我们关于毕达哥拉斯天文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菲洛劳斯（Philolaos）。他出生于这位大师逝世几年后，大约在公元前470年。菲洛劳斯的记录在今天看来并不确定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据此，世界由两个原则构成：“确定”与“不确定”，或者说“有限”与“无限”。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却通过“和谐”相互关联并保持在平衡中。和谐是将世界统摄为整体的关键所在。

这种和谐可以通过数字关系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和谐能够通过数学来认识和计算。【75】数字因而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因为若没有数字，则不可能在思想中把握或认识一个东西”^[14]。一切迹象表明，菲洛劳斯认为宇宙不只可以通过数字来计算，宇宙根本就由数字组成。据亚里士多德所言，菲洛劳斯主张数字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辅助工具。

在此前提下，菲洛劳斯发展了他的宇宙学说。他说，宇宙的中心存在一团火焰。地球——一个球状的地球围绕其而行！他是第一个指出地球是球形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认为，这个球并不处于世界的中心。正是哥白尼，在将近两千年后回溯到这一理论。跟地球一样，太阳、月亮、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一同环绕着那团宇宙中心的火焰。

菲洛劳斯的宇宙学剩下的部分是纯粹的猜想，很少有明确方向。尽管菲洛劳斯对于地球绕其轴心旋转的认识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他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不能看到宇宙中心火焰的一个观点，因为火焰总是朝着地球的另一面。很显然，菲洛劳斯认为地球只有一面有人居住。而且他相信月亮上很可能也有人居住。

至于菲洛劳斯记录的宇宙学说有多少是毕达哥拉斯开创的，还有待商榷。相比之下，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则更让人确信是来自大师本人，即宇宙和谐的观念：宇宙图景是数字的和谐图景。菲洛劳斯也认为，宇宙由和谐统摄。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不仅以物理的方式，也以声学的方式向人们描述和谐。他说，天体在旋转时发出声响，构成宇宙的和声。【76】然而人类听不见宇宙的音乐，因为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而我们的耳朵对宇宙和声没有知觉，就像夜晚人们在灯火通明的大城市看不到星星。宇宙和声会产生一种声污染，就如同我们今天的光污

染。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学知识运用到所有其他生活和知识领域。菲洛劳斯写道：“人们不仅能够在神的世界中，而且能在人类所有的作品和言辞、所有工艺以及音乐领域中发现数字的本质及其力量。”^[15]在音乐中，对数字的思考尤其富有成果。毕达哥拉斯学派认识到，和谐音程可以通过数字关系表达。如果乐器的弦缩短一半，人们就听到八度音；如果以2:3的比例缩短，就产生五度音；而以3:4的比例缩短则产生四度音。声音的高度取决于弦的长度，并且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精确的数学比例关系。数学可以规定乐器，如同规定宇宙天体的声音。当然，毕达哥拉斯谈论声音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谈论声学。他宣称，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维持着普遍的友好关系，它们相互关联于普遍秩序——宇宙中！

权力集团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真正的思想流派。并且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吸纳了许多遇到的事物，例如埃及人的自然知识、巴比伦人的数学与天文学。由此诞生了一个带有诸多个人烙印的，以灵性和数学为核心的学派。【77】每个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似乎都可以从这一混合剂中提炼出自己的灵丹。

毕达哥拉斯团体对友谊的重视则是完全非数学化并极具传奇色彩的。这在席勒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叙事诗中得到了描述：《人质》（*Die Bürgschaft*）。达蒙因刺杀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计划失败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还想尽快将妹妹嫁出去，于是请求他的朋友去国王那里为他做人质。最后达蒙历尽各种艰难险阻让自己的朋友重获自由，这份友谊甚至感动了最残酷无情的暴君。尽管这个故事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杜撰的，但它建立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具有传奇色彩的友谊理念上。他们的友谊理念背后是对一种哲学观念的坚持：正如宇宙应该以和谐统摄，人类同样应该致力于跟他人和谐共处。显然，对他们而言，友谊涵盖了一切人类关系：与自我、配偶、孩子、朋友以及邻人的关系。所有领域中的对立和矛盾都应该通过和谐的友谊得到和解。

尽管时常跟周围的人产生激烈的冲突，毕达哥拉斯与其在南意大利城市的拥护者却一点儿也不愿意低调。相反，他们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以至于总是引起纷争。原因可能是毕达哥拉斯信徒的贵族姿态。尽

管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但比起普通民众他们更青睐上层阶级。他们引人嫉妒，尽管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身上神秘的精英气质对于一些人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非常可疑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克罗顿，后来也在其他城市建立了一个权力集团。他们的领袖在克罗顿同邻邦锡巴里斯的交战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78】尽管克罗顿胜利了，但毕达哥拉斯最后却失宠了，于是他带着许多拥护者逃往梅塔蓬（Metapontion），一个位于赫拉克利亚和塔伦图姆之间，在意大利山谷中的希腊属地。在那里他继续宣扬学说，招纳门徒。毕达哥拉斯去世十年后，即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他的弟子在南意大利遭受迫害和排挤。但他的学派在塔伦图姆得以保留并延续至公元前4世纪。据说，菲洛劳斯也在此生活过，直到被迫迁往希腊。

既不能单纯将毕达哥拉斯视为秘教精神导师，也不能把他当作纯粹的数学家。如亚里士多塞诺斯所言，数学哲学源于“商人的实践”。亚里士多塞诺斯来自一个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的塔伦图姆乡镇，他的老师就是一位毕达哥拉斯学派弟子。数字哲学、比例学说、数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紧密。它们相互影响并且以这种方式改变了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希腊文化。有趣的是，毕达哥拉斯是唯一出现在古代硬币上的哲学家，而且类似的事出现过两次。大约公元前430—前420年，城邦阿布德拉的硬币上出现了毕达哥拉斯的面容。几百年后，萨摩斯为纪念自己失去的儿子，以他的姿态塑造了一位拿着权杖的统治者。

新兴的货币经济，连同算术、比例与测量知识一起，为逻各斯迅速获得人们的高度重视做出了贡献。测量、比例和逻辑的世界秩序本身也具有世俗维度，那就是分配、合乎比例以及公正的世界秩序。以理性方式统摄宇宙的最高原则也应该规定人类生活的理性秩序。【79】而衡量人类所有行为好坏的尺度是：正义。

赫拉克利特

波斯人占领的以弗所城，离萨摩斯和米利都不远。同样，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而且是毕达哥拉斯最有名的哲学对手赫拉克利特的故乡。后者生于公元前520年左右，在克罗顿的精神领袖出生50年后。赫拉克利特与毕达哥拉斯之间并没有过真正的竞争。然而，赫拉克利特对毕达哥拉斯的轻视程度就如同后者从南意大利传到以弗所的名声一样大。赫

拉克利特，这个一生中从不测量，不计算，不探索自然，从没发明过任何东西的人用最尖锐的语词谴责毕达哥拉斯。尽管赫拉克利特承认毕达哥拉斯“比任何其他人都开展了更多的研究”，但他认为，毕达哥拉斯所教授的大部分东西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这位受欢迎的智者实际上是一个“大骗子”，他的“博学”掩盖了真正的事实：他对于自己所谈论的东西只有最肤浅的理解。

扬人灰土，己手先脏。这种毫不留情的责骂往往也让骂人者显得不甚高明。在旁人看来，他们其中一位是在嫉妒另一位的名誉。传闻中，赫拉克利特不是一个和善的人。他出身贵族，据说曾拒绝过御用祭司这一在城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职位。他对周围人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言论中略知一二：

以弗所人应该一个个都上吊，把城邦交给年轻人。他们将赫谟多洛（Hermodoros）这个他们中最优秀的人驱逐。他们还说：“我们之中不应该有最优秀的人；如果有，那他应该去别的地方！”^[16]
【80】

据传，赫谟多洛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政治家。除了他之外，也就只有普里埃耶的毕亚思（Bias von Priene），一位泰勒斯时期的传奇政治家被那位脾气暴躁的哲学家赞美过。所有其他的名人在赫拉克利特眼中都是愚蠢之徒。荷马应该被禁止赌博，并领受鞭刑。诗人赫西俄德分不清白天黑夜。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地理学家赫卡泰奥斯学的多，懂的少。

赫拉克利特的愤世嫉俗在哲学中升华为对逻各斯的扩展与深化。而当哲学的一位代表人物痛斥一切被崇敬的传统时，人们则惊讶于哲学的超然自信。赫拉克利特哲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无法准确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思想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曾引用和收集过赫拉克利特思想的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罗马的希坡律陀（Hippolyt von Rom）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他的话总是神秘莫测又模棱两可，充满诗意又自相矛盾。因此，人们称赫拉克利特为自古以来的“晦暗者”。他经常玩文字游戏并使用双关语。他的语言造诣很高，但是语句晦涩神秘犹如占卜者的预言。赫拉克利特似乎同时扮演着占卜者、语义学家、先知和文字玩家的角色。

“正义”概念在其残篇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意义上的“规范”（*nomos*），第一次出现在一位西方哲学家的讨论中。之前曾介绍

过，阿那克西曼德将宇宙秩序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同样，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友谊理念也宣称，【81】每一个希望与他人友好共处的人都必须忠诚地信守城邦的正义。但直到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正义与法律才在天地之间找到了其确定的位置——作为超世俗理性的世俗对应物。

赫拉克利特断言，逻各斯不属于这个世界。逻辑与理性属于神性的范畴——一个绝对的世界。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只有极少数人会去认识和理解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承认，“所有人……都有认识自我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运用这种能力。^[17]每个人都被允许去思考，但很多人都不愿。因此，大多数人都处于一个由私人意见和个人观点构成的模糊世界。他们人云亦云，对于这个世界的确定真理却一无所知。他们奉为主臬的信条是：放弃自己的私人意见领域，顺从公认的普遍客观性：“因此，人们必须遵循普遍规律。尽管所有人都置身这一世界法则（逻各斯）之下，但许多人假装他们拥有独立思考能力。”^[18]

逻各斯是超越个人的。探究逻各斯的人也在探究现实（宇宙）整体。赫拉克利特指出，探究宇宙之人可以说：“我在探究自身。”对希腊人而言，关于“世界”的思考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而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是不可分割的。正义与法律是逻各斯在人类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们普遍适用，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个人观点而将其视为至高理性，并且臣服于它们。虽然几百年来，正义一直为贵族大地主的独裁统治所左右，然而在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的以弗所和其他城邦，人们却相信存在一种跟所有人都相关、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法权，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现实法律。【82】在他最著名的残篇中，赫拉克利特号召：“人们必须为他们的法律奋斗，就像为他们的城墙战斗。”^[19]在古希腊，当一个城市被城墙圈定护卫，城市便成为一个城邦。赫拉克利特认为，就像城墙抵御外敌以保证城邦的外在安全，法律维护城邦内在的统一和文明社会的活力。如其所言：“必须基于共同原则而构建事物，就像基于法律建立城邦，那样事物将会更稳固。”^[20]

然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神性逻各斯与人类正义的类比并不和平，也不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坚持的和谐、和解与友谊信条被赫拉克利特讥嫌为老好人的唱词。他的逻各斯、世界法则以及关于正义和法律的设想，都是富有战斗性的。逻各斯甚至整个世界都是由互相斗争的矛盾体组成的：“必须知道，斗争到处存在，正义即斗争，所有的事物由斗争和必然性来成就。”^[21]赫拉克利特说：“斗争是万物之父。”^[22]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统一通过对立物的斗争而产生。“冷的变成

暖的，暖的变成冷的，湿的变干的，干的变湿的。”^[23]他说：“矛盾之物组合成一体，美好和音诞生于不同的音符。所有事物都由斗争形成。”^[24]“在生与死、醒与睡、幼与老的对立中所显现出来的是同一个事物。它总是一会儿变成这个东西，一会儿变成那个东西。”^[25]这一思想也带有新兴货币经济的痕迹。货物变成金钱，金钱变成货物。赫拉克利特主张，一切东西由其对立面决定，而对立面就蕴含在事物自身之中；这一重大的思想（用柏拉图的话说），【83】作为辩证思想进入哲学史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埃利亚的芝诺（Zenon von Elea，约前490—前430）作为大辩证法专家出尽风头，并演绎了许多著名的悖论。

如果世界的本质是辩证的，那么赫拉克利特的语言风格如此晦暗就不足为奇了。他的许多名言不仅在内容上主张辩证思想，而且还将其通过语言形式展现出来。也许赫拉克利特自认为与绝对的逻各斯契合一致，他的语言展现了世界本身所是的样子。对于今天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狂妄。然而，对自身认知能力进行批判性反思，这在公元前500年还为时尚早。赫拉克利特喜欢用隐喻。根据使这句箴言流传至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的希坡律陀所记载，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对世界及其万物的审判都将在一团火中进行……降临的火焰会涌向并抓住所有东西。”^[26]在赫拉克利特眼中，火象征着毁灭和重生，生成和衰亡。此处将火阐释为万物的本原，是亚里士多德一厢情愿的解读。同样，柏拉图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皆在流变”视为其思想的核心，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阐释。

如果万物都在矛盾斗争中一同生成和衰亡，那么在正义问题上也就不存在完全不同的力量，不存在善与恶。赫拉克利特似乎主张的神性正义是火之审判者。在每一次权利争论中，就如在城邦法律的建立中，胜负通过立论与反驳决出。利益纷争的结果是在暴力斗争中诞生出新的正义秩序。赫拉克利特不青睐民主的正义。【84】因为正义的根源不是多数人的意志，而是“一位具有神性者”^[27]的个体意志。而这唯一的神并不像之后很多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善和道德的，而是善与恶之间不可消除的矛盾对立。这一理念深深吸引了19世纪末的赫拉克利特追随者——尼采。

赫拉克利特确信，逻各斯在世界之中客观地存在。并且，他似乎也相信，正义与法律是客观的，即便它们由人类表述。这种对客观的正义秩序的信念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无论满意或抵触，我们都习惯性地接受我们社会中的正义。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认为这是神的意

志，人的判决不是神的审判。

赫拉克利特有什么成就？作为辩证法家，他能够比毕达哥拉斯更好地解释在一个和谐宇宙中人类的纷争从何而来。赫西俄德用来解释罪恶来源的“潘多拉盒子”早已失去可信性。而毕达哥拉斯的友谊乐观主义显得过于牵强。看起来更具指导性的是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对立都构成统一，世界上所有的矛盾都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思想的魔鬼却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他所有的残篇都极为教条主义。它们似乎从不自我怀疑，没有解释为什么逻各斯由赫拉克利特掌握而不是其他人，没有反思与日常经验截然不同的绝对世界是如何进入人的思维，也没有思考如何为这些主张提供更详尽的论证。

从正面看来，赫拉克利特是有意识地与世界疏离的洞察者的典型，一位在哲学中时常被人模仿的榜样。【85】这样来看的话，他也许是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从反面来看，哲学的狂妄始于赫拉克利特。当爱奥尼亚哲学家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为宇宙万物寻找有理有据的解释时，赫拉克利特却以斩钉截铁的确信对世界下了判断。他在莎草纸上写下的句子如同石头上凿的那样。跟其他早期的逻各斯代言人、数学家与成功的商人一样，赫拉克利特自觉属于精英。心里充满如此这般骄傲的人很容易蔑视他人。逻各斯至上的赫拉克利特哲学于是带有某种很强的反启蒙特征：如果旁人无论如何都很愚蠢（正如他在残篇第十三中所断言），那么就也无须启蒙他们。哲学家因而成为傲慢的厌世者，对他们而言，社会和政治都太笨拙……

巴门尼德

尺度、数字和比例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化中拥有何种新的意义，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已有所阐述。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看到正义概念在那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意义变迁。正义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新的秩序，而非统治者的独断。它是世界法则（逻各斯）在人类法律（*nomos*）中的对应物。这种正义自称是普遍与客观的存在，连太阳都比不上它。因为太阳还会越界，从而被厄里倪厄斯（Erinnyen，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狄刻（Dike，正义女神）的帮手”抓住。[28]

诚然，毕达哥拉斯不只是货币经济的哲学家，而赫拉克利特哲学也
不仅只关注正义。【86】钱货交换现象也曾出现在赫拉克利特的箴言

中，他曾说：“万物都转化为火，而火又转化为万物，正如货物换金子，金子换货物。”^[29]两位哲学家都想要洞察世界的尺度与规则，无论是在宇宙还是人类生活中。

当赫拉克利特在以弗所思考生成与消逝的辩证法以及宇宙逻各斯与人类正义的类比时，在南意大利，离毕达哥拉斯学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埃利亚小城，位于今天的萨莱诺南端，是一个刚成为希腊属地的坎帕尼亚小城。公元前520年左右，古希腊令人惊叹的哲学家之一就诞生在这个位于意大利境内的如今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小城。他的名字叫巴门尼德（Parmenides），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通常只听过他的启蒙诗。巴门尼德的思想与赫拉克利特主张万物永在生成与消亡的观点相反。对这个来自埃利亚小城的人来说，没有生成与消亡，只有存在（Sein）。

巴门尼德残篇的开端如神秘短篇小说一般。巴门尼德由女神带到“光荣大道”上，他骑着骏马来到了“日夜大门”前。正义女神狄刻把门打开，巴门尼德见到了女神。女神友善地迎接了他，因为巴门尼德“带来的不是坏命运，而是公正（Themis）与正义（Dike）”^[30]。正义女神看管日夜大门，这是公元前5世纪正义的一个标志。正如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主题也与宇宙秩序紧密相关。

女神向巴门尼德宣告的只有一个命题：与大多数人的错误观念相反，只有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对于存在者而言，没有变化和毁灭，它是绝对静止和完美的。它的形状如同一个球体般完美。【87】那些主张存在者是变化之人是不理性的，想法也不成熟。

巴门尼德引入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念。他认为，世界中存在着不变者。这个重要的新命题影响深远。不变者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冠以很多名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就是拉丁语名词“实体”（*substantia*），即“物质”（*substantz*）。它的意思是“构成事物的东西”。

不过巴门尼德的残篇初看起来像一个由神话点缀的空想。跟“万物流变”的命题不同，巴门尼德的命题是“无物变化”。而他的命题有一个很现代的维度，这一维度远远超越了当时的观点和思辨范围。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巴门尼德这一命题背后的理由是，人们不能设想非存在者。因为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我在头脑中设想之物，非存在者无处可寻。人们不能设想“无”，而只能思考“有”。存在者与思维是一致的！

这一思考维度非常重要。因为巴门尼德的思考于当时的哲学而言是

全新的。这是人们第一次不仅对认识对象——世界，也对认识主体——意识进行反思！更为现代的表述是：一切存在之物首先在我的思维中为我存在。它不是世界中的“自在”之物，而是意识内容。

这种想法毫无疑问是正确且具有开创性的。巴门尼德推断的第二步则是，我的思维必须在世界中拥有一个真实的对应物，否则我的思维是空的。无中不能生有。所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与我的思维相符，即存在者。这推断的第二步并不像第一步那样逻辑严密。【88】因为谁能说，我的意识充分领会了世界？一条以热感应场来感受世界的盲蛇跟人类这样的“视觉动物”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显然，“存在者”也不是绝对的，而取决于不同视角。这个精彩的问题还将继续牵动哲学的发展。在此不展开详细讨论，之后我们还会不断回到这一点上。

当所有关于世界的知识被我思考时，那么它们也会受我的感性和认知机制所限制。然而，这个问题在巴门尼德那里并不存在。他宣称，他的真理是神性的。关于存在者的真理来自更高的权威，并不源于人类的感性世界。它是客观和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也相信逻各斯的神性；一种更高的理性，却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真理是一种至善，而大多数人只相信被感性伪装的东西。他们的世界是表象的世界，而他们的思想则是谬误的堆积。这种高傲的哲学思想同样影响深远。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影子。

巴门尼德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如果存在者是我能够思想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说，我能够思想的东西是存在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巴门尼德陷入了语言逻辑的陷阱。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我的头脑中只存在我能够设想和把握的东西。这种认识的一种常见表述是，我能够指称某个东西。通过“椅子”或者“诗歌”等语词，我能够把现实事物付诸抽象概念。我就像使用我的一只手一样通过语词“把握”或者“领会”事物。

毫无疑问我能够用语言把握事物，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宣称它们实际存在。我可以谈论哈利·波特或者《指环王》中的法师甘道夫，但是无须为他们在现实中找到对应者。相反，只存在一个虚构的观念。【89】他们“在世界上”，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被别人认知，但是他们并不现实存在。很少有人会写下“哈利·波特真的存在”这样的句子。在很多词语中也有相似的情况，根据所处的背景每个人可能想到的完全不同。当我谈到“度假”时，我会想起自己上次在西班牙度假。而读者听到“度假”时，可能会想起他上次去过的波罗的海海岸。这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度假”本身。即便人们都能够准确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他们所联想到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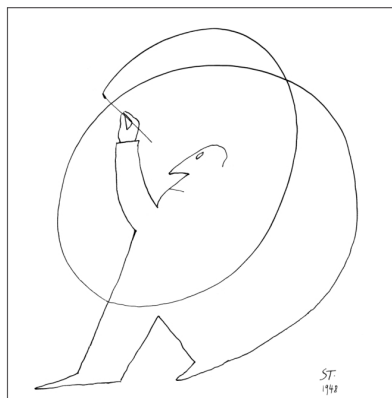
也是千人千面。

今天我们知道，思维、词语和现实不是同一个东西。同样，世界上不存在生成与衰亡的主张对我们来说也极为陌生。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低估巴门尼德对于哲学的重大意义。就目前所有留传下来的古文献来看，巴门尼德是第一位对思维本身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他的两个基本命题都对西方哲学影响重大：第一，存在者是大一！第二，存在者与思维同一！

世界不再是确定无疑的客体，而展现为由人的意识所敞开之物。尽管巴门尼德诉诸神性智慧而不是人的理性：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万物的尺度却不只是金钱、数学和正义，而是在人类智慧犹疑的开端进行支付与计算、测量与分配的人类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如何看待世界上的其他生命？人类灵魂与植物和动物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是说被逻各斯唤醒的我们如同神灵远远超越了它们？

人的本性【90】

逻各斯所在——转世的灵魂——失落的天堂——灵魂的材料——温和的
灵魂——一切皆为质料！



逻各斯所在

产生了西方的灵魂之不朽的那个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在一年中气温高达40度的320天里，人们头顶烈日。原始的风景铺展至海拔2000米高的阿斯普罗蒙特群山区。苍老的山毛榉和松树绵延生长在第勒尼安和爱奥尼亚海岸，来自大海的岩石垂直耸立，狐狸、狼群和野猫以此为居。天空灰白，苍鹰在落日的余晖中于柠檬树和龙舌兰的上空盘旋。

在意大利最贫穷、人口最稀少的土地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这里曾矗立着一群令人骄傲的城市，希腊商人、海员、手艺人、农民和哲学家在这里往来。【91】如一切过去的遗迹，残留的石柱、被时光侵蚀的高墙和神庙在沙地上沉默着，如鬼魅般苍白。

在欧洲，没有任何地区像意大利南部一样对西方思想的起源如此重要。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发迹于此，它也是众多后来的哲学家的故乡。正是在此，爱奥尼亚思想传统在精神和其他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灵魂和世界出现了新的局面。在这新的局面中，抽象的和不可见的、超自然的和普遍的、理念的和非时间性的，表现为真实的世界，经验世界倒是低级的、非本真的和不真实的东西。

在这片以前由神话统治的土地上，像毕达哥拉斯或赫拉克利特这样的思想家提倡理性的思考。然而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因此摆脱神学。不如说是他们把宗教移到他处：将宗教连同众多神明形象从感性世界请到了一个超自然领域。在一些地方，之前诸神表现得如人类一般，而现在人类可能看重神性中的真 / 善 / 美。其表达为永恒的逻各斯，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依据逻各斯，“一切由此发生”。可惜这逻各斯只吐露给最聪明的人。人们无法借“前哲学和哲学以外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掌握逻各斯。于是多数人相信，真实性就是那些真的事物。而哲学家知道，真实性是事物真的（wirklich）存在。

通过理性的尺度对世界做测量使理性变得非本真。究竟这位聪明的哲学家有何超过“众人”之处，使得他能够这样感受并认识逻各斯？他通过何种方式接触逻各斯？我如何能体验到，世界中不以感性形式存在的永恒与真实？我似乎不能通过肉体感受到逻各斯，而仅仅只能通过思想。【92】思想如何才能思考一些在感性可体验的世界压根不能够体验的东西？这些思想如何得以实现？我的灵魂需要哪些特征，才能够同逻各斯的绝对性关联在一起？我的灵魂是身体器官的一个部分吗？抑或不是？如果不是，它又位于何处？

我们从赫拉克利特处了解到，“逻各斯本属于灵魂”，“它会自我增长”。^[31]这是一句模糊的话，因为如果根据逻各斯的本性，它是普遍而绝对的，也即非人性的，那么“本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探究灵魂——以及它与逻各斯之间特别的关系，一些后续的残篇早就表明这是没有前途的尝试：“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它的本质隐藏得非常之深。”^[32]人们喜欢接着提这样的问题：一个灵魂分有永恒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灵魂本身是否是永恒，即不朽的——在这个问题中，赫拉克利特古老的绰号“晦暗者”显得名副其实。“人们在其死后期待着那些他们不能幻想或者臆想的东西。”^[33]死亡和不朽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掌握的事情。

然而在赫拉克利特的时代以及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希腊人到底如何理解“灵魂”和“肉体”呢？显然，关于逻各斯我们碰到了一个人全新的人类学问题。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世界里，没有肉体 and 灵魂的对立。既不存在表达“肉体”的词也不存在表达“灵魂”的词。荷马史诗里的英雄至多拥有一种天界的生命力：*psyché*（灵魂）。它维持着人和动物的生命，在死亡那一刻随着气息呼出。它从死者口中或伤口中漂浮而出，进入冥府，在黑暗中寂寞地继续存活。在《奥德赛》第十一卷中，死者灵魂呈

现为虚弱的影子，为了能够再次开口说话，必须喝下鲜血。【93】死者的灵魂好似软弱的吸血鬼，若不吸食鲜血，只能维持干瘪的存在。

因此构成一个人的特性的，并非灵魂。它既不负责我的感觉，也不负责我的思想，它仅仅是能让引擎发动的汽油。关于灵魂的这种假设，今天的我们已感到陌生。它使人想起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笔下虔诚的海伦的灵魂。她死去时，变为虚渺之物离开肉体，通过烟囱升向天空。赫西俄德和他的诗人同行品达（Pinda）也将蛇的习性归因于一个灵魂。蛇蜕皮的时候留下空空的躯壳，灵魂继续寄存于新形成的动物体内。与之相反，负责我的特性的不是灵魂，而几乎是我完整的肉体：*etor*或*kradia*，我的心；*menos*，我的活力；*thymós*，我的意志；*phrenes*，我的感官；还有*nous*，精神。在各自的主管范围内和许多交叉部分，它们生产出我的情绪和感觉、我的性情、我的想象世界和我的思想。

像赫西俄德的神话中所谈的一样，荷马叙事诗中的人虽然借助自己的头颅、躯干、双臂和双腿，即用生命走上战场，但他不具有作为整体的躯体。只有灵魂从其中离去，死亡的身体才得到一个名字，叫作肉身（*sóma*）。因而在公元前8和前7世纪，希腊人想象中的人有两个灵魂。其一是提供生命力的、不具肉体的自由的灵魂；其二是分布在数个器官上的肉体灵魂，它构成“我”及其特性。

在接下来的百年间，这种方案越来越脆弱。因为随着逻各斯上升为一种普遍理性，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逻各斯究竟位于人类的何处？即使逻各斯来自神——无论怎样且无论何处，它一定会在人那里与人相遇。【94】然而纯粹机械的生命活力和个人的身体器官好像皆非逻各斯特别合适的容身之所。似乎在宇宙起源说和自然解释的背景下，这个问题越发晦暗不清。随着这个问题，一种对人类与自然的全新思考开始了。灵魂从身体解放出来，踏上了它长达两千年的胜利之路。并且，随着这个过程而来的，是西方哲学中大概最大的错误。

转世的灵魂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位于美丽的小亚细亚海岸的米利都。据一则1世纪的资料显示，阿那克西曼德可能考虑过人类灵魂的问题：“阿那克西曼德称，灵魂的本性（指实体）是气态的。”^[34]阿那克西美尼甚至可能认为，“生物体是由简单、单一的气体和气流构成的”^[35]。我们的“灵魂，

即气”，支配着我们。^[36]阿那克西美尼在这里用来表示灵魂的词，是 *psyché*。如果灵魂果真“支配”着我们，那它远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燃料。阿那克西美尼将 *psyché* 理解为物质性的吗？因而这种理解要比荷马或者赫西俄德更明晰吗？

在同一时期，一场极其特别的运动发生了。这场运动是一种秘密学说，在希腊多个地区造成轰动——俄耳甫斯教（Orphik）。它的发源地可能是色雷斯。它的信徒援引想象中的、神秘的俄耳甫斯歌者。相应地，他们将自身的智慧著成了佳句与诗篇。许多都是关于灵魂不朽、净化与救赎的。我们并不知这些诗作是否与组织良好的教派或众多地方团体有关，他们有着自己的观念和传统。^{【95】}而至于对灵魂的印象，所有的俄耳甫斯教徒似乎都一样：灵魂和肉体是严格分离的。当肉体渐渐消失，灵魂依然不朽。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灵魂会再度离开肉体，俄耳甫斯教徒的灵魂亦如是。

对于俄耳甫斯教徒来说，灵魂先于肉体存在。灵魂不进入冥府，而是继续在地面游走并屡屡钻进其他形体中。俄耳甫斯教徒信奉轮回转世说，我们知道，印度教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们认为，灵魂根本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一个超越时间的或者不受时间限制的灵魂，它将个人的肉体仅作为行进中的停靠站。或者说，人们辨认出自己并非通过其身体，而是通过一个不可见的灵魂，并且甘于在死后作为乌鸦或者无脚蜥蜴继续存在。根据这种观念，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找到一条出路，灵魂总会得到显著提升：灵魂如天使般飘浮着，穿越永恒，进入常新的皮囊。如果我的肉体是受缚于物理学的奴隶，那么灵魂则是（我现在不能再简单地称其为我的了）神圣而自由的。

按照我们西方对哲学的理解，俄耳甫斯教派的轮回转世学说并不哲学。它缺乏理性论证的尝试。更确切地说，它是地中海地区一种古老的宗教，尽管它可能并非由地中海的环境所孕育。古埃及人同样在动物体中认识到灵魂的转世——当然仅在动物死后而非在持续的生命循环进程中。

俄耳甫斯教十分神秘且具有宗教属性。但它对哲学来说仍然意义深远，更确切地说，这要归功于毕达哥拉斯。这位大师在克罗顿创立学院时，意大利南部的俄耳甫斯教正处于鼎盛时期，许多地区都有其圈子。上层贵族代表在房间里或橄榄树下会面，谈论他们的灵魂。^{【96】}与拥有无数的屋神、院神、地区神以及万能神的朴素民众的宗教相反，俄耳甫斯教徒飘游进更为抽象的空间。他们的主题是身体躯壳之下内在的

人。他们对持续飘浮、不断转世的灵魂及其具体后果进行了长久的讨论：我该如何生活？考虑到轮回转世，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为了我的灵魂在下一段生命中能有很大的可能获得一个美丽的身体，而非在一个癞蛤蟆或是水蛭身体中萎谢，我能做什么样的努力？

毕达哥拉斯学派几乎不提其他问题。他们继承了俄耳甫斯教的轮回转世学说，并继续扩充它的内容。诗人伊翁（Ion）于毕达哥拉斯死后不久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俄斯岛，如果他所言不虚，那么毕达哥拉斯甚至以“俄耳甫斯”的名义出版了一部著作（没有保存下来）。看来，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完全将俄耳甫斯教的灵魂转世说据为己有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意大利南部，俄耳甫斯教还默默无闻，毕达哥拉斯学派却声名在外。

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俄耳甫斯教一样，认为相比于肉体，灵魂显然是人类更有价值的部分。灵魂——而非身体器官，决定了性格与性情、感觉与思想。继柏拉图之后，相对于天界的灵魂，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轻视尘世中受限制的肉体。肉身（*sóma*）是灵魂的坟墓（*sema*）——是这样的坟墓，灵魂从一个逃入另一个，如此往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无意义的相同者以某种方式做的无尽重复，不断进入一个新的皮囊。也无怪乎，并非所有灵魂转世说的信徒都满足于这样一种毫无指望的决定论。

转世说具体来说有不同的变种。【97】据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传说，重生是一个长达三千年的固定循环。这段时间里人类灵魂经历了整个动物界，从陆地动物到水生动物再到飞鸟，然后又回到人类。这是一个预定的行星轨道，人类没有丝毫机会可以阻止或参与决定命运。在这个理论中，人类在自然界没有特殊身份。人类就是一种动物，别无二致，体现着无情统治着他们的自然法则。

这样一种观念使许多俄耳甫斯教徒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变得很不幸。其原因在于永恒的自然之剧在道德上的冷漠，以及灵魂的不朽代价高昂。难怪出现了灵魂转世说的第二种变体。它只有一个目标：打破宿命论！在诗人品达看来，人类可以参与到对其灵魂命运的决定中，或许他是唯一可以这样做的生物。在现世中我活得越高贵、越纯洁，我的灵魂在来世也会越高贵纯洁。从道德考量，我不仅仅为一段独特的、有限的生命负责，而且要为永恒的灵魂负责。如果我从事一份好的工作，活得光明磊落，最终就会达成我最大的目标：我不朽的灵魂离开肉体的囚笼得到救赎，还于天界。

这两种版本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第二种版本不发生在自然法则的

世界，而在人类法则的世界。它不关乎与人无涉的世界进程，而是关乎公平和正义。以善行事的人在灵魂上得到报偿，坏人遭到惩罚，受困于阴暗、狭小的肉体囚牢中。在公元前5世纪，该法则如此频繁地亮相，改变了自然的游戏规则。判决与惩罚，补偿与赦免：正义审判不仅发生在渺小且终有一死的人类世界里，也发生在浩瀚而不朽的宇宙之中。

不朽的灵魂，但人类同时要为其负责，【98】这样的灵魂在自然界中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地位。然而人类越具人性，则同时越不具自然特性。人类的本性变为人性的创造，变为得到强调和自我负责的命运。地狱景象曾使灵魂变得暗淡，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则向其注入尘世不朽的仙丹妙药，之后为其搭建一座桥梁，通往美好的精神王国。具有悲伤论调的宿命论曾将人类置于自然的利爪之下，如今关于人类灵魂自主性的乐观思想则开始萌芽。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色的重新诠释产生了极大的后果。大约有这样的问题：我怎样对待动物？在荷马的世界中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似乎是生活在其他动物之中的一种惊人的猛兽。人类当然可以杀掉动物，吃掉它们，或者向众神献祭。但如果人们认为灵魂在动物世界里旅行，那么杀害动物即是谋杀。在这种谋杀之后，灵魂或许幸存，但毕竟人们谋害了一个生命，其中居住过一个美好的灵魂。动物的灵魂和人类的灵魂在灵魂转世的循环中是相似的，有区别的只有肉体。即使人们相信灵魂会继续存活，他们也不愿意被杀害，动物也是这样。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投向素食主义，并承诺保护一切被赋予灵魂的生命。

据说毕达哥拉斯确实以食素为生，或许他的学生亦如是。因为重视灵魂转世意味着改变生活、尊重动物。那些同时代人可能就由动物世界而来。在烹饪饮食那一边，审慎的生活要比放浪形骸的生活更受偏爱。人们不将生命花费在肉体的欢愉上，而是提升灵魂的欢乐。如今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人们偏偏禁止吃豆类食品。此外，营养学这一关于健康生活的学问也服务于伦理学。【99】它的目的是纯洁——在医学方面是健康，在道德方面是心灵的净化。

失落的天堂

起初一切都好。那时的人是“黄金一代”，“如众神般生活，心绪从忧虑中解放出来，远离辛劳，远离悲伤；负累从未进入他们的生活”。天堂

的花园没有繁重的土地劳作，丰盈硕果与丰产田地随处可见。在这个世界里，死亡也不是可怖的事。它不带来疼痛，只是进入人们的睡梦中，将其转变为一个友好而旁观着的精神。

仿佛一段邈远的絮语，摘自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这篇故事必定是为希腊人呈现的；这是一个更久远、更美好的世界，没有凶恶，没有争执，也没有痛苦。但为什么这个世界消失了呢？是什么毁灭了这个黄金时代？巴比伦、迦南人和希腊人的神话中显现出天堂花园，而人类为什么不再于这天堂花园里与动物友好相处呢？

为希腊文化界回答这一问题的人是恩培多克勒，他于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他的生活年代据推测在公元前495年至大约前435年。我们知道，他是一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还可能是一名医生。他似乎还被尊为术士和预言家，可能与毕达哥拉斯十分相像。他的家乡阿克拉加斯是排在叙拉古之后西西里第二繁荣的城市，恩培多克勒在当地是知名人物。在混乱的年代，他是主张民主制度的天才演说家。

位于阿格里真托城下高地的神殿之谷如今还矗立着无数庙宇，【100】直冲云霄。其中沙褐色的协和神殿由多立克柱支撑，耸立在橄榄树和仙人掌之间，十分宏伟。在众多丰润的河流与附近的海洋之间，到处都是适合思考的天堂：“树木经年覆盖这里，枝叶繁茂，硕果盈盈”，恩培多克勒在西西里炎热的气候中游乐。^[37]所有造物“对人类、野兽、飞鸟温柔且亲切，在他们之间燃起了爱”^[38]。一般说来就是：“女王即爱。”人类“带着虔诚的礼物试图为爱定下仁慈的基调，他们带着绘制成的动物（祭品）和芬芳奇异的膏药，以纯正的没药和浓郁的香熏作为祭礼，在地面浇洒黄色的蜂蜜制成的供品”^[39]。

然而这种幸福被毁灭了。毁灭并非由赫西俄德意义上的神性世界进程造成，而是由于一个恶行：对动物的宰杀！人们不再将绘制的动物作为众神祭品，而是使用真正的动物祭祀，对于食用动物，他们也毫无敬畏。于是，按照恩培多克勒的看法，他们失去了享有天堂的权利。因为他们不“用铁器将灵魂”撇去！“夺去生命并且贪婪地吞食高贵的肢体，这是人类最大的污点。”^[40]

大概没有古代哲学家（也许普鲁塔克例外）是恩培多克勒那样慷慨激昂的素食主义辩护者。他受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也信奉灵魂转世。他因此将杀害动物视为谋杀：“难道你们不愿要求停止这种丑恶的谋杀吗？难道你们感觉不到你们在黑暗的幻觉中互相撕咬

吗？”^[41]具体描绘一下这整个残酷的场面：“儿子改变了形态，父亲却糟糕地不知所以，宰杀了可爱的儿子，还在旁边祈祷！【101】仆人却犹豫了，是否要将其作为祭品。但是这人（父亲）无视他的啜泣，将其宰杀，并为全家准备了一顿骇人的宴席。”^[42]

恩培多克勒不是宗教狂热分子或满嘴胡言乱语的人。相反，他被视为至那时为止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之一。他在关于自然的说理诗中克服了米利都自然哲学家片面的元素论，划分了四种（平等的）元素：水、火、气、土——这一划分保持了两千年的支配地位。他的宇宙起源论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恩培多克勒关于物理学的知识和推论也值得注意。

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所有的希腊哲学家一样，我们仅能了解到支离破碎的恩培多克勒。他的论著可能极多。他大概还写过政治学和医学的相关著作，甚至可能创作过悲剧。留传下来的少许残篇来自大概两部各自独立的著作，其中一部关于自然哲学，另一部讲述神秘宗教的“净化”问题。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言，这两部著作均相当宏大，而仅有约十分之一的篇幅保存下来。

恩培多克勒将他的自然诗献给了他的学生鲍桑尼亚（Pausanias）。恩培多克勒教导他，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会生成，也没有什么会最终朽灭：“在所有有死之物中不存在生成，也不存在腐朽的死亡的终结。不！只有二者混合以及混合物的（再次）分离；只有在人类这里才有‘生成’这个词。”^[43]

这让人想起了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也许了解他。四种元素并非走向终结与朽灭，而是不断重新混合又再次分开。或者如恩培多克勒所称的那样：它们相爱，它们相恨。【102】吸引与排斥是自然界的运动，由相爱与斗争的两极造成。“因为所有这些（元素）都与它们的各部分友好地联系在一起：太阳、土地、天空和海洋，其中许多则在尘世中生长起来。而同样，所有倾向于成为混合的东西，相互亲近并且因爱相结合。与之相反，所有根据起源、混合以与形态互相分离的东西，是互相敌对的，完全疏离，不能结合，并且因斗争意志而不幸，而这意志归根于它的起源。”^[44]

与前人相比，恩培多克勒的理论显得更为先进。根据他的理论，一切皆由相同的（类似化学的）元素构成并相互混合，如水和葡萄酒，或是相互排斥，如水和油。与此同时，活力与变化在相爱与斗争这两极的力量斗争之中产生了。如果爱发挥了它最大的力量，那么元素会最大程

度地互相混合，这个世界会达到一个统一且平衡的理想状态。一种神性的球体形成，而斗争将逃至“极末端”。^[45]在世界的这一阶段，“人们既无法区分太阳迅捷的肢体，也无法区分土地粗蛮的力量，也无法区分海洋”^[46]。然而这个球体，这个 *sphairos*，为自己孤独的存在而高兴。但遗憾的是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斗争再次出现并且渐渐赢得上风。元素再次彼此分离，各成一团——这将持续很久，直到爱再一次在中心壮大，使元素重新互相混合。如此循环往复。

对于恩培多克勒来说，世界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当中。时而爱占据统治，而后斗争再次赶超，占据统治，最后爱重新掌权。在这位大师的有生之年，世界大概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斗争的胜利之师逐渐超越爱。【103】恩培多克勒以物理学的精确描述了今天地球的形态是如何形成的。气从理想球体逃脱并在其外表凝成一层外壳。现在，在这个没有气的球体中，热的火与湿的土分离，使得水从中喷涌而出。气离水而上升，渗入气外层，由此形成了大气层和空气。

这样的循环当然会有戏剧性的后果。因为只有在过渡阶段可能有生命，而不是在相爱或斗争的绝对统治下。生物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由四元素组成。同时不同的混合比例造成了植物、动物、人以及各个种类之间的差别。一切皆由相同物质的不同比例构成。据出自1世纪的一则重要材料来源埃提乌斯（Aëtios）讲述道，对于恩培多克勒来说，

动物和植物的最初形成绝不是完全成功的，而是仅有互相分离的部分产生；与此相反在第二阶段，由于部分慢慢生长合成，惊奇的形态产生了，第三阶段形成整个躯体的形态，第四阶段反而不再由土和水之类的元素混合而成，而已经是一片混乱，一方面，这是由于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它推动女性美丽的形态的结合，也促成了这样的场面。^[47]

如果表达得非常诗意，一位当代的生物学家也可能以相似的方式描述生物在演化中的高度发展。从最低级的生命形式通过雌雄同体渐渐产生了复杂的生物。但在恩培多克勒的观点中，生命形式究竟是否真的应该从彼此之中产生，这一问题尚不清楚。关于这一问题，流传下来的两份残篇未作说明：“有无数行肢的千足生物”出现了。土地“萌生了没有脖子的许多头颅，胳膊不附于肩膀，却独自四处乱行，【104】眼睛独自到处游荡，却不见额头”。^[48]与我们今天相符的生物据说即是从这些不完善的生物中产生，而其中人是最好的。但人类的演化并未结束。人类

倘若努力，可以继续自我完善并与众神平等。恩培多克勒的想象世界或许些微不同于现代生物学。它更类似于准宗教性质的硅谷网络奇幻世界.....

灵魂的材料

生物演化或许如此了不起，却依然只是宇宙中的过眼烟云。因为据恩培多克勒的观点，给植物、动物和人的生长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斗争占据上风，一切美妙的元素混合体将再次分开，所有生命都将消失。从斗争到相爱的过渡阶段中产生的那些生物，同样处于这种状况。假若所有的元素一开始就完全混合，这里也就不再会有个别的生命。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他们都想追求更高、更适宜的形式和等级，最终统统消失在浩大的世界循环中。

这样的宇宙演化论是冷漠的、宿命论的。人们自问，它应当怎样契合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转世观。如果其仅能成长于不断接近爱的春天，或是在斗争和分解之路上的秋天，那么怎样才会有永恒的灵魂？当其或于夏日受爱之融合的酷热而死，或相反在冬日受分离和消亡的严寒而死，灵魂中的某些东西又当如何维持自己的同一性？

恩培多克勒具体是如何设想“灵魂”的呢？【105】如果所有的生命都是由四元素混合而成，然后重新解体为四元素，那么不可损毁的名叫灵魂的东西的容身之处在哪里？如果并没有永久维系的东西，我怎样才能和时间上与自己保持为一，且为同一的？有代表性的是，恩培多克勒在其灵魂构想中放弃了灵魂（*psyché*）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精灵（*daimon*）。这个词意思模糊，大概意指某种“神性的精灵”。作为灵魂，此精灵游经众多生物之中，不但经于动物之中，而且经于植物之中！如果一切都是由相同的元素构成，那么在人、动物和植物之间就没有根本的质的区别。“我曾一度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丛灌木、一只飞鸟、一条从海洋跃至水面的沉默的鱼。”他在一部残篇中这样写道。
[49]这是一段美好的设想，但这个“我”却是有问题的。它如何能够对自己说“我”？汇集成这个“我”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同样特殊且偶然的物质的混合？或者干脆是超自然的且无形的东西？

恩培多克勒的表述是矛盾的。他有一次这样说道：“一切”都由四元素“恰当地被组合在一起”，“并且一切通过四元素思考、愉悦和悲伤”。

[50]因而承担我的内心波动的这个精灵（*daimon*）是物质性的，且遍布于

我的身体。但是另一次，恩培多克勒则认为思想仅仅位于血液和心之领域：“在涌来的血液的流动中（思想能力）得到给养，人们认为，思想就在此处。因为环绕着心脏流动的血液对人来说就是思想的能力。”^[51]反过来，另一次他这样说道：“要知道：一切皆有理性和思想的部分。”^[52]“一切已将部分保持在呼吸之间。”^[53]在这里“一切”明显不仅仅指人类。【106】由这种思想，恩培多克勒不仅视生物，且视一切自然中的进程均为被赋予灵魂的。无论如何曲解和解释，物理学家的陈述与生物学家都不怎么相符，与神秘主义者也毫不相符。

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恩培多克勒的灵魂构想中，没有显示出严格的逻辑。游荡的精灵自身仍具有荷马式死亡灵魂的残余，自然的构成质料（Baustoff）由相爱和斗争驱动，这精灵和构成质料并非有机地在哲学的整体设计中统一起来。恩培多克勒在他的宇宙起源说中还加入除物理学和神秘学之外的第三个维度，也就是道德，在此同样不能期待任何逻辑。

黄金时代的历史和人类原罪的历史如何与宇宙起源说相协调？老实说，根本不能！虽然人们可以描绘出黄金时代曾存于一个时期，其间爱尚比今日拥有更多的力量。而屠宰动物的原罪十分适合斗争已占上风的时期。但是对于这段衰落的历史，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人类原罪。黄金时代总归会按自然法则一步一步在斗争中瓦解。人类屠宰动物的过错结束了黄金时代，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也是莫名其妙的。人类一度拥有这样的力量，在伟大的自然之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同时也影响了自然之剧的演变历程。尽管这个历程是仅像星尘一样的东西，他仍是经由偶然，合目的地混合起来的。

伴随着（人类的）道德，一种全新的能量悄然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只容许两种力量：宇宙的爱和宇宙的斗争：

一个命运的判决，一个古老的、永远有效的诸神的决议，它被宏大的誓言封印起来。如果某人犯下罪行，手上沾染了受害者的血迹，那个发了假誓引发斗争的人，就会受到魔鬼的处罚：【107】所有人必须远离至福，三度四处游走万年之久，他们在这段时间进程内要接受有死的生物的各种形态，转换生命的艰难小径。我现在也属于其中，从神那里我堕落游走，因为我相信疯狂的斗争。^[54]

现在一切都不清楚了。如果恩培多克勒在“手上沾染了受害者的血迹”之前，（在他那里）还不曾参与为时三万年的灵魂轮回，反而似乎是

神圣的，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呢？他从什么地方来？他是天上的演化之最优生物吗，或者他可能从不曾在演化中占得席位？这与原罪有什么干系？这是唯一的事件吗——人类第一次屠宰动物，这是以天堂为代价的原罪？或者这只与每一个体的个别过错有关？恩培多克勒这样说道，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为什么从根本上是针对所有人的？如果这并非关乎原罪，而关乎每一个体的罪行，为什么至少素食主义者仍旧不在天堂生活？

那时的观念明显非常不同于当今时代的思想。对我们来说，道德观察根本上有别于科学理论。与此相反，恩培多克勒想要将一种非人性的宇宙起源说同完全具体的人性问题的联系起来：我应该怎样生活？就像许多俄耳甫斯教徒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给人类这样的机会，以一种伦理上可感的生活共同决定他们的命运？借此他们在植物中成为精美的月桂，在动物中成为狮子，“它们以群山为家，以大地为营”^[55]。经由好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它们详细的指示已经遗失——我们最终成为像恩培多克勒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即“成为预言家、歌者、医生以及栖居在大地的人类中的领导者”，甚至可能发展“成神、【108】最富名望之人”。^[56]

通向这里的道路在恩培多克勒那里也由成千上万的法庭铺成。每一次肉体死亡之后，赤裸的灵魂必须在冥府对它的纯洁无瑕做出汇报。然后它才能根据判决重新被穿上一具躯体。作为报酬，好的人生获得更高等的躯体，坏的人生则受到惩罚。这一法则的新价值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显示出来。整个自然中渗透着一个自然法共同体。人必须能够为他对其他生物的所作所为负责并为其辩护。并且不光对人类和动物，可能也对植物，比如对于恩培多克勒来说神圣的月桂。

尽管人能够以植物为食，但考虑到我们假定一切都被赋予了灵魂，这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如果灵魂也会游经植物，那么屠宰一只动物和拔除一颗生菜的区别是什么呢？唯一正当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吃水果，最好是吃那些已经落到地上的水果。但鉴于贫乏的资料状况，恩培多克勒是否视这样一种“俭朴的”生活方式为正确的方式，只有天知道。

温和的灵魂

长时间内，希腊人并不将肉体 and 灵魂视为对立的双方。灵魂在感觉中、在器官中、在情感中，以及在整个人里都曾位置。当逻各斯首次

进入希腊思想并且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肉体 and 灵魂才互相分离。因为无所不包且贯通一切的理性不是肉体的，而是纯粹精神的。这是神赐之物，诸神只分发给有死之物很小的一部分，【109】而且仅分给他们选中的所喜爱之物。具备这一出类拔萃的与神的联系，人们就能够像精明的大师那样安置好自己的生活，像赫拉克利特一样，或者像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一样，作为精神导师向新成员解释世界。

对人类的图景而言，这有着戏剧性的后果。因为将肉体 and 灵魂互相拆分得越清晰，人类就越能体现出，其作为一种怪异的混合体，产生自兽性的和神性的配料：有死的躯体之物和不死的精神之物。但是它们以何种方式在人类中共同作用？人们要怎样设想它们在细节方面的互相作用？这个问题不仅忙坏了远离生活的哲学家，也具有十分现实的维度——在医学中。

我们知道，恩培多克勒曾撰写过医学著作，他可能也行过医。理论哲学和实践医学的紧密联系在公元前5世纪是绝对正常的。恩培多克勒降生在西西里岛的时候，另一位哲学家兼医生阿尔克迈翁（Alkmaion）生活并任教于卡拉布里亚。他在克罗托内度过了一生，这也是毕达哥拉斯的工作场所。根据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份后来的补录，阿尔克迈翁年轻时，这位巨匠已是高龄。据此，阿尔克迈翁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徒孙辈，大约比恩培多克勒略长些年岁。

公元前5世纪的医生是什么？跟今天不完全相同。医生不是专业人士。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从哲学思考中得出实践性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为人们做医学治疗。当肉体 and 灵魂明显处于不平衡时，医生会重新建立一个人的舒适状态；这种不平衡是一种不和谐，以疼痛、呕吐、发烧、癫狂等等显示出来。我们在这里有意使用了“舒适状态”这个词。

【110】因为目的并非“健康”——这个词在古希腊完全没有纯粹医学的意义，而是“和谐”。今天，健康对很多人来说首先是疾病的缺席。与此相反，“舒适状态”是一种肉体 and 灵魂的理想状态。我可能是健康的，却不平衡且不幸运。如果我感觉到舒适状态，不仅肉体上的痛苦，灵魂上的痛苦也会远离，至少得到遏制。

不生病，不曾久病难治，不力弱体衰，不残疾，或者没有精神障碍，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世界被广泛地视为神之馈赠。所以治疗身体或精神疾病是巫师、萨满、祭司和先知的工作范围，这并不奇怪。为了治疗病人，需要一条通向众神的特殊通路。这些所谓的“白衣半神”远比现代医学久远得多。尽管如此，在古希腊，他们并不一定享有好名声。

从事医生的技艺在柏拉图看来对“一个理智者来说并非是令人满意的”^[57]。

在阿尔克迈翁的家乡克罗托内，形势有所不同。这里的医生拥有良好的声望。柏拉图也将一位名为德莫科德（Demokedes）的传奇医生称颂为榜样。在这样鼓舞人的环境中，阿尔克迈翁撰写了丰富的医学著作。此外，他同毕达哥拉斯学派走得很近，这在克罗托内并不罕见。他投身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成果，并将自己的书献给了三位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令人惋惜的是，这部著作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对他的学说的了解，要再次归功于他人的著述。

根据阿尔克迈翁，如果一个人处于和谐状态，他就是健康的。至关重要是活力与体力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克迈翁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政治学概念，即权利。他谈及*isonomia*——“平等”。如果一个人体内冷和热、苦和甜、湿和干“平等地”运动并且互相平衡，【111】这个人自身就是状态极佳的。但是假如一方力量或者另一方取得专制（*monarchia*）而成为王，那么人的身体就会陷入不平衡，这与政治体并无不同。无论在城邦里，还是在人的躯体中，唯有一种全面平等的均衡的正义能建立舒适状态。

将身体的和谐视为两极间的平衡，是典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结论。生活中的过度与无节制正像缺乏一样，有害健康。根据亚里士多德，阿尔克迈翁看到人的生活是由众多不同的对立所决定。此外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认识。对他而言，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或者流体不是心脏或者血液，而是大脑！在此，灵魂在西方文化史中首次获得了其合适的居所。令阿尔克迈翁格外注意的是，大脑的颤动有着戏剧性的后果——不仅对感知，也对思想而言。

他以一丝不苟的精力试图探寻感知和思想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他寻找着感觉器官与大脑之间的引导、机制和作用。亚里士多德一位重要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这样讲述道，阿尔克迈翁曾声称：

我们用耳朵听，因为耳朵里有一个空腔，是为声音而存在的……我们将呼吸通入大脑，以此我们用鼻子同时吸气、闻味。我们用舌头区分味道。因为舌头是温暖且柔软的，从而借由它的温暖使（味道）融解。之后舌头由于松软柔和的本性吸收了味道并再次（向大脑）给出味道。双眼通过环绕着它们的水看，但很清楚的是，双眼含着火。因为当眼睛受到击打时，【112】它（眼中的

火)就会喷出火花来。但它(光)反射的时候,我们是借助闪光之物和透光之物看的。并且光越纯粹,反射得越多。[58]

在与恩培多克勒的直接比较中,阿尔克迈翁的感觉—机制中的先进性就体现了出来。在对感觉的解释中,恩培多克勒成为其过于狭隘的元素说之牺牲者。在恩培多克勒那里,我们的感觉把捉到忠于事实的现实性,因为器官如它们吸收的东西一样,皆由恰好相同的诸元素构成。火、土、气和水遇到了由同样的元素混合比例构成的感觉器官。世间之物通过身体中精确相符的毛孔流入人体,并以图像、声音、气味等等形式向其传述这个世界。

阿尔克迈翁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洞察则要清醒得多。没有定义狭隘的机械理论束缚他的思想。作为经验主义者,他只将之前详细观察到的东西注入理论。如果观察不能使他接近目标,他有时也会倾向于推测。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大脑产生了精液,而且不仅是男人的大脑,女人的大脑也同样。通过精子的合流,性别被确定下来。哪种性别流出的多,就是哪种性别。

但是,如果像阿尔克迈翁这样机械地理解人的身体,那么灵魂活动的位置在哪里?思想也是纯粹的机械进程吗?它不再需要众神与神性之物以解释人的逻各斯了吗?是否有一个肉体自身的机制能够产生精神?看到这样一个没有灵魂的灵魂构想,恐怕毕达哥拉斯要愤怒得拍打棺材了!阿尔克迈翁用一个精巧的策略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思想、人类灵魂和逻各斯是超自然的、不死的,它们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113】他可能曾认为,“灵魂自己移动,并且在永恒的运动中得到理解;因此它是不死的,与神之本质相似”[59]。然而所有进一步的思考都在此结束。因为如果这涉及超自然之物,那么人就应避免谈论那些他在感性上不能理解的东西。在洞悉一切的情况下对神性之物下判断,这不是人类的事务,而是神的工作。只有超凡的躯体才能够“把开始和结束连接在一起”,反之,有死的人则不能——有一句话后来将歌德诱入这种愿望:“让开始同结束/互相聚集成一体吧!”然而对人类来说,认识和生活的宇宙之圈不会闭合。对这个宇宙之圈来说,剩下的只有对经验世界的摸索探究。

一切皆为质料!

也许阿尔克迈翁还赋予灵魂诗意的魅力,使其深不可测且不可解释

——研究的好奇心小心地将人类逐渐拆解成微小的组成部分，现在大门则敞开了。一位后继的哲学家经手做了这件事，他是来自米利都北部一个小城克拉佐美尼（Klazomenai）的爱奥尼亚人：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他的生年差不多与恩培多克勒一样。据推测他出生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活到约公元前428年。毫无疑问他受到一些前人的影响，也试着去捕捉灵魂。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有说服力的内容来自亚里士多德。据其，这个来自克拉佐美尼的人致力于关于宇宙的朴素而简洁的观点。银河乃是“某些星星的光”。据另一材料所述，他可能也曾明智且正确地认识到，月食中的黑暗仅是地球之阴影，【114】更无其他——这是关于月食的第一个正确的理论！他的认识论仍然是朴素的。像阿尔克迈翁一样，他对进一步揭示超自然之物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别人在神性的夜空下握住他们空想的油灯时，阿那克萨戈拉谦逊地写道：“由于我们感觉的弱点，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真理。可见的事物塑造了不可见之物的认识基础。”^[60]

阿那克萨戈拉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不是当时政治上相当无关紧要的爱奥尼亚，而是在当时整个古代世界里上升势头最好的城市——雅典。哲学史的舞台随着阿那克萨戈拉第一次移到了那里。据推测，公元前462—前432年间，他在这个新兴的政治与文化之都度过了约30年岁月。据普鲁塔克所言，伯利克里（Perikles）是最重要之人，这位雅典最重要的政治家，曾受教于阿那克萨戈拉并受到启发。对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角色，当然同时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角色！当伯利克里的权力被暂时削弱时，阿那克萨戈拉就因不敬神被其政治对手控告。人们对他提出诉讼，据说是因为他曾宣称，地球是一堆发热的石头。伯利克里把他的精神导师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并免除了他的死刑。阿那克萨戈拉在于爱奥尼亚北部的兰萨库斯（Lampsakos）的流放中度过余生。

阿那克萨戈拉是否确实插手了政治，以及他是否以无神论者公开出现，我们无从得知。重要的是他自然哲学家的身份。同所有之前的哲学家一样，他的著作也仅通过少许残篇和二手材料流传。我们从以前相互关联的大量文本中获得的一切，都像浮冰一样漂荡在黑暗的海面上。如恩培多克勒一样，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由物质构成。不存在一个空的空间。【115】一切皆含有小的以及更小的部分；这是一种原始混合，这种混合一直就在这儿。在此意义上，对阿那克萨戈拉以及之前的巴门尼德而言，世上没有任何新东西产生：“希腊人没有正确使

用产生和消失这两个词。因为（在根本意义上）没有事物产生或消失，而是从（已有的）现存事物中发生了一种混合，在另一方面则为分离。”^[61]

一切就一直在这儿，一切由相同的根基混合构成，且一切都参与到一切中去。如果某物向我们显示为火或者水，那就是说，因为火粒子或者水粒子在其中极其明显地占据了优势。同恩培多克勒一样，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一切都以不同的权重包括了一切中的某些部分。只是在此他没有将其严格限制为四种元素。

一位如此坚定不移的唯物论者如何对待灵魂和精神呢？首先他一度把精神（*nous*）也视为质料性的，就像构成事物的被融合的质料。精神不是超越尘世的，而是一个实体——尽管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实体。精神是“某种无穷的东西和独断的东西，它不与任何事物相融合”^[62]。因而世上一方面存在相互融合的事物，另一方面也有纯粹的不相融合的精神。因而，就像赫拉克利特那里的逻各斯，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是一种非个体的、影响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统摄宇宙，正如它为人类赋予灵魂那样。有时纯粹的精神同事物相融合，以这种方式给事物注入力量、能量和运动。如果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质料，精神就是驱动质料，它创造了活力和生命。

世上也有两类不同的事物。前者被精神亲吻，确切地说，同精神融合，后者则没有。充满精神的事物至少获得了运动，最多甚至获得了生命。“在所有大小、拥有灵魂的事物之上，精神居于统治地位。”^[63]

【116】在精神的层面上，人和动物间并没有区别——根本上讲相对于植物也没有差别。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完全相同的精神唤起它们的生命。阿那克萨戈拉似乎确实这样认为。因为他用以区分人与动物的这一决定性观点不是精神上的，而是高度实践性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阿那克萨戈拉曾声称，“人类是最聪明的生物，因为他拥有双手”^[64]。

构成区别的，是某种肉体的东西。人类解放了双手，这是一个开端，一切其他精神性的区别随之而来。按照普鲁塔克所述，阿那克萨戈拉认为相对于动物，人在经验、记忆和智慧方面是优越的。然而人的灵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灵魂之材料并未使人类从动物和植物中脱颖而出。人类既不出于精神上的原因，也不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能够成为更好的甚至不朽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恩培多克勒所从事的全部努力，即给予人类灵魂以特有的鲜明特征，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幻灭了。荷马的非个体的死亡灵魂，使肉体运动得以有可能的普遍气息，在阿那克萨

戈拉这里获得了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化学基础。

如此看来，阿那克萨戈拉似乎确实是无神论者。他显然认为，俄耳甫斯教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树林与房舍中讨论的泛神论及灵魂转世与真理相去甚远。然而就如在阿那克萨戈拉这里，人类如此超然的形象及其灵魂可能被告知，不会有青云直上这样的事。情况完全反过来了。所以在他伟大的后继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反驳阿那克萨戈拉而做出的独特而巨大的努力。在一个对人类精神过分朴素的唯物主义设想中，人类在宇宙中的突出位置就无法得到维持，【117】也不会有宇宙—人类之伦理乃至一个理想国度被勾画出来。但正是这些问题挑战了雅典的哲学思想，并引领其走向了最高成就。我们必须更加准确地看待公元前5世纪的这个城市，同时更准确地看待那个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角色，他给了哲学星球一记影响重大到难以置信的撞击，他就是苏格拉底！

流浪汉、他的弟子与雅典公共秩序【118】

苏格拉底之谜——民主之路——实用哲学家——受到危害的秩序——公共审判——柏拉图——脚本真人秀



苏格拉底之谜

他的生活众所周知。早晨他在长廊和竞技场；当集市人满为患时，就能在那里找到他。接下来的一天他会一直待在人多的地方，期待跟人相遇。大多数时候他在说话，人们只要愿意，就能听到他的谈话。^[65]

在做一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这方面，没有人比哲学家苏格拉底更称职。

关于他我们知道的并不多。【119】但正如黑格尔按普鲁士市民阶级的工作伦理所判定的那样，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离经叛道”的事件。然而在古代雅典，这种无所事事的游荡、闲逛、辩论，并非完全异乎寻常。一个真正的雅典人的生活不应只是循规蹈矩地养家糊口。然而，让这位集市哲学家变得可疑的并非懒惰，而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公元前423年，40多岁的苏格拉底出现在一部喜剧中。年轻的明星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才华如剧坛天空中闪亮的彗星，写下了这部喜剧。

喜剧名为《云》（*Die Wolken*），赢得了一场诗人竞赛的第三名。这部喜剧围绕古希腊的流行主题——金钱与债务展开。一位落魄潦倒的大地主去找苏格拉底学习如何在跟债主对簿公堂时为自己做最佳辩护。但他过于愚钝，学不会东西，于是将他的败家儿子送到了苏格拉底那里。苏格拉底的训练确有成效。但是儿子并没有将所学的辩论技巧运用到诉讼中，却转而攻击自己的父亲。他痛打了这位老人，并认为自己的母亲也必须被痛打一顿。充满恐惧的父亲意识到苏格拉底对年轻人的毒害作用，于是点燃了他的房子。

人们可以非常严肃地设想，如果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是关于苏格拉底的唯一史料，那么这位哲学家将被当作诡诈空谈家的典型，当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人载入史册。阿里斯托芬将这位公众哲学家戏谑为赤着脚的“高谈阔论之人”与“狂妄自大之徒”，他的动机不明。也许《云》反映了许多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苏格拉底。然而苏格拉底其实不像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所描述的那样。他并没有为他的智慧收过哪怕一分报酬。

【120】他没有为富人服务以谋取些许利益，而是在市场上公开辩论，让他的思想随风飘散。那么他以何为生？也许他继承了一些遗产，也许他获得有钱人的资助。他没有以文字形式留下任何著作，也没有开创某种观点分明的苏格拉底哲学。因此，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这种可能性对他来说似乎相当渺茫。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左右，可能是一位石匠的儿子。我们对其形象的了解源自两座半身像，塑成于他逝世几十年后。这两座半身像有数不清的古罗马副本：上面是一张长着狮子鼻的浮肿脸和光秃的额头。他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英勇无畏地战斗过。他身边聚集了许多有名的学生，这些人大部分出身高贵。

其中有两位学生向世人描述了他们尊敬的老师。这与阿里斯托芬所描绘的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两位学生的一位是来自科林斯的色诺芬（*Xenophon*）。他年轻的时候曾在雅典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无常的命运降临，他成为雇佣兵，前往波斯和伯罗奔尼撒。暮年之际，这位骑兵指挥官撰写了《回忆苏格拉底》（*Erinnerungen an Sokrates*）。色诺芬无法理解，人们竟能将苏格拉底这样虔诚的人指责为亵渎神灵者。他描绘了跟学生对话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捍卫友谊和远大抱负的传统价值，推崇孝道、节制和教育，宣扬保卫城邦的责任与勇敢以及公正等等。《回忆苏格拉底》可以被看作针对阿里斯托芬的诋毁所做的反驳。然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奇特。他几乎就只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手

工艺者与保守的绅士。

为了恢复苏格拉底的声誉，【121】色诺芬不得已掩盖了苏格拉底身上所有的独特之处。如果这位哲学家只是在广场上如此平淡地梳理观点，那么他对于另一个学生的巨大吸引力就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位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塑造的苏格拉底形象光辉耀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苏格拉底树立了一座伟大的纪念碑。

与色诺芬一样，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也是一位对知识拥有浓厚兴趣、技艺精湛的演说家。其他人在谈论正义、美、智慧或勇敢的时候，他总是在不断追问，坚持探寻一种更深刻和高等的，但同时也是无可置疑且“客观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与那个时代其他的哲学家不同，苏格拉底并没有将这些知识当作法则撰写下来，而是致力于不断推进对话，而往往没有一个最终结果。追求智慧的最高目标是完满的生活。关于公正与勇敢的话题最后总要导向善与正义的人生规划。然而苏格拉底没有找到它。他既没有建立起规范行动的理论，也没有树立起引导价值的准则。他只是不断寻找问题的肯定答案，最后却只找到否定结果。

然而，不断追问的苏格拉底成就的却是哲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业。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论辩言说的哲学。阿里斯托芬贬低他，色诺芬使他平庸，而只有柏拉图笔下理想化的苏格拉底深入人心，流传至今。亚里士多德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人们了解苏格拉底的第四个来源，同样也是这个方向。亚里士多德从未见过苏格拉底，他在后者逝世15年后才出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中将苏格拉底刻画为提出伦理—政治之基本问题的第一人。人们因此获得这样的一种印象：苏格拉底是哲学教育者的代表之一。【122】这样的定义并不会让人惹上杀身之祸。但是事实上，苏格拉底在他将近70岁的时候被人押上了公民法庭。因蔑视传统宗教，引入新神，以及破坏青年与父母关系的罪名，苏格拉底被指控并判刑。

民主之路

苏格拉底的审判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出于何种原因指控了他？为什么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雅典，否认神灵竟然是一项罪名？

相比爱奥尼亚或南部意大利城邦，雅典很长一段时间在古希腊世界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似乎只有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最重要的思想是“良好秩序”（*Eunomie*）。公民有义务参与

国家发展，建设适合所有人的最好制度。推动城邦的繁荣发展并非是为了争取个人利益，而是每个个体之于集体的责任。梭伦的良好秩序原则是历史上一个文明社会为建设有约束力的政治伦理所做的首次尝试。

梭伦通过新的法律机关来稳定公民国家，因为道德是暂时的，而法律是持久的。虽然他没有触动旧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代理机构，即最高法院（*Areopag*），但是设立了制衡机构。那个声名不好的“四百人会议”可能就是由他发起。而公民法庭则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变。从此以后，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法庭上通过“民众诉讼”控诉违背城邦秩序的行为。滥用权力的危险更大。【123】官员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非个人的、“客观的”法律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替代了个人的法律意识。

梭伦的法律条文被刻写在木板上，直到至少公元前5世纪末都适用，对雅典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与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典人被禁止出口粮食（除橄榄油外），也许是为了解决穷人的粮食短缺问题。于是，就发展为像米利都那样的贸易中心而言，雅典非常有局限性。公民权制度也是保守的。移民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获得雅典的公民权。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古老的家族手中。

团结统一、共同责任以及福利化社会的设想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是一种让雅典的自由男性公民标榜自身、昂首挺胸的理念。然而梭伦改革事业带来的并非“良好秩序”，而是对它的讽刺。雅典贵族之间斗争激烈，最终导致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上位，开始了僭主统治。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雅典人被这唯一的家族所统治。贫穷的农民阶级因接受慷慨的贷款而并不反抗。十二主神祭坛出现在广场上，成为新的城邦中心。统治者号召人们祭祀城邦女神雅典娜——这被视为雅典公民爱国主义的象征。

公元前510年，僭主统治被推翻。两位有野心的上层贵族代表在那场新的混乱中试图争取雅典人的拥护。一位是伊萨戈拉斯

（*Isagoras*），他在雅典宿敌斯巴达人那里获得支持。另一位是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他承诺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城邦的共同管理。所有的自由男性公民都应以合适的方式实现平等——通过“权利平等”（*Isonomie*）。【124】不久之后，南意大利克罗顿的阿尔克迈翁还将这个概念作为健康的基础。“权利平等”这一概念在反抗僭主统治的斗争中诞生，最初是指所有贵族之间权力的均衡分配。公元前6世纪末左右，克利斯提尼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权利平等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自

由公民？

公元前508—前507年，上位之后的克利斯提尼推行了大规模改革。他把公民群体划分成尽可能同等大的管辖区，并让各区尽可能自治。各区选举代表组成“五百人议会”以辅助“公民大会”。每位公民都有机会通过抽签被选入议会任职一年，一生最多当选两次。

理论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通向人们渴望已久的民众统治，即民主道路上的一次突破。但从一副刻在泥板上的蓝图到一个现实的民主政体，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教科书上缩写的古希腊历史被描述为一条向上追求理智与理性的道路：从极不公平的君主政体与较前者略微公平的贵族政体，经过梭伦并不完美的金权政治，到达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政体。然而这条道路绝不是笔直的，也没有最终到达如神赐的理想状态。它的推动力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必须警惕自己是否过于高估了理性的作用。

我们并不清楚克利斯提尼改革背后的个人动机。他可能确实想在时代的骚乱中寻找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及利益的均衡分配方式。也许他对权利平等的承诺只是一个取悦民意的手段。作为上层贵族代表的他当然知道，谁将在未来的国家中享有权力。无论宪法如何被反复修改，贵族的权力总能得到保证。【125】拥有更多财产、金钱、时间、关系与威望的人，在这种形式上平等的社会中并不与他人平等——至今都不会。

这将在接下来的雅典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印证。几乎没有一位在之后的民主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家不是出身贵族。绝大多数政治斗争并非为了寻找真理，也不是为了追求公正，而是服务于有权有势的派系与家族。形式上独立自主的人民变成了权贵的傀儡。后者操纵民意，行贿赂官，以权谋私。所以，当时世人没有将雅典的民主政体当作理想政体，这并不让人奇怪。于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这些我们通常在关于伟大的欧洲文明起源的主题演讲中将其与民主同时提及的哲学家，为何反对这种国家形式……

实用哲学家

不论克利斯提尼的动机如何，他本人在改革之后直接消失于历史的黑暗之中。当时的雅典不是令人神往的大都城，而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小城邦，在成功抵御外部威胁之后才变得强大。两场抵御波斯帝国侵略

的胜利（约前500—前479）使雅典人获得了古希腊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治权。

那时的雅典居民经历了公元前481年波斯人火烧都城。人们救出许多孩童，其中一个就是10岁左右的伯利克里。【126】他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孙，同时也是雅典伟大的战争英雄克山提波斯（Xanthippos）的儿子。出身雅典名门的伯利克里在这繁荣的民主城邦中大展宏图。身为首席将军的他，将政治与军事权力独揽于一身。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今天人们将伯利克里时代称为伟大的黄金时代。但他的长期执政无疑跟雅典民主与平等的最初设想并不相符。也就是说，雅典民主发挥最佳功用时，恰恰是它其实不起作用的时候。

雅典人经济上的自由恰恰通过自由的对立面来保证：通过一个毫无顾忌地利用和削弱小盟友的僭主政体。雅典的爱琴海保护者角色为它赢得了巨大影响力和无数财富。提洛同盟相当于古代的北约组织，曾帮助小城邦抵御波斯人。作为回报，这些深受折磨的盟友向雅典人缴纳贡金，承认雅典的管辖权并采用雅典钱币作为通行货币。而雅典特派员则在爱琴海上监督他们。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冷战结束之后，雅典立马采取措施确保提洛同盟不会解散，以及雅典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反叛者会被立即攻击并受到无情的惩罚。

在很短的时间内，雅典从一个抵御波斯的军事胜利者攀升为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的人都涌入这个城邦，只为在那里生活，哪怕作为下等公民。伯利克里则严格规定，他们不享有公民权利。民主并不适于所有在雅典的人，而仅仅属于那些之前已经拥有公民特权的人。在雅典黄金时代，这些人是几万名成年男子。【127】而包括妇女、儿童、下等公民和奴隶在内的居民总数显然要高得多。居民总数在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到伯利克里时代的短短50年中翻了一倍，从约7.5万人涨到约15万人，即从卡斯特罗普-劳克塞尔的居民总数涨到赫尔内的居民总数。后来人口最多的时候，可能达到了20万人。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多。罗马在恺撒时期容纳了超过100万人口。然而在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确实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城邦。

雅典就像古代的纽约，很远就能看见它的建筑。曾被波斯人烧毁的雅典卫城如今成倍扩建。帝国的新标志是帕特农神庙，它在极短时间内落成，是当时最雄伟的建筑之一。而“神庙”的称号完全是一种误导。因为在帕特农神庙中无人敬奉神灵。雅典城在这里为自己和它的臭钱（国家财富和从提洛同盟国家攫取的贡金）庆祝——类似今天的帝国大厦与

无数艺术家与手工业者成就的建筑工艺，海上霸权带来的繁荣贸易，以及迅猛发展的银行业，使雅典成为一个汇集各种影响力、理念、文化与情绪状态的大熔炉。雅典数百年间因地域上与外界相对隔绝而独立发展，并由此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时却以惊人的速度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各种文化融合，成为一个大都市。金钱保证了不同事物的同等化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交换，它不只是在巴特农神庙被人们狂热崇拜。为了获取金银，人们疯狂采矿。银行家经营定期和活期存款，或者专门经营针对军备、基建、雇佣兵的不同贷款品种，或者提供贿赂金。参与到贸易与信贷经济中来的，是艺术家、医生、雇佣兵以及雇佣兵领袖这些自由职业者，他们富有，但并非立刻就能变得“自由”。【128】

这时，人们在雅典街头会遇到一些哲学家兼政治顾问，例如阿那克萨戈拉。人们花一德拉克马就可以买到他的唯物主义著作，作品有一个通用标题《论自然》（Über die Natur）。作为智识上的通用武器，它推动了一个职业的诞生：智者（Sophisten）。城市生活越复杂，随之而来的挑战就越大，智力工作就变得越重要。但是教师、律师、政治顾问、演说家、音乐家或数学家这类职业的专业技能很难一下子掌握。那些不能像纯手工活或者经商这样可以很快学会的职业技能，人们必须通过昂贵的私人课程去掌握。

这类课程的教师就是所谓的智者。在当代德语的语境下这个词是贬义的，用来指称那些颠倒黑白、曲解法律的人，那些一肚子坏水，化学药水都不能净化他们的人。然而英语“sophisticated”这个词是褒义的，有“理智的”“文化的”或“娴熟的”的含义。在古希腊这个词最初是中性的。*Sophor*指“专家”，智者指“教授智慧的老师”，他们教授人们某种技能或手艺。智者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确定的哲学引导方向。成为智者只意味着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性职能。

历经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的150年的哲学思考，哲学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突然获得了非常实用的意义。像智者这样的人，在如雅典这样高度复杂化的城邦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不宣扬宗教或与宗教相关的知识，而是教授完全实用的演说技艺和其他技能。【129】哲学，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还是启悟者的神圣之物，现在成了律师的辩才。能言善辩比高绝之智更重要！智者的知识与技能不是纯理论的，而是实用的。他们的志趣不在于更高的真理与道德法则，而在于智识上的优越。总而言之，哲学越从灵性背景中疏离，它在现代城邦中就显得越实用。

想象不出比这更大的哲学家形象的转变了。从仰望星空时掉入水井的泰勒斯和孤独而又脾气暴躁的赫拉克利特，到伯利克里时期收入高、工作灵活的智者，这之间的差距可不小。这些智者中最著名的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他可能生活于公元前490—前411年，比阿那克萨戈拉小10岁左右。作为一名云游演说家，他从希腊北部色雷斯地区的爱奥尼亚属地阿布德拉出发，游历了许多城市。他多次停留在雅典，显然在寻找机会接近伯利克里。后者可能直接聘用了他。据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记载，伯利克里委托这位哲学家为意大利南部城市图里乌姆（Thurioi）制定民主法案。根据柏拉图和狄奥多罗斯的描述，普罗泰戈拉是一位极有威望之人，他富有并且成功——我们不禁想到那个“大车站”，柏拉图在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中描绘过它，它很可能是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园》的原型。

普罗泰戈拉没有留下作品。第欧根尼·拉尔修称，普罗泰戈拉是第一个著作被烧毁的人。哲学史中关于他也只有一句由柏拉图流传下来的话：

……他（普罗泰戈拉）在某个地方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者是其所是，非存在者是其所非是”……难道他不就是认为：每个事物于我而言的（真实）所是就是它向我显现的样子，【130】每个事物于你而言的真实所是就是它向你显现的样子吗？难道他不就是认为你跟我一样都是人吗？……有时我们不就经历着这样的事情：同一阵风吹过，我们之中的一位感到寒冷，而另一位则不这么觉得吗？^[66]

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对于哲学来说，就像毕达哥拉斯定理对于数学那样重要：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且没有其他更高的标准，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就都只是主观的，并因此是相对的。使一个人颤抖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则是舒适的。一个人认为是好的、公平的东西，另一个人会认为是坏的、不公平的。哲学家对宇宙和人类生活中客观绝对法则长达150年之久的探寻，在这里被当作希望渺茫的事业，因而我们与之告别。

然而对普罗泰戈拉的这种解读是有争议的。他真的认为一切都是主观相对的，还是认为只有像在风中冷得发抖这样的感觉印象才是？“人”在他那里具体指什么？是指“每个单独的人”（就像柏拉图所理解的那样），还是指“人本身”？在第一种情况下这句话意味着，每个人

看到的世界都不同。就像那句科隆名言：“每个疯子都是不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句话意味着，人作为人，不可能拥有其他经验或者知识，因为人是（有局限的）人类。那么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是涉及了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种属的人？

无论这句话的意思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取消了人的绝对维度。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所有东西都依赖于经验。没有什么是客观的，所有东西都是主观的。我是否同意一个关于生活与世界的观点，取决于它对我而言显得多有说服力。或者，我同意一个观点，是因为我能从中获利。真理并不通过某些人拥有的比其他入更高深的知识而产生，真理其实是一种断言。【131】许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就会把这个观点作为真理传播开来。如果许多人拒绝我的观点，那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一个观点的真理性并不由它的质决定，而由赞同它的人的数量决定。

受到危害的秩序

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具有惊人的现代特质。它有利于城邦且符合时代精神。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古代传统价值的消逝：通过利益追逐和货币经济、公民议政和市场纷争、民族融合与传统衰落、腐败堕落与刀光剑影。人类历史这一织物并非由笔直的单线编织，而是不同时期的混合线团。而图案往往在事后考察中才能显现出来。

宗教对于雅典是一个非常闪亮的装饰。当人们的传统信仰在城邦的新经济市场中为另一种宗教让步，当神庙变成银行而银行变成神庙时，宗教在城邦的非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乍一看是令人吃惊的。跨文化的新金钱宗教无法促成更高层面的相互联系。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不虔诚，礼拜、仪式与庆典对于国家秩序来说就越重要。金钱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同越要紧，传统宗教对于公众的身份认同就越重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对来说“经济自由的”雅典，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泰戈拉都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因为那个让人惊讶又老套的亵渎神明的嫌疑。【132】当希腊人在乡村或小城市里过着虔诚的生活时，他们就会尽可能地相信他们想要信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在大城市里越是没有信仰地追名逐利，就越会疑心重重地监察他人对诸神的态度。

“从来不曾存在，并且将来也不会存在这样的人，能从诸神或者世间之物那里找到真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作家科洛封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von Kolophon）如是说，但他没有受到审判。^[67]他认为，诸神的原型其实是人类：

荷马和赫西俄德所描绘的诸神的一切正是人身上让人唾骂的污点：偷盗、通奸与欺骗……埃塞俄比亚人想象自己的神是黑皮肤塌鼻梁，而色雷斯人的神则是蓝眼睛红头发。如果牛、马或狮子有手并能够像人一样画画和创作，那么马将画出似马的，牛将画出似牛的诸神画像，而且它们会塑造跟自己相似的诸神雕像。^[68]

色诺芬尼没有像19世纪的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与尼采一样宣扬任何无神论，尽管后者的无神论采用了跟他相似的论点。但是他针对人类根据自身形象创造诸神所展开的批判却显得不留情面。然而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希腊属地，并没有任何渎神案的发生。

相反，在雅典情况就十分不同。一个城邦的经济越自由，所汇集的居民越混杂，管理起来就越困难。人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什么以及相信什么的自由在无限增长。这意味着巨量的政治炸药。看上去，法律并非对所有公民来说都是宇宙秩序的象征。柏拉图称，智者埃利斯的希庇阿斯（Hippias von Elis）曾断言，人为规定的法律（*nomos*）是一种人造秩序，违背了人的本性（*phýsis*）。【133】就本性而言，我们跟亲眷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的不同。因此要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违背本性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当时其他的智者都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想让民主变得更民主，他们比雅典统治阶级更重视权利平等。正如活跃在意大利南部的智者利科弗龙（Lykophron）反对如下观点，即某些人生来就属于贵族阶层。他的雅典同僚阿尔西达马斯（Alkidamas）持相同看法。在一场著名的对话中，他尖锐地批判了奴隶制度，认为这是违背本性且错误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智者卡尔西顿的法里亚斯（Phaleas von Chalkedon）同样支持社会主义思想：“一些思想家主张，财产合理分配是最主要的事。他们断言，这事关整个公民社会的进步。因此卡尔西顿的法里亚斯将这一观念当作自己的代表性观点。也就是说，他认为公民财产必须平等分配。”^[69]此外，法里亚斯还提倡教育平等以及手工业的国有化。

许多智者的道德怀疑论中掺杂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乌托邦理

想。在统治阶层看来，这是危险的。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30年中遭遇巨大灾难，陷入动荡。公元前430/429年，一场严重的瘟疫在城邦中肆虐，伯利克里也是受害者。雅典在他的继任者手中又陷入与强敌斯巴达的冲突。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于是爆发，苏格拉底参战，成为一名重步兵。公元前415年，极具个人魅力的机会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Alkibiades）带领雅典人出征西西里岛，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远征。对此我们（在决定成败的月食话题中）已经谈论过。【134】对叙拉古战争的失败于雅典而言，意味着这长达27年、曾几度停战的战争开始走向尾声。公元前404年，雅典彻底失败之后，提洛同盟解散，它的军事霸权地位就此终结。像底比斯和科林斯这样的城邦繁荣起来。新成立的罗德斯城（Rhodos）则成了爱琴海最重要的贸易平台。

普罗泰戈拉之后的智者在最动荡的时代中活跃起来。公元前411/410年以及战败的公元前404/403年，雅典的寡头政权两次上台，第二次发生在斯巴达占领雅典之时。即使是在稳定的表面民主时代，公民大会也常常显得负担过重且软弱无力。个人，主要是贵族的作用变得比民主机构更重要，他们通常扮演演说家与领袖的角色。众所周知，不能滥用的权力没有吸引力。氏族贵族未被削弱的权力导致骇人的权力滥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统治阶级需要人们去购买和消费他们的产品，但彼时的统治阶层对剩余人口的需求程度与此不同。当时的民主跟国内市场需求无关，而主要被用来达成统治家族之间的利益平衡。然而，仅仅通过人们对权力平衡的兴趣来稳固自身的状态被证明是极度脆弱的。

作为雅典民主基础的司法制度则让人难以评价。法官不是一项职业，而是一种名誉职务。司法官员每年由抽签来确定。每一场公开诉讼中，501位陪审团成员仅仅通过多数票规则做决定，而他们的判决是最终裁决，不容置疑。【135】这种民众法庭依赖于原告和被告的演说能力，很容易被操纵。就控诉渎神罪来说，每一位公民不需要太高费用就能提起上诉。这类诉讼被证明是一种反对智者的有效方式，思想保守的人们不信任智者的话。谁对传统价值提出公开质疑，谁就是在扰乱神性秩序。谁怀疑神，谁就是在动摇公共价值基础。从古至今，这样的指控在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中都很常见。在自由民主的联邦德国，渎神罪直到1969年才被废除。

如果渎神罪的控告成功，那么在雅典等待被告的是罚金、流放或者死刑。阿那克萨戈拉在公元前430年左右雅典遭受最严重瘟疫时，被指

控亵渎神明，后来他成功越狱逃往爱奥尼亚。公元前415年，智者米洛斯的狄奥戈拉斯（Diagoras von Melos）表面上因无神论被指控，事实上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敢于在他的家乡批判雅典人的战争暴行。他也成功逃脱了。普罗泰戈拉在公元前411年遭受指控，当时雅典人在西西里岛遭遇了最惨烈的失败。人们把他硬拖到法庭前，因为他在自己那部现已失传的著作中对诸神的信仰立场不坚定：“关于诸神，我不能确定任何事，既不能确定他们存在，也不能确定他们不存在，更不能确定他们的形象；因为许多东西阻碍我们认识他们：事物的不明特性和人类生命的短暂。”^[70]控告者引用了这些句子。于是年迈的普罗泰戈拉被逐出雅典，流放西西里岛。流放之路要了他的命，他最后溺亡于大海。

公共审判【136】

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梳理一下之前的论述。今天看来，针对阿那克萨戈拉、狄奥戈拉斯与普罗泰戈拉的指控算是历史上这场最著名的渎神罪诉讼案的预热。就悲剧性意义而言，只有对意大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审判可以跟这场苏格拉底审判相提并论。人们也可以说，正是这场诉讼案使苏格拉底流芳百世。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苏格拉底当时也有像阿那克萨戈拉和狄奥戈拉斯那样的逃跑机会。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因此他成为司法的牺牲者，也成为正人君子的典范。他无罪而被判刑，却勇敢地面对死亡。这是雅典第一场针对哲学家亵渎神明，且被指控者真的因此送命的诉讼案。但如果当时一位年轻人没有坐在观众席上，也许这次事件就无法显示出任何历史意义。他就是追踪事件来龙去脉的柏拉图！

这场指控发生在公元前399年，跟往常的诉讼案一样只在雅典民众法院审判一天。众所周知，历史上这三位起诉人的姓名为：阿尼托斯（Anytos）、梅勒托斯（Meletos）和吕孔（Lykon）。至少三者中的一位是阿尼托斯，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拥护者，公元前404/403年，他参与推翻了受斯巴达人支持的长达30年之久的雅典寡头统治。苏格拉底首先为自己做了一场辩护演讲，尝试证明自己无罪。尽管如此他仍被判有罪，之后苏格拉底做了第二次申辩。这一次事关他的量刑。在被判处死刑之后，他做了最后的陈词。至少第三次讲话被认定是虚构的。【137】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三次讲话，而被告在被判处死刑后再申辩一次，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第一场演讲是非常精巧的辩论。苏格拉底讽刺地称赞了控诉人的修辞术，以表示他自己在修辞上的无能。他只是一个语言朴素的人，没有掌握任何法律申辩的技巧，而仅只是简单陈述真理。当然，这也不只是平淡的陈述，因为苏格拉底的整场演讲是极为高明的修辞术的典范。如果他真的做了如此这般的演讲，那他要么是在愚弄法庭，要么是柏拉图事后对苏格拉底的演讲做了如此大幅度的加工润色，以至于那些本该是严肃的话题对我们来说却显得很讽刺。

苏格拉底的态度由此具有某种超现实意味。因为这场申辩根本没有达到让自己无罪释放的目标，相反却挑衅了法庭。这位被告针对一项指控竭力为自己辩护，即他被指控为一位收取报酬的智者。他说自己既没有曲解法律，也没有违禁宣扬无神论的自然哲学。紧接着他开始陈述自己的哲学；这是一种充满自信的自我介绍——如果我们不称之为自负的话。正是德尔斐的神谕曾告知世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因为他与所有人都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种神性的智慧得到了印证，因为他总是遭遇无知，这些无知将自己伪装成知识。当然指出他人的无知让他变得不受欢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还在追随他。于是人们指控他败坏青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苏格拉底分析了渎神的控诉论点。【138】指控他的人看上去并不确定是指控他的无神论，还是指控他那个偏离城邦宗教的信条，即在行动上公然追随那个神性的内心的声音。苏格拉底自豪地说，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也说自己不惧怕死亡，但法官不应当忘记，如果他判无辜人死刑，那他自己就在犯罪。此外，他也表示，自己在怀疑的德性这方面对城邦福祉来说是无可替代的。而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正直的态度，尽管他早就知道，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一样终究只会失败。最后，他说自己期待一场公正但不因同情而影响判断的判决。

从法庭的角度看，再没有比苏格拉底更令人讨厌的人了。首先他向起诉人表明，他并不十分尊重他们。然后他指出死刑的黑暗恐吓于他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威胁感。最后他断言这个被重建起来的民主政体是丢人的，因为它既不道德也不值得尊重。只有批判者能够占据道德的高位，苏格拉底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真的说了这些或类似的话，那他被判有罪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当然，对柏拉图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其他人可能视为傲慢的态度在他眼中却是一个正直的哲学家在半吊子和空谈者面前的优越感。在

柏拉图眼中，苏格拉底彻底揭露了一个愚蠢且道德败坏的司法制度。而他的演讲艺术是一种灵活应变，目的是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起诉人的修辞术。跟指控者不同，苏格拉底运用演讲策略和技巧的背后不是某个深藏的目的，而是对真理与正义的热爱。与柏拉图本人不同，苏格拉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原则上人们并不能获得真理与正义。【139】人们只是做了追求它们的尝试。

在法庭宣布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被告进行第二次申辩。这次是关于量刑的。起诉人要求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又一次在法庭前表现得很幽默，他要求政府请吃一顿免费午餐。这是他事实上本应得的。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也同意交罚金。他富有的朋友能够为他筹款。

法庭立刻判处他死刑来回应他的狂妄自大。在第三次，无疑是虚构的讲话中，苏格拉底首先大度地接受了判决，以表示自己并不在乎指控。忍受他面临的死亡，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起诉人在指控他所使用的肮脏手段此后会更加肆虐，这才是最让人恶心的。但他并不想在法庭上对结果提出抗议。因为在他死后等待他的肯定不会比人世更糟糕了。或者死亡是一场永恒且无梦的安眠，或者等待着苏格拉底的是比此生更好更公平的来世。这两种可能性都是积极的，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好处。

这一申辩词即《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e des Sokrates*），成了世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那他到底有没有做过如此或类似的申辩呢？也许这只是柏拉图一部完全虚构的著作。而且有一点至今也未确认，即这场申辩到底是在审判之后就立刻记录在莎草纸上，还是等到二十年后才被追溯。但无论如何，柏拉图赋予了它极高的价值，并将苏格拉底塑造成拥有卓越品质的人类英雄。柏拉图视他为哲学家的楷模。这样一位理想的苏格拉底就是我们在《申辩篇》（*Apologie*）中所看到的。那么柏拉图塑造这样的形象是为了什么？他本人又究竟是谁？

柏拉图【140】

这位热情又仔细地还原了这场审判的年轻人，出身雅典的名门望族，含着金汤匙诞生。如果他从政，那他将有很大机会管理城邦。如果他选择从军，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将军。但他既没有成为政治家也没有成为战争英雄——他成了柏拉图；他是古代世界之光，欧洲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没有任何其他哲学家像柏拉图这般决定性地塑造了我们对两个问题的设想：“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他的影响也深入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同时也为古代晚期至中世纪基督教的重要部分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甚至认为，欧洲哲学传统完全是一系列对柏拉图的注脚。

既然柏拉图如此重要，那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他的生平。无论如何，这位哲学家是雅典最显赫贵族的后裔。他与同阶层的人一样，比起民主政体更倾向于寡头政体。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8/427年。他是最小的孩子，跟三位哥哥姐姐一起经历了父亲的早逝。他的母亲很快再婚且婚姻幸福，不过她的新伴侣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拥护者。这比起母亲的叔叔在公元前411年成为拥护寡头政治的政变人物，要更出人意料一些。她的堂兄克里底亚（Kritias）也是一位政变者。柏拉图23岁时，克里底亚加入了三十僭主集团，【141】三十僭主在斯巴达取得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之后夺取了政权。柏拉图的叔叔卡尔米德（Charmides）也属于这个反对民主政体的寡头政治集团。

在战争与衰落的阴影中成长起来的柏拉图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被作为国家接班人来培养。他通过赫拉克利特第一次认识了哲学，赫拉克利特神性又全能的逻各斯概念影响了柏拉图一生。他的思想导师不是他的私人教师，而是广场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与其他许多出身名门的年轻人一样，长期追随苏格拉底的思想。这时有人给了他第一个工作机会，即在三十僭主集团从政。柏拉图断然拒绝了，他像蔑视所有其他政治集团一样看不起三十僭主的统治：

我现在认识到：城邦管理者、法律和习俗——这些东西看得越多、年纪越大，管理好一个城邦对我来说就显得越困难……我们不再按照父辈的法则和道德观念来生活……法律制度与道德观念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衰落，以致最后我变得晕头转向，我曾充满激情地处理过政务，但看到并且不得不看到它们如何衰落并越过一个个底线。^[71]

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更是加深了柏拉图对现存政治局面的不满。在柏拉图的亲人那里，此时他们心中已然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怀疑，它促使人们四年之后与苏格拉底正面对峙，它就是：苏格拉底败坏青年！这个由苏格拉底教育出来的柏拉图蔑视民主政体，正如他轻视贵族的寡头政治。尽管这位年轻人面前是为他铺好的政治坦途。

苏格拉底被执行死刑之后，柏拉图感到了深深的恐慌，【142】他失去了所有对雅典政治的信任，于是离开了雅典。出走的第一站是墨伽拉。这个城邦位于雅典南部30公里的伯罗奔尼撒海峡，不久前刚从斯巴达压抑的统治中解脱出来，此刻正在试验自己的民主形式。在这里柏拉图遇到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攸克里德（Euklid）（不要与那位数学家混淆）。据说攸克里德把主要精力首先放在关于善的问题的研究上，这也成了柏拉图思想的核心。第二站是哪里就不那么清楚了。柏拉图可能到了昔勒尼，一个繁荣的希腊属地，位于今天的利比亚，昔勒尼同样发展了一种民主形式。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年迈的数学家忒奥多罗斯（Theosoros von Kyrene）为柏拉图提供了庇护，他是普罗泰戈拉的朋友与学生。柏拉图可能从那里继续游历到埃及。而这些经历并不能确定是历史事实还是文学虚构。

但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最后在意大利南部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毕达哥拉斯学派在那里还处于后期的繁荣。他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弟子的接待，客居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根据地塔兰托。尽管拒绝了意大利南部城邦的奢侈生活，但他在这里吸收了新的思想，这对他影响重大。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启发在柏拉图那里是很明显的。柏拉图吸收了关于灵魂不朽的想法，之后还成为灵魂转世理论和身体是灵魂的囚笼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著名的理念论无疑也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子。

公元前388年，这位游学者来到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柏拉图在那里遇到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os I.）时，大约30岁。我们听说的有关哲学家与僭主之间这场冲突的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奇闻趣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在争吵中分道扬镳了。柏拉图后来在海上被抓，并在埃吉纳岛上被当作奴隶贩卖，这一记载非常可信。【143】一位不那么出名的哲学家，即来自昔勒尼的安尼克里（Annikeris）偶然在市场上发现了名人柏拉图并赎回了他。柏拉图会在西西里岛上被当作哲学名人，这段历史倒有点令人惊讶。因为至少到那时，柏拉图几乎还没有作为哲学家在公众场合出现过。也许安尼克里当时认出柏拉图是名门望族子弟，而不是把他认作一位著名思想家。不管怎样，如果这件事确实发生过，那对柏拉图来说则是比较尴尬的。比起柏拉图在旅途中遇到的许多其他人，安尼克里在他的作品中哪怕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回到雅典之后，在南意大利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的游学经历给柏拉图带来的重要成果马上见效了。柏拉图也决定跟他们一样成立一所哲学学园，作为他维持、教授并传播自己思想的圈子。他买了一块种有橄榄

树的地，并于公元前387年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学园。具有传奇色彩的雅典守卫者，英雄阿卡德摩斯（Akademos）在这个地方有片小树林。因此，人们将这所学园称为阿卡德米（Akademie）。这个词并没有其他更深的含义，而只有一个比较随意的起源。

此前，像阿卡德米学园这样的思想工厂在雅典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范本。智者大多是孤独的斗士，而那些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公共学校没有建立起任何自己的哲学思想传统。只有刚建立不久的伊索克拉底修辞学校可以算作竞争对手。但不同于伊索克拉底，柏拉图的学园不承诺任何成为演说家的实用性训练，而只提供通识的哲学基础训练；目标不是专家，而是受过哲学训练的全才。在这里，人们研究几何学、天文学，甚至可能还有动物学。【144】此外，柏拉图的课程是免费的，而且学生们全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中。

阿卡德米学园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了整个古希腊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中心。在这里，柏拉图将于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教育未来领导希腊世界的年轻人。无数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各地而来，支持并追随他。通过阿卡德米和众多弟子，柏拉图哲学传播至整个古希腊世界。但是柏拉图哲学到底是什么呢？

脚本真人秀

要说清楚柏拉图到底教了什么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他近乎完整保存下来的著作是极其复杂的，并常常包含惊人的矛盾。此外，除了少数像《申辩篇》这样的特例以及一些书信之外，几乎没有柏拉图的个人著述留传，而只有对话录。

柏拉图对话录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难有一般类型可作参照。为了准确地表达他的哲学思想，柏拉图选择了一种研究性对话的方式。以前无数以《论自然》命名的著作在以物理学或哲学方式解释世界时用到感叹号的地方，柏拉图在对话录中都用问号。

柏拉图选择这种极为特别的新方式表达哲学思想，有诸多理由。这种机智的提问与诘问方式是苏格拉底的哲学风格，柏拉图深受其影响。而苏格拉底没有写下文字著述，因此也没发展出任何与其哲学风格相应的著述模式。他很少在哲学探讨中下定论，而主要是指出他人观点的不充分和谬误。【145】怎么才能将这种“否定性”哲学变成一种奠基其他众多思想的“肯定性”哲学呢？

我们不确定柏拉图开始写作对话录时，他已经发现了多少自己十分确信的真理。也许最初并不多。至少他早期的问题与探讨处于相当真诚的摸索阶段。至少有16篇对话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它们是些不完整的思想与未完结的探索——这比所有我们知道的早于柏拉图的哲学家留传下来的著述总和还要多。

除了苏格拉底的诘问方式之外，柏拉图对话录也许还有第二个可能的灵感来源。在雅典，人们相信有表达和宣扬真理的能力的，除了哲学和智者之外，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剧作家！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古希腊悲剧之父，经历过第二次波斯战争。他参加了那场战争并将它成功改写成剧本。他的两位最著名的接班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与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死于苏格拉底审判的前几年。我们可以在受人喜爱的阿里斯托芬那里看到，喜剧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备受欢迎。社会矛盾在这个代表世界的半圆剧场中作为现实缩影被演绎，人们从中品味剧中故事及其背后深意。悲剧和喜剧都是自由天空下的道德活动，它们的目标是使人们震撼并因此得到“净化”。戏剧的主题就像哲学那样探讨存在的本质：人是什么？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命运是什么？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是道德上的善与恶？我如何面对我的罪？我能期待什么样的宽恕？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永恒的哲学核心问题，康德在18世纪曾将其概括为：【146】我能知道什么？我能期望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人是什么？

看看一位有名的剧作家会获得多少赞美与尊崇，人们就会发现戏剧在雅典有多重要，影响有多广泛。而对柏拉图来说，这首先意味着一点：竞争！一方面，在晚期关于理想国家的讨论中，他期望艺术的自由受到大幅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写作中吸收了许多戏剧修辞手法。他对“诗人说谎”的冷酷断言并不妨碍他将文学手段变成娴熟的表达技巧。无数哲学问题在他那里以回答的形式出现——反之亦然。丰富多彩的故事和神话突然凭空出现，被用来阐释或结束一个主题。想象的帷幕落下之后，仍然有不少问题未下定论，留待听众与观众继续思考。

因此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种结合传统又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尽管这种传统是柏拉图当作竞争对象猛烈抨击的。就这样，他把作为真理教育的哲学之英雄——道德式要求、智者修辞学的机灵敏捷，以及诗人戏剧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柏拉图的哲学集智慧教育、演说艺术与戏剧于一身。当指责智者不诚实和诗人说谎时，他在所有追随者面前却自认以伟大的集大成者的形象出现：演说真理的艺术家和改编现实的剧作家。

柏拉图并不是唯一一个撰写哲学对话的苏格拉底弟子，但他是唯一一个从中创造了世界文学的人。在古代哲学研究者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论，即柏拉图的对话录到底在思考什么。也许这些对话在阿卡德米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被演说出来，可能还会像广播剧一样有角色分配。那么这一演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肯定是为了影响雅典社会与政治，【147】从意识行为上改变尽可能多的人。对一些柏拉图研究者而言，这些对话录包含了未加粉饰的哲学；而有些研究者只看到了训练课，他们认为哲学的重要部分已经丢失，因为对话录也许是被口头表述的。

以柏拉图的名义留传下来的文本数量多到惊人。如此惊人，并非只由于作品范围之广，还因为一些至今被认为是柏拉图作品的文本并非出自柏拉图本人。今天被认为真正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至少有24篇对话、《申辩篇》、少量的书信、一份哲学定义的汇编与一些诗歌。而大量“假”的柏拉图作品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一些可能是学生们编撰的柏拉图思想梗概，其他的则可能是仿制品。

真正的对话录却也是一种独特的“仿制品”。在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与精选出来的同时代重要的人，他们两个、三个或四个一起讨论关于神与世界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因此这一古代脱口秀演员名单读起来就像古代世界的《名人录》。从高层政客和将军阿尔西比亚德，高级军官尼西阿斯、拉刻斯（Laches）、赫莫克拉提斯（Hermokrates）、美诺（Menon），到智者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Gorgias）、希庇阿斯、欧绪德谟（Euthydemos）、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os）、普罗迪科斯（Prodikos）和波罗斯（Polos），苏格拉底的学生斐多（Phaidon）、斐德若（Phaidoros）、攸克里德和克力同（Kriton），诗人伊翁，伟大的老哲学家巴门尼德，柏拉图的老师克拉底鲁（Kratylos），柏拉图的亲戚阿德曼托斯（Adeimantos）、格劳孔（Glaukon）、卡尔米德和克里底亚，再到数学家泰阿泰德（Theaitetos）和忒奥多罗斯（Theodoros）。这些人中许多都是雅典以及古希腊其他地区有名甚至著名的人物，他们被放入对话录中是因为他们的名人效应。也有些对话者像卡里克勒（Kallikles）、狄奥提玛（Diotima）、普罗塔科斯（Protarchos）和蒂迈欧（Timaios），关于这些人我们知之甚少。【148】柏拉图自己只出场了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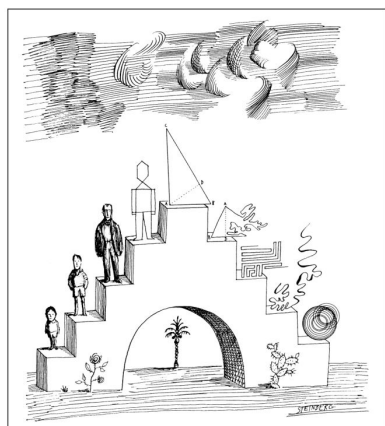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对话参与者在柏拉图让他们于对话录中出现的时间点上都已经过世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公元前4世纪的世纪之交前不久就已去世。这些对话在过去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上演，在大约三十或四十年

前。这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一位在世哲学家让他已过世的著名前辈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其他也已过世的同代人相互对话。这场对话中阿多诺与约翰·福特（John Ford）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就电影，与毕加索（Pablo Picasso）、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就艺术，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胡志明就革命事业，或者与萨特和罗素就社会公正等问题进行哲学探讨。这就像一种复古脱口秀，它的脚本是一种脚本真人秀（*Scripted Reality*）形式——一种在生动场景里演绎的伪事实。

场景也被打造得极其逼真。苏格拉底的对话发生在监狱中，在去往诉讼法庭的路上，在一场招待盛宴上，在运动场上，在私宅中，在梧桐树下，在散步或徒步旅行时。这样一种演绎哲学的方式极具启发性。读者或听众被深深吸引，进入场景，身临其境。柏拉图没有高高在上地训诫众人，而是与公众聊天。真理不是教条般地下定论，而是常常出现在对有疑点的智慧、行为与观点的反驳中。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是一种寻找、追求与摸索真理的丰富多彩的动态过程。这种哲学方式在公元前4世纪初是全新的。那么为什么柏拉图要这么做？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表象与存在【149】

贵族改善世界——可靠的知识可能吗？——蜡版与鸽子——柏拉图的神话——世界之非本真化——洞穴图



贵族改善世界

柏拉图哲学的宗旨是什么？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那里，这一宗旨很容易说明：帮助人们过上完满的人生！为此，人们必须找到关于存在的未经粉饰的真理，逼近事物的本原。以此方式人们获得方向，且能在同自然法则的协调一致中过上一种正直的生活。自然环境、城邦中的共同世界也属于这一自然。它必须变得更好，这首先意味着变得更正义。因此柏拉图的目标就是改善世界！社会中许多错误的、有害的发展应当向原初逆转。【150】显然，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的军事、社会与道德的毁坏中幸免于难的人，比如柏拉图，几乎不能从社会现状中获取任何东西。他希望凭借新的、清楚的知识保持旧有的东西，重树德性，并借此彻底修缮城邦。

柏拉图知道，在哲学领域有他的先驱。哲学追问并非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作为艺术形象在柏拉图那里继续存在，并且仿佛确立了一个新的开端。然而他的许多问题显然之前已经被讨论过了。柏拉图几乎悉数知晓其所有前辈。人们会惊讶于赫拉克利特或者某个南意大利哲学家的文本在希腊世界是多么的流行。

在《斐多篇》（*Phaidon*）中，苏格拉底敦促菲洛劳斯的学生格贝（*Kebes*）要广泛、全面地接受教育：“格贝啊，希腊是个大国，有很多博学的人，野蛮人的那些国家也很大，你们应当遍访这些国家……不要吝啬金钱和劳力，因为你能够花钱谋求的东西无过于此。”^[72]尽管有此要求，柏拉图在自己的灵感来源方面却总是闭口不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徒对柏拉图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人们会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尽管他们在柏拉图对话中极少出现。

然而，倘若对柏拉图关于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想法来说，有一个样板，那么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这么一个样板。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都赞赏数学和数字学说。柏拉图那位作为学园领导者的直系弟子，也撰写了一部关于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著作。阿尔克迈翁没有在任何地方被提及，可是若没有对他的著作的阅读，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对大脑的论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柏拉图两次谈及恩培多克勒，而在更多地方，^[151]他讨论了恩培多克勒“相爱”与“斗争”的原则。而巴门尼德在对话中则亲自出场，并同苏格拉底探讨他的存在学说、一和多的问题。同时，对赫拉克利特的研究也应被提及。

据《斐多篇》称，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给青年时代的苏格拉底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可是后来苏格拉底便不再满足于唯物主义的解释。如阿那克萨戈拉所言，人类天生会行走，因为他有两条腿。然而为什么人感受到意志，或者为什么人会有企图从一处走向另一处，依据苏格拉底的观点，阿那克萨戈拉并没有对此给出解释。关于这个问题，唯物主义缺乏一种深度，这种深度首先导向对人类本性及其理性的真正洞察。它虽然回答了如何，却没有回答为何。所以对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的考察，并不能探究他的本质。这种自然主义的考察同样无法处理所有伦理问题。

柏拉图与智者进行了最严厉的争论。在此人们觉察到洗清自己的过去以及摆脱这麻烦的竞争者的内在需求。在其晚期著作《智者篇》（*Sophistes*）中，柏拉图将智者贬低为阴谋家和骗子，然而在其早期著作《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却还很严肃地同智者就正确的生活与德性的观点进行辩论。他对这些竞争者最不公正的批评是，他们为授课收取金钱。一个像柏拉图这样非常富有的贵族，说起这一点是很轻率的。

不过针对智者，柏拉图也从哲学上进行了严肃的反对。正如他在同阿那克萨戈拉的辩论中认识到的，凭借智者的思想，他并没有在通往一种更好生活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如果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且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认为的，不存在更高的尺度，那么也就没有更高的真理和更深的洞见。【152】智者的哲学并没有导向一个世界总体系，而恰恰瓦解了这样的体系。只存在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只存在许多可想象的和可能的生活，而不是一种正确的生活。

在智者看来，这个世界并不能恢复健康。柏拉图的早期著作是一场同智者的相对主义的搏斗。不管在同智者的直接辩论中，还是在其他对话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总是在寻求关于事物的真理的更深或更高的层次。并通过此真理寻找颠扑不破的知识的约束力。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如何做的呢？他努力进行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友谊？诸如此类。定义应当要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如何理性地、清除所有疑惑，来定义某个东西，它也就如此存在。通过恰当的语词定义某东西便意味着，认识事物的真实存在。对柏拉图来说，在我头脑当中恰当选择的词语与在我头脑外世界中的事物的存在之间，没有区别。如同在数学中一样，对柏拉图而言，这种语言定义要么是客观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

柏拉图相信语言以及熟练使用语言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是何等难以置信的认识能力！哲学家用语言揭示出这个世界，从这一画面中散发出的是多么令人着迷的魅力。他的文字将光带进黑暗！或者如大约二百五十年之后的某位约翰（Johannes），显然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启发，于其缮写在莎草纸上的福音书序曲中写道：“太初有言……”正确的词语与正确的世界相符，这种观点影响了哲学史两千多年。这一观点很晚才发生改变，一旦改变就是巨大的变革！

根据柏拉图的看法，事物的本质存在于普遍的东西而非特殊的东西之中。单独一个勇敢或正义的行为并不决定什么是勇敢或正义。

【153】就如在数学中，人们必须找到普遍规则，每个事件只是其中一个特殊的应用形式。据此，个别之物并无哲学价值，唯独普遍之物才有。而通过准确的定义才能产生概念。

遗憾的是，柏拉图对话中只有非常少的部分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即发现这种普遍的定义。虽然别人的糟糕论证往往被苏格拉底的询问祛魅，可是共识并没有达成。虽然精于虔敬（《游叙弗伦篇》

[*Euthyphron*]）、友谊（《吕西斯篇》[*Lysis*]）、审慎（《卡尔米德篇》[*Charmides*]）、德性（《普罗泰戈拉篇》、《美诺篇》

[*Menon*]）、勇敢（《拉刻斯篇》[*Laches*]）或是正义（《理想国》[*Politeia*]）者代表着站不住脚的立场，但是这些德性之本质的一

种新的、更好的且明确的定义仍然没有实现。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创作的第一阶段更多是通过其修辞的优美，而非通过重要的知识吸引人。苏格拉底是灵活的思想者和指挥者，他用辩证法反驳别人的观点，并在尝试达到一种新的综合中迫使其面对相反命题。不过这一尝试在早期著作中却少有成效。虽然它一再成功地使各种基础相对化，对谈者正应在这一基础上达成他们关于事物本质的牢固观点。可是凭借这种综合，总是缺乏一种有关事物本质的清晰观点。并且很多对话并没有以清晰性结束，而是结束于一种逻辑上没有出路的面（即疑难 [*Aporie*] ）。

可靠的知识可能吗？

早期对话的许多疑难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谜团。开放式的结尾是一种方法吗？它只是纯粹策略性地用来激发读者和听众自身的思考能力吗？兴许柏拉图只是在重复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修辞术而已？【154】甚至苏格拉底也不能提供任何有力的新洞见？抑或——这是最大的嫌疑：柏拉图自己也不甚清楚。

在柏拉图的对话里，从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著作所经历的变化中，人们看到柏拉图的哲学是何等多样。这恰恰鲜明地将柏拉图同其前辈区分开来。尤其早期的对话，是辩证式的（*dialektisch*）——柏拉图首次将这个词引入哲学。辩证的对话是论证和反驳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游戏，它最终会导向一种更高的知识。就我们所知，在柏拉图之前并没有其他哲学家以此方式建构文本。辩证法的目标是一种对事物的“本质直观”（*Wesenschau*）。然而正如我们在柏拉图早期著作中能够察觉到的，这一本质直观被表明是十分困难的。其屡屡失败促使柏拉图思索所有知识之获得都以其为基础的那种本质：知识自身的本质！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他的同时代人：“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柏拉图断定，只有当人们知道正确与错误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他必须比苏格拉底更加深入地探究，且必须研究认识的本质。其中期著作中的一篇完整对话——《泰阿泰德篇》（*Theaitētos*）就致力于这个独特的问题。这是柏拉图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所以我们在此同样要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这篇对话的舞台设计得极其复杂。场景由两个层面组成。在一个情节中，苏格拉底以前的两位学生在墨伽拉相遇了。其中一位是历史上著

名的攸克里德，正是苏格拉底的那位学生，据说柏拉图在游学墨伽拉的时候曾拜访过他。另一位名叫忒尔西翁（Terpsion）。攸克里德说他刚刚在港口遇见了（历史上真实可考的）泰阿泰德。【155】他在科林斯战役中负了伤。现在他已病危，并被带到了雅典。

攸克里德从负伤的泰阿泰德说到一个他很久以前在雅典经历过的情景：当时还很年轻的泰阿泰德和苏格拉底在运动场上进行的一次谈话。泰阿泰德的两位朋友以及来自昔勒尼的数学家忒奥多罗斯也在场。这是在对苏格拉底审判前不久——公元前399年春天。攸克里德记录了这一对话。他们两人到攸克里德家中去，于是便有了上述的文本。

一切开始于苏格拉底向忒奥多罗斯推荐的学生泰阿泰德求问“知识”（*episteme*）的定义。什么东西普遍地标明了知识？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只针对泰阿泰德，似乎是柏拉图自己在摸索着前进。许多年以前，在《美诺篇》中，他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出知识的朴素定义：一旦某个观点能被说明理由，那它就通向了认识。且知识（Wissen）是我们认识（Erkenntnis）的总和。现在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恰好背离了这一定义。

当被苏格拉底询问时，泰阿泰德借助数学表明了他对于“知识”的看法。当一个几何原理恰好同样适用于所有正方形，而不仅只适用于少数几个特殊的正方形时，那么它就是真的。因此，知识在几何学中意味着普遍适用性。苏格拉底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则也要给数学之外的知识下定义。正当泰阿泰德犹豫不决时，苏格拉底促使他将还在酝酿的思想表达出来。苏格拉底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助产士。毕竟他的母亲曾是一个接生婆。

泰阿泰德开始了他首次的定义尝试：全部知识的根据是感知。那么正如我感知到事物那样，它们对我而言也是真的。苏格拉底并未信服。【156】如此这样的境况使人想起普罗泰戈拉的话，而这是柏拉图在此借苏格拉底所批评的说法。一旦一切仅以主观的感觉为依据，那么这个世界中就没有客观性。知识似乎就等同于意见。根据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也处于同一方向，他们将整个世界看作处在流动和变化之中。这里似乎也没有确切的真理。因为如果一切都在改变，这个动态的世界里哪还会有不变的知识的位置呢？

泰阿泰德对哲学追问的深度和混乱感到惊讶。不过苏格拉底安抚了他。惊异和好奇是所有哲学的开端。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对感觉等同于知识之理论的炮轰。人们通过诸感官感知某东西。众所周知，感官能够

让人产生错觉——既在发热病人或者精神错乱者那里，也在健康的人那里。我们（以及柏拉图）已经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了解到这种对感觉的贬低。从根本上，这从一开始便构成了位于西方哲学中心的宪法序言。我要么信赖我的感官，放弃对绝对知识的要求。这样我的哲学很快就会走向终点。要么放弃对感官的信赖，尝试以另一种方式达至更高的洞见。这样，一个广阔的认识领域就向哲学敞开，即超感官，这是一个哲学一步步从神学接管过来的领域。毫不奇怪，大多数哲学家在第二条小径上走了两千年之久——它为他们的重大结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苏格拉底对普罗泰戈拉将感觉与知识等同的清算极为高明且智慧。它堪称影响最大的，且一向是所有在感性的相对之物面前为超感官的绝对之物进行辩护的样本。【157】这一批判如下：并非所有我感知到的东西我都得理解。反之，并非所有我理解的东西都基于直接的感觉！我的记忆与前理解对我的每一个在某一情境中的新理解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外，人类并不简单地感知到单一的感官刺激，例如声音或颜色，而是通过心灵对其进行加工。它通过诸如“相同的”和“不同的”或者“美的”和“丑的”这样的判断，来对我们的感知进行分类和评估。不过“相同的”和“美的”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能够从感官的个别观察中获得。感官世界中没有“美”或者“相同”。但他们仍存在于我的头脑中。那么在一个由众多事物组成的世界中，绝对之物从何而来呢？

蜡版与鸽子

哲学界还将长久地研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此谈及的东西，有时会分成完全敌对的阵营。一个千年哲学问题开启了！我的头脑里有“原初的”理念和表象吗？或者我所思考的所有东西皆源于感性知觉？

不过，我们先继续跟随苏格拉底对普罗泰戈拉的批评。倘若所有东西仅只是主观的和相对的真，那么也就符合普罗泰戈拉的那句话。也许普罗泰戈拉甚至赞同它呢。然而苏格拉底如此看待普罗泰戈拉的那句话，就好像其首创者完全相信这句话的普遍真理性。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论证道：为何“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只是因为对普罗泰戈拉而言是真，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真的？如果这句话的内容是真的，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没有客观的真理资格。普罗泰戈拉简洁的推论——在生活中重要的并不在于真和假，而是在于有利和有害，【158】就同样不能令苏格拉底满意。如果对此没有更高的尺度，那么究竟谁有权决定某东西的

有利性呢？通常一个决定的有利性或者有害性要在事后才被证实。以此方式人们只能向前瞎跑，只能摔跟头。

感觉与知识的等同在苏格拉底雄辩的火焰中一败涂地。不幸的泰阿泰德又尝试了一个新的定义：知识的基础不是感性之物而是精神之物，更准确地说，是正确的意见或正确的观念。这一观点同样立刻遭到苏格拉底逐条反驳。如果有正确的观念，那么因此自然有错误的观念。且每一错误的观念如同正确的观念一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对某事物无所知晓的人也不会犯错，对此他连思索和谈论都不能。人们同样很少会说，错误与不存在的事物有关。关于一件事情的一个错误的观点也是关于一件事情的观点，就如一个准确的观点一样。

可错误是如何发生的呢？一种可能性是，我使感知到的东西同错误的东西发生了关联。我凭借记忆错误地将其分类。苏格拉底说，记忆可能是一个蜡块，有不计其数的印象镌刻于其之上。所有经历过的东西都在其上留下印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如果我不准确地感知某东西，那么其印记也就是不准确的。而不准确的印记诱使我错误地分类，也就是说将我引向错误。

乍一看，这一解释似乎令人信服。但也就只是乍一看。因为将记忆比喻成蜡块，与一切知识建基于感觉的想法仍然很相近。而无论如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想要反驳的恰好是这一观点。正如之前所说的，对他来讲这一观点太相对了，而且没有给绝对之物留下位置。因此这一蜡块刚一出现，就立马又重新被放进了废物室。【159】

苏格拉底如此问道：我犯的数学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计算错误并不是感觉或记忆问题。即使我知道一道算术题如何解答，也远不意味着成功地找到答案。苏格拉底在此区分了“占有”（Besitzen）和实际“拥有”（Haben）知识。苏格拉底说道：我们假设一下，我在鸽舍里占有许多鸽子。如果现在我想要从中拥有某只鸽子，那么我就必须从鸽舍中将其捕捉出来。于此存在风险，即或许我不能成功做到此事，又或许我错抓了别的鸽子。以此方式，占有知识和拥有知识就不是同一回事。

苏格拉底的区分与生活中“知道如何做”和“能做”之间的重大区别相似。前者对应“占有”，后者对应“拥有”。每个电视机前的足球迷都知道，如何边路传中，以便球能舒服地落在前锋头上。但是他自己大概不能传中。或者讲得更清楚些：当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做学校的数学练习时，我常常向他保证，我本来是知道怎么做的。但我并不能完成作业。于是我父亲习惯性傲慢地叹息说：“太监也知道，怎么做……”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两千四百年前就已经说过类似的东西：人们必须拥有（在掌握的意义上）知识，而不仅仅是（不管以何种方式）占有。一个计算错误就像是从自己的鸽舍里抓了一只错的鸽子。

泰阿泰德以此方式来理解苏格拉底的例子：鸽舍里有“正确的”和“错误的”鸽子，那么也就储存有真理和错误。然而鸽舍的例子不是这意思。错误并不就是鸽子自身，而是错误挑选鸽子。【160】不过我从何得知我抓到了错误的鸽子呢？为了知晓此事，我必须知道有关我的知识的一些东西。我必须从认识的立场出发来对此做判断。我需要一个来自另一个鸽舍的元-知识（Meta-Wissen）。不过为了同样能够在这一鸽舍里判断我是否抓到了正确的鸽子，我又需要一种更高的知识，也就是说一种元-元-知识（Meta-Meta-Wissen），等等。以此方式，我永远到达不了终点，而且我的知识永远也获得不了可靠的基础。

紧接着苏格拉底又驳斥了另外两种规定知识的可能性。他表明，即使一种意见被合理地奠基，知识也不太能够与这种“正确的意见”相等同。一个法官根据律师的辩护判处被告，他可能做出正确的判决，也就是说关于此案他有正确的意见，但不用确切地知道，他是否是正确的。

给知识下定义的最后一个尝试仅仅关注联结的逻辑。我可能会非常素朴地相信世界上的事物原则上是无法解释的。但是这样一来，我能否至少说，这些不可解释的事物要么是合乎逻辑地、合理地相互联结的，要么不是？数学重又在此充当了模型。三角形“本身”并不存在。但是三角形本身存在的想法，有助于给适用于每个具体三角形的规则下定义。那么一个合理的规则就可能是“知识”，与此相反，一个无意义的规则就不是知识。然而这一尝试同样落空了。因为通过逻辑的联结使得无法解释的事物变得可解释，终究是胡说。如果我对事物一无所知，那么我从何得知它们之间的联结是合理的呢？在此定义尝试中，我同样需要一种先于所有其他知识的知识。结果是：我们不知道知识是什么，因为为了获得知识，我们总是必须先知道一些东西。每一个定义都在兜圈子。

多么奇特的对话啊！在一个精巧讨论的结尾处，【161】所有问题都悬而未决。难怪两千多年以来《泰阿泰德篇》令学者大伤脑筋。柏拉图此篇对话的意图为何？获得这一结果，即不存在关于知识的可靠知识，这几乎与柏拉图哲学想要做的完全相反：柏拉图想要获得可靠的基础，以便能够在生活与共同生活中给人们一个好的方向。可是，如果我连什么是可靠的知识都不知道，那我应该如何前进呢？那么哲学探讨岂不是无益的了？就如没有食物的营养一样？

《泰阿泰德篇》并不是早期作品。这篇对话写于柏拉图创作的中期末段——到这时，柏拉图已经为一个更好社会中的一种更好的生活提出了非常广泛的具体建议。并且，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他手头已经有了一种非常确定的（且举世闻名的）理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应源自此理论。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理论并没有在《泰阿泰德篇》中被谈及。

并不缺乏通过解释整饬这一混乱的尝试。其中之一是说，《泰阿泰德篇》只是给柏拉图弟子的一篇训练对话，大致是为了反对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而做的论证训练；一种思想训练，人们通过它练习掌握作为方法的怀疑。其他意见则认为，在关于善和国家的伟大著作之后，柏拉图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并且背离了先前的诸种观点。还有一些相反的观点，即是说《泰阿泰德篇》是在有步骤地导向柏拉图先前的观点，并为其做准备。不过也应看到，在其晚期作品《智者篇》中，柏拉图以一种颇为现代的方式对真理到底能否在语言中被表达表示怀疑。至少真理不仅仅存在于相应的词语当中。语法也须被考虑，尤其是句法。

【162】这种有自身规则的语言究竟是不是揭示真理的适当工具？语言的规则原则上是否与世界的规则相符？

在认识论上，柏拉图的思想是极其多样和多层次的。问题在于：柏拉图是谁？如果有柏拉图，有几个柏拉图？人们是否乐意假定，40岁的柏拉图已经在头脑中拥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解释世界的系统，而随后又策略性地将其丢弃？是否可以因此认为，他的理论缺乏发展？或者是否必须假设，在关于国家的主要著作之后，他根本上改变了关于知识和世界的看法？

当人们既不这样也不那样假设的时候，可能最接近柏拉图。再聪明绝顶的人（包括柏拉图本人在内），也不能思考得完美无瑕。清晰和无矛盾是针对素朴之人的；睿智的思想是不同的。将他在40多年的时间里，那些伴随着构成动荡的人生与思想的所有错误与迷途、情绪与灵感、怀疑与坚忍而构想和写就的作品，都看作过程中的产物，这大概最接近柏拉图。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常常只相隔几页的内容，读起来却相距甚远——其中间隔的有时是其一生当中的数年，甚至可能是数十年。唯一一位柏拉图和唯一一种柏拉图哲学或许根本不存在，这大概只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和注释者的一个虚构。柏拉图自己应该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如同后来，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不是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这一看问题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出现的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中最引人入胜的一个，便是柏拉图对神话独特的处理。

柏拉图的神话【163】

什么是神话？我们记得，神话是对为什么这一问题的传奇故事式的回答。这一回答通常以绚丽的故事的形式出现，它据说是“真的”，尽管人们不能合理地论证其真实性。

乍一看，神话恰像是柏拉图哲学的对立面。因为对定义的探寻正是以理性的方式钻研真理的尝试。任何与之相反的非理性的东西都应该以4-的分数（不及格）结束一个学期。神话不只是非理性的——它还要成为非理性的。

我们再看一眼，就会看到，柏拉图的对话充斥着神话。这些神话里有大量的神和故事、古怪的念头、荒诞的说法，以及可疑的叙述。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让传奇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火，并由此解释了文明的诞生。《卡尔米德篇》中医生的医术被归因于神王查尔莫西斯（Zalmoxis）。《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苏格拉底惊人地道出了灵魂死后的命运。它们在“极乐岛”上，或在地下世界即在塔尔塔罗斯里再现。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同样驾轻就熟地解释过彼岸世界。《美诺篇》中，灵魂转世非常理所当然地被谈及。《理想国》中，一位名叫伊厄的士兵作为灵魂不朽的主要见证人被提到，他在死后12天取回他之前的灵魂，从而再次活了过来。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在同一篇对话里叙述了一个同样怪诞的戒指的故事：这个戒指可以使吕底亚国王裘格斯隐身。《斐德若篇》（*Phaidros*）中，苏格拉底讲述了灵魂马车的比喻。【164】每人驾驶一辆载有一个好的灵魂和一个坏的灵魂的有翼马车，而且必须始终留神安全地驾驭他的车。在同一篇对话里，苏格拉底把知了解释成人类的后代，它们由于大声歌唱而忘记了吃喝。同样在《斐德若篇》中他讲述了文字的神圣起源。不是人类，而是埃及的托特神发明了文字，并将其赠予人类（他们起初不相信文字）。

柏拉图《会饮篇》（*Symposion*）中球形人的神话已是举世闻名。根据阿里斯托芬的讲述，人最初是球状的，只有四只手四只脚是凸出来的。他们的性别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要么是雌雄同体。然而，宙斯切开了他们，并让人们沉浸于对另一半的渴求找寻当中。对话的结

尾，苏格拉底用一则关于厄洛斯神（Eros）诞生的神话传说为宴会助兴。据他说，厄洛斯是贫乏神（*penia*）和丰饶神（*poros*）的儿子。难怪爱由于匮乏和分离的缘故为自己开辟了通往目标之路。

在《政治家篇》（*Politikos*）中，柏拉图着手研究那广为流传的黄金时代的历史，并继续编织赫西俄德和恩培多克勒的传统。在《法律篇》（*Nomoi*）中，他也回到了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是黄金的，是因为施加统治的不是人类，而是善良的神灵。依据他们的本性，创世是完美出色的。只有人类由于不完美才导致和谐被扰乱以及不幸。在《蒂迈欧篇》中，以其名字命名此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蒂迈欧详细讲述了造物主当时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出于理性和必然性。

一个特别的谜团萦绕着那座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它不仅在《蒂迈欧篇》中，也在《克里底亚篇》（*Kritias*）中被描述或提及。大西洋上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王国，它早在九百年前就已经被雅典人打败。最后亚特兰蒂斯和雅典这两座城邦都在自然灾害的洪流中沉没；【165】亚特兰蒂斯则永远消失了。

柏拉图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样的神话故事？它们不是存在于自赫西俄德一直到毕达哥拉斯的幻想中的叙事吗？它们不是那种叙述吗，即对话当中的人们，以及读者、听众都知道，它们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这些神话有时为论辩提供了颇为生动的样本。即使不再信仰埃及众神，我还是可以同意如下这一说法：文字的发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削弱了记忆能力。尽管我不相信以前球形人存在，但我仍然明白拼命寻求合适的另一半时对爱的向往。且即便我将普罗米修斯看作一个虚构人物，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因为火而诞生这件事上，似乎仍然存在着许多真理。

令人捉摸不透的神话也一定有令人捉摸不透的效用。它们使其过程本身在感性上变得更可信，即使我不相信其绘声绘色的细节。从经验层面上的谬误或可能性极低之事中，同样可以产生关于一件事的深邃洞见，而且是我借助逻各斯确实不能获得的洞见！我应该如何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人需要爱？今天我们也依然无法在逻辑上，而是在心理学上来解释这种爱的需求。这同样适用于我们驾驭灵魂马车的技巧。不是古老的逻辑，而是历史上非常年轻的心理学在此继承了神话的遗产。心理学是没有诸神的神学。以前是宇宙及其不可理解且难以说明的事件，如今是我们心灵的宇宙。从占星师（*Mantiker*）变成了精神分析语义学家（*Semantiker*）。他们向我们解释那个重点转向内心的世界，为那些

起到塑造作用的形象命名，这些形象就像我们童年的众神和诸魔鬼似的，在我们脑中出没。【166】他们解释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形成。并且正如从前的恩培多克勒，他们为诸如相爱与斗争这类强大的原始力量命名，从而让它们作为爱欲力比多和死亡本能继续永恒存在。

同样，在其他许多柏拉图借用神话回答的问题上，至今没有合乎逻辑的答案。为什么存在的是一切而不是无？世界为何产生？为什么存在着人类？如果人们严肃对待科学且能够宣称，从世界形成到人类出现的进程是“合逻辑的”甚至是“理性的”，那就不会有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或者演化生物学家。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说明其原因：合理性不是自然的属性。认为某东西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是很人性的，且通常也是道德的评估。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道德不是自然的力量。柏拉图讲述神话故事时，他就是在定义与对确定知识的探寻原则上不可能有进展之处提供了答案。换句话说：就如界石一样，神话标记出苏格拉底式世界之边界。

当然，柏拉图同样尖锐地批评了神话与神话叙事。即，在这块界石之外的地方，只有对那些能够合乎逻辑、合乎理性地被解释的东西的不充分解释。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如果神话导致人类从中得出对生活来说错误的结论，那么它便是误导而要克服。正如柏拉图所写：这种神话是写给小孩子的故事。一块立错了的界石阻止人们踏上沃土；然而一块立对了的界石标记出可知知识的界限，阻止土地沦为荒芜。

现在人们自然会寻问，对柏拉图而言，究竟为什么需要这种界石以及这种斑斓的故事。【167】人们难道不会很容易满足吗？难道我不能简单地说：凡是我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的东西，绝对不该放进哲学里？（举个确切的例子，正如维特根斯坦在两千三百年之后所做的？）

但是柏拉图显然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将哲学的范围规定得这么小。如同定义一样，神话也是工具。它们都能对一个更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且当定义以理性根据保护思想大厦时，神话给予它一种绚丽多彩的粉饰。在思想体系的平衡中，它们完成不同的任务。定义理性地说服，神话则感性地说服。这两种情况都与真理有关，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人们明了，也就是说它们是显然的。然而为什么一些洞见是显然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呢？当人们说某东西对或不对的时候，人们能依据哪种更高的真理或者事实？

世界之非本真化

世界之非本真化（Veruneigentlichung）的历史始于赫拉克利特。不过它在柏拉图那里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虽然它可能只是柏拉图思想的中间期，但影响却如此巨大，以至于迄今对很多人来说，它似乎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部分。

我们记得，赫拉克利特认为，在感官可感的世界中“万物皆流变”。事物及现象变化着，那些看起来存在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譬如，液态的水会凝固成冰或在空气中蒸发。从相爱变为斗争，从忠诚变为背叛。昨天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东西，明天又无关紧要了。星星也不总是刚好在同一位置。在这样一个易逝的世界中，人们应该如何获得可靠的知识？对赫拉克利特而言，在感官的世界中，【168】没有这种不变、确定和有保障的东西。不过他声称：尽管如此，它仍旧存在，即在逻各斯的领域里有一个从我们的感官中抽取出来的世界。这里出现了法则，它规定着所有的存在和生成。凭借缜密、清晰的思想，聪明的哲学家便能够接近这个永恒不变的世界法则的领域。以此，我们获得关于统摄一切的逻各斯的知识。

正如我们所见，更加激进的是巴门尼德对世界的理解。在他看来，感官上可接触的世界不仅是易逝的，而且甚至是幻觉。我通过眼睛、耳朵、手、舌头和鼻子所获得的所有经验，都没有向我透露任何一点关于真实世界的东西。因为它们仅仅是我脑海里的经验。从我有限的视角来看，事物看上去是短暂易逝的，但这只是因为我的视角是有限的。在存在的神圣领域里——巴门尼德的女神解释了这个领域，反而没有变化。这里存在着“大一”。且这个大一是真实的。

正如我们知道的，柏拉图不仅重视赫拉克利特，而且敬重巴门尼德。他可能在西西里岛得到了进一步启迪，去区别感官的世俗世界和逻各斯的超世俗世界。正如我们所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对数学颇有研究。特别的一点在于，数学定律并非源于感官世界，而是仅源于逻辑。且这些定律在原则上恒定地起作用。因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也为，真实的世界位于感官世界的彼岸。

也就是说，所有上面提到的柏拉图的前辈都拥护“两个世界模式”。这边是易受迷惑的易逝的感官世界，那边是不变的、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合规律性之王国。所有这些都给柏拉图留下了印象。【169】对美、正义、勇敢、友谊等等进行定义越不顺利，似乎就越迫切地需要假设不存在于个别事物本身当中的事物之真实本质。像在数学中一样，必须有定律，它们给予诸多特殊性以普遍性。而这些定律必须是高于事物的，

这样每一个别事物才能分有它们。所以就像每个具体的三角形，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如何，它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角形。同样，虽然世界上有正义的行为与美的事物，但是“正义”和“美”本身却不在感官世界里，而是只存在于其外。一个美的东西并不是美，而是分有了美。

这时也许人们会以批判的方式反对：“美”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完全不必是外在于世界的。我可能会很简单地认为，“美”是我脑海中一个相当不精确的观念。不过柏拉图在此可能会立马反驳道：如果世界上只有美的特殊情况，对我来说究竟怎么可能产生一个美的普遍的观念？如果不是来自一个更高级的世界，这个更高级的抽象概念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极具决定性的推论。

这时柏拉图并不完全像巴门尼德走得那么远，即将我们总的经验世界及其变化解释成谎言与欺骗。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不过它们只是像真理和实在的摹本一样的东西。人们应该如何准确地设想它们，柏拉图在其《第七封信》（*Siebten Brief*）中做了解释。什么是圆？首先它是我使用的一个词。我可以如此定义这个词：“圆是从其中心到周边任意一点都距离等长的（图形）。”某人画一个圆的时候，我认识到圆事实上也存在。由此我不仅认识到具体的圆，而且我能理解，什么是与圆形相符的圆的东西。这就是说：我领会了圆的理念。以此方式，我就产生了对真理的认识。【170】我首先是猜测，然后产生信念，继而凭借我的知性（*Verstand*）领会某些东西，最后我通过理性（*Vernunft*）洞察它。

和所有其他理念一样，圆因此不只是人的观念，而且“自在地”（*an sich*）存在着。不管有没有能够想象圆的人类，它都存在着。与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相似，这些理念才是真正的世界。正如柏拉图的同时代人准确介绍的那样，这位大师在很多对话里——主要是中期的对话，最详尽的是在《理想国》中——都对此做了讲解。

这个所谓的“理念论”常常被看作柏拉图哲学的核心。但它既不是一种学说，严格地说也没有论及理念。伏尔泰曾经认为，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的，又非罗马的，又非帝国。在同一意义上，“理念论”的概念同样相当具有误导性。柏拉图没有在任何一处把那些他通过苏格拉底就这些“理念”做出的详细解释称作学说。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任何一处清楚地定义什么是“理念”。只有苏格拉底或详或略的谈论。对于一种学说来说，人们预期的显然是更多的约束力。可是柏拉图的“理念”的视角明显对学园没有任何约束。在这重要的一点上，柏拉图的几位学生以及

他那位作为学园领袖的继承人或者反对他，或者至少是不遵循他。

理念这个词根本上意味着“形象”。它是我们所“看见”或“看出”的东西。但柏拉图的妙处在于，他的“理念”恰恰不能够被看出，也不能为眼睛所见。我只能看见一个个圆，而不是在所有圆背后作为共性的理念。对柏拉图而言，我不能用感官，而只能用内在的、精神的眼睛看出“理念”。

那么依据柏拉图，什么是理念？【171】它不是我突然想到的随便什么东西，就是说它不是好想法或者荒唐的想法。它们是一些重大得多的东西：理念是真正的真实（die wirkliche Wirklichkeit），它隐藏于一切感觉现象背后。这一隐匿的实在性是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与理念式的。它是完美的，因此是无与伦比的“善”。它同样是无形的、无处所的，且是在诸神之上的。如同尘世的东西一样，一切神圣的东西从理念中获得它的形式和样式。而且正是因为存在理念，人类根本上才能够认识，否则我们只能在迷雾中东西乱窜。理念的引入，保障了在意见和知识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正是据此探求真正的定律。而依照柏拉图，真的东西，就是符合理念的东西。只有理念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能够进行事物的本质直观，并且看出一切可见的摹本背后不可见的原型。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并非很容易的问题。因为要是每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随手抓到事物背后真正的真实，那就不需要哲学家了。也不需要为了观看世界之本质而做的内感官的训练了，人们称这种内感官为理智（Intellekt）。显然，关于本质直观就是这样。那么它如何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呢？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为此追溯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恩培多克勒的古老观念：不朽的灵魂在世界的永恒环游。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或者理解某些我们通过感官经验所学不到的东西，是因为我们从前就已经知道它了。我们的灵魂回忆起（*anamnesis*）过去的日子，那时的灵魂暂时是无形的，接近“上天”。依照柏拉图的看法唯有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没有外部教导我们也可以从自身产生出知识。不过令人不悦的是，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认为的，我们在回忆时回忆起的只有回忆，而没有我们的灵魂曾经看见过的那些绝对真理。【172】后来柏拉图仍然认为，事实上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灵有助于对理念之本质的探究。不过问题依旧存在：怎样做呢？

洞穴图

这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画面之一：在一个地下洞穴里，囚徒被用链子拴在一堵墙上。他们向来在这下面生活，且不能转动脑袋。他们的目光只能朝向对面的石壁。来自洞穴隐蔽的入口处，即在这些被缚者背后，有光投射在这堵石壁上。不过那些囚徒是看不见光源的，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被照亮的石壁，以及石壁上出现的一种奇特仪式。可见的是人和动物形状的影子。这是一些塑像的影子，搬运者在洞穴入口处的光中将它们扛来扛去。搬运者在搬动这些塑像时交谈，但囚徒看不到他们。被缚者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塑像的影子。囚徒认为这些影子是鲜活的，并且还给它们附加了声音。它们在石壁上看到的世界是他们全部的世界，是他们从中获得知识的唯一真实。

“洞穴比喻”出现在柏拉图关于理想国家的一篇对话，即《理想国》第七章中。讲述者是苏格拉底，他的听众是柏拉图的兄长格劳孔。将会发生什么，苏格拉底如此问道，要是其中一个囚徒被释放了，并且能够回头看到墙壁，而不是继续观看洞穴石壁上粗糙的“影片”？他会看到塑像的搬运者，且必将认识到，他原先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的世界，而绝非真正的真实。他究竟能否经受得起这一认识？也许他将会迷失所有方向，相信自己疯了。【173】他也可能会逃回到他熟悉的幻境里，再次被拴住。

可是倘若人们将这被释放的囚徒从洞穴中拉到洞外，情况又会怎样？逐渐地，他将认识到，洞穴里的光是太阳施与的，而洞穴石壁上的影子世界其实是一个错觉。这时他可能突然被启悟，并觉得不再有任何必要回到他那狭隘的幻境中去。人们可能会再次带他到那儿去，而他的同伴会无法理解他，因为他绝对不会再像他们那样解释影子。他们会认为他疯了，从而认为，自由使人们变疯。无论谁想试图释放他们，他们都会杀掉他。

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来说，洞穴象征着人类的经验世界。我们把我们凭借感官所感知的东西看作真实的。然而我们把真理搞错了。借助于知性，我们能够逃离感官的错觉世界，穿过幻境的洞穴口转身离开，达至更高的认识。在昏暗洞穴外的自由中，我们能够看到理念世界，看到真正的真实，为善之理念的太阳所照耀。

这一场景具有启发性的力量。因为这幅洞穴图比喻的就是哲学自身。这个柏拉图勾画的绝对理念的抽象世界无须以论证的方式为自身辩

护，而那些停留在过于人性化思维的狭隘感官范围内的人们，才必须为自身辩护。他们是被蒙蔽的人。在柏拉图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勾画如此壮观的一幅哲学家的使命图——这一使命，即向他的同时代人阐明日常生活中的盲目性关联。甚至连赫拉克利特也没有走那么远。他满足于傲慢地知晓自己被逻各斯照耀这一独特优越性。【174】与其相反，柏拉图表述了一项使命：尽可能引导更多的人走出洞穴。

洞穴图是否与事实相符，苏格拉底自然不愿轻易肯定。倒不如说他说的是一种预感和希望。因此苏格拉底同样没有完全逃脱洞穴，他只是比其他囚徒多知道一些。

柏拉图对自由，即理念世界的描述完全缺乏明确性和清晰性。在某些地方它和古希腊诸神的天界相似。因些，就像过去存在着战争之神与丰收之神、智慧之神与锻造术之神、水神与土地之神、音乐之神与狩猎之神等，现在取而代之的就是理念。和之前奥林匹斯诸神一样，柏拉图的仿佛具有神性的诸理念也一样互相联系着。有些理念相互影响，相互交叉、混合。较一般的理念比特殊的理念要更为高级。所以理念与一个划分体系有关。例如，友谊或圆的理念在等级上就高于青蛙或椅子的理念。因为青蛙的理念只是动物理念中的一个，而动物理念又是生物理念中的一个。毕竟恰当地给理念分类意味着将种归于属，将较低级的属归于较高级的属。而这些属当中最高的五个是（根据《智者篇》里的一段）：存在、运动、持续、同一、差异。

在所有理念之上，占据着类似于宙斯位置的，是在柏拉图中期对话里已经提到的善之理念。可能它根本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元-理念，没有它，其他一切理念便会失去灵魂与光辉。在《理想国》著名的“太阳比喻”里，柏拉图将善之理念与那温暖并照亮万物的太阳相提并论。没有善之理念，其他的一切就都是虚无。这意味深长：柏拉图最高的理念不是“真”的理念，而是“善”的理念。【175】因为善是柏拉图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结合点，它是究竟为什么值得去做哲学的理由。

大家现在可能会以为，理念世界十分清楚明了、精细有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些对话里出现了彼此迥异的秩序。显然柏拉图曾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后来亚里士多德称其作未成文学说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期间曾试图通过基本原则对理念世界进行分类。这让我们想起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对作为万物之本原的探寻。只是柏拉图认为，一切物质性的东西都从属于精神性的东西。照这么说，最内在的世界所聚集的就绝不是物质。因此他从爱奥尼亚人

的原初物质中得出了一种精神性的原初物质，也就是原初的原则。

在这一秩序模式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一的原则和不确定的二的原则。“一”代表的是无限者和不可分者，而不确定的二的原则体现的则是可分者，大小、形形色色的东西。第一原则是绝对者，第二原则是相对者。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源自这两个原则聚集而成的不同混合物。某事物具有越多的一，其世界秩序上的地位就越高；某事物越是多种多样、模糊不清，它的地位就越低。

学者可能至今仍对此争论不休，即“真实的”柏拉图的这一未成文学说是否比《理想国》的理念论包含更多内容——在理念论中，善之理念高于其他一切东西，且善之理念不是一与多两种原则。显然“真实的”和“本真的”柏拉图并不比“真实的”和“本真的”世界秩序更容易把握……

然而在柏拉图那儿不只有分类的困难。【176】理念和原则的观念超然于人类的经验世界，“自在地”存在，它牵连许多难题。柏拉图清楚地知道他就是自己的最佳批判者。人们应当如何详细地设想一个事物？我们从经验世界的哪些事物中获得真正的理念？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应当有善的理念、冷的理念或三角形的理念。不过更奇怪的是，在柏拉图看来，在诸如椅子或床这些人造物背后也应该有理念。同样，有淤泥的理念、垃圾的理念或粪便的理念吗？有身体残疾者的理念或伤寒的理念吗？

在《巴门尼德篇》里，苏格拉底否认可能存在无用之物、丑陋之物的理念，不过智慧的巴门尼德教导年轻的苏格拉底——后者在这里破例地迷失了一次，所有事物的理念都存在，而不止有价值的、美的事物的理念。某物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的理念。而某物污秽，是因为它分有了污秽的理念。此外，许多东西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有些东西可以不仅有美的方面，而且也有丑的方面。一个行为可以具有正义的特性，也可以同时具有不正义的特性。由此可见，由于不同的纯粹理念混杂其间，人世间的事物都有些模糊不清。当红的理念、黄的理念、蓝的理念碰到一起时，结果看起来便像是棕色。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理念并没有什么不同。总是存在不同程度混杂的，而绝非纯粹、明确的理念。而恰恰由于这一缘故，对事物的定义才会同样如此艰难，正如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不得不再强调的那样：真理并非直接呈现的。

一个尤为艰难的问题在于，事物以何种方式分有理念。就是说：美的理念是美的吗？人的理念是人性的吗？椅子的理念是“椅子状”的吗？

人们不能给出否定的回答。倘若美的理念本身并不美，那美究竟从何而来？那就是说人们必须给出肯定的回答。【177】不过人们马上会陷入一个新的难题。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分有了人这个理念。人这个理念本身是人性的。可是它从何获得这一特性？本来它现在应该还需要一个更高级的人性理念，它使得人这一理念是人性的。然后这个概念又同样是人性的，且产生如下问题：人性从何而来？这个小游戏可以被无限地继续。

柏拉图自己在《巴门尼德篇》中认识到了这一困难，但是他没能解决它。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给这个难题起的名字让人想起格拉汉姆·格林奈（Graham Greene）的小说——它因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改编的著名电影*Third Man* Argument而家喻户晓——，即第三者论证。倘若人分有了人的理念并且还和它不同，那么它们共同的第三者是什么呢？

这些困难并没有消失。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对存在于人世间的东西都产生了影响：事物、行为和事件。可这是怎么进行的？精神之物如何进入物质之物？很长一段时间柏拉图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是很不清楚。直到在晚期作品《智者篇》和《蒂迈欧篇》中，我们才获悉了更详细的内容。在《智者篇》中，柏拉图让两种观点以“巨人搏斗”的方式互相碰撞。一派是唯物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只存在物体，所有精神的东西根本上并不存在。另一派则是“理念之友”，对他们来说，只有精神的世界是实在的，而所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更高者的模仿品而已。

按照我们迄今关于柏拉图所知的所有内容，他肯定会让第二派获胜。因为非常清楚，柏拉图是一个反唯物主义者——且还是公认的“观念论”哲学之鼻祖。可是这次对谈令人惊讶地打了个平手。因此“理念之友”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是一个绝对、【178】不变的理念之存在领域，另一方面是一个非本真的、流变的事物世界，它们之间的彻底分离不可能实现。因为正如“理念之友”所认为的，要是理念真是不变的和绝对的，那么人类根本就不能认识它们。理念世界必须至少有点儿类似于人类世界。尤其是在其中必须要有某种生命力显露出来。或者换句话说：理念也必须“活着”，由此活生生的人才能探究它。

所有这些可能都相当混乱。在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那里，读者能迅速领会他们的思想是关于什么的，然而关于柏拉图的“学说”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因此人们希望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地、负责任地解释清楚柏拉图关于“理念”所设想的内容。不过正如我们所见，不存在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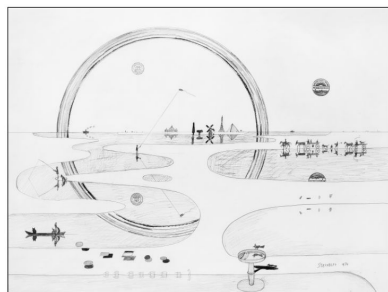
理念论，取而代之的是常新的样式和外表。正如自我批判式的对话《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所表明的，晚期柏拉图曾抱怨过他的理念论，并令人惊讶地对其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性讨论。

在柏拉图那里，人们有时会想到一个自己和自己下棋的棋手。曾经这么下过棋的人知道，其实总是黑子赢得比赛。白子布局，酝酿，拟定策略，然而因为黑子知晓这一切，所以它总是比白子聪明一点点。在柏拉图那里，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对每一种假设或理论，他总会想到一个更加聪明的反驳。所有这些都使柏拉图的思想变得困难重重。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柏拉图甚至采用全新的概念，并借此再次更改他的理念纲领。他突然不再谈及事物“分有”理念，而是把理念称作原型，人类世界的事物都是这一原型的“摹本”。据此，一个勇敢的人不再分有勇敢的理念——就好像他尝过它的味道——，而是试图用他的行为去接近勇敢的理念，去模仿（*mimesis*）它。【179】因此这一原型同样也是范本。理念现在同人类行为关联了起来，提供了理想和规范。它们是追求卓越的人试图接近的东西。在柏拉图的晚期作品中，比起认识论，他更注重伦理学。而且理念论明显被加载了道德的东西。理念变成了现在亟需竭力仿效的典范。

另一方面，柏拉图为此舍弃了如下想法，即认为存在着的一切东西，都应将其样式和本质归因于理念。在《蒂迈欧篇》中，他放弃了来自理念世界之事物的物质材料。除了原型和摹本之外，忽然又有了一个新的质料和物质的独特领域。物质就像吸墨纸吸收了理念，而自身不是理念。看起来就像是柏拉图在其晚年，以老年人特有的温和向唯物主义者稍微做了些妥协。借此他掌握了事物和人之间的区别。事物被动地任理念渗透自身，而人与理念之间的关系却是主动、活跃的。达至美德，过一种好的生活以及建造一座理想的城邦，意味着给自己一份雄心勃勃的工作。而恰是这一有德性的生活和有德性的城邦以及它们对善和正义之理念尽可能高的分有，一直是柏拉图思想的关键所在……

金钱还是荣誉？柏拉图的国家【180】

对社会的不满——整理灵魂！——理想国——对国家中的婚姻、家庭与私有制的抨击——马格尼西亚，或通往那里的路



对社会的不满

理念论就像一块沉重的墓碑凌驾于柏拉图的身后名声之上。今天人们想到他时，就会想起他将人类经验世界视为非本真的。除此之外，在墓碑上似乎还可以找到一个十分确定的要求：不是习惯上的政客，也不是任何人，而偏偏是哲学家能够统治一个国家：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成为真正的和彻底的哲学家。只要国家权力和哲学还没有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有对国家之恶的拯救，而我也相信不会有对人类的拯救……^[73]

一个社会中只有有智慧的人应该得到这个角色——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令人发笑的噱头。【181】当今的统治者既不是人民中有智慧的人，智慧大概也不是对今天的哲学家的普遍称谓。

柏拉图怎么会想到，为哲学家在国家中预留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离开知识论的领域。我们在其中逗留太久了，必须重新转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具体问题。柏拉图与定义、表象和理念较劲了四十年。他一定已经认识到，最下方的地基到处都不够稳固。感觉只能以感性的方式把握世界，数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固定的位置，我们想要经由一种真正的真实性带入经验的所有东西，终

究还停留在空想上。在苏格拉底的提问中以精确的定义对新事物进行的强烈关注，在新问题的充斥中被消解了。

那时，柏拉图身边的世界改变了。他的观点并非无中生有，即便他将理念和原则归为虚空。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毁灭性失败，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间，雅典从这次政治毁灭中恢复过来。柏拉图返回这座城市后约十年，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权统治结束了。在底比斯这个主要的新兴强权身后，雅典重新像帝国一样建立起来。雅典人热衷于在全爱琴海地区纠集同盟来对抗支离破碎的斯巴达。公元前378/377年，第二阿提卡海洋联盟成立，这次不是对抗波斯人，而是对抗斯巴达人。只不过联盟成员不再像第一联盟那样向雅典进贡了。但是尽管如此，向保护国上缴的费用金额仍旧很高，这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资金。上流社会借此建造新的战舰，金融业蓬勃发展，经济得以扩张。【182】第二海洋联盟成立三年后，斯巴达人在帕罗斯岛和纳克索斯岛间的海域上被击溃。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在紧挨其城门的留克特拉给了斯巴达军队最后一击。当不必继续对斯巴达人心存畏惧时，雅典人同其联盟伙伴的交往也就改变了。保护国又一次变成殖民强权——由此引发了雅典与受压迫盟友之间的危险冲突。

内政方面，雅典早已重回民主政体。全民大会的法律近来被两个委员会控制，它们要判定，法律是否还符合梭伦精神。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作为一种第二法庭对法律草案进行审核。从所有这些方式里，雅典人期待稳定性、减缓仓促的变迁。在新雅典，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

看上去确实如此。但在柏拉图眼中，他的家乡在道德上仍然在堕落。而且不仅雅典处于严峻的状况里：“最后我得出结论：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在政治上都毫无章法，因为整个立法领域都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这一状况除非有近似于奇迹的举措并伴随好运气，否则就是没救的。”^[74]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这样写道。按照他的观点，需要一个“惊人的计划”，一次根本上的革新，或者从一个被构想的零点出发构建一个全新的秩序。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局势中，是什么吓退了柏拉图，以至于在苏格拉底无辜被判处死刑十年后，他还是从根本上怀疑雅典的政治秩序？他对故乡文明的不安由何引起？

柏拉图的动机似乎是多层的。我们显然必须从一些零散的意见中搜寻这些动机。无论如何，保守的柏拉图，这个高贵的上层贵族代表一再出现在我们面前。【183】他持守的道德是流传下来的古老的关于荣誉和闲暇的贵族伦理。在柏拉图时代，这是唯一的伦理，一般被认为就是

伦理本身。对善的思考是一个十分贵族式的活动。然而，雅典古老的贵族被暴发户所排挤的程度之深，令柏拉图很诧异。统治了这座城市百年之久的上层社会，此时必须同新的暴发户分享经济和政治权力。与上层贵族不同，这些新富凭借买卖和货币交易赚取金钱——以在此世代居住的家族的眼光来看，这简直是亵渎！

在今天几乎无法想象，阿提卡（即雅典）式民主拒绝，更确切地说蔑视为钱而工作这件事。在我们的现代民主中，有酬劳动好像是不成文的公民义务。成天游手好闲的人被视为失败者，最好的充其量也就是纨绔子弟，差的则被视为社会寄生虫。但是在古代的雅典，为了报酬而劳动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尽管还处于民主政体之中，但一个善的且有道德的生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贵族式的。

虽然这个城市是民主的，但它不具有任何民主式的价值。我们这个时代正直的公民乐于展现自己是如何忙碌，而雅典公民则通过闲暇使自己显得高贵。通过生意赚取金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与之相反，依靠奴隶的工作来生活是值得尊敬的。在希腊最早期高度文明的时期，奴隶制已经普遍，在其他地中海地区也并无不同。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奴隶制已经实行逾千年。人们通过在战争中征服别的民族，或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市场获得奴隶。他们作为家奴做手工活或在田地里干活，出卖自己成为娼妓，不得不在采石场和矿山做最艰苦的体力活。仅在劳里昂矿场，也就是雅典银矿，就可能有多达2万名奴隶做苦工。【184】

对于这种贵族式的主人伦理的良好内核，柏拉图明显没有异议。如有些智者所讲，废除奴隶制的需求对柏拉图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他的敌人是商人和放贷人，也就是早期资本家，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按柏拉图的观点，这些人的生意就是欺骗。正如关于法律的对话（《法律篇》）中所说，他们的成功就是每个社会道德终结的开始。^[75]

传统上层社会普遍蔑视市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也不例外。除了田间劳动，所有其他工作都被禁止。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城邦为了正常运转，需要手工业者、医生、艺术家、雇佣兵与商人。少了无闲暇者，即少了那些没有投票权和公民权利的劳动人口，根本不可能有雅典的经济繁荣。再想想梭伦的“金权政治”按财富把公民权利和选举权分成了三六九等。在雅典和其他地方，占有的财富多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为什么人们不应该通过买卖和生意来增加财富的占有？就像已经讲过的，在希腊历史上，一切（自由）公民平等的观念始终是与公民极为不同的能力与政治影响力相矛盾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以

何种方式在经济上获得这种能力，为什么如此重要？

自由公民的公共道德因而就有正反两面。属于反面的是，买卖和金钱经济对于上层社会而言绝对不像他们的公开姿态所表现的那样陌生。让奴隶为自己的庄园劳作的人，也经常让他们作为小企业主经营庄园，并从中收取固定的利息。同样为了钱，地主也可以出租或出售他的奴隶。【185】人们出租地产，推动有利可图的不动产经济，或者通过放贷来收取利息。而从事受人尊敬的政治事务的人，则因关注公共利益而鲜少做这些事。但是在柏拉图的雅典，大量金钱流入对公共意见的操纵中。高薪的演说家接手了法律研究者、说客和外交官的角色。他们同那些被他们贿赂的人一样，也是可以反过来被收买的。因此，付钱或收钱就不只是为买卖和市场所特有。这本质上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

公民的自由贸易对于城邦的公共利益而言有其价值，而这些高傲、勇敢、在非战时休闲的公民，其古老的贵族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仿冒品。对于伴随着现代挑战、沸腾而混乱的大都会中的共同生活而言，显然这样一幅生活蓝图再也不适用了。在一个公民国家里，分工、专业化以及蓬勃发展的金钱经济终究使得贵族式的姿态只被容许作为一种装饰。

毫不奇怪，在此种征兆下，尽管有民主政治，但社会张力在这个城市愈演愈烈。统治家族利用他们公开谴责的市场手段毫不知耻地扩大财富。伯利克里统治下活跃起来的中间阶层再次逐渐萎缩了。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社会不平等在加剧。

在柏拉图还是孩童的年代，诗人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剧《请愿的妇女》（*Hiketides*）中仍将中间阶层描述为拯救和保卫国家的阶层。它是“国家秩序的守护人”。然而这个阶层到了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就破碎了。显然，当时的政策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不断增长的移民队伍，他们身无分文、离乡背井、没有权利，从各处而来，涌入这座城市，占据了居民中越来越大的部分。【186】这座城市于公元前5世纪似乎急速地从一种旧式的贵族统治转变为极其冒险大胆的民主政治之后，在公元前4世纪，几乎所有的改革热情都停滞了。“权利平等”（*Isonomie*）、公平以及利益均衡的原则在两个新委员会手中及其后没有被继续遵循：奴隶依旧是奴隶，不自由者依旧不自由，妇女依旧没有权利。梭伦时期的债务免除也不再有了。那些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在柏拉图出生时期不民主的东西，依旧是不民主的。

所有这些就是大背景，柏拉图在其中谋求他宏伟的目标：从根本上革新这个社会和国家！我们已经提到，上层贵族不是大胆的改革者，力

求运作得更好的民主政治。相反，他们宁愿看顾他们往日的福祉。在过去的日子里，传统的贵族伦理还没有被金钱经济腐蚀。荣誉代替金钱——就是这个伦理，在不断改善的征兆下一再浮现于柏拉图眼前。他想彻底地重新恢复这个伦理并使其协调一致。但是这个伦理能从哲学上为自己找到根据吗？

整理灵魂！

金钱和荣誉可以兼得吗？拥有很多金钱在道德上是好的，或是坏的吗？因为富人更容易说真话，并且总能够偿还欠下的债务，所以他的财产有助于正义？这些问题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柏拉图关于国家的一篇涉猎广泛的对话。

虚构的场景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187】在公元前408/407年左右。也就是柏拉图20岁的这段时间。场景发生地是兵器制造者玻勒马霍斯（Polemarchos）的家，他是比雷埃夫斯的一个富有的客籍外邦人，一个非自由民。大约有七个人偶然聚集在此处，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哥哥阿德曼托斯、格劳孔与智者色拉叙马霍斯，后者在历史上同样确有其人。屋主的父亲克法洛斯（Kephalos）问候了苏格拉底。很快人们就谈到克法洛斯的财富带来的安逸生活。这位年迈的兵器制造者解释说，大量钱财使他不用欠任何人的债，并且因此能过上一种有义务说真话的生活。不欠任何人的债务的人，也就不会对任何人犯有过失。钱财上的债务和道德上的债务对商人来说是一样的。而财富则有助于正义，有助于正义的生活。

但是苏格拉底立刻反驳了克法洛斯。任何人，即便他富有、尊重他人的财产、说真话，还远不能达到正义。如果我跟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说真话并给他属于他的武器，这究竟算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疯狂的，而不是正义的。

玻勒马霍斯表示赞同。正义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即以他人应得的方式来对待他人。苏格拉底产生了疑问。人们凭什么总能完全知悉，什么是一个人应得的呢？我们的行为总是交织着错误的估计。让不正义发生在不正义的人身上也不会让这个世界更正义。就在这一刻，色拉叙马霍斯插话了。他扮演了激进怀疑论者的角色（人们如今经常在左派网络论坛上找到这些人）。按这位智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正义。关于正义的所有空谈最终只是为了掩饰统治者的利益。强者贯彻他们的利益，接着

对“正义”夸夸其谈，然后创设法律以确保他的统治。

这样取消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是过火了。【188】他提出异议，统治者不会总是准确知道于其而言什么才是好处。掌权者的法律也可能伤害自身。那么其对“正义”的定义对他来说就不再是好处。这个论点是无力的，色拉叙马霍斯没有被说服。他还使出了另一张王牌：每个人自然感觉到，不公平和压迫是不正义的，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羡慕暴君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制造了美好的生活。由此人们可以得出两件事：正义对于人的幸福的价值显然被高估了；而理性的做法是，从一切幻想中把自身解放出来，并且更愿意过上一种任性的、无所顾忌的生活，就如本来在发生的这样。

柏拉图让色拉叙马霍斯道出了机智的话。道德在正义中没有基础吗？真的没有普适的常数，人们能在其基础上建立道德行为？至少，苏格拉底反驳了色拉叙马霍斯，专制者也不能彻彻底底不正义地行事。为了统治，他仰赖于同别人合作，至少要展现最低限度的正义姿态。

然而这个仍旧无力的论点并不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走的道路。一开始他反驳了格劳孔聪明的建议，即人们不是为了正义而正义的，相反他们合乎道德地行事，是因为他们许诺由此能得到赞赏。这种观点本来就指引了方向。现代学科如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心理学今天恰恰就由此出发，而非其他，即便他们不可能以柏拉图为引证。因为这种观点要证明的，并不是柏拉图的这个观点，而恰恰是其反面。其他讨论参与者的错误可能在于，【189】他们将正义看作某种我同他人交往中实际做出的，也就是看作对于周围人的义务。但对于柏拉图来说，正义首先是我同自己约定的某种东西。

对他来说基准点是“自然秩序”。如同在自然中，一切都井然有序、和谐并因而“正义”，因此人类也要讲求将其灵魂安排有序。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已经描述过，不同的灵魂部分——欲望、意气（或激情）和理性，必须被带入彼此协调一致的状态。如果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整理得很好，那么人类灵魂中就充满了“正义”，就如在自然中一样。

自然自身本就和谐、井然有序且“正义”，这是传统的希腊思想。我们从阿那克西曼德和很多其他柏拉图的前人那里得知这一点。不管怎样，“自然的正义”是一个强有力的假设，且这一设想影响极大。将好的且正义的行为视为同自然协调一致的行为是定义伦理学的一个十分特定的形式。后来的哲学家将其划分为自然法伦理学一类。除了主要在神学语境下可以找到的少许例外，关于这种建立规范的方式的历史被忽略

了。因为灵魂同自然的协调一致很难得到证明。我们关于自然的图景本身也改变了。不考虑一些秘传者，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在自然之喜怒无常的情绪、灾害与残杀中看到正义的驱动力，是极为困难的。

对于一个像柏拉图一样的自然法伦理学家来说，正义是灵魂的一种客观状态，人们通过诸多努力能达到这个状态。人们必须试着尽可能深地分有正义的超凡理念。如果我们在自身中拥有很多正义的理念，就能感觉到我们灵魂力量的一种和谐。【190】因为正义将勇敢、智慧和审慎的传统基本德性统一并整理为至高德性。然后我们“由善的精神作陪”，生活在幸福（*eudaimonía*）之中。在柏拉图及其同时代人的设想中，最重要的无外乎：在同自身的协调中幸福地生活！对此，内在的正义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不能在道德上与自身达到一种纯粹状态的人，灵魂深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或者如柏拉图以惊人的精准性所表达的：比起不正义地活着，我正义地活着时，我的生活会“729倍”地舒适。[76]

幸福，充实的灵魂平静，柏拉图以此来反驳商人、自私的政客和独裁者的效益思想和肤浅的幸运。人们在一个道德上好的生活中实现幸福。这样一种生活同时是健康且美好的。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关于道德上善的生活的伦理学非常私人化，因为一切首先被限制在自身的灵魂之中。两千年后的哲学提出一套完全别样的伦理学根据，它将正义的理念普遍化。然而在给针对每一个人的规则或甚至“权利”下定义这一方面，柏拉图涉及甚少。对“正义”进行抽象把握的观念并不处在希腊思想的中心，而恰恰是在思想的边缘闪现。因为在宇宙中，正当的世界秩序应该被预先给定，柏拉图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个秩序是否也是公平的。这个秩序不是由人制定的，而是由神或者其他什么制定的。虽然他努力表明，预先给定的秩序也是正确的秩序。但是当自然已经不再作为样本起作用时，对于所有相关者来说，秩序公平的问题不得不被推到一个遥远的时间点上。在这一刻，很清楚，正义是某种必须由人类无所凭借地以一个给定的样本制造出的东西。但是到那儿还有很远一段路。

柏拉图的伦理学不是关于公平的，也不是关于作为原则的正义的。【191】行为事实上是否展现了好的结果，它是否成功或失败，这个问题柏拉图也不真正感兴趣。人们应该出于正义的动机而行事，因为这对过上好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帮助。

这种正义的准绳是一个不可改变地预先给定的自然。如果灵魂相应

地井然有序，它就是正义的。如果世界形势同自然秩序协调一致，该形势就是合法的。此外，柏拉图对许多古老的贵族伦理价值未加改动。生活就是战斗和竞争，这被毫无争议地设为前提。甚至道德上的卓越的获得，似乎还与超越他人有关！在这样一个高傲且私人化的伦理学的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建筑吗？

理想国

想象这样一个城市，其中的一切都被整理得像一个幸福的人的灵魂。每个人都从事那些他们最有天赋的事，并处于尽可能最好的位置。和谐悬居于一切之上，正义遍布所有共同生活的活动之中。对于柏拉图而言，这样一个地方就是“理想国”——这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向他的听众讲述的美好城市。

这样的城市并不存在，苏格拉底也没有因此故作神秘。直至今日，关于理想国是什么，一直被长久地讨论着：是一个理想，是一座在模板中摹画的可能在每个灵魂中发生的“灵魂之城”吗？或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政治乌托邦？阿里斯托芬则问道，理想国里存在多少幻境？其中有多少被完全严肃地视为未来现实社会秩序的模板？【192】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讽刺作品吗？或者可以把柏拉图视作温和的极权主义之父，即一个思想专政的发明者，这种思想专政强迫每个人接受现存的秩序并由此成为“善的”和“正义的”？理想国最终会是一个反乌托邦、一块既成的噩梦之石吗？这个理性王国之梦生出的会不会是一个怪胎？

但让我们依次来讨论。苏格拉底关于理想国的论述之于政治毫无贡献。《理想国》讨论的是伦理学，也就是对灵魂的照料。如果苏格拉底讲到这座美好的城市是个“空中楼阁”，那么他是想以一个理想的共同生活为例向人们展示，他如何在个人那里构想了一个理想的诸灵魂力量的共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是一个以国家的形式铸造出的灵魂摹本。

柏拉图视政治为灵魂照料的延续，它以共同体为手段。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因而应当与一个幸福且正义的灵魂的理想状态相符合。因此，在一个理想的共同体中，我们与秩序井然的灵魂群体有关，与善意的共谋有关。国家的基础是志向（*Gesinnung*），而不是（或者其次才是）规则和机构。以今天对政治的理解，这使得柏拉图的国家理念如此“非政治化”。一个独立的、其规则以政治为名的世界，最先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

里。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属于伦理学——他的伦理学是政治的。

人们联合起来成为（城市）国家，建立城邦，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有一个最朴素的基础。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没有他人的帮助便不能生存。国家源于人类的需求本性与社会本性。柏拉图教科书般地描述了文明如何产生。很久以前人们以果实为食，健康而淳朴地生活着。从小小的开端逐渐产生了更大的共同体，最终形成了城市国家。

【193】这导致了很多新问题。虽然艺术和文化在发展，但同时奢靡和挥霍也在加剧。为了居民的供给和许多新需求，城邦不得不扩张。分工就产生了。由于城邦越来越繁荣，就出现了同邻邦的冲突，出现了战争。从自卫的公民中产生了职业军人，又分出了等级——领导者和护卫者。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其他职业。在已长时间非自给自足、专门化的公民和小群体之间，易货贸易和金钱经济开始了。市场与雇佣工作产生了。这很快导致各利益团体之间爆发了互相竞争和权力争斗。

但这一点恰在理想国中被阻止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展示了这是如何做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个整体上的理想方案——这是柏拉图在其时代的雅典未能实现的。这位哲学家像划分蚂蚁王国一样划分了理想国。每个人都拥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任务，这样每个人都会为整体的运转做出贡献。他区分了三种重要的功能。在蚁后的位置上是哲学王，即精心培养出来的精神贵族，洞察和总览公共利益。掌权的应该是这些最有能力的人，而不是那些想要获得权力或者不得已统治国家的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哲学家是克服了低级欲望的人。恰好是因为他的激情没有促使他去追求统治，所以他是所有可能的潜在统治者中最好的那个。因为要具备智慧之爱 and 善之理念，未来的哲学王将被送上一条漫长的教育之路：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声学以及雄辩术。

哲学王之下是护卫者，他们禁欲、不计报酬守卫着国家，此外还承担了（思想）警察的工作。【194】在为期十年的知识和体育训练后，他们中最有天赋者能够上升到哲学王的阶层。最低的位置上是古代意义上劳动的居民，即手工业者和农民。每个等级都根据各自的天赋遵从其角色和任务。因此，国家中充满正义。相反，如果个别人拓展了他的职责，并因而越过了权限，那么非正义就会扩张。护卫者就会知晓并去阻止这类事件。

人们将柏拉图的国家乌托邦与历史上的诸多极权主义体制相比较：从古代斯巴达的军事独裁到斯大林主义或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奥登斯堡学院。这些现象难道是“近似于奇迹的举措并伴随好运气”^[77]的结

果吗？或者就如我们今天对一切都进行反讽的社会中一些柏拉图专家不知疲倦地强调的那样，这是一部讽刺作品吗？然而柏拉图的国家乌托邦肯定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即便他可能不赞成其全部，他也赞成其中的某些内容。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曾说，“一个完美的秩序可能是对所有进步和娱乐的毁灭”。事实上，这二者柏拉图都很难应付。提到进步，人们根本就不再需要它。因为理想的国家不仅永远管理着这个共同体，它也满足其公民的灵魂需求。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本质与灵魂中的欲望相符合，他们的基本德性是节制。护卫者的本质是勇气，他是勇敢的化身。而哲学王的本质是理性，他是智慧的化身。从一个现代多元化和个体化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由哲学所承载的蚂蚁王国是以强制且荒谬的方式运行的。这个模型具有名为“理想国”的战略游戏的模式。这看上去根本不像什么可以在某处实现的东西。【195】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在看到巴西利亚巨大的中轴线时感到：“在建筑图纸上它总是静止的，在城市中则不是。”^[78]这多么适合来描述柏拉图的理想国草图啊！

但在这里，娱乐看起来也不比进步好多少。柏拉图关于肉体快乐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在《理想国》中是这样。苏格拉底像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一样出现，后者在死后才渴望这种快乐，那时不朽的灵魂已经从肉体的负担之中被解救出来。唯有精神满足是在尘世生活中通过诸多努力可实现的。柏拉图随后也在《斐利布篇》（*Philebos*）中做出过类似的判断。他将肉体快乐置于欲望的最低层级，将精神快乐置于最高位。在另一部晚期作品中，柏拉图显得友好一些。在《法律篇》中他承认，肉体愉悦对于人类而言是基本的，而不仅是一种蒙蔽认识的麻烦事。

相应的，柏拉图也很难处理美和艺术。柏拉图的文化政治是仅仅以教育为动机的。虽然对他来说美是重要的，但却不是为了感官享受。因此在《会饮篇》中他通过苏格拉底强调，当爱（*eros*）将美与善统一起来时，就达到了极致的完满。爱是一种精灵（*daimon*），它首先从感性上被感觉到，被它看到的某些东西吸引。这种美是一种回忆，是那种令人心动的美的气息，它重生之前曾在理念世界中看到自由飘浮的灵魂。神秘的渴求随之推动着爱靠近美的理念。在最简单的层级上爱倾心于一切美的肉体，然后从感性的东西向上朝着精神性的东西推进，且爱着“美的灵魂”。由对美的灵魂的爱，在向上的提升中，产生了对所有精神之物

中的美的爱。在最高层级，上升的爱看到美之理念的表象。在这里，精神看起来净化了所有低等肉体欲望。【196】从渴望中产生静观，同时从美中产生智慧。

对美的设想是如此超凡脱俗，这在哲学史上很有影响力：在美中，人类看到了理念的感性表象。从普罗提诺经黑格尔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都可以找到艺术本体论（Kunstontologie）的延续——存在一种纯粹美的东西，它在艺术中作为更高级之物的预兆和允诺而以感性的形式出现。

同样的观念也影响了柏拉图对艺术的理解。秩序、尺度、和谐比例和对称性是“美的”，这大概是在他的时代中普遍的思想成果了吧。如果画家画花瓶，他除此不会想到别的东西。建筑家正是根据这些纲领在雅典卫城建立庙宇。然而一定要走得如此之远，认为像圆形或正方形之类的几何形式比一个美的人在根本上更美吗？对柏拉图来说，这是他哲学式的美的理论的结果：绝对的美只存在于抽象中。（至上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现代绘画的建构主义者对这点很欣赏。）

这对柏拉图时期的艺术来说就是一根标杆，在这之下的艺术只能处于很低的地位。唯有建筑艺术使柏拉图产生兴趣，因为它不是模仿，而是创造。此外他认为，艺术主要令人云遮雾绕、使人迷惑、欺骗、制造尖锐的冲动、强化坏的本能以及败坏道德。如果所有人类世界的现象仅仅是理念的模仿品，而现在艺术仿制了这些模仿品，那么它就是在制造二手模仿品。它们不是力求达至本真之物，而只是模仿非本真之物。艺术家不应绘画摹型的摹型，而更应试着接近原型。但柏拉图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这种情况。

对柏拉图来说，美学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某种客观的东西。【197】美学的光芒来自人类经验世界之彼岸的预先给定的美的理念。在艺术中主体的自我实现，对他来说是愚蠢无聊的消遣，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在梦幻之境中跳舞的舞者，使人激动和陷入迷狂的音乐，玩弄和煽动观众的激情和情感活动的诗人和戏剧家——所有这一切，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最好都不应存在。这个世界同样不大需要“骗人的”诗人与哗众取宠、轻浮的戏剧家。因此人们可以设想，事实上，在理想国中，大部分时间是宁静的。只有令人振奋的颂歌、合唱诗歌和赞美诗有时响起，它们由艺术家创作。这些艺术家由神性的灵感驱使着，以至于能温和地预感到真 / 善 / 美……

对国家中的婚姻、家庭与私有制的抨击

回到理想国的构造。除宴席、笙歌和挥霍无度之外，什么东西最可能阻碍共同体的良好发展？柏拉图明确提到了一个敌人，即家宅中炉灶边的人们的自私自利。如果每个人在其私人家业（*oikos*）中都追求尽可能生活得舒服且富有，一个国家又怎么可能成功？家业对柏拉图来说是物质性的，而非理念性的。它是理性和国家利益的对手，是逻各斯的敌人。它既是利己的又是贪得无厌的。因此一个国家的所有力量，必须集中于约束私人家庭的无理需求。若个人的和公共的利己主义被激发出来，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受其控制的僭主政治就产生了。所以，理想国中应该得到满足的只有居民的实际需求，而非他们低等的对财物的贪婪。

不曾有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能走得像柏拉图崭新美好的城市幻想那样远。【198】因为同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世界相反，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能过一种尽可能无国家的且相当贵族式的（家庭）生活，在柏拉图那里，一切都被国有化了。

为了将家业的力量遏制于萌芽中，国家干预了生育。生育必须被合理地调控。国家准许卓越人口的增长而拒绝不那么卓越之人对孩子的愿望。按这个方式，除非对城邦有益，否则绝不能有更多的孩子出生。此外，这些应当是正常的孩子，不应有体弱或残疾的。如果即便如此仍生出了残疾的孩子，那么他们会被遗弃。柏拉图的优生学今天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残酷而不人道的。但在他的时代，对此大概没什么非议。不只是原始民族上千年来抛弃残疾的新生儿，而且在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斯巴达，丢弃或杀害残疾的婴儿也是普遍的。

在对家业的第二道打击中，柏拉图把儿童的教育确立为国家的任务。国家独立负责，通过花费颇多的教育体系，设法使每个孩子按照其天赋得到培养。并非像在现实的雅典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通过特权家庭平坦而顺利地获得到达国家顶端的道路，在理想国中孩子们要在自由的竞争中就其天赋相互比拼。因而青年不仅仅为奥林匹克竞赛训练，也为了国家的任务而竞争。获胜的最优者，就是最合适者和最有能力者。

在对儿童和青年进行机会平等的选拔方面，尤为有现代意味的是性别平等！柏拉图固然不是唯一考虑到这一点的人。至少在喜剧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比如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然而柏拉图的建议是

令人惊奇的。他轻视家政的世界，并非因为它是女人工作的世界。

【199】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前辈们要进步得多。所以对柏拉图来说，女人关心母性和家务，不是因为她们从本性上就被如此规定了；而是我们把母性和家庭劳作同女性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已经将女人简化为此了。根据柏拉图的观点，家政的世界训练出了像贪婪、贪财这样的坏品性，所以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及早远离这些东西。女人因此在理想国中也有权利受到国家的教育，并从事一份与其天赋相适应的职业。在兵役中（这是护卫者的义务），女人在军事上是平等的。她们可以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在司法中，她们也被赋予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这是乌托邦式的、充满想象的、激进的！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雅典以及希腊世界的所有地方都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女人和男人共同受教育，如从事音乐、裸露肢体做体操——不可想象！一个不属于无自由的下层社会的女人，却要从事一种职业，长久以来只有娼妓才有可能。女人在家政以外的社会联系一般是被禁止的。而且婚姻伴侣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妇女被包办婚姻——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如此。她们是丈夫的财产，因而在法律面前没有权利。

与之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多么进步啊！诚然，所有这些权利只适用于处于较高层级的男女公民，而不适用于那些未跨过教育体系最低门槛的人。后者依照古老的风俗习惯成为手工业者和农民。只有至少适合成为护卫者的女性，才能得到权利。更不用说非自由民和奴隶，他们最初根本就不参与竞争。【200】这样看来，柏拉图对奴隶和非自由民的社会偏见显然比对女人的偏见更大。居民中的多数人口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对于女性非自由民来说，所有方面都与奴隶毫无二致。柏拉图的这些设想是如此现代，因此它们也几乎不是出于对妇女的同情心或出于“正义”的原则。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的表达中推断出，对他个人而言，女人的命运无足轻重。他没有作为“理解女人者”被载入史册。女性护卫者和男性护卫者的平等，目的不在于女人的命运，而仅只在于对特权阶层内私人家业的摧毁。

操控国家命运的人应该摆脱个人的激情、利益与贪婪——这是柏拉图从他现实祖国的道德堕落中得出的核心要点。他必须为此包容那些地位较高的女人的平等权利——据说就是为此。对一些人来说女人反正不是特别重要，他们也可以在形式上将女人置于平等地位。不管怎样，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能感受到柏拉图的怨恨之情。相比于别人的孩子，以

错误的方式更偏爱自己的孩子，难道这不是女性的天性吗？难道女人没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去经营家政？去建造一个窝巢，抚养自己的那些后代，被培养成女性或具有女性气质的，争取越来越多的家产？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结论都是，人们应该将女人从教育体系中排除出去。只有男人才被允许教育孩子。并且只有那些成功地完全摆脱其性别角色的女人才能够成为女哲学王；相反，男人则能保持其原初所是的样子。

私人家业的力量被国家利益的逻各斯打破——这是理想国的第一个最吸引人之处。第二个最吸引人之处是，精神贵族取代了那些在民主政治中追求权力的原生贵族阶层。贵族的形式仍被保留，但实际上所指的只是最优的国家管理者，而不是最富有者。【201】总的来说，柏拉图的哲学王和护卫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荣誉而工作。在传统贵族伦理的观点看来，这是应当坚持的。一个社会中令人遗憾的价值堕落是金钱和市场的后果，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理想国中的金钱经济就必须被限制在一个最低限度。政治应当重新以仿佛与金钱无涉的方式进行——就像在古代的日子里那样。统治者则应该能够只依靠其先于城邦就拥有的田产所得而不受干扰地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他的时代中债务经济的一个坚定的回应。他的建议正是贵族们的反对的一部分，即反对远洋贸易和金融业、放贷和利息——通过这些途径，部分属于非自由民的商人阶层可以积累巨大的财富。柏拉图针对新贸易经济和债务经济的论述是明确的。在民主政治中，所有公民只考虑金钱和财产，与此同时越来越堕落废弛：他们“身居理想国之中，行为良好且有着很好的条件，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当时他们所有人都对那些侵占了他们财产的人满怀愤怒并伺机伏击，对其他人也是如此，此外他们也热盼着革新”^[79]。对金钱和财产自掘坟墓般的贪婪折腾着城邦中所有人，而放贷者不知廉耻地从中获利。“但是，那些沉迷于赚钱的人们，对其他人仿佛熟视无睹，总是一再地伤害那些无可躲避地被掠夺财产的人们，而当他们现在通过利息累计了天知道几倍于他们能力的财富时，他们也使得城邦里的寄生虫和穷人日益增多。”^[80]

结论就是，要在理想国中禁止借贷交易和利息行为！只有为没有及时付账的情形而设置的滞纳金才是被允许的。虽然理想国家中金钱继续存在，但其意义仅只在于维持支付往来。【202】相反，敛财或投资是被禁止的。

金钱的地位应从欲望的对象被降低为支付手段。城邦应该引进不具

有物质价值的钱币——像斯巴达的铁币、今天的纸币或民主德国的铝制硬币。此外，柏拉图还错误地认为：这样一种没有物质价值的金钱就不会被存积起来！银币应该仅为与其他希腊城邦进行交换而存在。在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地区，雅典的银制德拉克马就像今天的美元，是一种“世界货币”。它们因此对远洋贸易来说不可或缺，但应该像城邦中的所有外国货币一样，被换成无物质价值的金钱。

整治金融市场，废除利息，保障机会平等，当然也包括性别平等，完全由国家教育孩子，让统治者为了荣誉进行统治——由于这种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柏拉图作为政治哲学家被载入史册。苏格拉底凭借口才和技巧，凭借灵活、亲切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思想。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来说，这个乌托邦描绘的或许都是迄今为止最为艰巨的规划。而且这个乌托邦，根据其自我认知，并不是各种可能之中的一个建议。苏格拉底似乎觉得，柏拉图的美好城市应该是共同体生活的唯一方式，它从哲学上讲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然而，世界能以哲学的方式来疗愈吗？

马格尼西亚，或通往那里的路

我们不知道，柏拉图因其“天上的美好城邦”过上了多幸福的生活。【203】于我们而言，今天它不是那个由天使守护的闪亮的梦，就像四百年后出自约翰启示录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柏拉图自己似乎也对他的思想实验不完全满意。大概当时并不缺少同时代人的反对和批评：在他们看来，哲学王的角色似乎显得太过野心勃勃和自负了。对待女性的新视角可能并不为诸多传统主义者所喜欢。无论如何，在男权世界统治的这两千多年里，“女权主义”的活力还远没有普遍实现。理想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对自由金钱往来的严格限制、对大量积累资本的禁止，距其在历史上真正实现的时刻，同样还需要相当长时间。而且这一时刻应该也只持续了一段短暂的时光。

而其他非常具体的经验，也可能深深影响了柏拉图尚未完结的关于理想的共同生活的思想进程。公元前366年，大概是完成《理想国》后的一段时间，他再次动身前往西西里岛。他的老朋友狄翁（Dion）邀请他参与一个伟大的项目。形势看起来很好。叙拉古君主狄奥尼修斯一世不久前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人狄奥尼修斯二世（Dionysios II.）被认为坦诚且好学。刚好狄翁想要利用这个时机，图谋和柏拉图一起从根

本上改变叙拉古的政治状况。理想国有可能在西西里岛成为现实吗？

狄翁心中诗意的美好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散文式的现实境遇令人清醒。狄奥尼修斯二世不想建造一个理想国，他有完全不同的顾虑。他的统治受多方威胁，尤其受与野心勃勃的迦太基的战争威胁。当狄翁由于所谓的政治阴谋被驱逐流放，柏拉图也幻想破灭而离开了。在远离雅典的国家模式中至少实现其哲学构想的一部分，这个尝试又一次失败了。

然而四年后，他还有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西西里之行。

【204】此行的缘由似乎不完全是自愿的。狄奥尼修斯要求柏拉图前来，作为赦免狄翁的条件。然而这位哲学家很快察觉到，狄奥尼修斯不愿意冒险去做一个政治实验，甚至可能不愿意交出权力。与此相反，他利用柏拉图的名声来在诸多方面为他完全非哲学的暴政做表面掩饰，吹嘘其价值。

狄奥尼修斯没有履行释放狄翁的诺言，甚至没收了他的财产，于是柏拉图改变了阵营，与专制统治保持距离。他随行的学生斯彪西波（Speusippos）甚至在政治上成了反对派的一员，柏拉图陷入了棘手的状况中。被怀疑、受威胁，公元前360年他好不容易成功逃亡。当时这件事在叙拉古持续沸腾着。在阿卡德米成员的支持下，狄翁于公元前357年带着一小支雇佣军成功推翻了专制统治。但是政治形势依然混乱，狄翁的政权摇摇欲坠。无论怎样，他召集了一个委员会，为叙拉古拟定一部公正的新宪法。狄翁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理想国的实现，这饱受争议。很有可能他也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对他来说这只关乎自身的权力。相反，柏拉图似乎直到最后都信任他的朋友。柏拉图出于这个契机写的《第七封信》，将狄翁想在叙拉古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的事情流传后世。一些同时代人对此不以为然。公元前354年，柏拉图的朋友于掌权三年后，陷入一场军事政变而遭袭身亡。八年之后，狄奥尼修斯二世再次登上叙拉古的王座。

在西西里岛徒劳的冒险和诸多失意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消失得毫无踪迹。所以他在晚年感到需要接着充满争议的《理想国》之后再作一部关于理想国家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对话：《法律篇》。【205】相比于“社会主义的”美好城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设想看上去就像一个简洁的社会主义缩略版。他回到了家庭和私有制。柏拉图顺理成章地将他新的国家乌托邦只看作“次好的国家”——但至少是一个实际可实现的国家。

对话的开头场景风趣：一个雅典人、一个斯巴达人和一个克里特岛

人为思考理想的国家而碰面。这个动机是想象出来的。一座名为“马格尼西亚”的新城市要在克里特岛上建立，这三个国家理论家是社会建筑师。时间是在夏至日，这一天漫长且炎热。三位思想家踏上这条从克诺索斯进入伊达山脉的漫长小路，到了伊达山的岩洞里。海拔1500米，爬山持续了整个白天；他们有很多时间，怀着闪烁的激情，从所有细节思考一个理想的国家。

这三人均年事已高，就像三头年老的苍狼，在生命中见过了诸多风雪。他们无不道德的堕落和当前国家的危机感到悲痛。在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民主政治就是扯淡！但是专制同样糟糕。就连雅典人，包括其中很多亲眼见过柏拉图的学者，也反对一小撮精英的统治。必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虽然柏拉图之前就在其另一部晚年著作《政治家》中为哲学王的理念做过辩护。但是显然符合条件的人如此难找，以至于理想鲜少能实现。

所以现在需要寻找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雅典人的诉求不会改变，即一切私人生活都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国家作为道德机构在马格尼西亚仍旧起作用。【206】国家的任务是培育公民的灵魂，从最早的年岁就开始培养德性。柏拉图没有偏离他的主导思想，只是与理想国相比在手段上有所保留。

显然柏拉图从西西里岛的经历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好的意图和好的政治还远不一样！以前他确信，在生活以及共同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是去认识善并培养好的品质。这样剩下的似乎都会自然而然地接踵而至。与之相反，柏拉图在晚年似乎清楚了这一点：心怀善意的人也可能犯政治错误。任何好的意图都不得不面对各种情况、后果和副作用的纷乱，这些纷乱共同决定着一个行为的价值并使其晦暗不明。凭着这一洞见，柏拉图将政治从道德哲学这一唯一统治领域中解放出来。关键不仅在于政治知识（*politiké episteme*），还在于规则。好的品质是一座桥梁，它需要坚固的底座。而这些支柱就是法律。

如此看来，《法律篇》比《理想国》更具现代性，也和我们今天对政治的理解更为接近。但是从内容来看，《法律篇》依然保留了如下观点：即使在法律、控制机构和刑罚等重点问题上要经过广泛讨论取得一致，但国家统治仍然应由一个智识和道德更为优越的精英来实施，二者协调一致。同理想国中一样，国家机构的职位根据能力和天赋分配，并做成详细名单。在万物之上，还高高地存在着一个神性秩序，作为万物的准则。这个神性的东西，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我们应该在公共生

活与私人生活中遵循它。

政治，像在《理想国》中一样，在“次好的国家”中也要为家庭生活设立规则。结婚是义务，35岁还没有成婚的男人要为此受到惩罚；禁止通奸；迎娶另一社会阶层的妇女，并因此搅乱了社会阶层，【207】这样的行为要受到劝诫；所有性放纵虽然不被禁止，但是要被谴责；同样被谴责的是恋童与鸡奸。与男孩发生性关系在古希腊属于十分寻常的行为，甚至被视为教育的手段。但是柏拉图已经在《会饮篇》里对此表示反对。这些“毛还没长齐”的男生还是孩子，不是男人，因此在性方面还是禁忌的。

至于儿童的教育，柏拉图容许父母将他们的后代至少在幼年时期留在自己身边。“雅典人”在此给出了一整串的医学和教育学建议。除去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Enver Hodscha）——他大概是柏拉图所有学生中最好学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元首曾经如柏拉图这样为他的公民制定出如此详尽的儿童教育规程。尚在怀孕期间，母亲就必须通过体操、运动和平稳的心情使胎儿的姿势合适。在最初的几年里，要尽可能多地将孩子带在身边，以加强基本信任感；男孩和女孩同样受教育；左手和右手一样被需要（gefordert）、被促进（gefördert）；惩罚不应伤害孩子的尊严；体操和优美的舞蹈，增强精神和灵魂；玩耍很重要，但应该注意，得是充满教育价值的游戏；当然没有规定要用木制玩具，但那时还没有其他的材质……

关于城市的规模和财产分配，雅典人的想法是异乎寻常地静态的。所有事情一开始就被确定下来，并且尽可能不做改变。马格尼西亚应该提供5040户人居所的空间。他建议，将少量不动产通过抽签的方式判归公民所有，这些不动产是不允许出售的。为私有制和财产而争论是共同生活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在马格尼西亚这个问题被消除了，因为私人家业不允许扩张。【208】轻微的不公平是准许的，但在法律上要受到“一比五”规则的限制。国家保证最贫穷者的最低生存，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过这个最低量的五倍。

不管怎样，我们谈论的不是金钱，而是不动产和动产。因为金钱在马格尼西亚和在理想国一样，是无关紧要的。禁止占有金银财物，借贷、信用交易同样被禁止：“任何个人”都不许“拥有金银，只能拥有日常交换用的钱币，比如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81]国家也尽可能不鼓励远洋贸易，一切都应该靠自己争取。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恩维尔·霍查显然也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模板。马格尼西亚是公职人员和农民的国家，而无

自由的外邦人从事手工业。那么城市内的贸易又该如何看待呢？一方面，它助长了人们恶的性格特质，让他们变得不诚实、贪得无厌。另一方面，柏拉图也清楚，人们不可能完全放弃贸易。他找到了解决方法，即将削减至最低规模的贸易活动委托给具有有限居留许可的外邦人。他们的行为必须光明磊落。产品广告被禁止，同样，在售卖时，一切欺骗和夸大的行为都是禁止的。

《法律篇》是柏拉图国家哲学的最终形态，似乎也是其国家哲学最后的更新。它是个未完成品。这位其家族深深卷入城市寡头政治乱局中的上层贵族，重建秩序和道德的尝试，随着《法律篇》的搁笔而结束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政治乌托邦看起来就像旧秩序针对新时代的一场起义。几乎柏拉图强烈谴责过的所有东西，包括灵魂的分裂、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社会的商业化以及金融市场自治，都于其身后的两千五百年间越来越蓬勃发展。【209】然而，柏拉图在诸多由他主导的讨论中，以谈话参与者之口一再表达的一些话语和思想，它们充满智慧并为人指明方向，熠熠生辉、精炼巧妙且给人启发，以开创性的方式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最后，柏拉图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位建筑师，没有完成任何单个的大型建筑物，但在自己那里汇集、预知并事先实践了一切未来的建筑风格。就这样，现代国家哲学也从柏拉图的乌托邦精神中产生了——尽管是从其失败中产生的。

柏拉图逝世于公元前348/347年。他的坟墓可能位于阿卡德米地区或其附近。在《法律篇》中，他将灵魂描述为“能自己运动的运动”^[82]。他的灵魂是否安息在其肉体的坟墓中，抑或自其死后灵魂以不断变化的外衣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前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应该最后看一眼他的灵魂以作告别，同时也向柏拉图相信在他的和我们所有人的灵魂中已然看到的東西告别……

事物的秩序【210】

世界灵魂；一窥柏拉图的宇宙——暗中敌手——上天的产物——亚里士多德——“存在”意味着什么？——自然的秩序——宇宙、猴子、人类——有死的灵魂，不朽的精神



世界灵魂；一窥柏拉图的宇宙

让我们回忆一下画作《雅典学园》。画的中心位置是这片哲学家乐土的精神领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在我们对前者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认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人眼中，柏拉图的形象是这样的：一脸胡须，仪表堂堂，就像西斯廷教堂顶上米开朗琪罗所画的天父形象一样，他也直指天空。指向天空方向的食指好像在说：“看这儿，从这儿开始，其存在、形式、现象和意义，一切都与那个比恒星还要高的理念王国有关。理念王国也许并非一切，但是没有这个王国一切就都不存在！”与之相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站在同一级台阶上，望着他的老师，伸出手臂指向地面，【211】仿佛想要说：“不要激动，冷静下来！”

垂直方向的哲学与水平方向的哲学针锋相对，等级制与分类学针锋相对，空想与经验针锋相对——这是拉斐尔与同时期的许多人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描绘的形象，并一直流传至今。就像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的，这幅画像既不完全错误也不完全正确。二人的差异首先并不在思想的方向上。亚里士多德也有论及纯粹精神之物的领域。完全没有空想的话，他也得不出任何东西。差异在于，对柏拉图来说，宇宙应当有唯一一种秩序。相反，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

秩序。

尽管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这个宇宙的暗示，但对于是否向他的学生们提供一套他自己的关于宇宙的简洁理论，这位大师犹豫良久。而最终在晚期作品《蒂迈欧篇》中这样做时，他并非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述这套宇宙起源学说，而是通过他的对话者中的一位，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蒂迈欧来说出的。尽管在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柏拉图恰好把这本《蒂迈欧篇》夹在腋下，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极为慎重且决不以教条的方式阅读它。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困难的情况：蒂迈欧所说出的内容，肯定不是分毫不差的柏拉图的想法。另一方面，柏拉图花费如此多笔墨讲述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起源学说，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从中获得什么。

柏拉图知道，他正处于讨论宇宙和事物本性的时代。他的前辈已把古老的神圣秩序改造成了一种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在没有神的情况下仍能广泛地起作用。自从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以来，我们遇到的不是人而是力和质料。其中的例外诸如巴门尼德，他的（象征性的）女神也证实了这个规则。对于这一新的自然—秩序（与神圣秩序相对）而言，缺少的是伦理责任。【212】诸神的意志会任意转变，那么自然意志是如何的？

自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就从不缺少这样的尝试，即企图将自然法与人类的法联系起来，并由此创建一个新的道德模型。如果这种道德的自然—秩序不涉及人的灵魂，而只涉及国家秩序，那么它的效果就是苍白而流于形式的。只要想想诸如普罗泰戈拉这样的智者的那些危险的语言游戏，即除人之外无法认识也不承认任何尺度。但是如果人的行为在宇宙中没有固定的定位，而只是通过一个利益、诡计、蒙骗和欺诈的世界无根无据地闪现，那么道德习俗的衰落就无可避免了。恰好这一点就是柏拉图所强调的：要指明，人类的灵魂是秩序井然的宇宙整体的组成部分，宇宙已经为灵魂规定了善的行为的规则。

任务是宏伟的：一幅崭新的整体蓝图，要在宇宙中将人的灵魂置于比以前更高的位置！柏拉图从自然哲学这一领域开始，这是前苏格拉底哲学以最彻底的方式所探讨过的领域。然而他自己并不是自然研究专家，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他也不是先驱。因此柏拉图的这条道路经由的是高度假设性的领域。对很多东西的论证并不充分或者根本没有论证，更别说像柏拉图早期那样通过精确的定义来论证了。以这种方式如何谈论新的东西呢？

有这样一条基本假设，今天我们认为这条假设带有高度的空想性，但在柏拉图同时代的很多人看来它是理所当然的，柏拉图就是从这条基本假设开始的。它是这样一条断言，即世界上的事物并非如其所是的那样是偶然的。世界整体拥有唯一的秩序，它通常是隐蔽的。然而自然科学研究并不能发现它。想想柏拉图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失望。自然科学对事物的看法只是让石头滚得更远，却无法进入到事物的本质。

【213】“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它是如何存在的？”这一问题亟需一种更为深入的洞察。

柏拉图让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蒂迈欧讲述了一个起源神话。这是一个典型的神话：尝试将不可解释之事放进一个故事中，这个故事可以被原封不动或者以类似的方式多次讲述。讲述万物起源的故事的人当然知道，从这个故事中得不到什么知识，而且他的听众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一个关于起源的故事，其意义不在于获取对某些完全未知之物的更高深的知识；而是使那种陌生之物通过描述变得熟悉起来。神话的意义在于，以讲故事的方式战胜不确定之物中不可把握的力量。

正如我们从理论中认识到的，柏拉图把可以用感官感知的世界视为对更高级世界的不完美的模仿。而这一思想对宇宙起源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宇宙起源学说并非只谈论世界从何而来，而且也须阐明，为什么我们感知到的东西，相比于理念来说显得如此不完满。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困境”：要解释为何在完满世界的范围中有一个不完满的世界。

据他所说，万事万物都是由此开始的：有一位神性的造物主（*Demiurg*）对原初物质进行加工，由此造出了世界万物。造物主并不是从无中创造世界的。不存在“原初的自然发生”。在原初时刻已经有了两种东西：原初物质和理念世界。现在，造物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自我设定的任务如下：按照理念的样板以理性的方式形塑和塑造原初物质。然而原初物质是如此混沌，以至于作品无法完全成功。这些被制作出来的事物并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物质性的顽固特征。因此它们保持了一种混合的特征，一方面被诸理念的理性赋予灵魂，但总还是带有少许类似于原初物质的无规则性。我们的世界就是由这些扭曲的木头组成的，它是静止和理性的，同时又是动态和混沌的。

按照蒂迈欧的观点，造物主整理了原初物质并使之成为事物，
【214】由此就产生出宇宙的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这个被塑造出来的世界类似于一个圆球，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这是所有形式中最完美

的一个。世界灵魂（Weltseele）存在于它之中也存在于它之外，渗透到万物之中并赋予万物生命。它使自身以及其他万事万物活动起来。所有活动、过程以及所有的生成与消逝都是由它而起。而那些始终自行运动的东西，比如天空中的繁星、吹拂的风以及跳跃的青蛙，都是它的作品并从它那里获得灵魂。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想象，其中包含了早期哲学家关于自然的很多推测：造物主将物质塑造成四种基本形式，这四种形式我们已经从恩培多克勒那里得知——火、气、水和土。将这四种元素混合在一起，是这种宇宙起源学说中最现代的部分。然而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这个部分也并非完全原创。蒂迈欧将这些元素描述为几何形状：四面体、八面体、二十面体和立方体。这些形状（立方体）又是各由等边三角形组成，等边三角形是所有物质在数学上的基本结构。

然而，这种宇宙起源学说的重点并不在其物理与数学的细节之中：这是对整个过程赋予灵魂的形象！（而且我们将在本哲学史的第二卷中看到，这个过程由此深深吸引了后来的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以及其他人的“浪漫主义”哲学。）柏拉图的宇宙中只有生命没有死亡。每个元素都被赋予了灵魂，包括每块石头，以及每个运动的物理过程都是如此：宇宙是有生命的！而且它通过其在理念世界中所占的比重，支配着理性！因此，天空中的每一颗星辰、每一棵橄榄树以及每一只蝴蝶，都像人一样被以理性的方式赋予灵魂。问题仅仅在于，赋予的程度。

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做得很好，他让来自西西里岛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讲述这个故事，【215】人们从毕达哥拉斯主义者那里接受关于一个被赋予灵魂的宇宙的想法时所产生的反感，肯定比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获得此类想法而产生的反感要小一些。但是蒂迈欧想要最终达成的目标，并不只是一个在或好或坏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中以理性方式安置的宇宙：而是人类灵魂不朽！也正是这个对柏拉图来说如此重要的想法，在很多同时代人看来是绝对可疑的。相对应的，一旦讨论到人的不朽，柏拉图就会让对话录中的谈话参与者以怀疑的姿态进行回应。在《理想国》中，格劳孔对此摇头，在《斐多篇》中西米阿斯和格贝表示了怀疑。

但是柏拉图脑中还有另一个对手。这个人深深影响了很多同时代人，柏拉图很明显宁愿完全不提及他。尽管如此，这个人和他的学说还是得到了最高程度的推崇：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 von

暗中敌手

他是柏拉图之前西方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创造了“原子”这一概念。他生于约公元前460年，属于苏格拉底的同代人。或许他相当年长，其作品出现于柏拉图早期作品的年代。德谟克利特出生于阿布德拉，这是爱奥尼亚在色雷斯的殖民地。希腊人视色雷斯人为“野蛮人”，属于尚未开化的世界。18世纪德国作家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阿布德拉的居民，即“阿布拉德人”，除了德谟克利特之外，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丑。

根据德谟克利特自己的说法，他从阿布德拉出发，游历了许多城邦和国家，并且就当时能想到的所有知识领域撰写了大量文字。他的著作据说具有柏拉图著作的规模！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保存下来。【216】但是，我们从留传下来的文字中能够总结得出的内容却具有高度的冲击力，特别是从柏拉图的视角来看。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既不存在一个被完善安排的宇宙，也不存在一个精神自身的领域。这两个出自柏拉图的世界的最重要观点，对德谟克利特来说都是多余且错误的假说。

他推进了老师留基伯（Leukipp）的信念，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自然理论，而关于他的老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按照这一理论，自然纯粹是由微小且不可分的单位——原子所组成的！根据2世纪著名医生盖伦（Galen）的说法，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应当是这样的：我们认为事物具有的一切特征，都只是我们从原子中感知到的细微层次差别：“某物具有颜色只是看起来如此，它是甜的或苦的也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只存在原子和空的空间。”^[83]

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原子是永恒的。既不是造物主创造了它们，理念的精神也没有渗透其中。自一切时代的开端开始，它们就被寒冷和死亡萦绕：具有几何形状，小球形、正六面体、圆柱体或锥体。柏拉图或许从这里借鉴了他关于元素之精密结构的想法。将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原子或元素的形式加入柏拉图的宇宙起源学说非常容易。因为这种精细论述对于柏拉图的宇宙中万物有灵的特征来说，丝毫没有危胁。

柏拉图的造物主借助理念塑造了万物，但是在德谟克利特那里，造物主被定位为对世界毫无作为。我们的世界产生于一个原子旋涡，在这

个旋涡中，相对较重的东西向下坠落，而轻一些的则不断摆动向上升起。在这个持续分离的过程中，地球与其他星球一道形成了。这些来自自然的各种不同的原子，在世界各地相互组合连接，由此完全自动地构造出不同的事物。这就是质料，世界由它组成，天体星辰和火、水和大地、植物、动物和人。【217】且所有这些都不听从于任何精神或偶然过程，而是遵从自然法则。

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元素论所表达的东西，在这里被彻底推到极致去思考。如果说阿那克萨戈拉始终还要将灵魂视为“纯粹的”灵魂质料或精神（*nous*），将之与无生命的事物区分开来，那么德谟克利特则不再进行任何区分。汇聚成灵魂的原子与其他原子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它们顶多在某种程度上更精细、更平坦、更圆、更有活力。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整个世界是一个完满的球形，那么现在在德谟克利特这里，这些球就是微小的灵魂原子。借助呼吸和感官感知，德谟克利特将恩培多克勒和阿尔克迈翁的思想线索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就像恩培多克勒所认为的那样，呼吸和感知对德谟克利特而言就是元素的流入和流出，亦即原子通过气孔流入和流出。而就如阿尔克迈翁的观点，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在感官感知之外没有任何认识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人们最好不要自视过高。“我是这样阐述的，”他写道，“我们无法认识到，每个事物是如何成为现实或者未能成为现实的。”^[84]以及“事实上我们无法认识任何东西；因为真理位于深处”^[85]。这样的命题，就像19世纪恩格斯对之做出的判断，他认为，古代的唯物主义在认识问题上是不堪的。

经验世界与空想之间模糊的边界地带还存在如下问题：基于原子论，是否可能存在来世？古代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彼此矛盾的。根据埃提乌斯（Aëtios）的说法，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不是永恒的。但是这一点在他的整个思想框架中显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如果原子是永恒的，那么它们就是不朽的。因此每种灵魂的质料，包括人的灵魂，都是不朽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而另一方面，人们一定会自问，【218】这个想法多大程度上能安慰到人？一个人死去时，灵魂原子重新分散到世界中，然后与其他“陌生的”原子组合形成新的人类灵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虽然确保了基本质料的永恒性，但它并没有确保灵魂是不朽的个体。恰恰相反：这种自然哲学使人成为可分之物，成为无限可分之物。这样一种灵魂就完全不可能再是人格化的和道德身份的承担者了。我一死亡，就瓦解成不朽的

微小粒子——这样一种前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德谟克利特自己对此似乎并不感到忧虑。如果一个人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混乱的、带有希望的或失望的空想，而是冷静理智地去认知事物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会变得泰然自若。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幸福，即泰然自若、心平气和（*euthymia*）？

然而在柏拉图看来，德谟克利特的论著并没有导致泰然自若，而是导致了短暂的赞叹和巨大的沮丧！对柏拉图来说，德谟克利特快乐的唯物主义中的高明才智难以隐藏，但同样无法隐藏的是，涉及共同体生活时，原子论中彻底的反道德属性。我们应该只关注原子而不关注理念吗？这是真正的对本质的洞察吗？除了数不清的细小微粒，实际上就没有有任何其余的东西吗？

然而在德谟克利特关于伦理学的名言中，有一些与柏拉图重叠的内容。德性备受重视，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节制和审慎。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国家地位崇高，而对金钱的欲求则地位很低。但尽管有一些对公民的嘲讽式评论，他所推崇的统治形式却是民主政体。在这里，德谟克利特也训练自己处于泰然自若的状态，并且认为，政治中有错误，就像一般生活也有错误一样。因此德谟克利特总是一再将心境平和与一种深层的悲观主义结合起来。人从本性上并非是善的。【219】人们本应宁愿不生孩子，因为总体而言，生养孩子带来的烦恼比快乐更多。谈论女性时，他变得充满敌意。在他看来，女性最好闭上嘴。

我们不知道，柏拉图对这个来自阿布德拉的人怎么看。但是今天我们从他的灵魂学说和伦理学中能看出，他将自己定位为德谟克利特暗中的敌手。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柏拉图的时代，德谟克利特已经非常著名了。在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希腊世界，他的声望很可能比柏拉图的导师苏格拉底还要高得多。著名的医生，科斯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von Kos）是那个时代的超级明星，虽然他和德谟克利特同岁，却应当受过后者的教导。他关于身体四种体液的学说——血液、黏液、黄色和黑色的胆汁，使人们想起阿尔克迈翁在生理学上的推测。而唯物主义的思想也被激发出来，激情与对灵魂平衡状态的干扰不是从道德层面上，而是从生物学层面上被解释的。这种对人的自然主义式的看法必定会对柏拉图产生影响，使他心生厌恶并感觉危险——难怪他鄙视医生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医生与理想的哲学家形象处于危险的竞争之中。而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哲学家应当比医生更为优越。因为医生虽然知晓死亡，但对不朽却一无所知……

上天的产物

“不朽并非人人享有”——这是歌德名言中的点睛之笔，这一点柏拉图也意识到了。如果人们想要证明不朽，相应地就必须谨慎行事。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就是在最深处把一个人聚合在一起的东西。几乎所有早于他的自然哲学先驱都有相似的看法。【220】人不应仅仅是质料，而是“一种上天的产物”，在其中宇宙的结构被描摹出来。^[86]与不朽的宇宙生命相反，人的身体却是有死的。灵魂终将离开身体，并在另一个身体中继续生存。至此为止，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创新之处在于，柏拉图将灵魂分解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正如上文提到过的，在《理想国》中，他谈到了灵魂的三个部分：欲望的灵魂、激情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这也与国家的分层对应：手工业者与农民、护卫者和哲学王。这个三分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创新，直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在思考其中的细节。

那么究竟要怎样设想灵魂的三个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柏拉图用他的灵魂模型描绘了一种等级关系。激情的灵魂高于并支配着欲望的灵魂。同样的，理性的灵魂也高于并支配着激情的灵魂。在这里情绪也是被统摄的。善的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在其中理性的灵魂占支配地位，其他的灵魂部分则进行自我节制。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柏拉图看来，整个宇宙本身被世界灵魂赋予灵魂并生存着，那么无疑，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是被赋予灵魂的。柏拉图认为，植物作为生物拥有欲望的灵魂，而许多动物除此之外还拥有激情的灵魂。与之相对，理性的灵魂是高贵的，并且仅为人所拥有。人的生活如何才是成功的？他必须培植修剪那些自身中需要水且趋光的植物，并且克制自身中动物的狂野激情。按照哲学的方式正确地生活，就意味着：学习自我控制！

柏拉图以解剖学的方式在人身上精确地定位了灵魂的不同部分：欲望的灵魂位于肚脐和肝脏之间，激情的灵魂位于心脏附近，而理性的灵魂处在头部的某个位置，但他的灵魂模型并非真的是生物学上的，毋宁说他所谈的是道德上的比例关系。灵魂的诸部分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而是相互依赖的。【221】柏拉图从西西里岛的医生那里学到：没有什么比一种适当的身心平衡更好的了。许多事物必须通过内心被接受，由此理性才能对它们进行处理。没有属于勇气的激情，就没有勇敢；没有疼痛的经验，就没有审慎；没有快乐就没有喜爱。没有激情的源泉就没有精明的才干，没有精明的才干就没有德性。

如何确保这个三分的灵魂具有不朽的属性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柏拉图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证明来尝试回答。柏拉图想要论证的那个不朽的灵魂本身也在变化。在早期与中期的对话中，整个灵魂都应当是不朽的，但在晚期作品《蒂迈欧篇》中他开始有所不同：在这里他所谈的仅仅是，证明理性灵魂的不朽，而无关欲望与激情。与此相应的，很难认为有唯一一种柏拉图灵魂不朽学说。

和恩培多克勒一样，柏拉图也相信来世，相信新的身体是对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的奖励或惩罚。在《斐多篇》中，柏拉图以笃定的谴责口气描绘了一次庭审判罚，其中也包含了他对改过自新的期待。在《高尔吉亚篇》中，诸神依据对纯粹灵魂的详细观察，做出了一次死亡判决。《理想国》通过“厄尔神话”介绍了将灵魂拣选进天堂与地狱的过程。柏拉图的终极目标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中实现从身体的最终解放。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道德上的阶段性目标，将不能上升，而必须留级。对于男人而言，不那么严重的人生过失就会招致来世悲惨的命运，来世成为女人。如果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恶劣的，那么他可能被罚转生为动物。一味蛮干注定转生为蚂蚁。与此相反，植物则是来自游乐，这与恩培多克勒的观点不同。我们可以在《斐多篇》《理想国》《斐德若篇》与《蒂迈欧篇》中读到这些内容。

如果一个人不受控制的情绪破坏了人生的规划，【222】那么他就必须考虑到，他会受到惩罚在来世变成动物，这种动物正好跟那种情绪相匹配。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转世为动物，这与如下的想法特别不相符，即认为只有理性灵魂才应该是不朽的。这个摆脱了其他所有东西的理性灵魂在一只树蛙的身体中应当如何存在？这一理性灵魂在树蛙中应该如何自我提升与显示出来呢？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关于来世的观念，与柏拉图身体、心灵与道德三分的人类灵魂，二者并不能特别好地协调统一。

柏拉图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证明不朽，在此所显示的才智就显得更加令人吃惊。他在《斐多篇》中进行了首次尝试。在一个虚构的场景中，苏格拉底坐在监狱里，被他那些悲伤而哀恸的朋友们围着。死刑即将到来。但是苏格拉底却泰然放松。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他终究相信灵魂是不朽的。他的第一个论据如下：在宇宙中所有生命都是由一种循环运动组成的。有生命的东西死亡，就转变成了它的反面：死亡的状态。而死亡状态也会再度转变成它的反面：有生命的状态。世界遵从这种辩证法的自然法则——近似于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从所有存在之物中都有其对

立之物产生出来，而从这个对立面又会有与之相对的对立面产生，如此无穷。这个过程永不会有终结，因此苏格拉底认为，由此也不会有灵魂的消亡。

苏格拉底的第二条论据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所涉及的是再回忆（*Anamnese*）。关于理念的本质，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感官感知，那么他是从哪里对它有所知？任何一种知识都必定是人已经现成具有的，而这只能来源于一个更早的生命。与此相关的就有了第三条论据。为了认识理念，我必须不仅要提前关注它们，还必须已然将它们识别为理念。【223】但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可能，即我在自身之中拥有某些理念之物，它能将理念作为理念来认识。而这又只能由此来解释，即人的灵魂本身是属于理念世界的一小部分。因为理念是永恒的、超时间的，那么人的灵魂也必定是超时间的，也就是说，是不朽的。

在第四条论据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认为，尽管世界是由众多相互矛盾之物构成的，但是这些矛盾之物不能在同一事物中同时存在。比如，寒冷存在于雪之中，而温暖与雪不相容。有雪时，天气是寒冷的。而当天气变暖了，雪就没有了。如果人类的灵魂与生命是同一的，并且二者就像雪与寒冷一样共属一体，那么灵魂与生命也就不可分离。只有身体会落入死亡之手。但灵魂是死亡的对立面，是不可能遭受死亡的。人们肯定不可能同时活着与死去。

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的对话者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些“证明”；对此有一个可以想到的证据：柏拉图清楚他的论证基础极为薄弱。因此他在晚期著作中又再度回到了关于不朽的命题，并重新尝试使之变得可信。在《理想国》中，他重述了出自《斐多篇》的第四条证明。世界万物原则上都可因灾病被毁灭，但人的灵魂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做那么多恶行和暴行，但我们还保有我们的灵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里做了最后一次且完全不同的证明。他相当深切地回忆起阿尔克迈翁。就像阿尔克迈翁一样，苏格拉底将灵魂定义为一切运动的起源，并且也是首要根源。灵魂作为首要根源，不是任何已生成之物，而是始终存在。如果灵魂是可朽的，那么世界就会停滞，因为如果没有运动，万物就是虚无。这听起来并非完全难以置信，问题仅仅在于，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是哪一种灵魂。他所指的是否不只是伟大的世界灵魂？而且，【224】仅仅因为世界上的运动与生命普遍而言是不朽的，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灵魂也必定是不朽的吗？

这条在宇宙法则与人类内心生活法则之间引人注目的分裂并非完全

令人信服。就像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中闪现的那样，他自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释、类比与观念中的弱点。然而他不想放弃雄心勃勃的目标：对世界做出浑然一体的说明。所有的部分应当完美地相互吻合。而恰恰是在这里，他引发了他那位最著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怀疑！

亚里士多德

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一个学生在著作中与他伟大的导师相像，并将难题继续往前推动决定性的一步，那他就是杰出的。与此相反，在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领域，情况是反过来的。如果一个人与他伟大的导师过于相似，那么他会被认为是信徒或模仿者。为了变得杰出，人们必须划清界限，与既有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并截然不同。

在我们所处的公元前4世纪，既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最多可以说有自然科学思想的雏形，比如阿尔克迈翁、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然而通过观察、测量和实验来研究世界的可能性很低。以经验的方式探究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即物理学（Physik），还没有与形而上学（Metaphysik）区分开来。那时的物理学与今天所指的关于自然力的学说不同，指的是感官可感事物组成的世界，因此也包括身体。与此相反，形而上学研究的是那些恰好不能以感官探究的事物，它们位于物理学之后（meta）：【225】世界为什么存在，其原则和根据；能够将世界从最内在的层次统一起来的法则；灵魂、精神、理性和道德的超感官部分。对柏拉图来说，所有物理学都只是宏大的形而上学世界构建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即便“形而上学”这个词在柏拉图之后三百年才第一次被使用，但他仍被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之父。

如果被问及，亚里士多德是否类似他的老师柏拉图，或者他有没有反对他老师的学术观点，回答必然是：二者皆有！作为形而上学家，他不仅在认识论中而且在伦理学中展现了一些重要的差别，同时也展现了一些一致之处。相反，在物理学上，柏拉图没有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什么可继承的东西。柏拉图对自然的经验研究不感兴趣。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正如柏拉图的生平一样，我们所知的内容令人意外地非常之少。公元前384年，他出生于斯塔基拉（Stagira），这是爱奥尼亚人在哈尔基迪基（Chalkidiki）半岛建立的一座城市。那时柏拉图已经45岁，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建立已有三年时间。亚里士多

德的父亲尼各马可（Nikomachos）据说曾经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Amyntas III.）的御医，这是一位不太著名的地方诸侯。尼各马可去世得很早，亚里士多德由一位监护人培养。阿敏塔斯三世死后，宫廷中发生了肆无忌惮的权力之争。这时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去往雅典。公元前367年他进入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时，才17岁。他很早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著作，并自己演讲授课。

亚里士多德来到阿卡德米学园时，恰逢柏拉图在西西里岛。这位学生与他老师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尚有争议。就此有三句话被广为引用，即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n Ethik*）开头批评柏拉图善的理念时所说的那三句话：“尽管这种探究令我们为难，因为它要涉及亲密的朋友所提出的理论。【226】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这样选择，为了挽救真理而牺牲自身的感受，这似乎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作为哲学家的责任。因为，虽然两者都是我们所爱，但将真理视为更高的追求则是神圣的义务。”^[87]后来别人由此得出了那句激情洋溢的名言：“吾爱柏拉图，但更爱真理！”

尊重柏拉图，但并不是盲目的效仿，这显示了亚里士多德早已选择的那条独立道路的核心精神。在他看来，感官可感世界的真正根源并非位于空想的微光所笼罩的洞穴之外。与之相反，他要在洞穴本身之中寻找答案——借助对物、比例、关系的精确洞悉。如果柏拉图的宇宙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所有部分交错连接，那么亚里士多德承认，这些部分都有非常高的内在价值。

他关于这些不同的部分所撰写的著作，汇集到一起规模大得不可思议。他跟柏拉图不同，并非终其一生都在阿卡德米学园的庇护之下。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之后，38岁的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或许令他愤懑的是，不是他，而是柏拉图的侄子斯彪西波（Speusipp）成了学园的领导者。可能还因为，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带着他的军队入侵了希腊。雅典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马其顿最终占领这个城邦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平与马其顿密不可分的异邦人，亚里士多德会被看作可疑之人。

在这次变化无常的旅途的艰难条件下，对洞穴内壁的进一步洞悉却得以推进。首先我们在阿索斯与阿塔内斯（Atarneus）找到了亚里士多德，此地位于与莱斯博斯岛相对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这两个城邦处于赫尔米亚（Hermias）摄政统治之下，他是亚里士多德从前在阿卡德米学园的同学之一。【227】在一位有影响力的银行家的帮助下，赫尔米

亚从奴隶成为僭主。看来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一些朋友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很短。亚里士多德入赘了赫尔米亚家族，并与他的学生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 von Chalkedon）和提奥弗拉斯特一起辛勤地收集植物与（主要是）动物，目的是给它们确定名称并分类。

三年后，他生活在莱斯博斯岛上的米蒂利尼。他继续研究自然并不断辛勤地收集研究材料，与此同时，希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腓力二世（Philipp II.）的军队继续由北向南推进。他与波斯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再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条通往强国的道路了。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接受了国王的要求，教导他13岁的儿子亚历山大。这位哲学家搬到了马其顿的米耶萨（Mieza），在那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王储身上。而此后不久，有人看到他在德尔斐充当编年史作者和皮提亚比赛（Pythische Spiele）的故事记录者。这个音乐与体育的竞赛是当时除奥林匹克之外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其重要性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世界杯。那时马其顿获得了希腊世界的统治地位。公元前338年，底比斯和雅典的盟军在奇罗尼亚（Chaironeia）战役中被击溃时，前线形势最终明了了。希腊的诸城邦国现在分成了两部分；希腊是马其顿的统治区域。

三年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此时色诺克拉底是阿卡德米学园的领导者，这是一位老朋友，亚里士多德曾经在阿索斯与他一起。亚里士多德与学园保持距离，并在吕克昂（Lykeion）筹建了一所公共学校。那座名为“回廊”（*Peripatos*）的建筑将会很著名。流传着这样的传闻，据说亚里士多德在那里散步溜达进行哲思。

他在这里工作了12年，一边上课，【228】一边将他的大量笔记以一种百科全书的形式汇编到一起。他的教学论著就这样形成了。当常胜的波斯帝国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去世时，亚里士多德这个成果丰硕的时期也戛然而止。雅典人草木皆兵，亚里士多德因与马其顿有着亲密关系而受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获得的那些可疑的荣耀都是不正当的，就像以前的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由于渎神受到控告一样。亚里士多德逃亡到他母亲位于埃维尼亚岛上的哈尔基斯城中的一座房子里。一年以后，公元前322年，他去世了，享年62岁。

整个古代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哲学家能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写就如此之多的著作。他的写作量远远超过了柏拉图。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

件下，一个人如何能创作出规模如此宏大的著作。在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著作中，有大约四分之一被保存下来。此外，很不幸的是，所有对话录都失传了，这应当是他仿照柏拉图的模式而写的。这些对话录刻画了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而至少到罗马时代这些对话仍然广为人知。与之相反，那些讲课稿则很长一段时间下落不明，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才被重新发现。今天我们谈论亚里士多德时，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些“文稿”。而这些文本中不仅有大师的手稿，还有他的学生们，还有后来的研究者的文字。

这些文本讨论了当时所能想到的所有知识领域，从修辞学、逻辑学到诗学，乃至动物学和伦理学。与柏拉图几乎总是使用日常用语不同，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多不胜数的专业术语。此外，流传下来的作品的顺序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无法清晰识别。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总的来看有一条发展线索可以很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从“苏格拉底早期作品”、中期作品直到晚期作品，【229】这样一种发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几乎看不到。也许他是从许多细节问题开始，处理这些问题的统统都是不同的思想工具。由此他加强了经验科学研究，并最终越来越转向伦理学与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的秩序，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在探求。没有一位哲学家（也许黑格尔是例外）能够以类似方式厘清这个世界，并建立起这样一座自然哲学的概念大厦。这一成果具有如此宏伟的里程碑意义，新的区分、差别、概念和种属概念的数量如此之大，在这里只能粗略描绘一个轮廓。而这个轮廓已经难度极大，对外行读者来说并不容易。总之，睁开眼，别眨眼！

“存在”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在柏拉图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巨大球体，那么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世界则是一个带有许多抽屉格的药柜。药柜有三层，上面分别贴着带有如下字样的标签：理论的对象、实践的对象和诗学的对象（正在建立之中）。理论内容所在的第一层又进一步被分成三个抽屉——第一哲学、数学和自然研究，以及亚里士多德在这三者下新划分的学科领域。在实践内容所在的第二层，有伦理学、政治学和修辞学。处在第三层的是实用技艺，也就是手工业、诗学和医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应当通过以下途径理解世界，即我们要去

理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他将世界分为理论、实践与诗学三个部分，所遵循的是人类的三种入手方式，即遵循如下的样式和方式：我们如何经验、处理与塑造世界。然而与20世纪哲学的意义理论相反，

【230】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如何经验世界，其方式是被固定在世界本身的结构之中的。也就是说，如果人对世界的经验被谨慎仔细地检验过其正确性，那么这种经验与世界“本身”并没有差别。以正确的方式认识世界的人，必定可以认识正确的世界。就像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Ontologie*）同样丝毫没有怀疑，人类所认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客观世界。这个思想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对所有的自然科学而言已变得确定无疑。

与此相反，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两千年则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其基本观点认为，在人所认识到的内容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如果没有这个差别，那么哲学会一步步在科学之中彻底瓦解，就像一些自然科学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与此相对，自18世纪以来，哲学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一门元-学科，它反思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之可能性的前提。而自然科学家通常不太思考这些前提。

追问我们知识之前提的基础问题，其核心部分也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他最为著名的关于“存在”的著作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作品中，他研究了每一种认识的基础。我们谈论一个事物时，说它“是 / 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存在者如何作为存在者被获得？我们通过何种方式认识它？

亚里士多德很快发现，“是 / 存在”这个词有两种基本含义。某物要么是载体（*ousial/substantia*，存在 / 实体），要么是性质（*accidentia*，偶性）。第一个含义的例子就是如下命题：“这是一条狗。”第二个含义的例子：“这条狗是棕色的。”至于这些性质，人们又能在十种不同的含义中使用它们的“是 / 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在十种范畴（*Kategorien*）中。按照词源，范畴这个词意味着“指控”。【231】但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这个词（拼写完全相同）成了准确“命名”的辅助工具，并因此成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专业术语之一。范畴就是基本性质或存在特征。借助范畴，通过追问事物存在的十个方面，我就能更精确且更清晰地把握事物：追问事物的本质、数量、质量、与他者的关系、位置、时间、状态、它所从属之物、它主动所做之事，以及在它那里被动发生之事。然而这十个规定要素的划分并没有被一以贯之地坚持与使用。在其他作品中所谈到的则是三个、五个、六个或是八个范畴。

亚里士多德倾心于这种分类。如果说，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对话《泰阿泰德篇》中解释道，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惊异，那么现在亚里士多德就在他已揭示出来的存在大厦面前感到惊异。第一哲学无遮蔽地展现在他面前。凭借眼前这幅如此清晰的图景，人们终于可以从事存在学的研究——正好是在这一点上，柏拉图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并且这门第一哲学事实上被证明是长期、持久的。它延续了两千年。中世纪的学者将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视为对真理的纯粹揭示，将之与圣经并列，甚至有时将之置于超越圣经的地位上。

然而，人们如何认识到某物“存在”？首先我们借助感官感知它。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在感官感知中看到了认识最初与最低级的形式。如果记忆没有储存感知，不将感知与较早的经验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经验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动物的思维也与此类似。然而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不仅追问如何，也追问为何。人们可以通过反思更确切地阐释事物，并由此以科学的方式探究事物。他们可以自己创建普遍的观念与理论，并由此评判特殊的经验。【232】一言以蔽之：他们有能力哲思。最终作为回报，人们洞察了世界的根据与原则。

关于认识能力的等级关系中的很多内容使人想起柏拉图。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通过关注地球之外的理念而探究事物的本质。与之相反，他总是在世界自身之中寻找那种普遍之物，这种普遍之物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因此，他也并没有完全抛弃感官认识，而是认为它们有助于对很多事物的研究。

在探究事物的本质之前，首先必须详细确定思想的工具。我们如何以及沿着哪条路径接近真理？逻各斯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之前就已有悠久的传统。然而只要我们没有进一步阐明逻各斯的逻辑，它所起的作用就特别不明确。理性的思想如何运作？清晰性如何产生？一个命题什么时候是正确的，什么时候又是不正确的？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做出的成就是非凡的：他建立了逻辑学！他以明智而又广博的方式使之体系化，由此造就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区分了由一般到特殊而得出结论的演绎法与从特殊到一般而得出结论的归纳法。所有关于世界的有效假设，从那时起在逻辑上被视为前提。从这些前提中我们可以推导出结论，即推论。此外，人们还能按照命题的质（肯定的或否定的）和量（普遍的或特殊的）对命题进行区分。如果两个前提可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推论，那么一个逻辑推论就这样产生了。当我首先说“所有的狗都是动物”，接下来说“雷克斯是一条

狗”，那么从中就能推论出“雷克斯是动物”。

亚里士多德无疑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我们也能发现相似的推论，当然这些推论要“弱”得多，【233】且不那么严格。亚里士多德将这些日常哲学中的逻辑定义为辩证法（Dialektik）。与严格的逻辑学不同，辩证法检验陈述的有效性，因而十分适合作为哲学的训练科目。辩证的思维造就了说服力，但在此要找到严格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探讨真理的第三种形式是修辞学。逻辑的严格性在这里微不足道，尽管它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亚里士多德熟知他的先驱们在这个领域所写下的难以胜数的书籍。他知道，修辞学不仅可以作为真理的工具，同样能作为谎言与欺骗的工具。修辞学存在于演说者、演说和听众之间活生生的关系之中。按现代的说法，它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修辞学家能够直接对社会的政治与道德产生影响。因此这一点就很重要，即修辞学家应当将周围人的幸福视为责任，就像对待真理一样。修辞学家最重要的品性不是逻辑，也不是极强的说服力，而是素朴的可靠性。

自然的秩序

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人类的认识能力以及不同的认识路径进行分析与分层之后，以无偏见的视角来观察自然的路径就畅通无阻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阐释了考察自然的最好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人们应当首先确认现象，接着仔细研究各种困难之处，目的是为了最终获得可靠的观点，这些观点人们应当尽可能地加以论证。【88】

为了确认现象，亚里士多德汇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并一位接一位地检验其作者观点的可靠性。【234】柏拉图大多数时候只是将他的先驱们从供奉台上请下作为对话的伙伴，目的是以他们作为傀儡说出柏拉图自己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则系统地搜索每一条可信的来源，目的是证明或反驳先驱们。比如，我们关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所知的很多内容都要归功于这种筛选与检验。除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阿尔克迈翁、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当然还有柏拉图，那些非哲学家们也在此列，比如诗人赫西俄德、政治家梭伦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领域内的思考与创新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广

泛且无微不至，以至于想要在无损于其中单个部分的情况下概括性地呈现其全貌并不容易。此外，在包含这些内容的著作中，大多数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其产生时间。有一些著作的内容结构，比如《物理学》（*Physik*）的结构，也并非来源于大师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总体上呈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本质的复杂的观念世界，也无可避免地要掺杂一些他人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世界并不像柏拉图的世界那样精巧地浑然一体。柏拉图从所有自然现象中得出了最终可以被回溯到理念上的事物。由此才有了某个空间、某段时间、这个宇宙、某一次运动、某一个变化，以及所有其他自然与精神现象，因为它们每一个中都有理念。柏拉图为此付出了代价，即不得不如此处理时间、空间、运动等，好像这些都是感官上可被明确经验到的东西。但恰好是这一点与所有直接的经验相悖：没人能经验到时间与空间！这些以绝对的方式被断言的事物在我们的感知中只是相对的。我能看到宇宙在空间上的延伸，但我看不到某个空间。我的时间体验也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中详细探讨了连续性、无限性、空间与时间的问题。

【235】其核心是，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相对可经验和可描述的。

亚里士多德相信，时间（*chronos*）是无限且永恒的。柏拉图则正相反，他将时间看成造物主工作的成果。亚里士多德并不想求助于这样一种创世神话。对于有死的人而言，无限的时间当然无法被体验。取而代之，我们通过对时间的测量来经验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数学的数字世界，这个数字世界原则上是无穷的，且在测量时间时永远达不到尽头。这种测量与计算在人的头脑中发生，在那里所有时间经验，特别是测量行为，获得了某种主观色彩。万物以时间的方式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与柏拉图相比，这一思想非常新潮——当然没有新潮到这个程度，即仿佛亚里士多德能够由此推断出完全不存在纯粹客观的时间。很久之后的哲学家才会强调：不仅数学，还有由数学所构造的时间，都是人类观念世界的虚构之物——单凭这一看法，今天也可以使许多物理学家马上勃然大怒……

与之相似，空间（*topos*）也是相对的。它也只是主观的、相对可经验的。与时间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宇宙中只存在有限的空间而不存在感官可经验的无限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空间是一种无实体的有限性。无论宇宙能有多大，只要小小的地球位于它的中心，它就不是无限的。在这个宇宙整体中，神性—智慧的天体围绕

着一个中心火焰旋转——但这并不是太阳。这些天体并非由已知的元素所构成，而是由“第五元素”构成。这位经验主义者在这里陷入了幻想，其原因非常简单。亚里士多德不是天文学家。他写的几乎所有关于宇宙的内容，都来自其他人。

对时间和空间有效的结论，也必然对自然有效。【236】根本不存在自然，而只有自然物，比如石头或生物。也存在自然过程，比如树木的生长与风的吹拂。还存在自然力，它使这些过程成为可能。这之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然，所有加在一起同样也是自然。

认识自然之原因的入手方式同样不是浑然一体的。这个想法是新颖的，并且使旧有的较为质朴的解释世界的模式显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可以用四种不同的方式来提出关于某物之原因的问题。他以铜像作为例子。当我问，这个铜像存在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首先可以说：因为有质料，即青铜。没有青铜就没有铜像。因此这座铜像就有了一个质料因。其次，铜像也有一个形式，这是雕塑家构思方案的基础。这就是形式因。再次，铜像之所以能被制造出来，则是因为艺术家制作了它。艺术家们的工作就是动力因。最后，要做这项工作艺术家必须先有一个理由，例如，因为他想要制作一个装饰品或一个祭拜对象。铜像存在，是因为它能满足一个目的。这就是目的因。

当我想要知道自然是怎样的，我就必须考虑到，自然之中存在着不同的原因和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某物是怎样的，并非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很多原因。在人类创造的作品与自然的造物之间当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铜像比喻中有一个问题尚悬而未决，就是自然中的形式因从何而来。事物通过运动而形成，运动是个关键概念，亚里士多德为之费尽心思。

自然中的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它们产生、变化与消逝。当一只动物或一个行星运动时，它们在变换空间；身体在扩展或缩小。【237】某物变得干燥或湿润，变热或变冷。种子长成大树。实体、数量、质量、状态能够如此发生变化。因此，树之所以成为树，是由于它从种子发展而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种子是树之存在的“缺乏”状态；已长成的树才达到了它的目标，成为一个完满的构形。质料就是这样形塑自身，将万物从缺乏转化为构形，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但是运动根本上源自何处？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形而上学》第十二卷中给出了回答。按照他的说法，世界中的运动是通过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产生的，这是一种“纯粹精神”，它将世界进程置于运转中。这种推

动世界的精神比柏拉图的造物主要抽象得多，因为它唯一的行为就是推动进程。它不像犹太教的创世之神那样创造与完成（schafft und erschafft）。它没有目的与意图，也没有创世计划。倒不如说它是赋予灵魂的精神与物理力量之混合物，从其中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看到了世界的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两个极端都不可取。不可能存在作为人的神，因为人是有生命的身体，因此并非不朽或无限的。相反，纯粹物理学上的说明也没有用处，因为它并没有解释运动源自何处。“然而关于运动问题，它在事物之中从何处又是在哪里开始的，”他批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他们并没有对此殚精竭虑，而是将这一问题弃之不顾。”^[89]

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多少适用于解释运动的起源。但他还没有解释，自然物是根据何种特殊的智慧被塑造出来，并完美地运转的。这里我们要再想想铜像。铸像的目的，即目的因来源于它的雕塑家。雕塑家有塑造铜像的理由。【238】在人类世界中目的很容易找到，但在自然中就会有如下问题：究竟是谁这样怀着目的考虑一切？

如果让神来负责这件事，那么答案就很简单。当然这个神必须是一位极其复杂的（超）人，拥有最高的设计智慧与明确的目的。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件事处理得如此简单。因为他的“不动的推动者”丝毫没有考虑以下情形，即在介入自然秩序时顾及诸多细节。倒不如说它只专注于自身；这一精神，只将注意力投向自身，且从未离开过纯粹精神之物的领域。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中的万物都是合乎目的的。掌控自然的生成的不是偶然，而是为何目的？人类的门牙的目的是切断食物，臼齿的目的是磨碎食物。然而“合乎目的性”在这里还不意味着，生物为了活下来这个目的来装备自己。而是说，生物的目的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即有生命之物合乎自然的自我拓展。所以每个生物都是它自己的能量中心，其目的在于，保持自身的生命。

然而是谁如此聪明地想出了这一点？像在柏拉图那里统摄宇宙的巨大的整体理性，亚里士多德是拒绝的。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在目的因的世界中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相关。

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图景总是瞄准一个目标（目的论），就此而言每一个生物都是合乎目的地装备起来的。但是这个图景并没有一个整体目的论，没有一个整个自然图景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然而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意义，那么那种产生合目的性的机制，又是按照何种“非理性

的”规则运作的呢？这些问题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依旧悬而未决。

【239】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法国的自然研究者布丰（George-Louis Leclerc de Buffon）、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和圣伊莱尔（É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才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并在宗教解释以外寻找答案。他们的英国同行达尔文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几十年后说明了偶然事件的运作规则，这使得自然之非理智的方式变得更为显而易见。

宇宙、猴子、人类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整理。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什么呢？对背离柏拉图的学生来说是如下问题：存在着感官可感知且可探究的事物，比如欧洲仓鼠、蒲公英以及所有脊椎动物的两只眼睛；也存在抽象的观念与原则，例如动物、植物或数字2。人们应当如何设想这二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哪一个“更真实”：“人”还是汉斯·迈尔？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跟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对本质的指称“人”比汉斯·迈尔更根本。然而与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知道，虽然作为感性事物的汉斯·迈尔在世界中存在，但是“人”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任何先于或高于其他所有事物的存在领域，或者用哲学家的话来说，没有先天的（*a priori*）知识。因此也就不存在健康、美好与愚蠢本身，而只有健康的、美好的或愚蠢的人。普遍化、抽象之物以及对本质的指称虽然是可能的、有意义的、正确的且重要的，但是它们（与柏拉图的理念不同）不是实体！

整理自然，就意味着，借助某种根本不现场存在的东西去整理万物。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我们只能用语词来对万物进行分类。但亚里士多德确信，语词不仅仅是语词。【240】在他看来，世界之中存在着人、动物、美、差异等等，只是并非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他毫不怀疑，被正确使用的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写照。所以自然借助语词被划分为本质的与非本质的、较高的与较低的、普遍的与特殊的。

亚里士多德不能预料到遥远的将来，他将为中世纪基督教留下怎样的一笔遗产！他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他还将普遍指称例如“人类”或“动物”解释为人的概念，而非神的理念。尽管他仍相信“人类”是存在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思想的轰动性。普遍之物实际上是作为事物而存在，还是仅仅作为语词存在，这一问题将在后来成为中世纪学界极具争

议的大问题。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的信仰大厦皆依赖于此。

然而对于其理论中的这剂炸药，亚里士多德尚未察觉。对于他生活的世界，他的观点绝对没有像一千五百年后那么具有挑战意味。他只是想建立秩序，而不是使人不安。他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动物学著作，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在保存下来的文本中，大部分是对于有生命的自然的研究与分类（而且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已经遗失了）。我们今天谈论解剖学与生理学，谈论遗传理论或行为学时，仍然沿用着亚里士多德的部分概念。尽管“生物学”一词恰好并非来源于他，而是在18、19世纪之交，我们才在今天的“生命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它。但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毫无争议地是第一位，同时也是接下来两千年中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家。

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丰富的开拓性工作。然而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241】人们应当按照哪些标准区分动物，应当按照什么范畴来整理它们？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有血动物与无血动物，短期妊娠动物与长期妊娠动物，带有皮毛、羽毛、鳞片与甲壳的动物，冬眠与不冬眠的动物，短生育周期与长生育周期的动物，海洋、陆地与空中的动物，夜间动物与日间动物，拥有高度演化的新生幼崽与低度演化的新生幼崽的动物，独居动物与群居动物，向南迁徙的动物与不迁徙的动物。在这个未经整理的、拥有无数重叠与子集的、拥有各种包含或排他标准的世界中，现在什么才应被置于其他东西之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柏拉图的风格去提问的话，就是，什么才是比其他东西更为本质的？

他所做出的最高一级的区分，是有血液的动物与无血液的动物之间的区分。直至今日，这一区分仍将脊椎动物界与无脊椎动物界划分开来。第二层区分是从脊椎动物里区分出了卵生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与胎生动物（哺乳动物）。在无脊椎动物中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墨鱼、螃蟹、贝壳与昆虫之间的基本差异。与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相反，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重要的遗传规则。他的两位先驱都认为，新诞生的生物就是一个位于母亲子宫中完全被事先形塑好的其父母的副本。由此看来，万物（*pan*）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genesis*，创生的）。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受精鸡蛋的不同阶段并认识到，生物是按照一个纲要性的计划逐步被造就的（*epigenesis*，后生的）。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确立的东西，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人类是血液动物、胎生的，且从身体上看并非动物世界中的特例。

猴子看起来不是与人非常相似吗？因此在动物学中，人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如果一个人不是像柏拉图那样首先将目光投向理性灵魂，【242】而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动物学层面上观察人，那么他就必须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

人与猴子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对此，柏拉图沿用了赫拉克利特的两句话：“与人这个种属相比，最美的猴子都是丑陋的。”以及“与神相比，最智慧的人在智慧、美丽与所有其他方面表现得都像一只猴子”^[90]。但是柏拉图引用赫拉克利特并非出于动物学上的兴趣。这里顶多涉及了道德动物学，按照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看法，这种道德动物学将人类定位为宇宙中的混合物。一方面，低级的东西、某些类似于猴子的特征，通过人的外形与身体的欲望栖身于人之中。而另一方面，人可以凭借对逻各斯的分有，凭借他的理性灵魂，摆脱这些低级的东西，获得一点点神性。然而，在人之中猴子或神各占多少，这对柏拉图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其理性—道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不是神也不会成为神，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朝着神的方向奋发努力。我们并非生而为动物，但我们可能会向下沉沦为动物。一个堕落的“像猴子一样的”人将被惩罚在来世变成猴子，这个说法从隐喻中得出了一个阴森的现实。由此可以说，有一些猴子源自人。柏拉图并没有说有相反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猴子的看法没有什么道德意味。虽然他也认识到自然的梯级（*scala naturae*）能涵盖从植物经由动物与人直至恒星（！）。但是作为标准的不是道德的完满，而是实体意义上的完满。从这个角度出发，人就可以凭借以下标准与所有其他血液动物区分开来，即人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并因此拥有“在所有被造物中相较于其身高最大的脚”^[91]。

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类人猿。【243】到了17世纪，第一群猩猩才出现在欧洲科学家面前。但是他所熟悉的猴子与人非常相似，这一点被这位细致的观察者注意到：“有些动物处于人类与四足动物之间，例如猴子、长尾猴与狒狒……雌性的外阴与人类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而雄性的外阴则更类似于犬类的外阴。”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有些特别：猴子应当是一种“中间形式”，因为它“作为两足动物没有尾巴，作为四足动物没有髌部”。之前提到过的，来自埃及作为家养动物而闻名的长尾猴统统都有尾巴。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当时在地中海地区分布很广的没有尾巴的巴巴利猕猴被视为种属的范例。

随着“直立行走”这个特征被观察到，第一条重要的动物学标准就出

现了，按照这个标准，人类可以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与之相反，在灵魂层面，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与猴子之间很多显著的共同点：猴子也显露出多种多样的情绪，也悉心照料它们的幼崽。它们唯独不会笑，笑是一项人类独有的能力。当然理性同样是一项人类的宝藏，猴子不知道如何发掘出理性。其理由在这里仍然是人的直立行走。按照阿那克萨戈拉的说法，人之所以是最聪明的生物，是因为人类有双手，亚里士多德则将这个说法反了过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因为人是最聪明的生物，所以才有双手。通过直立行走而获得解放的双手，这适用于合目的性的标准。双手应当是“一种工具，自然如同一个聪慧的人那样，总是能将每一个事物分派给能够使用它的人”^[92]。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真理似乎位于二者中间的某处。我们直立行走与一种偶然形成的相互作用有关，而肯定不是由于一种理智的预先决定。

有死的灵魂，不朽的精神【244】

从事动物学研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从最细微处到最宏大处探究这个世界。什么是基本的生命原则？这些生命原则如何被组织成更高级的形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从最宏大处出发，从世界灵魂的诞生出发，人类则分有这个世界灵魂。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灵魂规定为一种从最细微处向更高等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灵魂的普遍的生命原则。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 (*psyché*) 问题作为一个物理学问题来处理。对今天的一些读者来说，这种处理方式颇为奇特。然而在“灵魂”这个主题下，亚里士多德并不像后来的基督徒那样，思考罪与救赎。他也不像17世纪的笛卡尔那样，想到了“意识”。他也远不是后来的浪漫主义者的做法，即将灵魂与主观性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概念属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灵魂就是被组织起来的身体的形式，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灵魂将生命带入物质之中，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毋庸置疑。问题仅仅在于，这个灵魂的本性是什么。它是像德谟克利特认为的那样由众多最微小的部分组成，还是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精神？它是感官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超感官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对我们人来说极为重要且建构了同一性的灵魂，是有死的还是不朽的？

如柏拉图所认为的，灵魂应当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一观点

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拒斥的。他在植物和动物中观察到的每一个生命过程，其基本形式都是身体性的。确实，植物与动物的整个有机体就是以这种合乎目的的样式和方式被规定为生命，这种样式和方式使这一生命得以可能并产生出来。一种来自外部的生命力、一种注入物质之中的精神，则是不必要的。【245】但亚里士多德也不太能从德谟克利特与另外几位唯物主义者让人鄙视的唯物主义那里开始。因为，灵魂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都是由元素构成的，这个观点长期以来都没有说明它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发生了什么作用。

因此，灵魂的秘密仍深藏于植物与动物的身体本身之中。它既不能仅仅通过身体也不能通过一种外在的精神附属物来解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毋宁说，生命的原则处在一种微妙的相互关系之中。在《论灵魂》（*Peri psychês*）这部著作中，他探究了身体与灵魂组成的这个不可分的统一体。他的基本概念是“质料”与“形式”。就像铜那样，雕塑家使用和加工它，然后才成为一尊铜像，通过这种方式雕塑家赋予铜一种形式，同样，生物的身体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获得了生命：它被赋予了形式。通过赋形的可能性与赋形的行动，生物才有了灵魂。但与雕塑家不同，雕塑家是从外部来面对铜这一质料的，而雕塑的原则就在所有有生命之物本身之中。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所有生命都具有的合目的性与目的的规定性。因此，灵魂既非位于身体之中，也非雕塑家，而是进行赋形与构形的（*Formung und Ausformung*）雕塑原则。

最重要之处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既不是事物，也不是附属物。不如说它是生命的原则，它将生命物与无生命之物区分开来。如果一个生物被赋予了生命，那么这个赋予生命的行为与塑造力就实现了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谈到了隐德来希（*Entelechie*），即“目标达成”。

因此生物不拥有灵魂，它们就是灵魂；因为没有灵魂它们就不是生物。但是要如何设想这个灵魂？所有的灵魂都一样吗，植物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一样？难道人的灵魂因此就无法与荨麻的灵魂区分开来？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发挥了作用。因为即便灵魂的原则在所有地方都一样，【246】但是人类灵魂却拥有与牛肝菌的灵魂不同的能力。在最低级的层次上，即植物灵魂的层次上，我们看到存活、生长与繁殖的能力。在高一级的动物灵魂的层次上，就出现了感知与欲求某物的能力。一个看到某物、听到某物或尝到某物的人，就会觉察到，是他看到了某物，听到了某物或尝到了某物。就这方面而言，动物灵魂不同

于植物灵魂，它拥有感知自我的基本能力。最高级的灵魂形式是人所独有的——人类灵魂。比起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所具有的能力，人类灵魂还多了分有精神（*nous*）与理性（*logos*）的能力。

与柏拉图的理性灵魂相反，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灵魂不仅是某种纯粹的精神之物，而且也是某种身体性之物。其原因在于，为了能够思考，我必须首先感知到那个我的想象与思想所指向的东西。没有感知，就没有表象世界，没有表象就没有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之所以具有理性能力，只是因为他拥有动物的身体。虽然理性本身是无身体的精神，但我们只有在与我们身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运用理性。

这门灵魂的动物学有着戏剧性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的精神没有身体就不能被实现，它也无法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因此我个人灵魂的重生，甚至不朽，乃是无法想象的。当我的感知系统消失，我的表象世界和我的思想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在身体与思想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个人灵魂是有死的。不朽的只有纯粹精神的原则，这一原则使我的理性思想成为可能。这并不特别令人欣慰。因为那个在我身体死亡之后不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的纯粹精神，没有任何生平记忆。我过去所认识的东西，纯粹精神几乎一无所知。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如果人类永远都是有死的，【247】那么后果就不仅影响了灵魂救赎，且毫无疑问也影响了行为。如果最终不能获得任何回报，那么我为什么要费心尽力去提升自己、变得正直、遵从道德上的善去生活？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再有像柏拉图所说的那个超越感官的、更高的终极目标，那么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典型的人的“欲求”应当指向何处？由此，一个在“道德隐德来希”意义上的伦理目标的实现，看起来就是不可能的。或者并非如此？

适合的道德【248】

道德动物学——德性——品性的统一性——幸福，以哲学的方式生活——在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之间——女人、奴隶与野蛮人——家庭经济与金融经济



道德动物学

教育出一位凭借穷兵黩武、挥霍无度、凶狠残忍、暴虐无道且杀人无数而从其同党中脱颖而出并被写入史书的王子，这对一位哲学家来说不能算是功绩。人们之所以能不计较亚里士多德曾兼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仍认为他理应是哲学史上或许最重要的伦理学家，是因为一系列永远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格外明智的洞见。

从道德角度观察世界的人会把世界分为他所尊崇（achtet）的和他所鄙夷（ächtet）的事物。这一区分有相应的规则吗？我能客观地认识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如果我可以认识好坏，【249】那么存在一条指导我将认识落实到生活中去的准则吗？从柏拉图开始，道德哲学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一切“正确的”人类行为都有一个目标：一种成功的、“幸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对道德上善的生活的追求承袭于他的老师。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就仅此而已了。当柏拉图作为形而上学家着手探讨伦理学问题，并在理念世界探索永恒和绝对的规范时，亚里士多德则更像一位行为研究者那般研究伦理学。人是如何行动的？为什么人们做出如此这般的行为？是什么推动着他们，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的幸福，又存在哪些危险的诱惑？为什么道德行为如此困难？为什么尽管所有人都追寻幸福

(*eudaimonía*)，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

一直以来，亚里士多德既是伦理学家，也是行为学家。如在动物学研究中那样，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研究中也首先是一位细致的观察者。遗憾的是，他作为人类学家仅仅较精确地考察了单一的种类：自由人！而奴隶和妇女被他刻画为有缺陷的生物。他们在他的一切伦理和政治考察中被边缘化。许多同时代人也有类似看法，但如我们在围绕柏拉图的讨论中所见，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在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严格从确切经验和精细观察出发来发展其哲学的人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女人和奴隶充满成见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令人失望的。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不算公民，而仅仅是一个不受待见、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因为这种身份，亚里士多德远比作为上层贵族的柏拉图对传统贵族伦理更具批判性。但他并不拒绝贵族伦理的核心：一种“光荣的”、有德性的以及沉思式的生活理想。【250】亚里士多德反感的是威权、等级制以及伴随柏拉图的道德上善的生活的理念而出现的绝对之物。亚里士多德并非要推倒旧贵族伦理，而是要将这种伦理“民主化”，扩大其适用范围，让每个公民都能过上这样的伦理生活，而不仅仅是哲学王或护卫者阶层。19世纪的市民阶层在流行时尚、精致礼俗和宅邸装潢中模仿贵族的举止仪态和品味格调，并让他们最高的政治代表在宫廷中居住，而亚里士多德则极力促成公元前4世纪的贵族道德“市民化”。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伦理学的论述。他的三部作品，《欧德谟伦理学》(*Eudemische Ethik*)、《大伦理学》(*Große Ethik*)与《尼各马可伦理学》详细讨论了如何追求正确的生活与共同生活的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远超他的其他伦理学著作，最为著名。它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伦理学的学术著作。而它的书名是谜一般的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此书是献给哪位尼各马可的，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和儿子都叫这个名字。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提出。亚里士多德想要指明，一个人为了过上完满的生活必须具备哪些能力和物质财富。这一目标不仅仅是获得关于善的理论知识。柏拉图认为，对善的准确认识足以完成善行的实践，而亚里士多德则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跟柏拉图不同，他由此总结出一个关于必要的和值得追求的灵魂财富与其他财富的完整目录，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人，这些财富是应该拥有的。

然而伦理学比动物学要困难棘手得多。尽管亚里士多德主张伦理学可以被科学地规定，但是，对善的生活的科学规定并非非黑即白，

【251】其中还有许多灰色调的细微渐变。在生活中，认识善是一件事，实践善的生活则是另一件事。除可精确规定的诸多常量以外，还会出现许多变量。伦理学是探讨规律外的例外情况之领域。这是令人信服的洞见。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比柏拉图“非人性”的伦理学更人性化——也就是说，更符合人类的本性。

行为研究者的“动物学”视角总归还是在伦理学中看到了一个所有人共同的目标。因为人类出于本性不仅仅生物性地追求着诸多目标。正如植物朝向阳光，人类也追求那些对生活有益的东西。人类是具有理性灵魂的生物，这一追求伴随着怎样才是特别有益的和能实现的这样的考虑。因此，在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成功，而更是幸福。因此，幸福生活（*eudaimonía*）是能够反思并最终改变其行为的生物之理性目标。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我们因此做出的许多行动决策，都是人具有的人类学基本特征之一。

人类天性向善。如果我们做好事，我们就过得好。凭借这个定义亚里士多德给人类设定了目标，而并没有让一种世界灵魂或人类世界之外的理念在此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是一种自然法伦理学。而并不依赖于超验的善之理念，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理性的生物。好的行动合乎一种更高形式的意图。它将人类的追求导向其目标。

不过到底什么是好的行为呢？对于柏拉图来说，如果行为的意图是好的，那么行为便是好的。行为以这种方式分有善的理念。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一种意向伦理学（*Gesinnungsethik*）。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252】只有行为的好的意图得以实现，它才是好的行为。也即是说，意图与其成功实现不能分离，二者必须同时被考虑到。出于好意的行为若是没有成功，那么其目标就没有实现，行为便也不是好的。比如我想勇敢，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因为太多的畏惧，我就是做不到。意志薄弱者、优柔寡断者以及失控者经常就这样失败了，尽管其意图是好的。

柏拉图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而后来的哲学家将对行为的评断进一步推至结果，且仅仅评价结果，也即行为的后果。据此，如果行为的后果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好的（后果主义）。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走那么远。正如对他而言，生命不能被割裂为行为与行为的实现，伦理行为也由意图与结果之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构成。谁实现了“行善”之目标，他便达成了善。正如实现了勇敢之目标的人是“勇敢”的，即使后来证明这种勇敢是不必要和鲁莽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是意向伦理学家，而非后果主义者；当然，他承认，我们的意志是薄弱的，而我们

的意图有时并不坚定。出于好意的行为因此往往难以成功。道德行为因而不仅仅如柏拉图所主张的那样以理性洞见为前提，而是同样以相应的稳定的品性（Charakter）为条件。那么我要如何获得稳定的品性呢？

德 性

我们行为的目的是幸福生活，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亚里士多德不考虑这一点，即一些人有意作恶。【253】这一想法在他形而上学式的生物学中也是不适合的，在他看来，所有人从本性上都是追求善的。人类究竟如何达到完满的生活，这种生活具体存在于何处，对此人们往往争论不休，“大众与思想家的答案是不同的”^[93]。在此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这种状况至今并没有改变多少。因为人们对思想和更高价值的需求显然是十分不同的。很多人将诸如性、有吸引力的伴侣、华衣美食、社会地位以及金钱等快乐的需求的充分满足视为完美生活，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完全赞同这一点。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好的品性是获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前提。当具备尽可能多的德性（*areté*）时，一个人才拥有好的品性。德性有助于我们过上以幸福为目标的生活。而什么是正当的德性呢？对于有些文化来说，比如人们可以想到的斯巴达或者第三帝国，对非我族类和其心必异者的强硬与残酷曾是重要的德性。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也认可这种德性。相反，许多文化则恰恰认为仁慈和宽容才是重要的德性。所有人生来应该追求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对于这些文化而言是无价值的，并不与某种德性相关。

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他而言，在什么是善以及哪些德性属于善这个问题中，不存在自由选择。尽管善不存在于宇宙空间之内，而是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好的行为中，他依然相信一种对所有人同等有效的普遍预设。正如关于正当手段的论题，关于一个成功的人生是致力于善的，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样无须讨论。我们有向善的自然倾向。【254】并且我们必须通过促进我们的德性来培养这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关于德性的清单不是他发明出来，而是他发现出来的。缺少某些德性的人，绝对无法达成更高的生活目标。

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因此意味着一项持续致力于自身的工作，意味着对一个道德总体艺术品的塑造。最终，一个人有德性地行动，是因为他纯然是有德性的。他的品性德性，诸如勇敢、谨慎、慷慨、大度，和

他的理智德性，诸如机敏、智慧、正义，得以充分发展并且彼此协调一致。他的理性判断力经过知识与经验的磨炼而变得敏锐，如此他便能实现善与公正的行为。人们了解生活，也了解自己。在这种充足经验的基础上，就能过上一种正确的伦理生活。

人尽管不是天生就具有德性，但却可以通过学习、思虑、练习和自我修养而成为有德性的人。伦理上的（自我）教育便是长期的判断力训练。人不是为了做出有用的正确决定而变得格外聪明和机智。而是，人们更应该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同时伴随着日益渐增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生活给人自己与世界带来快乐。至高的目标不是快乐本身。快乐仅仅是一种行为的心理回报，这种行为出于善本身（德性）而追求善（目的）。

至此，一切都是可理解的。然而，我需要哪些德性以及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德性又应该彼此处于何种比例关系？怎么评价这种理想的混合比例？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给出了为什么他不能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255】因为不能在人类之外的领域对善的理念和德性予以实在的把握，我们最终也不能对其进行整理与等级划分。德性“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仅仅存在于有德性地生活着的人之中。因此，也不能对其进行完备的描述。

德性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总是可变的。这意味着人的慷慨、谨慎、勇敢都是可多可少的。善的理念对柏拉图来说就如凌驾于一切星辰之上的太阳或北极星，在他看到唯一的善之理念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看到的则是善之多元性。人们勇敢的时候，人们为善；人们智慧的时候，人们为善。尽管二者皆“善”，但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善也会完全陷入互相冲突之中。在某些场合，当勇敢无用且仅仅是无谓的自我牺牲时，不勇敢倒更是明智之举。慷慨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太过于慷慨则使人成为轻率挥霍之徒。在这里，有限度地帮助他人，同样更明智些。慷慨从何处起是错误的，界限在哪里，这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定夺。

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基本上好的事物，偶尔也会是错误的，或者招致令人不悦的后果。理论上一直认定为“好”的东西，最终在实践中却也总得视情况而定。讲真话在理论上固然是对的。然而在生活中总有诸多情形，例如为了在不公正和危险面前保护心爱之人，说谎才是可取的。人们当然不应该杀人，但在自卫和战争的情况下为了救人则可以例外。

亚里士多德不仅了解价值与规范，而且知晓人性的和太人性的状况及弱点。【256】因而伦理学一方面告知人们什么是“正确的”，另一方

面也在什么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上给出提示。在此，价值和规范要比道德机巧更为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始终尽其所能、精明机巧地回避困难，他的生活肯定是不正确的。一种道德上好的生活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毫无疑问不是投机取巧，而在于意欲去践行一种道德上好的生活。

因此对德性而言，重要的在于恰当的尺度。因为高贵的与不那么高贵的品格特性仅仅是相对的存在。慷慨位于吝啬与挥霍这些恶习之间的中道（*mesotes*）。勇敢存在于鲁莽和怯懦之间的某处。德性不是极端，而是中间值。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必须在生活中不断历练道德判断力，并试图在生活中变得明智。

生活智慧（实践智慧，*phronêsis*）是所有德性中最重要的。因为我何时以及如何践行德性，最终必须由它来定夺。亚里士多德并未发明实践智慧这个概念。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就已经指出，没有实践智慧的话，勇敢、正义和审慎将不能得以适当地运用。柏拉图在旧有的贵族伦理中已经发现了这个概念。当一个贵族人士了解自己以及他在生活中应当得到的财富与尊重时，他便拥有了实践智慧。以这种自信的方式成为自我确信之人，是值得称赞的品性。

为了心理上的自我确信与自我肯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排除了物质上的自信，或者说，对社会地位的注重。拥有实践智慧意味着，自信且明智地掌控生活。这种生活智慧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就连为食物或冬眠操心的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具有前瞻性，并因此是具有实践智慧的。【257】另一方面，他不把智慧看成一种人的本能，而是当作通过经验与知识的积累而逐渐成熟的理智德性，当作我在生活中并为了生活而培养的一种习性（*habitus*）。拥有实践智慧之人管理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的愿望，反思自己的判断，继而在任何个别情况下，着眼于全局与整体上尽可能好的生活而做出决断。

生活智慧首先要面临两个不同的挑战。人的幸福由这个问题决定：我能否在与他人的共处中实现幸福。我的社会生活幸福吗？另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本身是否幸福。因为很有可能一个人尽管很有名望且受欢迎，自己却是不幸福的。在这里，只有笼统的建议和明智的原则还不够。

品性的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从心理学上进行细致的区

分，而不像其他伦理学家那样划出不可动摇的界限。善与恶不是绝对的事物。它们也不像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罗斯的戏剧中那样，是神的作品。命运既不受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摆布，也不在远方闪耀光芒的理念之阴影中如幽灵般出没。人肩负一切责任！除了人所作的善，没有什么是善！亚里士多德以这些洞见掀起了伦理学的革命。不是知识本身造就高贵和善好，而是知识与品性历练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它们。单靠求知不能塑造人性！知识获得若无心灵修养则空，心灵修养若无知识获得则盲。这个强命题将在之后的哲学家中引发激烈的争论。虽然后来者中不会有人像柏拉图那样认定有识之士自然会为善。【258】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即无知者与未受教育者因为缺乏为善的洞见而不可能是善的，最晚从康德开始就倍受争议。

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好的生活是理智引导的生活。并且，伦理行为是建立在明智思量基础上的明智行为。这种思量通过把控我们的意志、情绪、冲动反应、敏感度、情愫、愿望与期待，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性。倘若这种修养是成功的，那么易变且脆弱的品性就变成一种沉稳的品性，变成一种“拥有”德性而不只是简单运用德性的品性，这就是德性的内化。

根据这种观点，每个人都有一种品性。当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个概念时，之前它已经有一段历史了。品性（*charactér*）一词的原本含义是本性或特性，一个人根据其本性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们在公元前6和前5世纪开始铸币并以特定的品性规定钱币时，这个概念就以普遍的方式确立了下来。正如来源、材质和价值规定了一枚钱币的特性，人的品性也是被规定的。不管你信不信，古希腊人由此意识到：一枚钱币有两面，一种特性也有两面。但在亚里士多德的造词中，无论如何都只有唯一的品性，而不是多重品性。

品性的统一性与诸多德性的统一性，是德性伦理学最重要的信条之一。正如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式的人类图景中发现这种统一性，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式人类图景中我们也能发现它。尽管德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在一种德性之内是不存在冲突的。人们或者有一种德性，或者就没有。然而，这种统一性和严格性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很成问题的信念。【259】因为亚里士多德之后两千年，人们会问：“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¹⁾

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在实际生存和行动着的人中并没有找到稳定的德性。一名士兵可以在战争中格外勇敢，但在与妻子相处时却十分

懦弱。谨慎之人陷入不寻常的极端情况时，可能会完全失去控制。哪位信念坚定的道德学家在战俘营中会依旧如此坚定？相反，又有多少英雄事迹的主人公在事情发生时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德性，而仅仅就是做了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

持续习得的并被深刻反思和内化的德性，不仅十分难以获得，甚至几乎已经是非人性的了。拥有不可动摇之德性的人会被我们视为特例，抑或圣人。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他当作追求某个特定目标的平常的理性个体。甚至我们可能已经失掉了这种理想，即想要成为全然有德性的成熟之士。往往只有当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陷入冲突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强大的学习经验。问题、挑战和失败是我们终生学习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陪伴者。道德挑战的不可测度性也会一直蜿蜒环绕我们的人生。它并不会被成熟和智慧，而往往只会被执拗和天真掰直。人生的河流并不是笔直的运河。

在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想是不现实的。如果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他教育儿子尼各马可的良苦用心，那么我们就必须更确切地交代当时的社会状况，【260】亚里士多德是在这一社会状况中构建了他的德性伦理学。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自然也具备与今天的西方社会相去不远的复杂性。但是人们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状态下生活，这样的选择显然要少很多。出生于一个特定阶层的人，如农民的儿子、手工业者的女儿、商人的儿子或贵族子弟，一生都会固守在这一阶层，这与19世纪的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不同，甚或在许多方面也令人不无唏嘘地与我们的当下别无二致。生活在特定阶层的人会被这一阶层的秉性深深熏染。人们看待地产、金钱、信仰、婚姻和家庭的方式，通常已被事先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不仅仅阶层能塑造人，而且人也能塑造自身的观点，就显得是完全进步的主张。从外在的阶层气质变成了自身的品性气质。当亚里士多德认为，自身的品性气质比环境对于我们行为的影响力更大时，这种认识就显得可以理解了。

为了摆脱面对诸神的无力感和阶级等级的束缚，亚里士多德提出责任自负的原则（至少对于所有男性自由人）。要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必须在其品性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兴趣和目的。这一要求已然很重要，因为亚里士多德将其从个人推广到整个城邦。他认为，政治整体所追求的与个人所追求的是一样的。柏拉图在理想国和马格尼西亚中所期许的灵魂平静与城邦和谐之统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呼

应。因为个体的德性之间越是相互协调，城邦便也越和谐稳定。

自信自足的公民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城邦来说不应该是累赘，【261】这种想法本不足为奇——尽管现代国家更可能本末颠倒，不想对每个个体的幸福负责。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即让所有巨大的冲突和分歧在一个理想的城邦中完全得以避免，显得有些过时了。冲突与分歧应该在一种温和的协调中被消解掉。因为正如失败的人生只能归咎于德性上的失误，进而归于严重的品性缺陷，那么在城邦共同体中出现纷争，也只是因为某些人作奸犯科。一种“天然的”贫与富、强与弱、公正与不公、特权阶级与被压榨者的对立是不被接受的……

幸福，以哲学的方式生活

从这位自然研究者的动物学视角来看，人是一种构建共同体的群居动物，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physei politikon zôon*）。没有他人，人无法生活。社交是人固有的本性。当今，社会生活有很多可能的形式，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却只有一种，这种形式是如此合理，以至于人之复杂情感本性和理性本性在其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令人惊奇的是，他认为这种形式就是城邦，即古希腊的Polis。人的生活总是朝向完满，朝向幸福前进，人的群居本性则指向一种城邦生活。在这个城邦中，群居本性实现了它自然的目标：“城邦的诞生源自人的本性……因为城邦正是共同体的目标……”^[94]

城邦是理想的生活空间，是人（尤其是男性自由人）的首选聚居地。【262】在这里，人可以发展他理想的生活方式，即道德—政治的和更为完满的理论性生活。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巅峰就是成为自由的哲学家。哲学家可以不为诸多事物所累，独立自足地塑造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可以自由拓展知识、实践正义的人，作为一个与所有人友好共处的人。这种理论意义上的生活理想影响极其深远。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它塑造了学术和学者的自我认知。

最晚在拉斐尔的《雅典学园》问世之后，我们更愿意设想，大部分古希腊人——或者至少是雅典人，事实上都曾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沉思的、思考着的，以及闲适自在的。然而那些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用于追求智慧的人，很大程度上兴许并没有像我们认识的那么卓尔不凡。我们只需想想那个被阿里斯托芬描绘成一个无用的、胡说八道的灾星的苏格拉底是何种形象。像柏拉图这样出身雅典贵族的人，之所以或许看起来

与苏格拉底不同，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思考。亚里士多德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他将一个他不能参与选举的城邦理想化。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知道他是如何解决生计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生活视为对所有人而言最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无论如何是不怎么靠谱的，就像人们今天看待一个没有职位、财产或收入的饥肠辘辘的哲学家。

尽管如此，这种生活理想仍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这种理论式生活的理想中，亚里士多德在闲暇中仍能继续推广旧式贵族伦理。哲学家生活之优渥源于贵族生活之优渥。哲学家几乎成了古代贵族在精神层面上的追随者，这基于一种将好奇心、【263】不断学习和求知欲刻画为人之本性中最重要的特征的动物学。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只有哲学家能够正确地生活，所有其他人可惜只能偶尔为之。

做哲学家是最大的幸事，因为只有他有机会全方位品性卓越地生活，通达最高的人生幸福。在这一点上，人仅次于诸神。成就品性的卓越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得以明确的目标，是对贵族伦理的推进。而哲学家不用像荷马笔下的英雄那样无比强壮和勇敢，也不用在体育或者战争中创造辉煌成就。

“卓越”的概念适用于理论生活并被道德化了。而亚里士多德只保留了卓越的某些外在层面。如果人们在生活中不仅历练品性，还能积累财富，那就非常好了。正如我们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开头所了解到的，金钱以让人不负债的方式给人自由。那么，人们在没有钱的时候，应该如何发扬慷慨的德性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如是说：“然而那些外在的善……也属于幸福。因为，如果人们无法支配那些必要的辅助手段，就不可能，至少很难通过高贵的行为而引人注目。很多事情都需要借助于朋友、金钱和政治权力才能实现，这些东西在此发挥了类似于工具的作用。”^[95]

高贵卓越的品性的另一个外在层面则是美，这一层面也同属于公民世界。因为在古希腊时期，美不像今天可以被人工制造或者装饰出来，而只能靠运气：“还有些东西，如高贵出身、可爱的子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就会黯淡无光。一个身材丑陋……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96]高贵的出身和拥有子女对于卓越生活而言不是坏事。所以，一个出身高贵、仪表堂堂、家产丰厚、【264】子孙满堂的哲学家拥有最好的生活……

与柏拉图深奥的贵族伦理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谈的是一种实

用主义的贵族精神。亚里士多德将贵族精神从绝对的国家领域转化为明智的内在世界。人们在自由世界中应该贵族式地感受和行动。柏拉图将贵族精神限制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一种国家思想专制中。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更为自由主义，并且如我们接下来将了解到的，也更多元主义。他不将国家秩序，而是将具有足够条件的公民贵族化，只要这个公民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德性。这样的一种信念不仅对伦理生活，也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影响。亚里士多德拒绝柏拉图式的城邦共产主义。

自由和有德性的公民必须友好相处，只有这样，城邦才会成就幸福生活而不被国家思想专制拖累。德性的协调统一在有德之士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得到呼应。显然德性不源自一个虚无的空间或者灵魂自身，而是产生于共同体。人们越有德性，这个共同体就越卓越，反之亦然。城邦和公民应该以这种方式相互成就。在此，亚里士多德根据对人性的根本理解做出如是预设，即所有有德之士都欲求同样的善。并且人们在友好的沟通交流中一起认识和实践这种善。

政治于是成了以德为友的人们所构建的工程。在足球中屡试不爽的制胜法门——你们应该是十一个朋友！这应当被当作城邦的基石。个人兴趣要服务于共同友谊的理想，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看起来是陌生的。因为它与当代的个人主义相冲突。【265】我通过择友所达成的，恰恰不是普遍的共同体，因为我正是通过友谊把对我重要的人和对我不那么重要的人区分开来。友谊因而看起来是私人的东西，恰恰不是共同体之前提。我们看重的是对朋友的忠诚，而不是对好人的忠诚。（甚至在我们乐意支持“善”并欲求“善”的时候。）善究竟应该为何物，在这一问题上，今天的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去不远。或许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我们的道德世界并没有被一以贯之地构建和设计。相应的，我们倾向于对许多事物听之任之，而不去仔细检验。现代社会包容的多，规定的少。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团体的道德统一性跟品性的道德统一性同样陌生。此外，我们的生活世界要比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复杂得多。因为时间和精力缺乏，我们不能总是对我们的周遭世界进行相应的检验。我们也应当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利益统一体本身在公元前4世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那时候的雅典大街跟今天不同，那时的现实更是令人生厌的。载入史册的不仅仅是作为集体功绩的城邦政治，同时还有争斗与卑劣。

正如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之雅典的自由公民最多只

有数万人。外邦人、妇女和奴隶在政治上并没有被一并算作友爱的对象。在公民中建构且应该建构互助团体是一个现实的想法。然而，要将这些互助团体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博大的友谊之网，却是个幻觉。但这个幻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非常重要。【266】在他眼中，友谊才是城邦正义的保障。人们之间越是友善相处，城邦就越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尼各马可伦理学》宣称：友谊的建立是正义的表现。

友谊之联盟大概总要比对正义的爱更加稳定。与法律裁决相比，友谊确实将社会从最内在的层面上更为牢固地联结起来。尽管我们现在有理由认为友谊对于正义社会的价值并不那么大。因为友谊替代正义之处是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盛行之地。相反，在立法者和法官完全不考虑敌友关系，而是在法律面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也即在价值中立的地方，我们才能看到正义的实现。

因为亚里士多德如此高估了友谊在城邦中的作用，所以他相信，少量的规则便足以应付城邦的管理。面对偷窃、劫掠、身体伤害、杀人以及诽谤等罪行，人们只得到最基本的法律保护。法律与道德在此还没有真正区分开来。对法律的起草和运用不被归为法学，而是伦理学。有德之士会依法行事并能够公正地运用法律。因此，城邦的公职人员必须都是有德之士——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是难以攀登的高峰……

在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之间

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城邦作为政治动物之最适合的聚居地，让男性自由公民过上闲暇和沉思的生活成为可能。并且城邦也为这种生活打造了正义的友爱氛围。而哪种政体是适合的呢？亚里士多德试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267】然而二者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政体是君主制。这种制度让事情以最简单的方式得到协调规划。如同父亲照料他的孩子，统治者也照料其子民。但是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这种政体为无法控制的不当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君主太容易变成僭主，后者服务自己而非公共福祉，成为奴役自己孩子的父亲。

从德性的视角来看，仅次于最佳政体的是贵族制。亚里士多德非常推崇过去的贵族伦理，一直以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且显而易见的。他坚信在贵族伦理中，贵族与德性是直接统一在一起的。正如男人生来就

天经地义地统治着女人，贵族也如此统治着下等人。但是贵族制同样为不当行为提供了一些机会。因为在现实世界中，鲜有高尚的贵族获得实权进行统治。相反的是，某些特权人士总是臭味相投，很快建立寡头政治以服务其利益。这幅不光彩的图景就如同一个继承了万贯家财的贵族女儿凭借对财富的自信反抗男人的权力。

从德性的视角来看，再次之的政体是以梭伦时代为典范的金权政治。在这种政体中，公民根据收入的高低获得相应的选举权。亚里士多德将金权政治的规则比喻为兄与弟的友谊。德性视角下的最差政体是民主制，在这个政体中，每个自由公民都获得同样的投票权。民主制尤其不是有德性的政体。因为民主制中缺少“一家之主”，而每个人都能做并且肆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在所有政体中，民主制最能防止不当行为，这一点毫无争议。这让民主制成为“最不坏”的政体——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1947年11月11日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演讲中说过一句不无戏谑的话：“如果忽略掉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全部尝试过的其他政体，【268】那么民主制就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这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政体问题之阐述的一种出色总结。

事物的本质总是悖论。一种政体越是具有较少的德性，它运作起来就越是可靠。在以德性为基础来建构政治学的哲学家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论。因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这一课题也做了很多更为细致的思考。他想要通过将民主政治与他的德性理想协调一致来缓解民主政治带来的困扰。结果是一种混合政体方案。亚里士多德想要促成虽受万千宠爱但却易遭破坏的贵族制和虽不受待见但却更为坚固的民主制之间的和解。

这种混合政体方案在细节上看起来应该是何种样貌，我们却不得而知。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之四种不同的形式区分开来，在这些形式中他最不赞同彻底的民主制，即那种让每个自由民都获得平等的权利，并且在政治公职人员的竞选中获得均等机会的民主制。因为在蛊惑人心之徒的煽动下，这种民主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流氓暴政：“因为不为法律限制，彻底自治的民众寻求自主统治。然而，当谄媚者统领大众，这种彻底的民主将变成暴政。”^[97]

亚里士多德把最好的解决方案称为政治（*politie*），一种由理性之士所领导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主张每个自由民都应参与城邦政务，但他认为只有政治精英才可以成为高层领导者。因为普通民众缺少闲暇时

间去处理高度复杂的政治任务。【269】这样的理念毫无疑问是贵族或寡头政治式的。每个公民都可以选举，但是只有德高望重者和不愁生计之人才可以领导国家。

并非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想法都一清二楚。一方面，他谈到了民主政体中的民间智库以及民众日益积累的智慧和德性。另一方面，他却又拒绝民主统治这一形式，并倾向寡头精英的统治。他褒扬了城邦中的中间阶层，并希望这一沟通上层和底层阶级的中间阶层可以维系和扩大。但同时他却不希望中间阶层获得权力。有时他会称赞那些像梭伦那样的历史英雄，梭伦据说出身中间阶层。有时他又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从根本上来讲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统治城邦。此时，他早已偏离了在动物学基础上构建政治伦理学的哲学理想，而更像通过考量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经验进行论证的社会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在整体上有多少问题和矛盾，在细节上就有多少明智而富有指导性的洞见。他主张政治必须对公共福祉负责并以此衡量自身。公共福祉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但却比奠基了柏拉图两个理想城邦的善之理念要具体得多。亚里士多德也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了政治学。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培养和践行德性，所以政治的任务就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在此区分了两种自由：从事政治的自由与在国家事务上顺其自然的自由。这是政治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区分之一。康德将会详细地回溯这一区分。【270】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20世纪将这种区分概念性地把握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两个关键概念。

女人、奴隶与野蛮人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规划并非既定的蓝图。与柏拉图相反，在他眼中，政治中不存在技艺（*techné*），不存在人的计划或塑造，而只有体验着的实践。政治是从政者的生活，正如生活是生活者所做的事。政治生活是多面的，它的充实需要自由空间。这乍一听简直太过现代，简直不可能，但它确实就是这样。

尽管亚里士多德值得我们的尊崇，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问题。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有德性的公民不劳动。“劳动”的概念从来不出现在他的世界中，出现的只有手工业者的“制作”（*poiesis*）。“才干”（*Tüchtigkeit*）概念在我们的时代与“劳动”概念

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那些不劳动的人才可以有才干。因为劳动与培养德性并不般配。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必须劳动则意味着，被排除在德性范畴之外。因此，在女人和奴隶那里谈不上德性。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女人和奴隶被排除在德性世界之外，亚里士多德并不把这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也即闲暇者的不公正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是的，他从根本上否认奴隶和女人有获得德性的能力。因此他们只属于劳动世界，而没有能力上升到更高层的社会。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总是如此为他辩护，【271】即亚里士多德受到他身处时代的限制。但是这种辩护并不总是恰当的。平等对待奴隶和女人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存在很久了，尽管这种思想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此外，亚里士多德是许多领域的开拓者，那么将他的保守归咎于理智上的欠缺是说不过去的。看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远远低于其正常水准的。这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甚至冒险进行循环论证：因为奴隶和女人不具有德性，所以他们负责底层的工作。既然他们从事底层的工作，人们便认为，他们不具有德性。

所有认为女人先天在理性上有欠缺，奴隶则完全无理性的观点，是直接来自他们的社会角色推出的结论。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女人和奴隶无足轻重，由此人们认为，他们并不适合政治：“奴隶根本不具有筹划能力，女人虽然有这种能力，但却没有决断力……”^[98]

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女人和奴隶是认知上有欠缺的存在者。因而他们仅仅将低等灵魂肉身化。他们有感受和欲求，但他们的行为却没有理性和逻辑。逻各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是诸神和古希腊男人的私有财产，女人和奴隶要么不具有逻各斯，要么只具有极不成熟的逻各斯。正如在柏拉图那里自由男性必须协调其灵魂中低等的“女人般的”力量以便培养德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由男性对女人的统治也是天经地义的。

男人的自我统治使他们对女人的统治合法化。这种观点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不仅是陌生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那些不能成功协调其灵魂中低等力量的男人们该怎么办？他们似乎必须降格到女人的层次并因此失去其权利。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在理智和德性上超过女人。【272】所以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原则性的而是程度上的？所以人们不能全然区分“男人的”和“女人的”权利？从逻辑的视角出发，经验上局部的适用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普遍原则上的适用。在这一点上，这位逻辑学家因为从男性化的、太过男性化的理由出发而失去了推理的正确

性。

亚里士多德不仅证明女人和奴隶的本性不可变，他还从中推导出政治结论。作为逻辑学家的他其实非常清楚，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能毫无漏洞地从人的本性中推演出来。对政治事务的演绎是不存在的。政治学不是科学，而是从经验以及令人遗憾的偏见中获得的洞见。

亚里士多德的功劳在于将自由概念深深地植入政治思考中，他的这一功劳与认为人们在原则上不平等的偏见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少数人在城邦里是政治上自由的，大多数人则是不自由的。这一偏见的阴影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自由”的政治概念，并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与后者如影随形。甚至我们今天的政治思考往往也不能无偏见地处理“自由”概念。20世纪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打着“自由”旗号的政治罪行，人们只需想想越南战争。自由的社会似乎具有不受限制的许可，让人们自己觉得比不自由的社会更好，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文化中没怎么被深究的感觉。

自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不是民主政治的概念，而是一种统治关系的特权象征。自由世界是特权人士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与其余阶层严格划界。妇女和奴隶在古希腊家庭的私人世界中劳动，这是一个不自由的世界。【273】此外，雅典的妇女只被允许在公共场合以头纱罩发的面目示人。她们并不是自由的主体，而是男人的财产，没有头纱是“不体面的”。几百年后，这种强制遮头之风由希腊和罗马帝国传播到阿拉伯文化圈。虽然人们在古老的东方世界里也能找到遮头的证据，尤其在《旧约》中。但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女性大多是不遮头的。在阿拉伯世界，妇女的强制性遮头始自8世纪由倭马亚（Umayyad）家族建立的哈里发帝国，这次不仅仅是遮头，连面部也要遮住。

妇女的遮面如同“自由”一样是希腊式的。柏拉图将那些据说像男人一样赤身裸体做运动并且作为女战士守卫城邦的女人，安排到理想国去做女性护卫者，而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没有人天生是奴隶，这一思想似乎是亚里士多德难以接受的。许多古希腊人曾固执地认为，男人在本性上就比女人优越。然而，奴隶的本性是什么？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因为战争或者厄运而成为奴隶吗？是什么让亚里士多德如此确信男性奴隶没有理性？

奴隶没有理性这一点是不容易论证的。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奴隶像非希腊的外邦人和野蛮人一样，没有城邦。谁没有城邦，就

表明他仅仅部分地而不能完全作为政治动物发挥其作用。他没参与建构现实的共同体。这当然是残缺理性的特征！现在人们可以问，作为主人财产的奴隶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参与建构一个城邦？谁又能断定野蛮人不曾建立起与古希腊城邦一样的邦国？但是亚里士多德远没有这种历史视角。他宁愿将女人、奴隶和野蛮人看作特定的动物种类，他从他们的行为出发来推导其本性。

与以这种奇特的、非历史的眼光考察人类相应的，【274】是以同样非历史的视角考察城邦。亚里士多德显然并不想知道，即使具有高度理性的希腊人也会在某个时候无法生活在他所熟悉那种城邦中。他同样视而不见的是，他在哲学创作的巅峰期已然经历的这一事件，即腓力二世征服了独立的雅典城邦并将其并入马其顿帝国！因为他父亲和他太子老师的身份，亚里士多德与这些野蛮人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而他们通过剥夺其自由摧毁了被亚里士多德永恒美化了的家园。历史的维度是如此惊心动魄——尽管不是城邦形成的维度，而是其消逝的维度……

家庭经济与金融经济

古希腊的自由男性对妇女、奴隶与野蛮人的统治合法性在哲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为人的不平等进行辩解。如果对于女性和奴隶的压迫没有让像亚里士多德这般伟大的人物遭受名誉上的损失，那么直至19世纪那些相对渺小的人物在这一点上也就没什么好羞愧的了。

亚里士多德为私有财产所做的辩护，在影响力上与他对人的不平等的论证不相上下。与柏拉图不同，他不仅不赞成妇女在权利上的平等，而且也不赞同让年幼的孩子与父母分离，以及共产主义式的共同财产理念。在此，他的论点绝不是哲学的，而是冷静清醒而实用主义的。父母宁愿将他们的亲生孩子托付给他人，这在生物学的视角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并且也无法为国家所接受。【275】倘若如柏拉图建议的那样，财产为所有人所共有，那么最终就没有人会自觉为这些财产负责。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早已正确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缺陷。

“主要有两样东西唤起人们的关心与爱：自己的东西以及对它们的保护。”^[99]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经明确了财产使人幸福的观点，他说：“以与他的财产相称的方式建造他的宅邸（因为一幢建筑也是一件装饰物），首先把钱花在恒久存在的事物上（因为这些东西是

最美的），并且在所有情形下都注意要适度，这些都属于了不起的事。”^[100]尽管挥霍与骄恣是为人所指摘的缺陷，但是适当的财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绝对有助于开展有德性的生活。此外，追求物质财富的愿望有利于总体的国民经济。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一个段落给出了相关解释，这一段落被公认为经济理论的开端。但此时它还不涉及像我们如今的经济学那样对经济运行周期和运作规则的中立描述。它具有哲学意义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以何种方式有助于人们过上完满的生活。这个问题的意义直到今天也不曾变化，尽管当代的国民经济学家（特例除外）并不熟悉这一问题。

与柏拉图不同，个体家庭经济和家庭世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不成问题。“无论个体家庭、集体家庭，还是高贵家族的联盟，它们的的目的都是过上完满并独立的生活。”^[101]在雅典或是其他城邦中，这样的家庭大多数实现了自给自足。城邦里的个体家庭大多在乡下拥有田庄地产。在这里人们能够获取满足家庭所需的生活物资。亚里士多德从不怀疑这种同时兼有生产和消费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是一种合理、【276】健康的经济形式。城市文化的基础因而是私人农业。谁家在某些物资上有了剩余，就可以与那些需要这一物资的其他家庭进行交换。不仅市民之间互相交换，他们还和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进行交换。这实际上是一种物物交换，但其间也使用货币。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经营方式称作 *oikonomiké*——家政管理的学问，并对其赞赏有加。

如果货币在这种物品交换中被使用，那它就一方面具有支付媒介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充当衡量物品价值的标尺。但无论如何这都与赚钱无关。因为如果营利成了交换的目的，经济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从家庭经济的管理技艺变成赚钱技艺，即 *chrematistiké*。其目的不是获得某物，而是营利。货币的占有成了目的本身。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些伦理的东西被抛诸脑后。如果只涉及自己对物品的需求，人们可以很容易估量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但如果金钱是目的本身，那便不存在一种理性的尺度。欲求金钱的人看不到界限。他总是想拥有更多的金钱。多少钱才算够用呢？让我果腹的饮食和让我裹身的衣物一样，它们有一个自然限度。但是金钱不具有固定的自然限度。金钱的质仅由它的量来衡量。因此它倾向于腐化自然限度，这就致使医生为了金钱，甚至越来越多的金钱而提供服务。士兵不再为了有德性的灵魂变得勇敢，而是为了赚钱。行为的目的，如助人为乐和

勇敢，成为手段。【277】而原来的手段，金钱，则变成了目的。对于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德性伦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如柏拉图曾面临的那样。为了坚守道德，道德行为不应该成为手段。但是，金钱看起来迟早会让一切都沦为手段。

在城邦生活中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金钱，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坏事。如果所有人在物质上有同样的所得，那么这将“激怒受过教育的人”，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十分清楚他们应该比其他人得到更多。^[102]然而仅仅为了钱而去挣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可鄙的。“忙碌生活的目的”是“荣誉”而非金钱。如果以德性伦理学来治理城邦，那么除了经济效益外人们还必须考虑其他标准。否则，经济的道德平均主义会蚕食掉公共福祉。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坚决排斥利息经济。“钱生钱”的模式是“最天理不容的”。^[103]他认为，家庭世界与城邦之间的脆弱平衡不应该被这种毁坏秩序根基的机制打破。家庭与城邦是自然的，他们构建起人类的生活空间。相反，通过收取利息让钱生钱则是非自然的，也不是整体秩序原本的安排。无疑，这种有悖自然的行为使人不像人，让人被占有欲（*pleonexia*）吞噬。直至路德为止，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与亚里士多德所见略同。他们都认为赚钱技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这一洞见在今天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人们或许会希望，要是亚里士多德在细节上更确切深入地阐明货币经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该有多好。因为根据我们现今的认知，银行业有利于国民经济，且至少促进其动态增长。而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拒绝扩张性的国民经济。【278】为了成为有利于德性发展的理想生活空间，城邦不应该太大，而应该维持在中等大小。因而，他对国民经济需要增长这一要求完全没有概念。此外，他对继续深究这一问题表示反感：“精细的条分缕析虽有益于讨论，但如果过分沉湎于此，就不免太过平庸。”^[104]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位经济学思想家。他也是第一位分析和命名货币经济中“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人。只不过令人惋惜的是，他将对正当生活、政治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的思考局限于城邦，局限在一种在他的时代就已从政治图景里消失的政体中。故而，他的追随者不得不自问：如果时代限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考，那么他对于正当生活的洞见中还有什么能作为永恒真理而留存下来？除了理想的雅典城，还有其他适合灵魂发展的舞台吗？

- (1) “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Wer bin ich - und wenn ja, wie viele?*）也是作者另一部著作的书名。——编注

避世者与怀疑者【279】

被管理的世界——嬉皮士与挑衅者——“此后”的一代——怀疑论与怀疑
——随意的隐秘魅力



被管理的世界

如果有人问起，就哲学的处境而言，哪一个时代同我们最相似，亚里士多德身后五十年也许是一个好的备选。在某些方面，这一时期是一次哲学的繁荣。因为在古代，此前大概从没有像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一样，在极短时间内有过这么多哲学家。亚历山大大帝迅疾的征伐队伍将希腊文化从一览无遗的小城带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远方。即便还没有“希腊人”这个词，并且在雅典人眼中亚历山大甚至是个野蛮人，但希腊文化仍以时疫般的速度传播开来，并深入亚洲和北非。当时，一些聪慧好学的人士正是从这些地方前往雅典，为了在苏格拉底昔日进行哲学活动的著名广场走上一遭。【280】他们想看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校舍，阿卡德米和吕克昂学园，并在那里学习。最终他们在伟大哲学的发祥地安顿下来，建立自己的学派。

亚历山大毫无道理可言的征战像海啸般冲倒了旧世界的高墙，留下了无尽辽阔的风景。几乎在一夜间，视野得到了拓展，希腊打开了看向其他文化的视角，更加开放地接受中东和东方的影响。

另一方面，新的哲学还未做好准备，也缺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乐观主义。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死后的时代精神状态，有些让人想起1968年的西欧与我们今天时代的不同。所谓的“六八一代”曾是政治空想家，他们想让西方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社会主义。他们想象出社会立体主义的理论，把个体生活如整个社会一般往各个方向拓展，当然也

可能是扭曲。在历史的一瞬间，一个切分音的出现，使六八一代看到一个由十足令人兴奋的、至今无法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构成的世界。然而在他们希望的春天后，并没有乌托邦的夏天随之而来。到来的是冰冷的醒悟，即他们在资本主义铁铸的齿轮面前是多么渺小和无能，而后者确实推动着历史。不愿习惯美丽新商品世界的人或是不愿同其妥协的人，主要逃避到内心世界，从社会性劳动时代的社会—心理行话，到密教的徒手打造的栖息地，以及远东宗教教派的诸多变种。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比较总是不充分的——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希腊哲学与社会遭受了一个幻灭的过程，这个幻灭过程看起来与我们今天有些相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诸多方面固然是政治保守的。【281】柏拉图勾画出的乌托邦，更倾向于一个理想地构思的过去，而非朝向未来的预兆。亚里士多德对处于做了细微改变和理想化的框架下的雅典城邦进行了说明，却没有考虑让多数居民通向所有可能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两种政治愿景都是极为静态的，它们或是奠基于唯心主义之上，或是在生物学上得到巩固。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所有的政治解放运动和革命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借助于更好的认识，人们确实能踏入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恰如六八一代在七十年代的进程中那样，雅典的哲学家在马其顿人的统治下迅速丢失了这种信仰。除去芝诺（Zenon von Kition）和克吕西普（Chrysippos von Soloi）下落不明的国家著作之外，雅典在几百年间再没酝酿出任何政治乌托邦！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个关注点。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致力于灵魂的救赎。首要的不再是所有自由民充实的生活，而是个体的幸福，用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著名的表述来说，是关乎在错误生活中的正确生活。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私人化。这与剧院里上演的“新喜剧”并无二致。米南德（Menander，公元前342/341—前291/290）的戏剧显得多么政治无害啊！这位作家不再描绘社会状况，而仅仅描绘人类心灵的狡诈和软弱。连新兴的哲学流派也以争执与妒忌为特色——在私人辩论俱乐部中，人们多疑地窥探彼此。

人们首先关心自身的幸福，并只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即个体的生活意义与什么有关，这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生活时代的状况。

【282】微观世界就好像被管理的宏观世界的对应物。如果说柏拉图曾以此为出发点，即认为健康的国家以健康的灵魂生活为先决条件，那么

在公元前3世纪初，对健康的灵魂生活之思考往往缺乏社会维度。人们出奇迅速地接受了，“上面的人”总归在做他们想做的事。“上面的人”即马其顿统治者、他们的行政长官、众多内奸和一个无所不管的管理部门，他们莎草纸色的衣袖揽尽一切，制定一切。

亚历山大的胜利和入侵大军穿越了希腊地区、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继续将希腊文化传播、普及开来。但他同时也剥夺了希腊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他们一度再次陷入始终只能看到异族人的境地中。希波克拉底认为，安纳托利亚居民容忍、恭顺，不是因为政治状况，而是由于那里的气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个观点欣然赞同，后者甚至在《政治学》中对亚洲民族的不自由状态给出了一个近似自然科学的依据。他们“非常聪慧，擅长机巧，但缺乏勇气；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他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105]。

然而现在的希腊人，甚至骄傲的雅典人，某种意义上自己也处在这样“亚洲式的”生活条件下。这段历史似乎一夜间毁灭了自由的希腊公民作为世界“主人”的自然法地位。亚历山大迫使雅典居民将他视若神明，与波斯大帝并无二致。政治和经济受马其顿管理者监视。唯有响应继任竞争者、将军和亚历山大继位者的号召，【283】在亚洲或埃及的被占领地区定居下来时，他们才能够保持这不受限制的“主人”姿态。数十万人迁出希腊，前往新世界帝国的老城市和新建起的城市，在那里获得公民权。在那些地方，希腊的主人道德随着殖民者的居高凌下死灰复燃。此外，马其顿人长久以来视自己为完完全全的希腊人，就如同从前雅典、底比斯、科林斯、斯巴达等城邦的公民那样，相反东方人被他们视为劣等人。

在早期继业者⁽¹⁾战争引发的混乱和纷争之后，雅典落入了亚历山大大帝主要继位者之一卡山德（Kassander）的统治区域中。但是雅典对其新角色并不满意。亚历山大刚过世，马其顿人就镇压了一场武装起义。当时的行政长官正好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os von Phaleron），尽管历史学家对他的摄政有着积极的评价，但仍然发生了武装起义。当亚历山大的另一位将军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os Poliorketes）接手雅典时，情况就更加混乱了。这个城市再次沦为继位竞争者的战场，竞争者们由着多变的命运来来往往，他们招募士兵征集给养，甚至引发了一场饥荒。人口衰减和大量外流在雅典实属平常，城市经济实力也在倒退。

几年前还是西方世界中心的雅典，虽然之后很长时间里还是西方的

文化之都，但它的政治重要性却在减弱。毫不意外，这座城市里的各种新哲学几乎全是逃避苦难的哲学。这些哲学不开辟新视野，而是服务于对不安的免疫，即对错误的不安（怀疑论者）、对痛苦的不安（伊壁鸠鲁学派）以及对激情的不安（斯多亚派）的免疫。从作为理论建构巨匠的哲学家变成生活助手和顾问，或者变为彻底的拒绝者、挑衅者和行为艺术家，相比于他们无政府主义式的怀疑，苏格拉底倒是一个温和且善意的人……

嬉皮士与挑衅者【284】

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但他完全不受人尊敬。他后来的追随者热烈地尊崇他，而在批评者看来他是末流。关于他的事，柏拉图故意保持沉默，亚里士多德大约仅在一处提到过他。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的某时，第欧根尼从锡诺普——一个黑海边的米利都殖民地，来到雅典。自此他居无定所，在公共建筑的廊柱间栖身，在木桶里入睡——如果人们愿意相信的话。大概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像狗一样”生活，据传他甚至当众手淫。他是否曾落笔著书，关于这一问题诸多观点莫衷一是。相反，确定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许是在死后，他跃升为一位传奇人物。

我们所知的关于第欧根尼的差不多所有事情，都是从众多流传后世的逸闻中了解到的，而这些逸闻中可能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几乎所有故事都围绕着唯一一个核心：第欧根尼宣扬无所欲求。因而幸福不在于拥有极高智慧的生活（柏拉图），也不在于细心培养德性以善于处世（亚里士多德）。按照第欧根尼的观点，一个从这样那样的野心中抽身出来的人，恰恰是最幸福的。

诚然，这个想法并不是全新的，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也许第欧根尼事实上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然而，关于安提斯泰尼的原始资料就像关于第欧根尼的一样稀缺。关于这两个人的传说都宣称，他们视无所欲求为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一个人只要从其内在与外在的束缚中自我解放，他就是无所欲求的。【285】他安于现状（*autárkeia*），只知生理需求，如吃、喝、睡、性以及温暖居所的向往。

有关第欧根尼最著名的逸闻虚构了一次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的相遇。传说这位世界征服者曾偶然碰见这位躺在木桶里的哲学家。亚历山大

问，他能否有所效劳。这位哲学家对此的全部回应是：“能，离我远点，别挡住阳光！”

这个故事和其他很多有关第欧根尼的故事一样确定无疑是编造的。连他是否以及何时在雅典逗留过，何时在科林斯生活过，我们基本都不知道。如果逸闻收集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传说中还有些别的什么的话，那就是，第欧根尼传播了许多挑衅的胡话，并以吓唬身边的人为乐。他公然称社会习俗和约束是多余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秩序也一样。毕竟，健康的人类理智就已足够，人们压根不需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历史上的第欧根尼也是如此模糊不清地同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最重要的似乎是他对后来的同时代人的意义。“桶中人”的故事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前往雅典，这在公元前3世纪赋予了这座城市以古代世界里旧金山般的气息。效仿这一阿提卡嬉皮士文化的实例至少有七位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在无所欲求的生活观和世界观里或多或少地追随着安提斯泰尼和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拉尔修针对他们使用的概念“犬儒主义者”（*Kyniker*）源自哪里，众说纷纭。因为将这个名称追溯到单词“狗”（*kyon*），是有疑问的。

其中重要的犬儒主义者有底比斯的克拉底斯（*Krates von Theben*）与其妻希帕琪亚（*Hipparchia*），一位早期女性平权斗士。另一位知名人士是加达拉墨尼波斯（*Menippos von Gadara*），【286】他是讽刺文学体裁的奠基人。从犬儒主义者梅格洛波利斯的克尔克达斯（*Kerkedas von Megalopolis*）那里我们得到一篇文章，其中他极其尖锐地批判了财富和贪婪。他如此问道，为什么人们试图从每块石头中敲打出不要命的利益？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追逐一块他会洗劫一空的土地？

对“犬儒主义者”概念下的所有思想家及其性情的把握，肯定都是非常粗糙的，与其说这是紧密的亲关系的象征，不如说是原始资料缺乏造成的后果。也不是所有人都适于那位行为哲学家的人物模式，即像第欧根尼所做的那样，不断以挑衅的言行消遣身边的人。一方面无所欲求，另一方面进行挑衅，在哲学史的进程中二者渐行渐远。后来多数过着无所欲求的生活的传道者就不再是职业挑衅者了。

相反的是，哲学家中还有一种持续至今的传统，即作为挑衅者。人们可以想到一系列人物，从第欧根尼到伏尔泰、巴枯宁（*Michail Bakunin*）、尼采，再到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Deleuze*）、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等。这种哲学的标志就是有意识的、刻意的、政治性的褻

语、夸张，还有常常对那些受人贬低的老实同行的嘲讽——各种表达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哲学寻找并找到了现代艺术，从先锋派直到激浪派运动。

“此后”的一代

在犬儒主义成为某种时尚时，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当然还继续存在着。但在这位大师死后的数十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他的外甥及继任者斯彪西波仅在任十年，就于公元前339/338年去世了。【287】这期间他疏远了理念论，撰写了一部关于事物相似性的书。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对现实性做了比柏拉图所能做的更准确的分类。斯彪西波不再追随柏拉图式宇宙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没有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高于其他一切的绝对的善，只有单一性和多样性二者平等的效用。这一切听起来依据的更像是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

斯彪西波的继任者卡尔西顿的色诺克拉底（Xenokrates von Chalkedon）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传说他有一些木讷愚钝。他是极其高产的哲学家——撰写了70部著作，但全部都遗失了。从其他文献中我们知道，色诺克拉底将哲学清晰明了、指向明确地划分成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他想要将柏拉图极其复杂且充斥着矛盾的著作整理出来，合编成一部全集。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如我们所见，柏拉图的思想抗拒任何过于快速的平整化和系统化。

无论他的导师是否会对此满意——一个完整的柏拉图体系首先是经由色诺克拉底而问世的。然而很多地方却有所改变。理念不再具有成问题的物之特性。在色诺克拉底那里，理念成为像数一样抽象的东西。只有那些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的事物，在作为理念时才同时是物性的。人创造出的东西，椅子、菜肴、画作，在理念王国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物。在另一篇文章中，色诺克拉底干脆颠倒了柏拉图的思想。对柏拉图这位大师而言，动物理念比一条狗更为本质。与之相反，在色诺克拉底看来，狗比抽象的动物理念要本质得多。基于此，色诺克拉底也摒弃了人类灵魂的不朽，而柏拉图曾花了很多力气去证明这一点。

色诺克拉底于公元前314/313年去世时，【288】终于有了一种“柏拉图主义”，但是人们对其兴趣不是很大。虽然接下来的继任者珀勒蒙（Polemon）和克拉底斯（Krates）很重视这种柏拉图主义，然而柏拉图哲学在那时的雅典只是众多哲学之一。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名声还要更

糟糕。他的哲学受到的敬奉比柏拉图远少得多。吕克昂学园的继承者，逍遥学派，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当时，他们首要地还是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那些独立学科。直到约公元前287年，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掌管了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他主要作为植物学家而闻名。他的植物学代表作《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和《植物之生成》（*Causa Plantarum*），表明了他是一个比亚里士多德还要更细心的自然观察者。提奥弗拉斯特将其导师的观点分割开来，即植物的生命应当是实现功能，动物的生命应当是达成目的，人类的生命应当是获得幸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凌驾于这些考虑之上的“合目的性”这一大概念，在提奥弗拉斯特那里瓦解和局限为物质层面的细碎文字。

尽管摒弃了灵魂转世说，但提奥弗拉斯特却一再追溯到恩培多克勒的“化学式”思考。在提奥弗拉斯特《论虔诚》（*De pietate*）一文中，人们也可以觉察到这位来自阿格里真托（Agrigent）的哲学家的影响。与恩培多克勒一样，提奥弗拉斯特也慷慨激昂地斥骂动物祭祀的残忍。但对他来说，与恩培多克勒不同，其原因并非对杀死一个进入动物体内的人类灵魂一事的厌恶。提奥弗拉斯特的论据更多是生物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使得动物祭祀看起来如此野蛮的，是动物与人之间相近的亲缘关系，是动物与人之间情感的相似性——19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据此，道德相关问题就不是动物能否思考或说话，而是：“他们会痛苦吗？”

提奥弗拉斯特的继任者拉普塞基的斯特拉顿（Straton von Lampsakos）掌管逍遥学派直至约公元前268年，【289】他看来几乎完全摆脱了所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成果。他主要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而闻名。他认识到，下落的物体在空中会加速——这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前设。斯特拉顿的这一洞见与其他洞见对物理学来说如此重要，而对于一个哲学学派的团结一致却几乎没有贡献。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光辉在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几近熄灭，尽管他建立的学派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怀疑论与怀疑

随着阿卡德米学园和逍遥学派影响力的淡去，这个城市为众多新兴哲学家打开了空间。激进怀疑论就是其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巨匠，无论何时建造起崇高的思想建筑，都会有一群

狗在其旁边抬起后腿，就像第欧根尼一样。或者就会出现激进怀疑者，否认建筑整体的坚实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经常不用费太多力气，他们就能在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

在所有看待世界的哲学态度中，激进怀疑论一定是最谨小慎微的。怀疑一切的人从不会失望。再者说，进行怀疑要求不高也不困难，而使谨小慎微的人很容易获得站对边的感觉。但从逻辑上看，怀疑不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没有任何怀疑是从其自身出发就比断言要更真实的。某事“不正确”并不比某事“正确”在根本上更有可能。

对公元前3世纪雅典的氛围而言，怀疑似乎恰好是正确的态度。

【290】在那个时代，一个终其一生从未在雅典待过的人，却被视作精神导师。埃利斯的皮浪（Pyrrhon von Elis）出身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他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62—前270年。尽管因为与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相似，他没有撰写过任何著作，或者说恰恰因为如此，他的生平成了一个传奇。关于他的英雄故事几乎说不完。也许他曾跟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到过印度，见识了那里的哲学。对他尤其产生影响的显然是苦修者，即苦行主义导师，他们像第欧根尼一样以相似的方式无所欲求地生活着。皮浪面对亚历山大大帝时，像苦修者一样勇敢和冷漠，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编造的。正如据说第欧根尼将亚历山大从太阳底下撵走，其他哲学家也应该在面对占领者时，表现出那种希腊军队不曾具备的大胆无畏来。而且骄傲的城邦居民忍受外邦人统治越多，哲学家在他们的幻想中就越有胆量，在精神上就越独立……

回到埃利斯，皮浪创立了一个哲学学派，这大概是西方第一个受到印度哲学启发的学派。很多文献向我们讲述了那里所教授的东西。皮浪的名声想必很大，以至于甚至后世重要的思想家，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也在探讨他的学问。显然，除了印度哲学以外，皮浪还受到德谟克利特的启发，传授他情感平静和灵魂自由的目标。从认识论上来看，德谟克利特只认为那些能以类似自然科学的角度认识到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拒绝一切对世界本质的进一步推想。皮浪在这一点上也追随着他，当然，要激进得多。【291】他从根本上怀疑认识的所有形式，怀疑知觉，同样怀疑思想。在皮浪看来，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唯一留下来的是判断的悬置（*epoché*）——这种态度在20世纪成为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的出发点。

这种态度以皮浪式怀疑论的名称载入哲学史册，并在很长时间里持

续产生影响。因此，对世界的确定认识——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价值，成为自我欺骗的无用之物。哲学的工作不再是认识或知识，而是对一切，包括对逻各斯的怀疑。

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个态度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果我怀疑一切知识，那么为什么我不对怀疑是有意义的这件事产生怀疑？如果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怀疑也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个如皮浪一样的激进的怀疑者声称，怀疑比相信要更加正确！但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认识的？激进的怀疑者不用对怀疑的真理资格也做出怀疑吗？这种思想我们从希腊哲学中，从皮浪之前的时代就已经熟知。据西塞罗所说，德谟克利特的学生，希俄斯岛的米特罗多鲁斯（Metrodoros von Chios）曾说过：“在我们之中没有人知道什么，甚至从不曾知道我们是否知道。”^[106]米特罗多鲁斯主要以物理学家而为人所知，尽管他借这句话是想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东西，这本身当然也是值得怀疑的。

像苏格拉底一样，皮浪也不能将思考与生活区别开来。据说，他对事物和世事很冷漠。如果没有什么能够得到清晰的认识，那么人们就不能，也不必在生活中摆明立场。这样一种态度是无懈可击的，吸引了许多同时代人，也吸引了讽刺文学家斐利亚修斯的蒂孟（Timon von Phleius）。他出生于公元前320年的伯罗奔尼撒城市斐利亚修斯，据说曾在皮浪处求学。【292】在雅典他作为讽刺作家，尤其是多卷本讽刺诗歌《讽刺诗》（*Silloi*）的作者而为人所熟知。据推测，这首诗超过千行，但其中只有135行保存下来。在保存下来的部分中，作者与已死去200多年的科洛封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von Kolophon）进行了讨论，我们已经熟悉，后者（在“流浪汉、他的弟子与雅典公共秩序”一章中）曾对过于人格化的神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这首诗的风格模仿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叙事诗，所有人物都一直在场。蒂孟和色诺芬尼一起对所有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品头论足，此外还拿他们与神话里的英雄来对比，贬损他们目空一切和无所不知的样子。唯独皮浪没有受到轻蔑的批判，因为他是作为第一束光亮被带入其他哲学家蛮横狂妄的命题的黑暗中去。

一种在政治无聊的时代始终旺盛生长的思想，无立场、讽刺和尖刻的嘲弄是其廉价附属品。从其角度看，没有什么值得争取或争辩的，只有普遍的反对和一点点私人的幸福。心境平和（*ataraxia*）是怀疑论者追求的状态。因为“神圣与善的本性总是存在于，人身上最为平和的生活逐渐形成之源头”^[107]。“我不因现实中的损失而痛苦——我享受

它！”和“哲学取消了重要性——但我无所谓！”这些皮浪式的嬉皮士智慧，显然与马其顿统治下希腊城市的政治委顿完美匹配。也没过多久，激进怀疑论进入雅典，在那里它甚至霸占了曾经的英雄式的哲学圣地——阿卡德米学园！

随意的隐秘魅力【293】

让激进怀疑论在雅典登堂入室的人，是阿尔克西拉乌斯（Arkesilaos）。他出生于约公元前315年小亚细亚西北沿岸的皮塔内（Pitane）。像当时众多哲学家一样，他是来自今天土耳其地区的迁入者，他前往雅典，想在那里求学。他在提奥弗拉斯特圈子里待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转去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公元前268—前264年的某段时间，他成了阿卡德米学园的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他极富魅力与雅量。此外，他是个敏锐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演说家，对于损誉宽容大度。他的私人生活完全就是犬儒主义和怀疑论理想的反面。他并未无所欲求地生活，而是喜爱奢华和享受，置身于高级妓女（情妇）的环绕中，毫不羞耻。他与马其顿军事当局，特别是比雷埃夫斯的总指挥官关系很好。

在阿尔克西拉乌斯的领导下，柏拉图哲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久后人们就将阿卡德米学园的人称为怀疑论者（*skeptikoi*），与皮浪的追随者名号相同。因为这位新校长再次把柏拉图哲学拉回到其苏格拉底式的出发点上去。“怀疑”这个概念甚至在阿卡德米学园占据了一个位置，这是难以想象的。普鲁塔克将那些围绕着阿尔克西拉乌斯的阿卡德米学园的人称为“在一切事物里中止了判断”^[108]的人。此外，还不十分清楚的是，在这基础上，阿尔克西拉乌斯是否也撰写过文章，或者像苏格拉底一样仅进行口头工作。无论如何，他将苏格拉底哲学作为一种针对所有被认为确凿的知识的驳斥技艺，并使之复活。

阿尔克西拉乌斯接手阿卡德米学园时，柏拉图已经去世70年了。然而，据说这位新导师曾持有他的原始手稿。【294】色诺克拉底从柏拉图思想中创造出的东西——一个整齐有序的体系，在阿尔克西拉乌斯看来却是完全错误的。对他来说，柏拉图首先是：一个没有提出确定的立场，同时又对每一种观点都马上会产生怀疑的人。阿尔克西拉乌斯眼前的这个柏拉图是个怀疑者和讽刺者，他从未达至确定性，更谈不上创立教条了。

对这位阿卡德米学园的新校长来说，获得确定知识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这和皮浪没什么不同。如何能确定地知道某事是否正确？为此需要一条客观的标准，而它可能从未存在过。因为每一条标准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为证明一条标准是客观的，就需要另一条客观标准，以此类推。根据阿尔克西拉乌斯的观点，在一个论证的最后始终是一个信念、直觉或者明见性（Evidenz），它是不可能真正被证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像皮浪一样中止自己的判断。人们最多能够探索和揭示他人思想中的规则、认识路径与逻辑。阿尔克西拉乌斯复活了苏格拉底的雄辩术，他制定了一条规则：“想要听他说话的人们不应向他提问，而应该自己说出他们所思考的东西。如果他们说了，他会对此进行辩论。”^[109]

对阿尔克西拉乌斯来说，哲学中所有断言都是纯粹的空想。如此激进的怀疑论大概跟柏拉图没有很大关系，即便阿尔克西拉乌斯从未批评过这位阿卡德米学园创立者，且巧妙地处于他的传统中——将他视为苏格拉底在世间的代表。像在皮浪那里一样，人们可以在他那里争论，他的怀疑有多激进，以及他是否同样质疑了怀疑的意义，就像西塞罗所觉察到的那样。阿尔克西拉乌斯应当赞同如下这句名言，这句话由米特罗多鲁斯的西塞罗流传下来：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的无知。【295】那句被认为是苏格拉底的话“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也要因此添上这句补充：“而连这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且不乏机智——但这种态度是一切哲学的终结，所有进一步的哲学研究都是无用的。一个这样思考其职业的哲学家，根本不能创立学派（如皮浪），也不能领导学派（如阿尔克西拉乌斯）。

毕竟，像阿尔克西拉乌斯一样的激进怀疑论者熟悉这些价值判断，也就是这样的价值判断：最好是放弃价值判断。他不关心道德，也是顺理成章的。他既不重视某种行为，也不轻视它。这种态度当然同样是极度前后矛盾的。因为一个放弃所有判断的人，决不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最好放弃判断。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甚至是一个相当强的价值判断。此外阿尔克西拉乌斯表明，心境平和是生活的目标，这与德谟克利特和皮浪没什么不同。显然他知道，这是一个好的目标。对一个认为不可能做出价值判断的人来说，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价值判断！

鉴于无法过一种彻彻底底的怀疑论式的生活，问题就来了：激进怀疑论真是一个好的观念吗？至少它把显然最一贯的思考形式不可避免地带进了前后矛盾之中。错误可能在于，怀疑论者把一种真理概念宣称为

目标，这种概念对人类思想提出了过分的要求。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哲学家真的需要一种关于真理的知识来进行哲学探索吗？不能把哲学思考的门槛放得更低一些吗？某事不是绝对真的，但却是可信的，这难道还不够吗？这正是阿尔克西拉乌斯之后的继任者昔勒尼的卡尔内阿德斯（Karneades von Kyrene，公元前214/213—前129/128）走出的一步。他主要是因为一则西塞罗流传下来的逸闻而出名的。【296】卡尔内阿德斯曾是前往罗马的希腊外交代表团的一员（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这支代表团）。他在元老院面前，第一天赞成正义，第二天却反对，就被驱逐了。

卡尔内阿德斯建议将这个“可靠的观念”作为怀疑论者的方向，即“同时是可靠、未被曲解且经过彻底检视的”^[110]观念。从怀疑论哲学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条标准，它也不可能有意义。我从什么样的立场得到这一知识，即某物是可靠的？阿卡德米学园的人如此谨慎地想要避免欺骗和自我欺骗，却在这里为它敞开了大门。

一种哲学如果无法向其追随者施以援手，给他们一些能够帮助他们过上成功生活的东西，就会受到非议。因为哲学应该在某种方式上是有用的、有帮助的，对哲学而言这就是不成文的法定任务，它不仅适用于古代。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所说，阿尔克西拉乌斯因此也曾引入过一条不那么绝对的标准，即“有充分根据的事”。某事有充分的根据，虽然这不能获得最终的确定性，但能把可靠的事同不太可靠的事区分开来。诚然，塞克斯都在这里是否正确地复述了阿尔克西拉乌斯的观点，还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一切都被怀疑，“有充分根据的事”又如何可能存在？什么是有充分根据的？是我不管诸多同等程度的反驳，经过仔细考虑后想到的东西吗？或者是我凭直觉感觉到的东西，比如，要是我饿了，最好去吃点什么？在这里，后世思想家对阿尔克西拉乌斯的立场的说明十分矛盾，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尽管对于怀疑有着诸多疑问，阿尔克西拉乌斯仍是“所有哲学家中”“当时最被重视的”^[111]那一个。有一件事流传了下来，即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学创造出一种系统的反驳技艺。他完善了这个探明为什么某事不正确的思想。他的哲学成就无疑不是偶然的。【297】这种哲学在我们看来，于一个悲观、政治冷淡的时代具有典型意义。在马其顿人统治的数十年间，雅典居民非常明显地放弃了这一信念，即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一种哲学，其中质疑优先于各种断言，与此完美地匹配的情况是：在个体上极为尖锐，同时在整体上惊人地冷漠。对马其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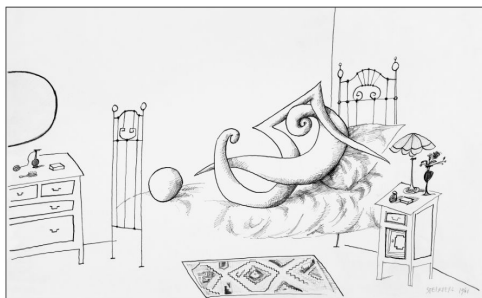
当局来说，这大概是一种相当无害的哲学，它被准许不受限制地存在着。不管怎么样，它都不导向任何建设性或者实践性的后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阿卡德米学园的激进怀疑论时期让人想起了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对阿尔克西拉乌斯和他的学生来说，事物的“不可辨认性”，就是雅克·德里达及其门徒所言的语言表达的“任意性”（随意性）。类似于阿尔克西拉乌斯的哲学，后结构主义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它在其自洽的（语言）怀疑论中对一切批评免疫。在时代进程中它越无关政治，同样也就越摆出玩世不恭和自负的样子。如同后结构主义一样，不止一代学生丧失了活动能力（随后作为犬儒主义者分布在各种广告代理和小品专栏里），阿卡德米学园精英式的怀疑论大概也大大地添了一把火，让阿提卡社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跛足而行……

- (1) 继业者（Diadochen），在泛希腊历史中，专指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互相竞争的那些王位继承人。——译注

错误生活中的正确生活【298】

无限的世界，冷漠的诸神——快乐伦理——自我管理——斯多亚派——
程序化的世界——做最好的自己！——自然本能与道德要求



无限的世界，冷漠的诸神

公元前3世纪初雅典城邦的景象与18、19世纪之交的魏玛有点类似：虽是小城，却是文化大都会。在这仅仅1平方公里的拥挤城市中，生活着如维兰德（Wieland）、赫尔德（Herder）、歌德和席勒这样的精神领袖，他们彼此紧密相邻、合作又互相竞争，他们让思想碰撞而又各自专注于自己的作品和世界。

雅典在亚里士多德去世50年后变化不大。两个一流的教育机构阿卡德米与吕克昂彼此相距仅两公里，步行不超过半小时。雅典卫城山脚下的希腊广场就位于两者中间，【299】无数哲学家效仿苏格拉底游走在市场上。斯多亚柱廊（*Stoa Poikile*）是雅典众多圆柱大厅中的一个，也是一个新兴哲学团体的集会地。位于市场与阿卡德米之间的是一座隐秘的园林（*Kepos*），它紧邻阿卡德米的围墙。园林的所有者是伊壁鸠鲁（*Epikur*），公元前306年他成为这座园林的主人，在温暖的夜晚与他的追随者们探讨哲学。

伊壁鸠鲁来自萨摩斯岛，公元前341年左右，他出生在这座岛上。他的父亲是农民或者教师。伊壁鸠鲁可能很早就在导师的支持下研究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德谟克利特无疑对他产生了更深的影。18岁的时候，他在雅典接受了军事培训。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随即爆发的拉米亚战争——这是雅典人的起义战争，给伊壁鸠鲁家族带来了灾难。

他们失掉了萨摩斯岛上的财产，并逃往小亚细亚的科洛封。伊壁鸠鲁在那里一度销声匿迹，直至他又重新出现在雅典，并与三位亲密的友人一起购置了园林。

这位大师与他的追随者以一种共产主义共同体的方式居住在园林一带。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人们。甚至妓女和奴隶也生活在伊壁鸠鲁的团体中，因而招致了雅典人的嘲讽。关于这种团体生活是多么不堪的传言很快传播开来。故事收藏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五百多年后如是评价伊壁鸠鲁：他是所有自然哲学家中最为下流不堪的。然而关于他的不堪行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此外，这些行径也与伊壁鸠鲁所宣扬的学说有着明显的矛盾。

在据说由他撰写的40篇手稿中，只有少量残篇留存至今。和许多其他希腊思想家的情况一样，每一种陈述伊壁鸠鲁学说的尝试，【300】都是从稀缺的残篇中对一幅画面的重构。他的认识论使人们联想到德谟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一样，伊壁鸠鲁也认为世界由虚空中的原子构成。原子是永恒的、不灭的，它们数量无限，在无际的宇宙中自行运动。据罗马人卢克莱修记载，伊壁鸠鲁曾宣称：

存在者整体是……无界限的。否则就必然存在与它相对的外部事物。那我们将看到，这个外部事物又有它的外部事物，后者与前者相对并限制它……而因为人们现在必须承认，存在者整体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所以存在者整体便没有外部事物，因而没有界限与终点。[112]

原子的数量无限，世界也存在多个。伊壁鸠鲁认为宇宙是多重的。其中，原子由于自身的重量下坠。有时会出现一些偏差，于是原子会彼此触碰。这些碰撞又引起新的运动，这是一种在原子层面发生的，以漩涡为形式的连环追尾事故。这些新的运动造就不可计数的原子组合，在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组合之中，有一种组合是人。人也仅仅由原子构成，并且还不单只躯体。甚至灵魂也由“大量的原子”组成。灵魂“像极了混有热的风，从某些角度看与风相似，但在其他角度看与热相似”[113]。

这些设想并不是完全原创性的，因为他们几乎从头到尾照搬了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但至少伊壁鸠鲁也有创新。因为对他来说，在一个彻彻底底的物质宇宙中确实存在着诸神。这是怎样罕见的诸神啊！他们是拥有人的形态和躯体的生物，也有新陈代谢，并且与其他事物一样由原子构成。【301】于是伊壁鸠鲁建立了一种迄今为止西方哲学中从未有过

的——唯物主义神学！他认为，存在着无数不同种类的神。而且他的神学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诸神没有创造宇宙，而是像人类那样生活于其中。他们享受着极乐并且无暇他顾，既不影响世界进程也不改变人类命运。当卑微的人类烦恼忧心的时候，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操心什么呢？伊壁鸠鲁关于诸神世界的设想，既不解释世界的形成，也不为人类生活敞开更深刻的维度，指示更高远的命运。在西方所有关于诸神的设想中，伊壁鸠鲁肯定是最具原创性的。正是因为它缺少上述这两种理论意图，而在所有其他哲学家与非哲学家那里，诸神恰恰因为这些意图才存在！

无论如何，人能预感到诸神的存在。最精细的原子有时会从神身上脱离，并以不可见的方式进入人类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有神的观念，效仿并崇敬之。与许多其他哲学家不同，伊壁鸠鲁不认为人们关于流行的祭祀仪式、传统上内容丰富的众神的天堂中所有的杰出人物，这一切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反对，人类将诸神设想为举止行为与自己相似并且参与人类生活的神：“快乐的不朽者既不知困难为何物，也不会帮人克服困难，因而既不会恼怒也不会偏爱；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弱者的特征。”^[114]

在伊壁鸠鲁看来，诸神也不能保证就是自由的。他们只不过是遵循自然法则的原子世界中的一部分。所以，同德谟克利特一样，伊壁鸠鲁不得不允许人们提出这一问题，即在一个完全机械因果式的世界中，自由如何存在？如果一切都遵循自然法则而被规定，那么人到底是否自由，是否拥有自己的意志？这是个爆炸性的问题。【302】如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悲剧所刻画的那样，在诸神掷骰子的地方，人没有真正的自由。人的命运被更高的力量预先决定了。如果永恒的自然法则确定了原子运行轨迹的话，那人的命运不也就被预先规定了吗？

事实上，意志自由对伊壁鸠鲁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在著作《论自然》（*De natura*）中强调，原子并不规定精神事物的行为方式：“自然对原子的某些运行方式及其行为和特性的细微差别没有做出规定；而是，自然的发展全然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些事物。”^[115]动物与人类因而能够改变自身的原子运动。并且他们自己对这些改变负责。然而，伊壁鸠鲁不能令人满意地对此做出解释，即如何在一个由自然法则规定的世界里找到自由和责任的起源，尽管他在一个精致的推理游戏中仔细推敲：“声称一切都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那些认为并非一切都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人；因为正如前者所言，

宣称并非一切都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这一点本身，正是基于必然性而发生的。”^[116]

快乐伦理

伊壁鸠鲁的哲学有如下三个要点：意志自由、感觉的真理以及快乐之于生活的重大意义。对他来说经验仅仅来自感觉，这是一种我们从普罗泰戈拉、安提斯泰尼与皮浪那里所获知的立场。两千年后这一立场将再次复兴。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者们与持有同样观点的17和18世纪的法国感觉论者们（洛克 [John Locke]、休谟 [David Hume]、贝克莱 [George Berkeley]、【303】孔狄亚克 [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将会站在这一立场，与当时占上风的理性主义相抗衡。

基于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推论，这取决于我将玻璃杯看作半空的还是半满的。我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条经验，如果它以感官知觉这样不可靠之物为依据，那么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感官知觉从来也不导向可靠的知识。怀疑论者走的就是这条路。或者我可以说，所有我经验到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的，并且十分真实。人们并不需要非常确定的知识来获得好的生活。敏锐的感官与清醒的理智——拥有这些的人就拥有了智慧。我们猜测，普罗泰戈拉选了前一条路，伊壁鸠鲁也一样。

他不反对逻辑，也不反对我们能凭借机敏的思考取得明智的洞见。但他断然否定存在一个作为真理唯一源泉的逻各斯。对于他来说，与人的感官和感性没有瓜葛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谁严肃地对待感性，那么他就会很快得出结论，即快乐有益于人，而痛苦是无益的。

这一洞见并不始于伊壁鸠鲁。早在昔勒尼学派（Kyrenaiker）那里，这种观点就已经出现。对他们的称呼源自今天位于利比亚的城市昔勒尼。公元前440年以来，这块希腊属地是一座民主城邦。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斯提卜（Aristippos，公元前435—约前355）就来自这里。可惜的是，他与其追随者没有著述传世，而只有后来的哲学家对他的评述。他获得的名声源自维兰德在19世纪初为他树立的纪念碑：《亚里斯提卜和几位他的同时代人》（*Aristipp und einige seine Zeitgenossen*），这是一部涉猎广泛的书信体小说，在小说中，【304】老练又从容的亚里斯提卜优雅地表达了其启蒙思想。

历史上的亚里斯提卜却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他的伦理学涉及大

量私人领域的讨论。作为一位早期感觉论者，他只相信感觉而不相信理性洞见。我们经验与认识的一切，都是通过感官而进入我们，并且由此引发精神过程。感觉有好有坏，有温和快乐的感觉，也有痛楚不适的感觉。伦理学的语法由此简化为：增加快乐并且减少痛苦——这是以快乐主义（Hedonismus，源自词义为“快乐”的*hêdonê*）之名广为人知的一种生活态度。

作为早期西方哲学家的亚里斯提卜没有将人生幸福定义为人们追求的遥远目标，而是定义为一种短暂的状态。人们并非通过长久的劳动以获得幸福，也不像资本一样通过勤勉来积累幸福。幸福是人们追求幸福时的体验。幸福生活是人们在其中常常（感到）幸福的生活。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名言“许多人会在徒劳地等待大幸福的时候，错失小幸福”，就是对亚里斯提卜所理解的快乐主义十分精辟的总结。

对于什么样的快乐值得去追求的问题，昔勒尼学派（包括亚里斯提卜的女儿和孙子）是乐意解答的。有许多种身体上的快乐与精神—灵魂上的快乐。这两方面同等重要。对于这样的想法，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对亚里斯提卜而言，重要的不是快乐的道德性质，而是快乐的强度。如果快乐是强烈的，那么它在道德上也是善的，因为快乐的彼岸不存在道德。质与量孰优孰劣的问题，却难以回答，因为强度同时包含这二者。【305】（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在他的电影《爱与死》[*Love and Death*, 1975] 的结尾，以相似的手法论证：“你要知道，对性生活来说重要的不是次数，而是质量。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八个月才有一次的話，那么人们应当对这一问题再好好思量一番……”）

尽管出发点全然不同，但昔勒尼学派人在某一点上甚至与亚里士多德相当接近。亚里斯提卜也看重富足、友谊和生活智慧。所有这些都让生活变得愉悦。有生活智慧的人应当从诸如嫉妒和迷恋的沉重情感中摆脱出来。亚里斯提卜认为，与悲伤、忧虑或畏惧不同，外部世界中也许不存在强制引起嫉妒和迷恋的东西。例如害怕某物是一种有意义的生理反射，而爱慕某物却不是！谁自信地掌控自身，谁就超然于迷恋和嫉妒之上。于是我们在亚里斯提卜那里看到一位有魅力的、富足又高雅的、放浪不羁的花花公子，这种形象兴许比维兰德笔下幽默的启蒙者更接近这位哲学家本身。

再回到伊壁鸠鲁。我们假定他知晓昔勒尼学派的学说，尽管他没有提及这一源头。与昔勒尼学派一样，他也将快乐置于其伦理学的中心。

伊壁鸠鲁确信，每个生物“从出生开始就为快乐”而努力，并且“把快乐当作至善”。^[117]然而与亚里斯提卜不同，伊壁鸠鲁的学说不是获得快乐的哲学，而是避免痛苦的哲学。他问道，是什么阻碍我们过上闲适从容的生活？答案是，由身体和精神上的缺乏与担忧引起的痛苦。饥饿和口渴时，我们感觉到痛苦，我们因畏惧与忧虑而受苦。相反，宴饮、愉悦与欢欣则使我们感到快乐，因为它们将痛苦屏蔽或是排遣掉。

伊壁鸠鲁与亚里斯提卜一样，【306】将自然的欲望与“空虚的”欲望区分开来。当我们欲求那些事实上根本不需要的事物，许多痛苦便会产生。我们还操心那些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无须操心的事情。在此，我们必须学会区别和追问，哪些畏惧与欲求是自然的，哪些是必要的。能理智地约束、控制欲望和冲动，并能区分主次的人，就能过上伦理上正确的生活。因为“对这些事物坚定而不动摇的洞察，让人们知晓如何管理身体，如何摆脱迷惘获得精神自由，因为这是属于幸福生活的目标”^[118]。

自我管理

一位秉承伊壁鸠鲁生活理念的人会期待什么呢？“进来吧，陌生人！好客的主人为你准备了超量的面包和水，你的欲望在这里将不会被激起，而会被平复”，伊比鸠鲁园林入口处的著名标语如是宣告。超量的面包和水？如果说伊壁鸠鲁把快乐当作伦理学的核心的话，那么这并不是一个亚里斯提卜意义上的快乐主义生活。伊壁鸠鲁所谓的快乐是有节制的。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快乐的强度，而是持续。一种持续而恬淡的幸福比先享乐而后饱和、先兴奋而后低落、先贪婪而后失望要更好。对于伊壁鸠鲁而言，一种始终细水长流的快乐（沉静的快乐）比强烈又不断的快乐（动荡的快乐）更有价值。根据他的观察，快乐越无节制，带来的持久满足就会越少。

如上所述，伊壁鸠鲁的哲学不是获得快乐的哲学，【307】而是避免痛苦的哲学。这种哲学将避免痛苦与怀疑论以及当时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到处都潜伏着痛苦的危险，面对神灵与死亡时的恐惧，对身体疼痛与精神折磨的畏惧，以及不必要的激情投入，这些都会导致痛苦。伊壁鸠鲁认为，存在着针对所有这些痛苦的身心层面的预防措施或者疗法：四味丸（*Tetrapharmakon*）。

一种正确的哲学发挥效用，就像治疗生命中炎症的抗生素一样。人类生活与诸神是不相干的，知道这一点有助于克服对神的畏惧。死亡对

于人类来说本是不可经验的，知晓这一点有助于坦然面对死亡。所有触动我们的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感觉而被经验到的。但死亡是感性生活的终结，为什么我们要害怕这种状态呢？死去的人不再遭受任何恐惧与疼痛。伊壁鸠鲁在给友人米诺修斯（Menoikeus）的信中写道：“所有坏事中最糟糕的，也即死亡，是与我们无关的；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死亡就不会来，而当死亡到来时，我们就不复存在了。”^[119]知晓这一真知灼见的人，或许会想起德意志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打击乐手”奥托·罗伊特（Otto Reutter）。他的《五十载梦幻泡影》（“In fünfzig Jahren ist alles vorbei”）中的如下歌词，显然改编自伊壁鸠鲁：“恐惧死亡毫无意义。人们根本不会体验死亡，当死亡来临，人们便离去了。”

正如亚里斯提卜所言，将自然且必要的东西，与我们完全不需要但被误导而竭力追求的东西严格区分开，这有助于约束欲望与激情。哪个冷静的人需要无节制的性生活？谁必须得吃肉？谁一定得富有？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人们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财产，而是通过减少自己的欲望让自己实质上变得富足。【308】“无限的财富是一种巨大的贫穷。”——希望德意志银行的入口上方能写上这句话。

伊壁鸠鲁所理解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治疗，目标是心境平和的精神状态，这与德谟克利特没什么不同。为了切实而持久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必须将导师的许多言教默记于心，这些格言在今天所有的箴言集中都不会缺席。在名言警句的启发下，人们可以尝试去尽情享受每一天并在生活小事中感受快乐。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从日常琐事中体验快乐的人，能从魔法石上敲出使生活幸福而有价值的神秘火花。

在伊壁鸠鲁看来，哲学思考和讨论也是快乐的。它有助于获得一种人们能够直接运用于切身生活的洞见。在伊壁鸠鲁的园林中，人们执行一项任务，或者说面对一项要求：“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很多读者会认出这是里尔克的十四行诗《古老的阿波罗石像残躯》（“Archaischer Torso Apollps”）的最后一句。在伊壁鸠鲁这里，改变命运不仅仅意味着变得更有道德、更正义（就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意味着彻彻底底地在饮食、性习惯以及财产观念等方面改变本有的习性。柏拉图认为富于哲学洞察力的人是社会的启蒙者和先觉者。伊壁鸠鲁则正相反，他认为明智之人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柏拉图不同，他的哲学首先并不涉及社会，而是关涉自身，即字面意义上的以自我为中

心。

伊壁鸠鲁创立了史上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哲学是实践性的生活助力（praktische Lebenshilfe）！毕达哥拉斯将哲学家视为某种印度教意义上的精神导师（Guru），赫拉克利特则将哲学家视为一位孤独的智者。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家成为追问者与探求者；【309】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是社会改良家，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哲学家是万事通。伊壁鸠鲁园林的言教是生活哲学的开端。因为在哲学史上，之前只有毕达哥拉斯及其七十一条“金句”讨论了这种生活实践规则。然而，这些还很可能并不源自毕达哥拉斯这位宗师本人，而是多年之后才被汇编而成。其确切年代非常难说，且尚有争议。

伊壁鸠鲁确立了生活的实践原理与具体的行为准则，由此全新定义了哲学的任务。人们只需想象一下，假如一位阿卡德米的新成员向柏拉图询问成功人生的实用性建议，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并不是经典问题，因为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是不存在的。）柏拉图或许会建议这个年轻的学生，至少花十年时间去学习算数、几何学、辩证法、修辞学等等。在柏拉图看来，通往更高知识的道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攀峰之旅。对于新人的问题，即为了征服南迦帕尔巴特峰他必须先做到什么，有经验的登山者也会如此回答。年长的专业人士会坚信，人们应该首先登上成百上千座小山峰。同样在今天，一名学生在第一学期向大学哲学教授们询问生活意义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这样回答：首先静心学习，广泛阅读，精勤思考，再广泛阅读，如此等等。

与此相反，伊壁鸠鲁的哲学承诺了一种删繁就简，这种哲学甚至仇视教育。它不看重大量的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而只专注少数重要的洞见。人们无须长期执着地研究理论。重要的是，要学会在明智且有耐心的实操中践行已经知晓的重要洞见。【310】于是伊壁鸠鲁在给米诺修斯的书信中写道：“明智……比哲学更有价值；所有其他的德性都出自明智。明智告诉我们，如果不进行明智、良善且正义的生活实践，就不存在快乐的生活；如果没有快乐的生活，也就无法进行明智、良善且正义的生活实践。”^[120]如果谁仅仅生活在理论中，而没有从理论出发开展生活实践，那么在伊壁鸠鲁看来，他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生活艺术家伊壁鸠鲁与“学院派”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十分有趣，因为它是贯穿整个哲学史的一条线索。直至今日，“学院派”一方与“建言派”或是哲学“治疗派”一方仍然互相鄙夷。所以，大学里的学院哲学家经

常会批评那些在商业上相当成功的生活咨询师缺乏哲学训练。反过来，咨询师则总是嘲笑学院哲学多么脱离生活实践和智慧。

伊壁鸠鲁认为有智慧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学会了如何自我调整和自我管理，没有错误的欲望与无谓的恐惧，他从容地观照世界并享受生活的小快乐。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与伊壁鸠鲁的前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就显得过于离群索居了。伊壁鸠鲁留传下来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处谈及城邦。生活在1世纪的普鲁塔克传承了伊壁鸠鲁的生活理念：“隐秘无闻地生活！”一位真正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并不热衷于获得公职或是重要的公共或政治角色。哲学家最多管理一个园林，而不是一个国家。所有的生活关系在伊壁鸠鲁眼中都是私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城邦的瓦解就从哲学上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连友谊都是政治的，相反，伊壁鸠鲁则认为它是非政治的私人事务。在他看来，交游广阔、胜友如云是件美事。

【311】伊壁鸠鲁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现代性，他认为所有人之间应该订立关于如何最好地彼此理解和相处的“契约”。这个前瞻性的理念在之后的西塞罗那里，而后又于17世纪再度出现并盛行一时。然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似乎是为一种有限的园林集体、一种“自由国家”所打造的，他的这种社会契约理念如何作为一种伦理学适用于所有人，就非常让人琢磨不透了。因为契约的前提是人们遵守和维护契约。即使是或多或少能够自我节制的人也需要他人的干涉以达到利益平衡。而这些如果没有政治与政治家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伊壁鸠鲁执掌园林长达35年，病故于公元前271/270年，死因可能是长期折磨他的肾结石或膀胱结石。从他写给伊多梅纽斯

（Idomeneus）的辞别信中可以看出，相较于病痛，他更在乎与友人谈笑风生。伊壁鸠鲁死后，人们遵照遗嘱在他自己指定的几个纪念日举行祭拜仪式。祭拜伊壁鸠鲁的园林团体存续了好几代，长达五百多年，直至公元2世纪。伊壁鸠鲁的追随者之中没有出现举足轻重的哲学家，载入史册的只有这个团体的学说。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尤其是2世纪的马可·奥勒留（Mark Aurel）的支持下，园林得以维持最后一段时间。尽管奥勒留实际上属于他们在哲学上的竞争对手，但他还是支持了园林。作为哲学家，他属于伊壁鸠鲁学派最重要的对手——斯多亚派（Stoiker）。

斯多亚派【312】

当伊壁鸠鲁与他的追随者享受着园林的私人幸福时，另一些哲人则相聚在斯多亚柱廊，即雅典市场上满墙绘有波希战争壁画的圆柱大厅。他们的学说即使在哲学之外也对西方世界产生了长达数世纪的无可匹敌的影响：斯多亚学派。“人性”与“世界公民”的理念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世界对于锡诺普的第欧根尼而言是头上的穹顶，对怀疑论者来说是一部带着七道封印的书，在伊壁鸠鲁那里是高朋满座的园林，而斯多亚派哲人则将自己理解为政治人。

记载如果可信的话，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ismós*）的概念最早来源于亚里斯提卜，他认为人的本质是道德能力。伊壁鸠鲁学派也关心“人性”，他们既不根据种族，也不根据社会地位或性别区分人类。在他们看来，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然而，真正将公元前2世纪的所谓人性（*humanitas*）学说发扬光大的流派当属斯多亚派。

世界公民主义（*Kosmopolitismus*）的理念也是一样。一开始在亚里斯提卜和第欧根尼那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概念。然而花花公子和隐士的世界公民观，看起来更像一种私人态度，而不是适于所有人的义务性伦理学说。只有斯多亚派才把一种真正以世界公民为目标的世界公民主义置于其伦理学的核心。这一理念可能源自一种失落的经历。雅典城邦共同体的解体使高傲的雅典公民成了政治上的丧家之犬。但是另一方面，雅典人由此学会了突破城邦高墙的局限，用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世界。【313】既然古希腊文明在波斯和埃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那么希腊人有什么理由不成为这一主流文明的世界公民呢？

然而，为世界公民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哲学家中，只有少数人来自雅典！在斯多亚柱廊向追随者们传播世界公民理念的是一位来自塞浦路斯岛的男人：科蒂昂的芝诺（*Zenon von Kition*）。他生于公元前333/332年，约公元前311年来到雅典。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笔下的传奇故事中，芝诺是做紫袍贸易的腓尼基商人，在前往雅典的途中船沉货毁。到达雅典的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大街小巷，并最终停在了一家书店前面。在那里，他读到了色诺芬撰写的关于苏格拉底生平的著作。当芝诺询问店主在哪里能找到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时，店主指了指此时恰好从书店旁走过的犬儒派哲人克拉底斯。芝诺立刻跟上克拉底斯并追随了他一段时间。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芝诺应该是在马其顿王安提柯·贡纳塔斯二世（*Antigonos II. Gonatas*）时期遇到了一位有权势的赞助者。芝诺这一时期始终保持着简朴生活，仅以面包、蜂蜜和些许红酒为食。此外，他与同时代的其他

哲学家一样敌视女人。

无论是芝诺的传说，还是第欧根尼·拉尔修撰写的其他名人逸事，人们都应该谨慎看待这些消息来源。其中包括这一传闻，即70岁的芝诺在离开学校时从楼梯上坠落而摔断脚趾，此后他选择了自杀，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62/261年。据说他当即自缢而亡，雅典人葬以哀荣。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罗列的芝诺所著的20部作品中，没有一部留存了下来。【314】然而，通过后来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芝诺的哲学。芝诺哲学看起来就像我们至此为止所了解的哲学家的精选集。恰是这一点让他招致以阿卡德米学园领袖阿尔克西拉乌斯为首的反对者的激烈批评。此外，他们嘲笑并批评芝诺冥顽不灵的教条主义。斯多亚哲学似乎再没遭受过比这更大的质疑了。尽管质疑使得斯多亚哲学在其他哲学家眼中不尽可信，但同时也恰恰成就了它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芝诺教导人们，应当学习观察自己，做事区分轻重主次。人们应当驯化野性的欲望与激情，可能的话，应当完全避免。对于不能改变的事物，比如包括死亡在内的自然法则，应该坦然面对。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一样，斯多亚派哲人也努力追求心境平和以及与自然和谐一致的自在生活。

人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获得一种高度的内在统一。这一理念我们在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以及伊壁鸠鲁那里都可以找到。而斯多亚哲学是一种极其独特又新颖的混合物。古代的一些极具智慧的哲学家竭力将斯多亚学说整合为一个体系，使其在复杂性上可以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匹敌。据猜测，完成这一体系的是芝诺的学生阿索斯的克里安特斯（Kleanthes von Assos，公元前331—约前232）和索罗伊的克吕西普（Chrysippos von Soloi，公元前276—前204）以及其他一些学生。克里安特斯从土耳其西部的阿索斯来到雅典，成为芝诺的接班人。克吕西普来自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位于小亚细亚海岸的乞里乞亚（Kilikien），他接替克里安特斯成为学派领袖。除了克里安特斯歌颂宙斯的诗篇和克吕西普关于逻辑学的残篇，我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之后的哲学家和编年史家的记述。【315】尽管如此，今天所谓斯多亚学说的全景图仍然得以形成。

整个斯多亚哲学从一个非常特殊的假设出发。据此，人类作为理性生物，以可靠的方式认识着世界。人类的咒语叫作“明见性”（Evidenz）。人类可以区分真与假，可以从世界中获得完全客观的、确定的知识。斯多亚派以此为前提发展了一种与从皮浪直至阿尔克

西劳斯的怀疑论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两个哲学流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长达数个世纪，也就不足为奇了。

斯多亚派哲学家认为，他可以完全把握世界。因为人这个物种拥有一种感性及认知的认识系统，它就是为能够正确认识所有事物而造就的。此外，人还具有一种与认知表象力（*phantasia kataléptiké*）相关的理解能力，它使我们能对事物做出正确判断，并形成概念。这两点都为斯多亚派所坚持。他们认为，通过人去认识真理，这是世界宏图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就让世界万物与人类认识完全吻合。

从这些极其大胆的假定出发，哲学家能够着手去探究宇宙的规律和世界的关联，并揭示出整个宇宙体系。此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哲学能够在系统性上比得过斯多亚派。至此为止，最严谨的体系化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只是确立了不同领域的哲学进路，而非构建一幅宏伟的哲学蓝图。这对斯多亚派来说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切哲学都应服务于良善的、正确的生活，所以万物也必须系统地相互关联起来。斯多亚派因而将柏拉图对浑然一体的哲学的诉求与亚里士多德系统化的多样性融合成一种新的世界体系。【316】此外，斯多亚派也接受了色诺克拉底将哲学分成逻辑学、物理学与伦理学的划分。由此，克吕西普建立了一座无所不包的思想大厦。

几乎与当时的所有哲学家一样，斯多亚派拒绝柏拉图的理念论。他们不相信，精神、理念或理智之物应该比感性的可感事物更具存在的优先性。对于斯多亚派来说，“人”“植物”或“正义”并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而是人的思想产物。也即是说，只有具体的人（作为个体）、具体的植物以及正义的行为真实存在于世界之中。相反，抽象的“人”“植物”等等并不存在，而只是有益的想象。这是一种极其现代的观点，它甚至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并将推动中世纪的思想发展。然而，直到17、18世纪，英国经验论者才真正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哲学。

如果抽象事物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思想产物，那它就使我把目光转向我们为了理解事物运用词语和句子的方式。对克吕西普来说（不同于某些斯多亚派哲学家），逻辑学是哲学的首要部分。人类拥有一种认知系统，它既具有精确理解，也具有理性推断的能力。在理性思维的帮助下，人类能够模仿统摄万物的世界理性。这与赫拉克利特将世界的逻各斯和人的逻各斯统一起来的思路并无二致。斯多亚派哲学家和赫拉克利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认为仅有极少的人进行理性思考，而前者相信每个人原则上都具有这一能力。

当克吕西普谈及“逻辑学”时，他指的是所有跟一种能力相关的事物，这种能力即我们进行理性思考并充分理解客观世界的能力。

【317】我们也许还记得前面提到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辩证法和修辞学都是非常好的人类精神的辅助工具。而它们对于克吕西普来说则意味着更多。它们是钥匙，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解锁世界秩序并将之揭示出来。

斯多亚派哲学家在修辞学上的创新不多，但他们在辩证法和语言逻辑学上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辩证法方面，他们将追求最高原则和终极真理的柏拉图传统，与他们那个时代关于逻辑问题以及诡辩的知识统一起来。语言逻辑学方面，他们也打开了全新的领域。他们认为，我们用以解开世界秩序的钥匙，（除数学外）就是语言的钥匙。因此重要的就是，认识并界定游戏规则，区分合乎逻辑的正确句子和不合逻辑的错误句子。

克吕西普为命题逻辑（Aussagenlogik）奠定了基础，并将一种判断手段，即标准（Kriterium）引入到命题逻辑中。如果一个命题符合清楚明白的标准，那么它就是真的。句子的外在关联（*hypokeimenon*）与意义内容（*lekton*）在克吕西普，也许还有芝诺那里，就已经得到区分——这一区分让19世纪末的数学家弗雷格在思考一个句子的“意义”与“所指”之时灵感迸发。此外，斯多亚派提倡毫无漏洞的论证，即一条论证能够必然地从另一条中推导出来。为此，除了形式逻辑，还需要一种清楚直观的语法，这种语法在当时还不存在。在这一方面，斯多亚派也功绩斐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主语和谓语的联结、进行名词变格、使用各种时态，都要归功于克吕西普。（不过我们的孩子也许会在语法课上咒骂他……）

程序化的世界【318】

克吕西普在逻辑学与语法学领域中的成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这方面已经离开斯多亚的哲学理念很远了。如前所述，实践的生活是斯多亚哲学真正的出发点。斯多亚派的哲人研究关于世界的知识时，总是会带着这个问题：什么能帮助我在尽可能的心境平和中过上幸福生活？

斯多亚派哲学家一定会认为，人们不需要大量形式逻辑的细节知识去获得这种生活。深入了解逻辑学，这在实践上的意义极其有限。通常

一些逻辑的基础知识就可让我们生活无碍。毫无疑问，除了爱好者和专家之外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即使语言逻辑学在今天我们时代的哲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狂热的逻辑学家通常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很好地自理。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给逻辑学留出空间。真正生存着的人们并不按照逻辑学而是按照心理学来生活和做出反应。后者大多数情况下与逻辑相悖。

斯多亚派哲学家的理想不是现实中的人类，而更像是《星际迷航》中的火星斯波克先生那种类型的。一种不受任何刺激与激情影响，不接受任何不合逻辑之事的人。逻辑的重要意义同样在斯多亚派对自然的理解中。因为逻辑思维与整个宇宙的逻辑相符合，所以它才确实如此富有价值。斯多亚派认为，世界本性上是彻底理性的，并且井然有序。与斯波克先生这一人中龙凤的理想类型相应的是，斯多亚派同样带有些许科幻色彩的“物理学”理解。【319】也即是说，斯多亚派哲学家很少检验他们关于自然的观点是否符合自然，这一点是出人意料的。对充分验证的知识的崇尚，在其他情况下对于斯多亚派哲学家而言是神圣的，但在这里却被遗忘。当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那些距离斯多亚派不足一公里的逍遥派成员，致力于精确地研究并揭开自然的奥秘时，斯多亚派哲学家则相信一个关于宇宙本质的完全非科学的神学基本假设。相较于他们在逻辑学中的巨大成就，斯多亚派哲学家在物理学上远远落后于亚里士多德。他们将整个物理学大厦建造在摇摇欲坠的基座上。

斯多亚派关心的不是自然理论，而是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回溯到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那里。斯多亚派主张，有两条永恒的原则统摄世界：神性与物质。神是积极动态的原则，它赋予物质以灵魂并统摄物质。斯多亚派哲学家是泛神论者。他们的神并非创造世界，而是世界内在的塑造力。同赫拉克利特一样，斯多亚派也把这种神力等同于火。正如火“以精通艺术的方式”创造某物又毁灭它，神也以火的形式塑造又摧毁万物。

神力将生长的“种子原则”置于所有物质中。在胚芽中，世界所有未来的变化和发展都被不可更改地制订出来。克里安特斯认为，神赐予物质火一般的力量，确保了世界的“生命热度”。如同克里安特斯所熟谙的《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生命热度给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可湮灭的能量。然而与柏拉图的“世界灵魂”不同，斯多亚派的生命热度是某种身体性而非精神性的事物。世界万物几乎都是身体性的，除了语词、虚无、地点和时间。【320】甚至知识和德性都是身体性的，因为

它们能够改变一个具有知识和德性的人，并对他的灵魂状态产生直接影响。

深入研究过亚里士多德的克吕西普，相对于物理学的“生命热度”，更偏爱接近生物学的概念“气息”。作为赋予生命的动态原则，气息以不同的程度作用于万物。未被赋予生命的物质和植物位于最底层。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斯多亚派哲学家将植物视为无灵魂的，因为它们无法自主掌控生命，而是被掌控的。斯多亚派认为只有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生物才是有灵魂的。因为灵魂的关键是“掌控能力”。如同神统摄物质那样，神性的掌控原则也统摄被赋予灵魂的生命。与动物不同，人能够使这一掌控趋于完美直至完满的自我掌控。倘若成功了，那么他的自我掌控便与世界的神性掌控协调一致。他的生活便完完全全地遵循自然法则。

然而，完美掌控自我的艺术并不简单，因为人的灵魂分为许多部分，它们必须在总体上协调一致，并且处于理性的支配之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秉持这种观点。埃提乌斯写道：“斯多亚派哲学家说掌控能力是灵魂最上层的部分，它产生观念、认同、感觉与驱力。他们也将掌控能力称为一种思维能力。从掌控能力中生长出七个灵魂部分并延展到身体之中——正如珊瑚伸出枝丫那样。”^[121]这些灵魂部分即五种感官、生殖器官和语言系统。

将灵魂拆成部分并给它们排序，是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热衷的事情。今天这些灵魂细目研究则是心理学的专长，【321】因为心理学总是尽可能完整地罗列激情、冲动和感情的清单。然而，这些区分直到今天也尚未被完全确定下来。令人惊讶的是，斯多亚派不将灵魂的掌控能力置于大脑，而是置于心灵中，在那里，掌控能力可以物质性地通过身体延伸到器官中。对他们而言，大脑的位置太过偏僻而无法成为控制中心。在这里，斯多亚派有意同当时最重要的生理学家们保持距离，后者自阿尔克迈翁起就认为灵魂位于大脑中。

对斯多亚派来说，灵魂是一种直接塑造身体的力量。因为灵魂不适时，就会表现在身体的可感表象上，如面色苍白、恶心、皱眉头等。身体的灵魂并不四处飘荡，而是万物关联网络中的一部分。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巨型因果链条。灵魂则为严格的因果性所决定。

然而将世界设想为独一无二的巨型因果链，却并不意味着斯多亚派如其实际地看待自然。和所有古代哲学家一样，他们认为，世界是命运、逻各斯和天意的结果。斯多亚派哲学家故而相信，万物已经被神火

所置的种子精密地预先决定了。由因果构成的永恒的神性世界是既定的，万物的命运也是被决定了的。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例外的，没有什么随意的。换句话说：因果性统治之处，自由已死。而骇人的地方在于，预先确定的世界进程却是向着灾难行进，更确切地说，向着一系列灾难行进。神火不仅塑造世界，也摧毁它。在这一循环的终点，有一场惨烈的末日劫火，万物都将被毁灭。

【322】世界被劫火彻底清空——直到创造和摧毁的轮回重新启动并精确重复。世界进程是一条独一无二的生灭往复的链条，它是永恒、既定的循环。

这是令人震惊的。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与自然法则的协调一致中找到心灵安宁的、泰然自若的斯多亚派哲学家而言，这种想法不应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专注于德性修养，在对万物生灭往复的观照中从容生活。一个反正也影响不了世界进程的人，也无须对此绝望，而是应该首先操心自己的灵魂救赎。然而，如果一切都被精确地预先确定了，这人该如何操心呢？如果严格的因果性根本不允许任何塑造行为和活动空间，塑造个人生命空间又从何而来呢？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特点是，它总是设计不同的模型，在其中世界被不可改变地决定着，同时又承认行动的自由。我们回忆一下，这个问题在恩培多克勒那里就已经存在了。既然相爱与斗争的冷—热冲突最终致使万物湮灭，那么灵魂如何，又为何要改善自身呢？就像之前已指出的那样，类似的矛盾贯穿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学说。而斯多亚派也深陷迷雾。

在过去的信仰中，奥林匹斯诸神决定世界进程，斯多亚派则认为逻各斯的或自然的（这对斯多亚派哲学家是一样的）神圣法则控制着世界命运。一切都被预先决定。但同时斯多亚派又宣称，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人而被设定，并且被以最优的方式设定！那么，命定的末日劫火是所有可能世界里最好的吗？此外，斯多亚派认为，人类应该也能够，并且必须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323】每个人都应该致力于德性，并由此获得幸福生活。但是在一个一切都被预先决定好的世界中，人应该如何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呢？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无限的、被预先决定了的整体关联网络，对于人来说，这种自由不可能存在！

也许这一矛盾对于这类哲学是典型的，它像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学派那般在错误生活中寻找正确生活。因为按照两种学派的观点，几乎所

有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令人迷惑的社会关联中。第一代斯多亚哲人芝诺和克里安特斯看来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预先决定的命运与个人责任之间的矛盾。到克吕西普那里，至少他在努力弱化这个难题。他确实能够有力地表明，尽管命运被决定，但没有人会这样生活，即把自身仅仅感知为必然因果链条中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决定视为我们的决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感觉自己不是为外物所决定。我们是否屈从于刺激或诱惑，似乎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觉得自己有自由意志。

然而，机智的克吕西普所证明的，却不是行动的自由。在一个因果既定的世界中自由地行事，这只是每个人的幻想。连逻辑学家克吕西普也不能真正将自己从这个陷阱中解脱出来。尽管他将人区分为遵循自己的理性本质并由此达到自律的人，和未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人。然而，我是否有能力过上合乎理性的生活，这个问题自我出生之时起就已然不可变更地确定下来了。我视为自由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不是自由的，因为对我而言，我的内心状况决定了我的行为。但这些内心状况不是我个人造成，而是由命运决定的。另外一个论证是当代决定论者，还包括一些脑科学家乐于援引的。【324】如果我不能掌控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是因为因果既定的脑回路预先编排了我的念头，那么就既不存在自由也不存在责任。如此一来，因我的犯罪意图与动机而追究责任的刑罚便似乎是荒谬的。因为一个因果既定的世界不具备追责条件。我们将在本哲学史的第三卷再详细讨论这一难题。

做最好的自己！

如果我的命运被预先决定了，那么我该如何生活？我的灵魂又是如何的？灵魂问题是斯多亚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意式冰激凌店里冰激凌的品种那样五花八门。因为，尽管斯多亚派哲学家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学说却在限定的框架内允许灵魂不朽理论。每一场末日劫火之后世界又会浴火重生。如果这个新世界的设计图纸一成不变的话，那么一再诞生的就是拥有相同灵魂的完全相同的人。克吕西普如是说过：“既然规律如此，那么下面的事就并非不可能，即我们在死去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回到现在的形态。”^[122]但是斯多亚派的哲人并非全都如此确信此事。“如果他们认为在（世界）重生时同一个我也再次诞生，那么他们有理由继续追问，现在的我和那个其他时间里的我是否具有同一性，因为他们在实体层面是同一个，或者我是否是碎片化

的，因为我归属于世界进程的连续序列中。”^[123]

这个问题有非常不同的答案。世界进程精确重复的一个无聊后果就是：【325】我在每一次重生之后过着如同电影《土拨鼠之日》里那般同样的生活。每一次都是相同的遭遇和相同的错误！如此往复亿万年！教父奥利金认为，人及其生活的精确重复学说至少让一些斯多亚派哲学家感到“尴尬”。在重生这一问题上，他们坚持会有一种“微小的、极其细微的差异”。^[124]

认为人是名为自然的巨大的理性世界网络中的一部分，这是所有斯多亚伦理学的出发点。所有道德准则和规范都一律源自并遵循自然法则。在这个意义上，斯多亚派的出发点与今天的生物学家和某些哲学家的相似，他们都试图“以自然主义的方式”阐释并奠基伦理学。人的本性中有什么？人在追求什么？伊壁鸠鲁的答案是“快乐”。斯多亚派的答案分两个部分。首先，人是一种能掌控自己的自然生物。在这一点上，人类与动物一样。此外，人和动物都追求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人起初追求的是有用之物，比如食物、温暖、庇护所等等。接下来所追求的则已经远远超出他们对自身的操心范围。动物也一样。它们关心幼崽的养育，并且彼此维系共同生活的规则。有用性因而包括自我保存与照料他人。

答案的第二部分将人类当作一种特殊的生物。人类不仅拥有欲望，还拥有理性。这极大地扩展并改变了游戏规则。对于理性生物而言，有用的不仅仅是满足欲求的事物，还有能满足理性要求的事物。根据其本性，理性、逻各斯是统摄万物的世界理性的一部分。这一世界理性是无限完满至善的。【326】在逻各斯之气息的催动下，我们的理性希求尽可能与神的理性一致，即变得与后者同样完满至善。因而人作为理性的生物，在本性上致力于做道德上正确的事。从我们的欲望天性出发，我们追求有用之物。从我们的理性天性出发，我们致力于做道德上正确的事。道德上正确的事因而是更高级的有用之物，但这仅限于理性生物。

因为由神—逻各斯统摄的世界是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所以人类理性对道德完美性的追求也全然是善的。在这一意义上，斯多亚派认为完满而有德性的生活是一种自然目的，其源自我们更高的生物本性。作为理性生物，人对善的追求是预先决定好的。每一个错误行为或缺陷都是我们人性—神性的理性程序的偏差。斯多亚派哲学家看不到灰色地带。一个行为要么是善的，即白色的；要么偏离我们的自然程式，是坏的，即黑色的。人类行为一点也不会超出这些范畴，甚至都不会是中立的或者具有多重含义的。

斯多亚派哲学家想要在生物学上证明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人道的”。他们的论证与后人的一种尝试类似，即从设想的人之本性出发，引申出什么是善与恶，以及人理应如何行动。在对人的生物描述与道德要求之间存在一道逻辑鸿沟，前者关于人是什么，后者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条逻辑鸿沟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至休谟对其展开研究并在逻辑上加以澄清。今天的“自然主义者”却一次又一次不小心地摔进去……

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多亚派哲学家过分高估了人的理性。【327】没有其他任何学派或思潮像他们那样将人类行为如此严格地还原为他们的动机。斯多亚派认为好人是理性高度发展的人，以至于他能够准确地知道，哪些思想与行为是值得赞同的。他在完美程序化的理性机器的协助下区分善与恶。斯多亚式贤者的一言一行总是善的，甚至在他有意为善而不得之时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动应当成功实现一个目标。这一观点与斯多亚派相去甚远。后者不认为人可以通过善行积累让善本身变得更多。对于斯多亚贤者而言，行为的结果不重要。他行善，是因为行善对于他自己是好的。

然而，对道德完满状态，即心境平和的不懈追求，本身含有一种巨大的矛盾。德谟克利特哲学和皮浪与伊壁鸠鲁的不动心也涉及心境平和。心境平和对所有人来说是处世的最佳心态。有智慧的人是自在的，因为他与自身同一。这是一个从斯宾诺莎和歌德的时代直至今日，对许多人而言仍然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观念。基督教传统则无法理解这一理想，因为人的救赎不在人本身，而在上帝那里。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告诉我们，人并不是通过旷日持久的劳动而达到泰然自若！然而，斯多亚派恰恰要求：人应该在德性之事上努力劳动，从而最终达到幸福的心境平和。为了洞彻真理、正义与至善，人应当终生修身养性。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观念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心境平和，而是卓越。卓越也体现为在劳动上的精明能干。这对于追求心境平和的人却是困难的，因为劳动与平和并不般配。【328】说某人应该通过努力劳动有朝一日变得自在，这估计是谣言。那一再尝试在极度疲劳中变得更自在的人，从未成功过。

人可以通过磨炼本领来获得更多的幸福，就像钱生钱的资本游戏一样。这种观点是希腊哲学中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在金钱的彼岸寻找幸福的柏拉图和斯多亚派哲学家用资本收益来比喻才干和德性的培养，将其视为一种收益，一种克服挥霍、实践节俭而获得的酬劳。这一点也许

并非偶然。他们用生活艺术的收益思维取代资本收益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和斯多亚派与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小说《吸血鬼之舞》里的那位阿布伦修斯（Abronsius）教授一样，带着他极力抗争的邪恶一道来到了世界。

斯多亚派伦理学的要求是具有挑战性的。斯多亚派哲学家提倡目的导向的行为方式，培养对完善自己有帮助的习惯与态度。斯多亚派的世界是一个自我追寻与自我完善的世界，也即是说只与自己打交道。孩子、妻子、财产与朋友，在生物学上是有用的生活组成部分，但却没有道德价值。

终生的自我完善（*oikeiosis*）是自然的生命程序——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讽刺漫画，我们将其称为纯粹身体性的完美化理想。想一想那些或明确或模糊地将自己当作自身量化运动的一分子进行持续观测和测量的人。在每一个细节上控制营养供给，用专业程序每天监控消化、睡眠、生理周期，计算走过的步数，等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量化和庸俗化了的自我完善。与斯多亚派哲学家一样，对于自身的严格关照助长了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他们神化自身，【329】奉自己的身体为神物，把对自身的关照奉为一种宗教。他们的心境平和是一种身体性的理想状态，斯多亚派追求的则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状态。即使我们通过完美健身的方式去获得心境平和（因为我们会觉得健身并不那么庸俗），这也不会改变我们完美主义诉求本身的非社会性。哲学导师与健身导师是同一枚勋章的两面。

与此相应，斯多亚派哲学家已然将精神的理想状态视为“健康”的最高形式。他们将有损健康的一切东西都病理化，首当其冲的便是激情。斯多亚派的健康生活指南类似医学建议：

在生活实践中不稳定的，并且与自身不和谐的行为或者性格是成问题的……它是混乱的源头，这些混乱……是精神的迷乱和冲动，它们与理性相悖，尤其有碍精神与生活的安宁。因为它们让人徒增烦恼和痛苦，压抑人的精神并以恐惧扰乱它。它们还以无节制的欲求煽动精神……它们是一种与审慎克制极端对立的精神上的无力……只能在德性中被治愈。【125】

不按理性规则生活的人是不健康的。所以医生盖伦写道：克吕西普说过，那些被欲望支配之人的灵魂，“与那些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偶然的诱因出现发烧、腹泻等这类问题的身体相似”【126】。柏拉图曾断言，灵

魂的不同部分彼此争斗会导致灵魂的冲突。斯多亚派哲学家则认为只存在一种唯一的灵魂能力，即起主导作用的理性。【330】而凡是与理性不相符的事物，就是缺陷，一种相对于理性程序的偏离。

不能控制自身欲望、渴求与恐惧的人，如同在不自律中违反交通规则。愤怒、性瘾、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享乐、贪图财富、追名逐利、幸灾乐祸、自我满足（！）、欺骗、犹豫、恐慌、羞愧（！）、迷乱、迷信、惊恐、惊慌、虚荣、同情（！）、悲戚（！）、烦恼（！）、生气、痛苦（！）以及厌恶，都会落在这一交通肇事者头上。^[127]斯多亚派哲学家描绘的理想图景，不仅骇人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是极其冷酷的。17世纪的法国人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写道：斯多亚派哲学家只知人之伟大，却不知人之苦难。

很难相信，斯多亚派中有哪怕一位哲学家如此坚持斯多亚式理想，即真的毫无同情心地生活。总会有一位或其他斯多亚派哲学家清楚意识到，斯多亚式的贤者不是现实，而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典范。谁能真正控制全部冲动，熄灭所有激情并且纯然自足地、坚定地生活？

自然本能与道德要求

随着斯多亚派的发展，他们的理想贤者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也越来越入世。斯多亚派哲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哲学在实践中遭遇了巨大的应用困难。于是问题暴露出来了：人们的自然道德动机与斯多亚派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理想并不相容。也即是说，人们从本性出发，相较于陌生人会更看重自己人。【331】拯救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十个陌生人的生命，在这个选择面前，谁都会选择自己的孩子。

我们认为自己人的道德价值比陌生人高，这是人类的本性。自1960年代以来，对这一生物上的亲近之爱的研究甚至形成了理论：“总体适应”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们认为在生物学上离他近的人比基因上距离远的人更重要，这不仅归因于人心，也归因于基因。然而，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破裂等等现象表明，这种理论在人类生活中并不总是绝对准确。

不论是否取决于基因，比起陌生人，我们更关注被我们视为自己人的亲友。就这点而言，从根本上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这一崇高要求，并不符合，而是悖逆于我们的本性。然而，斯多亚派哲学家却认为，所有人在道德上的平等是理性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人人平等虽然背离我们

的感觉，但却（以理想的方式）符合我们理性的洞见。这一内在矛盾是今天每一种理智的道德思考的出发点。事实上，这一出发点源于斯多亚派。

在平等理想方面，斯多亚派哲学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坚定。芝诺关于国家的著述在彻底性方面使柏拉图都黯然失色。也许这其中含有不少他导师克拉底斯的观点，克拉底斯曾设想一种由平和又知足的人构成的、没有权力中心的国家形态。芝诺批判当时流行的教育课程，并认为神庙没有价值。他也反对货币经济：“人们既不应该为了贸易也不应该为了远行而将货币储蓄视为必需。”^[128]在关于女人的社会角色方面，他号召权利平等并以近乎毛主义的方式，【332】要求规定同样的着装：“最终他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穿同样的服装，不可以完全遮住身体。”^[129]

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芝诺的国家不是由三个彼此隔绝的不同阶级构成的等级制国家。据普鲁塔克说，芝诺设想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同体：“我们应当将所有人看作我们共同体的成员，看作同胞，并且遵循同一种生活方式和同一种秩序，像一群牲畜那样一起吃草，并按照同样的规定被饲养。”^[130]芝诺批判君主政治和政治机关。因为没有谈及任何针对既有政治传统的治理建议，而只是提到应该遵守的法规，他被许多人当作无政府主义，即没有统治者的统治形式的鼻祖。因此芝诺必然也会谴责奴隶制，然而我们并不知晓他的相关论断。他精神上的追随者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变得愈加保守，但却令人遗憾地与奴隶制相安无事，并以斯多亚式的自在包容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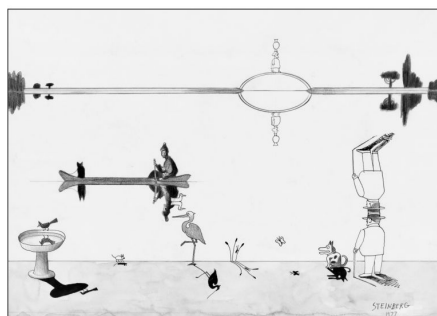
据不光彩的传闻，芝诺接受同类相食与乱伦，在这一点上，克吕西普与他观点一致，并且还有理有据。他的论据甚至能让今天最无畏的社会生物学家都感到恐惧。他说，如果在动物世界中存在同类相食的现象（比如猫科或者鳄鱼目），那么同类相食便是一项自然属性。乱伦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动物懂得乱伦禁忌。既然乱伦显然是动物天性，为什么在人这里就应该是错的呢？虽然芝诺和克吕西普没有为同类相食和乱伦摇旗呐喊。但他们对此也没有进行任何反驳——尽管人们不难看出，没有人愿意成为这种伦理和风俗的牺牲品。【333】而同类相食和乱伦也与斯多亚派哲学家所捍卫的“人性”相悖。

后期斯多亚派哲学家显然不再认可这一伦理上的阴暗点，并且可能对此羞于启齿。他们虽然像爱比克泰德（Epiktet）那样呼吁人们成为“世界公民”^[131]，但他们避免以权利平等和人民解放的诉求对抗当权

者。所以，后期斯多亚派哲人跻身上层统治阶层并进入皇宫，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这些上流阶层也不再生活在日渐衰落的雅典，而是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大都会……

合法化与赋魅【334】

一种新精神的征兆——新兴大都会——罗马的崛起，雅典的遗产——变革者的转变——怀疑天命——摩西，所有哲学家的老师！——变得神圣！——柏拉图式城邦中少数人的沉思



一种新精神的征兆

不知什么时候，大概在公元前250年，希腊世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人能预料到这场地震的巨大后果。事情发生在一个八十年前仍是荒漠，但现在经过空前绝后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的地方——亚历山大里亚！

我们可以把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与纽约相比较，但亚历山大里亚则远远不适合这种比较。在埃及战役中，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像棋盘一样被安置在海角。计划要建立的，至少是一座大都市，在最短的时间内，这里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335】其中有很多来自地中海东部贫瘠的沙漠地带的犹太移民。与希腊人、色雷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以及所有新的城邦居民一样，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

大约公元前25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居民开始着手将希伯来圣经《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语，这可能是在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äus II.）的委托下进行的。至少有很多资料表明了这一点，而且统治者对于犹太人感兴趣也并不奇怪。亚历山大为埃及战役招募了许多犹太移民当兵。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关系是不错的。在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上，犹太人都是托勒密的好臣民，他们给予国王应属于国王的东

西；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与此完全相反，他们饱受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塞琉古的欺凌。

根据传说，72位犹太学者将摩西的五卷书在亚历山大里亚翻译成希腊文。四舍五入就是70位译者，这就产生了“七十子译本”的名称，这一名称很快就成了希腊语版《摩西五经》的专有名称，尽管与历史上的72位译者并不相符。圣经的翻译初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意义很大的事情。这个生活在相当不重要的地区的游牧民族，被腓尼基人与其他海洋民族隔绝，他们的宗教传承有什么特别的呢？一个从没拥有过正当领地的民族，顶多只拥有一些战争胜利者如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后来人们把他们塑造成国王的形象，尽管历史学家未能找到任何关于他们的线索。此外，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只是在迅猛发展的城市中诸多信仰共同体中的一个罢了。

然而，七十子译本只是一场文化震动的开端，这场文化震动在下一个世纪空前绝后地席卷了整个西方与东方文化：【336】亚伯拉罕宗教的胜利之师！它从黑暗中产生。但很多人都说，它的星星之火源于埃及。大概是通过名为“阿肯那顿”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ophis IV.），一神教进入文化史中——对于唯一神的存在与全能的信仰！这种引入规规矩矩的一神教的尝试并没有成功，但是一神教的纲领已经在世界之中了。可以设想，来自埃及的移民将这种新的宗教观念带到了近东与中东——这是摩西与希伯来人出埃及记的故事的一种可能的历史原型。显而易见，移民在地中海东部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了一神教的思想，播撒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的种子，这种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信仰流派。

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犹太人迁出埃及，但他们在托勒密时代迁入埃及的事情在世界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摩西五经》在亚历山大里亚被翻译，当然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光芒四射的希腊世界中，我们要提及的却是一种无足轻重的闪米特人的信仰。希腊奥林匹斯古老的多神论继续在民间信仰中流传，并很快与埃及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为知识分子提供意义的希腊哲学此刻已有三百多年的传统。这一切都处于成长阶段，并将持续存在很长时间。然而，最终亚伯拉罕启示宗教将变得难以抵挡。

犹太宗教及其私生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如海啸般席卷了整个西方文化与近东、中东地区的文化。希腊人在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外衣下的逻各斯宗教已无法再坚守下去。【337】就如基督徒将从

古希腊和罗马的神庙中开掘建造教堂的石块一样，古代哲学提供了精神基石，赋予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信仰以稳定与高雅。斯多亚主义，希腊哲学服装盛宴中最后的晚礼服，也即将面临长期平庸的局面。尽管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von Hippo）相信，使徒保罗和斯多亚主义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有通信往来（这一点之后被发现了），但是斯多亚主义的余晖也已经所剩无几。

古代哲学缺乏质朴简洁、激情、一神教的启示力量以及自上而下进行宗教改革的活力。亚伯拉罕宗教谈论大众的灵魂，这对于古希腊哲学总归是陌生的、不可靠的。不过，民众越多，他们越无历史前提地、混杂地共同生活，就如在亚历山大里亚一样，这样希腊哲学的精英就越自食其果。像赫拉克利特以来的很多哲学家那样不重视民众意见的人，就不能对民众产生影响，他们很快被冲到边缘。尽管距基督徒改变、替代、吸收古代哲学尚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基督教将保留哲学的上层建筑，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也将是基督徒。种子在亚历山大里亚已经播下，这个在许多地方有别于雅典的城市，即将建立全新的文明……

新兴大都会

亚历山大里亚具体的居住人口数和雅典一样是不清楚的。没有户籍管理机构，就不可能有确切的数据，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很好地推测孟买、开罗和墨西哥城的居住人口。【338】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提到，这座城市有30万自由民，这个数字大约十倍于最繁盛时期的雅典。将女人、奴隶和非自由民都算上的话，亚历山大里亚绝对是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从很远处就能看到，在一个近海的小岛上，法罗斯的灯塔欢迎着到来的船只——这是古代世界的自由女神像。灯塔超过百米高，是世界上第一座摩天之塔，它象征着托勒密王国的影响力。

作为经济大都会，亚历山大里亚在建立数十年之后已是世界第一。不计其数的轮船携带粮食离开埃及，驶向地中海的诸多港口。随之而来地，亚历山大里亚人也拥有了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商品。税收与贡赋使得托勒密一世及其后继者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人。金钱流入商船与华丽的战船的制造中。与其他继业者的海上军事竞赛开始了，黎巴嫩、塞浦路斯和南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局部地区的森林被完全毁坏。

托勒密王朝在推动文化发展上也是慷慨大度的。亚历山大里亚大大

小小的图书馆拥有古代世界最全面的藏书。这里应该藏有40万到70万卷书；汇集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书籍，就通过抢夺与欺骗获得。此外，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一位年迈的名人，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他此前在雅典担任负责调节居民与马其顿政府关系的行政长官，现在则找到了一个没有压力的理想工作。

受惠于一个崛起中的帝国用之不竭的财富积累，托勒密王朝在他们的宫殿附近又建造了一个博学园（*Museion*），【339】这是一个学院和研究机构。很快，在其庄严神圣的大厅里（*museion*的本意是“剧院”）就聚集了半个世界的学者和科学家。人的聚集随着资本的积聚而来，有文化的人也不例外。那么，哲学中的重大成就对于博学园来说也就无须赘述。亚历山大里亚的很多哲学家毕竟仅仅是作为无意中的收获进入哲学史的。

自然科学家的成就变得越来越卓越。著名的科斯的普拉克萨戈拉（*Praxagoras von Kos*），他是传奇人物希波克拉底的后继者，当时除狄奥克勒斯-卡里斯托斯（*Diokles Karystos*）以外最有名的医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亚历山大里亚活动。数学方面的传奇人物是欧几里得，他从雅典搬到了亚历山大里亚。这位大概是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绝对可以和当时最伟大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媲美。关于欧几里得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甚至有可能是后人的虚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绝不是他唯一的工作，著名的《几何原本》也不仅仅是几何学，这部最伟大的数学经典，容括了古代所有数学知识。

相反，全能天才昔勒尼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von Kyrene*，公元前276/273—约前194）则在历史上有所记载。他曾在雅典跟随斯多亚派的希俄斯的阿里斯顿（*Ariston von Chios*）和阿尔克西拉乌斯学习。埃拉托斯特尼掌管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五十来年。这段时间里，他系统整理了几乎所有古代的知识，专心研究所有想要了解的领域。作为哲学家，他接近柏拉图，但却与之相反地认为灵魂不是纯粹精神性的，而是肉体性的。他撰写了讨论道德的文章与大量讨论财产的作品，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如同斯多亚主义者那样，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原则上平等地尊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埃拉托斯特尼更重要的身份是“语言学家”，这是一个显然由他自己创造的概念。【340】他致力于语法、文学史，推动文学研究，并且撰写诗歌，此外还有一部关于信使赫尔墨斯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宇宙论、柏拉图的自然哲学以及毕达哥拉斯的天体音乐。

埃拉托斯特尼撰写关于宇宙的作品，并不是偶然。因为作为物理学家、地理学家与天文学家，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惜他的三卷本《地理学》中仅保留下来一些残篇。“地理学”这个概念似乎像其他许多的概念一样，是埃拉托斯特尼自己创造的，它的意思是“地球绘制”。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馆长了解整个地中海地区与一直到印度的亚洲世界。在北方，他命名了大不列颠和坐落在很北面的“图勒”岛。这些都来自马萨里亚（马赛）的皮西亚斯（Pytheas von Massalia）的旅行见闻为依据，这位旅行家吹嘘自己曾乘迦太基商船到北海旅行。“吹嘘”一词在这里当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皮西亚斯是否真的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过大不列颠与“图勒”，还是存在争议的。并且，只有这位作家知道全部真相。想想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奇妙的短篇小说《加迪尔》（Gadir）。小说中，年迈的皮西亚斯被关在迦太基的监狱里，梦想着最后一次向北的逃亡。

埃拉托斯特尼最大的成就是计算了地球的周长。就如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许多希腊人一样，他也从地球是一个球体这个结论出发，并借助无数的佐证与深思熟虑的推测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他的结果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很难验证。我们不清楚，他的测量单位“斯塔蒂亚”（Stadien）是多长。但是人们认为，他测算的周长已经令人惊讶地接近了40 000千米的实际长度。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os von Samos，约公元前310—前230）的研究，他同样有可能在亚历山大里亚待过一段时间。【341】他被认为是日心说宇宙观之父——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相反。他可能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的启发，我们已经详细阐述过后者的宇宙论，菲洛劳斯是在相似的方向上思考问题的。尽管阿里斯塔克斯死后，还有一位很出色的学生，塞琉古的塞琉克斯（Seleukos von Seleukia），但可惜的是他的（宽广的）见解很遗憾并没有传承下去。

亚历山大里亚在那几百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拥有大都会所有的特征：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宫殿也有贫民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路边乞讨的人，有市场的呐喊声也有犯罪行为。它的文化鼎盛时期则是在埃拉托斯特尼的时代。因为之后不久，其他城市就开始崛起，与亚历山大里亚竞争。

在公元前3世纪，它的最古老的竞争对手是地中海最强大的迦太基（Karthago），位于当今突尼斯附近的腓尼基殖民地。这个城邦在那时

已经有40万居民，凭借商船和战船统治着整个西部地中海地区。其政治由寡头和军事力量掌控。他们关于城邦神巴尔-哈蒙（Baal-Hammon）的信仰，在古希腊历史作家看来是黑暗和残暴的；儿童祭品也被提及。这样的环境大概难以孕育出一种迦太基哲学，对于迦太基哲学我们知道的也不多。唯独有一则材料表明，迦太基人克莱托马库斯

（Kleitomachos，公元前187/186—前110/109）据说在其故乡从事哲学，这意味着迦太基可能是有哲学的。克莱托马库斯随后进入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亚历山大里亚的新对手是帕伽蒙（Pergamon）。许多德国人是因为在柏林参观过帕伽蒙博物馆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博物馆看上去好像就建在帕伽蒙当地一样（其实不是）。这个城邦政权以前在小亚细亚半岛北部，公元前200年左右几乎统治了今天整个土耳其西部地区。

【342】在哲学上，它数二流，尽管我们知道来自帕伽蒙的一些哲学家的名字。按照一则著名的传说，是这里的人发明了羊皮纸。这则传说称，帕伽蒙人计划建立一座巨型图书馆，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抗衡。嫉妒的托勒密六世（Ptolemäus IV.）因此采取了经济制裁，禁止向帕伽蒙出口莎草纸。那里的人急中生智发明了羊皮纸，一种用刮下来的动物皮制成的书写材料。即使这段历史不确凿，但帕伽蒙可能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成为羊皮纸的生产中心，逐步降低了莎草纸的使用。

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的安提阿（Antiochia）也不比帕伽蒙逊色。这个城市是托勒密王朝的敌人塞琉古人的主要居住地，之后这座城市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将扮演重要角色。其居住人口在罗马时代一度增长到50万。

这些新兴政权中，从长时间段来看最为重要者，在公元前4世纪成功夺得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但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城邦。在文化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也没有涉足海洋，公元前3世纪仍是二流的商业地区，但这个城邦即将在西方历史上写下一笔，并改天换地。我们说的是——罗马！

罗马的崛起，雅典的遗产

“强盛的迦太基王朝发起过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之后它仍旧强大，第二次之后尚有人居。第三次之后，这个王朝再也无处寻找。”尽管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关于三次布匿战争的概括是为了对第三次世界大

战发出警告，【343】但这也同时是对罗马和迦太基为抢夺地中海优势地位的百年之争的出色总结。公元前264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强国，这两个强大的王朝带着同样梦游式的天真陷入第一次战争。五十二年后，罗马帝国最终击退了迦太基，将统治区域扩张到西西里、撒丁岛以及科西嘉。

第二次战争是第一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受辱的迦太基人在统帅汉尼拔（Hannibal）的指挥下试图打击海洋新霸主罗马在意大利的大本营。在接下来七十年的战争之后，罗马赢得了胜利，将迦太基王朝削弱为一个地区势力。第三次战争意在消灭长期对抗的敌手，结束于公元前146年，罗马只用了三年时间完全摧毁了迦太基王朝。

凭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罗马成功得到了西班牙，同时在南西班牙的矿山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凭借这些宝藏和为军事力量配备的大量经济物资，罗马继续它的政治扩张之路。战争结束不久，罗马就参与了继业者王国的纷争，征服了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此外，公元前156/155年，罗马建造了有纪念意义的公使馆，我们已简单提到过它。为了躲过一项罗马的罚金，雅典人派了三位哲学家去罗马，他们是斯多亚派的塞琉古的第欧根尼（Diogenes von Seleukia），柏拉图学派的昔勒尼的卡尔内阿德斯与逍遥学派的克里托劳斯（Kritolaos）。三位聪明人物组成的使团并没有在罗马人那里得到预期的结果，但他们对帝国决策者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344】与此同时，罗马人继续他们的政治扩张。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强大的帕伽蒙也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最终，塞琉古王朝的最后一部分残余也并入罗马帝国，成了叙利亚行省。

罗马人向其他国家成功发动战争并获得土地时，罗马在内政方面却没有任何改观。最为棘手的是罗马农村人口的状况。为了满足整个地中海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需求，农民被强制服兵役，因而他们在意大利的田地都荒芜了。在西班牙、希腊与小亚细亚，新掠夺来的土地毫无悬念地落入富人手中，他们自行决定向农民征税。如此看来，罗马士兵在有野心且富有的地主的领导下，是在与自己的利益相斗争。而当罗马的贵族和大地主变得极其富有，他们常胜的步兵却经常被迫贩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成为农奴。正如在希腊，罗马的上层社会不需要下层社会作为消费者。此外，数十万免费劳动力成为奴隶，而这些人是通过战争劫掠来的。

因此公元前2世纪，罗马内部发生了起义和内战，就丝毫不令人奇

怪了。军事上过度迅猛发展成霸权的罗马帝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应付和处理国内已经彻底改变的状况。当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和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兄弟俩通过土地改革推行一种新的社会协议时，极端保守的罗马上层社会则极力反对任何变革。温和保守的元老院议员小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der Jüngere）接任了特别关键的职位。他是那位在扎马战役中给汉尼拔以重创的大西庇阿的养孙。【345】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毁灭了迦太基，年轻的小西庇阿名声大振。此外，尽管他残忍地毁灭了迦太基，但他的支持者西塞罗仍将他描述为一个考虑周全且有教养的人。

小西庇阿所受的大部分教育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位希腊人，他在公元前167年罗马攻占希腊后作为俘虏来到了罗马：麦加洛波里斯的波里比阿（Polybios von Megalopolis，约公元前200—前120）。波里比阿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很快就在罗马引人注目，并激发了罗马贵族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创作了关于布匿战争的规模宏大的历史作品，这部作品引人注目，因为他支持罗马人。波里比阿作为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都在于试图确立和捍卫罗马作为世界霸权的合法性。

作为世界历史中的暴发户，罗马也需要这种正当性辩护。波里比阿做了很大的努力，从哲学和文化史上为罗马帝国在历史中定位，这比对希腊城邦进行定位要更为深入与仔细。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城邦之外的人都视为野蛮人，而波里比阿则必须将罗马的发展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中。如果现在是罗马而不是传统的雅典和闪耀的亚历山大里亚处于文化史发展的顶端，那就需要大量论证。在他的四卷本历史著作中，波里比阿从很多领域都进行了探讨，从对人类本性（人类学）的总体思考，到宪法权利的问题。最终，在波里比阿眼中，宪法使得罗马成为合法的世界霸权，这是一种独特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元素的混合物，正如波里比阿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

波里比阿将罗马人的国家描绘得如此美好，是有一些讽刺意义的，【346】因为那时正是罗马内部矛盾十分激烈的时候，它正陷入土地、财富与决策权的合理分配问题引发的激烈内战中。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那个时代成功服务于新主人的希腊人。与波里比阿齐名的还有罗德岛的帕奈提奥斯（Panaitios von Rhodos，约公元前185—前109）。他也来自贵族家庭，在帕伽蒙和雅典学习。公元前129年，他成为斯多亚派的掌门人。他和罗马名人圈子关系很密切。帕奈提奥斯认识波里比

阿，他曾陪同小西庇阿去往埃及和亚洲。他在哲学上的功绩则表现在对斯多亚哲学大胆且惊人的改造。

变革者的转变

为什么会有人类？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谁思考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古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要研究，更是所有哲学与宗教都要处理的问题。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将世界构想得如斯多亚主义者那样，将其裁剪得如此与人类相匹配。斯多亚主义世界观漫画式地以人为中心。整个自然应该仅只围绕人类的意志而存在！这样，根据克吕西普的想法，甚至猪的灵魂也是神赠予人类的礼物。同样，盐帮助我们保存鱼类、调味，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品尝美味。^[132]

人类是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世界属于人类。帕奈提奥斯的学说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文化理论上对他的斯多亚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价。【347】这个合目的的世界的神性天命，世界理性的计划，不仅至上的生物——人类，而且所有其他生物都应该服从它。不，人类之中的最优者与不那么卓越者也是如此的。而最优者就是胜利与光荣的罗马人，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吃惊。

持同样观点的是帕奈提奥斯最有名且最有学问的学生，阿帕美亚的波赛东尼奥（Poseidonios von Apameia，公元前135—前51）。他同样为最强大的统治者辩护，认为他是最智慧的，因为世界理性仅仅将力量赋予那些精神上尤为卓越的人。诗人维吉尔（Vergil）之后曾就罗马的统治使命的问题向神话中罗马的建立者埃涅阿斯（Aeneas）的父亲——特洛伊人安基塞斯（Anchises）说道：“罗马人，你要考虑，用统治的方式去引导民众。/这应是你的技艺：提升教化与和平，/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反抗的人要使之屈服。”^[133]

按照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的看法，对于罗马人来说，世界的其余部分就相当于对于希腊城邦居民来说的野蛮人。尽管帕奈提奥斯是希腊人，波赛东尼奥则是叙利亚人！他们在罗马的功绩远比他们的出身重要。芝诺与克吕西普如果听到他们的学说，一定会愤怒地敲打棺材，但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似乎对此并无所谓。因为第一代斯多亚主义不是任何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他们也不想成为意识形态。想想芝诺的牧群图景，其中所有的人都似乎不受统治地生活。再想想，芝诺的国家乌托邦并不是指向未来的。恰恰相反，面对腐败和利欲熏心的文明中的错误

与歧途，它是一种对假想的自然状态的复归。芝诺的人类社会理想状态并不是帝国。它从来不是“金灿灿的”，而是一片和平的牧羊草地，尽管他也承认其中存在着乱伦与种种野蛮……

而在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那里恰恰相反，【348】罗马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自斯多亚主义。当任何一个罗马统治者、议员或皇帝拥护一种哲学时，这一哲学都具有斯多亚主义的特征（恺撒的例外忽略不计）。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所教授的东西中，不再有任何令人不安的东西。在政治上，它服务于罗马统治的合法性、对家庭（与批评者柏拉图或芝诺相反）与私有财产的辩护。之前严肃的斯多亚主义伦理学由此获得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特征。新的斯多亚主义者灵活地适应着大众日常心理的挑战。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对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实际效用表现得极为兴奋。这些对于早期斯多亚主义者来说，甚至连次要的东西都不是，现在却进入了哲学思考的中心：人类凭借双手幸运地成为自然的塑造者和统治者。在帕奈提奥斯看来，人类成为“第二”自然、自行生产的自然的创造者。而创造的手段则是手、工具和技术。“让地球听命于你！”这是罗马—斯多亚主义的创世任务。柏拉图主义者的精神性世界观与逍遥学派的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此不假思索地融为一体。

在这个掌控自然的精神—经验性任务中，相当重要的是对财产的自然权利。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知道，“由自然出发”并不存在所有权。克吕西普对此并不赞同，难道对于财产的权利只是一种暂时的要求？他没有责骂富人：“正如一个人走入剧院，占了一个位置，把其他后来的人都挤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原本所有人共享的东西，现在只由他独享：这就是富人。因为在他们事先占有了公共的东西之后，他们通过抢先夺取而将这些变为自己的财产。【349】如果每个人仅索取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东西，而把其他人需要的留给他人，哪里还有富人，哪里还有穷人呢？”^[134]

然而，帕奈提奥斯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即心理学式的对财产的辩护。对他来说，人类文化的历史中的一切，都开始于我们的祖先想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从这里发展出城邦的保护区。相反，试图彻底清除和重新分配传留下来的财产的人，是有罪的，帕奈提奥斯的这一论证，可能是为了反对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

私有财产法是一种习惯法，无论是先来的人还是前来争夺的人，都

应该将其维持下去。这种论证并不特别有说服力。如何为罗马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量土地掠夺辩护呢？希腊人、色雷斯人、帕伽蒙人、叙利亚人等等，他们的土地以前并不属于罗马。为什么在罗马城里适用的，对于那些罗马城之外的罗马人就不适用呢？

中期的和更晚的斯多亚主义者为财产权奠基，还缺少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后来的自由主义是决定性的，它就是“成就”的概念！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如果财产属于我，那是因为我基于劳动成就获得了它（或者基于我祖先的劳动成就）。财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能力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有能力者应该获得并保有他应得的东西。然而，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一样都缺少成就的概念。公民并不通过劳动获取什么，妇女和奴隶也是。能力是人们在经过训练的伦理交往中自己培养的，而不是借助劳动工具。

在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看来，适用于财产概念的，同样适用于政治。一切都应该如其所是地维持下去。【350】少数强大的领导者应该引领生活在罗马帝国中的大众，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年轻的罗马人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在罗德岛的波希多尼的哲学学校学习的正是这些。西塞罗是贵族家庭的后代，之前在罗马和希腊学习。几乎所有我们关于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的信息都要归功于他的记载。西塞罗首先致力于哲学研究将近20年，撰写了大量作品，并将许多希腊文书籍翻译成拉丁文。作为优雅的文体学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属于罗马最为优秀的人物，随后他开始了变幻无常的从政经历，先成为执行长官，之后陷入生命危险。他被恺撒的后继者所迫害，并于公元前43年自尽。

西塞罗将成为欧洲修辞学最重要的导师。他的巨大影响在于简明扼要的文风，他精通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来定义。此外，他将智慧与说服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智慧若没有雄辩是没有用的，而雄辩没有智慧则会造成许多灾祸。

西塞罗的哲学接近斯多亚派，但也有很多柏拉图式的思考。这给他带来“折中主义者”的名声，即在自己不参与的情况下从所有东西中挑选出合适的。西塞罗对罗马的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更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学。他让罗马人了解，人类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能动的。他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倡导自我责任。同时，他接续了柏拉图关于伦理学与城邦哲学的思考。西塞罗关于城邦（《论共和国》[*De republica*]）和法律的著作（《论法律》[*De legibus*]）讨论的是《理

想国》和《法律篇》的中心思想。然而，他的城邦理论比柏拉图更为现代。对于西塞罗来说，城邦是基于权利约定与利益共同体而建立的。城邦的基础是，在正义和有益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他的政治哲学的终点不是梦想中的理想国或者想象出来的马格尼西亚，【351】而是罗马共和国，正如之前的帕奈提奥斯，他以同样的热忱宣称，罗马的宪法是所有宪法中最好的。

怀疑天命

中期和年轻的斯多亚派在很长时间内费尽心思地为帝国的现状辩护。而这也使得斯多亚派成了真正的罗马官方哲学。为此，对斯多亚主义做出重大改变也是有必要的。人们抛弃了普遍原则，将伦理学几乎仅仅移到私人领域。我自己认为正确和可敬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我的政治行为！对事物的基本看法与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无须在逻辑与实际上保持一致。罗马的斯多亚主义者具有异常灵活的原则。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适应政治生活。

同样进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则仅仅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在斯多亚主义者看来，伊壁鸠鲁主义是大众哲学的快餐，但这一看法肯定是不准确的。毕竟在恺撒身边，更多的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他自己也可能跟伊壁鸠鲁的学说很接近。同样，像维吉尔和贺拉斯（Horaz）这样的诗人也钟情于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它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伽达拉的菲罗德谟斯（Philodemos von Gadara，约公元前110—前40），他当时从现在的约旦来到罗马。他的作品被认为简单易懂。菲罗德谟斯撰写哲学和文学的文本为伊壁鸠鲁辩护。留传下来的主要是诗歌集，其中部分带有色情的内容。菲罗德谟斯为受到抨击的伊壁鸠鲁主义做了详细的辩护，这不是偶然事件，因为其他哲学学派，尤其是斯多亚主义最为反对伊壁鸠鲁的学说。

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需要辩护。【352】把人类看作一种神性天命的目标以及把罗马帝国理解为历史理所应当的终结，伊壁鸠鲁学派与此观点相距甚远。而著名伊壁鸠鲁主义者卢克莱修（Lukrez，约公元前95—前55）的诗作《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则发展出一种特别现代的自然演化论图景。据此，在人类诞生之前，我们的世界已经持续经历着动植物的来回往复了。没有什么会长久存在的。“时间改变整个宇宙，地球上遍布着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

以至于一种状态不可能再生成它曾经所是的样子，而是要变成它之前不可能的样子。”^[135]卢克莱修不讨论那个只服务于人类的自然母亲，而是讨论“自然继母”（*natura noverca*）。对卢克莱修来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财产和金子不是天命有意创造出来的元素，而是分裂、不幸、争执的源头。

一种对自然与文化的考察，不把现状视为永恒和终极的，并将财产看作有害的东西，这不适合作为官方哲学。它甚至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清醒地保持对罗马的世界秩序的怀疑。甚至如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公元前1—65）这样著名的斯多亚主义者，都没办法摆脱对这个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伊壁鸠鲁式怀疑。也许这位在罗马飞黄腾达的富有的西班牙人，总的来说是被阅读最多的斯多亚主义者。他信奉心境平和（*ataraxia*）和泰然自若（*apatheia*）的理想，为理性对于激情的优先地位辩护，是人类平等的坚定支持者，慎重地批判奴隶制度。命运将重担加之于他，使他成为国师，培养罗马皇帝中最残忍和疯狂的尼禄（Nero），这应该对塞涅卡泰然自若的能力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塞涅卡被他的学生所迫而自杀之前，在诸多信件中，【353】没有忘记对斯多亚主义的自然—神式的天命进行立场鲜明的批判。在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渗透将世界尽数摧毁之前，一切本应该是更好的，对芝诺和克吕西普来说是如此，对塞涅卡来说也是如此：“你说什么？哲学教会人类使用钥匙和门闩？那除了给贪婪的人以暗示，还有什么别的？哲学为处于巨大危险之下的居民建造了高大的建筑？依靠偶然措施来保护自己，在没有技术和困难的条件下发现自然住处，这还不够吗？相信我，在建筑师和泥水匠之前的时代是幸福的。”^[136]塞涅卡沉溺于一种对技术和文化进步的深深的悲观主义中，而非通常的历史乐观主义——一千七百年之后，一位来自日内瓦的钟表匠之子，卢梭，以同样的态度在哲学中引起了轰动……

尼禄狂暴地迫害了越来越多重要的斯多亚主义者之后，曾经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快失去了影响力。晚期的斯多亚主义者，例如来自今日土耳其中部弗里吉亚地区被释放的奴隶爱比克泰德（约50—约138），尽管使斯多亚伦理学更为精进，但在政治上持消极态度。最后一位伟大的斯多亚主义者，皇帝马可·奥勒留（121—180），他用古希腊语撰写的《沉思录》，并不面向广泛的大众，而仅为自己。这些在今天各种格言集中都不会缺席的精炼语句，劝导人们在巨大的世界整体面前保持谦虚、恭敬和泰然自若。

皇帝对伊壁鸠鲁格言做的注解几乎与原文相混淆，考虑到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百年的敌对，这看起来有些讽刺。“幸福，意味着拥有好的品格”^[137]；“一根苦的黄瓜？把它扔掉吧！路上的荆棘？【354】避开它吧！就这样。不要再问：世界上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东西？”^[138]；“人们在乡村的田野、海岸边、山中寻求隐居。然而，这种愿望产生于一种狭隘的观点！只要你想要，任何时候你都能做到，抽身返回你自己。没有任何比人类灵魂更安静而不受干扰的避身之处。”^[139]关于永恒的智慧：“那些你时常沉思的想法完全是你的意向。”^[140]

斯多亚主义的思想保留下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从一种严格、无情的教条出发，要求在一中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自我完善，到技术与政治上罗马的统治使命，直到马可·奥勒留的自我沉思中寂静的忧郁！一开始，斯多亚主义是一种社会纲领，一个改变世界的计划。到最后，它成了一种心理上敏锐与智慧的私人哲学，不再洞悉统治使命，“谁能够改变人们的基本原则呢？”^[141]伴随着这句机敏的话的，一定是一种谨慎的畏惧。作为皇帝，马可·奥勒留必须为自尼禄以来对于基督教最为残忍的迫害负责！当他在日耳曼，在多瑙河边将其敏锐的自我沉思写在羊皮纸上时，他也让这种政策在那个时代贯彻。

这种迫害和大屠杀也许有许多缘由。罗马人需要为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帝国发生的瘟疫和经济危机找替罪羊。此外，竞技场上缺少足够的罪犯，为了重启持续停滞的马戏团式的谋杀戏剧，基督徒刚好被抓去填补空缺。在西方观念史上，马可·奥勒留对基督教的迫害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防御，【355】它给予观念与意义世界未来的意识形态赢家又一次持续的伤害。

2世纪，基督教从获胜到取代一切或者被接纳为西方的主流文化，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巧妙地利用哲学迂回前行，为的是逐步渗透到有教养的人之中——借助柏拉图主义！

摩西，所有哲学家的老师！

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斯多亚主义已经是一种非正式的官方哲学，罗马统帅苏拉（Sulla）的军队大肆毁坏雅典阿卡德米学园地区。公元前86年，西方最为古老的思想工厂长达300年的历史结束了。它的遗产由一个来自今天以色列南部的人继承：亚实基伦的安条克（Antiochos von Askalon，约公元前130—前68）。大约在公元前110年，他生活在雅

典，同时在阿卡德米学园和斯多亚派学习。罗马人向雅典逼近时，安条克逃到了罗马人的军营，并与一位苏拉军队的军官卢库鲁斯（Lucullus）成了朋友。此后不久，安条克陪同卢库鲁斯去了昔勒尼和亚历山大里亚。

回到雅典，他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哲学学校，他秉承阿卡德米学园的传统，称之为“老阿卡德米”（Alte Akademie）。它的名声很大，为了在安条克身边学习，很多出身高贵的罗马人前往雅典。西塞罗也寻找“老阿卡德米”，作为学习园地。尽管要完成繁忙的教学任务，安条克还是抽出时间陪同参加了他越发具有影响力的朋友卢库鲁斯的战役，也就是向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进军，这位哲学家死于那里，原因不明。

安条克的野心是将古希腊哲学统一于一个唯一的空间性和精神性的顶层之下。【356】在学习时代，他自己在阿卡德米学园以怀疑论者的身份出场，随后，在建立了“老阿卡德米”后，他彻底地批评任何形式的怀疑主义。阿尔克西拉乌斯和他的后代门生成了他公开的敌人。安条克指责他们严重背叛了柏拉图的哲学，并计划在古老的精神中再次恢复这种哲学。因此，他的学校取名为“老阿卡德米”。

那么，“原初的”柏拉图要如何继续保留下来呢？在柏拉图的继承者以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将柏拉图完善和系统化（色诺克拉底），后来又以片段的方式碎片化（阿尔克西拉乌斯）之后，在公元前1世纪，柏拉图在思想上已经死亡。然而，安条克活力四射地工作着。他并不把斯多亚派和逍遥学派理解为竞争对手。一切难道不都是起源于柏拉图的精神吗？对安条克来说，斯多亚主义者比起在阿卡德米学园持怀疑论的叛变者更为接近柏拉图。而安条克也向逍遥学派伸出手，去再次收集那些从柏拉图树干远端掉落下来的苹果。

但是，一份手稿显示出，安条克是用什么来冒充真正的柏拉图哲学，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离斯多亚主义者更近，而非柏拉图。斯多亚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即世界的身体性的基础建筑（物理学），以及它的目标，即心境平和，这些与德谟克利特类似，而非柏拉图。芝诺（还有伊壁鸠鲁也是）接受了小幅修改过的德谟克利特学说的导论和结尾章节。只有中间部分的阐述不一样。

安条克的物理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唯物主义的，而非像柏拉图那样精神性的。物质被一种作用力渗透于其中，根据神的天命构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357】柏拉图至少有时会去论证星空彼岸的理念，但安条克对此从未知晓。这一切在之后都给安条克带来了这样的名声，即戴着柏

柏拉图主义者面具的斯多亚主义伪装者。

事实上，这一点对于所有伟大的希腊思想流派都是一样的，即力求一种自制与泰然自若的状态。德谟克利特和芝诺的心境平和，与皮浪式怀疑主义者和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不动心状态是相近的。而著名的追求灵魂安宁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理念与此相距并不远。不管在具体问题中如何恼怒地互相敌视，但在一种值得向往的情绪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家则是非常一致的。有争议的是，共同体、社会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纳入对于成功生活的考量。同样有争议的是，一个智慧的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和容许肉体的快乐与舒适。

关于这点，安条克在方法上明显偏离了既往的哲学观念轨道。为什么身体不能对于人类的幸福做出主要贡献？对他来说，健康的身体状况、正直的身体姿态和优雅的步态也都绝对属于和谐的灵魂总体状态。类似这样的平衡，同样适用于幸福或政治问题。声望和统治不能给灵魂带来和平，其反面状况，即全然的隐退也无法做到。

当安条克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期间逝世时，他或许相信，他以现代化的方式拯救了古老的柏拉图学说。他的弟弟和学生阿里斯托斯（Aristos von Askalon）在之后的二十年中继续在雅典教授综合法。此外，他还同时教导马可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也就是历史上恺撒的谋杀者。然而，随着阿里斯托斯在大约公元前45年去世，“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这条线索在世界上也中断了。因为，后来的几百年中作为“柏拉图主义”轰动一时的东西与柏拉图本人已不再相同，【358】这就像唐老鸭与野鸭一样。

“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并不在雅典，而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在这里，柏拉图主义很快与犹太人从其故乡带来的新精神关联在一起。同样，亚历山大里亚在公元前1世纪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而成为像埃及那样的罗马帝国的外省。罗马的当权者庞贝（Pompeius）、恺撒和安东尼奥（Marcus Antonius）相继来到了这个城市。甚至托勒密公主克利奥帕特拉七世（Kleopatra VII.）与恺撒和安东尼奥的火热情事，都不能削弱罗马人对该地的军事控制。最终，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an）治下的罗马帝国将其吞并。这场骚乱的牺牲者并不仅仅是托勒密王朝，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不确定，公元前48年燃起大火的港口中，安置了多少库房的书籍。

但亚历山大里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动摇。作为罗马的粮仓，这座城市养活了帝国大部分人。在这变动的时刻，亚历山大

里亚的欧陀罗斯 (Eudoros von Alexandria) 对罗马当权者产生了影响。他自认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信徒”。欧陀罗斯援引了许多据称是关于毕达哥拉斯生平的流行作品。这些作品自公元前3、前2世纪以来经常在古代世界流传。在很多事实并不清楚的情况下，欧陀罗斯将毕达哥拉斯解释为西方哲学真正的鼻祖。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斯多亚派那里引以为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这位哲学大师的模仿。

欧陀罗斯揭示“真正的毕达哥拉斯”的要求，与安条克的一个大胆主张有关，即复兴“真正的柏拉图”。【359】然而，另一位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家认为，对这位应将一切都归功于他的伟大的精神导师的追寻，是完全荒谬的。他即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hilon von Anxiandira)。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教家庭，生活于1世纪的前半期。斐洛与许多在亚历山大里亚有影响力的犹太教徒一样，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七十子译本”对他来说反倒是陌生的，最初显得尤为晦暗不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斐洛把心思花在了将摩西书中的晦暗世界与在亚历山大里亚备受青睐的毕达哥拉斯叙事统一起来。最终，他在埃及的沙漠上描绘了一个深奥的谱系。据此，受到神性启示的摩西成了所有哲学的源头，他的学生是伟大的毕达哥拉斯，之后他把知识传给了柏拉图。这种哲学的噱头不仅是将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粗暴地融合在一起。它的登峰造极在于，以一种哲学—宗教的恭顺姿态面对唯一的犹太神，该神以魔力般的智慧将自己传达给古希腊哲学。

斐洛可能是一个幻想家，然而，将摩西与古希腊哲学相融合的观点，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想法。叙利亚人阿帕美亚的努梅尼奥斯 (Numenios von Apameia) 于2世纪把柏拉图归为一种强大的宗教流派，与印度的婆罗门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的门徒及埃及的宗教观念并列。所有这些宗教都分享唯一真正的真理见证，而柏拉图只是这种智慧的传话人之一，一位“在阿提卡言说的摩西”。

对于斐洛和努梅尼奥斯来说，历史上的柏拉图，比歌德之于现在的我们更加遥远。而较之于马丁·路德与今天的我们，毕达哥拉斯则与他相隔更多个世纪。然而，他们决定性地为未来的几个世纪塑造了独特的柏拉图形象。最主要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成问题的《蒂迈欧篇》以其毕达哥拉斯式的宇宙观，从那时开始将作为柏拉图的遗赠继续存在下去。【360】在这个解释中，他看起来像一位天地之间的神秘大人物。从柏拉图的造物主出发，塑造物质的建造师在斐洛那里，则成了一位全能的世界创造者，与《摩西五经》中的创世之神相提并论。而柏拉图在

精神与物质那里发现了两种原初规则，到了斐洛那里则以毕达哥拉斯的传统分为三种。正如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直角三角形是一切知识的始端，在斐洛看来，世界也是由三性（Trias）支配的。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思想形象。因为从这里到后来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只差一小步了……

变得神圣！

大约在基督出生前后的一百年内，每一种哲学都造就了他们自己的柏拉图。许多人仅仅只是把柏拉图的财产当门面而已。与我们称之为“柏拉图主义”相关联的，是一堆混乱的观念。最有影响力的是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教士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约45—约125），他极为勤奋，博闻强识。他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历史和哲学史最重要的源头。毕竟，现在尚存他一半的作品，有250多篇。在历经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学习生涯之后，他在德尔斐神庙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他最重要的老师叫阿谟尼乌斯（Ammonios），从名字看起来像是一位埃及人，我们只能通过普鲁塔克的著作了解他。普鲁塔克将他看作一位带有埃及传统中典型的强大精神——宗教特质的柏拉图主义者。生活的目标不再仅仅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的自制，而是尝试尽可能与神相似。

从柏拉图作品《泰阿泰德篇》和《理想国》中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有智慧的人应该“同神相似”。^[142]【361】然而，柏拉图可能想表达的是，不存在人格化的神，顶多存在“具有神性者”（das Göttliche）。相反，阿谟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将绝对的神性定义为阿波罗。生活的目标则是竭力仿效甚至成为阿波罗。虽然不能证明普鲁塔克与基督教以某种方式相关联，但他的神及其神性德性与基督显然非常接近：温和、宽厚、宽恕、好心肠、爱人。

然而，普鲁塔克不仅为人类保留了这些德性。他让这些德性也适用于与动物打交道！秉承素食主义者毕达哥拉斯的传统，他猛烈地抨击斯多亚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吃肉行为：

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毕达哥拉斯不吃肉吗？我多次问自己，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情感与理智状态下第一次对此有所触动：满嘴嗜血，用嘴巴对付死尸的肉，把死亡和不新鲜的肉体端上桌，作为配菜和主食的一部分，而这些肉体不久之前在其面前咆哮嘶吼、活动、四处张望。他的视觉如何忍受生物被宰杀、剥

皮与肢解的血腥景象，他的嗅觉如何承受恶臭；肮脏并没有让他的味觉远离伤口与从死尸伤口中流出来的汁液，这又如何可能？^[143]

有别于毕达哥拉斯信徒，普鲁塔克没有用灵魂转世来为禁止食肉作依据。他认为灵魂转世是可以设想的，但无法证实。他对于放弃食肉的理由是基于同情以及对造物的仁慈。此外，人们应该从无节制的恶习与享乐中净化自己的身体与精神，以此更接近神，完善自身。【362】在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有这种节制的传统。阿卡德米学园有两任校长，色诺克拉底和珀勒蒙曾主张素食主义。而在普鲁塔克的同时代人与精神上的继承人中，也存在几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如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os von Tyana，约40—约120）、普罗提诺（205—270）与波菲利（Porphyrios，约233—301/305）。我们将详细讨论后两位人物。

普罗提诺出生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一个庄园，在许多看来他是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后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其中一个理由是确定无疑的，即所有他的54部作品后世都保存了下来——同诸多其他哲学家相比真是一个幸运的例外！他的学生波菲利的命运在很多方面与普罗提诺紧密相连，他根据内容分类将普罗提诺的作品进行了整理，此外还描绘了普罗提诺详细的生活图景。今天我们认为，除去个别关于神圣的普罗提诺的奇迹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可靠的来源。

普罗提诺28岁时前往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亚历山大里亚众多柏拉图主义者之中的阿蒙尼奥斯·萨卡斯（Ammonios Sakkas）的学生。此外，阿蒙尼奥斯至少年轻时是一名基督徒，可能之后也一直是。3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是一座基督教之城，同样也是之后残忍迫害的发生地。从阿蒙尼奥斯的哲学中，我们只能知道，他与众多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致力于调解众多哲学流派的矛盾，以发掘出一种唯一真正的哲学。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里亚跟随阿蒙尼奥斯11年。243年，他陪同年轻的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征战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然而，镇压波斯人起义的战争最终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国王战死，普罗提诺穿越安提阿来到罗马，之后在那里度过余生。

在帝国首都，普罗提诺很快就大受欢迎，【363】有像阿梅里奥斯·根提里阿诺斯（Amelios Gentilianos）和波菲利这样有天赋的学生围绕在他身边。元老院议员、最高行政长官，甚至皇室成员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和萨隆尼安娜（Saloniana）都属于他的听众。一段时间

后，普罗提诺在罗马结交了许多朋友，进入了上流圈子。据波菲利所说，他应该当过仲裁法庭的法官，多次做过监护人以及基金管理人。他一开始只做口头上的教授，十年之后才开始撰写作品。普罗提诺用希腊语写作，只将作品讲给听众听，长期以来拒绝将其作品发表。每部作品与一个不同的主题相关，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完整体系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普罗提诺将自己视作柏拉图的继承者。而正如许多其他柏拉图主义者所理解的，他要“真正”成为柏拉图的忠实解释者，他要阐明柏拉图没有写出来的学说与隐藏着的整体体系。

普罗提诺很清楚，3世纪的希腊哲学并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遭到猛烈的迫害，基督教仍然从底层赢得了越来越多信众。与柏拉图主义者、斯多亚主义者、伊壁鸠鲁主义者和逍遥派人士不同，基督教以包罗万象的总体性与一神论吸引了所有对个人生活感兴趣的人。基督教的神是一位仁慈的父亲，而非一个“不动的推动者”，或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或一种作用力抑或伊壁鸠鲁那里一群对世事漠不关心的逍遥者。

如果普罗提诺想让柏拉图哲学变得吸引人，他就不能忽略那些竞争对手。相应地，他花了很多时间亲自或者委托他的学生去反驳竞争对手。他最钟意的对手是我们今天统称为诺斯替（Gnosis）的宗教思潮——这个词在普罗提诺的时代，用于一切可能的教义与理智的直观。诺斯替派信徒共同追求的是，在狭隘的肉体世界中得到宗教救赎；

【364】这种愿望我们早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普罗提诺也关心类似的精神救赎，所以他也将诺斯替派视作竞争者。让普罗提诺特别愤怒的是，诺斯替派信徒不把世俗世界视为对精神世界不完满的模仿，而是看作完全失败的作品。世界上存在着制作失败的造物，这对于普罗提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他而言，即便不完满的世俗世界隐约觉察到这一点，那个世界也是完美无缺的，不可能变得更好。因此普罗提诺猛烈地抨击他的对手。

普罗提诺把反对基督教的修辞学论战委托给他的学生波菲利。对于他来说，基督教的信仰同所有宗教的传统一样，是不清晰的，与柏拉图哲学中的概念阐明工作相比也是含混不清的。宗教对于波菲利和普罗提诺来说只是知识的入门阶段，它缺乏真正启悟人的洞见。

令人吃惊的是，与此相反，波菲利把另外一种冥思视为纯粹的知识来源，即卡尔迪亚预言（*Chaldäischen Orakel*）。据称，这位托名的作者是一名术士，通神术士尤里安（Julian der Theurg），流传着许多他的奇异事迹。预言真正的创作者应该来自努梅尼奥斯（Numenios）学

派，这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把柏拉图置入东方的宗教传统中。2世纪末，马可·奥勒留统治的时期，这种预言非常盛行。它包含了对人类重要问题的回答。此外，它也提出了毕达哥拉斯式的三性，正如我们从斐洛和努梅尼奥斯那里知道的。卡尔迪亚预言中的神是父亲、权力与精神三位一体。波菲利用柏拉图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存在、生命与精神，并以此对抗基督教。上帝成为人，即耶稣，这并不符合他的新柏拉图主义三位一体学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后来采纳了波菲利反驳言论的核心思想。【365】当基督教今日将上帝的显现形式称为圣父、圣子与圣灵时，它站在它最尖刻的敌人的肩膀之上，却将其文章烧毁……

波菲利的老师普罗提诺与三位一体学说相距甚远。对于他说来，世界中所有的表象与过程都要追溯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太一（*das Eine*）。这个太一在其他所有事物之上，其他所有事物都由太一产生。太一（同一 [*Homologie*] ）的思想形成了普罗提诺哲学与生活的方法和目的。所有其余的，宇宙论、“心理学”、伦理学、神秘主义和美学，都隶属于太一的思想。

普罗提诺像柏拉图一样，将精神世界从感性的可感知世界中区分出来，置于经验的彼岸。这种精神世界（*kósmos noetós*）包括最高的太一，第二层的绝对精神（*absoluten Geist*），第三层的灵魂（*Seelischen*）。人们可以感性体验的、由精神塑造出的原初质料的世界，对于普罗提诺就如对柏拉图来说是次一等的。

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太一处于一神论中神的位置，这与亚伯拉罕宗教相同。但普罗提诺反对给太一强加神性的特质。他并不把太一与善抑或是绝对存在相提并论。这样的描述对于普罗提诺来说太局限了，因为它为太一编造出某种特质。太一拥有的不是某个特质，而是所有特质。因此，在思考方式上，太一对于人类的经验来说是完全不可通达的。它不仅关乎事物，还关乎思想。它简直就是“无所不关”。唯一能接近太一的方式就是冥思（*Meditation*）。人们必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超越感官与精神，以感受太一，并——至少暂时——与太一相结合。这是所有哲学努力追求的目标：与太一合而为一！

柏拉图式城邦中少数人的沉思【366】

普罗提诺用柏拉图的学说作为建立哲学大厦的基石。然而，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绝对的终极智慧并不是通过不断进行概念的辩证法工作

而来，而是仅仅通过冥思来觉察。普罗提诺断然拒绝的东方宗教和智慧学说，对他的影响却是确凿无疑的。

普罗提诺应该尝试过更接近柏拉图，他试图将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序地嵌入自己的宇宙观中。正如太阳绽放光芒，在不失去实体的情况下，绝对精神（*nous*）从太一流溢出来。凭借这种精神，现象的世界开始了，即如谓“存在着”（*seiend*）所表示的状态。精神同时也是绝对存在。其他所有存在都是较不完美的，仅仅以有限的方式“存在着”。完美地存在着的是精神，因为它与思想同时发生。正如巴门尼德已经知道的，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于思想中展现，它与思想共在——没有思想就没有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影响巨大，它以后将深刻地启发19世纪初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

当人在思想中超越了感官现象世界并推进到抽象领域时，他就能在绝对精神的领域中遨游。对于普罗提诺来说，绝对精神的世界是一个完美，因而善且真的世界，它比我们感官所能体验的世界更为真实——比起我们共同置身于其中的、较不真实的世界，它是真正的真实。普罗提诺解释说，只有将太一与杂多之物建立起联系，人们才能思考它。这涉及亚里士多德所忽略的关系范畴。不借助于他者，人们无法思考太一。

在思考难度极大的关于绝对之物的领域中，【367】思考者认识到了作为一切现象之基础的理念，这与柏拉图并没有什么不同。理念是绝对存在的精神内容，甚至绝对存在仅仅由理念构成。正如精神从太一流溢出来，世界灵魂也从精神中涌出。它是纯粹精神性的，同时是永恒的，与斯多亚派的身体性灵魂不同。世界灵魂正如在柏拉图那里一样，在天体、植物、动物和人那里使自身具体化。世界灵魂在理念的协助下根据天界的原型塑造物质。在生物那里，灵魂还担任着操控器官的工作。他们必须与世俗世界的诸多条件和限制相纠缠，以达到与他们远远相隔的完满的幸福。总体来说，物质世界与天界世界相比，是一个非常低劣的世界，短暂、糟糕、丑陋。灵魂渴望回到天界之中伟大的太一中，而不是散落于一个世俗的身体中生活与操劳，这就不奇怪了。

如果灵魂是一种神性的产物，它真正的居所在天界，那么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灵魂一般都会降到尘世，进入到包围着它的世俗身体之中？这个问题让普罗提诺伤脑筋。对于诺斯替派信徒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对于他们来说，造物是坏的造物主的失败作品，因此灵魂在较差的情况下会在俗世出没。但对于普罗提诺来说，世界是从完美的太一流

溢出的最佳状态。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善的和有意义的。

依照普罗提诺的观念，人们应该站在世界整体的角度，而不是从灵魂的视角来思考事物。虽然灵魂在去往尘世的路上已经损失了很多，但俗世存在也通过灵魂能量的在场而至少获得了天界微弱的光芒。出于这样的原因，灵魂在天界和尘世之间循环往复，在人类、【368】动物和植物之间转世轮回。它的使命是给尘世赋予灵魂，同时让个体变得完善。所以，一方面，灵魂总是一往无前地转换于天界和尘世之间，这是有意义的。在这种角色中，它为此而感到高兴，即它自己“肆意地”自我决定，自由地决定身体的命运。另一方面，灵魂同时致力于终极的解脱，以便在遥远将来的某一天，在神性的美好世界中接近太一，这是对其赋予灵魂的功绩最为公正的酬劳。

普罗提诺通常将灵魂的下降以“满溢”和“流出”的形式描画成“五彩缤纷的图片”（黑格尔）。灵魂的上升则相对是一条从感官到超感官的漫长之路，在此人们必须学习去开启他们的理智。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来说，这种灵魂学说影响很大。因为灵魂构成个体——身体作为质料仅仅是丑陋的承载物——，所以努力帮助灵魂向上追求是人的责任。对此，人们必须努力训练，达到对理念的本质直观（Wesensschau），尤其是对那些美的理念。人们由于理智的缺陷，只能追寻物质性的善。那些不能观视到美的理念的人，必须用美的事物将自己包围起来。他这么做，因为至少他想对美略有所知，但是显然无法得到更多。因此，零散的人（男人）和有秩序的人（女人）都有内在的需要，去用美的事物来填补灵魂中的空洞，这是最初的形而上学奠基。

相反，艺术作品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它被专门制造出来，为的是能在其中感知美的理念。在艺术品之美中，天界的美以感性形式出现。普罗提诺开创性的思想，我们在“金钱还是荣誉？柏拉图的国家”那一章已经谈过了。【369】在艺术中“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之后主要对黑格尔和阿多诺的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理解为什么美对于我们有如此大的影响，人们必须更为准确地了解人类的心理。普罗提诺哲学在心理学上的细腻，毫无疑问是令人惊叹的。他致力于详细地研究“无意识”。普罗提诺属于较早发现内心世界的人，之后如奥古斯丁、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和爱克哈特大师（Eckhart von Hochheim）这样的思想家都对内心世界进行了研究。

根据柏拉图，通过灵魂对曾经在天界生活的回忆，我们学到了某些抽象之物。普罗提诺从中发展出一种复杂的无意识学说。我们的无意识

一方面由反射（Reflex）与自然本能组成。另一方面，它由灵魂对天界或者一个他者过去生活的回忆组成：“当死亡之时来到面前，对一个他者存在的回忆就能从早先的生活经历（在灵魂中）涌现，以致灵魂轻视种种来自于此生的记忆，而让其消逝，因为它已经离开身体而变得纯粹，因而能够（在记忆中）记起在尘世间不曾拥有的东西。”^[144]

因为真正的存在位于理念和所思（Gedachten）中，俗世的规则，例如物质世界的因果性，对普罗提诺来说并不重要。此外，当主张人类拥有自由意志时，他属于古代哲学中少有的没有陷入矛盾的哲学家。与斯多亚主义者不同，他深信不疑的是，灵魂能够自发和自由地决定它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作为天界的产物，它不与原因和结果的因果性相联系——这个论证在反对自然科学对自由意志的批判时，直到今天仍占有一席之地。

可惜的是，意志的自由很少得以利用，因为人类的理性太软弱了。【370】如同美，人类看起来也没有能力直观善。在德性上的不断努力只是那些最杰出者的事情。怪不得那些“戏剧”中——我们依据普罗提诺将人生称为“戏剧”——会经常上演坏与恶。那么，恶难道不是善的缺乏吗？“恶——这条原理很确凿——总是人们放弃的善。”人们也能将威廉·布什的这句话颠倒过来，作为虔诚的希腊人普罗提诺的断言。

对于伊壁鸠鲁、犬儒学派和早期斯多亚主义者来说，物质上的财富对于成功的人生并不重要，在普罗提诺看来也是如此。他所践行与倡导的生活是禁欲的生活，它与一个大目的保持一致，这个目的就是接近太一并体验与太一的结合（*henosis*）。简朴的面具背后，当然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人们可以严肃地想象一下，要是所有人都遵循普罗提诺的理念，情况会怎样。不会再有人工作，人类将会灭绝。说这种秘传的哲学是柏拉图哲学的完满形态，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它更像是柏拉图思想中的某些精神要素的漫画。

要说出它与柏拉图哲学最重要的区别并不难。普罗提诺的哲学不再与政治统治有关，顶多是自我统治。普罗提诺只在很个别的地方提到政治。他说，按照惯例，被统治者太过愚蠢，并不需要明智的统治者。而如果统治者真是智慧的，他首先会激起猜忌和嫉妒。没有理智的大众，就不会有理智的政治。所以，大多数人应当有一个高于自己的君主。波菲利称，普罗提诺也想借助皇帝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想把在坎帕尼亚的被遗弃的居住地改造成一个柏拉图式的城邦，但这不是政治构想，而是一种修行处所。【371】普罗提诺更像那个将光明的孩子

聚集在自己身边的薄伽梵，而不像列宁。人们可以粗略地将列宁与柏拉图相比较，因为列宁希望在理想国实行的一种共产主义式的专政。

在所有古代的超越性想象中，普罗提诺的太一哲学可能是最具有理智特性的：这种信仰，没有去迎合地中海和东方宗教所有苛刻的要求。这样看来，普罗提诺其实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哲学，而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具有永恒诱惑力的高品位的宗教替代品。普罗提诺的哲学是一种没有拯救者的救赎宗教，它仅仅保留给一个小圈子。然而，在缺乏社会和政治维度的情况下，柏拉图哲学将同时衰弱和缩小。虔诚取代了革命性，新柏拉图主义者把他们的修辞潜质用于对抗秘传的对手，而不是用来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好生活的乌托邦。

因此，在普罗提诺和他的学生那里，柏拉图主义的漫长之路结束了。这是最后一次理智化的伟大尝试，从柏拉图的积木中用始终相同的条块去建造一个整体体系。从众所周知的配件存货中不断产生新的变体，从而不断重新宣称，现在这就是永恒的终极真理，除了这种努力以外，“柏拉图主义”还意味着什么？此外，普罗提诺为柏拉图主义添加了严格的伦理学。而他表达出的最为重要的新思想就是，太一不应该用人类的文字书写。正如我们仍将看到的，这种“消极神学”经过一个自称亚略巴古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vom Areopag）的人，迂回进入了中世纪的世界。对于中世纪来说，普罗提诺是亚里士多德以外最重要的哲学家。同样，现代世界也受到他的很多启发。没有普罗提诺，就不能设想之后诸如诺瓦利斯（Novalis）、歌德、黑格尔、谢林以及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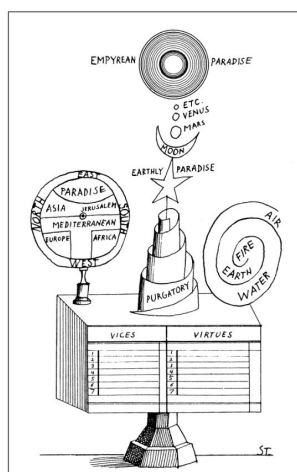
这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命运，它搭建起精致的空中楼阁，
【372】但土地周围却出现了裂缝。普罗提诺在270年去世，同时，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摧毁界墙。在高卢，他们建立起一个特殊王国，宣布与罗马脱离关系，但是并不稳固。在近东和远东，罗马显然失去了萨珊。即使戴克里先大帝（Diokletian）最后一次稳固了帝国，但帝国的长期衰落不可阻挡。308年，罗马暂时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在五年后的米兰敕令中，君士坦丁（Konstantin）和李锡尼（Licinius）两位国王官方承认了基督教。

新的信仰在帝国土地上迅速发展。通过其对独一性统治的要求，基督教很快排挤了其余的宗教与哲学对手。38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签署了一份文件，将基督教作为帝国的国教，不加粉饰地要求排斥其他宗教：“所有在我们宽大和适度的统治之下

的公民，你们应该.....皈依由神圣的使徒彼得传入罗马的这个宗教.....
此外，教皇达马苏斯以及主教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声明信奉它.....”^[145]

奥古斯丁或上帝之恩典【373】

耶稣、保罗、基督教及其早期门徒——新宗教的形成——怀疑、阅读与虚构的经历——债与罪——时间、意识、爱、启悟——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罗马的覆灭与慰藉



耶稣、保罗、基督教及其早期门徒

公元30年或者再早一些时候，一个年轻的游方布道者穿过迦百农周边地区，迦百农是位于北加利利海岸加利利省的渔村。他在这个地区游历了一段时间，身边聚集了一小群门徒。在这个甚至没有卢森堡一半大的罗马加利利行省，鲜少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374】这个地区草木不生，且人烟稀少，生活贫困。一两年后，这位布道者突然动身前往一段更长的旅程。他想去大约150公里外的耶路撒冷。犹太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逾越节准时来临，他和他的门徒进入了这座城市。对罗马占领势力和犹太人来说，在这个城市热闹的气氛里专注于自身的很多人中，他是一个在宗教方面胡思乱想的人。他也确实是这样。在一次难以解释的行动中，这名来自加利利的布道者突然在所罗门神庙前吵闹起来，弄翻了商人放着祭祀动物的货架。紧张的罗马当局在冷酷的执政官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的领导之下，没有犹豫很久，逮捕了这名布道者并判之以死刑。

耶稣基督的生活可能就如此，或与此类似地发生了。在此要强调的

是“可能”，因为并无法最终确定，他确实存在过。没有任何1世纪的罗马文献讲述过有关他的事。就连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能有关于这个时期以色列宗教流派的详细状况，我们要归功于此人——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起过他。最早的那份文献并不出自他的门徒之手，也明显后来被修改和“歪曲”了。

这份文献是罗马犹太籍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证据”：

耶稣大约生活在这一时期，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如果人们还能认为他根本上是一个人的话。因为他做了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他是那些愿意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师；这样他就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异教徒到身边。他是救世主。但由于我们这里的贵族人士的控告，彼拉多判处将他钉死于十字架；早先爱过他的那些人现在仍忠诚于他。因为他第三天又活着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神派遣的先知所预示的那样，更不用说上千件关于他的其他神奇的事情了。直到今天，【375】基督的子民——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仍源源不绝。^[146]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是一个笃信的犹太人，而非基督徒。对他来说，耶稣不是犹太人等待至今的救世主。这正把基督徒同犹太人区分开来：基督徒将耶稣看作众先知在《旧约》中预告的救世主——相反犹太人不这样认为。难以想象的是，据说约瑟夫斯写下了这些斜体的（原文中没有以斜体标示）⁽¹⁾的句子。这位历史学家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也不清楚。或许他仅从福音书里知道这些，而非其他文献。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耶稣的所有事情，事实上也来自这部所谓的福音书。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能确定地知道任何事情。因为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不是历史报道，也根本不想成为历史报道。这四位撰写耶稣生平故事的人也不为人所知。我们认为他们是比较有教养的人，并使用希腊语书写。他们发明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白文学（Bekenntnisliteratur），在西方传统里此前可能还从来没有过。虽然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样神化了他们的导师，把他刻画成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围绕着他编造出各种传奇故事。然而这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在公元60—100年间的某个时刻记录下来的东西，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尽管文献寥寥，人们却没有太过怀疑，公元30年左右，这位35岁上下、来自加利利地区的布道者耶稣，在耶路撒冷被罗马当局处以死刑。

而绝对有可能的是，他身后留下了一群不知所措的门徒，他们跟着他从加利利海来到耶路撒冷，到他死去为止都尊他为救世主。现在他们的导师预示的上帝之城未曾到来，他自己却死了，像罪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376】这一小群人和他们的“运动”惨遭失败，体面地讲大概几近终结。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一个奇迹，至少在不信教的人看来是这样。是的，这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出于各种我们直到今天仍在猜测的原因，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宗教运动从耶稣门徒的信仰发展起来了。三百年后，基督教成为拥有数百万民众的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国教，今天官方在册的基督徒则超过了20亿。

为这个伟大运动奠定基石的人是塔尔索的保罗（Paulus von Tarsus，约5—65），他是个受希腊文化教育的犹太人，来自安提阿（今土耳其东南部）北部地区的奇里乞亚。在奇里乞亚的犹太聚集区，这个来自某犹太家族的后代一开始可能叫作扫罗（Saulus），后来才改成了希腊—罗马式的名字保罗。对罗马帝国的外族公民来说，这种方式的更名并不少见。弗拉维奥·约瑟夫斯也不是从出生起就叫这个名字，最初他叫约瑟夫·本·马提亚胡（Joseph Ben Mathijahu）。这个家喻户晓的从“扫罗到保罗”的转变经历无疑是一个传说。据说，起初保罗猛烈迫害基督徒，后来成为其真正的宗教创立者，这倒是可信的。身为法利赛人，这位受过训练的《摩西五经》教授者是犹太教猛烈的智识改革运动的一员，并且显然不能容忍任何竞争对手。他的委托人可能是犹太公会，即耶路撒冷的最高犹太议会。

我们知道的有关保罗的多数事情，要归功于他写给新成立的基督教教团的信件。但《新约》十三封保罗的信件中，有六封今天被认为是伪作。此外，保罗为什么要在公元35年前后改变信仰阵营，从基督徒迫害者转变为基督教传教士，这在历史上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在对路加福音进行宗教释义的《使徒行传》中，【377】保罗是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产生了幻象，并发生了转变经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开始了在西方传教之旅，他经希腊地区到雅典和科林斯，在东方，他经过整个西土耳其一直到腓尼基城市西顿和推罗，最后在前往耶路撒冷时到了耶稣活动过的原始现场。

比传教之旅更重要的是精力与智力，凭着这些，保罗重新解释了耶稣的学说，并将那种宗教命名为基督教。如果耶稣说过，上帝之城即将到来，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一点现在几乎完全达到了。换言之，这

就说到基督精神的持续影响。如果耶稣曾经要求人们简朴地、不求物质满足地，并且不吝惜怜悯之心地生活，那么保罗很快将这一极端的伦理推至顶峰。成为这个新宗教之核心的，不是耶稣生前的学说，而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意义。虽然历史上的耶稣经常说起要成为选民和上帝之子，但他是不是真的乐意保罗在基督教神学中奉他为神呢？

历史上的耶稣极少有人感兴趣。因为保罗不仅重新解读了耶稣，他还为基督信仰添上了全新的附加内容，这些与耶稣的学说和布道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据福音书所载，那个过着简朴而虔敬的生活的人获得了永生。然而人于死后获得拯救，在保罗那里却不是由于善良虔诚的生活而自动获得的奖赏。这是一个关于神的恩典的问题。只有遵循该新兴教派的游戏规则的人才能得到恩典。保罗创造了教会工作人员的职业，即使徒和教师，他确立了妇女在教会中的次要地位——这与耶稣的传统相违背，后者身边也有女子围绕。

然而，这位来自塔尔索的传教士不只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政治家。

【378】他还机智地将其他宗教中有诱惑力的传统习俗和哲学思想片段融进基督教中。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美好、古老且神圣的逻各斯，通过柏拉图在希腊哲学中出现过上千次，接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保罗对此也非常熟悉。如果他想要赢得雅典、科林斯、萨洛尼卡和其他地方知识分子的支持，就必须将基督教和逻各斯结合起来。他这一招似乎确实成功了。可能是最后一部福音书的约翰福音，多次将基督与逻各斯相等同。由此转折出现，它后来导致了柏拉图—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并奠定了基督教的世界性影响。

保罗的第二次革新借鉴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是一个古老的波斯宗教，它在那个时代还很兴盛。后来在萨珊王朝的统治下，它甚至成为中东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据琐罗亚斯德教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善与恶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不仅存在着神圣的元善（Ur-Gutes），也存在着同样古老的元恶（Ur-Böses）或元罪（Ur-Sündiges）。我们不确定保罗是从哪儿知道这个思想的，也不确知他了解的是哪个版本。也许他借鉴了一些由琐罗亚斯德教解读过的犹太教；也许他直接了解琐罗亚斯德教传统。无论如何，他为基督教吸取了善与恶的二元性。从琐罗亚斯德教的元罪（Ursünde）出发，保罗创造了原罪（Erbsünde, *peccatum originale*）——这是一个新的思想结构，后来证明对于基督教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犹太教虽然知道亚当吃掉禁果的过错，却不知道自此传下的罪行。然而对保罗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

所谓的亚当的原罪而受到惩处，并以此方式拯救人类：“因为就像所有人在亚当身上死去，那么所有人也将会基督身上得生”，【379】给科林斯人的第一封信中如是说道。因而人类虽然作为整体得到了救赎，但是每一个体距此还很遥远。每个人必须亲自在上帝面前自我辩护，由此才会遇到并得到（triff und betrifft）真正的和解。

基督教的其他元素，就像保罗创造它们时一样，同样显露出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琐罗亚斯德教众像犹太人一样，对救世主降临期待已久，尽管是第三次了。此外，救世主的到来被与善对于恶的胜利相提并论。琐罗亚斯德教众熟知天堂和地狱的死亡审判，以及进行最后清算的末日审判。对保罗来说，末日审判将变成这个新宗教的关键点。因为末日不仅会开始一个新国度，还将得救的基督徒与该受诅咒的非基督徒分别开来。凭借末日审判，这一新兴信仰拥有了一种恐惧氛围和高压手段，这二者在迄今为止的宗教史中都有其类似物……

新宗教的形成

如果处于世界末日场景下的众门徒必须认识到，世界末日并未来临，那么他们的脑海中会上演什么情景？对于这一问题，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147]根据这项研究，在此前所信仰的东西和与此不协调的新经历之间，人们经历了一场“认知失调”。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即曾追随耶稣至耶路撒冷的门徒感受到了这种失调。神之王国不曾到来，他们的救世主却被处死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根据社会心理学知识，在这样的处境中，人们很少倾向于承认自己的错误。【380】他们反而会马上尝试对希望的落空进行重新解释，并再次巩固他们旧有的信仰。很多说法认为，基督教就是发端于此。必须指出，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失败的教派能够像基督教一样，如此成功地对其信仰进行全新的解释，这在历史中并不存在任何相似的例子。

宗教从来不是由单一因素铸造而成，而总是受到诸多影响的混合物。保罗打造的基督教也一样，它虽然只有短暂的历史，却已有漫长的传统。这一新宗教难以置信的魅力在于何处呢？能够让一个无名且暂时失败的运动实现在西半球数百年的统治，其诱惑力又在于何处？

基督教最初300年于其中成长的世界，从西方的罗马差不多延伸到东方的印度。范围之广，可以参见公元200年前后写成的《国家律法

书》(*Liber legum regionum*)。该书作者是著名基督教学者埃德萨的巴戴桑(Bardaisan von Edessa)的学生,他在此书中描述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从印度的种姓制度写到贵霜帝国(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骑兵文化、受琐罗亚斯德教影响的波斯、幼发拉底河畔和佩特拉的阿拉伯民族,以及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直写到北大西洋曲折的海岸线。基督教恰恰在这片世界逐渐传播开来。

起先,这一最为成功的教团位于近东、中东地区以及希腊和意大利。在这里,基督徒随处可遇到既有的宗教、崇拜和风俗,它们在数百年间互相融合,局面日新。许多宗教是地方性的,有一些仅由不知名的信仰团体构成,这些团体在不同的村之间有着不同的特点。世上存在着家宅守护神、城市守护神和属于民族的神。【381】大多数文化有若干神明,而一神论却是个例外。就像希腊—罗马世界一样,哲学同样存在于整个东方世界。这种哲学类似于为智识领导层而设的高档宗教替代品。想想柏拉图主义的诸多变种,它们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或多或少有着宗教色彩。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柏拉图主义最具智慧的变体,即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新柏拉图主义,虽然它流传的圈子小,但这个圈子里的人却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哲学家从一开始就为了唯一一个正确的世界体系而竞争,继而为了“真理”而竞争,但宗教的情况并不如此。多数信仰团体并不传教。它们既干涉其他文化尊重别的神明,也不为此感到担忧。同样要强调的是,这些团体也不像哲学家一样关心真理。宗教使人联合并统一起来,它们使风俗习惯及传统的现状得到保证,它们把对逝者的纪念郑重地保存在记忆中。毫不奇怪,只要仁慈地承认,在官方宗教崇拜中有罗马皇帝的一席之地,罗马帝国的众多宗教就不会有问题。

然而,基督徒与此不同。带着一个普遍的真理诉求,他们着手于一个计划,将古代世界和东方世界中到那时为止所已知的一切都置于其笼罩之下。这个新兴的仁慈宗教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它对其他宗教毫不仁慈的不宽容。当然,在基督教团体中,还是有人充满爱心,体贴他人,甚至人数还很多。福音书向我们讲述的这位社会教师耶稣,他慈悲、善良、博爱、谦逊、恭顺,传诵最高贵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几乎没有对手,顶多就是普鲁塔克的柏拉图主义也提出了相似的博爱。【382】然而基督教的博爱——在完全误解了耶稣的教导的意义上——仅适用于基督徒,而不适用于其他人。

只要基督徒仅在分散的小团体里生活而不掌握政治权力,这种对其

他信仰的不宽容就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恰是早期基督徒再三沦为无端迫害的牺牲品。虽然保罗在给罗马人的书信中，曾敦促基督徒要尊敬当局，承认罗马的国家权力，然而基督教团体拒绝对罗马皇帝进行祭拜。而在宗教问题上通常很宽容的罗马人也相应做出了激烈回应。公元41—311年间，基督徒在一波又一波的残忍迫害中艰难度日。293年，戴克里先对疲软的罗马帝国进行改革，重新组织行政部门，加强皇权，基督徒惨遇尤甚。此外，罗马人摧毁了基督教教堂，将基督教文章著述焚为灰烬，禁止基督徒在罗马国内担任任何职务，实行集体处决，还将无数基督徒流放至矿井与矿山。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迫害没有削弱基督教团体，反而让他们的联合更加坚固。以身殉教表明信教者坚定不移的心，它作为榜样影响着其他基督徒。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是凭借牢固的联合建立起各种团体的。他们圈子的人不像那些哲学家圈子这么优秀。从原则上讲，教团应对所有人开放，宗教也应为大家理解。尽管头300年里的基督教教堂往往是小型或者中型的集会场所，但是它们依然成了强大的宣传中心。基督徒将宗教作为生活的重心，他们的伦理和道德彻底由宗教决定。礼拜、仪式和符号使日常生活仪式化，主教才能宣告什么是真理，别人不行。【383】因而基督教不是包含在某文化之内的一种宗教，它就是一种文化。

基督徒把他们的神想象成一位仁慈的父亲，这也是全新的。犹太人的神性格喜怒无常，为善和发怒都没有节制。他和东方的其他神一样，就像一位暴君，人们能讨得其恩宠，也能轻易失去其欢心。但基督教是一种“父亲宗教”。信教的基督徒与其神的关系是一种强烈的心理联系，与家庭中的关系无异。

在这个与上帝和教团强烈地、“家庭式地”联系起来的世界里，却不仅只有善。教会同时是基督徒涤除自身罪孽的地方。不同于其他许多宗教，与唯一神或众神的交流主要不是私人的，而是集体性的活动。一项定期的仪式是让主教驱除罪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修磨德性全然为己，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在寂静中完善个人，而基督教教会却以祛污除秽的形式轰轰烈烈地举行涤除活动。人类由不可控制的精灵（*daimonen*）驱使，做出不受控制的行为，不仅是少数柏拉图主义者，一些东方宗教也相信这一点。而基督徒首先由此创造了驱除仪式与教团表演。251年，罗马三分之一的基督教教会人士有着驱除师的身份。

基督教教会不是光凭宗教上的联合就能稳固，金钱也很重要。教团

的每个成员在道德上被推动着，为教会布施。无论贫富，每个人都向教团支付金钱。以这种方式，基督教教会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这往往是其他宗教团体所欠缺的。【384】基督徒还出钱来承担制作书籍手抄本（Codex）的费用。除此之外，人们用木制封面将莎草纸或羊皮纸张装订起来。这些手抄本显然比传统卷轴小巧便携，可以一直带在身边。基督教因此成为能够编撰教义的“经籍宗教”。不同于其他没有装订文集的宗教，基督徒能将一个永久誊抄下来的真理一直带在身边。虽然犹太教的《摩西五经》有文字根据，然而只有通过手抄本让一部圣典得以再三传播的，才是文字宗教，它处处遵循在文本中揭示出的诸真理。

313年发生了什么事，让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这两位罗马皇帝从这一年开始容忍这个罗马人长久以来视为祸害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倍受争论的问题。原因大概是多种多样的。也许需要基督徒在帝国东部对抗新兴的劲敌萨珊王朝。而君士坦丁这位帝国新一位强势者的个人动机和信仰值得深思。在他摄政统治期间，基督教成了帝国最重要的宗教，尽管基督徒大概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

基督教好不容易才在帝国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当时，教会内部已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关于迦太基地区选举新主教的争论。由君士坦丁官方认可并支持的教会也不是毫无争议的。教会最重要的对手是多纳图斯派（Donatisten），它以其当时的领导人多纳图斯（Donatus）为名。在众多位于非洲的罗马行省，多纳图斯派占有所有基督徒的大多数。他们不承认罗马皇帝在教会中的新身份。圣礼神圣与否，并不依赖于教会，而是依赖于神职人员的纯洁性。一句话：多纳图斯派不认为教会与皇帝是神圣的，神圣的是他们坚定不移的、【385】不因任何来自尘世的妥协而暗淡的信仰。

多纳图斯派不欢迎君士坦丁皇帝，这是君士坦丁不能容忍的。他授权迦太基主教凯其里安（Caecilianus）尽全力对付异端分子。基督教教会充当帝国的权力手段时，比起其他权力机关，它也并不表现得更具基督教性质。教会残酷地迫害多纳图斯派人士。按照后者的自我认识，他们是在反对自己的基督教教会时作为首批殉教者而死去的。

当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长老阿里乌（Arius）对三位一体学说提出质疑时，又出现了新麻烦。阿里乌做了大量的柏拉图主义研究工作。根据圣父、圣子、圣灵皆以相同方式得以永恒并具备神性的观点，官方的基督教体系在他看来是荒谬的。对他来说，作为逻各斯来理解的圣灵，不可能具有父亲的特性，并创造出一个圣子来。据此，耶稣不是

神圣三位一体的某部分，而仅仅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类。罗马皇帝也不容许这一异端邪说，325年，他根据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决定将阿里乌流放。尽管三年后他得到了赦免，但他的对头，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Athanasius von Alexandria）——一个满肚子坏水的当权政客——还是继续执行了流放。自此以后，教会之中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再无正式质疑。

基督教第三次重大的建设机遇是4世纪与摩尼教的斗争。就像耶稣曾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先知和救世主学说的最终完成者，3世纪中叶的波斯人摩尼（Mani，216—276/277）也以相似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身份。其宗教观念是对基督教、诺斯替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理念的一种新综合。此外，摩尼采纳并影响了诺斯替教的观念，即古代晚期，人们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非本真的糟糕的世界。与此相对的，此前还存在本真的世界，在这个本真的世界里善战胜了恶；【386】这个诱人的希望显然触碰了时代的神经。传教多年后，就像耶稣受到罗马人的判决一样，波斯当局以相似的原因判决了摩尼，他死在了牢狱之中。

然而，新宗教恰如当初的基督教一样，依然快速扩散开来。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些摩尼教徒时，就像以前犹太教徒面对基督徒时一样，处于相同的角色当中。基督徒动用一切权力，试图阻止这一亚伯拉罕宗教存货的最新升级版获得成功。“摩尼教徒”这个词迅速就被拿来与“异端分子”相提并论。危险的竞争者遭到严酷的迫害，直至摩尼教于5世纪在欧洲和近东地区被彻底消灭。摩尼教只在东方长久保留下来，甚至一度成为东突厥汗国的国教。

尽管基督教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从内容方面来看，它在4世纪末前后依然不是很稳固，受到众多分裂力量的威胁。弥补这一缺陷，同时巩固基督教学说，使其到达最高的智识水平，这是古代晚期最重要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的任务！

怀疑、阅读与虚构的经历

从我19岁那年读了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一书并引发了我对智慧的追求后，多少年月悠悠过去了——大约有12年。而我始终流连希冀于世俗的幸福而无法弃绝，并乐此不疲。然而不要说获得智慧，即便只是对于智慧的这个寻求过程，就已经远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387】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可是

我这个不堪的青年，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就已陷于可悲的卑劣，那时我也曾向你（也就是神）祈祷请求纯洁，但是我说的：“请赏赐我纯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赏给。”^[148]

在此讲述其于渴望快乐与追求节制之间的内心斗争的这个人，是一位32岁的修辞学教师。他来自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塔加斯特城，曾流亡至米兰：他就是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 von Hippo）。他生于354年，父亲是罗马政府人员，与一名信仰基督教的柏柏尔女子结婚。一生中，奥古斯丁与母亲莫妮卡关系紧密。他的母语是拉丁语，在迦太基学习修辞学期间，他的拉丁语更为精妙。早前他认识了一个女人，和她一起生活了15年，还有一个儿子。他阅读过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Hortensius*），这部著作已经佚失，仅能通过引文而为人所知。作为哲学导论，该书讨论了经典的希腊式主题，即协助理性战胜情感。受过如此熏陶，奥古斯丁就不太能从他母亲的基督教入手。对他来说，在吸引人的程度上和理智上显得更令人满意的是摩尼教，他声明信奉摩尼教达九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384年，一道来自西罗马王廷的召唤突然从天而降。西罗马帝国的现状很糟。324年，君士坦丁将他的政府落址于新建成的君士坦丁堡。四十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出于管理技术上的原因，将帝国分为东帝国和西帝国。当东帝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所成就时，西帝国却在政治上陷入内忧外患中。有钱人从城市逃往乡村，罗马衰落了，赋税压力达到顶峰，经济能力衰弱。同时，在北部，帝国失去了对不列颠、高卢与日耳曼的控制。【388】国界不保，军队人员不足，兵士报酬极低。留驻特里尔和米兰的皇帝格拉提安于383年在高卢被罗马士兵杀害。

在这个倍受威胁的局面下，天才修辞学家奥古斯丁接到了一项任务，即充分发挥演说的技艺来维护年仅13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和他的政策，并为其歌功颂德。在米兰，这位皇帝身后有位强人，安布罗修（Ambrosius），一位具有权力意识的主教，当时他正与阿里乌的门徒激烈争吵着。天主教会尊其为四大圣师之首（其余为哲罗姆、奥古斯丁和教皇格里高利）。

奥古斯丁从母亲的影响中脱身，和爱人先迁往罗马，不久后又去了米兰。然而莫妮卡迅速跟了上来，不让儿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在安布罗修与其朋友的影响下，奥古斯丁开始阅读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的拉丁文译

本。他并不精通希腊语，只能通过波菲利的通识文章迂回了解普罗提诺。

这位来自非洲的修辞学教师放弃了一切之前在智识上影响过他的东西：摩尼教，还有阿尔克西拉乌斯“新阿卡德米”的怀疑论著作。从波菲利和普罗提诺那里学习，意味着去认识理性的任务，通过思想回到它神性的原初。与此相对，感性的世界是非本真的、不真实的、欺骗性的。同时奥古斯丁学习到，根本不存在同等级的违背神性原则的恶。对普罗提诺来说，恶只是人类身上善的缺席。奥古斯丁摆脱了激进摩尼教的观点，即将世界分为善与恶。就像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一样，从那时起对他来说只存在太一。太一是善与上帝。相反，恶只是上帝远离人类。这种情况正是要被克服的。【389】新柏拉图主义就如一座桥梁，帮助奥古斯丁从摩尼教徒迈向基督教。

在柏拉图著作里读出深深的宗教意味，这也不是新鲜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曾将柏拉图解读为犹太教信仰。2、3世纪，大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约150—约215）和奥利金（185—约254）以基督教的视角阅读了柏拉图著作。特别是后者，将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大规模地熔炼在一起，以至于后来在奥古斯丁的时代里，这招致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否必须将奥利金的学说定为异端邪说。

奥古斯丁开始接受基督教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es*）是一份以祈祷文形式写就的生活体验汇报，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该书显示出，奥古斯丁陷入了强烈的内心斗争。对母亲的爱和对女性的强烈渴望，使他感到困惑。他应该从世间隐退而过上禁欲的生活，还是争取一番事业？何处是解脱？他应该何去何从？什么能为他提供依靠？

后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道，他“自己曾面临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他不幸福？是因为他的灵魂离上帝太远？我们只能从过分神化了的、关键性的皈依经历幻象中了解到他向基督教的转变，这个幻象据说是在他米兰住所的花园里发生的。我

心中怀着最痛苦的悲哀正在哭泣。看，我听见从隔壁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歌唱声——我分不清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的声音，这个声音反复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此时我忍住如泉涌的眼泪，站起身来，对此我找不到其他解释，我一定是觉察到了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390】目光落到哪里就读哪里……我

把书（使徒之书）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因为当我还未读完这个句子时，就有一道明确无疑的光涌入心中，所有怀疑的阴霾就此消散。^[149]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段记载的可靠性。因为奥古斯丁此前在《忏悔录》中讲到，阅读新柏拉图主义如何为他开启了基督教的大门。还有一部早期作品《论幸福》（*De beata vita*），该书写于他自述的皈依经历之后，但却没有谈到任何上述的皈依经历，而只提到他转向基督教的动机，即阅读经验和安布罗修的布道。

然而，编造一段特殊经历对奥古斯丁来说显然是迫不得已的。教会的重要人物并不是通过思考而成为基督徒的，而成为柏拉图主义者、逍遥学派成员、伊壁鸠鲁主义者和斯多亚主义者则是要通过思考的。启示宗教的一个特征是，信仰是在一段皈依经历中——通常是在一个视觉或听觉幻象中——被宣布的。想想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皈依，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前君士坦丁的画十字的幻象，或者圣安东尼因一句上帝之言而回身，此后在荒漠中隐世而居的故事。

奥古斯丁没有到沙漠中去，但他离开了米兰，和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在附近一个名为加西齐亚根（Cassiciacum）的村庄定居下来。在此他开始了勤奋的写作，但不到一年，他就回到米兰接受洗礼。不久以后莫妮卡去世，奥古斯丁乘船前往塔加斯特城，【391】作为修道士生活在那里。然而，教会打算赋予他更大的责任。391年，他在位于塔加斯特城不远的希波接受神职，四年后成为主教。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富裕的北非教会更为强大，以对抗众多的异教分子。

债与罪

主教的职位是一把烫屁股的椅子。而现在发生在奥古斯丁身上的事却让人吃惊。到那时为止，如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一样，他的思想针对个体的人和通向灵魂救赎的个人之路。然而自从身处高位，他就将理论重心转移到作为一个机构的教会上来。不应再像希腊哲学中那样，由个体去寻找达至真理的通路，而是，教会已经知晓这一真理，以绝对权力来管理该真理。这位新主教铁面无情地应对威胁到教会权力的一切。他过去曾长期质疑基督教，认为其在知识上是低劣的，而偏偏是

他，如今猛烈迫害着他昔日的教友——摩尼教徒。他以同样的果决与多纳图斯派教徒斗争，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比教会机构更为根本。他禁止所有人的自由思想，规定了天主教教义（*disciplina catholica*）。

此外，约410年，他还遇见了另外一个对手。罗马不列颠行省的修道士伯拉纠（Pelagius，384—422）在罗马破口大骂基督教—罗马社会的道德颓丧和堕落。他想回到一种苦修的生活，耶稣曾为此做出榜样。在伯拉纠看来，原罪学说以及上帝善的创世中，恶的存在是尤为怪异之处。保罗曾将琐罗亚斯德教传统引入基督教，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一事解读为人类的救赎；而对伯拉纠来说，【392】这一传统与福音是不一致的。人类带着罪孽降生的地方到底在世界的何处？

相反，奥古斯丁可能出于政治权力原因无法放弃原罪学说。在保罗那里，作为“原罪”的亚当之堕落和作为“救赎”的耶稣之死之间的关联还是含蓄不明的，奥古斯丁将这关联进一步系统地发展为罪的学说。据此，人类之救赎是神的恩典，拥戴基督与教会，就可能得到这一恩典。当然，重点落在“可能”上。因为上帝施恩于何人或不施恩于何人，这一点没人能知道。而没有人本来就应得到这项恩典。

对于伯拉纠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关键在于，基督徒要过一种虔敬的生活。这意味着转向并专注于自己的内在性，这与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别无二致。外表友善、镇定从容、有慈悲之心、内心贴近精神，基督徒反对外在的救赎。相反，奥古斯丁在397年前后彻底打破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基督教传统。在所有相信灵魂不朽的希腊哲学家那里，救赎是善良、正当的生活作风的直接结果，但现在不再是了。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最终只有上帝能决定这些。

伯拉纠很是惊恐：如果事情只取决于信仰和上帝的恩典，那么，何人或者何事能够保证我在生活中举止得当？我丝毫不能通过我的生活作风来为自己挣得居于天堂的永恒生命吗？或者还要糟糕：如果我的福祉终究依赖于神的恩典，那么显然我将不止一次地面临这个问题，即我是否找到了正确的信仰——这是听任上帝任性而为！我的自由在哪里？

一个任性地将“他的”（den Seinen）与“其他人的”（den anderen）【393】区别开来的神，是一个残酷且非道德的神。在这件事上，奥古斯丁碰到了大麻烦，那就是来自伯拉纠及其门徒伯拉纠主义者的质疑。如果他对这些批评听之任之，那么教会将丧失其作为唯一拯救机构的重要性。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上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人类灵魂

的拯救，那么他就让拥有永恒之爱与无尽慈悲的上帝变得不可信。

最终，奥古斯丁做出了一个有些敷衍的决定，将此事一分为二。他坚持个体不会由于有德性的生活而获得救赎的资格。同时，为了体现上帝的伟大，人类将被彻底剥夺权力、遭到贬低！然而被赋予个人意志的人类，似乎至少可以自由地投身于“决心”，自由地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个信仰。当上帝决定是否要拯救个体时，这一决心或许能为其赢取些许加分。

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为此牺牲了所有的哲学论断。我能否感受到自己愿意信仰，这与什么有关？我不是上帝的造物吗？上帝没有多多少少赋予我一些决心吗？但从根本上来讲，一切事情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在奥古斯丁眼中如此重要的意志自由，不过是一段笑料。然而在奥古斯丁看来，思想论断没有教会的权力地位重要。这意味着：无教会，无救赎！那些如伯拉纠一样，认为关键在于道德生活的人，他们也可以放弃教会，这是不被容许的。所以，虔敬生活的个人劳苦必须由一位恩典的建筑师来考量，即由教会来考量。

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转向之一。

【394】是什么可能让他彻底剥夺人类权力，并对自由做出猛烈的攻击，我们只能对此做出推测。我们完全在神学之外，即在西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中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帝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占领别的地区了，因此缺少奴隶。后来，城里的贵族迁往乡下，很快就把各处农民变成了奴役的对象。面对哥特人这样的入侵者，军队不再提供保护；农民迫不得已放弃土地，为新地主提供服务。不论是在破败的城市，还是在日益由贵族掌控的乡村，没有一处能够像城邦里一样，能够谈论自由和自主。依赖于乡绅的判断，或者依赖于上帝的恩典，也许最终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大的不同——凭的都是足够好的运气！

我们不知道，奥古斯丁发展自己宿命论式的恩典论时，多大程度上受到罗马帝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当然也几乎无法想象，他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不仅在米兰，而且后来在希波，他都一直处在政治事件的中心。同样也一直存在的另一个动机——一千多年以来，恩典学说成为教会统治的工具，它让西方世界的信徒保持着卑微的姿态，且让他们处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

时间、意识、爱、启悟

大概没有一位西方思想家会像奥古斯丁一样，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对无尽的哲学思想瑰宝食如饕餮。就像保罗曾猎取其他亚伯拉罕式的诸多宗教，以使基督教首次从根本上成为一个宗教，【395】奥古斯丁也在所有合适的地方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并夹杂着斯多亚派哲学同样地攫为己有。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论文，计逾百篇；还不算信件和传道文。在他那里，哲学成了神学的附属行业，或者就像近700年后的本笃会修士彼得·达米安（Petrus Damiani）所形容的那样，哲学的任务就是成为“神学的婢女”。数百年以来，正是奥古斯丁，规定了什么是基督教以及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保罗的观点，存在一位建筑师，他曾规定了教会的结构工程、建筑图纸和美化设计，那么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

然而，教会应该带来福祉这件事不应该停留在福音书里。大概耶稣也不曾设想过建立一个自己的教会吧。更确切地说，考虑到一个即将到来的神之王国，他想改革犹太教，尽管他可能曾表明，彼得将会是他教团的中流砥柱。相反，一个只有它才能救世的教会却麻烦重重。比如，所有生活在耶稣之前的虔诚的人们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这么晚才把耶稣派来？如果只有受到耶稣启示的教会才能获得救赎，那这些早于他的人应该怎样得到渺茫的机会以获救赎？结论令人心酸，也与一个至善的神不相容。奥古斯丁逃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耶稣之前已经有了基督徒，只不过还没有很确切地明白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像这样的疑问，可能就是奥古斯丁要尽心竭力地研究时间问题的原因。因为就如基督教里有人询问以前的状况，一般而言就也会询问上帝创世以前的情况。创世之前是如何的？在上帝创造出这个世界之前，上帝在做什么？奥古斯丁给出的简洁答复最初让人感到诧异：【396】“上帝创造天地之前，什么也没有做。”^[150]存在物只能通过某物存在于此而存在。但如果创世才使得某物来到世上，那么此前就没有什么存在物。而时间是和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是和能感受时间的生物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事实上，时间只能经由某人拥有时间意识而存在。另外，这种主观的时间感受总是一种时间（eine Zeit），即当下。即便我思想过去或者未来，我也是当下地思想过去或未来。时间一直存在于此地和此刻。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话说：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因为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的现在便是直观，将来的现在便是期望”^[151]。

对哲学史而言，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定义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希腊的“时间”概念一般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时间被理解为某种“自在”的存在物，即便亚里士多德也一定会同意，客观时间往往也只能相对地被感受到。当奥古斯丁把时间解释为一件纯粹主观之事，即把它解释为一项意识内容时，他甚至还要超出亚里士多德一大截。对奥古斯丁来说，这项考察在神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即不存在两个时间：一个尘世的现存的时间和永恒的神性的时间。存在的只是，一面是短暂的主观时间体验，另一面是神圣的无时间性。这一道分离二者的鸿沟所隔开的比两个世界还要多：它把尘世的人类生活中的短暂与非本质之物，和超越一切时间的上帝永恒的完满性分隔开来了。

奥古斯丁是一位敏感细腻的心理学家。他不仅在时间主题上研究人类灵魂的心理过程。【397】他的整个认识论都围绕着我们把握和领会某事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微妙的内在过程。正如柏拉图和他的众多继承者，奥古斯丁试图去理解认识无法在感性世界中表现出来的事物与联系，这如何可能。对此，奥古斯丁在思想早期追溯到柏拉图的回忆（*anamnesis*）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所认识的并不是从经验中了解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从其过去的生命历程中回忆到这些知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设想一个不曾被任何人看到的三角形。我们可以创造像“永恒性”“无限性”或“完满性”这些不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灵魂此前在天界经历过这一切。

关于对天界的回忆，一个尤为精辟的例子是数字。奥古斯丁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数字的神圣之处，而数字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位置。要认识到一串数字序列的无限性，上天的启示就很有必要。他像柏拉图一样热衷于数学中那些智力可理解的内容，而这些可理解的内容在最深远处将世界结合在一起。因为上帝不是毫无计划地建造起这个世界的，而是根据数学规则创造了它。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部分上也是柏拉图的观点，对奥古斯丁来说，一切皆为数字。没有任何感性法则、空间法则、时间法则不是借助数学来描述的。数学是一切存在的通用语法——这项声明今天同样牵动着几乎所有数学家的神经，让他们心跳加速……

新柏拉图主义者曾努力要把柏拉图超时间的理念从成问题的事物属性中解救出来。对他们来说，像奥古斯丁一样，星空另一边的理念不是事物，而是原型（*Urform*），甚至就直接是数字。它们存在于神的精神之中；奥古斯丁欣然接受了这种构想。归根结底，理念可能栖身于世界

的何处，这一古老的关键问题由此得到了基督教式的回答：【398】理念存在于上帝的思想、理智和智慧中，存在于他启示的话语中。

但是必须得到澄清的还有，理念是怎么从神的意识到达人的意识的。对柏拉图来说，这是通过灵魂对神圣且可理解的天界进行再回忆而发生的，灵魂曾一度在这个天界驻留。基督教里当然没有对灵魂重生的规定，更是根本没有灵魂转世一说。尽管如此，神性天界与人类精神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联系。

奥古斯丁首先勾画出一幅人类记忆的复杂图景。在记忆的帮助下，我们不仅回忆起印象、经历和概念，而且我们的记忆非常具有创造性。它对这个世界进行整理，为其塑形，还对其进行解读。记忆看起来似乎是灵魂之胃（*venter animi*），在这里所有东西都被推翻然后再加工。它最令人惊叹的成就是我们借助记忆自我当下化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究竟从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根本上不是感性地感知到自己，我们的记忆又如何产生关于我们自己的印象？

没有什么比自我意识更为直接的了。奥古斯丁经过一再反复的思考证明了自我意识，这属于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思考，因为它预示了一个更为著名的思考。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我不可能严肃地怀疑我自己的意识。我存在这件事，我也不会搞错：“因为，我错故我在。也就是说，不存在的人是不会弄错的。因此当我产生错觉时，我恰好就是存在的。按照这个说法，我错故我在，如果‘我错故我在’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我怎么会在我存在这件事上搞错呢？因为我可能是那个被搞错的对象，所以即便我搞错了，毫无疑问我也不会把自己存在这事搞错。”^[152]

直到千余年过去，这番细致的思考才会迎来一阵研究热潮，【399】并成为哲学的全新开端。我们说的是笛卡尔和他著名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三十年战争前夜，这位法国人在一间农舍里经过无前提的思考，似乎从虚无中得出了这一句话。由此，笛卡尔为哲学奠定了一个新基础——主体性的基础，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相反，奥古斯丁决不涉及主体性思考的自我赋权。他只想表明，就像新柏拉图主义中已有的观点一样，人可以通过深入自省来接近真理。而这个隐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真理则是——上帝！

好消息是，人的本性中，也确实想要去认识上帝。我们感受到一种渴望，要去认识我们自己，并达至我们真正的本质。值得关注的是，奥古斯丁将这一渴望称为爱。在所有“我们想要”的开端都是对自己的爱（*amor*），以至于人们甚至能够将爱与意志相提并论。我们爱我们想要

的东西，我们想要我们爱的东西。尽管恩典学说为意志自由设置了严格的界线，让意志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但在奥古斯丁的意志作为自爱的理念中，闪现过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相比于所有古希腊哲学，奥古斯丁从心理上将个体的斗争与分裂描述得更为透彻有力。在柏拉图的车夫看来，野马乃是不同的灵魂诸部分，这些部分是难以驯服的，因为它们寻求不同的道路。在奥古斯丁那里则相反，（灵魂）中间的分裂是由意志自身造成的。这位车夫不知道他应该驶向何方——这个冲突，冷静客观的希腊哲学并不了解。

随着年岁的增长，认为对善与正确的认识是对过去所见之事的再回忆，这个观点在奥古斯丁眼中越来越值得怀疑。【400】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若没有上帝，更高级的知识、强大的意志决定就绝无可能。所以他在一些文章中以异常现代化的方式对语言做出了怀疑。人们到底能通过语词认识真理吗？在彻底的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语词不是达到真理的特权通道，它顶多对“回忆”和“提醒”有用。因此，神圣启示的所有高级知识一直保留下来，却没有被领会。关于理念如何从上帝的意识达到人类的意识这一问题，最后的答案恰恰是这样的：通过启发

（Illumination）！只有得到上帝之光照亮之人才有可能接近真理。虽然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这神圣启发的闪光，然而唯有被选中之人可以恰当地利用这神圣的知识之光。多数人却都没能做到。这种受到照亮的洞察保持为一种罕有的善，它将被选中之人与劣等之人分离开来。

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

410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奥古斯丁正处在权力与影响的顶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已有30年，教会在神学和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然后罗马失陷了！哥特人的统帅亚拉里克一世（Alarich I.）带着他的士兵攻陷了这座城市，将其洗劫一空。

这不仅是对罗马帝国的沉重一击，也是对基督教教会的沉重一击！教会的思想家，比如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von Caesarea）连同他的《基督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以及他之后的哲罗姆教父，不都热衷于永恒的基督教的“永恒”之城？基督教好不容易终于实现了它在帝国的独家代言的要求，【401】这座城市就陷落了——彻底离开了基督徒的至善的上帝。如果罗马诸神曾庇佑这座城市800余年，那么基督教上帝显然在第一个大挑战时就不灵验了。

虽然罗马的陷落没有终结基督教教会在帝国的权力，但它要求一个神学解释。奥古斯丁也接受了这一挑战。起先他委托学生奥罗修斯（Orosius）写一部人类灾难史。他想表明，罗马的陷落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个无限系列的一部分。奥古斯丁自己则历时14年创作了一部巨著，以解释教会与罗马、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以及神之王国与尘世王国的关系。这部关于上帝选民的著作叫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成书于426年，德语名为*Der Gottesstaat*。作为国家哲学的论著，该书在今天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同属一类，尽管严格讲来，它根本没有任何乌托邦的内容。无论是上帝的神圣王国，还是人类的尘世王国，都没有经由奥古斯丁而得到一部组织宪法。上帝之国——“耶路撒冷”——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国家机器的完美天堂。相反，尘世诸国——“巴比伦”——是如此低劣且无足轻重，以至于它们的宪法根本不重要。

如伊壁鸠鲁、西塞罗和一些斯多亚主义学者一样，奥古斯丁也认为尘世诸国是以某个“契约”为基础产生的——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这是一个极其现代的想法。然而这位希波主教所谈论的契约不像现代政治哲学的契约基础那样，是享有良好声誉的、公平的或理想化的。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他对人类诸国之成立的傲慢讥讽。因为，对他而言，尘世间不存在获得真正正义的机会：

取消了正义的王国除了是一个巨大的匪帮还能是什么？

【402】所谓匪帮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吗？这也就是一群人，他们按照首领的命令行事，按照约定结合成共同体，按照固定的协议来瓜分赃物。如果这个邪恶的共同体通过吸纳堕落之人得到壮大，攻城略地，建立分支，夺取城市，征服民众，那么它名副其实地就是一个王国。显而易见，支撑这个匪帮的并不是诸如逐渐消失的贪欲，而是得以实现的不受惩罚的特权。^[153]

尘世之国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犯罪的和好斗的一群人建立，他们从其他人那里掠夺了土地——哪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封建时期的欧洲诸国或者美国的诞生的历史学家会否认这一点呢？

尘世的国家建立总是一种暴力行动。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大概是对的。他站在了新阿卡德米派（如卡尔内阿德斯）和斯多亚派（如西塞罗）的肩膀上，只不过无论是卡尔内阿德斯还是西塞罗，他们在解释尘世国家缺少的正义时，都没有像这位希波主教一样，追溯到原罪。对于

他来说，世俗共同体生活的堕落绝对要归结于亚当享用苹果这件事。否则这个被认为距离上帝如此遥远的世界，为什么会被如此不公正地分割，就如那些现存的各国一样？同时，奥古斯丁在尘世国度里还认识到恶的细微差别。即便真正的正义保留在圣城耶路撒冷，人们也应该尽力实践之，哪怕是一点点。统治者应该遵循基督教价值观，应该睿智而慈悲，并且须臾不忘地传播基督教，【403】让一切反对基督教的人闭嘴。

关于尘世之国和上帝之国的这个双重国家学说，与其他很多理论一样，并不是奥古斯丁的首创。耶稣和早期基督教显然也深信上帝的国度即将来临。他们的希望以末世论的形式指向如此切近的拯救。另一个灵感来源大概是摩尼教。即使奥古斯丁猛烈地迫害摩尼教徒，但过去作为摩尼教徒的11年，在他身上并非没有留下痕迹。他一再将善与恶、拯救与罪当作乍看之下旗鼓相当的力量来对比。相较之下，奥古斯丁的新颖之处在于极端化，他极端地将生活的意义向彼岸转移。罗马也有可能衰落，但上帝之国不会被任何世俗威权所动摇，神圣耶路撒冷的城垛永不坍塌焚毁。所以这位基督教神父，应当会借用普罗提诺的话从容评价罗马的毁灭：“若一个人将树倒石落和有死之物的死亡视为伟大的事，他就不是一个伟大的人。”

公元430年8月，奥古斯丁在年届76岁之际，死于家乡非洲的希波城。此前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他还设法借助性欲来确证他倍受争议的恩典学说。他再度专心研究他的个人生活：肉身意志和灵魂意志的冲突。这位垂老的主教写道：没有比在性欲上更能察觉到人性之腐坏的了。当亚当和夏娃吃下知识之树的果实，他们认识到，他们正赤身裸体。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感到羞耻！那么这种羞耻无疑是性欲的结果。

对奥古斯丁来说，其缘由并不难找到：我们的所有意志受理智控制，而不是性需求和性器官。【404】我们变得激动，尽管我们常常不想要如此。我们有时想要激动，但激动不起来。我们体内的这股力量不顺从、不受控制，它是原罪的土壤，以及原罪在人身上这一当下状况最可靠的证明。没有其他基督教神学家，也大概没有古希腊哲学家，像奥古斯丁一样以相同的暗示性方式谴责性欲，视其为恶。他的原罪学说变成了基督教的原罪：经过数千次反复对肉身妖魔化，还伴随着心理伤害，而有无数人一直到20世纪还深受其害……

罗马的覆灭与慰藉

奥古斯丁去世之际，日耳曼民族中的汪达尔人包围了希波。不到十年时间，汪达尔人就全面占领了罗马帝国的这个非洲行省。从395年就分裂出去的东罗马帝国熬过了这段时间的纷乱，而西罗马帝国则解体了。自5世纪起，中欧地区蛮族横行，将无数日耳曼族人逐出他们祖居之地。瞬息万变的局面下，羸弱的西罗马帝国皇帝与从北部侵入帝国，袭至意大利地区的日耳曼军队统帅结成联盟。到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就不再是帝国了。455年，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这座城市第二次毫无防御地落入日耳曼入侵者手中。

在昔日帝国领地的北部，高卢和日耳曼地区，法兰克人和哥特人建立了新王国。后者于488年在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的带领下迁往意大利，并打败了日耳曼统帅奥多亚塞（Odoacer），奥多亚塞曾在过去的12年里扶持着末代罗马皇帝。【405】狄奥多里克是基督徒，但和其他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族首领一样，他是一名阿里安派信徒（Arianer）——他否认耶稣的神性。在东罗马带着怀疑的容忍下，这位哥特人作为罗马元首（*princeps Romanus*）在拉文纳统治了西罗马帝国30余年。

罗马上层人士波爱修（Boethius，约480/485—524/526）是其统治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波爱修是当时最有教养的人之一。他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古代晚期的学者，几乎了解并精通古希腊哲学所有流派——远超奥古斯丁。他的目标是将所有保存下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翻译成拉丁文；但他身居高位，这妨碍了这一计划。最终他只完成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这带来一个让人叫苦的后果，即之后的70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仅作为逻辑学家为人所知。

尽管和他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一样是基督徒，波爱修却生活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精神中，他意图借助亚里士多德哲学与这两者达成和解。波爱修坚决地否定了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为此，他详细研究了耶稣的神性这一重大的争议性问题。在东罗马看来，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并因此是神。在西罗马教皇看来，耶稣不仅拥有人的本性，也有神的本性。在坐在罗马皇位上的西哥特国王看来，耶稣只是一个杰出的人类。这些看似拘泥于细节的东西导致了敌对阵营和政治对立，这和今天伊斯兰世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几乎没什么不同。

波爱修借助逻辑学的精巧工具对这一问题做出剖析，为“个

人”（Person）和“本性”（Natur）下了定义，将东罗马和教皇再次聚在一起。在狄奥多里克看来，这一新的结合就是大逆不道——这威胁了他的权力。麻烦和纠纷接踵而至，这位哥特国王没有犹豫很久。【406】他下令逮捕了波爱修，将他智识上的“单人智囊团”送上法庭。

在波爱修临刑前的数月间，他困于囚牢之中，提笔写下一部畅销书：《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 philosophiae*）。古代晚期没有其他任何书能像这部作品一样，有这样多的版次、如此众多的译本，同时还有如此长远的影响历史。这是一部怪异的书。死亡迫在眉睫，波爱修撰写了一部虚构的仿古体著作。“哲学”如一个人一样出现，它能安抚满腹牢骚的波爱修。如果这个世界还是受到人类如此卑劣狡诈的统治，那么哲思之人就处于万物之上！通过摆脱俗世的烦忧、欲望和痛苦，完全朝向自身，并由此朝向自身中更崇高的部分，他寻找，并找到了与自然和理性的谐调。无所谓尘世中发生了什么，最终人类在一个善与爱的神性世界中感受到自身得到了升华。

波爱修的慰藉是一部希腊哲学精选集：柏拉图对宇宙的构想与亚里士多德对形式和质料的思考，以及斯多亚派骄傲的泰然自若，汇合在一起。这一切共同为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添枝加叶，在这样一种哲学中，人类通过自省努力上进，直至神性的太一。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是一部十分不符合基督教的书，相较于奥古斯丁要更接近普罗提诺。波爱修避免了所有基督教的暗示，没有引用任何圣经典故。又一次，是人类自身经过思考解救自身，而不是通过仅降临于选民的上帝恩典。

尽管波爱修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新的哲学思想成果的时代和世界，他在诸多方面仍影响了中世纪哲学。他的逻辑学著作后来引起了所谓的共相之争，这在下一章会提到。【407】此外，波爱修尝试借鉴普罗提诺为上帝存在做出证明，这启发了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Anselm von Canterbury）的著名证明。他设置了数学化的学科“四艺”（*Quadrivium*）：算术、几何学、音乐理论和天文学。这四艺后来构成了中世纪大学学习的基础。

一位托名亚略巴古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vom Areopag）的不知名的同时代人，与波爱修一样对中世纪有着巨大的影响。狄奥尼索斯是一个雅典人的名字，据保罗的《使徒行传》记载，他是保罗在那儿传道时皈依基督的。不管这个事件是否属实——5世纪晚期或6世纪早期，这个自称“亚略巴古大法官狄奥尼索斯”的，无论如何都完全是另一个人。教会将对尘世和天堂所有人的详尽描述归功于他。“狄奥尼索斯”为

所有宗教职业做了分类和分级。他对天使也做了同样的事——天使被置入一个垂直的秩序体系中，这个体系像幽灵般贯穿整个中世纪，甚至还被诸伟大思想家（如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von Aquin] ）视作模板。

这位可疑的“伪狄奥尼索斯”影响深远、举足轻重，因为他引用圣经为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Proklos）的作品润色，如此一来搭筑了一架通往基督教的桥梁。此外，他用一种不太寻常的方式将普罗提诺的“太一”和基督教的上帝融合在一起。在普罗提诺看来，“太一”如此不可言传地完满，以至于人们不能用任何形容词来描述它。它既不是“善的”，也不是“公正的”，也不是“智慧的”，等等——所有这些词语都太渺小了，而不足以描述“太一”。伪狄奥尼索斯正是把这一点转用到基督教上帝那里。上帝也是如此崇高地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描述适用于他。我们看一眼圣经，上帝像人类一样出现，他生气，发怒，惩罚，原谅，派遣儿子到尘世，如此等等，这明确无疑地展现出伪狄奥尼索斯如何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相去甚远。【408】通过他关于一个无特性上帝的言论，普罗提诺的“消极神学”被很容易地移植到基督教中——在此，“消极”意味着“不可确定”。9世纪，伪狄奥尼索斯出于偶然为中世纪所发现，为数不少的大思想家随后又将追溯到他的消极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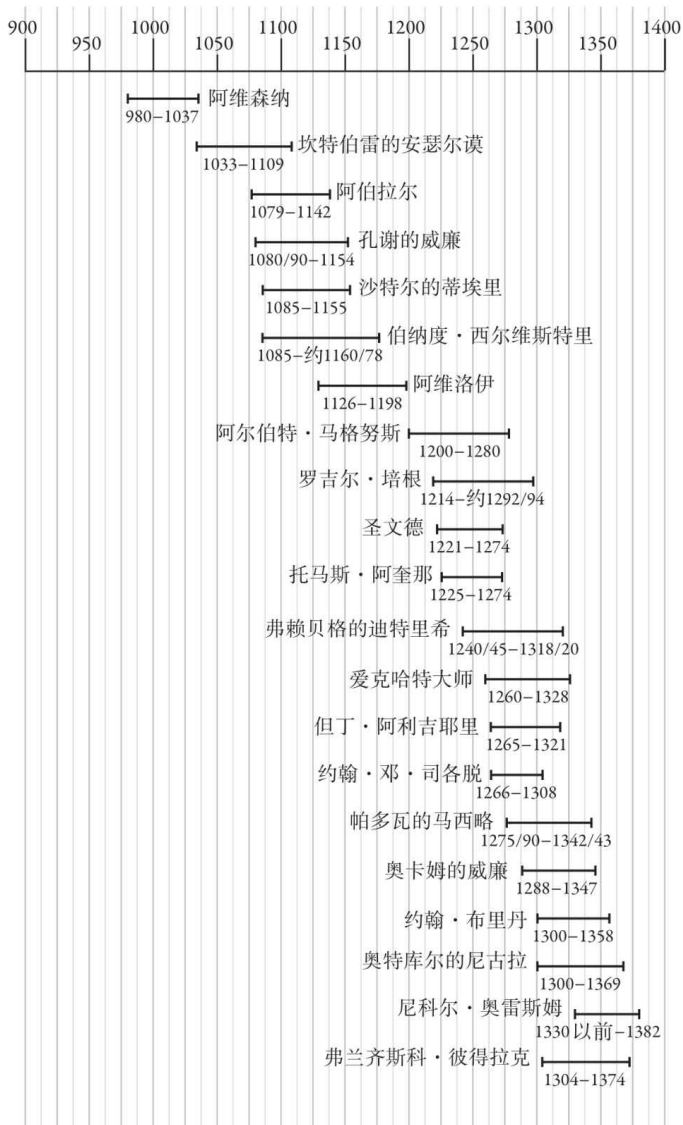
即使对奥古斯丁恩典学说的怀疑还未完全消失，除了神性之启悟，还有更为人性的救赎之希望在闪烁，但接下来几个世纪里作为“基督教”的东西，仍然在6世纪差不多被固定下来：这就是基督教及其教会在真理方面的绝对代言资格；以唯一善的上帝统一体代替善恶二元论；三位一体学说，据此圣父、圣子、圣灵既是三个，也是同一人格；基督的神性，这让他远超一个杰出人类之上；原罪学说，据此亚当的罪行使人类堕落，而基督拯救了人类；恩典学说，据此上帝拯救哪个人要听凭上帝的决定；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区别，因这一区别，人类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接近神性的一。还有奥古斯丁将世界划分为两个王国，即神圣王国和尘世王国。

然而教会在尘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罗马陷落之后，它应该从与尘世的交往中抽身而退吗？它应该与世俗国家合作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吗？或者它就应该追求尘世的统治权？伴随着这些问题，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关于这个时代，没有人能知道，人们将一度视它为一段长达千年的“中间阶段”（Dazwischen）——这就是中世纪.....

中世纪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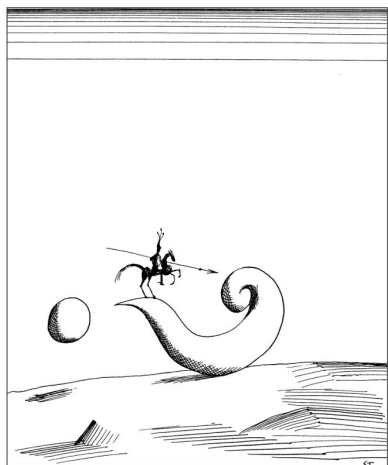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

公元



在教会的阴影下【415】

修道士、教皇、圣人——南北方国家的建立——爱留根纳，或自由意志——逻辑与信仰——上帝可以证明吗？——阿伯拉尔——玫瑰之名



修道士、教皇、圣人

公元537年12月27日，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踏入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仅仅用了创纪录的五年的时间，这个东罗马帝国强大的男人就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在直径为33米的巨大穹顶被安放在雄伟大气的中心建筑上之前，他早就颂扬了他的神，是那位神将这座建筑赋予了他，它甚至超过了传说中位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的神庙。这位皇帝所无法料知的是：稍早于时代的变革，他的这座“圣智”大教堂在今天被视作古代晚期最后一座大型建筑物。

这个穹顶历经了多次垮塌，【416】562年的平安夜终于覆盖到这座大教堂之上时，查士丁尼一世已经80岁了。精力正在衰退的他统治着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政治统一体；这个帝国，包括了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希腊。地中海沿岸的整个地区，只缺少了今天的摩洛哥、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沿海区域。

但是光鲜的外表具有欺骗性。尽管这位皇帝为他的帝国制订了一部

统一的新法，《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直至今日这部法典仍塑造着我们对于“罗马法”的印象。但是查士丁尼在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地，迦太基、西西里岛、罗马和拉文纳，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有效统治。首先是在意大利，东罗马的军队事实上仅仅统治了东北部一块可掌握的地区。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被留给了东哥特人与最后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的伦巴底人。在希腊的北部，阿瓦尔人威胁着边境，斯拉夫游牧民族的统治区域从波罗的海直至伏尔加河。东南部波斯人虎视眈眈，这是罗马人永恒的强大敌手。而在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鼠疫都在扩散，那些大型沿海城市的人口首当其冲地在减少。

在内政上，这个帝国也面临一场考验。尽管东罗马帝国的基础结构通过其对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合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大约有2000位基督教的主教居住在香火旺盛的大教堂内。他们代表了统治区域所有省份内的皇帝的权力。然而教会本身却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主教们越是深陷于世俗的交易，也就越不会被尊奉为宗教的典范。在帝国的东部，真正的信仰领袖是那些禁欲主义者。他们生活在城市之外的沙漠和荒野里——生活得无欲、断念并且“神圣”。【417】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他们的永生。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从未到达叙利亚的沙漠、安提阿的高山与加沙的沙丘。

官方教会的势力受到了限制。有损于教会的，并不仅仅是那场关于耶稣是人、是神抑或两者都是的无穷尽的古老争论。在以弗所和卡尔西顿（Chalcedon）举行的大公会议，尽管已经在449年和451年将耶稣作为神和人的不可分离的双重本性确定下来，却无法使争议各方满意。埃及和叙利亚的一性论者（Miaphysiten）仍然对作为神的耶稣的唯一（*mia*）本性（*phýsis*）起誓。那些得名于其早先的创教者聂斯托利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er）则遵循阿利乌（Arius）的传统，坚持认为耶稣始终还是一个人。查士丁尼在两种立场之间疲于应付。这两种信仰方向此后都长期存在，聂斯托利派至13世纪，而一性论者甚至时至今日在科普特基督教会以及更多独立的东正教会中还存在。

无论如何，查士丁尼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帝国。在西方，基督教界的总代表想去操心皇帝的事务。4世纪以后，罗马的主教被称为教父或者教皇。这个头衔很长时间内还不是专属的——其他的主教也如此被称呼。教皇并不支持任何既有的世俗国家，而是据有一片脱离控制的土地。因此他不得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别无选择地与阿里安派信徒狄奥多里克达成妥协。查士丁尼的军队发动了一场针对哥特人和伦巴底人的

毁灭性战争，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没有获得对西方的统治权力。仅仅15年之后，意大利的绝大部分都落入了伦巴底人之手。从此之后意大利就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伦巴底军阀治下的一个松散的管辖地。

568年，东罗马士兵永远撤离出意大利时，年轻的罗马人格里高利（Gregorius）成了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七年之后，这位出自德高望重的贵族家庭的后裔在政治中认输，【418】定居在宁静安逸的西里欧山上的家族别墅内。在这里，罗马中部地区，他遵循努西亚的圣本笃（Benedikt von Nursia，约480—547）的典范，建立了一座本笃修道院。在西罗马帝国的领域内，脱离世俗生活的基督教避世者很少独自栖身在荒野之中。大多数时候他们都结成小群体，以便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即便“君主”（*monarchos*）这个词是从“孤独”（*monos*）一词中得来的。这种修道士团体不是圣本笃的发明，但是他赋予修道院制度以严格的规则，这些制度成为很多修道院的典范。

格里高利当修道士的时间并不长。579年，他成为君士坦丁堡教皇的特别公使。那里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格里高利并不精通这门语言。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东罗马的宫廷里待了六年。590年，格里高利成为教皇，自此之后这个头衔就专门留给了罗马的主教。格里高利治下，教皇的权力以迄今尚不清楚的方式得到了加强。异教徒在无情的暴力之下被迫皈依，传教士被派遣到尚未开化的不列颠。在此期间，格里高利在高卢和西班牙与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日耳曼国家周旋。法兰克的国王成为基督徒大约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而在格里高利成为教皇的前一年，位于西班牙托雷多的西哥特国王雷卡雷德一世（Rekkared I.）发誓与阿利乌教派断绝关系，转而皈依罗马的天主（整体上的）教会。这两个王国富足而稳定，较少受到教皇的制约。如果罗马的主教想要至少维持对西方基督教界的控制，就必须强化他的主教地位。

格里高利——后来获得了置于名字之前的“大”的尊称——为身居宗教要职者写下一部规则手册（《牧灵准则》[*Regula pastoralis*或*Liber regulae pastoris*]），此书是要说明，信徒的灵魂应当如何受到神职人员的引导。这部著作影响颇大。格里高利规定，主教要掌管灵魂。圣徒并非在孤独的状态中履行这一职责，【419】而是要在主教教区具体的权力实施过程中！通过《牧灵准则》，教会将其掌管人们灵魂的职责固定下来，并且由此也掌管俗世的行为。神职人员作为世俗中的牧师就能够成圣徒，甚至比通过离群隐居还要容易。

按照这一新的解释，很多教会中的身居要职者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

都成了圣徒。迄今为止对圣徒的敬奉更多发生在殉道者和具有魅力的非教会人士身上。每个地区都有它的圣徒和守护圣徒。教会承认这些圣徒，并且尽力支持这些敬奉活动。由此它就满足了明显尚未消失的对多神信仰的需求——根本上是那些“异端”宗教的一种残余。那种随处可见的对于魔法的崇拜也属于此。教会发现和发明了这种崇拜的对应物，即圣徒骸骨、圣物，从中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格里高利，圣徒很自然地大量涌现。从此以后，每一位牧师因公务至少应得到一个圣徒的身份。格里高利本人后来也被封圣了，尽管情况本不该如此。

通过官方的新的圣徒身份，教会人员在原先西罗马帝国的整个范围内地位骤然升高。就像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作为严格的、监督一切的父亲控制着所有修道士的灵魂生活一样，按照格里高利的意愿，主教也应该这样掌管他的主教辖区。教皇的著作成了广泛传播的入门手册以及教会权力实施的合法保证。

自奥古斯丁以来，没有人像格里高利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教会的自我认识。而与两百年前希波的主教不同的是，那位坐在圣座上的高贵的罗马人，不再是一个受过全面教育的人。奥古斯丁尽管已几乎不识希腊文，但是至少研读过希腊哲学的拉丁文译本。【420】对于整个西方世界而言，源于希腊的、几乎涵盖一切的博学传统在波爱修之后就终结了。在他之后的很多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哪位著名的西方思想家能够全面掌握希腊哲学700年的传统。

从波爱修直至11世纪，“哲学”是什么？是少量拉丁经典作家的文本，诸如西塞罗和塞涅卡。波爱修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也属于此。此外还有在寺庙中“以哲学的方式”进行的沉思，出自奥古斯丁著作的一些段落组成的读物可能也算。但这就是所有了。自此之后，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那些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质朴直接且具有高度说服力的教会意识形态著作，就像格里高利的论著那样，而非哲学——一场灾难性的损失和智识上的荒漠化！在西方历史上，这样一场衰败是独一无二的。

教会所关心的始终是，以多样的方式系统化地传播它们新的信仰指导。生产这类书籍的地点是寺庙。修道士学习拉丁文的语法，以便阅读和书写，他们也学习生产羊皮纸。不再有私人图书馆，书籍在寺庙中制作，且大多数时候也保留在那里。7和8世纪，即便是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最大的图书馆也只有不超过几百本书。对比着想想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数十万书卷，它们当时储存着世界上的知识。与此相反，教会官方的

书籍生产只是极为缓慢地得到推进。一座寺庙需要2100个羊皮纸卷，以便誊写格里高利的全集，这是中世纪早期最为常见的书籍。这个大型的手写本总重差不多有50公斤，与大圣经差不多。

拉丁语是西方神职人员书写所用的语言，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它都是一门外语。它是教会和管理部门的语言。【421】普通民众说凯尔特语、法语、哥特语或伦巴底语。希腊或罗马的哲学家不会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们不必完全从头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以便让其他学者理解。基于所有这些情况，7和8世纪几乎没有产生重要的哲学，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将西欧的外来民族的后代视为文化上有待发展的国家，这些外来民族击溃了原先衰落的帝国，但是却没有成为其继承人。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帝国也没有建立基督教的教会，而是成了基督教迄今为止最强的对手……

南北方国家的建立

大格里高利于604年去世。同一时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另一个角落，即阿拉伯的麦加圣地，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民族古莱什族的一位族人看到了一个幻象。天使吉布利勒向穆罕默德显现，启示了他的使命，即传布真主的真言。这块多产的亚伯拉罕宗教的温床再度孕育出一种新的选民。与耶稣一样，穆罕默德也是众多感受到并传布这样一种天职的人中的一员，一开始看起来同样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当时的麦加是一个广受推崇的朝圣之地。形形色色的信徒来到这个城市，目的是为了在天房（Kaaba）向他们各自的神祇致敬。古莱什族在这种朝圣之旅中获利颇丰。而穆罕默德对此表示抗议，他只认安拉为唯一的神，这一点使他很快就无法在家乡继续待下去了。

穆罕默德与他的追随者一道迁移到400公里之外的亚特里布绿洲（Oase Yathrib），即后来的麦地那。【422】这位古莱什族人的后代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并且创立了一种新的信仰，即伊斯兰教（Islam，意为“献身”）。最初他对麦地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非常友好，而他自视为他们信仰的完成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争端才出现。穆罕默德处死了反抗他的500名犹太人。

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以及盟军贝都因人以暴力制服了古莱什族。630年，他带着大约2000名穆斯林进军麦加。在阿拉伯半岛上，这种形式的部族世仇司空见惯，而在政治上几乎达不成什么一致。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情况才得以改观。他的继任者们突然意识到，情况对他们而言是多么有利。由于受到相互间无穷尽的战争的消耗，东罗马帝国和萨珊王朝这两大强国都被大大削弱。穆斯林利用了这一真空。这些借由这种新宗教历史上第一次临时拼凑统一的部落，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出发，向北推进。临时拼凑的主要原因是，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阿布·巴卡尔（Abu Bakr）和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lib）相互敌对；这场争论时至今日仍然将他们的追随者，即逊尼派和什叶派分隔开。阿布·巴卡尔的继任者乌马尔（Umar）首先被证明是成功的统帅。作为第二代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他将他的战士派往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以及伊拉克。萨珊王朝在穆斯林的攻击下崩溃了，而东罗马帝国也遭遇了沉重的失败。其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三都落入了这些信仰斗士之手。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十年间，乌马尔就已经统治了一个帝国。【423】从一个暴力组织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一个地区性信仰开始成为一个世界宗教。

但与基督徒相比，穆斯林相对比较宽容。只要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他们新的统治者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并缴纳税赋，穆斯林就允许他们继续保持自身的信仰。怀着对其宗教和军队优势的自信，穆斯林继续向亚美尼亚挺进，将之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抢夺过来。阿拉伯人得到了摩洛哥，后来得到了整个北非。711年，他们在西班牙登陆，摧毁了那里的西哥特王国，并且设立了安达卢西亚哈里发，后来成为科尔多巴酋长国。这些捍卫信仰的战士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穿过法国南部时，才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732年在图尔和普瓦捷的争夺战中，法兰克人卡尔·马尔特尔（Karl Martell）战胜了一支打家劫舍的阿拉伯军队。阿拉伯人的版图延伸到巴利阿里群岛和西西里岛的占领地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不再扩张了。尽管如此，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比残存的东罗马帝国大十倍。

然而仿佛是在阿拉伯风暴未有触及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一个配角式的、面积小得多的新帝国：法兰克王国，他们将阿拉伯人阻挡在了法国。418—814年间，法兰克的统治者，从克洛维一世（Chlodwig I.）到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通过武力征服和野蛮入侵吞并了今天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整片区域。在那里基督教成为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类似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都被分派给皇帝的亲信和亲属，他们掌管着这些区域的权力。他们腰缠万贯，并且在处理异教的异端与基督教会之间的统一问题时，也机智万分。【424】由此基督教在日耳曼国家通过拉丁语的文字传统获得

了一种完全适合自身的样式。

对于教皇而言别无选择。他必须依靠法兰克王国，视之为基督教在西方的保护者。751年，这位所有基督徒的精神首脑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Pippin den Jüngeren）祈神赐福。按照古老的以色列习俗，被涂了圣油之后，法兰克国王现在就成了教会的赞助者。作为交换，他将从伦巴底人那里夺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片土地送给教皇。丕平的儿子和继任者查理大帝通过与伦巴底、萨克森和阿瓦尔展开冷酷无情的战争，扩大了王国。被证明比开疆扩土更困难的任务则是，也要在内政上巩固法兰克王国。其统治区域中的大片地区被大片森林覆盖而人迹罕至。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贫穷的状况之中，饥饿和贫困司空见惯。居住在亚琛的查理大帝于800年在罗马被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他投入大量的精力改善农业的种植方法，扩建修道院。到了他的继任者虔诚者路易（Ludwig des Frommen）的时代，法兰克王国有了180个主教教区首邑，以及700座较大的修道院。

建立具有统一语言的针对下一代教士的统的教育体系，就属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查理大帝为他的教育革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即约克的阿尔琴（Alkuin von York），他从亚琛开始组织了一场伟大的变革。他怀着巨大的热情致力于在整个国家建立一种易于阅读的标准字体。尽管“加洛林小写字母”并非阿尔琴的发明，但是他最先使之成为标准。重要的还有，所有的修道士都书写在语法和正字法上都正确的拉丁文。阿尔琴想要以这种方式令官方的基督教信仰保持纯粹并且避免误解。同时他推广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民族语言。如果想要向俗人解释上帝的话语，这些语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是，【425】这些语言已经充分地、与拉丁语规范语言混合在一起了。一方面是教会和政府的语言，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语言，两者之间继续保持着分裂。

阿尔琴在后来所谓的圣像之争中找到了一种全民教育的妥协方案。在君士坦丁堡，一场激烈的争吵已经喧闹了很长时间，所涉及的是如下问题：人们是否可以敬拜圣像。对于圣像的敬奉是否像那些偶像破坏主义者（*Ikonoklasten*，意为“偶像破坏者”）所指的，就是一种偶像崇拜？抑或这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就像偶像崇拜者（*Ikonodulen*，意为“敬奉偶像的人”）所宣称的，上帝的神圣性也在他的像中得到显现？在实用主义的阿尔琴看来，这场争论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热情。只要人们不将圣像与其表现的内容视为同一，就会反对圣像，为何如此？他在《加罗林书》（*Libri Carolini*）——一个受皇帝委托而做出的鉴定意见——中找到了

对他观点的支持。这部作品将表现内容与表现对象分开，这符合逻辑也合乎理性。由此，圣像有可能并不神圣。然而它们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对于宗教的扩散和传播有利——这是一个在西方无处不被贯彻的纲领。

与此相反，在另一个争论主题中，阿尔琴则几乎没有表现出宽容。西方教会也熟知关于耶稣神性问题的古老争论。西方的聂斯托利派自称为嗣子论者（Adoptianisten），并且按照阿里乌的传统进一步对此表示怀疑，即认为耶稣不仅仅是一个由上帝选中的、仿佛被上帝“收养”的人。阿尔琴在雷根斯堡、法兰克福和亚琛召开宗教会议，目的是将这些令人不快的教友判为“异端”。在对基督教标志的认同这一大问题上最终归于平静，尽管之前还有很长时间的争议。而接下来过不了很久，就会有完全古旧的和完全崭新的信仰争论……

爱留根纳，或自由意志【426】

850年，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知识界丑闻。导火索是宫廷语法学家约翰·司各特（Johannes Scottus）的一本书，这位爱尔兰后裔也自称爱留根纳（Eriugena）。在此期间，法兰克王国发生了分裂，秃头查理（Karl der Kahle）统治了王国的西部，就是今天不包含其西部省份的法国。他的主教兰斯的辛克马（Hinkmar von Reims）委托约翰·司各特撰写一份关于一场争论的鉴定意见，而这份意见很快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

我们按顺序来说。两年之前，848年10月，美因茨宗教会议的成员对修道士奥巴伊斯的高特沙尔克（Gottschalk von Orbais）判了刑。原因是高特沙尔克关于天命的观点，即宿命论。这位修道士完全在奥古斯丁的意义上宣称，上帝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两种天命，哪些人以后会进天堂，哪些人会进地狱。这个观点不仅是传统的，甚至是一条教会的教义。但是在法兰克王国，时代变了。而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这种学说将上帝解释为对于每个人的任意的、带有偏见的且不公平的评判者——在处于领导地位的传教士那里，并没有以其严格的形式得到完全的容许。那么人们应当如何劝诫进步、抱负和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方式，如果最终这些都无关紧要？很明显在法兰克的教士那里，流露出些微来自伯拉纠的历史悠久的反对意见，对抗的是希波主教的宿命论。人们召集了美因茨宗教会议，判处高特沙尔克终身监禁，并且在公共场合鞭笞

了他。

但是主教们对于高特沙尔克事件的观点发生了分歧。一个人只是因为详细地复述了奥古斯丁就被判了刑，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情形与教义传统的决裂过于巨大了。有鉴定意见认为要免除高特沙尔克的罪责。这种情况下，【427】辛克马主教委托身在拉昂（Laon）的宫廷语法学家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另写一份鉴定意见，以便调停这场争论。爱留根纳决定如主教和国王对此事的期待和希望那样去写：他将对高特沙尔克的判决解释为正当的。然而令人愤慨的是他的证明。因为爱留根纳是以哲学的方式而非神学的方式论证的，这令他的同时代人大为诧异。他既没有引用圣经，也没有依据教父的权威。尽管他接受了年轻时代、尚未被教条化的奥古斯丁的论证，但只是为了用以引出对晚期奥古斯丁的反对，并由此自由地哲思。

在爱留根纳看来，上帝是无限的完满，这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看法。由此上帝的所有人性特征都被抽离了。这样一位上帝一开始并不确定要拯救谁或者谁要被罚入地狱，也不会事后有所指向。一位完满的上帝首先是无时间的，其次也不是任意的。任意性是人类世界的特征，我们不能将之投射到上帝身上。因此并不是上帝决定救赎，而是人自身——并且是通过他的生活方式。因此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自由意志，那么他根本上就没有意志，而是类似于被远程控制着的。然而很明显，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正直、诚信、正派，那么他就接近上帝，反之，如果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且“有罪的”，那么他就远离了上帝。可以想想普罗提诺，他认为恶就是善的缺席。爱留根纳设想的地狱也与此相似。地狱并非一个充满烈火、折磨和受刑者的洞穴，而是单纯被看作不幸的远离上帝之地。

爱留根纳850年为自由意志所作的辩护，对于那样一个我们根本不相信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的时代来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对于可怜的高特沙尔克来说，这是一篇危险的文字，但是对于整个人类，这篇文章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且有前瞻性的。【428】显而易见，这个文本没有像大格里高利的作品一样成为畅销书。我们只能看到唯一一份手抄本。我们熟知的是特鲁瓦的普鲁顿修（Prudentius von Troyes）主教和里昂的艾尔兹迪亚肯·弗洛鲁斯（Erzdiakon Florus von Lyon）针对此文本愤怒的反驳，这些反驳认为爱留根纳犯了“致命的错误”并建议尽快让他停止恶行。如果秃头查理没有对这位拉昂的学者施以援手，那么他的处境不会比不幸的高特沙尔克更好。

然而爱留根纳却能够在不受逼迫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对自由意志做了被当时的人认为臭名昭著的辩护17年后，他于867年发表了代表作《论自然的区分》（*Periphyseon*）。这部书是一些零星想法和名言的合集。一位老师和他的学生就创世和世界秩序进行讨论。教会的权威意见再一次仅仅被作为他自身思想的靶子。在他的时代，爱留根纳是极少数懂希腊语的知识分子之一。此前他已经将一份由拜占庭皇帝所赠的伪狄奥尼索斯的手稿新译成拉丁文。新柏拉图主义对他代表作的影响同样强烈。就像伪狄奥尼索斯所认为的那样，爱留根纳也认为上帝是不能被规定的。因此，所有赋予上帝以人世特征的尝试，都会失败。上帝不能被把握，而只能被体验，在这种体验中，神性之物在我们之中显现。

推进得很远，很符合新柏拉图主义。更重要的还有，爱留根纳认为人也不能简单地被规定。他难道不就是上帝的摹本，因此同样是深不可测的吗？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理性和我们思想的力量中显现的难道不是整个世界？难道我们并非首先是具有神性特征的存在，而非可怜的罪人？为了将人从一切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爱留根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带有人类命运先定说的恩典学说被抛弃了。【429】作为酷刑室的地狱也被废止了。希腊人那种自信的人类形象再度复活。即便我们由于亚当的原罪被逐出天堂，我们的精神却仍然以自然的方式努力接近上帝，并且可以凭借自由的行为达到这一目的。在长达35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观点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被允许讲授，并且悄悄地流传——即便这种情况的发生极为罕见。直到1225年，教皇出面干预，反对爱留根纳的观点，并且基于或新或旧的争议焚烧了他的著作。

逻辑与信仰

爱留根纳关于人及其自由的现代化看法并没有得到贯彻。他思想中的明亮和清晰就如一团巨大黑暗中意外的磷火在我们面前我们一闪而过。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教会的想法并没有延伸到如此之远，即将一个人从他作为罪人卷入的纠葛中解放出来。他们操心的事完全不同。分裂的法兰克王国瓦解了。萨克森人奥托大帝（Otto der Grosse）在欧洲中部建立了一个新帝国，后来人们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中欧和西欧的安宁持续了几十年。随后爆发了一场新的建立国家的浪潮。

1000年，年轻的国王奥托三世（Otto III.）统治着中欧。他皇冠上的八角环形囊括了整个世界。八代表着“天”和“地”，每块宝石包含了一

种美德。他的权力巨大，甚至教皇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这位教皇就是他以前的老师，聪明而狡黠的学者欧里亚克的格伯特（Gerbert von Aurillac），后来被奉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 II.）。作为数学家，他发明了算盘，并且是最早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人之一。【430】他也曾专心研究星盘，并制作了一个天球仪。然而皇帝和他的教皇都在短暂的统治之后去世了。

在北方和欧洲文化圈的东部，当时有一大群“伟大的”和“神圣的”国王建立了他们的伟大帝国。这些国王来自诺曼底，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自波兰，来自波西米亚和匈牙利，来自俄罗斯，以及来自保加利亚：征服者威廉（Wilhelm der Eroberer）、神圣的奥拉夫（der heilige Olaf）、神圣的克努特（der heilige Knut）、伟大的博列斯拉夫（der große Boleslav）、神圣的弗拉迪米尔（der heilige Wladimir）、神圣的文策尔（der heilige Wenzel）、神圣的斯蒂芬（der heilige Stephan）以及伟大的西米昂（der große Symeon）。所有这些国王都生活在10和11世纪，他们机智灵活地与教会达成一致，并且在他们的领土上第一次建立了类似于“民族国家”的帝国。

这些帝国的建立都付出了牺牲。战争的破坏不断扩散。装备精良的战士穿着锁子甲，手持沉重的盾牌、长矛，戴着铁头套，他们为了国土使用暴力。然而发生在战役中的残酷死亡只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终结中的一种类型。平均的预期寿命大约是30到50岁（在欧洲直至19世纪，在其他地方直至20世纪仍然保持如此低下的水平）。一个40岁的人就是位老人了。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zenz II.）1195年前后修改了《旧约》中“诗篇”第90篇第10节的表述，即人会达到70到80岁的年纪：“现在少数人能活到60岁，极少有人活到70岁”——而他自己是在56岁去世的。

无处不在的死亡笼罩着生活。如果一个人病了，他生命的结束就很快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态度在哲学和神学中留下了痕迹。从12世纪开始，城市中的主教堂学校开始作为竞争者涉足通常位于乡间的修道院。这是一个飞速城市化的时代。当乡间的农民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唉声叹气，城市中新的共同体形式则正在形成。首先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这里获得了影响力和权力。类似于近1500年前的雅典，城市中旧有的封建体系和新的有产市民之间爆发了冲突。【431】一方是教士和贵族，另一方是新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市民阶层，两方之间产生了时而流血的权力斗争。就像在古希腊，生意人和工商业者组成的新阶层也是以理性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就像对买进和卖出、生意和盈利的计算与算计要符合逻

辑一样，根据这一理想，社会中的事同样应当理性化。

逻辑、理性、透明：当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皇帝与教皇在“叙任权之争”（1076—1122）中对欧洲的统治争吵不休时，征服者威廉则从1086年开始将国家中的地产绘制成地图。《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将法律关系——按照其理念——永远固定了下来。大约五十年后，一位来自博洛尼亚的高校教师、加默度会会士

（Kamaldulensermonch）格拉蒂安（Gratian）起草了一部普遍的教会法，即《格拉蒂安教令集》（*Decretum Gratiani*）。在关于财产、管理与政治问题上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从现在开始必须是有理据的，必须参考具有意义的书面法条进行论证。

教会无法对抗那种商人和律师的理性日渐强大的势头。他们的整个体系立足于非理性和信仰，而不是逻辑和理性。教会中只有极少数人自认为有能力和有义务，将信仰和逻辑彼此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这样的人。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名来自位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奥斯塔（Aosta）的贵族后裔。

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约1033—1109）并非像他的名字容易让人猜测的那样是个英格兰人，他是在萨伏依的伯爵领地长大的。23岁时，他横穿法国来到位于诺曼底的勒贝克本笃修道院（Benediktinerabtei Le Bec）。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兰弗兰克（Lanfrank）同样是意大利人，并且声名卓著。像大多数神职人员一样，兰弗兰克并不非常认同如下做法，即以辩证法的方式达至信仰。【432】在中世纪，辩证法意味着争论式的对话、对论证的理性化权衡以及对逻辑的运用。辩证法与语法学、修辞术、算术、几何学、音乐以及天文学并列，同属于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即七种自由的技艺。教会在与这种自由技艺的纠葛中发生了深刻的分裂。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自由技艺对于每位神职人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认为这是魔鬼的所为。

兰弗兰克站在保守的一边。与他的竞争对手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 von Tours）针锋相对。尽管这二位曾跟着同一位老师福贝尔特（Fulbert）在沙特尔（Chartres）学习，但是在对辩证法的看法上二人争吵不休。具体而言，他们的争论是在以下问题上爆发的：圣餐中的面包和酒能否实在地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还是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兰弗兰克将之理解为食物实在的转化。他相信，面包和酒事实上是在完全物质化的层面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的，亦即它们此后再也不是面包和酒了。与此相反，贝伦加尔认为这不是信仰，而是迷信。他的观点是，

圣餐中面包和酒只是在精神层面转换了含义。而物质化的实体在这里并没有任何变化。

兰弗兰克始终坚持他那个明显更为朴素的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贝伦加尔辩证法式的论证给了安瑟尔谟巨大的影响。他人生的目标就是，使信仰与理性彼此和解，并且使神学真正变得符合逻辑。

上帝可以证明吗？

两年多之后，安瑟尔谟就来到了勒贝克的修道院，他成了那里的修道院院长。在此期间，兰弗兰克则搬到了卡昂；1070年，安瑟尔谟遵从新任英格兰国王征服者威廉的召唤，成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433】安瑟尔谟利用在勒贝克的时间，不受干扰地以辩证法的方式去论证。当时的情况非常有利。11世纪的世界，除了修道院之外，哪里还会有哲学思考的空间呢？那些宫廷，比如当时亚琛的查理大帝的宫廷，长期在知识领域无足轻重。一切东西都被转移往修道院。然而那些修士可以支配的哲学宝藏则是非常简单的。古希腊的传统几乎完全被斩断了。只有奥古斯丁、波爱修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还能在像安瑟尔谟这样的思想家那里作为依据。借助这些资源，安瑟尔谟想要以逻辑和理性的方式通达基督教信仰。因为在他看来，逻辑和理性是上帝极好的馈赠，人由此而有能力分有神性之物。

如果一位哲学史的读者知晓，西方文化史中自中世纪鼎盛期和中世纪晚期以来，古代的理性是如何慢慢地再度被普遍接受的，那么安瑟尔谟的哲学就应被看作其中不言而喻的一个步骤。然而安瑟尔谟生活和思考的那个世界对此尚一无所知。今天完全支配了我们生活世界的理性，在那时还十分茫远，就像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门下的缝隙中透进来。时间和空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测量和丈量。直至14世纪，人们要测量时间时，还是使用日晷、沙漏钟和滴漏来计时。有关一个世纪甚至一千年的时间单位的观念，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时间（*tempus*）和天气（*tempestatas*）被混为一谈。计时是以循环往复的自然现象为基础的，比如立春、月相或者日出。人一生的时间被看成最大程度上可以纵观的时间单位。就在祖父母生活的时期，历史的神话铺陈、伟大的英雄和圣人，在世纪与政治统治的线索中交织于一起。

只有教士才关心历史年代。【434】8世纪，本笃会修士贝达（Beda）将世界产生的时间标定为公元前3952年3月18日，并由此修正

了教父哲罗姆的日历，后者认为世界起源于公元前5198年。然而尽管贝达引入时至今日依然通行的“按照耶稣出生的时间”的纪年方式作为历史时间的尺度，但是这一思想在中世纪的数百年中毫无意义。

在安瑟尔谟的时代，人们所获得的时间图景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希望、愿望和忧虑并不是光秃秃的数字，而是可以充分想象的事件过程。诸如“末日审判”和“基督再临”这样的概念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在一个几乎没有历史观念的时代，现实和虚构就会草率地混杂在一起。一旦最后活着的见证人去世，时间就失去了那一段，就如同蝙蝠的翅膀那样折叠起来。并非时间，而是空间统治了中世纪的想象力。生命的轮回是在通往天堂的大门前发生的。而天堂又再度类似于一幅中世纪的图景，类似于一个果园或者一个由城垛围护着的城市。

甚至连修道院中的那些地图绘制者也从未提出过如下问题：他们的地图是否与计算、与那些受到蔑视的经验相符。地表的自然状态并非要表达的主题，他们的地图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图。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要合乎比例。在中世纪已经没落的迦太基被标识的与新建立的吕内堡（Lüneburg）完全一样。埃斯佩里兹（Hesperiden）的诸神之园坐落于西南，非洲背后的某个地方。“极乐仙境”（Insel der Seligen）位于爱尔兰的西边。遍地都是高耸的教堂。这些地图的世界是人们的经验世界，没有把梦境和现实分离开来。

在这个以神话和宗教的方式混合的世界中，有像安瑟尔谟这样的人抽出了理性的解剖刀。【435】作为修道院副院长以及后来的院长，他在勒贝克书写了关于真理、正义、恶的起源以及意义与含义之区分的论著。其中他几乎没有引用其他著作。当所有其他的教士都在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注解”时，安瑟尔谟却用这种方式写作，即仿佛根本不存在哲学或神学传统。他早期的两部著作首先广为人知，即《独白》（*Monologion*）和《宣讲》（*Proslogion*）。特别是第二部，后来被载入哲学史。因为安瑟尔谟就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述：“我信仰，因此我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正如耶稣对带有怀疑的多马说道，“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约翰福音》20：29），安瑟尔谟也是如此期待，信仰将会引导他最终达至洞见和更为确定的知识。

通过辩证法的手段去揭示真理，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尝试，乃是安瑟尔谟在《宣讲》中对上帝存在所做的证明。关于此证明的基本思想起源于普罗提诺，然而后者所关注的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那个无所

不包的“太一”。普罗提诺认为，因为这个“太一”是绝对的完满，因此它也必定存在，否则它就是不圆满的。这一思想对波爱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重复了这一“上帝证明”，并且将之传递到中世纪的世界。安瑟尔谟熟知波爱修的论证，并且由此开辟出一条思想路径，这条路径经由四个步骤达成。证明开始前，安瑟尔谟借用普罗提诺和波爱修的方式，把上帝定义为无与伦比的东西（*quo nihil maius cogitari potest*）。在今天看来，这并非无前提的设定，因为这个设定已经包含了关于上帝本性的一个特定图景。多神论者不会如此定义一个神。这事实上是普罗提诺关于完满的太一观念，早于安瑟尔谟700年就已渗入基督教神学。

然而在安瑟尔谟看来，完满的上帝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满的上帝首先只是我的思想，一个在我的理智中存在的观念。

【436】我从何而知，与这个完满的上帝的观念相对应，还有一个外在于我的思想的实在的上帝？非常简单，安瑟尔谟如此论证：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他就不是那个人们可以想象的完满之物。因为具备完满性的所有特性，这就属于完满性。而如果一个完满的完满之物却不存在，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不圆满！因此，如果上帝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完满之物，那么他的完满性从逻辑上也包含这一点，即上帝存在。

安瑟尔谟的上帝证明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有很多相似的证明是遵循他的方式做出的，比如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尔的证明。然而有一些安瑟尔谟的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这个证明的困难所在：上帝是无与伦比的东西，这是我的思想。而属于这种完满性的上帝存在，同样是我的思想！我从何而知，我关于上帝的观念，如果是令人信服的，在外部世界就有一个这样的上帝与之对应呢？在我的思想世界中上帝必然是存在的，而上帝是如何从我的思想世界跃入他应当事实存在的现实之中的？所有在我头脑中的定义只能是我头脑中的定义。

安瑟尔谟多次为他的上帝证明辩护，但是他人的怀疑从未中断。在此期间，兰弗兰克于1089年去世了。四年之后，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威廉二世将这位智慧的理性主义者从勒贝克接回坎特伯雷，让他做大主教。在此期间这个职位变得日益重要。大教堂在兰弗兰克时代还不是一座壮观的建筑，此时也被建造成一座国家级别的上帝居所。安瑟尔谟在位期间，被称为“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但是这段时间却没有给他带来好运。【437】叙任权之争，亦即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的争斗，也在英格兰汹涌澎湃，这场斗争迫使在此事中毫不退让的安瑟尔谟经历了两次长达数年的流亡。最后，这位罗马教廷利益的自豪的捍卫者在外国度

过了与他在英格兰任职时一样多的时间。

尽管如此，他刚开始担任大主教时，还有空闲完成一部著述，讨论信仰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上帝为何化身为人？（*Cur deus homo?*）上帝献出自己的儿子，以使人从原罪中解脱出来，对此的信仰乃是自古以来基督教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要求。那种令像保罗和奥古斯丁这样的人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境遇下皈依信仰的东西，几百年后却无法直接说服安瑟尔谟。在他看来，尤其感到陌生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的遗产，按照这些宗教的说法，作为本源原则的善与恶相互间在争斗。保罗和奥古斯丁将亚当的原罪解释为魔鬼所为。这种观念与安瑟尔谟的思想世界完全不相一致，他的想法类似于爱留根纳（安瑟尔谟并不熟知他），即认为根本不存在魔鬼。

安瑟尔谟为原罪与基督受难之关系所找到的新的图景，源自他的中世纪生活世界。按照中世纪的流行观点，亚当由于其原罪冒犯了上帝，就如同不忠实的奴仆冒犯了他的领主。只有当领主得到补偿时，冒犯才能被宽恕——与这种补偿类似的就是基督的受难。这样一种英雄行为当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的，因为所有普通人都是罪人。因此上帝就必须亲自介入。因此，以上帝的方式，无罪的耶稣死去，乃是由于他的父亲不抛弃有罪的人类，而是宽恕了他们。善与恶之间的古老争斗在中世纪封建时代社会问题的外衣下，看起来成了一个虔敬与诽谤的问题。

【438】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人之中或人之外的权力搏斗，而是补偿（救赎论）。

安瑟尔谟于1109年去世。他对于原罪和受难的诠释被时代忽略，就如同被长时间讨论的他的上帝证明一样。然而，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位聪明的意大利北方人可被视为一种新思想的开端，人们称之为“经院哲学”。但这个词在中世纪并没有这样被使用过。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词后来指称一种以辩证方式论证的“科学式”证明过程的大获全胜，这种证明过程逐渐囊括了几乎整个学院神学。然而“经院哲学之父”这个头衔，安瑟尔谟必须要与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学术争论者分享。为了理解后一位人物与他的世界，我们必须动身前往12世纪世界上新的文化首都，前往那个时代无可比肩、光芒四射且繁荣忙碌的大都会——巴黎！

阿伯拉尔

由于当时欧洲中部的情形，巴黎在1130年前后成为一座大城市。位

于塞纳河中西堤岛上的居住点远远超出了河岸，居民数量接近3万。与古代的大都会雅典、亚历山大里亚、迦太基和罗马相比，这个数目并不算多，而与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相比，巴黎的人口也不算多。但是对于12世纪的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而言，这已经很多了。

此前的漫长岁月里，9世纪的诺曼人威胁着这座城市，并向皇帝秃头查理和胖子查理提出高额的金钱勒索。自10世纪以来，巴黎就是卡佩王朝偏爱的都城，这个王朝属于法兰克国王雨果·卡佩（Hugo Capet）的后裔。即便时至12世纪末，这座塞纳河畔的城市将成为法兰克王国的首都，而之前它已经是王国中最为著名的定居城市。【439】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使商业繁荣起来。首先是塞纳河畔的水路贸易，使得一个富裕的商人阶层得以形成。经营食品、酒、盐、武器和布料的商贩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与这座城市的繁荣程度。在城市中的很多码头上，船只日复一日地为建造房屋运送煤炭、木材与石料。1137年，巴黎第一家固定的大型市场——中央市场（*Les Halles*）就已开张，这就是著名的“巴黎之腹”。

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同一时期，王室和高层贵族剥夺了城市和地方的底层贵族的权力。此时文人群体则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为了城市和国家中的许多重要功能，王室和高层贵族需要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谈话记录员、行政专员、公证人、税务专家和银行家等。在修道院以及新建的圣母院的主教学校里，智识生活繁荣起来。如果有人12世纪初来到巴黎学习，就会有如下选择：在大教堂学校聆听著名的香浦的威廉（Wilhelm von Champeaux）的课程，去访问圣维克托的牧师学校，在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写经室或者蒙塔涅圣吉纳维芙（Montagne Sainte-Geneviève）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后来的巴黎大学，也就是索邦大学，应当就是源自最后这间学校，其校名来自于大学神学系的创始人索邦的罗贝尔（Robert von Sorbon）。

但是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且最闪耀夺目的教师，无疑是阿伯拉尔（Abaelard）。1079年，他出生于布列塔尼的南特附近，跟随那个时代最有名望的辩证法专家学习，最后在主教学校跟随香浦的威廉学习。天分很高的阿伯拉尔很快就成功地反驳了他的老师，并将之弃于身后。他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最初是在默伦，后来在考贝尔（Corbeil）。1108年，我们又在巴黎发现了他的踪迹，在这里他又一次与威廉闹翻。

【440】而当他找拉昂的安瑟尔谟作为新的导师时，情况并不比之前一次更好，很快他就猛烈抨击了安瑟尔谟，就像之前对威廉一样。1114

年，35岁的阿伯拉尔爱上了他的巴黎女学生海洛薇兹（Heloïsa）并使其怀孕。由于对她的叔叔菲尔贝（Fulbert）充满了恐惧，海洛薇兹躲避到阿伯拉尔乡下的老家，并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阿伯拉尔和海洛薇兹打算结婚，按照与菲尔贝的约定，婚事应当秘密进行。海洛薇兹去了阿让特伊的修道院。她的叔叔菲尔贝在那里发现阿伯拉尔违背了约定，他下令袭击并且阉割了阿伯拉尔。

在饱受屈辱和歧视的情况下，阿伯拉尔度过了他居无定所的余生。他在巴黎的圣丹尼斯修道院成为修道士，再一次与其他教士交恶，离开巴黎，隐退到位于香槟行省的一处隐居地。1127年，他成为位于布列塔尼的圣吉尔达斯-恩胡伊（Saint-Gildas-en-Rhuys）修道院的院长。在那里他的同僚多次袭击他，并威胁他的生命，于是阿伯拉尔六年之后返回了巴黎。在位于蒙塔涅-圣吉纳维芙的一家慈善机构中可以找到他。他在圣希莱（Saint-Hilaire）教堂上课。很短的时间内他用他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学生，并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影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annes von Salisbury）和弗莱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作为国家理论学者和历史学家留下了名声。策勒的彼得（Peter von Celle）后来成为著名的沙特尔座席上的主教。而且同时有三位后来的教皇在偷偷听阿伯拉尔的课。

他们听到了什么？在这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好争吵和辩论的辩证法专家的思想中，有什么新的和非同寻常的东西？首先，他所接受的在那个时代不同寻常的哲学教育就十分引人注目。他不仅读过柏拉图和波爱修，也读过波菲利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他非常熟悉哲学上对于知识的追求，由此他就否认了教会应当是真理的完全占有者。因为何为真理，与一个思考的人能够逐步领会什么，【441】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真理和知识，他就必须思考、讨论和争论。他必须遵循逻辑的规则来论证和发展他的观点，并且遵循辩证法的技艺对此进行维护和辩护。安瑟尔谟理性化的规划在阿伯拉尔这里被更进一步极端化。他的信条并不是“我信仰，因此我理解”，而是“如果无所理解，那就无所信仰”。

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教会而言，阿伯拉尔的思想是危险的。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确定不变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他的逻辑学进行核验，而一切传统之物都需要论证。在这方面，阿伯拉尔将新出现的公民自我意识转换到神学之中。他追问观点、立场和价值的根据与合法性。在他看来，传统无足轻重，仅仅是比较古老。而同样的，权威

也决定不了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力。重要的是理由——理性（*rationes*），而不是传统——权威（*auctoritates*）。

毫不奇怪，阿伯拉尔的“革命性”思想遭到强有力的对手的阻挠。他的《论圣三一》（*Theologia summi boni*）于1121年在苏瓦松的宗教会议上受到谴责。阿伯拉尔过度自由地以柏拉图的方式解释了上帝的三位一体。按照他的说法，圣父与善的力量，意义相同。圣子则对应于那种作为世界之基础的智慧。而圣灵就是爱。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神性之物。借由柏拉图的学说，让信仰看起来更加理性，这在阿伯拉尔的时代并非非常罕见。但是他面对那些教会的权威时表现出的好斗和目中无人，导致他在苏瓦松被判为异端。阿伯拉尔被迫亲手焚毁他的著作。

这个判决并无损于阿伯拉尔的干劲。他想将基督教推上时代的巅峰，他想使之具备推理性而非独断性。【442】1122/23年他完成了《是与否》（*Sic et non*），在这部代表作中，他列出了2000条教会权威的语录，来自圣经、教父乃至当时的教皇和神学家。他将这些语录以如下方式归置到一起：将对于185个信仰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的完全针锋相对的看法相互比照。这整个传统就是一大堆杂乱的矛盾！因此，在其完全的对立性中以辩证的方式详尽地研究它们，正当其时。但是，只有当人们将在修道院学校作为神启而被教授的知识相对化，并且着手去追寻隐藏在很多矛盾中的真理时，这种辩证研究才能展开。人们不能按字面意思接受圣经和教父，而是要真诚地接受它们！

通过诸如此类的课程，阿伯拉尔在1130年代引起了那些充满求知欲的巴黎民众的注意。他否认原罪使每一个体的人负罪。亚当所犯的罪行，其他人为何要承担？罪并非代代相传。阿伯拉尔也无法相信安瑟尔谟的赎罪说。上帝的荣耀多大程度上能以人们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件事得到满足？对于他来说，基督的死并不是罪，而是上帝之爱的征兆，是对一个崭新结盟的象征。因为，并非原罪和报复的债务关系将人和上帝联结在一起，而是每一单个人自由决定参与进上帝之爱的力量。

面对其他宗教，阿伯拉尔心胸十分开阔。尽管他认为基督教是唯一全面的、真正的信仰，但是他也承认，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分有这一真理。如果一切都无外乎逻各斯，那么什么是上帝的智慧？在这一点上，这位来自布列塔尼的辩证法学家坚定地站在柏拉图的肩膀上。众所周知，这种逻各斯并非仅仅在基督教之中，【443】而是已在希腊哲学以及受希腊哲学启发的所有一神论宗教中都可以找到。

玫瑰之名

阿伯拉尔对于一个问题的观点尤其富有洞察力，这个问题就是哲学史中的共相之争，这场争论在整个中世纪困扰着整个知识界。广为人知的是，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中是由此出发的：对于感官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理念。这些理念是位于天球之外的原型，与此相对，它们具体的在感官中的显现则只是摹本。按此观点，每条具体的狗都只是对“狗”的理念的个别摹本，而每个人都是对“人”这个理念的具体摹本。这两个理念又在诸如“生物”等更高一级的理念中被扬弃。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持不同的看法。他拒绝关于天球之外的理念的想象，尽管在他看来“人类”和“生物”也还是存在的。但是首先它们并非抽象之物，其次，它们因此也并非以与具体的狗或人分离的方式存在着。

此外，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早期和中期的中世纪主要遵循着柏拉图的足迹。理念论成为基督教神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中世纪的学者都相信，上帝的三位一体存在于三种精神实体的形式之中，圣父、圣子和圣灵。所有这些都是实在的，且以物的方式现成存在，就如“善”“恶”“罪”“宽恕”“正义”“爱”等等。尤其是像安瑟尔谟这样聪明的逻辑学家和辩证学家，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学者中流传着一部传播广泛的论著，它激起了一些怀疑。这部论著讨论的是波爱修对波菲利为亚里士多德讨论范畴的论著所写的导言所作的注疏。【444】在这里，波菲利和波爱修对于以下问题悬而未决，即种属（*genera*）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是否事实上只是样式（*species*）。

阿伯拉尔的老师贡比涅的约翰·洛色林（Johannes Roscelin von Compiègne，约1050—1124）被视为第一位伟大的怀疑者。当我们还在援引他的辩论对手的著作时，他就已经笃信如下批判性的观点：普遍性概念（普遍之物）并不真的存在。在洛色林看来，这些普遍性概念只是我头脑中的想象。人是真的存在的，而人类则与此相反，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因为普遍概念不是事物，而只能是名称（*nomen*），人们称这种立场为唯名论（Nominalismus）。

阿伯拉尔第二位著名的老师，乃是香浦的威廉（约1070—1121），他代表了与此相反的传统观点。在他看来，对于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而言，普遍概念是事实上存在的。这些概念是彻彻底底实在的，因此人们称这种立场为唯实论 / 实在论（Realismus）。（这个概念很

容易引起混淆。一位现代的实在论者并不认为“爱”和“人类”是某种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中世纪的“实在论”的含义恰好与今天的含义相反！)

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数百年之久，放在今天看，这是很令人惊异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如此重要？难道这不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是逻辑学家的练习题吗？然而恰好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兹事体大。中世纪的人们，那些朴实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教士们都生活在如下想象之中，即此岸世界应当是“非真实的”——乃是彼岸世界的预备阶段或资格赛阶段。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思考。但是这个想象对于人的认识意味着什么？大地上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实在？毕竟在所有事物之上都还有一个第二层的，更为真实的现实性。然而这样一种上帝的实在性中，有多少是人们可以经验到的？以何种方式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能够以逻辑的方式破解，【445】还是必须等待一次伟大的启悟？

当时的知识分子争论在他们抽象的和普遍的表象中具有多少实在性时，其背景就是这些紧迫的问题。正统的教会代表根本没有足够频繁地去重复说，他们所宣讲的所有一切都是实在的。他们宣称，唯一的真理、正义和上帝的秩序是真实存在的，所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实在的。教会的整个统治资格都取决于以下情形，即他们拥有那些揭示和代表了一个非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之物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用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的拉丁文书写的。

与此相对的，那些聪明的怀疑者对此表示了高度的怀疑，即教会应当享有通往真实实在性的特权，这种实在性并没有通过逻辑学的工具真正向理智阐明。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在那些普遍概念中，首先能看到的是语言上的约定；这种观点当然与教会相悖。因为这就可以得出，普遍概念除了是人的想象之外什么都不是——那么有谁或者有什么能够保证，上帝也并非只是一个人为的想象呢？世界上根本没有罪“实际存在”？正义并不“存在”？以及上帝的爱并非“在世界上存在”？

对普遍概念的怀疑是对中世纪神学的一次重大冲击。很显然，关于意义和含义的逻辑反思导致了一些教会从未准备接受的结论。因此当阿伯拉尔涉足这一领域时，这里已成了禁区。他谨慎地批判了“实在论”。当人、动物和植物在实体意义上是不同的事物时，作为实体的“生物”应当如何存在呢？人与草茎有所不同，而他与植物和动物的差异在于，他被赋予了理性。【446】因此，就像洛色林已经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普遍概念首先是语词。我们的心灵从感官感知中抽象出并且自动形成了一

个基于相似性的抽象含义。

这样就是唯名论的观点。然而这事实上就是极端唯名论的最终判决吗？洛色林公开宣称，我们的观念仅仅存在于语词之中。我们看到事物，然后借助我们的想象力造就我们的普遍概念。因此这些普遍概念仅仅以纯粹思想的方式存在着，并且不是像柏拉图和实在论者所认为的“先于事物”存在，而是“后于事物”存在。然而它们是否因此就不是实在的？借助于普遍概念，上帝的灵性发挥作用，帮助我以适当的方式认识了世界，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吗？此外，在我的心灵中，我从何分清，“人类”这个概念到底真的意味着某种实在之物，亦即意味着所有人的总和，还是意味着我自己想象的一个幻象，而非实在之物，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幻象？显然，阿伯拉尔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普遍概念的有效性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即便世界上不再存在玫瑰，“玫瑰”之名还是有其意义。同样的，“花”这个概念也有意义。玫瑰这个名称尽管是我想象力的一个产物，但是显而易见并非偶然的产物，而是作为事物之根基的一个产物。

读者很可能就本节的标题猜测，所有这些与翁贝托·埃柯（Umberto Eco）的小说《玫瑰之名》（*Der Name der Rose*）有某些关系。事实上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涉及了共相问题之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之后还会更详细地谈到。巴斯克威尔的威廉（William von Baskerville）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像阿伯拉尔或者像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一样的概念主义者，埃柯正是将奥卡姆的威廉用作这个角色的原型。尽管概念主义者认为普遍概念是语词而不是现实存在之物，但是他们也认为这些概念绝非完全任意的。【447】这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看上去提示了我们，所有一切最终都是语言，仅此而已：“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而今人唯持玫瑰之名。”然而这句话并非来自阿伯拉尔或奥卡姆，而是来自伯纳德·德莫尔拉斯（Bernhard de Morlas）的一首诗，他是法国克鲁尼（Cluny）的一位修道士。

当然阿伯拉尔概念主义的解决方案，绝非共相问题之争这一复杂墙体的拱顶石。这场讨论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接下来几百年的认识论，我们将会不断与这个问题相遇。当代恰好也还有如下争论：比如物理学中的自然法则到底是现成实在的，还是仅仅表达了人类的虚构，以便将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阿伯拉尔毕竟为敌对阵营提供了一个和解的解决方案。然而下一个丑闻不久之后就出现了。1130年代中后期，他写出了《伦理学》

(*Ethica*)，又名《认识你自己》(*Scito te ipsum*)。这是一包危险的炸药，因为他在书中非常明确地反驳了教会的官方观点。某物是好还是坏，并非只是一个关于正确或者错误价值的问题。因此或许不存在“恶的”快乐或者“坏的”意愿。对于阿伯拉尔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是，以何种方式我才能够使我的行动与良知协调一致，或者反之。我的行动与我的良知协调一致，那么我的行动在伦理学上就是善的。如果它与我的良知相悖，那么它就是恶的。因此这个决定性的伦理问题就不是一个外在的，而是一个内在的问题。

让我们回忆一下，对斯多亚主义者来说，人们在理性评判中能够认同一个行为时，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善的。阿伯拉尔也认识到这样一种认同，并且使之成为其伦理学思考的支点与核心。他的伦理学是一门建基于主观认同之上的意向伦理学。【448】就像这一类型的所有其他伦理学家一样，它将内心分裂、充满矛盾却又有良知的个体置于中心。它并非出自那个必须要去遵循的、固定且神圣的规则宝库。

过一种伦理上好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认识到自身的弱点。我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进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支配。如果我的行为导致了坏的后果，人们不能将之归罪于我。要负担罪责的情形只有，我所意识到的行为被判定为导致了坏的后果。只有信念和良知可以对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做出判定。也只有我自身才是我的行动的道德法官。在这一点上，阿伯拉尔遵循柏拉图和斯多亚主义者的观点，并且紧接着不可避免地陷入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之中。如果只有个体本身及其良知对所有行为负责，那么教会的权力如何才能施加到信徒的灵魂之上呢？

阿伯拉尔的对手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克勒窝的伯纳德(Bernhard von Clairvaux，约1090—1153)，他想要永久终结阿伯拉尔的学术事业。伯纳德在欧洲中部的影响很大，而且在教会的争论中，他大部分时候站在保守的一边。历史上，他是教会冷酷无情的强权政治家，也是煽动基督徒发动反对穆斯林和文德族人(Wenden)圣战的重要人物，文德族是一个斯拉夫地区的部族，生活在易北河和萨勒河的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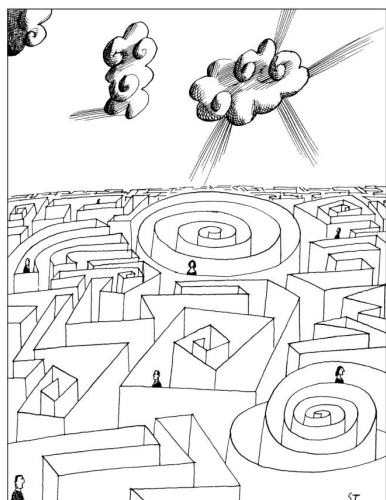
1141年，伯纳德硬拉着阿伯拉尔来到桑斯(Sens)的宗教会议上，指控他为异端。尚在被告人自我辩护之前，判决就已经确定。紧急状况下，阿伯拉尔求助于教皇。然而英诺森二世也已受够了这位来自布列塔尼的思想家。他判处阿伯拉尔在修道院中终身监禁，并且永远不许发声。带着沉重的疾病和受到责罚的标记，阿伯拉尔来到了克鲁尼修道院，接下来又去位于索恩河畔沙隆附近的圣马塞尔(Saint-

Marcel)。1142年4月，他在那里去世。海洛薇兹，当时是位于香槟省的圣灵修道院的院长，把他的遗体带到自己那里安葬。【449】如同二人之间频繁的通信关系所证明的，他们之间的爱情从未中断。22年后，海洛薇兹被安葬在她的爱人身旁。自1817年以来，这两位生前被强制拆散的爱人的共同陵墓就位于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中，在一座新哥特式的小教堂里。

以今天的视角看，阿伯拉尔和海洛薇兹是中世纪经典的爱情故事。13世纪，阿伯拉尔的人生忏悔史《我的苦难历程》（*Historia calamitatum*）就被译成法文而广为流行。以他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很快就出现了小说《玫瑰传奇》（*Le roman de la rose*）。从那时起有超过500种基于这个材料的改编作品，其中之一出自卢梭之手。今天，阿伯拉尔在哲学史上被视为中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反对教会的权威，捍卫主体的自由，并且帮助理性思考获得其正当地位。此外，在12世纪，他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著为支持，但是没有援引他的本体论和自然哲学，后二者波爱修可能没有再翻译。在这个意义上，阿伯拉尔的革命性思想今天在我们看来，只像一次先于之后那次巨大得多的震动而发生的前震：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首先是他的形而上学再次相遇。但是这次重返并不是沿着直接的路径实现的，而是经历了阿拉伯化的曲折道路……

创世的意义与目的【450】

亚里士多德归来！——基督教的时间，物理学的空间——阿尔伯特——
托马斯——新的上帝存在证明



亚里士多德归来！

953年，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做出了重大而艰难的决定：和阿拉伯人，那个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极为成功的强大竞争对手进行谈判。当时，摩尔人一再侵犯奥托大帝统治范围南界的省份法兰西顿（Fraxinetum）。9世纪末，他们在那里修建了桥头堡，一个转运奴隶和木材的海盗中心。奥托大帝希望勃艮第王国的人民在其庇护下能够安居乐业，于是派洛林的修道士戈尔泽的约翰（Johannes von Gorze）作为谈判代表，面见科多巴的哈里发。【451】

两年后约翰归来时，他已经全面领略了那个在所有方面都远胜于他们的文明。现代石头建筑取代木头房子，超前的排水系统与灌溉技术，高度发展的数学与医学知识，这些对于同时期的基督教世界而言，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约翰结识了哈里发座下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各知识领域的领袖人物。956年再次回到洛林时，约翰带来了涵盖所有可能知识领域的无数阿拉伯书籍。这是等待着在基督教世界大放异彩的瑰宝。

然而，对这笔瑰宝的发掘要等到百年之后，那个“天降之人”出现，才真正开始。他叫康斯坦丁（Constantin），姓“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是来自迦太基的柏柏尔人。他在东方待了近40年，到过巴格达和开罗。他研究了医学与其他许多学科，熟谙多门语言。他回到迦太基之后，很快名声大噪，但也招致众人妒忌。1077年，康斯坦丁逃往意大利，进入萨莱诺学院。当康斯坦丁凭借杰出的医学知识声名鹊起，这座本笃修会引以为傲的医学院早已名声在外。在离学院不远的卡西诺山修道院（Kloster Montecassino），他把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此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人的医学论文。

他花了几十年才将大量阿拉伯语论著最终译成拉丁语。12世纪最重要的翻译中心在托莱多。1085年，阿尔方斯六世（Alfons VI.）从摩尔人那里夺回了曾经属于西哥特人的城市。这里的基督徒有助于他的文化建设。他们，即所谓的莫兹阿拉伯人（Mozaraber），曾一度生活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于是在两种文化的交流沟通中扮演关键角色。托莱多的大主教瑞蒙德（Raimund）大力推行文化沟通。在这里，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莫兹阿拉伯人携手合作。【452】他们翻译古兰经和神学论文，以及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典籍。毫无疑问，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而言，最令人震撼的事件是亚里士多德原著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关于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这是令人振奋的文化碰撞！

阿拉伯的学者非常熟悉亚里士多德。然而他们首先接触的是从叙利亚语和波斯语转译过来的阿拉伯语译著，不是希腊文原著。当穆罕默德的圣战士在其逝世九年后征服波斯，一批被波斯人保存完好、十分珍贵的古希腊文献藏品于641年落入他们手中。穆斯林系统地翻译了这些文本。由此他们认识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等哲学家，也接触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集。

东罗马帝国只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有色眼镜下认识并往往低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阿拉伯人却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了。对阿拉伯人来说，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尽管许多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混入、夹杂在他们手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中，这一点却并未给阿拉伯学者带来困扰。对他们而言，如同对许多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那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相互协调。他们寻找的不是分歧，而是共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他们大有裨益的是诸如《论原因》（*Liber de causis*）这类著作，传闻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论述，但事实上是一部

新柏拉图主义作品。

总而言之，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跟一块古代的化石差不多。在文化传承的时代隔阂和翻译误释中，人们只能看到他残缺不全的面貌。

【453】9和10世纪的阿拉伯注疏家如阿尔-金迪（Al-Kindi）和阿尔-法拉比（Al-Farabi），也因此哲学史上留下了印迹。首先，便是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理论划分为令人费解的四个部分。其次，则是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学说与一种占星术宇宙论关联起来。理智控制月亮，月亮又决定自然进程。清楚、明白的古希腊思想在此变成了沙漠居民的神话，这一转变过程甚至都不允许亚里士多德自己来反驳一下。

波斯人伊本·西那（Ibn Sina）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也很有影响。他以阿维森纳（Avicenna）之名被载入哲学史，某些读者也许对这个诺亚·戈登（Noah Gordon）的畅销小说《神医》（*Der Medicus*）中的名字并不陌生。11世纪初，结束半生云游的生活之后，阿维森纳成为伊斯法罕的一位名医。与很多穆斯林哲学家一样，他试图将亚里士多德与天文学以及神秘主义调和起来。与生活在丘陵、山脉和森林的中欧城市居民相比，习惯天穹下开阔视野的阿拉伯文明与众星、太阳和月亮的世界更为亲近。因而，对于阿拉伯学者而言，有两件事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及其对宇宙天体的论述；新柏拉图主义对于天穹的迷恋和沉思。正如普罗提诺，阿维森纳也认为，一方面，上帝是无所不包的太一；另一方面，太一并不遥远如天穹，而是真实存在于万物中：它就是存在！

阿维森纳的核心概念是必然性。绝对必然之物，也即上帝，才具有绝对的存在。因为在上帝那里，“本质”与“存在”统一，宇宙中所有其他事物都派生于必然者。【454】在此，必然性的派生与偶然性的派生被区别开来。中心的、必然的派生是理智。理智直接从上帝那里流溢而出，并造就世界的多样性。因为人一旦思考，便分享了这神性理智，所以人与上帝具有内在联系。这从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可看出，即人总是先理解普遍事物，然后才是特殊事物。我们首先将某人当成一个“人”，而后才在更进一步的考察中了解他具体是怎样的人。在这一点上，阿维森纳与亚里士多德保持一致。

从物理学视角来看，被设想为绝对必然性的上帝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上帝如同不变的、永恒的自然常量，所有其他的東西都依赖于这一常量。然而，在亚伯拉罕宗教看来，对上帝的这种理解是一种挑衅！如果上帝是必然的，那么创世便是必然的，而所有从上帝那里新柏拉图主

义式“流溢”出来的事物也是必然的。那么上帝的自由，一种对人类而言如此崇高又仁慈的行为，比如创世，又该何处安放？上帝在物理层面越是伟大，在心理层面就越渺小。因为“物理”上帝如同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并不干涉人类生活，也不引导和评判人的灵魂。所以对伊斯兰教的伦理卫士，以及后来的基督教而言，阿维森纳学说是一种挑衅。他的许多著作在12世纪中叶的托莱多已被译出，并对中世纪思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在信仰的卫道士眼中更具挑衅意味的是以阿维洛伊（Averroës）之名为人所知的伊本·鲁西德（Ibn Rušd）。他生活在12世纪后半叶的科尔多瓦，作为医生和法学家，他深受哈里发青睐。作为亚里士多德坚定的追随者，他注解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直至1195年被穆斯林教士控告并判刑。【455】当时摩尔人的当权者被他国军队逼迫，在危险的政治形势中变得狭隘暴虐。人们偏离传统的思想观念也能令他们勃然大怒。尽管阿维洛伊两年后得到赦免，但很快就在马拉喀什去世了。

他被判刑的原因很快为人知晓：阿维洛伊比阿维森纳更为坚定地将宗教与哲学区分开来。他毫不掩饰地认为，只有哲学和自然研究能推进精神的发展并揭示真理。在宗教中，阿维洛伊只看到一种被斑斓的想象与表象装扮的象征艺术。哲学则能如剃须刀般对其进行锐利细致的分析。在他的理解中，宗教类似高端哲学之通俗流行的平民版本，一种服务于淳朴群众的有益信仰。这一思想跟同时代的犹太学者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观点如出一辙。12世纪中叶，年轻的迈蒙尼德逃离科尔多瓦，此后在开罗撰写了《迷途指津》（*Führer der Unschlüssigen*）。

宗教适于大众，哲学则适于学者。然而让伊斯兰教的卫道士明白这一点，却没那么简单。因为像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的许多主张是与穆斯林宗教背道而驰的。首先，在创世这个问题上就有诸多分歧。阿维洛伊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不是上帝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偶然创造的。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堵住了通往创世、救赎以及复活的古老历史之路。突然间，救赎不再是人生的主要关切，取而代之的是普遍自然史。神学成了宇宙演化论。

在自然史中肯定上帝的存在，这对阿维洛伊来说没有意义。【456】上帝在他那里扮演的角色对于伊斯兰教会来说太过于渺小。另外，和阿维森纳的情况类似，在阿维洛伊那里也缺乏“灵魂”的概念。两

位阿拉伯医生兼哲学家只谈论理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理智，如希腊的逻各斯，把人与宇宙、绝对者以及神性关联起来。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至少每个人都有灵魂，尽管灵魂是否不朽这一点存有争议。普罗提诺的神秘哲学也谈及仰望太一宇宙的灵魂，但是在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那里，灵魂不再出现。同时缺失的还有质料、实体或者作为个体之载体驶向彼岸的以太。

自然史取代救赎史？一种无灵魂的不朽？人们很难想象，基督教教士第一次读到阿维洛伊的学说时，他们的脑海中会是怎样一副情形。这一刺激的程度也许不会小于某个生活在极度封闭的专制统治下的人，第一次上网冲浪时内心经历的震慑。大约从1230年起，阿维洛伊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便出现在巴黎的教研室和萨莱诺学院、博洛尼亚以及其他大学的大课教室。它们由苏格兰或爱尔兰人迈克尔·司各特（Michael Scotus）受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s II.）的委托在巴勒莫译出。

在此之前，勤勉的翻译者已经一部接一部地译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与伦理学专著。可以确信的是，1210年之前，巴黎开设了很多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讲座。而在这一年，教会决定禁止对其著作进行任何私下或公开的研读。但巴黎的博雅院（Artistenfakultät）却没有特别在意禁令，这个机构负责所有未来的法学家、医学家与神学家的基础教育。于是，教皇在五年之后再次颁布了这条禁令。【457】

亚里士多德原著的重现于世正好发生在此时。当时在西欧，比如巴黎、图卢兹、牛津、那不勒斯和帕多瓦等地，在这些最早的大学中哲学已经获得一席之地。全欧洲学者对这些古老文本的好奇心是无可阻挡的，它们属于与圣经阐释、宗教寓言、教父智慧和教条教规不同的世界。在巴黎没有机会听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人就会去图卢兹，那里的人更为大胆些。1231年，教皇决定不再只是一味禁止亚里士多德，而是派人仔细检查这些文本，以便给出一个鉴定过的版本。然而，禁令在1245年再一次颁布，但到了1255年，基督教伦理的卫道士已然无力回天。巴黎的博雅院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设为必修课程，此后不再做任何妥协。牛津大学紧随其后，这一切势不可挡。从那以后，学术思考就无法绕过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注疏者的思想了。而打上基督教烙印的中世纪哲学即将迎来全新的开端……

基督教的时间，物理学的空间

那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可谓水深火热。城市快速而无序地增长，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叫喊，人们行走于污秽和阴沟之间，生活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之中以及阶级压迫之下。人们遭受着各种疾病和瘟疫的折磨，丧命于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掠夺。为了建房取暖和修建更大的教堂，人们滥砍森林植被。【458】大学教研室和大课教室之外的世界依旧混乱如斯，整个社会的世界观根基却几乎在一夜之间丧失了。因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切不再是不言自明的，比如，人是上帝仁慈创世的目的，人在上帝的恩典中从生走到死，人根据上帝的意志获得重生，教会是救世史在世俗世界的代表。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这种奥古斯丁式的确信以及死后得升天堂的希望之中。然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这种确信变得不再可信。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一个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才是理性的、逻辑的和真实的。这个一千六百年前的人，像一位严苛的启蒙者，驱散了笼罩着他们的虔诚的阴云。

对于13世纪的哲学家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功绩与他们的历史间隔，差不多相当于奥古斯丁和波爱修之于今天的我们！与今天不同的是，那时的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假如信仰的支柱没有开始摇摇欲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要在中世纪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估计是不可能的。阿伯拉尔在巴黎等地力图以理性抗拒教条式信仰的时候，孔谢的威廉（Wihelm von Conches）、沙特尔的蒂埃里（Thierry von Chartres）以及伯纳德·西尔维斯特里（Bernardus Silvestris）等人也摩拳擦掌，准备开创基督教的历史先河——通过数学知识和因果关系阐释创世说。

关于孔谢的威廉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据推测，他曾在沙特尔和巴黎教过书。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威廉早在1120年间就开始尝试对当时的知识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思考和把握，当时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还一无所知。这一尝试的结果便是，他基于柏拉图《蒂迈欧篇》阐述了世界的物理性和精神性起源。【459】他将“圣灵”阐释为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他把凡是与自然科学研究不相符的事物仅仅当作单纯的想象排除在研究之外。因而，对威廉来说，女人当然不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来的。对于一位通晓康斯坦丁医学著作的人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观点。同阿伯拉尔一样，威廉决定不再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圣经，而是严肃地对待它。

与威廉类似，沙特尔的蒂埃里也非常理性地看待创世。他也在巴黎教过书，但可能不曾在跟他同名的沙特尔区教过。尽管他并不认识后辈阿维洛伊，但两者所见略同，蒂埃里大概于1140—1150年间在圣经五彩斑斓的想象世界和冷静分析的哲学知识之间做出了区分。他并不认为上帝用七天从虚空中创造出世界和人类。而是如孔谢的威廉那样，他相信上帝仅仅提供了四种元素——火、水、气、土，然后万物从这些元素中自己诞生出来。所以他致敬的是恩培多克勒，而不是圣经的世界。斯多亚派的物理学观点给了蒂埃里很多启发。他将人类简单划归为动物，并且按照严格的数学规则和理想的数字形式来处理创世问题。这无疑会让今天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甚感欣慰。这是12世纪的流行观点。甚至对于自然研究兴致不高的阿伯拉尔也确信，世界是被上帝以“几何”的方式构造起来的。

来自图尔的伯纳度·西尔维斯特里是12世纪第三位以理性方式解释自然的人。他也被归入沙特尔的主教派。尽管这一判断可能并不合理。因为从他的《宇宙图景》（*Cosmographia*）来看，这一文本实际上并不是哲学论文而是诗歌。这部大约于1147年撰写的著作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世界的诞生。跟威廉和蒂埃里情况相似，夹杂着许多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概念的柏拉图的《蒂迈欧篇》，【460】对这部著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上帝创造的世界拥有神圣的理性起源。世界表面的混乱下是一种更高的宇宙秩序。他的理性创世史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伯纳度明确认可人类的性器官和性欲是人类繁衍的完美的生理手段。摆脱原罪的阴影和奥古斯丁的羞愧感，坦然接受交配繁衍的欲乐！这在12世纪中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

当亚里士多德如同一枚炸弹被投向中世纪世界时，物理学上最进步的基督教思想家的情况便大致如此了。而对他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重新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关于世界的起源和法则，这些令人不安的学说到底说出了什么？

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现在认识到，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揭示自然的奥秘，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对自然精细的经验探究。然而，威廉、蒂埃里、伯纳度的物理学阐释却是柏拉图主义思辨式的。一直以来，处于奥古斯丁传统中的教会排斥经验性的自然研究。人不能将上帝置于凡俗之物中！那些像阿拉伯医生那般解剖尸体的人看起来是可疑和病态的。然而阿拉伯医学的优越性，以及萨莱诺医师在新的知识基础上进行实践所获得的成就，却不容否认。有益于身体和灵魂的事物，事实

上并不一定就与教会或清真寺伦理相一致。萨莱诺学院的一条名言道：“沐浴、美酒与爱消耗我们的力量；然而沐浴、美酒与爱又多么让我们生机勃勃啊”。对此，奥古斯丁肯定会进行最强烈的抗议！

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进一步认识到世界是永恒的，万事万物为绝对有效的自然规律所统摄。【461】这里既没有创世，也没有神迹。因此阿维森纳，尤其是阿维洛伊在宗教伦理卫道士的眼中是非常令人不悦的，而且嫌疑重重。因为永恒的创世无论如何与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相冲突的。

中世纪的读者应该如何来把握这样的主张呢？如上所述，不能把中世纪的时间感拿来与我们今天的比较。尽管阿拉伯人已经发明了机械水钟，但是带齿轮的时钟直到14世纪才挂在钟塔上。在中世纪，计时仅仅是在小时和天数的单位上规定生活。人们一起干活儿的时候，时间才出现。尽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世界不应该有开端，但世界仍以时间的方式延伸，并有一个自身进程，这超出了中世纪人们的想象。他们对于超越人类的时代的期待是他们对于新的神圣时代或急切或平和的希望。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大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对人们这样解释道，“第三帝国”（Dritte Reich）不久就会到来。继旧约时代的圣父帝国之后，是自耶稣诞生以来的圣子帝国。而现在的圣子帝国时代马上要终结，即将到来的是圣灵时代，一个真理和爱的时代。天堂不在彼岸，而在现实的世俗时代，正如耶稣和他的子民与我们同在。约阿希姆的思想震惊了整个欧洲，赢得了很多信徒。然而令教会不安的是，没有了恩典与救赎作为统治手段，他们不得不为其权力担忧。

对于一个相信约阿希姆的观念的社会而言，一个没有意义和目的、与人类命运无关的自然历史是完全陌生的。一个由元素、运动以及生物构成的物理世界，和一个由信仰、爱、【462】希望以及救赎构成的基督教世界根本无法调和。这种调和即使是对中世纪最渊博、最睿智的思想家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人们如何能让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协调一致？人们能够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哪些理论？哪些又不能？信仰能经受得住多少冷静的思考？新兴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与基督教的拯救能够和解吗？面对这一挑战，13世纪的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来自多瑙河的施瓦本人，与一位来自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的贵族：大阿尔伯特（Albert der Große）与托马斯·阿奎那。

阿尔伯特

法国有巴黎，英国有牛津，而德国长久以来都没有令人瞩目的文化中心。13世纪伊始，至少科隆在土地面积和居民数量方面算得上一个大都会。在科隆400公顷的土地上居住着大约4万人，这片土地由四面高墙守卫，算是当时最大的防御工程。对科隆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它获得的一件礼物。1164年，腓特烈·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皇帝征服米兰之后，将他在米兰抢到的三圣王的遗骨留在了科隆城。这些遗骨自然不是真的，但却使科隆的朝圣者数量倍增。几乎一夜之间，这座莱茵河畔的城市成为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罗马并列的最重要的朝圣地。人们继续搜集圣骨，直至最终数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800具之多。1248年，人们为一座新的大教堂奠基，这座教堂也就是今天的科隆大教堂。1259年，科隆获得港口许可之后，莱茵河上的每一艘货船都争先恐后驶向科隆去卸货。

而科隆不只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也成为学术重地，【463】这几乎全归功于一人：大阿尔伯特。他的拉丁名字叫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200年左右，他出生于多瑙河畔的劳因根（Lauingen）。据可查资料，他在1223年成为帕多瓦博雅院的学生。那里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他结识了来自萨克森州的约旦（Jordan），约旦是成立于1215年的多明我会的成员，担任修会理事，是修会创始人的忠实拥护者。阿尔伯特立马加入了该修会。他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据说不久后他就成了最有名的亚里士多德讲师。在科隆当见习修士以及在弗莱堡修道院任哲学神学教师期间，他继续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1243年，他的名气已经大到足够让他获得去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五年的机会。在那里，他获得大学讲师资格，教授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他在1248年签署了一份规定焚毁犹太教经典的官方文件，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件不光彩行为。

同年，阿尔伯特回到科隆，建立起多明我会的基础学制，这是后来科隆大学的基础。他同时也是教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两次调停科隆市民和大主教之间的激烈争端。争端在他死后才最终引爆沃林根战役，无论如何他都尽力了。1254年，阿尔伯特成为多明我会的首席修士，并作为督察官巡游全国。三年后他回到科隆，短暂停留。他当了两年雷根斯堡的主教，而后被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IV.）任命为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的训导员（Hassprediger）。1264年，因教皇去世，任命取消。自此他潜心于研究，先是在维尔茨堡和斯特拉斯堡，1269年起又再次常

驻科隆。1280年，年迈的他在科隆离世。

阿尔伯特何以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464】首先他著作等身——超过70部之多。他差不多注解并评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著，其中包括《论原因》，只是他不知道这部著作并非出自大师之手。阿尔伯特以一种基督教世界并不熟的方式，将神学领域与自然研究区别开来。对他而言，两者是相互平行的存在。象征、神迹和未经确证的东西在神学中是有效的，但作为自然研究者，他会摒弃这些东西。

然而，与同时代的人一样，阿尔伯特也将天文学和占星术混为一谈。他相信人们可以在星象图中预言世界。在化学以及尚未与化学区分开的炼丹术领域，他也是开拓者。虽然他未能成功制造出黄金，但是他通过蒸馏和气化分离出了化学元素。在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人的知识指导下，他是第一批研究矿物结构的人。继罗马人普林尼之后，他是欧洲汇编了动植物领域的知识，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区分了477种动物的第一人。

阿尔伯特并不仅以自然研究而出名。他总是不断涉猎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和神学问题，这些问题源自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重新发现：世界是永恒的，还是一种造物？我们的理智是神性原则，还是每一个体都有一种人格性理智？灵魂是非物质且神性的，还是质料性且会变朽的？另外，人类是通过上帝的恩典，还是通过一种正确引导的生活而变得幸福？

在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上，阿尔伯特都寻求妥协。这位莱茵地区的施瓦本人以其科隆式的平和，在世界是否永恒的问题上持开放态度：谁又能知道呢？在灵魂与理智的问题上，【465】他提供了一个混合的解决方案。阿尔伯特认为，理智是灵魂的一部分，因而是个别的。但同时，理智被一种不可混淆的普遍性统摄。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解释，为什么当我们谈论普遍事物时，我们能够理解对方。我们的理智因而同时是人格的和非人格的，同时是个体的和普遍的。在理智的普遍性维度上，我们似乎超出了自身，因为我们也具有普遍性和神性。受古希腊传统影响，阿维森纳已然把我们的理智视为神性的，而阿尔伯特也持相同观点。只是阿尔伯特把理智与灵魂联系起来，由此确保灵魂的不朽，而阿维森纳和阿维洛伊并不谈论灵魂。

诸多类似的关于灵魂和理智关系问题的思考，使阿尔伯特得以回答这个问题，即人类如何或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幸福。我们能动的理智造就了我们的理解力，并帮助它更好地理解世界，例如通过与他人的对话。

我们的理智越是上升到普遍事物，我们就越能因此体验到更多的神圣事物并接纳它，我们的生活也就会更幸福。人因而并不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因上帝的恩典而变得幸福。人会幸福，因为人的理智使人性与神性在体验中融合。明智、正确的思考和理解，能让人获得所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在中世纪世界能够备受重视，阿尔伯特所做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但他同时必须小心谨慎并策略性地对待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多明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个保守修会。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阿维洛伊主义者进行公开侮辱的事件并不在少数。惩罚的方式有处决、公开火刑和焚书。【466】巴黎博雅院最有名的两位教师，布拉班的西格尔（Siger von Brabant）和达西安的波爱修（Boethius von Dacien），就分别于1270年和1277年惨遭厄运。他们被指控为“阿维洛伊主义”，因而被剥夺教学资格，之后莫名其妙地丧命于罗马。

教会上层的疑虑不无道理。因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阿维洛伊主义者令基督教的神圣历史变得非常荒诞。对于他们而言，自然史并非如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三千年间一幕幕上演的戏剧，而是一种永恒变化和稳定的不平衡的持续，就像今天的生态学家所坚信的那样。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信仰又是什么呢？想象和错觉？或是如阿维洛伊所主张的，对于淳朴的大众而言，信仰顶多算是多彩想象史的集合？

对待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有很大的可能性空间。布拉班的西格尔和达西安的波爱修没有顾及基督教神学因而遭此厄运。与他们不同，阿尔伯特试图缓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在13世纪针对此问题提出的诸多解决方案，简直是高难度的一字马劈叉。他试图让神圣天启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基督教式神学与哲学式清醒达成和解。这些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多么精彩。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阿尔伯特并不想将神学与哲学、信仰与自然研究糅合到一起，而更愿意将二者分离，让二者各得其所。对两个世界的分离并不阻碍他应征加入十字军东征对抗阿拉伯异教徒，尽管他打心底钦佩阿拉伯文化。宗教和政治处于阿尔伯特勋章的一面，哲学与自然探索位于另一面，而在这中间应是他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后者孜孜不倦地与他唱着反调。

托马斯【467】

这个于1225年在拉齐奥大区的阿基诺（Aquino in Latinum）附近出生的人，在很多人眼中，至少是13世纪甚或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作为贵族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托马斯5岁就进入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本笃会修道院。1239—1244年间，他在由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刚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博雅院完成基础通识教育。19岁时，他加入多明我修会，这让他的家人非常不满。有一段时期，家人将他强行软禁在离阿基诺不远的家族庄园。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并跟随阿尔伯特学习长达三年之久。阿尔伯特1248年回到科隆时，托马斯作为助手伴其左右。

他于1252年获得巴黎大学的教学资格，并很快获得人们的关注，因为他总能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全面又直观地讲解复杂事物。老师阿尔伯特作为多明我会的督察官遍游德国时，托马斯则在巴黎让学生们沐浴在春风化雨般的课程中。他早就胸怀大志，要将亚里士多德令人惊叹的思想以完美的、尽可能无矛盾的方式调和到基督教神学中去。托马斯的计划不是阿维洛伊、迈蒙尼德或者阿尔伯特的双重世界模型，而是一种最为理想的融合。

托马斯的著作总是涉猎广泛且形式多样，以至于在此我们只能就几个重点加以阐述。认为人从根本上可以完全洞察世界，这是他的出发点。对托马斯来说，一切都以理性和可理解的方式相互协调。上帝赐予的人类理智是用以把握这种理性秩序的出色工具。我们虽然看不见那些统摄世界的不可见的原则，但在可见世界中，【468】我们认识到这些原则的效果与影响。“作为科学的神学”的任务由此可被大致表述为——从可见的事物出发，回溯至那些藏在可见事物背后的普遍原则与隐秘的必然性。

托马斯所理解的科学不需要经验性的观察与实验。科学致力于演绎，而不进行实测。在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下，托马斯完成了他的早期作品《论存在与本质》（*De ente et essentia*）。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哲学上廓清了“存在者”的世界。首先，存在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逻辑的形式，也即一种可被认同的命题。如果我们的精神正确地认识事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一致，也即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存在者的第二种形式是实际存在着的事物。与逻辑的存在者不同，实际存在者有特定的大小、数量或者位置等等。在此，托马斯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学说。实在存在者有某种本质（*essentia*），它要么是实体性的，要么是派生的并因而是偶性的。接下来托马斯区分了实在

存在者的三种不同实体。有一种简单的实体，它是不可分的、不灭的、无限的和纯粹的。这一实体就是上帝——绝对的存在者。而所有其他存在者的实体都不是绝对的存在，它们是低等的，因为它们是复合的。这种实体分为非质料性的复合实体，如永生的天使和灵魂；以及质料性的复合实体，比如人、动物或者岩石，它们会变化、消解或者死亡。

我们很容易看清这个图式的重点。托马斯主张只有一个绝对的存在，也即上帝，而所有其他的东西只是仅仅以不同方式，非绝对地存在着。【469】以这种方式，他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确立了上帝的显耀地位。其他存在者的世界与此相对变得不那么真实。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清楚的一点是，只有事实上实存着的东西才具有本质。相反，在托马斯那里，天使和人类一样也有本质。从根本上而言，托马斯关于本质的想法要更宽泛一些。一切可概念化，也即可定义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且是本质的。

以这种方式，托马斯认为，他已经用纯亚里士多德式的方式凸显了上帝的角色以及神学的角色。对于希腊哲学家而言，神是“不动的推动者”，并因而是世界的起源（*causa efficiens*），对中世纪的神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而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这个“不动的推动者”中同时看到了世界的最终目的（*causa finalis*）。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本身是有意义的目的性行为。只有个体生命朝向目的，整个世界却不是这样。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Teleologie*）在托马斯那里成了神学（*Theologie*），成了无所不至且目的明确的救赎计划。这个“不动的推动者”成了启示的一部分，托马斯让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如此水火不容的两种精神在一场偷梁换柱的概念典礼上强行联姻。

托马斯在巴黎大放异彩之后，又去那不勒斯教授了一段时间。1261—1265年，他担任奥尔维耶托（Orvieto）的多明我修会讲师。接着以大学讲师的身份授课于罗马与维泰博（Viterbo）。这段时间内，他继续注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研究知识论问题。关于他这段时间完成的一些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我们之后还会有所涉及。1268年，托马斯返回巴黎，笔耕不辍。他与一众阿维洛伊主义者展开论战。论战中，他与阿维洛伊主义者针锋相对，主张理智与每一个个体灵魂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阿维洛伊认为不存在人格性的理智，存在的只是人对普遍上帝理性的分有。【470】相反，托马斯认为理智不能与个体灵魂分离。它就是灵魂的一部分，并且塑造着灵魂。精神塑造灵魂如同灵魂塑造肉身，

并且二者相互统一。对托马斯来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个命题，即个人的人格性灵魂是不朽的。那么，从上帝理智中小心翼翼分化出来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或许生灭如同动物灵魂，抑或不朽犹如天使。

令人诧异的是，托马斯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然而亚里士多德这个看重经验的古希腊人却并未谈及个体灵魂的不朽。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像托马斯那样将精神的功效与灵魂的功效关联在一起。但他并未将理智与灵魂融合到密不可分的程度。对亚里士多德及其注疏者阿维洛伊而言，只有普遍的理智是不朽的，而非个体的灵魂。

托马斯雄心勃勃。他不仅要证明（个体灵魂）不朽，也要解决近20年来的热门难题——世界是永恒的还是被创造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并不从虚无中诞生。托马斯对该问题的思考则更深入。他首先提问，什么是真正的“生成”（Werden）？之前不存在的东西产生了，我们通常便称之为“生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成是具有起因的时间性过程，这个起因让某种质料发生变化。所以，这里必然涉及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犹太传统下的基督教也同样如此设想创世。世界一开始并不存在，是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但不同的是，托马斯所谓的生成，也即创世，并不具时间性。这样的事物存在吗？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无论如何都不存在。然而，凭什么人类的理解力可以与上帝的全能相符呢？托马斯认为上帝能够在创世时完成一些人类不知道的事情，即让某物从虚无中诞生，但同时又让它是永恒的。【471】这些事我们人类当然不能领会。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它们，只要我们沉浸到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离开哲学而仰仗我们的信仰，信仰的觉悟超越于知识的世界。

新的上帝存在证明

上述问题的思考在托马斯的代表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可以找到。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耗费了他从1266—1273年的七年光阴。许多出自伪狄奥尼索斯的作品《论神圣之名》（*De divinis nominibus*）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也被他吸纳并用于《神学大全》的写作。就形式而言，它跟很多其他托马斯著作一样，算是一种汇编、教学用的教科书。他以直接而清晰的方式将关于世界内部结构的问题拆分为一百多个单一问题，即所谓的*Quaestiones*。大学的神学家之间的论辩就是以不同的立场提出互相对立的问题，然后试图去澄清它们。托马斯的《答辯诸问》（*Quaestiones disputatae*）也是以这种方式写就

的。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奋战于两大阵线：一方面，他想让正统的神职人员从其避世的思辨中脱身出来，实实在在地去理解世界的本性。创世不是无趣而腐朽的主题，而是精致而神圣的艺术。人们不是从启悟中，而是在探索自然法则及其合法性的高强度精神活动中获取知识。然而另一方面，托马斯又想反对那些过于唯物主义的亚里士多德拥趸、巴黎博雅院和阿维洛伊主义者，从而为基督教辩护。【472】《神学大全》的自身定位令所有人都无法望其项背。如一开始指出的，他想建立一门由哲学论证支撑的、作为科学的神学。

如果神学应当成为科学，那这意味着，信仰和理智不应互相冲突。最终，普遍的神圣理智的目的——托马斯也认为这种理智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方式从上帝那里“流溢”出来——是使人们超越感性事物而通达真理。一种这样的理智不能与被启示的信仰相冲突。因为信仰和理智指向同一个神圣起源。如果信仰和理智之间依然貌似存在矛盾，那也仅只是貌似而已。托马斯的任务就是要消解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以哲学的方式探索世界对托马斯来说意味着持续不断的训练。在理智的助力下，人从感知到的事物中提取出普遍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让人的理智越来越敏锐。如此一段时间后，人便认识了世界的自然秩序。人的理智在感观把握与精神通达的交互作用中发掘自然秩序。这一过程的精彩之处在于抽象，即从个别事物中提取出普遍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也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并不处于感性世界之外，而是作为神性的形式被包含在感性世界之中，并且能在其中被识别出来。最终我得以窥见上帝造就的这一由个体及其种属、特殊性及其普遍性砌成的完美艺术建筑。

然而，我们从何得知整个世界建筑有着神圣的起源呢？托马斯用五个步骤表明，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世界将无法得到解释。上帝存在的第一个论据是运动。事物生灭变化，从可能变为现实。【473】而这个运动的起源在哪里？是谁推动了它？在此，托马斯援引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学说，断定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只能是上帝。托马斯的第二个论据与第一个相似，即因果性。世间一切都是按照原因和结果的规则发生。那么第一性的、作为自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此，托马斯的答案也只有上帝。

第三个论据有关偶然事物的实存。世间的许多偶然事物从何而来？它们倘若不存在反倒更好！但它们偏存在着，这不能没有理由。每一个

偶然存在都派生于另一个存在。追本溯源，最终我们到达那个非偶然的
存在——上帝，其他一切存在都源自它。托马斯的第四个论据即世间事
物按照善、美或真的程度来划分层次。如果其中没有“至
善”（Optimum）作为层次划分的起点，我们的划分又何以可能呢？然
而，这个至善却不存在于我们的感性世界，因而只能是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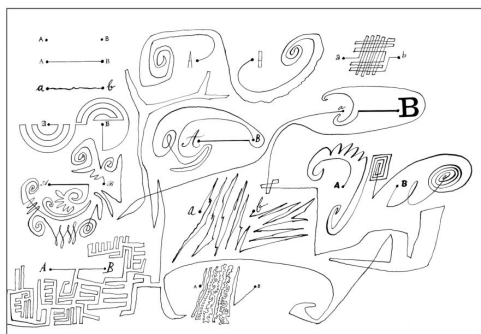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论据都解释了，为什么宇宙如果没有上帝就完全不可能存
在。我们因而称之为“宇宙论上帝证明”。在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下，托马
斯还推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论证——“目的论上帝证明”。正如亚里士多
德所表明的，自然是合目的的。生物完美地适应它们的环境，物理与化
学也遵循理性法则、和谐统一。倘若没有某个设立了这种理性法则与和
谐统一的卓越理智，这样的秩序将如何可能？托马斯认为，倘若没有某
个将目的、目标、发展以及完满性都规定好的秩序精神，这一切都是不
可能的。我们将这一秩序精神称作上帝。

托马斯的上帝证明成为神学和哲学界经久不衰的主题，【474】莱
布尼茨和康德都曾致力于研究这些证明。然而人们不应将这些证明当作
《神学大全》的全部。在这三部曲论著的前两卷，人们能找到许多在哲
学上有着重大意义的思想。托马斯不仅讨论形而上学，也探讨人类学；
同时还研究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他的思考从哲学的普遍性问题走向了社
会的实践问题。对此，我们之后会再详细阐述。

不过，接下来我们的目光会转向那些对托马斯融合哲学与神学的做
法产生怀疑的人，以及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将信仰和知识区分开来的人。
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秉性和思想趣味。他们是技术精湛的梦想家、
彻底的怀疑论者、经验论者或者逻辑学家。他们联手凿开了托马斯理论
大厦的高墙，并最终使其坍塌……

世界的祛魅【475】

对技术的赞美——意识决定存在——意志与个体性——奥卡姆剃刀——
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我们身上思考的质料



对技术的赞美

不同于巴黎或科隆，牛津只是它本郡的首府小城。而1167年，国王亨利二世（Heinrich II.）短暂地禁止英国人去巴黎学习时，牛津经历了一次腾飞。很快，牛津因它的宗教法庭吸引了来自各国未来的法学家到这里学习。并且自1214年以来，与巴黎相比，（牛津）大学也拥有了相对的自由。它的首位校长，诺曼底人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是圣方济会修士和神学家，但他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家闻名的。他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并致力于光学、天文学与占星学研究。一种尽可能不受神学影响的自然研究的风格在牛津被开创。

格罗斯泰斯特成为校长的同一年，他最重要的学生出生了：

【476】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培根在牛津学习，因为格罗斯泰斯特认为，只有读希腊语的亚里士多德才能正确理解亚里士多德，所以培根学习了希腊语。后来他在巴黎博雅院教授了很长一段时间。1245年回到牛津时，他学习了数学、天文学、炼金术与光学，并投身于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

1257年，培根成为方济各会修士。但他对修会很失望。这位热情的自然研究者想要为人类效劳，通过数学、物理学以及技术进一步推动人

类发展。他像亚里士多德与阿拉伯哲学家那样理解自然研究，认为其应服务于人类实践，并以经验考察为基础。这位方济各会成员，在还未满15岁时，就已经远离了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早先就怀有的改革热情。换言之，培根在他的方济各会兄弟看来是一个可疑之人，他质疑基督教的救世史。更糟糕的是，自1260年起，所有方济各会作家的作品必须通过宗教上级的审查。在巴黎，培根从此时起的停留之处，与在牛津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方济各会总会长圣文德（Bonaventura）亲自颁布了针对他的教学禁令。似乎在修会中，根本没有自然科学知识的立足之地。

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情况。1265年，这位深感沮丧的经验主义者收到一条意外的消息。枢机主教居伊·勒格罗·德富克斯（Guy le Gros de Foulques）对他的研究表达了兴趣。培根被鼓舞了。他悄悄开始急切地给枢机主教写信。这一研究不久被罗马教皇选中，情况变得更好了。当克雷芒四世（Clemens IV.）登上圣座，培根递交了他的作品《大著作》（*Opus maius*）、节选本《小著作》（*Opus minus*），以及导论《第三著作》（*Opus tertium*）。

尤其是他的主要作品《大著作》，不容小觑。【477】如格罗斯泰斯特一样，培根也认为，为了正确理解流传下来的知识世界，必须尽可能掌握多门语言，尤其是希腊语。自然的语法在他看来是数学，它决定了所有逻辑思想。只有数学为清醒的灵魂传递纯净的知识，提供最终的可靠性，因此它仿佛是“神性思维”。

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培根。自1263年起，另一位幻想家穿行于洲与阿拉伯世界，他是一位来自帕尔马的博学多才、接受良好教育的加泰罗尼亚人，除了母语希伯来语之外，还会说迦勒底语和阿拉伯语：拉蒙·鲁尔（Ramon Llull，约1232—1316）。拉蒙·鲁尔也热衷于数学与逻辑的普世语言；只有这种语言，能清楚地区分谎言与真相。作为那位英国圣方济会修士精神上的兄弟，他甚至构造了一种“逻辑机器”。它涉及七个不同大小的圆盘。每个圆盘的边缘都放着概念，它们根据圆盘互相之间的位置构建逻辑的概念结论——这在之后看来是首次使逻辑语言变得完全清晰的尝试。

再回到培根和他的《大著作》。在第840页，这位受排挤的自然哲学家总结了逻辑学、语法、外语、数学、物理学、光学以及炼金术的总体知识。他总是在其中添加自己的想法与尝试：他创造了“自然法则”的概念。接续希腊哲学，他将地球描述为一个球体。培根坚信，耶稣的出

生年份被算错了，他基于严谨的天文学思考而主张改良儒略历。他在光学中认识到，凹透镜含有光学的成像误差。他探求对海市蜃楼、光线折射、彩虹以及潮汐的解释。【478】在化学领域，他证明火并不是元素，而是产生于燃料与氧气的化学反应。在医学领域，他整理了阿拉伯药物，并为制造药物，用水银与血液进行试验。在生物学领域，他研究视力与解剖学。多年前他就已经知道，后来所说的黑火药是爆炸性的。他也思考如何制造眼镜。他是一位传奇的幻想家，预见了显微镜、液压系统、汽船、潜水钟罩以及飞机的出现。

所有这些知识和研究对培根来说，只有一种意义：传播基督教；改善平民的生活；扩大教会的权力范围，对抗信仰不同的敌对群体。正是最后这一项显得十分紧迫。在培根撰写自己的《大著作》时，成吉思汗的接班人钦察汗国深入今天的罗马尼亚地区和东波兰。到处都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谣言——基督教文化会被“鞑靼人”摧毁。培根也相信这一点。对他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这个显而易见的、即将来临的历史转折点将以何种方式发生——一种彻底的毁灭，还是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在传教中所宣扬的千年帝国的开始？

培根想要帮助而不是挑衅。让他承认神学是最高学科毫无问题，只要人们不愚昧地拒绝经验性的真理，不跟随错误的权威，不坚持传统的习惯，或是固执地逃进不成熟的智慧。但是他凭借自然科学进步拯救人类的伟大计划，仍然无法实现。虽然罗马教皇仍然展示了他对哲学问题的兴趣，他让培根接管了托马斯·阿奎那在罗马北部80公里处的维泰博的庄园，但是他并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大规模的革新。【479】克雷芒四世在他继位三年后的1268年去世。培根的作品沉寂消失。令人失望的神圣使者从此以后便怒气十足地破口大骂经院哲学家，招致无数敌人。1278年，培根被怀疑是“阿维洛伊主义”，又一次被软禁家中。直到1292年，去世之前不久，他才被允许离开家。这使他变得沉默，并且被迅速遗忘。

意识决定存在

光学问题，算得上是培根研究最多的自然科学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一问题至少隐喻了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结。中世纪的神学中充满了光之隐喻，总览万物、照亮精神与灵魂的神之眼。存在与现象、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不仅是光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学者们如此努力地研究天气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彩虹是什么——现象还是存在？培根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培根去世几年后，一个来自埃尔茨山脉的撒克逊人给出了当时最佳的回答：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 1240/45—约1310）。他晚年用一个六边形的水晶、两枚水晶球与露水做实验，由此得到了最接近正确的答案。是光线的折射，它遵循自然法则产生了彩虹的光线效果。

然而迪特里希并未作为物理学家被写入历史。他的文章很快被遗忘，这一光学上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480】他的元素学说与宇宙论同样是不成功的。此外，他还有关于天空的学说。在精心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与新柏拉图主义的《论原因》之后，他做了理所当然的工作：尝试将中世纪关于天体力学的知识与古代宇宙论相融合。

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托马斯·阿奎那顶多算外行。他的强项和兴趣在别处。迪特里希将天空从天使与鬼怪中净化出来，而这两者在托马斯看来推动了星体运动。同样，创世的想法在他看来是愚蠢的。更接近的是一种被称为“流溢”的持续创世，就像普罗提诺和他的学生所主张的那样。总之，在教会许可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界限内，迪特里希深受鼓舞。在他看来，神就是“太一”，而宇宙就是其完全流溢的结果。没有无法被解释的偶然与虚无，这些都彻彻底底地由逻辑世界统摄。一切都被神的完满智慧充满，从星球的运行轨迹直到人类的精神。正如普罗提诺和他的学生所认为的，这种精神渴望返回它神性的起源。由神赋予灵魂，它不停歇地追求着复返。到目前为止，这些都可以和奥古斯丁与教会协调一致。对奥古斯丁来说，神之恩典以不可预测的任意性，决定了谁可以攀登至接近神的地方，但在迪特里希看来，至福之门是为所有人敞开的。他只须通过思考接近那个早就居于其自身之中的永恒的至福。

无论如何，迪特里希总能在他所研究的光学、宇宙论、认识论或是神学中，引入重要的新东西。他热情满满地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心思想之一。他提出了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从何而知，我关于某物所想的确实与此物的本性相一致？因为事物的感官性直接触动我的理智，【481】并规定（vorschreibt）了正确的印象，亚里士多德如此回答。托马斯还补充说，这也是因为神没有迷惑我。

迪特里希想要知道得更确切。他彻底怀疑这一点，即我们的理智在自然中遇到的事物拥有这种力量和能力，只从远处就能为我们的理智规定对象。如果这里有某物规定了其他物，描绘并定义了其性质，那么这是理智（Intellekt）而非自然物。不是石头、时间或法兰西国王给我们

的精神以一种感性印象，而是我们的精神确定了什么是石头、什么是时间以及什么是法兰西国王。这一思想是哲学史上最举足轻重的纲领之一！许多名头比这位迪特里希更为响亮的人物，继续沿着这条小径前进，这就导致了后来在哲学中一次命中注定的转折。

在中世纪教会看来，这一转折是炸药——即使还需要一段时间，教会高层才能认识到它的爆炸力。当教会高层终于领会了它的爆炸力，他们的怒火触及的也不是迪特里希，而是他的一个亲密同伴。迪特里希自己不仅逃过一劫，而且尽管自1277年起遭受了禁止“阿维洛伊主义”的动乱，他仍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巴黎的大学讲课，还德高望重地出任了多明我会德国分会的最高职务。

所有这些都不同寻常。只须看一眼，迪特里希如何在他的文章中以不妥协的严厉态度评判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他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观点都不能满足他在逻辑和一致性上的严格要求。抨击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洛伊，就能让教会高层看来是正确的。偏偏迪特里希钟爱的陪练是托马斯·阿奎那，这是极受教会尊敬的首席思想家，【482】迪特里希代替他成为副主教，而这是所有可能的职位中第二高的。

托马斯整个体系的建立与瓦解都由于这一观点，即神根据同样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的理性创造与安排了这个世界。迪特里希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在他看来，事物的“本质”不是人类理智在自然中发现（*vorfindet*）的，而是其发明（*erfindet*）的。在我的精神认识事物的那一刻，是我的精神将万物塑造成它们对于我的精神来说所是的样子。精神定义了事物的性质，尽管这完全是按照它受神启发的理性规则。真实（*Realität*）在迪特里希这里的含义滑向了亚里士多德与托马斯的对立面，不是如真实的事物一样；而是如事物那般真实。而事物如何才是真实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智。

对于许多没上过哲学课的人来说，这一观点是陌生的。月球上的石块难道不是它们自己所是的东西，也不是人们所见到的样子，不是作为石块被认识，不是作为月球岩石被定义？迪特里希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也并没有反对，石块一般首先是由于人类的精神对其进行研究成为认识的对象。以此，它们才真正成为可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位多明我会修士用这一观点打开了一扇通往哲学研究中全新的主体性维度的大门，尽管他还没有完全踏入这扇门。

人们可能会由于迪特里希在主体性上的转向而误解他，称他为神秘主义者。但他完全不是。他甚至将自己视为得出唯一正确结论的、冷静

的逻辑学家。因为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不能对我们言说，所以我们来告诉这世界中的事物它们是什么。迪特里希相信，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世界真正的状况，与托马斯用他的方法所做的尝试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托马斯设想的世界与理智对话之处，【483】迪特里希只看到了精神的独白。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获得对隐蔽的世界法则的认识。

显然，迪特里希关于精神和世界的理论中，神的存在并不必要。虽然这位来自撒克逊的逻辑学家将哲学从神学中严格区分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脱离神。与托马斯不同，迪特里希并不认为是神担保了理智所认识到的与真正的事实相符。但他需要神担保，理智是一种如此杰出的工具，完全不需要与谁一致。这种有效的理智是我主动认识事物的工具，它——在严格遵守逻辑的情况下——如神一般，正确地构建事物。

然而，如果这种所有人都具有的、受神启发的理智基本上能认识并把握一切，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是完美的洞察者与天才？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愚蠢、无知与半吊子。显然，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继续深入训练他们的理智、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认识能力。思考是持续不断的逻辑工作，虽然我们的理智是受神启发的，但真理并没有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艰难地从“精神的隐匿”（Versteck des Geistes）中发掘这些宝藏。

哲学式的自我认识，这一宝藏尤其难以发掘。为了成为杰出的工具，理智必须认识它自己。在迪特里希看来，就这一点而言，大部分人从未特别成功过。否则托马斯·阿奎那也不会认为，理智是物质灵魂的精神附属品。当我们严格按照逻辑前进，就会发现，正如迪特里希所说，我们并非拥有理智，毋宁说，我们就是理智。我们不是那种附加地、支配一种杰出理智的灵魂。【484】没有理智的人类灵魂会是什么，而没有灵魂的理智又会是什么？灵魂不是物，理智也不是，对迪特里希来说，这二者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结在一起，是非身体的、非物质的，是只能被主观地掌握的。当理智研究自身，它不会发现任何客体。它认识到，自己是一种非物质的实在性，是所有意识内容的主体性来源。

迪特里希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也是彻底的。他甚至不把时间视为一种前定的自然物。亚里士多德表明、奥古斯丁强调的东西，在迪特里希这里被终结。我们不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是我们的意识借助想象力展开的。时间不是存在范畴（Kategorie des Seins），而是一种“直观范畴”（Kategorie der Anschauung），正如康德（并没有参考迪特里希）在五百年后将要写下的那样。

然而，迪特里希并不怎么成功。他的思想显然不合时宜，而他的思考方式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成为一种思想学派。尽管他拥有崇高的官方职位，但事实上仍在逝世50年后被人们遗忘，与罗吉尔·培根并无差别。至少，他是一位改革者，一位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中的并不危险的改革者。或许这是因为，他没有从中得出什么政治论断。

意志与个体性

对迪特里希来说，物理学与形而上学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在他研究光学、解释彩虹现象的时候，这二者才彼此区分开来。如果说罗吉尔·培根的宏大计划还难言成功，那么牛津大学至少要赋予他的自然研究一个更高的价值。数学、物理学与医学是1300年左右最重要的主题，这一情形不仅仅是在英国。【485】今天，在许多大学里人们将哲学从神学中区分出来，这获得了相当有益的结果。而托马斯·阿奎那几年前就想永远弥合的那个鸿沟，至此在制度上被固化下来。

无法相互协调的两个世界——看来，在神学与哲学的书斋和教室中所发生的，似乎与在宏大政治中没什么不同。整个欧洲一下子被从内部撕裂了。在中心，神圣罗马帝国支离破碎。腓特烈二世，那位从意大利开始统治帝国的皇帝，于1250年辞世。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到来了，即“空位时期”。直到1312年，才重新出现一位德意志皇帝，亨利七世（Heinrich VII.），但是他的权力已不再世袭。从此以后，由选帝侯选出君主——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从皇帝转移到诸侯那里。

很短的时间内，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好像在世俗与精神权力这二者之间永恒的斗争中，教皇才是最大赢家。但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在皇帝与教皇之间敌对的阴影下，法国的王权加强了。这看起来肯定越发奇怪，因为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tius VIII.）在他的教谕《神圣一体敕谕》（*Unam sanctam*, 1302）中要求，所有君主都从属于教皇：“我们宣布，所有丢失了灵魂至福的人之被造物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的臣民，我们告诉他们并且确认这一点。”教皇的指令其实是纸老虎。腓力四世（Philipp IV. der Schöne），这位来自法兰西的美男子，毫不犹豫地逮捕了教皇，并将他判为异端！教皇是异端？在这之后不久的1303年，卜尼法斯在罗马去世。从此以后，由腓力来确定谁是从属于他的教皇。卜尼法斯的继任者克雷芒五世（Clemens V.）是法国人，情况无外

乎如此，他在里昂被加冕为教皇！罗马对腓力来说已经过时了。从此以后，阿维尼翁成了教皇之城。

14世纪初，欧洲政治的坐标几乎是在一场突然袭击中发生了转移。
【486】皇帝与教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那些看似神圣、毋庸置疑、永恒的东西，悄然逝去：转变取代了延续。法兰西是新兴的超级大国，而英格兰已成为暗中的竞争对手。将近600万移民居住在不列颠诸岛。这里贸易繁荣，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已有良好的声誉。

这是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aëis Scotus）所处的历史背景，他是中世纪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出生年份不详。就像别名“司各脱”显示的，他是苏格兰人。1291年，他成为北安普顿圣方济会的神职人员。同时，他也在牛津大学学习，也许还有剑桥大学。如那个时代中常见的那样，他倾注了大量精力于亚里士多德研究。1302年，也就是教谕发布的那一年，他去了巴黎，但又不得不再次离开，因为他支持教皇反对美男子腓力。一年以后，他回到法兰西首都，并在这儿教了三年书。他的最后一站是科隆，短暂停留之后，他于1308年辞世，其时他在40至50岁之间。

早逝阻碍了邓·司各脱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但他仍应在哲学史上获得一个光荣的席位。尽管邓·司各脱的自我定位绝不是哲学家，而是神学家。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恰恰成了迄今为止中世纪最睿智的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者。丝毫不带有宗教狂热，邓·司各脱怀着冷静的愉悦，将手指戳进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伤口。正如以前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那样，邓·司各脱问道，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从何处知道那些他们所相信的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所正确认为的，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都来自经验。【487】但如果我现在从我的具体感知与观察推导出未知的普遍事物、种与属，以及世界的隐秘结构与秩序，那么这些都不是知识，而是思辨（Spekulation）。我不能从普遍概念里获得任何确定的知识。我只能看到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在邓·司各脱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事实的坚实地面耸起，就好像在不可见的世界中有一个底座。但这个底座是未知且不确定的。我不能一步步推演它。我也永远不能说，在普遍概念与抽象观念的世界里某物是必然如其所是地存在的。

邓·司各脱的论证方法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迄今为止，神学家已经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批评甚多，但并没有规定说，从以非感官的方式体验到的事物中就会一无所知。整个神学本身，就是由关于不可见的普遍之

物的大胆而独断的主张构成的！但是邓·司各脱做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事情：他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论证攻击亚里士多德，而这些论证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用来批驳神学的：他十分怀疑，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能否提供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能够认识这些他们相信能被认识的东西。并且，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归入思辨的领域！在邓·司各脱面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现在必须做出辩解的，不再是他们所致力对自然的感性现象的研究。而必须在这件事上为自己辩护，即他们只是设想自己知道，事物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存在的法则。

这么论证的话，那最后只有被经验审查过的，才能作为知识留下来。但这并不是邓·司各脱的用意所在。他坚信，存在一种关于万物的伟大而不可见的结构。但问题是，应该怎样准确地认识它呢？这是一个僵局，神学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相互指责对方的无知，邓·司各脱不想陷入其中。【488】相反，他想要按照哲学和神学之于人类个体及其灵魂救赎的功能（Funktion）来区分二者。

在邓·司各脱看来，亚里士多德式的哲学主要是自然研究。但是神学也并非关于真理的演绎。完全相反，在邓·司各脱看来，神学是有助于生活的东西。人们只是渴望意义和目的，这些远超出动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规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没有救赎，也没有对人类救赎的需要！而在邓·司各脱所生活的世界中，对救赎的渴望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他认识的人们都想知道，出于对彼岸生活的考虑，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此岸生活。但哲学无法给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回答，因为哲学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就只剩信仰了。这种信仰远不能使人类理智与神之理智短暂相通。这只在阿拉伯童话和托马斯·阿奎那里存在。这种信仰是直觉的知识，是对神的爱，是完全实践性的。我所相信的价值帮助我塑造生活，指引正确的方向。这些价值给我提供了对存在以及结构与意义的热爱。那么，除了圣经文本之外，我在何处能更好地得到这所有的一切？

对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来说，这是对其专业的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定义。他从哲学家那里取走了相当于形而上学的区域，却也没有将之再给予神学。诚然有一条出路：没有人知道，人类目前对于世间万物的无知状态是否会持续下去？人类更向高级发展，但上帝却没有依次为人类揭开他大衣上的褶皱，这难道不可能吗？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类是一种永远固定的动物。他关于人类文化的图景不含任何动力学。他所言的“政治的动物”看起来像玻璃后面的标本，【489】无法适应未来的任何变

化。而邓·司各脱受其时间之流的启发，将人类视为可发展的，在认识能力的进一步完善上也同样如此。

相较于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邓·司各脱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进。迪特里希授予人类理智以世界工程师的权利。邓·司各脱则从根本上怀疑人类理智的有效范围。他否认，事物的性质是从我们精神中以思想的方式产生。由此他将自己置入阿伯拉尔的传统中。像“人性”或“动物”或“善”这些普遍概念，描述的是我们确切知晓的东西，对这一点他是极度怀疑的。因此邓·司各脱认为，事实上我们只能谈论个体之物而无法谈论普遍之物。他并没有像“唯名论”走得那么远，后者认为“人性”与“善”只存在于语言之中。但是，关于人性和“善”等表达能否确有所指，这一点存疑。我们只能认识到个体的人和具体的善的行为。

我们只认识到个体之物与具体之物，这使邓·司各脱进一步研究个体。事实上，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强调和揭示了人类的个体性的中世纪思想家（也许阿伯拉尔是个例外）。他在此使用了大量的逻辑理性，这一点表明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运用逻辑理性。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明见的，它们是清楚明白的，因而不需要被证明。这看起来与人类的意志无异。它避开了所有逻辑与计算。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意志都指向一个目的：指向一种尽可能具有德性的，因此也是幸福的生活。由此出发，托马斯·阿奎那制定了一套神圣的程序，每个人根据这套程序都能努力追求变得与上帝相似，【490】并相应地完善自身。相反，邓·司各脱则秉承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的意志常常会走与理智不同的道路。此外，对舒适的渴望与对正义和善的渴望之间，似乎是分裂的。尽管有各种怀疑，但司各脱仍是上帝的仆从，他对善与正义的评价要高于对舒适的评价。一个勤奋的人尝试抑制自己的追求舒适的意志，这与柏拉图以及众多其他希腊哲学家所宣扬的并无二致。每个人都应该热爱上帝，这样的人就会控制自己，不会毫无节制地屈从于对舒适的渴望。而正如之前的奥古斯丁那样，邓·司各脱还认识到，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不成问题的事情，即将所见与所想相互协调，在邓·司各脱看来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繁琐的经院哲学中冷冰冰的逻辑，在他这里成了心理—逻辑。

奥卡姆剃刀

巴黎的邓·司各脱对亚里士多德的与神学中的形而上学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在350公里外的伦敦，有一个人首次被授予神职，他将更为彻底地怀疑我们关于神与世界的知识的可能性：这就是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1306年，在从前南华克区的沼泽地，也就是今天属于伦敦市中心的区域，这位年轻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成了副执事。

哥特式教堂逐渐变小，隐匿于碎片大厦（The Shard）旁，碎片大厦是欧洲最高的办公大楼，是属于卡塔尔王室的一座尖顶金字塔。在伦敦金融城这个现代“银行教堂”的阴影中，难以设想，【491】这座古色古香的教堂曾是一度支配着欧洲的信仰垄断组织的一部分。大教堂与银行大楼共在的图景表明了重大的权力转移，获胜的是合理的与理性的思想。而碎片大楼中的财务经理几乎都不会知晓，“思维经济学”这一与奥卡姆的威廉密不可分的概念，正是发源于此。

1308年，即邓·司各脱去世的这一年，威廉转到了牛津大学；1317年，他获得神学学士学位，但他没有继续攻读硕士。大学期间他就写过这样的语句：“神学不是科学。”这对14世纪初的神学家来说，是一句胆大包天的话！但威廉的意思不是说，神学家从事神学的方式是糟糕或错误的。其原因要根本得多。在威廉看来，人类在他们精神发展的当下时间点，还没有到达可以恰当地把握神学对象的程度，即作为世界造物主与起源的上帝。神学不是科学，这不能责怪神学家。这是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即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并对超感官之物一无所知。在皮浪和阿尔克西拉乌斯之后一千三百年，哲学凭借其怀疑与怀疑论重又触及了人类认识的可能性。

1320年，我们发现威廉再度来到了伦敦的圣方济各会。他致力于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研究，并制定了基本命题。首先是逻辑学。我的天哪，威廉的前辈演示了使用那些杂耍般的概念，他们在世界中放置了多么梦幻般的形而上学式的空中楼阁！然而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人，是从何处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他们内心的确定性源于何处？他们仅仅是因为存在这些语词，【492】所以才没有简洁地使用诸多概念吗？关于“必然性”的讨论是必要的吗？我们是否必须假设，确实存在着“普遍之物”，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能进行普遍化？真的存在自阿拉伯人开始经院哲学家就在讨论的众多不同的理智？如果我完全无法以感官的方式经验到柏拉图的理念，那么我从何而知它是实际存在的？人们是否最好删除众多的“原则”、流传之物、思辨之物以及毫无根据之物。因为它们或许在人类语言之外毫无容身之所。

威廉的建议是极端的：他要求以“思维经济学的方式”进行思考，将所有不涉及具体经验或是包含矛盾的东西，全部删去；许久之后的17世纪，这种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方法进入了哲学史。

如果我们坚持思维经济学，那么这门学问就会从我们对于现实的表象中获得大量的结论。我们生活在何种实在情形之中？与此相关的，我们一定会如何设想这个世界？威廉认为，就人类所能领会的范围来看，世界之中不存在必然之物。所有我们能够掌握之物都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它们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对哲学家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几乎所有哲学家难道不都是在尝试发现世界之中诸多个别之物背后不可见的必然性，以及它们隐蔽的秩序吗？他们的出发点难道不是认为，这些秩序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合目的的吗？然而，当人类不再相信自己有认识能力去揭示世界的隐藏框架时，还能剩下些什么？

至少，威廉没有怀疑过，上帝以理性的视角筹划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一点上，他确乎是一位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正如威廉设想的那样，上帝完全不能不合逻辑地行事。【493】毕竟逻辑是神圣的，并且这一点是从如下观点出来的，即上帝坚持他自己的逻辑。当然现在可以争论，如果上帝似乎是被迫遵循自己的逻辑理性且不能有任何矛盾，那么他是否还是全能的。因为一个全能的上帝的当然也能够废除他自己的逻辑。虽然这样做是毫无逻辑的，但正如人们所见，这是一个因果循环。因此威廉更倾向于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是造成了逻辑学和物理学上的恶作剧。因此可以推论，上帝不会让时间停止或倒流。他也不会创造无质料的身体以及由气体组成的脊椎动物。

但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认识事物？在亚里士多德与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我们通过与世界中的事物相协调而认识了这些事物。我们瞄准一个客体，在我们的内心目光前方构造一幅精神图像，即这一客体的表现。通过理智与这个客体的相互协调，我们达至客体，并由此在其普遍性中认识了它。在托马斯看来这是一种澄清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上帝的理智与人的理智联结在一起。仿佛是上帝的电流点亮了我们头脑中的灯泡。

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驳斥了这种人类精神与外部世界的一致关系。在他看来，认识的舞台剧并非在理智与自然物之间发生，而是在上帝——人的理智本身之内发生。与此相反，威廉则从另一方面批评了这一看

法。在迪特里希大谈理智之处，他是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冷静在狭义上谈的。他无法设想，无论如何，人类会完全真实地触及上帝的理智。邓·司各脱也怀疑这样一种理智的启悟。当在人之中照亮某物时，那是感受、想象与希望，但不是知性（Verstand）。【494】出于这个原因，威廉认为事物的普遍性同样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领会那些我们在感觉中体验到的个体之物。除此之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符合逻辑的，也就是前后一致的语句，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而这恰恰是科学所擅长的：通过协调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关联关系创造知识。

与过去的决裂几乎不会被过高评价。在哲学与神学传统中，当一种陈述与现实相一致时，即如其自在所是时，那么它就是真的。但在威廉看来，当我们在个别之物中以感官的方式把握现实性时，才能与它取得一致。与之相反的情形就要涉及普遍性的陈述，那样的话现实对我们来说是隐蔽的。除了遵循逻辑的普遍原则，构造合逻辑的命题，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同时怀着一个不可验证的希望：我们差不多能够命中那个自在存在的现实性。

从这一点上来看，威廉在一直未平息的共相争论中站在哪一方，就很清楚了。他同样没有解决方案，但是比起迄今为止所有给出的回答，他更钦佩这个问题本身。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处在一条无法克服的鸿沟中，即在我们能知道的东西与我们不能知道的东西之间的鸿沟。

如果我们的理智完全不能恰当地把握普遍之物，那么也就不应该断言，“人类”与“善”是真实的，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人类”与“善”。那些“唯实论者”认为“人类”是真实的，他们使用了一种他们完全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威廉认为，我们实际上只能真实地把握世界之中的个别之物。我们当然可以用理智来概括这些个别之物。我们能够从众多个体的人那里看到他们的共同点，来有意义地谈论“人类”。【495】与唯名论者不同，威廉认为“人类”不仅仅是一个语词，而且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以类似的方式，人们可以将威廉同阿伯拉尔一样归为“概念论者”：普遍概念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但它们并非是偶然存在的。

威廉关于事物的洞察并不符合那个时代教会高层的看法。托马斯·阿奎那不正是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体系，它不仅证明了上帝，而且解释了一位有修养的神职人员如何能够掌握并传播世界真理？而现在威廉解释说，这样一种知识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也许再加上一些他与牛津大学校长之间私人的争执，在1324年给威廉带来一场被迫的旅

行，去往一个对他来说高度危险的地方。他被召往阿维尼翁，在罗马教皇面前为他的异端论点作个人辩护……

没有什么是一必然的

在讨论威廉未来的命运之前，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其他人是如何进一步思考他的思想的。其中之一就是奥特库尔的尼古拉（Nicolaus von Autrecourt）。他生于1300年前夕，1320—1327年间在巴黎学习神学。他是中世纪晚期邓·司各脱与奥卡姆的威廉的传统中第三位伟大的认知批判者。尼古拉精准地理解了威廉，尽管他们俩也许从未亲眼见过面。但威廉使他明白，只有那些逻辑上无矛盾的，才能成为真的。然而问题在于，由此从篦子的缝隙间落下的，不仅是每一个不合逻辑的命题，还有我们日常经验的可靠性。

威廉几乎没有怀疑过，【496】我们能够通过感官的确定性来认识个别之物。而尼古拉认识到，这种确定性是不可靠的。因为我的感官会欺骗我。我常常不知道我是否搞错了。只要想想圣餐。教会要求人们相信，面包是由圣体变成的，尽管这一信仰与所有的感官明见性相悖。如果说真理在对个别之物的感官感知中显现，那么下列两种情况中就有一种是错误的：要么是我对圣餐有感觉，因为我的感官没有把握圣体成为面包的转变；要么是教会宣称的“圣餐变体论”是错误的。

对我而言，对个别事物的感性认识缺乏一个真理标准，以无矛盾的方式有效的命题只适用于逻辑关系。但当我将某物认识为白色、灰色或红色时，我无法在逻辑上检验这一点。矛盾律在我的感官感觉上不起作用，也无法领会它。

剩下的只有逻辑学。但是如果逻辑学只是在命题的层面上发生，而我们根本并不拥有任何与事实看似可靠地相符之物时，逻辑学到底有什么价值？所有逻辑推论，所有从后果向原因的回溯，都不能向我们人类揭示出任何确定的真理！因为“从对事物实存的认识中，并不能明见地推断出事物是什么——这种明见性是通过追溯最高的认识原则或最高认识原则的确定性而获得的”^[154]。

尼古拉质疑因果性，紧随这一思想而发生的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成就。苏格兰人休谟在18世纪将会问道：我知道，两个事物以因果关系的方式彼此联结起来。但是我从何得知，这种联结是必然的？我们所谓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497】实际上难道不仅仅只是经验的观

察？我难道不是只看到，某一个因果序列在不停地自我重复？就连康德，也要竭力向尼古拉和休谟证明，凡是合乎时间顺序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尼古拉斯在14世纪提到，我们称之为因果性的东西，只是某种以被证明是定期发生的经验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习惯为基础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所谓“规律性理论”的创始人。根据这种理论，原因与结果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相互作用。但在哲学史上，尼古拉斯从未真正具有过这样的地位。

1340年，当他像之前的威廉一样被传唤至阿维尼翁时，他的事业便戛然而止。圣经和教会的世界，不能是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世界。尼古拉由此招致了罗马教皇和教廷的猜疑。经过数年折磨人的审查与辩护，他终于被起诉了。尼古拉对此心存畏惧。他做出了让步，只做一些辩证式的思考。他公开撤回了自己的所有论题。但是罗马教皇并不相信他，并于1346年给他下达了终生的教学禁令。他要在巴黎公开烧毁自己的著作。实际上尼古拉只有一篇探究、一篇论文和三封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其余的作品全部遗失。尼古拉迁居到了梅斯，在那里他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并于1369年去世。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作为哲学家被讨论，被赞颂，被攻击。最终他的拥护者与评论者要么确保了他在神学中保留权力，要么将神学问题去魅转化为哲学问题。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取得了彪炳的胜利。14世纪初，此岸重又成为此岸，而彼岸则被推向遥远的远方。【498】生前的生活不断被研究，而死后的生活则从哲学关注中逐渐消失。

然而亚里士多德与他巨大的胜利一起渐渐褪色。他的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对中世纪晚期的学者来说越理所当然，他们就越要批判它。因此邓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与奥特库尔的尼古拉已经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揭露为是思辨性的。然而还有像尼古拉那样的人也会批判他的物理学。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将时间与空间设想为球形的连续之物同样缺乏自然科学的意味。时间与空间不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吗？它们为了被推动，难道不是一定以某种方式由物质组成，比如由最精细的原子组成？如果至少空间由原子构成这一点没错的话，那么空间之外一定存在着什么——一种虚无（Nichts）。亚里士多德排除的正是这种虚无。而相反，尼古拉却认为这是可以设想的。要到数百年之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这种虚无在物理学中才获得了恰当的位置。

尼古拉认为，对自然的物理学解释过于静态化。虽然万物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都处于运动之中，但是这种运动在进一步的观察中几乎不具有动态性。换言之，自然物似乎被编制好了程序。它们的变化具有确定的可能性。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变化，并由此达到其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就是这样谈论运动的。那么导致这种运动的推动力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尼古拉也没有找到答案。但他宣称，一定有一种压力，引起了推动力，由此导致了运动。

即使尼古拉没有得出新的物理学理论，他仍是最先为中世纪物理学引入两种全新思考的人之一：【499】如果不再是一种内部程序引发了躯体的运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种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物理学就是以此为起点的。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时间与空间都是由原子组成的，那么所有一切难道不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吗？我们的灵魂是由何种材料组成的？也许是由精神性的材料而非物质性的材料。但是精神性的材料难道不是一定也是某种意义上质料性的，且由原子组成的吗？在他的论文《输出秩序》（*Exigit ordo*）中，尼古拉提到一种思维具有的原子式—精神性的材料（*entia atomalia spiritualia*）。^[155]即使尼古拉在这里独立得出的是那些早期自然哲学家，像德谟克里特、斯多亚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已经提出的理论，但这对中世纪来说仍是全新的。对我们精神的物质式去魅过程开始高歌猛进……

在我们身上思考的质料

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奥特库尔的尼古拉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是约翰·布里丹（Johannes Buridan），他是农民的儿子，来自法国北部的皮卡第大区。1320年左右，他获得了法国莱莫恩学院（Collège Lemoine）的奖学金。紧接着，他转到了大学。1327年，他获得了博雅学院的硕士头衔，与此同时也第一次被选为校长。布里丹以亚里士多德注解专家而享有盛名。中世纪哲学家中找不出第二人像布里丹那样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不管是阿尔伯特、托马斯、邓·司各脱，还是奥卡姆的威廉。

在巴黎，布里丹加入了威廉追随者的圈子。然而他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注解和辩难，远远超越了他的导师。当涉及共相问题时，他的观点自然与威廉接近。和威廉一样，布里丹只认可个别之物的真实性。普遍概

念对他来说不是“真实的”，而是语言的抽象。【500】亚里士多德（还有阿维森纳）进行了一项观察，以解释一般概念之于对个别之物认识的优先性。当人们从远处看到某物，理智会立即清楚地认识到那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动物——此后人们才认识到个别之物，一个具体的人或是一只具体的狗。因此，“动物”和“人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属于一种更高的概念范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们比个别之物“更根本”。

也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经常使用一般概念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个别之物？布里丹正是如此论证的。翁贝托·埃柯在他的长篇小说《玫瑰之名》中通过主人公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之口，说的也是这个解释：

当你在远处看到某物且无法知晓它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满足于将它定义为外延不确定的躯体。当你靠得更近，如果你依旧无法知晓它到底是一匹马还是一头驴时，也许你会将它定义为一种动物。当你继续靠近它，你将会说出它是一匹马，但你依然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布鲁内卢斯（Brunellus）还是法维卢斯（Favellus）。只有你靠得足够近时，才能清楚认识到它是一匹布鲁内卢斯（也就是说这匹具体的而不是其他的马，就像你一直想要称呼它的那样）。这最终就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独特的感知。 [156]

埃柯在他的解释中想到了布里丹，使这位中世纪哲学专家为他的读者所知。他并不是偶然地称那匹马为“布鲁内卢斯”。这个名字也是在布里丹那里出现的，并且，是在他解释人们是如何从个别之物得出普遍概念时出现的。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彼此相似，所以我们能将他们概括为“哲学家”与“人”。但柏拉图与“驴子布鲁内卢斯”相互间几无相似。他们二者首先都处于“生物”中较高级的层次。【501】布里丹想要以此表达的，几乎是对整个欧洲形而上学祛魅：普遍概念并不是更高的知识！它们并不是一种更高级理性的一部分。它们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世界的前定结构，也不是阿维森纳与托马斯所说的上帝理智的表达途径。

布里丹认为，普遍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发现了它在抽象和概括事物方面的实用性。因此我们就能用概括性的语词来归纳事物之间彼此相似之点。这些相似点在布里丹看来并非偶然。因为通常情况下，产生于同一或相似来源的事物就会特别相似。关于事物的这一看法并未进一步发展至上帝的高度，而是扩展到“自然秩序体系”的领域，18世纪

的自然研究者为了安置当时不计其数的植物和动物而试图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那个时代的人们会激烈争吵，动物界的种属、目和门类是否与自然真正的秩序相一致，还是说这仅仅是为了便利的约定俗成。到了19世纪的进化论才在此问题上有了更为清晰的见解，将亲缘关系作为分类的基础，当然今天的生物学家也一定会承认，并不真的存在“人类”“鹰科”或“树木”，只存在个别的物种，它们与“人类”的、“鹰科”的或“树木”的特征相吻合。

布里丹认为，普遍概念不是从自然中产生并存在的，而是被人类按某种目的发明的。这与唯名论者所宣称的观点无异。而布里丹远远超越了唯名论。如果我们关于普遍认识的想法并非从上帝的理智中得到启示的，那么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理智。【502】在这一点上，大部分唯名论者都十分小心，因为如果非物质的人类精神不是由上帝来统摄或启悟，那么它应当是什么呢？这一精神流体必然有其来源。因为在自然中不存在可以与人类理智相提并论之物。

与之相反，布里丹秉持着非常朴实的态度看待此事。他将一切超感官之物与人类理智分离开来。同时，作为一位精通专业的物理学家，他甚至认为人的理智是物质性的。布里丹比那位不幸的奥特库尔的尼古拉更坚持不懈地谈论纯粹物质的灵魂与纯粹物质的理智。我们的精神仿佛是一台生产思想的机器。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所具有的挑战性再清楚不过：如果不仅躯体是物质性的，而且精神也是物质性的，那么精神就不可能是不朽的。而在2、3世纪之交，逍遥学派的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Aphrodisias）所宣称的恰好也是这个观点；布里丹坚定地遵循这条道路。然而，认为精神是物质性的与有朽的，古代人是否这样想，或者14世纪的人是否这样想，这二者是不同的。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是危险的。它必须被尽可能精心地加以修饰。

无论如何，布里丹必须说明，一个物质性的理智应当如何才能思考像普遍概念这样的非物质之物与抽象之物。布里丹没有对此感到为难。火焰渴望着什么？渴望某一块木材，或者在普遍意义上说，渴望某种能被点燃的可燃物。当一匹干渴的马面前没有水源时，它所欲求的是什么？它想要水，想要普遍意义上的止渴之物，想要某种无法在眼前看到的東西。如果无灵魂的火与相对而言无精神的马的渴望能指向非具体之物与普遍之物，为什么人类灵魂就不能有类似的功能？结果很清楚：为了追求普遍之物，【503】并不需要任何更高级的理智或者非物质性的

道具！

布里丹偏巧是从一幅与他本身完全无关的画那里获得了他身后的名声。这幅画画的是“布里丹之驴”。当一头驴子面对两堆正好同样大小且摆放的距离与它同样远的草垛时，它应当如何决定去吃哪一堆？在布里丹那里根本没有这样一头驴子，它是在三百年之后才进入哲学讨论的。但无论如何，这与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家们有着一种松散的关联。布里丹想要解释，知性与意志彼此之间依赖程度有多深。邓·司各脱难道不是认为，意志与知性彼此只在开端处有短暂的交集？意志是有独立生命的？与之相反，布里丹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后者已经指明了，这两者互相之间到底有何种程度的关联。当一个人（不是驴子！）需要在两种以知性看来是等值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我们的意志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智完全是预先给意志规定了界限。然而布里丹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类决定支持或是反对某物的自由，既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全能的。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人世间的自由，而不是神性的自由。而且它总是被圈在那些具体的可能性之内。

所有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在布里丹那里都属于物理学。就此而言，布里丹理应被视为现代经验主义思想的先行者。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灵魂》的注疏中，布里丹谈到一些动物也拥有智力。在他的分类中，他将人类视为特殊的智慧生物，将之安排在猴子旁边！人和猴子属于一方，较低智力的动物属于另一方——对于14世纪的教会而言，并没有比这更为大胆的挑衅了。

我们不知道布里丹得以毫发无损地幸免的背后原因。1340年，当尼古拉不得不踏上他命中注定的前往阿维尼翁的旅途时，【504】布里丹却第二次成为巴黎大学的校长。1360年，他在平静与安宁中离世。他对当世和后世的影响巨大，激励了无数学生。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再没有第二位哲学家能在学术界产生他那样的影响了。

布里丹坚定不移地将哲学奠基于经验之上。此外，就像在奥特库尔的尼古拉斯那里一样，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自然是他的阻碍。像尼古拉与布里丹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再像牧师相信神启一样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在他们看来，这位希腊人不再是知识人的救世主替身。布里丹也怀疑这位古代大师的运动学说，怀疑他的观点，即认为每个运动过程都是被自然地规划好，朝向其目标运动的。像尼古拉一样，布里丹也认为，每个运动都需要一个外部的推动，即一个引发它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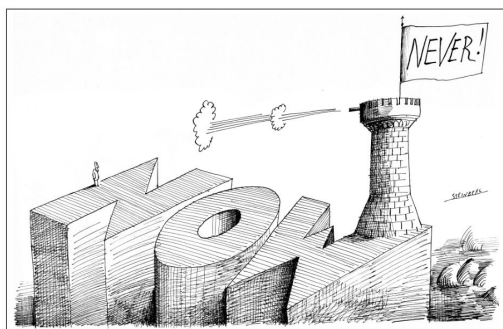
（Impetus）。因此，“不动的推动者”在很久以前推动了世界并导致了运动，这个运动在天地之间的物理学中延续下来。一个被旋转起来的陀螺，还会以仿佛自转的方式旋转很长时间。风车的车轮在风停了之后，也会继续旋转一会儿。

布里丹的新力学并不是物理学中最高的智慧。但是它为一种全新的思想做了准备，我们把这种思想与文艺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哥白尼与伽利略这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宇宙发生了更多的变化：理智成了物质性的，失去了其精神性。救赎历史在私人信仰的世界中被焚毁。自然重新回到关注的中心，超自然之物则被挤到了边缘。

所有这些都是对教会的自我认知的沉重打击，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是大变革的征兆。全新的关于天界和人类的物理学是巨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505】无论是罗吉尔·培根、奥卡姆的威廉还是约翰·布里丹，都不认为他们的自然哲学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挑战完全分离。在那个苦涩的贫穷与无耻的富有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战争与瘟疫肆虐的时代，他们想要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对于社会的批判并不是教会领导者所希望看到的，他们更愿意借助剑和锁链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许诺了现世天堂的人，是恰如其分的。而想要将世间变得更符合人性者，则生活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诸神的黄昏【506】

权力的阴暗面——统治的合法性——万物静止——被统治者的权利——
人身上的神性——新的坐标



权力的阴暗面

位于阿维尼翁的教皇行宫是一个可怖的、破旧失修的砖石建筑。游人乍看之下，这座明亮的砂岩建筑好像一座宜人的城堡耸立在这个地中海城市之上。有一句非洲谚语说道：“巨大的猴面包树倒下时，小山羊在其上攀登跳跃。”同样，每年7月，一众演员、舞者、杂耍表演者、哑剧演员和歌者在阿维尼翁艺术节上叫叫嚷嚷、唱唱跳跳地经过行宫及其周边。而近看陡立的墙面，再细窥历史，这高墙铁门却越发散发出阴暗的气息来。毫无疑问：教皇在阿维尼翁的统治时期，是基督教文化和历史上黑暗的一章。

自从1309年美男子腓力以雷霆手段将教廷迁至阿维尼翁，【507】基督教势力范围内曾经的世界统治者，就变成了法国王权的仆从。国王迫使教皇对他毫不留情地迫害圣殿骑士团一事漠视不理。这些圣殿骑士是十字军东征的最大核心力量，他们建立了一个严格组织的权力机构，坐拥大量财富，不向任何世俗统治屈膝称臣。身为放贷人，他们手中掌握着无数政要；法国国王也欠了他们一笔钱财。腓力需要五年时间与一位俯首帖耳的教皇，以便去解散骑士团，处死修道士，没收他的金银财宝。

作为回报，国王使他的教皇们能够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随意任人唯

亲。教皇克莱芒六世（Clemens VI.）将于1348年买下整座阿维尼翁城。然而，外在的愈发豪华仅是硬币的正面。与此同时，倍受屈辱的教皇在教会政治中显得前所未有地心情恶劣、处境危险且无可妥协。尽管外表金光闪闪，位于普罗旺斯的教皇权力还是感觉自己被逼到了角落里。

1324年，当奥卡姆的威廉抵达阿维尼翁时，情况正是如此。他在牛津的教务长卢特莱尔已在此等候多时，并且准备好了一份针对威廉的弹劾文书。他的这位死对头把他作品中的56条原理标注出来，斥之为异端。教皇委员会将这份谬误清单缩减至51条，认为其中29条是异端，剩下22条有争议。这些指责极具威胁，因为委员会将威廉看作伯拉纠主义者——这是一个异教徒，他让每个人都自己掌握救赎，不承认奥古斯丁的恩典学说。如果教皇的属下们视某物如烈火般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想到火刑！

教会已经公开烧死了不计其数的异教徒。但是他们却准许威廉自由出入阿维尼翁的方济各会修士集会，对他的判决拖延了多年。【508】1327年5月，当威廉在阿维尼翁已待了两年半时，另一位著名的嫌疑犯到了那里：霍赫海姆的爱克哈特，来自图林根多明我会的高级修士，广受称颂的巴黎大学大学士。现今他以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之名闻名于世。受科隆大主教的下属告发，他被迫像威廉一样到教皇面前自辩。他手上的牌也不怎么好。

1327年12月，当方济各会的领袖切塞纳的米歇尔（Michael von Cesena）来到阿维尼翁时，情况也没有好转。米歇尔是教皇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受修会创立者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 1181/1182—1226）的影响，想要带领过去百年间变得极为世俗化，并且非常富有的修会返回到它的原初状态：回到一种贫穷且俭朴的生活。修道士应该像圣徒一样过清贫的生活，是的，整个教会都应该以基督为榜样，过一种身无长物的生活。身负这一信念，米歇尔当时在阿维尼翁的豪奢宫殿中再度对此感同身受。他是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annes XXII.）传唤到此的，这位教皇因毫无节制而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敛财统治者，在摄政的18年间，他一步步上升为欧洲大陆最富有的人。这位耶稣基督的副手毫无顾忌地将所有那些认为正直的基督徒不应占有财产的人们判定为异端……

统治的合法性

威廉和迈克尔是同一个修会的弟兄，这个修会原本打算做的，是净化充斥着世俗豪奢与浮华的教会。作为没有收入的托钵修会成员，方济各会的成员应当关心乡下以及更多城市的穷人。此外他们应该过一种“圣徒般的”生活，即像耶稣及其门徒般俭朴。【509】不同于本笃会修士、卡尔特会修士和西妥教团修士，亚西西的方济各的继承人并不在一个固定的修道院里居住一生，而是作为传道者和牧师生活在城市中心，并且能在任何时候被调移到其他任何地方。

托钵修会迅疾的发迹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成功历史。在方济各会之前，多明我会就已建立。加尔默罗会也曾与方济各会服从于同一修会规定，此外奥斯定会隐修者后来也加入。但这无疑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获得的最大成功。在西欧和中欧地区，他们无所不在地照顾着街头巷尾的穷人。特别是方济各会向穷人宣告，他们的救赎即将到来。此外，多明我会还发现了独立的女性，并接纳她们，使她们聚拢到修会中。托钵修会找到了那些俭朴的人们，并把虔诚深深扎入他们心中。在兴起的中世纪城市中，他们很快就成为城市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这些勤劳的修士成为一个经济要素，在这些城市中获得地产，并将他们的教舍迁到那里。

然而，在经济上越成功，越得到认可，修会就要对教会做出越多妥协。创建不过几十年，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反抗和革命冲动就消失殆尽。他们现在反倒成了原来想要除掉的那个集团的一部分。在梵蒂冈教廷和地方教会之间的持续争斗中，托钵修会成员把自己当作教皇一派的善男信女。因为处境很好，方济各会很快停止宣传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人间。他们的乌托邦越来越四平八稳，也越来越苍白。虽然他们最初反对大学里的学术生活，但随后不久他们就向其蜂拥而去。在神学机构中周旋久了之后，【510】那些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成员也开始教授高深莫测的神学。特别是在巴黎，为了夺得教师职位，修会彼此间还产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

这一切就是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从保守的神学和“新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出发构思出伟大综合的背景。此外，他也不局限于迄今为止所谈论的那些认识论和自然哲学问题。约1260年，多明我会修士穆尔贝克的威廉（Wilhelm von Moerbeke）终于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译成了拉丁语。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现在能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人就其本性而言是 *zôon politikon*，即政治的动物。这里说的是城邦的成年公民，他感到自己对公共利益负有义务，他能参与选举，自己也能被选

举。亚里士多德还提及政治（*Politie*），即理性者的统治。所有这些内容在他的中世纪读者那里必定会导致极为不同的感受。对城市里的市民来说，这听起来是很诱人的。他们不是一直在与教会和封建君主争夺自主权吗？人们难道不应该像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公民一样，从一切“非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吗？

托马斯·阿奎那很快认识到，这是扔了一包多么危险的炸药。不需要封建君主，也不需要主教和神职人员。为了稳固地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甚至连基督教似乎也不是必需的。因为并非上帝规定了什么是正义的秩序，而是人的本性，是人作为建立国家和寻求其幸福的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政治的特性规定了这一切。

托马斯知道，要获得这一爆炸性文本的解释权，时间紧迫。在作为鉴定专家为教皇工作并撰写《神学大全》（*Summa*）期间，他还抽时间给塞浦路斯国王呈送了一份政治指南：《论君主政治》（*De regimine principum*）。【511】这一文本通常被学界视为仓促写就的即兴之作，也是经院哲学炫技弄巧的作品：尽管他通篇引用亚里士多德，但最终也不外乎是为教皇的绝对统治资格辩护。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托马斯引以为依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些章节，则被当下那些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追随者视为古希腊文化中有问题的遗产而摒弃：他引用了那些为奴隶制和奴役关系，以及为压迫妇女辩护的章节。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认为，妇女仅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必要的，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对上帝的追求。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人们应当为之奋斗一生的德性，在托马斯那里变成了我们必须接受的神之馈赠。同样的情形还适用于宇宙的神圣秩序。对人类来说，这一秩序以自然法则的形式被预先给定。作为最高的规则制定者，上帝一开始就规定了一切，制定了等级分明的结构。如果人接受这个秩序，就能生活得幸福且正确；如果不接受，就是违逆，一定会受到惩罚。

遗憾的是，完全合乎理性地实现这一永恒神圣的自然法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我们发现基督教的某些习俗规定、礼拜章程和法律条文是不合逻辑的，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循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给予我们的启示。

就如在他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中一样，托马斯也是从一种神性的秩序出发，深入到那些关于人类共同生活、法律、政治和经济等问题。最完美之物已被绝对地预先给定，关键只在于认识与实现它。上帝将每个

人安排在世界中他预先指定的位置上，如农民、手工业人、商人、君主和神职人员。【512】一切都如其所是地存在，经由神圣的自然法被规定下来。人类的“万民法”（*ius gentium*）——这是托马斯从西塞罗那里继承下来的概念——应该把这一自然法转换成公共法和私法。“市民法”（*ius civile*）是关于万民法针对各种特殊需求的具体阐释，它适用于单个共同体的法律，适用于城市或者国家。

托马斯将这些与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带领下编纂出来的罗马法联系起来。然而他的法律和正义的观念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上帝意志的表达。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托马斯不单单是一位神学家或哲学家，而是上帝的侍臣，他的精神具有高人一等的通达能力。托马斯所宣称的不是什么意见、观点或态度，而是一个逻辑推论体系，这个体系揭示了上帝隐蔽的决定。没有一位古代哲学家，甚至连柏拉图大概也不曾像托马斯和其他几位经院哲学家一般，被其同时代人视为权威。后来也没有哪一位现代哲学家获得过如此这般的世界解释权、如此这般的政治影响力，卢梭没有，康德没有，黑格尔也没有。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暂且抛开博洛尼亚野心勃勃的法律学家不论，教育是神学家的专属领域。几乎所有中小学和多数大学都是教会的机构。巴黎、牛津和其他地方的受教育者所追求的，不是为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准备的秘传的思想技艺，而是应服务于教会统治。他们所追求的应当是巩固教会的权力并将之拓展开来，应当为王公贵族建言献策，应当将教会的意见和教会的智慧传递到世俗权力中心。甚至连重大的争论，比如共相之争，在这一背景下也有了结果。“人类”是否真的存在，并非无事生非的争论。【513】因为如果“人类”“原罪”二者仅是语词，仅是语言上的约定俗成，那么“人类”究竟如何因“原罪”而堕落？我如何以哲学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这决定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意识决定存在！

因此，托马斯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所阐释的伦理、政治和法学的观念，也不只是为了对智慧的热爱。这些观念有着非常实践性的目标。相应地，这位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的结论也强硬且无情：对异教徒和犹太人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写道，受洗成为基督徒，却发誓放弃其信仰的人，应当处死。犹太人在世间的位置是永远的奴隶，没有财产，处于奴役之中。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在宣教文《论犹太政治》（*Über Judenpolitik*）中解释道，基督教掌权者应该在采取行动时不要太冷酷无情。

相形之下，一位有影响力的托马斯的同时代人圣文德（Bonaventura，1221—1274）也不遑多让。托马斯为多明我会所做的贡献，圣文德对方济各会也做了。他在奇短的时间里，把平凡的亚西西的方济各托钵修会转变为一个受到严格领导的教会统治工具，转变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集团，并使其在巴黎大学成为一股影响广泛的势力。和托马斯同时，即13世纪50年代，圣文德还在巴黎教书。然而，刚刚在巴黎争得教席的方济各会陷入了动荡。修会领导人帕尔马的约翰（Johannes von Parma）与教皇发生了争执。他认为修会预先制定行事规则的不应是罗马教廷，而是圣方济各。并且修会既不需要金钱，也不需要人手。

到底是方济各会的身份重要，还是精神—世俗的权力要求重要？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样的情形下，圣文德获得了教皇的信任。1257年，他成了约翰的继任者。圣文德立马就采取行动对付这位老领导者。教皇委员会将其同党投入监禁。约翰被打入冷宫。【514】圣文德立即写成一部圣方济各的传记，重新解释了他的一生。将来如果有人擅自谈论这位修会创立者，就要面临严酷惩罚。正如对耶稣而言，保罗是一位教条化的理论家，他把耶稣的学说引向明显的对立面，现在可怜的方济各也同样碰上了圣文德。他不该作为社会伦理学家载入史册，而是作为非政治传说中的媚俗人物。

作为哲学家，圣文德试图抵挡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影响。他的英雄是奥古斯丁、波爱修和伪狄奥尼索斯。不同于托马斯，这位方济各会的领导者认为，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绝对不相容的。不存在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亚里士多德的救世史。这倒是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新柏拉图主义中更容易找到。正如奥古斯丁要求圣文德不要在世间万物中寻找真理，而是要在自身中寻找。这对他来说也关乎“启悟”。人们不应该在自然中探索，而是应该对自己的内心敏感起来，从而对上帝敏感起来。

尽管圣文德至少和托马斯一样保守，他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凭借奥古斯丁，他唤醒了人类意志的力量，强调每个个人的个体性，神性的逻各斯之光在每一个体身上闪烁。作为牧师和教师，这位方济各会修士的理论基底是城市生活。他们与手工业者、商人和地方政治家一起，为自主掌握自己的公民权利而斗争。不同于托马斯，圣文德认为，不由选举产生的国王和诸侯，其统治是不合法的。而当尘世中教皇的权威无谓地受到怀疑时，圣文德则要求世俗当权者证明他们的合法

性.....

万物静止【515】

上帝认为什么是正义的统治？整个13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在尝试这种技艺，即把统治者和王国的兴衰解释为可探究的上帝的决定的体现。这个世界必须不断被重新注解与解释，这解释也必须适合神圣的自然法则。每一次政治变动都意味着一项进行整体解释的新工作。

毫不奇怪，像托马斯这样醉心于永恒法则的思想家，不怎么看重变化。但变化依然到来了。它们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统治者的更迭和战争，而主要是由于城市的活力。贸易和变迁锻造了城市至今仍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并质疑旧有的教会—贵族世界秩序体系，这一体系是以静止状态为基础的。

繁荣的贸易、城市的经济实力和与此相伴的强大的托钵修会，迫使经院哲学的神学家面对这一棘手的经济问题：他们如何看待私有财产？基督教最初是以“共产主义”为方向的运动。私有财产的占有应该限制在最低限度。人们挣得的财物属于团体中的大多数人。教会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世俗权力，从而同时也获得了土地和不动产。随着修建礼拜堂和大教堂的盛行，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规定，所有教会高层终身不得娶妻，这同样是为了阻止教会财产经由私人方式被继承。

一个富足的教会与富有的高层神职人员，这当然与最初要求的使徒般的生活方式极不相称。【516】这种改变并非是由于这种情况，即自5世纪以来，教会残酷迫害、消灭向往“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所有人和事。这在清洁派（Katharer）——其天主教对手如此称呼——身上发生得尤为猛烈。几乎在12世纪欧洲所有地方，都有这一信仰流派的信徒。清洁派有自己的习俗与仪式，有自己的信条。如同摩尼教和诺斯替教，他们把世界严格划分为纯洁的彼岸和堕落的此岸。他们追求涤除此岸世界的污秽，过着禁欲、素食的生活，相信转世轮回，把他们的共同体置于一切之上。此外，因为清洁派在经济方面极为成功，在整个欧洲上下，他们都受到迫害，遭到屠杀，公开遭受火刑。最终，他们最后的高地，比如普罗旺斯的蒙特塞居和加达湖畔的西尔苗内，于1244年和1276年相继覆灭。

当教会权力的阴暗一面毫不留情地对付所有异己分子，只容许如方济各会修士这样忠于教皇的、敷衍的“共产主义者”，而将其当作有用的

工具时，基督教神学家正忙于论证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所以即使假设奥古斯丁已然同意这种意见，即“共产主义”只是理想人类具有的倾向。但因为原罪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理想的人，所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被从这个世界排除出去了。自此以后，关于私有财产，不再有任何神圣法则适用，而只有人的法还适用。在这一点上，托马斯·阿奎那可能引用了罗马法的《万民法》和《市民法》，而罗马法是为人类事务而制定的。谁占有什么以及占有多少，这并非由上帝决定。邓·司各脱在这一问题上走得更远。对他来说，原罪不只使得财富的“共产主义”分享是不可能的。它还被上帝以一种新的自然法秩序代替，这就是私人财产。

在财产方面，【517】第二个需要经院哲学家集中心力钻研的问题接踵而来：事物价值几何？对于13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来说，这在神圣的自然法之中都已预先规定，没有问题。《创世记》为此给出了第一个答案。上帝最先创造的东西价值最低——空气、水、土地，如此等等。自那时起，价值日复一日上升，直至最高的善：人。以此方式，圣经为经院哲学家提供了他们寻求的东西：一种自然的等级划分和一个自然的价值体系。

然而像托马斯一样的聪明人很快就发觉，在很多对人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上，这一体系并不有效。珍珠比老鼠更有价值，就是这样，尽管上帝首先创造了海洋动物，然后创造了陆地动物。正如在权利方面，人们从价值上也必须十分准确地做出区分。世界原本的神圣秩序是什么，在人类世界中又是什么对什么有价值？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上帝的价值秩序有效，而且还有一套实践性的人类价值秩序。商品世界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有用性。

托马斯解释说，人认为他需要的东西比他不需要的东西具有更高的价值。这一创新是如此精于世故，但同样并不太有效。因为从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昂贵的珍珠和宝石相比之下显然比廉价的面包的用处要少。为什么上帝赋予珍珠比面包更高的价值呢？这个问题因此也就不了了之，没有得到回答。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事物的价值一定与上帝的价值秩序有某种关系。那么，为什么人们往往贪求像珍珠和宝石这样如此没用的废物呢？

按照托马斯的观点，上帝不曾赋予内在价值的唯一东西就是金钱。在他看来，金钱是人造物，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写到过的，金钱是由于其有用性的缘故而被发明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托马斯也赞同各国君主的实践，即任意地铸造以及重铸钱币。【518】因此，世俗权贵与宗教

统治者别无二致地一再减少钱币中的金、银含量，却不改变其币值。贵金属没有流进钱币生产中，而是进入了装饰和装潢中，装饰了修道院和教堂。

对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来说，钱币总归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易货贸易比金钱经济更重要。人们通常把某个商品的金额简单记在账上，随后在其他方面做出补偿。辅助工具多是树木的心材。债权人和债务人用符号把债务记在一块木头上，然后沿长边劈开木头。这样负债的人就有“某物被记在在符木上”。当偿还债务时，人们就拿着木头拼在一起，检查确保没有人做过改动。相反，金钱经济经常被饱受质疑地反复打量。它主要被使用在商人和大商贩的圈子里。不同于阿拉伯世界，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商人长时间以来名声都不太好。中世纪的英雄不是什么远游的商贩，如航海家辛巴达，而是尊贵的骑士，他们彬彬有礼，有着高贵的教养，身怀勇敢的英雄之气，但遗憾的是，好像现实中几乎从未诞生过这样的人。

不管这时商品是否凭金钱支付，无论如何，中世纪学者一定是为此事挠破了头，即什么是一件商品公道的价格？对邓·司各脱来说，买一件物品应该大约跟生产它花费得一样多。必要时，商品会卖得贵一些或便宜些，邓·司各脱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以此，他背离了中世纪的秩序结构，托马斯曾为经济规定了这个结构，就像为其他所有事规定的那样。灵活变动的价格在托马斯看来是一件可恶的事。手工业行会也这么认为。他们坚持，所有的价格都是固定价格。如果上帝和有用性决定了事物的价值，那么价格变化就是不允许的。【519】因为上帝不会改变他的估价，什么是有用的，就一直是有益的。

偏离这一理想轨道的人会因为从事“高利贷”而变得可疑——这是一项严重的罪状。商品在市场上供应之前，人们不会买任何东西。人们出售商品也不盈利、不涨价，而是仅以收购价卖出。而且也没有贸易垄断。早在奥古斯丁那里，盈利、涨价和贸易垄断就与公共利益相矛盾。按照这一理想，中世纪经济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马格尼西亚的经济一样静止不动。从城里的手工业者数目到培训学徒，一切都有规制。人们的需求应该以这一方式得到最好的满足，但不应被唤醒。

但是，现实则常常与理想产生矛盾。尽管基督教会与阿拉伯人一样，官方都谴责了利息，但整个中世纪是因利息而繁荣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把钱生钱看作不道德的、非自然的。但实际上，意大利北方的城市，特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早在12世纪就

用大量金钱谋取利益。各国的君主在意大利为他们的军事行动筹款，或者在犹太人那里借钱。对于犹太人，从事手工业是被禁止的，相反收取利息是被允许的。中世纪经济对犹太人显示出双重标准。对各国君主来说，身为放贷人的犹太人是很有用的，但同时，人们又因此瞧不起他们。对犹太人的搜捕、屠杀在中世纪是黑暗的日常，而且，王室债务人也能因此从其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

从事物的固有价值，到公道的价格、适当的报酬和对“高利贷”的禁止，这一经济秩序的确立和坍塌都伴随着如下观念：上帝先行规定了这些规则。然而，如果人们怀疑这个先行给定的东西，又会如何呢？

被统治者的权利【520】

当切塞纳的米歇尔和奥卡姆的威廉在阿维尼翁的教皇面前为自己辩护时，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去世50多年了。这期间，中世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些欺世盗名的阿维尼翁教皇不再能与他们并未完全基督教化的罗马和维泰博先辈们相提并论。作为中世纪思想家心目中的“共相”，神圣罗马帝国在此期间分崩离析了。就如托马斯在13世纪曾解释的，这个世界坚定不移地按照上帝的法则被构想和被塑造，但几乎承受不住经验的冲击，因为一切都在持续不断地变化。

在哲学中，如前所述，也有三大新思潮发展起来，自此以后，其活力就再也没有停息。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创造了“先验哲学”，这个观念即是说，所有存在只存在于意识之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意识中经验到上帝，那么甚至上帝也不存在。在上帝和人之间，作为中介的教会权力几乎没有空间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唯心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哲学。拉蒙·鲁尔（Ramon Llull）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即把概念之间的关系数学化。此前神职人员依照其基督教偏好对世界做出合理解释的地方，现在应有独立且精确的唯一的逻辑来统辖——后来这一思想启发了莱布尼茨。一个逻辑—经验的纲领就由诸如威廉、尼古拉和布里丹等一批思想家启动了，这一纲领将所有思辨的内容排除在哲学之外。到了20世纪初，这一纲领被称为“牛津哲学”，并彻底变革了哲学。

所有这些思想变革也改变了思想家与政治的关系。【521】教会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在米歇尔和威廉看来，这一古老的、早已千疮百孔的秩序急需修正。然而，期盼中教皇的发言并未到来。米歇尔在此期间锒铛入狱。威廉则极力支持他的修会领导人及其社会和政治观点。他们从

这件事里全身而退的最后机会就是逃跑。1328年5月26日，米歇尔、威廉与另外两位同伴从阿维尼翁逃到了海边，乘船去了比萨。在那儿等候他们的，正是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Ludwig IV. der Bayer）。一周之前，路易四世已在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一位他自己挑选、任命的教皇来加冕。

自从约翰二十二世几年前采取反对国王的姿态，并开除了路易四世的教籍，他就成了路易四世的死敌。新皇帝认识到，要让教皇的统治资格陷入世人的怀疑，并露出非基督教的真面目，教会中的“向往清贫运动”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在这样的处境下，米歇尔和威廉这样的关键人物恰逢其时地来到他身边。对他来说，方济各会就是直指教会高层世俗统治资格的一支利矛。

米歇尔和威廉动身前往慕尼黑路易四世的宫廷。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von Padua，约1280—1342/43）。他也是三年前从阿维尼翁的刽子手手中逃出来投奔路易的。他的思想比米歇尔和威廉还要激进。马西略来自帕多瓦——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大学之城和贸易之城。1312年，他成为巴黎博雅院的校长，他在那里悉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他的《政治学》。马西略从这些文本中得出的结论，比托马斯·阿奎那得出的远为丰富广泛。

在他的著作《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马西略彻底否定了教皇的统治。毫不奇怪，这本于1324年问世的书，引起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不满。他称这本书为诸异端邪说之中无以复加的顶点。

【522】马西略不仅把这部作品献给了教皇的死敌路易四世，他还想设立高于所有统治者的法律！在马西略看来，统治唯一合法的理由是，通过正义的法律为人们提供保护。其他一切都是不正义。为了权力、土地和信仰引发战争，这根本就是最大的不正义。

马西略对路易四世影响很大。他应该作为顾问参与了路易四世在罗马的皇帝加冕仪式。路易发动政变，宣布教皇为异端，并宣布废黜之，马西略也暗中插手了此事。然而当米歇尔和威廉来到慕尼黑后，他的重要性似乎削弱了。现在国王对这两位宫廷新贵更有兴趣。教皇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地将威廉开除了教籍。米歇尔催促召开一个宗教会议，它应该澄清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教皇的权力资格，还有关于清贫和富有的问题。然而教皇不想开宗教会议，他想要新的盟友。他找到一位新的修会领导者，这位领导者取代了米歇尔的领导地位。在随后的时间里，米歇尔和教皇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指责对方为异端。同时，威

廉满怀热情地忙于发展一门服务于国家和教会的新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的意图首先在于：把人们从不正义的统治者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并促进公共利益。

圣文德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威廉对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这是方济各会的良好传统。然而如果质疑教皇的合法性，他就偏离了自圣文德以来就惯用的方济各会的理想轨道。但对威廉来说，不再有什么如教皇统治之类的永恒常量，有的只是函数值。如前所示，威廉猜想，人类思想的规则和世界的规则不是一一对应的。我们通过抽象概念所阐明的东西，不是神圣的世界建筑，【523】而是我们的精神造就的纯粹语言的观念，无非如此。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上帝绝不是以语词来意指世界的。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类理性的权利显然将被剥夺。逻辑学家不再是借助上帝的帮助，由精神推断现实，而是一直囚困于自身之中。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在法律、国家或经济这些方面浇铸、固定下来的一切，又都重新流动起来。现在人们能够以此来构建不一样的东西。唯一的法律（*das Recht*）、国家（*den Staat*）、经济（*die Wirtschaft*）不再存在。中世纪的人们曾相信（今天也有很多人这样相信），他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威廉认为，每种国家制度都要从个体的人及其需求出发，而非从共相出发。这个问题对威廉而言，和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芝诺那里是一样的：国家及其法律与经济对人们来说，是有益的且有促进作用的吗？有益于公共利益的东西，就是合法的。如果它对此无益，就是不合法的，必须被改变。

出于其慕尼黑流亡者的身份，威廉想要所有统治者尽义务，去推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策。谁违背了这一点，就会丧失统治资格。统治者为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为了统治者而存在。没有人有义务服从一位专制者。

在最后一点上，甚至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威廉有道理。然而，接下来的一条推论一定会令他大吃一惊并退避三舍。这条推论就是：适用于世俗统治者的东西，也应该适用于精神统治者。教皇也要对信徒有益，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威廉写道，所有基督徒就成了他的奴隶。无条件的教皇统治，现在变成了有条件的教皇统治：一个若滥用则可被撤销的权力机构！【524】考虑到威廉实际上把他那个时代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全部视为异端，因此这些言论是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与切塞纳的迈克尔不同，他认为教皇的统治几乎无法从内到外进行改革。相

反，他将一场群众运动置于教会力量之上。应该对教皇做出评价的人不是官员和专家，而是千千万万信仰基督教的普通教徒。

威廉革命性的建议没有丝毫机会得以实施。还有谁会做这样的事？米歇尔死于1342年，威廉死于五年之后，他们要以信仰基督的形式革新教会，但这一尝试没有得到圆满完成。然而这一强有力的思想已经存在于世上了，即世上不存在一个规定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先行给定的秩序。这种思想不仅可以在威廉身上找到，还可以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找到，他的思想和禀性与持怀疑态度的方济各修士几乎没有区别。这就是爱克哈特大师。

人身上的神性

他本可能成为某个大人物——修会里的高官要员，即使不是教会里的高官要员，也差不了多少。然而霍赫海姆的爱克哈特决定，与其忠于他的事业，不如忠于他的思想。这给他带来了一场悲剧，但同时哲学史中赋予了他的一个尊贵地位。

这位来自哥达郊区的年轻人天资过人。1275年，15岁的他成为多明我会修士。他在科隆大阿尔伯特的高等学校求学，1293年前往巴黎。33岁时，他达到了在大学教学的法定年龄。一年后他回到图林根，成了埃尔福特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525】图林根修会的大主持正是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他认识到年轻的爱克哈特的天赋，让他做了自己的副手。一次热烈的思想交流，也许是一段友谊，确定了两人彼此间的关系。

然而爱克哈特回到了巴黎。1302年，他获得神学大学士学位，从此时开始，他就是“爱克哈特大师”了。一年后，他成了德国中部和北部的多明我会大主持。从这时起，他接任了德语区各种修会领导职位。1311年，他获得了多明我学者的最高嘉奖。他可以再次去巴黎的大学讲课了。随后，在1323/24年再次回到科隆之前，他大概主要是在斯特拉斯堡停留。

他在刚过60岁时回到了科隆的修士们之中，此时的爱克哈特身为神学家和教会政治家，正值威望顶峰。然而这次回到他学习的场所，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两位名声不佳的修士在大主教那里让爱克哈特声名扫地，还指控他是异端。大主教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宗教首脑。他强拉硬拽把机敏的爱克哈特送至宗教法庭。百余条罪状加诸其身。尽管北德

和中德教区的副主教拔刀相助，宣称大主教在爱克哈特的案子中并无职权，但这件事也并没彻底结束。爱克哈特让人宣读一份声明，其中他笼统地宣示，他没有任何异端邪说的思想。他身陷困境，最后于1327年向教皇求助——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这位基督的代言人就是那位阴暗的约翰二十二世，他已经把奥卡姆的威廉传召到身边。爱克哈特和他的副主教以及另两位支持者一同踏上了从科隆到阿维尼翁长达900公里的路程。在那儿人们会怎样指责他呢？是什么使他那样一位学识渊博的聪明人物，在敌人眼中如此危险呢？

乍看之下，爱克哈特的思想好像不是特别危险。【526】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研究认识论问题以及为圣经作注。他计划的巨著《三部集》（*Opus tripartitum*）一直没有完成。爱克哈特想要准确地探明，人类灵魂和神性领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不同于许多同时代的关键人物，他不想把哲学与神学分开。爱克哈特不是像奥卡姆的威廉一样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不想把神学从他的逻辑界限内排除，并将其归结为“直觉”。爱克哈特的出发点要更传统得多，这一点在教会眼中也是不太具革命性的。

但作为同时代人中的敏锐者，爱克哈特在面对所有幼稚的神学思想时也感到了不快。古老的东方的关于造物主的历史，即造物主从虚空中创造出世界和人，然后把亚当的罪作为原罪保留下来，按自己的判断拯救这个或者那个人，这在爱克哈特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就像在邓·司各脱或者奥卡姆的威廉那里一样。和很多别的人一样，爱克哈特认为关于宇宙、尘世和人的问题，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较为明智的解答。所以他要竭力要让圣经中的上帝摆脱作为一个“人”的形态。这个创造一切、贯穿一切、照亮一切者，不可能是一个人。它甚至也不是什么存在物。

像普罗提诺和他的学生一样，爱克哈特把“太一”视作某种纯粹的球形之物，正如“神圣之物”。就像伪狄奥尼索斯那样，他认为这个神圣之物不具备任何特性。因为太一总比智慧的、有效的、正义的等描述包含更多的内涵。根据定义，这个无限超越于人类精神的东西，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词来描述的：“永恒神性之不可见的光芒中那隐藏的黑暗是不可认识的，也将永远无法被认识。”^[157]

这就不是特别符合基督教的方式。【527】所以爱克哈特努力要把这一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的观念和基督教的上帝结合起来。这样，他就让这位三重意义的基督教创世神从“神圣之物”下降到更低一层，移居到世界舞台上。上帝在此看起来像一个较低的存在形式，一种神圣之物的人

格化授权。虽然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实用基准点，但是谁完成了他的信仰，他就穿透了信仰向神圣之物靠近。

因此，对爱克哈特来说，上帝不是像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所指的那种“无与伦比的东西”。提到上帝时，爱克哈特总是联想到作为更伟大东西的神圣之物。除此之外，爱克哈特的神圣世界秩序完全放弃了《创世记》中的创世行动。毋宁说，神圣世界秩序与《约翰福音》有关，并向中世纪读者呈现为纯粹的新柏拉图主义。“太初有言”——对爱克哈特来说意味着：理念作为“原型”从神圣之物那里涌出，带着神性的智慧渗透宇宙。在神性智慧的协助下，上帝在尘世展开。他一直不间断地这样做，甚至不只像在《创世记》中那样只有一次。与新柏拉图主义一样，在爱克哈特看来，世界彻彻底底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只是第二位的、价值较低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爱克哈特的导师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参与进来。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迪特里希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对爱克哈特产生了影响。但我们知道，如果爱克哈特把神性的理智置于一切之上，也置于“存在”之上，那他就和迪特里希想的一样。上帝是纯粹的理智性，此外别无其他。上帝不存在，不像石头或者行星那样存在。上帝并不在世界之中，而是世界这个东西别无选择地贯穿着上帝。同样的事也在某些不完满的方面适用于人的理智。它不是世界中的事物之一，而是在其思想中独立地充斥了这个世界。

像阿维森纳、托马斯和迪特里希一样，在爱克哈特看来，【528】人的理智是神圣的源头。然而，包括迪特里希在内，没有一位中世纪思想家像爱克哈特这样，把人推到如此接近上帝之处——这一观念后来极大地影响了青年黑格尔。爱克哈特在每个人类灵魂中为上帝保留了一个固定居所，即“灵魂深处”。这个灵魂深处是人类最原本的东西。它并非由上帝创造，却是永远神圣的。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层，寂静如海洋中最深的深渊，上帝的微光在我们身上闪耀。然而这个最深的点同时也是最高点。这里有我们内心的天堂，我们在这里完全与自身相伴，从所有渴望、意念和担忧中获得解放。如果我们想要靠近上帝，那么我们必须开启前往我们的中心的旅程。我们必须沉浸在自身之中，专注于自身。

一切存在皆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在这个理念上，爱克哈特继承了导师迪特里希。但这时他踏上了另一条道路。在迪特里希这位穿着形而上学家外衣的物理学家看来，正是精确的观察和严格的逻辑思考带领人们走向自身。但相反，在爱克哈特看来，存在着无需中介的终极认识和

自我认识。因而他与柏拉图一致，相信我们的感官根本不会认识新事物，而我们的灵魂认识某物时，它是在回忆此前所见过的东西。我们的内感官处理这种再回忆，我们的知性做出判断。而到达我们自身的最后一条通路是，运用理性和沉浸于我们的灵魂深处这两种不可分离的手段的相互作用。通过彻底转向我们自身，爱克哈特这样写道，我们“孕育出”上帝。探明自己的灵魂深处并和它完全融为一体，这是所有人的神性——自然的目标。基督所完成的也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称他为“圣子”。

最大程度也就是到这里，教会就应该失去了兴致。因为在爱克哈特看来，耶稣并不从根本上比我们每一个人更神圣。【529】在我们把握灵魂深处并据此生活这一层面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神圣的。基督教无与伦比的核心特质就在于，它把耶稣尊为上帝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一宗教而言，爱克哈特的观点是很糟糕的。他在最真实的词义上把圣子民主化了。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变得像基督一样神圣。普通人在爱克哈特这里至少和神职人员一样。他不仅用拉丁语写文章，还用德语写，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他是其中一个。他还用大量优美的词汇和专业概念丰富了德意志的语言。

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像基督一样神圣吗？爱克哈特是相信这一点的。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广博的学问，也不需要宗教式的幻视或幻听。人们只需要学习成为一个“生活的主人”，而非成为“阅读的主人”。人们必须像斯多亚主义者一样，控制自己的欲念，克服自己错误的渴望。人们必须在灵魂深处的“与世隔绝”中生活，而不是在生活的表面丢失自我。一个孕育出上帝的人也不指望上天国，不渴望在天堂得到酬赏。如果上帝的临近早就在他身上存在并闪耀，他还要在那里有什么大的期待呢？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彼岸不是目标。相反，他生活着，于人有益，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且“泰然自若”——爱克哈特用这个词丰富了德语语言。

最大程度在这一点上，他肯定原本就很清楚，他将遭遇巨大的怒火。他大概并非没有缘由地在他的《三部集》引言中写道，他所思考的很多东西乍看之下一定显得令人愤慨。确实也是这样。爱克哈特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些头脑简单的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应该这样看待上帝，即上帝在那头，他们在这头。而对上帝而言不是这样的。上帝和我，我们是同一的。”^[158]【530】主教和教士谈到上帝时就像谈到一个人、一个施恩行罚的暴君，这些人如果不是“头脑简单的人”，那还有谁呢？爱克哈特的思想使他远离教会。不存在原罪！不存在信徒在天堂中获得酬赏！相反，存在的只是通过理性运用和专注获得的自我报答。千千万万

的信徒，他们“泰然自若”，并且相信，完全无需教会就能变得神圣。这难道不是每一个教会权力和影响之结束的开端吗？

新的坐标

我们不知道，爱克哈特认为用他的思想去鼓舞所有阶层的人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可行的。无论如何，找不到任何文字能够详细解释一个农民、手工业者或主教应该如何把他的职业生涯同这样一种苛求的“泰然自若”联系起来。在像奥卡姆的威廉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看来，爱克哈特的精神纲领对群众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完全的胡思乱想。爱克哈特对他思想的政治后果有多深的思考，这件事非常模糊。当然他没有去挑动任何争论，但是争论找上了他。当他在科隆由于声名狼藉的修会教友的阴谋而论为牺牲品时，阿维尼翁教廷应该很快认识到，有哪些对教廷而言不祥的思想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教皇的手下找到28条言论，他们不想让这些言论逍遥法外。爱克哈特再次为自己辩护，他并没有蓄谋作恶。一个不想作恶的人，也不会作恶——这是他深信不疑的事。然而教皇委员会对这些信念伦理上的思考不感兴趣。当爱克哈特在阿维尼翁的多明我成员大会上焦躁不安地等待时，起诉人却无暇于此。他们毕竟还有对奥卡姆的威廉的诉讼要忙。

【531】比起一个多明我会修士想要把人性引诱到一种纯粹精神的生活的异端邪说，方济各会围绕切塞纳的米歇尔的争论在政治上远远更具爆炸性。爱克哈特快70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他一如既往地否认他的每一条罪行，但他被吓到了，他承认，人们有可能误解了他。在候审过程中，他去世了。他没有经历1329年5月的判决。教皇宣布，爱克哈特受到了魔鬼的引诱，但是撤销了他的学说。这28条命题被判为异端邪说或疑似异端邪说。

教会在中德和北德各处宣布了对爱克哈特学术论点的判决。没有一部作品允许得到保留，哪怕它只含有这些论点中的一条。特别是德语作品遭到谴责。教皇对失去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权力感到深切担忧。然而爱克哈特的追随者人数众多。他们保护着他的遗产，匿名印刷他的著作。这位逝去的学者是一位殉道者、一位民族英雄。认为普通教众和教会高层平等这一理念，经由对爱克哈特的审判将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政治运动。人们批评教会首脑的奢华、炫耀和傲慢，对宗教法庭破口大骂。人们努力像爱克哈特一样，通过母语作品为身边的普通人启蒙。

教士自觉地发现了母语，这对无限的教会权力来说，无疑是一次破坏。拉蒙·鲁尔已经用加泰罗尼亚语撰写了很多作品。在意大利，哲学家及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约1265—1321）勾勒出一幅哲学—文学的时代风俗画，即《喜剧》（*Commedia*），他的仰慕者薄伽丘（Boccaccio）认为这部作品如此伟大，以至于称它为《神曲》（*Göttliche Komödie*）。但丁写下充满诗意的意大利语，讲述了他游历地狱、天堂和炼狱的奇遇。【532】这部作品在文学上是一个轰动事件，让它的作者声名大噪。他的哲学思考也包含其中。身受家乡佛罗伦萨的命运之苦，但丁卷入了政治。这个富有的商人之城是教皇和皇帝的必争之地。但丁反对这位朝他家乡伸手要钱的教皇。他写下了《论君主制》（*Monarchia*）。在他看来，只有遥远的罗马—德意志皇帝是由上帝任命统治世界的，而非眼前的这位教皇。

但丁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放贷人的儿子。在意大利北部那些日益繁荣的城市里，城市贵族和信贷行业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这些城市中新兴的、以贸易为基础的富裕状况被证明是对教皇统治危险的对手。在打破中世纪权力结构的诸多原因中，这种富裕状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金钱冷酷的理性中，逐渐产生了对于同样冷酷的教皇权力来说更为强大的对手。就这一点来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中世纪产生了最深的断裂。对于这些商业之城中的生活来说，博洛尼亚的律师比神学家要更重要。

其中一位律师就是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他出生于阿雷佐。按照出身，他处于但丁的对立面，因为他的父亲属于那些站在教皇一边的佛罗伦萨人。他以怀疑的态度与全新的商人时代精神相对立。他也不属于理性主义者，后者在英格兰，在巴黎，也在意大利，剖析教会的学说，并使其失效。他们一路凯歌。作为与像奥卡姆的威廉和奥特库尔的尼古拉这样的人的同时代人，彼得拉克并不欣赏他们清醒的洞察力。反而他为内心塑造的丧失而哀叹，在他看来，这种丧失是与冰冷的新式哲学一道而来的。“为什么，”他叹息道，“你们在响亮的词汇前过早衰老，而忘记了事物呢？”^[159]

彼得拉克并不想取消逻辑学。【533】但他不认为逻辑学是唯一正确的认识方式。据他认为，某人要是20岁时不研究逻辑学，那是不理智的。但是谁要是40岁时还主要研究逻辑学，那么他也是不理智的。在彼得拉克看来，真正的知识不在于概念和联系，真正的知识是自我经验和世界经验。人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变得智慧，而非通过概念技艺。他相

信，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能看到一种相似的态度。但这位律师兼哲学家并非教会学说的辩护者。他把西塞罗、塞涅卡和柏拉图看作和奥古斯丁处于同等地位。他甚至在亚里士多德冷静的伦理学中找到了生活智慧。所以人们宣称彼得拉克为人文主义之父，人文主义是一种思想态度，它主要关心一点：人格的自由发展。按照这个理想，“人文主义”是一种不带任何偏见、教条或意识形态的态度，它在生活中以及在得到小心呵护的古代文献中寻找智慧。

在这个时代，像彼得拉克的朋友乔万尼·德丹第（Giovanni de Dondi）这样的意大利设计师造出了第一个机械表，并很快把它挂到教堂的高塔上，这一精神态度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难道是偶然吗？当对外部世界的测量蓬勃发展时，对内在本性的新探索也开始了。测量世界的著名人物之一就是来自诺曼底的尼科尔·奥雷斯姆（Nikolaus von Oresme，1330之前——1383）。作为教会成员，他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最后成了利雪（Lisieux）的主教。另外，他还做过法兰西国王的顾问。他把亚里士多德翻译成法语，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尼科尔在中世纪首次完全以机械的方式解释宇宙。他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和反过来是一样可信的。他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坐标系。由此开始，每一质变都能定量地用数量来描摹。【534】以同样理性的眼光，他写了一本书，反对诸侯的这一恶习，即通过重新铸币让货币增值或贬值。他对宫廷的影响让他成为历代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但是人文主义肯定不只是对精确测量的美好新世界的反作用。很多人道灾难也产生了影响。14世纪中期，西方历史上极具毁灭性的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黑死病”无所不在，它把每个个体一生的困苦戏剧性地拉到眼前。突然间，经院哲学家的概念殿堂是如此遥远！这场瘟疫让人们产生怀疑。在教会高层看来，它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人们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太多怀疑；在批评者看来，它是一个征兆，表明某些东西可能同教会奇妙非凡的神圣世界秩序不相符。

这一世界秩序实际上瓦解了。中世纪的世界观破碎了。从经济方面来看，成功的贸易城市越来越追求独立和自由，它们展示出颠覆的力量。从一种建立在永恒静止之上的经济中，产生了一个贸易和变迁的有活力的世界。供给经济逐渐演变为货币经济，它不了解，也不接受任何自然的界限。物理学的世界观和这种发展并行变化。自然和万物也进入运动之中。它们离开自己熟悉的轨道，此时也不再像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那样按照理想计划“达到目的”。伴随着自由贸易，这个神圣世界法则

的坚固逻辑消解了。“意志”突然重新出现在这里，摆布人和人的命运。这个人不仅是“人类”的一个单个样本，还是个体化且私人化的。在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和爱克哈特大师的思想中，甚至“自在之物”的客观性也被推到了边缘。【535】突然之间处于中心的不再是这个世界，而是世界中人的意识。

所有这些发展不是像一块大毛毯一样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但它们至少部分是互相纠缠的。它们意味着教会统治在西方的终结。这也许听起来如此令人惊讶：正是教堂尖塔上新挂的钟敲响，宣告了这一终结。哲学也作为神学以外的独立学科从隆隆的钟声产生。哲学重新被接受为某种属我的东西。此外，哲学是否得多于失，这说起来绝不那么简单。因为它在自由和独立上获得了多少，同时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就失去了多少。从今往后只有少数哲学家能像托马斯·阿奎那、奥卡姆的威廉、帕多瓦的马西略或尼科尔·奥雷斯姆一样，在统治者眼中再度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但是，哲学家总归是站在这些人物的肩膀上，为建立那个人们称之为“现代”的世界时代做出了贡献.....

附录

注释

1.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314d–315b。
2. 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en*），I，74。
3.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oxa*），I，23–24。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k*），1259a。
5. 汉斯·沃尔施莱格：《在这个远离精神的时代》（*In diese geistfernen Zeiten*, Diogenes, 1988），21页。
6.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Theaitētos*），174a。
7.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983b20f。
8.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Über die Seele*），411a8f。
9.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05a19f。
10. 辛普里丘：《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评注》（*Simplicius zu Aristoteles Physik*），24，13ff。
11. 普鲁塔克：《道德论丛》（*Moralische Schriften*），947f。
12. 埃提乌斯，I. 3，4。
1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1b。
14. 菲洛劳斯，9，残篇4。
15. 菲洛劳斯，12，残篇11。
16. 赫拉克利特，残篇121。
17. 赫拉克利特，残篇89。
18. 赫拉克利特，残篇32。
19. 赫拉克利特，残篇114。
20. 赫拉克利特，残篇114。
21. 赫拉克利特，80。
22. 赫拉克利特，残篇53。

23. 赫拉克利特，残篇126。
24. 赫拉克利特，残篇8。
25. 赫拉克利特，残篇88。
26. 赫拉克利特，残篇63–66；亦见希坡律陀，IX，10。
27. 赫拉克利特，残篇114。
28. 赫拉克利特，残篇94。
29. 赫拉克利特，残篇90。
30. 巴门尼德，1，残篇1。
31. 赫拉克利特，86，残篇115。
32. 赫拉克利特，84，残篇45。
33. 赫拉克利特，80，残篇27。
34. 阿那克西曼德，12 A 29。
35. 阿那克西美尼，13 B 2。
36. 阿那克西美尼，13 B 2。
37. 恩培多克勒，59，残篇78。
38. 恩培多克勒，197，残篇130。
39. 恩培多克勒，196，残篇128。
40. 恩培多克勒，194，残篇138；196，残篇128。
41. 恩培多克勒，192，残篇136。
42. 恩培多克勒，193，残篇137。
43. 恩培多克勒，19，残篇8。
44. 恩培多克勒，35，残篇22。
45. 恩培多克勒，44，残篇35。
46. 恩培多克勒，50，残篇27。
47. 恩培多克勒，31 A 72。
48. 恩培多克勒，95，残篇60；94，残篇57。
49. 恩培多克勒，181，残篇117。

50. 恩培多克勒，152，残篇107。
51. 恩培多克勒，148，残篇105。
52. 恩培多克勒，167，残篇110。
53. 恩培多克勒，165，残篇102。
54. 恩培多克勒，172，残篇115。
55. 恩培多克勒，183，残篇127。
56. 恩培多克勒，184，残篇146。
57. 柏拉图：《蒂迈欧篇》（*Timaios*），89b。
58. 提奥弗拉斯特：《论知觉》（*Von den Sinneswahrnehmungen*），25。
59. 埃提乌斯，IV，2。
60. 阿那克萨戈拉，101/102，残篇21。
61. 阿那克萨戈拉，24，残篇17。
62. 阿那克萨戈拉，55，残篇12。
63. 阿那克萨戈拉，66，残篇12，节录。
64.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构造》（*Von den Teilen der Tiere*），IV，10，687a 7 ff。
65.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Erinnerungen an Sokrates*），I. 1，10。
66.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1e-f。
67. 色诺芬尼，43，残篇。
68. 色诺芬尼，22，残篇11-25，残篇15。
6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6a。
70. 普罗泰戈拉，18，残篇4。
71. 柏拉图：《第七封信》（*Siebenter Brief*），325d-e。
72. 柏拉图，《斐多篇》（*Phaedon*），78a。
73. 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473e-d。

74. 柏拉图：《第七封信》，326a–b。
75. 柏拉图：《法律篇》（*Nomoi*），IV，705a。
76. 柏拉图：《法律篇》，587e。
77. 柏拉图：《第七封信》，326b。
78. 塞斯·诺特博姆：《无中生有：双城史》（*Ex nihilo. Eine Geschichte von zwei Städten*, Lars Müller Verlag，2012），22页。
79. 柏拉图：《理想国》，556a。
80. 柏拉图：《理想国》，556b。
81. 柏拉图：《法律篇》，741e–742a。
82. 柏拉图：《法律篇》，896a。
83. 盖伦：《论希波克拉底的元素》（*Von den Elementen nach Hippokrates*），I，2。
84. 德谟克利特，116，残篇10。
85. 德谟克利特，117，残篇11。
86. 柏拉图：《蒂迈欧篇》，90a。
8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1096a 11–17。
8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45b 2–7。
8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引论，II. A。
90. 赫拉克利特，102，残篇82；103，残篇83。
91.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690a 27。
92.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构造》（*Von den Teilen der Tiere*），687a 8–10。
9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b。
9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 30。
9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b。
9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9b。
9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2a。

9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0a。
9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2b 22–23。
100.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3a 6–10。
10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0b 33。
10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7a 39–41。
10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8b 2–3。
10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8b 34–35。
10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b。
106. 西塞罗：《学园派》（*Academica priora*），II，72。
107.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学家》（*Adv. Math.*），11.19–20。
108. 普鲁塔克：《驳克洛特姆》（*Adv. Colotem*），1120C，1121E–1122A。
109. 西塞罗：《论命运》（*De finibus*），2.2。
110.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驳数学家》，7.1，58。
111. 普鲁塔克：《驳克洛特姆》，1120C，1121E–1122A。
112. 卢克莱修：I. 958–997。
113. 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的信》（*Brief an Herodot*），63–67。
114. 西塞罗：《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I. 43–49。
115. 伊壁鸠鲁：《论自然》，（*De natura*）34. 21–22。
116. 伊壁鸠鲁：《准则学》（*Sent. Vat.*），40。
117. 西塞罗：《论命运》，I. 29–32。
118. 伊壁鸠鲁：《致美诺伊克乌斯的信》（*Brief an Menoikeus*），127–132。
119. 伊壁鸠鲁：《致美诺伊克乌斯的信》（*Brief an Menoikeus*），124–127。
120. 伊壁鸠鲁：《致美诺伊克乌斯的信》（*Brief an Menoikeus*），127–132。
121. 埃提乌斯，4.21. i–4。

122. 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度》（*Lactantius, Divinae institutiones*），7. 23。
123. 辛普里丘：《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评注》（*In Arist. Phys.*），886，12-16。
124. 奥利金：《反塞尔索》（*Contra Celsum*），4.68，5.20。
125. 西塞罗：《图斯库勒论辩集》（*Tusculanae disputationes*），4.29，34-35。
126. 盖伦：《论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学说》（*De plac.Hippocr. et Plat.*），5.2.3-7。
127. 参见斯托布斯（*Stobaeus*），2.90,19-91,9。
128. 第欧根尼·拉尔修：7.32-33。
129. 第欧根尼·拉尔修：7.32-33。
130. 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幸运与德性》（*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6，329A-B。
131. 爱比克泰德：《讨论集》（*Dissert.*），2.10.1-12。
132. 西塞罗：《论神性》，2，160。
133. 《埃涅阿斯纪》（*Aeneis*），VI，853ff。
134. PG 276f（早期斯多亚学派残篇，III，371）。
135. 卢克莱修：《物性论》（*Über die Natur der Dinge*），V，834-836。
136. 塞涅卡：《书信集》（*Briefe*），90, 8。
137.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VII. 17。
138.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VIII. 50。
139.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IV. 3。
140.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V. 16。
141.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IX. 29。
142.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76B；《法律篇》，500C。
143. 普鲁塔克：《论食肉》（*Vom Fleisshessen*），引自海克·巴兰茨

克、弗兰茨·特奥·戈特瓦尔德与汉斯·维尔纳·因根西普：《生—杀—食：人类学维度》（Heike Baranzke, Franz-Theo Gottwald und Hans Werner Ingensiep: *Leben–Töten–Essen. Anthropologische Dimensionen*, Hirzel, 2000），138页。

144. 普罗提诺，IV. 3. 27. 143–144。
145. 《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XVI, 1, 2。
146. 《弗拉维奥的证据》（*Testimonium Flavianum*），第18卷，63–64。
147. 这方面的经典作品有莱昂·费斯汀格、亨利·W.里肯与斯坦利·沙赫特：《当预言失算》（Leon Festinger, Henry W. Riecken und Stanley Schachter: *When Prophecy Fai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148. 奥古斯丁：《忏悔录》（*Bekenntnisse*，Reclam, 1977），217页。
149. 奥古斯丁：《忏悔录》（*Bekenntnisse*，Reclam, 1977），227页及以下。
150. 奥古斯丁：《忏悔录》（*Bekenntnisse*，Reclam, 1977），331页。
151. 奥古斯丁：《忏悔录》（*Bekenntnisse*，Reclam, 1977），340页。
15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XI，26。
153.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IV，4。
154. 引自约瑟夫·拉普（Josef Lappe），9页。
155. 奥特库尔的尼古拉：《要求》（*Exigit ordo*）（nt 29），见《书信集》（*Briefe*）（nt 13），88页。
156. 翁贝托·埃柯：《玫瑰之名》（*Der Name der Rose*，Bertelsmann，1982），40页。
157. 爱克哈特大师：布道51，《德文著作》（*Die deutschen Werke*），第2卷，476页及以下。
158. 爱克哈特大师：布道6，第1卷，111页。
159. 彼得拉克：《三部曲》（*Seccretum*），I，78。

选读文献

这一书目包含了对应于这部哲学史各章的精选权威文本。对于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大哲学家，这一书目主要满足于最为著名或容易掌握的少量导论和文献。进一步的参考，请详细研究和深入阅读。

哲学史

我们从卷帙浩繁的哲学史著述中选出：

杰出的大学者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ie des Abendlandes* [1945], Anaconda 2012）（中译本可参考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弗朗索瓦·夏特莱等：《哲学史》（François Châtelet u. a.: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8 Bände, Ullstein 1975）；

吕迪格·布勃纳（编）：《文本与论述中的哲学史》（Rüdiger Bubner [Hrsg.]: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9 Bände, Reclam 2004, 2. Aufl.）；

弗兰茨·舒普：《哲学史概要》（Franz Schupp: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Überblick*, 3 Bände, Meiner 2005）；

安东尼·肯尼：《西方哲学史：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Anthony Kenny: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Philosophie: Antike–Mittelalter–Neuzeit–Moderne*, 4 Bänd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4, 2. Aufl.）（中译本可参考《牛津西方哲学史》，王柯平、袁宪军、杨平、梁展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内容极其丰富详细的是那部由不同作者撰写，由沃尔夫冈·罗德（Wolfgang Röd）编撰的《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1–14, Beck 1976–2015 f.）。其中第1—5卷与本书论述的时期有关。

一项更为广博的工程是由不同编者负责的《哲学史概论》（*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chwabe 1983–2015 f.），30卷迄今出版了14卷。其中第1—5卷与本书论述的时期有关。

与拉斐尔同时代的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在他初版于1550年的作品《艺园名人传》（*Lebensbeschreibungen der berühmtesten Maler, Bildhauer und Architekten*）中记述了拉斐尔的生平。

关于拉斐尔的文本见乔吉奥·瓦萨里：《拉斐尔生平》（Giorgio Vasari: *Das Lebendes Raffael*, Wagenbach 2004）。

关于拉斐尔，还可参见卡佩伦的尤尔克·梅耶：《拉斐尔》（Jürg Meyer zur Capellen: *Raffael*, Beck 2010）。

关于《雅典学园》的细节，可参见乔万尼·雷亚莱：《签字厅》（Giovanni Reale: *La Stanza della Segnatura*, Bomiani 2010）；

康拉德·奥波胡博：《拉斐尔〈雅典学园〉中的对立与综合》（Konrad Oberhuber: *Polarität und Synthese In Raphael's Schule von Athen*, Urachhaus 1983）；

格伦·W·莫斯特：《拉斐尔与雅典学园：解读此画》（Glenn W. Most: *Raffael und die Schule von Athen. Über das Lesen der Bilder*, Fischer 1999）。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画像，参见恩诺·鲁道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危机》（Enno Rudolph: *Die Krise des Platonismus in der Renaissance-Philosophie*），收录于他的《城邦与宇宙：柏拉图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Polis und Kosmos. Naturphilosophie und politische Philosophie bei Plato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6），108–122页。

古 代

从前在爱奥尼亚……

关于泰勒斯对日食的“推算”，参见威尔利·哈特纳：《晦暗期与泰勒斯对日食的预测：历史真相与现代神话》（Willy Hartner: *Eclipse Periods and Thales' Prediction of the Solar Eclipse. Historic Truth and Modern Myth*），收录于《半人马座》（*Centaurus*），第14卷，1969年，60–71页，

以及奥托·诺伊戈保尔：《古代的精密科学》（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Dover Publications 1969, 2. Aufl.）。

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参见“古典学家”布鲁诺·施耐尔：《精神的发现：对欧洲思想产生于希腊的研究》（Bruno Snell: *Die Entdeckung des Geistes. Studien zur Entstehung des europäischen Denkens bei den Griechen* [1946],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9. Aufl.）；

艾瑞克·罗伯特森·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Eric Robertson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195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柏拉图关于泰勒斯的趣闻逸事是汉斯·布鲁门伯格思想的出发点：《色雷斯女奴的嘲笑：理论的史前史》（Hans Blumenberg: *Das Lachen der Thrakerin. Eine Urgeschichte der Theorie*, Suhrkamp 1987）。

关于早期希腊宗教，参见瓦尔特·布尔克特：《古风时期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宗教》（Walter Burkert: *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Kohlhammer 2010, 2. Aufl.）。

关于早期希腊世界的文学，参见赫尔曼·弗兰克尔：《希腊早期的诗与哲学：5世纪中叶前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散文发展史》（Hermann Fränkel: *Dichtung und Philosophie des frühen Griechentums. Ein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Epik, Lyrik und Prosa bis zur Mitt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Beck 1962, 2. Aufl.）。

这一章及以下数章中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篇，引自威廉·卡佩勒（编）：《前苏格拉底思想家》（Wilhelm Capelle [Hrsg.]: *Die Vorsokratiker*, Kröner 2008, 9. Aufl.）。

此外参见M. L. 格美利：《前苏格拉底思想家》（M. L. Gemelli: *Die Vorsokratiker*, 3 Bände, Artemis & Winkler 2000, 2009, 2010）；

亚普·曼斯菲尔德与奥利维尔·普利马维西：《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希腊语 / 德语（Jaap Mansfeld und Oliver Primavesi: *Die Vorsokratiker*, Griechisch/Deutsch, Reclam 2011）；

卡尔-弗里德里希·盖耶尔：《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引述》（Carl-Friedrich Geyer: *Die Vorsokratiker zur Einführung*, Junius 1995）；

克里斯多夫·拉普：《前苏格拉底思想家》（Christof Rapp: *Vorsokratiker*, Beck 2007, 2. Aufl.）；

威廉·K. C.古特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William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Bd. 1）。

《早期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与毕达哥拉斯学派》（*The Early Presocratics and the Pythagore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关于阿那克西曼德，参见狄尔克·L.库普里、罗伯特·哈恩与杰拉德·纳达夫：《语境里的阿那克西曼德：关于希腊哲学起源的新研究》（Dirk L. Couprie, Robert Hahn und Gerard Naddaf: *Anaximander in Context. New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Greek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关于神话的含义与阐释，参见克里斯多夫·雅默：《〈穿法衣的上帝〉：当代哲学神话—理论的界限与视角》（Christoph Jamme: »Gott an hat ein Gewand«. Grenzen und Perspektiven philosophischer Mythos-Theorie der Gegenwart, Suhrkamp 1999）；

赫尔穆特·海特：《理性的原始神话：论希腊神迹的哲学史谱系》（Helmut Heit: *Der Ursprungsmythos der Vernunft. Zur philosophiehistorischen Genealogie des griechischen Wunders*,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7）。

万物的尺度

关于希腊债务经济的背景，详见弗里茨·格施尼泽：《希腊社会史》（Fritz Gschnitzer: *Griechische Sozialgeschichte*,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3, 2. Aufl.）；

卡尔-威廉·魏尔维：《公元前6世纪前后阿提卡农民负债的原因和程度》（Karl-Wilhelm Welwei: *Ursachen und Ausmaß der Verschuldung attischer Bauern um 600 v. Chr.*），收录于《赫尔墨斯》（*Hermes*），133期，2006年，29–43页；

约翰·刘易斯：《梭伦的雅典里的奴隶制和法纪未施》（John Lewis: *Slavery and Lawlessness in Solonian Athens*），收录于《堤》（*Dike*），2004年，19–40页；

大卫·格莱伯：《债：第一个五千年》（David Graeber: *Schulden. Die ersten 5000 Jahre*, Klett-Cotta 2012），195–208页。

经典的、无可逾越的货币理论见格奥尔格·齐美尔：《货币哲学》（Geor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 Anaconda 2009）。

关于新近的数据资料，参见卡尔-海因茨·布罗德贝克：《货币的统治：历史与体系》（Karl-Heinz Brodbeck: *Die Herrschaft des Geldes. Geschichte und Systemati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1, 2. Aufl.）；

克里斯多夫·图尔克：《过剩！货币哲学》（Christoph Türcke: *Mehr! Philosophie des Geldes*, Beck 2015）。

关于毕达哥拉斯，参见瓦尔特·布尔克特：《智慧与科学：毕达哥拉斯、菲洛劳斯及柏拉图研究》（Walter Burkert: *Weisheit Und Wissenschaft. Studien zu Pythagoras, Philolaos und Platon*, Hans Carl Verlag 1962）；

詹姆斯·A·菲利普：《毕达哥拉斯与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James A. Philipp: *Pythagoras and Early Pythagoreanis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克里斯多夫·里德维格：《毕达哥拉斯导论：生平，学说，影响》（Christoph Riedweg: *Pythagoras. Leben, Lehre, Nachwirkung. Eine Einführung*, Beck 2002）；

莱奥尼德·茨穆德：《毕达哥拉斯与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Leonid Zhmud: *Pythagoras and the Early Pythagore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关于数学与数字的起源，参见赫尔穆特·格里克：《数字概念史》（Helmuth Gericke: *Geschichte des Zahlbegriffs*,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70）；《古代与东方的数学》（*Mathematik in Antike und Orient*, Springer 1984）。

关于理性与数字的关系，参见西尔维奥·维埃塔：《理性：一部世界史》（Silvio Vietta: *Rationalität. Eine Weltgeschichte*, Fink 2012），69–124页。

关于赫拉克利特，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知识的开端》（Hans-Georg Gadamer: *Der Anfang des Wissens*, Reclam 1999）。

关于法对于逻格斯发展的意义，参见托比亚斯·莱夏特：《早期希腊的法与合理性》（Tobias Reichardt: *Recht und Rationalität im frühen*

Griechenland,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3)。

关于巴门尼德，参见乌沃·霍尔舍（编）：《巴门尼德：论存在者的本质（希德双语残篇）》（Uvo Hölscher [Hrsg.]: *Parmenides. Vom Wesen des Seienden. Die Fragmente griechisch und deutsch*, Suhrkamp 1986, 2. Aufl.）；

恩斯特·海奇：《巴门尼德：逻辑、存在论与自然科学的起源；残篇》（Ernst Heitsch: *Parmenides. Die Anfänge der Logik, Ontologie und Naturwissenschaft; Die Fragmente*, Heimeran 1974）；

此外参见古典学者卡尔·莱恩哈特：《巴门尼德与希腊哲学史》（Karl Reinhardt [1916]: *Parmenides und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Klostermann 2011, 5. Aufl.）。

人的本性

关于南意大利的希腊哲学，参见君特·寸茨：《珀尔塞福涅：有关大希腊地区宗教和思想的三篇文章》（Günther Zuntz: *Persephone. Three Essayson Religionand Thought in Magna Graecia*, Clarendon Press 1971）；

詹姆斯·路希特：《早期希腊思想：破晓之前》（James Luchte: *Early Greek Thought: Beforethe Daw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关于希腊人的灵魂概念，参见古典学者弗兰茨·吕舍：《血、生命和灵魂：在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圣经和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家那里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牺牲宗教史之准备工作》（Franz Rüsche: *Blut, Lebenund Seele. Ihr Verhältnis nach Auffassung der griechischen und hellenistischen Antike, der Bibel und der alexandrinischen Theologen. Eine Vorarbeit zur Religionsgeschichte Des Opfers* [1930], Johnson Reprint 1968）；

此外关于早期希腊的灵魂观念，见简·尼古拉斯·布莱默：《早期希腊的灵魂概念》（Jan Nicolaas Bremmer: *The Early Greek Conception of the Sou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Aufl.）；

克劳迪亚·弗伦策尔：《前苏格拉底思想家那里的动物、人类与灵魂》（Claudia Frenzel: *Tier, Mensch und Seelebei den Vorsokratikern*），收录于弗里德里希·尼沃纳与让-鲁普·塞班：《动物的

灵魂》(Friedrich Niewöhner und Jean-Loup Seban: *Die Seele der Tiere*, Harrassowitz 2001), 59–92页。

关于希腊的灵魂构想,尤其是植物的灵魂见汉斯·维尔纳·因根西普:《植物灵魂的历史》(Hans Werner Ingensiep: *Geschichte der Pflanzenseele*, Kröner 2001)。

关于俄耳甫斯教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灵魂漫游,见赫尔穆特·参德尔:《欧洲的灵魂漫游史:从古至今的另类宗教传统》(Helmut Zander: *Geschichte der Seelenwanderung in Europa. Alternative Religiöse Traditionen von der Antike bis heut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9) ;

拉德克里夫·G·埃德蒙兹第三:《古代俄耳甫斯主义再定义:希腊宗教研究》(Radcliffe G. Edmonds III: *Redefining Ancient Orphism. A Study in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关于恩培多克勒,见瓦尔特·克兰茨:《恩培多克勒:古代形态与浪漫主义再创造》(Walther Kranz: *Empedokles. Antike Gestalt und romantische Neuschöpfung*, Artemis 1949) ;

罗斯玛丽·赖特(编):《恩培多克勒:现存残篇》(M. Rosemary Wright[Hrsg.]: *Empedocles. The Extant Fragmen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彼得·金斯利:《古代哲学、神话与魔法:恩培多克勒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Peter Kingsley: *Ancient Philosophy, Mystery, and Magic. Empedocles and Pythagorean Tra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5)。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参见菲利克斯·M·克莱维:《阿那克萨戈拉哲学:一次重构的尝试》(Felix M. Cleve: *The Philosophy of Anaxagoras. An Attempt at Reconstruction*, King's Crown Press 1949) ;

马尔科姆·舍菲尔德:《阿那克萨戈拉研究随笔》(Malcolm Schofield: *An Essay on Anaxagor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流浪汉、他的弟子与雅典公共秩序

关于苏格拉底,参见安德烈亚斯·帕策尔(编):《历史上的苏格拉底》(Andreas Patzer [Hrsg.]: *Der historische Sokrates*,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7) ; 《苏格拉底研究：关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十二篇论文》(*Studia Socratica. Zwölf Abhandlungen über den historischen Sokrates*, Narr 2012) ;

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苏格拉底：讽刺家与道德哲学家》(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格诺特·伯默：《苏格拉底此人》(Gernot Böhme: *Der Typ Sokrates*, Suhrkamp 1992) ;

沃夫冈·H. 普雷格尔：《苏格拉底：哲学对话的肇始》(Wolfgang H. Pleger: *Sokrates. Der Beginn des philosophischen Dialogs*, Rowohlt 1998) ;

爱克哈德·马滕斯：《苏格拉底导论》(Ekkehard Martens: *Sokrates. Eine Einführung*, Reclam 2004) ;

君特·费加尔：《苏格拉底》(Günter Figal: *Sokrates*, Beck 2006, 3. Aufl.) ;

罗宾·沃特菲尔德：《苏格拉底为何会死：消除神话》(Robin Waterfield: *Why Socrates Died. Dispelling the Myths*, Norton 2009) 。

关于阿提卡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状况，参见约亨·布莱肯：《雅典民主政治》(Jochen Bleicken: *Die athenische Demokratie*, UTB 1995, 4. Aufl.) 。

智者学派的重要文本，可见托马斯·席伦与托马斯·钦斯迈尔(编) : 《智者学派：文本选读(古希腊文/ 德文) 》(Thomas Schirren und Thomas Zinsmaier[Hrsg.]: *Die Sophisten. Ausgewählte Texte. Griechisch/ Deutsch*, Reclam 2003) 。

此外参见卡尔·约阿希姆·克拉森：《诡辩术》(Carl Joachim Classen: *Sophisti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6) ;

格奥尔格·B. 克菲尔德：《智者运动》(George B. Kerferd: *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黑尔加·舍尔滕：《诡辩术：城邦宗教与政治之威胁？》(Helga Scholten: *Die Sophistik. Eine Bedrohung für die Religion und Politik der Polis?*, Akademie Verlag 2003) 。

关于普罗泰戈拉，参见卡尔-马丁·迪茨：《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及其思想研究》（Karl-Martin Dietz: *Protagoras von Abdera. Untersuchungen zu seinem Denken*, Habelt 1976）；

约翰·M.奥弗伊森：《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Johannes M. Ophuijsen: *Protagoras of Abdera*,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3）。

可购买到的柏拉图著作的权威译本有：《柏拉图全集》（*Platon. Sämtliche Werke*. 3 Bänd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4）。

米歇尔·埃尔勒：《柏拉图》（Michael Erler: *Platon*, Beck 2006）。这可能是关于柏拉图及其思想最好的一本德文导论。

此外参见米歇尔·博特：《柏拉图》（Michael Bordt: *Platon*, Herder 1999）；

乌维·诺伊曼：《柏拉图》（Uwe Neumann: *Platon*, Rowohlt 2001）；

巴巴拉·岑普芬尼希：《柏拉图引论》（Barbara Zehnpfennig: *Platon zur Einführung*, Junius 2011, 4. Aufl.）。

表象与存在

关于柏拉图对话以及对话式的哲学，参见瓦尔特·布洛克：《柏拉图的谈话集》（Walter Bröcker: *Platos Gespräche* [1964], Klostermann 1999, 5. Aufl.）；

赫尔曼·贡德特：《对话与辩证法：论柏拉图对话之结构》（Hermann Gundert: *Dialog und Dialektik. Zur Struktur des platonischen Dialogs*, Grüner 1971）；

托马斯·斯勒扎克：《柏拉图与哲学书写：柏拉图早中期对话阐释》（Thomas Szlezák: *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Interpretationen zu den frühen und mittleren Dialogen*, De Gruyter 1985）；《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辩证法家形象：柏拉图与哲学书写（第二部）》（*Das Bild des Dialektikers in Platons späten Dialogen. 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Teil II*, De Gruyter 2004）；

狄斯金·克莱：《柏拉图的问题：同沉默的哲学家对话》（Diskin Clay: *Platonic Questions. Dialogues with the Silent Philosopher*,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恩斯特·海奇：《柏拉图及其辩证哲学的开端》（Ernst Heitsch: *Platon und die Anfänge seines dialektischen Philosophierens*,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关于德谟克利特，参见格莱德·伊卜舍：《德谟克利特：伦理学残篇（古希腊文/德文）》（Gred Ibscher: *Demokrit. Fragmente zur Ethik: Griechisch/Deutsch*, Reclam 1995）；

鲁道夫·洛布（编）：《德谟克利特：哲学文本》（Rudolf Löbl [Hrsg.]: *Demokrit. Texte zu seiner Philosophie*, Rodopi 1989）；《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物理学》（*Demokrits Atomphysi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7）；

格奥尔格·莱辛瑙尔：《德谟克利特的灵魂模型与原子物理学的原则》（Georg Rechenauer: *Demokrits Seelenmodell und die Prinzipien der atomistischen Physik*），刊于多罗忒·阿·弗雷德与布克哈特·莱斯（编）：《古代哲学中的身体与灵魂》（Dorothea Frede und Burkhard Reis [Hrsg.]: *Body and Soul in Ancient Philosophy*, De Gruyter 2009），111–142页。

关于柏拉图的对话《泰阿泰德篇》，参见约翰·麦克道尔：《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John McDowell: *Plato's Theaetetus*, Clarendon Press 1973）；

恩斯特·海奇：《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中的考虑》（Ernst Heitsch: *Überlegungen Platons im Theaetet*, Steiner 1988）；

约格·哈迪：《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中的认识理论》（Jörg Hardy: *Platons Theorie des Wissens im »Theaite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1）。

关于柏拉图对神话的使用，参见由马库斯·杨卡与克里斯蒂安·舍费尔：《神话学家柏拉图：对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话之新阐释》（Markus Janka und Christian Schäfer [Hrsg.]: *Platon als Mythologe. Neue Interpretationen zu den Mythen in Platons Dialogen*,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2）；

狄尔克·屈尔斯根：《神话的合理性：柏拉图的哲学神话及新柏拉图主义的诠释》（Dirk Cürsgen: *Die Rationalität des Mythischen. Der*

philosophische Mythos bei Platon und seine Exegese im Neuplatonismus, De Gruyter 2002) ;

凯瑟琳·克罗伯特、皮埃尔·德斯特里与弗朗西斯科·J.冈萨雷斯：《柏拉图与神话：柏拉图神话的使用和地位之研究》（Catherine Collobert, Pierre Destrée und Francisco J. Gonzalez: *Plato and Myth. Studies on the Use and Status of Platonic Myth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2）。

关于柏拉图哲学当中的善之理念，参见马塞尔·范阿克伦：《善的知识：柏拉图对话中德性知识的重要性与持续性》（Marcel van Ackeren: *Das Wissen vom Guten. Bedeutung und Kontinuität des Tugendwissens in den Dialogen Platons*, Grüner 2003）。

关于柏拉图哲学的总体情况，参见弗兰茨·冯库切拉：《柏拉图的哲学》（Franz von Kutschera: *Platons Philosophie*, 3 Bände, Mentis 2002）。

关于“理念论”，参见戈特弗里德·马丁：《柏拉图的理念论》（Gottfried Martin: *Platons Ideenlehre*, De Gruyter 1973）；

安德烈亚斯·格莱瑟：《柏拉图理念论导论：语言、逻辑与形而上学》（Andreas Graeser: *Platons Ideenlehre. Sprache, Logik und Metaphysik. Eine Einführung*, Haupt 1975）；

克努特·埃明：《逃至思想：柏拉图理念哲学的开端》（Knut Eming: *Die Flucht ins Denken. Die Anfänge der platonischen Ideenphilosophie*, Meiner 1993）。

金钱还是荣誉？柏拉图的国家

关于柏拉图的“政治性”灵魂设想，参见安德烈亚斯·格莱瑟：《柏拉图灵魂分离学说的难题：对柏拉图思想中连续性问题的思考》

（Andreas Graeser: *Probleme der platonischen Seelenteilungslehre. Überlegungen zur Frage der Kontinuität im Denken Platons*, Beck 1969）；

托马斯·M.罗宾逊：《柏拉图的心理》（Thomas M. Robinson: *Plato's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

关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参见莱恩哈特·毛勒：《柏拉图的“国家”与

民主：关于政治伦理学的历史分类学思考》（Reinhart Maurer: *Platons »Staat« und die Demokratie. Historisch-systematische Überlegungen zur politischen Ethik*, De Gruyter 1970）；

格奥尔格·克洛斯科：《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演变》（George Klosko: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Aufl.）；

关于《理想国》，参见奥洛夫·纪贡：《当下与乌托邦：柏拉图〈理想国〉阐释》（Olof Gigon: *Gegenwärtigkeit und Utopie. Eine Interpretation von Platons »Staat«*, Artemis 1976）；

雅各布·F. M.阿伦茨：《城邦的统一：柏拉图国家研究》（Jacob F. M. Arends: *Die Einheit der Polis. Eine Studie über Platons Staat*, Brill Academic Press 1988）；

奥特弗里德·赫费（编）：《柏拉图：〈理想国〉》（Otfried Höffe [Hrsg.]: *Platon. Politeia*, Akademie Verlag 1997）。

关于《理想国》和《法律篇》的比较，参见安德烈亚斯·马尔库斯：《哲学家统治还是法律统治？：柏拉图〈理想国〉和〈法律篇〉研究》（Andreas Markus: *Philosophen–oder Gesetzherrschaft? Untersuchungen zu Platons Politeia und den Nomoi*, Tectum 2006）。

关于柏拉图从早期作品到晚期作品中政治哲学的转变，参见克里斯朵夫·波博尼希：《重塑柏拉图的乌托邦：其晚期的伦理学和政治学》（Christopher Bobonich: *Plato's Utopia Recast. His Later Ethics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关于《法律篇》，参见赫尔维希·戈尔格曼斯：《柏拉图〈法律篇〉阐释》（Herwig Görgemanns: *Beiträge zur Interpretation von Platons Nomoi*, Beck 1960）；

恩斯特·桑德沃斯：《索特里亚：柏拉图式立法的哲学根据》（Ernst Sandvoss: *Soteria.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r platonischen Gesetzgebung*, Musterschmidt 1971）；

理查德·F.斯塔利：《柏拉图〈法律篇〉导论》（Richard F. Stalley: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Laws*, Basil Blackwell 1983）；

塞斯·伯纳德特：《柏拉图的〈法律篇〉：存在之发现》（Seth Benardete: *Plato's »Laws«. The Discovery of Be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巴巴拉·岑普芬尼希 (编) : 《法治与人治——柏拉图的〈法律篇〉》 (Barbara Zehnppennig [Hrsg.]: *Die Herrschaft der Gesetze und die Herrschaft des Menschen—Platons»Nomoi«*, Dunker & Humblot 2008) ;

克里斯多夫·霍恩 (编) : 《柏拉图: 法律/〈法律篇〉》 (Christoph Horn[Hrsg.]: *Platon. Gesetze/Nomoi*, Akademie Verlag 2013) 。

事物的秩序

关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自然哲学, 参见达纳·R.米勒: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第三种类》 (Dana R. Miller: *The Third Kind in Plato's Timaeos*,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

米莎·冯佩格尔: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万有灵魂》 (Mischa von Perger: *Die Allseele in Platons Timaios*, Teubner 1997) ;

菲利普·卡费克: 《宇宙的灵魂赋予: 柏拉图〈斐多篇〉与〈蒂迈欧篇〉中的宇宙论、灵魂学说与神学》 (Filip Karfik: *Die Beseelung des Kosmos. Untersuchungen zur Kosmologie, Seelenlehre und Theologie in Platons Phaidon und Timaios*, Saur 2004) ;

洛塔尔·舍费尔: 《天上的范式: 柏拉图论自然与国家》 (Lothar Schäfer: *Das Paradigma am Himmel. Platon über Natur und Staat*, Alber 2005) ;

恩斯特·A.施密特: 《柏拉图的时间理论: 宇宙、灵魂、数字与〈蒂迈欧篇〉中的永恒》 (Ernst A. Schmidt: *Platons Zeittheorie. Kosmos, Seele, Zahl und Ewigkeit im Timaios*, Klostermann 2012) 。

可购买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有恩斯特·格鲁马赫、海尔穆特·弗拉沙尔 (编) : 《亚里士多德: 德文译著集》 (Ernst Grumach, Hellmut Flashar [Hrsg.]: *Aristoteles. Werke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20 Bände, Akademie Verlag 1956) 。

推荐的导论有: 奥特弗里德·赫费: 《亚里士多德》 (Otfried Höffe: *Aristoteles*, Beck 2006, 3. Aufl.) 。

此外参见大卫·罗斯: 《亚里士多德》 (David Ross: *Aristotle*,

Routledge 1995, 6. Aufl.) ;

沃尔夫冈·戴特尔：《亚里士多德》（Wolfgang Detel: *Aristoteles*, Reclam 2005 ）；

克里斯多夫·拉普：《亚里士多德引论》（Christof Rapp: *Aristoteles zur Einführung*, Junius 2012, 4. Aufl. ）；

克里斯多夫·希尔兹：《亚里士多德》（Christopher Shields: *Aristotle*, Routledge 2007 ）；

海尔穆特·弗拉沙尔：《亚里士多德：西方之师》（Hellmut Flashar: *Aristoteles. Lehrer des Abendlandes*, Beck 2013 ）。

适合的道德

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参见威廉·F. R.哈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论》（William F. R. Hardie: *Aristotle's Eth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Aufl. 1981 ）；

弗里茨-彼得·哈格尔（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Fritz-Peter Hager [Hrsg.]: *Ethik und Politik des Aristoteles*,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 ）；

道格拉斯·哈奇森：《亚里士多德的德性》（Douglas Hutchinson: *The Virtues of Aristotle*, Routledge [1986], 2. Aufl. 2015 ）；

理查德·克劳特：《亚里士多德论人性之善》（Richard Kraut: *Aristotle on the Human G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萨拉·布洛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Sarah Broadie: *Ethics with Aristo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安东尼·肯尼：《亚里士多德论完美人生》（Anthony Kenny: *Aristotle on the Perfect Life*, Clarendon Press 1992 ）；

奥特弗里德·赫费（编）：《尼各马可伦理学》（Otfried Höffe [Hrsg.]: *Nikomachische Ethik*, Akademie Verlag 1995 ）；

大卫·波斯托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David Bostock: *Aristotle's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乌尔苏拉·沃尔夫：《尼各马可伦理学》（Ursula Wolf: *Nikomachische Ethi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2 ）。

关于政治学，参见君特·比恩：《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之奠基》（Günther Bien: *Die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bei Aristoteles*, Alber 1985, 2. Aufl.）；

奥特弗里德·赫费（编）：《亚里士多德：政治学》（Otfried Höffe [Hrsg.]: *Aristoteles. Politik*, Akademie Verlag 2001）。

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参见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经济学》（Peter Koslowski: *Politik und Ökonomie bei Aristoteles*, Mohr Siebeck 1993, 3. Aufl.）。

避世者与怀疑者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参见马尔特·霍森菲尔德：《古代幸福学说：犬儒主义与昔勒尼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导论版德文译本中的原始资料》（Malte Hossenfelder: *Antike Glückslehren. Kynismus und Kyrenaismus, Stoa, Epikureismus und Skepsis. Quellen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und Einführungen*, Kröner 1996）。

关于希腊化时期哲学的权威评注版文集有：阿图尔·隆与大卫·塞德利：《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文本与评注》（Arthur Long und David Sedley: *Die hellenistischen Philosophen. Texte und Kommentare* [1987], Metzler 2006, 2. Aufl.）。

关于犬儒主义，参见格奥尔克·卢克：《犬的智慧：德文译本与注解中的古代犬儒主义文本》（Georg Luck: *Die Weisheit der Hunde. Texte der antiken Kyniker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en*, Kröner 1996）；

玛格丽特·比勒贝克（编）：《现代研究当中的犬儒主义者》（Margarethe Billerbeck [Hrsg.]: *Die Kyniker in der modernen Forschung*, Grüner 1991）；

米歇尔·翁弗雷：《作为犬的哲学家：论犬儒主义者颠覆性思想的起源》（Michel Onfray: *Der Philosoph als Hund: vom Ursprung des subversiven Denkens bei den Kynikern*, Campus 1991）；

克劳斯·多林：《犬儒主义者》（Klaus Döring: *Die Kyniker*, C. C. Buchner 2006）。

关于古代怀疑论，参见弗里多·里肯：《古代怀疑论者》（Friedo

Ricken: *Antike Skeptiker*, Beck 1994) ;

罗伯特·J.弗格林：《皮浪关于知识与辩护的反思》（Robert J. Fogelin: *Pyrrhonian Reflections on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J.汉金森：《怀疑论者：哲学家们的辩论》（R. J. Hankinson: *The Sceptics.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Routledge 1995 ）；

罗伯特·W.莎普尔斯：《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与怀疑论》（Robert W. Sharples: *Stoics, Epicureans and Sceptics*, Routledge 1996 ）；

尤莉娅·安娜斯、乔纳森·巴恩斯：《怀疑论的方式：古代文本与现代阐释》（Julia Annas, Jonathan Barnes: *The Modes of Scepticism. Ancient Texts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Aufl. ）；

马尔库斯·加布里埃尔：《古代与现代怀疑论导论》（Markus Gabriel: *Antike und moderne Skepsis zur Einführung*, Junius 2008 ）。

错误生活中的正确生活

关于亚里斯提卜，参见克劳斯·多林：《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斯提卜与享乐主义者》（Klaus Döring: *Der Sokratesschüler Aristipp und die Kyrenaiker*,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8 ）。

关于伊壁鸠鲁，参见海因茨-米歇尔·巴特林：《伊壁鸠鲁：生活艺术理论》（Heinz-Michael Bartling: *Epikur: Theorie der Lebenskunst*, Junghans 1994 ）；

米歇尔·埃尔勒：《伊壁鸠鲁》（Michael Erler: *Epikur*），收录于弗利多·里肯（编）：《古代哲学家》（Friedo Ricken [Hrsg.]: *Philosophen der Antike*, Bd. 2, Kohlhammer 1996 ）；

卡尔-弗里德里希·盖耶尔：《伊壁鸠鲁引论》（Carl-Friedrich Geyer: *Epikur zur Einführung*, Junius 2015, 3. Aufl. ）；

卡瑟琳娜·黑尔德：《伊壁鸠鲁的欢乐与宁静》（Katharina Held: *Hedone und Ataraxia bei Epikur*, Mentis 2007 ）；

马尔特·霍森菲尔德：《伊壁鸠鲁》（Malte Hossenfelder: *Epikur*,

Beck 2006) 。

关于斯多亚派，有古典学者马克斯·波伦茨：《斯多亚派：精神运动史》（Max Pohlenz: *Die Stoa. Geschichte Einer geistigen Bewegung* [1949], 2 Bände,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2, 7. Aufl. ）。

此外参见塞缪尔·桑贝斯基：《斯多亚派的物理学》（Samuel Sambursky: *The Physics of the Stoics*, Routledge 1959 ）；

约翰·迈克尔·里斯特：《斯多亚派哲学》（John Michael Rist: *Stoic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弗朗西斯·亨利·桑德巴赫：《斯多亚派》（Francis Henry Sandbach: *The Stoics*, Duckworth 1994, 2. Aufl. ）；

马克西米利安·弗施纳：《斯多亚派伦理学》（Maximilian Forschner: *Die stoische Ethi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5, 2. Aufl. ）；

苏珊娜·博布钦：《斯多亚哲学中的决定论与自由》（Susanne Bobzien: *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n Stoic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布拉德·因伍德（编）：《斯多亚派剑桥指南》（Brad Inwood [Hrs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to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罗伯特·碧斯：《斯多亚派的视为己有学说，第一卷：内容复现》（Robert Bees: *Die Oikeiosislehre der Stoa, Bd. 1. Rekonstruktion ihres Inhalts*,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4 ）；

巴巴拉·古克斯（编）：《论老斯多亚派的伦理学》（Barbara Guckes [Hrsg.]: *Zur Ethik der älteren Stoa*,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

塔德·布勒南：《斯多亚派的生活：情感、职责与宿命》（Tad Brennan: *The Stoic Life. Emotions, Duties, and Fate*, Clarendon Press 2007, 2. Aufl. ）。

合法化与赋魅

关于埃拉托斯特尼及其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参见克劳斯·格乌

斯：《昔勒尼的埃拉托斯特尼：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史与科学史研究》（Klaus Geus: *Eratosthenes von Kyrene. Studien zur hellenistischen Kultur-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Beck 2002）。

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理学残篇，见杜安·罗勒（编）：《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理学：残篇与译文集（附评注和补充材料）》（Duane Roller [Hrsg.]: *Eratosthenes' Geography: Fragments Col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and additional materi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波里比阿的罗马史，见波里比阿：《罗马的崛起》（Polybios: *Der Aufstieg Roms*, Marix 2010）。

关于波里比阿，参见弗兰克·W.沃尔班克：《波里比阿、罗马与希腊化世界：随笔与反思》（Frank W. Walbank: *Polybius, Rom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Essays and Ref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Aufl.）；

鲍里斯·德莱尔：《波里比阿：在罗马邦镇的生平与著作》（Boris Dreyer: *Polybios. Leben und Werk im Banne Roms*, Olms 2011）。

波赛东尼奥的残篇见威利·泰勒（编）：《波赛东尼奥：残篇》（Willy Theiler [Hrsg.]: *Poseidonios. Die Fragmente*, 2 Bände, De Gruyter 1982）。

此外参见于尔根·马利茨：《波赛东尼奥的历史学》（Jürgen Malitz: *Die Historien des Poseidonios*, Beck 1983）。

关于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的文化理论，参见莱马·穆勒：《文化的发现：从荷马到塞涅卡的古代理论》（Reimar Müller: *Die Entdeckung der Kultur. Antike Theorien von Homer bis Seneca*, Artemis & Winkler 2003），336–364页。

西塞罗的著作见曼弗雷德·福尔曼（编）：《西塞罗：精选集》（Manfred Fuhrmann [Hrsg.]: *Cicero. Ausgewählte Werke*, 5 Bände, Akademie Verlag 2011）。

此外关于西塞罗，参见同一作者：《西塞罗和罗马共和国：一部传记》（*Cicero und die römische Republik. Eine Biographie*, Artemis & Winkler 2011, 5. Aufl.）；

克劳斯·布林格曼：《西塞罗》（Klaus Bringmann: *Cicero*,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4, 2. Aufl.) ;

维尔弗里德·斯特罗：《西塞罗：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
(Wilfried Stroh: *Cicero. Redner, Staatsmann, Philosoph*, Beck 2010, 2.Aufl.) 。

关于伊壁鸠鲁学派在罗马的遗风余韵，参见霍华德·琼斯：《伊壁鸠鲁传统》(Howard Jones: *The Epicurean Tradition*, Routledge 1992) 。

塞涅卡的著作见曼弗雷德·罗森巴赫（编）：《塞涅卡：哲学文集》
(Manfred Rosenbach [Hrsg.]: *Seneca.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5 Bänd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2. Aufl.) 。

此外关于塞涅卡，参见格雷戈尔·毛拉赫：《塞涅卡：生平与著作》
(Gregor Maurach: *Seneca. Leben und Werk*,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3, 6. Aufl.) 。

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以Kindle版本出版，见贝托尔德·施瓦姆：《爱比克泰德著作全集（全新修订本）》(Berthold Schwamm: *Epiktet. Das Gesamtwerk. Völlig neu überarbeitete Fassung*) 。

关于爱比克泰德，参见安东尼·阿图尔·隆：《爱比克泰德：一种斯多亚和苏格拉底式的生活引导》(Anthony Arthur Long: *Epictetus. A Stoic and Socratic Guide to Life*, Clarendon Press 2002) 。

马可·奥勒留的格言与沉思，见于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ark Aurel: *Selbstbetrachtungen*, marix Verlag 2011) (中译本可参考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

关于亚实基伦的安条克，参见约翰·格鲁克：《安条克与晚期阿卡德米学园》(John Glucker: *Antiochus and the Late Academy*,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

大卫·塞德利（编）：《安条克的哲学》(David Sedley [Hrsg.]: *The Philosophy of Antioch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关于欧陀罗斯，参见约翰·迪隆：《欧陀罗斯与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开端》(John Dillon: *Eudoros und die Anfänge des Mittelplatonismus*) ，收录于克莱门斯·琴岑（编）：《中期柏拉图主义》(Clemens Zintzen [Hrsg.]: *Der Mittelplatonismus*,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1) ，3–32页。

关于斐洛，参见佩德尔·伯根：《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时代的注释者》（Peder Borgen: *Philo of Alexandria. An Exegete for His Time*, Brill Publishers 1997）；

奥托·恺撒：《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引论：思想的信仰》（Otto Kaiser: *Philo von Alexandrien. Denkender Glaube. Eine Einführung*,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4）。

关于普鲁塔克，参见蒂莫西·E·杜弗：《普鲁塔克生平：探索美德和恶习》（Timothy E. Duff: *Plutarch's Lives. 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普罗提诺的作品见理查德·哈德尔等（编）：《普罗提诺文集》（Richard Harder u. a. [Hrsg.]: *Plotins Schriften*, 12 Bände, Meiner 2004）。

此外参见延斯·哈弗瓦森：《普罗提诺与新柏拉图主义》（Jens Halfwassen: *Plotin und der Neuplatonismus*, Beck 2004）；

卡林·阿尔特：《普罗提诺》（Karin Alt: *Plotin*, Buchner 2005）。

波菲利同基督教的论战，见德特莱夫·魏格特（编）：《反基督徒》（Detlef Weigt [Hrsg.]: *Gegendie Christen*, Superbia 2004）。

他赞成素食主义的文章，见德特莱夫·魏格特（编）：《戒肉食》（Detlef Weigt [Hrsg.]: *Über die Enthaltensamkeit von fleischlicher Nahrung*, Superbia 2004）。

奥古斯丁或上帝之恩典

关于历史上的耶稣，参见格尔德·泰森与安奈特·梅尔茨：《历史上的耶稣：一本教材》（Gerd Theißen und Annette Merz: *Der historische Jesus. Ein Lehrbuch*,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2011, 4. Aufl.）；

约翰·多米尼克·克罗桑：《历史上的耶稣》（John Dominic Crossan: *Der historische Jesus*, Beck 1994）。

关于时代背景，参见维尔纳·达尔海姆：《耶稣时代的世界》（Werner Dahlheim: *Die Welt zur Zeit Jesu*, Beck 2015, 4. Aufl.）。

关于耶稣的早期门徒，参见格尔德·泰森：《耶稣运动：价值革命的社会史》（Gerd Theißen: *Die Jesusbewegung. Sozialgeschichte einer Revolution der Werte*,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4）；《首批基督徒的

宗教：原始基督教》（*Die Religion der ersten Christen. Eine Theorie des Urchristentums*,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0）。

关于保罗，参见E. P. 桑德斯：《保罗引论》（E. P. Sanders: *Paulus. Eine Einführung*, Reclam 2009）；

乌多·施耐勒：《保罗：生平与著作》（Udo Schnelle: *Paulus. Leben und Werk*, De Gruyter 2014, 2. Aufl.）；

爱德华·洛瑟：《保罗》（Eduard Lohse: *Paulus*, Beck 2009, 2. Aufl.）；

关于最初的基督教世纪史，参见雅罗斯拉夫·百利金：《天主教传统的出现（100—600）》（Jaroslav Pelikan: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100–60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罗宾·拉内·福克斯：《从2世纪到君士坦丁大帝皈依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异教徒与基督徒》（Robin Lane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to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Penguin 2006, 2. Aufl.）；

彼得·布朗：《基督教欧洲之形成》（Peter Brown: *Die Entstehung Des christlichen Europa*, Beck 1996）；

约格·劳斯特：《世界的赋魅：基督教文化史》（Jörg Lauster: *Die Verzauberung der Welt.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Beck 2015, 2. Aufl.）。

可购买到的奥古斯丁德文版著作有：威廉·格埃尔林斯（编）：《奥古斯丁：剧作—著作》（Wilhelm Geerlings [Hrsg.]: *Augustinus. Opera-Werke*, Schöningh 2002 ff.），已出版12卷。

关于奥古斯丁，参见彼得·布朗：《神圣奥古斯丁：教会的教师与精神史的革新者》（Peter Brown: *Der heilige Augustinus. Lehrer der Kirche und Erneuerer der Geistesgeschichte*, Heyne 1973）；

克里斯多夫·霍恩：《奥古斯丁》（Christoph Horn: *Augustinus*, Beck 2012, 2. Aufl.）；

库尔特·弗拉施：《奥古斯丁思想引论》（Kurt Flasch: *Augustin. Einführung in sein Denken*, Reclam 1994）；

威廉·格埃尔林斯：《奥古斯丁引传：生平与著作》（Wilhelm

Geerlings: *Augustinus. Leben und Werk. Eine bibl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Schöningh 2002)。

关于奥古斯丁与摩尼教徒，参见福克尔·亨宁·德雷克尔与米亚姆·库德拉：《奥古斯丁与摩尼教》（Volker Henning Drecoll und Mirjam Kudella: *Augustin und der Manichäismus*, Mohr Siebeck 2011）。

关于奥古斯丁的时代以及其后的历史背景，参见哈特文·布兰特：《古代的终结：晚期罗马帝国史》（Hartwin Brandt: *Das Ende der Antike. Geschichte edes spätrömischen Reiches*, Beck 2010, 4. Aufl.）；

彼得·丁策巴赫尔与维尔纳·海因茨：《古代晚期欧洲（300—600）：一部文化与心灵史》（Peter Dinzelsbacher und Werner Heinz: *Europa in der Spätantike, 300–600. Eine Kultur-und Mentalitätsgeschichte*, Primus 2007）。

可购买到的波爱修的《哲学的慰藉》，见库尔特·弗拉施：《波爱修：哲学的慰藉》（Kurt Flasch: *Boethius. Trost der Philosophie*, DTV 2005）。（波爱修原著中译本可参考：《神学论文集 哲学的慰藉》，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关于波爱修，参见亨利·查德威克：《波爱修：音乐、逻辑、神学与哲学的慰藉》（Henry Chadwick: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Aufl.）；

玛格丽特·吉布森（编）：《波爱修：生平、思想与影响》（Margaret Gibson[Hrsg.]: *Boethius. His Life, Thought and Influe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2）。

曼弗雷特·福尔曼与约阿希姆·格鲁贝尔（编）：《波爱修》（Manfred Fuhrmann und Joachim Gruber [Hrsg.]: *Boethius*,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4）；

约阿希姆·格鲁贝尔：《波爱修引论》（Joachim Gruber: *Boethius. Eine Einführung*, Hiersemann 2011）。

关于亚略巴古的狄俄尼索斯，参见保罗·罗勒姆：《伪狄奥尼索斯：文本评注及其影响简介》（Paul Rorem: *Pseudo-Dionysius. A Commentary on the Texts and Introduction to their Influ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比亚特·雷吉纳·苏赫拉：《亚略巴古的狄俄尼索斯：生平—著作—影响》（Beate Regina Suchla: *Dionysius Areopagita. Leben–Werk–Wirkung*, Herder 2008）。

中世纪

在教会的阴影下

关于中世纪哲学，参见库尔特·弗拉施的权威作品：《中世纪哲学思想：从奥古斯丁到马基雅维利》（Kurt Flasch: *Das philosophische Denken im Mittelalter. Von Augustin Bis Machiavelli*, Reclam 2013, 3. Aufl.）。

关于拜占庭帝国，参见拉尔夫·约翰·黎利：《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史（326—1453）》（Ralph-Johannes Lilie: *Byzanz. Geschichte des oströmischen Reiches 326–1453*, Beck 2014, 6. Aufl.）。

关于大格里高利，参见卡罗尔·斯特劳：《大格里高利：缺陷中的完美》（Carole Straw: *Gregory the Great. Perfection in Imperfe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 Aufl.）。

关于伊斯兰教扩张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参见迈克尔·杰弗斯与拉姆齐·吉布兰·比克哈奇（编）：《皈依与联结：伊斯兰土地上的本土基督教社团》（Michael Gervers und Ramzi Jibran Bikhazi [Hrsg.]: *Conversion and Continuity. Indigenous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Islamic Lands*,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1990）。

关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革命，参见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编）：《加洛林王朝的文化：模仿与创新》（Rosamond McKitterick [Hrsg.]: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关于中世纪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参见阿尔诺·博尔斯特的权威著作：《中世纪生活形式》（Arno Borst: *Lebensformen im Mittelalter* [1973], Nikol 2013）；

亚伦·J.古尔耶维奇：《中世纪人的世界图景》（Aaron J. Gurjewitsch: *Das Weltbild des mittelalterlichen Menschen*, Beck 1997, 5. Aufl.）；

汉斯-维尔纳·戈茨：《中世纪的生活》（Hans-Werner Goetz: *Leben im Mittelalter*, Beck 2002, 7. Aufl.）。

爱留根纳的主要著作见《约翰·司格特·爱留根纳：论自然的区分》（Johannes Scottus Eriugena. *Über die Einteilung der Natur*, Meiner 1994）。

此外关于爱留根纳，参见德默特·莫兰：《约翰·司格特·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世纪观念论研究》（Dermot Mora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cottus Eriugena. A Study of Idealism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Aufl.）。

安瑟尔谟的宣讲，见罗伯特·泰斯（编）：《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宣讲 / 致辞》（Robert Theis [Hrsg.]: *Anselm von Canterbury. Proslogion/Anrede*, Reclam 2005）。

此外关于安瑟尔谟，参见罗尔夫·薛伯格：《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Rolf Schönberger: *Anselm von Canterbury*, Beck 2004）；

汉斯于尔根·费尔韦恩：《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1033—1109）：思想家、祈祷者、大主教》（Hansjürgen Verweyen: *Anselm von Canterbury. 1033–1109. Denker, Beter, Erzbischof*, Pustet 2009）。

关于阿伯拉尔，参见迈克尔·T. 克兰西：《阿伯拉尔：一种中世纪的人生》（Michael T. Clanchy: *Abaelard. Ein mittelalterliches Leben*, Primus 1999）；

斯蒂芬·恩斯特：《彼得·阿伯拉尔》（Stephan Ernst: *Petrus Abaelardus*, Aschendorff 2003）；

乌尔苏拉·尼格里（编）：《彼得·阿伯拉尔：生平—著作—影响》（Ursula Niggli [Hrsg.]: *Peter Abaelard. Leben–Werk–Wirkung*, Herder 2004）。

创世的意义与目的

关于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参见鲁德格尔·霍奈费尔德（编）：《大阿尔伯特与拉丁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接受的开端》（Ludger Honnefelder [Hrsg.]: *Albertus Magnus und die Anfänge der Aristoteles-Rezeption im lateinischen Mittelalter*, Aschendorff 2005）。

关于阿非利加的君士坦丁，参见查尔斯·布尔奈特与丹尼尔·雅克瓦特

(编):《阿非利加的君士坦丁与阿里·伊本·阿巴斯:医疗艺术与相关文本》(Charles Burnett und Danielle Jacquart [Hrsg.]: *Konstantin der Afrikaner und Ali ibn al-Abbas Al-Magūsī. Die Pantegni und verwandte Texte*, Brill Publishers 1995)。

关于阿维森纳,参见戈特哈德·施特罗迈尔:《阿维森纳》(Gotthard Strohmaier: *Avicenna*, Beck 2006, 2. Aufl.)。

阿维洛伊的文本中,容易获取的两个见帕特里克·O·沙雷尔(编):《阿维洛伊:关键文章——关于论证方法的研究》(Patric O. Schaerer [Hrsg.]: *Averroes. Die entscheidende Abhandlung. Di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Methoden der Beweise*, Reclam 2010)。

此外关于阿维洛伊,参见奥利维尔·黎曼:《阿维洛伊及其哲学》(Oliver Leaman: *Averroes and his Philosophy*, Clarendon Press 1988) ;

安科·冯屈格尔根:《阿维洛伊与阿拉伯的现代》(Anke von Kügelgen: *Averroes & die arabische Moderne*, Brill Publishers 1994)。

大阿尔伯特最重要的文本见于大阿尔伯特研究所(编):《大阿尔伯特及其科学体系:关键文本(拉丁文/德文)》(Albertus-Magnus-Institut [Hrsg.]: *Albertus Magnus und sein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 Schlüsseltex-te in Übersetzung Lateinisch/Deutsch*, Aschendorff 2011)。

此外参见阿尔伯特·齐默曼:《大阿尔伯特:他的时代、著作和影响》(Albert Zimmermann: *Albert der Große. Seine Zeit, sein Werk, seine Wirkung*, De Gruyter 1981) ;

英格里德·克莱默-鲁根伯格:《大阿尔伯特》(Ingrid Craemer-Ruegenberg: *Albertus Magnus*, St. Benno 2005, 2. Aufl.) ;

鲁德格尔·霍奈费尔德:《大阿尔伯特与13世纪的文化转折点:在伟大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划时代意义的视角下》(Ludger Honnefelder: *Albertus Magnus und die kulturelle Wende im 13. Jahrhundert. Perspektiven auf die epochale Bedeutung des großen Philosophen und Theologen*, Aschendorff 2012) ;

汉恩斯·莫勒:《大阿尔伯特》(Hannes Möhle: *Albertus Magnus*, Aschendorff 2015)。

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由约瑟夫·贝恩哈特编辑出版:《神学大

全》(Joseph Bernhart [Hrsg.]: *Summeder Theologie*. 3 Bände, Kröner 1985)。

关于托马斯, 参见列奥·埃尔德斯: 《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Leo Elders: *Die Metaphysik des Thomas von Aquin*, Pustet 1987, 2. Aufl.) ;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哲学》(*Die Naturphilosophie des Thomas von Aquin*, Gustav-Siewerth-Akademie 2004) ;

马克西米利安·弗施纳: 《托马斯·阿奎那》(Maximilian Forschner: *Thomas von Aquin*, Beck 2006) ;

罗尔夫·薛伯格: 《托马斯·阿奎那引论》(Rolf Schönberger: *Thomas von Aquin zur Einführung*, Junius 2012, 4. Aufl.) ;

福克尔·列平: 《托马斯·阿奎那》(Volker Leppin: *Thomas von Aquin*, Aschendorff 2009) ;

约瑟夫·皮佩尔: 《托马斯·阿奎那: 生平与著作》(Josef Pieper: *Thomas von Aquin. Leben und Werk*, Topos 2014) 。

世界的祛魅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的选录, 可见皮亚·A. 安托利克-皮佩尔(编): 《罗吉尔·培根: 大著作——道德哲学选集(拉丁文 / 德文) 》(Pia A. Antolic-Piper [Hrsg.]: *Roger Bacon. Opus maius. Eine moralphilosophische Auswahl. Lateinisch/Deutsch*, Herder 2008) 。

关于培根, 此外参见杰里米亚·哈克特: 《罗吉尔·培根与科学: 纪念随笔集》(Jeremiah Hackett: *Roger Bacon and the Sciences. Commemorative Essays*, Brill Publishers 1997) 。

关于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 参见库尔特·弗拉施(编): 《从迪特里希大师到爱克哈特大师》(Kurt Flasch [Hrsg.]: *Von Meister Dietrich zu Meister Eckhart*, Meiner 1984) ; 《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 1300年前后的哲学、神学、自然研究》(*Dietrich von Freiberg. Philosophie, Theologie, Naturforschungum 1300*, Klostermann 2007) 。

《约翰·邓·司各脱: 上帝的可认知性——哲学与神学文本(拉丁文 / 德文) 》(Johannes Duns Scotus. *Über die Erkennbarkeit Gottes. Texte zu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Lateinisch/Deutsch*, Meiner 2002) 。

该书保存了邓·司各脱的主要文本。

关于邓·司各脱，参见鲁德格尔·霍奈费尔德：《约翰·邓·司各脱》（Ludger Honnefelder: *Johannes Duns Scotus*, Beck 2005）；以及他与其他人编辑的：《邓·司各脱（1308—2008）：其著作的哲学面向》（*Duns Scotus. 1308–2008. Die philosophischen Perspektiven seines Werkes*, Aschendorff 2011）。

奥卡姆的威廉的重要文本，可见吕迪·伊姆巴赫（编）：《奥卡姆的威廉：知识与科学理论文本（拉丁文 / 德文）》（Ruedi Imbach [Hrsg.]: *Wilhelm von Ockham. Texte zur Theorie der Erkenntnis und der Wissenschaft. Lateinisch/Deutsch*, Reclam 1984）。

关于奥卡姆的威廉，参见威廉·沃森库尔与罗尔夫·薛伯格（编）：《奥卡姆的当代》（Wilhelm Vossenkuhl und Rolf Schönberger [Hrsg.]: *Die Gegenwart Ockhams*, VCH 1990）；

福克尔·列平：《奥卡姆的威廉：博学者、争论者、托钵僧》（Volker Leppin: *Wilhelm von Ockham. Gelehrter. Streiter. Bettelmönch*, Primus 2003）；

杨·P·贝克曼：《奥卡姆的威廉》（Jan P. Beckmann: *Wilhelm von Ockham*, Beck 2010, 2. Aufl.）。

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书信由吕迪·伊姆巴赫编辑出版：《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书信集（拉丁文 / 德文）》（Ruedi Imbach [Hrsg.]: *Nicolaus von Autrecourt. Briefe. Lateinisch/Deutsch*, Meiner 2013）。

关于尼古拉的权威著作是约瑟夫·拉普：《奥特库尔的尼古拉：他的生平、哲学、作品》（Joseph Lappe: *Nicolaus von Autrecourt. Sein Leben, seine Philosophie, seine Schriften* [1921], Reprint, Nabu Press 2010）。

关于布里丹的权威著作有杰克·楚普柯：《约翰·布里丹：14世纪艺术大师肖像》（Jack Zupko: *John Buridan. Portrait of a Fourteenth-Century Arts Mast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 Press 2003, 2. Aufl.）；

居乌拉·克里马：《约翰·布里丹》（Gyula Klima: *John Burid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诸神的黄昏

马丁·格莱夏特通过他的著作让人们了解了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教

皇的统治：第一部分：从开端到阿维尼翁的教皇》（Martin Greschat: *Das Papsttum. Teil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 den Päpsten in Avignon*, Kohlhammer 1986）。

关于奥卡姆的威廉同教皇教会的冲突，参见将基面贵已：《奥卡姆与中世纪晚期的政治演说》（Takashi Shogimen: *Ockham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关于从13世纪过渡到14世纪期间的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合法化问题，参见于尔根·米特克：《中世纪政治理论：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奥卡姆的威廉》（Jürgen Miethke: *Politiktheorie im Mittelalter. Von Thomas von Aquin bis Wilhelm von Ockham*, UTB 2008）。

关于托钵修会的角色，参见迪特尔·贝尔克：《贫困与历史：中世纪晚期托钵修会史研究》（Dieter Berg: *Armut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Bettelorden im Hohen und Späten Mittelalter*, Butzon & Bercker 2001）。

关于圣文德，参见克里斯多夫·M·库伦：《圣文德》（Christopher M. Cullen: *Bonaven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关于中世纪的经济及其理论，参见阿尔弗雷德·比尔金：《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进程：经济史与教义史研究》（Alfred Bürgin: *Zur Soziogenes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d dogmen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Metropolis 1996, 2. Aufl.）；

雅克·勒高夫：《重利与巨痛：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Jacques Goff: *Wucherzins und Höllenqualen. Ökonomie und Religion im Mittelalter*, Klett-Cotta 2008, 2. Aufl.）；《中世纪的金钱》（*Geld im Mittelalter*, Klett-Cotta 2011）。

帕多瓦的马西略反对教皇，赞同公民自治的论战文章，见帕多瓦的马西略：《和平的保卫者》（Marsilius von Padua: *Der Verteidiger des Friedens*, Reclam 1997）；

关于马西略，参见弗兰克·戈特哈特：《帕多瓦的马西略与巴伐利亚路易的罗马征途：政治理论与政治手段》（Frank Godthardt: *Marsilius von Padua und der Romzug Ludwigs des Bayern. Pol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爱克哈特大师的文集，见尼克劳斯·拉吉尔（编）：《爱克哈特大

师：作品集（2卷本）》（Niklaus Largier [Hrsg.]: *Meister Eckhart Werke in zwei Bände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2014）。

关于爱克哈特，参见库尔特·卢：《爱克哈特大师：神学家、布道者、神秘主义者》（Kurt Ruh: *Meister Eckhart. Theologe, Prediger, Mystiker*, Beck 1989, 2. Aufl.）；

库尔特·弗拉施：《爱克哈特大师：基督教的哲学家》（Kurt Flasch: *Meister Eckhart. Philosoph des Christentums*, Beck 2011, 3. Aufl.）；

迪特马尔·米特：《爱克哈特大师》（Dietmar Mieth: *Meister Eckhart*, Beck 2014）。

尼科尔·奥雷斯姆针对诸侯货币贬值的批评，见《尼科尔·奥雷斯姆：货币贬值宣传册》（Nicolas von Oresme. *Traktat über Geldabwertung. De mutatione monetarum*, Kadmos 2001）。

关于彼特拉克，参见格哈特·霍夫迈斯特：《彼特拉克》（Gerhart Hoffmeister, *Petrarca*, Metzler 1997）；

弗洛里安·诺伊曼：《彼特拉克》（Florian Neumann: *Petrarca*, Rowohlt 1998, 2. Aufl.）。

致谢

非常感谢那些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此书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尤其是我的第一批读者：汉斯-尤尔根（Hans-Jürgen）与格奥尔克·若纳坦·普莱希特（Georg Jonathan Precht），以及蒂姆·埃希（Timm Eich）与迪特尔·容（Dieter Jung）。我要特别感谢克里斯多夫·雅莫（Christoph Jamme），他友好的建议与明智的批评于我而言始终是可靠的。

人物索引

索引所示页码为本书方括号内的数字

Abaelard阿伯拉尔413, 439–444, 446f., 458f., 489

Abu Bakr阿布·巴卡尔422

Adeimantos阿德曼托斯147, 187

Adorno, Theodor W.特奥多·W.阿多诺148, 281

Aegidius von Viterbo维泰博的埃吉迪乌斯25

Aëtios埃提乌斯103, 217, 320

Aischylos埃斯库罗斯145, 257

Alarich I.亚拉里克一世400

Albertus Magnus (Albert der Große) 阿尔伯特·马格努斯(大阿尔伯特) 413, 462–467, 524

Alexander der Große亚历山大大帝54, 227f., 248, 279f., 282f., 285, 290, 299, 310, 334f.

Alexander von Aphrodisias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502

Al-Farabi阿尔-法拉比453

Ali ibn Abi Talib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422

Alkibiades阿尔西比亚德133, 147

Alkidamas阿尔西达马斯133

Al-Kindi阿尔-金迪453

Alkmation阿尔克迈翁34, 109–114, 124, 150, 217, 219, 223f., 234

Alkman阿尔克曼44

Alkuin von York约克的阿尔琴424f.

Allen, Woody伍迪·艾伦305

Alyattes II.阿律阿铁斯二世64

Ambrosius安布罗修388

Amelios Gentilianos阿梅里奥斯·根提里阿诺斯363

Amenophis IV.阿蒙霍特普四世336

Ammonios (Lehrer Plutarchs) 阿谟尼乌斯 (普鲁塔克的老师) 360f.

Ammonios Sakkas阿蒙尼奥斯·萨卡斯362

Amynthas III.阿敏塔斯三世225

Anaxagoras阿那克萨戈拉34, 113–117, 128f., 131, 135f., 151, 212, 217, 224, 228, 234, 237, 243

Anaximander von Milet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34, 50–56, 61, 86, 94, 175, 189, 211f., 234

Anaximenes von Milet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34, 53–56, 61, 94, 175, 211, 234

Annkreis von Kyrene昔勒尼的安尼克里143

Anselm von Chanterbury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407, 413, 431–438, 441ff., 527

Antigonos II. Gonatas安提柯·贡纳塔斯二世313

Antiochos von Askalon亚实基伦的安条克35, 355ff.

Antisthenes安提斯泰尼284f., 302

Antonius, Marcus马克·安东尼奥358

Apollonios von Tyan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362

Archimedes阿基米德23

Aristarchos von Samos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斯340f.

Aristippos von Kyrene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34, 303ff., 306f., 312

Ariston von Chios希俄斯的阿里斯顿339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44, 119ff., 145, 164, 191, 198, 262

Aristos von Askalon 亚实基伦的阿里斯托斯357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13, 16f., 23, 27f., 34, 39, 42–46, 50, 53, 56, 80, 83, 101, 109, 111, 116, 121, 125, 133, 175, 177, 192, 210f., 224–

282, 287ff., 291, 298, 305, 309f., 314–317, 319f., 326f., 345, 362, 366, 371, 383, 396, 405f., 433, 440, 452, 456ff., 462, 464, 467–473, 476, 480ff., 484, 486–489, 492f., 497–501, 503, 510f., 514, 519, 521

Aristoxenos von Tarent 塔伦图姆的亚里士多塞诺斯 72, 78

Arius 阿里乌 385, 388, 425

Arkesilaos 阿尔克西拉乌斯 34, 293–297, 314f., 339, 356, 491

Athanasius von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 385

Augustinus von Hippo 希波的奥古斯丁 35, 337, 369, 386–406, 408, 419f., 433, 465, 480, 484, 490, 514, 533

Averroës 阿维洛伊 413, 454ff., 459, 461, 467, 469f., 481

Avicenna 阿维森纳 413, 453–456, 465, 500, 528

Bacon, Roger 罗吉尔·培根 413, 476–478, 484, 505

Bakunin, Mic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286

Bardaisan von Edessa 埃德萨的巴戴桑 380

Beda 贝达 434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288

Berengar von Tours 图尔的贝伦加尔 432

Bergson, Henri 亨利·柏格森 371

Berkeley, George 乔治·贝克莱 302

Berlin, Isaiah 以赛亚·伯林 270

Bernardus Silvestris 伯纳度·西尔维斯特里 413, 458ff.

Bernhard von Clairvaux 克勒窝的伯纳德 448

Bias von Priene 普里埃耶的毕亚思 80

Bloch, Ernst 恩斯特·布洛赫 196

Boethius 波爱修 405ff., 420, 433, 435, 440, 444, 514

Boethius von Dacien 达西安的波爱修 466

Bonaventura 圣文德 413, 476, 513f., 522

Bonifatius VIII. 卜尼法斯八世485

Bradwardine, Thomas 托马斯·布拉德沃丁28

Brecht, Bertolt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342f.

Brutus, Marcus Junius 马可斯·尤里乌斯·布鲁图斯357

Buck, Pearl S. 赛珍珠304

Buridan, Johannes 约翰·布里丹413, 499–505, 520

Busch, Wilhelm 威廉·布什93

Cäsar, Julius 尤利乌斯·恺撒348, 350f., 357

Celio, Gaspare 伽斯帕雷·切利奥22

Charmides 卡尔米德24, 141, 147

Chlodwig I. 克洛维一世423

Chrysippos von Soloi 索罗伊的克吕西普34, 281, 314, 316ff., 320, 323f., 329, 333, 346, 348, 353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268

Cicero, Marcus Tullius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35, 290f., 294f., 345, 350, 355, 386f., 401f., 420, 512, 533

Clemens IV. 克雷芒四世476, 479

Clemens V. 克雷芒五世485

Clemens von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28, 80, 389

Condillac, Étienne Bonnot de 埃蒂耶纳·博诺·德·孔狄亚克302f.

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利吉耶里413, 531f.

Dareios I. 大流士一世54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162, 239

Deleuze, Gilles 吉尔·德勒兹286

Demetrios Poliorketes 德米特里一世283

Demetrios von Phaleron 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283, 338

Demokrit von Abdera 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34, 215–219, 224, 234,

237, 245, 290, 295, 299f., 314, 356f., 499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286, 297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16, 18, 244, 399, 436

Diagoras von Melos 米洛斯的狄奥戈拉斯 135f.

Diderot 狄德罗 15

Dietrich von Freiberg 弗赖贝格的迪特里希 413, 479–484, 486, 489, 493, 520, 525, 527f., 534

Diodor 狄奥多罗斯 129, 338

Diogenes aus Sinope 锡诺普的第欧根尼 23, 34, 284ff., 289f., 312

Diogenes Laertios 第欧根尼·拉尔修 38f., 80, 101, 129, 142, 285, 299, 313

Diogenes von Seleukia 塞琉古的第欧根尼 343

Diokles Karystos 狄奥克勒斯·卡里斯托斯 339

Diokletian 戴克里先 372, 382

Dion 狄翁 203f.

Dionysios I. 狄俄尼修斯一世 142, 203

Dionysios II. 狄俄尼修斯二世 203f.

Dionysius Aeropagita 亚略巴古的狄奥尼索斯（伪狄奥尼索斯） 407f., 428, 514, 526

Donatus 多纳图斯 384

Dondi, Giovanni de 乔万尼·德丹第 533

Dschingis Khan 成吉思汗 478

Duns Scotus, Johannes 约翰·邓·司各脱 413, 486–490, 493, 498f., 503, 516, 518, 526

Eckhart von Hochheim (Meister Eckhart) 霍赫海姆的爱克哈特（爱克哈特大师） 369, 413, 508, 524–529, 534

Eco, Umberto 翁贝托·埃柯 446, 500

Empedokles 恩培多克勒 26, 34, 99–109, 112, 115f., 150, 156, 164,

166, 171, 217, 221, 234, 288, 322, 459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8

Epiktet爱比克泰德333, 353

Epikur伊壁鸠鲁34, 299–303, 305–312, 314, 322, 327, 351, 401

Eratosthenes von Kyrene昔勒尼的埃拉托斯特尼34, 339f.

Eriugena, Johannes Scottus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426ff. 437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145, 185

Eusebius von Caesarea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400

Euthydemos欧绪德谟147

Feuerbach, Ludwig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32

Feyerabend, Paul保罗·费耶阿本德286

Ficino, Marsilio马尔西利奥·费奇诺22

Florus von Lyon里昂的弗洛鲁斯428

Franz von Assisi 亚西西的方济各476, 508f., 513f.

Frege, Gottlob戈特洛布·弗雷格14, 19, 317

Friedrich I. Barbarossa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462

Friedrich II.腓特烈二世467, 485

Fulbert福贝尔特432

Galen 盖伦216, 329, 451f.

Galilei, Galileo伽利略·伽利莱136, 504

Gerbert von Aurillac欧里亚克的格伯特429

Glaukon格劳孔24, 147, 163, 172, 187f., 215

Goethe, Johann Wolfgang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13, 219, 298, 327, 371

Gordon, Noah诺亚·戈登453

Gorgias高尔吉亚147

Gottschalk von Orbais奥巴伊斯的高特沙尔克426ff.

Gracchus, Gaius盖约·格拉古344

Gracchus, Tiberius提比略·格拉古344

Gregor (der Große, Papst) 格里高利 (大教皇) 388, 417ff., 421, 428

Gros de Foulques, Guy de居伊·勒格罗·德富克斯476 ; 亦见Clemens IV.
克雷芒四世

Grosseteste, Robert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475ff.

Hannibal汉尼拔343f.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格奥尔克·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2,
14, 16, 27, 119, 196, 229, 366, 368, 371, 512, 528

Hekataios赫卡泰奥斯54, 80

Heraklit赫拉克利特23, 26, 34, 79–86, 88, 91f., 109, 115, 129, 141,
150f., 156, 161, 167ff., 173, 234, 242, 271, 308, 316, 319, 337,
378

Herder赫尔德298

Herodot von Halikarnassos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38f., 96, 234

Hesiod赫西俄德47f., 51, 55, 61, 65, 84, 92ff., 99f, 132, 165, 234, 292

Hieronymus哲罗姆388, 400, 434

Hipparchia von Theben 底比斯的希帕琪亚285

Hippias von Elis埃利斯的希庇阿斯132, 147

Hippokrates von Kos科斯的希波克拉底219, 282, 339, 451

Hippolyt von Rom罗马的希坡律陀80, 83

Hippon von Rhegion瑞吉翁的希庞45

Hodscha, Enver恩维尔·霍查207f.

Homer荷马44, 46ff., 55, 61, 64, 92ff., 98, 132, 263, 292

Horaz 贺拉斯351

Hrabanus Maurus赫拉巴努斯·毛罗斯28

Hugo von Sankt Viktor圣维克多的雨果28

Hume, David大卫·休谟302, 326, 496f.

Husserl Edmund埃特蒙德·胡塞尔291

Ibn Rušd伊本·鲁西德454；亦见Averroës（阿维洛伊）

Ibn Sina伊本·西那453；亦见Avicenna（阿维森纳）

Innozenz II.英诺森二世430, 448

Ion伊翁96, 147

Isagoras伊萨戈拉斯123

Jesus von Nazareth拿撒勒的耶稣23, 374–377, 382, 390ff., 395, 403, 405, 417, 421, 435, 437, 461, 514, 528f.

Joachim von Fiore菲奥雷的约阿希姆461, 466, 478

Johannes (Evangelist)约翰（福音书作者）152, 375, 378, 527

Johannes (Offenbarung)约翰（启示录）203

Johannes von Gorze戈尔泽的约翰450f.

Johannes von Parma帕尔马的约翰513f.

Johannes von Salisbury索尔兹伯里的约翰440

Johannes XXII.约翰二十二世508, 521f., 525

Josephus, Flavius (ben Mathijahu)弗拉维奥·约瑟夫斯（本·马提亚胡）374ff.

Joyce, James詹姆斯·乔伊斯43

Julius II. 尤利乌斯二世21f.

Justinian I.查士丁尼一世415ff., 512

Kant, Immanuel伊曼努尔·康德14, 16, 27, 145, 258, 270, 474, 484, 497, 512

Karl der Große查理大帝423f., 433

Karl der Kahle秃头查理426, 428, 438

Karl Martell卡尔·马尔特尔423

Karneades von Kyrene昔勒尼的卡尔内阿德斯295f., 343, 402

Kebes 格贝150, 215

Kephalos克法洛斯187

Kerkedas von Megalopolis梅格洛波利斯的克尔克达斯286

Kleanthes von Assos阿索斯的克里安特斯314, 319, 323

Kleisthenes克利斯提尼123ff., 127

Kleitomachos克莱托马库斯341

Kleopatra VII.克利奥帕特拉七世358

Konstantin 君士坦丁372, 384, 387, 390

Konpernikus, Nikolaos尼古拉·哥白尼75, 504

Krates von Theben底比斯的克拉底斯285, 288, 313

Kratylos克拉底鲁147

Kritias克里底亚140, 147

Kritolaos克里托劳斯343

Kriton克力同147

Kroisos克洛伊索斯64

Laches拉刻斯147

Lamarck, Jean-Baptiste de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239

Lanfrank 兰弗兰克431f., 436

Leclerc de BuffonGeorge-Louis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239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戈特弗里特·威廉·莱布尼茨51, 474, 520

Leonardo da Vinci莱昂纳多·达·芬奇23

Leukipp留基伯216, 237

Licinius李锡尼372, 384

Lukrez卢克莱修352

Llull, Ramon拉蒙·鲁尔28, 477, 520, 531

Locke, John约翰·洛克302

Lucullus卢库鲁斯355

Ludwig der Fromme虔诚者路易424

Ludwig IV. der Bayer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521f.

Luhmann, Niklas尼克拉斯·卢曼19

Luther, Martin马丁·路德22, 359

Lykophron利科弗龙133

Lykurg吕库尔克69

Maimonides, Moses摩西·迈蒙尼德455, 467

Mani摩尼385f.

Mark Aurel马可·奥勒留35, 311, 353f., 364

Marsilius von Padua帕多瓦的马西略413, 521, 535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19, 69, 162, 198

Menander米南德281

Menippos von Gadara加达拉的墨尼波斯285f.

Menon美诺147

Metrodoros von Chios希俄斯岛的米特罗多鲁斯291, 294

Michael von Cesena切塞纳的米歇尔508, 520ff., 524, 530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23, 210

Montaigne, Michel de米歇尔·德·蒙田12

Moses摩西23, 359

Muhammad (Mohammed)穆罕默德273, 421f., 452

Musil, Robert罗伯特·穆齐尔13, 194

Nero尼禄352ff.

Newton, Isaac艾萨克·牛顿16, 289

Nicolaus von Autrecourt奥特库尔的尼古拉413, 495–499, 503f., 520, 532

Nietzsche,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尼采14ff., 18, 84, 132, 286

Nikias尼西阿斯62, 147

Nikolaus von Oresme尼科尔·奥雷斯姆413, 533, 535

Nikomachos尼各马可225, 250, 259

Nooteboom, Cees塞斯·诺特博姆195

Novalis诺瓦利斯371

Numenios von Apameia阿帕美亚的努梅尼奥斯359, 364

Octavian/Kaiser Augustus屋大维 / 恺撒·奥古斯都358

Olivi, Petrus Johannes彼得·约翰·奥利维28

Origines奥利金28, 325, 389

Orosius奥罗修斯401

Otto der Große奥托大帝429, 450

Otto III.奥托三世429

Otto von Freising弗莱辛的奥托440

Panaitios von Rhodos罗德的帕奈提奥斯35, 346–350

Parmenides巴门尼德34, 85–89, 101, 115, 147, 151, 168ff., 176, 211, 234, 366

Pascal, Blaise布莱士·帕斯卡尔330

Paulus von Tarsus (Saulus)塔尔索 (又译大数) 的保罗 (扫罗) 23, 337, 376–379, 382, 390ff., 394f., 407, 514

Pausanias鲍桑尼亚101

Peisistratos庇西特拉图123

Pelagius伯拉纠391ff.

Perikles 伯利克里114, 126f., 129, 133, 185, 334

Peter von Celle策勒的彼得440

Petrarca, Francesco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369, 413, 532f.

Petrus彼得23, 372, 395

Petrus Damiani彼得·达米安395

Phaidon斐多147

Phaidros斐德若147

Phaleas von Chalkedon 卡尔西顿的法里亚斯133

Philipp II.腓力二世227, 274

Philipp IV. der Schöne美男子腓力四世485f.

Philodemos von Gadara伽达拉的菲罗德谟斯351

Philolaos菲洛劳斯34, 74ff., 150, 341

Philon von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35, 359, 364, 374, 389

Phrynichos von Athen雅典的佛律尼科斯54

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ni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22

Pinda品达93, 97

Pippin der Jüngere矮子丕平424

Platon柏拉图13, 16f., 23–28, 34, 42f., 80, 83, 96, 101, 110, 116, 121, 125, 129f., 132, 136–159, 161–163, 166–186, 188–216, 218–223, 225f., 228, 230–235, 237ff., 242, 244, 246f., 249–252, 254–257, 260–264, 267, 269, 271, 273ff., 277, 280f., 284, 287ff., 293, 299, 308ff, 314ff., 319f., 326–329, 331f., 339, 350, 356–367, 370f, 378, 383, 389, 397ff., 401, 440, 442f, 448, 452, 456, 460, 490, 492, 500f, 519, 523, 528, 533

Plotin普罗提诺23, 35, 196, 362–371, 388, 403, 406ff, 427, 435, 452f., 456, 480, 526

Plutarch von Chaironeia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35, 53, 100, 114, 116, 293, 332, 360–363, 381

Polanski, Roman罗曼·波兰斯基328

Polemarchos玻勒马霍斯187

Polemon珀勒蒙288, 362

Polos 波罗斯147

Polybios von Megalopolis麦加洛波里斯的波里比阿345f.

Polykrates von Samos萨摩斯岛的波利克拉特斯71

Pompeius庞贝358

Porphyrios波菲利35, 362–365, 370, 388, 440, 443f.

Poseidonios von Apameia阿帕美亚的波赛东尼奥35, 347–350

Praxagoras von Kos 科斯的普拉克萨戈拉 339

Prodikos 普罗迪科斯 147

Proklos 普罗克洛斯 407

Protagoras 普罗泰戈拉 24, 27, 34, 129–131, 134ff., 147, 151, 156f., 161, 212, 228, 302f.

Prudentius von Troyes 特鲁瓦的普鲁顿修 428

Ptolemäus II. 托勒密二世 335

Ptolemäus IV. 托勒密六世 342

Pyrrhon von Elis 埃利斯的皮浪 34, 290–295, 302, 327, 491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23, 34, 70–75, 77ff., 84f., 91, 95f., 98f., 109, 132, 234, 308f., 340, 358f., 361

Pytheas von Massalia 马萨里亚的皮西亚斯 340

Raffael 拉斐尔 22, 24f., 129, 210, 262

Reutter, Otto 奥托·罗伊特 307

Roscelin, Johannes, von Compiègne 贡比涅的约翰·洛色林 444, 446

Rousseau, Jean 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5, 27, 353, 449, 512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罗素 148

Saint-Hilaire, Étienne Geoffroy 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 239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27, 148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 214, 366, 371

Schil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席勒 71, 77, 298

Schmidt, Arno 阿尔诺·施密特 340

Schopenhauer, Arthur 阿图尔·叔本华 12, 15, 18

Scipio Aemilianus der Jüngere, 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乌斯·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344ff.

Seleukos von Seleukia 塞琉古的塞琉克斯 341

Seneca, Lucius Annaeus 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 35, 337, 352f., 533

Sextus Empiricus塞克斯都·恩披里柯290, 296

Siger von Brabant布拉班的西格尔466

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429

Simmel, Georg格奥尔格·齐美尔69

Simmias西米阿斯215

Sokrates苏格拉底34, 116–122, 133, 136–142, 144–147, 150, 152, 154–160, 164, 170f., 173f., 176, 181f., 187f., 191f., 195, 202, 212, 215, 219, 222f., 228, 231, 234, 256, 262, 280, 283f., 290f., 293ff., 308, 313

Solon梭伦66f., 122ff., 182, 184, 186, 267, 269

Sophokles索福克勒斯145, 257

Speusippos(Speusipp)斯彪西波204, 286f.

Spinoza, Baruch de巴鲁赫·德·斯宾诺莎27, 327

Straton von Lampsakos拉普塞基的斯特拉顿289

Sulla苏拉355

Terpsion 忒尔西翁154

Thales von Milet米利都的泰勒斯34, 37–46, 49f., 55f., 61f., 128f., 175, 211, 234

Theaitētos泰阿泰德147, 155f., 159

Theoderich狄奥多里克404f., 417

Theodoros von Kyrene昔勒尼的忒奥多罗斯142, 147, 155

Theodosius I.狄奥多西一世372

Theophrast 提奥弗拉斯特111, 227, 288, 293

Thierry von Chartres沙特尔的蒂埃里413, 458ff.

Thomas von Aquin托马斯·阿奎那407, 413, 462, 466–474, 478, 480–483, 485, 488–491, 493, 495, 510–518, 520f., 523, 528, 535

Thrasymachos色拉叙马霍斯147, 187f.

Thukydides修昔底德62

Timaios蒂迈欧148, 164, 211, 213ff.

Timon von Phleius斐利亚修斯的蒂孟291f.

Umar乌马尔422

Urban IV. 乌尔班四世463

Valentinian I. 瓦伦提尼安一世387

Vergil维吉尔347, 351

Voltaire伏尔泰15, 170, 286

Wallace, Alfred Russell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239

Welles, Orson 奥森·威尔斯177

Whitehead, Alfred North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40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215, 298, 303, 305

Wilhelm der Eroberer征服者威廉430ff.

Wilhelm von Champeaux香浦的威廉439, 444

Wilhelm von Conches 孔谢的威廉413, 458ff.

Wilhelm von Moerbeke 穆尔贝克的威廉510

Wilhelm von Ockham奥卡姆的威廉413, 446f., 490–496, 498, 505,
508, 520–524, 526, 530, 532, 535

Wittgenstein, Ludwig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4, 19, 27, 167

Wollschläger, Hans汉斯·沃尔施莱格43

Xenokrates von Chalkedon卡尔西顿的色诺克拉底34, 227, 287, 294,
316, 356, 362

Xenophanes von Kolophon科洛封的色诺芬尼34, 132, 292

Xenophon色诺芬120f., 313

Zenon von Elea埃利亚的芝诺83

Zenon von Kition科蒂昂的芝诺34, 281, 313f., 323, 331f., 347, 353,
357, 523

Žižek, Slavoj斯拉沃热·齐泽克286

内容索引

Abstrakta 抽象68, 73, 157, 169, 196, 239, 287, 316, 366ff., 523

·亦可参见Idee 理念 ; Universalien 共相

Adoptianisten 嗣子论者425

Allgemeinbegriff 普遍概念 参见Universalien共相

Anthropologie 人类学 参见Mensch人类

Aporie 疑难153

Arbeit工作183, 193, 270f., 328, 349

·亦可参见Geld 金钱 ; Schulden 债务

Arianer 阿里安派信徒405

Aristokratie 贵族183, 185, 200f., 264, 267

Atom 原子 参见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

Benediktiner 本笃会 (修士) 418

Besitz 财产 参见Eigentum 财产

Bewusstsein意识87f., 396, 398, 400, 484f., 513, 520

Christentum基督教23, 140, 355, 363, 373–386, 408, 514

Demokratie 民主124ff., 133, 184ff., 200f., 267ff.

Demiurg 造物主 参见Schöpfung 创世

Determination 决定 参见Schicksal 命运

Dialektik 辩证法83, 154, 222, 233, 317, 366, 431ff., 438, 442

Diätetik 营养学 参见Gesundheit 健康

Dominikaner多明我会 (修士) 463, 465, 509f.

Donatisten 多纳图斯派 (信徒) 384

Ehre (*timé*) 荣誉64, 67, 186, 277

·亦可参见Timokratie 金权政治

Eigentum 财产67, 131, 186, 176, 207, 274f., 307, 348f., 352, 368, 515f.

Elemente 元素102f., 112, 214, 459

· Feuer 火83

· Luft (*aer*) 气53

· Urstoff (*archê*) 本原50, 55, 57, 83, 175

· Unstofflicher Stoff (*apeiron*) 非质料性的质料 (无定) 50, 51, 53

· Wasser (*hýdor*) 水44

· 亦可参见Substanz实体 ; Ursprung本原

Erbsünde 原罪66, 107, 378, 391f., 402, 404, 408, 437f., 442, 460, 513, 530

Erfahrung 经验 参见Wahrnehmung 感知

Erkenntnis 认识 / 知识76, 81, 87f., 112ff., 121, 130, 152, 154–162, 217, 230f., 239f., 290f, 315, 319, 397, 400, 444, 459, 467–477, 482f., 491–494, 496, 528, 533

· 亦可参见Bewusstsein 意识 ; Höhlengleichnis洞穴喻 ; Wahrnehmung 感知

Erleuchtung 照亮 / 启悟129, 173, 364, 400, 408, 445, 471, 479, 493, 502, 514, 526

Erlösung 救赎244, 364, 371, 392f., 395, 427, 461f., 488, 507

Ethik 伦理 (学) 122, 183f., 189ff., 249–252

· 亦可参见Politik 政治 ; Tugend 德性 ; Tugendethik 德性伦理学

Eunomie 良好秩序122f.

Franziskaner 方济各会 (修士) 476, 508ff., 513f., 516, 521f., 530

Freiheit 自由173, 260, 269f., 272f., 301f., 321–324, 369, 399, 503

Geist (*nous*) 精神93, 115, 217, 246, 366

· 亦可参见Seele 灵魂

Gelassenheit (*ataraxia*, *apatheia*) 心境平和 / 泰然自若190, 218, 292,

295, 308, 314, 318, 327, 329, 356f., 352, 530

Geld (*elektron, obulos*) 金钱 / 货币63–70, 73, 78, 82, 131, 183ff., 186f., 201f., 208, 263, 276ff., 331, 383, 507, 517–520, 534

· 亦可参见Eigentum 产权 / 所有权 ; Ökonomie 经济

Grechtigkeit 正义51, 86, 97, 138, 186–191, 266, 401f.

· 亦可参见Harmonie der Welt 世界的和谐

Gesetz (*nomos*) 法律 / 法则80–85, 97, 122f., 130, 132, 182, 184, 205f., 266, 350, 512

Gesinnung 品质 参见Tugendethik 德性伦理学

Gesundheit 健康99, 109f., 124, 329

Gleichberechtigung 平等110, 124, 198ff., 249, 270–274, 285, 331f., 352, 377, 511

Glück 幸运 参见gutes Leben 好的生活

Gnadenlehre 恩典学说393f., 399, 403, 405, 408, 417, 426, 428, 507

Gnosis 诺斯替派363f., 367, 385, 516

Gott 上帝 / 神360f., 363ff., 383, 392, 399

· das Eine (太) —85, 168, 365f., 370f., 388, 407, 453, 480, 526f.

· Gottesbeweis 上帝的存在证明

· 亦可参见Erlösung 救赎 ; Gnade 恩典 ; Neu-platonismus 新柏拉图主义 ; Religion 宗教 ; Schöpfung 创世 ; Theodizee 神正论 ; Theologie 神学 ; Trinität 三位一体

Gut und Böse 善 (与) 恶83f., 257, 326f., 378, 388, 408, 437

· 亦可参见Manichäer 摩尼教徒 ; Zoroastrismus 琐罗亚斯德教

Gutes Leben (*eudaimonía*) 好的生活107, 190f., 215f., 220, 249ff., 256, 258, 284, 303–306, 308f., 370, 448

· 亦可参见Gelassenheit 泰然自若 ; Tugend Gymnosophisten 苦修 (德性) 者290

Harmonie der Welt (世界的) 和谐50f., 74f., 329

Herrschaft 统治180, 193, 203, 267ff., 347, 370, 393f., 402, 522f.

· 亦可参见Macht 权力

Höhlengleichnis 洞穴喻172ff.

· 亦可参见Idee 理念

Idee (*idea*) 理念157, 169–172, 174–179, 195ff., 225f., 239, 287, 366f., 397, 472, 492, 527

· 亦可参见Abstrakta ; Höhlengleichnis 洞穴喻 ; Sonnengleichnis太阳喻 ;
Universalien共相

Intellekt 理智453f., 456, 464f., 467–470, 472, 480–484, 488f., 492ff., 500ff., 504, 527

Islam 伊斯兰教421ff., 442, 450–457

Isonomie 权利平等123f., 133, 186

Juden(tum) 犹太人 / 教335f., 359, 374, 282, 519

Kategorien 范畴230f., 241

· 亦可参见Universalien 共相

Katharer 清洁派516

Kausalität 因果性301, 321–324, 369, 473, 487, 496f.

· 亦可参见Schicksal 命运 ; Ursachen原因

Kirche 教会377, 383, 391, 393f., 416, 508f., 528f.

Konsequenzialismus 后果主义 252

Kosmos 宇宙211–216, 220, 234, 300f., 319, 341, 352, 473, 480, 504

Kyniker 犬儒主义者285f.

Kyrenaiker 昔勒尼学派 303ff.

Lebewesen 生物52, 103f., 220, 234, 300f., 319, 341, 352, 473, 480, 501

· 亦可参见Vegetarismus 素食主义

Liebe 爱(*eros, amor*) 58f., 100, 102ff., 106, 164f., 195, 322, 399, 406, 441, 449, 488

Logik 逻辑70, 81, 165, 168, 232f., 303, 316–319, 431ff., 441, 445, 468, 477, 489f., 493, 496, 520, 523, 533

Logos 逻各斯49, 55, 58, 60f, 78, 81f., 84f., 88, 91ff., 108, 112, 115, 141, 165, 168, 197, 232, 242, 271, 303, 316, 325f., 378, 442, 456

Lust 快乐 195, 221, 253, 302–306, 325, 387, 447

Macht 权力 / 力量41, 63, 106, 122, 125, 134, 188, 193, 198, 200, 205, 269, 382

· 亦可参见Herrshaft 统治

Manichäer 摩尼教 (徒) 385f., 389, 391, 403, 437, 516

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 46, 114ff., 151, 175, 177, 179, 197, 213f., 216ff., 219, 244f., 300f., 319f., 324, 356, 367, 468, 471, 483f., 498f., 502, 504

· 亦可参见Elemente 元素

Mathematik 数学70, 72ff., 76, 78, 89, 152f, 235, 397, 459, 477, 533

Mensch 人 (类) 106, 129, 151, 261ff., 312, 315, 325ff., 350, 406, 510

· 亦可参见Menschlichkeit 人性

Menschlichkeit (*anthropismós*) 人性312, 333, 381, 533

Miaphysiten 一性论者417

Mönch (*monarchos*) 修道士418, 420

Mythos 神话46–49, 57, 163, 165ff., 213

Natur 自然 / 本性50, 57, 98, 101, 132, 224, 233f., 236, 239–243, 301f., 318f., 321f., 325ff., 346f., 352, 498, 504f., 514, 534

· 亦可参见Wissenschaft 科学

Naturrecht 自然法 98, 108, 189, 251, 512, 516

Nestorianer 聂斯托利派417, 425

Neoplatonismus 新柏拉图主义364, 371, 381, 388ff., 392, 397, 399, 406, 407f., 427f., 452, 454, 472, 480, 526f.

Notwendigkeit 必然性302, 453f., 492, 496f.

Objektivität 客观性69, 81, 84, 88, 130f., 152, 230, 294, 315

Ökonomie (von *oikos*[Haushalt]) 经济 (源自家业) 61, 185f., 197, 274–278, 394, 431, 491, 511f., 515–519, 534

· 亦可参见Geld 金钱

Ordnung 秩序85, 86, 122, 189, 211, 229, 319f., 320, 346, 352, 467, 492, 501, 510f., 517, 524

· 亦可参见Harmonie der Welt 世界的和谐 ; Kategorien 范畴

Orphik 俄耳甫斯教 参见Seele 灵魂

Pantheismus 泛神论46, 116, 214, 319, 367

· 亦可参见Seele 灵魂

Papst 教皇417ff., 485, 507, 511, 521ff.

Pelagianer 伯拉纠主义者393, 507

Philosophie 哲学12f., 14f., 17, 19, 26f., 60, 307

·Verhältnis zur Theologie 与神学的关系359, 378, 395, 455, 485, 487f., 526, 535

Platonischer Dialog 柏拉图对话121, 144–148, 153, 163f.

Platonismus 柏拉图主义288, 357f., 360, 371, 363, 371, 381

· 亦可参见Neuplatonismus 新柏拉图主义

Politik 政治192, 260, 264f., 267f., 272, 310f., 332, 370

· 亦可参见Aristokratie 贵族制 ; Demokratie 民主制 ; Eunomie 良好秩序 ; Isonomie 权利平等 ; Timokratie金权政治

Polis 城邦183ff., 191f., 261, 270, 277, 310, 510

Politie 政治 268, 510

Prädestination 宿命 参见Schicksal 命运

Psychologie 心理学369, 396f., 490

Raum (*topos*) 空间 73, 235, 300, 498f.

Recht 法 / 权利 / 正义51, 85, 122, 266, 348, 416, 431, 511f., 516

· 亦可参见Naturrecht 自然法

Religion 宗教55, 91, 131, 380–383, 455

· 亦可参见Theologie 神学

Realität 真实75, 91, 217, 492, 496

· 亦可参见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 ; Erkenntnis 认识 / 知识

Schicksal 命运 98, 301f., 321–324, 352, 368, 426f., 461f.

Scholastik 经院哲学438, 517

Schöpfung创世 / 造物213, 235, 241, 300f., 319, 360, 367, 397, 455,
458, 480, 526, 527

· 亦可参见unbewegter Beweger 不动的动者

Schrift 文字 参见Sprache 语言

Seele 灵魂

· daimon 精灵105f.

· psyché 灵魂 46, 92ff., 244

· Teile der Seele 灵魂的各部分189, 219ff., 320f., 470

·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灵魂不朽94f., 163, 215, 217f., 220, 222f.,
246, 287, 377, 392, 470, 502

· Verhältnis zu Körper (*sóma*) und Materie与身体 (肉体) 及物质的关系
93, 95, 108f., 244ff., 300, 321, 324, 367f., 470

· Wiedergeburt重生 / 来世96f., 221f., 246, 324f., 367f.

· 亦可参见Geist 精神 ; Intellekt 理智 ; Pantheismus 泛神论 ;
Psychologie 心理学 ; Vernunft 理性

Seelenfrieden 灵魂安宁 参见Gelassenheit泰然自若

Sinnliche Wahrnehmung 感官知觉 参见Wahrnehmung 感知

Skepsis 怀疑 (源自skeptikoi) 161, 289, 291–297, 491

Sonnengleichnis 太阳喻174f.

Sophisten 智者128–131, 133, 151f.

Sprache 语言56f., 88f., 230f, 239f., 316f., 384, 400, 412, 424, 446,
477, 491f., 494f., 522f.

Stoa 斯多亚派289f., 312–333, 346, 351ff., 356

Substanz (*substantia*) 实体87, 239, 324, 445f., 468

· 亦可参见Elemente 元素

Techniker (*physikoi*) 技术专家 (自然研究者) 41, 54, 348

Templer 圣殿骑士507

Theodizee 神正论51, 395, 408

Theologie 神学300ff., 307, 335f., 419, 441f., 455, 464, 469, 472, 479, 488, 491, 510, 526

negative Theologie 消极神学371, 407f.

· 亦可参见Gott上帝 / 神 ; Religion宗教

Timokratie (von *timé* [Ehre]) 金权政治 (源自名望) 67, 184, 267f.

Trinität 三位一体360, 364f., 378, 385, 405, 417, 425, 441

· 亦可参见Universalien 共相

Tugend 德性 252–260, 264, 319f.

Tugendethik 德性伦理学192, 252, 264, 276f., 326f., 447f.

Unbewegter Beweger 不动的推动者237ff., 363, 454, 469, 473, 504

Universalien 共相156f., 406, 443–447, 486f., 489, 491f., 493ff., 499–503, 512f., 523

Universalienstreit 共相之争 参见Universalien共相

Ursachen (*causa*) 原因236, 238, 469

· 亦可参见Kausalität 因果性

Urteilesenthaltung (*epochê*) 悬置291

Vegetarismus 素食主义98, 100, 107, 288, 361f.

Vernunft 理性14, 49, 57, 60, 70, 78, 81, 88, 91, 93, 108, 151, 160, 166f., 170, 189, 194, 213f., 220ff., 238, 242, 246, 251, 254, 271, 315f., 318, 320, 325ff., 352, 370, 387f., 428, 431ff., 435, 445, 447, 454, 482, 501, 523, 528, 530

· 亦可参见Logos逻各斯 ; Techniker 自然哲学家

Wahrheit 真理 / 真话 / 真相13, 19f., 88, 112, 114, 130f., 138f., 151f.,
161f., 186f., 217, 232f., 255, 290f., 295, 303, 315, 359, 371, 381,
384, 391, 399f., 435., 440ff., 445, 455, 472, 477, 483, 495ff., 514

Wahrnehmung 感知 / 知觉112, 114, 155–159, 168ff., 173, 217, 229–
231, 234f., 291, 302f., 315f., 388, 397, 447, 472, 480f., 486f.,
495f., 528

Weltseele 世界灵魂 参见Pantheismus 泛神论

Weltuntergang (世界) 末日321f., 324, 379

Wesen 本质152f., 169, 171f., 212f., 232, 239, 290, 453, 482, 534

Wissen (*episteme*) 知识13, 59, 129, 154, 155–160, 230, 257, 294, 303,
309, 397, 440f., 458, 486f., 491f., 494

Wissenschaft 科学40, 49, 55f., 60, 290, 348, 460f., 468, 472, 475, 476

· 亦可参见Natur 自然 ; Wissen 知识

Zahl 数字 参见Mathematik 数学

Zeit (*chronostempus*) 时间73, 235, 395f., 433f., 461, 470, 484, 498f.

Zoroastrismus 琐罗亚斯德教378f., 385, 391, 437

Zivilisation 文明163, 165, 192, 347

Zweifel 怀疑 参见Skepsis 怀疑

图片说明

说明所示页码为本书方括号内的数字

第21页：

拉斐尔（Raffael），雅典学园（Die Schule von Athen）

© picture-alliance / akg-images

所有插图：

© The Saul Steinberg Foundation/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York

1.第11页

《线》（*The Line*），第一面板（first panel），1959年

油墨纸本，48.3×61cm

索尔·斯坦伯格基金会（The Saul Steinberg Foundation），纽约

2.第37页

无题，1960年

油墨纸本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60年6月18日

3.第63页

无题，1961年

油墨纸本，36.8×58.4cm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61年10月7日

4.第90页

无题，1948年

油墨纸本，36.2×28.6cm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5.第118页

无题，1961年

油墨与铅笔纸本，36.8×29.2cm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61年7月29日

6.第149页

无题，约1965年

油墨纸本

最早刊登于斯坦伯格的《巡视者》（*The Inspector*），1965年

7.第180页

《彩虹反射》（*Rainbow Reflected*），1974年

油墨、彩色蜡笔、彩色铅笔、铅笔以及橡皮图章纸本

74.6×100.3cm

索尔·斯坦伯格基金会（The Saul Steinberg Foundation），纽约

8.第210页

《检阅》（*Parade*），1952年

混合媒介纸本，36×57.5cm

私人收藏

9.第248页

《双脚在椅》（*Feet on Chair*），1946年

油墨与铅笔纸本，25.1 × 23.5cm

安东·范达伦（Anton van Dalen）收藏

10.第279页

无题，1961年

油墨纸本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61年7月29日

11.第298页

《爱欲I》（*Erotica I*），1961年

油墨及彩色铅笔纸本，36.8 × 58.4cm

索尔·斯坦伯格基金会（The Saul
Steinberg Foundation），纽约

12.第334页

无题，1977年

油墨、水彩及彩色蜡笔纸本，36.8 × 53.3cm

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索尔·斯坦伯格基金会（The Saul Steinberg Foundation）赠送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77年11月21日

13.第373页

无题，1966年

油墨纸本

最早刊登于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我对绝对之物的探寻》（*My Search for Absolutes*），1967年

14.第415页

无题，1966—1967年

油墨纸本，50.2 × 32.9cm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最早刊登于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 , 《我对绝对之物的探寻》 (*My Search for Absolutes*) , 1967年

15.第450页

无题, 1966—1967年

油墨纸本, 50.2 × 32.9cm

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最早刊登于保罗·蒂利希 (Paul Tillich) , 《我对绝对之物的探寻》 (*My Search for Absolutes*) , 1967年

16.第475页

《A至B》 (*A to B*) , 1960年

油墨及拼贴纸本

最早刊登于斯坦伯格 (Steinberg) , 《迷宫》 (*The Labyrinth*) , 1960年

17.第506页

无题, 1969年

油墨纸本

最早刊登于《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 1969年8月30日

译后记

不久之前，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他的畅销哲学书《魔术师的时代：哲学的黄金十年（1919—1929）》的中译本出版时接受了一个访谈，引起了中国学界相当广泛的共鸣。艾伦伯格谈到了当代德国哲学的贫瘠化，并指出“学院成了产业，围着自己转，生产空话。有人算过，一篇哲学学术论文平均只有两个半读者，审稿的评阅人可能都要比读者多”。而他本人则一直致力于哲学普及化的工作，以对抗哲学学院化的倾向，他从2011年开始主编的双月刊《哲学杂志》发行量已经超过10万，这本以“将问题带向市场，让公众帮助解决”为使命的哲学刊物，可能比所有德语哲学的主流学术期刊发行量加起来还多。

近20年来，哲学的大众化转向在欧洲已成为潮流。在经历了从康德、黑格尔、谢林到狄尔泰、卡西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院化时代之后，哲学正在新的时代境况中努力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变得平易近人、接近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学院化和专业化的哲学发展前景越来越狭窄，在现代知识系统中不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让哲学重回生活、恢复古典时期哲学面貌的理念给了这些致力于哲学大众化的思想家信心和动力，毕竟在苏格拉底时代，哲学是街头巷尾人人可谈之事，而在近代以前，大部分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哲学家也都不在大学哲学系里谋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非学院化时期实际上在哲学史上占据了大半篇幅，而我们将之作为论题提出来，则是19世纪末哲学进入完全的学院化时代的伴生现象。粗略地看，如果说学院化哲学体现出专业化、系统化的“经院哲学式”的共同特征，那么非学院化的哲学则更多的是反体系、反系统、更易被普通人阅读和接受。叔本华、尼采是后一阵营的佼佼者，差不多同时代的施泰纳（Rudolf Steiner）也可以算是非学院哲学家中的一员，他在教育、建筑、艺术、农业、医疗等领域对日常世界的影响，超过了之前和之后的大部分学院哲学家。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在德国大型书店里的哲学专柜前驻足，就会看到大部分仍是尼采、施泰纳的著作，以及当代流行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以及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畅销著作，而不是康德、卡西尔或者胡塞尔的大部头论著。从某个意义上说，

这些畅销哲学家维持着今日德国哲学之活力。而这些非学院派的哲学畅销书虽然造就了一种大众能够阅读的哲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变得流俗肤浅或者哗众取宠，而只是努力将细密的哲思用亲近大众的文风表现出来。就如同在本书中，作者书写的不是老套的哲学家历史，也不是单纯的问题史或者概念史，而是把哲学史叙事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叙述，是更亲近日常生活世界的思想史。

本书作者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是目前德国当红的大众哲学家之一，被称为“摇滚歌星式”的哲学家，他的流行哲学读物和Ted演讲使哲学被大众分享。最近他还从大名鼎鼎的彼得·斯劳特戴克和吕迪格·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手中接下了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脱口秀节目“哲学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担任主持人，节目名称则直接改为“Precht”。尽管他与新媒体的亲近、将哲学包装为文化消费品的做法受到了各方的非议，但至少这提供了一条学院化之外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思想的深刻性和严肃性，与流行性、商业化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本书的翻译工作始自2016年上半年。当时我之所以接手这个翻译，一方面是由于一直关注当代哲学大众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也是读过德文文本后觉得全书语言比较流畅通俗，易于翻译。因此我请杨妍璐、周焯楠、王朝璐和林延伟四位研究生与我共同翻译，初稿完成后，又邀请刘环、李逸超和薛宇杰共同完成校对和部分重译。因此本书的翻译是一个团队共同合作完成的，具体翻译分工按章节顺序如下：周焯楠、王俊；杨妍璐、王俊；王朝璐、王俊；杨妍璐、刘环；周焯楠、薛宇杰；王朝璐、刘环；林延伟、薛宇杰；周焯楠、薛宇杰、王俊；王朝璐、王俊；杨妍璐、李逸超、刘环；周焯楠、薛宇杰；王朝璐、李逸超、刘环；杨妍璐、薛宇杰；周焯楠、薛宇杰；王俊；杨妍璐、李逸超、刘环；王朝璐、王俊；周焯楠、王俊；林延伟。王俊完成整部译稿最后的校对修改。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世纪文景的李頔编辑的牵线和督促，而薛宇杰编辑为此书付出了比常规责编多得多的辛劳。还有帮助校对的刘环博士和李逸超博士，以及翻译初稿的周焯楠、杨妍璐、王朝璐和林延伟四位同学。

希望本书在中文世界也能够畅销，起到哲学普及的作用。

王俊

2020年6月21日于浙大紫金港

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季风 吹拂的 土地

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Michael Vatikiotis

[英] 迈克尔·瓦提裘提斯——著

张馨方——译

文
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季风 吹拂的 土地

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Michael Vatikiotis

[英] 迈克尔·瓦提裘提斯——著

张馨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 （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
（Michael Vatikiotis）著；张馨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ISBN 978-7-208-16955-5

I．①季… II．①迈…②张… III．①东南亚-历史 IV．①K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1597号

书 名：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

作 者：【英】迈克尔·瓦提裘提斯

译 者：张馨方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955-5/K-3050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by Michael
Vatikiotis

Copyright © 2017 by Michael Vatikiot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使用

献给雅尼克、克洛艾与斯特凡

我们——扮演走狗、猎犬——只能看到这出戏的片段。

Kita—andging diburu—hanja melihat Sebagian dari sandiwara sekarang.

——凯里尔·安瓦尔，《1946年笔记》
(Chairil Anwar, *Notes for 1946*)

目 录

序言

第一部 权力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第六章 逐步开放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第二部 冲突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第十章 信仰冲突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鸣谢

参考资料

序言

瞧这片终年潮湿、林相稠密、天气溽热的土地，再看人的影响——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抵抗习惯是将环境打造得适宜人居且肥沃丰饶。这里地貌平坦、耕作兴盛，维护良好的零散土墩围绕着人们赖以维生的水稻。平原上翠绿植被层层交叠，外围是坡度缓升的山丘，一路延伸到海岸，与布满柔细白珊瑚沙的辽阔沙滩相连，一旁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遮蔽，再往外便是平静而波光粼粼的碧蓝大海。这是典型的东南亚景致：世界上很少有风景如此动人，生命力又如此丰沛的地方。

每当我对欧洲朋友提起自己住在东南亚，他们总说我何其幸运，能够享受温暖的热带气候、生气蓬勃的文化与异国风味的食物。西方人一向对亚洲怀抱着浪漫憧憬，而这样的想象源自早期的旅人，他们整日与粗织羊毛为伍，还必须恪守严谨的宗教戒律，因此初次在远东见识到色彩鲜艳的丝绸及开放的社会风气时，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观感带来广泛的影响，从“东方”宗教与文化对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到现代曼谷或华丽或花哨的惹眼之处对观光客的直觉刺激。“西方什么都小，”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¹⁾（Jules Michelet）曾如此写道，“希腊的土地小到令我窒息；犹地亚⁽²⁾（Judea）的气候干燥到让我喘不过气。于是我将目光转到高傲的亚洲，魅力无穷的东方。”

但对我而言，出走东南亚并不浪漫。起初我以学生的身份来此，后来则是专业人士。随着时间流逝，我认识到现代东南亚的表里不一：一种面貌投射出惊人的社会与物质发展，即旅游宣传中“真实的亚洲风貌”，包含五星级的购物中心与添加当地香料的顶级美食，加上永远礼貌地面带微笑、英语流利且衣着时髦的人们；另一种内向的面貌则是冷酷无情的集权主义，不顾因争权夺利的乱局而被舍弃的人民。考虑赚取的收入与提供的安全感，那些幸福笑容面具的重要性难以估量：尽管泰国军政府镇压反抗势力并阻拦选举，仍有数百万名观光客蜂拥而至；新加坡严格执行限制言论的法律并据此逮捕了少数博主，但大型国际银行纷纷进驻寸土寸金的商业重镇，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也依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日旅客人数高达20万；缅甸回归军政，部分地区暴力抗争不断，却丝毫浇熄不了大批欧美观光客在豪华邮轮上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欣赏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欲望。

热带地区资源富饶的微笑面具背后，潜藏着稳定与生存长期饱受威

胁的现实，由于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日益不平等，西方一向（或至少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权力与法治逐渐消失，这样的处境越发严重。印度尼西亚农民成了贷款与气候变迁的受害者；柬埔寨少年在泰国渔船上做牛做马；来自缅甸的罗兴亚（Rohingya）移民挨饿受虐，被人口贩子丢弃在泰缅边境等死；无数的妇女与女孩被迫卖淫；冲突区的无辜家庭陷在反叛军与政府军队之间，生活岌岌可危。本书希望能破除这个热带世外桃源的表面神话，就此，意指媒体过度简化人民奋力对抗令人难以忍受的专制政权的事实。接下来的章节，我希望根据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地区的专业与个人经验，精要提出对当地国家与社会的了解。当中的论点虽然往往过于严苛，却发自内心。身为旅居东南亚四个主要城市与十个国家的旅人、作家及专业人士，我希望能与读者更精确而浅白地探讨，这个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地区之一，为何能够生生不息。

本书是一段探索东南亚的旅程，但并不是以随兴旅人的传统角度出发。这是一段漫长的观察经历：四十年来，我当过学生、记者、作家，然后是力图终结武装冲突的调停者。这段旅程旨在解开疑惑，深入此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根源、现代国家主权的构成影响，接着检视国家地位如何影响当代政治潮流，并长期引发激烈的人民抗争与暴力冲突。

东南亚位处亚洲核心，而目前亚洲的私人财富规模与投资规模在近代历史上首次超越了欧洲。该区十个国家的面积总计近320万平方公里、人口6.26亿，涵盖类型繁多、复杂度高且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与人种。在中世纪的某段时期，大部分的文明世界凭借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取财富。中国商人进口织物与稻米；阿拉伯人、印度人与欧洲人为了争夺贸易资源和保存食物的香料兵戎相见。这些商贸活动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在美洲或非洲仍鲜为人知的时代，贸易帮助塑造了这些王国与文化，向世界展现出开放的面貌。葡萄牙人于公元1511年首度征服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马六甲，三年后，西班牙人在古巴哈瓦那（Havana）建立殖民据点。

此后，东南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各大势力争相在令人慵懒倦怠的爪哇（Java）、马来半岛及中南半岛（Indochina）热带地区建立长期帝国。

五百年后，东南亚依旧是外来势力相争的战略要地。中国与美国为了该地的战略优势针锋相对，使这里成为新一代国际权势角力的主要战场。中国、欧洲、美国、日本与韩国的企业巨头，互相竞逐庞大的消费

市场与重大基础建设的交易。曼谷、雅加达、吉隆坡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大城市，成为精品与新兴设计师品牌的滩头堡；光是曼谷市内的购物中心，便总计占地20平方公里。同时，豪华饭店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争取密切合作计划的官员，无论是针对扩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议，或是各国与外来势力结盟的防卫合作协议，目光都对准了这片向来是连接东西方战略公路的地区。过去东南亚经常遭受外来势力入侵，如今亦然。

东南亚有三个国家毗邻中国，是地理位置最靠近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区域。这是恩典，也可能不是。曾有数世纪的时间，中国基本上是友善的邻国，而那些东南亚的统治者大多象征性地向这个幅员辽阔的北方邻国进贡，借此获取贸易、科技与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欧洲国家殖民东南亚的数百年间，中国势力减弱、日益封闭，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为止。从那时起，中国坚决主张自身影响力不容小觑，之后释出经济诱因，近年来则秉持强势态度。随着西方势力亟欲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与权势，东南亚也成了各国据以共同牵制中国的支点。对此，我在本书中持相反意见，就所有主要的西方体制、势力与军事力量而言，东南亚地区的权力与冲突演变反而使它们更难维持有效的影响力，长远来看，也让中国可以更轻易地拥有主导优势。

最初，早在欧洲人于16世纪入侵前，已经有几批大多来自北方的移民在东南亚苍翠繁茂的山谷与宝石般珍贵的土地上建立王国。他们种植稻米，与原住民进行贸易；他们借用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的元素发展王权与行政制度，利用人民对宇宙中心的强烈信仰，要求他们臣服于国王与皇族。在殖民者引进中央集权制之前的时代，各公国透过贸易与姻亲缔结松散联盟，向边远王国象征性进贡，并且享有开放自治权。近代以前的聚落集中在村庄与军事要塞星罗棋布的山谷，仰赖灌溉充足的稻田与果园维持生计；村落外围山林密布，是野生动物与恶灵的栖息地。低悬的云层笼罩分布于山谷边缘的林丘时，可以想见从前人们是多么敬畏那些无形的灵魂。所有信仰多少都有部分根植于人们不可见的事物。

尽管东南亚已经为滥伐森林付出代价，但过去辽阔狭长的国土与今日相差无几。主要的威权中心（即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的转变超乎想象。这些城市在开放外贸与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发现逐渐扩张的欧洲势力已侵门踏户。到了19世纪末，仰光、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达）与河内等殖民城市可见八角形石造楼房与有轨电车，风格与规模均可媲美欧洲殖民母国的建设。殖民时期于1945年告终之际，从太平洋战争中崛起的新兴独立国家为人民带来高度希望。缅甸、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全以羽翼已丰的民主政体之姿获国际认同为独立国家，然而，当中没有一个政体能长久维持自由与民主地位。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政治局势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现代化与社会觉醒的力量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资源重新分配与抽象平等的意识所吸引。这股力量与那些在殖民限制下蓬勃发展、畏惧在新民主政权下失势的传统精英互相抵触。面对推翻先前努力的矛盾处境，前代殖民势力选择加入传统精英的行列，因为眼前他们最畏惧的是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局势促使军政府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下进一步壮大，扼杀了东南亚昙花一现的自由契机。1962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体彻底瓦解；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政变遭到压制；1970年，柬埔寨军队干政。1970年代中期，泰国的左派抗争遭到军队无情镇压。作风强硬的领袖，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³⁾，采取煽动平民的策略及铁腕手段，漠视前代遗留的民主体制。到了1980年代中期，专制政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常规。

集权政府进化与扎根之际，世界上其他国家冷眼旁观。由于这些政权倾向表现仁慈的一面，努力让人民获得温饱而非一味监禁或滥杀（虽然他们确实也会这么做），因此很容易让人视而不见，甚至做出残暴行为也会受到宽容，因为他们可以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195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坐视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的武装镇压与任人唯亲，因为他是激进的反共分子，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曾说，“他是我们在东南亚唯一的人手。”1960年代中叶，印度尼西亚政府杀害近五十万名共产主义嫌疑分子，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发动制裁。这种现象如今依然存在：201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庭在海牙召集的审判小组裁决，美、英、澳三国应为他们口中的“种族屠杀”负责，国际社会并未展露一丝愤慨之情。

东南亚地区的冷战预示了镇压与犯罪免于受罚的黑暗时代，这从当时的著名照片中清楚可见：头部中枪倒卧路旁的越共（Vietcong）可疑分子；在西贡（Saigon，即现今的胡志明市）市区自焚的和尚；以及遭美军无意义地毯式轰炸的柬埔寨。讽刺的是，1975年美军仓皇从西贡大使馆屋顶搭机撤退的象征性照片，说明共产主义在越南大获全胜，替东南亚的经济繁荣铺路。曼谷市区弥漫着共产主义即将入侵的恐惧，泰国人不惜将土地贱价售给市内的锡克教（Sikh）社群，造成公寓数量激增，地产开发业飞快成长。

1970年代中期，中南半岛动乱结束，压抑已久的经济势力得以建立强大的贸易与制造业前哨基地，复制一百多年前吸引帝国势力进驻的部分优势，包含训练良好且为数众多的低廉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战略海港的进出权限。自1980年代中叶起，东南亚刚萌芽的四小龙经济体迅速成长，以致十年后的某个时间点，经济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以此作为全球经济新模型。这很容易被误认为全球成长的新面貌——曼谷、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与新加坡等城市，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映财富与产业的惊人发展。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领导人对西方嗤之以鼻，并发表亚洲价值取代西方民主的言论。来自西方金融重镇的投资银行为了利益一面倒表示支持，从新兴股票市场中大赚数十亿美元。这座经济高塔看似会永远屹立不倒，直到逐渐崩塌为止。

1997年，由货币投资市场引发的金融风暴揭露了高塔的严重裂缝，其中以治理面的缺陷最为严重。这些经济体尽管快速成长，却缺乏基本的监管，也与所属的社会脱节。半民主或独裁政权下的快速经济成长，鲜少公开运作机制或遵循制衡原则，涓滴效应微乎其微，收入差距也急速扩大。因此，当市场瓦解，大笔资金瞬间蒸发，人们惊觉没了工作与保障，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动乱与抗争，暴露了现代政治的上层结构其实发展不良，社会也分歧剧烈。

近十五年来，东南亚民主稳定进步，政府也变得更加开放与透明。经济情况大致复苏，截至21世纪头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为5%。东南亚再次蜕变为充满机会的区域，经济总值达2.4兆美元，目前是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与印度的第五大经济区域。2015年，曼谷素坤逸路（Sukhumwit Road）一家酒吧举办了一人15美元便可无限畅饮与享用自助吧的优惠活动，许多二十多岁的欧洲青年蜂拥而至。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然而，东南亚在魅力动人、华丽炫目及夜夜笙歌的外表下，暗藏着黑暗面。阿根廷或许是南半球的落后国家，但它的背后有军政支持与规范。综观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局并不如1990年代晚期大众所期盼的进步稳定。其中有几个主要国家，军方在政治上扮演着外显或隐蔽的角色：近半个世纪以来，泰国已发生过两起军事政变；马来西亚重启严

格的国家安全法；柬埔寨陷入政治暴力的恶性循环；菲律宾备受爱戴的强人总统自2016年5月当选后，便放任军队残杀数千名毒品嫌疑犯，还在联合国质疑此政策违反人权时表示，“我一点也不在乎”。

当代东南亚深受半民主状态所苦。过去四十年来，当地的民主发展不断面临过渡期，从1970年代中期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后期开始，最终导致十年后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在菲律宾爆发。由于各种原因与方式，这波政治解放浪潮曾陷入停滞，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落幕后始卷土重来。然而，至今未见显著转变。无论在选举或媒体上，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皆已衰微，而且经常遭到当局以违法及危害安全为由抵制。无论是马来西亚新立的安全与暴动法规、泰国的军事政变，或是菲律宾无视法律或司法自治权的民粹主义者，东南亚的民主之路似乎永远滞碍难行。对多数人民而言，更悲惨的是仅有极少数人受惠于民主化发展。如今，“寡头政治”一词用来指涉在地方上贪腐与独占权力以保有优越地位的精英分子。前泰国外交部长兼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立于1967年的区域组织）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曾透露，身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松懈的代价是你永远都无法承受的”。

因此，折磨着东南亚社会的根本问题至今悬而未解。这十个国家里，财富与福利极度不均的现象持续引发动荡与对立，不是无政府武装激进分子为博取自治权与地域认同而发动抗争，就是大规模抗议运动在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的街头上演。更棘手的是，如此的不平等为宗教极端主义与冲突埋下火种。该区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当地的普及程度一向胜过基督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及泛灵论者和平共处，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地区。但是近年来，这样的平衡遭到破坏。中东经由南亚散播的保守伊斯兰的狭隘理念凭借不平等与绝望而壮大，并且灌输人们偏见与仇恨的价值观，即便只影响少数群众，也受到有心人士的利用与渲染以达其政治目的。正当非洲穆斯林多数地区（特别是游牧区域）长久遵循的宗教共存模式为暴力冲突所侵扰时，东南亚也出现逐渐取代传统和平共处模式的偏执倾向。

正因如此，当地的稳定局势迟迟未竟，政治动向变幻莫测，社会不断变动。若想深入探究全球经济为何日益趋向亚洲，倚赖东南亚贸易及有利消费导向经济急速增长的投资或制造产业，就必须了解东南亚政治为何如此变化无常与裹足不前。

本书检视东南亚的势力动向与令人困惑的冲突事件，我也针对这个如此吸引人又具战略意义的区域局势提出个人见解。除了满足自己回顾过往经验的欲望之外，我也希望那些数世纪来无论以何种方式从东南亚丰沛资源获利的强权（无论是摄政者、迫害者或仁慈的封建领袖），都能够从本书汲取一些洞见。本书将不断回溯东南亚现代史上影响社会甚巨与阻碍政治进展的冲突起点：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1970年代初菲律宾的戒严时期，以及同一时期泰国当局对抗议学生的武力镇压，当然还包括1975年之后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发起的种族大屠杀。不公不义与免责的伤痕挥之不去，持续影响着政治转变与迟滞的现代趋势。书中不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多元性和多种族所受的威胁。东南亚社会的特色，是数世纪以来支持着稳定局势的动态多元性，不同种族与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代表这个社会整体上避免了欧洲与中东的偏执分裂现象。现代化与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危及这种和平共存的社会模式，而历史上也首度出现分裂不同宗教与种族的强烈力量，让稳定的社会岌岌可危。

西方政府奋力维持其亚洲势力的同时，也必须了解势力的分布及社会的压力点。同样地，倘若决策者依旧困在帝国框架中坚守狭隘眼光，将可能与中国新制定的“大国”政策发生冲突。由于四十年来在东南亚先任记者、后担任调停者的经历，我大多以势力、特权与暴力冲突作为论述的架构。我从未在当地经营公司、兴建难民营或在学校任教，而是埋首研究多彩多姿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因此得以近距离见证权力的更迭，以及这个动态经常对社会其他层面造成的极端危害。

写作本书期间，我一直受到许多朋友与同事的敦促、劝勉与鼓励。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过程，执笔心境诚惶诚恐：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视为家的东南亚，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以谨慎的态度去解释事情。若是过于草率地解释特定的趋势或现象，便会忽略了伺机而动的反例，误将改变视为永无止境，以及错把发现当成新的现象。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误导他人，或是被误导。身为“洋鬼子”与常驻东南亚的田野记者，我深刻意识到以适当怀疑态度调和尖锐分析的必要。因此，在进入本书之前，我认为非常适合借用已故的澳大利亚田野记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所说的话来破题。他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写过多篇备受尊崇的专栏，其中某一篇的序言写道：“英勇与愚昧是本周探讨的相对主题。”

(1) 1789—1874，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及诗人，著有《法国史》

(*Histoire de France*)、《女巫》(*La Sorcière*) 等作品。——译者注，下同

- (2) 古代以色列地（相当于今日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山区地带从《圣经》记载到罗马帝国时期，直到现在的通称。
- (3) 根据马来西亚取名的规则，“Mahathir Mohamad”的“Mohamad”是父名，而非姓氏，故只称马哈蒂尔。

PART I

第一部 权力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在你面前——微笑、皱眉、诱人、自负、卑鄙、无趣或野蛮，总是无声低语，“来这里一探究竟”。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
（*Heart of Darkness*）

上了当与不请自来，正是我在1979年初抵东南亚的心情。泰国国际航空DC-10飞机降落在曼谷廊曼机场（Don Muang Airport），我走出机门，一阵刺鼻的有机气味与潮湿的热气迎面而来，感觉就像在高温的厨房里被人拿湿毛巾狠甩一巴掌。这场知觉的震撼洗礼，把我瞬间从西方拉到了东方世界。我坐在坚固的丰田卡罗拉后座，准备从机场前往市区，车子一路疾驶，快速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与好几座装饰华丽的寺庙，寺庙的雕花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不久后，车子开进市区，街道旁脏乱的混凝土店面林立，空中交杂垂挂着无数电缆。这幅景象颇具后工业风，令人失望，有点像丑版的洛杉矶。第一个晚上，我下榻拉玛四世路（Rama IV Road）上的马来西亚旅馆（Malaysia Hotel），这是背包客口耳相传的著名旅店。进到房间，只见床垫软塌凹陷，床单上沾有污渍。我闲晃到旅馆附近一间印象中名为蓝狐（Blue Fox）的酒吧，看了店家以录像带播放的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回到旅馆，我听着窗边的老旧空调嘎嘎作响，彻夜难眠。

那一年，我初次见到的东南亚，深陷冷战所遗留的创伤中。美军于1975年从越南仓皇撤退，人民一片恐慌，害怕越南军队的坦克突破泰国边境不到48小时，便会攻进曼谷市区的素坤逸路。红色高棉凶残激进的手段撼动了柬埔寨，这个残暴的政权极力消灭知识分子，净空城市，并且逼迫幸存的人民耕植稻米。大多数的邻国受专制军政府统治，这些政府不是由西方摆布，就是受它们支持以制衡共产势力，进而压制共产分子在丛林边界发起的暴动。东南亚尽管笼罩在战争与对共产分子的恐惧中，仍怀有迈向繁荣稳定新时代的一丝希望。

大众观光业与廉价航空还未盛行的年代里，外国旅客很少涉足大城市与海滩度假胜地以外的地方。我不是观光客，而是在伦敦大学主修东南亚语言与历史的大二学生。那年夏天，我迫不及待地想尽可能探索这

个我选择研究却从未到过的地区，因此一到泰国，我立刻往南边的印度尼西亚前进。我飞到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顶端的棉兰市（Medan），好不容易熬过当地48小时的颠簸车程，横越苏门答腊，探访老家在西苏门答腊武吉丁宜（Bukit Tinggi）郊区某个村落的大学同学黛维·福图纳·安瓦尔（Dewi Fortuna Anwar）。司机没有见过西方人，坚持要我坐在摇摇晃晃的梅赛德斯（Mercedes）巴士前座。前排座位前是一大片布满苍蝇的挡风玻璃，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司机把车开在陡峭断崖旁，沿着崎岖山路蜿蜒而上。沿途多是翠绿的稻田，在雨水的拍打下闪闪发亮，红土田埂错落其间，犹如大地的伤口。在这段可怕的旅程中，我爱上了名为“Kretek”的甜味香烟；也是在西苏门答腊停留的那个星期里，我第一次见识到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这是东南亚社会必要的基础。

数周后，我回到武吉丁宜以北数千公里的泰国，与当地导游在热得发烫的红土路上走了好几公里，穿越茂密丛林，来到小镇迈萨良（Mae Sariang）西边。过了几个小时，我们抵达克伦族（Karen）的山地部落。一名脸上满是皱纹的和善长者站在茅屋外的拼竹台阶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盯着我们看，喊道：“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小村落的欧洲人，但克伦族的古老传说早已预示，知识之书将由白面之人带来，原因是，当初造物主在人类诞生之际散布这本书，但克伦族人太懒惰，以致错过了领书的机会。我帮那位长者照了张相，却忘了他的名字。当然，他以为我别有意图。当时，我正经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

我对东南亚的第一印象充满了炙热的热带阳光与强烈的气味，让人只能隐约瞥见这个懵懂拥抱现代世界，却又受到古代传统与习俗局限的复杂社会。1979年的新加坡，独立尚未满二十年。比起印度尼西亚与泰国，这个国家的市容较为整齐干净，许多街道上两层楼的住家式店铺林立，飘散出浓浓的肉桂与豆蔻气味。环绕名为“政府大厦大草场”（the Padang）的旧时殖民中心，草地修剪齐整，建筑洁白纯净，从至今犹存的板球俱乐部（Cricket Club）白漆灰泥墙往下俯瞰，一览无遗。相反，曼谷则是建筑外墙长满霉斑的水泥丛林，外围筑有热带庭园的精致木造宅邸零星分布其中，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早上会在庭园里用剩饭喂食池中的锦鲤，再将碎屑赏给忠心的侍仆。

旅游几周后，我与同样来自伦敦的学生们待在泰国北部首府清迈（Chiang Mai）。这是一个极富田园风情的城市，每逢温暖多雾的早

晨，或是落日将整片天空抹上淡粉色的黄昏时分，我总会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当地人优雅有礼，市区斑驳的城墙内矗立着近百座佛寺。骑单车绕城一圈，让人想起17世纪初法国耶稣会探险家在暹罗（Siamese）⁽¹⁾旧都阿育陀耶（Ayutthaya，又名大城）留下的雕刻。这座城市平易近人的魅力与喧嚣，让我开始了解东南亚社会的基本词源学。

清迈固然魅力十足，但我向往印度尼西亚，深深为它那糅杂了胜利与悲剧的国族理想所吸引，沉醉在铜锣与铙钹不和谐的敲击声中，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是表里如一的。大学毕业后回到伦敦，我申请继续进行包含印度尼西亚田野调查的博士研究。探究印度尼西亚奥秘的过程中，出身地中海东部、懂得多国语言的我，可以利用自己矛盾又复杂的西方移民身份。我写大学历史论文时以苏加诺（Sukarno）⁽²⁾为题，因而我对他的生平了如指掌。我想起希腊籍姑妈1960年代初在罗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秘书时，曾见过这位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还拿到一张他的签名照。潜意识里有股奇特的力量，使我对印度尼西亚深感着迷。

但我没能如愿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至少当时还是如此。上一代的学者，尤其是已故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试图揭发苏哈托（Suharto）⁽³⁾在1965年所谓的共产政变后趁乱上位、谋杀约五十万名共产党可疑成员与支持者的黑暗内幕，之后，独裁的苏哈托政权几乎禁止所有外国研究生入境。我转而加入一群社会科学硕士生的行列，他们在比较开放却并未更民主的泰国，费尽千辛万苦才敲开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大门。我花了50美元申请研究许可，而名义上研究清迈种族渊源的论文提案，让我在1982年初再度回到这座有如宝石般坐落于泰北群山间的魔幻城市。

研究期间，我接触到东南亚处理对立与冲突的特殊方式：一味避免。在泰国文化中，“面子”代表一切，是人类基本尊严的表现。在西方，一般人们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灵魂；而在亚洲，人们以更具体的方式展现自我。一旦丢了脸，自尊就会受到打击，以致突如其来的暴力反应不仅理所当然，也是意料中事。因此，泰国社会与其他东南亚文化一样，也发展出复杂的冲突避免机制，包含说话拐弯抹角以免冒犯他人的病态倾向，以及在外人看来是展现高度文明礼仪，其实是用来包装失去颜面的各种行为举止。我从教训中学到，以侵犯或使他人蒙羞的方式揭露真相与现实，必然会引起不理性的极端反应。某天，在清迈大学的一

场公开讲座中，我讲述了不肖人士贩卖泰国身份证给非法缅甸移民的知名诈骗案件。这个揭露真相的行为令当地军队指挥官大为恼火，朋友还要我小心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赔罪，我到一间佛寺，向住持捐献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如同古代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以拯救灵魂，丢失的面面也可以透过物质的交换挽回。这次的经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

1980年代中期是东南亚政治的转折点。一切始于菲律宾，年迈的独裁者马科斯紧握权力不放。但是，这位因妻子嗜高跟鞋成痴而出名的专制君主，在1983年下令当众刺杀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点燃了大众的愤懑怒火。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BBC World Service）位于伦敦布什大厦（Bush House）的狭小摄影棚里，报道刺杀事件后随即爆发的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我毕业后进入BBC工作，曾经在这个摄影棚里担任名称乏味的新闻时事节目《24小时》（24 Hours）的实习制作人。菲律宾多数的头条新闻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正是我值班制作新闻界所谓的“晨报”（晨间新闻）的时候。

那是有线电视刚开始全年无休的时期。马尼拉爆发的刺杀事件与示威游行，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的第一则国际新闻。当时是深夜，我正窝在布什大厦深处一间阴暗的摄影棚内，距离那些现场一万多公里远。我看到这则新闻时难掩兴奋，连忙联络相关人士准备直播采访，并借用了CNN报道的重要片段。紧接在世界新闻快报后15分钟的晨间节目，几乎都在谈论人民力量的革命。我迅速联络到人在家中的美国众议员史蒂夫·索拉兹（Steve Solarz）⁽⁴⁾，通过信号不稳的电话问他能否联机。“好啊，”他说，“但我正在上厕所。”人人都期盼马尼拉的人民力量革命能够唤起雅加达及仰光等地的政治解放意识。媒体大肆渲染马尼拉的事件，急迫地推断这是亚洲历史的终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受公司指派为印度尼西亚通讯记者之后，才开始真正接触东南亚政治。1987年5月，我再度从伦敦搭上长途班机，飞抵雅加达时，又被湿气甩了一巴掌，迎面而来的气味比上次更呛鼻。我身上带着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核发的记者签证、高阶的索尼磁带卡式录音机与一对破旧的BBC罐头（BBC cans，那个年代都如此称呼头戴式耳机）。我传回伦敦的第一则外电是印度尼西亚发射通信卫星的报道。

就这样，我告别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挥别伦敦奇西克（Chiswick）与切尔西（Chelsea）香醇的白酒与鸡尾酒，展开东南亚驻外记者的生涯。但是，我对印度尼西亚的了解有多少？

并不多。我花了几个月学习基础印度尼西亚语，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康奈尔大学知名东南亚政治与历史学者安德森与鲁思·麦克维伊（Ruth McVey）的著作；为了研读有关失落文化的隐讳文章，转而参考说教意味浓厚、书页发霉的合订版《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看了好几遍《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研究SOHO区脏乱的贵都（Equatorial）酒楼里用来装沙嗲（satay）或印度尼西亚色拉加多加多（gado-gado）的特殊餐盘。如此浅薄表面的知识与经验，几乎不够我应付排山倒海而来的都市事件与感官刺激，以及1987年雅加达盛行的诡密阴谋与官僚乱政。

“独裁主义”与“镇压”听起来像是专有名词：无情、遥远又模糊，它们无法传达专制政权受害者遭遇的肉体疼痛与心灵磨难。斯拉梅·布拉塔纳塔（Slamet Bratanata）^⑤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真正的熟人。有人说我必须见这位反政府人士一面。地下组织的领袖都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我猜想要找他应该很困难。因此，当走在门腾（Menteng）^⑥高级住宅区里某条邻近圣特蕾莎（Saint Teresa）教堂、满地落叶的街道上，来到一栋外墙斑驳的荷兰式别墅时，我有些失望。这位试图将透明度与负责制纳入招标过程而遭到解职的前矿业部长，在阳台看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他用代尔夫特（Delft）^⑦出产的瓷杯斟茶给我，以粗犷的荷兰口音轻柔地说着英语。斯拉梅的外表，并不如警告我不要接近他的信息部官员所形容的那样有威胁性。

尽管如此，斯拉梅并不是个低调的人。在我们往来期间，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谈论前总统苏哈托专制政权的不公不义及印度尼西亚的悲惨历史。他身为反对团体五十人请愿团（The Petition of 50）的发言人，写过多篇批判政府的社论与文章。谈话中，他生动描述扰乱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众多冲突事件，指明历次屠杀的确切年代。在他牵线下，我认识了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⑧将军。在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统治的短暂独立战争中，他负责策动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游击战略，而后在1965年9月30日^⑨那个命运性的夜晚，他带着妻子翻越官邸后院以躲避反政府皇室卫兵的追缉。这两个男人说出了毫无发言权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的尊严遭到践踏，必须压抑对种种事件的回忆，假装这些事件全是外国来的不速之客与狂热分子的夸张妄想。我不是狂热分子，但显而易见地我具有“侵犯性”。在我发表了一篇明显左翼倾向的文章后，信息部立刻传唤我，要我解释清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初到东南亚的那几年，我不断修正自己在伦敦学到的历史，同时努力安抚亲友们无声的恐惧与担忧。有太多太多事情不如我们想象。斯拉梅可以在客厅为我倒一杯以镶有银饰与水晶的荷兰瓷器装的热茶，却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或离开这个国家；纳苏蒂安或许在争取国家自由的道路上贡献良多，却遭政府流放至坐落于绿树成荫街道上的破旧房舍，他在那儿默默无闻，也不曾受邀出席任何官方场合。如同马尔克斯笔下落魄卸职的陆军将领，遭放逐的纳苏蒂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当初为了争取独立而号召成立的军队也早已解散。“军队就像棋盘上的棋子，”1990年12月某个炎热午后，这位老将军以深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们不再渴求团结，而是互相对立。”我从这里学到了东南亚人互动的另一个特点：一如我在泰国所发现的，问题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以保留颜面，更在于利用恐惧与胁迫来抑制冲突。

之后五年，我走遍印度尼西亚各地，从巴布亚省（Papua）蚊虫猖獗的马老奇市（Merauke）到亚齐省（Aceh）的沙瓊（Sabang）深水港。苏哈托政权的发展计划引发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处处可见，譬如，几乎每个村庄都设有发放基本用药与避孕药的小诊所。苏哈托体型肥胖，有着一头灰发和粗短双手，经常可以看到他与戴着简朴草帽、笑得合不拢嘴的农夫说话，考察以他名义创建的基金会是否确实发放补助给农民。当时，我也听过人们抱怨生活受到禁锢、喘不过气，因为他们不可以表达心声。军方势力无孔不入。在军队所谓的“双重功能”下，所有政府部门的在职官员都是国会成员，作为中央到地方的强大行政支柱。行事正直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因为民服务而备受爱戴，这种人大多在军人同侪中显得廉洁，且遵循一丝不苟的王室纪律。他的官邸一尘不染，庭院的草木修剪齐整，制服烫得笔挺，每天早晨都行升旗礼。实际上，他可能是怠惰的陆军上校，因为犯了错而被调到脏乱的落后地区，在当地施行暴政。远在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04年当上印度尼西亚第一届民选总统之前，我便造访过他在雅加达市芝朗卡普（Cilangkap）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部的办公室。当时苏希洛隶属军队信息部门，他的办公室空无摆设，而他的脸庞光滑圆润。大部分时候他都拿着各种颜色的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空谈，描述他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人心态。

的确，军队无所不在，但坦白说，我很少看到军事行动。我为了寻找战争的踪迹，多次走访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却只见到板着脸的士兵埋伏在空荡街道的咖啡厅里。战争在暗处打开，以小规模冲突的形式展现，或发生在战士的灵魂里。一支亚齐反抗军自1976年以来为了脱离

印度尼西亚不断奋战。政府军队被控滥杀数万名无辜的亚齐平民，根据亚齐解放运动（Free Aceh Movement）组织编写的可疑暴行黑皮书，有些士兵还开坦克直接辗死百姓。同一时间，亚齐反抗军领袖流亡瑞典，从事邮差或市书记官等低阶公职来获取社会安全保障。反政府组织火力薄弱，也没有任何领地，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政府军队残虐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

这个事实我在东帝汶（East Timor）看得最透彻。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这块不受重视的前葡萄牙殖民地，这片夹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其他偏远与落后岛屿间的蕞尔之地，原本可以花数十年的时间被开发成栽种咖啡豆的观光胜地，却被决定作为战俘集中营及贸易与咖啡的出口据点。198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出访其首都帝力市（Dili）之际，我来到此地。这位波兰籍教皇巡视完广阔的市郊地带后乘白色座车归来时，数千名群众哭天喊地，举着旗帜要求独立。之后，我在时任陆军中校的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¹⁰⁾邻近该地的宅邸中，见到憔悴消瘦、害怕得发抖的东帝汶囚犯，普拉博沃不久后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指挥官，并于2014年竞选总统。普拉博沃要囚犯们替我倒茶，骄傲吹嘘着他们受到多好的待遇。然而，茶洒得整桌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颤抖的双手。我永远记得那些囚犯用力眨着血丝满布的眼睛，无声地向我暗示自己的悲惨处境。

我在印度尼西亚当了五年记者，其中四年担任《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地区总编辑。这家新闻杂志社作为亚洲新闻来源而声望崇高，总部设在香港。我求学时常看这本杂志，后来看准机会加入他们的记者行列，当中有多位记者在亚洲地区颇负盛名。这份工作使我得以更深入地探究自己报道的故事，最终促使当局采取激烈手段，注销我的记者签证并将我驱逐出境。我想这跟我的报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我在当地待得太久，知道太多内幕。我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及我熟识的很有影响力的国防部长本尼·穆达尼（Benny Murdani）将军投诉。一天，我参加一场外交酒会，这种场合在当时与今日的社交媒体功用相同：查明事实的唯一方法是到使节宴会上的自助区晃晃。我拿了生菜色拉与一杯红酒，遇到穆达尼与外交部部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我向他们抱怨：“他们怎么可以赶我走？今年不是‘印度尼西亚观光年’吗？”幸好，他们听懂了我的言下之意，协助撤销了驱逐令，不过作为回报，我承诺会离开印度尼西亚。

之后，我被派驻到马来西亚。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拥有诞生自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平整草皮与黑白平房，比印度尼西亚更加都市化且稳定的早期现代化雏形。雪兰莪俱乐部（Selangor Club）⁽¹¹⁾与现为未来主义派建筑双子塔（Petronas Twin Towers）所在地的赛马场，构筑了我对吉隆坡的第一印象。英国人在1957年8月30日午夜撤离马来半岛之前，留下了所有现代司法体制与政治参与的外在标志：高等法院、审判席上戴假发的法官、西敏寺式（Westminster-style）的国会大厦，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议长与令牌。雪兰莪俱乐部的长形酒吧里不停转动、灰尘结块的风扇底下，顶着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律师执照的达罗毗荼（Dravidian）⁽¹²⁾裔高等法院法官们，大口啜饮威士忌苏打，一边观看板球比赛，一边以牛津口音争论不休。如此热络交际的场面掩饰了他们心中的深沉不安；因为英国殖民者也在这里建立了深受制度化种族主义所苦的不公社会，埋下了永久冲突的种子。

马来西亚是种族大熔炉，融合了马来人、中国人与印度人。英国殖民者于1957年离开前将政治主权授予马来民族，使得占该国33%人口的华人与10%的印度人明显处于弱势。简单来说，务农为主的多数马来族群，害怕被教育程度较高、住在都市的少数华人族群推翻。为了巩固政权，马来人制定了一套粗糙的官僚系统，确保自己能握有大部分的经济势力及至高政治权力。泰米尔族（Tamil）出身的马来西亚小说家马粘（K. S. Maniam），在他发人深省的小说《一个遥远的国度》（*In a Far Country*）中写道：“以前有一个国家，现在，那个国家里有好多个国家。”

东南亚境内的所有殖民贻害之中，没有一个比英国人创立、再经荷兰人仿效的印度尼西亚劳动力种族化制度，更具挑拨性与破坏性。这项制度有效率得残忍，专注于如何控制劳力成本，同时避免当地人民掌权；答案是，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依照种族来判定专业能力与地位阶层，并加以控制，以便限制社会垂直与水平流动的程度。派驻缅甸的英国殖民官约翰·西德纳姆·弗尼瓦尔（John Sydenham Furnivall）在1948年英军撤离缅甸时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殖民政策与实务》（*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中，完整描述了这个概念。我在进行关于清迈种族的硕士研究时，第一次接触到弗尼瓦尔的著作。他阐述“多元社会”概念，主张人们“来往但不融合”，拥有的各自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化且只在市集交谈，解释了当地经济体易受分裂与权力机制所支配的被动性。

不幸地，同样的机制传到了新兴独立国家马来西亚与缅甸；人们或

许将国家主权地位与独立的理想奉为圭臬，但事实上，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法律与传统依旧维持且强化着种族的藩篱。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众多分歧提供了政治权宜；在马来西亚居多数的马来人与缅甸境内的缅族利用这些分歧，在其他种族与语言族群——如中国人与印度人及缅甸掸族（Shan）和克伦族等高地少数民族——仍占多数人口的多元社会中，合理化自身的优越地位。这样的行为引发了慢性的社会分歧与紧张，以及暴力冲突。

我到当时独立已近半世纪的马来西亚时，那里的马来族知识分子依然对中国人怀抱恐惧与憎恨。一名印度裔的资深记者告诉我，他听过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Tunku Abdul Rahman）如此谈论中国人：“他们每个人撒一泡尿，这个国家就沉了。”这股恐惧转而驱使马来社会遵循伊斯兰教义，强调极度保守的习俗以固守种族与宗教的分界。法律禁止马来人改信其他宗教及违反宗教传统，例如，有人在斋月（Ramadan）进食期间破戒，便须缴纳高额罚款。当地严格执行穆斯林戒律，宗教事务局（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为此派人巡视公共场所，逮捕并惩罚当众牵手的情侣或违反禁食规定的人。这清楚示范了，虔诚奉行教规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当成界限的标记。如同我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对于维系东南亚社会的包容与多样性的长期危害，快速取代了身份认同上的短期进展。

马来西亚社会的分歧力量不容小觑，当地罕见跨族群通婚，政治立场更是依照种族来区分，种种现象从我在1990年代中期旅居该国之后便持续恶化。历代政府总是夸耀自己在促进多元种族和谐上的政绩，却也加深种族间的分歧且漠视荒谬的冲突事件，例如禁止穆斯林摸狗，或是控告冰激凌公司疑似使用非清真认证的食材。近期的荒诞事例，则是指控基督教徒利用圣诞节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我在1991年抵达马来西亚，不久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华裔马来西亚将军约翰·休（Johan Hew）对我形容，他的祖国好比“运转效能只有六成的内燃机”。虽然我喜爱马来西亚的许多事物，但那里潜在的种族分歧氛围令人窒息，我直到1994年末搬回至少表面上社会比较和谐的泰国，才松了一口气。

传统与文化的连续性常被视为社会稳定的要素。这种观念在英格兰的中学历史课程中，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中心思想，掩盖大英帝国荫底下英国人遭遇的所有不幸事件，强调君权与国会的传承。泰国也受同样的表象所苦。我结束求学生涯后第一次回到泰国，心中有种莫名的矛盾感。就某个层面而言，社会为了避免冲突而不断调和与包容，表示它已

经完全准备好迎接现代化，但同时又顽强抵抗现代习俗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在1980年代早期求学所结交的朋友之中，我感受到一股莫名对外面世界漠不关心的氛围。也许我参不透佛教的无常观，但我察觉到某种更为阴沉、险恶，建构于无知与对现代价值观的冥顽抵抗之上的气氛。

1990年代中期以特派记者身份回到曼谷，我发现自己几乎认不得这个城市，它变成了一个充斥新兴繁荣市场、毫无限度的发展与奢侈消费的地方。让我在1970年代末第一次来访时感到沮丧的发霉灰泥门廊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昂贵品牌的彩色抛光玻璃板与招牌。当地人购买体积一代比一代惊人的奢华房车高调炫富，再开着它挤在严重阻塞的道路上，吸着废气缓慢地荼毒自己。父母们开着有空调的车子接送孩子上下学，精疲力竭的孩子只能把握时间在车上吃饭睡觉，有时一天甚至超过6个小时都待在车里，这实在有违人道。我自己的两个小孩也不例外。他们早上5点醒来，开始无止境塞车的漫长上学旅程。我们的生活围绕着交通打转：应付它、避开它，常常干脆就坐在闷热的车里，任由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泰国人过着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赚钱很容易，还能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以宽松的条件向仰赖大量股市外汇的银行借贷更多资金；城市各处相继涌现资金匮乏与贱价出售的公寓群；大楼建筑规模雄伟，采用科林斯式的灰泥圆柱与要价不菲的大理石材。人们的习惯变了，抛弃泰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改为崇尚西方消费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他们脱下丝质“摩霍”（mor hom）服饰与狩猎装，改穿做工细致的杰尼亚（Zegna）海军蓝西装与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精品狩猎装；手里拿着的不是装有米酿的湄公河牌威士忌（Mekhong Whisky）⁽¹³⁾的玻璃杯，而是斟着典藏法国红酒的高脚杯；意大利餐厅一家接着一家开，带来一大群逃离萧条经济的欧洲厨师。一切感觉就像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描述的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只是，好景不长。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放手让货币贬值，造成泰铢重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出手介入。⁽¹⁴⁾家财万贯的富翁顿时一贫如洗。泰国的货币风暴扩大为全东南亚的危机，不久后，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泰国境内银行与企业相继倒闭，股票的价值连印刷股票的纸都不如；在高楼大厦上班的大批工作者消失无踪，只留下锈蚀的水泥与钢筋；几星期前还富可

敌国的人们，摆摊卖起三明治或开起低价抛售奢侈品的二手商店。这不仅是经济荣景的崩塌，泰国赖以隔绝外在世界的坚硬外壳也破碎了。

金融风暴唤醒了东南亚，这个地区过去深陷于外国投资客与创业者所打造的虚幻世界，其中相对年轻的国家从贫困的农业经济体瞬间转变成时髦现代、以消费为导向的“老虎经济体”。这场金融危机令素来稳居优势的精英顿时失去合法地位，也猛然危害了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西方时事评论家指称这是民主“普世”价值的胜利。相较于冷战时期为了防止共产势力扩张而对独裁领袖的过度纵容，西方世界在一度稳定的亲西方政府面对改革声浪而摇摇欲坠时高声欢呼。印度尼西亚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在雅加达多起暴动与叛乱中宣告瓦解。

1998年5月，我与一小群记者站在雅加达市中心一条空荡荡的大道上，一边是一整排配备自动步枪的军队，另一边是对士兵叫嚣、高喊民主的学生暴民。学生们义愤填膺，军队高度戒备；突然间子弹开始从我们头上“嗖嗖”飞过，有记者说那一定是橡皮子弹。这是肯定的。我后来得知，那些士兵以橡皮与传统弹药装匣，而且这场冲突是因苏哈托而起，虽然他本人不愿承认。苏哈托政府前部长、我的密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Sarwono Kusumaatmadja）曾在一个月前告诉我：“总统脱离了现实，就像达利画里融化的时钟。”墙头草的精英分子一见风向转变就背弃苏哈托，一夕之间变成民主发展与改革的追随者。

然而我感觉，还有更深刻、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变化正在发酵。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的前两年，我撰写报道时曾揣想，大多由西方资本与科技助长的繁荣与发展，能否作为革新的有效媒介。但是，我看见上位者采用并改造现代的治理形式。我写下，“传统的权力与权威模式已经被复原或加以改造，以支持强势的政府权威与领导”，预料东南亚的政治文化正朝可能背离社会主流趋势并引发冲突的方向演变。确实，在急遽现代化及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许多社会已失去稳定的根基，在混乱情势中随波逐流。极富远见的美国人类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著作中提到，通常夹带着叛乱与盗匪流窜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东南亚社会响应灾难的一贯方式。但在都市化的现代环境中，人们无处可逃，必须在惩罚的威胁下承受苦难。他们既不屈服，也不反抗这种倾向。

或许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雅加达于1998年5月4日爆发了多起暴动、洗劫与谋杀事件。引爆点是苏哈托总统调升石油价格70%的政策，尽管

在此之前，金融风暴造成的经济困境，已让社会的紧张情势酝酿了好几个月。政府军队开火后，学生的抗议情绪更加高涨，几小时内，雅加达大片北部区域（华人族群据点）遭到焚毁，任何看似华人面孔者均遭到暴民袭击与私刑。我加入为了采访有如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重演的事件而涌入雅加达的外籍记者，被CNN与BBC实时转播的镜头吓得胆战心惊。终于，暴动在军队进驻市区之后落幕，但前几天的事件已为苏哈托的下台做好准备。我与同事约翰·麦克贝恩（John McBeth）连夜在雅加达市区安塔拉大厦（Antara Building）十一楼的狭小办公室里，轮流在计算机前赶稿，努力将这些事件浓缩成精辟的分析报道，以便从周刊上如洪流般的每日新闻中脱颖而出。我望着窗外的市景，街上空无一人，只见突兀的军用车辆严阵戒备，这个国家的未来想必混沌不明，但我同时也抱持最好的希望。

事实上，这次的排华暴动几乎标志了印度尼西亚民主变迁的起点，却也为往后的暴力动乱揭开序幕。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日子，冲突开始浮上台面，一些是政治精英为了争权而挑动的，一些则源自边陲地区潜伏的分离运动的，或是有心人士在利用宗教教义控制不满的社会力量，以训练并解放武装暴力与极端主义。

东南亚拥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也是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小乘佛教）的摇篮，以及人数众多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信徒的所在地。大致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直以来都在彼此人口互占多数或少数的环境下和谐共存。穆斯林与东南亚的快速发展携手并进，接纳先进的想法，并为多元化的观念辟径。1990年代中期，原为在德国工作的特立独行的工程师、后于苏哈托执政时期担任科技部部长的哈比比（B. J. Habibie，在苏哈托下台后继任总统）与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Anwar Ibrahim）联手，为现代穆斯林推行一个全新的智慧平台。我参加了几场演讲与研讨会，在这些场合中，将信仰导向科学与科技的想法——也就是建立新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受到热烈讨论。安瓦尔滔滔不绝地谈论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呼吁在共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东南亚的和谐社会，倡导自由价值及人权的推动。他还赞助举办关于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José Rizal）与孟加拉国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研讨会。这是他推动的亚洲文艺复兴。此外，安瓦尔也相当擅长以传统伊斯兰式的辩才鼓动群众情绪。1993年某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在马来西亚东部吉兰丹州（Kelantan）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向大批支持者疾呼：“平凡人或许不懂重

要的议题，但他们懂得欣赏会说阿拉伯语的人。”我原本对安瓦尔在学生时期的宗教激进主义倾向⁽¹⁵⁾有所疑虑，但在他宣称现代穆斯林是善于包容、开着宝马轿车的极致唯美主义者，而非笃信《古兰经》、决不饶恕通奸者与身穿飘逸长袍的虔诚教徒之后，我的态度就软化了。可惜的是，以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他的观点与强烈野心只会加深敌人的妒忌与猜疑，最后让自己因贪腐罪名遭到起诉与监禁。亚洲“圣战”充满仇恨的尖刻言论，还是取代了亚洲文艺复兴优雅华美的词藻。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困惑。前一刻，东南亚穆斯林还在仿效西班牙摩尔人（Moors）于科学与社会方面的成就，下一刻却试图在新兴亚洲伊斯兰范畴内建立7世纪的阿拉伯帝国。2001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纽约的“9·11事件”，诱发了一连串狡诈煽动与引导的暴力行动。社会边缘人以绵薄财力资助这些行动，利用贫困乡村年轻男子对伊斯兰经典的错误理解，来控制自尊低落、奄奄一息的他们。在经历数十年财富与福利分配不均而高度发展的动乱社会中，这是引爆冲突的最佳策略之一。

起初，既有的小型区域冲突地区出现致命的聚合。甚至早在全球“圣战”随着纽约世贸双子大楼遭到恐怖袭击而爆发前，菲律宾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就已密谋在十一趟横越太平洋飞往美国的班机上同时引爆炸弹，假使这个计划成功，就会有四千人丧命。在菲律宾与泰国，次国家冲突包含了穆斯林少数族群为了脱离非穆斯林统治者而发起的抗争。东南亚最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分子之一汉巴利（Hambali），在2003年遭到逮捕并监禁于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他策划恐怖主义运动，希望借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贫困与边陲地区穆斯林青年的不满，以建立一个涵盖东南亚所有穆斯林分布区域的哈里发国（caliphate）。当时，我已经离开东南亚，并受上级指派为《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移居香港的安排，让我来到亚洲最完善的记者网络中心，能够仔细钻研经验丰富且满腔热忱的记者们每周所呈交的新闻，真是莫大的荣幸。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约翰·麦克贝恩、纳特·塞耶（Nate Thayer）、玛戈·科恩（Margot Cohen）及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等记者，都为东南亚事件做了最好的见证与分析。2001年9月11日，两架飞机撞毁距离《远东经济评论》所属公司道·琼斯（Dow Jones）办公室不远的纽约双子大楼后，也为杂志社带来致命冲击，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这一撞，终结了西方自大与狂妄的时代，使得道·琼斯公司不得不将目光与资金转移至别处。

同时，我的世界也改变了。我原本坚定相信具备社会与经济手段以避免卷入中东的憎恨与暴力浪潮的东南亚，如今深陷巨大的混乱旋涡中。我错估了局势。

过去十年调停武装冲突的经历，构成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最后一段路途与时光。2004年，纽约总部高层决定让我效力的区域新闻杂志社关门大吉，之后，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与一个致力于与武装团体协商签署和平协议的瑞士组织的执行董事见面。尽管我觉得这项事业的可行性不高，但依旧很感兴趣，加上我失业赋闲，因此欣然接受这个提议。几周后，我搬到新加坡，在那里为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HDC）成立了区域办事处。

虽然这么做看似冒险，但目的是寻求调停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没有坏处。1999年，继作风大胆却古怪的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同意与亚齐解放运动组织展开对话后，人道对话中心在亚齐省首度发起私人调解会谈。与会者包括被迫参与、猜忌多疑的外交部官员，以及亚齐解放运动的流放成员，双方初步同意，在一个由东盟率领的观察小组监督下进行人道的或短暂的停火。（这的确是个突破，但势力庞大的印度尼西亚军方联合雅加达的政治保守势力削弱了这些努力，不久后会谈中止，亚齐省宣布戒严。）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全是边缘人与禁地、长久蒙受暴力与苦难的世界里。当我彻底挥别在东南亚各地报道人们力图改革与进步的记者生活后，直接面对以种族与宗教偏见为基础的社会的巨大分歧。我了解到，人们无论多有责任感，仍会坚守一己之利而不会屏除分歧以追求共同发展。追溯暴力的起源及试图劝说人们和平共处的作为，驱使我从更实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区域。这个地区的政治实务及其伴随的危害，均带有残酷的实用主义。政府的声明或访谈将动机归因于崇高理想或政策目标，借此掩饰个人利益。顾全颜面的意图使许多人固守决不动摇的极端立场。暴力随之而来。

漫长东南亚旅程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尽管这个地区的社会物质水平大幅提升，但我发现了其中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令人沮丧地，这里的人可以为了俗事与私利，不计社会代价，让冲突长久地持续下去。无论是单纯为了保住面子，或是某些人际之间的权力斗争，险恶暴力冲突的风气几乎不曾缓和。政治仇恨加深了人们的对立，演变到最后无法化解，

让后续的世代打从心底感到不满。暴力留下了一群从未受到指认或弥补的受害者。无论政治或经济的前景有多看好，似乎都没有人致力于寻求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在我常驻东南亚期间，日益分歧与长久存在的精英派别支配着当地政府，不让现代体制的发展促进开放与透明的治理。接下来的章节，我将试着解释个中缘由。

(1) 泰国旧称。

(2) 1901—1970，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与第一任总统。

印度尼西亚人一般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甚至也可以为自己取名字，后来因为与其他国家人士通婚，有些人开始采用姓氏。所以文中会看到有些印度尼西亚名字似乎有两个以上，但实际上未必是其姓氏。穆斯林的情况又不相同。——编者注

(3) 1921—2008，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执政超过三十二年。

(4) 1940—2010，美国前众议员，曾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主席。

(5) 1928—1975，前印度尼西亚内阁阁员与部长。

(6) 雅加达地名。始于1910年代，是当时荷兰人和高级官员的住宅区，也是殖民地巴达维亚第一个经过规划的花园郊区。

(7) 荷兰地名，蓝瓷重镇。

(8) 1918—2000，曾任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是印度尼西亚实际的最高军权掌控者。九三〇事件后失势。

(9) 九三〇事件，简称G-30-S或Gestok。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因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被时为少将的苏哈托推翻；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之外，也造成大规模的排华浪潮。

(10) 苏哈托的二女婿。

(11) 1884年由英国殖民者创建的社交俱乐部，位于吉隆坡独立广场，至今仍是社会精英聚会地点。此处也举办国际板球比赛。

(12) 分布于印度南方的原住民。

(13) 泰国国内生产的蒸馏酒，虽然称为威士忌，实际上更近似朗姆酒。

(14)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间。事源于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暴降17%，使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15) 安瓦尔在1968年至1971年间，是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1971年至1979年间，安瓦尔曾经是立场鲜明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复兴主义者。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这是古代航海探险家眼中的东方，如此古老、神秘，如此灿烂而灰暗、生气勃勃而一成不变，充满危险与希望。

——约瑟夫·康拉德，《青春》（“Youth”）

就地理位置而言，东南亚就像亚洲大陆的庞大附属品，西临印度洋，东毗太平洋。东南亚大陆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Chao Phraya，也称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等三大主要河流的三角洲所组成，这些多泥的河道都各自滋养富饶的冲积平原，一千多年来供养着缅甸、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米食社会。除了丰沛水量与肥沃泥沙之外，广袤的森林区域也孕育着丰富的热带林木与动植物生态。再往南走，群岛像串珠般悬挂在长形半岛的尾端，深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温暖水域。暖洋环绕，加上受到温煦的东、西信风所眷顾，这些沿海地区支托着日益受到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影响的贸易中心。在规模上，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多比（E. H. G. Dobby）在1950年所说，东南亚含括的区域范围，足以“媲美全欧洲乃至非洲海岸线以北的海域”。

“东南亚”一词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指挥官们为此地区所取的军事代称，当时同盟国基地设于入侵日军势力无法企及的锡兰（Ceylon，现称斯里兰卡）。19世纪的欧洲学者将此区称为远印度（Farther India，相对于西方殖民母国的中心）；远印度的内陆地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因此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南半岛）；其半岛与岛屿名为“东、西印度群岛”（Indies），反映印度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前现代统治阶层的文化与信仰方面。古代航海家将东南亚喻为“季风吹拂的土地”（Land Below the Winds）：位处热带季风之下、台风带之上，航行更安全，温暖碧绿的洋流也比较容易预测。

有利的综合环境因素，使东南亚成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天然的贸易通道，预示了文化与技术影响的融合，将把此区域锻造成世界史上又一重要国际熔炉。全球共有六千支种族语言群体，其中六分之一便分布于东南亚；此区原已是世界上种族多元之地，而贸易更为此地带来印度与中国的民族。地中海人民拥抱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时，东南亚已受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浸染。早期，多元宗教的集

合，反映在人口的多元性上。研究东南亚叙事史学的20世纪英裔爱尔兰作家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曾描述毗邻现代泰国（当时称为暹罗）、缅甸西岸的丹老（Mergui）商港，他对于当地在17世纪时可能会有的情景有非常精确的想象：

.....港口里最多的不是缅甸人或暹罗人.....而是大多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他们支配了贸易局势。如果印度商行代表当地的命脉，那么蒙古住民就是其主调。印度支那人与佛教徒就是整体的氛围，朝气蓬勃却彬彬有礼；人们的衣着光鲜亮丽；缅甸与暹罗男子成天无所事事地闲晃；健美结实、性格率直的女人负责管理市场；阴沉易怒的马来人手抚蛇形匕首快速行经；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忙着牟利。

如此丰富的多元性意味着此地进出容易、高度开放，而且与外围世界紧密联结，赋予“国际性”一词新的意义。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才闻名欧洲的古代中国与印度哲学家，还在世传授学问之时，几乎同时参与了东南亚的知识与精神讲演。外貌不同于16世纪威尼斯人的阿拉伯、印度与中国商人，在三百年前就已遍布东南亚，在各个商港与首府建立聚落。早在欧洲各国占领东南亚之前，这里便已遍布由贸易与人员流动交织成的网络。菲律宾中部宿务市（Cebu City）的一间博物馆里，积满灰尘的架上摆着宋朝陶器，也展示着来自印度的刀剑。这些古董，可能是菲律宾的部族战士所有，用在抵御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于1521年率领三艘破旧小船与一群坏血病缠身的船员登陆时。10世纪时，中国商人定居在今日称作柬埔寨的高棉（Khmer）首都吴哥（Angkor），那时当地一度拥有逼近百万的人口，而伦敦人口还未达3.5万人。从印度沿岸启航的阿拉伯商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远东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比16世纪造访的欧洲人早了一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来此，控制所有丰饶物产，中饱私囊。如伏尔泰所述，“往东航行的欧洲王侯与商人，一直以来寻觅的不是智慧，而是财富”。

如今，东南亚就像数千年前那样地容易到达与善于包容。各个城市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处、文化与物质交流的大市场——女人仍然负责管理一切，而“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依旧汲汲营营地做生意。曼谷、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城市里，占地广大、光彩夺目的购物商场弥漫着香料的辛辣气味，以折扣价格贩卖国际品牌商品（并非全为正货），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消费者。自新加坡机场入境的旅客会看到“新加坡大

甩卖”(The Great Singapore Sale) 广告牌；同样的活动在曼谷则称为“午夜拍卖”(The Midnight Sale)。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意指市场的“pasar”是从古波斯语的“bazaar”演变而来。

然而，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多元族群得以借助外在影响发展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架构，却也同时引来侵略与征服的浪潮。美国历史学者伦纳德·安达亚 (Leonard Andaya) 认为，正是贸易与外国商人和旅客的出现，刺激了东南亚早期的国家形成——建构了“当地住民与群体的强烈自我意识”。他主张，面对来自先进社会的商人，当地人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的方法是与其他人结盟，形成更大量且更为广泛的网络，进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使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如此，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干旱平原与山麓的人口，经由苍茂的山谷自然地移居到沿岸地区，招致蒙古人入侵缅甸与越南。长久以来，人们将东南亚视为文化根植于南亚及东北亚的地理区域。印度教与佛教均从印度传入，影响当地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在英语广泛使用之前的数百年，梵语代表着权势与优越。不久后，伊斯兰教从商港传到印度沿岸；基督教随着荷兰与葡萄牙人东征的刀剑来此。中国是瓷器等物质、科学技术及商业与贸易用品的源头。泰语数字的发音基本上与粤语相同，反映东南亚与中国南岸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现代印度尼西亚文中，许多指涉日常用品的词汇（如桌子与窗户）均源自葡萄牙文；马来文则充满了阿拉伯文的外来语。东南亚的文化基础全都与其他地方有所关联。如同拉丁语与希腊语为大部分欧洲语言的根源，在东南亚地区，梵语、汉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及后期传入的英语，也全都影响了此地各种语言的现今用法。

经由东南亚熙来攘往的沿岸贸易中心，西方世界得以在冷冻技术问世前几世纪，取得异国香料以腌渍肉品。这使得马鲁古海 (Molucca Sea) 种植香料的数座小岛拥作物自重，令初期的欧洲贸易势力为了争夺此地而发生冲突。1664年，英国人在一场知名交易中，将长约3公里、宽不到1公里的弹丸之地伦岛 (Run)，跟荷兰换取曼哈顿岛。伦岛盛产肉豆蔻树，这种香料的价值在17世纪一度几与黄金相等。

在东南亚各地，接二连三的侵略所雕塑的古代文化综合体，留下了多彩多姿与创新的持久多元性。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东南亚分庭抗礼。今日，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六国⁽¹⁾，经由四通八达的现代航空旅游业（或许可说体现了季风吹拂的土地之名），而拥有古代东南亚贸易中心的中枢性，但其人口及社会的富庶程度无法与曼谷、吉隆坡或新

加坡等城市匹敌。

马六甲海峡绵延700公里，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狭长通道，可通往中国与欧洲之间大部分国际货运必经的南海，至今或许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有战略利益的天然海上航道。每年往来此地的贸易值约达6兆美元，海运石油量占全球总额1/4。再往南走，水域更深的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是大型船舰（更别说是核动力潜艇）在南海以外的替代路径。地理位置优越的东南亚招致多种现代形式的入侵势力，例如作为该区多国经济支柱的观光业与国际金融业。2015年，造访泰国的观光客达3200万人。有200家银行设立在面积狭小的新加坡，资产额高达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银行也将国际部门迁往当地。

矛盾的是，尽管东南亚从过去以来便展现国际的开放性，却仍然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地人民尽管组成非常多元，仍显保守封闭。数百年来对外贸易与探险的国家实施周期性锁国，试图与外界隔绝。东南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胆小怯懦者勿近。

我从西方来到东南亚最先接触的国家，是以蜿蜒林丘毗邻印度边界的缅甸（Burma，今英文正式名称为Myanmar）。缅甸有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前殖民历史，这段历史乃是由贡献非凡与成就不算伟大的战士君王交织而成，他们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与“旭日之王”等谦逊头衔。这些国王致力以军权统一国家，约在11世纪达成目标后，便开始掠夺与征战他处，逮捕及奴役反抗的百姓。有段时间，他们屈服于13世纪一举攻下缅甸、在当地大肆劫掠的忽必烈蒙古大军。然而，到了16世纪，莽应龙国王（King Bayinnaung）统治的领土，从印度东北部的边陲高地横越缅甸北部的掸邦，以至中国边界，还包含今日泰国的大部分区域。泰国北部古城清迈的原始泥墙，据说正是以入侵缅甸军队被杀士兵的骨骸堆建而成。

同样地，配备后膛式自动步枪与精准火炮的英国军队，在1885年只花了两个星期便征服缅甸末代王朝曼德勒（Mandalay），并且用牛车将当时未满30岁的末代国王载离有护城河的壮丽宫殿，流放印度，这是令缅甸人倍感屈辱的一刻。

新殖民地缅甸由英属印度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Calcutta）所管辖，并发展成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首都仰光蜕变为繁华的都市中心，可见电车及以红砖与灰泥砌成、侧边建有圆柱的宏伟建筑，其中有许多矗立至今，日渐破损，长满青苔。1920年代中期任职印度皇家警局

(Indian Imperial Police) 低阶警官的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在他所写的小说《缅甸岁月》 (*Burmese Days*) 中，巧妙捕捉了隐藏在雄伟帝国背后种族歧视与恐怖统治的丑陋面。在令人信服的《射象》 (“Shooting an Elephant”) 一文中，奥威尔如此描述他所谓的“大英帝国的丑陋行径”：“可怜的囚犯蜷缩在了上锁的恶臭笼子里，长期遭受监禁，面容灰暗绝望；臀部遭竹棍鞭抽而伤痕累累——种种情景都带给我无可承受的罪恶感。”

缅甸人的个性比邻近的泰国人或南方的马来西亚人与爪哇人还要直率。正如诺曼·刘易斯 (Norman Lewis) ⁽²⁾ 所述，这或许说明了缅甸人为何利用真人般大小的木偶，而不是类似印度尼西亚哇扬 (Wayang) 的皮影戏来传承神话。此外，缅甸人虽然可能相当偏执，却热衷行善，也许因为他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到寺庙习佛很长一段时间。

现代缅甸史 (该国军事统治者于1989年将英文国名改为 Myanmar) 是从民主走向暴政的悲剧轨迹，紧接在后的是为期数十年且经常激烈的民主抗争。日本占领缅甸期间，一场由学运人士昂山 (Aung San) ⁽³⁾ 率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声势如日中天，迫使英国同意缅甸独立。然而，1947年的内阁会议上，昂山遭到枪杀，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某些未经伦敦高层许可而自作主张的英国军官政敌所策动的阴谋。1949年缅甸正式独立后，多位宅心仁厚、受过良好教育、立意良善却力不从心的政治人物率领的无能暴戾政府，相继掌权。然而，面临边境少数民族与日俱增的挑战及强势的共产党暴动，不久后，军队变成了统一社会的力量。1962年，以奈温 (Ne Win) ⁽⁴⁾ 将军为首的政变揭开军事统治的高压时期，直到今日，缅甸还未能完全从中脱离。

相较之下，邻境的泰国人适应力强且深谙变通。缅甸人喜欢用不道德及毫无原则来形容他们的宿敌泰国人；泰国人则强调，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屈就与设法避免承诺，才能免受殖民的枷锁。泰族是极为独立的民族，原本居住在中国南部区域，当地至今仍有泰语人口。早期泰国社会以村落为单位，围绕稻米的耕植而发展，人们的血缘关系则以地方酋长或“领主” (Chao) 为中心。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王权扩张，泰族南迁并占领可种植稻米、组织更多劳力与建立大型政治实体的低地区。在锡兰岛僧伽传入的独特佛教信仰帮助下，泰族逐渐握有主权。

泰国成功脱离东方一度强盛的高棉帝国，在13世纪以理论上统一的王国崭露头角。暹罗王国 (Kingdom of Siam) 起初以泰国中部平原区的素可泰 (Sukhothai) 为据点，后来南迁至阿育陀耶的湄南河流域，

发展兴旺，利用组织良好的劳役人力种植稻米，实行同样管理完善的商业制度，并以帆船出口稻米与硬木，贸易范围最远至中国与日本。

自由是当时新兴泰国政体的关键面向。一块在素可泰出土、据说是兰坎亨国王（King Ramkhamhaeng）^⑤所颁令的13世纪晚期石碑上铭刻着：“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国王不向他的子民征收过路税。人们买卖牛畜或马匹，大象也是交易的品项……”事实上，人民可自由种植稻米与买卖家畜，但是必须把赚来的利润献给朝廷，而朝廷订定了垄断贸易与管理劳力（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男人都须服役）的精细制度。无怪乎17世纪中期一名造访阿育陀耶的荷兰人形容，巴沙通国王（King Prasat Thong）^⑥是“亚洲最富有的王侯之一”。

欧洲人自16世纪初陆续来到东南亚，最终占领缅甸、马来西亚及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其间屡次尝试征服暹罗王国。早期欧洲入侵东南亚的势力，由一小群冒险犯难的商人作为先锋，他们搭乘身体恶臭且营养不良的船员所驾驶的老旧船只前来。这些商人没有大型军队和军舰作为后盾，他们凭借扩展贸易的无畏精神与传教热忱，在各王室首都的泥泞郊区建立据点，例如暹罗王国所在的阿育陀耶。不过，无论是不平等贸易条款的实施，或是游说当地人改信基督教的尝试，皆徒劳无功。泰国人依然固执地过着自由的生活。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看法前卫、倾向左派的泰国学者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主张，泰国的经济受限于19世纪控制其邻近国土的英法势力，并未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无论如何，泰国国王们建立了一套专属的内部殖民形式，利用20世纪初引进的欧式官僚改革来确保集权政府能控制人民，这项制度在当时被视为既现代且先进，是现代国家的标记。

1941年日本侵略泰国时，泰国利用托词同时阻挡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势力；日本对美国宣战的要求，由于泰国驻美大使拒绝转达而从未如愿。因此，英国在日本战败后要占领泰国时，美国政府出面捍卫泰国主权。泰国的历史延续性一直是上天的恩惠与诅咒，其孕育丰富文化与特有风貌的同时，也阻碍了国家的社会变革。人民对位居政府体制之巅的国王的敬畏，构筑了宏伟神秘的权势高塔，并养成了阻挠权力与自治权下放平民的保守心态。现代马来西亚实行联邦制度，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将政权下放民选官员治理的各个省份与行政区，但泰国总共约90个省份的首长却是由内政部一一指派。人们屡屡试着挑战这股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不但遭遇顽强抵抗，还引发过去二十年来国家一直无法摆脱的政治危机。这种紧握权力不放的可畏决心，解释了为何军方历经17次政

变后，依然稳居政治核心。

从泰国往东横跨辽阔壮美的湄公河，现代柬埔寨、老挝与越南的区域即为旧称印度支那的土地。古代越南在中国军队与欧洲探险商人强势掠夺的夹缝中勉力求生，最终屈服于法国统治，法国还西进到高棉与老挝，通过同时剥削与教养当地人的矛盾政权，将殖民地治理得井然有序。文明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概念暗示着殖民统治必须有利可图且符合文明标准，因此，他们鼓励印度支那的人民学习法语、穿着法式服饰与皈依基督教。与此同时，平民做任何事情都得缴税，被迫将土地让渡给法属庄园并成为契约劳工。

太平洋战争落幕，受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启蒙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胡志明（Ho Chi Minh）是越南地方官员之子，他利用当地法语中学的学历取得前往欧洲的机会，先是担任厨师助手，后来成为糕点师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法国工作的他，起初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⁷⁾宣示自主的高尚言论吸引，后来甚至试图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来巴黎签订《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时寻求见面机会。胡志明向西方求助遭到断然拒绝，失望之余，受到社会主义激励，加入苏联第三国际（Comintern）⁽⁸⁾势力，并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训练，后来受派至中国。他在中国召集流亡的越南人士，替共产党及旗下黑衫军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所发起的武装运动奠定基础，该运动最终在对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中赢得胜利。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将越南一分为二，不久后，意图统一分裂共产党的北方共产势力向西方支持的南方反共傀儡政府发动攻击。随之而来的抗争又开启了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不仅牵连老挝与柬埔寨，还将法国与美国陆续卷入，其间牺牲了约一百五十万条人命。这场战争随着越南人民军在1975年攻下西贡而落幕，至此越南统一。

柬埔寨是唯一在后殖民时代经外来势力有效拯救与重建的东南亚国家。从某些角度看来，这是一种轮回。法国于1840年代拯救了濒临灭国的柬埔寨，之后殖民了将近一个世纪。1950年代，在作风高调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King Norodom Sihanouk）的带领下，这个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步入全新的后殖民时期。受法国教育熏陶同时具备高棉人感性特质的西哈努克，既是个西方式的公子，又是信奉印度佛教的神圣国王，令人捉摸不定。多起政变与反政变接踵而至，使国家动荡不安且陷入中南半岛的冲突之中。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起初作为越共分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崛起，后发展成极端共产运动，预示了将近五年惨无人道的

野蛮行径，包括下令疏散各大城市，并为了打造无阶级社会而屠杀知识分子，造成近两百万人身亡。然而，这么多的死亡与毁灭所遗留的影响却意外地平。1991年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Accords）确立由联合国指挥的复苏与重建行动，引领柬埔寨重拾名义上的民主政府。

尽管越南内战带来的创伤似乎已经褪去，但无可估计的伤亡人数仍在持续增加。自战争结束以来，已有4.2万人死于散布境内的地雷。在柬埔寨，联合国法庭花费超过十年的时间替受害者寻求正义。至今，只有几名年迈的红色高棉（柬共）领袖遭到起诉；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Pol Pot）还未被逮捕和起诉，就已在1998年去世。每年5月，柬埔寨政府举办“愤怒日”（Day of Anger）纪念活动，暗指柬共的恐怖政权直到越南入侵才结束的事实。柬埔寨现任总理洪森（Hun Sen）出身寒微农家，先后经历过越南战争与柬埔寨内战的洗练。他加入柬共政权后一路晋升高职，之后为了躲避政权内部清算而投靠越南。洪森自1985年三十多岁上任后便不曾卸职，如今是东南亚在位期间最久的总理。

狭长的马来半岛从泰国延伸到接近苏门答腊岛底端，数百年来一直扮演着各种类型的触角角色，接收与传送所有顺风飘荡而来的外在影响。8至9世纪，印度教与上座部佛教先后经由马来半岛传入，不久伊斯兰教也跟上脚步。1511年占领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为第一批定居于此的欧洲人。马六甲曾经受改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苏丹王统治，某段时间一直是发展兴盛的贸易帝国，早期欧洲探险家也描述这里是无数语言流通的繁荣交易中心。一名葡萄牙访客曾写道，马六甲是“季风带的末端与其他风带的开端……各方势力必会集结于此”。

19世纪早期，英军先占领了战略航点槟榔屿（Penang）⁽⁹⁾，然后是新加坡（坐落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泥泞岛屿）。英国人将岛上蚊虫滋生的低地沼泽改建成获利甚丰、人称“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贸易中心。为了集结劳力，英国殖民者引进数万名印度与中国的契约劳工，将他们安置于怡保（Ipoh）、太平（Taiping）及丰盛港（Mersing）等马来半岛上挖掘锡矿与生产橡胶的城镇。到了19世纪末，复杂的多元社会逐渐形成，其中的每个民族相互认同且尊重彼此依殖民顺位排序的空间与角色。与此同时，头戴遮阳帽、身穿卡其短裤、在酒吧里豪饮威士忌或威士忌苏打的英国人，从这个毫无共同国家意识的社会中牟取私利。盛行于其他国家的暴动，从未在英属殖民地的马来亚出现，与印度形成强烈对比。

就马来亚而言，殖民帝国的灭亡相对平和。一如当初从印度撤军的情况，英军在约定日的午夜悄悄撤退，留下基本上无异于英国议会的政府形式，掌权人士也与身着毛呢套装与软帽的英国上流阶层如出一辙。慈眉善目、钟爱威士忌的马来西亚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是接受英国教育、领导风格温和的马来贵族。他的手下互闹不和，而国内政治尽管浸濡温文尔雅的英式作风，最终仍流于丑恶。独立早期，针对华人族群的强势共产暴动扰乱了社会安宁，当局在英军协助下进行暴力镇压，整起事件才在1960年落幕。名称奇特的“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让政府自此以后拥有可遏制异议的恶意内部安全法规。马来西亚共产党成员多为华人，加深了占当地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的恐惧，最终导致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于1965年宣告脱离联邦独立。因此，1969年种族暴动事件之后，种族与宗教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此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只会空谈种族融合与“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却将国家带往分裂更严重、种族界线更加分明的未来。

马六甲海峡的另一端，荷属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es）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殖民企业之一。其原本为私人企业，17世纪初在遥远的马鲁古群岛靠着香料贸易起家。公司的早期商业领袖扬·彼得松·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强硬垄断香料群岛绝大部分的贸易时，如此描述自己的使命：“勿绝望，勿饶恕你的敌人，因神与我们同在。”库恩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铲除了所有反对他的人；某个时期，因为盛产肉豆蔻的班达岛（Banda Island）居民与英国人交易香料，便将他们屠杀殆尽。如今，班达内拉岛（Bandaneira）上还可可见库恩下令建造的大量商馆遗址，而荷兰政府并未积极维护，即便如此，他的家乡荷兰霍伦（Hoorn）仍立有他的雕像。这些群岛独有且盛产的肉豆蔻香料注定可以产生庞大利润。假使欧洲人不需要这些热带香料以掩盖未冷冻肉品腐烂的刺鼻气味，东南亚历史也许就会大不一样。

到了19世纪末，荷兰人以自认仁慈与父权的方式统治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却让人民陷入暴力与艰难处境。数万名印度尼西亚人因铺路及收割稻米与蔗糖过劳而死，但荷兰统治者似乎不以为意，只顾眼前的大把钞票，甚至就连1941年日军入侵时，也不考虑寻求当地人的协助。日本曾正式承诺让印度尼西亚独立，如同对待缅甸与马来亚的做法，同时又利用殖民行政体制治理国家，强迫数百万名百姓从事劳动，其中许多人因为替日本打仗而战死海外。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短暂且零碎。起初，一群仓乱结党的民族主义领袖在雅加达中部的狭小租屋处率先发起运动，由富有群众魅力、受荷兰教育的工程师苏加诺起草仅有四行文字的简要独立声明。苏加诺除了宣称脱离荷兰统治外，另外补缀了“将尽快审慎执行与权力移交等相关的事务”的礼貌言词，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有一位日本军官在场。四年后，独立运动告捷。荷兰人一开始激烈抵抗，经常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印度尼西亚的自由斗士，而反抗军的指挥官首创突击战略，之后当地的其他暴民也采取这种策略。日军投降后，荷兰向英军求助以有效入侵殖民属地。羽翼初丰的印度尼西亚军队由一群受过日军训练的义勇军、热血学生与本地盗匪组成，指挥官苏迪尔曼将军（General Sudirman）是位冷静沉着、患有肺结核的爪哇教师，至今仍是个神秘人物。在雅加达市区，有一座雕像刻画他瘦弱的身躯披着在热带气候下显得突兀的厚重长大衣，为以其为名的道路增添了几分优雅气息。起初，英军帮助荷兰作战，但随着后殖民时代即将到来，英军当中的印度部队不愿打击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印度与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介入并说服荷兰默许现状。印度尼西亚于焉诞生。

如同缅甸，印度尼西亚建国早期的特征也是反叛与动乱。印度尼西亚原本就是大型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他们早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前就已起而反抗，并在1948年遭到无情镇压。荷兰人带来了联邦政府制度，印度尼西亚建国者怀疑这是他们意图分化与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手段，而这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含括了幅员辽阔、文化及语言迥异的众多岛屿。统一的共和国就这样建立了。然而，爪哇本岛以外的一些区域与国内某些偏向伊斯兰国家形态的族群一样，都不满中央集权式的政府体制。随之而来的区域抗争，促使印度尼西亚长期关注统一并畏惧离心势力，让政府即使在1998年之后的改革时期，仍难以容许自治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头十年遵循多元民主的体制，但地方抗争与乖戾政治驱使建国总统苏加诺实行所谓的“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同时，由于他热爱群众动员政治，共产主义者获得了大批支持者。到了1960年代初，拥有三百万名成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眼见中国与苏联支持印度支那及马来亚地区的人民革命，西方担忧将再一次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几乎确定受到西方情报单位怂恿而挑战苏加诺的军方势力，在这个时期益趋不安，想出一个干预政治的理由：“双重功能”（Dual Function）。关于因此产生的极度贫穷与社会紧张的僵局，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Koch）的小说《危险年

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有透彻的描述。对立局势在1965年达到高峰，9月30日凌晨，起因至今未明的失败政变中有六位陆军将领遭杀害。发起政变的可疑人士（其中一些人经指认为总统卫兵）据称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关。如已故印度尼西亚研究专家本·安德森在其与鲁思·麦克维伊合著并于1971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所主张的，这更有可能是政府军队以共产主义之名掩盖争权意图的政变。

随后抵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动，导致最终夺走近五十万条人命的狂乱屠杀，确切死亡人数不明，幕后主使者至今尚未水落石出。因此，这起亚洲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依旧披着神秘色彩。体弱多病且失势的苏加诺苦守衰微政权三年后，一位处事圆融、脸颊圆胖的无名将军，在国会刻意操作的投票下，于1968年登上总统宝座。此后三十年，苏哈托总统以军方支持的专制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下台为止，统治期间促成稻米自足与高识字率的国家发展，但也压制了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

印度尼西亚往北的苏禄海（Sulu Sea）彼端为菲律宾群岛，是另一处在16世纪遭到外力掠夺与殖民的列岛，差别在于入侵的是西班牙。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面向太平洋，而其与欧洲的关系是经由墨西哥（当时称为“新西班牙”）管理，并被殖民到1821年为止。以大帆船为交通工具的西班牙贸易，构筑于“新世界”（New World）出土的银矿所铸造的钱币之上，并利用这些银币购买产自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瓷器、香料与奇木，再以帆船经由墨西哥载运至欧洲。这是一门利润丰厚的垄断生意，持续了三百年之久。蓬勃成长的西班牙裔族群，很快便使菲律宾本地人口改信天主教，教堂一座接一座建成，信徒人数攀升，教会也因为实行允许西班牙修士提高税赋的行政制度而变得十分富有。

尽管西班牙殖民政府将部分政权移转给当地人，许多菲律宾人也因通婚或信奉天主教得以接受教育，进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但这项制度本质上仍以剥削为目的。一群出身于经历过19世纪欧洲战争与革命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菲裔知识分子，逐渐展现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其中一位是才华洋溢的眼科医生何塞·黎刹。身为天赋异禀且言之有物的散文家、诗人与小说家，黎刹多在国外借由写作发起如滚雪球般扩大成抗争的改革运动。他诗意而有时梦幻的文章，词句简单，却能渲染情绪：“人生而平等、赤裸且没有枷锁。上帝造人，不是为了奴役之用。”这个观点虽看似简单，但对于许多受教会教育而视天主教会为唯一仲裁者的菲律宾人而言，肯定是个意想不到的启示。黎刹的言论激怒了教会与西班牙殖

民政府（其实内部有许多改革派人士表示同情），他们在1892年逮捕了他，并于几个月后以叛乱为由将他处死。

可惜，就在菲律宾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际，1898年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菲律宾。美国脱离英国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一处新殖民地，并且摧毁了羽翼初丰的菲律宾共和国，为当代美—菲之间长久敏感且矛盾的关系埋下了种子。宿务市（因为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麦哲伦与莱加斯皮 [Legazpi] 而闻名⁽¹⁰⁾）那座前身为监狱的博物馆中，罩着玻璃盖的盒子里摆着一面破旧的西班牙旗帜，周围展示着几张公共建筑的旧照。建筑物两侧的齐整草皮上，星条旗飞扬，令人想起美国这个自称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不那么久以前才在殖民地践踏了当初建国的自由精神。直到1935年，菲律宾群岛才获得美国授予自由邦协的地位，但仅仅过了十年，又遭到日本占领。

长期以来对自由的渴望，使菲律宾人具有强烈的国家归属感，这种观念有时透过热血的拉丁狂热展露无遗。尽管如此，大众舆论与独裁专政不到二十年就取代了仿效美国的民主体制。马科斯来自菲律宾北伊罗戈（Ilocos Norte），原本是小镇的律师与议员，智识出众，性格好胜，总是利用武力为所欲为。他在1965年当选总统，后来与爱鞋成痴的妻子伊梅尔达（Imelda）一同被控贪污。马科斯为保有权势，于1972年宣布戒严，最后在1986年警方与军队的叛变中下台，这次事件也是菲律宾的第一次人民力量革命。当几十万人沿着马尼拉主干道桑托斯大道（EDSA）游行时，人民也许说出了心声，但军队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后几年里，不满政府的军官屡次发起政变但未能成功。其中一个团体甚至在2007年占据奢华的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让政府军队别无选择，只能派遣装甲车攻陷酒店。

马科斯否认侵占公帑，声称在1986年选举中针对他的贪污指控，是反对党策谋的抹黑攻击。四年后，美国法院裁定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无罪，并未盗用公款在美从事投资。不过，菲律宾政府仍然冻结了马科斯在瑞士银行账户内约6.3亿美元的财产，之后起诉伊梅尔达，控告她在菲律宾境内贪污。至今，菲律宾总统府委员会仍在寻找据称遭贪污资产的下落。

菲律宾人是东南亚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人才最多且技能最多元的族群。他们从小学开始接受正规英语教育，因而能在国内欠缺发展机会时出走外地，有近1200万人在海外工作。据统计，2014年从国外汇入

菲律宾的存款高达240亿美元，几乎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

东南亚概论经常忽略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Borneo），那里有隶属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位处偏远的省州，而伊斯兰苏丹国文莱（Brunei）则夹在其中。这个坐拥海上石油与天然气矿藏的蕞尔小国，由一名因年事渐高及宗教罪恶感而逐渐戒除豪奢生活的马来苏丹所统治。过去两年来，文莱施行伊斯兰律法（Shariah），禁止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婆罗洲则一直到近年都是东南亚最落后与原始的地区。虽然岛上因为房地产开发与棕榈油出口而大规模垦伐，但其1.4亿年历史的热带雨林仍是地球上重要的绿肺（green lungs）地带。人们对主要资源的仰赖造成婆罗洲原始部落的过度开垦与边缘化，因此，除非这个地区获得实质的自治权，否则将是21世纪下半叶最可能发生动乱的区域。

到了20世纪末，相较于非洲，东南亚十个国家大多已达到令人惊艳的发展与稳定程度。1957年加纳与马来西亚双双独立时，两国的开发程度相等；它们都继承了一样的英国法律与行政制度，并倚赖橡胶与棕榈油等主要出口资源。过了半世纪，马来西亚大幅超越加纳，国内生产总值约达3000亿美元，而加纳只有400亿美元；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以1.8万美元领先加纳的3500美元。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强烈对比，是东南亚相对开放、教育程度高及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庞大外资之故。

今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3000美元，位居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东南亚人民居住在享有社会服务的城市——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有50%的人口分布于都市。这些国家中，务农人口低于40%，而且1/3的人口一日可支配收入介于16至100美元。

然而，东南亚出众的经济成长与显著进步的社会指标，却几乎未反映在政治的大幅进度上（广义上指多元民主政府），此时期平均不变、整整达10%的经济增长率，大多也不代表更平均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事实上，尽管东南亚整体贫困率不断下降，贫富差距与金字塔顶端收入的比例却也同时以惊人速度扩大。主要原因是，所有助长经济发展的投资皆有利资方而非劳工。一直以来，资方的收益丰厚，劳工薪资却始终被压低以极大化营业利润。不出所料，这造成了纷乱的抗争与动荡。我从1970年代晚期接触东南亚以来，当地局势长期混乱，人民普遍处境艰困。

可观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现代商业和工业的基础建设，掩盖了四成印度尼西亚人都处于一天收入仅约2美元贫穷线的黑暗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调查指出，印度尼西亚十五年来持续的经济成长，已使得贫穷人数减少、中产阶级人口上升。然而，过去十年来的发展主要仅有最富裕的20%人口受惠，其余80%的人口（约2.05亿人）在收入上远远落后。过去五年内，泰国整体贫困率已从14%降至10%，但显著的收入不均使其成为东南亚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不到20%的泰国人收入高占国内的60%。这种现象在来自邻国缅甸约500万名流动就业族群中更为严重，他们领取的工资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

本书探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此大量的资本与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我将在后续章节里剖析其中缘由。

(1) 此六国为：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 1908—2003，英国记者与旅行文学作家。

(3) 1915—1947，缅甸国父，昂山素季的父亲。

缅甸有90%以上的人没有姓氏，但有部分人士会采用英式取名方式，加上父母名字，变成有姓氏的样子，昂山素季就是如此，并非其家族姓昂山。——编者注

(4) 1911—2002，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与独裁者。

(5) 1239—1298，素可泰王朝第三位国王，泰国知名的五大帝之一。

(6) 1630—1655年在位，泰国巴沙通王朝的开创者，原是素可泰王朝的国防大臣（Kalahom），篡位另立王朝。

(7) 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连任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威尔逊亲自主导对德交涉和协议停火，并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阐述他所认为的能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与拟订《凡尔赛条约》，后于1920年因为创建国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 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创立，总部设于莫斯科。后于1943年解散。

(9) 马来西亚领地，位于马来半岛西岸，面向安达曼海的一个离岛。

(10) 麦哲伦于1521年4月7日登陆宿务，受到胡玛邦酋长及其妻子和八百名原住民的欢迎，后来这些原住民受洗，成为菲律宾首批天主教徒。莱加斯皮于1565年4月27日登陆宿务，并将其从圣米格尔（San Miguel）改名为圣耶稣市（Villa del Santísimo Nombre de Jesús）。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看来国王陛下要将所有宝藏都归于己有、剥削社会各方，才会觉得富有。

——耶雷米阿斯·范弗利特（Jeremias van Vliet）^①，《暹罗巴沙通王叙事》（*Description of King Prasat Thong of Siam*, 1640）

我在1980年代中期到印度尼西亚担任通讯记者不久后，认识了爪哇贵族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我住在这个国家的时间越久，越难忽略他们的存在。占印度尼西亚人口大多数的爪哇人，有将近一亿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于主流的印度尼西亚语，属于精致文化，深受阶层分明、重视心灵的8世纪左右传来的印度教与佛教影响。我有次到爪哇文化重镇、雅加达东南方约三百公里的迷人古城——日惹（Jogjakarta），走访了占地广大的苏丹王哈孟库·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猖狂地意指“世界之王”）王宫。从西方角度来看，我完全想不通，骄傲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怎会容得下拥有封建头衔与附加权力的苏丹国王。在苏丹国王脏乱的皇宫里，身穿棉质暗色长袍与棕色蜡染纱笼、头戴传统帽冠（blangkon，覆盖头顶、在脖颈处打结的硬挺头巾）的老人，赤脚来回踱步于满是尘土、部分由生锈波浪板覆盖的庭院。据说，他们是自愿领取低薪效服国王的皇家侍仆。我得知苏丹王还是共和革命英雄时，更加困惑了。据我了解，他因为拒绝与荷兰殖民当局交易，而且资助共和军对抗试图再次攻占革命首府日惹的荷兰军队，而赢得印度尼西亚人至死不渝的尊崇。事实上，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还曾在1973到1978年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副总统。

这位老苏丹王于1988年10月死于心脏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场面蔚为壮观。至少有百万人无畏风雨聚集在皇宫前，排成17公里的人龙，一路绵延至位于市郊丘陵的伊莫吉利（Imogiri）皇族墓园。覆上布幔的国王棺木乘着由八匹骏马拉曳及身穿多彩宫服的侍从护送的华丽灵柩车经过时，大批人群涌上前用身上的衣服摩擦车身，以获得苏丹王最后一丝神秘的庇荫。人们称他为“我们的国王”（Our King），过去的封建统治短暂成为这个已是现代化共和国国家的关注焦点。为了出席葬礼，我不得不穿上爪哇宫廷礼服——蜡染纱笼、传统帽冠与丝绒浅口船鞋。我搭上满载哀悼民众的巴士，随着送葬队伍前进。整整三小时的车程里，

苏丹王的一位近亲动也不动地坐在前座。与此同时，城市里谣传着神秘的现象：葬礼前一晚，太阳升起之前，时针停止摆动、公鸡也不啼叫；种在皇宫旁空地中央的两棵大榕树有一棵消失了（如今原地种了一棵新的小树）。很多人都说这是苏丹国将亡的预兆。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人们私下议论着，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苏哈托自认是王位的正当继承者。

爪哇文化是一个混融外来文化浪潮的综合体，席卷火山遍布的爪哇岛。今日，大多数爪哇人是穆斯林，但罗马天主教徒的人口也相当可观。同时，许多人也信奉根植于古代早期信仰的迷信神秘主义，臣服于掌管下至暴雨海岸、上至活跃火山等多变而肥沃环境的女神。让爪哇人团结一致的，是古老印度教神话《罗摩衍那》（*Ramayana*）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些故事经由精心设计的舞蹈与偶戏世代相传，受历代国王支持与提倡，不是现代进步与发展能轻易取代的。

之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之子——曼古布密（Mangkubumi）王子——受冕为哈孟库·布沃诺十世（Hamengku Buwono X）。我参加他在父亲逝世一年后举行的加冕典礼，那是一场爪哇仪典的精彩盛会，在古老宫殿的凉亭内，以黄铜制的甘美朗（*gamelan*）⁽²⁾铍的半音敲击声开始。已故苏丹王的兄弟、穿着精致手绘蜡染纱笼的普罗波尤（Puroboyo）在与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交谈时，衬衣不小心滑落到脚踝处。这位年长的王侯临危不乱，紧跟在一位宾客身旁，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一名观察敏锐的侍仆在后方护送他离场。这一幕让我想起皇宫博物院里悬挂的苏丹王古画像，画中的国王们戒慎恐惧地向荷兰殖民统帅俯首。尽管表面上摆出引人注目的顺服姿态，但这些君主依旧散发出自信、尊严、不容小觑的气质。其实，目前在位的哈孟库·布沃诺十世不仅是日惹特区总督⁽³⁾，甚至还考虑竞选印度尼西亚总统。不同寻常的是，爪哇君主们尽管与荷兰人勾结，还是顺利度过了共和革命与迈向独立的过渡期。

爪哇王权的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现代君主扮演着百万人民城市的统治者，并提倡现代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被视为能与古代南海女神（*Nyai Roro Kidul*）心灵相通而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君王。不久前，我搭出租车经过日惹特区一处新建的会议中心，司机说，这栋建筑只花几个月就完工。我回道：“喔，怎么这么快？”他流露着崇拜眼神说：“怎么这么快？当然是因为苏丹王施了魔法啊！”

了解君主与王侯在过去与现在的角色，是洞悉今日东南亚地区各方势力如何抗衡的关键。在以人民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潮流，将君主制的整体概念视为错误的时代里，上述观点似乎颇为荒谬。然而，就我个人对东南亚权力与政治的观察经验，现实并非如此。我非常赞成已故英国学者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的看法，他主张，虽然普遍认为君主政体已成为特例，但“就东南亚而言，这个原则只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君主的角色，在当代东南亚的治理上发挥了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不只存在于君主本人现身之际和所在。这种执政精英握有王权与特权的文化，转而助长了犯罪免罚与贪腐的温和专制风气。如罗杰·克肖（Roger Kershaw）在其探讨东南亚君主政体的著作中所述，君主体制的文化由“精英，甚至是君主本身所操控，以预防现代化的毁灭性效应”。

君主政体之所以能熬过殖民时代，是因为它是强化殖民社会控制的有用手段。荷兰人取得爪哇王族与其他当地苏丹王的支持，以巩固劳役制度；英国人拔擢与姑息马来苏丹王，好让他们承认大英帝国的统治权。之后，殖民时期结束，君主政体再度被视为有用的工具——作为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君主政治的虚荣表象，长久以来吸引着现代精英，表现出早期民族主义者没能走向更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举个例子，假如备受爱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领袖丹·马拉卡（Tan Malaka）未在1949年遭到谋杀，或者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Chin Peng）未在1960年代遭到政府在英军协助下的武力镇压，东南亚的权力结构可能会与现状大相径庭。反之，现代国家体制受到冷战期间西方奋力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支持，促进并重振了传统形式的王权统治。

基于对旧时权力形态的依赖，东南亚一直努力借由根植于古代“神王”（Devaraja）传统的领袖文化，来平衡政府对于民选官员的必然开放。这种独特的领导风格，使用的是出自前殖民时期王权统治模式的两种过时手法：贍徇制（patronage）⁽⁴⁾与犯罪免罚。随着习染现代、通常为革命性的主权在民观念的前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世代的结束，这些神秘王权的遗风反而变得更为深刻。它们长期阻碍人民自由，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以洞察东南亚当代的权力动态。

东南亚十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依然盛行君主政治，这种政治形态融合了传自前殖民时代的王权传统与现代的宪政形式。文莱、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均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君王；印度尼西亚则与众不同，地方层级的王国在共和体制下蓬勃发展。这两种传统，一个古老，一个现

代，彼此不安地共存——在纷扰的时代里更是如此，无论是因为王权递嬗或政治动荡。根据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地位的形式，标志了东南亚殖民时代的结束。泰国从未遭到殖民，但是该国的绝对君主制为了因应20世纪初官僚效率，以及之后1930年代民主改革的压力，早已进行现代化。君主立宪制是在限制皇室权力的条件下建立的。泰国最后一任专制君主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⁵⁾的旧照，捕捉到他某次走访数座欧洲首都的模样。当时他身穿轻便大衣与燕尾服，与高层人士密切交谈并研究现代行政体制。他把好几个儿子送往英国公学（public school）⁽⁶⁾。与西方体制接触的经验，驱使这位泰国国王限缩贵族权力，指定正式继承人，并且引进影响广泛的官僚政治革新。如我们所见，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现代化趋势遭到2016年10月辞世的普密蓬国王的逆转，他过世时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为了确保自己在马来亚的政权合法性，英国人发现资助当地传统君主是个省事的办法。他们观察到，马来社会惯于顺服合法的君王，人民会向君王发出不平之声并期待他主持公道，或是为人父者带着自家千金晋见，企望能获得恩赏。最终，在权力分立制度演化之际，统治新马来西亚联邦核心王国的九位君主，受奉为马来传统的守护者与伊斯兰教的保卫者。九位君王轮流担任马来西亚国王，也就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马来文作Yang di-Pertuan Agong）。如同爪哇中部的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柬埔寨亲王西努拉克既是传统君主，也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他于1953年带领国家脱离法国统治，后来辞去王位并参与政治。日惹特区苏丹王与哈孟库·布沃诺九世跟西哈努克的经历⁽⁷⁾极为类似，他协助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某个阶段甚至被视为国家领袖人选。有段时间他担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与财政部长，并得以保留领地，将其作为子嗣有权治理的特别行政区。一名熟识西哈努克的欧洲人告诉我，这位国王经常把“我是20世纪握有实权的独裁君主！”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些君王适应与再生的能力，不仅帮助东南亚的君主政体度过时代的更迭，还让自己保有权势与影响力。这不单是现代化的结果，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代化的发展肯定会削弱君主的重要地位。君主政体得以残存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延续了古代的神圣与文化象征，而君主本身（及其周遭的精英）利用可观财富来使瞻徇制得以长存。换句话说，这是来自君主政治的神圣与世俗两个面向的好处。然而，王权的本质为何？它的起源为何？在现代又是如何运作的？

几乎所有东南亚的古代社会都认为，国王能够透过神圣的宇宙秩

序，促进世俗人类世界的和谐。当地的古代王权形式得力于“达摩”（Dharma，规范个人行为的宗教与道德佛法）所体现的兼容佛教传统，融合排外的印度教传统种姓制度。早期佛教王国蒲甘（Pagan）的一座寺庙外墙，刻有12世纪某位古代缅甸国王宣示的铭文：“贪婪、憎恶、妄想，全根源于自我。啊，无论萌于何时，望其全皆消逝。不以迫害得利，愿己财富永存。”这段文字或许不如使英国贵族承诺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大宪章》（*Magna Carta*）那样具体，但它的年代其实比《大宪章》早了数十年。印度教与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君主信奉的基督教非常相似，它合理解释了实行正统集权统治、制定印度教神祇湿婆（Shiva）与毗湿奴（Vishnu）的象征，以及赋予国王超自然力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着矛盾：国王与佛教徒一样，有责任体现“达摩”陈述的公平与正义理想；但若他们高高在上、不顾民间疾苦且恪守印度种姓制度，最多便只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与集结权力。

这般权力与价值观的悖论在泰国最为明显。普密蓬国王1927年生于美国，为贵族医生之子。他在瑞士长大与求学，在位七十年间，始终支持为人民谋求正义与福祉的达摩观，直到2016年逝世为止。普密蓬国王虽然名义上是行宪君主，但位高权重的他，在人民（尽管受到《冒犯君主法》[*Lèse-majesté Law*]的规范）心中却享有几近神圣的地位。他在1946年继承的王权远比今天薄弱。倡议民主改革的平民与军官在1932年发动政变，终止了绝对王权制度。一些学者表明，比起解放人民，他们更在乎的是不让暹罗（泰国旧称）遭到殖民者蹂躏。紧接在后的的是漫长的强人军政时期。在兄长阿南达·玛希敦（Ananda Mahidol）死于疑点重重的事件后（被视为脑部中弹的意外），泰王普密蓬在1946年登基，当时看来他不具有成为强大君主的潜力。这位身材瘦弱、戴着眼镜的19岁国王，此前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瑞士的莱蒙湖（Lake Lemman）畔度过，热爱水上运动与开快车。然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他基本上已将君主制改造为泰国政体的核心，并且扩展到广泛的社会与发展基础架构。

对于那些担忧共产主义攻陷印度支那的势力而言，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君主似乎是牵制极权社会主义的最佳手段。在1957年军事政变中掌权、极端独裁的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看来，君主虽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盟友，却也有违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普密蓬从一开始受到沙立的监管，到后来利用坚信自由民主会威胁泰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政府官员、士兵与商人所组成的精英网络，发挥对政体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精英打着国王的名号，支持间歇性发起以推翻高傲民选政府的

保守军事政变，让保守司法制度的好处凌驾任何原则性宪法。对于泰王普密蓬的看法，如同我《远东经济评论》前同事保罗·汉德利（Paul Handley）于他精湛写作的普密蓬传记⁽⁸⁾中所述，宪法是“暂时的、反复无常的，不值得为它大动干戈”。

这种坚定的反动立场，几乎不容许任何有效的反对势力质疑王权制，及其用以执行《冒犯君主法》的社会与法律约束力；在泰国，如果触犯冒犯君主罪，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这对泰国社会影响深远，使人民由衷尊敬且服从君王。早上8点钟声响起，多数泰国人会在公共场合止步肃立，聆听国家公共广播系统播放皇室赞歌。同样的仪式会在晚上6点再重复一次。称呼皇室成员时，泰国人必须使用“您足下的尘土”这样的敬辞，代替人称代词“我”，而在国王或王后及其儿女的面前，则须俯身敬拜。1979年，我到曼谷的头一天碰巧遇上普密蓬国王主持佛教守夏节（Lent）⁽⁹⁾仪式，许多泰国朋友都认为这是个好预兆。我还记得，那天有个严肃的皇室内廷侍卫要我蹲伏在玉佛寺的大理石台阶上（当时我碰巧正在庙里游览），而跪拜的姿势低到我的膝盖后来痛了好几个小时。

泰国雄伟庄严的君主政体以王室宫务处（Royal Household Bureau）为基础，这个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度在名义上由政府管辖，实际上则由君主指任的官员所组成，部分资金更来自坐拥至少400亿美元的王室资产管理局（Crown Property Bureau）。通过土地管理与主要国营企业的投资，王室宫务处一年可赚进超过3亿美元，而且无须缴税。理论上，国王可随心所欲动用这些资产；事实上，王室宫务处已成为花费高昂、资本过剩的赞助熔炉，当中的侍从分属不同派系，并暗中从皇室捞得好处。皇室成员不只享有特权与职务协议，还受到《冒犯君主法》各种程度的保护——批评国王及其亲属者会被处以重刑，人们根本不可能对泰国君主体制提出任何质疑。

皇室周围形成了数个权力与瞻徇制的同心圆，其中包含军队，尤其是国王与王后侍卫组成的精英兵团。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这些卫兵控制了军队的指挥结构，并在2006年与2014年发起军事政变。一位政府要员向我透露：“你要知道，这些军官从小就服侍国王或王后，在王室社交宴会上彻夜守备，晚上等于是睡在国王寝宫门前。”这种阿谀有些荒谬：国王收容的流浪狗被尊崇为国家英雄，并成为动画电影的主角；王储的宠物贵宾犬则受命为空军军官且穿着制服。时任美国大使拉尔夫·博伊斯（Ralph Boyce）主持的外交晚宴上，名为福福（Fu Fu）的贵宾犬

跳上餐桌，吃着受惊宾客盘子里的食物，却无人挥手或出声赶走它。博伊斯在不久后发布于维基解密（WikiLeaks）上的官方越洋电报中描述这个景象，令人联想起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¹⁰⁾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皇宫所作的离奇叙述。

普密蓬国王个人对泰国及人民的发展怀抱的强烈使命感，支持着他无与伦比的魅力与人气。可提高作物产量的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包含灌溉、种云（人工增雨）及鱼苗与家畜的饲育，都是他的功劳。就规模与影响而言，这些政绩或许不出众，却将普密蓬塑造为慷慨大气的施惠者及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国王自认这些努力超越了象征意义。在他看来，泰国的存亡仰赖国内谨慎的经济与环境管理。后来，这样的观点正式定义为普密蓬对自给自足经济的概念，并成为官方发展正统的一部分。即使这个词汇的意涵至今依然含糊不明，但普密蓬国王本人的观点非常明确。“推动发展，必须尊重各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1987年对记者如此表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人民身上，只能提供建议。我们必须亲身与人民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充分说明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普密蓬国王晚年因罹患中风与退化疾病而不良于行，久卧病床，鲜少露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年度公开演说提出对法制与民主等议题的建言。有人认为，他公开赞同司法审判的举动使法官变得大胆狂妄，让过去十年来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一些势力畅行无阻。从外界角度来看，泰国当代的政治冲突，使得王室的保守体制与倚靠平民魅力（及雄厚财力）的民众运动相对立。在前任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中文名为“丘达新”）为首的为泰党（Pheu Thai Party，正式名称为“泰爱泰党”[Thai Love Thai Party]）中，部分领袖曾经参与王室反对并在1970年代遭军队镇压的左翼运动。因此，君主政体卷入政治冲突，导致冒犯君主罪的案件遽增。这种现象显然与过世前七年来一直疾病缠身的国王本人没有太大关系，更多与操纵皇位继承权以保有势力的守旧派王室精英有关。

普密蓬国王历时悠久且贡献良多的治理，在2016年10月13日划上句点，引起泰国社会高度担忧。数以万计的民众涌入通往曼谷大皇宫的街道，争相瞻仰国丧初期摆放在宫殿内供人瞻仰的国王遗体（为期一年，之后进行火化）。人们身穿代表传统丧葬礼仪的黑色或白色衣服，或低声啜泣，或泪眼婆娑，有人还拿着全民爱戴的国王肖像哀悼。然而，数起丑恶的事件玷污了举国悲切的哀伤，其中有貌似不甚悲痛的民

众遭到迫害。

普密蓬国王在位后期越来越少公开露面，一年只现身一次，接见高层官员，敦促人民遵守法制与尊重民主。泰国的政府官员不擅调解内部纠纷，因为他们习惯依赖国王作为调停人，即便国王的立场偏向由谨慎保守派组成、衰颓不振的联合政府。此外，尽管普密蓬因为平抚了1992年向学生等抗议人士开火⁽¹⁾的军队势力而受到赞扬，但在此前后，他曾替镇压民众的军事行动背书，并且支持军事政变。随着普密蓬国王的身体状况恶化，关于王位继承人的臆测也越来越多。时年64岁的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在1972年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根据继承法律，他是合法且正统的王位继承人。新闻报道指出，他一开始延后就任国王拉玛十世（King Rama X），是因为他自己要求与全国人民一同哀悼普密蓬国王的离世。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文官必须挑选吉日，或是皇室为了谨慎起见，让继位仪式与前任国王驾崩之间象征性地间隔一段时间，避免扎克里王朝（Chakri）只能维持九任君主之久的知名预言成真。

新任国王面临许多挑战。泰国人失去了一个备受爱戴的国王，对将来感到茫然，因为在过去，泰王超凡的道德魅力使人民仰赖他解决问题。处于高度分裂政治环境中的人士期待看到王权衰微，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王室支持军队干政。过去十年的混乱政局，促使泰国北部与东北部的政治新势力诞生，这些地区自认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受皇室中央集权与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样的认知在南部地区更为强烈，当地甚至出现代表马来穆斯林族群要求脱离泰国统治的激进暴动。普密蓬国王的逝世，让泰国失去了在国家存亡之际强大的统一领导力量。无论是利用将军会议与成员全是橡皮图章作用的立法机关以操纵权势的军方，或是内部分裂的政治精英，都不可能合理延伸出属于人民或合法的领导地位。没有人期待新君主即位后能修补这些裂痕。这或许是件好事。事实上，有些保守人士希望君王能放弃他在泰国社会的核心角色——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一位泰国高层长官与议员表示：“普密蓬国王遗留给后世的恩惠，应该是泰国人民现在能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治理自己。”

一直以来，操纵有效王权势力的不只是君主本身。前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哈托（1966—1998年在位）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杰出人物，得力于理想统治者之于人民的象征意义。他其实不是一国之首，但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都视他为国王。苏哈托于1921年出生于爪哇中部，是一位次等水利官员之子（可能为私生）。亲戚收他当养子，让他在家接受基础

教育。苏哈托掌权的过程至今仍是个谜，困惑着许多认识他的人与他所建立的环境。苏哈托不像在沉默革命后被罢黜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现代主义领袖苏加诺，后者是个极富群众魅力的演说家，苏哈托既未受过正规教育，也缺乏出众的智慧，无法领导拥有荷兰教育背景与社会主义理想、参与独立运动的经验比他丰富的战友。虽然谣言盛传他来自贵族家庭，但他的家乡其实距离日惹皇宫甚远——尽管他确实因婚姻关系而从邻近的皇城梭罗（Solo）跻身低阶贵族。然而，这个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男子奸诈狡猾且冷酷无情。1965年9月底，苏哈托在一场混乱棘手、杀害六名上将的军阶清洗行动中抓住掌权机会。他凭着华人企业家与高阶军官之间利润丰厚的交易，掌握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军资需求，因而受惠于海外华人移民一向赖以维生的贿赂形式。

此外，苏哈托调整并善用爪哇管理当地权力与贿赂的方式，当中细节由其女西蒂·鲁克马纳（Siti Rukmana）编纂于一部简短著作中。除了其他原因，苏哈托所具备的爪哇朴实智慧，合理解释了他运用伪装与诡辩以掌握权力的作为。他生性寡言，或许是为了遵循明智国王深知言语无法收回而说话谨慎的爪哇传统。除此之外，他还相当擅长确保事事都由他决定，就连乡镇的发展补助也亲自监督。以这点而言，比起泰国的普密蓬国王⁽¹²⁾（或许是在西方成长与求学的关系，他避免直接干预政治，以维持宪政君主的角色概念），他更像典型的印度佛教徒统治者。

历代爪哇国王从潜藏于超自然领域中的权力概念衍生本身的正统性；血脉或遴选则是次要的决定因素。神圣的灵感、魅力或气场（aura，印度尼西亚文作wahyu）与超自然力量（sekti）结合，从王室向外扩散，遍及整片国境。这股力量的具体本质会随距离而削减，实际上是短暂无常的——因此万一国王的政策失能，或者国家遭遇不幸，人民便可能认为国王已失去气场。研究爪哇历史的已故印度尼西亚华裔学者王福涵（Ong Hok Ham）多次指出爪哇王权的不稳定性。权力继承的首要基础不在世袭权利，而在于转世的超自然现象。皇权至高无上，却也流动不定，容易受内部皇族或外部王室官僚与行政体系的竞争所影响。

这种权力作为流动、有限资源的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苏哈托为何耗费这么多的精力，通过有效的发展来展现自身气场，以及费心扰乱潜在的对手。苏哈托呼应古代爪哇国王的做法，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展现对农人的支持。他下令在雅加达郊区建造一座大型牧场，发展畜牧技术。正如普密蓬国王经常被媒体拍到手拿着地图或平面图，指导官员执

行水利与造林工程，新闻中也时常出现苏哈托戴着斗笠割稻、与农夫谈论耕稻与饲养牲畜的画面。这位总统最喜欢指导农人耕田。他在说到牛的人工授精新技术时眉飞色舞，而在国家电视播出的节目中，也可见贫穷农夫殷勤招呼总统、恭听他对农业的珠玑之言时脸上的谄媚表情。其实，苏哈托生为水利官员之子，从未当过农夫。

苏哈托知道如何利用爪哇的传统权力的展示来增进自身的正统性。最为人称道的爪哇王室传说之一，以12世纪中叶统治谏义里（Kediri）东爪哇王国的查亚巴雅（Jayabaya，或Joyoboyo）国王为主角。他被视为明智国王或“公平之王”（Ratu Adil）的原型，重新统一王国并预示繁荣时代的来临。苏哈托与“公平之王”一样，小心翼翼地建立谦卑形象，好掩饰自己垄断权力与家族坐拥庞大财富的事实。他穿着浅褐色猎装，准时上下班。他婉拒入住以灰泥粉饰的宏伟总统官邸，住在雅加达中部郊区镶着廉价雕花玻璃的单层平房。他没有热爱跑车或沉迷女色的弱点，嗜好是钓鱼。然而，不同于查亚巴雅国王，苏哈托后来并未退位去静心禅修。

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均利用农业自足的象征（插秧或犁田），来美化理想君王的形象及展现大公无私的精神。苏哈托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之一，是1985年获联合国以表彰印度尼西亚稻米自足的成就所颁予的粮农组织奖（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Award）。普密蓬国王则偏好以较为谦逊的方式来凸显政绩——赞助奖励科学成就的国际奖项“玛希隆奖”（Mahidol Awards）⁽¹³⁾，但当地的圣贤传记将人工增雨与水利管理的创举都归功于他。如同素可泰时期的兰坎亨国王，普密蓬基本上确保了人民享有田中有米、水中有鱼的生活环境。

虽然苏哈托总统与普密蓬国王也可以说都意识到，在现代环境下透过政绩加强自身正统性的必要，他们统治的社会却容易受到传统领袖象征的影响，尤其是在精英阶级中，因为这个象征可满足他们的权力私欲。因此，苏哈托与普密蓬（现代东南亚在位时间最久的两位统治者）有意识地营造出公正、良善的统治者形象，以便符合印度教与佛教典范。这些广泛的象征性策略使对手难以质疑他们的正统性，有助于集结庞大权力。如同之前提过的，苏哈托确保自己是村里建造学校、诊所、道路与桥梁的资金来源（总计约占20%的国家发展基金）；这些资金由他透过极权主义的总统指令机制（Inpres）⁽¹⁴⁾直接拨款。身为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之父”，苏哈托从未打算让其他人居功。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旧时的温和专制作风阻碍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进展。苏哈托采取的微观管理与决策中央化政策，阻碍了国家制度与官僚发展，使印度尼西亚毫无迎接民主的准备。他的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儿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任意建立商业帝国来垄断有利可图的产业，进而使得外国资方必须与其交易。荷兰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在军方为了开发资金而形成的特许经营与商业垄断下，苏哈托将位于经济成长首选地区的企业分配给亲属，然后下令国有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他利用艰涩难懂的基金会法（已实行一段时间，供独立运动钻漏洞以获取资金）私藏数十亿美元，并强迫薪资微薄的公务员捐钱。

无论是巩固地位或维持财富，苏哈托与普密蓬都控制了社会，发展出严重不均、异常富有与一向强硬的官僚阶级，以维持自己无可匹敌的领袖地位。虽然有评论家指出这两人是有效实行主权在民的障碍，但他们身边的亲信与守门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这些人拥有非凡的权力，因此应该为长期腐败与改革障碍负起主要责任。这个趋势，从东南亚领导与权力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汲取了养分：贍徇制以及卑劣王侯对其追随者的管理。

东南亚国家由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耕田与资源共享而言，达摩佛法的理想与公开平等的需求达成一致。但随着社会进展，水稻农作兴盛的地区人口呈现倍数增长，强大且成功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可以最有效地集中权力与维持社会分化的策略。例如，13世纪的王室律法条款（*Mangraisat*）是泰国国家组织最早的详细记录之一，描述泰北清迈的法律与传统。当时的清迈是平河（Ping River）河畔有数千人口的小镇，河水灌溉着狭长的稻田谷地，周围是环境险恶、森林遍布与神灵栖息的山丘。“王室律法条款”的其中一项主要条款明定了官员的阶层：

一位“Nay Sip”负责十个平民（等于管理十人），一位领班担任中间人与公布指派的任务。一位“Nay Ha-Sip”负责五名“Nay Sip”（等于管理五十人），两位工头，一位在左，一位在右。一位“Nay Roy”负责两位“Nay Ha-Sip”（即管理一百人）……

依此类推。在今日的柬埔寨，这个顾及农业人力编制的基本阶级形式，覆上了一层9世纪高棉国王建立的印度教种姓制度治国术的浓厚色彩。深植于印度婆罗门传统种姓特权的王权习俗因此诞生，而泰国以及

处于高棉文明吴哥王朝的柬埔寨，均依循这种惯例，并将这种习俗转变为复杂的地位阶级化制度。过去，掌握最多劳力的国王才算治国有方。在这些早期王国中，拥有劳力与有效率地加以编制，比占领土地还重要。人口流动性极高，如果某地的人民遭到国王或王储恶劣对待，可以直接迁居到其他地方。没有人民的国王毫无权力可言，无怪乎马来文的“财富”（*makmur*），也有“人口众多”的意思。

为了维持臣民的忠诚，统治者必须建立奖励办法。这么一来，人民也能接受，统治者由于职务神圣而享有崇高地位，因此，与君王关系密切的人可获赐阶级与地位。观察入微的中国文人周达观⁽¹⁵⁾，曾在13世纪末游历高棉首都，他极其详尽地记载了高棉的文明与社会。他叙述一个依据奴隶多寡来区分个人地位的社会，国王至高无上，而领土内最美丽的女人们会被送入皇宫内侍奉君主。此外，他也简短描述了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在元朝以前——中国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管控之前，东南亚新兴王国仰赖中国商人进口贵金属，并拿稀有木材、宝石与其他中国视为奢侈品的自然物资作为交换。清朝于19世纪末衰亡后，中国从商的人口越来越多，借由王室授予的商业特权与包税，助长王室内部的派系斗争。

种种发展造就了东南亚社会与政治组织最具代表性的一项特色：赡徇制在团体与派系的规模与组成上发挥强大作用，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偏重人力的控制权，而不是土地与货物的拥有。奴隶制度多半成为常规，劳力的主要来源则是战俘。打胜仗的统治者没兴趣占领战败君王的土地与疆域；他们不仅夺取败将的军队，还收拢全部人口作为奴隶。这说明为何现代缅甸仍可见有前代泰国奴隶的族群，而居住在泰国的缅甸奴隶依旧怀有被迫迁徙的共同记忆。国王高骑战象攻城略地之际，平民所遭遇的困苦与伤痛，至今仍未见任何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我研究泰北清迈内外的历史族群期间，听过一些被当成猎物般载运到异乡定居者的故事。在这种战争形式下，大规模的杀戮或屠杀十分少见，因为人力是最主要的战利品。

那些有幸能侍奉尊贵统治者的人，处境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侍从十分雷同，只要有权驱逐或处决任何不忠或危险人物的神圣君主一声令下，他们随时都可能获得或失去头衔与地位。著名的19世纪缅甸社会观察家詹姆斯·乔治·斯科特爵士（Sir James George Scott），曾经描写过曼桐王（Mindon Min）的故事。1874年，国王听闻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英国议会选举的首相之争中输给本

雅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推测落败的格拉德斯通将会入狱。当代的东南亚社会与那个年代极为类似，将权力视为一种绝对属性：不是有，就是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力，生命的价值就一落千丈。这种将权力视为具体属性而非短暂或体制性事物的落伍思想，或许多少解释了人们为何不愿意放弃或转移权力，以及民主法规为何经常遭到漠视。在现代背景下，这种观念看似不可能继续留存，但确实存在。

虽然印度教与佛教合一的王权传统支持东南亚现代权术的方式容易受人诟病，却有助于防止拥兵自重。一般也许认为泰王普密蓬天性保守且坐拥个人权力与财富，但也有人推崇他在现代泰国史的关键时刻介入仲裁，调停敌对的军方与平民派系。他首次在1973年干预引起暴力冲突的学生运动，后于1992年再次调停政变的举动，在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显现他是个只在乎人民利益的明智国王——即便之后暴动的根本原因遭到忽视，使保守派精英占尽便宜。其他时候，譬如近期2010年的街头暴力与抗争，普密蓬意外地保持沉默，而政府派遣军队入城，导致流血冲突。苏哈托本身是位将军，但随着权力与地位提升，他将军队边缘化成权力来源，指派重要的平民技术官员负责经济事务，迫使军队在1980年代晚期开始谋反。另一方面，就君主政体消失后的演变而言，今日的缅甸则是非常有趣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缅甸历史的关键时刻发生在锡袍王（Thibaw Min）突如其来且尊严尽失地下台之时。1885年曼德勒（Mandalay）遭英军攻陷后，他成为缅甸的末代国王。缅甸未能恢复英国殖民者有所顾虑却若无其事地否决的君主体制，造成了文化真空，可说是迫使社会走向长期军事统治的现代命运。吴丹敏（Thant Myint-U）⁽¹⁶⁾在论述缅甸史的文雅著作《失落足迹之河》（*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中提出观察心得：“没有国王的缅甸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脱离在中世纪前即已支撑着伊洛瓦底江社会的观念与体制。”吴丹敏颇为主观与激昂的言论让我们认识到，缅甸社会的不安氛围源于历史精神的创伤。他写道，1885年之后的缅甸随波逐流，“在与过去毫无羁绊的情况下骤然进入现代世界，四处寻觅新的灵感，立基于比以往更加愤世嫉俗的民族主义情操”。身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U Thant）之孙的他指出，现代缅甸的核心，是对遗失历史片段的徒然寻觅。

旧皇宫的城墙与宽阔的护城河依然伫立于曼德勒，萦绕着的是往昔一度辉煌的王朝褪色的记忆，这里曾经被外国势力所践踏，而同样的外国势力今日拥护缅甸军队召起人暨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事

实上，缅甸皇宫在日本占领时期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后（缅甸将这起行动视为彻底的背叛），有大部分区域曾在1990年代进行重建。基于对这个背景的了解，2014年初的某天，我在前英国大使的爱尔兰裔妻子于曼德勒举办的文学节中，参加关于“老锡袍王”的一场会谈。锡袍王的孙子陶伐亚王子（Prince Taw Phaya）安静地坐在观众席，聆听印度作家苏达·沙阿（Sudha Shah）谈论自己的著作《流亡的国王》（*The King in Exile*）。王子的在场，使人听到遭罢黜的国王在印度西南部勒德纳吉里（Ratnagiri）的落魄处境时更加痛心，这些处境包括他把身上仅剩的珠宝施舍给穷人，还有他的子孙在印度开嘟嘟车与当技工维生。当时高龄九十的王子在会谈最后受邀致词，一开始沉默不语。

“你们不会想听一个老人的语无伦次。”他强忍悲伤地说。显然，过去的伤口因为这个故事，以及有关曾经繁荣灿烂的王室与逝去财富的描述而再度淌血。有一样东西被人夺走后未曾找回：缅甸红宝石。皇室遭到驱逐后，是否有人偷偷将宝石占为己有？如今镶在英国皇冠上的那颗宝石是否就是它？

老王子宣称：“是的，那就是它。”他激动地站起来对观众说：“跟鸽蛋一样大的宝石！”

受到过去英国曾将缅甸归入英属印度的事实影响，现代缅甸常被认为隔绝于泰国与柬埔寨等东南亚大陆的国家之外。其实，支配这些社会组织的传统与文化有着相同的根源。今日位于缅甸新建首都内比都（Naypyidaw，意为“国王居所”）的总统官邸，就像曼德勒的古代皇宫，还有一座护城池。总统在类似谒见室、满是镀金镶饰的房间里接见达官显要，而军队在缅甸三大帝⁽¹⁷⁾巨型雕像的影子下列队行进。

由衍生自婆罗门印度教的王权仪式加以分层和规范的灵性与佛教信仰混合体，锚定了东南亚大陆的佛教徒社会。这两种信仰元素都还不足以独力巩固与指引社会。1767年缅甸军队劫掠光荣的首都阿育陀耶之后，18世纪末的泰国迷失了方向。有数十年的时间，农村受盗匪所苦，由劳力组成的耕田系统瓦解，人们为了存活猎食彼此。那是一段黑暗混乱的日子，在泰国史上几乎已遭人遗忘，因为之后的新皇族，也就是如今的扎克里王朝出现，在曼谷湄南河畔建立了耀眼的首都，重拾旧有王国的礼俗与秩序，并从满目疮痍的阿育陀耶运来砖块，作为皇宫的象征性建材。

时间快转到1990年的柬埔寨，一场漫长的内战即将告终；1975年

到1979年的柬共政权，最后害死多少人？在自认亲农的政府利用鲁莽的乌托邦政策来逼迫人民从城镇迁至乡村、以抹灭柬埔寨历史的同时，也许有多达两百万人死在杀戮战场上。在农村，人民被迫耕田，不识字的柬共干部处决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过一段如此痛苦与血腥、与过去脱节的日子，但当接踵而来的内战最终落幕时，社会仍毫不犹豫地重新拥抱柬埔寨古代印度教与佛教合一的君主体制。如护身符般的君主政体尽管缺乏权力，依然帮助柬埔寨修补文化与重拾向心力，宗教仪式及精湛的皇室芭蕾舞演出，以某种方式掩饰了难以言说的红色高棉历史，同时（至少在西哈努克亲王在位时）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总理洪森垄断权力的影响。

从1950年代柬埔寨独立早期到2012年去世之前当权的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精明又迷人的人物；他利用王权巩固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强化服从的封建意识。继任的西哈莫尼国王（King Sihamouني）对音乐与舞蹈比较有兴趣；他以薄弱的权力管理摇摇欲坠的体制，而且据说完全为洪森所控制。掌权近四十年后，贫穷佃农之子洪森对于权力的看法与吴哥的古高棉国王非常相似，他们都将社会愿景投射在自己的威名与宽宏气度上。十多年来，洪森设立了四千所学校，校名不是包含他的名字，就是采用妻子文拉妮（Bun Rany）之名。起初担任红色高棉干部的洪森，也重振授予贵族头衔的惯例，任何对他的政党有所贡献的人都能受惠。洪森政府包含多达数百位的部长与国务卿，令人想起古高棉王国朝拥有的众多随员。不同于东南亚领袖一般由数十名特殊警察维护人身安全，洪森拥有超过五千人、配备现代武器且名为“总理护卫队”（Prime Minister's Bodyguard Unit）的军力。这般权力是民主手段也无可奈何的。2016年5月，柬埔寨总理洪森下令，所有国民必须尊称他为“光荣至上总理与权威司令”。

现代缅甸从未经历过东南亚王室权势核心的官僚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吴丹敏在《失落足迹之河》中好奇地提出：假如锡袍王活得久一点，英国人离开之后，他是否会再次当上国王？他接着提到，次级王侯们为了恢复前代贡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的荣耀，曾做过几次已遭遗忘、消极被动与不幸失败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来临的独立，由怀抱日本好战价值观的青年军官与受社会主义激励的政治人士所推动。此外，了解缅甸自尊与文化的弱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也很重要。如吴丹敏所指出：缅甸被并入英属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引进印度工作者，填补公务体系中令人垂涎的新职缺。“旧时缅

甸的都市与国际事物已经消失，新缅甸的现代事物都来自国外。”很难想象当时英国殖民官员说话的语调到底有多自命不凡。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前英国殖民官员的私人文件，其中引述了1920年代的典型看法：“怎么可以实行提拔缅甸人的计划？你有遇过适合当行政长官的缅甸人吗？让缅甸人当部长，有必要吗？你想想，一个缅甸部长处理政务与批核文件，而且受人尊称为‘长官’，这能看吗？”

不同于君王享有完整官僚传统的泰国，以及马来统治者行为骄纵却支配着社会的马来西亚，没有君主政体的缅甸，可说是一艘没有船长或文化支柱、在海上四处漂流的船。这样的结果是，这个国家依然受到兵力多达四十万的军队（世界排名第十五）控制，而且没有一个人物或制度拥有足够与之抗衡的力量或声望。当然，除非最后昂山素季上台能改变这个局势。尽管她在赢得缅甸民主选举的斗争中遭遇许多痛苦，但如今她赢得国会多数票，而且稳居有分量的国务资政而非总统一职，使一些人对她的领导风格感到忧心。依赖单一权力焦点的冲动显而易见。在她胜选六个月后，我前往缅甸，在那里遇到的部长或官员几乎都对她说唯命是从。一位副部长不断对我说：“所有事情将由国务资政决定。”昂山素季被视为不容许党内有任何异议或违抗的跋扈领袖。社交媒体的一张照片中，她坐在椅子上，党内官员跪在她面前。或许在未来，她会有勇气向同为牛津大学校友的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要回锡袍王的红宝石。

昂山素季是现代东南亚少数攀居政治高位的女性中最突出的一位，在当地由男性支配的统治传统中一枝独秀。其他女性领袖包括科拉松·“科里”阿基诺（Corazon “Cory” Aquino），1983年她的丈夫——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遭到谋杀后，她因为人民抗议的热潮而被推举为菲律宾总统。另外还有梅加瓦蒂·苏加诺（Megawati Sukarnoputri），她带领第一个组织健全的反对党，在1990年代早期高举印度尼西亚民主党（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的旗帜挑战苏哈托。梅加瓦蒂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之女，她在2001年获选成为改革时期的第二任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自2001年起至2010年间，一共当了九年的菲律宾总统。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中文名为“丘英乐”）则在2011年当选泰国总理。有趣的是，这些女性都与支持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有关，不是他们的女儿，就是妻子，英拉则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在东南亚，政坛主要由男性主导，传统上女性则在幕后发挥广泛的影响力。然而一旦置身领导地位，她们便成了令人畏惧的对手，权势仿佛更胜男性一筹。昂山素

季长达二十年的自由奋斗（包含软禁在家十五年），使她在2010年获释后成为强大军队势力打不倒的对手；科拉松的总统职位在1980年代中期因军队接管威胁而受到重创，但她在2009年去世时，带来的情绪渲染力极为深刻，以至于她的儿子尽管相对无能，终究还是靠着人民的同情票顺利上位；梅加瓦蒂在当代印度尼西亚政治中至今仍具有广大影响力，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当初就是在她的印度尼西亚民主奋斗党（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 of Struggle, PDI-P）⁽¹⁸⁾旗下当选。今后，令人瞩目的是遭到监禁的前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之女努鲁·伊莎（Nurul Izzah Anwar）的政治生涯，她继承了父亲的口才与个人魅力。但诚如她自己承认的，身为女性，当别人将你视为强大政治家族或王朝的象征，你很难去打造一个独特的领导平台。

今日，东南亚犹存的君主被视为进步改革的落伍羁绊。在泰国以外，大量批判性的文献贬责泰国君主对于盲目奉承的过时需求、加诸拒绝奉承者身上的严格法律制裁，以及对国内压抑保守势力的庇护。社交媒体上的批评文章，让毫无心理准备的批评者因为各种计算机犯罪行为而坐牢或遭驱除出境。然而，马来西亚的君主政体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些不同。如同泰国，各自治理一个州的九名在位马来君主⁽¹⁹⁾，是体制（这里指多数马来社会）的顶点。这种观点驱使他们在压力与冲突的时刻，挺身担任仲裁者的角色。宗教上，面对伊斯兰教义的操纵，马来君主能够发挥调节的力量；宪法上，他们凌驾于政治之上，却通过统治者会议（Conference of Rulers）⁽²⁰⁾在政治事务中扮演有限的角色。这个政体的主要功能是每五年选出国王，而论及马来权力与特权时，在名义上也具有保护宪法的作用。过去在统治圈中，诸如《惩戒法》（Hudud）⁽²¹⁾的实行或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程度等议题闹得沸沸扬扬。2015年，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疑似涉入财务丑闻而引发政治紧张时，马来君主加强了他们对于统一与稳定的温和关切。在2015年年中的统治者会议上，他们呼吁政府实施维护稳定的措施，而备受尊敬的霹雳州（Perak）苏丹纳兹林·沙（Nazrin Shah）则表示，为了统一，政府需要培养伊斯兰教的宽容文化并尊重不同意见。这些近年来的君主干政作为，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点出了国家面临政治危机时马来君主能否置身事外的问题。

2015年8月，柔佛州（Johor）苏丹易卜拉欣——已故的苏丹伊斯干达（Sultan Ibrahim Ibni Almarhum Sultan Iskandar）之子发表公开声明，建议总理多留意当时贬到十八年来新低点的币值。在可能遭指责为

干涉政务的激烈非难言论中，这位苏丹表示：“我也想提醒民选议员们负起受委托的公共责任，把个人利益暂摆一旁。”年轻的柔佛王储东古·伊斯梅尔（Tunku Ismail Sultan Ibrahim）则比他更勇于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关切。8月底，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吉隆坡市区抗议政府时，也出现引述柔佛苏丹言论的标语。讽刺的是，要求干净与公平选举的净选盟（Bersih）示威运动，选择的黄色是马来王室的传统代表色。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柔佛苏丹谈到政治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王族特权：

我在柔佛州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有权可随时召见首席部长（*mentri besar*）和我的政府里其他官员一起商量（*tegur*）政事。我是任命州政府的人。我无时不刻都将人民（*rakyat*）的福祉摆在第一位。

在泰国与马来西亚，长期的政局不稳定迫使君主干政，主要是因为君主政体尽管在宪法上受到限制，依然是一个拥有庞大权力与影响力的体制。然而，君主干政的结果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如马来西亚，让言论自由受限的人民能够发出不平之声；但也有像泰国，令保护王权的贿赂势力与法律约束成为解放言论的巨大障碍。2015年8月，一名泰国人因为疑似在脸书上污辱君王，而遭判三十年徒刑。新国王拉玛十世于2017年初下达的第一批命令，其中一项是修订任命摄政王权力的宪法法条，显示新君主的至高王权一如以往。他颁布的这道政令与其他改变将一起强化君主权力的事实，暗示了新国王亟欲掌权，促使政府官员与军队都得依附他的恩宠与支持。

显而易见，君主政体依然是东南亚政治中的重要角色。虽然在那些提倡促进平等秩序的人看来，君主政体显得难以理解与陈腐过时，但东南亚的权力关系根植于原始的领导传统，而这种传统来自国王与王侯是权力与权威焦点的时代。许多人依旧期待君主在政治紧张或危机之际担任仲裁者，譬如2014年，现任柬埔寨国王居中斡旋总理洪森率领的政府与反对党，试图使两方达成协议，但以失败告终。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传统君主强力捍卫宽容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对抗民选官员所引发的种族两极化与宗教仇恨，令马来西亚人备受鼓舞。然而在东南亚，由于权力与贿赂来自社会顶端，君主即使再怎么看似正直，地位再怎么凌驾于政治之上，都无法阻止政府高层为所欲为、毫不顾忌地操纵职权。

这种现象对于平民百姓，以及他们与传统和现代统治者的关系有何

影响？2014年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前夕，我在日惹皇宫门前的老垂叶榕树下采访一群选民。其中一位名为马斯·堤耶诺（Mas Tiarno），是这座城市里无数三轮车司机之一，他仔细解释自己认为谁会赢得这场选举。他自信地说：“爪哇中部的每个人都会投给佐科威。”话中指的是雅加达的人气省长佐科·维多多（实际上政绩也相当突出）。堤耶诺接着提出再平常不过的理由：佐科威是人民公仆，出身本地，廉洁又能干。“前阵子佐科威来日惹巡访时搭的是马车！很少见吧？”但真正令他敬佩的是，佐科威与苏丹王开了一场非常特别的会议。堤耶诺头朝着身后的皇宫大门方向点了一下，“就在里面，只有两个人，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他说这句话的同时，眼睛睁得斗大。“正常人晋见苏丹王只有大概一小时，而且地点从来不在皇宫里。”言下之意是，苏丹王通常会在特殊地点与南海女神进行心灵交流，其中之一是皇宫内的圣所。堤耶诺还说，出身爪哇中部的现任总统苏希洛提议排除苏丹王的统治者身份之后，城市动乱四起，他所属的民主党也在地方选举中落败，足见爪哇文化与传统对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强大影响。

这些发展并非意指人们愿意盲目臣服君主的威权。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中，可见许多君主因为治理无能或不公义而失去民心的例子。东南亚的平民也不认为权力与特权都专属君主一人。我将在下一章论述，特权精英无情且自私的行为，通常是东南亚地区暴力冲突的成因。

- (1) 1602—1663，1633—1641年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泰国贸易处主任，派驻阿育陀耶，撰写了四部关于阿育陀耶王朝历史的作品，对泰国史学有重要贡献。
- (2) 意指“敲击乐”，是印度尼西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音乐，又以巴厘岛和爪哇岛的甘美朗最著名。甘美朗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宫廷和宗教音乐，几乎每个庆典场合都会出现。为了演出效果，甘美朗多半在凉亭内演奏。
- (3) 日惹特区于1950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后成立。日惹特区总督没有任期限制，不必受印度尼西亚政府任命。
- (4) 指当权者将国家官职当作个人赠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给予亲朋好友的用人制度，是17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官职恩赐制的产物。
- (5) 拉玛五世（Rama V），自小受英国国家教安娜·列奥诺温斯（Anna Harriette Emma Leonowens）（电影《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中的家教）教育，英语流利。
- (6) 英国公学与皇室有关，部分是专为较富有的社会人士设立，入读这种学校的基本条件并非学费，而是家庭背景。
- (7) 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因为协助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拥有日惹特区，西哈努克则是得以保有法兰西联盟治下的独立地位，后来脱离法国而独立建国。

- (8) 《国王从不微笑》(*The King Never Smiles*) , 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
- (9) 又称“守居节”, 出自“结夏安居”(原为印度僧尼在雨季的三个月当中聚集修行的制度, 其间他们不能随意外出)。守夏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佛教传统节日。
- (10) 1932—2007, 波兰记者、作家、摄影师和诗人, 作品被翻译成外语的数量仅次于辛波丝卡(Maria Wislawa Anna Szymborska)。
- (11) 1992年4月, 素金达将军(Suchinda Kraprayun) 在选举落败后自封总理, 5月曼谷爆发反政府游行, 军事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示威民众, 造成五十多人死亡, 史称“五月事件”。
- (12) 普密蓬国王是唯一出生于美国的泰国国王(其父当时在哈佛求学), 他的父亲过世后, 母亲带全家移居瑞士, 返回泰国之前, 他都在瑞士求学。
- (13) 玛希隆奖的全名是The Prince Mahidol Award, 是泰国皇室赞助的奖项, 每年颁奖给全球杰出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成就。
- (14) 印度尼西亚文“Instruksi Presiden”的缩写, 意指“总统指令”。
- (15) 元朝事务官, 奉命出使真腊, 《真腊风土记》是关于当时的柬埔寨和吴哥的重要参考文献。
- (16) 历史学家, 剑桥三一学院毕业, 曾担任缅甸总理顾问, 并获颁印度莲花士勋章。
- (17) 缅甸三大帝为: 蒲甘王朝创建者, 第一个统一王国的阿奴律陀; 缅甸史上最强盛的东吁王朝第三位国王, 第二位统一王国的莽应龙; 贡榜王朝创建者, 再度统一缅甸的雍笈牙。
- (18) 1998年10月成立, 自印度尼西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政党。
- (19) 君主治理的九州岛是: 雪兰莪州、霹雳州、彭亨州、柔佛州、吉打州、吉兰丹州、登嘉楼州(以上各州的君主称为苏丹)、森美兰州(君主称为严端)、玻璃市州(君主称为拉惹)。
- (20) 由马来西亚的九位世袭统治者和四位委任州元首在联邦宪法三十八条文下组成的理事会, 议会的主要功能是每五年在九位世袭统治者中遴选出最高元首和副最高元首, 但只有世袭统治者拥有最高元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21) 根据伊斯兰教教法(Sharia) 所衍生的刑罚律法。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弱肉强食。

——瑞天咸 (F. A. Swettenham) ⁽¹⁾

2013年的某一天，我在曼谷与受害者家属齐聚一堂，他们的亲人在这座城市爆发的流血冲突中丧生，对立的双方分别是支持流亡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以及拥护保守君主势力的黄衫军。泰国在过去十年之所以会出现以颜色为标志的示威运动，是因为人民对于民选政府的支持，与保守派担心他信执意扭转社会秩序并以人民专政取代君主制度的恐惧，产生分歧。而这场会议的目的，是让对立双方的政治人士（包含副总理在内）与暴力受害者们面对面对谈。

妮查 (Nicha) 的先生是2010年4月10日在暴动中丧生的高阶军官，她表示，这是她从丈夫死后三年来，第一次能当面向政府要求解释，此举令官方大为震惊。受害者家属起初态度谨慎，到后来情绪溃堤，把顾虑一一摊开来说清楚。当时以他信的妹妹英拉为首的政府，在庞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内政部福利署与总理办公室的官员准备不足，什么承诺都给不了，甚至连一句慰问也没有。某个时间点，一名内政部官员能言善道地向他们表示，可以上政府网站查询申请补偿的详细信息。会议中最令人悲痛的时刻，应该是好几位家属恳求政府，不要让暴力冲突再度发生。帕窈 (Phayao) 代表受害者家属致辞，她的女儿在2010年于抗议地点附近的佛寺里照顾受害者时中弹身亡。她直视着副总理说：“感觉就像受到二度伤害。这口气我咽不下去，我需要知道真相。”

对我来说，这场特别会议有点像是天启。虽然我近距离观察东南亚政治已数十年，却一直希望在历史上规律出现且令人忧心的暴力与动乱中（我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其中），会有好事发生。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东南亚地区，这里几乎每年都笼罩在政治暴力的阴影下。当中，领袖一位接着一位掌权，不是倚赖武力，就是操纵选举。1980年代中期以来，泰国已发生三起军事政变，缅甸与柬埔寨政府动用军事武力镇压抗议群众，印度尼西亚爆发社会动荡与宗教或种族暴力，马来西亚有反对派人士遭到拘留与逮捕，新加坡有政治评论家遭到起诉，菲律宾则发生

两起人民示威运动及多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对于近三十年来拥有五亿人口的地区而言，这样的动乱次数可说十分惊人。

这些事件中，政治暴力受害者通常是最不为人知的一群。缅甸在2015年大选后进入民主过渡期之际，社会上很少人意识到，1988年5月暴动中死亡的数千名学生及其他人士，宣告了三十年黑暗时代的来临，更遑论为此负责了。事实上，认为国家在步入过渡期时应该回归并致力于全民政治的部分异议分子发现，自己正被那股同志们为其壮烈牺牲的自由民主力量所摒弃。在邻近的泰国，缅怀1992年五月事件中（军队强行镇压抗议军政府的示威学生）五十名受害者的纪念碑，直到2014年才终于在曼谷竖起，这在一个仍由军队统治的国家里，无论如何都极其讽刺。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事物用来纪念1960年代中期在反共产主义屠杀运动中遇害的五十多万人。尽管过去十年来，上任的民选政府承诺会考虑展开过渡性司法程序，最后还是等到印度尼西亚公民社会在2015年于海牙召集人民法庭，非正式的评判委员会才做出种族屠杀确实曾发生的无约束力判决。而缅甸政府又是依据哪一项人类尊严的标准，决定不给予西部若开邦⁽²⁾130万名穆斯林居民以公民身份与基本安全保障？

有时候，你会听到人们把过错都归咎于殖民历史：因为殖民者的心血来潮，产生了悬而未决或不必要的身份认同与融合问题。尽管逃过了殖民统治的掠夺，并避开了迈向独立时的剧烈动荡，泰国仍有一段漫长的政治暴力史。1973年与1976年的学生示威运动遭到无情镇压。从1976年10月军队在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镇压抗议学生的新闻画面中，可以看到士兵与警察以自动武器与火箭炮无情扫射校园里的人群。其中一位学生维尼察古尔多年后回想，自己当时蜷缩在舞台后面，大叫“没有武器，没有武器……不要开枪”，却一点用也没有。我一直努力相信，经常在东南亚首都街道上演、反抗军事力量的运动有其意义，因为在此之后，促进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措施必会随之而来。但是，2013年的那天，当我看着受害者妮查和帕窃伤心哭诉，而桌子的另一端，身穿暗色西装、一本正经的官员们（他们是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对付有军队作为后盾的保守君主主义者而捧红的政治演员），正不安地拨弄名贵的瑞士手表时，我意识到：其实这一切毫无意义。东南亚有太多的政治暴力肇因于精英的权力斗争，这些精英有如大象，朝目标前进时不惜践踏路上的长草。

这些精英完全不在乎每次发生内部斗争时，有多少民众受苦或死亡。2010年，支持前泰国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与阿披实·维乍集瓦

(Abhisit Vejjajiva) 率领的非民选君主政府，在曼谷中部爆发冲突，情势达到高峰时，我通过电话联系到总理阿披实，恳请他下令停火，避免民众伤亡。显然，一旦军队进驻并突破竹子与旧轮胎制成的路障，必定会发生流血暴动。基于人道立场，我主张双方应该暂时休兵。但是，阿披实在电话的另一端只说，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声音听来紧张而冷漠。同时，安于流放现状的他信也不愿意涉入谈判。在当时，边缘政策主导着一切。隔天，当我看着装甲吉普车碾过路障，突然间意识到：也许没有人会为了大众利益而奋斗，只有少数不择手段以维持地位与保有权力的人在互相争夺。会议桌彼端冷酷且无情的政治演员，毫不在乎他们一路走来所践踏的生命。即使在正迈向民主过渡期的印度尼西亚，情况也相同。1998年11月，苏哈托下台后，我目睹士兵们开枪射杀据称对后权威时代的早期改革表达失望的学生。我知道几位主要的改革派国会议员在附近一家旅馆聚会，于是离开触目惊心的现场赶了过去。“他们对学生开枪，”我对一群在休息室里悠闲喝着咖啡的官员说道，“你们难道不能去那里做些什么吗？”他们压根儿没想到要这么做。

即便是在相对平和的日子里，普通平民也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国家权力的危害。试想，如果你有一位近亲就这么消失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怎么能接受，自己的亲人或爱人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中丧生，而你不知道意外是在何时、何地或以何种方式发生，也没有任何法律途径可查明真相？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问问宋巴·颂蓬

(Sombath Somphone)、颂猜·尼拉派吉 (Somchai Neelapaijit) 或波·乍·利·拉琼查隆 (Por Cha Lee Rakchongcharoen) 的家属。这三名老挝与泰国公民曾试图参与活动以争取自身或他人的权利，通过最平凡的方式来改变社会。以宋巴来说，他争取的是永续发展，并因此获得菲律宾颁发享有盛誉的麦格赛赛奖 (Magsaysay Prize) ⁽³⁾；颂猜则是人权律师，奋力保护被拘禁在冲突不断的泰国南部地区的囚犯；波·乍·利 (又名“比利” [Billy]) 则是在泰缅边境工作的环保斗士。在东南亚地区，他们只是过去三十年来因工作触怒当局后凭空消失 (应是遭到谋杀) 的数千人之中的三名受害者。根据监督人权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国际”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指出，过去十年内，光是泰国就有大约五十名土地与环境保护人士遇害。

东南亚各国里，没有名声或地位的平民早已放弃争取正义与自由的生活。他们的家人无法诉诸司法途径，受害者通常就这样暗中遭到冷血谋杀，尸体像垃圾般被丢弃。当地人经常打的一个比喻是：“看到大象打架时，你最好离长草远一点。”这句话贴切喻指政治精英互斗，将人民的

苦痛与悲剧抛在脑后的社会现状。不幸的是，那些受到践踏的，是百姓，是无名小卒，如同泰国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或是1960年代中期在爪哇与巴厘岛境内无意义的反共产暴动中，失去父母、手足、朋友与亲属的无数受害者。

这些人大多为肤浅、空洞与不切实际的对未来的美好承诺所激励，因而投入抗议运动。他们起身阻止暴政与特权蔓延，进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希望总是破灭，被捣成惨不忍睹的烂泥，遭弃置于正义无可伸张的路旁：这是无止境暴力的悲剧曼陀罗。而且，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在死伤与损失厘清、战火终止之后，大家就会学到教训，社会将迎来和平。真相绝对不是如此。在东南亚，政治通常是残酷不仁的下流龌龊勾当，是冲突的主要肇因。

无所不在的政治，可说是抱持狭隘利益的人对权力的追逐。东南亚政局长期动荡，是因为当地为了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持续奋斗一直未能成功。在我报道这里政治发展的三十年间，此区不但经济有所成长，教育和其他社会指标也大幅进步，曼谷、新加坡与吉隆坡等城市更成为世界上全球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然而，这些由玻璃与钢筋所建构的时髦都市，暗藏着民怨长期鼎沸的弱点，原因是公众理想被少数特权阶层的有效集权所压迫而未能实现。人民越繁荣进步，越能领悟到他们的领袖有多失职。举例来说，贪腐与滥权曾因为受到秘密与无知的掩护而猖獗，如今一家小型的英国在线新闻网成功揭露马来西亚史上最大宗的贪污丑闻，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有一笔近七亿美元的账款汇入，他宣称这些钱是来自一位匿名捐献者，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掌权者如此狂妄的自私与寻租（rent-seeking）⁽⁴⁾行为（以及随之产生的失望与紧张），不断出现在我的东南亚旅程中。这种行为主导了我与当地人的互动，是我所有人际关系的共同线索，也是我目睹的惊人动乱的根本原因。我所知道的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曾在自由与正义的奋战中获得全面胜利，或顺其自然地达成国家抱负与认同。我将在本章试着解开东南亚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探讨它们阻碍自由、扼杀众多自由倡议人士，以及致使永久的和平与真正的民主无法蓬勃发展的缘由。

基于前述章节提过的历史原因，东南亚政治的特色是派系与小圈子令人困惑的交互作用。在缅甸攻读政治行为学的美国民族学者卢西恩·梅森·汉克斯（Lucien Mason Hanks）于1960年代率先观察到这个现象。

人们一般都倾向依照年龄、阶级与经验分成不同族群，但在东南亚，这种作用会受到由研究该区的杰出英国学者O. W.沃尔特斯（O. W. Wolters）所称的“重视个人与成就、不看重群体与世袭地位的文化”减弱。这点似乎出人意料，因为现代西方认为，亚洲社会缺乏对个人权力与成就的尊重，而西方社会已发展出合理限制个人行为的规范与体制。然而在东南亚的背景下，并不是如此。相反地，重点在于以成就者为中心的群体管理，以及从个人地位而非从种姓、血统或任何已实际定义的专业所获得的权力。这代表两件事：第一，管理政治活动的正规体制，无论是政党或国会、内阁或部会，都不遵守以抽象公众利益为基础的运作原则或总体目标。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倾向不服从统治或规定，除非这些原则符合个人利益，因而孕育了贪腐风气与裙带关系盛行的环境。第二，赠贿制压倒了精英领导制度。为了获得成功，人们奉献于所属派系或圈子的首领，而不是广泛的国家或人民利益。这种独特的人本政治行为模式容易阻碍对现代制度的信任，并加深前一章阐述过的传统观念。这些模式相对稳固、基础狭隘且排外，因此当权者试图集中与扩散己身权力，而非依据下位者的意见和要求转移或修正权力。

这凸显了东南亚治国的根本弱点之一：制度欠缺实质效力。掌权人士操纵权力主要是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而非大众福祉。任何试图挑战当权者的人都会被视为犯法，因此这些人即便遭到虐待，也可以合理解释成是因为他们叛国。这些挑战者抗议不公，引述自由、正义与人权等放诸四海皆准的规范与价值。之后，一旦情势逆转，这群人就会将曾经秉持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变得跟掌权者一样专制。这种现象渐渐使得社会大众害怕或蔑视执政者，倾向认为他们腐败且追逐私利。

虽说看似不可思议，但这个一成不变的恶性争权模式使得许多东南亚人的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并让东南亚国家比非洲或中东的许多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标准。21世纪初的十多年中，当地十个国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达5.1%，同期美国与英国的增长率还不到2%。尽管高经济增长率提升了人民的收入与生活质量，东南亚政治却鲜少不受自私、基础狭隘的个人或家族利益影响，因此人们通常会通过武力或暴力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这些利益——这说明为何掌权者往往是仰赖军队或警察支持的精英，以及大规模屠杀与失踪案件的策动者总是免受制裁。为何东南亚如此迥异于世界上其他区域？而了解其中的原因又为何如此重要？

首先必须知道的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行为都受到个人自私的冲动

支配，不受任何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强制力所拘束。不同于东亚，东南亚没有儒家孝道所灌输的至高纪律思想，或是朝廷或宗族社会制度强加的服从态度。服从是历史上中国政治行为的严厉一面，尽管王朝统治者无法满足人民的渴望或需求，他们却依然能长期确保控制。中国无疑存在党派之争，但学者们认为，党派也并未抵过无条件服从的风气。韩国表面上是自由社会，政治行为受儒家顺从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所影响，因此当领袖失能，他或她会公开认错以示谦卑，并低声下气地道歉，这在东南亚精英眼里肯定再奇怪不过了。例如，2015年，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Setya Novanto）遭到揭发，指称他向大型外资矿产企业要求20%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准营业权更新的条件，而他非但未引咎辞职，还对媒体说那只是在开玩笑。他的政治盟友表示，应该以诽谤罪起诉录音者（某位情报官员）。诺万托最终被迫辞去议长职位，但他所属的政党要求政府给予特权：将诺万托的过失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结果，诺万托不但没因丑闻淡出政坛，反而在2016年当选从业集团党（Golkar Party）党魁。领袖地位建立在激化赠贿制的慷慨赠予而非激发大众真诚支持的理想时，羞耻心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如此习惯容忍领袖的非凡财富，”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总理马哈蒂尔之女、作家与社运人士玛丽娜（Marina Mahathir）如此评论，“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照顾人民，理应享有这些财富。”她本身是精英分子，所以这段话或许是在解释，也可说是在合理化这些行为。

施以道德约束或预防措施如何？东南亚不像西方世界，人们在追求个人或家族野心时不会感到罪恶或羞愧。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传入此地已有数世纪之久，但是，任何宗教信仰提供的道德指引，对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甚微。宗教经典中的道德教条，反而被用来强制社会底层的人民遵守纪律与服从指挥，让精英享有特权。在东南亚各地，精英的政治行为不受共同的文化约束与宗教教义的限制。真是无奇不有。

近年来，罪罚免责的现象逐渐加剧，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2009年残害58人的屠杀事件，其中包含34名记者与媒体工作者，事发地点在菲律宾南部民答那峨岛马京达瑙省（Maguindanao）的荒凉道路上。受害者当时全都在一名省长候选人的随从车队中，一行人正在前往向当地选举委员会递交参选表格的路途中。身为候选人的布卢安市（Buluan）副市长埃斯梅尔·曼古达达图（Esmael Mangudadatu）认为，与拿督恩赛市（Datu Unsay）现任市长安达尔·安帕图安（Andal Ampatuan，该省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子）竞争省长宝座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安帕图安威胁他，如果他申请参选，就将他大卸八块。因此，副市长请来媒体见

证随行人代他递交参选表的过程，以为这样可以吓阻对手。结果，参选车队还未抵达小镇，就遭到约百名武装分子拦下，所有人惨遭杀害。行凶手段残暴野蛮得难以言喻：他们强暴女性后射击她们的下体；利用路旁的挖土机草率挖出一个大坑弃置受害者尸体，其中有些人可能遭到活埋。之后，数名安帕图安家族人士遭警方逮捕，但审判因司法程序延宕而迟迟未竟，没有任何嫌犯遭到定罪。后续章节会继续深入探讨免责这项政治行为的特色，这里关注的是，司法漠视那些因为精英利益而无端牺牲的人命——人们普遍认为，假如将安帕图安家族定罪，可能会危及马尼拉政客赢得马京达瑙省选举所需的赠贿关系。

赠贿关系的优越地位及其提供的保护，源自东南亚地区普遍依赖人际网络，而非制度（这些受规范的制度具有可预测或客观的行为准则）的现实。个人主张赠贿权利的现象益趋严重，与旧时为了避免冲突与确保有效人力管理而演变成阶级式社会的互惠义务有关。在传统社会里，这些义务存在于权势者与其追随者之间：首领与其男性亲属，贵族与其侍从，一路向上到国王与朝臣。现代背景下，这些古代的赠贿关系渗透到所有制度，取代用以治理、实际上却显得脆弱与约束力不彰的正式规范或律法。因此，人民有问题的时候，不找警察或诉诸法律，而是先透过关系动用权力。最安全的关系往往是家族，这也是东南亚充斥着党派王朝与长期裙带关系的原因：当选的议员替配偶与子女安插职位，以便下台后有人接替；官员提携家族成员，而在商场上，除了家人，还有谁能信任？菲律宾南部民选的苏禄省省长（Governor of Sulu）在两届任期将满时直接操纵选举，让儿子当选省长，并自任为副省长。悲惨的是，这些观念尽管陈腐过时且论证充分（从回溯1950年代的东南亚学术研究归结而出），到今日依然引人注目。

背景如此灰暗，我注定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追随东南亚曲折的政治发展。虽然过程从不乏味，而且充满了群众示威与伟大人物，但是，千篇一律的演变掩盖了领导人一再令人失望的事实，他们最终背离了表面上基于理想的全面承诺，总是图利、心胸狭隘且自私的精英。有鉴于现代东南亚民族主义根植于后殖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Socialist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现象似乎出人意料。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缅甸的吴努（U Nu）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全是伟大的早期民族主义者，他们心怀让所有人民拥抱自由与繁荣的愿景。这促成了新西兰学者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所称的，后殖民时期的高度现代主义：领导者将国家的奋斗投射为全民的社会革命，动员大众，并下令开展重大的公共工程。

在作为东南亚记者的职业生涯初期，我遇到一些已届晚年的“现代”理想主义者。例如，之前提过的斯拉梅·布拉塔纳塔，他原本是在荷兰受训、于雅加达工作的工程师，后来当上部长却因拒绝收贿而遭到罢黜；以及印度尼西亚备受敬重的两位革命英雄——纳苏蒂安与西马图庞将军（T. B. Simatupang），他们认为军队独占政权是根本的错误，但军队捍卫革命的价值仍是对的。尽管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jahrir）在我去印度尼西亚的二十年前早已离世，但我早年在那里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对这位在荷兰求学、于1945年受命为印度尼西亚首位总理的律师赞誉有加。夏赫里尔是社会主义联盟领袖，先后在阿姆斯特丹与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受训。回到印度尼西亚后，他对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感到震惊，认为人民的本土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呼吁人们坚守原则，其中多为社会主义理念。他在开创性的宣传手册《我们的挣扎》（*Our Struggle*）中写道：“国家革命只是民主改革的结果，民主应该先于民族主义。”

之后，我在马来西亚遇到资深记者菲拉辛加姆·库卡瑟斯（Veerasingham Kukathas，较为人所知的名字是K.达斯 [K. Das]），他秉持着略显费边式（Fabian）^⑤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这位身材高瘦、不断抽着“Kent”香烟的泰米尔人而言，所有种族都是马来西亚人，共同致力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理想，建立人民共有的马来西亚。他们上同样的俱乐部，一起喝着相同的威士忌，不分信仰或种族。与达斯同个世代的马来西亚人都尊崇国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位穆斯林继承了王权，且因为终生饮酒赌博而闻名。东古接受达斯访问时表示，他的主要信仰是追求幸福，而他身为国家领袖的义务是让人们幸福（或许与东南亚诸侯的传统意识形态没那么不同，东古也曾是诸侯，他们的正统性真正仰赖的不是种族平等，而是人民幸福与否）。他在1990年（可惜我来年才搬到马来西亚）去世前，经常表现出对国家逐渐显露伊斯兰国家雏形的鄙视。“怎么会这样？”他不可置信地说，“人民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成为穆斯林，而不是受国家主导……只有人民才有决定的权利。”

以我在这个时期的观察，我感觉得到，早期民族主义人士的理想主义乃推动建国的动力，并且为现代进步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太晚到戏院而错过主要情节的人。不幸地，这些早期民族主义领袖对于人民主权的理想，以及有关行政权制衡原则的“现代”价值观，在继位者接掌政权后，被顽强寻求执政正统性与少数集权的做法所取代。等我站稳旁观者立场，那些拥护由共同掌权的民选议员所建立的旧政府模式的人们多已辞世。同样一去不复返的是他们的民主仁政理念，

他们是在遥远的西方大学里，或在抽着烟斗与头戴英式遮阳帽盔、地位优越的殖民行政官员跟前，搜集到这些观念与思想的。正当人民开始有所寄望，东南亚的经济也逐渐起飞时，政治文化反而倒退，并且利用前殖民时代的权力模式作为庇护。对我而言，这个转变在1980年代十分明显，抱持“现代”治理观的上一代民族主义领袖，将政权交接给不熟悉民主政府、人权与言论自由等普遍观念的新一代领袖。研究显示，在今日的雅加达，本地大学毕业生的受教育程度，只相当于希腊或丹麦的初中毕业生。因此，不同于1950年代率先建国的世代，当前的领导人眼界较为狭隘，仅能在资金匮乏的学校与大学学习得有限的知识。

由于世代交替失衡，领导阶层和精英的组成无法符合受到数十年来物质进步所驱动的人民的期望。这凸显了东方学者的困境或陷阱。我们能否假设，旧有制度迟早会崩坏，并且被真正的人民主权所取代？这是勇敢的东南亚人权斗士一再提出的愿景：未来会有希望。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纪录看起来并不乐观；暴力压迫无止境地循环，中间有时出现稳定的良性专制政府，它们在使人民享有合理财富与满足的同时，也限制群众行动并掩盖人民的挫折感。事实上，独立早期的高度现代主义已被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行为所取代，这些行为更多深植于前殖民时期的印度教与佛教思想。

这是我从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早期东南亚政治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趋势。探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新加坡的李光耀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当代集权领袖，如何在表面民主的背景下合法化强人统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倾向恢复前殖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权利与责任被置于牵涉义务与无条件服从的更加死板与阶级化的框架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我在这里看见了对神圣王权传统模式（包含严谨、不带批判的忠诚）的调整，以作为象征性且通常自视良好的政绩的回报，而不是迈向更加开放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趋势。权力基础非但未向外扩展，反而变得更加狭窄，这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挑战会遭到武力反制与削弱。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在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之后倾泻而出的乐观主义——尽管言之过早，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滔滔雄辩地将前述两大事件描述为“历史终结”时刻。

很久以后，东南亚仿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系列更符合以“普世”人权与人类安全标准为基础的新兴全球规范价值观。2005年，一群多为前任领袖且恰巧全是男性的杰出人士齐聚一堂，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起草宪章。东盟成立于冷战高峰时期的1967年，主要是作为安全机制，让五个创始成员国有一个商议平台，可在区域内冲突发生前先发制人，并提高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有段时间，东盟相当于非正式的清谈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平衡东南亚地区的各种势力与处理悬而未解的猜疑（大多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中得到解决）。但是，东盟不久后有了常设机构：位于雅加达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勉强能用以消除贸易壁垒的架构。世界大国极力劝说东盟制定安全措施，因此协会成立了讨论安全议题的区域论坛。不过，还有更大的问题：目前包含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的东盟，代表着哪一种群体与社会？最终，2008年由十国领袖协议与签署的东盟宪章，严谨保护着国家的完整、定义主权与不干预的原则，在提倡个人权利方面却草率了事。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七项，其目的之一是“巩固民主、促进良好的治理与法规，提倡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兼顾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自始至终，重点都落在成员国而非区域个别公民的权利上，而宪章制定的人权条款，至今未对遭到国家暴力与迫害的受害者做出任何贡献。

在这段东南亚的旅程中，我一直为棘手的两难处境所困扰。由自私精英长期维护的绝对权力所衍生的破坏性文化，展现了旧有体制的延续，尽管在无能领袖的统治下，东南亚人民仍有显著进步，并且学会了对抗时代错误加诸人民主权的限制。就物质层面来说，人均所得让人们有办法买房与养家活口，在公民服务与设施水平足以媲美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大型现代都市中心，可观的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增加。东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识字率高，享有基础医疗服务，虽然仍有部分地区相对贫困，却没有真正的穷人。虽然社会与物质水平明显进步，但还是存在一种虚幻的现实：国家认为人民须为集权政府强加的规范所控制，这些规范明定学校教育可以包含多大尺度的真相、个人可以拥有多少土地，或是报纸可以刊登哪些内容。互联网的应用与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尚且无法克服这些约束；泰国一项严厉的计算机犯罪法案，允许警察以脸书或推特发文为罪名将人移送法办；马来西亚警察多次拘捕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意冒犯君主的信息与文章的人；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对同性情侣因为在脸书上发文互相示爱而遭逮捕。有鉴于种种限制，民主的确很难有太多进展。东南亚人民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公开表达关切：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

不过，民众并不愚昧。他们设法活在平行世界里，在这里，他们可以努力工作，逃离统治者的愚行，有时还能克服长期困扰东南亚的不平等处境。他们凭借冒险精神所换来的成果，是看着下一代摆脱自给农业的苦活，在城市里闯出一片天地。这些贫穷农人的儿女可以选择为了更好的生活独力打拼，而有相对较多的自主权，或是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以无形的方式贡献社会。人们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企图心既活跃又健全，并在惊人的程度上，自外于不良政府令人窒息的颓败与倍受媒体关注的精英内斗。那些强制灌输东方主义思维、鼓吹人民永久从属于旧有权力与社会秩序模式的人，应该谨慎一些，以免忽视东南亚充满生机与坚定自信的公民（*civitas*）本质。问题在于，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去遏制这些革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还可以倚赖财富与机会严重不均的现象来设限权力范围。虽然社交媒体广泛呼吁改变与问责，这些要求仍如强弩之末，无力抗拒强大且过度集权的国家为现代民主规范所套上的沉重枷锁。社会上也存在压力警戒区，威胁、抑制或侵害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苦难与暴力。

那么，为何这些传统的权力模式至今依然存在？为何泰国是军人当政，而在缅甸这种情况又为何更加严重？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民不能通过司法或民意来谴责他们的领袖？为何在菲律宾，有半数财富进了20%人口的口袋，同时，真正的政权落在少数家族手中？回顾这些国家尚未独立的时期，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有的权力与政府模式符合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因此受到殖民行政官的维护与改制。他们发现，既有统治者的正统性与社会的严格分化（譬如平民与贵族间的区别），是实用与有效的治理手段。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Pramoedya Ananta Toer）⁽⁶⁾曾写道，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事迹是，“他们与势力强大的爪哇封建领主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前荷兰官员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在1860年以笔名穆尔塔图利（Multatuli，拉丁文，意指“我受尽折磨”）出版的著名小说《马克斯·哈韦拉尔》（*Max Havelaar*）中详细解释了这个体系。书中描述了荷兰人借由当地爪哇贵族的权势强迫爪哇农夫耕种作物的制度。这些低阶贵族被授予“驻区长”（Resident）的头衔，大多从属于更年轻资浅、获授“副驻区长”厚颜头衔的荷兰官员。德克尔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一切造成了低阶官员指挥高阶官员的诡异情况。”此情形令19世纪中期的读者大感吃惊。应荷兰人要求，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甘蔗或稻米，“一项再简单不过的政策就够了。农民服从他的首领；因此只需要说

服这些首领、承诺给他们部分的收益……而这个策略完全成功了。”德克尔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引起轰动，并迫使荷兰人考虑改革这项种植系统。爪哇等地对当地首领或封建领主始终存有义务感，这种情感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下来，也是令普拉姆迪亚如此愤怒的原因。很久之后的1970年代，在荷兰殖民时代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阿拉伯裔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发表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穿殖民者认为当地农民懒惰成性的真相。他暗示，殖民势力对于当地人游手好闲、工作效率低落的固有看法，之后转移到后殖民国家，让政府鄙视贫困的人民，认为有必要不断指导与鞭策他们。

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迷思，也源自政府对愤怒、意图谋反的农民的恐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淘汰他们。随着殖民地缅甸与马来亚引进印度与中国劳工，当地的歧视现状与阶级制度，也自然成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在缺乏人力或未能劝诱掌权精英及其从属农民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殖民主义者进口大批契约劳工，进而形成了如今依然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与歧视。在殖民地缅甸，1940年的仰光有多达半数人口都是印度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成千上万名广东人、福建人与客家人，搭上每月抵达的轮船逃离中国沿岸穷困地区，途经新加坡及曼谷港口，来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今日，新加坡依然是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城市国家。到了20世纪早期，曼谷有半数人口为华裔。在1957年独立的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的印度与中国移民人口总计近全国人口的半数。

众多外地人涌入当地，进入特定职场（如房地产从业人员与销售员），或许是欧洲在东南亚殖民统治最不为人知的社会遗产，促成一种严格界定、名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形式。现今，多元主义意指一种健康的多元化形式，拥有不同血统、信仰或政治观的人们得以融洽相处。其原始定义衍生自驻缅甸英国殖民官员弗尼瓦尔的著作。他在当地观察到不同族群的成员因为殖民经济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会在仰光与雅加达的市场里“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想法与方式，”他写道，“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殖民势力利用精确的种族分隔界线控制当地人口，使东南亚区域在建立现代国家时继承了分裂的社会。

现代马来西亚与缅甸仍然受多元主义陋习所禁锢，这也解释了当代的一些社会弊病及其成因。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穆斯林超过一百万人，构成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为贫困的渔夫与农民。而这个缅甸

境内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毗邻孟加拉国的若开邦，大多数人为佛教徒。他们引用英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孟加拉国劳工的纪录，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本地民族。即便今日政府向所有罗兴亚人担保，他们都有资格享有某种形式的公民身份，但官方繁复的身份审核程序让他们迟迟无法取得国籍。由于权利遭到剥削，罗兴亚人被迫流亡到脏乱营地，或搭上破旧小船远走他乡，因此发生武装抗争运动也不足为奇。2016年年末，若开邦北部爆发冲突，引起一些情报单位推论，罗兴亚人的武装抗争已经与巴基斯坦的宗教恐怖组织挂钩。罗兴亚人的悲惨处境鲜明地呈现出过去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分化与管理问题，至今犹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各个国家通过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社会弊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社会曾经存在着异族通婚与一定程度的文化同化。但在缅甸与马来西亚地区，英国统治者极力加深劳工间的种族分化，使得种族偏见与政治冲突根植于社会。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公民身份遭到否认，并于1947年缅甸独立后被迫离境，至于那些仍旧留在缅甸的人，则被贬抑泛称为“卡喇”（*Kalar*）。

在现代马来西亚，主要来自南印的印度社群不但贫穷，政治上也屈居弱势；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群体虽然生活富裕，却饱受歧视。马来西亚为了提供马来人国家补助，在1970年代制定充满歧视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会有这项政策，是因为华人拥有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将有利可图的合约授予马来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高阶行政职员都必须包含马来人。因此，许多华人移居国外，大部分在以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定居。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平等加深了剥削与贪腐，富有的华人企业为了生存，只能贿赂马来人为主的政治势力。

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充满矛盾。面对过时的权力与赠贿结构，以及巩固这些架构的殖民剥削模式，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东南亚所有国家争取独立的奋斗都涉及现代性的呼吁，不是来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与自主原则，就是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捕捉到现代民族主义渐起的东南亚作品之中，或许就属普拉姆迪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最为重要。其中两本为普拉姆迪在1960年代中期以政治犯身份待在偏远的布鲁岛（*Buru Island*）时口述而成，书中追溯出身贵族的爪哇青年明克（*Minke*）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如同2006年去世之前曾与我会面的普

拉姆迪亚，明克也受社会主义者的平等理念吸引，同时，他也非常关注亚洲意识的复兴，以及争相角逐大位的政治文化。

我第一次与普拉姆迪亚见面，是在苏哈托当政后期，当时他正被软禁于雅加达郊区一间小房子里。当局起初监禁他，然后将他流放国内，最后允许他在“限制居住”（city arrest）的条件下生活。这个男人有着令人卸下心防的谦卑外表。他喜欢抽丁香烟，我也是。抽烟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联结；我们帮彼此点烟，因而建立起情谊。普拉姆迪亚的笑声深具感染力，个性十分开朗；瘦削的双手相当有力，加上他因为半聋，会用手势与表情来帮助表达；双眼炯炯有神。我比一些人幸运，能让自己的声音穿透普拉姆迪亚受损的耳膜，与他促膝长谈。他在有限条件下探索丰富印度尼西亚语言的方式，鼓励了像我这样印度尼西亚语不甚流利的人。普拉姆迪亚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典型印度尼西亚文化大师或文化学者（budayawan），他不会发表自以为是或空泛概括的意见。

普拉姆迪亚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性人物，替这个世界大国长达半世纪壮志未酬的失望与绝望发声，是我心目中最顶尖的当代文学家之一。可惜的是，他在世人或者应该说只有一些印度尼西亚同胞彻底意识到这点之前，便已驾鹤西归。我喜欢普拉姆迪亚写作的短篇故事，其中一篇名为《甘比尔》（“Gambir”），主角是两个住在雅加达甘比尔车站外铁轨旁的穷苦工人。当中没有太过深奥的内容，也没有重大象征或深刻寓意。然而，普拉姆迪亚巧妙揭露了国家的阴暗面，暗指政府从未成功促进数百万名生活在贫穷与绝望中的人民的福祉。故事里，出身低微的站员风餐露宿，不断与感冒和胃痛缠斗。他们醒来的时候，“揉掉眼屎，忍不住一直咳嗽，吐掉喉咙里一再积生的痰，还不时抓遍全身上下的痒。”

这些《来自雅加达的故事》（*Tales from Djakarta*）写于1950年代，但你同样可以在今日的城市街道旁看到处境相同的人们。他们也受相同的疾病所苦，鲜少或根本没有途径寻求现代医疗服务。2005年，雅加达小报刊登了苏普利欧诺（Supriono）的故事，苏普利欧诺是个贫困的清道夫，被人发现带着女儿的尸体待在甘比尔车站。如同无数个生活边缘人，苏普利欧诺唯一真正的财产是他用5美元买来的夹板推车，用途是捡拾回收的塑料瓶和纸板。3岁大的女儿努尔（Nur）罹患肠胃炎时，他彷徨无措。他能做什么？他每天的平均工资只有一块多美元；去当地诊所看一次病就要50美分。他一贫如洗、目不识丁，不知道需要替因拉肚子而脱水的孩子补充什么，也没钱再带孩子上诊所看病。他用肮

脏的推车载着全身发烫的女儿四处奔走，最后，努尔死了。

苏普利欧诺欲埋葬女儿，但是没钱请救护车把她载到附近的墓地，于是决定拉着推车徒步走数公里将她带到市区的火车站，买了便宜车票搭到邻近的茂物市（Bogor）。那里有朋友可以帮忙。正当他在等车时——身旁推车上躺着用衣布遮盖的女儿的尸体，而他全身上下依旧只剩不到1美元——路边摊贩察觉有异而报警，才让这件事情曝光。苏普利欧诺的悲剧不过是雅加达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之一，在这座有120万人口的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开着全新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的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全然不知城市里大约有8000名孩子深受营养不良所苦。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有将近15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婴儿及产妇死亡率也位居东南亚之冠。

对普拉姆迪亚而言，印度尼西亚历史一再令人失望；他会说，如今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苦力的国家”。起初受荷兰统治，后为国家独立后掌权的爪哇封建精英所奴役，他坚决主张，正是爪哇传统（Javanism）使印度尼西亚一再受人奴役。普拉姆迪亚在1825年出生于东爪哇的布洛拉（Blora）。他的父亲是教师与民族主义者；母亲是作风强势的爪哇女族长，赋予他对神秘世界的敏锐度与对女性的温柔信念。不同于许多当代人物，普拉姆迪亚并未被送到荷兰求学。他成年前的经验，都来自且根植于爪哇本地。在所有爪哇文化的转译者当中，普拉姆迪亚是唯一脚踏实地的人。他有点像顽固守旧的左派分子与隐蔽的革命者，而在2003年出席香港文学节时，他被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时代的旧识们簇拥着，其中大多是流亡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于五星级饭店举办的午餐会上，向与会的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发表演讲，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

我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仗着犯罪免责为所欲为。这让身为印度尼西亚人的我，想起了令人痛苦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与1950年代，因为美国协助击败了他们认为是共产分子的苏加诺总统。这是场悲剧，因为从那之后，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国家领袖。

这是一场真诚质朴却未能逢时的动人演说。如果他还在世，便可以指着现代印度尼西亚及其一切弊病质疑：“这与过去有任何不同吗？”

(1) 1850—1946，曾任英国殖民时期海峡殖民地总督（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任期为1869年至1901年。

- (2) 若开邦是缅甸全国穆斯林（罗兴亚族居多）最多的地区。基于历史和宗教因素，当地的罗兴亚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曾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
- (3)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
- (4) 意为寻求经济租金，指的是为了取得与维持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进行的一种非生产性谋利行为。
- (5) 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旨在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
- (6) 1925—2006，著有《万园之子》（*Anak semua bangsa*）、《人世间》（*Bumi manusia*）等。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么一来，如果他所属的国家或政府承认犯了荼毒同胞等罪行，他或她就不能感到羞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①

在生命价值取决于加害者之权力的国家里，谋杀不值得严加惩罚。旅居东南亚期间，我一直无法理解弱势者在偶然且人人避而不谈的情况下丧命的现象：无论是在东帝汶、巴布亚省及亚齐省等争议地区，印度尼西亚士兵以残酷手段先折磨、再杀害可疑的分离主义分子；人权激进分子在泰国遭暗杀；或是众多要求改革的平民在柬埔寨、老挝与缅甸凭空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有人犯下夺走人命的暴力犯罪，当权者或权贵人士竟能完全无视所有形式的正义，并且毫不予以惩罚。当我意识到，那些双手沾染鲜血的掌权者，利用前人庞大而粗糙的可耻法令来遮掩其罪行，并借由免罚特权继续度日与往上爬，非常轻易地就遗忘了过去的时候，我再想起自己与他们握手的次数，便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的年代充满了强制性的“普世”规范与价值观。过去七十年来，这些价值观持续受到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与近期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国际性组织与机构的强化和落实。近年来，人道主义的集体行动与国际法的正当程序大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即使罪犯很少在起诉后遭到定罪，但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Herzegovina）、肯尼亚与苏丹的人民而言，至少还有一丝希望与交代。然而，我接触东南亚的四十年里，从最初柬共（我在1979年首度来到东南亚时，其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刚结束）发动残害近200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到如今无法还给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与泰国的政治暴力受害者应得正义的失败，为了实践这些“普世”规范和价值观与主持正义所做的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本章中，我将聚焦东南亚所面临的、最不被承认但影响层面最广的社会与政治挑战，以及冲突的关键肇因。犯罪免责在东南亚地区比较像是慢性传染病，它让宿主表面看来健康却抑制了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并且导致了不公平与冲突未获解决的长期瘫痪。《远东经济评论》的同事纳特·塞耶在1997年访问恶名昭彰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几个月后他就

去世了)时,该则新闻被誉为全球独家内幕。这位在法国受教育的前革命分子即将走到生命尽头,身体虚弱、器官衰败,但他没有任何遗憾。“你要知道,我来,是为了参与革命,而不是屠杀柬埔寨人民。”他在位于偏远丛林的藏身处对塞耶如此表示。“你看看我。你觉得……我是个暴戾之徒吗?我不是。”

长久以来,我一直为这种厚颜掩藏真相(压抑住人类在杀害同胞时必须要面对的良知)的动机感到困惑。经常有人说,教人接受自身命运的佛法教义使人们变得消极,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但是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盲目服从萌生自印度教种姓制度遗风的权力。然而,这其实不足以解释,那些有权压制异议的人士夸耀自身成就的任性行为。一位新任缅甸议员在2016年初召开会议选举一位总统与两位副总统时,权大势大的军方提名了2012年发生血腥镇压抗议学生事件时在职的前军方安全事务长与仰光行政首长敏瑞(Myint Swe)。联合国支持的一项起诉控告威兰多(Wiranto)危害人类罪,因为1999年印度尼西亚军队撤出东帝汶、造成约1400人丧命的行动,正是由他担任指挥官,但是,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显然没有因指派这位前国军总司令担任掌管安全事务的高级内阁而感到良心不安。我在雅加达的一位同事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是时候该向前看了。”威兰多否认指控,而那之后,他曾先后参选总统与副总统,印度尼西亚一直未对他做任何制裁。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虽然之前大肆吹嘘执法成效,但是在东南亚的存在感十分薄弱。在此情况下,主权充当起有效的防护罩。曼谷是联合国亚洲区总部所在地,但泰国连同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却都迟迟未批准如今成为国际法惯例、主掌难民人道待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Refugee Convention)。自2006年起,由联合国共同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尚存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进行审判。至今,审判已耗费2.6亿美元,在柬埔寨政府渐次衰微的支持下,只完成了一起定罪。联合国在东南亚地区基础单薄,政治部门极少参与当地事务。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负责实行国际人道安全规范的国际机构,在当地的运作范围远远不如在非洲,得到的授权也更有限。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Rome Statute)在亚洲不够有代表性;泰国是缔约国,但尚未签署,而马来西亚最近才表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对亚洲地区的任何人道侵害案件,均尚未展开调查或起诉。

或许有更深刻的历史因素可以解释，东南亚人民为何如此擅长掩藏所有不好的回忆。对于那些从数世纪殖民统治中崛起的国家而言，利用暴力来控制人民，已成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层面。荷兰人于19世纪中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耕种制”（*cultuurstelsel*），强迫农夫耕植利润高的经济作物而不种稻米，导致许多地区爆发饥荒，以及荷兰人指定的中间人发起暴力抗争。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补救措施。重点是，掌权者表面上是欧洲殖民官员，他们大多未遭起诉——这项特权传承给了掌权的民族主义后继者们。东南亚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人权委员会，但这些机构权责薄弱，而法院也不愿意惩处当权者。结构松散的东盟聚集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拥有跨政府的人权机构，但由于不干涉的文化根深蒂固，以致在高官滥权这方面，东盟各国几乎都是自扫门前雪。本章大部分篇幅将会聚焦于犯罪免罚纪录惊人的印度尼西亚。虽然如此，东南亚其他地区同样可见泛滥的免责现象。

普拉姆迪亚最不知名的作品，也许就属他晚年书写的关于修建贯通爪哇东西岸的大驿路（Great Post Road）的文章。这条超过1000公里长的道路，在19世纪早期兴建时，牺牲了大约1.2万名无薪工人的生命。普拉姆迪亚去世两年前的某天，我去拜访他，他给了我这篇文章的复本。“读读这篇文章，”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我感到困惑。这是写了好几本出色亚洲民族主义小说的男人粗率的谦虚表现吗？深思之后，我觉得不是：对普拉姆迪亚而言，那些死于过劳与病痛的筑路工人长久被世人遗忘的悲剧，象征着印度尼西亚从殖民苦役走向独立的漫长道路中充斥着死亡与压迫。下令兴建大驿路的荷兰籍总督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Herman Willem Daendels）不发薪水、强迫工人劳动的做法也许无耻，但真正令普拉姆迪亚感到愤怒的是现代的印度尼西亚领袖，正是他们对众多惨遭杀害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苦难视若无睹。

194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之际，受害人数就开始累积；1948年，5000名共产分子在中爪哇茉莉芬（Madiun）附近遭到杀害；1950年代，约3万名叛乱的伊斯兰斗士在苏门答腊边远省份战死；接着，在1960年代中期，大约50万名乡镇人口（主要在爪哇和巴厘岛）在好几波反共产屠杀中牺牲（之前曾提过无确切死亡人数，50万人应为正确数目）。当时为全球最大党派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控幕后主导1965年9月30日晚上爆发的政变，造成包含六位将军在内的七名官员死亡。这起所谓的政变阴谋在几小时内便遭到压制，虽然从未证明有政变正在酝酿，但有些人怀疑，军官遭到杀害，刚好可作为夺权与发动反共政变的借口。来自中爪哇、寡言爱笑的将军苏哈托位处高阶指挥链之

中，但共产政变嫌犯在深夜围捕其他将军时，却不知为何没找上他，事后看来，他是这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在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中，苏哈托获得政权，继续有效掌握传承自苏加诺总统的权力。上位后，苏哈托在1965年末下令军队全面压制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屠杀事件也延续到了现代：1976年之后，亚齐省的反暴动行动至少造成3万人丧生；1975年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后，约有2万人遇害。1962年，荷兰将西巴布亚的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1969年，据称约有3万人在参加联合国支持的西巴布亚独立公投（印度尼西亚当局安排1025人投下反对票）时遭到杀害。此后，据信至少有1.8万人死于维安部队手里，尽管人权运动人士普遍引述的死亡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据。自1949年起，印度尼西亚各地总计至少有60万人丧命；若按年度折算，理论上每年有1万人死于暴力事件。普拉姆迪亚出于羞愧与困窘，总是将印度尼西亚称作“夹在多个国家之中的小孩”。2006年，他怀着悲愤离世，不看好这种杀戮文化在可见的未来里会有尽头。

年复一年，关于暴力的回忆宛如旧照片褪色般益趋黯淡。如今，距离反抗军在雅加达残杀七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引发爪哇与巴厘岛多数地区组织性狂暴杀戮的那个9月夜晚，已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爪哇与巴厘岛各地乡镇的人民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在深夜遭到残忍杀害，被以棍棒打死或以绳索勒毙，只因为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些许赞同。多数人或许曾参与共产党发起的活动，毕竟拥有300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而且也获得国父苏加诺总统的默许支持。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倾向支持共产主义，这也表示其中有许多受害者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某些地区的人只是戴着眼镜，就遭到残杀。

漫长的三十年里，受害者默默承受折磨，甚至还有一整排说谎的官员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每一年，为了纪念九三〇事件，苏哈托政权的“新秩序”（New Order）政策巧妙渲染那个命运性夜晚发生的事件，将遭到谋杀的将军塑造成英雄，指称谋反的共产分子为残酷杀手，对那之后的屠杀事件保持沉默。

1998年后，印度尼西亚挣脱独裁主义的枷锁，终于能拥抱建国者预见的民主制度，燃起了过去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在这个国家，自由民主不论在司法或调解上，都是作用薄弱的工具。媒体记录这个国家悲惨的历史，并未促成建立真相或追究责任的集体承诺。受害者反而遭受更多磨难，政府承诺提出国家道歉声明，结果他们却辗转得知，激进的

保守势力认定当年的屠杀事件正当无罪，在共产主义退潮三十年后，仍继续支持着反共的理念。

苏希洛在位时（他在2004年成为人民直选总统，直到2014年第二任期满才卸任），替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屠杀的一份报告背书。这份篇幅冗长的报告提出补偿受害者的方案，苏希洛也考虑进行国家道歉，但遭到军方与发动多起屠杀的伊斯兰团体激烈反对。事实上，在屠杀事件发生当时，苏希洛的岳父萨尔沃·埃迪（Sarwo Edhie）正是下令镇压共产主义人士及其追随者的特种部队将军。在任期届满前夕，苏希洛提议将萨尔沃·埃迪塑造为国家英雄。

受害者并没有遭到遗忘。问题在于，几乎没人准备好迎接追究责任的这一天。外界期待他们往前看，不再回忆过去。如同我们在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深刻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所看到的，那些在1960年代中期展开屠杀的人们以展现杀戮本领为乐。影片引述二度上任、现为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的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流氓才能做事。”*Tempo*新闻周刊因应奥本海默的惊人之作推出特辑，当中表示：“刽子手无所不在，他们挥舞镰刀，为了个人复仇、宗教信仰或对国家的使命感，进行杀戮。他们杀害任何一个明显或疑似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员，将受害者尸体弃置深谷、河流与洞穴。这些刽子手是否曾经为自己的骇人作为感到悔恨或罪恶？”

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持续研究印度尼西亚与旅居当地的我而言，尽管我对这个国家感情深厚，沉重的问题仍时常萦绕在我心中。在我的黎凡特（Levantine）混血背景下的遗传记忆里，某种东西让我理解人们在长期的区域紧张中继续前进的观念——即便途中伴随着长久不满与仇恨的阴影。我在雅典的希腊亲戚会彼此低声谈论希腊内战（Greek Civil War）遗留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相邻的国家为了旧账横越大小城镇互相发动攻击。由于我的亲戚们在巴勒斯坦出生长大，因此我从小便清晰地记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永无止境的谋杀争斗。印度尼西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国家是由自由理想铸造而成，受平等与正义的“普世”原则所支持。然而，他们很难解释潜伏于每个历史转折的无谓杀戮。

时任总统的苏希洛在2012年提出为1965年屠杀进行国家道歉的想法，让我有机会探究这个悬而未解的民怨问题。在此之前，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长达850页的报告，不出所料地，他们判定有系统地处决可疑分子的行为违反人权，提议展开正式调查以起诉应负起责任的罪

犯。负责汇整报告的调查小组组长强调：“许多受害者与共产党或其部属并没有关系。军队官员刻意让那些人看起来与共产党有关联。”这份报告清楚说明了，1966年屠杀事件落幕后，迫害依旧存在，因为任何疑似与共产分子来往的人士都不得担任公职。那些在拘禁后幸存的人们，身份证会上加上特殊注记，使他们几乎无法找到工作，直到1980年代为止：

1965到1966年间的暴力事件构成了一出人道悲剧，是印度尼西亚国史上黯淡的一章。这些事件因歼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及追随者的国家政策而起……（这项）国家政策利用极端且残忍的暴力手段……造成死伤……侵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人权……包含谋杀、灭绝、奴役、强迫免职、剥夺自由 / 无理由拘禁、折磨、强暴、迫害及被迫失踪。此外，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受创，进而在公民权利、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遭到歧视。

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是官方组织承认这出悲剧的规模，并指出政府官员应负起责任的第一份报告。当中包含将近400位受害者与生还亲属的证词，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发言权。即使1998年独裁主义时期结束后已放宽言论自由，遭到迫害、亲人失踪或就业受阻的受害者，依旧难以发声。譬如，在居住于巴厘岛的知名医生杰兰提克（Djelantik）的回忆录中，有段值得注意的叙述，他提到当地约有4万人遭到杀害。他写道：“光是出于好意供应节日的灯笼，或替共产党地方分支举办集会，就足以被人怀疑是党员或至少是追随者，进而有生命危险。”他也观察其他人对于爪哇的看法，发现许多受害者沉默地向命运屈服。他的亲侄，也是亲共信息部的官员，遭屠杀部队掳走，在被斩首前，他冷静地脱下手表、摘掉婚戒。在戒慎恐惧的社会里以直言作风闻名的杰兰提克写道，“巴厘岛人相信，这些恐怖杀戮是净化的行为”：

某些情况下，比如在苏卡瓦地（Sukawati）及其他村落中，共产分子会穿上白色衣裤前往警局，自愿当场受死。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这些事件会展现不凡的影响力。

鉴于罪行免责的沉重负担，我认为参加在总统官邸进行、研讨国家道歉提案的密室商谈于事无补。身为中立的局外人，我应邀替会议致开幕词，概略谈论了真相与正义，以及它们的疗愈性质。与会者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代表。知名的印度尼西亚籍转型正义专家加卢·万迪塔（Galuh Wandita）替受害者发声；另外还有退休陆军中将的儿子阿古

斯·维杰约（Agus Wijoyo），他的父亲是九三〇事件中据称遭共产分子杀害的六名将军之一。会议很快便出现激烈争论。加卢激动地要求军方举行司法审判及纪念活动，以供世人追悼与谨记那些无辜牺牲的生命。然而，阿古斯对于只有单方面人士受害的假设感到愤怒。他反问：“那六位将军呢？他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坚持反对道歉行动的论点或许是出自哈里·詹（Hari Tjan），他是信奉天主教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也是在1968年协助推翻亲共的苏加诺政权并拥护苏哈托上位的学生领袖之一。“我们都逐渐忘了，共产分子是为了土地改革而奋战。”他压抑情绪，颤抖着低声表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实行过土地改革吗？”众人一片沉默。他接着说：“那么，何必再打开这个充满蛀虫的罐子呢？”房间里的灯光仿佛全都熄灭了。

国家人权委员会报告发表的三个月后，检察总长表示，搜集到的证据“不足以作为展开官方正式调查的正当理由”。苏希洛总统麾下的政治、法律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佐科·苏扬托（Djoko Suyanto），驳斥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正是当初的屠杀事件，才使国家免受共产主义荼害，政府不需要做任何道歉。这项议题看似就此终结。《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引述苏扬托的话：“我们必须全方位来看待这个事件。共产分子意图谋反，政府需要采取实时行动以保护国家不受威胁。不要逼迫政府道歉。”报道还提到：“要是屠杀没有发生，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今天。”

尽管如此，大众依然期待2014年就任民选总统、与旧时保守势力没有关联的佐科·维多多，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考虑为侵犯人权事件道歉，是他上位之后所做的许多空泛承诺之一。他甚至还想办法会见1965年大屠杀的一些受害者。然而，随着事件即将届满五十周年，他的幕僚声明，总统有更急迫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要处理。其实，这应该是在保守派参谋人士的建议下，暂时搁置的诸多承诺之一，这些人士包括领导1960年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天主教与激进华人，以及帮助他上位的军官。实际上，军方仍然是政府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且似乎不愿意弥补血腥的过往。的确，军方至今仍对那六位将军之死遭指与共产主义有关怀有余怒。而被控发起屠杀的宗教组织，也不希望军队的地位因为任何的道歉举动而有所提升。佐科与印度尼西亚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哈玛迪亚（Muhammadiyah）会面后，政府决定不公开道歉的新闻紧接着曝光。

在种种借口、失望与未能处理国际视角中已遭遗忘的种族屠杀背

后，潜伏着对未来的深层恐惧。一个饱受不公不义所苦的社会对于社会变革的恐惧，或许解释了为何每当政治领袖考虑响应大规模屠杀事件时，就会爆发反共抗议运动。过去15年来，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或许下降了一半，但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两极化：该国2.5亿人口中，约有4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

社会凝聚力面临的威胁，也是阻碍究责的因素。1965年的爪哇社会由人数比例较为平衡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群体所组成；共产党获得许多基督教徒的支持（令梵蒂冈深感震惊），反共势力则在穆斯林中立稳根基。大家都知道，多数的杀戮行动其实是受军队鼓动的穆斯林少年匪徒与民兵所执行的。之后，许多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逃避猜疑与更多的骚扰。自此，伊斯兰化加速所带来的影响，削弱了不同信仰之间维持和谐的传统文化机制，宗教冲突因而在印度尼西亚越演越烈。

可以肯定的是，揭露历史上的这些杀戮时刻，会导致微妙平衡的多元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报复浪潮。1965年事件中，大多数的激进杀手，尤其在东爪哇地区，都是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组织宗教学者复兴会（Nahdlatul Ulama）有关的准军事部队成员。而在柬埔寨，当你处于不顺从红色高棉暴政就有可能遭活埋的情况下，你要费尽多大的努力才能根除那些犯下暴行的恶徒？如今有三分之二的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时代结束后才出生，埋葬历史，把过错推给实际上协助终结了红色高棉恐怖统治的越南等外在敌人，变得轻而易举。泰国的策略是让反叛者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抹除暴动的记忆。1980年代，所有逃到丛林加入激进共产势力的人都得到特赦。

无论受害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或是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民众，人们对于那些遭到当权者谋杀的受害者，似乎都出乎意料地缺乏怜悯。这种长期的免责倾向，是无力和解的永久冲突的潜在肇因之一。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不满的情绪持续恶化。虽然这五十年里，南非与智利等地的政府确实试图调解与弥补暴力的过去，东南亚却甚少设法解决不公，或是还原平民的人权受侵犯、资产遭摧毁、生计受影响以及生命被剥夺的真相。以国家名义犯下暴力罪行而入狱的人少之又少。

问题在于，在一个倾向通过抚慰人心或英勇果敢的神话与传说来解读过去，而不是记录真实事件的地区，历史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在那里，生存经常是忍受困境与不敢奢望复仇的受害者的首要考虑。此外，人们也对过去感到羞耻。熟悉东西方情感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

(Tash Aw) 主张，所有破碎的历史都必须留在过去。“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富裕，就不要谈论过去；研究历史等于回头看，现在只要在乎未来。”的确，大家常说东南亚人记性不好；否则，印度尼西亚人要如何面对1960年代的大屠杀，许多受害者被乱棍打死、斩首，尸体被丢入悬崖旁的大海或河川，十几天血流成河的去？柬埔寨人要如何带着1970年代中期夺走200万条人命的骇人种族屠杀的记忆度日？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发动残酷野蛮、净空城市的社会重整行动，并杀害受过教育的民众。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法庭只对一名如今还在世的红色高棉领袖判处终身监禁。尽管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仍有多名低阶官员屡次顺利逃过起诉，他们或许“只是尽忠职守”，但真正的作为就像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提出的“平庸之恶”⁽²⁾。柬埔寨政府冷淡地支持整起审判，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最后关头才倒戈的前红色高棉官员被定罪。总理洪森在叛逃到越南之前，原本效力于红色高棉政权。

不过，容我解释清楚：倘若认为东南亚人民对失落、受害无感，那你就错了。怎么会有人能够克服至亲遭暴行杀害，甚至亲眼看见这个过程的悲痛？面对这种遭遇，人的本能是寻求救济、正义甚至赔偿金，以真相作为慰藉，查明屠杀的原因与目的，帮助受害者及他们的家人试着去理解这般的暴戾。

罪行究责虽然罕见，却仍旧存在：近期的两起案件中，英国与荷兰法院所做的裁决或表现的态度，都有利于殖民时期的屠杀受害者。1948年，当时马来殖民地的一次反共行动中，英国士兵杀害了巴冬加里村 (Batang Kali) 24名手无寸铁的种植橡胶的农民。尽管事后展开多项调查，但英军并未受到任何指控。直到后来受害者家属上诉英国高等法院，才获得官方正式道歉，但之后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英国政府没有义务进行公开调查。而直到2011年，荷兰法院才对上世纪南苏拉威西岛 (Sulawesi) 的拉瓦格德村 (Rawagede) 惨案做出判决，因为声名狼藉的船长雷蒙德·韦斯特林 (Raymond Westerling) 的命令而惨遭杀害的431位受害者，其家属将获得赔偿金。

这些判决可能太过轻微，也来得太晚，而东南亚执行“转型正义”的过程中也鲜少揭露埋藏在这些分裂社会里的不满与不信任是多么深刻。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反共产主义依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官方立场。共产党在当地遭禁，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仍旧以经过修饰的官方版本，描写1965年的屠杀事件，并把重点放在六名将军据说遭到亲共谋反

人士杀害的悲剧上。2015年，印度尼西亚屠杀事件满五十年的纪念活动，不是遭到禁止，就是被迫在海外举行。同年，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在海牙成立，策划者是公民社会运动人士。2016年，法官听取证词，非正式地裁决印度尼西亚政府应该为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起责任，另外，澳大利亚、英国与美国也是共犯。即使法官的判决不具法律效力，海牙法庭的发起人仍希望借此推波助澜，驱使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这起案件。

如果我们认为（我想我们必须如此），表面上的消极不代表遗忘或原谅这些暴行与罪恶，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导致这些暴行的冲突，依然存在后续的世代里，并以全新且多为致命的形式不断往复循环。分析家质疑，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如此受“9·11”事件所掀起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所残害？实情是，许多加入伊斯兰组织（Jemaah Islamiyya，基地组织 [Al Qaeda] 的印度尼西亚分支）的热血新兵，由于亲人涉及伊斯兰之家起义（Darul Islam，狂热宗教领袖为了将印度尼西亚塑造为伊斯兰国家，而在1940至1960年代之间所发起的行动）后遭到不仁对待，而心怀不满。军队与反抗军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岛与西爪哇部分地区的离岛作战时，数千名伊斯兰组织的支持者，不是丧命，就是遭到监禁。这起运动的领袖卡尔托苏维里约（Sekarmadji Kartosuwiryo），1962年在一座偏远岛屿上被行刑队处死。

我们看到同样的未平冤屈一代传一代，引发东南亚其他区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在泰国。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泰国之所以频繁出现暴力的政治动荡与冲突，是因为当代的对立，对立双方分别是希望保有财富与特权的自私保守势力，与居住于泰国北部与东北部、冀望拥有更多选举权、要求更多财富的农民。如此的地理分歧有其历史缘由，但支持着对抗保守精英的知识信念，来自一小群前左派学生领袖，他们对于1970年代中期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一事依然感到怨愤。

紧接在1970年代中期学运潮之后的，是由军方主导、在曼谷对可疑共产分子或左翼支持者进行的暴力镇压。1976年，曼谷的泰国国立政法大学爆发屠杀事件，警察与士兵枪杀抗议学生，并在激进右翼暴徒对毫无防备的学生动用私刑时袖手旁观，当时，外国与当地记者捕捉并见证了种种暴行。新闻画面令观众震惊，他们讶于居然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杀戮及狂妄的暴行，以及当局不在意的作为。幸存者从内陆逃往丛林。在1980年代屈服与重新安置之后，一些学生以大学学者身份回到社会，一些则加入政党。他信在任职内政部重整单位的警官期间，认识了多位叛

乱者，之后于1990年代中期踏入政治圈时，他聘请其中少数人担任国是顾问，包含担任他信政党秘书长的普坦·威查亚猜（Phumtham Wechayachai）。这些人受到理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也或许是出于更重要的动机——对抗杀害亲人的稳固保守势力，因此帮助这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拟定平民主义政策，并在2001年及2005年连续赢得两届选举。他们在1970年代是血气方刚的激进学生领袖，疾呼平等；而现在有权有势了，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理想。总理办公室设置了请愿匭。内阁会议在偏远乡村地区举行，在那里，他信与部会首长们表面上“倾听”人民的需求，然后配发补助与小额贷款。他们也推行多项政策，例如，让每个泰国人民都能以约一美元的代价享受医疗服务的革命性的卫生保健计划。看来，旧时泰国共产党的社会平等理念似乎已经实现。

不出所料，害怕被篡位的极端守旧保皇主义势力，深知这些计划主导者的用意，进而将种种平民主义政策视为威胁。单单是古代为暹罗国王独有的请愿匭的象征主义，便足以引起怀疑。到了2005年，保守派针对他信及其左派幕僚发动破坏性的街头抗争，有效地使政府运作陷入瘫痪，最终引发2006年的军事政变。这次，平民主义分子没有丛林叛乱势力可以投靠，于是他们坚守立场，在曼谷市中心筑起屏障，破坏市区的零售与商业区。2010年5月13日，意图结束这场僵局的谈判失败，装甲车与武装军队冲破屏障，造成90人死亡。这些激进分子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与文章中，表达对致力推翻人民主权的保皇派军方人士与官员掌控局势的愤恨。对此，当局实行严格的《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作为响应，此后，这项条款便一直遭政府滥用，以将异议分子送入牢牢。

由毕业学生组成的左翼团体中，有一位比这群平民主义分子更有话直说的代表人物，就是不久前还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历史的通猜·维尼察古。关于泰国民族主义的起源，通猜的论述极具说服力。1996年，我和他一同观看记录1976年校园攻击事件的低分辨率黑白短片。他难过地哭了。同样为影片画面动容的我意识到，这段时期正是我在伦敦安稳无忧地就读大学的那几年。多年后，通猜小心翼翼地描述他称之为自创文化的泰国至高君主制：

我在极端保皇主义的环境中成长的同时，人们对君主政体的狂热逐渐加剧，1973年10月14日之后，这股热潮越发不可收拾，直到攀上过去十五至二十年的巅峰。实际上，人们保卫君主制，只是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着想。施行《冒犯君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同时，他们也提倡被视为可保护君主制度的习俗与传统，以防

堵对君主制的批评与负面看法。

过去十年来不断折磨泰国的，而且自2000年以来造成200人死亡的两极冲突的核心，根植于失落的1970与1980年代对不公不义的深刻怨恨，这是一种从未觅得出路的怨恨。

无论一个人为了遗忘过去而找借口扭曲多少事实，犯罪免责的严重不公依然存在。1999年，在公投结果揭晓绝大多数帝汶人倾向独立后，全世界胆战心惊地看着印度尼西亚军队帮助与教唆帝汶暴民在东帝汶街头叛乱横行。据联合国估计，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牺牲了约1400条人命，直到印度尼西亚同意撤军并允许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场面才得以平息。时任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否认在公投后下令执行焦土政策。在后续由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究责请求中，他是关键犯罪嫌疑人，而且被控违反人道罪。2002年印度尼西亚联合东帝汶成立的真相调解委员会评断，印度尼西亚必须为侵犯人权负责，当时的总理苏希洛也在2008年发布官方道歉，但这个举动并未促成对军方人士的任何起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尼西亚人为祖国军队辩驳的方式。一年后，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可谓最为开明、心胸最开放且热情的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他成立的民主论坛（Democracy Forum），为反对独裁政治及新的改革与民主时代奠定了根基。经过国民大会一系列的政治操作，以及多数议员的提名与选举，他在1999年当上总统。鉴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我问他威兰多有何看法。“人们对威兰多将军有错误的印象，”他说，“这源自一概而论的想法——我们归纳自己对军方的看法，认为他们嗜血，经常发动政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忠心耿耿，对国家的人力资源有很大的贡献。”他还说，他正尽力阻止国际法庭传唤威兰多与其同僚。

洞察如此根深蒂固的健忘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一直是我在东南亚持续追求的目标。我曾遇到最激励人心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之一，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 Mangoendingrat），他是已经退休的外交官，在1989年去世前受任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校长。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过他，询问他如何看待爪哇同胞对不公与压迫抱持的被动态度。他语调沉稳、不带任何情绪地回答：“只要能保留文化背景，爪哇精英并不真的在乎受到什么压迫。”苏查特莫科具有典型的消极冷静特质，而爪哇精英文化将这种性格视为美德。他告诉我，他们生存的唯一办法，是“不去质疑权力结构，而是学习

如何顺应其运作。这是对于压制与迫害所做的深刻文化调整”。

然而，透过文化来检视苦难是极为主观的。苏查特莫科的女儿加卢·万迪塔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最顶尖的转型正义专家。加卢非常关注历史的受害者，她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期间目睹了暴力事件。2015年，她安排1965年屠杀事件中的一些年长受害者参加巴厘岛文学节，而政府禁止巴厘岛出现任何有关屠杀的讨论。看到这些在五十年前那段黑暗时期失去手足与父母、身体虚弱却仍保有尊严的妇女泰然自持，实在令人感动。更令我动容的，是一名聆听朗读、自称受害者的三十多岁女性。她说，屠杀发生时，她还没出生，却已经失去了亲人，她想要知道他们的死因。不知道真相所受的痛苦戕害了她的心灵。“为什么我不能知道亲人的死因？为什么？”她啜泣道。

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反驳，揭露这些旧伤疤只会凸显现代的不公，并加深早已频繁导致冲突的社会分歧。因此，何必破坏现状呢？旧照片会褪色，如此大规模的杀戮与磨难几乎全都消失了，只剩留存于印度尼西亚人心中的社会集体创伤。这些创伤可见于现代作家的创作，也在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的纪录片^③中历历可见，当中一些演员本身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从照片里看不到的是人们的感受。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在内心深处，对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感到羞愧。这个过去的污点遮蔽了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最残酷的现实，或许是在政治环境下，人们不计一切代价保有权力，而冒着失去声望与地位的风险去回忆过往与补偿受害者并不值得。何必开启挑战既有现状的大道呢？在泰国，涉嫌证据充足的违反人权罪行与擅自对平民动武行为的维安部队，至今没有一个人遭到起诉。一直以来都有调查展开，但大部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律师与公民社会激进分子，在维安部队不配合的情况下草率进行。如果发现任何有罪情节，究责通常也止于下级，不会向上追溯到指挥阶层。真正的结果不是遭到埋藏，就是为了政治考虑加以粉饰。有一份官方报告，内容是关于1991年泰国军队在军事政变后射杀抗议学生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据称已经遗失。我问负责调查的律师是否有备份，他说他的那份复本也弄丢了。犯罪免责的特权扩及普通士兵，涵盖人脉广阔的精英家族成员。2013年，一支特种部队小组闯入爪哇中部的监狱，处决涉嫌谋杀其战友的四名囚犯。这些士兵被捕后被判短期徒刑。十年前，前总统苏哈托的小儿子被控下令谋杀判他贪腐的法官，结果他只蹲了四年的牢狱。在一个自建国及之前数世纪以来众多人命莫名遇害的国家里，死亡毫无意义。以

这个角度而言，普拉姆迪亚对其同胞的看法是对的。但更准确地说，对生命的无情漠视，才是冲突不断的历史的产物。

- (1) 1936—2015，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知名学者，民族主义研究专家。
- (2) 意指人们集体不思考，最终将把整个社会推向极致的犯罪。
- (3) 除了2012年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奥本海默还于2014年拍了续作《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第六章 逐步开放

公民社会若要蓬勃发展，必须有强大且充满生机的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取决于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安瓦尔

现代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转折点之一，是1970年代中期兴起的政治改革浪潮。受到1974年在葡萄牙推翻军事统治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的激励，这股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ird Wave of Democratisation）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述，在拉丁美洲地区获得最大回响，并且见证了智利与阿根廷强大军事政权的瓦解。很快地，东南亚地区也受到影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学生开始反抗暴政与贪腐。这些民怨大多遭到有效压制，而且往往通过暴力镇压手段。如先前所述，1976年10月，泰国军队在校园内对学生开火，允许右翼激进分子以私刑处决学生领袖，将他们吊死在树上，然后焚烧尸体；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校园自由，并古怪地将此举解释为“正常化”的过程；在菲律宾，政府佣兵追捕共产主义支持者，一抓到人就立刻处决。为了保命，数千名受到威胁与镇压的学生从曼谷与马尼拉的校园逃到丛林，加入共产分子的武装暴动。

共产暴动的影响，加上共产党在越南获得胜利，使西方明显对东南亚逐渐向共产主义集团靠拢感到恐惧。大约在1975年，美、澳两国对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的举动视而不见，想必是因为葡萄牙撤军后恐惧左派政权会接管东帝汶。这些左派学生运动深深影响1980年代在东南亚爆发的现代自由运动。但是，这些改革运动改变政治局势和为快速经济增长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具体方式，几乎说明了传统权力态势的惯性与革命政治的限制。

最先实行政治改革的是菲律宾：1969年，马科斯连任总统。起初，他巧妙操纵权力，将重大开发计划委交关系友好的寡头政客，而他们再协助他中饱私囊。到了1970年代早期，贪腐与任用亲信的现象猖獗，凸显了逐渐加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并引发人民的愤怒与憎恨。面对农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与因此快速发展的共产主义暴动，马科斯在1972

年宣布戒严。接着“刺客部队”以“抢救行动”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拘捕与暗杀行动，以镇压异议分子与反抗人士。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选择忽视这些行为，因为据说马科斯将会消灭可疑的共产分子。到了1980年代初期，马科斯法定任期届满已久却依然在位，独揽所有政权并废除民选国会。多数反对者不是在牢里，就是遭到流放。其中，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昵称“尼诺”[Ninoy]）尽管背负着死罪，仍然决定在1983年回到马尼拉。“我一直在仔细衡量菲律宾人民的美德与过错，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值得我牺牲。”阿基诺1980年在美国演讲时如此表示，之后这段话也成为他的名言。

他确实这么做了。阿基诺从流亡地美国飞回马尼拉，在走下飞机时遭到暗杀，使得大众起而反抗马科斯，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关注此事。美国劝服马科斯在1986年2月召开临时选举，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也在角逐之列。马科斯迅速宣布胜选。然而，在将选举视为盖章了事的东南亚各地，首次有由公民社会发起的选举监督组织质疑官方投票记录，他们提出可信的证据，指出科拉松的确小幅领先，赢了近一百万张选票。马科斯的顽强抵抗，起初引发军队中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但后来以失败告终。假使当初政变成功，充其量也只会重启独裁镇压行动。不过，反对马科斯的主要军方人士胡安·庞塞·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与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或许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在军中有多少支持者，因此转而投靠权势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进而通过全国广播号召大规模抗争行动。随着数万名菲律宾人涌入马尼拉主要干道（以混凝土建成、脏乱的桑托斯大道），并包围军事基地（里头叛变的军官正伙同低阶士兵大胆违抗军队统帅），马科斯的垮台似乎无可避免。在伦敦BBC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我与口沫横飞的评论家及情绪激动的相关人士联机时，从充满噪音的电话中感受到另一端期待解放的兴奋之情。2月25日，马科斯终于下台，他、妻子伊梅尔达及仅剩的随员，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航空基地搭上军用直升机，前往夏威夷。

从外界的角度看来，马尼拉境内发生的事件代表了人民力量的胜利。大规模抗争行动的场面激发世界各地发起争取自由的运动，影响力远播南非。经过CNN的报道，这样的影响扩散得更加快速。CNN利用全新卫星技术，在事件爆发时提供现场报道，并持续更新现况。人民终于得以发声。全世界都乐见这场人民力量革命：无论是否出于刻意，象征这场革命的黄色缎带，与共产主义联盟做了清楚划分。美国疏远马科斯与最终拥抱人民力量的作为，有效改善了亚洲与其他地区长期支持独裁政权的情形。不出几个星期，新任菲律宾总统，即阿基诺的遗孀科拉

松，便在华盛顿特区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在越南战败的十年后，美国得以支持民主的胜利典范——长久以来，美国决策者害怕共产主义者会成为最终赢家，因而设法从中作梗。这是东南亚的重要时刻。不幸的是，这场民主革命的影响未能均匀扩散，并且很快就失去力量。

与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燃起自由希望”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十分类似，人民力量为1980年代东南亚其他区域带来程度不一的影响，徒留一连串断续、落空且遭遇更多政治阻碍的改革运动。1980年代晚期反抗军事统治的缅甸青年，远不如同时代的菲律宾人那样幸运。人民力量席卷菲律宾三年后，数千名缅甸人在发起抗争时遭到射杀、囚禁与凌虐。缅甸军政府利用半吊子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国家实行严格的国有化政策，并且根据出身战前时代的经济学家与预言家的看法制定怪异的经济政策。1985年，正当多个邻国经济起飞时，缅甸却停用本国货币，以便让印有强人统治者奈温幸运数字的钞票广泛流通。⁽¹⁾

三年后，在原本应为吉日的1988年8月8日（东亚及东南亚多数地区将8视为幸运数字），数千名学生与佛教僧侣聚集在街道上疾呼改革，有意模仿两年前在马尼拉推翻马科斯的人民力量革命。然而，不同于菲律宾，缅甸军队并未站在人民那边；军队以蛮横武力回应，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街上的抗议民众，造成数千人死亡。军队势力大获全胜，但或许是意识到奈温将军拥护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名声败坏、不得人心，他们重新替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名称：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²⁾。令人意外地，新任的军政府宣称不会紧握权力不放，并允诺在1990年举行多党制选举。军方一定自以为得到人民真心爱戴，因为他们开放了一场比以往自由的选举，让遭到杀害的民族主义领袖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带领新成立的全国民主联盟党（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获得压倒性选票。昂山素季原本默默无闻，嫁给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并定居英格兰，之后开始踏上民主奋斗之路。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起初看似会遵守选举结果，并顺从人民的渴望，却在两个月后宣告选举无效，新的军事独裁时代也渐露端倪。昂山素季被软禁在家中，至于顺利逃到泰缅边境的人，则自立阵营或展开新生活，无法向家乡的目标群众传达主张。

民主的种子也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萌芽。1989年，我目睹印度尼西亚学生在雅加达街头游行、呼吁改革。他们身穿牛仔裤与T恤，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成群坐在路旁，整夜高歌革命旋律。他们说着关于

苏哈托的笑话，提心吊胆地笑着，害怕被别人听到。他们不会一味批评政府，而是针对土地争议与人民福祉的问题抗议。同样地，苏哈托总统得知菲律宾不久前爆发的事件，行事小心翼翼。开始感到孤立与被排除在权力斗争之外的军方，倾向温和地对待学生，迫使苏哈托体认到需要容忍更高的开放性。

马来西亚政府依殖民时期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所行使的全面权力，早已限制自1970年代中期便开始酝酿的学生激进主义。因此，1987年某些社会与民族问题引发抗争时，政府很快便采取行动。10月27日晚上，106名激进人士、学生、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因《国内安全法》遭围捕与拘禁。同年，新加坡政府也发起规模较小的类似行动，据称是为了揭露“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没有任何抗议事件达到与19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之初席卷东南亚的示威运动一样的规模，也并未对国家体制造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更加稳固、独裁的统治风格。

1980年代末期，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预示了自由市场价值与确保资本主义顺利运作所需的政治自由之胜利，让民主的种子更有希望在东南亚开花结果。学术界与全球决策者坚信，作为治理体制的民主必将普及，而遗留在东南亚的独裁体系不久便会消失。克拉克·内尔（Clark Neher）^③于1991年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较量的对立世界的转变，揭开了变革的序幕，而在“经济而非安全考虑”居主导地位的世界，民主化成为受人欢迎的副产品。然而，很快地，人们看好东南亚赶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尾端的期待逐渐落空。东南亚的强势领袖在有效击垮争取政策发言权的早期人民力量运动后，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

这些人运用了谨慎而精明的软硬兼施策略。1990年代是东南亚地区经济飞快成长的开端，同时，获得解放、行情看涨的西方经济体，在这个地区投入大量资本与时间，以期从经济改革中获利。198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实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改革，吸引大批外国投资者与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面对高涨的批评声浪，宣布实行经过审慎评估的开放措施（如我在1990年代关于苏哈托及其政治的研究中所述），这意味着政府能容忍有限的礼貌性批评，稍微松绑大众媒体的限制。虽然如此，却不见政府有任何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的意图，苏哈托看来也尚未准备好放权力。此外，市场的自由化与银行体系均经过权衡，使绝大部分的资本与利润落入苏哈托的家族与密友手

中。

1990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惨遭滑铁卢并撤军的二十年后，越南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随着贸易壁垒瓦解，越南尽管坚持奉行共产主义原则，仍被视为有经济增长潜力与值得投资的新领域。1987年实施的外国投资法，宣告外商直接投资洪流的来临。1992年，越南政府修订其共产主义宪法，承认私有企业；股票市场在进入21世纪之际开始运作。越南务实派领袖的成功治理，让直到1980年代中期仍仰赖苏联专业技术的稳定共产国家，转变成十年后最受欢迎的老虎经济体。越南的劳动人口遵守纪律、生产力旺盛，加上部分在战后远走他乡的百万名流亡者陆续带着知识、技能与资本回到国内，许多人期待，越南能够崛起成为东南亚多个老虎经济体中的小龙。尽管如此，越南迟迟不见政治改革的迹象，有的只是经过仔细忖度的对外开放。即便是饱受战火摧残的柬埔寨，也显现了新生的征兆，联合国在1992年后协助该国重建，动用15亿美元、约2万名人力，为其建立议会民主的根基。

这样的逐步开放，虽然对经济影响深远，却只为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现状带来表面的改变。可想而知，改革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而非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越南继续由封闭的共产党派系所统治；苏哈托依然是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当时，乐观主义者将这个“经济第一”的方法视为非破坏性转型的理想形式，认为它有助于建立经济繁荣的基础，以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可在未来展开有秩序的改革。然而，正如新兴中产阶级警觉到社会进步与民主变革的需求，收入与消费的大幅提升也危及国家现状，使得维持社会稳定必须付出更大代价，进而阻碍有意义的改革与变化。

投资的程度提升，对政治自由限制的担忧也随之降低。更多自信的领袖（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利用流利的英语提倡他们称之为“亚洲价值”的领袖风格，他们主张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适用于自身国家，并坚称人民愿意用不受限制的自由换取温和且能保护人民的专制政府。李光耀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自身特有的代议政府风格”，意指西方的民主模式需要加以修正。而马哈蒂尔在当时则作风强硬，痛斥西方害他在打造亚洲贸易联盟这件事上徒劳无功，并且纳闷这是否与“我们的脸孔是黄褐色”有关。事后看来，政治改革的步调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当中蓄积了过去十年来爆发的剧烈冲突。然而，鉴于今日东南亚的大部分社会与经济结构都是在1980年代晚期到21世纪初奠定基础，这段时期值得我们仔细回顾。

我在1990年代居住的曼谷与吉隆坡，被视为东南亚蓬勃经济的缩影，它们是受到看似宽容、倾向改革的国家所监督的适度自由市场。实际上，这正是带有恶性独裁主义特色的半民主状态的诱人之处。马来西亚经济逐渐起飞、投资者蜂拥而入的同时，政府也囚禁异议人士，钳制媒体言论。如果外国媒体（也就是我这一方）提出一点批评，谄媚政府的人士便会反驳，这是西方人“嫉妒马来西亚的成功”的表现。记者的报道必须经过审查，每个星期我都紧张地等待，不知道《远东经济评论》能否获准在马来西亚发行。我记得这段时期，马哈蒂尔总理曾在吉隆坡举办的投资研讨会上被问到，为什么自认可以在国家经济如此倚赖外国投资的时刻藐视西方。他一边怒视台下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一边反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还是会来投资我的国家。”

东南亚的经济成长有目共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5年至1995年期间，泰国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平均一年增长8.4%（如今一年要达到2%都十分困难）。如泰国经济学家巴素·蓬拜集（Pasuk Pongpaichit）指出，这个成就大多得力于为了避开日元升值而流入此地、将近500亿美元的日商资金。此外，还有守纪律与成本低的充足劳力（除了泰国，也来自邻近的缅甸），以及规模可观且富裕的中—泰商界所展现的强大创业才能与资本。

财富与活力显而易见。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正值经济发展巅峰的曼谷，我汗流浹背地坐在公交车上，车子在庞大车阵中寸步难行，却见暴发户坐在全新的奔驰或宝马轿车后座，舒服地看着影片。我遇过一些商业大亨，例如泰国最大企业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的总裁、讲话轻声细语的谢易初（Dhanin Chearavanont）。谢易初以农产品公司起家，在二十个国家经营高科技公司，并从事多样化的国际投资组合。他的父亲和其他数百万名逃离末代帝国的贫穷同胞一样，在1920年代从中国迁居此地，并以曼谷的唐人街为据点，做起农作物种苗的生意。到了1990年代中期，正大集团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私人企业之一，在中国、东南亚地区与美国都有开创性投资。今日，正大集团的年收益超过450亿美元，而谢易初及其三个兄弟更是泰国首富，身价逼近200亿美元。我在1994年初次见到谢易初，当时他刚从农业转战电信业，而我和他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一家合资银行的开幕典礼。我们漫步在上海著名的外滩时，他称自己是中国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最先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到了1990年代，他成为中国资金最雄厚的单一外国投资人。媒体惊叹，以泰国农商企业巨擘出名的谢易初，如何买下中国的一家摩托车公司、获取来自日本的新科技，并在十年内攻占15%的中国摩

托车市场。在总是使用自家食材的宴会上，大圆桌上的中式菜肴摆放合宜，我认识了几位他特别从商业发达的上海聘雇的高级经理。这位在泰国成功掌握7-11便利店特许经营权（店数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正大集团董事长，除了其他诸多成就外，也是一位古老棋盘游戏围棋的冠军棋手。

1990年代，东南亚华侨企业集团在全球法人舞台上赢得胜利；它们大量借贷与投资，并从世界各地获取资产。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委托的研究在1995年曾有统计，东南亚地区约有3000万名华人，贡献约达45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当时与中国大约5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如此惊人的企业活力让全球金融界的眼光为之一亮，吸引投资银行家与证券经纪人来到东南亚地区。他们穿着起皱的深色西装走下飞机，不断邀请像我一样的记者一起享用饭店的奢华自助午餐，以便探询实用的见解，评估是否值得花费数百万美元投资由深不可测的家族王朝所经营的陌生企业。他们只想听到好消息；当我开始一一列举信贷过度、事业独占与收入差距极端化的风险时，只见他们盯着桌上的卡布奇诺发呆。印度尼西亚股市于1988年首度开放外国投资时，有人以数百万美元资金买下雅加达一间鲜为人知的酒店企业股份。这是在甫获解放的市场上唯一可供交易的股票。尽管如此，这对想在欧洲与美国的萧条市场与触底利率之外寻找替代选择的投资者而言，依然有利可图。

在诸如《亚洲崛起》（*Asia Rising*）、《竹网：流亡中国企业家如何在亚洲建立新经济超级强权》（*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这类有着震撼书名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家庭工业。东南亚社会潜藏着恐惧，就像几年前美国人对日本可能接管美国国内企业感到恐慌一样。然而，这未能阻止资金的流动。东南亚华侨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向来追求小心谨慎的成长与发展方式。他们以保留所有权与从消费者及制造商身上获取利润为优先，牺牲前瞻性的工业发展，最终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卖空这个区域。随着新世纪来临，中国与韩国在技术与工业上的造诣与潜力，已远远超越东南亚。

对于趋势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的人而言，政治没有太多变化，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就当权者的家族和密友而言，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他们并不真的渴望政治改革。他们合理化自身特权，作为让原住民（马来西亚称“bumiputera”，印度尼西亚称“pribumi”）赶上

华侨的一种手段。到了1990年代早期，东南亚地区资金泛滥，激起企业集团的野心与贪婪：1993年，行事高调的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商人塞蒂亚万·佐迪（Setiawan Djody）与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合作伙伴，一同收购当时经营惨淡的意大利汽车品牌兰博基尼。他的梦想是替亚洲暴发户制造一款平价的奢华轿车。1980年代晚期，我受邀参观他在雅加达豪华气派的住宅，欣赏他担任主音吉他手的摇滚乐团的即兴演奏。佐迪坦承，自己是靠着与苏哈托家族的关系才能在商场上出人头地的，掩饰了他起初身为音乐家，并以亚洲顶尖吉他手的殊荣登上《滚石》杂志的过往。我在雅加达占地广大的格罗拉（Gelora）体育场欣赏由他重金安排的Kantata Takwa现场演出，这场表演传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活力，没错，还有自由。然而，佐迪的生活并不顺遂；十多年后，他年逾六十，必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自手术后便回归表演舞台。至于兰博基尼，则在1998年卖给大众汽车。

还有许多像这样从东南亚的繁荣崛起的故事：拥有裙带关系的人士与人脉广泛的官员，投资后来转型成庞大企业帝国的公司，其中很多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崩溃瓦解。即便如此，这个时期所创造的财富十分惊人；其影响能从所有东南亚国家首都均可见的由钢铁与玻璃构成的天际线，以及至今仍造成诸多苦难的可怕贫富差距中看出。1992年，泰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达0.536⁽⁴⁾，在全球国家中排名靠前；此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准，数值越高，代表分配越不平均。

随着资金流动，教育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东南亚的政治似乎也该有所改变了。人民力量的声势已过，在押注东南亚会长期稳定而非动乱的众多外国投资者心中，或许还是一段令人不安的回忆。随着外国资金的注入与本地经济体的开放，透明化与问责制的需求也变得无可避免。如此一来，蓬勃的股市与晶亮的办公大楼便成为民主的指标，即使通常只有精英阶级与都市地区才感受得到它们的影响。

变革的氛围千真万确。我曾与当时被视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有过谈话，包括曼谷民主党的阿披实及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的安瓦尔，听他们谈论亚洲政治的新解放思潮。

在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求学的医生后代阿披实，是我见过最年轻的政治人物之一。当时他30岁，体格略瘦，拥有一般只在艺术家身上看得到的温柔善感。他深邃睿智的眼神与不时挂在脸上的笑容深受曼谷选民喜爱，尤其是家庭主妇。在改革泰国过度集中与不当的教育体制上，他

早已身经百战。官僚警告教师们，阿披实建议成立的独立学校董事会将不会发给他们薪水，使他的改革终告失败。昵称为马克（Mark）的阿披实，注定发挥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与素养，根据透明的规章与程序，发展有效的议会民主。他运用从牛津大学辩论社会学来的各种辩论技巧及泰国上流社会的话术，与国会议员争论；讲英语时，他能言善辩，从不认输。他在泰国媒体上的形象显得高傲且有些自大，但我注意到，他一向听从当权者的命令。他的家族世系可追溯至任职法庭的中—越移民；行医的父亲也是贵族一员。如同许多有幸出国留学的精英分子，阿披实展现了双重形象：一面是拥有新奇点子、处事圆滑的西方人；另一面是尚未走出封建时代、效忠政府的官员。一开始，他还能轻松游走于两种形象之间，但他忠于精英与体制现状的行为越明显，他的良好形象在渴求获得权力的下层社会里就越衰败。

在马来西亚，我曾报道过安瓦尔于1990年代初期在政坛迅速成名的事迹。安瓦尔以领导穆斯林学生青年运动闯出名号，磨炼出激进分子的才能。他是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受惠者，这项政策在1971年制定，旨在帮助本地马来人脱离极端贫穷的处境，并通过各种教育及财产的优惠措施给予其公民权利。安瓦尔的父亲原本是地位卑贱的医院清洁工，后来力争上游成为议员与掌管卫生事务的高级官员。安瓦尔年轻时就读位于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仿英国公学精英体制的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求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政治，为贫穷与不公发声，还在1970年代中期吃了近两年的牢饭。身为辩才无碍的天生政治家，安瓦尔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简称“巫统”）。他带着赋予公民社会权利及让高学历青年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新颖观点，踏入主流政治。许多前途看好的马来西亚知识青年都相当爱戴他。

我在1991年初次与安瓦尔见面时，他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而且被外界认为很快将会登上总理大位。优雅的山羊胡、时髦的方框眼镜与对高级订制西装的爱好，凸显他十足的摩登形象。不过，安瓦尔一向反应机灵，往往能迎合大众口味。1990年代初的政治集会中，他在一个仇视非马来族群的马来农村里发表的演说，深深打动了我。演讲结束后，安瓦尔看到我和当时替外国媒体工作的马来西亚同事卡利穆拉·哈桑（Kalimullah Hassan），很是惊讶。他把我们带到一旁，狡猾地笑着请我们不要报道他刚才说的话。

阿披实与安瓦尔尽管各有缺点，但都以独特的方式与背景，尝试以崭新的方法提倡民主政治。他们没有试图煽动人民的力量，而是深入体制；他们致力于讨论想法，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支持他们努力的成果。他们采用先进且逐步对外开放的做法。他们两人都不是革命分子，也都有一半的立场支持权势阵营。然而，他们带给许多人希望，同时拉拢拥有现代观的从众分子与反对势力。他们因为擅长沟通以及将西方自由价值融入东方背景的能力，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八面玲珑的安瓦尔从《外交事务》季刊搜集最新的国际关系观点，借此赢得外国访客好感。阿披实则以伦敦周围各郡（UK Home Counties）的国会议员（此外还是他出生地球队纽卡斯尔联队 [Newcastle United] 的死忠球迷）身份脱颖而出。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轨迹，清楚呈现了他们按部就班、较不具破坏性的策略是多么无能，以及过去三十年来东南亚政治的进展多么有限。在泰国，阿披实带领非民选政府，并在2010年主导一起军队杀害近百名抗议人士的镇压行动；在马来西亚，安瓦尔被控贪腐而入狱，出狱后又在2013年几乎赢得大选后，因鸡奸罪名再度坐牢。这当中究竟哪里出了错？

1986年，菲律宾爆发的人民力量革命，仅开启东南亚其他国家严格管制的改革步调；十年后，1997年7月泰铢重挫，激起了更灾难性的效应。这场危机源自市场引导对泰国货币的不信任，因为1990年代经济起飞时，企业大量举债，当时认为泰铢投机交易的时机已然成熟。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因为泰国政府看似谨慎的财政政策，稳定了通胀率（介于3%—5%），也让泰铢币值持稳，大量外资因而流入，泰国政府还夸耀国库拥有适度盈余。高储蓄利率与8%的国内生产总值，使泰国看起来就像典型的亚洲小虎经济体。虽然如此，一切的浮华魅影终究无法长久。经济成长加上资金快速流动，银行业像气球般迅速扩张，变得越来越难以监督。银行与金融企业大肆向国外借贷。股市仿佛一个起伏剧烈的赌场，尤其是房地产业。整个市场是投机者的淘金宝地。市场自由化让资产暴露在寻求快速收益的投资交易下。高利率与热钱流抬高了资产价格，包含计划不周、资金不足的投机事业，以及规模过大、低价抛售的房地产。一切在1997年7月2日崩盘，当时泰国政府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短短一夜，泰铢兑美元汇率狂跌一半，菲律宾比索面临同样下场，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汇率则从约3000：1骤降至14000：1。

社会不安与动荡紧接而来。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协助纾困，同时执行严格的财政改革。坏账银行倒闭，利润飙升，过多

的补助遭到删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针对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掌控的垄断企业下手，但是，治病的同时也几乎害死人。因此，基金组织为了对症下药费尽心思。银行挤兑与补助的大幅削减，使印度尼西亚平民权益受损。一夕之间，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存款净空，消费力受到重挫。金字塔底端的贫穷人口，无法再靠着在路边摆面摊、卖肥皂及其他日常用品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经济状况较佳的民众，也被迫让孩子退出学费瞬间飙涨的学校与海外大学。苏哈托在1998年确保自动连任，并全面指派亲信与贪污官员（包含他的家族成员）组成内阁时，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更加沸腾，进而引发激烈民怨。

1997年爆发经济危机时，人们深感本国的强大领袖不再履行以有限自由换取繁荣发展的社会契约。苏哈托在1998年戏剧性下台，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关键的转折点。如同世界上不计其数的独裁者，苏哈托未能察觉自己时间已尽，还亟欲结合武力威胁与怀柔政策保有权力。最后，属下的背叛终结了他32年的统治，新任内阁成员变节，公开支持在国民大会屋顶上挥舞革命旗帜的学生。

从1998年5月开始，剧烈的变迁戏码在雅加达街头上演了好几个月。面对印度尼西亚陷入混乱的货币、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及飙涨的物价，或许是受到年纪增长与轻度中风的影响，苏哈托向来准确的直觉失灵了。随着反对势力以学运形式逐渐壮大，他选择提高汽油价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取消物价补贴，使消费者面临更艰难的困境。之后，他决定飞到海外参加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点燃了更多抗争的导火线。这两个决定都错估了情势。他一离开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紧张冲突便在雅加达街头爆发；人们烧毁店家，大肆掠夺，店主沦为暴徒以私刑泄愤的受害者。遭城市抛弃的愤怒暴民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砸毁商店玻璃，洗劫百货公司与抢劫银行。在苏哈托家族兴建的收费道路旁，多群盗匪拦下外观看来价值不菲的名车，并把主人拖下车，看到华人脸孔就狠揍一顿。军队畏缩不前，拿不定主意，也可能是因为不愿意背上屠杀的罪名。我从香港搭机到印度尼西亚，加入同事《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分社社长约翰·麦克贝恩的采访行列。我们对苏哈托下台做了全面报道，大部分内容聚焦于市中心商业区所爆发的动乱，此区曾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繁荣的中心，如今却因为骇人的血腥事件而停摆。

每座城市都有一颗心脏；雅加达的核心是名为赛曼吉（*Semanggi*，“立交桥”的印度尼西亚文）的水泥高架桥。这座多线道的交叉道路疏通各方向的车流，但这个功用没能在印度尼西亚史上派上太

大用场。1998年在赛曼吉高架桥上，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抗军队，抗议独裁统治，遥想十年前标志菲律宾民众起义的聚焦点的马尼拉桑托斯大道。1998年11月中旬的某个傍晚，学生们抗议政府通过军队紧急权力的新法令，矛头对准自苏哈托独裁政权终止后数月以来未能意识到民主时代来临的一位政治精英。改革请求（使苏哈托在5月下台）已变成狂暴的革命欲望。军队朝抗议学生开火时，我正在雅加达南北向的要道苏迪尔曼将军大道上，朝赛曼吉高架桥的方向走去。

我前方站着列成方阵的部队。未被水泥高架桥的阴影完全遮盖的士兵，他们身上的盔甲就像甲虫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在他们前面，数组凌乱的学生坚定地挥舞拳头与旗帜。我听不清楚他们在喊什么，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revolution or death）之类的口号。我旁边站着来自附近的上班族、店员和居民，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突然间窜出几声枪响，听来就像有人冷不防点燃一串鞭炮。学生们一开始群起围攻，之后仓皇四散，接着又冒出更多枪响。周遭的人们跌倒在地，我躲在花岗岩柱后头，这根梁柱属于一栋看来格外具现代感的办公大楼，而印度尼西亚才刚在历史上后退了一大步。

如今，在估计有16名学生丧命的地方，不见任何纪念碑或标牌，唯一留存的是当地人的回忆。艾哈迈德（Ahmad）在距离抗议地点只有一小段路的本敦甘希利尔（Bendungan Hilir）卖叻沙（laksa）。他与几位朋友在一间露天咖啡摊回想士兵突击的那天时说：“他们应该要用塑料子弹，但我看到人们身上有弹孔。”他描述士兵们四处搜索、逮捕并鞭打抗议者时，学生们如何逃到他们躲藏的市场里。那是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的混乱年代。学生们系着头巾，身穿代表学校或科系的彩色夹克，成群结队在街上漫行叫嚣；他们搭着强行夺来的城市巴士涌入雅加达；赛曼吉桥上似乎总会有朝某个方向前进的游行队伍或车队。很快地，“示威”（Demo）一词逐渐变成大众流行语。国会就坐落于高架桥附近，是一幢形似宇宙飞船的庞大建筑，由苏加诺在1965年下令建造，以安置一群意图与美国对抗、派系各异的国民。1998年5月苏哈托辞职之前，约有8万名学生占领布满灰尘的国会大厅，将泡沫塑料便当盒与塑料水瓶丢得满地都是——这些物品全是由看好局势转变的富有商业集团捐赠的。阿德玛加雅大学（Atma Jaya University）离国会仅一箭之遥，11月13日晚上，军队在校园内丢掷催泪瓦斯，对学生开枪。第二年，更多冲突爆发，学生们同样齐聚在交叉高架桥的立拱处，抗议哈比比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军队再次对他们开火。10名学生丧命。后人将这些意外称为“赛曼吉桥事件一”与“赛曼吉桥事件二”。

印度尼西亚社会始终企图制裁军队。2001年，印度尼西亚的人权委员会展开调查，证人指称许多士兵与警察在两起赛曼吉桥事件中滥用武力，而5月12日在特里萨克蒂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的开火，更造成4名学生死亡。军方否认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辩称部队的行动是为了避免群众动乱扩大；国会表示赞同，这起案件遭到驳回。

今日的赛曼吉桥一如既往地繁忙，疏运川流不息的雅加达交通，每天早晨与傍晚都壅塞难行，同一时间，警察疯狂挥动手臂和吹哨鸣笛，努力纾解车流。现在，当我坐在有空调的汽车里从桥上或桥下经过时，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正赶着去阿德玛加雅大学拍摄抗议学生，途中一名士兵用枪指着我；在这里，身体瘫软、失去生命迹象的学生倒卧在暗红色血泊中。在这里，就在这块毫无特别之处、纯粹供车辆行驶的柏油路面上，独裁政权垮台，民主体制诞生，这样的改变让我感到一阵骄傲。叻沙小贩艾哈迈德透露，这几年的情况好了一点。“士兵不见了，”但他接着笑说，“现在只有警察会骚扰我们。”

在1991年首度出版、1998年多起暴动后发行第三版的《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中，我广泛撰写苏哈托的生平，以及他依附权力的手段。仔细想想，我们全都对短暂的民主过渡期抱持太多期望，现实的情况，其实是缓慢渐进、蜿蜒迂回的改革道路，沿途充满许多障碍与挫折。此外，暴力冲突也层出不穷。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紧接而来的是一阵阵失望的浪潮，引起更多学生领袖与公民社会团体的暴力抗争。他们看穿了苏哈托辞职后的政权实际上落在之前的幕僚手中，而这些人不急于解放他们能从中获利的制度。之后，军方在政治上又保持了五年的重要地位。不满的保守势力在边陲地区发起动乱，在马鲁古省（Maluku）东部群岛上，至少有5000人死于自1999年持续至2001年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中。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部分地区，也爆发了种族与宗教的对立冲突。

今日，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虽然已有显著进步，民主过渡仍受对传统父权领导形式的顽固坚持的羁绊，为了适应与推翻不受拘束的自由和平等的趋势，这种体制展现了高度的创造力。政府利用无理的法律与赤裸的暴力，假稳定之名强制要求人民遵守法纪，给予人民的自由说收回就收回。在我写作本书期间，自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各城市的贫民窟中已有6000名毒品嫌疑人命丧蒙面暴徒手下。许多人认为这个可怕现象与马科斯时代的“抢救行动”没有两样，而杜特尔特要全

世界别多管闲事。在其他地方，政府越趋开放，表面上越民主，社会分歧也越明显。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导致了暴力冲突。印度尼西亚至今已举行过连续三次顺利过渡的总统大选，但宗教的偏执（经常引起暴力）使这个国家饱受折磨，而且日渐严重——我将在后续章节里深入探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领袖大谈多元主义的美名，却在官僚与激进分子联合拆毁基督教堂，或威胁以私刑处死任何被控污蔑伊斯兰教的人时，袖手旁观。曾被东南亚各国视为自由民主改革典范的泰国，或许是今日如此分裂趋势的最佳范例。名义上民主的环境下，政治人物彼此近二十年的开放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是掌权者与未掌权者（或捍卫理想的精英团体）的社会两极化；农村选民首度感觉获得选举权与公民权，享有特权的都市权势集团则倍感威胁。

在东南亚，人们经常根据18或19世纪欧洲创建与流传下来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去推论政府的行为与社会的响应。政治多元主义的发展，被视为和谐与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诞生的基础。然而，在现代马来西亚，宗教多元性受法律以及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宪法的保护，基督徒不得使用“阿拉”（Allah，“真主”的阿拉伯文）一词，穆斯林若吃培根或在斋月（Ramadhan）期间不禁食，会遭到逮捕；在民主进展甚丰的印度尼西亚，议员们讨论是否要重新实行禁止污辱总统的法规；而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公开摒弃独裁统治的菲律宾，犯罪者依然逍遥法外。

如今，当我走在曼谷与雅加达的壅塞街道上，依旧能够看到那股丰沛的财富与活力，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些资源仍旧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向下渗透到社会基层。精英分子开着有空调的豪华轿车，周围却是拼命要脱离债务与依赖困境的平民百姓。在泰国，约有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曼谷或其邻近地区。虽然官方统计雅加达1000万人口当中只有4%属于贫困人群，但市长在不久前表示，他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接近40%。在东南亚地区，都市更新与兴建能够吸引投资的基础建设和生活空间的压力，正迫使铁皮屋的居民无家可归；自2015年以来，雅加达大约已有一万户居民遭到驱离。这些由惊人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困境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诱发了强烈不满，尽管该区经济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些不满仍阻碍东南亚的发展，并种下社会动荡的危机。2012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拥有全球60%的中产阶级人口。然而除了印度，目前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大多仍由狭隘的寡头政治利益所支撑的独裁主义者，或称不上民主的政府所统治。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会长

久持续下去。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深入检视东南亚政治的当代动态，在当地，冲突大多是围绕着自私精英的顽固守旧，以及为了根除贪腐与建立公正透明的治理形式而起的斗争。

- (1) 1985年，缅甸突然废除50元和100元纸钞。1987年9月5日，缅甸政府又发出一纸命令，决定废止缅甸银行联盟（1990年后更名缅甸中央银行）发行的25元、35元与75元纸钞。政府停用上述钞票后，接着发行新的45元与90元纸钞，但政府却没打算让人民兑换旧钞。新钞上都有“9”这个数字，这是政府领导人奈温将军的幸运数字，纸钞上也印有两位殖民时期革命分子萨亚尔·山（Sayar San）及塔钦·菲勒·拉吉（Thakhin Phoe Hla Gyi）的肖像，而遭废止的三种旧钞上，则印有昂山将军的肖像。
- (2) 1988年9月18日成立，为缅甸军政府时期最高权力机构。1997年11月15日，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 (3) 北伊利诺伊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主任。
- (4) 基尼系数在0与1之间，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较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一人一票制是最难操作的政府形式。它的结果难以预料。

——李光耀，1984年12月19日

2006年9月19日，晚餐后接近10点，我在曼谷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画面。BBC报道，坦克开上曼谷街道，军事政变正在进行。身为经验丰富的泰国观察家，经常有人问我，看似民主的泰国，有没有可能再度爆发军事政变。这种可能性很容易令人质疑；毕竟，上一次政变发生在15年前，而且从那之后，历届选举都回归正常，并在没有军方介入干涉的情况下，屡次推翻平民领导的政府。循序开放的基本政治逻辑占了上风。我早该料到这一点。

军事政变不需要混乱与无法预测的民主过程，便能重新设定政治方向。泰国拥有漫长的军事政变史，大多为时短暂、未造成伤亡，军队的例行公事是进驻城市，等到愿意配合的新政府成立之后才撤兵，而且一开始就已安排好一切，让自己在政变结束后自动得到特赦。他们甚至还有年代久远的美制M41s特种坦克，政变期间常见于各大街道。在那个宜人的9月夜晚，这样的情景看起来是如此无害，以致一些外国游客悠闲地穿梭于坦克之间，还与它们自拍。这场政变尽管没有流血场面，但在2006年并未解决任何事情；只促成草率拟定旨在限制从政者权力的宪法，然后开放公投，并在略过半数的选民支持下拍板定案。八年后，分裂的政治势力瘫痪，血腥僵局持续了数个月，泰国军方于2014年5月22日再度介入，这是82年内第18次。同样地，受约制的宪法起草并送交公投。虽然投票人数不多，宪章还是再次通过了，其中赞成票占61%，比半数略多了一些。军方禁止宣传活动，也未积极确认选民已读过冗长的宪法草案，让非民选的上议会占尽利益，并且准备好推派一位非民选的总理。

无论我们多想替民主治理形式与人民主权的发展喝彩，武力从未真正远离东南亚的政治圈。对于一个社会与物质大幅进步、经常在经济成长与投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区域而言，为何会有这么多国家在衡量自由与良好治理的国际指标中垫底？为什么这个地区至今仍为了民主过渡而挣扎？不可否认，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牺牲自由与权利以掌控法律与秩

序、蛊惑民心的民粹派政客相比，缅甸的昂山素季与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堪称新兴民主国家的模范领袖。然而，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两位领袖均显露出对人权议题令人忧心的迟钝，以及通融既得利益的倾向。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拒绝特赦死刑毒犯的所有请求；国际社会对于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在缅甸若开邦的困境表示担忧，但在人权主义者眼里，昂山素季一直闷不吭声。然而，两位领袖却都对强大军队势力的威胁反应敏捷。限制权力与政治空间的硬实力（hard power）^①时代来临。

如果说1990年代是东南亚改革与政治变迁的时期，那么21世纪最初二十年所见的成果可说令人大失所望。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各国，解决了国内政治问题，享受发展与投资的急速复苏，让人们们对稳定与繁荣抱持高度期望。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军方停止干政；在缅甸，军方面临越来越多服从平民政府的压力。到了21世纪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地区大致由人民选出的政府，学会了响应人民的需求，并开始探究不平等与贪腐盛行的根本原因。

可惜的是，这种建设性的改革大多为时短暂。原因在于，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精英内部恶斗导致政治对立，贪腐恶习无所不在，贫富差距更跃升至警戒层级，进而引发暴力冲突。民选政府未能解决已急遽恶化的不平等问题，使选民偏向承诺牺牲自由与人权以采取坚决行动的民粹领袖。同时，军方在泰国重拾权力，在缅甸的民选政府治下持续握有政治权势，在印度尼西亚奋力夺回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东南亚掀起抗争与革命浪潮的三十年后，一位允诺大规模扫除罪犯、必要时将废除国会的强硬市长，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而马科斯之子邦邦·马科斯（Bong Bong Marcos），差一点就登上副总统的位子。

21世纪前二十年，刚好是我的记者生涯后期，其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先后担任主编与总编辑。之后，我住在港口景观有如风景明信片般美丽的香港，已经不再是新闻界的记者。然而，编辑的职务引领我走过东南亚的权力走廊，在这当中，我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分食可颂面包，与马来西亚总理共进午餐，还与泰国总理进行激烈的司法角力。到了2004年，随着短视的美国东家决定关闭杂志社且投入调停工作，我开始长年经营政治人脉，并面临到无限权力的残酷现实与矛盾限制。

这段时间里，我心中反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政体及其有益于社会的所有表象，为何在东南亚如此难以建立？真的是因为社会改革实

在跟不上政治变迁的脚步吗？我想不是，因为东南亚人民的教育水平、见识素养与经济状况，比我在1970年代晚期初次来此所见到的还要进步。不同于长期受冲突所苦的非洲与中东地区，东南亚在过去三十年里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缅甸或许是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根据官方资料，当地的识字率接近93%；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识字率也在同一水平。然而，东南亚虽然达到这些显著的进步指标，却也存在着严重的时间扭曲。通常，社会与政治阶级越高，思想就越落后。在这个区域，当权者似乎把政治改革视为一种威胁。

举个例子，在泰国，保守势力，即支持君主制的僵化官僚与军队精英，在整个1990年代都与政府维持不稳定的同盟关系，并满足于这样的局势，其间没有一位民选领袖有能力赢得明显多数的支持并挑战现状。但是，以企业家身份转战政坛的他信在2001年打造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开始履行对强大民意所做的承诺时，他非但未接受主权在民的清楚表征，反而出于本能地去破坏它。在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族群始终意图保有经济特权，因此当以都市为据点的多元种族反对势力在1990年代晚期崛起、挑战他们的垄断权力时，他们竭尽所能地利用刑法与王室权力诋毁对方的领袖。马来西亚则在近年通过刑事起诉与不可理喻的《国内安全法》，极有效地抑制了主权在民的言论。2016年8月，政府更是通过新的《国内安全法》，让警察可以不经上级指令就合法拘留任何人，而当局也可在任何地区宣布戒严，并以对抗恐怖主义为由，暂时取消所有公民权。总理还成立专属的准军事部队，加强执行新立的国内安全法。2016年，安瓦尔在吉隆坡郊区的监狱牢房中，哀悼着他口中的“灾难性失败——这个以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拥有多元宗教，原本应该要成为多元民主的耀眼典范，如今却沦为独裁的盗贼政体”。

硬实力会得到强化，是因为民主改革的制度薄弱。东南亚的政治精英随时处于变动状态，总是企图以低廉代价取得更高的地位与更长的掌权时间；他们多半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在这当中，体制薄弱，操作空间宽阔。政治改革与其他渐进的改变形式一旦真的实现，倾向受人格力量推动，而非经由持久的制度变迁来巩固。2003年，在强人总理马哈蒂尔之后继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选择不使用司法力量来处置批评人士。他释放安瓦尔，并允许其率领的反对党继续发展。马来西亚似乎暂时脱离了独裁主义的枷锁。但是，“巫统”逐渐失去民心，政府也在2007年的选举中大输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不久后，阿卜杜拉在2009年被迫下台，此后，当权者便不断利用司法来压制反对党。2015年，安瓦尔被控犯下鸡奸罪且证据确

凿，再度入狱。

像这样政治体制有欠严谨的例子也可见于菲律宾。当地的民选总统任期为六年，往往现任总统促成首波的开创性改变与改革后，寡头政治的现状便展开反扑，停滞期紧接而来，而下一届总统大位的潜在竞争者争相破坏现任总统的政绩，又开启了漫长、缓慢且具破坏性的衰退过渡期。继位者一上任，前任当权者便要面临各式各样的侵吞窃取罪名指控，而被送入监牢。

相较于世界上其他连年经历政治纷乱与人民抗争的地区，东南亚由于体制异常欠缺连贯性，进步的速度敬陪末座。在拉丁美洲，除了少数知名例外，暴力政变与反政变盛行的迷失年代在1980年代告终，留下了持久的稳定民主统治。尼日利亚、加纳甚至卢旺达等西非国家，尽管著名的部落或宗教内战频发，但血腥杀戮已被脆弱却值得尊敬的民主政府所取代。有别于地处偏远且经济自给自足的拉丁美洲，或是对全球供应链不甚重要的西非地区，东南亚的存在举足轻重。这个区域在全球投资与制造产能方面占有可观比重，也横跨贸易与交通往来的重要航线。那么，又是什么使它沦为世界政治发展最落后与终年动荡的地区？

在可说是议会民主高峰时期的1990年代，我住在泰国。当时，羸弱的联合政府成立，经历过屡屡受到控制、架构松散但大致还算公正的选举，塑造出统治者由人民决定的假象。自警察转为电信业大亨的他信在2005年连任后，在议会赢得绝对大多数的支持，组成至今健在的人的记忆里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让许多人认为泰国民主已臻成熟。在大家眼中，他是替多数人发声、承诺低利率贷款与全民健保制度的领袖。对于像泰国这种没有公办保险保障的国家，他信提出民众每次就医花费不到一美元的卫生保健补助政策，实属创举。

他信利用他自创的、名为“他信经济学”（Thaksinomics）的民粹主义品牌，在范围更广的邻里街坊中建立起形象。他信是客家人后裔，是在清迈开设巴士公司的本地政治家之子。他亲和力十足，外表年轻，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令许多同人印象深刻。他在新加坡特别受欢迎，而同为客家人的李光耀也对他极有好感。我在2000年与继任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大位的吴作栋见面时，他谈到了许多事情，还暗指他信可能成为东南亚的新领袖。“我认为，他信会是一位能干的东盟领袖，”他说，“我支持他，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行动主义者。”

正因为他信是冲动的行动主义分子，他并未成为贤明的东南亚新领

袖。保守势力的憎恨逐渐加深，使他倍感威胁。“时事评论家轻蔑地谴责我们的政策，将它称为民粹主义政策。”2003年，他信在马尼拉向一群企业高层如此表示，“我必须坦承，我很困惑。民粹主义政策，顾名思义一定是深受人民欢迎的政策。人们喜欢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可以带来好处。所以如果他们喜欢这个政策，又从中获益，那这项政策哪里错了？”

保守派对于他信的魅力可能使国王光环黯然失色感到不安。2005年，我在他信顺利连任前夕拜访其党部时意识到这件事。我在那里发现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他信弯腰让年长的农妇替他挂上编织花圈。其实，这幅景象是在模仿普密蓬国王著名的照片。当时与我同行的一位泰国记者看到照片后脸色发白，直说大事不妙。之后，他信滥用权力，操纵企业图利家族，他宣称被控逃税是遭人陷害，却屡次在法庭上遭到起诉与定罪。这一切在抗争不断、民主体制遭到扰乱与军事统治强行运作的迷失年代里达到最高点。如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²⁾，他信利用选民的授权为所欲为，在商场上名利双收。早在第一任总理任期内的2002年，他就拒绝听从任何指出施政不当的建议。在例行参加的广播节目上，他抱怨造谣者的行为，还担心出租车司机与顾客的八卦闲聊会影响舆论；也直言不讳地推崇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新加坡李光耀的软性独裁作风。他信将我的两位朋友，也是《远东经济评论》的通讯记者罗德尼·塔斯克（Rodney Tasker）与肖恩·克里斯平（Shawn Crispin）驱逐出境不久后，接受我的访问时表示：“强而有力的领导地位很重要。我知道这对民主有好也有坏，但我需要采取激烈手段，否则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必须强势。”

将近十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信，这次情况与之前颇为不同。在乡野农民组成的红衫军于2010年5月占领曼谷市区不久后，他在位于黑山（Montenegro）的豪华欧洲藏身处休息。数杯冰白酒与几盘开胃菜下肚后，他告诉我，他很难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把过错推给体弱多病的普密蓬国王身边的保守分子。从2010年开始协助泰国社会两大对立势力（一个保守与一成不变，另一个提倡新社会主义、总是引起混乱）开启对话空间与调停纷争以来，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操纵着权力斗争并宣称是在为多数人发声的自私和狭隘利益。

2010年5月，我坐在设于曼谷市区的冷冻海运货柜里，距离我经常与朋友和熟人碰面的五星级饭店餐厅或酒吧的饭店大门只有几步路。这里是临时搭建的会议室，专供率领数万名抗议军政府追随者的红衫军领袖与威胁以武力袭击红衫军阵营的军队进行谈判。这个临时营区外围布

有竹子与橡胶轮胎搭起的屏障，仿佛好莱坞片厂搭建的中世纪战争场景，绵延在一连串的市区十字路口。突然，有人开枪了。一位以前是军官的红衫军领袖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枪击，一名狙击手在他与外国记者谈话时瞄准他的头部开枪。我穿梭在抗争现场，对群众的热情与坚持感到惊讶，他们对接连站上抗议台的演讲者反应非常热烈。这些民众都由有组织且资金充足的抗争机构供应饮食，他信及支持者想必为此花了不少钱。武装分子酝酿叛乱的谣言四起，评论家也口沫横飞地谈论国家内战。

在一名红衫军支持者的协助下（他的父亲之前担任警察，当时帮忙维护他们的安全），我试着帮他们起草停火协议。然而，我们从未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所有与我同桌的领袖都畏惧激进且武断的红衫军头号领袖提达·塞佛恩塞斯（Thida Thavornseth，逃到丛林加入地下共产党的1970年代前学生社运分子）。身为游击队员的她，靠着担任管理武器与手榴弹的干部闯出名号。她气冲冲地闯进货柜会议室，拍桌质问：“你们现在要放弃？那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

几天后，装甲车碾过红衫军的阵线。我入住附近一家旅馆，员工们在窗户外架起大型木板作为防护；尽管如此，焚烧橡胶轮胎的刺鼻气味还是飘了进来。这是泰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模样。当我看到蜷缩在耀眼广告招牌后的抗议群众遭到枪杀，心中所有的乐观期待全消失无踪，从饭店露台上，我看到五光十色的市中心升起阵阵黑烟，突如其来的蛮横暴力让东南亚的购物天堂全变了样。

一直以来，趋势都不是单向发展的。东南亚的多元性也反映在政治进步与倒退的不同步调上，而且往往呈现令人困惑的分歧。正当泰国在21世纪头十年缓慢陷入压迫性的军事统治时，缅甸正蹒跚地脱离其中。经过冗长的审议，新宪法最终保留了军方的特权与权力，并在2010年举行了受严格管控的选举，组成混合的公民政府。其中多数的领导人为军人，他们脱去深绿色制服，换上缅甸男性穿的编织纱笼“笼基”（longyi），用不流利的英语低声说着“逐步”改革的承诺。

昂山素季带领全国民主联盟党抵制不公正的2010年选举，象征着民主反对势力。然而，该党在支持人士劝说下参加了2012年补选，赢得令人信服的胜利。顽强坚决的昂山素季坐镇国会，军队继续实行迟疑不定的“逐步改革”政策。他们将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活化窒碍难行、曾经奉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好吸引迫切需要的外国资本，但也同时谨慎护住军方在政治上的角色。就巩固民主而言，这些只是微小的进展，有时还会

后退几步。政府赋予媒体自由，之后又以新法规抑制自由；一些政治犯获释，只是为了有空间囚禁新来的罪犯。

2015年选举日下午4点投票截止不久后，仰光市区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鸽子成群栖息在旧殖民建筑发霉的屋檐上。在其中一栋为选举委员会开票中心的建筑里，人员庄严沉默地从塑料盒中取出第一批选票，将它们分成一叠又一叠。所有人静默不语，眼睛直盯着棕色小信封。选举人员缓慢而恭敬地打开每张选票，再依序传向一排跟厨房用浅碟不同的塑料浅盘。这个景象在全国上下不断上演，弥漫着一股忧心忡忡的氛围。人们不敢相信能有机会选择统治自己的人。第一批投票结果公布，显然，缅甸选择了彻底的改变。昂山素季反抗军事统治的代表性，让她成为国际间的自由象征，但是，对她的支持并不是当天许多接受我采访的选民投票的主要动力；他们出来投票，是因为想要终结军事统治。我在昂山素季党部外遇到的支持者当中，有些是从海外返国投票的人。直到当天傍晚暂时性的选举结果公布，群众（多数身穿红色T恤或系着红色头带——红色是全国民主联盟党的图腾颜色）才敢放声欢呼。之后，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当竞争激烈的人民选举能够决定领导者的更替时，例如缅甸大选，自由世界欢欣庆祝。身为那场选举的旁观者，我赞叹缅甸民众在选举中的纪律与耐心，因为他们在11月8日当天一早就排队等着投票。即使比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近年我报道的定期选举的泰国，缅甸的这场选举不但顺利，而且出乎意料地开放。尽管2006年在曼谷的记忆，有如那个暴雨下午的乌云般步步逼近，我还是很难不替缅甸的光明未来感到喜悦与乐观。

看到这么多缅甸流亡青年归来、经历数十年的黑暗与孤立生活后开始为国家重建贡献心力，着实鼓舞人心，但军方未显露任何放弃权力的迹象，仍旧令人沮丧。误解有一部分被2015年11月的选举结果消除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原本预期，强权的军队会设法推翻这个结果。即便他们试图指使作风强硬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威胁民众不得加入全国民主联盟党，结果依然一清二楚。受军方支持的政府派系在选举中溃不成军。套用缅甸语的说法，人民的渴望，已经像水晶一样清晰透了。2016年3月，全国民主联盟党执政，昂山素季碍于宪法规定，无法参选总统。她被任命为国务资政与外交部部长，掌握有效的行政权力，因为当我访问几位同党的部会首长，请他们针对2016年中的棘手议题发表意见时，他们全都将昂山素季的决定视为最终依归。同时，军方坚持宪法不

容侵犯，现任缅甸国防军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誓言坚守岗位直到2020年。无论昂山素季的部会首长们怎么说，显而易见，军方依然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缅甸争取自由的壮烈奋斗借由昂山素季英勇、坚忍的作为而鲜明呈现，让东南亚最现代先进的区域长期遭束缚的民主相形失色。新加坡是东南亚公认最进步的经济体：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佳医疗指标，以及全球最高的智能手机密度。然而，这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国家违背了所有关于长期发展的预测，并未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依然严格管控媒体言论与大众异议。2015年李光耀逝世时，少年博主余澎杉（Amos Yee）决定不加入绝大多数同胞的哀悼行列，上网发布羞辱李光耀的影像与评论，结果被控淫秽与骚扰罪，遭判入狱四个星期。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较高的生活与教育水平，意味着经济情况较好的异议人士拥有足够财力离开国家。果然，2016年，余澎杉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更多人干脆选择保持沉默。或许这是因为新加坡不同于马来西亚，其强势的一党专政并未导致经济挥霍与贪腐，也未造成暴力的社会冲突。新加坡藐视所有退化与毁灭的预言，这些推测经常使外国媒体付出极大代价，被控诽谤罪（《远东经济评论》也多次遭提告）。

然而，过去十年来我居住的新加坡也有所改变，程度远比当地自鸣得意的官僚所承认的还要高。随着专业人士与不具专业技能的劳工涌入此地，享受高新低税经济的好处，移民人口也在飙升。近年来多由中国与旅外印度富人所买下的摩天大楼，工地里全是一辆辆往返于拥挤宿舍载运中国或孟加拉国工人的卡车。来自菲律宾或缅甸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英语通常比本地人流利，也更乐于笑脸迎人，如今在当地的手机服务中心里，新加坡的社会新人已被他们取代。

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带有政治意味。2011年，从未失势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仅赢得60%的选票，是他们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最差的表现。势力薄弱且组织不佳的反对党赢得六个国会席次，是独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新加坡媒体专家与学者切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³⁾如此评论这次选举：“数十年的去政治化——期间技术官僚施政取代了正常政治，似乎已屈服于明显具争议性的文化。”为何会如此？原因在于移民。新加坡人民开始抗拒工作竞争、基本物价上涨与社会服务供不应求的压力。这算是民主带来的压力，却不见任何革命。五年后，人民行动党重新找回大部分失落的选票，证明他们聆听了选民的心声。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015年初以91岁高龄辞世，但局势并不如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变得动荡与混乱。不过，紧张迹象至今依然存在：沉默的大众越来越担心存款如大胆无畏的博主所说被“gahmen”（新加坡英语，意指政府）拿去投资；因外来移民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初期征兆，导致巴士司机短暂罢工；数量可观的移民劳动人口出现波动，如2013年新加坡小印度区在某个夜晚发生的暴动所呈现的那样。如同所有成功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发展优异，但就一个资源如此丰富、教育投资如此惊人的国家而言，它缺乏灵魂。这种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除非它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而开放言论自由也代表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2016年，数名孟加拉国移民劳工疑似参与宗教激进主义活动，而遭拘禁与驱逐出境。

我在1979年第一次造访新加坡，对于前一年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翻拍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小说《圣杰克》（*Saint Jack*）的经典电影中，背景里的破旧灰泥店屋与小贩船仍然印象深刻。由于当时新加坡仍有发禁，我记得自己当时似在担心头发太长、不合乎当地规范。樟宜机场尚未启用。新开张的华侨银行（OCBC）大楼在当时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在我眼中有如巨型的电动刮胡刀。过了十几年，随着经济日益繁荣，我迁居吉隆坡，那儿看起来比新加坡更有活力，而且饶富国际性。今日，电动刮胡刀大楼的光芒，对比林立的钢铁与玻璃大厦而相形失色。外来移民改变了这座城市，而相较于当代的吉隆坡，新加坡如其总理李显龙2015年在五十周年国庆演说中所恰当强调的，正设法成为一个真正种族多元的社会。我赞同他的言论，但我坚信，新加坡若是去除对言论自由与媒体的控制，必能不仅于此。亚洲需要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自由城市，现在更是如此。

对那些乐观主张东南亚民主效益的人而言，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发展，乍看之下似乎足以信服。然而，这段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尽管还未结束，仍旧凸显东南亚长期而普遍的文化与社会特色，在促成有效人民主权的道路上形成了哪些阻碍。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点燃了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使印度尼西亚在下一年得以摆脱独裁统治的枷锁。自那时起，印度尼西亚便一直努力维持在民主的轨道上。从2004年起，每逢总统大选期间，我都会走访当地人口最多的爪哇岛；我见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自由选举领袖，以及与缅甸一样为了期盼的改变而投票的决心。2014年总统大选时，民意倾向佐科·维多多，这位身材如芦苇般瘦小、商人出身的市长，不但未遵循精

英主导的瞻循传统，也没有任意指派职位，反而不时突袭政府部门，确保官员尽忠职守。在爪哇中部梭罗市的主要市场（维多多当市长闻名的地方），我遇到一些商人，他们在维多多来此巡视枯萎恶臭的果菜田、驻足视察物价或卫生水平的几次巡访中，与他建立起私交。他们说，这是政府应该具备的要素；有了这些人的选票，佐科·维多多将会建立廉洁担责的政府，并让这种操守风行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改变。

虽然如此，我不断发现，同样是这些人，对于良好民主政体的某些基本元素（譬如国会议员的身份）丝毫不感兴趣。在这些人心目中，人民主权只有在每五年选举总统时才用得到。我在2004、2009及2014年大选期间遇到的民众，没有一个人在乎本地议员是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客全是经内部遴选、再根据财力与瞻徇制造出的官员，一旦这些政客到了雅加达坐进国会，就会开始交易手中握有的投票权。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历了一段漫长崎岖的路程；这个新兴国家建立在现代自由与民主的原则之上，却花了半个多世纪才了解自己的根基所在。虽然自1998年推翻苏哈托总统的独裁政府以来，民主之路已没有任何退路，但许多印度尼西亚平民都怀疑这段路程能否带来帮助。他们看到政党由前民主时代的人物所主导：这些人物的政见缺乏有意义的政策；国会不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法规；行政院与内阁极度缺乏决断力，以致忽视了对宪法的义务。尽管如此，大家对民主的热情毋庸置疑。

沿着爪哇岛北岸穿行的，是与赤道平行的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道路之一。荷兰殖民者于19世纪修筑大驿路，以便在旧殖民首都巴达维亚与东部港口城市泗水（Surabaya）之间运送邮件及其他货物。如之前所述，大驿路兴建期间，数万名工人丧生，其中许多死于疾病与虐待。两百年后，大驿路依然是横跨这座有着一亿人口的拥挤岛屿的主要交通路径。这条路的双车道上满是车身不稳、危险行驶的货车与巴士，连接着爪哇前殖民苏丹领地的各个首府，以及15世纪著名的统称为“九圣徒”的早期穆斯林墓园。

2014年6月的第一周，我在总统大选造势活动初期沿着大驿路走了四天，与挚友也是前同事约翰·麦克贝斯一起在选战激烈的爪哇中部及东部地区采访当地居民。我们从南岸的日惹启程，途经梭罗与普沃达迪（Purwodadi）一路往北，最后抵达印度尼西亚最古老清真寺所在的淡目（Demak）。之前在2004与2009年总统直选期间，我们也走过同样的旅程，虽然路线略微不同。我们遇到了农民、工厂工人和渔民。之前

的行程中，人们告诉我们总统选举有多么重要。这次，我们察觉到，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但投票，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征兆。

小镇拉森（Lasem）距离旧港口南望（Rembang）数公里，至今，当地人仍以本地柚木手工建造五十多米长的坚固渔船。在那里，一群义工在桥上拉起长长的白布条，看起来像是新颖先进的政治宣传手法。他们全是佐科·维多多的支持者。佐科当了两任梭罗市长，2012年又当选雅加达首长，人气逐渐攀升，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短短两年内，他从首府的首长成为许多人看好当选下一届印度尼西亚总统的人物。那些人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场大选斗得难解难分，而群众社会运动使一切有了改变。

悬挂白布条，为的是让支持佐科的当地人可以在上面署名。一位党代表告诉我：“他们都是义工，没人拿钱做事。”在有组织的活动大多是受某种形式的赞助推动的国家中，他亟欲消除这种疑虑。他还说：“而且，很多义工还捐钱帮佐科·维多多造势。”

虽然这种支持行为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中不足为奇，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却显示出自苏哈托总统军事独裁政权垮台起进入民主过渡期的15年后，选民行为出现重大改变。往年，各政党一直试图通过营销手段拉拢民众赞助，就连穷人也资助佐科竞选，不过金额往往只有一二美元，而且大多通过当地银行汇款。来自日惹的导游汉多科（Handoko）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司机，他骄傲地宣称自己通过当地银行转账捐了75000印度尼西亚盾，是他每月可用收入的10%。据媒体报道，高达3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皆通过这种方式募得。拉森当地民众表示，现金捐款会在本地记者的见证下转交给佐科的竞选活动人员。

政治学家主张，唯有在民众参与的情况下，民主才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政治更像是精英的权力游戏与买票活动。传统上，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选票都会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因此对参与选举过程不抱太多期望。尽管佐科·维多多备受人民爱戴，但我找到了买票的证据：我们在小型港口路坤（Lukung）遇到的一群渔民坚持至少要拿到5万印度尼西亚盾，才会在选举当天去投票（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一天损失的收入）。印度尼西亚人民得到直接选举总统的机会时，事情开始有了转变。在2004年与2009年，我遇到拒绝拉票或买票的印度尼西亚选民。他们认真看待自己的责任。这次的差别在于，选民热切期盼其中一位候选人当选，在投票前积极参与并展现支持。

我与麦克贝斯在大选前一个月走访爪哇岛时，佐科·维多多的民调领

先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普拉博沃十个百分点。不过，竞选前夕，佐科的领先幅度逐渐缩小。他与竞选搭档尤素夫·卡拉（曾任丰田汽车业务员，2004年至2009年为当时总统苏希诺的副手），表现出设身处地为民服务的形象；同时，普拉博沃与搭档哈达·拉亚萨（Hatta Rajasa，前总统苏希洛的另一位副手），则将自己塑造成能力强、富有远见的领袖。拉森的选民，以及我们在大驿路沿途停靠的几乎每一站的当地民众，眼睛是雪亮的：佐科威（人们通常如此称呼佐科）关心人民的利益；普拉博沃则代表奉行“我们说了算”的由上而下治理原则的旧时代精英分子。

基于这个原因，佐科的政见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在途经的另一个城镇古突士（Kudus），我们遇到一群男人围坐在市场边的一角观看斗鸡。在附近的针记（Djarum）烟草工厂（镇上的主要雇主）担任警卫的努鲁，看着瘦巴巴的鸟互相攻击，斗得羽毛四散，爪子血肉模糊。“我们只在乎佐科威是我们的一分子。他廉洁正直，而且不贪污。”他一边说着，一边抽着Kretek甜丁香烟，直盯着斗鸡看。讽刺的是，这群着迷于好战斗鸡的男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推崇普拉博沃投射的男子汉形象。普拉博沃的支持者虽然声量较弱，而且经常羞于表达，但他们全都赞扬这位前将军强势果断的性格与担任总司令的作战经验。在往拉蒙岸（Lamongan，因为2002年巴厘岛夜店爆炸案的嫌犯出身于此而蒙上阴影）的路上、位于萨朗（Sarang）的一座小型造船厂里，我们在柚木和铁木堆里见到了造船工人穆斯里（Musli），这些木料是用来搭造可供往返周围水域的坚固宽舷渔船。他告诉我们，他会投给普拉博沃，“因为他出身军人，做事坚定又果决”。另外还说，佐科威或许廉洁诚实，但他只是个“凡人”。即便是与佐科威同乡的支持者，也承认普拉博沃的长处。“他绝对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拥有从政经验。”梭罗市区克勒韦尔市场（Klewer Market）的小吃摊贩卡尔诺（Karno）说。

这使得1.8亿名印度尼西亚选民在2014年7月左右为难。佐科威讨人喜欢、谦虚又诚实，但普拉博沃看起来更像个领袖。一位来自拉蒙岸、面容沧桑的稻农坚称：“印度尼西亚没有拥有一位公民领袖的本钱。”印度尼西亚国内外的自由派评论家担心，所谓的军队统治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多么受选民欢迎，并指责影射爪哇籍穆斯林的佐科威是华人基督徒的抹黑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采访的大多数选民期望并不高，他们虽然热情捐款赞助，对这场选举却意外地冷漠。这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比起十年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政治变迁抱持更多的安全感与更少的忧虑。但是，这也凸显出长久以来的现实，国家政治无论带给首都雅加达

人民多少希望，抢占多少媒体版面，对普通百姓而言依然无关紧要。那么，从佐科威竞选活动中人民的社会运动与投入里，能悟出什么道理呢？旅程最后，我们到了东部的工业城市泗水，在支持佐科威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党部外，遇到了激进党员胡尔约诺（Huljono），他一头灰发，戴着有污渍的贝雷帽。他指着街角印有普拉博沃与竞选搭档哈达·拉亚萨照片的大型广告牌：“两天前还没有那个东西。那里之前摆着佐科威的广告牌。这就是金钱政治的力量。”

在精英阶层之中与爪哇乡间，选举活动的关键是佐科威代表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新面貌：廉洁、透明与诚实，为民服务。贪污无疑是选举的试金石。佐科威激发了印度尼西亚下层社会少见的信任与期望。很多人担心，为了建立足以支撑现状的强大基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旧时局势、官僚与政治机制的牵制，以及种族和宗教间的原始紧密联系，可能会再度盛行。遗憾地，佐科威目前为止的施政表现似乎证明了这样的恐惧是合理的。到了2016年初，佐科威被迫有效废除让许多官员与政治家人狱的国家反贪腐委员会，以交换急需开放更多外资的经济改革。同年稍晚，他重新指派内阁成员，许多技术官僚被资助过他竞选的政治盟友所取代。佐科威的助手与拥护者辩驳，这纯粹是基于半根植于旧时贍循文化体制中的政治强权现实；他们坚称，总统在打一场需要短期交易的转型持久战。

这号人物被忽视的特质之一，或许是天生的保守倾向；他在社会强烈倾向军队的时期成年，当时军队的地方司令官被视为稳定的守护者，也是有益的商业伙伴。有了军方的支持，佐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商人才不会被商业规范压得喘不过气。这么一想，他身边围绕着明确支持守旧理念的前任军官，该令人感到惊讶吗？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Gatot Nurmantyo）于2013年宣称，民主政体可能不是最适合印度尼西亚的制度，令许多人吃惊。他说：“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因此，原本以为佐科威是新改革浪潮领袖的人们恍然大悟。“那些认为佐科威是真心倾向改革，努力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总统的看法，再也站不住脚。”澳大利亚观察家汤姆·鲍尔（Tom Power）表示：“虽然他指派的官员阵容不一定反映政党忠诚度，但他们就像历届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任的内阁一样特殊且政治化。”

尽管如此，佐科威打了一张王牌。他不熟悉雅加达社会，在这个2012年他当选首长的地方，他举目无亲，甚至连家都没有，却凭着当年任梭罗市长时赢得民心的憨笑，顺利登上总统大位。人民高度期待佐科

威会打破传统，永远打破精英对利益的垄断。这样的寄望大错特错：形象良好的新任总统很快就受到控制。他一上任，军方的保守势力及之前高举旗帜帮助他竞选的民族主义政党便掌握了政府。因此，他承诺的一些大胆政见，如原本有意开放外国媒体视察位处偏远的巴布亚省，最终只能收回。而执政团队中权力最大的成员——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卢胡特·潘佳坦（Luhut Panjaitan）⁽⁴⁾，在朋友佐科威当选不到一年便于新加坡发表公开演说，直言军方在稳定印度尼西亚政局上依然扮演关键角色。1990年代从军中退休的他嘲讽地说：“我不习惯穿西装和打领带。”

军方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扩大自己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影响力，主张在当下的后改革时代介入国土安全的国家警察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曾在苏哈托手下做事的前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反驳，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说是“武装的分离主义团体、激进人士与恐怖分子、自然资源窃贼、毒虫、人口贩子与跨国罪犯”。到了2016年年中，威兰多受命为新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自内心担忧社会与经济动荡会影响国家安全。面对造成分裂与贪腐的公民政客，以及担保实行多元主义、履行政府承诺的强大军事领袖之间的抉择，印度尼西亚人并不反对政治强权，只要它穿着民主政体外衣，而且不是盗贼当政就好。

民主进程看似较为稳定，也因此较为成熟的菲律宾，其政治系统最接近美国（菲律宾受其殖民直到1930年代）。然而，当菲律宾的两院制议会、总统职务的体制包装以及下至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言论，全都指向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表面的迹象引人误解。因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仰赖有效巩固精英利益与他们对政党政治中权力的紧密把持。

控制菲律宾政治的各个家族会在选举时互相为敌，但他们在维护财富与特权的核心问题上并无太大差别。菲律宾国会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170个政治家族，其国内近亿人口自1986年起便享有开放民主选举的投票权。2001年当选的阿罗约总统的父亲也曾当过总统；在她之后，阿基诺三世继任总统，其母亲为已故总统科拉松。他的父亲阿基诺二世是参议员，1985年在马尼拉机场遭到暗杀，引发了导致马科斯总统下台的人民抗议运动。尽管马科斯的统治令人痛苦，但高调炫富、花费无度，并以收藏3000双高跟鞋出名的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仍厚颜寻求连任议员，目前是家族所在地北伊罗戈省的众议院议员。他的儿子小马科斯（小名“邦邦”）获选为参议员，在2016年差点成为副总统；女儿艾梅·马科斯（Imee Marcos）现为北伊罗戈省省长，掌管家族本营的胁腹。

菲律宾政治文化始终不变的本质，可追溯至深受天主教修士封建制度压迫的原住民部落结构，在长达五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天主教修士是菲律宾社会的主要影响力。为了凸显西班牙统治的不公不义，知名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在19世纪晚期写下著名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这本书带动了独立运动，也使得黎刹在1896年被处死。可悲的是，现在阅读这本小说，还会令人不禁纳闷菲律宾社会至今有何改变。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修士的压迫，已为现代庄园地主与政治氏族所取代。如同过去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富者益富，贫者恒贫。“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寡头政治，某些少数人，有钱收买任何当权成功的人。我们正处于封建的国家。”前达沃市（Davao）⁽⁵⁾市长杜特尔特从众多当权人士中脱颖而出，于2016年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时，如此抨击他要对付的体制。

尽管有民主体制作为掩饰，当代菲律宾极其引人注目的，是少数精英与多数大众之间显著的贫富差距。举个例子，自2010年起，菲律宾十大首富的财产，从2010年的140亿美元，到2015年约450亿美元，成长了3倍。当时，12位菲律宾亿万富翁跻身《财富》（*Forbes*）年度全球富豪榜，当中以Shoemart零售帝国老板施至成（Henry Sy）表现最为突出，从2014年第97名，攀升至2015年的73名。同一时期，民众真正领到的平均日薪增加不到1美元。所有产业的平均基本日薪涨幅也只有8.8%。2012年，菲律宾25位首富的财产净值相当于国内7000万贫穷族群的收入总和。这么看来，无怪乎菲律宾是世界上少数仅存的共产暴动（一年残害数百人的暴力冲突）大本营。有趣的是，杜特尔特上任后推行的其中一个政策，是赦免共产主义囚犯，并且延揽数名共产分子加入政府。

在根除贪腐与确保公平竞争的企图下，东南亚的民主发展承诺带来平等与透明度。然而，试图颠覆或推翻民主成果的权力斗争，反倒在东南亚领土较大的内陆国家引发冲突并使官僚系统瘫痪；在民主体制运作较顺利的岛屿国家则导致社会紧张与周期性动荡。尽管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极受人民爱戴，上任的头两年仍被自己竭力钳制的保守派利益所牵绊。这重挫了使他当选的打击贪腐、提升经济等政见，迫使他通融不合时宜的利益。这样的困境在2016年11月展露无遗，当时，组织紊乱的伊斯兰强硬势力占领雅加达市区，要求佐科威的亲信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华裔基督徒，首都特区首长）下台并受死。这位人称“阿学”（Ahok）的首长，被控亵渎伊斯兰教。佐科威并未与暴民正面冲突，而是采取避免严重暴力的兼容低调做法，却让钟万学处境更加艰

难，或许也同时帮助了其他非穆斯林占得政府要职。佐科威巧妙地两面讨好——准许保守势力的利益、包容宗教与种族压力及应付精英分子的顾虑，得以维持稳定的局面与投资者的信心。虽然当时没人预料到佐科威或世界第四大国家的例行领袖直选制度濒临被推翻的危机，大众却越来越担忧，失控的种族与宗教势力会扭曲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我将在后续章节探讨这个主题。

随着民主选举开始重新排列权力中心的配置与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动态，这种紧张的局势看上去将逐渐成为往后十多年的常态。过去五年来，在曼谷、吉隆坡与金边经常出现暴力抗争的群众事件，警示了那些将票匭视为民主基底的人们。这些在首都示威的抗议民众，要求民主选举的赢家放弃权力，就泰国而言，还得将主权交给非民选的人民议会。尽管出现群众的积极行动与政治参与等令人鼓舞的征兆，东南亚的民主体制正面临严峻挑战：人民主权越来越受关注，一般选民开始能决定统治者，而传统的权力合纵与社会阶级（既有的派系与圈子）将会瓦解；面对不可预料、威胁着自身利益的投票结果，保守势力正抵抗着选举变迁，且挑战民主进程的法律基础，而手段通常是牵制群众抗争与暴力要挟，如同泰国与更近期的印度尼西亚。既有体制赢得胜利时，反对派大呼不公，再次利用暴民的力量试图推翻结果。因此，该区域为了让民主表述成为政府根基而长期奋斗后，选举过程逐渐转变成暴力与冲突的引爆点。真正的民主政体依然是幻影。

2014年5月某个周五晚上，在人口800万的曼谷，狗吠声清晰可辨。通常，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尤其是在星期五的夜晚。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人们在派对上饮酒作乐，夜店里乐团演奏着刺耳的音乐，种种嘈杂声划破了闷热的空气。但是，因为军方才刚在十年内第二次夺得权力，于是全面实施宵禁。这种时候，记者会在报道里写着：“不安定的平静到来。”就泰国而言，这个陈腔滥调会造成误解。原因是，这次不同于2006年的政变，我没有看见任何士兵，也没听到有人因不见武力而嘲讽地表达失望。这起政变出动了了好几辆卡车的士兵，他们围绕在一家陆军俱乐部门外，门里面，所有政治领袖受邀进行会谈，讨论该如何突破僵局。这个局势绝对不平静，因为在悄然、强抑的静默之下，潜藏着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忧心，也看不到身穿笔挺绿色制服的新任执政者达成一致计划的可能。

经过六个月的抗争与停顿，泰国回到将近十年前的状态。当然，军方干政终止了致使数十人死亡与七百多人受伤的小规模夜间冲突，许多

泰国人当然也勉为其难地心存感激。电视与广播里也听不到冲突双方在抗争台上夸张与羞辱的言辞，因为所有独立电台与电视节目都被勒令停播。出租车司机跟着电台播放的爱国歌曲哼唱。他上一次听到这个旋律是小时候。他说：“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政治归政治，我们老百姓才是投票决定总理的人。”

此刻，这样的可能性似乎非常遥远。人们得知，军方介入为的是重新恢复和谐与“帮人民找回幸福”，也听说遭到监禁的囚犯感到“开心与感激”；军方以宜人的极权措辞表示他们“正在调整态度”。全世界发出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民主体制，但大多数的泰国人却意外地不为外界的影响与压力所动。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眼前这种情况能够帮助国家维持数世纪的独立。或许事实真是如此。不过，今日的世界并未展现对主权的可见威胁，却提供繁荣的机会。泰国经济有近一成的比例建立在每年涌入当地佛寺与海滩的3000万名外国观光客之上。那么，又何必背离这一切呢？阿尔巴尼亚（Albania）在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统治下了无生趣。谁会在索马里内战的几十年后，还造访摩加迪沙

（Mogadishu）^⑥的海滩？这是泰国选择的道路吗？答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然而，这个国家在之后陷入僵局，因为社会、经济与某种程度牵涉文化的分歧而停滞不前，如此的分歧使得盛行老挝语的北部和东北部区域与中央发生争执，同时，以马来语为主的最南部依旧陷于争取自治权的暴力抗争。负责指挥的军官们，除了借由荒谬的民族主义行动来抑制这个两极化的国家与打压异议之外，并没有实质计划。

照理说，这个残局可以通过对话与调解技巧和平解决。但根据我的朋友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的观察，泰国政治同时也是突发事件的无助囚犯。在泰国，政府与政治运作的方式有种随兴的倾向。泰国人倾向以权衡影响力与职责高低的方式来控制个人，而不是建立共同的咨议机制或委员会来解决问题。这种现象有碍于制定具连贯性的解决策略，留下广大的模糊空间。因此，我又重回了2006年遭遇的场景：又一起政变，再一个不合时宜的倒退步伐。军方强势镇压政治与群众抗议。政治人物不得聚会或碰面，他们的资金也遭冻结。政变第二天，一小群学生聚集在曼谷市中心，拉起布条痛斥政变。他们与士兵扭打成团，一两名学生被逮捕。同样的事情在政变满一年时再度发生。我想起印度尼西亚朋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对祖国从苏哈托时代以来政治瘫痪的形容：达利画中融化的时钟。两年后，我写作本书时，军方势力显然已全面掌权，并且做好长期执政的准备。这个时期，位于军方镇压前线的要员包含差徒龙猜（Chaturon Chaisaeng），他是泰国最懂得变通的官员之一。

心力交瘁、精疲力尽的差徒龙瘫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装了薄荷茶的马克杯。“我们失败了，”他告诉我，“现在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十年都会是军方统治。”当时是2016年8月7日公投的数周后，多数泰国人都投票赞成只有很少数人读过、替非民选国家领袖地位铺路的保守宪法，而我正与前教育部部长兼为泰党副党魁他信谈话。“人民想要安全感；他们似乎很幸福，”他语带嘲讽地表示，“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显然不知道自己的人民在想什么。”对于1970年代中期的政治战将与左翼政治学运老手差徒龙而言，这是苦涩的领悟。难道人民想要的其实不是民主？

现实是，这些社会中，许多人渴望的是安全感。人民当然想自己选择政体与统治者，但就如今日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发达程度较高的区域所见，一旦生活受到威胁，民主便成为次要考虑。接下来，我将检视阻碍政治进展的安全问题的一些潜在因素，并解释为何东南亚地区许多民众的心中还会有其他优先考虑。这种长期不安定的情况主要有利于当权者。东南亚地区的退化政府可以仰赖阶级、种族与宗教分裂的社会。濒临极限的冲突，使当局得以理直气壮地实施戒严，操纵粗野的民族主义与侵略主义以牵制国际社会。马来西亚政府告诉忧心权力滥用的人民，在丑闻背后，西方正策谋暗中破坏马来穆斯林的优越地位；泰国政府告诉设法抵抗军事统治的人民，外来者居心叵测。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言，真正的答案是掌握先机，提倡人民运动，联合弱势而思想先进的公民社会团体与知识开化的政治行动者。希望是存在的，但是代价高昂，因为那些掌握硬实力的人物不会轻易放手。

- (1) 硬实力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提出。根据他的说法，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利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
- (2) 曾数度出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传媒大亨和银行家，因为多种罪名（泄密、召妓、逃税）与不良行为（裸照、性爱派对）倍受争议，曾被起诉与取消参议员资格。
- (3) 因为批评新加坡政府而未获其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续聘，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传理学院新闻系。
- (4) 曾任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部长，现任海洋统筹部部长。
- (5) 又译“纳卯”，菲律宾民答那峨岛达沃区首府，是岛上主要的港口和贸易城市。
- (6) 索马里第一大城市。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不要觉得我偷了人民的财产，我是人民的总理。

——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低劣的政治与不良的治理阻碍了东南亚的发展，但在背后像个可靠的内燃机一样驱动着这一切的，是受贿与贪污的恶性文化。东南亚国家经常高居全球评比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排行榜。根据监察反贪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的统计，2015年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柬埔寨在168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泰国位居第76位，印度尼西亚第88位，越南则居第112位。新加坡排名第8位，而奇怪的是，马来西亚虽处境艰困，排名竟然高居五十多位。在一个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与投资中心的区域，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令人担忧。

1990年代，人们自我安慰地期待，社会发展与投资日益增长，保护利益的责任感也将随之增加。东南亚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近百亿国内生产总值后，人们对于廉洁抱持更高的期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提供400亿美元的纾困金以稳定亚洲货币，当时，有一张照片捕捉到令人难忘的景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像个殖民官员般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签署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协议。但是，正如经济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尽管金融危机使储备金的管理获得改善，避险基金经理人与拥有秘密账户的富有精英之间的冲突仍旧存在。金融危机后的那几年，无论到东南亚哪里，我都未能看到社会真正学到教训的一丝迹象：资金肆意流动且大多未经审查，有钱人因而变得更加富裕。

贪婪的腐败不仅威胁着商业环境与社会稳定，也危害区域安全。牵涉政府及国家领袖的贪腐丑闻不仅使相关人士面临国际诉讼，扰乱了有助于平衡中国与美国等强大势力之争的双边关系，最终甚至引起亚洲战略优势之争。此外，贪腐也妨碍了政治改革，诱使腐败的高层领袖维持高压措施以保卫自身权力。贪腐不只是棘手的问题；它也正在削弱东南亚的发展。

现代东南亚处于贪腐荼毒着社会各阶层的世界。享有盛名的《远东经济评论》在1970年代中期报道，“茶水费”（台面下购买商品与服务费用）是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惜的是，随着时光流逝，改革推行了数十年，某些国家打造了更透明、更具代表性的政府，现代媒体科技也有先进的突破，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进展，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明显。除了过去三十年来的多起惊人丑闻外，小额贪污与日常寻租行为继续折磨着平民百姓。

任何在马来西亚或泰国因为超速而被拦下，在印度尼西亚申请过驾照或建筑许可，或是生活在菲律宾的人，都知道就连基本的执法与公共部门服务也包含了贿赂：奉交不经解释的现金。这些事情虽有例行程序，但从未有人遵循正规途径处理。一名雅加达的警察曾经拦下我，坚称我超速。他说我可以选择到警局缴纳罚款，并滔滔不绝地详述这样会花多少时间、要填多少表格等等。接着，他又提供另一个选择：付给他一笔低于罚单金额的罚款。他收下贿赂之后，甚至还开了一张收据！我在马来西亚与泰国也有过类似经验。贪腐根源于体制的薄弱：警察为了钱可以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监察机关收受贿赂后，对违法情事睁只眼闭只眼；行政官员与政府人员要收到额外献金才愿意行使义务。然而，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除外）政府资金短缺的程度，这种现象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从印度尼西亚说起，当地低阶公务员平均月薪约300美元，视情况会有额外的差旅津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2004年取得总统办公室的工作，超过一年没领到薪水，部分薪资甚至还以一袋米的形式抵付。相比之下，私企的初级秘书也许能领到比我的好友高一倍的薪水。印度尼西亚军队共有40万人，他们领取的80亿美元预算只够支付半数实际开销。印度尼西亚的国防支出（为东南亚最低的国家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但原因是许多开销均由预算外的企业所负担。中央允许地方指挥官“搜索粮草”以支付自己的运作成本。因此，印度尼西亚民众对官员贪污已见怪不怪。少数不贪污的廉洁官员会迅速成为英雄，而且通常会在民选中胜出，例如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以及继其之后出任雅加达首长、人称“阿学”的钟万学。

在泰国，反贪腐既是口号，也是现实。2015年，泰国的肃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贪污博物馆，里面展示了著名贪污丑闻的官员雕像与事件情景。每届新任政府，无论由军方或平民领导，都郑重承诺会根除贪污。2016年，政府甚至有意将贪污定为死罪。为了强调贪污的严重性，或者

是因为在泰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字词，政治人士发明了专有词汇“caw-rapshan”——这其实是英文“corruption”的拙劣模仿。然而，泰国公仆领的薪水比印度尼西亚公务员高，而其官僚拥有谨慎与诚实的传统，这种传统根植于21世纪到来之际在皇室监督下所推行的第一次现代改革。我曾多次接触泰国官员，他们以公平、诚实且带有道德理想的态度执行公务。一天，我因为护照里少了适当的戳章，被困在泰国与老挝之间的边哨站。困窘又担心的我，用含糊不清的泰语请他们加快处理速度，但心情愉悦的移民官员充耳不闻：他坐在老旧的旋转椅上，椅子上方挂着随处可见的国王与王后画像，他盖着一个个官方印章，翻阅一页页公文，精湛地表现出坚持依照程序解决问题的态度。佛教教义（就其限制泰国背景下的个人行为而言）将贪婪视为造成压力与罪业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如何，贪污都必须在隐匿与暗中进行。然而，现代的泰国佛教团体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涉嫌贪污。2013年，有段视频揭露，一位备受尊崇的僧侣手拿LV包，慵懒地坐在私人飞机的座椅上。警方以欺诈与洗钱的罪名指控他，并对他展开追捕，但他最后逃往美国。

支持贪腐的文化驱动力（尤其是赠徇制占优势）至今尚未被取代。赠徇体制下，资历（*run phi*）较长的人利用金钱确保他们的下属（*luk nong*）得到照顾，因此在某些方面得以维持下属的忠诚。赠徇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泰国，有人若想进入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金额庞大的预付款，但是没关系，他们往后可以通过非法收入收回这些钱。

在范围更广的区域中，比较现代的国家已设法控制贪腐态势。例如，新加坡很早便成立了有力的相关独立组织，就算无法根除，至少也能应对贪污——之前（至今依然）盛行于华人宗亲会或三合会（*Triads*）的地下活动。在新加坡，高得惊人的公务员薪资被视为防止贪污的合理做法：总理月薪170万美元，高于其他各国领袖。但是，新加坡的人口不到500万人，税基也偏高。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税基小到几乎无法识别。印度尼西亚人口2.5亿，申报纳税的人数只有3000万。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借由免税措施，鼓励人民将估计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多存在新加坡的银行里）带回国内。既然如此，为何东南亚其他国家即使清楚泛滥的贪污现象会抑制政经发展、导致冲突，仍然深受其苦？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根深蒂固的精英生存机制，也就是贿赂（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准）的驱使。有钱贿赂的人能确保自己获得服务或资源。

假如没有贿赂与贪腐，便能促成社会平衡，而这个现象将损害与侵蚀现有的阶级制度，并意味着需要与更多人共享稀缺的资源。此外，为了获得服务而支付额外费用，可以确保规则有利于付费者。因此，受贿的缓冲支持着精英的自私行为。如此一来，如泰国专栏作家空·李狄（Kong Rithdee）^①所巧妙叙述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顶尖学校而行贿；有钱人为了避税而在账务上动手脚；政府官员为了让妻小分派到最好的工作而买通高层。“这个体制让官员得以收取回扣并且对我们进行洗脑，让我们相信如果找对了人，就能解决任何事情。”我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人们都觉得我是疯了才会想自己申请签证或工作许可，而不找“能人”——这个人知道要找谁协商，以及为了取得所需服务必须私下付多少钱。在东南亚多数区域里，人们不缴所得税，而是用少许金钱贿赂。这种机制有点类似课税：你越有钱，就得拿越多的钱来贿赂。

贪污除了可帮助精英维持优渥的财富，对有意控制精英的人士而言，也是实用的政治工具。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等独裁主义领袖，通过大规模的贪污推动有助于自己掌权三十年的赠徇制度。在位者借由核发商业执照或垄断商品的进出口，来获得并保有下位者的忠诚。这种行为萌生自1950年代荷属资产的国有化（大多分配给军队成员与政治精英），而印度尼西亚最初的固有财产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苏哈托有别于其他国家领袖，大幅缩减经济基础。他三名最年长的孩子握有利润最丰厚的垄断事业，控制塑料与石油化学制品等工业基本必要资源的进口。外国投资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开放制造业时，苏哈托家族干脆调整方式并取得控股权，因此不再需要曾经拥有的进口垄断权（无论上游或下游）。等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国际透明组织宣布，苏哈托是现代史上最腐败的领袖，他在位32年间，据估侵吞了高达300亿美元的公款。

在印度尼西亚，普遍的贪腐现象成了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强大阻力。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期中，主要的障碍是公权力与司法（在现代民主体制中适当守护法律与秩序）的改革。在人民看来，这两项制度都未能胜任其现代角色。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公司调查，2010年，印度尼西亚只有40%的都市民众对司法有信心。同一份调查也指出，90%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政府内部的贪污无所不在。肃贪委员会于2002年成立，拥有调查甚至逮捕嫌犯的强大权力，民意的潮流开始转向。在开始运作的头几年，肃贪委员会达到惊人的100%定罪率。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监狱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势官员，当中包含多位盗用公款的部会首长。雅加达破旧不堪的西皮南监狱（Cipinang）从前关着面容枯槁的政治异议与反对人士，如今全是脑满肠肥、每天都有家仆或亲人送餐点来

的精英成员。即便是在当时，刑罚的轻重程度也受到贪腐情势左右：一些资源较多的囚犯可在周末到购物中心逛街与回家休息，等到星期一再回监狱。

肃贪委员会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不靠恶名昭彰的贪腐警察即可调查嫌犯。这个委员会的成效实在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当中的官员抱怨政府与警方不够配合；而踊跃检举不法的民众带来超过1.6万起待查案件。到了2009年，委员会开始调查某位资深警官，与警方陷入苦战。一名高级警官形容，肃贪委员是“尝试与鳄鱼对抗的壁虎”。近年，这个广受欢迎且成效可彰的委员会因为政治交易而遭到阉割。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的第一年，行政机构认为有必要考虑逐步废除肃贪委员会，好让自己有足够运作的政治空间。

贿赂通常是在东南亚经商的固定成本。在国营领域中，这意味着抬高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以弥补低廉的薪资。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就私有领域而言，贿赂经常是隔绝政府督查与干涉或是避税的成本。外界普遍认为，支配东南亚贸易领域的华人最容易贪污。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公正。这项指控源自华侨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事实，身为外来族群的他们，仰赖政府官员通融以获取通商必要的执照与许可。这样的依赖转而使他们私下进行贿赂，以确保能顺利取得必要的许可，而这种行为通常是受到意图趁机剥削华人以赚取额外收入的官员所指示。

大众普遍默认，贿赂以加速服务与商品递送的行为，促进了东南亚的经济，使得商业活动更有效率，而且通常能省去官僚体制的繁杂手续。因此，企业界充斥着回扣与贿赂的勾当，情况严重到这几乎已成了家常便饭。关于商业逐渐与政治密不可分、为现代企业和政治高层的大规模勾结与贪污打下基础的现象，马来西亚是个突出的例子。

马来西亚在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承续了西敏寺建筑风格的议会、采用英国普通法系（British Common Law）的法院，还有在为数众多的马来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华人和印度人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局限族群与宗教自由的宪法。独立最初的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在法治之下，向平等与繁荣踏出了令人赞赏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旨在针对贫困的马来族群重新分配财富的政策，消除了极端贫穷的现象，并且培养出一群在州属槟城引领东南亚地区科技热潮的技术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0年到2000年，当地的总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到7%，而贫穷人口

从1970年的一半人口下降至2008年的不到4%。1990年代初期，我住在马来西亚时，当地是最先进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英语广泛通行，另外，虽然当地实施防止族群冲突的严格措施，政治领域中依然存在活跃开放的辩论。这种现象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政治竞争文化活跃，政府一直受到成员全是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巫统”所控制，“巫统”更与服从的少数民族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直到近年一直保有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马来西亚学者特伦斯·戈麦斯（Terence Gomez）指出，贪腐问题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独立时继承了非常大量的外资所有权。规模庞大、多数来自英国的企业集团，拥有自然资源生产的大部分资产。更糟的是，次等规模的企业所有权又落在华人手中，而如今绝对执政的多数马来族群却几乎一无所有。如同在印度尼西亚，国有化蔚然成风。1970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非但未将财富平均分配给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反倒将目标定为在1990年之前，建立一个可望成功并占有30%企业所有权的马来商业界。这进而催生了大量旨在攫取企业资产并将其收归马来人所有的公营企业，同时也促使“巫统”搜刮资产并建立令人畏惧的专属企业帝国。

1980年代期间，一个兼任党司库与财政部部长、狡猾难测的人物，主导着“巫统”的商业利益。达耶姆·扎因丁（Daim Zainuddin）与他的上司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来自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州（Kedah）。达耶姆原本是在英国受训的律师，后来放弃法律事业，投入商界。他起初从事小本的盐业生意，之后转职房地产开发，辗转踏入政治圈。身材矮小、穿着一向朴素的达耶姆，出了名地难以约束。他不喜欢受到瞩目，以低调外表掩饰万贯家财，经常穿着褪色的旧蜡染衬衫与磨破的凉鞋出门。1990年代时，我每次造访他位于吉隆坡国道旁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里的办公室时，他总是打扮随兴，坐在一排屏幕前监看股市动态。当时，他的声势如日中天，但接受访问时总是含糊其词，很少直接回答问题，让人得费心捉摸他闪烁的眼神与抽动的胡须背后蕴藏的意涵。然而，达耶姆是“巫统”企业帝国幕后的主要操盘手，他在一群忠心的企业高层的协助下，利用复杂的股份交易与反向收购，在经济关键区域中建立错综交织的控股网络。

到了1990年代初，据估计，“巫统”的企业资产总值已超过10亿美元。在马哈蒂尔统治下的马来西亚，许多与“巫统”有关的企业都是垄断经营，尤其是在企业金融领域。当中运作的概念是，当权者指派密友领导这种企业，并找来聪明的年轻人经营。这些交易与赚得的收益，纯粹

作为选举经费。这些钱除了让“巫统”大亨口袋满满并确保他们的忠诚外，也用来影响摇摆不定的选民或动员拉票的说客，另外还可资助本地的经济提案，塑造政府关心民生的形象。

在偏袒政府的法院支持的有关煽动叛乱的严法之下，当地媒体害怕遭到审查与起诉，不敢报道这些获利丰厚的法人操作及政商勾结之事。但是，立场坚定的区域记者，如《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巴里·韦恩（Barry Wain）与拉斐尔·普拉（Raphael Pura），竭尽所能地揭露“巫统”的两大摇钱树——玲珑（Renong）与马来西亚联合工程（United Engineers of Malaysia, UEM）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盘根错节的交易网络。韦恩与普拉揭穿了“巫统”相关企业因为融资与资产负债杠杆倍数而摇摇欲坠，以及马来西亚经济实际上正沦为国内政治精英的人质，无论选举的频率有多高，这些精英都希望能够永久确保权力。韦恩如此评论达耶姆：“达耶姆的行为已经清楚展现了，他不会让利益冲突的传统想法，干涉他经营私有企业帝国、马来西亚经济或‘巫统’财务的方式。这三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达耶姆一直拒绝为任何企业渎职行为负责，也不曾被控以任何罪名。多年后，我在仰光机场的值机柜台遇到达耶姆，那时他七十几岁了。他身穿破旧的蜡染衬衫与招牌凉鞋，头上的红色棒球帽几乎遮住他表情丰富、淘气搞怪的脸孔。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以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当初在位多年与掌管“巫统”企业帝国所留下的影响一笑置之。如今，大众比较知道的是，他在经营艺术赞助事业。

达耶姆留下的是政治与商业密不可分的企业生态。而这种生态，为东南亚最惊人的贪腐丑闻之一提供了舞台，这桩贪污案件令马来西亚人闻之色变，牵涉的金额及贪腐的踪迹与其后造成的毁灭更创下新的纪录。

自马科斯在1986年遭到罢黜后，大众还没有如此关注过领袖的财富来源。年薪少于15000美元的马科斯，被控侵吞高达100亿美元公款，这个金额足以替贫穷的菲律宾偿还一半的国债。这些钱大多存在海外银行账户里。三十年后，这些非法财富只由1980年代成立以追踪赃款的政府组织寻回了一小部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惊人的政治抢劫案之一。

2015年，数篇报告陆续出现，暗指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据称的大胆阴谋中盗用政府监管的投资基金。最主要的指控是，纳吉布从基金转汇近10亿美元到他的个人账户，而他予以否认。政府的调查坚称这些钱

全部来自合法捐献，依官方规定，马来西亚总统月领大约6000美元的薪资。在东南亚历经两次金融危机，并承受数十年改革与民主变迁的压力后，对那些希望透明与开放的政府文化能够因此在该区域盛行的人而言，这也许是最令人灰心的时刻之一。

2013年，首度有人质疑总理纳吉布以财政部部长职权管理的国有投资基金公司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的财务正当性。这家基金公司旨在扩展并建立全球合作关系，以吸引更多外资，其中的一些交易规模庞大。2009年，1MDB宣布与沙特石油国际有限公司（Petro Saudi International）合资15亿美元，一年后更与阿布扎比一家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1MDB与中国及卡塔尔的国有企业也签订了类似交易，而一连串的债券发行使其贷款累计达110亿美元。2015年初，新闻报道指出这些债券可能不会如期偿还，反对党质疑其运作明显缺乏透明度。尽管政府声称大批款项是从海外募得，外界仍旧怀疑政府将资金注入1MDB以维持营运。所有资金都去了哪里？在1MDB发出一连串声明，指出债券、法定审计与需要更多时间解释交易细节等问题后，种种疑虑更明显了。最终，政府逐渐失去公信力，所提出的纾困请求也遭拒绝——这对国营机构而言并不寻常。

后来，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设于英国、由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儿媳所经营的小型博客⁽²⁾，开始刊登有关1MDB运作内幕的详细报道。这个博客显然有渠道可取得据称有关交易的关键文件，还发布了扫描文件复本。博客报道，一位心怀不满的前沙特石油职员哈维尔·胡斯托（Xavier Justo）将相关档案交给马来西亚媒体，后来因为疑似勒索前东家而在泰国被捕入狱。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的博客与《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在2015年初披露，曾就读英国公立学校的年轻华裔刘德祖（Low Taek Jho），与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Riza Aziz）过从甚密，疑似协助1MDB与沙特石油成立的合资企业从1MDB吸走近7亿美元，而这笔钱不知为何流入纳吉布某个私人账户：

总计681,999,976美元的款项，于2013年3月从阿布扎比投资公司Aabar⁽³⁾旗下的瑞士私人银行Falcon的新加坡分行，分批电汇至纳吉布在吉隆坡大马银行（AmBank）的私人账户，时间点正是大选前夕。

纳吉布否认任何不法作为，宣称这些钱是一名沙特皇室成员为了帮

助他赢得2013年大选所提供的“捐款”，其中大部分在选举后已归还。沙特外交部部长在2016年初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会谈后表示，就他所知，这些资金的确是捐款没错。1MDB坚称从未私下交付纳吉布任何金钱；然而，爆料接连而来。2016年3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海外调查员认为有超过10亿美元流向纳吉布的个人账户，其中大多来自1MDB。《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揭发，这些资金是经由一家事关（或刻意让它显得有关）1MDB和中东利益投资案的企业汇入纳吉布账户的。

马来西亚当局调查高层的初步举动，使这些指控变得更加敏感。检察总长阿卜杜勒·加尼·帕泰尔（Abdul Gani Patail）遭到纳吉布撤职之前，据称已准备起诉总理，不过其继任者展开另一起调查，并证明总理并未涉及不法，强烈反对予以起诉。纳吉布与马来西亚政府至今都没有控告《亚洲华尔街日报》或其他任何海外出版物，以反驳日益详细与来源显然可靠的爆料。然而，马来西亚的商业周刊*The Edge*的发行执照遭暂缓核准，在当地，一直以来对此贪腐丑闻表示关切的数名政治家与激进人士也遭控叛乱罪。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一贯否认，但随着瑞士、新加坡与美国当局开始调查1MDB涉嫌贪污的踪迹，这起丑闻有如雪球般越滚越大。马来西亚有数名外商银行高层遭到解雇或自行辞职。至少有一家瑞士银行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遭点名，成为可能的调查对象。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指出1MDB有35亿美元遭不法挪用于购买与刘德祖及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有关的资产，此二人都在起诉名单之中。里扎·阿齐兹的发言人向《亚洲华尔街日报》表示，其商业交易并无不当之处。刘德祖一直未对媒体发表关于指控的声明，但他的家人目前正极力阻止其名下财产遭到扣押。美国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曾将1MDB作为“私人银行账户”，但不会透露任何官员的身份。然而，她提到某位名为“大马一号官员”（Malaysian Official One）的人士。随后，马来西亚总理署（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一位首长在BBC的访谈中坦承，纳吉布就是“大马一号官员”，但他强调总理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意图保护1MDB，并开除曾经批评贪污案处理方式的政治人物与官员。多人受到波及，包括一名部长、一名国家正部长，以及身兼执政党“巫统”副党魁的副总理。所谓的独立调查小组成员，无预警晋升至低阶内阁职位。尽管“巫统”内部有所不满，但大多数

人不敢出声。经验老到的观察家推论，牵涉巨额现金的古老贿赂方式，必定足以使党内人员噤声。但在台面下，马来西亚民众群情激愤，对于法律或政治机构无力解决大众眼中再明显不过的贪污案件感到沮丧。2015年年中，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吉隆坡的街道抗议时，当局利用新修订的叛乱法案（几乎任何对政府不利的言论都可能受到起诉）威胁逮捕他们。我曾在反对党控制的槟榔屿参加的乔治城（Georgetown）文学节开幕典礼，会上马来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兹米·沙隆（Azmi Sharom）怒斥：“这个国家充斥着不公的现象，政府开始失去理智。”2015年年末的同一个活动中，知名马来西亚漫画家朱基夫里·安瓦尔·乌尔豪克（Zulkifli Anwar Ulhaque，人称“祖纳”[Zunar]）豪迈地展示嘲讽这起贪污案的多幅画作。在画中，他描绘总理及其夫人手上抓着好几袋钱，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由破旧街屋改造而成的临时画廊里，他站在一群画迷前方，挑衅地挥舞着自己创作的两本禁书，里面有多幅讽刺贪腐的漫画。“你可以禁我的书和漫画，”他告诉警方，“但你不能限制我的心灵。”之后，祖纳很快遭到逮捕并被控叛乱。

除了揭露1MDB可疑贪腐网络的惊人规模之外，这起案件也凸显政府贪污与官商勾结的严重程度，这在任何政府，或任何像马来西亚一样社会结构脆弱的国家都是如此。尽管马来西亚在独立之际表面上继承了现代的民主政府，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个国家如今依然是多个分裂族群的总和。因此，当贪腐丑闻曝光威胁到纳吉布的总理地位时，政府便以马来族群失去支配优势作为恐吓，打出种族这张牌。

根据官方统计，马来人与原住民，占了马来西亚联邦2800万人口的60%以上。今日，华人约占总人口的25%，印度人则低于8%。这些年来，马来人的人口持续增长，预计在下一个十年将超过70%。同时，华人族群的人口自该国独立时的40%不断下降。马来西亚的种族炼金术支持着政府的所有政策，并且驱动着一切政治盘算；虽然官方提出一体化愿景——“一个马来西亚”，事实上还是存在实质性的种族与宗教隔离。每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政党，譬如“巫统”即专属于马来人与穆斯林。另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与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两者皆属于执政联盟。反对党试图组织跨种族联盟的努力，最后只能屈服于内部种族间的猜忌与纷争。人们严格遵守种族与宗教的界线，即使政府不再规定企业应该雇用或晋升多少马来人，企业内部依旧会设定限额。

因此，政府在回应与1MDB勾结的消息时，选择引发马来族群的恐

慌，指称反对党正利用这起丑闻威胁马来人的特权与伊斯兰教的地位。一味恐惧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威胁，加深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分裂，分裂的程度严重到穆斯林要求超市提供专属购物推车，以免接触到非清真认证食物，这样的事件引发的关注甚至大于政府高层贪腐等其他议题。负责为马来西亚境内所有清真寺撰写主麻日聚礼（Friday Prayer）布道词的政府部门，在2016年3月发表一篇文稿，坚称：“对国家领袖忠诚的谕令不是来自领袖本身，而是真主。因此，倘若民众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真主。”可见曾被誉自由改革力量与温和伊斯兰拥护者的纳吉布，已准备好反驳种种指控。在信仰与族群的藩篱互相冲突的国家中，这种将宗教与世俗混为一谈的言辞，蕴含危险的言外之意。一位马来学者兼准政府发言人认为应该忽视指称1MDB腐败的报告，因为这些资料来自“卡菲尔”（*kafir*）⁽⁴⁾。这向多数族群马来穆斯林传达了清楚的讯息，即纳吉布的名声遭到马来西亚华人的玷污。一名执政党官员甚至宣称，过去几年来在伊拉克杀害穆斯林的美国政府，现在以马来穆斯林为目标。

纳吉布借由承诺改革国家不公的种族偏袒政策和过时的国内安全法，在2009年上台掌权。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扎克（Tun Abdul Razak）之子，曾在英国受教育，执政至今已有三十年，而他在1990年代担任国防部部长、后任教育部部长时，我熟知他是称职的首长与政治人物。迷人又讨喜的纳吉布，在许多方面是领导风格较为圆融的马哈蒂尔，他总是在挑拨性的雄辩言论中，无意间透露自己的深刻偏见与对权力的执着。纳吉布实际上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煽动人士；他的英语口语极其矫揉造作，连马来语口音听来都带有贵族鄙视平民百姓的感觉。然而，他却是胆小之人。我记得有次与他前往马来西亚东部沙巴造势，当时是1990年代中期，“巫统”在当地面临反对派的压力。我们搭乘马来西亚军用运输机从吉隆坡出发，然后改搭直升机前往当地参加政治集会。直升机接近看似丛林空地的区域时，纳吉布的表情显得紧张。他问一位随从：“人呢？”我看到下方有一小群民众，但没有看见任何欢迎的旗帜。“拜托，”我说，“你是政治人物，不会担心那么一点骚动吧？”纳吉布恐惧地瞪着我，然后命令直升机返回基地。

纳吉布上位时承诺改革，目标是修改妨碍言论自由的无理安全法律，以及改善扶持马来人与排挤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他也允诺让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信仰稳稳踏上通往宽容与温和的道路。他甚至发起了全球中庸运动（Global Movement of Moderates），不仅受到西方赞赏，东盟的领袖们也将其视为区域性的倡议。然而，1MDB的丑闻迫使他逆转政策，巩固权力基础并阻挡反对派制裁他的行动。自2014年

起，纳吉布恢复了更具压迫性的国家安全法案，借由旧时的叛乱法来抑制批评声浪。他非但未提倡温和的宗教改革，反而为了分裂反对势力与维持马来穆斯林的支持，而对宗教强硬分子逢迎谄媚。实行伊斯兰“惩戒法”（Hudud，施以鞭刑、刖刑及其他严酷刑罚）的提案，一直以来在州议会都没有动静，但是在1MDB丑闻爆发之后，瞬间就排入了联邦议会议程。此外，也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任何改革迹象，因为纳吉布害怕激怒忠诚党员而不敢胡乱修改章则。

纳吉布也许会在2018年5月底前举行的下一届大选中获胜⁽⁵⁾，但如果执政的巫统未能成功赢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他就会被1MDB丑闻拖垮，因为他与家人的长期贪污，以及据说他们为了自保而容忍的暴力事件将遭到揭发。黑暗龌龊的恐吓与谋杀内幕，伴随令人咋舌的贪污报道而来：美貌的蒙古女模特沙里布·阿丹杜雅（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与纳吉布的一名亲信有染（后来他获判无罪，但纳吉布的两名贴身侍卫因谋杀而被定罪），之后遭人掳走并以C4炸弹炸死；来自巴林的大马银行（AMMB Holdings Berhad，简称AmBank，纳吉布在那里设有账户）创办人侯赛因·纳佳迪（Hussain Najadi），于2013年某晚在停车场遭到离奇暗杀；而参与1MDB贪腐案调查的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遭到谋杀，尸体被肢解并藏在灌满石灰的油桶里，共有七人被控与这起谋杀案有关，其中包含一名资深军医。以上案件均未牵涉纳吉布或其家人，但一些人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一些潜在的告发者不是无耻地接受收买，就是遭到威胁。其中一位是私家侦探的遗孀，她拿到的收买金额少到像是在开玩笑；另一位是纳吉布的安保人员，他先是遭判必须为蒙古女模的谋杀负责，再获判无罪，而后又被判处死刑，后来他在保释期间潜逃国外，目前待在澳大利亚一家由“巫统”律师团掌控的拘留所，据说他们给了他一大笔钱，要他保持沉默。

马来西亚是这起丑闻的最大受害者：它的币值，连同身为享有海外援助与非洲投资的中等收入老虎经济体的国家声誉，一落千丈。难怪许多马来西亚人（拥有足够财富的族群）选择移民或到外地投资。不动产顾问公司莱坊（Knight Frank）估计，2014年，马来西亚人花费近50亿美元投资海外房地产。2016年初，马来西亚政府透露，自2010年起，已有5万人放弃本国公民身份。前政府经济顾问、现为海外学者的柯成兴（Danny Quah）感叹：“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领袖不再明确有力地表达符合人民利益的愿景，不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推崇。”到了2016年末，纳吉布依旧极具权势，成功避开了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谴责；目前为止，唯一的受害者是那些试图揭露高官违法作为的人士，包含国会反

对党的杰出议员拉菲兹·南利（Rafizi Ramli），他因为公布政府审计1MDB的机密报告复本，遭判18个月徒刑。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影响了范围更广的区域。2016年初，中国国有企业正式为1MDB的能源生产资金注入2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能源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并大幅协助清偿1MDB累积约9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坚称，这项交易出于充分的商业理由。先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拿出17亿美元投资1MDB拥有的房地产发展公司。这两项交易使中国在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也确保了其将能参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兴建工程案。2016年11月，纳吉布访问中国，并借由这次参访警告西方殖民势力，不要指导它们曾经剥削过的国家如何管理内政。结束访问后，他带着340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合约及订购4艘中国造海军战舰的合约返国。然而一年前，总理纳吉布才被媒体拍到在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打高尔夫球，而当时，马来西亚还支持华盛顿寄望可防堵中国在亚太经济势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马来西亚政府可说非常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它的领袖处于困境、暴露在大规模的贪腐丑闻之下，之后，美国当局并未选择忽视这起丑闻，而是在司法部进行的调查中对其加以扩大凸显。

贪污的领袖与政府倍受西方监视，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友好的。柬埔寨总理洪森的案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2011年声明，自己的年薪为13800美元，遭到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质疑。2016年夏季，“全球见证”指出，洪森的财产约达5亿至10亿美元，而其广大的家族成员更操纵了巨大的法人与公营企业版图。这份报告表示：“与洪森家族有关的企业占据了柬埔寨最有利可图的产业，包含贸易、金融、能源与观光业。他们也涉足一些因贪污而声名狼藉的产业，例如博彩产业、建筑业、农业与矿业。”对此，洪森本人并未正式响应，但他的女儿洪马娜（Hun Mana）在脸书上发布讯息，指控“全球见证”在选举前夕利用“谎言与欺诈手段误导大众”，败坏父亲的名誉。

起初，1990年代中期在金边握有权势的保皇派，例如西哈努克亲王便与中国关系密切，直到去世前都保留在北京的房子。但身为东南亚传统君王的西哈努克与其子诺罗敦·拉那烈王子（Prince Norodom Ranariddh）都善于取得良好平衡。因此，从1990年代晚期起，中国政府开始与洪森交往，而他最终摆脱了保皇党⁽⁶⁾，他在联盟中担任第二总理直到1998年。到了2006年，随着洪森稳居上位，中国承诺提供6亿美

元的补助与贷款，协助修复吴哥窟（Angkor Wat）、兴建横跨湄公河的桥梁，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截至2012年，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总额接近百亿美元。

柬埔寨前商业部部长孙占托（Sun Chanthol）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这些投资没有附带条件。“这全是因为我们需要迅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你问，中国有对柬埔寨开出任何条件吗？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没有。没有任何条件。”然而，西方因为洪森的治理方式而逐渐减弱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洪森选择成为对中国满怀感激与显而易见的盟友。因此，当东盟部长级会议2012年在柬埔寨召开时，作为东道主的洪森便可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

贪腐的规模与其遍及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各阶层的程度，是当地人民所担心的问题与重大的策略隐忧。领袖圈中持续存在贪污受贿，也严重阻碍了政治改革与变动。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与柬埔寨最为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结果有好有坏。历来，泰国的军事统治者将对抗贪污作为获得长期掌权支持的主要筹码之一，虽然他们在位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变得腐败。平民主义的改革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与较近的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都将打击贪腐视为主要政见。2016年7月总统就职日当天，杜特尔特在典礼上特别发布第一道行政命令。他在开场致辞时严厉警告：“我下令，所有部会与局处长不得更动与放宽已经核准、即将执行的政府合约、交易和计划。”这些话听起来好听，未来付诸实行将会面临极大挑战。

- (1) 《曼谷邮报》（*Bangkok Post*）生活版编辑，兼影评人。
- (2) 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的博客乃是由克莱尔·鲁卡斯·布朗（Clare Rewcastle）所开设，她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英国记者，并为自由砂拉越电台创办人。其创办的电台以揭露砂拉越政治丑闻著称，在推动媒体自由上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肯定。
- (3) 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子公司。
- (4) 阿拉伯文音译。穆斯林对不信伊斯兰教者的蔑称。
- (5) 2018年5月9日，纳吉布领导的“国阵”（“国民阵线”的简称）败选，马哈蒂尔再次成为马来西亚总理。5月12日，纳吉布宣布辞去“巫统”主席及“国阵”主席职务，即日起生效。
- (6) 奉辛比克党（Front uni national pour un Cambodge indépendant, neutre, pacifique et coopératif, FUNCINPEC），是柬埔寨的保皇派政党，由前国王西哈努克于1981年创建。摆脱保皇党是指洪森于1997年发动政变，并摧毁奉辛比克党

总部。

PART II

第二部 冲突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宗教、任何民族、任何拥有习俗与传统的族群，而是属于沙璜以至马老奇市的所有人民！

——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只想要自由。

——巴布亚领袖本尼·文达（Benny Wenda）^①

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名年约二十的男子的照片，他穿着士兵的工作服，头戴垂边帽，胸前佩了把老旧冲锋枪，对镜头露出微笑。我在1982年横越泰缅边界的秘密旅程中拍下这张照片，当时，我正要前往对抗缅甸军队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众多营区之一。这名年轻男子负责看守勃欧民族解放军（Pa O National Army）的一个偏远营区，那里距离缅甸边界只有几公里远。勃欧族为缅甸第七大种族，分布于今日毗邻泰国边境东岸、名为掸邦的缅甸地区。这座营区搭建在赭色的光秃山腰上，坡边矗立着高耸的龙脑香树。四周围有脆弱竹制军戒护栏的营地，由堆满沙袋的中央地下碉堡负责守卫，里面配备了一把二战时用的布伦枪（Bren Gun）与老旧生锈的闹钟，据说是为了警示守卫。照片里那位面露微笑的年轻士兵，在我拍摄的当下紧张地扣着扳机：这幅影像捕捉了东南亚动乱的本质，年轻人发现自己困在边远地区难以实现的奋斗中，靠着仅剩的尊严——身份认同——过活。

东南亚有段辉煌的内斗历史：世界上一些为时最久的内战发生在被人遗忘的遥远领土上。这些小规模战争也许不会侵犯生活在现代、发达程度较高的首都市民，也不会影响外国游客与观光客，只有少数几次例外。但是，它们确实会夺走数以万计的人命。它们危害经济繁荣、干扰民众生活，因而导致更多潜在的成本并阻碍发展。近年来证据显示，某些区域中，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长期种族冲突影响极其惊人，这些动乱正激起国际恐怖主义。缅甸若开邦的北方区域是东南亚境内最偏远的地方。主要城镇孟都（Maundgaw）与布迪当（Bhutidaung）紧邻缅甸

与孟加拉国的边界，多数地区住着无国籍的罗兴亚人。2016年10月初，由数百名罗兴亚人组成的团体攻击警察与军队哨站，来自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情报指称，这群人受到在印度发动攻击的巴基斯坦宗教激进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²⁾的支持，但罗兴亚族否认此事。在东南亚边境的一些穆斯林地区里，不受当局重视且逐渐恶化的种族民族主义自治或独立抗争，已经引起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S）注意。2015年，菲律宾南部以绑架勒索外国人而恶名昭彰的武装团体，发布了一个制作专业的视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他们斩首两名西方人质并录下整起暴行。正当人们担心肆虐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充斥北非与西非大部分地区的内乱，会在国际间引发新一波激进主义暴力浪潮，东南亚悬而未解的冲突又为更加野蛮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利环境。大多数冲突爆发的六十年后，这些对立依然存在，主要是因为数个世代以来，政府持续忽视它们、利用它们，并且阻挡外界为了终止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估计，自1947年以来，亚洲各地的次国家冲突已夺走大约160万条人命。1999至2008年间，死于亚洲次国家冲突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各种动乱（包括阿富汗等地）牺牲的人命还要多。这个数据令人咋舌，因为近年来在东亚的战争死亡人数比例，整体上已大幅下滑。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研究机构东亚和平计划（East Asia Peace）的资料，从1947年至1979年，东亚占了全球总战死人口的80%，但自1979年来，东亚的战争死亡人口比例不到4%。虽然亚洲的次国家冲突只影响整体人口的少数（约7%），但这部分的人数大约有1.3亿。某些事件的暴力程度惊人：泰国南部一个人口300万的地区，十几年来的战争已造成6500人死亡与4万人受伤。

泰国南部的叛军发起暴力运动，偶尔会避开三个有争议的省份与受外国观光客欢迎的地区。然而，东南亚多数的次国家冲突均发生于边境，例如缅甸的高地、泰国的最南部地区、菲律宾最南端的岛屿民答那峨、印度尼西亚极东边的巴布亚省及越南与老挝的小范围高地区域，这些全都距离喧嚣的大城市、壅塞的车流与豪华气派的购物中心非常遥远，通常也不会危及观光客，游客们很少踏足冲突区域，有时却会发现自己受到冲突影响。

除了菲律宾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全是种族民族主义导致的冲突，亦即少数民族为了获得一定程度有意

义的自治甚至独立，所发动的抗争。领导这些抗争的反抗团体拥有足够的军火与资金，并且获得所在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就缅甸与民答那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而言，他们掌控广阔的据点，并且拥有组织良好、结构正规的武装部队。之前我访问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总部时曾大吃一惊。它位于民答那峨哥打巴托市（Cotabato City）郊区的达拉巴南营区（Camp Darapanan），不但占据距省会郊区仅数分钟车程的区域，还获准在当地以自有军队部署武力防御。从整齐的草坪与外观平凡的办公建筑可见，营区已自成一国。军营甚至还有脸书主页。这个地区有许多武装团体交易毒品和违禁品，或是出口珍贵的宝石与木材，刚好可以利用自由抗争来掩饰营利的犯罪行为。在缅甸北部的克钦丘陵（Kachin Hills），挖掘翡翠矿石（华人视为珍宝的冷色绿宝石）的利润，一年据估超过300亿美元。这些利益落入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和与其对抗数十年的缅甸陆军（Myanmar Army）手里。然而，除了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者的特殊例子以外，光凭军事行动，向来无法击败这些动乱。

进一步检视，武装运动并不是从远处看到的那样。在发达城市社会边缘的险恶环境里进行地下抗争长达数十年，这些斗士显得疲累又憔悴。他们抛弃家庭，带着贫乏的干粮抗战。相形之下，他们偶尔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领袖，经常出国或流亡海外，生活在满是友好解放运动的神秘世界，游说容易动摇的自由政府，向他们寻求支持、庇护与福利，或向同样易受影响但名气较小的政府寻求武器与资金，另外也参加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³⁾及吉达（Jeddah）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⁴⁾的会议。这些领袖之中，有些人过着平凡朴实的生活，在瑞典或挪威的荒凉郊区当公交车司机或邮差。一位我认识近十年、自称曾领导解放运动的领袖，目前在瑞典郊区小镇光明正大地生活与工作。他拥有脸书主页，喜欢云游四海；参加会议时总是穿着时髦西装、打扮利落。不过，有次我到泰国南部主持会议，所在地点隔壁的饭店发生爆炸案，而他正是疑似主导这起炸弹攻击的组织领袖。幸好，那起爆炸事件只造成几人受伤。

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次的午餐与晚餐，每次都是他请客。然而，他是受过训练的游击战士，在1970年代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利比亚训练营中锻炼出作战技能。每次我见到他的亲信，他们总是满脸笑容，激动地拥抱我，而我总是思考着他们因为痛失亲人而犯下的暴行及自找的受害者情结。我认识的另一位前

斗士，他的儿子起初被认定命丧维安部队在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某处发动的攻击。满怀愤怒的他寄给我一个档案，里头是他儿子残缺尸体的照片。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其实是死于出了差错的毒品交易。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说：“我还有其他儿子。”

人们被迫采取暴力。他们逐渐习惯暴力。这成了一项事业、一种生活方式。

东南亚次国家冲突的种子在现代的建国过程中埋下，其中包含前殖民时期自治公国的瓦解，以及团结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今日东南亚的内部冲突大多发生在殖民时期之前就已独立的边境王国。其中一些公国历史悠长。位处今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苏丹国（Pattani Sultanate）⁽⁵⁾，15世纪就与中国及阿拉伯海岸有直接贸易往来，直到1786年被征服并成为暹罗国王的属国。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苏丹国（Acehnese Sultanate），则是支持16世纪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的三个国家之一。

武装反抗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高举叛乱旗帜，成员们利用褪色的主权回忆来合理化这些武力抗争。民族主义抗争首度爆发于1940年代时，泰国南部北大年当地的历史学者易卜拉欣·苏克里（Ibrahim Syukri）正在写作，叙述北大年王国如何在17世纪前发展为富庶的交易中心，并指出“当地经常可见从外地载运货物而来的船只”。除了阿拉伯人与一些华人，这个蕞尔小国也陆续吸引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商人前来，在多泥的北大年河（Pattani River）河口兴建工厂。到了16世纪末，北大年苏丹国的“拉惹”（Raja）⁽⁶⁾派遣贸易使节团到日本。这位历史学者大胆声称：“当时作为暹罗政府中心的阿育陀耶，在商业发展上比不上北大年王国。北大年的繁荣，激起了暹罗王室强烈的征服欲。”虽然这段话明显夸大了此地众多小型港口之中作为外国船只粮食补给站或雨季避难所的重要性，但其中关于北大年在四处掠夺的强大王国之外蓬勃发展自治的叙述，却为东南亚现代民族统一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亚齐反抗军领袖亟欲重申17世纪古苏丹国与欧洲势力签署的条约。他们与北大年的马来穆斯林一样，看到这些原始条约的复本时，一直心怀感激，它们虽然黯然失色、遭人淡忘已久，却被珍视为另一个年代的主权记忆。另一个例子是，今日分布于缅甸东岸说孟语

（Monspeaking）⁽⁷⁾的种族，直到16世纪才建立强盛王国。第一批来到当地的欧洲商人，在古孟族商港马达班（Martaban）建仓库，并在勃固

王国（Pegu）^⑧首都兴建大使馆。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孟族要求自治，但是遭到拒绝。从那时起，孟族解放军（Mo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今日最多有1000名武装士兵）不断为独立而战。殖民时期之前，弹性的自治形式是东南亚的常态。遥远的王国拥有属国的拥戴与忠诚，但军队行动力受限，意味着这些效忠大多只聊备一格。这些曾在全球贸易与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的地区，自豪感始终萦绕不去。人们怀念消逝已久的荣耀与地位，而这些回忆是东南亚暴力叛乱运动宣示国家地位与要求独立的重要支柱。

殖民势力带来了领土集权的手段与机制，范围从电报、铁路以至地方官员。引进有效的行政权力与职权，破坏了强制管理与放任之间的平衡，让边陲地区直到19世纪后期甚至更晚，才享有自治权。欧洲与美洲的入侵者破坏了东南亚大陆与世隔绝的山地社会；这些人不是一丝不苟的殖民行政官员，就是原为苏格兰人所有的孟买缅甸贸易公司（Bombay Burmah Trading Company）的伐木工人，以及来自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跋涉东南亚大陆的山林，找寻柚木与无所依归的灵魂，在这两方面皆大有斩获。基督教传教士是第一批记录高地民族语言的人，经常教授当地人拉丁字母，好让他们与避之唯恐不及的低地王国有所区别。陆军中校亚历山大·拉克斯顿·麦克马洪（Alexander Ruxton McMahon）是这股破坏力量的前锋。身为英属缅甸副首长的麦克马洪在19世纪最后三个月走访缅甸偏远山区，区分、记载与收服（虽然并非有意）几世纪以来未臣服于任何类型统治与治理的人们。他在1876年出版的《黄金半岛上的克伦人》（*The Karens of the Golden Chersonese*）序言中写道：“游历此区途中与人们的亲密沟通，有时甚至去到从未有白人到过的丛林……让我得以搜罗早前观察家未注意到的许多事物。”

1980年代早期在泰国北部求学时，我专门研究居住在边境高地、偶尔为了寻找商业机会而移居城市的少数民族。阿卡族（Akha）、克伦族、拉祜族（Lahu）、傈僳族（Lisu）与赫蒙族（Hmong）等特殊族群，起初便已从中国西部迁居缅甸、老挝与泰国人口稀少的山区。经常造访清迈与清莱（Chiang Rai）山区部落的旅程中，我享用当地人用气味强烈的森林药草炖煮的山猪肉，配上几碗粉色山稻米饭以及平底无脚瓷杯盛装的米酒。之后，大家围绕在营火旁，说着一群灵魂奔放的人的古老传说。我们聊到大半夜，之后我总是瘫躺在劈竹拼成的地板上，在黎明来临前，被松木燃烧的甜香与女人们晨起打水的脚步声唤醒。他们的独立感根深蒂固，无视现代政府与当权者的侵入，让我印象深刻。

殖民时代末期，统一中央集权的粗暴武力取代了较为宽容的分而治之的权宜策略。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在四海皆兄弟与统一的野心理想之上。“让我们共同庆祝今日到来的独立”，掸邦土司⁽⁹⁾苏瑞泰（Sao Shwe Thaike）⁽¹⁰⁾在1948年1月以缅甸联邦（Union Of Burma）第一任总统的身份首次公开演说时表示：

有很长一段时间，缅甸的主要民族——克钦族（Kachin）与钦族（Chin）——倾向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国家单位。近来，一个更高、属于缅甸联邦的愿景，撼动了我们，今天我们团结一心，决定共同促进缅甸的利益，并且尽快实现这个国家作为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使我们为了独立所做的努力有了初步成果的，正是统一，但愿今后成为缅甸联邦的主权独立共和国的每一位成员，仍会继续喊着统一的口号。

但是，这种统一的薄弱基础建立在充斥着殖民迫切需求与历史偏见的行政架构上。残缺的整合与被迫同化成为不满的导火线，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引发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广大区域的暴力冲突。随着新国家艰辛立基，模糊不清的边界与社会种族分裂的断层线也爆发叛乱。当中许多民族（如缅甸的克伦族与克钦族）觉得遭到抛弃与背叛，因为他们一直是分权治理殖民游戏的棋子。其他民族，譬如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以及某种程度上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都逃过了被征服的命运，也不会只因为现代的国家地位就改变他们的独立心态。摩洛穆斯林与亚齐人是西方帝国势力最难征服的民族。美国占领军为了进攻菲律宾民答那峨的丛林地带，研发了0.45口径的自动手枪，以击退会手持剑矛从树林里猛冲而出的摩洛匪徒。摩洛人由于誓死奋战，因此伤亡惨重。印度尼西亚作家穆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¹¹⁾告诉我，1940年代他还小的时候听过亚齐人的故事，他们出于极度憎恨会在街上刺杀荷兰人。受到现代“圣战士”的民族主义理想激励，亚齐人会采取与他们类似的自杀手段。经过历时三十年、牺牲六万条人命的战争，荷兰人直到1904年才降伏亚齐人。七十年后，亚齐人对加入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未得到好处感到失望，因而爆发剧烈的内部冲突。

去殖民化过程的散漫管理，解释了今日东南亚多数致命内部冲突形成的原因，在这方面，过去十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有近距离的观察。人口多为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北大年苏丹国，直到18世纪后期都是独立或

至少是半独立状态，到了1786年才臣服于暹罗王国。当时的历史记载证实，暹罗军队以暴力手段镇压反抗势力，用绳索将男人、女人与小孩绑在一起，然后让大象踩死他们；当代的报道指出，至少有五万名难民往南逃到邻近的马来邦国。如今，一座17世纪建造的苏丹国巨型铜炮矗立在曼谷市中心的国防部大楼外，看起来就像个草坪艺术品。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旧时的北大年苏丹国请求盟军帮助他们脱离泰国独立。依照《英国—暹罗条约》（Anglo-Siam Treaty），今日北大年、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也拉府（Yala）、沙敦府（Satun）与宋卡府（Songkhla）的马来穆斯林地区割让予暹罗王国。即便如此，由于泰国拒绝向日本宣战，让日本轻轻松松就侵门踏户，北大年的马来人还是希望能召开对他们有利的听证会。然而，英国可能是因为忙于管理南边的马来邦国，忽视了他们的请求。太平洋战争落幕不久后，出身北大年皇室、受英国教育的马来王子东古·马哈茂德（Tengku Mahmud），开始向泰国最南部的三府⁽¹²⁾输送枪支，为刚起步的反抗运动备战，革命就此展开。

到了1960年代中期，暴力内战在缅甸多数地区、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与印度尼西亚酝酿，被越来越具压迫性的强制统一所刺激，并且配备有稳定供给的现代武器，其中一些是从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¹³⁾外流而来，一些是购自黑市。这些冲突到后来变得致命又漫长，因为中央政府坚拒响应反抗军的需求，不愿准许其自治。然而，政府至今仍无法击败这些叛乱的武装运动。英军在1940年代晚期发展出最早的现代平叛策略，在马来半岛丛林奋战以牵制马来亚共产党。他们的主要策略是，不承认俘虏拥有任何法律权利，并否认虐待被控藏匿当时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本地居民。东南亚国家平定叛乱的方式，延续了前任殖民者某些不经司法程序的特性，包括凌虐与未经审讯的拘留等手段。这些战斗大多不为人知，东南亚的维安部队留下了惊人的残暴压制叛乱纪录。常见的镇压方式，包括惩罚性杀害被认定为支持反抗势力的平民，摧毁居民的住所与生计，以及滥用私刑与未经司法审判的杀戮。尽管如此，维安部队仍持续进行一塌糊涂且冗长耗时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浮报军事预算，而不是赢得胜利。

在当代的缅甸、泰国与菲律宾，长久以来对抗分离主义游击部队的维安行动，在没有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有助于提升军队的威望与合理化其扮演国家守卫者角色的需求。就缅甸内战而言，军方发展出有利可图的生意，与控制邻近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广大区域的少数民族打交

道。在泰国南部，过去十年来充满敌意的内部冲突，解释了泰国军队的整体国防预算为何大幅增加，以及为何发放额外津贴给驻守南部区域（众所周知也是走私品的主要转运站）的士兵。知情官员透露，关于这个冲突，军方认为继续维持暴力状态才是“成功”，但必须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解决冲突不是目标，因为这代表退让。

2007年完成、尘封已久的泰南调停报告中，序言引述了20世纪初前泰国国王拉玛六世（Rama VI）的话，指出管理南部的关键是“派遣合适的人去治理”，但文中并未提到融合。负责编写报告的一位委员会高层成员告诉我：“目标不是人民的福祉。”同样地，反对派压迫当地居民，经常提高税赋以资助武装抗争，或是对贸易课以重税。他们的暴行杀害了无辜平民，像是2016年10月28日，监视器拍下两名年轻摩托车骑士枪杀一名泰国女教师。他们在现场留了纸条，上头写道：“献给你们这些杀害马来人的混蛋。”在泰国南部，对立双方均针对性地枪击平民。

政府发现这些冲突难以压制，或因太多利益可图而不想压制的同时，以主权受威胁为由，延迟召开和平会谈。这或许是这些旧时冲突持续牺牲众多人命的最大原因：政府根本无意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直到最近二十年，政府才开始与反抗军对谈。苏门答腊北部亚齐省爆发的冲突，在短暂的对话与谈判后告终，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05年同意给予该省大幅度的自治权，并允许武装反抗势力自由组织政党，以求地方选举的胜利。这项单纯的妥协方案终止了为期三十年的低强度动乱，其间约有五万名无辜村民在小规模冲突与军队报复行动中丧生。

经过17年的谈判，2014年3月，菲律宾南部的冲突终于弭平，也高调签订了全面和平协议。而在缅甸，政府谈判代表与民族武装团体联盟经过短短两年的协商，在2015年3月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 NCA），为国家级的政治对话铺路，未来可望承认约占全国三分之一领土与人口的非缅族区域的联邦权利。

尽管有如此充满希望、得来不易的协议，和平却依然脆弱且难以实现。在缅甸，21个民族武装团体中，只有8个最后正式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军队继续在停火协议范围以外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加深人民的不信任。2015年2月，在菲律宾的民答那峨追捕可疑恐怖分子的突袭行动失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因为政府违反长期停火协议而回以防卫反击，造成44名菲律宾警察突击队员丧命，在此之后，涵盖民答那峨邦萨摩洛自治区（Bangsamoro）⁽¹⁴⁾的全面协议变得颓弱无力。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总统大选逐渐逼近，没有人准备好要捍卫和平

进程。通常，每次政府做出改变，就会出现解决内部冲突的新方法。不只内战有利可图，草率促进和平也能获得政治资本。这十年来，我在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研究内部冲突时发现，每个新上任的政府都有效破坏了前任统治者的成就，并且采取全新的手段，让武装团体怀疑政府的和平承诺，不信任对方派来的特使。时间回到2005年，民族和解委员会（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uncil）在泰国南部成立，旨在找出与讨论加深冲突的当地民怨。我参加过许多次和解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一些泰国官员非常乐于倾听民意，也有意拟定政策来解决冲突的根源。后来，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并未受到重视，并在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遭到尘封。

此外，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倾向对边境冲突视而不见。不同于非洲与中东地区许多造成死亡与摧毁首都的小型战争，这里的小规模冲突大多局限在某些地区。尽管如此，经济的危害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估计，长达三十年的亚齐动乱使印度尼西亚损失了一百亿美元，金额是2004年夺走近二十万条人命的大海啸的两倍；泰国南部持续十二年的冲突，大约造成了三十多亿美元的损失。动乱之后，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教育中断或受阻，不再有社会服务与正义，这些无可估算的人力成本一代传一代。

我在菲律宾南部的迷人岛屿苏禄省清楚见识到这一点，此地以14世纪在阿拉伯商人引进下首先接纳伊斯兰教而闻名。苏禄省虽然富有魅力、景色优美，却是东南亚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深受与传统部落冲突有关的特有暴力所苦，这些冲突中的暴民誓死奋战，直到恢复荣耀为止。即便是男人无意间“瞄到”有夫之妇之类的小事，也会引发出动重型迫击炮与机关枪的小规模战争。

当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偏远岛屿稳定发展成获利甚丰的观光景点时，苏禄省的地方动乱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在丛林密布、俯瞰首府霍洛（Jolo）的山丘上，坐落着一个居高临下的菲律宾军营。1970年代，菲律宾军队入侵霍洛岛，在摧毁具有历史意义的市中心的血腥战役中，试图从摩洛穆斯林反抗军手中夺回失土。从约瑟夫·康拉德驾着纵帆船，缓缓驶过苏禄海，遭遇好几群武力强大的陶苏格族（Tausug）海盗之后，这里没有太多变化。康拉德在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里，形容陶苏格海盗是“细致讲究又野蛮原始的一群人……看来坦率大胆的男人们赤脚行走，装备齐全，悄然无声”。今日，同样的男人在丛林间穿梭自如。几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著名恐怖分子在这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设立训练营

区，练习制作炸弹的技巧。近年来，以“伊斯兰国”的名号招募士兵的证据逐渐浮现。摩洛叛乱结合大量武器与低劣或不存在的律法和秩序，酿成更加暴力的部落冲突，使数千人生活在贫穷与恐惧之中。

我造访苏禄省时，由因为身负沉重自动武器与额外弹药而快要跌倒的警官随行护送。如康拉德所述，陶苏格人随身携带武器，吹嘘自己把枪看得比女人还重要。以小型武器展开黑社会式枪战的影像，未能忠实呈现苏禄岛部族使用重型迫击炮与0.5口径机关枪猛攻的战事。此外，菲律宾政府对于要求马来西亚归还沙巴（苏禄苏丹⁽¹⁵⁾）的继承人主张其所有权）一事的安排，以及自治要求始终未竟的问题，使苏禄省人民抱持久久不去的憎恨，难怪驻扎该区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会害怕得窝在山顶营区，吹嘘那里是岛上唯一能喝到星巴克咖啡的地方。

那么，这些冲突为何如此难以解决？为什么菲律宾摩洛人从1960年代起就不断挣扎？为何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从1940年代以来就一直抗拒泰国的统治？而克伦族（如同孟族）又为何从缅甸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起，开始向中央政府发动内战？

岌岌可危的主权是最明显的原因之一。解决次国家冲突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显然是允许某种形式的自治。但是对大部分的东南亚政府而言，主权依然是高度敏感的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民族国家相对年轻，民族主义抗争的记忆犹新。就群岛国家而言，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允许地处偏远的岛屿自治，被视作鼓励它们独立。因此，出于对分裂或丧失领土的偏执恐惧，政府紧抓着州属不放，持续大力推行强势统治，并将人民当作臣属，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公民般以诚相待。这凸显了惊人程度的短视近利：什么样的国家领袖或官员会算计，为了保有主权，一天死三个人（泰国南部冲突平均一天的丧命人数）也在所不惜？同时，许多觉得受到压迫或被迫臣属的社会都坚决保有民族认同与某种程度的自治，甚至宁可选择削弱人心的战争，舍弃和平。

这种双重性深深根植于自1948年以来不断困扰缅甸的种族冲突之中，而这些对抗共同形成了从印度边界延伸至中国边境、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之一。非缅人的民族构成缅甸三分之一人口，并占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从刚独立不久的联邦政府得到名为《邦隆条约》（Panglong Agreement）的早期承诺。不过，这个承诺可谓含混不明。一开始，民族领袖们相信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根据宪法授予部分选举权的善意。他们这么做，是希望改革会接踵而来。然而，在独立不久后对抗边境地区反叛的种族军阀与共产主义动乱的过程中，缅甸军队提升了

战斗力，并在强人奈温将军的率领下，获得平民政治圈中无可匹敌的向心力。1962年军方干政并夺权，联邦体制的希望完全破灭。军队将边境地区的民族团体视为极力寻求独立的从属人民，需要动用武力加以镇压。受军方骚扰与虐待而加深的失望，是驱使民族团体公然叛乱的关键因素。

1980年代初在清迈求学时，我住在掸族民族主义运动（Shan Nationalist Movement）一位领袖的隔壁。生于掸邦永贵的赵赞永贵（Chao Tzang Yaunghwe）⁽¹⁶⁾，是在英国统治下获得行政权力的诸多掸族土司之中一位的儿子。如之前提过的，他的父亲苏瑞泰是担任缅甸联邦第一任总统的掸邦贵族。赵赞永贵与他的母亲⁽¹⁷⁾——人称“尊母”（Mahadewi），即永贵的“伟大女王”（Great Queen）——同住在靠近城市西北边屏障的简朴房子里。我们都叫他尤金（Eugene），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就读于天主教神学院时取的名字。在漫长的夜晚与优雅、气度非凡（而且厨艺过人）的“尊母”准备的美味掸族晚餐中，我得知了尤金的过去。他本人与反叛军领袖的形象有些不同。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快50岁，是个身材瘦削、书生气质浓厚、戴着眼镜并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男人。他勉为其难、平铺直叙地述说自己的战争经历，而我从中了解到，他在1962年军事政变不久后掸邦起而反抗政府时，放弃学业加入掸邦军（Shan State Army），之后屡屡经历考验与失望。后来，他写了一本震撼人心的暴动回忆录，描述掸族领袖（包括之后在狱中去世的父亲）试图在缅甸联邦制度下为掸邦人民争取公平与正义，却徒劳无功、希望幻灭并遭到背叛的故事。

虽然“尊母”从未提及丈夫的命运或是儿子对民族主义抗争的醒悟，但她曾经激发我研究种族渊源的兴趣。“你得小心点，”她以骄傲的语调说着，眼神中带着戏谑，“身份只是方便的工具而已。你看，我不再拥有任何身份：我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尤金与他的母亲都在流亡加拿大期间过世。

缅甸军方牺牲了理想主义与受过教育的政治人物（如失势的吴努与苏瑞泰）之后，变得更加强大。建立联邦国家、不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且以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骄傲的愿景，也随着这些人物的死亡而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重拾前殖民时代缅甸国王荣耀的空想。这些历代国王当中，最成功的君主在统治期间征服边境地区，宝库里全是打胜仗掠夺来的战利品，宫殿里全是俘虏来的奴隶。缅甸军队受辉煌军国主义的镀金愿景蒙蔽，让民族地区沦为战场，士兵们犯下强制劳动、强

暴妇女与屠杀民众等暴行。当地军阀趁着权力真空，强制推行以鸦片为基础的经济，强制劳动与课税，并处决遭控背叛民族目标的人。尤金描述自己担任掸邦军第一军区指挥官的经历时向我透露，最大的挑战是避免部队骚扰他们捍卫的人民。他在1986年，也就是1970年代中期离开战场的十年后，反思道：“未来不太乐观，因为就目前的仰光而言，可能会继续将种族叛乱视为一般的土匪行动，并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它们，如同1949年以来的这段日子一贯的做法那样。”尽管和平努力一直存在，但这种状况在2016年依然如此，而到了2017年初，政府意图振兴正规和平进程的努力，显然还是为持续的斗争所阻碍。

数十年的战乱期间，不时出现薄弱的停火协议带来的半和平时期，加深东南亚社会武装冲突的社会经济问题，程度或许比世界上其他受战争摧残的区域都还要严重。索马里、莫桑比克与苏丹等国家虽然也经历数十年的内战与冲突，现代却享有统一与相对和平的时期。此外，尽管恐怖记忆历历在目，黎巴嫩内战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197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在一些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内战中，至今已有大批人口遭到杀害，当地的军事侵略行动拥有更优良的装备，也比较不受山区丛林地势所妨碍。

这些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持久性造成了惊人的差别。以冗长的消耗战而言，和平与安全不过是年迈亲人的遥远记忆，在现代世界里几乎找不到类似的事物。害怕失去领土，使东南亚政府拒绝承认或处理由不断拖延的内部冲突导致的根本性不满。例如印度尼西亚最东部的省份巴布亚省，涵盖约一半面积的新几内亚岛，清楚呈现了政府在处理引发冲突的长期不满时有多么愚蠢。各届雅加达政府一直拒绝针对印度尼西亚在1969年以不当方式并吞这块土地的事件，给予巴布亚人任何赔偿。巴布亚人要求政府承认联合背书的公投有欠妥当，因为多数选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人，在人身自由或安全受威胁下投票。这种未能解决单一历史恩怨的失败，强烈推动着如今助长暴力的民怨。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激烈武力镇压才是解决之道。数十年来以严格安全措施响应巴布亚地区小型抗争的做法，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仇恨。住在巴布亚首府查亚普拉（Jayapura）的阿普丽拉·瓦扬（Aprila Wayan），之前担任记者时曾目睹一些朋友遭到逮捕甚至杀害，心中留下创伤，至今依然背负着沉重的痛苦。我建议，与政府对话也许行得通，她咒骂：“对话都是狗屁。”当我在本尼·文达（自称是巴布亚反抗运动的流亡领袖）与他的妻子玛丽亚（Maria）位于牛津郊区的廉价市建

住宅里和他碰面时，也面临不信任与憎恨所形成的阻碍。文达之前逃出了印度尼西亚监狱，他说自己差点受虐而死；他年轻时曾目睹印度尼西亚军队对高地部落的叛乱分子开火。不出所料，文达认为与雅加达当局进行对话没有帮助。相反地，他将信任投注于发展迅速的独立激进人士联盟——西巴布亚联合解放运动（United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West Papua），其中有许多成员旅居海外。2016年年中，这个团体差一点就成为南太平洋国家组织之一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¹⁸⁾的正式成员。

尽管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卸下了独裁主义统治的重担，以真正当责的民选政府取代例行公事的民主体制，并且遵奉人权的“普世”价值，但自1998年之后，没有一个政府能有效解决巴布亚人的不平。年复一年，巴布亚人成为家园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因为非巴布亚移民不断从印度尼西亚其他区域流入此地。2014年当选总统的佐科·维多多承诺调查人权侵犯案件时，超越了许多领袖。正当这个目标有些进展时，他却任命一位保守派的前军队司令担任巴布亚省首长。

东南亚政府未能解决内部冲突，使暴力变成当地大部分区域的家常便饭，并通过施行戒严法与军事占领来限制民主自由，甚至放任司法不公与侵犯人权的情事持续存在，鉴于该区多数国家如今已达中等收入水平，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情形。这也让许多边境冲突地区暴露在缓冲国政策与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中，如同缅甸与中国边界的局势。以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而言，这些冲突是东南亚的致命弱点。我想起自己过去任BBC菜鸟记者时报道北爱尔兰新闻的悖论，在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遭到扼制，而《防止恐怖主义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合理化了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正当英国政府计划继续忍受往后数十年伦敦市中心的致命恐怖攻击，以捍卫英国统治的正当性与少数北爱尔兰亲英派新教徒（Loyalist Protestant）⁽¹⁹⁾的利益时，泰国政府似乎也准备好面对两倍于北爱抗争受害者的人数与更严重的日常暴力。在泰国南部，长期冲突曾在一个月內造成50—80人死伤，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泰国维安部队成员。然而，这些受害者——无论是国军、平民教师，抑或是佛教僧侣——几乎不曾被人提起；政府仿佛想用沉默来掩盖过往的苦难，而不去正视冲突的根源，或是做出可能危及主权的艰难抉择。

多数造访泰南冲突区的游客都和我一样，经由合艾机场（Hat Yai，邻近的宋卡府的区域性机场）来到此地。从商业多为华人经营、繁荣发

达的合艾，沿着状况良好、贯通泰国南北主要干线的双向车道开车横越大陆到北大年，大约需要90分钟。自2004年以来，连接泰国与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峡，每天都有枪击事件，每周都有炸弹攻击，至今已造成近7000人死亡。然而，在我2005年首度来到此地的几趟旅程中，除了设置凌乱的军事检查哨与装备轻巧的悍马军用车（Humvee）的突兀巡逻外，起初很难在平坦无奇、一望无际的橡胶园与沙滩景色中，察觉暴力冲突的踪迹。我发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伪装战争。用泰语与当地人的交谈，尤其是政府官员或安全人员在场时，只会得到他们忽视战争与满足于现状的响应。但是，如果在路边隐蔽的茶店用当地马来语与人闲聊，便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我早年的一位向导与信息提供者是个名叫易卜拉欣的年轻小伙子，他先是在泰国的大学念书，后来拿到伊斯兰奖学金前往喀土穆（Khartoum）的苏丹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Sudan）深造。易卜拉欣个性温和、笑容开朗迷人，但他很难得一笑。他在老旧的澳大利亚轿车前座置物箱里放了一把9毫米自动步枪，出于从未对我透露的原因，而且他有一条腿是假肢。

我在2004年中泰国南部再次爆发冲突的六个月后抵达此地，当时，一群训练有素的暴民动用数百支自动武器与弹药，突袭北大年南边那拉提瓦府的一座军营。对此，政府启动安全镇压行动，引发激烈反抗。2004年10月25日，好几千名青年在边境城镇达拜（Tak Bai）示威，许多人遭到逮捕，双手被捆绑着押上平板卡车，载往监狱。途中有85人死去。社会大众并未强烈抗议；虽然老一辈的退休叛乱领袖出来解释，但并没有任何人遭到究责或惩处。达拜事件标志了无止境丑陋冲突的再现，并导致东南亚近期历史上一些极其混乱的时刻。

泰国政府坚称马来穆斯林乐于继续作为泰国的一部分，强调他们享有宗教自由，譬如可以成立提供马来语课程的专属宗教学校。政府高层官员宣称，反抗军与示威者是罪犯，或者可说是行为像小孩般无理取闹的少年犯。不过，易卜拉欣与他的朋友们提到了马来穆斯林青年逐渐增长的挫折感，他们觉得自己在泰国社会中没有地位，也没有主张自我身份认同的空间。“泰国政府一直认为这是民族同化的问题，”旺·卡迪尔·曼（Wan Kadir Che Man，慈祥和蔼的北大年马来领袖，如今在马来西亚过着舒适的流放生活）表示，“他们认为马来人必须被同化、被融入到制度里，以及‘成为泰国人’……但是，北大年的马来人明白自己不是外国人，也知道他们的领土其实一直被原本是外国势力的泰国人所占据。”

同时，卷土重来的暴动由一群不表明领袖身份、也不为自身暴力行

为负责的神秘革命分子带领，他们一直给新一代战士洗脑，让他们愿意为了从“暹罗压迫者”手中独立而牺牲自己。易卜拉欣与其他人一样，年少时在当地伊斯兰学校求学以及后来到海外留学期间，都被灌输过这种教义。2004年的暴动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它发生在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仅四年后，距离其东南亚分支宗教极端组织之前在巴厘岛发起、牺牲了数百条人命的爆炸事件也只有两年。如今，泰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对佛教徒多数族群发动小规模战争。这是意图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家吗？人脉广阔的向导易卜拉欣想起自己曾在喀土穆与本·拉登一起参加晚祷会，不久后，这位鼎鼎大名的沙特百万富翁成了“圣战士”，并成立了基地组织。据他表示，本·拉登讲话轻声细语，也没有发表太多激励人心的言论，他对本·拉登没什么印象。

正是在这种暴力、恐惧与困惑的背景下，考虑和平谈判的泰国政府请求人道主义对话中心（HDC）找来叛军代表。由于我身为学生与记者在泰国长期累积的经验与人脉，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指派我联系相关人士。那是在2006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而我没有什么头绪。叛乱分子声称他们不是凶手，他们越来越少在路边埋伏突袭，也未发布任何狂妄声明。我倒是知道有一群住在马来西亚边境、年事已高的前反叛人士，以及从前亚齐叛军那儿得知了几位流亡于瑞典的领袖。于是，我们从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着手。

经过许多个月的寻找，并排除了几个错误的线索，我有了一些进展。2006年，我在埃及的秘密会议中联络到第一位相关人士。我成功说服革命民族主义阵线（Revolutionary Nationalist Front，在马来文里简称BRN）的代表团前往开罗。我们在尼罗河岸一间两星级饭店的咖啡厅里，弓着背享用了好几碗橄榄与鹰嘴豆泥，喝着装在烫手玻璃杯里热气腾腾的甜薄荷茶。代表团的团长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而其他团员大多四十几岁，胡子刮得干净整齐。他们的外貌充满书卷气，与其说是革命代表团，倒更像是学术访问团——正如他们在埃及政府面前表现出的模样。他们坚称，“圣战”不是他们玩弄的手段；他们是受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的左派革命思想所启蒙。他们本性不信任所有外国人与局外人，包括我在内。我们用马来语交谈，但有时，我们的会面感觉更像是审问。他们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甚至拒绝下榻同一间饭店。他们告诉我，保密是必要的。就像他们说的，每次他们表明身份并与另一方交涉时，领袖不是遭到杀害就是被拘留。一位团员形容：“这就像在修剪草皮。”的确，据称泰国当局在1954年谋杀了德高望重的哈吉·苏龙（Haji Sulong）——启蒙这起革命运动的男人。他们的保密起了作用，因为泰

国军队固然耗费数十亿美元增强防卫武力，拥有近40万名常备军以及用金钱就能买到的现代监测科技，还是无法击退叛军。

阿苏登（Azuddin）说：“我们抗争的基础越来越强大，因为人民开始意识到个别历史的重要性。”年迈的他曾是北大年早期的分离主义运动成员，而我是在调停冲突双方的过程中认识他的。我们通常都在哥打巴鲁（Kota Bharu）佩达纳饭店（Perdana Hotel）霉味弥漫的大厅碰面，这家年久失修的饭店建于1970年代，就位于马来西亚边界附近。阿苏登感叹：“还有泰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警察与军队对待人民的方式，以及他们看待我们的眼神。”十年了，日复一日的爆炸与枪响夺走数千条人命后，泰国高层官员挑衅地坚称，南部省份的动乱可以通过建立“泰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解决，“这将能说服人们为国家做好事，而且效忠国王”。在精心维护的南北高速公路沿途的检查哨，当地的马来穆斯林孩童愤怒地瞪着身穿凯夫拉（Kevlar）⁽²⁰⁾盔甲、头戴尺寸过大钢盔而汗流浹背的年轻农兵。那些士兵不会说马来话，难以与当地入沟通。对于这些神经兮兮的泰国士兵而言，每个人都很可疑；而对于那些孩子来说，每个泰国人都是侵略者，也是理所当然的攻击目标。

暴力局势因此持续恶化。我沿着通往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的道路，经过好几处结构脆弱、匆忙搭建的检查哨，它们看起来像是后来才加盖的设施，作为坐镇其中士兵的简略庇护所，与外头隔着铁丝网，目的是阻挡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时猛力丢掷的手榴弹。暴民是从不暴露身份的鬼魅。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在一次为了报复军方突袭伊斯兰寄宿学校的致命行动中杀害了数名泰国佛教僧侣。在邻近边界的农村寄宿学校，某个炎热下午，一位上了年纪的伊斯兰教长告诉我：“每个人都害怕被捕，我们不敢在晚上离开自己的家园。即便是身为阿訇⁽²¹⁾的我们，要这么做也是困难的。我们很难履行教学的义务。”我问他们害怕谁，或者害怕什么。他回答：“大部分人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反抗运动。失踪的人越来越多。”我问有多少人？他说：“好几千人。村民说他们在河边与森林里看到一些尸体。”

我问他反叛运动的事情。教长小声地提到革命民族主义阵线及旗下神秘的青年组织，据政府估计有五百多名成员。他说：“他们的势力遍及每一个村落。”独立运动源自伊斯兰宗教教学社群，但他们却奇妙地采用世俗手段来争取自由。没有人祈求“圣战”，或是提到可能被解读成宗教所驱使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们谈论北大年民众遭遇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政府的彻底失望。由于这场冲突是在后2001年时期宗教极端主义兴

起之际展开，因此了解这个看似违反直觉的动机有其必要。我在战区或在马来西亚边境的秘密会议中遇到的一些战士，说起话来就像率领人民抗争的游击战司令，与秉持教义或仇恨意识形态的人们相去甚远。他们为了以马来人而非穆斯林为主的文化自由与生活方式发起抗争，尽管这两个族群密不可分。在2004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从军的一名战士表示：“北大年的人民仍然十分恐惧，觉得受到很深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他们妥协。”

备受尊崇的前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指出：“政府完全不知道叛乱者的需求是什么。”他本身是来自冲突区以外偏北部省份的穆斯林。在他看来，北大年的马来人受集体民怨而生的共同助力所驱动：“这种情况就像基地组织，不需要统合的指挥架构，每个人早就蓄势待发……（大部分时候是）为了复仇。”政府也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建立皇室组织以支持信奉佛教的村民，鼓励受伤住院的士兵回到战场上寻仇。

在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暴力无情、充满误解与仇恨日益加剧的灰暗背景下，我努力居中促成和平对谈。最初的几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河畔别墅召开。反叛者——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成员——是我在好几个漆黑的夜晚到路边咖啡厅会面的同一群人；只不过这次他们身穿素净套装，像是亚洲版的“MIB星际战警”。其中一位曾在瑞典工作与生活了二十年，担任警方与法庭的翻译官，他的外表犹如民间武装部队联盟的领袖。“我们的联盟里有许多团体，其中有些默默无闻。”他带着令人胆怯的自信，叙述过去反抗军如何依照公开作战的策略对抗泰国军队，并在经历惨重死伤（部分是因为遭敌军渗透）之后，改采地下行动。1990年代中期在大马士革和开罗有过几次谈判，他表示：“但泰国人并非真心想要和解，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从内部摧毁我们。”

叛军有备而来，他们拿出备忘录，要求即将命名为“北大年”（Patani Darussalam）的、由四个南部省份与宋卡府数个行政区组成的区域，享有自治权。他们愿意考虑有限的停火以换取豁免权。泰国政府的唯一代表是个表情严肃的将军，短暂担任过议员，而且还是总理亲信，他并未展现丝毫的同情心。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也没做太多表示，只和当过泰国航空空乘员的妻子说了几句话。这个轻蔑的举动激怒了叛军：“我们被对方当作殖民对象一样对待……他们还尽量避免称我们是马来人。为什么我们非得被叫作泰国人？”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持续在泰国与马来西亚以外的中立国家召开秘

密会议。慢慢地，冲突的两方展开对话，逐渐建立互信。一些泰国安全官员与叛军发展出尴尬的往来关系，与他们在敌对的沉默中对立而坐、尽说些死板与强硬的声明的那些日子天差地别。令人沮丧的是，双方代表团都只是各自领袖的代理人。他们无法替领袖发言，也没有执行或改变政策的职权。叛军那方的代理人通常是过去在战场上打仗的战士，获得高层授予的薄弱且可轻易中止的权力。

经过多次乏味的冗长会议，双方对僵局开始有了某种共识，泰国人承认叛军要求独立的严肃意图，而叛军意识到对方永远不会对主权妥协。在这当中，双方看来都只是敷衍了事，将优渥的每日津贴占为己有，尽情享受奢侈的饭店自助飨宴。然而在一点一滴构筑的互信与互重中，进展出现了。双方都承认自己为真正的伤亡所苦。他们以渺小却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协助彼此前进——无论是更新通关文件或短暂停火，以加速信任的建立。

就沙场上的年轻战士看来，这种对话是对斗志与勇气的威胁。他们认为与国家交涉只会导致投降与背叛。更确切地说，交易哪会有什么好处？到了2016年中，对话不断受曼谷政治僵局所干扰，而在泰国政府执意推行以安全为基础的措施下，国内南部的武装运动将暴力行动扩散到古北大年苏丹国边界以外的地区。2016年8月，泰国有数个观光景点遭到突如其来的炮轰与纵火，造成四人死亡与多人受伤。虽然曼谷当局试图不将国家层级的暴力归咎于边境的分离主义冲突，但后来证实，革命民族主义阵线是幕后凶手。曼谷警方发言人纠正先前报道，指称现场的炸弹全都类似南部叛军使用的炸药，表示“这与恐怖主义不同”。他还荒谬地夸耀：“假如这是恐怖攻击，我们的情报单位就会指出是哪个组织做的。”事实上，革命民族主义阵线从未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而且就这场运动而言，曼谷敌对的政治派系相互指控，正好满足了它削弱泰国的意图。

近年来，基于一定程度的民主进展，东南亚政府面临越来越多与非国家武装组织展开对话的压力：不论是像民答那峨那样，军事解决方案失败；或是如同亚齐的局势，情况变得令人无法接受地残暴。尽管如此，对话与谈判并未获得有效利用，持续存在的民怨也蠢蠢欲动，即便是在冲突看似平息的地方，如亚齐，也是如此。双方都有面子与自尊问题。泰南地区冲突再起之后，政府花了宝贵的六年时间制定政策，合法化官员与武装叛乱成员面对面谈判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形容反叛分子是“与国家意见不合的人们”。

亚齐冲突落幕十年后，反叛运动的遗军沉浸在权力中，安于允许他们建立专属政党的特殊自治安排，也安于雅加达当局默许他们为了胜利而使用强制手段与恐吓。2016年之前处于自治下的亚齐省，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政体，支持严格执行对违法者处以公开鞭刑的伊斯兰律法。这是国际间期望的和平利益吗？我参加了亚齐和平协议的十周年纪念会，发现所有旧时的反叛领袖不是意见不合，就是抱怨这份协议的执行缺乏诚意。一位亚齐议员激动地表示：“我们曾经拥有‘麦加的前廊’（Verandah of Mecca）之美名，这是因为亚齐地理位置朝西北面向沙特阿拉伯而获得的传统标签。后来，大家称我们是和平的前廊。但是今天，我们变成失去机会的前廊。”

东南亚冲突中的正式谈判一向牵涉许多装腔作势与僵化的立场表态，造成极度不信任与缺乏诚意的态度，因而无法达致实时或可行的结果。遇到这类问题的国家一般会寻求第三方的协助，但就我的经验来看，东南亚国家通常不愿意接受外部调解。岌岌可危的主权、边陲地区的重要性与贫乏的对话，说明了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部分地区为何会持续发生次国家冲突。就如菲律宾南部的民答那峨，即使达成协议与签订和平条约，引发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1996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居中牵线，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同时，该阵线的一个派系愤而投效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²²⁾。看来，菲律宾政府2014年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的邦萨摩洛共和国全面和平协议，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于是，如此循环往复，暴力冲突的悲剧曼陀罗，让军官们摸着口袋里的津贴与回扣眉开眼笑，让军火走私商赚得不亦乐乎，也让政客们靠着佣兵与军火得以在每五年一次的选举中无往不利。

有鉴于东南亚的经济与战略重要性，忽视这些旷日持久的次国家冲突，或者拒绝寻求和平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罪愆。随着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扩大到以前位处边陲的地区，这种行为变得更具毁灭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中，许多冲突地区横跨战略性的边境特区与贸易管道，譬如泰国南部或中缅边界；当东南亚十个国家一致宣示大家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些冲突区偶尔也会出现暴动。过去十年来，循着地方冲突与暴力的路径，我试着劝说人们握手言和，尽管进展不多，却一直给我启示。这份工作使我更实际地去看待这个区域，程度远比以前身为对争取自由抱持空想的记者时来得深。显然，无论有无外在的激励或干扰，今日解决这些冲突最合理的方式，会是各国对地方分权与自治

的要求，采取与时俱进且宽容的态度。许多宣称基于主权理想的抗争动机，不过是为了掩饰自私的个人利益——保有官位或有利可图的非法收入来源，有时甚至还替军事支出寻找合理借口。和平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其中包含了妥协，但是，东南亚地区至今依然将让步看成是示弱、丢脸。为了保住颜面，人们采取极端立场，坚持己见。暴力接踵而来，然后去满足其他更加功利的欲望。

我办公室墙上的照片中，那名手持生锈冲锋枪的年轻男子，想必是泰缅边境内战时期出生的第二代。当时带领我跨越边境的男人，是“勃欧民族解放军”一位名为奥凯尔（Okker）的年轻上校，如今他加入了与缅甸政府协商实行联邦体制的组织。至于照片里的小伙子，他的孩子与现在的士兵也很有可能全装备着由中国制造的更现代化的武器和新制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的挣扎永远没有尽头。

- (1) 遭到放逐的西巴布亚独立运动领袖，现居英国。
- (2) 东南亚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宗教恐怖组织。
- (3) 由多个没有联合国席位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1991年2月11日成立，但2004年以后，该组织实际运作停滞。——编者注
- (4) 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是一个伊斯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其成员国遍及中东、中亚、西非、北非和印度，共计有57个国家。
- (5)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中称之为“大泥”。
- (6) 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国王或土邦君主、酋长的称呼。
- (7) 南亚语系，主要是生活在泰国和缅甸的孟族所说的语言。
- (8) 据传，勃固王国是由两位孟族公主于公元573年建立。
- (9) 缅甸土司是受中国土司制度影响形成，主要推行于掸人地区。东吁王朝征服掸人地区后，沿用明朝土司制度的基础，结合掸人社会的特点，并融入缅甸政治制度，建立了缅甸的土司制度。这项制度在贡榜王朝时期更加确立，是近代英国在缅甸实施分治政策的基础之一，对缅甸联邦的构建与缅甸民族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 (10) 首任缅甸总统，末代永贵（Yawnghwe）土司。
- (11) 印度尼西亚记者、作家，也是《印尼拉亚报》（*Indonesia Raya Newspaper*）的创办人。作品《雅加达的黄昏》（*Senja di Jakarta*）是印度尼西亚首部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他反对印度尼西亚建国领袖及首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并因此遭到监禁。2000年被国际新闻学会选为过去五十年的50位国际新闻自由英雄之一。
- (12) 即也拉府、北大年府和那拉提瓦府。

- (13) 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又称“越南战争”，是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越南共和国”（俗称“南越”）政权，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与“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从19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1975年西贡（现胡志明市）沦陷。
- (14) 菲律宾自治区，取代旧有的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ARMM），并拥有更大的自治权。2014年3月，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邦萨摩洛全面协议，该协议将以“邦萨摩洛”政治实体取代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标志着菲律宾政府与南部伊斯兰分离运动之间长达17年的和平谈判宣告完结。
- (15) 苏禄在被并入菲律宾之前，是一个独立的苏丹国。
- (16) 赵赞永贵（1939—2004），著有《缅甸的掸族：一个流亡掸人的回忆录》（*The Shan of Burma: Memoirs of a Shan Exiled*，1987年初版）。
- (17) 召楠眼罕（Sao Nang Hearn Kham），木邦土司之女。苏瑞泰过世之后，她携子前往泰国进行掸族独立运动。
- (18) 1986年由美拉尼西亚四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共和国，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的卡奈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Kanak and Socialis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KS）组成的跨政府组织，旨在促进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经济。2015年，印度尼西亚成为联合会员。
- (19) 这里是指赞成北爱尔兰与英国统一的人。
- (20) 一种高强度纤维，多用于制作军用防护配备。
- (21) 对伊斯兰教学者或教师的尊称。
- (22)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72年。1977年，哈希姆·萨拉马特（Hashim Salamat）脱离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第十章 信仰冲突

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想成为阿拉伯人、奉行阿拉伯文化，不想遵守我们马来人的习俗传统，那就做吧。我也欢迎你们去沙特阿拉伯生活。

——柔佛州已故苏丹伊斯干达

1980年代中期，在爪哇的中部城市日惹，过去身穿破牛仔裤且留着长发的男学生，开始蓄起小撮胡子、戴上白色无檐帽；女生们则开始用“希贾布”（hijab）^①遮盖头顶与脸部。到了2004年，当地足球俱乐部 Slemaniyya 的支持者，穿上印有醒目本·拉登照片的T恤。

“这和塔利班（Taliban）或基地组织无关，我们只是想支持自己的俱乐部。”一位足球俱乐部的支持民众笑容灿烂地对我说。那就像是在参观影城，逛着重现阿拉伯半岛沙漠的东南亚布景。我与言谈温和的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法赫鲁·法拉赫（Muhammad Fajrul Fallah）在日惹一间俯瞰交通要道马里奥波罗街（Malioboro Street）的餐厅里喝着咖啡，他试着解释这些令人困惑的变化。我与多数的印度尼西亚观察者一样，认为伊斯兰的温和表现是常态，尤其是在爪哇中部，这里的精致文化体现了其古老的印度教—佛教根源与更晚近的伊斯兰表层间的微妙平衡。但是，印度尼西亚在后独裁主义时代的改革中经历了许多变迁。我与法赫鲁在具有指标意义的2004年大选前夕碰面，这场选举是自1998年独裁主义时代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总统直选。

“年轻人只是爱用伊斯兰的符号。”法赫鲁小声说道，周围汽车和机车的喇叭声与这座城市里随处可闻的三轮车铃铛声此起彼落，一片混乱喧嚣，让我几乎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们从来不会变得暴力或什么的，只会大家都上一样的课、参加一样的祷告会，而且，环境变得更开放了，所以他们觉得改变行事作风没关系。”

我对明显的悖论感到震惊：比以往开放的政治环境导致人们拒绝其他观点，使他们在更自由的情境中更加执着于正统性，进而带来偏狭与憎恨。所有这些麻痹人心的伊斯兰正统，是印度尼西亚民主过渡的可悲副作用吗？了解伊斯兰教在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中不断变动的面貌与角色，对于厘清造成东南亚冲突的关键因素非常重要。以全球的角度

来看，我们生活在与宗教分歧和冲突相关的暴力时代——以信仰之名攻击非穆斯林，而愤怒的非穆斯林仇视那些借由武力促进宗教发展却宣称和平的穆斯林。伊斯兰经典（Islamic Holy Scriptures）包含各种不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印度尼西亚最大型的阿拉伯组织之一穆罕默德协会前主席斯沙姆苏丁（Din Syamsuddin）眼中，具有“矛盾的倾向”。其中有和平与宽容的训示，也有通过权力与告诫以攻击无信仰者的强烈呼吁。错误的解读给鲁莽的政客与激进派势力开启了玩弄无知心灵的大门。在更世俗的层面上，对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²⁾而言，传统的虔诚信仰与现代的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现代背景下的穆斯林处境尴尬，”马来西亚政治家安瓦尔在狱中时如此辩驳，“我们该如何调和现代治理与传统教义？”安瓦尔与其他自由派人士主张，民主是所有穆斯林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因为他们的信仰强烈要求人们参与社会。问题是，这个开化且现代主义的观点，一直被具有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危险观点所侵蚀，后者拒绝接受民主，因为只有真主会替人民发声（*vox populi vox dei*）。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前，东南亚有好几年都深受宗教暴力极端主义折磨。基地组织最初策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之一，是计划在1995年于亚洲飞往美国的11个航班上设置炸弹。这个“波金卡计划”（Operation Bojinka）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炸弹里的化学物质过早爆炸。当时，由来自科威特、身为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炸弹攻击主谋者之一的拉姆齐·尤素福（Ramzi Yousef）率领的同一批恐怖分子，亦曾计划在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1990年代中期访问菲律宾时展开刺杀行动。基地组织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有两个原因：一是能触及支持组织理念的穆斯林；二是可进入马尼拉与曼谷等安逸自由的城市，在那里，几乎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资金也因金融法规宽松而能轻易移转。根据美国海军的报告，本·拉登的妹夫穆罕默德·贾米勒·哈利发（Mohammed Jamil Khalifa）于1990年代早期受命至马尼拉建立据点。

然而，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内，基地组织并非东南亚一系列骇人恐怖攻击的幕后主使。纽约与华盛顿特区爆发“9·11”事件不久后，根植于更长久以来力图要在印度尼西亚恢复伊斯兰国家地位的本土“圣战”组织，决定与基地组织共同对抗西方，并锁定西方人。2002年10月12日，威力强大的汽车炸弹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库塔（Kuta）市区的沙里（Sari）夜店炸得面目全非。202人丧生，遇难者多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与欧洲人，另外还有38名印度尼西亚人。我原

本已不太能接受“9·11”事件酿成美国发起反恐战争的余波，身为《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现在又面临新战线的现实，而这场战争受到阿富汗战争的前穆斯林游击队员（mujahideen）与理想破灭的神职人员组成的危险世界支配。他们满怀怨恨，长久以来因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世俗政府对宗教激进分子实施压迫政策而受尽折磨；这次，他们搭上基地组织发动的新暴力“圣战”的顺风车。不过，他们凸显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问题。

宗教极端主义引发东南亚多数“圣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瓦哈比（Wahhabi）基本教义派，这个教派诞生自18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社会运动，该运动竭力鼓吹人们重拾先知穆罕默德传统所确立的伊斯兰基本价值观。瓦哈比派与沙特王室（Royal House of Saud）结盟，巩固当代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基础。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Kamel Daoud）曾写道：“瓦哈比运动通过与女性的超现实关系、对非穆斯林踏入圣地的禁令，以及严酷的宗教律法，来彰显本身的教义。这意味着对形象与象征以至艺术的极度憎恨，也代表对身体、裸体与自由的仇恨。”在深植于艺术的细致传统与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女性享有尊重甚至权力的区域里，这样的教义看来似乎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基础。但是，它的确做到了。对于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以及全世界而言，这是怎么发生的？这又代表什么？

2016年1月底，印度尼西亚首都街道发生8人丧命的恐怖攻击，不久后，同事寄来上遍各大社交媒体版面的可疑凶手之一所发布的简短视频。视频中的男子是一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留着整齐胡须、围着头巾，手持一把自动武器，从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占领的某处对着摄像机说话。视频的背景看起来像大楼废墟。他挑衅军方与警方，放话叫他们来抓他，声音充满愤恨：“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把你们一网打尽……”这个来自爪哇农村的小子，最后怎么会到了满目疮痍的叙利亚城镇，效命于犯下近期最残酷暴行的组织？身为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驻站记者，在伊斯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于2001年9月11日无可挽回地改变之前，我见证了一些宗教激进分子的早期运动。言论自由与社会运动的限制开始松绑之际，我报道过伊斯兰社会与政治意识的崛起。我知道伊斯兰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在思考虔诚穆斯林社会的意涵时心里真正的想法。这个经验让我屡屡接触到各种社会变化，虽然当时的动向不明，事后看来却意义重大。

自“9·11”事件以来最主要的变化，是“圣战士”的意识形态经由与社

会疏离的伊斯兰青年所组成的地下网络蔓延，并在地势崎岖、山地遍布的阿富汗战场与巴基斯坦纪律严谨的代奥本德派（Deobandist）⁽³⁾的马德拉沙（madrasa）⁽⁴⁾获得巩固。对许多东南亚人而言，这样的演变令人措手不及，而且出乎意料。2015年逝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在“9·11”事件一年后的2002年接受访问时，与我分享他对此议题的强烈看法。李光耀代表着与穆斯林一同成长的世代，而穆斯林虽然虔诚忠贞，实际上还是会为了共同和谐的利益接纳非穆斯林。他曾与马来西亚国父、受命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一起打高尔夫球、喝威士忌。李光耀将心中的社会愿景称为“热带伊斯兰”（tropical Islam）⁽⁵⁾：“你知道的，那里有着绿树、青草，没有沙漠，还有非常多元的族群组成。”然后，他突然又指出，这些“圣战士”正企图夺取权力与建立哈里发国。“这太荒谬了，不可能实现的。”他在装有空调、摆设平淡乏味的办公室里对我这么说。

十五年过去，他们并未建立一个称得上是哈里发国的国家，但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其他许多穆斯林占少数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却变得非常保守。因此，如今人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便利商店里再也买不到啤酒，导致印度尼西亚的主要酿酒厂宾当（Bintang）获利骤降近40%。印度尼西亚的国会议员在2015年开始讨论制定全面禁酒的法案。而在2016年，东爪哇省全面禁止贩酒。在马来西亚，某些地区实行伊斯兰惩戒法；盛产石油的小国文莱目前实施伊斯兰律法，禁止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这些表面的变化通常会引发媒体关注，但在台面下，受到信仰净化行动、更严格的宗教奉行，以及更令人忧心、为宗教牺牲的要求所影响的穆斯林社会，正暗潮汹涌。这大多可归因于新瓦哈比运动，以及同样固守教义的“萨拉菲派”（Salafist）⁽⁶⁾意识形态，它们借由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慈善捐款，散播至东南亚各个角落，并在1970年代中期（独裁主义版图正开始变化之时）石油热之后蓬勃发展。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这种外来病毒，在东南亚受到“伊斯兰国”势力所展现的激进主义新典型强化。然而，比起欧洲、北美洲与中东地区，东南亚只有少数心怀不满的穆斯林加入了“伊斯兰国”的行列——相较于突尼斯的3000人、法国的1500人，世界上最大的逊尼派（Sunni）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仅有约300人输诚。从2016年“伊斯兰国”在雅加达与吉隆坡策动的攻击看来，这个数据并没有让情况变得比较缓和。简言之：执着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以及保守伊斯兰道德观在曾被视为“温和”或“宽容”的社会散播，深度影响着支持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多元主义基本假设。这当中也具有政治意涵：当东南亚的穆斯林越来越受瓦哈比派

影响，他们就越不可能相信民主。我的父亲帕纳约蒂斯·杰拉西莫夫·瓦提裘提斯（Panayiotis Jerasimof Vatikiotis）^⑦专事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政治理论研究，他说从主权在民衍生出的现代国家地位正当性的整个概念，严重抵触伊斯兰主张，伊斯兰坚持主权属于真主，“国家世俗权力的正统性，建立在至高真主的意志与伊斯兰律法的实行上”。家父在1997年过世，不久后激进宗教超乎想象的暴力首度出现。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思想普遍强大，我们在这里可能永远都看不到像中东地区那种国家结构解体，使得“伊斯兰国”确立领土根据地的情形。但就如前一章所提到的，东南亚存在着无人管辖的地区，为暴力激进主义提供了孵化的自由环境。

来自中东地区的外在影响与刺激，一直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崛起的重要因素。1970年代吹起的石油热，促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与海湾六国大幅投资伊斯兰教育。据估计，在过去几十年里，沙特阿拉伯对海外伊斯兰教育至少投资了1000亿美元。尽管其他社会领域受到政府强硬干预，此区的宗教教育却开放私人投资，着实令人意外。在印度尼西亚，4万所或是更多宗教学校中，约有90%由私人经营，只有10%是国营。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容易出现急遽社会经济变动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人笃信宗教。宗教信仰是逃避贫穷与不确定性的避风港，若有经费可供逃离现实，便会助长信教风气。因此，在宗教信仰与认同既成为界线也是面对未知的缓冲的社会里，人们广泛拥抱宗教。宗教上的暴力激进主义使得令人担忧的教派分歧正在东南亚急速升温，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区不断变动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发展。

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人，一直以来设法在宽容氛围下恪守各自的信仰。在爪哇的城镇与城市里，教堂毗邻清真寺，穆斯林、基督徒与佛教徒的仪式充斥着古印度教的习俗。东南亚传统的多元社会中，法律保障信仰的自由并保护宗教信仰；譬如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宪法第二十八条明定，“人人得自由选择与践行他／她所选的宗教”。信徒们懂得遵守宗教信仰的界线，但还不到必须与外人隔离的程度。1980年代我在清迈读书的时候，经常跑到锡克教寺庙吃免费午餐，或是在天气炎热时待在清真寺里纳凉与沉思。今日，如果有外国脸孔走进东南亚的清真寺，假使他们不是穆斯林，也很有可能会被请出去。几年前在马来西亚一位穆斯林朋友的葬礼上，我就曾被人礼貌地挡在清真寺门外。

从其他迹象也可看出宽容与和平共存逐渐销蚀的惊人程度。在爪哇

中部，作风强硬的逊尼派穆斯林炸毁佛寺、故意破坏基督教堂，并袭击天主教徒。2015年末，亚齐北部的天主教堂遭焚毁，一万人流离失所。近年的攻击事件中，雅加达一所天主教高中的校园遭人丢掷汽油弹。少数穆斯林教派也成为攻击目标；爪哇西部的艾哈迈迪耶（Ahmadiyya）教派不断受到迫害，2013年，什叶派（Shiite）在爪哇东部与逊尼派教徒爆发激烈冲突。调查显示，2012年宗教少数族群遭遇暴力攻击事件的次数，比起前一年增加了20%，相较于2007年多了50%。

在宪法保障宗教自由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政府与法院显得无能为力。一起著名案件中，茂物市当局忽视最高法院下令解禁新教徒教堂建筑许可的判决。2016年初，在加里曼丹岛东部与西部地区，抗议小型教派“曙光群岛运动”（Gafatar，为Gerakan Fajar Nusantara的简称）的事件，使7000人无家可归，当局因此指控该教派鼓吹分离主义，并将他们全关进拘留所。

“伊斯兰防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FPI）等穆斯林施压团体，逼迫茂物市及行政区当局，禁止贩酒并强制人民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从而削弱了原本应受法律支持的宽容政策。2016年11月，受“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号召的15万人把雅加达市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身穿白衣，挥舞黑色旗帜，抗议身为华人基督徒的民选雅加达首长钟万学，因为他引述《古兰经》里某段警告穆斯林小心受非穆斯林统治的内容，而被控侮辱《古兰经》。警方讯问这位备受欢迎的市长，最终决定以亵渎罪起诉他，而政府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

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是马来多数族群认同的核心，社会日益稳定地排挤非马来族群的印度人与华人。印度教寺庙与基督教堂越来越难取得官方核发的运营许可，敬拜的地方也遭到攻击。2015年年中，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署（Malaysian 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针对表演从业人员颁布新法规，强调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观，并避免诱使人们发出“太过放肆的笑声”。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局（Malaysian Tourism Board）却又打出马来西亚为节庆国度的宣传口号。2014年底，文莱禁止圣诞节装饰，并宣布全面实施伊斯兰律法。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近年来缅甸的多数佛教族群也受到存在已久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的严重排挤。在东南亚占主流的上座部佛教被视为仁慈和平的信仰。但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样，仁慈的理想可以掩饰强烈的保卫本能。“保护信仰也是我们的义务。”来自曼德勒市的住持阿利亚万沙·比万萨尊者（Venerable Ariyawuntha Bhiwunsa）在市郊的寺院里对我如

此说道。在宝塔的幽暗庭院里，他正试着教导信众冥想的基本步骤，因为他看到，因土地与身份认同而起的族群冲突，随着国家日益开放而逐渐恶化。他的教学工具主要是数本藏书及讲道魅力。旧时的阿拉干邦（Arakan）即今日的若开邦，坐落于缅甸西岸，与孟加拉国相邻，面朝孟加拉湾。若开邦与缅甸其他地区距离遥远，长久以来一直是国内最落后的邦属。这里也是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穆斯林族群与亚洲无国籍人口最多的地方。佛教多数族群与数代以来自称罗兴亚人的穆斯林少数族群一同生活于若开邦，彼此虽然互动尴尬，但大致上还算和平，然而，缅甸政府始终对穆斯林持怀疑态度，从未正式承认罗兴亚人是一个民族。因此，罗兴亚族没有公民身份。

今日，居住在若开邦约130万名的罗兴亚人，加上主要分布于邻国孟加拉国其他地区的100多万人，占了全球无国籍人口的10%。外界认为，这个问题只是缅甸在通往民主体制与良好政府的崎岖道路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但是，当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在2012年爆发，这个挑战凸显了缅甸境内危险的宗教分歧，而且威胁到东南亚其他地区。暴力冲突不仅迫使两个族群分裂，使得罗兴亚人被迫在资源匮乏的难民营中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也使得将近20万名罗兴亚人搭船潜逃，最后却被人口贩子非法偷渡到泰国与马来西亚当廉价劳工。尽管不幸的罗兴亚族人比设法逃到欧洲的阿富汗与中东难民的人数还少，他们却是唯一因为身份认同而遭到迫害、无处可去的族群。一些罗兴亚人甚至出现在抵达欧洲沿岸的移民潮当中。

一个炎热下午，我开车到若开邦首府实兑（Sittwe）的坎多高尔（Khang Doke Khor）难民营时，看到一大片尘土飞扬、作为足球场之用的空地旁，有座临时社区中心。我在这里遇见了营长与另外几个男人，他们向我叙述自己被人逐出家园、失去投票权的经历，以及在邻近沙滩盼望船只能载他们离开以找寻新生活的漫长等待。他们介绍我与一位眼眶泛红、身材精瘦的男子认识，他自称穆罕默德·塔伊布（Mohamad Thayeb），给我讲了他儿子的故事。他在自己的儿子好不容易搭上开往马来西亚的船两个月后，接到人口贩子的电话，对方要求2000美元赎金，否则就伤害他儿子。这个悲惨的家庭只筹到700美元，因此人口贩子鞭打他的儿子，并打算让他活活饿死。穆罕默德·塔伊布强忍泪水说，多亏另一个罗兴亚难民好心照顾，儿子才捡回一命。这正是今日罗兴亚人遭受的苦难。他们过去勤奋捕鱼耕田所享有的安全与繁荣，如今在若开邦几乎已不复见。

这场宗教分歧中，双方争辩分外激烈：若开邦佛教多数族群引述19世纪的英国历史，证明罗兴亚族是英国人从孟加拉国带来的移民劳工，因此他们不是本地人。说着几乎与孟加拉国语相同语言的罗兴亚人，坚持自己是若开邦的原住民。而试图促成两个族群进行对话的做法引发盛怒与愤慨，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更因为尝试以人道援助与咨询解决问题，在若开邦不断遭到攻击。更糟的是，最初的本地化反穆斯林情绪，受到经由社交媒体散播的佛教民族主义激化，开始蔓延至缅甸其他区域。人们利用脸书与推特散播仇恨。在2014年，至少有一起反穆斯林暴力事件经由社交媒体散布关于疑似性侵的指控，后来证实是空穴来风。在缅甸设法推动踌躇不前的民主过渡发展时，这种煽动宗教憎恨的动作大多带有政治动机。

那么，宗教的派系主义与极端主义为何会在长久以宽容传统自豪的区域里滋长？答案包含几个因素。一方面，由于东南亚的经济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开始起飞，使得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面临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变动，民众也因而对信仰更加虔诚。繁荣与发展也扰乱了传统的村庄社会，并放松了认同的束缚。许多人搬到大城市，或以移民劳工的身份前往海外或跨越边界。孕育他们的紧密农村群体不仅受到家族关系约束，也受到倾向稀释宗教正统性的多面向文化与万物有灵传统的影响。我在1990年代的雅加达亲眼见证了这样的变迁，当时本土文化与传统的联结早已松绑且遭到遗忘，出身爪哇各地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传统村落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受到伊斯兰教义吸引而沉浸于宗教信仰之中。

对宗教信仰的投入，导致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在爪哇和平共处的穆斯林与基督徒，或是在缅甸一同生活的佛教徒与穆斯林，都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因为他们之间拥有毗邻而居与日常互动所衍生出的熟悉与宽容，也对本地身份认同有共识。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而言，家族关系或地方传统在发展与城市化的浪潮中遭到稀释或抹杀，宗教经常成为人们心灵的避难所，因此也是更强烈的身份标志。

同时，无论是好是坏，在民主过渡期中更加受到公众争议的政治，创造了寻找具吸引力的平台以动员选民的需求。在印度尼西亚，有些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党派并未占多数——两个公开支持伊斯兰教的政党在2004年的选举中，最多也只拿到10%的选票。从那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多于这个比例的选票。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宣示世俗理念的政党利用宗教认同寻求民众支持。这说明了印度尼西亚与缅甸的民主过渡期为何会秉持宗教政治的主张并肩前进：政党倾向以提供赞助的个人，而

不是怀抱理想的领袖为中心。信仰与宗教认同是替代建立在世俗理想之上的抱负与从属关系的实用工具。过去20年里，容易导向激进思想与极端主义行动的纯粹信仰便借助了这两种工具。我在缅甸遇到的和尚们解释，群体中的穆斯林受到外来的保守逊尼派正统观念影响，变得越来越孤傲。穆斯林族群日益分裂，佛教徒女性嫁入穆斯林家庭后，不是足不出户，就是外出时一律围上面纱。这种明显的区别导致了恐惧与猜疑，并且加深了教徒之间的摩擦。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印度尼西亚，第一代的新瓦哈比理念于1960年代晚期在社会扎下根基，并在1998年苏哈托时代结束后更加引人注目。过去除了基本锡制穹顶上的扩音器之外，外观几乎与教堂一模一样的清真寺，如今被花俏艳丽、建有砖造圆顶与高耸宣礼塔的摩尔式建筑取代。显然有大量资金流入印度尼西亚，其中大多来自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地区富有的伊斯兰基金会。有好几所当地机构成为这些外资的流通渠道，其中最知名的是1980年在沙特支持下成立的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Ilmu Pengetahuan Islam dan Arab，或称LIPIA）⁽⁸⁾，以及伊斯兰传播委员会（Dewan Dakwah Islamiyah Indonesia，简称DDII）。在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里，学生以阿拉伯文学习伊斯兰教义，穿着传统阿拉伯服装；许多毕业生获得沙特政府的资助继续到当地进修。更不为人知的是，沙特提供的资金开始改变人们的信仰，宗教学校的课程中，较为正统的罕巴里学派（Hanbali）⁽⁹⁾取代了严肃的逊尼派沙斐仪学派（Shafi'i）⁽¹⁰⁾，因而催生了沙特瓦哈比派支持的强势萨拉菲教义。沙特提供的资金用于训练中东学习中心的阿訇。这些阿訇带着对伊斯兰信仰更加狭隘、甚至激进的观念回到印度尼西亚，进而引起社会对无信仰者的憎恨。好战的“伊斯兰防卫者阵线”由哈比卜·利奇（Habib Rizieq）率领，他是接受沙特政府补助前往当地求学的伊斯兰与阿拉伯语学院毕业生，以沙特宗教警察为模板，建立强迫社会遵守伊斯兰道德约束的组织——“伊斯兰防卫者阵线”。的确，谈到宽容氛围走向宗教紧张与冲突的这些转变，印度尼西亚或许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1980年代晚期的万隆（Bandung），是早期宗教激进主义的温床。这个位于西瓜哇的繁忙省会坐落于山丘上，因为气候凉爽而颇受荷兰人喜爱。荷兰人建造绵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林立包豪斯（Bauhaus）与新艺术（Art Nouveau）建筑风格的萨沃伊·霍曼（Savoy Homann）等大饭店；荷兰人住在位于优雅的无花果树与梧桐树遮阴的街道上、外观宏伟的合掌式别墅中。20世纪初万隆理工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B) 成立后, 这里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即为万隆理工学院工程系校友。高等教育在现代蓬勃发展, 而今日的万隆更聚集了数十万名学生, 难怪这里一直是学生运动的温床。但在1970年代中期后, 苏哈托总统遏止了学生发表言论的所有正常渠道, 唯有清真寺除外。

我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多次到万隆旅游, 通常是从建于荷兰殖民时期的雅加达甘比尔车站搭下午的班车前往, 在两小时的车程中欣赏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风光。在市中心轮廓分明、富有现代感的萨勒曼清真寺 (Salman Mosque) 里, 我遇到了好几群领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中, 贾拉鲁丁·拉赫马特 (Jalalludin Rakhmat) 为我介绍他的追随者, 并解释当时的社会与政治发展。

贾拉鲁丁是求知欲旺盛的书生, 拥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气质。那段期间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火如荼, 1979年伊朗革命 (刚好发生在伊斯兰教历的15世纪初) 影响了抱持理想主义的激进青年。当时, 在其他伊斯兰世界里, 新世代的穆斯林表现出越来越不受控制的倾向, 他们憎恨世俗精英拥有财富, 受到质疑西方文明至高地位的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hood) 等组织重申伊斯兰教义的主张吸引。伊斯兰世界当时的发展, 加上印度尼西亚当时更加压抑的氛围与禁止学生参与政治, 强烈驱使年轻人去探索反抗的极限。“这些学生是我们的主要优势,” 贾拉鲁丁说, “自从政府禁止学生参与政治后, 清真寺就变成他们的圣殿, 一个他们可以表达对政治不满与失望的地方。他们谈论伊斯兰的时候, 其实是在讨论社会与政治问题, 伊斯兰教只是为了安全着想的掩护。”

我在与这些学生相处的几个月里, 明显看得出他们因为缺乏言论表达的渠道而倍感沮丧。这个阶段, 也就是以西方为目标的宗教激进主义爆发前的二十多年, 接受伊斯兰教义似乎是青年争取更多自由与民主的安全方式。我被身穿邋遢牛仔裤和留着长发的万隆群众所吸引, 这个时期, 只有少数人蓄胡或穿着阿拉伯服装。我们坐着谈论彼此对社会与政治抗争的看法长达好几个小时, 一边喝着浓郁的黑咖啡, 抽着刺鼻的Kretek甜味丁香烟。言谈中感受不到多年后将普遍存在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或对立迹象。在我看来, 他们是一群渴望自由的学生, 只是碰巧信奉伊斯兰教而已。

同时, 社会也兴起另一股潮流: 从伊斯兰教的神秘信仰与仪式实践中寻求慰藉的倾向, 以及中产阶级对于苏非派 (Sufi) 神秘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 两者皆起因于人们越来越抗拒社会成长与发展的附带效应,

例如猖獗的消费主义、长期失业与普遍的贪腐现象。奴尔科利斯·马吉德（Nurcholis Madjid）在1980年代中期创立以雅加达为据点的帕拉马迪纳基金会（Paramadina Foundation）。他逝于2005年，先前曾在东爪哇接受传统伊斯兰教育，拿了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读现代社会学。他因为提倡宽容与节制而受人敬重，而他的基金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吸引雅加达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到豪华饭店参加研讨会与训练课程，聆听现代主义派的伊斯兰学者谈论商业与伊斯兰价值之间的联结。尽管奴尔科利斯本身表现出宽容与节制的形象，比如他曾疾呼“我们要伊斯兰，不要伊斯兰政党”的口号，他依然支持在日常生活中灌输适当的伊斯兰价值。

印度尼西亚各社会阶层的民众没有大型动员的渠道可以表达对现代社会压力的关切，因此，接纳宗教信仰成了宽慰的来源。学者斯蒂芬·黑德利（Stephen Headley）指出，伊斯兰政党遭到苏哈托“新秩序”政权边缘化，伊斯兰族群价值理念的要求进而变成印度尼西亚人民可获取的唯一“公民力量”来源。伊斯兰教义因此填补了他们的空虚感。极具个人魅力的阿訇，借由数百万份流通的录音带与流行杂志，传达诚实与纯洁的价值观；他们的纯洁与虔诚形象，与见利忘义的官僚和政客大相径庭。

21世纪初，我在雅加达郊区的一所“旁多克”（pondok）拜访过一位这样的阿訇；旁多克指的是学习宗教的地方，衍生自阿拉伯文的“funduk”，意指休憩用的屋子。这位阿訇名为A. A.吉姆纳斯提埃尔（A. A. Gymnastiar），简称阿吉姆。他身穿昂贵的丝质长袍，头上围着翻折整齐的包头巾，全身散发浓郁的廉价古龙水气味。他的双手干软柔滑，握手力道轻柔却自信。数千人参加他的布道，听他以肯定、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述虔诚与纯洁的价值观，他经常运用简单的表述，例如“改变降临在更懂得生活的人们身上……”然而据新闻报道，阿吉姆在神圣的斋月期间，一场布道就能赚进数十万美元，最终替他赢得“伊斯兰小甜甜布兰妮”（“The Britney Spear of Islam”）的绰号。他经营的多家企业与出版社大量印制布道的书籍与DVD，利用旗下的电台广泛宣传。借由宗教仪式达到的净化为人们的心灵带来平静，在19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是一门好生意。这令我想起那位擅长打动人心的基督教传道士在美国建立的企业帝国。阿吉姆的企业诉诸普遍的爪哇文化，在过度拥挤、阶级分明的社会里，个人面临必须与他人维持外在和平关系的压力，因躲进神秘思辨的领域以求摆脱社会责任的沉重负担而得到平衡。对学生而言，拥抱伊斯兰仪式，让他们在声音不被听见、抱负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获得了力量。“人们无法控制环境而无能为力时，就会听从超自然力量以及

宗教力量对于环境的假设，”我的朋友贾拉鲁丁这么说道，他早在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倾向浮现之前就已开始担忧，“人们正不加思索地接纳这种笃信宗教的情形。专长物理与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宁愿把力气拿来死记硬背伊斯兰教义。他们应该要更理性一点。他们可是我们的未来啊！”

在充满政治纷扰与沉重宗教和经济压力的时代，这一切较为正统的对伊斯兰教的遵奉，就发生在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里。大约在此时，某些伊斯兰杂志如备受欢迎的*Sabili*周刊开始广泛流通。印度尼西亚社会在我眼前开始变得迥然不同：女人用布盖住头发，男人蓄起胡子、头戴白帽——过去，这是只有到麦加朝圣（Haj）的人才会穿的服装。雅加达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由世俗化的左翼总统苏哈托在1960年代开设），如萨里娜百货（Sarinah），撤掉一整层鲜艳传统蜡染服饰的柜位，让更多色彩简朴的伊斯兰头饰与祷告用品进驻。这也提醒了人们，宗教产业变得多么有利可图，除了伊斯兰高级订制服，也贩卖清真认证食品。这个独裁国家是否将这种逐渐增强的伊斯兰化视为威胁，很难说。印度尼西亚2.5亿人口中，有近90%是穆斯林，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然而，还是有人认为需要抵制这股盲目虔诚的一窝蜂热潮。印度尼西亚并未认真平衡习经院（Pesantren，伊斯兰教学校在印度尼西亚的称呼）里的宗教课程。苏哈托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成立伊斯兰神职人员的训练课程，但讽刺的是，一些到西方求学的人士回国后，带来了更危险的政治激进主义观点与包装成伊斯兰教义的左翼思想。同时，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削弱伊斯兰政党的势力之后，对伊斯兰传教活动的发展视而不见，为那些不得在政治平台上提倡伊斯兰教的人士提供了方便渠道。随着19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以沙特为据点的伊斯兰世界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成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传教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确切的金额难以估计，但就1980年代中期当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来看（对比今日的3500美元），不难想象这些资金的影响。

成就卓越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默尔·里克莱夫斯（Merle Ricklefs）在他的爪哇伊斯兰权威研究中指出，民间传教活动的成功，使政府不得不加速推动兴建清真寺的计划以追上其脚步，因而加深了信众的虔诚。到了20世纪末，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认同在中产阶级的都市青年中变得更加明显；在新瓦哈比派学者的影响下前往沙特阿拉伯受训的传教士渗透校园，大笔资金也从中东流入。印度尼西亚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

认同宗教排外的道路，而这样的认同，是接受欧洲教育的左派建国者一直希望通过宽容与多元主义的宪法保护措施去避免的。

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宗教政治激进主义早在1970年代便已在校园里生根，由年轻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改革派政治人物）安瓦尔率领的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担任开路先锋。如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受英国教育、在独立时期领导国家的马来精英具有的温和世俗倾向，逐渐受到乡村社会中清真寺与宗教学校里基层伊斯兰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基本教义派运动的基础，衍生自执政党“巫统”以及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Parti Islam Malaysia）⁽¹¹⁾之间的对立；前者倾向拥抱自由与现主义，后者则利用保守派伊斯兰平台，并要求实行伊斯兰律法，来威胁“巫统”的优越地位。1970年代中期，“巫统”曾与伊斯兰教党短暂共享权力，但这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后，开始在日常生活备受伊斯兰信仰与传统影响的马来穆斯林地区竞争选票。为了在这些大多为农村的选区中赢得胜利，“巫统”开始利用煽动性言论与更加保守的伊斯兰宗教活动，以打败伊斯兰教党保守势力。为了拟定伊斯兰议程，马哈蒂尔总理邀请安瓦尔加入“巫统”，而安瓦尔在1982年答应了。我在1990年代初被派驻到马来西亚担任通讯记者时，一年一度的“巫统”大会已变得不太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会，倒更像是野心勃勃的马来领袖夸耀自身虔诚信仰伊斯兰的平台。

在那之前，我对马来文化与社会的看法，受到自己长期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之间的联结较不紧密。某天我从马来西亚东岸登家楼（Terengganu）的小型机场飞到关丹（Kuantan），出租车司机称赞我说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问我：“你怎么不是穆斯林？”那一瞬间，我意识到马来社会在伊斯兰化的方向上走得有多远，远到如今在马来半岛上，马来人的前伊斯兰文化几乎被完全抹去。面对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巫统”的政治人物承诺守护信仰以求上位，进而促使伊斯兰教党在基层选区中积极倡议更严格地实行伊斯兰律法。

不出所料，这种基于信仰而非世俗政策的激烈选战，成为激进分子进化与寻求庇护的沃土。国家领袖担心遭到虔诚的伊斯兰敌对势力攻击，拒绝明确否认马来西亚即将成为伊斯兰国家，而非穆斯林的华人与印度人越来越胆怯，害怕多元主义与宽容的联结像隐身于宪法内的印度尼西亚一样日渐衰微。

受种种社会与政治因素强化而更加明显的信仰压力，加深了身份认同的分歧，进而凸显了东南亚各地族群在以往世代中较不显著的差异。笃信伊斯兰教对于混融的族群尤其具有变革性的影响：清真寺的规模扩大，叫拜声更加响亮，人们的服装与外貌也变得更独特。过去一度自视为印度尼西亚人或马来西亚人、泰国人或缅甸人的族群，现在似乎更加与众不同。我与缅甸和泰国的佛教领袖交谈时，听出他们对于这样的差异化感到忧心忡忡。他们问：“现代穆斯林的外表和举止怎么跟过去差这么多？”虔诚信教带来显著差异的恐惧，引发了控制互动与树立安全藩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是通过制度来达成的。在缅甸，一直以来都有防止穆斯林与佛教徒通婚的措施。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反对该国基督徒将“阿拉”一词作为真主的通称，并且借由司法规范来避免他们这么做。

逐渐扩大的宗教分歧，造成温和派的声音难以占有优势。近期，一群马来西亚的重要人士表示关切，担心国家实行伊斯兰律法所带来的争议会威胁到多元主义，保守派穆斯林学者坚称，穆斯林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族群，因此有权受伊斯兰律法治理。对此，保障宗教自由的宪法束手无策。

在缅甸，佛教徒如果质疑对穆斯林不利的激烈言论，就会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在2015年11月大选前夕，批评言辞尖刻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招致危险。2015年6月，专栏作家与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前信息官吴庭林，被控污辱宗教而遭逮捕及判刑。在这之前，他呼吁佛教民族主义者对其他信仰的少数族群更宽容一点。更令人担忧的是，印度尼西亚某家报社刊登批评“伊斯兰国”的漫画，使自家编辑遭政府指控亵渎罪。

这些事件全都显示着，东南亚的两大宗教之间开始浮现令人忧心的裂缝，可能会在这个区域蹒跚步向社会与经济整合的同时，造成分裂。佛教徒大多居住在内陆国家，而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岛屿国家。穆斯林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一半。小规模示威运动早已处处可见。来自以佛教为主的缅甸若开邦穆斯林，逐渐流向以穆斯林为多数的马来西亚；来自马来穆斯林为大宗的泰国南部三省的佛教徒，经历了十年针对佛教僧侣与伊斯兰传教士的族群冲突后，陆续出走。这不代表东南亚必将转变为中东与部分非洲地区所见的极端暴力局势，但是为东南亚提供良好稳定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已经遭到撕裂，需要加以修补。在自由放任与倍受争议的政治背景下，这个问题成为真正的挑战。

我在东南亚从事报道工作的三十年里，社会积极接纳宗教信仰，取代许多人在1980年代之前赖以逃避困境的世俗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虽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了笃信宗教的现象，但政治始终才是关键的驱动因素。

伊斯兰之家在印度尼西亚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而发起的叛乱，在1960年代遭到武力镇压，往后的二十五年里，牵连或支持伊斯兰之家的宗教激进分子不是锒铛入狱，就是受到贱民般的对待。过去，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尽其所能地削弱伊斯兰的政治抱负。1990年代初伊斯兰情感获得政治渠道后，这种情况无预警地改变了。由于军方对苏哈托权力过剩（尤其是家族垄断企业）日益不安，这位总统认为有必要拉拢人民。当时，苏哈托接纳被下放到边陲地带数十年的“绿党”（the Greens，对穆斯林游说团体的称呼）的举动，似乎是为了牵制军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但对于认为自身势力未适当反映于权力结构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机会。“我们穆斯林因为没能整合，所以势力衰弱，”1990年年中，我在泗水的艾法拉赫清真寺（Al Falah Mosque）里遇到的年迈穆斯林学者如此感叹，“为了促成有效整合，我们只能采用政治参与的手段。”规模最大的阿拉伯组织宗教学者复兴会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也呼应了这种慨叹，在我与这位十年后注定成为总统、几乎完全失明的神职人员举行的定期会议上，他对我说：“我们势力庞大，苏哈托需要我们。”一年后，伊斯兰知识分子与学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slamic Intellectual and Scholars，ICMI）在苏哈托信赖的科技部部长、即将继任总统大位的哈比比的赞助下，于1991年在东爪哇出产香甜苹果的迷人山镇玛琅（Malang）正式开幕，长久企盼的整合基础与伊斯兰参政终于确立。

正如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在1960年代接纳共产党，以建立广大民意基础并抗衡军方势力，苏哈托在1990年代初期也为了寻求支持而接受伊斯兰信仰。在军方支持下掌权而追寻伊斯兰正统性的这种需求，与巴基斯坦军事强人齐亚·哈克（Zia-ul-Haq）选择的道路相似，他在1970年代中期的军事政变中推翻平民政府，之后开始推行严格的伊斯兰化政策。借此，齐亚为政治伊斯兰对今日巴基斯坦造成的重大影响奠定了基础。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而言，到了1980年代中期，军方显然越来越担心他集结的权力与赞助。为了与军方势力抗衡，苏哈托成立伊斯兰知识分子与学者协会，开始培植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政治与军事人才（这是典型的分权治理策略），而这位身材发福的总统在1991年到麦加朝圣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穆罕默德·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

苏哈托之所以笼络伊斯兰知识分子，几乎可以确定是因为比起改变印度尼西亚的根本世俗基础，他对于巩固权力基石的短期目标更感兴趣。此外，他也从某些在伊斯兰意义上被认定为“绿党”的军方人士中，发展了现成的支持者。这个情况与土耳其相反，当地军方以世俗自居，而且大约在同一时期逐渐偏向伊斯兰政党。但是，受苏哈托赞助的伊斯兰势力有别的想法。当时一位顶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告诉我：“我们担心印度尼西亚可能会黎巴嫩化；经济精英是华人与基督徒，军队首领是基督徒，其他全是穆斯林。这样的组成非常危险，需要平衡。”军方与许多基督徒精英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侨日益担忧。他们认为，给宣扬基本教义派的伊斯兰价值观打开大门，等同于赋予穆斯林多数族群危险的权力，而这样的伊斯兰价值观已经因为沙特资金的流入在印度尼西亚社会酝酿多时。今日，穆斯林暴徒挑战华人基督徒市长，证明了那些知识分子当初的担忧是正确的。

起初，军方象征性地支持伊斯兰，但是之后，军方的势力在穆斯林的赞助下逐渐壮大；掌权的穆斯林开始玩弄政治手段，很快地，政府开始难以质疑或限制虔诚教与教条主义的同步蔓延。这全都发生在沙特阿拉伯人积极复兴逊尼派以对抗什叶派的时代。广义而言，沙特阿拉伯亟欲削弱在他们看来因伊朗革命成功而扩散的什叶派思想。与伊拉克之间耗时十年的战争，使伊朗变得衰弱与孤立；毛拉⁽¹²⁾则忙着内部整合。这意味着唯一的外部支持与影响，来自极度排外与具争议性的瓦哈比主义。

在马来西亚，宗教政治以类似方式发展，而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政治背景下，伊斯兰信仰也受权力的谋夺所控制。如先前所提，泛马来亚伊斯兰教党（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¹³⁾的崛起，彰显出日渐加强的宗教与政治姿态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政党成立于1951年，多年来与主流政党“巫统”分庭抗礼。它与“巫统”同属左倾党派，对伊斯兰信仰的拥护也并无不同。这个局势从1980年代初开始转变，反映了源于伊朗革命、更具基本教义派色彩思想的传播，即激励了众多学子以及我在万隆的友人贾拉鲁丁等激进青年的思想。从此刻起，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开始提倡更纯粹的伊斯兰教义，暗中破坏“巫统”在马来农村选区拥有的支持，这反映出马来人不该只是口头上说说伊斯兰教义，而应该将其视为生活方式的感受。

我报道1990年代的补选宣传活动时，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雄辩口才与具说服力的观点印象深刻。在人口较少的村庄，尤其在信仰与传

统价值受农耕生活放大的北部，该党的领袖们让民众觉得，他们是在乎人民福祉、信仰虔诚的单纯人士。他们表示，“巫统”允许马来人贪污，而且受到非穆斯林控制。这些想法中有许多是隐晦不明的，而且难以想象它们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即保障多元主义与排除伊斯兰国家排外面向的情况下，付诸实行；尽管如此，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于1990年在马来半岛东北岸的自治州吉兰丹得到了多数选票。在寡言却极具魅力的谦逊传教士尼克·阿齐兹（Ustaz Nik Aziz Nik Mat）的率领下，吉兰丹州推行伊斯兰律法，缓慢而稳定地步上伊斯兰国家的轨道。

为了对抗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这些动作及挽救大量流失的政治基础，“巫统”被迫以自命不凡的方式独力开展伊斯兰化。如新加坡学者廖振扬（Joseph Liow）关于伊斯兰在当代马来西亚的出色研究所指出，“掌控局势已成为一种竞争”。为了显示他们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的激烈反抗是有意义的，“巫统”领袖利用自己对政府机器的掌控，将伊斯兰价值导入官僚制度，将随和被动的伊斯兰宗教活动，转变成约束未婚伴侣、惩治拒绝在斋月禁食的穆斯林，以及近年来以严厉的煽动叛乱罪起诉伊斯兰批评者等一系列强硬措施。马来西亚作家与记者拉赫曼·拉希德（Rehman Rashid）在抒情著作《马来西亚之旅》（*A Malaysian Journey*）中有感而发，称伊斯兰存在“可怕的迷思，接近狂热的信仰”。本身是马来穆斯林的拉赫曼，引述了一名印度出租车司机对城市里清真寺外的虔诚穆斯林群众的评论：“这些人是追随者。如果有好的领袖，他们就会成为好人；有坏的领袖，他们就会变成坏人。”事实上，在能够有效利用政府力量钳制毛拉的强人领袖（如马哈蒂尔）带领下，非穆斯林的少数族群安全无虞。但在2003年，马哈蒂尔将政权交接给副手阿卜杜拉之后，官方放宽了对毛拉的限制。

约在此时，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政府被迫面对激进宗教运动的兴起，认真考虑非穆斯林族群的忧虑。19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禁止人民信奉践行无害苦行的伊斯兰教派澳尔根（Al-Arqam）。他们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不具威胁性的怪人，靠着贩卖腌菜和蜜饯养活多名妻子。尽管族群多元的马来西亚明显对极端主义团体有所警觉，不过，正是因为一群印度尼西亚人逃到了明确保护伊斯兰虔信与学术的马来西亚，后来在巴厘岛与雅加达发动恐怖攻击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ya，JI）⁽¹⁴⁾才会诞生。

设法推动印度尼西亚成为伊斯兰国家、却在1960年代遭击溃的人物，包含了阿布·巴卡尔·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与阿卜杜拉·松卡尔

（Abdullah Sungkar），他们都是阿拉伯裔印度尼西亚人。这两人经由效忠伊斯兰之家的阿訇与激进人士的潜在网络，引领日趋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而此运动受赛义德·库图卜（Sayyid Qutub）与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的穆斯林兄弟会教义的影响尤巨。两人在1970年代晚期遭印度尼西亚当局囚禁，后于1982年逃到马来西亚。之后，这两人借由阿訇身份，结识了在阿富汗当穆斯林“圣战士”的马来西亚人与印度尼西亚人。正是这些人带头为伊斯兰祈祷团招募人力，而美国反恐专家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形容他们是一群不受控的分子。最初，他们的宗旨是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古省与苏拉威西岛爆发的宗教冲突之后，向基督徒发动报复攻击。“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很快便倒向席卷全球的“圣战”浪潮。

以知识分子的层面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中论述文明冲突的文章，令世人严重恐慌。亨廷顿描绘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分歧，已逐渐转为更受信仰与文化观点所定义的思想分裂。虽然亨廷顿是如实分析，但他向世人传达出一种新的分裂感，这种感觉在冷战结束仅仅几年后便带来了冲突的威胁。这与人们对于一段历史结束后、新的全球化社会到来的狂喜相抵触。外界预测，亨廷顿的文章将会“证实穆斯林认为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并且印证伊斯兰与穆斯林将成为西方目标的预感。人们对于伊斯兰与穆斯林的负面看法将会增加”。这样的分歧要是只存在于学术领域，或是交由世故老练、拥有现代视野的政治人物处理，或许早已弥合。安瓦尔及他在1990年代中期培植的穆斯林知识青年，费尽心思才解决这个难题。

安瓦尔在竞选过程中向仰慕他的群众发表演说，指伊斯兰国家需要利用现代科技与工业发展来平衡传统教义。他谴责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他们喊完‘圣战’的口号就回家睡觉。”安瓦尔试着尽量迎合每个人。他的助手总是说，他依然保有激进的本质，尽管因为种种经验而趋于温和；事实上，他就像只政治变色龙，十分擅长取悦所有人。然而，他一方面关注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另一方面也真心想找出可以在多元与现代工业社会中推行伊斯兰教义，同时也能避免引起混乱或争议的方法，也就是减少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分歧。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安瓦尔撰文倡议“文化联合集团”（Consortium of Cultures）：“随着亚洲换上新面貌，它必定有信心能欣赏西方文明并从中学习，而西方也必须向东方学习。”当诸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顽强的独裁领袖，仍通过自己在殖民时代的英国教育背景，不断利用根基薄弱且解释不清的“亚洲价值”来抵抗西方的入侵时，安瓦尔主张亚洲若想现代化就

必须接纳西方民主与法律观念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安瓦尔的伊斯兰观点并非狭隘排外，而是兼容并蓄且文明的。

倘若安瓦尔当初没有突然被赶出政坛，他的激烈论战与启发人心的领导，或许有助于遏制后续的负面发展。1998年，在企图乘着呼吁改革的浪潮推翻马哈蒂尔却失败后，安瓦尔丢了副总理职位、遭到起诉，并因贪污与鸡奸罪锒铛入狱。飞机撞上美国双子塔时，他未作任何表示，后来他在2004年出狱时，于《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日记，内容如下：

我经常思索着，自己在人类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至少是在我的人生中）被逐出舞台，是否有不明原因。有鉴于我在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人脉，大家一定期待我在所谓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扮演某种外交角色。而我必然不愿意辜负这样的期望。

虽然安瓦尔显得自大傲慢，但他的见解有其道理。因为当炸弹紧接着“9·11”事件在巴厘岛、雅加达及其他地方陆续引爆时，人们疯狂抢着指认与消灭凶手。安瓦尔及其盟友在1990年代提倡的文明对话，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以下内容同样引自安瓦尔的日记：

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们讥笑提倡对话的想法，直指数十年来的对话仍然无法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但是，文化的对话与和平对话不同。根据197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会厌恶所有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关于对话，）《古兰经》以正面语言传递了类似信息，它告诉我们，真主创造国家与部落，好让我们互相学习。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但会了解、也会欣赏彼此的价值——这点我非常确定——然后，我们会明白，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独占道德或正义。

一切为时已晚。李光耀口中有着绿树、青草，没有沙漠的“热带伊斯兰”，究竟有何进展？亨廷顿预测的文明分歧已化作现实，并带来骇人影响。对西方的憎恨，已经超越旧时独裁主义提倡的亚洲价值；东南亚穆斯林从阿拉伯的炉灶，而且还是7世纪源于沙漠的阿拉伯价值观，吸收了更多基本教义派的信仰表现。这进而具体改变了曾与非穆斯林邻居和谐交融、和平共处的族群。因此，如今佛教徒与基督徒感觉受到威胁，转而接受并强化自身的基本教义陈述，以保卫自我空间并划清界限。

安瓦尔缺席政坛期间（再一次入狱）⁽¹⁵⁾，文明对话的责任落在他的女儿努鲁·伊莎身上。努鲁·伊莎现为国会议员与安瓦尔创立的反对党人民联盟（People's Alliance Party）副党魁，最近，我在吉隆坡采访她，问她认为谁可以带领伊斯兰世界展开与非穆斯林之间更为宽容、理性的对话时，她直盯着自己的双手。她回答：“我们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和正义与发展党（AKP）⁽¹⁶⁾非常有信心。”当时是2016年7月，距离土耳其政变失败、埃尔多安以致力于远离西方的伊斯兰强人姿态上位，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她承认，土耳其称不上是理想模范。争取自由的奋斗，最终反而滋长了更多专制与暴力的乱象，多么讽刺啊。

- (1) 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
- (2) 犹太教、基督教（含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这些宗教皆承认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地位。
- (3) 代奥本德派诞生自19世纪中期逊尼派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为中心，最近已经扩展到英国，甚至南非。
- (4) 出自阿拉伯文，原本指的是各种教育组织，包括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的。但在西方世界，通常用于指称伊斯兰学校。
- (5) 意指正统伊斯兰教依旧是无所不包的信仰，严格规范着穆斯林的一生。但在赤道热带区域的温和文化背景下，正统伊斯兰教的严峻性质缓和许多。
- (6) 逊尼派中一种以萨拉菲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是思想广泛的流派，通常分为三类：专注宣教、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萨拉菲”，积极参与政治的“政治萨拉菲”，以及主张暴力斗争的“圣战萨拉菲”。
- (7) 1928—1977，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唯一专门研究亚洲、非洲与中东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机构，享誉世界，也是英国顶尖大学。
- (8) 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公立大学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Al-Imam Muhammad Ibn Saud Islamic University）于雅加达成立的分院。
- (9) 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学（Fiqh）的四大主流学派之一。这个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艾哈迈德·伊本·罕巴勒（Ahmad ibn Hanbal），他的弟子建立了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立场被认为较为严格且保守，尤其是在涉及伊斯兰神学的问题上。
- (10) 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学的四大主流学派之一。由阿拉伯学者沙斐仪（Al-Shafi'i）于公元9世纪初创立。另外三大学派是哈乃斐派（Hanafi）、罕巴里派和马尔基派（Maliki）。在早期的伊斯兰教中，沙斐仪派是伊斯兰教法学中遵循者最多的一派。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哈乃斐派在部分穆斯林聚居区取得主导地位。
- (11) 1951年成立时，原名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1971年改名为马来西亚泛伊斯兰教党（Pan-Islamic Party of Malaysia），后来于2011年改为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
- (12) 伊斯兰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称呼。

- (13) 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所以1951年成立时，Malaysian应该是指马来亚。
- (14) 寻求在东南亚建立独立国家的基本教义派伊斯兰武装组织，根源可追溯至1940年代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的“伊斯兰之家”运动。
- (15) 安瓦尔在2015年再度因鸡奸罪成立被判入狱五年，失去议员资格。服刑期间，在野党联盟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成立，并推选安瓦尔为联盟实权领袖。自2017年11月以来，安瓦尔因肩膀旧伤保外就医，随后一直在医院接受复健。安瓦尔的刑期原本于2018年6月8日届满，但随着希望联盟在5月9日全国大选中胜出，安瓦尔已获马哈蒂尔新政府特赦。
- (16) 2002年起，一直是土耳其执政党，埃尔多安是党主席，为中间偏右的温和伊斯兰保守派土耳其政党。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地理条件注定，位居大国边缘的小国，随时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

昂陶（Aung Thaw）准将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前倾，在符合这个场合的礼节下，尽可能地强调：“缅甸跟其他东南亚国家完全不一样。”黝黑的肤色与精壮的身材呈现出典型的军官形象，掩饰了这位国防部副部长的出色才智与开放立场。“你看，”他接着说，“我们周围都是强大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很幸运，它由数个群岛组成，不会受到陆路的威胁。”

这位将军极力表明，缅甸以东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185公里，以西与印度接壤的边境线为1463公里。

我们在缅甸毫无生气的现代化首都内比都（建于国家的中心位置，据说是为了保护政府不受侵略）见面仅几个月后，这位将军的战略顾虑成真了。2015年头几个月，主要由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NDAA）羽翼下的华裔所组成的致命叛乱势力，攻击驻守中缅边界果敢（Kokang）地区的缅甸军队。战争因此爆发，之后的几个月里，有近千名缅甸军人牺牲，缅甸军方表示，其中大约有200名军官被叛军的狙击手以据称是中国制造的精密来复枪杀害。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宣称拥有5000名兵力。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现代武器由中国制造。短短几个月后，印度特种部队攻击小队于2015年6月初偕同直升机部队跨越缅甸西部边界，拦截疑似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Manipur）多次突袭印度军队的叛乱分子。对于毗邻两大强国的缅甸而言，光是担心两国的影响都来不及，还得面临武装冲突与入侵威胁。

我在本书开头描述了东南亚介于“季风吹拂下”的繁忙贸易路线之间的机缘巧合。历史上，这种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对东南亚地区相当有利，确保大量的贸易机会，以及流通的商业往来所带来的科技与文化副产品。交通的便利性也让东南亚地区容易遭受侵扰。现代东南亚从最近的两次入侵中复原，已经花了快一个世纪的时间：一次是欧洲人向东持续约400年的侵略；另一次是日本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南进。这两次

的帝国入侵都开创了新时代。阅读任何有关东南亚的当代观点或分析，不难察觉中国带来的新影响。在这一章，我将探讨现代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动态，以及这个区域面对世界上最大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所迎来的挑战。除了人口稀少的中亚、同样罕有人居、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东部省份、印度，或巴基斯坦与尼泊尔的高海拔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世界上没有任何区域比东南亚更靠近中国，更容易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此外，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可说是今日世界超级强权的较量戏码中最重要的一条支线，在美国试图摆脱长达20年的中东纠缠之际，中国的崛起，驱使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战场，建立战略“枢纽”。几乎如同19与20世纪的巴尔干半岛，东南亚位于逐渐受强权争夺的地缘政治板块边缘。西边的印度虽然倾向不结盟与追求和次大陆密切相关的利益，却因为与中国的边界问题而不得不与美国交好。某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指出，东边的中国“意图重拾它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对于以地缘政治炼金术为生的众多学者与战略思想家而言，亚洲的大博弈（Great Game）^①蓄势待发。

在人口结构和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有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从现今的中国云南省沿着湍急河流，跨越平缓起伏的山丘，来到并居住在东南亚大陆。蒙古人在13世纪为当时的中国打下云南的江山，该省随后成为蒙古入侵缅甸的据点。今日，云南拥有4500万人口与2000亿美元的经济产值，是中国经由东南亚将沟通渠道延伸到海域的军事重地。如英国知名汉学家费子智（C. P. Fitzgerald）提到的：“中国的影响、文化与势力，自人类最初拥有可靠的历史影响力的时代以来，便不断向南推进。”

中文词汇“南洋”，指称涵盖中国与东南亚海洋与陆地交界的温暖南方地带。看似与太平洋有关的这个词汇，也用来指涉数世纪以来移民东南亚并建立成功商业社群的华人（南洋人）。对面临各式地缘影响的东南亚而言，中国不只带来军事上的压力，也牵涉人口统计的逻辑思维——意即东南亚必须知道，隔壁住了13亿人口。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中国对移民东南亚且握有该区大部分财富的3000多万华人有任何想法，又会发生什么事？正是这种潜意识里对大量中国移民的恐惧，以及中国对该区华裔族群先入为主的域外主张，而非经由军事力量实际侵略海陆的威胁，让许多东南亚政府时刻都在担心自身的主权。

自19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间不曾出现真枪实弹的战争。先前描述

的有害内部冲突隐藏在孤立与漠视的帘幕之后，而且鲜少跨越国界。似乎没有人希望通过外在军事力量威胁东南亚，而美国尽管在越战后留下负面形象，仍然充当这个地区守卫者的角色。美国空军出动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与“北越”的记忆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以“地方而非基地”的观点来看待东南亚的友好的暂时性表现。美国水陆两用的船舰与直升机运送粮食与用水给2004年亚齐省海啸难民的情景，取代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东南亚的威胁形象。这个和善的安全形象对东南亚大有帮助，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止。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于河内发表有意挑战中国的演说后，情势开始有了变化。根据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需要更强硬地主张在东南亚战略地位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将矛头指向中国对南海的主张。“我们认为，声索国⁽²⁾在追求领土主张与连队及海域权利时，应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希拉里表示，“依照国际法惯例，南海海域的合法主权应完全衍生自对于自然地貌的正当主权。”这段言论直接针对中国坚称拥有整片南海海域主权的主张，以及中国地图和护照上所绘的著名的九段线主张⁽³⁾。

对此，中国坚决主张其南海主权。到了2016年年中，中国已在处于亚洲几处最繁忙航线中的小型珊瑚礁地貌上，打造出数条能够承载现代战斗机与巨型运输机的跑道。这些岛屿也部署了高频雷达与高海拔导弹连。在这些岛屿周围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军船舰或飞机，都收到中国强硬要求它们离开的消息。

中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影响一直难以估量。尽管外界对于中国从一个被孤立与贫穷的国家跃升为全球大国感到极度恐慌，但这个国家从1970年代以来，并未真正与任何国家发生过战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军队的能力与实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国的军事预算在全世界的排名仅次于美国。然而，中国直接的军事干预并不是困扰东南亚的因素。东南亚政府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与身为经济强权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打交道。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⁴⁾将军说过，亚洲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是中国没有兴趣或不关心的。如今，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与10兆经济产值，这番话似乎比以往都还要真实。

中国于1978年宣布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起飞，得以为东南亚的商品与服务提供近距离的市场。某些人指出，邓小平受新加坡等华人占多数的繁荣国家的成功启发，意识到以华人为主的海外社会所能带来的机遇，而且预见了这些社会将对中国由农民驱动的农业经济带来革

命性影响。同样地，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机会，也被视为东南亚发展与蓬勃的重要驱动因素，相较于2000年的320亿美元，现今东盟十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只位居第四。东南亚一度担忧中国的低人力成本会吸走他对东南亚的投资，但现在就中国境内的工资增长（目前平均月薪超过1670美元，而2015年的印度尼西亚、缅甸与菲律宾平均月薪约1100美元）来看，这似乎不太是个问题。今日，一些低端制造业甚至从中国移往印度尼西亚等收入较低的国家。

当然，假如中国经济崩盘，必会重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过去两年来由于中国增长放缓而减少的稻米需求，早已打击泰国与越南等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假使衰退演变成危机，东南亚未言明的恐惧便会是涌入的中国移民，情况就类似19世纪末、清朝于1911年灭亡不久前，数十万中国穷人从旧时通商口岸争相进入东南亚，也如同17世纪中叶明朝衰亡后规模较小的中国移民潮。中国的朝代变迁在历史上一直是驱使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因素。中国投资东南亚港口与高速铁路等大型基础建设计划，再次引发最近一波的华人移民潮。中国劳工争先抢夺加入建设计划，并且经由东南亚边境地区的经济特区渗入该区，而这些东南亚经济特区已初具唐人街的风貌。

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东南亚与中国有过各种交涉经验。如之前所提，蒙古人在13世纪曾经侵略缅甸。他们好高骛远，因此没能成功入侵。之后，明朝在15世纪初至中叶再次尝试掠取越南，依旧失败了。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清朝对缅甸贡榜王朝发动了四次侵略——起初可能是追捕寻求缅甸朝廷庇护与支持的明朝难民的惩罚性征战。这些入侵行动全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军队过度扩张，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平原、纪律良好的部队，在东南亚环境恶劣的丛林里陷入困境、为热带疾病所扰。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首度尝试攻取缅甸失败，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东南亚。

中国似乎也并未全心致力于发展为海上霸权。亚洲最为学识渊博、成就出众的华裔学者之一王赓武主张，中国在历代的不同时间点，尤其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统治着华东与南海。15世纪初，身为穆斯林与太监的著名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人数众多的舰队从中国沿岸启程，甚至试图入侵爪哇。王赓武指出：“但是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他们认为没有真正的威胁……因此何必浪费资源？”

除却这些短暂且并不太成功的扩张事件，“天朝上国”（Middle

Kingdom) 通常与东南亚诸国维持着良性正向的关系。中国朝廷将外在世界视为充斥着野蛮人的禁地，乐于接受南方幅员广大的领土上各邦属所奉献的臣服象征。纳贡任务包括到帝国首都正式觐见，对皇帝行叩头礼，表示承认皇帝为世界之王，以及呈递贡品以示忠诚。这些一年或两年一次的进贡，为刚开始发展的邦属换来了通常利润可观的贸易权利。如1725年某位船长所记载：“三年前，我们代表暹罗王向大清皇朝进贡。当时，有人建议我们，因为稻米在暹罗非常便宜，所以4200吨的稻米要出口到广东、福建与宁波……”与世隔绝的、被封闭在紫禁城内的中国士大夫，似乎从不担心这样的安排让他们处于输面，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位居世界中心这种令人宽慰的自负。这是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称的古代中国“理性和平主义”的基础。

近期，就中国历史而言，东南亚不见明显威胁也是因为充分的内在原因：曾是前殖民时期亚洲重心的中国，两百年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或因朝代衰亡与混乱而苦恼。清朝的长期衰微在鸦片战争后尽显，紧接在后的是数十年的斗争，各地方沦为军阀领地，而后遭到日本帝国侵掠。二战结束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战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随之而来的是将近三十年的冷战孤立时期。这段为时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中国被有效隔绝于东南亚之外。直到1950年代冷战开始，中国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才开始浮现。19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有机会接管印度尼西亚，中国表示支持，却未提供实际援助。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亚洲多数地区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它纯粹是在利用谨慎的策略性影响以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存有争议。中国与苏联两大共产主义势力在1960年代因为党派分歧与更重要的领土问题而决裂。到了1978年，邓小平破天荒前往东南亚访问，与该区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崭新关系。中国政府的主要意图是继续将重要大国，特别是苏联挡在邻近地区之外。

无论如何，紧接在印度支那战争后抵抗美国势力并不是太难，因为美国政府为了疗伤止痛，在1975年之后从越南与柬埔寨撤军。到了1990年代，美国忙着在中东从事军事冒险行动，此后一直努力从中脱身。然而，或许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与划清势力范围，在缅甸共产党与缅甸军方直到1989年才结束的漫长内战中，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同年，逃到泰国南部丛林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投降。1980年代末，中国宣布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势力发动的武装抗争。

对于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中国起初以不同方式对待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与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晚期声明，外籍华人不算海外华人。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有越来越多的活动试图吸引华侨援助。19世纪人口外移的中国南部有许多地区都设立侨务委员会，吸引华侨后代回国并且 / 或者帮助建设家乡。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里，大部分流入中国大陆的投资都来自港澳台同胞与东南亚的华侨。到了1989年，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金额总计约达300亿美元，其中将近10%来自东南亚华侨。

199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新加坡宣布，中国已准备好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地区，并且暂时搁置主权问题。王赓武认为中国是因为20世纪中叶被日本帝国侵略的记忆，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之所以积极主张对一小群珊瑚礁岛（中国已在这些岛周边部署固定航空母舰）的主权，是为了拒绝给予讽刺地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U.S. Pacific Fleet）自由进出此区的权利。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南亚不论能否接受，“都将从南海议题中，厘清美国的决心与中国的意图”。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其详细描述南海主权争夺史的著作⁽⁵⁾中，更加尖锐地主张：“在我们的时代，南海的情势将定义未来。”在菲律宾政府认可中国的行动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于2016年7月做出“判决”⁽⁶⁾。中国怒斥这项“判决”，局势依旧没有改变。

作为调停者，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并从2015年开始研究如何缓和或许将成为“战争起因”（*casus belli*）的情势。中国政府国防官员接受我的访谈时表示，比起有效控制坐拥海域资源的经济开发区域，他们认为在珊瑚礁岛上插上国旗与部署军事设施才是当务之急。汉学家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cobson）说：“今日中国人觉得是时候开展斗争与停止过多让步于外人，尤其是日本与美国。许多中国人认为政府在外事务上‘优柔寡断’。”对我而言，这反倒意味着情感上告急：这是一场无法通过传统的谈判与仲裁手段轻易解决的关键权力游戏，而东南亚成为两大地缘政治势力亟欲争夺的大饼。

在东南亚陆地上，中国一直坚称并未支持共产叛乱。就在最近，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更向前倾，带着更大的兴趣和参与度，小心谨慎地在互不干涉的指导原则之下发挥影响。先前提到在中缅边界果敢邦的激烈战争，看似得到邻近云南省的幽灵企业支持，然而中国政府并未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印度指控中国通过私人贸易公司与地下情报组织为印度东

北各州叛军提供武器。中国军方对人们臆测中国官方支持这些跨境行动的想法严辞反驳，不过他们承认，当位于边境的华人族群要求提供援助时，会感受到“舆论压力”。

为了抵抗来自强大邻国无论真实或潜在的威胁，东南亚长久以来亟欲发展强而有力且具凝聚力的区域认同，以保障国土安全及发展成为共同市场。因此，旨在对抗共产激进行动、受西方支持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瓦解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67年于曼谷诞生。东盟在成立的最初四十年里，大多致力于共同安全与经济问题的国家群体发展。自由贸易的政权树立，而在2015年，东盟成员国宣示其为经济共同体，开放边界让资金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至今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关税壁垒与人力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共同承担安全责任与享受5亿人口市场利益的团结区域承诺并未真正实现，充分说明之前强调的东南亚区域主权岌岌可危，并且凸显了势力庞大的邻国所造成的威胁。

东盟倍受其他国家误解，他们以为，整合的东南亚国家群体正迈向团结。这个看法大错特错。正如比拉哈里·考斯甘所说：“在东南亚，主权是相当新潮的概念，而且往往脆弱；人们尚未遗忘历史仇恨，这个区域也受到各大强权垂涎。”东盟为了维持整体性，所有决策都在共识之下达成，这表示它在政策上无法有太多作为，而且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出任何实质决定。

尽管缺乏实质效力，东盟至少还是得以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大国对话；其中多数已签署作为此组织基础的友好合作条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预见中国崛起的西方势力与日本的强烈要求之下，东盟发起规模更大的安全论坛，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共同安全议题，当中成员甚至包含朝鲜。过去三十年来身为区域安全讨论核心人物的新加坡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盟区域论坛（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RF）成立后，“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合理或令人信服地主张，世界大国对东南亚的安全事务不具合法利益？”

然而，虽然东盟在这个安全机制的网络中占据所谓的中心地位，但过去十年里，所有围绕东盟的大国——中国、美国及（比起另外两国介入程度较少的）印度，其实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更多往来权利。从许多方面看来，小规模冷战已经开打，目的在于取得支配地位，或者至少避免有任何国家独占如今仍是全世界重要贸易廊道的地区。东南亚的问题

在于，该区国家向来都倾向平衡外部势力，而不是从中选择其一。冷战初期，美国原本尝试拿东南亚公约组织实验，在东南亚建立与北约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可惜运气不佳。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中期，东盟才正式与中国展开对话。多数的东南亚大国其实都在1990年代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其中泰国与马来西亚由于华人群庞大，早在1970年代已大胆踏出这一步。

随着越战结束及日益专注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已逐渐丧失在东南亚的势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开始根据其外交官员喜欢称之为“共赢关系”或共同利益的原则，来建立崭新的关系框架。一开始，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老挝与柬埔寨等软目标（soft targets）⁽⁷⁾上。老挝拥有共产党政府和与中国接壤的绵长边界，一直在中国发展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上占重要地位，它在道路、铁路与水坝建设计划中让步，让中国享有后勤通道与水资源，自己却面临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与自然资源衰竭的问题。耗资60亿美元建造铁路连通中国与老挝的标志性计划，使得资金短缺的老挝政府抱怨，自己被迫吃下30%的股份。对于这项建设，中国在人口不到700万的国家中投入50亿美元，并且动员30万名中国工人，势力逐渐扩大。靠近中国采矿计划区的老挝偏远地区中，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不断出现攻击华人的零星暴力事件。

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深厚的原因有二：其一，它需要可以牵制邻国越南的势力，而柬埔寨对越南尤具敌意，部分原因是柬共政权从越共衍生而来；其二，不结盟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关系。由洪森（他摆脱了柬共政权以防被清洗）领导的内战后新秩序，在他于1990年代晚期摆脱保皇党后，迅速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套用一句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话，在许多方面，正是中国在1980年代晚期协助重建柬埔寨的成功国际与区域外交，使外界最初感到逐渐崛起的中国会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今日，柬埔寨充分示范了过度亲中的隐忧，中国政府则将其形容为“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已经向柬埔寨提供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个人口仅1500万的国家，来自中国的大量军事支持（包含装备与训练）逼近2000万美元并持续攀升，中国移民估计也已达50万名，而且人数不断增加。金边市中心兴建的大型购物商场与公寓住宅的复合式建筑（离建于1960年代的地标金宝殿饭店 [Cambodiana Hotel] 仅一箭之遥），象征着中国在柬埔寨日益重要的角色。大批中国劳工进驻神州长城（Sino Great Wall）公司工地，工地上方高挂大型横幅，写着“为柬埔寨人民建造的神州长城”。

东南亚地区逐渐感受到中国对经济的影响。身为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尽管自1978年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但在199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对该区域的投资仍只有缓慢增加。最初，东南亚人投资中国是主流趋势，至少直到1990年代晚期金融危机前都是如此。成立于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如泰国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集团（Robert Kuok）与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Lippo），尽管面临来自中国当地竞争者的抵抗，但全都从首度进军中国市场的尝试中获取了可观利益。不过，自2005年起，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每年可见50%的惊人成长，预期不久后将超越日美两国。单就柬埔寨而言，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投入约100亿美元的资金。

东南亚部分地区令人不快的统治或动荡，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肥沃的投资环境。过去二十年里，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都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禁止西方企业进驻，让中国国有企业得以自由发展。这些投资大多着眼手笔重大的基础建设，例如管线、铁路、港口及水力发电设施。孟加拉湾的港口与云南之间兴建了两条管线以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建设业龙头中信集团（CITIC）等中国国有企业涌入柬埔寨，在一系列政治评论家认为太过仓促，而且需要交由昂山素季带领的新民选政府重新权衡的交易中，于管线终端的邻近地区建造水坝、港口与开发房地产。

这些投资或许能帮助中国打造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让各国政府获利，但它们的目的在于开发低廉的能源，以及开拓从中国内陆贯穿东南亚到海洋的可靠陆路。这些交易有其必要，以便中国的能源供应不会完全仰赖马六甲海峡——在任何与中国的重大权力冲突中容易遭到扼制与封锁的主要东西向海道。如美国战略思想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提出：“中国为了养活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能源、金属与战略矿产资源需求的推动下，走向国外。”东南亚也许不是原材料的最佳源头，但这个地区确实提供了进入海域的安全路径，经由这个管道，原材料可以从远地运来，进而用于基础建设。王赓武指出，长久以来，中国与其战略路线上的人民建立密切友好的关系，以满足自身需求。一如古代从中国延伸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凭借中亚游牧部落的安定而确保了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想的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必须通过与沿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来获得保障。

现代形式的资本运作，已经取代传统模式的效忠与进贡。中国提议借贷东南亚100亿美元，以加速这些交易的进行并建立一系列的资金与

投资机制，也承诺在初期挹注400亿美元给2014年建立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同年，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又称“亚投行”），意图与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⁸⁾概念的借贷机构相抗衡，例如在中国眼中专门为西方捐赠国谋利的世界银行。通过亚投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泰国发放的资金，中国也可倚赖海外华人族群的狂热兴趣来与中国企业合作。但伴随争夺交易与基础建设计划而来的，是取得土地的需求，或中国进口劳工的契约条款。令人吃惊的是，2015年，印度尼西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新移民劳工来自中国，其中多数效力于中国赞助的基础建设工程。

自此，“共赢”的概念面临压力。因为，假如中国设法建造深海港口及道路和铁路，以连接北上到中国的陆上路线，同时坚持派出成千上万名中国工人来执行这些计划，东南亚又有什么好处？过往阴暗的记忆依旧挥散不去。

中国在东南亚的庞大势力，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最为明显。这座位于克钦山以北、距离中国边界约100公里远的山城，是翡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高度价值的半宝石）的主要贸易中心。从仰光搭飞机到密支那需时近两个小时，到了当地，我发现坐落在寂静伊洛瓦底江畔的城镇弥漫着边境氛围。我下榻的简陋旅馆里，处处可见邻近小镇帕敢（Hpakant）露天矿产丰厚的照片。在那里，工人们在危险环境下（经常在晚上）艰苦地开采翡翠，挖出的矿石再由缅甸或克钦族人士挂名营运的中国企业出口，据英国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估计，这个产业在2014年的年利润超过3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在我受邀参加多道菜式晚宴的偌大中式宴会厅尤其明显，席间供应的美食可见以高价买来的异国风味中式佳肴。我在2014年造访当地时，唯一可靠的手机信号是从中国发送过来的。许多日本品牌的SUV以缅甸车牌覆盖原本的中国车牌。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于2011年决定对中国发出警告，地点也在密支那。登盛向克钦平民社会组织持续数个月的抗争低头，无预警中止耗资近40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Myitsone Dam）工程。中国原本指望能靠这项建设，以低廉成本向云南供电。

新的缅甸政府在国内寻求急需的人民支持的同时，或许也在向西方献殷勤，因为他们决定停建水电站时，正值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迈出解除制裁与开放对缅甸投资的第一步。缅甸人民显然渴望表明，他们已准备好迎接一段更加平衡的外交关系。而尽管登盛的大胆举动对中国而言

可能是个警钟，中国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建立相似的基础建设投资模式的后续行动，意味着停建决定没有太大影响。目前中国是印度尼西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新加坡等地方进行操作。这些投资大多着重于采矿与电力工程，带来许多类似之前对于密松水电站周围克钦族赖以维生的平原所造成的环境隐忧。

除了作为密松水电站灾害关键的环境考虑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有可能在东南亚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激动地警告，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将自身经济与邻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只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意图扩张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连带强化影响力与势力”。马明汉（Michael Mazza）⁽⁹⁾在《国家利益》双月刊（*The National Interest*）如此指出。许多东南亚政府担心的是，中国借由兴建道路、铁路与港口（通常与海外华人经营的当地企业合作），已在区域经済中建立稳固基础，不久的将来便会开始要求海外华人合作（假如不是效忠的话）。在与遥远冷漠、看似毫无兴趣直接干预东南亚事务的中国往来数百年后，如今双方更为错综复杂的经济与人口关系，是否会将双方的关系转变为控制与依赖的模式？

1998年5月，苏哈托政权奄奄一息的最后几个月里，抗议的怒火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蔓延，愤怒的暴民开始攻击华人经营的商行。原因为何？表面上，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货币大幅贬值，造成粮食与生活用品短缺。印度尼西亚的富裕华裔族群（人口接近800万）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持有房产与银行账户，长期反复遭到攻击。当中有许多人住在门禁森严的小区，但上一次攻击华人的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1965年，起因是当时政府的反共杀戮行动。不同的是，1998年的暴动中，中国与全球的华裔族群抗议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电视播放暴民焚烧与洗劫华人商店的画面，新闻报道华人女性遭强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护当地华人。更早之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已清楚且慎重地表示：“印度尼西亚华人不只关系到……印度尼西亚的长期稳定，也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与邻国顺利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同样地，港澳台地区民众与全球各地的华人也表达关注，不过，东南亚各国政府全都选择相信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对海外华人福祉负有责任的声明。这情形与几年前形成了强烈对比。如今，一名中国资深外交官员在排华暴动正值高峰之际，匆忙赶往雅加达监督撤离持有中国护照的民众，过去的刻意划界突然间没那么重要了。

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最早在9世纪来此寻求贸易的早期旅居人士，到13世纪被带来此地的数万名契约劳工，或是20世纪只带着“枕头与草席”来此打拼的人，华人一直是东南亚社会为人所知且值得注意的族群。今日，居住在东南亚十个国家的华人约有3000万人。其中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或福建，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从厦门与广州港口出发的定期航路建立后，大举移民东南亚。现今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口为华人，他们的祖先是英国人引进到港区工作的苦力。在马来西亚，华人近年已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600万），当初他们是为了挖掘锡矿或到茶园与橡胶园工作而来到此地。在泰国，华人移民来此寻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多的财富，占泰国总人口（约7000万）的10%以上，并为曼谷人口多数。

这些华人主要从商并居住在都市地区，基于财富与锲而不舍地与权势者培养关系，在社群中拥有分外重要的影响力。除了他信，过去二十年的泰国总理当中，至少有6位是华人后代。虽然他们大多使用本地姓名并与当地人通婚，所经营的企业仍多属家族所有且为私人控股。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而言，华人族群似乎非常团结，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朝同化的方向前进（此观点也恰巧符合学界长久以来的假设）。然而，依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观察，却并非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具备多种族背景，所以对此特别敏感：如果任何社会有一个面向是流动且可被操纵的，那便是身份认同了。

民族认同与同化，在本质上是可交易的，它们既是机会的产物，也是世系血统的事实。我有一位泰国朋友是华人，出生在泰国南部的合艾镇，毕业于学生以华人为主的檳榔嶼大英义中学（Penang Free School）及英国一所声望崇高的大学。他成年时正值冷战巅峰，当时，他为了成为货真价实的泰国人，隐瞒（或曾经隐瞒）自己的华人文化认同和语言能力。他掩饰得很好，还在几家泰国华人经营的企业集团工作，最后担任一家泰国华人银行的资深主管。不过，虽然长期浸濡在泰语与英语的世界，他仍鼓励儿女学习中文，并支持儿子到中国工作与生活的决定。到了1990年代后期，泰国重新开放人民学习中文的权利。过去，基于对共产党“第五纵队”（Communist Fifth Column）⁽¹⁰⁾的恐惧，泰国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学习中文；1980年代初期我在泰国求学时，唯一能学到中文的地方可能是泰国北部的山顶村落，奉行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孤军在1949年从中国撤退后，便在那里落脚。二十年后，泰国北部大城清迈到处是受到在当地拍摄的卖座中国爱情电影吸引的中国观光客，还有一些宣传中文学校的广告。

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预言，如同其他地方，泰国的华人将会消失。当时，这是合理的预测：对许多泰国华人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中国的亲人了。我在曼谷担任通讯记者时，有一位内勤助理透露，她的父母曾经抱怨这情形对他们造成了负担：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比以往穷得多，而许多华南村落欠缺物资，因此华南人民会拜托他们的泰国表亲探访时带各种东西回来，从摩托车到冰箱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族群鲜少或根本从未与中国的亲人联系。当他们再次能够回乡探亲，已是整整一个世代后的198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是可以赚钱与寻找新机会的地方。随着北京、上海与毗邻香港的深圳盖起一栋又一栋的办公大楼与购物商场，许多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几乎已经同化的那一代人的子女——逐渐回归祖国，开始说起中文，并且以中国人的身份找工作。

起初，中国不确定该如何面对海外华人及他们对祖国产生的新情感。当印度迅速将国内的华人正式定义为“暂居本地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中国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做法。他们对富可敌国的大亨及大型企业的所有人敞开大门，譬如泰国的正大集团与盘谷银行、马来西亚的凯瑞集团（Kerry Ingredients）及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并批准这些企业的合资交易，以利用他们的资本与技术。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Chin Sophonpanich）很快便在家乡苏州附近成立分行。但是，政府并未替无法带来资本的返乡华人提供什么便利。虽然中国的永久居留法规较其他国家宽松，但政府仍刻意不去主张这些人是本国公民。不认同政府看法的当地中国企业家，甚至认为这些南洋入侵者除了竞争，什么也贡献不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其与海外华人的经济与文化联结也随之加深。

邻近中国的东南亚，使这次的返乡潮成为卓越的归乡典范。在马来西亚发迹的糖业大亨郭鹤年，靠着自己在华成立的多家公司赚得盆丰钵满，其中以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最为突出。2015年，《财富》估计，郭鹤年的资产约达100亿美元，使他以92岁高龄成为马来西亚首富。许多像他这样饮水思源的巨擘为了报恩，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理与外界的关系。举例来说，郭鹤年入股的中信集团，为中国的龙头贸易集团。他们协助兴建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网络，并促进中国与本国的外交关系；此外也帮忙应付野蛮的外在世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些现代大班（Tai-Pan）⁽¹⁾俨然是中国在详细计划崛起之际的媒介。他们有多少财富重新投入东南亚仍是个问号。同时，2015年年

中，中国启动一项计划，让海外华人能够取得可在中国使用的身份证明，并可获得五年多次入境的签证。

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东南亚的影响与日俱增，尽管提出了一个多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战略”，但仍有声音质疑这种亲密关系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风险明显更高。今日，中国认为美国、日本以及（程度没那么高的）印度都在极力牵制它。为了因应这样的局势，中国学者正设法合理化更积极参与东南亚的政策。他们提出“建设性参与”及“和平干预”的说法。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7年12月向中国学者强调，要“积极研究热点问题”，并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答案，从而在“世界稳定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分心处理中东问题近二十年后，美国政府发现中国正在添购军火以挑战他们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并意识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挑战。与中国发生东海领土纠纷的日本，正努力摆脱战争对自身军事力量的角色与实力的限制。印度对东南亚并未实行前瞻性的政策，但近年来已在亚洲最远至越南外海的地区部署数艘军舰。

尽管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目前美国海军在南海仍拥有战略优势，南海紧张局势的形成，使中国更急于打造贯穿东南亚的陆路，以满足能源及其他资源需求。此外，随着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到7%以下，是十年来最低），国有企业更加重视在关系友好的东南亚邻国的海外投资。

2014年5月军事政变后，泰国实际上遭到签约同盟近两百年的美国排挤。华盛顿要求泰国尽快回归民主政体，否则不恢复以往的通商关系。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ny Russell）在2015年1月表示：“泰国未能及时终止戒严，恢复公民权，并且确保会制定新宪法与办理选举，因此在国际盟友的眼中益发不可靠。”面对美国的态度，泰国愤而增强军事实力，而中国政府迅即提供支持。起初，泰国看似正坚定走向中国阵营，与中国进行会谈，讨论缩短曼谷及其东北部城市与中国边境致命距离的高速铁路兴建计划。

泰国近年来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与196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冒险主义并无太大分别——据称，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30年代曾如此评论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他是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可憎的南越独裁者，对过去五十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屠杀事件视而不见。的确，中国看起来像在模仿过去处于地缘战略扩张时代的美

国。这传达了什么信息？中国已经崛起，是当今的全球强权，有更广泛的利益要维护。

泰国愿意调整与强国维持平衡关系的传统模式，让东南亚地区胆战心惊。马来西亚是下一个目标：总理纳吉布因被控盗用投资基金而走投无路的处境非常棘手，中国在2016年初提出援助方案。通过正常的招标渠道，中国国有企业支付近40亿美元，向以总理纳吉布为首、负债累累并深陷困境的1MDB基金，购买能源与房地产的资产。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9月，在支持政府的集会指控反对党遭到中国与印度少数民族控制，因此不再具有重要地位之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现身吉隆坡市区唐人街的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公开呼吁抗议人士保持冷静。新闻报道，大使在发送月饼后表示：“这里商业繁荣，观光客人潮不断。看到中国商人与马来西亚及印度商人和谐地为这个地区的发展付出，我感到骄傲。”近二十年前，印度尼西亚华人遭攻击时，这里的人曾经有魄力地声援华人。

一切种种让东南亚清楚意识到，中国逐渐提升的地位与经济力量所带来的风险与机会。中国对于新“区域秩序”的主张，呼应了19世纪美国用以合理主张其有权干涉美洲大陆事务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政策。一些东南亚国家试图平衡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质疑中国在本地区的一些主张。缅甸总统登盛暂缓密松水电站工程后，菲律宾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上挑衅中国对于南海（菲律宾政府偏好称之为西菲律宾海 [West Philippine Sea] ）主权的主张。此外，中国在新加坡兴建中华文化中心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兴建了一座新加坡文化中心。单就贸易层面而言，东南亚似乎不太可能找到取代依赖中国的可行方案。美国政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¹²⁾——旨在向所有亚洲合作伙伴（中国除外）提供有利的贸易条款——是勇敢的一步，但也是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首批受害者之一。特朗普政府明显在2017年放弃了TPP，与多边主义及自由贸易的口号渐行渐远。然而，随着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前美国亲密盟友如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国家中扩大势力，美国继续通过军事手段实践其前瞻性策略，包括派军舰到南海巡航，这种被视为侵犯主权的行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新加坡蓬勃发展，拒绝亲中以防范中国日渐增长的企业重要性与地缘政治势力。这解释了这座渺小的岛国为何一直对美国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的经济与军事优势的需求，秉持如此尖刻与坚决的态度。新加坡是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主要支持者；它允许美国军舰经常性巡防，并且与美方签订基础协议，供美国海军在亚洲海域部署新的沿海战舰。但是，持续成长的中国资本与投资，威胁到新加坡作为“非中国”的地位。马云是中国最大的数字交易与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身价近300亿美元的马云，带领阿里巴巴在中国庞大消费市场上占据了优越地位。阿里巴巴旗下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支付宝在中国拥有超过7亿名用户，他们用支付宝支付各种服务费用，从出租车车费到一碗面的饭钱，几乎无所不包。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争相延揽马云担任数字经济顾问，最后马来西亚赢了。泰国正努力说服马云建立全球电子贸易中心。东南亚似乎准备好成为马云手中早已傲视中国市场、利润甚丰的数字支付与购物平台的下一个市场。同时，亟欲巩固不亲中形象的新加坡，也正在制定与推行国家专有的全面电子支付计划，以便保持国家银行体系的独立性。但这一步也许来得太晚了些。

这个选择一目了然：与作为分界线的东南亚展开新冷战，或者同意中国的条件，接受一种全新的、迄今未能预见的经济与文化支配形式。这是西方战略家长久以来所持的观点，如同记者布赖恩·克罗泽（Brian Crozier）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看法，他将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视为“冷战‘激烈’开场的战地……强权互斗的战场”。

然而，全面冷战的局面不太可能发生。对于在南海发生的棘手冲突，不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希望引发热战，也都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会威胁到商业与贸易的发展。每年约有6兆美元的贸易资金经由南海转移，其中大多流向中国。

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近距离观察这个局势，试图为南海设想合适的危机管理行动。我曾与一位中国外交部高层官员并肩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依循中国人偏好在正式会议上表现的礼仪交谈，他说：“你们拥有地区专业化的所有优势及接触广泛学术研究的渠道；而我们仍只处于发现新事物的阶段。我请你们外国人来商谈，你们却指控我们是操弄南太平洋等遥远地区的要角，但是，这些地方有一半我们连它们在哪儿都不知道，还得上谷歌搜寻！”

相形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自己身为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力量拥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在北京，一位人民解放军高阶军官对我说：“你知道，祖国的下一场战争不会在海上开打，而是在陆地。”我问他，真的吗？不是在南海？近年来，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速度明显。“不是，”这位人民解放军官员断然说道，“我们和美国一样都对非洲与中东地区极感兴

趣。这些地方在未来都会遭到攻击，而我们跟美国一样，料想到时必定得去保卫他们。”无知曾是在冷战初期策划政变与反政变、身穿棉质军服并顶着平头的美国军人的标志。然而，中国的超级强权策略与美国并不相同。

早在1992年，东南亚国家首度对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表达担忧，并在勉强同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后，又于2013年针对更为正式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进行磋商。到2017年年中，框架草案基本成型，但没有看到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内容。大家并不指望这一准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中国指出分歧将依靠双边协商来解决。同时，中国加速推动在一连串的小型地貌上兴建飞机起降跑道的计划。最常被提及的岩礁之一永暑岛（Fiery Cross Reef）上，目前建有中国民航机与军机使用的三公里长飞机跑道。这些是引起美国高度担忧的不沉航空母舰。被西方称为“十字火礁”⁽¹³⁾的永暑岛毗邻国际间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中国宣称拥有这座岩礁及其防空区的主权，各国又该怎么办？

为了减轻压力及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向区域中友善的国家提议联合演习及其他信心建立措施。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些互动，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擅长利用非正式的“第二轨道”（Track II）⁽¹⁴⁾对话来缓和他国的恐惧。面对所有关于欠缺管理安全的正式安排的担忧，中国似乎乐于充分利用名为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的非正式安全论坛。中国官员与学者（一般也是政府官员）可在其中不拘礼节地与来自东南亚地区二十个国家的同僚与同事互动，讨论共同的安全挑战，而无须做出任何改变官方政策的承诺。涉及国防官员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与其他非正式论坛，可随时作为缓冲，让各国通过参与论坛来缓和紧张，并且为中国争取增强军事力量所需的时间。

记录中华帝国过去与他国接触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许多难以捉摸的士大夫为了避免做出可能被解读为有损帝王与国格的决定，所采取的阴谋与拖延策略。面子就是一切。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不过，阻挠手段与妄想有其限制。中国的问题在于，最晚从2010年起，基于美国的鼓励（如果不是压力），东盟便已开始向中国要求除了舒适会议与五星级饭店宴会厅里的

私下闲聊以外更多的保证。但中国不擅长与不按其条件来走的集体讨价还价。这正是危险之处。

现今中国的势力可说正值该国历史的巅峰。因为尽管满族人以其游牧根源远征中亚大草原，明朝皇帝怀抱远大外交梦想，中国的势力范围始终受到限制。然而，随着中国拥抱现代科技与参与国际经济，这些限制正逐渐消失。今日，有将近一亿名中国公民遍布中国以外的全球地区。很快地，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也将会像依赖谷歌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脸书一样，深受马云的网络理财平台影响。涌入泰国佛寺的大批中国观光客，迫使寺庙架设安全护栏。而这些中国人日益呈现机会主义移民的形象：他们身上带的不再是枕头与草席，而是iPhone、信用卡与现金，还有贪婪的胃口。巴黎的路易·威登奥特莱斯外也架起了安全护栏。人们必须记得的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从沿海地区大举外移时，如非因官方商务之需离开帝国疆界的中国人必判死罪。

中国目前有方法软硬兼施地展示实力：发展中的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¹⁵⁾可在南海以外的海域妥善部署，以及撤离利比亚与也门战争区域的中国公民。其重装海巡船（基本上是改装的海军驱逐舰）可在中国主张南海的九段线范围以外的印度尼西亚海域，抵御比以往更具侵略性的渔船。目前一家新的基础建设银行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作为东南亚各地建造港口与道路之用，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整个亚洲连接起来并直通欧洲。那么，扩大保护居住在东南亚数世纪之久的海外华人的作为呢？显然，“理性反战主义”的旧时模式在现代有其限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展开强势的主权捍卫行动，展示身为新超级大国的实力。中国期待东南亚冷静地接受这个全新的权力方程式，并且持续声明美军在该区的部署将对亚洲和平造成威胁。

今日，中国不再掩藏自己的实力或权力。如今，美国正在阻止中国的崛起，在此情况下，战争恐会爆发，而东南亚将会是战场。然而，展望东南亚的未来，我们必定可以假设，西方除了华丽的辞藻，它们抵制中国崛起的力量与兴趣也正逐渐衰退。

(1) 源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大博弈”一词一般认为是由英国探险家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所提出，后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基姆》（Kim）而流传开来。

(2) 指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如果一个地区被一个国

家和平、公然地占有50年，其他国家没异议，那么该地区就在法律上成为其领土。因此，为了宣示本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就必须发出声音，索取该领土的主权，即为“声索国”；没有发出声音主张主权的，就是“非声索国”。然而，中国未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因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所谓的“南海主权声索”就是一个西方的话语陷阱。

- (3) 九段线是中国对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的主张，九段线内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
- (4)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短暂出任临时总统，后由于左派政党反对他要求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而被迫辞职。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
- (5)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6) 此指南海仲裁案。
- (7) 指那些通常缺乏适当安全保护或难以防护的设施和资源。
- (8) 1944年7月至1973年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体系。
- (9)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研究员。该研究所为设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主要研究政府、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议题。
- (10) 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 (11) 源自广东方言，为过去广东人对外国商船船长的称呼；今日多指拥有庞大权势的商业巨子。
- (12) 最初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多边关系自由贸易协议，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正式退出该协议。美国退出后，该协议冻结约20项条文，并改组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 (13) 中国填海造陆，让原本的永暑“礁”扩大成为永暑岛。
- (14) 政府间或官方间的国际交流被称为“一轨外交”（Track I diplomacy），“二轨外交”就是非政府间、非官方的互动交流。最先提出第二轨道理论的是美国前外交官蒙特维尔（Montville）。在第一轨道官方交流，双方代表国家立场，具有强硬、排他性和防范对方的心理阻碍。第二轨道方式在没有第一轨道所背负压力之下，可较灵活、广泛地互动，发展相互信任，有利于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并可减缓政府间紧张关系，更易促使政府就某方面合作达成共识。
- (15) 指能将海上力量扩展到远洋及深海地区、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形态。蓝水海军要具有能在外洋长时间执行任务，并在宽广的大洋中保护本国及海外国土利益和安全的能力。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慢慢地，这座城市空了。海水拍打岸边的声音，与柴郡猫（cheshires）的号哭，取代了榴槌小贩的叫卖声与单车的铃响。

——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发条女孩》
（*The Windup Girl*）

抗议的民众数以万计。他们身穿白衣，挥舞着写有宣示效忠真主的阿拉伯文黑色旗帜，要求逮捕备受欢迎的雅加达民选市长钟万学，他是华裔基督徒。这起在2016年11月初将我困在雅加达市区的抗议行动，因为人称“阿学”的市长而起，据说他称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支持非穆斯林的领袖。抗议的主要策划者是据称由政治人士与维安部队资助的军事施压团体“伊斯兰防卫者阵线”，他们指控阿学亵渎伊斯兰教。“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动员了至少15万人走上街头。在幕后主使示威运动的政治人物，可能以为自己能控制这些刻意动员的暴民，据估计，这起雅加达的抗议集会花了近百万美元。但是，到场的好战强硬分子烧毁警车，不断冲撞保护总统府的警方封锁线，表现对于低收入、物价上涨与政府驱逐人民的满腔愤怒与挫败。2016年10月，世界银行针对低得吓人的印度尼西亚平均家庭所得统计数字表示：“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消费市场中，富含蛋白质与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售价非常高，大部分的蔬果与家禽也是如此……这些营养更丰富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的价格，相较于欠缺农业且几乎所有食物都仰赖进口的新加坡，要高出许多。”除了食物通胀之外，那天的抗议也显现出，民怨与社会不满是多么容易演变成种族与宗教仇恨。我看着穿着白衣的抗议人士排成好几列长排队伍，挥动着貌似有关“伊斯兰国”的旗帜时，深感震撼，因为他们象征了分裂社会刚获得的权利与自由所带来的承诺与威胁。

这场突如其来的抗议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回响，持续了一段时间。一方面，11月4日的抗议与12月2日更大规模的示威，肇因都在于雅加达首长选举中关于2019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相互竞争的数名候选人，亟欲削弱阿学清廉高效的形象，也决心破坏支持率在当选两年后仍有60%的民选总统的地位。在现代印度尼西亚，以种族与宗教为由攻击经正当程序当选的领袖，是卑劣却有效的政治操控手段，可以省去高成本宣传的需求与利用政见或实际政绩说服人们的挑战。这反映出政治竞选活动非

常容易牵扯种族与宗教。但这么做的同时，印度尼西亚也面临令人困扰的现实。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包容性的印度尼西亚认同，但过去几年来，偏见的丑陋面浮现（虽然是出于政治动机），持续侵蚀作为印度尼西亚人认同核心的宽容、多元主义与多样性。

这次短暂接触政治策动的憎恨，深刻地提醒我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脆弱。尽管民主多元主义（二十年漫长过渡期的果实）带来了契机，在此情况下，得来不易的自由却被公然用于引发种族与宗教偏见以满足政治利益。这些议题轻易便被带上街头并转成暴力，也说明了本书一再传达的担忧：体制缺乏整合与发展，或是不够尊重法律。为什么政党没有促进宽容与平等价值观的责任？为何国会议员不能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讨论这个议题？抗议爆发的那天，总统人在哪里？显然，他选择去视察市郊的铁路工程。之后他的幕僚告诉我，有人给了他不当的建议。在那天，他的领导能力令人失望地消失了。在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维护着非穆斯林的权利；愤怒的暴民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践踏这些权利。

这次抗议事件后，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声势摇摇欲坠。我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依旧乐观地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将能自我修正，而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温和核心必能抵抗憎恨与偏执的浪潮。我不像他这么肯定。两周后，在穆斯林民族主义人士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伊娃·桑达利（Eva Sundari）说得很好：“我们的宽容原则正受到威胁与考验。”她沉痛地指出，温和的“沉默多数”依然保持沉默。

鉴于我在本书中描述的变迁与退化，未来（以2050年为例）东南亚在另一个世代空间会是什么样子？东南亚人虽然活在当下，容易遗忘过去，却也关心着未来，因为那关系到他们的家族财富与命运。“过去是痛苦的，现在是轻松的，”马来西亚小说家欧大旭写道，“这是实际的问题：他们只想好好过生活。”然而，我有许多东南亚朋友对未来感到忧心。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对比，乐天的西方人全都期待东南亚区域的绚烂与成长，看好它的耀眼未来，而焦虑的东南亚人，无论富有或贫穷，都担心着潜伏的灾难。

泰国与缅甸的人们尤其迷信未来的命定，经常向算命师与灵媒求神问卜。其中最有名的占卜师去世之前住在仰光，人称ET。这位残障的中年妇女因为外形长得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电影里的友善外星人，而有此称号。她曾替许多信徒指点迷津，其中包含缅甸

前军事独裁者丹瑞将军（General Than Shwe）及前泰国总理他信。据说她靠预言赚了数百万美元，由于失聪与口齿不清，她的预言都由姐姐翻译。如果她还在世，可能永远都不需要退休。东南亚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与现代世界关系良好，却深受源自人类愚行与贪婪而骤降的灾难所苦。东南亚的人们确实应该担心。

在窥视个中奥秘之前，让我先简述本书探讨的主题。第一，根据我四十年来的经历，有一件事亘久不变，那就是东南亚的精英分子始终自私自利，他们会为了自身的财富与权力而任意牺牲人民的权利。政治的激烈动荡、长期未解的社会冲突因素、惊人的财富差距，以及长久以来因犯罪免责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和人命损失，已经清楚反映了这个现象。尽管东南亚国家比今日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更常宣称自己坚守多数的民主政府原则，也具备可坚守这些原则的足够的国内生产总值，长久以来却未能实现人民主权的承诺。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最新世界自由调查报告显示，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二者皆为半民主政体，只有部分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民主缺陷，无法如同非洲与中东地区，以长期战乱与相关社会问题来作为借口。相反地，过去四十年来，东南亚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每年都有6%到8%的稳定经济增长率。

第二，支持着东南亚社会稳定的宽容与包容的关系逐渐淡化，认同政治正在崛起。顺应全球潮流，宗教正统性的成长让不同宗教族群更加壁垒分明，造成严重的偏执与排斥，日益加深暴力冲突。退化的多元主义为暴力极端主义创造了适合生长的环境。环视东南亚地区，我们会发现，导致紧张与暴力的种族与宗教偏执态势高涨，为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空间。此外，大批跨越边界寻求庇护与经济机会的人，让这里成为易受暴力极端主义危害的区域。同时，社会环境因令人担忧的收入不均而劣化，使得许多青年难逃暴力意识形态的影响。

东南亚政府并未利用支持宽容传统的政策来面对这项挑战，反而变得容易受到以权力为目标的保守动机影响。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宗教领袖可以宣告宽容派穆斯林是异类，并判处质疑伊斯兰律法的非穆斯林华人死刑；近来，某位印度尼西亚安全事务高层官员表示，同性恋者威胁到国家安全。在来自沙特阿拉伯、更偏向教权主义的声明中，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事务部部长在2016年3月向国会宣布，非法的自由信念包含：“坚守多元主义的概念、相信人心可以带来启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质疑《古兰经》与《圣训》（*Hadith*）⁽¹⁾的解释、迫切要求崇

拜信仰的新阐释、质疑先知的道德训谕，以及擅自解读伊斯兰教法学（Fiqh）^②惩罚。”这些政策，加上长期的次国家冲突导致的疏离与脆弱，以及滥用权力与践踏人权的免责，无怪乎东南亚易于成为助长社会分歧与不满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港湾。

第三，影响东南亚的外在环境发生变化：保守伊斯兰教义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受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竞争所推动，以及中国以经济与军事力量崛起，是东南亚自太平洋战争及20世纪中期殖民时代结束以来，经历的两个重大发展。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似乎一心想加剧控制穆斯林世界的斗争，而这只会导致散播保守教义的宗教学校继续受到资助，进而替强势的极端主义思想创造有利的孵化环境。假使政府努力通过去极端化政策阻止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同时却坐视宽容政策因沙特阿拉伯与什叶派伊朗展开存亡之争而逐渐遭到侵蚀，这就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任一方，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影响力，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穆斯林目前都在亚洲，它们应该要能发挥更大的牵制作用才对。但是，假如社会上没有捍卫宪法权利与自由的政治意志，反而操纵种族与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愈发常见，那么将会不断有人受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平衡与调节中国迅速发展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正导致地缘政治的摩擦，并且使得东南亚变成强国角力的熔炉。而且，即使中国的成长放缓或者遭遇灾难性的内部崩解——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先例，东南亚仍会因为华人极可能移民到此而受影响，如同他们在17世纪明朝灭亡之际的迁徙，以及19世纪末清朝瓦解时更大规模的移民。那么，根据这三项发现，又不想花大钱听信ET的预言，我们能对眼前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呢？

我们可以将印度尼西亚视为政治的风向标。这个在理想派民族主义革命的炮火下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也采用了一些“普世”的指导原则，其中包含多样性与民主制度。每年的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总统府会举行正式典礼，升上图样简单的红白国旗，庆祝国家独立。从来未曾与任何特定国家建立爱国情感的我，在见证这个简单的典礼时，发现自己竟然产生一丝情感，一种归属于这个雄心勃勃而又有些不可思议的国家的愿望。虽然印度尼西亚一路走来阻碍重重，多次遭遇悲惨、未能和解的挫败，但它终于步上了真正民主体制的轨道。之后的四次选举中，人民自由选举至多可连任一次的总统，法院也针对贪腐罪行判处包含部长在内的高层官员长期徒刑。然而，在自由与开放政府方面的种种进展，为政

治人物与失职官员的怠惰所危害。他们采取徇租与裙带资本主义的手段，固守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进而抬高物价与财富，以致贫穷的印度尼西亚人连营养均衡的一餐都吃不起，还有近40%的5岁以下孩童发育不良。如前所述，这些政客与官员似乎乐于为了短期政治利益，挑战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的法律与制度。不久后的未来，野心勃勃的政治人士利用伊斯兰教义与偏见的力量来满足私利，很有可能也同时大幅削弱印度尼西亚的多元基础，让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如同中东地区的种族与宗教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强势的领袖坚持印度尼西亚的建国愿景，致力于民族的多元性，并改革官僚政治、建立维护多元主义的司法制度；可惜，目前这些仍无处可寻。

缅甸与马来西亚则介于中间。在这些国家里，殖民者策动多元民族主义的遗风，后来长期阻碍了有效的建国与民主进程。在过去三十年持续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培植宽容国家认同的马来西亚，这种情况特别严重。我拜访马来西亚朋友，看到他们沮丧地感叹多元种族协议正缓慢破裂时，感到非常悲痛。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的马来文化逐渐消逝，这些文化如今位处宽容与源自7世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义、极度保守的概念化之间。“你不会相信，”一名商界出身的激进女士告诉我，“我收到信息，建议我不要用马来语说‘谢谢’，而是像虔诚的穆斯林一样说阿拉伯语的‘shukran’。”在我看来，马来人的文化和语言根植于融合印度教与佛教的世界，是可以促成宗教和谐与宽容的。但是，伊斯兰愿景者的单调衣着正逐渐取代马来文化所体现的多彩轻盈装束。因此，我有许多马来西亚朋友（一些是马来人，一些是穆斯林）怀着沉重的心情计划定居海外，也鼓励孩子到其他地方找工作。

缅甸在不久后将会面临以真正联邦制融合多元少数族群的挑战，会因少数族群的和平进展缓慢，而持续阻碍国家发展。过去几年与民族武装团体成员合作的过程中，我对他们为了努力建立持久和平而与政府交涉的意愿印象深刻。但他们也向我透露，他们害怕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尤其是军方）依赖分而治之策略以强化对巴玛族（Bamar）多数主义统治的倾向。结束缅甸的诸多内战（其中有些是当代历史上为时最久的内战）必将是标志性的成就，但是在2015年11月让昂山素季掌权的选举之后，这个愿景不会如众人期盼地那么快就实现。即使她希望与武装民族团体展开宽容的政治对话，也将因民族军与缅甸军队之间多年累积的不信任而窒碍难行，这样的敌意仍长久为发生在美丽却偏远、无人管辖边境的山林里的持续冲突所加深。

另一方面，泰国是一个极度过时的国家，利用强大、至高无上的官僚政治与军事力量，抑制日益增长的人民主权要求，来维护少数宫廷精英的势力与特权。1932年，民主政体表面上取代了绝对君主制度，过了大约八十年后，君主制依旧是权力的支柱，受极端保守的法官与盲目效忠、捍卫弄臣特权网络的士兵们所保护。普密蓬国王2016年10月的逝世，预示皇室权力可能大幅衰退。然而，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也是新国王登基的几周后，泰国人依然为君主制的权力与影响所震慑，因为新国王让人猜不透他喜欢哪些人，以及他是否支持民主选举与遏制军队势力。他上任后首批举措，其一是拔擢一群强硬派的军队将领担任枢密院（Privy Council）⁽³⁾要员，并下令修改宪法增强国王权力。同一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军方愿意放弃权力的迹象。政府官员感觉被边缘化而痛苦万分，知道自己必须为民主的灭亡负起部分责任。他们允许内部的纷争引发街头暴力冲突，让军方有干政的借口，进而获得一些人民的接纳与支持，这些人不完全是因为受压制才屈服的。2016年8月的民调发现，70%的民众对两年前在军事政变中夺权的总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抱持信心。即使许多人相信选举最终举办时，可以重拾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本身却迫使军方尽可能地推迟民主进程。

令人遗憾地，柬埔寨也正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个国家尽管从1970年代中期越战衍生的种族屠杀黑暗时期中惊人地复苏了，稳定政局的却是一位强人领袖，类似于古高棉文明的神王，他将自己与自己的生存视为国家的体现。2018年的大选逐渐逼近，许多人害怕，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理洪森率领的柬埔寨人民党（Cambodian People's Party）将会利用各种不民主甚至暴力的手段维护权力。直到不久前，仍由流亡政治人物桑兰西（Sam Rainsy）所带领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也未能引起民众多少期待。借助高棉流亡分子在欧洲与美国拥有的广泛支持，反对党倾向渲染危险的种族主义与高度民族主义情绪，来激起人民对洪森及其盟友的憎恨。在金边，一位位高权重的政府外交顾问对我说：“他们完全不在乎是否会爆发内战。”

人口超过9000万的菲律宾与越南，拥有庞大的社会经济潜力，却受压抑的政治文化所限制。菲律宾被寡头政治囚禁；领导家族全权控制着全国上下的政府体制，阻挡有意义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致使边境地区盛行武装共产叛乱。即便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等局外人趁着抵制权力垄断的民意而上位，马尼拉帝国总能削弱这些叛变争权者的基础，不是弹劾，就是动用武力。

不按常理出牌、言语粗俗的杜特尔特，在2016年年中展开六年任期之后，似乎热衷于破坏现状。一开始，他针对前殖民势力美国开炮。前任总统为了抵制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主张，加强了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但杜特尔特全面颠覆这项政策，暗地里向中国释出对话与和解的善意。科拉松之子阿基诺三世带领的前任政府已与华盛顿签订新协议，同意让美国军方偶尔巡防菲律宾周围的战略据点。出乎意料的是，杜特尔特辱骂奥巴马总统是婊子养的，还宣布取消计划已久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国内，他实现了扫毒的承诺。本书创作之际，在数批蒙面枪手进入市区贫民窟四处搜寻官方嫌疑毒贩的新毒品战争中，超过7000人遭到杀害，其中多数都是穷困且住在市区贫民窟的人。许多受害者只是吸毒的失业人口。他们的尸体遭到遗弃的照片——有些人被吊在招牌上，有些人遭到强力胶带蒙面封口——震惊了人权团体与国际社会，而杜特尔特对他们的响应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这位直到最后才决定参选总统的前达沃市长，下令的首次行动即造成混乱并引人注目，注定让菲律宾当局心神不宁，他们认为杜特尔特个性反复无常又自恋，决心要废除他们的财富与特权。或许最令寡头政体与军方难堪的，是杜特尔特愿意通过谈判来终止共产分子叛乱。他一开始即表明意图，任命四名共产党支持者为内阁成员。之后，他在就任几周内很快地重启十年来停滞不前、毫无进展的和平进程。2016年末，我访问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成员，他们似乎对一年内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若要结束武装抗争，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全面改革社会、经济与政治；很难想象如此野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具体划分大范围的土地资产以供重新分配）能比谈判桌上的讨论获致更多的成果，更别说是付诸实行了。除非，杜特尔特令对手极度恐惧的真正用意，是借支持来拖延这些人要求改革的激进议程。

到了2016年底，据说当局已开始设法罢免杜特尔特这个独行侠。尽管他的声势不坠，仍然有人担心动荡循环再起、政治进展逆转。2017年初，一名参议员因为批评反毒战争而被捕，副总统也被逐出内阁。当初的担忧者也未能预料到，杜特尔特的初期政绩会是安葬早已过世的独裁君主马科斯。马科斯死于1989年流亡期间，但菲律宾政府拒绝在国内举行合乎体制的葬礼。这位独裁者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就这样摆在他的家乡北伊罗戈省的玻璃棺木里将近三十年，直到2016年11月，杜特尔特在一片抗议声浪中，于马尼拉国家英雄公墓（Heroes' cemetery）为马科斯举行正式丧礼。在理应早已摆脱独裁统治、过去三十年来持续发展生气蓬勃、委任分权的民主政体国家里，弥漫着悲痛的氛围。“三十年过

去了，许多菲律宾人感觉自己依旧停在原地，”杰出的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如此评论，“寡头执政者依然掌控着所有事情，保有既得利益。”

东南亚其他国家近年来政治动荡期间，越南因为引人注目的稳定与长期的经济成长，得以安然无恙。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在2016年初低调表示：“过去三十年中，越南从贫穷国家之列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发展成功的案例。有赖接近7%的平均增长率与目标明确的政策，数千万人脱离了极端贫穷的处境。”然而，其出众的稳定与成长掩盖了共产党的影响力，他们持续通过一向强悍、不见阻扰革命迹象的压制手段来垄断权力。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指出，越南当局在2016年“限制基本权利，包含言论、舆论、结社与集会自由。所有宗教团体皆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运作也受到监视。博主与社运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警察骚扰与威胁，被蛮横地监禁在家、行动受限且遭肢体攻击”。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出访河内时，越南政府拘留了试图与奥巴马见面的异议分子，而这趟刻意安排的访问中最自然的一幕，或许是奥巴马在路边摊与美国名厨一起吃面的时候了。

新加坡拘谨、小心节制的代议制政府，由于受到良好的国家财政与总理李显龙身旁格外团结的治理精英支持，出乎意料地禁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许多方面，与邻国马来西亚不同，新加坡的稳定一直因为精英内部未见明显斗争与冲突而得到保障。尽管存在着移民压力，支持新加坡发展良好的社会服务成本也逐渐增加，这个岛国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似乎并未面临任何威胁。社会以见招拆招的方式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恫吓，不过新加坡政府仍警告人民小心恐怖攻击。新加坡没有一味依赖变化无常的高科技制造业，而是将自己打造为亚洲首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警告同为货物集散地的中国香港避免与中国内地冲突，同时伺机从这个前英国统治的地区的不安中获利。然而，到了2016年，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⁴⁾却盘旋在这个岛国闪耀的天际线。虽然银行业释出诱因，为了升级服务与为大量专业利基提供有利环境做了许多努力，但强大的全球经济逆势仍旧无法逃避。2016年底，新加坡高端房地产与零售服务的需求下跌，景气指数降至十年内最低点，出现衰退即将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未来，这可能会导致民众要求一个更贴近人民需求政府的压力——过去的两次选举结果显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有时难以维持坚守的人民意向。

议会制民主在东南亚立基不深；普遍的半民主体制既未建立保护权

利与自由的有效体制，也没能创造确定性或稳定。我在1970年代晚期第一次到东南亚时，人民对政治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怀抱高度期望。在将近四十年后的2016年，马来西亚反对党国会议员与人权倡议者查尔斯·圣地亚哥（Charles Santiago）写道：“我们正在见证不断恶化的区域人权状况，因为政府——无论民选或非民选——压制评论者、反对派人士与独立公民社会。旨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国家体制，正受到强人的威胁且被迫屈从执政党命令。”这个对人民表达担忧或寻求正义的限制，正使得民众越来越疏远这个强盛的中央国家。精英不顾民主政府的特质，未能提供大众福祉与幸福，已经造成令人忧心的财富差距。我相信，逐渐扩大的社会隔阂，加上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及之前所述日趋顽强的族群与宗教藩篱，终将驱使各群体采取行动。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述，历史上，东南亚人民借由逃离与迁居边缘地带，来回避恶劣或暴虐的政府或统治者。这个方法如今不再适用，即便是在曾经提供庇护的高地也一样。斯科特写道：“在当代世界里，我们的自由未来在于完成驯服利维坦（Leviathan）^⑤的艰巨任务，而不是逃避它。”

幸好，作为相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半民主政体，一定程度的赋权缓慢地改变着权力分配，影响国家的面貌与地缘政治的局势。在国家层级上，准自由的状态让东南亚人民得以认同与联合民族或宗教团体以挑战国家权力，或是与这些团体一同致力于透明度与善政的议题，譬如马来西亚人称之为“净选盟”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尽管严格的安全法规要求所有集会都须经过警方核准，净选盟自2007年以来已成功动员数万名抗议民众，不顾强力水柱与催泪瓦斯的驱赶，示威要求公平选举与反对政府贪腐。面对2011年的净选盟示威活动，政府被迫成立议会选举委员会，推动选举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各式各样的公民社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目的是监督本地发展，特别是解决贪腐问题。当然，当前的局势造成了两面的发展：好战偏执的伊斯兰防卫者阵线可以，也确实迫使印度尼西亚限制信仰自由与非穆斯林的各种自由权；同时，在社会基层，公民社会展现韧性并在地区层级中促成改变。

在泰国，虽然政府强制实行军事统治，小型激进团体仍可成功防止不负责任的法人或国有企业强占土地与资源。这正是清迈大学泰国学者阿塔克·沙塔亚努拉克（Attachak Sattayanurak）所称的行进中的民主，是关联更紧密的社会的产物。我在清迈的一位出版商与企业家朋友曾经参加示威行动，抗议她就读的贵族女子学校隔壁、作为重大进步指标的土地开发项目；而后来，这项属于富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工程被叫停了。

2016年中，当军队镇压言论自由与政治动员、关闭1000个网站并威胁窃听有关国家安全的通话时，政府向社会团体低头以终止金矿开采执照与强占私有土地的经济特区开发许可的纠纷。另一名泰国学者他内·乍伦孟（Thanet Charoenmuang）向我透露，这是“你吃得到的民主”（democracy you can eat）⁽⁶⁾；越过了无法兑现承诺的政党，忽略了规定，主张人民意志。

注意，民主化理论认为，经济成长与繁荣会赋予都市中产阶级力量以对抗自私的独裁者，如典型的结构主义名言所说“没有小资，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然而松动东南亚国家及其所属机构的角色和权力的却不是这股力量。相反地，在东南亚，都市精英长期独占权力与资源的现象，一直支撑着强大的独裁主义政府。而由于人民需求不能以广泛包容的方式被满足，人们被迫诉诸战争。这正是有害的破坏性冲突与腐蚀性的社会分歧引发极端主义观点的原因。当权者没有建立更加开放、公平的政府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利用这些危险的社会裂痕来防止自身权力流失。

因此，为了平等与自由的长期抗争，看来将会是东南亚近期的未来。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显示，即使现代通信科技与媒体更加普及，这些抗争仍不一定会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权者掌握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控制司法裁判。因此当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逃避策略不再是选项，不难预料，人民唯一所剩的方法是抛弃国家，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发动抗争要求独立。政府对于民怨的迟缓响应与试图削弱反对势力的分而治之策略，将迫使族群与团体追求自身利益与反抗权力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否决人民主权现象最剧的泰国，已经呈现这种发展迹象。

2016年8月泰国公投的结果，清楚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分裂。62%的泰国选民投票支持不民主的宪法，以及总理有可能不是人民选出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但假如仔细分区域检视，便会发现这个国家一如往常地分崩离析。泰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与北部多数区域（反体制红衫军的阵营）在两个议题上都投了反对票，引起骚动。受军方严密监视的著名泰北激进人士表示：“这场投票显示人们渴望民主。”他在清迈的咖啡厅里一边紧张地环顾四周，一边对我说：“强制实行裹着糖衣的半民主政体暂时抑制了抗争，但它们已准备好随时崭露头角，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南部地区的马来穆斯林也反对宪章，当地的叛乱分子在公投前夕进行地毯式轰炸，以强调他们的感受。

“两个泰国”（Two Thailand）的问题，即曼谷及其周围地区和极端

势力的较量，已存在数十年。泰国是东南亚中央集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央指派的政府官员遍及社会各阶层。当代分析家将这种分歧描绘成社会经济歧视与不平等。根据泰国学者维拉尤斯·坎裘查特（Veerayoth Kanchoochat），人口仅占全国17%的曼谷享有72%的政府预算；而人口占34%的东北部地区只获得6%的公共预算。

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这些显著的不平等，可能会滋生主张收复国土的情绪，并促使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独立，就如同泰国南部区域。泰国的团结与统一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2016年8月公投的结果明显画出了危险分裂的轮廓。

在邻近的缅甸，将超过20支民族军拉上谈判桌的努力正缓慢地进展。这些装备齐全的团体不信任政府，也不认为放弃抗争能得到多少好处。缅甸政府呼吁全国停火，但是军方仍然持续攻打丛林密布的山丘地带以夺回领土，抗争也似乎没有尽头，尤其是在克钦邦，截至2016年底，当地已有10万人逃到邻近的中国。在泰国与缅甸，人们可以主张以平等的条件进行融合，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到目前为止，高度中央集权的强权政府，希望不必允许太多的平等，就能得到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的所有利益。对于东南亚最靠近中国的两个国家——缅甸与泰国——显而易见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我们应该感到忧心。

虽然我照理应该避免对在每个历史转折点总有意外发展的区域做预测，但鉴于我在之前章节中陈述的所有潮流，以展望可能的社会与国家面貌作结，还是有其优点。这一切会如何发展？东南亚人民如何解决长期低劣的治理与持续的不平等？去中心化与地方分权主义是否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结构？我们将从这里进入未知领域，由自愿表达忠诚，并借商贸加以巩固而又宽松联合的东南亚前殖民区域传统，或许是我们的最佳向导。

到了2050年，东南亚可能会更像其在欧洲列强于16世纪入侵之前的状态。这里会更加分权，并以少数得来不易的自治权为特色。这个向后退的转变，也受环境变迁的驱使。许多自殖民时代便一直作为国家权力行政与政治核心的大都市中心，坐落于沿岸地区与可供海上贸易的河口。但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拥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口的城市，将开始面临气候变迁所直接导致的剧烈问题。目前，曼谷与雅加达的地势已在明显下沉中。土壤盐碱化使当地越来越缺乏淡水资源。浸满水分的地基带来安全上的威胁。2015年泰国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表示曼谷到

2025年可能会有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因应这个危机，有一项建议方案是兴建费用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的高防波堤。同时，雅加达也在几年前便开始建造防波堤，以加强抵御海水。环绕可望成为淡水海湾的巨型防波堤，在2014年进入建设的第一阶段，估计成本为20亿美元。这项建设有部分目的是防止2013年雅加达市区街道遭海水淹没达六英尺深的事件重演。中央政府被迫耗资建造防波堤，加上基于政治因素而关注日渐紧缩的资产，因而更容易在偏远、激进的边境地区问题上妥协。

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国家抱负未能呼应人民主权的需求，意味着政府必须有所让步。如同欧盟与俄罗斯在21世纪初面临国土复归运动的挑战（同样见于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及高加索地区），人民主权最终战胜了国家主权。除此之外，不同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⁷⁾国家，套用斯科特的说法，东南亚拥有新近抵抗政府的显著群体记忆，以及自给自足的悠久地区传统，最终，这些特质可以让这种过渡变得顺利许多。

根据这些赤裸的现实，到了2050年，东南亚很有可能将失去东盟成员国地位最基本的贸易与安全利益。东盟的十个成员国，在地理与经济依赖（以中国为主）的基础上将会更加一致。受到美国政府的唆使，印度与日本最近都变得比以往强硬，在东南亚更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与双边互动。不过，任一方都难以提供充分的战略力量，因为两者都相对狭隘，而且缺乏民族与经济优势。2016年8月，昂山素季当上外交部部长与国务资政后，首度正式访问中国，却让形式上的总统（ceremonial president）拜访印度。期待美国出钱出力抵抗东南亚不受中国影响，并不实际。经过西亚与中亚二十年徒劳无功的战争，美国政治的当前立场又回到以国内为主的心态，特朗普之前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在竞选演说中强调了这点，表示盟友们若想得到保护，就得付出更多。当时，特朗普的幕僚首度对中美关系所作的评论并不令人意外：“这么一来，将出现重大妥协，美国会接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并保证不通过任何方式干预，以换取中国不挑战亚洲现状的承诺。这也许不会是口头约定，但会是引导未来双方关系的默契。”

多数的东南亚政府察觉美国不愿意激怒中国的态度，如今不再指望美国国防会采取超越象征性的军事行动，也不再期待神盾（Aegis）驱逐舰或尼米兹级（Nimitz-class）航空母舰会不定期地演习示威。

中国地理与文化相近性的优势，将因为东南亚集权强国的衰弱，以及经济仰赖中国且由中国建造的道路与铁路连通的小型自治实体的崛起，而逐渐扩大。然而，就像中国历史所提示的，繁荣与稳定周期性地

受到血腥政治变迁的威胁，东南亚总是深受其害，却也从中获利。

随着西方对东南亚持续六百年的影响力慢慢消退，某种明显具有亚洲风格的势力又取而代之，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早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南亚便已经从其与印度和中国的邻近地理优势中获取重要物资及文化食粮。因此，这个现象将再度上演；与之前不同的是，现代科技互动对身份认同与主权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不敢说未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利用残存的西方引力来削弱亚洲强权的锋芒。之后的发展，端视西方各国共同决定除了投入资本，是否也协助促进人类安全（包括硬安全与软安全⁽⁸⁾）而定。

2016年某天，我在曼谷同前泰国外交部部长与驻美大使甲西·披龙耶（Kasit Piromya）共进晚餐，他感叹，美国国务院因为泰国军政府而疏远两国的关系。甲西虽然可说是保守派的盟友，但彬彬有礼、受西方教育的他，也是军事苛政的激进批评者。在他看来，泰国与美国最终都是输家，中国通过把潜艇等更多的军事装备卖给泰国军队得到好处，并且谈定了获得大型中泰企业集团资助、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交易。西方国家会发现，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放弃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比以往更困难。欧洲政府在安置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与伊拉克难民，以及处理以“伊斯兰国”名义发动的随机恐怖袭击的同时，必然无力主张维持东南亚的战略平衡。如果东南亚政府不尊重日益扩大援助条件的规范与价值，这些努力会变得更艰难。这说明为何了解东南亚权力与冲突的动态有其必要。

写作本书期间，我苦思良久，是什么让东南亚无法达到以其经济优势与成就而言应该要有的社会与政治发展。我在前面强调过权势精英的自私，以及人民对安全感的追求，削弱了他们对贪婪及其所滋长的暴政的反抗。这或许解释了，泰国人民为何会推翻政治人物与投票赞成独裁主义宪法。东南亚的现代领袖也在民粹主义中发现，具吸引力与解放的元素可作为越来越有效的夺权手段。因此，可靠的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在2016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10个菲律宾人中有8个对生活感到恐惧，但同样地，有90%的受访者依然支持杜特尔特总统的反毒战争。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受煽动主义愚弄太久；他们终究会挺身挣脱暴政的枷锁。东南亚拥有人民起义与抗争的漫长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时近2016年末，本书快要完稿的那段时间，我找了一天到柬埔寨首

都金边壮丽的滨江区散步（金边位于巴塞河 [Bassac]、湄公河与洞里萨河 [Tonle Sap] 汇流处）。当时正值雨季之初，洞里萨河河水呈带泥的红色，拍打着城市的岸边。几世纪以来，柬埔寨人仰赖洞里萨河高涨的河水，才能利用雨季末期独一无二的逆转水流，淹没大片陆地区域，以提供渔获与丰沛的灌溉用水。基于这个原因，洞里萨河可谓生命之河。那是周日的下午，微微冷风拂过水面，柬埔寨的男女老少涌进面貌一新的滨河大道。有些人围绕在算命师身边，其他人带着鲜花到面朝河滨的旗杆神庙（Preah Ang Dongker）敬拜。男孩们将钓竿悬在河边，滑着手上的智能手机；旁边情窦初开的女孩们则精心自拍。年轻的妇女们将襁褓中的孩子搁在铁栏杆上欣赏河岸风景，身穿T恤与运动鞋的老伯们沿着河岸气喘吁吁地慢跑。

这幅市民知足常乐的生动情景，让我短暂地振奋起来。因为这个在1979年（我第一次到东南亚的那一年）满目疮痍的国家，在同一个世代的今日，竟能如此生气蓬勃与平静祥和。柬埔寨基本上是因国际间的大力支持而获得解救的，尽管派系斗争伴随战争余波而来，民主的种子仍旧播下，而且似乎顺利地开花结果，促成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少外界看来是如此。然而，总理洪森权威传记的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焦（Sebastian Strangio）形容得好，处于民主时代的柬埔寨，是“外界眼中的墓园”。那个周日下午的散步固然令人感到平和与宁静，表面下却蕴藏着怒火沸腾的情绪，人们谈到未来也怀抱恐惧。此外，数万人跟随、备受爱戴的政治评论家甘磊（Kem Lay）在2016年7月10日遭到枪杀，他的送葬队伍绵延40公里，充分显露出民众压抑愤怒已久。一名政府高层表示：“我知道他们愤怒，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当权者认为自己有权获得绝大部分的资源，向来都如此。”柬埔寨的顽固总理洪森如此，1980与19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同时期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以及之后泰国的他信也是如此；这些领袖全都承诺带给人民幸福与繁荣，最终却让社会分裂，并且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他们高举明智、恢宏的领导旗帜，却图利家族与扫除异己。他们在走过之处，留下了愤恨与冲突。

柬埔寨不再是东南亚最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如今拥有的却是区域中最腐败国家的头衔。这是东南亚的命运吗——困在残暴悲剧的循环中，一部分好不容易复苏了，又再度堕落？那天早上，我逛完河岸之后，与一位高层官员共进早餐，他对我说：“柬埔寨有句谚语，‘河水高涨时，鱼吃蚂蚁；低潮时，蚂蚁吃鱼。’”

(1)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由后人所编。《圣训》形成于8至9世纪，其主

要内容是穆罕默德对教义、律例、制度、礼仪及日常生活各种问题的意见主张。

- (2) 伊斯兰教的法学，是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延伸，以教法学家的释法（Usul al-fiqh）和伊斯兰教令（Fatwa）补足伊斯兰教法。
- (3) 泰国枢密院是由国王任命的咨询机关，通常由已卸任的泰国总理和退役将领组成。根据泰国宪法，枢密院可以在国王缺席时代理国家元首职权。
- (4) 指个人或家户因为某些突发状况而落入贫穷的概率。经济不安全感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二是个人或家庭可以自行吸收或对抗这些风险的能力。
- (5) 原为英国17世纪著名作家霍布斯论国家组织的书名，后来代称权力集中的（君主）国家。
- (6) 指民主政治不是光有政策，而是能确实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语出刚果驻美大使蒙布利（Serge Mombouli）的谈话：“我们不能光谈论民主、透明和善政，而一天结束之际，人民却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夜晚没有电，没有工作。我们两者都需要。人民不吃民主。（People do not eat democracy.）”
- (7)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于1648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立约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及荷兰共和国等。
- (8) 硬安全主要指军事对抗的措施；软安全指涉制度与规范方面的保障。

鸣谢

本书浓缩了我在东南亚生活与工作近四十年的想法与经验。除了亏欠朋友与许多东南亚受访者不少人情债之外，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善意与无私，其中包含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让我与家人感到宾至如归，而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关于东南亚的知识。与世界上这样一群分外大方、宽容与克制的人们一起生活，我深感荣幸。假如我对他们受到统治与虐待的方式表现出过于严厉及批判的态度，也是出于对他们的敬重与情感。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特别感谢比尔·塔兰特（Bill Tarrant）、拉尔夫·博伊斯、马丁·格里菲思（Martin Griffiths）、通猜·维尼察古、廖振扬、普丽西拉·海纳（Priscilla Hayner）、盖萨·春哈旺（Kraisak Choonhavan）、卡利穆拉·哈桑、大卫·哈兰（David Harland）及里奥·海尔米（Rio Helmi），在成书期间，他们都是同意协助我检阅本书所有或部分章节的好友与同事。

从事研究、报道与专业调停多年，我十分依赖来自各种背景的东南亚人士所提供的建议与支持。如果一一列出，谢词的篇幅恐怕会变成一本小型电话簿。其中一些人如果身份曝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特别感谢几位备受尊崇的东南亚长辈，尽管他们已辞世，却仍旧长存我心中：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拉塔斯、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王福涵、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L. B. 穆尔达尼（L. B. Moerdani）、普拉姆迪亚·阿南塔·图尔、穆赫塔尔·卢比斯及斯拉梅·布拉塔纳塔；马来西亚的詹德兰·叶舒仑（Chandran Jeshurun）与K. 达斯；以及缅甸的赵赞永贵。

身为记者，即使我与同事们通常都在互相比较劲，隐瞒的事情并不少于彼此分享的消息，我依然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我很幸运能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旅居东南亚的一些优秀记者共事，他们大多曾替《远东经济评论》工作或撰文。要特别感谢的人有：菲利浦·鲍林（Philip Bowring）、纳扬·昌达（Nayan Chanda）、大卫·詹金斯（David Jenkins）、哈密什·麦克唐纳（Hamish MacDonald）、默里·希伯特、伯特·林特纳（Bertil Lintner）、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es）、林赛·默多克（Lindsay Murdoch）、基思·里奇伯格（Keith Richburg）、玛格·科恩、玛格丽特·斯科特（Margaret Scott）、大卫·墨菲（David

Murphy)、肖恩·克里斯平、大卫·普洛特 (David Plott) 与亚当·施瓦茨 (Adam Schwarz)。已故的德里克·戴维斯 (Derek Davies) 与罗德尼·塔斯克是我的导师, 如果没有他们, 我的东南亚旅程可能在到达当地不久后就结束了。

停留东南亚期间, 我替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工作了几年, 我要感谢马汀·格里菲思给我机会, 让我能在结束愉快的记者生涯后展开新事业。其间, 我的同事, 尤其是大卫·戈尔曼 (David Gorman)、希拉达·索发冯恩 (Theerada Suphaphong)、詹姆斯·比恩 (James Bean)、亚当·库珀 (Adam Cooper)、夏妮·安赫利塔 (Shienny Angelita)、凯蒂娅·帕帕吉亚尼 (Katia Pappagiani) 与大卫·哈兰, 在东南亚迈向和平的漫长曲折道路上, 总是陪伴并激励着我。我也深深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方向的历史教授们所给予的学术指导, 包含默尔·里克莱夫斯及拉尔夫·史密斯 (Ralph Smith)。无论他们多么教导有方, 本书仍可能有谬误之处, 而我会为此负起全责。

感谢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的艾伦·萨姆森 (Alan Samson) 及他的团队赋予本书生命。如果没有经纪人凯莉·福尔克纳 (Kelly Falconer) 的大力协助与持续鼓励, 我或许就不会构思或完成这本书了。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雅尼克 (Janick)、克洛艾 (Chloe) 与斯特凡 (Stefan)。他们的爱与情感始终带给我力量与灵感。

参考资料

第一章 深入东南亚核心

Michael Vatikiotis. 1984. "Ethnic Pluralism in the Northern Thai City of Chiang Mai."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K. S. Maniam. 1993. *In a Far Country*. Kuala Lumpur: Skoob Books.

J. S. Furnivall.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Vatikiotis. 1996.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rimming the Banyan Tree*. London: Routledge.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Times Editions.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E. H. G. Dobby. 1950. *Southeast Asi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Maurice Collis. 1936. *Siamese Whi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J. J. Clarke. 1997.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Quote from Voltaire taken from his 1756 *Essai sur les Moeurs* cited in Maurice Collis. 1961. *The Great Withi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Anthony Reid. 1988.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onard Andaya. 2008.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ilton Osborne. 2000. *The Mekong: Turbulent Past, Uncertain Future*. Sydney: Allen & Unwin.
- George Orwell. 2003. *Shooting an Elephant*. London: Penguin.
- Norman Lewis. 1952.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London: Jonathan Cape.
- David K. Wyatt. 1982.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 Sarasin Viraphol. 1977.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es Milton. 1999. *Nathaniel's Nutmeg: How One Man's Courag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Sceptre Books.
- Thant Myint-U. 2006.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New York: Straus and Giroux.
- Thongchai Winichakul.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Benedict Anderson and Ruth T. McVey. 1971.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 1965, Coup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 Rajaratnam, ed. 1996. *José Rizal and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Institut Kajian Dasar.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 Kershaw, Roger. 2001. *Monarchy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ces of Tradit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Routledge.
- Pavin Chachavalpongpun. 2013. "Monarchies in Southeast Asi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13, March 2013.
- Paul Handley. 2006.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ng Hok Ham. 2003.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Java*. Jakarta: Metafor.

- Anthony Milner. 2008. *The Malays*. London: Wiley Blackwell.
- John Monfries. 2015. *A Prince in a Republic: The Life of 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 of Yogyakarta*. Singapore: ISEAS.
- J. M. Gullick. 1989. *Malay Socie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rles F. Keyes. 1977.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 Peter Harris, Duguan Zhou. 2007. *A Record of Cambodi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 Shway Yoe [Sir George Scott]. 1963. *The Burman: His Life and Notions*. The Norton Library: New York.
- Thant Myint-U. 2006.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New York: Straus and Giroux.
- 论柬埔寨总理洪森，以及他效仿柬共领袖的作为：<http://thediplomat.com/2016/08/the-state-and-the-cpp-cambodias-social-contract/>.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 关于老挝人权捍卫人士宋巴·颂蓬的失踪：<https://www.hrw.org/news/2016/07/15/laos-premier-should-account-disappeared-activist>.
- 关于失踪的泰国社运人士波·乍·利·拉琼查隆（人称比利 [Billy] ）：<https://www.hrw.org/news/2014/04/20/thailand-prominent-activist-feared-disappeared>.
- 关于揭露马来西亚大规模贪腐丑闻的“砂拉越报告”网站：<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35350>.
- O. W. Wolters. 2008. *Early Southeast Asia: Selected Essay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cian M. Hanks. 1968. “Entourage and Circle in Burma.” 2:1 *Bennington Review*.

关于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塞蒂亚·诺万托的报道：[http://](http://www.nytimes.com/2015/12/18/world/asia/indonesia-corruption-setya-novanto.html)

www.nytimes.com/2015/12/18/world/asia/indonesia-corruption-setya-novanto.html.

2015年11月，马哈蒂尔之女玛丽娜在槟榔屿乔治市文学节上发表的演说。

论2009年菲律宾马京达瑙省爆发的大屠杀：<https://cpj.org/blog/2014/11/maguindanao-five-years-on.php>.

Fareed Zakariah. 1994.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1994-03-01/conversation-lee-kuan-yew>.

印度尼西亚与欧洲教育程度的数据比较：<http://www.cgdev.org/blog/need-pivot-learning-new-data-adult-skillsindonesia>.

Anthony Reid. 2015.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London: Wiley Blackwell.

S. J. Tambiah. 1976.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 K. Wyatt. 1994. *Studies in Thai History*.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Multatuli. 1860. *Max Havelaar, or the Coffee Auctions of the Dutch Trading Company*. London: Penguin.

Syed Hussein Alatas. 2010.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Pramoedya Ananta Toer. 1980. *This Earth of Mankind*. London: Penguin.

马来西亚官方对于新经济政策的说明：<http://www.epu.gov.my/en/development-policies/new-economic-policy>.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论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http://www.voacambodia.com/a/a-decade-later-khmer-rouge-tribunal-leaving-a-mixed-legacy/3384074.html>.

Pramoedya Ananta Toer. 2002. *Jalan Raya Pos, Jalan Daendels (The Great Post Road, Daendels Road)*. Jakarta: Lentera Upantara.

“Komnas HAM declares 1965 purge a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he Jakarta Post*, 24 July 2012.

The Findings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1965-66, 23 July 2012.

“Executioners’ Confessions.” *Tempo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1-7 October 2012.

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驳回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的1965年屠杀报告：
<http://the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archive/ago-rejects-komnas-ham-report-on-1965-massacres/>.

A. A. M. Djelantik. 1997. *The Birthmark: Memoirs of a Balinese Prince*. Singapore: Periplus.

关于海牙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庭：<http://www.abc.net.au/news/2016-07-21/1965-indonesian-mass-killings-were-’crimes-against-humanity’/7647274>.

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冲突的评估报告：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K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016) University of Warwick. https://www2.warwick.ac.uk/fac/soc/pais/research/researchcentres/ierg/westpapua/papua_assessment_report_final_uk.pdf

2014年11月，通猜·维尼察古接受泰国新闻网站“自由人”（Prachatai）英文网一名流亡泰国记者的采访：<http://prachatai.org/english/node/4539>.

1989年5月31日，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前外交官苏查特莫科。

第六章 逐步开放

Bertil Lintner. 1990. *Outrage: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angkok:

Diane Publishing Company.

- Clark D. Neher. 1991.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ian Affairs* Vol. 18, No. 3 (Fall, 1991), pp. 139-152.
- Michael Vatikiotis. 1993.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 London: Routledge.
-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1998. *Thailand's Boom and Bust*.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 关于泰国正大集团总裁谢易初的个人资产：<http://www.forbes.com/sites/forbespr/2016/06/02/cp-groups-chearavanont-brothers-top-2016-forbes-thailand-rich-list/#454baf-8ac9f6>.
-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 1995. Published by the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5, Canberra.
- Murray Weidenbraum and Samuel Hughes. 1996. *The Bamboo Network*. New York: Free Press.
- 印度尼西亚商人塞蒂亚万·佐迪收购意大利车商兰博基尼：<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1994-10-23/hassel-borghini-landed-on-its-wheels>.
- 论泰国渔船走私奴隶的问题：<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aug/19/costco-cp-foods-lawsuit-alleged-slavery-prawn-supply-chain>.
-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eds. 2016. *Unequal Thailand: Aspects of Income, Wealth and Pow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克里斯·贝克 (Chris Baker) 论泰国贫民联盟 (Assembly of the Poor)：<http://www.reddmonitor.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ae13.pdf>.
- 自1992年起在菲律宾遇害的记者人数：<https://www.cpj.org/killed/asia/philippines>.
- 论雅加达的贫穷率：<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01/29/jakarta-sees-rising-poverty-widening-income>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关于2006年泰国政变的新闻报道：<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sep/19/thailand>;
<http://www.nytimes.com/2006/09/20/world/asia/20thailand.html>.

论2016年8月泰国宪法公投：<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Viewpoints/Duncan-McCargo-Thailands-ambiguous-referendum-result?page=2>.

Anwar Ibrahim, "My Plea from Prison: Malaysia Must Choose Freedom over Repression," *Washington Post*, 12 October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6/10/12/my-plea-from-prison-malaysia-must-choose-freedom-over-repression/?utm_term=.696de00abcd5.

关于前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064535.stm>.

2000年3月，作者采访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Thaksinomics": Keynote Address by Thaksin Shinawatra,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Organized by The 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the Philippine-Thai Business Council Dusit Nikko Hotel, Manila, 8 September 2003.

论曼谷红衫军：<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294268>.

Jonathan Powell. 2014. *Talking to Terrorists: How to End Armed Conflicts*. London: Random House.

论缅甸大选：<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33547036>.

切里安·乔治论新加坡：<http://www.airconditionednation.com/2011/05/15/ge2011-aftermath/>.

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论外界对于印度尼西亚民主的疑虑：http://www.asia-pacific-solidarity.net/southeastasia/indonesia/indoleft/2013/kompas_tniexpresses

汤姆·鲍尔论佐科威：<http://www.newmandala.org/cashing-in/>.

论威兰多将军担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阁成员：<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8/04/why-wirantos-appointment-minister-controversial.html>.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新闻引述纳吉布的言论，“不要觉得我偷了人民的财产”：<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33442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7/jul/02/theasiancrisis10yearslat>.

泰国专栏作家空·李狄论泰国的贿赂文化：<http://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886684/takingdown-sorrayuth-no-graft-panacea>.

盖洛普民调对于印度尼西亚腐败的调查：<http://www.gallup.com/poll/157073/corruption-continues-plague-indonesia.aspx>.

关于马来西亚商界的贿赂与贪腐风气的见解：<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1/18/curbing-fraud-corruption-the-majority-of-respondents-of-a-kpmgsurvey-believes-that-business-cannot/>.

Edmund Terence Gomez. 1994. *Political Business: Corporate involvement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Monograph of the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

Barry Wain. 2009. *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论马科斯侵吞公款：<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y/07/10bn-dollar-question-marcos-millionsnick-davies>.

“砂拉越报告”第一篇详细记述1MDB丑闻的文章：<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5/02/heist-of-the-century-how-jho-lowused-petrosaudi-as-a-front-to-siphon-billions-out-of-1mdb->

worldexclusive/.

“砂拉越报告”随后发表的文章，据悉详述了流入纳吉布账户的金额：

<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5/07/sensational-findings-prime-minister-najib-razaks-personal-accounts-linked-to-1mdb-money-trail-malaysia-exclusive/>.

详述1MDB如何遭到揭露与报道的长篇文章：[http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28/1mdbinside-story-worlds-biggest-financial-scandal-malaysia?CMP=Share_AndroidApp_Tweet)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28/1mdbinside-story-worlds-biggest-financial-scandal-malaysia?](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28/1mdbinside-story-worlds-biggest-financial-scandal-malaysia?CMP=Share_AndroidApp_Tweet)

CMP = Share_AndroidApp_Tweet.

马来西亚民众对于体制腐败程度的反应：<http://asiapacific.anu.edu.au/newmandala/2015/11/30/wielding-the-pen-as-a-torch-for-freedom/>.

关于马来西亚官方通过布道词要求人民效忠领导人的新闻报道：<http://m.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disloyalto-leaders-is-disloyalty-to-god-muslims-told-in-friday-sermon>.

柯成兴论今日的马来西亚：<http://blogs.lse.ac.uk/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15/08/06/malysias-leaders-no-longerserve-the-people-danny-quah/>.

详述中国投资1MDB的文章：<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25170>;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6/08/01/china-firm-denies-1mdb-bailout-plo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900056/chinas-investment-embattled-1mdb-throw-malaysian-prime>; <http://www.sarawakreport.org/2016/07/outrage-najibs-secret-deal-with-china-to-pay-off-1mdb-and-jhows-debts-shock-exclusive/>.

关于大马银行创办人侯赛因·纳加迪遇害的新闻报道：<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18324>.

关于马来西亚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遭谋杀的新闻报道：<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6/04/15/pathologist-kevin-morais-was-killed-its-not-suicide/>.

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报道，柬埔寨总理洪森及其家人持有的商业股份：

<http://www.globalwitness.org/en/reports/hostile-takeover/>.

柬埔寨商务部部长论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http://www.washingtonpost.com/sf/world/2015/09/05/the-push-and-pull-of-chinas-orbit/>.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论贪腐：<http://newsinfo.inquirer.net/793344/full-text-president-rodrigo-duterte-inauguration-speech#ixzz4Gjhjac2j>.

第九章 小规模战争与倍受争议的身份认同

亚洲基金会提供的国家内部冲突数据：<http://conflictstudy.asiafoundation.org/>.

Ibrahim Syukri. 1985. *The Malay Kingdom of Patani*.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Thant Myint-U. 2011.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eutenant Colonel A. R. McMahon. 1876. *The Karens of the Golden Chersonese*. London: Harrison.

<http://www.bangkokpost.com/lite/topstories/355107/time-to-return-the-phaya-tani-cannon>.

论泰国南部一名教师遭到叛乱分子谋杀的事件：<http://www.khaosodenglish.com/news/crimecourtscalamity/calamity/2016/10/28/teacher-shot-dead-pattani-school/>.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 T. Yawnghwe. 1987. *The Shan of Burm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关于流亡的巴布亚领袖本尼·文达：<https://www.freewestpapua.org/>.

关于泰南冲突伤亡率的估计：<http://www.newmandala.org/violence-thailands-deep-south/>.

Joseph Chinyong Liow. 2005. *Muslim Resista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Duncan McCargo. 2015. *Tearing Apart the Land: Islam and Legitimacy in Southern Thailand*. Ithaca: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论泰国政府否认南部的叛乱分子是国内炸弹攻击事件的凶手：<http://www.nytimes.com/2016/08/15/world/asia/thailand-bombings-police-investigation.html>;
<http://prachatai.org/english/node/6471?utm>.

第十章 信仰冲突

2004年5月，作者在雅加达采访法赫鲁·法拉赫。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t/terrorism-in-southeast-asia.html#background>.

Kamel Daoud. 2015. *The Meursault Investigation*.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2年10月，作者采访李光耀。

P. J. Vatikiotis. 1987. *Isla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沙特阿拉伯投资海外伊斯兰教育的金额估计：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r-yousaf-butt-/saudi-wahhabism-islam-terrorism_b_6501916.html.

1989年11月8日，作者在万隆采访贾拉鲁丁·拉赫马特。

Taufik Abdullah and Sharon Siddique, eds. 1986. *Islam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Joseph Chinyong Liow. 2009. *Piety and Politics: Islamism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 Headley. 2004. *Durga's Mosque. Cosmology, Conversion and Community in Central Javanese Islam*. Singapore: ISEAS.

<https://www.hrw.org/news/2016/03/29/indonesia-persecution-gafatarreligious-group>.

关于印度尼西亚塞塔拉民主和平学会 (Setara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Peace) : <http://setara-institute.org/en/english-religious-intolerance-increases-in-indonesia-watchdog-says/>.

M. C. Ricklefs. 2012. *Islamisation and Its Opponents in Java: A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c. 1930 to Present*.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年11月20日, 作者在万隆采访印度尼西亚阿訇吉姆纳斯提埃尔。

1990年6月5日, 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

1990年12月8日, 作者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经济学者达湾姆·拉哈尔佐 (Dawam Rahardjo)。

Rehman Rashid. 1993. *A Malaysian Journey*. Kuala Lumpur: Rehman Rashid.

Sidney Jones. 2002. "How the Jemaah Islamiyah network operate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43, 11 December 2002.

Samuel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3年8月20日, 作者在吉隆坡采访马来西亚作家赛义德·奥斯曼 (Syed Othman)。

Anwar Ibrahim. 1996. *The Asia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Times editions.

Anwar Ibrahim. Diary Extract, 7 September 2004.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C. P. Fitzgerald. 1972.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Bangkok: White Lotus.

2010年7月23日, 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对南海议题做出评论 :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0/07/20100723164658su0.4912989.html>.

- Ooi Kee Beng. 2015. *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ingapore: ISEAS.
- Yoneo Ishii , ed. 1998.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 Singapore: ISEAS.
- Robert Kaplan. 2012.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of the World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ilahari Kausikan. “Consensus, Centrality & Relev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Lunch talk at ASEAN Summit “Charg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ies: Emboldening SMEs for the AEC.” Organized by RHTLAW TW, Singapore, 4 August 2016.
- 论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程度 :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6/01/25/china-likely-biggest-investor-indonesia.html>.
- Hong Liu. 2006. *The Chinese Overseas: Vol. 4 Homeland Ties and Agencies of Interaction*, London: Library of Modern China, Routledge.
- Jeffery Sng and Pimpraphai Bisalputra. 2015. *A History of the Thai-Chinese*. Singapore: Edition Didier Millet.
- Bill Hayton. 2014.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da Jakobson. 2014. “China’s Unpredictable Maritime Security Actor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ydney, December 2014
- 马明汉论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 :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japans-battle-influence-southeast-asia-14006>.
-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走访吉隆坡中国城 : <https://themalaysianinsider.wordpress.com/2015/09/25/china-envoy-visits-petaling-street-warns-against-using-violence/> Carlyle Thayer (2013) ‘ASEAN, China and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apjjf.org/2012/10/34/Carlyle-A.-Thayer/3813/article.html>.
-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33, Number 2, Summer-

Fall 2013.

“Is Chinese influence re-defining Southeast Asia.” *Straits Times*, 4 February 2016.

中国移民在老挝遭到攻击：<http://www.nytimes.com/2016/01/30/world/asia/laos-bombing-kills-chinese.html>.

关于缅甸翡翠产业市值：<https://www.globalwitness.org/jade-story/>.

Brian Crozier. 1965. *Southeast Asia in Turmoil*. London: Pelican.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论印度尼西亚食物价格的通货膨胀：<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202891477357946-101/IEQ-OCT-2016-ENG-web.pdf>.

全球自由度地图：<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the-mapthat-shows-most-and-least-free-countries-in-the-world-a6869861.html>.

马来西亚政府称自由派穆斯林为异类：<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3/17/liberal-muslims-being-monitored-parliament-told/>.

论泰国总理巴育的民望：<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politics/Prayut-gets-high-marks-in-survey-on-confidence-30294000.html>

人权观察组织提出的2017年世界报告——越南篇：<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vietnam>.

James C. Scott.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泰国公投结果：<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Viewpoints/Duncan-McCargo-Thailand-s-ambiguous-referendumresult>.

论菲律宾对沙巴主权的主张：<http://philippineclaimoversabah.blogspot.com>.

论2015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http://thediplomat.com/2015/02/what-is-asean-community-2015-all-about/>.

Dr Veerayouth Kanchoochat. 2017. "Politics in Thailand: What to expect in 2017-8." Paper delivered at the 2017 Regional Outlook Forum, convened by the Yusof Ishak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9 January 2017.

论全球暖化对于曼谷的影响：<https://weather.com/science/environment/news/bangkok-sinking-subsidence-warming-15-years>.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044746/under-donald-trump-us-will-accept-chinas-rise-long-it-doesnt>.

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调查菲律宾民众对于杜特尔特总统反毒战争的看法：<http://news.abs-cbn.com/news/12/19/16/8-in-10-pinoys-fear-dyingin-drug-war-says-poll>.

人类的情感： 认知与历史

* 光启文景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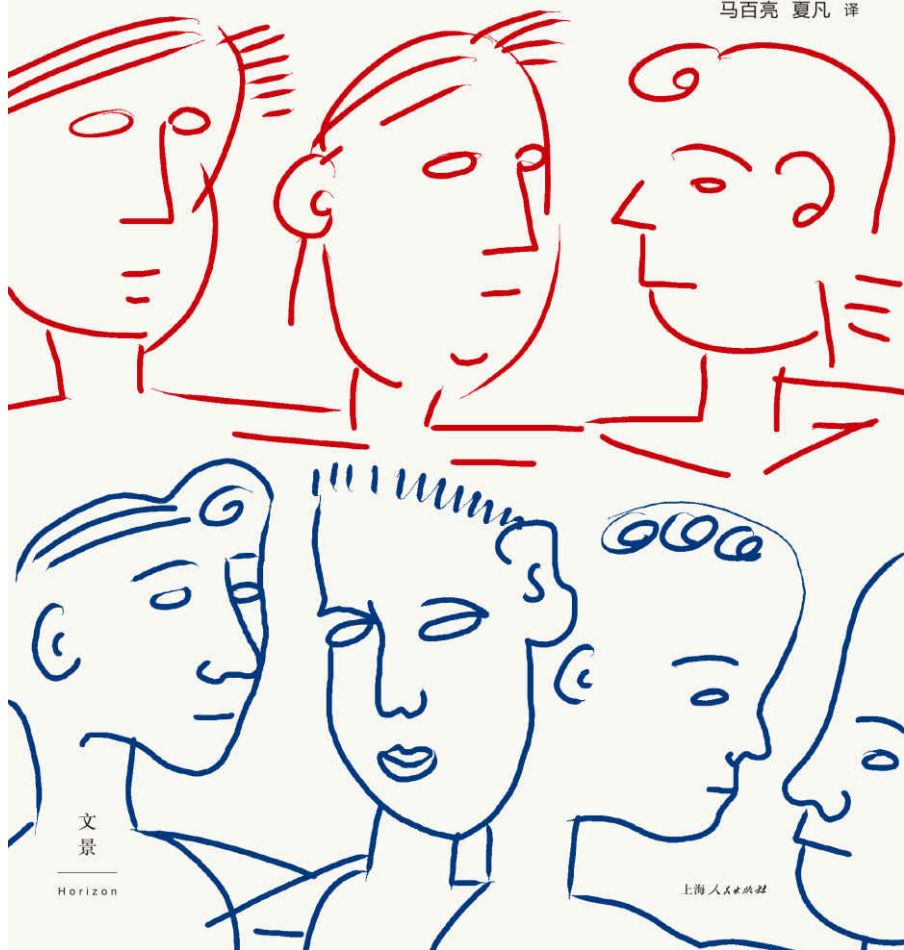
陈恒 主编

Geschichte und Gefühl:
Grundlagen der
Emotionsgeschichte

JAN PLAMPER

[德] 扬·普兰佩尔 著

马百亮 夏凡 译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人类的情感： 认知与历史

[德] 扬·普兰佩尔 著

马百亮 夏凡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 （德）扬·普兰佩尔著；马百亮，夏凡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6882-4

I．①人… II．①扬…②马…③夏… III．①情感—历史—世界—研究 IV．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58412号

书 名：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作 者：[德] 扬·普兰佩尔

译 者：马百亮 夏凡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灵逸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882-4 / K·3034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Original title: *GESCHICHTE UND GEFÜHL:*

Grundlagen der Emotionsgeschichte

by Jan Plamper

Copyright © 2012 by SiedlerVerlag,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Verlagsgruppe GmbH, Münche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致谢

导言：历史与情感

第一章 情感史的历史

第二章 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

第三章 普遍主义：生命科学

第四章 情感史的视角

结语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谨将此书献给柏林情感库
(Berlin Feel Tank)

图表目录

- 图1 约瑟夫·勒杜与通往恐惧的两条路径
- 图2 森政弘与“恐怖谷”
- 图3 带有铃铛和呼吸管的棺材
- 图4 愤怒的面部表情
- 图5 恐惧或恐慌的面部表情
- 图6 情感语言的类型总结
- 图7 卡尔·G.海德的“情感流动模型”
- 图8 悲伤、愤怒还是厌恶？请记住！
- 图9 向测试对象展示的面部表情的照片
- 图10 故事中人物的面部表情
- 图11 暴露牙齿的行为被视为进化的残余
- 图12 在恐惧的影响下心率加快
- 图13 罗伯特·达吉恩的用于测定血压的脉搏描记器
- 图14 接吻测量仪
- 图15 菲尼亚斯·盖奇和他的铁棒
- 图16 铁棒在菲尼亚斯·盖奇头骨中的位置
- 图17 大脑区域（包括边缘系统）及其功能
- 图18 沙赫特-辛格的情感模型
- 图19 fMRI扫描仪的横截面
- 图20 一条死鲑鱼与有关情感的大脑活动？
- 图21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实验
- 图22 BASIS词汇表
- 图23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下十字架》（1435—1438）
- 图24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的海报

图25 哭泣的总统候选人？暴风雪中的埃德蒙·马斯基（1972年2月26日）

图26 哭泣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2007年1月11日）

表1 盖伦的体液说及相关的情感原型

表2 拉莎在《戏剧学》中对应的颜色和神灵

表3 概念原语与词汇普遍性

致谢【vii】*

与其说是我想到了写这本书，不如说是这本书找到了我。当时我正在从事一项关于历史上士兵的恐惧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概念性的问题纷至沓来，我不得不停下来，以便有一些时间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这件事发生在2007—2008学年期间，当时我还是慕尼黑历史研究所（Historisches Kolleg）的初级研究员。在我告诉当时的所长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说我要改变研究方向时，他表现得很通融。我在这家独一无二的高级研究所度过了富有成效的一年，我要感谢的人很多，除了洛塔尔·加尔之外，还有卡尔·乌尔里希·盖尔伯格（Karl-Ulrich Gelberg）、伊丽莎白·许尔斯（Elisabeth Hüls）和伊丽莎白·米勒-卢克纳尔（Elisabeth Müller-Luckner），还有我的同事阿尔布雷希特·科德斯（Albrecht Cordes）、约尔格·菲施（Jörg Fisch）、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和马丁·弗雷德（Martin Wrede）。此外，我还要感谢迈克尔·霍赫-格什文德（Michael Hochgeschwender）、本杰明·申克（Benjamin Schenk）和马丁·舒尔茨·韦塞尔（Martin Schulze Wessel）。在慕尼黑的这一年里，我和他们展开了友好的交流，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这本书是在类似田园诗般的条件下写成的，当时我受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Foundation）提供的为期多年的狄尔泰奖学金资助，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的乌特·弗雷沃特情感史中心（Ute Frevert's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从事研究工作，这里是我的“情感库”。那里的同事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讨论，对我的文章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并让我看到了他们本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本书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甚至根本就不会问世。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何塞·安东尼（Jose Antony）、克里斯蒂安·贝利（Christian Bailey）、克里斯蒂娜·贝克尔（Christina Becher）、玛格达莱娜·贝尔扬（Magdalena Beljan）、加比·本德曼（Gaby Bendmann）、安雅·贝尔克斯（Anja Berkes）、克莱尔·比尔比（Clare Bielby）、罗伯·博迪斯（Rob Boddice）、菲利普·邦格兰德（Philippe Bongrand）、朱利安·布劳尔（Juliane Brauer）、丹尼尔·布吕肯豪斯（Daniel Brückenhaus）、莫里茨·布克纳（Moritz Buchner）、凯特·戴维森

(Kate Davison)、萨宾·多纳尔 (Sabine Donauer)、克里斯蒂安·艾弗特 (Christiane Eifert)、帕斯卡·艾特勒 (Pascal Eitler)、达格玛·埃勒布罗克 (Dagmar Ellerbrock)、梅里赫·埃罗尔 (Merih Erol)、莫妮卡·弗雷尔 (Monika Freier)、乌特·弗雷沃特 (Ute Frevert)、本诺·加梅尔 (Benno Gammerl)、爱丽丝·高夫 (Alice Goff)、约阿希姆·哈伯伦 (Joachim Häberlen)、克丽斯塔·黑默勒 (Christa Hämmerle)、贝蒂娜·希策 (Bettina Hitzer)、菲利普·冯·胡戈 (Philipp von Hugo)、乌法·延森 (Uffa Jensen)、克里斯蒂娜·坎茨 (Christine Kanz)、乌尔苏拉·冯·凯茨 (Ursula von Keitz)、玛娜·基亚 (Mana Kia)、安雅·劳克特 (Anja Laukötter)、苏珊娜·米希尔 (Susanne Michl)、萨利尔·米斯拉 (Salil Misra)、斯文·奥利弗·米勒 (Sven Oliver Müller)、索菲·奥利弗 (Sophie Oliver)、斯蒂芬妮·奥尔森 (Stephanie Olsen)、蒂恩·范·奥斯勒尔 (Tine van Osselaer)、玛格丽特·佩尔瑙 (Margrit Pernau)、约瑟夫·普雷斯特 (Josef Prestel)、蒂尔·范·拉登 (Till van Rahden)、伊姆克·拉贾玛尼 (Imke Rajamani)、卡罗拉·洛克曼 (Karola Rockmann)、什维塔·萨赫德瓦 (Shweta Sachdeva)、穆罕默德·萨贾德 (Mohammad Sajjad)、丹妮拉·萨克瑟 (Daniela Saxer)、莫妮克·舍尔 (Monique Scheer)、玛莉塔·施莱尔 (Maritta Schleyer)、安妮·施密特 (Anne Schmidt)、马克·西摩 (Mark Seymour)、纳迪姆·沙赫 (Nadeem Shah)、克斯廷·辛格 (Kerstin Singer)、弗兰齐斯卡·蒂姆 (Franziska Timm)、卡伦·瓦尔加达 (Karen Vallgarda)、尼娜·费尔海恩 (Nina Verheyen)、吉安·马可·维多 (Gian Marco Vidor)、克劳迪娅·瓦斯曼 (Claudia Wassmann) 和海伦·渡边·奥凯利 (Helen Watanabe-O'Kelly)。在一个蓬勃发展但同时遭到严重炒作的新领域工作，这是令人振奋的。我们工作的大环境，概念和术语的快速发展，研究成果的快速发表和引用，这些都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说，在学术生涯中再次拥有这种经历的机会都几无可能。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来说，与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实验心理学家共事是我的一大优势。乌尔曼·林登贝格尔 (Ulman Lindenberger) 百忙之中对有关生命科学的章节进行了全面而有建设性的评论，伊莎贝尔·德齐贝克 (Isabel Dziobek) 和豪克·黑克伦 (Hauke Heekeren) 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研究所的多学科会议上，我也从与雷·多兰 (Ray Dolan)、【viii】克劳斯·菲德勒 (Klaus Fiedler) 和塔妮娅·辛格 (Tania Singer) 的讨论中受益匪浅。在那些与研究所联系不

那么密切的人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露丝·雷斯（Ruth Leys）。我对她感激不尽，她在不同的场合与我进行批判性的辩论，并在关键时刻鼓励我不要放弃。吕迪格·齐尔（Rüdiger Zill）以情感哲学专家的敏锐目光，阅读了本书导言部分的哲学附记。对上述的每一个人，我都心存感激。

玛格丽特·佩尔瑙邀请我一起在德国人民学习基金会（Studienstif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的一个暑期学校教书，最后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那些来自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2010年9月来到格尔利茨（Görlitz）“情感史”暑期学校的生命科学家是阿兰姆·克雅晏（Aram Kehyayan）和马克·施密特（Marco Schmidt）。马克阅读并评论了本书的第三章，暑期学校的另一名学生菲利普·格拉赫（Philipp Gerlach）也是如此。菲利普也是我2011年初的实习生，他为导言的哲学部分做了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非常感谢！

在我写作期间，英戈·吉尔登哈德（Ingo Gildenhard）、约亨·海尔贝克（Jochen Hellbeck）和卡尔·施勒格尔（Karl Schlögel）从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听我讲述本书的内容，并提出问题，这一切都很有帮助。迪特里希·贝劳（Dietrich Beyrau）、克劳斯·格斯特瓦（Klaus Gestwa）、克丽斯塔·黑默勒、芭芭拉·H.罗森宛恩（Barbara H. Rosenwein）阅读了整部书稿。从项目一开始，芭芭拉·罗森宛恩就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导师，她对我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做出可靠、快速的回答。斯蒂芬妮·格特（Stefanie Gert）和伊娃·斯珀施耐德（Eva Sperschneider）以及哈特穆特·伯格拉贝（Hartmut Burggrabe）和约翰娜·罗克（Johanna Rocker）提供了一流的研究协助。我欠他们一个大人情，我欠他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人情。

在德国兰登书屋西德勒出版社（Siedler Publishers）出版这本书的德文原版时，安塞尔姆·德林-曼陀菲尔（Anselm Doering-Manteuffel）、埃利·巴尔-陈（Eli Bar-Chen）和伊格尔·哈尔芬（Igal Halfin）都提出了建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西德勒出版社的合作是一次与出版界顺利而又令人安心的经历。我的编辑海克·施佩希特（Heike Specht）委托我写了这本书，安特耶·科尔斯迈尔（Antje Korsmeier）从哲学家的角度提供了实质性的反馈，对于我能想到的，托拜厄斯·温斯特尔（Tobias Winstel）总是能看得更远，他们不仅非常专业，而且友好、平易近人。插图部门的迪特琳德·奥伦迪（Dietlinde Orendi）也是如此。最后，克里斯蒂安·弗里切（Christiane Fritsche）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风格编辑了修改后的手稿。迪塔·艾哈迈迪 (Ditta Ahmadi) 在本书的排版过程中创造了奇迹。

本书的英译获得了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奖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ternational Prize) 的资助。我要感谢本书的英译者基思·特赖布 (Keith Tribe)。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卡罗拉·罗克曼细致精心地审校了译文。阿妮卡·菲德勒 (Anika Fiedler) 帮助寻找了英文引文。她得到了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系的资助, 我很荣幸从2012年9月开始在该系任教。此外, 历史系慷慨解囊, 支付了这些插图的版权费用, 并让克斯廷·弗勒 (Kerstin Feule) 从其行政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它们。我很高兴本书的英文版在乌特·弗雷沃特 (Ute Frevert) 和托马斯·迪克森 (Thomas Dixon) 主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上的情感” (“Emotions in History”) 系列丛书中找到了归宿, 【ix】罗伊娜·安克特尔 (Rowena Anketell) 精心编辑了文稿, 艾米丽·布兰德 (Emily Brand)、罗伯特·费伯 (Robert Faber)、艾玛·斯劳特 (Emma Slaughter)、凯瑟琳·斯蒂尔 (Cathryn Steele) 和克里斯托弗·惠勒 (Christopher Wheeler) 熟练地指导了文稿的制作。我的朋友伊利亚·温科夫斯基 (Ilya Vinkovetsky) 认真地检查了最初的校对稿。

本书是从我参加的一门解剖学课程开始讲起的, 夏里特医院解剖研究所 (Anatomical Institute at the Charité Hospital) 的约翰内斯·福格尔 (Johannes Vogel) 慷慨地邀请我参加他2009年12月7日在鲁道菲解剖学教室 (Rudolphi Room) 的课程。我的妻子伊琳娜·克莱梅内茨卡娅 (Irina Kremenetskaia) 就在百米开外的夏里特神经外科实验室工作。我们的婚姻表明, 在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可能的, 至少在个人层面是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 有幸拥有两个情商极高的女儿, 让这一切容易很多, 她们是奥尔加 (Olga) 和丽莎 (Lisa)。对于我的家人, 我不仅要表达谢意, 还要表达爱意。

* 方括号内数字为英文原版页码, 全书同。

导言：历史与情感【1】

一个只有葡萄干大小的黑色椭圆形阴影组织，与大脑中其他颜色较浅的物质混合在一起，甚至不能把它单独分离出来，这就是杏仁核。它不像肝脏或肾脏那样是一个器官。你可以把肝脏或肾脏从人体躯干的塑料模型上取下来，然后再放回去，这很简单。有人给我看了一个大脑切片中的杏仁核，这些切片看起来就像切开的花椰菜。一名学生检查了许多装有福尔马林的桶，直到她找到一个大脑切片，她仔细地将切片分开给我看，杏仁核才清晰可见。

那是2009年12月的一个清晨，在欧洲最大的大学医院柏林夏里特医院解剖研究所的鲁道菲解剖学教室里。在此之前，我给他们发了邮件，告诉他们我正在研究“一战”时俄国士兵的恐惧，想看看杏仁核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它控制着人类对恐惧的反应，而且我在神经科学著作中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我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下周一我可以去参加医学院的解剖学课程，届时会看到杏仁核。在见到讲师前，我把自己的兴趣告诉了这些大学第四学期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当他们从塑料桶里找出一个又一个滴着福尔马林的脑组织，寻找合适的那一个时，我瞥了一眼旁边的桌子，两个女学生正把一个装尸体的袋子抬到桌子上。她们取下蓝色的塑料覆盖物，接着取下包裹头部的纱布，把已经去除皮肤的尸体翻过来，用一块木块支撑头部，取下已经锯开的头骨顶部，开始用钳子和手术刀在脑腔深处寻找。我突然想到，这两个学生深入大脑皮层以下认知区域的路径和我本人研究历史的路径是一样的。这些学生在某一时刻会遇到掌管着恐惧的杏仁核，这是最重要的情感最具要害意义的地方。

在英语里，杏仁核是“amygdala”，是希腊语中“αμύγδαλο”（“杏仁”）的音译，因为它形如杏仁。这个词出现于1819年，创造者是否是杏仁核的发现者、德国解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布达赫（Karl Friedrich Burdach, 1776—1847）。①到了20世纪30年代，动物实验和对病人的研究表明，【2】这是大脑中所有由威胁引起和对威胁（例如毒蛇）做出反应的神经过程发生的区域。这些过程可以把神经系统从放松状态中激活（增强肌肉张力，加速脉搏跳动，总之包括逃离毒蛇所需要做的一切），通常被归类为“恐惧”或“焦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计算机断层扫描相关的新成像程序强化了这一观点。我问在刺眼的灯光下忙于

解剖的学生关于杏仁核功能的主流观点是什么，他们一致回答说杏仁核负责“负面情绪，尤其是恐惧”。

人们对杏仁核重要性的普遍认识可能要归功于纽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的畅销书《情感大脑：情感生活的神秘基础》（*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1996），该书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勒杜及其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组建了一支名为“杏仁核”（*The Amygdaloids*）的乐队，他本人演奏“重精神”（Heavy Mental，这个词是对表示“重金属”的“Heavy Metal”一词的戏仿）电吉他。勒杜指出了通往恐惧的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杏仁核的快速通道，另一条是通过大脑皮层的慢速通道。⁽²⁾根据他的说法，当一种威胁（蛇）被发现时，这一信息只需要12毫秒就能到达杏仁核，杏仁核为神经系统准备好进行一种基于进化生物学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这种快速反应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让身体准备好逃离威胁，或者奋起反击。在两倍于此的时间里，同样的信息被传递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会盘算：那真的是一条蛇吗？会不会是一块看起来像蛇的木头？如果真的是一条蛇，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是活的，是有毒的还是无毒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危险，大脑皮层就会向杏仁核发出信号，神经系统就会平静下来。⁽³⁾勒杜书中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自1996年以来，它在研究恐惧的作品中被援引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图1⁽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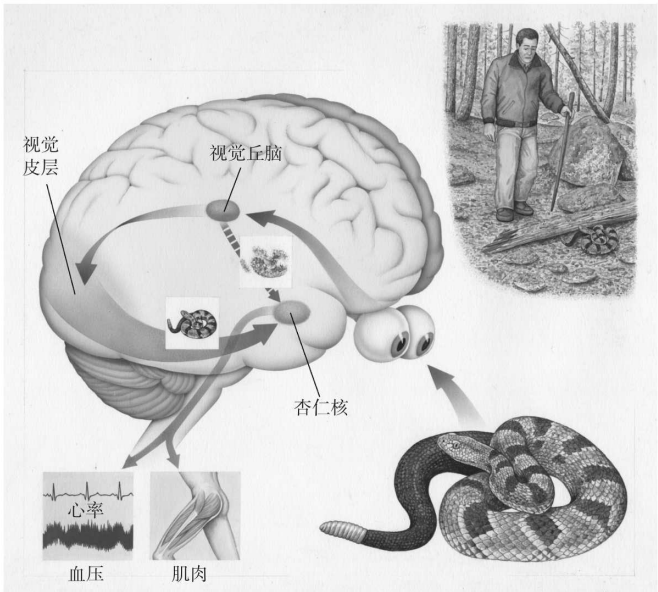


图1 约瑟夫·勒杜与通往恐惧的两条路径

从那以后，杏仁核就变得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每次我提到自己关于士兵恐惧的历史研究时，都会被问到。很少有像士兵的恐惧这样的情感被自动套用一个人类学的常量（今天它穿上了神经生物学术语的外衣）。这背后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从实验室老鼠到智人，所有的动物都会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有坚实的神经生物学内核，即杏仁核。这是自19世纪以来情感研究的第一个极端，即认为情感固定不变，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涵盖了所有物种，超越了时间；它既是生物学的概念，也是生理学的概念；它是本质主义的，【3】与生俱来的。杏仁核在大脑中处于核心位置，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一切，而这里也正是那些学习解剖的学生准备去探索的地方。

但是杏仁核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在大脑的特定操作（情感就是其中之一）中被激活的一组神经细胞，至少大多数研究人员仍然认同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问哪些神经细胞属于杏仁核，争论就开始了。因为杏仁核邻近的区域也是由神经细胞组成的，其中一些也被认为与情感有关。⁽⁵⁾【4】我第一次看到杏仁核时的印象是，大脑的黑色区域和周围不那么黑的区域之间是逐渐过渡的，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清楚地界定它并不容易。关于杏仁核的功能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认为它只负责负面情绪的观点现在普遍被认为已经过时。今天，杏仁核被认为和其他组织器官一起负责嗅觉和视觉，例如它们让爵士乐师能够区分按照乐谱演奏的音乐和即兴演奏的音乐。⁽⁶⁾此外，人类杏仁核中神经细胞的组织和连接方式与啮齿类动物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实验的对象是啮齿类动物，而得出的结论则用在人身上。⁽⁷⁾最后，严格意义上说，谈论单数的“杏仁核”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左右半脑中各有一个杏仁核。它们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是否执行不同的任务呢？如果是，目前神经生物学家激烈讨论的到底是哪一个呢？⁽⁸⁾

我离开教室，再次置身于柏林冬日微弱的阳光下，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在阅读有关恐惧的人类学研究著作时，我曾经遇到过完全不同的情况。人类学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具有特定神经解剖学位点的普遍又独特的恐惧机制，而是关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恐惧的处理方式上的差异。士兵的恐惧更是如此，例如在19世纪中期被英国人征服之前，新西兰的毛利人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如果一个毛利战士的身体在战斗前表现出恐惧的迹象，比如发抖，人们就会说他被“阿图阿”（atua）

附体了。一旦违反被称为“塔普”（tapu）的社会规范，这位神就会被激怒。为了摆脱这种被附体的状态，需要举行一种仪式：战士必须从一位地位较高的毛利妇女的胯下爬过去。因为这位妇女的性器官（尤其是阴道）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让这位战士摆脱被“阿图阿”附体的状态。如果这位战士在妇女的胯下爬过时不再发抖，这就意味着他摆脱了被附体的状态，可以毫无畏惧地投入战斗。但是如果他还在发抖，那么这个净化仪式就宣告失败，他可以待在家里而不受惩罚。显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中会有人被“阿图阿”附体，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战场上的毛利战士根本不会感到害怕。因此，毛利战士的恐惧是外在的，不是来自他的“灵魂”“心灵”或“大脑”，【5】而是来自一个超验的“塔普”规范和更高级的存在。⁽⁹⁾

这个例子极大地改变了关于士兵恐惧的普遍认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所有情感研究的第二个极端：情感是灵活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决定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具有文化相对性和独特性。最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情感的学术讨论就一直围绕着这两个极端展开：固定与灵活，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决定论与反决定论，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与这两个极端有关的概念之间并不互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何时、何地出现的？是什么把两者区分开来？怎样才能把两者精确地描绘出来？这些都不清楚，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任何参加过有神经科学家和人文学科专家参与的多学科会议的人（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跨学科性），都知道这是多么敏感的问题。围绕这两个极端的讨论很快就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对立阵营。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两极化经常被注意到。芭芭拉·罗森宛恩写道：“一些学者认为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建构’。”⁽¹⁰⁾在英格丽德·卡斯滕（Ingrid Kasten）看来，问题是“在哪里以及如何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划分界限”。⁽¹¹⁾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和卡罗尔·Z.斯特恩斯（Carol Z. Stearns）谈到了将“持久的（动物性）与短暂的（文化性）”区分开来的挑战。⁽¹²⁾据吕迪格·施内尔（Rüdiger Schnell）说：“今天对情感的历史研究涉及两种基本的、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几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有自己的历史，由一般的历史变迁所决定。”他还认为“普遍主义者和进化论者”属于一个阵营，“建构主义者属于另一个阵营”。⁽¹³⁾阿明·京特（Armin Günther）问道：“情感到底有没有历史，它们是否是人类学的常量？”⁽¹⁴⁾最后，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和杰弗里·怀特

(Geoffrey White) 得出结论：“关于情感的文献中有许多经典的理论或认识论张力，其中包括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¹⁵⁾【6】人们通常认为即使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没有发生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依然有必要明确指出，这个对立并没有被采用。例如一部与医学民族学有关的文集中提到，“这些论文没有把重点放在特定情感的普遍性或文化独特性之上”。⁽¹⁶⁾

同样，有人指出，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这种划分对思想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¹⁷⁾只要快速浏览一下18—19世纪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划分并非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来自另一个二分法，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分。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思想家来说，“自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范畴，它常常是神话的主题（如黛安娜女神），广受崇拜（在自然的神殿里）。它会发生变化，灵活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固定不变、简单地存在着。自然是“一个从未在现实中完全实现的意图”。它“仍然被理解为一种灵活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实”。⁽¹⁸⁾自然是可以塑造、可以改变的。

启蒙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在18世纪初期，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愈见明晰。从此，大自然不再具有变化性，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征。首先，对于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自然状态”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时期；对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来说，“自然状态”则是社会存在之前的时期。其次，自然被定义为“原始的”，这是对异域的、非欧洲民族的描述。第三，启蒙思想家开始将自然等同于人类的身体，尤其是其内在的、不易改变的方面，包括本能，就像在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和其他“机械论”哲学家的著作中那样。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自然的语义与一般环境相融合，使动植物成为“自然”。⁽¹⁹⁾最后两种意义——作为身体的自然和作为环境的自然——成为宗教出现以前合法性的一种形式。【7】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世俗化”，但是要加上很多限定，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绝对的合法化的例子。自然被转变成一个坚实的绝对基础，具有新的终极确定性。在19世纪，这一过程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思想的传播及其作为“优生学”的庸俗化有关，也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联系在一起。⁽²⁰⁾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也体现在对科学方法的讨论中。例如，1894年，在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对理论研究和具体研究进行了区分：通则式的自然科学寻

求普遍有效的规律，并倾向于还原主义的实验方法，而具体的人文科学追求的不是普遍规律，而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²¹⁾这一区分一直沿用至今。

科学史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对立根深蒂固，任何超越这种两极化的尝试都需要对所有科学学科进行集体治疗。只有在精神科医生的沙发上，19世纪意识形态的遗产才能得到“妥善安置”。⁽²²⁾在这本书中，一次又一次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开窗户，揭示一个新的视角，一次对情感的后治疗研究，一种超越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二分法的情感研究。

本书有两个目标。首先是对情感史的介绍，因此也是对这门学科现状的整合。这样的介绍很不容易，因为目前情感史正在朝各个方向发展。打个比方，这就像用照片记录火箭从发射台发射后加速的每一个瞬间。我认为对于情感的历史来说，这仍然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情感的心理学、民族学和哲学来说，就已经太晚了。到目前为止，在情感史领域已经发表的东西还可以收集起来，但我们最终会走到无法回头的地步，到那时，知识总量会达到一个临界状态，超过这个临界点，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全部吸收。作为一部概括性的作品，本书会进行总结和整理，关于最近研究的误解将会被澄清，并且会有大量的直接引用。这样，读者在书写自己的情感史作品时，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在其他任何此类概述中一样，概述只是概述，【8】我们建议所有的读者继续阅读我提到的文献，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对细节的把握，而不是粗略的梗概。

尽管如此，本书又不仅仅是一个概述，它也是对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干预。这一点在每一章中都显示得很清楚。我在总结材料时力求保持中立，同时使自己的意见尽可能透明，尤其是在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涉及文学、图像研究，也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随意借用神经科学知识的做法进行批判性评估时。这种借用通常就像是一场狂饮，但紧接着将是可怕的宿醉，我亦有同感。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随意的借用，因为在原则上这种借用可以带来重要创新。借用者需要对神经科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在他借用时才能了解其出处。本书试图促进这样的了解，在第三章中，概述和干预这两个目标是不可分割的。一边是对整个领域做出公允的评估，一边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一领域，其他的作者向我展示了如何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甚至可以很优雅地做到这

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榜样，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开始写这本书。(23)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从19世纪末情感史的发端开始讲起，对情感研究进行了历史梳理。这一发展过程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背景之下，同时也被置于对情感史产生影响的其他学科的背景之下。我用这种方式表明情感史也有其历史。第二章是社会建构主义关于情感的探讨，讨论的是在不同文化对情感的不同处理方面，对我们的理解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科，那就是人类学。第三章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端，即本质主义，对19世纪末以来实验心理学对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述，特别是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在这里我必须澄清一点：我用“生命科学”这个术语来指代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神经科学和相关学科。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生物学”一词的延伸，指的是认知心理学、大脑研究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神经学研究等领域。“生命科学”一词表明这些独立学科之间存在流动性。第四章对情感史研究中那些可能具有前景的领域进行了展望。第二章专门探讨社会建构主义，第三章专门探讨普遍主义，这的确保留了当前盛行的二元对立结构。【9】这种结构对所有关于感觉和情感的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整合这些作品的著作，本书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结构。但是，如果本书能够对这两大阵营提出质疑，并最终促成两者之间的和解，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本书关注的是情感史所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情感？谁有情感？情感有历史吗？假如有的话，历史学科是怎样对其进行处理的？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方法都需要探索许多科学领域，尤其是拥有长达2500年历史的哲学。首先，这是因为哲学研究的影响特别大，因此构成了本书的必要框架。其次，因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人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使其黯然失色。第三，因为哲学研究经常专注于主题和二分法，而不是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立，从而展示了超越这一在最近的情感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区分的前景。(24)

一、情感是什么？

188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题为“情感是什么？”。(25)詹姆斯确实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意味深长的是，问题和答案都来自一位心理学家。这就引出了之前的问题，即应该由谁来为情

感下定义。因为关于情感的话语并不总是为同一个学科所支配，后续的学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一些学科，比如威廉·詹姆斯本人所属的心理学，在前几个世纪并不存在。粗略地说，在西方，从古代一直到1860年左右，定义情感的主要是哲学和神学，其他还有修辞学、医学和文学，而在1860年以后，实验心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后期，【10】这种主导地位转移到了神经科学上。(26)

对这样的一般性说法需要加以限定。首先，我们可以引入情感的元历史，探讨什么人可以权威地讨论情感，在何时何地讨论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样的历史是为特定时期而书写的，但我们或多或少只有关于古希腊、18世纪北美殖民地和19世纪英国的可靠证据。(27)本书不能提供一部关于情感的总体史，甚至也不能提供一部完整的情感元历史，把我们拥有的知识岛屿拼凑成一个群岛，然后填入把它们分隔开来的海洋。这里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即如果要构建这样的元历史，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无论如何，认为西方2500多年关于情感的神学和哲学思想已经被150年的情感心理学研究所取代，这样的想法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非西方世界对于情感的思考，在那里，情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即使在心理学兴起之前，东西之间的相互传播已经十分多元和多向，再用“西方”和“非西方”的范畴来讨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28)

还有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1996年约瑟夫·勒杜所理解的神经科学的“情感”，与1979年克劳斯·舍雷尔（Klaus Scherer）在实验发展心理学领域所使用的“情感”，真的是一回事吗？2002年芭芭拉·罗森宛恩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情感”，与1998年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在神经科学领域所使用的“情感”，是一回事吗？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使用的“情感”，【11】与1910/1911年《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情感”（affection）词条，是一回事吗？后者写道：“情感无关焦虑或兴奋，它相对来说是惰性的，与感官元素的完全缺失是相容的。”1980年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所理解的“情感”（les affects），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尼语中的“情感”（perasaan hati），2002年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在英语中使用的“情感”（affect），1876年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所描述的“情感”（emozioni），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29)简而言之，是否存在一种意义上的统一性，足以让我们将这些源自不同领域、时代和文化的不同术语全部视为一种“情感”呢？

乍看起来，似乎的确不能这样。据统计，即使在英语世界的实验心理学这个有限的领域，从1872—1980年，情感已经有了92种不同的定义。⁽³⁰⁾通常认为，情感的主要特征就是它难以被定义，例如在1931年，一位美国心脏病学家将情感描述为“一种流动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就像风来了又去，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或者就像半个世纪后两位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情感，但是一到给情感下定义就为难了。”⁽³¹⁾

然而，之所以将所有这些定义都放在“情感”之下，有三个原因。首先，情感的许多概念在词源上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如果你追溯德语中的“Emotion”和“Gemüthsbewegung”（灵魂的激荡），你会发现它们都与拉丁语中的“movere”（移动）有关。在多种语言中表明并追溯所有这些联系将是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一大工程，这只能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除此之外，即使是语言中没有“情感”这个概念的文化，也经常引入这个词。【12】其次，对于研究情感的历史学家来说，情感词语的语义比较和对如何翻译某些词语的探讨也十分有用。第三，没有元概念的学术将重新沦为一种完全随意而为之的事业。唯名论的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前居主导地位的学术模式是反对唯名论的，所以情感史研究也应该利用元概念。

我决定使用“情感”（emotion）作为一个元概念。作为同义词，我也会用“情绪”（feeling）一词。与此同时，我不会回避历史化的必要努力。因此，我将致力于阐释特定表达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用法。我将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affect”这个词。在神经科学的影响下，近年来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纯粹物理的、前语言的、无意识的。因此，本书中不会将其作为元概念来使用。如果我将其作为一个元概念来使用，我将不得不占用大量的篇幅来推翻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用法，引入评价、语言和意识方面的考虑。

现在回到我最初的问题：情感是什么？今天，许多关于情感的公共的、跨学科的学术话语被一种受神经科学影响很大的心理学所主导。大行其道的是一种普遍的集体失忆症。就有关情感的心理学（更不要说哲学）观念的历史而言，虽然今天在神经科学领域有不同的声音，提出整个哲学史代表了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期待。⁽³²⁾这里只能粗略地勾勒出2500年来对情感的哲学思考。这段历史一个不变的特征是接受的过程，包括今天的心理学，在这方面，“无言的”接受很重要。在此过程中，实际的哲学联系无法识别出来。如果在本文结束时，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哲

学的一些元素变得可以识别，那么接下来的讲述也就实现了其目的。

最早、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定义之一来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³³⁾他是这样描述希腊语中“*pathos*”（情感，复数 *pathē*）一词的：

情感包括所有使人改变看法另作判断的情绪，伴之而来的是苦恼或快感，例如忿怒、怜悯、恐惧和诸如此类的情绪以及和这些情绪相反的情绪。⁽³⁴⁾

这段引文来自其《修辞学》中一段论述情感如何模糊司法判断【13】的文字。该书的目标群体是那些从事政治或法律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要使用雄辩来对人施加情感上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给他们提供了一份指导手册。在罗列各种情感的目录中，亚里士多德并不像今天通常所做的那样简单地区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而是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能够产生快乐或痛苦。

人们对这段文字的解释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因此它仅限于修辞术的实用语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亚里士多德情感观的典型代表，更普遍地说，是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公元前500—前336/323）情感观的典型代表。情感被理解为一种反应，不是对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行动或由行动导致的情况的反应，其结果影响一个人的相对地位，或其他人的相对地位。⁽³⁵⁾对他们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列表让他们想起了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在20世纪后期所认定的基本情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情感概念及其对判断的强调是认知评价的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这种实验心理学的观点与埃克曼相反，但属于同一时期。但也有人指出，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强调情感的主体间性和交际功能。⁽³⁶⁾显然，即使是非常古老的情感观点也被热切地投射到最新研究的关键分歧之上。

让我们继续探讨亚里士多德和一种特殊的情感，即愤怒（*orgē*）。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忿怒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显著的报复心理所引起的有苦恼相伴随的欲望。如果这就是忿怒的定义，那么一个发怒的人必然是对某一个人发怒，而不是对一般人发怒，因为那人曾经轻慢或将要轻慢他本人或他的亲友。忿怒中也有快感相伴随，这是由于有

希望报复，因为认为自己能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是愉快的事；没有人追求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14】发怒的人追求自己可能达到的目的。所以诗人描述忿怒的话说得好：比往下滴的蜂蜜甜蜜得多，在人们的胸中膨胀。忿怒中有快感相伴随，就是由于这个道理，并且是由于人们心里起了报复的念头，于是眼前出现的幻象引起快感，就象梦中的幻象引起快感一样。(37)

可见，愤怒既不是一种完全积极的情感，也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情感。愤怒当然是痛苦的，但也包含着对“甜蜜”报复的期待。此外，亚里士多德关于愤怒的概念有一个时间维度，即愤怒有终点，而仇恨没有终点，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想象的力量也是愤怒的一个因素：报复是甜蜜的，而这种甜蜜是想象出来的。在这里，期待之花在想象中绽放。

亚里士多德将情感与想象中的世界联系起来，因为想象可以提供进一步反思美学和感情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赶紧去帮助他，这时我对他的同情，与我对小说《雾都孤儿》的主人公奥利弗·特威斯特（Oliver Twist）的同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不同呢？对直接影响我的“真实”事件的情感反应，能否与对小说、电影或电脑游戏等文化产品的情感反应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呢？这与我害怕蜘蛛，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有什么关系呢？亚里士多德认为，相对于以某种方式与现实世界相关的情感，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的情感（纯粹是幻想的产物）没有那么强大。(38)

事实上，“pathē”这个词最早被柏拉图（公元前424/423—前348/347）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用来指代源于自身的环境。最初的情况并非如此。“荷马史诗中的人物认为自己在情感的力量面前或多或少是无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将情感定义为一种外在的东西，而不是人自身产生的。上文提到毛利人战士把他们的恐惧归因于“阿图阿”，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39)也许正是由于古希腊情感理论的长期影响，我们今天用来表达情感的许多隐喻都与“情感是外在的”这一观点相呼应，例如我们会说“被愤怒征服”，“被快乐攫住”，“被爱情打动”。(40)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哲学家只是从单向的“判断—回应”模式来理解情感，而不考虑判断和推算。【15】事实恰恰相反，例如，亚里士多德将恐惧定义为“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致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痛苦或不安的情绪”。(41)他并没有把恐惧视为对想象中的未来灾祸的一种自动（也是身体上的）反应，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会受到信念和观点影响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可以有意识地打断自动的情感过程。根据亚

里士多德的理论，我在树林里看到蛇之后之所以会心生恐惧，是因为我想象中被蛇咬伤之后的痛苦。但我能在这种本能的情感开始之前就将其抑制住，因为我六岁时去参观了波士顿动物园，对饲养箱里的蛇产生了真正的喜爱；或者是将这种情感终止，因为作为一个40岁的人，我已经能够用行为疗法控制我的恐惧。

除此之外，由于内在判断的因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感不仅可以被自己改变，也可以被他人改变，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年轻人需要培养自己的情感，这样才能使正确的判断成为第二天性。⁽⁴²⁾斯多葛派哲学家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是对他情感定义中涉及判断的因素持不同看法。⁽⁴³⁾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他们与亚里士多德分道扬镳，他们的泛神论使他们强调大局，认为情感无关紧要；其目的是达到一种无情感的或平静的无欲心境（*apatheia*），进而实现内心的宁静。⁽⁴⁴⁾爱情和婚姻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在他们的泛神论观点中，两者相对来说缺乏意义。这种控制情感的方式在很久以后依然余响犹存。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在其《沉思录》中谈论了安宁的理想，并建议政治家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内心的平静，而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斯多葛主义者”，她对情感的理解强调个人的幸福，而斯多葛派强调心灵的宁静，但她仍然把情感视为“评价”。⁽⁴⁵⁾

在公元2世纪，出现了一位深受柏拉图影响的希腊医生，其情感观念影响了阿拉伯和欧洲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一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他就是盖伦（Galen，130—200），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气质的学说，认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具有特殊的性质。⁽⁴⁶⁾盖伦认为如果某种体液过量，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气质偏向于一个特定的范畴（见表1）。

表1 盖伦的体液说及相关的情感原型【16】

換
意志薄弱
膽汁
懦弱強惡、多思
蠱液質
懦弱薄、不好相處

盖伦并不认为化学或物理媒介有什么治疗作用，而是强调了道德教育和节制的作用。他的体液学说，特别是与体液失衡有关的情感病理学特征（胆汁质、多血质、忧郁质和黏液质），经过改头换面，出现在伊

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作品中，也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心理学家的作品中。(47)

自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关于情感的思考都以灵魂的三分说为基础。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由理性（*logistikon*）、激情（*thymoeides*）和欲望（*epithymetikon*）三部分构成的。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都对这一观点做出了调整，但奥古斯丁（354—430）的调整产生的影响最持久，他受到早期基督教关于情感的著作的影响。(48)奥古斯丁创造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梯式的灵魂模型，其中最低一层是纯粹的植物和物质的阶段，而作为最高一层的第七层是至福或神的显现的阶段。(49)最高的两层为人类所专属。【17】奥古斯丁认为情感是一个单独的范畴，隶属于意志，以此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对情感过程的划分，后者认为情感过程是一种更加物质性的原初运动（*primus motus*），一种第二层的认知和道德的评价。

所以，正义的意志是一种好的爱，邪恶的意志是一种坏的爱。因此，爱努力去占有它所爱的东西，这就是欲望；爱占有或享有了它所爱的东西，这就是欢乐；爱逃避它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恐惧；爱经历着它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悲伤。同理，如果爱是好的，那么这些情感就是好的；如果爱是坏的，那么这些情感就是坏的。(50)

然而，由于原罪，人的意志通常会把他引向错误的方向。只有接受了神的怜悯，并将其意志向上帝所在的不动点的人才能使他的情感积极向上。在这方面，奥古斯丁的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从根本上是矛盾的。因为与斯多葛派不同，他们的泛神论概念引导他们发现了地球和自然界的神性，奥古斯丁将神性定位在一个不可企及的、超然的领域。因此，在他看来，情感指向的是死后的生活。现世的一切都是污秽的、短暂的，包括人的身体。(51)这与亚里士多德截然不同，因为他认为情感和认知是不可分割的。可见，奥古斯丁已经预见到了让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总是备受指责的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52)与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情感上的宁静相比，奥古斯丁更喜欢生活的情感性，只要它服从意志，以神性为旨归。(53)

中世纪对于情感的思考没有古代那么深入，对其后几个世纪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经院哲学家通常被视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补充，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54)人

们常说笛卡尔是真正的创新者。他不仅被认为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还被认为是二元论的奠基人，尤其是身心二元论，而这还涉及情感与理性的对立。⁽⁵⁵⁾【18】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经常被这样理解。例如，就像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在总结其畅销书《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时所说的那样：

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 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res extensa*）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道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道鸿沟；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最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⁵⁶⁾

最近，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笛卡尔通过将上帝合理化，使他成为理性的缩影，将自己与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哲学家划清界限，因此同样使情感充满了理性。例如，他将恐惧视为意志的一部分，认为控制恐惧并不是抑制激情，而是一种激情对另一种激情的胜利，是“有用的思想产生一种激情（比如勇气），以抵消另一种激情（比如恐惧）”。⁽⁵⁷⁾尽管如此，这样的修正主义不应减损笛卡尔的创新性，就像他在《论灵魂的激情》（*The Passions of the Soul*）中所宣称的那样，他打算以“医生”的身份来研究情感，并将其与灵魂分离开来，这样就可以将情感作为机制来研究，就像对所有的生物体一样（除了人类的灵魂之外）。⁽⁵⁸⁾【19】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别人的手指靠近我们的眼睛时，即使大脑知道这根手指是朋友的，身体依然会做出恐惧和自我保护的反应，于是我们会眨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维被证明是无用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机器的结构，才使得这个移向我们的眼睛的运动在我们的大脑中激起了另一个运动，它引导动物精气进入相应的肌肉中，从而使我们的眼皮低垂了下来”。⁽⁵⁹⁾

路易十四的宫廷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在其情感解剖草图中也利用了笛卡尔的情感理论，开创了情感与被媒介描绘（素描、

摄影、电脑生成)的面孔(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事实证明,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勒·布伦创造了一种特定情感面部表达的粗略分类,这种分类一直沿用到19世纪。但即便是他还在世时,就有批评者指出,他理想中的典型的面部表情过于静态,不仅缺乏情感的过程性特征,而且是同时出现的,而不是清晰地连续出现。到了20世纪后期,作为对基本情感理论的一种常见批评,即人们或许不能以情感的纯粹形式来认识情感,这种反对意见再次出现。(61)

斯宾诺莎(1632—1677)常被视为笛卡尔二元论的对立面,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的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和形象研究领域经历了一场惊人的复兴(见第三章)。这种复兴从达马西奥的畅销书的标题中就可以读到,从批判性的《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到肯定性的《寻找斯宾诺莎》(*Looking for Spinoza*)。可以说,现代神经科学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采纳斯宾诺莎的思想,应该归因于他思想的模糊性和无序性。我们也可以将斯宾诺莎的复兴追溯到他对二元论的排斥,这使他他将情感和灵魂视为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他经常被称为一元论者,因为他相信一种单一的神圣物质。在其主要作品《伦理学:依几何次序论证》(*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1677)中,他将自然科学、几何学与情感联系起来,这样做有一个额外的好处,【20】即增加了他对感兴趣于神经科学的文学家和感兴趣于文学的神经科学家的吸引力。(62)

斯宾诺莎认为心灵(也包括情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会遵守普遍有效的法则。

所以,我将采取我在前面两部分中考察神和心灵的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征服情感的力量;并且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63)

他还把情感分为行动和激情,行动源于我们自身,而激情则有外在的根源。然而,自我和外在并不是绝对不同的,因为两者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假定只有三种基本的情感,即快乐、悲伤和更高层次的贪欲(*cupiditas*)。在他对待情感(或其他对象)的方式中,这些基本要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公理警句形式表达的法则,例如:

命题三十八 假如一个人开始恨他所爱的对象,于是他对它的

爱便完全消逝了。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将因此愈是恨它，比如如果他从来没有爱过它还要厉害些，并且他从前对它的爱愈大，则他对它的恨也将愈大。(64)

在19世纪，这些命题的物理性质和法则性质引起了生理学家的注意，后来又赢得了实验心理学家的赞赏。(65)当前的斯宾诺莎热尤其关注他的一元论。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领域的作家竞相援引他的理论，这样他们就可以对“物质”(matter)大肆赞扬，无论是日常用品、树木还是北极的冰。物质就像人一样，具有感觉和最终的能动性，因此，物质也在我们的移情范围之内，值得保护，甚至需要保护，对于生态运动以及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政治运动来说，这种思想颇具吸引力。(66)

【21】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学者也被一元论吸引，因为它使思维过程的具体化成为可能。(67)

神经科学家也对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影子，例如以下观点：“大脑和身体是平行的、相互关联的过程，在每一次交汇时都相互模仿，就像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些平行现象的深处，存在着一种机制，用来在大脑中反映身体的活动。”(68)斯宾诺莎的思想也可以被进化理论和内稳态理论所吸收。内稳态理论认为生物会控制自身的体内环境使其保持相对稳定。神经科学也支持他的美德理论，可以说，“我们必须努力制定和完善人类的法令，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在使法令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本能地要与他人合作”。(69)总之一句话，斯宾诺莎是一位“典型的生物学家”。(70)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从未写过一篇专门探讨情感的文章，但他在写作中经常提到情感，从早期的《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一直到《利维坦》(*Leviathan*)和《论人类》(*De Homine*)。“那个时期的作家中没有一位能像他那样，认为情感对人的一生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71)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可怕的激情生活，“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22】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72)但这种状况包含着一种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激情的生活和恐惧的生活能够彼此平衡，使理性的决定成为可能。霍布斯认为，这种平衡来自社会契约，这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唯一途径。

对霍布斯来说，所有的情感都是身体的表现，与意志相联系，指向

外在的物体。情感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是朝向一个物体，即渴望，或者是远离一个物体，即厌恶。如果我们既不渴望也不厌恶某物，我们就轻视它，并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置于两者之间。这两个方向创造了一个简短的“简单”情感目录，如爱、悲伤和快乐，当与其他因素结合时，这些简单情感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复杂情感。(73)对于霍布斯，我们需要记住“他的主要兴趣不是心理分析，而是要形成一个关于人性的概念，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并为公民性的机构和政治性的政府提供一个可理解的依据”。(74)

18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对霍布斯和他的对手约翰·洛克（1632—1704）做出了回应，阐述了一套道德情操体系，提出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移情概念。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 1671—1713）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关系密切，他探究了情感的效用，并以一种比霍布斯更为理性的方式来认识情感。对霍布斯来说，作为情感的一部分，自然情感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同类，而非自然的情感则是反社会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75)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沙夫茨伯里伯爵还看到了人性中“美德和利益最终可能是一致的”。(76)情感先天就是有价值的，而对幸福的追求必须与此相一致。人的不同情感之间就像“乐器的琴弦”一样，相互联系，追求自然的和谐。(77)

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更进一步。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认为情感“本质上是相互平衡的，就像人身上的拮抗肌一样”。(78)【23】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异教徒”哲学家，他把激情变成了某种控制理性的东西，“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79)对休谟来说，理性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评价和表征内容”，所以即使是一场谋杀也可以是完全理性的。(80)只有当我们的激情涉入时，谋杀才会变得不道德。休谟本人强调说：

人如果宁愿毁灭全世界而不肯伤害自己一个指头，那并不是违反理性。如果为了防止一个印第安人或与我是完全陌生的人的一些小不快，我宁愿毁灭自己，那也不是违反理性。我如果选择我认为较小的福利而舍去较大的福利；并且对于前者比对于后者有一种更为热烈的爱好，那也同样不是违反理性。(81)

除了激情控制理性的思想之外，休谟关于情感的思想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最近这个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同情。根据休

谟的理论，同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医学上的“传染”隐喻才能被勉强理解。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情感的外在表现（例如因悲伤而落泪），我们就会在脑海中构建一个这个人所经历的情感形象，这种形象会与我们自己的情感联系起来，进而产生一种可以影响我们自身行为的情感（例如拥抱一下这个人作为安慰）。⁽⁸²⁾休谟对于情感的这些思考，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思想一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到约翰·梅尔（John Mayer）和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提出、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普及的“情商”这一概念，以及当代心智理论和对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科学研究。⁽⁸³⁾

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对情感的认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理性的神圣化需要做出牺牲，而理性与情感的严格分离就是这样一种牺牲。

【24】因此，情感被定义为非理性的，有人称赞它的非理性，也有人谴责它的非理性。前一派在感伤主义时代（约1720—1800）占据主导地位，让·雅克·卢梭成为情感真实性崇拜的开创者。他认为，处于理想状态的人天生平等，没有被文化的可悲影响所污染。正如他在小说《爱弥儿》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⁸⁴⁾情感的形成意味着人重新进入了原初的状态，从而摆脱了文化的影响。因此，卢梭极力反对剧院里对情感的呈现，认为这种呈现是一种模仿，因而不是不真实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演员所呈现的情感会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影响观众们的情感。因为“所有的激情都是姐妹，一个人就足以激起千万人的激情”，社会主体会受到过度刺激的威胁，并最终失去自我控制。⁽⁸⁵⁾

启蒙运动中理性和情感的分离在康德（1724—1804）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但与卢梭不同的是，在康德那里，情感被赋予了强烈的负面色彩。康德从未发展出一套连贯的情感理论，但他确实谈了很多关于情感的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赋予情感以重要的地位，称其为理性的“他者”。他对道德情操的最初想法与休谟有关，但从18世纪90年代起，他采取了一种明显的反情感立场，将情感（*emotio*）和理性（*ratio*）作为二元对立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在1798年出版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一书中，他把情感细分为激情和情欲，认为激情是理性无法控制的，从而将其与任何道德规范分离开来。对康德来说，激情是突如其来的，是“在当前状态中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如果在主体中不能引起

思考（人们应当放任还是拒斥这种情感的理性表象），那就是激情”。⁽⁸⁶⁾激情可以成为“理性的暂时替代物”，而情欲则远远超出了理性所支配的伦理范畴。“很难或者根本不能用主体的理性来驯服的偏好就是情欲。”⁽⁸⁷⁾这对康德来说意味着“屈服于激情和情欲，这也许总是心灵的疾病，因为二者都排斥理性的统治”。⁽⁸⁸⁾内心的自由建立在自我控制的基础之上，对于自制力而言，没有比情感更大的威胁了。⁽⁸⁹⁾【25】一言以蔽之，没有人期望有情欲，因为如果人是自由的，谁愿意让人把自己置于锁链之中呢？⁽⁹⁰⁾

情感是什么？重要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到此为止。从1800年前后开始，不同学科关于情感的著作逐渐增多，后面的章节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析。第一章讲的是历史，第二章讲的是人类学，第三章讲的是实验心理学，而后面这两个学科是19世纪初才建立起来的。自那时起，哲学保留了其对情感的兴趣，代表人物包括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在过去20年中，快速发展的情感分析哲学加入其中，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以一种贯穿于以下章节的方式来理解情感。还要指出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概述，如果对过去的情感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的研究就完全可以迅速发展。此外，这类概述很少显示情感和当时文化与时代的日常思维具有相关性。例如，古代史学科刚刚开始通过研究未被使用过的石头、黏土和莎草纸资源，让对希腊情感文化的研究超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⁹¹⁾

二、谁的情感？

对情感哲学思想的回顾表明，并非所有人的情感在程度和方式上都是一样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把年轻人作为刻意灌输情感的对象，他们必须练习正确的判断，直到它成为第二天性。没有人考虑动物是否可能拥有情感这个问题。⁽⁹²⁾今天，人们通常把情感看作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是固有的和私人的，是负责自主性的内部器官，是人的主体性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具体化的地方。【26】这些独特品质的产生和稳定需要划界和区分，简而言之，就是要产生一个他者。“他者”的产生留下了文本的痕迹，这些痕迹的多样性和广度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过程永远

不会结束，仍然是未完成的、不稳定的，总是不断试图创造新的差异。要想回答“谁的情感？”这个问题，最好考虑一下他者产生过程中的文本痕迹。在这里我们将考虑两个区别：首先，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然后是人与类人机器之间的区别。

把动物和身体与情感联系起来，把人类和思想与理性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历史学家帕斯卡·艾特勒以德语词典为资料来源，展示了从18世纪晚期开始，维持这一传统不被打破是多么困难。例如，在1745年，18世纪最重要的字典之一《泽德勒普通百科辞书》（Zedler）对德语里表示感觉的“Empfindungen”和表示情感的“Gefühle”以及“Affekte”做了区分。动物被认为能够产生感觉，但只有人类能够产生情感，因为“动物是没有情感的，它们能感知现在的事物，但缺乏反思和沉思，这就是它们不能被情感所打动的原因”。⁽⁹³⁾艾特勒指出，50年后，在感伤主义的顶峰时期，“感觉”概念经历了一个重估的过程，人类感觉/情感和动物感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⁹⁴⁾

19世纪下半叶，两项新的发展动摇了人与动物在情感方面的区别。首先，进化论对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区别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在1872年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查尔斯·达尔文把来访者与自己的宠物的情感表达进行了比较。其次，新兴的生理学（包括情感生理学）在实验室里用动物做了实验，并由此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和动物大脑与器官有关的情感理论，因为从动物身上所观察到的一些反应与人类的反应非常接近。这引起了一场关于活体解剖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种做法是否会伤害动物的情感。这也涉及人类对动物的感情，尤其是同情和移情。⁽⁹⁵⁾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界线，即人是有感情的，而动物没有，不得不被一再地重新划定。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类人机器上，如小说和电影中的自动机和机器人。这也遵循了一条不确定的道路，因此留下了有用的文本线索，【27】形成了人类对机器产生感情以及机器发展自己情感生活的长期传统。作为一种文学传统，这可以追溯到霍夫曼（E. T. A. Hoffmann）1816年的小说《沙人》（*Der Sandmann*）。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年轻人爱上了一个机械娃娃。接着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讲的是一个科学实验创造的怪物产生感情的故事。在电影史上，类人机器十分常见，例如在《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1987—1994）中，机器人

Data由于缺乏情感而不断做出奇怪的决定，又例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22世纪的11岁机器人，它看起来和人一样，也有情感，并受到人类家庭的喜爱，这种爱一直持续到这个家庭昏迷的儿子醒来。⁽⁹⁶⁾这表明，任何对类人机器无法产生某种感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情感缺陷，或者不完全是人类。实验心理学家对实验对象的移情能力进行了研究，在一种类似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type）的情境中，通过给人类替身痛苦的电击，以测试他们的同情心：

尽管所有参与者都很清楚，无论是接受电击者还是电击都是假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和听到替身接受电击的情景时，往往会在主观、行为和生理层面上对其做出反应，就像一切都是真实的一样。⁽⁹⁷⁾

这类实验通常假定一个镜像的概念，只有当我能想象到他者与我自己相似时，我才能产生同情，而镜像概念反过来又假定我对我本人有一个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科学研究支持了这一概念的迅速传播（见第三章第三节）。因此，我同情他人的能力，以及同情无生命的类人物体的能力，成为衡量我自身人性的尺度。

人们注意到，这种对类人机器的移情有一个有趣的副作用，即如果机器太像人类，所有的同情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厌恶。因此，如何才能设计出一种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同情又不会引起反感的机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为日本和德国等老龄化社会设计用于日常家居和个人护理的机器人的工程师，还是对于电脑动画电影的制作人来说，都是如此。例如，2001年电影《怪物史莱克》（*Shrek*）的制作团队就不得不减弱菲奥娜公主与人类的相似性，因为“她开始变得过于真实，而且效果明显让人不快”。⁽⁹⁸⁾ 1970年，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发现了这种效应，并将其命名为“恐怖谷”（uncanny valley）。对此，最好以如下曲线图来表达（图2）。⁽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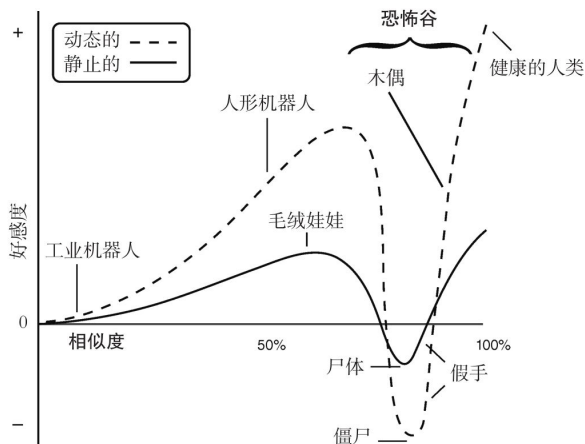


图2 森政弘与“恐怖谷”【28】

资料来源：Simplified version of Mori's original graph in Karl F. MacDorman, “Mortality Salience and the Uncanny Valley”, *IEEE—R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oid Robots*, Tsukuba, Japan (5—7 December 2005) [conference paper], 399—405, here 399.

哲学家卡特琳·米塞尔霍恩（Catrin Misselhorn）用错误的视觉感知来解释这种现象。人与机器共有的典型特征和表面特征越多，主体对客体的认同就越强。与此同时，对这一客体的习惯性情感倾向被激活。对缺乏真实性的认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会让移情失败。根据米塞尔霍恩的说法，这涉及“在四种情况之间的快速摇摆”：首先，一个客体被感知，用一个合适的概念去识别该客体的过程被触发；接着客体开始与概念相重合，这种重合没能成功；客体与概念之间的认同被中断，但接着又再次开启，因为客体仍然被感知。“这让人想起无线电接收器在恶劣条件下试图调到发射机的情况，对一个电台的接收总是会受到另一个电台和噪声的干扰。”^{〔100〕}在情感上，这种干扰表现为厌恶。

那么谁有情感呢？很明显，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29】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回答也不尽相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回答让我们能够对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做出推断。在区分人与动物以及拟人机器人的过程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差异，包括社会差异、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在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原住民以及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妇女和下层社会成员，都被预先假定有不同的情感。与其将“谁的情感？”这一问题作为出发点来寻求无可置疑的答案，我们不如把历史上对这个问题不断变化的回答作为我们调查的对象。

三、情感在哪里？

情感在哪里？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它在人体之外，在神灵那里，那么我们人类就会成为超自然力量的玩物，突然被压垮，又突然被解脱出来。这种想法通常与人类对感情的控制十分有限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位北夏延（North Cheyenne）部落的印第安妇女如果情绪反复无常，她的族人就会说她曾经在晚上往窗外张望过，而这在北夏延部落被认为是禁忌。这位妇女觉得自己被一股外来力量袭击了，很快就昏了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¹⁰¹⁾另一方面，如果情感位于人体内部，这些位置和赋予它们的属性会影响到由此产生的情感理论。我们已经从盖伦的体液病理学以及相关的情感原型（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黏液质）中看到了这一点。

情感在体内的位置通常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古埃及人认为大脑负责血液供应，而心脏负责情感，所以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他们毫不犹豫地用钩子通过鼻子插入大脑，把大脑分成小块，然后用小铲子从鼻孔中取出，心脏则被留在体内。⁽¹⁰²⁾与古埃及人不同，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地方，在他这里，大脑被视为情感、思想和其他很多东西的中心。【30】当他还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屠夫父亲让他用手在一头被宰杀的牛的大脑中搜寻杀死它的子弹，他犹豫了。他父亲的顾客“可不喜欢在享受美餐时吃到铅”。约瑟夫发现自己很难把手“伸进大脑；你必须抛开牛的大脑是其思想器官的任何想法，而是要把它当作一块肉来对待”。⁽¹⁰³⁾

情感在体内的位置也会对语言表达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意象和隐喻方面。与在很多文化中一样，澳大利亚原住民宾土比人（Pintupi）把童年与一种前社会化阶段联系在一起，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情感不受控制、自我控制能力有限、难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意识不到自己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儿童被描述为“缺乏知识的”“不自觉的”。有趣的是，他们也被描述为“聋子”（*patjaru, ramarama*）。为什么说他们是“聋子”呢？因为对宾土比人来说，思想是成熟的关键，是一种摆脱狂野情感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思考”“理解”和“听到”都与一个动词有关，即“*kulininpa*”，其字面意思是“听”。因为对他们来说，负责思想的器官是耳朵，而负责情感的器官是胃部。⁽¹⁰⁴⁾

通过比较眼睛的概念和它对情感的意义，我们可以获得这方面的认识。在许多语言中，包括英语和德语，光是快乐和满足的转喻，所以一

个快乐的人被描述为拥有“明亮的”或“闪亮的”眼睛的人。相比之下，中文里有“仰首伸眉”这个说法。⁽¹⁰⁵⁾中国人描述眉毛的方式在其他语言中是几乎找不到的。再如，“愁眉不展”的意思是“眉头紧锁”或“眉头紧绷”，这些都用来表达焦虑不安；“愁眉苦脸”的意思是“面带忧伤”；“扬眉吐气”形容的是摆脱了压抑状态后高兴痛快的样子；“眉飞色舞”形容的是非常喜悦而得意扬扬的样子。⁽¹⁰⁶⁾在中国，眉毛是“内心感受最明显的指示器”，⁽¹⁰⁷⁾因此是心灵的窗户。

与此同时，情感的概念（包括定位）与它的口头、书面、听觉和意象表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相反，这种关系极其多样。例如，虽然面部表情在身体概念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在16—17世纪北印度伊斯兰教的宫廷绘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面部是情感场所的证据。【31】在这里，表达感情的决定性手段是身体的运动、色彩、笔触和图画构图。⁽¹⁰⁸⁾此外，身体表达情感的语义很少是通用的，而是模棱两可的。在许多文化中，微笑意味着快乐和满足，但也可能意味着羞耻，或者是礼貌的搭讪，甚至是对死亡或损失的反应。⁽¹⁰⁹⁾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非欧洲的东西视为永远不变的。到目前为止，我所介绍的例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罗伯特·利维（Robert Levy）在塔希提岛（Tahiti）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情感的根源在于腹部，但也有少数人提到了心脏，利维将其归因于基督教传教士和《圣经》的影响。⁽¹¹⁰⁾情感器官在人们认识中的转移始终是一个历史知识的问题。如果认为身体是永恒的、泛文化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想对身体的建构有更准确的认识，第一个问题是情感是源自身体之外（例如神灵），还是身体内部？身体仅仅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还是这种超自然力量就在体内？身体与什么样的宇宙观紧密相连？

你甚至不需要离开欧洲，就能认识到情感位于体内的认识并不稳定。我们只需要回到笛卡尔那里就行了，他在1649年写道：“灵魂的激情的最后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动物精气推动大脑中央小腺体的躁动”，这里的小腺体指代的就是松果体。⁽¹¹¹⁾大卫·哈特利（David Hartley，1705—1757）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他试图将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联系起来。他认为情感是由外部刺激形成的，外部刺激引起了神经髓质的振动，这种振动随后通过“醚”传递到大脑，在那里，越来越微弱的振动以微振的形式被感知。因此，情感就是“微振”。⁽¹¹²⁾所以很明显，即使在典型的西方文化中，情

感在人体内的位置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情感的位置和身体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非常基本的运动，如心跳、脉搏和胃液的分泌。【32】情感的位置概念会影响这些身体运动吗？如果我来自一个把脉搏加速视为愤怒信号的文化，相对于在一个不是这样的文化中长大的人，我的脉搏跳动会不会更快？目前我们先搁置这个问题，但后文会反复谈到它。

四、情感有历史吗？

正如在对情感的哲学思考中所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情感是什么的回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每一种反应都是对情感不同概念和特征的回答，而情感本身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变的。如果这是真的，情感就没有历史，只有情感的概念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许多普遍主义的理论确实是这样宣称的。他们并不主张情感是以不同的方式概念化的，但坚持认为情感拥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基礎。因此，无论是罗马军团的士兵、中世纪的戟兵，还是凡尔登战场上的列兵或者是刚果童兵，面对敌人时的恐惧都是一样的，而且伴随着同样的体征：脉搏加快、瞳孔放大、心跳加速、出冷汗。毛利人战士摆脱“阿图阿”的附体，然后勇敢地投入战斗，与此并不矛盾，因为身体对恐惧的程序化反应只是转移到战前阶段，但所有文化和时代所经历的这种反应本身并无不同。

这或许是事实。但是，情感的概念会影响感受主体对情感的体验方式，即心理学所说的感受性，这也是事实。在毛利人战士的例子中，情感概念的影响非常显著，以至于他很可能对一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刺激做出无畏的反应，例如当对手企图杀掉他时。这证明了文化框架的力量，它可以使天生的、自动触发的情感反应失效。此外，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了特定情感概念对基本生理过程（如脉搏）的影响这一关键问题。这里提前透露一下本书第四章将会介绍的论点，这是一个由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提供的初步答案，该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情感词汇”和情感感觉之间反馈效应的关注。如果我说“我很快乐”，就会启动一种自我检查的机制，以确定我此刻是否真的感到快乐。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机制，这种自我探索、自我反省的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感到不快乐，从而与所表达的情感发生冲突。或者我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并覆盖同时感受到的其他情感。当前心理学流行的神经语言规划（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NLP）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后一种

假设，就像心理咨询一样，【33】它把一切都建立在把情感说出来对人产生的积极影响之上。(113)威廉·伊恩·米勒 (William Ian Miller) 是一位法学理论家，也是研究冰岛萨迦中的情感的专家。他说：“一旦我们给一种情感命名，它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114)

让我们假设，在表达情感方面，身体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战士在战斗中（或者像毛利人战士那样是在战斗前）感受到的对敌人的恐惧永远不可能与缓慢的脉搏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人文科学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普遍性通常是无趣的，其中有些普遍性“真实得过于琐碎”。(115)此外，与堆积如山的文化差异方面的材料相比，普遍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情感观念和文化模式的多样性。就目前而言，对于情感是否有历史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本书提供了别人给出的答案的概要，同时也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五、我们在书写情感史时可能会用到什么材料？

乍看之下，情感的历史似乎只能利用人们谈论自己情感的材料来书写。由于最迟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情感就属于内心和私密的领域，这些材料最初并不打算公之于众。它们与自我有着明显的联系，通常以日记、自传和回忆录的形式出现，还可以延伸到私人通信，例如信件（情书）、电子邮件、短信或安全服务监听的电话交谈。这种方法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大部分人并不从事写作；其次，在很多个世纪和文化中，这种材料并不存在。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这种方法的限制，因为今天的情感史几乎使用了所有可供历史研究的材料。即使存在限制，这些限制与在其他历史分支学科中遇到的限制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从考古学开始说起，因为考古学能够依赖的书面材料很少。尽管如此，近年来考古学家们一直在试图重构史前和远古时代历史行为者的情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如何描述历史行为者可能拥有的情感框架。【34】例如，尝试重建一个墓地的空间结构，然后推测这个墓地的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出席葬礼者的情感。(116)当然，这个过程建立在许多预设之上：首先要假定凯尔特人、罗马人或蒙古人确实是有情感的。其次，墓地的空间结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考古学对这样的难题并不陌生，所以对于这些来自情感史的新问题基本上没有异议。

用来书写外交史的材料也是如此，它不再把自己定义为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对外事务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被认为或多或少地扼杀了外交史。但外交史幸存了下来，并在过去几十年里以“外交文化史”和“国际史”的形式获得重生，前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外交的象征性和仪式层面，后者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和制度的历史交织。⁽¹¹⁷⁾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高级别的国际政治中，在君主之间、将军与秘书长之间、总统与政党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中，情感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在1841年生下继承人后，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让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做继承人的教父。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意了，但是这引起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亲属的抗议，因为无论是论年龄，还是论关系，他们都应该排在这位普鲁士国王之前，却竟然被忽视了。阿尔伯特的德国父亲恩斯特·冯·科伯格公爵（Duke Ernst von Coburg）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明白：

为什么普鲁士国王被授予这个荣誉，恕我直言，我觉得这很不合适……普鲁士是我们家族的头号敌人，吞掉了我们一半的世袭财产，而且还不断地威胁要夺走剩下的。而且，面对我们当前的请求，现任国王表现得很不情愿、极其傲慢和不公……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收回成命，而这一定会给德国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尤其是在整个萨克森。我十分痛心地注意到，【35】你对你曾经属于、现在仍然属于的这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是多么地漠不关心。⁽¹¹⁸⁾

“极其傲慢和不公”“痛心”和“荣誉”，这是欧洲贵族书信中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他们的王朝关系在许多方面决定了19世纪中期的政治。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元首之间的信件、国家元首写给亲属的书信、外交邮包、正式协议、新闻公告，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官方文件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都很值得研究。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考虑对“痛心”或“荣誉”的修辞运用，还要考虑它们在特定场合下的具体结构。外交材料通常以法语或英语这样的通用语写成，但经常会转换成其他语言，因此可以对不同情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歧义和误解进行微观考察。⁽¹¹⁹⁾

外交礼仪通常涉及荣誉、尊重和保全面子。1898年，法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Felix Faure）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女王住在尼斯附近，她已经快80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对双方来说，礼仪上的问候都不太顺利，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

家（君主制和共和制）在情感编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维多利亚女王没有按照外交礼仪的要求在宫殿台阶上迎接，而是派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前往迎接。她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半，在里维埃拉宫住了几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福尔先生来看我。伯特（Bertie，即威尔士亲王——译者注）在楼下迎接了他，并带他上楼。三位公主和几位侍女在楼梯口，我站在客厅门口，请他坐下。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举止迷人，可见他是“大贵族”，而不是“暴发户”。他闭口不谈政治，但非常友好地说我“深受法国民众的爱戴”，希望我在此住得舒服。⁽¹²⁰⁾

在她死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被转录和清理，原件则被销毁。另一种说法是，事实上，维多利亚女王认为这位法国总统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36】她表达这一观点的方式是没有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而福尔也确实对此心领神会。女王的私人助理去世后，她的回忆录在1952年出版，其中这样描述了总统的来访：

他环顾四周，想看看都有谁在那里迎接他，但既没有看到女王，也没有看到威尔士亲王，于是他连帽子也没有摘下来，似乎在暗示访问还没有正式开始。他戴着帽子和三位公主握了握手，当然也和那些男仆握了握手。这样的举动超出了王室礼仪的规定，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惊讶。后来我听说，在巴黎方面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每个人都说是离谱的、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总统随后被带领上楼，威尔士亲王匆忙下楼迎接，好像是迟到了。直到此时，总统才摘下他的帽子。⁽¹²¹⁾

到了20世纪，公共领域和媒体的影响力扩大，甚至在地位悬殊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中也是如此。⁽¹²²⁾例如，在1957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可能因为公开表达强烈的情感而失去了他的职位，更确切地说，那是一次关起门来的情感表达，但随后却被公之于众。他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我控制，因此与艾登相比，麦克米伦更能代表当时男性的“克制文化”。⁽¹²³⁾

在外交会议中，参与者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在个人接触过程中，感官认知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历史学家发现所有这些都很难重构。但这不应妨碍他们在分析会晤的政治后果时，至少把人际交流考虑

进来，试图理清其原因。外交情感史远没有涵盖所有为历史情感研究提供了材料的未开发的潜在领域。对于情感史来说，从来就不缺乏材料。

那么，对于那些试图描绘“情感人”（*Homo sentiens*）历史图谱的人来说，我们能从所有这些信息中得出什么结论呢？⁽¹²⁴⁾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综合转向干预，并提前透露第四章的内容，即仅仅根据历史行为者定义情感的方式来定义情感是不够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历时性的。这里可以提前给出本书的另一个结论，即情感史研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比历史的其他分支要长得多。要确定其研究对象，历史研究就需要一个跨时间的范畴，而这一范畴预先假定有许多共同之处。一边是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法语情书中所表达的情感，一边是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写给女儿们的信中被认为是“情绪化”的内容，如果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必然会重新陷入纯粹偶然性的结局。⁽¹²⁵⁾只有当存在一个元范畴时，历史的书写才有可能，即使这个元范畴有时会与源语言中使用的概念发生冲突。这代表着我与任何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脱离关系。

因此，研究情感的历史学家需要对情感下一个初步定义。在这里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本书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南，帮助人们寻找这样一个定义。我们不需要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定义，

【39】一个为了更加精确而仅仅与某些非常有限的领域有关的定义。我们最好尽早开始着手解决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自古以来一直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情感是否是一种自动反应，就像在刺激—反应框架中那样，外部刺激引起稳定的反应，或者想象是否会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相对于生命科学和其他学科，情感史通常赋予想象更大的作用。

其次，我们需要弄清楚身体和情感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先要在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背景下，考察关于情感和身体的局部和历史观念。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非言语性身体行为（比如“shokeling”，即正统犹太教徒祈祷时摇晃身体的方式）的描述上时，或转移到具体的语言行为（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子之间的书信往来，这是早期现代法国贵族的特征，他们认为写下来的情感比口头表达的情感更为重要）时，身体才能被定义。⁽¹²⁶⁾

第三，判断或评价的情感成分是值得思考的。应该赋予历史行为者多少能动性，即他们是否更多是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行动，是否根据文

化、特定群体的成员身份或群体的构成来区分他们的情感对象，这些都是情感史上的重要问题。

最后，在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上确定一个立场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历史行为者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以这种方式表达了情感与道德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赋予他们的情感一种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与在认为情感与道德无关的社会中不同。如果能阐明这四点，我们就在形成情感的定义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础已经奠定，下面我们就可以着手充实情感史的空间了。

- (1) David Sander, “Amygdala”, in Sander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motion and the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32, here 28.
- (2) 见 <<http://www.amygdaloids.co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4.
- (3)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 6, esp. 163—168.
- (4) 本插图又见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 6, esp. 166.
- (5) 一篇综述文章称：“杏仁核由功能不同的核团（即13个主要的核团，每个核团都可以进一步细分）组成，它们之间有广泛的核间和核内连接。” Tim Dalgleish, Barnaby D. Dunn, and Dean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55—368, here 358. 另一篇论文对神经细胞有一种被称为“杏仁核”的单一结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将其称为“大脑半球结构和功能上的异质性区域”。Larry W. Swanson and Gorica D. Petrovich, “What is the Amygdala?”,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21/8 (1998), 323—31, here 330. 还有人认为，来自大脑其他部分的神经细胞属于一个“扩展的杏仁核”，其中包括基底前脑的无名质。John P. Aggleton (ed.), *The Amygdala: A Functional Analysis*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 M. Davis and P. J. Whalen, “The Amygdala: Vigilance and Emotion”, *Molecular Psychiatry*, 6/1 (2001), 13—34.
- (6) 关于嗅觉，见 Geoffrey Schoenbaum, Andrea A. Chiba, and Michela Gallagher, “Neural Encoding in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during Olfactory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9/5 (1999), 1876—1884; 关于视觉，见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Hanna Damasio, and Antonio R. Damasio, “Fear and the Human Amygdal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5/9 (1995), 5879—5891; 关于爵士音乐家对即兴音乐和有乐谱的音乐的区分，见 Annerose Engel and Peter E. Keller, “The Perception of Musical Spontaneity in Improvised and Imitated Jazz Performances”, *Frontiers in Audito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83(2011), 1—13.
- (7) 见 Richard J. Davidson, “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orrectives from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Brain and Cognition*, 52/1 (2003), 129—132, here 130.
- (8) Daan Baas, André Aleman, and René S. Kahn, “Lateralization of Amygdala Activ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Studies”, *Brain Research Reviews*, 45/2(2004), 96—103.
- (9) Jean Smith, “Self and Experience in Maori Culture”, in Paul Heelas and Andrew Lock(eds.),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lf*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1), 145—159, here 149.
- (10) Barbara H. Rosenwein, “Introduction”, in Rosenwein (ed.), *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 (11) Ingrid Kasten, “Einleitung”, in C. Stephen Jaeger and Ingrid Kasten (eds.), *Codierungen von Emotionen im Mittelalter: Emotions and Sensibil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Berlin: De Gruyter, 2003), xiii—xxviii, here xiv.
- (12) Peter N. Stearns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4 (1985), 813—836, here 824.
- (13) Rüdiger Schnell, “Historische Emotionsforschung: Eine mediävistische Standortbestimmung”, *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38 (2005), 173—276, here 180, 213.
- (14) Armin Günther, “Sprache und Geschichte: Überlegungen zur Gegenstandsangemessenheit einer historischen Psychologie”, in Michael Sonntag and Gerd Jüttemann (eds.), *Individuum und Geschichte: Beiträge zur Diskussion um eine “ Historische Psychologie”* (Heidelberg: Asanger, 1993), 34—48, here 35.
- (15) Catherine Lutz and Geoffrey M. White,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1986), 405—436, here 406 . 另外，海伦娜·弗拉姆（Helena Flam）认为有“建构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参见Helena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e Einführung*(Konstanz: UVK Verlagsgesellschaft, 2002), 118. 根据欧文·林奇（Owen Lynch）的观点，“西方理性对情感的等级划分暗示了人类对动物、文化对自然的进一步等级划分”，参见Owen M. Ly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in Lynch (ed.), *Divine Pass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34, here 10.
- (16) Mary-Jo Delvecchio Good, Byron J. Good,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Introduction: Discourse and the Study of Emotion, Illness and Healing”,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2/1 (1988), 1—7, here 2.
- (17) 见Lutz and Whit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406, 429—430.
- (18) Lorraine Daston and Gianna Pomata, “The Faces of Nature: Visibility and

Authority”, in Daston and Pomata (eds.), *The Faces of Natur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Berlin: BWV, 2003), 1—16, here 14.

- (19) Maurice Bloch and Jean H. Bloch, “Women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in Carol P. MacCormack and Marilyn Strathern (eds.),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5—41, here 27.
- (20) 关于高尔顿对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贡献，见Donald A. MacKenzie, *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193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1) Wilhelm Windelband, *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 Rede zum Antritt des Rectorats der Kaiser-Wilhelm-Universität Strassburg, gehalten am 1. Mai 1894* (3rd edn., Strasbourg, 1904)。又见民族学家约翰·莱维特 (John Leavitt)。他认为，情感研究一直受到一种徒劳的划分的阻碍，这种划分存在于一种由通则论科学研究的自然和一种由“意识形态科学”所负责的文化之间。参见John Leavitt, “Meaning and Feeling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merican Ethnologist*, 23/3 (1996), 514—539, here 515。
- (22) 洛林·达斯顿与本书作者的对话 (2009年6月25日)，又见Jan Plamper and Benjamin Lazier, “Introduction: The Phobic Regime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58—65, here 59。
- (23) 我最重要的范本是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的*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24) 我们要感谢人种学家凯瑟琳·卢茨，她用两句话对人类情感史做出了可能是最简明扼要的描述：“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社会对情感概念的广泛讨论通常是出于哲学、宗教、道德或最新的科学心理学的目的。其中包括柏拉图对快乐与善的关系的关注；斯多葛派认为激情天生就是邪恶的这一信条；早期的基督徒试图区分人类脆弱的情感和上帝的情感；霍布斯认为激情是行动的主要来源，自然地促进了战争与和平；卢梭认为自然的情感是有价值的，应该与文明产生的‘人为的’或虚假的情感相区分；19世纪的心理学家开始把情感看作心理生理学的本质，意识越来越不被认为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Catherine A.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and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53。
- (25) William James, “What Is an Emotion?”, *Mind*, 9/34 (1884), 188—205。从那以后，这个标题被多次使用，例如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 (Jerome Kagan) 的*What Is Emotion? History, Measures, and Mean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6) 菲利普·费希尔 (Philip Fisher) 描述了与情感有关的领域，尽管他没有给出时间顺序：“从一开始，我们对情感的认识和看法就是一个复杂的产物，在哲学、文学 (尤其是史诗和悲剧)、医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法律和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研究相互重叠，有时相互妨碍。在我们这个时代，进化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最近在大脑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新研究，加上博弈论和经济学，尤其是哲

学，延续了这种杂糅性，不同领域之间既共享，又相互依赖，有时相互干扰，甚至相互破坏，有时也相互合作。”参见Philip Fisher, *The Vehement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 (27) 关于古希腊，见David Konstan, *The Emo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Studies in Aristotle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06);关于北美殖民地时期，见Nicole Eustace, *Passion Is the Gale: Emotion, Pow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481—486；关于19世纪的英国，见Thomas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The Creation of a Secular Psychological Categ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8) 关于这种传播的过程，可以参考希腊—波斯—阿拉伯—印度三角中“瘰癧”的情感维度：Guy N. A. Attewell, *Refiguring Unani Tibb: Plural Healing in Late Colonial India*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7), 225—237；关于情感本身，以及它在希腊—波斯—阿拉伯—印度—英国关系中的身体定位，见Margrit Pernau, “The Indian Body and Unani Medicine: Body History as Entangled History”, in Axel Michaels and Christoph Wulf (eds.), *Images of the Body in India* (London: Routledge, 2011), 97—108, esp. 104—106。
- (29) 见LeDoux, *Emotional Brain*; Klaus R. Scherer, “Nonlinguistic Vocal Indicators of Emo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arroll E. Izard (ed.), *Emotions in Person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9), 495—529; 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3 (2002), 821—845; Jaak Panksepp,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rles 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1872); “affection”, in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i. A to Androphagi (11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 299—300, here 300;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Mille plateaux*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314; Karl G.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Mapping Three Cultures of Emotion in Indo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1;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esare Lombroso, *L'uomo delinquente in rapporto all'antropologia, alla giurisprudenza ed alle discipline carcerarie* (Turin: Bocca, 1876), 651。
- (30) Paul R. Kleinginna Jun. and Anne M. Kleinginna, “A Categorized List of Emotion Definitions, with Suggestions for a Consensual Defini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5/4(1981), 345—379。
- (31) Stewart R. Roberts, “Nervous and Mental Influences in Angina Pectoris”, *American Heart Journal*, 7/1 (1931), 21—35, here 23; Beverley Fehr and James A. Russell, “Concept of Emotion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3/3 (1984), 464—486, here 464。

- (32) Antonio R.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Orlando, FL: Harcourt, 2003), 15.
- (33) 关于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对于情感的思考，最简明的介绍见Barbara H.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1.
- (34) 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 John Henry Free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73. 更一般的版本，见Michael Krewet, *Die Theorie der Gefühle bei Aristoteles* (Heidelberg: Winter, 2011)。(中译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70页。)
- (35) William W. Fortenbaugh, *Aristotle on Emotion: A Contribution to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Rhetoric Poetics, Politics and Ethics* (2nd edn., London: Duckworth, 2002), 114. 该书作者认为这段话不具代表性，仅限于修辞；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见Konstan, *Emo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40.
- (36) 亚里士多德作为埃克曼的先驱，见Carol Tavris, “A Polite Smile or the Real McCoy?,” review of Paul Ekman, *Emotions Revealed: Recognizing Faces and Feeling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3), in *Scientific American*, 288/6 (2003), 87—88. 亚里士多德作为认知心理学评价方法的先驱，见Randolph R. Cornelius, *The Science of Emotion: Research and Tradi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6), 115; Kagan, *What Is Emotion?*, 11—12; Richard Lazarus, “Relational Meaning and Discrete Emotions”, in Klaus R. Scherer, Angela Schorr, and Tom Johnstone (eds.), *Appraisal Processes in Emotion: Theory, Methods,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7—67, here 40. 亚里士多德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见Konstan, *Emo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31 (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家阿格妮塔·费希尔 [Agneta Fischer])。
- (37) Aristotle, “Art” of Rhetoric, 173—175. (中译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第71页。)
- (38) Simo Knuuttila,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37, 40.
- (39) Christoph Demmerling and Hilge Landweer,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Von Achtung bis Zorn* (Stuttgart: Metzler, 2007), 2. 又见Bruno Sne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trans. T. G. Rosenmay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Ger. orig., *Die Entdeckung des Geistes: Studien zur Entstehung des europäischen Denkens bei den Griechen*, 1946]。
- (40) “我们会说被恐惧‘麻痹’，被爱和嫉妒‘打击’，被悲伤‘压倒’，因为愤怒而‘疯狂’”；Robert C. Solomon, *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0. 对古代情感哲学的讨论，见Rüdiger Zill, *Meßkünstler und Rossebändiger: Zur Funktion von Metaphern und Modellen in philosophischen Affekttheorien*, PhD dis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erlin, 1994.

- (41) Aristotle, “Art” of Rhetoric, 201. 又见Knuuttila,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35, 37. (中译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第81页。)
- (42) A. W. Price, “Emotions in Plato and Aristotle”, in Peter Goldi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1—142, here 137—138.
- (43) 对情感最感兴趣的斯多葛派学者有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 公元前333/332—前262/261)、克利西波斯(Chrysippos, 公元前281/276—前208/204)、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os, 公元前135—前51)、塞涅卡(Seneca, 公元前1—公元65)和爱比克泰德(Epiktetos, 50—125)。关于斯多葛派及其对情感的态度,见Richard 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From Stoic Agitation to Christian Temptation: The Gifford Lectur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rgaret R. Graver, *Stoicism and Emo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Barbara Guckes (ed.), *Zur Ethik der älteren Stoa*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更早的文本见Maximilian Forschner, *Die stoische Ethik: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Natur-, Sprach- und Moralphilosophie im altstoischen System* (2nd ed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5)。
- (44) 关于内心的宁静,见Joachim Ritter (ed.),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i (Basel:Schwabe, 1971), 429—433, 593.
- (45)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5, ch. 1.作者在细节方面超越了斯多葛派,她承认了动物的情感能力。她总体上区分了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斯多葛派方案,接受前者,拒绝后者。见Jules Evans,“An Interview with Martha Nussbaum”, *Philosophy for Life*(5 February 2009) <<http://philosophyforlife.org/an-interview-with-martha-nussbaum/>> accessed 21 February 2014.
- (46) 有关盖伦四体液说的介绍,见Jutta Kollesch and Diethard Nickel (eds.), *Antike Heilkunst: Ausgewählte Texte aus den medizinischen Schriften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Stuttgart:Reclam, 1994), 25—27.
- (47)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41; Knuuttila,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93—98; Sorabji,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253—260.
- (48) 关于这些早期的基督教修士,所谓的沙漠教父,以及他们对情感的看法,见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46—50.
- (49)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34.
- (50)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 and trans. R. W. Dy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Lat. orig., *De civitate dei*, 426], 590. (中译见[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修订版)》[下册],王晓朝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7页。）

- (51)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50—51.
- (52) Robert C. Solomon, *The Passions: Emo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3). 根据托马斯·迪克森的说法，罗伯特·所罗门 (Robert Solomon) 认为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基督教思想家应该对情感和理性的分离负责，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是激情和理性，理性就像激情一样，可以被“驱动” (*motus*)，尽管这只是一种积极的驱动，比如爱，见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53—54。
- (53)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以自传的形式论述了对情感的自愿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欲望 (*libido*) 有关，见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51—52。
- (54) 对于中世纪情感的认识，见Peter King, “Emotions in Medieval Thought”, in Goldie(ed.),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otion*, 167—187; Knuuttila,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chs. 3—4; Piroška Nagy and Damien Boquet (eds.), *Le Sujet des émotions au Moyen Âge* (Paris: Beauchesne, 2009), esp. pt. I.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见Nicholas E. Lombardo, *The Logic of Desire: Aquinas on Emoti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11)。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从托马斯·阿奎那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见Dominik Perler, *Transformationen der Gefühle: Philosophische Emotionstheorien 1270—1670*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1)。
- (55) 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 (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 强化了身心二元论。关于他的情感理论，见Tad Schmaltz, “Malebranche: Neigungen und Leidenschaften”, in Hilge Landweer and Ursula Renz (eds.), *Klassische Emotionstheorien: Von Platon bis Wittgenstein* (Berlin: de Gruyter, 2008), 331—349。
- (56) Antoni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248—249。许多批评家指出，达马西奥把笛卡尔当作一个假想对手，而没有考虑到对笛卡尔作品的研究，见Henrik Lagerlund, “Introduction: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Late Medieval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in Lagerlund (ed.), *Forming the Mind: Essays on the Internal Senses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from Avicenna to the Medical Enlightenment*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1—15; Timo Kaitaro, “Emotional Pathologies and Reason in French Medical Enlightenment”, in Lagerlund (ed.), *Forming the Mind*, 311—325。(中译见[美]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殷云露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234—235页。)
- (57) Deborah Brown, “The Rationality of Cartesian Passions”, in Henrik Lagerlund and Mikko Yrjönsuuri (eds.), *Emotions and Choice from Boethius to Descart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259—278, here 270。关于笛卡尔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具有原创性，见Anthony Levi, *French Moralists: The Theory of the Passions, 1585 to 16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试论现代早期情感升级的史前史，见 Wilhelm Dilthey, “Die Funktion der Anthropologie in der Kultur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i. *Weltanschauung und Analyse des Menschen seit Renaissance und Reformation* (6th edn., Stuttgart: Teubner, 1960), 416—492。

- (58) René Descartes, “Préface to ‘Passions de l’âme’: Letter of Descartes to the editor, 14 August 1649”, in Roger Ariew (ed.), *Descart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i. *Descartes’s Works in Translation* (Bristol: Thoemmes Press, 2002), B3.
- (59) Descartes, “Préface to ‘Passions de l’âme’”, 37. 该案例被以下著作征引：Daniel M. Gr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 From Aristotle’s Rhetoric to Modern Bra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23. (中译见 [法] 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页。)
- (60) [Charles] Le Brun, *A Method to Learn to Design the Passions: Proposed in a Conference on the General and Particular Expression: Written in English, and Illustrated with a Great Many Figures Excellently Designed by M. Le Brun, Chief Painter to the French King,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ranslated and all the Designs Engraved on Copper by, John Williams* (London: n.p., 1734)[1st Fr. edn., 1698].
- (61) Anne Schmidt, “Showing Emotions, Reading Emotions”, in Ute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Vocabulary of Feeling 17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2—90. 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当今强调情感混合性的著作如凯根的《什么是情感？》(What Is Emotion?)。
- (62) Baruch de Spinoza, “Ethics”, in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d. Michael L. Morgan,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2), 213—382.
- (63) Baruch de Spinoza, “Ethics”, in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d. Michael L. Morgan,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2), 278. (中译见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6页。) 关于斯宾诺莎，见对于情感思想最完整的一部单卷本概述，虽然该书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实验心理学的观点组织起来的（因为两位作者是心理学家）：H. M. [sic Harry Norman] Gardiner, Ruth Clark Metcalf, and John G.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A History of Theori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7), 192—205. 又见 Steven Nadler, “Baruch Spinoza”,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11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1/entries/spinoza>> accessed 22 February 2014.
- (64) Spinoza, “Ethics”, 298. (中译见 [荷]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128页。)
- (65) 例如，可参见一位生理学家的著作：Johannes Müller, *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des Menschen: Für Vorlesungen*, ii (Koblenz: Hölscher, 1840), 543—552.

- (66) 见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x—xi。“我试着去见证在我身上和周围流动的生命物质。尽管干细胞、电、食物、垃圾和金属的运动和效力对政治生活（以及人类生活本身）至关重要，只要这些活动和力量一出现在公众面前（通常一开始是通过干扰人类的计划或期望），马上就被表现为人类的情绪、行动、意义、动机或意识形态。这种快速的替代维持了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实际上支配着那些‘它们’。根据我所借鉴的（非机械论的、非目的论的）唯物主义传统，它们可能成为强有力的动因。在这本书中，斯宾诺莎是我的试金石，尽管他本人并不算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我引用了他的意动物体的想法，这些意动物体努力通过与其他物体相结合来增强它们的活动能力。我和他一样，相信一切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这一主张暗示一切物质在深层都是互相联系的，不可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基质，它与生态敏感性相呼应，对我来说，后者也是重要的。”原文对“生态敏感性”做了强调。
- (67) 见William E. Connolly, *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7—8。“人类作为有思想的存在，对自己形成了两种不可简化的观点。斯宾诺莎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思维和延展是同一物质的两个方面，而不是构成宇宙的两种物质。我采用的是修订过的斯宾诺莎的‘并行论’……依我看，这个论点和那些反对它的论点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改良后的斯宾诺莎主义可以为它带来好处。首先，它表达了那些认为人类生命是在没有神干预的情况下从低级形态进化而来的人的理解，并且又没有将人类的经验简化为第三人称的讲述。其次，它鼓励文化理论家去探索身体 / 大脑过程的观察和思维的生活经验之间显著相关性的积累证据。第三，它鼓励我们积极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技术（其中许多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了），这些技术可以刺激思维的变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必对思维采取一种简化的认识。第四，当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被注入身体 / 大脑的过程中时，它允许我们去探索思维本身是如何改变身体 / 大脑过程的微观组成的。因为，正如两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杰拉尔德·埃德elman（Gerald Edelman）和朱利奥·托尼诺（Giulio Tonino）精辟地指出的那样：‘一起放电的神经元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采用的并行的版本鼓励探索技术和思维之间不透明的、普遍存在的联系，而不是将思维本身的经验简化为一系列观察状态。它理解思考的复杂性，同时鼓励我们使用技术来变得更加深思熟虑。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思考是神经文化的一部分。”
- (68)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217. 该书也列举了引用斯宾诺莎的其他生命科学家（William E. Connolly, *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300 n. 7）。
- (69)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173—174.
- (70) Damasio, *Looking for Spinoza*, 14.
- (71) Gardiner, Metcalf, and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184.
- (7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 (rev.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9.（中译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5页。）

- (73)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 (rev.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6. 总体来说, 霍布斯对情感的探讨分散在多个文本中: 《法律要义: 自然法与民约法》(1640/1650) 的第7、9和12章; 《论公民》(1642); 《利维坦》(1651) 的第6和13章; 《论物体》(1655) 的第25章第12—13节; 《论人类》(1658) 的第11章。
- (74) Gardiner, Metcalf, and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187—188.
- (75) 此外, 沙夫茨伯里“最早发现了作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能力或感受的情感。与他的老师约翰·洛克相反, 他认为情感不是源于感觉和反射, 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Angelica Baum and Ursula Renz, “Shaftesbury: Emotionen im Spiegel reflexiver Neigung”, in Landweer and Renz (eds.), *Klassische Emotionstheorien*, 351—369, here 353.
- (76) 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7.
- (77) Gardiner, Metcalf and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212.
- (78) Francis Hutcheson,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Conduct of the Passions and Affections: With Illustrations on the Moral Sense*, ed. Aaron Garret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2), 119, 原文强调。
- (79)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ng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 ii. *Of the Passions* (London: John Noon/Thomas Longman, 1739), 248 (pt. 3, sect. 3). (中译见 [英] 休谟: 《人性论》[下册], 关文运译, 郑之骧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449页。)
- (80) Sabine A. Döring, “Allgemeine Einleitung: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heute”, in Döring(ed.),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12—65, here 16. 有关“自称为‘异端’哲学家”的休谟, 参见Solomon, *True to our Feelings*, 100.
- (81) 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ii. 249—250 (pt. 3, sect. 3). (中译见 [英] 休谟: 《人性论》[下册], 关文运译, 郑之骧校, 第450页。)
- (82) Rachel Cohon, “Hume’s Moral Philosophy”,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0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0/entries/hume-moral>> accessed 22 February 2014.
- (83) Max Scheler, *The Nature of Sympathy*, trans. Peter Heath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8), 14—17; Peter Salovey and John D. May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3 (1989—1990), 185—211; Daniel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关于心智理论和镜像神经元参见本书第三章。

- (84)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Emile and Sophie, or, The Solitaries)*, trans. and ed. Christopher Kelly and Allan Bloom (Lebanon,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10) [Fr. orig.,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 167. (中译见[法]卢梭:《爱弥儿 论教育》[上卷],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页。)
- (85) Jean-Jacques Rousseau, “J. J. Rousseau, Citizen of Geneva, to M. d’Alembert: Letter to d’Alembert on the Theater”, in *Letter to d’Alembert and Writings for the Theater*, trans. and ed. Allan Bloom, Charles Butterworth, and Christopher Kelly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4), 251—352, here 265. 也见Sidonia Blättler, “Rousseau: Die Transformation der Leidenschaften in soziale Gefühle”, in Landweer and Renz (eds.), *Klassische Emotionstheorien*, 435—456, esp. 440—441.
- (86) Immanuel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trans. and ed. Robert B. Loud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9, 原文强调。(中译见[德]康德:《实用人类学(外两种)》[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 (87)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52, 149, 原文强调。(中译见[德]康德:《实用人类学(外两种)》[注释本],李秋零译注,第132页。)
- (88)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49, 原文强调。(中译见[德]康德:《实用人类学(外两种)》[注释本],李秋零译注,第132页。)
- (89) “内在自由要求两点: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把握住自己(*animus sui compos*)和做自己的主人(*imperium in semetipsum*)”,这就是说,驯服自己的激情和统治自己的情欲。”参见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and ed. Mary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r. orig.,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97], 166.
- (90) 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151. (中译见[德]康德:《实用人类学(外两种)》[注释本],李秋零译注,第134页。)
- (91) 自2009年以来,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现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该小组最初以古代史学家安戈洛斯·查尼奥蒂斯(Angelos Chaniotis)为中心,见*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The Greek Paradigm*。这个小组研究成果的第一卷,见Angelos Chaniotis (ed.), *Sourc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Emotions in the Greek World* (Stuttgart: Steiner, 2012)。
- (92) 关于亚里士多德,见Amélie Oksenberg Rorty, “Structuring Rhetoric”, in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ed.), *Essays on Aristotle’s Rhetor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33, here 18—19; Konstan, *Emo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22.
- (93) Pascal Eitler, “The ‘Origin’ of Emotions—Sensitive Humans, Sensitive Animals”, in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91—117, here 95.

- (94) Pascal Eitler, “The ‘Origin’ of Emotions—Sensitive Humans, Sensitive Animals”, in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98.
- (95) Pascal Eitler, “The ‘Origin’ of Emotions—Sensitive Humans, Sensitive Animals”, in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99—105, 109.
- (96) Catrin Misselhorn, “Empathy and Dyspathy with Androids: Philosophical, Fictional and (Neuro-)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Konturen*, 2 (2009), 101—123, here 101—102. 也见Thomas Thiel, “Fühlt die Maschine? Die Androidenrobotik an der Grenze zur Utop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July 2010), N4; Wolfgang Gessner, Gesine Lenore Schiewer, and Alex Ringenbach, “Why Androids Will Have Emotions: Constructing Human-Like Actors and Communicators Based on Exact Sciences of the Mind”, in Denis Lalanne and Jürg Kohlas (eds.),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MMI Program*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133—163.
- (97) Mel Slater et al., “A Virtual Reprise of the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s”, *PLoS ONE*, 1/1 (2006), e39, here 1.
- (98) 转引自Misselhorn, “Empathy and Dyspathy with Androids”, 103.
- (99) Masahiro Mori, “The Uncanny Valley”, trans. Karl F.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19/2 (2012), 98—100 [Jap. orig., “Bukimi no tani”, 1970].
- (100) Catrin Misselhorn, “Empathy with Inanimate Objects and the Uncanny Valley”, *Mind and Machines*, 19/3 (2009), 349—359, here 357.
- (101) Anne S. Straus, “Northern Cheyenne Ethnopsychology”, *Ethos*, 5/3 (1977), 326—357, here 341—342.
- (102) 这种做法在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9—前1076）最为普遍，见Ann Rosalie David, “Mummification”, in Donal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9—444, here 440—441.
- (103) Joseph LeDoux, “Brains Through the Back Door”, in John Brockman (ed.), *Curious Minds: How a Child Becomes a Scienti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4), 142.
- (104) Fred R. Myers, *Pintupi Country, Pintupi Self: Sentiment, Place, and Politics among Western Desert Aborigin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6), 107.
- (105) Ning Yu,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1 (2002), 341—367, here 343.
- (106) Ning Yu,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1 (2002), 341—367, here 345.
- (107) Ning Yu,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2 (1995), 59—92, here 79 . 也见 Zoltán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2.

- (108) Monica Juneja, “Visualising Emotional States in Indian Court Painting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在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演讲 (2009年6月8日) ; Monica Juneja, “Translating the Body into Image: The Body Politic and Visual Practice at the Mughal Court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Michaels and Wulf (eds.), *Images of the Body in India*, 235—260, here 239, 243.
- (109)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1.
- (110) Robert Levy, *Tahitians: Mind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ety Isla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71.
- (111) René Descartes,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trans. Stehen M. Vos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 [Fr. orig., *Les Passions de l'âme*, 1649], 50.
- (112) Gardiner, Metcalf, and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222.
- (113) 关于这种反馈机制, 见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010), 237—265, esp. 242.
- (114) William Ian Miller, *The Anatomy of Disgu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 (115) Gross,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 34.
- (116) Sarah Tarlow, “Emotion in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1/5 (2000), 713—746.
- (117) 例如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1—256; Ursula Lehmkuhl, “Diplomatiegeschichte als internationale Kulturgeschichte: Theoretische Ansätz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zwischen Historischer Kulturwissenschaft und Soziologischem Institutionalismu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3 (2001), 394—423, 第414页明确提到了情感;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and Frank Schumacher (ed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3); Markus Mösslang and Torsten Rlotte (eds.), *The Diplomats' Worl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iplomacy, 1815—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010年, 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以情感为主题的外交会议, 见Heidi Mehrkens, Review of “Persönli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Staatsmännern als Kategorie der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1815—1914)”, *H-Soz-u-Kult*, H-Net Reviews (November 2010)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31864>> accessed 23 February 2014.

- (118) 恩斯特一世 (Ernst I) 于1841年11月28日写给阿尔伯特的信, 转引自 Johannes Paulmann, *Pomp und Politik: Monarchenbegegnungen in Europa zwischen Ancien Régime und Erstem Weltkrieg*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0), 277—278, 原文强调。
- (119) 关于情感在外交中所引起的误解, 见Susanne Schattenberg, “The Diplomat as ‘an Actor on a Great Stage before all the Peop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the Portsmouth Peace Negotiations of 1905”, in Mösslang and Riotte (eds.), *Diplomats’ World*, 167—194; Susanne Schattenberg, “Die Sprache der Diplomatie oder Das Wunder von Portsmouth: Überlegungen zu einer Kulturgeschichte der Außenpolitik”,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eue Folge*, 56/1 (2008), 3—26; Susanne Schattenberg, “Die Angst vor Erniedrigung: Die U-2-Krise und das Ende der Entspannung”, in Bernd Greiner, Christian Th. Müller, and Dierk Walter (eds.), *Angst im Kalten Krieg*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9), 220—251。
- (120) Paulmann, *Pomp und Politik*, 229。
- (121) Paulmann, *Pomp und Politik*, 230。
- (122) 与此同时, 将日记和个人回忆录等私密文件存入私人或国家档案馆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遍。参见弗兰克·科斯塔格利奥拉 (Frank Costigliola) 根据这种史料对“冷战”的情感史研究, 基于以下资料来源: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Gender, Pathology, and Emotion in George Kennan’s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3/4 (1997), 1309—1339; Frank Costigliola, “‘I Had Come as a Friend’: Emotion, Culture, and Ambigui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3—1945”, *Cold War History*, 1/1 (2000), 103—128。
- (123) Martin Francis, “Tears, Tantrums, and Bared Teeth: The Emotional Economy of Three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s, 1951—1963”,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1/3 (2002), 354—387, here 357。
- (124)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173。
- (125) *Lettres de Napoléon à Joséphine pendant la première campagne d’Italie, le Consulat et l’Empire et lettres de Joséphine à Napoléon et à sa fille*, ii (Paris: Didot Frères, 1833), 33, 73, 106, 124; Ed Pilkington, “Obama Writes Emotional Letter to Daughters Malia and Sasha”, *The Guardian* (15 January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jan/15/obama-letter-children-malia-sasha>> accessed 23 February 2014。
- (126) Orest Ranum, “The Refuges of Intimacy”, in Philippe Ariès and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iii. *Passions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9), 207—263, here 259—261。

第一章 情感史的历史【40】

一、吕西安·费弗尔和情感史

在情感史的肇始时期，只有一个人孤独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就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5—1956）。无论如何，大多数试图描述情感史历史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①1929年，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围绕它形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流派之一。《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研究从上层人物、君主和外交家的领域转移到普通人、农民和工匠的世界，把历史建立在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年鉴学派成为最早考虑情感的研究者之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费弗尔因研究马丁·路德（Luther Martin）和莱茵河的历史而出名。1938年6月，他参加了亨利·贝尔（Henri Berr）组织的题为“人与自然的感性”（“Sensibility in Man and Nature”）的会议。1941年，其修改后的论文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发表。^②在这篇文章中，他呼吁历史学家把情感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鼓励他们在研究过去的情感时，克服对心理学学科的一切犹豫。【41】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费弗尔写道：

只要翻开亨利·布雷蒙（Henri Bremond）的《法国宗教感情的文学史》（*Bremond's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rance*）的第九卷……打开标题为“死亡的艺术”（“L'art de mourir”）那一章。不到300年前那个时代的人与我们之间，在道德和情感方面有多么大的鸿沟啊！^③

对费弗尔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这一鸿沟构成了所有情感史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需要找到一种语言来丈量这一鸿沟。

费弗尔的文章首先是呼吁对情感进行研究，不管这样做可能会招来什么样的批评。面对所有那些质疑情感史合法性的人，费弗尔指出他们已经在其历史著作中包括了情感的因素，只不过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时代错乱的方式，将他们自己时代的情感观念强加于过去，而没有考虑到在此期间情感的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④费弗尔对当时流行的用心理学

来研究大众历史的方法嗤之以鼻：

以福楼拜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Bouvard et Pécuchet*）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为例，他们在与当地女帽商和女店员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心理学经验，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阿涅丝·索雷尔（Agnès Sorel）对查理七世的感情，或路易十四对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的感情，以至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都惊呼：“噢，太对了！”⁽⁵⁾

费弗尔问道：“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拿破仑勃然大怒’或‘一时狂喜’时，难道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吗？”⁽⁶⁾回答是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拿破仑时代，“勃然大怒”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公开展示的勃然大怒是什么样子。

费弗尔接着呼吁分析不同时期文字和图像中的情感表达。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感的概念史，它描述了情感这一概念的意义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的变化。⁽⁷⁾费弗尔是第一个勾勒出这个研究领域轮廓的人，而这个领域将占据未来情感史的很大一部分。他非常有远见地认识到了区分一种情感与另一种情感的难度，并强调了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很清楚，许多情感常常会同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情感甚至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⁸⁾

对费弗尔来说，这一切事关重大。“要知道，没有爱情史，也没有死亡史。”他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只要情感史还没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⁹⁾【42】但是这种紧迫感从何而来？为什么费弗尔会认为情感史如此重要？

费弗尔显然受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著作的影响，其中包括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1922年出版的《原始思维》（*La Mentalité primitive*），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1928年出版的《群体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亨利·瓦隆（Henri Wallon）1938年在《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情感的文章（由费弗尔编辑）。⁽¹⁰⁾但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是促使费弗尔发表演讲和出版论文的最主要原因。⁽¹¹⁾首先，他对情感的理解带有很强的主体间性，即一个人的情感会引起其他人的情感，从而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或者用费弗尔的话来说，“情感是会传染的”。⁽¹²⁾此外，还有至今仍然很受欢迎的群体理论家、同时代人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的影响。不难看出，勒庞的话针对的是莱茵河对岸的大众和纳粹党在集会上狂喜的面孔。⁽¹³⁾其次，他还认为“通过理性活动逐渐抑制情感活动”的线性历史叙事正在被“最近的历史”和“复活的原始情感”所破坏。⁽¹⁴⁾他从理性到情感的转变与这种让人不安的认识有关，即“我们内心的情感生活总是准备着要淹没理性生活，并突然逆转我们引以为傲的从情感到思想、从情感语言到理性语言的进化”。⁽¹⁵⁾第三，费弗尔建议研究的情感主要是消极的：“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正如费弗尔所言：“这种与人性无关的空谈的主题，未来将最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死尸坑。”⁽¹⁶⁾因此，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国家社会主义诱人的情感潜力促使费弗尔采取了这种方法。⁽¹⁷⁾这样看来，【43】似乎至少有两个人站在了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吕西安·费弗尔、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

二、费弗尔之前的情感史

费弗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真的位于情感史的发端位置吗？今天，没有多少人觉得强人的故事或对关键时刻的追寻具有说服力。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将讲到情感史的现状，这里我们从当前所理解的源头开始讲起。⁽¹⁸⁾之所以加上“正如当前所理解的”这个限定，是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对情感史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1900年之前那段时期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下面的描述必然是片段性的，将对费弗尔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对于情感地位的描述限定在几个具体的例子中。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个非常早期的例子。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54—约前399）来说，情感即使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推动力，也是主要推动力之一。恐惧和其他强烈的情感使得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互相残杀。斯巴达人“之所以认定和约已被破坏，并且必须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的势力日益增长”，而科林斯人（Corinthians）的行为则是因为“他们怨恨科基拉人（Corcyreans）”。⁽¹⁹⁾古代史学家拉姆齐·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概述了古代情感史的全貌。他认为，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情感“让人们打破常规，破坏现状。然而，他们的情感并非是不理性的”。⁽²⁰⁾这些情感构成了“普通且肯定合乎情理的行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合乎情理的行为，是因为修昔底德及其读者或任何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情感”。⁽²¹⁾

麦克马伦认为，对于修昔底德之后的其他历史学家来说，情感只是一种修辞手段，用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作为一种说服的手段。只有到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0—前120）那里，情感才再次成为人类决策和行动的激发因素。【44】帝王的情感会产生非常重大的结果，“帝王的个人情感会变成历史”，但波利比乌斯认为这些情感很难解读，他不断地问自己，一个君主怎么会堕落成为暴君？⁽²²⁾

对于像罗马元老院或迦太基人这样的集体行动者来说，希望、绝望和勇气等情感确实支配着行动，但历史学家发现，这些情感更容易理解，因为它们不是国王那样的个人的情感，而是可以用外部环境来解释。⁽²³⁾因此，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认为，情感的力量是一种决定性的冲动，至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对古代情感史的第一次重构是这样认为的。⁽²⁴⁾

除了古代的历史著述，我们对费弗尔之前情感史的大部分了解都与19世纪后期有关，当时的历史学家开始讨论情感的作用。这是因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对欧洲和北美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不同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²⁵⁾最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哲学的名下。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它们逐渐分道扬镳。哲学不得不把它作为主导科学的地位让给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使人文科学面临着巨大压力，因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客观性”总是意味着科学家的理性，而这种理性被理解为对情感的压制。

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挑战，德国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于1883年出版了《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对自然科学垄断客观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声称人文科学具有更大程度的客观性，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理解世界，而且这种理解与感官及情感有关。

【45】人文科学以“人性的全部”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了“完整的、没有被删减的经验”。⁽²⁶⁾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家则执着于“从自然的机械秩序中得出思想或精神上的事实，而这是不可能的”。⁽²⁷⁾狄尔泰接着说：

对于我们来说，各种社会状态都是可以从内部加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够根据我们对于自己的各种状态的感知，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把这些社会状态再现出来；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历史世界的各种表现，都可以通过爱和恨，通过充满激情的乐趣，以及通过我们的全部激情，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因此，盲目运作的各种原因的发挥作用过程，就被各种表现、感受和动机发挥作用的

过程取代了。(28)

决定性的解释学步骤要求历史学家与历史行为者融为一体。由于历史学家能够调动他所有的感知能力，包括与情感有关的感知能力，所以他能够从整体上理解过去的人类。

研究心理结构的决定性事实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对另一种状态的影响是内在体验的一部分。我们体验这种结构。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活、历史和所有隐藏在人类思想深处的东西，因为我们体验了这些过渡和影响，从而意识到这个包含了所有激情、痛苦和人类命运的结构。(29)

学者们在解读狄尔泰的著作时，通常会谈到1900年前后的一次断裂，他放弃了对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诠释学的建立之中。相应地，情感也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狄尔泰从1900年开始建立的诠释学依然非常重视情感。丹尼尔·莫拉特（Daniel Morat）将狄尔泰的诠释学描述为一种“感觉的方法”（*Gefühlsmethode*），这是完全恰当的。(30)

与狄尔泰同时代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也对情感很感兴趣，他借鉴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观点。1897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文化史？”（“Was ist Kulturgeschichte?”）的论文，主张将“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内心生活规律的精确科学”的成就考虑进来，【46】以丰富对“个人行为内在动机”的历史解释。(31)特别是，兰普雷希特从科学分工的角度指出，人类学研究的是“有意识意志的情感 and 行为”和“感觉和动力”，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32)就像兰普雷希特所采用的那样，其结果是一种带有情感因素的国家进步叙事，与主张增强情感控制的目的论只有一个区别：在发达的民族，情感是不受限制的，相反，“进步精神强度原则”（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psychic intensity）占了上风。因此，“个人主义时代的绘画比传统主义时代的更加充满激情，前者如丢勒的作品，后者如《快乐花园》（*Hortus deliciarum*）中的微型画，然而，作为主观主义时代的画家，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几乎比丢勒更加富有激情”。(33)

继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之后，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森（Georg Steinhausen, 1886—1933）和库尔特·布莱齐希（Kurt Breysig, 1876

—1940)也同样认为,将国家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和情感集体演员是没有问题的。施泰因豪森在1895年出版的《中世纪以来德国情感生活的变化》(*Der Wandel deutschen Gefühlslebens seit dem Mittelalter*)中提出了“德国人情感和感性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一系列的对比:“自然与人为”“恒定与易变”“德国人与外国人”“普通人与精英”,在这些并列项目中,前者总是被赋予更加积极的意义。⁽³⁴⁾但是施泰因豪森笔下的情感史是怎样的呢?在第二个阶段,“在14世纪初,德国人是冷静而简单的,几乎没有情感(Gemüt)”,其生活的特点是“情感非常有限”。⁽³⁵⁾相对而言,第四个阶段(即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是“感性和情感的时期”,在此期间,德国陷入了“情感”和“眼泪”的海洋。⁽³⁶⁾

1931年,库尔特·布莱齐希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的情感史》(*Geschichte der Seele im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架构。他从一个假设出发,即“在人类的每一个发展时期,不同的内在力量(Seelenkräfte)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³⁷⁾20世纪30年代,布莱齐希继续发表作品,正如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所指出的那样,在他的作品中,“日耳曼人的清晰与狭隘的民族视角相结合,达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³⁸⁾但是,无论是布莱齐希和施泰因豪森,还是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都没有出现在早期情感史的文献中。由于他们很少有时间去研究情感的易变性,所以在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提供一部现代情感史所能利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他们四位与20世纪早期对情感史有所贡献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有许多联系。⁽³⁹⁾【47】在19世纪80年代,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1886—1929)曾与兰普雷希特一起研究文化史。1905年,他将“情念程式”(Pathosformel)的概念引入艺术史研究,用来描绘绘画和雕塑中富有情感的姿态或面部表情。⁽⁴⁰⁾他指出,强烈的情感被简化为“情念程式”,可能在几个世纪后,又以手部动作或面部表情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情念程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感互文性。1958年,瓦尔堡的同事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从古代雕塑中借用情感化的姿态,“他们试图用经典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类生存状况最深层的不安”。⁽⁴¹⁾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被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形容为一只“从一颗坚果跳到另一颗坚果的哲学松鼠”,他发现情感是很难避免的。⁽⁴²⁾对西美尔来说,促进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和过程总是与情感有关。

不管我们认为社会性的外部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

识到心理动机、情感、想法和需求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不仅是这些事件的承载者，还是这些事件的基本生命力，而我们其实不过是有关当事人，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像一出木偶戏，并不比乱云飞渡和枝丫横生更可以想象或更有意义。(43)

信任、荣誉和忠诚，以及敌意、嫉妒、愤怒、仇恨、轻蔑和残忍，这些情感不仅可以导致个人和群体的分裂，还可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情感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形成，【48】西美尔对此毫不怀疑。(44)因此，“政治历史和人类学在情感方面的联系”成为1912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第二次年度会议的讨论主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45)

此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德文原版，1904—1905/1920；英文版，1930）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情感的讲述。韦伯将各种形式的新教教派排列在一个情感温度计上：加尔文主义者处于冰蓝色区域，他们相信自己是“神意的工具”，倾向于“禁欲主义行为”和“入世禁欲主义”，只承认无关情感的商业上的成功才是上帝恩宠的标志。韦伯将路德派置于中间位置，他们自认为是“圣灵的容器”，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因此，路德教的信仰几乎没有考虑控制情绪化行为和朴素情感的自发性活力”。相比之下，虔信派则在天主教的炽热领域摇摆不定：“在摩拉维亚兄弟会（Herrnhut）特有的虔诚中，情感因素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突出了“宗教情感的率真乃是它纯净无瑕的标志”。(46)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也对儿童般的情感感兴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他出版了《中世纪的秋天》（*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1919；英文版，1996）。(47)赫伊津哈笔下的中世纪有大量不受约束的哭泣和愤怒，“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富有激情的暗示，显示大起大落的情绪，不加修饰的热情、突发的残忍和温柔的情感”。“对1435年的阿拉斯（Arras）和会，让·热尔曼（Jean Germain）是这样描写的：和谈代表的发言令人激动，听众激动得倒在地上，或泣不成声，或放声痛哭。”(48)情感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特点是极端和缺乏克制的。在政治领域，赫伊津哈评论道：“在15世纪，直接表达情绪的方式常常会冲破效用和精心思考的堤防。”(49)在司法领域，赫伊津哈强调：“这种正义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异教的性质，受复仇情绪的支配。”(50)【49】在宗教领域，赫伊津哈认为：“缺乏宗教敬畏心的舒适感、日常生活的满足感与极度狂热的虔诚展示交替进

行。”⁽⁵¹⁾在赫伊津哈看来，对女巫的迫害代表了“和厌恶、恐惧、仇视、难以容忍的侵犯相联系的情绪，即使这样的侵犯是在信仰的领域之外”。⁽⁵²⁾

除此之外，在赫伊津哈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伤心落泪”“盲目的激情”和“痛苦的过度敏感”等表达。⁽⁵³⁾就史学影响而言，他关于情感的作品要逊于他所探讨的时代，即中世纪晚期的14世纪和15世纪，当时正处于现代早期的门槛上。随后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新教关闭了情感控制的阀门。简而言之，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把过度情感化的中世纪儿童塑造成了现代人。赫伊津哈对情感控制的线性发展的精彩叙述，虽然没有了当时的隐喻，却被证明是极其顽强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它被赋予了最优雅、最诱人的形式。

三、费弗尔及其后的情感史

193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历史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在瑞士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这本书并没有引起费弗尔的注意。1969年，这本书被译为英文。⁽⁵⁴⁾埃利亚斯从德国移民到巴黎，然后又到了伦敦。他从1933年就开始写作这本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本书才以德语再版，在被翻译成英语之后，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⁵⁵⁾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著作，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这一现代性始于1600年左右，是一个对情感的控制不断加强的线性过程。⁽⁵⁶⁾【50】作为现代人意味着要鄙视其他用餐者糟糕的餐桌礼仪，要为往地板上吐痰的亲戚而感到羞耻，要为在公共场所看到裸体而感到尴尬。在现代之前，一切都是不同的：前现代人几乎从来不用餐叉，“餐具仍然很有限：左边是面包，右边是酒杯和餐刀”。⁽⁵⁷⁾前现代人会在餐桌上用手指擤鼻涕，会从公用盘子里直接动手拿东西吃，或者把啃过的骨头扔到地板上，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有那些用桌布擤鼻涕，把食物弄到鼻子和耳朵上或眼睛里，或把公用盘子里的东西吃光的人，才会遭到鄙视。⁽⁵⁸⁾前现代时期的人没有超我的观念。在现代性开始之前，并没有“现在这种无形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墙，相互排斥和分离”，相反，情感更加自由，其表达“比后来更自由、更直接、更开放”。⁽⁵⁹⁾

埃利亚斯的核心隐喻是“情感经济”（affect-economy）。⁽⁶⁰⁾他认为

情感必须永远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从一个地方消失的情感必然会在另一个地方表现出来。根据埃利亚斯的观点，在向现代性过渡的过程中，中世纪男女可以自由表达的情感被禁忌所束缚。这些禁忌被内化了，外部的强迫变成了自我的强迫。这会导致灵魂的扭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运动来发泄野蛮的、不受控制的情绪；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强迫行为和其他症状”。⁽⁶¹⁾ 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对精神分析嗤之以鼻，但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⁶²⁾ 埃利亚斯的持久功绩在于，他为情感史这个新兴领域提供了概念武器。他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来描述情感现实，使用的术语都涉及本质主义的概念，【51】如“情感结构”“情感形成”和“情感生活”。⁽⁶³⁾ 他还发明了一些复合术语，这些术语捕捉到了情感的真实构建，如“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情感的社会调节和管理”和“情感模型”。⁽⁶⁴⁾

考虑到埃利亚斯的写作时期，他处理情感概念的方式是非常开放的。例如，他写道：

这样便对情感可塑性的界限提出了问题。毫无疑问，情感有其本身固有的特定规律性，可以把这种规律性称为“天生的”。历史的进程是按照这一规律性而形成的，同时这一规律性又规定了历史进程的活动范围和界限。⁽⁶⁵⁾

又如：

羞耻与难堪感觉的形成以及难堪界限的前移，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感觉形式是在某种形式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同时它们又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作用……对于人的心理功能来说，自然的与社会的进程是不可分割的，是共同起作用的。⁽⁶⁶⁾

这些思想既包括本质主义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建构主义的因素。它们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威廉·M·雷迪（William M. Reddy）所探讨的综合性情感概念。雷迪认为情感是由文化和历史因素形成的，但是他从未否认情感具有普遍的物质内核。

埃利亚斯和费弗尔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认为情感会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都提倡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心理学；都有情感的主体间概念；都认为情感史必须借助绘画对情感的描绘；都对情感控制的脆弱性

非常敏感，都意识到在欧洲，情感会以很快的速度冲破理性的束缚。(67)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固定本性和变化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埃利亚斯进步的、主体间的情感概念并没有赢得支持者。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对情感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普遍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在其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恐惧的多卷本著作中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焦虑，【52】但是他把这些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他最终没有把情感看作是一个文化历史变量。(68)

俄罗斯背景的英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研究的是法国史，他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的四卷本法国史从1848年讲到1945年，以“野心、爱、愤怒、骄傲、品味和焦虑”这六种激情为主题。

(69)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泽尔丁是怎样理解野心的：

对野心的研究涉及希望与嫉妒、欲望与挫折、自信、贪婪与模仿，将导致社会诸多弊病的阶级冲突置于显微镜之下。(70)

因此，即将被改写的是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尽管泽尔丁坚持认为他会同等重视对私人生活（家庭生活等）和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在实践中，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书中最多的篇幅探讨的是个人在个人主义时代追寻意义的情感后果，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宗教、家庭和村庄曾经提供的基础不再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泽尔丁创造了一种医学语言来描述个人主义的疾病、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具体意义上的恐惧和歇斯底里。(71)

泽尔丁和埃利亚斯一样，走在了其时代的前面。(72)他转向情感可以被解读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反应。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规律性、严格因果关系、量化和大型结构的探索。泽尔丁的方法论信条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和模糊的”。那是在1973年，而整整15年后，后结构主义才重新将个人解释为一个多层次的、矛盾的、有弹性的实体，这样的解释开始在对理论感兴趣的、反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流行开来。(73)【53】泽尔丁还认为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极其多样，“每个活动都围绕自己的轴心运行，专注于自己的当务之急，被自己特有的线条所划分”，这一观点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相似，而当时他们在历史学家中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74)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而把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宗教、科学、体育

等)作为次要的表现形式。但对布尔迪厄来说,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节奏,而卢曼则用“系统”和“子系统”来描述。(75)泽尔丁是最早将历史学家理解为一个主体的人之一,历史学家的行为是由情感决定的,他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他的研究对象是根据情感偏见和倾向来选择的。据泽尔丁说,让·德吕莫之所以会发起这一研究,“因为他希望了解在他十岁时一个朋友突然去世带给他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致他三个月没去上学……所以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促使他对他人的经历进行大量的反思”。(76)

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泽尔丁、费弗尔或埃利亚斯的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其主要代表是彼得·盖伊(Peter Gay)、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和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尽管他们将历史心理化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很快就对情感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77)乌特·弗雷沃特指出,盖伊在1984—1998年之间出版的多卷本《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把19世纪的历史作为内心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历史来书写,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夫妇亲密的枕边谈话,【54】也描写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对狩猎的热爱,以及“一战”前精心策划的冒险外交。(78)

然而,对心理历史学更普遍的批评针对的是它对情感的解释:情感被以一种违背历史的方式强制归入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实际上是属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学说的解释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嫉妒心很强的父亲让马丁很早就走出了信任阶段,离开了“他母亲的呵护”。父亲试图让马丁早早地疏离于女性,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和可靠。他成功了,却让儿子对婴儿期的信任产生了深切的怀念。路德在神学上的解决方案似乎完全符合他个人妥协的需要,即在精神上回归毫无疑问的信仰,从政治上服从那些运用世俗法律之剑的人。(79)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数百万同胞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他在童年时遭到酗酒父亲的“可怕殴打”。(80)同样,20

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也成了“对儿童的爱的早期增长”的结果。⁽⁸¹⁾因此，对情感及其历史的心理史学描述充满了明显的时代错误。当历史行动者的确说着心理分析语言的时候，心理分析可以发挥作用，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情感历史的洞察。因此，例如，如果不使用心理分析术语介导的情感范畴，就无法写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左翼集体生活实验的情感史。⁽⁸²⁾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55】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大卫·萨比安（David Sabean）、路易斯·蒂利（Louis Tilly）这些德国和美国研究早期现代历史的史学家，与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的英国人口史学家，以及法国人类学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家族史和情感史，而没有涉及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从机构上讲，这一多学科群体包括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和巴黎的法国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的成员。他们试图打破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两分法思维：一方面是母子之间无私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是男性家庭成员之间利己的非情感关系。他们想恢复情感和目的理性之间的关系。⁽⁸³⁾按照埃丝特·古迪（Esther Goody）的说法，“家庭角色的安排和对家庭角色的情感承诺之间没有简单的联系”，这意味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完全不能被认为是无私的，或缺乏情感的。⁽⁸⁴⁾哥廷根和巴黎的研究人员还对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等人对家族史的描述提出了质疑。根据这一描述，从18世纪开始，夫妻关系中包含的情感内容稳步增加，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如果“遇到年轻人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放弃丰厚嫁妆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这就是浪漫”。⁽⁸⁵⁾在现代早期之前，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绝不仅仅局限于目的理性。

20世纪70年代，性别史兴起，有关学者提出的论点与哥廷根和巴黎的学者的论点如出一辙。⁽⁸⁶⁾肖特认为，1750—1850年间，私生子数量的增加可以用来表明一点，即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基于爱情而非实际考虑的婚姻关系中来，因此，现代性可以被解读为婚姻浪漫化的进步历史。⁽⁸⁷⁾性别史学者对此也提出了反对意见。【56】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反对这种浪漫化的观点，认为它将女性的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非劳动，从而巩固了现代早期婚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制度中，妻子终身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延续期间都将其体力劳动和性交给丈夫，她的行为被认为是出于爱，并

且得到的回报也是爱，而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婚姻市场上，被用来交换爱的不仅仅是爱，还有为了生存而做的工作。⁽⁸⁸⁾

因此，很明显，在性别史（主要是妇女史，甚至就被称为妇女史）的早期，强调的是情感的工具性，即它会加强已经确立的性别不平等并创造新的不平等。被认为是生物性的、本质的自然“母爱”也是这一新的性别史的关注目标。⁽⁸⁹⁾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性别史学家对性别的范畴提出了质疑，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男女生理差异实际上也是历史建构。性别史分化为身体史、性史、男性史，以及其他一些小学科。在这些学科中，情感都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⁹⁰⁾正如在哥廷根和巴黎发展起来的现代早期家庭史中一样，情感仍然是次要的，因此1997年埃迪特·绍雷尔（Edith Saurer, 1942—2011）指出，“是时候将爱情史作为性别关系史的研究起点了”。⁽⁹¹⁾【57】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在使传统女性的情感变得高尚方面所做的贡献，即使是作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不能低估的。

彼得·N·斯特恩斯是《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的创刊编辑，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斯特恩斯夫妇的共同努力，情感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一篇被广为阅读的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个人情感体验与情感规范之间的严格区别，并将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

一个社会或社会中一个特定的群体对基本情感及其适当表达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以及社会机构和制度在人类行为中反映和鼓励这些态度的方式。⁽⁹²⁾

历史学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支配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情感表达的管理机制或者是基本社会群体上。他们所说的包括幼儿园、学校和军队这样的机构，也包括婚姻和家庭这样的制度。例如，在学校里，年轻人被教导要尊重长辈；在军营里，士兵要学会隐藏他们的恐惧；在家庭里，父母给孩子呈现一种基于浪漫爱情理想的理想关系。当然，情感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受历史变化的影响。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反威

权主义教育演变成了平等人之间的爱；“越战”期间美国军队的军事改革促使人们更公开地承认士兵的恐惧，虽然这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处理这些恐惧的新方式；而浪漫爱情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

斯特恩斯夫妇认为情感和情感学是不同的分析实体，但又相互关联。根据历史行为者的情感范围，情感和情感学之间的关系被重组。如果有一段时期，婚姻纠纷中出现愤怒的表达是为社会所接受的，而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持续的愤怒情绪则变成了一种负罪感，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日记发现这种感觉。⁽⁹³⁾这就引出了史料的问题，这是情感史所强调的，也是斯特恩斯夫妇所关注的。他们在1985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日记、自传等个人材料以及纯文学。此外，表达社会抗议（罢工、示威、革命）的经典社会历史材料也可以被谨慎用作情感的证据。后来他们专注于成才学作品。⁽⁹⁴⁾作为社会历史学家，起初，他们非常担心难以接触到工人阶级的情感，特别是那些文盲。⁽⁹⁵⁾

【58】他们后来对成才学作品的关注导致了这样一种指责，即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并且过高估计了其材料的社会覆盖面。例如，芭芭拉·罗森宛恩认为，他们从礼仪指导书籍中收集到的关于愤怒、嫉妒或恐惧的任何信息，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而是只与一部分中产阶级有关。⁽⁹⁶⁾

斯特恩斯夫妇认为情感史是社会史的延伸，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吃惊，因为在21世纪初，许多人会把情感史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还是话语分析、身体史或性别史的一部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角度来看，斯特恩斯夫妇和赫伊津哈、费弗尔、埃利亚斯、德鲁莫、泽尔丁一起，研究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英美和法国的社会史，包括它的许多分支，尤其是家庭史。在哥廷根和巴黎的现代早期历史学家那里，以及在同时代的性别史中，探讨的主要情感是爱、恐惧、愤怒和嫉妒。此外，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还从社会史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最初移民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促进夫妻之间的爱被视为一种预防婚姻纠纷社会破坏性的方法。亚伯兰·德·斯旺（Abram De Swann）也指出，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工人抗议活动数量的减少可能与对人们的战略管理有关。他认为，通过引入更灵活、更积极地对待雇主的工头，“优化了”公司员工的“情绪管理”，在抗议活动发展起来之前就将其遏制住了。⁽⁹⁷⁾与此同时，斯特恩斯夫妇与新左派历史学家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乔治·吕德（George Rudé）划清界限，而这些历史学家则又与勒庞划清界限，他们将人群的反抗和其他集体抗议行为描述为基于理性的行为，认为他们是以目标为导向、以

自身利益为目的的行动者，而不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有时违背自身利益的行动者。⁽⁹⁸⁾相比之下，斯特恩斯夫妇宣称的目标是对集体抗议的动荡本质提供一些历史洞见。⁽⁹⁹⁾在1985年发表纲领性论文之后的20年里，斯特恩斯夫妇出版了大量专著，其中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愤怒和情感控制的，有关于嫉妒的，有关于20世纪美国作为一种情感风格的“酷”的，还有关于恐惧的。⁽¹⁰⁰⁾【59】对他们来说，1600年现代性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情感规范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这导致了后来对他们的指责，说他们不加批判地采用了埃利亚斯的年代划分，是从赫伊津哈、费弗尔和埃利亚斯提出的分水岭之后开始其研究的。⁽¹⁰¹⁾尽管斯特恩斯夫妇的学术影响很大，并且随着1993年由彼得·斯特恩斯和简·刘易斯（Jan Lewis）合编的“情感史”丛书（*The History of Emotions*）的出版，这一学科有了一些制度化的迹象，但当时的情感史还是没有取得性别史、身体史、后殖民史和其他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所取得的那种突破。⁽¹⁰²⁾

尽管如此，从当时出版的情感史著作可以看出，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言学的转向刚刚开始对德国的历史等学科产生影响，而在美国，一种更为重要的转变正在影响一系列学科，即生命科学兴起并成为主导学科。本书第三章将更详细地论述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就目前而言，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可以说生命科学的兴起为语言学转向所忽视的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其中包括客观性、经验主义、普遍主义（历时的和共时的），严肃的、非讽刺性的表达方式。自由漂移的符号和不断变化的意义，流动的身份，后现代主义的“怎么都行”，语言游戏和讽刺，所有这些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历史著作（包括那些描写情感的著作）很快就显示出这种转变的影响。尤其是自从情感成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后，利用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描述情感的倾向增加了，而不像社会不平等或政治文化那样。威廉·雷迪是美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将生命科学的思想运用到情感研究中，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其结果是一系列纲领性作品的问世，其中包括论文《反对建构主义》（“Against Constructionism”）和专著《感情研究指南》（*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¹⁰³⁾对于后者，本书第四章中将有详细的介绍，它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方法与认知心理学的普遍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综合的情感史概念，然后将其应用到对18世纪法国史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的研究。

四、情感史和“9·11”事件【60】

《感情研究指南》于2001年9月10日出版。⁽¹⁰⁴⁾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当然，这是一个巧合，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虽然“9·11”事件是一声突然敲响的警钟，但它也成为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更长期过程的发展，其瞬间影响和催化作用都促进了当前全球情感史研究的繁荣。

起初，“9·11”事件似乎戏剧性地释放了狂热负面情绪的力量。在9月17日播出的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深夜秀》（*Late Show*）中（这是自双子塔遇袭以来的第一期），美国电视新闻资深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指出，恐怖分子的动机是“深深的、持久的仇恨”。他两度泪洒节目现场。⁽¹⁰⁵⁾“9·11”事件之后，许多人认为仇恨和嫉妒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主要动机。⁽¹⁰⁶⁾因此，当美国参议院于11月15日就“恐怖组织和动机”召开听证会时，受邀的安全专家、一位精神病学家和布什总统的高级顾问就抨击了这一观点：“首先要强调的是，恐怖分子没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不是疯狂的狂热分子。事实上，恐怖组织就像绿色贝雷帽小队一样，会把情绪不正常的人从他们中间剔除出去。”⁽¹⁰⁷⁾

与此同时，“9·11”事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引发了过度紧张的沟通“海啸”。因为这主要是通过电子媒体（短信、移动电话剪辑、聊天室会话、博客和电子邮件）来传播的，历史学家称其为“电子运动（e-motion）的历史”。⁽¹⁰⁸⁾这里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9·11”事件对沟通的影响是否提高了总体上已经情感饱和的沟通，尤其是与男性有关的沟通。毫无疑问，像世贸中心消防员这样的人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并不排除国家媒体描述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的失落和悲伤。⁽¹⁰⁹⁾【61】随着“9·11”事件的结束，“解脱”（closure）一词开始在专栏文章中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与创伤性事件的情感处理有关的专业术语，尽管在每次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的“解脱”都会被延迟。⁽¹¹⁰⁾在2001年12月底举行的美国年度回顾会上，有人指出：“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2002年，这些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学会了新的情感词汇，它们跨越了复仇和追求正义之间的微妙界线。”⁽¹¹¹⁾

“9·11”事件的长期后果如何？其中一个影响是加速了对语言学转向的偏离，这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在此过程中，“9·11”事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各方都在问，对于操纵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撞向一幢人满

为患的摩天大楼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后结构主义有什么看法？对于像宗教狂热和仇恨这样的现象，话语分析有什么可说的？在“9·11”事件之后，这些现象似乎如此直接和前语言化，“古老的”和“原始的”这样的形容词被反复用来形容它们。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袭击事件使后结构主义历史的分析方法受到了质疑，并进一步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兴起。人们突然意识到后结构主义是不相干的，而这产生了额外的审美效果。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 and 历史武器库一下子变得琐碎，在道德上也出现了问题，其颇具讽刺意味的写作风格也变得很不恰当。其结果是历史写作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打破讽刺运动”（ironoclasm），虽然这种对讽刺的回避是短暂的。⁽¹¹²⁾

最终，“9·11”事件加速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生物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生物学最终取代物理学成为主导科学，新的“生命科学”把几个世纪以来由人文科学所负责的人类“永恒”的问题据为己有，这些问题包括自由意志、自我和感情的本质。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变成了：如果一个杀人犯脱离了他所处的环境，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完成了他天生就要做的事情，那么他的罪过有多大？如果“我”不能从大脑中分离出来，如果作为主体的“我的大脑杀人了”这个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62】那么他怎么能说“我杀人了”呢？因为这就要假设有一个存在于大脑之外的主体并且以第三人称来谈论大脑。如果同情是由镜像神经元驱动的，那么同情能力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人的积极特征呢？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一直在寻求这些以及其他相当简单化的问题的答案，但是从神经生物学家那里，而不是从法律和道德哲学家那里。

总体来说，20世纪末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时代：所有的新经济炒作；貌似不会结束的增长；试图解码人类基因组的公司老板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曾一度被自然科学家认为是江湖骗子，《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文化专栏对他的报道比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还要多。⁽¹¹³⁾那是一个用进化生物学的语言来谈论爱情的时代，就像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1998年出版的《基本粒子》（*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英文版出版于2000年）中所描绘的那样。⁽¹¹⁴⁾这部长篇大论的小说读起来就像一本基础生物学教科书，两性关系被简化为一场为优化男性基因库而展开的斗争。对于那些尽管有“改善两性关系”的想法和“社会建构”的审美观，但仍然觉得自己被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所吸引，并且从巴黎到布拉格拆散了许多异性恋伴侣的男性来说，《基本粒子》为他们提供了科学依据。“9·11”事件终结了新经济和生物技术的繁荣，但同时也推动了生命

科学思想和理论进入传统上为人文学科所专属的核心地带。所有这些线索在“9·11”事件中聚拢到了一起。总之，如果要坚持一个关键时刻的虚构性，并寻找一段有清晰开端的历史，如果我们要寻找今天的情感史的诞生地，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的曼哈顿。

从那以后，情感史进入了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会议上找到。此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都有了专门的研究团队。⁽¹¹⁵⁾【63】情感的本质已经成为媒体普遍讨论的话题。保加利亚当代艺术家内德科·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在波恩艺术博物馆创作了一件装置作品，他简单地称之为“情感”（“Emotions”）；⁽¹¹⁶⁾在争夺2018年“莱德杯”（Ryder Cup）欧美高尔夫球对抗赛主办权的过程中，德国以“情感德国造”（Emotions made in Germany）为口号；⁽¹¹⁷⁾广告文案将足球称为“纯粹的情感”；⁽¹¹⁸⁾有一本很受欢迎的杂志叫《情感》；人们购买汽车是因为它们的情感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人很可爱，对他人也很体贴，我们就会夸奖他“情商高”；如果我们的邻居遛狗总是不拴绳，我们就会埋怨他“情商低”。⁽¹¹⁹⁾难怪学者和科学家之间有那么关于“情感转向”的讨论。⁽¹²⁰⁾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支学科，拥有专门的教授职位、期刊、组织和会议，让我们拭目以待。但下面的情况肯定是有可能的，与经济史等学科不同，情感史可以被其他学科所吸收，既可以为性别史、性史、身体史、环境史和空间史增加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以拓宽民族史、全球史、社会史甚至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对于情感史这种繁荣的结果，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对于贝蒂娜·希策、苏珊·J·马特（Susan J. Matt）和尼娜·费尔海恩在2010年和2011年就“最新发展”所作的详细报道，我们能增加些什么内容呢？⁽¹²¹⁾【64】要描绘这个快速扩张、日新月异的面貌是困难的，但我会试着描述它在2012年的轮廓和边界。

有一个限制是显而易见的：情感史探讨的基本上是欧洲和北美的历史，虽然也有一些文章和专著是关于其他地方的，例如早期中医和哲学的情感理论，或者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学中的愤怒。⁽¹²²⁾有人从情感史的角度对日本人的荣誉规范进行了研究，有人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媒体引发的公众对一位杀人犯的同情浪潮。⁽¹²³⁾殖民历史的某些方面也有人研究，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和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共有的、相互关联的恐惧文化。⁽¹²⁴⁾就印度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版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作品，涉及爱情、语言民族主义和情感，以及身体史和情感史的相互联系。⁽¹²⁵⁾【65】玛格丽特·佩尔璠的各种著作也可以纳入进来，她研

究的是印度穆斯林关于礼仪和性别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情感和情感的表达给予了指导，还研究了与其有关的印度穆斯林文明话语及其情感元素。⁽¹²⁶⁾

欧洲历史的古典时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已经在导言部分谈到了情感和考古学。⁽¹²⁷⁾在古代史方面，埃贡·弗莱格（Egon Flaig）等人展示了罗马政客是如何巧妙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姿态的。⁽¹²⁸⁾

例如，公元前133年，护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提出了一项新的土地法草案。就像改革贵族土地所有权的其他尝试所面临的困难一样，这遭到了另一个护民官的反对，而这相当于一种不可逾越的否决。因此，提比略·格拉古拒绝履行他的行政职能，使元老院的工作陷于停顿。随后，两位元老院议员打断了他的一次公共集会，并试图在数千名罗马公民面前动之以情，说服他改变主意。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拥有元老身份的曼利乌斯（Manlius）和富尔维乌斯（Fulvius）俯伏在提比略面前，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劝他三思而行。”⁽¹²⁹⁾按照当时公共政治交流的规则，这种姿态的接受者必须采取行动，于是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去了元老院。

【66】由于元老院议员们继续反对他的法律草案，提比略威胁要对他的主要对手奥克塔维乌斯（Octavius）的政治命运进行公开投票，即是否让他继续担任护民官一职。投票罢免护民官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将会导致他的流亡，而这不亚于宣判其社会死亡。因此，在表决之前，提比略试图用语言和姿态说服奥克塔维乌斯批准这项新法律：“首先，他公开恳求奥克塔维乌斯，用友善的语言对他表达善意，并紧握着他的双手，恳求他做出让步，满足人们的要求。”⁽¹³⁰⁾提比略充满感情色彩的姿态没有奏效，奥克塔维乌斯在投票中失利。在计票即将结束时，如果再有一票，他的对手就会失败，提比略停顿了一下，

他又在众人面前拥抱他、亲吻他，热切地请求他，不要自取其辱，不要让一个朋友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当听到这些恳求时，据说，奥克塔维乌斯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沉默良久。但是当他把目光转向那些站在一起的有钱有势的人时，他们对他们似乎很敬畏，同时也担心在他们中间获得恶名，所以他决定以身试险，叫提比略尽管使出严厉的手段，自己是不会让步的。

⁽¹³¹⁾

最终，奥克塔维乌斯拒绝改变主意，他在投票中失败，险些被处以

私刑。提比略的法律随后在人民大会通过。

所有关于提比略及其反对者姿态的证据都来自一个历史学家，即普鲁塔克，但是弗莱格却能利用其他的著作和资料拟定一份“特定文化的情感姿态清单”。“姿态的语义并非取决于不变的心理或关系倾向，而是取决于事件的序列性，取决于这些语义的差异以及它们如何被嵌入冲突之中，而这些冲突往往也是对所推定的意义的争议。”⁽¹³²⁾考虑到罗马精英政治中“共识的习惯性取向”，提比略的拥抱和亲吻对奥克塔维乌斯来说意味着以下内容：

如果罗马元老院议员确实面临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公共场合都要达成共识，或者至少对能够达成共识的想法持开放态度，这不仅是为了他们本人，而且是为了全体罗马人，那么，提比略的拥抱和亲吻就具有双重语义：一方面，这使对手更容易缓和其激烈的反对，同时也给对手提供一个台阶，使他可以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放弃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一姿态向人们表明，奥克塔维乌斯是不为所动的，他有一个道德缺陷，即他不肯做出让步，虽然他知道他所坚持的是不公正的，已经背离了罗马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也违反了和谐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¹³³⁾

在这里，弗莱格结合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行为学和符号学，【67】提出了一种的确十分新颖的解读，对过去被古代历史学家视为个人风格或无意识驱动的非语言政治沟通做出了清晰的解读。他还能够将其与希腊历史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了罗马政治的新发展，并且以此追溯历史变迁。

五、芭芭拉·罗森宛恩和情感共同体

中世纪研究者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¹³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世纪研究者一直在研究一部重要的文本，而这也是情感史领域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就是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本书有两个英文译本，一个是《中世纪的衰落》（1924），另一个是《中世纪的秋天》（1996）。在研究这本书的历史学家中，芭芭拉·罗森宛恩是最突出的。1998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愤怒的文集。在这本文集中，学者们对赫伊津哈关于中世纪一种未经调和的、幼稚的情感表达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格尔德·阿尔索夫（Gerd Althoff）的研究与弗莱格对

于古代的研究颇为相似，他指出，墨洛温王朝国王的愤怒并非不成熟或过度情绪化的产物，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象征性交流过程中的战略符号。公开的愤怒既针对追随者，也针对敌人，强调了国王参战的决心。(135)罗森宛恩在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那里发现了一种情感的“气动”或“液压”模型：(136)各种常见的情感在身体里，它们会“涌起”“沸腾”“爆发”“冒泡”——简而言之，它们变得清晰可见。这个过程十分多样：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或以艺术的形式（水力模型是弗洛伊德冲动升华理论的基础）。罗森宛恩将液压隐喻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纪的体液病理学和“神经力”（nerve-force）。这种神经力被达尔文定位于身体内部，表现为“强烈的感受”，其中包括情感。(137)

2002年，罗森宛恩发表了一篇有关情感史研究的综述文章。(138)【68】这篇文章立刻成为经典，因为它有力地反驳了她所说的情感史的“宏大叙事”，即“西方的历史就是情感克制不断加强的历史”。(139)根据罗森宛恩的观点，之前所有的情感史理论都认同这一说法，从赫伊津哈，经埃利亚斯和费弗尔，然后到德吕莫和斯特恩斯夫妇，从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到弗洛伊德的“文化”概念，再到福柯笔下的现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现代规训制度。(140)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提出的“宏大叙事”成功了，但是他们关于液压模型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它曾经的有效性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知心理学所终结，最晚在20世纪70年代被人类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所终结。前者用大脑中理性的认知过程取代了感觉是内部流动过程的观点，而后者则摒弃了普遍主义的观点。

但除了情感控制不断增加的“宏大叙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罗森宛恩提出了她本人对于情感的社会基础的看法，即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她认为，

情感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完全一样，包括家庭、社区、议会、行会、修道院、教区，但研究人员研究它们首先是为了揭示情感系统：这些共同体（以及其中的个体）对于对他们有价值或有害的东西的定义和评估；他们对他人情感的评价；他们所认识的人际情感纽带的性质；他们期望、鼓励、容忍和谴责的情感表达方式。(141)

因此，人们必须放弃任何无意识地将现代民族的概念转移到没有这种概念的时期的做法。在中世纪，人们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并在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移动，这些共同体往往是相互重叠的，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规范。(142)

此后，罗森宛恩进一步发展了她的情感共同体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她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将情感共同体定义为：在情感表达和评价方面具有相同规范的群体。⁽¹⁴³⁾形象说来，情感共同体是：

里面有多个小圆圈的一个大圆圈……大圆圈是由基本的假设、【69】价值、目标、情感规则和公认的表达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情感共同体。较小的圆圈代表从属性的情感共同体，参与到较大的情感共同体，揭示其可能性和局限性。小圆圈也可以被细分。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大圆圈，它们或者完全独立于第一个圆圈，或在一个或多个点与第一个圆圈相交。⁽¹⁴⁴⁾

这个模型似乎被有意识地表述为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文化，虽然罗森宛恩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

罗森宛恩通常将情感共同体视为具有密切关系（即个人接触）的社会共同体。然而，它们也可以是“文本共同体”，人们通过媒体联系在一起，而不需要见面。罗森宛恩提请人们注意中世纪的记忆技巧，因为文本不仅要铭记在心，而且是自我的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像与朋友交流一样与文本进行交流。⁽¹⁴⁵⁾因此，情感共同体可能与福柯的“话语”、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以及雷迪的“情感表达”（*emotives*）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一个情感共同体可以建立在单一的情感之上，而只能建立在几种情感之上。⁽¹⁴⁶⁾

那么罗森宛恩是如何在实践中识别情感共同体的呢？⁽¹⁴⁷⁾她通常不是从资料开始，而是从一群已经过着集体生活（修道院、行会或村庄）的个人开始。⁽¹⁴⁸⁾然后，她开始收集与这个群体有关的各种资料，作为一位中世纪研究者，她收集的主要是宗教文本、证书、圣徒传记、书信、历史和编年史。⁽¹⁴⁹⁾她从中提取情感词汇，注重模式、叙事和性别差异。类似的情感词汇被整理到一起。为了避免时代错乱（认为一个情感词是一个常量，在过去的意思和现在一样），罗森宛恩还研究了该情感共同体当时的情感理论，如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20世纪西方社会的心理学。由于情感不仅仅是通过情感词汇来直接表达的，她对情感语言中的借用和意象（隐喻或修辞手法，【70】如描述一个人很生气时说“他火冒三丈”）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整理这些词汇时，她考虑到了特定情感词汇的出现频率，并对这些频率进行了定量分析。她指出，许

多情感词汇具有显性或隐性的规范功能，应被理解为“情感脚本”，其时间变化应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150)

在《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共同体》的引言中，罗森宛恩试图反驳可能的批评。她在这里应对的批评意见是：原文本身受某一种特定体裁惯例的制约。为了避免一种体裁的特征可能会被解读为一个情感共同体的特征，罗森宛恩指出，有必要使用来自不同体裁的各种资料，明确每一个体裁的规则。因为体裁的惯例本身就是历史建构，其建构原则是历史学家可以分析的。她还应对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似乎饱含情感的表达方式往往只是惯用短语，而不是情感的表达。例如，“亲爱的×”或“我很高兴能够接受新的挑战”这样的表达仅仅是一种习惯用语，与爱或高兴无关。罗森宛恩回应说：“这当然是，这些短语本身也受到历史变化的影响，而这表明某些特定情感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在罗森宛恩看来，在考虑常见的问候语是不是、在哪里是以及在什么时期是“问候语”的时候，如“见到你真高兴！”或“早安！”，我们需要始终将历史关联性记在心里。(151)

情感共同体的概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情感纽带是如何形成和复制的。它避免了心理史学的个别化陷阱，心理史学从来没有成功地从个体跨越到集体。它避免了埃利亚斯作品中集合体的问题，他试图寻找整个时代的情感基调，结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粗糙的形象。它比或多或少代表了斯特恩斯方法局限性的个人情感更进一步。它也避免了斯特恩斯的致命假设，即文本中关于礼仪的规范可以等同于实际存在的情感规范。但正如罗森宛恩所言，它是否比雷迪的“情感制度”(emotional regime)更有潜力，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52)这种区分似乎有点牵强，因为情感史的整体概念性词汇表还太新，无法做出如此明确的区分，还不如创造性地把这些理论基础要素结合到一起。因此，许多学者将情感共同体和情感体制作作为同义词来使用。(153)【71】但有人可能会说，情感共同体的概念本身会受到每一个与社会化理论有关的问题的影响，说它不够开放和激进，因为情感共同体的边界是那么易变，又有那么多的漏洞，人们宁愿被迫避开“边界”这个表达，从而也就避开了“共同体”这个表达。

尽管如此，罗森宛恩在如下方面是对的：埃利亚斯认为前现代情感是幼稚的，这样的观点阻碍了历史学家对1600年之前几个世纪的考察。他们不去寻找可能的连续性，而仅仅是简单地假设有一个中断。自埃利亚斯以来，还没有专门探讨1500—2000年这一时期的情感史著作。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段时间从1600年转移到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正如近年来许多关于历史变化的有趣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情感一直在不断变化。(154)例如，苏珊·C.卡兰特-努恩（Susan C. Karant-Nunn）研究了宗教改革对天主教、新教和加尔文宗的情感影响，展示了宗教改革后16世纪和17世纪每种倾向是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情感脚本”的。天主教的脚本侧重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遭受的肉体痛苦，路德教侧重于精神，而加尔文宗则将情感与严格的上帝相匹配，后者能看透一个人的灵魂，并能立即分辨出真诚与不真诚的宗教热情。(155)乌特·弗雷沃特利用从专制主义到开明专制主义的过渡，展示了在腓特烈大帝漫长的统治时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情感交流的逐渐转变。用当代诗人安娜·路易莎·卡施（Anna Louisa Karsch）的话来说，“儿童一样的臣民”变成了“很高兴发现自己是人的公民”。(156)这些公民“认识到臣民的爱会产生诉求。如果爱不仅仅是孩子对严父的顺从，如果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而不是‘冷漠地’机械地奉献，这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交流空间”。(157)马蒂娜·凯塞尔（Martina Kessel）研究了无聊，发现在18世纪，无聊仍然“主要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感觉，只是表明很长一段时间”，而工业革命则与“太多的空闲时间，或太少的工作”有关，因此无聊成为一个情感问题。(158)

【72】苏珊·J.马特研究了身处美洲的人处理思乡病的方式的变化。在19世纪，它仍然是一种合法的情感，成年人可以公开承认，然而到了20世纪，它已成为一种不成熟的象征，似乎只有在夏令营期间与父母长期分离的儿童才会有。(159)

情感变化的另一个例子来自阿兰·科尔班。他展示了1870年8月在法国西南部一个村庄发生的一幕场景：一名年轻贵族在数百名村民的见证下遭受折磨和火刑，这在整个法国引发了公愤。然而在这幕场景的100年前，同样的景象并不会被认为是残酷的：如果是1760年，就连妇女和儿童也会前来观看。因为在当时，“死刑是值得庆祝的场合。人们在绞刑架的阴影下赌博、喝酒、打架。在精心策划之下，酷刑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方式进行着”。(160)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去神圣化过程首先削弱了仪式和亵渎的影响，使这种景象变得“可怕”，后来麻醉学的发展降低了疼痛的阈值，而感伤主义文学中“敏感灵魂（l'âme sensible）的出现”则完成了剩下的任务。(161)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写了一本关于恐惧的文化史，书中指出，恐惧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162)而乌特·弗雷沃特则研究了情感的衰败，即情感的失落和找回。例如，懒惰（acedia）曾经是一宗重罪，但在现代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男性和女性经常感到缺乏热情和动力，但他们不会出现中世纪僧侣认为患有懒惰症的人会有症状：发烧、关节疼痛。此外，懒惰的根源也不会追溯到恶魔或魔

其他的研究不是寻找历时的差异，而是共时的比较。(164)例如，威廉·雷迪就对性别和性历史学家对爱情缺乏研究兴趣而感到震惊，至少与围绕性欲和性而蓬勃发展的产业相比是这样。【73】于是他开始研究浪漫爱情和性快感之区别的历史根源。他将其追溯到12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宫廷之爱越来越被理想化，而神学上对强烈欲望、性欲、私欲和贪欲（*concupiscentia*）的神学探讨（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日本和印度，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都没有出现快乐与爱情的两分法，就会发现欧洲人的这种分离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根据雷迪的说法，直到今天，这种快乐与爱情分离的现象在日本仍然不存在。例如，日本妓女每天的性接触远少于法国妓女。前者提供的服务包括多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因为身心俱疲的日本商人在妓女那里所寻求的是解脱或慰藉，而“性行为可有可无”。(165)阿帕德·冯·克里莫（Árpád von Klimó）和马尔特·罗尔夫（Malte Rolf）比较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陶醉（*Rausch*）和斯大林主义的狂热（*entuziazm*），认为前者没有对象，只是为了打破障碍，而后者总是有特定的对象。(166)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本书后面章节将探讨的两个问题。首先，现代的情感史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写成科学史。一旦科学把情感作为研究对象，就不仅产生了关于情感的知识，而且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其次，有必要把20世纪的情感史主要作为媒介和传播的历史来研究。早在1941年，费弗尔就呼吁通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来重构过去的情感观念。他也确实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凡·艾克（Van Eyck）的画作中对情感的视觉描绘可以让我们对15世纪佛兰德斯的情感生活获得直接和“真实”的了解。相比之下，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性质上是新的，【74】并且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欲望首先是由大众传媒引起的。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情感不是被媒体预先设计好的。(167)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启了新的情感史的2001年9月11日。如果没有电视，“9·11”事件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如果恐怖分子没有如此确定他们的暴行会被拍摄下来，在全球范围内播出，然后被反复播放好久，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因此，如果没有媒体，我们将有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其书写也会完全不同。

20世纪中叶，费弗尔将“情感史”描述为“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未知的领域”。(168) 50多年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人们正在测绘这片未知的领域，并提出各种要求。情感史确实有

过一次繁荣。本章把早期的情感史研究与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与个人和制度联系起来。这表明情感史也是有历史的。无论我们从哪里开始，总是会遇到一个重要的区别，一边是本质主义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跨历史的情感概念，另一边是社会建构的、与特定文化有关的、相对主义的、历史的情感概念。情感研究者依赖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事实上，情感史的整个历史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二元对立的角度来书写。现在让我们转到后者，即社会人类学所代表的相对主义的后天因素。

- (1) 认为情感史起源于费弗尔的研究如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3 (2002), 821—845, esp. 821—823;以及Joanna Bourke, “Fear and Anxiety: Writing About Emotion in Modern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5(2003), 111—133, esp. 113—114.
- (2) Lucien Febvre, “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 Comment reconstituer la vie affective d’autrefois?”, *Annales d ’histoire sociale*, 3/1—2 (1941), 5—20. Lucien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ed. Peter Burke, trans. K. Fol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12—26 . 费弗尔的实际讲稿直到1943年才出版，即在修订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出版之后。Lucien Febvre, “La Sensibilité dans l’histoire: Les ‘Courants’ collectifs de pensée et d’action”, in Henri Berr(ed.), *La Sensibilité dans l’homme et dans la natu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3), 77—100 . 关于这一背景，见Peter Schöttler, “Lucien Febvre, die Renaissance und eine schreibende Frau: Nachwort”, in Lucien Febvre, *Margarete von Navarra: Eine Königin der Renaissance zwischen Macht, Liebe und Religio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8), 361—362, here 377—378, n.63. 费弗尔还在另一篇写于1938年的文章中讨论了情感，他提出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我们要避免把现在（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在）投射到过去”；“我们放弃了心理上的时代错误，这是最糟糕的时代错误，也是最阴险、最有害的错误”；“因为历史心理学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当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向我们讲述‘人’的情感、决定和推理时，他们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决定和推理，我们作为西欧白人的特殊情况被整合到有着悠久文化的群体”。参见Lucien Febvre, “History and Psychology”,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ed. Burke, 1—11, here 5, 9.
- (3)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4—25.
- (4)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 (5)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9.
- (6)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 (7)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

- (8)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8.
- (9) 关于图像中的情感，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0—23；关于概念史，见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4；原文强调。
- (10) 阿兰·科尔班 (Alain Corbin) 提到了这一背景，见“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in Corbin(ed.), *Time, Desire and Horror: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Senses*, trans. Jean Birrell(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81—195；又见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2—823。
- (11) 和人们经常所声称的不同，我们不能把他在维希政权的经历视为一个动机，因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最初的版本来自亨利·贝尔于1938年组织的那场会议。感谢彼得·舍特勒尔 (Peter Schöttler) 指出这一点。
- (12)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
- (13)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15。费弗尔还强调了情感的主体间性，以应对那些认为情感史过于个体化和不够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者。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4。关于勒庞对费弗尔的影响，见Corb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181。
- (14)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5—16, 26。例如，费弗尔把文学或艺术职业描述为“情感麻醉的手段”。他并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升华，而是作为简单的替代；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15。
- (15)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5.
- (16)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26.
- (17) 又见费弗尔1939年对埃德蒙·韦尔梅伊 (Edmond Vermeil) 的《德国革命学说：1918—1938》(*Doctrinaires de la révolution allemande 1918—1938*) 的书评：“教条和教条主义者：还是算了吧。但是我们真的能从学理上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吗？……仇恨、侵略和激情，我们应该去研究的不是纳粹的理性和教条在过去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情感和感性是如何形成的。说纳粹主义是一场革命，这没有问题。但什么是革命？是教条的转变吗？在我看来，更多的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情感反应范围的变化，因此是社会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写一部情感史。”参见Lucien Febvre, “Sur la doctrine nationale-socialiste: Un conflit de tendance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1/4 (1939), 426—428, here 427。
- (18) 对费弗尔之前情感史的简要概述，见John Corrigan, *Introduction in Religion and Emotion: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1, here 20, 28—29。
- (19)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Steven Lattimor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43 (1.88), 15 (1.25)。(中译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 (20)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9. 本书共三章：第一章论述了古代历史学家描写情感的方式；第二章重点介绍了一些作家的研究和实验心理学的理论，从詹姆斯·兰格（James Lange）到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第三章更仔细地研究了情感在一些年鉴学派著作中的地位，并以19世纪早期推动北美反奴隶制运动的情感为例进行了总结。

- (21)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 (22)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15.
- (23) Ramsay 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17.
- (24) 很明显，一旦我们理解了麦克马伦的动机，他那本与众不同的书就不能作为情感在古代史写作中所起作用的最后结论。他的动机是要驳斥古代史研究的老前辈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 1903—1989）。在其《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一书中，塞姆对待古代历史人物好像他们是出于理性的考量；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50. 麦克马伦在总结时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要求，即历史学家应该与他们的历史行动者形成共情，为此他举了那些经常与主人公一起感受苦难和哭泣的小说作家的例子；MacMullen,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134—135.
- (25) 以下内容我参考的是Jakob Tanner“Unfassbare Gefühle: Emotion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m Fin de siècle bis in die Zwischenkriegszeit”, in Uffa Jensen and Daniel Morat (eds.), *Rationalisierungen des Gefühls: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Emotionen 1880—1930* (Munich: Fink, 2008), 35—59; Daniel Morat, “Verstehen als Gefühlsmethode: Zu Wilhelm Diltheys hermeneutischer Grundleg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Jensen and Morat (eds.), *Rationalisierungen des Gefühls*, 101—117.
- (26) Wilhelm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Selected Works*, i, ed. Rudolf Makkreel and Frithjof Rod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51, 173.
- (27)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63.
- (28)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88—89.（中译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6—58页。）
- (29) Wilhelm Dilthey, “Ideas about a Descriptive and Analytical Psychology”,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H. P. Rick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88—97, here 94, 原文强调。
- (30) 见Morat, “Verstehen als Gefühlsmethode”。莫拉特论证了专注于对狄尔泰远离移情（Einfühlung）概念的局限性。他认为狄尔泰的术语“移入”（Hineinversetzen）、“重现”（Nachbilden）和“重新体验”（Nacherleben）依然有情感因素，虽然这种因素并不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见Wilhelm Dilthey,

“Ideas about a Descriptive and Analytical Psychology”, in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H. P. Rick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4—115.

- (31) Karl Lamprecht,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Beitrag zu einer empirischen Historik”,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F*, 1 (1896/7), 75—150, here 86. 这里有关兰普雷希特和情感的评论受到了以下材料的启发, 见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1—44. 关于兰普雷希特, 又见Rüdiger Schnell, “Historische Emotionsforschung: Eine mediävistische Standortbestimmung”, *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38 (2005), 173—276, here 222—223.
- (32) Lamprecht,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118.
- (33) Lamprecht,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132.
- (34) 见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6.
- (35) 见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5.
- (36) 见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 (37) Kurt Breysig, *Geschichte der Seele im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 (Breslau: Marcus, 1931), viii.
- (38) 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6.
- (39)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西美尔的宏大理论也暗示了情感史发展的宏大叙事, 这样的观点见Eva Illouz,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1—2.
- (40) 见Aby Warburg, “Dürer and Italian Antiquity (1905)”, in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Brett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553—558.
- (41) Gertrud Bing, “Aby M. Warburg: Vortrag von Frau Professor Bing anlässlich der feierlichen Aufstellung von Aby Warburgs Büste in der Hamburger Kunsthalle am 31. Oktober 1958”, in Aby M. Warburg, *Ausgewählte Schriften und Würdigungen*, i, ed. Dieter Wuttke (3rd edn., Baden-Baden: Koerner, 1992), 455—464, here 461. 见Warburg’s *Pathosformel*: Kurt W. Forster, “Energie, Emotion und Erinnerung in Aby Warburgs Kulturwissenschaft”, in Johannes Fehr and Gerd Folkers (eds.), *Gefühle zeigen: Manifestationsformen emotionaler Prozesse* (Zurich: Chronos, 2009), 283—303; Ute Frevert, “Angst vor Gefühlen? Die Geschichtsmächtigkeit von Emotionen im 20. Jahrhundert”, in Paul Nolte, Manfred Hettling, Frank-Michael Kuhlemann, and Hans-Walter Schmuhl (eds.), *Perspektiven de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Munich: Beck, 2000), 95—111, here 102—3; 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7—49. 瓦尔堡受到了达尔文对情感符号生理表达的强调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的影响, 见Carlo Ginzburg, “From Aby Warburg to E. H. Gombrich: A Problem of Method”, in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 (42) 加塞特引自Lewis Coser,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199.
- (43) Georg Simmel,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i (Leiden: Brill, 2009), 35. 有关西美尔与各种情感的更多细节信息, 参见Helena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e Einführung* (Konstanz: UTB, 2002), 16—43.
- (44) Simmel, *Sociology*, 256; 关于信任 (Vertrauen), 315—316; 关于荣誉 (Ehre), 387—389; 关于忠诚 (Treue), 517—522; 关于敌意和嫉妒 (Feindseligkeit, Neid, Eifersucht), 255—258.
- (45) Ursula Lehmkuhl, “Diplomatiegeschichte als internationale Kulturgeschichte: Theoretische Ansätz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zwischen Historischer Kulturwissenschaft und Soziologischem Institutionalismu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3 (2001), 394—423, here 414. 感谢约恩·哈佩尔 (Jörn Happel) 告知我这篇论文。
- (46)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114, 120, 113, 114, 126, 135. 又见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44—60; 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49. (中译见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270、276、281、288页。)
- (47) “每一种经历都更加直接和绝对, 人们对悲欢的感觉很像是儿童的感觉。”见 Johan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1页。) 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译本是《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赫伊津哈和马克·布洛赫一样, 因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的影响, 对集体情感有一种消极的看法。
- (48)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2, 8.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第8页。)
- (49)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15.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第14页。)
- (50)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20.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第18页。)
- (51)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203.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第186页。)
- (52)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288—289. (中译见 [荷兰] 赫伊津哈: 《中世纪的秋天》, 何道宽译, 第263页。)
- (53) Huizinga,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8, 20, 226.
- (54) 除了费弗尔之外, 年鉴学派还有一些人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情感。在《国

王神迹》(*Les Rois thaumaturges* , 1924年出版; 英文版1961年出版) 中, 马克·布洛赫描述了中世纪国王的萨满式力量, 这种力量决定了臣民对国王的忠诚, 见Tanner, “Unfassbare Gefühle”, 55。《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 1949年出版, 英文版1953年出版) 这部方法论遗作是他在1944年被盖世太保谋杀前不久写的。在书中他提到了情感的重要性: “宗教史家怎么会满足于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呢? 他完全知道, 教室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 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见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Knopf, 1992), 56。(中译见[法]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 张和声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70页。)

- (55)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trans. Edward Jephcott, ed. Eric Dunning, Johan Goudsblom, and Stephen Mennell (rev. edn., Oxford: Blackwell, 2010) [Ger. orig.,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2 vols., 1939].
- (56) 文明化的过程“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在这个或那个方向上最多样化的交叉运动、转变和进发”, 见 *Civilizing Process*, 157。卢德思 (Peter Ludes) 也主张文明的过程在概念上是线性的, 见 Peter Ludes, *Drei moderne soziologische Theorien: Zur Entwicklung des Orientierungsmittels Alternativen* (Göttingen: Schwartz, 1989), 152, 354 n. 12。对埃利亚斯的观点有很多批评, 见 Hans-Peter Duerr, *Der Mythos vom Zivilisationsprozeß, i. Nacktheit und Scha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further volumes in 1990, 1993, 1997, and 2002。总结见 Gerd Schwerhoff, “Zivilisationsprozeß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orbert Elias' Forschungsparadigma in historischer S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6 (1998), 561—606; Michael Hinz, *Der Zivilisationsprozess: Mythos oder Realität? Wissenschafts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Elias-Duerr-Kontroverse* (Opladen: Leske und Budrich, 2002); Axel T. Paul, “Die Gewalt der Scham: Elias, Duerr und das Problem der Historizität menschlicher Gefühle”, *Mittelweg* 36, 16/2 (2007), 77—99。
- (57)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91.
- (58)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55—56.
- (59)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60, 168.
- (60)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29.
- (61)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376。又见他关于将冲动加以内化、将禁忌转化为自我约束, 并将体育作为安全阀的论述。关于神经症, 他写道: “神经症可能一直存在,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冲突的历史形式, 它需要心理发生学和社会发生学的启示。”参见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127。
- (62) 对埃利亚斯著作中的心理分析和情感的更多探讨, 见 Barbara H. Rosenwein, “Thinking Historically about Medieval Emotions”, *History Compass*, 8/8 (2010), 828—842, esp. 829。

- (63)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28, 98, 169, 29.
- (64)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169, 158, 29.
- (65)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135. (中译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 (66) 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关于恐惧,“毋庸置疑,使人感到恐惧的可能性,正如使人感到欢乐的可能性一样,都是人性的不可改变的妆奁。不过潜伏于或炽燃于个人身上的恐惧的强度、性质和结构,从来就不仅仅取决于他个人的品性,至少是在他生活于其中的多元化的社会里,也从来不仅仅是由其品性决定。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由历史、他和他人关系的建构、其所在社会的结构决定的;并随着这一切的变化而变化”。参见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442。(中译见[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第527页。)
- (67) 有关对心理学的开放,参见Elias, *Civilizing Process*, 120—121。
- (68) 德吕莫利用了来自当代实验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框架。对他来说,对恐惧的历史研究并不是对一种易变的情感的研究,而是对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恐惧的主体和客体的分析,即“谁害怕什么”的问题,见Jean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VIe—XVIIIe siècles): Une cité assiégée* (Paris: Fayard, 1978), 21。
- (69) 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1945*, i. *Ambition and L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vii. 这里引用的一段话出自第二版的前言,1973年的第一版中是没有的。又见泽尔丁对其多卷本著作的反思,见“Pers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5/3 (1982), 339—347; 以及 Zeldin, *An 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 (70) Zeldin, *France, 1848—1945*, i. *Ambition and Love*, vii.
- (71) Zeldin, *France, 1848—1945*, ii. *Intellect, Taste and Anx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尤其是第三章(“担忧、厌倦和歇斯底里”)。在第二章(“个人主义和情感”)中,作者概述了从浪漫主义作家到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对意义的探索及相关的情感成本。
- (72) 泽尔丁并不是全然孤独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博士生朱迪思·德夫林(Judith Devlin)研究了19世纪法国大众文化中的迷信残留,在此背景下,还触及各种情感。参见Judith Devlin, *The Superstitious Mind: French Peasants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3) Zeldin, *France, 1848—1945*, i. *Ambition and Love*, vii.
- (74) Zeldin, *France: 1848—1945*, ii. *Politics and Ang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ix.
- (7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 John Bednarz, Jr with Dirk Baec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在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地方,人们可以找

到与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概念、卢曼对“系统”一词的使用极为相似的事物与现象: George Steinmetz, “Germ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Nazism: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1—283, esp. 269—271。

(76) Zeldin, “Pers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345.

(77) 关于由于缺乏父母之爱和把婴儿包在襁褓中而引起的童年焦虑, 见Lloyd deMause,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in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Harper& Row, 1974), 1—73, esp. 49—50。又见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orton, 1984—1998); Peter Loewenberg, “Emotion und Subjektivität: Desiderata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us psychoanalytischer Perspektive”, in Nolte et al. (eds.), *Perspektiven de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58—78。关于前现代时期, 见Lyndal Roper,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4)。关于在情感史中应用心理分析范畴的优势: “我发现精神分析理论最有用, 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将情感与内部状态和冲突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精神分析的洞见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特定情感的原因, 以及在我们与他人关系中起作用的无意识和意识过程……使用精神分析理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个。首先, 精神分析学在解释个体方面比在处理群体方面做得更好, 而历史学家通常想要了解的是集体行为。第二个危险是, 除非我们非常小心地将其使用历史化, 否则精神分析最终会沦为还原主义, 这样所有不同的历史过程都可以还原为恋母情结和侵略性, 或者是未解决的自我与母亲的区别。当精神分析学开始使我们的解释变得平面化, 变得可以预测、变得过于通用时, 它们就无法使过去人们的主观性真正吸引人了, 而这本来是使用这些理论的唯一目的。”Roper, “Forum: History of Emotions”, *German History*, 28/1 (2010), 67—80, here 71。

(78) Frevert, “Angst vor Gefühlen?”, 97。

(79) Erik H.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62), 255—256。

(80) Lloyd de Mause, “The Gentle Revolution: Childhood Origins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Democratic Movements”,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17/4 (1990) <<http://www.kidhistory.org/gentle.html>>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4。

(81) Lloyd de Mause, “The Gentle Revolution: Childhood Origins of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Democratic Movements”,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17/4 (1990) <<http://www.kidhistory.org/gentle.html>>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4。

(82) Cf. Sven Reichardt, *Authentizität und Gemeinschaft: Linksalternatives Leben in den siebziger und frühen achtziger Jahre* (Berlin: Suhrkamp, 2014); Sven Reichardt, “‘Wärme’ als Modus sozialen Verhaltens? 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Kulturgeschichte des linksalternativen Milieus vom Ende der sechziger bis Anfang der achtziger Jahre”, *Vorgänge*, 44/3—4 (2005), 175—187; Sven

Reichardt, “Authentizität und Gemeinschaftsbindung: Politik und Lebensstil im linksalternativen Milieu vom Ende der 1960er bis zum Anfang der 1980er Jahre”, *Forschungsjournal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21/3 (2008), 118—130.

- (83) Hans Medick and David Warren Sabean, “Introduction” in Medick and Sabean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Essays on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here 4. 20多年后, 苏珊·布鲁姆霍尔 (Susan Broomhall) 把视角扩展到整个家庭, 见 Susan Broomhall (ed.), *Emotions in the Household, 1200—19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84) Esther Goody, “Parental Strategies: Calculation of Sentiment? Fostering Practice among West Africans”, in Medick and Sabean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266—277, here 277.
- (85) Edward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17.
- (86) 对于性别史和情感 (特别是爱) 的介绍, 见 Ingrid Bauer, Christa Hämmerle, and Gabriella Hauch, “Liebe widerständig erforschen: Eine Einleitung”, in Bauer, Hämmerle, and Hauch (eds.), *Liebe und Widerstand: Ambivalenzen historischer Geschlechterbeziehungen* (Vienna: Böhlau, 2005), 9—35。
- (87) Shorter,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80—83, 148—161. 又见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102—119 (有关家庭情感关系的章节)。
- (88) Gisela Bock and Barbara Duden, “Arbeit aus Liebe—Liebe als Arbeit: Zur Entstehung der Hausarbeit im Kapitalismus”, in Gruppe Berliner Dozentinnen (eds.), *Frauen und Wissenschaft: Beiträge zur Berliner Sommeruniversität für Frauen, Juli 1976* (Berlin: Corage, 1977), 118—199, here 121. 肖特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在 1949 年写道: “‘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是使他们分裂的严重误会的一个根源。拜伦说得好, 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 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既然女人“无论如何注定要从属他人, 她宁愿侍候一个神, 也不愿服从暴君——父母、丈夫、保护人; 她选择了心甘情愿受奴役, 觉得这种奴役是她自由的表现; 她竭力通过彻底承受自己作为非本质客体的处境来克服它; 她通过自己的肉体、感情、行为, 极端地赞美被爱的男人, 把他设立为价值和最高的现实, 她在他面前要自我虚无化。对她来说, 爱情变成一种宗教”。真正的爱只存在于两个平等自主的人之间: “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 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 又是对方。”参见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ed. and trans. H. M. Parsh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652, 653, 677。(中译见 [法] 波伏娃: 《第二性》, 郑克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838、837、867 页。)
- (89) 例如, 可参见 Elisabeth Badinter, *Mother Love: Myth and Reality: Motherhood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81); Yvonne Schütze, *Die gute Mutter: Zur Geschichte des normativen Musters “Mutterliebe”* (Bielefeld: Kleine, 1986)。

- (90) 情感在性别史上边缘地位的典型表现是，在一本著名的性别史导论中，情感只是被一笔带过，见Claudia Opitz-Belakhal, *Geschlechtergeschicht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10), 110；在Philippe Ariès and George Duby (gen. eds.),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iv.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ed. Michelle Perrot,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4) [Fr. orig.,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iv.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grande guerre*, 1987]中，在第四卷总结的最后才提到这个问题。
- (91) Edith Saurer, “Liebe, Geschlechterbeziehungen und Feminismus”, *L’Homme*, 8/1 (1997), 6—20, here 20.
- (92) Peter N. Stearns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4 (1985), 813—836, here 813.
- (93) Stearns and Stearns, “Emotionology”, 825.
- (94) 又见Carol Zisowitz Stearns and Peter N. Stearns, *Anger: The Struggle for Emotional Control in America’s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95) Stearns and Stearns, “Emotionology”, 830.
- (96)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4—825.
- (97) Stearns and Stearns, “Emotionology”, 818 (Demos); 832 (De Swaan).
- (98) George F. 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1964); Charles Tilly,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H.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 (99) Stearns and Stearns, “Emotionology”, 816—817.
- (100) Stearns and Stearns, *Anger*; Peter N. Stearns, *Jealousy: The Evolution of an Emo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Peter N. Stearns, *American Cool: Constructing a Twentieth-Century Emotional Sty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ter N. Stearns and Jan Lewis (eds.), *An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N. Stearns, *American Fea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igh Anx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01)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6.
- (102) 又见1998年召开的主题为“情感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Emotions”)的会议，这场会议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高级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讨论会发展而来。与会者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会议的组织者是迈克尔·海德(Michael Heyd)和约瑟夫·卡普兰(Yosef Kaplan)。出自米沙尔·阿尔特鲍尔·鲁德尼克(Michal

- (103)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27—351;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4) Cf. *Amazon* <[http://www.amazon.com/Navigation-Feeling-Framework-History-Emotions/dp/0521004721/ref=sr_1_1?](http://www.amazon.com/Navigation-Feeling-Framework-History-Emotions/dp/0521004721/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16212175&sr=1-1)
[ie=UTF8&s=books&qid=1216212175&sr=1-1](http://www.amazon.com/Navigation-Feeling-Framework-History-Emotions/dp/0521004721/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16212175&sr=1-1)>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4.
- (105) “Media Monitor”, *The Hotline* (18 September 2001).
- (106) James F. Williamson, “Properly Fought, A Just War is Defensible”, *Commercial Appeal* (12 October 2001), B5. “在仇恨、嫉妒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激发之下，恐怖主义分子无视国际社会的蔑视。”对于联军在阿富汗遇到的普通阿富汗人，“这些人身上显然没有激发恐怖分子的那种仇恨”。参见“World Must Pitch in to Rebuild Afghanistan”, *Press and Sun Bulletin* (18 November 2001), 14A.
- (107) 杰罗尔德·波斯特 (Jerrold Post)，乔治·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临床教授，转引自“U.S. Senator Mary Landrieu (D-LA) Holds Hearing o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Motivations”, *Federal Document Clearing House (FDCH) Political Transcripts* (15 November 2001)。
- (108) “电子运动的历史”指的是“9·11”事件相关的电子通信所引发的时间上的混乱，其中事件的实际顺序以及前后的清晰感觉变得模糊不清，见 Despoina Valatsou, “History, Our Own Stories and Emotions Online”, *Historein: 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 8 (2008), 108—116, here 114. 该文的主要史料来源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历史与新媒体中心 (CHNM) 的“9·11”数字档案。
- (109) “9/11: We Will Never Forget”, *New York Post* (31 May 2002), 4; Terry Corcoran, “Officers Recall the Cheers”, *Journal News* (Westchester County, NY) (10 September 2002), 1A.
- (110) Shaila K. Dewan, “Closure? A Buzzword Becomes a Quest”,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2001), section 1A, 41.
- (111) Patrick May, “2001: A Year of Uncertainty”, *San Jose Mercury News* (30 December 2001).
- (112) 作为记录文化趋势的文化地震仪，专栏副刊也记录了这种变化，见 Edo Rents, “Mehr Ironie wag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28 October 2001), 21; Susanne Ostwald, “Ende der Ironie: Jedediah Purdy und die Halbwertszeit der Kulturkritik”, *Neue Zürcher Zeitung* (21 January 2003), 51; MaryAnn Snyder-Körber, “Was kommt nach dem 11. September? Die Terroranschläge des Jahres 2001 in den USA haben die Alltagskultur Nordamerikas nachhaltig verändert”, *Der Tagesspiegel* (8 August 2007), Sonderthemen. 正是2001年的“打破讽刺运动”，才使人们有可能回顾1989年发

生的事件，并由此产生对讽刺的推动，见Dirk von Petersdorff, “Die Schule der Ironie: 1789, 1989”, *Merkur*, 64/732 (2010), 403—412, here 407。关于讽刺在21世纪头十年后半期的回归，参见Andrian Kreye, “Die leicht Verzweifelten: In den USA kehrt die Ironie zurück—als neue Ernsthaftigkeit”, *Süddeutsche Zeitung* (28 February 2005), 13; Burkhard Müller, “Sei niemals nicht ironisch: Empirisch gesichert: Kurssturz für das uneigentliche Reden”, *Süddeutsche Zeitung* (26 November 2008), 13。

(113) Frank Schirrmacher, “Die Patente der Fliege: Eine Begegnung mit J. Craig Vent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8 April 2000), 49.

(114) Michel Houellebecq,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 trans. Frank Wynne (New York: Knopf, 2000) . 同年，弗兰克·韦恩 (Frank Wynne) 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

(115) 这方面的会议如：“Representing Emotions: Evidence, Arousal, Analysis” with Peter Burke, Otniel Dror, and others (曼彻斯特大学，2001年5月)；“现代早期欧洲和北美殖民地的情感”(德国历史研究所，华盛顿特区，2002年11月)；Geschichte + Theorie (AG + T)工作组的四次会议：“Medien und Emotionen: Zur Geschichte ihrer Beziehungen seit dem 19. Jahrhundert”(洪波，2005年2月)，“Rationalisierungen des Gefühls: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Emotionalität, 1880—1930”(柏林，2006年10月)，“Die Präsenz der Gefühle: Männlichkeit und Emotion in der Moderne”(柏林，2007年9月)，and“Eine Geschichte der Tiere—Eine Geschichte der Gefühle: 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auf das 18. bis 20. Jahrhundert”(柏林，2010年5月)；“Emotsii v russkoj istorii i kul'ture”(法国—俄罗斯科学与人类社会研究中心和德国历史研究所，莫斯科，2008年4月)；“解读东欧、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情感”(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2008年6月)；“前现代的情感文化史”(于默奥大学，2008年10月)。最重要的研究小组包括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情感研究所(2002年，雷迪和斯特恩斯都做了开幕演讲)；苏黎世Collegium Helveticum的“Die Rolle der Emotion: Ihr Anteil bei menschlichem Handeln und bei der Setzung sozialer Normen”(始于2004年)；马赛大学和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联合主持的“中世纪的情感”(Les Émotions au Moyen Âge, 简称EMMA，始于2006年)；瑞典于默奥大学的前现代情感文化史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motions in Premodernity, 简称CHEP，始于2007年)；柏林自由大学的“卓越汇集”/“情感语言”研究中心(the Excellence Cluster/Research Center“Languages of Emotions”，始于2007年)；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情感史中心(始于2008年)；伦敦大学的玛丽女王情感史中心(始于2008年)；纳瓦拉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的“情感文化与身份”(Emo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简称CEMID，始于2010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情感史卓越中心(始于2011年)。

(116) Rainer Burkard, “Ekelige Verführung”, *Die Zeit*, 41 (22 October 2008), 55.

(117) *Golf Time* 12 (July/August 2009), 33.

(118) “Tränen als pure Emotion”, *Fifa.com* (23 April 2010) <<http://de.fifa.com/>

- (119) Daniel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 (120) Thomas Anz, “Emotional Turn? Beobachtungen zur Gefühlsforschung”, *literaturkritik.de* (18.01.2007) <http://www.literaturkritik.de/public/rezension.php?rez_id=10267>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4; Rainer Schützeichel, “Emotionen und Sozialtheorie: Eine Einleitung”, in Schützeichel (ed.), *Emotionen und Sozialtheorie: Disziplinäre An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2006), 7—26, here 7;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and Jean Halley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Vanessa Agnew, “History’s Affective Turn: Historical Reenactment and Its Work in the Present”, *Rethinking History*, 11/3 (2007), 299—312; Ute Frevert, “Was haben Gefühle in der Geschichte zu suche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2009), 183—208, here 183—184; Jürgen Kaube, “Tränenkunde: Die Dämpfe des Herzens”, review of Beate Söntgen and Geraldine Spiekermann (eds.), *Tränen* (Munich: Fink, 2008),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June 2009), N3. “遵循的就是‘情感的转向’，虽然还没有人使用这个说法，但就是如此，遵循的是当时文化科学中对感情、存在、情感、激情等唤起状态的热情。”见 Jan Plamper, “Introduction” in *Emotional Turn? Feelings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Special Section], *Slavic Review*, 68/2 (2009), 229—237.
- (121) Bettina Hitzer, “Emotionsgeschichte: Ein Anfang mit Folgen”, *H-Soz-u-Kult* (23 November 2011) <<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forum/2011-11-001>>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4; Susan J. Matt, “Current Emotion Research in History: Or, Doing History from the Inside Out”, *Emotion Review*, 3/1 (2011), 117—124; Nina Verheyen, “Geschichte der Gefühle[Version: 1.0]”, *Docupedia-Zeitgeschichte* (18 June 2010) <http://docupedia.de/zg/Geschichte_der_Gef%C3%BChle>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4. 又见范围更有限或更早的文献，见William M. Reddy,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Self and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02—315; Florian Weber, “Von der klassischen Affektenlehre zur Neurowissenschaft und zurück: Wege der Emotionsforschung in den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53 (2008), 21—42; Alexandra Przyrembel, “Sehnsucht nach Gefühlen: Zur Konjunktur der Emotion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L’Homme*, 16 (2005), 116—124; Schnell, “Historische Emotionsforschung”.
- (122) Angelika C. Messner, “Emotions, Body, and Bodily Sensations within an Early Field of Expertise Knowledge in China”, in Paolo Santangelo and Ulrike Middendorf (eds.), *From Skin to Heart: Perceptions of Emotions and Bodily Sens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41—63; Angelika C. Messner, “Making Sense of Signs: Emotions in Chinese Medical Texts”, in Paolo Santangelo and Donatella Guida (eds.), *Love, Hatred, and Other Passions: Questions and Themes on Emo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Leiden: Brill,

2006), 91—109; Curie Virág, “Emotions and Human Agency in the Thought of Zhu Xi”,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37 (2007), 49—88; Zouhair Ghazzal, “From Anger on Behalf of God to ‘Forbearance’ in Islamic Medieval Literature”, in Barbara H. Rosenwein (ed.), *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3—230.

- (123) Eiko Ikegami, “Emotions”, in Ulinka Rublack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3—353; 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124) Michael Laffan, “White Hajjis: Dutch Islamophobias Past and Present”, in Laffan and Max Weiss (eds.), *Facing Fear: The History of an Emo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2—216; Lisbeth Haas, “Fear in Colonial California and within the Borderlands”, in Laffan and Weiss (eds.), *Facing Fear*, 74—90.
- (125) Daud Ali, “Anxieties of Attachment: The Dynamics of Courtship in Medieval Ind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6/1 (2002), 103—139; Francesca Orsini, “Love Letters”, in Orsini (ed.), *Love in South Asia: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8—258; Sumathi Ramaswamy, *Passions of the Tongue: Language Devotion in Tamil India, 1891—197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Lisa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The Making of a Mother Tongu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Scott Kugle, *Rebel Between Spirit and Law: Ahmad Zarruq, Sainthood and Authority in Isla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seph S. Alter, *Gandhi’s Body: Sex, Diet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又见从情感史的角度书写的殖民史: Margaret Critchlow Rodman, “The Heart in the Archives: Colonial Contestation of Desire and Fear in the New Hebrides, 1933”,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8/3 (2003), 291—312.
- (126) Margrit Pernau, “Male Anger and Female Malice: Emotions in Indo-Muslim Advice Literature”, *History Compass*, 10/2 (2012), 119—128; Margrit Pernau, “An ihren Gefühlen sollt Ihr sie erkennen: Eine Verflechtungsgeschichte des britischen Zivilitätsdiskurses (ca.1750—1860)”,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49—281; Margrit Pernau, “Teaching Emotions: The Encounter between Victorian Values and Indo-Persian Concepts of Civ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Delhi”, in Indra Sengupta and Daud Ali (eds.), *Knowledge Production, Pedagogy, and Institutions in Colonial In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27—247; Margrit Pernau, *Emotions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India: From Balance to Fervor* (Oxford UP, 2019). 佩尔瑙还指导了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的一些博士生, 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以下论文: Monika Freier, “Cultivating Emotions: The Gita Press and Its Agenda of Social and Spiritual Reform”,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3/3(2012), 397—

413; M. Sajjad Alam Rizvi, “Conceptualizing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sian Suf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forthcoming); Maritta Schleyer, “*Ghadr-e Dehli ke Afsane*”, *Annual of Urdu Studies*, 27 (2012), 34—56.

(127) Sarah Tarlow, “Emotion in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1/5 (2000), 713—746.

(128) Egon Flaig, “Wie man mit Gesten zwingt: Der Einsatz des Emotionalen in der Politik des antiken Rom”,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 Geschichte Politik Wirtschaft*, 30/3 (2001), 72—83. 又见 Alfred Knepe, *Metus temporum: Zur Bedeutung von Angst i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des 1. und 2. Jhds. n. Chr.* (Stuttgart: Steiner, 1994); Dirk Barghop, *Forum der Angst: Eine historisch-anthropologische Studie zu Verhaltensmustern von Senatoren im Römischen Kaiserreich*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4); Christian Meier, “Die Angst und der Staat: Fragen und Thesen zur Geschichte menschlicher Affekte”, in Hans Rössner (ed.), *Der ganze Mensch* (Munich: DTV, 1986), 228—246. 从古典文献学的角度来看, 见 David Konstan and N. Keith Rutter (eds.), *Envy, Spite and Jealousy: The Rivalrous Emotions in Ancient Gree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关于罗马和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辩论》(*Tusculanae disputationes*), 见 Robert Kaster, *Emotion, Restraint,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R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9) Plutarch, *Lives*, x. *Agis and Clemones, Tiberius and Caius Gracchus, Philopoemen and Flaminius*, trans.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1.

(130) Plutarch, *Lives*, x.171.

(131) Plutarch, *Lives*, x.173.

(132) Flaig, “Wie man mit Gesten zwingt”, 74.

(133) Flaig, “Wie man mit Gesten zwingt”, 76, 77.

(134) 显然, 对中世纪情感史的研究和在中世纪文学研究中对情感的广泛关注是相辅相成的, 见 Peter Godman, *Paradoxes of Conscienc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Abelard, Heloise, and the Archpo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5) Gerd Althoff, “Ira Regis: 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Royal Anger”, in Rosenwein (ed.), *Anger's Past*, 59—74.

(136)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34; 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010), 237—265, here 250—252. “液压模型”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所罗门 (Robert Solomon) 等人, 见 Robert C. Solomon, *The Passions: Emo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3), 77—88.

(137) Charles 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with an

introduction, afterword, and commentaries by Paul Ekman (3r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4, 转引自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35。

- (138)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 (139)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7.
- (140)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28.
- (141)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842.
- (142) 对于中世纪不同的情感共同体之间在情感规范方面的差异，罗森宛恩有了新的认识。如今，她认为可能的变化幅度没有她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所认为的那么大，见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56—257。
- (143) Barbara H.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 (144)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24.
- (145) 2009年7月6日，在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的一次演讲中，罗森宛恩提到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也使建立成员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的情感共同体成为可能。
- (146)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6.
- (147) 关于罗森宛恩的方法论，见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53—254; Rosenwein, “Thinking Historically about Medieval Emotions”, 833—836; Barbara H. Rosenwein,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ssions in Contex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Emotions*, 1 (2010), 12—24。
- (148) 她在2009年7月6日的柏林演讲中明确了这一点。
- (149) 她还把形象和音乐视为可能的史料，见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54—255。
- (150) 见她2009年7月在柏林的演讲。
- (151)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6—29.
- (152) 见本书第四章。罗森宛恩认为雷迪的情感体制是现代的、二元的（一方面，把宫廷或国家作为一种情感体制；另一方面，将社团或沙龙和共济会作为一种情感避风港）。她认为情感共同体概念更加多元和开放。此外，在雷迪的理论框架中，情感体制要适应情感导航、情感苦难和情感自由，而情感共同体的概念则没有这样的负担，见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3。
- (153) 罗森宛恩本人明确试图在她的情感共同体中为雷迪的“情感体制”保留一席之地，见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5。
- (154) 关于现代早期的情感，见Gail Kern Paster, Katherine Rowe, and Mary Floyd-Wilson(eds.), *Reading the Early Modern Passion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mo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Nicole Eustace, *Passion Is the Gale: Emotion, Pow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Andreas Bähr, *Furcht und Furchtlosigkeit: Göttliche Gewalt und Selbstkonstitution im 17.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3); Vera Lind and Otto Ulbricht (eds.),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Colonial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 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2002).

- (155) Susan C. Karant-Nunn, *The Reformation of Feeling: Shaping the Religious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60—62, 96—99, 128—131, 254—255.
- (156) 转引自Ute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2), 126.
- (157) 转引自Ute Frevert, *Gefühlspolitik: Friedrich II. als Herr über die Herze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2), 126.
- (158) “无聊”在德语中是“Langeweile”，字面意思是“很长时间”，见Martina Kessel, *Langeweile: Zum Umgang mit Zeit und Gefühlen in Deutschland vom späten 18. bis zu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1), 19, 26.
- (159) Susan J. Matt, *Homesickness: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8—200, 254—255. 在这本书中，马特的叙述读起来就像一部以情感为中心的移民史。另一部类似的文本见Sonia Cancian, *Families, Lovers, and their Letters: Italian Postwar Migration to Canada*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2010)。
- (160) Alain Corbin, *The Village of Cannibals: Rage and Murder in France, 1870*,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 orig., *Le Village des cannibals*, 1991], 90. 我要感谢马克·埃利 (Marc Elie) 提醒我这部作品的存在。又见波勒·珀蒂捷 (Paule Petitier) 和希尔万·维内尔 (Sylvain Venayre) 对科尔班的采访：“Entretien avec Alain Corbin”, *Écrire l'histoire: Dossier emotions*, 2 (2008), 109—114.
- (161) Corbin, *Village of Cannibals*, 91, 119.
- (162) Joanna Bourke,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 (163) Ute Frevert, *Emotions in History: Lost and Found*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32.
- (164) 不要区分追踪情感历史变化的历时性研究和研究同一时期情感差异的共时性研究，而是可以选择情绪的生理信号——哭泣、大笑和微笑——作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关于哭泣，见Elina Gertsman (ed.), *Crying in the Middle Ages: Tears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Anne Vincent-Buffault, *The History of Tears: Sensibi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Thomas Dixon, “The Tears of Mr Justice Willis”,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17/1 (2012), 1—23. 关于大笑和微笑，见Gerd Althoff, “Vom Lächeln

zum Verlachen”, in Werner Röcke and Hans Rudolf Velten (eds.), *Lachgemeinschaften: Kulturelle Inszenierungen und soziale Wirkungen von Gelächter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 (Berlin: de Gruyter, 2005), 3—16.

- (165) William M. Reddy, “The Rule of Love: The History of Western Romantic Lov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uisa Passerini, Liliana Ellena, and Alexander C. T. Geppert (eds.), *New Dangerous Liaisons: Discourses on Europe and Lov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 50 . 又见 William M. Reddy, *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 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66) Árpád von Klimó and Malte Rolf, “Rausch und Diktatu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1/10 (2003), 877—895 . 又见Árpád v. Klimó and Malte Rolf, “Rausch und Diktatur: Emotionen, Erfahrungen und Inszenierungen totalitärer Herrschaft”, in Klimó and Rolf (eds.), *Rausch und Diktatur: Inszenierung, Mobilisierung und Kontrolle in totalitären System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6), 11—43。比较的情感历史，又见Susanne Michl and Jan Plamper, “Soldatische Angst im Ersten Weltkrieg: Die Karriere eines Gefühls in der Kriegspsychiatrie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und Russland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09—248。
- (167) 已经有一些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见Frank Bösch and Manuel Borutta (eds.), *Die Massen bewegen: Medien und Emotion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6)。又见Oliver Grau and Andreas Keil (eds.), *Mediale Emotionen: Zur Lenkung von Gefühlen durch Bild und Sou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5)。
- (168) Lucien Febvre, “Pour l’histoire d’un sentiment: Le Besoin de sécurité”,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1/2 (1956), 244—247, here 247.

第二章 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75】

一、情感的种类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简称APA）使用的一套分类系统，它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由遗传因素或外部负面事件引起的情感障碍，表现为冷漠、食欲不振、缺乏动力和自杀念头等症状。在“抑郁症”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有许多其他模型，从希波克拉底的“黑胆汁”（μελαγχολία）到19世纪的“忧郁症”（melancholia）。但是，作为一种临床意义上的疾病，抑郁症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抑郁”症状的清晰表述可能更多地与美国精神医学的专业化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分类的必要性有关，而非其他。但是这确实有一些好处，那些遭受抑郁之苦的人不再被认为是恶魔附体，也不再被认为是生来就堕落的软弱者，而是得到了专业的医学诊断。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谈论抑郁症时，引号应该被省略了。这肯定与心理人类学家加纳纳特·奥贝耶谢克（Gananath Obeyesekere）在20世纪80年代对抑郁症的看法相类似，当时他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斯里兰卡思考了这个问题。

奥贝耶谢克发现，在斯里兰卡，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位美国朋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当这位美国朋友在斯里兰卡进行田野考察时，顺路拜访了他，并见到了另一位斯里兰卡朋友。在即将回国时，这位美国朋友对他说：“你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典型的抑郁症患者。”^[1]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不同。奥贝耶谢克以及这位斯里兰卡朋友的妻子和医生从来都不认为他“抑郁”，更不要说他本人了。当然，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周围的人也知道，作为一个修行的佛教徒，他经常去山上冥想打坐。冥想使他能够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摆脱自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所感受到的痛苦。【76】从那之后，奥贝耶谢克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越多，对这个文化框架的认识就越清晰，而在这个文化框架中，没有所谓的“抑郁症”这样的情感障碍。

在佛教本体论中，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只是通往涅槃之路的几个初级阶段之一。因此，我们所处的尘世被认为充满苦难，人类的身体被认

为特别肮脏。佛教徒利用腐烂和粪便这样的比喻，把心理语言学意义上的身体和自我分离开来。一位61岁的斯里兰卡人谈到自己的身体时说：

我努力控制我的身体。我想，我的头发、牙齿、指甲、神经和骨头等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它们不是我的。它们没有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虽然人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生活，衣着华美，但这一切对于来世毫无意义……我的身体就像尸体和粪便一样令人厌恶。(2)

一位85岁的老人强调说：

我的身体令人厌恶。我想：如果把我的肠子取出来，那得有多长啊！我一点也不想要这个身体。(3)

这些比喻和后工业化西方社会对美丽和青春的痴迷简直有天壤之别。奥贝耶谢克所描述的斯里兰卡佛教神话和宗教仪式也是如此。他将这些神话和宗教仪式统称为“文化的工作”。他的结论是，他那位被认为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把他的绝望概括成了一个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佛教的意义上可以定义为“苦”。(4)如果说他患有抑郁症，这不过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奥贝耶谢克提出了“一个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说法”：

以南亚男性（或女性）为例，如果他们有以下症状：体重急剧下降、性幻想、夜间遗精和尿液变色，在南亚，患者可能被诊断为患有一种疾病，即“精液流失”。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可以在从中国到秘鲁的每一个社会中发现这一系列症状。然而，如果我说很多美国人都患有“精液流失”的疾病，即使我能“证明”这种疾病是普遍存在的，我的看法也会被一笑置之。(5)

奥贝耶谢克的情感人类学只是人类学众多分支之一。以玛格丽特·特拉维克（Margaret Trawick）对南印度泰米尔人（Tamils）爱的概念的研究为例。在这里，爱的最高级形式是母爱（*tāy pācam*）。母亲不能温情脉脉地注视她的孩子，特别是在孩子睡着时，因为母亲充满慈爱的目光会给孩子造成永久的伤害。如果一个母亲非常爱她的孩子，她就应该加以贬低，比如给孩子起一个糟糕的名字，像“秃子”或“大鼻子”，或者开玩笑地说“你要死了吗？”。(6)【77】简·法扬（Jane Fajan）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拜宁人（Baining）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他们来说，

孤独就像饥饿一样，饥饿不是生理需求的表现，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缺失，因为社交被认为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共进餐是社交的表现。

⑦格雷格·厄本（Greg Urban）对欧洲人旅行日记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16世纪，图皮南巴人（Tupinamba）见到欧洲人之后打招呼的方式是哀号。这群生活在亚马孙雨林盆地（今天是巴西的一部分）的人们通常以放声大哭的方式来欢迎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熟人和陌生人。

⑧最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乌尼·维坎（Unni Wikan）对巴厘岛人的笑的研究，以年轻的苏里亚蒂（Suriati）为例。她突然接到电报，说未婚夫伊萨姆（Isham）死了。葬礼结束后，她平静地回到家中，行李里放着死者的两组照片。苏里亚蒂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看着照片，开始大笑起来：

这没什么好难过的！人已经死了，难过有什么用呢？一根棍子断了，另一根就会长出来。他不是还有兄弟吗？哦，原来有现成的替代品！世界上到处都是男人。为一个人悲伤是没有意义的。算了吧，开心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⑨

这些来自情感人类学研究的例子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它们动摇了任何关于泛文化情感的观点。在不同的文化中，情感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这无疑削弱了任何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情感这一观点，甚至是情感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这一观点。沿着经纬度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是一回事，沿着几十年和几百年的时间轴移动是另一回事。当我们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时，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情感呢？

这里有两个例子。冰岛萨迦是以散文形式讲述英雄事迹和家族恩怨的文学作品。尽管它们是艺术作品，但仍在不断地被历史学家们用来研究中世纪的日常生活。这些传说常常会详细描述情感，尤其是情感的躯体表征。故事人物的脸变红了，或者变白了，他们大笑、微笑、哭泣、扬起眉毛。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有一种比脸红出现频率更低的情感波动，会导致主人公的身体膨胀。在《尼亚尔萨迦》（*Brennu-Njáls Saga*）中，当索霍尔·阿斯格里姆森（Thorhall Asgrimsson）发现他的监护人被杀时，“他身体肿胀，血液从耳朵里流出，晕倒在地”。⑩在《拉克斯峡谷萨迦》（*Laxdæla Saga*）中，一个12岁小男孩只要想到自己被杀的父亲，【78】身体就会因为“悲伤而肿胀”。⑪用“肿胀的身体”来表达情感？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认为冰岛萨迦过于文学化，认为膨胀的身体更像是一种隐喻，而非情感在身体上的“真实”反映，只要

看一下与莫里哀同时代的安托万·博多·德·索梅泽（Antoine Beaudou de Somaize）的《女雅士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precieuses*, 1660—1661）就够了。他向我们展示了过去所谓的真爱是如何沦为了算计和诡计。这部充满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既有对情感的描述，也有对情感表达方式的指导，介绍了“叹息”的12种变体，可根据场合需要加以使用，它们分别是：爱的叹息、友谊的叹息、悲伤的叹息、嫉妒的叹息、同情的叹息、不确定的叹息，等等，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变体又分别有自己的变体。(12)

此外，即使情感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对象也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恐惧的对象（即害怕什么）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乔安娜·伯克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对被活埋的恐惧是怎样像野火一样从19世纪末一直蔓延到20世纪的。1897年发表的一项美国社会学调查报告显示，对被活埋的恐惧在各种恐惧中名列前茅。(13)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认为对死者的处理过于随意，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公民运动。他们收集了数百份目击者的报告，称有人在棺材里“死而复生”，言外之意是肯定也有人根本没有机会复生，但是并没有关于这种大规模恐慌的统计证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公墓的1200具尸体被挖掘了出来，只有6具尸体显示出埋葬过早的迹象。(14)但是，纽约州斯帕克斯（Sprakers）的埃莉诺·马卡姆（Eleanor Markham）等人的亲身经历加剧了这种恐慌。马卡姆患有心脏疾病，并于1894年7月8日“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抬棺材的人和医生注意到棺材里有东西在动。他们打开棺盖，发现“可怜的埃莉诺·马卡姆仰面躺着，脸色苍白而扭曲，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喊道：“天哪！你们要活埋我！”后来，她说：

你们准备埋葬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清醒……我的处境之可怕完全无法形容。我能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我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力，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呼喊，但还是无能为力。(15)

对其他人来说，救援来得太晚了。当棺材被打开时，他们的尸体缩成一团，指甲断了，还有其他挣扎着要逃脱的迹象，但是最终还是死掉了。此后不久，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可以避免被活埋的装置：带有通风竖井的棺材，或者可以供死而复生者呼救的铃铛（图3），都很畅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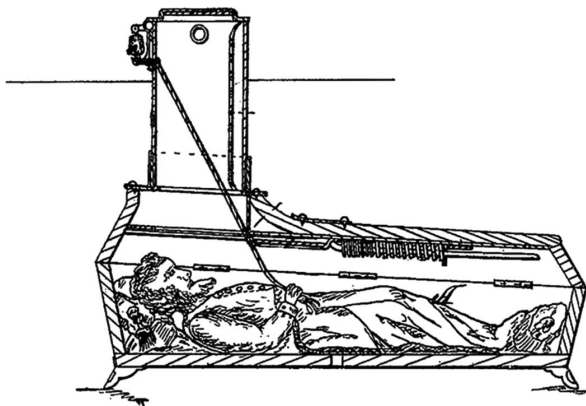


图3 带有铃铛和呼吸管的棺材【79】

资料来源：Joanna Bourke,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between 244 and 245; US Patent No. 81, 437 (25 August 1868), inventor: Franz Vester, Newark, NJ.

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44年的短篇小说《过早埋葬》（*Premature Burial*）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铃铛系统。爱伦·坡津津有味地向读者描述了在棺材中醒来的恐怖。

这时，在我的无限悲伤中，款款走来了希望天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预防措施。我扭动身体，做出一阵阵痉挛般的努力，试图打开棺盖：它纹丝不动。我在手腕上摸索着寻找铃绳：手腕上空空如也。这时，慰者逃之夭夭，绝望板起面孔，重新占据上风；因为我不仅发现棺材里根本没有我精心预备的柔软内衬，而且，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湿土的气味突然钻进我的鼻孔。(1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迅速驱散了这种流行的恐慌。但是这种恐慌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两百年后就消失了呢？关于死亡宣告的权威性，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有激烈的争论，【80】从中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在这几十年里，丧葬承办人、医生、科学家和有组织宗教的代表都在寻求话语主导权。起初，结果只是众声喧哗，但是随着生与死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人们不再确定埋葬标志着生命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划清了生死之间的界线；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此时也是战壕和弹坑使得被活埋成为一个严肃问题的时候。(17)我们这里不去探究为什么这种集体恐慌会结束，因为我们仅仅是要证明特定情感的对象是多么易变。

历史学家穿越到过去的旅程可以与人类学家穿越空间的旅程相提并

论，两者都产生了差异，与此时此地的差异。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这里被同时使用，这并非巧合。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其他民族的探索首次揭示了情感的表达和概念，而这些表达和概念又反过来让历史学家做出这样的假设：情感是社会所建构的，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的。本章后面会介绍人类学家的发现，包括对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两次越界，同时也更广泛地探讨情感的社会建构。(18)

二、旅行写作和早期人类学中的情感

像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在整个欧洲，不仅有不同的说话、饮食和生活方式，还有不同的感受方式。(19)但最早意识到欧洲之外的人有不同的情感，或至少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同的（后文将讨论情感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区别），是那些踏上“发现之旅”的欧洲航海家。1772—1775年间，格奥尔格·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曾参加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第二次环球航行，【81】他注意到塔希提人表达“亲切、慷慨、真挚的友谊、慈爱和怜悯”的方式。(20)甚至塔希提人脸上表现出来的情感也似乎与欧洲人不同。在1768—1771年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中，随行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写道：“在我所见过的面孔中，很少有人的表情比他们更丰富。”(21)在其他人的看来，塔希提人脸上的表情令人怀疑。他们觉得这些表情有欺骗性，就像库克本人在第二次环球航行中离开胡阿希内岛（Huahine）时所说的那样：“酋长、他的妻子和女儿几乎没有停止过哭泣，尤其是后两者。我不清楚他们在这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悲痛是真是假。”(22)库克的航海长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也不知道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否真实。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路过一个因为儿子夭折而“悲痛欲绝”的母亲。当他走近时，他震惊地发现“哀悼者看到我突然大笑起来……几个年轻的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也都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快乐，眼泪立刻就干了”。布莱对他的同伴解释说：“这位母亲并不为她的孩子而悲伤，因为如果她真的因为失去了儿子而伤心的话，她的悲伤是不可能那么快就平息的。他（布莱的同伴）打趣地叫她接着哭，但是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见到她有任何悲伤的迹象。”(23)

这种情感真实性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传教士，他们在19世纪初前往塔希提，试图从当地人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已经成功皈依基督教。起初，塔希提人脸上表现出来的力量被认为是一种特别深刻和持久的基督教化的证据，但后来这被证明是一种幻觉。1851年，传教士约翰·戴维斯

(John Davis) 出版了一本英语—塔希提语词典，其中26个条目证明了情感及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例如，“好听而具有欺骗性，就像伪君子的言语”，“华而不实”，“空洞的同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及“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假装虔诚或服从”。⁽²⁴⁾

在这些“发现之旅”以后，人类学这门新学科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随后传播到德国、俄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在情感的多学科研究中发挥了先锋作用，表明人类共性观念背后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是名为民族学、人类学和人种学，还是名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这门新学科很少关注情感的本质，而主要是关注社会组织（包括亲属关系），尤其是人的起源问题。人的外貌和习俗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解释这种多样性呢？人类是有一个起源，还是多个起源？人类是一种还是多种？⁽²⁵⁾【82】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这些都是人类学最初的核心问题。

人类同源说和对普遍的精神结构的强调是早期英国人类学家的进步反应。他们献身于反奴隶制的事业，如贵格会传教士的儿子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chard，1786—1848）。⁽²⁶⁾这种方法与17—18世纪广为流传的“高贵野蛮人”思想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与这种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基督教时间循环性观。像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和让-雅克·卢梭这样的哲学家认为，“高贵野蛮人”更接近于人类堕落之前的自然状态，因此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同时代堕落、腐败的欧洲人。这个观点回应了托马斯·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观点，并且保留了其情感因素，认为来自外族文化的人拥有更纯粹、更原始的情感。⁽²⁷⁾

在这场辩论中，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引发了一次重新洗牌。进化论强化了人类同源说，为其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撑。达尔文完全摒弃了神创论的观念，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原则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开放性，将那些目前在世者简化为进化的一个阶段，并且后面还会有很多个阶段。进化论的庸俗化版本被“科学化”为种族主义话语，和新的毁灭性技术一起，导致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达尔文将自己与一切野蛮人的观念划清界限，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不高贵的，他将我们所有人都视为“野蛮人”。这一点在他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述，他在书中强调：“从远古到现在，人类对恐惧的表达方式几乎没

有发生什么变化。”⁽²⁸⁾对达尔文来说，情感是普遍的，因为它们显然对所有动物的生存斗争都有好处，从灵长类动物到智人。这种普遍化及其与生存斗争（自然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之间的联系是实验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实验心理学必须以实验对象的可比性为先决条件。

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进行的“发现之旅”和他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之间的联系，就像他的著作对同时代人类学的影响一样，很少有人研究过。【83】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于1869年成为第一位担任民俗学教席的人。现代情感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对阿道夫·巴斯蒂安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²⁹⁾冯特和巴斯蒂安这对双子星在两个方向上产生了影响：在法国，他们影响了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42）；在美国，巴斯蒂安的学生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于1887年移民美国，开创了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大约100年后，情感人类学正是由此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三、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1912年，他写道：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30)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84】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31)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态”。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勒庞是研究人类群体的右翼理论家，他的观点被贝尼托·墨索里尼等更加右倾的人所利用。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到了勒庞，当时我们提到他为吕西安·费弗尔提供一些基本思想。(32)

20世纪法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一样，他也受到涂尔干和德国传统的影响，因为在1941—1948年，他在美国期间受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此外，他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在纽约时曾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结构主义教父索绪尔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法国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图腾制度，进而研究宗教和情感。在他之前，不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基于“原始”民族和图腾（通常基于动物起源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发展出宗教理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表明，宗教生活始终与共同体有联系，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33)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的使用并不代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认知操练，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抽象化是罕见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所有关于图腾的重要作家——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克罗伯（Kroeber）——都把图腾追溯到情感，也就是认知的对立面，因此放弃了任何提出一个科学解释的机会。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由于感性是人最捉摸不透的方面，所以才会有不断诉诸感性的诱惑，而将那些其实并不适用于解释，所以也将不能解释的东西遗忘了。(34)

涂尔干认为人类通过情感构建动物图腾，【85】是为了与他们已逝的祖先建立联系，(35)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这种“神圣情感理论”，他认为：

实际上，冲动和情绪什么都解释不了：它们往往都是结果，或者是体力的结果；或者是精神潜能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是后果，而不是原因。(36)

就情感而言，列维-斯特劳斯被证明是众多实验心理学家中又一个唯物主义者，卡尔·朗格（Carl Lange，1834—1900）和威廉·詹姆斯根据他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前景的理论，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介绍。他们认为情感不是身体内部的东西，相反，肢体语言本身就是情感。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著作对《图腾制度》（*Totemism*）中关于冲动和情感的这段文字给予了不同的重视。有人认为斯特劳斯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家，为某种程度的评价或意图主义创造了空间。(37)也有人认为，他将情感明显地简化为肢体动作，这足以让他成为心理学家西尔万·S.汤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1911—1991）的帮凶。汤姆金斯是所有社会建构主义者最讨厌的人，也是保罗·埃克曼的精神之父。(3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人们最早感觉到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是最突出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从1914—1918年在新几内亚的研究，在英国开启了基于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和学习原住民语言之上的20世纪的社会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坚称，他关注的是亲属关系，但他的日记雄辩地表明了人类学家在从事田野调查时的感受。(39)即使在澳大利亚，他也有这种感受：

对热带地区充满了恐惧；【86】厌恶高温和闷热——想到遇见去年6月和7月那样的高温就一阵莫名的恐慌……非常沮丧，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前面的任务……我在1914年9月12日（星期六）抵达新几内亚……我觉得很疲乏并且内心空虚，以至我对此地的第一印象

不甚清晰.....10月31日.....因为当时那里没有舞蹈或集会，我就沿着沙滩一路走到了奥罗柏（Oroobo）。非凡的旅途。这是我第一次在月光下欣赏这里的植被。非常奇妙和富有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轻轻地撕破了熟悉事物的面纱.....走进了丛林。突然觉得很害怕，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试着省视内心：“什么是我的内在生活？”毫无理由自我满足。(40)

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也是情感人类学反思的奠基文献。后来，人类学家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的情感构成了收集“数据”的基础。因此就有了在与观察对象进行接触时的情感，因为被观察者的情感总是会与观察者的情感进行对话（见下文关于琼·L·布里格斯 [Jean L. Briggs] 的内容）。

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另一位先驱是威廉·哈尔斯·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 1864—1922），作为人类学家，他一直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战争期间，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为遭受“炮弹休克”（shell shock，即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服务。其事迹因为派特·巴克（Pat Barker）的《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 1991—1995）而名传后世。里弗斯与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以及苏格蘭克雷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精神病院的其他病人之间的通信，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史料之一。他的创伤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田野考察的影响，还有待研究。(41)

里弗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 1881—1955）在1922年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研究中，将“情感”定义为“以某一对象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情绪倾向系统”。他还认为，“一个社会的存在取决于其成员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特定的情感系统，通过这种情感系统，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需求的调控”。“这种情感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社会作用于个人而形成的。”(42)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在1931—1937年在美国教书，因此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因此，当德国的人类学陷入相对默默无闻的境地时，巴斯蒂安通过博厄斯、【87】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对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巴斯蒂安的“儿子”弗朗茨·博厄斯，这条线索可以延伸到他“孙女”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她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马上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菊与刀》，这本书描

绘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群像。(43)本尼迪克特不仅让日本的“羞耻文化”与美国的“内疚文化”之间的区别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她考察了指导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情感观念，并将其与类似的北美观念进行了比较。例如，日文中的“恩”的概念支配着一切。它是“爱”和“尊重”的混合体，也意味着责任和对某人的感恩。“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44)在“人情的世界”那一章中，本尼迪克特概述了日本人对五种情感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45)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是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此或多或少算是巴斯蒂安的“曾孙女”。(46)米德对美国人类学和20世纪美国文化史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47)她在1925—1926年对萨摩亚群岛的实地考察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对美国教育和种族关系的重组做出了贡献，而且她对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妇女）的描绘也为性革命奠定了基础。她观察到波利尼西亚人：

对感情表达方式的态度同对行为举止的态度一样不同寻常。各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被区分为“情有可原”或者“无缘无故”。易动情感、喜怒无常、忧郁寡欢的人被说成是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泄怒、好斗。“无端暴怒”一词并非意味着脾气坏，后者是由“易怒”一词来表达的；同时也不意味着对合理的刺激产生一种不成比例的反应；【88】它只能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即无缘无故地愤怒；用不太严谨的话来表达，即一种不因任何表面刺激而产生的感情状态。(48)

总体来说，米德认为“萨摩亚人更喜欢中间路线，即情感的适度”。(49)和其他人类学家相比，米德更加明确地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向美国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她指出，在美国核心家庭中，“情感的专门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个包括几位成年男女在内的稍大一些的家庭共同体，似乎保证了孩子们不致发展出某些残缺性态度，诸如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等等”。(50)

后来有许多人类学家追随米德，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人类学研究都建立在对南太平洋岛屿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非洲、南美或北美印第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米德成为像保罗·埃克曼这样的心理学家的心头大患，这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说明。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学流派，他们尤其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这对夫妇有关。我们只有一些来自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情感的评论，比如“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以及“为了下定决心，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为了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我们需要感情的公开形式，这只有仪式、神话和艺术才能提供”。⁽⁵¹⁾在探讨情感表达仪式特征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品经常被引用。⁽⁵²⁾他的第一任妻子希尔德雷德更加注重情感。【89】在20世纪50年代，她指出每个人都具有表达文化普遍性的情感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文化变量的改变，这些文化变量使其受到不同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有的文化鼓励某种特定的情感，而有的文化则往往会压抑它们。希尔德雷德·格尔茨倾向于在一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的普遍意义上谈论爪哇人，即使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相比也是如此。她认为，“他们不喜欢任何强烈的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真正的友谊或爱情关系。爪哇的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安静和顺从，她们更善于表达情感”。⁽⁵³⁾她还谈到恋母情结的冲突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⁵⁴⁾尽管如此，她还对当地人的情感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有这些概念都以某种方式与尊重发生关联，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递给他们。她由此得出结论，“儿童训练程序”不仅是情感社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对内心情感生活所做假定的内在组成部分。⁽⁵⁵⁾

今天已被视为杰出学者的其他几位人类学家认为，情感与文化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1937年，欧内斯特·贝格尔霍尔（Ernest Beaglehole，1906—1965）提出，对于生活在西太平洋环礁上的伊法利克人（Ifaluk）来说，仪式毫无疑问是一种情感的释放，而这种情感通常因缺乏私人空间而被压抑。他认为，如果没有特定的社会认可的表达压抑情感的方式，社会就会在自身的神经症压迫下崩溃。⁽⁵⁶⁾1952年，梅尔福德·斯皮罗（Melford Spiro）提出，由于伊法利克人对鬼魂的恐惧，攻击性被压制了，这种攻击性的直接表现被他们对和谐的文化痴迷排除在外。⁽⁵⁷⁾后来又出现了详尽的精神分析解释，例如，1967年乔治·莫里斯·卡斯泰尔斯（George Morris Carstairs，1916—1991）的研究就是如此。⁽⁵⁸⁾卢茨和怀特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涉及“双层理论”：

普遍的情感位于情感的底层。就像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思维 and 二级过程思维一样，情感的统一或普遍的方面被文化的“模子”“滤

镜”“透镜”“表现规则”或“防御机制”所“塑造”“过滤”“传递”“扭曲”或“遮蔽”。⁽⁵⁹⁾

20世纪70年代，一项比较人类学的研究得出结论，【90】在世界范围内，浅色与积极情感之间存在联系，而深色与消极情感之间存在联系。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颜色和情感之间的联觉”，罗伊·德·安德拉德（Roy D'Andrade）和迈克尔·伊根（Michael Egan）由此提出了“先天反应”的概念。⁽⁶⁰⁾ 1978年，罗德尼·尼德汉姆（Rodney Needham，1923—2006）提出：

尤其是对情感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情感并不像在不同语言中用来区分它们的名称那样，天然是这样分离或多种多样的。⁽⁶¹⁾

四、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情感人类学

1．因纽特人的情感

对人类学经典著作的介绍就到这里，可见它们对情感的关注相对较少。琼·布里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情感上。今天，她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情感人类学的开拓者。⁽⁶²⁾

1963年夏天，布里格斯来到屋库因纽特人（Utkuhikhalingmiut，简称Utku）中间，这是加拿大因纽特人的一个小部落，她想在几年的田野工作中研究他们的萨满教。二三十位屋库因纽特人生活在离最近的定居点约241千米的地方，生活面积约9万平方千米，以捕猎鱼类和北美驯鹿为生。他们过着季节性的放牧生活，共有八户人家和三个大家庭，夏天住在帐篷里，剩下的时间住在冰屋里。布里格斯被分配到首领伊努蒂亚克（Inuttiaq）和他的妻子阿拉克（Allaq）家中，成为他们的养女，被更名为伊妮（Yiini）。当时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是卡米克（Kamik）、莱吉莉（Raigili）和萨拉克（Saarak）。他们的第四个女儿卡亚克（Qayaq）出生于1964年4月。布里格斯接受了这个角色，尽管她当时已经34岁，和阿拉克年龄差不多，也不比大约40岁的伊努蒂亚克年轻多少。

她很快就发现，【91】她最初想要研究萨满教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屋库因纽特人就已经成为圣公会信徒，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萨满祭司“要么在地狱里，要么躲藏了起来”。⁽⁶³⁾然

而，另一个课题出现了，那就是情感。情感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族志观察，另一个方面是布里格斯无意中违背了的屋库因纽特人的情感规范。他们慢慢地把她转移到屋库因纽特人社会的边缘，使她成为一个局外人，只好提前离开，在加拿大政府派飞机来接她时，她已经急不可耐要离开了。

布里格斯后来意识到，支配所有屋库因纽特人行为的一条规则是，永远不要发火。她根据自己和伊努蒂亚克一家在一起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叫《永不发火》（*Never in Anger*）。对于屋库因纽特人来说，长大意味着获得“伊胡玛”（ihuma），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理性”，主要表现在情绪控制方面。只有“儿童、傻子、重病之人和疯子”没有“伊胡玛”。⁽⁶⁴⁾这个家庭接受小萨拉克身上比一个同龄的美国孩子多得多的自私和愤怒，仅仅因为她还缺少“伊胡玛”，家里人知道她很容易发脾气，经常会哭闹。他们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作为父母教育理念的“坚定”在屋库因纽特人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存在的。⁽⁶⁵⁾

萨拉克的“伊胡玛”在她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到来了，因为她又有了一个妹妹。然而，母亲的注意力并没有一下子完全转移到妹妹身上，而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一家庭对“故态复萌”的容忍度比当代美国或欧洲家庭所能想象的要高。这一点在争夺母乳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萨拉克还没有断奶，所以会和刚出生的卡亚克争夺母乳。布里格斯以养女的身份住在同一个冰屋里，她这样描述了萨拉克在妹妹出生后不久第一次意识到妹妹存在的情景：

萨拉克睡得很香，过了一会儿，她动了一下，伊努蒂亚克有节奏地拍着她的背，试图哄她入睡，但没能成功，她还是醒了，于是他就把小妹妹指给她看，我赶紧屏住了呼吸。但是伊努蒂亚克并没有发火，一点也没有。萨拉克叽叽喳喳地叫着，饶有兴致地戳着小妹妹。当她看见母亲把妹妹抱在怀里开始喂奶时，暴风雨开始了，这是一场哀号和拍打的暴风雨。阿拉克抱着婴儿，用温柔的声音说：“不要伤害她。”于是，萨拉克要求获得她受到了威胁的吃奶的权利。虽然我知道屋库因纽特人很有分寸，但我从未想到，当危机来临时，能够以如此温和的方式得以处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经常听到阿拉克用一种虚假但是充满同情的厌恶语气说话。“奶水的味道太糟糕了。”【92】她说。语气中充满了爱意。但是，当萨拉克继续尖叫并拍打着妈妈和妹妹时，阿拉克做出了让步，把哭闹的萨拉克抱在怀里，一边用一只乳房喂她，尽管时间很短，一边用另

一只乳房喂小妹妹。我没有注意到萨拉克是自愿还是被说服离开妈妈怀抱的，不管怎样，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哭了。这一次，伊努蒂亚克出面了，他安慰女儿说：“我们都很爱你的。”但是萨拉克太伤心了，没有注意到他。“去睡觉吧！”伊努蒂亚克更大声、更粗暴地说，“你已经很困了！”最后她哭着睡着了。伊努蒂亚克看了看他旁边枕头上的小脸，脸颊上仍有湿润的泪痕，黑色的小辫子也歪了。“可怜的小东西！”他说，“她意识到了，所以很不开心。”⁽⁶⁶⁾

这对父母几次中断了他们想让萨拉克断奶的尝试，表现出很多的耐心。在布里格斯看来，这根本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屋库因纽特人认为“伊胡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自发出现的，不需要父母的干预。既然它还没有在小萨拉克身上出现，家人就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

对布里格斯来说，情绪控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也让她感到痛苦。这不是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的，而是她自己无意中违背了这样的情感规范。这一切并不是突然而公开地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起因是布里格斯难以适应北极的酷寒，还有就是语言交流障碍，以及她对屋库因纽特人行为的误解。“回想起来，我和这家人的关系似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屋库因纽特人的角度来看，我起初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陌生人，接着成为一个无法管教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个招人讨厌的人。”⁽⁶⁷⁾

在第一阶段，布里格斯住在她自己的帐篷里，这个帐篷很快成为屋库因纽特人的关注焦点。整天都有来访者，她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些私人空间，尽管对于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因纽特人来说，独自一人、无人理睬是最糟糕的惩罚。在语言和外表方面，布里格斯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她不得不让他们重复说过的话，而这在屋库因纽特人中间是很少见的。甚至在冬天到来之前，她就非常担心寒冷，因为她的手上和脚趾上已经长了冻疮。布里格斯后来注意到，当她拜访屋库因纽特人时，他们会继续做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她也就不再注意她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了。这样做表面上很受欢迎，但实际上被认为是对规范的一种违背，导致她后来被边缘化，被称为“kapluna”（意思是白人）。此外，布里格斯经常会烦躁或哭泣，而这种情绪爆发同样被屋库因纽特人坦然接受。

我后来发现，我太不把自己急躁易怒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当回事了。【93】如果我成功地控制住自己，就像我在第一次攻击冲动耗尽之后所做的那样，事后愉快地讲起这件事，他们会和我一起大

笑。或者，人们似乎接受了我为了消除越界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做出的慷慨姿态，那么我就会认为这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只有在一年后，当我回到约阿港（Gjoa Haven），伊卡育克图克（Ikayuqtuq）告诉我屋库因纽特人在第一个冬天有关我的说法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68)

冬季气温跌至零下50℃，布里格斯搬进了伊努蒂亚克的冰屋，事情到了关键时刻。在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养女方面，布里格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她发现伊努蒂亚克的行为傲慢、自私，家长作风十足。后来她说：“我很喜欢伊努蒂亚克外出，因为这时我就可以摆脱我所认为的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跋扈’。”(69)她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与伊努蒂亚克发生冲突，“例如，好不容易把冰屋里的温度升高到可以打字的程度，却被他给破坏了”。(70)此外，她也觉得他对待妻子和孩子的方式让她难以忍受：

他命令她们为他做各种事：泡茶，做饼，给他拿烟斗，帮忙喂狗，把墙上的冰凌凿掉，似乎一点也不会因为打断了她们的活动而感到内疚，有时甚至会打断阿拉克的睡眠。如果墙上漏了个洞，床上就会积起雪来，或者夜里有只狗从锁链中挣脱出来，起来处理的一定是睡得正香的阿拉克，而不是她醒着的丈夫。(71)

布里格斯渐渐意识到，对于屋库因纽特人来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基本美德。但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她与伊努蒂亚克的关系越来越糟，外面的天气也越来越糟糕，这让她别无选择，只能躲到冰屋里属于自己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外部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她写道：“把屋库因纽特人的标准应用到我的行为上，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个人的谴责，但是很多时候，即使我下定决心要以屋库因纽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当时的情况根本就不允许。”(72)她压抑的情绪“必须发泄出来”，她必须像火山一样“爆发”：

所需要的自控力比我习惯于约束自己的自控力要大得多。而且，我还承受着比以前大得多的压力，由此产生的紧张急需表达出来。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笑声来表达，就像屋库因纽特人那样，但笑得很不自然。我常常在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平静之后，为自己终于获得了一种表面上适当的平静而沾沾自喜，但令人沮丧的是，总是会有一阵突然或强烈的情绪发作让我露馅。当我不得不说

上一千遍“我不懂”时，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冷漠，它掩盖了我因疲劳或沮丧而想哭的愿望。有一次，因为急着要离开冰屋，我不假思索地把莱吉莉挪到一边，而不是轻声让她挪一下。当阿拉克和她的姐姐闲聊时，她们眯起的眼睛和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使我无法忍受，【94】我会用喃喃的英语说一些批评的话。当污泥连续三天从过热的圆屋顶上掉下来，落到我的打字机上，让我不得不结束当天的工作时，我禁不住发出一阵咒骂（也是用英语说的）。(73)

在一个特定事件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公开的破裂。夏天到了，一些美国白人和加拿大业余渔民来到了这里，他们傲慢的态度使布里格斯感到十分羞愧。当他们以布里格斯认为不公平的条件从屋库因纽特人这里借了两只宝贵的独木舟时，作为翻译的她表示反对，而这暗示着屋库因纽特人同样也反对。为此，她受到了屋库因纽特人的严厉批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情绪控制、礼貌、慷慨等规范的一种侵犯，也是对伊努蒂亚克作为领导者角色的一种挑战。此后，他们继续给她提供吃的，但不再理会她了。这导致布里格斯出现了一段持续数月的抑郁，在此期间她的语言能力也下降了。只有在得知可以提前离开时，她的抑郁才消失。除此之外，这些因纽特人终于明白，她当时作为翻译是想要帮助他们，她这才再次被这家人接受。“我再次将伊妮作为我家庭的一员。”伊努蒂亚克用这句话结束了这场冲突。(74)

伊努蒂亚克成为屋库因纽特人情绪控制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里格斯开始认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屋库因纽特人”，“作为一个情感异常强烈的人，他也要严格控制自己。就他而言，能够感觉到有些情感被抑制住了”。(75)伊努蒂亚克作为屋库因纽特人首领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超乎寻常的冲动，这让他的自控能力显得更加强大。(76)但这又导致了一种更大的恐惧：“据说，一个从来没有发过火的人，如果真的发火了，甚至会杀人。”(77)与此同时，布里格斯开始意识到，避免极端情感（尤其是愤怒）的表达是屋库因纽特人自我意识的核心。就像布里格斯发现的那样，“让人烦恼的想法”被认为有一种自主的力量。屋库因纽特人认为这些想法能够杀人，或者是让人生病。在约阿港，一个因纽特人告诉布里格斯，屋库因纽特人曾这样评价她：“如果伊妮生气了，别理她。如果因纽特人生气了，这是值得记住的事情，但是白人早上生气，下午就忘了。”(78)

这一重要的民族志研究的显著之处在于研究者深入的自我反思。布里格斯的“行为数据”语料库中不仅有“屋库因纽特人情感模式的描述”，

还有她本人对屋库因纽特人情感的观察，他们对情感的陈述，她本人对情感的表达，以及屋库因纽特人对此做出的反应。(79)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布里格斯自我反思的一个例子如下：

在我前两次前往阿拉斯加因纽特村庄的田野考察中，【95】让我强烈认同的是因纽特村民，而不是我偶尔见到的那些白人。我和因纽特人相处得很好，我期待着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观点很美国化，我更希望自己能从内心发现自己本质上是因纽特人。然而，我没有大声说出这样的浪漫想法。我为自己“不专业”的态度而感到羞愧。我对被领养是否明智而感到不安，担心这样会丧失在群体中的“客观”地位；担心这样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耗竭我的给养；担心会因为没有隐私而无法工作。因此，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认真考虑被收养的问题。然而，有一天在约阿港，当伊卡育克图克问我为什么要在后河（Back River）住一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告诉她，我想被一个因纽特家庭收养，以便学会像因纽特人一样生活。我这么说，部分原因是我想向她隐瞒我将要“研究”因纽特人这件事，今天想来，我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对这件事学术性的一面感到尴尬，以为她会认为这是在窥探。(80)

布里格斯与伊努蒂亚克家庭相处的结果是第一部情感民族志专著，以令人压抑的细节表明了情感表达的文化适境性。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情感表达，而不是情感本身，因为《永不发火》这本书从来就不是一部社会建构主义的作品。这个标题具有误导性，因为布里格斯在书中反复强调，屋库因纽特人确实会感到愤怒，但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抑制。例如，在布里格斯看来，莱吉莉真的无法忍受她专横的妹妹萨拉克，但是却无法表达出来，这些消极的情感经常在噩梦中出现。(81)布里格斯本人简要地总结了这本书的目的：它考察了“情感（无论是友爱的还是敌对的）是如何被引导和沟通的，以及人们试图引导和控制这种情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不当表达的方式”。(82)

2. “显在认知”（hypercognized）情感和“潜在认知”（hypocognized）情感

罗伯特·利维是情感人类学的另一位开拓者，他和布里格斯一样，根本就沒想要提出情感是一种文化产物。把他和布里格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情感也是愤怒。然而，他的田野考察是

在比布里格斯更温暖的气候中进行的，即塔希提岛，这个岛屿是自18世纪以来大量旅行写作的关注对象。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关注塔希提人如何表达他们的“自然情感”，尤其是爱，而这创造了性自由的神话。这个神话是由早期的“发现者”和艺术家所阐述的，前者如1767年来到这里的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 1729—1811），【96】后者如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他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生活在岛上，直到去世。这种对塔希提人性生活的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性革命思想与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有关。⁽⁸³⁾

利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塔希提人进行了田野考察。他提出了社会相关（显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无关（潜在认知）情感的区别。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认为是潜在认知的情感没有被感受到。利维更感兴趣的是不同人群对普遍情感所给予的不同重视。从家庭到社会的各种社会群体对特定情感的重视程度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情感是否受到重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许有一天，历史学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广告、政治和运动领域，今天对“情感”一词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对“心理”和“思想”的使用一样频繁和宽泛。例如，今天，校园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要从“情感”上接受事实，而不是从“心理”上或“思想”上接受事实，后者是20多年前的说法。再例如，赢得篮球锦标赛的球队会被说成“情感”上团结一致，而不是“心理”上很强大或“心理”状态良好。如今，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名为“情感”的真空吸尘器。⁽⁸⁴⁾这种从“思想”和“心理”到“情感”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哪些情感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被认为是“显在认知的”呢？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历史分析。

布里格斯很可能会认为屋库因纽特人的愤怒是显在认知的。无论如何，这就是利维对塔希提人的愤怒概念“riri”的看法。指导塔希提人行为的原则不是情绪控制，而是与此相反，即尽可能快地用语言“驱除”身体里的愤怒。前提是，如果有人生气的话，因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上有价值的胆怯”确保了这种情况几乎从来不会发生。⁽⁸⁵⁾利维从他的信息提供者塔希提人塔瓦纳（Tāvana）那里了解到，“愤怒的人就像一个瓶子，当它被灌满的时候就会开始溢出来”。被压抑的愤怒“对人的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可能会给人的头脑或心脏带来问题。有些人甚至会死于愤怒”。⁽⁸⁶⁾在被问到如果感到愤怒该怎么办时，塔希提人奥罗（Oro）也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如果你对某个人感到愤怒，不要拖延，马上去和他谈一谈，结束这种愤怒。之后，你们之间就会和好如初。”⁽⁸⁷⁾弗洛拉

(Flora) 补充说, 压抑的愤怒会让你的头发变白。【97】薇薇 (Veve) 描述的惩罚听起来很像传统的西方乡村社会的惩罚: “如果有人生我的气而不告诉我, 他就会去告诉别人。他会说我的闲话, 夸大其词, 然后村子里就会有麻烦了。”⁽⁸⁸⁾

在塔希提岛, 利维还遇到了与西方社会相比在处理情感方面的极端差异, 尤其是悲伤, 而哭泣被认为是人类悲伤的普遍标志。关于塔希提人行为的最初报告指出, 在葬礼上, 塔希提人会突然从悲伤哭泣转换到快乐欢笑。表露性哭泣的数量——用眼泪数量和哭泣音量来衡量的悲伤表达——与直接促因之间的关系也与欧洲不同。1909年的一份报告称, “久别重逢的喜悦的表达方式竟然是哭泣和泪水, 与在葬礼上一模一样, 这太匪夷所思了”。⁽⁸⁹⁾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田野调查期间, 利维就对当地人处理塔瓦纳去世妻子的方式感到很不安。当他第一次走近这个垂死女人的房子时, 他听到了“响亮而活泼的谈笑风生”。一进屋, 他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这分明是一场家庭聚会, 而那个垂死的妇女则被推到了角落里。⁽⁹⁰⁾塔瓦纳的妻子“没有呻吟, 没有哭叫, 也没有抱怨。她以一种克制、低调、平淡的方式死去”。⁽⁹¹⁾在她死前不久, 屋子里还传出笑声, 紧接着有了几滴眼泪, 但欢乐的气氛很快就恢复了。“葬礼刚过去几天, 塔瓦纳的孙子们已经开始在坟墓上玩耍起来。他们坐在凸起的水泥上, 有说有笑, 玩弄着放在那里的鲜花。”⁽⁹²⁾当利维问他们为什么面对亲人的疾病和死亡却要如此欢乐时, 他被告知说这是为了塔瓦纳着想, 让他能够暂时以为妻子正在康复。因此, 如果他的妻子能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那将最好不过了。

利维发现不仅在情感的身体表达上存在巨大差异, 对于情感在人体内位置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引言中已经提到过的一个关键问题, 后面我们将再次遇到。利维的信息提供者告诉他, 愤怒、欲望和恐惧或者说是它们在塔希提语中的对等物位于肠胃。有人声称, 这些情感会“进入心脏”。利维认为“关于情感位置的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圣经》的影响, 但也可能涉及对胸部和腹部情感反应的感知”。⁽⁹³⁾他还注意到, 塔希提语不仅缺乏与西方语言所表达的特定情感类型相对应的词汇, 而且缺乏诸如“情感”“激情”“情绪”等总体概念。⁽⁹⁴⁾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种缺乏情感元语言的状态。【98】我们应该注意到, 利维的研究是一个在社会建构主义发展之前的情感人类学的例子。我们在布里格斯的作品中发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元素, 虽然当时还没有社会建构主义这个表达, 但在利维的作品中却没有。相反,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今天听起来很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述。例如, 利维指出, 在

塔希提人那里，个人的心理压力“抑郁”和在我们中间一样普遍。但是通过求助巫医，它“被超自然的解释所掩盖”。至于塔希提人臭名昭著的过早性行为 and 滥交，则被归因于他们不愿进入婚姻状态。利维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对进入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焦虑，以及对放弃自由的焦虑”。最后，利维认为，一些塔希提人“经常会在似乎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担心来自他人的身体伤害”。⁽⁹⁵⁾

五、语言学转向与社会建构主义

情感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总结了指导20世纪70年代情感人类学的假设。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文和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范式转变，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情感民族志的出版，最后推翻了这一指导性假设。现在有人认为，不仅情感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而且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拥有的情感本身也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范式的转变被称为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标志着进入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1979年所说的“后现代状况”。这也与迈克尔·福柯（1926—1984）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研究有关。启蒙思想、科学真理、客观性、进步的宏大叙事、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明确关系、性别和种族的基本分类、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明确划分、拼贴的新架构和科学与文学中的语言游戏，所有这些都受到了他们的质疑。⁽⁹⁶⁾任何黑格尔式或马克思式的“目的”（*telos*）、线性叙事的小说、电影或历史，古典主义的严肃性，或像包豪斯（Bauhaus）那样的建筑现代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在十年游戏一般的颠覆和反讽之后，所有这些曾经的确切性即使还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88年，人类学家凯瑟琳·卢茨提出，“情感体验不是先于文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化的一部分”。⁽⁹⁷⁾【99】这句话出自一位人类学家而非后结构主义理论大师之口，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情感是先于语言的、身体和文化的普遍现象，还有什么比情感能够更好地体现出特殊性呢？或许，长期以来人们对情感的自然性的信念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矛头转向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忽视了二元对立至今依然很强大的另一面，即情感。

1. 猎头的快乐

1980年，米歇尔·Z.罗萨尔多（Michelle Z. Rosaldo, 1944—1981）《知识与激情：伊隆戈人的自我概念与社会生活》（*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一书出版，为情感人类学中社会建构主义的十年拉开了序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她和丈夫罗纳多·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一起在菲律宾北部的森林中从事田野考察。这里面积约1 554平方千米，生活着大约3 500名伊隆戈人（Ilongot）。伊隆戈人以狩猎和耕种为生，有时三个核心家庭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被日本人占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教士使其皈依基督教基要派。从1972年开始，马科斯（Marcos）军事独裁政权一直致力于将菲律宾原住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罗萨尔多夫妇要考察的是伊隆戈人如何“讲夜间神话，为祭祀宴会制订复杂的计划，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古代智慧的关注”。这是米歇尔·罗萨尔多后来以一种讽刺的语气所描述的。⁽⁹⁸⁾罗萨尔多夫妇发现的不是神话、仪式和古老的智慧，而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与一种行为有关。这种行为早在20世纪早期一位人类学家的报告和日记中就有记载，但人们认为已经绝迹了，那就是猎头。罗萨尔多夫妇是在对信息提供者熟悉起来之后才了解这件事的。这让他们变得十分焦虑。米歇尔描述了伊隆戈人猎头时的真实情况：

一个男人（从来不是女人）选择去杀人，告诉他的亲属，计划发起突袭，因为他的内心“很沉重”。尽管他可能希望在特定的亲属团体或地区内杀人，但他并不关心受害者是谁，也不把暴力行为限制在与他年龄或性别相当的手上。他和同伴们要么是为失去的亲人而悲伤，要么是为过去的猎头行为而嫉妒，要么是为受到的侮辱而愤怒，一心要复仇，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要意识到自己的愤怒（*liget*）。他们缓慢而静悄悄地前进，经过几个失眠的夜晚，他们忍着饥饿，穿过森林中的未知区域，到达一个预先确定好的伏击点，在此过程中，他们会感受到一种“集中”的压力，压力会越来越大。他们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压低嗓门，吹着芦笛，让自己的心紧张起来。^{【100】}到了埋伏的地方，他们就会击打头部以强化愤怒。他们眼睛血红，开始缩小范围。在射击之后，袭击者会冲向受伤或死亡的受害者，疯狂地用刀砍杀。那些因砍头而获得荣誉的人并不需要亲自杀死或砍掉受害者的头颅，而是只需在头被砍下的时候抓着，然后把它“扔”在地上，这样他就能摆脱心头的重压。完成

任务后，他会发出胜利的叫喊，其他人也会一边抛头颅一边叫喊。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很紧张、专注和谨慎。接着，开心的胜利者丢下了被砍下的头颅和尸体。清除了心头的暴力之后，他们会寻找开花的芦苇，像羽毛一样戴在头上，象征着此时浑身轻松，而芳香的叶子则让人想起他们偷走的生命。找到这些之后，他们会赶紧回家。(99)

在田野考察的第一阶段，军事控制和基督教化意味着他们已经很少去猎头了。尽管如此，米歇尔在1968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0名20岁以上的男性中，有65人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曾杀过人并砍下头颅。(100)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关键不在于当前人类学关于它作为一种“成人仪式”(rite of passage)的功能的观点，而在于他们自己的解释：斩首一个人使“他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这是原住民谈论情感的一种方式。米歇尔写道：

男人之所以要去猎头，是因为他们的情感。促使他们去杀人的不是神，而是“沉重”的心。通过猎头，他们渴望“摆脱”压在他们心头的“愤怒”。(101)

如果用一种内部而不是外部的视角来看，对于米歇尔来说，核心的问题不是这种内心语言所处的宇宙论，而是这些概念在伊隆戈文化中的意义。

虽然其他人类学家倾向于采用“从外到内”的研究方法，他们首先描述一个有特定模式的社会，然后探究个体如何实现“社会化”，以便能够在其中工作和生活。我发现，如果从辩证分析的另一端出发，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个人情感生活是如何以社会行为的形式实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社会行为的，这样会更有启发性。这就需要对伊隆戈语中有关心灵和动机的词汇进行考察，尤其是那些表示“能量 / 愤怒 / 激情”和礼貌或“知识”的词汇。此外，还需要发现有关这些词汇所适用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假设。(102)

伊隆戈人的“心”(rinawa)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激情”或“能量 / 愤怒”和“知识”(bēya)是关键的概念，并且互相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能量 / 愤怒是男性自主性的一种表达，在第一次性接触和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之前，【101】必须将其付诸实践并加以驯服。(103)

猎头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也许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媒介。一旦男性进入一种稳定的关系，他就会停止猎头，用心里的知识控制住能量 / 愤怒。因此，这涉及从情感和仪式的角度对社会制度（婚姻）和层次结构（年轻 / 年老，男性 / 女性）的描述和支持。

20世纪70年代，在她田野考察的第二个时期，米歇尔向伊隆戈人播放了一些猎头歌曲的录音，他们开始变得悲伤，甚至愤怒，不想再听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近皈依了基督教，已经完全放弃了猎头行为。这些歌曲引发了他们对猎头的“怀旧”，更准确地说，这些歌曲打动了他们的心，产生了不好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再通过猎头进行疏导，而是可以被导向一个特定的目的。⁽¹⁰⁴⁾如果一个未参与过猎头的未婚年轻人看到另一个年轻人佩戴象征着猎头的耳环，他也会出现一种类似的能量。这也将内心与沉重、困惑、疾病、努力以及挫折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理想的内心是“无重量”的，就像直立的植物一样在风中“舞动”。猎头行为“安抚了猎头者的内心”。

最后，对于猎头者来说，“摆脱”负担让人开心。让他心中云开雾散、重新充满生机的，不是谋杀，也不是复仇，而是他在砍断一个人的头并把它扔到地上时所感到的放松。⁽¹⁰⁵⁾

米歇尔表明，情感对于伊隆戈人的自我构建十分重要。尤其是像愤怒和知识这样的情感范畴被认为直接取决于外部事件（在打猎时看到动物，寻求猎头耳环，听猎头歌曲）。他们没有像“良心”或理解这样被内化的心理控制，情感是自决的，愤怒和知识在内心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他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运动”。⁽¹⁰⁶⁾因此，它们并没有与某个对象相联系，而是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能动性：

在伊隆戈人互相讲述的故事中，内心并不渴望、反映或以其他方式与外部事件对立。讲述者说：“我的心说‘开枪吧’，我就开枪了。我的心说‘他来了’，他就来了。”⁽¹⁰⁷⁾

这种通过愤怒和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自我不同寻常的建构，表明自我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自我或主体性的范畴（即作为个人的意义）即使不是所有后结构主义理论最核心的范畴，也被认为是核心范畴之一。福柯等人所关注的是要展现其

历史性和可塑性。【102】如果说出一个支配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的总体范畴，那就是自我。

此外，伊隆戈人的例子颠覆了西方关于女性情感特别强烈的观念。因为愤怒与知识的辩证关系所影响的是男性，他们的情感比女性更加强烈。(108)相比之下，在西方世界，是女性更加“情感化”，情感更加强烈。

2. 作为真实情感媒介的诗歌，而不是眼泪

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性别问题，这一点在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的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她可能是唯一一个研究情感的人种学家，也是少数几个人种学家之一。阿布-卢赫德在美国长大，现在在那里教书。她的父亲是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齐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知识分子易卜拉欣·阿布-卢赫德（Ibrahim Abu-Lughod, 1929—2001）。父亲把她介绍给那些她将在其中进行田野调查的人。1978年10月，她抵达开罗，准备由此前往靠近利比亚边境西部沙漠的阿瓦拉德阿里（Awlad'Ali）贝都因人部落。她的父亲坚持亲自介绍他的女儿，因为他知道在传统的穆斯林阿拉伯社会，父亲的保护对未婚女儿在社会和学术上的成功至关重要。当时，她对这种安排感到“有点尴尬”。但现在回想起来，她很感激父亲的帮助，因为没有父亲伴随的话，

对于像贝都因人这样保守的民族来说，部落和家庭是至高无上的，对女孩的教育还是新事物。如果一个女孩独自行动，他们会认为她一定是疏远了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男性亲属，以至于他们不再关心她。⁽¹⁰⁹⁾

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洞察是因为她本人被视为当地的贝都因人之一。阿瓦拉德阿里人认为所有的穆斯林和埃及人之外的阿拉伯人都是“我们中的一员”。莱拉的母亲是美国人，即社会学家珍妮特·李普曼·阿布-卢赫德（Janet Lippman Abu-Lughod, 1928—2013）。由于在世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莱拉只会说基本的阿拉伯语。她小时候曾在埃及生活过四年，后来又和约旦的亲戚们一起度过了几个夏天。与一个在开罗生活一辈子的埃及人相比，她依然更容易被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这种远与近的结合继续驱动着莱拉，她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103】描述了一个既作为自我又作为他者的“双重身份”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生活。⁽¹¹⁰⁾

在亚历山大港，莱拉的父亲安排了一次与贝都因人的会面，让他们知道他女儿的意图，即要提高她的阿拉伯语，了解一下贝都因人的生活，为此目的，她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接收她的家庭。部落长老听说后，提出要把莱拉接回自己的家中。于是，她成了他家的“养女”，就像布里

格斯在研究屋库因纽特人时所做的那样，当然，她也读过布里格斯的民族志。这个角色给了她很多洞见，但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贝都因人以父系家庭的形式生活在部落中，年长的堂兄弟（叔父的长子）有优先和堂妹结婚的权利。孩子和他们的男性亲属一起生活，莱拉讲述了一个五岁男孩的例子。他的父母离异后，他跟着母亲长大，直到爷爷把他接回他的正常家庭，也就是父亲的家庭。

尽管男孩以前从未见过爷爷，但他还是跑去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手放在爷爷的手里，几乎头也不回就走了。他的母亲伤心欲绝。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点头，似乎并不惊讶。(11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瓦拉德阿里人不再四处游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简朴的房子里。他们不再在游牧经济中担任牧羊人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他们的羊进行贸易。此外，他们还通过出售土地和走私获利。在埃及西部、靠近利比亚边境、远离首都和政权的地方，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这种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导致了男女之间更大程度的隔离。在游牧时期，女性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家族的帐篷之间走动，但一旦开始住在房子里，她们就更有可能被阻止与男性亲属或陌生人见面。这就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并增加了她们蒙面的程度。与此同时，富有的男性能够养得起更多的妻子，这也对家庭的情感经济产生了影响。(112)

莱拉本来对情感问题并不感兴趣，但当她融入新家庭封闭的女性世界后，情感问题就成为她关注的焦点。(113)这里的妇女会演唱一种名为“津纳瓦”（ghinnāwas，字面意思为“短歌”）的歌曲，这种歌曲大多是即兴演唱，有时是迅速变化的对话，【104】形式上类似于日本的俳句，在情感内涵方面类似于美国的蓝调歌曲。“津纳瓦”的演唱要想成功，语音和语调是决定性因素。除了其他的功能之外，成功的演唱可以加强在场妇女之间的感情。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尽管“津纳瓦”有体裁规则，并且被程式化，但仍然是阿瓦拉德阿里人的妻子用来表达她们感情的渠道。阿瓦拉德阿里人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缺乏真实性，因此并不指望这样的语言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致，有时甚至可能是完全矛盾的。相比之下，“津纳瓦”是“个人生活的诗歌”，讲述的是悲伤、令人苦恼的爱与思念、对丈夫第二任妻子的嫉妒、对似乎完全被第三个妻子占据的丈夫的渴望、对于丈夫之外的某一个男人的爱。因此，津纳瓦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阿戈勒”（agl），即贝都因人的自我、内心、

意识、精神或完全没有宗教色彩的灵魂。(114)

在此背景下，在西方人看来最奇怪的是，一种理想的、“真实的”情感并没有表现为明白无误的身体符号或非正式语言，而是表现为一种文学体裁，即使在即兴创作的高潮，依然遵守固定的规则。

就像莱拉注意到的那样，“津纳瓦”是验证情感的主要方式。她听到一个妻子的演唱，这位妻子可能对她所嫁的男人感到鄙视，也可能没有。丈夫的家庭对这种情况感到不安，莱拉违背了她的诺言，即永远不让别人知道她听到的诗歌，她把这些诗歌告诉了那位丈夫的弟弟。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嫂子只是在逗弄他的哥哥，假装不喜欢他，好让丈夫送给她礼物。然而，一听到这些诗歌，他马上就改变了看法。当这位人类学家向这位妻子提起她自己的“津纳瓦”时，她告诉莱拉，她爱的是来自另一部落一个敌对家族的男人。(115)

吟唱“津纳瓦”的社会背景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让有关性别关系、社会等级和阿瓦拉德阿里人情感的一般讨论成为可能。对男性来说，公共领域被严格的荣誉准则所支配：骄傲的、不可战胜的、自主的贝都因男性拥有高度的情感和身体自控能力。女性的行为也会受到同样严格的羞耻规范“哈萨姆”(hasham)的约束。这是弱者的荣誉，意思是“羞耻”和“害羞”。它与面纱密切相关。最终，“哈萨姆”的意思是担心被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统治，担心破坏阿瓦拉德阿里人自治和自由理想。

(116)“哈萨姆”规范禁止女性公开（更不要说在男性面前了）谈论真正的、【105】理想的爱情（与包办婚姻中的爱情相反），也禁止女性嫉妒丈夫的其他妻子。

例如，马布鲁卡(Mabrūka)嫁给丈夫已经16年了，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发现丈夫打算娶第二任妻子，但是她似乎一点也不为之烦恼，只是说：“让他娶吧，我才不在乎呢。但是他应该给我买些好东西。他一无是处，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关心他的家人，确保他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117)即使她的丈夫婚后和新婚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通常的七天，她的反应也很淡定，似乎毫不在乎。在第二次婚姻后的第10天，他终于又来了，给她带来了从市场上买的食物。马布鲁卡只抱怨说他忘记了一些东西。然后她丈夫拉希德(Rashīd)拿起枪去打猎了。她告诉正在拜访她的莱拉说：“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了。”莱拉温和地问她是否会想念丈夫，得到的是一个果断的回答：“不可能。你认为我还爱他吗？我甚至没问过他的事。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18)不久之后，她开始吟唱饱含深情的诗歌，其中谈到了悲伤和失

望，内容如下：

他们总是对我许下虚假的诺言……

dimā khallō l-‘agl

‘āmrāt bimwā‘idhum.⁽¹¹⁹⁾

这样做是否意味着马布鲁卡对她的家人“撒谎了”或误导了他们，而她的诗歌暴露了她的真实情感呢？莱拉认为根本就不是这样。这种愤世嫉俗的解读就像欧文·戈夫曼的观点，即人们在公共场合交往时会戴上“面具”，把真实的面孔保留在“后台”，在那里他们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¹²⁰⁾莱拉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西方对真实自我的幻想，并赋予女性的公共话语和私下吟诵的诗歌一样的真实性，平等对待这两种话语（莱拉在这里明确借用了福柯的观点）。⁽¹²¹⁾因此，莱拉也会反对上述观点，即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口头陈述缺乏真实性。

与此同时，莱拉还认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审美上，“津纳瓦”诗歌都很适合表达不能在“哈萨姆”规范框架内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津纳瓦”既是程式化的，又是即兴创作的，这就创造了一种模糊性，从而为情感的表达创造了空间。吟唱者总是可以隐藏在诗歌形式的背后，声称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106】自己只是在遵循一种传统。当然，“津纳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阿瓦拉德阿里人的心目中，它和埃及开始将西部沙漠逐渐现代化之前的光辉时代有关。⁽¹²²⁾

3. 社会建构主义的顶峰

当人们谈到情感人类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时，通常与莱拉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出现的一个名字是凯瑟琳·卢茨。⁽¹²³⁾1977年，卢茨前往西南太平洋的伊法利克环礁（Ifaluk Atoll）进行田野考察。组成伊法利克环礁的两个主要岛屿加起来面积不到2.6平方千米。它们在1797年被英国人“发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被日本占领。1945年，它们被联合国指定为美国的战略托管领土。在卢茨进行研究时，430名伊法利克人住在单间茅草屋中，每户平均有13人。⁽¹²⁴⁾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民族志一样，卢茨的专著也体现了她高度的自我反省，这使她本人的立场十分明确。她告诉我们，她正在寻找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不会自动地与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西方的刻板印象，她在20世纪70年代多次遇到这种刻板印象，虽然美国大学里的女性在担任教

授和其他高级职位方面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她强调伊法利克人实行的是入赘制度，即全家人住在妻子父母的家里或附近，这使她期望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而情感的性别划分则不那么重要。她还透露了自己对南太平洋的浪漫憧憬，认为这里是一个“更好”、更和平社会的堡垒，正如保罗·高更所描绘的那样。(125)

无论是在卢茨的作品面世之前还是之后，社会建构主义都从未被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过。她书上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比情感更自然，更与文化无关，更私密，因此也就更不受公众监督，更不成熟，更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理性。然而，这些观点可以被视为文化话语中的项目，其关于人性的传统假设和种种二元对立——身体与心灵、公共与私人、本质与表象、非理性与理性——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不证自明的情感本质。(126)

相应地，【107】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

解构情感，表明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对话中的使用建立在一种经常隐含的联系组成的网络之上，而这种联系赋予了使用这个词的陈述以力量。(127)

但她也希望西方文化能够更加重视情感和女性：

尽管每一个在谈论自我、隐私、强烈的情感或无法言说的事物时，都会使用像“嫉妒”“爱”和“恐惧”这样的词，但它们也被用来谈论这个世界上被贬低的事物，即非理性的、无法控制的、脆弱的和女性的。(128)

最后，卢茨指出，她关注的是将“情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有待发现的东西或一种有待提炼的本质”。(129)

根据卢茨的观点，解构主义和去本质化将打开一种不受扭曲的思考当地人情感建构的视角。对伊法利克人来说，这些情感建构更像是主体之间的，而不像在西方那样是个人的；更多是身体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有时会有身体上的影响；标志着社会地位，而不是内在状况。因此，卢茨提出“情感体验不是先于文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普遍认为情感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变的，但在这里，这一假设被

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即一种关于情感的文化话语如何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化话语”。⁽¹³⁰⁾

这种对翻译的关注使她的研究有别于克利福德·格尔茨那种典型的解释学方法。据卢茨说，格尔茨总是问“他们的感受是什么”。⁽¹³¹⁾她对“翻译”的理解当然不是语义和指称性的，而是语用和施为性的。她对调整情感词汇的含义不感兴趣，相反，她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情感符号，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

例如，如果从指称和语义的角度来翻译，伊法利克语中“song”的意思是“义愤”。但这表明了伊法利克人的什么特征呢？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因为“song”的实践不涉及宣泄和失控，不像西方的愤怒观念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怒气的爆发。伊法利克人是一个没有成文法律的面对面社会，“song”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规范形式发挥着作用。无论是谁，如果表现出“song”既可以指另一个岛民违反了道德规范，也可以指他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使“song”生效所需的资源是受到限制的、不对称的，更有权势的伊法利克人可以比没有权势的伊法利克人更频繁地表达“song”。然而，伊法利克人是一个合作的民族，因此这并不涉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或对社会资源的争夺。【108】相反，据卢茨说，表达“song”的首领更关心集体的福祉，他们表达了所有伊法利克人的意志。支持这种解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首领们被认为在最大程度上拥有在伊法利克人看来最重要的情感“fago”，一种同情、爱和伤心的混合体。因此首领应该像真正的伊法利克人一样，只有比其他人多了一些情感，主要是“fago”，并且只有在其他伊法利克人违反禁忌时才会诉诸“song”。⁽¹³²⁾

在伊法利克环礁上，卢茨发现自己要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的文化起源，而这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接触越多，其特殊性就越明显。有一次，一位伊法利克人问她是否见过没有脚趾的人。卢茨谈到她在纽约见过的一个无家可归者，他不仅没有脚趾，也没有腿，靠一块有轮子的木板四处活动。一位迷惑不解甚至有些震惊的伊法利克人说：“如果我看到他，我会对他充满‘fago’。”其他的伊法利克人问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家人在哪里，为什么不照顾他。⁽¹³³⁾他们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该岛时带来的好莱坞电影的反应与此大致相同。一名妇女告诉卢茨，在播放暴力场面时， she 会把目光移开，“对那些被杀的人我感到强烈的‘fago’”。⁽¹³⁴⁾

带着“我的文化、阶级和性别的日常与内隐的情感理论来到这里，想了解岛民的‘真实情感’，认为他们的情感生活本质上是私人化的，认为

恐惧和愤怒是需要‘征服’的，爱是需要公开宣告的”，当她离开时，已经有了两个情感模型：她自己的欧美中产阶级模型和伊法利克人的民族心理学模型。(135)前者认为情感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半病态的，也是“真实和美化了的自我的所在地”，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136)如果情感被认为是不好的，那么它就是冲动（不是有意为之），是价值判断的（不是事实），是幼稚的（不是成熟的）、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是非理性的（不是理性的）、是混乱的（不是有序的），是自然的（不是文化的），而所有这些都与女性、穷人和黑人联系在一起。但总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使用情感，比如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他们利用愤怒来实现政治解放的目的。(137)如果情感被认为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充满生机的（而不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也是个人的和自治的。这样，情感就成为真实的、未受影响的自我最后的避难所，人们常说的“你无法想象我的感受”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概念。(138)

然而，就像卢茨所描绘的那样，在伊法利克人那里，【109】元概念更加注重整体性：“nunuwan”表达的既不是由“tip”（意志、欲望）直接创造的心理感受，也不是由“tip”所决定的心理感受，而是和“tip”一样的东西。“nunuwan”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发生在主体之间，所以谈论时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而不是单数。一种情感决定了另一种情感。一个人的“song”会引发另一个人的“metagu”（恐惧）。“nunuwan”是由社会互动和外部事件共同导致的，后者具有直接影响，不涉及更深层次的内化。它们根植于对包含三个实体的自我的理解之中，这三个实体分别是：人（yaremat）、鬼魂（yalus）和天主教的上帝（yalus或got）。伊法利克人认为死人会变成鬼魂，会给人带来疾病和噩梦。(139)

卢茨是如何解释这些文化差异的呢？就像所有的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她的解释很少强调因果关系。尽管如此，伊法利克人整体式的情感观被归因于一个起源：一个建立在面对面接触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所有消极的疏离因素的缺失，这就是为什么伊法利克人的情感世界是健康的。(140)当然，我们可以就此展开争论，就像我们可以就两种单一的情感文化模式的升华展开争论一样，一种是欧美中产阶级模式，另一种是伊法利克人的民族心理学模式。问题是：这两种情感文化真的没有发生过接触吗？那么迁移和相互影响呢？伊法利克人对天主教上帝概念的引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这两种情感模式是否有时间性？(141)这里我们需要展开历史研究，从而引入一些时空差异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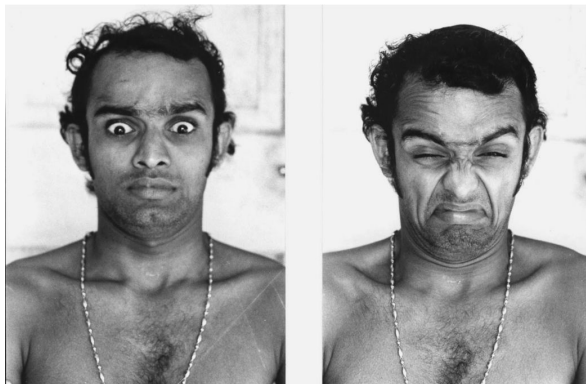


图4 愤怒的面部表情【111】

资料来源：Schwartz, *Rasa*, 64, photo: Phillip Zarrilli。



图5 恐惧或恐慌的面部表情

资料来源：Schwartz, *Rasa*, 66, photo: Phillip Zarrilli。

拉莎理论在印度的流行及其对日常情感的影响很难评估，【112】尽管如此，这些审美情感不太可能是在与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肯定，这些照片中的面部表情与西尔万·汤姆金斯或保罗·埃克曼（见第三章）作品中的基本情感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后者却被认为具有文化和历史的普遍性。^{（148）}

在印度许多舞蹈传统中，例如在南印度的卡塔卡利（Kathakali）舞蹈剧院，人们认为舞蹈的表演者和表现形式是融合在一起的，超越了所有的二元论，这使得表演者和观众都能感受到神的存在。^{（149）}观众的情感“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的、超验的和普遍性的情感，即拉莎”。^{（150）}根据人种音乐学家刘易斯·罗厄尔（Lewis Rowell）的说法，拉莎是

一种超验的情感意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表演的各个方面都

融为一体，这种意识超越了激发它的环境.....并将观众的个体情感状态汇入一个情感“场域”。⁽¹⁵¹⁾

因此，弗雷德里克·阿普费尔-马格林（Frédérique Apffel-Marglin）借鉴了罗萨尔多的思想，将拉莎视为一种具体化了的的思想，而非情感。⁽¹⁵²⁾将“sringara rasa”定义为“情欲”是错误的。观众“品味”到的是一种具有身体、精神和情感性质的体验，也可以称之为“身体—情感—思想”。⁽¹⁵³⁾

拉莎的美学成就在历史上得到了证明。它起源于古典梵语和印度教文本，通过舞蹈和戏剧传播到十分多样化的文学和美学传统中，以及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印度宗教中。一些学者甚至在宝莱坞电影等其他领域看到了它的影响。⁽¹⁵⁴⁾

与情感人类学中众多的社会建构主义案例研究一样，那些与印度及拉莎有关的案例再次动摇了我们稳固的自我意识。有些学者甚至把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的自我与“可分割的个体”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不可分割的个体”联系起来。⁽¹⁵⁵⁾【113】其他人的结论是，拉莎理论“不强调情感是自我的低级部分，也不强调通过个人独特的情感来了解自己，而是将一个人的情感视为他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现实的本质”。⁽¹⁵⁶⁾这代表着对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真实性的文化”（culture of authenticity）的最终放弃，这种文化起源于18世纪的西欧，也强调“情感的力量和真实性”。⁽¹⁵⁷⁾格尔茨将其描述为“西方人对人的概念，认为人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特的、或多或少整合了动机和认知的宇宙，是意识、情感、判断和行动组成的动态中心，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这样就在传统与真实、面具与面孔之间创造了一种人为的分离。⁽¹⁵⁸⁾印度的例子表明了性别关系的另一种安排。根据欧文·林奇的观点，“西方人将女性等同于自然和情感，将男性等同于文化和理性，这种认识在印度即使存在，也很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¹⁵⁹⁾

最终，社会建构主义甚至动摇了西方认为真实性与特定媒介有关的观点。尼科·贝斯尼尔（Niko Besnier）的作品介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它表明在非西方社会，书信可以成为表达情感的核心媒介。相比之下，在西方社会，书信只是情感交流的几种可能形式之一，而主要的表达媒介是语言或非语言交流。贝斯尼尔发现，居住在南太平洋图瓦卢环礁上的努库莱莱（Nukulaelae）部落有310名成员，他们掌握文字已经有大约一个世纪，平时用书信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因此，即使是在处理那些本质上不涉情感的话题时，写信的人也会把他们所描述事物的情感方面表现出来。这种情感的外显性与情感的隐蔽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渗透于大多数面对面的日常对话中，包括破坏性的八卦。(160)

这颠覆了西方将口头沟通与情感联系起来、将书面沟通与理性联系起来的做法。贝斯尼尔的发现不仅与西方的日常假设相矛盾，也与社会语言学的主流观点相矛盾。在主流观点中，“人们认为口语普遍比书面语更‘情感化’，更适合表达情感”。(161)【114】社会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是，面对面的互动有助于提高情感交流的水平。另一方面，贝斯尼尔强调说：

这些说法大多得到了当代西方主流语境的支撑，在这些语境中，写作被视为没有说话那么“主观”和“情感化”，而且通常更加“可靠”。与西方的、以学校为导向的、中产阶级的环境，特别是学术界和其他文化再生产场所有关的识字实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特征。

(162)

七、情感的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一些初步结论

如果要总结有利于情感人类学出现的条件，其中最明显的可以在相互关联的学术和社会发展中找到。粗略地说，就学术发展而言，决定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从文学研究领域向其他学科的扩散。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包括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妇女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这两股力量一起破坏了性别和自我具有自然基础的假设，将重点转向了它们的社会和历史建构方式。情感的范畴则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化。

因此，人类学是研究情感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的先锋，在20世纪80年代提供了许多关于情感本质的有趣研究。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同时空之间、人类学和历史之间进行比较，以及历史研究可以从人类学中借鉴什么，这些问题无法在这里得到解答。然而，必须强调自我反思的人类学实践。在阐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被束缚在一个特定地点”方面，人类学家已经创造了奇迹。我们已经看到，布里格斯表达了她本人对田野调查的希望，并把自己的体验当作“数据”，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因纽特人的情感是在与她的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也看到了米歇尔·罗萨尔多是如何带着浪漫的想法开始其研究的，阿布·卢赫德被她父亲介绍给别人时是多么尴尬，以及凯瑟琳·卢茨为什么因为梦想在美国大学里

实现男女平等而选择研究伊法利克人。(163)

这些都是深刻自我反思的例子。【115】同时，田野调查中所涉及的情感内容本身也成为研究的对象。(164)当然，社会建构主义的假设与自我反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为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属于自己的”，会直接导致一个困境：如果描述是一种建构，那么自我描述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历史研究能够像人类学一样多一些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这将是非常有益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来自真空，他们的研究也不是“不带任何感情”。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像人类学家写作田野调查日记那样记录自己的感受呢？其中可以包括关于个人与史料的接触；打开史料时的嗅觉和触觉印象；偶然的发现；在图书馆入口外的吸烟休息时间，并在此期间与同事交流，有人讲述了一本书的写作计划；请档案管理员一起喝茶，因为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思路。(165)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融合自然会存在诸多问题。其中许多是众所周知的：首先是共时的人类学和历时的历史学之间的区别，但我们可以预料，一位专注于社会建构主义的人类学家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研究材料不同的问题：人类学研究的是活着的人，能够观察到他们非语言形式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学必须主要依靠来自以前某个小群体的书面证据，只有非常有限的途径来获得对人类表达的了解。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口述史，对此将在第四章中展开讨论。

然而，社会建构主义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探讨。在社会建构主义出现之前，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与启蒙运动一样，确立了文化普遍性，并赋予所有文化同等的价值。弗朗茨·博厄斯关于人类精神统一的概念有这样一个预设，【116】即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常量，不受文化、肤色、性别或国籍的影响——乍看起来，这是一种解放人的思想。然而，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这些概念不够尊重其他文化，因为这些普遍概念起源于欧洲，后来才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认为，诸如此类的普遍概念只是特定文化的建构，就像非欧洲文化的地方性概念一样。因此，必须要做的是重建每一种文化的内在逻辑，认识到其传统的、真实的、非普遍的（非西方帝国主义）性质。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不在西方学术传统的框架之内，人类学知识如何可能存在？正如瓦朗坦·穆迪贝（Valentin Mudimbe）所言，“如果没有与西方认识论的联系，就不可能有人类学”，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66)我们不是经常会遇到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说的“文化困境”和“身在文化中而寻找文化”的现象吗？(167)除此之外，对一个共同的

认识论命名的需求具有更加深远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它隐藏着一种冷漠的危险，即认为奇怪的和陌生的就是奇怪的和陌生的，他者就是他者。这种冷漠的描述对方的方式和把对方视为“野蛮人”差不多。此外，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会对可能的相似性视而不见。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原则出发，最终得出普遍性确实存在的结论呢？

其次，与刚才的问题有关，我们必须认识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建构主义是不可能的。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专著《什么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ism of What?*）的标题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其逻辑结论来看，社会建构主义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科学语言在内的多种语言的假设，简化为唯名论的不确定性。⁽¹⁶⁸⁾ 为了保持一致性，社会建构主义者必须认为“X的社会建构”是没有意义的；情感人类学不能使用任何元概念（包括“情感”）来描述外来文化。因为“情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它有一个特定的含义，与当地文化中的概念不一致。【117】因此，卢茨在描述伊法利克人时，应该只谈论“nunuwan”，因为谈论伊法利克人的“情感”，就暴露了一种明确的种族中心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意味着任何人类学都是不可能的，让我们面临难以理解的差异和文化特殊性。

卢茨的《不自然的情感》（*Unnatural Emotions*）一书就提出了上述问题。该书于1988年出版，当时正值保守派和左派之间的文化战争。如果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评判文学质量的审美和形式标准也是社会建构的。如果以前的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民族和同性恋——在文学和批评机构中占了上风，然后他们就能够运用不同的标准，贬低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的作品，抬高根据不同标准来评估的作品；⁽¹⁶⁹⁾ 如果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礼貌用语和方言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因此，一些美国高中采用了以黑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引入了黑人英语课程。文化战争的根源在于，在所有文化相对主义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些共同之处，美国国徽及其货币上所说的“合众为一”是否仍然有效。情感研究就是围绕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对比展开的，因此，本书也是围绕这一对比展开的。⁽¹⁷⁰⁾

附记一：社会学

你可能会说文化之于人类学就像社会之于社会学。无论这一提法的优点是什么，它指出了人类学研究跨越地理空间的运动的方式，而社会

学研究的是社会空间内的运动，即沿着社会阶梯向上和向下。当然，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存在英美之差异，但是，没有一门学科发展出一套比社会学更灵敏的工具来衡量社会。因此，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这部分关于情感社会学的附记将首先介绍一些较早的社会学思想，【118】然后转向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和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社会学研究。

如果我们通读古典社会学家的著作，寻找与情感有关的内容，就会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西美尔，以及维尔弗雷多·费德里科·帕累托（Vilfredo Federico Pareto, 1848—1923）、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 1889—1968）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著作中找到。西美尔对忠诚的社会纽带的研究，以及他对人们处理金钱的方式的分类（小气鬼、浪子、苦行者、愤世嫉俗者、厌世者）都带有情感因素。⁽¹⁷¹⁾马克思·韦伯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徒受到了对下地狱的恐惧的驱动。⁽¹⁷²⁾皮蒂里姆·索罗金认为，社会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从对情感开放的文化到对情感封闭的文化，从感性到观念。⁽¹⁷³⁾虽然人们对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思想的核心存在争议，米德一直在和一些从事情感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关键人物进行对话，他们是威廉·詹姆斯和威廉·冯特。⁽¹⁷⁴⁾

即使在战后早期，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主义阶段的第一个模式变量就是情感/情感中立（affectivity/affective neutrality）。帕森斯认为，要想定义一个情境，就必须要在这两者中间做出选择。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满足眼前的需求（情感），或者延迟这种满足以满足长期的需求（情感中立）。⁽¹⁷⁵⁾尽管如此，正如海伦娜·弗拉姆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后的岁月里，情感“在美国社会科学和那些受其影响的欧洲社会科学中，处于极其边缘化的状态”。她认为，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压力之下，人们希望相信“人类基本上是理性的，遵守规范的，或者正式的组织能够迫使个人以理性的方式行事”。⁽¹⁷⁶⁾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社会学才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因为人们对宏大理论失去了兴趣（开始怀疑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被提出），并转向了微观社会学。这一转变离不开一个人，她就是阿莉·霍赫希尔德。

“在太平洋西南航空的航班上，我们的微笑并不是漆上去的”：阿莉·霍赫希尔德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这样一则广播短片：“在太平洋西南航空的航班上，我们的微笑并不是漆上去的。所以，尽情微笑吧，从洛杉矶，一路到旧金山。”⁽¹⁷⁷⁾ 1980年，在达美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培训中心，培训师是一位“理着平头的50来岁的机长”，用南方口音要求说：“现在，姑娘们，我希望你们走出去，真正地微笑！你们的微笑是你们的最大资产。我希望你们走出去并使用它。真正地【119】微笑！真正笑出来。”⁽¹⁷⁸⁾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霍赫希尔德将这种不仅能够在工作中表现情感，而且能够“真正”感觉到它的能力称为“情感工作”（emotion work）。让一个人的“真实”情感与那些需要的情感保持一致，这在实践中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如果行不通，就会出现“类似于认知失调的情感失调（emotive dissonance）”。⁽¹⁷⁹⁾ 20世纪80年代，人们使用了许多技巧来避免这个问题，并使“情感工作”获得成功。空乘人员被鼓励不要把机舱当成工作场所，而是要当成自己的家。“受训者们被要求将乘客当作‘自家起居室里的一位私人贵客’。”⁽¹⁸⁰⁾一位空乘人员这样描述说：

想想看，这个新面孔和你认识的人有哪些相似之处。你会从在座位中某个人身上看到你姐妹的眼睛。这会让你对她热情相待。我很喜欢把机舱想象成我家的客厅。一旦有人偶然来拜访，你或许不认识他们，但是你会待之以礼。可以把这个放大一点——每名空乘人员这样招待36名乘客，但是感觉还是一样。⁽¹⁸¹⁾

这一技巧可与美国的融入式表演法（method acting，又译为方法派表演或体验派表演）相媲美。这种融入式表演法作为一种“心理技巧”，或者说一种假想式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俄国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y，1863—1938）的作品。他告诉演员们要培养情感记忆，这样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情感事件就能被随意回忆起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亲眼看见一个乞丐被一辆有轨电车撞死。但在他的记忆中，还储存着另一个更强大的场景：

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在人行道上偶然遇到了一个意大利人，正俯身望着一只死去的猴子。他一边哭泣，一边将一块橘子皮硬塞到这头动物嘴里。这一场景似乎比乞丐之死更能引发我的情感，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想，如果让我在舞台上演出街头意外

的话，我可能会在有关意大利人与死猴的场景记忆中搜寻情感素材，而不是在悲剧本身中找灵感。(182)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的学生一样，【120】空乘人员也应该储存他们的记忆。经验丰富的空乘人员报告说，她们在培训课程中学习了以下技巧：“如果我假装自己真的感到高兴，有时我实际上也真的高兴了。乘客对我的反应，仿佛是我非常友好的，然后我也会更加友好地回应他们。”在压力大的时候，深呼吸，放松你的脖子和肩膀的肌肉，或者说说服自己摆脱压力也是很有用的。“小心留神！别让他影响到你”，然后“我会跟同伴说起这件事儿，她也会告诉我同样的话。不一会儿，愤怒就会过去了”。(183)

另一方面，情感工作或“情感管理”只有在遇到难以应付的乘客和她们自己的愤怒时才会失灵。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的空乘人员学会了同情难缠的乘客，并为其行为寻找解释，她们会努力记住这一点：

我会试着记住他好像喝多了，他可能害怕飞行。我会让自己这么想：“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真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他的时候，我就不会因为他冲我吼叫而生气了。那时，他就像一个冲我吼叫的孩子。(184)

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就应该想象一下摆脱麻烦根源的方法。一位教练建议说：“你心里可以这样想：只剩半个小时了。只剩29分钟，现在只剩28分钟了。”如果连这都不管用，就应该试着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沉浸于攻击性的幻想中。这两种方法都能奏效。一名空乘人员说：“我会咀嚼冰块，吱吱嘎嘎地把怒气嚼掉。”另一位空乘人员承认：“我会考虑对他做点缺德事，如把泻药倒进他的咖啡里。”(185)尽管如此，所有的控制都有可能会失灵，导致如下的报复：

有一回我终于决定让某人吃个苦头。一个女人抱怨个不停。我用最好听的声音对她说：“我们一直在竭诚为您服务。很抱歉您在飞行中感到不开心。很抱歉您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她继续抱怨食物有多糟，空乘人员有多差，她的座位有多不舒服。然后，她又开始对我和我的同事喊叫，她恰巧是位黑人。“你这个黑鬼贱人！”她说。好吧，这个太过分了。我告诉朋友说，犯不着为她感到痛苦。这位女士要求再来点血腥玛丽，我调好饮料，放在托盘上，朝她的

座位走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脚趾被地毯绊了一下，我绊了一跤，血腥玛丽全洒在了她白色的裤子套装上。(186)

这种报复可能代表着情感工作的失败，但也可以被看作是成功的抵抗，因为情感工作毕竟是工作，用霍赫希尔德的话说，这会导致异化：

在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之间的这种差异底下，存在着为完成工作而可能付出的代价的相似：工作者可能跟被用来从事工作的自我的那个方面相疏离或异化，无论这个方面是身体还是灵魂的边缘。(187)

他的措辞甚至更加激进：“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客厅外面，【121】在美国的市场上，演员醒来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真的被动过了手术。”(188)

也许这里谈论的应该是女演员，而不是男演员，因为情感工作与性别有高度的关联性。需要情感工作的职业通常是女性的领域，如秘书、社会工作者、小学教师、护士，当然还有空乘人员。根据霍赫希尔德的观点，这些之所以是“女性工作”，有几个原因。首先，在小女孩的早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强调的是情感，而不是行动。其次，“童年时期女孩和男孩接受的不同训练”，倾向于鼓励男孩的攻击性而抑制女孩的攻击性。第三，男性在高薪职业方面的人数优势促使女性从事那些需要投入更多情感的工作。(189)男性只在消极情感工作的地方占主导地位，例如在讨债公司，霍赫希尔德认为这是航空公司的对立面。

甚至这两个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受的培训也大不相同：虽然训练空乘人员更好地处理情感问题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讨债公司招募的人员通常只接受一个小时的介绍性谈话，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因此，这些新员工在来的时候已经被假定具备了必要的攻击性。一位收账员说：“我宁愿花8个小时去收债，也不愿花4个小时搞电话销售。”他说：“在做电话销售时，不管对什么人，你都要表示友好，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表示友好。热情地工作对我来说很难。”(190)工作中，空乘人员佩戴着姓名徽章，而收账员则会保持匿名。霍赫希尔德参观过的一家讨债公司“由两条大丹犬看守”，“在只有收账员才能看到的地方，窗户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张提示牌‘让你的客户猝不及防，掌握谈话的支配权’”。(191)一位入职不久的收账员对她说：“我的老板走进我的办公室说：‘你不能更生气一点吗？’制造恐慌！’我老板就是这么说的。”(192)出

其不意的策略，对债务人个人荣誉的攻击、威胁和侮辱至今仍是收账员的惯用伎俩。法律只禁止明目张胆地骂人。自1983年《心灵的整饰》（*The Managed Heart*）一书出版以来，情感工作变得更加重要，职位和工作者的数量也增加了。霍赫希尔德在2009年描述这一发展过程如下：

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各地的服务业工作岗位数量迅速增长。据我估计，在美国，大约60%的服务性工作需要大量的情感劳动。这项工作不平等地落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有四分之一的男性，但是有一半的女性从事情感劳动含量很大的工作，【122】如小学教师、护士、社会工作者、儿童和老年护理工作。 (193)

此外，情感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我所说的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心脏移植”。越来越多的护理工作者离开贫穷的南半球的老人和小孩，到富裕的北半球从事有偿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那里的老人和小孩。 (194)

霍赫希尔德研究情感工作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异化和情感失调都建立在真实的情感自我和不真实的情感自我之间的区别之上。最重要的灵感来自欧文·戈夫曼的作品，如前所述，他认为社会就像一个舞台，人们在上面戴着“社会面具”。 (195) 对于霍赫希尔德来说，职业性的微笑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面具，她称之为“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但她比戈夫曼更进一步，她强调情感工作涉及真实情感的参与，即“深层扮演”（deep acting）。戈夫曼曾写信给她，当制服发放出去时，皮肤也发放出去了。她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

例如，我们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穿上新制服），说话更有权威，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情感外观。这就是戈夫曼所说的“皮肤”。但是，我们自己以新的方式参与我们的深层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两英寸的肉”。“社会面具”比我们当前的自我观念让我们所认为的要深得多。 (196)

霍赫希尔德还认为，正是对真实情感的需求导致了异化，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这种价值被置于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和“自主的”自我之上。

但是，用单数来谈论美国社会的文化真实性是否正确呢？⁽¹⁹⁷⁾来自不同文化，对真实性、亚文化和个体差异有着不同看法的移民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即使用单数来谈论美国文化的真实性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一个先定真实和虚假自我的角度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更准确地分析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真实性作为一种价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将提供关于情感工作所带来的异化程度的特定历史指标。这反而使霍赫希尔德的义愤失去了其意义，实际上剥夺了《心灵的整饰》中的道德优越感。对传统工厂工作的社会学研究肯定会揭示出类似的异化效应。^{【123】}如果有一项对越南鞋厂的类似研究，在那里，16岁的女孩轮班做运动鞋，一次就是12个小时，那么，培训空乘人员的的情感层面很可能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除了这些批评意见，《心灵的整饰》的出版还标志着情感社会学中出现了个独立的研究领域。⁽¹⁹⁸⁾在制度上，这从国家社会学协会设立新部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例如，1986年，情感社会学部作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部分成立了。⁽¹⁹⁹⁾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将自那以后的研究分为七个主要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情感社会学的这一分支认为，情感存在于大脑皮层下较早进化出来的区域，因此表明它们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是先于语言存在的。特纳将这一观点总结如下：

直到很久以后，也许只有智人才出现了听觉语言，但这种语言是依附于情感语言的。然而，一旦听觉语言出现了，情感、语言和增强了的认知能力都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对人类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文化系统。⁽²⁰⁰⁾

特纳认为，第二个领域是“象征性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米德，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涉及个体自我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情感也发挥着作用。⁽²⁰¹⁾

第三个领域把所有可以追溯到戈夫曼的方法归入“拟剧论”（dramaturgy）之下，他：

认为个体的行为总是在向他人展现自我。^{【124】}在从事戏剧表演时，个体会使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规范组成的文化脚本，以及舞台道具（衣橱、空间和物品），不仅戏剧性地而且战略性地展

除了追随戈夫曼的霍赫希尔德，佩吉·斯奥兹（Peggy Thoits）也属于拟剧论的范畴。她的发现与芭芭拉·罗森宛恩的发现非常相似（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看到的，还有情感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因为在她看来，个体属于不同但有重叠的情感共同体。(203)

特纳的第四个领域是“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这与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有关。柯林斯指出，在面对面的见面中，人们使用仪式化的问候、手势和语言形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情感丰富的声音，这种声音在见面的过程中得到调节。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个体，就会产生群体团结。如果这些仪式被外人侵犯了，就会使得这个群体对他们感到愤怒，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群体的团结。(204)

第五个领域是“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它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行动者有所投入（如时间），或者赢或者输（如积极情绪）。(205)第六和七个领域分别是“权力和地位”与“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这些也许是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寻求用一种理论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核心范畴——社会不平等。(206)我们可以把最后一个领域归给一位游走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学者——伊娃·易洛思。(207)

“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伊娃·易洛思

“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这是伊娃·易洛思引用的一句广告语。(208)这个说法乍一看可能很有趣，但随着易洛思开始深入思考如今人们见面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125】易洛思试图剖析爱情的商业化，以及它作为最“私密”的情感，不受商业和市场影响的理想化。她质疑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的”市场是否能够通过情感的商业化复制和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根据易洛思的说法，我们对浪漫爱情的看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无私的而不是利益导向的，有机的而不是功利的，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简而言之，浪漫爱情似乎避开了理解资本主义所常用的传统范畴。(209)同样，正如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无情地侵入了我们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最隐秘的角落”。因此，易洛思认为，今天的爱情与市场机制和广告紧密相连。(210)这种矛盾——非资本主义浪漫爱情的“集体乌托邦”与几乎完全商业化的浪漫

爱情相结合——使爱情领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文化矛盾上演的舞台”。⁽²¹¹⁾

易洛思的《消费浪漫乌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一书以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浪漫爱情的历史图景开篇,接着以20世纪80年代的采访以及对杂志、广告和个人建议的分析为基础,对后现代爱情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考察一下广告的趋势,就有可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针对中产阶级的广告与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截然不同。前者划定了明确的空间界限和性别界限——女性在厨房,男性去上班,两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或浪漫的亲近。相比之下,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模糊了这些界限,例如,展示了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相互拥抱。从20世纪30年代起,更加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道德开始盛行,并被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理想。现在,通过消费,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这一理想。现在,可以说爱已经成为可以购买的东西,或者用易洛思的话来说:

在20世纪早期的20多年里,浪漫的主题越来越多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而且,后来浪漫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表现自我的产品的广告宣传新的浪漫模式,不仅把这种情感从家庭生活、男女领域划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脱离出来,而且实际上是反对婚姻的。【126】通过对比“婚姻的乏味”和“浪漫的刺激”,这些广告呈现了婚姻状态的负面形象。⁽²¹²⁾

广告媒体对婚姻的这种负面呈现表明,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普遍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接近尾声时,工作越来越被视为生活的纽带,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乌托邦式的思考:在集体想象中,浪漫变成了不工作、休闲和假期,最终,浪漫成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假期这样的乌托邦建构。今天我们仍然有这种浪漫的概念。易洛思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她:“如果你周末去了某个浪漫的地方,或者去了夏威夷之类的浪漫之地,回来后却发现行李不见了,我觉得这很不浪漫。”易洛思认为,这位受访者“抓住了浪漫与非浪漫对立的本质。浪漫意味着异国情调(夏威夷)、开心(旅行、派对)、富裕(机票、考究的衣服)、魔力和放松。浪漫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位于日常生活之外,日常生活被认为是费力的、实用的、例行公事的、不好玩的”。⁽²¹³⁾

由于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易洛思的许多受访者认为,和持久的关

系相比，在短暂的风流韵事中，“爱情”更加强烈。⁽²¹⁴⁾显然，如果把每天一起吃早餐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密关系也理解为“爱情”的话，这种现象是文化上“制造”的。此外，让我们想到“爱情”的大部分广告如今都与假日产品有关，强调的是产品的非日常性。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加勒比度假的广告，画面上是被棕榈树环绕的孤独海滩或日落，而另一方面，

浪漫——以及象征浪漫并被浪漫所象征的产品——都发生在一个理想化的、永恒的亲密和消费的乌托邦中。饮酒浓缩了所有欢庆的感觉，吸烟意味着放松，意味着退回到私人世界；在钻石里，爱情是永恒的。⁽²¹⁵⁾

还有一种来自“二战”后治疗时代的“反话语”：

在这种观点看来，维系婚姻，甚至保持激情，都需要付出“努力”。因此，这种新的理想试图把不容易调和的态度和活动结合起来。【127】要想成功，夫妻双方必须把自发性、精心算计和谈判能力与对“热恋”的品味相结合。由此产生的享乐主义治疗模式的特征是“在一起玩得开心”“拥有共同的兴趣”“交谈”“互相了解”“理解对方的需求”和“妥协”。⁽²¹⁶⁾

精心算计和自发性之间的反差只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之一。有目的的理性利润优化也与无私的理想相矛盾：“浪漫关系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它可能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的，但只有在个人证明了自己无私的那一刻，它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²¹⁷⁾当然，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市场的平等化逻辑与爱情的非凡能力之间，即爱情绝不是“盲目的”，而是使人能够以梦幻般的确定性和惊人的精确性找到和自己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那一位。一旦公开的不平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模式被废除，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后现代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肯定新的阶级划分和阶级认同的同时，也蕴含着对休闲和真实性的无阶级梦想。”⁽²¹⁸⁾因为，正如易洛思所提出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为爱伴侣的个人品质甚于其市场价值的同时，做出符合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决定呢？”⁽²¹⁹⁾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对这一机制给出了一种解释：潜在的伴侣利用既定的物理标记，如衣服和语言等习惯性标记，来表明他们所属的阶层。这是在意识的阈值以下含蓄地或“无意地”发生的，因此，自由选择伴侣、自主决策以及原创性和个性原则的理想可能不会受到玷污。⁽²²⁰⁾然而，易洛思始终未能完全解决这一矛盾。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矛

盾”概念直接取自马克思。

爱情的媒介结构化（medial structuration）的问题在后现代变得尤其重要。在这个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时代，爱情符号中任何原创性和真实性的理想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易洛思引用了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话：

我认为后现代的态度就是一个人喜欢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
【128】他知道自己不能对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并且她也知道他知道）芭芭拉·卡德兰（Barbara Cartland）已经用过这句话。不过，还是有办法的。他可以说：“就像芭芭拉·卡德兰所说的那样，我疯狂地爱着你。”此时，他已经避免了虚假的纯真，已经清楚地说过不可能再纯真地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说他想对她说的话：他爱她，但他是在一个失去纯真的年代里爱她的。（221）

这些矛盾及其扭曲的逻辑后果是“承诺恐惧症”（commitment phobia）的流行——也许这已经被包括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易洛思认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而是资本主义爱情模式过度发展的一种变体。她认为，承诺恐惧症是指在面临过多选择时无法做出决定的现象。在爱情市场上，似乎总有更好也更加短暂的东西：

有人甚至大胆地提出，“承诺恐惧症”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副产品，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肯定自主性的基础上，导致人们不愿放弃选择的自由和“找到一个更好伴侣”的可能性。（222）

易洛思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社会学呢？她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从理论上讲，她兼收并蓄，既借鉴了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经典著作，又借鉴了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易洛思经常引用理论，将其应用于她的材料，并通过修改她最初的观点来结束。她的方法包括定性访谈和实验，例如让受试者从三张“浪漫”明信片中选择一张，并给出理由。她还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广告与1989—1991年期间的一些广告进行比较，并没有做出任何全面分析的主张，而是同时利用了杂志和各种形式的咨询文献。如果该书对历史研究中遇到的各种惯例有任何主张的话，那么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年到20世纪80年

代这种时间上的混乱可能值得担心。此外，《消费浪漫乌托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浪漫爱情的社会学研究著作。⁽²²³⁾然而，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幻灭的效果。她用坚定的手引导着她的社会学手术刀，无情地揭示了爱情的社会经济框架，到了书的结尾，浪漫几乎荡然无存。

八、20世纪90年代（一）：社会建构主义之后的情感人类学【129】

让我们从社会学的题外话回到人类学，再一次探讨文化战争的关键问题：是普遍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选择普遍主义的大多是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或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这样的保守派，而在20世纪90年代，钟摆摆向了另一边。自由派人士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和曾经的学生活动分子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代表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与保守派联手，认为身份政治可能太极端了，而且似乎忽视了这一切的主旨，即社会不平等。⁽²²⁴⁾同性恋者或许能够庆祝自己的巨大成功，在公共场合受到的歧视也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少，但是如果纽约或底特律某些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孟加拉国，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芝加哥南部，贫困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那么哈佛和康奈尔等常春藤盟校聘用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这样的非裔美国人或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学术超级明星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的统治阶级仅仅是为了回避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在顶尖大学校园里玩多样性游戏吗？阶级、种族和性别三位一体的分析范畴显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最终，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是首要的，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导向的是普遍主义而不是特殊主义。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慢慢失去了动力，正如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所有学科都从人文和社会科学转向了生命科学，如神经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大脑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玛格特·莱昂（Margot Lyon）于199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为“缺失的情感：文化建构主义在情感研究中的局限性”（“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Study of Emotion”）。⁽²²⁵⁾在她看来，情感在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她指出，“文化建构主义探讨情感的方式确实有局限性。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情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建构”。⁽²²⁶⁾在对格尔茨的象征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后，她又回到了情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情感位于哪里呢？”⁽²²⁷⁾她不满于情

感在公共象征空间和内部心理空间中的位置。她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情感概念的关键范畴是身体。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体本身，还是其文化“建构”，对情感的身体方面的考虑还不够充分。【130】因此，在关于人类学“重新回到身体”的一节中，她概述了一种新的“回到身体的”人类学可以发挥的作用：

情感研究可以通过对身体能动性的考虑，对身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更广泛的理解。情感在身体能动性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它天然地将身体的和交际的方面联系起来，从而涵盖了身体、社会和文化这些领域。(228)

她由此得出结论：

要超越文化建构主义的局限，就必须对情感及其社会和生物本体论有更广泛的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正式的社会关系，例如权力和地位，它们在重新调整我们对社会情感的研究时，发挥了不受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构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对生物学的恐惧，重新让人类学回到身体。(229)

莱昂并没有说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她这篇文章依然是纲领性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生命科学。就身体的概念而言，社会建构主义似乎从未发生过：身体没有受到语言或文化的影响，因此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本质。

附记二：情感语言学

这里我们可以再插入一段题外话，这次是关于语言学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它依赖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同时又超越了情感人类学。它还使用普遍模型与心理学家展开直接对话。

(1) 安娜·韦尔兹比卡 (Anna Wierzbicka) 与一种文化普遍的自然语义元语言

安娜·韦尔兹比卡反驳了像保罗·埃克曼这样的心理学家的观点，后者认为情感词汇与情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面部表情的图像最好地表达了基本情感的内容（见第三章）。虽然在神经科学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观

点，但不是通过面部而是通过大脑成像技术来寻求一种普遍的内容，韦尔兹比卡依然表示反对。她认为使用神经科学方法的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是幼稚的，以民族为中心”，因为他提出“精神生活独立于特定的语言而存在”，英语中的概念“即使没有名字也可以被思考”。韦尔兹比卡引用了语言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例如埃克曼的批评者詹姆斯·拉塞尔 [James Russell] ）的证据，来证明情感词汇确实与情感有某种关联。此外，她还提请人们注意，【131】主张基本情感的理论学家对面部表情图像的描述并不一致，他们不是用瞳孔放大和嘴巴张开等中性表达，而是用恐惧一词来描述。⁽²³⁰⁾然而，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相反，韦尔兹比卡坚持普遍情感的观点。她认为存在着一种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元语言，这种语言是通过对多种语言的长期研究发现的，她称之为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简称NSM）。其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概念原语与词汇普遍性【132】

我词性实称（YOU），某人
（SOMEONE [PERSON] ），某事（物）
（SOMETHING [THING] ），人（PEOPLE），身
体（BODY）
限定词THIS），同样的（THE SAME），另一个（OTHER）
数量词ONE），二（TWO），一些（SOME），许多（MANY/
MUCH），所有（ALL）
形容词GOOD），坏的（BAD），大的（BIG），小的（SMALL）
思维谓词THINK），知道（KNOW），想要（WANT），感觉（FEEL），
看到（SEE），听到（HEAR）
言语SAY），单词（WORD），真实的（TRUE）
微动DC事件，发生（HAPPEN），移动（MOVE）
和动作
存在和拥有IS, HAVE）
活着（LIVE），死亡（DIE）
逻辑概念），也许（MAYBE），可以（CAN），因为
（BECAUSE），如果（IF）
时间（WHEN [TIME] ），现在（NOW），之后（AFTER），之前
（BEFORE），长时间（A LONG TIME），短时间（A SHORT
TIME），一段时间（FOR SOME TIME）
方位（WHERE [PLACE] ），这里（HERE），上面（ABOVE），下
面（BELOW），远处（FAR），附近（NEAR），旁边（SIDE），里面
（INSIDE）
程度（VERY），更加（MORE）
分种（KIND OF），一部分（PART OF）
类似LIKE）

名词性实词 GUÉN, ALGO, GENTE, CUERPO

限定词 EL MISMO, OTRO

数量词 DOS, ALGUNOS, MUCHOS, TODOS

形容词 MALO, GRANDE, PEQUEÑO

心理谓词 SABER/CONOCER, QUERER, SENTIR, VER, OÍR

虚说 IR, PALABRA, VERDAD

行动/事件和动作 IR, MOVERSE

存在和拥有 IR, TENER

生死 IR, MORIR

逻辑概念 ZÁS, PODER, PORQUE, SÍ

时间 CUANDO, AHORA, ANTES, DESPUÉS, MUCHO TIEMPO, POCO

时间 TIEMPO, POR UN TIEMPO

空间 DE, ACQUÍ, SOBRE, DEBAJO, LEJOS, CERCA, LADO, DENTRO

加强, MÁS

分类 CERO, PARTE

类似 COMO

资料来源：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6—38。

根据韦尔兹比卡的说法，这些是所有现存人类语言使用的基本构成要素。她的意图无非是通过一种元语言来证实早期哲学概念中的“天赋观念”（innate ideas，笛卡尔）、“人类思维字母表”（alphabet of human thought，莱布尼茨）、“所有语言围绕的中间点”（威廉·冯·洪堡）和“人类的心理统一性”（psychic unity of mankind，弗朗茨·博厄斯）。⁽²³¹⁾ 她认为这种概念原语和词汇普遍性与普遍语法结构有关。⁽²³²⁾ 这种通用的语言和语法使人们能够表达普遍的情感。她认为，“自然语义元语言方法首先区分本质的与可选的，捕捉不变的因素，并将复杂的概念分解为尽可能简单的概念，完全依赖于单独确立的概念启动词和词汇语法上的普遍性”。⁽²³³⁾ 如果将情感的文化普遍性纳入自然语义元语言，会是什么样子呢？韦尔兹比卡提出了以下假设：

① 所有语言都有一个表达“感觉”的词。

② 在所有语言中，有些感觉可以被描述为“好的”，有些则可以被描述为“坏的”（而有些则既被认为“不好”也“不坏”）。

③ 所有语言都有与哭泣和微笑相对应的词语，尽管意思不一定完全对等，这些是表达身体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的词语。

④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似乎都把一些面部表情与好的或坏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他们把嘴角上扬与好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而嘴角向下或鼻子皱起与坏的感觉联系在一起。

⑤ 所有语言都有“情感”感叹词（即表达基于认知的情感的感叹词）。

⑥ 所有语言都有一些“情感术语”（即表示一些基于认知的情感术语）。

⑦ 所有语言都有词语来表达（i）“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ii）“我想做点什么”的想法；（iii）“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不好”的想法。这些词语与英语里表达害怕、愤怒和羞愧的词语有语意重叠（虽然并不完全一样）。

⑧ 在所有语言中，【133】人们都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身体“症状”（也就是说，通过一些被认为是这些感觉的特征的身体事件）来描述基于认知的感觉。

⑨ 在所有语言中，基于认知的感觉都可以通过身体的感觉来描述。

⑩ 在所有语言中，基于认知的情感都可以通过比喻性的“身体意象”来描述。

⑪ 在所有语言中，都有不同的语法结构来描述（和解释）基于认知的情感。(234)

她概括如下：

显然，不同文化和社会（以及不同时代）思考和谈论情感的方式呈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但共性和普遍性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何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如何通过对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的筛选来形成对普遍概念的一些理解，而不是通过将完全源于自己语言的理解模式绝对化。尽管如此，我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个有理有据的第三方标准，这种“第三方标准”是由人类普遍概念的微型语言提供的，而这些普遍概念源于实证的跨语言研究。(235)

这里可以提出很多观点。语言和模仿中情感的表达或许可以简化为普遍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然而，历史学科是根据不同的规则运作的，并且有不同的认识论。它最终对这种普遍性并不感兴趣，因为历史学家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正如丹尼尔·M·格罗斯（Daniel M. Gross）所言，韦尔兹比卡所提出的这种事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但是，未来的概念史将利用语言学（尤其是词汇语言学）

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韦尔兹比卡的理论是有理有据的。

(2) 佐尔坦·科维克塞斯 (Zoltán Kövecses) 与隐喻

隐喻研究专家佐尔坦·科维克塞斯的研究超出了情感词汇的范畴。对他来说，英语里“anger”（愤怒）这个词并没有完全涵盖“愤怒”的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乔治·P.拉科夫 (George P. Lakoff) 合著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愤怒”一词包含了更多的隐喻，在这些隐喻中，“anger”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出现，例如“let off steam”（发泄怒气），“blow up”（爆发），“making one’s blood boil”（使人怒火中烧），“foam at the mouth”（暴怒）。⁽²³⁶⁾这些形象可以通过一些隐喻类型来捕捉，如“愤怒是热量”（例如“hot head”是指容易被激怒的人）；“愤怒是一种危险的动物”（例如，【134】“他脾气很暴”）；或者“愤怒是一种负担”（例如，“发脾气之后，我觉得轻松多了”）。最广为使用的意象是“愤怒是容器中液体的热量”。这种“核心隐喻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愤怒可能是强烈的，可能会导致失控，而失控可能是危险的”。⁽²³⁷⁾多年来，科维克塞斯进一步发展了其隐喻理论，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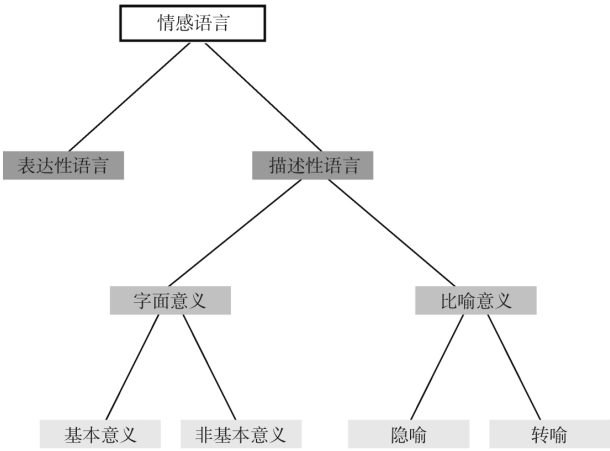


图6 情感语言的类型总结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 (Peter Palm) 基于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6中的一份图解。

此外，科维克塞斯认为，几乎没有任何“纯粹的”情感隐喻，而是常用的隐喻被用于情感。⁽²³⁸⁾最主要的隐喻是力量和能量：“情感就是力量”。因此，有一个支配所有其他隐喻的隐喻。“情感隐喻不是孤立的、

不相关的特定层面的隐喻，而是围绕着力量的一般概念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这为情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39)

科维克塞斯甚至认为情感研究被困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认为这种二分法是无益的，需要某种调解，一边是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如罗姆·哈瑞（Rom Harré），【135】他认为情感主要是由语言来建构的；另一边是约瑟夫·勒杜，他认为情感是在大脑中无意识发生的，语言中的情感表达仅仅是“对情感锦上添花的装饰”。(240)科维克塞斯是如何看待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的呢？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被认为是情感的体现。(241)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乎普遍”的隐喻。愤怒的生理维度为愤怒的概念化设定了一定的界限。例如，愤怒通常被与体温升高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现象。(242)这种生理现象为愤怒隐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框架。愤怒的一个近乎普遍的隐喻是“有压力的容器”。科维克塞斯承认生理和隐喻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身体体验不一定会产生隐喻，但是“它使得大量其他可能的隐喻概念化要么不相容，要么不自然。例如，如果把愤怒理解为轻柔地飘落的雪花，一个与愤怒时我们的身体和生理机能完全不相容的形象，那就太奇怪了”。(243)

最后，他还试图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两极之间采取一种调和的立场。

在普遍生理学对其所施加的限制之内，人们可以选择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情感概念化。这些限制给说不同语言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244)

情感语言的这种“新型综合体”被称为“基于身体的建构主义”，它认为：

有些方面是普遍的，与身体的生理功能有明显的联系。一旦分析出情感语言普遍性的方面，情感语言和概念中非常显著的差异就可以通过参照文化知识和语用话语功能的差异来解释，这些差异是根据不同的文化定义的规则或场景来运作的。【136】这种方法也使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利益可能与固有表达倾向相矛盾，并压制或扭曲固有表达倾向。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永远站在对立的阵营中，一边是天生主义者，另一边是社会建构主义者。(245)

因此，对于作为语言学家的科维克塞斯来说，情感最重要的“来

源”是言语，尤其是比喻性的言语。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情感的语言和意象表达部分体现了普遍性，部分体现了文化性。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成立。但是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简化为生理状态呢？如果连身体也是文化的呢？

九、20世纪90年代（二）：超越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性

身体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辩论以不断更新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最近一轮的辩论中，帕斯卡·艾特勒和莫妮克·舍尔以“文化”作为回应，展示了从20世纪90年代身体史和性别史中借鉴的身体的文化概念对情感史的贡献。不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认为身体是不变的自然的避难所，从而赋予情感身体性的一面以一个永恒的、泛文化的维度，艾特勒和舍尔从历史化的角度来看待情感的体现。正如他们所说，文化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铭刻在身体之上：

一旦获得了某些能力、缺陷或习惯，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培养的，都很难摆脱。它们会在身体上留下标记：肌腱缩短，让人无法以特定的方式坐下；血压升高或突然昏厥；心脏狂跳，或流眼泪。(246)

艾特勒和舍尔批评了语言学转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情感不仅如人们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文化意义，而且实实在在地产生于物质。它们不仅通过身体来表征，而且首先必须通过身体来实践或制造。要追踪身体的“物质化过程”，我们要密切关注永久的甚至可能是最小的变化的物质性……人们假定，就其物理形式而言，对身体的日常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无不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从声音的音高到骨骼的密度，从胰岛素的产生到呼吸速率。(247)

这也适用于大脑，自从生物革命之后，【137】它就被确定为终极本质，是人身上最不可变的物质。艾特勒和舍尔强调，“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不再用没有时间性的因素来对抗情感史，而是用大脑中的临时结构和过程”。(248)神经科学家很喜欢谈论大脑的“可塑性”，但很少有人像艾特勒和舍尔那样清楚地阐明对这种能力的认识论指控。这相当于文学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对象推入核磁共振扫描仪，给他们读《安娜·卡列尼娜》，

将杏仁核内血流量的增加（屏幕上显示为黄色）解释为“可怕的唤起”，不仅要处理经过亿万年进化的大脑，还要处理作为个人经历和短期变化产物的大脑。因此，任何统计推断都只能从一个实验对象得出： $n = 1$ 。

此外，“物质化过程”（processes of materialization）和铭刻的过程在时间上是开放的、不稳定的：

不断的重复不仅是为了情感的意义，也是为了情感的体现。因此，物质化过程最好被视为沉积过程（processes of sedimentation）。这个观点的关键是身体和情感在这方面获得或失去物质性或稳定性。不断的重复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失败的可能性”。⁽²⁴⁹⁾

艾特勒和舍尔继续强调后结构主义方法，因此，

与在情感研究中盛行的语言或认知还原论分道扬镳，对话语作为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对话语作为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多。关注的焦点不是谈论和思考情感，而是实践情感，或者换一个更好的说法，是尝试情感。在这一框架内，特定的身体会促进、助长或阻碍特定的情感，而情感与身体有关，塑造或改变身体，无论是微小的笑纹还是扭曲的脊椎，无论是血清素含量升高还是发生胃溃疡。⁽²⁵⁰⁾

从20世纪初的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世纪90年代的讨论状况。

当时，要超越二元情感构造的呼吁并不局限于语言学和佐尔坦·科维克塞斯。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领域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早在1987年，南希·舍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和玛格丽特·M.洛克（Margaret M. Lock）就在情感中发现了一个研究对象，【138】它有望带领医学人类学走出由一系列二元对立构成的死胡同，其中包括：“心灵 / 身体，看得见 / 看不见，自然 / 超自然，神秘 / 理性，理性 / 非理性，真实 / 虚幻。”⁽²⁵¹⁾情感是克服这种笛卡尔主义传统的重要媒介，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缺失的环节’，能够把思想和身体、个人、社会 and 政体连接起来”。⁽²⁵²⁾非西方文化中的疾病民族志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有时是在生病的过程中，就像在深度恍惚或性狂喜的时刻那样，身心、自我和他人合而为一”。⁽²⁵³⁾情感人类学使精神性身体的轮廓清晰可见。

乌尼·维坎在巴厘岛进行的研究超越了这一点。巴厘岛北部布莱伦（Buleleng）县的巴厘人对自我有一种“双重锚定”（double anchoredness），一个在内心，一个在脸上，但是根据维坎的说法，这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维度一直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中。⁽²⁵⁴⁾她指出，把心视为“真实”自我的避难所，而把脸视为一个面具，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被从玛格丽特·米德到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人类学家广泛接受。相比之下，维坎坚持当地的“人的整体观”，一个包含了心和脸两个维度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被视为基本的，另一个被视为肤浅的。⁽²⁵⁵⁾

与此同时，维坎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倡导者保持着距离。虽然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情感的关注最终还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女性”特征（如情绪化）的重新评价。所以，根据维坎的观点，非理性情感和理性认知之间的二分法被简单地复制了。因此，抛弃情感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已经到来，取而代之的是更严肃地对待元情感概念的意义，就像那些巴厘岛人那样，他们将“keneh”理解为“情感—思想”。为此，有必要重新关注“人”和“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人类学家必须完全沉浸在异域文化中，并学会“感同身受”。翻译工作将使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因为如果没有翻译工作，外来文化将永远是“他者”，事实上是“异国的他者”。为了彻底摆脱这种思维，有必要让自己沉浸其中，追寻并确定人类的共同之处。⁽²⁵⁶⁾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与多元意义上的他者交流，他将永远无法发现普遍意义是什么。【139】维坎本人有“生活体验”，重新强调了“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参与性的一面。她最终意识到自己相信巫术，因为过多微笑而出现面部痉挛，不过痉挛的症状最终消失了，这让我们想起了舍尔和艾特勒所说的产生“尝试性情感”（trying emotion）的沉淀过程。⁽²⁵⁷⁾

普遍性不能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来定义，而是在与巴厘岛的多元性相碰撞的过程中出现的。对于巴厘岛人来说，这些文化普遍性就是哭和笑。维坎认为巴厘岛人把眼泪看作是一种无法用意志表达的悲伤，这或多或少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用奥斯丁（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说（我们将会看到威廉·雷迪使用了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这种反应是表述或描述这个世界的，而笑改变了世界，它是表述行为的。巴厘岛人说，笑让世界看起来更美好，

笑能成就快乐，也能带走悲伤……笑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不是抽

象的，而是经验上的认知和感受。就像如果一个人的脚又湿又冷，他就会发抖和头晕……笑可以帮助一个人忘记不好的事情，让人感觉良好，精神振作。它也有助于保持面部和身体的年轻状态。(258)

根据维坎的观点，正是在这里，开启了对意料之外的共同特征和有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的研究视角。因为“西方生物医学刚刚开始承认笑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并将其用于治疗”。(259)因此，巴厘人的医学和西方医学之间有共通之处，“不断增加的临床文献证实了情感和精神状态对健康的影响”。(260)只有视野开阔，才能尽可能全面地考虑问题，并不是只有维坎和人类学才认识到这样的优势。(261)大约在同一时期，史学界开始发出声音，强调由广泛比较而产生的丰硕成果，因为这种比较不仅揭示了差异，还可以揭示出乎意料的相似性，而这也使得澄清相似对象的特殊性成为可能。(262)

与维坎的工作相类似，【140】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前十年得到发展的是一些创新性的实证研究，它们超越了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二分法。一个例子是丽莎·米切尔（Lisa Mitchell）的研究，她用情感的视角解释了20世纪50年代南印度人出于对自己语言的热爱而自杀的现象。这里需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1947年独立后，印度实行的是联邦制，使用的是以前英国统治时期的行政边界。这些边界从来没有尊重过语言上的差异，波蒂·斯里拉穆卢（Potti Sriramulu）是第一个绝食而死以抗议这些边界的人。1953年，在尼赫鲁的统治下，建立了第一个以语言边界为基础的邦（安得拉邦），在此之后，印度南部各邦的许多人都效仿了斯里拉穆卢这一榜样。出于对自己语言的热爱而自杀的事件变得广为人知，多年来，这被解释为“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实事求是的问题。除了中产阶级以外的任何人的参与，要么被解释为虚假的意识，要么被解释为精英的操纵，要么被解释为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论文中，仅此而已’”。(263)

丽莎·米切尔并不认为这些解释令人满意。她问自己：“要让一个人愿意为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家而死，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264)她的回答是，首先，在19世纪，这样一种语言观念已经从欧洲传入，即把语言等同于生命物，并认为与语言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生物几个典型的生命阶段——出生、童年、成熟、死亡——被转移到语言身上。这让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消亡感到担忧。其次，语言被拟人化为一个印度教神灵，受到崇拜。泰米尔人的母语被当作母亲和女神来崇拜，作为泰米尔语的概念，“tamilpparru”一词被创造出来，意为“对泰米尔语

的热爱”。⁽²⁶⁵⁾【141】第三，印刷媒体的发行量稳步增长，接着是音频媒体的发展，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语言。这种实践基础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语言是如何被视为重组各种知识形式和日常实践的基本和自然基础的。这些实践包括历史写作、文学创作、正典的形成和改造、教育学、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身份的呈现。”⁽²⁶⁶⁾

19世纪末，作家古鲁贾达·斯里拉马穆尔蒂（Gurujada Srimamurti，1851—1899）为出版他的第二版《泰卢固诗人传》（*Lives of [Telugu] Poets*）寻求赞助。这是一本介绍那些用泰卢固语（Telugu，一种南印度语）写作的人的书。他在前言中向“那些热爱泰卢固语或为泰卢固语而感到自豪的人”呼吁。⁽²⁶⁷⁾米切尔说，在20世纪中期，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人们对这种语言的情感依恋更加强烈。此外，人们还担心随着印度的独立，印地语会在南印度占据支配地位，因为印度中部和北部的大多数邦都说印地语。此外，各个邦的疆界并不像英国统治时期那样重视对语言的这种热爱，但安得拉邦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先例。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对泰卢固语的情感依恋的激进化，最终导致了出于对一种语言的爱而自杀的现象。这些抗议活动以其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安得拉邦建立几年后，日益增长的压力促成了1956年《邦重组法案》（*State Reorganization Act*）的出台，在语言的基础上对各邦进行了重新划分。最后，邦和语言的统一成为惯例，而不再是例外。⁽²⁶⁸⁾自杀浪潮也就此结束了。

米切尔的研究对民族主义及其与情感关系的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她将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综合了传播史（分析新词典、广播等）、语言人类学（评价词典和语法，加上访谈）和历史学（档案研究、访谈）的方法。其结果是对一直难以解释的事件（即印度南部因热爱语言而引发的自杀浪潮）做出了一种多层面的、原创性的解释。

十、最近的普遍主义情感人类学【142】

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时期，情感人类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其特点是具有普遍主义倾向。虽然必须承认这只涉及少数学者，但鉴于第三章关于生命科学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其中一些学者借鉴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情感结构”或一种“普遍的情感模式，爱与恨、结合与分离、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

系，这种辩证关系必须在每个社会中得到表达，这是不言而喻的”。⁽²⁶⁹⁾有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人类学家，他们利用田野调查的数据来证实保罗·埃克曼关于基本情感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假设，比如快乐、愤怒、厌恶、恐惧、蔑视、悲伤和惊讶。⁽²⁷⁰⁾卡尔·海德（Karl Heider）就是其中之一。

海德自1968年以来一直与埃克曼合作，1986年，他们共同到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布基廷吉（Bukittinggi）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察。

⁽²⁷¹⁾海德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下：

文化是如何影响情感的？显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情感的词汇。但除此之外，有多少情感行为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呢？比如，同样是表达“愤怒”，美国人的“anger”和印度尼西亚人的“marah”有多少相似之处呢？⁽²⁷²⁾

由于海德将埃克曼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海德认为，埃克曼对面部表情的研究揭示了将不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共性。从此以后，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已经确立的六种基本情感中提炼出文化差异，即埃克曼的“表现规则”（这将在第三章中得到进一步的讨论）。这里有一种将心理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的劳动分工：“人类学家研究情感的任务是寻找差异，【143】识别并解释在泛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不同情感行为。”⁽²⁷³⁾或者，正如海德在他的研究之初系统阐述的那样：

假设3：情感行为是泛文化行为和特定文化行为的混合。它是由泛文化影响（也许是物种共有的生物学特征）和特定文化规范共同塑造的。

假设4：由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存在于泛文化语境中，必须同时考虑二者。一种非比较的情感民族志有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不能识别出很多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行为，而忽视文化影响的方法可能将一些实际上具有规范性的特定行为视为实验错误。

假设5：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特定文化因素对情感的影响。⁽²⁷⁴⁾

海德认为：

情感行为是在泛文化的基础之上由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将两者区分开来。(275)

在海德对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对立的表述中，像凯瑟琳·卢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成为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而像杰瑞·鲍彻（Jerry Boucher）这样的心理学家则成为极端的普遍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克曼的立场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快乐的中间立场，它为普遍主义（基本情感）和文化特异性（“表现规则”）都提供了一席之地。海德对比了“认为所有情感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的泛文化主义者”和“认为一切总是不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276)换句话说：一方面，存在一种“泛文化普遍主义，即那些完全忽视不同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另一方面，存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即完全忽视或拒绝面部表情研究所带来的泛文化发现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人种学家”。相比之下，优于这两个极端的是“认为泛文化的面部表情是由文化表现规则调解的妥协立场，如埃克曼的”。(277)

海德的方法基于一个主要的假设：普遍的基本情感的存在，正如埃克曼的面部表情实验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将在第三章中得到更详细的讨论。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埃克曼的假设绝对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明；相反，即使在实验心理学内部，这一观点也存在激烈的争议，更不用说在其他研究领域了。海德本人在语言人类学方面的实证研究被认为建立在埃克曼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海德的研究是否会土崩瓦解呢？这是完全不会的。【144】因为他的研究并不一定依赖于埃克曼的基本情感理论。事实上，他提供了对情感人类学的经典语言学研究，就像尼科·贝斯尼尔的研究或凯瑟琳·卢茨对“fago”和“song”的研究那样。(278)

海德选择了四种语言：米南卡堡语、米南卡堡-印尼语、标准印尼语和美式英语。他认为这四种语言有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联系。与一项类似的比较研究相比，他在这些语言中看到了更多的文化差异。前者是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研究——在欧洲和以色列选取了六种语言，而这些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被认为不那么显著。(279)海德从他的四种语言中收集了在各自文化中可以被归类为情感词的词语，并为它们的语义绘制了“认知地图”，即在一种语言内部和不同语言之间意义关系的图示。通过这种方式，他使情感词汇表达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变得显而易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三种语言中，“takut”这个词大致意为“恐惧”，它与“内疚”之间的联系比英语中的“恐惧”概念更加紧密。此外，它还有“蔑视”和“羞

耻”的意思。(280)

甚至海德在其“认知地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感概念，实际上也比他对埃克曼的介绍性评论所引发的思考要复杂得多。首先，对海德来说，情感总是混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埃克曼关于基本情感的观点，并且还涉及与心理学其他分支的融合。(281)其次，海德并不把情感看作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他以图形化的方式将其表示为“情感流动模型”（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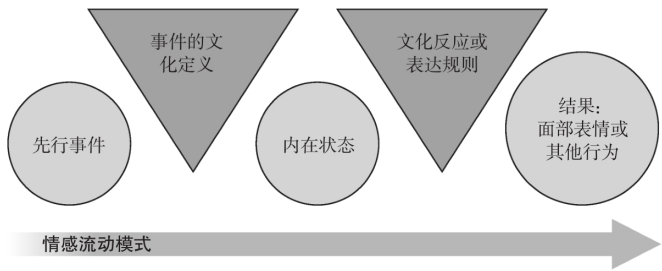


图7 卡尔·G.海德的“情感流动模型”【145】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7中的一份图解。

他对这种情感流动模型描述如下：

对先行事件可以做中性的描述如“一个孩子的死亡”。首先是特定文化规则对这一事件进行文化定义，从而产生简单或复杂的内在情感状态。然后是特定文化的干预，因为情感的表达是由特定文化反应规则或者表现规则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内在情感状态会发生变化，可以被强化、削弱或抵消，或者是被另一种情感的行为（通常是面部表情）所掩饰。例如，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讲述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情感表现规则：爪哇社会有许多优雅之处，其一便是对情感的掩饰。有时人们说，爪哇人对每一种情感都有相应的微笑。换句话说，在爪哇人那里，对每种情感都要用微笑来掩饰。然而，我们怀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爪哇人对每种情感都有不同的微笑。(282)

情感流动模型是：

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型，它承认了真实情感行为的复杂性，既承认多种情感的同时同步组合，也承认情感的先后发生。这是一个万

花筒模型，就像儿童玩的万花筒一样，允许复杂的混合情感随着时间而变化。(283)

可以说，这最终只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型，它抑制了情感纯粹是“内在”产生的可能性，例如，对于一条出现在积极情境中（比如春日的阳光）的蛇的恐惧。(284)尽管如此，海德的情感流动模型仍然是最有前景的方法之一。

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可以回到情感人类学的趋势，它可以象征一般情感研究中社会建构主义的极端。这种将人类学等同于社会建构主义，甚至是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做法，当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现实的混沌比任何秩序原则都更加强大，无论它如何试图为这种混沌找到结构。我们在本章讨论的案例中已经看到，甚至情感人类学也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许多代表人物认为自己的研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普遍主义（生命科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人类学）之间的两分法过于简单化。人类学既有更具普遍主义色彩的研究路径，也有更具建构主义色彩的研究路径。把两者和某个十年联系起来的做法也过于简单化，例如说20世纪70年代是普遍主义的十年，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十年。事实上两者更多处在一种混合和共处的状态，现实总是更加混乱。概括历史在这十年或那十年的变迁从来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146】这一问题在人类学领域更为严重，因为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的描述和结论的发表，往往要花费多年时间从事田野调查。人类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通常会很短，更不用说生命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了。在人类学研究中，有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这一章关于情感的内容，例如，把哭泣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主题。然而，最终，感知和历史科学的有效性会胜出。罗萨尔多、阿布-卢赫德和卢茨的研究被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历史研究）认为是对社会建构主义立场最突出的表述。最后，有一点很重要：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人类学那样，在推翻情感是永恒的、无处不在的这一观点方面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

- (1) Gananath Obeyesekere,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in Arthur Kleinman and Byron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39. 也见 Gananath Obeyesekere, *The Work of Cultur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in Psychoanalysis and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2) 转引自Obeyesekere,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141—142。
- (3) 转引自Obeyesekere,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142.
- (4) 转引自Obeyesekere,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139.
- (5) Obeyesekere,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 136.
- (6) Margaret Trawick, “The Ideology of Love in a Tamil Family”, in Owen M. Lynch (ed.), *Divine Pass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7—63, here 42, 44.
- (7) Jane Fajans, *They Make Themselves: Work and Play Among the Baining of Papua New Guin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19.
- (8) Greg Urban, “Ritual Wailing in Amerindian Brazil”,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0/2 (1988), 385—400, here 385. 也见Mark Münzel, “Tränengruß und weinendes Lied bei den Tupi in Südamerika”, in August Nitschke, Justin Stagl, and Dieter R. Bauer(eds.), *Überraschendes Lachen, gefordertes Weinen: Gefühle und Prozesse: Kulturen und Epochen im Vergleich* (Vienna: Böhlau, 2009), 221—236。
- (9) Unni Wikan, “Managing the Heart to Brighten Face and Soul: Emotions in Balinese Morality and Health Ca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1989), 294—312, here 297.
- (10) William Ian Miller, *Humilia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Honor, Social Discomfort, and Viol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2; here 98, 101.
- (11) William Ian Miller, *Humilia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Honor, Social Discomfort, and Viol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8.
- (12) Antoine Beaudeau de Somaize, *Le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ses* (ed.), Charles-Louis Livet (repr. Paris: Jannet, 1856; Hildesheim: Olms, 1972), 131—139. “叹息的类型学”这个表达和《女雅士词典》都来自Niklas Luhmann,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r. orig., *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1982], 66。
- (13) Joanna Bourke,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34. 又见Martina Kessel, “Die Angst vor dem Scheintod im 18. Jahrhundert: Körper und Seele zwischen Religion, Magie und Wissenschaft”, in Thomas Schlich and Claudia Wiesemann (eds.), *Hirntod: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Todesfeststell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1), 133—166; 关于19世纪欧洲大陆对被活埋的恐惧, 见“Klingel im Sarg”, *Der Spiegel*, 48 (1967), 177。
- (14) Bourke, *Fear*, 34.
- (15) Bourke, *Fear*, 34, 35.

- (16) Edgar Allan Poe, “The Premature Burial”, in *Th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ii (New York: Armstrong & Son, 1884), 484—505, here 502—503. (中译见 [美] 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英汉对照》，马爱农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 (17) Bourke, *Fear*, 37—39.
- (18) 两部读本收集了关于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的不同学科的关键文本：Helena Wulff(ed.), *The Emotions: A Cultural Reader* (Oxford: Berg, 2007);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r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9)。
- (19) 希罗多德论阿伽塞尔西人 (Agathyrsoi)：“阿伽塞尔西人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民族，他们喜欢佩戴黄金饰物。他们实行男女杂交，这样他们的男子都是互为兄弟的，既然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也就不会嫉妒和怨恨了。”Herodotu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iv, ed. Robert B. Strassler, trans.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325. (中译见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33—434页。) 塔西佗论日耳曼人的葬礼：“恸哭流涕，片刻即止；而悲悼之情则久而不衰。他们认为：对于死者而言，妇女宜于哭泣，男子则宜于悼念。”参见 Tacitus, *Agricola, Germany, and Dialogue on Orators*, trans. Herbert W. Benario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6), 76. (中译见 [古罗马]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8页。)
- (20) Georg Forst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His Britannic Majesty's Sloop, Resolution, Commanded by Capt. James Cook, During the years 1772, 3, 4, and 5*, ii (London: White, 1777), 133.
- (21) 转引自 Robert I. Levy, *Tahitians: Mind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ety Isla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97.
- (22) Levy, *Tahitians*, 97.
- (23) Levy, *Tahitians*, 98.
- (24) Levy, *Tahitians*.
- (25)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67. 关于人类学的历史，又见 Henrika Kuklick (ed.), *A New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8)。
- (26)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48—51; Fredrik Barth,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and Sydel Silverma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4 (*ab uno sanguine*).
- (27) Margrit Pernau, “An ihren Gefühlen sollt Ihr sie erkennen: Eine Verflechtungsgeschichte des britischen Zivilitätsdiskurses (ca. 1750—1860)”,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49—281, here 250.

- (28) Charles 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with an introduction, afterword, and commentaries by Paul Ekman (3r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56.
- (29) Barth et al.,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84. 关于巴斯蒂安, 尤其参见Klaus Peter Köpping, *Adolf Bastian and the Psychic Unity of Mankind: The Foundations of Anthropology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Münster: Lit, 2005).
- (30) É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 Carol Cos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r. orig.,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1912], 295—296. (中译见[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年, 第547页。)这段话被人类学家反复引用, 通常是为了超越仪式, 考虑仪式对“真实”感觉的相互影响。见Bruce Kapferer, “Emotion and Feeling in Sinhalese Healing Rites”, *Social Analysis*, 1/1 (1979), 153—176, here 153. “与涂尔干不同的是, 我认为当个人或团体通过仪式的文化媒介来表达愤怒、恐惧、爱、悲伤、憎恨和快乐时, 他们通常会真正感受到他们所表达的东西。”关于涂尔干和情感, 见Helena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e Einführung* (Konstanz: UTB, 2002), 61—89.
- (31)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 (32) “然而, 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 即使根据这一假设, 宗教也还是某种谵狂的对象。在集体的欢腾之后, 人们相信自己已经从眼前的世界被带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于这种状态, 除了谵狂, 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说法吗?”参见Durkheim,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71. 又见Barth et al.,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175, 184. (中译见[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汲喆译, 第308—309页。“异议”, 原译文为“疑议”。——译者注)
- (33) 总结见Durkheim,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318.
- (34) 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9), 140. (中译见[法]列维-斯特劳斯:《图腾制度》, 渠敬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 第83页。)
- (35) Durkheim,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176—177.
- (36) Lévi-Strauss, *Totemism*, 142; 原文强调。(中译见[法]列维-斯特劳斯:《图腾制度》, 渠敬东译, 第86页。)
- (37) 见欧文·林奇, “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是在无意中注意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种情感理论, 认知理论,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认知理论是一种将精神活动的某些方面——信仰、思想或判断——作为情感的基本要素, 并特别用来识别不同情感的理论”。参见Owen M. Ly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in Lynch (ed.), *Divine Passions*, 3—34, here 7—8.
- (38) 凯瑟琳·卢茨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相关段落中引用如下: 20世纪的理论心理学特别强调情感和身体之间的这种联系。以汤姆金斯定义为例, 他的情感观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理论之一: “情感是一套肌肉和腺体反应, 不仅位于脸上, 也广

泛分布于整个身体，会生成‘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感官反馈。”列维-斯特劳斯也利用了这种文化联系，他写道：“或者是体力的结果，或者是精神潜能的结果。”见Catherine A.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66, 原文强调。

- (39) 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已经成为利用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人类学家广泛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例如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3.
- (40) Bronisl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5, 7, 30—31. (中译见[美]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8、57页。)
- (41) William H. Rivers, *The Todas* (London: Macmillan, 1906)；又见W. H. R. Rivers, “Psychiatry and the War”, *Science*, 49/1268 (18 April 1919), 367—369; William Halse R. Rivers, *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 A Contribution to a Biological Theory of the Pseudo-Neuro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关于《重生三部曲》，见Pat Barker: *Regeneration* (London: Viking, 1991); *The Eye in the Door* (London: Viking, 1993); *The Ghost Road* (London: Viking, 1995)。
- (42) A. R. Brown [= Alfred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233—234.
- (43)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Eric Robertson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是受本尼迪克特影响的作品之一，见Ruth Leys,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4, esp. 123; Barth et al.,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296.
- (44)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13.
- (45)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ch. 9.
- (46) 1936—1950年间，米德与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1904—1980) 是夫妻。他们是几对人类学夫妻中的一对。贝特森后来开始研究控制论，他把民族精神理解为“一种由文化加以组织的情感系统”，见Catherine A. Lutz and Geoffrey M. White,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1986), 405—436, here 412. 又见Gregory Bateson, *Naven: The Culture of the Iatmul People of New Guinea Tribe as Revealed Through a Study of the “Naven” Ceremonial* (2nd ed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47) 关于米德，参见Nancy C. Lutkehaus, *Margaret Mead: The Making of an*

- (48)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Morrow, 1928), 127. (中译见 [美] 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周晓虹、李姚军、刘婧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第127页。)
- (49)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Morrow, 1928), 128.
- (50)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Morrow, 1928), 212, 212—213. (中译见 [美] 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 周晓虹、李姚军、刘婧译, 第194页。)
- (51) Clifford Geertz, “Chapter 3: The Growth of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i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81, 82; first published in Jordan M. Scher, *Theories of the Mind*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713—740. (中译见 [美]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年, 第100—101页。)
- (52) 格尔茨影响了布鲁斯·卡普费雷尔 (Bruce Kapferer) 等人, 后者可以被称为后涂尔干的格尔茨主义者。他指出:“僧伽罗人的治疗仪式既提供了一个由病人概念化的现实模型, 也提供了一个如何构想现实的模型。象征和象征行为被组织成仪式, ‘既将前者塑造成后者, 也将后者塑造成前者, 赋予社会和心理现实以客观的概念形式, 既将自己塑造成它, 也将它塑造成自己’。”见 Kapferer, “Emotion and Feeling in Sinhalese Healing Rites”, 156, 原文强调。爱德华·谢弗林 (Edward Schieffelin)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卢利人 (Kaluli) 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因此, 无论个人体验如何 (尽管卡卢利人试图让愤怒、羞耻和悲伤尽可能公开), 情感都是社会定位的, 并有一个社会目标。在此意义上, 情感不仅存在于个人身上, 而且也存在于社会情境和互动之中, 并且它们有助于构建这些情境和互动。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 对情感和文化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可以合理地将目光投向个人内心深处之外的社会互动过程, 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激发情感的来源, 还有情感的形式和意义的重要部分……格尔茨曾经说过, 不必去观察个人的隐私来理解重要的文化符号和信仰, 它们的意义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在很大程度上, 人类的情感也是如此。社会共有的意义不仅为个人情感提供了许多意义和含义, 这些情感也是他们所参与的情境的社会建构的一部分。”见 Edward L. Schieffelin, “Anger, Grief, and Shame: Toward a Kaluli Ethnopsychology”, in Geoffrey M. White and John Kirkpatrick (eds.), *Person, Self,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Pacific Ethnopsycholog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68—182, here 180.
- (53) Hildred Geertz,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 A Study of Javanes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2 (1959), 225—237, here 226.
- (54) Hildred Geertz,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 A Study of Javanes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2

(1959), 232, 236.

- (55) Hildred Geertz,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 A Study of Javanes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2 (1959), 236.
- (56) Ernest Beaglehole, "Emotional Release in a Polynesian Communit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3—4 (1937), 319—328, here 320.
- (57) Melford E. Spiro, "Ghosts, Ifaluk, and Teleological Functional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4/4 (1952), 497—503.
- (58) G. M. Carstairs, *The Twice Born: A Study of a Community of High-Caste Hind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59) Lutz and Whit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412.
- (60) R. D'Andrade and M. J. Egan, "The Colors of Emo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1974), 49—63, here 49.
- (61) Rodney Needham, *Essential Perplexitie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2 May 197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20 .
卢茨论尼德汉姆：“例如，尼德汉姆认为，在许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词汇，对于他们声称要描述的情感来说，必然是‘错误的’，他声称这是因为情感是自然的、普遍的，不受词汇中所表达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影响。”见Lutz, *Unnatural Emotions*, 67。1981年，尼德汉姆提出了一个更为谨慎的观点，他抱怨对情感的人类学研究是缺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家对情感这一话题几乎没有给予系统的关注。”然后问，是否有理由从情感的各种语言表达中得出结论，即情感是多种多样的。他接着回顾了从笛卡尔到埃克曼推演出基本情感的努力，并得出结论：“更让人困惑的是，虽然我们的情感生活中有那么多人为和偶然的因素，我们的情感生活依然具有如此的强迫性和个性。”见Needham, *Circumstantial Delive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99—102, quotations 99, 102。
- (62) 见Lutz and Whit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430。
- (63) Jean L. Briggs, *Never in Anger: 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 (64) Briggs, *Never in Anger*, 111.
- (65) Briggs, *Never in Anger*, 112评论说：“第一个秋天，我在日记中失礼地说，萨拉克是我所见过的两个最不可爱的孩子之一，另一个是萨拉克的小表弟罗西（Rosi），他的情绪更加暴躁，也同样口无遮拦。”尽管如此，不久之后，就连布里格斯也被萨拉克的魅力折服了。
- (66) Briggs, *Never in Anger*, 157.
- (67) Briggs, *Never in Anger*, 226.
- (68) Briggs, *Never in Anger*, 260.

- (69) Briggs, *Never in Anger*, 106.
- (70) Briggs, *Never in Anger*.
- (71) Briggs, *Never in Anger*, 106.
- (72) Briggs, *Never in Anger*, 258.
- (73) Briggs, *Never in Anger*, 258—259.
- (74) Briggs, *Never in Anger*, 302—303.
- (75) Briggs, *Never in Anger*, 41, 42.
- (76) Briggs, *Never in Anger*, 46.
- (77) Briggs, *Never in Anger*, 47, 原文强调。
- (78) Briggs, *Never in Anger*, 261.
- (79) Briggs, *Never in Anger*, 5. 凯瑟琳·卢茨强调了这种反思性民族志观察的新颖性：“布里格斯描述了她对雪屋屋顶融化的冰水滴在打字机键盘上的反应，以及她对这里的孩子‘专横’地要求她分享自己精心储藏的葡萄干的反应，这就引入了对田野考察的一种新认识。它至少暗示了人类学家的情感世界和我们表面上去‘观察’的文化一样值得关注。”见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2。
- (80) Briggs, *Never in Anger*, 20.
- (81) Briggs, *Never in Anger*, 144.
- (82) Briggs, *Never in Anger*, 4.
- (83) 关于布干维尔和塔希提，见Maurice Bloch and Jean H. Bloch, “Women and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in Carol P. MacCormack and Marilyn Strathern(eds.),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5—41, esp. 31, 37.
- (84) 见“Products: Special Cleaner: Rechargeable Vacuum Cleaner”, *Fakir-Hausgeräte GmbH* [website] <<http://www.fakir.de/index.php/emotion-as-350.html>> accessed 1 March 2014.
- (85) Levy, *Tahitians*, 285.
- (86) Levy, *Tahitians*.
- (87) Levy, *Tahitians*, 285.
- (88) Levy, *Tahitians*, 286.
- (89) Edmond de Bovis, *État de la société tahitienne à l'arrivée des européens* (Papeete: Impr. du gouvernement, 1909), 60, 转引自Levy, *Tahitians*, 289.
- (90) Edmond de Bovis, *État de la société tahitienne à l'arrivée des européens* (Papeete: Impr. du gouvernement, 1909), 291.
- (91) Edmond de Bovis, *État de la société tahitienne à l'arrivée des européens* (Papeete: Impr. du gouvernement, 1909), 292.

- (92) Levy, *Tahitians*, 298.
- (93) Levy, *Tahitians*, 271.
- (94) Levy, *Tahitians*.
- (95) Levy, *Tahitians*, 176, 198, 283. 20世纪70年代普遍主义情感人类学的另一个例子是Charles Lindholm, *Generosity and Jealousy: The Swat Pukhtun of Northern Pakist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该书受到了精神分析学家、依恋理论的先驱约翰·鲍尔比 (John Bowlby) 的启发。
- (96) 有关后结构主义对美国人类学影响的简要叙述, 见Barth et al.,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322—327。
- (97)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5, 原文强调。
- (98) Michelle Z.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4.
- (99)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55—56, 原文强调。
- (100)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14.
- (101)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19.
- (102)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19—20.
- (103) “愤怒本身既非善也非恶, 而是暗示了一种激情的能量, 这种能量会让年轻人努力工作、结婚、杀人和繁衍后代, 但是如果不受成年男性‘知识’的支配, 就会从事野蛮的暴力活动。在理想情况下, ‘知识’和‘激情’在‘心’中协同工作。”参见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27, 原文强调。
- (104)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32—34.
- (105)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52.
- (106)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38.
- (107) Rosaldo, *Knowledge and Passion*, 38.
- (108) 一个类似的例子: 美国人类学家史蒂文·菲尔德 (Steven Feld) 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卢利人中做过田野调查, 只有在公共场合哭得难以自持时, 他才获得了最大的尊重, 见Feld,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2nd ed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233, 也见261—263。
- (109) 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2.
- (110) 当然, 就阿布·卢赫德所宣称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而言, 像“双重身份者”这样的范畴是不被接受的, 因为它们假定了固定身份的存在。如果将身份当作建构过程的产物来处理, 这种矛盾就不会消失: “在人类学家正在研究的‘他者’同时被建构为 (至少在部分程度上) 自我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参见Lila Abu-Lughod,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ichard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137—162, here 140.

- (111)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53.
- (112)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70—73.
- (113) 她的兴趣转向情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使用了非结构化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不做记录，而是后来凭记忆记录下来。参见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3, 25.
- (114)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31, 181. 贝都因人对灵魂的建构与西方关于情感的物质内在空间的观念非常相似。
- (115)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20—221.
- (116)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103—108, 117.
- (117)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29.
- (118)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30.
- (119)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因此，妻子对侮辱的正确反应不是掉眼泪或口头反击，而是背诵一首诗，见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196—197.
- (120) Goffman,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戈夫曼的比喻显然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之上。
- (121)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37—238.
- (122)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239—240, 251—252, 256—257.
- (123) 两人还一起主编了一本书：Catherine A. Lutz and Lila Abu-Lughod (eds.),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4)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3, 22, 26, 29, 39, 151.
- (125)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4—17.
- (126)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3.
- (127)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 (128)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3—4.
- (129)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4.
- (130)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5, 原文强调。
- (131)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8.
- (132) 权势较低的伊法利克人如果想要处罚岛上居民的侵犯行为，会说违反了首领的“song”，而不是违反了禁忌，见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69, 158。关于“song”，见Lutz, *Unnatural Emotions*, ch. 6.
- (133)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20, 134.

- (134)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36.
- (135)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215, 55.
- (136)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56.
- (137)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56—7, 62, 67, 73.
- (138)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61, 71—72.
- (139)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92—94, 88—89, 82, 102—103, 87—88.
- (140)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128, 149, 152, 219.
- (141) 许多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民族志中的照片时会感到困惑，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人类学家穿着老式的牛仔裤、20世纪70年代的衬衫，留着长发，站在“原住民”旁边。这些照片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分析，即使是对图片稍微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也会感到吃惊。卢茨给一系列带有面部表情的照片配上的文字说明突然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比如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位露出乳房的母亲保护着自己赤裸的孩子，文字说明是：“摄影师告诉小女孩篮子里有一根皮下注射针，小女孩吓坏了，她的妈妈对她微笑着。”见Lutz, *Unnatural Emotions*, 50。关于旧式的民族志摄影中重要的去本质化，见Christopher Pinney, *Phot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
- (142) 不要和歌颂奎师那与湿婆的舞曲“raasa”或“raas”混为一谈。见Susan L. Schwartz, *Rasa: Performing the Divin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p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8), 20。
- (143) 见Susan L. Schwartz, *Rasa: Performing the Divin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p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8), 8。
- (144) Phillip B. Zarrilli, “Psychophysical Acting in India”, in Zarrilli, Jerri Daboo, and Rebecca Loukes (eds), *Acting: Psychophysical Phenomenon and Proce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72 . 又见Phillip B. Zarrilli, *Kathakali Dance-Drama: Where Gods and Demons Come to Play*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45) Schwartz, *Rasa*, 4 . 对《戏剧学》的评注有很多，见Phillip B. Zarrilli, “Psychophysical Acting in India”, in Zarrilli, Jerri Daboo, and Rebecca Loukes (eds), *Acting: Psychophysical Phenomenon and Proce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72 . 又见Phillip B. Zarrilli, *Kathakali Dance-Drama: Where Gods and Demons Come to Play* (London: Routledge, 2000), 17。
- (146) Balwant Gargi, *Theatre in India* (New York: Theatre Arts Books, 1962), 12 ; 转引自Schwartz, *Rasa*, 15。
- (147) Zarrilli, “Psychophysical Acting in India”, 72。
- (148) 见Richard A. Shweder and Jonathan Haid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Emotions: Ancient and New”, in Michael Lewis and Jeannette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0), 397—414, here 401。

- (149) Schwartz, *Rasa*, 97. 她还强调：“因此，表演具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在宗教仪式之内，还是在宗教仪式之外。正是通过表演，神圣性在印度变得触手可及。”见见Richard A. Shweder and Jonathan Haidt,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Emotions: Ancient and New”, in Michael Lewis and Jeannette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0), 6。
- (150) Lynch,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18.
- (151) Lewis Rowell, *Music and Musical Thought in Early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28.
- (152) Frédérique Apffel-Marglin, “Refining the Body: Transformative Emotion in Ritual Dance”, in Lynch (ed.), *Divine Passions*, 212—236, here 212. 也见 Frédérique Apffel Marglin, *Wives of the God-King: The Rituals of the Devadasis of Pur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3) Apffel-Marglin, “Refining the Body”, 212, 220.
- (154) Matthew Jones, “Bollywood, Rasa and Indian Cinema: Misconceptions, Meanings and Millionaires”, 它是对丹尼·博伊尔 (Danny Boyle) 导演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的评论，发表于 *Visual Anthropology*, 23/1 (2010), 33—43；又见Darius Cooper, *The Cinema of Satyajit Ra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55) McKim Marriott, “The Open Hindu Person and Interpersonal Fluidi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1980；转引自John Leavitt, “The Shapes of Modernity: 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ical Doctrines”, *Culture* 11/1—2 (1991), 29—42, here 33. 麦基姆·马里奥特 (Mckim Marriott) 关于印度教“个人主义”的观点招致了大量批评，见Steve Barnett, Lina M. Fruzzetti, and Ákos Östör, “On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dia: A Reply to Marriot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3 (1977), 599—601。
- (156) Lynch,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18.
- (157) 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8, 99.
- (158)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59.
- (159) Lynch,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19.
- (160) Niko Besnier, *Literacy, Emotion, and Authority: Reading and Writing on a Polynesian Ato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9.
- (161) Besnier, *Literacy, Emotion, and Authority*, 115.
- (162) Besnier, *Literacy, Emotion, and Authority*, 115.

(163) 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史蒂文·菲尔德，在《声音和情绪》（*Sound and Sentiment*）的第二版中描绘了卡卢利人在看到关于他们的书时的反应。见配有如下文字的照片：“基利亚（Kiliy3）和作者见证《声音和情绪》的到来，1982年7月1日。”见 Feld, *Sound and Sentiment*, 243。菲尔德对他选择卡卢利人的理由所作的陈述很有启发性：“事实上，很快你就会意识到，卡卢利人很快就会打开话匣子，并重复别人说的话。你不需要像我这样，来自美国东北部城市，又是犹太人，才会喜欢这种交流风格，但是我认为我的生活背景能够帮助我轻松地诠释这种生动的人际关系和语言风格，这是一种合作而不是咄咄逼人。为了探寻这句话背后的刻板印象，我要讲一个我在一次人类学会议上听到的笑话。据说有两种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族志。一种说那里的人粗鲁、务实、理性、固执、专横、偏激和精于算计。这些书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白人男性以及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新教徒写的。另一种把那里的人描绘成多愁善感、热情、活泼、迷人、好客、情绪化和敏感。这些书是女人和犹太男人写的。”他接着说：“暂且不谈即使是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文学的短暂审视也会证明这个笑话的概括是错误的。这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夸张的感知是如何成为种族、性别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基础的。每一位民族志学者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包括围绕着人际风格的一系列行为和价值观。”见 Besnier, *Literacy, Emotion, and Authority*, 250。

(164) James Davies and Dimitrina Spencer (eds.), *Emotions in the Field: The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Fieldwork Exper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eorge W. Stocking, Jr, *Glimpses into My Own Black Box: An Exercise in Self-Deconstr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165) 见 Arlette Farge, *Le Goût de l'archive* (Paris: Édition du Seuil, 1989); Randolph Starn, “Truths in the Archives”, *Common Knowledge*, 8/2 (2002), 387—401。

(166)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

(167) Clifford, *Predicament of Culture*, 9。

(168)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有关唯名论的介绍，见 Gonzalo Rodriguez-Pereyra, “Nominalism in Metaphys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1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1/entries/nominalism-metaphysics>> accessed 2 March 2014; Martin Jay, “Magical Nominalism: Photography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Culture, Theory & Critique*, 50/2—3 (2009), 165—183。又见卡拉·赫西（Carla Hesse）：“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现实主义是任何经验主义主张的必要基础，这种主张认为能够从证据中重构事实，并声称语言（以及更广泛的任何意义系统——视觉、文本或听觉）具有外延和内涵功能。此外，要想提出关于文化或人类存在任何其他方面可持续的一般主张，语言在某个层面是指称性的（即它指代的是自身之外的某种事物，虽然这种指代是偶然的）这一点很关键。”见 Carla Hesse, “The New Empiricism”,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1/2 (2004), 201—207, here 202。

- (169) 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是由艾伦·布卢姆 (Allan Bloom) 的《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引起的, 他将文学经典的流失归咎于1968年美国大学的反冲, 并为美国文化的多元化而哀叹, 又见Gregory S. Jay, *American Literature & the Culture Wa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70) 关于文化战争, 见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W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2/19(30 November 1995), 4—6; Richard Jensen, “The Culture Wars, 1965—1995: A Historian’s Map”,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9/1 supplement (1995), 17—37。关于非洲中心主义, 见Molefi Kete Asante, *Afrocentricity*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88), 又见围绕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所起的争论, 如Mary R. Lefkowitz, *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Jonathan Zimmerman, *Whose America? Culture Wars in the Public Scho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71)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16—43, 232—236。
- (172)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44—51。
- (173)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98—101。
- (174) 大卫·弗兰克斯 (David Franks) 指出: “米德的主要观点再一次不是关于情感研究本身”, “建立系统的情感理论的任务留给了他的追随者。”见David D. Frank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Symbolic Interaction*, 8/2 (1985), 161—170, here 163, 164。然而, 他认为相对于阿莉·霍赫希尔德, 情感对米德来说更重要: “同样地, 乔治·赫伯特·米德也没有谈论情感, 但他进一步从互动的角度为谈论情感开辟了道路。”见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12。又见Jonathan H. Turner,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Basic Theoretical Arguments”, *Emotion Review* 1/4(2009), 340—354, here 340。
- (175)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107—110。
- (176)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114, 115。
- (177)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89。(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 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 第121页。原译文有误, 译为了南方航空。——译者注) 也见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3 (1979), 551—575。
- (178)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4, 原文强调。(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 人类情感的商业化》, 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 第18

页。)

- (179)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90, 原文强调。
- (180)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05, 原文强调。
- (181)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原文强调。(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138页。)
- (182)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42。(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63页。)
- (183)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55。(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78页。)
- (184)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55。(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78—79页。)
- (185)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13—114。(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146页。)
- (186)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14。(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147页。)
- (187)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7, 原文强调。(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21页。)
- (188)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55.
- (189)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63.
- (190)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39。(中译见[美]阿莉·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第173页。)
- (191)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40.
- (192)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146, 原文强调。
- (193)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Introduction: An Emotions Lens on the World", in Debra Hopkins, Jochen Kleres, Helena Flam, and Helmut Kuzmics (eds.), *Theorizing Emotions: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9), 29—37, here 32.
- (194) 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32.
- (195) 关于戈夫曼,见Hochschild, *Managed Heart*, 214—218。
- (196) Hochschild, "Introduction", 30—31.
- (197) 对霍赫希尔德更进一步的批评,见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202—204。
- (198) 后来发表的作品有: Jürgen Gerhards,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 Literaturbericht",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38/4 (1986), 760—771; Rom Harré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eggy A. Thoits,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 (1989), 317—342; Rom Harré and W. Gerrod Parrott(eds.), *The Emotions: Social,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mens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W. Gerrod Parrott and Rom Harré, “Princess Diana and the Emotionolog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s*, 30/1 (2001), 29—38; Ansgar Klein and Frank Nullmeier (eds.), *Masse, Macht, Emotion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9); J.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ck Barbalet (ed.), *Emotions and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2);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Dirk Baecker, “Einleitung: Wozu Gefühle?”, *Soziale Systeme*, 10/1(2004), 5—20; Rainer Schützeichel (ed.), *Emotionen und Sozialtheorie: Disziplinäre An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6);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nathan H. Turner,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Monica Greco and Paul Stenner (eds.), *Emotions: A Social Scien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Jan E. Stets, “Future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2/3 (2010), 265—268.

(199)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9.

(200)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4.

(201)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4—345.

(202)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6.

(203) 佩吉·斯奥兹 [Thoits, P. A. (1990). “Emotional deviance: Research agendas”. In T. D. Kemper(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80—203] 通过强调实际情感和情感规则之间差异的来源、个人使用的各种情感管理策略和情感管理失败的情况，扩展了霍赫希尔德的理论。斯奥兹认为在下列这些情况下，实际情感和情感规则之间的差异都会增加：“当个人占据多个角色时（从而在情感之间建立潜在的角色冲突）；当一个人的亚文化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时（从而在两种文化预期之间产生冲突）；当个体陷入角色转换时，可能产生情感压力或与情感规则冲突的模糊性；当情感规则和确定情感规则的仪式过于僵化，不允许有丝毫偏离时。”见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6.

(204)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7.

(205)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51.

(206) Turner, “Sociology of Emotions”, 347—351.

(207) 易洛思在不同学科之间穿梭，这一点或许解释了她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弗拉姆非常全面的《情感社会学》（*Soziologie der Emotionen*）一书中。

(208) Eva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2 . 也见Eva Illouz, *Gefühle in Zeiten des Kapitalismus: Adorno-Vorlesungen 200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6); Eva Illouz,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209)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2.
- (210)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146.
- (211)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2.
- (212)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37.
- (213)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119, 120.
- (214) 易洛思评论其采访时说：“我的受访者的所有经历都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和一个紧凑的戏剧化结构。事件发生得很快，对主人公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所有的故事中都有障碍，阻碍了主人公将爱情故事带入婚姻或建立长久的关系。最后，它们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正在进行的、更加模糊的情节，而是有一个明确的结尾：几乎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爱情故事都有很强的叙事结尾。在50名受访者中，只有3人认为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的恋爱关系最浪漫，其他所有人的故事都有一个明确的结尾。”见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169.
- (215)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84—85.
- (216)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53.
- (217)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240.
- (218)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100.
- (219)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210—211.
- (220)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214 , 引用布尔迪厄《作为社会再生产策略的婚姻策略》(“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一文中的话,“幸福的爱情(就是社会认可的、注定成功的爱情)和命运之爱是同一回事,后者通过自由选择的方式将社会相容的伴侣聚集在一起,而这种自由选择只在表面上是不可预测的、偶然的”。这篇文章出自Robert Forster and Orest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trans. Elborg Forster and Patricia M. Ran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7—144 [Fr. orig., “Les Stratégies matrimoniales dans le système de reproduction”, 1972], 引言出自第140页。
- (221) Umberto Eco, “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 *Encounter* (April 1985), 7—18, here 17.
- (222)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175.
- (223) 见Luhmann, *Love as Passion*.
- (224) David A.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Todd Gitl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5).

- (225) Margot L. Lyon, “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2 (1995), 244—263.
- (226) Margot L. Lyon, “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2 (1995), 247.
- (227) Lyon, “Missing Emotion”, 251.
- (228) Lyon, “Missing Emotion”, 256.
- (229) Lyon, “Missing Emotion”, 258—259.
- (230) Anna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28, 47—48.
- (231)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6.
- (232)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233)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40.
- (234)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75—276.
- (235) Wierzbick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06—307.
- (236) Daniel M. Gr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 From Aristotle’s Rhetoric to Modern Bra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4.
- (237) George Lakoff and Zoltán Kövecse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in Dorothy Holland and Naomi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5—221, here 197, 200.
- (238) Lakoff and Kövecses,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197, 200.
- (239)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61, 85. 用语言学的话来说：“我想给出的一般结论是，大多数情感隐喻的源域并不特别从属于情感域，虽然有些是的。”见 Lakoff and Kövecses,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49.
- (240)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302. 关于罗姆·哈瑞，见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184—185.
- (241) 普遍性和“接近普遍性”，见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39.
- (242) 体温升高是一种普遍的对愤怒的生理反应，这是科维克塞斯提出的，他利用了列文森、埃克曼、海德和弗瑞森对北美人和苏门答腊岛西部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进行实验的结果，见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59. 科维克塞斯参考了Robert W. Levenson, Paul Ekman, Karl Heider, and Wallace V. Friesen, “Emotion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in the Minangkabau of West Sumatr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6 (1992), 972—988.

- (243)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160 . 科维克塞斯在文化普遍主义方面比我们更谨慎。他认为愤怒隐喻的普遍传播可能“纯属巧合”，“它可能是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的”，但是他相信普遍性和生理性提供了一个更确定的基础，见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59. 科维克塞斯参考了 Robert W. Levenson, Paul Ekman, Karl Heider, and Wallace V. Friesen, “Emotion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in the Minangkabau of West Sumatr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6 (1992), 162.
- (244)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165 , 原文强调。
- (245) 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183.
- (246) Pascal Eitler and Monique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Eine heuristische Perspektive auf religiöse Konversion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82—313, here 285.
- (247) Eitler and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290—291.
- (248) Eitler and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291.
- (249) Eitler and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292—293.
- (250) Eitler and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293 . 两位作者借鉴了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行为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习惯概念。
- (251) Nancy Scheper-Hughes and Margaret M. Lock, “The Mindful Body: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1987), 6—41, here 7.
- (252) Nancy Scheper-Hughes and Margaret M. Lock, “The Mindful Body: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1987), 28—29.
- (253) Nancy Scheper-Hughes and Margaret M. Lock, “The Mindful Body: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1987), 29.
- (254) Unni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A Balinese Formula for Liv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04—107 . 见她的重要文章“Managing the Heart to Brighten Face and Soul”。
- (255)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114.

- (256)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281 (“去异国化”)。
- (257)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270—272.
- (258)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123, 原文强调。
- (259)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123.
- (260) Wikan,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148.
- (261) 来自人类学的例子, 见在巴厘岛和许多南太平洋社会中发现的“解缠”(disentangling)习俗。在一个小组的背景下讨论和解决“纠结的感情”(即人际冲突), 乍一看很像西方的冲突解决策略。然而, 如果加以更仔细的比较, 就会发现两个显著的不同: 首先, 在巴厘岛, 没有真正的个人自我的概念, 而在西方, 自我的概念可以被心理治疗的病人或法庭上的法人所援用。相反, 在这里只有复数形式的人, 这些人只存在于“社会关系的矩阵”中。其次, 这种习俗与心理治疗中宣泄性哭泣这样的“情感的身体表达”无关。见Geoffrey M. White and Karen Ann Watson-Gegeo, “Disentangling Discourse”, in Karen Ann Watson-Gegeo and Geoffrey M. White(eds.), *Disentangling: Conflict Discourse in Pacific Socie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9, here 8, 12。
- (262) 有关历史比较, 见Heinz-Gerhard Haupt and Jürgen Kocka (eds.), *Geschichte und Vergleich: Ansätze und Ergebnisse international vergleichen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6); Hartmut Kaelble, *Der historische Vergleich: Eine Einführung zu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1999); Hartmut Kaelble and Jürgen Schriewer (eds.), *Vergleich und Transfer: Komparatistik in den Sozial-, Geschicht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3); 关于批评, 见Margrit Pernau, *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 (Stuttgar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esp. 30—35。
- (263) Lisa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The Making of a Mother Tongu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
- (264) Lisa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The Making of a Mother Tongu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 (265) Lisa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The Making of a Mother Tongu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 又见第69页: “就像印度使用的许多其他语言一样, 泰卢固语越来越多地被精心拟人化,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它也第一次开始被想象和描述为拥有独立于其口头和书面使用者的生命。尽管泰卢固语有时被比喻为诗人可能会从中得到乐趣的情色少女, 但直到19世纪, 泰卢固语主要被用作书面和口头交流的媒介, 语言游戏、艺术和音乐趣味及显示精湛技艺的媒介, 宗教和文学教育的媒介, 还有铭文、记录和会计的媒介。然而, 到了19世纪末, 泰卢固语也开始被视为一种新的拟人化的崇拜对象和引以为傲的对象, 一种特定的研究、教学和关注的对象, 并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在19世纪, 泰卢固语获得了一些新的属性, 包括诞生和拉玛·曼特纳(Rama Mantena)在她关于语言和历史时间的著作中所说的发展阶段和不断进步

的生命叙事。它还获得了一个谱系，与其他语言的亲属关系，以及自己死亡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泰卢固语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经历了一次新的完全人格化。从那时起，泰卢固语开始以一种新的人格化和性别化的形式出现，即‘泰卢固塔利’（Telugu Talli，‘泰卢固母亲’），以类人的形式——通常是女神——出现在描述性的叙述、诗歌、歌曲和艺术表现中。”见Rama Sundari Mantena, “Vernacular Futures: Colonial Philology and the Idea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India”,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42/4 (2005), 513—534.

(266)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11.

(267)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11.

(268) Mitchell,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7.

(269) Lindholm, *Generosity and Jealousy*, 273；又见第267页：“尽管存在着复杂性和模糊性，尽管人们对人类二元性的来源存在争议，但这些术语仍然有着惊人的呼应。我认为，人类确实有一种情感结构，它由与分离和独立有关的情感和与依恋和相互依赖有关的情感组成。这种情感结构可能来自长期的养育和强烈的母子关系，也可能来自天生的本能，或者两者的结合，它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尽管它的表达可以被社会环境所改变。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需要感受到自主性，所有人都需要体验到依恋感。这隐含在精神分析作品对人性的定义中。”

(270) 另一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情感术语的普遍性研究使用了比较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方法，见A. Timothy Church, Marcia S. Katigbak, Jose Alberto S. Reyes, and Stacia M. Jensen, “Language and Organisation of Filipino Emotion Concepts: Comparing Emotion Concepts and Dimensions Across Cultur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2/1 (1998), 63—92.

(271) Karl G.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Mapping Three Cultures of Emotion in Indo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iv . 关于海德和埃克曼的合作，见Paul Ekman, “Afterword: Universalit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Dispute”, in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63—393, here 383—384.

(272)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3.

(273)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3.

(274)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13 , 原文强调。

(275)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55.

(276)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7.

(277)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87—88 , 原文强调。

(278) 海德明确提到卢茨的语言学著作；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88.

(279)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57—58 . 对六种欧洲语言的研究见Klaus R. Scherer, Harald G. Wallbott, and Angela B. Summerfield (eds.), *Experiencing Emotion: A Cross-cultural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80)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113, 119.

(281) 例如，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认为，与情感现实相比，情感词汇是贫乏的，因为它们代表一个单一的类别，而不是涉及两到三种情况的混合形式，见Jerome Kagan, *What Is Emotion? History, Measures, and Mean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他接着说：“让我们同意暂停使用单一词语，例如恐惧……用完整的句子来描述情感过程，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赤裸裸的概念。”见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216。

(282)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7, 原文强调。

(283) 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98.

(284) 或许有人会批评海德书中偶尔出现的政治上不正确的说法，例如他把印尼的达尼（Dani）部落排除在外，理由是他们“还处于前文字阶段和蒙昧状态，我想了解的是文明的、有文字的文化”。Heider, *Landscapes of Emotion*, 21.

第三章 普遍主义：生命科学【147】

一、保罗·埃克曼和基本情感

图8显示了三种面部表情，分别表达了悲伤、愤怒和厌恶，请判断哪幅图片属于哪一种情感。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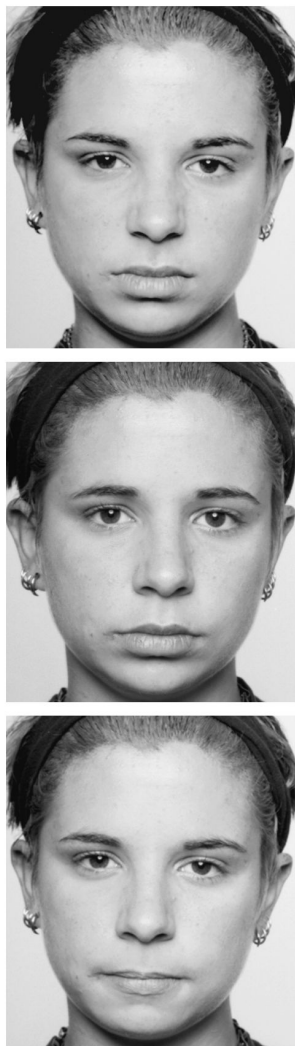


图8 悲伤、愤怒还是厌恶？请记下来！【148】

资料来源：©Paul Ekman 2003, Paul Ekman Group, LLC。

2009年初，电视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在美国开播。最终，其他50个国家购买了该剧的放映权。这部电视剧的主要人物是心理学家卡尔·莱特曼（Carl Lightman）博士，他经营着一家公司，帮助警方和安全部门开展刑事调查。该公司专门从事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通过研究揭示真实意图和感受的“微表情”来识别说谎者。无论专业的骗子怎样努力误导其提问者，这些微表情都逃不过提问者的眼睛。尽管有双方协议，但那些为公司工作的人还是会把他们的技术带回家。例如，莱特曼刚刚向他十几岁的女儿艾米丽保证，那天晚上不会对她的男朋友丹使用任何秘密的科学技术。但是当丹要带艾米丽出去时，莱特曼（我们可以用“移动的测谎仪”来形容他）打开门，来了一句：“你想今晚和我女儿上床吗？”然后开始以通常的方式研究丹的反应。⁽¹⁾

莱特曼的原型是保罗·埃克曼。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他一直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他也是保罗·埃克曼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9年，埃克曼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情感语言学领域的重要人物。【149】就像我们在第二章末尾提到，他还与人类学家卡尔·海德合作写过书和文章。⁽²⁾埃克曼是《别对我撒谎》的剧本顾问，而莱特曼与埃克曼的相似之处，从他母亲自杀等生平细节，到埃克曼与演员蒂姆·罗斯（Tim Roth）之间的任何体征上的相似之处，都在合同中有详细的规定。这种合作并没有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结束。在一个与电视剧相配套的博客中，保罗·埃克曼博士解释了“每一集背后的科学依据”。⁽³⁾这里决定性的重要因素是知识产权的使用，因为整个系列的想法都来自埃克曼对情感的研究。这项研究包括什么内容呢？

埃克曼最广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基本情感理论，即所有文化的人都有的一些基本情感，而且他们能够在他人身上识别出这些情感，其中包括快乐、愤怒、厌恶、恐惧、悲伤和惊讶。这些概念在英语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在其他语言中的翻译，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埃克曼来说，情感的表达并不是发生在语言中，而是发生在身体上，可以从脸上看出来。每一种基本的情感都有相应的不容置疑的面部表情，没有人能够隐藏这种表情。如果有人想要欺骗他人，或者当“表达规则”（埃克曼的术语）阻止基本情感的表达时，微表情总会泄露出来。微表情可能只持续不到一秒钟，但它们仍然会通过一切试图掩饰自己情感的行为“泄露”出去。⁽⁴⁾

普遍的面部表情是基本情感的主要特征。无论埃克曼的定义如何变

化，这个观点始终贯穿他的思想。⁽⁵⁾多年来，他对基本情感的选择和数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992年，埃克曼提出了六种基本情感：快乐、愤怒、厌恶、恐惧、悲伤和惊讶，他认为或许还可以加上轻蔑、羞愧、内疚、尴尬和敬畏。⁽⁶⁾【150】两年后，他谈到了五种已被证实的基本情感和三种可能的基本情感：

一致的证据表明，泛文化的面部表情包含五种情感：愤怒、恐惧、悲伤、享受和厌恶。对于惊讶、蔑视和羞愧／内疚是否有一种泛文化信号，仍然存在分歧。⁽⁷⁾

对于任何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来说，如此突然的改变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这让人怀疑，那些被认为固定不变的基本情感是否会发生变化，但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促进了多元主义的发展。认知系统相互重叠，即使在进步的逻辑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进步也是相对缓慢的（某些东西一旦确立，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在人文科学领域往往是数十年——才能被取代）。相比之下，自19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一直持一种短期的进步观。⁽⁸⁾在这一领域，每一种已经获得的知识的有效性只能延续到它被新的知识所取代之时。事实上，知识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来定义的：它将被取代。根据自然科学的观点，在对任何真实、有着最终结果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的同时，完善实验是很有可能。因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埃克曼考虑到由基本情感的“混合”构成的“复杂”情感的可能性，并没有什么对他不利之处。对埃克曼来说，测试用例“被认为是幸福和轻蔑这两种基本情感混合体的洋洋自得”。⁽⁹⁾他后来限制了基本情感的定义，认为只有基本情感才能被恰当地称为“情感”。⁽¹⁰⁾

埃克曼是如何想到基本情感这一概念的呢？科学史学家露丝·雷斯（Ruth Leys）批判性地审视了埃克曼所走的道路，并构建了一种“当代谱系”（genealogy of the present），明确地将其与米歇尔·福柯联系起来。雷斯明白，这是对当前学术趋势的一种诊断——在这种情况下，是许多从事人文和生命科学工作的人所采取的“情感转向”——识别出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并寻找它们的来源。⁽¹¹⁾就埃克曼而言，雷斯创造了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科学实践的发展路线（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使用摄影）与学术和文化趋势并驾齐驱。【151】

在埃克曼本人的叙述中，他在14岁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这是由

他母亲的自杀引起的，他后来意识到母亲患有抑郁症。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使他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他进而把自己作为分析对象，甚至在25岁左右时，他仍然在从事一项涉及团体和个人治疗的职业。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他接触到了B. F.斯金纳（B. F. 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中阐述的实验心理学方法。除此之外，他对摄影和现代舞也很感兴趣，后来，照片和非语言交流在他的情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克曼在芝加哥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在纽约获得了博士学位。1957年，他搬到旧金山，从此一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担任心理学家。先是做研究助理，然后是教授，并且还在军队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心理学家。⁽¹²⁾最初，埃克曼“服膺文化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习观”，他回忆说，他“完全相信关于表情和姿势的一切都是后天习得的”。⁽¹³⁾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另一位实验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的影响，这一认识发生了改变。汤姆金斯已经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主流分道扬镳。受达尔文关于情感的著作的影响，他提出了“情感程序”（affect programmes）的概念。这些都是特定的生理反应和行为方式，是由外部刺激引起的，不受文化、个人经历、意志或想象的影响。汤姆金斯认为，外部刺激会在大脑中那些在进化上最古老的部分引发反应，这些反应会自动以特定行为和身体动作的形式出现。雷斯这样描述汤姆金斯的方法：

如果我逃离一条蛇，这不是因为我相信有一个危险的东西在我面前，不想被它咬到，而是因为我害怕蛇。蛇的威胁就在那里，蛇让我害怕，因为在进化史上，蛇曾经让我们的祖先感到害怕。⁽¹⁴⁾

情感被视为刺激—反应序列的一部分，【152】今天我们人类对刺激的反应方式很可能并没有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但在当时却提高了我们祖先的生存概率。这个模型不允许其他说法的存在，例如，我逃离一条蛇，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我小时候被蛇咬过，或者因为它让我想起在我小时候强奸我的叔叔的阴茎，又或者我并没有逃离蛇，因为我喜欢爬行动物。露丝·雷斯称这种立场为“非意向性的”，而与其相反的意向性立场包括非常不同的方法，比如精神分析，在这种方法中，像蛇这样的客体不会自动在每个人身上触发相同的反应，而是由个人经历中形成的意义导致不同的反应，又比如在认知心理学中，强调的是评价的时刻。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说，对于雷斯来说，意向性和非意向性是20世纪后期情感心理学研究所围绕的两个极端。⁽¹⁵⁾埃克曼采纳了汤姆

金斯的假设，然后开始考虑可能证实这一假设的实验设计。首先，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汤姆金斯制作的面部表情照片，并要求他们将一组情感与照片中所描绘的情感相搭配。由于这些搭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埃克曼认为这初步证明了普遍主义的假设。(16)

接下来，埃克曼自己拍摄了一组展示各种情感表达的照片。他说：“我们从3 000多张照片中选择了一些出来，以获得那些只显示单一情感的照片。”正如露丝·雷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过程，因为在此过程中，根据命令所产生的情感被视为真实的，而不是模拟的。此外，挑选“纯粹的”和普遍的基本情感的过程不受任何控制，而是完全由埃克曼和他的同事凭直觉来决定。(17)【153】这里可以补充的第三点是，这几千张照片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面部情感表达大全，因为这些情感是通过发出的命令来模拟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命令将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情感现实简化为几个情感词。因此，埃克曼对语言的使用暴露了这个实验过于简单化的本质。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在回顾自己60多年的情感研究时建议，我们应该“同意暂停使用恐惧等单一词汇，用完整的句子来描述情感过程，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赤裸裸的概念”。(18)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到埃克曼的实验中，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让实验对象表达“恐惧”，一种是士兵盯着敌人的枪管时，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另一种是游乐场里骑着马穿过幽灵隧道时产生的一种自我诱发的、可以被称为“刺激”的恐惧，应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19)

为了证明这些情感的普遍有效性，以及它们的基本或“主要”特征，埃克曼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展示了一系列“纯粹的情感”（见图9）。大多数这样的实验使用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在这个实验中，他们选取了99名来自美国的学生，29名来自日本的学生，40名来自巴西的学生，此外还有32名来自新几内亚和15名来自婆罗洲的文盲。实验过程如下：

观察者的任务是从六种情感中选择一种与每张照片相搭配。在美国、巴西和日本，每次向一组大学新生放映20秒的幻灯片，其中外国出生的学生被排除在外。在新几内亚和婆罗洲，这些照片（13厘米×18厘米）被一一展示给每个观察者。这些情感词被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即日语、葡萄牙语、新美拉尼西亚皮钦语（Neo-Melanesian Pidgin）、福尔语（Fore）和比达尤语（Bidayuh）。在新美拉尼西亚皮钦语中，没有表达厌恶与轻蔑或惊讶的对应词

汇，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的是一个短语，如看到一些发臭的东西、看到一些新的东西。(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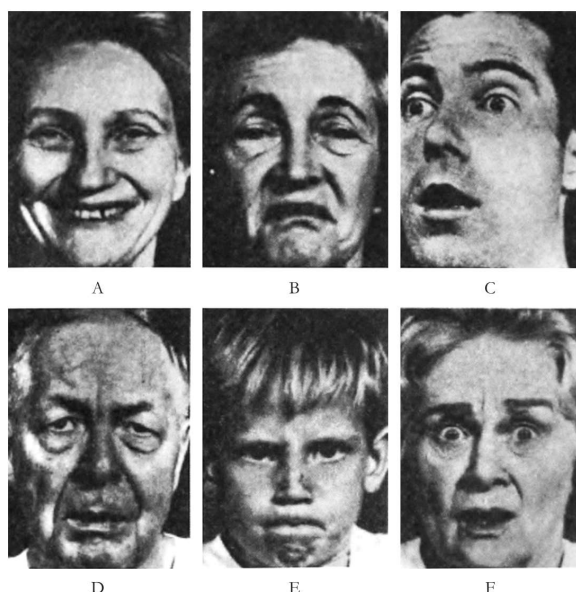


图9 向测试对象展示的面部表情的照片【154】

资料来源：Ekman, “Afterword”, 363—393, here 376 © Paul Ekman Group, LLC.

注：这些面部表情的照片被一张一张地展示给受试者10—15秒的时间。观者必须在愤怒、恐惧、悲伤、厌恶、惊讶和快乐之间做出选择，并决定哪一个词最适合哪幅照片。跨文化研究发现，A表现为快乐，B表现为厌恶，C表现为惊讶，D表现为悲伤，E表现为愤怒，F表现为恐惧。

结果，所有的实验对象都将相同的情感描述与相同的照片搭配在一起。考虑到实验构建过程中的同义反复，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每个实验对象都会看到一张脸的照片，这张脸被认为代表了一种纯粹的恐惧（如果埃克曼认为不能很好地代表这种情感，就会将其拿掉），以及六个情感概念的列表，其中一个“恐惧”的概念，这是实验对象被要求与照片相搭配的。

不久，埃克曼的实验设计就受到了批评。人类学家、著名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强调埃克曼收集的表达方式是不自然的，并抨击了“这是一种文化上未经修饰的情感表达，而不是情感的模仿”的观点。

(21)埃克曼所证明的仅仅是，“如果指定有限的特定情感，如悲伤、快乐、愤怒和厌恶，就有可能让不同文化的成员表现出这些文化之间可以

相互理解的模仿”。⁽²²⁾为了强化这一观点，米德在评论中配上了表达不同情感的戏剧面具。这种详细的批评与对埃克曼所实践的实验心理学的全面抨击相结合，这种心理学认为，【155】“每个学科的成员都把自己的专业方法当作唯一的方法”。⁽²³⁾米德的前夫格雷戈里·贝特森是一位人类学家和控制论专家，他强调了面部情感表达的社会和交际功能。他认为，这些面部情感表达并没有以一种直接和未经过滤的方式传达埃克曼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情感，而是被用来与他人交流，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包括意图、意志和语境。此外，还有来自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瑞·伯德惠斯戴尔（Ray Birdwhistell，1918—1994）的批评，他与米德和贝特森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他本人对情感表达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情感的非语言交流中没有具有文化普遍性的面部表情，而是有很大的文化多样性。当埃克曼最初的研究成果问世时，伯德惠斯戴尔指出，埃克曼研究的实际上并不是未受污染的文化，新几内亚雨林的原住民只是在模仿约翰·韦恩（John Wayne）和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因为他们都看过两人的电影。⁽²⁴⁾

为了反驳这种批评，埃克曼将他的实验扩大到更多的文化，其中有一种文化是非西方的，缺乏书面语言，即新几内亚西部的达尼人，今天它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初，卡尔·海德准备对这些人进行另一项田野调查，他表示愿意在修改埃克曼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一项研究。“由翻译讲述一个故事，这些达尼人选择与故事相符的面部表情”，而不是把一串被认为是基本情感的表达翻译成当地语言，让他们将其与图像搭配起来（见图10）。⁽²⁵⁾



图10 故事中人物的面部表情【156】

资料来源：Ekman, “Afterword”, 363—393, here 380 © Paul Ekman Group, LLC。

注：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人物，你的脸会是什么样子。A = 你的朋友来了，你很高兴。B = 你的孩子死了。C = 你生气了，要打架了。D = 你看到一只死猪躺在那里很久了。

按照埃克曼的说法，海德一开始时认为埃克曼的研究结果不能被证实，因为达尼人没有与表达普遍基本情感的英语概念相对应的表达。埃克曼认为，这种最初的否定倾向有力地加强了海德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而这些结果几乎与埃克曼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随后，埃克曼指出：

唯一的例外是达尼人无法区分愤怒和厌恶的表情，尽管他们能将这些情感与其他所有的情感区分开来。海德预见到了这一发现，因为他观察到达尼人会避免表达愤怒，常常用厌恶来掩饰。(26)

同样地，回顾起来，埃克曼注意到缺乏任何实证证据来证明表达规则，即通过标准化的社会表达模式来覆盖“真实”的基本情感。这涉及自然（基本情感）和文化（表达规则）之间的协调。埃克曼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以下实验：让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观看澳大利亚原住民青年做包皮环切的影片，同时还要观看外科手术的影片，所有这些电影都会令人紧张不安。(27)受试者将分别观看这些影片，并被秘密录像，作为对照，【157】他们也会在观看不会引发压力的“中性”影片时被录像。以这种

方式记录下来的图像将被展示给两组受试者，每组受试者都属于第三种文化。两组受试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和美国学生在相同的时间点做出了相同的情感反应。虽然被认为是“不可捉摸的东方人”，按照通常的刻板印象，日本学生会掩饰他们的情感，而这正是选择日本学生作为实验对比文化的代表的原因。

然后使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Facial Action Scoring Technique，简称FAST，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即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简称FACS）对录像进行研究，这一技术由埃克曼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华莱士·V·弗瑞森（Wallace V. Friesen）开发并申请专利，用于分析面部肌肉动作。这再次证实了在文化适应的表面下也可以检测到同样的基本情感。⁽²⁸⁾最后，实验被重复进行，先是让实验对象独自观看“有压力的”影片，用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对其进行录像。然后，受试者当着他们自己文化中“权威人物”的面观看同样的影片，这位权威人物实际上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博士生。结果发现，在第二个实验中受试者的“面部表情完全不同。日本人比美国人笑得更多，以掩饰他们的负面情绪”。⁽²⁹⁾可见，文化确实发挥了作用，虽然自然仍然是基本的，埃克曼总结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或后天培养的问题”。⁽³⁰⁾

埃克曼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他取代了伯德惠斯戴尔，成为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有关非语言交流的研究项目的顾问，这标志着他日益增长的声望达到了巅峰。雷斯写道：“埃克曼战胜了伯德惠斯戴尔，这是一次方法论上、学术上和体制上的胜利，这决定了美国情感研究未来几十年的命运。”⁽³¹⁾埃克曼自己的回顾性判断是，这代表着科学战胜了猜测，客观战胜了主观，以经验为基础的实验心理学战胜了建立在参与者观察基础上的人类学解释学，将观察者的地位定义为既位于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的内部，也位于其外部。⁽³²⁾雷斯本人的视角是科学史学家的视角，她在这里看到的是影像的暗示力量战胜了诚实和严肃的科学。这是便利性所取得的胜利，因为实验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埃克曼公司在网上提供的一组面部照片进行重复。这也是一场战略行动的胜利，一场以成功地将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边缘化而告终的胜利。特别是，它是情感作为想象中一种“硬的”普遍物理范畴的胜利，这本身与其他科学对这一范畴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关。⁽³³⁾【158】我们将会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21世纪初，人文科学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埃克曼的情感概念及其神经生物学分支。

正是由于埃克曼的研究成果被人文科学所吸收，本书才用如此多的

篇幅来介绍。在生命科学领域，埃克曼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已被神经科学所取代。现在，情感的运作原理要到大脑中去寻找，而不是在脸上。(34)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按照科学的程序和真实性原则，埃克曼的研究不攻自破。更确切地说，他的假设的经验证据可以说是非常薄弱的，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可以提出其他证据，仍然可以证实这些假设。让我们扼要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

(1) 利用情感状态的照片进行的实验构建是循环论证。首先，选择表示基本情感的概念简化了情感的复杂性。这些概念是否与基本情感相匹配，而不是与其他情感相匹配，这并不明确。然而，由于后者“更为复杂”，因此被先验地排除在外。同样不明确的是，为什么只使用英语中的情感概念，为什么没有尝试用其他语言来提取基本情感。其次，测试对象被要求通过面部表情来模仿所选择的、据称是基本的英语情感概念。第三，使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对照片进行分类，只选择那些似乎符合要求的基本情感的照片。但面部动作评分技术是利用原来的摆拍照片开发出来的。因此，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寻找“纯粹情感”的照片涉及循环论证。最后，研究人员向其他受试者展示的是被认为显示了基本情感的照片，然后要求他们将这些照片与最初用来形成这些照片的同一套概念匹配起来。即使是这样一种重复的实验设计，当实验在其起源的美国文化中进行时，依然没能建立起概念和表达之间的完全匹配。还有一点，读者们，你们是否正确地识别出了本章开头几张面孔所表达的情感？试试看！上边的这幅照片表达的应该是厌恶，中间的表达的是悲伤，下边的是愤怒。一旦离开美国，这种匹配度就会下降。有些所谓的基本情感根本就没有被记录下来，对于某种特定的基本情感，【159】有些非美国文化中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或者任何与其相接近的概念。

(2) 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文化中进行的实验是建立在讲述的基础上的，即围绕照片编造故事，把这些故事从英语翻译成当地语言，然后再翻译成英语。讲述和翻译的过程都弱化了图像与情感之间的联系。

(3) 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真正不受外来影响的。如果埃克曼的实验是在未受影响的文化中进行的，那么第二个实验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严格意义上讲，该文化已经不再是未受影响的了。这违反了实验可重复性的科学原则。

(4)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是面部表情，而且只有面部表情，被认为能表达一组特定的基本情感。埃克曼对面部的选择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有关面部表情的思想，然后到

勒·布伦的《情感表现法教程》（*Méthode pour apprendre à dessiner les passions*, 1668）和拉瓦特（Lavater）关于面相学的作品，再到达尔文和迪谢纳的照片。⁽³⁵⁾这一传统也得益于实验心理学的要求，以及其认识论和技术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情感在身体上位置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脑成像技术出现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在对情感进行实验心理学研究时，大脑是得天独厚的研究场所。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对于情感在身体中的确切位置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看到，拉莎理论和印度舞蹈并不认为只要观察面部表情就可以获得最充分的情感真实性。相反，面部表情被有意用来为戏剧效果服务。还有一些表达情感的方式因为我们对图像和视觉的执着而被完全忽视。例如，在这些实验中，嗅觉从来没有被提及过，然而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中，恐惧与出汗有关，因此也有嗅觉成分。

（5）正如露丝·雷斯所证明的，埃克曼对情感状态的照片的运用，被真实性与模仿之间的内在矛盾撕裂了。一方面，埃克曼批评了早期关于面部表情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使用了摆拍的照片。他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贬低了所使用照片的价值。但随后他就改变了立场，声称最有可能被摆拍的照片是最纯粹、最真实的。⁽³⁶⁾

（6）情感可以在最纯粹的表达瞬间被捕捉到，【160】这一想法的前提是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然而，即使是最先进的摄像器材，在拍照时也会有轻微的延迟，部分原因在于器材本身，部分原因在于手指必须按下按钮才能打开快门。因此，认为一切都可以实时捕捉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个实验模型来说，这种延迟是有问题的，因为该模型假定最自然的反应会立即跟随给定的刺激，毫无延迟，一个突然的口头命令（例如恐惧！）会产生一种受表达规则影响最小的情感。

（7）雷斯还考察了一个人独处、未被观察时的感受，与一个人在权威人物面前并被观察时的感受之间的差异。首先，在拍摄照片时，拍摄对象能够意识到摄影师的存在。即使当埃克曼在新几内亚拍摄照片和录像时，那些被拍摄的人也总是会意识到埃克曼作为摄影师的存在。然而，埃克曼也承认，实现“真实的”情感面部表情的理想环境是独处，并且是在一个人认为没有被观察的情况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实验使用的是一部隐藏的相机。⁽³⁷⁾

（8）使用隐藏摄像头对美国和日本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对埃克曼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对原来的实验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选择了沉默。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埃克曼实验室的“背叛者”艾伦·弗里德隆

德 (Alan Fridlund) 对这项研究提出了详细的批评。下面的几点批评最有分量。首先, 他对埃克曼的假设提出了批评。埃克曼认为, 在实验室环境中观看电影,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独自在家时的感受一模一样。弗里德隆德认为, 仅仅因为受试者在生理上是独自一人, 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也是独自一人, 因为指导实验的人总是一个潜在的观众, 而实验室本身就是实验进行的舞台。⁽³⁸⁾其次, 弗里德隆德指出, 当日本受试者在旁边有权威人士的情况下观看电影时, 他们不动声色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表达规则, 而是因为日本社会对礼貌的普遍要求。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在场的其他人身上, 而不是屏幕上。第三, 弗里德隆德批评了埃克曼实验设计中的假设, 即在实验过程中, 只有面部才表达情感。显然,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面部肌肉也被用来说话。面部动作评分技术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面部肌肉在表达情感时与说话时的区别, 【161】而这对实验结果产生了影响。⁽³⁹⁾

综合来看, 埃克曼情感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方法论问题十分突出。我再说一遍: 对埃克曼的大多数批评并非来自人文学科, 基本情感理论的不足已经被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心理学的常规标准所证明。⁽⁴⁰⁾

埃克曼的怀疑者日益形成网络并制度化。后一种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 2009年, 埃克曼的著名批评者莉莎·费德曼·巴瑞特 (Lisa Feldman Barrett) 和詹姆斯·拉塞尔创办了刊物《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这一刊物也发表情感史方面的论文。尽管如此, 埃克曼在学术界的其他领域, 以及在政治和流行文化中都很受欢迎。自“9·11”事件以来, 美国政治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 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激烈辩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在“9·11”事件之前, 这些辩论遵循的是相当可预测的、总体上“民主的”路径, 辩论在公开场合进行并会达成妥协。但是在“9·11”事件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不同的意见似乎已不被容忍, 焦点集中在全面安全而非相对安全的愿景之上。这个新时代的逻辑与埃克曼实验室的实验逻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埃克曼的方法假设, 人的情感可以从他们的脸上清楚地看出, 独立于产生这种情感的个人, 独立于他们的情感, 也独立于他们管理和引导他们情感的方式, 即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

考虑到这一切, “9·11”之后埃克曼成为反恐项目“通过观察技术筛查乘客”计划 (Screening Passengers by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简称 SPOT) 的教父也就不足为奇了。2004年测试阶段结束后, 到2012年初, 美国161个机场安装了SPOT机器。这些机器会捕捉面部“微表情”,

用来选择排队者中那些被认为有什么要隐藏的，或者在撒谎的人。⁽⁴¹⁾埃克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这一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

说这是根据一种未经检验的观察方法，对个人隐私无谓的侵犯，对于抓获企图炸毁一架飞机或将其撞向一座大楼的恐怖分子，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会侵犯乘客的公民权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40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对欺骗和行为的研究。我知道，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知道撒谎者的样子和行为，【162】如果不使用这些知识来搜索恐怖分子，那就是疏忽大意。除了行李检查、雷达扫描、炸弹嗅探犬和其他安全措施，观察技术还可以帮助降低风险，有可能会阻止类似于2001年9月11日那样的致命袭击。⁽⁴²⁾

实验室内的确定性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特有的认识论获得的：把现实缩小到几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通过两个变量之间已被证明的因果关系来确保内部效度，通过结果可以推而广之这一事实来确保其外部效度，通过在实验室外的自然环境中将得出同样结果这一事实来确保其生态效度。这些是支配实验心理学的法则，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在非常有限的适用领域可能是正确的。但外部效度至关重要，把实验室的实践引入混乱的政治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尤其是那些被安全话语所主导的政治实践，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创造自然科学所需要的那种界限。无论实验室制造的确定性多么诱人，它都无法在安全政策领域复制。无论是SPOT，还是国土安全部使用的五级警报（以特定颜色表示威胁级别），都永远无法创造绝对的安全，它们所能做的就是承诺可以做到绝对安全。

这一承诺的产生消耗了大量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公共资金。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这与要求有关国家安全的辩论再次回到政治逻辑，而不是安全话语的逻辑有关。不同的政治圈子和一种新的专家文化已经发起抵制。前者剥去了启蒙运动传统中伪科学的安全话语，而后者则坚持必须运用成本效益计算，即防范恐怖主义的高昂成本是否值得。⁽⁴³⁾

最近，从实验室向政治领域的转移已不再是一条单行道，而更像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埃克曼现在将自己的研究隐藏在安全逻辑中，声称他将不再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⁴⁴⁾这种科学上的不透明与公众越来越多的可见性相伴随。《别对我撒谎》只

是他一系列媒体露面 and 访谈中的最新一幕。【163】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说自己对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虽然做坏事被抓到但仍然想让我们喜欢他的家伙。”在199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克林顿否认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有染时，埃克曼声称自己可以通过表情看出克林顿在撒谎。

二、第三章的路线图

从这些导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章探讨的是一种特殊的观点。它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警告历史学科不要走其他人文学科的道路，草率地借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章的语气将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厉，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其他人文学科采用实验心理学研究方法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本书导言部分阐明的原则仍然有效，即历史学科必须尽可能保持开放，在处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邻近学科时不允许有任何禁忌。

那么，本章将探讨哪些内容呢？首先，我将阐述达尔文的情感心理学。然后我们将回到情感心理学研究的神学起源，然后按时间顺序先后介绍威廉·詹姆斯、卡尔·朗格和威廉·冯特。接下来讲解的是世纪之交的实验室实践，社会等级对大脑空间概念的影响，以及弗洛伊德作品中情感理论的缺失。然后，我将讨论心理学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情感繁荣”，介绍一些有影响力的范式，如沙赫特（Schachter）和辛格的方法以及评价学派。接着我将讲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神经科学热潮和脑成像技术。然后是对三个重要的神经科学假说及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的批判性介绍，分别是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里佐拉蒂（Rizzolatti）、加莱塞（Gallese）和亚科博尼（Iacoboni）的镜像神经元理论。最后，我将概述一个被称为“批判神经科学”的松散联盟的出现，这个联盟不仅包括神经科学家，还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已经超越了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立。

三、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之间的战场【164】

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于1872年以英语和德语出版，后来成为玛格丽特·米德等社会建构主义者与保罗·埃克曼等普遍主义者之间争

论的最重要战场之一。正如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所言，面对这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情感研究著作”，两派都在反复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解读。⁽⁴⁵⁾

1955年，米德出版了这本书的一个版本，并为此写了一篇引言。1972年，埃克曼被任命为100周年纪念版的编辑，但该版的出版被推迟到了1973年。⁽⁴⁶⁾ 1998年，埃克曼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标志着他的解读取得了胜利：这是有史以来编辑程度最高的版本，埃克曼将整段文字用方括号的形式插入第一版。他指出达尔文在什么地方是正确的，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自己在什么地方证实了达尔文，达尔文在什么地方证实了自己。此外，埃克曼还写了一篇后记，这是一篇关于他与米德、贝特森和伯德惠斯戴尔之间争论的详细叙述，都是从胜利者的角度（即埃克曼本人的角度）讲述的。

让我们试着解开围绕达尔文这部著作而展开的争论，从它最近的阶段开始，即从埃克曼作为胜利者的角度。埃克曼说，米德1955年的版本对达尔文著作的歪曲几乎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在1955年由玛格丽特·米德编辑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她收入了关于身势学的一次会议的照片，表明伯德惠斯戴尔、她本人和其他人被这种方法所吸引。在她对这一版的介绍中，米德没有提到达尔文关于表情普遍存在的观点，也没有提到“情感”这个词。相反，她赞扬了伯德惠斯戴尔提出的身势学这一新学科，并建议用“交流”一词来取代达尔文的“表情”一词。我想知道，如果达尔文知道他的书是由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介绍的，并且书中收入了那些最反对他的情感表达理论的人的照片，他会有何感想。⁽⁴⁷⁾

换句话说，按照埃克曼的说法，文化相对主义者米德把普遍主义者达尔文看作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165】埃克曼认为，1973年的100周年纪念版已经停止了这种兼并主义的宣传，虽然当时米德十分权威，而他只是一个无名小辈。通过接下来25年的不懈努力，他本人对达尔文的解读，成为唯一正确的解释，最终战胜了之前所有的解读。1998年版的前后分别是埃克曼的介绍和后记，他详细的评注使这一版成为史上唯一有效的解读版本。

埃克曼的一些评注值得品味。这里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原文被保留，埃克曼的评注被置于方括号内：

还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就是：究竟是那些在各种不同的

精神状态下所发出的声音在决定嘴的形状，或者是嘴的形状在被其他独立的原因所决定，而声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幼小的婴孩在哭喊的时候，就把他的小嘴张大；这种情形，显然是为了要发出充分的音量来而必须这样的；可是，这时候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因，嘴就采取了近于四方形的形状；后面将要再说明这种情形；它是由于眼睑闭合和上唇因此被提升起来而形成的。我不打算在这里谈到，究竟嘴的这种四方形使号泣声或者哭喊声变化到什么程度；可是，我们可以从黑尔姆霍兹（Helmholtz）和其他研究家的研究著作里知道，口腔和嘴唇的形状在决定着嘴里所发出的元音的性质和音调高低。

[谢勒和我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试图发出一个连续的声音，同时改变我嘴周围不同肌肉的收缩。谢勒对我发出的声音的分析表明，绷紧嘴巴周围不同部位的肌肉（口轮匝肌）对声音的高低有明显的影 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也没有发表这一发现。] (48)

在这里，埃克曼试图通过描述他本人的一个实验来证实达尔文的一个论点。我们不禁要问，在描述一个由一位心理学家朋友（谢勒）指导的非正式实验时，他是否帮了达尔文或者他本人的忙。在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是埃克曼本人，实验结果从未发表过，而且很难复制。在第二个例子中，埃克曼纠正了拉马克（Lamarck）关于后天特征遗传的观点，有些矛盾的是，这些观点出现在了达尔文的书中，尽管达尔文反对拉马克的理论：

如果有一种突发的噪声，而它的刺激由于听觉神经而被传达出去，那么它所引起的惊起，在成年人方面，就同时会引起眨眼的动作来。可是，我观察到，我的几个婴孩在出生了两星期的时候，虽然会由于突然发生的声音而惊起，但是确实并不时常因此眨眼；而且我相信他们绝没有眨过眼。年纪较大的婴孩的惊起，显然表明出一种想要去抓住某种可以阻止跌倒的东西的模糊企图。当我的一个婴孩出生了114天的时候，我把一只厚纸做的匣子靠近在他的眼睛面前挥动，但是他的眼睛一次也没有眨动；后来我把几颗糖果放进纸匣里去，仍旧在原来的位置上把纸匣挥动起来，这个婴孩就每次眨眼，并且略为惊起。显然在这里不可能去假定说，这个被保育得很周到的婴孩会根据经验来知道，在他的眼睛附近所发生出来的沙

沙声就表明是一种对眼睛的危险。可是，这种经验却是在一连经过了很多世代的长时间以后渐渐地获得的；【166】根据我们在遗传方面的知识来判断，如果亲代初次所获得的习惯在子代里表现出来，那么子代在表现出这种习惯的时候的年龄，绝不可能小于亲代在获得它的时候的年龄。(49)

这里运用了一个策略：埃克曼能够通过插入不完全正面的评论，来披上超然和公允客观的外衣，从一个100年后的视角来批判和纠正，而在这期间达尔文的许多假说都可以得到验证。此外，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于经验主义和真理价值观的年轻科学家，勇敢地反抗地位已经牢牢确立的学术权威（米德和贝特森）和他们的傀儡（伯德惠斯戴尔）。正如科学公正所要求的那样，批评者被顺便提及，但他们被呈现为与埃克曼的实验无关。例如，弗里德隆德曾是他自己实验室的一名成员，但后来脱离了出来，埃克曼在书中是这样说他的：

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反对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的声音再次出现。美国心理学家艾伦·弗里德隆德抨击达尔文没有强调表情的交流价值……弗里德隆德赞同贝特森和一些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把表情视为情感是没有用的，而应该将其作为交流信号……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两分法是错误的。(50)

关于弗里德隆德的内情，即他们曾合作多年，并联合发表了作品，他只字未提，而是全盘否定了弗里德隆德的批评。

与埃克曼有关的另一个主题将我们带回第二章所涉及的问题，即是普遍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对普遍情感的确认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表现得有些过于激烈。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人类学家斥责埃克曼，称他的研究是“法西斯主义”。(51)米德和贝特森等文化相对主义者确实遵守了通常的学术礼节，但实质上对埃克曼也同样严厉。由于他们的年龄足够大，曾经目睹了优生学在纳粹主义时期是如何被利用的，因此很清楚地看到普遍人类标准的假设所固有的危险，因为任何对这些标准的偏离（例如残疾）都会导致边缘化，并可能会被认为是病态的、有罪的。他们认为如果把差异作为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他们此时似乎铭记着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性历史。这是一种弱化版的普遍主义，被理解为各部分的总和。与此同时，从埃克曼的研究得出的普遍主义结论的方式中，米德、贝特森和

他们的盟友看到了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改革的威胁，因为这些改革都以弱势社会群体的可塑性及其做出改变的能力为前提。“【167】这就是非裔美国人的样子，你无法改变他们。”在他们看来，这个恶毒的普遍主义观点也贯穿了埃克曼的研究。但文化等级制度的拥护者也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不仅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自达尔文时代起，他们就一直反对所有肤色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同样感受的观点，民权运动的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埃克曼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末，他遭到“一名黑人激进分子”的攻击，他指责埃克曼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声称黑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没什么不同”。⁽⁵²⁾

埃克曼一直声称，他从一开始就受到民权运动反种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推动。他指出，就政治含义而言，他的研究更多涉及团结和友爱。⁽⁵³⁾最终，他试图强调达尔文反种族主义的一方面，他认为在这方面，达尔文是远远超前于其时代的。我们可以在1998年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找到下面这段话，同样，埃克曼的评论是用方括号括起来的：

猿类的不同的种和属，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事实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这对于是不是应当把所谓人种看作是独立的种或者变种这个问题有几分关系；因为我们从下面几章里可以知道，全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都用显著的同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感觉，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出来。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一些声称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人提出，不同的人种不是来自同一个祖先，而是来自不同的祖先——白种人的祖先比黑种人的祖先更高级。达尔文关于人类情感表达是相同的这一观点有力地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即所有人类都有共同的祖先，这挑战了一个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观点。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指出，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一书中确实提到过“高等”和“低等”种族。] ⁽⁵⁴⁾

这让我们回到达尔文的书以及米德和埃克曼谁的解读更可信的问题。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如何解释其非凡的适应性（可以被不同学科截然相反的立场所借鉴）？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说法，当他第一个孩子在1840年出生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本书的最初构思：

我曾经观察自己的初生婴孩，打算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婴孩

在和其他小孩共处的时候，还绝不会学习到任何事情；同时我确信，在这小小的年纪，而且还不能靠经验来学习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理解到微笑，由于看到微笑而感到愉快，同时用自己的微笑来应答它。(55)

直到后来，达尔文才以科学家的身份开始研究情感，【168】并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他最初的想法是将其纳入他的《人类的由来》（1871），但是那本书的篇幅在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他就把这方面的材料排除在外。在完成《人类的由来》之后，他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写出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后来，埃克曼不厌其烦地把自己描绘成这位杰出预言家这一被遗忘的关键文本的发现者。1998年版被描述为“达尔文被遗忘的杰作”的“第一个最终版”。强有力的声音支持这一观点。史蒂文·平克指出在保罗·埃克曼对情感普遍表达方式的研究重新激起人们兴趣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人们或多或少忽视了达尔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从未被忽视，甚至在19世纪成为畅销书。自1872年出版以来，这本书的英文版不断被重印，到1976年已经有73个版本。(56)

达尔文花费多年时间收集资料，并进行了归纳。他把归纳得出的一般结论放在书的前面。他从三个原理谈起，乍一看来，这三个原理不一定与情感有关，但在他看来，这三个原理是所有情感表达的基础。第一个原理与“有用的联合性习惯原理”有关：

一定的复合动作，在已知的精神状态下，为了减轻一定的感觉或者满足一定的欲望等而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用处；每次当这种同样的精神状态被诱发出来的时候，即使这种情形很微弱，也就会靠了习惯的和联合的力量而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去完成同样的动作，即使这些动作在这一次完全无用。(57)

因此，狗在排泄完粪便后，“往往同时把自己的四只脚向后搔土几次，甚至在光秃的石子铺的路面上也是这样，好像它的目的是要用泥土去覆盖自己的粪便似的”。(58)如果遇到难题，人们会挠头，就好像可以在脑子里抓住一个想法，虽然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59)

第二个原理是“对立原理”，它假设每种情感都有其相反的一面。达尔文将狗尾巴的友好摆动解释为狗准备攻击时不动的尾巴的对立面。摇尾巴的原因不是外部刺激，而是一种相反的情感表达。达尔文用同样的

方式解释了人们耸肩的方式，把耸肩与充满疑问的脸、扬起的眉毛和头部的倾斜联系起来。【169】这与咄咄逼人的姿势相反，后者是下巴向前伸，眉头皱起，头部挺直。(60)

第三条原理是“神经系统的直接作用”。这是“由于神经系统的构成独立于意志，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习惯”。(61)达尔文的意思是多余的神经能量转移到了肢体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通过这些部位表达情感。不仅因为害怕而发抖能说明这一原理，而且下面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举出一种最显著的情形，来证明神经系统在受到强烈的刺激时对于身体的直接影响；不过这是一种稀有的反常现象，就是毛发的颜色褪失；有时在一个人发生极度的恐怖和悲哀以后，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62)

在提出了这三个原理之后，达尔文列举了大量基于这些原理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并不总是可以明确地归因于这些原理。由于其他原因，《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也对现代读者提出了挑战。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论点。当达尔文试图总结他的论点时，很明显他的畅销书是多么自相矛盾和模棱两可。除此之外，还有后来一些作家的偏见，他们对达尔文的论点发表了一些陈词滥调。埃克曼等人传播的观点之一就是，达尔文是情感研究中文化普遍主义的创始人。埃克曼说：“达尔文认为我们的情感表达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是进化的产物。”(63)的确，《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假定了一种普遍性，一口气说出了人与动物露出牙齿、闭上眼睛和腿部肌肉紧张的情况。通过这样做，达尔文将动物人性化，并将人类“动物化”。与他同时代的人觉得前者很感人，但对后者并不感兴趣。基督徒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会接受达尔文关于暴露牙齿行为的进化起源的观点，毕竟，对于19世纪的英国公民来说，露出牙齿并不会增加生存概率，因为他们很少去咬敌人。因此，达尔文认为，这种习惯起源于用牙齿战斗的动物，如土狼和狗（图11）。



图11 暴露牙齿的行为被视为进化的残余【170】

资料来源：Darw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246。

有人对达尔文的这一论点表示担忧，即年轻女性脸红与她天生的、上帝赋予的羞怯没有关系，而是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⁶⁴⁾达尔文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争议性，但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他很少强调情感的进化观点，即情感的表达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优势，因为它使警告和威胁成为可能。

将人类和动物同等看待强调了非语言的、身体的情感表达，而忽略了对语言表达。在这一点上，达尔文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么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实验心理学领域更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条件降低了对情感语言表达的关注。人们对主观体验不再感兴趣，例如病人对心理学家的问题的反应，他或她的感觉如何，或曾经有过什么感觉。同样，任何有关有意识地、依靠意志来控制情感的问题（用露丝·雷斯的话来说就是“意向性”）也变得无关紧要。为了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情感，并产生符合年轻的实验心理学的认识论需求的结果，就必须让情感摆脱语言，将其简化为身体的动作。

与这种普遍主义的潜在声音相对应，《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充满了反对普遍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这些表明了达尔文作为经验主义者的立场，他以归纳的方式展开，收集他所能收集到的材料，然后对其加以描述。在这里，达尔文似乎经常被困在第一个描述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即几乎没有进一步发展他最初提出的三个原理。实证例子来源很广泛，包括对儿童、智力有问题的人、老年人、来自非欧洲文化的人、家养宠物和野生动物的行为的观察。达尔文利用了他自己的观察（包括他对自己的孩子和宠物的观察），其他研究人员对动物的描述，【171】精神病院院长的了解，以及36份调查问

卷的结果。在这些问卷中，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记录了他们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印象。达尔文几乎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材料与对艺术的评论以及古代作家、《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语录结合在一起，而没有对这些非常多样化的“材料”之间的差异做任何评论。

如果我们以新西兰为例，就会看到为什么达尔文被更多地贴上文化相对主义者而不是普遍主义者的标签。他强调，“当地妇女可以随意地大量流泪”，尽管哭泣“似乎是最基本、最自然的表达痛苦的方式，无论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就像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那样”。⁽⁶⁵⁾在另一篇反驳无论何时何地眼泪都是痛苦的表征这一论点的文章中，他指出，对于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的居民来说，“据路易·德·弗雷西内（Louis de Freycinet）的说法，眼泪实际上被认为是幸福的表征”。⁽⁶⁶⁾下面这句话听起来与此很相似：“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即郇和）告诉我，他经常看到中国人在极度悲痛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⁶⁷⁾接着，达尔文讨论了接吻：

我们欧洲人如此习惯于把接吻作为一种爱的表征，以至于它可能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火地岛人杰米·巴顿（Jemmy Button）告诉我，这种做法在他的国家是不为人知的。新西兰人、塔希提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人、非洲的索马里人以及因纽特人也同样没有这个习惯。⁽⁶⁸⁾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在情感表达中文化相对性的例子并没有被达尔文忽视或掩盖，而是被埃克曼对达尔文的解释所忽视或掩盖。

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拉马克主义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经典”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甚至本节开头引用的心理学教科书也承认困惑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读到：

你可能认为达尔文会提出情感对我们的生存发挥了作用。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这就是他所说的，但他并没有。⁽⁶⁹⁾

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个战场上，目前还没有停火的迹象。恰恰相反，前不久丹尼尔·格罗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用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来捍卫人文学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申达尔文是一位理论家，他的精妙思维对人文科学的贡献是无与伦

比的。(70)【172】根据格罗斯的观点，达尔文的情感概念“解释了情感的媒介、场合和社会情境”。(71)

达尔文不像埃克曼那样，试图通过援引“表达规则”的变体来掩盖对迪谢纳照片中情感表达的不同解释。他指出，无论有没有书面解释，展示照片的结果都不一样。用达尔文本人的话来说：

这种展示照片的试验，对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这使我相信，我们多么容易被自己的想象所迷惑，而且当我第一次观看杜庆博士的照片，同时阅读他的说明书，并且因此知道了它们所应该表明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就对全部照片（除了少数几张照片以外）的真实性发生极大的惊叹。可是，如果我只查看这些照片而没有看到任何的说明文字，那么显然无疑地我也会像已经讲到的其他的人一样，在有些情形方面，发生很大的迷乱了。(72)

埃克曼把情感限制在短暂的、自发的生理事件上，认为只有六种基本的情感；而格罗斯指出，达尔文强调的是想象力，以及诸如爱、同情、憎恨、怀疑、嫉妒、吝啬、骄傲等情感。(73)达尔文意识到了情感的复杂性，而不是埃克曼那样精确而独特的情感类别。(74)与埃克曼志同道合的同事、脑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使用了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品中的文化产品作为其论文的文本装饰和插图，而在达尔文那里，这些资料提供了人类行为的例子，因此需要解释。(75)根据格罗斯的说法，埃克曼“模糊了达尔文作品的微妙之处”，并以一种“贫瘠化了的达尔文理论”蒙骗了整个世界。格罗斯的结论是：“正如一个多世纪前达尔文所理解的那样，我们有很多原因需要艺术和人文学科，其中包括一门既能解释我们现在的基本生活方式，又能解释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科学。”(76)这与其说是针对达尔文，不如说是针对埃克曼，而且不管这种观点多么高尚，它都太极端了。但它再次表明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其实际内容之外的真正意义，即它仍然是一部意见分歧很大的作品。

四、心理学情感研究的开端，或者说感觉、激情和情绪的变化如何从神学转移到心理学，并在此过程中成为“情感”【173】

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并不是在真空中写成的。托马斯·迪克森通过追溯英语中元范畴“情感”的发展，概述了其历史。他认为这是

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复杂性在许多方面成为输家：“情感”语义场包含了一系列由“激情”“心灵之爱”“情绪”“欲望”和“快感”等较早的个体概念所传达的不同含义。(77)迪克森认为，这种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元范畴的过程始于18世纪30年代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在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的《人类心灵哲学讲座》中达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他是爱丁堡人，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发表于1810—1820年间。(78)这一过程与我们称之为世俗化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线性化。像“激情”和“心灵之爱”这样的概念属于《圣经》和神学，而“情感”这一范畴则是一个涉及有机体和自然概念的科学词汇。这种取代使情感有可能被看作是独立于形而上学的影响，后来又被看作是不受任何意志或意图影响的纯粹的物理过程。世俗化以及这种与意志的分离，反过来使人类和动物共有的情感的动物化成为可能。这是基督教宇宙论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因为对基督教宇宙论来说，感知能力是人性的标志，它“和理性一起，构成人类心智中特别优越的特征”。(79)

在思想史研究中，迪克森发现，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1819—1903）这样从进化论角度思考问题的早期情感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与达尔文一样，与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在与基督教神学对话，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的出发点。以斯宾塞为例，他反对人类的智力发展是由形而上学的实例来指导的观点，其中包括大脑和情感的发展。在他看来，智力的发展确实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这是一个遵循进化规律的自主过程。(80)与斯宾塞和达尔文不同，贝恩并没有明确否认意志的存在，也没有否认意志会影响情感。他把意志整合进来，形成了一个包含意志、认知和情感的三角模型。【174】他将意志及其影响定义为一种驱动肌肉运动的精神运动，其中包括那些负责表达情感的肌肉。这台发动机是由食物提供的能量驱动的，或者用迪克森的话说：“食物取代上帝，成为意志的原动力。约翰·格罗特（John Grote）等贝恩的基督徒读者反对这种新的科学心理学，这并不让人奇怪。”(81)

虽然斯宾塞和贝恩在世时（主要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受到了英美公众的广泛欢迎，但达尔文的名声却经久不衰。他也绝对是最复杂的例子。我们该如何解释《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非达尔文主义”内容呢？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将情感与对生存有用的身体属性联系起来，而且还提醒人们注意它们的无用性和多余性。可以说，达尔文是他自己的反基督教论战的受害者，这场论战往往给他的进

化论和生物学论点蒙上阴影。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早期一些作品的批评上，主要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774—1842）的《表达的解剖与哲学随笔》（*Essays on the Anatomy and Philosophy of Expression*，1824）。这本书宣扬了一个无所不知的造物主的天意，例如一个年轻女子脸红是上帝赋予她的一种机制，保护她免受不道德行为的伤害。⁽⁸²⁾这使达尔文忽略了情感表达在进化上的可能优势。⁽⁸³⁾迪克森持不同意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仔细阅读，他认为达尔文从查尔斯·贝尔、托马斯·H.伯吉斯（Thomas H. Burgess）以及其他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多。事实上，迪克森认为，《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是通过类比《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来构建的：虽然亚当和夏娃最初控制了他们的行为和感情，但这一切都随着夏娃咬了一口苹果而失去了。迪克森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达尔文这本书包含了一个非基督教版本的奥古斯丁式人类堕落的故事，把情感的表达描述为“人类机器的故障”。⁽⁸⁴⁾

这种基督教神学元素被转移和重新引导并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的观点，比基督教思想逐渐消失的线性世俗化过程更具吸引力。⁽⁸⁵⁾此外，这种转移和重新引导的框架也提供了一部分解释，即为什么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所有研究情感的人，如达尔文和其他我们很快要讨论的人一样，如此努力地把情感从自由意志或意图中分离出来。⁽⁸⁶⁾在这一时期，心理学这门新科学出现了，它有必要将自己从其他竞争的科学（尤其是神学）中分离出来，创造自己合法性的领域和形式。【175】它还必须将自己与“反科学”的基督教宇宙论明确区分开来。正如迪克森在解读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时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因素不断地重新出现，这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关于情感的长期传统在深层次的持续影响。情感与自由意志的分离发生在19世纪后期，这可以用实验心理学实验室的还原论认识论和实践来解释。⁽⁸⁷⁾当时发明的现代心理学实验设计很难测量人类和动物的感受，以及人类是如何评估、处理和影响自己的情感的。实验设计发展的过程确实是相互的：认识论决定实验，反之亦然；情感实验决定了情感概念，反之亦然。

大约在同一时期，新兴心理学的代表们形成了一种脱离自由意志和意图的情感生理学观念，可以应用于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由于出现了一个跨国的科学界，其成员相互通信，在会议上碰面，互相发送书籍和副刊，并交换博士生，这种观念迅速传播开来。这种跨国网络使我们无法确定情感与意图的分离究竟从何而来，因为它往往与一位特定的心理

学家有关（最多两位，见下文），他就是威廉·詹姆斯。1884年，詹姆斯写了一篇文章《情感是什么？》，这篇文章和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起，可能是情感方面被读得最多的心理学文本：

相反，我的论点是，身体的变化直接跟随着对刺激性的事件的感知，这些变化发生时我们的感觉就是情感。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失去了财富，我们就会难过哭泣；如果遇到一只熊，我们就会惊吓而逃；如果被对手侮辱了，我们就会生气而发起攻击。这里需要辩护的假设是这个顺序是不正确的，一种精神状态不是由另一种精神状态直接引起的，身体的表现必然会介入两者之间。更合理的说法是，我们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哭泣，感到生气是因为我们攻击，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发抖，而不是说我们哭泣、攻击或发抖是因为我们感到难过、生气或恐惧。如果没有感知之后的身体状态，后者在形式上将仅限于认知层面，苍白、单调、缺乏情感的温度。我们可能会看到熊，认为最好是逃之夭夭；受到侮辱，认为应该发起攻击，但我们实际上不能感到恐惧或愤怒。⁽⁸⁸⁾

因此，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逃避蛇（或熊），【176】而是在受到刺激（发现蛇或熊）后身体做出反应（瞳孔放大、呼吸急促、肌肉紧张、脉搏加快），这种反应就是情感。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情感主观性和个人化的方面，感知和评价是可以忽略的。他接着说：

纯粹的、无实体的人类情感是不存在的……我越仔细地观察自己的状态，就越是坚信，无论我的心情、情感和激情如何，实际上都是由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变化的表现或结果所构成的；要想让自己肉体上麻醉，我应该被排除在情感生活之外，无论是严厉的还是温柔的情感，我将只以一种认知的或理智的形式存在。这样的存在，虽然似乎是古代圣贤的理想，但对于那些在几代人以前的感性崇拜复兴之后出生的人来说，却太过冷漠，不可能被热切地追求。⁽⁸⁹⁾

这里有一个历史化的因素：正如詹姆斯写作时所理解的那样，必须从身体的角度来认识情感，虽然这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其他时期，在理解日常生活和科学中的情感时，一个非身体的定义很可能被接受。这种历史化因素的发现再次表明，即使是情感方面的经典心理学著作，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想避免重复关于这些经典文本的陈词滥

调，情感史研究迫切需要一部可靠的、“内在的”情感心理学思想史。詹姆斯之所以没有被载入情感研究的史册，并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化方法，而是因为他提出的“身体表征优先于情感”的观点。⁽⁹⁰⁾这种方法“确实在经历某种复兴，因为它强调情感的体现，这可以与更广泛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框架很好地契合”。⁽⁹¹⁾这种对身体表征的重视今天被称为“詹姆斯主义”，那些认为自己是其追随者的人则被称为“新詹姆斯主义者”。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詹姆斯-朗格情感理论”，因为丹麦人卡尔·格奥尔格·朗格（Carl Georg Lange）在同一时间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朗格被认为是另一位把情感和意图分离开来的心理学家。1885年，他用丹麦语发表了他关于情感的主要著作，后来被翻译成其他语言。⁽⁹²⁾詹姆斯和朗格观点的相似之处可以从这段关键引文中看出：

如果取消了受惊吓的人的身体表征，【177】他的脉搏平静地跳动，表情坚定，肤色正常，动作敏捷而坚定，言语有力，思想清晰，那他还有什么恐惧呢？⁽⁹³⁾

但正如克劳迪娅·瓦斯曼所表明的，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朗格和詹姆斯之间存在差异。所涉及的文本中有一点是完全不同的：瓦斯曼认为詹姆斯的理论短文是“科学修辞的杰作”，而朗格的书则是一本详细的专著，充满了对病人的临床描述。詹姆斯和朗格对情感功能的生理解释也截然不同。⁽⁹⁴⁾虽然詹姆斯确实曾在大脑中寻找负责处理情感的“中心”，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中心存在的观点，而是勾勒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情感是感官、四肢和内部器官的神经所产生的刺激。⁽⁹⁵⁾在这里，来自器官的信号直接指向大脑（因此是“传入”），但“仅仅”带来认知，即关于恐惧或爱的“冷冰冰的”概念。相反的方向什么也没有发生，即没有信号从大脑传递到器官。这个理论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情感的“外围”理论，因为身体外围发生的事情是决定性的。但人们错误地将朗格与这种认识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大脑中有一个神经细胞的集合体，一个“血管舒缩中枢”（vasomotor centre），充当着神经信号的交换台，负责发送和接收信号，因此既是传出的，也是传入的。因此，视觉刺激（比如看到蛇）通过眼睛和视觉神经传送到脊髓上方的脑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到达延髓，然后，神经刺激会导致相关血管扩张（例如心脏，这样就可以逃离蛇）或收缩。⁽⁹⁶⁾这个模型是在神经的确切功能被确定之前很久提出的，与大脑中神经化学过程的任何知识无关。大约在1900

年，也就是朗格提出观点之后的十年，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1857—1952）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把狗的脊髓和一根重要的神经从血管舒缩中枢分离出来，这条狗能够继续对同样的刺激做出“情感”反应。谢灵顿由此得出结论，朗格所谓的血管舒缩中枢在情感的产生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⁹⁷⁾虽然如此，据我们所知，朗格是第一个在大脑中寻找情感位置的现代实验心理学家。对于达尔文和许多像埃克曼一样的20世纪心理学家来说，身体的这个部位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面部，直到当代神经科学的迅速崛起才使这一认识死而复生。

一般来说，实验心理学的这一早期研究阶段被忽视了，在更传统的科学史上，它几乎没有被提到过。【178】还没有一项称职的研究是建立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本会包括查尔斯·贝尔、查尔斯·达尔文和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 1871—1945）的英文著作，威廉·冯特的德文著作，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的法文著作，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 1831—1910）和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 1846—1910）的意大利文著作，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 1849—1936）和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 1857—1927）的俄文著作以及卡尔·朗格的丹麦文著作。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清这些思想以及日益扩大的国际网络的相互影响。

克劳迪娅·瓦斯曼还重新发现了早期情感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威廉·冯特，他不是后来以其《心理学大纲》（*Grundriss der Psychologie*, 1896）而为情感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冯特，而是更早的、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前的那个冯特，他于1863年出版了《人类和动物心理学论稿》（*Vorlesungen über die Menschen- und Thierseele*）。冯特是通过感官知觉的研究而进入情感研究领域的。他首先形成了一个关于感官起源的理论，然后转向感官的过程和功能，将他的兴趣扩展到整个心理精神机制，并通过这种方式到达情感。⁽⁹⁸⁾在《人类和动物心理学论稿》中，他区分了短暂的“情绪”和更持久、更复杂的“情感”，包括与美学领域相关的“复杂情感”。⁽⁹⁹⁾无论今天对情感的定义有多混乱，现在看来，这都是前后颠倒的：情绪与对外部刺激的快速反应有关，而情感通常被认为是更复杂的长期过程。但冯特的基本观点是，情感以及印象是在大脑中处理的。他认为情感是主观的，也就是说，与情感主体有关，与“主观是个人的，因此难以接近”和“客观是外部的，因此是自然的”之间的区别无关。此外，冯特还认为情感对认知至关重要，即使是新生婴儿也能够区分“甜”和“酸”、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冯特的成名既不是因为刚刚

被重新发现的他对情感的早期研究，也不是因为他在世纪之交更为人所知的情感研究，而是因为1879年他在莱比锡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这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心理学的科学实践。

五、情感实验室和实验室的情感，或者说，基于实验精神的心理学中情感概念的诞生

如果你在最近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寻找生命科学中情感研究的历史轮廓，会发现以下标准的叙述：一切都始于达尔文，【179】他在1872年发表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为基本情感的概念奠定了基础，并将情感视为一种精神状态，有一种特定的身体表达与之相照应。19世纪80年代中期，威廉·詹姆斯和卡尔·朗格反对达尔文，推翻了这种认识，宣称身体表达本身就是情感。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沃尔特·坎农和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1898—1977）又与詹姆斯和朗格针锋相对，反对身体运动就是情感的观点，因为这些动作太慢、太模糊，它们不仅在情感条件下发生，而且在与情感无关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就这样，坎农和巴德取代了詹姆斯和朗格。教科书上的讲述继续下去：在那之后，出现了行为主义，它根据一种基于身体反射的人类行为模型来处理情感，因此“在本体论上将情感简化为其他东西”。^{（100）}随着行为主义的出现，黑暗时代开始了。只有早期对大脑的研究为情感控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比如詹姆斯·巴贝兹（James Papez）以及1937年对大脑皮层和下丘脑之间联系的发现，才打破了这种黑暗。直到20世纪60年代，情感心理学研究才经历了一次重生，出现了三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发展：汤姆金斯对达尔文基本情感方法的阐述；玛格达·阿诺德（Magda Arnold）创立了认知心理学的评价学派，保留了情感研究中的价值维度；斯坦利·沙赫特（1922—1997）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1934—2010）创建了一个综合了生理唤醒和认知标签的模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情感的心理学研究围绕基本情感和评价这两极展开。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欣欣向荣。^{（101）}

标准的讲述到此为止，很清楚，但过于简单化。我们已经看到早期阶段的情况是多么复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我们从观念的历史转向实践的历史。这里的问题是：实验心理学的实践是如何构成情感概念的？威廉·冯特的实验室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情感模型以及人的情感？

我们可以在安吉洛·莫索那里找到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意大利的第一次实验中，最令我惊讶的现象是手部血管的不稳定性，因此，无论被试者是醒着还是睡着，在最轻微的情感影响下，它的体积都会以十分令人惊讶的方式发生变化。在莱比锡的实验室安顿下来几天后，我在同事路易吉·帕格里安尼（Luigi Pagliani）教授的房间附近做了一个实验。他以朋友的忠诚帮助我做任何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确定呼吸和手臂体积变化之间的联系。【180】正在帕格里安尼教授站在记录装置前，双臂插在装满水的玻璃缸里时，卡尔·路德维希（Carl Ludwig）教授走进了房间。记录装置显示，水位马上下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由于一种明显很轻微的情感，手和前臂的体积竟然会大幅度减小。路德维希教授本人也非常惊讶，他以深受学生们喜爱的那种和蔼和幽默，拿起一支笔，在纸上记录下因为他的出现而引起血液循环紊乱的现象：“狮子进来了。”⁽¹⁰²⁾

一位科学家正站在实验室里对自己做实验，测量自己的手和手臂的体积。当他敬畏的老师进来时，他的四肢体积缩小了，测量仪器显示了这一点。实验对象因恐惧而真的出现了“畏缩”。

19世纪末，科学界的一些人普遍认为情感并非内在于身体的，不能通过对主观感受的口头描述来研究。他们认为，在实验室或诊所里，用动物和人类作为实验对象，使用一种全新的、专门开发的仪器，在生理上是可以测量情感的。测量值与情感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如此之紧密，以至于人们常常认为仿佛情感就是心率、血压、唾液的pH值或尿液中的糖分。

为了测量情感，身体必须被唤起，而为了唤起身体，它就必须事先处于非唤起状态。要想找到一个没有情感的身体作为基准线和零值并非易事，正如科学历史学家奥特尼尔·德洛尔（Otniel Dror）在他基于实验室记录、科学家之间的通信和研究日记的开创性著作中所证明的那样。首先是一个找到正确的动物或人进行测试的问题。生理学家认为，有些动物和人基本上不适合进行情感实验，因为有的物种或种族、年龄或性别群体本身就是情感化的，如野兔、小动物、黑人和妇女。根据哈佛大学1921年的一篇博士论文，后两者的“控制力较弱，因此情感生活更活跃”。⁽¹⁰³⁾在每个类别中，生理学家还假定了一个等级秩序，即狗总是比猫更适合做实验对象，而猫又总是比兔子更适合。⁽¹⁰⁴⁾即使在先前的假

设中，即中年的白人男性和狗都是理想的实验对象，仍然有基于性情和性格的选择。一位科学家偏爱狐梗杂交犬，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181】一位心理学家则“将一条‘极度紧张的’、名叫布拉基（Blackey）的狗，和‘性情与其完全相反’、名叫蒂利三世（Tilly III）的狗区分开来”。⁽¹⁰⁵⁾

一旦找到实验对象，就要找到所有情感都被关闭的零值。科学家可以用一系列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目标，例如，动物被逐渐引入实验室和实验，在此过程中，习惯化被等同于缺乏情感。⁽¹⁰⁶⁾科学家对实验过程也做了调整，以便让动物适应，目的是将压力降到最低：在抽血前的几个小时，“动物的毛发被刮干净”，然后“轻轻地将其绑到一块舒服的木板上”，用的是“一根锋利的中等大小的针”。⁽¹⁰⁷⁾有的动物被抚摸并平静下来，或者整个实验过程都在一位科学家的膝上进行，“事实证明这非常令人满意，除了连续坐两到八个小时令人厌烦之外”。⁽¹⁰⁸⁾在20世纪20年代，实验动物被去皮，这是一个通过外科手术切除皮质的过程。因为这是大脑中被认作情感控制中心的区域，去皮会带来“更纯粹”的情感和“真实”的零值。⁽¹⁰⁹⁾

一旦确定了零值，实验就可以开始了。所有的实验都是从刺激开始的，而这个清单简直是无穷无尽的。视觉刺激可以是色情作品、蛇（活的或橡胶的）、皮肤病的照片、人的肠道、摆在桌子上的酒精，还可以是《新约全书》。声音刺激可以是手枪射击，也可以是跳爆竹、大笑、尖叫、狗的吠叫和无意义的音节，又可以大声朗读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火线》（*Under Fire*），或大喊“社会主义者！”。⁽¹¹⁰⁾

然后有两个基本步骤：要么观察身体对刺激的反应，要么从身体上取一个样本进行测量。自我观察是第一种方法的一个形式。在19世纪晚期，安吉洛·莫索让自己受到强烈的情感刺激，测到自己的体温上升了0.7摄氏度。⁽¹¹¹⁾后来，男性心理学家阅读了《一千零一夜》中“较为色情的内容”，但没有发现任何情感反应，他们要么归咎于自己的大脑皮层，要么归咎于自己的“批判性、知性态度”。⁽¹¹²⁾科学家们还测量了他们自己，例如，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之前、期间和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种体育运动成为最重要的情感避难所，人们可以通过这一运动不受约束地表达情感。⁽¹¹³⁾在这里，旧的仪器被证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研究人员对客观和标准化情感测量的期望。【182】1900年以后出现了一次发明高潮：呼吸描记器可以测量呼吸，心电图可以测量心跳，脉搏描记器可以测量血压，电流计可以测量各种身体分泌物的pH

值，体温计可以测量体温（图12和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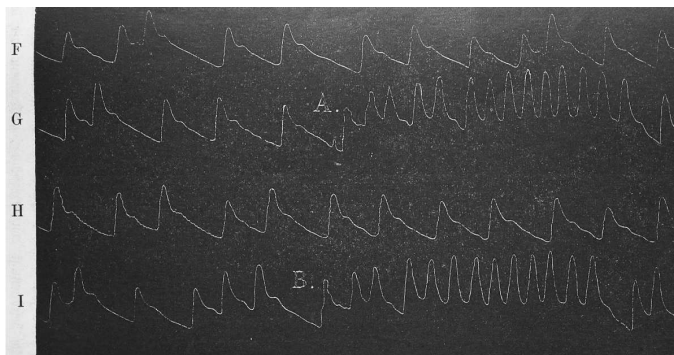


图12 在恐惧的影响下心率加快

资料来源：Mosso, *Fear*,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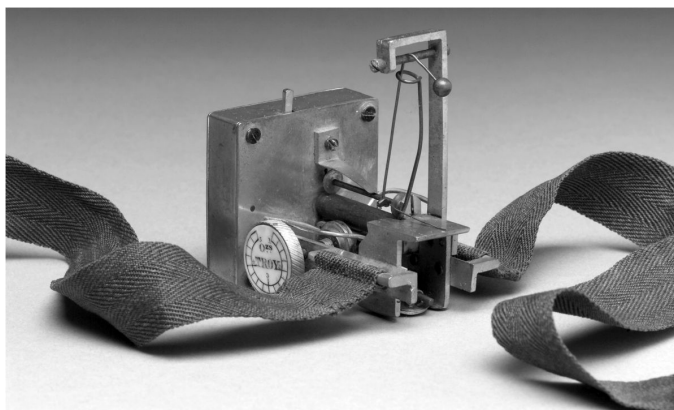


图13 罗伯特·达吉恩的用于测定血压的脉搏描记器

资料来源：Dudgeon sphygmograph by James Coxeter and Son, London, 1885—1930 (©Science Museum/Science &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这些都是标准的仪器，或者用奥特尼尔·德洛尔的话说，是“便宜、简单”的仪器，“直接测量了人类生理相对普通的方面”，在揭示人类和动物的情感生活时，这些仪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¹¹⁴⁾【183】到20世纪30年代初，测量已经商业化，因为测量情感的仪器被大批量生产出来。⁽¹¹⁵⁾很快，各种情感测量仪就面世了，例如利用接吻测量仪（Kiss-O-Meter），可以“客观地”测量两人接吻时爱的程度，数值在0到120之间（图14）。一项关于接吻测量仪的研究得出结论，接吻的强度随着年龄和婚姻时间的增长而减弱。在一个实验中，已婚男性被说服去和岳母接吻，得到的数值不超过6。于是有人建议，也许要扩大范围，把负数包括在内。⁽¹¹⁶⁾



图14 接吻测量仪

资料来源：© Awe Inspiring Images/Shutterstock Images, New York.

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实验扩展到更多的对象和受试者身上，【184】例如，他们会走出实验室，研究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不久的情感状态。(117)在动物身上测量到的基本上是恐惧和愤怒，而在人类身上测量到的情感种类要多得多。(118)在人类受试者身上，科学家更相信客观地获得脱离意志的前语言情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隐秘的测量，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受试者并不知道自己被测量了：“受试者放松地坐着，双手放在电极上，电极可能隐藏在椅子的扶手里，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中最私密的过程正在被记录下来。”(119)在这里，记录的过程似乎是自动的，就像情感在进行自我记录一样。(120) 1908年，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主张在法庭程序中使用心理学专业知识，这使人们对机器的信任达到了令人沮丧的顶点：“我们必须把这个人带到记录装置前，以便查明他的心里是阳光普照，还是乌云密布。”(121)

第二种方法是从受刺激的身体中提取分泌物样本（血、汗、唾液、尿液）并加以测量。下面是1931年的一个实验：

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猫被放在一只大狗的面前。狗想去咬猫，但被笼子挡住了，它变得越来越愤怒。猫变得越来越害怕。两者的血液样本在实验前后都采集到了。(122)

两种技术被用来分析身体分泌物。首先，我们可以测量“情感”分泌

物，例如唾液的pH值、尿液中的含糖量或血样中的红细胞数量。其次，可以通过对动物或人的“非情感”组织实施注射来引入情感分泌，然后测量这个组织的情感化程度，正如一位研究人员在一份关于愤怒的实验报告中所说的，这就像一个“愤怒温度计”。⁽¹²³⁾有一种不太常见的方法是对死于情感的动物的组织样本进行分析，例如一只死于恐惧的鸟。在此过程中，显微镜被用来寻找细胞内强烈情感的迹象。⁽¹²⁴⁾

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情感的主观和语言方面。情感的神秘面纱实际上已被揭开了。爱德华·惠勒·斯克里普丘（Edward Wheeler Scripture, 1864—1945）在1908年总结道：“有些人反对将汗腺尊崇为情感器官，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尊崇的位置。”⁽¹²⁵⁾甚至连梦也可以被具体化，因为当受试者睡着时，【185】连接在他们身上的仪器所记录的内容似乎比不可靠的记忆提供了更好的关于梦的信息。⁽¹²⁶⁾科学家将对情感的科学性的信念内化，并在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表达出来。例如，1932年，沃尔特·坎农写信给他的同事史密斯·伊利·杰利夫（Smith Ely Jelliffe, 1886—1945）：“我刚在9月号的《精神和神经疾病杂志》（*Journal of Mental and Nervous Diseases*）看到对我的《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的书评，这篇书评激发了我间脑（丘脑下的一个大脑区域）当中的那个合适位置，让我感到很开心！”⁽¹²⁷⁾

综上所述，可以说从1900年起，情感实验室中各种实验室情感的构成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科学活动领域，在1900—1940年期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顶尖心理学家进行过有关情感的实验。⁽¹²⁸⁾首先，情感与其他经常会引起类似身体反应的现象（主要是疼痛）是分离的，所以这些情感可能会保持在一个纯粹的状态。其次，情感被放在一个量表上，确定一个零点作为一种未受刺激的状态，可以根据这种状态对数据进行排序。第三，努力规范实验，使情感能够复制，内化现代实验科学的一个原则，即实验是可重复的，并且在相同的条件下，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第四，继续努力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情感，一根针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取代了主观情感的语言自我描述，成为真相的保证。⁽¹²⁹⁾

这些阶段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或确定的，而是不稳定的，涉及一系列矛盾。那些研究情感的人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1925年，沃尔特·坎农和西德尼·威廉·布里顿（Sydney William Britton）写道，研究情感的人看到自己“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¹³⁰⁾保罗·D·麦克莱恩（Paul D. MacLean, 1913—2007）是边缘系统的“发现者”，在回答为什么詹姆斯

·巴贝兹（1881—1958）只写了一篇关于情感的论文时，他说，巴贝兹感觉到了“你在谈论情感时表现出的柔弱的一面，而不是一个真正坚强的科学家”。⁽¹³¹⁾那么，在1900年前后，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情感的真正含糊之处是什么呢？首先，正如德洛尔所说的那样，有一种“情感研究的分裂状态”，这就“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悖论：情感作为一种认识对象，仅仅是通过打破实验室作为一个无情感空间的地位来研究的，这种地位对产生知识的行为至关重要”。⁽¹³²⁾【186】此外，人们从来都不清楚所测量的是真正的情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特定数量的白细胞真的代表了“情感唤起”，而不是感染吗？特定类型的心跳是否真的意味着“恐惧”和“焦虑”？或者它们表明测试对象的心脏瓣膜出了问题。⁽¹³³⁾最重要的是，在以人类为实验对象的实验中，从来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否故意试图扭曲实验，通过观察测量针来学习控制自己的血压。⁽¹³⁴⁾理想的人类反应体实际上是一种故意不动感情的身体，它消除了自由意志，这当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最终，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困惑和悖论都存在于情感本身。正如德洛尔所言：

从定义上说，情感是一种意外事件，即使在实验室里，也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情感意味着实验室对动物机器、可靠控制、可预测性、可复制性和标准化的理想的崩溃。⁽¹³⁵⁾

与威廉·冯特、威廉·詹姆斯、沃尔特·坎农等人一样，实验心理学的敏锐观察者、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甚至认为：

因为情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是无法停止的，也不能在“显微镜下”观察。这意味着我们越仔细地观察它们，我们就越不了解自己的感受。集中注意力已经是一种情感变化。⁽¹³⁶⁾

六、社会秩序的概念是如何组织大脑内部秩序的

实验室情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史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事业。如果这类历史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者，那么我们可能希望，今天那些研究大脑内部情感的人在他们工作中所建立的空间表征图谱能提供一些线索。⁽¹³⁷⁾两个例子将展示这些空间概念所包含的隐式评价的程度，利用文化形成的概念，如高和低、右和左。第一个例子：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1835—1911）是19世纪晚期最有影响力的神经解剖学家之一，他认为，【187】认知功能主要位于额叶皮层，而情感功

能位于皮质下。仅仅把杰克逊的发现当作隐喻是不够的。它更多是一种有关秩序的社会概念深入到了大脑研究的所谓客观领域：在大脑皮层的高级区域是“政府”，由最有能力的人组成，而在下面的皮质下区域是普罗大众。根植于大脑病理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只不过是失控的阶级斗争，或者是推翻自然高低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企图：

高级神经结构是从低级神经结构演变而来的，就像从一个国家演化出来的政府控制和指导这个国家一样。如果这是演化的过程，那么相反的分解过程不仅是“去除”高级神经结构，同时也是对低级神经结构的“放手”。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机构突然被摧毁，我们有两个理由感到惋惜：（1）失去了杰出人物的服务；（2）现在是不受控制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138）}

杰出人物和“不受控制的人民”，或者像以前一样，主人和奴隶、天堂和地狱——这些只是激发大脑对医学和心理学进行想象的一些形象，事实上，现在仍然如此。例如，我们可以阅读大脑研究者约瑟夫·勒杜1996年发表的一句话：“传统上，大脑皮层下的感觉处理结构被认为是大脑皮层主人的奴隶。”^{（139）}

第二个例子：1912年，美国神经科学家查尔斯·K.米尔斯（Charles K. Mills, 1845—1930）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大脑的右半部分只负责情感。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右半球假说”依然有支持者。这种单侧化，即大脑的每一半是否在神经元的情感活动中执行不同的功能，或者它们是否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问题，是当今情感神经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40）}对米尔斯产生影响的观念、语言意象和社会秩序观念，很可能对约翰·休林斯·杰克逊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88】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尽管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即大脑的左半球负责认知，右半球负责情感，这样的假设不过是把杰克逊上下结构的图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不能认为这种行为的两重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整的，但是对于某些发展良好的功能，如语言、音乐和情感……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就语言而言，左半球起主导作用，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141）}作为证据，米尔斯列举了“不由自主的或爆发性的笑或哭，以及一例伴有特殊大笑的杰克逊癫痫，其病变部位在右半球”。^{（142）}

在这个时期的大脑研究中，典型的医学指标基本上是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区域的关闭。如果某一特定区域停止运作，同时观察到异常行为，这两个因素就会形成因果关系，并得出损伤部位

是造成功能障碍的原因这一结论；反之，在健康状态下，是这个区域负责相应的功能。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实验过程，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就目前而言，我们只需要明白这一点：指出空间结构、语言意向和社会秩序的潜在概念的重要影响并不意味着杰克逊和米尔斯没有实验证据，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假设不是通过实验归纳得出的。然而，空间的社会文化概念和用来表达这一点的隐喻总是决定了哪些实验实际上已经完成，它们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实际测量的是什么。鉴于20世纪早期的测量方法还比较原始，米尔斯完全偏离了正题，因此提出了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

七、对大脑情感反应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克逊、米尔斯和朗格（最后一位提出了“血管舒缩中枢”的概念）是如何将研究情感的实验心理学家带回大脑的。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大脑可能与情感有关，他们看到大脑受损的病人随后会出现异常的情感表达。在医学史尤其是情感史上，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盖奇是一名工头，1848年，他在佛蒙特州修建铁路时发生事故，一根1.1米长、直径3厘米的铁棒穿过他的头部。【189】那根铁棒飞起来的力量如此之大，从他的左眉下方进入他的头部，又从他的头骨顶部飞出，落在15米外。尽管有大量出血和感染，盖奇依然恢复了意识和健康，只有左眼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很快，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变得易怒和喜怒无常，“不再是以前的盖奇了”。盖奇的医生约翰·哈洛（John Harlow）注意到，他“反复无常，优柔寡断，制定了许多有关未来行为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一安排好就被放弃了”。^{〔143〕}盖奇丢了工作，从此靠在游乐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来谋生，那根铁棒总是伴随其左右（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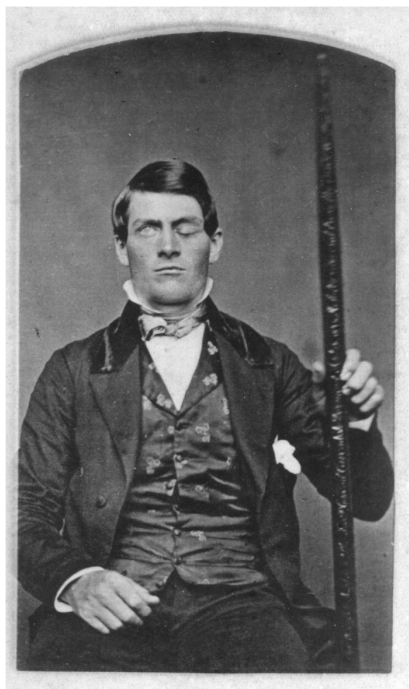


图15 菲尼亚斯·盖奇和他的铁棒

资料来源：脑损伤幸存者菲尼亚斯·盖奇的照片，展示的是他拿着伤了他的铁棒；照片被剪裁以移除周遭部分。来自得克萨斯州盖奇家族的照片收藏。

1860年盖奇在旧金山去世后，哈洛得到了他亲属们的允许，
【190】将其遗体转移到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哈洛和他的同事们检查了盖奇的头骨，之后，头骨和铁棒都被捐给了该大学的医学博物馆，并在那里永久展出。

对盖奇头骨的研究表明，这根铁棒破坏了他的大脑眶额皮质和前额皮质（图16）。哈洛的结论是：“可以说，他的智力和动物属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经被破坏了。”【191】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杰克逊思想的影响，皮质和智力“更高”，其余的“更低”，情感属于动物属性。⁽¹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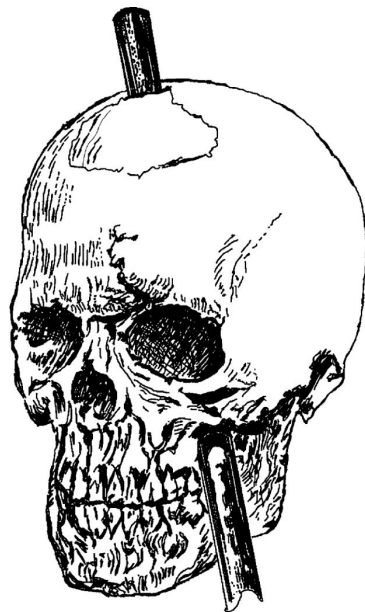


图16 铁棒在菲尼亚斯·盖奇头骨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Birgit Jackel, “Zur Bedeutung der Hirnforschung für Entwicklung und Lernen im Elementar- und Primarbereich” (2006) <[http://www.birgit-jackel.de/kongresse/duisburg 2006/text 01. html](http://www.birgit-jackel.de/kongresse/duisburg%202006/text%2001.%20html)> accessed 11 March 2014.

今天，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依然对菲尼亚斯·盖奇很感兴趣。⁽¹⁴⁵⁾实验心理学中情感研究的历史记载把他的案例作为研究情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即通过病变进行研究）的起源。⁽¹⁴⁶⁾假设大脑某一特定区域受到损伤，就可以得出有关该区域功能的结论。随后，人们在实验动物的大脑中故意制造损伤，并且患有特殊情感障碍的人可以通过切除大脑的特定部分来“治愈”。在美国，从1936—1955年，有4万到5万名被诊断为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人接受了前额叶切除术。人们希望这种手术将带来与菲尼亚斯·盖奇所经历的相反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激进的干预确实使病人平静下来，尽管手术本身很快就遭到质疑。⁽¹⁴⁷⁾

像菲尼亚斯·盖奇这样的例子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大脑，将其作为情感过程的场所。所以，在我们转向精神分析之前，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情感和大脑研究中的三个里程碑。它们都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因此都比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成像技术的发明早很多。

1．坎农-巴德理论

20世纪20年代早期，亨利·黑德（Henry Head，1861—1940）的研

究表明，那些大脑一侧丘脑受到损伤的人，会对作用于受伤一侧身体的疼痛刺激（比如针刺或被烫到）表现出明显的强烈反应。⁽¹⁴⁸⁾大约在同一时期，沃尔特·R·赫斯（Walter R. Hess, 1881—1973）对猫进行了实验，他用电极刺激猫的下丘脑，产生非特定的情感反应，如心率加快和防御性（他称后者为“情感防御反应”）。⁽¹⁴⁹⁾后来，他改进了他的方法，并最终可以仅仅通过刺激大脑的特定部位带来特定的情感，如愤怒、恐惧、好奇心或冷漠。【192】他还怀疑，大脑的功能是根据奖励来细分的，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快乐和回避压力来细分的。从这些发现和他自己的实验中，沃尔特·坎农得出结论，丘脑区域是情感的关键，大脑皮层部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更年轻）和丘脑皮层以下部分之间有一个回路。⁽¹⁵⁰⁾后来菲利普·巴德加入了他的阵营。在巴德最重要的实验中，他切除了一只猫的大脑皮层，这导致了猫突然而不稳定的攻击行为，他称之为“假愤怒”。通过排除的过程，他得出结论：情感不可能只存在于大脑皮层。⁽¹⁵¹⁾

坎农-巴德理论通常被视为詹姆斯和朗格理论的对立面，因为它将情感过程的位置从身体的外围（脸红、出汗）转移到了大脑。事实上，坎农和巴德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与詹姆斯和朗格的研究区分开来，他们指出，很难将特定的情感明确地归因于身体的外围运动（我怎么知道我的脸红是与尴尬有关，还是与性唤起有关？）。情感史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不能采用将坎农-巴德取代詹姆斯-朗格这样简单的心理学陈述。无论如何，如上所述，一旦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詹姆斯-朗格的理论，就会发现它们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耦合在一起。

2. 巴贝兹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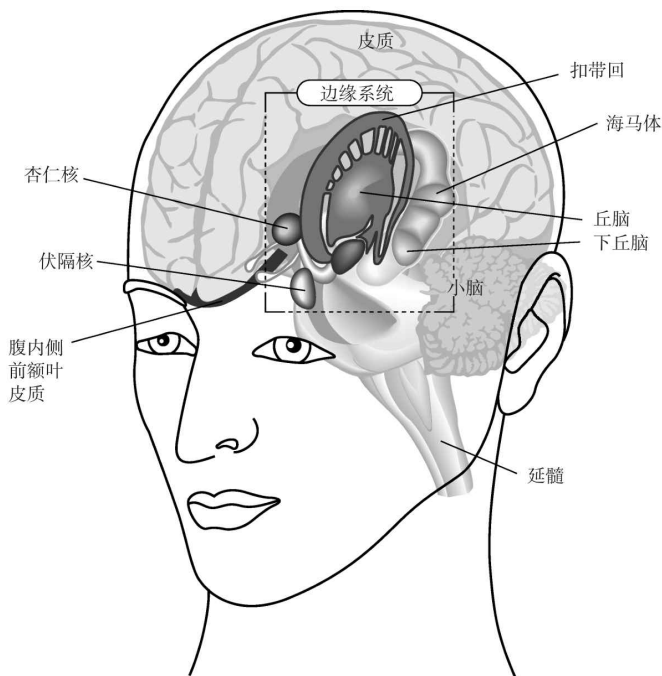
在神经成像被发明之前，詹姆斯·巴贝兹在大脑中定位情感方面做出了第二个重要的举动。他以坎农和巴德的发现为基础，即皮质下丘脑与皮质相结合，代表着一个基于过度和控制的重要情感系统。1937年，巴贝兹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完善了这种联系。他认为丘脑是一部处理刺激输入的总机，将这些输入引导到较高的认知路径或较低的情感路径。较高的路径与大脑皮层的感觉区域有关，尤其是扣带回，并将感觉印象划分为感知、思维和记忆。然后刺激通过复杂的路径返回丘脑，经过扣带回、海马回、穹窿和乳头体。相比之下，较低的路径要快得多，直接通向乳头体，激活它们，【193】激发情感的表达。⁽¹⁵²⁾

巴贝兹环路至今仍被认为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可以

在引言中提到的勒杜的研究和恐惧的两条路径中看到巴贝兹的研究所引起的回响。同样重要的是，在科学史上，巴贝兹提出的相互交织和多方位的路径表明了今天看来越来越有可能的对大脑的看法，即大脑是一个动态的和交互的实体。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经和神经化学突破之前，巴贝兹可能就已经意识到更多的连接和路径有待发现，将来我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脑活动确实涉及所有的相互作用，即使在此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强度和不同的中心。这一观点现在与一种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观点相竞争，即个别区域完全负责特定的职能。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3. 边缘系统

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是边缘系统的“发现”。除了建立在坎农和巴贝兹的研究基础之上，这项研究还利用了克吕弗-布西综合征（Klüver—Bucy Syndrome）。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 1897—1979）和保罗·布西（Paul Bucy, 1904—1992）注意到，在通过手术切除猿类的颞叶后，猿的情感反应变弱了，性欲变得更加强烈，喜欢用嘴探索，并且更喜欢吃自己的排泄物。根据所有这些发现，保罗·D.麦克莱恩创造了大脑解剖及其与情感关系的一个全面的新模型。⁽¹⁵³⁾他认为大脑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原始的”情感，比如恐惧，可能位于大脑最古老的部分，即“爬行动物脑”，纹状体和基底神经节就位于这个部位。攻击性和更复杂的社会情感位于古生哺乳动物脑，包括巴贝兹环路的许多区域（下丘脑、丘脑、海马回和扣带回），也包括杏仁核和前额皮质。新哺乳动物脑主要由新皮质组成，主要负责对情感的认知控制。麦克莱恩接着说，情感是一个发生在大脑这三个部分的过程，参与区域的总和是“边缘系统”，得名于布洛卡（Broca）1878年提出的“大边缘叶”（*Le grand lobe limbique*）。特别是，古生哺乳动物脑中的海马体是一部活跃的总机，接收外来刺激，将其传递并导致身体反应，这些反应本身被折射并被视为情感（图17）。



- 皮质: 复杂认知、语言、记忆、意识
- 扣带回: 情感学习、情感记忆
- 海马体: 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 空间记忆
- 丘脑: 大脑接收信息的开关
- 杏仁核: 消极情感, 尤其是恐惧和焦虑
- 伏隔核: 奖励、性唤起、上瘾
- 小脑: 运动协调
- 腹内侧前额叶皮质: 决策、冒险行为
- 下丘脑: 体温、饥渴、疲劳
- 延髓: 心率、呼吸和其他自主功能

图17 大脑区域（包括边缘系统）及其功能【194】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

尽管麦克莱恩最初的假设在他在世时经常受到质疑，但今天，每当有人提出情感在大脑中位置的问题时，仍然会提到边缘系统。【195】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是假定大脑不同区域之间存在麦克莱恩所说的相互作用过程，而是有一组松散且不断变化的区域，其中通常包括杏仁核和前额皮质。(154)

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情感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的焦点，但正是坎农-巴德理论、巴贝兹环路和边缘系统为基于大脑的情感研究奠定了基础。与其他所有研究情感的方法一样，这些方法总是通过当时空间和秩序概念、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的棱镜折射出来。20世纪上

半叶另一个伟大的心理学研究传统也是如此，它就是精神分析。

八、弗洛伊德缺失的情感理论

一本很受欢迎的英语情感心理学教科书直白地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没有提出情感理论。”⁽¹⁵⁵⁾但问题马上就来了：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等心理疾病不属于情感病理学吗？与客体恐惧相反，焦虑不也包含一种漫无目的的、扩散的、在灵魂中疯狂蔓延的危险感吗？创伤的概念不是肯定包含了情感紊乱的假设吗？弗洛伊德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不是与情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吗（例如，当提到文化中的“不满”时）？精神分析似乎缺乏一套具体的情感理论，而情感同时又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这一悖论可以通过阅读卡塔琳娜（Katharina）的病例来探讨。这是弗洛伊德《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德文原版，*Studien über Hysterie*，1895）中最著名的病例之一。

在一次阿尔卑斯山的徒步旅行中，弗洛伊德在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年轻的女服务员卡塔琳娜很快就发现弗洛伊德是个医生，并向他求助。她患有呼吸困难和恐慌症：

我总觉得我会死。我通常很勇敢，可以一个人去任何地方——到地窖里去，到山上去。但是自从那天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哪儿也不敢去了，我一直觉得有人站在我身后，想一下子抓住我。⁽¹⁵⁶⁾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诊断是：“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焦虑发作，是由癔症的‘先兆’症状引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癔症的发作，其内容是焦虑。”但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描述，后面还应该隐藏着更多的东西。【196】弗洛伊德问自己：“难道不会还有其他的内容吗？”⁽¹⁵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解释的开端：为什么在精神分析中，情感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情感经常出现，但它们只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附带现象。

卡塔琳娜接着说，在她恐慌发作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张可怕的男人脸，但她却认不出来。弗洛伊德写到，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使用催眠术，但由于当时是在一家山间客栈，他只能问更多的问题。“我应该试着猜一猜。我经常发现，对女孩来说，焦虑是一种恐惧的结果，当处女的心灵第一次面对性的世界时，就会变得不知所措。”⁽¹⁵⁸⁾所以他对卡塔琳娜说，他怀疑恐慌发作是在她经历了某种痛苦之后开始的，这里

他指向的是性的领域。卡塔琳娜突然想起，她曾透过一扇窗户看到自己的姑父压在堂姐弗兰齐斯卡（Franziska）身上。那时候她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她第一次感到呼吸困难。不久之后，她开始长期呕吐。她的姑姑注意到了，并对她进行了严厉的盘问。卡塔琳娜把她所看到的一切描述了一遍，姑姑就这件事问过姑父。后来，弗兰齐斯卡怀孕了，导致了一次公开的分手和离婚。姑姑和卡塔琳娜一起搬了出去，开了一家小客栈，她现在就在这家客栈工作，这也是弗洛伊德当时下榻的客栈。

当卡塔琳娜谈论她姑姑的离婚时，弗洛伊德描述道：“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把这些线索抛到一边，开始给我讲两个更久远的事件，发生在上述创伤事件两三年前。”⁽¹⁵⁹⁾这些事件都与姑父试图性侵卡塔琳娜有关，第一次是在她14岁的时候：

有一个冬天，她和姑父一起去山谷探险，并在那里的旅馆过夜。他坐在酒吧里喝酒、打牌。她觉得很困，很早就去楼上的房间上床睡觉了。他上来的時候，她还没有完全睡着，然后她又睡着了，醒来突然“感觉他的身体”在她床上。她跳了起来，责备他说：“姑父，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床上呢？”他试图安抚她，说：“别出声，傻丫头，别动。你不知道有多好玩。”“我不喜欢你的‘好’东西，你甚至不让人睡个安稳觉。”她一直站在门口，准备逃到外面的过道里，直到最后他放弃了，回到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她也回到自己的床上，一直睡到早晨。从她本人所说的为保卫自己而采取的方式来看，她似乎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起性侵。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他想对她做什么时，她回答说：“当时不知道。”她说过了很久，她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197】}当时她抗拒是因为她不喜欢睡觉被打扰，而且“因为那样不好”。⁽¹⁶⁰⁾

卡塔琳娜似乎已被回忆所治愈：“在这两次回忆的末尾，她停了下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张阴沉、不高兴的脸变得活泼起来，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心情也愉快起来。”⁽¹⁶¹⁾对弗洛伊德来说，解决办法在于弗兰齐斯卡事件与她姑父之前的性侵企图之间的联系。因为当卡塔琳娜看到她的姑父和弗兰齐斯卡发生性关系时，意识到对她来说存在的威胁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现在唯一没有查明原因的是那张经常伴随着她焦虑发作而出现的可怕面孔。即使是这个谜也可以解开，因为卡塔琳娜说：

是的，我现在知道了。那是我姑父——我现在认出来了——但当时并没有认出来。后来，当所有的争执爆发后，我姑父对我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他不停地说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不多嘴多舌，他就永远不会离婚。他不断威胁我，如果他在远处看见我，他的脸会因为愤怒而扭曲，他会举着拳头向我扑过来。我总是从他身边跑开，总是害怕他会在我不注意时抓住我。我总是看到的是他生气时的面孔。(162)

弗洛伊德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这个事件：

卡塔琳娜在焦虑发作时感受到的是一种癔症，也就是说，这是与每一次性创伤相关的焦虑的再现。我在此不对经常出现在大量病例身上的一个事实发表评论，即仅仅是对性关系的怀疑就会唤起处女个体的焦虑。(163)

1924年，也就是差不多24年后，他又补充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冒昧地揭开审慎的面纱，揭露卡塔琳娜不是女房东的侄女，而是她的女儿。因此，由于她父亲的性侵企图，让这个女孩感到不适。(164)

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状态（今天我们称之为恐慌发作）具有特别戏剧性的一面。卡塔琳娜的例子似乎证明，虽然精神分析不断地转向情感，但情感永远没有进入解释，对弗洛伊德来说，因果解释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是性。

这当然是一个过于粗糙的概括。乌法·延森已经证明，在精神分析中，情感不仅是潜在心理过程的“核心标记”，而且“情感的矛盾和焦虑状态”是“贯穿弗洛伊德生活和工作的两条主线”。(165)【198】实际上，相对于弗洛伊德后来对情感和焦虑、情感在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情感与文化之间联系的思考，他早期不完整的、复杂的情感理论更具有生物学和机械性的特征。我们只看一下其早期情感理论的一个方面。弗洛伊德假设了一种心灵经济，其中包括驱动力、未分化的情感（不区分恐惧、仇恨或爱）和分化的情感。他在1915年发表的《压抑》中说：

从对精神分析所做观察的粗略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本能代表的数量因素有三种可能的变化：要么是本能被完全抑制，以至于

找不到它的踪迹，要么是它以某种方式或其他定性的色彩显现出来，要么是变成焦虑。(166)

这里有一个由驱动力、情感和个人感受组成的三角形。延森写道：“情感状态由一种能量元素组成，这种能量元素在心理机制中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发挥作用。”他接着说：“一种情感以一种扭曲或位移的形式，强行通过一种不完全的压抑，从无意识进入有意识，以这种方式可以被作为一种情感来感受。”(167)这让我们想起，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作品中，有一种对弗洛伊德情感理论的呼应。他谈到了“情感经济”，并指责现代社会用禁忌来掩盖在中世纪仍未被过滤的情感表达。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情感可以在体育运动的人造舞台上表现出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情感被压抑，导致神经官能症、强迫症和其他疾病。延森将弗洛伊德情感理论的生物学和机械性特征归因于生理学对早期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男性价值观的内化，如理性被理解为对情感的控制，还有过度的科学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科学免受对其缺陷的指责。最终，那些研究情感的人，尤其是研究精神分析的人，被指责为“不科学”。

延森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关于情感的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他们承认一种感觉（例如爱），同时压抑另一种感觉（例如恨），这驱使他们做出强迫性的行为。对弗洛伊德来说，对情感的矛盾心理也有人生经历方面的影响，【199】他后来回忆说，他小时候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侄子，他崇拜这个侄子，但也讨厌他的优越感：

我所有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化身……我的情感生活一直在以下一点上有所坚持：我应该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讨厌的敌人。我总是能够重新为自己提供这两者，童年的理想状态被如此彻底地再现，以致朋友和敌人在同一个人身上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并不鲜见。(168)

延森认为，第二个线索是焦虑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弗洛伊德写道：“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焦虑问题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各种各样重要的问题汇聚在一起，这个谜题的答案一定会对我们理解整个精神世界带来很大的启示。”(169)当他把焦虑的概念从早期“情感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来时，弗洛伊德马上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

即婴儿出生时的原始焦虑是所有其他焦虑的蓝本，这种焦虑与出生时“由于血液更新（内部呼吸）中断而引起的大量刺激”有关：“‘焦虑’这个词强调了呼吸受到限制的特征，这在当时是真实情况的结果，现在几乎总是在情感中再次出现。”⁽¹⁷⁰⁾在一个人后来的人生过程中，所有的焦虑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最初的情况。弗洛伊德强调：“随着对被父母亲阉割的恐惧的去人格化，这种危险变得不那么明确了。阉割焦虑会发展成道德焦虑——社会焦虑——现在要知道这种焦虑是什么并不容易。”⁽¹⁷¹⁾乌法·延森认为，弗洛伊德的焦虑位于自我的层面，从那里到达超我，使焦虑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感觉”。⁽¹⁷²⁾自我寻求个体的幸福感，传递焦虑的信号，这种信号被转化为道德，以及强大的、超个体的集体和社会文化成就。“在作为一种症状的个人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失败中，可以看出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的因素：一种感觉，对这种感觉的理性控制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任务，也必须成为所有人共同的任务。”⁽¹⁷³⁾

自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经历了各种变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追溯情感在这些变化、发展和修正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多大意义。【200】但是为了说明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介绍当前的两个事例。首先是最近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它将神经科学所理解的情感与精神分析概念相结合。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约拉姆·约维尔（Yoram Yovell）将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与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提出的情感指挥系统（Emotional Command Systems）结合起来。潘克塞普在1998年创造了“情感神经科学”这个表达。约维尔提出的是一个爱情的神经心理分析模型。⁽¹⁷⁴⁾潘克塞普的情感指挥系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神经化学过程，能够带来生存上的优势，因此在功能上是基于进化生物学的。情感指挥系统中的“探索”“恐惧”“愤怒”和“欲望”位于大脑皮层最深处，位于脑干内部和周围。这些情感指挥系统负责人类和动物的基本活动，如应对威胁或繁殖。其他位于大脑皮层下、较高区域的情感指挥系统调节简单的社会行为（“恐慌”“关心”“玩耍”），这些行为与社会关系和对分离的恐惧有关。尽管潘克塞普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情感指挥系统和驱动力理论相混淆，认为它太复杂了，无法与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和自我或性冲动的概念相提并论，但这一过程已经完全被神经精神分析这一新领域所采用。⁽¹⁷⁵⁾

约维尔还谈到了浪漫爱情，它既与对象有关（爱的是谁？），又与文化有关（许多文化缺乏浪漫爱情的概念），在这种背景下，将情感指挥系统和驱动力理论联系到一起。或者更精确地说，约维尔试图以情感指挥系统作为纠正方案，重写弗洛伊德的理论。约维尔认为，支配一切

的普遍的欲望驱动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浪漫爱情，只有把不同的情感指挥系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情感指挥系统中的“探索”最接近力比多，而“恐慌”和“关心”最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驱动力的欲望方面，这三个因素在浪漫爱情中不谋而合。最后两个因素导致了与依恋和对分离的恐惧有关的焦虑，这是浪漫爱情的具体方面。“不管怎样，驱动力理论现在可能会被修正，以便包括非力比多的本能和情感系统，比如依恋系统。在精神分析学和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共同努力研究并理解浪漫爱情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成为两者之间一个有用的连接。”⁽¹⁷⁶⁾费莉西蒂·J·卡拉德（Felicity J. Callard）和康斯坦蒂娜·帕普利亚斯（Constantina Papoulias）认为，【201】只有当人们对弗洛伊德进行神经科学解读时，这才会奏效。这种解读在进化生物学的框架内对快感原则（Lustprinzip）进行功能性的解释，而这种解读与人们通常对浪漫爱情的理解相去甚远。⁽¹⁷⁷⁾

其次，如今，在治疗创伤和其他情感疾病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强调讲故事这一手段的治愈能力，即使在精神分析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域也是如此。其目的不是像早期的精神分析实践那样，追溯创伤的起源并揭示其触发因素。治疗师不是为了把被压抑的可怕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相反，叙述本身被认为具有治疗效果。讲故事有一种反复的操演性的力量，使零碎的记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此外，叙述使人对一些可怕的事情产生一种距离感。叙述过程通过消除情感的直接性来消解情感。⁽¹⁷⁸⁾一些治疗方法预设了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情感的识别也有治愈效果。例如，叙事暴露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援引了神经科学的原则，即“情感标记（而不仅仅是对情感本身的识别）会破坏情感反应，并减少边缘系统的活动，否则，当出现负面体验时，这些活动就会发生”。⁽¹⁷⁹⁾但是最终叙述也是决定性的：

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连贯的表现病人经历的一系列事件……这个过程允许习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反应会减少。治疗师的任务是鼓励痛苦记忆的激活，防止病人利用习得的策略避免或终止这些记忆和身体感觉的激活……病人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习惯于在不引起强烈情感反应的情况下回忆事件。⁽¹⁸⁰⁾

九、20世纪60年代以来情感心理学的蓬勃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情感的概念性和经验性著作的数量呈

指数增长”。⁽¹⁸¹⁾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与心理学的内部发展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有关。【202】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是情感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而后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社会的总体发展很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妇女进入大学和职场，无疑展现了诸如情绪化等典型女性特征的面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治疗、自助团体和谈论个人感受的新时代运动的影响，情感的地位在更广的社会范围里提高了。⁽¹⁸²⁾和平运动也对“情感”概念中任何消极内涵的淡化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在与和平运动有关的团体中，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焦虑的人日子不好过。⁽¹⁸³⁾这一转变，连同那些尚未进入历史记载的其他变化，在情感心理学研究中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爆炸。让我们通过考虑一些最成功的范式来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结果。

十、情感的综合认知生理学理论：沙赫特-辛格模型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和杰罗姆·辛格提出了一个假设：处于一般生理唤醒状态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用不同的情感描述来识别这种唤醒状态。根据沙赫特和辛格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生理信号与某一种情感有排他性的关系。一般的生理信号只有在评估程序完成后才能找到情感上的术语。因此，愤怒、嫉妒或快乐并不是身体的状态，而是基于情境的、习得的归因。他们认为，那些从生理的角度对非特异性生理唤起提出有启发性解释（“他们被注射了肾上腺素”）的人，根本没有对这些状态使用情感标签。与此同时，如果没有生理上的刺激，就不可能有情感上的描述。⁽¹⁸⁴⁾

为了验证他们的假设，沙赫特和辛格设计了一个模型，【203】其中包括184名男性受试者，他们都是大学生，被告知要注射一种维生素来测试他们的视力。事实上，他们被注射了肾上腺素溶液，这种溶液通常会导致心率和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呼吸加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一位受试者都受到引导，认为这些影响是用来测试他们视力的维生素所带来的结果，但研究人员向其中一部分人解释了所谓的维生素注射的效果。然后，这群人被大致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被要求在一些演员的帮助下模拟欣快感，另一组被要求模拟愤怒感。后来检查了每一位受试者的心率，并让他们填写了一份关于自己身体状况（心率、颤抖、耳聋、瘙痒、头痛）以及对自己情感状态的印象的问卷。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所有被提供了生理上的解释（注射维生素会导致心率加快、手发抖等）来说明其身体状况的人都说自己没有产生情感反应，只是对注射的溶液有反应。那些没有被告知注射药物对身体影响的受试者要么很愉快，要么很愤怒，并将他们的身体反应描述为狂喜或愤怒。这创造了“可能是学术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情感理论”，至少在“发表后的20年里”是如此。⁽¹⁸⁵⁾沙赫特-辛格模型又被称为双因素模型或认知-生理模型，它认为情感和身体运动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身体就没有情感），习得认知负责解释和说明所涉及的特定情感（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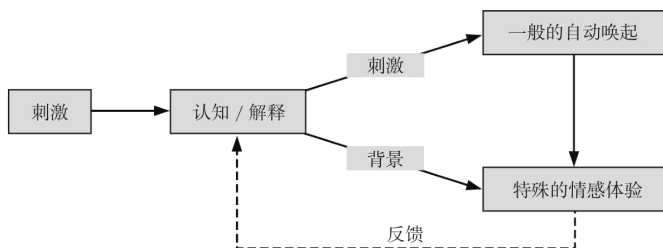


图18 沙赫特-辛格的情感模型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The Schachter—Singer Theory of Emotion”, *Psychwiki.com* <http://www.psychwiki.com/wiki/The_Schachter—Singer_Theory_of_Emotion> accessed 12 March 2014中的一份图解。

由于其综合性，沙赫特-辛格模型一直与（新）詹姆斯主义和认知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沙赫特本人称他的理论为“改良的詹姆斯主义”）。(186)

【204】今天，人们总是从正面强调这种认知和生理的综合，虽然有人对这一模型的细节提出批评。(187)

十一、情感评价：认知心理学与评价模型

在沙赫特和辛格提出其情感模型的几年前，美国心理学家玛格达·阿诺德已经详细阐述了一种情感模型，这种模型为引发情感过程的刺激或情感对象的评价留出了余地。阿诺德及其合著者约翰·A·加森（John A. Gasson）认为，情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为一种相应的生理趋避模式所强化”。(188)和刺激—反应模型不同（我逃离蛇，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刺激），对事物的判断也会影响人的反应：我逃离毒蛇，因为我知道它是危险的，但我对无脚蜥无动于衷，因为我知道它是无害的。换句话说：

要唤起一种情感，该对象必须被评定为能在某些方面影响我，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特定目标而对我个人产生影响。如果我看到一个苹果，我对它的品种和味道了如指掌，这些并不会对我有任何触动。但是，如果这个苹果是我喜欢的品种，而我又生活在既不产这种苹果又买不到它的地方，我可能会怀着一种真切的情感渴望得到它。(189)

该模型可以简化为以下简单模式：

虽然阿诺德在她的模型中加入了评估元素，但是她确实同意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学家关于情感的观点，即情感是生存斗争所必需的。虽然这种评估为文化的、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影响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但阿诺德确信“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动物之间总会有一个相似的情感核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90)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205】围绕着“评估”研究形成了情感研究的一大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1987年创办的《认知与情感》(*Cognition and Emotion*) 期刊。这方面的专家包括菲比·C.埃尔斯沃思(Phoebe C. Ellsworth)、尼科·弗里达(Nico Frijda)、巴特加·梅斯基塔(Batja Mesquita)和克劳斯·R.舍雷尔(Klaus R. Sherer)。评估法的成功恰逢“认知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激进行为主义消亡”。(191)如今，这一流派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其模型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一个模型发挥了主要作用，也很好体现了其实验文化，那就是“自我报告”，即受试者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口头或书面评估。这并不意味着不去测量受试者的排汗、脉搏和瞳孔扩张的情况，但生理数值不再是唯一来源。人们不断将评估法与情感哲学对比，尤其是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进行对比，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引言中看到的，他的观点也包括评估层面。这个维度为评估法对文化以及历史的影响开辟了道路。因此，长期以来，人文科学研究者发现情感研究的评估法是实验心理学中最容易被接受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2)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后来神经科学中出现的争论产生了兴趣，即评估过程究竟有多快。阿诺德本人也曾强调，认知并不是瞬间产生的，一般来说，评估是“直接的、即时的、不需要反应的、非智力的、自动的”。她以棒球为例。在棒球比赛中，球员必须在几分之一秒内确定球移动的方向，然后协调自己的动作，确保能接住球。如果球员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动作或球的方向，“他将无法留在赛场上”。(193)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 1923—2008)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避而不谈阿诺德的评估法，这引发了他与心理学家理查德·S.拉扎勒斯(Richard S. Lazarus, 1922—2002)的激烈争论。扎荣茨提出的情感模型在很多方面都和评估法很相似，尽管它与旧的阿诺德学派无关，但它以与认知心理学的争论为导向，仿佛评估法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194)扎荣茨认为情感“后于认知”。(195)在所有的人类行为中，尤其是在涉及决定时，例如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你喜欢这个人吗？”“你对死刑怎么看？”“布里奶

酪和卡门贝尔奶酪，你更喜欢哪一种？””，情感扮演着主导的、无意识的、临时的、先于认知的角色。(196)情感反应“与冷冰冰的认知相反……它毫不费力，无法逃避，不可改变，整体性强，更难用语言表达，但易于沟通和理解”。(197)【206】在这一点上，扎荣茨仍然认为认知和情感是完全分离的。他认为，由于认知系统使用的语言与文化有关，所以它更慢、更复杂，也更精确。相比之下，在进化方面，情感系统更加古老，它在生存方面创造了优势，是先于语言的，更加迅速，意识的因素更少，因此更具普遍性。最终，情感可以很容易地跨文化交流。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把情感描述为这样一个非语言的过程，再加上扎荣茨一直谈论的“情感”这个事实，预示了后来神经科学研究中对情感的定义。因此，把现在的神经科学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不合适的，就像扎荣茨本人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这也是因为他本人看到了自己与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情感与认知分离，情感反应的主导和首要地位……都非常符合无意识的倡导者弗洛伊德的精神。”(198)

评估理论家理查德S.拉扎勒斯回应说：“在扎荣茨的分析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对认知的认识。”(199)拉扎勒斯认为，扎荣茨对认知的定义过于狭隘，因为他把认知定义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这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涉及复杂的数学方程的求解，或者深奥的哲学文本的理解。这样一来，他就利用了一种以计算机为模型的广泛而错误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认知是一种利用毫无意义的位元进行计算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只有经过一连串的运算之后，才会出现像情感这样有意义的东西，而对于扎荣茨来说，可能为时已晚。相反，如果我们使用评估学派对认知的更广泛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涉及意义的产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大多数无意识的评估过程视为认知。根据拉扎勒斯的说法，评估并不一定是“理性的，有意识的”。(200)因此，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认识在时间上先于情感，而不是反之。在20世纪80年代初，扎荣茨和拉扎勒斯之间的争论确实引起了轰动，但在十年后，这种争论就显得过时了，因为新的神经科学方法彻底改变了人们研究大脑中情感的方式。

十二、神经科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其他成像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研发了一种让大脑活动可见的新程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207】这不仅给神经科学带来了突破，还为生命科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出现令人惊叹。以灰色大脑扫

描图上的黄色斑点为基础，人们对爱、自由意志、人类共情能力、儿童习得语言的方式、节奏感和真实性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当然，对这些大脑照片所作的泛泛之谈和简单阐释的批评很快就随之而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称呼：“新颅相学”“大脑色情”“神经泡沫”和“斑点学”，即在大脑扫描中发现彩色斑点的“科学”。⁽²⁰¹⁾但在探索新成像程序的局限性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其运作方式。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过测量大脑血液中氧含量的变化，从中得出有关神经元活动的结论。这一过程是基于红细胞因其含氧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磁性的原理。血液中氧含量高低之间的差异称为血氧水平依赖（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简称BOLD）对比。在最简单的神经细胞活动中，电脉冲的传递（人们常说的神经细胞或神经元的“放电”）要利用氧气，而这会改变血液中的氧含量。当然，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迟，这种延迟可以通过测量软件得出固定值，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估算。⁽²⁰²⁾这意味着fMRI扫描仪只能间接测量神经元的活动，并且会有时间延迟。⁽²⁰³⁾

那么实验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受试者要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取下来，并戴上耳机以隔绝噪声（扫描仪会产生很强的磁场和很大的噪声）。他戴上视频眼镜，手持键盘，然后被推进扫描装置。根据机器的类型，要么整个身体、上半身和头部，要么仅头部位于隧洞内（图19）。对照组用以排除类似于幽闭恐惧症的情感不会被实验情境触发。**【208】**为了获得最佳的大脑成像，在长约30到60分钟的实验中，受试者必须一动不动地躺在扫描仪中长达15分钟。⁽²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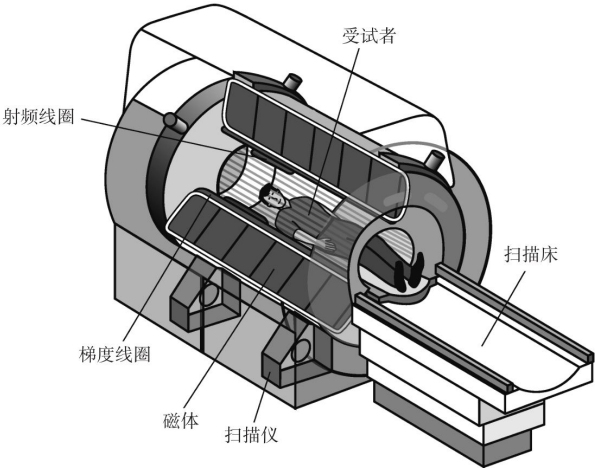


图19 fMRI扫描仪的横截面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Neuroskeptic, “fMRI in 1000 Words”, *Discover Magazine* (24 May 2010)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euroskeptic/2010/05/24/fmri-in-1000-words/>> accessed 11 March 2014中的一份图解。

在每项实验中，受试者都会受到某种刺激。⁽²⁰⁵⁾或是通过耳机接受听觉刺激，或是通过视频眼镜接受视觉刺激，或是通过触摸身体接受触觉刺激，或是嗅觉刺激。这些刺激通常与相应的任务有关。在情感研究的实验设计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刺激来“诱发”受试者的情感色彩，然后研究这种情感色彩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例如，让你听一首悲伤的音乐，或看一张愁眉苦脸的照片，【209】或是回忆自己生活中一段悲伤的往事，然后展示一个面带微笑的政客的照片和一个表情严肃的政客的照片，让你决定更愿意相信哪个，这重要吗？其次，通过视频眼镜或耳机，用文化产品刺激受试者，诸如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段话、电影《德古拉》(*Dracula*)中的一个片段或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从受到刺激的大脑区域，就可以识别出由这种方式所引发的一种或多种特定情感。例如，如果杏仁核亮了，那么就证明该文化产品会引发恐惧，因为此前许多实验表明，杏仁核负责恐惧。如果杏仁核和伏隔核都被激活，说明刺激包括恐惧和性唤起，因为伏隔核容易受到性刺激。

这种实验设计的一个变体是测试大脑的特定区域是否会受特定对象的刺激。例如，中国人对非中国人（如欧洲白人）的共情，是否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fMRI实验表明，共情取决于共情对象的种族身份，并且总是青睐自己种族群体的成员。受试者通过视频眼镜观看了接受注射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当看到中国人接受注射时，他们的前扣带回（负责共情）和岛叶皮层总是比看到欧洲人接受注射时更加活跃。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说：“我们的发现这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种神经认知机制，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帮助种族群体内的成员而不是种族群体外的成员。”⁽²⁰⁶⁾

fMRI扫描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它不会对受试者造成任何伤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的空间分辨率与fMRI扫描大致相同，但其与X射线一样，也会释放辐射。脑电图（EEG）、脑磁图（MEG）和经颅磁刺激（TMS）等非有害成像程序，虽然在时间分辨率上远优于fMRI扫描，但在脑功能的空间定位方面不如fMRI扫描。最近的趋势显然是不同成像方式的组合，即多方式认知功能成像。

从一开始，神经科学家就指出了成像程序的局限性。【210】首

先，没有进行直接的测量，甚至没有检测到血液中氧含量与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建立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正如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指出的那样，血流动力学信号不过是一个“替代物”。⁽²⁰⁷⁾其次是信号具体性的问题，“fMRI成像信号很难区分特定功能的处理和神经调节，也很难区分自下而上的信号和自上而下的信号，还可能会混淆兴奋和抑制”。⁽²⁰⁸⁾第三，斑点的空间分辨率，血液氧含量的彩色表征太低，无法将它们精确地与大脑特定区域一一对应起来。还记得在这本书的引言中关于杏仁核的讲述吗？聚集在一起被称为“杏仁核”的神经细胞很难与它们周围的神经细胞划清界限，它们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不能精确地确定血液氧含量，也不能明确大脑特定区域的确切范围——那么任何尝试将大脑活动与某个特定区域联系起来的做法都是有问题的。第四，越来越清楚的是，就大脑活动而言，实际上整个大脑都参与了；但是，由于BOLD的活动范围的起始点必须设置在某个地方，而有些区域的活动恰好低于这个点，所以没有被记录下来。实际活跃的部位要远多于大脑扫描所显示的，因此人们对大脑活动的整体概念是扭曲的。⁽²⁰⁹⁾第五，也是最后一点，fMRI扫描存在严重的统计和软件问题，如以下实验所示。2009年，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将一条鲑鱼放在fMRI扫描仪中，并向它展示了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照片，这些人的情绪效价有的积极，有的消极。然后他问受试“照片中的个体一定经历了何种情感”。其实，这条鲑鱼“长约46厘米，重1.72千克，在扫描时已经死亡”。⁽²¹⁰⁾尽管如此，脑部扫描还是显示了一些表明大脑活动的斑点（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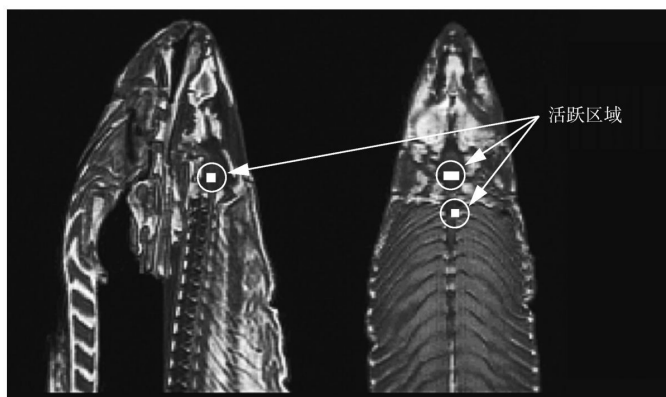


图20 一条死鲑鱼与有关情感的大脑活动？【211】

资料来源：Craig M. Bennett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Interspecies Perspective Taking in the Post-Mortem Atlantic Salmon”, 4.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扫描成像被细分为骰子形状的立体像素。一张扫描成像通常包含超过100 000个立体像素。这么多的数据总是会有统计噪声的风险，即尽管大脑相应区域完全不活跃，但立体像素看起来是活跃的。我们需要一种算法来滤除这种统计噪声。如果选择了错误的算法，那么就会得到假阳性结果。研究一条死鱼大脑扫描的活动迹象，就好比评估一个人死后的情感表达。

尽管神经科学对其仍持保留意见，但fMRI扫描还是大获成功。从原始数据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搜索ISI/Web of Science显示，第一篇关于fMRI程序的论文发表于1991年，1992年又出现了四篇，从那以后就呈指数增长的态势。到2007年，每天大约有八篇此类论文发表。⁽²¹¹⁾

【212】成像过程是“迷人的”，你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屡屡听到这样的说法。⁽²¹²⁾在21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医院和认为自己能有所作为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都配备了扫描仪。这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当前标准扫描仪是3特斯拉（Tesla，表示磁场强度的单位），2011年的成本为300万美元到400万美元。能买到的最大机器的磁场强度是7特斯拉，价格是其三到四倍；目前磁场强度为15特斯拉的机器正投入生产。除了购买机器的开销外，相关设备和运行人员还要花费大约50万美元。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神经科学家注意到，扫描仪的引入大大降低了实验设计创新的范围和质量。实验室花费数年时间将旧实验转移到扫描机器上，根本没有想出任何新的实验。“也许新进入脑成像领域的人最常见的错误是采用一种已经被其他技术（例如认知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使用过的成熟范式，并将其完全照搬到扫描仪上，丝毫没有优化设计或考虑可能的结果是否能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有所启发。”⁽²¹³⁾

大脑成像的喻义在生命科学之外产生了特别神奇的影响：美国一流大学的英语和艺术史领域的著名教授已经忘记了30年的结构主义，似乎准备赋予黄色（或红色）以一些本质属性，就好像有自己主观意图的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什么是黄色，以及应该将其放在扫描软件内置的刻度上什么位置（请参见下文）。到处都是不寻常的混乱迷雾，而这也赋予了这些灰色的大脑扫描一些形而上的特征。只有当这一切结束，当科学回归严肃，学科回归到原本的做事方式，我们才能够判断fMRI扫描给科学知识带来了什么进步。

哪些是最常见的、与情感有关的神经科学实验呢？⁽²¹⁴⁾接下来将介绍这些内容，客观描述完每个实验后都会附上评论。

十三、约瑟夫·勒杜和两条恐惧路径假说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提到了一个著名的理论：约瑟夫·勒杜关于基本情感运作方式的理论。【213】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刺激进入杏仁核后，大约在12毫秒内，杏仁核会让身体处于一种警戒状态（脉搏增快，肌肉做好逃离蛇的准备）；刺激同时会进入大脑皮层，它的高级认知功能会对刺激是否真的是一种威胁做出快速判断。如果大脑皮层认为这种刺激真的构成威胁，身体就会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如果确定它并不构成威胁，身体就会放松下来，恢复到休息状态。这就是两条恐惧路径理论：一条路径涉及杏仁核中大脑皮层下的情感区域，这是进化中的古老部位；另一条路径涉及认知发生的皮质区域。该理论还包括这两个独立区域的联合运作。勒杜的理论在神经科学领域之外已广为人知，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对称性，具体体现在毒蛇的实例和与之相关的意象中，这可能是讨论情感问题时最常引用的例子。这一理论成功的第二个缘由在于，在这个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情绪障碍已经成为常见病症的时代，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潜力。勒杜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这些疾病，以及他的研究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的潜在用途。(215)最终，勒杜的理论之所以在神经科学领域之外广为人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勒杜是除了达马西奥之外最著名的情感神经学的普及者，他曾写过两本畅销书，已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216)

虽然更多的公众熟知了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以及杏仁核与恐惧的联系，但在神经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一假说是不成立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质疑杏仁核是否存在一条“快速”通道，以及情感刺激引发的情感过程是否存在时间差异；另一方面，事实表明，杏仁核对视觉刺激并不特别敏感，与视觉丘脑的联系也不紧密。尽管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主要模式是通过声音而非视觉或嗅觉刺激，但在勒杜的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中，这一直是一个不变的主张。神经科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杏仁核和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远比勒杜的模型所显示的更多，也更复杂，而且神经元回路比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无论如何，杏仁核并不像勒杜所称的具有“快速粗糙”的功能。相反，它更像是负责分配各种输入的配电盘。【214】其中，一个重要的输入是丘脑中央的神经集合体——丘脑枕，这显然是处理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217)

重新审视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实际上产生了如下结果：该假说受到驳斥，这代表了科学上的真正进步。但是，如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在内的其他领域不接受这样的进步，那么它们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十四、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躯体标记假说

另一位畅销书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同样也是脑研究者，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神经科学领域。与埃里克·R.坎德尔（Eric R. Kandel）、史蒂文·平克、维拉亚努尔·S.拉玛钱德朗（Vilayanur S. Ramachandran）、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等人一样，他也是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位明星。他可以称得上是情感研究领域最著名的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已经在人文科学领域被广泛接受，尤其是他在畅销书《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1994）中提到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简称SMH）已为公众所熟知。

躯体标记假说认为，体内的情感信号可以简化、加速和改善诸如决定等高级认知过程。躯体标记是身体周围（皮肤、手、头发）留下的对身体情感表达的印记或痕迹，它们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简称VMPFC）。当即将要做的决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时，它会用积极的情绪渲染一个有希望的选择。排除消极的选择可以促进决策过程，加快决策速度。重要的是，躯体标记可以直接作用于身体回路发挥作用，在身体上标记具有潜在积极结果的行为选择。例如，通过脉搏加速，让受试者意识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它们还可以利用“模拟身体回路”（as-if loop），将注意力放在有前景的行为选择上，而不需要使用躯体标记，将思想作为高级认知的元素。

躯体标记假说基于著名的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简称IGT）实验。受试者从四副不同的扑克牌中选择纸牌，他们每次抽取一张牌，试图在损失最小化的情况下，将收益最大化。在抽牌完毕后，受试者要么得到奖励，要么受到惩罚，而玩家并不知道每一副牌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奖惩计划。有的牌会让玩家在开局时总是获利，但随后会面临更高的损失，最终导致净损失。还有的牌既有较低收益，也有较低的损失，【215】最终结果是得到净收益。设计这个实验是为了让受试者快速回忆起那些最初涉及高收益，但最终导致更大损失的牌（图21和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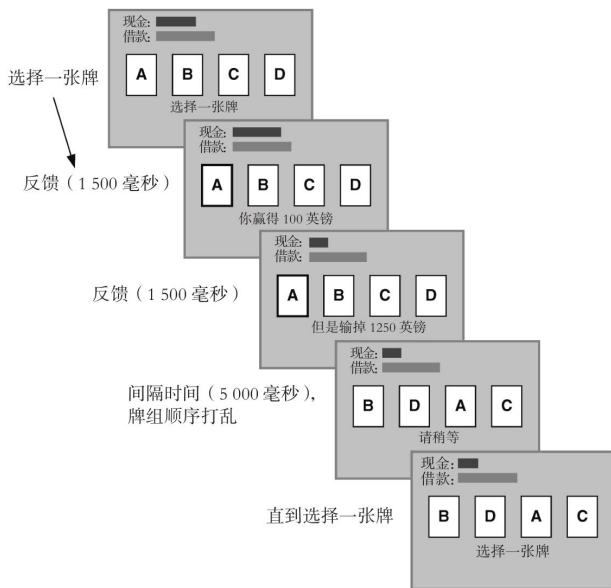


图21 爱荷华博弈任务 (IGT) 实验

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Anna Pecchinenda, Michael Dretsch, and Paul Chapman, “Working Memory Involvement in Emotions-Based Processes Underlying Choosing Advantageousl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3/3 (2006), 191—197, here 194中的一份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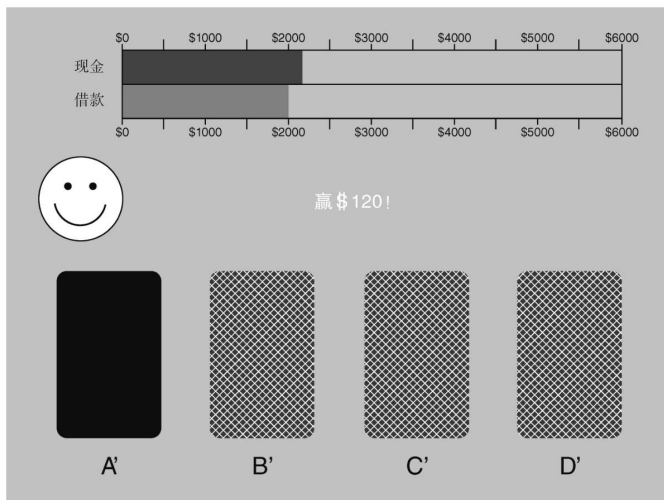


图22 BASIS词汇表【217】

资料来源：“The BASIS Glossary”, *The Brief Addic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Source (BASIS)* <<http://basisonline.org/basis.glossary.html>> accessed 13 March 2014.

在安东尼奥和汉娜·达马西奥（Hanna Damasio）成名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艾奥瓦大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神经系统异常损伤患者数据库，这些患者大多是由于病变导致脑组织损伤，但也有因脑瘤导致的脑组织丧失。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是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另一组是大脑未受损的对照组。结果显示，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追求更高的收益，而不考虑最终的负面结果，而那些大脑未受损的人总是关注最终结果，乐于接受更小的胜利。就像达马西奥的同事、实验设计者安东尼·贝查拉（Antoine Bechara）所说的那样，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缺乏远见”。⁽²¹⁸⁾科学家们还发现，当第一次获得高收益时，预期阶段皮肤电导反应（Anticipatory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简称SCR）的测量值和其他生理数值都开始上升。

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被重复了很多次，也被更多地用于检验其他假设。自1994年以来，已经发表了100多篇基于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论文。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了纸牌游戏中的决策。例如，对来自芝加哥的HIV阳性的受试者进行实验，他们有严重的药物依赖问题，他们的最终结果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一样糟糕。这项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药物依赖性损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方式与由于意外或脑瘤引起的病变相似。还有一点可以进一步论证：正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只想以牺牲长期利润为代价，赢得眼前的胜利，因此抽更高风险的牌一样，那些有严重的药物依赖性问题的患者会从事非常危险的性行为，所以助长了HIV的传播。⁽²¹⁹⁾爱荷华博弈任务应用于生物政治学的潜力非常大。既然这意味着高危的性行为（这本身就会给卫生系统带来高昂的代价）不是“性格懦弱”“死气沉沉”或“犹豫不决”的结果，而是与大脑息息相关，那么规范药物依赖者的性行为，严惩侵犯行为是可行的。【216】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结果尚未应用于这一方面，但已经被用于测试，以确定是否有针对强迫症的药物治疗办法。⁽²²⁰⁾此外，爱荷华博弈任务在经济神经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可能性。⁽²²¹⁾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其支持者，他们对将身体和心智结合起来的具身认知理论做出了回应。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

躯体标记假说受到了很多质疑。⁽²²²⁾人们质疑它是否真的有新颖之处。威廉·M·马斯顿（William M. Marston，1893—1947）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71年，神经科学家瓦勒·J·H·诺塔（Walle J. H. Nauta，1916—1994）根据麦克莱恩的边缘系统理论，提出额叶与身体周围的感官印象和复杂决定相关，这与20年后达马西奥的观点非常相似。⁽²²³⁾第一个质疑与实验心理学对制度记忆的恢复有关。第二个质疑

是质疑爱荷华博弈任务是否真的激活了情感记忆，并且在“认知上难以理解”。⁽²²⁴⁾达马西奥曾声称，“区分贝查拉和同事们的任务与其他概率推理任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受试者通过感觉来做出选择；他们会预感某些选择优于其他选择”。⁽²²⁵⁾【218】这个实验的成败取决于这个问题：在选择扑克牌时，如果只有没有情感信号的高级认知过程被激活，并且对于决策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个实验就不能说明躯体标记的存在。事实上，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试者比实验设计所预期的要更完整、更快速地掌握这一实验中奖励和惩罚的一般逻辑，因此可以在认知元层面上执行任务，这比用躯体标记做决策更为重要，如果这些躯体标记的确存在的话。⁽²²⁶⁾一篇概述文章总结如下：

关于爱荷华博弈任务的奖励 / 惩罚计划在认知上完全无法理解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这意味着，早期的爱荷华博弈任务涉及隐蔽的、无意识的躯体标记来调节决策的断言不再被认可。⁽²²⁷⁾

第三个质疑与对情感信号的解释有关——皮肤电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如前所述，根据达马西奥的观点，认知决策的能力之所以可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在身体回路中，皮肤电导反应的真正变化被记录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或者就像身体回路那样，在皮肤电导反应没有真正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一个伪印象。各种重复的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未能阐明所测得的皮肤电导反应是否真的是预期的积极决策的迹象。这些信号也可能是“对反馈的响应、风险指标、决策后情绪状态的标记，或者是某个特定响应选项好坏的信号”。⁽²²⁸⁾

第四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未受损的健康对照组有关。反复的实验表明，在对照组所有假定健康的受试者中，有恒定比例（约五分之一）的表现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受试者一样糟糕。这给爱荷华博弈任务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的可靠性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大群健康的人在爱荷华博弈任务中的表现和那些有病变的人一样糟糕，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没有问题，那么爱荷华博弈任务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启示呢？⁽²²⁹⁾第五个质疑是由一些科学家提出的，即使是无瑕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表明皮肤电导率反应和决策行为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²³⁰⁾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解剖学有关。达马西奥和他的同事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组织，到目前为止，这种组织尚未在大脑中绘制出来。【219】受到质疑的不仅是这些细胞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轮廓，

还有它们在爱荷华博弈游戏中作为躯体标识器的这一说法。很明显，大脑其他区域的病变——比如同样界线不明确的杏仁核——也限制了爱荷华博弈任务的成功概率。同样很明显的是，达马西奥实验室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左侧区域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有一方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右脑。(231)

十五、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马可·亚科博尼，镜像神经元和社会情感

2010年，两位神经科学家称：“很难想象有哪一类神经元能比镜像神经元更让人兴奋”；同年年底，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总结道：“镜像神经元很流行。”(232)这两种说法都不夸张。还有什么不能用正常的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功能失调来解释的？微笑、打哈欠、共情、爱、儿童的语言习得、宗教、心灵理论，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233)还有脱发、阳痿和自闭症（“破碎的镜像神经元假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镜像神经元来解释。(234)【220】神经科学普及工作的明星维拉亚努尔·拉玛钱德朗在2000年大胆预测，“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235)

但什么是镜像神经元？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等人于1995—1996年在帕尔马发现了镜像神经元。(236)里佐拉蒂和加莱塞研究了南平顶猴（豚尾猴）身体运动中的神经元事件。他们观察了猴子伸手把坚果放进嘴里时神经细胞水平所发生的变化。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从连接到大脑的电极上发现，无论是当猴子做动作时，还是当猴子看到人类或其他猴子做同样的动作时，神经元特定区域（前运动皮层）都会放电。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能在前运动皮层发现视觉感知，毕竟前运动皮层以前只和动作相关。考虑到他们观察到的神经细胞放电的双重功能，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将其称为“镜像神经元”。这就是躯体运动和认知之间无意识神经元联系、无意识模仿和高层次理解之间神经元关联的假说的起源，与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识器假设大同小异。

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人类身上可以找到类似的神经细胞，它们都处在一个类似的放电回路中；在2010年，就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237)与此同时，许多实验室声称，通过使用经颅磁刺激和fMRI扫描的非介入性程序，可以发现镜像神经元在负责运动的前运动皮层之外的区域也会放电，并且与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能力的神

神经元有着类似的放电顺序。(238)很明显，语言习得（以及更多）是以类似的自主和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记者和普及工作者从中得出了本节开头所提到的结论。【221】以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博尼描述的实验为例：

在一系列实验中，要求其中一组参与者想着大学教授并写下所有想到的东西，他们通常会联想到高超的智力。另一组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心里想的是足球流氓，这些不守规矩、破坏力强的球迷通常让人联想到愚蠢（或至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后两组都被问了一系列的“常识”问题，表面上看，这一任务与第一个任务无关。但事实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些早先专注于大学教授的参与者的表现要优于那些一直在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的确，思考“大学教授”的参与者比起对照组在回答常识问题时发挥得更好，而这个对照组反过来又比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表现更好。

结论：想着大学教授会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想着足球流氓会让你变得更笨！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总结了研究，他说：“相关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模仿可以让我们变慢或变快、变聪明或变愚蠢、数学好或数学差、乐于助人、粗鲁或礼貌、啰唆、敌对、好斗、合作或竞争、顺从或叛逆、保守、健忘、细心或粗心、整洁或邋遢。”这个清单够长的，我相信这种持续的无意识模仿确实是某种形式的神经镜像的表现。(239)

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认知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还可以通过二级模仿（即心里想着其他聪明人）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会使其他神经元（负责认知）与其保持一致。这是实验的核心结论。在此我们不讨论该实验的细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里显然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模仿回路中，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一个人从未与他可以模仿的聪明人打过交道，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变聪明？如果每个人都在模仿其他人，那么人类行为的差异又是如何出现的？

但亚科博尼更进一步。在《存在主义神经科学与社会》（“Existential Neuroscience and Society”）一章中，他写道：

反对神经科学影响政策的第二个原因与我们的自由意志观念会

受到的威胁有关，而自由意志显然与模仿暴力的理论有关。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性——也许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也是我们作为个体的自主性的一个限制因素。这是对长期以来的认识的重大修正。传统上，与个体行为的生物决定论形成对比的一种观点是，人类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物构成，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社会准则来定义自己。然而，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物学决定的。【222】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新知识？因为难以接受而否认？还是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制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我当然会支持后者。(240)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是否应该禁止那些在幼儿园就表现出攻击性的孩子进入社会，将他们关起来，这样他们的同龄人就不会模仿他们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严格审查媒体和日常语言中暴力的表现形式，因为这些影片以及暴力的语言表达必然会引起模仿（在午餐时，我大声表达了对专横的老板使用暴力的愿望，这样做不仅让我自己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而且让那些与我一同吃午饭的人也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

在里佐拉蒂和加莱塞首次发现镜像神经元约15年后，也就是2012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更具差异化和批判性的视角。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是语言的神经基础，他们没有质疑神经元新形式的存在，但他们怀疑高级认知是神经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回顾最初的实验并建立新的实验，他们证明了颞叶的语义分析不是放电回路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实际上是感觉运动神经元，在不同的行为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观察到，恒河猴能够区分向它们扔石头的人和向它们扔食物的人，尽管它们自己既不能扔石头也不能扔食物。希科克和他的同事认为，镜像神经元与其他“目标导向”的关联细胞相似：它们使投掷动作和被投掷物体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241)希科克和其他人认为，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应该盯着他们最初的问题，更多地思考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将他们发现的神经元的镜像性延伸到认知。

有些神经科学家认为，在使用像fMRI扫描仪这样的仪器进行成像时，其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太过粗糙，无法证明像镜像神经元放电这样快速而微小的现象的存在。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大脑扫描中，很可能只有不同细胞同时放电——有些负责运动功能，有些负责认知功能——才能被观察到。在缺乏介入性程序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同时具有运动和认知

功能的单个神经细胞的放电情况。这使得人类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尤其遭到质疑。⁽²⁴²⁾

最后，一些神经科学家指出，早在20世纪初，【223】科学家们就已经考虑到了观念功能和运动功能在大脑中的联系。例如，早在1908年，胡戈·利普曼（Hugo Liepmann）就根据他对因脑损伤而不能运动的病人和在执行有目的的学习动作方面有困难的患者的研究，区分了观念性失用症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他认为，观念性失用症是指失去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则是不能协调动作。⁽²⁴³⁾这一“新”范式再次吸引了新的研究人员和资金，而它所引发的轰动也再次受到了另一种声音的抵制，这种声音代表了长期以来被实验心理学的体制记忆所忽视的知识。

然而，镜像神经元的例子对神经科学的普及具有指导意义。像里佐拉蒂和亚科博尼这样的知名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普及这些看似难以置信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普遍浓厚。此外，科学记者傲慢和浮夸的想象力也启发了一些神经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这样想：如果一个无知的记者能写出一本关于镜像神经元和两性之战的畅销书，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日复一日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也不用为了保住手下工作人员的饭碗而没完没了地填写课题申请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涉及一种新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和他在纽约的文学经纪人工作密不可分。

布罗克曼第一次成名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与纽约先锋派舞台上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约翰·凯奇（John Cage）有来往。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一名文学经纪人，帮助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其他新时代运动作家打理出版事务。现在他的经纪人工作专注自然科学领域，代理的作者包括约瑟夫·勒杜、马可·亚科博尼和史蒂文·平克。畅销科普书是一个相对新颖的事物，它们运用生动的、日常的例子，其叙事性话语远远超出了实验研究，有时试图从总体上解释这个世界。如果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一举成功，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布罗克曼把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变成了作家。与其他学科（如历史）相比，他的经纪人工作更专注于著作的构思和创作，因为历史的专业语言更接近日常用语，并且在学术普及领域历史悠久。布罗克曼的手下密切关注实验室的进展，评估其市场潜力和研究人员对媒体的友好程度（毕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像史蒂文·平克

那样能说会道、有镜头感，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像约瑟夫·勒杜那样有业余时间（业余时间是在乐队里弹电吉他）。然后，他们选定一位生命科学家，

【224】帮助他完成一本科普书籍的出版计划书（通常不超过两页）。这份计划书随后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出版社——在1999年，布罗克曼以200万美元的预付款买下了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的一部作品。正如布罗克曼所说，“进化生物学家挣的钱和摇滚明星的一样多，这有什么问题吗？”⁽²⁴⁴⁾这本书出版后，出版商的营销机器就开始运作了，作者在YouTube上播放视频片段，参加脱口秀，以专家身份出现在晨间电视节目上，通过非洲的饥荒阐述镜像神经元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学校枪击事件后在晚间电视节目中阐述镜像神经元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促进了销售，出版商赚回了预付款。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许多购买这些书的版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出版社也同样希望至少能够收回成本。按照行话来说，作者们就进入了一个周期：如果他每三年能出版一部新作，这个周期带给他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周期为七年的作者，对后者来说公众关注的半衰期来得更快。换言之，一个周期为三年的作者的品牌效应胜过一个周期为七年的作者。

这在出版界很常见，其运作方式与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代理历史学家一模一样，其中包括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伊恩·克肖（Ian Kershaw）或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你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机场买到他们的作品。布罗克曼和怀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布罗克曼在作者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无论是构思环节还是写作环节，原因很简单：通俗易懂的描述性书籍的写作不是普通科学家所具有的核心能力之一。但是，增加的投资显然是有回报的，达马西奥、平克和勒杜所取得的业绩远远高于从事普及工作的历史学家，更不用说马尔科姆·T·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的科学新闻的销量了。这也与生命科学家所宣称的处理真正重大问题的方式有关，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过去是从让·保罗·萨特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那里了解的，因为他们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

生命科学之所以能够上升到这种统治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布罗克曼和他的机构。布罗克曼在互联网论坛edge.org上为生命科学家创建了一个重要的媒体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表达对人类重大问题的看法。C. P. 斯诺（C. P. Snow）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观点，一种是自然科学文化，另一种是人文科学文化。布罗克曼则提出了“第三种文化”，包括“经验世界中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解释性的写作，正在

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让我们看到生活更深层的含义，重新定义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²⁴⁵⁾

十六、站在矮人的肩膀上，或者说，神经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洛伊木马”【225】

今天，勒杜、达马西奥、里佐拉蒂和他们的实验越来越多地被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引用，其频率不亚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的著作。⁽²⁴⁶⁾脑部扫描图和彩色树突装饰着文学批评和政治科学新书的封面。使用“神经”作为前缀的新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神经政治学、神经经济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美学、神经文学批评、神经神学。虽然哲学和语言学在后现代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神经科学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分析文本和图像的学科的主要资源。有时候，这一胜利被宣布为一个新的、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时代的标志，虽然这个时代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称。即使在历史学领域，随着语言学转向，文学和人类学导向也被认为已经部分被取代，第一批关于神经历史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如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的《记忆的面纱：历史记忆的特征》（*The Veil of Memory: Features of a Historic Memory*, 2004）和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2008）。情感（emotions）——或者，更准确地说，是“affects”，这是神经科学对强烈的身体和无意识的感觉的称呼——是今天奠定神经科学文献基调的核心。神经科学导向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情感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一种解释是，神经科学战胜了自然科学。新知识和新方法——我们已经看到，fMRI扫描是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方法之一——首次使大脑可视化成为可能，这些突破在科学政策上得益于美国“大脑的十年”（1990—1999）等大规模研究计划，经济上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调控作用、互联网的繁荣、更容易获得的风险投资，以及伴随着互联网繁荣而来的生物技术繁荣。在新千年伊始，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解码，在许多地方，人们似乎可以重新开始寻找人类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答案——语言习得、自由意志、意识和情感。200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这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化版块的前六页贴满了字母A、C、G、T，这是构成人类基因组的32亿对当中的最终序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在美国，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226】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想的日渐式微。正如丹尼尔·斯梅尔所言：

在一个《圣经》直译主义兴起的时代，在一个总统们怀疑进化论真实性的时代，在一个美国进化生物学的教学被简化而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时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时支持他们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同仁显得更加重要。(247)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文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后结构主义的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生产的逻辑有关，科学生产不断求“新”，导致一连串的“转向”；此外，它还与政治和伦理有关。(248)很有影响力的酷儿（Queer）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1950—2009）在其《触摸情感：情感、教育学、操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一书中写道：

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研究生，他们善于揭露隐藏在世俗、普遍主义、自由人文主义之下的历史暴力。然而，这些研究生们的性格形成期与他们老师的完全不同，这些学生的感情岁月完全是在一个排外的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领导的美国度过的，在那里，“自由主义”是一个禁忌词，“世俗人文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边缘的宗教派别，然而绝大多数人声称自己与天使、撒旦和上帝等多个无形实体有直接的交往。(249)

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塞奇威克这一代人赶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潮流，为诸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的解放等经典启蒙理想奋斗了十几年甚至20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对人文主义普遍主义的暴力化、集权化的潜力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种思维转变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法文原版*Surveiller et punir*, 1975）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这本书以两张法国量刑实践的快照开头。1757年，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企图行刺国王。达米安的尸体印证了其罪名的严重性，他被严刑拷打、肢解，身体各部分被烧毁并四处丢弃，他的房屋被毁，亲戚被迫改名，这些都明确表明了在前现代时期惩罚的“残酷”。福柯将达米安的命运与

1838年少年犯监管所的规定进行了对比。在少年犯监管所中，每天都进行着有秩序的活动：上课、劳动和宗教活动。这意味着，在前现代惩罚的是肉体，而在现代惩罚的是灵魂。这是权力从宏观物理学到微观物理学的转移，在该书的结尾，【227】几乎没有任何读者会对哪种惩罚形式更糟糕有任何疑问。进步原来是一种痴心妄想。

如果我们按照塞奇威克的思路，1960—1980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从解放斗争中获益，但从未学会如何为启蒙运动而奋斗，也没有学会将启蒙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即使像塞奇威克这样的老师还没有，大多数美国人是信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已经与启蒙运动决裂。换句话说，一个人是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还是直接出生于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在不知道为什么事物会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游移的身份、多孔的边界、转变的话语还会持续多久？塞奇威克和她的同事们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坚实的锚点：更强健的现实概念和更清晰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塞奇威克会选择西尔万·汤姆金斯的情感变体，这本身就值得知识和科学史的关注。但事实是，塞奇威克选择了埃克曼和人类面部基本情感理论的先驱作为她的理论渊源。她的学生似乎还认为，受汤姆金斯和实验心理学启发的理论对思考政治变革非常有用：“她对汤姆金斯的解读（以及汤姆金斯本人的著作）对于对政治虚无主义持怀疑态度的研究生来说非常有益，而这种政治虚无主义似乎是成功的学术实践所固有的。”⁽²⁵⁰⁾

对其他人来说，在个人和存在层面让人放心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安全感，即这一切是建立在基因学和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就像西尔万·汤姆金斯的情感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如果同性恋基因（同性恋的一种基因倾向）真的存在呢？如果同性恋基因是不可变的，我不再需要担心导致我成为同性恋的环境、成长过程和童年经历。我甚至不能“皈依”，就像美国的同性恋基督徒一样，在“去同性恋”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只好与异性结婚并开始组建家庭。⁽²⁵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运动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开始，是由朱迪斯·巴特勒和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等后结构主义者中的先进人士发起的。与文化不同，天性可以达到一种巨大的解放。

对许多人来说，【228】基因和神经元所提供的安全感是他们在多年研究和争论中寻求的最迫切问题的答案：从“作者之死”、对马克思主义的削弱到精神分析的毁灭。艺术史学家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 曾写过颇受好评的关于圣像破坏运动的著作，他走上神经科学的道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尽相同，后面我们很快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252) 弗里德伯格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艺术品过了数百年依旧能够打动人，在观众中唤起同样的情感，而另一些艺术品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利用躯体标记假说和镜像神经元假说，他指出，成功的作品能引起身体的情感共鸣，而这是由于潜在的普遍的神经生物学的作用。

参照罗吉尔·凡·德尔·维登 (Rogier van der Weyden) 的《下十字架》(*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 1435—1438年间为鲁汶的一座教堂所作) 这一艺术作品，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弗里德伯格的论点 (图23)。这是死去的耶稣基督的正面画像，他看起来正在被从十字架上抬下来，尼哥底母 (Nicodemus) 抱着他的胳膊，亚力马太的约瑟 (Joseph of Arimathea) 抬着他的脚。另一侧，在耶稣脚下的位置，圣母玛利亚昏倒在地，由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和革罗罢之妻玛利亚 (Mary of Cleophas) 搀扶着。按照弗里德伯格的说法：

这幅画告诉我们，情感只有通过身体自身才能充分表达。此前，画家曾描绘过圣母玛利亚站着或跪在十字架旁边，但在《下十字架》中，她晕倒在地的姿势恰恰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姿势。罗吉尔用毫不夸张的肢体语言，传达了她的深切“悲悯”之情。通过描绘她对圣子所受伤害的感同身受，表现了她对圣子的悲悯。这部作品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在各个方面，它的原始背景都不复存在，但它仍然能对观众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正是这些人 (尤其是基督) 的肢体和他们的身体强有力地传达出情感的姿势和面部表征，继而引发了观者对这幅作品的关注。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滑落时，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滑落，我们可以注意到圣母玛利亚重现了同样的动作，仿佛表达了她看到儿子后的悲痛。(253)



图23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下十字架》（1435—1438）【229】

资料来源：© akg-images/Erich Lessing, <<http://www.museodelprado.es/de/besuchen-sie-das-museum/15-meisterwerke/grundlegende-werksangaben/obra/die-kreuzabnahme>>, accessed 13 March 2014.

此外，弗里德伯格宣称自己是保罗·埃克曼普遍的基本情感理论的信徒，认为面部尤其能表达这些情感：

此外，当我们看到这幅画中主要人物脸上的泪水和肢体动作深刻地传达出各种情感时，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驱动这些情感表达的肌肉力量。(254)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方面，弗里德伯格将艺术作品的成功普遍化，他声称，对动作表现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共鸣是反应的中心标准，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另一方面，他又为艺术史专家或者是鉴赏家留了一扇后门，允许有特殊性的存在。他援引了一个著名的镜像神经元实验，在该实验中，舞者和非舞者观看芭蕾舞和卡波耶拉舞的录像，与非舞者相比，舞者的感觉运动神经细胞激活能力更强。按照弗里德伯格的说法：“由于以前掌握的技能 and 接受的训练，舞者在观看录像时运动回路的反应更强烈。”(255)由此，弗里德伯格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这样的结论：“伟大”艺术中体现的专业身体动作能够培养很强的身体共情。但这是真的吗？要证明这一点，需要重新审视经典的艺术作品，看看其中对动作的呈现及其对该作品的重要性，【230】分析所描绘的动作是否会导致所有人的神经元放电，特别是让专家的神经元强

烈地放电。此外，经典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一事实也倾向于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对动作的身体共情应该成为判断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标准。无数社会学研究试图衡量人们对艺术的喜爱程度，其结果又如何呢？根据这些研究，人们对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作品中精心刻画的动作并不感兴趣；真正对普通民众情感产生影响的艺术反而是山脉、海洋、天空、咆哮的雄鹿和蓝色。⁽²⁵⁶⁾除此之外，弗里德伯格认为有感染力的艺术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基本观点不合逻辑，因为他还坚信，对某些人（专家、鉴赏家）来说，艺术具有更大的感染力，言外之意是他们比其他人更具普遍性。

此外，尽管弗里德伯格的理论很有发展前景，但他仍缺乏一些神经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即为什么写实、自然的照片（如2004年在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拍摄的那些）的感染力要小于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那幅画。⁽²⁵⁷⁾虽然很难从现代视觉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但将“写实摄影”与“艺术家的艺术”区分开来，对于弗里德伯格来说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强调历史更悠久、更经典、更高雅的艺术的影响。如果不这样的话，最具感染力的总是那些写实的并被普遍认为如此的形象。最后，最严重的问题是弗里德伯格依赖于本章第十三至十五节所讨论的实验，如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里佐拉蒂和加莱塞的镜像神经元理论，而在神经科学领域内部，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是具有争议的。即使弗里德伯格比神经政治学的科学家（我们很快就会转向他们）更善于阅读神经科学文献，也更仔细，尽管他同时亲自进行了神经科学实验，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他的想法是否可信取决于其深层的神经科学假设。

最终，弗里德伯格的兴趣无非是为“伟大”艺术辩护，或者是为经典的观念辩护。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判断特定的艺术品是“伟大的”，使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吸引着人们，并且将继续对子孙后代产生吸引力？正如后现代的信条所说的，伟大的艺术很可能只是那些掌权者（艺术赞助人、鉴赏家和艺术史家）所说的伟大的艺术。经典可能永远是政治谈判和冲突的产物。【231】但是如果“伟大”艺术的形式和美学标准不是来自世俗化的宗教文化概念，而是来自严格的神经科学呢？⁽²⁵⁸⁾围绕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下十字架》，弗里德伯格又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所谓二流的艺术，可能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擅长引起恰当情感背后的运动反应。”⁽²⁵⁹⁾更宽泛地说：

直接和无中介反应的形式（各种直接和无意识反应的临时称

呼)提供了一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方式:即使没有任何特殊知识或有意识回忆的情况下,数百年之前的艺术品依然能够对当代观众产生吸引力。(260)

弗里德伯格是如何发现神经科学的?根据他自己的讲述,阅读19世纪艺术史学家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作品让他了解到了欣赏艺术作品的普遍基础:“在1873年出版的《论视觉的形式感情》(*Das optische Formgefühl*)中,罗伯特·费肖尔将感觉和感情区分开来,这预示了最近神经科学对情感和有意识感觉的区分。”(261) (“情感”一词的使用表明,即使是专家也很少将神经科学的生理的、无意识的“情感”和较少生理的、有意识的“感情”区分开来。)弗里德伯格认为,19世纪这些艺术史学家已经走上了正轨,虽然他们的遗产在新的艺术史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压制。这门新学科必须看上去扎实而严肃,而它不能只谈论感情。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的《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 1960)“也许是将艺术和科学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最佳尝试,但几乎没有涉及情感”。(262)后来,弗里德伯格开始对神经科学产生兴趣,甚至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之一维托里奥·加莱塞等神经科学家一起做过实验。(263)弗里德伯格最近的神经科学实验表明,我们的镜像感知以运动的表征为特征,而不以静止物体的表征为特征。这证实了希科克对镜像神经元假说的修正,后者指出相对于“认知”,镜像神经元更多与感觉和运动有关。(264)弗里德伯格可能是视觉艺术研究中最杰出的神经科学皈依者,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许多艺术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一起工作过,后者创造了“神经美学”的概念,【232】并用来自“伟大”艺术的刺激来设计实验。(265)这显然是一种趋势。

这里不去追寻文学研究中与神经科学类似的趋势。(266)让我们看一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神经理政治学。在这方面,它起初也有将自己与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的意图。后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它缺乏同时处理语言和身体、认知和情感的能力。威廉·E·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写道:

你会注意到,神经科学是要讨论的话题之一。正因为如此,最近经常有人(尤其是我的朋友们)向我提出以下问题:“比尔,这种冒险不会把你推向迄今你一直反对的还原主义(或者是科学至上主

义、颅相学、社会生物学、基因决定论、行为主义、取消式唯物主义和不加修饰的经验主义，等等）吗？”我不这样认为。我的感觉是，在文化理论家值得称赞的努力阻止一种还原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陷入另一种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忽视了生物学是如何融入思想和文化的，以及自然的其他方面又是如何融入这两者的。
(267)

布莱恩·马苏米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他称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表现主义本体论是边缘的，“对于20世纪末的欧洲思想来说，很难找到一个这样不流行的概念”。他声称“所有这些假设都受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后现代思想’的严格检验”，(268)相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表达的本体论地位，“‘后现代’的形象是交流的失控。它似乎失去了在与客观的一致性中的根基，在没有尽头的、没有保证的‘滑移’（slippage）过程中，它似乎没有原因、没有动机”。(269)《情感理论读本》（*The Affect Theory Reader*）告诫读者说：

这里我们要为理论的有用性划定一个界限，【233】希望这些文章所引发的不仅仅是话语。我们希望它们去触动、感动和调动读者。我们这里提供的不仅仅是文字，我们想让它们展示出情感的行动。
(270)

当然，这些想法是用文字表达的，而不是用声音或视觉来呈现：字体没变，没有做凸出处理，也没有一副就散发气味的东西。但是，这种反对后结构主义的划界运动并没有阻止神经政治理论家，他们称他们的新方法为“生机论”或“新唯物主义”，他们以典型的、折中的后结构主义方式来利用后结构主义概念，以取代福柯的“生命政治”。

神经政治理论家说，他们与众不同，遥遥领先于我们大多数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与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最早也最重要的行动是将无意识的身体情感和有意识的情感分开，但两者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前者，后者无法想象（而前者却可以没有后者）。后者是一种认知形式，总是有前者的因素在里面。以下是从康诺利开始人们所做的一些定义尝试：

情感压力从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来源传到人类的感觉中枢，这些来源包括阳光、电击、侮辱性的言论、磁场、汹涌的大海、鼓舞人心的行动，等等。这种状态随后被组织成感觉和更高级的情感。

在最基本的层面，情感是一种化学电荷，它在你到达感觉或意识的临界值之前，将你推向积极或消极的行动。这种行为在它形成文化灌输的感觉、情感或情绪之前就引发压力。情感电荷由流经神经系统不同部分的振动组成，它对外部到达的东西做出初始的、快速的、潜意识的反应。凡·高画笔下金光闪闪的向日葵、沐浴在阳光下的身体、意想不到的爱抚、刺耳的声音、刺鼻的气味、跃动跳舞的身体、一道闪电，这些都会作用于感觉中枢，然后被组织成有意识的感知、感觉和反应。的确，这个组织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新的振动和已经存在的感官习惯之间的一系列共振所致，除非这种情感压倒了那些习惯。灌注情感的行为甚至在知觉形成之前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在看到视觉图像或意识到危险感之前就会急转弯。

(271)

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强调“认知和对表征的无情感的理性考虑无法再被分清”。(272)最后，马苏米表示：“思想像闪电一样，具有突然的个体发生的力量。它是被感受到的。”(273)

下一步涉及行动或能动性的范围。【234】鉴于认知维度的具体化和弱化，大量的有机体，甚至是物体，被认为具有能动性。用康诺利的话说：

将人的能动性解释为一种突现现象似乎是合理的，一些非人类过程的属性与人类能动性带有家族相似性，可以参照非人类过程出现的原始能动性来理解人类的能动性。(274)

接下来讨论的是细菌的原始能动性（“具有能动性的一些特性”；“它会被糖吸引，它把追求糖作为目的，它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它实现预定的目的时会感到满足”）(275)以及猴子和屎壳郎的能动性：

即使在某些复杂程度上，也不能确定是否只有人类才具有能动性。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并引发了一场至今还未停息的神经科学革命。他指出，猴子具有受文化灌输的镜像神经元，它们虽没有复杂的语言技能，却能很好地解读其他猴子和其他生物的意图。随后，它们把一些意图纳入自己的行动之中。它们也可以根据对这些意图的初步了解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在语言之前和之下的文化能动性。就连屎壳郎在遇

到障碍物时，也会调整移动粪便的第一阶欲望，即使不改变自己的目的，至少也会调整实现目的的方法。(276)

在如此宽泛的能动概念下，有更多的物体和生物变得值得加以保护。(277)

归根结底，一切神经政治思想的核心都是抵制问题。应当说，神经政治学是由左翼人士（或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发起的，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从保守的广播电台和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成立以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保守派产生的情感和认知危险越来越大。他们认为，这些新的视频类型以一种更微妙、更无意识的方式向媒体消费者传达信息：“如今，诸如《汉尼蒂报告》（*The Hannity Report*）、【235】《格伦·贝克》（*Glenn Beck*）和《奥雷利因素》（*The O'Reilly Factor*）等节目都在渗透政治认知的色彩……因此，怨恨和教条式的犬儒主义现在被编码进了感知本身。”(278)在这种可以被称为“认知情感”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的抵抗是不够的。面对这种新的威胁，基于“客观”阶级立场、主观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反抗是无能为力的，理解这一点是抵抗的第一步。康诺利写道：“没有一个社会范畴或宗教能够完全对应于你试图暴露、抵抗或克服的存在倾向。”(279)除此之外，

仅仅改变个人或选民的信仰是不够的，因为信仰的分层体现和角色的实际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信仰是表现的一种具体化倾向；一致的表现实践有助于改变或强化信仰；新的信仰强度又会反过来影响未来的欲望、行为的优先级和政治行动的潜力。(280)

因此，康诺利建议采取特定措施，以自动塑造互相联系的、抵抗的身体和行为：

如果你是中产阶级，请购买丰田普锐斯或雪佛兰沃蓝达汽车，并向你的朋友和邻居解释你这样做的原因；写博客；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多骑自行车上班；考虑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在你的教堂引入新话题。当你做这些事情时，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犹豫不决的信念和欲望此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而其他倾向则会消失。现在，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以更稳健的方式参与更大的政治团体，加入其他那些信仰、角色表现和欲望也在不断变化的人当中去。你可以将这种组合称为微政治，这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必须将其与宏观政治联

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两者才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今，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反共鸣机构，这些群体在宗教信仰、阶级地位、种族或族裔认同、性取向和性别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这是为了壮大将地球放在首位的群体，而不管他们自己如何解释最基本的生存条件。(281)

这是具有应用野心的左翼政治科学，它不同于没有这种野心的理性选择政治科学（因为它缺乏一种身体—情感维度），它还将自己与有应用野心的后现代身份政治区分开来（因为这种趋势缺乏“合众”之后的“为一”）。(282)【236】然而，用老生常谈的话来说，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抵抗的内容可能从哪些情感和认知来源中获得。考虑到唯物主义者和生机论者的共情形式，从细菌到人类，都是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再做那些使人类享有特权的决定。例如不能在严格条件下进行动物实验以开发新药；也不能使用转基因、健壮、高产的种子，因为这样做虽然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却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神经政治也没有为最贫困人口争取超出最低生存保障范畴的财产再分配（例如，激进的递进税）提供任何基础。最后，这种神经科学论证既不能推翻暴君，也不能结束种族灭绝。这是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有限愿景，而它将普遍性推向了荒谬。

神经政治学依赖于生命科学的发现。关于神经政治理论家如何运利用生命科学，有两点可以说明。首先，他们引用了一些普及的文本：粗略算来，康诺利的《演化的世界》（*A World of Becoming*）引用了11次，班尼特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引用了18次。这些参考文献大多不是论文，而是普及工作者的著作，它们都是基于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和镜像神经元理论，有时也基于利贝特实验（Libet experiment）。(283)这些假说都有疑点。所有这些，以及无意识的情感和有意识的情感之间的基本区别（这可以追溯到汤姆金斯和埃克曼），都受到了科学史家的批判，例如，在有自然科学背景的露丝·雷斯的作品中。在实验设计、样本量和认识论前提方面，人们都做了认真和详细的研究，但神经政治学完全忽略了所有这些实质性的批评。(284)相反，它的支持者在哲学的一般性中寻求庇护，就像康诺利在回应雷斯批评时所做的那样，声称在右翼博客、福克斯新闻和茶党的时代，太多的东西都岌岌可危。他们声称，面对这样的发展，理性话语无济于事。(285)其次，用典型的后现代的随意方式来对待生命科学：对康诺利来说，达马西奥的《斯宾诺莎效应》（*Spinoza Effect*）是“神经科学

的一项优秀研究，【237】它利用了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和他认为情感总是伴随着感知、信仰和思考的观点”。⁽²⁸⁶⁾在神经科学中，既没有“好”，也没有“最好”“非常好”“不那么好”，只有对或错，这是坚固的二元认识论规则所允许的唯一限定条件。⁽²⁸⁷⁾

最后，谈谈神经政治的文学风格和围绕它的炒作。从文体上讲，神经政治文本既包含了个人情感陈述，又夹杂了笔记本电脑、电脑键盘和铅笔芯的描述，因为写作总是有身体维度和情感维度，同样还有物质维度。还有新时代运动风格的对比和画图，加上完全没有讽刺，仿佛在后结构主义从世界记忆中彻底抹去的第二天，神经政治家们刚完成了一节创意写作课。

十七、全世界的情感主义者，团结起来！以哈特、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神经科学

神经科学思维也已从学术界扩展到了政治运动领域。批评全球化的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除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拒绝商标！》（*No Logo!*, 1999），还有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帝国》被称为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它描绘了一幅全球化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图景：扁平的等级制度、网络化、计算机化生产、权力分散的国家、私人警察武装和军队；人们无路可退，至少不能退出由生命权力主导的生态位。⁽²⁸⁸⁾在《帝国》，尤其在其续篇《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和其他一些篇幅更小的著作中，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在新的全球化世界中工作的性质是如何变化的：工作的产物被认为是无形的，但是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定性方面是支配性的”。一方面，我们有知识职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谈论一种新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另一方面，还有“情感劳动”（目前还没有人谈论过“情感阶级”[*affectariat*]）。⁽²⁸⁹⁾首个研究情感劳动的是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238】我们之前在第二章中谈论过她。

情感劳动是产生或操纵诸如舒适、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等情感的劳动。人们可以意识到法律助理、空乘人员和快餐店员工（微笑服务）工作中的情感劳动。至少在主要国家，情感劳动重要

性上升的一个迹象是，雇主倾向于把教育、态度、性格和“亲社会”行为作为员工必需的主要技能。说一个工作人员有良好的态度和社交技能也就是说他善于情感劳动。(290)

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概念来自斯宾诺莎、德勒兹、马苏米和达马西奥。(291)哈特写道：

一方面，我们有理性、心智活动，以及身体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激发性的身体理性；另一方面是心智激情和身体激情。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理性和激情是一样的，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因此，要想理解这一复杂命题，简单来说，我们要不断地把行动和激情之间的关系、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我们事先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心智能想什么、情感能做什么。它需要我们对这些尚不可知的力量进行探索。就这样，斯宾诺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类本体论，或者说，一个不断开放和更新的人类本体论。(292)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情感被认为是抵抗的源泉。因此，一般来说，情感视角“为政治组织和集体拒绝与解放的实践开辟了道路”。(293)更确切地说，按照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

尽管这些危险可能很重要，但不能否认生命权力作为潜在劳动力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的生命权力。这种生命政治语境正是研究情感与价值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一方面，情感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资本主义积累和父权秩序的必要基础。然而，在另一方面，情感、主体性和生命形式的产生，为自主的稳定循环（可能还有解放）提供了巨大的潜力。(294)

没有比这更具体的了。【239】

许多人并不反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虽然他们的确反对把抵抗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其中一种批评来自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达马西奥所提出的神经科学本质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本质”总是以象征意义为前提。因此，一旦人们对任何事情达成一致，例如对于“自然”的认识，他们就使用可行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语言）来改变其性质。(295)左翼分子从另一个角度批评哈特和奈格里采取的方法，并坚持客观社会经济因

素的首要地位。在文学学者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看来，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抵抗的神经科学和情感基础（他认为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副产品，而不是我这里所做的后后现代主义的副产品）涉及一个本体化的过程，抵抗通过这一过程自我消解：

通过将人们相信什么的问题替换为他们想要什么的问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后历史主义重复了保罗·德·马尼安（Paul de Manian）用情感替换认知的做法。这种在历史终结之际转向情感的做法与历史开端之际转向情感的做法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主体的首要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超越了他们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如果自由主义者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者一定是错的。但一旦人们相信的东西被他们想要的东西（正如福山所说）所取代，或者是被他们看到的東西（正如德·马尼安所说）所取代，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没有争议了。你想要的和我想要的只是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之间的区别，就是你所站的位置和我所站的位置之间的区别，顾名思义，也就是主体位置的区别。(296)

迈克尔斯对哈特和奈格里的批评带有讽刺意味，暗示他们为自怜的中产阶级而写作。例如，他声称，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只会让人们忘记社会不公：“因为穷人没有被边缘化，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对主体的压迫性定义’所害，那些参与朱迪斯·巴特勒版的‘左翼政治计划’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他们。”此外，

哈特和奈格里的伟大功绩在于为左翼改造穷人，他们的伟大才智则在于将贫穷本体化，将贫穷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缺钱。因此，圣弗朗西斯成为《帝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把脱贫计划变成了变为穷人的计划。

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把自己看成是潜在穷人的计划。因为一旦我们把贫困变成一种身份认同的结构，【240】与身份有关而非与金钱有关，我们会开始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不够“穷”。正是这个原因，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对“认同至上主义”（identitarianism）的常见形式（文化、民族和种族）怀有敌意，尽管如此，他本人还是再现了他们的本体论承诺。

.....在更普遍的意义之上，或许可以说我们这些中产阶级才是受害者，我们不像圣弗朗西斯那样有生气，不像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样有生气。或者再进一步（但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话题），或许可以说今天的左翼痴迷于一系列本质上属于自由的问题，从种族主义到同性恋婚姻，这是回避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方式。
(297)

迈克尔斯对意识形态差异而非情感本体论差异的坚持，得到了同样利用情感范畴的保守派圈子的支持，尽管后者是以一种相反的、肯定的方式，在为低工资的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力辩解时，声称重要的事情应该是“感觉良好”。这是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纲领，也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英国“大社会”的构想。⁽²⁹⁸⁾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神经科学的普遍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多元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全球化在神经科学中发现了可以为其所利用的普遍主义。⁽²⁹⁹⁾

十八、对神经科学的借用：暂时的平衡

事实表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曾大胆利用的神经科学实验常常是可疑的，甚至完全站不住脚。对这些实验和假设的批评来自神经科学本身。狂热的神经科学业余者应该为此而烦恼吗？他们不能把一个基于实验的假说当作“有趣的解读”吗？就像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同一段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那样，以此来暗示符号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开放性？

我不知道怎样才可行。人文和社会科学在经历了后结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阶段之后，又回到了寻找普遍真理的道路上，并且似乎认为已经找到了神经科学的合适来源。如果一些曾经被认为正确的神经科学发现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241】那么就没有相对主义的救生圈可以拯救它，这表明今天的真相只是一种可能的解读。非浮即沉，非黑即白：这就是自然科学认识论的运作方式。⁽³⁰⁰⁾

在面对他们不喜欢的自然科学发现时，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家都选择遵循这种自然科学认识论：无论是颅相学、优生学、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面相术，还是20世纪后期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暗含的种族主义，这些都不是众多解读中一种有趣的“解读”，而是错误的、完全过时的、没有经过充分证明的、被明确驳斥的解读。⁽³⁰¹⁾相比之下，神

经科学家对自己的认识论毫无异议。他们已经习惯了真理很快就会被取代，也习惯了悬挂在每次实验头上的可复制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使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就无法避免与它们进行更彻底的接触。人们需要了解实验设计、样本量、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对于像勒杜和达马西奥这样的普及工作者，人们应该保持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这些人大多只提出一个假设，将笛卡尔、斯宾诺莎或莎士比亚的名言穿插其中，粉饰门面，供那些非神经科学家读者阅读。威廉·雷迪曾说过：“我对普及工作者的不满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趋势的理论，就好像这个理论已经被公认为对大脑和思维功能的一种无可争议的新解释。他们系统地淡化研究的多样性，以便从最近一些流行的突破中推断出引人注目的答案。”⁽³⁰²⁾ 他所言甚是。如果考虑到在不同国家普及化的程度，那么所谓的普遍理论的特别之处就变得显而易见。在德国，格哈德·罗斯（Gerhard Roth）和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也许还有汉斯·J. 玛科维奇（Hans J. Markowitsch）和曼弗雷德·斯皮策（Manfred Spitzer），宣称自己的神经科学真理很有市场；但是在美国，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发现还多少有点不为人知。⁽³⁰³⁾ 正如哲学家托马斯·梅岑格（Thomas Metzinger）所言，【242】“21世纪完全商业化的流行知识分子”最终可能会助长高级的“肤浅”。⁽³⁰⁴⁾ 正是因此，人们应该记住时间差异：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实验室研究成果，到和布罗克曼的公司签约向大众推广，其间都有很长一段过程（虽然比历史档案从研究到出版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因此，作为一个外行，依靠普及性著作的危险就是其所掌握的都是已经过时的知识。人们还应该对媒体、广播或电视上耸人听闻的新神经科学发现持怀疑态度。通常，这些所谓的最新发现仅仅建立在一篇文章的基础之上，而且还是由科学记者解释和总结出来的。

要对神经科学持怀疑和更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从阅读元分析开始，这种分析是系统地比较数百篇同一主题（例如，镜像神经元）的论文的结果。在神经科学领域，这些元分析被视为黄金标准，但也有必要阅读大量的单篇论文。如果被某个特殊发现所吸引，那么应该记住所涉及的时间性，并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这个发现是否真的能满足历史研究中使用的鲁棒性（robustness）标准：任何陈述的范围都是严格限制的，做出这种陈述的对象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非常规的，并且任何结论在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在考虑某些东西是否被认为长期有效时，历史研究是有优势的。尽管许多神经科学家抱怨他们的学科缺乏

制度记忆，五年前做的实验就像被遗忘了一样，【243】但这种递归功能是历史的核心。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那么发生在让·德吕莫身上的事情还会发生。他是一本关于早期现代性恐惧的经典著作的作者，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到过。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从实验心理学中借来的普遍观点：“一旦处于警戒状态，下丘脑就会做出反应，通常会调动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躯体行为，特别是促进内分泌变化。”在这本书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观点已经彻底过时了。(305)

十九、超越一切鸿沟：批判性神经科学和合作的真正可能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对自己的学科提出批评，或者接受了来自人文科学家的批评，他们对神经科学持一种怀疑但是开放的态度。神经科学家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学科建立一种制度记忆，这样他们就能避免重复过去的发现，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接受了基于长期传统和逻辑一致性的哲学批判。相反，尽管那些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细化确定并最终改进了大脑的程序、图像和模型。他们会像对待其他任何科学成就一样，认真对待这一进步。当扁桃腺发炎时，他们会服用青霉素，也会将食物放在冰箱里保存，并希望有治疗癌症的方法。我们可以称这个松散的联盟为“批判性神经科学”。(306)当然，这个联盟的边界漏洞百出，难以划清界限。例如，神经科学家理查德·J·戴维森（Richard J. Davidson）与埃克曼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但是戴维森在2003年发表了《情感研究中的七宗罪》（“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244】拉尔夫·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与达马西奥合作过，但也与神经科学家路易斯·佩索阿（Luiz Pessoa）一起发表了著作，他同样对自己的学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307)

因此，神经科学的成果与邻近领域的联系程度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至少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大脑的知识不能对心智、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突破固有思维的方法最具成效。以下是批判性神经科学家目前关注的三个主题：功能分区，即认为大脑特定区域负责特定功能；可塑性，即大脑变化范围的问题；社会神经科学，不仅研究个人，还考虑到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动，甚至在群体内部的互动。这些暂且不在这里详细讨论，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指出神经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的交叉之处，

指出它们在认识论方面的明显重叠，以及这些交叉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1. 功能分区

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大脑的特定区域负责特定的功能，当执行特定的功能时，只有一个区域被激活，而那些不参与的区域是不活跃的。现在，这种大脑的地形学观点仍然影响着大量的研究，以及在媒体上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科普知识：“在颞叶中可发现上帝”，“杏仁核控制着大脑中的社交生活”，等等。⁽³⁰⁸⁾

批判的神经科学已经从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大脑的功能分区和地形学观点是对现实的不完整描述，特别是当这些想法成为固定的绝对观念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样的观点，即大脑一个特定的区域被激活时，这个空间会“亮起来”，随后再进入休息状态。⁽³⁰⁹⁾第一个遭到质疑的就是静息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发现大脑活动与解决实验任务没有直接关联。⁽³¹⁰⁾【245】今天，这种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带有目的性的，面向的是特定的未来长远目标，而不是与解决特定短期任务有关的短期冲刺。⁽³¹¹⁾这种与解决任务相关的平行大脑活动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简称DMN）。⁽³¹²⁾此外，“以前对独立于刺激的、与任务无关的想法和‘走神’的分散研究被集中归于‘思维游移’这一范畴”。⁽³¹³⁾然而，思维游移也是一种活动。这是在处理大脑扫描产生的数据处理中的计算问题时注意到的，即“在分析模型中作为噪声被抛弃的自发活动”。⁽³¹⁴⁾最后，关于病变的研究表明，以前从未被认为有能力这样做的区域可以承担受损区域的功能。⁽³¹⁵⁾最近，批判神经科学谈到了“一体化”，以及一个互动的、动态的、网络化的观点。大脑科学家恩斯特·波佩尔（Ernst Pöppel）在一次采访中总结了这一点：

提问：情感对我们的思考和学习很重要。你是如何做出艰难的决定呢？是根据你的直觉，还是根据你的理解？

波佩尔：你这个问题不对，但这不是你我的错。我们使用诸如智力、意识、情感、自由意志等概念，这是我们2500年来的传统，但这些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功能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没有独立的情感，也没有独立的感知和记忆，它们都来自大脑的解剖结构；它们都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紧密相连的。每一种情感同时也是感知和记忆，每一个理性过程都嵌入情感评价中，每一种直觉都与行为意图相联系。

提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脑研究的成像程序表明特定活动与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有关。

波佩尔：那是一种幻觉。这些区域总是嵌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在实验中，当有人吃巧克力，或感到疼痛，或发生性行为，或有强烈的欲望时，所谓的岛叶皮层（脑岛）会亮起来。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当执行特定活动时，大脑中总会有多个区域作为整体参与其中。(316)

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246】即在大脑局部活动中仍然存在强度梯度，而这种强度的变化表明功能分区的假设是正确的。例如，马可·亚科博尼提出了以下观点：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细胞都与其他细胞相连，正如在美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连最小的城镇也通过公路系统与其他城镇相连。路线可能很迂回，但是你可以从头走到尾。同样，从理论上讲，大脑也是如此，这个连接的迷宫比美国或任何其他道路系统都要复杂无数倍。为了让大脑的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对话，就需要一条特别直接的道路，就像某种州际公路一样。(317)

然而，目前可用的fMRI扫描等程序还不完善，甚至连亚科博尼所说的州际公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同时考虑高速公路和偏僻小路了。但是这些程序需要不断改进，并且在连接它们这一方面，人们正取得巨大的进展，例如fMRI、PET和EEG/MEG的结合。根据当前的知识，以下画面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的大脑，在执行某个特定功能时，有几个区域非常活跃地参与其中。在这些区域中，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强度高于其他区域。不同区域的活动强度不同，但没有哪个区域是完全不活跃的。

从这些可以看出，正如波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就历史研究来说，“情感”“认知”和“意识”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写。即使坚持这些概念构成现实的方式，但如果到头来真的证明这些认知区域几乎不能彼此分开，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例如，这可以阐明个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通向意识形态的道路将比完全理性对待更加难以描述。为什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和美国有那么多学生转向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其归因于理性（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有点荒谬；鉴于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自上层和中产阶级，理性选择的说法无法解释这

一现象，因为它假定利润的最大化是一个不变的动机。在接受采访时，这些人谈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公平感和随之而来的愤怒。我们这里有一个“认知情感”或者“情感认知”的混合物，但这些概念仍然与“认知”和“情感”这两个独立领域的二分结构有关。如果对大脑的互动观点得到发展，历史研究试图从中得出一个异于通常来源的分析概念，那么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引入一个整体观的新表达。

功能分区范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脑一体化的认识，这为科学史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种对大脑的认识中，许多全新的东西已经在控制论中得到了发展。【247】主动自体调节的控制论模型（即生物体中稳定、恒定的状态，例如维持体温）可以作为始终活跃的大脑的模型，让我们摆脱完全不活动的大脑这一概念。(318)大脑不同区域的相互作用也与控制论网络理论有相似之处。(319)最后，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逢功能分区范式和大脑不活动状态相关观念的瓦解，这与它们和当今世界运作方式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关，这些相似之处看起来是很明显的。互联网、数字通信媒体、多任务、智能手机和全球化的全天候供应链管理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交互式大脑的形象。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仍是活跃的，而非处在不活跃状态，这样的—个事实与我们的现代生活相呼应：今天，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工作和失业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工作是一个常量，而收入来源却不断快速变化，从长期稳定的铁饭碗到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2. 神经可塑性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大脑内部的神经发生（神经细胞的构建）和连线（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就基本上固定不变了；成熟的大脑有固定数量的神经细胞，它们之间的连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认识一直占据上风。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成熟的大脑会持续产生神经细胞，并形成新的连接。(320)换句话说，即使是大脑的硬件也会随着人的一生而发生改变。(321)文化差异、生命阶段（尤其是青春期）、破坏性经历（创伤）、精神药物的影响（毒品，但也包括在俱乐部里疯狂地跳舞），所有这些都会在大脑结构中留下痕迹。在这方面，不同大脑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皮层下区域的可塑性较差，而这里也是大脑进化史上最古老的区域。尽管如此，这种神经可塑性的观念为诸如历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开辟了可能性：生活不断地铭刻在大脑中；大脑成为历史变异的对象。我们将不得不假设大脑具有历史性和适应性，

再也不能把大脑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堡垒。这也给神经科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许多关于“大脑”普遍性的陈述遭到质疑；领域大幅减少，【248】代表性降低到 $n = 1$ 。如果神经科学家进行脑部扫描，他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是在扫描“大脑”，而是在扫描某一个人的大脑，而这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属于特定的群体，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时代。(322)在研究特定群体，不同时代、历史形成的大脑时，历史学家必须成为神经科学家的对话伙伴。

3. 社会神经科学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它利用了理解大脑可塑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它的目的是“克服神经科学研究中个体性的陷阱”，并确保其生态效度，即实验在狭窄的实验室范围之外的意义。(323) 2010年，一位实验心理学家总结了情感研究的十大“热门话题”，其中热门话题七是“情感相关过程中的个体差异，着眼于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热门话题八是“情感相关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相似性”。(324)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心理学一直在研究主体间的情感。(325)早在1992年，社会心理学家就提出了“社会神经科学”的概念。(326)共情很快成为神经科学领域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与心灵理论不同的是，共情并不意味着它要以“承认他人的想法、信念和意图”为前提。(327)这是一个情感问题，就像历史学家乌特·弗雷沃特和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妮娅·辛格给出的如下定义所表明的那样：

如果（1）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感状态，（2）这种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同构的，【249】（3）这种情感状态是由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引起的，并且（4）我们意识到另一个人是“我们”情感状况的触发因素。(328)

在社会神经科学家进行的共情实验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带到扫描室。例如，

辛格和她的同事邀请情侣们进入实验室，目的是研究对疼痛产生共情的神经基础。女方在实验期间一直躺在扫描仪中，这样就可以测量她的大脑活动。两名受试者手上都接有电极，他们的手会感觉有点痒或疼痛。女方躺在扫描仪里，她可以通过一组镜子看到她自己的手和她伴侣的手上都连着电极。她还看到一个屏幕，屏幕上

的箭头显示了他们中的哪一个将受到刺激，以及这种刺激是强是弱。这使我们可以将真正的疼痛引起的大脑活动与共情引起的大脑活动进行比较。对这些情侣们的研究表明，疼痛网络的情感成分不仅在女方自己受到痛苦的电击时被激活，在她知道她的伴侣受到电击时同样也会被激活。根据调查问卷，那些共情能力更强的人，在与疼痛相关的区域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状态。(329)

这只是关于共情的一个实验。其他的实验则是针对共情障碍的（如针对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共情障碍），或者是针对不同动机系统的竞争，或者是针对共情过剩的现象，等等。

在这三个领域中，神经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交叉。虽然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看起来很稳健，但不如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开普勒定律那么稳健，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经受住了无数次考验，而这三个领域是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需拭目以待。

我想以一种可能会被人认为有些琐碎的方式来结束这部分内容。现在一些神经科学家认为，艺术仍然是全面描绘人类的最佳方式。没有任何实验可以模拟人类现实的混乱。每一个想了解记忆的人都应该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每一个想了解情感复杂性的人都应该阅读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是乔纳·莱勒（Jonah Lehrer）的建议。在学习神经科学专业时，他曾在记忆研究专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实验室工作过。(330)

我们已经到了本章的末尾，这一章主要探讨了生命科学中情感的普遍主义的观点。我本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生命科学中情感研究的历史。【250】在她们的一篇探讨学科史的文章中，心理学家玛丽亚·金德伦（Maria Gendron）和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提出有三种典型的理想“传统”——基本情感、评估和心理建构主义。伦道夫·科尼利厄斯（Randolph Cornelius）谈到了四种“视角”——达尔文主义、詹姆斯主义、认知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并回溯性地分析了自19世纪以来对这些理想类型的研究，甚至以图形的方式呈现了对这些纯粹形式的偏离。

(331)露丝·雷斯选择了一种谱系学方法，追溯了从心理学延伸到其他科学领域的范式的开端，并从中发现一种强烈的反意向论的元素。托马斯·迪克森和克劳迪娅·瓦斯曼撰写了关于情感心理学研究的思想史，并研究了这些观点之间的联系，如哪个观点被谁所接受，又是如何接受的。奥特尼尔·德洛尔研究了与情感有关的实验心理学实验以及其对情感概念的影

响。

我本来还可以强调概念的谱系——享乐效价 (hedonic valence) 及其相关的指导性区别——基本的和复杂的,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与对象相关的和与对象无关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我本可以介绍其他实验,虽然它们与情感间接相关,但这些实验还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关于本杰明·利贝特的实验和决策过程中的无意识行为,或者延迟的半秒;关于伏隔核、奖赏系统和神经递质的实验;关于回忆和记忆的情感基础的实验。我本可以讨论借鉴神经科学研究的其他学科,例如神经经济学。我本可以澄清其他的谬见,比如西尔万·汤姆金斯以下的说法:“很明显行为主义轻视情感的作用。”⁽³³²⁾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扭曲了人们对情感研究的认识。我本可以在这里讨论行为主义的不同脉络,伊凡·巴甫洛夫和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的反射理论,以及他们对情感刺激的研究。但我最终还是会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最紧要的问题:历史学科是否应该借鉴生命科学?如果是,又该怎么做呢?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探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最有意思的尝试,并以这种方式超越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

- (1) 最初的对话是这样的:“艾米丽·莱特曼:‘不,我们不能这么做。在我做准备的时候你就让丹进来,最好别搞什么神秘的科学技术来搞清楚我们今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答应我!’卡尔·莱特曼:‘我保证不搞神秘科学。’卡尔·莱特曼(打开前门)说:‘你好,丹!’丹:‘莱特曼博士,您好!’卡尔·莱特曼:‘你想今晚和我女儿上床吗?’”《别对我撒谎》试播,福克斯,2009年电视剧。
- (2) 见“Paul Ekman”, Paul Ekman Group, <<http://www.paulekman.com/paulekman/>> accessed 5 March 2014; “The 2009 TIME 100: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Time Magazine*(27 April 2009)。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排名中,埃克曼排在第59位,见Steven J. Haggblom, René Warnick, Jason E. Warnick, Vinessa K. Jones, Gary L. Yarbrough, Tenea M. Russell, Chris M. Borecky, Reagan McGahhey, John L. Powell III, Jamie Beavers, and Emmanuelle Monte,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2 (2002), 139—152, here 147。
- (3) <<http://community.fox.com/drpaulekman/blog>> accessed 28 January 2011; 该链接已经无法使用,但博客的内容可以在这里找到:“Lie to Me Blog”, *Lie to Me Now* <<http://www.lie-to-me-now.com/blog>> accessed 6 March 2014。
- (4) 这里的“泄露”概念来自埃克曼,见Ekman, “Afterword”, 363—393, here 373。
- (5) 在埃克曼漫长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他对基本情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在普遍面部表情中又增加了八个特征:(1)“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也存在”;(2)独特的生理;(3)“前导事件”的独特普遍

性”；（4）“情感反应的一致性”；（5）“快速开始”；（6）“持续时间短”；（7）“自动评估”；（8）“突然出现”。见Paul Ekman, “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6/3—4 (1992), 169—200, here 175。在另一种意义上,基本情感也是“基本的”：“在处理基本的生活任务时,情感因其适应价值而进化。”见Ekman, “Afterword”, 171, 原文强调。例如,恐惧的作用是让身体做好逃跑的准备,并以这种方式帮助物种生存。

- (6) Ekman, “Afterword”, 170.
- (7) Paul Ekman and Richard J. Davidson, “Epilogue—Affective Science: A Research Agenda”, in Ekman and Davidson (eds.), *The Nature of Emoti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09—430, here 413.
- (8) 关于自然科学中进步思想的谱系, 见Lorraine Daston, “Fear and Loathing of the Imagination of Science”, *Daedalus*, 127/1 (1998), 73—95。
- (9) Paul Ekman, “Basic Emotions”, in Tim Dalgleish and Mick J. Power (eds.),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Chichester: Wiley, 1999), 45—60, here 46—47.
- (10) Paul Ekman, “All Emotions Are Basic”, in Ekman and Davidson (eds.), *Nature of Emotion*, 15—19, here 19.
- (11) 对于自己的写作方法, 雷斯说: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史学家, 以我所谓的‘当代谱系’的模式写作, 我的意思是, 我倾向于书写人文科学的当代发展或范式, 它们有一个相对较近(也相对密集)的历史或谱系。我的目标是同时记录那些我感兴趣的发展或范式(或概念或问题)的历史, 通过定位当前辩论的谱系学并批判性地评论它们来介入当下。”见Ruth Leys and Marlene Goldman, “Navigating the Genealogies of Trauma, Guilt, and Affect: An Interview with Ruth Ley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9/2 (2010), 656—679, here 656—657。又见Ruth Leys,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0; Ruth Leys,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3; 当然还有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76—100。
- (12) 这些埃克曼的生活和事业的细节取自他最详细的自传文本: Paul Ekman, “A Life’s Pursuit”, in 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iker-Sebeok (eds.), *The Semiotic Web 19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7), 3—45。
- (13) Paul Ekman, “A Life’s Pursuit”, in 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iker-Sebeok (eds.), *The Semiotic Web 19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7), 16, 10.
- (14) Ruth 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Representations*, 110 (2010), 66—104, here 69.
- (15) 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69, 88—89.
- (16) 目前还不清楚埃克曼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了达尔文, 后者曾从生理学家迪谢纳德·

布洛涅 (Duchenne de Boulogne) 拍摄的50多张照片中挑选了11张照片, 给24位拜访他的人看, 让他们判断每张照片所表达的情感。这次家中实验的结果是, 他的访客们只在一些情感上达成了一致, 比如快乐、悲伤和恐惧, 而对其他照片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达尔文经常与迪谢纳通信, 他认为这证实了他对迪谢纳的观点的怀疑, 即每块肌肉控制着60多种不同的面部表情。达尔文和迪谢纳之间的联系多年来一直广为人知, 雷斯对其进行总结了, 见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70—75。直到2010年, 达尔文这一实验的细节才为人所知, 档案研究显示, 在收到迪谢纳的照片后不久, 他在照片的背面写道: “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见Peter J. Snyder et al., “Charles Darwin’s Emotional Expression ‘Experiment’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Neuro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19/2 (2010), 158—170; Ferris Jabr, “The Evolution of Emotion: Charles Darwin’s Little-Known Psychology Experi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Observations Blog* (24 May 2010)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2010/05/24/the-evolution-of-emotion-charles-darwins-little-known-psychology-experiment>> accessed 6 March 2014.

- (17) Paul Ekman, E. Richard Sorenson, and Wallace V. Friesen, “Pan-Cultural Elements in Facial Displays of Emotion”, *Science*, 164/3875 (1969), 86—88, here 87. 也见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75—79.
- (18) Jerome Kagan, *What Is Emotion? History, Measures, and Mean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6.
- (19) 我这里指的不是迈克尔·巴林特 (Michael Balint) 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激动”, 见 *Thrills and Regressions* (London: Hogarth, 1959)。
- (20) Ekman, Sorenson, and Friesen, “Pan-Cultural Elements in Facial Displays of Emotion”, 87.
- (21) Margaret Mead, “Margaret Mead Calls ‘Discipline-Centric’ Approach to Research an Example of the Appalling State of the Human Sciences”, review of Paul Ekman (ed.), *Darwi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e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1 (1975), 209—213, here 212, 原文强调。
- (22) Mead, “Margaret Mead Calls ‘Discipline-Centric’ Approach to Research”, 212.
- (23) Mead, “Margaret Mead Calls ‘Discipline-Centric’ Approach to Research”, 210.
- (24) 这里对贝特森和伯德惠斯戴尔的观点的描述来自Ekman, “Afterword”, 364—377。
- (25) Ekman, “Afterword”, 383. 心理学家卡罗尔·伊泽德 (Carroll Izard) 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见Ekman, “Afterword”, 375.
- (26) Ekman, “Afterword”, 383.
- (27) Ekman, “Afterword”, 384.

- (28) 关于这个实验，见Ekman, “Afterword”, 381.
- (29) Ekman, “Afterword”, 385.
- (30) Ekman, “Afterword”, 393.
- (31) 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97 n. 49.
- (32) Ekman, “Afterword”, 365—366, 372—373.
- (33) 关于埃克曼和图像的力量，见Anne Schmidt, “Showing Emotions, Reading Emotions”, in Ute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Vocabulary of Feeling 17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2—90.
- (34) 例如，基本情感理论的一个神经生物学版本：Jaak Panksepp and Lucy Biven,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2012)。出版社的简介称，“雅克·潘克塞普的毕生研究揭示了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都是由七种常见的情感系统组成的——寻求、欲望、愤怒、恐惧、忧虑、悲伤和玩耍。本书简单易懂地解释了这些共同的系统是如何指导包括人类在内所有哺乳动物的情感生活的”。
- (35) 见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Alan J. Fridlund,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An Evolutionary View*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 (36) 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Alan J. Fridlund,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An Evolutionary View*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77—78.
- (37) Leys,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74—75.
- (38) Fridlund,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291.
- (39) Fridlund,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285—293.
- (40) 对埃克曼的最新批评，见Rachael E. Jacket al.,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Are Not Culturally Univers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9 (2012), 7241—7244。
- (41) 见Benjamin Carlson, “The Daily Exclusive: Facing Reality”, *The Daily* (27 May 2012) [每日新闻应用程序] <<http://www.thedaily.com/page/2012/05/27/052712-news-tsa-behavior-detection-1-3>> accessed 2 August 2012 (失效链接；该报于2012年12月15日停刊)；Ben Buchwalter, “Forget Your ‘Junk’: The TSA Wants to Feel Up your Mind”, *Mother Jones* (2 February 2011)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1/02/tsa-spot-scan-paul-ekman>> accessed 7 March 2014。
- (42) Paul Ekman, “How to Spot a Terrorist on the Fly”, *Washington Post* (29 October 2006), B03。对SPOT最早的批评，见Sharon Weinberger, “Intent to

Deceive? Can the Science of Deception Detection Help to Catch Terrorists?”, *Nature*, 465/7297 (2010), 412—415.

- (43) Peter N. Stearns, *American Fea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igh Anx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Corey Robin,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c Siegel, *False Alarm: 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5); Cass R. Sunstein,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4) Weinberger, “Intent to Deceive?”, 413.
- (45) Dacher Keltner, Keith Oatley, and Jennifer M. Jenkins, *Understanding Emotions* (3rd edn., Hoboken, NJ: Wiley, 2014), 5.
- (46) 这一版即Paul Ekman (ed.), *Darwi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e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这一延迟是由于西尔万·汤姆金斯未能提供他所承诺的关于他自己的情感理论的一个补充章节，见Paul Ekman, “Preface to New Edition”, in Paul Ekman (ed.), *Darwi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eview* (Los Altos, CA: Malor Books, 2006), vii—ix, here vii.
- (47) Ekman, “Afterword”, 370.
- (48)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96.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 (49)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44—45.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28页。)
- (50) Ekman, “Afterword”, 389.
- (51) Ekman, “A Life’s Pursuit”, 18.
- (52) Ekman, “A Life’s Pursuit”, 19.
- (53) Fridlund,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18—19.
- (54)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30—131.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87页。)
- (55)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53.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234页，有调整。)
- (56) 见对1998年版的善意评论：Eric Korn, “How Far Down the Dusky Boso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23 (1998), 23—24以及“How Far Can Darwin Take Us? Adam Gopnik with Steven Pinker”,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20 May 2009) <<http://www.nypl.org/audiovideo/how-far-can-Darwin-take-us-adam-gopnik-steven-pinker>> accessed 10 March 2014。平克谈到“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基本上被忽视了一个世纪，直到保罗·埃克曼复兴了对表情的普遍主义的研究”。仅仅在这本书同时以英语和德语出版三年后，它就被收录进了德国家庭百科全书，由此可见

其成功，见Pascal Eitler, “The ‘Origin’ of Emotions: Sensitive Humans, Sensitive Animals”, in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91—117.

- (57)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4.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21页，有调整。)
- (58)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50.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30页。)
- (59) 这个例子已经做了微调，见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7。
- (60)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55—56, 265—272, esp. 271.
- (61)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4.
- (62)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69—70. (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47页。)
- (63) Paul Ekm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xxi—xxxvi, here xxii.
- (64) “这种认为上帝特别设计出脸红来的信念，是和现在已经很广泛承认的一般的进化理论相冲突的。”见Paul Ekm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335，原文强调。(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220页。)
- (65)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58, 157—158.
- (66)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74—175.
- (67)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207.
- (68)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213. (本页引文没有采用周邦立的译文，因为好多译名无法统一。——译者注)
- (69) Keltner, Oatley, and Jenkins, *Understanding Emotions*, 5.
- (70) Daniel M.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with Charles Darwi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 *Critical Inquiry*, 37/1 (2010), 34—59, here 35—36.
- (71) Daniel M.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with Charles Darwi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 *Critical Inquiry*, 37/1 (2010), 48.
- (72)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21，强调来自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48。(中译见[英]查尔斯·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第11页。)
- (73)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49.
- (74)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50.

- (75)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51—52 . 见 Darwin,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21—22.
- (76) Gross,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44, 59 . 萨拉·温特 (Sarah Winter) 也将达尔文描述为人文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 见“Darwin’s Saussure: Biosemiotics and Race in Expression”, *Representations*, 107/1 (2009), 128—161.
- (77) Thomas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The Creation of a Secular Psychological Categ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 (78)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133.
- (79)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136.
- (80)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149.
- (81)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159.
- (82) 见 Thomas H. Burgess, *The Physiology or Mechanism of Blushing: Illustrative of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Emotion on the Capillary Circulation* (London: John Churchill, 1839)。
- (83) 对这本书中反达尔文主义内容的标准解释, 见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169.
- (84) Dixon,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87.
- (85) 关于这一过程, 见 Friedrich Wilhelm Graf, *Die Wiederkehr der Götter: Religion in der modernen Kultur* (Munich: Beck, 2004)。
- (86) 关于这一过程的细节, 见 Roger Smith, *The Nort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Norton, 1997), 492—501.
- (87) 这里没有包括威廉·冯特, 他在其《生理心理学原理》(*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 1902—1903) 的第五版中提出了“意志的情感理论”, 见 Claudia Wassmann, “The Science of Emotion: Studying Emotions 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2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2005, 110—111; Claudia Wassmann, “Emotion into Science: How Our Modern Ideas about Emotion Were Creat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motional Studies (HIST-EX)* [在线期刊] (29 November 2011) <<http://historiadelasemociones.wordpress.com/2011/11/29/emotion-into-science-how-our-modern-ideas-about-emotion-were-created-in-the-nineteenth-century-claudia-wassmann/>> accessed 11 March 2014.
- (88) William James, “What Is an Emotion?”, *Mind*, 9/34 (1884), 188—205, here 189—190, 原文强调。
- (89) James, “What Is an Emotion?”, 194.
- (90) James, “What Is an Emotion?”, 199.
- (91) Tim Dalgleish, Barnaby D. Dunn, and Dean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55—368, here 356.

- (92) Carl Georg Lange, “The Emotions: A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trans. Istar A. Haupt from the authorized German translation of H. Kurella, in Carl Georg Lange and William James, *The Emotions*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22), i. 33—90. [Da. orig., *Om Sindsbevægelser*, 1885].
- (93) Carl Georg Lange, “The Emotions: A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trans. Istar A. Haupt from the authorized German translation of H. Kurella, in Carl Georg Lange and William James, *The Emotions*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22), i. 33—90. [Da. orig., *Om Sindsbevægelser*, 66.
- (94) Claudia Wassmann,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Loop’: Carl Georg Lange’s Theory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6 (2009), 974—990, here 975.
- (95) 詹姆斯没能找到负责情感的“大脑中心”，见 Claudia Wassmann, “Physiological Optics, Cognition and Emotion: A Novel Look at the Early Work of Wilhelm Wund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4/2 (2009), 213—249, here 247.
- (96) Wassmann,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Loop’”, 976, 980—984.
- (97) Wassmann,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Loop’”, 987.
- (98) Wassmann, “Physiological Optics, Cognition and Emotion”. 也见 Wassmann, “Science of Emotion”, 26—112.
- (99) Wassmann, “Physiological Optics, Cognition and Emotion”. 也见 Wassmann, “Science of Emotion”, 231—232.
- (100) Maria Gendron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A Century of Ideas about Emotion in Psychology”,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16—339, here 330.
- (101) Maria Gendron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A Century of Ideas about Emotion in Psychology”,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16—317.
- (102) Angelo Mosso, *Fear*, trans. E. Lough and F. Kiesow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94—95.
- (103)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Reaction Time Symptoms of Deception and Constituent Mental Stat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Ann Arbor, 1921, 5—6, 转引自 Otniel E. Dror,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ies of Inscription”, *Configurations*, 7/3 (1999), 355—401, here 386.
- (104) Otniel E. Dror,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The Turn to Emotions in Anglo-American Physiology, 1900—1940”, *Isis*, 90/2 (1999), 205—237, here 220.
- (105) Otniel E. Dror,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The Turn to Emotions in Anglo-American Physiology, 1900—1940”, *Isis*, 90/2 (1999), 221.

- (106) Otniel E. Dror,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The Turn to Emotions in Anglo-American Physiology, 1900—1940”, *Isis*, 90/2 (1999), 223—225.
- (107) Dror,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225, 原文强调。
- (108) Dror,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230, 226.
- (109) Otniel E. Dror, “Techniques of the Brain and the Paradox of Emotions, 1880—1930”, *Science in Context*, 14/4 (2001), 643—660, here 649—653.
- (110) Otniel E. Dror,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Laboratory and Clinic”, in Fay Bound Alberti (ed.), *Medicine, Emotion and Disease, 1700—19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25—143, here 131.
- (111)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58.
- (112)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94.
- (113) Otniel E. Dror (= Dror, Otniel Yizhak), “Afterword: A Reflection on Feelings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0/4 (2009), 848—851; Otniel E. Dror, “Modernity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motions, 1880—1950”,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1998, 166.
- (114)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64.
- (115)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59.
- (116) Dror,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Laboratory and Clinic”, 136.
- (117)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59.
- (118) Dror,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Laboratory and Clinic”, 131—132.
- (119)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67.
- (120)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57.
- (121) Hugo Münsterberg, *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08), 122—123.
- (122) Dror, “Techniques of the Brain and the Paradox of Emotions”, 648.
- (123)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70—371.
- (124)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71.
- (125) E. W. Scripture, “Detection of the Emotions by the Galvanometer”, *JA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50/15 (1908), 1164—1165, here 1164.
- (126)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99.
- (127)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96.
- (128) Dror, “Affect of Experiment”, 208; Dror, “Modernity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motions”, 14—15. 克劳迪娅·瓦斯曼反驳了德洛尔的观点, 即图形表示已经取代了语言的自我描述, 她引用了鲁道夫·舒尔茨 (Rudolf Schulze) 的《来自实

验心理学和教学法研讨会》(*Aus der Werkstatt der experimentellen Psychologie und Pädagogik*, 1909)及其“印象法”。在这个方法中,实验对象先接触外部刺激,然后询问他们的个人感觉,见Wassmann,“Science of Emotion”, 226—228。

- (129) Dror,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Laboratory and Clinic”, 129.
- (130) Dror, “Techniques of the Brain and the Paradox of Emotions”, 649.
- (131) Otniel E. Dror, “Counting the Affects: Discoursing in Numbers”, *Social Research*, 68/2(2001), 357—378, here 370.
- (132) Dror, “Techniques of the Brain and the Paradox of Emotions”, 644.
- (133)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73—374.
- (134) Dror,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380—381.
- (135) Dror, “Affect of Experiment”, 237.
- (136)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 Sophie Wilkins and Burton Pike (New York: Knopf, 1995) [Ger. orig.,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3 vols., 1930—1943], ii. 1277.
- (137) 这方面重要的作品如Michael Hagner, *Homo cerebialis: Der Wandel vom Seelenorgan zum Gehir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Erhard Oeser, *Geschichte der Hirnforschun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2nd enl. edn.,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 (138) J. Hughlings Jackson, “The Croonian Lectures on Evolu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Lecture II”,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214 (1884), 660—663, here 662. 对杰克逊大脑组织思想的学术分析,见Anne Harrington, *Medicine, Mind, and the Double Brain: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 7, esp. 210—212, 217。
- (139)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52. 也见Andreas Heinz, “Wie böse ist die Impulsivität?”, *Arcadia*, 44/1 (2009), 24—30, here 29; Andreas Heinz, “Irre Lüste und Lustloses Irren: Konstruktionen von Lust und Begierde im 20. Jahrhundert”, in Detlev Schöttker (ed.), *Philosophie der Freude: Von Freud bis Sloterdijk* (Leipzig: Reclam, 2003), 175—186, here 176—177。
- (140) 见Harold A. Sackeim and Ruben C. Gur, “Lateral Asymmetry in Intensit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Neuropsychologia*, 16/4 (1978), 473—481; Harold A. Sackeim, Ruben C. Gur, and Marcel C. Saucy, “Emotions are Expressed More Intense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ace”, *Science*, 202/4366 (1978), 434—436; Gary E. Schwartz, Geoffrey L. Ahern, and Serena-Lynn Brown, “Lateralized Facial Muscle Response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Psychophysiology*, 16/6 (1979), 561—571; Gary E. Schwartz, Richard J. Davidson, and Foster Maer, “Right Hemisphere Lateralization from Emotion in the Human Brain: Interactions with Cognition”, *Science*, 190/4211 (1975), 286—

288; Ralph Adolphs et al., “Cortical System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Emotion in Facial Express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6/23 (1996), 7678—7687.

- (141) Charles K. Mills, “The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Emot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Points in the General Nervous Mechanism of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Organic Nervous Mental Disease and Insan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edic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 (1912), 297—300, here 298.
- (142) Charles K. Mills, “The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Emot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Points in the General Nervous Mechanism of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Organic Nervous Mental Disease and Insan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edic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 (1912), 298.
- (143) John M. Harlow, “Recovery from the Passage of an Iron Bar through the Head: Read before the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3 June 1868”, *History of Psychiatry*, 4/14 (1993), 274—281, here 277.
- (144) Harlow, “Recovery from the Passage of an Iron Bar through the Head”, 277.
- (145) 见Hanna Damasio et al., “The Return of Phineas Gage: Clues about the Brain from the Skull of a Famous Patient”, *Science*, 264/5162 (1994), 1102—1105; Richard David Precht, *Who am I? And If so, How Many?: A Journey Through Your Mind*, trans. Shelley Frisch (London: Constable, 2011) [Ger.orig., *Wer bin ich—und wenn ja wie viele?: Eine philosophische Reise*, 2007], 121—124.
- (146) Keltner, Oatley and Jenkins, *Understanding Emotions*, 23.
- (147) Walter Freeman, “Frontal Lobotomy in Early Schizophrenia: Long Follow-up in 415 Cas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9/553 (1971), 621—624; Elliot S. Valenstein, *Brain Control: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Brain Stimulation and Psychosurgery* (New York: Wiley, 1973).
- (148) Henry Head, “Croonian Lecture: Release of Func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Containing Papers of a Biological Character* (1905—1934), 92/645 (1921), 184—209.
- (149) W. R. Hess and M. Brügger, “Das subkortikale Zentrum der affektiven Abwehrreaktion”, *Helvetica physiologica et pharmacologica acta*, 1 (1943), 33—52.
- (150) 有关坎农-巴德理论的重要论文见Walter B. Cannon, “The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 Alternativ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1—4 (1927), 106—124; Walter B. Cannon, “Again the James—Lange and the Thalamic Theories of Emo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38/4 (1931), 281—295; Philip Bard, “A Diencephalic Mechanism for the Expression of R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84 (1928), 490—513; David M. Rioch and Philip Bard, “A Study of Four Cats Deprived of Neocortex and Additional Portions of the Forebrain”,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60 (1937), 73—153.
- (151) Dalgleish, Dunn, and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356—357.

- (152) Dalgleish, Dunn, and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357.
- (153) Paul D. MacLean, “Psychosomatic Disease and the ‘Visceral Brain’: Recent Developments Bearing on the Papez Theory of Emo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1/6 (1949), 338—353.
- (154) 见Dalgleish, Dunn, and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357—358。
- (155) Keltner, Oatley and Jenkins, *Understanding Emotions*, 7.
- (156) Sigmund Freud, “Case 4: Katharina”, in Josef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55), 125—134, here 126.
- (157) Sigmund Freud, “Case 4: Katharina”, in Josef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55), 126.
- (158) Sigmund Freud, “Case 4: Katharina”, in Josef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 *Studies on Hysteria*,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55), 127.
- (159)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29.
- (160)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29—130.
- (161)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31.
- (162)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32.
- (163)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34.
- (164) Freud, “Case 4: Katharina”, 134 n. 2.
- (165) Uffa Jensen, “Freuds unheimliche Gefühle: Zur Rolle von Emotionen in der Freudschen Psychoanalyse”, in Jensen and Daniel Morat (eds.), *Rationalisierungen des Gefühls: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Emotionen 1880—1930* (Munich: Fink 2008), 135—152, here 141, 138 . 也见Mai Wegener, “Warum die Psychoanalyse keine Gefühlstheorie hat”, in Johannes Fehr and Gerd Folkers (eds.), *Gefühle zeigen: Manifestationsformen emotionaler Prozesse* (Zurich:Chronos, 2009), 143—162; Nancy J. Chodorow, *The Power of Feelings: Personal Meaning in Psychoanalysis, Gender, and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66) Sigmund Freud, “Repression”,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iv.1914—1916,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Hogarth, 1957), 141—158, here 153.
- (167) Jensen, “Freuds unheimliche Gefühle”, 142.
- (168) Sigmund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econd Part)”,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1900—1901,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53),

- (169) Sigmund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art III)”,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vi.1916—1917,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63), 393.
- (170)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art III)”, 396—397.
- (171) 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xx.1925—1926,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and Anna Freud (London: Hogarth, 1959), 77—178, here 139.
- (172) Jensen, “Freuds unheimliche Gefühle”, 151.
- (173) Jensen, “Freuds unheimliche Gefühle”.
- (174) Yoram Yovell, “Is There a Drive to Love?”, *Neuro-Psychoanalysis*, 10/2 (2008), 117—144; Jaak Panksepp,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这里我参考的是Constantina Papoulias and Felicity J. Callard,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Drive in Neuropsychanalysis: From Sexuality to Self-Preservation”, in Christine Kirchhoff and Gerhard Scharbert (eds.), *Freuds Referenzen* (Berlin:Kulturverlag Kosmos, 2012), 189—215。关于神经心理分析, 又见 Giseler Guttman and Inge Scholz-Strasser (eds.), *Freud and the Neurosciences: From Brain Research to the Unconscious*(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8); Mark Solms and Edward Nersessian, “Freud’s Theory of Affect: Questions for Neuroscience”, *Neuro-Psychoanalysis*, 1/1 (1999), 5—14; Eric R. Kandel, *Psychiatr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New Biology of Min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05)。
- (175) Papoulias and Callard, “Rehabilitation of the Drive in Neuropsychanalysis”, 196—197.
- (176) Yovell, “Is There a Drive to Love?”, 140—141.
- (177) Papoulias and Callard, “Rehabilitation of the Drive in Neuropsychanalysis”, 203.
- (178) 见Tilman Habermas, Michaela Meier, and Barbara Mukhtar, “Are Specific Emotions Narrated Differently?”, *Emotion*, 9/6 (2009), 751—762; Tilman Habermas and Verena Diel,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Loss Narratives: Event Severity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s”, *Emotion*, 10/10 (2010), 312—323; Tilman Habermas and Nadine Berger, “Retelling Everyday Emotional Events:Condensation, Distancing, and Closur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2 (2011), 206—219.
- (179) Maggie Schauer, Frank Neuner, and Thomas Elbert, *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A Short-Term Treatment for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2nd rev. and enl.

edn., Cambridge, MA: Hogrefe, 2011), 32.

- (180) Maggie Schauer, Frank Neuner, and Thomas Elbert, *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A Short-Term Treatment for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2nd rev. and enl. edn., Cambridge, MA: Hogrefe, 2011), 33.
- (181) Gendron and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335.
- (182) Pascal Eitler, “Der ‘Neue Mann’ des ‘New Age’: Emotion und Relig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70—1990”, in Manuel Borutta and Nina Verheyen (eds.), *Die Präsenz der Gefühle: Männlichkeit und Emotion in der Modern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0), 279—304. 也见Sabine Maasen, Jens Elberfeld, Pascal Eitler, and Maik Tändler (eds.), *Das beratene Selbst: Zur Genealogie der Therapeutisierung in den “langen” Siebzigern*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1).
- (183) Susanne Schregel, “Konjunktur der Angst: ‘Politik der Subjektivität’ und ‘neue Friedensbewegung’, 1979—1983”, in Bernd Greiner, Christian Th. Müller, and Dierk Walter(eds.), *Angst im Kalten Krieg*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9), 495—520; Jörg Arnold, “‘Kassel 1943 mahnt ...’: Zur Genealogie der Angst im Kalten Krieg”, in Greiner, Müller, and Walter (eds.), *Angst im Kalten Krieg*, 465—494.
- (184) Stanley Schachter and Jerome E. Singer,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Psychological Review*, 69/5 (1962), 379—399, here 381—382.
- (185)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st Rainer Reisenzein, “Schachter—Singer Theory”, in David Sander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motion and the Affective Scienc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52—353, here 352.
- (186) 沙赫特将他的模型称为“改良的詹姆斯主义”, 见Stanley Schachter,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 Stat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 (1964), 49—80, here 70 ; 沙赫特作为认知心理学的代表, 见Ruth Leys, “The Turn to Affect: A Critique”, *Critical Inquiry*, 37/3 (2011), 434—472, here 469.
- (187) Reisenzein, “Schachter—Singer Theory”, 353.
- (188) Magda B. Arnold and John A. Gasson, “Feelings and Emotions as Dynamic Factors in Personality Integration” , in Arnold and John A. Gasson (eds.), *The Human Person: An Approach to an Integr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4), 294—313, here 294.
- (189) Magda B. Arnold,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i. *Psychological A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71.
- (190) Arnold,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i. 179. 也见Randolph R. Cornelius, *The Science of Emotion: Research and Tradi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6), 119.

- (191) Cornelius, *Science of Emotion*, 114.
- (192) 也见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93) Arnold,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i. 175.
- (194) 扎荣茨认为：“当代认知心理学直接忽视了情感”，只有社会心理学对情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见R. B.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980), 151—175, here 152, n. 3。
- (195) R. B.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980), 151.
- (196) R. B.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980), 152.
- (197) R. B.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980), 169.
- (198) Zajonc, “Feeling and Thinking”, 172.
- (199) Richard S. Lazaru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9 (1982), 1019—1024, here 1020.
- (200) Richard S. Lazaru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9 (1982), 1019.
- (201) 关于“新颅相学”，见William R. Uttal, *The New Phrenology: The Limits of Localiz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he 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关于“大脑色情”和“神经泡沫”，见Christopher F. Chabris and Daniel J. Simons, *The Invisible Gorilla: And Other Ways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 (New York: Crown, 2009), 139—143;关于“斑点学”，见Cordelia Fine, *Delusions of Gender: How Our Minds, Society, and Neurosexism Create Difference* (New York: Norton, 2010), 153。对fMRI扫描及其（生物）政治含义的批判，见Joseph Dumit, *Picturing Personhood: Brain Scans and Biomedic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Kelly A. Joyce, *Magnetic Appeal: MRI and the Myth of Transparen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02) 目前，这些数学模型中最流行的是由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等人开发的动态因果模型（Dynamic Causal Modelling，简称DCM），见K. J. Friston, L. Harrison, and W. Penny, “Dynamic Causal Modelling”, *NeuroImage*, 19/4 (2003), 1273—1302。
- (203) fMRI成像扫描仪的发明者之一彼得·A·班德蒂尼（Peter A. Bandettini）在2004年总结了扫描仪的局限性：“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不能以毫秒为单位绘制瞬态活动图。它不能在小于2平方毫米的空间尺度上描绘大脑活动。由于基线漂移，它无法映射非常缓慢的‘状态’变化。它不能区分兴奋性输入和抑制性输入引起的活动。它不能映射基线活动和代谢状态。它不能解决先后激活的大脑区域之间的级联通信。校准程序相对粗糙。它不能推断个体的激活图，因为它们与普通人群的大脑

激活图有关。”参见Peter A. Bandettini, Ph.D., Investigator, *Neuroscience@NIH* <http://neuroscience.nih.gov/Lab.asp?Org_ID=160> accessed 11 March 2014.

- (204) 对实验设计的外部和技术方面的描述提供了“fMRI Research Project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Sanford School of Medicine at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http://www.usd.edu/medical-school/biomedical-sciences/fmri-research-project-participant-information.cfm>> accessed 11 March 2014.
- (205) 有关情感的常见实验的描述, 见Hugo Critchley, “Emotion and Its Disorders: Imaging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65 (2003), 35—47; Tom Johnstone, Carien M. van Reekum, Terrence R. Oakes, and Richard J. Davidson, “The Voice of Emotion: An FMRI Study of Neural Responses to Angry and Happy Vocal Expressio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3 (2006), 242—249; Kateri McRae, Kevin N. Ochsner, Iris B. Mauss, John J. D. Gabrieli, and James J. Gross,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1/2 (2008), 143—162.
- (206) Xiaojing Xu et al., “Do You Feel My Pain? Racial Group Membership Modulates 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9/26 (2009), 8525—8529, here 8528. 另见意大利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表明, 如果进行经颅磁刺激(而非fMRI), 如果受试者是种族主义者, 他们看见黑皮肤的手被针刺破, 其大脑中负责共情的区域比看到白皮肤的手被针扎时的激活程度更低, 见Alessio Avenanti, Angela Sirigu, and Salvatore M. Aglioti, “Racial Bias Reduces Empathic Sensorimotor Resonance with Other-Race Pain”, *Current Biology*, 20/11 (2010), 1018—1022, 延伸介绍, 见Joan Y. Chiao and Vani A. Mathur, “Intergroup Empathy: How does Race Affect 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Current Biology*, 20/11 (2010), 478—480.
- (207) Nikos K. Logothetis,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Nature*, 453/ 7197 (2008), 869—878, here 869.
- (208) Nikos K. Logothetis,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Nature*, 453/ 7197 (2008), 877.
- (209) Felicity Callard and Daniel S. Margulies, “The Subject at Rest: Novel Conceptualizations of Self and Brain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Study of the ‘Resting State’”, *Subjectivity*, 4/3 (2011), 227—257.
- (210) Craig M. Bennett, Abigail A. Baird, Michael B. Miller, and George L. Wolford, “Neural Correlates of Interspecies Perspective Taking in the Post-Mortem Atlantic Salmon: An Argumen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Correction”, *Journal of Serendipitous and Unexpected Results*, 1/1 (2010), 1—5, here 2. 也见Daniel S. Margulies, “The Salmon of Doubt: Six Months of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y within Social Neuroscience”, in Suparna Choudhury and Jan Slaby (eds), *Critical Neuroscience: A Handbook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Neuroscience*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1), 273—286。除了鲑鱼的例子外，2009年fMRI扫描仪使用者的另外两篇论文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关于“重复数据提取”(*double dipping*) 的统计问题，见Nikolaus Kriegeskorte, W. Kyle Simmons, Patrick S. F. Bellgowan, and Chris I. Baker, “Circular Analysi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The Dangers of Double Dipping”, *Nature Neuroscience*, 12/5 (2009), 535—540。关于所谓的“巫毒相关性”(*voodoo correlations*)，见Edward Vul et al., “Puzzlingly High Correlations in fMRI Studies of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 (2009), 274—290。科学社会学家托斯滕·海涅曼 (Torsten Heinemann) 解释说，没有任何“巫毒相关性”的负面新闻，通过自觉和“示范性地使用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足以“动摇神经科学的根基”，尽管这只是表面文章。海涅曼认为，这一事例再次显示了“神经科学的巨大力量：科学知识在不同公众中的普及化。它们甚至善于对本学科内产生的批判性著作进行重新诠释，以此作为自身卓越工作的一部分，并与外部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见Torsten Heinemann, *Populäre Wissenschaft: Hirnforschung zwischen Labor und Talkshow*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2), 144—145。

- (211) Logothetis,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869.
- (212) 又见2010年对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 (Alan Baddeley) 的采访：“The Promise of Neuroimaging”, *Go Cognitive* <<http://gocognitive.net/interviews/promise-neuroimaging>> accessed 12 March 2014.
- (213) Jody C. Culham,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Analysis”, in Roberto Cabeza and Alan K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Cognition* (2nd ed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53—82, here 59, 原文强调。
- (214) 相关介绍，见Gary G. Berntson and John T. Cacioppo (eds.), *Handbook of Neuroscience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oboken, NJ: Wiley, 2009), vol. i, ch. 16; vol. ii, chs. 32—42。
- (215) LeDoux, *Emotional Brain*, ch. 8.
- (216) 与安德烈亚斯·W.道姆 (Andreas W. Daum) 相比，我使用“普及工作者”和“普及化”这两个词的范围更宽松，分析性更弱，见Andreas W. Daum, *Wissenschaftspopularisierung im 19. Jahrhundert: Bürgerliche Kultur, naturwissenschaftliche Bildung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14* (2nd enl. edn, Munich: Oldenbourg 2002), 25—29。
- (217) LeDoux, *Emotional Brain*, 163. 见Luiz Pessoa and Ralph Adolphs, “Emotion Processing and the Amygdala: From a ‘Low Road’ to ‘Many Roads’ of Evaluating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11 (2010), 773—782; Luiz Pessoa, “Emotion and Cognition and the Amygdala: From ‘What Is It?’ to ‘What’s to Be Done?’”, *Neuropsychologia*, 48/12 (2010), 3416—3429。同样对勒杜持批判观点，见Ian Hacking, “By What Links Are the Organs Excited?”,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970 (17 July 1998), 11—12。

- (218) Antoine Bechara et al., “Insensitivity to Future Consequences Following Damage to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Cognition*, 50/1—3 (1994), 7—15, here 14.
- (219) Marvin Zuckerman and D. Michael Kuhlman, “Personality and Risk-Taking: Common Biosocial Fac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6 (2000), 999—1029; Antonio Verdejo-García et al.,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Substance Dependent Individuals during Drug Use and Abstinen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rrelates of Addict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12/3 (2006), 405—415; Margaret C. Wardle et al., “Iowa Gambling Task Performance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teract to Predict Risky Sexual Behavior in Individuals with Dual Substance and HIV Diagnoses”,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32/10 (2010), 1110—1121. 批评见William A. Schmitt, Chad A. Brinkley, and Joseph P. Newman, “Testing Damasio’s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with Psychopathic Individuals: Risk Takers or Risk Aver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8/3 (1999), 538—543.
- (220) Paolo Cavedini, Tommaso Bassi, Claudia Zorzi, and Laura Bellodi, “The Advantages of Choosing Antiobsessive Therapy According to Decision-Making Function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24/6 (2004), 628—631.
- (221) 见Martin Reimann and Antoine Bechara, “The Somatic Marker Framework as a Neurological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Review, Conceptual Comparisons, and Future Neuro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5 (2010), 767—776.
- (222) 对于躯体标记假说的批评, 见Barnaby D. Dunn, Tim Dalgleish, and Andrew D. Lawrence,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A Critical Evaluatio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0/2(2006), 239—271. 又见Eric-Jan Wagenmakers and Sander Nieuwenhuis, “Damasio’s Error: D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endervuur”, *Neuropraxis*, 9/6 (2005), 159—163; Hideki Ohira, “The Somatic Marker Revisited: Brain and Body in Emotional Decision Making”, *Emotion Review*, 2/3 (2010), 245—249.
- (223) Walle J. H. Nauta, “The Problem of the Frontal Lobe: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8/3—4 (1971), 167—187.
- (224)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49.
- (225) Antonio R. Damasio, Ralph Adolphs, and Hanna Damasio,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esion Method to 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Emotion”, in Richard J. Davidson, Klaus R. Scherer, and H. Hill Goldsmit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6—92, here 84.
- (226) 对此评论的总结, 见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48—249.

- (227)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49.
- (228)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51.
- (229)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52.
- (230)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52—253.
- (231) Dunn, Dalgleish, and Lawrenc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258—262.
- (232) Gregory Hickok and Marc Hauser, “(Mis)understanding Mirror Neurons”, *Current Biology*, 20/14 (2010), R593—R594, here R593; Werner Siefer, “Die Zellen des Anstoßes”, *Die Zeit*, 51 (16 December 2010). 也见 Ruth Leys, “‘Both of Us Disgusted in My Insula’: Mirror Neuron Theory and Emotional Empathy”, *nonsite.org*, 5 (18 March 2012) <<http://nonsite.org/article/%E2%80%9Cboth-of-us-disgusted-in-my-insula%E2%80%9D-mirror-neuron-theory-and-emotional-empathy>>。
- (233) 关于镜像神经元、微笑和打哈欠，见 G. Rizzolatti et al., “Resonance Behaviors and Mirror Neurons”, *Archives italiennes de biologie: 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37/2—3 (1999), 85—100。关于共情，见 Giacomo Rizzolatti and Corrado Sinigaglia, *Mirrors in the Brain: How Our Minds Share Actions and Emotions*, trans. Frances Ander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t. orig., *So quelche fai: Il cervello che agisce e i neuroni specchio*, 2006], 173—193。关于爱，见 Maddalena Fabbri-Destro and Giacomo Rizzolatti, “Mirror Neurons and Mirror Systems in Monkeys and Humans”, *Physiology*, 23/3 (2008), 171—179。关于儿童的语言习得，见 Lisa Aziz-Zadeh et al., “Congruent Embodied Representations for Visually Presented Actions and Linguistic Phrases Describing Actions”, *Current Biology*, 16/18 (2006), 1818—1823。关于宗教，见 Vilayanur S. Ramachandran, “Mirror Neurons and the Brain in the Vat”, *Edge* (9 January 2006) <<http://edge.org/conversation/mirror-neurons-and-imitation-learning-as-the-driving-force-behind-the-great-leap-forward-in-human-evolution>> accessed 13 March 2014。关于心灵理论，见 Vittorio Gallese and Alvin Goldman, “Mirror Neurons and the Simulation Theory of Mind-Read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2 (1998), 493—501。关于文化，见 Gerhard Lauer, “Spiegelneuronen: Über den Grund des Wohlgefallens an der Nachahmung”, in Karl Eibl, Katja Mellmann, and Rüdiger Zymner (eds.), *Im Rücken der Kulturen* (Paderborn: Mentis-Verlag, 2007), 137—163。又见 Joachim Bauer, *Warum ich fühle, was du fühlst: Intuitive Kommunikation und das Geheimnis der Spiegelneurone*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2005)。
- (234) 关于脱发，见 E. Bruce Goldstein,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8th edn,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0), 277—280；关于阳痿，见 H. Mouras et al., “Activation of Mirror-Neuron System by Erotic Video Clips Predicts Degree of Induced Erection: An fMRI Study”, *NeuroImage*, 42/3 (2008), 1142—1150；关于自闭症，见 Mirella Dapretto et al., “Understanding Emotions in Others: Mirror Neuron Dys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Nature Neuroscience*, 9/1 (2006), 28—30.

- (235) V. S. Ramachandran, “Mirror Neurons and Imitation Learn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uman Evolution”, in John Brockman (ed.), *The Mind: Leading Scientists Explore the Brain, Memory, Personality, and Happines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1), 101—111, here 101. 该文建立在2000年6月1日的一次采访的基础之上, 见“MIRROR NEURONS and Imitation Learn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uman Evolution”, *Edge* (1 June 2000)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ramachandran/ramachandran_index.html> accessed 13 March 2014.
- (236) 见L. Fadiga et al., “Motor Facilitation during Action Observation: A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73/6 (1995), 2608—2611; Giacomo Rizzolatti et al.,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3/2 (1996), 131—141; Vittorio Gallese et al., “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 *Brain*, 119/2 (1996), 593—609.
- (237) 见Giacomo Rizzolatti and Laila Craighero,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2004), 169—192; Roy Mukamel et al., “Single-Neuron Responses in Humans during Execution and Observation of Actions”, *Current Biology*, 20/8 (2010), 750—756; Christian Keysers and Valeria Gazzola, “Social Neuroscience: Mirror Neurons Recorded in Humans”, *Current Biology*, 20/8 (2010), R353—R354.
- (238) 在研究人类时, 神经科学家采用与研究猴子时不同的伦理规范, 避免在头骨上钻孔以将电极直接植入他们感兴趣的神经元组或单个神经元上; 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无论如何都要接受脑部手术的患者, 例如, 得了癫痫或慢性抑郁症的患者。
- (239) Marco Iacoboni, *Mirroring Peopl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200—201.
- (240) Iacoboni, *Mirroring People*, 269—270.
- (241) Hickok and Hauser, “(Mis)understanding Mirror Neurons”, R593. 也见Vittorio Gallese et al., “Mirror Neuron Forum”,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4 (2011), 369—407, here 370—371, 373—375。也见希科克和戴维·波佩尔 (David Poeppel) 主持的博客“Talking Brains: News and Views on the Neural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http://www.talkingbrains.org>> accessed 13 March 2014.
- (242) Ilan Dinstein, Justin L. Gardner, Mehrdad Jazayeri, and David J. Heeger, “Executed and Observed Movements Have Different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in Human aIP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8/44 (2008), 11231—11239; Ilan Dinstein et al., “A Mirror Up to Nature”, *Current Biology*, 18/1 (2008), R13—R18.
- (243) Doreen Kimura, *Translations from Liepmann’s Essays on Apraxia* (London, CA-

ON: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80) [Ger. orig., *Drei Aufsätze aus dem Apraxiegebiet*, 1908] . 关于利普曼的讨论, 见Georg Goldenberg, “Apraxia and Beyond: Life and Work of Hugo Liepmann”, *Cortex* 39/3 (2003), 509—524.

- (244) Andrew Brown, “The Hustler”, *The Guardian* (30 April 2005). 布罗克曼的评论见Ulrich Schnabel, “Wie Agenten, Verleger und Autoren mit populärer Welterklärung Gewinn machen: Trendsurfer der Wissenschaft”, *Die Zeit*, 6 (29 January 1998), 43.
- (245) John Brockman, *The Third Cul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17.
- (246) 这个意义上的“特洛伊木马”出现在格罗斯的文章《捍卫人文科学》(“Defenting The Humanities”)第35—36页中。“在这篇文章中, 我回忆起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如何强调了声称紧随其后的情感的内在修辞性, 它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渗透到了人文学科, 并在文学的认知方法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简称CAL) 这个新的关键领域扎下根来。”
- (247)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1.
- (248) Doris Bachmann-Medick, *Cultural Turns: Neuorientierungen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Taschenbuch-Verlag, 2006).
- (249)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9—140.
- (250) Gregory J. Seigworth and Melissa Gregg, “An Inventory of Shimmers”, in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eds.),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5, here 22.
- (251) Tanya Erzen, *Straight to Jesus: Sexual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s in the Ex-Gay Move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Michelle Wolkomir, “Emotion Work, Commitment, and the Authentication of the Self: The Case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Support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3 (2001), 305—334; Michelle Wolkomir, *Be Not Deceived: The Sacred and Sexual Struggles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M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美国“去同性恋”运动的先驱、牧师艾伦·梅丁格 (Alan Medinger) 写了一本自助书, 旨在帮助年轻的同性恋者实现“皈依”, 见 *Growth into Manhood: Resuming the Journey* (Colorado Springs: Waterbrook Press, 2000)。
- (252) David Freedberg, *The Power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espon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253) David Freedberg, “Memory in Art: History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Response”, in Suzanne Nalbantian, Paul M. Matthews, and James L. McClelland (eds.), *The Memory Process: Neuro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337—358, here 344—345.

- (254) David Freedberg, “Memory in Art: History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Response”, in Suzanne Nalbantian, Paul M. Matthews, and James L. McClelland (eds), *The Memory Process: Neuro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345.
- (255) David Freedberg, “Memory in Art: History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Response”, in Suzanne Nalbantian, Paul M. Matthews, and James L. McClelland (eds), *The Memory Process: Neuro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351—352 . 弗里德伯格提到的镜像神经元文章是B. Calvo-Merino et al., “Action Observation and Acquired Motor Skills: An fMRI Study with Expert Dancers”, *Cerebral Cortex*, 15/8 (2005), 1243—1249.
- (256) 见“索茨艺术家” (Sots Artists) 考玛尔&梅拉米德 (Komar & Melamid) 在不同国家所做的“最受欢迎的绘画”系列调查。他们呈现了不同地区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艺术作品，见Komar & Melamid, “The Most Wanted Paintings on the Web”, <<http://awp.diaart.org/km/index.html>> accessed 13 March 2014。亦见“The Search for a people’s Art”, *The Nation*, 258/10 (14 March 1994), 334—348; Andrew Ross, “Poll Stars: Komar & Melamid’s ‘The People’s Choice’”, *Art Forum* (January 1995), 72—77, 109.
- (257) “事实上，由于我打算在其他地方阐明的原因，这种‘超审美’反映在图像上可能比在现实上更强烈，这最终取决于艺术家对这种可能性的直觉理解。”见David Freedberg, “Empathy, Motion and Emotion”, in Klaus Herding and Antje Krause-Wahl(eds.), *Wie sich Gefühle Ausdruck verschaffen: Emotionen in Nabsicht* (Berlin 2007), 17—51, here 41.
- (258) 又见Tomohiro Ishizu and Semir Zeki, “Toward a Brain-Based Theory of Beauty”, *PLoS ONE*, 6/7 (2011), e21852: 1—10.
- (259) Freedberg, “Memory in Art”, 347—348.
- (260) Freedberg, “Memory in Art”, 337.
- (261) Freedberg, “Empathy, Motion and Emotion”, 27.
- (262) Freedberg, “Empathy, Motion and Emotion”, 23.
- (263) David Freedberg and Vittorio Gallese, “Motion, Emotion and Empathy in Esthetic Experi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5 (2007), 197—203.
- (264) Fortunato Battaglia, Sarah H. Lisanby, and David Freedberg, “Corticomotor Excitability during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a Work of Art”,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5(2011), 79: 1—6 . 弗里德伯格关注神经科学的发展，并且清楚地意识到镜像神经元假说是争议的：“尽管镜像神经元不能支撑目前以它命名的许多主张”，见Freedberg, “Memory in Art”, 341.
- (265) Semir Zeki, *A Vision of the Brain*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93); Semir Zeki, *Inner Vision: 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mir Zeki, *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the Brain: Love, Creativit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Happines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 也见Whitney Davis, “Neurovisuality”, *Nonsite.org*, 2(12 June 2011) <<http://nonsite.org/issues/issue-2/neurovisuality>> accessed 14 March 2014; John Oinans, *Neuroarthistory: From Aristotle and Pliny to Baxandall and Zek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urnal of Neuroesthetics; Arts and Neurosciences Review*.

- (266) 参见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ne F. Thrailkill, *Affecting Fictions: Mind, Body, and Emo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arbara Johnson, *Persons and Th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oul Schrott and Arthur Jacobs, *Gehirn und Gedicht: Wie wir unsere Wirklichkeiten konstruieren* (Munich: Hanser, 2011)。又见Andreas Lambert, Oliver Kauselmann, and Boris Kleber, *Cognitive Poetics: Visualisierung von emotionalen Reaktionen auf Literatur* [web installation] <<http://cognitive-poetics.net>> accessed 14 March 2014.
- (267) William E. Connolly, *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3.
- (268) Brian Massumi, “Introduction: Like a Thought”, in Massumi (ed.), *A Shock to Thought: Expression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 (London: Routledge, 2002), xiii—xxxix, here xiii.
- (269) Brian Massumi, “Introduction: Like a Thought”, in Massumi (ed.), *A Shock to Thought: Expression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 (London: Routledge, 2002), xv.
- (270) Seigworth, “Inventory of Shimmers”, 24, 原文强调。
- (271) William E. Connolly, *A World of Becom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0—151.
- (272) John Protevi, *Political Affect: Connecting the Social and the Somatic*, *Posthumanities* 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25.
- (273) Massumi, “Introduction”, xxxi, 原文强调。关于马苏米对感情和情感的区分: “对于马苏米来说, 情感是基本的、无意识的、非主观的或前主观的、非所指的、不受限制的和密集的; 而感情是衍生的、有意识的、受限制的、有意义的, 是一种可以归于一个已经构成的主体的‘内容’……或一种可以驯服并与该主体相称的‘内容’。主体被感情压倒, 但他们拥有自己的情感。”见Steven Shaviro, *Post-Cinematic Affect*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09), 3, 原文强调。
- (274)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23.
- (275)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24, 原文强调。
- (276)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26.
- (277) 生机论者, 或者更确切来说是新唯物主义的神经政治思想家简·班纳特 (Jane Bennett) 思考了事物的能动性并得出了主要是政治学和生态学的结论, 见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也见Andrew Barry, “Materialist Politics: Metallurgy”, in Bruce Braun and Sarah J. Whatmore (eds.), *Political Matter: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89—117; Gay Hawkins, “Plastic Materialities”, in Braun and Whatmore (eds.), *Political Matter*, 119—138.

(278)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54—55.

(279)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90.

(280)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145, 原文强调。

(281) Connolly, *World of Becoming*, 91.

(282) 其他的学科分支也回避了理性选择方法,因为它们缺乏情感—身体维度,见Gerd Gigerenzer Colin F. Camerer and Ernst Fehr, “When Does ‘Economic Man’ Dominate Social Behavior?”, *Science*, 311/5757 (2006), 47—52; G. Gigerenzer and R. Selten (eds.),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Gerd Gigerenzer,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Viking, 2007)。从类似的角度探讨经济组织的社会学,见Helena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e Einführung* (Konstanz: UTB, 2002), 178, 187—188。

(283) 在本杰明·利贝特 (Benjamin Libet) 的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做一个小的身体动作,例如弯曲手指,并记录他们决定做这个身体动作的时间。同时用脑电图测量大脑活动。结果表明,负责运动的皮层区域(运动皮层)在做有意识的决定和执行运动之前会“自我准备”;因此存在一个前意识的脑—体回路。这个实验被用来质疑自由意志理论和其他理论。对利贝特实验的批评见Daniel C. Dennett, *Freedom Evolves* (New York: Viking, 2003); Christine Zunke, *Kritik der Hirnforschung: Neuropsychologie und Willensfreihei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7), 110—128。

(284) 见Leys, “The Turn to Affect”。

(285) William E. Connolly, “Critical Response I: The Complexity of Intention”, *Critical Inquiry*, 37/4 (2011), 791—798; Ruth Leys, “Critical Response II: Affect and Intention: A Reply to William E. Connolly”, *Critical Inquiry*, 37/4 (2011), 799—805。

(286) William E. Connolly, “Materialities of Experience”, in Diana H.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ed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8 n. 6。

(287) 人们也不能像约翰·普罗特维那样,从严格的哲学角度为躯体标记假说辩护;“肖恩·加拉格尔 (Shaun Gallagher) 会说,达马西奥假设的细节‘要么以一种现象学上站不住脚的方式将身体夸大到思想的层面,要么将其简化为神经元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科隆贝蒂 (Colombetti) 和汤普森 (Thompson) 的提醒,模拟身体回路需要持续不断的体细胞更新,因此并不仅仅是神经中枢的表现,我们可以保留‘躯体标记’假说”,见Protevi, *Political Affect*, 198 n. 35。

- (288) Slavoj Žižek, “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13/3—4 (2001), 190—198.
- (28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109, 原文强调。也见Michael Hardt,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2 (1999), 89—100; Michael Hardt, “Foreword: 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 in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and Jean Halley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x—xiii. 也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90)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108.
- (291) 斯宾诺莎、德勒兹、马苏米, 见Hardt, “Foreword”, xiii n. 2; 达马西奥, 见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374 n. 9。
- (292) Hardt, “Foreword”, x.
- (293) Hardt, “Foreword”, xii.
- (294) Hardt, “Affective Labor”, 100.
- (295) Adrian Johnston, “The Misfeeling of What Happens: Slavoj Žižek, Antonio Damasio and a Materialist Account of Affects”, *Subjectivity*, 3/1 (2010), 76—100; Slavoj Žižek, “Some Concluding Notes on Violence, Ide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Subjectivity*, 3/1 (2010), 101—116.
- (296) Walter Benn Michaels, *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 1967 to the End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9—10.
- (297) Michaels, *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 180—181, 原文强调。
- (298) Jacob Weisberg, *The Bush Trage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is outlined, for example, in Marvin Olasky,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and How it Can Transform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Arthur C. Brooks,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 (299) 这似乎是合适的, 见Patricia T. Clough, “The Affective Turn: Political Economy, Biomedicine and Bod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1 (2008), 1—22, esp. 15—17。
- (300) 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特别是证伪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领域。在此我们只提一点, 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对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的证伪主义的修正如下 (在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那里为他辩护): 一般来说, 只有特定的陈述和预测被证伪, 全盘否定整个研究方案非常罕见。见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8—101; Imre Lakatos, *Proofs*

and Refutations: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关于这场争论, 见Gunnar Andersson,*Kritik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Kuhns, Lakatos' und Feyerabends Kritik des Kritischen Rationalismus*(Tübingen: Mohr, 1988)。一篇总结社会科学和神经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异同的有用的文章, 见John Cromby, “Integrating Social Science with Neuroscience: Potentials and Problems”,*BioSocieties*, 2/2 (2007), 149—169。

- (301) 钟形曲线是人类群体中智商分布符合钟形的正态曲线, 是赫恩斯坦 (Herrnstein) 和默里 (Murray) 的著作的书名, 书中声称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力水平低于美国白人。Richard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302) 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rns by Jan Plamper”,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010), 237—265, here 248.
- (303) 虽然在神经科学领域流行的英语文本几乎总是很快被翻译成德语, 但几乎没有类似的德语著作被翻译成英语。见Gerhard Roth, *Fühlen, Denken, Handeln: Wie das Gehirn unser Verhalten steue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1); Gerhard Roth, *Aus Sicht des Gehirns*(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3); Gerhard Roth, *Persönlichkeit, Entscheidung und Verhalten: Warum es so schwierig ist, sich und andere zu ändern*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7); Michael Pauen and Gerhard Roth, *Freiheit, 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Grundzüge einer naturalistischen Theorie der Willensfreih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Wolf Singer, *Der Beobachter im Gehirn: Essays zur Hirn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2); Wolf Singer, *Ein neues Menschenbild? Gespräche über Hirn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3); Wolf Singer, *Vom Gehirn zum Bewußtsei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6); Hans J. Markowitsch and Werner Siefer, *Tatort Gehirn: Auf der Suchenach dem Ursprung des Verbrechen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7); Hans J. Markowitsch, *Das Gedächtnis: Entwicklung, Funktionen, Störungen*(Munich: Beck, 2009); Manfred Spitzer, *Nervensachen: Geschichten vom Gehir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Manfred Spitzer, *Dopamin & Käsekuchen: Hirnforschung à la carte*(Stuttgart: Schattauer, 2011); Manfred Spitzer, *Nichtstun, Flirten, Küssen und andere Leistungen des Gehirns* (Stuttgart: Schattauer, 2012); Manfred Spitzer, *Digitale Demenz: Wie wir uns und unsere Kinder um den Verstand bringen* (Munich: Droemer, 2012)。例外的是Hans J. Markowitsch and Harald Welzer, *The Develop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rans. David Emmans (Hove: Psychology Press, 2010) [Ger. orig., *Das autobiographische Gedächtnis: Hirnorganische Grundlagen und biosoziale Entwicklung*, 2005]; Birgitt Röttger-Rössler and Hans J. Markowitsch (eds.), *Emotions as Bio-Cultural Processes* (New York: Springer, 2009)。一本是在德语原版出版五年后出版的, 另一本是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小组的论文集。
- (304) Thomas Metzinger cited in Schnabel, “Wie Agenten, Verleger und Autoren

mit populärer Welterklärung Gewinn machen”, 43.

- (305) Jean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VIe—XVIIIe siècles): Une cité assiégée* (Paris: Fayard, 1978), 13. 又见斯特恩斯夫妇, 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命科学对情感的认识总结为“腺体或激素反应”; 见Peter N. Stearns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4 (1985), 813—836, here 834.
- (306) 借自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网站: <<http://www.critical-neuroscience.org>>; 也见Choudhury and Slaby, *Critical Neuroscience*; William R. Uttal, *Mind and Brain: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探讨情感的第4章。又见批评的博客: Michael Anderson, “After Phrenology: Will we Ever Understand the Brain”, *Psychology Today*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after-phrenology>>; Luiz Pessoa, “Emotion & Cognition and the Brain”, <<http://cognitionemotion.wordpress.com>>; Michelle Greene, *NeurRealism* <<http://neurealist.blogspot.de>>; *The Neurocritic: Deconstructing the Most Sensationalistic Recent Findings in Human Brain Imag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pharmacology* <<http://neurocritic.blogspot.de>>; “Neuroskeptic”, *Discover*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euroskeptic/>>; all accessed 16 March 2014.
- (307) Ekman and Davidson (eds.), *Nature of Emotion*; Richard J. Davidson, “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orrectives from Affective Neuroscience”, *Brain and Cognition*, 52/1(2003), 129—132; Justin S. Feinstein, Ralph Adolphs, Antonio Damasio, and Daniel Tranel, “The Human Amygdala and the Induction and Experience of Fear”, *Current Biology*, 21/1(2011), 34—38; Pessoa and Adolphs, “Emotion Processing and the Amygdala”.
- (308) “They Found God and Other Spiritual Phenomena in the Temporal Lobe”, *Personality Cafe* <<http://personalitycafe.com/science-technology/21574-they-found-god-and-other-spiritual-phenomena-temporal-lobe-o.html>> accessed 16 March 2014; 见Martin Haidinger, “Die Amygdala regelt im Gehirn das Sozialleben”, in *Wissen aktuell* (OE1 on ORF, 27 December 2010, 1.55 p.m.) [broadcast].
- (309) 这种趋势的典型代表是路易斯·佩索阿的元分析, “Emergent Processes in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actions”,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2/4 (2010), 433—448, 及Dalgleish, Dunn, and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363. “对情感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析表明, 涉及情感和情绪处理的大脑区域比最初设想的要多得多。”
- (310) Gordon L. Shulman et al., “Common Blood Flow Changes across Visual Tasks: II. Decreases in Cerebral Cortex”,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9/5 (1997), 648—663.
- (311) R. Nathan Spreng, Raymond A. Mar, and Alice S. N. Kim, “The Common

Neural Basi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rospection, Naviga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Default Mode: A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3 (2009), 489—510.

- (312) Marcus E. Raichle et al.,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2 (2001), 676—682 . 也见Marcus E. Raichle and Abraham Z. Snyder,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an Evolving Idea”, *NeuroImage*, 37/4(2007), 1083—1090.
- (313) Callard and Margulies, “The Subject at Rest”, 235.
- (314) Callard and Margulies, “The Subject at Rest”, 236.
- (315) Laurent A. Renier et al., “Preserved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for Spatial Processing in the Middle Occipital Gyrus of the Early Blind”, *Neuron*, 68/1 (2010), 138—148.
- (316) Martina Keller, “Wie kriege ich den Kopf frei? Interview mit Ernst Pöppel”, *Brigitte*, 8 (25 March 2009), 127 . 也见Anthony Randal McIntosh, “From Location to Integration:How Neural Interactions Form the Basis for Human Cognition”, in Endel Tulving (ed.), *Memory,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The Tallinn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2000), 346—362.
- (317) Iacoboni, *Mirroring People*, 117.
- (318) Callard and Margulies, “Subject at Rest”, 231; 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2nd ed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1), 115.
- (319) Michael A. Arbib, *The Metaphorical Brain: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rain Theory* (New York: Wiley, 1972); Michael A. Arbib (ed.), *The Handbook of Brain Theory and Neural Networks* (2nd ed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Viktor K. Jirsa and A. R. McIntosh, preface in *Handbook of Brain Connectivity* (Berlin: Springer, 2007), v—vii.
- (320) Beatrix P. Rubin, “Changing Brains: The Emergence of the Field of Adult Neurogenesis”,*BioSocieties*, 4/4 (2009), 407—424; Tobias Rees, “Being Neurologically Human Today: Life Science and Adult Cerebral Plasticity (An Ethical Analysis)”, *American Ethnologist*, 37/1 (2010), 150 — 166.
- (321) Martin Lövdén et al.,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Adult Cognitive Plastic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4 (2010), 659—676.
- (322) Ulman Lindenberger, Shu-Chen Li, and Yvonne Brehmer, “La Variabilité dans le vieillissement comportemental: Conséquence et agent du changement ontogénétique”, in Jacques Lautrey, Bernard Mazoyer, and Paul van Geert (eds.), *Invariants et variabilités dans les sciences cognitiv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02), 315—334.
- (323) Ute Frevert, “Was haben Gefühle in der Geschichte zu suchen?”, *Geschichte*

- (324) James J. Gross, “The Future’s So Bright, I Gotta Wear Shades”, *Emotion Review*, 2/3(2010), 212—216, here 215.
- (325) Brian Parkinson, Agneta H. Fischer, and Antony S. R. Manstead, *Emotion in Social Relations: Cultural, Group,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5), 还有一本强调社会心理学方法的教科书, 见Paula M. Niedenthal, Silvia Krauth-Gruber, and François Ric, *Psychology of Emotion: Interpersonal, Experiential,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 (326) “社会神经科学”的概念是由约翰·T·卡波乔 (John T. Cacioppo) 和加里·G·伯恩森 (Gary G. Berntson) 提出的,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Decade of the Brain: Doctrine of Multileve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8 (1992), 1019—1028, here 1025。又见Ralph Adolphs, “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Social Neuroscience”, *Neuron*, 65 (2010), 725—767, here 752。
- (327) Ute Frevert and Tania Singer, “Empathie und ihre Blockaden: Über soziale Emotionen”, in Tobias Bonhoeffer and Peter Gruss (eds.), *Zukunft Gehirn: Neue Erkenntnisse, neue Herausforderungen* (Munich: Beck, 2011), 121—146, here 135。也见Romana Snozzi and Tania Singer, “Empathie aus der Sicht der sozialen Neurowissenschaften”, in Fehr and Folkers, *Gefühle zeigen*, 97—113。
- (328) Frevert and Singer, “Empathie und ihre Blockaden”, 136。
- (329) Frevert and Singer, “Empathie und ihre Blockaden”, 137。
- (330) Jonah Lehrer,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Boston: Mifflin, 2007), 1—24 (感谢Slava Gerovitch提供此参考); “Chimera of Experience: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h Lehrer”, *Edge* (21 May 2009) <http://edge.org/3rd_culture/lehrer09/lehrer09_index.html> accessed 17 March 2014。
- (331) Gendron and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Cornelius, *Science of Emotion*。心理学家伊尔塞·克雷斯平-埃克斯纳 (Ilse Kryspin-Exner) 区分了四种理想类型: 情绪的一般心理学理论、神经心理学方法、面部情感以及情感的认知理论。见Ilse Kryspin-Exner, “Ich fühle, also bin ich: Emotionen und ‘Rationalität’ aus einer psychologischen Perspektive”, in Heinrich Schmidinger and Clemens Sedmak (eds.), *Der Mensch—ein “animal rationale”?: Vernunft—Kognition—Intellige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4), 216—238。
- (332) Silvan S. Tomkins,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i. *The Positive Affects* (New York: Springer, 1962), 5。

第四章 情感史的视角【251】

一、《感情研究指南》：威廉·M.雷迪试图超越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

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威廉·M.雷迪率先在他的情感研究（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中富有成效地运用了生命科学。他探究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荣誉概念，同时也关注了情感人类学的最新文献。⁽¹⁾在此过程中，他愈发怀疑这项研究的社会建构主义方向。1997年，他发表了一篇纲领性的论文《反对建构主义：感情的历史民族志》。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在文中提出的观点。⁽²⁾

雷迪开篇就指出了这样一个困境：人类学相对主义者的视角阻碍了规范性立场的形成，即使作者希望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举了情感人类学中的一个例子：本尼迪克特·格里玛（Benedicte Grima）表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Pushtun）妇女在结婚时应该表现出一种十分强烈的悲伤情感，并且只能表现出这种情感。如果她们亲近的人（例如儿子）受伤了，普什图妇女们会聚集在远离受伤者的地方一起放声痛哭，互相表达悲伤，而受伤者则被完全忽视。因此，在这两种社会情境中，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与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新娘应该感到幸福；如果有亲友受伤了，应该对受伤者给予关心和关注。和在第三章中的情况一样，格里玛这样的研究再次推翻了情感是普遍共通的这一观点。情感是社会所建构的，正如格里玛所说的那样，“情感就是文化”。⁽³⁾

雷迪紧接着指出了格里玛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252】例如，格里玛描述了婚姻是如何安排的，婚后新娘搬入丈夫家中，其地位一落千丈。因为她必须在夫家承担很多家务劳动，还必须接受在家庭中的最低地位。在过门后的很多年里，婆婆和丈夫的姐妹（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还有丈夫以前的妻子）会用尽言语和其他一切方式，对这位新人呼来唤去。格里玛认为“gham”不是社会建构，而是普什图家庭结构特有的一种附带现象。她对“穆斯林文化”中的“老人政治”持批判态度，对这种形式的“压迫”更是深恶痛绝。⁽⁴⁾

但雷迪认为，无论是谁，一旦踏上了社会建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放弃一切价值判断。你必须在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做

出选择，而不能脚踏两只船。这种困境不仅贯穿于社会建构主义情感人类学，还贯穿于整个后结构主义。那么，如何找到一个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立场呢？雷迪建议将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两个极端转换为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普遍主义相当于“表述句”，即对世界的描述性陈述，而社会建构主义相当于“施为句”，即改变世界的陈述。例如，“冷杉树枝是绿色的”是一个“表述句”，而在结婚登记处说“我愿意”则是“施为句”。因此，对情感的陈述同时具有描述作用和施为作用，既能描述世界，又能改变世界。“我很难过”在部分上是对一种状况的描述，部分上是对几种情感中某一种情感的强化（因此会削弱或覆盖其他情感）。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微笑可以引发积极情感这个道理。为了合理地看待情感陈述的复杂性，雷迪提出了“情感表达”这个概念。

他引入认知心理学的维度来扩展这一概念，通过实验来加强改变世界的情感陈述的力量，后文马上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论述。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雷迪起初只是用“情感表达”这个词来调和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以便重新获得规范性地位。雷迪认为，通过用情感来描述世界的一种状态，我们也会试着去影响这种状态；因此，我们在采用一种评价立场。【253】希望用“情感”这一范畴，将符号从其后结构主义的、自由漂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为其提供一个“真实世界的锚点”。希望情感“在语言的背景下产生言语”，用“情感表达”来超越福柯的“话语”、德里达对“在场”的批判，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所有这些都认为不允许政治抵抗），^⑤这似乎有点过分。这一论点会引发许多问题。首先：这种情感陈述模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无关情感的陈述？用社会科学的话来说，“情感表达”的范围有多大？界限在哪里？换言之，对于像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核心问题，能否用情感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创新来解决？

发表雷迪这篇文章的杂志邀请了五名人类学家和一名历史学家对此发表评论。当时普遍的批评意见是，雷迪并没有真正描绘出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现状，人类学研究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热衷于社会建构主义。雷迪对情感和记忆的理解尤其受到他们的批评。以作为历史资料的审判记录为例，参与者30年后的情感与30年前不会相同，因此对“情感表达”的认识共时性太强，漏掉了对记忆的分析这一步。^⑥另外，两名人类学家指责雷迪忽视了田野工作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对前者而言，参与观察者影响观察对象的情感，而对后者而言，历史学家的出现不影响历史参与者的“情感表达”。^⑦凯瑟琳·卢茨写道：“雷迪不值得效仿，他‘以进

步的反建构主义的名义，只是简单地将心理生物学研究应用于民族志研究’。”人们应该考察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研究的社会建构性质、资助这种研究的制药公司，以及它们对当代辩论的影响。在这方面，她举了女性杂志中关于经前期紧张（PMT）和抑郁症的专栏的例子。⁽⁸⁾然而，在构建基本的批评话语时，所有这些反应都有些无能为力。这是否与雷迪的创新性有关？他给人这样一种模糊的印象，即有人正在发起一场范式转换，而很快展开的情感讨论要么是在雷迪之前进行的，要么是与他有关系的。其他的评论者已经准备承认雷迪的成就。【254】研究法国史的专家林恩·亨特（Lynn Hunt）宣称，“威廉·雷迪再次领先他人至少两步”。⁽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雷迪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建构。2001年，他出版了《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¹⁰⁾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我们在此将详细探讨。雷迪的雄心壮志弥合了情感人类学中社会建构主义与认知心理学的普遍主义之间的鸿沟。这一点在他书中的辩证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一部分，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第一章（正论）之后是关于人类学（反论）的一章，在随后的两章中，他自己的情感理论（综合）取代了这种对立。在第二部分，雷迪用了四章的篇幅将他的新理论应用于法国历史，他遵循的是社会科学演绎法，首先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然后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检验。⁽¹¹⁾这种结构与雷迪跨界阐述其主张的方式不谋而合：他以清晰的语言，不带有任何后结构主义写作的讽刺或戏谑，坚持认为有必要创造一种能够捍卫自由和正义等价值观的立场。这是他与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所共有的价值观，但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后，这种价值观就像性别这一范畴一样，已经动摇，变得站不住脚了。如果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的价值观也同样是社会建构的，只有局部有效性。这样一来，例如我就不能反对非洲部分地区行割礼时切除阴蒂的行为。正如雷迪本人所强调的那样，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会遭遇这种两难处境。

在关于认知心理学中普遍主义的第一章中，雷迪首先强调不可能明确地定义情感：它们既不能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也不能被归结为一些基本情感和其他情感。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同样也不可能将情感与认知或情感与理性区分开来。实际上，用道格拉斯·巴内特（Douglas Barnett）和希拉里·霍恩·拉特纳（Hilary Horn Ratner）的话来说，情感就是“认知情感”（cogmotion）。⁽¹²⁾他们认为，情感应该被理解为“超量习得的认知习惯”，当然，这些习惯并不总是通过意识决定而习得、改变或遗忘，而总是会受到两方面的约束：

(1) 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情感与目标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255】情感中的“效价”(valence)或“快乐基调”(hedonic tone)，使得情感要么天生让人愉快，或者天生不愉悦；情感有一种“强度”，这种强度决定了个体克服它们的难易程度。(2) 关于心理控制的最新研究表明，心理控制对于有情感参与的学习有关行为有一定的抑制性。(13)

第一个约束与情感的强度和随之而来的有意识影响有关。第二个约束更为复杂，与当时流行的有关精神控制的知识有关，例如，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的精神控制，这方面的知识证明了这种控制的悖论性。例如，假设我坐在一架飞机上，我想要压抑对飞行的恐惧，就必须让这种恐惧待在我大脑的活跃部分，这样我才可以不断地控制它。我无法做到让它完全消失，所以我只能随时关注它，以防它进入我的“意识”。因此，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监控”(ironic monitoring)。(14)

对于雷迪来说，情感认知心理学最新研究的综述主要是为了勾勒出一个与后结构主义人类学情感研究非常相似的立场，从而使看似对立的两个学科变得更加关系密切：

总之，心理学家对认知的研究方向已经发生转变，从线性认知模型，转向多层次、多类型激活的、涉及抑制及增强复杂组合的，多路径认知模型。摒弃线性认知模型促使心理学家不再截然区分意识与无意识、超意识与潜意识，调节过程与自发过程。研究中的上述变化给人们带来对情感本质的全新认识。……传统观点把情感同非线性思维(自由联想、诗意的、象征性的)及生理冲动(脸红、肾上腺素流、心率改变等)联系在一起。之所以把非线性思维与生理唤醒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同人类认为的智慧的标志相距甚远。意识、理性与自觉行动，通常被人类认为是智慧的象征。象征性思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思维；生理唤醒，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自愿行动。但随着“自愿”“意识”等这些概念的传统内涵的崩塌，随着思维越来越被认为是对多层次激活、注意及持续的反应，区分思维与情感的难度日益加大。(15)

心理学家之间是否存在雷迪所描述的共识，在神经科学蓬勃发展时期，认知心理学及其基于“评价”的命题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目前这些问

题尚无定论。然而，对他而言，对事件现状的描述是调和心理学与人类学、普遍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前提。【256】

尽管认知心理学还没有对最后一点予以充分的关注，但雷迪认为情感人类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从一开始到今天，情感人类学始终未能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文化对情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潜在的、普遍的心理对情感的影响又有多大。在任何地方，死亡都是痛苦的吗？或者只是在个体被高度强调的文化中，死亡才带来痛苦呢？在一种文化中受欢迎，在另一些文化中被压抑的浪漫爱情，是人类的普遍情感吗？抑或仅仅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产物？就抑郁症来说，它究竟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罹患，还是现代临床治疗同现代社会隔离而带来的文化产物呢？⁽¹⁶⁾

这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是相对应的，但生命科学所讨论的内容有所不同，例如，智力或精神分裂症仅仅被当作自然和文化这一经典二分法的一个变体。雷迪认为人类学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情感是社会建构还是普遍存在？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这门学科认识论的核心。如果采纳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广义文化概念，既然不允许有超文化的空间，那么就不可能有一种独立的立场来表达文化形成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理解情感如何随时间变迁而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变化过于偶然，无法对其加以分析。⁽¹⁷⁾在这种观点看来，伴随中世纪臣服行为（*deditio*）而来的眼泪洪流（比如卡诺莎之行），与21世纪一位年轻演员为一场充满希望的选角试镜而流的眼泪一样，同样是由文化决定的；只有当这些眼泪具有同样的情感内核时，人们才能称其为变化。⁽¹⁸⁾

根据雷迪的观点，是选择普遍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这关系到人类学的道德核心。如果一切都是由文化决定的，那么情感上的变化在道德上是无法区分的。雷迪引用了情感人类学经典研究中的两个例子。米歇尔·罗萨尔多（见本书第二章）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和情感研究的先驱者，他花了很多年研究菲律宾山区的伊隆戈人，讲述了1980年菲律宾政府如何取缔了男性的猎头习俗，以及全体伊隆戈人是如何开始皈依基督教的。这样所产生的结果是，伊隆戈的男性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作为一名文化相对主义者，罗萨尔多在这一点上无法采取立场：她不能说她在道德上谴责猎头行为，【257】拥护政府的新法律，也不能说她反对对

一个生活方式值得保留的民族进行这种干预。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情感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著名作者凯瑟琳·卢茨，基于对居住在波利尼西亚环礁的伊法利克群体的研究，对西方的情感观念进行了批评。她指出，伊法利克人享有一种合理的愤怒（*song*）的权利。但是，她补充说，这种权利不是男性所独有的，它不分性别，属于一种比通常的西方政治要平等得多的政治。然而，在西方对于男性公开表达愤怒的评价是积极的，对于女性则是消极的（“歇斯底里”），这同样也适用于伊法利克人，同样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因此也同样是合理的。因此，雷迪认为，卢茨的后结构主义最终剥夺了她在与伊法利克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批判自己文化的可能性。

即使认定西方的情感常识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情感“构建”为“自然的、天生的”，尤其是认为女性是情感化的，也无法改变西方认为情感属于自然领域的事实。对伊隆戈的受访者因猎头活动消亡而产生的痛苦体验，罗萨尔多进行了批评。如果说这种批评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无论是卢茨，还是阿布-卢赫德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男性中心现象及视情感为自然的、女性的主张的批判与抨击，相应地也没有任何意义。⁽¹⁹⁾

那么，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如何才能被构建到情感的概念之中呢？雷迪使用的是情感、“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导航、情感避难所、情感痛苦和情感自由这些术语。但是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情感是一种激活的认知材料，它始终指向特定的目的，并且必须要对其进行高速“转换”，以使其保持在“注意力”阈值以下。（为再次提醒我们雷迪试图摆脱的旧的理论 and 原则，我们可以尝试用熟悉的心理分析术语来阐释最后一句话：情感是具有对象的认知活动，通常停留在无意识状态。）“情感表达”最早出现在雷迪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但是我们需要记住，“情感表达”是描述世界又改变世界的言语行为。如果我说“我很高兴”，这可以简单地描述一种状态，也可以覆盖我同时感受到的其他情感（愤怒、悲伤），当然这是在非语言层面上。⁽²⁰⁾“情感体制”是一套规定的“情感表达”以及相关的仪式和其他象征性的活动。公开宣扬爱国主义，对着军旗发誓，就是这种“情感表达”，也是现代民族情感体制的一部分。每种政治体制都得到情感体制的支持。【258】“情感导航”指的是在相互冲突的不同情感目标之间进行操控。情感冲突时常发生，例如，1938年，一位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犹太裔德国人可能会在对她的犹太丈夫的爱和她对一个“种族纯粹”国家的热情之间左右为难。不同取向之间的冲突越

大，“情感避难所”就越少，“情感痛苦”就越大。“情感自由”意味着“情感痛苦”的最小化。雷迪认为，情感自由的概念“将指向一种政治参与的形式，这种形式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居高临下或民族中心主义的”。

(21)理想状态是最大程度情感自由。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理想来衡量所有历史时期、所有文化中的情感体制，并在道德上对其进行评价，而不会再次陷入激进的普遍规范，从而导致民族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情感体制的范围如下：

位于这个频谱一端的是严格的体制，要求个体表达规范性情感，避免不当的情感表达。在这类体制中，有限的情感话语也都被仪式或官方的艺术形式所模塑。基于强化规范性情感及使其为个体所习惯的期待、个体被要求恰当使用衍情式话语。拒绝按照规范表达情感的人（无论是否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对上帝或国王的爱戴或对军队的忠诚）都将受到严重惩罚……这个频谱的另一端是仅特定时期特定场合要求严格的情感规范的体制，比如对特定机构（军队、学校、祭祀）、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或生命中特定阶段。(22)

雷迪接着说：

因此，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如下：严格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感管理工具，但是以牺牲更大的自我探索和导航空间为代价的。宽松的体制为情感导航提供了足够空间，允许在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之间，或者通过构建稳定的小群体，存在多样的情感管理手段。我们之所以认为一种政体优于其他的，有两个原因，我们反对严格的情感体制：（1）通过激起目标冲突及打击那些不能恰当对规范的情感表达反应的人的方式，严格体制的稳定性方得以保持；（2）当这些政体对所有不规范行为都进行惩罚时，它们也把自己同一种重要的人性对立起来——脆弱性，容易被目标或目的改变、经历转变、危机或怀疑所影响的脆弱性——这些词语的配对有着重要意义。(23)

现在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最大可能的情感自由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生物学改良形式，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谁来定义“最大可能”和“自由”的含义呢？判断这一点的立场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和相对的。但这对雷迪的理论是不公平的。如果认真对待“情感表达”，那么历史参与者所作的情感陈述就无法与他

们的情感分开。【259】相反，他们的情感表达和感受之间有一个反馈回路。例如，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一个农民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初，他向秘密警察告发了自己的父母，他可能遭受了比用通常的历史分析方法记录的更大的情感冲突。他身处的情感体制可能使他陷入这样一种情感冲突，一边是对父母的爱，一边是对“小爸爸”斯大林所代表的国家的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只能从他对斯大林口头上的效忠和他对父母的真爱，或者是对斯大林的完全忠诚这两个方面来还原十岁的帕夫利克的情感世界。两个情感目标的同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在此之前几乎是不可能被充分捕捉到的。

在《感情研究指南》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他的理论之后，雷迪将书中的实证部分转向了历史“数据”，转向了情感主义时代的法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情感主义出现之前，在诸如表达“情感”的词汇如“*émotion*”和“*sentiment*”出现并取代具有情感色彩的“礼仪”（*civilité*）之前，法国人是否有过不同的情感？雷迪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情感表达”：“情感表达的概念表明，如果单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其情感效果也会发生变化”。“情感表达”的概念“使我们可以在无须详细说出特定某人的真实感受的情况下而进行表达”。^{〔24〕}感伤主义之下新的情感词有何作用？雷迪的回答野心勃勃，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做出了几乎全新的解释。

正如雷迪所说，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专制主义的法国，有一种贵族的荣誉准则，它以一种极其等级森严的方式来规范情感的外在表现，其主要目的是避免冒犯。^{〔25〕}相比之下，18世纪早期，情感避难所开始出现：沙龙和共济会，充满感情的信件和小说，基于浪漫爱情的婚姻，所有这些都以温暖、亲密和诚实为特征。字里行间的情感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富有表现力的、真实的情感。“情感表达”的反馈效应最终注定了感伤主义的结局。在感伤主义对情感的公开表达中，有一种内在的激进力量——书信中的爱意越来越浓，仇恨越来越深。除此之外，这些情感被理解为自然的、真实的，男男女女都能强烈地感受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感伤主义的范围不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政治技巧也要植根于情感之中。雷迪强调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对情感的高度依赖，指出卢梭的《新爱洛伊斯》（*Le Nouvelle Héloïse*）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通过这种方式，雷迪重新调整了对“理性时代”的看法，并将1700—1794年称为“感性时

代”。

雷迪认为，法国大革命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照感伤主义逻辑组建起来的情感避难所。⁽²⁶⁾【260】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都是感伤主义者，他们相信眼泪和其他身体上的迹象是真实的情感表达。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情感表达”，他们就会明白，持续不断的情感表达会导致一种过热，强烈的情感体验不会持续太久。无论如何，情感是多方面的，越来越多的情感可以共存。这种情感共存和对某一种情感（或几种情感）的过分强调造就了“目标冲突”。在恐怖时期，这种情感体制螺旋上升，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首先，期望一个人能不断地体会极端和真实的情感，在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之后，就开始反过来质疑情感的真实性。其次，其他情感的共存（例如，对断头台的恐惧，作为雅各宾派的人，实际上就只应欣然地迎接它，把它看作是正面的美德之剑）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情感及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最后，这导致巨大的情感痛苦，以至于最终只能意味着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终结。⁽²⁷⁾雷迪接着说：

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情感是什么，而且因为表达情感就意味着会改变情感，是否改变、如何改变的问题，有时候可以预测，有时候则不可预测。要求人们要具有某种“自然”情感，否则要面临死刑，这就会激发起大部分人的关于“我表现得是否真诚”的暗暗疑虑。“我表现得真诚吗”这一问题，往往难以回答。⁽²⁸⁾

他还说：

大革命并没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情感庇护所，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情感战场，在这里每个人的真诚都被怀疑，在这里人们忙于转移怀疑，但不管这种转移怀疑的努力对生存而言是多么重要，其本身就是不真诚的表现。⁽²⁹⁾

企图用美德共和国取代专制主义打破了虚假的“情感表达”：

倘若衍情话语（即情感表达）理论正确的话，感伤主义对于人性的看法就是以有趣的方式而错了。（说它“错误”，是指在面对我的研究主题时，我有意打破了相对主义立场。）⁽³⁰⁾

“准确的”情感表达能够指引情感，【261】在不同的取向之间操控自如。然而，感伤主义“虚假的”情感表达导致所有情感表达的自我激进

化，情感的导航变得僵化，从而破坏了情感对立目标之间的平衡。

这本书的其余部分追溯了在1794年的热月政变后感伤情感体制的消亡。雷迪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人的公众情感表达除了怀疑和悲观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感伤主义的情感表达可能只能存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在私人、家庭或女性的领域；在艺术领域；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³¹⁾乔治·桑（George Sand）所代表的是感伤主义的余波；她的失败为雷迪提供了证明一种后感伤主义体制已经取代了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证据。⁽³²⁾自由理性与浪漫情感之间的严格分离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造成留存至今的“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笛卡尔。18世纪政治领域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成功地从所有集体记忆中抹去。⁽³³⁾恐怖时期感情上的过分伤害所造成的创伤太大了。

雷迪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情感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他是极少数能够判断生命科学论文中基础研究质量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他对人类学著作也有丰富的了解。这两种特质以及他数十年来对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史料的研究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如此，仍有值得批评之处。首先，有人怀疑雷迪研究的基石也是他最重要的创新“情感表达”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雷迪的“情感表达”这一概念是从约翰·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然而，非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是否与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相似，目前尚不清楚。心里想着“我很快乐”和口头表达“我很快乐”的情感影响一样吗？刻意地微笑与说出“我很高兴”的效果一样吗？如果我们像芭芭拉·罗森宛恩一样，把这些想法放到历史上：“雷迪的‘情感表达’将言语置于其他形式的情感行为之上，但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世纪的冰岛），脸红、颤抖和膨胀比言语更重要。”⁽³⁴⁾即使在言语行为中，口头表达的社会情境仍然是模糊的：例如当我对需要付钱帮我寻找幸福的心理治疗师说“我很快乐”时，或者当我对认为我陷入了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我很快乐”时，起作用的反馈机制是一样的吗？

雷迪在情感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也有问题。

【262】他似乎认为典型的政治体制是现代民族国家，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人类存在的大多数时代，没有统治社会各阶层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组织。相反，历史参与者同时属于几个共同体。这里再次引用罗森宛恩的话：

有许多不同的场所，例如，18世纪的沙龙、婚床和法庭，更不用说贫穷劳动者的家了（后者由雷迪本人提出），这些难道不可能构成他们自己的情感共同体吗？这些共同体与“感伤主义”（或宫廷礼仪）所规定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35）

或许，如果想保持一致，“情感体制”必须采用复数形式。

你可能会对雷迪试图解决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方式表示怀疑：一旦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重新获得道德的、评价的立场。对于其范围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后结构主义的困境不仅局限于情感，还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真理和客观性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接受雷迪本人在他书中的描述，认为情感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记忆、意图或语言”一样。（36）既然本体、自我和主体性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核心，那么雷迪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肯定同样适用……然而，现实和真理的问题与通过最大限度地引导情感来缩小情感痛苦的问题，两者之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情感是否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使后结构主义的困境变得戏剧化？它仅仅是关于情感，还是将情感作为遭受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几个领域之一？我们真的能找到一条彻底摆脱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出路吗？

令人困惑的是，与雷迪的情感自由观念最接近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民主和对少数人权利的可靠保护，雷迪创造了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以便有可能再次建立有说服力的政治评价，事实证明，这种立场为西方民主国家（即雷迪的当代政治现实）的许多进步力量指引了方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雷迪并不是在为保守派失去所有价值观而哀叹，而是在寻求将后结构主义从其激进后果中解放出来的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它一开始就破坏了对西方和男性文化的主流导向，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缺乏任何道德核心。雷迪回应一位评论家说，他的乌托邦更像是朱迪斯·巴特勒的乌托邦，而不是玛莎·努斯鲍姆的乌托邦。（37）

【263】但是，认知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其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情感对象之间存在冲突？认知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史是怎样的？雷迪的整个想法是循环论证吗？

即便他否认这一怀疑具有误导性，也无法轻易消除这种怀疑：

〔对雷迪提出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先提出一个关于情感的特定的认知心理学理论，然后又说，某种体制最适合这个理论，因为它允许最大限度的情感庇护所、情感导航和情感自由，创造最少的痛苦。另一种选择是，首先阐述你的政治道德价值

观，然后说某种认知心理学最符合这些政治道德价值观。你是怎么认为的？

[威廉·雷迪]：我的意图是通过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批判性阅读来发现，而不是先验地列出我的政治道德价值观，这一过程的动机是后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挫折感。我试着与感兴趣的读者分享这个过程。⁽³⁸⁾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雷迪说（尽管是半开玩笑的）他只选择生命科学中能够证实他政治信念的内容。⁽³⁹⁾那么，与生命科学的偏差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只能归化偶然的政治立场吗？它是否只适用于偶然的政治立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它就不能代表任何后结构相对主义的进步。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露丝·雷斯，虽然她从来没有像雷迪那样声称要为历史研究创造一种新的情感理论，而是通过对达马西奥和埃克曼的批判，将自己局限于区分“好的”和“坏的”自然科学研究。⁽⁴⁰⁾作为一个“好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她引用了莉莎·费德曼·巴瑞特和詹姆斯·拉塞尔的研究，而他们都对埃克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核心情感”的概念是否能经受住来自雷斯的严厉批评，并证明自己是“好的”自然科学。归根结底，“核心情感”更像是汤姆金斯和埃克曼的基本情感，而不是像马苏米的“纯粹强度”，因为它们没有对象，【264】也不能被意图直接接触到。⁽⁴¹⁾此外，在核心情感的平均水平、波动性以及刺激类型的反应性方面，也存在“基于遗传的个体差异”。⁽⁴²⁾这让人们觉得雷斯需要客观区分“好”与“坏”，真与伪。只有这样她才能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批评那些人文科学工作者对生命科学的滥用，但她在选择自己的情感概念时却没有采用相同的标准。

但回到雷迪：他的理论最终将根据它产生的实证结果来衡量。对于一本以社会科学为导向，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著作来说，它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人类学家西格妮·豪威尔（Signe Howell）早在1997年就指出：“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情感表达的）争论仅仅是一种提示，是缺乏信服力的。最终，人类学对认知和情感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⁴³⁾但是，即使在雷迪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后，历史学家仍然有许多疑问。杰里米·波普金评论说：“雷迪对法国历史的叙述并不陌生，他的主要突破点与传统历史相同。”⁽⁴⁴⁾这不仅不是完全陌生的，而且有点令人不安。因为雷迪的历史写作似乎是单向度的，在雷迪的情感史中，新文化史中语言学上的细微差异，对隐喻、转喻、提喻、体裁等的敏感度，都变得

无关轻重。

对雷迪的批评是否会损害甚至破坏他的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当然，他依然很有影响力。【265】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不愿在他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追随他，但有些内容已经变得超然化、庸俗化了，这在学术界是常有的事。情感体制、认知情感和“情感表达”，如今这些术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情感体制”一词很少以其完整的意义被使用。它是一套规范的“情感表达”以及适当的仪式和其他象征实践。它通常被理解为“情感规范”，即斯特恩斯的“情感标准”或霍赫希尔德的“情感规则”的同义词。

二、情感实践

民族历史学家莫妮克·舍尔进一步发展了雷迪的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谈论过她，提到她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研究的启发，与帕斯卡·艾特勒合撰了一篇论文。她对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进行道德判断不感兴趣，而是要克服诸如身心、结构和能动等二元论，最重要的是克服情感的外在表达与内在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的对立。舍尔试图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情感史，其中包括身体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文化和历史，但这只有在身体被文化和历史同化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舍尔从新的意识哲学出发，特别是延展心智理论（Extended Mind Theory，简称EMT）和与“情境认知”相关的方法，对认知只能发生在大脑中这一观点提出异议。⁽⁴⁵⁾她引用了新意识哲学主要代表之一阿尔瓦·诺埃（Alva Noë）的观点，后者认为思维、感觉和感知并不是“由大脑单独来完成的。意识需要大脑、躯体和世界共同协作。的确，意识是全身在其环境背景下的成就”。⁽⁴⁶⁾舍尔通过分析感觉运动系统、手势和控制身体的方式，得出结论：“社会和环境语境下的身体随着大脑一起思考。”⁽⁴⁷⁾

通过关注与神经科学有关的新哲学，【266】例如诺埃曾参与神经科学实验，历史学家可以更好地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评价”认知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后者曾是他们的最爱，因为它把情感等同于认知，而这似乎为时间变化开拓了空间。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这种新的意识哲学很少提及身体是如何被文化和历史塑造的。舍尔认为最好是从“认知的身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就像布尔迪厄那样。⁽⁴⁸⁾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她提出了自己的“情感实践”理论，她将其

定义为“控制身心以唤醒本来没有的情感，把这些分散的情感集中起来并赋予它们可理解的形状，或者改变或消除已经存在的情感”。⁽⁴⁹⁾她提出了四种情感实践，分别是调动情感实践、记录情感实践、交流情感实践和管理情感实践。

1．调动情感实践

调动情感实践常常与媒体的使用有关，而且通常更具有群体性而非孤立性。以求爱为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表明，它蕴含很强的可变性：“技术的变化（从情书到手机和互联网）和场所的变化（从监督下的探访到约会再到聚会）。”⁽⁵⁰⁾这些情境和技术建构出来的情感并不相同，但都在塑造可能婚姻对象的情感和感情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忠实的服从、荣誉、激情、崇拜、熟悉到尊重。因此，求爱不仅是一种行为，它对于情感和（性别化的）自我的建构都会产生影响”。

⁽⁵¹⁾

另一个例子是经常与舞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毒品，它可以促进情感的快速实现。然而，用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好像一种化学物质无论在哪里都能引发相同的情感。安慰剂效应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也能产生情感。此外，致幻药物的使用常常被嵌入仪式和文化代码之中。⁽⁵²⁾

最后一个调动情感实践的例子是天主教文化中的忏悔。忏悔的情感不一定要在忏悔之前出现，也可以在忏悔的过程中出现，【267】通过相关的身体技巧，如下跪、戴头巾或佩戴苦修带。结合这些技巧，忏悔就可能会产生想要的情感，可能“调动”它。这里的重点在于“可能”。舍尔认为，情感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可预测的，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次数太多的话，这种实践就会被抛弃。⁽⁵³⁾

2．记录情感实践

记录情感实践主要是说话和写作，但也包括思维中的无声记忆。因此，“情感表达”也是记录情感实践，而舍尔的情感实践超越了雷迪的“情感表达”，更注重记录的形式。因此，记录情感实践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是否涉及写作、说话或思考。如果涉及写作，是用手写还是用计算机打字来完成。如果是说话，说话的对象是谁，重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记录情感实践总是一个产生意义的问题，或者如舍尔

所说：“情感就像雪花，每一种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通过记录才能将其归类。”⁽⁵⁴⁾从脱口秀节目到传达情感技巧的治疗“行业”，“情感的符号化和再次符号化”已经高度商业化。⁽⁵⁵⁾

舍尔强调，记录情感实践的重构使历史学家能够把握“真实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印度，只有通过宝莱坞电影，英语国家文化中的“我爱你”才首次获得广泛认可。它渗入印地语，成为求爱和结婚仪式的一部分，而在此前这个表达并不为人所知。“如果记录情感使情感得到体验，那么记录这种变化就意味着书写一段最完整意义上的情感史。”⁽⁵⁶⁾

3．交流情感实践

交流情感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交流。如果政客希望在自然灾害后在电视上传达他或她的关心，这一过程将发生在“多个感官层面，涉及不同的知识模式”，包括“面孔、手势、声音模式、身体姿势，或如眼泪、肤色变化或呼吸沉重等外在表现”。⁽⁵⁷⁾舍尔认为，成功情感交流的关键是信息要以预期的方式被接收。同样，在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信息的传达者必须适当考虑具体情境、参与者们以及他们的社会期望。

舍尔认为交流情感实践的关键是，先验领域的前提被重新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例如情感交流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参与者没有体会到真情实感吗？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268】提升感情真实性的交流情况是否是一种理想？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和“模拟”的情感没有区别，因此这种区分对情感交流的成功与否是否有影响？还是这种情况更适合模拟，因此情感表达变成了约定俗成？

4．管理情感实践

乍一看，这似乎解释了迄今为止所写的情感史的大部分内容：情感规范和对它们的疏忽，以及对它们的侵犯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特恩斯的情感学将成为管理性的情感实践，而有关礼仪的自助书籍将成为其历史探究的史料来源。但这就未免太草率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历史研究中容易理解的规范和难以理解的“真实”情感之间的区别就会占上风。按照舍尔的理解，管理情感实践不仅控制情感，还会产生情感。它们与“福柯所说的将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的知识秩序密切相关”。⁽⁵⁸⁾其他的两分法也由此而来，例如，男与女，外与内，文明与不文明，公共与私人。小男孩很少哭泣，而小女孩则经常要忍气吞声，这是具体的管

理情感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既有公开的（礼仪书中的明确指导），也有隐性的（老师或其他权威所规定的实践）。

除了这四种情感实践之外，还有一种惯习，舍尔非常重视布尔迪厄提出的这一概念。惯习描述的是已经沉淀并被吸收的“身体知识”。音乐家们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乐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音乐内化的速度要快于认知速度较慢的人。同样，运动员们的身体也能习惯性地做出快速而复杂的动作，这些都是用来阐明“惯习”含义的经典事例。⁽⁵⁹⁾惯习有社会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烙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受教育程度不仅体现在他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或者能立即识别出歌剧的咏叹调，或者知道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单词的正确复数形式，还体现在知道对一个笑话要笑多大声，或者是知道在博士考试后的招待会上要与谈话对象保持多远的距离，等等。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很快学会，但如果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就会犯错误，如果过于拘谨或者过于急切，就会露出马脚。

惯习当然是无意识的，它是“静态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269】惯习总是需要“在日常实践中得到确认”。⁽⁶⁰⁾惯习“给不完全并且不总是可预测的行为留出了空间，也可以表明变化和抵抗，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复制”。⁽⁶¹⁾因此，它允许“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之间的对比，或文化需求和身体的永恒、普遍的‘真理’之间的对比，而身体的功能和结构不受其用途的影响”。⁽⁶²⁾正如舍尔所强调的：

熟练地利用身体的自发运动、冲动和激活是一种习得的实践，通过模仿而获得，使身体和大脑发生持久的变化。习惯性的姿势和动作会在一个特定部位形成肌肉组织、神经分布和血管，使一些肌腱变短，使另一些肌腱变长，影响骨密度和形状，并诱发脑组织的特定发展。⁽⁶³⁾

尽管如此，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设定了绝对的限制，毕竟“没有一个人人类社会会发明一种需要五只脚的舞步，或者一种需要八根手指的乐器”。⁽⁶⁴⁾

作为惯习的情感从来就不仅是对刺激的线性反应，而且是循环的。⁽⁶⁵⁾它们绝不是布莱恩·马苏米所说的“纯粹强度”，他将情感定义为完全无意识的和生理上的，并赋予它自主的地位。⁽⁶⁶⁾舍尔认为，情感总是有生理层面的，虽然它深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人不会“拥有”情感，而更像

是去试验情感，或者产生情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完全有意识到完全无意识，在此过程中，情感会沿着这个连续的过程发生转变”。⁽⁶⁷⁾同样，我们不“是”一个情感主体，也“没有”一个情感自我，“这个情感主体不是先于情感而是在产生情感的过程中出现”。⁽⁶⁸⁾

这一切对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史料来源的范围扩大了，并且对现有史料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除了明确的情感词汇和传记资料外，关注点开始转向身体语言，例如“热血沸腾”。所有形式的身体感觉在文字、声音和图像上的痕迹都很重要，例如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颤抖，恐惧，压抑的愤怒，因羞愧而晕倒；当然还有本书导言部分提到的“仰首伸眉”，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成语意味着意气昂扬、幸福满足。在这一点上，舍尔远远超越了雷迪，雷迪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上。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冲突，由于它们表明了“产生情感”的失败，从而揭示了这方面的潜规则。【270】在冲突中，不同的管理情感实践相互碰撞，使得人们有可能得出有关情感文化的更广泛的结论。

三、神经历史学

舍尔的“认知情感”意识概念与延展心智理论相关，雷迪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在当时，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对生命科学感兴趣，他选择了认知心理学和评价学派以及其意向论维度。⁽⁶⁹⁾自从雷迪接受了实验心理学之后，就出现了一股神经科学浪潮，在它最终成为历史之前，已经席卷了许多人类科学。它就是今天的神经历史学。⁽⁷⁰⁾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他备受推崇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探讨了作为一个核心问题的情感，雷迪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让我们先来看看斯梅尔这本书。

斯梅尔想要扩展“历史”的时间界限，将其起点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文字之前。因此，他首先揭示了在19世纪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基于书面资料的事业，这门学问丧失了什么。这就变成了“史前史”，苏美尔人和楔形文字的历史，旧石器时代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反乌托邦，只有某种‘从天而降’、定义不清、创造了运动和历史的催化事件才能打破这种不变性”，那就是书写技术的发明。⁽⁷¹⁾

如果一个人挥别19世纪后期在书面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研究，而将史料的概念（斯梅尔更愿意称之为“痕迹”）扩展到包括石头碎片、化石、DNA痕迹、同位素、行为模式、【271】陶器碎片和音素；

如果一个人记得“伟大的历史学科包括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宇宙学”，那么，在斯梅尔看来，我们就对历史有了更好、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深度历史。(72)这就出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它将旧石器时代和后石器时代联系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人类文化与人类大脑、行为和生物学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而展开”。(73)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痕迹”，就会发现它与文本史料之间的相似性。斯梅尔称：“痕迹是任何编码了关于过去的某种信息的东西。”(74)他接着说：

今天所发出的音素是一个活化石，虽然在几千年后它的谱系已经被遗忘。DNA也是如此。尽管人口遗传学家偶尔会从古代遗骸中提取DNA，但他们更常用的做法是从唾液或血液中提取现代DNA。现代DNA与编辑文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它由几行代码组成，用四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书写，可以忠实地再现原文。就像文本一样，它承载的信息可以被后代阅读且只有被阅读才会有意义。唯一的区别（对一些人来说很重要）是DNA不是任何人的意图的产物。(75)

但是，斯梅尔认为，正是这种意图的缺失，才使得生物学与历史研究的某些分支更加接近。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站在了匿名结构的一边，而忽视了意向性；社会史不关注个体的能动性。(76)在其他方面，生物学与其他生命和地球科学离历史也并不遥远。历史和进化生物学对时间都有一个开放的概念：种系发生（即一个群体内部关系的进化发展，是相对于个体发生而言的，后者是指一个特定个体的起源和发展）理论假定开始和结束都是开放的。简而言之，是无穷无尽的。(77)神经心理学将能动归于神经元事件，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归根结底，“历史学家总是习惯性地用心理学来思考。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对史料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假设”。(78)

该书第四章“新神经史”讨论了情感。斯梅尔将情感定义为“相对自动的”，并且和勒杜与达马西奥一样，区分了无意识情感和生理情感，以及作为意识和生理情感产物的感情（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所见，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将前者称为“affect”，【272】将后者称为“emotion”）。(79)这种对情感的定义对斯梅尔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他认为情感决定人类行为，但它们是无意识的、古老的，它们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个反意向论的情感概念（这里再次运用露丝·雷斯的区

别)，斯梅尔就不可能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漫长的年表。他是这样说的：

还有大脑的所有非认知特征。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由行为倾向、情绪、情感和感情决定的，而这些都是有很悠久的进化史。这些身体状态并不是幽灵般的东西在意识中神秘地一闪而过。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表明，它们是生理实体，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并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包括情感）是相对自动的，与所有类人动物的大脑所例行处理的生命治理的其他领域（基本的新陈代谢、反射、痛苦、愉悦、驱动力、动机）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也许全部）还与一系列激素和神经递质有关，例如睾酮、雄激素、雌激素、5-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催乳素、加压素和肾上腺素等。这些化学物质产生于遍布全身的腺体和突触，它们促进或阻止信号通过神经通路。它们会诱发我们身体上和体内的躯体状态，帮助确定情感的实际感受。我们与其他动物共享几乎所有这些化学物质，尽管鬣蜥的神经系统不一定会像我们一样使用睾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化学物质都有自己的自然史。⁽⁸⁰⁾

结论就是：“大脑结构和身体化学物质的存在意味着倾向和行为模式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普遍的生物基础。”⁽⁸¹⁾

斯梅尔反复强调，他已经把先天和后天的二分法抛诸脑后。那么，鉴于如此多的普遍主义，变异性在哪里呢？⁽⁸²⁾他把情感当作一种刺激和反应模式；可变性来自历史变化的刺激。对蛇的恐惧是源于数百万年来“蛇”对人的威胁刺激。如今，对蛇的恐惧这种“深层历史痕迹”已经不会再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在野外遇到蛇。进化上有用的是对汽车的恐惧，而害怕汽车的人会更受自然选择的青睐。完全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几百万年后，又会有其他刺激因素决定进化上的有利行为，而对汽车的恐惧将会变成另一个深层的历史痕迹。⁽⁸³⁾

【273】无论如何，这就是斯梅尔对动态影响之作用的设想。

当然，这种动态没有抛弃先天和后天的二分法，而是与以往一样与其紧密相连。因为根据斯梅尔的观点，情感——这里要重复一遍，勒杜和达马西奥将其定义为无意识的生理现象，与有意识的情感相对——是不变的：“情感……成为我们要做和已经做的许多事情的一个结构背景。”⁽⁸⁴⁾斯梅尔再现了我们在汤姆金斯和埃克曼那里遇到过的旧的情感

程序。只有情感对象（蛇、汽车）是可以改变的。斯梅尔写道：“一位中世纪的女圣人吃虱子，舔舐受感染的伤口和麻风病人溃疡的脓液，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这样做会对旁观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改变的只是对厌恶刺激的文化反应，而不是这些刺激的普遍性。⁽⁸⁵⁾因此，斯梅尔没有考虑情感本身是否可以改变，也没有考虑大脑的“硬件”本身是可以改变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矛盾。一方面，从远古时代开始，动物和人类就用“精神药物机制”来影响大脑的状态，这种机制被定义为“由人类文化产生的改变心情的实践、行为和制度”。⁽⁸⁶⁾此外，不仅人类有这种精神药物机制，因为：

很多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这样做。在围场中感到无聊或孤独的马，有时会以惊吓自己为乐。不断呼出的鼻息会引起化学反应，引发惊吓反射和兴奋的神经化学反应。鸟儿们聚集在结着熟透了的果子的树上，享用着含酒精的果实，它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去摄取改变心情的物质，而不是去制造它。猫会被猫薄荷所吸引。⁽⁸⁷⁾

人们会跳舞、喝酒，会让自己沉溺于宗教的狂欢，会进行怡情之性。因此，就像情感一样，使用精神类药物来自我刺激的倾向似乎是普遍的（尽管尚不清楚斯梅尔会在哪一种机体上划定界限）。

另一方面，根据斯梅尔的说法，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农业革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精神药物机制。总是有加速发展的时期，如18世纪的欧洲“有咖啡因文化、感伤小说和色情作品，以及越来越多的消费品”。⁽⁸⁸⁾如今，在我们的全球消费文化中，精神药物机制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因此斯梅尔迅速做了相应的转变，以便引入我们变得越来越迟钝这一历史变化。⁽⁸⁹⁾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越使用精神药物机制，我们反而变得更麻木呢？这种彻底的转变提供了唯一的可能，【274】让斯梅尔把历史的可变性带入了他的模式，并且做了历史学家通常做的事情：把变化进行分类。毕竟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分期的确是他的主张。当然，他的方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使用某些精神药物机制，而有些人不使用。⁽⁹⁰⁾如果我们在这里遵循斯梅尔的观点，就不能再把一些精神药物机制称为“轻度上瘾”。因为，根据斯梅尔的说法，所有的精神药物机制最终都会导致依赖性的下降和迟钝感。

斯梅尔坚持认为情感本身是不变的，对他来说，这成为一个真正的

难题。情感与认知的分界线不断被打破，以他列举的非洲猎物追踪者为例，他能够发现远处狮子的踪迹，这表明他比那些不生活在稀树草原的人更能适应自己的环境：

非洲追踪者只要扫一眼平淡无奇的平原，就可以定位到远处的狮群，而车上其他人却没有看到，这让人意识到自己视觉皮层的突触是多么不发达。(91)

为什么对环境的认知适应会铭刻在大脑皮层中，而在情感主义时代阅读小说时却不会呢（按照斯梅尔的说法，阅读小说纯粹是一种情感—精神药物实践）？(92)

关键的问题是，这又怎么增加了历史的解释力呢？我们来看一下斯梅尔对恐怖主义政治体制的解释：

在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中，可以找到一种能够灌输服从意识的实践。例如，对母系狒狒社会的研究表明，地位高的雌性狒狒经常恐吓地位低的雌性。与黑猩猩社会一样，这种恐怖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由于它们无法预测虐待，地位低的雌性就承受着非常高的压力，这会导致它们的生育能力下降，而这为占支配地位的雌性提供了明显的优势。在后石器时代社会，地位低的人体内产生应激激素的装置和机制的范围或密度都有所增加。政治精英们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确切生理后果。相反，政治行为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些解决方案上，因为这是最有效的维护权力的方式。(93)

斯梅尔还描绘了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贡贝国家森林公园遇到的一只幼年雌性黑猩猩的行为：【275】

有好几次，帕西恩（Passion）在女儿波姆（Pom）的怂恿下，抢走并吃掉了其他母亲的孩子。吃完这一顿可怕的饭后，帕西恩会用拥抱和轻拍去安慰那些伤心的母亲。这种行为看起来很变态。然而，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如何更好地建立或维护权力，而不是制造压力，并提供缓解压力的手段？(94)

斯梅尔在这里明确提到“20世纪的法西斯政权”。(95)这些解释显然达不到复杂性的标准，甚至达不到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宏观社会学理论

的标准，更不要说各种详细的微观研究的标准了。正如丹尼尔·格罗斯所说，它们是“真实得很琐碎”。⁽⁹⁶⁾在处理特定的案例时斯梅尔的还原主义变得最为突出，因此，他没有像雷迪在《感情研究指南》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将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历史“数据”的分析研究，这也许并非偶然。

在评价斯梅尔时，威廉·雷迪指责他犯了功能主义的错误。雷迪表明，尽管斯梅尔声称已放弃进化心理学，转而支持非功能主义的神经科学，但由于缺乏神经科学知识，导致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功能主义的经典陷阱。例如，

根据斯梅尔的观点，人们在社会上级面前通常会无意识地“用更高的声音说话，脸上带着顺从的笑容，对上级开的蹩脚玩笑也会开怀大笑”。斯梅尔猜测，在农业革命之前，这种行为编码模块在小规模社会中“可能已经濒临灭亡”。但是，一旦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出现，父母会根据这个模块的指令，塑造他们孩子的突触结构。斯梅尔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通过这种方式，文化和基因编程相互作用，增强了先前被抑制的行为……当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早期的农业社会高度等级化。几千年来人类就知道，训练至关重要，习惯和习俗的作用十分强大。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不断重复的行为可以改变突触结构。实际上，神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和文化的产物。但是，要是说高声说话和顺从的微笑是对官僚君主制的“自适应”，可以通过学习来传递，这就远远超出神经科学目前所能证实或反驳的范围。如果把这种推测当真，就如同打开了一个装满功能性想象的潘多拉盒子。⁽⁹⁷⁾

非洲追踪者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除了斯梅尔所强调的人类的根源在非洲之外，这个例子很可能被一位白人、自由主义者、男性美国学者用来反对种族主义。⁽⁹⁸⁾【276】但是，如果你把追踪者的例子翻转过来，那么反种族主义中隐藏的危险逻辑就显而易见：以斯梅尔的观点来看，你可以说，非洲人的大脑中缺乏文化技巧的铭刻，无法演奏古典音乐，也无法欣赏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更不用说肖斯塔科维奇或施尼特克的交响曲了。

因此，单纯的情感史不是正确的方法，正如《论深度历史与大脑》的一位评论者所说：

一个更严重的障碍是历史学家缺乏评估生物和医学发现的关键

工具。例如，我本人就无法判断我在这里所写的关于神经生理学研究的发现是不是正确的、有争议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对斯梅尔来说也是如此。很难想象，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会不断拓展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专业知识，以便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而不是毫不怀疑地接受它。(99)

四、情感史的视角

“很可能先天决定我们会对刺激做出反应，并受反馈机制的影响，但这对历史研究有何帮助呢？”这位评论者接着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经元的方法……是决定论的重启。”(100)许多人赞同这种基本的批评。要想对神经科学釜底抽薪，就需要具备充分的神经科学的知识，秉持怀疑态度，这正是威廉·雷迪想要做到的。如果“情感”变成另一种“心态”，或者退化为“国民性”这样的范畴，那也没有多大用处。(101)【277】与任何历史潮流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和过度简化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忽视它们所构成的威胁。并非凡是不符合时代常识的历史解释模型的东西都是情感。换句话说，应该避免给所有无法用“利益”和“理性”解释的人类行为贴上“情感”的标签，这两者是典型的优化增益的理性选择假设。

区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种区分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及其测量方法，有太多的思想家从中获得了享乐效价的概念；但这在情感史上几乎派不上用场。把情感等同于经济的比喻以及情感股票及其当前余额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用处。这里总是隐含着平衡预算的想法，而这可以回溯到情感的水力模型。最后，把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和合成情感、简单情感和复杂情感也于事无补。正如杰罗姆·凯根不厌其烦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关注情感的复合性；情感总是比有着明确界限的情感概念（“恐惧”“愉悦”“羞耻”）更为复杂。(102)

在给出诸多提醒之后，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几个领域，在这些领域，情感史研究似乎有可能富有成效。其中有些是历史的分支，可以受益于情感的视角。对每一部分的介绍都会穿插一段历史小故事。

1. 政治史、社会运动和情感

1988年10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简化了药物的标准，使艾滋病药物能够更快地通过临床试验，尽快提供给需要的患者。

(103)而在此之前的10月11日，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组织了大约1 000人在华盛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楼前举行了示威活动，参与者大部分是男女同性恋活动分子。大楼被迫关闭了一天，示威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24）。(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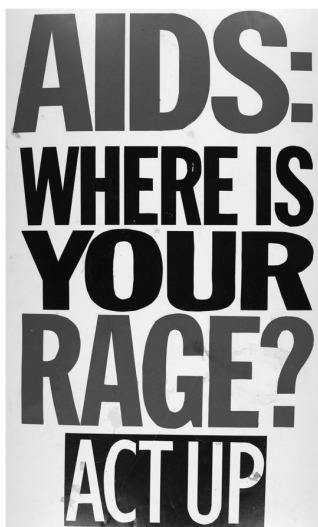


图24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的海报【278】

资料来源：Image Title: “How Many of Us Will Be Alive for Stonewall 35?”
Verso: “AIDS:Where is your Rage? ACT UP”, ACT UP New York records, 1969, 1982—1997(bulk 1987—1995), posters and placards ©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注：海报上的文字为“艾滋病：你的怒火在哪里？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

传统的政治史会将这一系列事件描述为带头人成功领导的抗议行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参与会被视为该联盟创始人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战略技巧和个人魅力的结果。这种传统的历史将突出活动分子的利益，那就是要实现更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消除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促进医学研究，降低价格让更多的人能购买到现有的药物。

然而，社会学家黛博拉·古尔德（Deborah Gould）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却截然不同。她将1988年10月11日的这次示威活动视为情感型社会运动的创造性政治的典范。古尔德本人是改组芝加哥分部的成员并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她写道：“我们的常识是‘化悲痛为愤怒’。”(105)

【279】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的创立与具有媒体影响力的、新型非暴力

抗议形式的出现有关。例如，在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绝望之日”，活动分子冲进新闻直播间，在摄像机前高呼诸如“抗击艾滋病，而不是阿拉伯人；艾滋病才是新闻！”的口号。这和其他有关事件都是对下面这种绝望形势的反应：政府、教会和社会大部分人对同性恋群体大规模死亡的态度，往好了说是漠不关心，往坏了说是充满蔑视。(106)与传统的政治历史不同，将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的历史与情感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要强调实用主义的利益——活动分子情感化的语言和行为被看作是这些利益的附带现象，相反，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政府和社会中的活动分子和受众）复杂的情感过程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此外，这还意味着与认为社会运动是由理性领导的社会学传统分道扬镳。(107)

由情感史加持的政治史可以有何作为呢？例如，它可以思考政治中处理公众情感表达的方式的变化。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是最有可能击败在任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人。但是当马斯基似乎在公开场合哭泣之后，他不得不退出民主党初选。新罕布什尔一家新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马斯基的妻子是酒鬼，后来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尼克松竞选团队编造的。在暴风雪中，马斯基在报社外举行了一场会议，极力否认这一指控。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脸颊上似乎流下了泪水，但后来马斯基说那是融化的雪水（图25）。(108) 30年后，乔治·沃克·布什担任了八年的美国总统，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镜头前流泪，例如2007年1月11日在一名22岁士兵的追悼仪式上（这位士兵在2005年因拯救战友而牺牲）。(109)



图25 哭泣的总统候选人？暴风雪中的埃德蒙·马斯基（1972年2月26日）【280】

资料来源：Corbis：U1731490。原说明文字：“曼彻斯特，新罕布什尔：马斯基

出版社。2月2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最大的报社——《工会领袖报》（*Union Leader*）报社前，民主党总统初选候选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右）在大雪中展开竞选活动。他猛烈抨击了该报的出版商威廉·勒布（William Loeb）。”© Bettmann/Cor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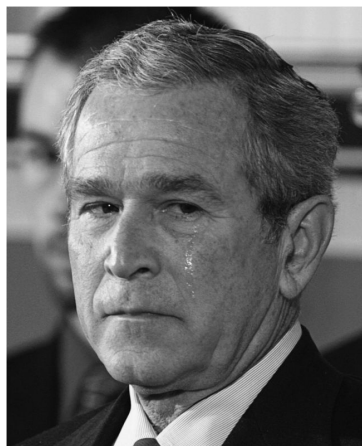


图26 哭泣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2007年1月11日）【281】

资料来源：说明：“2007年1月11日，华盛顿白宫东厅，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为海军陆战队队员杰森·邓汉姆（Jason Dunham）颁发荣誉勋章的仪式上热泪盈眶。邓汉姆下士在伊拉克服役时，为了救他的海军陆战队巡逻队战友，奋不顾身扑上一枚手榴弹，结果自己被炸死。REUTERS/Jim Bourg（UNITED STATES）。”© Jim Bourg/X90054/Reuters/Corbis。

在同一年，布什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在任期间经常哭泣。我敢打赌，作为总统，我流下的眼泪你数也数不过来。”⁽¹¹⁰⁾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从马斯基到布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马斯基因为哭泣而被认为是软弱和不可靠的，而布什却没有？公开情感表达的界限是什么？这个界限是如何改变的？为什么？在这里，政客的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发挥着什么作用？

从情感史的角度思考政治词汇也是很有价值的。本书的导言部分提到了外交官们对有情感编码的语言和动作的使用。公开表露出来的愤怒又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在议会论辩的过程中，它是最有效的战术资源之一”，⁽¹¹¹⁾或者在追悼会、党代会、君主接见、皇室婚礼、政治巡回演讲、向养兔专业户或教区委员会发表演讲的场合下呢？

在情感转向之后出现的政治是怎样的呢？比如“政治抑郁者的国际游行”（International Parade of the Politically Depressed）、“抑郁示威”（Depress-ins）、“绝望网络”（networks of desperation）等示威行

动。黛博拉·古尔德所属的“芝加哥情感库”（Chicago Feel Tank）又是什么情况呢？它经常有意讽刺地使用情感语言。(112)

最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那些在政治环境中引发行动的决定性情感”。但是它们极难获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历史研究的一小部分。(113)如果可以找到研究这些问题的史料和方法（本章结尾将提出一个建议），那么就能为政治决策的因果解释提供情感基础。

2. 经济史与情感【282】

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萧条；有些人甚至认为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但其原因仍不清楚。其他国家的银行业和经济危机（1927年的日本，1931年的德国和英国）的原因则都很明晰，但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史学家依然对美国的经济崩盘感到迷惑不解。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质疑，这么小的起因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指出，“理解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114)

如今，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已破解了1929年10月24日股票恐慌性抛售和道琼斯指数暴跌的奥秘。詹姆斯认为，在这样的恐慌中，类似灾难性事件的记忆会浮现出来，并与当代事件相结合。面对不确定性，人们似乎需要某种历史立足点；但是，通过将他们的行为与假定的历史先例（过去股票和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崩溃）联系起来，行动者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因为没有一次崩盘会与另一次一样。詹姆斯继续说道：

换句话说，历史参照是金融危机持久而必要的驱动因素：在欢欣鼓舞的状态下，人们就会幻想乌托邦式的未来；当这种状态破灭时，他们又会回忆起过去的灾难（他们可能从未亲眼见过）。(115)

1929年的大崩盘让当时的人们想起了1869年9月24日（星期五）发生的崩盘。过去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当下，以至于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的股市崩盘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16) 1929年之后的每次崩盘都是如此：1987、2000和2008年，危机中最糟糕的日子都被称为是“黑色的”。因此，遇到金融崩溃这样典型的集体危机情况，人们总是会试图从过去寻找意义，出现“一种狂热的时间想象”，这种想象融合了不同的时间性。(117)

古典经济社会学的作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往往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理性”无关。大多数人会把马克斯·韦伯与合理化的概念和现代科层制及工作世界的“铁笼”联系起来，但就像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不仅仅探讨虔诚和情感。乌特·弗雷沃特指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韦伯，就会发现他的分析并没有忽视现代资本主义中情感在创造价值和引导行为方面的力量”。⁽¹¹⁸⁾【283】她问道：“难道他没有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贪得无厌的欲望’‘痛苦不堪的激情’和‘变幻无常的价值’才是经济主体的真正动机吗？”⁽¹¹⁹⁾

在韦伯的一生中，相对年轻的心理学开始对产业工人的情感产生兴趣。一项基于对5 000多名工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跟摆脱工作相关的情感占主导地位，对现代机器生产的典型反应是“厌恶”。⁽¹²⁰⁾一名年轻时曾在家庭作坊工作的金属工人说：

机器取代我的工作，铸造厂和磨坊雇用了80到100名工人，设
想一下，如果你在没有嘈杂声的地方干了42年，突然之间喧闹和噪
声充斥在你耳旁，年纪大的人难免会心烦意乱。我整天汗流浹背，
感到焦虑不安。我常常像个小孩子一样哭泣，晚上会失眠。我现在
晚上会留着一盏灯，这有助于缓解我的情绪。⁽¹²¹⁾

在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工作心理学和情感心理历史的可能性，
还可以看到工作和情感相结合的历史的轮廓。⁽¹²²⁾

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待消费似乎也很有前景。⁽¹²³⁾广告专家很早就
对情感的功能产生兴趣，并着手去探索。⁽¹²⁴⁾广告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它开发的媒体产品、海报和电视广告、街头广告和网络广告、有装饰的
热气球和人们穿着泡沫服装分发的传单都可以作为史料来源。它和情感的
媒体史的关联是相当明显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广告”同样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从国家社会主义宣传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下的“视觉激励”，再
到20世纪末的电视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议。【284】从古斯塔夫·勒庞到保
罗·伯奈斯（Paul Bernays），再到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公共关系和政治宣传的先驱那里，情感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呢？夏尔·戴高乐和罗纳德里根的形象塑造者利用了什么样的心理和情
感资源呢？

3．法律史与情感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 1863—1916）是测谎仪之父，师从威廉·冯特，他对法国因反犹情绪而起的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4年，犹太人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向德国人泄露军事机密。芒斯特伯格指出，当阴谋者

试图制造不利于他的证据时，他们一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当他们向他口授一封包含有被发现的叛国手稿字句的信时，他浑身发抖，几乎无法执笔。警察和犯罪分子所说的拷问大部分在于那些问心有愧者的身体迹象；要使被告本人情感崩溃就是这种不当的执法行为的胜利。(125)

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肢体动作、颤抖的手被认为是他内心情感的表征，最终是他有罪或无罪的证明。(126)如本例所示，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生理情感的表达在刑事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最早将法律史和情感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在19世纪末，并且也不仅仅是在法国。许多关于法律纠纷的资料谈到了对名誉的攻击和侮辱，从冒犯君主到私人之间的诉讼。(127)关于婚姻纠纷和离婚后财产分配的资料中都充斥着情感。(128)此外，有些法规只涉及情感，例如激情犯罪。就像吸毒或酗酒一样，情感也可以作为减轻惩罚的理由。如果情感史适用于法律和法律史，这可能与律师本人对情感的浓厚兴趣有关。(129)

4. 媒体史与情感【285】

1938年万圣节前夕的傍晚，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放了广播剧《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这是H. G.威尔斯（H. G. Wells）1898年的小说，讲述的是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故事。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广播剧，并将地点从英格兰改为新泽西。这部戏的逼真程度以及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让许多听众信以为真，听众惊慌失措地给电台打电话，询问这次来自火星的袭击的更确切信息。(130)

这个例子说明了媒体在现代情感史中的重要性。可以利用现有的关于传播媒介的研究，设法实施其主要原则：媒体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媒介的结构特性决定了意义产生的形式和机制。许多历史学家在研

究文学作品时都认同这一观点，即文体的惯例对意义的产生有重大影响。例如，他们将自助指南中的行为修正意图和犯罪惊悚片让人产生紧张和愉悦的方式区分开来。但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将这种理解应用到大众媒体和情感的研究中。(131)

当然，把一些媒体产品（例如历史频道对纳粹主义的处理）称为“情感化的”是不够的，好像情感可以自由开关一样。(132)在考虑情感及其与媒介结构属性的关系方面，电影和媒体研究与媒体哲学可能走得最远。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斯（Christiane Voss）将电影院中的观众视为“电影替身”（filmic surrogate body）：

我的论点是，观众的身体在心理和感官情感上与荧幕上发生的事件产生共鸣，它（如我之前所描述的那样）把一个三维身体“借给”银幕，从而将二维电影事件的映射到三维的感官身体。这样，观众就成为银幕的临时“替身”，而这个身体则成为电影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133)

观众的参与远远不止是观众对电影的刺激做出反应。【286】例如，作为一个替身，观众参与了电影叙事巨大的时间间断性，而“我们可能会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审美纠葛实际上很快就会结束——当灯光再次亮起，影院里90到120分钟的电影放映时间就结束了”。(134)

沃斯将情感定义为叙事现象，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将所有组件组装在一起”。同样，“复杂的情绪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而非随机的特征，具有特定的戏剧式结构”。(135)电影可以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电影让观众替身参与到平行的叙事情感中，这些情感不再被解读为艺术呈现，而是被当成观众自己的情感。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沃斯认为情感总是有认知的维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电影观众并没有完全参与到屏幕上发生的事情中，而是保留了一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坐在电影院里，过着一种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电影的生活，这样的背景感受”加强了电影播放时观众对叙事和情感的参与。(136)

历史学家肯定会更重视其他因素，例如观众反应的历史性（何种文化、何时、何种性别的人群看情节剧会流泪？）和相互影响（电影院里其他观众的存在如何影响自己的感受？）。尽管如此，像克里斯蒂安·沃斯这样的研究让人意识到，如果情感史学家把媒体的特性考虑进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此外，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不同的媒体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属性。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士兵们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体为战斗做准备。在特定的时间，人们会选择一种特定的媒介，这当然不是巧合。越南战争期间，士兵们用电影做准备；今天则是通过电脑游戏和模拟实战来做准备。这意味着人们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些媒体（散文、诗歌、进行曲）比其他媒体更有效。另一方面，观看电影让人们更容易与自己的暴力行为拉开距离：“我的一部分在做着什么，而另一部分在远处看着，被它看到的事情所震惊，却无力阻止它们的发生。”这是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在描述他如何杀害越共时的原话。⁽¹³⁷⁾

对媒体丑闻的研究得益于将情感作为分析的因素。⁽¹³⁸⁾除此之外，对于情感史来说，不断变化的接受系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287】奥尔加·卡普索娃（Ol'ga Kuptsova）是俄罗斯一位研究戏剧的学者，她写到，在18世纪，观众的反应都与巴洛克时期15种典型的情感相呼应，表演者本人利用的也是这些情感。到18世纪末，随着情感主义的传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观众的反应开始大相径庭。在同一个地方，有的人会大声叹气或抽泣，而有些人会隐忍着情感。直到作家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和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ii）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广泛传播之后，戏剧观众的情感反应才统一到某种规范的层面。果戈理期待观众成为一个整体，“所有人突然体会到同样的惊奇，流下同样的眼泪，能够一起开怀大笑”。⁽¹³⁹⁾ 1839年，别林斯基在描写《哈姆雷特》（*Hamlet*）的表演时写道：“这些头衔、性格、喜好、品味、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都不同的人，汇聚成一个整体，体会到同一种思想和情感。”⁽¹⁴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戏剧的观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些思想。他们从果戈理和别林斯基那里学到了如何将他们的情感表达统一起来。

小报、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情感媒体史的史料多种多样。这种媒体史可以为理解现有的情感史提供新的启示。人们可能会问，芭芭拉·罗森宛恩的情感共同体完全通过媒体而构成，它与那些基于面对面交流的情感共同体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从罗森宛恩研究的中世纪以来，现代大众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对远距离实时通信的可能性应该予以多大的重视呢？

5. 口述史、记忆和情感

1.1 我：嗯……有个叫海尔格（helga）的女人。

1.2 同伴：.....我记得.....那个长餐桌。有点像青年旅社。

1.3 不知怎么的，我意识到，（。）呃，（。）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些美好的事情。

1.4 我觉得对我来说，坠入爱河是件很容易的事。（停顿）呃嗯，

1.5 （停顿）现在才发现某人特别漂亮或怎样，那只是

1.6 后来才意识到的。起初，那只是一种感觉。

1.7 实际上和我第一次（。）呃，（。）性爱（。）经历很相似（。）

1.8 这个女人和我，我们坐在（。）沙发上.....我们

1.9 谈论一些事情。（。）然后，（短暂地笑了笑）

1.10 突然，我们看着对方，然后，开始（。）彼此靠近【288】

1.11 就这样（。）开始（。）接吻

1.12 我真的不能解释这一切。我，我（。）并没有爱上这个女人

1.13后来，我，但是.....（。）真的（。），真的（。）被吸引住了.....

1.14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好吧，（。）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就像，为什么现在

1.15 在这个时刻与这个女人在一起，我想都没有想，噢，你想

1.16 有时候，甚至，我真的发现她，（。）我感觉到了更多，不仅仅是

1.17 而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所有这些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1.18 总的说来，对另一个女人来说也是这样.....

1.19 先看看，嗯，她是谁，我有多喜欢她.....我是否觉得她

1.20 也很漂亮.....然后，那目光开始（。）像那样互相吸引.....

1.21 然后你也意识到（。）另一个人也在看你。

1.22 与海尔格的情况就是（。）这样。(141)

历史有时被认为是“恋尸”的，或者说与招魂有关，因为与人类学和生命科学不同，它专门研究死人的东西。当然，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因

为口述史是当代史的一部分，已经有一些人尝试把它纳入情感史。本诺·加梅尔对17名男性和15名女性进行了长时间的录音采访，他们都自称是同性恋者，都是响应了他为同性之爱作证的呼吁。这是他“感受不同：西德农村的同性恋和情感生活（1960—1990）”项目的一部分。访谈形式如下：第一天通过访谈了解受访者生平，第二天根据既定方案和问题对受访者进行访谈。如之前大段的引语所示，访谈的笔录把重读和其他韵律特征也考虑进来，（。）表示大约一秒钟的短暂停顿，（停顿）表示更长的停顿。

因此，口述情感史符合定性社会研究的详细规则。首先，它将自己与这样一个假设区分开来，即如果让人直接讲话，那么就可以更接近于“真正经历过的”事物。相反，正如加梅尔所强调的，尤其在口头陈述过去的感受时，“过去体验”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变得显而易见。

对回忆的感觉的叙述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289】即使在当前的情感体验中，对感觉的心理和物理实质性的解释也很难脱离其主观价值、“内在”体验和“外在”社会文化框架。传记讲述和情感一样，要么模棱两可，要么多种多样，不允许对历史参与者的真实感受做出任何明确的陈述。^{（142）}

与对现实的激进叙事建构相反，加梅尔坚持同时代人在采访中关于情感记忆的陈述的“可信性”。他认为“当故事的内容和叙事结构之间存在照应关系时”，当同时代见证人的谈话方式（对此有复杂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与他或她所说的内容相呼应时，记忆就是可信的。^{（143）}此外，传记叙事总体上提供了对“自我塑造”（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的自我呈现）的洞见，而这反过来使“对这些身份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叙事主体独特的行事风格进行推理”成为可能。^{（144）}最后，采访者和受访者与社会文化背景或多或少应该可以一致。例如，如果受访者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代运动和治疗性文化的影响，而采访者虽然不太了解来自这种背景的规范、言语模式和隐喻，却能了解来自其他背景的，由此产生的不一致本身就值得探讨。

和一般的口述史一样，情感的口述史特别提出了代表性的问题。在选择受访者时，加梅尔当然希望确保他们尽可能多地反映研究期间西德农村同性恋的各种生活方式。这样一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地确定1980年西德同性恋者的爱或欲望（想想同性恋文化中的“享乐主义”）是否占主导地位，或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艾滋病经历是否以恐

惧、悲伤或愤怒为特征。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细节：“呃”“呃嗯”和重读传达出了情感的流动性、短暂性和难以确定的方面。这就好像可以用放大镜来检查反馈回路——缺少动词，用另一个人的言语表达来覆盖共现的情感。雷迪本人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这些过程，但他的材料来自司法史，不能像对口述史那样生动地描述。

情感的口述史也提出了情感与记忆之间关系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神经科学越来越关注“情感记忆”。⁽¹⁴⁵⁾【290】

还有关于创伤的研究，它的灵感来自精神分析，这已经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要对“过去”和“现在”做出明确地区分，要对情感体验和情感记忆做出区分，要对坠入爱河的经历与后来对这段经历的记录做出区分，要对暴怒之下用菜刀杀人和因为“情感”而减轻刑罚的判决之间做出区分；无论这样做的问题有多大，其间的时间流逝有时还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情感史上几乎没有被考虑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类学家西格妮·豪威尔认为，雷迪在谈论其“情感表达”时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司法程序中充斥情感的文件不包含任何“情感表达”，没有直接的情感言语行为，而是一段长时间之后的书面记录。在言语行为与其记录之间存在多个中间阶段。简而言之，雷迪对历时性不敏感，他就像一位从事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家一样，采取的是共时性的方法。⁽¹⁴⁶⁾因此，建议想利用口述史资源的历史学家牢记情感体验与其记忆之间的时间差异。

6. 历史学家是情感的存在

众所周知，塔西佗强调，他对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历史的讲述“无忿无偏”。⁽¹⁴⁷⁾正如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1922—2011）在谈论历史主义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时所说的那样，在19世纪，兰克所说的“公正无偏”有“不同的表达，但始终坚持将‘激情和兴趣’排除在外，当然，相对于那些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事件，对于时间更加遥远的事件会更容易做到这一点”。⁽¹⁴⁸⁾1946年，英国历史学家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写道，“非理性的成分”，“与思想不同的感觉、与概念不同的情感”是“心理学的主题……但它们却不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¹⁴⁹⁾历史和情感可能属于同一类，但历史的书写和情感的书写的相互排斥的，这在引文中都很清楚，无论写作的时代有多么不同。缺乏激情正是历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291】这不仅仅是19世纪

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时，客观性逐渐上升到中心地位的结果。(150)

利用世纪之交瑞士和奥地利一些讲德语的历史学家的信件和日记，丹妮拉·萨克瑟研究了他们消除情感的策略。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史料中过去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激情和热情必须被驯服。19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确实听到了很多关于发现未知宝藏和“由此产生的胜利感”的说法，但他们本人接受的训练使用的主要是印刷版本的史料。在历史学家挖掘出惊人的发现之后是记录、整理和复制，这些日常活动在他们的信件中被描述为“无聊”，“让人想要放弃”，“让人头脑麻木”和“很糟糕”。(151)

除了史料收集，19世纪后期的年轻历史学家还要接受“共情”方法的训练。在19世纪70年代，年轻的历史学家必须以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完成写作练习。这种“通往过去的感情之桥”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参与者、史料编纂者和19世纪的历史研究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152)到19世纪末，历史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客观性要求逐渐取代了共情观念和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正规训练。共情和客观性之间不可能妥协。1900年前后，共情不再是历史训练的一部分；年轻的历史学家现在不得不凭“直觉”去理解共情的本质。(153)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波新的历史学家开始将情感本身作为学术关注的对象。在1917年发表的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马克斯·韦伯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能忍受年复一年地看到平庸的人被提拔到你之上而不感到痛苦和受伤吗？”他接着说：“……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忍受这种情况而不对自己造成伤害。”(154)韦伯指出，通往终身教授这条令人生厌的道路让人们把从事科学作为一种永久的职业，而这种道路只有在科学发现的刺激中才能得到补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体验’。如果没有这种被外人嘲笑的狂热，如果没有这种激情……就没有科学的天职，那么他就应该从事别的事情”。(155)

在20世纪，【292】人们并没有研究过书写历史的人与他们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在很大程度上，驱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史的是年轻历史学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公（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和越南战争）的义愤填膺。即使是作为一种疏离的“客观性”也可能有不同的意图、功能和层面。1939年，当时年仅13岁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2007）从维也纳逃离纳粹的魔爪，在他关于大屠杀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沉默背后的努力——我们感觉到一种参与性的脱离。希尔伯格写道：

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是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我读过的方法文献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词语。我添加了图表和数字，这给我的书（《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增添了一种冷静超然的色彩。我的确屈服于一些诱惑。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对我说，这部作品包含了一种明显被压抑的讽刺。(156)

希尔伯格从音乐中寻找灵感：

写作和音乐一样，是线性的，但文学中没有和弦与和声。因此，我越来越专注于室内乐，它只有几件乐器，因此我能清楚地听到每一种乐器和每一个音符。舒伯特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认识，即力量不依赖于简单的音量，而是取决于不断地增强和对比。贝多芬的钢琴鸣奏曲《热情》是钢琴音乐的最高成就，它证明了一台钢琴可以相当于一个管弦乐队。它向我证明，我不能一直大声呼喊，我必须压抑声音和回响，我必须有选择性地、非常有选择性地放松我的控制。(157)

在希尔伯格之后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在历史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距离——一种讽刺的距离。在过去几年里，有人抱怨说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那里永远无法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在处理档案中的材料来源时，早已被情感、触觉和嗅觉所淹没。探索发现给他们带来的兴奋感总是比后结构主义的疏远策略更为强烈。最重要的还有“马基雅维利对于与死者对话并被他们‘亲切接待’的看法”。(158)也有人反对说，在档案工作中最主要的情感是无聊。(159)【293】但是，不管是被情感淹没还是感到无聊，毫无疑问的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档案工作和一般的历史工作中，更多地自我反省他们的情感并无坏处。在这方面，人类学遥遥领先于历史学。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应该记录他们在档案工作中的情感呢？

五、前景展望

这里只选取了几个将来可以书写情感史的领域，但它们绝不是全部。情感的概念史可以研究某一种情感在长时间内的含义变化，如恐惧，(160)以及时间变化，如一般的“德语情感词”，(161)或特定材料的情感词的变化，例如词典。(162)还可以考察民族情感刻板印象的发展，例

如，英国人表示“坚定沉着”的“stiff upper lip”（绷紧上唇）；葡萄牙人表示“无精打采”的“saudade”；俄罗斯人用来表示一种略带闲散的苦乐参半的忧郁的“khandra”；还有德语中表示“焦虑”的“angst”。⁽¹⁶³⁾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刻板印象呢？在这方面，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人们在有限空间内能够看到彼此时，集体情感又是怎样的？在足球场或纳粹党集会上人们身体的互相影响还没有被纳入情感史的研究范围。⁽¹⁶⁴⁾关于民族主义与情感史相结合的研究，迄今为止只做了非常初步的工

作。⁽¹⁶⁵⁾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温暖”的历史还没有人书写。⁽¹⁶⁶⁾【294】社会经济解释称，东欧集团国家是以需求不足为基础的社会，从而使得更为激烈和密集的社会交往成为必要，以弥补供给的结构性问题。这种解释远不能充分说明苏维埃时代厨房里属于知识阶层成员的情感，如今许多人回想起来那一时期仍会充满怀旧之情。此外，几乎没有可相提并论的情感史，尽管情感的具体性质最好通过跨国比较或纵向研究来揭示。⁽¹⁶⁷⁾

研究情感史的可能领域有很多，同样，可能的研究材料也有很多。悼念讣告、1939年莫斯科五一节的舞蹈编排、1954年在伯尔尼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闭幕阶段的无线电广播、法律或建议手册等规范性文本、口述史的采访，所有这些都与情感史有关。⁽¹⁶⁸⁾ 20世纪60年代新教徒做礼拜的照片和影像，以及19世纪宗教仪式的照片、版画和文字描述，例如，美国中西部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的罪恶感是通过雅各与上帝的斗争而“感受”到的，表现在颤抖的身体和尖叫上，以上这些都可以作为材料。⁽¹⁶⁹⁾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1768），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87；俄语原版，*Sevastopolskie rasskazy*，1855），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2—1931；法语原版，*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1913—1927），一直到廉价的冒险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研究情感史的好材料。除了文字材料外，还有视觉和听觉材料，甚至是嗅觉材料，它们通常都与文本有关，【295】所有这些都与情感联系密切，对情感史也有重要意义。⁽¹⁷⁰⁾图像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范围，从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对如何描述情感的说明到绘画本身。对同一幅画（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不同时期的情感表达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解释者的文化假设。⁽¹⁷¹⁾

最后，即使是材料的空白和沉默也有作用：“证据缺失并不一定就是没有证据。”通过我所称的“沉默的解释学”，或许可以在语言的微观层面上对噪声和断裂进行解码，并在情感描述被禁止的情况下对代替情感语言的话语进行解码。(172)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进行精神分析，讨论压抑和无意识，但是考虑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这似乎既无必要，也不可取。例如，假设在阅读俄国军官对战役的描述（这是“一战”中的一种常见文体）时，我读到一段话，其中对战场的描述突然变得不合逻辑。作为一个想了解战斗过程和结果的历史学家，我可以查阅其他的资料，可能会从一个士兵的回忆录或一位精神病医生根据受创伤士兵的记录所写的文章中找到线索：在这场战斗中，士兵们惊慌失措，【296】奔向与他们原本应该去的不同的方向。这引发了战斗中的意外转变，导致了俄国军官对战役所做描述中出现了逻辑漏洞。

但如果我既没有士兵的回忆录，也没有军队精神病医生写的文章，这场战斗的结果将仍然是一个谜。我们需要寻求新方法。首先，我会尽可能地重构当地的情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去收集关于战斗描述一般惯例的信息。这样一来，我会发现对恐惧的描写，尤其是以恐慌告终的集体恐惧，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时，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除此之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需要根据等级、宗教和种族将情感建构的信息收集起来。然后我会非常仔细地重读军官所写的文本。是否存在替代性的话语，如对天气的评论，或者对反复擦拭武器的士兵的长篇大论？这是否会扰乱文本的内在逻辑，例如，是否有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节奏转变？是否出现了文本其余部分从未使用过的介词？作者是否破坏了他的叙述逻辑？如果可以得到同一军官的其他作品，那么文学研究的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可以用检查文本真伪的文体风格学软件来确定某一文本是否确实出自该作者之手。这种软件可以比较文本，还可以显示某个特定的单词或短语是不是第一次在文章中出现。(173)

在背景和重建工作结束时，我会猜想，在军官对战役的描述逻辑崩溃的时候，应该有对士兵恐慌的描述。这样一来，战斗的结果就可以理解了。这种阅读字里行间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分析上的飞跃。但是，相比大部分历史学家随意地使用他们自己时代的情感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过去，从而落入不合时宜的陷阱，这实在是一种极其明显的飞跃了。

(1) William M. Reddy, *The Invisible Code: Honor and Senti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814–184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2)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27—351.
- (3) Benedicte Grima,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among Paxtun Women: "The Misfortunes Which Have Befallen 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6.
- (4) Benedicte Grima,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among Paxtun Women: "The Misfortunes Which Have Befallen 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163. 阿布-卢赫德的《含蓄的感情》(*Veiled Sentiments*)中也贯穿着类似的矛盾。一位评论家怀疑阿布-卢赫德同情这些贝都因人的妻子及其颠覆性的歌唱, 他写道, 贝都因人的妻子们唱的“津纳瓦”(小曲)是“在日常话语中被否定的事物的情感表达的特权载体, 因此也是弱者巧妙而强有力的战略手段(破坏正常权力关系的工具)”。从严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 阿布-卢赫德应该对阿瓦拉德阿里部落的父权秩序保持中立, 见Michael M. J. Fischer, "Aestheticized Emotions & Critical Hermeneutics", review of 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in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2/1 (1988), 31—42, here 31.
- (5)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331; 关于哈贝马斯, 见第332页。
- (6) 对此的反应见Linda C. Garro,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1—342.
- (7) 对此的反应见Signe Howell,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2—343; 和Chia Longman,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4—345.
- (8) Catherine Lutz,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5—346, here 345.
- (9) Lynn Hunt,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3—344, here 343.
- (10)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雷迪本人不接受我将他的方法描述为“社会科学演绎法”, 见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010), 237—265, here 246—247.

- (12)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5. “认知情感”这一表达出自Douglas Barnett and Hilary Horn Ratner,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67/3 (1997), 303—316.
- (13)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21.
- (14) Daniel M. Wegner and Laura Smart, “Deep Cognitive Activ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Unconsciou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5/6 (1997), 984—995, here 987. 也见Daniel M. Wegner, “Ironic Processes of Ment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1/1(1994), 34—52.
- (15)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31.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 (16)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37—38.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9页。)
- (17)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41.
- (18) 关于中世纪臣服仪式上的眼泪，见Gerd Althoff, “Empörung, Tränen, Zerknirschung: ‘Emotionen’ in der öffentlichen Kommunikation des Mittelalters”, *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30(1996), 60—79; Gerd Althoff, “Gefühle in der öffentlichen Kommunikation des Mittelalters”, in Claudia Benthien, Anne Fleig, and Ingrid Kasten (eds.), *Emotionalität: Zur Geschichte der Gefühle* (Cologne: Böhlau, 2000), 82—99.
- (19)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42.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55页。)
- (20) “这种感觉并不仅仅存在于话语之前，而是作为一种影响成为‘真实的’，塑造了不同的行为和导向。如果说‘举国哀痛’，就意味着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哀痛的主体。这样一来，‘全国’就成为共同的‘情感对象’。因此，情感具有施为性，是言语行为，在产生影响的同时取决于过去的历史。”见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原文强调。
- (21)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29, 113.
- (22)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25.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165—166页。)
- (23)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26.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167页。)
- (24)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43—144.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189页。)
- (25)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45, 148. (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191页。)

- (26)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69.
- (27) 见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326。正是大革命期间所使用的感伤主义晚期的语言（见该书第189页中马拉的例子和第193页的另一个例子）“很适合用来质疑这些情感的真实性，只是因为他们应该是但永远不可能是‘自然的’”，见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85。
- (28)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97。（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262页。）
- (29)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98。（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264页。）这里他还提道：大量证据表明处于统治地位的雅各宾派自己也为自己的地位而焦虑不安，他们不敢承认这种焦虑，也无法直接讲述焦虑最安全的回应就是常常怀疑他人。
- (30)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46。（中译见[英]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第193页。）
- (31)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237—248.
- (32)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248—256.
- (33)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143.
- (34) 罗森宛恩对雷迪《感情研究指南》的评论，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4 (2002), 1181—1182, here 1182。又见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41。
- (35) 罗森宛恩对雷迪的评论，见第1182页，又见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42。
- (36)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315.
- (37) 威廉·雷迪回应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对其《感情研究指南》所做的评论，见*H-France Review*, 2/119 (2002), 477—480, here 479。
- (38) 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46.
- (39) 最近一次是2011年4月14日，在耶路撒冷范·利尔学院（Van Leer Institute）举行的“学会感受”（Learning to Feel）会议上，在他的主题演讲“情感和语言一样吗？”后的提问环节。
- (40) “在他的整个回应中，康诺利似乎想把我描绘成一个以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方式，试图保护人文主义文化理论不受‘外部’具有科学头脑的思想家侵犯的人，而他是一个坦诚接受神经科学家的发现的人。但这种描绘是假的。我从未说过人文主义者没有什么可以向科学家学习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艾伦·弗里德隆德、詹姆斯·拉塞尔、莉莎·费德曼·巴瑞特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共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某个特定的思想是在哪个学科中产生的，而在于这个思想是否好——实际上是它是否正确。正是因为我欣赏科学，我才与糟糕的科学划清了界限，也与那些采纳了我在论文中反对的理论假设的人文主义者诉诸后者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当代的神经科学家对雷斯的文化解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吗？’康奈利问道（第799页）。事实上，有些人通过挑战许多同行错误的还原论，并强调语境意义在情感

状态中的作用，做到了这一点]。”见Ruth Leys,“Critical Response II: Affect and Intention: A Reply to William E. Connolly”, *Critical Inquiry*, 37/4 (2011), 799—805, 此处见第803页。

- (41) 对费德曼·巴瑞特和拉塞尔来说,“核心情感被定义为一种神经生理状态,一种简单的原始的非反射性情感,在情绪和情感中最为明显,但总是可以意识得到。虽然是一种情感,但它可以被描述为两种泛文化的两极维度:愉快—不愉快(效价;感觉好与坏)和激活(唤醒;感觉精力充沛与无精打采)。之所以选用‘核心情感’这个说法,是因为它(与‘情绪’‘愤怒’等不同)不是一个日常的概念。核心情感可以保持不变(如情感),也可以快速变化(如情绪)。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有些是内在的,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是人类无法感知的。从功能上讲,核心情感是核心自我的一个方面,是一个人状态的晴雨表,因此,它影响着从反射到复杂认知的心理生物学过程。个人经常将核心情感归因于某件事,他们通常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弄错。虽然一个人总是处于某种核心情感状态,哪怕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对核心情感的兴趣部分源于它在我们情感生活中的作用。核心情感本身就是自由漂浮的(即与某物无关)。在诸如焦虑或抑郁之类的无对象的情感障碍中,就会产生强烈的自由漂浮的核心情感。核心情感是情感事件中的心理热度。被认为由于某事而引起的核心情感的迅速变化是像愤怒这样的以物体为导向的情感的一个关键因素,生气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某人的冒犯而感到难过(通常,愤怒还包括评价、行动,等等)。核心情感是情绪和情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见James A. Russell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Core Affect”, in David Sander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motion and the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4.
- (42) James A. Russell, “Core Affect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1 (2003), 145—172, here 148.
- (43) Howell,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342—343.
- (44) 杰里米·波普金对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的评论,见*H-France Review*, 2/118(2002), 470—476.
- (45) 延展心智理论认为认知过程是超越大脑甚至人体的过程。环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东西,而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情境认知也认为,认知过程总是与环境和情境紧密联系,而环境和情境有时会很快改变,见Batja Mesquita, Lisa Feldman Barrett, and Eliot R. Smith (eds.), *The Mind in Contex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 (46) Alva Noë, *Out of Our Heads: Why You Are Not Your Brain, and Other Lessons from the Biolog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9), 10.
- (47) Monique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and Is That What Makes Them Have a History)? A Bourdieu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motion”, *History and Theory*, 51/2 (2012), 193—220, here 197. 也见Monique Scheer, “Empfundener Glaube: Die kulturelle Praxis religiöser Emotionen im deutschen Method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105 (2009), 185

—213。与布尔迪厄在情感上的社会学趋同，见Andreas Reckwitz，“Umkämpfte Maskulinität: Zur Historischen Kulturosoziologie männlicher Subjektformen und ihrer Affektivitäten vom Zeitalter der Empfindsamkeit bis zur Postmoderne”，in Manuel Borutta and Nina Verheyen (eds.), *Die Präsenz der Gefühle: Männlichkeit und Emotion in der Modern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0), 57—79; Andreas Reckwitz, “Affective Spaces: A Praxeological Outlook”, *Rethinking History*, 16/2 (2012), 241—258; Andreas Reckwitz, *Das hybride Subjekt: Eine Theorie der Subjektkulturen von der bürgerlichen Moderne zur Postmoderne* (Weilerswist: Velbrück Wissenschaft, 2006)。

- (48)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199.
- (49)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9.
- (50)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9.
- (51)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9—210.
- (52)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1—212.
- (53)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0.
- (54)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3.
- (55)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3 , 作者强调。
- (56)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4.
- (57)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4.
- (58)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16.
- (59)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2.
- (60)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4.
- (61)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 (62)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 (63)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2.
- (64)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1.
- (65)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6.
- (66)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07.
- (67)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 (68) Scheer,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220 , 作者强调。
- (69) 20世纪70年代末，雷迪跟随杰罗姆·凯根从事了为期一年的发展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并积累了20多年的生命科学知识。关于雷迪师从凯根的经历，见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xiv; Plamper, “History of Emotions”, 237. 此外，在 1975—1976年期间，雷迪应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邀请，与艾伦和威廉·休厄尔 (William Sewell) 以及人类学家米歇尔和罗纳多·罗萨尔多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工作。如果雷迪的作品包含了神经科学研究的成果，那么这些材料比勒杜和达马西奥等普及工作者的作品更有依据，同时也证明了他在这一主题上的广泛涉猎，见William M. Reddy, “Saying Something New: Practice Theor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terary Studies*, 44/1 (2009), 8—23。

- (70) Edmund P. Russell, “Neurohistory”, *Rachel Carson Center at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http://www.carsoncenter.uni-muenchen.de/download/staff_and_fellows/projects/project_russel.pdf> accessed 17 March 2014; Edmund Russell, *Evolutionary History: 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德语中最著名的例子更多处理的是集体记忆，而不是情感，见Johannes Fried, *Der Schleier der Erinnerung: Grundzüge einer historischen Memorik* (Munich: Beck, 2004); Niels Birbaumer and Dieter Langewiesche, “Neuropsychologie und Historie—Versuch einer empirischen Annäherung: Posttraumatische Belastungsstörung (PTSD) und Soziopathie in Österreich nach 1945”,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2/2 (2006), 153—175。
- (71)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4。又见Andrew Shryrock and Daniel Lord Smail (eds.),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72)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48。
- (73)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8。
- (74)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48—49。
- (75)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49。
- (76)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72。
- (77)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80。
- (78)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59。
- (79)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3, 150—151。
- (80)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3。
- (81)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4。
- (82) 斯梅尔对先天与后天二分法的反对，见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8。
- (83)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39—140。
- (84)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7。
- (85)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5。
- (86)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61。

- (87)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27.
- (88)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55.
- (89) “除此之外，我们对每天刺激我们情绪和感情的机制变得麻木，这种神经化学的不敏感性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十年的兴奋点再过十年可能会变得无聊。”见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88.
- (90) 斯梅尔写道：“像海洛因和可卡因这样的毒品之所以会吸引一些人，是因为它们模仿了大脑中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作用，可以人为地改变身体状态。”见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51.
- (91)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37.
- (92)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18, 128, 155, 161, 175, 180, 182.
- (93)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66—167.
- (94)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74.
- (95)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186.
- (96) Daniel M. Gr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 From Aristotle's Rhetoric to Modern Bra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34.
- (97) William M. Reddy, “Neuroscience and the Fallacies of Function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49/3 (2010), 412—425, here 414—415.
- (98) 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见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9—10, 15.
- (99) Dror Wahrmann, “Where Culture and Biology Meet”, review of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in *Haaretz* (24 April 2008). 我要感谢伊格尔·哈尔芬让我注意到这篇评论。
- (100) Markus Völkel, “Wohin führt der ‘neuronal tur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Christian Geyer (ed.), *Hirnforschung und Willensfreiheit: Zur Deutung der neuesten Experimen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4), 140—142, here 140. 又见 Christian Geyer, “Frieds Brainstorming: Jetzt ist auch die Geschichte aufs Gehirn gekommen”, in Geyer, *Hirnforschung und Willensfreiheit*, 134—139; Alexander Kraus and Birte Kohtz, “Hirnwindungen—Quelle einer historiographischen Wende? Zur Relevanz neuro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se für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5/10 (2007), 842—857; Michael L. Fitzhugh and William H. Leckie, Jr., “Agency, Postmodernism, and the Causes of Change”, *History and Theory*, 40/4 (2001), 59—81. 关于能动性和生命科学方法见特刊“The Return of Science: Evolutionary Ideas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8/4 (1999); 还有特刊“Agency after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40/4 (2001); 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 (101) 又见罗伯特·所罗门，他声称自己打破了关于情感的八个神话：“神话一：情感是无法言说的；神话二：情感就是感情；神话三：水动力模型；神话四：情感存在于头脑中；神话五：情感是愚蠢的（它们不具有智慧）；神话六：有两种情感，积极的和消极的；神话七：情感是非理性的；神话八：情感发生在我们身上（它们是‘激情’）。”见Robert C. Solomon, *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7—200。
- (102) Jerome Kagan, *What Is Emotion? History, Measures, and Mean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的草稿中有一章标题就是“情感与行为：情感的不稳定性”，其中写道：“这种情感从一开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特殊状态，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来表达：人们必须把它的形成想象成森林，而不是一棵树。例如，一棵桦树，从萌芽到死亡都是一棵桦树；但是，一片桦树林可以从混交林开始，由于各种原因，如果桦树能够在这片树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片混交林就变成了桦树林，其他非桦树树种的存在无关紧要。”见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 Sophie Wilkins and Burton Pike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6) [Ger. orig.,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3 vols, 1930—1943], ii. 1266, 1275—1276。
- (103) “A Timeline of AIDS”, *AIDS.gov*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ttp://aids.gov/hiv-aids-basics/hiv-aids-101/aids-timeline/>> accessed 18 March 2014.
- (104) James Wentzy, “Detailed Scene List and Transcription: Fight Back, Fight AIDS: 15 Years of ACT UP”, *ACT UP* (November 2002) <<http://www.actupny.org/divatv/synopsis75.html>> accessed 18 March 2014.
- (105) Deborah B. Gould,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8.
- (106) “DIVA TV Program Synopsis: Day of Desperation”, *ACT UP New York* <<http://www.actupny.org/diva/synDesperation.html>> accessed 18 March 2014.
- (107)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es: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in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0 . 也见Gould, *Moving Politics*, 14—15。也见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108) “Remembering Ed Muskie”, *PBS Newshour* (26 March 1996) <http://www.pbs.org/newshour/bb/remember-jan-june96-muskie_03-26/> accessed 18 March 2014.
- (109) Raymond Hernandez, “Tears Are Shed at the White House for a Marine’s Bravery in Iraq”, *New York Times* (12 January 2007), B3.
- (110) Robert Draper, *Dead Certain: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418.
- (111) Christophe Prochasson, “Le Socialisme des indigné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émotions politiques”, in Anne-Claude Ambroise-Rendu and Christian Delporte (eds.), *L’Indignation: Histoire d’une émotion (XIXe—XXe siècles)* (Paris: Nouveau Monde, 2008), 173—190, here 174 . 也见Christophe Prochasson, *L’Empire des émotions: Les Historiens dans la mêlée* (Paris: Demopolis, 2008).
- (112) “Feeltank Chicago” <<http://feeltankchicago.net/01.html>> <<http://politicalfeeling.uchicago.edu/>>; Jason Fournberg, “Don’t Fear the Reaper: Th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nfronts the Angst of our Age”, *Newcity Art* (September 2008) <<http://art.newcity.com/2009/09/08/dont-fear-the-reaper-the-museum-of-contemporary-phenomena-confronts-the-angst-of-our-age/>>; “Pathogeographies”, *Feel Tank* <<http://pathogeographies.net/>> all accessed 18 March 2014.
- (113) José Brunner, editorial in *Politische Leidenschaften: Zur Verknüpfung von Macht, Emotion und Vernunft in Deutschland*, *Tel Aviver 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38 (Göttingen: Wallstein, 2010), 9 . 也见Alf Lüdtke, “Emotionen und Politik: zur Politik der Emotione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Informationen/SOWI*, 30/3 (2001), 4—13.
- (114) Harold James, “1929: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Crash”,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129—144, here 132—133.
- (115) Harold James, “1929: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Crash”,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140.
- (116) James, “1929: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Crash”, 140.
- (117) Jan Plamper and Benjamin Lazier, “Introduction: The Phobic Regime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58—65, here 64 . 又见Benjamin Lazier and Jan Plamper, “Introduction” in Plamper and Lazier (eds.), *Fear: Across the Disciplin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2), 9.
- (118) Ute Frevert, “Gefühle und Kapitalismus”, in Gunilla Budde (ed.), *Kapitalismus: Historische Annäher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50—72, here 51.
- (119) Ute Frevert, “Gefühle und Kapitalismus”, in Gunilla Budde (ed.), *Kapitalismus: Historische Annäher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50.

- (120) Ute Frevert, “Gefühle und Kapitalismus”, in Gunilla Budde (ed.), *Kapitalismus: Historische Annäher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1), 54.
- (121) Frevert, “Gefühle und Kapitalismus”, 54—55.
- (122) Sabine Donauer, “Job Satisfaction statt Arbeitszufriedenheit: Gefühlswissen im arbeitswissenschaftlichen Diskurs der siebziger Jahre”, in Pascal Eitler and Jens Elberfeld(eds.), *Eine Zeitgeschichte des Selbst* (Bielefeld: Transcript, forthcoming).
- (123) 关于嫉妒和消费, 见Susan J. Matt,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Envy in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 1890—193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关于购物, 见Erika Diane Rappaport, *Shopping for Pleasure: Women in the Making of London’s West E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有关消费和购物作为研究主题的批评, 见Daniel Miller, *The Dialectics of Shopp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124) 见安妮·施密特的项目, 她正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研究20世纪的情感和广告史。
- (125) Hugo Münsterberg, *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08), 115.
- (126) 德雷福斯说他的手是因为寒冷而颤抖, 但没有被采信。生理迹象被认为是客观的, 见Ruth Harris, *The Man on Devil’s Island: Alfred Dreyfus and the Affair that Divided France*(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0), 16。
- (127) 关于奥匈帝国, 见Philip Czech, *Der Kaiser ist ein Lump und Spitzbube: Majestätsbeleidigung unter Kaiser Franz Joseph* (Vienna: Böhlau, 2010); 关于沙皇政权末期的俄国, 见Boris Kolonitskii, “*Tragicheskaja erotika*”: *Obrazy imperatorskoi sem’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10)。
- (128)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pt. 2.
- (129) 参见“法律与情感: 学术新方向”(“Law and the Emotions: New Directions in Scholarship”)会议, 伯克利(2007年2月8至9日), 以及1998年5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的一次会议, 其论文集见Susan A. Bandes (ed.), *The Passions of Law*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0) Werner Faulstich, *Radiotheorie: Eine Studie zum Hörspiel “The War of the Worlds” (1938) von Orson Welles* (Tübingen: Narr, 1981). 尽管美国各地都大肆报道, 但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 (131) Frank Bösch and Manuel Borutta (eds.), *Die Massen bewegen: Medien und Emotion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6). 也见Oliver Grau and Andreas Keil (eds.), *Mediale Emotionen: Zur Lenkung von Gefühlen durch Bild und Sou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5)。

- (132) 这方面又见Barbara 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1. “一个特别简单化的情感概念，仿佛不同时代的激情可以或‘开’（冲动和暴力）或‘关’（克制）。”
- (133) Christiane Voss, “Film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Illusion: The Spectator as ‘Surrogate Body’ for the Cinema”, *Cinema Journal*, 50/4 (2011), 136—150, here 145. 也见Christiane Voss, *Narrative Emotionen: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philosophischer Emotionstheorien* (Berlin: de Gruyter, 2004).
- (134) Voss, “Film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Illusion”, 145.
- (135) Christiane Voss, “Die leibliche Dimension des Mediums Kino”, in Bösch and Borutta(eds.), *Die Massen bewegen*, 63—80, here 77.
- (136) Christiane Voss, “Die leibliche Dimension des Mediums Kino”, in Bösch and Borutta(eds.), *Die Massen bewegen*, 79.
- (137) Philip Caputo, *A Rumor of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7), 306.
- (138) Daniel Siemens, “Sensationsprozesse: Die Gerichtsreportage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in Berlin und Chicago”, in Bösch and Borutta (eds.), *Die Massen bewegen*, 142—171.
- (139) Ol’ga Kuptsova, “‘Ekzazheratsiia chuvstv’: Osobennosti emotsional’nykh reaktzii russkoi teatral’noi publiki 1830—1840-kh godov”, in Jan Plamper, Schamma Schahadat, and Marc Elie (eds.), *Rossiiskaia imperiia chuvstv: Podkhody k kul’turnoi istorii emotsii*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10), 131—143, here 136.
- (140) Kuptsova, “‘Ekzazheratsiia chuvstv’”, 139.
- (141) Benno Gammerl, “Erinnerte Liebe: Was kann eine Oral History zur Geschichte der Gefühle und der Homosexualitäten beitrage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314—345, here 324—325; 文字记录中化名文本的英文翻译参见Mrs Fischer, interview 2, sequence 613; Benno Gammerl, “Same Sex Intimacies in Transition”, *History of Emotions—Insights into Research* (October 2013) <<https://www.history-of-emotions.mpg.de/en/texte/same-sex-intimacy-in-transition>> accessed 18 March 2014. “（。）”是指大约一秒钟的短暂停顿，“（停顿）”是指更长的停顿。
- (142) Gammerl, “Erinnerte Liebe”, 317.
- (143) Gammerl, “Erinnerte Liebe”, 317—318.
- (144) Gammerl, “Erinnerte Liebe”, 318.
- (145) 关于神经科学和情感记忆，见Kevin S. LaBar and Roberto Cabez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Emotional Memor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7/1 (2006), 54—64; Ulrike Rimmele, Lila Davachi, Radoslav Petrov, Sonya Dougal, and

Elizabeth A. Phelps, “Emotion Enhances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Remembering, Despite Lower Accuracy for Contextual Details”, *Emotion*, 11/3(2011), 553—562. 一部赋予情感中心地位的、对记忆的政治和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见Ulrike Jureit and Christian Schneider, *Gefühlte Opfer: Illusionen der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Stuttgart: Klett-Cotta, 2010)。

- (146) 豪威尔的反应，见“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 (147) P. Cornelii Taciti, *Annalium ab excessu divi augusti libri: The Annals of Tacitus*, i, ed. Henry Furneaux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180.
- (148) Rudolf Vierhaus, “Rankes Begriff der historischen Objektivität”, in Vierhaus, *Vergangenheit als Geschichte: Studien zum 19. und 20. Jahrhundert*, ed. Hans Erich Bödeker, Benigna von Krusenstjern, and Michael Matthies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358—369, here 361. 又见Jörn Rüsen, “Emotional Forces in Historical Thinking: Some Meta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the Case of Mourning”, *Historein: 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 8 (2008), 41—53, here 42.
- (149) R. G. Collingwood, “Human Nature and Human History”, in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repr. 1962), 231.
- (150)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51) Daniela Saxer, “Geschichte im Gefühl: Gefühlsarbeit und wissenschaftlicher Geltungsanspruch in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in Uffa Jensen und Daniel Morat(eds.), *Rationalisierungen des Gefühls: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schaft und Emotionen 1880—1930* (Munich:Fink, 2008), 79—98, here 90.
- (152) Saxer, “Geschichte im Gefühl”, 92.
- (153) Saxer, “Geschichte im Gefühl”, 95.
- (154)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Peter Lassman, Irving Velody, and Herminio Martins (eds.),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3—32, here 8.
- (155)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Peter Lassman, Irving Velody, and Herminio Martins (eds.),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9.
- (156) Raul Hilberg,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 (Chicago: Dee, 1996), 87—88，作者强调。
- (157) Hilberg, *The Politics of Memory*, 85.
- (158) Emily Robinson, “Touching the Void: Affective History and the Impossible”, *Rethinking History*, 14/4 (2010), 503—520, here 513. 又见Arlette Farge, *The*

Allure of the Archives, trans. Thomas Scott-Railt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Fr. orig., *Le Goût de l'archive*, 1989] ; 又见多米尼克·杜帕特 (Dominique Dupart) 和克洛德·米勒 (Claude Millet) 对阿莱特·法尔热 (Arlette Farge) 的采访: “Entretien avec Arlette Farge”, *Écrire l'histoire: Dossier émotions*, 1 (2008), 89—95.

- (159) Benno Gammerl, “Introduction: Emotional Styles—Concepts and Challenges”, *Rethinking History*, 16/2 (2012), 161—175, here 171.
- (160) Henning Bergenholtz, *Das Wortfeld “Angst”: Eine lexikographische Untersuchung mit Vorschlägen für ein großes interdisziplinär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
- (161) Ludwig Jäger (ed.),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des deutschen Gefühlswortschatzes: Aspekte, Probleme und Beispiele seiner lexikographischen Erfassung* (Aachen: ALANO, 1988).
- (162) Ute Frevert et al., *Emotional Lexic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Vocabulary of Feeling 17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63) 关于德国人的“焦虑”, 见对Frank Biess的采访, “Die Deutschen und ihre Krisen: ‘Angst war ein Leitmotiv’”, *Der Stern* (26 February 2009) <<http://www.stern.de/wirtschaft/news/maerkte/die-deutschen-und-ihre-krisen-angst-war-ein-leitmotiv-656061.html>> accessed 19 March 2014; Frank Biess, “‘Everybody Has a Chance’: Nuclear Angst, Civil Defence, and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in Postwar West Germany”, *German History*, 27/2 (2009), 215—243; Frank Biess, “Die Sensibilisierung des Subjekts: Angst und ‘neue Subjektivität’ in den 1970er Jahren”, *WerkstattGeschichte*, 49 (2008), 51—71.
- (164) 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始于Hans-Ulrich Thamer, “The Orchestr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e Nuremberg Party Rallies of the NSDAP”, in Günter Berghaus (ed.), *Fascism and Theatr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in Europe, 1925—1945*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6), 172—190; Alf Lüdtke, “Love of State—Affection for Authority: Politics of Mass Particip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an Contexts”, in Luisa Passerini, Liliana Ellena, and Alexander C. T. Geppert (eds.), *New Dangerous Liaisons: Discourses on Europe and Lov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 58—74.
- (165) Roger D.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ren Hagemann, “Aus Liebe zum Vaterland: Liebe und Hass im frühen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in Birgit Aschmann (ed.), *Gefühl und Kalkül: Der Einfluss von Emotionen auf die 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Cologne: Steiner, 2005), 101—123; Ronald Grigor Suny, “Thinking about Feelings: Affective Dispositions and Emotional Ties in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Mark D. Steinberg and Valeria Sobol (eds.), *Interpreting*

Emotion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2—127; Nicole Eustace, *1812: War and the Passions of Patriot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又见托马斯·J. 谢夫 (Thomas J. Scheff) 的早期作品,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sm, an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Étienne François, Hannes Siegrist, and Jakob Vogel (eds.), *Nation und Emotio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Vergleich, 19. und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5)。

- (166) 见Dale Pesmen, *Russia and Soul: An Explor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67) Susanne Michl and Jan Plamper, “Soldatische Angst im Ersten Weltkrieg: Die Karriere eines Gefühls in der Kriegspsychiatrie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und Russland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09—248.
- (168) 关于悼念讣告, 见Angela Linke, “Trauer, Öffentlichkeit und Intimität: Zum Wandel der Textsorte ‘Todesanzeige’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Ulla Fix, Stephan Habscheid, and Josef Klein (eds.), *Zur Kulturspezifik von Textsorten* (Tübingen: Stauffenberg-Verlag, 2001), 195—223; 关于世界杯广播, 见Rudolf Oswald, “Emotionale ‘Volksgemeinschaften’: Das ‘Wunder von Bern’ 1954 als Rundfunkereignis in Ungarn und Deutschland”, in Bösch and Borutta (eds.), *Die Massen bewegen*, 369—386; 关于运动员的手势, 见Angela Linke, “Sprache, Körper und Siegergesten: Eine Skizze zur historischen Normiertheit von sprachlichem wie körperlichem Gefühlsausdruck”, in Johannes Fehr and Gerd Folkers (eds.), *Gefühle zeigen: Manifestationsformen emotionaler Prozesse* (Zurich: Chronos, 2009), 165—202。
- (169) Pascal Eitler and Monique Scheer, “Emotionengeschichte als Körpergeschichte: Eine heuristische Perspektive auf religiöse Konversion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5/2 (2009), 282—313, esp. 296—304; Monique Scheer, “Empfundener Glaube”。
- (170) 将感官史与情感史联系起来的几个例子: Alain Corbin, *Time, Desire and Horror: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Senses*, trans. Jean Birre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Fr. orig., *Le Temps, le désir et l'horreur*, 1991]; Daniel Wickberg, “What Is the History of Sensibilities? On Cultural Histories, Old and N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3 (2007), 661—684; Alexander M. Martin, “Sewage and the City: Filth, Smell, and Representations of Urban Life in Moscow, 1770—1880”, *Russian Review*, 67/2 (2008), 243—274; Constance Classen,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 (171) 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见Zirka Z. Filipczak, “Poses and Passions: Mona Lisa’s ‘Closely Folded’ Hands”, in Gail Kern Paster, Katherine Rowe, and Mary Floyd-Wilson (eds.), *Reading the Early Modern Passion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mo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68—88。又见 Claudia Schmölders, “Affekte”, in Uwe Fleckner, Martin Warnke, and Hendrik Ziegler (ed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konographie, i.Abdankung bis Huldigung* (Munich: Beck, 2011), 29—35。早些时候, 诺贝特·埃利亚斯试图在中世纪绘画中确立被认为是痛苦的边界, 见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trans. Edward Jephcott, ed. Eric Dunning, Johan Goudsblom, and Stephen Mennell (rev. edn, Oxford: Blackwell, 2010) [Ger. orig.,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2 vols, 1939], 173—180。

- (172) 另见芭芭拉·罗森宛恩, 她在写完《阅读沉默》(“Read the silence”)之后说:“一些材料在语气和内容上没有感情色彩。它们和明显情感化的文本一样重要。情感共同体通常会在强调一些情感的同时避免一些情感, 或者在特定的环境中避免某些情绪。这些是历史学家们可以利用的材料。”见Barbara H. Rosenwein,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ssion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motions* [online journal], 1 (2010) <<http://www.passionsincontext.de>> accessed 19 March 2014。沉默的解释学与吕西安·霍尔舍 (Lucian Hölscher) 的概念“空无的语义学”和“不理解的解释学”无关; 前者涉及13世纪从印度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中将数字零引入欧洲的时间度量, 因此与开放未来的概念有关; 后者与过去人类行为不可约的“差异性”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 这种“差异性”仍需理论化, 见Lucian Hölscher, “Semantik der Leere”, in Hölscher, *Semantik der Leere: Grenzfr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öttingen: Wallstein, 2009), 13—32; Lucian Hölscher, “Hermeneutik des Nichtverstehens”, in Hölscher, *Semantik der Leere*, 226—239。
- (173) 见免费程序签名文体风格学软件系统 (Signature Stylometric System, 由彼得·米利肯 [Peter Millican] 编写) 或JGAAP (由帕特里克·卓拉 [Patrick Juola] 编写的Java图形作者资格归属软件)。

结语【297】

在本书中，我试图在情感史研究中创造某种秩序，把它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各归其位。其他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安排，而这些组成部分将继续游移不定。写作此书之际，正值情感史的繁荣时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淘金热的气息。^①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次繁荣有一个起点的话，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是“9·11”事件催生了延续至今的这一切。甚至在这个日期之前，人们就能感觉到对后结构主义的普遍不满，以及对“真实的现实”的新渴望，但“9·11”事件就像一个现实冲击，让旧的范畴和概念变得多余和过时。“经验”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垂死的范畴，现在它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复兴。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认为我们不能直接接触过去，也不能直接接触他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的中介作用，都要受到语言的影响。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首先必须研究语言和它所遵循的逻辑和规则等。历史学家试图恢复“一种直接与他人、社会和过去直接接触的体验的概念”。^②仅举几个突出的例子，2005年，中世纪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写道：“对于后语言学转向史学来说，新的主流概念是‘体验和实践’。”除了其他问题之外，重要的还有“对身体的新认识，它不再被看作是一个行为主体为了行动而使用的‘工具’，而是一个精神、情感和行为惯例被铭记的地方”。^③2009年，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家林恩·亨特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的重要论文，她在文中主张，有必要转换“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文本或语言隐喻”。但人们可能会问，靠什么？亨特以一种让人放下戒心的诚实写道：“如果我知道靠什么，我会告诉你的。”^④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具体化概念贯穿了她的研究：“世界不仅仅是通过话语来构建的，也通过具体化、手势、面部表情和情感来构建，也就是说，通过非语言的交流模式来构建，而这些交流模式都有自己的逻辑。”“理性和情感不能被清楚地分开，后者对前者的运作至关重要。”^⑤【298】我们还可以援引其他的例子，用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是在“寻求一种客观主义危机的客观出路”。^⑥

因此，“9·11”事件促使人们从语言学转向中撤退，这一撤退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情感转向。在其他学科中，这与对神经科学的借

用是同时发生的，后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成为科学世界的主导力量。除了个别例子外，情感的历史还没有受到神经科学的影响。为什么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随意借用神经科学是危险的，在这个阶段应该清楚了：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神经科学所知甚少，无法判断哪些假设是可信的，哪些结果是正确的，哪些结果是错误的。人们可以求助于像达马西奥这样的普及者，但通常他们会从自己实验室中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并以此宣称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有效的。且不说别的，考虑到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与畅销书中所反映的情况之间的时间差，等到这种普及著作出版时，往往已经过时了。

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对神经科学的借用。一个人必须专心致志，多读一些通俗读物，既要阅读个人的研究论文，又要阅读综述大量论文的元分析。你不必担心，掌握专业词汇比你想象的要容易，也没有必要参加正式的培训。由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神经科学知之甚少，也不知道神经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到美国和欧洲的文学和视觉研究中，因此，即使是一点点时间投资也是值得的。由于精神分析这门学科还没有完全从20世纪70年代的心理史学中完全恢复声誉，因此在历史学家中，贬低精神分析是一种受人尊敬的消遣。但危险在别处：我们需要防范对神经科学过分简化的改编。神经科学和历史的认识论根据不同的规则运作。在前者中，因果关系、变量、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是重要的口号。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可以重复的情况下，实验结果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在相同条件下的重复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因此，自然科学家更习惯于“真理”的快速变化。诺贝尔奖有时在一项发现时隔几十年后才颁发，这没什么好奇怪的。【299】利用神经科学发现的历史学家应该时刻记住这些不同的时间。例如，躯体标记假说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如果它被推翻，神经科学家并不会寝食难安，目前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那些要依此进行解释和构建完整理论的人来说，如果结果证明躯体标记假说是错误的，这将是一次很不愉快的觉醒。对于神经科学家来说，真的只有对错之分。任何其他借用这一理论的科学也必须采用这一逻辑。像“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理论”或类似的说法是行不通的。解释的任何开放性都将破坏对“坚实现实”的新探索，而正是这种探索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向神经科学靠拢。

对于一个规模虽小但不断壮大的多学科小组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来自神经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们要着手建立“批判性神经科学”。目前，共同努力的领域正在发展，本书介

绍了其中的三个：神经可塑性、社会神经科学和大脑的功能整合。如果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并且它的基础就像现在看起来这样坚实，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与历史学家合作。

自19世纪以来，对情感的研究一直围绕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两极展开。尽管对所有的转变和潮流以及当前对现实的渴望持怀疑态度，即使是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也抛出了真正的问题。使用元概念——唯名论——的不可能性将意味着学术的终结，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学术的终结。但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建构主义者并没有实践任何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以本书前面提到的中世纪冰岛萨迦为例。在13世纪的《尼亚尔萨迦》中，当索霍尔·阿斯格里姆森听说他的养父被谋杀时，“他身体膨胀，血液从耳朵里流出，晕倒在地”。⁽¹⁾我们都能理解晕倒，身体膨胀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当你生气时血液会从耳朵里流出来吗？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在中世纪，人在愤怒时从耳朵里流出血液是很正常的，身体的界限超出了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范围。但是，从我们今天对身体的所有了解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13世纪也是不可能的。七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进化发展会产生如此重大的生理变化。在相当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把身体视为绝对的真理。我们这样做的次数比“正统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多得多。

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这种二分法也决定了本书的结构。但我们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超越这种结构，为情感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最次再次借用洛林·达斯頓关于需要集体心理治疗的比喻。【300】如果一门科学学科要最终打破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这是必要的。如果心理治疗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一个疗程不得不中止，那么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找一个新的治疗师，重新开始。

- (1) Nina Verheyen, “Geschichte der Gefühle, Version: 1.0”, *Docupedia-Zeitgeschichte* (18 June 2010) <http://docupedia.de/docupedia/index.php?title=Geschichte_der_Gef%C3%BChle&oldid=74436> accessed 19 March 2014.
- (2) Harold Mah, “The Predicament of Experience”,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5/1 (2008), 97—119, here 99. 这种复兴最著名的例子是Frank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Gabrielle M. Spiegel, “Introduction” in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8, 19.
- (4) Lynn Hunt,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671—678, here 674.

- (5) Lynn Hunt,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674, 673; 关于达马西奥对她作品的影响, 见Lynn Hunt,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673 n. 5。又如: “对情感和自我体现的新研究指出了一种方法, 可以避免把体验简化为话语和社会结构”; “为普遍主义留出空间, 不管这个空间有多小, 都意味着对社会和文化建构主义的彻底排斥”; Lynn Hunt, “Kulturgeschichte ohne Paradigmen?”,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16 (2008), 323—340, here 337, 338。关于达马西奥, 见Lynn Hunt,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339—340。亨特在她的人权研究中运用了这些见解, 见*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7), 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总结的那样, 在这本书中她认为“18世纪晚期的某些感官或具体的‘体验’, 包括阅读书信体小说和在公共展览上观看图片, 逐渐在法国男人和女人的大脑中产生了实际的、生理上的变化, 从而导致了两种共同的心理发展, 即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和对陌生人的同理心的增强”。见Sophia Rosenfeld, “Thinking about Feeling, 1789—1799”,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697—706, here 703。
- (6) Václav Havel, “The End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Times* (1 March 1992), section 4, 15.
- (7) William Ian Miller, *Humilia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Honor, Social Discomfort, and Viol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2.

术语表

情感 (affect) : 通常被认为是自主的、通过语言或其他身体符号表示的非所指的、无意识的身体事件 (或其他人所说的“强度”)。因此, 一般来说, 情感先于并不受意图、评价、意志、意识形态和认知操作的影响。

情感程序 (affect programme) : 由外部情感刺激引起的一系列身体反应 (如面部肌肉运动) 和行为方式。与基本情感范式相关。

情感神经科学 (affective neuroscience) : 关于情感的神经科学。这个词是由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在1998年创造出来的。

杏仁核 (amygdala) : 大脑左右半球的杏仁状皮质下神经细胞群; 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 这是引发消极情绪, 尤其是恐惧的场所。

无欲心境 (apatheia) : 在古希腊斯多葛哲学中, 一种没有感情的或平静的状态, 产生最大的内心宁静。

评价 (appraisal) : 瞬间 (或几乎瞬间) 评估一种情感刺激对一个人的健康是多是坏。情感的典型认知心理学方法。

失用症 (apraxia) : 无法进行有目的的学习动作。

内心宁静 (ataraxia) : 在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中, 通过无欲心境而达到的一种纯粹的幸福或平静的状态。

基本情感 (basic emotions) : 该范式认为存在一组跨文化情感, 这些情感通常与通过展示规则“泄露”的不同面部微表情相关, 例如, 在需要人们看起来快乐的社交场合中, 透过快乐的面具来解读的悲伤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解码肌肉运动)。在1992年, 有六种情感被认为是基本情感: 快乐、愤怒、厌恶、恐惧、悲伤和惊讶。这一范式与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以及后来的保罗·埃克曼有关。

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 : 由赖因哈特·柯塞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 等人开创的史学领域, 研究如“自由”“民族”等概念 (Begriffe) 意义的转变。其早期的典型是语言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的先驱, 因为它坚持相信存在一个“硬的”非语言的现实。

行为主义 / 行为心理学 (behaviouralism/behavioural

psychology)：以B.F.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在20世纪中叶尤为流行。与精神分析学派相反，他们一致认为心理学应该只关注可观察的行为，而不是隐藏的心理过程，并将情感视为基于生理反射的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生理反馈 (biofeedback)：一种通过观察记录生理过程 (如心率或痛觉) 的仪器来训练这些过程的方法。例如，当面对不愉快的听觉刺激 (如警报器的声音) 时，受试者通过在监视器上观察它来学会使心率恢复正常。

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 (biopower or biopolitics)：现代人口的管理机制，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微妙的技巧，例如在人口普查中对他们进行社会和种族方面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歧视性的社会政策。这一术语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有关。

生物革命 (bio-revolution)：随着千年之交新经济生物科学的繁荣与生命科学的普遍出现，生命科学不仅成为自然科学 (而不是物理学) 的主导学科，而且也成为人文学科的主导学科。

血氧水平依赖对比 (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 contrast, BOLD contrast)：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中，测量大脑中血液氧含量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关于神经元活动的结论。这是基于红细胞根据氧含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磁性这一认识。

认知情感 (cognition)：由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巴内特和希拉里·霍恩·拉特纳提出的一个术语，强调认知与情感不可分离。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心理学派，认为情感是认知的形式。大多数认知心理学的情感模型都包括一个评价维度，一个物体 (比如森林里的蛇) 在这个维度中得到的评价 (比如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与过去的经验有关)。

表述句 (constative)：描述世界的话语，如“草是绿色的”。语言学家约翰·奥斯丁创造的术语。

核心情感 (core affect)：由心理学家詹姆斯·拉塞尔和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提出的情感多级模型。最初阶段的核心情感只有享乐效价 (好坏) 和强度 (强弱)。人身上一直会有核心情感。只有在后期，意义、客体关系和意识才开始发挥作用，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谈论“情感”。换句话说，情感本身并不存在。核心情感的初始阶段就像哲学家和情感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所说的“纯粹强度”。

皮质（cortex/cortical）：大脑上部的结构，被认为在进化过程中比边缘系统发育晚，还被认为负责复杂的认知、语言、记忆和意识。

质疑神经科学（critical neuroscience）：神经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相信神经科学的前景，但对其简单的使用持怀疑态度，他们的主张远远超出了实验的范围。他们努力超越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这个术语来自20世纪末在柏林建立的一个学者网络。

文化权变性（culturally contingent）：受文化制约的，相对的，特定的，反决定论的，可塑的。

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被认为与实验的即时任务无关，而是与更长期的目标有关的大脑活动。也与大脑的休息状态有关，更普遍地说，与大脑始终活跃的新认识有关。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

表达规则（display rules）：影响情感的身体表达，尤其是面部表情和社会规范。例如，表达规则可以禁止在脸上显示愤怒，但是微表情（面部动作）无论如何都会“泄露”潜在的愤怒。这一术语与西尔万·汤姆金斯和保罗·埃克曼等人的基本情感范式有关。可以说，表现规则映射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性，基本情感代表的是自然，而表达规则代表的是文化。

领域（domain）：生命科学或社会科学所陈述的知识领域。

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实验结果在实验室外自然环境中适用的程度。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测量和观察大脑活动的技术。其时间分辨率优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但空间分辨率较差。换句话说，它可以显示大脑对外部情感刺激的反应，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滞后时间要短，但在确定大脑中该反应的位置方面却不那么精确。

主位/客位（emic/etic）：人类学术语，分别指局内人与局外人对一种文化的看法。

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提出的概念，指对工作场所情感的管理，尤其是那些规定实际情感而不仅仅是情感表达的工作。如果感觉不到这种情感，就会产生“情感失调”。在没有交换价值的私人环境中，同样的情感管理被称为情感工作。

情感指挥系统 (Emotional Command Systems, ECS) : 可以带来生存优势的普遍的神经化学过程。“探索”“恐惧”“愤怒”和“欲望”这样的情感指挥系统位于大脑的最深处,在脑干内部和周围。这些系统负责人类和动物的基本活动,如处理威胁或繁殖。其他的指挥系统在更高但仍然处在大脑皮层下的区域,调节简单的社会行为(“恐慌”“关心”“玩耍”),涉及社会关系和对分离的恐惧。这个概念是由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提出的。

情感共同体 (emotional community) : 认为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共同体”(定义各异)中,并在共同体中与他人共有某些情感规范、评价和表达方式。每个共同体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社会群体,如宫廷或修道院。同样,整个社会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尽管其中有一些变体。通常任何时候都有许多情感共同体。这个表达是由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创造的。

情感惯习 (emotional habitus) : 这一概念借鉴了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即主要通过模仿学习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的一套心理和身体的倾向和习惯。术语“情感惯习”被用来表示更具体的文化所期望和习惯的感觉模式。历史人类学家莫妮克·舍尔曾提出,情感既不存在于身体中(像基本情感范式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存在于心灵中(如认知方法所主张的那样),而是存在于习惯中,而习惯代表了受社会制约的身心。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这个概念由心理学家约翰·梅尔和彼得·萨洛维提出,由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普及。

情感导航 (emotional navigation) : 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指在情感体制中对情感进行处理。

情感自由 (emotional liberty) : 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指成功的情感导航建立在情感体制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强烈呼应之上,或者,最终建立在情感体制和情感在人脑中的运作方式之间的呼应之上。

情感实践 (emotional practices) : 历史人类学家莫妮克·舍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她的定义是“对身体和心灵的操纵,在没有情感时唤起情感,集中分散的情感唤起,给它们一个可理解的形状,或者改变或消除已经存在的情感”。舍尔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为基础,区分了情感实践的调动、记录、交流和管理。

情感避难所（emotional refuge）：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指比主导的情感体制赋予更多情感自由的实践或制度。它们有助于使情感导航在情感体制中更成功，否则很难与情感的运作方式相兼容。

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情感体制规定了情感表达与伴随的仪式和其他象征性的实践，以支持一个政治体制。所有的政治体制也都是情感体制。

情感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指因缺乏情感自由和情感避难所而导致的情感导航困难所造成的痛苦。例如，由要求在情感表达中始终保持真实性的情感体制所引起的情感痛苦，因为这不符合情感的实际运作，而这种运作总是具有开放性和模糊性。最终的原因是大脑的结构限制了情感的运作方式。

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个词是由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和精神病学家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创造的，指的是可以通过例如关于如何感受的建议来接触的主导情感规范。真实感受（情感体验）可以通过第一人称资料（如日记、信件）来研究。这样，情感规范的变化和新规范与实际感受之间的不协调将变得明显。

情感表达（emotive）：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创造的术语，指一种情感表达（通常是动词），既能描述这种情感（如“我很快乐”），又能通过开启一个开放的自我探索过程（例如，通过质疑自己的幸福，问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不是同时存在其他的情感状态，比如悲伤，或者通过改写同时呈现的情感状态，放大快乐的体验），在他人以及这种情感本身导致一种改变。同时具有约翰·奥斯丁所说的表述句和施为句特征的话语。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essentialist）：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语言、文化和社会之外的现实的核心。“去本质化”意味着使现实的建构透明化，从而显示出本质主义的徒劳。

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过分关注一种文化、民族或种族等。

延展心智理论（Extended Mind Theory, EMT）：哲学、神经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分支，强调认知和意识分布在整个身体，而不只是在心智或者大脑中，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

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指实验结果可以推广，在实验的狭小范围之外是有效的。

面部动作评分技术 (Facial Action Scoring Technique, FAST , 后来被称为FACS , 即面部动作编码系统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 由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和华莱士·弗瑞森发明并申请专利的面部肌肉运动分析方法。基本情感范式的测量技术。

情感规则 (feeling rules) : 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创造的术语, 指调节情感表达的社会规范。当情感规则 and 实际情感不相符合时, 就会产生“情感失调”。

功能整合 (functional integration) : 大脑各部分在大脑活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其对立的是功能分区。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 高空间分辨率的神经影像技术。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segregation/specificity) : 认为大脑的一个区域负责一种功能的观点。与神经成像扫描 (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有关, 在这种扫描中, 仅有一个着色区域活跃。与其对立的是功能整合。

享乐效价 (hedonic valence) : 指某种情感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图谱中的性质。

身体习性 (hexis) : 惯习的身体方面 (根据社会地位思考和行动的潜意识结构) , 如教授坐在扶手椅上交叉双腿的姿势。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创造的概念。

显在认知 / 潜在认知 (hypercognized/hypocognized) : 人类学家罗伯特·利维创造的术语, 分别用来描述特定文化中被优先考虑的情感和被淡化的情感。例如, 在当今美国文化中, 幸福就是一种被显在认知的情感。

意向性 / 意向论 (intentionality/intentionalism) : 在 (分析) 哲学和其他领域的不同问题, 对于情感来说, 涉及对情感对象进行评估时的意志、评估或信念。这一概念在科学史家露丝·雷斯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她批判情感理论和基本情感范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内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 : 实验的连贯性, 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被证明。

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e) : 不同的人之间相互作用。与其对立的是人类行为的自主或个人主义概念。

单侧化 (lateralization) : 大脑半球 (左半球或右半球) 功能的差

异。

大脑病变 (lesion) : 对大脑特定区域的损害, 从而导致功能障碍。在神经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某一特定区域停止工作, 同时观察到异常行为, 受损区域就被认为是功能障碍的原因 (与此相对应, 在健康人身上功能正常也是该区域的作用)。1848年, 菲尼亚斯·盖奇是这方面最早的病例之一。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s) : 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神经科学及相关学科的总称。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是“生物学”一词更为狭义的含义的延伸, 引入了其他与生物有关的领域, 如认知心理学、大脑研究或基于计算机的神经科学研究。

边缘系统 (limbic system) : 皮质下的大脑区域, 被认为在进化上更加古老, 包括海马体、杏仁核和穹隆。人们认为它负责最古老的、与生存有关的情感, 如恐惧。

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一种转变, 即把语言作为历史分析的主要焦点。认为现实的语言构成是首要的, 先于语言的本质无法接触。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有关。

逻各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 过分关注语言 (书面和口头) 表达。

脑磁图描记术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 一种测量和观察大脑活动的技术。在时间分辨率上优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但在空间分辨率上不如后者。

元概念 (metaconcept) : 描述事物本身以外事物的术语, 例如将伊法利克人的“nunuwan”描述为“情感”就是将“情感”作为一个元概念。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分析范畴, 而不是日常用语。

微表情 (micro-expressions) : 不由自主地表达真实的基本情感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结果, 可以超越社会规范 (表达规则), 可以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进行解码。是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的基本情感范式的一部分。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 一种特殊的脑神经细胞, 被认为负责猴子模仿其他猴子身体动作的行为和更高的认知功能, 如人类的同情心。

神经元（neuron）：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神经元的基本操作是发送电脉冲，即所谓的“放电”。

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大脑产生新的神经细胞并在这些（或现存的、较老的）神经细胞之间形成连接的能力。许多人文学者寄希望于这个假设，因为它有望将历史、文化等知识铭刻在大脑中，从而使其去本质化。

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历史学派，强调语言和符号在现实文化建构中的作用。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社会史的继承者（在政治史黯然失色之后）。受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米歇尔·福柯的影响。这个术语出自林恩·亨特1989年主编的里程碑式作品《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

新唯物主义 / 生机论（new materialism/vitalism）：后后结构主义理论，试图将物质概念化，赋予其能动性，达到一个“更坚实”的实在概念，在定义实体（从事物到小型生物到人类）时要淡化意识。这一理论受到了现象学和情感理论等的影响。部分程度上由生物革命驱动。

唯名论（nominalism）：对日常或“地方”语言的排他性使用（如在不同时期的“喜爱”“感情”“激情”）和对元概念（如不同时期的“情感”）的放弃。

施为句（performative）：可以改变世界的话语，例如在登记处的结婚仪式上说“我愿意”。这是语言学家约翰·奥斯丁创造的术语。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彩色放射性标记的神经成像技术。具有空间分辨率高的优点，但也有发射潜在有害放射性物质的缺点。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post-structuralist）：与意义不确定性和现实建构相关的理论方法的总称。常被用作“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1979年）的同义词。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的理论相联系。

实践理论 / 行为学（practice theory/praxeology）：社会和文化理论的方法，试图调解社会结构和个人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连接分析的宏观方面和微观层面。皮埃尔·布尔迪厄是重要的实践理论家之一。

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历史学派，强调历史行动者、过程

和事件的心理维度。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经常被批评为不顾史实把精神分析等概念强加给来自不同时代和文化的人，而在这些时代和文化中，精神的形成可能是不同的，还因为没有把握好从个人到集体的艰难飞跃而受到批评。

拉莎 (*rasa*)：源自梵语，意思是“味道”。印度自古以来组织情感表达的美学理论。主要与舞蹈剧院有关。在剧院里，每个拉莎都与特定的面部表情、手势、颜色和神性相关联。

感受性 (*qualia*)：主观的意识经验。实验心理学试图通过自我报告（例如，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来获得这些数据。

还原论 (*reductionism*)：一些人文学者在评论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的实验设计时使用的贬义词，是指将现实还原为少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做法。

可复制性 (*replicability*)：实验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得到相同结果的能力。

沙赫特-辛格模型 (*Schachter-Singer model*)：一种情感模型，它假定对身体情感符号的认知评价是可变的。例如，呼吸短促可以被解释为恐惧、兴奋或性唤起。也被称为综合认知-生理模型，因为它既不认为情感就是生理信号，也不认为情感只是认知。由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和杰罗姆·辛格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

感觉运动神经元 (*sensorimotor neurons*)：负责运动的一种神经细胞。

情境认知理论 (*situated cognition*)：神经科学、哲学、文学批评和相关领域的一种理论，认为认知功能不仅仅发生在大脑中，而且与其他人以及更大的环境因素有关。

社会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vism or 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vist or constructionist*)：认为现实（包括情感）是可塑的，因为它是由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构成的，而不是以本质主义的方式预先存在的。

社会神经科学 (*social neuroscience*)：基于对多个个体的实验的神经科学。试图公正地对待人的主体性的关系本质。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建立在个体的关系情境性之上的心理学派。受到了社会学的影响。

躯体标记假说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SMH) : 认为更高的认知过程 (如决策) 被身体的情感信号所简化、加速和改善。基于爱荷华博弈任务 (IGT) 实验之上。由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等人提出。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 在不同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到对深层结构的信仰, 例如通过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或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流行。

皮质下区域 (subcortical) : 大脑皮层下的区域 (例如边缘系统就位于这里)。在进化过程中比大脑皮层发展得更早。

经颅磁刺激 (transcranial magnetic simulation, TMS) : 测量和观察大脑活动的一种技术。在时间分辨率上优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但在空间分辨率上不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恐惧的两条路径假设 (two roads to fear) : 认为存在一条通往恐惧的快速 (12毫秒) 路径, 这条路径通过杏仁核, 杏仁核在感知到刺激 (比如森林里的蛇) 后, 激活身体, 使其处于警惕状态 (战斗或逃跑反应)。而神经化学反应到达认知操作 (例如, 蛇是活的吗? 它是一条毒蛇吗?) 发生的大脑皮层的时间是它的两倍。这一概念是由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提出的。

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universalist) : 认为在所有文化和时代都普遍存在的现象或模式。通常与决定论、本质主义、先天性, 或不变的、基本的、坚实的和硬的本质有关。

参考文献

注：本书目基于2011年底以前的英文著作。2011年后的著作仅供参考。在2011年才出版的几部著作也是如此：它们是在2014年春季通过电子邮件列表HIST—EMOTION和H—EMOTIONS进行众包，最终收录在内的。通常，如果使用了书中（如文集）中的某一章，则仅列出书名。

1. 系列丛书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East Asia, Brill, eds Paolo Santangelo and Cheuk Yin Lee.

Emotions i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s Ute Frevert and Thomas Dixon.

Emotions of the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s Robert A. Kaster and David Konstan.

History of Emot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ds Peter N. Stearns and Susan Matt.

Palgrav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eds David Lemmings and William M. Reddy.

2. 期刊

Emotion Review <<http://emr.sagepub.com/>> accessed 2 April 2014.

Passion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motions <<http://www.passionsincontext.de>> accessed 2 April 2014.

3. 博客

Anderson, Michael, “After Phrenology: Will We Ever Understand the Brain?”, *Psychology Today*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after-phrenology>> accessed 16 March 2014.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Histories of Emotion: From Medieval Europe to Contemporary Australia* <<http://historiesofemotion.com/>>

accessed 2 April 2014.

Dixon, Thomas, and Jules Evans (eds),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Blog*, Queen Mary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motions <<http://emotionsblog.history.qmul.ac.uk/>>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Greene, Michelle, *NeurRealism* <<http://neurealist.blogspot.de>> accessed 16 March 2014.

Hickok, Greg, and David Poeppel (moderators), *Talking Brains: News and Views on the Neural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http://www.talkingbrains.org>>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The Neurocritic: Deconstructing the Most Sensationalistic Recent Findings in Human Brain Imaging,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pharmacology <<http://neurocritic.blogspot.de>> accessed 16 March 2014.

“Neuroskeptic”, *Discover*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euroskeptic/>>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Pessoa, Luiz, *Emotion & Cognition and the Brain* <<http://cognitionemotion.wordpress.com>>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4 . 网址

Amsterdam Centre for Cross-Disciplinary Emotion and Sensory Studies, *ACCESS* <<http://access-emotionsandsenses.nl/>> accessed 10 April 2014.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s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http://historiesofemotion.com/>> accessed 2 April 2014.

Critical Neuroscience Network <<http://www.critical-neuroscience.org>>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Feel Tank, *Pathogeographies* <<http://pathogeographies.net/>> accessed 6 January 2014.

History of Emotions Working Group, Berkeley, *History of Emotions* <<http://hoe-berkeley.squarespace.com/>> accessed 5 April 2014.

Laukötter, Anja, and Margrit Pernau (eds), *History of Emotions:*

Insights into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http://www.history-of-emotions.mpg.de/en>>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Paul Ekman Group LLC <<http://www.paulekman.com>>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La Sapienza”, Facoltà di Studi Orientali, *Emotion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 Interdisziplinary Research on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Ming-Qing China* <<http://w3.uniroma1.it/santangelo/emotions.htm>> accessed 9 April 2014.

5 . 历史

Arnold, John 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edieval La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in Miri Rubin (ed.), *European Religious Cultures: Essays offered to Christopher Brooke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08), 107—130.

Bantock, G. H., “Educating the Emotion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34/2 (1986), 122—141. doi: 10.2307/3121322

Barker-Benfield, G. J.,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Barker-Benfield, G. J., *Abigail and John Adam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Sensi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Biess, Frank, “ ‘ Everybody Has a Chance’: Nuclear Angst, Civil Defence, and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in Postwar West Germany”, *German History*, 27/2 (2009), 215—243.

Blauvelt, Martha Tomhave, “The Work of the Heart: Emotion in the 1805—1835 Diary of Sarah Connell Ayer”,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5/3 (2002), 577—592. doi: 10.1353/jsh.2002.0003

Boddice, Rob, “The Affective Turn: Historicising the Emotions”, in

Cristian Tileaga and Jovan Byford (eds), *Psychology and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7—165.

Bourke, Joanna,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Bracke, Maud Anne, “Building a ‘Counter-Community of Emotions’: Feminist Encounters and Socio-Cultural Difference in 1970s Turin”, *Modern Italy*, 17/2 (2012), 223—236. doi:10.1080/13532944.2012.665283

Broomhall, Susan (ed.), *Emotions in the Household, 1200—19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roomhall, Susan, and Jacqueline van Gent, “Corresponding Affections: Emotional Ex-change among Siblings in the Nassau Famil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34/2 (2009), 143—165. doi: 10.1177/0363199008330734

Bullard, Alice, “Sympathy and Denial: A Postcolonial Re-reading of Emotions, Race, and Hierarchy”, *Historical Reflections*, 34/1 (2008), 122—142. doi: 10.3167/hrrh2008.340108

Cairns, Douglas [L.], “Honour and Shame: Modern Controversies and Ancient Values”, *Critical Quarterly*, 53/1 (2011), 23—41. doi: 10.1111/j.1467-8705.2011.01974.x

Carrera, Elena (ed.), *Emotions and Health, 1200—1700*,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Traditions (Leiden: Brill, 2013).

Castillo, Greg, “Making a Spectacle of Restraint: The Deutschland Pavilion at the 1958 Brussels Exposi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7/1 (2012), 97—119.

Chandler, James, “Moving Accidents: The Emergence of Sentimental Probability”, in Colin Jones and Dror Wahrman (eds), *The 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37—177.

Chanotis, Angelos (ed.), *Unveiling Emotions, i. Sources and Methods for the Studies of Emotions in the Greek World*, Heidelberger althistorische Beiträge und epigraphische Studien 52

(Stuttgart:Steiner, 2012).

Chanotis, Angelos, and Pierre Ducrey (eds), *Unveiling Emotions*, ii: *Emotions in Greece and Rome:Texts, Images, Material Culture*, Heidelberger althistorische Beiträge und epigraphische Studien 55 (Stuttgart: Steiner, 2013).

Clark, Elizabeth B., “ ‘ 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Weak’: Pain, Sympathy, and the Cultur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2 (1995), 463—493.

Classen, Constance,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Cook, Hera, “Emotion, Bodies, Sexuality and Sex Educa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Historical Journal*, 55/2 (2012), 475—495. doi: 10.1017/S0018246X12000106

Cook, Hera, “Getting ‘Foolishly Hot and Bothered’? Parents and Teachers and Sex Education in the 1940s”, *Sex Education*, 12/5 (2012), 555—567. doi: 10.1080/14681811.2011.627735

Cook, Hera, “From Controlling Emotion to Expressing Feelings in Mid-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7/3 (2014), 627—646. doi: 10.1093/jsh/sht107

Corbin, Alain, *The Village of Cannibals: Rage and Murder in France, 1870*,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 orig., *Le Village des cannibals* (1990)].

Corbin, Alain, *Time, Desire and Horror: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Senses*, trans. Jean Birrell(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Fr. orig., *Le Temps, le désir et l'horreur* (1991)].

Costigliola, Frank, “ ‘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Gender, Pathology, and Emotion in George Kennan’s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3/4 (1997), 1309—1339. doi: 10.2307/2952904

Costigliola, Frank, “ ‘ I Had Come as a Friend’: Emotion, Culture, and Ambigui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3—1945”, *Cold War History*, 1/1 (2000), 103—128. doi:10.1080/713999913

- Costigliola, Frank, *Roosevelt's Lost Alliances: 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rozier-De Rosa, Sharon, "Popular Fiction and the 'Emotional Turn': The Case of Women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Compass*, 8/12 (2010), 1340—1351. doi: 10.1111/j.1478-0542.2010.00743.x
- de Luna, Kathryn M., "Affect in Ancient Africa: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Emotion Talk'", in Gian Claudio Batic (ed.), *Encoding Emotions in African Languages*(Munich: Lincom Europa, 2011), 1—16.
- de Luna, Kathryn M., "Affect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46/1 (2013), 123—125.
- deMause, Lloyd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deMause, Lloyd, *Foundations of Psychohistory* (New York: Creative Roots, 1982).
- Dixon, Thomas, "The Tears of Mr Justice Willes",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17/1 (2011), 1—23. doi: 10.1080/13555502.2011.611696
- Earle, Rebecca, "Letters and Love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Americas*, 62/1, (2005), 17—46.
- Eustace, Nicole, *Passion Is the Gale: Emotion, Pow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 Eustace, Nicole, *1812: War and the Passions of Patriot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 Eustace, Nicole, Eugenia Lean, Julie Livingston, Jan Plamper, William M. Reddy, and Barbara H. Rosenwein,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5 (2012), 1487—1531. doi: 10.1093/ahr/117.5.1487

- Febvre, Lucien,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in Peter Burke (ed.),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trans. K. Fol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12—26.
- Flynn, Maureen, "Blasphemy and the Play of Anger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Past and Present*, 149/1 (1995), 29—56. doi: 10.1093/past/149.1.29
- Flynn, Maureen, "The Spiritual Uses of Pain in Spanish Mystic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4/2 (1996), 257—278. doi: 10.1093/jaarel/LXIV.2.257
- Flynn, Maureen, "Taming Anger's Daughters: New Treatment for Emotional Problems in Renaissance Spain", *Renaissance Quarterly*, 51/3 (1998), 864—886.
- "Forum: History of Emotions", *German History*, 28/1 (2010), 67—80.
- Francis, Martin, "Tears, Tantrums, and Bared Teeth: The Emotional Economy of Three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s, 1951—1963",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1/3 (2002), 354—387. doi: 10.1086/341153
- Freier, Monika, "Cultivating Emotions: The Gita Press and its Agenda of Social and Spiritual Reform",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3/3 (2012), 397—413. doi:10.1080/19472498.2012.693711
- Frevert, Ute, *Emotions in History: Lost and Found*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Frevert, Ute, Monique Scheer, Anne Schmidt, Pascal Eitler, Bettina Hitzer, Benno Gammerl, Nina Verheyen, Christian Bailey, and Margrit Pernau, *Emotional Lexic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Vocabulary of Feeling 170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Fulkerson, Laurel, *No Regrets: Remors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Gammerl, Benno (ed.), *Emotional Styles—Concepts and Challenges* [Special Issue], *Rethinking History*, 16/2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 Garro, Linda C.,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1—342. doi:10.1086/204622
- Gay, Peter,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Norton, 1984—1998).
- Gertsman, Elina (ed.), *Crying in the Middle Ages: Tears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Gienow-Hecht, Jessica C. E., and Frank Schumacher (ed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3).
- Gil, Daniel Juan, "Before Intimacy: Modernity and Emo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Discourse of Sexuality", *ELH: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69/4 (2002), 861—887.
- Harris, William V., *Restraining Rage: The Ideology of Anger Control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rtman, Saidiya, *Scenes of Subjection: Terror, Slavery, and Self-Ma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endy, David, "Biography and the Emotions as a Missing 'Narrative' in Media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Lance Sieveking and the Early BBC", *Media History*, 18/3—4 (2012), 361—378. doi: 10.1080/13688804.2012.722424
- Hendy, David, "The Dreadful World of Edwardian Wireless", in Siân Nicholas and Tom O'Malley (eds), *Moral Panics, Social Fears, and the Medi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Routledge, 2013), 76—89.
- Hendy, David, "Representing the Fragmented Mind: Reinterpreting a Classic Radio Feature as 'Sonic Psychology'", *Radio Journ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Broadcast and Audio Media*, 11/1(2013), 29—45.

- Howell, Signe,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2—343. doi:10.1086/204622
- Huizinga, Johan,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Du. orig., *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 (1921)].
- Hunt, Lynn,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3—344. doi:10.1086/204622
- Hunt, Lynn,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7).
- Hunt, Lynn,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 (2009), 671—678.
- Ikegami, Eiko, "Emotions", in Ulinka Rublack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3—353.
- James, Harold, "1929: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Crash",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129—144. doi: 10.1525/rep.2010.110.1.129
- Karant-Nunn, Susan C., *The Reformation of Feeling: Shaping the Religious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Keys, Barbara, "Henry Kissinger: The Emotional Statesman", *Diplomatic History*, 35/4 (2011), 587—609. doi: 10.1111/j.1467-7709.2011.00968.x
- Kietäväinen-Sirén, Hanna, " ' The Warm Water in my Heart': The Meanings of Love among the Finnish Country Popul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Family*, 16/1 (2011), 47—61. doi: 10.1016/j.hisfam.2010.10.002
- Laffan, Michael, and Max Weiss (eds), *Facing Fear: The History of an*

Emo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Larrington, Carolyne,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and Study of the Medieval Period”,*Early Medieval Europe*, 10/2 (2001), 251—256. doi: 10.1111/1468-0254.00090

Lean, Eugenia,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Liliequist, Jonas (ed.), *A History of Emotions, 1200—180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Longman, Chia,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4—345. doi:10.1086/204622

Lutz, Catherine,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45—346. doi:10.1086/204622

Lyons, Martyn, “Love Letters and Writing Practices: On *Écritures Intim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4/2 (1999), 232—239. doi: 10.1177/036319909902400206

MacDonald, Michael, “The Fearefull Estate of Francis Spira: Narrative, Identity, and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1/1 (1992), 32—61. doi:10.1086/385997

Mack, Phyllis, *Heart Religion in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Gender and Emotion in Early Method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cMullen, Ramsay, *Feelings in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laremont, CA: Regina Books, 2003).

Martin, Alexander M., “Sewage and the City: Filth, Smell, and

Representations of Urban Life in Moscow, 1770—1880”, *Russian Review*, 67/2 (2008), 243—274. doi: 10.1111/j.1467-9434.2008.00483.x

Matt, Susan J.,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Envy in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 1890—1930*(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Matt, Susan J., “Current Emotion Research in History: Or, Doing History from the Inside Out”, *Emotion Review*, 3/1 (2011), 117—124. doi: 10.1177/1754073910384416

Matt, Susan J., *Homesickness: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tt, Susan J., and Peter N. Stearns (eds), *Doing Emotion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Medick, Hans, and David Warren Sabean (eds), *Interest and Emotion: Essays on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itchell, Timothy, *Passional Culture: Emoti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pai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Mösslang, Markus, and Torsten Rlotte (eds), *The Diplomats’ Worl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iplomacy, 1815—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Nash, David, and Anne-Marie Kilday, *Cultures of Shame: Exploring Crime and Morality in Britain 1600—19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Nielsen, Phillip, “Building Bonn: Democrac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Humility”, *History of Emotions—Insights into Research* (2014) <<http://www.history-of-emotions.mpg.de/en/texte/building-bonn-democracy-and-the-architecture-of-humility>> accessed 2 April 2014.

Olsen, Stephanie, *Juvenile Nation: Youth, Emotio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ritish Citizen*(London: Bloomsbury, 2014).

- Passerini, Luisa, Liliana Ellena, and Alexander C. T. Geppert (eds), *New Dangerous Liaisons: Discourses on Europe and Lov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
- Pawlak, Nina (ed.), *Codes and Rituals of Emotions in Asia and African Cultures* (Warsaw: Elipsa, 2009).
- Pernau, Margrit, "Teaching Emotions: The Encounter between Victorian Values and Indo-Persian Concepts of Civ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Delhi", in Indra Sengupta and Daud Ali (eds), *Knowledge Production, Pedagogy, and Institutions in Colonial In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27—247.
- Pernau, Margrit, "Male Anger and Female Malice: Emotions in Indo-Muslim Advice Literature", *History Compass*, 10/2 (2012), 119—128. doi: 10.1111/j.14780542.2012.00829.x
- Phillips, Mark Salber, *Society and Sentiment: 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Britain, 1740—18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lamper, Jan, Introduction in *Emotional Turn? Feelings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Special Section], *Slavic Review*, 68/2 (2009), 229—237.
- Plamper, Ja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49/2 (2010), 237—265. doi: 10.1111/j.1468-2303.2010.00541.x
- Plamper, Jan, and Benjamin Lazier, "Introduction: The Phobic Regime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s*, 110/1 (2010), 58—65. doi: 10.1525/rep.2010.110.1.58
- Plamper, Jan, and Benjamin Lazier (eds), *Fear: Across the Disciplin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2).
- Popkin, Jeremy D., Review of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 *H-France Review*, 2/118 (2002), 470—476.

- Reddy, William M.,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27—351. doi: 10.1086/204622
- Reddy, William M., *The Invisible Code: Honor and Senti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814—184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Reddy, William M.,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eddy, William M., Response to Jeremy D. Popkin's review of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 *H-France Review*, 2/119 (2002), 477—480.
- Reddy, William M.,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Self and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1/4(2009), 302—315. doi: 10.1177/1754073909338306
- Reddy, William M., "Saying Something New: Practice Theor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terary Studies*, 44/1 (2009), 8—23. doi:10.1515/ARCA.2009.002
- Reddy, William M., "Neuroscience and the Fallacies of Function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49/3 (2010), 412—425. doi: 10.1111/j.1468-2303.2010.00551.x
- Reddy, William M., *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 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Rizvi, M. Sajjad Alam, "Conceptualizing Emotions: Perspectives from South Asian Suf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forthcoming).
- Robb, Peter, "Children, Emotion, Identity and Empire: View from the Blenchyndens' Calcutta Diaries (1790—1822)", *Modern Asian Studies*, 40/1 (2006), 175—201. doi: 10.1017/S0026749X06001946
- Robinson, Emily, "Touching the Void: Affective History and the

Impossible”, *RethinkingHistory*, 14/4 (2010), 503—520. doi: 10.1080/13642529.2010.515806

Rodman, Margaret Critchlow, “The Heart in the Archives: Colonial Contestation of Desire and Fear in the New Hebrides, 1933”,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38/3 (2003), 291—312. doi:10.1080/022334032000154056

Roper, Lyndal,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 Routledge, 1994).

Roper, Michael, “Between Manliness and Masculinity: The ‘War Genera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Fear in Britain, 1914—195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2 (2005), 343—362. doi: 10.1086/427130

Roper, Michael, “Slipping Out of View: Subjectivity and Emotion in Gender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9 (2005), 57—72. doi: 10.1093/hwj/dbi007

Rosenfeld, Sophia, “Thinking about Feeling, 1789—1799”,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2/4(2009), 697—706. doi: 10.1215/00161071-2009-018

Rosenwein, Barbara H. (ed.), *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senwein, Barbara H., review of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4 (2002), 1181—1182. doi: 10.1086/532671

Rosenwein, Barbara H.,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3 (2002), 821—845. doi: 10.1086/532498

Rosenwein, Barbara H.,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senwein, Barbara H.,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ssion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Emotions [online journal], 1 (2010) <<http://www.passionsincontext.de>>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Rosenwein, Barbara H., “Thinking Historically about Medieval Emotions”, *History Compass*, 8/8 (2010), 828—842. doi: 10.1111/j.1478-0542.2010.00702.x

Rothschild, Emma,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üsen, Jörn, “Emotional Forces in Historical Thinking: Some Meta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the Case of Mourning”, *Historein: 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 8 (2008), 41—53.

Santangelo, Paolo, “Emo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olution and Continuity in Ming-Qing Perception of Passions”, in Viviane Alleton and Alexei Volkov (eds), *Notions et perceptions du changement en Chine: Textes présentés au IX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études chinoises* (Paris: IHEC, 1994), 167—186.

Santangelo, Paolo, “Emotions and the Origin of Evi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Halvor Eifring (ed.), *Minds and Mentalit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184—316.

Santangelo, Paolo, “The Myths of Love-Pass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ng Qing Yanjiu*, 8(1999), 131—195.

Santangelo, Paolo, *Sentimental Edu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ual Research in Ming and Qing Sources*, Sinica Leidensia 60 (Leiden: Brill, 2003).

Santangelo, Paolo, “A Textual Analysis for Capturing Data Concerning Emotions”, in Lilie Suratminto and Munawar Holil (eds), *Rintisan Kajian Leksikologi dan Leksikografi: Pusat Leksikologi dan Leksikografi* (Jakarta: Fakultas Ilmu Pengetahuan Budaya, Universitas Indonesia, 2003), 87—98, 306—315.

Santangelo, Paolo, “Evaluation of Emotions in European and Chinese

Traditions: Differences and Analogies”, *Monumenta Serica*, 53 (2005), 401—427.

Santangelo, Paolo, “Emotions and Perception of Inner Reality: Chinese and Europea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4/2 (2007), 289—308. doi: 10.1111/j.1540-6253.2007.00414.x

Santangelo, Paolo, and Donatella Guida (eds), *Love, Hatred, and Other Passions: Questions and Themes on Emo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Leiden: Brill, 2006).

Santangelo, Paolo, and Ulrike Middendorf (eds), *From Skin to Heart: Perceptions of Emotions and Bodily Sens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un-wen: Studien zur Geistes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in China 1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Saillant, John, “The Black Body Erotic and the Republican Body Politic, 1790—182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5/3 (1995), 403—428.

Scheer, Monique, “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and Is That What Makes Them Have a History)? A Bourdieu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motion”, *History and Theory*, 51/2 (2012), 193—220. doi: 10.1111/j.1468-2303.2012.00621.x

Scheff, Thomas J.,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sm, an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Schleyer, Maritta, “Ghadr-e Dehli ke Afsane”, *Annual of Urdu Studies*, 27 (2012), 34—56.

Shryock, Andrew, and Daniel Lord Smail (eds),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Smail, Daniel Lord,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tearns, Carol Zisowitz, and Peter N. Stearns, *Anger: The Struggle for Emotional Control in America’s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Stearns, Carol Zisowitz, and Peter N. Stearns, *Emotion and Social*

Change: Toward a New Psycho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8).

Stearns, Peter N., *Jealousy: The Evolution of an Emo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Stearns, Peter N., *American Cool: Constructing a Twentieth-Century Emotional Sty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arns, Peter N., *American Fea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igh Anx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Stearns, Peter N., and Jan Lewis (eds), *An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earns, Peter N.,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4 (1985), 813—836. doi: 10.2307/1858841

Steinberg, Mark D., and Valeria Sobol (eds), *Interpreting Emotion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Tarlow, Sarah, "Emotion in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1/5 (2000), 713—746. doi:10.1086/317404

Tyson, Amy M., *The Wages of History: Emotional Labor on Public History's Front Lin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3).

Valatsou, Despoina, "History, Our Own Stories and Emotions Online", *Historein: 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Other Stories*, 8 (2008), 108—116.

Vincent-Buffault, Anne, *The History of Tears: Sensibi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Fra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Virág, Curie, "Emotions and Human Agency in the Thought of Zhu Xi",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37 (2007), 49—88.

Wahrman, Dror, "Where Culture and Biology Meet", review of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Human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in *Haaretz* (24

April 2008) <<http://www.haaretz.com/culture/books/where-culture-and-biology-meet-1.244504>>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Wickberg, Daniel, “What Is the History of Sensibilities? On Cultural Histories, Old and Ne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3 (2007), 661—684. doi: 10.1086/ahr.112.3.661

Zeldin, Theodore, *France: 1848—1945*,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1977).

Zeldin, Theodore, “Person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5/3 (1982), 339—347. doi: 10.1353/jsh/15.3.339

Zeldin, Theodore, *An 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6 . 科学史

Alberti, Fay Bound, “Angina Pectoris and the Arnolds: Emotions and Heart Disea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al History*, 52/2, (2008), 221—236.

Alberti, Fay Bound, *Matters of the Heart: History, Medicine and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Biess, Frank, and Daniel M. Gross (eds), *Science and Emotions after 1945: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Boddice, Rob, “Species of Compassion: Aesthetics, Anaesthetics and Pain in the Physiological Laboratory”, *19: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15 (2012), 1—22.

Boddice, Rob Gregory (ed.), *Pain and Emotion in Modern History*, Palgrav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Callard, Felicity, and Daniel S. Margulies, “The Subject at Rest: Novel Conceptualizations of Self and Brain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Study of the ‘Resting State’”, *Subjectivity*, 4/3 (2011), 227—257. doi: 10.1057/sub.2011.11

- Choudhury, Suparna, and Jan Slaby (eds), *Critical Neuroscience: A Handbook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Neuroscience*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doi:10.1002/9781444343359
- Dixon, Thomas, *From Passions to Emotions: The Creation of a Secular Psychological Categ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ror, Otniel E. (Dror, Otniel Yizhak), “Modernity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motions, 1880—1950”,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1998.
- Dror, Otniel E., “The Affect of Experiment: The Turn to Emotions in Anglo-American Physiology, 1900—1940”, *Isis*, 90/2 (1999), 205—237. doi: 10.1086/384322
- Dror, Otniel E.,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Emotion: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ies of Inscription”, *Configurations*, 7/3 (1999), 355—401. doi: 10.1353/con.1999.0025
- Dror, Otniel E., “Counting the Affects: Discoursing in Numbers”, *Social Research*, 68/2(2001), 357—378.
- Dror, Otniel E., “Techniques of the Brain and the Paradox of Emotions, 1880—1930”, *Science in Context*, 14/4 (2001), 643—660. doi: 10.1017/026988970100028X
- Dror, Otniel E.,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Laboratory and Clinic”, in Fay Bound Alberti(ed.), *Medicine, Emotion and Disease, 1700—19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25—143.
- Dror, Otniel E., “Afterword: A Reflection on Feelings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0/4 (2009), 848—851. doi: 10.1086/652024
- Gendron, Maria,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A Century of Ideas about Emotion in Psychology”,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16—339. doi:10.1177/1754073909338877
- Gouk, Penelope, and Helen Hills (eds), *Representing Emotions: New Connections in the Histories of Art, Music and Medicine* (Farnham: Ashgate, 2005).

- Hayward, Rhodri, “Enduring Emotions: James L. Hallida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Psychosocial”, *Isis*, 100/4 (2009), 827—838.
- Jabr, Ferris, “The Evolution of Emotion: Charles Darwin’s Little-Known Psychology Experi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Observations Blog* (24 May 2010)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observations/2010/05/24/the-evolution-of-emotion-charles-darwins-little-known-psychology-experiment>>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Leys, Ruth,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eys, Ruth, “How Did Fear Become a Scientific Object and What Kind of Object Is It?”, *Representations*, 110 (2010), 66—104. doi: 10.1525/rep.2010.110.1.66
- Leys, Ruth, “Critical Response II: Affect and Intention: A Reply to William E. Connolly”, *Critical Inquiry*, 37/4 (2011), 799—805. doi: 10.1086/660994
- Leys, Ruth, “The Turn to Affect: A Critique”, *Critical Inquiry*, 37/3 (2011), 434—472. doi:10.1086/659353
- Leys, Ruth, “ ‘Both of Us Disgusted in My Insula’: Mirror Neuron Theory and Emotional Empathy”, *Nonsite.org*, 5 (18 March 2012) [online journal] <<http://nonsite.org/article/%E2%80%99Cboth-of-us-disgusted-in-my-insula%E2%80%9D-mirror-neuron-theory-and-emotional-empathy>>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Leys, Ruth, and Marlene Goldman, “Navigating the Genealogies of Trauma, Guilt, and Affect: An Interview with Ruth Ley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9/2 (2010), 656—679. doi: 10.1353/utq.2010.0227
- Papoulias, Constantina and Felicity Callard,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Drive in Neurop-sychoanalysis: From Sexuality to Self-Preservation”, in Christine Kirchhoff and Gerhard Scharbert (eds), *Freuds Referenzen*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2012), 189—215.
- Pfister, Joel, and Nancy Schnog (eds), *Inventing the Psychological*:

Toward a Cultural History of Emotional Lif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ilar, León-Sanz, “Resentment in Psychosomatic Pathology (1939—1960)”, in Bernardino Fantini, Dolores Martín Moruno, and Javier Moscoso (eds), *On Resentment: Past and Present*(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135—168.

Rees, Tobias, “Being Neurologically Human Today: Life and Science and Adult Cerebral Plasticity (An Ethical Analysis)”, *American Ethnologist*, 37/1 (2010), 150—166. doi: 10.1111/j.1548-1425.2010.01247.x

Richards, Graham, *Putting Psychology in Its Place: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3rd edn, London:Routledge, 2010).

Richardson, Angelique (ed.), *After Darwin: Animals, Emotions, and the Mind*, Clio Medica 93(Amsterdam: Rodopi, 2013).

Riskin, Jessica, *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 The Sentimental Empiricist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Rose, Nikolas, and Joelle M. Abi-Rached, *Neuro: The New Brain Scienc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Mi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Rubin, Beatrix P., “Changing Brains: The Emergence of the Field of Adult Neurogenesis”,*BioSocieties*, 4/4 (2009), 407—424. doi: 10.1017/S1745855209990330

Snyder, Peter J., Rebecca Kaufman, John Harrison, and Paul Maruff, “Charles Darwin’s Emotional Expression ‘Experiment’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Neuropharmac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19/2 (2010), 158—170. doi:10.1080/09647040903506679

Uttal, William R., *The New Phrenology: The Limits of Localiz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he Brain*(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Uttal, William R., *Mind and Brain: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Cambridge, MA:MIT Press, 2011).

- Wassmann, Claudia, “The Science of Emotion: Studying Emotions 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2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2005.
- Wassmann, Claudia, “Physiological Optics, Cognition and Emotion: A Novel Look at the Early Work of Wilhelm Wund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4/2(2009), 213—249. doi: 10.1093/jhmas/jrn058
- Wassmann, Claudia,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Loop’: Carl Georg Lange’s Theory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6 (2009), 974—990. doi: 10.1080/02699930903052744
- Wassmann, Claudia, “Emotion into Science: How Our Modern Ideas about Emotion Were Creat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motional Studies (HIST-EX)* [online journal](29 November 2011) <<http://historiadelasemociones.wordpress.com/2011/11/29/emotion-into-science-how-our-modern-ideas-about-emotion-were-created-in-the-nineteenth-century-claudia-wassmann>>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Weinberger, Sharon, “Intent to Deceive? Can the Science of Deception Detection Help to Catch Terrorists?”, *Nature*, 465/7297 (2010), 412—415. doi: 10.1038/465412a
- Winter, Sarah, “Darwin’s Saussure: Biosemiotics and Race in Expression”, *Representations*, 107/1 (2009), 128—161. doi: 10.1525/rep.2009.107.1.128

7 . 人类学

- Abu-Lughod, Lila,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Apffel Marglin, Frédérique, *Wives of the God-King: The Rituals of the Devadasis of Puri*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esnier, Niko, *Literacy, Emotion, and Authority: Reading and Writing on a Polynesian Ato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riggs, Jean L., *Never in Anger: 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D'Andrade, R[oy], and M[ichael] Egan, "The Colors of Emo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1974), 49—63.
- Fajans, Jane, *They Make Themselves: Work and Play among the Baining of Papua New Guine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Feld, Steven,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2nd ed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 Fish, Jonathan S., *Defending the Durkheimian Tradition: Religion, Emotion and Morality* (Aldershot:Ashgate, 2005).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Geertz, Hildred,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 A Study of Javanes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22 (1959), 225—237.
- Grima, Benedicte,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among Paxtun Women: "The Misfortunes which Have Befallen 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 Heider, Karl G., *Landscapes of Emotion: Mapping Three Cultures of Emotion in Indones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apferer, Bruce, "Emotion and Feeling in Sinhalese Healing Rites", *Social Analysis*, 1/1(1979), 153—176.
- Leavitt, John, "The Shapes of Modernity: 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Anthropological Doctrines", *Culture*, 11/1—2 (1991), 29—42.
- Leavitt, John, "Meaning and Feeling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merican Ethnologist*, 23/3 (1996), 514—539.
- Levy, Robert I., *Tahitians: Mind and Experience in the Society Isla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Lindholm, Charles, *Generosity and Jealousy: The Swat Pukhtun of Northern Pakist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Lutz, Catherine A., *Unnatural Emotions: 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Lutz, Catherine A., and Lila Abu-Lughod (eds),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utz, Catherine, and Geoffrey M. White,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 (1986), 405—436.
- Lynch, Owen M. (ed.), *Divine Pass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Lyon, Margot L., “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2 (1995), 244—263.
- Michaels, Alex, and Christoph Wulf (eds), *Emotions in Rituals and Performances* (London,Routledge, 2012).
- Mitchell, Lisa, *Language, Emotion, and Politics in South India: The Making of a Mother Tongu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yers, Fred R., *Pintupi Country, Pintupi Self: Sentiment, Place, and Politics among Western Desert Aborigin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6).
- Needham, Rodney, *Essential Perplexities: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2 May 197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Needham, Rodney, *Circumstantial Delive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Obeyesekere, Gananath, “Depression, Buddhism, and the Work of Culture in Sri Lanka”,in Arthur Kleinman and Byron Good (eds), *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34—152.

Obeyesekere, Gananath, *The Work of Cultur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in Psychoanalysis and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Ramaswamy, Sumathi, *Passions of the Tongue: Language Devotion in Tamil India, 1891—197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Rosaldo, Michelle Z., *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cheper-Hughes, Nancy, and Margaret M. Lock, “The Mindful Body: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1987), 6—41. doi: 10.1525/maq.1987.1.1.02a00020

Schwartz, Susan L., *Rasa: Performing the Divin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Spiro, Melford E., “Ghosts, Ifaluk, and Teleological Functional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4/4 (1952), 497—503.

Straus, Anne S., “Northern Cheyenne Ethnopsychology”, *Ethos*, 5/3 (1977), 326—357.

Urban, Greg, “Ritual Wailing in Amerindian Brazil”,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0/2 (1988), 385—400.

White, Geoffrey M., and Karen Ann Watson-Gegeo, “Disentangling Discourse”, in Karen Ann Watson-Gegeo and Geoffrey M. White (eds), *Disentangling: Conflict Discourse in Pacific Socie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49.

Wikan, Unni, “Managing the Heart to Brighten Face and Soul: Emotions in Balinese Morality and Health Ca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1989), 294—312.

Wikan, Unni, *Managing Turbulent Hearts: A Balinese Formula for Liv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Adolphs, Ralph, “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Social Neuroscience”, *Neuron*, 65 (2010), 752—767. doi: 10.1016/j.neuron.2010.03.006
- Adolphs, Ralph, Hanna Damasio, Daniel Tranel, and Antonio R. Damasio, “Cortical System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Emotion in Facial Expressio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6/23 (1996), 7678—7687.
- Adolphs, Ralph, Daniel Tranel, Hanna Damasio, and Antonio R. Damasio, “Fear and the Human Amygdal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5/9 (1995), 5879—5891.
- Aggleton, John P. (ed.), *The Amygdala: A Functional Analysis*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rnold, Magda B.,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i. *Psychological A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Arnold, Magda B., and John A. Gasson, “Feelings and Emotions as Dynamic Factors in Personality Integration”, in Arnold and Gasson (eds), *The Human Person: An Approach to an Integr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4), 294—313.
- Aziz-Zadeh, Lisa, Stephen M. Wilson, Giacomo Rizzolatti, and Marco Iacoboni, “Congruent Embodied Representations for Visually Presented Actions and Linguistic Phrases Describing Actions”, *Current Biology*, 16/18 (2006), 1818—1823. doi: 10.1016/j.cub.2006.07.060
- Barnett, Douglas, and Hilary Horn Ratner,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67/3(1997), 303—316. doi: 10.1006/jecp.1997.2417
- Battaglia, Fortunato, Sarah H. Lisanby, and David Freedberg, “Corticomotor Excitability during Observ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a Work of Art”,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5(2011), 79: 1—6. doi: 10.3389/fnhum.2011.00079
- Bechara, Antoine, Antonio R. Damasio, Hanna Damasio, and Steven

- W. Anderson, "Insensitivity to Future Consequences Following Damage to Human Prefrontal Cortex", *Cognition*, 50/1—3 (1994), 7—15. doi: 10.1016/0010-0277(94)90018-3
- Bennett, Craig M., Abigail A. Baird, Michael B. Miller, and George L. Wolford, "Neural Correlates of Interspecies Perspective Taking in the Post-Mortem Atlantic Salmon: An Argument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Correction", *Journal of Serendipitous and Unexpected Results*, 1/1 (2010), 1—5.
- Berntson, Gary G., and John T. Cacioppo (eds), *Handbook of Neuroscience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i (Hoboken, NJ: Wiley, 2009).
- Buchwalter, Ben, "Forget Your 'Junk': The TSA Wants to Feel Up your Mind", *Mother Jones* (2 February 2011)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1/02/tsa-spot-scan-paul-ekman>> accessed 7 March 2014.
- Calvo-Merino, B., D. E. Glaser, J. Grezes, R. E. Passingham, and P. Haggard, "Action Observation and Acquired Motor Skills: An fMRI Study with Expert Dancers", *Cerebral Cortex*, 15/8 (2005), 1243—1249. doi:10.1093/cercor/bhi007
- Cannon, Walter B., "The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 Alternativ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1—4 (1927), 106—124. doi:10.2307/1415404
- Cannon, Walter B., "Again the James-Lange and the Thalamic Theories of Emo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38/4 (1931), 281—295. doi: 10.1037/h0072957
- Cornelius, Randolph R., *The Science of Emotion: Research and Tradi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6).
- Curtis, Valerie, *Don't Look, Don't Touch, Don't Eat: The Science Behind Revul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Dalgleish, Tim, Barnaby D. Dunn, and Dean Mobbs,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motion Review*, 1/4

- Damasio, Antonio R.,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Putnam, 1994).
- Damasio, Antonio R.,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9).
- Damasio, Antonio R., *Looking for Spinoza: Joy, Sorrow, and the Feeling Brain* (Orlando, FL:Harcourt, 2003).
- Damasio, Antonio R., Ralph Adolphs, and H. Damasio,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esion Method to the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Emotion”, in Richard J. Davidson, Klaus R. Scherer, and H. Hill Goldsmith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6—92.
- Damasio, Hanna, Thomas Grabowski, Randall Frank, Albert M. Galaburda, and Antonio R. Damasio, “The Return of Phineas Gage: Clues about the Brain from the Skull of a Famous Patient”, *Science*, 264/5162 (1994), 1102—1105. doi: 10.1126/science.8178168
- Dapretto, Mirella, Mari S. Davies, Jennifer H. Pfeifer, Ashley A. Scott, Marian Sigman,Susan Y. Bookheimer, and Marco Iacoboni, “Understanding Emotions in Others:Mirror Neuron Dys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Nature Neuroscience*, 9/1 (2006), 28—30. doi: 10.1038/nn1611
- Darwin, Charl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1872).
- Darwin, Charl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with an introduction,afterword, and commentaries by Paul Ekman (3r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avidson, Richard J., “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 Correctives from Affective Neuroscience”, *Brain and Cognition*, 52/1 (2003), 129—132. doi:10.1016/S0278-2626(03)00015-0
- Dinstein, Ilan, Justin L. Gardner, Mehrdad Jazayeri, and David J. Heeger, “Executed and Observed Movements Have Different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in Human aIP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8/44 (2008), 11231—11239. doi: 10.1523/JNEUROSCI.3585-08.2008

Dinstein, Ilan, Cibu Thomas, Marlene Behrmann, and David J. Heeger, “A Mirror Up to Nature”, *Current Biology*, 18/1 (2008), R13—R18. doi: 10.1016/j.cub.2007.11.004

Dunn, Barnaby D., Tim Dalgleish, and Andrew D. Lawrence,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A Critical Evaluatio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0/2 (2006), 239—271. doi:10.1016/j.neubiorev.2005.07.001

Edwards, Derek, “Emotion Discourse”, *Culture & Psychology*, 5/3 (1999), 271—291. doi:10.1177/1354067X9953001

Ekman, Paul, “A Life’s Pursuit”, in 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iker-Sebeok (eds), *The Semiotic Web 19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7), 3—45.

Ekman, Paul, “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6/3—4 (1992), 169—200. doi: 10.1080/02699939208411068

Ekman, Paul, “Basic Emotions”, in Tim Dalgleish and Mick J. Power (eds),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Chichester: Wiley, 1999), 45—60. doi: 10.1002/0470013494. ch3

Ekman, Paul (ed.), *Darwi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eview* (Los Altos, CA:Malor Books, 2006).

Ekman, Paul, “How to Spot a Terrorist on the Fly”, *Washington Post* (29 October 2006), B03.

Ekman, Paul, and Richard J. Davidson (eds), *The Nature of Emoti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kman, Paul, Wallace V. Friesen, and Phoebe Ellsworth, *Emotions in the Human Face: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an Integration of Finding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2).

Ekman, Paul, E. Richard Sorenson, and Wallace V. Friesen, “Pan-Cultural Elements in Facial Displays of Emotion”, *Science*,

- Fabbri-Destro, Maddalena, and Giacomo Rizzolatti, “Mirror Neurons and Mirror Systems in Monkeys and Humans”, *Physiology*, 23/3 (2008), 171—179. doi: 10.1152/physiol.00004.2008
- Fadiga, L., L. Fogassi, G. Pavesi, and G. Rizzolatti, “Motor Facilitation during Action Observation: A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73/6 (1995), 2608—2611.
- Frank, Robert H.,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 Fridlund, Alan J., *Human Facial Expression: An Evolutionary View*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4).
- Frijda, Nico H., *The Emotions, Studies in Emo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allese, Vittorio, Luciano Fadiga, Leonardo Fogassi, and Giacomo Rizzolatti, “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 *Brain*, 119/2 (1996), 593—609. doi: 10.1093/brain/119.2.593
- Gallese, Vittorio, Morton Ann Gernsbacher, Cecilia Heyes, Gregory Hickok, and Marco Iacoboni, “Mirror Neuron Forum”,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4 (2011), 369—407. doi: 10.1177/1745691611413392
- Gallese, Vittorio, and Alvin Goldman, “Mirror Neurons and the Simulation Theory of Mind-Read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2 (1998), 493—501. doi: 10.1016/S1364-6613(98)01262-5
- Gigerenzer, Gerd,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Viking, 2007).
- Gigerenzer, G[erd] and R. Selten (eds),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Cambridge,MA: MIT Press, 2001).
- Goleman, Danie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 Gross, James J., “The Future’s So Bright, I Gotta Wear Shades”, *Emotion Review*, 2/3 (2010), 212—216. doi:

- Guttmann, Giseler, and Inge Scholz-Strasser (eds), *Freud and the Neurosciences: From Brain Research to the Unconscious*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8).
- Habermas, Tilmann, Michaela Meier, and Barbara Mukhtar, “Are Specific Emotions Narrated Differently?”, *Emotion*, 9/6 (2009), 751—762. doi: 10.1037/a0018002
- Habermas, Tilmann, and Nadine Berger, “Retelling Everyday Emotional Events: Condensation, Distancing, and Closur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2 (2011), 206—219. doi:10.1080/02699931003783568
- Habermas, Tilmann, and Verena Diel,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Loss Narratives: Event Severity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s”, *Emotion*, 10/10 (2010), 312—323. doi: 10.1037/a0018001
- Herz, Rachel, *That’s Disgusting: Unraveling the Mysteries of Repulsion* (New York: Norton, 2012).
- Hickok, Gregory, and Marc Hauser, “(Mis)understanding Mirror Neurons”, *Current Biology*, 20/14 (2010), R593—R594. doi: 10.1016/j.cub.2010.05.047
- Hillman, James, *Emotion: A Comprehensive Phenomenology of Theories and Their Meaning for Therapy*(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 Iacoboni, Marco, *Mirroring Peopl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Ishizu, Tomohiro, and Semir Zeki, “Toward a Brain-Based Theory of Beauty”, *PLoS ONE*, 6/7 (2011), e21852: 1—10. doi: 10.1371/journal.pone.0021852
- Jack, Rachael E., Oliver G. B. Garrod, Hui Yu, Roberto Caldara, and Philippe G. Schyns,“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Are Not Culturally Univers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9 (2012), 7241—7244. doi: 10.1073/pnas.1200155109

- Jackson, J. Hughlings, "The Croonian Lectures on Evolution and Dissolu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Lecture II",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1214 (1884), 660—663. doi:10.1136/bmj.1.1214.660
- James, William, "What Is an Emotion?", *Mind*, 9/34 (1884), 188—205.
- Johnstone, Tom, Carien M. van Reekum, Terrence R. Oakes, and Richard J. Davidson, "The Voice of Emotion: An fMRI Study of Neural Responses to Angry and Happy Vocal Expressio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3 (2006), 242—249. doi: 10.1093/scan/nsl027
- Kagan, Jerome, *What Is Emotion? History, Measures, and Mean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Kandel, Eric R., *Psychiatr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New Biology of Mind*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05).
- Keltner, Dacher, Keith Oatley, and Jennifer M. Jenkins, *Understanding Emotions* (3rd edn, Cambridge, MA: Wiley, 2013).
- Keysers, Christian, and Valeria Gazzola, "Social Neuroscience: Mirror Neurons Recorded in Humans", *Current Biology*, 20/8 (2010), R353—R354. doi: 10.1016/j.cub.2010.03.013
- Kleinginna Jun., Paul R., and Anne M. Kleinginna, "A Categorized List of Emotion Definitions, with Suggestions for a Consensual Defini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5/4(1981), 345—379. doi: 10.1007/BF00992553
- LaBar, Kevin S., and Roberto Cabez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Emotional Memor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7/1 (2006), 54—64. doi: 10.1038/nrn1825
- Lange, Carl Georg, "The Emotions: A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trans. Istar A. Haupt from the authorized German translation of H. Kurella, in Carl Georg Lange and William James, *The Emotions*, i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22), 33—90. [Da. orig., *Om Sindsbevægelser* (1885)]. doi: 10.1037/10735-002
- Lazarus, Richard 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 and

-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9 (1982), 1019—1024. doi: 10.1037/0003-066X.37.9.1019
- LeDoux, Joseph E., “Emotion, Memory and the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70/6 (1994), 50—56. doi: 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694-50
- LeDoux, Joseph E.,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Lehrer, Jonah,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Boston: Mifflin, 2007).
- Levenson, Robert W., Paul Ekman, Karl Heider, and Wallace V. Friesen, “Emotion and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ctivity in the Minangkabau of West Sumatr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6 (1992), 972—988. doi: 10.1037/0022-3514.62.6.972
- Lewis, Michael, Jeannette M. Haviland-Jones, and Lisa Feldman Barrett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3rd ed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 Logothetis, Nikos K.,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not Do with fMRI”, *Nature*, 453/7197 (2008), 869—878. doi: 10.1038/nature06976
- Lövdén, Martin, Lars Bäckman, Ulman Lindenberger, Sabine Schaefer, and Florian Schmiedek,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Adult Cognitive Plastic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4 (2010), 659—676. doi: 10.1037/a0020080
- McCosh, James, *The Emo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0).
- McGinn, Colin, *The Meaning of Disgu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cIntosh, Anthony Randal, “From Location to Integration: How Neural Interactions Form the Basis for Human Cognition”, in Endel Tulving (ed.), *Memo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The Tallinn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2000), 346—362.

- McRae, Kateri, Kevin N. Ochsner, Iris B. Mauss, John J. D. Gabrieli, and James J. Gross,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1/2 (2008), 143—162. doi: 10.1177/1368430207088035
- Matthews, Gerald, Moshe Zeidner, and Richard D. Rober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My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 Mead, Margaret, "Margaret Mead Calls 'Discipline-Centric' Approach to Research an 'Example of the Appalling State of the Human Sciences'", review of Paul Ekman (ed.), *Darwin and Facial Expression: A Century of Research in Re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3),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1 (1975), 209—213. doi: 10.1111/j.1460-2466.1975.tb00574.x
- Mesquita, Batja, Lisa Feldman Barrett, and Eliot R. Smith (eds), *The Mind in Contex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 Mills, Charles K., "The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Emot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Points in the General Nervous Mechanism of Ex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Organic Nervous Disease and Insan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edico-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1912), 297—300.
- Mosso, Angelo, *Fear*, trans. E. Lough and F. Kiesow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6). [It. orig., *La paura* (1884; 5th edn, 1892)].
- Mouras, H., S. Stoléry, V. Moulier, M. Péligrini-Issac, R. Rouxel, B. Grandjean, D. Glutron, and J. Bittoun, "Activation of Mirror-Neuron System by Erotic Video Clips Predicts Degree of Induced Erection: An fMRI Study", *NeuroImage*, 42/3 (2008), 1142—1150. doi:10.1016/j.neuroimage.2008.05.051
- Mukamel, Roy, Arne D. Ekstrom, Jonas Kaplan, Marco Iacoboni, and Itzhak Fried, "Single-Neuron Responses in Humans during Execution and Observation of Actions", *Current Biology*, 20/8 (2010), 750—756. doi: 10.1016/j.cub.2010.02.045
- Nauta, Walle J. H., "The Problem of the Frontal Lobe: A

-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8/3—4 (1971), 167—187. doi: 10.1016/0022-3956(71)90017-3
- Niedenthal, Paula M., Silvia Krauth-Gruber, and François Ric, *Psychology of Emotion: Interpersonal, Experiential,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 Oatley, Keith, *Emotions: A Brief Histor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 Ohira, Hideki, "The Somatic Marker Revisited: Brain and Body in Emotional Decision Making", *Emotion Review*, 2/3 (2010), 245—249. doi: 10.1177/1754073910362599
- Ortony, Andrew, Gerald L. Clore, and Allan Collins,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anksepp, Jaak,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anksepp, Jaak, and Lucy Biven,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2012).
- Parkinson, Brian, Agneta H. Fischer, and Antony S. R. Manstead, *Emotion in Social Relations: Cultural, Group,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5).
- Pessoa, Luiz, "Emergent Processes in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actions",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2/4 (2010), 433—448.
- Pessoa, Luiz, "Emotion and Cognition and the Amygdala: From 'What Is It?' to 'What's to Be Done?'", *Neuropsychologia*, 48/12 (2010), 3416—3429. doi: 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0.06.038
- Pessoa, Luiz, and Ralph Adolphs, "Emotion Processing and the Amygdala: From a 'Low Road' to 'Many Roads' of Evaluating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11 (2010), 773—782. doi: 10.1038/nrn2920
- Plutchik, Robert, *The Emotions: Facts, Theories and a New Mod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Plutchik, Robert, *Emotion: A Psychoevolutionary Synthe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 Raichle, Marcus E., Ann Mary MacLeod, Abraham Z. Snyder, William J. Powers, Debra A. Gusnard, and Gordon L. Shulman,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2 (2001), 676—682. doi: 10.1073/pnas.98.2.676
- Raichle, Marcus E., and Abraham Z. Snyder,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an Evolving Idea”, *NeuroImage*, 37/4 (2007), 1083—1090. doi: 10.1016/j.neuro-image.2007.02.041
- Ramachandran, Vilayanur S., “Mirror Neurons and Imitation Learn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uman Evolution”, *Edge* (31 May 2000) <<http://edge.org/conversation/mirror-neurons-and-imitation-learning-as-the-driving-force-behind-the-great-leap-forward-in-human-evolution>>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Ramachandran, Vilayanur S., “Mirror Neurons and the Brain in the Vat”, *Edge* (9 January 2006) <<http://edge.org/conversation/mirror-neurons-and-the-brain-in-the-vat>>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Reimann, Martin, and Antoine Bechara, “The Somatic Marker Framework as a Neurological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Review, Conceptual Comparisons, and Future Neuro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5 (2010), 767—776. doi: 10.1016/j.joep.2010.03.002
- Renier, Laurent A., Irina Anurova, Anne G. De Volder, Synnöve Carlson, John VanMeter, and Josef P. Rauschecker, “Preserved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for Spatial Processing in the Middle Occipital Gyrus of the Early Blind”, *Neuron*, 68/1 (2010), 138—148. doi:10.1016/j.neuron.2010.09.021
- Rimmele, Ulrike, Lila Davachi, Radoslav Petrov, Sonya Dougal, and Elizabeth A. Phelps, “Emotion Enhances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Remembering, Despite Lower Accuracy for Contextual Details”,

- Rizzolatti, Giacomo, and Laila Craighero,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2004), 169—192. doi: 10.1146/annurev.neuro.27.070203.144230
- Rizzolatti, G[iacomo], L. Fadiga, L. Fogassi, and V. Gallese, “Resonance Behaviors and Mirror Neurons”, *Archives italiennes de biologie: 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37/2—3 (1999), 85—100.
- Rizzolatti, Giacomo, L. Fadiga, Vittorio Gallese, and Leonardo Fogassi, “Premotor Cortex and the Recognition of Motor Action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3/2 (1996), 131—141. doi:10.1016/0926-6410(95)00038-0
- Röttger-Rössler, Birgitt, and Hans J. Markowitsch (eds), *Emotions as Bio-Cultural Processes* (New York: Springer, 2009).
- Ruckmick, Christian Alban, *The Psychology of Feeling and Emo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 Russell, James A., “Core Affect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1 (2003), 145—172. doi: 10.1037/0033-295X.110.1.145
- Sackeim, Harold A., and Ruben C. Gur, “Lateral Asymmetry in Intensit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Neuropsychologia*, 16/4 (1978), 473—481. doi: 10.1016/0028-3932(78) 90070-2
- Sackeim, Harold A., Ruben C. Gur, and Marcel C. Saucy, “Emotions are Expressed More Intense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ace”, *Science*, 202/4366 (1978), 434—436. doi: 10.1126/science.705335
- Salovey, Peter, and John D. May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3 (1989—1990), 185—211. doi: 10.2190/DUGG-P24E-52WK-6CDG
- Sander, David,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motion and the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chachter, Stanley,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 Stat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 (1964), 49—80. doi: 10.1016/S0065-2601(08)60048-9

Schachter, Stanley, and Jerome E. Singer,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Psychological Review*, 69/5 (1962), 379—399. doi:10.1037/h0046234

Schauer, Maggie, Frank Neuner, and Thomas Elbert, *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A Short-Term Treatment for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2nd rev. and enl. edn, Cambridge, MA: Hogrefe, 2011).

Scherer, Klaus R., Angela Schorr, and Tom Johnstone (eds), *Appraisal Processes in Emotion: Theory, Methods,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cherer, Klaus R., Harald G. Wallbott, and Angela B. Summerfield (eds), *Experiencing Emotion: A Cross-Cultural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chmitt, William A., Chad A. Brinkley, and Joseph P. Newman, “Testing Damasio’s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with Psychopathic Individuals: Risk Takers or Risk Aver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8/3 (1999), 538—543. doi: 10.1037/0021-843X.108.3.538

Schoenbaum, Geoffrey, Andrea A. Chiba, and Michela Gallagher, “Neural Encoding in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during Olfactory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9/5 (1999), 1876—1884.

Schwartz, Gary E., Geoffrey L. Ahern, and Serena-Lynn Brown, “Lateralized Facial Muscle Response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Psychophysiology*, 16/6(1979), 561—571. doi: 10.1111/j.1469-8986.1979.tb01521.x

Schwartz, Gary E., Richard J. Davidson, and Foster Maer, “Right Hemisphere Lateralization from Emotion in the Human Brain: Interactions with Cognition”, *Science*, 190/4211 (1975), 286—288. doi: 10.1126/science.1179210

- Scripture, E. W., “Detection of the Emotions by the Galvanometer”, *JA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50/15 (1908), 1164—1165. doi: 10.1001/jama.1908.25310410004001a
- Shulman, Gordon L., Julie A. Fiez, Maurizio Corbetta, Randy L. Buckner, Francis M. Miezin, Marcus E. Raichle, and Steven E. Petersen, “Common Blood Flow Changes across Visual Tasks: II. Decreases in Cerebral Cortex”,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9/5(1997), 648—663. doi: 10.1162/jocn.1997.9.5.648
- Slater, Mel, Angus Antley, Adam Davison, David Swapp, Christoph Guger, Chris Barker, Nancy Pistrang, and Maria V. Sanchez-Vives, “A Virtual Reprise of the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s”, *PLoS ONE*, 1/1 (2006), e39. doi: 10.1371/journal.pone.0000039
- Solms, Mark, and Edward Nersessian, “Freud’s Theory of Affect: Questions for Neuroscience”, *Neuro-Psychoanalysis*, 1/1 (1999), 5—14.
- Spreng, R. Nathan, Raymond A. Mar, and Alice S. N. Kim, “The Common Neural Basi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ropection, Naviga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Default Mode: A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3 (2009), 489—510. doi: 10.1162/jocn.2008.21029
- Strongman, K. T.,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From Everyday Life to Theory* (5th edn, Chichester:Wiley, 2003).
- Swanson, Larry W., and Gorica D. Petrovich, “What Is the Amygdala?”,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21/8 (1998), 323—331. doi: 10.1016/S0166-2236(98)01265-X
- Tomkins, Silvan S., *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 i. *The Positive Affects* (New York: Springer, 1962).
- Verdejo-García, Antonio, Antoine Bechara, Emily C. Recknor, and Miguel Pérez-García, “Executive Dysfunction in Substance Dependent Individuals during Drug Use and Abstinen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rrelates of Addict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logical Society, 12/3 (2006), 405—415.
doi:10.1017/S1355617706060486

Vul, Edward, Christine Harris, Piotr Winkielman, and Harold Pashler, “Puzzlingly High Correlations in fMRI Studies of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 (2009), 274—290. doi: 10.1111/j.1745-6924.2009.01125.x

Wardle, Margaret C., Raul Gonzalez, Antoine Bechara, and Eileen M. Martin-Thormeyer, “Iowa Gambling Task Performance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teract to Predict Risky Sexual Behavior in Individuals with Dual Substance and HIV Diagnoses”,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32/10 (2010), 1110—1121. doi:10.1080/13803391003757833

Wegner, Daniel M., *White Bears and Other Unwanted Thoughts: Suppression, Obsess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Mental Control* (New York: Viking, 1989).

Wegner, Daniel M., “Ironic Processes of Ment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1/1 (1994), 34—52. doi: 10.1037/0033-295X.101.1.34

Xu, Xiaojing, Xiangyu Zuo, Xiaoying Wang, and Shihui Han, “Do You Feel My Pain? Racial Group Membership Modulates 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9/26 (2009), 8525—8529. doi: 10.1523/JNEUROSCI.2418-09.2009

Yovell, Yoram, “Is There a Drive to Love?”, *Neuro-Psychoanalysis*, 10/2 (2008), 117—144.

Zajonc, R. B.,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980), 151—175. doi: 10.1037/0003-066X.35.2.151

Zuckerman, Marvin, and D. Michael Kuhlman, “Personality and Risk-Taking: Common Biosocial Fac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6 (2000), 999—1029. doi: 10.1111/1467-6494.00124

9 . 哲学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trans. with introd.,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George A. Kenn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r. orig., Τέχνη ρητορική].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 and trans. R. 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Lat. orig., *De civitate dei* (426)].

Bagnoli, Carla (ed.), *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raund, Susanna Morton, and Christopher Gill (eds), *The Passions in Rom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Brown, Wendy, *Regulating Aversion: Toleran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and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Brunschwig, Jacques, and Martha C. Nussbaum (eds), *Passions and Perceptions: Studies in Hellenistic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Byers, Sarah Catherine, *Perception, Sensibility and Moral Motivation in Augustine: A Stoic-Platonic Synthe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olish, Marcia L., *The Stoic Tradition from Antiquity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2 vol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34 and 35 (Leiden: Brill, 1985).

Cooper, John M., *Reason and Emotion: Essays on Ancient Moral Psychology and Eth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Cottingham, John,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Reason and the Passions in Greek, Cartesian and Psychoanalytic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ttingham, John, "Sceptical Detachment or Loving Submission to the Good? Reason, Faith, and the Passions in Descartes", *Faith and Philosophy*, 28/1 (2011), 44—53. doi:10.5840/faithphil201128115

Descartes, René,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trans. Stephen M. Vos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Fr. orig., *Les Passions de l'âme* (1649)].

de Sousa, Ronald,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Fitterer, Robert J., *Love and Objectivity in Virtue Ethics: Aristotle, Lonergan, and Nussbaum on Emotions and Moral Insi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Fortenbaugh, William W., *Aristotle on Emotion: A Contribution to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Rhetoric, Poetics, Politics and Ethics* (2nd edn, London: Duckworth, 2002).

Gardiner, H. M. [sic Harry Norman], Ruth Clark Metcalf, and John G. Beebe-Center, *Feeling and Emotion: A History of Theori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7).

Goldie, Peter,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xford: Clarendon, 2000).

Goldie, Pet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raver, Margaret R., *Stoicism and Emo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Harris, William V., *Restraining Rage: The Ideology of Anger Control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ng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 3 vols (London: John Noon/Thomas Longman, 1739—1740).

James, Susan, *Passion and Action: The Emo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Kant, Immanuel, "The Contest of Faculties", trans. H. B. Nisbe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76—190 [Ger. orig.,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1798)].

- Kant, Immanuel,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and ed. Mary Greg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Ger. orig.,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97)].
- Kelly, Daniel, *Yuck!: The Nature and Moral Significance of Disgus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 Kenny, Anthony, *Action, Emotion and Will* (London: Routledge & Paul, 1963).
- Keppler, Jan Horst, *Adam Smith and the Economy of the Pass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0).
- Knuuttila, Simo, *Emo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 Kolnai, Aurel, *On Disgust*, ed. Barry Smith and Carolyn Korsmey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4).
- Konstan, David, *Pity Transformed* (London: Duckworth, 2001).
- Konstan, David, *The Emo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Studies in Aristotle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 Konstan, David, *Before Forgiveness: The Origins of a Moral Id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Konstan, David, and N. Keith Rutter (eds), *Envy, Spite and Jealousy: The Rivalrous Emotions in Ancient Gree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orsmeyer, Carolyn, *Savoring Disgust: The Foul and the Fair in Aesthe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agerlund, Henrik, and Mikko Yrjönsuuri (eds), *Emotions and Choice from Boethius to Descart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 Lamb, Jonathan, *The Evolution of Sympath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9).
- Levi, Anthony, *French Moralists: The Theory of the Passions, 1585 to 16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 Lombardo, Nicholas E., *The Logic of Desire: Aquinas on Emoti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2011).
- Meyer, Michael, *Philosophy and the Passions: Toward a History of Human Natur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iner, Robert, *Thomas Aquinas on the Passions: A Study of Summa Theologiae 1a2ae 22—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isselhorn, Catrin, “Empathy and Dyspathy with Androids: Philosophical, Fiction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Konturen*, 2 (2009), 101—123 <http://konturen.uoregon.edu/vol2_Misselhorn.html> accessed 5 December 2013.
- Misselhorn, Catrin, “Empathy with Inanimate Objects and the Uncanny Valley”, *Mind and Machines*, 19/3 (2009), 345—359. doi: 10.1007/s11023-009-9158-2
- Mori, Masahiro, “The Uncanny Valley”, trans. Karl F. MacDorman and Norri Kageki,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19/2 (2012), 98—100 [Jap. orig., “Bukimi no tani”(1970)]. doi: 10.1109/MRA.2012.2192811
- Noë, Alva, *Out of Our Heads: Why You Are Not Your Brain, and Other Lessons from the Biolog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9).
- Nussbaum, Martha C.,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Nussbaum, Martha C.,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ussbaum, Martha C.,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Roberts, Robert C., *Emotions: An Essay in Aid of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Rorty, Amélie Oksenberg, “Structuring Rhetoric”, in Amélie Oksenberg

- Rorty (ed.), *Essays on Aristotle's Rhetor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33.
- Rousseau, Jean-Jacques, “J. J. Rousseau, Citizen of Geneva, to M. d’Alembert: Letter to d’Alembert on the Theater”, in *Letter to d’Alembert and Writings for the Theater*, trans. and ed. Allan Bloom, Charles Butterworth, and Christopher Kelly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4), 251—352.
- Rousseau, Jean-Jacques, *Émile, or, On Education (Includes Émile and Sophie, or, The Solitaries)*, trans. and ed. Christopher Kelly, and Allan Bloom (Lebanon,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10) [Fr. orig.,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
- Solomon, Robert C., *The Passions: Emo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3).
- Solomon, Robert C., *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orabji, Richard, *Emotion and Peace of Mind: From Stoic Agitation to Christian Temptation: The Gifford Le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pinoza, Baruch de, “Ethics”, in *Spinoza: Complete Works*, ed. Michael L. Morgan, trans. Samuel Shi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2), 213—382 [Lat. orig.,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1674)].
- Starr, G. A., “Egalitarian and Elitist Implications of Sensibility”, in Leon Ingber (ed.), *L’Égalité* (Brussels: Bruylant, 1984), 126—135.
- Terada, Rei, *Feeling in Theory: Emotion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 文学及视学研究

- Ahern, Stephen, *Affect and Abolition in the Anglo-Atlantic, 1770—1830* (Farnham: Ashgate, 2013).
- Baum, Joan, *Mind-Forg’d Manacles: Slavery and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s* (North Haven, CT: Archon, 1994).

- Bell, Michael, *Sentimentalism, Ethics, and the Culture of Feeling*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0).
- Berlant, Lauren, “Poor Eliza”, *American Literature*, 70/3 (1998), 635—668. doi: 10.2307/2902712
- Berlant, Lauren, *The Female Complaint: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entiment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Braund Susanna, and Glenn W. Most (eds), *Ancient Anger: Perspectives from Homer to Galen*, Yale Classical Studies 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urgett, Bruce, *Sentimental Bodies: Sex,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 the Early Republic*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urnham, Michelle, “Between England and America: Captivity, Sympathy,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 in Deidre Lynch and William B. Warner (eds),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the Nove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7—72.
- Burnham, Michelle, *Captivity and Sentiment: Cultural Exchang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682—1861*(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7).
- Cairns, Douglas L., *Aidōs: The Psychology and Ethics of Honour and Shame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Cairns, Douglas L., “Hybris, Dishonour, and Thinking Big”,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6(1996), 1—32. doi: 10.2307/631953
- Cairns, D[ouglas] L., “Anger and the Veil in Ancient Greek Culture”, *Greece & Rome*, 48/1(2001), 18—32. doi: 10.1093/gr/48.1.18
- Cairns, Douglas [L.], “Look Both Ways: Studying Emotion in Ancient Greek”, *Critical Quarterly*, 50/4 (2008), 43—62. doi: 10.1111/j.1467-8705.2008.00853.x
- Carey, Brycchan, *British Abolitionism and the Rhetoric of Sensibility: Writing, Sentiment, and Slavery, 1760—1807*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5).

- Carretta, Vincent, and Philip Gould (eds), *Genius in Bondage: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Black Atlantic*(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 Chandler, James, *An Archaeology of Sympathy: The Sentimental Mode in Literature and Cinem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Cohen, Margaret, “Sentimental Communities”, in Margaret Cohen and Carolyn Dever (eds),*The Literary Channel: Th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of the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6—132.
- Coleman, Patrick, *Anger, Gratitude, and the Enlightenment Wri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vetkovich, Ann, *Mixed Feelings: Feminism, Mass Culture, and Victorian Sens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enby, David J., *Sentimental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France, 1760—1820*, Cambridge Studies in French 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ickey, Stephanie S., and Herman Roodenburg (eds), *The Passions in the Arts of the Early Modern Netherlands* (Zwolle: Waanders, 2010).
- Dyson, Michael Eric, *Pride: The Seven Deadly S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llis, Markman, *The Politics of Sensibility: Race, Gender and Commerce in the Sentimental Nov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llison, Julie, *Cato’s Tears and the Making of Anglo-American Emo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Faflak, Joel, and Richard C. Sha (eds), *Romanticism and the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Festa, Lynn, *Sentimental Figures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Fra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Fisher, Philip, *The Vehement Pa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Fitzgerald, John T. (ed.), *Passions and Moral Progress in Greco-Roman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2008).
- Fögen, Thorsten (ed.), *Tears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Berlin: de Gruyter, 2009).
- Freedberg, David, “Memory in Art: History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Response”, in Suzanne Nalbantian, Paul M. Matthews, and James L. McClelland (eds), *The Memory Process: Neuro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337—358.
- Freedberg, David, and Vittorio Gallese, “Motion, Emotion and Empathy in Esthetic Experi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5 (2007), 197—203. doi: 10.1016/j.tics.2007.02.003
- Gottlieb, Evan, *Feeling British: Sympat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cottish and English Writing, 1707—1832*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Gross, Daniel M., *The Secret History of Emotion: From Aristotle’s Rhetoric to Modern Brain Sci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Gross, Daniel M., “Defending the Humanities with Charles Darwi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 *Critical Inquiry*, 37/1 (2010), 34—59. doi:10.1086/656468
- Hagstrum, Jean H., *Sex and Sensibility: Ideal and Erotic Love from Milton to Mozar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Halttunen, Karen,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rnography of Pain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2 (1995), 303—334.
- Hemmings, Clare, “In the Mood for Revolution: Emma Goldman’s Pass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43/3 (2012), 527—545. doi: 10.1353/nlh.2012.0030
- Hendler, Glenn, “The Structure of Sentimental Experience”, *Yale*

- Hendler, Glenn, *Public Sentiments: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 Hinton, Laura, *The Perverse Gaze of Sympathy: Sadomasochistic Sentiments from Clarissa to Rescue 911*(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 Juneja, Monica, “Translating the Body into Image: The Body Politic and Visual Practice at the Mughal Court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Axel Michaels and Christoph Wulf (eds), *Images of the Body in India* (London: Routledge, 2011), 235—260.
- Kanerva, K. T., “Ógæfa as an Emotion in Thirteenth Century Iceland”, *Scandinavian Studies*, 84/1 (2012), 1—26.
- Kaster, Robert A., *Emotion, Restraint,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Ro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eBrun, [Charles], *A Method to Learn to Design the Passions: Proposed in a Conference on the General and Particular Expression: Written in English, and Illustrated with a Great Many Figures Excellently Designed by M. Le Brun, Chief Painter to the French King,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ranslated and all the Designs Engraved on Copper by, John Williams*(London: n.p., 1734).
- Levecq, Christine, *Slavery and Sentiment: The Politics of Feeling in Black Atlantic Antislavery Writing, 1770—1850* (Durham, NH: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08).
- Menninghaus, Winfried, *Disgust: Theory and History of a Strong Sensation*,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Joel Golb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Ger. orig., *Ekel:Theorie und Geschichte einer starken Empfindung* (1999)].
- Meyer, Richard (ed.), *Representing the Passions: Histories, Bodies, Visions*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3).

- Michaels, Walter Benn, *The Shape of the Signifier: 1967 to the End of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iller, William Ian, "Emotions and the Sagas", in Gísli Pálsson (ed.), *From Sagas to Society: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Early Iceland* (Enfieldlock: Hisarlik Press, 1992), 89—110.
- Miller, William Ian, *Humilia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Honor, Social Discomfort, and Violence*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iller, William Ian, *The Anatomy of Disgu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itchell, Robert [Edward], *Sympathy and the State in the Romantic Era: Systems, State Finance, and the Shadows of Fut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Montagu, Jennifer, *The Epression of the Passions: 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Charles Le Brun's"Conférence sur l'expression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4) (PhD thesis, Warburg Institute, London, 1959).
- Mullan, John, *Sentiment and Sociability: The Language of Feel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8).
- Munteanu, Dana LaCourse (ed.), *Emotion, Gender, and Gen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11).
- Musil, Robert,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2 vols, trans. Sophie Wilkins and Burton Pike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6) [Ger. orig.,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3 vols (1930—1943)].
- Nathans, Heather S., *Slavery and Sentiment on the American Stage, 1787—1861: Lifting the Veil of Bl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Ngai, Sianne,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Onians, John, *Neuroarthistory: From Aristotle and Pliny to Baxandall and Zek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aster, Gail Kern, *Humoring the Body: Emotions and the Shakespearean St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Paster, Gail Kern, Katherine Rowe, and Mary Floyd-Wilson (eds), *Reading the Early Modern Passions: Essay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mo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Pfau, Thomas, *Romantic Moods: Paranoia, Trauma, and Melancholy, 1790—18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inch, Adela, *Strange Fits of Passion: Epistemologies of Emotion, Hume to Austen*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ichardson, Alan, *The Neural Sublime: Cognitive Theories and Romantic Tex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amuels, Shirley (ed.), *The Culture of Sentiment: Race, Gender, and Sentiment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anders, Ed, *Envy and Jealousy in Classical Athens: A 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Santangelo, Paolo, “Emotion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Ming-Qing Period”, *Ming Qing Yanjiu*, 9 (2000), 237—308.
- Shimamura, Arthur P., *Experiencing Art: In the Brain of the Behol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oni, Vivasvan, *Mourning Happiness: Narrative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tarr, G. Gabrielle, *Feeling Beauty: The Neuroscience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 Stern, Julia A., *The Plight of Feeling: Sympathy and Dissent in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Thrailkill, Jane F., *Affecting Fictions: Mind, Body, and Emotion i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Vaught, Jennifer C., *Masculinity and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Women and Gende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ldershot: Ashgate, 2008).

Ward, Candace, *Desire and Disorder: Fevers, Fiction, and Feeling in English Georgian Culture* (Lewisburg,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Wood, Marcus, *Slavery, Empathy, and Porn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Zeki, Semir, *A Vision of the Brain*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93).

Zeki, Semir, *Inner Vision: 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Zeki, Semir, *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the Brain: Love, Creativit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Happiness*(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11 . 文化研究、法律、语言学、政治科学、社会学、神学

Ahmed, Sar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Ahmed, Sara,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bruzzo, Margaret, *Polemical Pain: Slavery, Cruelty, and the Rise of Humanitarianism*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iley, Joanne, *Parenting in England 1760—1830: Emotion, Identity, and Gene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Bandes, Susan A. (ed.), *The Passions of Law*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Barbalet, J[ack] M.,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arbalet, Jack (ed.), *Emotions and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2).

- Barclay, Katie, *Love Intimacy and Power: Marriage and Patriarchy in Scotland, 165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arreto, José-Manuel, “Ethics of Emotions as Ethics of Human Rights: A Jurisprudence of Sympathy in Adorno, Horkheimer and Rorty”, *Law and Critique*, 17/1 (2006), 73—106. doi: 10.1007/s10978-006-0003-y [repr. in Costas Douzinas and C. Perrin (eds), *Critical Legal Theory*, iv. *Critical Legal Themes* (London: Routledge, 2011), no. 56].
- Barreto, José-Manuel, “Rorty and Human Rights: Contingency, Emotions and How to Defend Human Rights Telling Stories”, *Utrecht Law Review*, 7/2 (2011), 93—112.
- 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erendsen, Desiree, “Religious Passions and Emotions: Towards a Stratified Concept of Religious Passions: Robert Solomon versus Thomas Dixon”, in Lieven Boeve, HansGeybels, and Stijn van den Bossche (eds), *Encountering Transcendence: Contributions to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Religious Experience* (Leuven: Peeters, 2005), 201—212.
- Berlant, Lauren (ed.),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Berthomé, François, and Michael Houseman, “Ritual and Emotions: Moving Relations, Patterned Effusions”, *Religion and Society: Advances in Research*, 1 (2010), 57—75. doi:10.3167/arrs.2010.010105
- Boltanski, Luc, *Distant Suffering: Morality,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allahan, Cornelia, *In Good Conscience: Reason and Emotion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1).
- Cates, Diana Fritz, *Aquinas on the Emotions: A Religious-Ethical Inquiry*, Moral Traditional Series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The Affective Turn: Political Economy, Biomedicine and Bod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1 (2008), 1—22. doi: 10.1177/0263276407085156

Clough, Patricia Ticineto, and Jean Halley (eds),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akley, Sarah (ed.), *Faith, Rationality, and the Passion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doi:10.1002/9781118321997

Cochrane, Tom, Bernardino Fantini,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Emotional Power of Music: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usical Arous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Contr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onnolly, William E., *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Connolly, William E., “Materialities of Experience”, in Diana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ed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8—200.

Connolly, William E., “Critical Response I: The Complexity of Intention”, *Critical Inquiry*, 37/4 (2011), 791—798. doi: 10.1086/660993

Connolly, William E., *A World of Becom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orrigan, John, “ ‘ Habits From the Heart’: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us Ideas About Emotion and Habit”, *Journal of Religion*, 73/2 (1993), 183—199.

Corrigan, John, *Business of the Heart: Religion and Emo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Corrigan, John (ed.), *Religion and Emotion: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orrigan, John, "Cognition, Universals and Constructedness: Recent Emotions Research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Willem Lemmens and Walter van Herck (eds), *Religious Emotions: Some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34—47.
- Corrigan, J[oh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Corrigan, John, Eric Crump, and John M. Kloos, *Emotion and Relig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 Corten, André, *Pentecostalism in Brazil: Emotion of the Poor and Theological Romanticism*, trans. Arianne Dorval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Fr. orig., *Le Pentecôtisme au Brésil* (1995)].
- Dalferth, Ingolf U. and Michael Rodgers (eds), *Passion and Passivity: Claremont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1).
- Dixon, Thomas, "Revolting Passions", *Modern Theology*, 27/2 (2011), 298—312. doi: 10.1111/j.1468-0025.2010.01677.x
- Egger-Wenzel, Renate, and Jeremy Corley (eds), *Emotions from Ben Sira to Paul*,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Yearbook 2011 (Berlin: de Gruyter, 2012).
- Elias, Norbert,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trans. Edward Jephcott, ed. Eric Dunning, Johan Goudsblom, and Stephen Mennell (rev. edn, Oxford: Blackwell, 2010) [Ger. orig.,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2 vols (1939)].
- Force, Pierr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Ideas in Context 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ondreau, Paul, *The Passions of Christ's Soul in the The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 (Münster: Aschendorff, 2002).

- González, Ana Marta (ed.), *The Emotions and Cultural Analysis* (Farnham: Asghate, 2012).
- Goodwin, Jeff,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Gould, Deborah B., *Moving Politics: Emotion and ACT UP's Fight against AI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Greco, Monica and Paul Stenner (eds), *Emotions: A Social Scien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8).
- Harding, Jennifer, and E. Deir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9).
- Hardt, Michael,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2 (1999), 89—100.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 Harré, Rom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 Harré, Rom, and W. Gerrod Parrott (eds), *The Emotions: Social,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mens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Hemmings, Clare, "Affective Solidarity: Feminist Reflexiv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eminist Theory*, 13/2 (2012), 147—161.
doi: 10.1177/1464700112442643
- Hesford, Victoria, *Feeling Women's Liber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3 (1979), 551—575.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Introduction: An Emotions Lens on the

World”, in Debra Hopkins, Jochen Kleres, Helena Flam, and Helmut Kuzmics (eds), *Theorizing Emotions: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9), 29—37.

Hoffman, W. Michael, “The Structure and Origin of the Religious Pa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8/1 (1977), 36—50.

Illouz, Eva,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Illouz, Eva,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Illouz, Eva,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Illouz, Eva,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Johnston, Adrian, “The Misfeeling of What Happens: Slavoj Žižek, Antonio Damasio and a Materialist Account of Affects”, *Subjectivity*, 3/1 (2010), 76—100. doi: 10.1057/sub.2009.36

Joyce, Kelly A., *Magnetic Appeal: MRI and the Myth of Transparen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Juslin, Patrik N., and John A. Sloboda (eds), *Handbook of Music and Emotion: Theory, Research,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Kingston, Rebecca, *Public Passion. Rethinking the Grounds for Political Justice*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Kingston, Rebecca, and Leonard Ferry (eds), *Bringing the Passions Back In: The Emotion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Vancouver: UBC Press, 2008).

Kövecses, Zoltán,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akoff, George, and Zoltán Kövecse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Anger Inherent in American English”, in Dorothy Holland and Naomi Quinn (eds),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5—221.
- Layton, Richard A., “Propatheia: Origen and Didymus on the Origin of the Passions”, *Vigiliae Christianae*, 54/3 (2000) 262—282.
- Layton, Richard A., “From ‘Holy Passion’ to Sinful Emotion: Jerome and the Doctrine of Propassio”, in Paul M. Blowers, Angela Russell Christman, David G. Hunter, and Robin Darling Young (eds), *In Dominico Eloquentio—In Lordly Eloquence: Essays on Patristic Exegesis in Honor of Robert Louis Wilke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2), 280—293.
- Lemmings, David, and Ann Brooks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Libby David J., Paul Spickard, and Susan Ditto (eds), *Affect and Power: Essays on Sex, Slavery, Race, and Religion in Appreciation of Winthrop D. Jorda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 Luhmann, Niklas,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 trans. Jeremy Gaines and Doris L.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r. orig., *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1982)].
- Lunt, Peter and Paul Stenner,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as an Emotional Public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1 (2005), 59—81. doi: 10.1177/0163443705049058.
- McNamer, Sarah, *Affective Meditation and the Invention of Medieval Compassion*, Middle Ages Se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 Madell, Geoffrey, *Philosophy, Music and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adigan, Kevin, *The Passions of Christ in High-Medieval Thought: An*

Essay on Christological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golis, Diane Rothbard, *The Fabric of Self: A Theory of Ethics and Emo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ssumi, Brian (ed.), *A Shock to Thought: Expression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 (London: Routledge, 2002).

Massumi, Brian,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oscato, Javier, *Pain: A Cultural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arrott, W. Gerrod, and Rom Harré, “Princess Diana and the Emotionolog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s*, 30/1 (2001), 29—38. doi:10.1023/A:1026649932173

Petersen, Roger D.,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ttigrove, Glen, and Nigel Parsons, “Shame: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Emotions”,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8/3 (2012), 504—530.

Pinker, Steven, *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Norton, 1997).

Protevi, John, *Political Affect: Connecting the Social and the Somatic*, Posthumanities, 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Rai, Amit S., *Rule of Sympathy: Sentiment, Race, and Power, 1750—1850* (New York: Palgrave, 2002).

Reckwitz, Andreas, “Affective Spaces: A Praxeological Outlook”, *Rethinking History*, 16/2(2012), 241—258. doi: 10.1080/13642529.2012.681193

Roberts, Robert C., *Spiritual Emotions: A Psychology of Christian Virtu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 Robin, Corey,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oodenburg, Herman, “ ‘ Si vis me flere ... ’: On Preachers, Passions and Pathos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in Jitse Dijkstra, Justin Kroesen, and Yme Kuiper (eds), *Myths, Martyrs and Modernit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Honour of Jan N. Bremmer* (Leiden: Brill, 2010), 609—628.
- Rubin, Miri, *Emotion and Devotion: The Meaning of Mary in Medieval Religious Culture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cheff, Thomas J.,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Scheff, Thomas J., and Suzanne M. Retzinger, *Emotions and Violence: Shame and Rage in Destructive Conflicts*, Lexington Book Series on Social Theory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1).
- Sedgwick, Eve Kosofsky,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aviro, Steven, *Post-Cinematic Affect*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0).
- Siegel, Marc, *False Alarm: 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5).
- Smith, J. Warren, *Passion and Paradise: Human and Divine Emotion in the Thought of Gregory of Nyssa* (New York: Crossroad, 2004).
- Stets, Jan E., “Future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2/3 (2010), 265—268. doi: 10.1177/1754073910361975
- Stewart, Kathleen, *Ordinary Affec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tump, Eleonore, “The Non-Aristotelian Character of Aquinas’s Ethics: Aquinas on the Passions”, *Faith and Philosophy*, 28/1 (2011), 29—43.
- Sussman, Charlotte, *Consuming Anxieties: Consumer Protest, Gender, and*

British Slavery, 1713—1833(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oits, Peggy A.,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 (1989), 317—342.

Turner, Jonathan H., *Human Emotions: A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Turner, Jonathan H.,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Basic Theoretical Arguments”, *Emotion Review*, 1/4 (2009), 340—354. doi: 10.1177/1754073909338305

Voorwinde, Stephen, *Jesus’ Emotions in the Gospels* (London: T&T Clark, 2011).

Walzer, Michael, *Politics and Passions: Toward a More Egalitarian Liber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rbner, Pnina, and Helene Basu (eds), *Embodying Charisma: Modernity, Local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in Sufi Cults* (London: Routledge, 1998).

Wierzbicka, Ann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olkomir, Michelle, “Emotion Work, Commitment, and the Authentication of the Self: The Case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Support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0/3 (2001), 305—334. doi: 10.1177/089124101030003002

Wulff, Helena (ed.), *The Emotions: A Cultural Reader* (Oxford: Berg, 2007).

Yu, Ning,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2 (1995), 59—92.

Yu, Ning, “Body and Emotion: Body Parts in Chinese Expression of Emotio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1 (2002), 341—367. doi: 10.1075/pc.10.12.14yu

Žižek, Slavoj, “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13/3—4 (2001), 190—198. doi:10.1080/089356901101241875

Žižek, Slavoj, “Some Concluding Notes on Violence, Ide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Subjectivity*, 3/1 (2010), 101—116. doi: 10.1057/sub.2009.34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

图表和图片中出现的，页码以斜体显示；脚注中出现的，会在页码后面标注n。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Hawking) 《时间简史》（霍金）223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Sterne)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斯特恩）294

A World of Becoming (Connolly) 《演化的世界》（康诺利）233—236

Abu Ghraib 阿布格莱布监狱 230

Abu-Lughod, Ibrahim 易卜拉欣·阿布-卢赫德 102—103

Abu-Lughod, Janet Lippman 珍妮特·李普曼·阿布-卢赫德 102—105 ,
103 n. , 105 n. , 109 , 114 , 146 , 252 n. 4

Abu-Lughod, Lila 莱拉·阿布-卢赫德 102

acedia (idleness/indolence) 懒惰 72

ACT UP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 277—
279 , 278

Adolphs, Ralph 拉尔夫·阿道夫斯 244

affect 情感 50—52 , 50 n. 56 , 301

Affect Theory Reader, The 《情感理论读本》232

affective neuroscience 情感神经科学 3—4 , 189 , 200 , 301

African trackers 非洲猎物追踪者 275—276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Reddy) 《反对建构主义》（雷迪）59 ,
251

Agathyrsoi 阿伽塞尔西人 80 n. 19

Age of Sentimentalism 感伤主义时代 24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ielberg) 《人工智能》（斯皮尔伯格）27

- AIDS 艾滋病 277—279 , 289
- air hostesses 空乘人员 119—121
- Albert, Prince 阿尔伯特亲王 34
- Alberti, Leon Battista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 295
- alienation 异化 122—123
- Allaq (Utku leader's wife) 阿拉克 (屋库因纽特首领伊努蒂亚克的妻子) 90
- Althoff, Gerd 格尔德·阿尔索夫 67
- Americ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277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57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APA) 75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社会学协会 123
- amygdala (brain) 杏仁核 (脑) 1—4 , 3 , 3 n.5 , 137 , 210—214 , 219 , 244 , 301
- Amygdaloids* 杏仁核 2
- Andaman islanders 安达曼群岛居民 86
- Andhra state (India) 安得拉邦 (印度) 140—141
- anger 愤怒 135 , 135 n. 242
- angst 焦虑 293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journal)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杂志) 40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 authenticity of emotions 情感真实性83—90
 - development of new discipline 新学科的发展 81—82
 - early 早期人类学 80—83 , 90—98
 - early, and emotions 早期人类学 , 与情感 90—98
 - emotional variety 情感观念的多样性 75

linguistic/cultural turn 语言学或文化的转向 98—109

recent universalist 最近的普遍主义人类学 142—146 , 142 n. 269

reconciliation with psychology 调和心理学与人类学 256

relativist perspective obstructs development of normative stance
人类学相对主义者的视角阻碍了规范性立场的形成251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社会建构主义68 , 84 , 102 , 109—
114 , 142

studies in the 1980s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114—128

and unique fear mechanism 独特的恐惧机制 4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Kant) 《实用人类学》
(康德) 24

anti-slavery cause 反奴隶制的事业 82

Anticipatory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 预期阶段皮肤电导反应
(SCR) 215

antithesis principle 对立原则 168

apatheia 无欲心境 15 , 301

Apffel-Marglin, Frédérique 弗雷德里克·阿普费尔·马格林 112

appraisal approach 评估法 205

apraxia 失用症 223 , 301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17—18 , 73

archaeology 考古学 33—34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2—15 , 17 , 25

Arnold, Magda B. 玛格达·B. 阿诺德 179 , 205—206

Arnold's emotion model 阿诺德情感模型204—205

Art and Illusion (Gombrich) 《艺术与错觉》(贡布里希) 231

Art of Rhetoric (Aristotle) 《修辞学》(亚里士多德) 13—14

Ashley-Cooper, Anthony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22 , 22 n. 76 , 82

ataraxia 内心宁静 15 , 301

Athenians 雅典人 43

atua (spirit) 阿图阿 (神) 4, 14, 32

Augustine 奥古斯丁 16—18, 17 n. 54

Austin, John 约翰·奥斯丁 252, 261, 302, 304, 306

Australian Aboriginals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84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he (Huizinga) 《中世纪的秋天》(赫伊津哈) 48, 67

Awlad 阿瓦拉德 103—104, 106

Baining 拜宁人 77

Bali 巴厘岛 138—139

Bandettini, Peter A. 彼得·A. 班德蒂尼207 n. 204

Banks, Joseph 约瑟夫·班克斯 81

Bard, Philip 菲利普·巴德 179, 192

Barker, Pat 派特·巴克 86

Barnett, Douglas 道格拉斯·巴内特 254, 302

Barrett, Lisa Feldman 莉莎·费德曼·巴瑞特 161, 249—250, 263

basic emotions 基本情感 13, 19, 57, 112, 142—144, 147—163, 172, 179, 212, 227—228, 254, 263, 301

BASIS Glossary BASIS词汇表 217

Bastian, Adolf 阿道夫·巴斯蒂安 83

Bateson, Gregory 格雷戈里·贝特森 155, 166—167

Beaglehole, Ernest 欧内斯特·贝格尔霍尔 125

Beaudeau de Somaize, Antoine 安托万·博多·德·索梅泽 78

Bechara, Antoine 安东尼·贝查拉 215, 217

Bedouins 贝都因人 102—104

Begriffsgeschichte 概念史 11, 41, 301

behaviourism 行为主义 179, 250, 301

- Bekhtere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 178 , 250
- Belinskii, Vissarion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 287
- Bell Curve 钟形曲线 241 , 241 n. 302
- Benedict, Ruth 鲁思·本尼迪克特 87
- Bennett, Jane 简·班纳特 20—21 n. 67 , 234 n. 278
- Bernanke, Ben 本·伯南克 282
- Bernays, Paul 保罗·伯奈斯 284
- Berr, Henri 亨利·贝尔 40
- Besnier, Niko 尼科·贝斯尼尔 113—114 , 144
- bēya* (knowledge) 知识 100—102
- bhava* 巴瓦 110
- Bing, Gertrud 格特鲁德·宾 47
- bio-revolution 生物革命 61 , 137 , 302
- biofeedback 生理反馈 186 , 301
- biology 生物学 61 , 271
- biopolitics 生命政治 233 , 301
- biopower 生命权力 238—239 , 301—302
- Birdwhistell, Ray 瑞·伯德惠斯戴尔 155 , 157
- Black Friday, *see* Great Crash (1929) 黑色星期五, 参见大崩盘 (1929)
- black gall 黑胆汁 75
- Black Panther Party 黑豹党 108
- Bligh, William 威廉·布莱 81
- Bloch, Marc 马克·布洛赫 40
- Blondel, Charles 夏尔·布隆代尔 42
- Bloom, Alan 艾伦·布卢姆 117 n. 169
- Boas, Franz 弗朗茨·博厄斯 83—84 , 87

Bock, Gisela 吉塞拉·博克 55—56

body-based constructionism 基于身体的建构主义 135—136

BOLD contrast 血氧水平依赖对比 207 , 210 , 302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巴 38 , 41

Boucher, Jerry 杰瑞·鲍彻 143

Bougainville, Louis-Antoine de 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 95—96

Britton, Sydney William 西德尼·威廉·布里顿 185

Brockman Agency 布罗克曼公司 242

Brockman, John 约翰·布罗克曼 223—224

Buckley, William F. Jr 小威廉·F. 巴克利 129

Bucy, Paul 保罗·布西 193

Buddhism 佛教 75—76

Burdach, Karl 卡尔·布达赫 1

burial alive 活埋 78 , 79

burial sites 墓地 34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279—280 , 281

Butler, Judith 朱迪斯·巴特勒 227 , 239 , 262

Cage, John 约翰·凯奇 223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64

Callard, Felicity J. 费莉西蒂·J. 卡拉德 200—201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48 , 71

Cannon, Walter 沃尔特·坎农 185 , 186 , 191—192

Cannon-Bard theory 坎农-巴德理论 191—192

Capra, Fritjof 弗里乔夫·卡普拉 223

Caputo, Philip 菲利普·卡普托 286

cardiograph 心电图 182

Carstairs, George Morris 乔治·莫里斯·卡斯泰尔斯 89

castration 阉割 199

Catholicism 天主教 48 , 71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The (Benedict)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 87

Civilizing Process, The (Norbert) 《文明的进程》(诺贝特) 49—50

Clifford, James 詹姆斯·克利福德 116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163

Coburg, Duke Ernst von 恩斯特·冯·科伯格公爵 34—35

cogmotion 认知情感 254 , 265 , 302

Cognition and Emotion (journal) 《认知与情感》(期刊) 205

cognitive appraisal 认知评价 13

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 68 , 253—256 , 263 , 302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尔迪厄 53 , 53 n. 75 , 67—69 , 127 , 127 n. 220 , 266—269

Bourgeois Experience, The (Gay) 《布尔乔亚经验》(盖伊) 53—54

Bourke, Joanna 乔安娜·伯克 72 , 78

brain 大脑

amygdala 杏仁核 1—4 , 3 , 3 n. 5 , 137 , 210—214 , 219 , 244 , 301

a blueprint for the constantly active 作为始终活跃的大脑的模型 247

and cognition 认知 265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这三个部分 193—194

and fMRI scannin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 206—212 , 207 n. 202 , 208 , 211 , 220—222 , 225 , 246

frontal lobe 额叶 217

hippocampus 海马体 193—194

limbic system 边缘系统 185 , 193—194 , 195 , 201 , 217 , 305

mirror neurons 镜像神经元 219—224 , 231—234 , 306

and neuroplasticity 神经可塑性 247 , 299 , 306

palaeocortical regions of 大脑皮层下区域 187 , 192 , 200 , 213 , 247 , 307

and Phineas Gage 菲尼亚斯·盖奇 188 , 189—190 , 191

regions of 大脑其他区域 194

subcortical areas 皮质下区域 187 , 192 , 200 , 213 , 247 , 307

thalamus region 丘脑区域 191—194

Brennu-Njáls Saga 《尼亚尔萨迦》 77—78 , 299

Breysig, Kurt 库尔特·布莱齐希 46

Briggs, Jean L. 琼·L. 布里格斯 90—95 , 94—95 n. 79 , 96 , 103 , 114

Cognitive-Physiological Model, *see* Schachter-Singer Model 认知-生理模型, 参见沙赫特-辛格模型

Collingwood, Robin George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 290

Collins, Randall 兰德尔·柯林斯 124

commitment phobia 承诺恐惧症 128

conferences 会议 62 , 62—63 n. 115

confession 忏悔 266—267

Connolly, William E. 威廉·E. 康诺利 21 n.

68 , 232—236 , 263 n. 40

constative 表述句 139 , 252 , 302

constative/performative properties 描述作用 / 施为作用 252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Illouz) 《对浪漫乌托邦的消费》 (易洛思) 125 , 128

Cook, James 詹姆斯·库克 80—81

Corbin, Alain 阿兰·科尔班 72

Corcyreans 科基拉人 43

core affect 核心情感 263—265 , 264 n. 41 , 302

Cornelius, Randolph 伦道夫·科尼利厄斯 250 , 250 n. 332

Craiglockhart (Scottish mental institution) 克雷格洛克哈特 (苏格兰精神病院) 86

“culture of authenticity” (Taylor) “真实性的文化” (泰勒) 113

critical neuroscience 批判性神经科学 245 , 302

cybernetic network theory 控制论网络理论 247

Damasio, Antonio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book sales of 书的销量 224

conception of embodiment 具体化概念 297—299 , 298 n. 5

and Descartes 笛卡尔 18 , 18 n. 57

and the neurosciences 神经科学 241

and Ralph Adolphs 拉尔夫·阿道夫斯 244

and Ruth Leys 露丝·雷斯 263

and 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躯体标记假说 214—219 , 220 , 230

unconscious emotions 无意识的情感 271 , 273

Damasio, Hanna 汉娜·达马西奥 215

Damiens, Robert-François 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 226

D'Andrade, Roy 罗伊·德安德拉德 90

Dani people 达尼人 155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foundations for basic emotions idea 为基本情感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179

looked for emotion in faces 探寻脸上的情感 177

and the “nerve-force” “神经力” 67

and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物种起源》 82

and Silvan S. Tomkins 西尔万·S. 汤姆金斯 151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26 , 164—172

and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159

and use of term “emotions”所使用的“情感” 10

Das optische Formgefühl (Vischer) 《论视觉的形式感情》 (费肖尔) 231

Daston, Lorraine 洛林·达斯顿 7 , 300

Davidson, Richard J. 理查德·J. 戴维森 243

Davis, John 约翰·戴维斯 81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284

De Homine (Hobbes) 《论人类》 (霍布斯) 21

de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 6

De Swann, Abram 亚伯兰·德·斯旺 58

de Waal, Frans 弗朗斯·德·瓦尔 214

de-essentialization 去本质化 107

“Decade of the Brain” (US initiative) “大脑的十年” (美国计划) 225

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 107 , 240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默认模式网络 (DMN) 245 , 302

Deleuze, Gilles 吉尔·德勒兹 11 , 232

Delumeau, Jean 让·德吕莫 51—53 , 52 n.68 , 68 , 243

de Mause, Lloyd 劳埃德·德莫斯 53

Demos, John 约翰·迪莫斯 58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US) 美国国土安全部 162

depression 抑郁症 75—76

Der Sandmann (Hoffmann) 《沙人》 霍夫曼 27

- Der Wandel deutschen Gefühlslebens seit dem Mittelalter* (Steinhausen) 《中世纪以来德国情感生活的变化》(施泰因豪森) 46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98, 225, 253
-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Damasio) 《笛卡尔的错误: 情绪、推理和大脑》(达马西奥) 18—19, 214
-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17—18, 31, 261
- Descent from the Cross, The* (Weyden) 《下十字架》(维登) 228—231, 229
- diachronic studies 历时性研究 72, 72—73 n. 164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75
- diencephalon 间脑 185
- Dilthey, Wilhelm 威廉·狄尔泰 44—46
- diplomatic history 外交史 34—35, 34 n. 118
- Discipline and Punish* (Foucault) 《规训与惩罚》(福柯) 226
- display rules 表达规则 89, 142—145, 149, 155, 160, 172, 302
- divine creation 神创论 82
- Dixon, Thomas 托马斯·迪克森 250
- dogs 狗 168—169, 177, 180—181
-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284
- Dreyfu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284, 284 n. 126, 345
- Dror, Otniel 奥特尼尔·德洛尔 180, 182, 185 n. 129, 186, 250—251
- dualism 二元论 17—19
- Duchenne, Guillaume-Benjamin 纪尧姆·邦雅曼·迪谢纳 159
- Duden, Barbara 芭芭拉·杜登 55—56
- Dürer, Albrecht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46
- Durkheim, Émile 埃米尔·涂尔干 83—84, 83—84 n. 30, 86
- Dynamic Causal Modeling (DCM) 动态因果模型 (DCM) 207 n. 203

Eco, Umberto 翁贝托·艾柯 127—128

ecological validity 生态效度 162 , 241 , 246—248 , 298 , 303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36

edge.org 224

Edward, Prince of Wales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 35—36

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脑电图) 209 , 246 , 303

Egan, Michael 迈克尔·伊根 90

Egypt 埃及 102—103

Eitler, Pascal 帕斯卡·艾特勒 26 , 136—137 , 139 , 265

Ekman, Paul 保罗·埃克曼

accusations of racism 种族主义指控 167

affect programme 情感程序 273

and Anna Wierzbicka 安娜·威尔兹比卡 130

and basic emotion theory 基本情感理论 13 , 144—163 , 149 n. ,
152 n. 16 , 156 , 158 n. 34 , 229

and Darwin 达尔文 164—171 , 168 n. 57

and facial expressions 面部表情 112

and Mead's footsteps 米德的脚步 88

postulate of culturally-universal basic emotions 具有文化普遍性的
情感的假设 142

and Richard J. Davidson 理查德·J. 戴维森 243

and Ruth Leys 露丝·雷斯 263

and Sedgwick 塞奇威克 227

and Silvan S. Tomkins 西尔万·S. 汤姆金斯 85

Electra complexes 恋父情结 88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脑电图 (EEG) 209 , 246 , 303

Elementary Particles, The (Houellebecq) 《基本粒子》 (维勒贝克) 62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Hobbes) 《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霍布斯) 21

Elias, Norbert 诺贝特·埃利亚斯 49—53, 50 n. 61, 51 n. 66, 59, 67—68, 70, 71, 198

Ellsworth, Phoebe C. 菲比·C. 埃尔斯沃思 205

emic/etic 主位与客位 303

Émile (Rousseau) 《爱弥儿》(卢梭) 24

“Emotion” (magazine) 《情感》(杂志) 24

Emotion Review (journal) 《情感评论》(期刊) 161

emotion scripts 情感脚本 71

Emotion (vacuum cleaner) “情感”(真空吸尘器) 96

Emotional Brain, The (LeDoux) 《情感大脑》(勒杜) 2

Emotional Command Systems (ECS) 情感指挥系统 (ECS) 200, 303

emotional communities 情感共同体 68—71, 69 n. 145, 303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Rosenwein) 《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共同体》(罗森宛恩) 68, 70

emotional dissonance 情感失调 122

emotional habitus 情感惯习 305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 23, 63, 303

emotional labour 情感劳动 119—122, 121—122, 303

emotional liberty 情感自由 257—258, 262, 303

emotional navigation 情感导航 257—258, 303

emotional practices 情感实践 266—268, 270, 303

emotional refuge 情感避难所 257—259, 260, 263, 304

emotional regimes 情感体制 70—71, 304

emotional suffering 情感痛苦 257—258, 260, 262, 304

emotionology 情感学 57, 57—58, 268, 304

emotions 情感 and 9/11 “9·11”事件 60—67, 60 n.108, 74 abroad 国外 80—83

Enlightenment, the 启蒙运动 6, 23—24, 72, 226—227, 259

Epiphysis, *see* pineal gland 松果体, 参见松果腺

Erikson, Erik 埃里克·埃里克森 54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 51, 304

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Spinoza) 《伦理学：依几何次序论证》(斯宾诺莎) 19—20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76, 117, 258, 304

eugenics 优生学 166

Evans, Richard J. 理查德·J. 埃文斯 224

in the anthropological classics 在人类学经典著作中 83—90, 83—84 n. 30/32

anthropology of, after social constructivism 社会建构主义之后的人类学 129—136

before Febvre 在费弗尔之前 43—49

and brain research 大脑研究 188—192

classics of anthropology 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83—90, 83—84 n. 30/32

cognitive psychology/appraisal models 认知心理学 / 评价模型 204—206

and Darwin 达尔文 164—172

during and after Febvre 在费弗尔前后 40—43, 49—59, 49 n. 54, 53—54 n. 77

early anthropology 早期人类学 90—98

Ekman's basic 埃克曼的基本情感理论 147—163, 148, 154

Freud's feeling theory 弗洛伊德的情感理论 195—201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历史的视角 276—293

imaging procedures 成像程序 206—212

introduction to 导言 5, 9—25, 9 n. 25, 14 n. 41

linguistic turn 语言转向 98—109, 109 n.141

location of 位置 29—32

in the Middle Ages 在中世纪 67—74, 67 n.134

mirror neurons/social emotions 镜像神经元 / 社会情感 218—224, 230, 236, 242

neurohistory 神经历史学 270—276

and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225—242, 243—250, 243 n. 307

possession of 拥有 25—29

practices 实践 265—270

psychological conceptions of 心理学概念 178—186

and recent universalist anthropology 最近的普遍主义情感人类学 142—146, 142 n.269

and the Schachter-Singer model 沙赫特-辛格模型 201—203, 307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t 社会建构主义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09—114, 114—128

social order and the brain 社会秩序和大脑 186—188

and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SMH) 躯体标记假说 (SMH) 214—219

and two roads to fear theory 恐惧的两条路径假设 212—213, 236, 307

types of language 语言的类型 134

and universalism duality 普遍主义的二元性 136—141, 139 n. 261

varieties of 种类 75—80

and William Reddy 威廉·雷迪 251—265

a working definition 工作性定义 32—40

“Emotions” (Bonn Museum installation) 《情感》(波恩艺术博物馆的装置作品) 63

“Emotions made in Germany” (Ryder Cup) “情感德国造” (“莱德杯”)
63

emotive dissonance 情感失调 119

emotives (speech acts) 情感表达 (言语行为) 257—262 , 265 , 267 ,
290

empathy 共情 248—250 , 291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Wallon) 《法国百科全书》 (瓦隆) 42

evolutionary biology 进化生物学 123

exchange theory 交换理论 124

executions 死刑 72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The” (Hunt) 《革命的体验》 (亨特) 297—
298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The (Darwin) 《人类和
动物的表情》 (达尔文) 26 , 82—83 , 164 , 167—171 , 170 ,
179

Extended Mind Theory (EMT) 延展心智理论 (EMT) 265 , 265 n.
45 , 270 , 304

external validity 外部效度 162 , 304

eyebrows 眉毛 30

facial expressions 面部表情 147 , 148 , 149—150

FACS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see* FAST (Facial Action Scoring
Technique) 面部动作编码系统 (FACS) , 参见面部动作评分技术
(FAST)

fago 法戈 108 , 144

Fajan, Jane 简·法扬 77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42

FAST (Facial Action Scoring Technique) 面部动作评分技术 (FAST)
157—161 , 304

Fauré, Felix 费利克斯·福尔 35—36

fear 恐惧 4 , 72

Febvre, Lucien 吕西安·费弗尔

and Gustave Le Bon 古斯塔夫·勒庞 84

history of emotions 情感史 40—44 , 40 n. , 42—43 n. , 49

parallels between Elias and 埃利亚斯和费弗尔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51 , 59

and psychohistory 心理历史学 53

reconstruction of past ideas of emotion 重构过去的情感观念 73—
74

Western history one of increasing emotional restraint 西方的历史
就是不断增强情感克制的历史 68

“Feeling Different: Homosexuality and Emotional Life in the West
German Countryside” (Gammerl) 《感受不同：西德农村的同性恋
和情感生活》(加梅尔) 288—289

feeling rules 情感规则 69 , 265 , 304

Feld, Steven 史蒂文·菲尔德 114—115 n. 163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行割礼时切除阴蒂 254

Ferguson, Niall 尼尔·弗格森 224

field 场域 53 , 53 n. 75

films 电影 267 , 286—287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79—80 , 296

Fisher 费希尔 10 n. 26

Flaig, Egon 埃贡·弗莱格 65—67

Flam, Helena 海伦娜·弗拉姆 118

fMRI scannin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 206—212 , 207 n. 202 ,
208 , 211 , 220—222 , 225 , 246

football 足球 63

Forster, Georg 格奥尔格·福尔斯特 80—81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69, 98, 101, 150, 225, 226, 233, 253, 268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 234, 236

Frankenstein (Shelley) 《弗兰肯斯坦》(雪莱) 27

Ground Zero 世贸中心遗址 60—61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ewspaper) 《法兰克福汇报》 225

Franks, David 大卫·弗兰克斯 118 n. 174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71

Freedberg, David 大卫·弗里德伯格 228—231, 230 n. 258, 231 n. 265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59, 259—260, 259 n., 297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50, 195—201, 206

Frevert, Ute 乌特·弗雷沃特 53—54, 71—72, 249, 282

Freycinet, Louis de 路易·德·弗雷西内 171

Fridlund, Alan 艾伦·弗里德隆德 160, 166

Fried, Johannes 约翰内斯·弗里德 225

Friedrich Wilhelm IV, King 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34

Friesen, Wallace V. 华莱士·V. 弗瑞森 157

Frijda, Nico 尼科·弗里达 205

frontal lobe (brain) 额叶(大脑) 217

functional integration 功能整合 299, 304

functional segregation, *see*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功能分区 244—247, 305

functionalism 功能主义 275

Gage, Phineas 菲尼亚斯·盖奇 188, 189—190, 191

Galen 盖伦 16, 29 Doctrine of the Four Fluids 四种体液学说 16, 16, 29

- Gallese, Vittorio 维托里奥·加莱塞 220—222 , 231
- Galton, Francis 弗朗西斯·高尔顿 7
- galvanometer 电流计 182
- Gammerl, Benno 本诺·加梅尔 288—289 , 288 n. 141
- Gasson, John A. 约翰·A. 加森 204
- Gauguin, Paul 保罗·高更 96 , 106
- Gay, Peter 彼得·盖伊 53—54
- Geertz, Clifford 克利福德·格尔茨 88—89 , 88—89 n. 52 , 107 , 113 , 129 , 138 , 256
- Geertz, Hildred 希尔德雷德·格尔茨 88—89
- Gendron, Maria 玛丽亚·金德伦 249—250
- Germain, Jean 让·热尔曼 48
- Geschichte der Seele im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 (Breysig) 《人类历史上的情感史》(库尔特·布莱齐希) 46
- gham (sadness) (悲伤) 251—252
- ghinnāwas (little songs) 津纳瓦 (小曲) 103—106
- Gitlin, Todd 托德·吉特林 129
- Gladwell, Malcolm T. 马尔科姆·T. 格拉德威尔 224
- God 上帝 17—18 , 71 , 109 , 174 , 244 , 294
- Goe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284
- Goffman, Erving 欧文·戈夫曼 84 , 105 , 105 n. 20 , 122—124
- Gogol, Nikolai 尼古拉·果戈理 287
- Goleman, Daniel 丹尼尔·戈尔曼 23
- Gombrich, Ernst H. 恩斯特·H. 贡布里希 231
- Goodall, Jane 珍妮·古道尔 275
- Goody, Esther 埃丝特·古迪 55
- Goody, Jack 杰克·古迪 55

Gould, Deborah 黛博拉·古尔德 278—281

Grand Theory 宏大理论 118

Great Crash (1929) 1929年的大崩盘 282

Great Depression (1930) 1930年的大萧条282

Greece 希腊 13 , 15

Grima, Benedicte 本尼迪克特·格里玛251—252 , 252 n. 4

Gross, Daniel M. 丹尼尔·M. 格罗斯 133 , 171—172 , 275

Grundriss der Psychologie (Wundt) 《心理学大纲》(冯特) 178

Guattari, Félix 费利克斯·加塔利 11 , 232

Günther, Armin 阿明·京特 5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62 , 253

habitus (Bourdieu) 惯习(布尔迪厄) 127 , 268—269

Hacking, Ian 伊恩·哈金 116 , 116 n. 168

Hamlet (Shakespeare)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287

Harlow, John 约翰·哈洛 189—190

Harré, Rom 罗姆·哈瑞 135

Hartley, David 大卫·哈特利 31

hasham (shame) 哈萨姆(羞耻) 104—105

Havel, 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298

Hawking, Stephen 斯蒂芬·霍金 223

Head, Henry 亨利·黑德 191

headhunting 猎头 100—101

hedonic valence 享乐效价 250 , 277 , 305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25 , 225

Heider, Karl 卡尔·海德 142—145 , 144—145 n. , 145 , 147 , 149 ,
155

Herodotus 希罗多德 80 , 80 n. 19

Hess, Walter R. 沃尔特·R. 赫斯 191

Hesse, Carla 卡拉·赫西 116 n. 168

hexis 身体习性 307

Hickok, Gregory 格雷戈里·希科克 222 , 231

Hilberg, Raul 劳尔·希尔伯格 292

Himmelfarb, Gertrude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129

Hindus 印度教 112—113 , 141 , 267

hippocampus (brain) 海马 (大脑) 193 , 194

history 历史

family 家庭 55

gender 性别 55

History of Emotions, The (Stearns/Lewis, eds) “情感史”丛书 (斯特恩斯、刘易斯合编) 59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43

Hitzer, Bettina 贝蒂娜·希策 63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6 , 21—22 , 82

Hochschild, Arlie 阿莉·霍赫希尔德 118—122 , 124 , 265

Hoffmann, E. T. A. E. T. A. 霍夫曼 27

Hollinger, David 戴维·霍林格 129

homeostasis 内稳态 21

homesickness 思乡病 72

Houellebecq, Michel 米歇尔·维勒贝克 62

Howell, Signe 西格妮·豪威尔 264 , 290

Huizinga, Johan 约翰·赫伊津哈 48—49 , 48 n. 47 , 59 , 67—68

human genome 人类基因组 225

humanoid machines 类人机器 27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23—24

Hunt, Lynn 林恩·亨特 253—254 , 297

Hutcheson, Francis 弗兰西斯·哈奇森 22—23

hydraulic model 水力模型 67 , 67 n. 136

hypercognized 显在认知 96 , 305

Iacoboni, Marco 马可·亚科博尼 221—223 , 246

Icelandic sagas 冰岛萨迦 77—78

ideational/ideomotor apraxia 观念性失用症 / 观念运动性失用症 222

Ifaluk Atoll 伊法利克环礁 106 , 108

Ifaluk people 伊法利克人 89 , 106—109 , 114 , 117 , 257

ihuma (reason) 伊胡玛 (理性) 91

Illouz, Eva 伊娃·易洛思 118 , 124—128 , 126 n. 214 , 127 n. 220

Ilongot people 伊隆戈人 99—102 , 256

In Search of Lost Time (Proust) 《追忆似水年华》 (普鲁斯特) 294

India 印度 73 , 109—112 , 140—141 , 159 , 267

inner freedom 内在自由 24—25 , 25 n. 90

intentionalism/non-intentionalism 意向性 / 非意向性 30 , 152 , 305

interaction ritual 互动仪式 124

internal validity 内部效度 162 , 305

Introduction á la psychologie collective(Blondel) 《群体心理学导论》
(布隆代尔) 42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Dilthey) 《精神科学引论》 (狄尔泰) 44

Inuits 因纽特人 90—95 Utku (Utkuhikhalingmiut) 屋库因纽特人 90—
92 , 94—96

Inuttiaq (Utku leader) 首领伊努蒂亚克 90—91 , 93 , 95

Iowa Gambling Task (IGT) experiment 爱荷华博弈任务 (IGT) 实验

ironoclasm “打破讽刺运动” 61

Jackson, John Hughlings 约翰·休林斯·杰克逊 186—188

Jakobson, Roman 罗曼·雅各布森 84

James, Harold 哈罗德·詹姆斯 282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9 , 85 , 118 , 175 , 179 , 186 , 192

and the Schachter-Singer Model 沙赫特-辛格模型 202—204 ,
204 , 307

Japan 日本 73 , 87 , 106 , 157

Japanese code of honour 日本人的荣誉规范 64

Javanese 爪哇人 89

Jelliffe, Smith Ely 史密斯·伊利·杰利夫 185

Jensen, Uffa 乌法·延森 197—199

Jordan 约旦 102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Stearns) 《社会历史杂志》(斯特恩斯) 57

Kagan, Jerome 杰罗姆·凯根 144 n. 281 , 153 , 277 , 277 n. 102

Kamik (Utku daughter) 卡米克 (屋库因纽特首领伊努蒂亚克之女) 90

kamikaze pilots 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 87

Kandel, Eric R. 埃里克·R. 坎德尔 214—249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16 , 24—25

Kapferer, Bruce 布鲁斯·卡普费雷尔 88—89 n. 52

kapluna (whites) (白人) 92 , 94

Karant-Nunn, Susan C. 苏珊·C. 卡兰特·努恩 71

Karsch, Anna Louisa 安娜·路易莎·卡施 71

Kasten, Ingrid 英格丽德·卡斯滕 5

Katharina (Freud's waitress) 卡塔琳娜 (弗洛伊德的女服务员) 195—

- Kershaw, Ian 伊恩·克肖 224
- Kessel, Martina 马蒂娜·凯塞尔 71
- khandra* (melancholia/idleness) (忧郁 / 闲散) 293
- Kierkegaard, Søren 索伦·克尔凯郭尔 25
- Kiss-O-Meter 接吻测量仪 183 , 184
- Klimó, Árpád von 阿帕德·冯·克里莫73
- Klüv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克吕弗 193
- Klüver-Bucy Syndrome 克吕弗-布西综合征 193
- 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Rosaldo)
《知识与激情：伊隆戈人的自我概念与社会生活》(罗萨尔多) 99
- Koni (Labrador dog) 科尼 (拉布拉多犬) 36 , 37
- Kö vecses 科维克塞斯 133—137 , 134 n.239 , 135 n. 242—243
- Kramer, Larry 拉里·克莱默 278
- Krugman, Paul 保罗·克鲁格曼 282
- kulininpa* (to hear) (听) 30
- Kuptsova, Ol'ga 奥尔加·卡普索娃 287
- La Mentalité primitive* (Lévy-Bruhl) 《原始思维》(莱维-布吕尔) 42
- La Nouvelle Héloïse* (Rousseau) 《新爱洛伊斯》(卢梭) 259
- Lakatos, Imre 伊姆雷·拉卡托斯 241 n.301
- Lakoff, George P. 乔治·P. 拉科夫 133
- Lamarck, Jean Baptiste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 165
- Lamprecht, Karl 卡尔·兰普雷希特 45—47
- Lange, Carl 卡尔·朗格 85 , 177 , 179 , 188 , 192
- language 语言 140—141 , 144
- Late Show* (tv programme) 《深夜秀》(电视节目) 60

lateralization 单侧化 187 , 305

Lavater, Johann Kaspar 约翰·卡斯帕·拉瓦特 159

Laxdaeta Saga 《拉克斯峡谷萨迦》 78

Lazarus, Richard S. 理查德·S. 拉扎勒斯 205—206

Le Bon, Gustave 古斯塔夫·勒庞 42 , 58 , 84

Le Brun, Charles 夏尔·勒布伦 19 , 159

Le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ses (Beauveau de Somaize) 《女雅士词典》
(博多·德·索梅泽) 78 , 78 n. 12

Le Grand Lobe limbique (Broca) 大边缘叶 (布洛卡) 193

LeDoux, Joseph 约瑟夫·勒杜

and the amygdala 杏仁核

brain the centre of emotion 大脑被视为情感的中心 29—30 ,
135 , 188

Reddy, William M. 威廉·M. 雷迪

and *emotives* 情感表达 69—70 , 70 n.152 , 290

first to make productive use of life sciences 首次将生命科学的思想
运用到情感研究中 59 , 251—265 , 260 n. , 267

love as an object of study 将爱作为研究对象 72—73

and the neurosciences 神经科学 241 , 276

opted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appraisal school 选择了认知心理学
和评价学派 270 , 270 n. 69

and Peggy Thoits 佩吉·斯奥兹 124

and Scheer 舍尔 269

and Smail 斯梅尔 275

and synthetic conceptions of emotions 情感综合概念 51

and Papez 巴贝兹 192

the term emotion 情感术语 10

the two roads of fear 恐惧的两条路径 212—213 , 230

unconscious emotions 无意识情感 271 , 273

and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225—226

Lehrer, Jonah 乔纳·莱勒 249

Letterman, David 大卫·莱特曼 60

Lévi-Strauss, Claude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84—85 , 85 n. 37

Leviathan (Hobbes) 《利维坦》 (霍布斯) 21

Levy, Robert 罗伯特·利维 31 , 95—97 , 98 n. 95

Lévy-Bruhl, Lucien 吕西安·莱维-布吕尔 42

Lewinsky, Monica 莫妮卡·莱温斯基 163

Leys, Ruth 露丝·雷斯

and dubious hypotheses 这些假说都有疑点 236

and Ekman 埃克曼 150—152 , 150—151 n.11 , 157 , 159—160

a genealogical approach 谱系学方法 250

and intentionalism 意向性 170 , 272

never claimed to create a new theory of emotion 从未宣称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理论 263

Libet, Benjamin 本杰明·利贝特 236 n.284 , 250

Libet experiment 利贝特实验 236 , 236 n.284

libido 力比多 200—201

Lie to Me (TV series) 《别对我撒谎》 (电视剧) 147 , 147 n. 1 , 149 , 162

Liepmann, Hugo 胡戈·利普曼 223

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学 8 , 251—265

Liget (male autonomy) (男性自主性) 100—102 , 101 n. 103

light 光 30

Lightman, Dr Carl 卡尔·莱特曼博士 147

Lightman, Emily 艾米丽·莱特曼 147

- limbic system 边缘系统 185 , 193—194 , 195 , 201 , 217 , 302
- linguistic turn 语言学转向 56 , 59 , 61 , 98 , 136 , 225 , 297—298 , 305
- linguistics 语言学 130 , 144
- Lipps, Theodor 特奥多尔·利普斯 231
- Lives of [Telugu] Poets* (Sriramamurti) 《泰卢固诗人的生活》(斯里拉马穆尔蒂) 141
- Lock, Margaret M. 玛格丽特·M. 洛克 137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6 , 22 , 31
- Loewenberg, Peter 彼得·洛温伯格 53
- logocentrism 逻各斯中心主义 136 , 232 , 305
- Lombroso, Cesare 切萨雷·龙勃罗梭 11
- Longerich, Peter 彼得·隆格里希 224
- Looking for Spinoza* (Damasio) 《寻找斯宾诺莎》(达马西奥) 19
- melancholia 忧郁症 75
- Menzel, Adolph 阿道夫·门采尔 46
-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270
- Mesquita, Batja 巴特加·梅斯基塔 205
- metaconcept 元概念 305—306
- Louis XIV, King 国王路易十四 259
- love 爱 73 , 76 , 127—128 , 140—141 , 200—201
- Luhmann, Niklas 尼克拉斯·卢曼 53
- Lustprinzip* (pleasure principle) 快感原则 201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54
- Lutheranism 路德宗 48 , 71
- Lutz, Catherine A. 凯瑟琳·A. 卢茨
- against emulating Reddy 不值得效仿雷迪 253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al and the physical 情感和身体之间的这种联系 85 n. 38

became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extremist 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极端主义者 143 , 146

and culture 文化 89

developed a critique of Western ideas of emotion 对西方的情感观念进行了批评 257

and emotion literature 关于情感的文献5

emotional experience argument 情感体验的争论 98—99

and fieldwork on Ifaluk Atoll 去伊法利克环礁进行田野调查 106—109 , 114 , 117

and history of emotions 情感史 9 n. 24

and investigation of *fago* and *song* 凯瑟琳·卢茨对“fago”和“song”的研究 144

reactions to the igloo ceiling's dripping 对雪屋屋顶融化的冰水的反应

Lynch, Owen M. 欧文·M. 林奇 113

Lyon, Margot 玛格特·莱昂 129—130

Lyotard, Jean-François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98

Mabrūka 马布鲁卡 105

MacLean, Paul D. 保罗·D. 麦克莱恩 185 , 193—195 , 217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伦 36

MacMullen, Ramsay 拉姆齐·麦克马伦 43 , 43 n. 20 , 44 n. 24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法国人文之家 55

Malinowski, Bronislaw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85—86 , 85—86 n. 39

Managed Heart, The (Hochschild) 《心灵的整饰》(霍赫希尔德) 121—123

- Maori tribes 毛利人部落 4—5, 14, 32—33
- Marcus Aurelius 马克·奥勒留 15
- Markham, Eleanor 埃莉诺·马卡姆 78
- Markowitsch, Hans J. 汉斯·J. 玛科维奇 241—242
- marriage 婚姻 126
- Marston, William M. 威廉·M. 马斯顿 216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84, 125, 127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28, 237, 246
- mass media 大众传媒 74
- Massumi, Brian 布莱恩·马苏米 11, 232—233, 233 n. 274, 263—264, 269
- Matt, Susan J. 苏珊·J. 马特 63, 72, 72 n.159
- Mauss, Marcel 马塞尔·莫斯 84
-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istory 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 55
- Mayer, John 约翰·梅尔 23
- Mead, 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德 87—88, 87 n. 46, 96, 118, 123, 138, 154—155, 164—165, 166—167
- Medick, Hans 汉斯·梅迪克 55, 55 n.83
- Meditations* (Marcus Aurelius)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15
- ME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脑磁图描记术) 209, 246, 305
- Méthode pour apprendre à dessiner les passions* (Le Brun) 《情感表现法教程》(勒·布伦) 159
- Metzinger, Thomas 托马斯·梅岑格 242
- micro-expressions 微表情 147, 149, 161, 306
- Middle Ages 中世纪 67—74, 77
- Miller, William Ian 威廉·伊恩·米勒 33
- Mills, Charles K. 查尔斯·K. 米尔斯 187—188

- mind-wandering 思维游移 245
- mirror neurons (brain) 镜像神经元 (大脑) 219—224 , 231 , 306
- Misselhorn, Catrin 凯特琳·米塞尔霍恩 28
- “Missing Emotion: The Limitation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Emotion”(Lyon) 《缺失的情感：文化建构主义在情感研究中的局限性》(莱昂) 129
- Mitchell, Lisa 丽莎·米切尔 140—141 , 140—141 n. 265
- Modernity 现代性 50 , 59
- “Mona Lisa” (painting) 《蒙娜丽莎》(油画) 295 , 295 n. 171
- monism 一元论 20—21 , 21 n. 68
- monogenism 人类同源说 82
- Morat, Daniel 丹尼尔·莫拉特 45
- Mori, Masahiro 森政弘 28 , 28
- Morozov, Pavlik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259
- Mosso, Angelo 安吉洛·莫索 178—181
- Mudimbe, Valentin 瓦朗坦·穆迪贝 116
- Münsterberg, Hugo 雨果·芒斯特伯格 284
- Musil, Robert 罗伯特·穆齐尔 186
- Muskie, Edmund 埃德蒙·马斯基 279—280 , 280
-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43 , 84
- 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NET) 叙事暴露疗法 (NET) 201
- National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42 , 73 , 258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41
-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自然语义元语言 (NSM) 130—131
- Natyashastra 《戏剧学》 110
- Nauta, Walle J. H. 瓦勒·J. H. 诺塔 217

Navigation of Feeling, The (Reddy) 《感情研究指南》(雷迪) 59—60 ,
254 , 259—261 , 275

Nazism 纳粹主义 285 , 292

Needham, Rodney 罗德尼·尼德汉姆 90 , 90 n. 61

Nehru, 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40

nervous system 神经系统 169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NLP) 神经语言规划 (NLP) 32—33

neurogenesis 神经发生 247

neurohistory 神经历史学 270—276

neurons 神经元 231 , 306

sensorimotor 感觉运动 307

neuroplasticity 神经可塑性 247 , 299 , 306

neuropolitics 神经政治学 232—236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225—242 , 243—250 , 243 n. 307

Never in Anger (Briggs) 《永不发火》(布里格斯) 91 , 95

New Cultural History 新文化史 58 , 264 , 306

new materialism 新唯物主义 233 , 306

New Zealand 新西兰 171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31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25 , 225

9/11 “9·11”事件 161 , 297—298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279

Nobel Prizes 诺贝尔奖 298—299

noble savage 高贵的野蛮人 82

Noë, Alva 阿尔瓦·诺埃 265—266

nominalism 唯名论 116 , 299 , 306

Plutarch 普鲁塔克 65—66

- pneumatic model 气动模型 67
- pneumograph 呼吸描记器 182
-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 79
-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 43—44
- Popkin, Jeremy 杰里米·波普金 264
- Pöppel, Ernst 恩斯特·波佩尔 245—246
- post-structural pluralism 后结构多元主义 240
- non-intentionalism/intentionalism 非意向性 / 意向性 30, 152, 305
- North Cheyenne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北夏延部落印第安人 29
- North Indian Islam 北印度伊斯兰教 30—31
- Nukulaelae people 努库莱莱人 113
- nunuwan* (mental feelings) (心理感受) 109
- Nussbaum, Martha 玛莎·努斯鲍姆 15, 15—16 n. 46, 262—263
- Obama, Barack 贝拉克·奥巴马 38
- Obeyesekere, Gananath 加纳纳特·奥贝耶谢克 75—76
-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强迫症 216
- Octavius 奥克塔维乌斯 66
- Oedipus complexes 恋母情结 88—89
- 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Smail) 《论深度历史与大脑》(斯梅尔) 225, 270, 276
-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Darwin) 《物种起源》(达尔文) 82
- oral history 口述史 287—290
- Oro (Tahitian man) 奥罗(塔希提人) 96
- Ortega y Gasset, José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 47
- Other 他者 26, 116, 138
- palaeocortical regions (brain) 大脑皮层 200

Palaeolithic era 旧石器时代 270—271

Panksepp, Jaak 雅克·潘克塞普 10 , 200

Papez Circuit 巴贝兹环路 192

Papez, James 詹姆斯·巴贝兹 179 , 185 , 192—193

Papoulias, Constantina 康斯坦蒂娜·帕普利亚斯 201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亚 77

Parsons, Talcott 塔尔科特·帕森斯 118

Pashtun women 普什图妇女 251

Passions of the Soul, The (Descartes) 《论灵魂的激情》(笛卡尔) 18

pathe 情感 14

Pathosformel 情念程式 47

Pavlov, Ivan 伊凡·巴甫洛夫 250

Peace Movement 和平运动 202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 43

performative 施为性 107 , 139 , 202 , 252 , 266 , 306

peripheral theory of emotion 情感的“外围”理论 177

Pernau, Margrit 玛格丽特·佩尔瑙 65 , 65 n. 126

Pessoa, Luiz 路易斯·佩索阿 244 , 244 n. 310

PE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PET) 209 , 246 , 306

Philippines 菲律宾 99 , 256

physiognomy 面相术 159

physiology 生理学 26

Pietists 虔信派 48

Pilgrim settlers 最初移民者 58

pineal gland 松果体 31

Pinker, Steven 史蒂文·平克 130 , 168 , 168 n. 57 , 214 , 223—224

Pintupi aboriginals 原住民宾土比人 30

Plato 柏拉图 14, 16, 25

pluralism 多元主义 150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61, 114, 129, 150, 226, 237, 257, 262, 292, 306

Postlithic era 后石器时代 271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98, 232

practice theory 实践理论 306

praxeology 行为学 67, 306

“Premature Burial” (Poe) 《过早埋葬》(爱伦·坡) 79

Premenstrual Tension (PMT) 经前期紧张 (PMT) 253

premodern men 前现代的人 50

Prichard, James 詹姆斯·普里查德 82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Weber)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48

Protestantism 新教 48—49, 71

Protevi, John 约翰·普罗特维 233, 237 n.288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249, 294

psychohistory 心理历史学 53—54, 70, 298, 306

psychotropic mechanisms 精神药物机制 274

Qayaq (Utku daughter) 卡亚克 (屋库因纽特首领伊努蒂亚克之女) 90—91

qualia 感受性 32, 307

racism 种族歧视 167

Radcliffe-Brown, Alfred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 86—87

radical behaviorism 激进行为主义 205

Raigili (Utku daughter) 莱吉莉 (屋库因纽特首领伊努蒂亚克之女)

Ramachandran, Vilayanur S. 维拉亚努尔·S. 拉玛钱德朗 214—219

Ranke, Leopold von 利奥波德·冯·兰克290

rasa theory 拉莎理论 110—113 , 110—111 , 110 n. 142 , 112 n. 149 , 159 , 307

Rashīd 拉希德 105

Rather, Dan 丹·拉瑟 60

rational choice 理性选择 235 , 235 n. 283

Ratner, Hilary Horn 希拉里·霍恩·拉特纳 254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84

Reddy, William M. 威廉·M. 雷迪

and *emotives* 情感表达 69—70 , 70 n.152 , 290

first to make productive use of life sciences首次将生命科学的思想运用到情感研究中 59 , 251—265 , 260 n. , 267

love as an object of study 将爱作为研究对象 72—73

and the neurosciences 神经科学 241 , 276

opted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appraisal school 选择了认知心理学和评价学派 270 , 270 n. 69

and Peggy Thoits 佩吉·斯奥兹 124

and Scheer 舍尔 269

and Smail 斯梅尔 275

and synthetic conceptions of emotions 情感综合概念 51

reductionism 还原论 137 , 232 , 275 , 307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71

Regeneration Trilogy (Barker) 《重生三部曲》(巴克) 86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6 , 240

replicability 可复制性 186 , 241 , 307

rhesus monkeys 恒河猴 222

riri (anger) (愤怒) 96

ritual 仪式 84

Rivers, William Halse 威廉·哈尔斯·里弗斯 86

Rizzolatti, Giacomo 贾科莫·里佐拉蒂 220 , 222—256

Rolf, Malte 马尔特·罗尔夫 73

romantic/unromantic 浪漫的 / 不浪漫的 126—127

Rosaldo, Michelle Z. 米歇尔·Z. 罗萨尔多 99—100 , 109 , 112 , 146 , 256—257

Rosaldo, Renato 罗纳多·罗萨尔多 99—101

Shorter, Edward 爱德华·肖特 55

Shrek (film) 《怪物史莱克》(电影) 27

Simmel, Georg 格奥尔格·西美尔 47—48 , 118

Singer, Jerome E. 杰罗姆·E. 辛格 179 , 202—204

Singer, Tania 塔妮娅·辛格 248

Singer, Wolf 沃尔夫·辛格 241

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 情境认知理论 307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SCR) 皮肤电导反应 (SCR) 218

Skinner, B. F. B. F. 斯金纳 151

Smail, Daniel Lord 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 225 , 270—275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23

Rosenwein, Barbara H. 芭芭拉·H. 罗森宛恩 5 , 10 , 58 , 67—71 , 69 n. , 71 n. 153 , 124 , 261—262 , 287 , 295 , 295 n. 172

Roth, Gerhard 格哈德·罗斯 241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6 , 24 , 82

Rowell, Lewis 刘易斯·罗厄尔 112

Russell, James 詹姆斯·拉塞尔 161 , 263

Ryder Cup Germany 德国“莱德杯” 63

Saarak (Utku daughter) 萨拉克 (屋库因纽特首领伊努蒂亚克之女) 90
—92, 95

Sabeau, David Warren 大卫·沃伦·萨比安 55, 55 n. 83

Sacks, Oliver 奥利弗·萨克斯 214

Said, Edward 爱德华·赛义德 102

Salovey, Peter 彼得·萨洛维 23

Samoa 萨摩亚 87—88

Sand, George 乔治·桑 261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25, 224

Sassoon, Siegfried 西格里夫·萨松 86

saudade (listlessness) (无精打采) 293

Saussure, Ferdinand de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84

Saxer, Daniela 丹妮拉·萨克瑟 291

Schachter, Stanley 斯坦利·沙赫特 179, 202—204

Schachter-Singer Model 沙赫特-辛格模型 202—204, 204, 307

Scheer, Monique 莫妮克·舍尔 136—137, 139, 265—269, 270

Scheler, Max 马克斯·舍勒 23

Scheper-Hughes, Nancy 南希·舍珀-休斯 137—138

Scherer, Klaus R. 克劳斯·R. 舍雷尔 10, 205

Schmidt, Anne 安妮·施密特 283, 283 n.124

Schnell, Rüdiger 吕迪格·施内尔 5

Schopenhauer, Arthur 亚瑟·叔本华 25

“Science As a Vocation” (Weber)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 291

Scripture, Edward Wheeler 爱德华·惠勒·斯克里普丘 184

Sebastopol (Tolstoy)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托尔斯泰) 294

Section for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 情感社会学部 123

Sedgwick, Eve Kosofsky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 226—298

self-reflection 自我反思 114

“Sensibility in Man and Nature” (conference) “人与自然的感性”(会议) 40

“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Davidson) 《情感研究中的七宗罪》(戴维森) 244

sex 性 73, 197—198, 215

Shaftesbury, Earl of, *see* Ashley-Cooper, Anthony 沙夫茨伯里伯爵, 参见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m rage 假愤怒 192

shamanism 萨满教 91

Shelley, Mary 玛丽·雪莱 27

Sherrington, Sir Charles Scott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爵士 177

shokeling 39

Snow, C. P. C. P. 斯诺 224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 74

social constructivism 社会建构主义

and anthropology 人类学 68, 84, 102, 109—114, 142

comparable with the *performative* 相当于“施为句” 252

description 描述 307

and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 51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语言学转向 98

and *Never in Anger* 《永不发火》 95

polarization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两极化 5—6

and Reddy 雷迪 254

and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256, 299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129

social neurosciences 社会神经科学 248—251 , 248 , 307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 13 , 248 , 307

sociology 社会学 117

Solakov, Nedko 内德科·索拉科夫 63

Solomon, Robert 罗伯特·所罗门 276 , 276 n. 101

Solomon, Robert C. 罗伯特·C. 所罗门 17 n. 53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SMH) 躯体标记假说 (SMH) 214 , 217—220 , 230 , 237 , 237 n. 288 , 299 , 307

song (正当的愤怒) 107—109 , 108 n. 132 , 144

Sontag, Susan 苏珊·桑塔格 224

Sorokin, Pitirim 皮蒂里姆·索罗金 118

south Indian Kathakali dance theatre 南印度的卡塔卡利舞蹈剧院 112

Spartans 斯巴达人 43

Southern pigtailed macaques 南平顶猴 220

sphygmograph 脉搏描记器 182

Spiegel, Gabrielle 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 297

Spielberg, Steven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27

Spinoza, Baruch de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19—21 , 20—21 n. 64/67

Spinoza Effect (Damasio) 《斯宾诺莎效应》 (达马西奥) 236

Spiro, Melford 梅尔福德·斯皮罗 89

Spitzer, Manfred 曼弗雷德·斯皮策 241

SPOT (Screening Passengers by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SPOT (通过观察技术筛查乘客) 161

Sri Lanka 斯里兰卡 75—76

Sriramamurti, Gurujada 古鲁贾达·斯里拉马穆尔蒂 141

Sriramulu, Potti 波蒂·斯里拉穆卢 140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54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73

Stanislavsky, Constantin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19, 121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film series) 《星际迷航：下一代》（电影系列） 27

State Reorganization Act 1956 (India) 1956年的《邦重组法案》（印度） 141

Stearns, Carol Zisowitz 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 5, 57—59, 68, 70, 265—268

Stearns, Peter N. 彼得·N. 斯特恩斯 5, 57—59, 68, 70, 265—268

Steinhausen, Georg 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森 46

Sterne, Laurence 劳伦斯·斯特恩 294

Stoicism 斯多葛主义 15—17

storytelling 讲故事 201

stratification 分层 124

Studies in Hysteria (Freud) 《癔症研究》（弗洛伊德） 195

subcortical areas (brain) 皮质下区域（大脑） 187, 192, 200, 213, 247, 307

suicide bombers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60, 60 n. 106

Sumeria 苏美尔 270

superego 超我 199

Swinhoe, Robert 罗伯特·斯温侯 171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象征性互动主义 123

taboos 禁忌 50, 50 n. 61

Tacitus 塔西佗 80, 290

Tahiti 塔希提岛 80—81, 95—98

takut (fear) （恐惧） 144

tamilpparru (devotion to Tamil) (对泰米尔语的热爱) 140

Tamils 泰米尔人 76, 140

Tanner, Jakob 雅各布·坦纳 46

tapu (social rules) 塔普 (社会规范) 4—5

Tāvana Vahine 塔瓦纳 97

Taylor, Charles 查尔斯·泰勒 113

Tea Party 茶党 236

Telugu language 泰卢固语 140—141 n. 265

terrorism 恐怖主义 60

thalamus region (brain) 丘脑区域 (大脑) 191—194

“Uncanny Valley” (Mori) “恐怖谷” (森政弘) 28, 28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 254

description of 描述 307

duality 二元性 136—141, 139 n. 261

and Kövecses 科维克塞斯 134—135

and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252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社会建构主义 5—6, 143, 256, 299

Unnatural Emotions (Lutz) 《不自然的情感》(卢茨) 117

Urban, Greg 格雷格·厄本 77

US Army 美国军队 57

Utku 屋库因纽特人 103

vasomotor centre 血管舒缩中枢 188

Velvet Revolution “天鹅绒革命” 54

Venter, Craig 克雷格·文特尔 62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VMPFC) 214—215 , 218

Verheyen, Nina 尼娜·费尔海恩 63

Vibrant Matter (Bennett) 《活力物质》(班纳特) 236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34—36

Vierhaus, Rudolf 鲁道夫·菲尔豪斯 290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286

Vischer, Robert 罗伯特·费肖尔 231

vivisection 活体解剖 26

Voss, Christiane 克里斯蒂安·沃斯 285—286

Wallon, Henri 亨利·瓦隆 42

The Veil of Memory: Features of a Historic Memory (Fried) 《记忆的面纱：历史记忆的特征》(弗里德) 225

theory of alienation (Marx) 异化理论(马克思) 84

Theory of Mind 心灵理论 248

thermometer 温度计 182

Thoits, Peggy 佩吉·斯奥兹 124 , 124 n.203/207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43

Tiberius Gracchus 提比略·格拉古 65—66

Tilly, Charles 查尔斯·蒂利 58

Tilly, Louis 路易斯·蒂莉 55

tip (will/desire) *tip* (意志、欲望) 109

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经颅磁刺激) 209 , 307

Tolstoy, Leo 列夫·托尔斯泰 294

Tomkins, Silvan S. 西尔万·S. 汤姆金

斯 85 , 112 , 151—153 , 179 , 227—228 , 250 , 273

totemism 图腾主义 84—85

Totemism (Lévi-Strauss) 《图腾制度》(列维·斯特劳斯) 85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Sedgwick) 《触摸情感：情感、教育学、操演性》(塞奇威克) 226—227

trauma 创伤 289—290

Trawick, Margaret 玛格丽特·特拉维克 76

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 225, 225 n. 247

troublesome thoughts 让人烦恼的想法 94

Tupinamba 图皮南巴人 77

Turner, Jonathan 乔纳森·特纳 123—124, 124 n. 203

Turner, Victor 维克多·特纳 85

Tuvalu atoll 图瓦卢环礁 113

two roads to fear theory 通往恐惧的两条路径假设 212—213, 236, 307

Two-Factor Model, *see* Schachter-Singer Model 双因素模型, 参见沙赫特-辛格模型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he (Huizinga) 《中世纪的衰落》(赫伊津哈) 67

War of the Worlds, The (Wells) 《世界大战》(威尔斯) 285

Warburg, Aby 阿比·瓦尔堡 47

Warhol, Andy 安迪·沃霍尔 223

Wassmann, Claudia 克劳迪娅·瓦斯曼 177—178, 186 n. 129, 250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48, 114, 118, 282—283, 291

Wegner, Daniel 丹尼尔·韦格纳 255

Welles, Orson 奥逊·威尔斯 285

Wells, H. G. H. G. 威尔斯 285

West Germany 西德 54

Weyden, Rogier van der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 228—231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Lamprecht) “什么是文化史”(兰普雷希

White, Geoffrey 杰弗里·怀特 5 , 89

Whitman, Walt 沃尔特·惠特曼 249

Wierzbicka, Anna 安娜·韦尔兹比卡 130—131 , 132 , 133

Wikan, Unni 乌尼·维坎 77 , 138—140 , 139 n. 261

Williamson, James F. 詹姆斯·F. 威廉姆森 60 n. 106

Windelband, Wilhelm 威廉·文德尔班 7 , 7 n. 21

Wölfflin, Heinrich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231

Wundt, Wilhelm 威廉·冯特 83 , 118 , 178 , 186 , 284

Wylie, Andrew 安德鲁·怀利 224

yalus (spirits) (鬼魂) 109

yaremat (people) (人) 109

Yiini (adopted daughter) 伊妮 (养女) 90 , 94

Yovell, Yoram 约拉姆·约维尔 200

Zajonc, Robert 罗伯特·扎荣茨 205—206 , 205 n. 195

Zarrilli, Phillip 菲利普·扎里利 110

Zedler (dictionary) 《泽德勒普通百科辞书》 (字典) 26

Zeki, Semir 萨米尔·泽基 231

Zeldin, Theodore 西奥多·泽尔丁 52—53 , 52 n.

译后记

人类是一种情感的存在，情感的历史和人类一样悠久，但是我们对情感究竟了解多少呢？什么是情感？情感包括哪些内容？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来说，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特殊的？即使同一种情感，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形式有何差异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关情感的知识与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问题包括：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情感是心智的特征还是生理的特征？动物有情感吗？女性比男性更加情感化吗？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是不同的吗？情感是否可以“文明化”？换句话说，存在野蛮人的情感和文明人的情感之别吗？情感会导致疾病吗？群体是否存在情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群体情感和个体情感之间究竟有何异同？两者之间又有何种关系呢？情感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还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呢？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会大相径庭，而这也表明关于情感的知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情感史是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而本书是一本试图全面介绍这一领域发展的学术专著。本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情感”（“Emotions in History”）系列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官网是这样介绍的：“人们对情感生活的历史维度的兴趣与日俱增。‘历史上的情感’系列丛书从时间上涵盖了中世纪到现代，从空间上跨越了区域和国家边界，汇集了对世界各地人类体验的研究。本系列通过对科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和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研究，探究了情感的多面本质。”从2014年2月这个系列的第一本《情感词汇》（*Emotional Lexicons*）问世，到2021年3月刚刚问世的《度假的情感经济》（*The Emotional Economy of Holidaymaking*），已经出版了18部，其中除了前面有几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外，其他的都是个人专著，可以说涵盖了人类情感体验的方方面面。

这本《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的作者扬·普兰佩尔教授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教授。他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德国和美国接受的教育，200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在俄罗斯生活了4年，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任教6年，曾在慕尼黑历史研究所（2007—2008）、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2014—

2015)、耶拿高等研究院(Imre Kertész Kolleg Jena, 2016)和格赖夫斯瓦尔德的阿尔弗里德·克虏伯高等研究院(Alfried Krupp Wissenschaftskolleg, 2018—2019)担任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和感官的历史和移民史。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从空间上讲,他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从时间上讲,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除了本书之外,他还出版了《新的我们,为什么移民不是问题:德国人的另类历史》(*The New We. Why Migration Is No Problem: A Different History of the Germans*, 2019)、《斯大林崇拜:权力炼金术的研究》(*The Stalin Cult: A Study in the Alchemy of Power*, 2012)。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最初于2012年以德文出版,已经被翻译成意大利语、俄语和日语,中译本根据作者的意愿,所依据的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7月出版的英文版。由于情感史研究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特征,作者也相应地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本书涉及人类学、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心理学(包括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情感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

作者学识渊博,从人文科学到生命科学,引经据典,顺手拈来。这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压力和工作量。对于书中的引文,译者最初的做法是直接从英文进行翻译,后来听从编辑老师的建议,为了方便中文读者查找文献,对于已有中文译本的被引用作品,尤其是一些已经有了学界公认译本的经典作品,尽量采用或借鉴现有的译文。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性质的译者行为,这种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先要找到译本,接着在书中定位引文的位置,然后把译文抄写到一张纸片上,当然还要按照学术规范,将译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以及页码等信息一并抄写,最后贴到校样上本书译者的译文上方。这样一个过程,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译文比较,有时会发现现有的译文和英文意义不符的情况,不得不对其做出调整。这里要感谢无数前辈译者的辛勤劳动,正是他们在以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后来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是抄写,而是定位,如果说要找的译本中标注了原书页码,这项工作便简单很多,但是大部分译本并没有这样做,本书译者所能做的只能是根据引文的内容来判断其在译本中的大致章节和位置,在这方面印象比较深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虽然比较烦琐,但是对于本书译者来说,这一过程也别有一番趣味。

味，自以为受益匪浅。显然，最方便这样做的地方是图书馆。这里要感谢上海海洋大学图书馆，虽然是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图书馆，我所需要的大部分译作竟然都能找到，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纸笔和双面胶，享受穿梭于书架之间和字里行间的快乐。对于图书馆中找不到的几本书，本书译者则通过京东进行了网购，虽然是在疫情期间，但是往往能够今天订货明日可达，不得不感慨今日物流之发达，感恩现代科技之便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书翻译期间，被本书广泛引用的情感史研究领域两部经典著作的中文版问世，一部是上海三联出版社于2020年1月出版的阿莉·霍赫希尔德的《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另一部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的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情感史研究的极大兴趣，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治和经济全球化似乎遭遇挫折的今天，学术全球化的趋势是多么地不可阻挡。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0年5月，一位和本书合作译者同名的夏凡老师翻译出版了阿莉·霍赫希尔德的另一部经典作品，即《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在译名方面，译者必须坦言，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处理“emotion”“affect”和“feeling”等词语，经作者普兰佩尔教授推荐，译者请教了情感史领域的另一位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林郁沁教授。虽然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求助，林教授还是给出了详细的解答，这让译者真切感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团结和温暖。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解答并不是答案，但是对本译者来说，这种解答比任何答案都更加具有启发性。她的回复大意翻译如下：

你一定也知道，翻译常常不是逐字逐句的对应，而是要翻译出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更完整的认识论背景。我担心这些术语是极其复杂的。事实上，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经常指出这样一点，即如果没有对它们所处的认识论领域进行更全面的阐释，某些术语几乎不可能被翻译。所以，我恐怕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尤其是我不确定普兰佩尔教授是如何在他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术语的。

虽然如此，接着她还是做出了如下的说明：

“Emotion”当然可以简单地翻译成“感情”，但是“feeling”的意思更加复杂，或许可以翻译成“情感”，但还是那句话，要看具体语境。“affect”一词很难翻译，尤其是当普兰佩尔教授从情感研究的学术文献中提取资料时。我不确定这些文献是如何被翻译成中文的，你得知道是否有人这样做过。

我建议你找一个精通西方学术写作，中文流利或母语为中文的研究生来与你一起解决这些术语的翻译问题。这可能意味着要付钱给他们，让他们阅读普兰佩尔教授的著作，了解他是在概念上使用这些术语的，再用中文提出相应的术语，然后你可能需要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术语来翻译英语中的对应概念。

就段落的翻译而言，译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形式的研究》中的一段引文，英文原文如下：

Whatever external events we might also identify as social, it would be like a marionette play, not any more conceivable and meaningful than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clouds or the interweaving development of tree branches, if we were not to recognize fully as a matter of cours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feelings, thoughts, and needs, not only as bearers of those events but as their essential vitality and us really as only interested parties.

2002年华夏出版社的译文如下：

尽管我们把外在发生的事件称之为社会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完全不言而喻地把心灵的各种动机、感情、思想、需要，不仅视为那些外在性的载体，而且看作它们的本质和我们真正唯一感兴趣的东西，那么外在的事件就会只不过是一种木偶戏，并不比乱云飞渡、相互交合或者树枝胡乱生长在一起更易理解，更有意义。

不难发现，无论是英文原文，还是中文译文，都非常难以理解，就像我在向普兰佩尔教授请教的邮件中所说的那样，这里的问题不是句子结构的问题，而是内容理解的问题，一会儿是木偶戏，一会儿是云朵相互穿透，一会儿是树枝互相交叉，英文中已经如此难以理解，如果简单地直接翻译成中文，恐怕读者更加难以理解。普兰佩尔教授直接建议我

把这段引文去掉，把脚注改成：

See, for example, Georg Simmel,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i (Leiden: Brill, 2009), 35. For more details about Simmel and the emotions, see Helena Flam, *Soziologie der Emotionen: Eine Einführung* (Konstanz: UTB, 2002), 16—43.

接着他又提供了西美尔的原文：

Welches äußerliche Geschehen auch immer wir als gesellschaftliches bezeichnen, es wäre ein Marionettenspiel, nicht begreiflicher und nicht bedeutungsvoller als das Ineinanderrinnen der Wolken oder das Durcheinanderwachsen der Baumzweige, wenn wir nicht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seelische Motivierungen, Gefühle, Gedanken, Bedürfnisse, nicht nur als Träger jener Äußerlichkeiten, sondern als ihr Wesentliches und uns eigentlich allein interessierendes erkannten.

他指出，原文充满了抒情色彩，但是无论翻译成什么语言，都是很困难的。他问我这样处理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的话，他可以把这段话从德文重新翻译成英文。译者不愿意给他增添过多的麻烦，于是谢绝了他的好意，并且最终决定保留了这段引文，只是竭尽所能，在英文译文和中文译本的基础之上，重新翻译如下：

不管我们认为社会性的外部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心理动机、情感、思想和需求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不仅是这些事件的承载者，还是这些事件的基本推动力，而我们其实不过是有关当事人，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像一出木偶戏，并不比乱云飞渡和枝丫横生，更可以理解，更有意义。

在上述这封邮件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嘱咐说：“请继续向我发送问题，我想要最好的中文译本！”从事翻译事业（虽然社会上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对翻译工作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本人依然认为翻译是一项很有价值的事业）十几年来，在笔者打过交道的英文作者中，普兰佩尔教授可以算是最关心自己作品翻译进展的作者了。除了感谢他不厌其烦地

答疑解惑，还要感谢他的督促，否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可能还要花更多的时间。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教授和浙江大学的陈新教授，他们一直非常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正是在请教这些学术名家的基础之上，才确定了本书的中文译名。本书的英文标题为“The History of Emotion”，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情感史》，显然这样的书名很有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正如陈新教授指出的那样，想要了解情感史的人，不会不理解这个标题，而不了解情感史的人，有可能也想了解情感史。书中涉及法国文化的内容，请教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黄艳红教授，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的翻译分工，本书第三章第11节至第19节、第四章以及索引由夏凡翻译，其余部分由马百亮翻译，最后由马百亮统稿。虽然翻译依据的英文版本是在作者本人积极参与的情况下翻译过来的，但不得不承认，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中间还是多隔了一层，与作者普兰佩尔教授来来往往几十封邮件，很多是为了向他核实求证，让他把意思重新表述一下。如上文所述，本书所涉学科众多，前沿性、综合性和理论性都很强，虽然译者广泛查阅有关文献，并多次通过邮件请教作者，但受限于学养和见识，理解存在偏差、表达不够清晰、术语不够精确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这里要感谢作者详细而及时的答疑解惑，感谢贾忠贤和周灵逸两位老师的耐心、包容和付出。译者应该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学习者，译路之上，甘苦自知，学海无涯，文责自负。敬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正，以期再版或修订之际加以改进和更正，译者的邮箱为 allohamax@163.com。

马百亮

2021年春于滴水湖畔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Pierre Clastres

[法] 皮埃尔·克拉斯特 著

陆归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Pierre Clastres

[法] 皮埃尔·克拉斯特 著

陆归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 （法）皮埃尔·克拉斯特著；陆归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6951-7

I．①瓜… II．①皮…②陆… III．①美洲印第安人—编年史—南美洲 IV．①K77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29238号

书 名：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作 者：[法]皮埃尔·克拉斯特

译 者：陆归野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951-7 / C-62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by Pierre Clastres

Copyright © Plon, un département de Place des Editeurs, 1972

Translator's Note © 1998 Paul Auster

Drawings by Jean-Marc Chavy

Photographs by Pierre Clastre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英译序

第一章 诞生

第二章 两份和平条约

第三章 回溯

第四章 成年人

第五章 女人，蜂蜜，战争

第六章 杀戮

第七章 一个男同性恋的生与死

第八章 食人族

第九章 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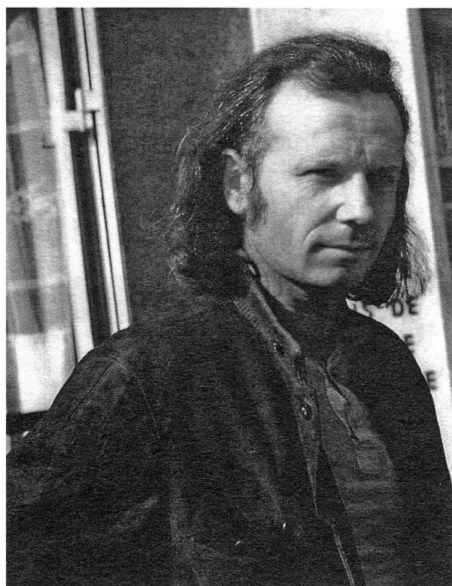
关于转写的说明

讨论与批评

克拉斯特思想初探

证词

译后记



作者简介

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生于1934年。他起先在巴黎进修哲学，随后转攻民族学。他在巴拉圭形形色色的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数年，包括瓜亚基部落、瓜拉尼部落，以及大厦谷中的阿什卢斯莱部落。在圣保罗教了一段时间书后，他曾与委内瑞拉境内亚马孙丛林中的亚诺马米人共同生活。此后他返回法国，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担任研究工作。此外，他也是法西院（Collège de France）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的一员，接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指导。

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致力于从政治人类学方向构建民族学。在与瓜亚基人共同生活后，他出版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1972）一书，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观察并描绘了瓜亚基人不起眼的习俗、语言和思想。他与瓜亚基人亲密无间，在潜移默化中，部落中人在举止、思想上与他互相影响，这本书就是最为重要的见证。

在《编年史》外，他还著有《反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1974）、《壮言》（*Le Grand Parler*，1974）、《政治人类学研究》（*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politique*，1980）等书。

皮埃尔·克拉斯特于1977年因车祸去世。

译者简介

陆归野，1992年生人，长于浙江。书多未曾经我读，事少可以对人言。

献给伊莲娜

插画目录

由让-马克·沙维（Jean-Marc Chavy）绘制

daity：用于运水的容器

用来携带婴儿的背带

瓜亚基猎人使用的各类箭只

一团被用作浆糊的ganchi蜂蜡，包裹着一只犀鸟喙

石斧和金属斧头，用了相同的方式组装

prachi：男人用来制箭的主要工具

水豚的颌骨

有着金属尖端的prachi

dave：冻子椰子叶编成的垫子

koto：用来吸收液体的刷子

kara：陶器，上面的装饰图案由蜗牛壳尖端画成

取火

tapy ywa：举行男子成人礼的帐篷

pabwa：用来猎浣熊的臂带

ambwa：猎人在庆典上戴的帽子

mimby：风笛

用秃鹫骨和蜡制的塞子做的哨子

一个女人为她生病的丈夫涂画

naku：女人的篮子

射箭的姿势

为弓上弦；为箭添羽；在箭的一侧刻上凹痕

pepo：用来装羽毛

pekä : 扇子，用于生火、赶蚊子

英译序

这是我所知的最悲伤的故事之一。如果不是因为时隔二十年后的一次小小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鼓起勇气讲述这个故事。

一切始于1972年。我当时正住在巴黎，因为和诗人雅克·杜宾（Jacques Dupin）的私交（我曾翻译过他的作品）而成了《瞬息》（*L'Éphémère*）杂志的忠实读者，那是一本由玛格画廊（Galerie Maeght）出资的文学杂志。雅克是杂志编委会成员之一，与他共事的还有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安德烈·杜布歇（André du Bouchet）、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以及保罗·策兰（直到策兰在1970年去世）。杂志一年四期；有那么一群人为它的内容把关，《瞬息》中刊载的作品自然向来都是上上之作。

杂志的第二十期，同时也是最后一期在那年春天面世，而在惯常的来自著名诗人与作家的稿件之外，里面还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无众之一》（*De l'Un sans le multiple*）的文章，出自一位名为皮埃尔·克拉斯特的人类学家之手。短短七页，它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高妙，引人深思，论证严密，不仅如此，文笔也十分优美。克拉斯特的散文似乎同时具备了诗人的气质与哲学家的深刻，文章的直截了当、人情味和毫不做作打动了。这七页透露出来的笔力让我意识到，刚刚发现的这位作家，我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他的作品。

我问雅克这是何方神圣，他向我解释，克拉斯特曾师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年纪还不到四十，而且是法国新一代人类学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他在南美洲的丛林中进行过田野调查，也曾在巴拉圭和委内瑞拉最原始的石器时代部落中生活，并有一本讲述这些经历的书即将付梓。当《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在不久后出版时，我出门给自己买了一册。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编年史》不是干巴巴的、以“在野蛮人中生活”为题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篇记者将自己的身影从其中抹去的关于某个陌生世界的报道。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

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我于1974年夏天搬回纽约，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试着以翻译为生。那是一段艰难岁月，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因为根本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我经常得接手一些无甚价值的作品。我想要翻译好书，想要干值得干的活，这可比赚面包钱要紧多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在我书单的第一位，我曾一次又一次向我供稿的各家美国出版社推荐这本书。在无数次被拒之后，总算有人表示了兴趣。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75年底或是1976年初，可能有半年左右的误差。不管怎么说，这是家新出版社，刚刚起步，乍一看一切迹象似乎都不错。他们有很优秀的编辑，签下了几本不错的书，也愿意冒险。在那之前不久，克拉斯特和我刚刚开始通信；当我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和我一样激动。

翻译《编年史》对我来说是一次无比愉悦的经历；译稿诞生之后，我对这本书的感情也没有减退半分。我将底稿交给了出版社，他们通过了我的翻译，而正当一切似乎正奔向一个圆满的结局时，问题开始出现了。

似乎，那家出版公司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资金充足。更糟糕的是，出版商本人在金钱问题上似乎颇有些不该有的偷鸡摸狗之处。这一点我很确定，因为本来我翻译的稿酬是应该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给出版公司的拨款支付的，但当我向他们索要稿酬时，出版商却顾左右而言他，向我保证届时一定会把钱付到我手上。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将拨款挪作他用。

那些日子我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根本没法干等着稿酬到手。这关系到我是有饭吃还是断粮，付得出还是付不出房租。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中，我每天给出版商打电话，可他永远在敷衍，不停想出新说辞搪塞我。终于有一天，再也等不下去的我亲自跑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他当场付钱。他再次找了个借口开场，但这一次我丝毫不肯让步，宣布他若是不给我一张全款支票，就绝不离开。我应该没有做到出言威胁的地步，但说不定也干得出来。我当时怒火中烧，甚至还记得自己想过，万

一切手段都没有奏效，我已经准备好了对着他的脸来上一拳。事情最终没有发展到那个局面，不过我确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里，而那一刻我看得出，他开始害怕了。他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于是他当场打开了桌子的抽屉，拿出支票簿，把钱付给了我。

回头想想，这被我看作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刻之一，是我作为一个人类的职业生涯中无比灰暗的一章，而我的所作所为也毫无值得骄傲之处。但我当时一贫如洗，也完成了工作，所以他们应该付我钱。为了说明那些年过得有多拮据，我就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为例。我从来没有给手稿留过底。我没钱复印译稿，而鉴于我以为稿子交到了靠谱的人手里，世上的唯一一份译稿就是出版商办公室里的那份打印稿。这个事实，这个愚蠢的疏忽，这种赤贫状况下的工作方式日后会回来找我的麻烦。这完全是我的错，而它让一次小小的不走运变成了一场全面爆发的灾难。

但在那个当口，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正轨。在稿酬相关的种种不快得到解决后，那个出版商表现得仿佛他确实很想要把这本书做出来。译稿被交到了排字工人手上，我修改了校样，又把它们交还给了出版社——并再一次没有留底。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现在出版流程已经启动。这本书出现在了图书预告目录中，预定1977至1978年的冬天就会出版。

然后，就在《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行将面世之前数月，传来了皮埃尔·克拉斯特死于车祸的消息。根据我听到的说法，在法国某地，他在行驶时因轮胎打滑，失控翻下山崖。我们从未见过面。他去世时不过四十三岁，我一直以为日后自有大把见面的机会。我们曾通过数封信，在通信中成了朋友，并且都很期待可以坐下来一起喝茶谈天的那天。世事之吊诡无常让这次谈天无从实现。而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后，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1978年来了又去，不见《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出版。又是一年悄然而逝，然后又过了一年，书依然不见踪影。

到了1981年，出版社已是日薄西山，我很难打听到任何消息。就在那年，要不就是第二年，不然就是第三年（这一切已经在我脑子里混作一团），那家公司终于倒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书的版权被卖给了另一家出版商。我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告诉我，是的，他们打算把书做出来。又一年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又打了个电话过去，前一年和我通话的那个人已经不在那家公司了。另有一人接了我的电话，他告

诉我公司无意出版本书。我想向他们要回我的译稿，但他们没能找到。他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过这么份稿子。似乎，我的译稿从未存在过。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皮埃尔·克拉斯特已经去世，我的译稿也已消失不见，整个计划就这么跌入了遗忘的黑洞之中。去年夏天（1996年），我写完了一部名为《穷途，墨路》（*Hand to Mouth*）的关于金钱的散文体自传。我本有意将这个故事加入叙事之中（因为我失策没有给译稿留底，因为发生在出版商办公室的那一幕），可等到要提笔时，我丧失了勇气，没能咬咬牙将它落纸成文。我觉得这一切都太悲伤了，讲述这样一个悲惨至极的漫长故事毫无意义。

在我完稿之后两三个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差不多一年前，我受邀前往旧金山，去赫斯特剧院的城市艺术讲座系列露个面。活动定于1996年10月举行，到了日子，我就上了飞机，如约前往旧金山。等到台上的活儿结束之后，我需要坐在大堂里签售。赫斯特是一个客容量很大的剧院，大堂里排起了长队。人们正等着我给他们的书签名——这可真是一份价值可疑的荣耀——这时，在人群中，有个人我看着我眼熟。那是我曾经在别处见过一次的年轻人，一个朋友的朋友。这个年轻人恰巧是位狂热的藏书家，一头善于搜寻初版和稀罕玩意的警犬，是那种可以在灰尘遍布的地窖里对着零落的弃书翻上整整一个下午，就为了捡到个小宝贝，还把这种事当成家常便饭的书籍侦探。他微笑了一下，同我握了手，然后把一沓带封皮的校样塞到了我手里。校样有着红色的平装封面，而直到那一刻，我从未见过它的任何复印本。“这是什么？”他说道，“我从没听说过这么本东西。”它就这么出现了，突然间，就在我的手中：我那失踪多年的译稿校样，尚未经过修改。自世事之大者而观之，这或许算不得什么值得让人大惊小怪的事件。但对我而言，从我个人微观的角度来看，万千情绪在一瞬间吞没了我。我拿着这本书，双手开始发颤。我感到晕眩，头脑一片混乱，几乎连话都说不出。

这校样是在一个二手书店的清仓书架上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花了五美元买下了它。现在我望着这校样，饶有兴味地注意到，讽刺的是，封面上宣称的出版日期是1981年4月。对于一部完成于1976或1977年的译作而言，这实在是一次漫长到近乎煎熬的磨难。

如果皮埃尔·克拉斯特今天尚在人世，这本失踪之书的发现将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斯人已逝，而我在赫斯特剧院感受到的那一阵短暂的、奔涌而出的喜悦和不可置信，如今也已慢慢消散，化作深切而悲伤的哀痛。世界如此堕落，竟这般作弄我们。世界如此堕落，一个有那么

多东西可以贡献的人，竟然如此年轻就已经辞世。

以下，便是我对皮埃尔·克拉斯特的著作《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的翻译。且不论其中描绘的世界早已消逝，作者在1963年至1964年间曾经生活其间的这个小群体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且不论作者本人也已逝去，但他写的书依然与我们同在。亲爱的读者，你的手中正握着这本书——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是在面对造化弄人的摧枯拉朽时，一次小小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为之庆幸。至少皮埃尔·克拉斯特的著作流传了下来，而这已聊足慰怀。

保罗·奥斯特
1997年2月20日



皮楚基和她的婴儿

第一章 诞生

“Beeru! Ejo! Kromi Waave!”一个声音耳语道。一开始，这声音遥远而模糊，接下来却近得我耳朵生疼。这语言陌生而怪异，我却能听懂。正是夜半时分，想要在这种时候把自己从温暖火堆旁的被窝中拽出来，谈何容易。可这声音不依不饶地重复着：“Beeru! Ejo! Pichugi memby waave! Nde rö ina mechä! vwa!白人！来！皮楚基的孩子出生了！你自己说想看的！”刹那间，一切都清晰了起来，我知道这是在说什么了。恼火，郁闷。他们这样由着我在事情发生的当口闷头大睡，我提前数日叮嘱的一有分娩的苗头就叫我还有什么意义？我那么做是因为，婴儿降生这件事在这个部落中越来越少见，而我又实在太想围观皮楚基分娩了。

俯身在我跟前的是她哥哥卡雷库伦布基，“大浣熊”。火光在他平静的大脸上跳动着，巨大的面庞上看不到半点情绪。他没戴唇饰，一条细细的口水泛着光，从他下唇的孔中流了出来。见我醒了，他便不再多说，站起身，迅速消失在黑暗中。我紧跟着他的脚步，暗中祈祷孩子才刚刚生下来不久，我还能找到些东西满足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好奇心。因为很有可能，这是我唯一一次围观瓜亚基婴儿降生的机会了。谁知道我会错过些什么呢？整个过程中人们做了哪些手势、说了哪些不寻常的话来欢迎新成员的到来，迎接印第安婴儿的仪式又是怎么样的——我很可能永远错过了这一切。而不论我的提问有多么精确，不论知情人向我提供的描述是多么精准且忠于现实，它们都无法替代现场观察。因为，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时刻——某个做了一半的手势，或是哪个脱口而出的词语——往往隐藏着意义那倏忽而逝的独特性，往往蕴含着一束光，为世间万物赋予生机。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印第安人一样迫不及待地企盼着皮楚基孩子的降生。我不愿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这场分娩从一开始就立马具有了社会性意义，不能单纯地被概括为一个生理过程。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对整个群体来说都是一次天翻地覆，绝非某个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那么简单；相反，它导致人类的世界与不可见力量所在的世界之间失去平衡，并颠覆了现有的秩序，而这正是仪式必须要设法重建的。

距离皮楚基一家所住的小屋不远，一堆火正在熊熊燃烧。严冬时节，它的光亮没能给6月的夜晚带来丝毫温暖。高大的树木如壁垒般将

小小的营地挡在南风之外。万籁沉寂，风瑟瑟吹过叶间，微弱不可闻，唯一的动静是各家各户干燥的篝火在毕剥作响。几个印第安人在这儿，围着女人蹲坐着。皮楚基两腿张开，坐在一床蕨叶和棕榈叶上，两手抓着一根木杆，杆子被紧紧固定在她跟前的地面上。这么抓着是为了能更好地配合骨盆处的肌肉收缩，好让孩子的“降落”（因为waa，出生，还有一个意思是“降落”）更容易些。放下心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卡雷库伦布基。其实，他叫我叫得正是时候——一团东西突然出现了。我偷偷瞄了眼，看到了上面的血痕，紧接着，那团东西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啼哭。孩子“降落”了。做母亲的微微喘着气，却没有发出一丝呻吟。是她坚韧如铁，还仅仅是因为她对疼痛不甚敏感？我不确定。但不管是怎么回事，印第安人分娩过程之顺利是出了名的，我的眼前便是铁证：

kromi（婴儿）就在那儿号哭着，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数分钟内。是个男孩。围在皮楚基身边的四五个亚契人没有说话，他们专注的脸上读不出任何情绪，甚至也没有浮现任何笑容。我若是再天真几分，很可能把这一幕当作是野蛮人残酷与不通人情的写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场景会带来巨大的喜悦。孩子降生时，全家人聚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印第安人的反应和我们一样郑重。他们绝非漠不关心——任何人若是流露出这样一种态度都会引起众怒；恰恰相反，这份安静是刻意的，是有意为之，他们在这一场合表现出来的慎重正代表他们对新生儿的关心。从这一刻开始，他们要照料群体中这个弱小无助的新成员，要负责让他茁壮成长。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必须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手中保护他，这些森林中的夜行者已经盯上了它们年幼的猎物，只消一个信号——一点动静、一句话——就足以让它们定位并杀死他。它们若是知道皮楚基的孩子在这一晚降生了，那他就完蛋了，他会被厉鬼Krei闷死。因此，当一个女人分娩时，所有人既不能说也不能笑——孩子的诞生过程必须隔绝一切人声。所以我知道，瓜亚基人其实是高兴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对男孩的偏好得到了满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那么喜欢女孩：女孩和男孩得到一样多温柔的溺爱。然而这个部落的生活习性如此，因此一位未来猎人的诞生会比女孩更受欢迎。

在皮楚基身边围成一个保护圈的人中，有两个人角色尤其具有决定性。Kromi chäpirä（双眼充血的婴儿）刚刚发出他的第一声啼哭。他现在还躺在地上。一个男人跪了下来，手中拿着块小竹片。这就是瓜亚基人的小刀，它远比我们以为的要锋利、危险。几下精确利落的动作之后，他切断了脐带、打上了结，胎儿和母亲的分离至此完成。在近旁的地面上有个大daity（一个鸡蛋形的容器，用细竹条编成，外部覆有一层

野蜂蜜的蜂蜡使它能够防水），里头盛满了冷水。男人用双手掬起一些水，开始为新生儿沐浴。他将水淋遍了孩子小小的身躯，温柔而稳当地洗去了身体表面的液体。清洗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一位年轻女人蹲下身来，把孩子安置在自己的左臂中，紧紧抱在胸前。这是为了在这个冬夜的冷水澡后让孩子暖和起来。就这样，她的右手开始了piy（对四肢和躯干先后进行按摩），手指灵活地摩挲着孩子的身体。这个女人有时被称为tapave——那个抱（孩子）的女人——但她更多时候被称为upiaregi，那个（将孩子）举起来的女人。为什么印第安人会倾向于用“从地上举起孩子”这样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动作来称呼这个女人，而非另一系列动作——比如说抱着孩子，通过按摩让他暖和起来？这一语言上的选择并非毫无根据，它的背后有一套微妙的逻辑。首先，upi这个动词（举起），是用来表达出生的动词——waa，下落——的反义词。出生意味着下落，而为了抵消这次“下落”，孩子必须被举起来。Upiaregi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为孩子带来温暖与舒适；在印第安人的思想中，她的首要作用在于结束诞生这一过程，而诞生始于一次下降。以下降的方式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尚未出生，举起这一动作则确保了婴儿能够“上升”为人。



daity：用于运水的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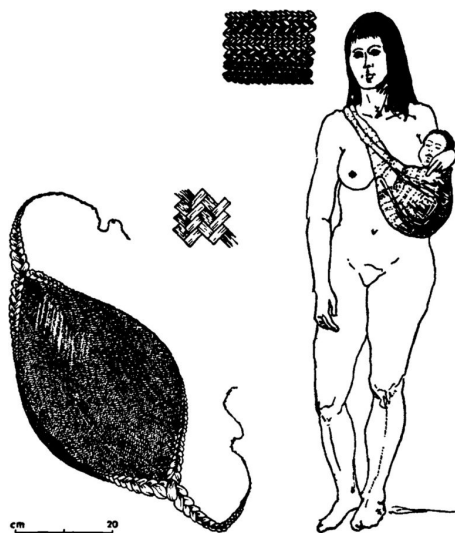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套诞生仪式中看到的，很明显是对瓜亚基人起源神话的写照；这个神话说的不是别的，正是Ache Jamo pyve——瓜亚基人始祖——的诞生。神话里说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瓜亚基人的始祖住在广袤但环境恶劣的地底。瓜亚基人的始祖走出了那片广袤而环境恶劣的土地，他们都离开了……为了走出来，为了离开那片土地，瓜亚基人的始祖就

像狢狢一样用手指甲扒土……”为了让自己变身为人类，成为地上的居民，瓜亚基先民必须离开他们地下的居所；而为了抵达外界，他们用手指甲挖出了一条垂直的地道，并沿着地道上行，就好像在深深的地底挖出洞来的狢狢。神话清楚地点出了这个从动物变成人类的过程，其中涉及遗弃原始居所——地洞，并越过（低处的）地底动物世界与（高处的）地上人类世界之间的阻隔。最早的瓜亚基人的“诞生”正是这个让他们离开土地的上升过程。同样地，婴儿诞生的瞬间并非他waa的时刻——下落的动作重新缔结了人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相反，诞生发生在upi的瞬间：纽带被切断了，而这正是个体真正的开端。女人举起了新生儿，此前他就那么躺在地上，而现在她就这样把他扯离了地面——这正是对不久以前男人用竹刀斩断的另一条纽带的无声隐喻。女人让婴儿摆脱了土地，男人则让他摆脱了他的母亲。文字与图像、起源神话与诞生仪式相互见义；每当一个婴儿降生，瓜亚基人就会通过这个动作无意识地重复一遍自身历史的开篇，我们必须像聆听一段口头讲述一样阅读这个动作。

神话中事情的发展顺序决定了仪式中不同阶段的先后顺序（也可以倒过来说，是仪式的结构为故事提供了句法），这一事实在仪式某个瞬间与神话某个阶段的一一对应中甚至更为显而易见。脐带一被剪断、打上结，婴儿就要接受沐浴，如此一来他成为人的第一步就建立在与水的接触上。水会在此出现，自然是因为其必要性，但也可能是出于仪式规则所需。我们若是不单单考虑沐浴在卫生方面的作用，而是同时把它作为仪式性行为来解读的话，把沐浴看作是下一步，也就是upi的前奏与筹备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所提示：也即是说，婴儿与土地的分离的第一步，是婴儿与水的结合。神话中的确提到过水，尽管方式稍有些隐晦。在离开土地之前，神话中的瓜亚基人必须涉水而过：“……瓜亚基人的始祖为了离开地底，抵达地面，要穿过一片丰美的水域……”此外，神话中最早的瓜亚基人在地洞底部时的相貌似乎也能够解释水的作用：“……瓜亚基先民腋窝发臭，皮肤发酸，肤色赤红……”这基本说的就是他们就像新生儿一样，脏兮兮的，同样需要沐浴。还可以补充的是，那些有着刚刚分娩完的产妇的部落被瓜亚基人叫作ine，“发臭的”，这进一步证实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镜像游戏。就这样，事物间的隐秘秩序一点点被揭示了出来：历史与仪式共享同一套逻辑，同一种思维模式将它不自觉的结构法则映射到了一系列词语与手势之上，而再一次，在古老的森林的庇护下，人们完成了对这一同盟忠贞不渝的庆贺。

印第安人始终沉默着，一切语言都是多此一举，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应该做什么。女人继续抱着孩子，他现在暖和起来了。接下来，jware——刚才为婴儿沐浴的男人——再次接手，开始猛烈地按摩婴儿的头部。他的右手掌张得很大，紧紧按压在头骨上，仿佛那是他要模铸的材料。而这正是jware试图要做的。他希望把头骨整成圆形：印第安人觉得这种头型最漂亮。但是，正如我们所能预料的那样，他的按摩并不能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一头部“矫形”是jware的责任，但是其他人也能接替他的工作，这表明人们对婴儿的关爱以及他们想要直接参与仪式的渴望。就连婴儿的母亲，也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对婴儿的头部进行同样的“治疗”。Jware停了下来，把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印第安人。风纠缠着火苗，时不时在黑暗中撕开一道光亮的口子。瓜亚基人对寒冷无动于衷，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kromi身上：他们全力以赴迎接他的到来，而在这项严肃的任务中，任何疏忽对婴儿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新生的瓜亚基人身边，目光、手势和裸露的身躯构成了一块充满忠诚，甚至爱慕的空间，这象征着印第安人中大人对小孩的感情。



用来携带婴儿的背带

分娩非常顺利，因为婴儿降生之后的接生工作衔接得很快。一个男人收起了地上的那床蕨类植物，胎盘就落在这上面。他将这捆东西收到一处，拿到距离营地较远的地方埋了起来。这自然是出于卫生上的考量，但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出于一种最根本的谨慎心理：来自女人体内的东西中蕴含的危险必须被隔离。当然了，简简单单的掩埋并不足以削减其威胁，为了祛除胎盘招来的魑魅魍魉，还有更多手续需要完

成。这就是仪式第二阶段的目标，它将占用第二天的大部分白天时间：一旦婴儿的安全有了保障，接下来需要留心的就是成人的安危了。至于这一晚，似乎一切都已经结束。Upiaregi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母亲则将他放进她身上斜挂的宽背带中。从今往后的日日夜夜中，这将是婴儿的家，只有等他开始走路了才会离开它。在此期间，他和他母亲是彻底的共生关系，她随时准备回应他的呼唤，只消一个皱眉、一声哼唧，她就会把乳头塞进孩子嘴里。我们也很少听到印第安婴儿号哭，事实上，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开始哭，但凡他一张嘴作势要发难，充满乳汁的乳头就已经被塞进了他嘴里，任何坏脾气的苗头都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个做法有双重功效：既保证大人能得到休息，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让孩子永远能得到满足。皮楚基端详着她的孩子，她的微笑中包含着无限柔情，一时间将整个部落的贫乏一扫而空。她站起身来，抱着孩子走回了自己的小屋，完全不需要任何帮助。她看上去并不十分疲惫。她的两个丈夫，查楚基和老托康基，并不在那儿；但她并不是孤身一人，因为另一户印第安人家会陪她过夜。就像此前那样，印第安人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地散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tapy。“O pa.”卡雷库伦布基低语道，“结束了。”几分钟后，营地中的每一个人都已入睡。风与林木继续着它们上千年的对话，篝火在深夜噼啪作响，而部落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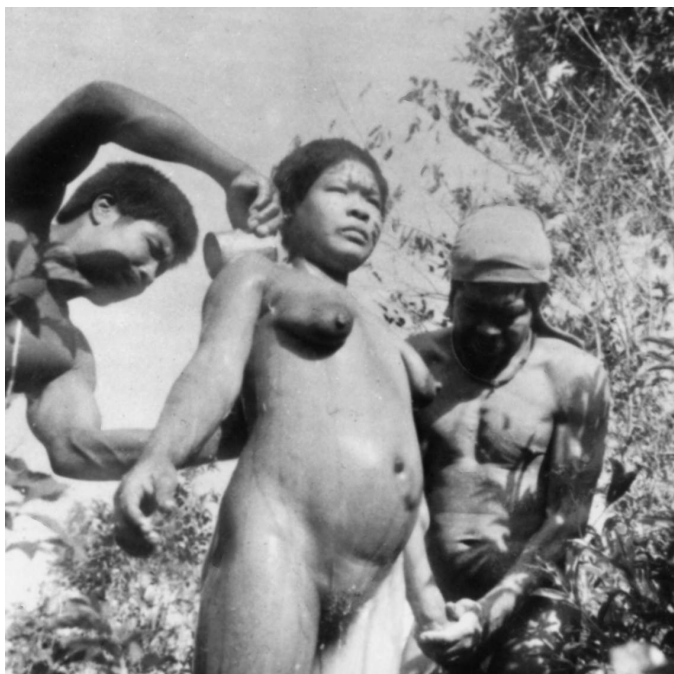
灰蒙蒙的清晨没有半分热带的气息。天空很低，太阳还没升上地平线，人们那因夜间严寒而依旧僵硬的身体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白天的温暖。营地中一共十几间小屋——或者说，简陋的居所——在一块空地上差不多围成一个圆圈。四周的植物形成一道厚实、阴森的墙，纠缠的藤蔓、枝丫与寄生植物在我们头顶蔓延如屋顶。稍远处，一小块空地打破了绵延不断的森林。这个季节，覆盖地面的草更像黄色而非绿色；但今天早上，草泛着白色，上面的霜要等日上三竿才会消失。几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已经在跑来跑去了。“你们冷吗？”“Duy pute.很冷。”他们答道，边哆嗦边微笑。但他们并没有抱怨，而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默默忍受着。印第安人已经醒过来一阵子了。通常来说，男人天还没亮就会去打猎，但今天他们觉得kyrymba iä（没有勇气）。他们冷得发僵的肌肉没法拉开弓，猎人们更乐意在火堆旁再打上一会儿盹。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需要出席kymata tyrö，皮楚基的分娩使得他们必须经历这一环节。她本人跪坐着，正在给孩子喂奶。“他很会吃，”她说道，“他以后肯定是个bretete，一个好猎人！”卡加普古基——“大野猫”——正准备动

身，他没有带弓和箭，只是随身带了他的金属大砍刀。“你去哪儿？”“Kaari kymata eru vwä.去林中带些kymata回来。”Kymata一词指的正是timbo（羽叶醒神藤）这种藤蔓植物。它对鱼类有毒，这一特性为很多南美部落所熟知，他们在某种名为“毒鱼法”的特殊钓鱼技巧中使用它。毫不夸张地说，当它被撒到水里时，这种植物含有的某种物质能够让水中所有的鱼都窒息。但是瓜亚基人却不清楚这一妙用，他们只有在仪式中才用到timbo。而它就是卡加普古基出门要找寻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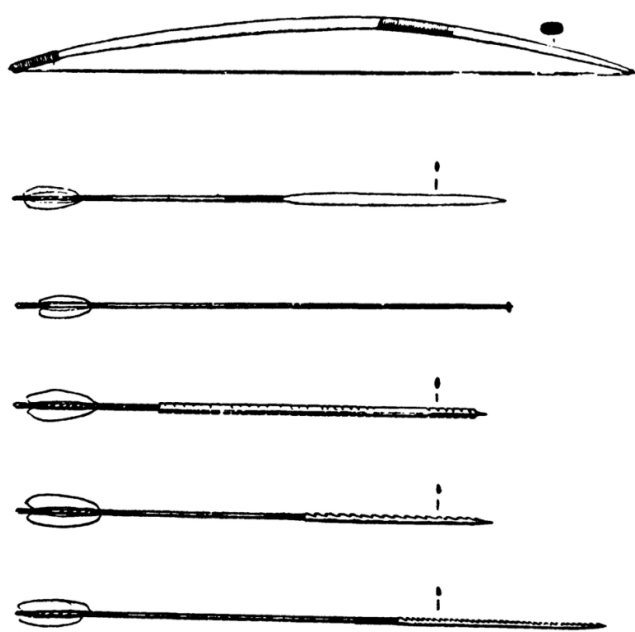




皮楚基分娩后的净化仪式



我问起了皮楚基的两个丈夫——第一丈夫，查楚基（Chachugi，“Chachu”意为大野猪）和第二丈夫，托康基（Tokangi，“Toucan”，犀鸟）。他俩都没有在他们三人的小屋过夜。查楚基睡在了他兄弟家。他是apäete，新生儿真正的父亲：那不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而是一妻多夫制下规定如此。婴儿诞生时女人的两个丈夫都是婴儿的父亲，但他们的地位说来并不平等，因为japetyva（第二丈夫）的地位和权力明显都逊于imete（第一丈夫）。这就是为什么托康基——哪怕年事已高，却依然能不时获得皮楚基的青睐——只能算是apä vai，婴儿的半个父亲。当然了，他们关爱和尊重对方，但皮楚基的儿子将会知道，在两个父亲中，查楚基才是他真正的父亲。我在小屋中找到了查楚基。他正在为他巨大的弓绷弦，弓足足有两米半高。他接着用指尖试了试木制长箭的箭头，若有钝的，就用碎片削尖。碎片来自巨型蜗牛的壳，这种生物在森林中随处可见。“Nde bareka o？你要去打猎？”“Go.对。”他不怎么健谈。“你怎么不睡在自己的tapy里？”“Pane vwä.因为pane。”他简洁地回答道，看着手上的活，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瓜亚基猎人使用的各类箭只

Pane的概念占据了瓜亚基人思想的核心。印第安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碰上大事或是“无力回天”的情况时就已经频频提起它，而日后还有无数场景告诉我切不可小瞧这一让他们近乎着魔的念头：它在某种意义上左右并支配了印第安人的大多数行为，以及他们的认知。查楚基的回答言简意赅，但这没什么好让人惊讶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妇的丈夫而言，他所要遵从的行为准则再清楚不过了。Pane是什么？这一看似人畜无害的小词事实上意义重大。它代表着对一个印第安人而言最糟糕的情况：出猎不利。一旦我们意识到整个部落的全部经济收入都来自打猎和采集，尤其是打猎时，我们就能理解这样一种失利对猎人而言会有多大影响了。从林子里两手空空地回来意味着此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予他人，也就意味着他不会收到任何回馈，因为整个部落的食物供应链太过脆弱，它没法长久地支撑一个pane的猎人这样一种致命的重担。因此，男人必须通过猎杀动物来供养部落。换言之，对一个瓜亚基人来说，部落赋予他的角色仅此一种：不论是根据定义、原则，还是论天职，一个男人都等于一个猎人。事关部落的支柱以及每一个男人的个人荣誉，打猎及其对立面界定了社群的边界。因此，一个猎人长久以来最关心的事——或者说，他的执念——就是避免一切有可能造成pane的情形。查楚基恰恰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中，因为一个女人的分娩会直接牵连她的丈夫。首先，他不能在场，这就是为什么查楚基离开了他的小屋。如果他

不小心目睹了妻子分娩，这一视觉“接触”的惩罚很快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将会pane。但是他做了预防工作。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瞥到皮德基，他决绝地背对着她的所在，直到整个仪式彻底结束后才回到她身边。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他现在的危险处境，他不太乐意谈论这些事情。至于我，也不愿强求。印第安人不是情报机器，我若是以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回答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当他们愿意回答，心情不错，或是有空闲时，他们才会回答。通常来说，比起和一个人类学家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愿意睡觉，更何况我得到的最好的情报往往是印第安人自发告诉我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查楚基已经检查完所有的弓箭准备动身了，他看上去甚至很是急迫。

我注意到，在场的所有猎人中，他是唯一一个动身去林子里的。但这一天并不是什么黄道吉日，天气很冷，动物都窝在巢穴、树洞中，或是藏身于层层落叶之下。然而，查楚基准备武器并非白费力气，他的行为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因为，这一天若是有可能碰上并杀死猎物，那也只能是他了。我若是问他，他甚至可能会回答说，他很确定自己能带回些东西来。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猎人有过人之处，这个想法不存在于瓜亚基人的思想中。当然了，每一个印第安人都会自信满满地说：“Cho rö bretete.我是个好猎人。”但是他永远不会说：“我是所有猎人中最厉害的。”也更不会说：“我比某某某厉害。”尽管每个瓜亚基人都认为自己技艺不凡，但没有哪一个会把自己和他人相比；每个人都会颇有几分风度地承认所有人都同样拥有完美这一品质。因此，查楚基的自信绝非出自傲慢——这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而是源于笃定的认知：“Ure kwaty.我们就是知道。”每当我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解释，或是当某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过于理所当然时，他们总是会加上一句：“我们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他们的发言像这样变得神神叨叨的时候，基本可以确定这背后的信息将尤为耐人寻味，我最好竖起耳朵。查楚基的知识来自何处？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对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空间，而是人类世界鲜活的延展——后者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对前者造成影响。一个女人的分娩会深深地改变整个群体的处境，同时，这一失衡也会波及自然界，而森林中的生命也会遭受新一轮波动。

从前一天晚上婴儿降生开始，查楚基就成了bayja——他成了“一切生物注意力之所在”，森林中的居民将汇聚到他这个中心。他静静地在林中前行，身上散发出来的东西紧随着他的步伐，却很难用语言形容：那是一股包裹着他的力量，却并不为他所控，他每向前一步，这股力量都

会散播关于他存在的迹象。一个人若是bayja，动物便会蜂拥而至。查楚基很清楚这一点，而这也是他信心背后的秘密。如果说一个猎人能够有一个机会随心所欲大展身手的话，对于查楚基来说现在正是这么个时候。他之所以出猎，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会碰上猎物；因为他妻子刚刚才分娩，他成了bayja（bayja只会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只可能是女人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整晚都小心地与妻子保持距离，连看也不看她一眼。眼下他获得猎物的几率大大翻倍，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样的日子去冒pane的险。

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查楚基之所以出猎，并不仅仅是为了要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捞上一笔，以增加他的食物“生产量”。事实上，他冒着严寒出门并不是简简单单为了一饱口腹之欲；哪怕他的小屋里储藏有充足的肉类，他依然会出门。原因很简单：他必须去林子里，因为他的存在彻底受到了皮楚基分娩一事的牵连——他别无选择。他必须去打猎，不是为了带回猎物，而是为了救他自己的命。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成为bayja导致他直面死亡的威胁，而想要逃离这一处境，他就必须开杀戒。威胁来自哪里？源自他现在拥有的那种吸引动物的力量，瓜亚基人某种意义上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隐形的分身。这种力量正把大量野兽赶向他的方向，而他必须弯弓射箭，将它们射杀。表面上看，一切都是上上签。猎人将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因为动物会自己跑到他面前——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办法携手而至。事实上，多亏了那个陪伴着他的隐形分身的存在，查楚基受惠于猎物的“合作”——它们甚至会自投罗网。但实际上，事情又没那么简单，而动物所响应的那种奇特力量只能帮上一部分忙：因为所有动物，不论高低贵贱，都会对这种力量做出反应。瓜亚基人把动物分成两大类：首先是印第安人常常猎杀的那些（比如猴子、狢猯、野猪、雄狍等），其次就是美洲豹。林子里若是有人处在bayja的状态，美洲豹会是最先发现的。印第安人常言：“Ache bayja bu baipu tarä ikö. 当一个瓜亚基人成了bayja时，美洲豹会蜂拥而至。”因此，当查楚基灵活地沿着小路前行时，有一千双眼睛盯着他。寂静的森林中暗潮汹涌；查楚基知道，尽管他看不见也听不到它们，但美洲豹就在不远处，或是在阴暗的树丛后盯梢，或是蹲踞在低矮的树杈上。它们被ete-ri-va——那一天围绕着查楚基的神秘力量——吸引，正静候着猎人，打算看准时机发动进攻，把他撕成碎片。查楚基面临的威胁就源自它们，而他只有开了杀戒，才能够消除这种威胁。换言之，在这个森林充斥着大量猎物的日子里，一个男人若是不履行自己作为猎人的职责并从树林中带回些猎物的话，他自己就会成为另一位猎人——美洲豹——

的捕食目标。

因此，这一天的出猎非同寻常。通常来说，对查楚基而言，美洲豹主要是个竞争对手，因为二者往往争夺同样的猎物。可现在，这个男人既是猎人，同时又是被捕猎的对象，因为这一天，美洲豹想要撕成碎片的动物就是他本人。为了夺回并保住自己生而为人中的地位，为了避免因为被美洲豹吞食而沦为动物，他必须证明自己作为猎人、作为动物猎杀者的身份。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必须成为一个猎人。查楚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如野兽般死去，或杀戮如猎人。这就是bayja带来的后果：通过给予受它影响的人以吸引动物的力量，它让这个人拥有了维持自己“人格”的方法，但同时，这也会让他面临更大的危险，因为美洲豹将结伴而至。因此，成为bayja意味着生活在模棱两可之中，意味着同时成为猎人与猎物，换言之，意味着存在于自然与文明的中间地带。这也许就是在瓜亚基人对bayja明面上的解释之下更深层的意义：查楚基面临的危险不过是他摇摇欲坠的生存状况的鲜活隐喻；置之死地而后方可生。

这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查楚基如此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目光飘落到妻子的所在之处。因为这一天，他充满仪式性的出猎关涉宇宙层面，甚至带上了些神圣的色彩；同样地，如果他屈服于自己的好奇心，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厄运自然也要比所谓“字面”意义上的pane严重得多。他将发现，在这个自己最需要好运的时刻，他会在与美洲豹的对抗中毫无还手之力，而且是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这一次，pane可不仅仅意味着空手回到营地，而是意味着他将成为野兽爪牙下的亡灵。因此，如果他在几个小时之内没能回来的话，我们很清楚葬礼的悼词应该说什么：“Baipu rö upa.美洲豹已将他吞食一空。”当然了，我并不清楚查楚基是怎么想的。（若是幻想自己能够看穿一个野蛮人的内心世界，那我也未免太傻太天真了些。）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敏捷地走进了那个危机四伏、充满活力的世界，一如既往地勇敢，并小心地让自己不被丛林的呼唤误导。事实上，他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他找寻着自己，自己的本质。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迷失了自我，但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他所面临的风险。避免死亡并非头等大事（印第安人并不怕死），最重要的事情是竭力让他脚下的土地、里面的动物、其中的居民，以及控制这片土地的力量认识到他是谁。死在丛林中的可能性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背后则是对他的存在更深一层的质疑，是一次“死刑”（即便只是象征层面的死刑），因为这让他存在的本质受到了动摇。眼下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说，世界已将查楚基关在门外，不再承认他一

直以来占据的位置。因此，他必须重新将自己的存在施加于世界之上，以一个猎人的所作所为来赢回在世上暂住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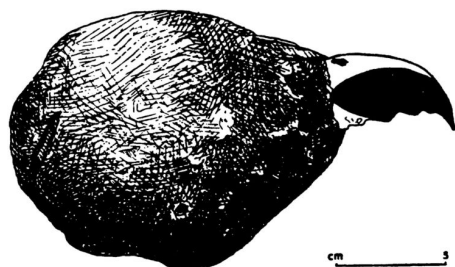
然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残酷无情的变化，让查楚基的人生天翻地覆？究竟是哪种突如其来但又致命的力量让他走上了它铺好的路，并让他直面死亡，以消弭他的存在？（现在，真实的世界究竟如何已经无关紧要。查楚基确信美洲豹将蜂拥而至，因此，它们便真实存在于森林里。）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意味着我们并不满足于印第安人明面上的回答，而是想要下沉到更深的意义中，深入到他们潜意识的层面。瓜亚基人的理论很直白地把查楚基的处境与他成了bayja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而这又是因为他的妻子刚刚分娩。由此可知，当一个女人生育时，她的丈夫（或丈夫们）将会有生命危险。但分娩是不是唯一一种会导致男人受到bayja威胁的情况呢？并非如此。威胁同样存在于以下情形中：女儿初潮，或是有人流产（不论是故意还是意外）。如此看来，似乎只有当女人的女性特质爆发并同时扰乱了她个人的身体以及整个群体的社会生活时，bayja这一危险力量才会被释放出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流产或女性初潮带给部落生活的影响不亚于一次分娩，人们往往会通过仪式来处理这些事件：仪式作为一种手段，使得一个原始的、刚刚发生的事件具备了社会性，这一事件也由此被吸纳到了一个经过中介的象征系统中；换言之，正是在仪式空间中、并通过仪式空间，自然秩序才具有了文化意涵。如此说来，我们是否应该把bayja和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的特质联系在一起呢？这里女性特质指的是女性体内不洁的部分——至少印第安人是这样认为的；至于男人，则要竭尽全力避免受这些不洁之物的污染，类似的场面我已经观察到了无数次。仪式程序上的差异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上面提到的三种情况都会导致同一套净化仪式的举行（眼下准备这一仪式的正是昨晚在皮楚基分娩时帮忙的人），但是，只有在妻子分娩的情况下，丈夫才会出门打猎。当然了，初潮、流产和生育三者有共通之处，它们给部落里的男人带来同样的问题（它们都会导致bayja以及一切随之而来的危险），也都要求男人走完同一套仪式。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系统无疑可以用一条共通的原则加以解释。但显然，分娩一事过于特殊，不好与其他情形混为一谈。整个群体给分娩赋予了更为重大的意义；简而言之，它带来了意义的“过剩”，这一过剩必须用仪式上的“过剩”或者“多余步骤”来回应，也即查楚基出猎一事。他想要通过打猎来克服的这种危险，并非来自通常意义上的bayja，后者仅仅通过用timbo藤蔓净化就能被祛除。

很显然，bayja带给男人的问题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这一差异导致

了作为对应方法的仪式的差异：是什么导致在涉及分娩时，女人的丈夫必须去打猎，而另外两种情形却不用呢？很简单，因为多出了一个新生儿。如果说初潮和流产之后的净化仪式完全是由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决定的话，在分娩的情况下，这仅仅构成了决定仪式步骤的部分原因：因为现在又新增了一条纽带，它连接着男人和新生儿，并使女人的丈夫变成了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存在散发的光晕导致了更大的危险，这使得父亲的灵魂躁动不安，于是他接受挑战，走进密林中。女性被看作是对男性的威胁，因此她在象征层面的重要性往往会盖过新生儿的存在：我们把他忘了，因为他的存在太过突出。因此，分娩所要求的仪式比女性的其他生理活动引起的仪式更为复杂。事实上，对男人而言，它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步骤：如果说净化沐浴能将他从妻子所导致的bayja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对仪式性打猎的解释就必须从婴儿的作用来着手。

让我们把母亲的问题搁置一旁，先问一问为什么婴儿的诞生会将父亲置于这样严峻的境地中？做父亲的必须出门与大量的美洲豹争夺猎物，以免于它们的攻击。因此，虽说婴儿降生时，每个人都致力于让他的世界变得更友好、和平、宜居，可是对做父亲的来说，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世界变得凶险异常。这里危机四伏，不计其数的美洲豹被扔到了他的必经之路上，试图消灭他的存在。这一对立背后神秘而充满恶趣味的原则可以化作一条干巴巴的法则：孩子与世界的结合意味着父亲与世界的分离。印第安人的行为告诉我们，他们的思想似乎在说，孩子与父亲不能共存于世。美洲豹作为死亡的代言人与婴儿的使者，被委派来重建世界的秩序，以完成印第安人潜意识中弑父的宿命：孩子的降生便是父亲的死亡。存在受到质疑的父亲只有通过杀死猎物才能够活下去，并以战胜者的姿态与美洲豹决一死战，而美洲豹正是婴儿力量的化身。换言之，父亲与孩子杠上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力量不光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它甚至还动摇了宇宙的秩序：只有通过除去另一条生命，一条新生命才可能诞生；而一条生命的降生所破坏的秩序只有通过与之相抵消的死亡才能够被重建。就算做父亲的成功杀死了猎物，从而从美洲豹的爪下逃脱，在象征层面上，孩子降生已经宣告了父亲的死亡。最终，印第安人的仪式行为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发现：人不是永恒的，我们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屈服，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横跨生死。在这里，野蛮人潜意识中、只能由行为表达的思想竟与西方思想背后高度自觉的逻各斯神奇地契合在了一起。最终，印第安人也好，哲学家也罢，他们的努力所共同面临的困境都在于——不知死，焉可知生。

在印第安人思想中，对美洲豹的恐惧占据着核心地位。人们没把美洲豹看作丛林中的野兽，而是看成某种隐形力量的使者。而我数星期前获取的消息恰恰在事后证实了这一点。我不在时，有个女人生下了孩子。第二天，她的丈夫出门打猎，但那晚他是两手空空回来的。“Pane.”他言简意赅地说道。或许他没能严格遵守不可窥视的禁忌。总之，形势变得很危险，而他只能寄希望于timbo净化仪式来将危险拒之门外。“你打算怎么做？”“Ai mita tatape jono bai pu iä vwä.烧些蜂蜡，这样美洲豹就不会来了。”除此之外，烧蜂蜡的仪式只会在一种情形下发生：蚀。当蓝色的美洲豹——天上的美洲豹——试图吞下月亮或太阳的时候，烧化的蜂蜡升起的烟会将它逼退；受到威胁的星辰因此得救，世界末日再一次被延后。



一团被用作浆糊的ganchi蜂蜡，包裹着一只犀鸟喙

日近晌午，霜终于化了。气温渐高，印第安人从夜间寒气下的冬眠中缓和了过来。一队女人从森林中回来了，她们在巨大的、棕榈叶编的篮子的重压下弯着腰，努力直起脖子，以托起前额粗大的带子上所悬挂的重量。她们带回了几十公斤橘子，并很快将它们分给了部落的全部成员。橘子没有被递到其他人的手中，而是被扔到了每个人跟前的地面上。地面有坡度，水果滚个不停，弹得到处都是。这些橘子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水果，它们和apepu毫无瓜葛。后者是野生的“橘子”，它们长满了整个森林，但对于瓜亚基人的味蕾而言酸得分。这些作物是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著名的瓜拉尼征服时期带进巴拉圭的。传教士早已消失了踪影，橘树却存活了下来，甚至四处繁衍——这显然是多亏了动物和鸟把橘树的种子带到了森林深处。因此，林间旅人偶然在路上转过一个弯后，很可能会惊喜地在森林的心脏地带发现一片静谧的橘林。橘子熟时，野猪、鸟雀、猴子……还有瓜亚基人都会齐聚在此，宴飧一番。

卡加普古基也回来了。他用不着走上太远，因为timbo到处都是。他带回来了一大捆藤蔓植物，是他从树干上一条条扒下来的；又用砍刀短促地、一下下削下来一条条细细的藤条，它们蜷曲起来，渐渐形成了

颇为可观的一堆。他不停地干活，因为净化仪式等查楚基一回来就会开始。此外，由于每一个参加到分娩过程中的人都需要经历这个仪式，对timbo的需求量将会很大。Kymata tyrö（用timbo清洗）——也即“用藤蔓净化”——在瓜亚基人中间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它似乎都快成了一种万灵药。他们不光光会在个人或是部落生活的重大场合使用它，每当他们想要保护某人（通常是个男人），好让他免于可以预见的危险（现在就属于这一情况），或者是想要停止某个已经开始、并变得越来越危险的行为时，他们都会诉诸这一仪式性沐浴。打个比方，一个人很可能因为没有遵守某种饮食禁忌而生病。他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而为了将他体内病痛的“幽灵”赶走，瓜亚基人就会让他接受kymata tyrö。但无论是为了预防还是治病，人们永远在仪式性场合使用timbo，而它这完全是象征意义上的效用源自某种奇特的“超自然”因果论。这就是为什么卡加普古基在准备timbo。这能让他们祛除bajya，以净化那些可能沦为bajya受害者的男人，还有那些有可能把bajya传染给其他男人的女人。

然而，美洲豹并不是bayja导致的唯一危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怪物，它并不会像丛林的王者一样立刻出现，却和它们一样危险。它掌管着苍穹，有时可见，但大多时候隐而不见——这就是memboruchu，“大蛇”，也就是彩虹。彩虹不同的色带实际上是两条大蛇，一内一外。每当暴风雨后，彩虹身体的弧线横跨了天空时，印第安人就会以愤怒的叫声迎接它的出现。他们必须将它赶跑，用叫声把它吓走。因为它过于危险，所以一般最好不要用手指它。但是它真正的恶意只会发泄到那些身为bayja的男人头上。它试着把他们一口生吞，而只要他们还没有被timbo净化，彩虹就会卧在上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俯冲到他们头上，或是在溪流间和林中空地上攻击他们。“大蛇”之可怖在于它宣布死亡的来临，但更糟糕的是，当它将天空分成两半时，印第安人知道美洲豹正准备把他们撕成碎片：这也就是为什么bayja的受害者必须接受净化仪式，半点都拖不得。

下午才刚刚开始。查楚基从树林中出现了。他避免了pane的命运，因为他左肩上挂着两只巨大的kraja，吼猴（singes hurleurs）。没人说话；他把两只动物给了其他印第安人。他一只都没有留下，这是因为他被禁止食用自己打到的猎物；至于他的妻子，她刚刚分娩，因此有诸多饮食上的禁忌，其中一条就是忌食吼猴肉。她若触犯了禁忌，就会头痛难忍，双眼充血。孕妇同样需要遵守禁食吼猴肉的忌口，但背后的原因有所不同：如果她不遵守的话，她将来的孩子将会沦为kyrypy opo的受

害者。我至今没能参透这一短语的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肛门跳”，或许指某种先天畸形。

不管怎么说，它让人想起小孩子间的互相辱骂（如“红屁股！猴子屁股！”），指的肯定也是猴子这一特殊的体征。

在此期间，卡加普古基已经将他准备的timbo搬到了皮楚基之前生孩子的地方。他还带了一个大容器（daity），里头盛满了水。他抓起一把把蜷曲的藤条，将它们浸入水中，小心地挤出全部汁液。液体很快就变白了，他不断重复这一步骤，直到他已经制取了足够多的混合物为止。眼下万事俱备，就等仪式开始。“不洁”的瓜亚基人都到了——包括所有直接参与到分娩过程中的人，以及皮楚基的两个丈夫。仪式从皮楚基开始。这个女人站着，双手撑着一根立在地上的木杆。卡加普古基在另一个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执行仪式的从来都是男人）抓了一把还没用过的藤条，把它们浸入水中，然后开始用力擦拭皮楚基的背部。这两个男人一丝不苟地投入了清洗的工作中，他们满怀工作热忱，没有放过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处私密的褶皱、脸上的任何一条缝隙。Timbo渗出来的白色泡沫和肥皂一样有效。随着皮楚基被清洁完毕，同一盆水被用来冲洗她的身子。“清洁人员”静静地干着活，忙碌的他们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

接着，从近旁的一个小屋中传来了chenga ruvara——女子唱的仪式歌曲——尖锐的声音。说是“歌曲”，实则是“恸哭”：一个女人身子前倾，双掌覆盖着面庞，绵长的呜咽声迸发自她的指缝间。接下来是一首刺耳而哀怨的曲子，全不加节制，歌词或是被拖得老长，或是被中断、吞音，对一个非瓜亚基人来说有如天书。这样的发泄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呜咽声再起，如此循环往复。Chenga ruvara一般会长于十分钟；所谓“带泪的问候”说的就是这个。^①很多部落都会用眼泪迎接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或很久不见的族人。瓜亚基人也是这样使用chenga ruvara的，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个声音还装点了他们生活中一切不同寻常的场合，比如净化仪式。此外，chenga ruvara从来都不是一个女人的独角戏。刚刚开始歌唱的那位是瓜亚基两位酋长其中一位的妻子。她独自一人的歌唱与哭泣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这是个信号，因为一瞬间所有在场的女人都齐声呼应，林间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巨大的哭号声。对于一个没有准备的听众来说，这声音是种折磨。最后一轮号哭声淡去后，她们的头又都抬了起来，双手放下，露出的不是饱受折磨的面容，而是一张张平静的脸，泪水已消失不见。几步开外，熟视无睹的孩子们兀自玩着，

对大人的举动毫不在意。大合唱也没能打断“清洁人员”干活。皮楚基的位置已经由另一个女人接替，他们以同样的细心帮她沐浴。接下来，所有的“病人”，女人在前男人在后，一个接一个经历了两位执行者勤劳的双手的洗礼。现在只剩他俩了，他们用剩下的水和藤蔓植物的藤条为对方清洗，其间没有流露出半分对工作的糊弄，其中一位甚至还用无情的手指从另一位鼻孔中弄出了被遗忘的鼻涕。

仪式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我看到皮楚基十岁上下的大女儿迅速地做了一系列乍一看有几分怪异的动作。她父母的小屋里头正烧着火，她从中取了一根冒着烟的柴火出来，将它插进了盛有净化用水的容器中，将火熄灭，然后又把它拿回小屋，放回柴火堆中。对于我惊奇之下的问题，印第安人是这样回答的：“Y pirä mombo, y pirä wachu ubwy mombo.这是为了防止红水退去，这是为了防止大红水上涨又退去。”在瓜亚基神话中，所谓的“红水”或“大红水”指的是很久以前几乎使先民灭绝的大洪水。⁽²⁾小女孩的行为（当然了，是在大人的授意之下）是为了让这一灾难不会重演。这个简单的行为，以及瓜亚基人向我解释时精练的说明，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概括了瓜亚基人的宇宙观和他们关于世界命运的哲学思考。这就是野蛮人头脑的弯弯绕绕之处：它的特殊之处都隐藏在最为平淡无奇的伪装之下。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开这个“文本”。它如此精简，被浓缩成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为了让这个动作说话，我们必须通过分析来释放它背后盘根错节的意义，而这一切都缠结在一个听话的小姑娘灵巧的双手所完成的动作中。在这条无声的信息中——这是一片淘气且叫人捉摸不定的居所，在那里，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悄然震颤着——瓜亚基人的思维赋予了这条信息解释世界意义的重任，而这意味着作为人类学家，我们的努力是有限度的：我们无法知晓一切，总有些无法解释的东西抵抗着，它们无法被驯化，而不管怎么说，印第安人的思维有着足够的控制力，知道如何将他们想要保密的东西遮掩起来。但这个动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若是稍走神，就很可能错过了的动作？

首先，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虽然人们从来都认为水火是典型的势不两立，但这里，出乎意料地，它们似乎很团结：因为灭火——木棍上的火被熄灭了——使止水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大洪水的发生。让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看看什么会导致“大红水”决堤。女人几乎永远都是潜在的祸根：如果一个女人非常莽撞地在月经期间碰到了水，灾祸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大地也会为洪水淹没。但就连男人也难保不会引发洪水：那些刚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子的“净化者”，以及杀害了另一个亚契

人的凶手在他们身上的邪恶力量尚未被仪式性的沐浴祛除之前，一定不能接触水，不然他们也可能引来洪水。但眼下的情况又并非如此。没有人即将冒触碰水之大不韪：危险来自别处。当然了，洪水的威胁与皮楚基的分娩自然是有几分联系的，更确切地说是与她孩子的诞生有关，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这个人世间初来乍到的新生命已经导致了一种混乱，足以将天地人搅得不得安宁。但同时，这又和那根被插入水中又放回火中的木棍有什么关系呢？对大洪水——也就是瓜亚基人“灾难学”中的一个时刻——的明确指涉促使我们更仔细地考量这根燃烧的木棍的含义。的确，亚契神话中不包含任何关于大地燃烧（这是另一灾难——大洪水——的对立面）的直接描述，然而，里面确实提到过一段没有黑夜的时期：这就是永昼，太阳高悬在天顶，日夜不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天地大火对应物。由此我们知道，瓜亚基人的宇宙观中，的确存在世界为大火摧毁这一幕，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不久前的分娩导致的天地大动荡的话，可以说，这根被熄灭的木棍在它所处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更普遍的、近乎神圣的意义，而它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填补“大红水”的空缺。吞噬着这根木棍的火焰成了天地大火的转喻意象，而用有净化效果的水熄灭燃烧的木棍这一行为，则是为了灭去暗暗燃烧着的另一种火，从而消除其威胁。

因此，天地大火不会发生。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眼前的问题：为了防止洪水，我们必须防止天火。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独立的词汇（水与火）间有种因果关系将它们相连呢？如果真是如此，只怕我也很难找出这一关联的本质，甚至可以说绝无可能，因为印第安人对此只字未提。不过，若是继续沿着野蛮人的潜意识追寻下去，我们必须把水和火看成是结构上互相关联的一对概念、一个体系，才能理解它们。因此，我们必须预设天地大火与大洪水是一体两面的。它们是造成先民灭绝的两股势力，是印第安人末世论的两张面孔，它们是死亡的体系。同时，因为二者同气连枝，相辅相成——二者当然没有同时发生，这里是就永恒的时间跨度而言——其一造成的威胁自然也会因为它的对立面带来的威胁而增加，尤其是在这种混乱失序会席卷天地的情况下。简而言之，一条生命的诞生可以同时带来火灾和洪水。因此，如果其一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另一者接踵而至的话，那么反过来说，后者的消失自然也能致使前者消失；所以，通过灭去火焰的象征形象来避免天地大火也势必能够预防大洪水。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印第安仪式会想要通过灭火来止水？首先，人们更容易想到用水灭火，而非以火灭水。然而，这更大程度上关

系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就像很多其他部落的神话一样，事实上，在瓜亚基神话中，大地燃烧发生在洪水之前。通过灭掉木棍上的火——以避火患——从而防止水患，我们见到的是神话中火在水前的先后顺序在仪式中重演。最后还有一个有待解释的细节：小女孩的举动能否由大人来完成？还是说，只有孩子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考虑到木棍浸入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水，而是藤条具有净化功能的混合物，我们可以回想起，从前一天晚上开始，部落中的生命，乃至天地自身沐浴的空气都弥漫着一种会带来混乱的不洁。而印第安人之所以用的是具有净化功能的水，恰恰是为了祛除这种不洁，消灭这种混乱。同时，正如所有的大人那样，印第安人也相信儿童是纯洁的，因此他们把拯救世人的重任交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手中——她尚未被污染，而一旦成年，这种污染将避无可避。最后，印第安人的语言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的手势究竟又描述了些什么？我们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听到的，不过是最简单但又令人痛苦的真相那熟悉的声音：孩子的诞生中蕴含着死亡的种子，质疑着他人的存在。我们被困在一个充满洞见却又十分残酷的事实中：人并不是神，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让我们走向死亡。

现在仪式结束了，邪恶力量也得到了控制。部落中暂时被中断的生活也将走上宁静的正轨，恢复日常节奏。然而，我们若是觉得瓜亚基人面对皮楚基小儿子的诞生抱持的是完全负面的态度，认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让他们置身险境，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婴儿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喜悦虽然克制，却确凿无疑，这足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群体中新成员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才是它惠及整个部落的真正方式。这一社会层面的助益从何而来？新生命的诞生使得新生儿与某些成年人之间形成了确凿的纽带，它同时还带来了家庭之间结盟的机会，并增强了新生儿所在群体的集体感。

在参与分娩过程的大人中，有两个人角色尤为重要；从这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新生儿都会与他们俩维系最亲近的关系。可以想见，这两个人正是那个在jware剪断脐带之后将孩子从地上举起来的女人（也即upiaregi）和jware本人。某种意义上，他俩相当于我们社会中的教父与教母。他们用一个专名称呼他们的“教子”——chave，而他俩的地位与孩子的父母相当。事实上，jware不能与他的教女发生性关系，upiaregi也不能与她的教子发生关系。很少有人违背这一禁忌（尽管例外偶有发生），不过，新生儿与主司他诞生仪式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禁忌而变紧张，而是充满了善意、爱意与温情。婴儿整个童年

时期都会收到来自教父母的小礼物，通常是食物。晚些时候，等男孩成长为猎人之后，他也会投桃报李，用自己杀死的猎物回馈他们。但更重要的是，upiaregi与jware会在他们chave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再次承担重任：等女孩子来了初潮，男孩也长到了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成人的岁数（大约十五岁左右），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会在焦躁不安中迎来成人礼这一人生大事。此时，帮助他来到世上的教父母的在场带来的亲切感能对他们起到安抚作用。Upiaregi的辞世将会对chave产生重大影响，jware的离世则更甚。尽管他们逝世时送别的哭泣声是仪式的一部分，但其中的真情实感并不会因此打折扣——历历可见的眼泪可以证明这一点。葬礼上的哀歌将持续好几天，每一“节”都有几声潘笛做点缀，向教父无可挽回的离世致哀：“我的jware没有回来，他不会再回来。我的jware已不在世上，我为此泪流不止……”

诞生仪式还让教父母与新生儿的父母缔结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前者此前未必是后者的至亲好友，因此，婴儿的诞生同样也促成了几个从前“互不相识”的家庭形成新关系。几个语言现象证实了这些纽带的存在。从这一刻起，这个新的关系将孩子的教父母与父母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人为”地成了亲戚，他们将这样称呼对方：孩子的母亲将称呼他的upiaregi为cha vaichy；jware被孩子的父母称为cho kaveru；至于upiaregi还有jware的孩子则被他们称为kave。就这样，家庭组成的群体建立了起来（除非孩子的教父母与父母此前已经是近亲——这一情况并不罕见），而群体中的人们也会更乐于互相帮助，互相合作。他们将一同在森林中活动，交换食物，在有人生病时或是在某些仪式中互相帮忙，如此等等。因此，孩子的诞生并不单单是某个家庭的私事，而是一个能够丰富整个社群生活的机会。根据情况，如有必要，这样一个场合甚至可以通过向两个同样封闭的群体提供联盟的契机，继而建立真正的政治关系。皮楚基儿子的诞生就是这一“开胃”作用的完美体现：这一场合中的政治运作正是按照下述的方式惠及了所有人。

我身边的印第安人实际上来自两个不同的群体：他们分属两个小部落，而直到不久以前，他们之间从未互通有无过。他们不认识对方，甚至还把彼此看成敌人，尽管他们都来自瓜亚基“族”（至于他们是怎么凑到一块的，我后会交待）。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尽管两个群体决心平气和搭伙过日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在日常生活的很多场合中，他们相互之间多少有几分保留，甚至流露出很明显的冷漠。他们当然已不再是敌人，但撇开近期的一次“通”婚不谈，他们仍然把对方看作是Iröiangi，陌生人。印第安人很清楚，局面若是再这样僵持下去未免会

有几分滑稽。因此他们，至少那些率先来到这个营地并扮演起东道主角色的人，已经决意向对方明白无误地示意，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永远消除至今仍分隔双方的“鸿沟”。皮楚基的分娩，或者，不如说是她打算给胎儿取的名字，成了他们破冰的好时机。

所有瓜亚基人都是用动物命名的（或者说，几乎所有人；皮楚基恰恰就是个例外，因为“pichu”是一种幼虫）。一个人的名字是由动物名加上后缀“基”（gi）组成的，以表明这是一个人名，而非动物。此外，森林中居住的大多数物种都能在瓜亚基人名表中被找到。最显眼的一些例外是在印第安神话中地位尤为重要的某些鸟类，它们被称为“闪电的家禽”。此外，没有哪个瓜亚基人是以“刺鼠”为名的——这当然是因为这个词不仅指这种小个啮齿动物，还指男性生殖器官。Tavwagi显然会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名字。几天前，一个女人很是快活地说起自己丈夫的阳物是多么尺寸傲人，他当时在场，看起来十分窘迫，而不像是受到了奉承的样子。我转过身对他说：“看来你的名字应该叫作Tavwapukugi，大鸡鸡。”全场乐得不行。那位丈夫万分困窘，他显然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调侃；他的妻子倒是很高兴。话虽如此，人名并不会随性别而异，男人女人可以拥有同样的名字。这对于交谈的清晰晓畅毫无助益，因为谈到他人时，人们必须不停澄清涉及人物的性别。话说回来，名字是怎么选的呢？孩子出生前，母亲就负责选好了名字。在她孕期的最后几个月，她会从别人带给她吃的诸多种类的猎物中选择一种，并决定这将是她未出世的孩子的bykwa，“本体”，而孩子便会以这种动物为名。打个比方，几周前，皮楚基吃下了kande肉（这是一种小野猪），并决定这就是她胎儿的“本体”；因此，昨夜出生的婴儿的名字就成了康德基（Kandegi）。

问题在于，女性在选择的时候遵循的是什么标准呢？她会不会出于对某种肉类的偏好做出选择——这种偏好很可能有些“非理性”，就好像我们社会中孕妇的“口味偏好”？从不少印第安人给我的回答来看，这是有可能的，甚至十分可信。但这可能也是一个个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根据某种正儿八经的社会性考量做出的选择。通过选择某种动物，也即是说，通过排除其他可能的动物（以及其他可能的名字），这个女人在她自己、丈夫和孩子这方，与送他们这种动物肉的猎人——也即chikwagi——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社会关系。因为，如果婴儿与这个猎人之间注定会产生友爱之情的话（毕竟婴儿怎么会忘了自己的身份是这个决定他名字的人赐予的呢？），他们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会延展、覆盖到他们

身边成人所处的社交网络上。正如upiaregi与jware的情况一样，即将诞生的婴儿与他的chikwagi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不会局限于起名这一刻，并在群体中承担起了一种组织性作用。皮楚基的情况生动体现了这一点。在为孩子选择将来的名字时，事实上，她挑选的猪肉是对方部落的一位猎人送来的。这份礼送的自然是肉，但同时，它还是两个至今互相敌对的部落之间象征永久和平的橄榄枝。通过以这样的方式毛遂自荐成为一个“陌生”婴儿的chikwagi，这个男人明确而慎重地表明，他和他的同伴都希望能够与陌生人建立起永久的友谊。还有什么场合比婴儿的诞生（而他就要成为一位“父亲”）更适合干这件事情呢！礼尚往来，被巴结的群体也热情地回应了这个邀请，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颇有几分政治头脑：在所有可能成为chikwagi的人选中，皮楚基决定选择陌生人的代表。如此，陌生人将不再陌生，而是会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他们的盟友。这就是树林中的野蛮人现实而又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手段……通过给予孩子他的“本体”和名字，卡加普古基某种意义上成了孩子的“创造者”，而对于他这个角色以及其政治意涵的认可，就这样在两个部落之间创建了一道社会契约。

为了不浪费分毫时间、立马开始执行这个约定，卡加普古基和他的家人前一晚选择住在了皮楚基的小屋中——她的两个丈夫暂时离开了。让母亲和孩子单独待在那儿显然是不可能的：看不见的存在正对着婴儿幼小的生命垂涎不已，因此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受到保护。为了提防夜行者和各种魑魅魍魉，皮楚基所在的群体选择了一个来自另外那个部落的男人，他曾是个陌生人：而从这一刻开始，他们都成了irondy，同伴。净化仪式结束后，“守夜人”的妻子准备了一顿饭，皮楚基、她的孩子和卡加普古基一家一起吃了。这当然是严肃的一餐，它见证了一次诞生和一场结盟，而这两件事情本身都足以让印第安人心情愉悦；但它并不是一次宴会，因为里头完全没有肉：所谓的食物，不过是从冻子椰子（pindo）中提取出来的某种面粉，在水里煮着吃了。事实上，任何仪式完结后的饭食通常都不会有打猎所得的肉菜。然而，虽说这不过是顿素食，它的意涵却很丰富，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喂饱在场者的肉体，而是为了滋养整个群体的社会生活。印第安人总是忙着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场合作为手段，用于重建部落内部的团结；也作为借口，好让每一个人再次确信，他们真的组成了一个共同体。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饮食以一种朴素的方式，体现了家庭食用的丰盛肉菜与整个群体食用的简朴素食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传达了一种个人伦理与群体哲学，它表明个体的命运完全是由群体的前景决定的，每个人都必须抛弃个体的孤独

感，并牺牲自己的私人幸福。

天光褪去了，同样随之而去的还有一种严肃、近乎紧张的氛围，它笼罩着这一天：从天刚蒙蒙亮开始人们就投身于仪式之中。规则得到了遵循，该说的话被说出了口，也没有哪个手势被遗漏。该干的活都已经干完，现在印第安人可以放松下来，安安心心睡上一宿——和昨夜一样，今夜也将不免于严寒。他们回归了日常生活；熟睡的营地中，木头在巨大的篝火中毕剥作响。

几个小时后，沉沉黑夜中，我被一种熟悉的声响惊醒：一个男人正在唱歌。查楚卜塔瓦楚基——“胡子茂密的大西猫（Pécari）”——跪坐在脚跟上，他唱得如此用力，简直就像是在抵御黑暗。他不时漫不经心地拨弄一下营火，火焰的光亮在他全裸的身躯上嬉戏。他会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慢慢将它吐出，发出“诶—诶—诶—诶……”的声音，直到气竭。然后他将再吸一口气，再次发出一连串的“诶—诶—诶—诶……”，如此再三。这吟唱几乎没有任何抑扬变化，但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对喉音的巧妙运用，从而产生了婉转而精确的音调变化。偶尔，在某些间歇，吟唱声后会跟随着几个几乎无从辨别的字句。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查楚卜塔瓦楚基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新生儿的jware，这个下午他还是两位“清洁人员”之一。现在，他一个人守着夜，一边歌唱着。他的歌唱其实是一种挑衅，是对夜间生物一次胜利的挑衅，尤其是针对厉鬼Krei的挑衅。Krei以勒死新生婴儿为己任，可它现在却无法靠近孩子，因为仪式把孩子安置在了它无法触及的地方。这首歌在孩子身边建起了保护性的屏障，它的声响吓退了各路鬼怪，将它们赶回黑暗之中。而二十四小时前，当皮楚基临盆时，情况恰恰相反：除了几句零星的耳语，一道寂静无声的高墙确保了小康德基能够安全地降临到世上。人们必须避免任何动静，以免引起Krei的警觉。而现在，亚契人已经完成了古老的智慧教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可以回归到事物的日常秩序中，胜利的歌声也得以重新回荡在夜间；人们现在甚至不妨对Krei发起挑衅和威胁：如今，它的恶意已无法危及生者的世界。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夜空中无休无止地回荡着查楚卜塔瓦楚基的声音，他向天地昭告：凡人无罪，他们再一次在神明的注视下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大洪水的神话

当红水，当大红水刚开始上涨时，不计其数的亚契人被冲走了。红水，大红水冲跑了很多亚契人。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爬到了一棵棕榈树顶上，他们爬上了一棵古老的棕榈树顶端。他们从高处看到水势并没有退去，他们哭了。而水依旧在上涨。洪水涨得如此之高，它冲倒了大树，这两个亚契人不得不爬到了另一棵古老又结实的棕榈树上。这一棵没有被冲倒。他们掰下棕榈树的果实，将它们扔进水里：“噗！”水势依旧没有退去。后来，他们又扔了更多果子下去：“咚！”果子撞到了石头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下去了。大水带走了所有的亚契人，他们都变成了水豚（capybara）。变成水豚之后，这些亚契人的灵魂现在生活在水中。

- (1) “带泪的问候”（salutation larmoyante）是印第安部落中的一种习俗，见载于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的记录中。这一习俗在南美洲尤为多见，但同样也流行于北美洲的少数部落中。——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 (2) 神话全文见章末（第58页）。——原注



小伙子卡加普古基

第二章 两份和平条约

1953年。那一天，浣熊并没有显得比往常更躁动不安。很显然，它们铁了心地想用自己长长的犬牙去啃那些被主人用来拴它们的灌木和小屋柱子，这蠢兮兮的顽固样子逗乐了孩子们。不过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永远都在想方设法，想要恢复自由身。何况，这当然是白费力气：那些漫不经心地系在这些动物脖子上的短绳把它们直接牢牢拴在了柱子上，绳子太短，根本没有留给它们任何辗转腾挪的余地。它们只能偶尔勉强够到木头的树皮，接下来它们就会暴躁地用牙齿将树皮扯下来。没有人对此有半点留意，除了那些偶尔想为自己找点乐子的孩子。当然了，浣熊群中任何异常的躁动，包括它们尖锐的叫声，都会引起印第安人的警觉。这是bita——家畜——提醒他们营地周围出现了陌生且很可能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的方式，尤其是在夜间：某条心不在焉游荡而过的蛇，或是哪只baipu——无礼的、在亚契人的篝火旁四处逡巡的美洲豹。当它靠近时，浣熊出于恐惧和愤怒会暴躁不已，它们疯狂地啐着唾沫，身体做着无谓的挣扎想要摆脱绳子的束缚，差点把自己勒个半死，它们的吼叫声会立马惊醒众人。通常，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野兽一旦惊觉到自己的行踪已经被发现，就会掉头离去。然后浣熊会慢慢冷静下来，所有人又回到睡梦中。

Baipu没来给亚契人添麻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外，它们的数量也愈发稀少，就连年轻人都能回想起，从前，他们曾频繁听到被追捕的美洲豹嘶哑的吼声——远比现在频繁。森林中的日子变了。老人们会回想起（更多是惊讶于自己年轻时的自由，而不是出于近年来的苦涩感），从前，他们可以在某条河岸或是某块空地的边上，伺机等待口渴的豹子或野猪毫无忌惮地经过。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去那些地方打猎了，也不再去很多其他地方。西面变得很危险，而传统的信仰——死者的灵魂居住在落日附近——似乎遭到了反驳：死神为了对亚契人发动攻击，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居所。最近几年里，亚契人不得不任由死亡不断攻城略地。而在缓慢穿过森林，向东撤退的过程中，时不时地，他们需要某位同伴的尸体留在身后。亚契人一直都知道要与大草原保持距离，避开这些四面为森林所包围的岛屿，并对Beeru钟爱、因此不愿远离的那些区域敬而远之。然而，依然有几个大胆的猎人敢于接近这些可怕生物的聚居地。他们蹑手蹑脚地在森林的边缘停下，蹲踞于茂密的灌木丛

中，或是栖身在大树低矮的枝干之上，手持弓箭，箭在弦上，就这么观察数个钟头，紧张得心脏狂跳，但又因为过于全神贯注而无暇颤抖。他们已准备慷慨赴死，但同时也已经在心里盘算着，当晚，回到遥远的营地，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到男人激动的叫喊和女人的哭泣时，自己的遭遇能化为一个多长的故事。同时，他们也已经做好了Beeru随时会放出“闪电”的心理准备。他们观察着，准备一头逃进森林中，发出比獾更大的动静，虽说此时他们比森林还要静止。他们注视着这些身着奇装异服的强大生物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们的强大是如此致命，你甚至不能把他们看作敌人（敌人对他们来说很近也很熟悉，他们知道怎么对付“马其塔拉人”^①或Iröiangi，也可以预见他们的反应。对方如果是个Iröiangi，在你胜利的弓箭穿过他们的身躯之前，你甚至可以和他说个话——然而，面对Beeru你能做什么呢？）Beeru是如此人多势众，他们的火飞速吞噬着古老的森林，他们滑稽如鸚鵡，却比蚂蚁还让人沮丧。亚契人所观察的，正是白人。

干这事需要勇气，但更需聪明才智。很少会有猎人愿意到远离自己部落地盘的地方去，测试自己的极限，并在这危险的游戏里奉陪到底。Beeru的动物——牛和马——正安静地吃着草，完全没想过要离开自己的主人。它们的主人在亚契人面前来来去去，有时在马背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竞跑着。印第安人很是欣赏马的优雅，称之为bai-purä，“漂亮的动物”。但更让他们动心的是马肉甜美的味道。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有着猎杀落单的马和懒散的牛的习惯（他们管牛叫achipurä，“漂亮的角”）——只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光线来用弓箭瞄准这些半睡半醒的动物。6月到8月的寒季往往让人收获颇丰，因为在这期间，这些动物会离开草原，在冰冷刺骨的南风中寻求树木的庇护。马比牛更为警觉，它们往往会在亚契人进入射程之前消失踪迹。相反，“漂亮的角”几乎永远是猎物的上佳之选。庞大的身躯使得瞄准它们易如反掌。它们会在长箭的刺痛下嗷嗷叫；很多时候，长箭会贯穿而过，不击碎任何骨头。很快它们就会栽倒在地，在树根和蕨类植物之间跌跌撞撞。这样反而更好些，因为印第安人在追踪这些受伤的牲畜时，几乎从来不会追到森林之外。他们不会浪费任何时间等待牛死去，人们必须在Beeru到来之前迅速行事，因此他们会毫不手软地用竹刀从还在喘气的牛身上割下大块的肉。每个男人都会把能扛动的肉扔到肩膀上，然后一齐消失在树林的阴影中，急着回到自己的妻儿身边——他们正饥肠辘辘地等着。此外，因为印第安人花了大把时间观察Beeru，这让他们熟悉了这些动物的习性，也摸清了它们喜欢的场所。如果离得不远，印第安

人还能听到白人的笑声。“Beeru笑得很大声。”他们闷闷不乐地想着。在白人的同盟中，有一种可怕的生物。它吼叫声的力道、它始终如一的狂暴，以及它一旦捕捉到了亚契人的气味之后在追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迫切，统统让亚契人瑟瑟发抖。就连胆敢光凭一张弓就与美洲豹正面交锋的勇士，在听到远方传来baigi的狂吠时，都会像个娘们般跑走：baigi是他们给狗的名字，“动物中的动物”，天生的暴力的象征。

然而，狗和它们的主人正在向森林更深处侵蚀。从前，双方的界线多少还是明确的：草原归Beeru，森林归亚契人。可现在，白人在冬末点起的熊熊大火正在逐渐吞噬印第安人的领地。他们开路以运送砍下的树干，就这样，森林一点点地被他们占领了。这给亚契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们从前的猎场正在不断缩减，如果某个Beeru在什么地方盖了房子，他会马上烧出一块地来种上他的木薯和玉米，他的牛和马将四处开疆拓土，他的狗会狂吠，孩子会哭喊。这样，猎物就会离开这个曾经静谧的所在，而印第安人将无法继续在那里打猎。这也是美洲豹离开的原因。同样的事情在Beeru手下到处上演。尽管印第安人已经事事小心，与Beeru的狭路相逢还是越来越频繁。现在，部落里几乎永远会有女人涂黑了脸，削去了发，悼念离去的父亲、兄弟或是儿子。然而，比他们所知的任何事情都更难以理解、更骇人听闻的是，Beeru把他们赶进森林深处是为了偷走他们的kromi，孩子，而这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懑。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拿孩子做什么，但已经有很多男孩女孩被白人掳走。女人们悲哀地哭着唱着；至于男人，他们不能像女子般流泪，但听到妻子凄厉的哭号时的愤懑迫得他们用弓箭抽打自己，以吐出胸中的悲痛——这份悲痛沉沉积在心中，把他们压个半死。男人若是承受了太多痛苦，就会变成yma chija，狂暴的力量。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打斗，开始想要攻击所有人。孩子们会跑开，女人则会喊道：“他们要射箭了！不要射箭！不、要、射、箭——！”她们会勇敢地跑向暴躁之下开始用弓箭击打彼此的男人，在他们即将弯弓搭箭之前用自己的身躯拦在他们面前。男人们很容易被安抚，他们往往只是半生气而已，一次舒服的piy——覆盖全身的按摩——就足以让他们镇静下来，尽管有的时候，会有女人因为头上正中一击重拳而在地滚。

出于上述原因，亚契嘉图人（Aché Gatu）不得不在一块虽然广袤、却因为白人的侵略而不断缩小的土地上游荡。酋长居弗库基很是忧心。他问道：“如果我们四周都是Beeru开的路，我该把亚契人带到哪片丰茂的森林中去？”这个小部落已经难以为继。居弗库基已经统领它很久

了。自从他当年单枪匹马袭击、解决了一小队巴拉圭伐木人，满载着斧头和大砍刀回到自己的部落，并把它分给众人之后，他就一直统领着部落。考虑到他的英勇和慷慨，再加上这次奇袭带给他的声望，老布万基——居弗库基的父亲之一，当时也是部落的首领，死于同白人的对峙——在去世前不久向亚契人宣布：“这个男人会成为你们的Eruaregi，我死后，他会成为你们的首领，他很kyrymba，我的儿子，他很勇敢。”自此之后，居弗库基的全部职责便是带领他的部落前往充满猎物的地方，但尤为重要的是，他要让他们远离Beeru。他们居无定所，不断迁徙，在一个营地仅住几宿，甚至可能无法严格按照规定，为需要穿唇孔的男孩和来了初潮的女孩举行成人礼。在这样的代价下，很长一段时间里，居弗库基勉强能够保障部落过上一段甚至称得上是平静的生活，他们唯一的困扰是偶尔会有irondy命丧白人的闪电之下。可现在，这变得很困难：白人太多了，他们同时出现在四面八方，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还带走了孩子们。可他们又该如何抵抗白人和他们的chuvi——那杀人于百步之外的“闪电”——呢？和闪电对上时，弓箭全无用处，猎人也很少真正依赖弓箭，尽管阴部干涸的老妇人们——年老的waimi——会在清晨猎人出发打猎前，满腔仇恨地对他们高喊：“沿着白人的路走！藏在倒下的大树背后等他们！用弓箭射杀他们！掏出他们的眼睛！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倒吊起来！”她们对白人别无所求，但求他们去死。不久前，几个女人在一个男人的陪伴下接近了一块木薯地。chuvi迸发出闪电时，女人们正忙着装满她们的篮子。啊！男人叫着倒下，口吐鲜血。女人们鸟兽四散。第二天，她们想回来将尸体带走。迎接她们的是同伴的脑袋，被插在一根木杆上，一群苍蝇正蜂拥在干涸的血迹四周。

1953年的那一天，太阳还没升到天顶。除了几户出门打猎的人家，几乎所有的亚契嘉图人都在那儿。Beeru来得如此突然，浣熊甚至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小小的红色火星发出的骇人声响，与升腾的烟雾一起打破了营地的静谧。对亚契人来说，时间静止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也可能不过是半秒的工夫，营地成了一座寂静的岛屿，没有半点动静。一只正在打磨箭头的手停了下来，手中还拿着蜗牛壳；一张嘴大张着，正要吞下幼虫；一个女人无休止地向她的婴儿微笑着。爆炸声响起，炸药苦涩的气味驱散了烤肉的味道。孩子们开始大喊大叫，他们的妈妈低下脑袋，双手捂住他们的耳朵。攻击者藏身在距离营地几十米远的树木之后，拿着沉重的军用步枪开火了。子弹射穿的树叶和树枝在他们身旁落下。当他们向空中射击时，他们的首领正冷酷地估算着这里有多少瓜亚

基人。可他的手下很是害怕，他们不知道这些生物有多少能耐。他们是森林中最野蛮的生物，而根据知情人的线报，他们还有尾巴。通常，所谓的“文化”人都会相信这些古老的传说与故事，比如这位英国人马斯特曼⁽²⁾。他于187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他的《巴拉圭七年历险记》（*Sept ans d'aventure au Paraguay*）。以下是他对这些印第安人的描述，他们的名字被拼错了：“他们显然属于人类中最低等的那一类；他们矮小的身形，近乎全黑的肤色和细长的四肢让人不快地想起猴子；他们似乎比动物更为愚笨。他们不建房舍，赤身裸体，也不知道怎么用火；他们住在森林中，靠水果和树根果腹……他们似乎没有清晰可辨的语言……这些圭拉库人（Guyracuis）[原文如此]……有着短短的尾巴，因此，他们不得不随身携带一根尖木棍，用来在地面挖洞，好舒服地席地而坐。”可以肯定，这些印第安人住在树林中就像树上的猴子一般自在快活，另外，因为上帝抛弃了他们，他们也同猴子一样没有受洗——“*Bichos del monte no más ...*他们不过是森林中的动物而已……”混血们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的腹地，包围了这个国度中算得上是最为野蛮的部落的营地，这种恐惧与兴奋让他们热血沸腾，他们紧张的手指压低了chuvi的枪管。年轻的布雷久基（Brejugi，意为“河鳐”）满怀愤懑与绝望，抓紧了他的弓箭。“Epytake!——住手！”距离他最近的进攻者用瓜拉尼语喊道，同时手指扣下了驳壳枪的扳机。子弹穿过了布雷久基的胸膛，这个男人和他迟滞的弓箭在爆炸声响起的瞬间应声倒下。

这些人很满意他们的头领，皮金·洛佩兹（Pichin Lopez），一个专业追捕印第安人的猎人，同时也是这片丛林中的专业向导。这片森林几乎覆盖了整个巴拉圭的东部，尽管它们时不时会被大片用于牧羊的大草原（campos）截断。这些人很高兴，因为他们收获颇丰。他们未动干戈就抓获了整个群体，这让他们满怀兴奋，也让他们忘了追踪瓜亚基人时漫长而艰辛的日子。这笔利润将非常可观。他们面前有差不多四十口人——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他们紧紧挤在男人们身边，在恐惧之下呆若木鸡；男人们则无能为力，他们的双手被缚在背后。在整个圣胡安内波穆塞诺（San Juan Nepomuceno）地区，瓜亚基人身价很高，平均价抵得上一头牛或是一匹良马，换算成现金差不多是四五千瓜拉尼（约160—200法郎）。这对于这些除了马匹、砍刀与左轮手枪之外身无长物的穷光蛋而言是一笔横财。这也是头一次有一整个族群被抓住。通常，他们只能抓住一两个孩子。要转手这些来自森林的“货”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对于年幼瓜亚基人的需求量要远远大于零星的供货。这种需求甚至还在上涨，很多家庭都想要买个小野蛮人。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不

少游侠（montaraces）——习惯了森林中的苦日子的强壮男人——逐渐变成了这个利润丰厚的捕猎行当中的专家。捕猎一旦成功，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问题在于，该如何找到印第安人。实话说，这项工作要求他们在森林中耐心地追踪数日，甚至数个星期。瓜亚基人永远在四处迁徙，留下的踪迹却微乎其微，人们甚至可以近距离路过一个营地，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随着移居者逐年砍下更多的森林，亚契嘉图部落游荡的区域因为这种侵蚀而急剧缩减，这降低了这项工作的困难程度。更何况，现在印第安人已经无处可逃：北面，人们新造了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它连接着首都亚松森（Asunción）与巴拉那（Parana），斩钉截铁地将印第安人古老的领地横截为二；西面与南面，巴拉圭人的定居点连绵不绝；最后，（尽管白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东面有一个亚契嘉图人不信任的敌对瓜亚基部落，虽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了。他们被围困在自己的庇护所中，原地打转。

为什么巴拉圭人这么想要瓜亚基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为这些孩子洗礼并使他们从野兽升格为人，是他们为野蛮人做的天大的好事。但是大部分人并不屑于用宗教上的借口来掩盖这背后赤裸裸的经济考量：瓜亚基孩子会成为收购他的那个家庭的奴隶，终其一生分文不取，为这个家庭工作到死。被捕获的印第安人只要不试着逃跑，就未必会被虐待。他们的逃跑不仅会导致自己的主人失去一个劳动力，更严重的是，这有损主人的尊严：一旦奴隶逃走，他将无法再摆出“主人”的派头，而可以想见的是，主人不会轻易让自己身陷这一境地。瓜亚基女孩很少逃跑，因为不消多日她们就会成为主人的情妇，在卖身中堕落。然而，男孩一旦进入青春期，并且意识到自己将一辈子无法与人发生性关系——因为没有哪个巴拉圭女人会愿意与这些半兽人发生关系，他们就会日思夜想着要回到森林和自己族人的营地中去；他们迟早会试着逃跑。人们总是会试图将他们抓回，并不时徒劳而返。有个农村人为了追捕他的奴隶以挽回尊严，甚至丢了性命。那是1943年的事。此人原先拥有两个年轻男奴，他们是在一次受袭中被捉住的。某天夜里，这两个瓜亚基人逃跑了。他们的主人立马开始了追踪，他借来了当地另一个居民手下的三个印第安人。几天后，小分队找到了那两个印第安人，他们没来得及找到自己的部落。主人狠狠地抽了两个逃犯一顿鞭子以示惩戒，然后他们踏上了返程。夜幕降临时，他们草草扎了营。主人极度相信自己凌驾于印第安人之上的权力，同时又对他们无比轻蔑（毕竟，他怎么会想到一条狗或是一头牛竟会想要复仇呢？），所以他吃过饭后就把自己裹在斗篷里，躺在火边睡下了。他确信事情已经回到正轨，一切防范

措施都是多此一举。他一秒也不曾想过，瓜亚基人也会拥有人类的感情，也不相信对瓜亚基人来说，自由的滋味并非完全陌生。而这让他丢了性命。机不可失。在他睡觉时，那两个瓜亚基人告诉他们的同伴，自己不愿再回到白人身边去，他们要再次逃跑，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得杀死这个Beeru。他们知道部落就在近旁，因此他们激动地在黑暗中低语，试图说服另外三位族人和他们一起走。其中一人同意追随他们的脚步；另外两人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巴拉圭人的世界中，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太久，显然他们担心自己不能再次习惯昔日森林中的自由自在。但是他们默许了其他人的行为。接下来，密谋者着手处决了白人。他死得很惨。两个印第安人按住他的头和腿，把他摁在地上，第三个人拿着一根火把，把燃烧着的那一端捅进了他的喉咙。他死得很快，无声无息。大仇得报，印第安人带着被害者的武器消失在夜色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剩下的两人在几天后回到了巴拉圭人中，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至于我，则是从死者儿子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故事。他一心为父亲报仇，因此成了一个瓜亚基人猎人，并参与了1953年的袭击。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加剧了巴拉圭人想占有瓜亚基孩子的渴望：他们让后者用身体为自己工作，从而拯救这些异教徒的灵魂，而除了这种宗教原因之外，他们对瓜亚基人还抱有一种，怎么说呢，对肤色的好奇心。关于印第安人的传说不可胜数，但苦于他们藏得太好，传说无从查证，人们不免因此浮想联翩，脑洞大开。有些人相信他们和猴子差不多，因为他们有尾巴，还住在树上；还有些人则相信他们是超人，因为这些森林的精灵，除了拥有令人生畏的本事和知识之外，他们的金发碧眼白皮肤，还让他们拥有了出人意料的外貌。故事里都是这么说的，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里头确有几分真话。最让巴拉圭人好奇的是，瓜亚基人的皮肤据说是白色的。他们对这种差别太敏感了，以至于他们急着想要拥有这样一个白皮肤生物。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巴拉圭人会这样想，恰恰说明了他们把自己看作有色人种。事实上，大部分巴拉圭人都是瓜拉尼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后代，乡下人尤甚。这一现象始于16世纪前半叶，当时瓜拉尼的酋长们——所谓的Mburuvicha——同意了与最早的西班牙征服者结盟，以抵御他们共同的敌人，大厦谷^③中好战的部落。当时，刚抵达不久的白人正试图前往传说中位于西方的黄金国（Eldorado）。按照印第安人的说法，那里是金银铜铁各式物什的源头，直到它们在历经了一系列交易之后出现在了巴西东部的大西洋沿岸。多明戈·德伊拉拉（Domingo de

Irala)和他手下的一小撮士兵自南面抵达了新世界,他沿着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而上,一直到了现在的亚松森,这座城市建立于1536年。他们还不知道,淘金热驱使他们前往的黄金国不是别处,就是印加帝国,而他们的同胞皮萨罗⁽⁴⁾和他的手下前不久刚征服了它,还拘禁并处决了那里的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在他们与金矿之间横亘着广袤难居的大厦谷。为了穿过它,他们组织了有力的远征队以抵御姆比亚人(Mbaya)和帕亚瓜人(Payagua)的攻击,这两个部落的人一队一队穿过河流,无休止地骚扰着瓜拉尼村落。这就是为什么瓜拉尼人很快就看到了与Karai——白人——结盟的好处,后者有着武器和马匹:这种政治手段能帮助他们在面对仇敌时迅速获得军事胜利。而鉴于对印第安人而言,唯有家庭纽带方可确保盟约货真价实,他们便把姐妹和女儿交给了西班牙人,将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姻兄弟或女婿。在大厦谷中印第安人的凶猛抵抗下,瓜拉尼人的盘算没能得逞。相反,瓜拉尼人自己倒成了这一计划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坐视自己的“姻兄弟”将后宫扩张到数十个女人的规模。西班牙人可没有瓜拉尼人那么尊重亲缘关系,他们极不人道地剥削当地的印第安人,以至于在他们抵达二三十年后,原先居住着成千上万土著的地区几乎已没有了土著的身影。相反,那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混血,他们是西班牙“绅士”(hidalgo)和美丽的印第安女人的后代。今天的巴拉圭人就繁衍自这一源头,而这条血脉也在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中越来越根深蒂固。他们的相貌与多多少少呈古铜色的皮肤很清楚地透露出,他们体内流有印第安人的血液,尽管他们未必愿意承认这一点。

似乎,这是很多混血人种共通的特质:就像白人对他们表示轻蔑一样,他们 also 对自己的土著亲族示以同样的轻蔑。当然了,因为巴拉圭人口在历史上的构成方式使得种族混合带来的影响很有限,所以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类区别。然而,一个巴拉圭农民完全不会觉得自己与任何印第安人——即便是manso,已经归化了的印第安人——有半点相似之处;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在戏谑的轻蔑与仇视之间徘徊不定,哪怕印第安人的处境很可能只比这个农民悲惨一点。他若是得知自己与印第安人同出一源,定将大吃一惊——事实上,他会拒绝相信这样的天方夜谭。出于某种直觉,他很看重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倒不是财富,因为他没什么物欲;而是白皮肤和浅色的眼睛。这种执念明显体现在大众审美中的理想女性身上,瓜拉尼人毫不拐弯抹角地形容道:最让人魂牵梦萦的女性应该kyra, moroti ha haguepa——丰满、肤白、毛发浓密。他们相信瓜亚基人就长这样,这种信念加上他们对白皮肤的喜好导致这些印第

安人成了巴拉圭人朦胧的欲望对象。

这便是印第安人与巴拉圭人之间的关系，既有明面上的，也牵涉到一些更隐微的因素。这其中混乱的象征体系显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1953年的那天，一个武装小队是怎么样成功捕获亚契嘉图部落的。只不过这一次，那些追捕印第安人的猎人没能从这次远征中揩到半点油水。某种意义上，这事甚至让他们显得十分可笑。他们本打算将印第安人在圣胡安内波穆塞诺卖掉，然而，当他们到达附近时，由于没能找到任何能够容下四十多个俘虏的地方，劫持者决定让俘虏待在外头某个通常被用来关牛的畜栏里。他们淡定地解释道：“瓜亚基人太习惯森林里的自由了，如果把他们关起来，他们肯定会陷入瘫痪，不知道怎么出去。”出于如此天才的理由，巴拉圭人把印第安人当成了一群牛来看管。当然了，当晚居弗库基就放出了逃跑的信号，等到清晨，围栏中早已空无一人。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几分轰动。事件的细节传到了亚松森高层的耳朵里，他们决定终止类似的行径。一道保护原住民的法令颁布了下来，在这个国家里，杀害印第安人有史以来头一遭成了犯罪。只不过，法令的效力因为难以实施而大打折扣，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对亚契嘉图人的追捕几乎与先前同样频繁。

不管怎么说，对印第安人而言这不过是一次缓刑，等到1959年8月，他们妥协了。森林已不再是他们的避难所，而是成了囚笼；他们与Beeru遭遇得越来越频繁，猎人杀死的牛和马不断增多，而白人的报复性袭击也变得愈发凶残。居弗库基看不到出路，决定缴械而降。在距离圣胡安内波穆塞诺差不多三四里⁽⁵⁾处住着一个农民，他的种植园与森林接壤。他曾经是个印第安人猎人，家里还蓄养着两个某次远征时抓来的成年人，其中一位已经上了年纪。这个粗鲁狡猾的巴拉圭人显然觉得，总有一天他能够得到亚契人守护着的宝藏，他从来不对自己的印第安人动粗，他们在他的园地里劳动，但从不过度劳动，还被喂养得很好。他给他们留下了不可思议的印象：这是一个不tawy的Beeru——一个不残忍的白人，甚至还费心学了点他们的语言。就这样，那两个亚契人心中的害怕和疑惧平息了下来，他们逐渐开始相信，Arroyo Moroti（白溪，也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将会是部落的救赎，这个宁静的地方居住着唯一一位能够保护印第安人的Beeru。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他俩消失了；而数周后的一个夜晚，当那个白人——他总是将自己的泰然镇定与其他凶残的白人相区分——看到那两个印第安人从树林中现身，身后跟着整个部落时，他并没有太吃惊。疲于奔命的居弗库基在那两个印第安

人（其中一人是他的兄弟）的施压之下妥协了，他放弃了一切，来到白人的世界寻求帮助和保护。这些流浪者抵达了他们最后的居所。

多亏了里昂·卡多根^⑥的努力——这位谦逊的、自学成才的巴拉圭人把一生中的很多精力都用在了为印第安人辩护上，他对瓜拉尼地区的研究是别人无法取代的——这个新闻在民族学圈子里传开了：人们终于能够研究这个隐藏了四个世纪的部落的秘密了。阿尔弗雷德·梅特罗^⑦对一切与印第安人相关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并为这一可能性感到十分兴奋。他向我提供了一些东西，当年的我并不知道如何衡量其价值，但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件多么千载难逢的事：他给了我研究瓜亚基人的机会。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帮助下，我和同事S君一起在1963年2月底抵达了森林，准备动工。我准备这趟旅程的过程乏善可陈，毕竟我几乎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次“探险”。在我花了数月时间熟悉了他们的语言，有能力一点点穿透印第安人的内部世界之后，我的旅程才真正开始，而這些，在没有掌握语言的情况下光靠单纯的观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必须说，初抵瓜亚基部落时，我并不完全是白板一块。卡多根已经去了好几次白溪，得益于他对巴拉圭东部最后的瓜拉尼印第安人使用的三种方言的深刻了解，他很快就听懂并学会了瓜亚基语，因为后者尽管有不少鲜明特点，却与瓜拉尼语十分相近。卡多根在当地录制了不少磁带，做了转写和翻译，然后把它们寄到了巴黎的人类博物馆。这样，我得以在真正见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之前，学习这门陌生的印第安语言。于是，在动身前的四个月里，我每天花数小时一遍又一遍地听那些磁带，习惯它奇怪的语音，吸收里面的词汇。在巴黎，我能够毫不费力地展开这项工作；相反，我若是到了当地，同样的工作可能会耗费数月的耐心。我几乎一到印第安人的营地就能理解并说出一些句子来——的确，那都是些简单的句子，但是这已经足以让我与印第安人进行基本的交流，不然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令人沮丧，索然无味。“Nde ikö ma ko.”一个瓜亚基人在我们抵达数小时后对我说。站在面前对我说话的，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人（这一描述其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他对我说话了，而我听懂了。“你来了？”他礼貌地问道，就像在和自己人说话一般。“Cho ikö ma. 嗯，我来了。”我礼貌地答道。与印第安人最初的交流如此顺利，我很高兴，也松了口气。我们的对话就停在了这里，再讲下去我就撑不住了。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掌握的语言是如此贫乏，与其是帮忙，它更像是帮倒忙。这是因为瓜亚基人为我最初的表现折服，以为我能够像他们一样完美地使用这种语言，所以，即便我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却拒绝相信这一点，还觉得我出于某种不可解的原因隐

藏了自己的实力。这使得他们不太能信任我，还高估了我的语言天赋。好在误会最后解开了，主要是多亏了孩子们，比起他们的父母，他们能更好地认识到我真正的语言水平。

一辆笨重的牛车拉着我们的行李。在离开了圣胡安内波穆塞诺——这个棋盘状的村落建在一个旧耶稣会遗址上——之后，我们首先穿过了广袤的大草原。时不时会有人沿着红土路打马而过，光着脚，脚跟上穿着马刺。这些沉默寡言的混血有着明显的印第安人相貌，大砍刀从不离手，腰间往往还别着支左轮手枪。离开亚松森之后就很难听到人讲西班牙语了，很少有乡下人能正确发音。巴拉圭的乡下是瓜拉尼人的地盘，只有新近移民到此的人和少数拿鼻孔看人的城里人才会否认这一点。每当我们的车夫兼向导碰上一位骑马人时，他们都会简短地寒暄两句：“Mbaeixapa?”“Iporante ha nde?”“最近怎么样?”“还不错，你呢?”接下来往往是些简洁的问题：“Ha ko gringo kova, mo’opa oho?——这些白人佬（gringo），他们去哪儿?”我们的车夫通常回答得很含糊。他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寻访可怕的瓜亚基人，但为什么呢？我们可能是新教传教士，又或者，我们想要打探他们知道的森林宝藏的消息。不管是哪种解释，我们都很有钱，而且我们显然不是要去“研究”那些印第安人——白人佬那么狡猾，怎么会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东西上！接下来，骑马人会继续上路，马儿奔驰而去，草帽压低的帽檐之下，他的眼中闪过惊讶之色。不久后，大草原就被荒地（capueras）取代了。这些被人遗弃的种植园现在已经令人不快地长满了高大的荆棘、矮树丛和厚实的灌木，这片土地也变得不再适合耕种。这时，这个农夫就会像他的印第安祖先一样，重新为我们开辟出几百米的道路。正是酷暑难当，我们甚至无心欣赏犀鸟绚丽的羽毛，巨大的喙很容易就暴露了它们的行踪。好在地平线上，大片黑压压的森林正不断逼近，我们终于来到了乔木的树荫下。这里确实要凉快不少，但现在迎接我的却是另一桩酷刑：数不清的昆虫一波波前来，无情叮咬着我。牛儿缓步走着，对车夫的叫声充耳不闻（Hake,añamemby!快走，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几公里后，我们下了一个缓坡，下面是一块空地：这就是白溪。

我目光所及之处并不见瓜亚基人。他们的小屋隐藏在树林里，但是并没有人从那儿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印第安人的冷淡是出于礼节，他们假装没有见到来客，这样对方就能平静低调地安顿下来。过了很长时间——有时候是一个多小时——才会有人出来迎接来客或是很久不曾来访的朋友：“来了?”“对，刚到。”另外，印第安人不愿与白人走得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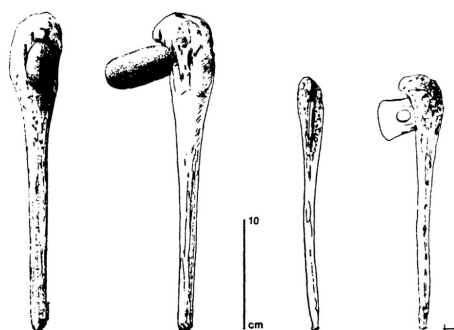
近，这种不信任是有原因的。更何况，那一天对印第安人来说发生了另一件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的到来就黯然失色了。各位还记得，居弗库基和他的群体从1959年8月就在这里了。亚契嘉图人——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意为“好亚契人”——打那以后就过上了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他们依旧在森林里游荡，打猎，采集果子；他们外出的时间或长或短，短不过一日，长则在外一整月，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命定的家园——在白溪的永久营地。这是他们的避风港，是他们在这个充满恶意的世上唯一一处栖身之所。此外，他们的巴拉圭庇护者想要掌控他们，因此不乐意看到他们离开太久。当然了，花在往返路上的时间会影响到人们的打猎时间，这意味着部落的口粮减少。这个男人因为成功地招安了瓜亚基人而在整个地区声名鹊起，但同时，他也因为自己的新权力而有了直接的获益，其中一项就是他享有了部落里的年轻女孩子——只有圣人才能在这些曼妙身躯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简而言之，他现在成了部落的酋长。巴拉圭政府认可了现状，并给予了他法律上的身份。尽管这职位薪水微薄，可是从亚松森送往印第安人手中的面粉、脂肪、糖类、奶粉等食物却数量可观。当然了，亚契人的确收到了一部分东西，但他们的白人首领扣下了剩下的部分，并将之卖给了当地的农民，以从中获利。货物的量是根据收到补给的印第安人的数量来算的，因此，印第安人的人数若是更多些，里头的利润就会更丰厚。正好，几个世纪以来，在几里外的陡峭的温蒂路斯（Ywytyrusu）山间，还住着另一个瓜亚基部落。

在与白人相处的过程中，这群印第安人的处境尽管没比他们的同族亚契嘉图人好到哪里去，但他们好歹还没被逼到要投降的份上。他们游牧的地盘，科迪勒拉山系（Cordillère），是一处天然的避难所，巴拉圭人很少会深入到那里。相反，瓜亚基人会时不时发动一场进攻，然后迅速撤退到追兵到不了的山林间。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能这样自由地生活上很多年，因为巴拉圭人没有侵占他们的猎场——山地过于支离破碎，没法成为好的牧场。然而，他们目前为止相对平静的生活注定无法持续下去，因为亚契嘉图人的主人急着想要增加油水的来源，他决定支配这个新部落。换作其他任何人，这都将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有了居弗库基和他的族人，他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件事。想要在森林中找到一群游牧人对任何人来说都近乎天方夜谭，除非另一群游牧人出手：对他们而言，追踪那些在其他人看来不可见的踪迹简直轻易如儿戏。然而他还得做一番思想工作来说动居弗库基联系另一个部落，当他在亚契嘉图人抵达白溪约两年后首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们没有对此表示半点兴

趣。亚契嘉图人知道，在自己领地的东面存在着这么一个部落，但他们从没见过那个部落的任何一个成员。两个群体默默约定了双方互不碰面；两边都很小心，以免进入对方的狩猎范围。如果有猎人碰上了不属于自己群体的踪迹，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自己已经来到了Iröiangi——陌生人——的领地上。他们会立马掉头，以免碰上一队传说中穷凶极恶的部落成员，尽管对方同他们一样，也是亚契人。印第安人会用激动的声音说，“如果你碰到了陌生人，接下来，大支的箭！很多箭！陌生人太可怕了，我们不勇敢，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跑了，跑得很远！”双方都高估了对方的好战程度，就这样，两个部落实现了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地待在自己的领地内，以免因越过雷池而引发可怕的报复。他们的恐惧在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中达到巅峰：另外那个部落是食人族！

因此，居弗库基有些迟疑。亚契嘉图人很害怕，担心陌生人一到达就会用一场箭雨把他们扎成筛子，然后吃掉他们。最终，白人酋长的镇场和他的枪支平息了他们的不安，于是在1962年初，一小队印第安人出发前去寻找Iröiangi了。当然了，他们并不打算透露这趟征途的真正动机，他们之所以会接下这个任务，是因为他们私下里将这次行动看作是向素未谋面的敌人复仇的好时机；此外，他们很期待不用以身犯险，却又能屠杀那些他们蔑视并痛恨的野蛮人的那一天。事情当然没有那样展开，因为对巴拉圭人来说，死掉的印第安人没有任何价值。亚契人没出几天就找到了他们想要搜寻的踪迹：某棵树的树干上有一道刻痕，距离地面约一人高——这个微不可察的记号，是留给跟在后头的女人的；在另一处，一棵灌木的树枝被手折断了；更远处，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一棵棕榈树被砍倒了，树叶被捋了个精光，而其纤维的形态说明有一把石斧在上面留下了切口。他们距离目的地不远了，印第安人变得有些焦虑；他们感受到了Iröiangi的存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下一秒就会听到箭响弦惊之声。要不是Beeru带上了他的“闪电”，他们很可能早已自行停止了远征，正打算回去告诉族人他们赶跑了敌人。一天早上，他们听到了捶击声。声音并不远，但是中间隔了层厚厚的植物。击打声之间有着相同的间隔，亚契人认出了石斧砍树干时熟悉的声音。“Iröiangi在找蜂蜜。”他们低语道。他们悄悄朝声音来源走去，只见几十步开外，一个男人趴在一棵树上，正在试图把树洞的入口弄大些。蜜蜂在那安了个窝，他则觊觎着里面的蜂蜜。树根处站着个年轻女人，她把棕榈叶编成的筐子放在地上，一旁是只daity——一个用来盛蜂蜜的防水容器；她正等着男人收工。他俩都没听到任何动静；男人干着

他的活，女人在旁围观。印第安人轻易地制住了那个女人，后者在看到不认识的亚契人和一个白人的时候呆若木鸡。男人吓了一跳，任由沉重的斧头掉到了地上。底下，三四张弓拉满了，箭头正直指向他。“Machi pira eme!不要射箭！”他脱口而出。“Ejy modo!Ejy modo!下来！从那儿下来！”亚契嘉图人喊道。这个采蜂蜜的人很困惑，这些Iröiangi在这里干什么？想必这些人会杀掉他俩？特别是那个Beeru，他为什么会和亚契人在一起？他接受了自己小命不保的事实，认命地下了树。



石斧和金属斧头，用了相同的方式组装

他的名字是康德基，“小野猪”，那个年轻女人是他的女儿。康德基已经是个体yaete，一个老人了，他已经有了孙辈。他不再带着弓箭打猎，却依然能在森林中四处活动，追寻着蜜蜂的踪迹，爬上蜜蜂筑巢的树。那天一大早，他离开了族人，去他之前发现的蜂巢采集蜂蜜。因为他已经当了很久的孤家寡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让女儿同自己一起出行，帮他用daity背蜂蜜——这是一项他自己没法干的活，因为背东西是女人的工作。他本打算在日上中天之前回到营地，可接下来，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康德基下到了地面，双手依然环抱着树干，未曾远离。他等着一张弓抡向他的脖子，砸碎他的头骨，或是等着白人放出chuvi中的“闪电”。然而，他等来的却是蜂拥而上的亚契嘉图人，疯狂地朝他吼叫，一边拳脚相加，骂道：“你们Iröiangi真是又蠢又坏！你们是亚契vwagi，吃亚契的人，食人族！”男人没有尝试为自己辩白。至今为止一言不发的白人下了几道命令。人们平静了下来，缚住康德基的胳膊，把他和他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然后小分队就离开了。亚契嘉图人知道，Iröiangi不会追到自己的领地之外。他们强行沿着原路返回，并在几天后全须全尾，大获成功地回到了白溪。

康德基发现自己不光身在敌对的亚契部落中，还来到了Beeru的世

界。事情简直让人发蒙：亚契人和白人竟然待在一块！而且，双方都对他态度恶劣。这两个Iröiangi一出现在营地，亚契嘉图的女人就躲了起来，男人则嘀嘀咕咕道：“我们杀了他们吧！他们坏得很！”一个老人走到康德基跟前，狠狠对着他的脑袋抡了一拳。这个老人叫拜瓦基，是亚契嘉图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很烦躁，因为他老婆离开他去另寻更年轻有力的新欢了，理由是他已经没法再做爱了。可他自己，却还想要拥有一位dare——部落里头年轻漂亮的女人。他送幼虫给她们，希望能讨她们的欢心：“Meno vwä!来做爱吧！”可她们却无礼地当面嘲笑他：“Nde rö tuja praruete! Meno kwa iä!你太老太虚了！你根本没法做爱！”这一切都让他怒火中烧，因此，当他看到一个本族一直以来都憎恨的Iröiangi时，就把后者当成了他的出气筒，还打了他。后来，拜瓦基和康德基成了好朋友，他们会时不时地把食物作为小礼物送给对方。除了脾气暴躁、但下手其实并不重的拜瓦基，康德基并没有遭受其他人的羞辱。有人解开了他的胳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白人的房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绕着房子跑了三圈，一边大叫，这让远远围观着的女人们骚动了起来。Beeru让人给他送了肉和一些他没见过的食物，其中有一样简直可以与蜂蜜相媲美——糖果。他们在白溪度过的最初几日让康德基和他的女儿确信，这群人无意杀死他们。恐惧消散后，他们还在闲暇时观察起了亚契人和Beeru奇怪的生活。和亚契人相比，这位白人对他们友善多了。如果他想要让康德基协助他的计划，他不仅仅要引诱康德基站到他这边，还要说服后者，让他相信加入其他瓜亚基人在白溪的生活对他们部落而言是最有益的选择。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两位俘虏，是他让亚契人不再惧怕白人，他在这儿是为了杜绝一切暴力的发生，而这个营地是整个森林中唯一一个能护得印第安人周全的场所。康德基觉得这些讲法很有说服力，他自己不就一辈子生活在对猎杀土著的白人的恐惧中吗？他曾有多少同伴死在子弹之下？又有多少kromi，多少孩子，在被掳走后一去不返？现在Beeru说的一切似乎都表明，亚契人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

于是三周后，白人叫去了康德基和他的女儿。他送给康德基的东西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让他开心：一把金属做的斧头和一把大砍刀，这些白人使用的工具很偶尔才会落到亚契人手上，而且常常需要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白人送给了年轻女人一件tyru——颜色鲜艳的衣服，她立马就把它收进了篮子里。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去找自己的族人了。他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告诉族人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把收到的礼物给其他人看。白人还保证，日后他会亲自前往Iröiangi所在的山间与他们相结

识，并带给他们更多的礼物。二人离开了。这次远行让他们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刚被抓时，他们还以为自己准会在远离部族的地方丧命呢。然而，多亏了这个Beeru gatu meete，多亏了这位善良大方的白人，他们能够活着回去找他们的irondy，他们的同伴了。他们要告诉族人的故事是多么精彩啊！想来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已经殒身美洲豹和秃鹫的腹中了，女人们剪了头发作为守丧的标志，男人则用弓互相厮打，以治愈内心的创痛。返程只花了很短时间。盛大的chenga ruvara迎接了这两个归人：康德基回家的第一晚，他整夜坐在篝火旁，吟唱着他们的冒险故事。其他人躺在地上，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他们正以极大的热忱专心听着。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所有的猎人都营地，这些男人就会召开漫长的会议。没有人怀疑康德基所说的故事，因为他是个chyvaete，他的年纪摆在那儿，这些年来他可没法像一个小孩一样乱说话。但他们应该相信陌生的亚契人和那个想邀请他们过去共同生活的白人吗？但他们又想到了他的礼物，那把沉重、锃亮的jamo jy——金属做的斧头：他们中还没有哪个人能够很好地驾驭它，但是到了要砍树或是要凿开蜂窝的时候，相形之下，老旧的itagy——石斧——显得滑稽可笑，只够让女人拿来当石杵用。而那位Beeru保证了要发给每个人一把金属斧头！

卡雷瓦楚基（“大浣熊”）有些犹豫。这群亚契人认他做头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他的兄弟卡加瓦楚基（“大野猫”）的帮助下，他总能够避免让自己的族人与敌对的亚契人发生冲突。他是部落里最强壮的人，他巨大的胳膊可以把弓拉断；决斗中，族人们都怕他的拳头，也没有人在听到他唱“Cho rö bretete，我是个伟大的猎人”时会觉得这是在夸大其词。是他，第一个找到了kaa gatu——充满猎物的丰茂森林。可现在，他该不该听从康德基的意见，并成为白人的cheygi——白人的朋友兼同盟呢？他无法忘怀，十五年前一大群白人是如何入侵了亚契人的领地，个个带着chuvi，数日间，死亡和恐惧在族人间蔓延，时时刻刻都有爆炸声响起。此前几个月，他们部落杀死了大量牛和马，如今只好撤离他们平日的猎场。有不少亚契人因为这次挫折垂头丧气，他们彻底离开了自己的地盘，一路向北，去了其他瓜亚基人居住的地方。据说那里的瓜亚基人很是凶狠，但显然，白人比他们更凶狠。他们永远离开了，从此再无音信。他们会不会被那些亚契人吃掉了呢？还是被他们当作了pave——兄弟？剩下的人则没能下决心离开熟悉的土地，他们在温蒂路斯山建立了自己的etoea——猎场。从他们所在的高处，他们遥望着夜间白人点起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有时，他们甚至能听到白人的马路上传来

沉沉的轰隆声。这是白人的bita——家畜——之一，它是个庞然大物，总是发出巨大的轰鸣：那便是itapegi，卡车。亚契人从山脊处遥望着这一切，在那里，他们能获得相对的安宁。他们是否应该拿这份可以倚仗的片面安宁，去换取对彻底安宁的简单承诺？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立马接受白人的提案，其中就有蒲昌普朗基，“跛脚”；被响尾蛇咬后他捡回一命，却就此成了跛子。打那以后，他就很难在其他人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时跟上大部队，只好拖着畸形的脚一瘸一拐跟在后头。其他人则拒绝相信Beeru的好意。亚契人分成了两派。最后，多数派——他们也许更多是被这次冒险的前景所吸引，而没怎么考虑到这背后的风险——倾向于归附另一方，而卡雷瓦楚基也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等白人前来。

探险队是1962年5月组织起来的，人数要比抓住康德基的小队更多些，包括数位巴拉圭人和十几位瓜亚基人，有男有女。女人的加入是为了向Iröiangi证明，使者团没有恶意：当亚契人之间要发生战事时，只有男人会参加，因此，女人在场是和平的信号。然而，白人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整个部落，他们也不确定交给康德基的任务是否已经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不愿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必须确保己方有足够的人手，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抵御随时可能存在的埋伏。但事实上，此行并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一天早上，探险队的营地突然被口哨声、尖锐的叫声和呼喊声包围了，尽管人们视野所及不见任何印第安人的踪影。树丛间飞来两支箭，但它们所瞄准的地方都要远高于人们的脑袋。正当亚契嘉图人开始害怕的时候，突然，树后出现了约六十位陌生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猎人们虽然背着弓箭，但他们脸上、胸膛上并没有画黑色的纹饰，这种纹饰只有在进攻时为了吓退敌人才会被使用。他们没有恶意。一位男人走上前来，简单地复述了一下康德基所转达的承诺。白人派亚契嘉图人作为中介，证实了这一切。不少金属工具被分发了下去，女人在哭声中表达了对亚契人和Beeru的欢迎，然后，整个队伍便动身了。就像三年前的亚契嘉图人一样，Iröiangi也永远离开了他们的etoa。

然而，仍有少数顽固分子——不满十人——无法接受这一决定；其中就有老托朗基，他憎恨并鄙视Beeru。此外，还有两个孩子。这一小撮人消失了，剩下的人都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了。然而，1963年2月23日，恰恰在我们到达白溪的那个时间节点，他们从森林里走了出来，出现在了营地中。在过去九个月间，他们没能熬过远离族人

的孤独，何况他们还不停地发现族人的踪迹：这棵树是某人砍下的，他们说道，这些幼虫属于某某某。他们现在成了温蒂路斯山唯一的主人，但他们害怕独自主宰那片土地。此外，两个孩子中，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得了重病，mano ruwy，几乎一脚踏进了鬼门关。或许白人有办法救她。他们下定了主意，而就在我们抵达亚契人之所在的那个时间点，托朗基的小分队出现在了营地中——这个巧合简直不可思议，我更愿把这看作是一个征兆。那八个男人和女人剃了头发。孩子肩膀上盖了一块野猫皮做的小披肩。他们一言不发，紧紧挤成一团，充满怀疑地注视着他们的新生活，而自由的森林就在他们身后。亚契人的亲友不事声张的到来吸引走了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注意力。印第安人照料新成员去了，他们背对着我们的牛车，车上装满了礼物——我们本打算在某次盛大的交换仪式上送出这些礼物。不过的确，这也让我们得以在数小时后第一次围观“带泪的问候”——某些16世纪的编年史家，比如安德烈·特维和让·德勒瑞⁽⁸⁾，在写到巴西沿海的图皮南巴士著时就描写过这种仪式化的与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亚契嘉图猎人中的一位，加古基，当时并不在场。他在下午将尽时回来，有人把新闻告诉了他。两位Iröiangi女人，一老一少，去了他的棚屋。他站起身来。二人中的waimi——老妇人——面对他站着，双手搭在他肩膀上；年轻的那位站在他身后与老妇人对称的位置上。他被困在两个女人中间，她们紧紧地将身体朝他身上压去，把他箍在自己的胳膊之间。接下来，chenga ruvara开始了。她们的吟诵充满感情，词句模糊不清，在悲哀的啜泣声中时断时续，仿佛是某种怪异的呜咽之歌的副歌。加古基时不时受到表示尊重的piy——对身体与颈部的按摩。这一切持续了十分钟，始终散发着令人难忘的庄重感，在其他小心地对此视而不见的印第安人中形成了一座充满恩典与美德的孤岛。我久久沉迷于这优雅的礼节中，欣然将热浪与蚊虫抛诸脑后——我真的来到了野蛮人之中。

- (1) 马其塔拉人（Machitara），瓜亚基人对姆比亚人的称呼。
- (2) 乔治·F·马斯特曼（George F. Masterman），19世纪英国医生，曾于1860年代在巴拉圭任外科医生。
- (3) 大厦谷（Chaco），另译“大查科”，南美洲中部的冲积平原。“Chaco”是瓜拉尼语，意为“狩猎场”。
- (4)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476年间出生，卒于1541年），西班牙早期殖民者。
- (5) 书中的“里”均是法国古里，一古里约合四公里。
- (6) 里昂·卡多根（Léon Cadogan，1899—1973），巴拉圭人类学家，对瓜拉尼语言

与文化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 (7)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 (Alfred Métraux, 1902—1963), 瑞士-阿根廷人类学家。
- (8) 安德烈·特维 (André Thevet, 1516—1592), 法国方济各会修士、探险家、作家。让·德勒瑞 (Jean de Léry, 1536—1613), 法国探险家、作家。



居弗库基，亚契嘉图人的“酋长”



幼虫大丰收

第三章 回溯

他们无疑是真正的野蛮人，尤其是那些Iröiangi。他们与白人的世界产生接触才几个月的光景，而大部分时间，这种接触也不过局限于和一个巴拉圭人打交道。这些野蛮人的野蛮体现在何处？不在于他们表面上的怪异之处：裸露的身躯、长长的头发、用牙齿做成的项链，还有男人夜间的吟唱，等等等等——这些都让我十分着迷，甚至可以说，我来这里想找寻的，正是这一切。他们的野蛮其实体现在沟通的巨大困难上。最初，乍一看，我们之间的沟通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为了试图填补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我做出了种种小心翼翼的，而且无疑是十分幼稚的努力，但我所遭受的，却是亚契人彻头彻尾、令人沮丧的漠不关心，而他们的野蛮也体现在这种漠不关心上。打个比方，我若是递给一个坐在棕榈树荫下削箭头的男人一把大砍刀，他连眼皮都不会掀一下，也不会流露出半分惊讶，他只会淡定地将它接过，检查刀的状况，试试刀刃——刀刃很钝，因为这工具还很新，然后将它放在一旁，继续自己的工作，并始终保持沉默。他周围还有其他印第安人；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我在沮丧，甚至烦闷中离开了，而只有那时我才能听到些简短的窃窃私语：他们显然正在对这礼物评头论足。当然了，我若是期待他们礼尚往来，送我一张弓、给我讲一个神话故事，或是把我当成亲戚，那我也未免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些！有好几次，我试着同Iröiangi用我仅有的瓜亚基语交谈。我注意到，尽管他们和亚契嘉图人的语言相同，二者讲话的方式却有所不同：他们的语速听上去要快很多，辅音往往会消失在一连串的元音中，因此我甚至没法辨别出我知道的单词——总之，我没能听出太多名堂。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故意显得很难相处的。比如说，有一次我问了一位年轻人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没什么难启齿的地方，因为亚契嘉图人回答它的时候毫不犹豫：“Ava rö nde apä？你父亲是谁？”他看着我，不能说他是因为一个滑稽的问题而感到震惊，也不能说他没听懂我的问题（我格外注意，发音时缓慢又清晰）。可他仅仅是看着我，带了几分无聊，没有回答。或许是我的发音太糟糕了？为了确认这一点，我跑去找了个亚契嘉图人，让他重复一下这个问题；他的问法与我几分钟前的问法别无二致，但是Iröiangi回答了他。我还能怎么办呢？这让我想起了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在不久前对我说的话：“我们若是有幸能够研究某个原始部落，它自身一定已经开始腐坏瓦解了。”

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还带有几分“青涩”的社会，至少那群Iröiangi是如此，尽管他们迫于无奈开始在一个“西方”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某种意义上，他们最近之所以会移居到白溪，难道不是更多出于一种集体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不能承受的外界压力的反抗吗？）。我们的文明那对他们而言致命的气息几乎没有触碰过他们，也尚未将他们污染，因此亚契人还能保有他们森林生活的宁静和清新。这份暂时的自由注定不能持续太久，但是眼下他们别无他求；它尚未因任何伤口而衰败，他们的文化也不会因为这道伤口在不知不觉中迅速腐烂。因此，亚契Iröiangi的社会尚未开始腐化，它十分健全，以至于它无法与我、与另一个世界的人展开一场关于它自身的衰败的对话。同样地，这也是为什么亚契人接受了我请自来的礼物，却同时又拒绝了我发起对话的意图：因为他们足够强大，并不需要与我对话——只有当他们生病时，我们才会开始交谈。老拜瓦基死于1963年6月。他显然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逗留在生者的世界。不管怎么说，他是亚契嘉图人中最年迈的，他的高龄（肯定有七十多了）让我总是很想问他一些过去的事。总的来说他还是很乐意配合这些对话的，但我们只聊一小会儿，在那之后他会感到疲倦，并再一次陷入自己的思绪中。有一天晚上，他正打算在篝火旁睡下，我凑了过去，坐在了他边上。很明显，他非常不待见我的到来，因为他轻声又不容辩驳地嘀咕道：“Cho rö tuja praru.Nde rö mitä kyri wyte.我是个虚弱的老人家。你的脑壳还没硬，你还是个小婴儿。”他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留下他一人戳弄着篝火，回到了自己的地方。我有点沮丧，我们在说出真相的人面前往往如此。这就是亚契人的野蛮之处：沉默塑造了他们，这个令人忧伤的符号象征了他们最后的自由，而我太想从他们身上扒掉这层沉默了。这是在和他们的灭亡签订契约，我不得不动用耐心和小聪明，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贿赂（小礼物、食物、各种友好的手势，还有甜美的、近乎糖衣炮弹的语言），不得不突破亚契人的消极抵抗，侵扰他们的自由，并迫使他们开口。多亏了亚契嘉图人的帮忙，我花了差不多五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切。

亚契嘉图人已经在白溪住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一个印第安部落与白人长期接触的话，这么一段时间已经足够让这个部落分崩离析。好在这个地方近乎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巴拉圭访客会偶尔途经此地，这让印第安人每天得以与自己的族人朝夕相处。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自然受到了影响，但他们的文化尚未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比如说，他们不得不学着每天吃木薯，并且减少肉类的摄入，这让瓜亚基人很痛苦。但因为没有人试图让他们改信基督教，他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遭到动摇，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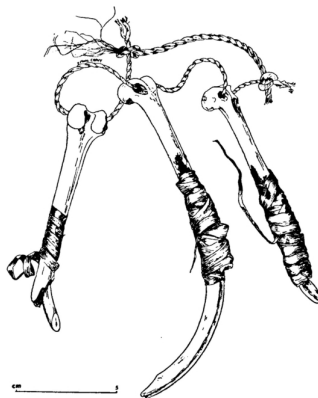
信仰世界也依然生机勃勃。这保护了他们，让他们免于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在任何外界迫使的改宗之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亚契嘉图人依然还是亚契人，尽管他们已经多少习惯了与外人打交道。但是当Iröiangi入住他们的营地时，居弗库基的族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比他们早了两年半来到这里，并在对待后者时采取了一种趾高气扬的态度，犹如老手对待新人，甚至像是封建领主对待乡巴佬一般。两个部落之间一上来产生了某种阶级之分；或者说，陌生人不争不闹地接受了另一方的意愿。因为如果说，他们的巴拉圭酋长是亚契嘉图人对抗白人世界的唯一保护伞，那么同样地，卡雷瓦楚基和他的族人也需要他们同胞的保护。若是没有后者，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这背后的风险是他们可能会失去进入Beeru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必须仰仗亚契嘉图人的好意，而对方也对这有利的局面喜闻乐见。

Iröiangi的到来对亚契嘉图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开心事——远非如此。他们倒没有反对这件事，毕竟这是白人的意思，然而，作为不情不愿地接收了这些惹人厌的来客的东道主，他们不过是臭着张脸迎接了对方。这两个部落一直以来就住在自己的森林里，只求老死不相往来。双方互为潜在的敌人，因此他们犯不着展示出某种“友谊”——反正也无人在意。更何况，居弗库基很清楚地知道陌生人将会从Beeru的恩赐中分走一杯羹，如此，亚契嘉图人的那一份将按比例缩水。但最重要的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人数差异令人郁闷：在他们看来，另一方小心翼翼的露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一次入侵。居弗库基的群体不过三十人：十四个男人，七个女人，外加小孩。陌生人那边却有六十人，不久后又多加了十个人——我目睹了他们的到来。这简直就是碾压：“Tarä pute rö Iröiangil这么多陌生人！”亚契嘉图人说道。他们会不会利用人数优势夺走这边男人共享的为数不多的配偶？这些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还有他们对Iröiangi的轻蔑：白人赐予了陌生人斧头和砍刀，但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东西，也不知道该怎么磨刀；这些乡巴佬什么都得靠人教。因此，人们决定避免与这些入侵者有任何随便的接触，也不愿与后者混在一起，并建议对方在安营扎寨时拉开一定距离。就这样，在白溪的树荫下其实有两个界限分明的营地，分列溪水两侧。他们让陌生人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人数上的优势永远不能弥补他们深深的无知：“Iröiangi kwa iä ete, ure kwa ty.陌生人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则不同，我们习惯了知道这些事。”Iröiangi没有起半点疑心，他们很相信亚契嘉图人，做梦都没想过要挑战对方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他们从白人那儿获得的大量知识。于是陌生人谦卑地接受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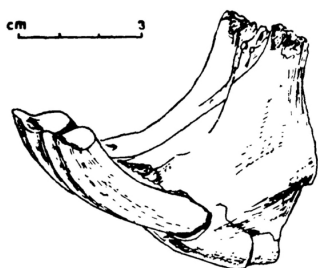
低人一等的地位，就这样，尽管居弗库基并没有想过要在卡雷瓦楚基的族人中灭他的威风，他却成了所有亚契人的首领。作为一个有手腕的政治家外加勇敢的猎人，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陌生人的腼腆和笨拙来为自己的族人牟利。首先，他为自己的兄弟皮库基（“小鱼”）娶了个老婆；皮库基的原配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他。Iröiangi刚来的时候，卡雷瓦楚基有两个老婆，一个时间长些，另一个是新娶的。新娶的是个年轻女人，丈夫死在了巴拉圭人手里。卡雷瓦楚基收了她作自己的japetyva，二老婆。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卡雷瓦楚基因此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了皮库基。前者不痛不痒地与自己的年轻妻子分开了，虽然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女儿；他的大老婆则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各自都已经结婚，成了一家之主。然而，一个男人如果有两个妻子，他就必须打到比别人多一倍的猎物。此外，卡雷瓦楚基也意识到，放弃这项权利能够讨好居弗库基。至于那个年轻女人，她很高兴自己的新丈夫是亚契嘉图人的一员——他们是如此富有，并且充满自信。这次交易的好处是双重的：女性人数稀缺的亚契嘉图人多了个女人，同时，这次婚姻使得两个从前相敌对的部落成了同盟。以皮库基和他的妻子为中介，两个部落中的人成了姻亲。当两群亚契人还相安无事地住在森林里时，这样一件事情——冰释前嫌成为一个群体，所有人都变成irondy，同伴——是不可想象的，可一旦他们丧失了自由，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今往后，他们就是pave，兄弟，尽管这全非他们的本意。

就这样，两个群体之间有了良好的默契；某种耿耿于怀的心情暗地里依然持续着，但这种情绪很少在明面上发作。比方说，两个部落都避免把对方当作Iröiangi，因为这样做对于vaja——姻亲——而言，是一种冒犯。但是和自己人在一起时，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忘了他们是vaja，只说对方是陌生人。有一天，库步拉基向我透露了双方关系的真实现状。他心不在焉地看着一群Iröiangi说道：“等他们都死了，我们就把他们的老婆抢过来。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女人。”那些老妇人甚至比他还耍口无遮拦。有天晚上我正和居基（“青蛙”）压低声音聊天，她是个相当老的亚契嘉图女人。营地很安静，人们几乎都已入睡。突然间，某个tapy中传来了一记放屁声，在周围的静谧中回荡着。我笑着问居基：“Ava rö pyno？谁放屁了？”她显然以为我是在指责她，就愤怒地高声喊了出来，好让所有人都能听到：“陌生人很会放屁！Ine pute，他们放的屁可臭了！我们亚契嘉图人从来不放屁！”没有人质疑这一极其恶毒的诽谤。因为瓜亚基人往往对身体的自然机能避而不谈，他们只会通过打嗝来自我表达，作为吃饱了的健康象征。其他一切语言都是不被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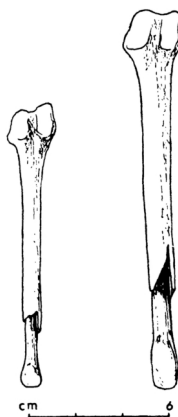
的。就连孩子们也会到离小屋很远的地方去方便，到耳不闻眼不见的树下。有时候，你能听到渐行渐远的笑声——那是结伴去解手的年轻女子。如果有人漫不经心地挑了个离营地太近的地方，就会有老女人高声骂道：“Wata reko! Kaari rō puchi!走远点！对，去森林里大便！”这条小溪有条清浅的沙河床：这就是为什么瓜亚基印第安人把它叫作Moroti，“白”；陌生人和亚契嘉图人都用溪水洗东西。然而，亚契嘉图人并不愿意平等对待自己的姻亲，居弗库基手下的猎人极少和卡雷瓦楚基的人一起去打猎。这种恶劣态度某些时候让他们显得几乎有些滑稽，就连言行通常都很有分寸的居弗库基有时也不免如此——与其说他是真的在说些什么要紧事，不如说他是用自己严肃又充满嘲讽的视线把对方瞪得浑身僵硬。有一天，居弗库基正专心地监督一个Iröiangi削一支箭。过了一会儿，他叫了对方一声，想要查看这支箭。“Mechä vwä.我看下，”他说道，人却没有动。对方赶紧把箭拿给他看。这是支不错的箭，就像大部分亚契人的箭一样，上面的倒钩都在同一侧。居弗库基查验了一番箭的弯直和牢固程度，然后仔细检查了凹槽有多深，是否分布均匀。接下来他把箭拿给坐在身边的妻子看了，然后难堪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唇边还挂了一抹遗憾的微笑：“Vai pute!真是丑得没救了！”他的恶意显而易见，因为这支箭不比任何其他箭要差。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内行，居弗库基为什么要抹黑它呢？这是因为这位工匠没有金属刀具，他削箭时用的是瓜亚基人传统的凿子，prachi，用水豚的长犬牙接在猴骨所制的柄上制成，整个东西是用蜂蜡粘起来的，然后用藤蔓植物的茎绑在一起。因此，凹槽做不到很清晰、光滑——这对白人的刀具而言是很容易的事，但用prachi却难度大增。居弗库基很清楚这一切，但他想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族人的技术先进性上，便嘲笑了Iröiangi简陋的箭。他没法与白人一争高低，便转而找上了比自己更低一等的人：在Beeru的世界里没有平等可言，居弗库基很快就领悟了这一点。



prachi：男人用来制箭的主要工具



水豚的颌骨



有着金属尖端的**prachi**

然而，尽管对他而言保护自己部落的利益重于一切，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陌生人的利益。正如陌生人把他看作位在卡雷瓦楚基之上的真正领袖一样，他同样认为自己需要对陌生人负起与对自己的族人几乎相同的责任，因此，每当白人來分发食物、药物或是工具的时候，他会确保所有亚契人拿到自己该拿的那份。同样，每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或是有某个关系到所有人的决定时，居弗库基会不辞辛劳地挨家挨户通知这个消息，给出大量的评论和细节，确保所有人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开始，他的这些拜访让我很是惊讶，因为事实上印第安人已经知道了消息的内容。每当巴拉圭人有什么事情要向他们宣布时，他会让所有人聚集在自己的泥房子前，用一种奇怪且让人困惑的瓜亚基语和瓜拉尼语的混合体发言。只有三四个亚契嘉图人能听懂这种黑话，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天书。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演讲必须经过翻译，这是由那几个少数能听懂的人现场完成的。但即便如此，在所有人回到自己的tapy之后，居弗库基仍会用一种冗长的方式重复他们方才听到的寥寥数语。听他宣讲时，印第安人看上去似乎对他所说的毫不知情：这是一出怪异的喜剧，人们专心致志地听着，并装出惊讶的样子，尽管居弗库基显然没有被他们装出来的惊讶骗到。这出游戏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种共谋究竟遵循着什么原则？为什么居弗库基需要重复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与巴拉圭人通知的内容毫无瓜葛；不论消息重要与否，印第安人都会摆出同样的态度。在他们从居弗库基口中听到这件事情之前，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真正得知了此事：似乎，只有居弗库基的金口玉言才能保证消息的价值与真实性。

很明显，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印第安部落中政治权力的本质，以及部落与其酋长之间真正的关系。作为亚契人的首领，居弗库基必须开口说话。这是人们对他的期望，而为了回应这份期望，他才会一个tapy一个tapy地“通知”人们。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接观察印第安人的政治体系，因为它就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的眼前。对他们而言，酋长从来不是通过上令下效统领其他人的人：没有哪个印第安人会认同这个观念，绝大多数南美洲的部落宁可选择死亡与灭族，也不愿屈从于白人的威压。瓜亚基人同样相信这一“野蛮”的政治哲学，他们对权力（pouvoir）和暴力（violence）有着明确的区分。为了表明自己能够挑起酋长这一重担，居弗库基必须证明自己与巴拉圭人不同，他并不通过高压来施行自己的权力，而是使用暴力彻头彻尾的对立面——话语和语词。当他在营地挨户拜访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告诉亚契人任何新消息，而是在证明自己有完成落在肩头的任务。因此，他的话语有双重的含义：它表面上的那层意思不过是为了在掩饰的同时，揭露出贯穿了他所说的话的另一套语言，以及蕴含其中、隐而不显的真正含义。这套完整的语言，这套沉重的话语试图在群体及其首领的权力之间达成平衡，而它实际表达的是：“我，居弗库基，是你们的beerugi，你们的首领。我很乐意成为首领，因为亚契人需要一个向导，而我想要成为那个向导。我已经体验过

了指引你们的乐趣所在，我想让这份快乐延续下去。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酋长，我就愿意一直带领你们走下去。这是否意味着我想要把这份认可强加到你们身上，与你们发生冲突，混淆我个人的欲望法则与整个群体的法则，来让你们供我差遣？不是的，因为暴力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们会拒绝这样一种本末倒置，并从那一刻起拒绝承认我这个beerugi。你们会另选他人，而我垮台时将会摔得很痛，因为一旦所有人都拒绝了我，我将陷入孤独之中。我不停地想要从你们那儿获得认可，但这种认可源于和平而非冲突，产生于话语而非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话，并做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群体的法则与我个人的欲望是一致的；你们想知道我是谁：我言说，你们倾听，我就是酋长。”

某种意义上来说，印第安人能意识到居弗库基这场想象中的演讲所表达的政治思想。我和某个人聊到酋长的行为时，他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我问他居弗库基“做”（faisait）了什么（相当于英文中的“to do”），我使用的动词是“japo”，“做”（to make）；他激动地回答说：“Jyvukugi japo iä, inandy!居弗库基述而不‘做’！”这并不是说居弗库基什么也不“做”：恰恰相反，他很勤劳，成天都在努力地制造弓箭。然而，我的情报员想说的是，居弗库基不是通过“做事”来定义自己的，而是通过“言说”；正是这一特征将他和其他人区分了开来，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酋长。每当他在必要情况下采取非暴力手段——语言——时，这一义务都使酋长永远处于整个群体的控制之下：因为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保证他的权力不会危及整个社会；而另一方面，他的沉默则让人不安。当然了，瓜亚基人并没有总结出一套关于政治权力的理论来，他们仅仅是运用并维持了这样一种关系，它被铭刻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也在所有印第安部落中不断看到这种关系。酋长象征的“权力”并非一种专制；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始部落距离创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系（也即近似于我们社会中的政治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是说，这些“野蛮”社会通过一种社会行为（因此也是无意识的行为），拒绝让他们的“权力”变成强权。酋长被禁止以权谋私：他们必须保持警觉，确保自己的私欲永远不会侵害整个群体的利益。他们为群体服务，是它的工具。首领永远处在团体的控制之下，他们不能违背社会规范，而整个社会生活就建立在这些常规之上，并受其巩固。有人说过，权力导致腐败。印第安人无需担心这一危险，这倒不是因为特别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而是因为从社会学层面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印第安社会不是为之而生的，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灭亡了。

16世纪上半叶临近尾声时，西班牙征服者抵达了南美洲大陆的腹地。最早的那批探险家已经被印第安人屠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远征之后，征服者乘着船沿“白银之河”——拉普拉塔河逆流而上。西班牙人如此命名这条河，是因为他们相信它通往充满贵重金属的国度——印加人的秘鲁。他们自己尚不曾抵达那个国度，但住在巴西海岸上的印第安人——他们带着铜制大砍刀，穿着银制胸铠——告诉他们，这些玩意来自远在西边的群山，安第斯山脉。西班牙人还知道，一个葡萄牙水手，阿雷荷·加西亚（Alejo Garcia），曾于1521年在海边沉了船，位置差不多就在今天桑托斯（Santos）港一带；他带着一群图皮南巴印第安人向着西边进发了。抵达巴拉圭后，他毫不费力就募集了数百名瓜拉尼战士，其中一些人已经对黄金国有所知晓，因为他们曾在它的边境劫掠了数次。阿雷荷和他的人马穿过大厦谷，抵达玻利维亚，在印加帝国的边陲搜刮了一大堆金银，然后返程往东边走。他们刚到达巴拉圭河，瓜拉尼人就杀死了这个葡萄牙人：现在战利品是他们的了，但加西亚仍然是史上第一个穿越南美洲，并亲眼见证“秃鹫”（Caracara）——瓜拉尼人对印加人的称呼——财富的白人。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西班牙人挂心，恰恰相反，这个大胆的葡萄牙人的命运让他们信心倍增：这不恰好证明了黄金国真实存在，而且触手可及吗？可事情却没能如他们所愿。在西班牙征服者和黄金之间横亘着大厦谷，栖身其间的印第安人是凶猛的战士，也是瓜拉尼人的死对头，因此，他们同样也是Karai——瓜拉尼人的白人盟友——的死对头，他们的头皮在白人那儿尤其值钱。在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西班牙人终于抵达了山地，此时，他们从印第安人那儿得知，留胡子的白人带着手枪，骑着烈马，早已在这个国家的北部播下了战争和死亡的种子。西班牙人这才知道，皮萨罗已经捷足先登，灭掉了这个帝国。他们来得太晚了，命里与黄金无缘。

当年，来自安达卢西亚（Andalusie）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e）的幼狼第一次无所畏惧，横冲直撞地踏上巴拉圭的土地，建立了亚松森这个小小的堡垒，它在未来成了这个国家的首都。不过实话说，这一切已是很久前的事情了。时间已经足够悠久，足以让这里的气候和美丽的瓜拉尼女人磨平他们的棱角，而一次又一次试图穿越大厦谷无果也已经让他们垂头丧气，他们最终放弃了赢得那笔财富的梦想。他们与祖国几乎断绝了音讯，在西班牙的人们已经听不到拉普拉塔河的征服者的消息，现在他们选择在情妇的臂弯中自我放纵。前不久与瓜拉尼人的结盟最终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男人都成了他们的奴隶，女人则成了他们的情妇，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了很大的后宫。已经

成百、马上就要上千的karai ra'y——半白人半印第安人的混血孩子——正在土坯房和园地里到处撒野，他们的叔叔，昔时曾是骄傲的战士，现在则在园地里为主人——他们的姻兄弟——种木薯和玉米。

当然了，西班牙“绅士”并没能统领所有的瓜拉尼部落，他们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亚松森周边。北边和东边还有不少瓜拉尼部落，他们强大富足，住在群居房中，每一处都能容纳两百多人。那儿的年轻人骁勇善战，老人充满智慧，至于那些伟大的巫师——身怀神通的Karai——他们知道如何与诸神交谈：这就是为什么来自东面的白人同样被称作Karai，因为他们看上去也具有神秘的力量。多亏了巫师们载歌载舞，种植园里的庄稼茁壮生长，Karai华美的词藻取悦并吸引了Tupan，他总在需要时送上一场及时雨。森林里到处是猎物：弓箭、陷阱和棍棒总是能够让住在tava——农村——里的人带着充足的肉类满载而归。最后要提的则是与Ka'aygua之间毫不留情的战争。Ka'aygua是谁？“森林里的人”，这是瓜拉尼人对这个部落的蔑称中的一个（瓜拉尼人用它来指代一切他们觉得野蛮的部落）。这些人几乎从不现身，除非是为了到园地里偷东西。一旦踪迹被发现，你就会听到他们逃进森林时发出的动静，仿佛发疯的獾一头扎进树丛。瓜拉尼人正是这样看待Ka'aygua的：他们觉得后者是动物，他们的名声让女人闻风丧胆。瓜拉尼人很乐意把他们斩尽杀绝，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些Ka'aygua甚至不知道怎么种地，也不建造屋舍，而是在巨大的森林里无休止地游荡。没有人能靠近他们，就连他们中的一小队人马在清晨离开森林，前来攻击村落的时候也不行：一连串的箭雨会落到瓜拉尼人睡觉的吊床上，他们的脑袋和四肢会遭受石斧和木棍的击打，然后偷袭者会拖着捕获的女人迅速撤退。有些时候，放哨的人能嗅出些攻击将至的风吹草动，这时他们就能够把Ka'aygua击退。还有些时候，好几个村庄的战士会联手追踪Ka'aygua，如果成功截住了后者，他们就会大摆宴席，痛啖俘虏肉，以报复对方的攻击，并为被杀的族人复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Ka'aygua会消失在森林深处——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那一带。

Ka'aygua并不知道瓜拉尼人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称自己为亚契（Aché），这个词在瓜亚基语中的意思是“人”。至于瓜拉尼人，亚契人只用“Machitara”一词来称呼他们，意为“很多箭”。双方互为寇仇的日子太久，他们甚至想不起来在战争和伏击之外的情形下与对方打过任何交道。因为瓜拉尼人在人数上远远多于亚契人，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作“数不清的箭”。简而言之：一边是“很多箭”-瓜拉尼人，他们住在森林边缘的永久居所中，林木遮掩着他们的村庄和园地；另一边则是亚契-瓜亚基

人，这些偷偷摸摸的游牧人住在森林的腹地，寸步不让地抵御着对方逐步的进击。这就是巴拉圭东部的两支印第安人，不可化解的世仇将他们永远捆绑在了一起。尽管亚契人已经接受了白人的世界，但他们永远不会同意与瓜拉尼人结盟。我住在他们那儿的时候，一小队瓜亚基人离开了白溪，在距离白溪一天路程的地方搭建起了一个临时营地。然而，就在那附近有一群瓜拉尼人，差不多三十人。无比热爱和平的瓜拉尼人一听说世仇的到来，就迁徙到了四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并向巴拉圭士兵寻求保护：他们以为亚契人过来是为了屠杀他们，好掳走他们的女人。

在遥远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段仇恨？鉴于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答案；因为缺乏传世的考古资料，美洲土著的过去迷雾重重、一团乱麻。然而，某些假说似乎要比其他推测更靠谱些。瓜拉尼人的地盘从巴拉圭河延伸至乌拉圭，几乎直抵大西洋沿岸。至于巴西那侧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都和瓜拉尼人很相似），则被称作图皮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图皮-瓜拉尼是一个同质的文化群体。显然，这些印第安人都是征服者。他们在南美洲大陆四处扩张。一方面，这是因为某种宗教信仰上的不安，所以才使得他们为了找寻Ywy mara ey——没有恶的国度，地上天堂——而四处迁徙；但同时，这也是出于某种好战精神，它使得年轻人眼中战士的榜样充满荣光；最后，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确实需要更大的地盘，而这或许是为了应对急剧增加的人口。无论如何，瓜拉尼人肯定不是巴拉圭最早的占领者，即便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上百年——有系年8世纪的陶器为证。我们可以猜测，最早一批瓜拉尼侵略者或许没有占领整个沙漠，但他们很可能在那儿发现了少数居民，并不得不用武力削弱他们。这些居民在人数上根本无法与冷酷无情的kyreymba——瓜拉尼战士——相比，因此他们完全没能抵挡住后者的进攻。瓜拉尼人在控制新近占领的土地时有一套非常高效的手段：他们会尽可能将男人杀光，和女人成婚，并将孩子领养。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就是发生在巴拉圭和乌拉圭之间的事，但我们也同样没有反证。因此，我们认为可能的情况是：瓜亚基土著就是在瓜拉尼人入侵之前，居住于此地的原住民幸存下来的后代。有一条补充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推测。与某一个广泛流传却虚假不实的观念正相反，大多数的南美洲土著都是农民——至少在土地适合耕种的热带地区是如此；对他们而言，种植所得的粮食与渔猎、采集所得的野生资源一样重要。事实上，非农业的游牧文明非常罕见。然而这样的文明的确存在，瓜亚基人就是佐证。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面前是一群真正的活化石，他们带我们回到了农业尚未存在的远古时代。若

真是如此，这些部落是如何在周围的人纷纷展开并完善农业活动的情况下，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在这两三千年的时间里，农业在这片大陆上四处开花，瓜亚基人是如何在外来影响下始终无动于衷，抵挡住一切文化借鉴，坚守在历史边缘的？我们很难相信他们逃过了农业的“传染”（可以说，这恰恰是农业的传播方式）：毕竟现在的游牧民族并非真正来自远古时代。所以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些游牧民族之所以对农业一无所知，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过农业生产，而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这一技能。这一缺失恰恰向我们表明，就像所有其他部落一样，瓜亚基人也没能逃过历史的烙印。

究竟是什么重大事件导致了瓜亚基人历史上的倒退与文化上的返祖归宗？某种迫使他们远离故土的可疑的自然灾害？有可能。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碰上了某种敌对的武装力量，或是与某种更先进的文明发生了冲突——换言之，侵略战争让瓜拉尼人出现在了瓜亚基人的地盘上，迫使瓜亚基人不得不另求栖身之处，以避开这些侵略者。于是他们过起了近乎东躲西藏的生活，并试图隐藏他们少量的庄稼（这一点已被证实，我们下文会讲到）。然而世界已经开始动荡，他们不可能回到从前的生活了。Machitara人向他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而越来越颠沛流离，最终，亚契人彻底放弃了农耕生活。这件事很晚近才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纯粹的敌对关系，不免太简单粗暴——这意味着双方在共存中从未对对方产生过任何影响。然而，他们之间很可能存在过暂时的和解、临时的关系松动与战火的中歇，这使得瓜亚基人有机会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学习吸收瓜拉尼人最有吸引力的文化特质。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瓜亚基人没能回到他们的原始状态，而是学习并化用了敌人的语言，使之为己所用；他们挪用了对方的部分神话与信仰，还隐隐借鉴了对方的仪式生活。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发生后，瓜亚基人不仅在文化上倒退了，他们还瓜拉尼化了。或许，对下面这个简短的姆比亚-瓜拉尼（Mbya-Guarani）神话就该赋予这样的历史意涵，直到今天，巴拉圭的姆比亚-瓜拉尼人依然知道如何讲述这个神话：“起初，姆比亚人和瓜亚基人共同生活在Pa'i Rete Kwaray——有着太阳身躯的神——的领导下。有一天，瓜亚基人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了仪式性的舞蹈中。愤怒的Pa'i Rete Kwaray斥责了他们，对他们下了诅咒，并把他们赶出了森林。这就是为什么从此之后他们作为野蛮人四处流离至今。”瓜拉尼人的良心不坏，但他们并没有看透彻：的确，亚契人罪有应得，他们本不该在以神之名举办的仪式上违背礼节、冒犯神灵；但同时，这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焦

虑，这导致姆比亚人无法淡定地接受双方的差异，但他们又无法去除这些区别，因此他们试着将这种差异囊括在一套熟悉的符码、一套令人心安的象征符号中。对姆比亚人而言，瓜亚基人并非来自另一种文明的人，因为文明内部不可能存在差异：相反，瓜亚基人生活在规则、常识和法度之外——他们就是野蛮人。就连诸神都与他们为敌。当然了，所有的文明中都存在着异教徒，但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在对神明高唱颂歌时向来都毫不迟疑；而还有一些人，哪怕身受酷刑与屠戮，也拒绝崇拜这位神。我们大可以在这之中衡量我们的世界的真正价值。

征服美洲（La Conquête）开始时，最先来的是士兵，然后是牧师。到了17世纪初，伟大的鲁伊斯·德·蒙托亚^①开始了传教运动，它最终壮大成了巴拉圭令人惊叹的耶稣会帝国。其中的重重痛苦和磨难自不待言，还有很多耶稣会成员在那里丢了性命。但他们的顽固和不依赖武力来让瓜拉尼人在传教会安顿下来的决心最终突破了印第安人的防线。很快印第安人就意识到，与耶稣会一起生活成了除了被奴役以外的另一种出路：事实上，他们正好被夹在圣保罗的葡萄牙殖民旗兵

（Bandeirantes）和亚松森的西班牙人的交锋中，双方都把瓜拉尼部落看作是无穷无尽的奴隶的来源。起初，传教士很多都是逃难者；等到一个世纪后，耶稣会已经能够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印第安人，将基督教介绍给他们，并为此洋洋自得了。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土著住在集合化传教村^②中。很快，神父们就得知了Ka'aygua的存在——瓜拉尼人把他们形容得十分可怕。出于某种好奇心外加对传教的狂热，这些耶稣会成员想要近距离见一见这些“森林里的”人，并将这些饱受邪恶荼毒的灵魂引渡到上帝这一边来。他们多次试着用和平的手段与他们接触，但都徒劳无功；瓜亚基人太神出鬼没了。因此他们决定放弃自己的非暴力原则，转而追求效率。他们在瓜拉尼人的帮助下发动了武力征讨，后者十分乐于对瓜亚基人动手。这一次，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抓住了差不多三十个瓜亚基人，并且把他们带回了耶稣会。神父们已经完美掌握了瓜拉尼语，他们很快就意识到，Ka'aygua的语言与之关系密切。他们甚至觉得瓜亚基语十分动听，并把这种音乐性归因于Ka'aygua人用来解渴的林间泉水之清澈。但是他们没能长时间继续对这些土著进行观察：这些野蛮人太过固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效法基督徒的行为；剩下的人则重新回到了荫翳的森林中，继续遭受魔鬼的折磨。耶稣会成员觉得很挫败，他们也无意再重复一次如此毫无所获的试验。接下来没有人知道瓜亚基人的消息，一直到20世纪初；他们的存在简直成了某种迷思，若不是人们时不时地听说他们又发动了一次突袭

——谣传把这些突袭描述得天花乱坠。

尽管耶稣会成员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信仰，但他们也都是饱学之士，十分注意观察新世界以及此间的居民呈现的光怪陆离的景观。他们记录下了后者的习俗和信仰，并把它们看作是魔鬼的手笔。就这样，耶稣会的档案某种意义上成了美洲大陆的百科全书，而这些在数十年间缓慢积累起来的知识为洛萨诺神父⁽³⁾那本优美详博的《巴拉圭征服史》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u Paraguay*) 提供了原材料——他奉命撰写此书，费了二十多年心血，走访了每一个传教村，翻检了所有的资料，还询问了每一名亲历者。多年以后，耶稣会在1768年被逐出美洲，而直到那时，他的大作才完工。这本《征服史》中不光充满了关于那些改信基督教的部落的信息，也涉及了异教徒，其中就有瓜亚基人。一直到最近，我们对瓜亚基人的全部了解就包含在洛萨诺神父关于他们的薄薄几页纸中。他对他们的描绘当然不完整（这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准确，我的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点。我同时还证实，早在历史学家洛萨诺神父使用这些材料的一百多年前，瓜拉尼人就已经向耶稣会传教士提供了关于“Guachagui”——这是洛萨诺神父对瓜亚基人的称呼——的高质量情报。武器、工具、盛液体（水或蜂蜜）的容器、饰品、男女的发型、营地的搭建、渔猎技巧——这一切都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描绘，以至于人们不免为作者的言简意赅而扼腕。然而，涉及信仰问题的时候却需要另当别论：在这一方面，洛萨诺和其他所有的传教士没什么两样，他的陈词滥调和种族中心主义令人失望。不错，他传达的不过是耶稣会的正统观点而已，而不是他的瓜拉尼情报员提供的具体信息。他这样写道：“就宗教信仰而言，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信仰，不迷信，也不崇拜任何事物；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对唯一真神——创造天地之神——的粗浅认知，此外他们还隐隐约约知道邪恶会遭受烈火的惩罚，这让他们心怀畏惧。”这简直是对瓜亚基人宗教观的彻底扭曲，而且很显然是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臆想——甚至都没怎么动用想象力。洛萨诺不过是粗暴地把基督教对创世主、善恶，甚至地狱的理解强加给了瓜亚基人！相比之下，下面这段对亚契社会的简短议论倒是颇堪玩味：“他们有着时不时对彼此宣战的习俗，目的通常是为了偷走对方的女人，因为他们中女人实在太少了。男人的数目要多得多，而这在西印度群岛绝对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洛萨诺在这里合理地提到了瓜亚基社会的一个特点，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保留了这一特征：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而总体上来看，在其他土著部落中情况正好相反。刚到白溪时，这种性别失衡让我感到很吃惊：居弗库基的群体中恰好是十四男七女。女性人口的短缺足以解释不

同亚契部落之间为何会发生“内战”：他们试图从他人手中获得自己缺乏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女人会这么少呢？洛萨诺对此未置一词，因为他对瓜亚基人的信仰一无所知。实际上，这一性别比例的失衡根本不需要通过某种生物学层面的异常来解释。女性人口的短缺与印第安人的仪式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后者又关系到他们的信仰。我花费了不少耐心才了解到了这些信仰，而某种意义上，我得知的东西有些骇人。

让我们暂时先把我几年前对瓜拉尼人的观察与16、17世纪人们对瓜拉尼人的观察做一个比较。在洛萨诺的书中，就在瓜亚基人的前面一节，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段落。它涉及Ka'aygua印第安人，我们或许还记得，瓜拉尼人没有用这个词来称呼某个特定的部落，而是拿它来无差别地指称那些生活在他们附近的群体——也即是低他们一等的部落。然而，关于Ka'aygua印第安人的描述却和瓜亚基人完全吻合，因此，毫无疑问，Ka'aygua就是亚契人。然而，最让人惊奇的是，洛萨诺非常精确地指出，Ka'aygua活动在巴拉那河（Parana）和乌拉圭河之间，而巴拉那河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瓜亚基领地的东侧边界之所在。除了洛萨诺的这条记载（我们没有理由对之表示怀疑），从来没有人提到过Ka'aygua生活在这个区域，也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其他能与这位耶稣会历史学家的描述相吻合的部落。对此我们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不能说这个种族仅仅存在于洛萨诺的想象之中，因为我能够把他的描述和瓜亚基人对上。相反，结论应该是，差不多就在人们开始讨论他们的时候，那些当年住在“大河”（这是“巴拉那”的字面意思）彼岸的亚契人消失了——他们或是被瓜拉尼人所消灭，或是融入了后者之中。这事没什么好稀奇的：在印第安人悲惨的历史中，不论是在北美还是南美，类似的例子数以千计，唯一的区别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受害者甚至来不及在凶手那儿留下名字就已经被白人屠杀了。不过，让我们先看看洛萨诺是怎么写的：“就目前的发现来看，在整个美洲，Caaigua人的信仰与灵魂都算得上是最野蛮的……他们住在乌拉圭河与巴拉那河之间，在我们巴拉圭传教站的土地上。这个种族人数很少，很显然这是因为他们不断遭受森林中美洲豹与野兽的袭击。因为他们并没有团结在一处，而是四处分散，无法互相帮助，他们宁静的生活为野兽所扰，不得不进入密不透风的丛林中，最终葬身于斯。”

下面，我要提起一件发生于1963年1月的事情；但仿佛，瓜拉尼人为耶稣会成员提供消息的那段日子与亚契嘉图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刻之间，时间不曾流逝过分毫。组成这个部落的两个群体中的一个已经沿着某条熟悉的路线在森林里行走了多日。路线沿途有着被砍倒的冻子椰

子树作为标记；几个月前，在duy pute——6、7月的霜降——让林中生活陷入沉睡之前，人们已将它们砍下。在此期间，mynda——肥大的甲虫——在中空的树干里产了卵。一截截冻子椰子树长约两三米，在地面上横斜交错，里头满是虫卵：对于这些昆虫来说，这是特意为它们而准备的，意在邀请它们前来，在树干中择处而居。如此，每当温季来临时，瓜亚基人就能收集到大量的guchu——mynda肥美的幼虫。对印第安人而言，这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夏日特供。除了尝起来味道甘甜，这些蠕动着、六到十厘米长的躯壳中包含着肥腻的黄色油脂，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分都是脂肪。“Eaah! ë gatu!啊，多甜啊！”印第安人会兴奋地将斧头斫开这些看上去像肿瘤一样的树干；它已经被贪食的幼虫吞食一空，后者以树干甘甜的髓质为食。透过幼虫在这些已经大半腐朽的树干上留下的伤口，便能看到一团木纤维中，数十只肥大的mynda幼虫居住的长廊。在动手之前，最好先把耳朵凑到树干边上：一棵枯木内部本该是个一片死寂的腔室；但这里你却听到活物在里头爬行、涌动，发出恶心的声响。它们随时都会破开这层保护性的树干，爬进你的耳咽管！于是斧头挥舞，木屑四溅，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气息扑面而来，接下来，女人们将一斤又一斤的幼虫塞进篮子里，一大团白乎乎的活物仿佛在绿色的篮子底部沸腾着。

就这样，亚契人巡查了一圈他们的“动物农场”，也可以说那是他们的“种植园”，虫卵就好像是播在树干里头的种子。他们就着收集到的guchu大快朵颐，但还有一大份被留给了营地里的同伴们。接着，他们便启程回营了。男人走在前头；他们只带了弓和箭，领先女人数百米，后者则被孩子和身上沉重的篮子拖慢了脚步。其中有一个男人叫库步拉基。他的父亲拜瓦基没敢踏上这么远的路途；他很确定，儿子会为留守白溪的自己带回大量guchu。但他的母亲查楚外米基却和他们一起上路了。她年事已高，却依然渴求年轻男人的陪伴，来向他们谋求自己的丈夫无法再提供的东西。她急于品尝meno——情爱之乐，这让拜瓦基大为光火。而且，她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但这一次，她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跟上其他女人的步伐，尽管她们走得并不快，她的篮子也没有装很多东西。她不得不拄起一根粗大的棍子：她是真的waimi——老了。

但她没有开口抱怨，毕竟抱怨也无济于事，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如果她呻吟出声，其他人甚至还会骂她：这么做并不合适，甚至不太厚道。能走就走，不行就停——在她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老妇人拖慢了整队人的脚步，她自己就是这么想的。那些对于整个群体而言已经成了累

赘的waimi的结局从来没有让她觉得困扰过。说不定很快就会轮到她了，但是眼下她必须继续向前。走在她前面的女人保持着原先的速度，但是她渐渐掉队了。尽管她努力追赶，距离却逐渐变大。Ikä mano ruwy——她的骨头已差不多坏死，身体也筋疲力尽。女人们踩折灌木枝时发出的窸窣声变得越来越微弱，很快，她就什么声响也听不到了。查楚外米基现在孤身一人，森林也已经恢复了寂静。

库步拉基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四周的地面，没有心思关注身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确，他母亲是个waimi，但他看到的她从来都能行走自如。或许她很快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到时候就会有人说：“Wata kwa iä. 她已经没法走路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显然，现在事情还没到那种地步。库步拉基已经提前接受了他母亲的结局。他知道她迟早会被杀死——一旦她没法再走路，这事就不远了。其他的亚契人会选出一个年轻男人，他会从背后接近她，然后用石斧一举砍碎她的头骨。接下来，人们会按照先人的教诲着手准备葬礼。这就是瓜亚基老妇人的命运。库步拉基知道这一切，他很爱他的母亲，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突然间，一个猎人警觉地喊道：“Veno gatu!快听！”在远处，女人们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尽管森林会盖住一切响动，但男人们训练有素的耳朵很快就辨别出了现在的情况：“Baipu! Baipu koro!美洲豹！美洲豹在吼！”他们沿原路跑回去保护女人和孩子们。后者同样听到了那个声响，却没觉得害怕，因为声音是从很后面传来的。那头野兽正在嘶吼，它的怒气越来越重。亚契人很容易就能听懂它的叫声。他们在远处，看不见它，但他们听着美洲豹讲述自己所做的一切：它已经找到了猎物，本该轻而易举就能一掌把对方打晕，但猎物躲开了它的攻击，并开始了防御——这就是为什么baipu被激怒了。然而，那巨大的吼声说明它并没有放弃，正要卷土重来。女人们在惊恐中拿手捂住了耳朵；男人们聆听着，箭在弦上，正在等待着时机。库步拉基等着美洲豹结束他母亲的性命。她目前还没有叫出声；很显然，她正挥舞着自己的拐杖，试图把野兽吓跑。所有人都一言不发，专心听着：眼下的情形让这个女人踏出了离开生者世界的第一步，只有疯子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手干涉。将死之人应当得到尊重。当mano的时刻降临到一个亚契人身上时，你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让事情自行发展，直至结束。不管怎么说，迟早得有个人负责杀死这个老妇人：baipu替亚契人免去了这桩差事；何况，没有哪个男人乐意扮演brupiare——杀人者（确切来说是祭司）——的角色。但这恰恰表明，毫无疑问，这只在良辰吉时从天而降的美洲豹并不是一头真正的美洲豹。当然了，从外表上来看，它的身份

毋庸置疑：baipu pini pute，这是只斑纹绚烂的美洲豹。但外表能说明什么呢？瓜亚基人能看穿表象，这是他们数百代先祖一代代积累下来的智慧，他们很擅长这一点。这头美洲豹其实是个亚契人，是个化身为baipu的亚契人先祖。等他们回到营地，他们有大把时间来确定它的身份，老人们会给出他们的判断。但是库步拉基已经做出了猜测：这或许是他的外祖父（他早已去世，库步拉基甚至都没见过他），他暂时离开了灵魂的栖息之所——地表上方、靠近日落之处的那片大草原。他的jamogi重新降临到了森林中，来带走自己的女儿查楚外米基。平衡将得到恢复，女儿将重新回到父亲身边，先前的分离已经结束。在高天之上没有森林，人们也不需要打猎，他们将在那儿团聚。或者，它会不会是查楚外米基的另一个儿子，死在白人手下的库尚基？他很可能因为无法忍受与母亲的分隔，而化身成美洲豹的模样。因此，他回来带走她，ai——母亲：他们注定会重聚。

叫声响起：美洲豹朝着它弱小的对手扑了过去。它的吼声变得短促了起来，仿佛是在喘息：它已经得手了。一声惊呼传来，但那不是呼救声：她已经无法言语，她已经远去了。查楚外米基死了。库步拉基和他的同伴向着白溪进发。Kranve——他现在是孤儿了。没有必要回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他能猜到，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此外，远离那个地方才是明智之举，因为除了美洲豹，Ianve现在正在那里出没。Ianve是死者凶恶的灵魂，它无法忍受孤独，想带着生者一同上路。再晚些时候，等到美洲豹与时间让他母亲的尸骨变得干干净净时，他们会吟诵死亡之歌。

两三个月后，库步拉基的弟弟宽蒂罗基正躺在tapy里瑟瑟发抖。他病了，还时不时地因为一阵阵咳嗽而浑身颤抖。我给了他感冒药，并向他保证，他明天就会好起来。“不会的，”他说道，“cho kwera iä, cho mano vera.我不会好起来了，我要死了。”“为什么？”“Ianve ikemba. Ianve已经彻底进入了我的身体。”“谁的Ianve？”“某个人。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她就是我母亲查楚外米基的‘教母’。”他不再说话，心情十分低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真的就快死了，而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寡妇，并为之悲痛万分。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的Ianve进入了宽蒂罗基的身体，好让他害病并杀死他。她想要把他变成自己在高天之上、灵魂的栖所中的丈夫。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向自己的教女查楚外米基“复仇”。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死者，他们总是试图卷土重来。Ianve很危险，它很会折磨人。几乎所有的病痛与意外都是Ianve造成的。死者很狡猾，他们对生者发动了一场无止尽的战争。Ache, rö ianve relo jwe

ii. Ianve根本不希望亚契人存活于世。死者的记忆要比生者的长得多。生者很容易就会将他们遗忘，可死者却保持警觉。母亲的死对宽蒂罗基来说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已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想要把自己的痛楚唱出来，人们在悲哀过度时往往会这么做。这种时候，只有用木弓展开一场暴力的决斗或是伴着笛声悲吟才能给人以慰藉。第二天，他准备好了自己的mimby，这是用一小段藤蔓将四根长短不一的玫瑰木绑在一起做成的。待他准备好了，我在他面前支起了录音机的话筒；很显然，他完全没有受到干扰。他的吟唱持续了很长时间，分成好几段，每一段都吟诵得很清晰。段与段之间，风笛接连不断地吹奏着那四个悲哀而令人绝望的音符。那一天很冷，天色阴霾，营地中唯一的声音是mimby演奏的音乐和这个男人的吟唱。

“我的母亲已经不在，我为此恸哭不已。我不愿走进林中。因为进入林中会使我想起我长逝的母亲，而我为之涕下。

“我回想起在那里见到的一切。我见到了母亲的骸骨，美洲豹已经把它们吞噬殆尽。我看到大块的骸骨四散，我亲见这一切，正如我亲见母亲的头骨。我对卡加瓦楚基喊道：‘我母亲的头骨在彼！击打那头骨！’他便击打那头骨。

“是了。我已是孤儿一个。已是孤儿的我，不会再进入林中。我将守在我孱弱的父亲身旁。奔跑在林中啊，至于我，我将不再前往。

“我知道，我的母亲乐于给予。一想起她带回来的guchu，我为之涕下。我将不再走进林中。

“我的母亲啊，我母查楚外米基。那些guchu她不曾享用。我清楚地知道，这么多的guchu她带回来只是为我。知晓这一切让我涕下。

“事情确是如此：我知道，我的母亲不曾享用那些guchu。她把它们尽数与人。我的母亲啊，她乐于给予。职是之故，我将不再走进林中。

“Go!不错！我知道，尽管她年事已高，我的母亲仍出门寻找guchu。我还知道，我那死去的兄弟库尚基，他带走了他的母亲。他带她到太阳近旁。在日边，在他母亲——我母亲身畔，那便是我兄弟之所在。她就在她的孩子库尚基身畔。是他将我母亲带走，前往日边。

“是了。我已是孤儿一个。我见到我母亲的头骨一次又一次被击打。是卡加瓦楚基，他击打我母亲的头骨。他用弓击打地上的头骨，将它击入土中。他用弓击打，将它深深击入土中。

“我亲见那骸骨与头骨，我母亲的头颅与骸骨零落四散；她的骸骨一次又一次为美洲豹咬碎，头骨也为它所食。我为之流泪，卡加瓦楚基则用弓击打骸骨。他用弓将它击入土中，深深击入土中。

“已是孤儿一个的我，因此不再走进林中：孤儿若是走进林中，会被美洲豹的爪牙撕成碎片。亚契人已告诫过我：‘身为孤儿的你若是走进林中，会被美洲豹撕成碎片！不要再回到林中！’我铭记心头，我也不会走进林中。我将守在我孱弱的父亲身旁。

“这支风笛是为了我长逝的母亲；这支风笛向我的母亲致哀；而身为孤儿的我，哪儿也不去。

“这支风笛便是不再进入林中之人。至于我，我很清楚，我的母亲已为kajarete——大野猫——所食。我亲见卡加瓦楚基用弓奋力击打那骸骨；我亲见他用弓将它深深埋入土中。

“我已是真正的孤儿一个，我将不再走进林中。即便我因饥寒走进林中，我仍将泪流。我孱弱的父亲这儿木薯遍地，大片的wyrā-ia，我们称之为‘木之果’。”

就这样，此后宽蒂罗基日复一日地用近乎相同的词句诵读着哀祷文，它被称作ai ikō iā bu，“母亲已逝”。或许他的吟诵瓦解了Iāve的小动作——Iāve想要杀死他，查楚外米基的儿子，从而向后者“复仇”。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宽蒂罗基从感冒中活了下来。他的痊愈并没有对他本人或是他的妻子产生困扰，尽管他俩前一天还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马上就要死了。在我和他们待在一块儿的那段日子里，我曾有很多机会观察印第安人思维的微妙之处，以及其中耐人寻味的反转——他们的思维模式造成了这些反转。

洛萨诺知道Ka'aygua游牧者偶尔会遭受美洲豹的袭击，而查楚外米基令人悲叹的命运则是个有用的提醒，它让我注意到，这种动物对任何在森林里不小心撞上它的人（即便是像它一样的猎人）来说，都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此外，还有更精确的细节让我确凿无疑地相信，Ka'aygua人就是瓜亚基人：“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的身体畸形很不同寻常：几乎所有人的鼻子都是如此之塌，它们看上去更像猴鼻而非人鼻；有些人驼背，脖子极短，甚至无法与肩膀相区分；还有些人，他们肉体上的畸形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灵魂上的残缺。”这种理论非常有基督教特点，甚至带有某种斯宾诺莎主义的色彩，因为在斯宾诺莎看来，灵魂就是肉身的“理念”（l'idée），反过来说，一具畸形的肉体也只可能承载

邪恶的灵魂。很明显，洛萨诺从没见过任何瓜亚基人。我带回来的照片可以证明他们中没有哪个人是畸形的；显然，瓜拉尼人也不曾向耶稣教传教士说过类似的话。与之相比，书中提到的瓜亚基人的短脖子更接近事实一些。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脖子里头缺了几块颈椎骨——他们一块不少。但的确，与其他印第安人相比，瓜亚基人看上去不怎么赏心悦目。不过首先，确切来说，这一特征只有男性才有，女性则有着非常优雅的脖颈。接下来需要解释的是，这一特征其实是因为瓜亚基男性肌肉高度发达，他们的颈部与肩膀宽阔结实，因此，与其说他们脖子短，不如说他们有牛一样的脖子。瓜亚基人的体能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他们弓的尺寸与拉力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考虑到这些弓的携带者身材矮小，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惊人了。男性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五八，因此，他们的身高看上去和他们身体的宽度差不多。我偶尔会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打闹着玩，从小小的对手身上，我已经能够感受到成年男子的力量中蕴含的那种坚韧与密度。因此，如果我的观察无误的话，洛萨诺的结论便是错误的：瓜亚基人的脖子并没有任何畸形之处。

我一到白溪，某些印第安人鼻子的形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中的某些人（绝非所有人）的鼻子看起来像是没有骨头，或者说，里头的骨头是那么小，以至于它并不能支撑起整个鼻子。因此，他们的鼻子看起来是扁平的，甚至塌陷在脸里面，几乎完全没有隆起的样子，鼻孔也没有以近乎不可见的角度俯临着上嘴唇，相反，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嘴唇的延伸，因此，当你观察他们时，你会看到一个微小的附肢底下有两个巨大的孔洞。这当然会引起注意并导致人们对他们的面部特征评头论足，因为这种相貌确实有点像猴子，即便他们的面部表情完全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皮楚基（我围观了这个亚契女人的分娩过程）的长相就可以为证。我相信，恰恰是与分娩相伴的仪式帮我理解了洛萨诺精确描述的这种“异相”的根源之所在。大家或许记得，新生儿从母亲的子宫“降落”后就会接受沐浴与全身按摩，piy。而脑袋则会享有特殊服务：这便是所谓的tö papy，“让脑袋变圆”，理论上这能够赋予婴儿的脑袋以球体的形状，也是公认最漂亮的形状。然而有些时候，为新生儿沐浴按摩的jware粗糙的双手会在kromi脆弱的骨头上按压得太重，于是婴儿的鼻子就会隐约像猴鼻一样，塌陷下去，然后怎么说呢，冲天翘起。当然了，这种事不是每次都会发生，显然，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印第安人的长相符合洛萨诺的描述。然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部落中见到过这种特殊的体征，这强有力地让我相信，历史学家笔下的Ka'aygua就是我见到的瓜亚基人。

但我还有更多证据。在为这群畸形的怪物描绘出了一幅毫不加粉饰的肖像之后，洛萨诺继续写道：“然而，他们的肤色通常是白色，这与其他印第安人暗沉的肤色非常不同，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住在阳光炙烤不到的地方；如果被迫住到森林外头，他们很快就会丧失生机，就如鱼离开水。”把瓜亚基人比作离了水就不能活的鱼是有几分事实依据的。瓜亚基人是彻头彻尾的ka'aygua，也即“森林里的人”，森林中人。他们没法在其他地方生活，他们害怕开阔的地方，对平原避之不及。死者的家园不就是一个邪恶的所在，一片prana wachu，一片大草原吗？不错，只有在kaa——森林厚厚的荫蔽之下，瓜亚基人才能感到身心舒坦。他们甚至不知道在空地光秃秃的草皮上究竟该如何行走。我曾多次目睹他们在走路时别扭地摇晃着屁股，小心翼翼地以内八的姿势抬起脚，就好像他们周围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又好似前面横亘着一根需要跨过的树干，或是一条需要绕过的藤蔓。从孩提时代起，他们的日常习惯、身体动作、骨头、神经和肌肉中就已经刻上了森林的烙印，亚契人永远都忘不掉森林。若是被扔进草原，他们穿行其中的样子就好像有凭空想象出来的树木挡了道——如果我们继续拿动物打比方的话，他们看上去突然就像鸭子一样。洛萨诺说得不错，如果他们在prana上连行走都这么艰难的话，Ka'aygua人又怎么可能在家园之外的地方生存下来呢？“Go. Acherö pranare.没错，亚契人最早是从草原来的。”他们的起源神话这样说道。然而，“Kaari rö ure etoa.森林才是我们的家园。”——这便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给出的答案。亚契人是森林中人，ka'aygua。

此外，耶稣会传教士提到的肤色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这暗示着白人存在于美洲，暗示着新世界中有着并非来自西方的白人元素。此外，它还让编年史中“Caaigua人”的身份之谜涣然冰释：就像其他词语一样，它指的也是亚契人。瓜亚基人的存在使某个关于征服美洲大陆的神话得到了解释，同时，也给予了这个神话以事实依据：他们是白种土著。但我们必须更确切地指出，他们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白种土著。我们知道，这片大陆上的土著民族呈现出了许多种类的外貌特征，但是他们共享着某些反复出现的特点，这使得他们被清楚地划分为美洲印第安人，并被归类为蒙古人种。这些特征包括：高耸的大颧骨；脸裂（所谓的“亚洲人”面相）；杂乱的黑色头发，且很少脱发；稀疏的体毛和甚至更为稀疏的面部毛发；最后便是他们古铜色的皮肤，其深浅会根据所在地区和部落有所变化。举例来说，瓜拉尼人的肤色就要浅于大厦谷中的印第安人。从南美洲最早的探险活动开始，旅人、士兵和传教士带回来的故事和报告中就提到过白种野蛮人。其他的印第安人也会提及他们，

在那些描述中，他们不是极度胆小，就是极度凶残。但是这些情报相当可疑，尤其是因为人们都对广袤的森林中的居民知之甚少。实话说，没有哪个人曾目睹过白种印第安人，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类的报告都被无视了。这也很正常，因为没有任何直接的目击情报能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但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对事实置若罔闻；洛萨诺的情报也并非出自他的臆想：17世纪的Ka'aygua人很可能是白种人，因为现代亚契人就是白种人！

并非所有瓜亚基人都有着同样的外貌特征。下面这个事实使得他们带来的人类学难题进一步复杂化了：部落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肤色深浅不一，最深的呈印第安人最典型的古铜色（尽管不那么明显），浅的则呈白色——不是欧洲人那种泛着粉红的白色，而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白色，泛了点灰，用种不太正确的说法，这让人觉得此人身体不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一大堆各不相同的颜色，让人很难确定究竟是更偏古铜还是偏白一些。自然了，他们的眼睛和颧骨是蒙古人种的样子。因此，这些白皮肤的“亚洲人”让我觉得很神奇。此外，瓜亚基人把自己分成了pire iju，“白皮肤的”，和pire pirä，“红皮肤的”，尽管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高下之分。有些时候，有的婴儿生来就有很深的肤色——pire braa，“黑皮肤”。这种不寻常的肤色让人们很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由某种逡巡在暗夜中的邪恶生物导致的——黑皮肤让它们能够融入黑暗中。因此，这个新生儿必须被杀死，他的奶奶会负责勒死他。

奇怪的是，这些苍白的脸上却有着一些不该出现的特征（至少男人如此）：尽管印第安人通常并不蓄须，他们却会留胡子。一旦长大成人，如果某些瓜亚基人的胡子变得很浓密的话，他们甚至会以自己的面部特征为名。打个比方，查楚卜塔瓦楚基刚出生时被赐予的名字是Chachu——“大野猪”；现在，年近四十的他却被称作“长着大胡子的大野猪”，因为又多又长的胡子已经侵占了他的脸庞。所有印第安人都怀有同一种忧虑：他们需要在自然世界中时时巩固并保护自己的“人性”，保护自己不被大自然的野性所吞噬。大自然则始终在窥视着人类，想将他们重新纳入自己的怀抱。因此，不论是在伦理学层面上还是美学层面上，努力把自己与动物相区分都意味着尊严和体面。至少，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凸显这些区别。动物长满毛发；人类则不然，某些部位除外：腋窝、私处、眉毛、眼睫，以及某些年长男性下巴尖端几撮稀稀拉拉的毛发。但即便就是这么一丁点毛发，也必须被拔除、被消灭，以避免人类和动物的躯体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混淆。他们需要像苦行僧一样对自己的身体施加暴力，他们的身体必须携带文化的标识，以证明他们已经永

远离开了自然：他们必须拔掉自己的毛发。这并不是什么小事：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论男女，甚至小孩都会定期加诸自身的折磨。为此他们使用了诸多技巧，最常见的方法是用柔韧的小树枝做成的镊子拔毛，这会让皮肤和眼皮变得又红又痒。人们之所以必须遭这样的罪，不光是出于爱美之心，同样是为了确保他们的面容能明确体现人类的身份——不过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任何东西，若是会让人不快地想起动物那蠢笨丑陋的模样，都会被拔除。

瓜亚基人则对拔体毛这种事情没什么执念，因为光是他们的胡须就够人忙活的了。Buta jupi的意思是“刮胡子”，就好像他们称“打磨弓箭”为rapa jupi一样。他们自己动手刮胡子，但更多时候，女人会为自己的丈夫刮胡子。她们会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一块小竹片，拿它小幅度地反复刮擦皮肤。礼尚往来，男人也会用同一种工具为女人剪头发。我们到白溪之后给印第安人分发了小镜子，从此，他们就不再这样互帮互助了。他们从没见过镜子，并立马将之称为chaä，“眼睛”，就好像他们把我的眼镜称作chaä beta，眼睛的tembeta一样。若是用柏拉图的囚徒在离开洞穴之后第一次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时的那份惊讶，来形容他们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相貌时的反应，这个比喻的力道未免太弱了些——更准确来说，他们为之如痴如醉。他们会对着自己一次性看上整整半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尤其是男人），一会儿把镜子拿到离自己一臂长的位置，一会儿又把它凑到鼻子底下。他们呆若木鸡地盯着这张属于自己，却从没见过过的脸，但当他们试图用指尖触碰它时，能够感觉到的却只有chaä冰冷坚硬的表面。有些时候，他们会把镜子翻过来，看看背后是什么。亚契人在面对chaä时表现出了极度的兴奋，所有人都想要拥有一面。这种热情甚至让印第安人做出了某种反常的举动——囤东西。事实上，不少女人甚至囤了五六面镜子，她们把它们揣在篮子里，时不时就拿出来摆弄一番。后来，我又把照片拿给瓜亚基人看。他们几乎从来都认不出他们的朋友，甚至他们自己。相反，孩子们却十分敏锐，很快就学会了辨认人脸。有一天，三四个印第安人正在看一份我随手丢在屋里的法国报纸；他们边低声交谈边拿手指着照片里的人脸。我听了一会儿，发现他们正在认人：“这是谁？”“是查楚亚内基。”他们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手上正指着一个乐呵呵的圆脸白人，他戴着一顶大帽子，还打着领带：那是赫鲁晓夫。我兴之所至，就找了个人问他是否认得出《忧郁的热带》封面上那个南比克瓦拉（Nambikwara）青年。仔细端详后，他大声叫道，“Teeh!”接着他咧开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这显然说明他不可能出错——就好像我本打算

问他个措手不及的——然后说道：“Go rō cho!是我呀！”

洛萨诺对Ka'aygua人的描述是真实的，他的叙述同样能印证巴拉圭人关于白皮肤、蓝眼睛的瓜亚基人的传说。最后这个关于蓝眼睛的细节有点太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肤色说明，Ka'aygua人和瓜亚基人属于同一个群体，并且与其他印第安人分属不同的人种。洛萨诺笔下的Ka'aygua人住在巴拉那河彼岸这一事实不过说明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比瓜拉尼人历史更悠久的群体占有的领地要远比现代瓜亚基人的领地更广阔。Ka'aygua人文化倒退的时间显然比亚契人更久，他们在美洲被征服的时候就已经彻底过起了游牧生活：“他们十分不擅长未雨绸缪，甚至都不能确保自己的食物供给，”我们的历史学家写道，“他们果腹的唯一手段，就是捕鱼和打猎——如果他们刚好在河中、森林中碰上了什么东西的话；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靠虫蛇鼠蚁和其他害虫填饱肚子，这些东西可以轻易找到……森林中的蜂蜜是他们最爱的美食，蜂蜜酒则是他们的琼浆玉液，后者能让他们保持温暖，以抵御冬季的严寒。”另一边，在涉及瓜亚基人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尽管他们在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蜂蜜、水果和动物来填饱肚子，但他们也会种玉米；不过，玉米的收成却不会很好，因为他们更喜欢趁着玉米尚软、还未成熟之时吃掉它……”因此，在Ka'aygua人已经丧失了农业技能时，亚契人却依然知道怎么种玉米。但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经历了更严重的文化倒退，并且永远放弃了玉米种植——事情变得太难以预料了，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频繁地逃离自己的园地，将没来得及收获的玉米留给鸟雀和啮齿动物。此后提到他们的所有说法都把他们描述成纯粹的游牧民族。而当我和瓜亚基人谈起人为种植的植物时（他们从没有停止过食用人为种植的植物，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都在从瓜拉尼人和后来的巴拉圭人那里偷木薯和玉米吃），他们的语言中似乎没有用于表示“种植”的词汇，他们对先人的农业活动也毫无印象：“Beeru rō wyraia wate rekopa; ure Ache reko iä.白人才是拥有木薯和玉米的人，我们亚契人什么都没有。”他们说这话并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意思。自打时间之初，万事万物在土著和白人、穷人和富人之间被分配好的那一刻起，世事便一直如此。瓜拉尼人也是这么想的；命运把狮子才能享有的份额分给了白人，但是印第安人必须守住落到他们手中的那一份，他们不能将它拱手交给白人。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姆比亚人（也就是亚契人口中的“Machitara”）顽固地抵抗着对基督教的皈依。现在，白人，还有Juru'a（“那些长着血盆大口的人”）的恶习和疾病正在毁坏他们的健康和孩子们；现在他们或许能够相信，自己真的已经被神灵遗弃；但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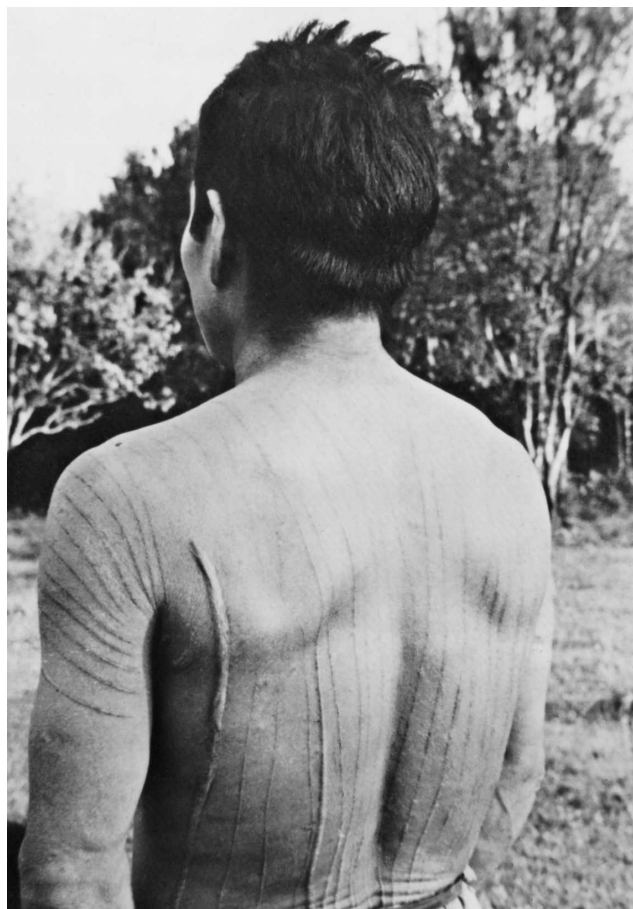
便在这时，他们依然抵抗着。为了替自己的偏执愚蠢找个出口，很多粗鲁、野蛮、没教养的人往往都成了传教士（通常传教士都是美国清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就在几年前，他们中的一人叨扰上了姆比亚人的酋长维拉（Vera，“闪电”）。这个印第安人穿着发臭的破衫烂袍，在沉思中抽着烟，坐在他的小屋前，听着Juru'a颇具教育意义的跑火车——后者正对他大谈上帝和救赎。这些无稽之谈让维拉感到疲倦，于是他站起身来，消失在了自己的tapy中；等他再出来时，却变了个模样：这个几分钟前还一身落魄的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神，一个karai ru ete。他扔掉了白人的破衫烂袍，头上戴一顶jeguaka——这个棉质的头饰是男人在仪式性场合的装饰品，顶上有一圈五彩缤纷的羽毛，还有流苏垂到他赤裸的背上。他唯一的衣物是一条同样是棉质的遮羞布，手中则是一根打磨得很精致的硬木杖——ywyra'i，这是他领袖权的象征。一圈光轮以雷霆万钧之势环绕着这位酋长，这位mburuvicha——他对诸神的坚定信仰造就了他的伟大。接下来，目瞪口呆的传教士听到了“闪电”雷鸣般的声音：“听好了，Juru'a！你们白人已经被赐予了大草原和丰饶的物资。而留给我们姆比亚人的只剩森林和少量的东西。就让我们维持现状。让白人的归白人。我们姆比亚人不会去你们的家园打扰你们。我们是Ka'aygua，林中人。离开我的房子，走开，永远不要回来！”

我非常享受居弗库基的陪伴。他是酋长，对部落的传统知识了如指掌，并且在智识问题上谨慎而诚恳：因此，他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极优秀的情报提供者。他若是不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就会向另一位印第安人求证。出于上述原因，当他不需去林中打猎时，我会在他那儿待上数个小时。有天下午，我正心不在焉地听着他和他妻子毫无新意的对话。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变得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发现他们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吹口哨！让我尽可能凭我的理解对这件事情的本质做个解释。我并不认为这种沟通方式像手语一样和普通语言有所不同。或者说，我不认为自己听到的，是种与发音清晰的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口哨语言——那种所谓的口哨语言，其音调、音高和抑扬变化都传达了某种意义，只有熟悉这种语言的人才能捕捉到；这样的语言很可能存在，尤其是因为在其他民族中已经发现了类似的表达方式。但是就眼下的情况而言，我相信这仍是一种普通语言，只不过经历了某种变形。在聆听这段令人惊异的对话的过程中（可惜我没能有幸把它录下来），我听到了什么呢？大部分声音是tss，dzz，djj一类的口哨声，被突然的喉塞音打断的爆破音，紧接着是长长的重浊呼气声，最后

以单纯的呼气收束。当然了，我什么都没能破解。然而，这就是正常的瓜亚基语，是我能部分听懂的语言，只不过被精简成了以口哨形式吹出来的辅音结构，外加被削弱为呼气声的元音。简单来说，这就是任何人用这种语言窃窃私语时的样子，只不过在这里，它被浓缩成了最基本的、可捕捉的形式。他们发出来的声音种类之贫乏似乎完全没有妨碍到居弗库基和他妻子之间热烈的讨论，他们看起来很是开心，面庞时不时因强忍着笑意而颤抖。此外我还注意到，有些时候我只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他们在阅读对方的唇语，而不是在听口哨声。正是这一点让我相信，这种说话方式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口哨语言。为什么瓜亚基人会发明这样一种沟通方式？我只能对其原因加以推测：这种通过扭曲变形来操控语言的方式，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近乎无声，这使它介于声音和手势之间。根据我的想象，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危，亚契人试图尽量不要被敌人听到半点风吹草动——敌人包括死者的幽灵，但更有可能是Machitara和Beeru。但是这种推测毕竟过于务实了些，也许我们应该转而从下面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寻找线索：蜂蜜之神加卡伦迪（Jakarendy）从不说话，而是通过吹口哨引来人类，并用自己的弓和蕨叶做的箭向他们发起进攻。不管怎么说，我基本可以确定，那一天，为了让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居弗库基和他的妻子没有用正常的方式说话，而是选择了“吹口哨”。他们也确实成功地让我如坠五里雾中。

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一切太过留心。直到我回到法国，重读了洛萨诺的书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小插曲是多么耐人寻味。事实上，洛萨诺在写到Ka'aygua时这样说道：“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你很难学会，这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时候，他们更像是在吹口哨；或者说，他们从喉咙深处发出窃窃私语，却没形成任何词语。”我再一次叹服于瓜拉尼人向传教士提供的情报之准确，以及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记录时体现的忠实。面对瓜亚基人时，我得以想象自己重回几个世纪以前，回到美洲大陆尚未被发现的年代。

- (1) 鲁伊斯-德-蒙托亚（Ruiz de Montoya，1585—1652），在巴拉圭传教的耶稣会修士。
- (2) 耶稣会集合化传教村，或耶稣会复制村（réduction，意为拷贝），是17、18世纪耶稣会在南美洲为当地土著建造的一种居民村落。
- (3) 洛萨诺神父（Père Lozano，1697—1752），西班牙民族志学者、作家、耶稣会传教士。



成人礼：疤痕文身



年轻的查楚基的成人礼

第四章 成年人

“所谓的成年人并不存在”，近来有人这样写道。在我们那把自己作为成人的象征来标榜，并以此自居的文明中，这样的评价未免有些矛盾。但正因如此，至少在我们的世界中，这句话很可能是对的。需要补充的是，任何对欧洲人来说能够成立的东西，一旦出了欧洲，就将不再适用。我们自己很可能永远都不会长大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处成年人同样不存在。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清晰可辨的疆界究竟何在？要沿途走到哪里，才算是触及了我们的疆域的边界，不同的事物才会开始存在，新的意义才会开始诞生？这并不是一个空洞刻板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将答案定位到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上。的确，当那个答案因机缘巧合而出现时，在那个当下，并没有人思考它所回应的究竟是什么样一个问题：那是15世纪末，伴随着新世界的发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整个西方一起发现了那些生活在别处的人——美洲野蛮人。事实上，正是在这些岛屿上，在蒙特祖马（Moctezuma）统治的墨西哥，或是在巴西海滨，白人第一次跨越了他们世界的绝对边界，很快，他们就把这条边界看作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界线。与非洲的住民相比——他们在某些微妙的意义上与旧日的欧洲世界更为接近——印第安人代表了对西方而言彻彻底底的他者。他们间的差异历历可见，而西方人在消灭异类时绝不心慈手软。日后，这些红皮肤的人将与剩下的那些真正的野蛮人共享这一令人悲哀的殊荣：爱斯基摩人，布须曼人⁽¹⁾，澳大利亚人……这些暂居者寄身的世界已不再属于他们。显然，现在来衡量这次相遇的主要意义或许还为时过早。对印第安人而言，这次相遇是致命的；但或许，出于某些奇妙的因缘际会，它很可能同样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说，现有形态下的我们世界的历史的终结。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发问：是否，“所谓的成年人”在印第安人中同样也“不存在”？

不管怎么说，尽管巴拉圭人掳去了那么多小孩，在白溪，孩子的数量相对来说依然不算太少：在亚契嘉图人中有十二人，在陌生人中有二十人，大多在五到十二岁之间。然而，新生儿以及幼儿人数之少恰恰证明了过去几年中亚契人面临的困境。如果人们每天都因为白人杀手的存在而疲于奔命，他们又如何能将一个kromi好好抚养成人呢？女人们则时刻对孩子的需求保持警觉，一旦小东西发出第一声啼哭——婴儿总是

睡在悬挂在他母亲身旁的背带中，就像睡在一个迷你吊床上——她就会将一小块美味的零食塞进他张大的嘴巴中，好让他闭嘴。然而，当女人们时刻因为害怕白人夺走自己的孩子而身心俱疲时，她们又如何能在为婴儿沐浴时，释放出孩子所需的无限柔情呢？当Beeru和他们的狗靠近时，女人们是这般惊惶，她们会在几秒钟内崩溃，然后一头扎进森林中，将睡在身边垫子上的kromi忘得一干二净。亚契人至今还记得某个女人的死状：她独自一人背着一个三岁的男孩出门，却不走运地碰上了一队Beeru。他们对她穷追不舍，她本可以甩掉他们，因为她远比其他更擅长在林中穿梭。然而，她却不得不穿过一片空地。她埋头向前跑，就在快要抵达空地的另一侧时，她觉察到背上的孩子震了一下，同时听到了巨大一声枪响。冲击波推得她向前，孩子被甩到了地上。她转过身来，只见子弹几乎将孩子劈作两半。但她没什么时间哀悼：第二颗子弹出了膛，让她和自己的儿子在死者居住的prana wachu中团聚。一个高乔人（gaucho）告诉我，就在几年前，他在找寻走失的牛群时曾碰上一个女人正在采摘浆果。她并没有听到他靠近的声音，因为他的马踏在厚厚的草丛上。他立马掏出皮制的套索绑走了她，并一路把自己的俘虏拖在身后，回到了牧场。女人表现出来的镇定令人惊异。她说了很多话，做了一大堆手势；没人听懂了。她指指自己沉甸甸的乳房，并做出了喂奶的动作：她解释说，自己的孩子留在了营地，必须得有人给他喂奶，因此他们应该放她走。这出哑剧让人们觉得很有趣，他们也震惊于看到一个瓜亚基女人竟表达出了和自己妻子一样的情感。然而，为了让她给他们干活，他们没放她走；几个星期的囚禁之后，她终于想办法逃了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白溪，小孩子的数量很少：这对女人来说太过困难了。她们会丧失勇气，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发现自己怀孕后，会要求丈夫为自己进行ykwa——流产。男人鲜少拒绝为妻子提供这一服务。他会使出浑身力气用自己的拳头挤压她的小腹；有时他会两膝并用，跪在她身上；还有些时候，他会用一块沉重的木头。煎熬中的病人会在重压之下蜷起身子，但这份痛楚并不会让她中止这一计划。还有些女人则更乐意等到孩子出生后动手：孩子一落地，她们就会立马杀掉婴儿，或是重击他的脖子，或是把他勒死。这些手段之高效绝非印第安人冷酷无情的象征；恰恰相反，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但他们别无选择。是白人让他们陷入了这般境地：他们偷走kromi后犹不满足，甚至还逼得印第安人放弃了生育。这些手段直到不久前还十分常见，但这并不是由外部的暴力导致的，印第安人完全是自愿如此，以避免日后的困境。如果一个女

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某个情人的孩子，可又不打算和对方结婚，她就会在母亲的帮助下进行流产。此外，如果一个已婚妇女诞下了两个年龄过分相近的婴儿，她会将第二个孩子杀死，因为这个母亲将无力同时喂养两个kromi：毕竟，瓜亚基孩子到差不多三岁前一直都是母乳哺育。另外，如果自己的女儿在第一个孩子的哺乳期再次怀孕的话，孩子的外祖母会非常沮丧。她会尖声骂道，“Nve bruaa wachu ma jove! embogi mano vera!你肚子又大了！还在喝奶的孩子会死的！”这些其实是明智的处理方式，它们保障了群体的人口平衡，确保夫妻之间关系和谐，并保护了孩子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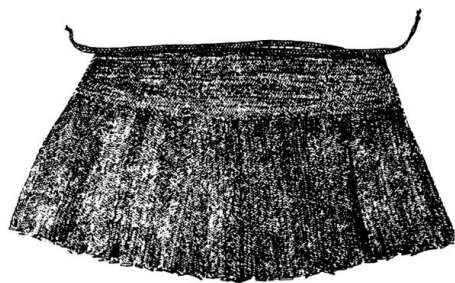
最初的几个星期，我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大多数时间，特别是和一群七到十二岁的孩子（kybuchu）。这群孩子约十人左右，他们的年龄让他们多少独立于自己的父母与整个成年人群体之外。除了Iröiangi在一定程度上不信任我之外，成年人对我并没有太多疑心。但他们很快就会对和我的交流感到厌烦，因为多数时间我聊的话题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你的父亲是谁，你母亲的姐妹是谁，你母亲的兄弟是谁，诸如此类。有些时候，我想要了解的人已经死去，印第安人就会很不乐意谈起他们：“你母亲是谁？”“她死了。”他们对另一些问题的回答则更令我感到困惑：“你们怎么称呼自己母亲的兄弟？”“我母亲没有兄弟。”但是他们知道tuty（舅舅）一词。总的来说，印第安人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超过一刻钟时间。一旦过了这个点，他们就会开始大打哈欠，不停地回答“kwa iä”（我不知道），我便知道对话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我在他们面前堆满糖果作为礼物——他们喜欢糖果是因为它与蜂蜜相似——却毫无效果。好几次我甚至没能阻止情报员因为极度无聊而在我脚边睡过去。在问询时分发糖果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但有一回，这些糖果导致了一次有趣的误会。加夸楚基已经是个老妇人了，虽说她的丈夫不过三十来岁。但显然，岁月并没有冲淡她对自己丈夫注意力的渴求，因为某天，她听说自己的丈夫与某个年轻女人有染，便在盛怒之下卷起铺盖、装满篮子，到另一个营地投奔自己的儿子去了。有一次，我正在和加夸楚基交谈，并注意到她的注意力开始一点一点涣散。似乎，比起我那些细枝末节的、涉及一些她压根记不清的祖先的问题，她对营地里的动静更感兴趣。我便照常问道：“你想要颗糖吗？”提问时，我用的是西班牙语单词“caramelo”，亚契人把它变成了“kramero”。比起瓜亚基语中代表甜食的“eë”一词（意为“甜的东西”），他们更乐意用这个词。“Kramero？”我面带饱含感染力的微笑问道。然而，加夸楚基的耳朵并不好使，她没听懂我在问什么，因为她惊掉了下巴，目光中也带上

了不可思议：“Meno? Meno nde jwe? 做爱？你想要做爱？”她把 kramero 听成了 meno，意思是做爱。她还以为我也对我俩的对话产生了厌烦，正暗示我们去哪个树荫下找点乐子，把她的丈夫忘到脑后呢。这个误会自然是解开了，不过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加夸楚基都会拿一副迷离的眼神打量我。

总之，最开始我浪费了不少时间在印第安人没兴趣回答时穷追不舍——这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浪费时间。男人开始想他们的弓箭、打猎和蜂蜜，而女人则开始想她们的帐篷或是孩子，总之就是开始想日常生活的事。（几个月后，我的朋友加古基向我坦白：“我一看到你过来，cho myryrö jwe，就想要逃跑。”）因此，为了完成我第一阶段的任务——精通他们的语言，我决定与所有亚契人中唯一有闲情逸致教我语言的人做朋友：孩子们，kybuchu。这个计划大获成功，也并没有让我大出血（我不过用了几公斤糖果，十几把小刀，还有些小花招）：我身边几乎总是能找到一群老师。尽管他们有些时候很吵，又总是很快就开始对自己的学生瞎起哄（他们热衷于偷学生的靴子），但在我看来，他们总是有无止尽的耐心和善意。他们远比自己的父母要现实，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瓜亚基语水平其实相当有限，他们知道必须像对待一个白痴一样向我解释个不停，他们也知道归根结底，我就是我：一个愿意拿出大把 kramero 来换很少一点东西的 Beeru。多亏了他们，我的词汇量和对句法的理解与日俱增。不过，这当中难免会出些错。有一天，我走在一个男孩身旁，我的手指向了在我们身前的地面上移动着的影子。他说：“kapi。”我信心满满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单词。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轻的情报员告诉我的，其实是影子下面草的名字。大多数的 kybuchu（这指的大约是七到十五岁的男孩）都有自己的弓和箭。这份礼物有时来自他们的父亲，有时来自 jware，甚至还可能来自非亲非故的人：比如，有一个陌生人就曾经把自己的弓送给居弗库基的儿子。这个年纪的男孩已经受过很好的训练，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他们不用离开营地太远，就能够独自在森林里花数小时跟踪与自己的弓箭磅数相适的猎物——这力量可不能等闲视之。不时可以见到男孩子回到他母亲的帐篷中，看似漫不经心地把一两只鸟扔到她面前，像一个真正的猎人那样言简意赅地说：“Kybwyrä cho eru. 我打到的鸟。”大人的祝贺也同样简短，但很被猎人所看重。对 kybuchu 来说，打猎还只是一种游戏，但是他们与长辈一样对此充满热情。Iröiangi 的部落抵达白溪的那天，男孩子们看到空地中央的小池塘里，游着几只巴拉圭人养的家鸭。他们还以为难得天降鸿运，有野禽到来，立马便忘了自己正在试图进入白人的

世界，围住池塘，向鸭子射出一场箭雨。

在三岁之前，孩子从来不会离开母亲的身边。这里的“从来”是严格的字面意思：他们几乎一秒都不曾离开自己的母亲。在会走路之前，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背带中，或是跨坐在母亲的髌关节上。母亲往往把孩子随手带在身边，哪怕她只是去汲水或拾柴。可以说，在婴幼儿时期孩子和母亲像是粘在一块般，不分昼夜地待在一起，静静地，因为kromi很少有机会开口哭泣。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印第安父亲很幸运：他们的睡眠不会被震耳欲聋的号哭打断。此外，在孩子能够下地之前，做父亲的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角色要扮演。如果孩子是个女孩则尤其如此，而瓜亚基人总是更想要男孩些。成为父亲同时还会影响到男人作为丈夫的身份，因为理论上来说，只要孩子还没断奶，夫妻俩就不能行房。这一禁令当然是为了防止孩子的出生间隔太短，而多数时间人们都遵守了这一禁令。不过事情也有例外，那些时不时需要丈夫帮自己堕胎的妇女就是明证。因此，同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孩子之间永远有着至少两岁的年龄差。除了母乳，kromi的饮食中也包括了大人的食物：某些已经去核的水果橙色的果肉；还有幼虫，人们会把它的汁水挤到小嘴里（幼虫的块头若是太大了，人们就会用指甲掐去它们甲壳质的头部）。当婴儿开始长乳牙时，人们会给他拿一小块肉试试牙。婴儿会坐在dave——一块用棕榈叶编成的漂亮垫子上，吮咬那块肉，把它丢到地上再捡起来。很快上面就沾满了灰尘、小树枝和树皮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随孩子玩去；大人们最多不过是在这块形状不明的食物沾上了太多垃圾时，抖它两下罢了。做母亲的就坐在一旁，织着一个篮子、一个用羽毛做成的盒子，或是一块tyru——用植物纤维制成的布料。这某种意义上便算是针织了，因为瓜亚基人并不会织布。人们拿tyru当小毯子，冬日围在肩头的披肩，或是将它盖在篮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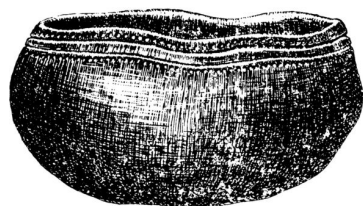


dave：冻椰子叶编成的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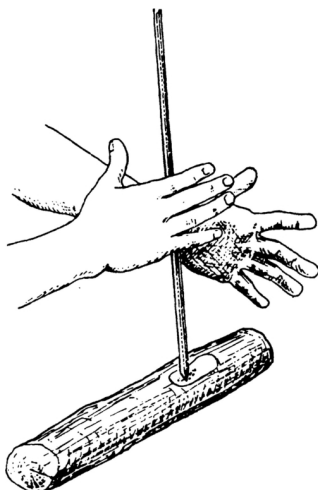


koto：用来吸收液体的刷子

还有做饭。有些肉用烤的，还有些则用煮的。通常来说，西貒、狍子，还有一些大型动物都是先用火烧（flambés）之后拿竹刀切开；接下来肉块被串在火堆上方斜插的杆子上，支上一根分叉的木棍，就这么让它慢慢烤着。油脂流了下来，在余烬上发出滋滋声。对亚契人来说，如果打猎所得的动物有足够多的油脂，就是好东西；若是不然，他们便会很失望。为了不浪费这上好的佳肴，人们会用一根棕榈木来吸收这些油脂滴。这种棕榈木一侧的纤维分了岔：这就是koto，人们会把这种刷子浸入液体中（比如油或蜂蜜），然后吮吸它。其他的猎物都是煮着吃，比如kraja，吼猴。瓜亚基人物质文化的奇怪特征在于，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却会制作陶器。女人制作很简陋的陶器，有时用手指印加以装饰。烤肉时用的正是这些器皿——kara；此外还有些食物也是用这些器具烤的，比如某些棕榈树的顶芽，我们欧洲人的食谱把这种开胃小菜称作棕榈芯（palmito）。若是生吃，它有一种很甜美的味道；作为熟食时，人们会把它和幼虫炖成一锅汤。冻子椰子树还能产某种面粉。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人们必须凿开树干，取出大量纤维，然后一把一把将它浸入水中，再挤干水。在洗完纤维之后，木纤维中充斥的“面粉”的白色粉末就这么被留在了碗里。等到这些“冻子椰子果肉”全部清洗完毕，人们会把发白的水全部蒸干，直到只剩某种厚厚的面团。这就是煮熟的面粉，里头加上幼虫或蜂蜜就可以做成bruee。面团不用太久就冷却了下来，人们会围着kara坐成一圈，每个人用指尖捏一小团“面糊”，再吞下去。想要喝东西解渴的话，边上会有一个daity或是一根粗大的竹竿，里头都盛满了水。一团团的纤维堆成一堆，很快就阴干了；它用途很多，包括擦屁股。小孩子一旦觉察到自己下头有了便意，就会停止把玩犀鸟的巨喙，四肢着地，屁股撅在半空，大喊：“Aigiao, puchi!妈，我拉了！”



kara：陶器，上面的装饰图案由蜗牛壳尖端画成



取火

亚契人的一天开始得很早，甚至早在第一缕晨光出现在天边之前。如果附近没有Beeru的踪影，又有着充足的猎物的话，他们会在同一个营地待上好几天。等到动物变得稀少起来，他们就会离开。亚契人排成一行行进，男人在前，女人在后。女人会随身带一根冒烟的木棍，这让她们能够在停下来时轻易地生火，从而让男人免于用kyrypi tata的办法生火的艰巨任务——每当天雨木湿之时这一任务就尤为艰难。这种摩擦生火的技巧要求他们在干木板上像钻孔机的钻头一样搓转箭杆，最终，木屑在摩擦下被点燃，冒出一缕烟；接下来他们会把一撮干苔藓扔到上头，吹火，火终于燃起。这一举动十分严肃、近乎神圣，不能有人说说话，更不可以笑，不然火就没法被点燃；而当男人在手掌间搓动芦苇秆时，女人甚至无权在旁围观。他们不会走上太长时间：几个小时，很少超过三四个钟头。他们会在顺风顺水的地方停下来——某个树木不是太高的地方，因为高大的树木会引来Chono，雷电；也不会停在森林最深

处，因为那儿往往有大量烟雾。活水近旁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也不能太近，以免蚊虫为患。有些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们会碰上一块空地，树下长满了漂亮的长叶蕨。这样男人很容易就能清理出地方来“安营扎寨”——enda。每一家的首领都会搭建自家的营帐：四根分叉的木杆支撑着用藤蔓扎紧的横木，再往上厚厚铺上一层椰子叶或是蕨叶。Tapy本身并不大，但它的屋顶密不透风。每个帐篷底的边缘处都燃着火，这样雨水便淋不到它。营地四周若是长着格尼帕树（genipa）就再好不过了。美洲豹踩在树叶上发出的噼啪声会向营地暴露它的行踪。如果附近还有长叶赫利芸香木（anbwady，学名Helietta longifolia），那便是好事成双：用它的树皮按摩身体对于很多种病痛来说都是上佳的良药，尤其是针对baivwä——这种疾病有很多病因，主要是由食用没有兑水的蜂蜜引起的。当格尼帕树的果实成熟时，人们会将它装在玃狨的甲壳里进行加热，然后才食用。不过，还有很多部落会拿它的果汁作为靛青色的涂料来装饰他们的身体，因为这种颜色与胭脂树（urucu）果产生的红色涂料能产生鲜明的对比。

七八岁是上学的年纪。你是否以为这些小野蛮人要比我们的孩子无知？这个年纪往上，他们便开始学习为了成功应对森林中的游牧生活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到了晚上，等到夕阳西沉，祖母会在睡前讲过去的故事，讲起亚契先民是如何出现在地上的，讲起那黑暗尚未存在的年代。祖母告诉孙儿，不可见的生物有哪些，他们必须对之心存敬畏；作为亚契人，对待其他亚契人必须永远慷慨大方；若是有人拒绝与同伴分享，譬如说，野猪肉，野猪会咔嗒一声咬紧它的獠牙，那吝啬鬼便将无法射中它们。就连进食也不能掉以轻心。你不能随随便便吃下任意一种东西；这一切都得经过循序渐进的学习。很快孩子们就被教育不可以站着吃猴子肉，不然美洲豹会把犯错分子撕成碎片。如果有人在吃食蚁兽时大笑，同样的事情也会降临在他们头上。就算小孙子（kiminogi）在祖辈低沉的嗓音中酣然入睡，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会把同样的故事听上成百上千遍，这些故事会被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等到他自己长大成人，他将以同样的方式复述听到的故事。因此，jary和jamogi——祖母和祖父——多多少少承担了教给孩子“字母”与伦理道德的责任；而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天文学，等等——方面的启蒙则是父母的职责所在。不错，一个男孩如果不了解鸟兽的习性、叫声、它们藏身与逃跑的方式、它们的生活习惯与频频出现之地，他又如何能成为一个bretete，一个好猎人呢？同样地，为了成为一位优秀的采集者，从而为未来家庭的伙食做出贡献，女孩子必须对一切植物了如指掌，也必须知

晓草木何时开花结果。学习这一切都不是一日之功。因此，一个kybuchu一旦强大到了能够在森林里行进一段时间也不觉得疲惫的程度，他就会同自己的父亲一道出猎。Kybuchu在林间的学徒生涯会持续数年，直到他足够年长，足以被当作大人。他会变得越来越见多识广，愈加强大，也愈发机敏。他还不能自己造箭，但他整天都能看到父亲削制它们。他意识到箭头绝对不能浪费，如有中箭的猴子或鸟雀被箭头钉在树干或树枝上，作为猎人，他必须爬到树上把所有东西都取下来。箭头的尖端会受折损，但他会把它重新削尖。若是尖端变得太短，他就必须给它接上一根长一点的箭杆；但因为现在这支箭变轻了，它就只能被用在处于较短射程内的小动物身上。他观察着，聆听着，他的父亲则充满耐心，从不会不耐烦。做儿子的学到了绝不能赤手空拳去抓bairekwa鱼，因为鱼鳍上长长的尖刺会伤到他；他得知，有时候，加卡伦迪（蜂蜜之神）出于对亚契人的满腔愤怒，会挡住蜂巢，不让亚契人找到它们；此外，他还得知蜜蜂不会在taira barbara出没频繁的地方筑巢，后者是一种酷嗜蜂蜜的动物，热衷于掏蜂巢。男孩被教会了要谨慎。他必须意识到，怀着幼仔的母獭充满危险，myrökije鸟的叫声昭示着它的同伴美洲豹就在近旁，而brupichu的叫声则说明周围有可供猎杀的水豚。

涉及动物时，某些礼仪必须被遵守。猎人在猎杀动物时必须对它们致敬：他回到营地，猎物倒挂在他那光荣地沾满血迹的肩头，然后他放下猎物，为之吟唱。如此一来，这头动物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食物而已。若有动物被降格为纯粹的食物，它的同族很可能会被激怒，并不愿再被射杀。打猎可不光是杀死动物这么简单。你对这些动物有所亏欠，只有语言才能让你杀死的动物起死回生，这份亏欠才能被偿还。人们不指名道姓地感谢它们的献身，于是morangi就被用来指代brevi（獭），而kande（小西猫）则被称为barugi。对待动物，你必须同它虚与委蛇，必须假装自己谈论的对象另有他人，如此骗过你的猎物之后，你就抹去了人类的暴行，你的杀孽也就此一笔勾销。猎人的吟唱在人类与动物的秘密契约上盖了章。男孩还学到，想要生活在林中，你就必须戒绝杀伐过滥，尊奉万物一体之道，以确保自然继续它大方的馈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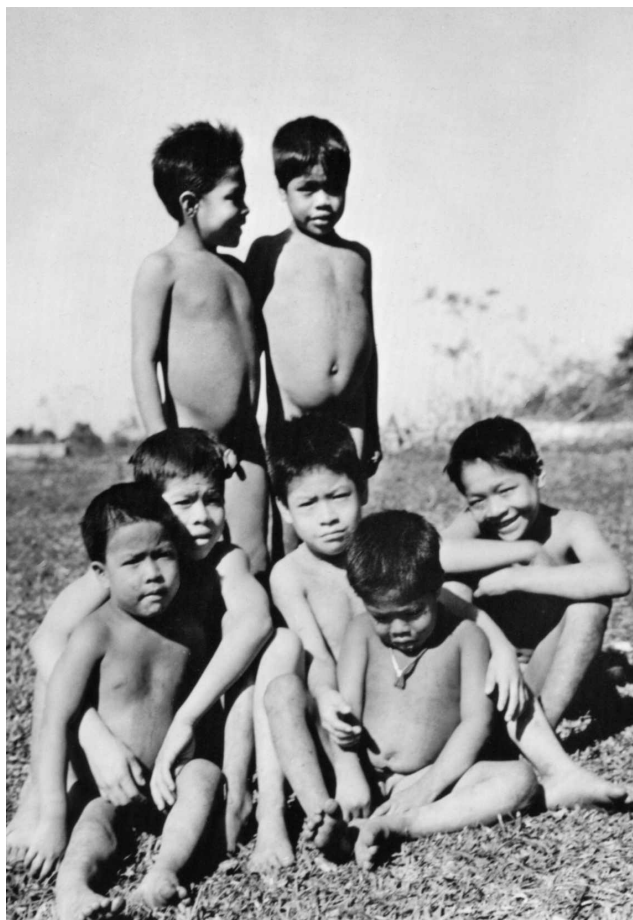
致食蚁兽：“我带来了这‘庞然大物’！是我将它射于箭下。这庞然大物是我所杀，我带来了我箭下之物！”

致雌性大西猫：“来！让我们生起熊熊烈火！我来了！这美丽的母亲，这年迈之物，我带来了一只年迈的动物！”

致鹿，前后缀以哨声：“我带来了那久久徘徊于阴影中的动物！”

致吼猴：“我回来了！它的大胡子没什么稀奇的，我将它带来了！胡子邋遢的臭东西，我将它带来了！”

季节变迁，寒冬再临，当tata jemo——昴星团出现在东方时，男孩的知识已经积累起来了。林间的事物对kybuchu而言日渐熟悉，它们与他对话，他理解它们，在林中如鱼得水，成了森林中的一员。终于有一天，他的父亲决定，儿子的童年已经结束了。



kybuchu







kybuchu瓦楚基

是时候了。Kybuchu已经很yma——强大。他们熟知与bareka——打猎——有关的一切秘密；你也不能让他们继续与女人保持距离，再这样下去局面会变得很麻烦：他们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对女人上下打量，尽管这并不被允许。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Dare mecha ka-i ä, kana pija.如果一直盯着年轻女人，你很快就会勃起。”不少男孩会跟在部落里的姑娘身后，在她们去溪边抓青蛙时等着她们。当她们注意到男孩子表露无遗的手势与叫声时，姑娘们难道会仅仅报之以一笑吗？最终，不止一个姑娘在kybuchu热烈的频频示好之下投降——我们总是会知晓这种事。若是不然，男孩们会自己动手纾解。事情再清楚不过：他们不再是孩子了——他们已经长大成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年轻的库步拉基向自己的父亲表明，他想要 imbi mubu，穿唇孔，作为对他猎人身份的确认。从此，他会戴上唇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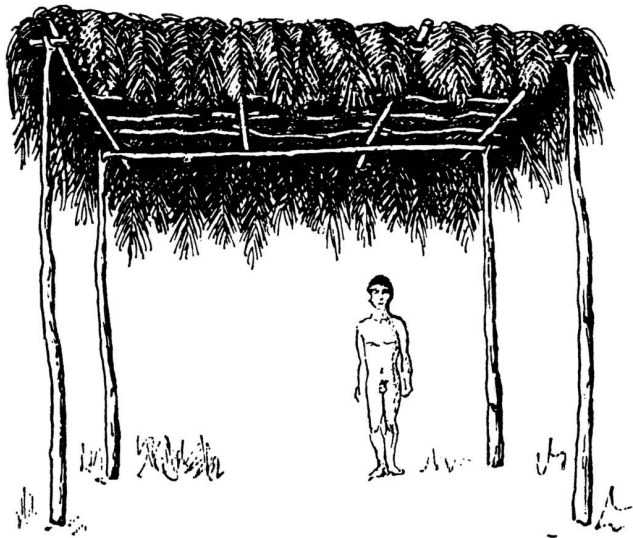
作为长大成人的标志，从而得以无所顾忌地触碰此前垂涎已久的女人。那一天，他的父亲冉比亚基很高兴，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意味着他自己将从一个kybuchu ete（一个成年人，一个尚在盛年的猎人）进入下一阶段：一个chyvai provi，“一个已经步入老年的人”。营地里还有两个和他儿子差不多同龄的青少年。冉比亚基和其他几位父亲合计了一下，并告诉男孩们，他们也将接受试炼。所以，一共会有三个peperöve，三个一起参加成人礼的小伙伴，而一同经历imbi mubu一事将会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纽带，让他们终其一生互相帮助。另外，出于对他们共同的青春的纪念，同时也作为友情的象征，冉比亚基希望他本人的peperöve——居弗库基，来扮演仪式中的主要角色。居弗库基同时还是三个即将成为大人的男孩中一人的哥哥。

库步拉基去找居弗库基：“我希望你来为我穿唇孔。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至于那位弟弟，他的父亲对他说：“让你哥哥给你穿唇孔吧。”第三个参加者也一样。居弗库基同意了这一邀请，他将为三个年轻人打开通往成人世界的大门，而群体中的猎人也会增加：“我会成为你们的imbimubua regi，为你们的嘴唇穿孔的人。”男孩们很高兴能征得他的同意，因为居弗库基已经是部落中颇有声望的一员了。他开始下令：“去那边，用手清理出一块空地来。”他们三人花了一整个下午在距营帐稍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准备enda ayiä——举行成人礼的场所。他们很细心地清理空地，砍下灌木，拔起所有的植被：一切都已干净有序。夜晚来临时，他们在空地的正中间点起大火，并肩坐下，第一次独自度过长夜。此前他们从没有斋戒过，母亲总会有东西给他们吃。但是这个晚上，他们不能吃喝：若有男孩想要成为一个beta pou，一个刚戴上唇饰的人，一个刚被启蒙的新手，他就必须如此。此外，这也是这些kybuchu第一次轻声吟唱，他们青涩的嗓音唱着男人的prerä。猎人们则在远方用自己的吟唱与他们相和，以此鼓励这些未来的beta pou。吟唱持续了一段时间，寂静的夜与闪耀的火光环绕着他们。接下来，传来了三个女人的声音，仿若一声声抗议，又有如满怀悔恨与痛苦的呜咽，那是年轻人的母亲们。她们知道自己即将失去孩子，很快他们将不再是她们的memby，而将成为值得尊敬的男人。她们的chenga ruvara是最后一次力图让时光暂停的尝试，它率先歌唱了他们间的离别，也纪念了一次与过往的决裂。女人们歌中带泪地拒绝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对男人而言是一种挑战：他们的prerä变得更为激越，更加暴烈，开始充满攻击性，几乎要将母亲们低微的哀歌吞没；她们正听着自己的儿子像男人一样歌唱。男孩们知道自己是男人与女人争夺的对象，这也激励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

今晚他们不再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属于女人的世界，不再属于他们的母亲；但他们又还没有成为男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坐在enda ayiä里——这是个异空间，一个临时的所在，是一个神圣的前哨地带。男孩的过往与未来便在此交锋，而他们也将在死去的同时获得新生。火已燃尽，人声归于沉寂，人们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他们再次去找居弗库基。他们感到饥饿，但这是个大日子，他们有些害怕。“到森林里砍些冻子椰子树来。”居弗库基命令道。男孩们带上了金属砍刀，那是居弗库基不久前从一个巴拉圭伐木工的营地偷来的。他们动身了。树被砍下，树干被打开，这样里面的髓质就可以被取出。他们砍下了椰子叶和小树的顶芽，将这些都带回了营地，巨大的叶片捆成一捆扛在肩头。与此同时，居弗库基动身打猎去了，因为他需要一头长鼻浣熊。

几位父亲都在那里：“Tapy ywa nwa! Baky vera! Pichua!快造大房子！快要下雨了！Pichua要来了！”Pichua就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它总是在亚契人要进行imbi mubu时到来，这是个好兆头。天地以及它们背后的力量从来不会对人类的命运冷眼旁观，它们总会响应人类的所作所为；有时它们甚至会干涉太过，让亚契人感到害怕。这种时候他们就必须告诉风雨，它们说话时太大声了，并要求它们离场。然而，成人式上越是风雨大作，仪式就越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建了一个特殊的庇护所。Kybuchu们独力将它建在了昨日清理出来的空地中央。这个tapy被叫作ywa，“大的”，因为里头有足够的空间让人站直身体。相较之下，通常的帐篷都太矮，没法让人站直。Tapy ywa很高（接近三米），也很宽敞，可以容纳很多亚契人。男孩们带回来的椰子叶被铺在顶上，屋顶则由插在地里的粗木杆支撑。儿子们忙着搭建棚屋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则动身去林子里取toi eë——男孩们砍下来的椰子树的髓质。她们将它装满了自己的篮子。这些髓质将同顶芽一起，成为接受成人礼的男孩的食物。现在，行成人礼的房子已经就绪，三个男孩在其中并肩坐下。他们一言不发地等待着。



tapy ywa：举行男子成人礼的帐篷

居弗库基扛着头浣熊回来了。他将这头浣熊烤熟了，又剥了皮，一块脂肪被放在一边。一切都已经就位。斋戒暂时中断，kybuchu要开始进食，一直吃到肚子鼓出来为止。在接下来的数日中，因为嘴唇的关系，他们将无法吃下任何东西。于是他们用tangy——和椰子叶一起被带回来的棕榈芯——和他们母亲取回来的toi eë塞满了自己的肚子。除此之外，他们被禁止食用任何其他食物，只能吃浣熊的皮和油脂。就这样，他们将肚子塞得满满的。亚契人很清楚为什么要特意喂浣熊给kybuchu吃：“Karo rö Ache wywy. Kare rö Ache ove.浣熊也是亚契人。浣熊是亚契人的Ove。”Ove是死者的另一个分身，它会上升至日边；与之相反，Ianve则不愿离开死者，并在夜晚逡巡于营地四周的地面。因此，浣熊也是人类；它们接过死者的Ove，然后爬到那棵不可见的巨大神树的顶端。从那儿，沿着连接上界与下界的藤蔓一路攀爬，它们就可以上达天界。浣熊肉可能会招致危险，和蜂蜜还有其他一些需要小心处理的食物一样，它可能会带来baivwä——疾病。毕竟，浣熊不也是人吗？不过，居弗库基给那些即将接受成人礼的男孩的浣熊皮和油脂并不危险。这些男孩已经死去，同时又活着：对于童年、对于母亲那满怀温柔与爱意的世界而言，他们已经死去，但他们马上将作为成年男子获得新生。因此，kare不会伤害他们，反而会让它们充满浣熊所代表的属于成人的力量。在大棚屋中，男孩坐在一块草垫上，吞食着浣熊皮和肉。



搭建供男孩成人礼用的帐篷



进餐结束了。成人礼即将开始，因为已经接近日中；阳光正炙烤着 enda ayiä。静静悬在天顶的太阳散发出来的温暖与光亮正是对传说中的另一种温暖与光亮的重演。很久以前，亚契先民从土地中出来，首次变身为“人”——nondete。当时，夜晚与黑暗尚未存在，只有永恒的白昼，太阳永远悬在天顶。因此，出于对亚契史上最初始的事件的纪念，人们选择等到正午再进行 imbi mubu 的仪式，以此标志真正的亚契人庄严的起源。那些 Ache jamo pyve——亚契先民——是在阳光照耀下从土地中出来的，而悬在黄道最高点的太阳也同样见证着男孩的新生。

一个男人走过来了；他用竹刀为三个沉默的请求者剃了头发。接下来，他用事先放在一旁的那块浣熊脂肪长时间揉搓他们嘴巴四周，放松他们的肌肤，以免太过僵硬。结束之后，他拿一把冻子椰子纤维擦去了油脂。居弗库基就坐在棚屋中，在他们身后。他站起身来，手中拿着一块削得极为锋利的猴子胫骨。这就是穿唇孔要用到的工具，名为 pijū。他朝着库步拉基俯下身来，后者向后仰着脑袋。居弗库基左手捏住他的

下唇，并将它向前拉。他深深地望进男孩的眼中，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就这样在目光没有半点游移的情况下用右手将piju由外向内、从下往上刺入了男孩的嘴唇。洞就这样打好了，他撤去了骨头。接下来，另外那个男人，也就是他的助手——人称kutua regi——取代了他的位置。这名助手也拿着一根piju，但并不尖锐。现在换他捏住嘴唇，并将骨头由内至外、从上到下扎入洞中：这个动作叫作kutu，之前那个则被称为mubu。他把骨头留在伤口中，并用一条细丝线裹住它。丝线出自男孩的母亲之手，名为kaimbo，用于防止骨头滑落。这些东西会被留在那儿，直到伤口开始痊愈；这样创口就不会闭合，而是长牢。数日后，人们会把piju取出，丝线则穿过唇孔留在嘴唇内侧，里面那头用一个choa蜂蜡做的小球拴住。库步拉基什么也没有说，即便他感到疼痛，他也没有表露出半分：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任何动作。接下来，两人为另外两个kybuchu如法炮制，他们同样很勇敢，没有任何抱怨。伤口出血不多。现在他们三人都已成了beta pou，刚穿了唇孔的人，新近成年人。在此之前，他们还属于embogi，小鸡鸡；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将被称为betagi，戴唇饰的人。

一个健全的男人，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不光是由他的embo定义的，他的beta同样定义了他。在他“入伙”，并带上唇饰之前，他都只是一个embogi，小鸡鸡。但是，一旦他戴上唇饰，他就脱离了embogi的队伍，加入了betagi的阵营；这是因为，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可以让自己的生殖器发挥作用，开始引诱女人——比如说，在她们单独去取水的时候。这样的“挑战”beta pou可不会等上太久。他的唇孔和填充其中的唇饰赋予了他这种权利，并揭示了某个目前为止秘而不宣的真相：一个男人是由他的性器定义的；而只有当一个kybuchu不再被叫作“小鸡鸡”的时候，人们才承认他真正拥有了性器官。这就是语言的两面性，乃至狡猾之处：它命名了某种缺席的东西，可当这种东西在场时，语言又将其掩藏。男人没有性器官时，他是一个“小鸡鸡”，但一旦拥有了性器官，他就不再是“小鸡鸡”了。

在此期间，母亲们在举行成人礼的棚屋内点起了火，又拿了个陶锅煮起了剩下的棕榈芯。男孩们一人拿了把刷子，把它浸在汤里，然后将它敷在自己的嘴唇上。这是为了让伤口保持温暖，好让它顺利愈合，以避免伤痛。他们拿toi eë重复了这一步骤，后者同样经过了加热。伤口总会有轻微感染——人们会说嘴唇发臭了——但情况不会恶化。有时候，负责穿孔的人会笨手笨脚地把嘴唇撕裂，他们只好等到嘴唇完全愈合再重复整个仪式。

举行仪式的区域弥漫着一股令人愉悦的香味：那是人们扔进火中的choa蜂蜡的香味。烟雾在空气中上升，直冲云霄之上太阳的栖息之所。这烟雾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燃烧的蜂蜡在对天空说什么呢？亚契人会回答说：“Ure kwaty.”“我们很清楚它说了什么。它说，事情就该这么办，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是这么教我们的。只要我们能遵循古来的言行举止，世界就能平安无事，它将书写同一个故事，而不会是迷雾一团。”

这是因为，创世之初就有燃烧的蜂蜡的气味与烟雾。为了让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必须有一个亚契人往火中扔choa蜂蜡。当初，事情发生时，太阳正静止不动，炙烤着大地：kyray chât endave——阳光无处不在。一天，一个男人正和他尚未成年的儿子一起走着。途中他们经过了Baiö的大锅。“别碰它！别碰Baiö的大锅！”做父亲的告诫道。可他的孩子没有听话，而是一棍打碎了大锅。紧接着，尘土自他打碎的破口中汹涌而出，随之而来的还有森林中的鸟兽，它们都是Baiö蓄养的动物。最后跑出来的东西让人们惊怕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那就是黑暗，夜晚，它取代了光明与永昼，吞噬了世间万物。阳光已不再！唯剩黑夜，无休无止的黑夜！男孩愚蠢的行为带来了永夜。接下来，Choa蜂蜡被扔进火里，轻烟和它那令人愉悦的香味升入空中，再次带来了白昼，而亚契人也终于知晓了世界的最终面貌：太阳沿着正常的轨道行使，白天与黑夜渐次交替，从那以后一直如此。然而，世间的秩序会不时遭到混沌无序的威胁：每当天空中可怕的住民，蓝色大美洲豹扑向日月，想要将它一口吞下时，人们就会再次生活在永昼或永夜之中，而那将会是世界的终结。因此人们十分害怕，并竭尽全力阻止它的发生——他们必须把美洲豹吓跑。女人们尖声喊叫着，把芦苇扔到火中；当芦苇在火中爆裂时，男人则会做出jeproro的动作——他们朝那动物大吼，以期将它呵退，并用石斧拼命地劈开地面。亚契人的营地里会有吓人的巨响，每个人都会拼尽全力发出动静。最终，美洲豹会在恐慌之下丢下它的猎物，太阳会再次出现，月亮也会皎洁如初，万事万物又回到了正轨。

印第安人从中领悟到的秘密和智慧如下：过剩，以及持续的过剩，往往会改变事物的正常运作，而人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阻止它，以免混沌无序打乱群体生活。一个男人不可能既是小孩又是大人，不能既是个kybuchu又对女人眉来眼去。他只能二选其一；先是其一，再是其二；先是个“小鸡鸡”，然后再成为戴唇饰的人。人们不能任由事情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生者在此，死者在彼；小孩在一侧，大人在另一侧。昔日，人们燃烧蜂蜡，它的轻烟将日与夜永久地一分为二；如今，在成

人礼上燃烧的蜂蜡也升腾到了人类世界的核心，并在其中形成了一道转瞬即逝的烟柱，这意味着人一旦跨过了这条分界线，就再也没有回头路；这意味着世间万物都是一体，同一套秩序支配着世间的生活与人类群体的生活。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一个尚未成年的男孩，打碎了Baiö的锅并放出了黑暗。现在，人们为年轻男子的嘴唇穿孔。通过这个仪式，亚契人承认，就好像日夜相继一样，世代之间也依次交替。嘴唇上的伤永远不会闭合，因为它同样是逝去的时间的象征：不论是这个变成了男人的男孩，还是他的父亲母亲，没有人可以追回这逝水年华。Gononga，世事就是如此。因此，在静止的烈日之下，人们点燃一小撮蜡。它就像一道判决一样，为空间划界，赐万物以逆旅，赋世人以居所。烟雾告诉我们什么？它说，凡人皆有一死。

目前为止一片寂静的营地中迸发出了chenga ruvara的声音。现在，不光母亲们在唱——这是所有女人的合唱。她们跪坐在脚后跟上，双手遮掩着面庞，就那么唱着。突然，三个男人站起身来，在愤怒中低声咆哮了起来。他们扑向母亲们，对她们拳打脚踢。那是刚刚经历了成人礼的年轻人的父亲们。前一日对抗是声音层面的，是男人和女人歌声之间的较量。而现在，人们动手了。冉比亚基用脚跟对着库步拉基的母亲一记猛踢，她滚到了几米之外，哭喊出声。接下来，所有其他的女人都飞身前来帮助母亲们。她们抓向男人的手臂和肩膀，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她们稳住了男人们，用椰子树的髓质摩擦他们的脸颊和胸膛。“别打了！”她们朝着男人的耳朵大口吹着气，仿佛想要把什么东西装回里头去。可现在男人已经成了by-ia，他们不再拥有“by”——他们的“灵魂”已经抽离，变得无法自制。“我们必须复仇！我就是那个复仇者！”叫喊、呻吟与呼号从四面八方传来，气氛愈发燥热，人们陷入癫狂。现在，那些原本只是在旁围观的男人都站起身来了。全副武装的他们挥弓执箭，将弓箭拍得啪啪作响。“别放箭！”那些妻子喊道。但他们没有听从，而是一起投身到了jeporo之中。他们竭尽全力大喊，面容在盛怒之下扭曲——因为他们也陷入了by-ia之中。现在他们变得很危险：箭已在弦上，弓也已拉满，正蓄势待发。女人们感到恐惧，开始哭泣；孩子们都被吓到了，四散躲入林间。他们藏身在树干后头，茫然地观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第一阵箭雨四下飞散，擦着成人礼的棚屋而过，还掠过了它高高的顶棚。男人们慢慢朝棚屋逼近，满怀侵略性。现在，三位刚经历了成人礼的年轻人也开始感到了恐惧。

他们很清楚男人周身散发出来的明确无误的怒气绝不是装装样子而已；他们也知道，若是没有rapa michi——若是没有这场人们用弓箭互

相攻击的暴力游戏，若是没有jepproro和那些拳打脚踢，若是没有男人女人之间的对抗和女人的败北，若是没有这一切，成人礼就不成其为成人礼。但不管怎么说，在狂热的对抗中，男人有时候会无法自控，下手没了轻重。他们就在那里，站成一排，大声喊叫着，就仿佛beta pou是美洲豹一般，同时还放着箭；他们现在看上去简直想要杀了这些年轻人；他们似乎拒绝把他们看作是大人，看作是已经成年的人；他们似乎拒绝接受这些新同伴。但居弗库基也在那里，他并不觉得害怕。他就在那里保护这些刚刚被他一手扯离童年的年轻人。他会从男人们手下保护他们，并让这群成年男子接受这些年轻人，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也变得by-ia——充满愤怒；他对着猎人们发起了挑衅，并示以威吓。他以脚跺地，抓起一把把泥土扔向男人们——他令人生畏。他发出一声巨吼，因为他是男孩们的jepare，他们的“复仇者”。女人们很快围了过来：她们围住他，替他按摩，帮他好好放松了一番。她们请求他不要发出太大声响，要他冷静下来。“我那beta pou的孩子会逃走的！”母亲们说道。他听着，渐渐冷静了下来。男人们没敢再上前一步，他们开始往后撤。Enda ayia中又恢复了宁静。弓箭被放到了一边，人们坐回自己的帐篷中，成人仪式结束了。

亚契人在营地又待了四天四夜，以待嘴唇开始愈合。年轻的成年人待在他们自己的帐篷中，并在那里过夜。因为唇孔中的piju，他们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只能用刷子蘸着吃母亲们备下的棕榈芯汤。况且，大部分食物对他们来说都是禁忌。狢狢肉会导致打猎时的厄运，pane；西猫会带来疾疫；猴子会让他们像新生儿一样双眼充血；响尾蛇则会让他们的屁股变得又扁又瘦——这对亚契人来说很是令人沮丧。任何种类的蜂蜜都在禁止之列，他们若是不遵守这条规矩，就射不中动物。这些年轻人饥饿难当，这就是为什么每晚，你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母亲为自己饥肠辘辘的儿子哀伤地唱道：“我的孩子！他连肚子都没了！”

至于居弗库基和他的助手，他们也需要遵循同样的禁忌：他们不得食用棕榈树髓质之外的一切食物。除此之外，就像男孩们的父亲和兄弟一样，他们也必须严格戒绝房事。这种场合下的meno会导致嘴唇上的伤口疼痛，拖慢愈合的速度。通过远离自己的妻子和爱人，这些男人做到了与年轻的新伙伴共进退，因为很显然，男孩们暂时还没有赢得与女性亲密接触的权利。要等到伤口完全愈合，等到系在唇中、用来防止唇孔闭合的丝线断开，他们才能这样做：直到kaimbo断开，男孩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betagi。但只要丝线还完好无损，他就不能近女色。不然，他将会遭遇对男人而言最糟糕的命运：打猎时厄运缠身。如果现在他做了

什么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将来他就无法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然而，除了成为一个bai jyvondy——一个猎杀动物的人之外，一个男人难道还有其他使命吗？亚契人至今仍会谈起某件现在让他们觉得很好笑的事情，但当初，他们却为此大为光火：年轻的布库基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无视了所有的规矩，尾随了一个取水途中的姑娘，并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到了她身上。而他的唇孔处还垂着丝线呢！

四天后，亚契人离开了营地。很快，唇孔的边缘就会变得齐整，也不会再发臭。此时三位betagi各自的父亲会将自己的唇饰给他，从此以后，男孩就会在部落扎营的时候佩戴它。所谓的唇饰是一根细长的猴子骨头，女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而佩戴的目的就是为了pravo vwä——勾引她们。如今，已经成了男人的他们会在父亲的指导下制作自己的弓和箭。出猎时，他们会将长长的唇饰取下（因为拉弓时右手会有撞到它的风险），并用一根短上很多的beta作为替代。若是不戴唇饰，他们将打不到任何猎物。待他们右肩扛着死去的猎物回到营地，他们知道这时该唱什么歌。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礼节，他们会送一块肉给自己的“穿孔人”，居弗库基和他的助手。

是否只要嘴唇穿了孔，亚契人就长大成人了呢？事实并非如此。Imbi mubu是一项盛大的仪式，所有人都会参与其中。这是一项集体活动。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青年已经步入成年。他还有别的任务尚未完成：jaycha bowo，刺青，也即背上的疤痕文身（scarification）。只有过了这道坎，这个年轻人才有资格去完成他一直以来的使命：他将不再是那个可以不负责任四处拈花惹草的浪子，而将成为某个女人的丈夫，她则会为他生下后代。

在举行这一仪式前，他们会等上差不多六到八年。鉴于男孩会在十五岁左右得到他的beta，刺青仪式通常会在他二十二三岁时进行，按照亚契人的说法，这叫buta provi bu，等他长出些胡子的时候。等到时机成熟，部落中的某位年长男性——通常是男孩穿唇孔的人——会告诉他：“你已经不再是个betagi了。你已经长成了成年男子，因此，我要为你刺上文身。我将是那个为你割开后背的人。”这不是在询问他的意愿，而是一个声明。他们必须现在了结此事，而betagi必须经历这一过程。男人会去找一块石头。有些时候，他必须走很远，因为这种石头只有在某些溪流的岸边才能找到。它的一头必须很尖，但不能和竹片一样，那样割起来就太轻松了。因此，想要找到合适的石头就需要很好的眼力。这就是新仪式所要用到的全部道具：一小块石头。

等到他找到了趁手的石头，这位bowaregi会在一处开阔之地的中央砍下一棵有着光滑树干的小树，并注意让它在倒下来时能斜倚在另一棵树的树枝上。现在万事俱备，手术（我们需要从近乎“外科手术”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词）可以开始了。他们等太阳升到天顶。年轻人伏在倾斜的树干上，双手抱树。他趴在上头，露出后背，绷紧皮肤。“文身师”拿起石头，从他的肩部顶端一路割到屁股隆起处。和用锋利如刀的竹片割开来有所不同，这可不是什么轻描淡写、浮于表面的割痕。这道背上的裂缝正儿八经地深入到了每一层皮肤。想要不借助竹刀的锋刃就留下这样的沟壑，必须有很大的握力，因为皮肤会产生阻力。Bowaregi使出浑身力气下压，将皮肤撕裂。就这样，背部的整个表面都被笔直的平行线犁了一遍，从一侧肩膀到另一侧，至少有十条切割线。鲜血横流，年轻人、“司祭”的手、树干还有他四周的地面莫不为鲜血覆盖。根据亚契人的说法，这种疼痛令人发指，相比之下穿唇孔根本就是不痛不痒的小打小闹。Jaycha bowo简直要了受术者的命。然而，就像是在imbi mubu的过程中一样，男孩并不会呻吟或叫出声。相反，他会失去意识，但依然紧咬牙冠。这沉默彰显了他的勇敢，他有权被看作是个成年人。

等到整个背部全部完工，bowaregi会取一些来自kybai树（kybai的意思是“男人”）的木炭，将它碾碎，并与蜂蜜混合。他将这种膏体抹到伤口上，让它深深地渗入其中。木炭粉有吸墨纸的效果，可以止血并帮助防止大出血。此外，它还会嵌入伤口中，这样等到伤口痊愈时，这些长长的割痕就会呈现出漂亮的蓝黑色。刺青的痕迹必须是清晰可见的黑色，不然仪式就算不上成功。当它成功时，这个年轻人就会变成jyvete，可畏的。年轻人从树干上下来，脸朝下趴在一块席子上。他的母亲正在哭泣。接着，她在一棵树上刨下些木条，把它加热了撒到伤口上，就让它这么晾上好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减轻疼痛，起到镇定剂的效果。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她会一天数次像这样照顾自己动弹不得的儿子。在伤口基本结痂以前，整个部落都会留在这个营地里，因为年轻人根本无法移动。那实在太痛了，他的伤口可经不起再一次崩裂。他吃得很少。肉是不行的，因为食肉会导致刺青无法正常变黑。人们只让他吃掺了水的蜂蜜。当然了，直到背部“风干”之前他都不能做爱，不然他将无法痊愈。他遵守了规则，再加上母亲的细心呵护，年轻人的伤口不再发臭，并开始结痂，在皮肤上留下一道道粗粗的纵向“浮雕”。亚契人可以再次上路了。年轻人很虚弱，但猎人们会给他很多肉，这样他很快就会重新长膘。

现在开始他成了一个bretete，一个成年猎人，他也成了kybai

gatu，正儿八经的成年人。铭刻在他肌肤之上的正是他如今身份的象征：一个成年人，某个女人未来的丈夫。他的童年从唇孔间消失了。但那时他尚未真正长大成人；这让他赢得了青春岁月的欢乐时光，那是他的pravoty——“追求姑娘”的日子。但是青春期并不比童年更持久，一切事物都有其应有的时限，而每一段时光都是短暂的。什么样的男人会想要在正常期限之外无限延长自己作为betagi的自由，来无休止地与女人调笑？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成为部落中混乱与矛盾的根源，不论是对于已婚男性而言（他们的妻子会受到威胁），还是对其他刚刚成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正等着自己上阵）。一个人如果已经到了足以成为kybai gatu的年纪，却还想要维持betagi的身份，在适婚的年龄却还想赖着当一个不负责任的单身汉，他将在社会中造成失序。他必须放弃一个身份以接受另一个角色，另一个他命中注定要接受的角色，而整个部落也会强制要求每一个个体承认这一点，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延续。在imbi mubu和jaycha bowo的漫长间隔期间，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因为群体告诉他，你可以这么做。在一段时间之后，群体又下令，到此为止。接下来疼痛的试炼便证明，这段时光真正结束了。一切无需多言，男人只需沉默地忍受痛苦，这试炼是beta pou在向他的群体还债，因为群体允许他引诱女人。每当蓝色的美洲豹试图吞噬太阳或月亮时，它便是在威胁宇宙的秩序；同理，betagi如果拒绝成为大人，他就是在威胁社会的秩序。单身汉就好像是群体中的美洲豹。为了阻止上天重新陷入混沌，亚契人用斧头劈开了大地；同样地，为了预防他们所在的群体陷入混乱无序，他们割开了betagi的后背。割裂的肌肤，伤痕遍布的大地——同一个符号。它标示着万物的法则与人类的法则，但同时也揭露了谜团之所在：日月相继，昼夜交替，可这同一性的永恒轮回与人类毫无瓜葛。

一天早上，我正在和卡雷库伦布基聊天。他的妻子，年轻的查楚基，是个陌生人。她可不单单是丰满而已，是真的胖，导致我一开始还以为她怀孕了，虽然她的胸部并不是很明显。当我问她时，她羞怯地回答道：“Bravo iä wyte.我还没怀孕。”当时我们正在和她的丈夫聊天，可她却一反往常的谨慎，怀着几分焦虑走上前来，在丈夫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就跑到森林中藏了起来。做丈夫的立马站起来往陌生人的营地去了；他几乎没来得及向我解释：“pirä upu o.她流血了。”查楚基甚至还没有进入青春期，她当然不可能怀孕，因为所谓的流血，说的是她的初潮。我可真是走运：（如果印第安人不反对的话，）我将有可能目睹一个年轻女孩的成年仪式。

查楚基之所以跑进森林里，是因为刚来了初潮的女孩子应该这么做。她必须避开他人的目光，从而暗示他们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按照他们的说法，此时这个女孩子是“by-ia”，没有“自我”，丧失了镇定，因此她羞涩地跑出去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全营地的人都知道“pirä upu o”了——查楚基从林木的庇荫下走了出来，她目光低垂，飞快地走到父母的帐篷中坐了下来，后者已经离开了。她的祖母是唯一还在帐篷中的人。她小声对祖母说：“Cho piräma.我的血来了。”然后她的祖母大声地告诉另一个坐在稍远处的老妇人：“我们家丫头的血来了。”“我是她的tapave。”她回答道。事实上，查楚基出生时，正是这个老妇人将她从地面上举起，然后抱在怀中；现在，她将帮助她那刚刚成了女人的chave。做母亲的发出了一声孤独的叹息。现在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已经正式得到了消息。她的父亲进行了一次jeproro，他大声叫了好多次：“我女儿的血流到了西獐肉上。”查楚基突然站起来跑到森林里去时，他们正在烤小野猪。

两位老妇人在女孩“教父”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一丝不苟的biri。这是一种按摩，须用双手覆盖肌肤，然后轻轻地掐捏。查楚基躺着，闭着双眼，那三个人则蹲在她上方。远远一看，这情景很怪异：六只手正在一具一动不动的身体上忙活着，从一头到另一头。在场的男人中，好几个离开了营地；除了她的父亲，剩下的人都有意地转过身，背对他们。至于她的丈夫，他从最开始就已经消失不见。按摩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结束时，查楚基的身上稀稀拉拉地盖了两三片干燥的棕榈叶。她的tapave和教父都起身消失在了林中。在此期间，她的父亲在营地中离其他帐篷有点距离的地方搭起了一个脆弱的低矮屋架。这就是tapy jyvapa，“流了血的人”专用的拱型小屋。但是与男孩不同，人们不会为了女孩的成人礼专门清理出一块空地。过了一会儿，她的教父教母回来了。教父扛着冻子椰子叶，教母则带着一大捆蕨叶。冻子椰子叶将被同时用作棚屋的屋顶和墙壁。这个棚屋恰如其名，的确是拱起来的，呈倒V形，“V”字的两个分叉短短的。教母在屋里头铺了一床蕨叶；接下来，查楚基溜进小屋内，浑身上下被剩下的蕨叶遮得严严实实。她完全处于隐形的状态，因为她是kaku——她一定不能被看到。她的教母坐在离这个隐蔽小屋不远的地方，哭了几分钟，然后开始为自己的“教女”准备食物：她现在能吃的只有面粉和冻子椰子芽。

几个小时过去了。亚契人有些睡了个午觉，还有的则忙于他们的日常生计。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对我说了一个字。鉴于我是去那里观察的（手中笨拙地拿着铅笔和本子），我没敢离开，尽管天气炎热，蚊子成

群，我自己又饥肠辘辘。我必须留在那里，以确保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在接下来的至少两三年里都不会再有第二个女孩子的成人礼了，因为没有哪个女孩子到了pirä upu o的年纪。一个印第安人给了我一块生棕榈芯，尝起来像榛子，十分美味。但事实上，这一天不会有任何其他活动了。下午将尽的时候，教母给女孩带去了素斋，她闭着眼很快地吃下了它。她不光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甚至还要小心地不让自己的目光落到任何人身上，尤其是男人，除了她的父亲和教父。她很“糟糕”，是邪恶与痛苦的源头，是bayja的根源。亚契人用bayja来指称男人所陷入的凶险异常的情况，这些情况通常是由分娩或是来了初潮的女人流的血导致的。

第二天，我为了围观仪式起了个大早。我紧赶慢赶，仪式还是已经开始了：偏僻的小屋已经搬到了新位置，这样它就彻底位于营地之外了。这是因为查楚基前一天晚上住的地方已经被污染了——不是被她的血直接污染，而是被经血所带来的厌恶与恐惧污染的。那个地方成了不洁之地，不可居住。年轻女孩的父亲已经动身进了林子里面，他将会带回来一捆kymata藤蔓的藤条，缺了这个净化仪式将无法举行。藤条的需求量很大，因为有一大群人需要被净化：除了那些因为直接接触到查楚基而被污染的人之外，还有一群小心翼翼与她保持距离的男人。塔图忒皮朗基（“红皮肤的狢猯”）向我解释了一切，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天她的丈夫这么快就离开了。塔图忒皮朗基正淡定地吃着幼虫当早餐，虫子挤满了他的餐盘。他问我：“你呢？你不参加kymata tyrö，kymata净化吗？”“我不知道。我也要参加吗？”“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做过爱？”“和哪个女人？”“和kujambuku，那个大女人”（这是亚契人对即将来初潮的女孩的称呼）。“没有，我没和查楚基做过。”“Amai！哎哟！”

他显得相当惊讶；于是我也惊讶了起来，因为他似乎认为，我有可能品尝过那个小姑娘的滋味，而那再正常不过！

“好吧，”他说道，“咱俩一样。没有做爱就不会有bayja；没有bayja，就不需要净化。”

所以道理很简单：所有曾和尚未来月经的女孩子有过性关系的男人都需要参加净化仪式。早些时候，当我听说查楚基作为卡雷库伦布基的breko（合法妻子）却还不是一个女人时，我已经够震惊的了。可现在我又得知，她不光有个丈夫，甚至还有情人！塔图忒皮朗基毫不迟疑地给了我一串名字；他似乎对全体亚契人爱情生活的最新八卦了如指掌。我们一共数出了七个人。查楚基，这个最多不过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让

七个男人品尝到了快乐。Amai！

这七个bayja中，有几个人在这里，还有些则不在：他们已经外出打猎好些天了。必须得有人通知他们这件事情，好让他们尽快赶回来，祛除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卡雷库伦布基一点也没耽搁就动身去找他们了。如果不接受净化，他们很可能会落入美洲豹的爪下——他们bayja的状态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美洲豹；又或许，他们会被化作彩虹的大天蛇Memboruchu吞噬。不管怎么说，很有可能他们已经被brara——毒蛇——咬了一口。

离群索居的女孩躺在棕榈叶和蕨叶下面。女人们去取水了。她的教父将藤条浸入水中，一把接着一把。水开始泛白，冒出泡泡。如果这水被倒入小溪，下游所有的鱼都会肚皮朝天，仿佛因窒息而死。但是亚契人只会用kymata来祛除bayja，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要做的。一根长木杆被紧紧插在了她隐居的小木屋旁的地面上。教父走到查楚基身旁，将她从蕨叶下拉出来，用一块布料盖住她的脑袋，领她到木杆边上，她则用双手抓住了木杆。他褪下她的面纱，将一顶aicho——一种用棕榈叶细细编成的女帽——戴上了她的脑袋；帽子戴得很低，像贝雷帽一样盖到眼睛上方。这种帽子只有在女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才会被使用，以确保她将来能长出一头秀发。好几个人——她的父母，教父教母，再加上我的朋友塔图忒皮朗基——使劲刷洗着这个女孩，她自己则静静低着头，闭着眼睛。他们用大把浸在净化用水中的藤条将她擦满了“肥皂”，然后又替她从头到脚冲洗了一遍。他们小心地确保没有忽略她的私处，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她大腿上的血痕被海绵迅速拭去。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女人们就会蹲下身来，唱一段chenga ruvara，然后继续工作。很快，他们就将查楚基彻底清洗了一遍，又用干藤条把她擦干。然后，在布料的遮掩下，她再次被领回了自己隐居的地方。

现在轮到“净化者”互相净化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靠在同一根木杆边上，被仔细地冲刷一净。这个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除了这五六个参与到仪式中的亚契人以外，还有查楚基之前的情人，再加上她丈夫去找的那几个。对我来说，更为新奇有趣的则是查楚基那边的动静。她没有进到小屋里面去，而是面朝下，趴在一堆蕨叶上。她的aicho已经被摘掉了，她的教母齐根剪去了她所有的头发。接下来，人们用荨麻纤维编成的小绳子在她的两个膝盖下打了个结。和她一开始接受的按摩一样，理论上这能够防止她的腿变细。亚契人对瘦子深恶痛绝，那意味着身体不健康，尤其是女人——他们更希望女人们丰满而圆润。此外，一

个“骨头干瘪”的女人可无法强壮到身背一个装着两三头浣熊的篮子，背带里带着个孩子，手持火把还能穿越森林。瘦女人不是什么好事，反而十分可悲。因此，他们会用尽一切预防措施来确保kuja的小腿和大腿有令人满意的曲线。

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现在，查楚基仍趴在地上，正在经历一次鞭打。两个老妇人，一人手持一条像是皮制的短鞭，正用尽全力抽打着她，从肩膀到脚踝。没错，她们真的是使出了全身力气，但落在她皮肤上的击打声并不响亮，因为鞭子实在太细太短，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疼痛。因此，这一环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验女孩的忍痛能力。“那是什么？”“Brevi embo rö go.獾鞭。”“你们为什么打她？”“我们用獾鞭打kujambuku，这样她就会想要男人。”这个回答听起来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被獾的生殖器鞭打就会让查楚基更热情地寻求男人的注意（何况目前为止她也没有性冷淡到哪里去）？我继续追问下去，但亚契人没有更明白地回答我：“Go nonga ure.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说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或许，还有很多其他部落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选择獾是有原因的。对亚契人来说，獾本质上是一种猎物，它能提供大量鲜美的肉，因而受到追捧。它对木箭来说过于皮糙肉厚了，所以人们通常用陷阱捕捉它。他们会在它常去的溪流边挖个圆锥形的坑，然后用薄薄一层草叶棚架把坑盖起来。这笨重的野兽（超过两百公斤）没能发现这个把戏，掉进坑中，没法上来。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痛击之——brevi ityty，把獾打趴下。但是在很多印第安文化的神话中，这种肥大的、长着略显淫荡的粗长鼻子的动物往往扮演着引诱者的角色。抛开那笨重而不美观的外表不谈，它就是位让人无法拒绝的唐璜。丈夫们担心它干的种种勾当，那常常为他们的名誉带去致命的污点。獾显得非常下流，并被描绘得相当淫荡，仿佛它是如此热衷于风月人间，女孩子都为它神魂颠倒。因此，如果人们希望一个刚成年的女孩能够吸引男子，而不是让他们败兴，还有什么能比用卡萨诺瓦的阳物鞭打她更合适呢？当然了，查楚基并不需要这媚药，但至少我们知道，这样一来她将彻底被獾鞭玷污，部落里的小伙子也会为之精神一爽。到头来，亚契人还是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的。

净化仪式迅速地进行着。藤条堆正在缩水，不过剩下的量依然足够净化她丈夫找回来的那些猎人。他们毫发无伤地回来了，没有人被蛇咬伤。他们在远处高喊了两三声，示意自己正在靠近，营地里的人也做出了回应。他们必须这么做：敌人永远不会提醒营地自己的人自己已经抵达，所以，如果他们不想冒一箭穿胸的风险的话，就需要提前提醒部落

里的人自己的身份。从前，亚契人曾在通往营地的小径上，将尖锐的竹片四处隐藏在树叶下面，这样不请自来的客人如果不清楚竹片都藏在哪儿，就很可能一脚扎上一个。这群男人（包括她的丈夫），谁都没朝查楚基看一眼，就向着指定的地方去了，他们将在那里挨个接受沐浴。一个女人正在受净化的女孩身上涂画。卷成牛角状的玃狢壳中盛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这是蜂蜡、树脂和一小撮木炭粉的混合物。女人取了些混合物放在一把打磨得极为光滑的木刀的边缘，将它杵在火边，等混合物几乎变成液体，再将它敷到女孩的皮肤上。它形成了一道乌黑发亮的印记，几天也不会消褪，哪怕女孩在溪水中洗澡也无妨。装饰从脸开始：额头上是横条，鼻子两翼各两道竖线，脸颊上四道，下巴六道。接下来女人着手涂画她的脖子和胸口，很快，她的全身，一直下到耻骨的位置都被十道竖线所覆盖，效果非常绚丽。她的胳膊也得到了同样的处理，然后是后背。等画完这些，女人涂抹了自己的前臂、躯干和肚子，接着又为两位全程参与仪式的老妇人依法炮制。

夜色降临了。查楚基已经回到了她的小屋，依然没有进食。她某位情人的两个孩子也经过了净化，小一点的那个（约十五个月大）对仪式进行了剧烈的抵抗，因为水很凉。有人告诉我：“当一个kujambuku流血时，如果有孩子吐了，他可能会死。”一口大锅里正煮着冻椰子做的面粉和玉米混合成的薄粥，已经煮了有一会儿了。煮好之后，人们往里面加了点蜂蜜，然后做教父的给每个在场的人分了一份bruee——正是这场集体用餐为查楚基净化仪式的第一部分画上了句号。

其实，和beta pou一样，女孩子也要经历jaycha bowo，但这一环节会紧接着净化沐浴举行，而不是等到数年之后。步骤都一样，她的教父会负责挑选石头。Kujambuku将背朝下躺着。司祭会从胸部的底部开始，将皮肤一路割开到耻骨的位置，每边各两道圆弧形的痕迹，而不是像男孩子一样的竖线。接下来，他会用较短的割痕填满两边之间的空隙；这些短线同样是弯曲的，横跨整个肚皮。这种jaycha mama，圆形刺青，可以确保女孩很快就怀孕；很快她就会有一个孩子。她肚子上的沟壑告诉我们，这具肉体从今以后将注定丰沃。伤口将被抹上木炭粉；它们会愈合，呈现出永不消褪的黑色，从而在女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印记。亚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为了让他们的女人个个漂亮丰满。如果不进行这次刺青的话，她们会gaiparä，很瘦，很糟糕。但如果一个母亲的肚皮doroparegi——丰硕——得恰到好处，她的头胎将会很顺利地“落下来”，而女人也用不着受苦。

我本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围观这一切。可等我一觉醒来，四分之三的印第安人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几个老年人，还有查楚基的父母。查楚基本人还在隔离中。所有人都灰着一张脸。我问他们怎么了，她的父亲非常不悦地告诉我：“Jaycha iä!Kujambuku kyrymba iä ete!没有祭祀！那个女孩一点胆子也没有！”史上头一遭，瓜亚基人的规矩被打破了。查楚基很害怕，她不想面对jaycha bowo，这疼痛的试炼把她吓到了。真是岂有此理。人们怒火冲天。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所有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她“流血”这件事情发生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她们和白人接触之前，查楚基做梦也别想在亚契女人自古以来的神圣使命面前临阵脱逃。但局势已经变了，早年的传统，甚至近年的传统都在白人的世界中一点点消磨殆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规矩都得到了遵从，而这就是为什么亚契人能排除万难、在与各族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忠于法度，这就是亚契人的立身之本。一旦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物质基础之间的纽带被切断，对法度的尊崇以及对其价值的信仰都只能土崩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查楚基会害怕——她的恐惧不光代表着她的痛苦，它同样也是正在侵袭亚契人的疾疫的最初症状。这一疾疫便是绝望。他们本不该离开森林，本不该来到白人的地盘：“靠近白人，亚契人就不再是亚契人了。可悲啊！”居弗库基就这样在某个漫漫长夜彻夜悲歌，神态中透着死相。可虽然查楚基拒绝了仪式，猛烈的pichua还是来了，伴随着狂风大作。

直到她第二次月经为止，整整一个月时间里，查楚基都没有吃任何肉、蜂蜜，或是黄蜂的幼虫，如此她的眼睛就不会充血，她的头生儿就不会是个女孩，她分娩时将无灾无痛，她的第一个儿子也不会畸形。她也没有吹奏笛子，因为那会让她的手臂“干涸”。她也没有做爱，更何况，没有哪个男人胆敢邀请她：一个dare pou，新近成为女人的人，实在太危险了。在一段时间内，所有参与了净化仪式的男男女女都必须戒绝meno带来的欢愉。

查楚基害怕成为一个大人，一个真正的亚契人，她想要永远保持“新女人”的身份。这样的状态能长久持续下去吗？无论答案如何，事实是，某个寒冷的6月早晨，人们发现了这个小dare pou已经僵硬的尸体，她在夜间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没人对此发表任何看法。Ache rö kwaty，亚契人早就知道。

(1) 布须曼人（Bushmen），即桑人（San），生活于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原住民族。“布须曼人”英文意为“丛林人”，某些语境中这一称呼被认为是种蔑称。



森林中的瓜亚基地

第五章 女人，蜂蜜，战争

日子过得很平静，尤其是当巴拉圭首领不在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消失数星期，在邻近的村落喝得大醉。待他在马鞍上摇摇晃晃回来，他会任由自己陷入莫名其妙的怒火中，抽出柯尔特左轮手枪，一边用瓜拉尼语含糊地咒骂着，一边朝四面开火。印第安人会感到害怕，不过这事情不常发生，更何况，不管怎么说，这个白人不会在森林里和亚契人待上太多时间。相比之下，更多时候他会跑去脏兮兮的酒馆里喝伤心酒，在那里，朗姆酒上头的醉汉往往二话不说就会掏出匕首或左轮手枪干上一架，你可不想目睹那样的场景。

补给耗尽时，我会骑马去圣胡安内波穆塞诺买香烟、扁豆、肥肉，还有大米之类的东西。那边有个日子过得很丰润的店主，因为他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垄断了当地贸易。他的顾客会从遥远的居所骑马而来，将马拴在门口，并在等待装货时在那儿聊上很久的天。就这样，那个耳朵很尖的杂货店主变得对周围地区的消息了如指掌。有天，这个友善又快活的男人叫我跟他走到小店后头去。“佩德罗先生⁽¹⁾，听我说，”他说道，“这一带所有人都觉得你很有钱；我听说有人要来抢劫你。我这儿有个保险箱，我建议你把钱留在这儿。这样就算你被杀了，好歹钱还在！”他加了一句，一边大笑道。

当我告诉他“很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放在他的保险箱里”的时候，他显然没有相信我。不管怎么说，我向他道了谢，然后踏上了回森林的路。我有点焦急，因为夜色开始降临了。不过我毫发无伤地回到了营地，还因为这趟出行有几分像西部片里的情节而偷偷得意了一下。

离开白人的世界并再次加入森林中的瓜亚基世界，意味着我的生活再次变得极度放松而懒散，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倒是与印第安人的与世无争很合得来。自从亚契人在白溪住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现在他们伙食中的蔬果大量增加了（主要是木薯），肉类却大大减少了。一旦印第安人几天闻不到肉味，他们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为了确保充分的肉类供应，他们必须去离白溪很远的地方，长时间消失在森林中，而巴拉圭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这样。印第安人自己也不愿跑得太远，远离这个不管怎么说至少能给他们安全感的地方。在别处，他们很可能会与Beeru冲突再起，后果将是致命的。然而，亚契人实在是无肉不欢——最多三天，不能更多了。他们会变得阴

郁而怠惰，在火堆旁打盹，完全拒绝与我合作。幸好，极度饥饿会让他们采取行动。有个男人一大清早就起床了，早在太阳升起之前。在火光中，他跪坐在脚后跟上开始歌唱，将同样的内容反复唱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没有一刻停歇。一开始，我没能听懂这首歌。但它永远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结尾：一旦有一丝微弱的光亮足够让他摸清东南西北，他就会站起身来，带上弓箭离开。他不过是在宣告四方，他打算去打猎，同时也告诉大家，如果当天没有回来，他将会在森林里待上多少个晚上。如果他打算去打数天猎（用亚契人的话来说是“数夜”），他的妻儿也会跟他一块前往。不过后者将在天光大亮的时候出发，至少比他晚出发一个小时：他那背着篮子和孩子，还拿着一根冒烟的木棍的妻子可没法跟上他的步伐。一个男人如果这样宣告自己的计划，那么至少还有一两个男人会和他一起走。他们小心地离开了，没有吵醒任何人。但唱歌的男人永远是最先离开的。他通过歌声提醒族人，自己将要离开，点明自己此行的方向，并呼唤同伴一起上路。但他并不会等待答复，而是径直离开，并不关心是否会有人跟随他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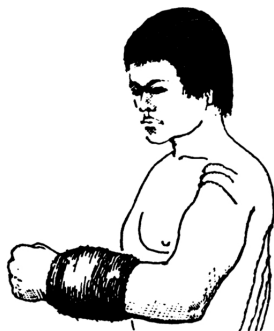
点明出行的方向并不是什么毫无用处的预防措施。在森林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如果他和同行的猎人迟迟不归，族人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们总归是件好事。就这样，有天晚上，一个男人唱道，他将去猎猴子，并将在三个晚上后回到营地。有两个人和他同去，所以一共会有三家人，包括两个小孩。可是过了整整一礼拜他们也没有出现。“美洲豹把他们吃了。”亚契人说。每当哪个猎人没能如期归来，他们都会这么说。同样地，我如果说想去森林里散个步，他们总会说：“美洲豹会把你的肠子扯出来。”事实上，绝少有人碰上过美洲豹，而除了最近身亡的查楚外米基，这畜生已经很久没来骚扰过任何人了。每当印第安人提起baipu的威胁时，他们谈论的，与其说是那种动物本身，不如说是任何有可能打乱他们日常生活节奏的意外，而美洲豹不过是这种混乱的隐喻而已。不管怎么说，这行人的迟迟不归开始让他们担心了。他们决定去一探究竟，我也加入了队伍，无视他们的警告：“很远！很多美洲豹！我们的同伴已经死了！”事实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我会拖慢他们的速度。但他们最终做出了让步，而我也很快就理解了他们为何如此不情愿。寻常出猎时，所有人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地缓慢搜寻一片地区，但这次可不一样，是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直达目的地。他们走得飞快。我慢吞吞吊在队尾，或是被藤蔓搞得磕磕绊绊，或是因为突然被拴在一个树桩上而动弹不得。荆棘钩住了我的衣服，而我则试图通过疯狂甩肩膀把它们弄下来。我不光掉到了队伍的最后面，还闹出了很大动静！相比之下，亚契

人则安静、敏捷、高效。我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部分来自我的衣服，树枝和藤蔓滑过印第安人光溜溜的皮肤，却不会伤到他们。我决定向他们学习，脱掉早已破烂不堪的衣服，把它放在了某棵树下，等返程再拿上。我只留下了靴子——我实在没法光脚走路，而且我怕蛇——和一根粗皮带，上面插着一只手枪套，里头是我的左轮手枪。除此之外，我浑身精光。我就穿着这么一身奇怪的行头再次上路了；至少，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碰上什么令人尴尬的邂逅。

我们过了两条小溪，一条是涉过去的，另一条则是从一座瓜亚基人的桥（一条两头搭在两岸上的树干）上过去的。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我们到达了营地。那儿只有个挺大的帐篷，灰烬已经冷了，一个人也没有。印第安人将地面到处检查了一遍，互相指出了些我压根就看不见的东西，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朝着某个方向出发了。又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发现了失踪者们。他们为什么遗弃了第一个营地，又在这么近的地方重新扎了营？我不知道。或许他们觉得那里ine，有臭味，被污染了，又或者他们被某个幽灵吓到了。这里也只有一个帐篷，棕榈叶的新鲜程度告诉我们，它们是前一天才被割下的。一缕轻烟从火堆处升起，火已经将近熄灭。除了一个正在给她的小女儿喂奶的女人之外，帐篷中的其他人都躺着。他们病得如此严重，我们到达时，他们连眼睛都没怎么睁开。正常情况下，男人应该已经将箭搭在了弦上，因为我们出于谨慎，没有用通常的叫声宣告我们的到来：在森林中发现另一个人类的踪迹时，你永远都不知道对面会是什么人。他们躺在地上，发着高烧，很显然是患了流感。“晚上的时候，”他们呻吟道，“Krei来了。他想要闷死我们。”你若是感觉到胸口的重压，发现自己呼吸困难、陷入噩梦，你就知道是Krei来了。“你们得回营地去，”我们对他们说，“那里有人会照顾你们，还有药。”没有回答，他们对此无动于衷。让我感到极其惊讶的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些男人最多只在那儿待了十分钟。他们完全没有坚持要求那些人起身。拿起武器，他们开始往回走：任务已经完成——他们找到了猎人们，也和他们交谈过了；他们不愿意回来，所以剩下的人就开始往回走。你或许会觉得他们极度冷漠，对病患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很残忍，可事情并不是那样。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不强迫同伴跟他们回来，是为了尊重对方的自由。病人们显然已经做出决定要留在那里，因此他们不应该被强行带回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亚契人生病的时候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等疾病离开他。如果这些Krei的受害者说：“我们想要回去，但是我们没法回去。”那么毫无疑问，剩下的人会竭尽全力帮他们。这正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等我们开始往回走的时候，老托康基转

身朝他们tapy的方向喊道：“等你们死了，briku u pa modo，秃鹫会吃了你们的！”印第安人很讨厌想象自己不经过仪式就辞别人世：怎样都好，只要不用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大自然和其间的野兽，尤其是秃鹫。“来了！”只听他们回答道。女人疲惫地收拾好东西放进篮子里，托康基和另一个男人背上孩子，我们分担了病倒的猎人的弓箭便启程了。我们慢慢地前进，因为他们没法走得太快。几个小时之后，夜色已深，我们回到了营地。亚契人没有对此大惊小怪。感冒的病人分到了阿司匹林，火也燃起来了，然后所有人都睡下了。

我很少在亚契人打猎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每次我都得在星空下宿上一两夜，睡在森林柔软、潮湿的地面上，边上是一堆火，它的烟尘对驱赶蚊虫几乎没有太大用处。我实在没法逼自己吃虫子，所以饿肚子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此外，除了疲倦不堪，这类出行很少给我带来任何收获。我只能观察到某些狩猎技巧与策略：比如说，当一群男人围困住一群在树顶上叽里呱啦的猴子，或是一队chachu野猪时——个头大点的一看到我们靠近，牙齿就开始咔嗒作响（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愤怒）——他们会怎么做。此外还有集体猎浣熊的活动，因为印第安人很喜欢浣熊肉。只有已婚的成年男子会参加这类狩猎，他们不是将树上的动物用箭射下来，而是强迫它们下到地面上，然后徒手开抓。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人们会分散在浣熊出没的树丛间，朝着树枝放箭，投掷木片和土块，大喊大叫制造巨响，动物们则会吓得惊慌失措，一心只想着一件事：逃离这声响。它们脑袋朝下往下溜，却不料树底站着个人，左前臂上缠着用植物纤维和女人头发做成的带子。这种pabwa是女人用自己的头发（比如说哀悼期间割下来的头发）给丈夫做的。头发被保留下来，就为了做这种专用于猎浣熊的带子，不过它除了实用价值之外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等浣熊快下到地上时，男人会用自己全副武装的左臂把它抵在树干上，用右手抓住它的尾巴，将它在空中大肆挥甩一番，然后用尽全力将它朝树干砸去——这会摔碎它的头骨或脊椎。通过这种技巧，猎人们可以活捉到浣熊，并用它们来看守营地——只要他们想这么说的话。但pabwa在面对浣熊凶残的啃咬时并不能永远起到有效保护，有好几个男人很是自豪地给我看了这种伤口留下的巨大疤痕：“这样等我死的时候就会有猛烈的pichua！”



pabwa：用来猎浣熊的臂带

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印第安人是如此灵活，如此手段高超，他们的动作是这样精准有效：这是对身体的全面掌控。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做不到这些，他们不是很愿意在出猎时让我随行——这已经算是保守的说法了。同样地，对任何想要同行的白人，他们都会回绝。这纯粹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们知道如何迅捷而安静地移动，白人却做不到。白人穿着鞋子，将小枝丫踩在脚下，导致藤蔓震动，树枝噼啪作响。他搞出如此大的动静，方圆百米外的动物都惊觉到了，它们或是跑开，或是躲了起来。狩猎泡汤了。为了不干扰亚契人最重要的活动，我不愿把自己强塞给他们。我在白溪根本不愁怎么打发时间，因为不是所有印第安人都会同时离开；我总是能找到人聊天，开玩笑，消遣度日。那里从不无聊。

多亏了kybuchu，永远都有人告诉我营地发生的一切。他们如果没有跟着自己的父亲去林中打猎，就会四处晃悠，或是在空地里玩耍。他们最重要的消遣之一，就是窥探大人的私密活动。他们盯着大人的举动，并在后者去林子里的时候跟在后头，悄悄观察他们，然后长时间地对自己的闻见评头论足，一边捂住自己的笑声。他们出现在任何地方，令人烦不胜烦，却又叫人无法拒绝。他们不抱任何幻想，因为对他们来说，成人世界是个彻底祛了魅的世界，毫无秘密可言，可以一眼望到底。必须小心这些kybuchu。当结伴去解手的年轻姑娘淡定地以为没有闲人在旁时，她们会突然听到这个隐蔽场所附近回响着阵阵笑声，然后树丛中便会迸发出寻常的猥琐评论：“Kyrypy pirä! Kyrypy pirä!红屁股！红屁股！”男孩中胆子最大的会喊：“Nde pere pirä!你连下面都是红的！”接下来他们会在年轻女人的咒骂声中穿过灌木丛四散开。

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知道了关于性的一切。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大人们都很热衷此道——这再正常不过，而这事自然

不会逃脱这些永远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注意。其次，尽管“成年人”并没有半点想要昭告天下的意思，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也从不对性或是与之相关的话题遮遮掩掩。他们会在孩子在场时毫无羞耻感地讨论meno（做爱），与诸位情人之间的艳遇和糗事，以及那些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黄段子。他们对自己审查没有兴趣，不以肉身为耻，也从不遮掩他们对欢愉的追求——就这样，他们同意活在小孩子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骗小孩子，小孩子也不会被骗到。然而，正事上他们从不含糊：一个男人永远不会在任何人（不论老少）面前与他的固定伴侣举止亲昵。自由与克制——这就是印第安人中的风气。或许会有人觉得，这样的百无禁忌会导致kybuchu过早地开始冒险，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清楚：meno是好事，因为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会对女人做大人对她们做的事情，但那要等到他们赋予我们模仿他们的权利之后，等到我们有了唇孔，不再被称作embogi而是被称作betagi之后。女人是成年人的特权。

Kybuchu之间偶尔会发生口角，但那永远不会升级成拳脚。我时不时会碰到他们中的某一位来找我。他会绕着小屋转悠，偷偷瞥我几眼，最终下定决心：“某某和某个女孩做爱了！”他小声嗫嚅道，因为需要散布这样的消息而一脸痛苦。这当然是彻底的造谣，是为了替他自己受到的某些冒犯复仇。这儿有三四个女孩，但因为她们要比kybuchu年长些，所以她们对年轻男人和已婚男子更感兴趣。当我问起时，那个被诽谤的男孩会立马义愤填膺地回答：“Kybuchu不做爱！只有当你有了beta的时候才可以！”他们很清楚，一切违背这一规则的举动都会换来pane的惩罚。话虽如此，他们依然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大人们。比如说，会有某个男孩子从树林里钻出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完又立马急匆匆跑开：“快来！查楚基和白普基在做爱！他们在树林里！Juja ury pute！我们笑死了，太好玩了！快来！”为了让我相信，他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模仿着可怜的查楚基——他正忙着和白普基欢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聚集了如此多的视线。我的鲁莽（或所谓的职业道德）还不至于让我接受这些急切的邀请。但是这个从不出错的情报系统让我得知了那些成年人或许不愿让我知道的事情：地下恋情、不伦私情，以及那些不轨的欢愉——正是这些禁果让某些人乏善可陈的生活变得完整。Kybuchu这么做倒不是为了举报他人，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大人身上找些乐子的好办法而已。而另一方面，我就这样深入到了亚契人的私生活中，我也因此得以理解，这些事如何波及了夫妻生活的和谐稳定，又如何影响了婚姻矛盾的解决之道。

亚契人在对待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卫生习惯时表现出了同等的谨慎。他们如果打算在白天行事，就得偷偷溜进林子里。男人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其实正是这模样彻底出卖了他；过一会儿会有个女人站起来，朝同一个方向走去：他们有约。通常他们会选择午后暖和一点的时段，那会儿所有人都在睡觉。但总有kybuchu还醒着……从来没有人会在晚上到林子里去：黑暗过于危险，充满了魑魅魍魉。他们待在tapy里。但即便我经常睡在一堆印第安人中间，我也从未听说过任何放纵的声息：他们似乎行事很快。不过，库步拉基有一回告诉我，他还小的时候，曾半夜醒来，发现父母在做爱：“太恐怖了！”他说。然而，你常常可以看到年轻伴侣互相抚摸，尽管用的是非常随意的方式。有些时候丈夫会用脸颊蹭妻子的脸，但不会亲吻她——亚契人不接吻；他们咕咕地对彼此絮说着柔情蜜语。相比之下，实际的肢体接触较少发生。一个年轻女人盘腿坐着，在大腿上揉搓着纤维，正在做一根弓弦。在她身旁，她的丈夫正在打盹；但他显然只是半睡半醒，因为他突然把手伸进了那个“你懂的”地方。女人在惊讶中叫出了声，但她很享受。他每次重新发起攻击，她都会笑出声。他们就这样玩闹了一会儿，然后两个人就都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脸上毫无可见的情绪波动。此外，在亚契人中生活的差不多一年时间里，我从没见过有人勃起。撇开瓜亚基人对此事的热衷不谈，我并不觉得他们是此道中的高手——或许一两个陌生人中的男人除外。但同时，他们显然都在自行摸索自己的喜好，因为有一次，讲起某个想要妻子为自己口交的年轻丈夫时，所有人的态度都是震惊中带着调笑的。这说明对其他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常规操作。

部落里少数几个年轻女子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她对自己喜欢男人这件事毫不遮掩。男人也不会对她视而不见（“这个姑娘，”他们说，“很轻易就会对你门户大开。”）。但她似乎不知餍足，并永远会让自己属意的人知悉她的欲望。如果身边没有什么合适的betagi，她会和同龄的女孩子玩一个让她们大笑的游戏：有人会讲一个故事，吸引另一个人的注意力，然后突然摸她的下体。那个人则会在惊讶或喜悦之下尖叫出声，然后试着对第一个人进行还击。但这可比不上男人。一个暖和的下午，所有人都在午睡，这个女孩漫无目的地在营地中游荡着。她的身体让她发狂，可她看起来心情很差，显然是因为没能立刻找到想要的东西。但现在她看到了布库基。他睡着了，身体摊开趴在地上，脑袋夹在胳膊间。她毫不迟疑走近他，在他身上躺下，然后开始自然而然地用自己的身体猛烈撞击他的屁股，仿佛是在对他进行鸡奸。这个被如此剧烈地扯离梦境的倒霉蛋在惊恐中低声埋怨了起来。她

不以为意，将他钉在地面上，囚禁在自己的两腿间。不仅如此，她还把一只手伸到了他肚子下方，试着抓住他的生殖器。他们俩在地上扭作一团，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女孩沉默而执着，男人则轻声叫道：“Poko eme! Poko eme!别碰！别碰！”这没什么用，因为这正是她所渴望的。而她也成功了。受害人很快就停止了抗争，过了几分钟，他俩一起去了更远一点、视线之外的地方。她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也得手了。

Kybuchu总会告诉我哪个丈夫或妻子欺骗了自己的伴侣，他们的出轨对象又是谁。有些时候这样的艳遇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不会有人把在林子里的隐蔽处做个爱想得太严肃。最多，那个被戴了绿帽的丈夫拥有复仇的权利（但就连这也取决于他的脾气有多坏），但他不会真的去复仇，因为那样他就得拿弓打破情敌的头。他只会象征性地复仇，只会将自己的弓仪式性地朝着情敌一挥，而不是真的打到他。这就是jepy rave，装样子的复仇。我只在瓜亚基人中发现过一起情杀：老托康基年轻的时候曾用箭杀死过一个男人。即便托康基现在老态毕露，他仍然有着yma chija的名声：一个生性残暴的人。女人则不如自己的丈夫这么宽宏大量，尤其是当丈夫是个出名的猎人的时候。很显然，她们可不乐意让别的女人偷了自己的汉子。为了惩罚这个负心汉，她们或是在一段时间内拒绝与他同房，或是立马以牙还牙：她们会让另一个男人享受自己丈夫所弃绝的欢愉。事情不会再往上升级了，而夫妻间的关系也不会因为彼此的荒唐事大打折扣。

此外，很多时候，一点点幽默有助于平息被冒犯者的怒火。有一天，营地里比往常更热闹。我的一个小情报员跑来告诉我：“康德基裂了！出血了！他们要举行净化！”发生了什么？康德基和一个不属于他的女子交欢了。有人看见他跑了回来，性器上头全是血：他确实把自己弄伤了。边上有很多人，所有人都议论纷纷。好几个男人说，如果那活儿“裂了”，是因为女方太瘦，阴道太窄，康德基强行进入时，割伤了自己。（我的看法是，割到他的不是过于锋利的阴道，更有可能是因为攻势过猛；又或者，他会不会是因为在林中的地上做爱而被草叶或树枝刮伤了？）但不管怎么样，按照亚契人的说法，这场事故无从避免：这个女人难道不是新寡吗？康德基难道不知道至少在一段时间中不能碰这样的女人吗？Ianve已经惩罚了他，也会惩罚那个女人：他会像扛一块猎物一样将她扛在肩膀，扛到远离亚契人的地方，迫使她在草原上独自睡上数夜。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他俩都必须经历净化沐浴。康德基既窘迫又不安，因为当晚Ianve会试图闷死他。然而人们又说，Ianve同样也会折磨那些满足于拥有一个女人的男人。因此，为了过上太平日子，最

好和好几个女人睡觉。当他们为康德基擦拭的时候，他的妻子嘲笑了他：“Ocho pa!他完全裂了！这回他学会怎么和这么瘦的女人搞了吧！”对她而言，这样的复仇已经足够，二人很快就和解了。

类似的意外情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调剂，也丰富了部落的历史，但它们完全不会对群体的团结带来任何不良影响，也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八九年前，远在他们与Beeru接触之前，在亚契嘉图内部曾产生过一次分裂。居弗库基当时已是群体的领袖，他有个漂亮的妻子叫奇米拉基。有一天，在丈夫外出打猎的时候，她独自去了离营地有些距离的地方。她走的时候没吱声，只想着摘一些guaviju树的果子。在她身边，鸟儿毫不怕生地唱着。一只mere持续的叫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只鸟似乎藏在灌木中。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走上前，拨开灌木丛，结果不见mere，却发现了一个为了吸引她的注意而模仿鸟叫的男人：那是年轻的库步拉基，一个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仪式的成年男人。然而，因为亚契嘉图内部女性稀缺，他被迫住在父母的tapy中，继续着单身汉的生活，吃着他母亲准备的饭食，通过和已婚女子发生短暂的关系来解决meno的需求。“如果没有女人的话，”亚契人解释道，“我们分享别人的女人。”居弗库基的妻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抓住她，强迫她躺下，并当场完成了piarö——也就是所谓的强奸。但事实上，人们说奇米拉基没怎么反抗。谁知道呢？说不定她出去找果子就是为了这档子事！不管怎么说，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甚至有了更戏剧性的展开。

事实上，奇米拉基很享受这次艳遇，并希望它能继续下去。事情很快就变得人尽皆知，当居弗库基得知此事时，他怒火中烧，因为他真的是个yma chija。而更让他生气的是，他是这位年轻对手的jware兼jepare：他在他出生时帮了忙，还为他穿了唇孔。某种意义上他就像是库步拉基的父亲。此外，亚契人非常严厉地谴责了年轻人的不端行为：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乱伦！出离愤怒的居弗库基抓起弓开始朝四周胡乱放箭。他动了杀意，男人们跑到了树后，女人们则叫出了声。等他终于射完了所有的箭，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几位老妇人成功让他镇定了下来。她们急急忙忙为他做了一次piy，又苦苦哀求，终于让他冷静了下来。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他去意已决，好几户人家（特别是他的兄弟们）决定和他一起走。这便是亚契嘉图人内部和睦关系的终结。分裂持续了数月，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气氛很可能升级为公开的敌对关系，甚至战争。幸好居弗库基的父亲布万基已经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英明地挺身而出，决定试图弥补这关系。

他独自动身去找儿子们；他走了很远，在森林中穿行了数日。他找到了分裂分子们，着手说服居弗库基，让他和其他人回去；部落需要它的酋长来对付白人的进攻，而这样的进攻正在日益频繁地发生。居弗库基现在已经冷静了下来；这几个月来与妻子的分居平息了他的怒火。他已经不再“没有自我”，不再失去神智，而心头残留的苦涩并没有导致他听不进道理。于是他遵从了父亲的建议，因为作为酋长，他感到自己应该对整个亚契嘉图部落负责。更何况，他也没有女人。现在他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女人，况且不管怎么说，他想要的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奇米拉基。但那个情敌，库步拉基，依然是个问题。在类似情况下，男人们往往会接受下面这个解决方案，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当一个单身汉成为一个已婚男人的竞争对手时，在公众意见的推动下，人们会决定让“地下”情人成为他所追求的女人正式的“第二丈夫”，而不是让事态在半遮半掩的情况下恶化下去。不然事情迟早会为社会带来骚乱，并导致两位竞争对手的亲友陷入敌对状态。就这样，两个男人之间的竞争得到了压制，现在他们都成了女人的丈夫，而势不两立的纷繁情欲也在一妻多夫制婚姻的缔结之下得到了化解。

亚契嘉图人再次团聚在了一起，歌声与泪水庆祝着这次和解。现在奇米拉基胜利主宰了她的两位丈夫：第一丈夫——imete——居弗库基，以及第二丈夫——japetyva——库步拉基。一旦这一解决方式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认可，和平便降临到了这个三角关系上。如果japetyva——处在边缘地位的丈夫——是个年老且性致缺缺的鳏夫，夫妻的日常生活就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第二丈夫会承担些细碎的活计，比如砍柴、接水、照顾孩子。而作为这一切的回报，他得以避免孤独，并与家人共同进餐。如果两个丈夫都年轻力壮，他们的妻子则更是得利：在物质层面上是如此，因为两个丈夫会疯狂地争相为妻子带回尽可能多的猎物；同样，在肉欲层面上也是如此，因为她永远可以指望两位伴侣倾倒在她们。鉴于二人或许会同时对她们产生欲望，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选择权永远在妻子手上，但是她们要小心，不能厚此薄彼。有些时候她们会和imete到林子里去，另一些时候则是和japetyva。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毫无怨言。至于孩子们，他们把母亲的所有丈夫都看作自己的父亲，尽管他们会根据各人与母亲的关系对他们加以区分。据此，第一丈夫是真正的父亲（apä ete），而第二丈夫则是个半职父亲（apä mirö）。最后，如果一个男人在某个女人的孕期与她交媾过，他便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父亲身份：他被称作apä perombre，那个进行了perö的父亲，也即是说，那个与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睡觉的男子。所有这些男人都同样坚

定地声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身份。奇米拉基有一个儿子，一个kybuchu。这个男孩和库步拉基惊人地相似，后者必然是他血缘上的父亲。然而，男孩却把居弗库基看作是自己的apä ete，而居弗库基也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有一次，居弗库基在男孩在场时不太过分地逗弄了妻子两句，男孩一怒之下打了他父亲几拳。他的父母笑着说：“你很kyrymba，很勇敢。”

白天，并没有任何特殊规矩约束tapy中家庭成员的位置。但到了晚上，每个人在火边睡下的位置是有事先规定的，你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地儿躺下。只要地面不潮湿，亚契人会就那么睡在地上，不然他们会睡在棕榈叶席子上。他们裸睡。亚契人受不了晚上还穿着白人给的衣服，所以一到睡觉时间他们就会把衣服脱下。睡觉场所是以女人为中心开始分配的。首先，有一堆火在帐篷边缘烧着。然后是睡在第一排的人：不到七八岁的孩子们。过了那个年纪，他们就会变得相对独立于父母，开始一起睡在自己的火堆边上。孩子后头是他们的母亲，她面朝火堆，以便取暖。如果她有个婴儿，她会把他放在背带中，贴在身边，使其免于寒冷。最后，女人后边是她的丈夫或丈夫们，自然了，他们睡得离火堆最远。此外，等到温度降得太厉害的时候，比如到六七月份，在第一堆火的对面会燃起另一堆火。就这样，女人被象征性地从头到脚按照她的双重身份分成了两半：她的正面是她作为母亲的一面——孩子就睡在母亲的身前与火堆之间。她本人在孩子的空间与成人的空间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边界。后背则是她作为妻子的一面，只属于她的丈夫。

如果她只有一个丈夫，事情很简单：他会在妻子边上舒展开身子睡下。但如果她有不止一个丈夫呢？这种情况下，女人就会再次被分割，但不是沿纵向，而是横着来，如此她就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因为一个女人似乎不太可能有超过三个丈夫）。每个丈夫占有一个“区域”，具体视他在婚姻等级中的地位而定。首先是女性身躯的下半部，从腰部往下；接下来，按照递减的“价值”阶梯来看，下一个是女人的头部；最后是两者之间的那部分，也就是由女子后背构成的中段。当然了，女人最被看重的部位，同时也是她女性身份的体现，属于第一丈夫。他差不多在女人的垂直方向上躺着，头抵着她的大腿。这是他的权利，因为他是imete。第二丈夫睡在远离第一丈夫的另一头，和他们共同的妻子脑袋挨得很近。如果还有第三个丈夫的话，剩给他的就是中间地带：就性别角度而言这是最中性的地带。哪怕妻子在心底里最偏爱他，他毕竟是资历最浅的那个。这就是亚契人睡觉的方式。此外，人们用女人身上分配给他们的部位来定义她的丈夫们。这些生动而精确的词语逼真地表现了

女人是如何被一分为三的。它们值得被记录下来。

第一丈夫（imete）可以用以下三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

kyrpytywaty：那个总是睡在肛门边上的男人。

kymakätywaty：那个总是睡在腿边的男人。

aivirotywaty：那个总是睡在屁股边上的男人。

第二丈夫（japetyva）的不同称呼如下：

tötywaty：那个总是睡在脑袋边上的男人。

jyrukatywaty：那个总是睡在肋骨边上的男人。

在Iröiangi中没有一妻多夫制家庭。刚到白溪的时候，他们的酋长甚至有两个老婆：她们中的一人被赠给了亚契嘉图人，从而加固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盟约。然而这种婚姻形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陌生人对此不知情。他们和另一个群体一样，熟知这种形制，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采用。不过，因为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女人没有必要拥有多个丈夫。然而有一天，问题来了。自从查楚外米基在一月去世后，她的最后一任丈夫，年轻的加佩基（他接替了老拜瓦基的位置）就没了妻子。他回去和父母住在了一起，由他母亲为他做饭、为他的弓制弦。他当然也曾试着去讨年轻女子的欢心，并成功地与一名Iröiangi的妻子，克拉加基，发生了点什么；她是两个男孩的漂亮母亲。对于她的情人来说，很显然这不过是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但女方对此要认真得多。事情发生在6月。一大批亚契人离开了白溪（我也和他们一起走了），去一片很远的橘树林旁安营扎寨。那里可能是某个耶稣会的旧址，数千只熟透的橘子压弯了树枝。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是双重的意外之喜：因为那儿除了多汁的橘子，还有那些被橘子吸引而至的动物，尤其是猴子，甚至还有野猪——这让打猎容易了很多。那个女人跟着她的情人走了，甚至都懒得关心一下留在白溪的丈夫和孩子。这两个男人之间已经爆发过一次颇为激烈的争吵，并互相用弓击打了对方几下。做情人的感到了害怕——女人的丈夫是部落中最强壮的男人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加佩基抓住了这次旅行的机会，以便和女人的丈夫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当克拉加基决定和他一起走时，他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微妙。克拉加基对自己的丈夫很恼火，因为他一次又一次残忍地掐她：当男人们对自己妻子的举止不满时，他们就会这么做。加佩基无意继续这段开头就如此不妙的私情，但

他该拿这女人怎么办呢？她不想回白溪。于是，人们决定去把克拉加基的丈夫——卡加瓦楚基和两个孩子找来，这样他们就能夫妻和解。印第安人一致决定委派我去找那个做丈夫的，并把他带到他那水性杨花的妻子身边。

我一点也不乐意干这差事，在两个营地间来往要骑上整整一天的马，可我却没法拒绝：你必须答应他们，为他们效劳。于是我出发了。我找到了卡加瓦楚基，他显得悲伤而沮丧。我不太知道该如何说服他加入其他人：“在这里，你就像个鳏夫。没有女人。谁来给你烧饭？你吃什么？你的孩子会想妈妈的。跟我走吧。”我一个劲地用最黑暗的语言来描绘他在这里的处境，并用另一个营地中极为诱人的生活作为对比（“那里的橘子很好吃。那儿有猎物。”）。固执的他只回答了一句：“Ape rö cho enda.这是我的家。”他是对的：应该让克拉加基回来，而不是让他去找她和她的情人。我没有再坚持。我再次动身了，确信任务已经失败。没等我走出半里路就听到后头有脚步声：卡加瓦楚基跟上来了，小儿子坐在肩头，另一个儿子蹒跚跟在他身后。我如释重负。他做出了决定。我背起男孩，路上，我向他问起了他妈妈。他什么都知道，也很清楚他母亲和加佩基之间的私情。他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Kuja meno jwe.那个女人想做爱。”

我们在夜半到达了营地。第二天，卡加瓦楚基言简意赅地表示，他同意让另一个男人成为克拉加基的第二丈夫。这是矛盾的唯一解决方案，因为女方不愿意放弃她的情人。因此，加佩基会以tötywaty的身份和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并睡在克拉加基的脑袋边上。这是个真诚的提案，卡加瓦楚基并没有怀藏其他心思。但加佩基显然没能和他达成共识：他害怕这位丈夫的力气，而身为一个亚契嘉图人，他对寄居陌生人篱下深感抵触。他拒绝了这一提案，快快乐乐地回到了白溪。卡加瓦楚基完全没有因此感到失望，对他来说，这段婚外恋有了个圆满的结束。至于克拉加基，沮丧之下她闹起了脾气，甚至不再和我说话，搞得好像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似的。

有些时候人们会以性器官为名。有一个年老的、瘦骨嶙峋的Iröiangi老太太——我有一次曾看到她用干瘪得像可丽饼一样的乳房安抚自己的小孙子——人们在称呼她时只叫她佩雷尚康基，“枯树阴道”。所有人都这么叫她，包括小孩子。这并没有任何不敬之处，只是客观的叫法罢了，她也不觉得受到了冒犯。所有亚契人都有根据动物取的名字，而几乎所有动物都能为人们提供名字。为数不多的例外包括某些不

可食用的鸟，因为它们是Chono——雷神——的宠物；还有就是刺鼠（agouti）。事实上，除了embo，亚契人还用tavwa jakä一词来指称阴茎，意为刺鼠头。如果某个男孩子在做手势时小鸡鸡到处甩来甩去，就会有女人向他喊道：“喂，小子，别抖了，你的刺鼠头在乱蹦！”此外，有身孕的女人会避免吃刺鼠肉，不然的话，她会生下一个像勃起的阴茎一样浑身肿胀的孩子。

亚契人按照性事应有的价值享受此事：在开放又谨慎的态度下，它能为男男女女打开乐园的大门。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件乐事呢？但是事情还是要有章法，没有人会用一己之私欲取代群体的法则，后者永远占上风，因为从不会有人违背它。当一个群体足够自由时，无政府主义并不构成一种诱惑，也就不会发生。瓜亚基印第安人的群体就是如此。他们是野蛮人。

6月十分寒冷。冰冷风自南方吹来，树木的高墙差点就挡不住它。我完全无法相信自己是身在热带附近，有好几次，清晨醒来时，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近乎极地的景色：大草原凝霜的草叶和结冰的水洼。正是duy pute——大寒时节。对亚契人来说，这标志着一年将尽，下一年即将开始。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的新年。篝火不分昼夜地烧着，下午将尽时，所有人会一起花不少时间在林中砍柴。就这样，我从印第安人那儿学到了什么样的木头是最好的柴火，烧起来又暖和又不起烟。Kybuchu已经养成了在我的篝火边睡觉的习惯，这样就可以免去自己捡柴火的麻烦。不过话虽如此，他们也会给我搭把手。那些有衣服穿的孩子都会把衣服脱了才睡觉。于是我边上就有八九个kybuchu，有时候还会有两三个大人加入我们——巨大一堆赤裸的躯体，手脚脑袋全部混成一团，生物的体温就像柴火一样温暖着他们。不时会有人在睡梦中变换姿势，边翻身边哼哼唧唧，同时打乱整个结构。接下来会有几秒钟无声的动荡，直到结构再次稳定下来。在这样的夜间骚动中，竟然没有哪个人直接睡到灰烬上，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然而，那样的事偏偏就没发生过，尽管在动荡中没有一个人醒来。到了早上，所有人都会染上一身柴火灰。印第安人会用力把自己掸干净，因为他们讨厌沾上灰。按他们的说法，有些小孩生来就有pire krembu，“灰扑扑的皮肤”。这些孩子会被杀死。他们同样讨厌看到我一身灰。我若是半夜在灰烬中滚得全身是灰，他们会对着我猛拍一通，试图帮我衣服弄干净。“灰！这个必须弄掉！”他们烦躁地说道。怀孕的女人永远不能吃braa蛇的肉，不然孩子就会有灰皮肤。这种厌恶从何而来？这或许与黑夜缘起的神话有关。神话

中的那个男孩打破了Baiö的大锅，放跑了黑暗与灰烬，同时也把自己弄脏了。或许，亚契人是在担心沾上灰会导致混沌（也就是永夜）的回归，而这正是那个未成年小男孩的愚蠢行为招致的。不管怎么说，只有在用于治疗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忍受与灰烬发生接触。如果有人得了重病，人们会用灰烬覆盖他全身。病人会那样躺上很长时间，浑身白乎乎的，然后被洗干净。就这样，6月把我们冻得不轻，连着好几个晚上气温都到了零下。

到了月底，除了几个kybuchu以外，所有的Iröiangi一句招呼也没有就带着家什消失了：某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他们去了东边，进入了森林的腹地，在那里他们不必担心碰上任何人。亚契嘉图人则留在了白溪。我一度以为陌生人突然做出了决定，要永远回归森林中的生活。“这是为了tö kybairu”，亚契嘉图人向我解释道。

当年，亚契人曾享有自由，也曾是森林的主人。当时，每个部落都掌控着自己的狩猎场所，他们或是无视邻居的存在，或是已经做好了一旦有人来犯，就用弓矢击退对方的准备。但每个群体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住在一起。每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团体都进一步细分为二十到二十五人的小团体，由几户人家组成。像亚契嘉图人就包含两个小团体，人数更多的陌生人则包含了四五个。印第安人之所以这样散居在森林各处，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因为他们是如此依赖打猎，他们必须考虑到每个地方不会聚集太多的猎物。你的运气可没有好到能每天撞上一群野猪，并在数秒内将它们猎杀一尽。鉴于动物散布在广袤的土地四方，人也必须如此。一片地区若是想要养活一整个部落，就会因为资源短缺而撑不过去，但一个小团体却可以在那里毫无困难地喂饱自己。换言之，这些部落的地盘被进一步划分成了更小的地盘，这些小团体就在其中四处游荡。每个小团体对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土都享有某种所有权，其面积与占领此地的人数相比简直大到没边：每二十个人需要几百平方公里的森林来安然度过一年的四季变迁。他们没法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哪里若是出现了人类的踪迹，数日之后，那儿的动物就会去远处寻找安宁与和平。人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跟上它们，从一个营地辗转到另一个营地，最终扫荡过整个地盘。在一整年的漂泊之后，印第安人便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赋予这漫游某种意义、某种方向，因为他们会在砍倒棕榈树几个月后重溯自己的脚步，回去收集在此期间在树中繁衍的幼虫。此外，对每一个团体来说，正是这些幼虫“农场”标志了人们对某一块地方的所有权。当我们在行进中凑巧碰上某些倒下的树干时他们会说：“这是查楚基的棕榈树，那是皮拉久基的。”自然了，没

人会碰这些树干，因为那是他们同伴的所有物。

同一个部落内部的小团体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和睦的，因为其中的成员不光是irondy（同伴），还是血亲。两个小团体会时不时碰上对方，一起扎营一段时间，然后各奔东西。但是原则上来说，每一个小团体几乎一整年都会在自己的地盘范围内独自游荡，过着在各种意义上都和自己的邻居别无二致的生活。当然了，如果其他团体被白人追得太紧，过来暂时投奔同伴，他们也会对自己的兄弟报以友善的欢迎。还有些时候，也会有某个小团体的信使前来告诉其他团体的人，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需要其他人到场。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人们常常可以数月不闻其他亚契人的音讯。人们本可以永远保持分离，因为没什么能阻止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但是每年，仅有一次，所有的小团体都会聚集到同一个营地中来，整个部落会团聚，所有irondy会互相挨着点起篝火：这就是亚契人的盛大节日，tö kybairu。而1963年6月，陌生人避开好事者的目光前往远方庆祝的，就是这个节日。

最初的寒潮刚至，天气变化就成了一时的谈资。人们密切注意着这个进程：首先来的是duy pou，初寒，还不算特别凛冽；然后就是duy provi，小寒；到月底就是duy pute，大寒。这就是启程的信号。他们同时还注意着kymata藤上花朵的颜色变化：它们渐渐从浅黄色变红，而这恰恰与大寒同时发生。“寒潮就是藤蔓变红时经历的pichua。大寒是在为红色的藤蔓复仇。”在瓜亚基人的想法中，“复仇”就是事物间的相互制约，它重新建立起被临时扰乱的平衡，并确保世间的秩序不会发生变化。所谓jepy——复仇——究竟是要报什么仇？它报复在世间或人间发生的一切事件，无论好坏臧否，只要这事件在亚契人群体中导致了任何的增减损益。人与物都必须遵守规则；一切越轨事物的边界都必须被划清，或是被揭露；世界偶起波澜的表面必须保持合一，波澜不惊。这就是印第安思想中jepy这一概念的根源，因为他们在面对导致界限扭曲的动荡时深感不安。这个方法让他们能够同时祛除一切变化，夷平差异，并继续生活在同一性（Même）的光照之下。

但寒潮又是为了什么而替藤蔓复仇呢？这是因为一到6月，kymata就怀孕了，它即将生下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myrynga蜜蜂的蜂蜜。这当然是隐喻性的母子关系，昆虫在隐秘的树洞中积攒蜂蜜，而蜂蜜就这么被留在了那里。然而，亚契人却把kymata看成是一位母亲，从而给蜂蜜赋予了植物世界中的家庭地位。但它只不过是这一特殊时期的蜂蜜的母亲，寒潮告诉我们，是时候采集它了：那是最新的蜂蜜，最初的蜂

蜜，它的回归意味着孕育着自己的新生的大自然正在地底悄然震颤。已是新年时节。当藤蔓开花，兼以霜降，这意味着有馥郁的蜂蜜可采；同时，鸟巢中雏鸟始生，母犭狝已经怀孕，而落叶之下、树根之间沉睡的蛇也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藤蔓开花了，这就是kyrypretä、jeivi和avia pytä快乐的歌声所传达的。它们栖息在枝头，听见它们的歌声让人多么愉悦，而得知它们正在召唤大家参加tö kybairu又是多么让人激动！

蜂蜜被称作ai，又名tykwe，意思是果汁，比如myrynga tykwe的意思就是myrynga蜜蜂的果汁。但最初的蜂蜜，藤蔓的孩子，被称作kybairu。人们用它来为亚契人最盛大的节日命名。在这个节日里，所有irondy齐聚一处，共同品尝大自然最初的果实，最新的蜂蜜，也就是kybairu，来庆祝世界正常运转，同样的季节按时回归。蜂蜜庆典是一个大好时机，它提醒人们真正的社会是部落（tribu），而不是小团体（bande）；因此tö kybairu——严格来说，这是只有大人才能参加的游戏——明显蕴含了人们重建更大社群的愿望，即便只是在短短一段时间内。Tö的意思是头，或者说，人头，因为另有别的词来指称动物的脑袋。Tö kybairu是一种游戏，参与其中的男男女女会把自己的脑袋挨在一处，好让它们共同组成同一个图案，从而结为一体，就好像盛满蜂蜜的蜂巢中组成每一层的蜂室一样。蜂巢是社会的隐喻。这就是为什么陌生人不需要亚契嘉图人加入——他们属于另一个蜂巢。人们只和自己人玩这个游戏。

“当kyrypretä鸟开始欢鸣时，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去拜访cheygi的营地了；是时候团聚了。我们很开心。我们很高兴再次见到同伴。所有人都会大声欢笑，场面会很欢乐。那儿会有女人。”Cheygi是谁？他们是其他小团体中的人，他们已经很久没见过对方了。他们很高兴见到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亲朋。但他们尤其高兴能见到女人，cheygi的女儿和姐妹们。他们缺女人；他们将要玩的这个游戏当然是蜂蜜的庆典，但不仅如此，它同时也是爱的庆典，让人们得以在pravo——追求女人——的快乐中自我放纵。“拜访cheygi是为了追求女人。”这是蜂蜜的庆典，求爱的盛会。

最要紧的是得拿得出手，不能看上去邋里邋遢，那样会吓到别人：男人很用心地拔掉自己的眉毛，因为女人不喜欢像动物一样眼睛边上长毛的糙汉。头发也得好好收拾一番：他们剃干净自己的前额和头顶，整个发型呈冠状，并把头发蓄至脖子处。那些肯花心思又能打到所需要的动物的人还会做头饰，他们将美洲豹皮卷成锥形，饰之以一络络垂到肩

膀上的浣熊尾巴。头饰很漂亮。如此打扮的男人才是个真正的亚契人，一个伟大的猎人。所有不同小团体中的男人都费尽心思，以讨女人的欢心。他们都在为欢爱做准备。无论婚否，每个人都指望着与游戏期间看对眼的漂亮的cheygi女儿来一场叫人心醉神迷的艳遇。但对于还是光棍一条的年轻男子来说，吸引他们的可不仅仅是春宵一度带来的意料之中的欢愉，更激动人心的是，他们还可能在此找到一个妻子。原则上，印第安人不会在小团体内部通婚，而是会去其他小团体娶亲：tö kybairu 同样也是不同小团体的男子之间交换女人的机会。就这样，在6月的严寒中，鸟儿的歌声激荡着年轻亚契男子的心。



ambwa：猎人在庆典上戴的帽子

去找女人！印第安小团体前去和彼此相见时，这本可以是他们的进行曲。然而，这一场合的严肃性要求人们慎重行事——尽管这丝毫不会有损过程中的愉悦。尚有难关需要克服。途中，男人留心辨认着可能是蜂房的树洞。因为天气很冷，蜜蜂都很呆滞，完全没有进攻性。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取出蜂蜜，女人会用它盛满大大的daity。会有很多kybairu可以分给同伴。蜂蜡则被保存了起来：在仔细咀嚼过之后，人们将它捏成丸状，码好放进篮子里。远方淡淡的烟雾、足迹，还有微不可闻的叫声告诉人们，cheygi已在不远处。在相聚的前一天，男人会准备好蜂蜡、炭粉和树脂的混合物。这东西很稠，味道很好闻。女人便是用这玩意涂抹男人的。首先是脸：她们用黑色的炭粉涂抹他们的前额、两颊和嘴巴四周；其次是整个躯干，正面背面都要画，再沿着手臂画上长条。有些男人会让女人在此基础上用准备好的糊状物画上细线，然后在上头黏上白色的urubu绒毛。还有些人会让人在剃干净的脑袋上画上同样的

纹饰。男人们已准备完毕，人们知道，cheygi现身时会带着同样的装扮。漆黑的炭粉将白皮肤遮掩了起来，乌黑一片的脸上，眼白熠熠发光。这些男人，看上去十分恐怖！他们会吓跑敌人。事实上，这就是亚契人发动进攻时用来覆盖全身的战争用装饰。“来偷东西的Iröiangi一看到我们浑身漆黑的样子就会被吓跑。他们怕我们！”

事情就是这样：一次和平的聚会始于对暴力的展示，但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即将在此举行的联姻来加强所有cheygi之间的政治联盟。女人和孩子稍稍落后几步，男人已经到达了一块赏心悦目的空地，弓箭在手，盛装打扮。双方面对面站着，战士们已经做好了攻击对方的准备。他们是否真的会那么做？完全不会。这里并没有恶意，所有人都心平气和。那这究竟是在干什么？人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清楚，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实上，交换女人以及通婚并不仅仅关系到将要结为夫妇的男男女女。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涉及了两个群体：接纳这个女人的群体和交出她的群体。当一方从另一方手中拿走某样东西时，不平衡就出现了（尽管现在或将来，会有另一个女人取代第一个女人的位置）：一方受损，一方获益。婚姻并不是什么中立的行为；它使事情发生变化，而这有时会引起冲突，导致暴力或战争。

瓜亚基部落内部曾经征战不断。有时候是为了攻占一块猎场，但更多时候，就像洛萨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掠夺女人。这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男人几乎永远多于女人。就算事情可以通过允许一妻多夫而得到解决，复婚制并不能永远保证每个男人都能拥有至少一个女人。这个麻烦会危及部落生活，部落因此决定攻击陌生人，并偷走他们的女人。最年长的亚契嘉图人仍记得几十年前，他们曾夷平另一个部落的一个分支，那些人居住在遥远的东方、靠近巴拉那河岸。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的男人，并夺走了女人。人口状况出现了反转：好几个男人都有了两个妻子。

在婚姻和暴力、女人和战争之间有一种秘密关系。人们为什么要用一次剑拔弩张的表演作为tö kybairu庆典的开场，并打扮成战士的模样？这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并小心不要忘记——他们与cheygi之间即将因为交换女人而建立起纽带，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这些马上就要成为姻亲的男人之间的对立，而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男人和他姐妹的未来丈夫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这样解决：或是通过打斗的暴力手段，或是通过结亲。你可以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之后掳走女人，同时把你的姻兄弟变成敌人；你也可以和平地交换女人，这样两个部落就成了同盟。战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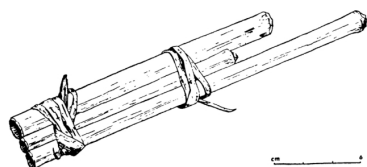
一次侵略性的拜访，和平的访问则像是一场被成功避免的战争。但二者同出于一个目的：为了得到女人。当然了，在cheygi内部，在同一个部落的男人之间，不存在挖走别人妻子的问题。但最好还是顺从事物的本质，将联姻中的暴力因素公开展示出来，而不是遮掩它。他们不会真正发动战争，他们要模拟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群涂着装饰、全副武装的男人，正站在即将举行聚会的空地上盯着对方。他们只是装出凶狠的样子而已，但是你不能把它视为儿戏。假装开战之后，接下来必须要有和解仪式；这可以证明前往tö kybairu的路不是通往战争的道路。弓箭被放到了地上。男人们向对面走去，两两成组，一人来自这个小团体，另一人来自另一边。这些二人组可以继续站着，但通常人们会选择坐下。这是亚契人唯一允许——甚至渴求——肢体接触的场所，而日常关系中，肢体接触是被严格禁止的。你很容易注意到对印第安人来说，触碰对方这种事情有多令人反感。人们分发食物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是直接用手递过食物；相反，分发食物的人会把一大把幼虫或是一块肉放在地上，然后接受礼物的人会把它捡起来。这种谨慎很明显是出于良好的礼节。然而这背后还有别的原因：人们相信，肢体接触是一种攻击性行为。因此，如果你想要否定当前这个时刻表面上的攻击性，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破例接受肢体接触这样一种人们平时公认的、饱含敌意的行为。如果男人现在连这都能接受，那就意味着他们真的不是敌人。就这样，人们开始了某种仪式性的游戏，这是通往仪式各个环节的必要前奏：kyvai，挠痒痒。战士们两两一组，双臂互相环绕着，将手指伸到同伴的胳肢窝和肋骨底下。这可以算是一种比赛，比的是谁最后才笑出来。人们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憋笑，同时忍受挠痒痒这样一种陌生的折磨。通过允许让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互相触碰，kyvai的真正作用显露了出来：建立或加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在营地，经常可以看到某个亚契嘉图人靠近一个陌生人，并要求对方坐在自己身边。这两个男人会把脑袋抵在一起，然后开始kyvai，并且像爱人一样用哄人的声音絮语着，向对方自信满满地发起挑战：“你看，cheygi，我们正在进行kyvai。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发笑，让我们开心。我会挠你的痒痒，你可受不了这个。你会开始大笑，然后躲开。我们是朋友了。”那个受此酷刑的男人绷住身子，双臂紧紧夹在身侧（但这样他也没办法挠另一个人的痒痒了），徒劳地憋住气，用力到面目扭曲，但他没法坚持太久。突然间他破功了，抽搐之下浑身发抖，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想要逃走；另一个人试着拦住他，他们就这样僵持了一阵子。最

后，笑到快背过气的cheygi打着喙尖声求对方高抬贵手：“够了！痒死了！我肚子都痛了！”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至于我，如果我要请别人帮忙的话，最好还是避免被拒绝的尴尬。因此，最好找个cheygi，而为了和他建立起这份友谊，我会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沉溺在kyvai带来的快乐中。这可真是件每个人都能分享的乐事。我找的同伴——在其他场合我可没那个胆挑战他——会在几分钟的挠痒痒攻势之后崩溃在地，变身成一位满地乱蹬的赫拉克勒斯，像新生儿般抽噎不止。

有一次，我想对一个怀胎多月的Iröiangi女子表示友好。我手还没碰到她，她就猛地移开了，看上去很是局促，但没有生气。“Bayja vwä!”另一个女人喊道，“这是因为bayja!”然后她向我解释道，因为我想要对一个怀孕女子进行kyvai，等孩子生出来时，我就会遭受bayja。我必须接受kymata藤蔓的净化，不然就会被美洲豹吃掉。等时候到了，他们就为我进行了净化，我半只美洲豹也没碰上。

Tö kybairu的开幕式结束了。男人们进行了一次成功的kyvai，大家都很高兴，现在所有人都成了cheygi。人们很快就扎好了营，里头到处都是亚契人——一整个部落都在这里。男人去河边洗掉已经完成使命的油彩，女人则唱起了仪式性的祝词。Daity中盛满了蜂蜜，散发出阵阵芳香，棕榈刷子也已经准备就绪。两种野猪肉正在火上大块大块地烤着。印第安人聚在一起庆祝时，他们最喜欢吃这种肉，而男人也在打猎时收获满满。就这样，他们在傍晚吟唱着，或者说是激昂地宣告着自己的英雄事迹。那些故事大多相似，用热切的口吻不加修饰地道来，并永远以同样的方式作结：“我是个了不起的猎人！是我，我就是最伟大的动物猎人！”这样，第二天即将与他们寻欢作乐的女人就会知晓追求者的一切优点。她们聆听着男人的吟唱，同时用巨大的空心竹竿在地上打着拍子。乒！乒！它发出悦耳的回响。年轻女人在男人讲完故事之后开始唱歌吹笛，男孩们应和着她们，因为他们为这一场合特意制作了minby。年老的女人则吹起了用秃鹫骨雕刻而成的哨子。喊叫，歌声，欢笑，音乐，佳肴；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再加上美貌的女人。Jura ury pute!他们高兴得放声大笑。第二天，他们要抢proaä。



mimby：风笛



用秃鹫骨和蜡制的塞子做的哨子

事实上，争夺proaä才是聚会的目的，也是仪式的高潮，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一刻。Proaä是一种大个头的豆类，有点像欧洲的蚕豆，生长在森林中藤蔓的豆荚里。在proaä mata这一游戏中，某个人（不拘男女）会把一颗豆子放在自己的腋窝或拳头里。游戏的目的在于迫使此人交出豆子：人们会开始挠他的痒痒，没多久他就会放弃，胜者则会拿着这颗大家都虎视眈眈的豆子在空空中大肆显摆。但与先前两两一对的和解仪式不同，在这个tö kybairu中，所有成年人都会联手对付豆子的持有者。游戏一开始，所有人都围坐在他身边；同一时间有数十只手一起挠他。他在地面上打滚，人们扑到他身上；他试着逃跑，人们抓住他。一堆堆的人倒在彼此身上。这是一场疯狂的混战，女人高声尖叫，男人则低声闷哼。此外，孩子可不能参加这个游戏，因为人们是如此忘乎所以，其中的暴力冲突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更何况，这事也和孩子没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这个游戏正是男男女女选择彼此的时机。已婚者可以在此找到婚外恋对象；还是单身的人可以示爱，如果这份激情能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可以结婚。

部落团聚期间，人们全程都在玩这个游戏。每个人都会轮流持有那颗豆子，然后豆子又被人抢走。男孩女孩很容易就会在心上人面前将豆子拱手奉上：在某个人的挠痒痒攻势下投降，这么做和示爱无异。我心甘情愿让你拿走豆子，这样你就会允许我拿走些别的东西；而我之所以这么卖力地想从你手上抢走proaä，是因为我想要你。Tö kybairu是肉身的庆典。一切事物都成了触碰和使用身体的借口。若是有女人正在唱歌，一群男人会从天而降，然后展开一场猛烈的kyvai。所有人都兴致满满，这份愉悦让他们开始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只有脾气臭到极点的人才会这样的集体狂欢面前无动于衷。作为一次全民盛典，tö kybairu同时庆祝了两件事情：一、整个群体都齐聚一处；二、自然作为秩序之所在。人们一起享用最新鲜的蜂蜜，种种乐事衡量着人与人的友谊，爱情的竞争中也诸事不忘。Tö kybairu实现了所有人隐秘的期望，对生活之乐的神圣召唤予以回应——这就是最重要的节日。

这同样是结亲的时节。如果两个年轻人在数回合的挠痒痒较量中已经相互打量过，也已不止一次春风一度，并决定长期共享meno的欢愉，

这种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考虑结为夫妻。一旦他们做出了选择，也下了决定，剩下的事情就很快了。他们会话不多说，直奔主题。“Cho reko jwe,”男人说道，“我想要拥有你。”“Nde reko vera,”姑娘回答道，“你会拥有我的。”在这种语境里，占有更多是指丈夫能够拥有自己妻子这一特权，而非肉体意义上的占有。接下来，年轻的丈夫会搭起一处tapy，那将是新婚夫妇的家。在那之前，双方都还和各自的父母住一起。但从今往后，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火堆，年轻女人会为自己的丈夫做饭。等到小屋落成，男人便会去他岳父岳母家。他们的女儿正坐在那里。年轻男人粗暴地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拖在身后：“到我的tapy里来，坐到我旁边来。”这是对绑架女子——breko mata，抢婚——的模拟，尽管整个步骤已经简化成了纯粹的装样子。由于任何冒犯都会引来报复，接下来女孩子的父亲会进行jepy。具体怎么做？——他会用拳头打自己的妻子。至此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剩下要做的就是由女婿在第二天把猎物献给岳父，幼虫则献给岳母。等到小团体各自上路时，新婚夫妇可以自行选择加入夫妻中一方的团体。而且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们在那里过得不开心，他们很容易就可以重新加入自己的cheygi。但通常，人们会选择和女方的亲戚一同生活。

男人会和什么人结婚？显然，他们可以和任何人结婚，除了重大禁忌所涉及的那些女人：母亲、姐妹、女儿，还有就是“教母”和“教女”。过去，择偶时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可能要更复杂些。但现在，很大程度上由白人追杀导致的人口减少，以及女性人数的稀少导致他们无法遵从比这更严格的规则系统。为了让每个男人都能娶到老婆——哪怕需要和另一个男人共享，禁忌被简化到了最低限度。不然的话，到处都会是单身汉，社会的存续也会在短期内受到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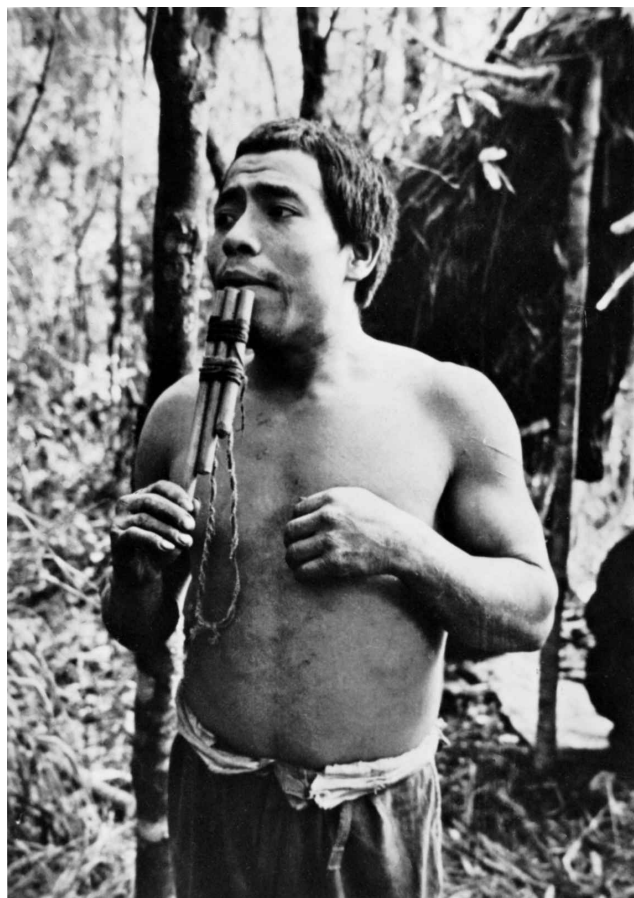
所以，对一个男人来说，可供选择的女人范围非常有限。这一困难局面导致了不少奇怪的婚姻。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男人娶了自己姐妹的女儿这样的婚姻——这是古时图皮-瓜拉尼人最中意，甚至可以说是最经典的婚姻形态——而是，举个例子来说，居弗库基娶了不忠的奇米拉基，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很可能，再早几十年，这样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被看作是乱伦。但现在，人们完全不会这样想，瓜亚基人眼中的乱伦只有上文提到的五例。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最后两种情况并不是太严重。但与之相对的，在涉及前三种女人的情况下，违背禁忌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乱伦会招致它自己的惩罚。就算人们不去惩罚有罪的男人，他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且再无挽回的可能。任何和自己母亲睡觉的人都会变成一只獾，和自己姐妹睡觉的人会变成一只吼猴，睡

了自己女儿的人则会变成一只孢子。乱伦的男人灭绝了自己的人性，违背了身而为人最重要的原则。他弃绝了自身，自绝于自己的文化，重新堕入自然之中——他变成了动物。没有人可以在为世界带来混乱后依然逍遥法外。构成世界的各个层面必须各安其位，自然与动物在此，文化与人类社会在彼。彼此之间，无路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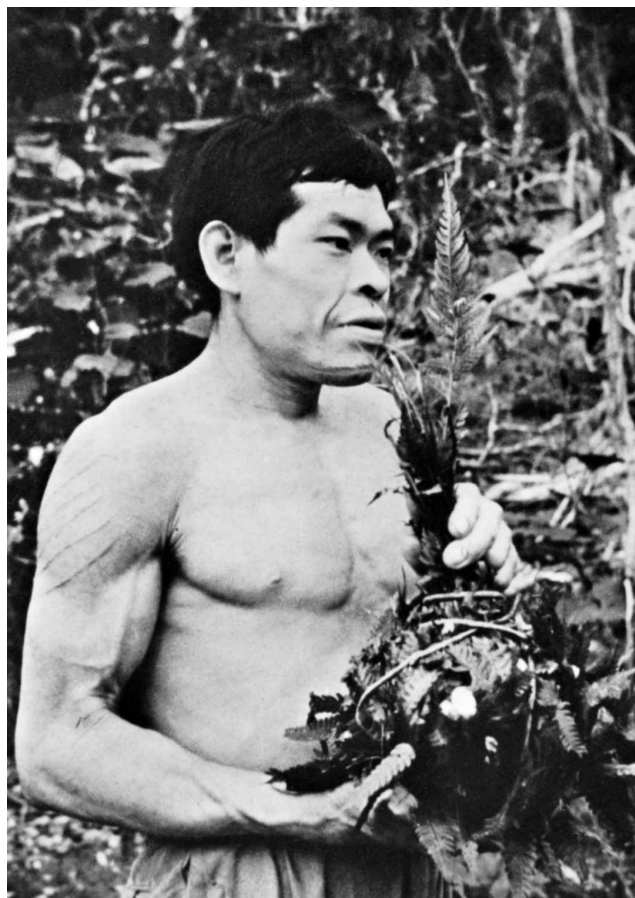
亚契人前去参加tö kybairu时走的是一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路。大寒给了他们信号。作为生者，作为准备好回到自己故乡的人，他们会不会是唯一前往聚会地点、并在那里将颂歌献给生之丰饶的人？不。寒潮与风霜同样也是亚契死者的pichua。怀着对下界的乡愁，亚契先祖的灵魂从天上的居所降临到了世上。他们是不是想要扰乱生者的聚会，让后者不再想要维持作为生者的身份？有可能。但tö kybairu占了上风：它所希求的恰恰是世间生命力的复苏与再临，它表达着它的精神，庆祝着它的胜利。那些夜间的居民在寻找些什么？这些惨白的游魂想要从不再畏惧他们的生者那里获取些什么？但他们还是来了——大寒可以证明这一点。但tö kybairu呢？它恰恰是生活在下界之人的节日，是对死亡的公然挑战，它确凿无疑地宣布，死亡已经无法再左右亚契人。Tö kybairu是死亡的对立面。大寒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既是怀着蜂蜜的藤蔓的pichua，也是死去的灵魂归来时的漫天风雨。它告诉我们，这归来是徒劳一场。毫无疑问，凡人皆有一死，这是他们的命定之路。但人们无法沿着反方向而行。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这里同样存在着一种秩序，它让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相分离。既然如此，为何生者和死者会同时出现在这里？因为这是生者欢快而充满嘲讽的诗篇：任何对秩序的颠覆也无法使注定两不相干的事物相聚在一起。

一个月后，陌生人在6月底再次出现在了白溪。他们瘦了些。刚回来的那几天，他们没怎么说话，只和自己人待在一处，也没有与亚契嘉图人打交道。节日过去了，tö kybairu已经结束。这也是最后一次tö kybairu。亚契人的心中，生之欲望与欢乐已经一点一点地抽离了。

(1) 作者名皮埃尔（Pierre），在西班牙语中是Pedro，“佩德罗”。



给逝世母亲的哀歌



加古基

第六章 杀戮

对于一个瓜亚基部落来说，与他者的关系只有敌对这一种可能。白人，Machitara-瓜拉尼人，甚至陌生的亚契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和他们只有一种语言可讲，那就是暴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伴内部，你可以感觉到瓜亚基人始终致力于消除一切暴力关系。在那里，贯穿始终的只有最一丝不苟的礼节，对任何会导致某人屈居于他人之下的尊卑之分的拒斥，全体成员对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渴望，人们也力图用语言化解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摩擦与怨怼。By-ïä意味着不再镇定，失去神智，而他们不愿意看到irondy陷入这样的状况。必须立刻阻止这一局面：女人很快就会出手干涉，去安抚那些暴怒的男人。大人们从来不会打对方，除非是仪式要求这么做。而更让他们难以想象的，是世界各地小孩受到的体罚。Kromi和kybuchu是他们父母真正的主人；大人们心甘情愿地当着奴仆，而尽管孩子们不会向大人撒气，有时却也会考验后者的耐心。但他们之间从不会有任何粗暴的举动，也不会有恼怒之下不由自主的耳光，只有女人细声的抱怨和男人半点用都没有的哼哧。最后占理的永远是孩子。譬如，某个小女孩的固执就在她父亲面前占了上风：她想要出去散步，但她只想和他一块去，而且只想坐在他肩膀上。他并不想去，但疲于听她一再重复“Jachi raa! Jachi raa! 把我扛在肩膀上！把我扛在肩膀上！”，他最终还是屈服了。这个倒霉的男人服从了小暴君的心血来潮，驮着她在营地里来回走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咕咕哝哝地抱怨着。

有一次，怀胎多月的皮楚基从森林里回来了。她背着满满一篮幼虫、水果和家里的其他什物，篮子在她脑门处挂住；篮子上方的肩膀上坐着她那不愿走路的两六岁的孩子。愤怒之下我走上前去骂了那个小男孩：“你看看你！这么大人了还不会走路？”他蛮不在乎地看着我，他的母亲则替他开脱道：“他还是个孩子！他脑袋还软着呢！骨头还脆着呢！”我又多管闲事了，就好像某一天，我看到某个女人不顾寒冷的天气给她发烧的小女儿洗澡一样。冰水刺得她尖叫起来。我认为这会害死孩子，结果做母亲的很生气地让我一边待着去：“身子很热的时候我们就洗澡！我们亚契人就是这么弄的！”她是对的。我难免会办这样的蠢事，但这不会影响我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

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亚契人厌恶暴力，尤其当暴力在他们看

来会危及他们的孩子时。而显然，巴拉圭人对年轻人的抓捕与贩卖为奴导致大人们的担心开始变得走火入魔。这种担心很感人，但有时候也会有些滑稽。Kybuchu有一个足球。他们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但是很喜欢追着球跑。有时候男人们也会加入，可球技远比他们精湛的孩子们却不让大人碰到球，并淘气地以此为乐——他们总是在最后一秒把球骗走。在激烈的叫喊声中，孩子们互相扭打，还会跌倒在地。这一切发生时，母亲们根本没法淡定地观看比赛，而是迅速陷入巨大的焦虑之中。经常会有某个抽泣的女人作为代表过来找我，恳求我立马介入其中，终止这场显然即将变成大屠杀的活动。“我一共就两个孩子！”她在我鼻子底下晃动着食指和中指，催我去救他们，“我们不开心！很害怕！我们不想看到kybuchu打架！”可他们根本没有在群殴。总而言之，母亲们会使用一系列手段，包括哀求、生气的命令和挽歌制造出巨大的骚动，游戏很快就会终止。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里角色颠倒了：孩子们成了投降的一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听话，而是为了求得一点清静，仿佛对他们而言，母亲们的抗议只是一个等着他们来满足的任性之举而已。

但另一方面，有些时候，这些母亲的冷酷无情，甚至残忍让我感到震惊。有天，一对兄弟拿了他们父亲的大砍刀出门玩。笨手笨脚的哥哥伤到了弟弟的脚，一时血流不止。弟弟开始大哭，哥哥出于害怕跑走了。他们的母亲听到了骚动，来到两兄弟所在的地方。我本以为她会哭天抢地，但她没有。她走上前去，盯着儿子看了一会儿，嘀咕了几声便转身离开了，把儿子留在了那儿。我们把他清理干净，给创口上了绷带，又强迫他静静躺了许久（虽说他想去找其他kybuchu）。接下来我走了差不多两百米，把他扛到了他父母的小屋。他母亲正坐在那里剥木薯，她无动衷地看着我们走了进去。不久前，正是同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只有两个儿子，也是她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们追着球跑。可似乎，儿子的伤势对她来说根本无关痛痒。我把孩子安顿在她身边，她立马迸发出了一首chenga ruvara，那歇斯底里的声音似乎是在表达最最深切的悲痛。哪个才是真的？是她那看上去蛮不在乎的沉默，还是chenga那仪式性的放声高歌？我分辨不出来……

下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上面说到，亚契人委任我去做卡加瓦楚基和他妻子的和事佬，我便去白溪接她的丈夫。夜半回到营地时，我诧异地得知，男人和他的小儿子（大儿子被我扛在肩上）不在那里，而理论上他们本该比我先到。你很难想象他们会迷路，因为印第安人从来不迷路。但我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他们静悄悄地出现了。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我听到了他的解释。在白溪和新营地之间，森

林被一块空地分隔了开来，这是几户巴拉圭人家为了种玉米和木薯清理出来的。其中一户是家boliche⁽¹⁾，一家小规模村中“小店”，在那里你可以买到烟酒、手电筒电池，还有盐和糖。我需要补充一下自己的烟草储备，因此，虽然天色已晚，我还是决定绕上几公里的路去买些烟。我告诉了卡加瓦楚基自己要去干什么，让他先走，并告诉他，我和他的大儿子会晚点到。他同意了，我们就分头上路了。我买到了东西，一边在油灯的灯光下与店主用瓜拉尼语寒暄了几句。突然间，他的狗朝着森林的方向狂吠了起来，但黑暗中你几乎看不清森林的样子。“几只林子里的野兽罢了。没事。”男人说。我和kybuchu动身离开了，后者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但他父亲又在干什么呢？他告诉了我，并因为怀疑我而感到几分羞愧。当我告诉他我要去买烟时，他并不相信我。暮色中只有我们几人，远离亚契人的地盘，又离Beeru很近；他当时很确定我在撒谎，他以为我打算带走他的儿子，把他交给白人！

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决意阻止这件事，就暗中尾随着我，藏身在树木中，观察着Beeru房子中的动静。狗嗅到了这个主意已定的亚契人，他下定决心要救下自己的大儿子，尽管他孤身一人，拖着小儿这个累赘，身上也只有弓箭可作武器。他等了片刻，发现无事发生，又看着我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路了，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并没有因为卡加瓦楚基不相信我而感到郁闷，因为成百上千的不幸事件告诉印第安人，白人狡诈而残忍，而我对此再了解不过了。甚至，对他来说，毫不犹豫地进入陌生白人的地盘已是充满勇气的举动：他坚信这些白人可能会放狗咬他，抓住他，甚至用步枪射杀他。这件事让我对卡加瓦楚基多了几分敬意，但它也招来了一段让人意料不到的后续，害我陷入了某种尴尬境地。对卡加瓦楚基来说，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夫妇之间的调停者（尽管我本无意承担这一角色），同时，他对我倍感信任，因为我保护了他的儿子，没有把他交给白人。他是否想要表达谢意？还是说他觉得我于他有恩？不管怎么说，两三天后，他那在与加佩基的偷情中感到失意的妻子找上了我，向我提出了赤裸裸又不忠的邀约：“我们到林子里去吧！为了meno！”我大笑回答道，我倒是很乐意这么做，但是我害怕她的丈夫。她二话不说就找到了他，把他带了回来，当着我的面问道：“Cho pravo!我就选他！Nde rö jepy vera？你要报复吗？”本着想让大家满意的心态，这个遵从传统又充满善意的男人回答道：“没有复仇！只有jepy rave!只有装样子的复仇！”这下我左右为难，装样子的复仇难道不会变成真正的惩罚吗？你永远说不准，更何况，用弓敲脑袋，哪怕只是仪式性的，但那依然是拿弓敲一下脑袋啊！事已至此，我拒绝

了女人的提议。卡加瓦楚基没做出太多反应。他刚除掉了加佩基，不是很情愿和我共享自己的老婆。另一边，她则以此为新的借口来奚落我，还生闷气。倒是她儿子在评论这件事情时一语道破：“这个女人想做爱。”

然而，恰恰就是这个kybuchu的命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父亲为他冒了如此大的风险，可这件事中展现出来的父爱与关怀，却似乎与他的命运相矛盾。陌生人去参加tö kybairu时，卡加瓦楚基也带着全家一同前往——其中也包括他那得了重感冒的大儿子。他不想把大儿子留在白溪。他们动身两天后，在距离营地差不多半天路的地方，一个在玉米地里耕作的农夫听到了微弱的呻吟声。他循声而去，找到了声音的源头。在那里，他发现一棵大树根部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那是卡加瓦楚基的儿子。他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有力气呻吟出声。男人带他去了最近的巴拉圭村庄；人们试着救他，给他打针，却回天乏术。他在三天内去世了，显然是死于暴发性肺炎。他独自一人在森林里的树根脚下待了三个夜晚，生着病，又没有火。没有动物袭击他已经是个奇迹。

奇怪。这个男人冒了生命危险去救自己的儿子——这或许只是想象中的危险，但对他而言，那危险真实存在；但也是他，在儿子身患重病时，留下他一个人孤独死去。卡加瓦楚基回来时，我问起了这件事。“Achy pute, mano ruwy.他病得很重，只剩一口气了”。Mano的意思是死，但也有病重的意思，对印第安人来说，二者几乎没有差别。有些时候人们能被治愈，还有些时候则不然：他们当然还活着，但死亡已经降临，招致死亡的疾病也已经将他们扯离了生者的队伍。他们不过是靠着缓刑苟延残喘着罢了，但很快，时间便会为这短暂的折磨画上句号。然而对这些尚未成为尸体，却也不再活着的人，你还能怎么办呢？坚定地期待他们康复显然是愚蠢可笑的行为，因为他们已经是mano——另一边的人了。更何况，他们对其他的人来说很危险。他们的死亡可能会传染，也没有人想要靠近他们。与死亡为邻意味着把自己暴露在同族的攻击之下：灵魂、鬼魂和幽灵会抓住一切机会折磨生者。这就是为什么卡加瓦楚基把自己儿子放在树根下，然后接着上路了。这么做残忍吗？亚契人不那么认为，也没有哪个人会因为他这么做而出言责备。我们西方人或许会觉得他很残忍，但那不过是因为我们向来认为，疾病是能被治愈的。可如果没法治愈呢？亚契人就是这么想的：流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未知的疾病，在他们与白人接触之前，这种白人的疾病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它让他们伤亡惨重，他们不知道这种病叫什么，且对之束手无策。当我告诉他白人试图救治他的儿子，却无功而返时，卡加

瓦楚基并不惊讶。更何况，难道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没有展示出大人对小孩近乎夸张的溺爱吗？他们甚至连严格都算不上，这样的亚契人怎么可能残忍得起来？

孩子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但即便如此，有时候人们也会杀掉他们。

当我得知女人的数量少于男人时，我几乎和当年的编年史家一样惊讶。瓜亚基群体中的性别失衡可谓是长期问题了，早在17世纪初就有这方面的报告，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也证实了这一点。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你甚至不能把它归因于某种基因上的畸变，以为是它导致女人生下的男孩人数多于女孩，因为当我给在世的亚契人立族谱时，很明显，男孩女孩生下来时人数大抵相等。但是后来很多女孩都消失了，而每当我问起这件事时，人们总会用短短几句话搪塞过去：“她已经死了，因为复仇。”在她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亚契人是不是想隐瞒些什么？

不，事情与某些需要把我蒙在鼓里的秘密毫无关系，而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瓜亚基宗教的根基是这样一种信仰：他们相信死者是一群不可见的幽灵，他们不愿意离开生者的身边。所有人都清楚知道这事，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能证实这一点：死者下定决心，要赖在人们居住的地方。那样的话，人们又该如何送他们上路，前往灵魂的栖居之所呢？人们该如何摆脱死者？有几种办法。首先，如果有人死了，所有人都要立马离开营地，在很远的地方另行安营。亚契人希望如此一来，死者的Ianve就没法找到他们的行踪。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这么办，问题也安全解决了。但如果死的是个孩子，人们会留在原地。孩子们不危险，他们还没有Ianve——那个夜半在篝火四周徘徊的凶狠狡猾的“灵魂”。哪怕人们把他们的小小身躯埋葬在帐篷下方，也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批最后才来到白溪的亚契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中的一个孩子得了病，几天后便死了。他的父母在tapy底下挖了个洞，这成了孩子的墓穴。

切不可低估鬼魂。他们在生者之中大搞破坏，以至于几乎所有死亡都可以算到他们头上。死者很擅长以各种面目示人。有些时候人们能够及时认出他们，避开攻击；但还有些时候，这些灵魂令人躲闪不及。比如说，有一天托康基和卡雷库伦布基在打猎途中，发现正对着自己的是一头巨大的美洲豹，立在一根被雷电劈倒的树干上。这野兽没有半点惧意，正打算扑向二人。但卡雷库伦布基是个出色的猎人，向来箭无虚发。他先后射出两箭，贯穿了baipu的胸口。托康基知道这是怎么回

事：他立马认出了自己的母亲。她已去世多年，很少有人还记得她。但她还没忘记自己的儿子——他现在已是老人了。她想要杀死他，这样她就不会在beeru prana，在死者灵魂的大草原中孤身一人了。为此她化身成了一只巨大的美洲豹。幸好那个年轻的bretete（出色的猎人）在那里；不然托康基恐怕要就此一命呜呼。相较之下，加古基就没有这么幸运。有一天他面色惨白跑回营地，害怕到说不出话来。他摩挲着肩膀，上面有道伤痕。马上就有人动身去取了些kymata藤条来，加古基得到了净化。他当时正在砍一棵冻子椰子树，结果6月的风一吹，将附近一棵树的树枝吹折了下来，堪堪避过他的脑袋，倒是他的肩膀接了一记重击。他成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受害者。据说，女人通常会选择攻击她们鳏居的女婿来为自己死去的女儿“报仇”，同时，这也是为了在他们那儿试试运气，好让他们在死者的栖息之地成为自己的丈夫。很显然，这些死去的丈母娘想要和自己年轻的女婿快活一番。

当托康基和他的救命恩人背着美洲豹回到营地时，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应有的欢呼。美洲豹可不是每天都能打到的。女人们用响亮的chenga ruvara向baipu致意，男人们开始了吓人的jeproro，至于杀死它的卡雷库伦布基，人们用piry树皮为他按摩了一番。杀死美洲豹可不是杀死什么随随便便的猎物，它会给猎人带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还要用一大块蜗牛壳在他身上摩擦：这样他就不会碰到其他想要为同伴复仇的美洲豹。人们给美洲豹剥了皮后便将它切开，把肉一分为四，架在一个巨大的木烤架上。亚契人酷嗜美洲豹的肉，所有人都可以吃这种肉。至于脂肪则被保存了起来，日后可以用来治疗骨痛。但是有些亚契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它，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皮肤突起，让男人看起来像只浑身斑点的小鹿。

很少有哪天是在没有幽灵打扰的情况下过去的。人们立马就能发现它们，因为疾病是幽灵到来的标志。它们在场时总是会有人得病，或轻或重：可能是感冒，消化不良，或是骨头发沉。但是就算知道某人生病是因为吃了不该吃的蜂蜜或猴子肉，人们依然能迅速辨认出，是哪个死者把他的灵魂连同疾病一起送进了病人的身体。想赶走它不难：他们或是会举行kymata tyrö的仪式，或是会用蜡和树脂的混合物涂抹病人的身体，这种混合物的香味会让Ianve不舒服，还有的时候，人们会将病人全身糊满灰或泥。孕妇很擅长治病。她们腹中的胎儿让她们拥有了远超过其他亚契人的治疗能力。她们的唾液非常有效，可以喷洒在病人患病的部位。若有孕妇来照顾你，这基本上是你能够痊愈的有力保障。此外，这些女人还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消息，而且知道得远比别人要早。她们

腹中的孩子告诉了她们一切。如果有一群野猪在这一带转悠，她们是最早知道的。她们会告诉猎人，后者会立马朝着她们提示的方向出发，在那里找到野猪，然后大开杀戒。此外，一个群体中之所以最好能有个孕妇还有另一个原因：胎儿可以在任何人之先听到敌人逼近的声音，尤其是白人。然后他会告诉他母亲，如此一来，得到了预警的亚契人就可以远远逃开。最后，这些尚未降生的小家伙还有一种力量：他们可以预见未来，预知死亡。若有某个亚契人得了不治之症，胎儿会立马意识到这一点，并告诉人们，某人快要死了。他们很少会弄错。8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卡雷基的女人生病了。她日渐消瘦，呼吸声也重浊了起来。人们一直在照顾她，直到某天，年轻的、怀着身孕的布里古基宣布，她腹中的孩子告诉她，卡雷基要死了。人们遂不再照顾她，因为这已无济于事。几天后她真的去世了，她的丈夫布库基从此成了鳏夫，并因此受到亡妻的Ianve的威胁。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小屋，住到了远处他兄弟那里。然而Ianve嗅到了他的踪迹，并设法进入了他的身体，因此，人们短暂地为布库基的身家性命担心了一阵子。几片阿司匹林再加上乌黑的、香味强烈的涂料成功赶走了卡雷基的幽灵。



一个女人为她生病的丈夫涂画

亚契人有所不知的是，他们的邻居瓜拉尼人也同样知晓母亲与胎儿之间的这些对话。但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在那里孩子保持着沉默。类似的对话发生在他们的神话中，在关于所有瓜拉尼部落起源的伟大神话中。神话讲的是神圣双胞胎——我们的哥哥和我们的弟弟（Notre Frère Aîné et Notre Frère Cadet）——的冒险。人类的一切不幸都源出于此，而人们之所以会住在恶土（la Terre Mauvaise）上，都是因为双胞胎的母亲拒绝聆听体内的胎儿们想同她说的话；她同时怀着丈夫，天神南德鲁弗思（Nanderuvusu），和情人，“我们知晓一切的父亲”（Notre père qui sait les choses）的孩子。“什么！你们都还没被生出来，就想和我说话？”她说道，然后猛地扇了自己紧绷的肚子一巴掌。她的孩子们

被刺痛了，从此不再和她说话；她迷了路，被途中遇到的几头美洲豹吃了。天地间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而它还在继续下去。

至于亚契人，他们会听婴儿的话。离了这些话他们将不知如何是好。就连死者都需要kromi。

当一个男人在盛年去世时，他将不得不离开部落、家人和孩子，并因此感到莫大的悲伤。满怀忧伤的他在营地四周逗留着。亲朋好友的歌声和泣涕也无法说服他离开——结果只会适得其反。Irondy的悲痛挽留着他。“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他杀了很多动物！”多么深切的眷恋！这对于还活着的人来说又是多大的危险！人们痛悼他的离开，但同时，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回家，去西方那片灵魂栖居的大草原。得知他正小心地隐匿起身形，在火堆边游荡着，亚契人感到害怕。死者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人们必须献上他想要的东西。一个kybai gatu——英俊男人——的离世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导致了一种过剩，一种失序：他是某种不公的受害者，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逗留于此，等待人们偿还对他的亏欠。一日得不到补偿，他便一日不会离开。死亡害他遭受了什么？孤独：jarö，他现在孤身一人。这就是他最大的损失，但同时，人们也由此找到了补偿他的方式。世界对他的冒犯必须被报复：每当有人在盛年去世时，jepy总是紧随其后。人们按照他想要的方式为他复仇。人们满足他的愿望，而这确保了死者最终将离开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地方。Kybai gatu想要什么？他想要摆脱孤独，他想要有个人陪他一同上路，前往灵魂的居所。只要人们给他一个同伴，他就会离开。谁会成为这个灵魂伴侣，当他因为被世界抛弃而在夜半哭泣时，给他以安慰？当然不会是某个他不喜欢的人；相反，人们必须为他在黑暗中找一个他深爱的人，一个能让他欢笑的人。人们会杀掉他几个孩子中的一个，而且杀的几乎永远都是女孩子。这就是猎人的jepy，亚契人用这样的复仇向他致敬。他将女儿扛在肩头，带走了她，就像他生前无数次扛过她那样。她将永远是父亲忠诚的同伴。

当她出生时，他承担了诅咒：他成了bayja，隐形的美洲豹成群结队，向生者带来了死亡的答复。他们想要带走这位父亲，以抵消那个“脑袋尚软”的婴儿的降生为世间带来的过剩。万物必须维持原样，有增必有减。而现在，这个男人已经不在。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毕竟，他孩子的诞生不就是在传达这个道理吗？作为回报，他们也会和自己的父亲一同离开世界；他们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现在人们在为他复仇。女孩肯定会被杀掉；至于男孩，人们一般会避免对他动手。作为未来的猎人，

部落日后会需要他们。然而，有些时候他们也注定要遭受jepy。

加古基是个性情温和的男人。有些时候，他因为受到欺骗而痛苦。他年轻迷人的妻子白普朗基不知道如何拒绝他人；她也常常忘记自己有个多么好的丈夫：他总是待在森林里追踪猎物，找寻蜂巢，或是采集幼虫。她什么都不缺，却仍然觉得不满足。他本可以打她，但他什么都没做。是谁在夜幕降临时悲伤地吹着风笛？清澈的五音自芦苇笛管间逸出，婉转地呼唤着那个不愿再睡在丈夫身边的女人——她躲到了远处她父母的tapy中。每当心中烦恼时，加古基不会粗暴地动手，而是会拿起自己的风笛。然而，人们却称他为brupiare：他是个杀戮者。

尽管暴雨连天，昭示着夏天的到来，亚契人依然快速前进着。这样狗肯定会跟丢他们的踪迹，那些追在他们身后的Beeru也没法找到他们。数月前离开的雷鸟（Les Oiseaux du Tonnerre）⁽²⁾重新回到了大地，带来雨水和雾气。他们的主人Chono因此正在发怒，他那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充斥于天地间，东一下西一下劈过天空的骇人闪电也宣示着他的滔天怒火。必须趁着这个机会逃跑。正当他们前进时，这个稀稀拉拉的小队碰上了一小块空地。奇米拉基当时是瓦楚皮朗基的妻子，她正尽可能稳当地用背带背着她的孩子。若是换一个时间地点，她本该花点功夫用树脂盖住kromi的下腹部，以免孩子受到闪电的惊吓。但现在她没有这个时间。接下来Chono——雷神——的威力加倍了。他朝着亚契人周围四处投掷火焰，想要杀死他们。奇米拉基受了一击，动弹不得，但性命还在。孩子在母亲的胸口被击中了，已经断了气。就这样，因为鸟儿回到大地而大光其火的雷神，让亚契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们觉得自己终于安全时，男人们扎起了营地。

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先是甩掉了白人的追踪，然后又承受了Chono的怒火。女人的哀歌更是激起了他们的痛苦。然而，奇米拉基的哥哥冉比安基心中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却是愤怒：他的tuty——他妹妹的儿子——死了，这让他无法承受。他难以保持平静，人们也没来得及安抚他——他已经过于by-ia。绝望之下他拿起弓，在营地四处乱跑。他要为自己最喜欢的外甥复仇，亚契人也知道他即将这样做。Chono这个高高在上的掌权者狠狠地冒犯了他，而面对这个触怒了冉比安基的力量，亚契人缴械投降。他们束手无策，根本没法对抗这力量，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厄运的重负对他们来说太难承受。对面是人的时候，即便残忍如白人，他们也能想办法对抗；然而敌人若是超自然的存在，若是整个世界都对他们满怀恶意，他们就只能ete ikö iä——丧失身

体，丧失勇气，束手而降。

某些糟糕的事情正在空气中发酵。一整个晚上，冉比安基一直在吟唱。所有人都听到了死亡的话语；当这个男人侵晓时分站起身来时，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就好像他已经做出了那些举动一般。躺在那边的席子上酣睡的是白普基的大儿子，亚奇普朗基。他即将殒命。冉比安基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巨弓。Kromi娇弱的脖子没能承受住这一击。他的母亲没有目睹这一场面，她的脸埋在双手间。一记钝响过后，她开始高声哀歌：她的doroparegi，她的大儿子，这个刚刚开始蹒跚学步的漂亮的小鸡鸡，作为复仇的牺牲品被杀死了！但是她对冉比安基没有怨恨——人们已经麻木，已经感觉不到愤怒和怨恨。杀戮已经完成，男人张着嘴站在那里。现在他愿意以任何方式死去，绝不还手。然而，没有一个人打算对他出手。恰恰相反，营地的人忙活了起来，因为这位杀戮者现在有危险，他必须经历净化仪式。是什么在威胁他？不是他那个小受害者的Ove——这个无足轻重又人畜无害的游魂，已经被浣熊带到了看不见的森林所在的上界；而是Ianve，夜间的幽魂。他们必须救冉比安基的性命，而这就是女人瓦楚基和她的丈夫正在专心准备的事情。

在好几天内，brupiare绝对不会吃任何东西。他只能喝一点水，而且不能和水发生直接接触。如果他忘了这一预防措施，就会引发上古时席卷先民的大洪水。因此，为了喝水，冉比安基会将koto刷子容器中浸湿，然后吮吸它。至于meno，这是绝对不能碰的；再说了，有哪个女人会愿意和一个brupiare欢好呢？他是个被标记了的男人，而直到仪式帮他去除这个标记以前，他都会被一股危险的气息围绕，这让他成了边缘人物，一个人类社会外部的临时居民。两位净化者给冉比安基的脸和胸口盖上了厚厚一层泥。他们认真地把泥四处铺满，然后用力对身体进行了按摩。女人抓了一把泥塞进病人口中，他开始打嗝。但他必须真的吐出东西来，因为Ianve很可能已经从肛门进入了杀手体内——它常常这么做。为了防止它彻底侵入整个身体内部，必须强行把它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必须呕吐。瓦楚基多次把手指伸进了冉比安基的喉咙深处。和食物恰恰相反，Ianve会从肛门进去，从嘴巴离开。事实上，幽灵想要把他的受害人变成自己的食物；他想要从内部开始，逐渐吞食掉他的身体。冉比安基吐了出来。他精疲力竭，但Ianve肯定已经被赶了出来。接下来男人和女人用浸过kymata藤条的水帮brupiare冲洗了身子，将他从泥做的壳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冉比安基还要等上数日才能确认自己已经脱险，在此期间，他必须一动不动待在营地外面。然后世间将会再次井然有序，他也可以恢复自己那丧失了一段时间的身份——

bretete，一个真正的猎人。

夜幕降临时，奇米拉基和白普基唱起了歌来。现在是她们表达悲痛的时间。Chono带走了奇米拉基的孩子，冉比安基则杀死了白普基的孩子。然而，是Chono导致冉比安基丧失了神智。她们的歌声中只有悲哀；冉比安基倾听着她们的哀悼。其中不存在恨意，也没有自责。谁都没有错，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远在天边。但人们还是要为此落泪，这是女人的角色。奇米拉基和白普基哭泣着。

然而，更多的不幸还在后面。最终，是加古基为Chono发起的这一系列杀戮画上了句点。满怀悲伤的加古基沉痛地讲述了他变成brupiare的过程。Kybuchu们静静地听着。他们没有对此表示惊讶，因为他们之中，好几个人此前已经目睹过类似的事件。

冉比安基杀死的孩子深受加古基的疼爱，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没有止步于这个孩子的死亡。他的名字是亚奇普朗基，“美丽的角”。他母亲怀孕时，有个猎人将自己打到的牛肉送给了她。她因此决定“美丽的角”将会是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bykwa——本体，而这也将成为他的名字。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有数个bykwa；很少有亚契人只拥有一个bykwa。白普基儿子的第二个bykwa来自浣熊肉。加古基杀死了一头浣熊，并把肉送给了她吃。他也由此成了孩子的bykware，“赋予孩子本体的人”，也是他某种意义上的父亲。慈爱与尊敬之情联结着bykware和bykwapre。等到他年老体衰之时，这个男人可以指望自己赠予“本体”的男孩带猎物给他。加古基十分悲痛，这悲痛一点也不比冉比安基少。为了给自己的tuty复仇，冉比安基杀死了这个孩子。现在轮到加古基了，他打算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必须复仇。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死亡必须用另一个孩子之死来偿还？毕竟他们不是大人；和猎人不同，孩子们的Ove不需要同伴就可以上路。亚契人也承认了这一点：kromi不需要jepy。那么，冉比安基究竟是为了谁而复仇？加古基又准备为谁复仇？他们不是想为自己的外甥和“儿子”复仇，而是为了报复他们共同承受的创伤。Chono和Beeru让亚契人出离悲痛。死神逐渐变成了他们最忠实的同伴。若非Chono不想给亚契人活路，他又为何要用闪电击中那个“脑壳尚软”的婴儿呢？既然Chono已经亲自出手杀死了婴儿，那人们苦苦挣扎并帮助kromi长大又还有什么意义？有些时候亚契人觉得他们已然失了方向，穷途末路让人发疯。前方一无所有，只有死亡。男人们杀死了孩子们，开始自寻灭亡。这就是不幸的印第安人，这就是他们末日的悲惨狂欢。

日子又过了几天。冉比安基逃离了Ianve的毒手，亚契人又可以上路了。加古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打猎上。他打了足够多的猎物来喂饱自己年老的妻子邦宾基，又将剩下的分给了其他irondy。然而到了傍晚，他却没有任何prerä来庆祝自己在森林中的赫赫战绩。他沉默不语，慢慢等待体内积蓄起jepy所需的力量：想要杀人你就必须要krymba，勇猛。杀死一个敌人不算什么，人们会欣然完成此举；相比之下，杀死自己部落里的人则非同小可，你必须彻底by-ia，你必须说出那些一旦出口就不可收回的话——而你和其他人将一辈子为这些话所囚。“有天晚上，我坐在自己的火堆边开始唱歌。Ja bykware oo wachu gatu uare, kyra wachu uare, by-ia; cho bykware jepy verä cho!因为有人吃了肥美多汁的肉，因为有人吃了上好的肥肉，由此这个男人赐予了孩子本体。现在这个男人已经丧失神智；我，作为赐予本体之人，我要复仇！”整个部落看上去已经沉睡，但其实，所有人都在侧耳倾听。人们等待着。加古基会动手杀人吗？他已经选中了受害者的名字。他在某种神秘理论的指引下做出了选择。但做选择的人真的是他吗？确切来说，这个注定难逃一死的位置从一开始就被预留给了那个即将占据这个位置的人。只有她，只有这个不幸被选中的女孩，才能延长或终结这一系列笼罩着亚契人的事件，以及那股让加古基魔怔的神秘力量的进程。男孩之死只不过让男人的半只脚踏在了另一边。这死亡击垮了他，但这还不够。必须再次激起他的痛苦。正是加古基本人希望给自己添上另一道伤口，一处致命伤，最后的一击，好抚去这难以承受的伤痛。

他吟唱着，说他明天要杀死那个名叫康汀基的女孩，来为那个被他赋予本体的孩子复仇。她同样也是他的“女儿”，她“本体”的一部分源自他。是他射死了一只野猫，并将它送给了怀孕的女人。女人吃下了猫肉。因此，他曾帮忙为女孩赋形。他的“儿子”已经被杀死，而现在，他打算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加古基正在一片混乱中坚定不移地走向自己的死亡。

“晚上我吟唱了很久。我向人们解释说，为了复仇，我想杀死瓦楚基和克拉加基的女儿。我说，明天天一亮，我就会拿起弓。”他提到的那两个亚契人，正是冉比安基杀死小男孩之后为他净化的那对男女。他们从Ianve手下救下了一位brupiare，而现在，另一位brupiare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吟唱着，说他正准备杀死他们的女儿。他们保护了冉比安基，但同时，这让他们自身也受到了污染。正是这污染让他们身处这个致命循环之中，虽说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与这个循环擦肩而过罢了。同样地，也是这污染让他们和不幸紧紧相连。“我大声吟唱着，女孩的母亲躺

在小屋中聆听着。她仔细听着我的话，她知道我要杀死她的孩子，我是那个孩子的bykware。她父亲克拉加基也听到我想要对他女儿进行jepy。我继续吟唱着。很久以后，我看到瓦楚基在火光中坐了起来。她开始了chenga ruvara。”她独自哭泣着。通常，女人会一起唱歌，从而给彼此以力量。但这次，没有人会来帮助瓦楚基。她只能一个人倾诉着自己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唱得并不大声；她的chenga ruvara并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词语出现在两阵抽泣的间歇：这里没有对行将发生之事的拒绝，也没有对这一意外的抗议，只有一个即将在几小时内失去孩子的母亲，在直面自己无助的悲痛。Chono导致的这一连串连锁反应已没有被阻止的可能。亚契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克拉加基就在那里。他很强壮，也很爱自己的女儿。那他为什么不阻止加古基对她动手呢？因为他知道，这事情与加古基毫无瓜葛：他身上流淌着亚契人所憎恶的力量。Ure kwaty，旁观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加古基停止了歌唱，在席子上躺下。女人唱道：“那个赐予她本体的人要杀死这个漂亮的女孩。”她提醒人们，加古基与即将成为祭品的女孩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也提到了他将要对她做的事。她莫不是在小声请求他，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放弃自己的计划？有可能，但这请求注定得不到回应。加古基不能杀死任何人，除了自己的bykwapre。女孩父亲的歌声紧随母亲的哀叹而来。这是为了让加古基知道，他们已经听到了他那可怕的口信。对亚契人来说，这是个悲伤的夜晚——死神就在他们之中。但那个女孩呢？

她正躺在父母身边，被篝火的暖意笼罩着。她纤细的身体刚开始摆脱孩童的模样。她是什么人？她当然不是婴儿，甚至也不是个小女孩。她已经算是个kujambuku，一个“大女人”了。人们如此称呼那些胸部已经开始隆起，也很快就要来月事的女孩：她们几乎是个女人了。她目前还不是女人，但她又可以算是，因为她已经尝过了情爱的欢愉。这事所有人都知道，部落里也不是没有指摘的声音。人们并不是因为她在男女之事上的早熟而责备她。几乎所有kujambuku都会这么做，还没等到大潮来临她们就选好了情郎，有的甚至选好了丈夫。但做出选择的人真的是她们吗？实际上，当女孩身上的女人味刚开始显山露水时，应该说，是男人们一头扎进了gaita（求欢）之中。“过来，daregi，坐到我旁边来！”一个男人说道。一个kybai gatu对她表现出了兴趣，还叫她“女人”（实则她还不是个女人），这两件事让她很是受用。她朝男人走去。“Cho pravo!我看中你了！”他说道。他们开始享乐，这是一场游戏。但有只手在女孩的大腿上游走着，甚至走得更远；她平静地接受了

爱抚，没有拒绝。“好美的腿！真丰满！让我摸一下！”这个狡猾的勾引者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恭维总是很吃香的。周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小伎俩。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并将在某棵树底结束。过不了多久，卡加普古基就会邀请这个姑娘和他到树林里去。这些花季少女不会主动踏出第一步，但她们学得很快。

亚契人之所以对加古基的“女儿”指指点点，是因为她对某个人投注了太多不该有的感情：那个男人竟敢把所有禁忌忘在脑后，和自己的chave进行了gaita！漂亮的康汀基任凭她的jware勾走了自己的心，这男人几乎可以算是她的父亲，是他在她出生时为她沐浴。他从头到尾就不应该做出这种事；他的罪孽要比她深重得多，因为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人们并不会去惩罚这样的过错：没这个必要。再说了，人们很快就会忘掉这种事。而她，就是加古基口中那个第二天就要面临死期的女孩。“我大声唱着，好让所有的亚契人都听到。为了复仇，我要杀死这个漂亮姑娘，她就要死了。”所有人都听得很清楚，包括那个被加古基点了一整晚名字的女孩。在棕榈叶的遮蔽下，康汀基一动不动地躺着；死期将至的她又怎么睡得着呢？面对内心中升腾的巨大恐慌，她一个人孤立无援；温柔慈爱的父母在她身边吟唱着，悲伤地接受了她的死亡判决。

“Kwě bu rō，清晨我起身，拿起弓去杀死那个睡梦中的女孩。可她却醒着，一整晚没有合眼。”康汀基知道加古基会在清晨前来复仇。她战胜了睡意等待着，这样她就可以随时留意加古基的动静。她一看到他起身，就立马跳了起来：“Pacho eme! Pacho eme!别打我！别打我！”一边飞快地逃到树下。加古基追在她身后，姑娘哀求着，一边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她跑远了！我没能下手。我完全没了勇气！”加古基放弃了在这一天动手的打算。然而，jepy只不过是延后了而已。过了些时候，女孩回到了营地。没有人和她说话，一切看上去都再正常不过。加古基也外出打猎去了。白天就这么过去，夜晚降临了。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火堆旁歇下了。所有亚契人都已入睡，除了加古基和那个女孩。她就像前一晚那样等待着早晨的来临，这样她就可以再次逃跑。二人在火光下观察着对方，他跪坐着，她平躺着。然而她却他没有他那么强壮，没能像他一样有足够的精力保持清醒。想要赢下这漫长的拉锯战，她还是太年轻了些，渐渐地，她的眼睛闭上了。她睡了过去。“我在清晨往她脖子上来了一下，杀死了她。她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她睡着了。”她母亲也睡着了。可她父亲却醒着。克拉加基看见了，他说：“这个人杀死了他赋予本体的对象。他曾一箭射死一只野猫作为我女儿的bykwa！”

亚契嘉图人尽职尽责地为死去的女孩举行了葬礼，好让她与生者相分离。也有人为她报仇，但这次报仇是一次jepy rave。她那有罪的jware将自己的弓举到了另一个亚契人的头顶，却没有下手。生活再次归于平静。至于加古基，他也必须经历早些时候冉比安基接受的那种治疗。他姐姐，还有他那受害者的母亲为他举行了净化仪式。“那个孩子被杀的女人，她为杀人者进行了piy。”她们给他全身涂满泥，又把泥塞进他嘴里，给他催吐，这样Ianve就不会导致baivwä，恐惧就不会郁结在他的胸中，他也能好受些。女孩的母亲瓦楚基把手指塞进他的喉咙中，从而引发了痉挛。一个男人出去采集了大量藤蔓条，为加古基洗净了身子。女人们唱起了歌，这既是为了哀悼死去的女孩，也是为了加古基，因为他现在正处于Ianve的威胁之下。“等我的身体再次变得白净之后，女人们用木片将我浑身上下涂满了芬芳的树脂。这美妙的香味能够阻止Ianve进入我的身体。接下来，我的妻子邦宾基在树脂上粘了些漂亮的白色秃鹫绒毛。杀戮者必须保持身体轻盈，而urubu毛可以防止身子发沉。等到净化结束，我就扔掉了杀死小女孩时佩戴的唇饰，那是用一只小野猪的骨头做成的。一个人在杀了人后一定不能留着自己的beta。不然的话，Ianve会试图进入他的身体，引发baivwä；他的血也会开始变稠、发臭。会有什么东西沉积在他的肚子里，仿佛沉积在地面凹陷中一般。那就是看不见的玃徐之病（la maladie du Tatou Invisible）。”

接下来的日子里，加古基进行了彻底的断食——肉、蜂蜜、水，通通不行。此外，作为预防，他一个人一动不动待在自己的小屋里；他的妻子也这样做了，人们为她带去了食物。只要他待在那里，被自己人围绕着，就不会有危险。但他如果离开营地，Ianve就会趁虚而入。五六天后，他慢慢开始用刷子喝一点稀释过的蜂蜜。替他准备蜂蜜，又把它端过来的，正是受害者的母亲瓦楚基。她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照顾着杀死自己女儿的人，仿佛在她眼中，加古基现在必须取代她那被夺走的女儿的位置。这就是亚契人的处事之道。一个男人为了复仇杀死了一个孩子，又立马填上了自己创造的空白。他成了这位母亲的chave，从这一刻开始，他开始叫她chupiaregi，我的教母。这就是为什么她要供他饮食。新生儿“降”生之后，那个把他从地面上举起来的女人被称作upiaregi。她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她的chave。Brupiare杀死了另一个亚契人。但他给出的致命一击也杀死了他本人，他和受害者同时死去了。加古基在静止不动、沉默和断食中度过的那些日子就是他死去的日子，他不再是生者中的一员，而是待在远离他们的地方。是谁，为他开出一条回家的路，为他的流放画上句点，让他——这个杀戮者——重

获新生？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哀悼中的母亲。她已经剃去了头发。她给brupiare送去了最初的食物，助他重生。他在地面前宛如“脑袋柔软”的新生儿，她则成了他的“教母”，chupiaregi。他一击杀死了她的女儿，现在却成了她的“教子”。对这位母亲而言，这是否太残忍了？但亚契人的规则就是如此。杀人者与牺牲者之间形成了奇异的纽带，它创造出一个秘密空间，让双方在其中冰释前嫌。同时，它也保证在部落中，受到同一个不幸事件牵连的两个家庭不会因此结下夙怨。

加古基与瓦楚基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这鸿沟是如此之深，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将它化解。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杀死女人的孩子时死去，又在这位母亲面前，以女孩的身份再生。

加古基花了整整一个早上讲这个故事。有些时候，漫长而焦灼的沉默中断了故事。但我们不能打破这份沉默。然后他又会继续下去。他本可以像平常一样，说自己要去打猎或是说自己困了，然后起身离开。但这一次，他固执地坚持了下来，带着几分不由自主，也带着几分自我强迫。一个外人请求他讲述这些事情；或许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想要把这些事情说出口。然而，这些话是多么支离破碎，多么勉强，近乎微不可闻！可一旦这些话被不可挽回地说了出口，他又是多么迫切地再三重复着，紧张之下他的拳头又攥得多么紧！“我在她身后跑了一小段路。这个kujambuku正朝着森林逃去，一边尖叫着：‘他要杀我！别杀我！’而我就在那里，失去了勇气，毫无斗志！但我已经唱过歌了，我必须完成jepy！”他继续道。或许就连他也惊讶于这么久以后，自己内心深处的块垒竟依然如此之沉，挡住了语词的去路。加古基，这个一点也不暴力的人，是一个brupiare。他正等待着夜晚的到来，这样当妻子在外浪荡时，他就能用风笛唱出心中的苦痛。

起初，亚契嘉图和陌生人保持着距离：前者态度傲慢，后者虽然人数众多，却低声下气。可他们最终还是在事态面前屈服了。在白溪共度的日子与共同出猎瓦解了双方之间的沉默，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了对方的cheygi，而两个部落之间的通婚也逐渐促成了真心诚意的和解。闲暇的日子给了他们攀谈的机会；有了肉质肥美的“精瘦肚腩上的皮”，他们的口腹之欲得到了满足，性情也温和了起来，开始愿意开口聊天了。他们都聊些什么？通常会聊近期与Beeru的遭遇，聊森林中枪林与箭雨之间的战斗，有时也会聊到自己或他人目睹的奇闻轶事：一条大到令人生畏的蛇、一只黑色的美洲豹、数不胜数的野猪。他们很少碰到隐形的生物，但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有些时候加卡伦迪会让人们看到他

——背着弓，还有蕨叶做的箭。对那些不幸被他吓了一跳的亚契人而言，这实在是倒霉事一桩。好在加卡伦迪也不算太坏心眼；他不过是喜欢以吓人为乐罢了。然而有时候他也会真的放箭。有一次，查楚卜塔基就被他射中了腿。血没流多少，他却觉得自己要死了。加卡伦迪会在下午将尽的时候现身，边走路边吹口哨——没有人会把这声音误认成鸟叫。他和他妻子都有着古怪的习惯。她总是试图掳走年轻男孩，好和他们做爱；每当她这么做时，妒火中烧的他就会试图夺走kybuchu的小鸡。每当亚契人没法找到他早些时候看到的某个蜂巢时，他很清楚发生了什么：那是加卡伦迪为了捉弄他而挡住了蜂巢的入口。因为加卡伦迪是蜂蜜之神。

拜瓦基通常不怎么开口，但他时不时会说起自己某一天遇到加佩鲁的故事。加佩鲁是水的主人。天晴的时候，你可以在河流或瀑布边上看见他。他肤色很深，讲起话来轻声细语的，胸口没有肉。拜瓦基知道这时最好不要逃跑，不然加佩鲁会用随身携带的那根黑色木棍往他脖子敲上一下。他站在原地，加佩鲁给了他一块水豚皮。水豚是一种和猪差不多大小的啮齿动物，住在水边。他必须接受礼物，然后就可以平安离开。“太吓人了！”人们听到咯咯的笑声——那是拜瓦基回想起自己在加佩鲁面前惊慌失措的傻样，正努力忍住不笑呢。

陌生人很喜欢说起北边的亚契人，那是群可怕的、坏透了的食人族。不久前他们一路南下，都快到了卡雷瓦楚基的地盘。双方发生了一场恶战，因为他们必须被拦下：“好多箭！很粗的箭！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我们吓坏了。所有人都在大叫，我们使劲骂他们：‘你们这些吃人肉的亚契人，我们要杀死你们，还要抢走你们的老婆！秃鹫会吃掉你们！我们很勇敢！’

“他们就在那里，嘴唇上戴着beta，整个人涂得黑乎乎的。太吓人了！于是我们就逃跑了。我们的一位兄弟肚子上中了一箭。我们把他留在了那里。他没法再走路了，肠子都流到了腿上。臭死了。”他的听众发出了“噫！”的一声。他们听说过这些凶残的亚契人，但从没碰上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理论上来说，这些无知的陌生人没有什么可以教他们的。但是像这样偶尔放下架子也没什么不好的，毕竟这样才有足够的话头来消遣漫长夜。

所有人（连孩子在内）都知道忒鲁基的事迹以及他的死状。他是亚契嘉图人很久以前的首领。他们之中，只有最年长的那些曾在童稚时见过他。当年，忒鲁基还很yma wachu——正是壮年。他的“本体”是

tery。那是一种巨型水獭，比人还大，在森林的溪流中捕鱼为食。忒鲁基的力量和勇猛已经成了传说。在他的领导下，亚契嘉图人曾同时与住在东面的其他亚契人，以及人数远不及现在的白人相抗衡。当年，忒鲁基一族人多势众，他们有足够多的小团体来占领无边无际的森林。拜瓦基至今仍记得当初，他是如何随自己的父亲一起踏上攻打亚契库拉瓦人（Achē Kyravwa）的远征的——那是食人的亚契人。忒鲁基是统帅。他的远征队在清晨包围了一大群敌人。他们几乎杀光了Kyravwa人，并俘虏了他们的女人。人们办了场盛宴，然后亚契嘉图人瓜分了战败者的妻子。忒鲁基给自己挑了三个年轻女子；再算上原来那个，他就有四个老婆了。“想当年，亚契人知道该怎么打猎！如果你是个了不起的猎人，你就可以有很多个老婆，还能把她们都喂饱。我们其他人也都是bretete，但女人太少了。”

忒鲁基的妻子中有一个叫乌露基。她本不该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俩同父异母。但是部落中女人太少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比起这个，还是和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更为严重。那样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乱伦，忒鲁基也会变成一只吼猴：“Kraja才会和自己的妹妹做爱。”忒鲁基之所以会带领族人去攻击其他亚契人，并抢些女人回来，恰恰是为了改变女人数量稀少的现状——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一天，乌露基的兄弟卜加基出门打猎，却迟迟未归。第二天，人们沿着踪迹寻去，只发现了他七零八落的尸身。人们认出了这可怕的伤口：那是大型食蚁兽的前爪留下的痕迹。据说，它甚至可以吓走美洲豹。乌露基开始吟唱对她哥哥的悼念。一个烦躁的男人用弓威吓了她一下。这个举动让忒鲁基变得by-iä，面对着自己的vaja——他母亲的丈夫，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石斧一抡就结束那个男人的性命。为了给死者报仇，忒鲁基的兄弟钦贝基用弓箭射死了死者所有的孩子。他们之中有个beta pou，这个刚成年的小伙子试图逃跑。可他却快不过长箭：箭头扎进他的后背，穿透胸口而出。

忒鲁基已经消失很久了，但人们依然会讲起他。这是因为，离奇的是，杀死他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他自己的ijagi。Ijagi的意思是同伴。森林中的所有居民都有一位和它形影不离的同伴；此外如果它被杀了，还会有复仇者给它报仇。打个比方，野猪的同伴是kweve鸟，它的歌声会告诉亚契人它们就在近旁；美洲豹则负责为野猪报仇——就像它为几乎所有死在猎人手下的动物复仇那样。苍蝇是吼猴的同伴；冻子椰子树则与guchu和pichu幼虫为伴。Pipi鸟宣示着浣熊的动静，pana蝶则透露着玃狢的行踪。美洲豹的同伴是myrökyje鸟，然而美洲豹是个特例，这

个最强的复仇者是唯一一个没有jepare的动物。至于亚契人，他们也有各自的ijagi：正是这种动物的肉赐予了每个人他的bykwa。查楚基（Chachugi）的ijagi是chachu，大野猪；居弗库基（Jyvukugi）的则是jyvuku，黑猫。这些动物同伴很清楚它们究竟是被与自己同名的猎人射死的，还是死于别的猎人之手。每猎到一只动物，人们就会用歌声向它致意，但若是有人杀死了自己的ijagi，他就得分外小心：他必须向它献上更长的歌曲。这有点像杀死自己的亲戚。每当归营的猎人将带回来的雄狍或浣熊放在地上时，常常会有女人开始哀悼——因为那猎物正是某个死去的婴儿或兄弟的ijagi。看到这动物，女人回想起了那个已经离她而去的亚契人，她因此为这猎物哭泣。

Tery（大水獭）的ijagi是水，因为它住在溪流中。和美洲豹一样，这种动物也是位复仇者，但它只负责为krombe（河里的乌龟）复仇。然而忒鲁基想要抓的恰恰就是乌龟。当时，他正在靠近岸边的河水中跋涉着。突然间，一只悄声游到他身旁的tery袭击了他。他试图用随身带的半把木弓自卫，那野兽却瞄准了他的胳膊，将之撕成了两半。听见他的呼喊声，几个亚契人跑了过去。水獭逃之夭夭；人们将忒鲁基搬回了营地。他掉了很大一块肉，还流了很多血。苍蝇覆满了伤口。他很快就断了气，死在自己的ijagi手下。他瘦得要命，身上没有半点肉。人们由此得知，这只水獭是某个陌生亚契人的灵魂，当年正是忒鲁基射杀了他。人们把消息告诉了钦贝基，他当时正和自己的小团体在远处游荡。他来到了营地，心中满是失去兄长的悲痛。他吟唱起了所有关于他俩一起打猎的过往，所有死在他们手下的敌对亚契人，还有白人侵入亚契领土时，他俩发起的反击。“Ja pave mano bu, jepy.我的兄弟死了，我要复仇。”忒鲁基的妻子乌露基为他生下了三个女儿，彼时都已经长大成人。钦贝基用一把铁斧——那是某次袭击白人时拿回来的战利品——将三个姑娘悉数杀死。就这样，她们陪同自己的父亲朝着看不见的森林而去了。

托康基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因为他很清楚事情的一切经过：他就在那儿，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钦贝基杀死了忒鲁基的三个女儿。和拜瓦基不同，他很健谈，也喜欢追忆往事。 he现在是闲人一个，因为他已经很虚弱，几乎不再出去打猎。皮楚基负责为他煮饭：他原来的妻子已死，他就成了皮楚基的第二丈夫。皮楚基很少和他欢好，因为她的imete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有时会抱希望地到其他女人那里碰碰运气，一边嘴里说着“Poko mi vwä! Tara iä!就让我轻轻碰一下！绝对不多

碰！”——那语气仿佛是在说“你总不至于连这都拒绝吧”，一边朝着浑圆的胸脯伸出手。他很少能得逞，但他也不恼火。Kibioo（讲故事）是他的爱好。

他很轻易就向我承认了自己是个brupiaty：他已经当惯杀戮者了。事实上，他曾杀死数位亚契人作为祭品——至少三人死在了他手下。和加古基不同，他很乐意讲述这些事情，这让他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他第一次动手是在很久以前。当时他的后背上还没有刺青，而忒鲁基的母亲——亚契人称她为加鲁基，“老祖母”——也尚在人世。然而当时的她已经老迈不堪，连路都走不动了。这对于忒鲁基妻子之一的乌露基来说是个大麻烦。终于有一天，当加鲁基明显已经精力不济时，乌露基找来了托康基，让他杀死她。这种事情从来都是由年轻小伙子下手的。托康基当场便抓起一把铁斧，走到老妇人身边；她正背对着他，脸埋在双手间——这姿势再合适不过了。他用斧头根部一举击碎了她的脖子。接下来人们为他行了净化仪式，催吐则是由加鲁基几个女儿中的一人帮忙的。“Wata kwa iä pute!她已经一步也走不动了！”托康基快活地解释道。

后来，等到乌露基成了寡妇，她被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钦贝基，因为男人总是会接手兄弟的妻子。然而，她却发现托康基——也就是她新任丈夫的儿子——是个kybai gatu，英俊小伙子。她没有向他掩饰自己的想法，他也没有半分忸怩。就这样，做父亲的成了她的丈夫，儿子则成了她的情人。搞不好，当初她叫托康基杀加鲁基时就已经动了这个心思呢。

另外两起谋杀是为了复仇。贾比基是托康基的弟弟。打猎时，他没能看到一条睡在一堆枯叶下的chini。那响尾蛇闪电般抖擻开身子，在他脚踝上咬了一口。贾比基回到了营地。女人们立马动身去找某种树叶，把它加热然后敷在伤口上。但她们白忙活了一场：贾比基死了，因为他不是paje。你没法事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paje，只有毒蛇的咬伤可以告诉你答案。如果他活了下来，这人就是paje：他体内的某种东西化解了毒素。不然的话，他就会中毒而死。亚契人的两位酋长居弗库基和卡雷瓦楚基都是paje。他们都被chini或是brara咬过，但二人都只不过发了点小烧罢了。有时候，当印第安人剖开树干收集幼虫时，他们会在一群全白的幼虫中，看到唯一一条通体漆黑的虫子。人们把那种虫子称为paje，只有paje体质的男人才可以吃。

贾比基就这样死了。鉴于兄弟理应为彼此报仇，因此，轮到托康基

来施行jepy。他的父亲钦贝基通知了他这一消息。他打碎了一个小男孩的头骨，然后受害者的母亲用污泥为他进行了piy。

忒鲁基去世后，亚契嘉图人有了位新首领，库鲁蒲拉基（Kyrypyragi）。Kyrypyra是一种鸟，名字的意思是“屁毛”。这位新族长是忒鲁基的“教子”，他和钦贝基一起接手了jware的遗孀们。亚契人对他远没有对忒鲁基的那种感情：他们说他生性残暴，令所有人生畏。他们不太喜欢他：此人“berugi iä, Achete”——不是个领袖，作风与亚契人截然相反。有一次，托康基某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美洲豹撕成两半死了。为了给他复仇，库鲁蒲拉基杀死了他分到的女人中的一个。她是最年轻的那个。虽说通常女人不会有jepy，但为了给她复仇，某个亚契人杀死了库鲁蒲拉基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女儿。那个女孩正好是托康基的chave，他为之悲痛不已。By-iä的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用弓杀死了这个小女孩的姐姐。就这样，她们的母亲皮拉基失去了两个孩子。然而，正是她为托康基进行了净化仪式，好让他不被Ianve吞噬。这个brupiaty满怀激情地讲述了这一切。他做了各种手势；讲到弓或是斧头落到某个人的脖子上时，还配上了Han!的音效。

Iröiangi认真聆听着。每当他们能认出亚契嘉图人所唱的献给某种动物的曲子时，他们就会很开心：“Ure wywy go nonga——我们也是这么唱的。”而每当两边的习俗相左时，他们就会显出讶异之色，并介绍自己的做法。在这互通有无的过程中，两个群体逐渐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会得到理解。居弗库基的族人尤为挑剔：“陌生人讲话太快了！这帮笨蛋连话都不会说。”但事实上，他们自己说起话来比陌生人还要快。“某某某（一个陌生人）说了啥？”“我不知道，”一个亚契嘉图女人答道，“我压根就没在听。他们啥都不懂。”Iröiangi带着金属唇饰，这让另一群人震惊。此外，男人还会佩戴用美洲豹或其他猫科动物牙齿制成的项链，而在亚契嘉图人中，只有女人会这么做。“娘们才戴项链！像我们这样了不起的猎人根本不用这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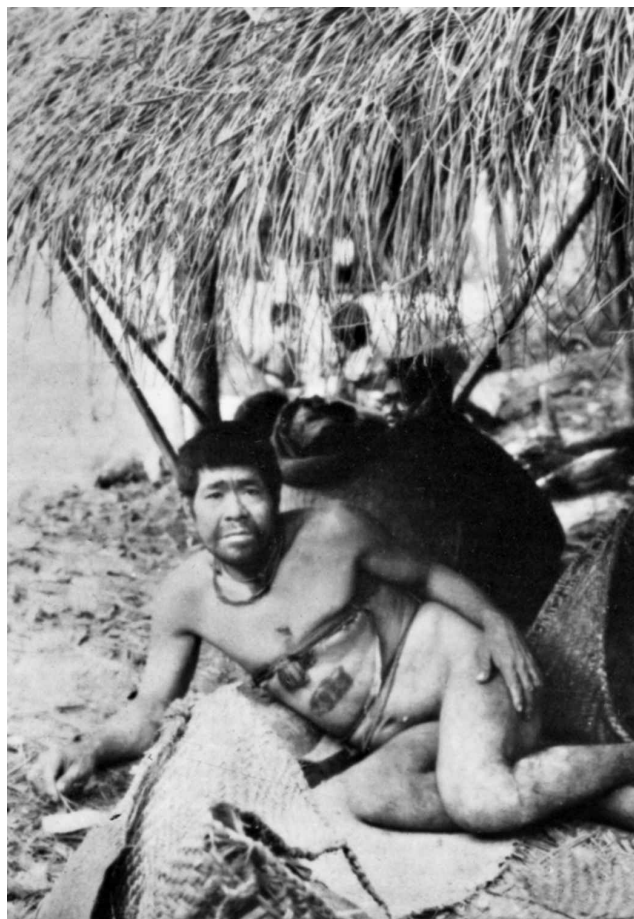
这些无礼的评价不是当着对方的面说的，而是留到只剩自己人的时候才说。人们心里大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表面上大家总还是很客气的。某个陌生人舂了些玉米粒，和了面一道煮了。他还没成家，所以只好自己做饭。等玉米团子煮好后，他拿了一个给某个亚契嘉图人：“来点玉米饭怎么样？来，尝尝。”“不用了，真的。”那个亚契嘉图人说，“真不用。我肚子撑得不行，一点也不饿，你看！”接着他拍了拍肚

皮，夸张地把它鼓起，好向陌生人证明里头真的已经满满当当了。但事实上，他认定了那食物是馊的，而陌生人都脏得要命。更何况，一旦他接受了任何东西，这将会成为他的软肋，因为这样他就无法拒绝这位馈赠者的任何要求。正如居弗库基所言：“陌生人总是在讨东西！你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有多能吃！他们吃完就开始闹肚子，然后拉得到处都是！”

这很正常。你没法让世代为仇的两伙人在一夕之间成为亲友。更何况，陌生人那边也没有对亚契嘉图人全盘接受，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说出来。证据就是他们忘了邀请亚契嘉图人去参加tö kybairu。但这并不能阻止双方对习俗进行比较。每当有猎人死去时，Iröiangi也会进行jepy。然而，他们复仇的方式与亚契嘉图人有所不同。他们会把尸体放进挖好的土坑中。为了劝灵魂离开，他们会献上死者的一个孩子作为祭品，并且会尽可能选择他的小女儿；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某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kujambuku。他们将她放进坟墓中，在她父亲的上方。男人们围着坑站好，然后一个接一个跳到孩子身上，用双脚将她压垮，直到她断气为止。如果这孩子还是个kromi，事情结束得很快：她几乎立马就会死去。但如果她是个“大女人”，她的骨头会更硬些，等她死就要花上些时间。她会大喊我不想死，然后试着逃出墓穴。Go nonga ure：这就是我们的做法，我们陌生人的做法。

男人们感到悲伤，他们胸中郁结着巨大的痛苦。女人的chenga ruvara阴沉沉地响起时，男人开始用弓互相击打彼此。等他们死时，弓背留下的粗大伤口会给他们带来满川风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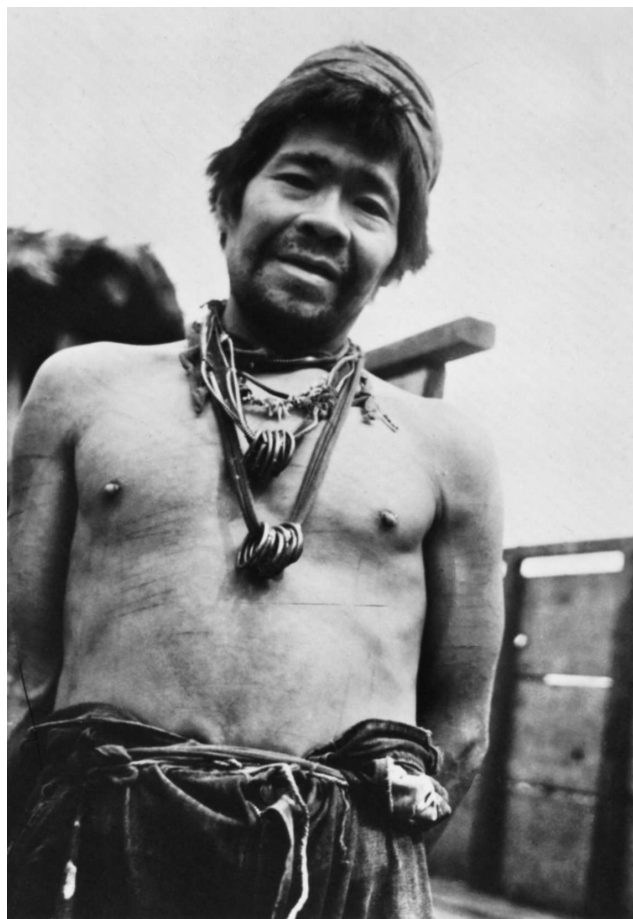
- (1) Boliche，西班牙语，拉丁美洲方言中意为小杂货店。
- (2) 雷鸟，英文作Thunderbird，是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身形巨大，振翅高飞时便会风雷乍起，眼皮翕张之间便会放出万道闪电。



查楚卜塔瓦楚基



即将动身去森林中寻找蜂蜜的查楚卜塔瓦楚基



查楚卜塔瓦楚基和他的饰品

第七章 一个男同性恋的生与死

“你们会死的，秃鹫会把你们吃掉的！”托康基如此警告那些身患重病却不愿回白溪的亚契人。这都是些随口一说的套话，本意绝非让人不安。恰恰相反，其用意在于让对方在动身前放宽心：这是他可能碰上的最坏结局，但它发生的几率实在太低了——几乎毫不现实，而这已经足以让对方心安。这是一种礼貌：如果某个人要孤身走入林中，你不可能对他连一句善意的招呼都没有。“你要去打野猪？美洲豹会撕碎你的胆！”“没有美洲豹！我很勇敢！”这不过是意在让他提高警惕：“你要去林子里？好吧，你确实是个不错的猎人，但还是要千万小心！”森林中的危险一刻也不该被忘记；但人们并不会给他人以忠告，因为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很简单，只要夸大其词，便能不动声色地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为了说明自然的可怕，人们往往会提起三种动物：首先是美洲豹，它是森林中的王者，无论昼夜。然后是秃鹫：当一个人还活蹦乱跳时，它们并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但它们却暗中留意着地上之人衰弱的征兆；它们可不会等到一动不动的身躯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才出手。最后是毒蛇——尤其是chini和brara，它们外皮上或绿或黑或灰的斑点，能轻易与植被融为一体，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灌木丛低低的枝丫上。等你意识到它们在那儿，往往已为时太晚；它们那小小的毒牙已经刺入了你的脚、你的踝关节，或是你的小腿肚子——但通常不会高于这个部位。如果你不是paje，那完了，你的小命就交待在这儿了。天上的秃鹫、地上的毒蛇和林中的美洲豹是森林致命的象征。所以在kyvaity——墨绿的丛林深处，你必须谨慎行事。但人们之所以会小心，是因为他们熟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是这儿的内行。亚契人在这里很自在，简直如鱼得水。在这个让外人晕眩、惊惧的世界中，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其间的千籁万窍、植物与泥土的芬芳、清风和流水的低语，以一种熟悉的语言同他们交谈。这里和大草原不同。在那儿，他们感到恐惧，不堪一击，暴露在万事万物之下：那是个不同的空间，陌生而充满敌意。那是白人与亡灵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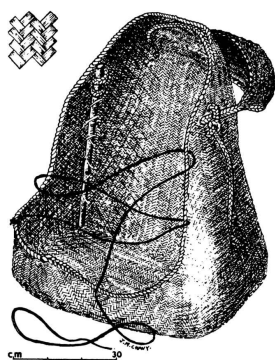
如果你看到数十只秃鹫聚在一处，懒懒地在空中盘旋着，并一点点朝地面靠近，你便知道，它们定是发现了猎物：一具动物的腐尸，想来是在猎人或猛兽手下受了重伤，最后在那儿断了气；或是某只动弹不得

却还有一口气的野兽——这些briku见证了它最后的挣扎，然后才不急不忙降落到它身上。某天，当一个在离营地有一段路的地方晃悠的猎人回来后告诉大家，他看到很多秃鹫正在盘桓时，我们便是如此推测的。每逢一大群秃鹫一起等待猎物断气，这种时候的它们就尤其容易被弓箭射中。于是，便有几个男人起身往那个方向去了。亚契人好食秃鹫肉；此外，它们长长的羽毛可以用来制箭，较长的骨头还能拿来做出猎用的哨子。我们走上前去，那儿果然有一群秃鹫。为了不惊动它们，我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一小片没有树的空地上。它们中有不少就停在我们周围的树枝上，有如一个个邪恶的黑点，还有一些则围绕着地上的什么东西扑腾着。它们数量众多，鸟喙正忙活着，半张的翅膀遮住了它们正在吞食的东西。突然一声鸟叫，它们齐齐轻扇翅膀而起，接着又波澜不惊地停在了近旁。

那天，空气中没有半点香味，它们正在攻击的尸体散发出一股恶臭。那个男人才刚死不久，但briku撕开了他的肚皮，从而加速了腐化的过程。成群结队的苍蝇闻风而来，伤口中渗涌而出的东西让它们醉倒。眼睛已被鸟啄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满是血污的窟窿。嘴巴被撑大了，鸟喙已从齿间破门而入，直取舌头。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出了他，何况尸体的长度让答案毋庸置疑。那是个陌生人，他的身高曾让我吃惊：他比最瘦长的猎人还要高上十公分。但现在，他已成了秃鹫的口中餐。这是亚契人所不乐见的。就在几天前，他离开了营地，说是要去和两户正在打猎的人家碰头。他病得很重，显然中途放弃了这一计划，最终却没能撑到营地。他孤零零地死去了。他肯定也看到了天上群集的秃鹫朝着自己俯冲而下，一只接着一只，逐渐在身旁围成一圈。它们现在一动不动，尚有几只口中叼着血淋淋的肉块。四下一片寂静。数百只黄色的小蝴蝶在克兰贝基的尸体边木然扇动着翅膀。

克兰贝基在很多方面都很引人注目，尤其是他那超乎寻常的身高，这让他在小个子的亚契人中简直成了个巨人。但他的勇猛程度并不与之成正比。总的来说，他给人一种柔弱感。他的肚子宽大而肥满，而其他男人的小腹即便在放松时也十分紧致、坚硬。简单来说，他是个奇怪的猎人。但仅此而已吗？他部落中的同伴从不主动提起他，而即便他们真的谈起他，也往往讳莫如深。至于亚契嘉图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比陌生人健谈多少。但他们意味深长的眼神与颇堪玩味的笑容表明，虽说他们对此避而不谈，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绝对有不少看法。很显然，克兰贝基可不是什么路人甲。

因为他像女人一样留着长发（男人都留短发），有天，我想为他拍张照，并请他握住他那张就在一旁的弓。他礼貌地站起身，却拒绝拿起那武器。“为什么？”“那不是我的弓。”“没事，你就拿一下。”“我没有弓，我也不想碰这张弓。”他坚定地说道，表情带几分厌恶，仿佛我要叫他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接下来，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恶意，他指了指一件我根本没想过会属于他的东西：“我拿我的篮子好了。”这完全是对亚契世界的颠覆：一个男人，没有弓，却有自己的篮子！克兰贝基到底是什么人？一旦这个男人的奇怪之处已经暴露在了我的眼皮底下，人们就不再对我遮遮掩掩。他们一点点把他的故事透露给了我，首先是亚契嘉图人——他们很高兴能再一次证实，自己之所以能那么瞧不起陌生人，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他们也绝不会允许克兰贝基这样的人生活在他们之中。后来，Iröiangi也认可了亚契嘉图人描绘的肖像，并为之增添了不少细节。然而，从当事人那儿我什么都没听到。羞涩而内敛的他避开了我发起对话的请求。他一言未发便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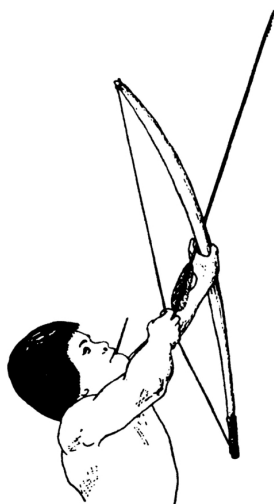


naku：女人的篮子

亚契部落坚持向年轻人灌输bretete（伟大猎人）的概念，这种坚持关系到部落的道德原则与个人荣耀，但它同时也是出于纯粹经济上的需求。这个游牧民族生活在可食用作物相当有限的森林中，因此，他们没法靠采摘为生。当然了，块根、浆果、水果、棕榈芯、蜂蜜和幼虫也构成了他们食物来源中很大的一部分。女人的职责就是采集这些隐藏的食物，并在部落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寻找它们。然而，并不是走到哪里都能碰上果实累累的树木，而森林也只有到特定的季节才会慷慨赠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日子，kuja回到营地时，篮子没有从她们的脖子上沉沉垂下。Naku深处只有很少的东西：少量留给孩子的幼虫，尤其是给那些“脑壳还软的”，因为幼虫富有营养；一只老鼠；一两只青蛙；有时候还会有条蛇——人们会抓住它的尾巴，在它张口咬人之前迅速把它摔向

树干，然后烤了吃。偶尔这样吃上一阵子还能接受，但如果老这么吃，你很快就会消瘦下来，而那令人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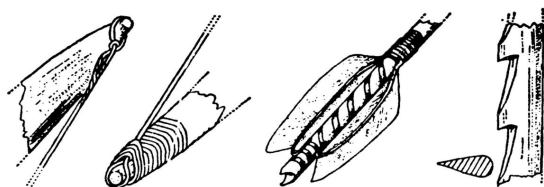
大部分食物是男人提供的。在瓜亚基社会中，他们背负着确保能向人们定期提供肉和脂肪的重任，少了这些是万万不行的。Bareka——打猎——是他们的职责；这是他们身份之所系，他们通过这项活动定义自己。一个男人只可能把自己看作猎人，你没法既是男人，同时又不是猎人。男性气概的整个象征空间就在jyvö——射箭——的动作中展开，而男孩从小就为了步入他们命定的角色、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而准备着。跟随父辈在林间奔走的漫长学徒岁月，确认他们猎人身份的成人礼，女人对最厉害的bretete的青睐，以及男人为了庆祝射手们的赫赫战功而歌的夜曲，这一切都让男孩将集体意志当作个人自身的意愿。他们必须成为真正的猎人，因为他们背负着部落的存亡。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生命的本质与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全系于此：你要么作为猎人而生，要么死去。你别无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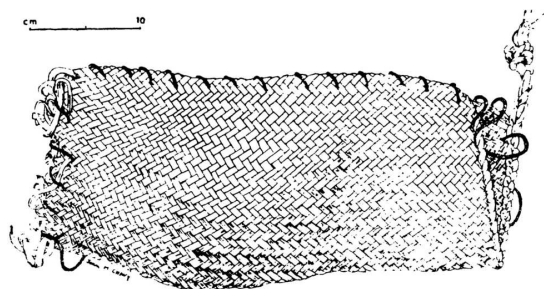
射箭的姿势

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者”是男性唯一的角色，这是否意味着男人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异化的牺牲品呢？他们是否受到束缚，并被迫选择了唯一的选项？绝非如此。没有人把打猎当作苦役。尽管这几乎是男人唯一的职业选择，也是他们每天的正经活计，人们依然把它作为一种“娱乐运动”来实践。当然了，无休无止地追踪猎物，一动不动地接连数小时观察一头狍子或一群猴子的动静，或是在数分钟内保持拉弓的姿势，仅仅是为了抓住那个能让你透过厚厚的林木瞄准一只鸟或是一头浣熊的刹那

——这些都是在工作。你知道它们正鬼鬼祟祟，藏身在高处的树枝上，只不过你看不到它们；你只能静待它们现身的那一刻，然后放出早已搭在弦上的箭。他们还得挖好陷阱，等獭掉进去，或是刨开狢狢的洞穴：男人不停刨着，与此同时，动物正试图钻向洞穴更深处。通常这项对速度的比拼都是猎人获胜，只不过他得花不少力气：有时候那洞穴变得如此之大，他整个人都会消失其中。除此之外，男人还得时刻补充箭头的库存。箭头是将坚硬的木头回火后制成的，但它们会随着使用而耗损、断折。它们也常常遗失，或是因为中箭的动物受伤后跑了，或是随着某支射空的箭飞进树丛，消失不见。简而言之，不管男人是在林中奔走，还是在营地休息，他们总是干着与打猎相关的活计。



为弓上弦；为箭添羽；在箭的一侧刻上凹痕



pepo：用来装羽毛

打猎永远是一场冒险，有时充满危险，但永远激动人心。当然了，从蜂巢里掏出甜美的蜂蜜，或是劈开棕榈树发现里面涌动着金龟子留下的美味guchu也是让人开心的事情。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事情都在人们的预料之内，没有神秘感，也没有任何突发状况：一切不过是按部就班而已。相比之下，在森林中追踪野兽、与它们斗智斗勇、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将距离拉近到弓箭射程之内、听到箭在空气中的呼啸声以及接下来射中野兽腹侧时的那一声钝响——这其中的乐趣他们已经历了无数次，却永远像第一次出猎时一样新鲜，一样激动人心。在bareka一事上，亚契人可谓是乐此不疲。部落对男人别无他求，而这也是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因此，他们得以与自己和平相处；没有任何内部分歧，也没

有任何事情令他们耿耿于怀，心烦意乱。他们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他们的身份，他们履行着整个部落从古至今赋予他们的责任，无悔无惧，并由此实现了自我圆满。你或许会说，他们是命运的囚徒。但这是从什么角度而言呢？在亚契猎人自己看来，他们生活在完全的自由之中。

想要成为一个bretete，你必须体力充沛，沉着镇定，身手矫捷。你必须达到身心放松、心体合一的境界。这就是paña。Paña: pane-iä，意思是pane的对立面。至于pane，那是男人最害怕的东西。因为你一旦沦为pane的受害者，bareka就完蛋了。你将会两臂无力，箭也会七歪八斜，显得徒然而滑稽。你什么都杀不死。你的右肩不会因为野兽的重量而下沉，回营之路也将分外凄凉。两手空空的猎人没法放声高歌，来庆祝自己的收获，相反，你只能静静坐在自己的火堆旁。如果japä——射空——接连数次发生，人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pane已经降临到了这个猎人身上。这种耻辱令人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自己无力履行自己的角色：一个猎人。但事情还能进一步恶化。事实上，男人从来不吃自己打到的猎物：这是亚契人分配食物的原则。我若是杀死了猎物，我妻子会把它切开，因为我本人不可以亲自动手。她会留下几块给自己和孩子，再把剩下的肉分给同伴，先是给亲族、兄弟和姻兄弟，再给其他人。分配过程中，没有人会被落下；如果肉很少的话，每一份的分量就会小些，但所有人都会分到点东西。作为回礼，我也会收到其他人带回来的猎物的一部分。我分给人们自己的所获，人们也会报我以相应的回馈。因此，每个猎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他人打猎，并以其他人的猎物为食。他完全仰赖他人的供给，他的同伴亦然。如此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因为所有人都“生产”同等分量的肉。这被称作pepy，交换。

但如果我身陷pane之中，我又该拿什么来回报他人，作为对收到的猎物的回礼呢？不付出就不会有所得。你没法在pane的同时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到最后，你的同伴会厌倦不断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的日子。如果哪个老人虚弱得连弓都拿不动了，人们会给他食物。这是他应得的，做儿子的也不会让父亲腹中空空。然而，如果这种寄生关系持续了太久，某一天人们会把他留在某棵树脚下，边上生一堆火，而他将在那里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然而，一个强壮的男人和老人可不一样。如果他陷入了pane，那是因为他活该：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一切不守规矩的举动都有其代价，鲁莽之徒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受天谴的罪人呢？这么做毫无益处。

幸好人们很少碰上长期的pane。每个人都会有不走运的日子，他那游移不定的箭离弦的时机可能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他的手在弯弓时或许会力道不够。这些情况都可以得到补救。年轻男子的唇孔和背上的刺青，就是为了确保他们能进入paña的状态。因此，如果pane发生了，人们就会重复这一步骤。猎人的朋友可以帮他完成这一切，也有人自己动手；新的疤痕会诞生，但是要比之前的致命沟壑浅很多。疤痕包裹着二头肌，与原先的伤口相交错；有几道割在小臂上，还有几道割在大腿上。不会流太多血，而一旦伤口在糊满木炭粉后开始愈合，这些浅浅的疤痕就会在皮肤上形成漂亮的装饰。这种疗法几乎永远都会奏效：pane会离你而去，你将再次成为一个bretete。如果你再次陷入pane，就把这一切从头来过。这一类噩运的原因很难说。它可能会降临到任何一个猎人头上，而除了背上的jaycha之外，随便哪个亚契猎人身上都有额外的疗伤性文身。就连居弗库基身上都有好几条。

如果说有些时候，pane的原因显得扑朔迷离的话，还有些时候，人们可以再清楚不过地指出它的起因。其中一种，就是食用自己打到的猎物，并拒绝参与到交换中来。这种情况太过致命，人们连梦里都不敢做出这种玩火的行径来。若是想要私吞自己打到的所有猎物，你只会永远与动物世界彻底隔绝，因为pane会让你从今以后再也杀不死任何动物。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和食物之间的关系经由他人的中介，你很可能将彻底自绝于自然世界，并被完全抛弃在外，就好像你因为拒绝分享自己的所获而被社会拒之门外一样。这就是亚契人全部知识的基石，而他们之所以对之遵循不二，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基于以下的认识：一条隐秘的纽带将世界和人类联结在一起，在一侧发生的一切都将在另一侧产生回响，双方受到同一套秩序支配，我们绝不能违背它。

同样地，亚契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pane的举动。比如说，年轻的猎人从来不会吃动物的脑子。那确实是一道佳肴，但那么做会招致厄运。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很少打猎或者几乎不打猎的chyvaete才能享用它，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不会引起任何风险。年轻男子还被禁止食用某几种蜂蜜，如tei蜜蜂的蜂蜜，因为它们也会导致pane。相比之下，食用tare蜜蜂的蜂蜜的唯一后果不过是让kybuchu私处不长毛而已。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成为一个伟大的猎人，不就意味着彻底与自己的弓合而为一吗？而pane所做的，不正是让一个人和他的弓相分离，让弓成为身外之物，仿佛背叛了自己的主人一般？弓就是猎人自身：一个“刚穿了唇孔的人”最初的任务便是独力制作自己的第一张成人用的弓。这武器远不仅是一件工具。主人去世时，它和他的箭一样，都会成为Ove

enda，“消失的灵魂的栖息之所”。这时，最好丢掉这些变得危险的物件。弓是男人的符号与象征，是他存在的证明与安身立命的方式。因此，一个猎人去世时，他的弓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和他最后的唇饰一样，弓作为男人的一部分没法在主人逝世后留存于世。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弓在pane期间抛弃了你，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再是个猎人，你从此什么也不是。

弓所包含的力量就是它的软肋。想要让一个猎人染上pane很容易：你只要玷污他的弓就行了。他立马就会受到牵连，陷入pane之中。弓是男子气概核心之所在，是雄性气魄恒久不变的象征。因此，人们必须保护它，使之免于对立面的侵扰。猎人的空间延伸至何处？哪一条边界，一旦跨过，就会让你身处男性世界之外？那就是女性的世界。在这样的空间分布中，有一种秩序主宰了这些作用力线，以确保不同的区域泾渭分明，互不干犯。如果某种混乱导致两个区域开始互相渗透，男性空间就会因为与女性空间相接触而受到污染、削弱、损害。换言之，如果一个女人碰了某张弓，pane就会降临到它主人的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被严格禁止与弓箭有任何接触。因为虽说她们本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对男人来说，后果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对于kuja而言，什么东西就好像弓箭之于男人？那就是naku，篮子，它是女性气质的终极象征。每当一个kujambuku在经历了隔离仪式与腹部文身之后成为dare，她都会把棕榈叶编成篮子，来庆祝自己步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怎么编篮子，因为母亲教过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也编过小一点的篮子。现在轮到她亲手来做篮子了，她将终其一生背着它，直到死亡。弓即男人，同理，篮子就是女人。因此，如果一个猎人碰了篮子，或是胆敢像女人一样找个篮子背——这种想法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荒谬至极——他将面临同样的后果：pane将会是对他接触篮子的惩罚。

承担后果的永远是男人。男性与女性气质之间无端的交叠永远只会有一种意义上造成影响，也只有男人会承担罪责。当然了，因为猎人再也没法带回任何食物，在这个意义上kuja同样也会受到pane的影响。但这就是女人的力量，她们会为男人带去祸端。为了成为猎人，也即是说，为了成为男人，你必须时刻对女人保持警惕，即便她们不在经期。可以说，想要做一个男人，你只能站在女人的对立面。一旦有人抹消男女之间的距离并跨越那条界线，他就会被感染。他将变得什么也不是，他的雄性气概也会随之而尽：他已经掉进了女人的世界中。弓箭-男人，篮子-女人，人就这样被一条轴线分为两类。一个没有弓的男人算什么呢？他成了一个背篮子的人。

这就是克兰贝基。那句“我的篮子”不是开玩笑，因为那确实是他的篮子，是他在某个女人的指导下亲手所编。他为什么会有篮子？因为他没有弓。那他又为什么会没有弓呢？因为他pane。但这pane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事实上，他几乎一直都处在这个状态中。他从没能用弓和箭杀死过任何一只动物，所以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pane之于他就好像bretete之于其他人。这不是意外，而是天生如此。可是当种种原因导致他失去了自己的弓之后，为什么他会为自己准备一只篮子呢？他本可以什么也不做，换言之，他本可以处在弓和篮子之间。这样有可能吗——做一个既没有弓也没有篮子的人？除了童年时期以外，是否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人对两性差异忽略不计？但克兰贝基是个成年人，他已不再是个kromi了。他不能继续生活在这个模棱两可的中性地带。一旦你长大成人，男人、女人，弓箭、篮子，你只能二选其一，不存在居中的第三个选项。那么，一个没有弓的男人到底算什么呢？他是个“非-男人”，因此，他成了个背篮子的人。

在白溪，有两个男人背着篮子，他们都是Iröiangi。另一个人名叫查楚卜塔瓦楚基，“长胡子的大野猪”。他脸上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他通常得花很大一番功夫才能找到愿意帮他刮胡子的女人，所以他的胡子一直径自野蛮生长，变得颇具规模。不过，我送了他一面镜子和几片刀片作为礼物，他便把刀片插在一块裂了缝的小竹片里，然后把它们牢牢固定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常常打理胡子了。为表谢意，他称呼我为apäio，爸爸。查楚卜塔瓦楚基之所以背了只篮子，是因为他处于pane之中。但与克兰贝基不同的是，他很强壮；因此，尽管他在pane的影响下，已经好几年没用过弓了，他却依然坚持徒手抓浣熊，还在地穴中追踪猓徐的去向。他会把猎物分给大家，也会从其他猎人那里收到答礼。他肩膀上累累的细长墨线证明，为了用文身战胜厄运，他做出了种种努力。然而，一再的失败之后，现实占了上风，他最终向命运低了头。他某个兄弟的妻子给他做了只篮子。他与他们同住，但后者与其说是欢迎他，不如说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嫂子若是哪天心情不好，便不给他东西吃。那些日子他就得自己做饭。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和pane的男人结为夫妻，因此，他只好自己干女人的活计。他之前结过婚，但是妻子死了，留下他一人。种种证据表明，查楚卜塔瓦楚基的运气实在不算太好。

相比之下，克兰贝基在面对自己的处境时显得泰然自若。的确，他话不多，但心态平和。他和一户人家同住，彼此相处得很好。烧饭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会帮那户人家的妻子做各种日常家务。你甚至可

以把他看作男主人的另一个妻子。早上他会和kuja一同出门搜集幼虫、水果和棕榈芯。回来时，他的篮子和同伴们的一样满。他会放下篮子，跪坐下来，开始勤快麻利地准备晚餐：给浆果去壳，给块根剥皮，准备bruce——一种用棕榈芯和幼虫混合而成的浓汤。他还会打水，捡柴火。无事可做时，他就休息，或是用男主人杀死的动物的牙齿做项链。它们很漂亮，远比女人做的那些要赏心悦目。女人们往往满足于给自己丈夫打到的各类动物的牙齿穿孔，然后用一条细线将它们串起来。最终成品不过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牙齿，按照动物被杀死的先后顺序排放在一起。这些项链有的很长，可以长达两米，上头串着上百颗来自猴子、刺鼠，尤其是无尾刺豚鼠的牙齿，碰撞时叮当作响。野猪和孢子的牙齿则不会被保存下来。如果一个女人心情不错， she 会把项链一条条绕在脖子上，愉快炫耀着，以证明自己的丈夫是个伟大猎人，然后把它们放回篮子底。克兰贝基的项链则包含了更多心思。他只用猴子的犬牙，而且还是大小基本相当的牙齿。仅靠一枚无尾刺豚鼠的牙齿给这些小犬牙穿孔可不是什么容易事，但克兰贝基有的是耐心。

营地里没有人会对他多看一眼，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只干女人干的活，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并予以默认。就这样，克兰贝基不比部落中任何一个人更引人注目，也不比任何人更寂寂无名，他平静地扮演着命运为他定下的角色。他和女人们待在一起，也像她们一样生活；他没有剪短头发，还背着一只篮子。扮演这个角色时的他很自在，可以自由做自己。他又有什么需要难过的呢？

相比之下，查楚卜塔瓦楚基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你根本不能说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没法说他对现在的情况感到满意。不是的。证据就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亚契人都嗤之以鼻。人们不会公开取笑他，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做的习惯，但大家都觉得他很滑稽，并在背后偷偷笑话他。男人们多少有些瞧不起他，而每当女人们看到他背着篮子出现时，她们总是捂嘴偷笑。至于那些通常对大人尊敬有加的孩子，和他在一起时，就会把礼数和举止规范抛到脑后。他们一个劲捉弄他，态度无礼，还不肯听他的话。有时候他发起怒来想要抓住他们，但孩子们跑得太快了；他便泄下气来，郁闷地在森林里散个步，或是一个人去一旁躺着。人们总是装出一副觉得他在分发猎物时非常吝啬的样子，但事实上，他和其他人一样慷慨。比如说，这天早上他出门去了，说是要去找幼虫。回来路上他碰上了一队男人。“怎么样？”“啥都没有。没有guchu。”然后他接着往前走了。等他走到听不见的地方时，其中一个男人说道：“啥都没有？U pa modo!全被他吃掉

了！”然后所有人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可是，这根本就是冤枉人。为什么亚契人对可怜的查楚卜塔瓦楚基这么刻薄？显然，人们有时觉得，他那热衷于用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装饰自己脖子和脑袋的样子就像一个小丑。每当他看到一小块金属、一个弹壳，或是一个瓶子，他根本抵挡不了诱惑，而是会把它捡起来，用绳子串起来，然后挂在脖子上。就这样，你常常会看到他胸口挂着一大坨项链，上面是十来个青霉素瓶子、几把开沙丁鱼罐头的钥匙和几片奇形怪状的铁片。他会这么戴上一段时间，然后将它弃置一旁，另寻新欢。有一次，有人给了kybuchu一个橡皮球，没过多久他们就把它玩坏了。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他把它切成两半，把其中一半做成了一顶豪华圆帽，可以盖住整个头顶，一直到眼睛。这个主意让他很是得意。然而，亚契人看到这个附庸风雅之徒时却一脸怜悯：“我毫不意外！他这人就这样！”换言之，这个pane的受害者通过这种低级的浮夸作风再一次找到了博人眼球的方法。

然而，亚契人的恶劣态度背后必然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不管怎么说，查楚卜塔瓦楚基带回来的浣熊和犰狳早已大大弥补了他这些不自觉的小毛病。他作为猎人的所获当然有限，但绝非微不足道。相比之下，从没抓到过动物的克兰贝基却从未遭受过亚契人的任何恶意。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这两个遭受pane的男人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两个同样被排除在猎人圈子外、并且在负面意义上相似的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才导致人们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理论上来说，亚契人本应对他俩一视同仁才对。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因此，二人都遭受pane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俩是相似的。事实证明，他们完全不同。

男人 = 猎人 = 弓，女人 = 采集者 = 篮子：正是这两条等式严格规定了亚契人的生活轨迹。不存在第三条等式，没有额外的第三空间来保护那些既不属于弓箭又不属于篮子的人。一旦你不再是个猎人，你就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在象征层面上，你已经成了一个女人。克兰贝基深知这个道理，也接受了：他彻底放弃了猎人这个他无力承担的角色，而这立马让他站在了女性那边；他成了她们中的一员，也接受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他像她们一样背着篮子，一条背带系在额头。那查楚卜塔瓦楚基呢？很显然，他什么都不懂。因为他天真地以为，即便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权利，他依然能够留在男性世界。这个不再是猎人，也不再被看作是猎人的男人，被他自己想要作为男人生活下去的愿望遮蔽了双眼。Esse est percipi⁽¹⁾，诚哉斯言。当其他人看到他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看待他的？或许这问题问得不好，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查楚卜塔瓦楚基是个隐形人。为什么？因为他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为pane，他并不存在于男人中；但同时，哪怕背着篮子，他也不存在于女人中，因为他拒绝融入她们的群体，也拒绝生活在她们的空间中。然而，这个他拼命想要占据的空间，这个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他也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他成了一个可悲的居住者，住在一个不可能的空间中。这就是他之所以是个“隐形人”的原因：他身在别处，不在任何地方，同时又无处不在。我们该怎么看待查楚卜塔瓦楚基的存在？这种存在无法被思考，在那里他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绝不可能再回到来时路，又不敢迈步向前。这就是他惹恼了亚契人的原因。他们之所以会不自觉地反感这个陷入pane的男人，是因为他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姿态拒绝随波逐流，听任事情自然发展——而这本该让他找到新的位置、他真正应该占据的位置，也就是和女人们在一起。如果你有个篮子，那是因为你是个kuja。可他不愿意这样，而这在群体中导致了混乱和失序，搅乱了人们的想法，同时也搅乱了他本人的思绪。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看起来如此紧张，如此手足难安。他没有选择最舒服的位置，反而让事情乱了套。

你只要看看查楚卜塔瓦楚基是怎么背篮子的就明白了。他的姿势和女人们还有克兰贝基的不同：他们把一根背带挂在额头；如此，女人们就可以在走路时低头弯腰，眼睛看着地面。查楚卜塔瓦楚基却不是这样背naku的：他的背带挂在两肩上，垂向胸前。有时候篮子会滑下来，他就得用手稳住，还有些时候，背带会勒住脖子，叫人难受极了。但那样他就可以像男人一样走路了。

至于克兰贝基，他和弓箭的关系和女人们与弓箭的关系别无二致。他从来没碰过任何一张弓，因为这会为弓的主人带去厄运。他和kuja之间没有任何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建议他拿着弓拍照时，他拒绝了我，并转而拿起了自己的篮子。但他做的还不止于此。在象征层面上，这个弃绝弓箭，又同男子气概划清界限的人，已经最大程度进入了女性的世界。所以陌生人才会对此三缄其口，所以才会有亚契嘉图人那些隐晦的暗示。关于他，亚契人究竟知道多少事？为什么一边的人对此避而不谈，另一边的人则只会阴阳怪气地嘲讽他？这是因为，克兰贝基是个kyrpy-meno，一个走后庭的，一个男同性恋。

他部落的人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尽管他们觉得有些丢脸。但这是因为亚契嘉图人对此颇为鄙夷：“我们中可没有kyrpy-meno！只有

Iröiangi才那样！”但是所有人都同意，克兰贝基之所以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都要怪pane。亚契嘉图人的鄙夷并不针对他个人。不如说，对他们而言，一个男人竟然接受了另一个男人的求欢并献出了自己的kyrypy，这事情本身就很搞笑。他们私下里会嘲笑这件事，但更多是它当作又一个证明自己比陌生人更优越的证据。毕竟在他们部落中，人们想不到任何类似的例子。他们能想起的只有卜加米亚朗基的故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拜瓦基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有个亚契人出去打猎，并幸运地撞上了一头kware——一头被逮了个措手不及没能钻进树丛中消失不见的大型食蚁兽。他甚至连支箭都没费，就用弓一击打断了那动物的脊椎。那一带植被非常浓密，树下爬藤与蔓草纵横交错。猎人将还在苟延残喘的猎物丢在一边，挥着弓箭向前，想在植被中开出个口子来。就这样前进了数十米后，他来到了一片更开阔的地带，便折回原地，好将食蚁兽背在背上带走。这时，他看到动物边上有个人。那是卜加米亚朗基，这个年轻男人尾随他来到这里，现在正在野兽边上。他在那里干什么呢？猎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正在和死去的食蚁兽交媾！他彻底沉溺在快感中，甚至没听到有人靠近。这个男人对猎物做的事情让猎人怒不可遏。他二话没说，一箭射去，卜加米亚朗基便应声倒在了kware的尸首上。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亚契人总结道。

至于kyrypy-meno，他们对此闻所未闻。对亚契嘉图人来说，一个男人在女人的美色面前无动于衷就已经够匪夷所思的了。可不仅如此，这人竟然还会在其他男人的身下承欢，那简直就太不像话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pane。那他们是怎么说克兰贝基的呢？首先，显然，他从来没有“找过女人”。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活儿太小了，和浣熊的一样小。常常有人把它比作箭头上的倒刺：那玩意儿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根本没法使。说句实话，这很可能仅仅是恶意中伤。那么克兰贝基的伴侣都有谁呢？我们是否需要承认，陌生人与亚契嘉图人大不相同，里头的猎人一个个都热衷于kyrypy-meno呢？因为很显然，光克兰贝基一个人可没法搞同性恋。

没错，他确实有伴侣。但没有很多，人选也大大出人意料。按照逻辑你也许会觉得，既然克兰贝基这样的男人代表了亚契社会中性别伦理失序的那一面，代表了对一切被遵守的既定价值的颠覆，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性生活发生的场域不会受到任何规则的束缚，或许他可以随心所欲，从己之所好——换言之，部落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和克兰贝基欢好，只要他愿意。但事实远非如此：同性关系的缔结绝非毫无法纪，它被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则掌控着。克兰贝基代表着上下颠倒的

亚契世界，但他并不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对立，也不是对它的否定。他的身边环绕着另一种秩序、另一组规则，它们构成了“正常”秩序与规则的镜像——即便是反转的，却依然是同样的图像。

亚契人社会生活的基石是什么？是不同家庭群体之间的结盟，这种关系通过联姻以及不停地交换女人才得以形成、实现。Kuja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交换，在于成为一个不是她父亲、兄弟、儿子的人的妻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便有了picha，同盟。然而，一个男人可以被“交换流通”吗——即便他以女人的身份存在？打个比方，如何才能对克兰贝基的礼物做出回馈？我们甚至很难想象这件事，因为他不是女人，而是个男同性恋。一切社会的首要法律都旨在禁止乱伦。因为他是个kyrpy-meno，克兰贝基生活在社会秩序之外。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体系的逻辑（或者说是其镜像逻辑，但二者其实是一回事）被推演到了它的极端：克兰贝基的伴侣是他的亲兄弟。“Picha kybai meno-iä.一个kyrpy-meno不和自己的盟友做爱。”（Picha kybai意为kyrpy-meno。）这一禁令与主宰男女关系的规则恰恰相反。同性恋只可能是“乱伦行为”。一个男人只和自己的兄弟鸡奸：在这个象征乱伦的关系中，人们得以确保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男女之间的）乱伦发生，从而避免社会组织受到危害。

这就是为什么克兰贝基的伴侣人数如此有限。当然了，时不时会有某个和他没有亲缘关系的男人向他示好，那位放荡不羁的布库基就是其一。不过这么说吧，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也很少会传出门外。这就是克兰贝基的命运：pane，同性恋，他颠覆了性别与社会秩序，却依然没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特别不满。

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他最后的厄运，眼下秃鹫正在分食他的尸体。让它们这么饱餐下去是不明智的。人们要将克兰贝基下葬。一个男人回到营地将消息公之于众。他会带回来几个女人，这样她们就可以唱起死者的chenga ruvara。在此期间，剩下的人开始着手布置墓穴。大砍刀利落地砍了几下，他们就在丛林中清理出了一片空地，并在正当中挖了一个洞。它看上去像是一口井，基本呈圆柱形，宽度恰好可以容下一人，深度达一米多。森林地面上那层厚厚的腐殖土不算太难挖，砍刀很容易就砍了下去。秃鹫仍在一旁，完全没有被我们的动静吓走。它们没有试图靠近尸体。有个男人走到稍远的树下去找chipo了，那是一种细细的藤蔓，可以当绳子用。

报信的人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个女人。其中一人是酋长卡雷瓦楚基的妻子。她负责主持部落中的大小仪式，也永远是第一个开口吟唱的人。剩下两人是克兰贝基的姑嫂，她们带来了两张用冻子椰子叶编成的席子。她们跪坐着，唱响了chenga ruvura。在这里，她们的抽泣甚至比往时还要悲伤，因为现在这抽泣声中不再混杂着营地生活中那轻微却又接连不断的嘈杂声。寂静，阳光，秃鹫。男人们（其中一人是死者的兄弟）看上去无动于衷。克兰贝基的逝去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飞快地交谈着，几乎让人听不清。这低语是不是给死者的悼词？我不知道，但我怀疑是的。在人们完成了对克兰贝基的道别之后，男人们接手了仪式。尸体很臭，他们手脚飞快、用近乎粗暴的手法把尸体双腿高高折叠到了胸口位置，期间不得不动用点蛮力，因为尸体已经开始僵化。这是婴儿的姿势：人们生前如此，死后也当如此。为了维持尸体的这个姿势，人们用先前采来的藤蔓将他紧紧捆了起来。手臂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它们紧贴着躯干，就在肋骨旁，前肢被折起挨着上臂，手肘抵着身躯。最后是脑袋。男人们摁着脖子让脑袋往下折，直到贴着胸口。接下来，人们让他双手抵着太阳穴，手指微张，指骨略略握起，仿佛猛禽的指爪。脑袋被置于双手之间，藤蔓的死结把它牢牢定住。克兰贝基巨大的身躯如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落在网兜中的球。现在可以下葬了。

一张席子被铺在了洞穴的底部和四侧，这样尸体就不会直接碰到泥土。两个男人提起了这沉甸甸的包袱，把它放进坟墓中。尸体面朝西方，朝着死者的国度。但尸体不是直挺挺放下去的，也没有双脚着地，而是向前倾，几乎跪坐在膝盖上，脑袋垂下来，抵在洞穴的一侧。一块横着抵在洞中的木块支撑着前臂，仿佛死者正在倚栏沉思，脑袋埋在双手间。又仿佛是一只正试图离开窟穴的动物。接下来，人们在尸体上覆上第二块席子，细致地用它围住脑袋和躯干，这样人们现在用来覆盖墓穴的泥土便不会碰到尸体。他们向下压了压泥土，但这口井没有完全被填满，土只盖到距离洞口十到十五公分的地方。洞口周围的地面中插满了木片，这层屏障可以防止泥土松动，同时也掩盖了墓穴。此外，它还可以阻止动物靠近。葬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墓穴上覆上一层稻草做的屋顶，几乎与地面持平，这让墓穴看上去像一个小型住所。而事实上，人们建造的就是一座房子：首先它可以遮风挡雨，但同时也保证了死者会待在墓穴中。若是没了这层屋顶，他就会从里面出来，他的鬼魂也可能会去骚扰其他同伴。但这里才是他的家，他的tapy：他得待在这里。小孩则另有一套规矩：人们会将他们用两张席子包好，仰面朝天背朝黄土，然后彻底把墓穴填埋严实，这样一切痕迹都会迅速消失。没必要知

道墓在哪里；没有人会回那里去。孩子们没有Ianve，也不会去打扰生者。孩子甚至可以被就地埋在tapy下——这就是证据。

然而，人们必须为克兰贝基的坟墓做个标记，以便再次找到它。如果他死在营地中，人们会将他就近安葬，然后立刻转移到Ianve追踪不到的地方。成年人下葬后，亚契人总是会在销毁或焚烧其所有物（女人的篮子、席子与男人的弓箭）之后离开那一带。他们会把弓折断，扔进火中。箭不会被毁掉，但是会被随意射向四面八方。它们也是Ove enda，是灵魂的栖所。一个人死后，他生前拥有的东西一件也不能留。它们太危险了。因此，人们刚一得知克兰贝基的死讯，他的篮子就被扔进了火中。向空中升腾而去的轻烟为Ove描绘出了最终离去的路线。但这一次，亚契人没有从现在的营地搬走。墓穴离这里太远了，Ianve追不过来。但同时，人们必须记住墓穴的位置，好再次回来为葬礼画上句号。

死者入土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几个星期之后——这是为了留够时间让尸体彻底腐烂，只留下一具枯骨——在此期间仍然在森林中四处游荡的亚契人又回到了墓穴之所在。不论他们之间离得有多远，也不论过去了多长时间，人们必须将死者和生者彻底隔绝开来：他们将离开他，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摆脱他。如何做到这一点？人们将护在墓穴上的屋顶扯了下来，将墓穴重新打开。洞中是一具被藤蔓绑在一起的尸骸。他们将它弄了上来，小心翼翼，以免碰到它——不然就会招致baivwä，这对一切受感染的人而言几乎永远都是致命的。死者的一位男性亲属拿起一块分叉的木头，把尖端捅进眼眶，分开了头骨。然后他拿起弓，将头骨用力击碎，又把它扔进了一个为这个场合特意燃起的火堆中。头骨会在那里燃烧殆尽，空洞的眼眶朝天，这样Ove就能清楚地知道，它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离开。剩下的骨头或是被烧了，或是就那样留在原处，人们不会再次将墓穴填满。一切都被弃置在原地，人们离开了。下葬的过程有多庄严，葬礼的第二阶段就有多慌忙仓促。那么，方才，亚契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实上，通过击碎、焚烧死者的头骨，人们第二次杀死了他。在那之前，他还没有死透，他的鬼魂还逗留在头骨中。现在事情已经办妥了，Ianve已被赶走，死者也已被遗弃。所以说，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重修墓穴，或是维护它呢？这地方已经没用了；现在骨头没剩几根，动物和湿气很快就会来帮忙善后。这个过程一共只花了几分钟，但有时人们会大老远赶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唯一能确保死者与生者踏上殊途的方法。

说到底，一个manove——一个死者——究竟是什么呢？那当然是

种非常糟糕的东西，它会激发人心中的恐惧，尤其是因为manove充满恶意，同时又叫人看不见摸不着。但最糟糕的是，它们是亚契人绝对的敌人：死者是如此满怀恶意，甚至想要杀死生者。一个死去的亚契人已不再是人，而是成了一种别的东西。死者只想要由死亡来主宰一切。他们和美洲豹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后者象征着亚契世界中潜伏着的一切致命威胁。当然了，亚契人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明确表达这些观点，但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对这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当人们准备将克兰贝基的尸体下葬时，他的手被拗成一个奇怪的姿势抵住脸庞，手指形同鸟兽的指爪。“为什么把手这样放？”“Baipu pypö vwä.这样这里就会出现美洲豹的记号。”Pypö意为人类或动物在泥土中留下的足迹。但这里这个词指的并不是足迹本身，而是直接指代留下痕迹的事物：那就是美洲豹的脚爪，死者张开双手与他那分开又蜷起的手指所模仿的正是这个。为什么陌生人会将死者以如此奇怪的姿势下葬？这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便揭露了manove的真实身份和它们新的生存方式：死者就是美洲豹。它们不光被排除在了生者的群体之外，后者甚至还将它们逐出了文明社会——通过将它们变成美洲豹，将它们逐回自然界。“手这样放，他就变成了一头美洲豹。亚契人的幽灵有着和美洲豹一样的脑袋。”

除此之外，“灵魂”不也会变成美洲豹吗？“Ove rö baipu,o. Ove已经变成了美洲豹。”亚契人很少和真正的美洲豹面对面。他们碰到的这类猫科动物几乎从来都是鬼魂为了伤害某人变身而成的。任何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化身成这种动物。但人们知道，有那么一群人——只有他们，肯定会变成美洲豹：那就是yma chija，个性强烈的人，比如居弗库基。其他亚契人的Ove则会变成barendy，一个“闪闪发光的存在”，一颗天上的星星。为了升到天上，会有一头浣熊背着Ove沿着大树的垂藤一路往上爬，或者，Ove也可以顺着一束阳光上行。Barendy周身毛发遍布。它从不说话，但是每当它出现在傍晚时，就会用屁眼制造很多噪音。这时亚契人就会闭上嘴，捂起耳朵，不然barendy就会砸到他们头上，烧掉他们的头发——就像人们烧掉猎物的皮毛一样——并把他们烤熟。他们一听到它前来，就会赶紧用土把火堆盖上，以免吸引它的注意力。但它并不是火的主人。通体透白的Dyvitata才是火的主人。每当它在空中飞过时，它的屁股就会喷出一缕火：kyrpy tata，屁股喷的火。

不管怎么说，即便Ove变成了一个barendy，它也不见得会一直维持这个形态；它可以根据场合变成一头美洲豹，甚至一条毒蛇；也可以爬到树上，让一条蛇从树上掉下，恰恰砸到它想杀死的亚契人的脑袋上；

最后，它还可能假扮成其他动物的样子，比如那只杀死忒鲁基的水獭。所有人都知道，从现在开始克兰贝基将会以jakuchä鸟的样子生存下去，因为这就是男同性恋的最终形态。这些“灵魂”无处不在，形态各异，它们有时被称作Ove，有时被称作Ianve，而亚契人要很努力才能拒它们于门外。它们就是那个已死之人吗？还是说它们仅仅是他邪恶的分身？人死后会发生以下必然结果：manove将会分成两半，一半将成为与生者为敌的幽灵，另一半则会成为中立的“灵魂”，人畜无害的它将前往日落之处栖息，那是死者的居所，亚契人把它描述成一片大草原，或是称之为“看不见的森林”。当亚契嘉图人和陌生人比较他们对死者命运的理解时，其中的差异让他们震惊。前者坚持认为在“看不见的森林”中只有chingy树（疏花旱蓼树），后者则认为生长在那里的唯一植物是树干上苔藓遍布的baikandy（奥寇梯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尽可能将死者埋葬在这种树的树荫下。在那里，在尘世上方的那片草原或森林中，“灵魂”们蜷曲着身子躺在那片土地的主宰者，Chono，雷神的身旁，一如婴儿卧在母亲的子宫中。一旦来到上界，Ove便会一边等待着Pichua，一边开始哭泣。然后天上就会暴风骤雨大作，伴随着砰沵的雷鸣。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亚契嘉图和陌生人对此没有任何分歧：Ove会决定一个亚契人何时应该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做准备。“Ove会做一个陶罐。”库步拉基一脸严肃地解释道，而坐在他身旁的陌生人则非常激动地点着头：“Go! Go nonga!没错！就是这样！”

“亚契人的Ianve、亚契人的Ove把骨头放进罐子里，放进它亲手做的那个罐子里。它会把灰烬、骨灰和烧成灰的骨头放在那里：放在它自己的罐子里。它把头骨和骨头放在一块。亚契人的Ove自己做罐头。

“它把打碎的、被烧过的骨头放进罐子里，它随身带着自己烧成灰的骸骨。它就把它们放在那里，它把自己的骨头放在亲手做的罐子里。

“接下来，等到那个人的Ove离开的时候，当它离开并进入自己的罐子的时候，当它亲手敲碎自己做的罐子的时候，死亡就降临了。它在死亡的凝视下处理了自己的骨灰。

“从前的亚契人⁽²⁾、曾经的死者会自己做陶罐，但今天的亚契人已经不会亲自做了。一个人只有年纪大了才会做陶罐。

“Ove会把灰烬、头骨灰和身体的骨灰放在那里。所有骨头都放进里面了，还有头发，所有剃下来的头发，这些也都被放进了罐子里面。

“亚契人⁽³⁾还从他那被剖开的腹中放出排泄物。他把自己的排泄物也

放在了里面，死者的排泄物，肠子里头的东西。一切都被放在了罐子里面。

“在深不见底的黑暗深处，Ove将死者的排泄物放进了罐子里，然后是灰烬、骨灰、头发、被烧得一干二净的头骨，一切的一切。

“当那个亚契人⁽⁴⁾即将离开时，当他的Ove敲破自己亲手做的罐子时，他的死期便要到了。它敲碎了罐子，头骨的灰烬从口而入：这便是死亡降临的时刻，也是致命的疾病降临的时刻。

“它击碎了濒死之人的骨头，击碎了他的头骨，也击碎了陶罐。致命的疾病便在这时降临了，死亡也降临了。在深不见底的黑暗深处，Ove击打着。”

就这样，人们其实事先已在为死亡进行准备。死期是由Ove决定的，当它打碎了装着（想象中的）骨头、骨灰、毛发和排泄物的陶罐时——这是对不久以后即将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的预演——死亡的时刻就已经来临，Ove也离开了躯体。这时，Ove会把装着骨灰的罐子放在一棵树的树根之间，灵魂之鸟（Les Oiseaux d'Ove）——通常是雷鸟——便会来这儿和它相聚。白天它们都挤在罐子中，一个挨着一个。它们会在晚上离开陶罐，陪伴“灵魂”前往“看不见的森林”。

如果亚契人的敌人兼邻居Machitara听到这一切，他们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从前，他们也曾将死者葬在土中，收集起他的骸骨（至少当死者是酋长或大巫师时他们会这么做），把它放进一口大骨灰瓮中，再把骨灰瓮放进墓穴里。我们在亚契人那里同样发现了瓜拉尼人所实行的这种仪式，但对亚契人而言，它只存在于对Ove moo kara的信仰之中。Ove moo kara就是那个罐子，而它其实就是神话中的那个骨灰瓮。在亚契人集体历史的开端有一口大锅：Baiö的大锅。一个还没有唇饰的男孩打破了它，月亮和黑夜都随着奔涌的灰烬中从锅中逸出。这一切都发生在看不见的森林中，当时美洲豹尚未存在。人们各自命运就这样被这口虚幻的骨灰瓮决定了。这些从Baiö大瓮的裂口奔腾而出的尘土或许就预示着经历过葬礼之后，亚契人都将化为灰烬，随后，这些灰烬又被Ove放进了它小小的陶罐中。因此，在Baiö的大锅这个神话中，我们不光能看到亚契人关于宇宙秩序之起源和昼夜交替的理论，我们还能（毫不意外地）第一次听到以下说法：宇宙秩序让世间变得可居，而死亡就是人们为这个秩序付出的代价。当太阳开始在空中升落时，亚契人才真正成了亚契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了这个让人无从逃避的秩序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个秩序让人类的存在变得短暂无常。Ove之瓮的神话是对

Baiö神话的补完；后者是关于死亡缘起的神话，也是一切关于生命的思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这些神话传说还能帮我们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亚契人对待灰烬的态度。如果说在印第安思想中，神话中的灰烬是对死亡的隐喻，那么现实生活中，小屋里篝火的余烬就是对骨灰的转喻。如果有人浑身灰烬遍布，弄得脏兮兮的，这不就意味着他的身上印刻着自己的宿命与年寿之短长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迅速将灰烬掸去，因为这可不是人们乐意看到的东西。这个记号过早地预示了终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

克兰贝基生前不是一个猎人，因此人们不会通过决斗来纪念他的死亡。更何况，陌生人不喜欢在白人的围观下进行决斗。他们之中，好几个人脑袋上有以前决斗时留下的巨大伤疤，猎人们也颇以这些伤疤为荣。一位伟大的bretete去世时，他的同伴会在森林中清理出一片空地作为较量的场所。这场较量是对manove最后的道别，目的并不在于杀死对手，而是为了一试他的深浅。会有一个男人蹲坐在空地中，双臂交叉，支在膝盖上，头枕着双手。决斗要做的就是对他的脑袋发起攻击。他不会抵抗，也不会试图避开攻击。他必须生生扛下这一击，不能叫出来，也不能摔倒。进攻者正对着他，长弓在手，站得纹丝不动；然后将木弓高高举起，朝着对方发际线的位置击去。他下手很重，足以留下伤疤，但进攻者也控制了力道，以确保承受者不会有丧命之虞。他只会进攻一次：头皮破了，血飞溅到伤者的肩膀上。他很勇敢，没有倒下。接下来换伤者进攻了（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对方则会扮演他方才的角色。又是一击击下，决斗结束了。这是一场光明正大的比试，两位勇士都不过是在帮忙衡量彼此的身手。较量过后，双方不会结下任何梁子。恰恰相反，他们会满怀欢喜地炫耀这些粗大的伤痕，那是kyrymba——勇气——的象征。对身负伤痕的人，pichua将不会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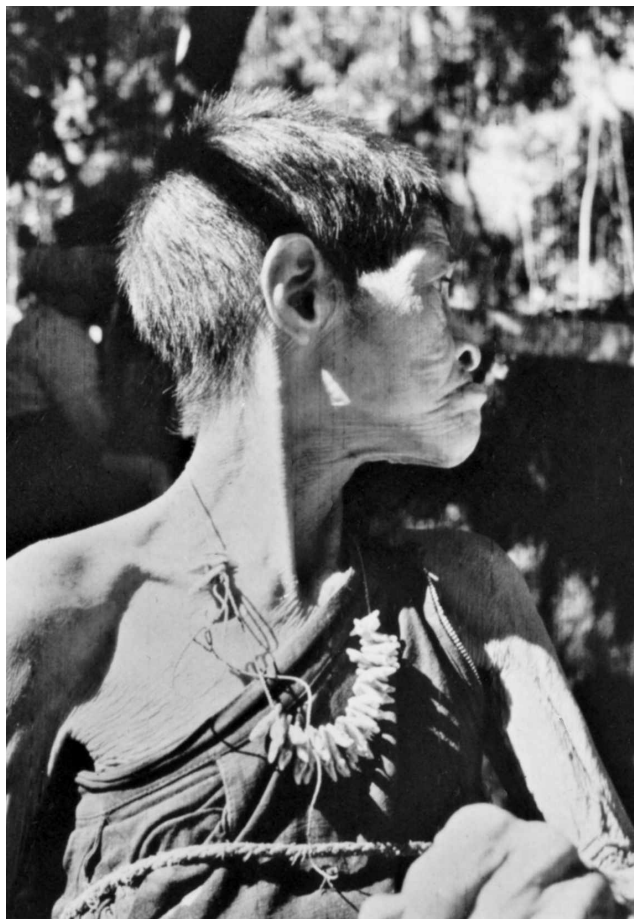
克兰贝基下葬时，好几个从未见过陌生人葬礼的亚契嘉图人让他们解释了一些东西，而后者也很热心地给出了答复。由此可知，亚契嘉图人的葬礼有别于此。当时的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想要发现这一切并不容易，因为一开始，他们狠狠地骗了我。

(1) Esse est percipi，拉丁文，“存在即被感知”。

(2) 说话人没有对死者的灵魂（Ove）和死者本人（亚契人）做出区分。——原注

(3) 说话人没有对死者的灵魂（Ove）和死者本人（亚契人）做出区分。——原注

(4) 说话人没有对死者的灵魂（Ove）和死者本人（亚契人）做出区分。——原注。



老妇人佩雷尚康基（“枯树阴道”）

第八章 食人族

对陌生人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那些在他们地盘的东北面游牧的亚契人是食人族。至于亚契嘉图人，他们对另一个部落做出过同样的指控。那个部落曾一度占有一直延伸到巴拉那河畔的大片森林，然而，自从忒鲁基为了抢他们的女人与对方大战了一场之后，这个部落就消声灭迹了。另外，亚契嘉图人还说，他们中的幸存者不是被白人抓走了就是被杀了。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太可信，毕竟陌生人和亚契嘉图人所谈论的都是自己的敌人——换言之，说到这群人时，他们很乐意极尽抹黑之能事：这是帮丑家伙，胆小鬼，笨得要命，话都不会说，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吃人。Aché Kyravwa：食人族。然而我该如何相信这么过激的发言，又该如何求证呢？食人者永远都是那个他者（l'Autre）！至于亚契嘉图人和陌生人是不是食人族，我自然不曾问过他们这个问题。然而，初抵瓜亚基部落时，我多多少少相信这些印第安人都有吃人的习惯，因为坊间他们这方面的名声已是由来已久，正好可以追溯到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的时候。因此，我最初曾满怀期待地以为自己会来到一个食人部落中。但我大失所望：他们不是食人族。

显然，你不能开门见山地问他们：你们吃人吗？更何况，我当时初来乍到，还不认识kyravwa一词。在我和他们的交谈中，尤其是面对亚契嘉图人，每次谈起如何处理死者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听上去都再清楚不过：ure juta，我们把他们埋在土里。接下来他们会极为细致地描述墓穴的细节，尸体在穴底的姿势，以及洞穴是如何被填满的。“我们寻来很多土，然后把它往下压。”——伴随着将土拍严实的手势，一边还在空中比划着墓穴的形状——“这样死人就埋好了。”“然后呢？”“没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因为有Ianve。”这不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亚契嘉图人的葬礼被压缩到了最精简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没有所谓的葬礼。更奇怪的是，他们描述的埋葬方式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通行的一模一样：一个等身大的墓穴，尸体仰躺着。然而，南美洲印第安人通常会像Iröiangi那样埋葬他们的死者：尸体会以胎儿的姿态被放进一个圆柱形的洞中。可亚契嘉图人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你也许会觉得亚契嘉图和西方葬礼的相似是纯粹的巧合。至于仪式之精简，我曾经倾向于将之归因于文化上的遗失，以为这一点再次说明了亚契人历史上所经历的文化退化，并以为，在成为游牧民族之前，他们曾用不那么草率的仪式来向死

者致哀。这不是没有可能，但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然而，所有亚契嘉图人的描述都高度一致，这让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说法。至于一切我从巴拉圭人、Machitara-瓜拉尼人还有历史学家那里听来的关于瓜亚基人的说法，我也只好把它们都当成是一派胡言。

然而，洛萨诺神父在说到Ka'aygua——“森林里的人”，也即亚契人——的时候，他的语气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会在夜间阴险地突袭那些睡梦中的人，由此可见他们有多天不怕地不怕；这么做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因为对战利品的觊觎，而是出于对人肉的渴望，因为他们会像猛虎一样对着死人的尸体狼吞虎咽；他们把这些突袭称为战争，并以战士自诩。”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段文字？可能有二。要不就是瓜亚基人一度是食人族，却出于某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放弃了这一习俗。要不就是历史学家的信息来源并不可靠，毕竟他们在记录时满足于重复瓜拉尼人讲的故事，而后者和Ka'aygua人又是死对头，因此，针对这个部落的食人指控是彻彻底底的诽谤。第二种假设似乎更有可能些，因为这也并非白人第一次在南美洲给某个土著民族打上食人的标签了。第一批西班牙征服者抵达海边诸岛、随后登陆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地区的海岸时，碰上了很多热衷于和近邻开战的强大部落。这就是加勒比人，他们和图皮-瓜拉尼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会仪式性地杀掉战俘，然后在盛大的宴席上广邀亲友，一同大快朵颐。食人族与西方人的这次初遇让后者惊恐万分，于是此后，他们就用这个食用自己同类的部落之名来指代这种在他们看来野蛮之极的行为：“cannibale”（食人肉者）就是“Carib”（加勒比）一词在西班牙语中的变形。

然而，随着白人逐渐深入大陆腹地，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食人部落，而南美洲也不再是哥伦布当初想象的那个人间天堂——当时他刚刚抵达奥里诺科河（Orinoco）的三角洲，还把它众多支流误当成了伊甸园里的七条河，满心以为这儿就是天堂。与预期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这里成了一片地狱，其间的居民每天除了吃掉彼此之外无所事事。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食人不过是单纯的杜撰。这并不是人们初次抵达一片陌生土地时，为了夸大自己遭遇的危险和这些看上去半人半兽的土著的野蛮程度而做出的情有可原的杜撰，而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谎言，意在掩盖白人殖民者的政策，并为之张目。自从神学家们在漫长而充满耐心的讨论之后决定，新大陆的居民同样是上帝的造物、同样拥有不朽的灵魂，换言之，一旦基督教世界意识到了土著的人性后，人们就无法一边宣称圣意，试图向这些受黑暗与邪恶禁锢的灵魂传播福音，一边把他们降格为奴。他们只能二选其一。当然了，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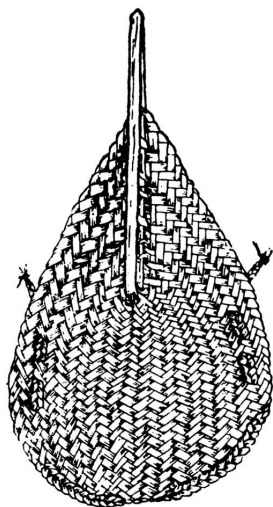
里和里斯本宫廷的这些决定和征服者没有太大瓜葛，后者与西班牙、葡萄牙的牧师和公职人员不同，并不急于让更多的灵魂聚集在主的身边。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新世界大赚一笔，而且是越快越好。然而想要这么做，他们就必须剥削奴役印第安人。然而，当时的新法规旨在“保护”这些免费劳动力，因此与美洲大陆新主人的利益背道而驰。于是，该如何曲解这些法规、使之为己所用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人们被禁止向部落发起战争，这么做是非法的，除了下面这种情形：如果这些土著是食人族，向他们发动战争就有了正当理由，甚至成了值得嘉许的举动。面对食人族，你大可不必手下留情。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你只需宣称某个部落有吃人的习俗，便足以理直气壮地对他们发动战争。打那以后，但凡有人需要奴隶，他只需声称“这些土著对他们的邻居是个威胁，他们会为了吃掉自己的邻居而杀死他们”，便足以借着这套高尚的说辞对他们穷追猛打。这些指控几乎永远都是不实的，然而，许多部落最终还是在欧洲人的种植园和矿井中死伤殆尽，后者只想着靠免费劳动力来开疆拓土，从而轻而易举地提高利润。简而言之，在16、17世纪，印第安人很快就背上了食人的恶名，而食人族的名单长度也随着殖民者对奴隶的需求量同步增长。

瓜亚基人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我一度认为或许就是这样。也许，最早的那批耶稣会传教士按照当时的普遍习惯，想当然地把美洲土著的两大罪愆之一贴到了这帮印第安人头上——因为他们太野蛮了，他们拒绝聆听和平的话语。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帮印第安人每天忙着做两件事情：吃人是其一，peccatus nefandus（同性恋）则是其二。在当代巴西，人们至今仍常常用Bugres（即法语中的bougres）一词称呼印第安人——也就是保加利亚人。这个民族当时以他们的性倒错闻名于西方世界，以至于“保加利亚人”（Bulgare，或是法语中的bougre）成了鸡奸的同义词。这个专有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后来被广泛用于指称印第安人。总的来说，就像很多其他部落一样，瓜亚基人被错误地当成了食人族，而洛萨诺神父也误把过去的传言信以为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亚契人的研究损失了点噱头，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也不能对此添油加醋。

我抵达瓜亚基部落已经两个月了。天气一直很热，蚊子的攻势就没消停过，而这一切都对科学研究的进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不管怎么说，每一天我多少都能获取大量信息，而尽管热带气候下的慵懒导致我的工作欲和自律心都大打折扣，我只需观察四周的日常生活便足矣：随

便看看都能让我发现些新东西。有一天，居基（“青蛙”）正坐在我边上。1月的时候，美洲豹吃掉了查楚外米基，随后不久，佩雷尚康基（“枯树阴道”）也去世了（大概是老死），于是居基就成了印第安女人中最年长的一位。这个老妇人瘦小干瘪，却依然很机敏，也不会懒于填满自己的篮子，或是跟着她儿子中的一个到林子里去。她对周遭发生的事情不太关心；若是没有埋头于某些微不足道的小活计，她就会满怀慈爱地和自己的kimonogi（孙子）玩。她对陌生人没什么好感，并毫无心理负担地指责他们又邋遢又粗鲁。当她未婚的儿子加佩基断了与卡加瓦楚基妻子的关系时，她很开心。她并不是很想要一个Iröiangi女性来当自己的katy（儿媳妇）。



pekä：扇子，用于生火、赶蚊子

老人家总是比其他人要对各种事情更知根知底一点，所以他们是最好的消息来源。基于这个假设（虽说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我问居基愿不愿意和我聊一会儿。（之所以找她，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拜瓦基不太把我当回事；虽然他没把这写在脸上，但他其实觉得我是个tawy，白痴。）居基同意了。她跪坐在我的小屋中，对里头一切属于Beeru的物件——加以检视，同时把手伸进旁边一只糖果袋子里，费劲地把糖果从包装纸里头抠出来。我想要问问她的孩子的事情——她生了不少，得有七八个；还想问问她的几任丈夫。顺便一提，几乎所有亚契女人都生了至少三个孩子。理论上，部落人口本应有所增长，或至少保持稳定，但为什么现在反而在急剧下降呢？首先是因为白人的追捕——他们杀了很多印第安人。第二个原因的影响相对较小：那就是杀婴的习俗，这可以

是发生在仪式层面的“复仇”，也可能是为了个人之便。（比如，一个女人如果已经有了个尚未断奶的孩子，就最好除去自己的新生儿，因为她没法同时哺育两个婴儿，也没法背着他俩在森林中四处游牧。）如果居基的孩子都活到了现在，他们应该已经人到中年，因为她的小儿子加佩基已经是三十岁男人了。她讲了起来，这种悲惨的抱怨我听得太多了，我甚至开始对此无动于衷。

“Beeru mata, Beeru juka.白人抓住了他，白人杀了他。”有时居基会问我，“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某某某？白人就是在那里把他带走的”，一边指着那个地方。“我没见过他，我还没去过那边。”说真的，我并没有听得很认真。我俩都昏昏欲睡，尽管她要比我稍微精神些，因为她一直咂吧着kramero。“那那个呢？那是谁？”“是个女孩，有这么高。”她举起手比划出一个三四岁孩子的身高。“她已经死了？”“死了。亚契人把她杀了。”“为什么？”“为了复仇。”“懂了。然后他们把她埋了，juta。”我甚至都没等她说出这句话，因为亚契人从来都是这么做的。“那另外一个呢？”“Juta-ia, kaimbre, duve rö u pa modo!”那一刻，她刚刚说完的这句话在我这儿不过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当时正打算向午后的昏昏睡意束手投降，四下寂静，但闻一声刺耳的虫鸣，听上去和我们的蝉鸣声颇为相似。事实上，让我竖起耳朵的反而是居基的语气：她抬高了声音，听上去有些恼怒。

“你说什么？”她重复道：“Cho memby juta-ia, ache rö u pa.”死寂。我陡然一惊，朝她望去，仿佛一个人长久以来踏破铁鞋，早已放弃，却不期然遇上了自己寻找的东西。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成了一个不经意间撞上猎物的猎人。居基正在瞌睡中咂吧着糖果，完全没注意到我。但一切已经发生：话已出口，她没法再收回它。我险些就忘了呼吸。当我替她说出“人们埋葬了她那死于仪式性谋杀的女儿”的时候，她语气坚定地纠正道：“没有被埋！他们把她烤了吃掉了！”然后又加了一句，“我的孩子没被埋进土里。亚契人吃掉了她。”你看，亚契嘉图人确实是食人者，而我也坚信这个满脸褶子的小老太婆告诉我的就是事实。我迅速追问了下去，但没有让她意识到自己刚刚递到我手上的，是何等的无价之宝，不然她可能会受惊——我追问究竟是谁吃了她女儿，她是怎么被烤熟的，又是如何被吃掉的。她欣然回答了这些问题，只有在试图回忆时才会慢下说话的速度，因为这一切已经过去很久了。趁着这个机会，我顺便问起了更晚近的几起死亡：都是同一回事。亚契嘉图人把他们的manove烤了吃了。多么精彩的一天！没必要再问下去了，因为居基已经累了，而我也想要一个人细细品味自己的发现。我同“美味”的

青蛙道了别，并且以一种绝不会引起怀疑的诚挚态度向她道谢：“你说得很好！”“Go!我说得很好！”她认可了我的话，眼皮都没抬一下。她拿走了那一整袋糖果，那是她应得的。

第二天，我根据居基给出的情报展开了侦察工作。首先，我要核实这些信息；其次，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骗我。托康基、加古基还有其他的kamevwä（大骗子）！我津津有味地畅想了一下自己将给这帮伪君子带去怎么样的混乱，并立马付诸行动了。第一个受害人是我的“父亲”托康基，他在讲到那些埋葬死者的长条墓穴时是多么口若悬河啊！他甚至曾说起他是如何亲手给自己的教父库鲁蒲拉基挖了个墓穴。此人在忒鲁基之后任族长一职，却在某天中了白人的埋伏，最后中弹而亡。当时亚契人都跑开了，但他们几天后又回去尽了最后的义务。“我亲手埋葬了我的教父”，托康基曾告诉我。我向他重新提起了那次谈话，他也还记得这件事，并再次表示：“没错，是我帮库鲁蒲拉基挖的墓。”我打算在这上面将他抓个正着，因为居基将这个男人死后的命运事无巨细地告诉了我。我让我“父亲”先上了钩，然后说道：“那好，现在我来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居基已经全告诉我了。”（我必须透露出自己有一个不容托康基反驳的信息来源。）然后我重复了那个老妇人说的话。托康基很认真地听着，还点了好几次头，仿佛在说：“没错，没错，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最新发现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半分惊讶。如果说之前，我还想着能轻易抓住他的小辫子的话，这算盘可谓是彻底落空了。他仅仅发出了一声淡定的“Teeh！”，然后说道：“Nde kwa ma, ko!看来你总算知道了！”他半句反驳都没有，就非常平静地接受了我的说法。

库鲁蒲拉基是个完美的例子，因为他去世时，托康基和居基都在现场。一旦他们确认四周已经没有白人在转悠，亚契人就回到了那个地方。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所以他们没法走通常的程序。男人们用竹刀割下了可以吃的肉：肩膀、双腿，还有双臂上的肌肉。居基本人当时正怀着那个后来被亚契人杀掉的女孩子，她分到了一小片胳膊上的肉。生殖器则只能被留下：ine pute，它臭得厉害。至于托康基，他没有吃肉，因为人们不吃自己的教父。相反，确实是他埋葬了那些没法食用的部分——就像他说的那样，只不过不是埋在长长的土沟中，而是简单地挖了个洞，以保护尸体不受动物打扰。再过一阵子，如果周围没有白人出没的话，理论上来说，他们要回来把头骨敲碎、烧掉。如此说来，我的“父亲”在墓穴形状的问题上对我撒了谎，还隐瞒了食人一事。他欣然承认了这一点：“Kamevwä provi!我撒了点小谎！”可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呢？如果说，亚契图嘉人遭受了某些来自宗教势力的压力（不论是

天主教还是清教），人们或许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停止这种信教者眼中罪大恶极的行径。幸好——感谢上帝——并没有人想向他们传教，他们也从没见过任何信教者。托康基告诉了我实情：是他们的Beeru“保护人”下的禁令，是他明令禁止他们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一瓜亚基习俗，被它恶心坏了。至于为什么不准提，他从没给过任何解释，反正他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说辞。但是，被人当成是食人部落头子这种奇耻大辱，他可受不了。印第安人遵从了命令，尽管对他们来说，要对这么一件事守口如瓶让人颇感困惑——那不过是他们宗教生活中的一个仪式罢了。但是因为居基的年纪在那里，所以没有人向她传达这个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她对这一新的禁令并不知情。要不是她，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洛萨诺在把Ka'aygua人描述成狂热的食人者的时候其实是对的。很快，亚契嘉图人就确认我已经发现了实情，于是，再也没人试图向我隐瞒这件事情了。从那时起，他们都同意公开讨论这个本来就无需保密的话题。不过我们一致决定，永远不要在巴拉圭人面前讨论这件事，以免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那个白人直到最后都没搞清楚我们很多次对话的主旨。

印第安人的态度刺痛了我，因为他们向我隐瞒了些事情，尽管不是出于本意。可我难道不值得他们的全盘信任吗？（不过，转念一想，我为什么又会觉得他们就该信任我呢？）但同时，这个机会也让我激动万分，因为我得以研究的，是对我们的文化而言最为陌生的东西：食人。碰上这些让大多数西方人痴迷不已的话题时，即便身为一个人类学家，我也不能免俗，难免有所好奇。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这么多时间，以至于在亚契人看来，我简直是对吃人的话题走火入魔，甚至搞不好，我自己就是这一仪式的实践者。

“Ure rö Ache vwa, Ache kyra vwa.我们吃人，我们吃人肉。”所谓的kyra vwa——亚契嘉图人说他们在东边——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一旦他们不再对这个事情遮遮掩掩，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狂热的食人族。单纯说他们“喜欢”人肉，未免有些轻描淡写。他们酷嗜人肉。为什么？“Eë gatu,”他们解释道，“因为人肉很甜，甚至比野猪肉还要好吃。”从味道上来说，人肉和白人的养殖猪肉最像。而更重要的，则是那些肥肉。人肉比森林中的任何动物都要肥美，在皮肤和肌肉之间永远都有厚厚一层kyra，味道极佳。“Kyra gatu!”“美味的肥肉！”我的情报员们捏了捏我的肱二头肌打趣道。“Gaiparä!Jypi pute!我这儿很瘦！一点肉也没有！”我回答道，然后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

人们通常把食人族呈现为变态的怪物，为了一顿美食，他们会对自己的邻居痛下杀手。洛萨诺对他们的想象便是如此。在世上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似乎极为看重人肉的营养价值，这显然是因为那儿长期缺乏蛋白质来源。而在极端历史情况下，那些从前看起来与这种“骇人”行径相距甚远的人，也可能为了生存堕落到吃人的地步。尽管没有人乐意提起这件事，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美军、日军中，此外，据说还有纳粹集中营中，都发生了食人行为。但很显然，这一切都不适用于亚契人的情况：你只能用蛋白质过剩来形容他们的伙食，因为肉是他们的主食。他们不会为了吃人肉去特意杀人，他们不过是吃了部落中的死者。这其中有很大的区别：至少，在初步分析时，正是这一点区分了族内食人（endo-cannibalisme）和族外食人（exo-cannibalisme）。瓜亚基人实行的是族内食人，因为他们的肚子成了同伴最后的栖身之所。但没有人因此被杀死，亚契人中，会命丧族人之手的，只有羸弱的老妇人和死于jepy仪式的小女孩。然而，即便是族外食人（即吃掉本族之外的人，换言之，敌人）也不意味着人们会为了饱餐一顿而追杀与他们敌对的邻居。根据1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记载，强大的食人族图皮-瓜拉尼人会屠杀他们的战俘，然后在庄严的仪式中吃掉他们。可他们并不是为了吃掉这些人才将他们抓起来的。战俘的宿命是被抓住他的人吃掉。但是，直到死期来临之前，战俘都能自由地生活在主人近旁。在等待那无法逃避的死期到来的年月里，他甚至还能娶妻生子，因为那一刻在他被抓之后数年才会来临。这让特维和德勒瑞无比震惊。然而，当图皮南巴人发现白人竟然会将战俘关在地牢里、并剥夺他们的自由时，他们的反感也不下于前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么做真是既荒谬又野蛮。

当忒鲁基和他的同伴为了抢女人而杀掉敌对的亚契部落时，他们会把所有被杀的男人都吃掉。但他们不会为了这一目的发动进攻。不如说，这只是一个品尝鲜美人肉的上好机会，因为稀少，所以显得愈发珍贵——毕竟他们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一举杀死七八个Iröiangi的。有一天，和居弗库基聊天时，我问他有没有吃过亚契人以外的人肉，比如说某个Machitara人的肉。不错，他确实吃过一次，当时某个瓜拉尼人正独自在森林中打猎，却被一群亚契猎人围住了。这个倒霉蛋甚至来不及试图逃跑，就被长箭射穿了。接下来亚契部落办了个盛宴，不过当然了，那些动手杀人的猎人没有参加。同样地，这更多体现的是他们在美食面前来者不拒，而不涉及仪式性的问题：如果有个敌人刚刚被杀掉，你又有什么好客气的呢？“那居弗库基你吃过Beeru的肉吗？”“U iä wyte.

目前还没有。”他回答道，一边眯起眼促狭地笑了。他说的是实话吗？不管怎么说，是不是实话并不重要，何况他也不愿意再多说下去。总而言之，尽管亚契嘉图人曾杀死过外族人，也吃掉了他们，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杀的人。我目前只发现了一起例外，虽然比较模棱两可。曾经，有一个女人说她想吃人肉，有个男人因此而死。卜加米亚朗基（他和那个与食蚁兽交媾的男人同名）是个犯了乱伦的亚契人。有一天，面对和他同住一屋的漂亮dare时，他忘了这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眼中只看到了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就占有了她。这种事情极少发生，但如果真有这种事，人们会对犯罪的人百般指责、嘲笑，却并不觉得有必要惩罚他。所有人都知道，像卜加米亚朗基这样的人死后会变成孢子。可他却上了瘾，持续和自己的女儿进行meno，而不是在一度尝欢之后就将此事忘诸脑后。他的执迷不悟让亚契人很恼火，于是有个女人便要求她丈夫杀死卜加米亚朗基：“和自己女儿发生关系的人一点也不英勇！亚契人不想看到这种事。去杀掉他吧！”为了给丈夫更充足的杀人理由，她接着说道，“我想吃亚契人肉。卜加米亚朗基，那个占有了自己女儿的人，非死不可。”她丈夫便杀死了这个犯了乱伦的父亲，然后亚契人吃掉了他。在那个发怒的女人心中，究竟哪一种动机更强烈些？是对乱伦的厌恶，还是对人肉的渴望？前者会不会仅仅是后者的借口？亚契人在描述卜加米亚朗基的行径时，不太使用meno——做爱——一词，他们用得更多的是它的同义词，uu或tyku，意思是吃，而这个词即便在印第安人看来也远比meno更野蛮粗暴。因此，实际上那个女人说的是：“卜加米亚朗基吃了他女儿。我想吃掉卜加米亚朗基。”通过在现实中把那位父亲吃掉，她是否不自觉地有一种想要在象征层面与他交媾的冲动——就好像那位父亲和女儿之间真实发生的交媾也意味着他象征性地吃了她？也许这两个词模棱两可的语义引起了一种对人肉的渴望，但它其实暗暗掩盖了另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欲望。对于语言中不时流露的色情意涵，亚契人未必不如我们敏感。

我听了很多关于人肉宴的描述，因为一直以来，亚契嘉图人吃掉了他们之中全部的死者，除非对他们来说继续停留在死亡发生地的风险太大了（因为有白人在附近）。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三年多以前，也就是他们来到白溪为止。吃人肉和吃动物肉完全不同：它远远超越了纵情吃喝中强烈的世俗性，而是一个极为神圣的举动，因为它关乎生者对待死者的方式。Iröiangi埋葬他们的死者，亚契嘉图人则将他们吃掉：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就是行走的墓地。所有人都如此，概无例外。不

论死者的年龄、性别和死状，无论他是横死还是寿终正寝，所有的死者都会被吃掉。这同样适用于死于仪式性的谋杀的孩子（极为罕见的例外是那些braa pute——肤色太黑——的孩子），以及那些因为走不动路而遭到了结的老妇人。（然而，没有哪个亚契人好这口，因为这些老妇人实在太干瘪了，皮肤底下半两肉都没有。）若非有无法解决的难处，亚契人绝不会放弃他们葬礼上的宴席：除非他们病得太重、太没有胃口，或是因为白人就在近旁，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举行这一仪式。

当某个小群体失去了其中的一员时，首要任务是通知整个部落。如果人们知道其他人就在附近，在一两天脚程可达的范围内，人们会派个小伙子去通知某某的死讯，并让族人前来，他们也会很快会赶到。但有的时候，他们的cheygi离得太远了，这厢可等不及。准备工作不能拖上太久。碰上这种情况，这个小团体就会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再去加入大部队，同时送上几块留给缺席者的肉，以示友谊。“Pire raal拿点皮吃吧！”他们招呼道。其他人会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没有被遗忘，而这对小团体中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你若是不把死去同伴的肉带一点给远方的朋友，这将是一种无法辩驳，也不可饶恕的侮辱，甚至足以导致冒犯者和受辱者之间交恶——如此一来，往来于双方之间的就只剩利箭了。这件事的严重程度就好像拒绝一件礼物：你当然要学会如何赠予，但你也得学会如何接受。二者涉及的是同一种礼节。亚契嘉图人至今仍会说起忒鲁基时代某个男人发怒一事。他杀了几只吼猴，很自然地，他送了一部分肉给自己的兄弟。可他那当时显然心情极差的兄弟却假装对这肉视而不见，并在煮好之后也没有碰过它。送礼的人很惊讶：“你不打算吃这kraja肉？”“对，不吃。”另一位干巴巴地回答道。这位猎人怒从心头起，瞬间就变成了by-ia的状态，拿起弓猛地砸向这位无礼之徒的脑袋。后者跑开了，却被一箭射中，命绝当场。亚契人吃了他。杀人者则不得不丢下妻子开始跑路，因为现在他有性命危险。他向某个友邦寻求了庇护。

等到受邀的irondy都到齐之后，宴飧就开始了。首先你要搭起烤架，byta。这个任务通常被交给新近成年的小伙子。他们会在地上支起四个分叉的支柱，差不多半米高，上头架着四根棍子。然后他们在上面放了几块挨得很紧的横木，用藤蔓绑在一起，来组成整个框架。就这样，一个长一米半、宽一米的平台就搭好了，底下升起了一大堆火。所有亚契人都在byta上烤肉，很小的孩子除外：他们用陶罐烤肉。

在此期间，人们开始处理尸体。一个男人——最好是死者的教父，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会用他的竹刀把尸体切开。他会先将脑袋和四肢从躯干上取下，再把手和腿拆卸开，然后取出器官和内脏。人们很仔细地把脑袋剃干净：如果是男人，须发都会被剃掉，而且一般由他的妻子来剃；孩子的头发则通常是由母亲来剃。与肌肉、脏器（确切来说，这些都是肉）不同，脑袋和肠子是在锅里煮的。男人身上没有哪个部位会被扔掉，而女人身上唯一被去除的地方是她的pere，性器官，人们会将它埋起来，而不是吃掉。有时候肠子也会被放在一旁，但这不是因为某种饮食上的禁忌，而是因为它太臭了，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将它埋起来。除此之外，一切都会被放到byta上。底下有很多木炭，这样火就不会烧到烤架上，肉就可以慢慢地烤。肥肉——也就是亚契人肥美的kyra——滋滋作响，芬芳四溢的油脂正大滴大滴沿着木板缝往下滴。为了不浪费任何一滴油脂，亚契人会用刷子接在下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大声啞吧刷子了。等到肉完全烤熟、不再带血了，人们就会把它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谁会参与到这盛宴中来？谁能分食死者？所有在场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除了死者的近亲。做父母的不会吃自己的孩子，孩子不会吃父母，兄弟姐妹也不会吃掉同胞，这就是规矩。然而，就像所有规矩一样，人们不会时刻对之严格遵守，而一定程度的违规是被允许的。比如说，当亚契人吃掉加古基的父亲瓦楚基时，加古基就曾打破过规矩。事实上，他父亲是自杀而死的。这种死法有些诡异，因为自杀在印第安人中极少发生。“我那会儿和那个kybuchu一样大。”加古基指着一个男孩说道。由此可知，他当时差不多十岁上下。那段时间，瓦楚基非常忧郁。他年迈的母亲去世了。他为此十分伤神，泪流不止。那正是他需要关爱与宽慰的时候，然而，他的妻子却选择在那时与塔图忒皮朗基（“浑身通红的狢猯”）有了一腿。这已是瓦楚基之所不能承受，生命对他来说已经不值得留恋。他做了什么呢？印第安人都知道，他做的举动很危险，甚至是致命的：他直接吃了irö蜜蜂没兑水的纯蜂蜜。食用纯蜂蜜意味着把自己暴露在baivwä之下，这种疾病从不放过任何人。接下来，可以预见的结局发生了：瓦楚基的自杀之举成功了，他得病而死。纯蜂蜜威力极大。亚契人按照老规矩把他烤了。“那你呢？加古基，你吃你爸的肉了吗？”（我几乎是随口问了句废话，因为孩子不会吃自己的父母。）“嗯，我吃了。我吃了点腿上的肉。”他指着自己的腿肚子说道。“哦！加古基！你竟然吃了你的父亲，可是ja apä u iä，人们不会吃自己的父亲！”“我没吃多少！就一点点！这么点！”他拿手比划了差不多一块牛排的大小，“我那时候很小，还不懂事，他们把肉给我，我就吃

了。”他试着给自己开脱，因为他知道自己本不该接受这块肉。话虽如此，事情并不算太严重，迫不得已时这样的违规是被允许的。但与之相对的，某些更严格的禁忌则从来没被打破过：男孩一定不能吃自己的姐妹，父亲一定不能吃自己的女儿，母亲一定不能吃自己的儿子，反之亦然。性别不同的家庭成员不能吃对方的肉。为什么？因为吃一个人的肉，某种意义上就是和他发生关系。如果一个父亲吃了自己的女儿，他便在象征意义上乱了人伦，就像卜加米亚朗基一样。总而言之，亚契人不会吃那些被禁止与自己进行meno的人：在这个外婚（exogamie）、外食（exocuisine）融为一体的系统中，乱伦禁忌和饮食禁忌是完全重合的。

另外，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尸体的任意部分呢？确实可以，脑袋和生殖器除外。和动物的脑袋一样，前者通常被留给老年人（不分男女），而年轻的猎人之所以被禁止食用头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吃了就有可能变成pane的受害者。至于生殖器——它和脑袋一样，也是煮着吃的——永远是给女人吃的，而且首先会被拿给孕妇吃，以确保她们能生个男孩。白人杀死库鲁蒲拉基时，居基正怀有身孕。可惜人们没能把生殖器和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分离开来，所以居基只好放弃了食用，虽然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生殖器留给她。她最后生了个女孩，如果她当时吃了生殖器，或许就能避免这个结局。

人肉的配菜是一种“蔬菜”：那就是冻子椰子树的树芯或嫩芽，人们会把它和脑袋、脏器一起煮了，或是和肉一起架着烤了吃。这种蔬菜不是单纯的配菜，它的作用相当明确：它可以中和人肉太过“坚硬”的质感和其中过于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myrakwa导致人肉与其他任何肉类都不一样，并危及那些将人肉单独食用的人。和纯蜂蜜一样，人肉单吃会导致baivwä；而像水和冻子椰子这种从来不会触犯任何饮食禁忌的中性食物则能抵消二者的危害。一旦伴着棕榈芯食用，人肉就会丧失其“力量”，人们就可以像吃其他任何肉类一样放心食用它。然后大家就可以淡定地评价道：“Pire kyra wachu! Kyra gatu!多肥的皮啊！多好的肥肉啊！”人们不会在一顿之内吃掉所有东西，肉太多了。他们会把剩下的肉用棕榈叶或者蕨叶包好，在接下来的几天当冷菜吃，或是把它们送给那些没能通知到的cheygi。骨头则会被敲碎，以便取出骨髓。这是女人的最爱，尤其是年纪大点的。

宴席散了。现在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搭起byta的年轻人接受净化仪式。人们用浸过kymata藤蔓的水给他们清洗，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

baivwä。然后人们把头骨敲碎、烧掉，就像Iröiangi所做的那样。这一步完成后，人们就离开了。烤架被留了下来，支棱在原地——至少人们不会撤掉烤过成人的烤架。印第安人为这一行为提供了两个解释：如果有irondy路过，他们就会知道有个亚契人去世了，并为之哭泣。但路过的若是个陌生人，也就是说，敌人，他们就会知道这一带有食人族出没，并在恐惧之下逃走。如果byta烤的是个小孩，人们会毁掉它。

人们很少不明就里地行动。我们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套说辞，即便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说辞都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呈现的也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事情的真相。然而，亚契嘉图人却似乎偏偏没有这么一套说辞。虽然他们已不再对吃人一事遮遮掩掩，可神奇的是，他们居然没法对这个习俗说出个所以然来——这是一群稀里糊涂的食人者。“你们为什么成了kyravwa？”回答几乎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老一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或者，他们的回答是彻头彻尾的同义反复，等于什么都没说：“我们吃亚契人是因为我们是食人族。”更多的你就问不出来了。这让人很不爽，但你显然不能质疑印第安人的诚意：既然他们已经愿意开诚布公地讨论自己的食人习俗了，为什么还要隐瞒他们赋予这一行为的意义呢？然而，我所能得到的最像样的解释也不过是纯粹出于饮食上的考量。当时，库步拉基正在告诉我十年还是十五年前，人们是怎么吃掉托康基的妻子蒲兰贝基的。这个女人死于蜂蜜导致的baivwä。库步拉基当时刚成年不久，他搭起了烤架；他兄弟同样也很年轻，他则负责把尸体切开。托康基什么也没吃，因为ja ime u iä——人们不吃自己的配偶。“但是我吃了很多。”故事的讲述者说道。“为什么？”“因为里头有那么多肥肉！”“但你为什么想吃肥肉？”“我不想再这么瘦了。”对他来说，这显然已经构成了充分的理由；而在他眼中，像我这样试图为亚契人的食人习俗寻找比口腹之欲更高深的理由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陌生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新盟友是kyravwa。某种意义上，他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对所有亚契群体来说，你的邻居就是食人族。刚抵达白溪时，他们和亚契嘉图人打交道时极其小心保守，因为毕竟，在他们眼中，这帮新邻居很能够做出哪天肚子一饿，就把大家都杀了吃了这样的事。这类事情完全没有发生。但是当我问起对方的食人习俗时，他们所给出的也不过是饮食层面的解释而已：“亚契嘉图吃人是因为他们喜欢人肉。”“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吃人？”“因为我们不喜欢亚契人的肥肉。”他们对这一习俗没有流露出半分理解之同情；虽然没有公开说过，

但他们对此持谴责态度。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简单来说，这两个群体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食人者，就是喜欢人肉的人。我一度以为，这就是全部理由了，直到某天，和库步拉基一起劳作时，我问他为什么陌生人不像他那样吃人。他立马毫不犹豫、不容置疑地回答道：“Manomba o.哦！可是他们都会死的！”“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吃死人。”终于！事情总算有点拨云见日的迹象了。

“Ache pete bu rö, ove ikö ruwy, ove tarä ikö, Ache jachira vwä Beeru endape.你如果把死人埋了，那就好像是Ove围过来了，很多很多的灵魂想要把亚契人带到祖先那里去。然后，kyrymba iä，我们就会害怕。U pa bu, ianve ikö iä, ianve veve ma：但如果我们把死人吃了，就不会有Ianve了。Ianve会飞走。”原来如此：食人，是击退死者灵魂的附加手段。为了消灭亡灵，人们必须把尸体吃掉；如果尸体没被吃掉，Ove和Ianve就会逗留在生者四周，随时准备向他们进攻，好穿透他们的身体并造成baivwä，最终杀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亚契嘉图人对于陌生人很快就会死这件事深信不疑：他们根本就是住在一群亡灵中间。“如果你不吃掉死人，baivwä就会出现，你会得重病，你会死掉。”可是苍天啊，亚契嘉图人到底为什么不早这么说！神奇的是，想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我必须问他们关于Iröiangi的事情，提醒他们陌生人不是食人族，并让他们注意双方之间的差异。但如果我直接问他们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就会一直跟我绕圈子：我们是食人族是因为我们是食人族。然而，一旦我把他们扯离这个切身而又无比清晰的事实，他们立刻就会从事情的反面道破真相：不吃人意味着自己送死。

库步拉基绝对是亚契人中最好的消息提供者。敏锐而又有耐心的他永远都能立马明白我在问什么，也似乎很乐意解释关于部落的事情；相比之下，其他人（甚至居弗库基）都会很快对我的采访感到厌倦。有些时候，当我词穷了或是当问题不太好问时，我会这么开头：“假设我是个亚契人。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我的对话者听到后都会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而且从来都不会忘了加上一句：“Teeh！你是亚契人？你？”“不！不是这样的！我在假装我是个亚契人！”然后对面就会放声大笑，这让他乐得不能自己。一旦对话朝那个方向展开了，事情就没完了。但是和库步拉基聊天时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每次都能迅速预料到我想要问什么，而他的回答永远都异常清楚。不幸的是，在所有亚契人中，他也是最汲汲于与白人“合作”的那个。他坚信这是部落唯一现实的出路，他们必须这么做。可是他错了。相反，居弗库基则始终保持着高傲的态度，拒绝对Beeru委曲求全。他被迫和白人一起生活，但这已经是他会

做出的唯一让步了。

因此，主要是多亏了库步拉基，我才得以知晓亚契人为何吃人。其根源在于pakryra这样一个概念。我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因此没能听懂它的意思，但他很有条理地为我全面剖析了一番。库步拉基是从pakryra的反面说起的：“你飞奔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你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他模仿着跑步者正喘粗气的样子，胸膛上下起伏着，一边拿拳头捶着心口。“Pakombo，心咚咚狂跳，”他说，“这就是非-pakryra的状态。”他继续说道，“你很害怕，你看到一头美洲豹，或者有人刚刚告诉你一个亲戚的死讯。你彻底丧失了勇气，感觉快死了。”他倒下身去，倚着一棵树，面容疲惫，毫无生气，“这也是pakombo，你的心跳得很快。这是因为你失去了pakryra。”就这样，通过精确的语言和生动的手势，库步拉基让我一点点了解了pakryra是什么——那就是死者的灵魂从生者那里取走的东西。它代表一个健康的正常人类在没有忧愁困苦，也没有自我怀疑时的身心状态，此时他的生理和心理处在良好的平衡之中。这一状态的反面是pakryra-ia，焦虑（l'angoisse）。焦虑可以通过数种方式将你吞没：人在突然撞上一头野兽，或是听到一个坏消息时受到的巨大惊吓都可能导致焦虑。然而最剧烈的、几乎不可战胜的焦虑，是由你身边不可见的死者导致的，那就是死亡的焦虑本身。“如果你不把死人吃掉，你就会感到焦虑。如果你吃了他们，你就会觉得很平静，心脏也不会跳个不停。焦虑是最致命的疾病，心平气和才是健康。如果你感到焦虑，你就会浑身无力。”

一起死亡会在群体中导致社会学意义上的失序，但部落中的每个人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事件。这绝不是一种抽象的无序状态，相反，人们对它有着如此切身的体会，以至于它会造成令人无法承受的忧虑，并让人心脏狂跳。这种焦虑的来源清晰可辨：它源自Ove，是它想要鸠占鹊巢进入你的身体，因为它刚刚失去了自己的肉身。然而它的身体，它在尘世间最后的依靠其实还在这里，那是它可见的分身，可如今已了无生气。所以它才会执着地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久久逗留。印第安人的思想和习俗都能证明这一点。他们相信，死亡让灵魂解脱了身体的束缚，而那一刻之前，身体一直将灵魂像“犯人”般囚禁在内，以免它跑出来为害人间。可灵魂却拒绝了它刚获得的自由，而是立马想要通过找到另一具躯壳、通过侵入某个活人的身体来逃避这种自由。然而，因为Ove会带去baivwä，这么做一定会导致死亡。对此人们该如何防范呢？最实际的做法是：想要终止灵魂的种种企图，就必须吃掉它刚刚离开的那具躯体。通过将死者的灵魂与它的旧躯壳解绑，人们可以阻止活

人的肉身与死者的灵魂相结合。随着死亡切断了灵与肉之间活生生的联结，灵肉双方就开始独自存活，独立于对方存在；它们被彻底分开了。二者将无法共存下去——食人仪式说明的不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吗？亚契人吃掉了死者的尸体，从而阻止灵魂进入生者的身躯。而人们用来抵御Ove的屏障，恰恰正是它生前寄居的那具身体。现在，那具身躯就在它想要前往的地方，在生者的腹中，而Ove想要进入的，便是生者的身体。如果Ove坚持要进入某个活人的身躯，它会在里头发现什么呢？它会找到自己从前的容器，现在已是支离破碎，化作了腹中餐。那是与它再无瓜葛的旧容器被嚼碎的残渣，是它有实体的另一半，如今已被销毁，七零八落。食人宴实现了生者与死者肉体上的结合，而这也意味着生者与“死去的灵魂”之间的解绑；而作为食物被消灭的尸体迫使Ove彻底意识到自己究竟是什么：它是个没有实体的幽灵，生者四周已再无它的位置。就这样，面朝西方的头骨燃烧时升起阵阵轻烟，带着Ove升入空中，直到这轻烟隐没不见，消失在上界，在那看不见的森林中，在大草原中，在死者的国度中。

因为食人这件事是如此令西方人作呕，所以我们会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身边人吃掉，他一定也会像我们一样，觉得又恶心，又恐怖。当一个亚契嘉图人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时，他自然很清楚地知道，亲友们都在期盼些什么，但除此之外，他又可能想些什么呢？他很确定：很快，我就会被一块块切开，然后被架在byta上烤，同伴们会就着我的尸体大快朵颐，他们会敲碎我的骨头，吮吸里面的骨髓。面对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他能否无所畏惧，淡然处之？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亚契人都是铁石心肠，在面对宿命时甚至比最冷酷的禁欲主义者还要无动于衷？决非如此。

对一个垂死之人来说，自己即将成为他人的盘中餐一事完全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困扰。正相反，到了最后一刻，当他意识到Ove即将离去时，恰恰是他本人在临别晤言之际，百般嘱托别人一定要将自己吃掉。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事情很快就会超出他的掌控：Ove或Ianve会想要杀死他的同伴。他很清楚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人们必须吃了他。于是他要求人们这么做，显然为不得不辞别亲人而感到悲伤，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他倒不担心自己不会被吃掉，因为这件事人们一定会说到做到。何况，他的Irondy正聚集在四周，忧心忡忡地重复着：“等你死了，千万不要害我们生病啊！”然而，还有一些人与他的羁绊可能比普通族人更深些，而他特别想要从Ove手

上保护的，正是这些人。因此，他不停地提醒他们，一定要吃掉自己。

在亚契人和垂死之人之间，最后一次对话永远都是这个内容。库步拉基的父亲、蒲兰贝基以及很多其他人临终时都是如此。蒲兰贝基去世时，她有两个丈夫：第一丈夫托康基，第二丈夫蒲忒拉基（意为“毛茸茸的背”，因为他的“本体”是食蚁兽，这种动物身上长满了又厚又长的毛）。这两人中，她更中意第二位。她很爱他。当亚契人意识到蜂蜜造成的疾病正在拖垮蒲兰贝基时，他们问她：“你会给我们带来baivwä吗？”“不会有baivwä。把我全吃光！”然后她把此时已泪流不止的丈夫蒲忒拉基叫上前去，向他做出了最后的嘱咐：“我不想要baivwä害你生病，也不想要你死掉。吃掉我！这样你就不会生病，Ianve也不会进到你身体里面。”他这么做了，然后没有生病。这是这个女人对丈夫的爱的最后证明，也是丈夫最后一次为妻子做出充满爱意的举动。

这么多关于食人的对话向我揭示了瓜亚基人宗教生活的其他侧面。“Cho rö X ove”，他们有时会这样对我说。“我是某某某的灵魂。”这是不是一种对转世说的信仰？此人自称是某个已故亚契人的Ove，那他是否真的是那个人的灵魂化身而成？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Ove似乎没有个人特征，而是一种完全中性的存在，并完全不会对它的新宿主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一个男人可以是某个女人的灵魂，反过来，一个女人也可能是某个男人的灵魂。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构成困扰：一个携带着女性Ove的男人依然是纯粹的男性，而一个拥有男性Ove的女人，她的女性气质也不会因此损失分毫。我身上的灵魂原先的主人并不住在我体内，我也和其他没有携带Ove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亚契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灵魂，此外，这种“转世”信仰也仅见于亚契嘉图人之中。陌生人并不相信这个。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只有通过吃人，才能“成为”某个死者的Ove。“我是忒鲁基的Ove。”居弗库基的妻子奇米拉基不无骄傲地说道。为什么？因为当忒鲁基去世时，多可基正怀有身孕。亚契嘉图人吃了他们的酋长，并把他的生殖器给了多可基，以求她生个儿子。然而，降生于世的却是一个女孩，那就是奇米拉基。因此，奇米拉基可以说自己是忒鲁基的Ove。同样地，库步拉基是库鲁蒲拉基之子布雷比普朗基的Ove，后者死于一头美洲豹爪下。当时库步拉基的母亲正怀着孕，她吃下了那个年轻人的生殖器，并不负重望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库步拉基是布雷比普朗基的Ove。

Ove转世投胎的作用之一，在于它能为某些事件提供大致年代，并赋予亚契人近些年的过往一个大概的先后顺序。他们没有任何衡量时间的方式，甚至连每年的季节流转也只能借助寒潮降临来划分，因此，他们是通过部落中的某些大事来为过去的日子分段的，比如他们会说，“当时加古基刚戴上唇饰；当时白人杀死了钦贝基；当时我们吃了查楚基”，诸如此类。对印第安人来说，这已经足够精确，而他们也常常援引那些事件作为参照坐标。可对外人来说呢？多亏了吃人的习俗，你多少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份。比方说，奇米拉基是个四十上下的女人。而她也忒鲁基的灵魂，她的母亲吃下了他的生殖器。因此，忒鲁基之死发生在大约四十年前，在1920年代初。同理，你可以把布雷比普朗基之死定位到1920年代后期，因为他灵魂的归属者，库步拉基，是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然后又因为布雷比普朗基的父亲库鲁蒲拉基要比他多活几年，我们可以推断出库鲁蒲拉基，作为酋长忒鲁基的继任者，统领了部落差不多十年时间。这说明，虽然他身后臭名昭彰，但事实上亚契人对他并没有太多不满，不然他们不会听任他一直领导下去。这些都只是模糊又微不足道的小碎片。可我们没得选，也不该轻视任何材料，更何况，这是满足我们西方人狂热纪年癖的唯一手段。

7月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几天。等我回到白溪时，我得知，在远方庆祝蜂蜜节的陌生人还没回来。有几个陌生人kybuchu没有跟大人一起去，其中就有瓦楚基，一个勇敢的小猎人，年纪在十二岁上下。他欣然同意陪我去居弗库基的营地，离白溪要走上几个小时。他跟在我后头，安静地小跑着。他没法走在我前面，亚契人又永远不会并排行进。每当我隔一会儿就不知道该往哪走时，他就会喊“Govety!那边！”，把我引回正确的方向。但突然间，仿佛再也没法把这个惊天大新闻憋在肚子里了，他脱口而出道：“Ache rö Baipugi kromi u pa modo.亚契人吃了白普基的孩子。”“Nde Kaury! Kamevwä!你瞎说的吧！你撒谎！”“Kaury iä! U pa modo!我没有瞎说！他们真把他吃了！”我很清楚他并没有撒谎，只是想激得他再多说几句。但他显然不像我一样对中细节兴趣十足，只是解释说，亚契嘉图人想要吃人肉，就把小布里古基给煮了。他还报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他能告诉我这些，我真该为自己感到幸运。其他人会让我知道吗？这还真不好说，尤其是涉及宴席参与者的部分。后来，婴儿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告诉了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对于打从来到白溪就没再吃过人肉的亚契图嘉人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重拾这一习俗可谓是天赐良机。他们单独留在营地，

Iroiangi和白人都不在，没有人会打扰他们。此外，他们的情绪很低落，因为一阵流感在六七月寒潮的助威下夺走了差不多十个亚契人的性命，包括克兰贝基和老拜瓦基。亚契嘉图人显然没有考虑过要吃掉他们，因为那个Beeru明令禁止了这样的行为。但现在，到了7月末，已经没人约束他们了。此外我觉得，我那无休无止的关于食人习俗的对话同样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聊了这么多次吃人，以至于重拾这一习俗的念头在亚契嘉图人心头疯长了起来。想必对他们来说，人肉就像是忧郁和麻木不仁的唯一解药，而现在的他们，已被这两种情绪吞没了。

皮库基就是这样解释的：“我病了，没了勇气。白普基的孩子死了。亚契人的肉可以让你不生病。我想要好起来。”小布里古基是个十八个月左右的漂亮孩子，我们刚到印第安人中间时，他刚刚开始蹒跚学步。他会摇摇晃晃地从母亲白普基那里走到父亲康德基身边，一边因喜悦或害怕而叫唤出声，旁边围着一圈亚契人，满怀柔情，正小声鼓励着他。所有人都很爱这个孩子：在印第安人归降后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他存活了下来，而这让人们稍稍重拾了信心。皮库基也是孩子的父亲，因为他与尚在孕期的白普基发生了关系。他对孩子的疼爱完全不下于孩子真正的父亲康德基。后来孩子生病了，我们所有人都去照顾他，亚契人给他以慈爱，Beeru则带去了药物。7月中旬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多了。然而在我们短暂缺席的期间，这个曾为亚契嘉图人的内心和双眼带去无限喜悦的kromi却突然病情恶化而死。至于接下来的事情，人们几乎是以一种漠然的口吻告诉我的，除了他母亲——她边说边哭，脑袋剃得精光，作为哀悼的象征。显然，我本不该再翻出她的伤心事。

“我想要吃他的肉。不要把他埋掉！他身上肥肉很多。”皮库基在完成了jeporo（亚契猎人发狂的大吼）后说道。他放声吼了出来，因为他的悲哀是如此沉痛，但同时，这吼声也意在驱赶Ove。“U eme! pete rö mi!别吃他！把他埋起来！”白普基回答道。此前在森林里的时候，她什么都没说；可现在，悲痛和哀伤让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她并没有因此生皮库基的气，也相当理解他的食欲。接下来，孩子的父亲康德基插话了：“如果你不想把他埋了，那就吃了他吧。”皮库基重申道：“我病得很重，快死了！我真的很想吃人肉，这样就能好起来。如果你吃了亚契人肉，你会好得很快。”但另一边，孩子母亲温柔的哀悼还继续着：“Krei半夜闷死了我的孩子。现在我也要死了。”那个Krei是谁？是孩子的祖父艾拉基，早年死于白人之手。看到儿子康德基生病了（当时几乎所有亚契人都病倒了），他开始迁怒于儿媳白普基。他认为她应该为自己儿子病倒一事负责，而作为惩罚，艾拉基杀死了她的孩子布里古

基。这位已经故去多年的父亲至今依然守护着自己的儿子，并为他报了仇。

于是白普基给自己的儿子剃了头，又把头发埋在土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吃掉他的皮”。皮库基把小小的尸体切开，取出内脏，把它们埋了起来：“我们不吃肚皮里的东西，那玩意太臭了。”接下来他把肉分成数份，放进一个个陶罐里，和tangy（也就是嫩冻子椰子叶的菜心）拌在一起，看上去有点像蔬菜炖肉。然后就开始煮了。亚契人不会把小孩子拿来烤，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没法让每个人都分到一口。但如果你把它和tangy一起加水煮的话，分汤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分到正常的一人份。等到菜准备得差不多了，在场的人都吃了起来，除了孩子的母亲和他的姐姐白普朗基，也就是加古基的妻子。男人和孩子都在拿刷子蘸着油腻腻的汤喝，每喝一口就感叹一句：“Tapia gatu!多好的肥肉啊！”他们把东西吃得精光，并不觉得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给那些不在场的亚契嘉图人留一份。当时居弗库基和库步拉基已出门打猎多日，却没能在回来时分到一口羹，但他们也没有为此而生气，毕竟时代不同了。

加古基很爱自己的妻子白普朗基，可是有两件事让他非常痛苦：她对他不忠，且至今还没给他生下过孩子。他想要个儿子，所以很想借一下这顿宴席的东风。于是他拿过那个孩子小小的生殖器，想让她吃下。可她却语气尖酸地拒绝说：“没有人会吃自己兄弟的肉！”这话没错。但她之所以会拒绝，与其说是为了遵循这一饮食禁忌，不如说是为了借机伤害加古基。同样地，当加古基抬手打自己的老婆时，那更多是出于愤怒，而不是为了给小布里古基“复仇”。皮库基开始觉得恼火了。他是白普朗基的父亲，因为他是白普基的第一丈夫。他揍了加古基几下，后者没有还手。然后他让女儿睡到自己的小屋来：“别再跟着你老公了！”她照做了。于是，等到夜幕降临时，加古基就开始借笛声诉说自己的哀愁。

几天后，陌生人回来了。他们听说了这桩新闻。对于另一个部落的人吃了白普基的孩子这件事情，他们似乎并没有觉得太吃惊。然而令他们好奇，甚至震惊的是，他们自己的kybuchu竟然也参与了那次人肉宴。事实上，亚契嘉图人之所以会邀请这些孩子加入，是因为亚契人不会让别人看着自己吃东西。就这样，Iröiangi的kybuchu吃了人肉，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事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少，他们远没有父母那么大惊小怪：“好吃吗？”“很甜，很好吃！”“Teeh！”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孩子吃了人肉，做父母的觉得很不高兴。但他们没有骂孩

子，免得惹恼亚契嘉图人——因为后者会很自然地把那样的责骂当成一种批评。他们不过耸了耸肩，说道：“他们还小，还不懂事！”我和陌生人中某个一年前刚刚穿了唇孔的年轻betagi聊起这事，他响亮地说：“我们不吃亚契人！”“为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答道：“Oo iro pute!因为那个肉很苦！”我们身旁站着两三个吃了布里古基肉的kybuchu。我和那个betagi说，这个肉不可能那么苦，因为小男孩们也吃了。我这句坏心眼的反驳让他噎了一下。他转身问其中一个kybuchu：“Iro ko?苦吗？”“一点也不苦！我吃了肝！”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得意扬扬地叫了起来：“肝不苦！苦的是皮！”这句话的逻辑不容辩驳，接着他总结道：“我们才是好亚契人！他们是食人族！”语气里是彻头彻尾的鄙夷。他成功地再次树立起了部落间的高下之分，而他自己的部族占了上风——低人一等的永远是他者。

我们去了举办人肉宴的地方。亚契人选择在营地外头举行这个仪式。白普基膝盖跪地，为孩子之死泪流不止。接着她指向了人们生火的地方：“灰都在那里，骨头烧下来的灰都在那里。”头骨和小一点的骨头都被敲碎，扔进了火堆中。然而，并不是一切东西都已化为灰烬。女人的指尖轻轻地筛过骨灰，指着一块碎片说道：“那是我孩子的肩胛骨。这里有一小块脑袋，这儿还有腿上的骨头。”眼泪流过她的双颊，一点点冲刷掉了上面黑色的哀悼纹饰。正是这张疲倦、惶惑而空洞的脸告诉我，亚契人的末日已经来临。



浑身盖满秃鹫毛的病人

第九章 尾声

尽管又回过巴拉圭数次，我却再也没见过瓜亚基土著。我不愿去看。我能在那里看到什么呢？我初至白溪时，他们大约有百口人。等我一年后离开时，那里已不足七十五人。其他人都死了，死于疾病和肺结核的蚕食，死于医疗条件的匮乏和各种物资的短缺。那些活下来的人呢？仿佛无人认领的失物一般，日暮途穷的他们离开了自己生存的史前时代，被扔进一段历史中，这历史与他们毫无瓜葛，只会摧毁他们。但事实是，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又一页枯燥的人口调查报告——上面是越来越精确的日期、地名和数据——又一次记载着最后的印第安部落的消失，仅此而已。那现在呢？那些勇敢的亚契猎人，他们都去哪了？根据1968年的最新消息，他们的人数已不超过三十。但既然他们和其他部落一样都已经被判了死刑，人数多少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一盘从15世纪下到现在棋已经走到了终局，一整片大陆将会失去它最初的住民，而很快，这一方“世界”也将终于能够真正以“新世界”自居。“多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民族被消灭殆尽，多少人死在剑下！就因为我们要珍珠和胡椒，世界上那块最丰饶、最美丽的土地被搅得一片混乱！这是多么野蛮、粗鄙的胜利。”面对西方文明对美洲的侵略，蒙田便是这样“致敬”的。

那亚契人呢？他们难道就没有意识到，丧失自由就意味着自己将无处容身吗？当然意识到了。可他们屈服了，他们消极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少数情况下，会有男人让怒火迸发出来，他会大叫自己想杀死白人，但这已是最极端的表达。反抗又能带他们走向何方呢？他们清楚地知道Beeru数量众多，杀了一个还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也无路可走。他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也觉察到了自己灵魂中的死气，而比任何同伴都要看得通透的居弗库基知道该如何表达人们的心情。有天，为了录音，我让他唱他们打猎时的prerä给我听。但他更想唱另一段旋律。在悲伤的曲调与深深的不忿中，每一组对句都消失在一声呜咽之后，又荡开在竹笛袅袅不绝的忧郁之中。那一天，他唱的是亚契人的末日，也唱出了他本人在看到一切都已走到尽头时的满腔绝望。

想当年，亚契人还是真亚契人时，亚契人还是真亚契人时，他们也曾射猎于林间，当年浣熊肉肥美无比。可如今？今之亚契人已不复昔之亚契人。呜呼！

想当年，亚契人还是真亚契人时，他们也曾曾在林间射倒浣熊无数，也曾大块吃皮，大口吃肉。今之亚契人已不复昔之亚契人。呜呼！

亚契人，林间的亚契人射任何野兽都不在话下；利箭在囊，腥臭的野猪死在他们箭下，有肥肉不可胜食。可如今？今之亚契人不复射猎于林间矣。呜呼！

利箭在囊，林间的亚契人曾射杀野猪无数。他们曾大口吃肉，其上血迹已干。可如今？今之亚契人翻身于灰烬之中。今之亚契人不复射猎于林间矣。呜呼！今日林间若有熊咆虎啸，亚契人将不复弋猎其后。呜呼！

亚契人，曾射落jaku，也曾大块吃肉。可如今？亚契人已骨瘦如柴，满面尘灰，在篝火畔日渐腥臭，腥臭不可闻。今之亚契人不狩不猎，今之亚契人不复逐兽入林矣。

利箭在囊，林间的亚契人曾射杀野猪无数。也曾大块吃肉，快意平生。今之亚契人不复射猎于林间矣。呜呼！昔日出猎，曾闻得封豕群嚎，砺爪磨牙；亚契人，也曾弯弓搭箭，惟彘肩是食，吮喋如婴孩，和乐且耽。今之亚契人不复射猎矣。呜呼！

居弗库基唱了很久，期间几乎提到了所有亚契人曾经猎杀过的动物。他也提到了，是哪种鸟鸣提醒他们，是时候去cheygi那儿参加蜂蜜节了；而每当他提起某种事物时，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一切都已过去，都已烟消云散。当他说亚契人放弃了森林中的生活，转而在火堆的灰烬中打滚时，这显然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他们还在继续打猎。但一切都不复从前。居弗库基没有弄错：他清楚地看到了部落的命运，他也不知道，部落已经任凭死亡的腐臭将自己萦绕。

至于我，我最想要记住的是亚契人的虔诚；是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中，他们的存在所产生的分量。我想要如实记录他们在对待某种古老知识时，那值得世人引以为范的虔敬，而这种知识早已被我们那野蛮的暴力在某个瞬间挥霍一空。又比如，我想要让下面这段记忆永远鲜活：我想要记住陌生人从森林中回来、看到某个当时他们还不认识的白人女性时给予她的庄重欢迎。当这群陌生人见到她时，女人们立马跪倒在地，以手覆面，唱起了一曲有力的chenga ruvara——不是因为哀痛或悲伤，而是出于喜悦和友谊，正如人们在表示欢迎时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们不会发l的音（这个音不存在于他们的语音系统中），他们把她的名字稍稍

变了变，于是她就成了所有亚契人口中的伊若娜基（Erenagi）。^①

在看到新月滑过林梢时向它放箭，这么做可笑吗？亚契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他们知道月亮是活物，它在空中的身影会害kuja流经血，而这可能为猎人招致厄运。他们报仇，是因为世界不是静止的，你必须捍卫你自己。就这样，数个世纪以来，亚契人一直在森林腹地中，顽强地过着小心而隐蔽的游牧生活。可是这屏障已遭到破坏，整个过程犹如一次渎神。

已是夜间。Yva javu——暴风雨正在发话。周围到处是电闪雷鸣，雨水鞭打在棕榈屋顶上，风正拉扯着森林里年迈巨树的高枝。每当Chono暂歇，留给人片刻寂静时，你可以听到狂风中林木干巴巴折断的声音。闪电刺目的白光将寂静的营地扯离黑暗，电光炫目，叫人看不清随风摇曳的火光。这是昨夜去世的Iröiangi女子带来的pichua，亚契人刚刚将她葬下。她的女婿卡加瓦楚基正坐在火堆旁，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什么，一边随手拨弄着火苗。这实在是一场巨大的pichua：Ove与上界的君主Chono联手了。这场暴风雨已持续了太久，现在轮到卡加瓦楚基来安抚自己的岳母了。每一声雷鸣之后，他都会面朝苍天高声呼喊：“Nde pichuare, baky emeeee!降下这场pichua的人啊，我求求你，别再下雨了——！”他就这样呼喊了两个小时，可老妇人的情绪却完全不见平息。但最终，她听从了男子的祈求。风平雨止，Chono朝北边去了。亚契人没有被惊醒，卡加瓦楚基护得了他们一夜安眠。篝火轻快的毕剥声外，但闻水声滴答，碎开在草叶上。星星再次出现在了晴朗的夜空中。而直到很久以后，依然有雨滴自树杪悠然滑落。

① 指作者克拉斯特之妻伊莲娜·克拉斯特（Hélène Clastres）。

关于转写的说明

为了尽可能在转写印第安语词汇时保持精简，我把语音规则简化到了最低限度。

“j”的发音同英文，相当于法文中的“dj”；

“ch”的发音同西班牙文，相当于法文中的“tch”；

“u”的发音同法文“ou”；

“e”的发音同法文“é”；

“y”是瓜亚基语中的第六个元音，发音近似于喉音化的“u”。

˙代表鼻音化。所有元音都可以被鼻音化。

像所有图皮-瓜拉尼语言一样，瓜亚基语中没有“f”和“l”。

讨论与批评⁽¹⁾

我认为，吃活人要比吃死人更野蛮；将一个知疼知痛的人体折磨拷打得支离破碎，一点一点地加以烧烤，让狗和公猪撕咬致死[.....]要比等他死后烤吃更加野蛮。

因此，按照理性的准则，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蛮夷，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则不能，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都比他们更野蛮。他们的战争是十分高尚的。可以给人类的这一怪癖加上什么遁词和溢美之词，也统统可以给他们的战争加上。战争在他们那里，除了好勇尚武这唯一的起因外，没有任何别的起因。他们并不为征服新的领土而作战，因为他们一直享受着大自然的富饶，他们不必辛苦劳作也能获得所需的一切，丰富得无需再去扩大他们的边界。他们依然处于只求满足自然需要的幸运状态，超出的一切对他们说来皆是多余。

蒙田《随笔·论食人族》⁽²⁾

现代社会教会了我们如何服从，如何命令；而原始社会的教诲与之恰恰相反

拉波哀西⁽³⁾和皮埃尔·克拉斯特觉得很震惊。按照他们的判断，奴役状态远非人的“本性”，相反，当一个人接受了丧失自由的状态时，他就已经“被剥夺了本性”。坚称“人生而自由”的拉波哀西总结道：从前，人们必然倾向于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与奴役。他曾怀疑这一类群体是否存在，而日后皮埃尔·克拉斯特前往美洲大陆研究的，正是这类群体的幸存者：换言之，这些社会“完全遵循人类的天性”，其中既不包含，也不支持任何阶级之分。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原始的”.....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究竟为何要容忍自己的“天性”受到压抑？拉波哀西和皮埃尔·克拉斯特回答说，这是因为有一种毁灭性的欲望与我们对自由的渴望相对立，甚至还凌驾其上：那就是支配他人或受到支配的欲望。我们渴望附庸关系，甚至爱上了这种状态。“人们仿佛是着了魔、中了咒一般，想要侍奉暴君.....”

现代社会从孩提时代就教育我们要服从或命令他人，而原始社会教

给我们的与之恰恰相反，并力图压制住这种“不良欲望”。如果印第安“酋长”背离了他的职责（也就是提醒众人遵守部落的法则），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部落之上，他就会成为某起“阴谋”的受害者，等待他的将是“放逐”或死亡。权力是原始社会的噩梦。权力的真空则是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想。

弗朗索瓦·博特（François Bott），
《世界报》（*Le Monde*），1980年10月17日

温柔的掘墓人？

这件事的好处姑且不论，野蛮人最终消失在了美洲大陆上。士兵、传教士、商贩和形形色色的行政官——这些文明人已经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使命，将美洲土著的伊甸园削减到只剩些忧郁的骨架，而这一切甚至发生在“美洲土著”一词本身被发明出来之前。

由此民族学家才得以毫无畏惧地去热带探索。他满怀科学家的种种坚定信念，在一片早已被精心准备好的土地上前行着。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指出：“我们若是有幸能够研究某个原始部落，它自身一定已经开始腐坏瓦解了。”这句箴言表现出了一种智识上的廉耻心。我们由此可知，某些民族学家还坚守着良知；还有一些则对这种科学研究所扮演的角色发出了质疑，在他们心中，这种科学也参与促成了其研究对象的消亡。

（……）皮埃尔·克拉斯特的编年史恰恰作于瓜亚基人即将消失殆尽之时。他曾与巴拉圭某个土著部落最后的族人一同生活过，这群百人上下的男女和孩子在白人的“保护”下生活在森林深处。这段在印第安人中的居留发生在十年前；这群土著从前曾以游牧为生，食人，而且可能过得很快活。事情很清楚：这是来自深渊的哀悼（*de profundis*）。P.克拉斯特——是他让我们得知了梅特罗的这句话——显然毫不掩饰下面这个事实：他所珍视的这门科学，其实践完全系于这群倏焉将逝的幸存者身上。民族学家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掘墓人。《编年史》中的他，用礼物换取他们的许可——允许他长时间在场，包容他的鲁莽——也用小刀和糖果换取仪式与神话。他很快就对这些野蛮人产生了同情与喜爱。他比印第安人更理解他们，这解释了他的感激之情，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文明人的贬损和非议面前为他们辩护。

（……）这本书完美展现了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学，各种情感充溢全篇；这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学，它摒弃了一切道德偏见。克拉

斯特用他的才华为我们带来了一首献给瓜亚基人的天鹅之歌，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他们的残忍、他们习俗之壮观，或是对他们缓慢的灭亡避而不谈。如今文明人早已不再书写冒险小说，这样一本民族志可以轻易地取代它们。

安妮-布丽奇特-克恩（Anne-Brigitte Kern），
《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1973年4月

印第安人永远沉默

纵观全书，克拉斯特始终不忘在字里行间展现民族学家的困境。尽管他没有夸耀自己的负罪感，但他很清楚地知道，研究瓜亚基社会的瓦解过程本身也是在“侵扰他们的自由，谋划他们的死亡”。因此，他决定尊重他们的缄默，并拒绝把他们当作情报机器：“印第安人始终沉默着，一切语言都是多此一举，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吉尔·安克蒂尔（Gilles Anquetil），
《文学新闻》（*Nouvelles littéraires*），1973年1月15日

然而按照他的描述，民族学家的处境经常有几分滑稽。比如，他写到自己到处找情报员的样子——除了一个跑不快的老妇人和想要糖果的孩子之外，人们已经厌倦了他提的各种问题，总是看到他就躲。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世界报》，1972年11月24日

克拉斯特的整本《编年史》以其独有的方式讲述了亚契人的灭亡。与传统的态度完全相反，在这里，民族学家试图通过建立起作为主体的自己，来抹去作为民族学家的自己。这种书写不是什么伪科学展览，它强有力地，乃至无比生动地指向了一种有意识的干预，它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它自身的界限、它的脆弱与不可靠、它问题重重的起源和它那令人不安的最终目的。这个文本朴素率直，尽可能做到透明坦诚，以求消解某种民族学元知识（*métasavoir ethnologique*），并试着将自己呈现为对印第安人现实生活的直接陈述（*énonciation*）——即便这种陈述已经经过了作者的反复思考（*réfléchi*）。在这现实中，死亡的阴影密布，使得《编年史》读上去就像是最后的瓜亚基人而唱的一曲挽歌。

罗歇·达东（Roger Dadoun），
《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1972年12月31日

对一次种族大屠杀的谴责

最后，我们不该忘记这部作品政治性的，甚至激进的一面。因为它的作者从来不曾忽略过下面这一点：他的研究对象、他所讲述的世界被这个文明判了死刑，而这个文明在输出民族学家的同时，也输出了商人、疾病、神父，有时还会输出士兵。（……）但这部瓜亚基人编年史也是一曲挽歌，因为世上已再无瓜亚基人。他们最后这群百人上下的族人像是一堆绝望的枯枝败叶，在摒弃了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之后，湮灭在了文明世界的单调乏味之中。

安德烈·阿孔（André Akoun），
《心理学》（*Psychologie*），1973年4月

一时间，人类学家的事业，在不过分夸大自己的负罪感，同时又尽可能清晰的情况下突然有了意义。诚然，“手中笨拙地拿着铅笔和本子”用各种问题骚扰印第安人，这确实是在“谋划他们的死亡，突破他们冷漠的消极抵抗，侵扰他们的自由”，但作者之所以如此上下求索，是因为他的眼中只有那最宏大的目标：他要证明，他们也是人。因为印第安人是受害者，但人们却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拒绝授予他们正义和公道。（……）克拉斯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被判了死刑，但在这个案子中，比起那些终日不得闲的印第安猎人性格中的凶残嗜血，不如说，是本族文化的丧失和疾病给他们下达了这份死刑判决书。

米歇尔·伊扎尔（Michel Izard），
《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1972年10月2日

狂热的食人族

从一方面来看，研究一个放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让民族学家的的工作变得容易了很多，因为这让他能够快速地核查信息。此话不假。一个群体的涵化（acculturation）——也就是它在和某个外来群体接触后丧失自身身份与特质的过程——能让情报员更容易收集到关于过去这种生活方式的资料，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丧失了它那深刻的价值，其神秘特质也随之荡然无存了。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况要求民族学家更为敏锐，因为他不能再直接分析亲历的事实，而是必须借由口述信息来重构这个群体的传统生活。而克拉斯特也不得不以这种方式重构亚契人所实行的食人仪式。

埃尔维利（Hervilly），
《农业法国》（*La France agricole*），1974年4月19日

克拉斯特抵达当地时，瓜亚基人作为食人族的名声已是历久不衰。这位民族学家因“一种美妙的兴奋”而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四处问询，却一无所获。某个热带午后，在香甜的昏昏睡意之中，他听到亚契人中最年迈的老居基说起了她几位子孙各不相同的命运。他一点点引她入彀，而她就是在这时“上钩”的；她说了，而且还重复了一遍：“我的孩子没被埋进土里。亚契人吃掉了她。”

这是民族志里一个小小的“尤里卡！”⁽⁴⁾时刻。人类学家抓住了他的食人族，而后者在得知他已经知情之后，得意地对此供认不讳，供词还挺冗长：“我们吃人，我们吃人的肥肉。”他们是食人族，克拉斯特强调道，“狂热的食人族”。“单纯说他们‘喜欢’人肉，未免有些轻描淡写。他们酷嗜人肉。”（……）但不管他们多么满怀激情地宣称自己热衷此道，这种饮食层面的解释并不能满足民族学家的胃口。（……）克拉斯特进一步探究了下去，以“pakryra的概念”（这代表心跳、痛苦、恐惧，以及死亡的焦虑本身）和Ove的概念（这相当于人死后的灵魂）为线索，他向我们展示了萦绕在瓜亚基人心头的恐惧：他们害怕生者的躯壳会被死者的灵魂占有。为了将它拒于门外，除了将灵魂刚刚抛弃的那具已经受到毁坏、腐化、肢解的身体吞食一尽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从这个角度来看，食人成了“击退死者灵魂的附加手段”。对此克拉斯特提出了下面这个美丽的结构主义公式：“食人宴实现了生者与死者肉体上的结合，而这也意味着生者与‘死去的灵魂’之间的解绑”。

罗歇·达东，
《文学半月谈》，1972年10月16日

透过仪式看神话

神话和仪式的结合尤其让我着迷。比如说，当我试图理解婴儿降生后举行的那一系列仪式时，我注意到这一整套仪式其实就是对一个个短小的神话片段的写照。诞生仪式重演了起源神话，并阐明了其意义。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通过仪式来分析神话，把仪式看作理解神话的正道。对瓜亚基人来说，很显然，起源神话的一个个片段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出现在了诞生仪式中。神话贯穿了这个社群的日常生活，而这种贯穿性就体现在仪式中。（……）仪式的作用在于为这一事件、这一失序祛魅，

在于重建被这次降生打破的平衡。仪式是一种符码，意在防止失序与混沌在社会中扎根、并威胁到天地间的秩序。

（……）印第安社会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命运与宇宙的命运分开看待，宇宙和社会、自然与文化是一体的。因此，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即对整个宇宙产生影响。

皮埃尔·克拉斯特专访，
《文学新闻》，1973年4月23日

一个“或许”丰裕的社会

随着他的研究逐渐展开，克拉斯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自给性社会”⁽⁵⁾之类的通行概念，或是一个纯粹建立在贫乏与技术落后之上的原始社会的概念，或许尚有待商榷。我之所以说“或许”有待商榷，是因为克拉斯特的分析倾向于把“生产力落后”与拒绝劳作这些“原始”特质，看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之后的结果，那是“对无谓的过度生产的拒绝，他们决定，生产活动只要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即可”。而他的这个初步假说所带来的问题与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克劳德·罗伊（Claude Roy），
《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印第安社会中，每天用来搜寻食物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小时。人们从不会为了果腹，而焦虑地寻找食物。那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丰裕的社会（sociétés d'abondance），或者至少是个有闲社会（sociétés de loisirs），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有二十一个小时被用在闲暇乐事上，在此期间印第安人会睡觉、庆祝、找乐子或是讲神话故事度日。

皮埃尔·克拉斯特专访，
《文学新闻》，1973年4月23日

没有国家

经典人类学将“无国家社会”（sociétés sans État）与“国家社会”（sociétés étatisées）相对立。没有国家的社会处于匮乏之中，活动在历史的边缘，对权力不屑一顾，最终在贫乏的自给性经济中走向衰

败。因此它们才被冠上了“原始”之名。与之相对的则是我们的历史性社会，后者的根基在于生产的发展。皮埃尔·克拉斯特将整整一代研究者政治、哲学上的偏见都看成是这样的蹩脚分析，他坚决拒斥了这种看法，并用事实研究取代了理论论证。原始社会并非对权力一无所知，他们的社会结构无不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早的丰裕而有闲的社会，他们“故意”限制工作量来避免过度生产，因为正是过剩（surplus）导致了不均、奴役和社会分化，而国家正由此而生。他们是反国家的社会（sociétés contre l'État）。

格扎维埃·德尔古（Xavier Delcourt），
《世界报》，1977年8月5日

（……）从前，人们在观察克拉斯特今天所研究的印第安人时，往往倾向于完全从负面的角度用“没有”来定义他们的社会（sociétés sans）。这些民族没有书写、没有历史、没有组织，他们在进化的滚滚洪流中落在后头。（……）而克拉斯特的独创性恰恰在于，他翔实有力地向我们证明，这些人并非毫无法律，毫无信仰，毫无组织，也毫无政治结构。相反，他们遵从的是另一套法律，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认可的是一套不同的价值，他们眼中社会权力的概念不能被等同于国家社会中的社会权力。早在他居留于瓜亚基社会期间，克拉斯特就已经观察到，他们对“权力和暴力有着明确的区分”，一个酋长“为了表明自己能够挑起酋长这一重任，就必须证明他不会通过高压来施行自己的权力”。

（……）

印第安酋长被看作“和平使者”、仲裁、调停人。而按照体制规定，酋长必须慷慨大方——在这种机制以及强制性的“礼物交换”机制的调节之下，人们得以防止大量财富积聚在酋长手中。在决定他的任免时，最重要的品德便是他作为演说者和“劝说者”的能力。因此，原始社会并不是没能建立起一个集权国家，他们建立的，是“无暴力的权力”（le pouvoir sans violence）。

克劳德·罗伊，
《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

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

让我们试着抽象地描述一下克拉斯特是如何工作的。首先他进入了

他的部落（且不论他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去的）。接下来，他抓住了第一条汇聚（conjonction）到自己面前的线索：瓜亚基人会把哪些存在、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他就这样追踪着这条线索，直到其中的事物或存在开始分道扬镳，乃至最终参与到新线索的汇流之中……举例来说，首先有一组线索“男人-猎人-森林-弓-被杀死的野兽”；然后是彼此相分离（disjonction）的“女人-弓”（因为女人不准触碰弓箭）；由此我们有了新的集合“女人-篮子-营地……”；然后是另一组相分离的概念：“猎人-猎物”（猎人不能吃他自己打到的猎物，也就是他自己杀死的野兽）；由此而来的是下一个集合“猎人间联盟-饮食禁忌；联姻-乱伦禁忌”。为了像这样抽象地描述这一过程，我们没有点出这种串联法动态的、循序渐进的特征。比如说，从“弓箭-女人”与“男人-篮子”这样相分离的组合出发，克拉斯特发现瓜亚基人中有个同性恋，他没有自己的弓，而是拿着一个篮子。但最重要的是，瓜亚基人的生活不能被简单表示为概念上的合流与分离之间的排列组合，关键在于，这些合流与分离是如何在彼此之间引发改组、互补和再创造的。再举一例：克拉斯特很晚才发现他们想要向他隐瞒的事实——有一个瓜亚基群体是食人族。但自从他得知此事之后，这个事实便以无比具体的方式被印刻了下来：在食人族中，死尸与活人的躯壳之间的结合是为了确保生者与死者的灵魂相分离，同时祛除与死者之间的凶险结盟所蕴含的危险。（克拉斯特还顺便说明了在这个瓜亚基群体中，食人行为是如何起到历书的作用的。）就这样，神话和仪式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盘根错节之处进行了缓和或是变形。

克拉斯特的目标如下：他想建立起针对一个群体的具体理论，也即对这个群体的社会空间进行一点一点、一片一片的辐射状重组。他没有任何先决的整体性预设，也没有根据任何假设进行材料上的编排、切割。他在真正意义上追随着这些野蛮游牧者的脚步。他更注重的是野蛮人究竟做了什么，而不是任何结构或话语。言说、仪式和神话并不具备任何优先权，只有在合流与分流的当口，与这个群体的劳作、嬉游、行动与嗜欲相交汇时，它们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某个仪式中，有个小女孩通过一个迅速的动作将一根木棍放入了一个容器中：“这个我若是稍有走神，就很有可能错过了的动作……”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吉尔·德勒兹，
《世界报》，1972年11月24日

毋庸置疑，皮埃尔·克拉斯特著作的力量与风格，恰恰来源于以下这些时刻——当他开始细致地刻画场景与行为，当他精心阐述人们受控的认知、还原所谓的真相时，他便将这一研究写进了一项思想的伟业之中，而阅读《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所产生的魔力便在于斯。

弗朗索瓦·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
《文学杂志》，1980年12月

皮埃尔·克拉斯特憎恶木头般的空话套话（langues de bois）。但是他作为论战者与作家的品质不该让我们忘了他作为研究者和学者的一面。因为皮埃尔·克拉斯特首先是个学者，而哪怕他的性格没那么强，哪怕他没有采用如此干净又特点鲜明的文风（他的文字奇特而真诚），他依然是那个使得人们对原始社会中权力问题的讨论面目一新的人。

（……）有些人希望把这项研究看成是一个哲学性、政治性的课题。大错特错——这是一项实打实的科学研究。作者的兴趣在于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和例证，来揭示某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的运作方式。他注目的是原始社会中的一切。

雅克·默尼耶（Jacques Meunier），
《世界报》，1980年10月17日

- (1) 本评论由“人类地球”（Terre Humaine）丛书编辑部编纂而成。——原注
- (2) 译文引自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上卷）（译林出版社，1996），第三十一章“话说食人部落”，第235—236页。
- (3) 艾蒂安·德·拉波哀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作家，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反暴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18岁前后写成《论自愿为奴》一书。1976年，帕约出版社（Payot）出版了此书评述版，收录了克拉斯特为此撰写的《自由、不幸与无名之物》（“Liberté, Malencontre, Innommable”）一文。文中写道，“拉波哀西问道，多数人为什么会愿意服从一个个体，甚至不仅愿意服从他，还自愿侍奉他？这如何可能？”正是这一事实“震惊”了拉波哀西和克拉斯特，由此，拉波哀西从逻辑层面提出，在人们臣服于统治者之前，必然存在一个权力真空的社会形态。可以说，克拉斯特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在南美洲原住民中的田野调查，让他得以从经验层面检视拉波哀西的逻辑推断。
- (4) 尤里卡，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用以表达发现某件事物、真相时的感叹词。
- (5) 克拉斯特本人对“自给性社会”（société de subsistance）的定义大致如下：“[自给]意味着永远生活在果腹的需求与手段之间的脆弱平衡中。因此，一个施行自给经济的社会，其成员很勉强才能填饱肚子……这种生存方式意味着与饥馑无休止的斗争，因为此间的人们，囿于技术和文化的缺失，无法生产出超过需求量的

食物。”克拉斯特认为这一概念是现代西方观念的产物，不足以准确描述很多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具体参见《哥白尼与野蛮人》（“Copernic et les Sauvages”）一文，收录于克拉斯特《反国家的社会：政治人类学研究》（*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一书中。

克拉斯特思想初探

皮埃尔·克拉斯特留下了一部短小、凝练又极为重要的作品集，而我们至今还没能对其革新之功做出完整的衡量。^①但我们已经可以断言，有些人的作品将在这个世纪极大地改变我们对社会与历史的看法，克拉斯特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因为，作为一位民族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可不仅仅深深改变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对野蛮人世界的认知——这是他精力与研究兴趣之所在，而他也正是以此为题，写成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一书，一份关于理解日常生活的令人难忘的证词。作为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更罕见的意义上的哲学家，一个追寻着真正的问题的人（最简单、最关键的那些问题），他关于原始社会的思考已经足够深入，足够向我们揭示一切社会陌生却又无比关键的一面。

让我简单总结一下他的贡献：以那些看上去不存在政治权力的社会为例，他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结构是如何最终指向一种政治决定论（*détermination politique*）的。他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生存模式的定义，其核心、其重中之重就在于这个社会面对政治分化（*division politique*）时选择的立场。这就是凝缩在“反国家的社会”（*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一词中的观念，而这个乍看十分怪异的词也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的标题。社会之所以会与国家相对立，是因为每个社会的秩序如何，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它在权力面前不自觉做出的选择。一个社会可以拒绝让贯穿其间的君主（*Maître*）与臣民（*Sujets*）之间的潜在裂缝进一步扩大，并依此构建自我。那些被我们称为“原始”的社会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间正是这样做的。但另一边，一个社会在自我组织时，也可以放任这道目前尚处于可控状态的裂缝不断加深，并允许某种万民之上的权力在其中生根发芽，代替民众掌管他们的生活，并以民力为食——我们所处的“文明”社会在过去短短三四千年间正是这么一副光景。

因此，从野蛮人群体原初的毫无阶级之分，到我们充满来自国家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线性发展过程所拥有的逻辑连贯性。在那个线性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与统治力量的加强携手并进，直到共产主义的爆发所带来的解放。但事实上，与此相反，二者之间只有彻头彻尾的断裂；双方在解决和处理权力问题的方法上南辕北辙。历史并不具备线性发展所体现的清晰的整体性。在其进程中，历史

并不会遵照某种事先部署好的严格计划，好让在最初的出发点——“原始共产主义”——潜在的某些可能性在最终得到明确且高度自觉的体现。克拉斯特正是将我们带回到了这样一种断层之谜、一种根本上的断裂性迷思面前……

起初，当我们还是野蛮人时，确实“没有国王也没有法纪”，后来，我们学习了服从的义务和权力这项权利（le droit du pouvoir），从而变成了文明人。从此，每当人们想提出某种历史话语，就不得不在其开端对此进行说明，这种解释也就成了各类历史话语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实际上，这种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问题，同时，这种理论显然也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进步论。这些野蛮人社会缺少各类属性明确无误的政府机构，这种缺失难道不就正是一幅赤贫社会图景中的一环？这一缺失与极度贫困不正是一体的吗？这一缺失难道不正意味着极其有限的劳动分工、技术资源和生产能力，规模甚小的社会群体，极为缓慢的革新与社会变革，以及极具代表性的文字与城市的缺席？如果说这一切都让野蛮人社会与国家毫无共通之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不需要。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让这样一个立法与管理机构毫无用武之地。历史由简入繁，而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社会，即使算不上彻底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发达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那些以采集和打猎为生的社会，相比之下农业社会已经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比起“野蛮人”（sauvages）一词，我们更应该说“原始人”（primitifs）。

如此看来，事情的前后因果似乎很容易厘清。一方面，他们资源匮乏，只够少数人赖以为生。因此这些群体的规模往往很小。另一方面，他们的技术也很原始，甚至不要求人们有任何专业训练。所有人都做着差不多的事情，性别差异成了劳动分工的最初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为人们分配不同的活计。而在一个人人比邻而居的世界里，更没有必要集中少数人做决定。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权力必然是微弱的。几乎到处都有酋长，但都很不成气候，也几乎没有任何实权——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因此，非常合乎逻辑地，权力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好像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与劳动专业化同样处在胚胎期一般。一旦人口增长，资源增多，技术变得更复杂、更高效，那么社会的组织功能与强制性功能也会随之增强。而有朝一日，这种功能会强大到足以被称为“国家”。

这种种“显而易见的推论”都会被克拉斯特击得粉碎。首先，他近距

离观察了那些“酋长”。我们关于人的常识已经习惯于把权力认定为必然存在的事物，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们想象成国王、王子、暴君或者国家权力其他化身稍显逊色的雏形。然而事实上，这些酋长绝不是这一类王公贵族的袖珍模型，不如说恰恰相反，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对一个群体中原始领袖角色的仔细探讨。酋长并没有在社会生活留给他的狭小的功能性空间内初步施展某种权力。不，他没有施展任何权力，如果权力意味着让别人听命于他。人们赋予他的，并非下达指令的角色。如果他采取了某种行动，这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整个群体的主流呼声，并对之进行了核实。此外，没有人会被迫遵守他的决定。除了动用唇舌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他的基本能力，就是言说（la parole）。酋长是善于言谈之人，他试图在出现争端时为整个群体带来和平，他向人们宣扬和谐相处的美德，并试图让人们相信团结统一的必要性。这当然是酋长最重要的言论之一。他会说某些特定的话，歌颂那些赋予万物今日之形状的先祖的大德，并勉励今人忠于传统。这样的仪式性话语，只有他一人有权宣诸于口。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看成是对合法话语的垄断，看作是日后强权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之先声，就未免有些荒谬。因为，酋长不能立法，甚至都不能宣布法律。此外，他也不能裁决人们是否遵纪守法。他呼吁人们尊重一种看不见的法律，也就是祖宗之法；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法律，但是没有人有资格为之代言，也没有人能制定或更易这些法律。酋长告诉人们，没有人有资格宣称自己就是合法性的来源，并因此要求人们臣服于他。在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制定法律，也不可能有权力存在。这正是大多数野蛮人酋长所致力于宣扬的演说的真正内容。凭借他们的口才，他们道出了自己没有权力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慷慨大度和美妙的言辞赢得了不少威望，并因此试图迫使他人做某些事情，下达命令，或是制定法律，那他们可就要倒霉了。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会弃之如敝屣；不得已时，人们会杀死他。一个酋长不可以真的做老大。这不光是因为人们赋予他的功能与施行权力没有半分瓜葛，也是因为他受到了整个群体毫不留情的约束，被人们限制在了话语的作用范围之内，这种话语富于社会意涵，但同时又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权力。因此我们在讨论原始社会时，涉及的甚至都不是权力的缺席，而是一种体制层面上对权力的坚决拒斥。这些社会并非对权力一无所知。它们刻意拒绝了权力。

这听上去像是这些社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权力问题做出了反思和应对。仿佛他们做出了决定，要防止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这个具体决定虽然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中，却在酋长机制和人们的态度中得到了

体现)；在他们看来，权力不均之中暗含着威胁，这种潜在威胁不断渗透到他们之中，但他们又有意识地阻断了其实际发展。他们没有单纯地将权力从他们之中排除出去。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权力完全不存在的样子。相反，他们在一个本可以发号施令、宣布规则、手握大权的位置上，设置了“酋长”一职——一个与其他所有人有着正式区别的个体——以此证明身居其位的酋长受到了多少诱惑的百般侵扰，而想要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会永远窥伺着他。但他们把酋长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不过是个没有实权的空位。他们本可以在那里安排一个人，让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此外，至少应该有个人在那个位置上提醒他们，存在着立法者与组织者相分离的可能性（哪怕他的存在同时消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过是选择了将真正掌握实权的位置付之阙如，从而让整个社会保持平等与未经分化的状态。这似乎就是蛮族酋长那确凿无疑的“无权”（impuissance）所暗含的思想……

反国家的社会——从逻辑上来说，原始社会就这样成了反对变化、极端保守的社会。在他们充满宗教性的思想方式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射箭时瞄准的方式、我们的礼俗，甚至使用的技艺都和我们自己无关；这些都是先祖和诸神之所欲，也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这一切，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谨遵他们的教诲与示范罢了——这就是野蛮人各种信念中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这种坚决的否认必然导致了对政治分化的加倍拒斥：社会之所以呈现出现在的面貌，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功劳，而应该归功于超自然的、远比我们高级的存在；因此，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来擅自改动这一切。没有任何人类有权对我们的规矩和习俗中的任何东西妄加更改——这么做意味着在字面意义上行使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永远都意味着定立新法，改易故辙。权力首先代表着不断对社会进行再定义的权利。而原始宗教恰恰宣布，这绝无可能。在此，宗教信仰所定下的保守主义就这样成了保障政治平等的手段。因为，人们宣布祖先之法不可触碰，并同时保护集体秩序不被反复无常的普通人所染指，这么做恰恰是在阻断权力最根本的野心。

在野蛮人那里，如果说宗教具有政治色彩的话，那么经济就更是如此。传统上，人们把原始经济描述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在那里，人们凭借微薄的生产力来勉力维持少数人的生计。确实，这个概念建立在一种切实的观察之上：乍一看，原始经济绝无可能产生大量过剩（surplus）。似乎，人们的生产水平永远只够他们根据需求做出适时的

调整。只不过，就像很多严谨的研究论证的那样，过剩的缺失不应该归咎于人们的能力不足，事实上，他们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皮埃尔·克拉斯特为此书法文版作了序）一书中特别指出，人们远没有将一切活动都用于搜寻食物以勉强果腹；总的来说，人们花在寻找粮食和劳作上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手头的资源远没有到被完全榨干的程度，他们的实际产量也大大低于生产力所能达到的上限。由此萨林斯提出了下面这个反转：这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丰裕的社会（sociétés d'abondance）。他们拒绝过量生产，拒绝通过积聚物资来获得发展，也拒绝把增长作为目标。一个比其他人更勤勉的劳动者或许偶尔可以积聚起数量可观的粮食和物资，而群体中剩下的成员就会开始赖他养活，直到将这些储备消耗一空。大多数酋长都会走上这条路，地位使然，他们被迫慷慨解囊，被迫比常人投入更辛勤的劳作，以满足人们对他的索取——毕竟他们责无旁贷。只有酋长的生产量会超出他的自身需求。他劳作是为了分予他人。这恰恰说明了按需生产这样一种经济模式的政治意义。生产量超过生活所需意味着为某些不劳而食的人生产——也就是为了还清自己对掌权者的亏欠而生产，后者凭自己的权利有赖臣民供养。相反，没有经济上的过剩就不会有被异化的劳作（travail aliéné）。所有人都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而干活，没有人靠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生。原始社会对他们酋长所背负的担子并非毫不知情，但这是为了表明，人们并不欠酋长任何东西，因为在这里，酋长——这些空有位置却没有权力的人——才是给予者……

今天，没有什么比把原始社会看成一个我们应该复归的范本更荒谬的事情了。让我们先假设这样一种回归是有可能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可能性，何况不管怎么说，克拉斯特本人所持的便是与之相反的意见。哪怕我们仅有一秒认为野蛮人的世界不是我们认为的样子——换言之，不把它看成一个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世界——而是把那个世界当作一个我们可以加入的范本，这也是在对其中的奴役行为视而不见。原始社会从不曾、现在也不是那个我们只需要在其中寻找优点的文明社会（bonne société）。克拉斯特从未停止强调过这一点：野蛮人为政治平等付出了代价，克拉斯特并不确定今天我们会轻易同意去付出这样一种代价。诚然，在权力之外，那儿没有法律被制定，但法律被残忍地刻在了肉体上。没有对臣民的依赖，也没有劳动异化，可同时，人们对社会组织可能发出的质疑也不会存在。没有屈辱的投降，有的是战争中常见的暴力。原始人选择了与国家保持距离，但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人为这一选择付出的令人痛苦而又充满约束性的代价——没有哪个人像

克拉斯特这样着重指出过这一点。原始社会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分化的问题。他们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答案，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答案使得整个问题原封不动地遗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每个社会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碰上权力分化的问题。至于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是去预防国家分裂，而是去化解这样一种古老的必然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让我们默记于心，那个在自我组织时意图遏制权力的社会所教给我们的关于权力的一切.....

马塞尔·戈谢 (Marcel Gauchet)

《自由》 (*Libre*) , 第347号 , 1978年

小帕约图书馆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 巴黎

- (1) 本文的大多数内容最早见载于1977年10月10日至11日的《解放报》 (*Libération*) 。——原注

证词

皮埃尔·克拉斯特，或对归属的拒绝

皮埃尔·克拉斯特于1977年7月29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时年43岁。对此我感受到的愤怒要多于悲哀，因为他不该就这样死去。那些讣告和死后的致意不过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愤怒。且不提某些“快乐的科学”（gai savoir）的掘墓者发起的坏人清誉的造势……

寻找当下的真相这样的做法会让那些想要一辈子占理的人感到不满。木头般的空话套话令人耳聋。光是皮埃尔·克拉斯特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们败兴。不过好为人师的事情就留给那些永远执迷不悟的人吧：我既不是个圣器管理者，也不是个守墓人。我不过是个热心读者罢了。

皮埃尔·克拉斯特想要像科学一样构建民族学（ethnologie）——这么做本不至于冒犯到那些诋毁他的人。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某种自命不凡的口吻。恰恰相反。他思想的自由无拘既是一种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一种风格。其中充满了对于归属的拒绝，因此也充满了对背叛的拒绝。那些偏狭的宗派信徒永远不会原谅他。⁽¹⁾

他对拉波哀西的重新阐释代表了他的看法：二人之间存在强烈的共鸣。他的发问之胆大放肆已经构成了意义上的颠覆。他以悖论为工具，专门截取某一个意义非凡的细节，而这么做引起了视角上的巨大变化。昔日的教条何在？只消说在这里“权力的政治关系先于剥削这一经济关系存在，并成了后者的基础”，或者说，“没有国家的社会”变成了“反国家的社会”，就会有一整片民族学阵营陷入昏厥！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几乎毫不费力，就像是一次有趣的物理实验。皮埃尔·克拉斯特让我们为自己的愚笨无知感到羞愧，而人们最初的本能反应就是大喊“全是他设计好的”！

（不过，皮埃尔和江湖骗子扯不上半点关系。他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且总的来说是个愤怒的人。就像热内·居伊·卡杜⁽²⁾一样，他也有他的伊莲娜 [Hélène]；他偶尔也会向我提起自己的儿子，他给他起了个印第安名字……黑色是他的颜色。他的目光中永远萦绕着几丝绝望。他背负着几道秘密的伤痕：最明显的一道，便是他的两位同行，研究美洲的人种学家吕西安·塞巴格⁽³⁾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⁴⁾自杀所留下的。他的

谦退导致他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处在话题中心的穷人，而他也不愿意显摆自己的社会出身。）

皮埃尔·克拉斯特逃离了世俗社会。他骄傲，却并不野心勃勃，也不会汲汲营营。对于那些想找个学界名流或精神导师的学生，他报之以沉默。当然了，他对归属的拒绝意味着反之亦然：没有人属于他。如果他语带反讽，那当是出于矜持或笨拙。他的攻击性与辛辣刻薄比简单的诙谐打趣走得更远。他通过攻击来自我辩护。他故作挑衅。他将逻辑推演到极限。下面就是他的命脉和思路，以及其界限：不错，为了改变世界，我们确实必须先了解世界，但如果这种了解完全是出于想要改变世界的意愿，那它又有什么价值？一种完全由先见（*prescience*）构成的科学（*science*）能如何？在那个结构性操练和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这或许会带来惊愕和不安。试想一下：一个声称自己完全独立思考的思想家，逆流而上，摒弃了教条和组织，试想一下吧！

但我们必须承认：皮埃尔·克拉斯特不需要通过上学来思考，对他来说，只要有几种精心选择的参考书目就够了。他属于一个没有家族精神（*l'esprit de famille*）的灵魂大家族（*une famille d'esprits*）。或者说，他属于一群自由不羁却饱受中伤的灵魂，他们跨越了各个历史时期。至少，我相信这是我在与他的交往中了解到的。

但我不想因为大加赞美他的各种品质，反而授人以柄，让他的对头掌握对他不利的缺点。今天，他的著作是他最好的辩护人：如果你刚读完或刚刚重读完《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你一定要阅读或重读《壮言》（*Le Grand Parler*, 1974）、《反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1974）和《政治人类学研究》（*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1980）。如果你能与这高傲的思想过招，跟上这些基础而严谨的论证，发现这个由一张张快照和对概念的颠覆构成的论说，你从中学到的将远比我就此能说出来的更多。首先，你将会发现一段人类与我们的野性之间漫长的关系史。而这种野蛮（*sauvagerie*），正是人类受诅咒的一面。

我们仍未能对皮埃尔·克拉斯特及其作品做出很好的定位。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想要偷偷地将他边缘化，说他离经叛道，甚至对他拒不承认，还妄想历史会采纳他们的说法……真是弥天大谬：恰恰相反，他们的顽固抵抗恰好证明这位作家兼人类学家的研究的独创性，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了克拉斯特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极权主义的危险（*le danger totalitaire*）。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国家（*l'État*）的目的变成了对自

由的保障、全面的解放、对“民族”（Nation）的真正表达以及对知识的积累和保存，就说国家是原则上不容置疑的存在。

如果说我一直在强调其中充满争议的一面，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以其特有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柏拉图与智者派之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之间、尼采与诸位教授之间、胡塞尔与世界观哲学（les visions du monde）之间，以及海德格尔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争端。皮埃尔·克拉斯特原是读哲学出身，也会有他自己的偏狭顽固之处，而这种偏狭显然源于一种误解：如果说克拉斯特既不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偏生喜欢抬杠，而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分析方式不适用于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酋长制、权力、战争和国家的起源。仅此而已。

但你或许会问，《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又能带来哪些新见，这个故事和作者的学说又有什么关系？我个人在其中看到了很多画面和特写，以及对一个正在消逝的社会的精确又带几分颤抖的观察。一部印第安世界的《夜与雾》^⑤……寻求庇护的游牧人开始定居——这些瓜亚基人在一个日后会成为集中营的地方安顿了下来。他们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末日。面对着（说着和他们相同语言的）“陌生人”以及（来自另一个团体的）新成员，他们试图营造着岁月静好的假象。他们讲着从前的故事，维系着他们想要维持的那种形象。他们像是在观看死亡之镜一般，在自己讲述的故事中观察着自己，由此讲述作为人类的真相。等到我自己在1968年造访他们时，那儿剩下的不过一小撮幽灵，处在他们官方保护者——一个巴拉圭军队前中士——的奴役之下。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皮埃尔的朋友呢？……我抵达的那一晚，他们偷偷过来放了些东西在我的吊床里：五个蜗牛壳，一端已经碎了，之前被他们当成刨刀用。这是他们拥有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在瓜亚基人的悲剧面前，皮埃尔·克拉斯特没有无动于衷。他向当局抗议，并支持所有对杀人者发起公开谴责的人。但是我相信，他私下里也认为这一切不会让印第安人的命运有丝毫变化，而他也担心自己在瓜亚基人的惨剧面前，以既得利益者的形象出现。他事先就拒绝成为一个游说者（lobby），拒绝将为美洲印第安人辩护发声的权利垄断在手中。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上述的一切。这是一部叙事性的民族志杰作，它记录了一切辩论、一切矛盾、一切疑惑和一切先入为主的预设。例如，一位老妇人坦白了自己吃人的行径，就为了

换一些糖果……这不过是一个一笔带过的小故事，一个细节，但是它告诉我们民族学充满了玩世不恭与不对等关系，它还以一种严肃而滑稽的方式让我们回想起了阿尔弗雷德·梅特罗那句见引于第一部分的箴言：“我们若是有幸能够研究某个原始部落，它自身一定已经开始腐坏瓦解了。”

皮埃尔·克拉斯特用《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为一系列观察工作画上了句号，这种观察始于16世纪的编年史家和见证者，如伊夫·埃夫勒，让·德勒瑞，安德烈·泰韦，克劳德·阿布维尔和汉斯·史达顿。没有人比克拉斯特更好地为这些故事赋予了一个新的面向、一个全新的人类学之春。而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皮埃尔·克拉斯特通过创作一部新式的观察之作，照亮了民族学凝视（regard）的源头，同时又一举超越了后者。

想要追寻一颗流星的轨迹并不容易；想要客观公正地检视这部作品也不容易。尤其是在这个愚昧无知得到助长的年代，在这个世人纷纷指鹿为马、满大街都是布瓦尔和佩库歇^⑥的时代。他们的社会学扯淡以音速传播，势同擂鼓，是以我们还需要数年（等到这些热潮退去）才能看清，在克拉斯特纷杂的、尚待厘清的思想中，在他那提纲与草稿的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重拾的线头。

克拉斯特的作品有一位盟友：时间。

雅克·默尼耶

- (1) 克拉斯特早年曾是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的一员，于1956年脱离该组织。此外，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克拉斯特在论及结构主义的局限时向来直言不讳，也因此与当时的结构主义阵营渐行渐远。
- (2) 热内·居伊·卡杜（René-Guy Cadou，1920—1951），法国诗人，妻子为伊莲娜·卡杜（Hélène Cadou）。
- (3) 吕西安·塞巴格（Lucien Sebag，1933—1965），法国人类学家，与克拉斯特同在列维·斯特劳斯门下。1965年，在恋上雅克·拉康之女朱迪斯（Judith）之后自杀，在当时的人类学界产生了巨大震荡。1963年，吕西安·塞巴格与克拉斯特夫妇一同在亚契人中生活了八个月；正文第79页提到的“S君”指的他。相较而言，塞巴格对瓜亚基人的研究更多着眼于神话、梦境与精神分析，克拉斯特则更注重对仪式、权力的讨论。
- (4) 梅特罗于1963年服用过量巴比妥酸盐自杀。他也是克拉斯特的师长，克拉斯特继承了他对原始社会的浪漫化看法。
- (5) 《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法国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1922—2014）1956年关于奥斯维辛的纪录片。
- (6) 布瓦尔和佩库歇，福楼拜同名长篇小说的两位主人翁。二人都是抄写员，在一次

偶遇后一见如故，尔后在乡下的小别墅中从事“科学研究”，对诸多学科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却除了与日俱增的困惑外一无所得，最终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译后记

说来惭愧，在小朱老师将这本书推荐给我之前，我甚至不曾听说过皮埃尔·克拉斯特的名字。这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法国人类学界寄予厚望的学者本有可能接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衣钵，却在才思最盛的年纪猝然离世。他“对归属的拒绝”，也让人们直至今日仍不知该如何处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2020年3月，《人类》刊载的题为《今天还有必要读克拉斯特吗？》（“Faut-il encore lire Clastres?”）的文章便清楚表明，这个问题在克拉斯特逝世四十多年后依然成立，他的学术思想也依然有待更全面的、脱离了派别之见的检讨。^①

不过，刚拿到这本书时，对于围绕这位“离经叛道者”的诸多争端，我自然是一无所知，也不曾深究，而是径直翻开书页，一头扎进了遥远的异世界。前两章读得飞快——我太急着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才会让保罗·奥斯特二十年来始终念念不忘了。他也果然没有夸大其词：信心满满地将《忧郁的热带》封面上的南比克瓦拉青年认成自己的亚契人，化身美洲豹归来复仇的先祖，足以致命的纯蜂蜜（可谓天下最浪漫的自杀方式了），还有盛大的挠痒痒游戏和抢豆子大会……这一切光是作为故事已足够叫人眼界大开。可读着读着，我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放慢了步子，而书页的空白处在不知不觉间也已满是潦草的笔迹：读到这样克制而富有诗意，充满温情又不煽情的文字，我一边沉浸其中，一边又忍不住分出神来琢磨某些字句该如何处理，才能尽量保有原文的神韵。

而神奇的是，等到正式动笔翻译时，我却频频在不经意间撞见克拉斯特的名字。先是某日打开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看见扉页赫然引用了一句《反国家的社会》；此后，又在大名鼎鼎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瞥见克拉斯特的身影，还发现他的作品与德勒兹、加塔利二人使用的诸多重要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恰如皮埃尔·杜梅斯尼尔（Pierre Dumesnil）所言，“皮埃尔·克拉斯特的宿命，便是在被人遗忘后，又不断被人重新发现”。^②而随着我不断深入这部民族志的“腹地”，类似的巧合不断发生，以至于当我敲下最后那句“克拉斯特的作品有一位盟友：时间”，为全书的翻译工作画上句号时，心中忍不住生出了“这场相遇发生得何其之晚”的感慨。好在时间的长河汨汨流过，当年的潮骚早已退却，这颗乍看之下并不打眼的璞石——借用克利福德·

格茨的评价，本书的文风带着一种“近乎过时的、前现代的平实”（almost anachronistic, pre-modern flatness），⁽³⁾且不提“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这个复古如出自洛萨诺神父之手的书名⁽⁴⁾——却不曾被泥沙裹挟而下，依然散发着莹莹幽光。

和奥斯特一样，翻译这本书于我也是一次无比愉悦的经历。从2019年1月动工，到9月第一稿译毕，再到此后的数轮校改，每天晚饭后的翻译时间都是课业之余宝贵而奢侈的“放空”时刻。打开文稿，现代生活的纷杂从耳畔倏地退去，我就像欣然忘记了热浪和蚊虫的克拉斯特一样，进入了林中人的世界。而对词句的打磨，也成了安定感的来源，成了bretete打磨弓箭般的日常。瓜亚基人只有成为beta pou才有资格制作自己的第一张弓；至于读者诸君手上的这张弓是否合格，这自然得由各位来评判。好在几位irondy的援手让我稍稍有了些底气：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湛叔、花超荣和豆瓣友邻Vivida老师对几处哲学、植物学专有名词译法的指教。感谢Elliott Mokski和龚勋不厌其烦地同我拆解克拉斯特某些暧昧多歧的词句，以及附录中数处缠绕如藤蔓的评论文字。感谢我的母亲，我永远的第一读者，当我因为反复阅读译稿而对其中的拗涩习而不察时，她总是能提供宝贵的意见。最后，感谢世纪文景的编辑小朱老师，愿意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一个没有图书翻译经验、也不知底细的友邻，并无限包容我的拖延与强迫症——互联网时代的线上交友莫过于此了。当然，译文中一切疏漏舛谬与不尽如人意之处，俱是我个人的责任，敬请读者指正。

在翻译正文的过程中，奥斯特流畅的英译既是重要参考，也是我踮而望之的标杆（即便对读时偶尔也发现有可以“且容小僧伸伸脚”的时刻）。但或许，同是异世界的领路人，与克拉斯特相比，再好的译者也难免显得计输一筹：一个译者尽其所能，也只能将别处的风土人情借由本国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谓“由彼入此”，读者大可安坐家中，心安理得地让译者替自己跋涉完中间的漫漫长路，等着“山来就我”。克拉斯特则不然。他不会为自己的读者寻找某事物在西方世界里的等价物，而是舍弃了种种西方中心的预设，甚至部分舍弃了自己的身份，变成“布里古奇比雷基”（Brikukiviregi，意为“红脑袋秃鹫”，不过这个名字和他的外貌没有半点瓜葛）⁽⁵⁾，成为了森林中的一员。《编年史》的读者可做不了安乐椅侦探，你必须同克拉斯特一起乘着晃晃悠悠的牛车进入那遥远的林间，与他经历同样的茫然与困惑，也不得不活动开筋骨头脑，打起十二万分精神试图拼凑出这个陌生世界的轮廓。一旦在过程中走了神，泄了劲，脑袋停了转，你很快就会如坠五里雾中，对着满纸

的baipu、baivwä和Beeru干瞪眼。或许你也像克拉斯特一样，掏出了纸笔，记起了田野笔记。你们将一起弄明白，为什么老妇人听到kramero会惊掉下巴，为什么亚契人会把“镜子”称为chaä，embogi与他们的embo之间有着怎样的辩证关系，Karai为何能同时指代白人与巫师，查楚卜塔瓦楚基名字的由来，以及gatu一词的八百万种用法。然后更进一步，一起查清亚契人为何会急着掸去身上的灰烬，弄明白谁可以成为kyrpy-meno的伴侣，解码亚契嘉图人食人的真相……如果各位读到这里，尚未被一脑袋的问号弄得摸不着头脑，而是能够自信满满地说出上述问题的全部答案的话，恭喜你，你已经是个合格的见习人类学家了。

⑥此时的你，也不再需要译者背着山去就你了——你已经来到了山的这一边。

陆归野

2021年7月

- (1) 《人类》(L'Homme) 由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 主办，是法国人类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克拉斯特的大多数学术文章都发表于此。
- (2) 《权力的问题：皮埃尔·克拉斯特访谈录》(The Question of Power: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Clastres. Semiotext(e), 2015, 8.)。
- (3) 克利福德·格尔茨《深度闲逛》(“Deep Hanging Out”)，见《纽约书评》1998年10月22日刊。格尔茨给《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的这篇书评写于1998年英译本出版后不久，在当时的他读来，这本迟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才与英文读者见面的著作已经是传统的、旧式民族志的代表了。
- (4)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有两条自我评价，或许值得在此一提：首先，他把自己看作田野工作者，而不是理论家；其次，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些编年史。
- (5) 克拉斯特没有在书中提到亚契人赠予他的这个名字，吕西安·塞巴格在他的论文《一位瓜亚基女人的梦境分析》(“Analyse des rêves d'une Indienne Guayaki”，见载于萨特、波伏瓦主编的杂志《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 1964.06.01, Vol.19)) 中记下了这条有趣的信息。这个名字是他们抵达白溪三个月后收到的，顺便一提，塞巴格的名字是“瓦楚基”(Wachugi)，意为“孢子”。
- (6) 如果还有读者有闲情逸致，想要将从克拉斯特这儿学到的技能运用到实战之中的话，国际语言学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Olympiad) 将满足你全部的好奇心。

SNIGDHA POONAM

印度青年 狂想曲

DREAMERS

HOW YOUNG INDIAN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印度] 司妮达·普拉姆——著 | 于果果——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SNIGDHA POONAM

印度青年
狂想曲
DREAMERS

HOW YOUNG INDIAN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印度] 司妮达·普拉姆 —— 著 | 于果果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青年狂想曲 / （印）司妮达·普拉姆（Snigdha Poonam）著；于果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Dreamers: How Young Indian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ISBN 978-7-208-17008-7

I．①印... II．①司...②于... III．①青年-生活状况-研究-印度 IV．①D433.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47780号

书 名：印度青年狂想曲

作 者：[印度]司妮达·普拉姆

译 者：于果果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7008-7/C-632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阅 读 未 来

豆瓣douban



bilibili



远而近的阅读
一起做个有趣的书呆子！

关注“世纪文景”



DREAMERS

Copyright © 2018, Snigdha Poonam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我的父母

目 录

PART I 第一部分 “没有B计划”

- 1 标题党
- 2 英语男
- 3 疏通者

PART II 第二部分 “我已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 4 男愤青
- 5 女愤青

PART III 第三部分 “一切表象都是假象”

- 6 明星
- 7 骗子

后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PART

I

第一部分

“没有B计划”

1 标题党

以下选题会场景可能来自印度100万个标题党创业公司中的任何一家：一群编辑围坐在桌前讨论接下来要将哪些新闻和八卦推给读者。整个过程迅速又残酷，选题讨论就好像在拍卖场上竞标一样：

为什么你的好朋友就是你的真爱，像米拉·库尼斯和阿什顿·库彻一样

关于阿曼达你需要知道的事——贾斯汀·比伯的新女友

如果你从一场车祸中幸存，你的脸会是什么样子

15条最搞笑的针对特朗普的恶评

从卡戴珊家族到啤酒肚，从性的坦白到生活小窍门，编辑部只需要15分钟就能把所有美国人痴迷的话题过一遍。平均下来，他们每做一个决定只要15秒。可怜的阿曼达不由分说地被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挤掉了，后者刚刚为了回击一条育儿丑闻，在Instagram（以下简称Ins）上发布了一张她亲吻孩子的照片。编辑们选择了一个大胆的立场，说这位前“辣妹”没做错什么。或者，像之后发布出来的文章所说，“为什么嘴对嘴亲你的小孩不是件坏事”。一位涂着黑色眼影的年轻女编辑告诉整个编辑室，选择这个选题的理由是“亲小孩在美国正流行”。车祸选题被调整为，想象两辆车同时撞到一个人的脸上会发生什么。大家一致同意这个选题只做个视觉故事就可以了，因为很显然美国人就爱看事故惨剧。金·卡戴珊输给了凯莉·詹娜。又一个很拼的女孩子自告奋勇要做一个DIY实验，为了给“如何不动刀子就能获得凯莉·詹娜的嘴唇”这个选题贡献实战经验。（很显然，“凯莉·詹娜嘴唇挑战”也很火。）最后一个选题没有变化——唐纳德·特朗普，永远有流量。选题的通过靠的不是他们的新闻价值，而是他们能否激发人们本能的情绪。15分钟里，这10个年轻人探索了所有能触动美国人情绪的开关：让美国人激动的、害怕的、伤心的、好奇的——一切。

这场选题会并非发生在美国，而是在印多尔，一个位于印度中部的中等规模城市。这场会议的与会者都不足23岁，他们此刻正坐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全玻璃办公室里。他们正在决定的是，几个小时后美国人起床的时候将读到什么。

他们很少判断失误，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如此。每天有上百万人会点击他们的网站——WittyFeed。其中80%是外国人，而这其中又有一半是美国人。WittyFeed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内容工厂之一，单在Facebook上就有超过10亿的关注。此类网站中，唯一比它拥有更多点击量的就是全球内容流量引领者，BuzzFeed。现今估值只有3000万美元的WittyFeed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几年内赶超BuzzFeed。但这并非他们的最终目标，这群年轻无畏的创业者想要把它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比BBC、CNN还要大”）。他们打算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遵循他们的座右铭——想刷屏，靠感情（It's emotion that goes viral）。

即便是在印度，也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WittyFeed。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发现它的数据很惊人：月点击量8200万，浏览量15亿，用户1.7亿，Facebook上有420万个赞。^[1]如果以他们自己的新闻评判标准——奇葩程度——来看，WittyFeed确实是做新闻的。一群根本没有见过世界的印度小镇青年，就因为自己互联网玩得比别人溜，就敢梦想统治世界？

2016年5月，我来到印多尔，想要亲自看看WittyFeed到底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不管我能否得到答案，至少可以认识一群整天活在线上的印度人。从德里飞过来，印多尔的各个方面都显得很小镇：路很窄，楼也很矮，一家条件一般的酒店每晚的价格都很便宜。然而，这座小镇的雄心壮志却随处可见——有很多牛经过的路边开着很酷的咖啡馆，广告牌上宣传的是摇滚音乐会，年轻人都穿着随时可以拍Ins风照片的衣服在街上溜达。

印多尔新兴的事业野心，在WittyFeed位于全镇最高办公楼9层的那个9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达到了高峰。办公室被装修成令人惊讶的硅谷风格。墙是一块巨大的画布，上面画满了表达公司内核的一切图像，既有详细的图解展现WittyFeed发展历程，也有他们最喜欢的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Instagram、Google和Snapchat——的标志，还有写着初创公司“准则”（创造、疯狂、勇气等）的拼贴画。这些五彩斑斓的墙围着的开放式办公室像一扇窗口，展现了这个公司充满希望的、全球化的灵魂：裸露的墙砖、浓缩咖啡机、懒人沙发、乒乓球台、供员工放松的角落，以及健身房。办公室设计成这样的效果是，只要员工的眼睛不在小小的电脑屏幕上，就一定会看到一些励志的东西，既而志向无限远大，想法无限接近美国思维。这些东西可以是明星的大头照——玛丽莲·梦露或者麦当娜，也可以是鸡汤格言——“99.9%不等于

100%”或者“制定目标—达成—重来一次”，还可以是WittyFeed心目中最有感染力的三位美国人——亚伯拉罕·林肯、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在这个充满了励志鸡汤的环境里，一旦有人产生自我怀疑，他需要做的就是站在CEO的办公室门外，看看巨大的阿拉丁画像说着那句激励全印度无数梦想的鸡汤：“世界就是一个精灵，它会告诉你‘你的愿望就是我的使命’。”CEO（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有个名字：临冬城。卫生间也有名字：男卫生间叫“卡奥”，女卫生间叫“卡丽熙”。和《权力的游戏》里那个血腥的中世纪世界一样，WittyFeed的世界里也充斥着对于权力和他人领土的渴望与垂涎。

二十几名员工一起住在几个大的平房里，他们被要求视对方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洗发水或者牙膏用完了就找CCO（首席内容官）要。想要进入WittyFeed的世界，他们必须将过去留在门外。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由“00后”组织的针对“00后”的“邪教”：你的过去越少，进入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大。每个想要在WittyFeed工作的人都会被清楚地告知这个要求。这必须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而且他们必须对这份工作足够渴望。这个公司甚至更想要没什么工作经验，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他们的面试中——最长的可能要一天——最重要的是回答一个检验他们是否适合这份工作的重要问题：你是谁？回答的形式可以是一段独白，也可以是在房间里跳一段热舞；后者可能得分更高。

对于大多数参加面试的印度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印度的年轻人并不被鼓励问“你是谁？”这种问题，在一个你是谁——种姓、阶层、地区、信仰——从出生前很久就被决定了的社会里，“觉醒”是一件奢侈品。这也是这一代印度人和他们之前的大多数世代决定性的不同。

应聘者把自己置于这种存在主义的审问中，是因为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我在印多尔最先见到的三个WittyFeed员工中，有两个都在不久前失去了父亲，挑起了负担整个家庭的重任。适应WittyFeed的世界被大多数员工形容为一种奇怪但改变命运的体验。从对于世界一无所知，到决定世界应该知道什么，达到这样的转变只需要在公司待一周。但这绝非易事。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约会过的18岁印多尔女孩，你不可能一觉醒来就写出一篇治疗美国人失恋痛苦的良方。你得从学习如何像目标读者一样思考开始：有美国小孩想要找“一个像钢铁侠的贾维斯那样的AI管家”，有嬉皮士想要找一个可以给美国政客找麻烦的App，还有Tinder用户想要掌握“面包渣”^[2]艺术。

慢慢你就进入状态了——或者状态就浸入你了。你脑海中的每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潜在热点的灵感，它从你眼前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就应该立刻计算出大概会有多少人会点进去看。如果你精于此道，有些灵感会直接带着缩略图闪现在你眼前。有时候你觉得你可能已经疯了，但是你环视四周，发现大家彼此彼此。

“有一天帕尔文哥^[3]坐飞机回印多尔。他在上厕所的时候脑海中忽然蹦出一个想法：飞机上的屎去哪了呢？他一回来就把这个点子分享给我们，当天我们就发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结果大受欢迎，获得了31.5万的阅读量，后来这个想法在整个内容产业里被效仿。”拉瓦尼亚·斯里瓦斯塔瓦在带我参观办公室的时候告诉我。当时刚开完选题会，每个人都已在做该做的工作了。“内容部”有人实时监控赛琳娜·戈麦斯Ins上的动态，“技术部”有人在写一个破解Facebook读者限制的程序，“交互部”则有人在更新接下来两个小时可能火起来的话题清单。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显示网站上每秒读者人数的屏幕。“现在有9000人”，斯里瓦斯塔瓦用肩膀指了一下屏幕的方向。

斯里瓦斯塔瓦看起来比实际还要年轻：她胖乎乎的，一头卷发，眼睛闪闪发光。她在两年前加入WittyFeed，那时才20岁。“他们并没有问我之前做过什么，而是让我唱歌。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唱歌并不容易，但当时我还是硬着头皮唱了。”她需要这份工作。“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妈妈已经上了年纪，很难再出去工作了，我下面还有个妹妹。当时我正在我家所在的城市上大学，就在古吉拉特邦，但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有一天我听说印多尔有一个创业公司在招人。”斯里瓦斯塔瓦现在是WittyFeed的内容总监，她的写作生涯是从一条情感建议开始的。“开始我不知道说什么，你不可能提笔就写这种东西。因为你必须很真诚，所以我开始挖掘自己的内心，并大量阅读。写这种文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感情投入。随着时间积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写大起大落的故事了，比如说有人带着伤痕坚强地生活这种。我们想要获得的女性目标读者就很容易被这种故事打动。”

过去两年中，她也帮忙开创了WittyFeed的另外几个栏目：猫、胡子、OMG（我的天哪）。她的“OMG”嗅觉很少失灵：那个飞机屎的故事就被她放在了这个栏目里。由WittyFeed的常驻“排泄专家”撰写的文章“你的便便在飞机厕所中的经历会让你惊掉下巴”很快就获得了50万阅读量。文章的缩略图是马桶前的两条腿，红色的内裤脱到了膝盖的位置。她的第一篇爆款——标题为“仔细看过这张图后，男人和老婆离婚

了”的图集——讲的是丈夫回到家后发现一个男人藏在他老婆的床底下的故事，至今阅读量超过300万。^[4]她的第二篇爆款讲的是道恩·强森和泰勒·斯威夫特的对口型之战。“连《星际迷航》的乔治·武井都转发了。我们的网站上瞬间出现了5万人，我简直欣喜若狂。人们不停点赞、转发、评论。我就是在那一刻知道，我肯定做对了什么。”她所相信的转发的力量被证实后，斯里瓦斯塔瓦立刻全身心投入到WittyFeed的生活中。她的妈妈和妹妹也搬到印多尔和她一起租房住，她们也不再质疑她不寻常的生活方式了。“你在满足美国人的好奇心，所以凌晨3点钟总会有故事可以写。你不能等到早上10点到办公室才开始写，爆款不是这么做的。”

她说在这一行干得越久，就越能贴近她的读者们，虽然他们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写了一篇教程教大家如何在花园里建一个游泳池。我们仍然保证标题很贴近大众——‘他负担不起游泳池，但是他的这个做法绝了’。这条也转疯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绝招，比如一旦你告诉别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们的好奇心就会被立刻勾起。我写了一篇‘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刷牙的方法一直是错的！’，收获了200万的阅读量。在飞机便便的文章大获成功之后，我们开始做一系列‘你想过吗’的选题。比如我们有个编辑就写了‘你想过女宇航员在太空来大姨妈要怎么办吗？’。”

并非所有的文章都能达到百万级的阅读量，但是至少要达到最低标准10万阅读量，也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在编辑部这个熔炉中活下来。“你肯定也有过那种时刻，就是你在刷Facebook的时候，会很随意地刷过很多链接，然后你突然刷到一条推送，引起了你的好奇心，让你不得不退回去把它点开——我们就在内容里下了这种钩子，逼你把它点开。”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条流量相关的科学规律。“我们有一个系统专门追踪能出爆款的关键词——令人恐惧的、震惊的、鼓舞人心的。”

随着聊天渐渐深入，斯里瓦斯塔瓦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权威。她外表看起来还像个中学生，但说起话来却像是硅谷的大佬。“通过5万个关联主页——美甲、情感、健康和生活方式主题的知名主页——我们总共控制了100万Facebook的浏览量。他们拥有至少4万关注者会分享我们发布的内容，我们则根据他们吸引了多少流量给他们分成。我们有90%的流量都来自Facebook。通常情况下，印度和其他地区的点击量算作非优质点击，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点击算作优质点击。1000个印度的点击量我给1美元，1个美国的点击我就给7美元。”她用一种相似

的办法给公司的写手们计算工资。“我们在全球有超过150位作者，他们来自菲律宾、中国和西班牙。”我们就坐在她长长的办公桌旁，这张桌子上还坐着内容组的其他8位同事。有些同事正在接触南美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可以为网站提供独家的西班牙语内容，“需求量简直爆棚。”

斯里瓦斯塔瓦现在不再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了，她甚至不再把自己看作打工仔。“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企业家，所有人都想做出一番成就。”她入睡之前想的最后一件事不是明天的工作，而是公司下一步应该拓展到哪个国际大都市去。“我们现在已经在新加坡建了一个分部，还想要在洛杉矶建一个。我们的主要读者在美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缩手缩脚呢？”还没等我为她的野心鼓掌，她已经跑到前台去接待一名19岁的面试者了。几小时后，斯里瓦斯塔瓦告诉我她不喜欢这个大学生的态度。她说这个女孩子对工作没有足够的欲望。

这个选拔标准是CEO定的，他经常坐在临冬城的位子上评估整个办公室的欲望值。和《权力的游戏》中那个正直的公爵奈德·史塔克一样，他有信任的指挥官作为左膀右臂——CCO恰巧是他的亲弟弟，CTO（首席技术官）则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辛格尔的右手正打着石膏，他解释说，因为“对某件事情很生气就用手砸了墙”。

辛格尔似乎知道自己并不完全是个正常人。他倒是很感激自己的癫狂，正因如此他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辛格尔在哈里亚纳邦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父亲是个中间商，连接起农民和粮食市场。他16岁的时候第一次被自己的疯狂裹挟，疯狂地想赚钱，想赚很多很多钱。“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从我的村子开始，然后是我的街道、我的区，再到整个邦、整个国家，最后是整个世界。”然而他并不知道人们是怎么变有钱的。村子里的大部分人每天就是围着那一亩三分地转悠，甚至没有人上过高中。辛格尔决定要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全印度的年轻人似乎都走这条路发财致富。他搬到了德里，开始准备工程师学校的入学考试。

然后他又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波疯狂。“在德里，我开始看报纸，看新闻频道，然后意识到管理我们国家的是一帮混蛋。我一直很爱国——我爱印度并愿意为它付出一切——但现在我发誓要把我的祖国夺回来。”2009年，国大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简称）即将进入他们掌权的第二个任期，而全国觉醒的年轻人们正开展运动要求变革。2010年，辛格尔进入了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工程师学校攻读计算机工程学位。“我很想利用计算机做点事情，做些相关的生意，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做程序员的天赋。”很快，他发现了互联网。不久之后，他发现了整个世界。“互

联网是这个世界所发明的最强大的工具。我简直着了迷。”

辛格尔意识到他可以利用互联网一举两得——既能赚钱，又能改变国家现状。他已经有了一个团队，包括跟他上了同一所大学的弟弟，以及与他有共同追求的几名同学。“我们开始做两件事：一件是帮其他公司建网站的小生意，还有一件是创立‘印度将被改变’（Badlega India）网站，上面发布我们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的关于国家的信息，包括值得关注的新闻、名人，以及历史。”“印度将被改变”是辛格尔心中印度应该成为的样子，然而支持这个愿景的是完全虚构的事实（如印度自独立以来因腐败已经损失7300万亿卢比^[5]，这些钱足够建成140万间低价住房），以及极端的解决办法（如公共服务部是否应该出台一个“公民宪章”？根据宪章规定，完不成工作就要受到重罚）。^[6]“那时我的爱国之情达到了巅峰，我完全被愤怒遮住了双眼。我们因为缺乏认识选了一群傻瓜来管理国家，他们制定了错误的法律，一个伟大的国家就这么被毁了。”除了发表文章，呼吁“青年革命”，他还组织集会和烛光游行，为的都是相同的目的。

然而，不管是他的生意还是激进的行动，最终都没能结出果实，但他的团队却意外发现了一座金矿。2011年末，辛格尔17岁的弟弟帕尔文建立了一个Facebook主页发布“印度奇观”。“那时候我刚刚发现互联网这东西，完全被它所提供的可能性震惊了。”如今22岁的网络老手帕尔文说道，“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看遍YouTube上所有能看的电影，简直太爽了。然后我发现了Facebook。我注册，建立档案，开始结交朋友，和他们聊天。对我来说这太有趣了。然后我发现你可以建立一个主页，在上面发布任何你想和世界分享的东西。”这个主页叫作“世界奇观”，但他上传的全都是印度历史遗迹的照片，比如德里的阿克萨达姆神庙和莲花寺。不到一个月，就有几千人给这个主页点赞。^[7]“人们的兴趣在慢慢增加。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只放建筑或者只放印度的东西呢？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物——人、地方、冒险、科技。很快，主页上有将近一半的点赞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不到一年主页就收获了100万个赞，这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个转折点。现在这个主页已经获得了420万个赞，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从这个小小的主页开始的。”

辛格尔发现内容市场后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要建一个网站发布那些让人们忍不住要点开的内容——有人给这种爆款内容取名为“大脑的垃圾食品”。兄弟俩把父亲在粮食市场的那一套搬到了内容行

业：早早到达，拼命叫卖。他们既不在乎语言——离开村子之前他们都没接触过英语——也不在乎他们在WittyFeed上的故事传达了什么样的中心思想。他们只关心这些内容能否直击读者的心灵，不管是色情的表白还是养娃的灾难。维内·辛格尔向我传授了他的后真相世界——在标题党的行业里，掌握事实不重要，掌握人心才重要，“爆款在我心”。他至少打通了通向梦想之一的大道：赚大钱。

2014年，辛格尔搬到了印多尔，这是他们第三个合伙人的老家。这个城市足够大，能容得下很多野心勃勃的求职者；它也足够小，让他们不至于因为选择太多无从下手。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家庭资源集中到一起，在商场里租下一间办公室，雇用了一群低学历、没经验的年轻人，开始大量炮制清单式文章：“7条讨男友欢心的秘诀”“14个饥渴女孩坦白的秘密”“10张凯蒂·佩里最奇怪的脸”。在斯里瓦斯塔瓦加入公司几个月后，WittyFeed达成了百万里程碑。辛格尔在印多尔买下了他们的第一幢小房子，并把他在哈里亚纳邦老家的父母接了过来。

他们的爸爸现在每天在一家时髦的商场里照看一间本地最潮的服装店。“我们给他开了这家店，每款衣服都只有一件。如果你从这里买了一条裙子，我们可以保证在整个市里绝对找不到第二件。”对兄弟俩来说，这个商业模式又是一大成功，但他们的爸爸还在适应从卖粮食到卖短款上衣的巨大转变。“他有点提不起精神，有点郁闷。来这家店的只有女大学生，她们都和他说英文。现在最火的那些短款、破洞的衣服他也不看不惯。他之前在村子里可是干活的主力，如今到了45岁却无事可做。”那天晚上，我去店里看了一眼。老辛格尔被一摞摞新到的吊带连衣裙和破洞牛仔裤围着，看起来很无聊。我问他对新生活还满意吗，他含糊地点了点头。我买了一条长裙，希望让他对这个世界少点失望。

老爸仍然用村里的标准评判一切，但儿子们也是如此。帕尔文·辛格尔把自己称作一个来自哈里亚纳邦村庄里的朴实小伙，虽然这个从小村子来的朴实小伙会给胡子加上“#”，还会精心打理他的小辫子。他哥哥也是半句不离村子——“我是我们村里走出来的最成功的人。我最自豪的一刻就是去年我80岁的爷爷来到印多尔，他看到我的新办公室说，‘我的天，这简直和村里的市集（*mandi*）一样大。’”不久后，维内·辛格尔娶了他同村的女朋友，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冒险。当时他组建了一个公司，想要证明印度可以领导世界，还策划了如何把未婚妻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带她逃离因为爱上一个其他种姓的人要遭受的惩罚。

带老婆私奔并把她带到印多尔之后，辛格尔让她在WittyFeed当高

级编辑，现在负责拓展网站的西班牙语内容。这个23岁的女孩子是整个办公室里除了她丈夫之外所有人的“嫂子”。她不但要管WittyFeed的内容，还要负责80个被她丈夫看作自己“孩子”的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她穿着一身新娘的装束，大红色的纱丽长衫和配套的手镯，在办公室里到处送祝福。

嫂子是WittyFeed每个人口中“WittyFeed文化”的最新施行者，这是硅谷文化和印度村镇文化的混合体。在WittyFeed，一天从诵唱印度教音节“Om”开始，以舞会为结束；每次庆祝都在Facebook上直播，每个矛盾都通过村委会解决；恋爱被鼓励，情绪被煽动。辛格尔一家认为，他们比美国的初创公司有一点优势，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他们对手公司的那些“00后”也许会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但是他手下的80个年轻人把他看作自己的大哥，并且唯命是从。“如果你遵从印度的价值观，你就能赢得与西方的任何比拼。印度人不比任何人低等，我们只会比他们更好，因为我们有家庭观念。”辛格尔说，“家庭是一切的核心。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是这些孩子的家。当他们的父母来到公司，我们会行摸脚礼^[8]。”

作为这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家庭的家长，维内·辛格尔以成为年轻员工的人生模范为骄傲。他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之前他的激进主义想要培养出的那种年轻人：他们应该拥有放眼世界的野心和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想要征服世界但又不会丧失作为印度人的自豪感。当然了，印度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最终也由辛格尔决定。派对狂欢没问题，但要和家人一起。“我们每个月都会租屋顶酒吧，给他们办一次大派对，想要什么应有尽有。”我猜这“应有尽有”里暗含酒精和毒品。但是他并不支持吞云吐雾，“我不允许他们吸任何东西，在办公室还是外面都不行。”年轻人的思想太容易被控制了，这些员工说起他来，就好像被洗脑的民众说起他们的独裁领袖一样：

维内哥想要改变我们的国家。

如果有人批评印度，哥就会非常生气。

他就是每天鞭策我的人，他说话的方式，还有他生活的方式。

他每周日早上都会给他们讲话，听起来就像是那种励志演讲一样。他走上在角落的讲台——“君临城”——给自己、团队、公司和国家设定目标，每次都能滔滔不绝几小时。“下一个五年里，我会着力发展公司，

然后下一个十年，我会着力发展国家。”在他身后，他们可以通过大楼的落地玻璃窗看到印多尔平整的轮廓。“我希望让他们感觉站在世界之巅。”这个建筑的策略奏效了。窗外的风景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还听着你认识的最厉害的人，讲他认识的最厉害的人。史蒂夫·乔布斯经常被提起，他的话直接说到了这群孩子们的心坎里。他们相信会影响世界这件事上，他们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平起平坐。

把每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活。

有时候生活会给你当头一棒。别灰心。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最近，埃隆·马斯克在演讲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惭愧地说我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有一本书我从头读到尾，埃隆·马斯克的自传。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辛格尔告诉我。他的世界观越来越受到这个科技鬼才因科幻小说启发而创立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人类的未来将会有两种可能：要么多星球生存，要么种族灭绝。

如果我在世时看不到人类登上火星，那我会非常失望。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更好地启蒙大众而奋斗。

他的励志哲学的另一大母矿也借鉴自美国。辛格尔和他弟弟一样，自从发现互联网后就投入大量时间仔细研究美国的流行文化。他生活和事业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美国电影和美剧。“《权力的游戏》：谋略、激情、原则。《越狱》说的是‘没有B计划，只有A1、A2、A3计划’。《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船长教给我的是决不放弃的态度。在第二部的结尾，他的船遇上了龙卷风，还被敌船包围，结果他抽出一把剑说，‘来吧。’《绝命毒师》：虽然主旨不够积极，但是主角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洛奇》：人生就是看你能承受多大的挫折并且继续前行。我遭遇了8次破产，当我欠了3000万卢比的债，口袋里只剩22卢比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部电影。”

他的励志鸡汤每天都会增加新内容。他可能已经向团队复述过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和好莱坞英雄说的每一句有意义的话了。最近，激励了这位不爱看书的CEO的，是一位19世纪的英国诗人，在印度也曾经大名

鼎鼎。“你们听说过鲁德亚德·吉卜林吗？今天早上有人给我发来一首他的诗，叫作《如果》。我已经发给整个团队了。”

那天晚上，我重读了《如果》，然后我就知道是哪句话吸引了他和他的团队：

如果你能掳起赢得的钱财
来一场孤注一掷的游戏，
输掉，然后从头再来
对你的损失绝口不提。

在辛格尔的特朗普时代世界观里，生意场上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就。和这位亿万富翁出身的美国总统一样，辛格尔也认为，能领导一家成功的公司让他成为领导一个国家的不二人选。

“我把我的公司看作一个缩小版的国家。我领导它的时候，它按照每一个指标运行。每个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他们只有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能留下来。为什么政治不能被看作一个让国家变好的工作呢？”

他对于领袖的理解似乎也照搬了特朗普的那一套。“一位好的领袖，应该是一半民主一半独裁的。”我问他有没有受到任何印度领袖的启发，他的回答并不让我意外。和千百万支持印度影响世界的年轻人一样，辛格尔也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现在我们给他内阁里的部长发推特，就能收到回复，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2014年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象国家领导者可以这么亲民。他每周都在电台发表公众讲话，人们能感受到他在那儿。”

遵照这一标准，即他们利用科技进行自我宣传的能力有多强，他给政客们排了名。拉胡尔·甘地因为不是本人在运营推特账号被判出局，而埃尔维德·凯杰利瓦尔则因为在Facebook直播演讲中使用了“多个机位”而备受赞赏。“非常成熟，非常专业。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和年轻人联系起来。”

辛格尔认为他能比他们所有人都做得更好。“有些事情势在必行，因此需要适合做这些事的人进入政坛。如果你想做出一些改变，政治是唯一的途径。”他觉得，如果他能建立一个3000万美元的公司，告诉美国读者一些有的没的，那就没什么他做不成的事了。但最近，他开始觉得

印度的政治舞台太小了，不值得他劳神费力。“我不再想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理了。”

我去印多尔不是为了听维内·辛格尔改变印度和改变世界的大计，我只想知道他怎么能身在这里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内容工厂之一。但辛格尔不太愿意聊自己的生意，他已经通过网站的数据证明了一切。他只想谈他的“愿景”。他陷入得越深，似乎就从现实中抽离得越远。我们两个面对面坐在生机勃勃的WittyFeed咖啡馆里——“全市最好的咖啡馆”——但他的思绪显然已经飘到了外太空。他的眼睛盯着我后面的什么东西，于是我回过头去，想在已是下班时间却仍旧忙碌的编辑室里找到他的焦点（美国很快就将醒来），但他并不是在看我能看到的任何东西。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我想要领导全人类，人类比一个国家要大。我想要到外太空去，我希望人类能成为一个多星球存在的物种。我想领导火星。”

我平静地把这话记了下来。那一年，我听过比这疯狂得多的话。从2014年我开始在印度遥远的角落和年轻人们交谈以来，到2017年他们说上句我就能接下句为止，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这样的口号，这是他们极端情绪的宣泄：他们的希望、计划、担忧、梦想。印度人口超过半数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9]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年轻人群体。“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年轻人。”联合国2014年的一份报告用震惊的语气记录下这一事实。它将印度这前所未有的人口构成的意义用最简单易懂的话概括了出来：“这其中蕴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如何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抱负，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10]

世界的未来依赖于印度年轻人能否实现抱负，但是现在看来，这还是个白日梦。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多年来警告的那样，印度迫切需要解决它的“3E”问题，大多数印度年轻人将被列入这三个范畴：未受教育（uneducated）、待业（unemployed）、无工作能力（unemployable）。这个国家完全要依靠庞大的青年群体成为超级大国，但却不知道如何将数字变为资本。

这个挑战涉及的问题让对印度最有信心的支持者也犯难。想要在国际经济上发号施令，印度需要在未来十年里让1亿年轻人接受教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在这十年里，至少需要建成1000所大学和将近5万所学院。（什么概念呢，美国总共也只有4200所学院。）^[11]即便印

度奇迹般地完成了这项壮举，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也仍然是个问题。目前，不到17%的毕业生有直接就业的能力^[12]，只有2.3%的印度劳动力接受了正规的技能训练（日本80%，韩国96%）^[13]。但现实是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只有极少数印度特权阶层能够自主选择不工作。然而，印度在创造就业上举步维艰。大约1.17亿人需要被吸纳到新的、更具有生产力的工作中去。^[14]求职者和工作缺口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使得国际劳工组织将这一代印度人称为“受伤的一代”（Scarred Generation）。他们预测“集体性的挫败感”将引发抗议活动和社会动荡。^[15]

事态已经开始恶化。过去的三年里，许多邦内的大批印度年轻人开始因为工作配额问题走上街头。在安得拉邦，他们封锁了道路和铁路网络^[16]；在哈里亚纳邦，他们切断了对首都的自来水供给^[17]；在古吉拉特邦，他们封锁了工厂，警察向他们开火^[18]；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威胁要摧毁那些因平权运动而得到雇佣的人^[19]。事态正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数量庞大的印度年轻人中的大部分仍活在一潭死水中。地方百姓构成了现代印度的核心，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只会在临近大选时出现于我的新闻推送中，只有那时我的同事们才会下乡采访，了解“年轻选民”的想法。他们都会带回同样的结论：一波远大抱负正在印度的乡下蔓延。

似乎离城市越远的人，梦想就越远大。我们能看出来他们想要什么——在机会、收入、个人价值、政治立场、爱情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看不到是什么驱使他们有这些需求。搞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把我们分开的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和父辈、祖父辈在这个年纪的生活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生活在哪里，还是如何生活。然而视角稍微转换，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同了。一名20岁的印多尔年轻人和美国艾奥瓦州的同龄人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样的，这也可能让他们生出同样的需求和梦想。对印度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和他们理想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1亿人突然间拥有了远大的梦想，然而不管是家人、老师、老板还是政府，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还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意识到只能靠自己。他们只能告诉自己，他们需要自己建造一个世界，才能成为想要成为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你能达到怎样的成就要看你有怎样的渴望。一旦他们给自己创造了这个名为梦想的泡沫，他们就会把全部人生都压在追求梦想上——要么拼命干，要么就

是死路一条。

年轻的印度人正在这块看似最不可能的土地上，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可能性。WittyFeed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吗？我现在对于此事的信心，相比踏进这个小镇童话之前并没有增加。在我发现辛格尔和他的帝国时，标题党的魔力已经在减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Facebook开始不愿意让其他玩家通过它的名气获利。如果WittyFeed想要保持数据，它就要调整策略。这其中吸引我的不是什么样的内容能成为爆款，而是为什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印多尔公司能在标题党新闻的世界性崛起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后来又见过辛格尔几次，都是在大城市的活动中，他在那谈论小镇精神的崛起。只要一走上台，这位CEO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是个“来自小镇的朴实青年”那一套。凭借着不太流利的英文，他告诉台下那些紧张的年轻观众们要以自己不标准的英文为傲；引用投射在巨幕上的网页访问量，他告诉观众们世界的未来都要靠他们的想法；带着直击灵魂的眼神，他告诉台下绝望的一代，他们要让印度再次伟大。

因为彻夜思索如何让自己和国家走上荣誉的巅峰而满眼血丝的辛格尔，似乎挺喜欢新印度的形象。然而这个新的印度并非总是让人易于接受。首先，它是重男轻女的典型。男人总是要负起来自家庭、社会、国家的各种责任，经受比女人更大的压力。在2004—2005年和2009—2010年之间，有超过2400万男性上岗，同时有2170万女性下岗。世界银行等对此现象感兴趣的调查者将其归咎为“社会规范：婚姻、母性、棘手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偏见，以及父权社会”。^[20]

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在祖父那辈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成年——社会问题上态度保守，性方面腼腆，宗教上敬畏神明——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又和美国青少年一样：要赚钱和出名。他们能获得真正机会的可能性极为渺茫——每个月有100万印度人进入就业市场，他们当中大概只有0.01%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但他们对于成功却有着最不切实际的幻想。^[21]他们是最具全球视野的印度年轻人，但他们基于语言、地域、宗教，以及对于国家前殖民地时代辉煌的夸大认知而形成的“何为印度人”的看法也最为狭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印度的旧政治很不满，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国大党死板、严格的自由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他们对于新政治的认知就是如今掌权的印度人民党，一个主张排他的民粹主义和教派隔离的政权。他们是自独立以来最绝望的一代印度人——86%的人曾对未来感到“焦虑”——但他们也是最执迷于统治世界的

一代。^[22]不管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困苦，他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群体，而且他们坚信世界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规则运转。这些印度年轻人的决心，将给印度内外带来不只经济上的影响。他们心中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想法，导致这一代印度人以自己的观点重新定义一切：工作、成功、道德。这也会以一种我们还不能预见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了解在时刻变化的印度做一个年轻人是怎樣的。我了解找不到自己定位的沮丧和寻求天翻地覆的变革的欲望。作为一个从新晋自由主义印度的小城镇中产家庭长大的女孩，我也常常要重新调整种种想法，包括我是谁、我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想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我很幸运，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就是说服自己要有更远大的志向。我不需要为了成功或生存奋斗，只要追求个人自由就行了——离开家，做喜欢的工作，为爱结婚，自己的生活自己说了算。我的斗争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某个系统，而是传统。我被高种姓和高阶层的壳保护着，不用像其他人一样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唯一需要斗争的就是我的家庭，而且这也不算上是硬仗。

和现在的印度年轻人不同，我当时对这个世界愤怒不起来，因为我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我被世界吸引还来不及呢。那时印度刚刚在铁门上开了一个洞，让人得以一窥外面的世界，而我就被它的五彩斑斓深深吸引了。我接触到只有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群人才拥有的好东西：有线电视、流行音乐、校园漫画。我对于它给我日常生活带来的诸多选择心怀感激，比如至少能有不止一个牌子的香皂可以选。我长大过程中所经历的印度，比我父母年轻时候的印度在各方面都好太多了，很难想象谁会觉得它有什么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印度就是在崛起。

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包括那些愤世嫉俗的人。V. S.奈保尔在1990年代初游历印度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家虽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极端的团体、教派、宗教、地域矛盾”，但同时也在拥抱“自由的观念”，达成“精神上的自由”。那个十年里，《纽约时报》每五篇关于印度的报道里就有一篇讲的是印度又和某外国企业签订了令人激动的商业合同。从太空科技到私人电脑，所有在造的东西都将印度送往美好的未来。^[23]

和我现在遇到的年轻人不同，20岁的我并不想让印度统治世界，看到我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的政治理念和我父母一样，我们都是所谓的国大党支持者。我父母的父母也支持国大党，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政党可以选择。国大党不但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也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后代所建立的政党，它奠定了印度民主、世俗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政方针和支持自由与公正的外交方针。没有人觉得国大党是完美的——腐败、裙带关系和威权主义也在其中滋生——但它同时也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现代的、技术进步的、科学领先的国家，至少在它执政前期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把它看作一个懂印度、面对各种极端主义仍然能够带领国家继续前行的政党。我长大的过程中听到的都是，国大党是属于所有人的政党：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穷人还是富人，老人还是年轻人。现在的我会质疑这一点，但当时我深信不疑。

我基本上继承了我父母的偏见，很少对阶层、种姓、地域和宗教发表观点。但和2017年那些20岁的年轻人不同，我有幸在后真相时代前就成长为一名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我阅读书籍和文章不是为了验证我的观点，而是为了挑战我的观点。所以大多数时候都以尴尬收场。

刚开始为这本书做功课和采访的时候，我以为这些印度青年人就是年轻版的自己——不到十年前我还是个焦虑的18岁的孩子呢——但是和2010年代这些18岁的孩子待上几天，我就意识到他们和我太不一样了。

和年轻时的我不同，他们非常坚定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要成就大事的——事实上，这常常是他们认知自己的第一步。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自我认知。一般情况下，不被重视会导致人对自己的想法更谨慎，对自己的预期更没把握，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他们被丢在自己的幻想里，并把这种幻想不断拉伸，直到这些幻想变成一道墙，将他们和漠不关心的世界隔绝了起来。

我在远离印度中心地带的德里思考我们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时，并不知道这些。那时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了解他们（将近6亿人），是了解现代印度的关键。所有人都同意当时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中最艰难的阶段——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而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就是开始成年的这群人。我最关注的选题就是印度年轻人们如何试图理解和适应这个脱轨的世界。我在德里旁听了“个性发展”课程，它教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的乡村青年如何展示自己。^[24]我整晚整晚地在第一家涉足印度市场的相亲网站上，和印度各种偏远地区的男人们——从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到泰米尔纳德邦的萨勒姆——聊天。^[25]我还整天读那些自出版的小说，其中都是通过工作、旅行、恋爱完成自我发现之旅的印度年轻人们指导其他印度年轻人该怎么做。^[26]

我接触的大多数对象都是男性：他们都表现得不自在、焦虑，且好斗。我总是保持着距离，从一些屏障后面试探他们最深的情感——这些屏障是书、网络，还有课堂。我总是害怕一旦走得太近我会发现什么。

但是和他们聊得越多，我就越觉得需要走近些。他们很愿意跟我讲关于自己的一切，有些人在分享人生中那些很私人的细节时告诫我说，这些坐在德里是没法理解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孟买郊区以骗外国人为生的小伙子，他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他说：“我可以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但你也不妨来一次——只要一次——让我带你去我住的这片，我家、我的工作场所看一看。”

2014年中，我开始到小村镇去，想要弄清楚印度年轻人们想要什么，他们想怎么得到它们，以及他们的梦想将会如何改变他们和我们的世界。那一年是能否建立一个新印度这个问题的一次关键考验。“梦想家们”在那一年选出了他们的总理，这个人能理解他们对于就业、进步和荣耀的焦虑与希望。这个国家最难满足的选民终于有机会把他们的理想投射落实。印度的年轻人们把纳伦德拉·莫迪推上了总理之位，现在他们就指望他信守诺言了。^[27]他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能帮助他们完成梦想吗？如果他成功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首先去了我的家乡兰契。在当地，如果你生于一个中产家庭，那你们家认识的所有人不是公务员就是经营家族企业的。大概十年前，印度东部以外还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直到这里突然出了位印度板球队队长。多年来，兰契所有能离开的年轻人都走了，想要有所成就，当个医生、工程师、律师、记者，或者公司职员，就唯有离开。

离开的不只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所有人在快到工作年龄的时候都会这么做，到大城市去做工人或者快递员，由此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在德里或者孟买，随便某一天我遇到的人里，来自比哈尔邦我祖父那个村子里的人可能会多过大城市的本地人。多年来，我问了很多人为何离开家乡。不管他们做什么——在德里南部教瑜伽，还是在班达尔帮侨民买东西——答案都是一样的：人往高处走。

2014年之前，我偶尔回兰契都是为了洒红节^[28]或者排灯节^[29]的家庭聚会。我父母和姐姐现在还住在那里。和所有规模相仿的城市一样——人口几百万且还在增长的“二线城市”——兰契也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印度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了一个有作为的“国际化”城市。每次我回去，城市都有巨大的变化。二线城市的现代化标志在过去几年慢慢出

现：机场、公寓楼、典型的连锁酒店、购物中心。二线城市标志性的混乱也同时出现：堵车、污染、犯罪、污水。我作为当事者见证了城市变化的过程，却希望自己是旁观者。改变城市的面貌总比改变它的观念容易，对于后者我不抱什么希望。

印度小城里最有限的不是它的面积或者人口——兰契的面积和人口比很多主权国家还大还多——而是它的想象力。我回去就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观念。我也去了其他的小村镇，有的地方小到让兰契看起来有如一个巨大、发光的天堂。我当时在找新印度的那些可以让年轻人追求成功的地方，那些你不需要过往经验、学历背景或者重要人脉也可以进入的机会之地。比如，你可以成为“活动策划经理”。在印度的二线城市转了三年之后，我收到的活动策划经理的名片比其他任何职业都多。从公司聚会到政府集会，任何事都是一项“活动”，而没什么活动是不能策划的。所有人都在策划婚礼；当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私人的消遣就会演变为公开的大场面，首当其冲的就是晨间礼拜。

或者你也可以进入“媒体行业”。就我理解，这个媒体行业并不是指记者那种需要你具有优秀的语言能力或者追求真相的能力的工作。唯一吸引我那些年轻朋友去做媒体行业的本能，是对于影响别人观念的渴望。维内·辛格尔不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被此吸引的年轻人。我在兰契认识的第一个年轻人是位26岁的电台主播。他主持的节目《乔希工厂》是当地电台最受欢迎的节目——“四成消息，六成娱乐”。R. J.山奇对于消息的部分更感兴趣。不是消息本身，而是他对消息的见解。“见解，见解是最重要的，”有一次他向我解释他的媒体座右铭，“你需要把一则90度的新闻转成360度的。”

和辛格尔及其团队一样，山奇给他的受众（将近100万听众）提供的不是新闻，而是对新闻所持的情感：骄傲、宽慰、羞耻和愤怒。大学一毕业，山奇就跟着很多朋友一起去了德里，最后在一家大型IT公司的接线中心找了份工作。一年都没做完他就回来了。“如果我没回来，我就是德里一个普通的接线员。”在那次顿悟的八年之后，R. J.山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人，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建立个人品牌上。闲暇时候，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忙着为如何治理国家献计献策。

“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没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政客、官员、警察都算在内。印度的政客对本职工作能力不足，他们懂政治，但却不知道自己分内的事。”

如果可以，他会把国家当作一个公司来管理。

“被选举的代表应该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证明他们自己是否称职，展示他们有什么样的业绩。他们应该有一个打分系统，公众以任期内的表现为他们打分。”

在他的想象中，如果管理国家像管理公司一样，那每个人都可以按能力做事——没有歧视或者特权的可乘之机。

“为什么我们还按照种姓、宗教或者出生地来制定政策？”

他最喜欢的宝莱坞电影讲的就是像他这样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掌控了德里的国会。

“是时候了。”

不管是新印度还是旧印度，人们总可以通过从政追求金钱或者权力。但现在，一个想要成为议员或者立法者的年轻人并不想要这种设定。他不需要一个票仓或者选举基金，他甚至不需要有把5000人聚集到一场政治集会上的能力，他只需要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懂得多。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年轻人告诉我管理国家应该像管理公司一样。当然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梦想着能管理他们自己的公司。

这是新印度梦吗？它看起来确实和过去是分割开的。之前世代代的印度年轻人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赚工资；现在每秒钟都有一名年轻人萌生一种创业的想法。也许他们需要这样的想法——毕竟他们也知道获得一个赚月薪的工作太难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咨询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发现人们不需要有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司了。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地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都用凭空的想法和希望建造着梦想中的公司。

现在的政府很乐于用承诺鼓励这种梦想，让印度听起来像是年轻企业家们的终极目的地。2017年5月，因为担心“就业末日”，印度人民党主席、莫迪的副手阿米特·沙阿说，“这个国家给超过10亿人提供就业岗位是不可能的。”三年前，印度人民党通过承诺就业赢得了政权，如今他们说要给印度人“自我雇佣的机会”。^[30]在这套鼓励建立一个聪明、自食其力的印度的漂亮话背后，是目标受众们还没空想明白的潜台词：“我们管不了你们的梦想了，但是我们很高兴让你们自行解决。”

我身边从来不缺梦想家，他们像鬼片里的僵尸一样从各个角落爬出来。但我只被其中的一些吸引。我选择跟访的对象有些明显的共同点，首先，他们拥有最远大的梦想。每个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三者之一：有钱、有名，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野心似乎已经超越了理性

——和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待上一天之后，我翻看笔记时就会吃惊地发现，像“疯狂”“疯癫”这样的词被我用了多少次。大多数时候，这些词都是他们对自己的形容，或者别人对他们的形容——但有些时候，我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们了。

除了少数几个只想成为大人物的人以外，大部分我跟访过的人想要的都是钱和影响力。但在所有我接触的个例中，我都很难明白或者理解他们是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生出那些梦想的。我很难跨越他们的现实和梦想之间的那条鸿沟；他们则正相反，对此毫不在意。他们除了靠自己，完全没有别人的帮助，这点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痴迷于自己的梦想，我则痴迷于他们为实现梦想付出的诸多努力。

每个人的办法都独树一帜。他们或天真或精明，或诚实或狡猾，或悲观或理想主义——很多时候每样都有一点。但是在专心致志之外，他们身上还有些什么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不断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试图寻找答案，也去看看他们是否会、能否会像他们梦想的那样变得有钱、有名，或者举足轻重。像每个报道艰难追梦日常的记者一样，我对于他们的未来会如何非常好奇。

而且，虽然我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我的直觉告诉我，观察他们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能看出印度未来的一些影子。我好奇什么样的人有机会实现梦想，而什么样的梦想又有机会被实现；我也很好奇那些完全没有机会实现梦想的人会变成什么样。

有些人我跟访了几天，有些几个月，有些长达几年——没有先后顺序。我是通过报道任务认识了一些初期的采访对象，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下了部分他们的故事。我问了每个人我能否进入他们的生活观察一段时间，他们都欣然同意。本书中的一些人用了化名，有的是应他们本人的要求，有的则是为了省去一些麻烦。我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关注他们，即通过社交媒体。在那里，他们建立起精心设计的形象，从而让他们的梦想更容易实现；在那里他们也定期、详尽地分享他们的新鲜事，不管是日常生活、工作，还是其他方面。他们的时间线（Timeline，即Facebook的一个功能）看起来就是他们生活的详细列表，但同时，这一代印度人也只愿意在社交网络上展现完整的自己：个人生活、政治见地，以及事业发展。如果他们想告诉我什么，比如有重要的人生大事要宣布，他们就会在Facebook或者WhatsApp上给我留个言，这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两个重要渠道。更多的时候，他们就通过照片和视频与我交流。

我经常旁观这些个人旅程，偶尔也参与其中。如果他们征询我的建议，我也会说自己的看法。我不总是同意他们的决定，他们也不总是关心我怎么想。然而，我很难不受到他们生活变化的影响。我为他们的成功欢呼，也为他们的失败难过。在他们心中，我一半是旁观者，一半是自己人——这并不是个好立场。比如说，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除了告诉他们对错之外不会帮他们更多——尤其在他们也很少提要求的情况下。“你没看到我现在正需要你的帮助吗？”我明知会让他们失望，还是拒绝帮一个人买火车票逃离绝境，也拒绝帮另一个人付车贷。

我们的关系也无法逃离一个事实，即他们大部分都是男人，而我，是个女人。很多时候，我正好是他们除了家人以外生活中唯一的女性，而且和他们认识的所有女性都不同。我独自住在大城市里，到世界的尽头去和各种人交谈，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我们的互动很少顺利开始——他们对我或是非常尊重，或是居高临下；或是心醉神迷，或是疑心至极；或是展示脆弱，或是乐于照顾。有的时候我们能避免剑拔弩张，他们有他们要做的事，我也有我的。所有我跟访的对象都清楚地知道我在做什么，谁也不会惊讶为什么会被我选中。远在我拿着纸笔到来之前，他们就知道早晚有人会来。

参考书目

V. S. Naipaul (1990),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Penguin Books.

Ed. Peter Ronald DeSouza, Sanjay Kumar and Sandeep Shastri (2013), *Indian Youth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Sage.

Parul Bansal (2012), *Youth in Contemporary India: Image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Springer.

[1] <https://factordaily.com/wittyfeed-viral-content/http://www.forbesindia.com/article/startups/wittyfeed-the-content-churner/48371/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tartups/wittyfeed-surpasses-twitter-and-instagram-becomes-20th-most-visited-website-in-india/articleshow/57292656.cms>

[2] Bread-crumbing，指有挑逗意味但不给出承诺的信息。——译者

[3] 他们的CCO，帕尔文（Parveen）是名字，哥（bhaiyya）是敬称。——编者

[4] <https://www.wittyfeed.com/story/7265/husband-divorced-his-wife-after-looking-closer-at-this-picture>

- [5] 10卢比现约合1元人民币。——编者
- [6] <http://www.badlegaindia.org/>
- [7] <https://www.facebook.com/AmazingThingsInTheWorld/>
- [8] 摸脚礼是印度的一种礼节，身份低的一方对长者或身份高的一方行摸脚礼，表示尊重。——译者
- [9] <http://www.livemint.com/Opinion/2WSy5ZGR9ZO3KLDMGiJq2J/Indias-burgeoning-youth-are-the-worlds-future.html>
- [10]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EN-SWOP14-Report_FINAL-web.pdf
- [11]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South-Central/2012/0116/In-India-the-challenge-of-building-50-000-colleges>
- [12] <http://www.aspiringminds.com/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20Employability%20Report%20-%20Engineers%20Annual%20Report%202016.pdf>
- [13]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06/23/new-world-bank-project-give-impetus-india-skills-agenda-to-provide-over-8mn-youth-with-market-relevant-training>
- [14] <http://www.livemint.com/Opinion/EZnQxosavPuFxrBznAonXM/The-challenge-of-unemployment.html>
- [15]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165465/lang-en/index.htm
- [16]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india-news/andhra-pradesh-kapu-protest-turns-violent-despite-cm-chandrababu-naidus-reservation-assurance/205017/>
- [17]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delhi/Jat-quota-stir-Water-supply-cut-Delhi-may-go-dry-today/articleshow/51073879.cms>
- [18]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patidar-agitation-to-intensify-police-indulging-in-violence-hardik-patel/>
- [19]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the-new-wave-of-caste-wars-maratha-feel-their-social-order-is-under-threat/story-fAhHlz8OEDcOYXZuoAHkLI.html>
- [20]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9945473>
- [21] <https://blogs.wsj.com/briefly/2015/07/22/indias-labor-force/>
- [22] <http://www.lokniti.org/pol-pdf/KeyfindingsfromtheYouthStudy.pdf>
- [23] <http://www.nytimes.com/1990/07/05/business/entrepreneurs-flourish-as-india-makes-reforms.html>
- <http://www.nytimes.com/1990/02/26/business/international-report-pepsi-is-open-for-business-in-india.html>

- [24] <https://india.blogs.nytimes.com/2013/07/05/developing-indias-personality/>
- [25] <http://www.caravanmagazine.in/reportage/casting-net>
- [26] <http://www.openthemagazine.com/article/books/the-new-heroes-of-mba-lit>
- [27]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news/Election-results-2014-Lok-Sabha-Elections-2014/articleshow/35227336.cms>
- [28] Holi, 又称“胡里节”, 是印度传统节日与传统新年, 每年2、3月份间举行。节日期间, 人们互相抛洒用花朵制成的红粉, 投掷水球, 迎接春天的到来。——编者
- [29] Diwali, 又称“万灯节”、印度灯节或屠妖节, 是印度教、锡克教和耆那教“以光明驱走黑暗, 以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 每年10月或11月中举行。——编者
- [30]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ot-possible-to-provide-jobs-to-all-so-we-promote-self-employment-amit-shah/story-z1XMRYTdWOkBseTzjyrMIL.html>

2 英语男

我在兰契待了一年之后才走进“美国学院”的大门。每次离开家我都会经过老普路，而每次开车经过老普路我都会看到这个招牌。这条狭长的马路是这座城市的交通要道，连接起许多重要的地方。此外，它也连起了兰契及周边孩子们的职业目标和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工作与求职者之间的鸿沟，让各种生意在老普路上兴起。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如此。这条鸿沟越大，弥合这条鸿沟的承诺就越有吸引力。我住在兰契的时候，老普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产家庭的避风港，家长把你送到这里上培训班，目标是职业学校的入学考试，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比如医学、工程、管理、银行、行政服务……老普路上的培训中心为所有职业提供入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提供不了的。

但在2001年，你能想到的职业也就那么多。如今，世道不同了。市场上的工作数量也许增长得并不理想，但是每天都会有一种新的工作出现。如果一份工作能够保证不错的薪水和一定的社会地位，那它肯定附带着一个只能通过几个人的准入考试，而老普路上的培训中心就声称能让你通过这样的考试。在这里，中产阶级垄断“体面”工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这场竞赛。

如今这块地方培训中心林立。每一寸地皮都被一间培训机构占据了，它们为各种五花八门的考试提供“保过”服务——MBA/APMT/SSC/PMT/NTSE/NEET/SLEET/MCS/JAC/ BPSC。这条路上有一个三层的购物中心，里面全都是培训机构，都在玻璃上贴着不同的考试简称。这里的天际线就是一个战场，布满了广告牌、明星教师闪光的大头照，以及培训经济中的硬通货——苏尼尔·库马尔（物理，IIT，IIM）、拉凯什·夏尔马（化学，BHU）、尼廷·梅赫拉（微积分，Roorkee，IIM）^[1]。培训老师宣称可以攻破的入学考试越难，他在培训市场上就越值钱。

在这个宇宙中，英语有个单独的入口——如果你不会用英语回答问题，所有的辅导都是枉然。如果你足够幸运，可以选择用某种方言答卷。但在印度，想通过任何面试，都必须用英语告诉西装笔挺的面试官你为什么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每五家提供数学或者逻辑辅导的培训中心，就会对应一家专攻“英语口语”的培训中心，现在简称“口语”。而那些“说口语”的人，就被叫作“口语人”。

至少，英语口语美国学院是这么叫的。这是一家迅速扩张的连锁培训机构，面向的市场是想要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人。机构显然对他们的品牌灵感非常骄傲，从“美国学院”在印度北部——从德里贫民窟到德拉敦的小山顶——的迅速扩张可以看出，这个策略似乎是成功的。“美国学院”光是在兰契就有四家店面，是老普街上最大的培训机构，一个巨大的红箭头直接把主路上的人引到它门前。2015年3月的一天，我也沿着箭头向左转。有五个年轻人在前台排队，一个看起来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小伙子正在给一对父子介绍不同“套餐”的价格。在他身后的墙上，我看到一张剪报上印着他的脸。角落里一张软塌塌的沙发上坐着三个年轻人，正在认真地翻阅宣传册，除了前台和沙发之外，屋子里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屋里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我正好和那个介绍的人打了个照面，他开口问道：“您需要帮助吗？”我就问他现在都有什么课。“基本对话、个性发展、小组讨论、面试”，他一口气说了这一串，口音一听就是练过的。“为什么我应该加入‘美国学院’？”我问他。“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人都可以说英语。”通过这几句简短的英文对话，穆因·汗就知道我不是来这学口语的。他双臂交叉搭在桌上，问我到底是来干吗的。我说我是想来了解一下英语口语如何能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告诉他我想要旁听基本对话的课。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付1800卢比的费用，他就让我到他的班上听课。“那跟我来吧，”汗示意我从房间出来上台阶，“我正在教一批新的学生，你要想观察整个过程，现在时机正好。上这个班的学生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协议中还有一点就是我必须要在课上把嘴闭牢。

十年前，穆因·汗自己也连ABC都不会。他17岁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免费英语课，那时他还在村子里的市集上卖气球，基本就没上过什么学。他全家的收入都靠着两头牛；从他能提得动木桶开始，汗就每天挨家挨户送牛奶。晚上，他在大街上铺一张布卖东西——“柴火、玩具，什么都卖”。汗没有条件把珍贵的白天浪费在教室里，于是他进了一个当地的学校，每年去一次就行——参加期末考试。有几件事他很清楚：三年后他将拿到一个文科的本科学位；但他不知道这能用来干什么。他知道有人可以通过受教育变得有钱有权；他也知道他没有这个选择。穆因·汗既不能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加入新的精英群体，也不能进入行政服务这行成为老派的精英。他爸爸没钱让他像维内·辛格尔那样受教育，他上不了德里的培训中心，连老普路上的都去不了。

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不需要考试就能拿到——做接线员。这是一

种进入白领世界的终极骗术。想要这份工作，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会说英语。不是那种英语文学里的英语，或者官方项目报告里的英语，而是低配版的英语，所谓的英语口语。它对使用者的要求不过就是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进行基本交流。英语口语将成为新印度实操性的语言，混合菜系餐馆、购物中心和机场值机柜台的交流用语。

更重要的是，英语口语使得印度接线中心成为一种现象。1998年，德里的一名企业家在他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挂了两排交叉的纱丽，给每个“电话亭”装上一条电话线和一个耳机，雇了一群18岁的年轻人来接电话，就这样将他的点子付诸实践了：把打给美国公司的电话转接到印度，收费仅为美国本地同样服务的一小部分。正如他转年对记者所说的，总要有有人把1亿印度人合起来的英语能力变现。^[2]

从2000年到2011年，印度获得了超过一半的世界接线中心市场。2005年，印度的接线业务达到顶峰，收益增长了38%。到2006年，穆因·汗在借来的电话上接了一通服务热线，第一次流畅地讲英语时，整个国家都对接线行业充满了好奇。2006年，有超过200万印度人在接线行业工作。第一批接线中心的雇员都是会讲英语的城里大学生，对他们来说做夜班接线员是实现经济独立的一条捷径。所有那些在古鲁葛拉姆^[3]或者班加罗尔的“跨国”公司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取美国名字——哈里什（Harish）就是哈里（Harry），贾纳丹（Janardhan）就是约翰（John）——然后训练他们的口音，直到他们的“r”都软了下来，“v”和“w”能区分开。2000年代后半期，这个行业发展得比大学生加入的速度还快。为了保持发展速度，接线行业需要寻求另一个层次的人力资源——那些不会说英语但能被训练得像会说一样的人。印度就以这种方法试图成为一个国际强国。很快，英语口语的生意就成了印度实现梦想的大本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你就到当地市场去数有多少个英语口语中心的广告。它们和帮你准备考进理工学院或者公务员体系的那些培训机构的路数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不需要任何过往的学历资质，培训的时长由你自己定，还有就是不管你最终学会了多少英语，出来都是赢家。

2004年夏天，“自然创意英语梦”在孔达开了一间培训中心。这个村子距离兰契大概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但却落后了一百年。除非迫不得已，你是不会开车到那去的。终于，有人找到了去那的理由。为了让培训中心运转起来，负责人邀请了全村的年轻人来上一堂免费的课。第二天，来了七个孩子，穆因·汗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说英

文，这简直让他着了魔。那个人在接下来一小时说的所有话，在汗看来都是他在这世界上闻所未闻的知识。那天，他拖着不情愿的步子走出教室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想找几个硬币却发现了金银宝藏的小偷，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成为这样的男人。”

上了一星期免费的课之后，老师邀请这些年轻人交550卢比上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课程。汗没有这笔钱，但他知道他得想办法凑上。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给全村所有有牛的人干活。挤了两个月的牛奶之后，汗数了数手里的钱：350卢比。他把钱放进了口袋，走进培训中心告诉老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这个课，但是他还差200卢比。老师让他第二天就来上课。

新生在开始上课之前要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穆因·汗足足花了11天才开口。他害怕的不是说英语。每当他想从座位上站起来时，让他张不开口的是他的“层次”。他认识班上的每个人；知道他们都来自“有地位”的家庭，而且以前都上过学。他害怕他们能闻到他身上的牛粪味。只有当他的英文和他们处在同一水平了，他才能和他们以同学相称。为此，之后的六个月里，汗基本就没睡过觉。每天晚上他从市场回来之后，就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他的本子，大声诵读英语老师当天在课上说的每一个词。他不但要模仿老师的发音，还要模仿他说话时的语气——是顿了一下，拖长声，还是轻声笑了。老师经常在他的英语里夹带方言，这让他的英语听起来非常自然。在一对一的练习课上，汗就一直想练出这个效果。

全村都睡了之后，整夜地编排、展示对老师的生动模仿，穆因·汗就是这样学习口语的。有一天快下课的时候，他站在教室前面，用英语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大家早上好，对我来说这是庆典般的一天。”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不管模仿得多努力，他能感觉到一个英语句子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听上去很没有生气。他知道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说更多英语——这是他的“新任务”。有一天往家走的时候，他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第二天早上醒来，汗借他爸爸的手机拨打了121，电话供应商的免费客服电话。这是他在课堂外能招之即来的唯一会说英语的人，于是他就不停地和接线员说他学到的所有英文。这成了他每天都做的事。大多数时候，对方听他念叨几句就会挂掉，但偶尔他们会听汗和他们讲“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我的朋友、家人、梦想”。

汗练习得越多，就越觉得不够。很快培训课程就要结束了，如果他把在课上学到的英文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不但损失了几十小时可以

用来赚钱的时间，也失去了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于是在课程结束的几周前，汗召集起他的好朋友们，把他们带到一条流经村子的小河边上。在那里，他和可以信任的六个朋友站成一圈，要求他们在小河的见证下发誓：“未来一个月，我们只说英语。”他们坚持了13天，有几天汗的家人以为他疯了，因为他不和他们任何人讲话。

课程的最后一天以老师的讲话开场。作为教师总结，他告诉这批毕业生，要出去追求他们的梦想。下课前，他叫穆因·汗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五分钟后，他让面前这个战战兢兢的17岁男孩子接替他做新的老师。汗本该觉得攀上了人生巅峰，但那一刻他却直冒冷汗：“我能想到的全都是我要教的学生会是什么反应。我就是那个每天早上给他们送牛奶的人——‘这个送奶工（*gwala*）要教我们英语！’等我站在讲台上他们一定会这么说！”

在印度，英语深深嵌入了阶层划分和社会分工的DNA里：收入、种姓、性别、宗教，或者归属地。它对于社会凝聚力造成的持续威胁让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人士都忧心忡忡。连圣雄甘地都有名言说：“让千百万人学习英语，是对他们的一种奴役。”

还有一次，独立后的印度议会对于以地方语言代替英语作为高等教育语言的建议犹豫不决，甘地对此称：“恶意将外国语言强加于国家的青年将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男孩子必然认为不会英语他们就做不了公务员，而女孩子则被教育英语是婚姻的通行证。”

甘地首次讲话一百年之后，英语成了这个国家全球计划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它仍然被看作一种排他的工具。如今，英语的问题不再是将一种殖民语言强加在一无所知的当地人身上的问题，而是习得资源不均等的问题。“英语对个人或社会有害，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奇坦·巴哈特说。他自封为一场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而引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就是英语习得资源的不平等。巴哈特是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投资银行家，2004年他用英语写了他的第一部校园爱情小说，也是在这一年，穆因·汗的村子里建立了第一个英语口语培训中心。那时候只有一小群人——从小听说读写都用英语的人——才会用英语写书。而且他们用的英语也自成风格——大词、长句、文绉绉、东方主义浓重。巴哈特却把“通俗”（Popular）一词放在英语小说前面，并在之后的十年里写出六部小说，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每本新书都刻意用简单的英语写作，他也收获了数以千计的“新兵”与他共同对抗他口中的“语言中的种姓体系”。巴哈特还给“拥有”英语的印度人起了个名字：英一级（E1）。“这些人有

会说英语的父母，有机会去上英语教学的好学校（一般在大城市），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也让他们接触到英文的报纸、书籍和电影等等。英语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他们的部分思维模式都是英语的，他们是非常抢手的。”凭借着英语能力建立起来的特权层级——英一级控制着一群人，他们就是英二级（E2）：“人数大概是英一级的十倍。他们理论上对英语很熟悉，（但是）如果他们接受英一级的面试，他们看起来就会能力很差，即便他们同样聪明、努力，有创造力。”^[4]

现实情况可能并不像他说的这样简单粗暴。是否“拥有”英语的分界线不一定在巴哈特所说的富有的城市上层人士和乡村中没受过教育的穷人之间。他的理论并没有把印度国内围在英语周边的另外许多高墙考虑在内——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学英语，高种姓比低种姓更容易学英语，印度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容易学英语，实际情况中的英一级和英二级还有很多种。同时，英二级也有很多途径可以推翻英一级的控制，其中一种就是熟练自然地说英语。反抗的中心，就是英语口语培训机构。

在兰契首屈一指的英语口语培训中心里，穆因·汗站在50人的班级面前，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自他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教室并站在黑板前，已过去了十年。这个在讲台上踱步的27岁小伙子，像教科书般展示了冷静是怎样炼成的。他既不高，也不帅，但在讲台下坐着的人眼中，他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特质：酷。落在前额两侧的几缕黑发，让他胡子拉碴的小脸看起来很有趣，他休闲与正式混搭的衣服——带领子的T恤、麻布长裤、尖头黑皮鞋——让他的小身板看起来很时髦。而面对下面的学生时，他的表情是专注的，圆圆的眼睛里写满了严肃。

教室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放着两排木凳，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走道。女生坐在一边，男生坐另一边。屋子很简陋——门口挂着一条米黄色的帘子，屋里有一台空调分机、一块小小的白板，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的讲台。这样的地方给人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也写在学生们的脸上，每个人都在寻找别人的弱点，就好像被扔进拳台的拳击手一样。英语是他们每个人在生活的某个时刻都需要的一份助力——不管是求职面试、升职考核，还是迁入一个大城市，或在婚恋市场上给自己加分——但总有些人比一般人更需要。

我在2015年4月10日，加入了下午3点钟“美国学院”的课程，那时他们已经开学一个月了。汗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又念起了他在每个班都会重复的咒语：语法不重要。“那些写满了规则和限制的厚语法书，朋友

们，只会让我们离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梦想越来越远。”现在是时候反其道而行之了。我们不会按照单词—句子—故事的顺序来学英语，我们直接从故事开始。我们会学如何以主动式和被动式使用一个动词：学习“正在做”和“正在被做”的区别。于是他假想出一个人物，“沙玛吉，一个中年、中产的普通男人”。

在汗的故事里，他自己永远是主角，故事的内容始终是他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偶遇沙玛吉和他老婆。大汗淋漓的沙玛吉推着他车胎被扎破的摩托车去修车铺，后座上还坐着他的胖老婆。“我和他一起找（look for）修车铺，他的车被修理（being looked at）的时候我在旁边陪他。他老婆在外面等着，渐渐失去了耐心。她气喘吁吁地要求他立刻上路。沙玛吉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从来不会惹老婆生气。他回答说：‘亲爱的，摩托车正在被修理（is being repaired）。’看到他怎么描述这个动作吗？不是直接翻译成印地语，印地语会说‘摩托车正在修’。永远不要这么说。必须用‘修理’的被动式，前面加‘被’。”通过向学生们解释动词的主动被动式，汗教给他们的是最古老的英语语法之一。穆因·汗的课上颠覆的不是英语语法本身，而是你必须到学校或者读一本语法书学英语的观念。除了很关键的部分，汗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用印地语讲的。他的课大概就是这样的形式——学生们只给最重要的部分做笔记；课上说的那些故事他们永远都忘不了。但我不久之后就发现，他在课堂上做的远不止讲故事和笑话。等到这门课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学到的不只是如何用英语表达一个想法，而是如何获得一个值得表达的想法。

“真相没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汗正在和学生说这个。这句话还没落地就被学生们记在了笔记本上。这是一堂英语格言课，而汗正非常努力地想要说服学生们把这些当作人生信条。然后汗读起了自己的日记：“美不在脸上，而是在心里。”（他的日记是一部个人规划大纲，从他的大量阅读中提炼而成，“励志、自立自助、哲学、人生、健康、财富、金钱、态度、人类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宗教”。）“有多少男生会因为女孩子的外貌而喜欢上她？”他问道，严肃的目光扫过班里的男生区。“外表不重要吗？”一个年轻男孩子举起手，勇敢地问道。“孩子，外貌并不重要，”汗抓住这个机会说，“美貌是短暂的，会随着时光而消逝。一个人现在可能长得美，但不可能永远都美。但如果她有一颗美丽的心灵，那她永远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引用了以讲话句句是励志鸡汤而出名的前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书上的一句话：“我很丑，但我有一双助人为乐的手。”

我不知道学生们有多把他的课当回事，是不是会觉得他们学到的口头英语不值他们交的学费——2000卢比，每周三节课，一共上三个月——但他们听他讲话时全神贯注的样子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加入这个班不久之后的一天，穆因·汗要求学生们一个个到讲台上用他们已经学到的英语向全班做自我介绍。每个人在讲台上都用同一套脚本介绍：他们的名字、家庭状况（父母做什么，住在哪里，他们的兄弟姐妹在哪上学），以及他们的最终目标（进政府、开公司、MBA）。

有些学生分享的细节非常私密，并不适合告诉陌生人——但是这些不宜分享的事却正是他们来上课的原因。一个女孩子说，她父亲放弃了养家糊口，有一天突然离开了，她的妈妈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一个男孩子说，他家有一笔农户贷款要还。汗耐心地听完所有人的故事，回到讲台上对全班说，他不想知道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只想知道他们计划怎么解决。

在我们挖掘穆因·汗教给我们的每句古谚语的内涵时，我回想起自我介绍的那天。相比求职面试的现成答案，或许学生们更需要的是去参加并拿下这个面试的动力。这也就是汗在课程结束时给他们的教导：“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都带来一次机会。什么意思？问题和困难就像是个洗衣机，同学们，他们会拽着你打转，会打你、洗刷你，但最终等你经历过这一切，你就会变得更干净、更耀眼、更聪明、更闪亮。”

说英语和个人性格的建立有什么关系？和个性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英语口语班可能是大多数印度年轻人唯一被要求表达自我的地方。对于一个主张填鸭式教学的社会，突如其来的自由可能会带来奇特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个性解放。说英语不仅将你和世界上另外5亿说同一语言的人联结起来，也能开阔你的思维和整个世界观。所以穆因·汗对上他课的学生们的期望不是学英语，而是用这种语言去思考——为他们自己着想，跳出固有思维，大胆梦想。

有一天快要下课的时候，汗要求每个人做准备，下堂课要进行辩论。辩题是“自由恋爱vs.包办婚姻”。这带来一个奇怪的情形：班里的每个人应该都要参与辩论，但是就我了解，坐在教室一边的女生们从来没有一个跨过走道和对面的男生讲过话。虽然以英语和现代化为卖点，许多培训中心仍然保持着标准印度课堂男女分坐的传统。我去上课的第一

天，就被要求和一群女孩子一起到女生等候室去。男孩子如果先到就直接进教室；女孩子则要等老师进教室之后才能依次进入。辩论那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女生这一边可以听到大声的祷告，希望不要被第一个叫到；男生那边则是谈笑风生、互相打气。辩论开始时大家都很友善，学生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对他们要回应的人，遵从汗的指导，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先说“我亲爱的朋友”“在我看来”，以及“请允许我”这样的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坐在前排的一名男生：“朋友们，我们聚在这里对哪种婚姻最好发表自己的见解——是自由恋爱好，还是包办婚姻好。每种婚姻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缺点，但我认为自由恋爱比包办婚姻更好。我确实需要家庭的支持，因为我的余生都要和家人一起度过，但我和人生伴侣一起度过的时间是更多的。”

这个观点受到了对面一个女生的猛烈反击：“在我看来，包办婚姻更好。自由恋爱像烛火一样，会燃烧并带来光亮，但这只能维持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父母比我们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他们能为我们选择最合适的伴侣。在奇坦·巴哈特的小说《求爱双城记：我的婚姻故事》里，他对爱情是这么说的：‘男孩爱女孩，女孩也爱男孩，但是在印度女孩应该爱男孩的家人，男孩也应该爱女孩的家人，女孩的家人应该爱男孩的家人，男孩的家人应该爱女孩的家人，因为在印度婚姻不是两个人的，而是两个家庭的。’”

这是一个可以在印度的任何房间都争得热火朝天的话题。很快，教室就陷入了混乱。学生们全然忘了任何时候都不该说印地语，不该在别人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不该高声讲话，不该搞人身攻击。就在汗费力地控制场面时，两排学生站了起来，面朝对方火力全开：女生对女生吼，女生对男生吼，男生对女生吼，男生对男生吼。

“结婚前女孩子说什么东西都不要，结婚之后她们什么都要。”

“你什么意思？恋爱，和她约会，带她到处玩，两个人一起什么都做了，结果你娶了别人。他到底在说什么啊？”

“即便是包办婚姻，也可以花时间互相了解，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你想要互相了解多一点。”

“但这也要在订婚之后，不是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两年之后，等你生了孩子，你家人就会放弃了，所以人们还是应该自由恋爱。”

“你怎么能骗父母呢？他们生了你养了你。”

“在自由恋爱里有自由选择伴侣：他们长什么样，怎么做事，他们有多爱你，有多关心你。”

“但我爱我的家人！”

“亲爱的，我知道你爱你的家人，我也爱我的家人，但是我有勇气说‘妈妈我想和这个男孩子结婚’。”

“人们忘了嫁妆这事。在我的村子里，有很多受过教育的聪明女孩子和离过婚的、有残障的或者没什么文化的男孩子结婚，就是因为她们没钱准备嫁妆。”

“说到嫁妆，受害者可不只是女方。拿我们家为例，我有个弟弟是公务员，而我没工作。提亲的就只会找我弟弟，而不是我。我家还要求女方给不少嫁妆。”

“我亲爱的朋友啊，是因为社会就是这样，这不是女方父母的错。即便他们自己不想，也会有很多人去找他们，告诉他们你弟弟是个多么理想的夫婿。”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爱。美貌会褪去，性格才会永存。陷入爱河不能只看脸。”

“包办婚姻也可以有爱情。”

“印度的观念是，即便和你生活的是一条狗，你也会爱上它。”

“如果你想追求自由恋爱，那就去吧！”

“我会的！”

1991年，“英语口语美国学院”在北方邦密拉特开了第一家培训机构——同年印度向世界打开大门。在那之前几年，维克拉姆·P·兰巴，一个来自密拉特的20岁小伙子，没有通过印度军队一个初级职位的面试。他虽然通过了笔试，体检也合格，但就是因为英语太差被刷下来了。“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兰巴先生意识到和城里教会学校的学生相比，来自印度北部小城镇的学生们多么没有竞争力。当时，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公立学校的孩子们直到六年级才开始接触英语。兰巴先生发现没有人为他们这些人做任何事”，“英语口语美国学院”的CEO阿默德·库马尔·巴拉德瓦杰说。而他口中的维克拉姆·P·兰巴是他的老友，也正是学院的院长。

巴拉德瓦杰在“美国学院”总部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坐落于一满条是培训中心的街道中部，这些培训中心中有三属于“美国学院”。在密拉特这座100万人的城市里，“美国学院”一共开了七家分校。巴拉德瓦杰告诉我，自从25年前第一家培训中心在这里开张，“美国学院”已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当地学生。“2003年，我们在密拉特举办了一场庆典，邀请所有以前的学生来参加，结果来了30万人。”

“美国学院”1991年建校的时候，只有一间教室。兰巴把已经移民美国的软件工程师弟弟拉来帮忙，建立了一个“训练模块”，声称反向解构了美式英语。“那时就流行这一套，所以他们也打出这样的品牌宣传”，巴拉德瓦杰说。品牌的标识是他们第一届的某位学生设计的：星条贯穿“AMERICAN”（美国的）这个单词。生意就这么做起来了。

巴拉德瓦杰1995年到这家公司工作。他来到密拉特的“美国学院”教书时，培训机构已有5个班级，每个班12名学生。“美国学院”开设为期3个月的基本英语交流课程，学费300卢比。“那时候没人相信，你能在3个月里教会一个人说英语，我们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一个连字母都不认识的学生，你怎么教他说英文呢？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告诉陪孩子来上课的家长，我们不教他们语法，只教他们怎么用这门语言。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教他们英语口语，故事里还夹带着当地方言，力求贴近学生。”学校的一切都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包括设立男女分开的等候室。“在把女儿送来读书之前，家长们通常会先过来看看情况，保证我们学校的环境不会带来麻烦。女生可以和男生讲话，但最好还是在教室里，在有老师监督的情况下。”

这种现代与传统交汇的模式似乎是可行的。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学院”在印度北部一共有325个分支机构，大多数是由以前的学生管理的。“他们每年要付20万卢比才能挂我们的名。”巴拉德瓦杰不厌其烦地强调“美国学院”不是一个商业帝国，更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每次我提起利润或者收益，他都很不高兴。他说，他估计印度整个英语产业——“培训中心、图书、接线中心培训、GRE/TOEFL课”——价值大概有“几千亿”卢比，在这个大背景下，他们公司从分支机构那里获得的6.5亿卢比的收入都是小钱。他说，驱动着“美国学院”发展的是，公司在—个一眼望不到头的产业中抢得了先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印度人精通英语。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了两个月课后，穆因·汗向学生们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英

英语口语。他们学习了“would”的几种用法——“will的过去式（他说了他会去 [He said he would go] ）、表达愿望（我想要和你说句话 [I would like to have a word with you] ）、礼貌的请求（你可以帮我做件事吗？ [Would you be able to do this for me?] ）、希望（我以为你会来的 [I thought you would come] ）”；他们还学习了你可以“得到”（get）某物，以及“让”（get）某人做某事；一组过去式不是加“-ed”的常用动词（比如“leave”“shoot”）；以及你“必须”（must，此处“不表达可能性，而是和‘have to’用法相同”）在与人见面时表现出“十分荣幸”（great pleasure），并且“从心底里”（from the core of your heart）感谢他们。

我惊讶于他竟能将英语口语包装成一捆蓄势待发的箭。上了几周他的课，我还是没能抓住汗教学方法背后的逻辑——这一秒他还在讲及物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下一秒又列出了握手之前要说的五个要点。但他一直坚持这种方法，坚信等到这50名学生离开“美国学院”的时候，他们可以应付大多数需要讲英语的场景了。

这种自信不是穆因·汗独有的，而是驱动英语口语这个车轮的信念之轴。不然谁能理解英语口语书上那些日常用句的归类呢？据《简单完美的印地语—英语口语课程》所讲，一共有五种句子：惊叹（你好！好的！哦，我的天！），命令（看这儿；走开；停车；别迟到；别管闲事），What即什么（今天演什么电影？你做什么工作？晚饭菜单是什么？），How即怎样（你还好吗？你太好了！你多大了？），以及否定（别抽烟；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没迟到）。日常英语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些为读者们可能遇到的情景准备的句子——我已经吃过早饭了；学校明天也关门；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今天是节假日吗；你们提供什么食物；我们家孩子没有你们家的淘气。

这方法对不对放一边，反正它是有效的。否则这些书也不会被码在商店一角或是放在大卡车上叫卖；像“美国学院”这样的公司也不可能从1991年只有密拉特一家培训中心，开到2015年全国有550家。这25年里，“美国学院”的毕业生一定有成千上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全家第一个会说英语的。同时期对于英语口语产业扩张的粗略估计也显示，像这样会讲英语的第一代人数以千万计。

数量上的巨大增长意味着：当“美国学院”班上的50名学生走入社会，他们很可能会碰上其他从书本上或者在培训中心学习了英语口语的人。他们跟同事、服务生、客服经理所说的这种英语将决定这个国家未

来的语言，以及世界范围内英语的未来。在下一个十年里，印度有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英语使用人口（超过美国），他们所说的英语将成为未来的英语。

一名19岁的年轻人在WittyFeed上做内容的时候，她不担心语法是否正确，只关心够不够劲爆，能不能说到点子上。一个活动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drive home a fact），也可以“为我们解释事情清楚”（drive us home to the fact）。只要WittyFeed的读者会点开看，谁关心语法对不对呢？

在穆因·汗的教科书里，说英语只有一条规则：大胆说，像规则是你定的一样。这是他每次课程结束时候都会说的座右铭，也暗暗反驳了据说是甘地提出的“说英语是被奴役”的说法。他告诉学生们，重要的不是会用英语说多少话，而是怎么说这些话。

在他的村子里教了三年英语口语之后，汗到兰契一家大型IT公司的接线中心面试。他们并不欣赏他的英语——“母语的影响太明显了”。但时至今日，汗很高兴那天面试没能如他所愿。被拒之后几个月，一个朋友推荐他应聘“美国学院”在兰契第一家分校的教师职位。他进行了电话面试。“他们让我列出我可以用英语说的话题，我列了100条——我的妈妈、我的家人、我的童年、我的生活、我的梦想……”

工作在手，汗带着一套西装、一条领带和一双搭配正装的皮鞋来到兰契，整套行头都是从村里一个开裁缝店的朋友那儿借的。“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要在‘美国学院’教书的人的样子，”汗津津有味地回想起自己的外形大改造，当时他还留了法式小胡子，“人们脑海中对于说英语的人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如果我不符合这个形象，他们就很难接受我是教英语的。我的邻居一直不相信我是做这个的，直到有一天早上他看到我穿了上班的行头。”

汗已经在“美国学院”待了七年：如今他已经从讲师晋升成“教学主任”。他的第一堂课从早上7点开始，最后一堂在晚上11点结束。我表示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也知道，”汗说，“但这给我带来快乐。现在我的学生有的在美国，有的在英国，有的在沙特阿拉伯，有的在IIT（印度理工学院）、IIM（印度管理学院），还有20个是PO（银行的实习职员）。是这些激励我继续工作的。”

汗告诉我说，他知道他的英语口语会让人对他另眼相看，并利用这一点“展示自己的地位。不管我在印度哪里，我心里都觉得说英语给了我

面对一切的勇气。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在机场，还是在银行，我总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我在德里的时候觉得很自信，我觉得高人一等，因为90%的印度人都想要会说英语”。这也意味着他再不能回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了。会说英语成了他的超能力——“不管我去哪儿，人们见到我都很激动。当我回到我的村子里，人们就会到我家来听我说英语，‘Kuch bol ke sunao na’（说几句英语）。被当作像歌星或者舞者一样的人挺尴尬的，但我还是会随便说几句满足他们。”

我们之间的大多数对话发生在接待处后面的一个预制房里，他把这当作办公室用。每节课之间他基本没有休息时间，但他倒是不介意我课间进来打扰他。汗平常没时间交朋友，而且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跟我聊天的，因为我可以和他用英语聊他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英语更让他感兴趣。我们俩还是有共同点的：我们的职业生涯都是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会用英语聊英语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汗对于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不太关心。我给他发过我写的文章的链接，但他只读过一篇关于奇坦·巴哈特小说的书评。我在文章里提了一些意见，我认为巴哈特对于那些他反复描绘的主人公——雄心壮志的印度年轻人——越来越不了解了。但汗从来也没有对此观点发表他的见解。

他说话的时候总会环顾四周，目之所及堆满了影响他人生的书籍——《古兰经》、Rapidex英语短语、励志演说、肢体语言、自我完善。对学生来说，汗身上所展现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智慧、修养，以及人能战胜自身最大恐惧的那种绝对信念。十年前，汗想变成和他的英语老师一模一样的人；如今，他的一言一行又被成百上千的学生当作实现梦想的钥匙，观察着，模仿着。

“当你意识到你的能力是什么，你就无往不胜了。我已经意识到我的能力是什么”，阿努普·库马尔（Anoop Kumar）说。他是这个班里最勤奋的学生，来得最早，每天都坐在前排的同一个座位上，也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自从五个月前走进穆因·汗的教室，他就开始执行一个任务：“我可以扫描出别人身上的天分，然后把它转移到自己身上，最近我在扫描穆因先生。我想要成为他。”我花了很多天才找到和他独处的机会。根据男女交往原则，汗建议我不要在课后找他，不然可能会让他“有想法”。早到然后在教室里等他也不现实，因为我得和女孩子们一起等到上课时间才能进教室。最终，在我的多次请求下，汗同意亲自帮我给库

马尔带个话。第二天，我来到女生等候室，看到库马尔一个人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他说，汗带的话让他搞不清状况，但是能被挑选出来他还是很高兴的。“他告诉我你想跟我聊聊我自己，我很激动。昨天晚上我给好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我兴奋得睡不着。”库马尔像说悄悄话一样告诉我。

这不是我第一次和学生私下聊天了。我之前还和班上的几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过——两个坐在后排的女生把我抓到她们摩托车的后座上，带我到一个黑漆漆的酒吧里一醉方休。在喝醉之前，我问她们想通过在“美国学院”的三个月课程得到什么。其中一个女孩子要通过一个银行工作的面试，这样就可以把包办婚姻的时间再推迟几年；另一个想要在她的IT公司里升职，这样就可以继续独自生活在班加罗尔了。英语口语能带给她们的，是逃离。

对库马尔来说，这是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机会。这是他第二次跟着穆因·汗上“基本交流”的课了。每一次要花1800卢比，耗时3个月。“我还要再上一轮，虽然还得再花1800卢比，因为我还没有完成对穆因先生天分的扫描。”库马尔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惯常的坚定神情。阿努普·库马尔就是因为听说了穆因·汗才来“美国学院”上课的。“有人告诉我他和我们有共同语言，而且会教我们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对我来说，如果和一个不理解我出身的老师学习会很困难。”库马尔三年前和两个兄弟一起从恰尔肯德邦一个村子来到兰契，想要有所成就。“我们都是来学习的。两个上了大学，一个上了中学。教育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父亲是个农民，母亲给别人种地。”他家属于Koeri种姓^[5]，被印度政府划归为“最落后”的一种；他的父母把三兄弟送到兰契，希望他们不要再像上一代那样一辈子种地。

阿努普·库马尔能待在兰契的时间有限，他把每分每秒都规划好了。“我做所有事情都有时间规划。现在我的目标是在8月10日之前流利地说英语，就在我生日前一天。”库马尔说。他会在每句话后停一会儿，确保我能听懂。“我已经准备再上一次一样的课了，因为我还不能自然地同像你和穆因老师这样的人说英语。”等他完成这个目标，他就会向新目标迈进。“完成学业之后，我就要找工作了。为我的家人考虑，我要找一个能付2万卢比的公司，并且继续为我的长期目标努力，最终找到一个政府工作。”说这话的时间是2015年4月20日，也就是说库马尔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练习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会尽一切努力达成这个目标，他的一天就从听英语新闻广播开始。“别人听新闻是为了了解

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是。你会发现新闻主播开场总是说，‘晚上好，我是安基特·慕克帕德亚，为您带来新闻。’我那天在课上做自我介绍时就是这么说的——‘晚上好，我是阿努普·库马尔，为您带来关于我的信息。’”

对库马尔而言，我们身边的世界就是个英语口语的大课堂。而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留心听：“班上有个女孩回答所有问题最后都带一句‘感谢您认真听我讲话’。现在我说完话也会带上这句了。”库马尔每天都带着一张白纸到处走，记下所有他学到的新东西，或者让他好奇的东西。我们讲话的这天，这张纸已经记满了。左上角写着“should”（应该）：“在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使用‘should’。我在努力用它造句。”

就像17岁时的穆因·汗一样，库马尔只把那些可以和他练英语的人当作真朋友。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愿意整晚和他讲话的人——那是8个小时不间断的英语口语练习。“今天早上，我一个在邮局工作的朋友问了我这么个问题——‘忽视’（ignore）的反义词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我可以用两三个词回答他，但不知道反义词是什么。我查了词典，正确答案是‘注意’（notice）。英语可真不简单。”

我第一次注意到阿努普·库马尔，是他在班上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库马尔有一次说，等他学完英语口语，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后，他就想去“激励别人”。我们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我开始理解英语口语对于印度巨大的“励志”市场的魅力。如果你会说英语，别人就会听你说话。如果别人愿意听你说话，你就能让他们接受你的建议，不管是如何学英语、如何交朋友，还是如何减肥。

英语就像魔法一样。“科学开发”的英语训练机制就是这样进行市场宣传的：英语魔法、英语咒语、英语魔法咒语。那些在晚间电视购物节目里兜售各种稀奇古怪玩意儿的推销员，都像是阿努普·库马尔的翻版。

我是个推销员。我的顾客之前从来不听我讲话，我的老板总是骂我。

以前从来没有女孩愿意跟我讲话，因为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我老公以前从来不带我去他的工作聚会，因为我让他感到丢脸。

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一剂名为英语口语的灵药。现在推销员能卖出公司的宽带了；大学生被他的梦中情人邀请去喝咖啡了；新媳妇则成了老公的骄傲。总而言之，只要你学会说英语，你既可以用它来改

善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靠教别人如何改善生活为生。

人们甚至会花钱听你说话。

励志演说是23岁的桑托什·德夫·塔库尔的生计。我是从兰契一位在英文报纸工作的朋友那儿听说他的。我朋友的工作就是寻找城市里发生的任何放之四海皆“酷”的事物——线上约会、文身馆、骑摩托车的女人——然后写一篇夸张的文章。从水烟吧到下一场大型时装秀的面试，他总是在很酷的地方报道很酷的事情，他也结交任何他觉得有用的朋友。所以他建议我去看看桑托什·德夫·塔库尔的Facebook主页时，我立刻照做了。主页上满是励志界大佬说过的格言：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中国谚语

成就的唯一途径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史蒂夫·乔布斯

主页上还有桑托什·德夫·塔库尔本人的海报，其他站在高处对着层层波浪或者站在山峦之巅，配上他自己的原创格言（至少他的追随者认为是他的原创），证明了Photoshop的法力无边。

永远不要让别人阻碍你的前程。把逆境转化成优势。

塑造你人生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主观决定。

登山虽然困难，但美景一定在最高处。

他在海报、视频、偶尔的Facebook更新中所表达的并不限于成功的技巧，也有很多对人生的深思。主题从金钱与财富的不同（“心静如水的人才富有”）到追求幸福（“我们在哪里寻找幸福——工作、升职，一些远大而我们还没拥有的东西”），很丰富。我第一次和塔库尔见面时，他刚满24岁。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就好像是我编的一样。他的故事和穆因·汗在励志课上讲的个人历程、试炼和成功简直一模一样。

贫困：塔库尔的父亲为兰契公共工程部开压路机，他们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办公室里，用石棉打隔断分区。

决心：塔库尔14岁时卖掉了祖母的金吊坠，开了一家物理和数学培训中心，开始攒钱。

逃离：对穆因·汗来说，英语口语教室是逃离的窗口。对塔库尔来

说，是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新地方。他高中毕业时已经攒了足够的钱去邻近的奥里萨邦的布巴内什瓦尔读一个私立工程学院。他离开了，决心永不回头。

学习：接下来的四年里，桑托什·德夫·塔库尔自学了所有在其身处的世界取得成功需要的技能——英语口语、销售、市场营销、企业家准则。他开始读励志书籍，一口气读了几百本“吉姆·罗恩、托尼·罗宾斯、尼古拉斯·詹姆斯”。

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希夫·凯拉的《你能赢》。这本书在1998年首次将励志自助这个门类带到印度英语中。塔库尔那时刚刚加入一家网络营销公司，为了能在新城市维持生计。“在印度，每个加入网络营销公司的新人都会拿到这本书。”我问他为什么一定是这本，他说：“因为希夫·凯拉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多外国的励志作家并不了解，他们觉得会说英语、有自信是理所当然的。但凯拉从这些事开始讲起，他的书里有三章都是关于建立自信的。”

也许正因如此，这本书才被翻译成了各种印度语言，并大卖250万册。^[6]也正是通过《你能赢》，塔库尔学到了最基础的英文。“那时候我的重点不在语法上。”他只希望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年轻的男生们在他的大学宿舍里喝着廉价的朗姆酒谈论印度政治时——具体来说，就是国大党如何毁了他们的国家，让他们这样的人毫无未来——谈话总是被那些能用英语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主导。“我也开始读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印巴分治、甘地、巴基斯坦的书。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站起来用英语说出一些事实，比如独立前后印度的GDP。”他的这些“事实”，和那个对国家出离愤怒的工程学院学生维内·辛格尔创建的网站上引用的“事实”没什么分别。和那些剑指火星的骄傲的爱国者一样，这时的塔库尔也意识到，他应该成就一番大事。又过了一年，他拿到了中级软件工程师资格，也获得了加入IT公司的机会，人生一帆风顺。但是过度的励志摄入搅乱了他的头脑。“谁想做个凡人啊。”

塔库尔告诉我，他爸爸曾经也很叛逆。14岁的时候，老塔库尔被退学了，于是就离开了家。塔库尔的祖父在比哈尔乡下拥有一座荔枝园，也觉得儿子没必要对一个普通的学校老师唯命是从。所以，当年只有14岁的老塔库尔跳上了荔枝卡车，到兰契找了学校入学。他放弃的是一个做庄园主的稳妥未来；而他选择的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新生活——受教育、做公务员、拿退休金。

然而，对他儿子来说，这一切不能更无聊了。如果他拿着平庸的工

程师文凭，在一家平庸的公司找份平庸的工作，他就会成为饱含着印度中产欲望的平庸之海中的一颗水滴。于是，他听从了励志大师的建议，坐下来写了两列平行的清单：他擅长的事和他想做的事。“以前我和我培训中心里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来告诉我，我跟他们说话会让他们感觉很好，我对他们有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我擅长也想要做的事。”塔库尔就这样找到了他的使命。

凭借着他在布巴内什瓦尔的培训中心建立起来的能说会道的名声，他开始向工程学院提供服务。他提出一个想法：他来给学生们进行人生和职业指导，学校付5000卢比。光是布巴内什瓦尔就有40所私立工程学院，全印度大概有几万所。他们中大多数的入学费从几百到几千卢比不等——对于几百万没能“撬开”位于金字塔顶的印度理工学院大门的学生们而言，计算机工程学位是唯一一个帮他们实现由IT行业撑起的印度梦的机会，这些工程学院的商业模式就依赖于学生们的这个梦想。

塔库尔所能提供的，是让这个模式变得更容易。“我告诉学生们，他们用不着做打工仔。我向他们介绍线上商业、创业公司，以及不做循规蹈矩的事情的前景。”有时他会和他们分享自己从一个从未上过学的10岁小男孩那获得的信条：“我走进一家槟榔店，找那个看起来管事的小孩买烟。他之前在外面扫地，听了我的要求后还在继续扫。我在那站了五分钟，等得不耐烦准备离开。走之前我问他，‘你本可以把那根烟卖给我的，不介意少赚5卢比吗？’他回答他说不在意这些小钱。他把手划向空中说，‘你看，满世界都是钱，你只要知道怎么接住它。’这是我从别人那得到的最好的忠告。”

我第一次见到塔库尔的时候，他刚毕业一年。他穿梭在各个小镇的工程学院，教那些还没醒悟的学生们如何接住飘在空中的钱。他通过这些在Facebook上收获了一众粉丝。那些制作精良的海报也是留住这些粉丝的办法之一。

开始再早也不算早，同样地，重新开始再晚也不算晚。

如果你一直等待最好的时机，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从2014到2016年，他一直在WhatsApp上跟我更新他的动态，主要就是他在从比哈尔邦到哈里亚纳邦的某不知名工程或者管理学院给学生讲演的照片。2016年末，我终于在德里见到了他。他到城里来领奖——“年度新锐励志演说家”——颁奖者是一家教育杂志。

第二天我在一家叫“咖啡日”的咖啡馆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荣誉的影响。过去两年里，他胖了不少，这是成功的标志。现在他是布巴内什瓦尔一间注册公司的老总了，手下有70名员工。有人做内容，有人给学校、学院和小公司打电话推广服务，也有人代表他去演讲。现在他去学校演讲的费用是25 000卢比，去公司65 000卢比。他告诉我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人生，发展他自己的思想。“过去我是从别人的书和视频里获取我喜欢的东西，现在我有自己独创的想法可以分享了。我现在上台，就带一张白纸。讲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会把这张纸拿出来给大家看，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我问他是否还在练习英语口语。他能流利地说英语，但时不时会出错。他说如果他再打磨自己的英语，就会失去和目标受众的联系。“每当我结束演讲，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很喜欢我能用和他们一样的口音，说和他们一样的语言。”显然，奇坦·巴哈特的这一代读者已经到达了他的起点，并且正在用他的成功法则抓住同一个市场。

塔库尔最近成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青年团的邦内协调人，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他和维内·辛格尔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纳伦德拉·莫迪吸引。他说，总理和他一样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你读过他的传记没有？他是九十年代初唯一一个用笔记本电脑的政治家。他了解青年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塔库尔说他是帮助印度人民党赢得年轻人的关键人物。作为印度人民党2014年全国大选的“校园大使”，他鼓励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注册成为印度人民党成员。做到这一点，对他而言并不困难。在他看来，左右政治选举和网络营销的原则是一样的。他说，在这两个领域里，想卖出一件产品，靠的不是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情绪，而是销售者的情绪。作为要将纳伦德拉·莫迪的思想卖给年轻人的销售者，桑托什·德夫·塔库尔对于这个产品很有热情。和我在小城镇见到的其他创业者一样，塔库尔也不想搬到大城市去——那里竞争者太多，交通也太拥挤了。“我不喜欢等”，他指着在咖啡馆等待结账的队伍说。在布巴内什瓦尔，他已经是个不需要排队做任何事情的大人物了。

他在布巴内什瓦尔有车有房，但他在兰契的家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不理解我在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能赚多少钱，但那也没用。我在布巴内什瓦尔住了八年，他们一次都没来过。”塔库尔对于家庭的看法和所有的印度男人一样。他想赚很多钱，为的是给家人优渥的生活条件；他想要变得成功，为的是让家人以他为傲。但和维内·辛格

尔不同，塔库尔还未能说服家人抛弃原来的生活，加入他创造的新生活。想要让自己在家人眼里成为大人物，他需要在自己的老家变成大人物。他对于成功标准变了，但他的家人没有。自从他搬到这，他们还没有离开过兰契，甚至他去德里领奖的那晚他们也不在。“观众席中没有一个人在我成名之前就认识我。”塔库尔决心从现在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明年他将在老家举办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5000人”），再找一个兰契的大人物给他颁发奖杯。

我再一次见到穆因·汗的时候，他刚刚在网上订了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作者是爱穿高领毛衣的新时代巴西人保罗·科埃略。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拉丁美洲的牧羊少年到金字塔去，与神明交谈并发现了“世界之语”的曲折故事。在印度，这是一本常年畅销的书，每个小镇的每条街上都有卖；如今这本书仍然在全球最大的励志书市场上，启发着成千上万人去追求梦想。即便是维内·辛格尔这样不怎么读书的人都读过这本书，至少从他墙上的许愿精灵来看是这样。现在穆因·汗计划强迫世界让他梦想成真。在我上完“美国学院”课程的五个月之后，穆因·汗离开了这个口语帝国，开设了他自己的英语口语和励志指导中心。他给学校起名叫“Lingo”（行话）。他所拥有的资源不及“美国学院”的一毫，但他拥有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技能：“我可以让任何人开口说英语。”汗现在和前总统卡拉姆一样，说起话来全都是励志格言。

赚利润比赚工资好。

如果上帝能够喂饱街上的一条流浪狗，那他怎能看着我活活饿死？

汗一直处于一种打了鸡血的状态。我问他过得怎么样时——那是我们时隔一年多再次见面——他说“好得不得了”。不是还行，不是挺好，连很好都不够。他的新办公室确实是个进步——更大、更明亮、装修得更好，连他的教室都没有原来那么令人压抑了。他还是从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快9点，教六个班总共近300名学生。他向我展示了Lingo的课程，这反映了他精力充沛的头脑。学生们不再为单词的用法记笔记了，他们被要求参与各种有着奇怪名称的活动：电椅、记者会、速必达、演习，以及面谈。入学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选择英语口语以外的一系列附加课程：站姿、坐姿、自我信念、自我形象和开发内在能力。他说，他最近读了很多书，部分课程来源于19世纪印度教思想家辨

喜（也叫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对于“个性塑造和个人培养”的教育。

英语口语中心最主要的承诺就是将失意者变为人生赢家。在Lingo，穆因·汗想要把他的学生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成立Lingo之前一个月，他创建了一个名为“穆因——人生导师”的新Facebook主页，想要验证他作为职业励志演说家的吸引力。500人——大多为他之前的学生——立刻点赞。一年以来，汗每天都在主页上传一条励志的想法。

恐惧是最大的敌人，在它杀死你之前把它杀死。

你的人生能走多远，要看你的眼光有多长远。

不冒险是人生最大的危险。

主页上还有他在兰契版国际演讲会——一个特许经营的演讲爱好者俱乐部平台——上演讲的视频。他花15英镑买了半年的会员资格。俱乐部的12名会员每周日在一间医学院的教室见面，每人选择一个话题进行7分半钟的演讲。他在俱乐部里最初进行的演讲之一题为“是的，我们可以”；他的追随者们最喜欢的一场演讲叫“不要告诉你的梦想困难有多大，告诉你的困难梦想有多大”。

在评论中，人们写下他们如何受到这些视频的启发，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像桑托什·塔库尔的目标受众一样，人生导师穆因的追随者也对他英语的方式有共鸣：简单的词汇和浓重的口音。而穆因·汗也向来能理解他的受众，如他所说：

鞋哪里磨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

再过一年，汗准备开始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付费励志演说家。未来五年里，他想要周游世界传播自己的智慧。但在他关于未来的所有计划中，他从未想过要搬到兰契以外的任何地方去。“我的市场就在这，我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

我不想竞争（compete）——我只想成功（complete）。

汗说他不离开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喜欢大城市那种匆匆忙忙的气氛，而且，“如果所有人都去了纽约和伦敦，那谁为印度工作呢？”和“小镇青年”维内·辛格尔一样，塔库尔和汗从未将成功与他们为此所走过的漫长旅程分割开来。每当塔库尔回到兰契老家的时候，他都

会去看一所破旧的房子，他贫困的童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我一个人在屋子外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它能让我感受到我走了多远。”他还要求父亲留下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最初，他一直是骑着这辆车去送报纸的。

我们在穆因·汗的“美国学院”课堂上学到的一点是，没什么比忘记自己来自哪里更大的罪过。他在总结“曾经”（used to）这个词的用法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故事说的是他老家的一个朋友成功在孟买站稳了脚跟，然后就看不起老家的平淡生活了。“‘别总是坐井观天了，让我带你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吧’（*Aao kabhi aao, dekho duniya, zindagi kya hai, kuen se baahar aao*），每次回来他都这么告诉我。终于有一次，我到孟买去出差，决定借机接受他的邀请。我钱包里有他的地址，所以我就到孟买去找他。”汗对着下面聚精会神的观众们点点头，说他循着这个地址来到了贫民窟。他的描述十分生动，并富有细节——路太窄了，对面的人走过来得把你举起来，放在他身后才能过去；他脚下的路从“颠簸”到“泥泞”再到“污秽不堪”，说的时候还不忘顺带讲这三个词的区别；房子小到孩子们被包在床单里，用钉子挂在角落里。最终，汗找到了他的朋友：“我看着他为了在孟买这样的城市活下来要做出的妥协，问他说，‘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他回答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习惯（become used to）这样的生活了。’”汗的故事讲完了，他对于学生们一脸惊愕十分满意。“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坐在前排的一个女生问。“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的成分。”汗狡黠一笑。

一个印度人可能同时热爱英语——一门外国语言，和他们的祖国吗？这可能是国际化的印度人面对的最棘手的困境。你需要说英语才能成功；然而一旦熬过了学英文的阶段，你就不只想要成功，还想要有动力——但就像穆因·汗所说，如果你不能为了比自己的未来更大的目标去奋斗，那励志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想要激励一个人，归根到底是要激励他为了国家而奋斗。但如果你仍然被前统治者的语言所奴役，又谈何对国家的忠诚呢？

在德里一个名为“如果变成有钱人”的励志研讨会上，我所听到的最偏激的批评就是英国人给印度人的血液里注入了慢性毒药。32岁的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眼里冒血，说出了18世纪印度人的愤怒：“你有什么资格做我们的主人？你凭什么到我的国家来？”坐在这个位于德里中心租用的会议室里的听众大约有50人，都很年轻；其中只有两位女性。和我一

样，大家都是在早报上看到这个活动宣传的。乔杜里看起来很有活力：个子很高，体格结实，穿戴也很讲究。他黑黝黝的脸上总是带着愤怒，声音如雷。台下的听众还沉浸在一片惊叹之中，他又继续给他们讲印度光荣的历史、勇武的君王——普拉塔普大君、希瓦吉、旃陀罗笈多·孔雀，以及富庶的王朝。他提醒观众他们的国家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名叫“古鲁库”^[7]。这些学院在医学、管理、科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启蒙，让印度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他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只要上网查查印度的历史就知道了，“去Google一下”。

英国人是怎么毁了这一切的呢？“他们解散了古鲁库，建立起了学校和大学。他们给我们课本，让我们说英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发明了一种考试无尽、扣分不断的教育模式，这样即便他们被迫离开，印度仍然在其统治之下，但统治者却是印度人自己。”作为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乔杜里生动地描绘了英国议会里的场景——殖民教育体系的设计师麦考利勋爵，幸灾乐祸地搓着手，把计谋告诉跟他一样心术不正的同事。

他继续说，正因如此，英国人离开印度七十年之后，印度人还是被自己人奴役着——先是做学生们时被分数分成三六九等，然后是做雇员们时靠工资和奖金被评估。乔杜里扫视了一圈整个房间，然后宣布所有的听众都是奴隶。这些人还有救吗？“你们得学会掌控自己的未来。别指望这世界给你一分一毫。”他告诉他们，想要白手起家不需要学历、经验、资金，不需要任何资本。“别听他们说要先有钱才能赚钱的鬼话。”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梦想。“不是那种睡觉时进入你脑海的幻梦，而是那种让你睡不着觉的梦想。现今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梦想往往演变成了欲望。欲望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火花的梦想，你的梦想里得有火花。”

没有哪个梦想比成为有钱人更值得追求，他说。而想达成这个梦想只有一个办法：做生意。“做好一份赚工资的工作是个微不足道的目标。那天我看新闻里说，87%的IIT学生想要进公司工作。这是我们的悲哀。”当然了，他说，他们做错的第一件事是上了工程学院。“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去微软工作。微软的老板是比尔·盖茨，他上大学了吗？亨利·福特上大学了吗？”他告诉屋里的听众，所有赚了大钱的人都有远大的梦想。“如果你想达到你从未达到过的成就，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做从未做过的事情”（*Agar woh paana chahte ho jo aaj tak nahin paaya toh woh karna padega jo aaj tak nahin kiya*），乔杜里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怒火中

烧。只有这样，印度才能成为一个“富一代”的国家，他说。

如果你无法靠自己到达目的地，你总可以让整个宇宙来帮助你，乔杜里又重复起了保罗·科埃略的允诺。“我是怎么做到现在这么成功的？就是相信自己。每当有人质疑我能力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继续努力吧，朋友，你马上就会创造历史。’”

在演讲的最后，乔杜里告诉我们说，想赚大钱也得舍得花钱。他的九日课程售价55 000卢比，授课内容包含“有钱人是怎么赚钱的”和“阻碍你赚钱的是什么”等话题。我不确定他的这些建议能否改变屋子里50个人的人生，但即便只改变了5个人的命运，乔杜里都会是成功的。他计划在未来的十年里获得足够的影响力成为印度总统，这样他就能为国家服务了。除了教人们赚钱，他还在德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上一套完全不同的课，教人们“如何在竞选中获胜”；课程短则几周，长则一年，学费从15 000卢比到10万卢比不等。从2006年乔杜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做广告开始，他的学校已经培养出八届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了。

作为北方邦阿姆罗赫一名中层公务员的儿子，乔杜里14岁的时候一心要长大成为印度总统。他告诉我说，从那时起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如果我能训练足够多的人进入政界，那当我进入政界的时候就会有足够多的自己人。如果我能让足够多的人赚钱，那不管我去哪竞选都不会缺竞选资金。”现在是在印度追求远大梦想的最佳时机，他说。他告诉他的观众们，从小时候开始，他每天晚上都会去总统府（“开始骑自行车，后来骑摩托车，现在是驾驶豪华汽车”），站在那座庄严的大楼外望着它。在入主总统府之前，乔杜里会继续向大学生和中年职员们滔滔不绝地讲以印度方式思考的重要性。

穆因·汗那个真人大小的人形立牌正在大学路上呼吁兰契的年轻人通过英语改变命运，而他本人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我讲麦考利勋爵对印度造成的损害。“在印度，我们仍然很崇尚英语教学的中学和大学。如果你不会英语，任何机会都没你的份儿。”他认为，问题不只是英语这门语言在我们眼中的优越性，而是整个英语世界的优越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印度的一切都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们觉得美国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我们买安利的产品，因为它是美式的。”他不也是靠着卖美式英语口语赚钱的吗？但我没有点破这一点。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如果不是被逼到这儿，他是不会做这份工作的。他知道自己既是人生赢家也是失败者；按照这个逻辑，印度也是如此。汗会说，英语是镇压我们的语言，用来镇压我们的，先是美国人，现在是我们自己。

和沙赫纳瓦兹·乔杜里不同，汗满足于能够嘴上抱怨抱怨现状。他可能比维内·辛格尔和桑托什·德夫·塔库尔更白手起家，但是穆因·汗没有一点进入政坛的想法。他最多是给当地的政客当家教，他们暗中想要通过学习英语进入国家级的政治圈（这也包含在Lingo提供的特殊课程里）。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继续扩大受众群。

我不想要成功，我想要变得举足轻重。

根据励志课程所讲，想要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一步就要自觉举足轻重。汗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从他谈自己奋斗史时的样子就显露无遗。有一次我们聊到他在自己老家上第一堂课的场景，那堂课讲的是祈使句，“命令、要求、指挥，去那儿，坐这儿”。他一直都记得，有些家长听说这个新老师是谁之后就让孩子从培训中心退学了。重新讲起这个故事时，他完全没有任何自怜自艾的感觉。

不管去哪儿，穆因·汗都会一直教英语口语。抱怨了五分钟麦考利之后，他又走进Lingo的教室上下午的课。他问学生们今天下午感觉如何，学生们则齐声回答“好极了”。时间倒回我刚开始在“美国学院”和穆因·汗聊天的时候，他有一次告诉我，每当他走进教室开始说英文时，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之情从未消逝。“当我说英语的时候，我的内心在歌唱，就连现在我和你讲话的时候也是如此。”

参考书目

Rashmi Sadana (2012), *English Heart, Hindi Heartland: The Political Life of Literature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iv Khara (2014), *You Can Win: A Step by Step Tool for Top Achievers*, Bloomsbury India.

M. K. Gandhi (1938),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J. K. Tina Basi (2009), *Women, Identity and India's Call Centre Industry*, Routledge.

[1] IIT，印度理工学院；IIM，印度管理学院；BHU，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Roorkee，IIT鲁尔基分校。——译者

[2] <http://www.bbc.com/news/av/magazine-30729450/the-man-who-opened-india->

- [3] 古鲁葛拉姆为德里的卫星城，原名古尔冈（Gurgaon）。——编者
- [4] <https://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he-underage-optimist/let-there-be-english-but-abolish-caste-system-around-the-language/>
- [5] 指印度东北部从事农业生产的雅利安-达罗毗荼人。——编者
- [6] <http://www.thehindu.com/society/motivational-speaker-shiv-khera-on-the-need-for-self-help/article19103320.ece>
- [7] gulukuls，印度古代教育制度，学生和老师住在一起，一同学习。——译者

3 疏通者

我第一次见到潘卡·普拉萨德时，他正站在我姐姐的官邸外，一手提着塑料袋，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作为当地报纸的特约通讯员，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跟着我姐姐到处跑。我姐姐是名政府官员，负责恰尔肯德邦南部的一个“乡”，底下有69个村子。作为乡发展委官员，她负责的是印度一长串行政体系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难管的一环。我们从小跟着做官的父亲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所以深知其中的艰难。她现在有自己的官员住所了，是圈在高墙内占地不小的一片死板的住宅楼中的一间。望着这幢殖民风格的楼，我没想到的是，我姐姐并不是乡里唯一一个掌权的人。

“Sarkar”，也就是政府，对于普通村民来说是个吓人的存在——神秘莫测，且难以接近。我就是在一摞摞落满灰尘的文档和文件夹中长大的，文件里那些复杂的辞令让我觉得这怎么能办得成事呢？德里的高层官僚让印度普通政府项目呈现出复杂、麻烦、不亲民的显著特征。于是印度的村民们对于国家的计划要么根本不知情，要么搞不明白。普通印度人和政府之间间隙最大的地方就是最底层，也正是这些底层的老百姓最不知道政府欠了他们什么。

乡村的治理被包装成一种城市的幻象，这种政策可能和殖民行政文化的偏见相关。身处政府高层的人仍然被看作有能力且诚实的，而那些在政府底层的则被看作没能力且不值得信任的；更何况，身处高位的行政人员们也通过了更难的考试。福利政策的实行也是个冗长的过程；它需要你精通文书，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奔走。大多数普通人都交由疏通者去处理。

疏通者通常是男人，在印度的大多数省份，被叫作“pyraveekar”。“pyravi”是个古老的乌尔都语单词，意为在政府官员面前帮人办事，这个词也很好地展现了南亚政府的本质。“pyravi”是一种艺术，要求从业者擅长多种能力：能坚持、有追求、会游说、会套近乎，最重要的是，能够建立和散播影响力。

乡村的疏通者存在的时间和任何想要管理村民的人一样长。事实上，这是印度乡村最有油水的一种职业了。疏通者不但在他的乡村社区中不可或缺，也是国家发展机器的决定性组成部分。他们做的事情和做

事方法的核心部分——获取信息，和政府官员及政客建立联系，在客户中获得赞誉的方式——几十年里都没有改变。

乡村疏通者的新变化是，他知道他在下一盘大棋。他知道要靠政府维持生计，但也知道政府更需要他。他继续深入地存在于村庄的生活里，但同时也更加关心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他不仅知道如何发掘他人身上对他有用的地方，也知道如何让科技——手机、电脑、互联网为他所用。他现在的工作可能只限于和乡里的官员打交道，但是他能预见到自己被任何垂涎印度村庄可支配收入的人所需要，比如企业家、银行、客户公司。他衡量自己是否成功时，不看前人设下的标准，而是看被社会承认的成功人士设下的标准。

当然了，光站在那儿看潘卡·普拉萨德是看不出这些的。他是个瘦小的男人，长长的鹅蛋脸上有一双大大的、充满好奇的眼睛，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24岁）要年轻得多。不过他已经尽力打扮得像一个能把事情办成的人了——精心打理的胡子，侧分的头发，条纹衬衫的扣子扣到领口，前胸口袋插一支圆珠笔，熨过的西裤，黑腰带，还有正装表。在我们互相自我介绍的前十分钟里，他就问了我一连串关于在德里做记者的盈亏问题——挣多少钱，银行里有多少钱，认识多少大人物。听了我的回答，他皱皱眉头表示不满意。

在有可能成为当地历史性时刻的一天，我来到了乡里，本来是为了采访一个故事。尼赫鲁-甘地政治家族的继承人、国大党2014年全国大选的候选人拉胡尔·甘地要到距离该乡只有几公里的一个露天市场发表演说。那时竞选已经到了最终也最白热化的阶段，收买该地巨大的部落票仓可能是胜选的关键。当天大约有5000人将来观看这次演讲。

我姐姐去执行安保任务。空地上一个角落已经为甘地直升机的降落而围了起来，我们三人在他直升机预计降落前一小时从乡里出发。然而三小时后，甘地却还没来，我们一直在等他。和我们一起等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蹲在地上，抬头望天，寻找直升机的踪迹。穿过各种人群——官员、当地领导、记者——普拉萨德告诉我，甘地如果来的话也是浪费时间。部落带早就被当作一摊浪费富矿的死水遗弃了，如今急需发展。我们所站的地方，是被委婉地称为“受影响”地区的中央；正如一位官员曾经悄悄告诉我的，“这些地方，每天都有五六个年轻人凑在一起，组建一个‘毛派组织’。”这个地区反叛的年轻人想要获得的是机遇，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元首的美好祝福。普拉萨德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做了选择：他们要投票给甘地的对手，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

莫迪。傍晚时分，当地的国大党工作人员已经穷尽了对甘地家族的赞美，开始临场作诗。又过了一个小时，人群的躁动不安即将演变成骚动暴乱，国大党的志愿者终于宣布了他们早就知道的事：甘地不会来了。他们说，他的直升机遇到了故障。我转过身去想告诉普拉萨德他说得对，才发现他已经走了。他个人对国大党或者拉胡尔·甘地没什么意见，他只是认为是时候寻求变革了。六周后，印度人民党赢得了恰尔肯德邦14个议会席位中的12个，国大党一个也没拿到。^[1]

到了2014年6月，纳伦德拉·莫迪已经在德里上位了，而我则回到了乡里，跟着潘卡·普拉萨德到处走。他代表着乡下年轻人的聪明才智。他相信，归根结底，他生来是要做大事的。而且他从很小就知道，想要做到这一点要及早计划。14岁的时候，他已经付诸行动了。

我不在的一个月里，国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回到乡里，所有事情还和1930年的时候一样。每天早上10点，我姐姐的车会出现在屋顶插着印度国旗的主办公楼外。然后，原本坐在高莫哈树下的村民们，就突然开始忙活起来，好像在演一出戏。当然了，他们从来也不会费力记住他们拼了命要见的官员们的名字；乡政府里的每个职位都有简称——CO（Circle Officer，警务处副处长），BPO（Block Programme Officer，乡计划协调员），DSO（District Supply Officer，县供给官员），JE（Junior Engineer，初级工程师），MO（Marketing Officer，市场官员）^[2]。乡干部主要就是靠手里的那点权力签字盖章，办事的人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顾乡层级频率极高的人事变动，村民们每天还是不断涌进政府大楼，为的就是两件事：加入社会福利项目，或者抱怨为什么被落下了。他们从尘土飞扬中看到我姐姐的红色汽车出现时，就会默默地想今天会不会是他们的幸运日。

她坐上黑色的高脚凳，看着面前大桌子上那张被各种颜色标记的辖区图时，外面的村民正四处奔走，找小工把他们的文件递进去。一旦坐进办公室，我姐姐就会立刻换上她工作的面孔：授权内部采购，批准或驳回请假单，接受各种社会活动的莅临邀请。我们的父亲总是跟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能比得上政府赋予你为它代行的权力。过了很多年大城市的生活——酒吧、夜生活、购物中心——之后，我姐姐有一天突然选择了离开，似乎是要验证父亲的话。如今，她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五年，我也得以观察她是如何执行影响几千人生活的政府决策的。她的大部分工作都要和男人打交道，而这些男人却不知道如何和她打交

道。年纪大的职员管她叫“先生”（Sir）；封建地主见了她也温柔几分；中介跟她讲话时看向远处，不敢直视她。

从可以有自己想法的那天开始，潘卡·普拉萨德就看中了将他放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工作。他受教育程度不高，没什么专业技能，手里也没钱。相比维内·辛格和桑托什·塔库尔这种在获得职业机遇之后意识到自己当老板能有更大成就的人相比，他的情况和穆因·汗更像，对他俩来说上学都是奢侈的。普拉萨德想要和他们一样有钱有权，但又不想离开自己的村子。

想要在一个钱权都被国家掌控的地方变得有钱有权，只有一个办法。但和我姐姐又不同，他得不到政府的授权去执行其决策。他没有参加检验他知识储备的考试，也没有参加检验他口才和自信的面试。同时，他肯定也没有钱和关系能找到进场的门路。于是他在政治上走了一条和千百万偷公家电的印度公司如出一辙的路——把他们自己的线搭在主电缆上。16岁时，普拉萨德就因为拍护照照片在村里出了名。

八年之前，当他做小包工头的爸爸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时，普拉萨德说服他用积蓄买了两件东西：一台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普拉萨德在他牢房那么大的老家的墙上挂起一张蓝色背景纸，然后宣布要制作护照尺寸的照片——8张60卢比，16张120卢比。家里人觉得他疯了，但是普拉萨德并不在乎。在村里上六年级的时候，普拉萨德缠着他爸爸要买一部手机，那时候村里还没人有手机。人们对他没抱什么希望，后来听说他在村里挨家挨户租借手机，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每分钟收费10卢比。

不管你想找印度政府帮忙办什么事，其中大多数都需要上交护照尺寸的照片。只有这张3.4厘米×4.5厘米的面无表情的人脸被贴在申请表

的右上角，申请才算数。这个点子肯定能成功——能在1公里之内就办成的事，谁会跑12公里到地区中心去办呢。这事发生在2006年，当时国大党执政刚两年，福利政策一个接一个出台。前一年的农村收入保障计划（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即MGNREGA）让最懒的村民都动了心，于是，所有人都需要一张护照照片。^[3]刚开始，村民们走进普拉萨德的摄影间还有点迟疑，不过，几周之内在蓝背景前面照相的人——头发抹了油，脸上擦了粉——就从早到晚排起了长龙。普拉萨德拿着一张四年前的照片告诉我说，那时候拍得很差。他的灯光设备仅有一个白的日光灯，但是也没人抱怨。这标志着普拉萨德开始成为乡里的万事通。

2004年到2009年，国大党领导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福利政策，触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疗、住房、饮用水、学校、道路、儿童营养。^[4]国大党决定将农村贫困人口放在所有选民的首要位置。执政期的最后一年，政府宣布了一项重大的福利政策，发放配额津贴，并减免总计千万卢比的农民贷款。^[5]2009年，国大党通过和一个少数党联盟而重掌政权。他们将这看作社会福利政策的回报，并发布了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社会福利政策——唯一身份认证项目（Unique Identification，也称UID项目）。^[6]

项目计划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D数据库，目标是给每名印度公民发放一个12位数字的唯一身份证号码，并与生物识别技术——他们的指纹以及虹膜扫描相连。这个数字身份证号码将保证福利顺利地由政府下发到居民手中。当德里还在激烈争论印度政府是否有权对他们的公民进行监视，以及现金汇款能否真的消灭中介，解决现金流出的问题时，“数字身份中心”已经开始在乡村腹地生根发芽了。

2012年，同一个政府规定要接受某些国家福利，如农村收入保障计划的发放，就必须要有数字身份证。^[7]这在许多村庄引发了不小的骚乱。想要申请一张数字身份证，你需要做地址认证——提供银行对账单、驾驶证、食品供给卡、电费单和护照。对于生活在偏远村庄的人来说，这些文件每一个都很难办。但是政府给公民们设置的每个阻碍都提供了一条旁门左道。村委会可以给你一张申请表，你填上地址，贴上护照照片，再找村委会委员长签个字，这张申请表就变成了一张合法的地址证明。此时，护照照片不再是一张人脸的四方形复制品了，而是改变命运的法宝。“我兄弟、我爸爸，还有我，没日没夜地拍摄照片，连拍了几个星期”，普拉萨德告诉我。最后，他挣到了很可观的一笔钱——10万卢比。

让他讲自己的故事并不容易。在我定期去乡里采访的三年间，没有一次能把他抓到我面前坐下，完整地说上两句。普拉萨德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认识；他就是没空细讲。在他这行里，时间就是金钱。他一般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回答我的问题——取指纹，写报告，在不同的办公室之间奔走。“我能怎么办呢，每天就是有这么多活呀（*Arre, kya batayein, bahut kaam hai aaj kal*）！”每次我嘲笑他紧凑的行程时，他都这么回答。

农村人通常分两种：除了自己的活别的什么都不干的人，以及随时

随地眼里都能看到活的人。普拉萨德属于后者。乡里需要干的活确实比任何人能想到的都多。从规定上说，我姐姐的工作包括一系列职责——建设基础设施、收税、举行村委会选举，但实际上，她要处理的最棘手的事情并不在此列。比如说，当信仰不同宗教的情侣私奔时，她要负责维持各方秩序；再比如，一群大象决定一路踏过村庄回到森林里，那也是她要负责解决的（一位基层官员曾经告诉她，当地人相信，想让大象退回去的办法就是让BDO，即她本人亲手喂一只香蕉给它吃）。衡量她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只是她对于政府项目的执行情况，或者她开展了多少次选举，还有她培养百姓忠诚度及维护个人形象的能力。

如果你够聪明，读报纸就会更小心，因为没人比当地的通讯员更不靠谱了：他们自私自利。你会看到报道讲一个人做某某工作其实是为了给他们真正不能见人的工作——未获许可的酒厂，甚至敲诈勒索的行径打掩护。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你知道的事太多了——贪腐、外遇、丑闻——于是别人就不敢惹你了。但普拉萨德做通讯员的原因更单纯些：他想要做个疏通者。

2008年他已经开始给一家地方日报拉订阅量了，所以当这家报纸要在他的乡里招聘一名特约通讯员时，他就毛遂自荐了。他喜欢读书写作，做通讯员之前已经在当地一份萨德里语（印度方言）的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了。这份工作月薪3000卢比，再加上他照相馆的稳定收入，是笔划算的买卖。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与乡里官员的紧密联系。他在各个办公室转一圈，就能拿到当天的新闻——开什么会，发布什么声明，有什么特别的项目——然后跟着他们到县里去参加开幕典礼、视察，以及日常盘点库存。我姐姐在乡里工作的那三年间，他写了几十篇跟踪她行动的报道，从田野视察到升旗仪式，什么都有。为了能撑起整个版面，他还报道了乡底下六个村子的重要活动。在卡兰，一名印度人民解放阵线的区域指挥官——土生土长的“毛主义者”——因为世仇射杀了他的亲戚。在玛拉西里，另一名印度人民解放阵线的区域指挥官射杀了在村里工作的一名和平部队的志愿者。在贝多，首席副部长在一场当地活动中说年轻人应该拿起书本，而不是端起枪，还要学会面对现实。

2000年，矿产丰富的哈尔肯德邦为了它的原住部落人口而从母邦比哈尔独立出来，而今却为分布极广的“毛派暴动”十分头疼。最开始这些人可能是被政府和跨国公司侵吞部落领地、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恶行激怒的，但暴动很快爆炸式升级，演变为各种小团体在全邦范围内开展地盘

争夺战。^[8]警方认为，很多年轻人不断加入这些组织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更持怀疑论的当地观察者则认为“毛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职业选择，这可能与政府用现金和额外福利奖励投降的毛派分子有关。

普拉萨德的其他报道也并不振奋人心。一名村民用石头砸烂了村委会主席的头，因为他想加入食物保障计划的申请被无视了。他报道说，在乡里，想让中介帮忙从政府经营的印度银行贷款15 000卢比，要付1500卢比的贿赂。警方追捕两个“误入歧途”、坠入爱河并私奔的年轻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女方家庭以绑架和性侵为名起诉了信仰印度教的男方。

大多数文章我都是在Facebook上读到的，普拉萨德隔一天就会发一次报道链接。他不知道县里有多少人会看他的报道，但他知道他那上千个Facebook好友——既有当地熟人，也有完全陌生的人——是会看的。作为一个基本上没离开过村子的人，他的文章通过互联网传播得很远。在我们关于新闻的对话中（他找我订阅了我就职的英文杂志，把我文章的每行字都打在谷歌翻译里面，就这样读完了我的文章），他强调了“笔杆子的力量”。为报纸工作六年后，普拉萨德成了各个想要在乡里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群体之间的重要纽带。这些群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警察、私企、政客和“多余分子”。

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频繁且暴力，其中一些深深印在当地人的记忆中。2012年，一所公立中学的校长和一名教师被自称“新老虎军”的当地团伙劫持并残忍杀害。该团伙要求政府从给学校的资金里拨出一部分给他们，对赎金的要求在学校一幢在建的新楼外墙上存留了足足两个星期之久。2014年，一个政府支持的前毛派组织“和平部队”中有7名成员被掌权的游击队所杀。2015年，两名男性驾车驶入乡政府总部，因政府合同引发的内部矛盾射杀了一名中介。

我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后的一天去了我姐姐的办公室。她办公桌对面坐着两名警察，都笑眯眯的。他们在问她有没有怀疑谁是凶手，以及他的作案动机。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告诉他们，她知道的和他们一样多。经过短暂的恐慌，乡里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人们比以前更忙了。此时的普拉萨德要做的事远超过了收集新闻。2009年，邦政府任命他为VLE（Village Level Entrepreneur），即村级企业家，他的公司——他称之为“dukaan”（店）——被用作摄影室、记者站，以及“Pragya Kendra”，即公共服务中心，就是找一个有电脑能上网的人，保证政府

公务和私人服务能够传递到村一级。VLE不赚固定工资，但是根据传递服务的数量从政府或者私人企业赚取一定的佣金，大约几千卢比。成为VLE的要求是了解如何使用电脑和互联网，要展现出“企业家的素质和社交能力”，有能力投资75 000卢比建立服务中心——普拉萨德自然成为附近这一片的合适人选。

村民们不去乡办公室了，转而在他房门外排起了长队，经常天没亮就来。普拉萨德则直到早上8点才会出现。他对此解释说，如果一有人来就立刻处理他们的问题，那就没人把他当回事了。为了显示他的地位提升，他在转椅上铺了一条白布，象征官方权力，开始是棉的，后来换成了人造毛的。这项工作赋予他许多权力：发放种姓和收入证书，开银行账户并处理转账，给老妪、寡妇和残疾人发放政府津贴，给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下的工作发工资，订火车票，预付电话费。他的大多数新业务都包含在一台像刷卡机一样、被称作微型ATM的设备里。这台机器通过扫描指纹验证受益人的12位数字身份证号码，利用VLE的SIM卡上的数据服务将其传输到一个复杂的服务器网络，然后才能进行就业保障金、老年抚恤金等任何福利保障计划下的转账服务。普拉萨德会用政府分发给他的现金付钱给村民们，这样人们就不用再往乡政府跑好几趟，对着那些代表当地政府权力的缩略字母们^[9]卑躬屈膝了。

从那时起，普拉萨德每天大部分收入都是坐在一间5平方米的小屋里赚的。屋外面的房子还没盖完，但这离村政府总部的车程只有10分钟。一个油漆刷的标牌把人们从国道引入旁边的一条岔路，召唤村民们到这儿办理由MGNREGA授权的项目——每年100天体力劳动获得120卢比日薪。然而想要办成，还须穿过各种乡村景观——在茄子地或者冬瓜地弯腰耕作的农民们、坡顶的小房子、散步的牛、在茶馆里打牌的男人们，还有坏掉的太阳能板。最终，你会来到普拉萨德那个让邻里眼红的房子前。房子有两层楼，外墙被刷成了粉色，好像是自己独树一帜的美羞红了脸颊。很多访客都不是通过大门进来的，他们要去的是普拉萨德的办公室，一个连着主楼的玻璃房子。

玻璃上用明红色的字写着他提供的服务。潘卡·普拉萨德和穆因·汗、维内·辛格尔一样，都是新时代的企业家。如果说汗用英语、维内·辛格尔用互联网实现了成功和影响力，那普拉萨德用的就是他触手可及的从相机到计算机的所有科技形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事实上，他才是这群人里最精明的；他对于客户需求的掌握最精准，客户对他的依赖也最原始。他不只为自己创造了一片机会之地，也成了这片领地的主宰。

我第一次去他村子的时候，他直接就把我带到了他那幢羞涩粉房子的客厅。走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碰到正在往水泥地上铺大理石瓷砖的工人们。普拉萨德说他上周刚买了这些瓷砖，算是划掉了他长长的人生目标清单里的又一项。我坐在塑料椅子上左右打量这间客厅——一个四轮的架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视，墙上挂着裱起来的家庭照片，我面前的塑料桌上摆着一盘咸饼干——他坐在桌对面的一张小木床上问我觉得这房子怎么样。我告诉他这看起来棒极了。他听了非常高兴。他后来告诉我，那天简直糟透了——他爸爸没有按要求穿干净的衬衣和定制的裤子，而是穿着笼吉^[10]和背心满屋子乱转；虽然他不久前刚在卫生间装了淋浴头，他妈妈还是到村里的池塘去洗澡；所有人没有用印地语而是用方言跟我说话；孩子们只会在门后张望，却没有走进来双手合十跟我问好。当他把我送回乡政府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他理解家人需要些时间来适应地位的变化。我们俩都知道，这用不了太久。

在印度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权力总是与诱惑相伴。在恰尔肯德邦创立的最初十年里，许多邦部长因为拥有“过度的资产”被调查甚至逮捕，到高层政府官员家突袭查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11]在看似没有尽头的邦首席部长名单中，有一位因涉及上千万卢比的采矿诈骗案被关进了监狱；据说他以极低的费用向企业发放开采煤矿和铁矿的执照。他用公家的钱买了各种东西，其中包括一处价值170万美元的利比里亚矿产。^[12]

印度的所有政府项目都涉及日常腐败——政府发放的粮食很大一部分不会送到穷人手里；承建的农村住房项目只有一半会真的建起来；大概几十亿卢比都消失在充斥着捏造的花名册和假工单的MGNREGA里。^[13]腐败并不只是为了钱。在印度穷乡僻壤那些男性主导的政府里，一个人如果不能在正常工资之外赚更多的钱，就会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而贪污的能力则被看作是勇敢者的勋章。普拉萨德的访客偶尔会在他发放了种姓证明或者完成银行转账之后，塞给他一张50或者100卢比的票子。他告诉我说，第一次遇到这事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不用花钱就能从政府那拿到东西，这让村民们很不习惯。

对普拉萨德来说，这代表的不是腐败，而是合群。掌管国家的人收上百万，他为什么要为偶尔的50卢比内疚呢？和他们相比，他想要的不过是比他的官方日薪多拿500卢比。

2014年6月，普拉萨德达到了他作为政府疏通者的职业顶峰，成了

一名注册数字身份证处理员。他受政府委派收申请表，记录生物信息，并发放数字身份证。这给他的每月收入增加了34 000卢比。成为注册数字身份证处理员意味着他在乡政府总部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办公室——老楼里的一间小黑屋，里面装配了制作数字身份证的精密设备。普拉萨德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坐在这台设备面前，扫描虹膜并复核名字和地址。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被安装在他家的办公室里，现在这里不仅是摄影室、记者站、公共服务中心，也是数字身份证中心。所有空余的空间都被作为地方疏通者所需的各种设备塞满：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微型ATM、数码相机、打印纸，以及一张装裱起来围上花环的心灵大师赛峇峇的照片——普拉萨德将自己的成功都归功于他。UID官方要求数字身份证照片为白底，所以曾经用来拍护照照片的蓝纸板被盖上了一块白兜提^[14]。

聚集在他办公室外的人越来越多，来得越来越早，看起来也更着急。普拉萨德是负责五个村子的唯一一个公共服务中心；很多当地人要走几公里的路到这儿来，手中攥着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所有可能证明身份的文件。普拉萨德坐上这个职位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好撞见他被一群抢着要跟他说话的人团团围住，他蹲在椅子上，腿上擦着一大沓申请表。以这个姿势等了几秒钟之后，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伸出胳膊把人群推到门外，冲着他们惊愕的脸把门一关。然后，普拉萨德把表格整理成一摞，看了最上面的那张，然后叫了苏克·德维的名字。一个从腰部就开始佝偻的女人，用拐杖拨开围在门口的人群走了进来。苏克·德维已经80岁了，走了5公里来办数字身份证，为的就是拿到她的老年抚恤金：一个月600卢比。让她在白色兜提背景墙前面的塑料凳子上坐直之后，普拉萨德把一个网络摄像头对准了她受惊吓的脸，确认了一下电脑里的图像，而后点击了在线申请页最下面的“提交”按钮。然后他抓起她的手，用湿毛巾擦了蹭她的指尖，按在一个盒状的指纹扫描机顶上的透明区域。结果机器识别不出任何指纹输入——泥土在她皴裂的手指里嵌得太深了。苏克·德维很沮丧，作为一个每天和牛粪打交道的人，她问普拉萨德，人的皮肤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UID项目实施了几周之后，印度政府就发现，项目最想帮助的很多人因为常年劳作，手都粗糙到没办法输指纹。但是政府说，没有什么是一点凡士林解决不了的。而普拉萨德决定就用水。他把毛巾再次打湿，在苏克·德维的手上来回擦了几遍，然后按在扫描仪上。试了五次，终于成功了。德维又坐回到凳子上，睁大眼睛瞪着一个像望远镜一样的虹膜扫描仪，先一只眼，再另一只。这个只试了三次就成功了。普拉萨德拿

起她的大拇指在表格上按了个手印，然后把表格放进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里。苏克·德维安静地收好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

普拉萨德继续给其他“客户”办理：67岁的帕特雷·贝克想要开个印度银行的账户；20岁的手机店主萨努·库马尔想要从银行取1000卢比；一个穿着明亮纱丽、编着辫子的女人来拍护照照片。其中一些人办完事要走的时候会给普拉萨德点钱，30到100卢比不等，他都收到抽屉里。他说会把这些钱用于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把从网上打印下来的数字身份证塑个封，说是给我解释，似乎更像是在自我安慰。但他也说，得小心一些，不能什么时候都收，也不能谁给都收。他告诉我说，自己小心提防着呢，有人想害他，尤其是他身边的所谓同事。

9月的一天，普拉萨德一起床就发现自己被一家有竞争关系的报纸的本地版“曝光”了，是一个同行通讯员使的坏。报道引用了一个男人的话，说他在普拉萨德的办公室里拿到数字身份证之后，给了100卢比。普拉萨德和采访里的这个男人都被叫到了警务处副处长的办公室，那个男人被讯问是否给了钱，他说是的；普拉萨德被问是否收了钱，他也点点头认了罪。“我问警官说，我因为自己的认真工作接受别人的一点酬谢有错吗？”普拉萨德在电话上告诉我。那个警官想了一下，然后放他走了。但她告诉他，不能再用乡政府总部的办公室处理数字身份证了。

普拉萨德告诉我，他决不会让这件事影响他“一分一毫”。他手里的活儿太多了，根本没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业余时间，普拉萨德会带着数码相机到处去帮Indira Awaas Yojana国家住房项目的受益人拍照片；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给村民们75 000卢比贷款，均分在建造开始、建造一半和建造完成这三个阶段发放。受益人需要通过拍摄工程进展的照片，换取后两期的贷款。普拉萨德收500卢比帮他们拍摄后两个阶段的进展。如果付2000到3000卢比，他就会为地区行政部门提供调查数据电子化的服务。等着某位官员来的间隙，他会拿出一部手机，把他半文盲的特约通讯员朋友在另一部手机上口述的报道打成文字。

我总是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有什么办法，人生就是打仗啊”（*Kya karein, jeevan sangharsh hai*），他拉着脸说。他仍然把自己看作一个渺小的人，和巨大的不公平的世界斗争。

8月15日，印度独立日，普拉萨德打给在德里的我，说印度真正的自由是要脱离腐败。在他看来，他和在他门外等待的人们唯一的不同就

是，他了解这个系统并且能用它维持生计；而他们开始不懂这个系统，后来又害怕它。如果他没能这么做，那他家现在还会住在去二层小楼的路上他曾经指给我看的那间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的一居小屋里。我见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和其他很多印度的大城市不同，这里没有什么放松的办法——去健身房，叫一餐好饭饱腹，和朋友、同事们喝一杯，在他这儿都没有。但他仍然拥有这一代人最喜欢的放松工具：Facebook。他有五部手机，三部有高速网络，其中的一部会被拿来上Facebook。他把他仅有的一点空余时间都用在了这里：发状态，点赞，评论，分享。“花不了多少时间，”他说，“只要有人发了什么，我就会秒赞。如果是照片，我就回复‘美丽的脸’。如果我看不懂一个人发的新状态，我就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这时候我不但会点赞，还会立刻分享。”他的大多数更新要么是他文章的链接（《新路建设计划发布》）或者励志鸡汤（《只有在工作的人才会犯错——那些没工作的人都把生命浪费在找别人的错误上》）。隔几天他就会发一张新自拍，有的时候他会在半夜发几句悲情的歌词。

音乐是他全部的娱乐活动。“电影对我来说太长了，浪费时间。我只会看7分钟以内的东西。”唯一让他牺牲了宝贵的三小时工作时间的是一部宝莱坞传记电影，讲的是马亨德拉·辛格·多尼如何从兰契的一名小镇青年成长为印度板球队队长的故事。在多数夜晚，下班、吃饭、上床之后，普拉萨德会拿出手机，在YouTube上搜歌曲的视频。他最喜欢的无一例外都是情歌。上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正痴迷一首流行曲，讲的是一对恋人为了在一起与命运斗争的故事。他不只喜欢那首歌，还喜欢那位歌手——浅肤色、圆脸、大酒窝、卷发的女孩子——视频也是她自己主演的。连宝莱坞那些时尚的女演员都算上，他从没觉得谁长得这么漂亮过，他说。

在生活中，他声称自己是没时间谈恋爱的。每次我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都说找女孩子是浪费时间。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关于分手和劈腿的歌，好准备没有爱情地生活下去。有一天赶上他心情不错，他带我去见了一位“特殊的朋友”。这个女孩子来自一个部落社区，就住在邻村，现在正在上护士培训课。他们几年前在一个电脑培训课上认识，已经在手机上聊了一年。因为怕事情变得复杂，他们一直回避线下见面；既然结婚是不可能的，那就没必要走得更近了。即便是那一天，“见面”也很简短：我们开车经过她的村子，她从屋里走出来跟我们挥了挥手。

普拉萨德很清楚地知道，等到时机成熟，自己要跟什么样的女孩子

结婚。她必须来自商人族群班尼亚人下属的种姓（“否则我在族群里就没地位”），最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你疯了吗，我肯定不会找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人结婚！”），她的家庭得负担得起他应得的嫁妆，不是因为他需要他们的钱，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地位。他放弃嫁妆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女孩子长得美若天仙。“但这种可能性很小。上次我见了一个女孩，她简直是照片上的反面。全都是PS的。我见到她那一刻，简直头都大了（*Dekhne ke saath bukhaar aane laga*）。”

我主动提议给他在相亲网站上建一个简介，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大的选择范围，甚至还能选和他一样种姓的女孩子。但他不想把网撒到恰尔肯德邦以外了：“哎哟，可别。谁知道给我配的都是哪来的女孩子，坎普尔、勒克瑙的可不行。”不管多合适，我从来都没提过德里的女孩子。“如果我岳父要死了，去德里的火车得花4000卢比”（*Sasur mar gaya toh Tajdhani mein 4000 ka ticket le ke jaana padega*），他像平常一样愁眉苦脸地说。

他很想去首都看看，不过要等到他能毫无愧疚地买一张机票的时候。然而他只想去把景点都逛逛，并不想久留。普拉萨德很确定他如果去德里肯定能找到工作，但是他一点也不想做卖保险或者送比萨外卖那种苦工，却只能挣现在四分之一的薪水。他只想住在现在的地方，做他自己发现的工作。不管这个系统有多么可恶，他现在都要紧紧抓住它。

像潘卡·普拉萨德这样的人，可没有闲工夫沉迷于那些改变国家、改变世界的空泛主意。和穆因·汗或维内·辛格尔不同，普拉萨德不是通过逃离自己的出身发的财，而是正相反。如果你问他对现在的政局怎么看，他会告诉你他没时间想这些。他的客户不是美国的网民，或者志向远大的英语学习者；他们的生活质量全看普拉萨德能多快处理好他们的申请。正因为他和这个系统距离如此之近，他才意识到，本质上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国大党也好，印度人民党也好。他觉得拉胡尔·甘地应该更努力点，但他也不是纳伦德拉·莫迪的盲目追随者。不管谁在德里掌权，普拉萨德都知道，在这个穷乡僻壤，掌控他命运的只有他自己。

丑闻的事情尘埃落定后，普拉萨德立刻回到他乡政府的办公室继续扫描指纹和虹膜，村民们也继续回到高莫哈树底下排队等待。有一天，村民们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普拉萨德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从他们身边经过，在楼外很有派头地停了车。摆弄一下办公桌上的申请表之后，他从未有过地公事公办了起来：因为信息不全而朝来办事的人大喊大

叫，“把插队的人踢出去”。我问他是不是要改变做事风格了，他耸耸肩说：“什么都不会变的。如果有人必须赚钱，那他一定能赚到，谁也阻止不了（*Kamane waala kamayega, usko koi mai ka lal rok nahin sakta*）。”没有人有资格教他应该怎样赚钱，怎样花钱。对于花钱，他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他意识到，买东西会即刻赋予他一种权力。除了给自己买衬衫、牛仔裤或者墨镜，他还花很多钱买窗帘、靠垫套等家居用品，以及给家里的女人们买珠宝和纱丽。他在兰契最大的商店购买大部分东西，而且从来不要求打折。

2015年末，他给他的一位兄弟办了婚礼，要的嫁妆反映了他们家新的社会地位——10万卢比和一辆给他自己的摩托车。他办的宴席之大，村里见所未见：长达三天的狂欢派对，100公斤羊肉，和与之相配的家酿（*daaru*）。宴席的第二天，他带我参观了他带顶棚的后院，一大帮工人正为晚上的大阵仗挥汗如雨——有的在做玛莎拉调味酱，有的在切洋葱，还有的在剥羊皮。

他的家人已经接受了他的户主地位。他的父亲和兄弟都听从他的命令，母亲和姐妹则要遵守他定下的规矩。姐妹什么时候放弃学业，兄弟什么时候结婚，这些事情都由一家之长——25岁的普拉萨德决定。

回到客厅，他兄弟和新娘正坐在镀金的椅子上收礼物。屋里有个新装饰，电视机旁靠墙放着一辆蓝绿色车座和车把的自行车。我问他，明明去哪都骑摩托，要一辆自行车干什么。“这是我的老自行车，我最开始就是骑着它挨家挨户让人订报纸的，”他说。这个旧物放在这里是为了提醒宾客他的人生经历了多大的飞跃——就像桑托什·塔库尔留着发达之前骑的爸爸的自行车一样。这不禁让人猜测，印度有多少个客厅里放着这样的自行车，用来标志印度年轻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旅程。

按照他地位提升的速度，摩托车很快就不够档次。他兄弟婚礼的一个月后，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全新的马恒达Bolero型SUV，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昂贵的权力象征。车是分期付款的，首付26万卢比，之后每月付1.1万卢比，分44个月付清。我问他是否会找个教练，他说：“我自学，最多一礼拜就学会。”几周后，他把这辆闪亮有型的棕色SUV一路开到了兰契，停在我家门口让我欣赏它的速度与美貌。后来他告诉我，买这辆车并不只是一时冲动。作为一个花了84.4万卢比买车的人，他在婚姻市场的身价至少提高到60万卢比。这符合他更大的计划。

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就不得不把这辆车从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开到村民们看不到的地方去。像所有不合时宜或者过分炫耀的东西一样，这

辆SUV给他带来了眼红的诅咒。在他把这辆巨兽停在他的两层小楼外三个星期后，村民们就起草了一大摞投诉信，说他“工作方法”有问题，然后交到乡政府总部。我在德里跟姐姐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这事。“这次问题严重了”，她说。后来我给普拉萨德打了个电话，他的口气也并不乐观：“这些村民们，他们看不得这辆马恒达。”

这件事发生之后几个月我都没空回乡。如我所料，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姐姐也和往常一样，又有一堆新的事情要烦。其中一件，就是食物保障计划最急迫的受众拿不到食物配额。村民们十几个一群到乡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抱怨，说免费的米面糖盐还有煤油都没有他们的。台上没完没了地念调查数据时，台下一个年轻人从志愿者手里抢过麦克风，冲着食物供给官员的方向大喊：“给我们食物，不然我们就拿枪解决了！”

这场危机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而更加严重。印度当时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四分之一人口受到影响，农业受到严重损害。^[15]2016年前三个月，超过100名印度农民自杀。^[16]恰尔肯德邦是亮起“红色警报”的邦之一。中央政府下令，雨季到来前在每个村庄建造5个田间蓄水池；对我姐姐而言，就是于三个星期内在乡里建546个蓄水池。等我回来的时候，她还剩下300个水池要在一周里建好。之后我在乡里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跟着我姐姐在石砌的地下室间穿行，看着她检查乡里的食品分发情况。她走进政府许可的配给站，仔细地四下观察了一番，让她的助理去数地下室有多少袋粮食、多少桶煤油，在她的笔记本上计算（“店里应有的粮食数：25公斤或将近3袋[10公斤一袋，袋子重量1公斤]；店里实际粮食数量：6袋；店里多余粮食：30公斤”），然后让小贩解释余下的粮食是怎么回事。

回答五花八门，有的搞笑，有的奇怪。在一家店里，一个年轻的女人刚开始做经销商，还在摸门道。她一边解释，眼泪一边从她的大眼睛涌出来，她说以为从每袋里面留一斤给自己家吃是正常操作呢。在另一家店，一个干这行25年的老头交叉着手跟她说，每到月中他的地窖总是堆满了粮食，因为村民们都懒得来拿。在乡里视察是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我看来，最大的玩家是那些对真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那天晚些时候，在检查一个蓄水池时，真相就在一个小树枝做的记号上摇摆。2米，我姐姐弯腰一看就说。2.4米，她的司机兼当地知情人说。3米，年轻的工程审查员非常认真地说，按政府定的要求一分米都不少。于是，人们从田里拿来一根很长的树枝，把它立在底部集了一点水的池子里。大家心里对标记之间的距离都心照不宣，还是弯下腰又看了一

次，结果谁也没有让步。

和以前一样，普拉萨德从过去经验中学到的就是，想要达成自己的抱负，还要行动得再快一点。马恒达已经搬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生意也恢复了常态。他把办公室重新装修，现在沿着门放了一张两边到墙的桌子，既是一个完备的工作台，也当作“前台”。这样，他完全把办公室变成了一家商店，更重要的是，它在申请者和当权者之间建立起一道有形的壁垒，桌后坐着一名年轻的助理整理申请表。普拉萨德还有很多钱要去赚，时间却很不够。他知道他应该慢下脚步，但每次想休息一下时，想象中的巨大损失就会在他脑子里乱撞，撞得头疼。“我不想和钱对着干（*Paisa chod ke jaane ka man nahin karta hai*），我赚得越多，就越想赚更多。”

他现在赚的钱大概比他的官方工资多500卢比。他也更想要过那种银行里有几十万卢比的日子。他还没有走出过恰尔肯德邦，但是他决定只坐飞机出行。“不管去哪，我都要坐飞机。”他为妹妹挑选了结婚对象，并同意出60万卢比的嫁妆，包括平板电视、冰箱和摩托车。“我们把她嫁出去时给的东西越多，她对他们家的价值就越大。”她的嫁妆是从兰契最好的商店买的，提前几周就送到了婆家。2016年年中，他用又一场豪华婚礼把妹妹嫁了出去。这场婚礼动用了当地一半的小时工，村委会的所有人都来参加了。然而第二天早上6点，普拉萨德照常开工，因为“生意比什么都重要”。

到了11月，对于大部分做其他生意的人来说，这一年就差不多过去了。对普拉萨德却并非如此。2016年11月8日，纳伦德拉·莫迪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政府一夜之间废除了印度二种大面值的现金：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总理解释说，这是打击贪腐和黑钱之战的部分措施。他的支持者表示，如果能说服12亿人用电子途径收付款，那么纸币的历史就可以终结了。国家陷入一片恐慌，政府对取款额度进行了严格限制，而新纸币却还在印刷中。即便印钞机日夜不停，ATM机外排队的人还是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愤怒。^[17]

印度的城市居民可能已经出离愤怒了，而农村却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在农村，并非所有人都有银行账户，很少有家庭会有多个账户。他们的大部分存款就放在床垫底下，都是面值500或1000的大票。这些村民不但要冒着失去他们全部积蓄的危险，还要被迫走十几公里到银行去，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钱的账户里取出小额的、政府批准数额的现金来。^[18]

农村是莫迪远大计划的真正试炼场。如果那些贫穷的、闭塞的村民们都能够无现金生活，那么印度就能给世界上一课了。“经验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总是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面对困难”，莫迪在电视上呼吁道。^[19]

普拉萨德被工作压榨得不行。从11月到12月，他在家中的办公室经手了总共400万卢比的银行转账。作为实验期间乡里任命的12位“商业代理”之一，他的工作不但要提供银行业务，还要忽悠他的客户们转向数字化。“很简单的，”他带着惯常的自信说，“客户一来，你就让他们通过和数字身份证相连的微型ATM机登入普惠金融账户。填写数额，比方说5000卢比，然后机器会要求他输入指纹，然后中介也输入指纹。两个指纹都核实通过之后，你就可以存钱、取钱，办所有银行业务了。每天，我要帮全乡的人转账10万卢比。”转账完成之后，普拉萨德就会让客户们试试政府的数字支付app，然后注册一张政府发放的借记卡。到12月末，他已经成功说服乡里的3000人下载app，或是申请借记卡。“我告诉他们，即便他们取出来新的2000块纸币，他们也得找地方换成零钱。为什么不直接把手机当作钱包用呢？”

普拉萨德不再为报纸工作了。“我没时间做那个了。整天跑来跑去的，又没什么钱拿。”他每天做的事就是拓展他的生意。“这是最好的工作。谁想给政府干活啊？我每个月能挣3万到4万卢比。”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给总理最有野心的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距离我的目标还远着呢”（*Dilli door hai*），他说。和往常一样，他不喜欢夸耀自己。

他没忘记登录政府网站，把他说服转向数字化的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都输入进去。2017年1月1日，恰尔肯德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兰契为莫迪对“数字财富”的判断举行了一场庆典。首席部长在点灯仪式之后说，这个计划得以实行，多亏了村民们的热情参与。政府决定奖励一些突出贡献者。普拉萨德第四个上台领奖——奖品是一台新的生物识别机，被漆得像初升的太阳一般火红。

参考书目

A. Raghuramaraju (2010), *Modernity in Indian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 Pamela Price and Arild Engelsen Ruud (2010), *Power and Influence in India: Bosses, Lords and Captains*, Routledge.

- [1] <http://www.elections.in/parliamentary-constituencies/2014-election-results.html>
- [2] 印度行政区划大致分为邦、专区、县、乡（市）、村（镇）。“block”为乡，“district”为县。——编者
- [3] [http://www.unrisd.org/80256B42004CCC77/\(httpInfoFiles\)/134916AD19B8FC29C1257EEE0056063E/\\$file/India.pdf](http://www.unrisd.org/80256B42004CCC77/(httpInfoFiles)/134916AD19B8FC29C1257EEE0056063E/$file/India.pdf)
- [4] [http://www.unrisd.org/80256B42004CCC77/\(httpInfoFiles\)/134916AD19B8FC29C1257EEE0056063E/\\$file/India.pdf](http://www.unrisd.org/80256B42004CCC77/(httpInfoFiles)/134916AD19B8FC29C1257EEE0056063E/$file/India.pdf)
- [5] <http://www.livemint.com/Politics/XeGU40jlsHGKrfwJK1ccL/Govt-announces-Rs60000crore-loan-waiver-for-farmers.html>
- [6]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latest-news/aadhar-takes-off-pm-sonia-launch-uid-in-tribal-village/>
- [7] <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aadhaar-and-mgnrega-are-made-for-each-other/article3599261.ece>
- [8] <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15/04/india-coal/loyd-text>
- [9] 指前文所提到的CO、BPO、DSO等职位的官员们。——编者
- [10] 笼吉是一种在东南亚国家穿着的男性服装，有时缝制成裙状，特别适宜在炎热的地区穿着。——编者
- [11]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jharkhand-turns-into-hotbed-of-corruption-109102000100_1.html
- [12]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todays-paper/tp-opinion/the-unfolding-koda-scam/article1068902.ece>
- [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sep/07/india-grain-farming-prices-poor>
<http://news.rediff.com/report/2010/may/23/study-finds-massive-corruption-in-govts-flagship-nrega.htm>
<https://www.outlookindia.com/magazine/story/71-villagers-say-theres-high-corruption-in-government-welfare-schemes/237112>
- [14] 一种印度男性传统下衣，由布围成的宽松长裤。——编者
- [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6089377>
- [1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116-farmer-suicides-in-first-3-months-of-2016/articleshow/52002524.cms>
- [17] <https://qz.com/836378/one-week-of-narendra-modis-demonetisation-in-india-the-good-the-bad-and-the-ugly/>
- [18]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demonetisation-hits-villages-tehsils-handful-of-banks-and-limited-staff-rural-areas-feel-the-pinch/>

[19]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53404>

PART

II

第二部分

“我已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我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倾听年轻人的冲冲怒气。他们基本上抱怨的都是同一件事：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未来，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也没有未来。驱使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做主的本能，和驱动他们政治理想的是同样的情绪——愤怒和焦虑。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70年历程完全是荒废的。他们质问，一个剥夺年轻人梦想的国家，能算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在他们看来，要为如今的状况承担责任的人不在少数。这份长长的追责名单以外国人开头，从莫卧儿帝国的君主到英国统治者都算在内。他们认为这些人毁掉了让印度站在早期文明之巅的一切——古鲁库教育、印度教王国，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富。印度是否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还从广受印度年轻人追捧的野史博客上搜罗出一大串数据扔给我，以兹“证明”。

直到公元17世纪，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直到18世纪晚期，印度和中国拥有世界GDP的50%。

在第一个千年里，印度拥有世界GDP的32%；直到1700年，印度还拥有世界GDP的24%—28%。

随后，他们的追责名单转向了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过统治权的政党和领袖，将矛头指向甘地和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们认为这两个人虽然了解一个刚刚独立的印度需要的是什么——经济复兴、军事力量、文化弥合——但却将国家的精力全用在了世俗主义、民主和社会对这些抽象理念的接纳上。

尼赫鲁在最关键的时期毁掉了我们的国家，那时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为印度的未来几十年打下坚实基础并指引方向的领袖。

尼赫鲁在国家的奠基时期几乎走错了每一步，没能让印度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团结的、有文化底蕴的国家。

如果任他领导，那他就会解散整个军队。因为他想要以外交政策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放飞他的和平鸽。

我并不憎恨甘地，但他的一些决定真的很可悲，比如建立尼赫鲁-甘地王朝，保留种姓，以及以道德之名向穆斯林让步。

他们告诉我，年复一年，在尼赫鲁后代控制下的政党，沿着他的愿景将印度朝着当初的承诺越推越远：“王朝统治、民不聊生、贪腐滋生、民粹主义和少数民族姑息政策横行……”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国大党——自印度独立以来掌权时间最长的政党——如何损毁了印度梦。他们说每次有人站出来想要得到关注时，国大党总会抬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人扔到他们面前——这人要么更穷，要么来自更低等的种姓或者更边缘的地区。因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开始憎恨所有在这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中排在他们前面的人。

如果你恰巧是个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憎恨也可以来得很容易；从国家第一次被征服开始，你就感到自己的权利在一连串的反叛之后被一点点骗走了。你希望所有人都能见你所见——你就是印度的化身，每一次对于它古老秩序的打击，就是对你自己社会地位的打击。你不用排那条长队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愤怒。不管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我所见到的年轻印度教徒想要的都是一样的：经济增长高于社会公正，多数民主高于自由民主，文化民族主义高于世俗主义，宁可要边界战争也不要睦邻友好。这些东西既包括人们想要的东西，也包括之前拥有现在失去的东西，比如你在自己那个圈子里的地位。

这些年轻人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焦虑呢？很多人转向了政治。通常，他们不用走出自己的学校或者生活区，就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发泄愤怒、消解焦虑的组织。这些群体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要看他们为了自己的愤怒和焦虑愿意走多远——比如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印度教激进分子，或者就是一个为印度教的利益工作的组织。他们中有些会参与竞选，比如印度人民党，也有些在幕后工作，比如国民志愿服务团（简称RSS）。他们可能会设定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让那些年轻气盛的印度教徒发泄怒火——全印度学生会（简称ABVP）面向印度的大学生，印度青年民兵团则面向印度的地方社群；或者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捍卫印度教至高无上的象征——牛、传统、女人。如果不是纳伦德拉·莫迪横空出世、扭转乾坤，这种情况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总要有人看到这个拥有雄心壮志的群体的票仓。除了被束缚的沮丧感之外，年轻的印度教徒还有什么？那就是提升自己社会层级的渴望。莫迪理解他们的沮丧。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你们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我们最强大的资本。只有你们

成功，国家才能成功。然而你们的需求和受到的限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即便你们接受了教育，也很难找到工作。脆弱的基础设施和贫乏的公共服务将你们束缚在低效、受辱、生活质量低下的泥沼之中。整个国家似乎卡在了历史中，而你们则被束缚住了手脚而无法跨入未来。

这一切都需要改变。

他也理解他们的渴望。莫迪需要做的就是说出励志的漂亮话，然后他的“印度教优先”理念就成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法宝。他不仅用他们的方式讲话，也用他们的方式沟通——公开信、Facebook视频、Twitter。

你的梦想应该是做什么事，而不是成为什么人。

杯子是全满的——一半是水，一半是空气。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靠鼠标上的一根手指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项目，把自己当作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只要他能凭着高喊“印度必胜”和“年轻就是力量”让年轻人们热血沸腾，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创造新工作，能不能打击腐败，根本就没人在意。

在他复兴印度的花言巧语的带动下，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成为主要政党后，几乎赢得了他们参加的所有选举。印度人民党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莫迪的呼唤下崛起的政治团体，基本上每一个为印度教徒谋利的组织都是如此。自莫迪掌权，ABVP掌控了校园，印度青年民兵团掌握了住宅区，成百上千自发的军队走上农村的高速路寻找丢失的牛。我在印度中部见到的年轻男人们，不是被愤怒驱使，就是被向上流动的渴望驱使。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纳伦德拉·莫迪的政治主张和新民族主义印度教所吸引。

那其他族群的人要怎么办呢？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所有我认识的、愤怒或上进的、非高种姓印度教徒的人。我问沙赫纳瓦兹·乔杜里，一个极度愤怒和想要往上爬的穆斯林青年，能否在印度政坛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说他相信莫迪的话。那莫迪政府对于穆斯林那些官方和非官方的限制怎么解释呢？从他们吃什么到他们爱谁，莫迪政府都要管呀？他避开了我的问题。我问了有时在课上引用莫迪语录的穆因·汗同样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往上爬，那你就应该闭上嘴，继续

努力。他们也许并不喜欢莫迪，但是我知道他们不敢告诉我——一个高种姓的印度教记者——他们的工作和莫迪的一样，就是贩卖抱负，他们害怕站在金钱的对立面。

印度的年轻女性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又是怎么看的呢？她们也感到愤怒吗？是的。她们想要向社会上层攀爬吗？当然了。但我却很少看到她们参与地区政治。政治太男性化、太不安全了，她们这样为自己辩解。她们发现身边愤怒的年轻男人们把怒火转向她们，认为她们对于提高自身地位的渴望是一种威胁，甚至唯恐闯入她们反抗和复仇的大戏里。参与政治的年轻女性并不算少，至少足够填满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女性席位。但如果你走进大学校园或者一个小村镇，是不会看到任何女性为印度失落的文明而义愤填膺的。然而我所见到的年轻女性都一眼看到政治的本质：权力。如果一个女人想得到权力，事情会是什么样？一个女人为获得政治权力孤军奋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吗？我想要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4 男愤青

2014年，我第一次见到维卡斯·塔库尔。当时他29岁，计划在五年之内赢得一场选举。单从外表来看，他一点也不像个印度北部的年轻政客：不穿传统库尔塔衫，不留小胡子，不带蛤蟆镜，身后也没有小跟班。他穿着带图案的T恤（卷起袖子时会露出一个迷幻的湿婆文身），破旧的牛仔裤和沙滩凉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过周末的程序员。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来自中产家庭、上教会学校、讲英文的年轻人会立志要赢得选举，而不是做个公司白领。我在Facebook上找到了塔库尔，像大多数想要卖东西给同龄人的印度青年一样，塔库尔也在社交网络上做生意。他在一个相当有趣的时间点得到了一份重要的工作——印度人民党在恰尔肯德邦的第一个社交网络作战室的召集人。塔库尔的工作是塑造邦内全部50万网民的政见。在全国大选中保住了绝大多数席位的印度人民党，彼时鼓足干劲想要在各邦重复他们的胜选法宝。这其中就包括社交网络作战室：一群擅用互联网的年轻党员坐在电脑前生产“内容”——从更新状态到段子、表情包，任何能让手机用户“转”起来的东西。

我见到维卡斯·塔库尔的时候，他要在六个月内为恰尔肯德邦的印度人民党“建立声望”。在我们伴着咖啡的长谈中，塔库尔对他的政治理想滔滔不绝，对于这个作战室的位置和工作方式却讳莫如深。“这个作战室建立在钟乳石理论上，”有一天他突然宣布说，“这些政治理念一点一滴积累起来，渗透到民众当中去。”他直勾勾地盯着我，以示强调。塔库尔对于自己“思想者”的人设颇为自豪。他告诉我，他人生的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大问题：人生的意义、印度的历史、政治的未来。作为一名焦虑的少年，塔库尔在某一时刻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从根本上就是错的。虽然在历史上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印度却不曾被世界重视，而印度教徒也不被印度重视。他认为造成这种权力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但首要问题是印度搞错了孰轻孰重。作为一个在印度于1991年打开国门前不久出生的人，塔库尔在第一次意识到印度的国际地位时就十分失望。他将矛头指向决定国家优先事项的人——从2004年到2014年，从塔库尔19岁到他29岁，一直执掌印度的国大党。

在塔库尔看来，国大党就是阻止国家走向伟大的化身。国大党的掌权者们被殖民的负担压得抬不起头，无法带领国家崛起并走向繁荣。他

们的政治是懦夫的政治，他们的政策是一串让塔库尔恨之入骨的字眼：“补贴”穷人，“安抚”少数民族，为落后种姓提供教育和就业“名额”，与敌人“对话”。在一个对萌芽中的独裁政权疾恶如仇的青少年看来，这些话一文不值。塔库尔告诉我，学生时代他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毛主义者这样的左翼分子为伍。然而，这个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他赞成他们诉诸激进行动，但对于阶级斗争他有不同的看法。塔库尔想要的是恢复他的家族失去的特权。谈话中，他经常提起他的祖父母不得不放弃北方邦的一个封建庄园，因为印度刚独立时重新分配了土地，作为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一部分。“我们搬到了布尔尼亚，和比哈尔邦相邻。我家的新房子就在一个穆斯林贫民窟（*basti*）的旁边，这地方因为经常持械抢劫富裕的印度教家庭而臭名昭著。总有人图谋不轨，但我们是塔库尔家族的，所以我们会用塔库尔的方式回击。”

他没解释塔库尔家族对于招惹了或可能招惹他们的人，究竟是怎么回击的，但此事不言自明。我从小就听过比哈尔蓝维尔军杀人的故事。1990年代，塔库尔家族（一个强大的地主种姓）的私人军队加入了比哈尔一场由毛主义者挑起的阶级战争。在一系列意在恢复秩序的屠杀中，他们杀死了300多名达利特人（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1]比哈尔的塔库尔家族习惯了当老大，即便在当时，他们还是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从洋洋得意的胡须，到大量的武器装备，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保住这些土地。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应对1990年代的一系列变动——一面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根基的新型政治，一面是由市场友好型改革推动的新方向。

他们看好的是，那个年代还有更多事情在发生。1992年12月6日，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这座建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清真寺坐落在北方邦的阿约提亚，这里被认为是罗摩神的出生地。^[2]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利用这次胜利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帮助印度人民党赢得了1999年的大选。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胜利给了塔库尔家族希望，他告诉我，“直到印度人民党掌权，我们的家族和社区才开始感觉境况有所好转。”从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成千上万的训练小队。每天早上5点，10岁以上的印度教男孩会在社区内最大的空场上集合，训练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士兵。“我在布尔尼亚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一，就是那段时间RSS在贫民窟集结训练小队（*shakhas*）。”但塔库尔一次也没去过。等他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家已经搬去了兰契。他爸爸在当地卫生部找到一份文职工作，他家也继续过着被他称作“普通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他自己则被送到这

个城市众多教会学校中的一所。他不喜欢这所学校，对此也毫不掩饰。“我当时前额点着红点，手上缠着佛绳。有一天，一位神父告诉我不能这样，他说学校不赞成宣扬任何宗教信仰。我问那为什么还有教堂，为什么还唱基督的圣歌，他则说要把我赶出学校去。不久之后，我就被学校开除了，但离开学校之前，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暴揍他一顿。”一周之后，塔库尔的父母把他送到一所建立在辨喜的哲学之上的学校。正是这种哲学思想，让塔库尔的焦虑得到了解答。辨喜不只是位传播印度教的和尚，他出生在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个上层家庭，从小接受英语教育。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让物质主义横行的西方世界认可追求精神生活的东方世界才具有天生的优越性。他既穿橘黄色的袍子在树下冥想，也用英语写书、演讲。他是被印度年轻人认可的最具感染力的励志演说家，他的书销量堪比保罗·科埃略。^[3]

选择一件事，把它当作你的生命——脑子里是它，梦里是它，生活里也是它。

起来！醒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变得更强。

辨喜说服印度教徒们，要以自己的信仰为骄傲。他要求他们不把宗教看作一套晦涩难懂的信仰和行事方法，而是看作对于世界难题给出的一套有逻辑的，甚至很酷的答案。他告诉那些当时被英国殖民了半个世纪的印度人，要以自己的文明为傲。他们这些“千百万个对压倒一切的白人权威肃然起敬的愚人们”，提供重建国家的一种方式——宗教。辨喜赋予印度教徒们一种专属的世界观：一份永恒的礼物。这种世界观驱使那些听过他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演讲的印度教徒挑战西方的叙述，也驱使14岁的塔库尔在1999年读到这些之后做出同样的反应。^[4]在读完八卷辨喜的思想著述之后，塔库尔开始读所有他能找到的印度历史和印度教哲学。他说，他就是这样开始建立一个未被西方世俗观念改写的个人知识库。塔库尔选择传媒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在课堂上，他学习信息的运用和语言的艺术；课余时间，他为当地报纸撰写社论文章。他大一时做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加入ABVP——这是RSS的学生分支，也是大学范围内印度教统治下的一股激进力量。2015年，这个组织声称有320万成员，分布在2万所学校中，他们中的100万人是在印度人民党2014年全国大选获胜后加入的。^[5]

在新学校，维卡斯·塔库尔再次和基督教权威起了冲突，这次他想要

以牙还牙。复仇是加入ABVP的一个好理由，这个组织吸引的就是校园里最愤怒的年轻印度教男生。ABVP是个令人恐惧的力量——不只是针对天主教学校里的教徒——因为它总是站在异见的一边，且常常有武装加持。“我加入ABVP是有原因的。以前我看到校园里有印度教女孩被贫民窟的穆斯林男孩骚扰会很生气，但没人敢说什么。”大学的那几年，塔库尔沐浴在ABVP阳刚的政治理念当中。他给我讲他和同僚们多少次心满意足地碾压了敌人，说的時候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做了你能想象到的一切，打架（*maar-peet*）、霸凌（*gundagardi*）。我们在当地警察局有关系，只要我开口，他们不用拘捕令就可以逮捕任何人，并且把他们倒挂三天。”

面对这些年轻人给我讲述的“壮举”，有时我不知如何回应。该表现出钦佩、疑虑，还是保持微笑？我能明显感到他们夸大其词，甚至感觉他们这么说就是为了跟我显摆。但是当他们在故事里假想出障碍、夸大对手的时候，我还是很难保持面不改色。幸好塔库尔更喜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思想上的战士。有一天他跟我说，“曾经，政治是‘政治操纵’（*thekedari*）的礼貌性说法，只吸引某一种人，他们都粗暴强硬且虚伪圆滑。但现在，因为年轻人对政治的冷感成了一种危机，全职政治家应运而生。我们去了解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了解话语的力量，然后有了自己的发现。”辨喜早在19世纪就说过：“事实可以有一百种叙述方法，每种都是真的。”这番谈话是我在见到WittyFeed的CEO维内·辛格尔一年前进行的；之后那位爱国的CEO和我说的有关青年与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在重复这一次对话。在辛格尔开始收看新闻频道并建立自己对于印度与世界的见解之前好几年，塔库尔就已经埋头于书本和文章，想要证实自己的猜想。关于这个国家失势的所有问题，他都能推荐一本书给予解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如何毁掉了印度；国大党如何毁掉了印度经济；西方世俗主义又如何毁掉了印度教。塔库尔的政治是愤怒政治。他既不穷也没有陷入绝境，他不需要政府的救济，但他对政府在救济的人感到十分愤怒，因为觉得他们不配。每次我见到塔库尔都问他为什么想从政，他的回答一直不变：国家需要他。“当我们想到政府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是蔬菜或者油价？要改变这个思想，我们要做的有很多。”

所以不是为了让印度教徒战胜其他人？我问。“我从政是因为我想代表印度教徒，不是为了破坏其他人对他们身份的权利，我的政治是为自己人发声。”他说。有一天——那时我们认识了大概几个月——他告诉我，“我必须得到有一个有权力的位子。不是为了钱，我的家产还不少，我就是为了获得权力。”他父亲很希望他能在政府谋个职，如果他儿子不

能像他祖辈那样左右贫苦农民的命运，那至少要保住他自己的地位。“‘儿子，在政府谋个职吧’（*Beta, sarkari naukri kar le*），我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我告诉他，‘如果我就在政府里找个工，那谁来当政府呢’（*Sarkari naukri kar li, toh sarkar kaun banega*）？”作为一个计划在五年内参与一场竞选的人，塔库尔并没有后台。在我看来，他所拥有的就是Facebook上的5000名追随者。“你应该去看看，我在Facebook上发布与政治有关的东西，然后碰巧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几百个追随者会立刻反扑他。”

这些追随者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攻击在何为印度人的问题上与他们有分歧的人？至此我打过交道的只有精神上的，而非武力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守卫者。我对那些选择武力斗争的战士们也很感兴趣，但让这种人坐下和我喝杯咖啡，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加入战斗，却绝非易事。终于，我找到了一个人。

2015年2月14日，我在密拉特一家购物中心的肯德基见到了一名19岁的少年。我问他，为什么早上离开家的时候，要在摩托车的后面绑一根铁棍？阿尔琼·库马尔又瘦又小，苍白瘦长的脸上还长着青春痘。他在我对面坐了六个小时，小口吃着炸鸡，其间很少和我对视。和人面对面聊天却一直看手机，这样的年轻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真正吓到我的是我每次看向他身边的两个朋友时，他望向我的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库马尔并不想见我，原则上他是不和女人打交道的。我正是他憎恨的那种女人——城里人，独立，有主见。但当他在座的一位朋友早上给他打电话说他们得见一个从德里来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就来了。于是他就坐在这儿，漫不经心地吃着我给他买的套餐，并勉强地回答我的问题。

最后，他一边用叉子在盘子上画圈，一边挤出一句话：我讨厌情侣。

他在公众场合——公园、商场、快餐店——看到情侣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把铁棍扔向他们。他不能每天都这么做，所以他每年最盼望的就是情人节。这一天，印度青年民兵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年轻的小情侣。^[6]这也是他们一年中唯一可以获得世界关注的一天——记者跟着他们跑，警察则随时待命处理他们惹的麻烦。这些男孩子会提前很多天就计划他们的行动，观察小情侣们的动向，分配监控点。为了他的第一次情人节行动，库马尔准备了很多年，为的就是建立一个令人生畏的光环。如今，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情人节了。这一天，整个密拉特都是他

的战场，而他则是一个披着战袍的指挥官，要拯救密拉特于危亡。他一边给我讲全城的各种“恋人聚点”，一边倒计时等待黄昏的来临。他们一直在等领导的电话，领导将给他们晚上的行动分配位置。库马尔本想在等待指令时安静地计划他的行动，无奈他周围的环境实在不适合战略部署。从早上开始，餐厅就满是情侣。库马尔的眼睛不再盯着手机了，而是密切关注着我们身边玫瑰花和泰迪熊的交换活动。这种仪式让他心生厌恶。“我希望，我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人脸上棒子。”他自言自语，瘦骨嶙峋的手指急不可耐地敲打着。然而，他还没得到开始行动的指令。

库马尔上五年级的时候就加入了印度青年民兵团，那时他才13岁，他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在邻里间看起来很酷。库马尔长大的地方，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浑噩度日，直到下一个节日的到来。他发现，在这里只有为保卫印度教民族主义而战，人生才有意义。然而作为一名青少年，他是没有机会在一线战斗的。所以作为青年战士的前几年，库马尔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其他13岁的孩子一起站在印度青年民兵团在当地的办公室外，装作很凶的样子。开会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僚们就负责将塑料椅子摆成一排，测试麦克风的聲音。他的职位升得很快，不久他就掏出印度青年民兵团的徽章开始处理各种大事小情，从低学校出勤率到街头群架，他都能管。所有人都会退后，或者在他看来“大家给你izzat（面子）”。17岁的库马尔进入密拉特的乔杜里·查兰·辛格大学时，已经是名有资质的民兵了。为了确保大家都知晓这一点，库马尔开始翘课。“学校是我说了算（*College mein apni chalti hai*）。”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当他心里也有点没底的时候，他就这么宽慰自己。老师会向校长告状，然后校长就会威胁让他停课。但是如果ABVP大学部主席给校长打个电话，看似温和实则严厉地警告他这么做的后果，校长还会坚持采取行动吗？“秘书长（*Mahamantri*）认识警局里的所有人，学校能再向谁告状呢？”

渐渐地，库马尔将影响力拓展到另一个圈子。没人管他的出勤了，于是他便得寸进尺：组织抗议活动、毁坏公物、碾压敌人。2014年，库马尔愤怒地得知“普通类”法学生——大多数是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在一次内部考试中比“预配额类”的法学生得到更低的分數^[7]。库马尔参与了ABVP同事的一系列暴力抗议活动，反对校长的“偏袒”，希望校长辞职。那一年早些时候，北方邦政府决定干预，库马尔一口气告诉我说，是他“独自”去见了地方长官，把他们的要求告诉他。（地方官是由中央政府派遣的，而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5月赢得了对中央政府的掌控

权。)他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举足轻重过。“你应该看看他办公室的安保。我进去之前，他们给我拍了照片，还录了视频。我的天，你连个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库马尔现在把他的狠毒都用在了一件事上：打击穆斯林。像密拉特很多同龄的男性印度教徒一样，他对穆斯林的憎恨与生俱来。密拉特是一个由42%的穆斯林人口和58%的印度教徒人口组成的城市，一直都被划分为“易暴乱”地区。^[8]它的第一次教派暴乱发生于1939年，远早于印巴分治，而最近的一次在2015年。成百上千的居民在暴乱中丧生。新闻总是将其归咎于某个偶然事件——印度教徒大学生和穆斯林大学生打斗，一位穆斯林男子娶了名女印度教徒，穆斯林侵占印度教徒财产——但是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制度化暴乱体系”的存在。^[9]如果一个城市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人数、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都旗鼓相当，这些地方的印度教徒相比其他地方就更难和穆斯林共处。1987年，在一次骇人听闻的教派暴力中，一群印度教准军事组织成员冲进一个穆斯林聚居地，挑了45名男人带到河边，让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个一个开枪打死。45个人，最后只活下来3个。^[10]

教派憎恨一般是密拉特的男孩子体验到的第一种强烈感情。穆斯林男孩每赢一次街头群架，库马尔就怒不可遏；每次有穆斯林在他的街区买房子，他也十分沮丧；每当他们街区的印度教徒女孩和穆斯林男孩约会，他就怒火中烧。所以当印度青年民兵团的分会发誓再也不会允许一个穆斯林男人追一个女印度教徒的时候——他们管这叫“爱的圣战”——库马尔立刻加入了该分会。从那时开始，库马尔一队人马会从总部收到消息，说看到一个女印度教徒和一个穆斯林男孩在一起。他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两个人不会再见面了。对库马尔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牵涉一定程度的暴力行为，这是他最喜欢的部分。他在情人节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转悠，拼命寻找印度教徒—穆斯林情侣。“去年很好玩。我观察了那男的一个月，正巧在那一天我看到他和一个达伦波里的女孩在甘地公园里手牵手。我简直无人能挡。”

如今的库马尔已经得到了当年那个排队要入印度青年民兵团的少年所渴望的一切：威望、地位和荣耀。“不管我站在达伦波里的什么地方，立刻就会有一长队的男人站在我身后。”一个密拉特男人在得到这一切之后，还想要什么呢？库马尔2017年就要毕业了，他手中会有一个商科的本科文凭，却不知道拿着它能干什么。密拉特剩下的上千名男青年也面临同样的境地。库马尔已经对未来感到焦虑——他无法做回透明人了。

他知道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在考虑从政”，深深叹了一口气后，他说。

那些解释特朗普的胜选和英国脱欧的时评，把阿尔琼·库马尔这样的人称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和他一道的有千百万被遗忘的印度青年，他们的愤怒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当他在印度青年民兵团的办公室摆椅子的时候，世界正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库马尔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心仪他的女孩子。再往深里说，他不知道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只有一个方法：惩罚所有排在他前面的人。他认为这就是政治的意义。他也知道，只有一个政党允许他这么做。

库马尔后来就完全不去上学了。“我把我的时间划分给ABVP、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徒联合会（简称VHP）——在这个办公室待俩小时，那个办公室待仨小时，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两个月前，当印度人民党在密拉特举办大会的时候，库马尔拼尽全力在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最高层面前刷存在感。“有25 000人出席，都是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名流。”库马尔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套近乎”上了。他从桌上拿起手机，开始背诵那些已经“认识他”的人的姓名和电话。他希望我把这些细节写下来。他说如果我想麻烦这些人办事，提他的名字就行。我有点替他难过，虽然我知道他接到电话指示的那一刻就会放弃这个采访，冲到街上去。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政治。“为了服务国家，”他说，表情肃穆。但是政客不是说当就当的，我说。他笑了，这是那天他第一次笑。他说我不应该瞧不起他，他自有计划，即追随一个计划已经成功的人，走他的路。桑吉特·索姆2012年作为来自密拉特的印度人民党候选人赢得了邦议院的席位，但他不是因此成名的。2013年，在议会选举的几个个月前，印度人民党意在赢得北方邦的支持，而这位年轻的议员通过手机转播了一条假视频，直接引爆了北方邦西部的一场教派暴动，导致50人死亡、5万人无家可归。印度人民党在暴动之后的选举中赢得了80个席位中的71个。索姆这个连书都没读完，最大的本事就是引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端的人，获得了奖赏。^[11]自此之后，他一直是密拉特年轻印度教徒们的榜样。“他每次来密拉特，我都跟在他身后”，库马尔说。

库马尔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个原因。索姆最近雇了一位私人教师教他英语——这个人正好是库马尔的哥哥。一个通过教唆男印度教徒们和穆斯林邻居开战而走上政坛的人，为什么要学英语呢？库马尔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桑吉特·索姆在政治上的成功可以让他一下就获得那种别人要奋斗一辈子才能享受到的生活，但如果他不会说

这种特权阶级的语言，他在别人眼里就还是个土包子。他出国访问、会见显贵、混上层社会的时候，英语才是他需要的语言。根据库马尔在密拉特听到的传闻，索姆个人提升的长期计划还包括从澳大利亚拿一个MBA学位。库马尔的英语不好，但他倒不太在意。他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解决，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树立他的政治形象。这项工程在最适合他的平台上展开：Facebook。库马尔一共有6个Facebook账号，每个都面向不同的受众，从密拉特的小混混，到为“爱的圣战”斗争的国际战士，都是他的受众。他每天24小时在线，经常整晚都不睡觉。我问他还有没有时间留给个人生活，他疑惑地看着我。留给女孩，我说，“你喜欢女孩吗？”库马尔告诉我他更愿意“和女孩保持距离”。他的朋友听了这话差点把可乐喷了出来。“他之前有过女朋友，”这个朋友说，“不过她跟别人跑了，一个有钱人。”

“是真的吗？”我问库马尔。

“女孩子啊，”他的目光又回到了手机屏幕上，他嘟囔着说，“她们不值得信任。”已经下午5点了，但库马尔还没有接到上头的电话。等到我们分别的时候，电话显然是不会打来了。印度青年民兵团取消了年度情人节暴力活动的原因是，领导们意识到情侣们不会挤在密拉特的街上和公园里。他们会和以前一样待在肯德基和麦当劳，吃不起这些人就会攒钱在新建的商场里安全地度过这特殊的一天。库马尔的目标受害者们一整天就坐在他身边——牵着手，交换泰迪熊，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可乐——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怒视他们。他们被全球化带来的安全空间保护了起来，也是因为全球化，库马尔被贬到了社会地位排名的末尾。生活看起来对他不公，当他骑着摩托回家的时候，那些在爱情上比他幸运的人都还没回来。这时的库马尔，真的没力气继续战斗了。

关于女孩子的问题，两年以后又被提起，这次是在卡尔纳尔——德里和哈里亚纳邦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再一次，我问一个为了保卫印度教的荣誉而准备出发巡逻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愤怒？和阿尔琼·库马尔一样，萨钦·阿胡贾也把自己看作一个拯救者。不过他要从一群异教徒——穆斯林、基督徒、达利特人——手中救出的不是女印度教徒，而是牛。和库马尔相比，阿胡贾更能适应生活。首先，他更外向。面对提问时，这名26岁的年轻人至少不会把头埋进他的智能手机。他有着摔跤手的身量、黑帮的态度，以及“杀人的执照”——一张国家开具的身份证，证明他是“牛民团”的成员。这是哈里亚纳邦为全国护牛运动做出的贡献，旨

在保护神圣的牛不会遭到吃牛肉、穿牛皮的人的“毒手”。^[12]

那个晚上，我们倒是没有聊以神圣牛母为名发起的战争。我们的对话中没有一次谈到穆罕默德·阿科拉克，这位年老的穆斯林劳工因为被怀疑在自己的冰箱里藏了一袋牛肉，而被北方邦西部的印度教暴徒杀害。

^[13]我们也避开了古吉拉特邦的城镇乌纳，那里的一群达利特人被印度教暴徒们绑在卡车后面打到不省人事，因为前者干了由种姓制度分配的工作：剥牛皮。^[14]当最后一抹残阳也离开了位于卡尔纳尔中心的寺庙庭院时，萨钦·阿胡贾正和我激烈地辩论女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先通过三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概括了一下女人不应该是怎样的。

（1）女人不能像他认识和喜欢过的那个很好的卡尔纳尔女孩那样，跑到德里去工作，然后和小短裙、夜生活的大城市文化搅和在一起。

（2）女人不能像他最好朋友的老婆那样，因为觉得在家待着给丈夫全家做饭太无聊，就抛下丈夫离开了。

（3）女人也不能像当地媒婆给他挑的那个女孩那样，经他一个住她旁边的朋友调查，基本上和那一片的每个人都在一起过。

“比如你吧，”他指着我的衣服——库尔塔衫和牛仔裤，“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但你明白衣着得体的意义。”我反驳说看一个女人不能只看她穿什么。每次我和阿胡贾在女性问题上有所分歧时，我都试图保持礼貌。“牛民团”是当今印度最令人胆寒的一群人。他们的官方标志是一个鎏金的牛身，两侧伸出刀剑和AK-47。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将用生命保护牛母的数量丝毫不变。这是一场让敌人永世不忘的战争。”这支军队以独立共和制运作。他们有自己的团歌和宪章，还有一个车队，以及囤积的武器和军火。牛民团的司令是通过三层投票选出来的；步兵则是通过提交申请表选出的。在哈里亚纳邦，每天都有几十个年轻人申请加入这个队伍。^[15]他们被“把法律握在手里”的暴力所带来的刺激深深吸引，“牛民团”的创立者约根德拉·雅利安在罗塔克的办公室这样告诉我。

约根德拉12岁就离开了他的村庄和家人，加入了一个由印度教改革派分支——雅利安社开办的古鲁库。眼前的约根德拉穿着白色棉质的兜提，头发又黑又长。我问是什么驱使他放弃了普通的生活。他说，“不然的话，就是上班—回家—养娃的日子。我想做点不一样的。”正在走向中年的雅利安，确实过着不同寻常的生活。他单身，住在静修所，领导着一支5000士兵的军队。住在静修所的人们每时每刻都要遵守它的常规安

排。“4点起床，洗衣服，祈祷，在健身房举重，吃纯素的食物，喝牛奶”，帕敏德·雅利安说。他在白天是雅利安社的高级秘书，晚上是保镖。离开静修所的晚上，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提醒他说，他本可以上大学，和一个女孩谈恋爱，到酒吧去玩的。“所有23岁的人都能这么做”，他说。他也提醒我，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经历他这样的夜生活：“飞车、枪战——普通人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東西，就是我们的生活。”

萨钦·阿胡贾成为“牛民团”的成员，是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和库马尔不同，阿胡贾加入战斗不是因为年少的血气方刚。他的行动都有方法可循。一个男人想要变得完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掌握时间的能力，他告诉我。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卖保险；晚上7点到8点，练习举重；晚上9点以后，他回应牛母的“召唤”。他之所以保护牛，不是因为这和他的印度教徒身份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牛民团”能带给他一种年轻人最渴望的东西——威望。“人们会服从你，”他这么跟我说，和库马尔与塔库尔的口气一样，“你就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

对于阿胡贾来说，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没有什么比感受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了。他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和过去不同了，说得更直白些，他找不到其他能证明他存在意义的东西了。家庭不能：他尽自己的义务做儿子、孙子、哥哥、姐夫，但这没法让他高其他男人一等。女人不能：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的。（“卡尔纳尔的所有女孩子都有男朋友，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结婚了。”）工作也不能：他既没有政府公务员的权威，也没有农场主的趾高气扬。一天8个小时，阿胡贾都在卖保险。

虽然他对于做自己的老板、每天拓展自己的生意十分骄傲，他也清楚别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关心的是他的那张身份证——在路口、当地RSS办公室、警察局，每当他被人认错的时候，他都会从兜里掏出这张身份证。“牛民团”的身份给予他的并不只是一张身份证。这让他成为这个袖珍小镇从港口到铁路尽头的所有牛的首席拯救者。为了保有这个特权，他要做的就是不断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护牛者。要不是因为印度国内有一帮失意者总在他们的WhatsApp小组里发并非自己营救的牛的照片，他也用不着这么做。（“他们只会在真的护牛者从走私犯手里救下牛的那一刻去合影，然后立刻点击发送。”）

人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把护牛者当回事了。就连他们的英雄——纳伦

德拉·莫迪也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真假护牛者的问题。^[16]没有人会质疑阿胡贾对于“护牛”的投入，他既能够熟练地讲出牛在印度教里的神圣地位，也能警觉地在街上搜寻被偷走的小牛。但他知道不能洋洋自得。一切都是检验——连护牛人在大巡逻之前喝热牛奶的速度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是评委。不知阿胡贾是否预料到他的上级在莫迪演讲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会向他抛来一个问题。“牛民团”的地区主席桑迪普·拉纳在寺庙里传递命令时狠狠瞪了阿胡贾一眼，问上个月给他的那两小瓶牛尿怎么样了。阿胡贾愣了一秒，然后说他喝了一半了，每天早上滴两滴在他的水杯里。拉纳要看半空的瓶子的照片，阿胡贾说当天晚上在WhatsApp上发过来。照片恐怕要等一阵了，因为那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就在不到24个小时前，印度士兵冲过了有争议的克什米尔边界，在巴基斯坦控制的领地炸毁了一串军事营地。^[17]于是轮到卡尔纳尔的护牛者们采取边界行动了，虽然他们的边界就在80公里之外那个标志着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边界的警察哨所。相比地理边界，这更是一个文化边界。北方邦有大量穆斯林和达利特人，而哈里亚纳邦以食素的印度教徒居多。^[18]掌控哈里亚纳邦的是一个维护印度教徒利益的政党；而统治北方邦的是一个依赖穆斯林选票支持的政党。^[19]在权力的舞台上，牛是个很安全的道具。这不是印度教徒第一次用他们的神兽置假想敌于难堪的境地了——一百多年来，圣牛一直是非常好用的吉祥物——这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阿胡贾第一个骑着摩托出了寺庙大门，我坐在车里跟着他。车上有五个人——拉纳和其他两个人坐后座，一个年轻的护牛者开车，还有我。杆子和锁链都被扔在后备厢。另外还有至少四队骑摩托或者开车的护牛者跟着我们上了高速。我们在警察局外面下车的时候，后面已经排了一大串车。知道拉纳一行人要来，哈里亚纳邦的警察已经设置好了路障，将两个邦之间的交通完全切断。所有人都进了警察局之后，拉纳给他们分配了当晚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搜查车辆，有的讯问司机，有的获取情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护牛者们爬上一辆接一辆急停在路障前的车，给每辆车都来了一遍搜牛行动。每个锁都被撬开了，每个盒子都被掀开了。那天晚上，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之间运输的东西很多：苹果、洋葱、肥皂、鸡蛋，还有汽油。但对阿胡贾和他的同僚们来说，很不幸的是，这里面一头牛也没有。

我坐在车里观察了整个晚上。拉纳不允许我出去，说是担心一旦情

形失控我可能会吃枪子儿。即使我乖乖待在门窗紧闭的奥迪车里，他都不能保证我一定安全。自封为我的生命和名声的守护者之后，他把我托付给了那晚的司机，一个无比有激情的护牛者。维诺德·苏里亚旺希是一名典型的“仇恨者”，胸中有无限强烈的仇恨之情。我们在黑暗中坐着的三个小时里，苏里亚旺希不厌其烦地给我过了一遍他的“仇恨”清单：穆斯林、国大党、大城市文化、自由媒体。直到几年前，苏里亚旺希还经常和一群激进派印度教徒到北方邦去。就是这群人经常给印度教学生讲，他们的文化和身份如何受到威胁。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他就将行动转移到社交媒体上。他现在手上同时运营着6个Facebook主页，100个WhatsApp群。“从早7点到晚7点，我在Facebook上更新伊斯兰教的议程表。直到凌晨2点半，我都一直在WhatsApp上社交。”像库马尔一样，苏里亚旺希也把社交媒体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

他们能够“运营”的Facebook主页和WhatsApp群越多，运营自己不同政治身份的能力就越强。他们用每个账号建设政治人格的不同方面，从热爱圣牛到抨击孟加拉人都包括在内。发布内容固然重要——新闻文章、个人观点、活动照片——坚持不懈地发布更加重要。我渐渐习惯了一天收几百条WhatsApp信息，以及被同一个人申请加六次Facebook好友这种事。“所以这些人当中到底哪个是你呢？”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他说他也有一个账号是代表他本人的，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以“本人”的身份给我发一个好友申请。我慢慢对这种事习以为常。你需要一个做自己的地方——分享自拍和歌、笑话和励志名言。

和阿胡贾一样，苏里亚旺希也给自己打工。他经营着一家从他爸爸那里继承的借贷公司。“我每天干什么？有人来借钱就借给他，有人来还钱就收个利息”，他说。剩下的时间则属于国家。我表示敬意地点了点头。我们终于过完他的“仇恨”清单时，已经是半夜了。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无聊，我说是。他说他要用手机给我放首歌——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那是1990年代宝莱坞电影里的一首情歌。“心儿疯，心儿狂”（*Dil toh pagal hai, dil deewana hai*），歌词里唱道。

午夜时分，苏里亚旺希和阿胡贾把我载到一个加油站，我从那打车回德里。阿胡贾有点失落我没能看到他行动，我跟他说明我可以找个晚上再来。他会意一笑，知道我再回来经历一次突袭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想让我相信他那牛仔的派头，回去的一路他一直在给我讲他那些为了拯救牛母“命悬一线”的戏剧性夜晚——有一次一个走私者开着SUV把他的摩托生生从路上挤下一条深沟；还有一次两辆装满牛的卡车从两侧把他的

摩托挤在中间。我想告诉他我相信他，但我在下车的时候只挤出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

我觉得不管是阿尔琼·库马尔还是萨钦·阿胡贾，都没那么在乎他们的国家。他们没拿出什么让我信服的理由。对于他们声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献身这一点，我也很怀疑。他们加入了保护印度教身份的战斗中，但他们真正为之奋斗的是获得身份，什么身份都行。他们最想要的是在镇上成名——库马尔在密拉特，阿胡贾在卡尔纳尔。库马尔选择加入“爱的圣战”，因为这触碰了密拉特的印度教徒对于有魅力的穆斯林的恐惧；阿胡贾宣誓保护圣牛，因为这是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哈里亚纳邦这个牛母之地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做法，就和你照着雇主的好恶修改你的简历是一样的。我并不怀疑他们“仇恨”的缘由：自以为是的女孩们，以及变化太快让他们不适的整个世界。但归根结底，他们的愤怒是对于自身微不足道的地位的愤怒。他们的愤怒，就像是一个人被告知自己有特殊通行证，却再也进不去城里最酷炫的酒吧。这是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愤怒。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想让我感同身受——他们真的尽力了——我也不能真的理解。

维卡斯·塔库尔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俩能谈的很多，而且能相互理解。我们的对话通常温和有礼，用英语进行，双方都很有求知欲，谈的都是积极向上的话题。我们是那种可以成为朋友的关系——在同一个城市长大，我的很多老朋友和他有一样的世界观。我们会为了在哪儿见面拌嘴，我假装为他的国大党笑话捧场，他向我保证会看看左翼自由派写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和塔库尔见面是想要看看，他的那些妙语连珠到底是否有价值：用数据和事实武装自己的年轻人能否改变印度政治的未来。

在塔库尔理想的政治里，没有小事的容身之地。“我们要首先消灭那些有具体动机的人提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我们对当代青年的塑造上，那些整天谈论圣牛、谈论“爱的圣战”的人，应该被耻笑。我支持印度人民党，并不代表我就要杀死穆斯林。古吉拉特邦是怎么回事？古吉拉特邦是世界印度教徒联合会的主要阵地——参加的都是些生活受挫的傻瓜，他们就想打宗教这张牌。莫迪一上台，世界印度教徒联合会就从古吉拉特撤走了。为什么（*Kyun*）？因为莫迪的改革派政策，他的政府是倡导包容性发展的。”

塔库尔又一次选择了将莫迪在古吉拉特政策中最符合他自己理念的

部分讲出来。我摆出了事实和数据，质疑莫迪2014年在全国推广的“古吉拉特模式”，但他并不赞同。2002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死于古吉拉特一场有预谋的暴乱中，那时莫迪刚开始做首席部长；到了2014年，莫迪已经是印度人民党中央选举的头号候选人了。这十几年中，纳伦德拉·莫迪树立起一个实干派领导人的形象：投资增加、商业盈利、政策施行。做实事的同时，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行动，比如得到媒体的拥护和实业家的认可。他组织了很多吸引眼球的活动，在一众地位很高的重要人物——外国高官、企业巨贾、精神领袖——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以带领印度走向未来的人。^[20]这个策略奏效了。印度教徒开始把他看作一个能压制穆斯林，并带领印度向前发展的人；而穆斯林则把他看作一个需要敬畏的人，也觉得他能办事办成。剩下的人，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就觉得他是个务实的人，对于别的，他们并不关心。

他实干家的形象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很多旁观者从他的叙述中指出过问题。他们对比了预期投资和实际的项目，发现他对某些商人会有偏向，他们还统计了他创造的就业机会的数目。^[21]但这些都没用。自从当上总理之后，莫迪涉足了所有新的沟通渠道，从时髦的“空中飞人”到“人民的公仆”，打造自己的多种人设。10个印度人中有2个会收听他每周日在广播上的演讲；他的Twitter有3000万粉丝，Facebook有4000万，Instagram有580万，YouTube有59.1万多关注者。这些让他成为社交媒体上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之一。^[22]

和纳伦德拉·莫迪一样，塔库尔也想掌握洞察民意的艺术。“公众对于写着空话的大广告牌再也不感兴趣了。你得从思想和观念上和他们联结。公众不在乎宣传报道了，他们需要你用思想和他们互动（*Public prachar pe nahin jaati hai. Vichar ke star pe kaam karna hai*）。”2014年末的一天，塔库尔终于带我来到印度人民党的社交网络作战室。作战室在一□新的公寓楼里，就是我父母几年前搬进去的那种。公寓的客厅勉强改成一个办公场所，他解释说，让社交网络行动离政党的办公室远一点是为了安全考虑。印度人民党在接下来选举中的社交媒体计划，就由这个办公室里的六人团队来执行。但当塔库尔向他们介绍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来看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忙着想办法，让纳伦德拉·莫迪和在恰尔肯德邦呼声很高的首席部长阿尔琼·蒙达的脸并排出现在印度人民党的底色上。这里面有莲花的问题——政党标志放在哪里才能体现最大的影响力呢？放在两个人脸的中间，整张图的最上面，还是放在一角？看到最终版的图片后，塔库尔给了两条修改意见：把橘色和绿色改得柔和一点，并且去掉莲花团。这张图经过一天时

间最终完成，接着会被发给所有能连上网的人民党官方支持者手中。“这张图会通过WhatsApp发送到全邦7万名正式的印度人民党雇员手中，并通过160个印度人民党正式和非正式账号上传到Facebook上。”塔库尔一边说，一边把冷饮递给他的同事和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又去了作战室几次。平常的日子里，作战室的有趣程度跟邮局不相上下。塔库尔的同事中既有年轻的IT能手，也有中年的政党公务员。他们产出的大部分内容——文字、图片、声音和动画的集合——与普通选民的日常生活有关，比如交通、就业、蔬菜价格。大多数时候，作战室的所有精力都用于把尽量多的对反对党的攻击，写进一条WhatsApp信息里。这个团队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刷他们的Facebook推送，看他们的朋友都在聊什么：邦内部落政治的崛起，初级公务员职位预约，通货膨胀。然后他们开会选定每天的话题，并把它包装成一个拉选票的推送，并保证其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至少24个小时。

这项工作的要求并不太高，塔库尔看起来也没有很在乎。“为什么不关注那些会决定印度未来的更大的问题？比如教育、劳动力、产业、中央与地方关系、联邦经济这种。”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塔库尔爆发了。他开始意识到印度人民党并不是招他来制定议程的，他们只是招他来传播议程的。他很期待夜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塔库尔会跑到楼顶，打开门锁，放几瓶威士忌在桌上，然后给所有手机上的重要记者打电话。作为负责党派形象的人，晚上的这次闲聊也是他简报的一部分。讨论印度相关的话题比如何在Photoshop里面调那朵莲花更合他心意。“你应该找个时间加入我们”，他曾经这样邀请我。

塔库尔和我接触过的人们一样传统。比如说，他从不让我付账单。被他邀请到一个满是整晚胡言乱语的醉酒男人的地方，我还是挺惊讶的。他决不会随便给一个当地的女记者这种接触他们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他觉得我见识了兰契以外的世界；如果你在德里住过，那你就见识过一切了。结果我还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随着邦选举的临近，塔库尔越来越不在意他每天的战场了。他把这个时间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一个有思想的政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我跟他聊天，他都会给我讲对于“洞察民意”的新实验。2014年10月，在选举第一阶段的几个星期前，我又来到作战室，看到他同时在打两个电话。他当时正在组织一场活动：年轻选民和首席部长候选人之间的全面辩论。他亲自拟定了辩论大纲——全市最好学校的学生将会向候选人发

问，问题包括技能发展、经济政策、贪污腐败和土地政策。这个想法看起来完全来自维内·辛格发在他“国家建设”网站上的问卷调查。

问：最高至终身监禁的严格监禁是否应该用于造成国家损失但能在两年内弥补损失的贪腐？

- 应该
- 不应该
- 不知道

塔库尔说，对于他新建立的非营利政治品牌营销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他打电话也是为了运营一场活动：定场地，在报纸上发通告，准备灯光、音响、交通、食物、饮料。我问他，他的政党对于这个为了民主而服务各方的做法没有意见吗？“你不了解这个事，女士，”他用低沉的政治家的嗓音说，“每个人都会在研讨会上讲话，但是到了第二天，报纸上全部都会是有关印度人民党候选人所说的话。”这场活动在全市最大的体育馆里举行。对于其规模的描述，也只能这么说了。本来就没几个学生来参加，热心提问台上政客的就更少了。候选人们都来晚了，来了之后就一直在抢话筒。报纸第二天确实发了一篇报道，但位置在角落里，不容易被发现。

初选辩论后的一个月，塔库尔告诉我他想办一份报纸，或者至少开个新闻网站。他说，为了在政坛上能有影响力，你必须要想办法控制媒体。两周后，塔库尔决定开一个政治新闻及分析的网站。他问我对于这个主意怎么看，我说这是否又是一个为印度人民党发声的非官方线上媒体？“绝对不是，”他放下电话，看着我的眼睛说，“那些都是胡扯，既没有独创的想法，也没有针对党派路线的异议。我想要的是一个接纳更广泛辩论的空间，接纳所有观点的空间。”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像他的上一个政治活动一样“中立”，但此时我们不可能让塔库尔反思他的动机。在他的脑海中，他是位远见卓识的领袖，正在走向征途。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每次见到他，他都有一个比上次更大的梦想：建造连锁养老院和孤儿院，找回失踪儿童计划，投资太阳能，接手一个村庄。他似乎已经决定这辈子要做个公众人物。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看不到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之后的一年，我很少见到维卡斯·塔库尔。我在兰契的时候，他都很

少在。印度人民党在恰尔肯德邦的竞选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大概看出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愿。印度人民党在社交网络上的工作还在进行，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塔库尔的领导才能。2014年12月，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获得了恰尔肯德邦81个议会席位中的42个。^[23]选后民调显示，人们表示投票依据是就业、通货膨胀，即塔库尔所说的“蔬菜价格”，以及发展工程：道路、电力、医院。恰尔肯德邦50%的印度教徒把票投给了印度人民党，^[24]媒体则不失时机地将胜利归结为“莫迪潮”^[25]。恰尔肯德邦的印度人民党分支因为和当地年轻选民成功“联结”而受到表扬，作战室也得以保留。塔库尔对这些新的发展并不感兴趣。他的偶像，印度人民党前任首席部长、当地部落政客阿尔琼·蒙达失去了议员席位。^[26]这对于塔库尔的政治生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毕竟蒙达是唯一一个曾经认可他潜力的政党领袖。塔库尔曾经对于蒙达去过他家这事很得意，他的家人也为他感到骄傲，觉得他追回了一些他们失去的特权。塔库尔担心蒙达的落选会让种姓问题重新回到邦政治的中心。整个选票分配过程中，各政党以种姓为基础的计算方式让塔库尔很烦恼。他希望最后证明他们所有人都是错的。塔库尔认为，不管公众最终的决定是什么，他的政党如果选出一个非本部落的人在一个拥有大量部落人口的邦作为代表，都将是一个愚蠢之举。12月28日，印度人民党证实了塔库尔所担心的事。他们选出一个来自落后种姓的无名小卒作为首席部长，他甚至不是恰尔肯德邦任何一个部落的成员。^[27]对塔库尔而言，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塔库尔想要获得一个席位，唯一的可能性是通过个人成就被授予。但他的个人成就又是什么呢？

2015年10月，是我那年最后一次见塔库尔，我们坐在一个大酒店的大堂。塔库尔晚了一小时才到，还要早走。“有很重要的会议”，他说着，把两个大屏手机放在了桌上。我提起选举结果。在他为印度政治的未来郁闷懊恼的时候，我提出印度人民党的决定可能是因为那些高种姓选民担心部落人成为邦掌权者。蒙达可能完全有能力管理恰尔肯德邦，但是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中产阶级却总是提起他贪污的问题。不出所料，塔库尔又以他那典型的做派打断了我，并纠正我对于贪污的狭隘看法。“你如何定义贪污？”塔库尔放下手中的柠檬汁，冲我问道。“你看，”他拿起一只手机，“这个手机90卢比，但是市场建议价是92。造这个手机需要花的钱已经花了，这个产品不受影响。另一个场景是：这个手机价值90卢比，报价90卢比。结果5卢比已经给出去了，于是虽然这个产品需要花90卢比来造，你却只花了85卢比。收佣金和贪污是两件不同的事。前一件事，我是先把活干了才收钱；后一件事，活还没干完，

钱就已经先花掉了。”

他和政府的关系与潘卡·普拉萨德和政府的关系很不一样，但和普拉萨德这个小小疏通者一样的是，塔库尔也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灰色金钱交易就能把事办成的系统。我曾问过他，如果他获得了政治权力，他会怎么做。“我会贪污，毫不犹豫地贪污，”他回答我的声音整个酒店大堂都能听到，“你如果不贪，就会被这个体系抛弃。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展示权力。”那天他给我讲了好多有趣又匪夷所思的事情。“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会成为一名议员或者立法会议员。”然而，对于他的党派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未来，他却毫不关心。“对于一名政客而言，选举结束了还能干吗？”所以，他决定用他的时间做点有用的事。他的计划包括开拓他品牌营销公司的服务，开一个半导体装置工厂，并进一步深入未知的领域。

在兰契时，塔库尔把很多时间花在捉鬼上。从2010年开始，他就是一名持证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了。自打14岁在辨喜学院上学时有过一次超自然经历，他就一直对他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十分着迷。“我可以看到听到我周围人都感知不到的东西。”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这么跟我说。大学时期，他白天上传媒课程，晚上就解决宇宙的奥妙，为此他还参加了一个美国中西部超自然研究所开设的在线课程。2010年，塔库尔加入了一群超自然现象研究者。这群人在孟买工作，没在检查废弃楼房的其余时间，就在卖剧情转折的点子给恶俗恐怖片编剧。塔库尔已经从这个领域消失很久了，他把自己的精神追求放在了政治生涯之后。而今，他又想要颠倒两者的优先次序了。

他预测说，超自然世界的一些发展将会令指导普通世界的权力结构感到恼火。他说，某些时期超自然世界会通过比震动更强的形式展示影响力，而我们就处在一个这样的时期中。根据他所收到的超自然简报，现在印度见到UFO的报告比以往都要多。他问我是否注意到，越来越频繁的超自然现象会导致政府加紧对公众的控制。我只能盯着我的柠檬汁不作声。他又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以解决即将到来的宇宙权力结构的更迭。

那时候——距离我见维内·辛格尔还有好几个月——我不知道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还对重新排列各星球的引力有兴趣。塔库尔又建议我去读一读辨喜的全八卷著作。“他在哲学上的成就，需要西方哲学家再努力两百年才能赶上。”只有那些被点醒的人才能塑造新秩序下的政治。“而这，”他用手划过冷飕飕的空气，指向未知，“只是一个开始。”

参考书目

Swami Vivekananda (2014), *The Complete Works of Swami Vivekananda*, Vols 1-8, Advaita Ashrama.

Christophe Jaffrelot (2011), *Religion, Caste and Politics in India*, Hurst.

Rohit Chopra (2012), *Techn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Cultural Negotiations From Colonialism to Cyberspace*, Cambria Press.

- [1] https://roundtableindia.co.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06:ranvir-sena-massacres-and-state-complicity
- [2]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december/6/newsid_3712000/3712777.stm
- [3]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swami-vivekananda-youngster-from-india-won-over-the-world/story-6xN7dIZYJiqTirMCwwloLI.html>
<http://indiatoday.intoday.in/education/story/swami-vivekananda-death-anniversary/1/706997.html>
- [4]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urrent-affairs/full-text-of-swami-vivekananda-s-chicago-speech-of-1893-117091101404_1.html
- [5] <http://www.caravanmagazine.in/reportage/age-of-abvp>
- [6]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andhra-pradesh/valentines-day-vhp-bajrang-dal-warn-lovers/article8230633.ece>
- [7] 印度各邦通过采取在公立学校、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为“落后人群”预设配额的方法，矫正社会阶层扭曲的问题。
- [8] http://ashutoshvarshney.net/wp-content/files_mf/statesorcitiesstudyinghindumuslimriots.pdf
- [9] <http://www.paulbrass.com/files/Epwarticle.pdf>
- [10] <https://scroll.in/article/811062/hashimpura-may-22-1987-the-forgotten-story-of-one-of-indias-biggest-custodial-killings>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provincial-armed-constabulary-faces-flak-for-controversial-role-in-meerut-riots/1/337211.html>
- [11]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who-is/who-is-sangeet-som-taj-mahal-history-muslims-hindu-4893208/>
- [12] <https://scroll.in/article/813871/will-haryanas-cow-protection-ids-simply-be-a-licence-for-vigilantism>
- [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4409354>

- [1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gujarat-7-of-dalit-family-beaten-up-for-skinning-dead-cow-2910054/>
- [15] <https://granta.com/cult-hindu-cowboy/>
<http://www.caravanmagazine.in/reportage/in-the-name-of-the-mother>
- [16] <http://www.firstpost.com/india/beware-of-nakli-gau-rakshak-pm-modi-denounces-cow-vigilantes-for-the-second-time-2940986.html>
- [17]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army-conducted-surgical-strikes-on-terror-launch-pads-on-loc-significant-casualties-caused-dgmo/articleshow/54579855.cms>
- [18] <http://www.tribuneindia.com/news/comment/numbers-favour-dalit-muslim-unity-in-up/297311.html>
http://www.huffingtonpost.in/2016/06/14/how-india-eats_n_10434374.html
- [19] <http://in.reuters.com/article/india-politics-beef-modi-khattar-haryana/bjp-leader-urges-muslims-to-give-up-eating-beef-idINKCN0SA1HK2015101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elections/assembly-elections/uttar-pradesh/news/samajwadi-party-banks-on-muslim-yadav-formula/articleshow/56698505.cms>
- [20] <http://www.businesstoday.in/magazine/case-study/case-study-strategy-tactics-behind-creation-of-brand-narendra-modi/story/206321.html>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13/641/641_shiv_visvanathan.htm
- [21] <http://www.livemint.com/Leisure/dLPCSc8BG725fx5dEB07uK/Whats-the-Gujarat-Model-and-whos-seen-it.html>
<http://www.epw.in/journal/2014/11/reports-states-web-exclusives/gujarat-model-development.html>
<https://scroll.in/article/855027/gujarat-model-the-gleam-of-states-high-growth-numbers-hides-dark-reality-of-poverty-inequality>
- [22] <http://www.businessinsider.in/PM-Modi-is-the-most-followed-leader-on-social-media/articleshow/56687885.cms>
- [23]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india-news/jharkhand-assembly-polls-vote-counting-begins-in-24-centres/22239/>
- [2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olitics/its-opponents-divided-bjp-sneaks-through-the-gap/>
- [25] <http://www.firstpost.com/politics/assembly-elections-jharkhand-swept-by-modi-wave-as-bjp-and-ally-set-to-from-govt-2003095.html>
- [26]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olitics/bjp-gets-clear-majority-in-jharkhand-arjun-munda-loses-election/>

[2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olitics/jharkhand-to-get-first-non-
adivasi-cm-as-party-decides-to-elect-raghubar-das-for-the-top-job/](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olitics/jharkhand-to-get-first-non-
adivasi-cm-as-party-decides-to-elect-raghubar-das-for-the-top-job/)

5 女愤青

里沙·辛格决定参加竞选时还不到30岁，她给了自己两周时间获得胜利。她参加的是北方邦最重要的竞选之一——不是勒克瑙的议会或者德里的国会选举，而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学生会选举。这场选举不仅决定哪个学生党派将在校园甚至整个城市掌权，也被看作一个关乎更大政治局势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几十名学生将角逐学生会的五个职位，上至学生会主席，下至文化部部长，围观这场大型选举活动的人数则达几千人。^[1]

里沙·辛格要竞选的是学生会主席的职位。过去的一百年里，阿拉哈巴德大学一直是北部印度一个重要的政治战场，而学生会主席就是这个战场的老大。学生们选择参与竞选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野心，也因为其他职业选择的严重缺乏。这个学生会职位不只是一个政治职位，对于来自印地语区的城市和乡村的成千上万高校年轻人而言，这更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大多数学生在大学里多年的勤学苦读不能带来些别的什么，但至少他们有机会进入政治这把保护伞的最中心。

然而，想要赢得这个职位，需要遵循一系列步骤。首先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好的名声——你要明确一系列影响学生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宿舍分配、图书馆开馆时间、录取过程中的贪污问题；然后举行演讲承诺会和学校行政交涉；与地方报纸建立联系，为这些活动进行宣传；把这些报道剪下来，在之后的演讲中读给观众们听。同时，你也需要一些资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钱（20万到30万卢比），用来打印竞选海报，雇一群保镖引导集会，给自己和支持者们租SUV，付钱给当地的茶摊和饭馆，以自己的名义给潜在的支持者分发小吃饮料。你还得给自己找顾问，也就是与你同样政治理念的前学生领袖和政客。当你有了一个政治策略，需要找一位竞选主管来执行。主管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动员学生中和你同一种姓的成员，另一方面和其他有着共同敌人的团体达成联盟。而这些事都要有酒有肉才能办得成。

这些步骤都到位之后，就该穿上你最白的库尔塔衫，戴上一副炫酷的蛤蟆镜，双手合十站在敞篷吉普的座位上。如果你赢得选举成为学生会主席，一个月之内就能回本。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疏通者，阿拉哈巴德就是你理想的大本营。学生会主席负责协商大学 and 任何私人组织的协议，甚至可以以大学的名义给小的学院发学位证书。他同时也直接接触

这个城市的保护费经济——不管是建造商、店主、餐厅老板，还是教育机构，所有想要在这里做生意的人都要给他交租以换取安全，防止那些喧闹的学生给他们造成损失。你不会想和这些人为敌，因为参与完学校政治，他们的首选是加入职业黑社会，其次是加入邦议会。更重要的是，学生会主席可以不用提前打招呼就出现在任何人——地方法官、警长、政治党派领袖——的办公室，转达要求以换取合适的补偿。阿拉哈巴德人会说，这是一场男人的游戏——在大学127年的历史中，没有女性敢竞选学生会主席是有原因的。于是，2015年9月21日里沙·辛格宣布参选时，整个阿拉哈巴德都震惊了。

你肯定要有点疯狂才敢挑战阿拉哈巴德的男生，他们活着似乎就是为了战斗。大多数对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报道都集中在男学生对于混乱的热爱：一个男生不是在校园里制造骚乱，就是在胡打乱闹，或者稍微温和点，也是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过激行为令人咋舌：打破教室的窗户，毁坏餐厅，打室友，给副校长关禁闭，对他的秘书和保安动粗，打其他学生，扔炸弹，甚至偶尔把自己都给点着了。他们爱好武器，且一视同仁：除了炸弹，他们也扔石头、板球拍、曲棍球棍和自制手枪。^[2]学校的副校长有个人保安队和紧急避难所。这个城市的警察机关通常也有几支特种部队在待命。而全城剩下的人，其中包括女生宿舍中的2000名女生，除了祈祷什么都做不了。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英国殖民政府于1885年建立阿拉哈巴德大学，目标是培养一种不同的印度人。他们要在都市文化中培育土生土长的印度人，让他们按照牛津剑桥的标准接受最好的教育，涵盖西方法律、古典学、科学和各艺术科目。教学大纲由麦考利勋爵——他是殖民教育体系的缔造者，也是他激发了穆因·汗和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的愤怒——监督制定，本意是创造一群“外表印度人，内心英国人”。大学的楼宇也是西北省份中最好的建筑，仅次于泰姬陵：皇室的红砖墙、巨大的庭院、拱廊、旋转楼梯、雕花的石柱、尖顶、彩色玻璃天花板，还有郁郁葱葱的花园。教授都是来自帝国教育委员会的佼佼者；而第一批学生则是来自北部和中部的印度教与穆斯林贵族。那时男生们做过的最淘气的事情，不过是即兴表演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他们说，英语嵌在了这所大学的基因里。到了1920年代，这所大学已经培养了几批被启蒙的学生，他们成了公务员、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和作家，都是印度权力里的中流砥柱。

然后，一切都变了。在独立运动的最高潮，一些学生发现了政治。1920到1925年间，所有自由运动的主要领袖——提拉克、郭克雷、马拉维亚、帕尔、奈都夫人，以及甘地本人——都来到阿拉哈巴德，发表关于反抗和革命的演讲。尼赫鲁每周都在他的家庭住宅里和大学生们交流，他的姐妹们则去到学生宿舍分发革命徽章。学生们变得激进，学生会也是如此。曾经的学术交流平台，变成一个传播异见的平台。1921年12月，学生会决定抵制威尔士亲王来大学进行访问。1930年，一个学生爬到阿拉哈巴德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屋顶，在旗杆上升起了印度的三色旗，结果被警方击毙。在抗议中，学生们关闭了学校。那之后的将近一百年中，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学生政治一直是印度北部青年文化的反映。大学定义了男人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女人应该有怎样的恐惧，如何获得成功和权力，而种姓、阶层和社区在其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一直以为兰契在污秽和混乱上无人能敌，直到我在阿拉哈巴德车站下了车。我在印度的所到之处，还没见过一个地方过去与现在的冲突能造成如此灾难性的结果。坑洼拥挤的道路、盖了一半的楼、裸露的下水道和浓重的雾霾，这些就是在火车站外迎接你的景象。造成这个景象的原因和让印度所有二线城市成为泥沼的原因一样：疯狂施工、过度拥挤、市政崩塌。

然而，还有一处证明这座城市荣耀过往的遗产，仍高高耸立在它新建的钢筋水泥的外观之中，那就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大楼。曾经的红色已经褪成铜锈的颜色，但柱廊仍然一望无尽，穹顶也还像泰姬陵的一样又大又圆，尖顶直通云霄。另外一件没有被时间改变的事，就是这所大学对于整个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巨大影响。我在学校的宾馆订了一个房间，整个宾馆唯一的变化就是前台多了一台平板电视，一排穿着白色库尔塔衫的男人正坐在那看突发新闻（“邦议会发生骚乱”）。经营宾馆的是一位中年婆罗门，他很少开口讲话，生怕动了嘴里嚼着的槟榔叶。大多数坐在那看新闻的人，都是过来求他给他们的朋友或者支持者订房的。一晚上的房费只要500卢比，想住进来的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

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来到阿拉哈巴德。那时，全印度大学青年政治的权力更迭正在酝酿中。但核心并不会改变，高种姓印度教男性的利益和所有其他想要挑战他们特权的人相对立，后者包括：其他落后种姓的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3]、穆斯林、基督徒，还有女性。但是这个对立关系的轴心已经变化了。“对立者”现在联合起来，人数可以和印度

教徒相匹敌了。印度政府在2006年拓展了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基于不同种姓的学位预留，将来自下层群体——农民、部落成员、宗教上的少数派、女性——的学生在印度主要大学中的比例提高到将近一半。如今下层民众在大学政治中拥有了更大的声音，而他们正抓住所有机会证明这一点。^[4]

现在印度所有主要大学的校园都成了战场。2014年开始，战争集中在“何为印度人”的问题上。与之前掌权的国大党联盟不同，印度人民党认为这个冲突不应该由学生内部解决。国民志愿服务团制定了针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更广泛的工作规划，在此推动下，政府大力支持它的校园军队——全印度学生会。^[5]

在我走进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奢华校园四个月之前，海德拉巴大学的一个名叫罗希特·维穆拉的年轻人，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之后自杀了。他是达利特人——穆斯林联盟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候选人在2014年赢得了他所在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职务。那一年，将近六成的学生属于提前保留名额的类别。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达利特人被直接放在了ABVP印度教种姓学生的对立面。2015年8月，双方因为ABVP破坏一部纪录片放映的事起了冲突，那部纪录片讲的是印度人民党明显插手了不久之前北方邦的反穆斯林暴乱，而那场暴乱很大程度上正是桑吉特·索姆和他的WhatsApp视频挑起来的。很快，人力资源部就发起了问询，随后引发校内对“反国家主义”投诉的迅速反击。2015年12月，五位达利特族的研究学者，其中包括26岁的物理学者维穆拉，被禁止进入学校宿舍、使用校园内的公共空间，以及参加竞选。2016年1月，维穆拉在宿舍房间的风扇上上吊自杀。^[6]

维穆拉死后不到一个月，内政部下令逮捕了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因为ABVP投诉他有“反国家主义”的行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坎哈伊亚·库马尔，他来自比哈尔邦，通过申请获得了落后地区的预定名额才得以进入尼赫鲁大学。他曾参加过一次纪念阿夫扎尔·古鲁忌日的游行，此人是克什米尔人，因为参与了2001年那场造成九人死亡的针对印度国会的袭击而被定罪。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在2013年被执行死刑。直到最后，关于他的定罪和死刑都争议不断。^[7]

从查谟到加尔各答，印度人民党掌权以来，所有的主要大学都被卷入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世俗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斗争。而阿拉哈巴德大学忠于传统，认为自己正处于斗争的最中心。

坐在女生宿舍角落的房间里，我问里沙·辛格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参加竞选？辛格瘦瘦小小的，盘腿坐在床上时看起来就更小了。她的穿着是典型的年轻、有政治野心的印度女性的装束：库尔塔衫、牛仔裤、运动鞋，还披着一条披肩。她的脸很小，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又黑又直的头发紧紧地梳向后面，扎成一个马尾辫。

辛格告诉我，她在宣布竞选之前对于学生会已经思考了很久。权力对她而言很重要。从上中学开始，她就在为这一步做准备了——她先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上校委会主席。学生们都服从她，以至于学校管理层也要听她的。在大学里，她继续拓展她的影响力。作为一所女子学院的经济系本科生，辛格加入了一个性别平权组织。“我开始了解女性权利这个概念，也开始了解父权是什么（*Patriarchy samajh mein aane lagi*）。我开始清晰地看到女性在小城镇社会中的地位，”她说。她开始质疑自己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她的爸爸和哥哥会替她和她的姐妹们做决定：和谁结婚，在哪生活，几点回家。最终，她作为性别研究的研究生进入阿拉哈巴德大学，并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震撼。“在校园里你根本看不到女生，她们只出现在课堂上。她们低着头进校门，再低着头出校门。即便这样，也阻止不了男孩子们的非议。”

对于这些非议，辛格选择回怼，这让情况更糟糕了。“他们会跟我的小摩托飙车，那我也飙回去——不然我该怎么办？”但这种斗法看不到头。“然后我决定以我的姿态作为回应。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但我不会退缩的。”当她和那些男孩子在校外的马路上飙车的时候，辛格会一手握住车把，另一只手不停握紧又松开拳头。“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准备好战斗了。”她说，促使她决定参加学生会竞选的都是些小事情，其中一件关于一家茶馆，就在学生会所在的那幢白色的石砌历史建筑旁边。她喜欢在那儿和朋友们见面喝茶，但没几个女孩子敢走进学生会的地盘。全校2000名女生中，没有几个踏入过拉拉容吉这家著名的茶馆。拉拉容吉位处环绕着学校的那条繁忙马路的交叉口，和学生会大楼附近的绿地一样，都是男人们的领地。事实上，男人们的领地包含了阿拉哈巴德所有的公共空间：道路、公园、电影院。女生们唯一可以进出这些场所的办法就是——和男生一起。否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可能会被盯着看、被嘲笑、被困入一隅，甚至被“咸猪手”非礼。所以，辛格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女生们可以自由地在阿拉哈巴德校园走动。

辛格对于比试肌肉的学校政治也很恼怒。“学生会选举完全是男性活动，这让我很不满。整个大学时代，女生们都会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或者就是选择回家，因为竞选期间男生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她说。2014年选举期间，她从可以俯瞰整个校园的女性研究系的阳台上，看到这场传统盛会的全部浮华。“所有浮华——SUV游行、帐篷、宴席，还有各种打斗。我就是在这时候下定决心要挑战这种以肌肉、金钱、种姓为核心的文化。”从那天开始，辛格会定时去学生会茶社，一个人待着。“渐渐地，其他三四个女孩也会跟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会大声打趣说女孩子有一天会接管学生会大楼。”

2015年的学生会选举日期在9月7日宣布，时间定在9月29日。辛格一开始想要把她的计划告诉家里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就在两周前，她爸爸刚刚把她骗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相亲照。看到照片时他很生气。“他问我，‘你为什么穿凉鞋？你难道没有女式的鞋子吗？’我说我还没有。我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收到男方在照相馆拍的照片呢？”她爸爸已经存了400万卢比作为她的嫁妆，他是不会因为这种“抖机灵”的话而动摇的。除了爸爸，她还有两个哥哥要对付。

然而她最大的麻烦还是钱。不管你多么节俭，竞选总是需要钱的：印海报，设竞选办公室，每天至少给竞选团队提供一顿饭。9月15日，辛格在宿舍起床之后做了这么几件事。她先是到大学教导员那儿辞掉了兼任的教职。“她很震惊，问我说，‘你知道竞选学生会意味着什么吗？’我说，‘不知道，所以想要让这件事更容易理解一点。’”然后辛格去了银行。“我发现我从工资里一共存下了8万卢比。我决定全部投到竞选中去。”然后她回家，把计划告诉了爸妈。“我妈妈觉得我疯了，我爸爸以为我在开玩笑。”睡觉前辛格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她的朋友和支持者召集起来，宣布这个消息。

这些都搞定之后，里沙·辛格看了看竞争对手的状况。这些政党根据影响力排名如下：印度学生联合会（印度共产党的学生分支，简称SFI）、印度国民学生联盟（国大党的学生分支，简称NSUI）、PCM（Pratiyogi Chhatra Morcha，反对预留学位的右翼组织）、SCS（Samajwadi Chatra Sabha，社会党的学生分支），以及ABVP。距离下一次的邦议会选举只有两年之遙了，胜选的获利史无前例地大。印度人民党已经征服了中部地区。他的下一个大目标——拥有印度五分之一人口的北方邦，从人口上来说可是一块宝地。

但是在勒克瑙，掌权的社会党不会轻易让大权旁落；社会党领袖穆

拉亚姆·辛格·亚达夫是种姓政治和权力比拼之下诞生的强人，参加第一次选举之前，他曾经是一名职业摔跤手。利用落后种姓（大部分为农民）和穆斯林的上进心，社会党总是能够掌权。竞选最终就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定律，而这个定律显然是根据种姓得来的：印度教种姓会投给ABVP（婆罗门人和卡雅斯塔人）或者PCM（塔库尔人和班尼亚人）中的一个，那些落后种姓和穆斯林则会支持SCM。各党派会给他们的学生分支提供所有胜选所需要的东西——资金、影响力和策略。

如果里沙·辛格想要加入这场游戏，她需要找到那些还没有被注意到的人群和还未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这些人和事就在她身边。“没有人关心女性，也没有人关心那些社会党票仓之外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最重要的是，没人知道普通大学生的需求究竟是什么。”辛格提出的竞选口号——学生会候选人中的第一个——将校园里所有被忽略的人群汇聚成一个统一的阵营。“我们会谈到，给女生制定宵禁，却迟迟不修几年前倒塌的一大片宿舍墙，这是多么虚伪——难道后者不会给女生带来危险吗？我们也会说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学生很多年都用不上滤水器，也没有可以坐的椅子，却还去找他们要选票，这种行为多么无耻。我们还会涉及农村学生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他们并不像其他学生一样会讲英语和用电脑。”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学生所住的宿舍相比“普通”学生的宿舍在设施上差很多，这充分证明了之前学生会是如何制定优先次序的。

9月18日，里沙·辛格宣布她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从第二天开始，她和她的团队就进入了全面备战竞选的模式。“一些朋友捐了钱，加起来有4万卢比。我们在宿舍里支起一个小帐篷当作办公室。我们需要一个让男女生都可以进入的主竞选办公室。有人建议去请求附近一家橡胶厂的老板，借用他的门厅，于是我们又在那里支了一个帐篷，后来又有人以我的名义创建了一个Facebook主页。”

与此同时，辛格又去了一次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照。和上次的那张不同，辛格这次的装束是库尔塔衫、牛仔裤、围巾和眼镜，这一身不符合相亲照的任何一条要求，但用在竞选场合却十分合适。站在相机后面的摄影师甚至没有要求她笑一笑。在竞选团队印在海报上的照片里，辛格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库尔塔衫——用最少的宣传获得最大的关注度——直视镜头，表情有点犹豫，又很认真。9月19日，她的支持者组织了一场集会，向全阿拉哈巴德宣布了她的决定。参加集会的大概有40人，其中两个男人走在最前面，举着一个印有辛格特写的横幅。女生们

则举着黑底白字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奠定辛格竞选目标的口号：一半的人已经做了决定——学生会将属于我们（*aadhi aabadi ka naara hai, chhatra sangh hamara hai*）。

阿拉哈巴德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疯狂的情景了。第二天，辛格接到一串电话，一个比一个紧急。大多数来自小圈子里的意见领袖，他们控制学生会选举以及连带的地方权力。他们被称作“Mathadhish”，直译过来就是大主教；他们的工作是“管理”影响选举的人和情况。“他们大多数人说我的话都在我意料之中——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把你自己和你的职业都带到了极大的危险中；你将来会后悔的。”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电话里的语气已经从“为你担忧的大叔”变成了“黑帮大佬”。他们中的一些人第二天去了她姐姐家。“他们告诉我姐夫，‘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她身上。’这些人想要‘管理’我的家人，这让我非常愤怒。”我对我姐夫说，“如果你们不能支持我，那至少不要支持我的敌人。”

那天早些时候，里沙·辛格从一个学校办公室买了提名权。她应该在转天回到办公室提交申请，但是人们不会简单地过去把表格交了。走进学校大门之前，候选人们会先开车在城里转一圈，后面跟着成百上千的支持者，挥舞着他们的横幅，喊着他们的名字。辛格那天出发的时候，身后跟着50个女孩子。他们沿着班克路绕了一圈，在看热闹的人群的集体惊叹中停在了拉拉容吉，向公众讲话。当辛格终于开始向学校进发时，她身后有大概100人了，其中包括不少报社记者。行进途中，他们还会在对手的大本营停下来，试图说服那些为对手工作的学生们，应该把票投给寻求改变的人。

接下来的四天里，辛格走进一间间教室，用同一句话开场：“不要只因为我是女生而投票给我，但也不要因为我是女生而不投票给我。”第一天晚上，4名女孩子在她的竞选帐篷前停了下来；第二天，12名女生加入了她团队的晚间“头脑风暴”会议，讨论竞选思路。“我们对每一个前来的人说同样的话：首先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做过学生会主席；然后给他们讲我当选后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宿舍倒塌的墙，女生在宿舍外见朋友的时间限制。继而谈到我们把票投给谁由我们的兄弟或者男朋友决定，是多么耻辱。这个方法奏效了。”在几名得力的女生和一些转换阵营的新人的帮助下，辛格的竞选主题曲在半夜空降到了Facebook上。歌词的第一句唱道，“朋友们，让我们的爱人告诉我们该投票给谁，但让我们投给自己支持的人。”

“我们的选票这么廉价吗？”竞选帐篷中产生的这个口号在六栋宿舍楼的楼道里发生质问——这说的是一种传统的竞选策略，每一位竞争过学生会职位的男生都用过。他们一般会在竞选前夜出现在宿舍楼的大门前，通过一位忠诚的支持者送进去一袋三角炸饺。而口号的结尾回答说：“让我们吃掉所有人送来的炸饺，但把票投给自己支持的人。”那一年，男性候选人们还是带着浸着油渍的袋子准时出现了，但当他们探进头来想找一个友好的志愿者时，站在门口的一群女生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竞选方针。男朋友们在规定时间内来访时，一些女孩告诉他们，“每年我们都根据你们的要求投票，不如这次反过来吧？”

9月20日晚，学校取消了社会党候选人的提名，因为他的提名表上有个错误。于是这场竞争中只剩下两位热门候选人，都是右翼分子。9月21日，社会党提出从“外部”援助辛格。考虑了五天之后，辛格接受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接受你们的资金或者其他资源。’我想要的就是他们那份选票。”9月27日早上，她开展了首次竞选集会。辛格在校园里拉选票的时候，200个女生重复着她的口号。当这一天的活动结束，辛格和她的支持者们走向了学生会大楼，坐在草坪上齐声喊：“一半学生的口号，学生会现在是我们的了（*Aadhi aabadi ka naara hai, chhatra sangh hamara hai*）。”于是，女生接管学生会大楼的消息在全市传开了。“男生宿舍慌了，竞选办公室一片寂静，可能他们都在想对策。”辛格说。

辛格的队伍下午5点离开了大学，但并没有回到宿舍去。“我们决定在市里转一圈，在每一个重要地点停下来做一番演讲。”中间他们碰到一位PCM竞选者在演讲，于是决定在马路对面也进行演讲。“很多人在听他的演讲，但我们这边也有女孩子在演讲。很多人就是好奇发生了什么，于是跑到我们这边来听。当时场面很疯狂——马路对面的PCM支持者开始朝我们这边扔石头，当他们发现无法驱散聚在我们这边的人时，他们甚至找来一群牛经过我们这里。”

辛格在凌晨2点回到宿舍，然后哭了一整晚。“我一直在想我可能犯了个大错。我把我的整个人生都赌在了这场竞选上。当我再醒来的时候，我要到学生会的楼顶做一次合格的演讲，证明我是学生会主席最合适的人选。但那天晚上，我心里没底了。我发了高烧，失了声，早上8点还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威胁说一旦我离开宿舍就要强奸我。”辛格大概早上10点钟离开了宿舍，穿上了她最好的一套行头：宝蓝色库尔塔衫、白色紧身裤、白色披肩和她平常穿的运动鞋。她先回了趟家。“我告诉他

我们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大日子，我需要他们的祝福。那时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开始接受我的疯狂之举了。‘她就是这样，我们也阻止不了她’（*Aisi hi hai, hum usse rok nahin sakte*），他们向担心我的邻居和亲戚解释道。”竞选的最后两天，她爸爸把车借给了她，希望保证她的安全。

辛格载着一车尖叫的啦啦队员来到学生会大楼，当时一名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者正在激情洋溢地演讲。她没法直接走到她在楼顶上的位置，因为整个阿拉哈巴德似乎都挤在大街上；而大学里的所有人——学生、老师、职员——都在学校里面席地而坐。整个城市的警察和协警那天都驻守在学生会大楼里面或者附近，媒体也是一样。学生会选举是阿拉哈巴德每年最大的公众活动了。演讲最好的候选人会赢得选举，而赢得选举的候选人也就赢得了管理整个校园的权利。辛格告诉我：“一个小的错误可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挫折，很多人都盼着你犯错。所以他们不会让你轻易拿到麦克风。你从媒体中挤过去时，可能有人会绊你一脚，或者直接过来一拳把你打晕，这都是很常见的。你能怎么办呢？”辛格踏出汽车之前，她的支持者们——大概100人，有男有女——分成两条平行的队伍，手拉手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台阶上。“另外一群人一路推着我走到台阶那里，那有一队警察等着接手。”每名候选人有7分钟的演讲时间。第一个被邀请上台的是来自PCM的主席候选人。他力劝阿拉哈巴德人原谅里沙·辛格。“她对我来说就像个妹妹一样，因为一些既定利益误入歧途，才参加选举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喉咙上，以示真诚。

辛格上台的时候，她平静得像圣人一样。她谈到学生会辉煌的历史和糟糕的现状，也谈到了竞选纲领里面没有特别提过的问题：反对罗摩神庙，反对撤销学位预留。她还谈到女厕所，给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学生提供干净的水，以及图书馆为所有人延长开放时间。最后，辛格提醒听众们，她不是任何一个男性候选人的妹妹。

辛格离开学生会大楼时，她还有两天时间拉选票，她把每一分钟都花在了男生宿舍里。“我和一群女生一起去的，我们进行了很多一对一的讨论，倾听他们想要从学生会主席那里得到什么。”投票日那天凌晨，辛格被一名年轻支持者叫醒，对方听起来很慌张。ABVP反击了。“他们让女性支持者把校园里所有印着我照片的海报都撕掉，而我们做了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拿了一摞宣传某个文化部部长候选人的海报，盖在所有ABVP的主席候选人的照片上。”在2000名宿舍学生到投票站排队投票的两个小时前，一个年轻女人逼问辛格，ABVP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给她

投票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人“反对男性”？

五小时后，每个投票箱都被封好送到了行政楼的保险库，计票在第二天晚上6点钟开始。阿拉哈巴德人再次涌到校园的路上。计票应该会在—间戒备森严的会议厅进行，投票结果将通过边墙旁最高的那棵树顶上拴着的大屏幕进行广播。除了副校长和计票工作人员外，唯一允许进入这间会议厅的就是五位学生会主席候选人。辛格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她坐在了圆桌旁的最后一个位子上，两边分别是ABVP和PCM的候选人，即她最大的敌人。“那些男生把椅子转向我。他们瞪着我，我也瞪着他们。其中一个人在拍他的大腿，我就一直瞪着他们。”

计票在晚上11点钟结束，街上充斥着对结果的猜测。在约定的时间，计票员大步走向桌子的一端，拿起麦克风宣布了结果。他读出了文化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秘书长和副主席各自的票数，ABVP赢得了所有席位。“最后他宣布主席的得票，从低到高：NSUI（700票），AISA（800票），ABVP（1400票）。他顿了一下，对我来说好像过了很久。终于，他清了清嗓子，然后说PCM是2243票。最终我以11票的优势，总计2254票赢得了竞选。将近100名协警冲进来把我围住。”2015年10月1日，凌晨2点，辛格走进了女生宿舍。宿舍里所有的女孩子都没睡，在草坪上跳舞。又一个不眠之夜后，辛格穿上一条没洗的红色库尔塔衫和蓝色牛仔裤，开始了她如今尽人皆知的向学生会大楼的迈进。“整个宿舍的人都跟在我后面，包括职员、厨师，还有清洁工。”

早上10点，里沙·辛格回到学生会大楼的楼顶，作为阿拉哈巴德大学学生会首位女性主席进行宣誓。人们听不清她说出了些什么，因为一边有“罗摩万岁”的喊声——来自ABVP，他们在庆祝他们获得学生会的多数席位；另一边则是成百上千的女性，她们唱歌、跳舞、敲鼓，搞出了不小的动静。辛格的父母没来，他们岁数太大了，受不了这么疯狂的情形。那天他们一直在家，接电话和接待邻居。“我回家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很为我骄傲。我的脸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因为太过震惊，他们就—直给她重复早上的头条标题：“里沙·辛格创造了历史”。

辛格的胜利意味着巨变：对于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政治、阿拉哈巴德市的文化，以及在拼肌肉的政治文化中女性参政的可能性。^[8]辛格第一次作为主席前往学生会还是骑着她的小摩托，这是她夺回这些街道的方式。辛格掌权之后没过两天，一个新的口号就在宿舍楼道传播开了：如果女孩子连学生会都能管，谁还能阻止她们进茶馆呢（*Aadhi aabadi ka*

naara hai, Lalajungi hamara hai) ?

辛格的胜利对莫迪时代印度教的、男性的、有攻击性的典型政治提出了挑战。它证明在这个国家的政坛上，还是有空间留给女性的——即便她们的想法会威胁主流政治的核心。每当里沙·辛格谈到她所反对的年轻男性时，我就会想到维卡斯·塔库尔。他的政治理念被他作为ABVP成员、印度青年民兵团和护牛团成员的身份所塑造，他选择用暴力对待一切不符合他世界观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做一个男人是他们政见的核心。也许对他们来说，像里沙·辛格这样的女人对他们身份的威胁比吃牛肉、勾引印度教女人的穆斯林还要大。

她定然扰乱了阿拉哈巴德年轻男人们的世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宣布结果之后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们集成不同的小队，在午夜到凌晨2点这段时间里，来到女生宿舍门口。他们清清喉咙，然后飙出一串串污言秽语，使女孩子们不得不用胶带给窗子隔音。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性别惩罚的威胁一直贯穿着辛格的整个竞选活动。这些威胁从隐晦的“你是个女人”，到残忍的“我会让你再也不敢把脸露出来”。这让辛格感到害怕，但同时也让她嗤之以鼻。不把性别威胁当回事很难，但有的时候你也能看破那背后的虚张声势。100个男生齐声朝着2000个女生喊“婊子”，这个场景和声音既吓人又好笑。宿舍女生们回忆起这事，没有捂着耳朵，而是当个笑话说来。

并非阿拉哈巴德大学的所有男生都恨里沙·辛格。辛格很清楚，她的选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女生宿舍之外。但是把辛格看成敌人的男生也很多，而他们中ABVP成员又占了多数。他们已经以民主的名义做了很多妥协，也在宣誓仪式之后的拍照环节卑躬屈膝地站在她两侧；他们站在那儿看着她走进办公室，坐在王位一样的椅子上——那椅子铺着白巾，是无所不在的印度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们也逼着自己去参加她召集的会议，以掌握学生会的议事日程。他们这么做大概是期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能恢复往日的秩序，这一天到来得并不迟。就在辛格接手学生会的一个多月后，她就迎来了最凶残的敌人，以及学校近年来有记录的最血腥的权力斗争之一。也是这件事，让阿拉哈巴德以外的世界听说了里沙·辛格的名字。

2015年11月10日早上，辛格的同事推翻了学生会的规定——她被这些同事邀请参加一个会议，要告知她一项关于学生会的决定，他们已经决定了让谁作为学生会就职典礼的首席嘉宾。辛格开始以为这些男生

在开玩笑。约吉·阿迪亚纳斯作为就职典礼的首席嘉宾确实足够大咖了，但她无法相信学生会能够认可他出名的理由。作为阿尔琼·库马尔和萨钦·阿胡贾这些印度教民族主义士兵的偶像，阿迪亚纳斯是一位僧人出身的政治家，他最著名的演讲是关于针对穆斯林和管教女人的。辛格进入政坛时就憋着一股气，为什么像阿迪亚纳斯这样的人那么容易就能拥有权力。1998年，这位时年26岁的戈勒克布尔的知名寺院僧人和议会里最年轻的印度人民党成员之一联手建立了一个护牛组织，为了巩固他的印度教选民基础。2002年，纳伦德拉·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那场反穆斯林暴动发生后不久，约吉·阿迪亚纳斯把他的军队更名为“Hindu Yuva Vahini”，意思是年轻印度教徒的工具，并把它权力扩展到有关印度教权益的所有问题上。从那之后，他和他的士兵们犯下一大堆刑事罪行，包括“谋杀、暴乱、携带致命武器、破坏宗教场所、擅自进入穆斯林墓地，以及煽动两个宗教团体之间的敌意”。

辛格告诉她的同事们，他们不能未经她的同意就邀请他来参加学生会就职典礼。“我说，‘约吉不能参加就职典礼，因为大学不只属于某一个种姓或某一种宗教的学生。’”他们告诉她请柬已经发出，约吉也接受了。“他们说要么请他，要么就没人了。他们问我想怎么做。”辛格第二天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告诉记者们发出去的那些底部写着她名字的邀请卡和她本人没关系。她说她最不想做的就是邀请一个煽动暴民的宗派主义者给一个民主选举出的组织举行就职典礼了。^[9]第二天，她的头像又登上了头版，紧挨着她抨击的那个人的头像。11月15日，ABVP投降了，他们又发了一轮新的邀请卡，上面没写她的名字。“他们坚持要求这个活动一定要举行，因为他们拥有学生会的大多数席位”，辛格说。学校已经分给他们一大片地方支起一个巨大的帐篷，来招待成千上万来自北方邦各地的阿迪亚纳斯的追随者。

辛格在回宿舍的路上走过帐篷，看到几十名ABVP的志愿者在那边摆弄花束装饰。她拿一张白纸写下了她的抗议声明。“我找到副校长，把那张纸给了他。”11月17日早上，副校长召集学生会的高层开了个会，要找到事情的解决办法。学生们一直在问关于对峙的问题，报纸每天都会出个报道。“来开会的应该有5个人，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有100个男生，都是ABVP的支持者。他们一看到我就开始大喊：‘主席女士在抗议。’”辛格觉得这场面很恶心，又有点害怕。“但我不能表现出来，我离开了房间，并告诉副校长，‘当你能够按规矩召集会议的时候再叫我。’”里沙·辛格开车去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告诉他事情的原委以及她要抗议的决定。“我写下了我的目的，签了字，然后递给他。”到11月

18日，学校停了课，学生们分成两个阵营。辛格在学校里到处走，爬上围墙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们听进去我抗议的理由，你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把你的想法传达给民众（*Aapko apni baat pahunchane ke liye thoda uncha khada hona padega*）。”

就职典礼的安排在11月19日早上终于尘埃落定。约吉·阿迪亚纳斯将在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当天晚上7点，辛格和她的支持者们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绝食抗议，这里也是离学校大门最近的一幢楼。^[10]围墙以外驻守着100名由地区政府派来的警察。“我们8个人开始举起标语，唱起抗议的歌曲。凌晨1点30分左右，大概30个人闯进了学校大门，对我们发动袭击。我认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ABVP的成员，剩下的看起来像雇来的打手。”辛格告诉我，她在一群暴徒中间看到了她的秘书长。“他手里拿着个棍子，准备朝我的脑袋来一下。这时我的朋友扑过来替我挡了这一棍——他气炸了。”没有学校管理层的命令，警察是不能进入校园的。“我仍然抓住这个机会，出去说服他们，但他们说他们不能破坏规定。我的朋友在我面前被烂揍一顿，我只能靠自己做点什么了，所以我捡起来一根棍子，然后跳了进去。”很快发生了一串动作。“我走过去站在一个被打的朋友前面，结果被推了出去，力气之大让我在倒地的那一刻就摔断了一条胳膊。我在晕倒前看到最后的画面，就是警察进来制止了骚乱。”

辛格在凌晨4点钟回到了宿舍。她一点也不想把那块地方让给ABVP，但是她这边已经没有人了。“而且我的胳膊开始剧痛。我从4点开始打电话，打给这个城市里所有能帮忙制止约吉进校门的人，一直打到6点。”早上5点到7点，大门外架起了一个金盏花的拱门，中间挂着一个标语牌欢迎约吉·阿迪亚纳斯莅临阿拉哈巴德大学。“我在房间里想，如果最终不能阻止约吉，那挨的这些打，受到的这些骚扰，都是为了什么呢？——在骚乱中，有人一把抓起我的杜帕塔，把它甩了出去。我起床，从柜子里拿出一条黑色杜帕塔围在身上，然后走进校园。那时满街都是警察，ABVP的人看到我的时候很惊讶。”辛格爬到墙上，开始向他们喊话。“我说，‘如果你们认为还能继续进行这个活动，那你们就错了，我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发生的。’他们开始喊‘罗摩万岁’，我就继续讲话盖过去。”到了早上9点，规模不小的社会团体成员聚集在学校的大门前，跟着他们的还有地区长官和警察局长。市政府接着把所有人都清了出去，然后封锁了大门。虽然没有副校长的命令他们不能进入校园，但是他们有权力阻止阿迪亚纳斯扰乱阿拉哈巴德的法律和秩序。上午11点半，有消息称这位蛊惑民心的政客的车队被政府官员禁止进入市内。

[11]“我们的支持者——当时有将近150名——都站在学校大门外。街道的另一边聚集着来自各个邦的印度人民党支持者。他们向我们冲过来，但我们没有退缩。”到了中午，市里开始戒严。两小时后，在女粉丝们的簇拥下，辛格坐在她的房间里，喝着橙汁，解除了绝食。

里沙·辛格赢了，又一次。在她看来，这次胜利比上一次还要来之不易。她打败的不是被憎恶和荷尔蒙驱使着的年轻男人，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客和暴徒领袖。我在这件事后不久第一次听说辛格的斗争，并且立刻感到这和我在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多次拜访阿拉哈巴德，想要通过和她及其他人的对话、当地报道、图片、与事件有关的音频及视频，把从她决定竞选到与约吉·阿迪亚纳斯对峙之间的整个故事拼起来。

但等到她的冒险之旅走到这一步，事情的发展就变得比较容易预见了。抗议成了她政治理念的标志，我开始担心她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我也开始担心，面对真刀真枪的政治，她是否真的有天赋。她能否说服对手，甚至与他们合作？她能否面对一个不如她所愿的局面？她能促成一份协议吗？如果她在印度政坛还有未来，那她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政客呢？她是否会走北方邦前首席部长玛雅瓦蒂的路——那是一个精明冷血的达利特人领袖，善于喊追求正义的口号，以及做种姓计算；或者她会像西孟加拉邦现任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那样——她像一股易燃易爆的自然原力一样，至今还保持着最初驱使她作为一名年轻女孩进入政坛的那份简单直接的愤怒？更重要的问题是，里沙·辛格在政坛能撑多久？

2016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学生会。我是坐着小摩托来的，我的司机是阿西娅·拜格，一名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她也是里沙·辛格实际上的竞选经理。辛格开着小摩托去宣布当选的时候，她就坐在摩托的后座上。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我还是可以看出这幢宏伟的建筑本身就值得人们加入这场全印度最混乱的学生竞选。

拜格的故事和阿拉哈巴德大学的任何学生都有着不同的开端。当她从郊区的一个小镇来到这里读书的时候，她只想要完成课程然后离开。她在学校食堂第一次遇到里沙·辛格，然后她们立刻就成了朋友。2015年9月，辛格决定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拜格和辛格的其他好友一样，被她的胆量震惊。“我告诉她，不论她有什么样的想法，我都支持她。”拜格站在学生会草坪的中央，如是说。拜格在很多方面都和她的朋友们不

同：她更年轻，更活泼，更像个女孩子，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她连辛格的一半都不如。但是当辛格从学校里拿回提名表的时候，让竞选活动运转起来的责任就落在了拜格的肩上。从那之后，这个20岁的女孩子支起了帐篷，写了竞选主题曲，还参加了至少两次绝食抗议。阿拉哈巴德所有知道辛格的人，也都知道拜格。“从大街到商场，不管我们去哪儿，人们都能认出我们。他们指着里沙女士说，‘就是这个女人，里沙·辛格——学生会主席’。”

辛格太忙了，经常没间接听她两部电话中的任何一部，所以一般是拜格回答“主席女士在哪儿”，以及“她接下来什么时候有空”这样的问题。当我坐上去阿拉哈巴德的火车，我也是给拜格打的电话。那是辛格最忙的时候：2016年9月，她正式加入了社会党，并接手它在阿拉哈巴德的学生支部。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这是她为下一步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她不可能加入印度人民党，而包括国大党和玛雅瓦蒂所在的大众社会党（简称BSP）在内的任何对立党派，都没有向她伸出橄榄枝。

在她加入主流政治之后，她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人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找她：一个卖果汁的小贩想在宿舍区寻个摊位；应届毕业生想要推迟公务员准入考试的日期；还有路人为下一次学生会竞选中社会党的席位而游说。阿拉哈巴德警局派来的一队持枪保镖日夜伴其左右。她爸妈还在为结婚的事情唠叨她，但她知道他们也明白，现在给她找个合适的男人嫁出去就更难了。“我跟我爸说，‘至少你不用再给他们发照片了。’”在那个周末，我和辛格都离开了。我回到了德里，而她去了勒克瑙。她是被北方邦首席部长和社会党的继承者阿基莱什·亚达夫叫去的。她的学生会主席任期到2016年10月结束。9月1日，学校宣布下一个竞选季开始。这一次，竞争是在社会党和ABVP之间进行的，而它背后的政治意义比上一次选举还要大。在同一天，社会党选择了里沙·辛格作为他们的竞选领袖。

我为里沙·辛格打气加油，因为我对她既愧疚又佩服。我们有一样的理想，但我却没有她那么理想主义，也没有她的勇气。我为世俗主义做的最多就是礼貌地和一个护牛者辩论世俗主义的意义是什么，而辛格则为反对种姓、公社制和父权制——她所说的“肌肉力量”——而斗争，我对于国家政治问题产生的不满，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有发声。

由女性发起斗争的故事吸引着我；报道并写出她们的斗争，对我来说几乎是对于没有参与其中的一种补偿。在我去阿拉哈巴德见里沙·辛格

四个月前，我去了北方邦中部的一个小镇巴拉本吉，见一群年轻的达利特和穆斯林女性，报道一些你在普通报纸上很难看到的故事：种姓暴力、配额泄露、女性自杀。^[12]我曾经跳上一个26岁的达利特女人的自行车后座，让她骑车带着我到处报道。我两只手紧紧抓着后座，她则七拐八拐地骑着车在村子的小路上向各种人——店员、警察、流浪汉——打听一个没有别人会问的问题：前一天晚上在村子井里发现的那个死掉的15岁达利特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

施拉达·巴斯卡的勇敢体现在太多方面，我在后来写出的文章中并没有足够的空间一一详述。作为一位达利特女人，她敢于在塔库尔种姓为主导的地方四处打听真相，甚至经常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对峙。她一直被各种人威胁：比如村里的某些塔库尔人，嫌这个达利特女人不听他们的话；再比如那些政府官员，不喜欢这个达利特女人到处打听流言蜚语；以及各种路人，不喜欢这个达利特女人问他们问题。我惊诧于她的勇气，但她也给自己对正义的追求设了限。有700人订阅了《新闻浪潮》，作为一个倡导社会公平的方言出版物，这已经算很多了，然而它在巴拉本吉之外就鲜为人知了。施拉达·巴斯卡的抗争还是在小圈子里，相比之下，大学层面的学生政治就不同了——更高的风险、更高的回报，也更富戏剧性。而里沙·辛格喜欢的正是这些。当她复述起她激昂演讲中的语句时，总是带着点得意。即便当她说起和最坏的敌人之间的狭路相逢时，你也能听到她声音里的激动之情。她的故事不仅深深吸引了我，也深深吸引了她自己。

2016年9月，我再次回到阿拉哈巴德，但那里已经脱胎换骨成了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从火车站到大学招待所那五公里的车程中，我所看到的海报上的人脸比真正大街上的行人还要多。大学的街道看起来简直就像战争前线——只不过是纸为武器。地上至少铺着四层竞选宣传单，墙上贴着的也差不多。这一周后来的几天，出现的就不只是纸张了。那天早上的报纸上全都是警察在选举前查获的物品：豪车、枪，以及装满现金的行李箱。接下来的一周里，印度人民党和社会党将向学生领袖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据说ABVP为了学生会主席的位子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我很想知道由里沙·辛格带领的社会党支队能走多远。我有足够多的机会找出答案。

那天晚上我和辛格爬进了一辆在女生宿舍外面等着她的SUV。一名年轻的社会党工作人员帮她开车门，车里还坐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他们挤出一个像小男生一样拘谨的微笑。我们被带去参加竞选周的第一场

社会党演讲，举行演讲的街区已经挤满了住日租房的大学生。

辛格是当晚的明星演讲者。她的任务是向这个黄金选区介绍社会党的五位学生会候选人。更重要的是，她要告诉台下的观众们，为什么应该选其中一个作为他们的主席。社会党选择阿吉特·亚达夫作为候选人的理由很简单。“为了维护普通学生的权益，我从警察那里挨的打是最多的”，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在台上这么喊。他会指着自已额头左侧一条深深的伤疤，告诉台下的听众，他注定要成为他们的领袖。多年前他父母把“vidhayak”（邦议会成员）这个词加在他的名字里可不是白加的。穿着白如灼日的挺括的库尔塔衫，他会告诉底下的人阿拉哈巴德的学生政治代表什么——“从街头到国会”。

阿吉特—辛格组合非常草根，但大家都知道这并不足以赢得选举，因此他们此刻急忙奔向阿拉普尔。他们到那儿的时候，场子已经完全布置好了。台上站着五个身着白色库尔塔衫的年轻男士，台下还有100个年轻男人挥动着厚厚一沓五颜六色的宣传册。所有人都等着这个夜晚真正开始——也就是辛格走进来的那一刻。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志愿者抢着去拉开大门，他们屏息静气等着她进来。还没等她的脚真正挨到地面，他们就一窝蜂地拥了上去。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笑的事情之一，但辛格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有趣。

我意识到权力的天平在一年之后已经改变了。社会党的肌肉型男们都依靠着辛格的明星效应来赢得这场选举，阿拉哈巴德人很难想起上一次一个学生会主席能吸引到这么多人是什么时候了。而辛格需要向勒克瑙的上级证明她不是一个偶然的胜者——这也是她从街头走向国会的唯一途径。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她那次获胜是凭借着她提供给选民的实际好处，但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她的胜选和她的政治才能毫无关系。距离这个夜晚一年之后，我和一群男人坐在离得不远的赖伯雷利市，听一位老记者兼当地的权力推手道出里沙·辛格奇迹背后的真相。“她什么也不是，”他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她能赢的唯一原因是她拿到了社会党的选票——那是塔库尔人和亚达夫人的选票。现在大学里60%的学生都来自农村的其他落后阶级（简称OBC）。只要利用社会党的平台，不管是谁都能赢。”当时在场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但此时在阿拉普尔的这个晚上，一切都是关于辛格的明星效应的；当她拿起麦克风，全场的大学生都沸腾了。她也身穿白色衣服，围着一条社会党的红围巾以炫耀她的新职位。“我向这里所有的朋友致以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候”，辛格的第一句话就很有分量。天空中飘下毛毛细雨，

给她的脸打上一圈光晕，她把手里的纸展开，读了一首为这个场合准备的诗：“我们像暴风雨一样电闪雷鸣 / 我们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 / 敌人们，不要看轻我们 / 我们是社会党，不是那些平庸的政客。”每个人都掏出手机拍下了此刻呼风唤雨的里沙·辛格，然后这些照片立刻被上传到Facebook并迅速得到点赞。

这是辛格这晚能得到的最多的关注了——现在是时候说重点了。“投票给这五个人，”她双手合十说，“听我的没错。”她成为学生会主席时还不是社会党的成员，但是她告诉台下的人们，过去一年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都遵照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全市免费公交，全校免费Wi-Fi，“因为社会主义不允许语言歧视”而反对公务员考试强制使用英语的激烈辩论。她提醒大家，去年她也是站在这里，请求他们帮助她创造历史。而这一次，她想让他们帮助她改变未来。“我们不能允许宗派势力进入北方邦，只有一种政治应该统治北方邦，那就是以平等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政治。”宣传册在雨点中抛撒出去，伴随着“里沙·辛格万岁”的呼声。而这次辛格没有停顿，“你们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口口声声要为国家寻求一种新的政治，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你们想的全是自己的种姓和信仰的教派。这次不行！这一次，你们所投出的必须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票。”

辛格结束演讲的时候，街上挤满了男人，台上也是。面对阿拉普尔的黑夜，作为这里唯二的女性，我们两个是很弱势的。相比自己，辛格更担心我这个外来者。她不但安排她的保镖站在我旁边，在台上也一直看着我这边的情况。那天夜里，她坐在自己的床上告诉我，对她来说新生活最难的一点是平衡她的日常工作中产阶级对于女性声誉的看法。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大街上给社会党候选人小队拉票，但她会确保不在很晚的时间去她自己住的街区。“我爸说，‘晚上10点之后不要出现在这里，不然邻居会有闲言碎语的。’”接受做竞选领袖时，她就了解这个不言而喻的条件。“我会为校园制定策略，但我管不了校外的街头。”

到了街头，管用的不是策略，而是存在感。等到里沙·辛格演讲完回到宿舍之后，剩下的就靠存在感了。辛格可以制定新规矩——“禁止撒钱，禁止开豪车，禁止暴力，拥有候选人的最终决定权”——但是竞选活动进行了三周后，重要的就不是规矩而是结果了。在第二天早上社会党竞选大本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一群年过60的老党员建议候选人要结合不同种族——亚达夫人做主席，穆斯林做副主席——并且说服警察放还扣押的宝马车，辛格并没有反对。副主席候选人在自我介绍中说他是“一

个会在念祷告之前到神圣的恒河里游个泳的穆斯林”以吸引婆罗门选民的时候，辛格也一笑而过。社会党开圆桌会议讨论前一晚那个孤注一掷的宣言——阿吉特·亚达夫“Vidhayak”说“学生会大过亚达夫联盟吗？”——让社会党失去了多少选票的时候，里沙·辛格甚至都不在场。

到9月21日中午，当我们离开竞选大本营，街头已经变成男性的狂欢。十几个队伍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学道上：候选人们在最前排，被各自的帮派扛在肩膀上往前走，身后集结着支持者们开的摩托车和SUV，他们挥舞着党派的旗子，高喊各自的口号。与其说这是一场力量展示，倒不如说是一场征战。在竞选演讲的前一天，街上只有四种人：候选人、支持者、记者和警察。里沙·辛格在社会党队伍的前排，她的右手牵着亚达夫人的手，以表示支持；左手牵着我的手，以保证安全。辛格为了解释学生选举的疯狂给我讲过很多故事，我也认真地记下了每一个细节，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我被后面一排排的男人猛推着，又被前面的一排排男人死盯着，我不知道这周剩下的几天我还该不该留在这儿。我决定再待一天看看。

到了傍晚，辛格问我想不想参加晚上的“麦克会议”。我只在理论上了解过这是什么——不同候选团队之间的公开辩论——但她告诉我实际上这和我之前看过的任何辩论都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它被称作“麦克会议”是因为不同的竞选团队应该以麦克风为武器进行对决。声音是这个仪式的关键。“擂台”搭在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两旁，麦克风就支在擂台上。最壮大的两个学生党派相对站在路的两侧，剩下那些不重要的人就自己找地方站着。这一次对垒的是社会党和ABVP。

事实上，比麦克风更重要的是演讲者——体型壮硕、色彩缤纷、震耳欲聋的四个人，每个人紧挨着架起这个台子的四根杆子站着。每个麦克风前站立的不是候选人本人，而是一排该党派的竞选组织者，候选人是被支持者们扛在肩膀上抬着走过走道的。这块场地上挤满了男人，剩下那些没有抬着人的，要么挥舞着横幅，要么到处分发宣传册。方圆500米内，每个人都同时在说话，其中也包括三支专门进行过防暴训练的阿拉哈巴德警察部队。马路的另一边，是对方党派朝着麦克风嘶吼，试图盖过对手的声音。

第一眼看过去，这像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活动，因为根本什么都听不见。不过我已经被教育过了，重点不是听见。重要的是对阵双方都要不间断地讲话；目的不是被理解而是盖过对方的声音。这就像是一次发生在大壶节^[13]上的说唱对决；竞选前夜，阿拉哈巴德这条小马路上产出的

相互辱骂比整个竞选的其他时段都要多。

社会党和ABVP的擂台之间这条窄窄的马路成了当天晚上活动的中心。社会党人率先发力，指责ABVP造成了罗希特·维穆拉的死亡（“你们是杀人犯”）。我知道这一点主要因为我就站在演讲者的身后。辛格站在他旁边，对对面的谩骂报以微笑。站在走道对面的正是她在学生会的同事，她似乎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要么就是她能完全猜到所有他们能说的话。当这个夜晚过半，所有人都能看懂当时的情形了——在ABVP台上的男人们先是指了指辛格，又指了指麦克风。在对方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里沙·辛格接过了话筒。她微笑着告诉她的前同事们从竞选的第一天她就想说的话：“我没让约吉·阿迪亚纳斯进校门，我也不会让你们再进入学生会。”没人听到她说了什么，但这让ABVP那边更愤怒了。话音还没落，一颗炸弹就在我们左侧爆炸了。正当我捂着耳朵跳下马上就要倒塌的台子时，又有两颗粗制滥造的炸弹接连引爆。警察冲进了烟雾缭绕的街道，剩下的所有人都想一跑了之。我和所有人一样要逃命，虽然我并不知道往哪儿跑。当我在狂奔中找到辛格，我知道我的阿拉哈巴德之旅该画上句号了。

我从没见过如此失控的场面。在这之前，我见过一群年轻男人用稻草扎了个别国的塑像，然后在一个拥挤的市场中央一把火烧了它。他们在烧完的灰烬中猛踩一番，直到把每一点红色都踩成黑的。^[14]我还见过另外一群年轻男人一个晚上搜查了200辆大卡车，就为了找穆斯林偷牛的蛛丝马迹。除了极少数的特例，我对于现代印度人之疯狂的广泛观察最终指向了同一缘由：那些年轻男人们因为不知道自己处在世界的什么位置而十分焦虑。而他们最难面对的，就是那些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的女人们。他们可以面对我，因为我的立场是去了解他们的男性力量，而不是威胁。而面对像里沙·辛格这样的人，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里沙·辛格却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不管是能争善辩的印度教信徒、护牛者，还是反情人节暴徒。这使得学生竞选的疯狂与众不同。在走道对面冲着她顶胯的男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急于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她也是一样的。自从决定参加竞选，她基本就没有做过什么保险的决定；本可能取了性命男人的男人不在少数。如果列一个单子，排在前面的肯定有为反对学校命令而进行了四天的绝食抗议，以及捡了一根木棍冲进一群挥舞着板球拍的醉汉们中间。

现在，作为一名以“男生就是男生”的观念建立起来的政党的正式成

员，她的工作就是领导一群以此为纲的男人。这种情形下，每一秒都充斥着紧张气氛，很难看出她会不会赢。竞选期过了一周后，我就明白不该寻找确定的答案，而应该去关注那些能够确定的事情。对我来说，在那场“麦克会议”的余波中——社会党的队伍曾在竞选大本营集结起来去评估状况——可以确定的是，当天晚上标志着一个小高潮的出现。在场的所有人，从辛格的保镖到她的高级顾问，再到她年轻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不抱着以牙还牙的态度，每个人都因为被侮辱而怒气冲冲。他们有同样的目标：复仇。最终，站在一大群社会党员中的一个年轻男人对他的领导开了口：“只要你下命令，我们就以牙还牙，以炸弹还炸弹。”回话的是一名资深的学生领袖，他把目光投向辛格，说：“不，让我们以我们的成绩回击。”

转天我离开了阿拉哈巴德，但我一直都在关注辛格。10月1日，她在Facebook上，发了唯一一条关于选举结果的更新：ABVP赢得了学生会主席的职位。也是在Facebook上，我看到了辛格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2017年1月17日，里沙·辛格发布了一条状态，感谢北方邦的首席部长、社会党继承人，给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她被社会党推举为候选人去参加邦议会的选举，而且是代表她长大的街区。里沙·辛格这次又要去一趟照相馆了。

参考书目

Neelam Saran Gour (2015), *Three Rivers and a Tree: The Story of Allahabad University*, Rupa Publications.

Craig Jeffrey (2012), *Timepass: Youth, Class and 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dia.

Dhirendra K. Jha (2017), *Yogi Adityanath and the Hindu Yuva Vahini*, Juggernaut.

[1] <http://www.epw.in/hi/journal/1970/23/special-articles/student-politics-allahabad-university.html>

[2] <https://www.ndtv.com/allahabad-news/student-riot-shuts-down-allahabad-university-478910>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allahabad-varsity-closed-as-vc-is-held-hostage-and-students-go-on-rampage/article3359859.ece>

<http://www.theweek.in/content/archival/news/india/allahabad-varsity->

- [3] 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是因历史原因形成、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印度宪法规定的两类社会弱势群体的总称。——编者
- [4] <https://scroll.in/article/805919/the-seeds-of-todays-ferment-in-central-universities-were-sown-in-2006>
- [5] <https://www.thequint.com/news/politics/bjp-stumped-by-young-idealists-gurmehar-kaur-rather-than-rahul-gandhi-akhilesh-yadav>
- [6] <http://www.caravanmagazine.in/reportage/from-shadows-to-the-stars-rohith-vemula>
- [7]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JNU-student-leader-arrested-on-sedition-charge-after-Afzal-Guru-protest-event-sent-to-3-day-police-custody/articleshow/50963303.cms>
- [8] http://www.huffingtonpost.in/2015/10/01/allahabad-university-elec_n_8225120.html
- [9]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ausu-president-says-wont-let-adityanath-enter-allahabad-university-campus/>
- [10] <https://scroll.in/article/770358/in-pictures-allahabad-university-students-protest-to-stop-yogi-adityanath-from-entering-the-campus>
- [11]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adityanath-barred-from-entering-allahabad/>
- [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5/mar/30/female-reporter-rural-india-khabar-lahariya-feminist-newspaper>
- [13] 又称圣水沐浴节，节庆期间，印度教徒在恒河沐浴，清洗旧日余孽。——编者
- [14]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ot-loving-thy-neighbour-a-peek-into-the-mindset-of-nationalist-china-bashers/story-jQDn7NXUePnmHDRXcgvTYK.html>

PART

III

第三部分

“一切表象都是假象”

假设你是一名印度年轻人，已经逼自己跨过了最大的阻碍：你告诉自己，我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没人发觉你有本事，但你不怪他们，他们自己也忙着讨生活。现在，你开始思考策略。你知道你最终是要变得有钱又有名，但是怎么达到那一步，得你自己想办法。有一天，一个人给你提供了改变人生的详细计划，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告诉你说，外面有一个世界能让你这样有梦想没资历的人取得成功，只要你遵循简单的指导。你上钩了，一路按照他的指导行动，做了一切被要求做的事。你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改变了走路的姿态，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你背下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的答案，以及所有有可能问你问题的人的名字。然后，你孤注一掷地跳入了梦想中的世界。

再然后，你就被困在了降落的地方。这时候你才想到各种没人提醒过你的事情，比如，跳入这个世界的远不止你一个。这个世界里挤满了人，看起来都跟你一模一样。不管是外貌、走路的姿势，还是说话的方式，都跟你别无二致。你怀疑他们也背过同样的答案，以回答同样的问题。但这还不是对真相最致命的疏忽。当你发现只会跟着指导行动是不够的，这才是最糟糕的。没有特殊通行证，你一步也无法前进。你可以回去拿通行证，但是没人告诉你那张通行证是什么样子。到这时，你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你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世界追寻梦想；平常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那一套，在这里不通用。这不像开家创业公司，或者教英语谋生，在这个大门紧闭的仙境里，不管你多么努力地追求梦想，它能不能实现总是由别人决定。你后来反思，相比乞求看门人把你放进去，你在这里做看门人岂不是更好？这可能是你在这儿赚钱和获得影响力的唯一途径。

但你已经为整个计划付出了代价，没有回头路了。

即便你不是一个追梦者，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你可能就是个普通人，要求也不多：一份工作、一辆车、一套房。但你得先找到工作，才能有其他。然而第一步就不容易。相比工作，可能还是梦想着大富大贵更容易些。

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就业市场了——你读了些书（“高中毕业64分，商科本科56分”），学了些技能（“英语口语、计算机”），甚至还攒了一份简历。也许简历是你雇人写的，但是你确实想要“在一个能提供学习机会、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工作”。你保

证“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努力工作，争取达成公司和个人的目标，成为一个专业人才”。你并非不想要农舍或者奥迪，但就目前而言，挣到月薪就可以满足了。你已经离开了家，数数积蓄，还够撑大概一个月。有天你遇到一个给你开出薪资的人，你谢天谢地。他没跟你说这份工作是干什么的，你也没细想。你希望自己进入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即便是虚构的你也不介意。你一头扎了进去，这次降落在了梦想世界的中心。这一回你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你成了那个创造幻觉、嘲笑别人上当的人。你并不想一辈子做这个，但是你租了房子，还申请了车贷。你不认为你这么做是公平的，但你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也不是靠公平运转的。如果是的话，那自己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这是一些印度年轻人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准备好加入这场游戏，即便规则使他们捉襟见肘。

6 明星

在兰契一个漫长的午后，我去看了场选美比赛。如果按照全城广告牌的尺寸来算，哈尔肯德邦先生 / 小姐选美算得上是个大活动了。比赛前几天，报纸已经开始事无巨细地报道：兰契最大酒店的宴会厅已经被预订；上千人参加的海选中筛选出一小撮决赛选手；很多人打电话去预订前排座位。^[1]在昏暗的宴会大厅中央，一个胶合板搭成的舞台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我进去的时候正在进行“民族赛”，台上的男孩女孩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走来走去，DJ台传来派对歌曲的音乐。参赛者们——十男十女——已经进行了四轮比赛，由坐在舞台左侧的评委进行点评。他们当天晚上还有六轮比赛，每轮强调一个时兴的主题，“现代”“时髦”“随性”等等。

每轮都会淘汰一名选手，对于台下主要由亲友组成的观众们而言，淘汰理由并不清晰。他们中的十个人晋级到问答环节。穿着自己最夺人眼球的衣服，他们在台上站成一排，等待一个会使他们的梦想实现或破灭的问题。问题都很普通：你是谁？你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个头衔？你会用这个头衔做什么？选手们的回答都没能打动评委。最后一个被提问的是个高个子男孩，他穿着一件刺绣的黑色舍瓦尼^[2]，留着八字胡。观众们很喜欢他——评委向他提问之前，他以一句低沉的“as-salaam-alaikum”^[3]向他们问好。对于他到底是谁，他将用这份荣誉做什么，他并没有给出什么惊艳的回答。他洪亮而清晰地告诉他们的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第一个哈尔肯德邦先生。这个答案在他脑海中酝酿多时了——“因为我拥有一切成为明星的资质。”他说出这句话，好像已经在镜子前演练了多年。掌声之热烈直接锁定了当晚的结果。奖杯和他的装束很搭，他大概就是为了这一刻选择了黑色。

哈尔肯德邦先生——穆罕默德·阿扎尔每天早上都花很多时间设计自己当天的造型。他可能会穿同样的衣服，但从不重复同样的造型。他有一千种方式让自己的造型鹤立鸡群：棕色条纹状山羊胡、当领结的甘查纹围巾、单只黑耳环、文身贴、立起的衬衫领子、踝靴、仿雷朋蓝墨镜。他换发型比普通人梳头发还快。大部分时候他头发很短，但偶尔他把两鬓剃成青楂儿，或把一边的头发剃成一系列列的，或者把头发往上梳成一撮一撮的，或者几乎总染渐变的发色。这种虚荣肯定会把人搞得有点不正常。阿扎尔总是在搜寻身边任何可以反光的表面，说起话来也像

一个永远被镜头环绕的人。“我的身高和个性是上天给的礼物（*Mera height aur personality Allah ka shukr tha*）。”在兰契购物街的咖啡日咖啡馆里，阿扎尔一米八的大个子蜷在椅子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的梦想都很独特，从一开始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何对出挑和出名特别着迷，“我一直都想做点什么让自己红起来，做点不一样的事，做点能给我的家乡带来荣耀的事。”

阿扎尔出生在常合——兰契市区外的一个穆斯林为主的贫民区。这个地方如果上了新闻，绝不是因为那里的年轻人有了什么成就，准是宗派斗争引发的。阿扎尔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两居室里长大，全家都靠着他爸爸在电厂做监工的薪水过活。往返于逼仄拥挤的家和空荡荡的学校之间，阿扎尔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得离开这儿。他坚信想要离开常合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件大事，让这一片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你去当模特得了（*Tu jaa modelling kar*）！”有一天他在那儿打扮自己的时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于是，阿扎尔决定成为一个模特。他觉得这是利用上天给他的天赋赚钱出名的最佳方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想法中去：在YouTube上看模特们走T台（“虽然我的手机屏幕不能放大”），把他房间的一角改作锻炼区（“无手俯卧撑、瑜伽、各种锻炼”），练习用各种姿势拍照，并且把照片传到Facebook上求“反馈”。19岁进入兰契的娱乐圈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甚至给自己改了个符合新身份的姓——“汗”，印地语电影圈里一半的大明星都这么干。“你看看我，”他往后靠了一点儿让我看他高大的身材，“是不是像一个‘汗’？”

我看到的是又一个对自己命定的人生不满的年轻人。2014年9月，我打电话邀请他喝杯咖啡的时候，阿扎尔·汗已经走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他不是第一个离开常合的人——每年都有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贫民区，找个不需要什么资历的地方去工作：兰契的快递公司、孟买的工厂、迪拜的餐厅。但阿扎尔选择了更冒险的路。

当阿扎尔·汗准备来这闯出一片天时，兰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城市有了它很想炫耀的景象：咖啡馆提供招牌拿铁，酒店的酒吧周六晚开派对，当地市场贩卖外国T台上最新的潮流服饰。这里的人们有足够的闲钱可以维持他们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新中产已经摆脱了担心别人看法的负担，出国旅行、在高档餐厅吃饭、去健身房健身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一天，我来到兰契第一份生活方式杂志《兰契生活》位于老普路上的办公室，对编辑说：“请知无不言。”2010年，当时25岁的施瓦姆·阿加沃尔辞去了他在古鲁葛拉姆的公司的白领工作，回来将他父亲的

印刷生意转成做一份城市杂志。我在很多地方都见到了这份杂志，包括机场、酒店的酒吧和美容院。“这股风尚正在蓬勃发展”，阿加沃尔说。他把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转向我，让我看他妻子和小姐妹们出去“夜生活”的细节——在一间高档餐厅里，这些女人们都穿着小黑裙，坐成长长的一排，他老婆坐在最中间摆姿势。“那天的主题是LBD（Little Black Dress，小黑裙），”阿加沃尔告诉我，说着把电脑屏幕转了回去，“她们每个派对都有主题——沙滩、假面舞会、伴娘团。”从水烟聚会、泳池派对到摇滚演唱会，城里发生的一切足够他每个月填满杂志的版面了。此外，还有为健身房开业、汽车展销、清仓甩卖、手工艺展览、文化活动和公司年会举办的各种时装秀。^[4]然而，当阿扎尔·汗为出道寻求平台时，他还是感到很迷茫。

“自打我决定成为模特之后，”阿扎尔告诉我，“不管我走到哪儿，村里人都会跟我说，‘阿扎尔，你太适合做模特了，名副其实（*Tu deserve karta hai*）。’但我如果连个走秀都参加不了，那怎么当模特呢？我又怎么能在秀场开始之前就得到消息呢？我都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些秀场照片时才知道的。那些一直告诉我说我天生就该当模特的好心人们根本不知道时装秀是什么，也不知道走T台是怎么回事。”他做了他能做的：在新闻报道中找组织者的名字——如果他够幸运能找到的话，放在Google里搜索，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然后去找他们。“前台的小姐让我把作品集留下然后等电话，于是我就给她一个装有我照片的信封，然后等消息。”这些照片是从他发在Facebook上的头像中精挑细选的，每个都是不同的造型：有的硬汉，有的忧郁，有的性感。

2012年年初的一天，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个试镜招聘。当他准时到达现场（一个大学的停车场）时，一群男孩女孩已经排起一条长队了。《我偶尔陷入爱河》本来只是个小地方的低成本电影，但是汗听说制片人在争取让一位宝莱坞演员在里面露一面。传言在排队试镜主角的人群中传开了，惹得大家心跳加快。汗觉得自己试镜表现很一般，所以第二天有人打电话通知他被选中演主角时，他激动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后来才明白，当初去面试的所有人都接到了这个电话。当他们急匆匆赶去同一个地方见导演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要求交2万卢比的定金才能往下进行。坐在桌对面的人说，就凭我们对你这个无名之辈的信任，这笔买卖很合算的。“我们谁也没有这笔钱，所以大家都退出了”，汗说。有些人——总会有这样的人——后来改变了主意，卖了一辆摩托车或者一块表，但钱却再也送不出去了。制片人和导演的电话号码之后再打不通了。

不管多么不合情理，这个体系自有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抱负能够成为另一个人口袋里的钱，那谁会怕承诺呢？我经常遇到这种将自己放在印度年轻人和他们的梦想之间的人，穆因·汗、维内·辛格尔、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皆在此列。并非所有人都是诚实公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了在那些想要出名的年轻人身上捞一笔。这个骗局从明星这个概念出现时就开始存在了。这让孟买既是梦想之城，也是骗局之城，它的陷阱从拥挤的火车站一路延伸到宝莱坞的电影公司。但现在你用不着跑到孟买来受骗了。如果在兰契可以追求金钱和影响力，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当明星呢？有梦想的地方就有骗局，有追梦者的地方也就有骗子。

这个小插曲没有让阿扎尔失去信心，但此时他明白他的成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了。事情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是也无路可退。“我在试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在城里做过模特，他答应带我去他之后要走的时装秀，所以这次试镜也不全是浪费时间。”三周之后，汗就在当地官方会展场地Zila Maidan为一家设计公司的时装秀排练了。“在那之前，我对于走秀的所有了解都是在YouTube上看的。我的走步就和萨尔曼·汗在电影里走的一样。”如今，阿扎尔把自己交给他的“前辈”训练：“‘你的脚，’他们告诉我，‘应该直直地落在地上。走路的时候肩膀不要动。肱二头肌以上的手臂要绷住，以下的手臂要动。眼神应该一直盯着台下观众——你假装是在看着他们，实际上谁也没看到。’”阿扎尔坐上了从常合出发的班车，背包里是他建立新生活需要的一砖一瓦，“正装衬衫和裤子、时髦些的破洞牛仔裤和T恤、墨镜、化妆品”。

阿扎尔·汗终于在一个名为《焚烧：第四季》的活动中“出道”了。这是种“综合表演”：唱歌、跳舞、走秀。汗试镜时表现很好，甚至会在面试团队示意要小费的时候成功塞了300卢比。当他走过T台，观众报以掌声，他穿着自己买的为自己造型的衣服，脚直直地落地，眼睛看着所有人又没看到任何人。他的一位朋友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在视频的最后一，阿扎尔从一位当地老板的手里接过一座奖杯。那天晚上，至少在发现自己错过回常合的末班车之前，他觉得登上了人生巅峰。“我在街上游荡了三四个小时，直到送报车带着当天的报纸要从城里出发。”挤在另两个坐车回村的人中间，阿扎尔·汗从车的后窗看着城市消失在视野中，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的生活很快形成了规律。从试镜开始，标准费用是300卢比；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批人里选拔，所以活动策划都统一要价，既不想比别

人便宜也不想比别人贵。对于这些志向高远的未来之星们来说，这个价钱也还能接受。活动策划们需要给各种人付各种钱才能搞起一场活动，他们最后肯定也要赚一点的。而且，和大城市那些打拼者要付的门槛费比起来，这简直不值一提。你还得自己买时装秀用的衣服和配饰，不过幸好每场时装秀要求的T台“造型”都是一样的——正装、潮流、西式、民族、复古——不过大家都知道一套衣服不能穿超过两次。相比试镜费，在衣服上花的钱要多得多，而负担不起这些人就会慢慢掉出追梦者的队伍。

参加第三次时装秀的时候，阿扎尔·汗的积蓄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普通人有很多节日——杜尔迦普加节^[5]、排灯节、开斋节、开斋节前夜，过节前他们要买东西。而我有许多时装秀，走秀之前我要去市场买衣服。”你甚至会知道评委和主要嘉宾分为几大类，根据活动策划者的经费和人脉，他们可能请来银行经理、女子学院时装系主任、车展老板或者不知名的政客。摸着门道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精通此道。学会如何自我介绍就费了他不少工夫。“我说服自己要消除心里的恐惧（*ki apna dar nikalna hoga*）。我通过给朋友们打电话聊天练习更自然地说英语。我能听得懂，但是很难说出口。不管怎样，我准备了‘你为什么想当模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和评委保持着眼神交流，说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答案，“身高、个性、长得帅、上相”。

当然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什么活儿接什么活儿。汗告诉我，每一场秀都是接下一场秀的机会。“当红先生和当红小姐”秀带来了游乐场的共和国日特别活动秀，然后又带来两场大学毕业秀，最终带给他在展销会的第一场“设计师”秀。一个季度之后，他的收入是“零”。用汗自己充满诗意的描述，这就是他作为模特的生活：“走秀结束，我拿到一份小礼物，坐上送报车回家（*Show khatam hua, memento mila, press gaadi mein baitha, ghar gaya*）。”阿扎尔·汗想要的和我跟采的每个人都一样：钱、名气，抑或两者都要。和穆因·汗、里沙·辛格一样，他知道一切只能靠自己。他为自己的梦想做了最大的努力——他做了所有能够带他到达彼岸的事情，从身材到造型，从练步法到说英语。然而他的任务中有一点与别人都不同，在他寻求成功的这个世界里，还没人找到成功的法则。

阿扎尔·汗听说哈尔肯德邦先生 / 小姐的比赛是在斋月，那时候距离他进入模特界已经两年了。这个比赛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主打“时尚

秀、选美、俄罗斯肚皮舞者、性感女郎派对、来自孟买的特邀DJ，以及苏非派音乐酒吧”。来自当地大学时尚设计系的设计师将复制孟买最新时装周上展示的服装。模特们通过四个城市的试镜选拔出来，观众则由城市精英阶层组成——医生、公务员，以及实业家。

想要通过选拔绝非易事。试镜费300卢比，但所有通过试镜的人还要交2500卢比的押金才能参加这场秀。他们被告知，这笔钱是用来给他们化妆造型的。活动策划说，他们将接受特别聘用的“专家们”的辅导，从他们的步法到英语口语都包含在内，他们还能呼吸到三星级宾馆的纯净空气。汗手上没有这笔钱，但他知道砸锅卖铁也得凑出来——这也是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机会。他如果赢得了这个头衔，就再也不用求人给工作机会，也不用白干活儿了。如果能赢，他就可以平蹬孟买的T台，或者信步走进宝莱坞。如果他能成为哈尔肯德邦先生，那他就成大事了。从第一天训练起，他就决定要拿出他的最佳水平。“一个朋友以我的名义帮我申请了银行贷款，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样交通就可以方便一点。我选择了‘魅力’牌摩托车，这和我想进入的圈子很搭。”

他写了一段非常吸引人的自我介绍，然后录在磁带上练了上千次：“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祝你们安康（*as-salaam alaikum*）。我叫阿扎尔·汗，我的爱好是打板球，参加时装秀，骑摩托。我的梦想是成为最成功的模特，把荣耀带给自己和家乡（*Meri hobbies cricket khelna, fashion shows karna aur bike chalana hai. Dream hai ki main ek successful model banoon jis se mera aur mere area ka naam roshan ho*）。”他在电视上看了太多的才艺比赛了，所以他知道除了比拼的才艺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都纳入考量范围。他把教练教的所有东西都用上了，“其他人在彩排前后都会偷点懒，但是我从不允许自己犯错。我每天都花心思做各种造型，为的是给评委展示我的可塑性。我对他们毕恭毕敬，上台问好，下台挥手再见。”当为期两天的比赛终于开始的时候，汗似乎已经获得了优势。好的设计师会选择他，当他上台评委也会投来赞许的目光，甚至有两名女选手都说他看起来挺帅的。“我感觉到我会赢。在台上宣布结果之前，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就冲进休息室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现在感觉站上了人生巅峰。”伴着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备受尊敬的评委宣布了正式结果，阿扎尔·汗和首席嘉宾——前首席部长的妻子——握了手，从她手中接过了他人生中最闪耀的一座奖杯。

被唯唯诺诺的助理们包围着的塔布里兹·汗，看起来像个贩毒头目。

即便没有这些助理也是一样——他身材小短，挺着个大肚子，穿着迷彩T恤，袖子卷起来露出结实的肱二头肌，黑色牛仔裤配粗跟黑皮鞋，看起来就很吓人。他的脸又圆又宽，留着山羊胡，头发长而油腻。要不是他开口讲话，我简直不相信那清脆的嗓音和孩童般的笑声会出自他口。不过他不得不开口讲话，他可信不过别人来讲他的故事。刚刚29岁的塔布里兹·汗已经拥有一个正在崛起的活动帝国。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和名人们的合影，展示了他从一个普通人到举办邦里第一个时装周和选美比赛的奋斗历程。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登上当地报纸副刊的几周之后。他身边聚集着的比赛冠军和其他高官显贵，给他脸上增光不少。他说，我在采访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他很赞同，每个活动策划都在重新定义小城镇的生活风尚。“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真是一分钱也没有”，这是白手起家的人标准的开场白。他来自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这种家庭里男人们每个月挣固定的工资。汗第一次反抗传统是从大学退学，这可完全应了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的那套说辞——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职位，并不需要大学学历。“你四边打量一下兰契，活动机会遍地都是。多亏了这地方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口袋里的钱太多了，除了到大城市旅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花。然后他们开始在家大办派对。生日派对、婚礼派对、25周年银婚纪念、50周年金婚纪念……你需要准备的就是金椅子、金色的舞台、金色的嘉宾服装、金色的娱乐活动，还有各种老歌新歌。我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一名汽车经销商。他们想办一场年会，需要个舞池和几名主持人。我帮他们安排好了，他们付给我2500卢比的策划费。”2007年，他确信活动策划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业，于是他成立了一间活动管理公司，取名叫“Ramp”（T台）：“你看，这个城市里各种事情都需要模特。不管是汽车展销厅的开业，还是水泥经销商集会，所有人都希望能搞点吸引人的活动。如果接不到活儿，你就自己搞个时装秀，让模特们、设计师们都付点门槛费，请一个政客的老婆当首席嘉宾。我从中能挣多少钱呢？挣不到钱，但是能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三年间，这位企业家拓展了公司的业绩，并把公司更名为“Dream Merchant”（梦想贩卖家）。“然后我开始思考：孟买有时装周，德里和加尔各答也有。我们兰契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各种人：先是衣料公司的老板，交150万卢比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品牌曝光；然后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们，交1500卢比他们就可以向不知道往哪儿花钱的人们展示自己设计的衣服（“要参加拉克美的时装周最少要交10万卢比”）；然后是那些还做着明星梦的孩子们，

花3000卢比就可以完成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的飞跃（“在五星级酒店走台这种事他们只有做梦才敢想”）；最后要说服前首席部长的老婆，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时装周颁奖正好能让她更进一步——塔布里兹·汗发现了一个成功法则。

阿扎尔带着他高高的奖杯回家，在一众亲友和邻居中间，他最先看到了妈妈。“她一直在哭。”然后他看到五个男人，他还欠他们的钱。“不知道怎么传出去说赢得这个头衔给了我50万卢比，所以他们就来要我一次性还清欠他们的10万卢比。”

这10万卢比是他这一年在“圈子”里欠下的债。其实，阿扎尔·汗在走上出名这条路之前，先试了很多赚钱的路。

“我爸的工作是工厂监工。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但不管在哪儿工作，他都被压榨。他这辈子都拼命工作，赚的钱却很少。后来他没法拼命了，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手脚不灵活了，最后不得不退休。但是那时全家都靠他养——九个孩子还有我妈妈。虽然没攒下什么钱，但我们习惯了之前还算舒适的生活。我陷入了窘境。我哥哥已经读完一个非全日制的工程师课程，还在等分配。所以我必须挑起这个担子。”

高中最后一年，阿扎尔当起了老板。他先开了家中餐馆。

“那是家小快餐店：辣子鸡丁、炒面、馍馍、春卷。就想做个小本生意——10 000到15 000卢比：就准备几套塑料桌椅、盘子和勺子。我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两张桌子，简单装饰了一下，看起来有种餐厅兼酒吧的感觉（*Uss mein do table adjust kiya, decorations kiya, poor a resto-bar feel daala*），我还找了个好厨子。开业特别成功——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卖出去了。这种情况坚持了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一周花1 000卢比，就能挣4 000卢比。餐厅开了五六个月，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厨子跑了。我也试过其他厨子，但他们都做不出原来的味道，慢慢地客人们就不来了。我们开始亏钱——后来我甚至付不出厨子200卢比的日薪。最终我们关了店，把桌椅搬回了家。”

然后是倒卖五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卖五金的人。做这行最好的一点是‘没有老板，没有考勤’（*Sabse plus cheez iss mein yeh hai woh bola ki ‘no boss, no time limit’*）。你工作几小时、干多少活儿都自己决定。我觉得这工作很理想。如果他10卢比进的件，12卢比卖给我，我就15卢比卖给店家。这

些都是做门窗用的零件：门闩、螺钉、门堵……你把样品往包里一装就可以出发了。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可能做买卖的商店，然后一个个找上门去——有些店主会让我再拿样品过来。我在这行越做越好，我能说服人们买我的东西，一个月卖5万卢比的货，很容易就能赚5 000到6 000卢比，做得好的时候甚至能赚10 000到15 000。这些钱足够全家的开销了。”

然后，鉴于“一个人不应该依靠单一收入来源”，他开始兼卖男士衬衫。

“我搬到兰契，在一个做衬衫的工厂下面租了一间房。我上去找到厂主，告诉他我可以把他的衬衫卖成抢手货。他同意供货给我，比如一件衬衫300卢比，他每件给我便宜50卢比，那我每卖给店家一件，就能赚50卢比。我有时候也牺牲一点利润，给店家打个5卢比、10卢比的折扣，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订单就蜂拥而至。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一个月能卖10万卢比的衬衫。那一年开斋节那个月——那是2011年——我卖了20万卢比的衬衫，利润有20%。我家从来没有为开斋节那么奢侈地买过东西，我们花了2万卢比。终于转运了。”

然后他开了自己的商店。

“我渐渐意识到，倒卖东西是个有风险的工作。你无法按时收到钱，有时候根本收不到钱。我想：如果我自己开个店是不是更好呢？我直接从生产商进货，在店里卖，然后返给他们利润。所以，有一年开斋节，我在家旁边的集市上摆摊，生意从一开始就很好。但是有件事我没搞明白就仓促地做起了生意——人们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买新衣服，所以商店只在斋月期间卖衬衫。于是我弟弟在那儿坐一天，一件衬衫也卖不出去。幸好那时我哥哥终于找到了工作——信实通信，他赚的钱足够养活家里了，我就趁机把店关了。我还是欠一些人钱，加起来将近10万卢比，我一直找借口躲着他们。这事儿我家人一点也不知道，直到讨债人在我带着奖杯回家那天来要钱。”

我见到阿扎尔·汗的时候，他只剩几天就必须凑出那10万卢比了，那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先去找了塔布里兹·汗，毕竟后者也要为这糟心事负一定的责任。“我跟他谈，你怎么也得帮帮我，至少给我找个走秀的活儿让我赚点钱。他说他也很想帮我，但是像我这样的新手，他实在帮不上忙。他说我应该先花钱做一套专业的作品集，然后再来找

他。”然后，汗就花了好几天在市场上找欠他钱的人，即便只欠1000卢比也不放过。然而他什么也没追到。

最后，他还是去找政府帮忙了。在一个更“有经验”的朋友的建议下，他申请了国有银行的就业计划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养蜂”事业——“蜜蜂单位”是小型企业中的一种，政府会为这种企业提供门槛很低的贷款。第一期贷款是20万卢比——税后15万卢比，差不多正好可以解决他的麻烦。但是“蜜蜂”怎么搞呢，我问汗。他说有人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刻借给他一个公司，用来应付检查。我对于他能否把这个骗局进行到底存疑，但此时对他而言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说 he 可以用第二期贷款给他的“蜜蜂”做些真正的努力。

汗急切地想要挣脱这个困境，开始他应有的生活。从2014年末到2015年中，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给我讲一个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的新计划。那段日子里，我们每次见面都坐在咖啡日咖啡馆的同一张桌子旁，打开我的笔记本，找出真正的、全国性的印度先生比赛的申请表。他让我帮他填好各种信息，附上他最喜欢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选美比赛当晚他穿着黑色舍瓦尼、用印度传统方式俯身问候的照片。他说，如果能赢得印度先生的头衔，就没什么能阻挠他的梦想了。结果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接到。后来他甚至一度会在见面前一小时给我打电话，说他没钱给摩托车加油了。他沮丧地说起那些参加了印度先生比赛的朋友们，有一个最近刚刚出现在一张音乐专辑里——在他发在Facebook上的视频里，他穿着波点衬衫，在树下和漂亮的女孩子们跳舞。有一天我们到商场里去见那个MV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们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提什·库马尔正盯着面前的一杯茶出神。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白T恤，外面套一件牛仔坎肩。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又异乎寻常，眼睛凸出，头发又黑又卷。库马尔的座位旁边环绕着他在娱乐界成功的证明：MV剧照、他声称“带出来”的演员的艺术照，以及报道剪报。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并非他的正职。他主要的工作是“做生意”（我忘了是水泥还是燃气），但他也兼职帮助迷茫的孩子们处理“奇幻世界”的问题。他是有经验的——1992年，他在一个神话题材的电视节目片场当过助理摄像。在那之后的30年，库马尔和其他“有经验”的人一样，把自己放在追梦者和成名之间的那扇大门旁。与所有娱乐圈疏通者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可以轻松且有把握地获取利益。

“有想要出名的歌手，自己录歌但需要有人帮他们宣传出去。有想要出名的演员，在寻找一些能放进作品集的演出经历，才能去孟买宝莱坞。”

坞。我帮他们牵了线，共同投资拍了一个MV，这样可以同时展现他们俩的才能。投资都是他们的，我只做技术上的事——申请拍摄许可，拍视频。如果你想在孟买拍MV，森林度假区的拍摄许可是每天16 000卢比；在这里拍视频，每天16卢比，一天可以拍8首歌。”

我问他视频拍完之后干什么。“放在YouTube上，在网上宣传，然后赚版税。”但这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他强调。我问他，汗的话要花多少钱才能拍个MV。“那得看他自己（*Woh toh yeh khud sochenge*），”他很不耐烦地看着汗说，“你要自己决定你想要如何建立自己的事业。”他的暗示让这个小房间的气氛紧张起来。“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找你要钱”，库马尔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终于说了这话。“你看看她，”他让我看他身后的那面墙，“这是一个前印度小姐参赛者。现在如果你想找她合作，最少需要2500卢比。”我意识到库马尔不会在我面前开“价码”，所以我找个借口离开了。那天晚上我给阿扎尔打电话，他说库马尔给他开了1万卢比的价。阿扎尔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阿扎尔开始觉得事业不顺不是他的错，而是他所在地方的错。他得离开这儿。在广告片里演一个小角色，他回来就能把欠的债都还上。他开始在报纸上找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的试镜广告。广告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招聘男生女生，18—25岁，形象佳，性格好，广告/电视剧/宝莱坞电影角色，将照片和简历发送至以下号码。他每天一次次给这些号码打电话。电话里，他假装代表一些听起来名字差不多的制作公司，说他已经把照片和简历按要求发过去了。他们会说，太好了，他已经被加入终选名单了。他们还会加一句，这是一个犯罪剧或者摩托车广告里的小角色，他可以开始为在孟买两周的拍摄打点行装了。他会感谢他们给他这个重要的机会，说到这儿他们就会打断他。“等一下，”他们会突然插一句，“还有一个小步骤要完成：你能记下这个银行账户，然后往里面打6000卢比吗？这是为了给你制作艺术家证。”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到德里来找我，让我帮他打听一下这些人是不是骗子。我会打给那些号码，然后问电话那头的人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制作公司的地址、网站、Facebook主页也行。可以想见，他们似乎总在搬家，或者正在建网站。

汗还没有放弃。一天早上，他在报纸上看到德里一所表演学校的广告，看起来很靠谱。上面有个真的地址，还写了从最近的邦际公交站过去的路线，后面甚至有电话号码和一个运营中的网站，网站上面还有很多拍电影的视频。他们提供的机会是：来上我们的表演课，赢得一个角

色。一位朋友给他提供了住处，于是他又开始计划了。他得说服家里人让他去，说服讨债的人相信他，然后还得筹一小笔应急基金。

与此同时，我也去了一趟这间演艺学校——C. L.巴拉尼表演学校。这间学校开在德里非常拥挤的区域的地下室小房间里。通向这个房间的小路上垂下很多电线，人得弯着腰走过去。学校的负责人，C. L.巴拉尼本人是名中年男子，看起来饱经风霜，眼神很犀利，甚至有点多疑，松散的头发被他染成乌黑。他面前的桌子上扔着各种古代的奇怪工艺品，包括一个破烂的公文包。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性感的电影海报，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脸上涂了很多层白粉的警察，一只手举着手枪，另一只手环抱着女主的腰。我问他这地方就是学校吗？“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是在真实的地方上课的——可以是村子，也可以是市场，可以是任何表演剧本写到的地方。”巴拉尼说，表演都是和直觉相关的。他告诉学生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们所拥有的。“我告诉他们，我会给你一个角色，不管是个多小的角色。我说话算话。这角色可能是个宗教频道上时长五秒的广告，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学校新闻频道上的一则广告，但是他们都能在电视上讲台词，即便台词是‘想成为演员吗？来C. L.巴拉尼表演学校。’”过去十五年中，他培养了大概五六十名学生。并非所有人最后都会成为演员。“并非所有学生离开学校都能混得好。我只能保证给他们一个起点。如果他们直接去孟买，可能一下火车就被骗得分文不剩。有的孩子在上了我的课之后去了孟买，过了六七年还没得到面对镜头的机会。”沉思了一会儿，他又说，有一些发展得也还不错。“四个月之前，我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他八年前上过我的课，现在和他兄弟在孟买已经住了七年。他赚钱的办法就是每天在电影城里转悠，求各种在招人的小角色，基本都是群演。一天差不多能挣700到750卢比，一个月干十天，就能养活自己了。”那下一期课什么时候开始呢，我问。“只要有人来就开始”，他说。巴拉尼最近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方法：“孩子们到这儿来，跟我一起住，我管饭。我教他们最基本的东西，给他们一个三小时速成课的CD。这一套打包只用12 000卢比。”

随着时间的流逝，阿扎尔·汗想要获得成功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虚假。在这里，似乎靠别人的梦想为生比自己追梦更容易。在跟访阿扎尔·汗的三年里，我没看到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成名，连那个自己拍了MV的朋友也没成名。不过，肯定有某人在某地成功了，因为总有来自无名小镇的人空降宝莱坞。但对于成千上万走上追梦之路却不知前路在何方的人来说，他们每迈出一部都比前一步更疯狂。我再见到汗的时候，甚至不用告诉他我见了巴拉尼。他告诉我他拿到了贷款。这是我第

一次看到他不为任何事情担心，不管是钱、事业，还是家庭。我起身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是个预兆，他的生活将变得不同。

两个月后，我在兰契火车站酒店的宴会厅碰到了阿扎尔·汗。他坐在一张铺着白布、装点着金丝带的长凳上，面前摆着矿泉水和纸笔。他的打扮第一次显示出成功人士的样子：挺括的白衬衫、蓝色牛仔裤、尖头黑皮鞋。这是新一届“哈尔肯德邦先生/小姐”的海选，作为上届冠军，阿扎尔·汗被邀请来做评委。评委席上其他人的背景各不相同，都是塔布里兹·汗相信绝对不会反对他决定的人，比如他的办公室助理，和一个看起来就心不在焉的朋友。我正走向一排坐在墙边的选手们，塔布里兹·汗突然叫了我的名字，让我加入评委席，当时还差三位重量级嘉宾。他说幸亏我来了，我可以用流利的英语点评选手们的心理素质，剩下的评委负责他们的形体部分。我悄悄坐在他旁边，然后等了几个小时评委席才码齐了人。选手们——大概20名年轻男女，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开始坐立不安了。塔布里兹并不为其所扰，又给评委们上了一轮咖啡和三明治。

第一个从选手席起身大步走过宴会厅的是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穿着一条她自己设计的闪光小黑裙。她鞠了一躬，坐在椅子上接受“面试”。塔布里兹问她来自哪里，她说来自一个偏远的小村子。他表示很惊讶，她竟然走这么远来参加比赛，她则立刻回答，“我一直梦想着能出名。”塔布里兹示意轮到我问问题，那个女孩子转向我，眼神里渴求我口下留情。我问她为什么想要来参赛获得这个头衔，她说就是因为没有别的事让她感兴趣了。自打10岁在网上看到时装秀的视频，她就觉得自己能干这行，这是一个让她逃离无聊生活的机会。掌握着决定权的塔布里兹宣布说，他无法保证她能进入下一轮，但她的机会很大。她的走步还需要精进，但是有自己的特色。他说她的脸问题更大，选美比赛之前婴儿肥一定得去掉。

塔布里兹不断对之后选手们的身高、体重、牙齿和青春痘提出西蒙·考威尔那样的“诚实”批评，间隙还不忘凑近我继续讲他的个人故事。他觉得，从他一路奋斗的经历来看，和这些人不一样的是他一路不被看好。他说，这些孩子不会懂的，他一个大学肄业的人需要多大勇气才能告诉家里人他想做点不一样的事。他认为，他们不是真的有什么野心，不过是内心空虚想来体验一下。真正的野心是他这样的，会驱使他追求一些超越中产想象力的事情——金钱、人脉，以及掌控他人命运的能

力。他的野心还没有完全达成，有些他自己认定的荣华富贵还没得到：一间农舍和一辆奥迪。

塔布里兹·汗把最毒舌的嘲讽留给了一个小伙子，在后者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个小伙子穿着马甲，留着山羊胡，大步向他走来。塔布里兹给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来晚了。小伙子愁眉苦脸地说，他得先送他爸爸去上班，才能过来。塔布里兹问他，有没有告诉爸爸自己想成为明星。还没有，他说，不敢说，但如果他成功进入选美比赛，他会说的。塔布里兹做出了决定：“我认为你还没准备好。你听到自己是怎么讲话的吗？你听起来就像一个刚从村里出来的人。你得改进自己的个性和英语水平。明年再来吧。”在之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碰到阿扎尔正对着大堂里一个镜面柱子自我欣赏。他告诉我他很荣幸被邀请来当评委。他还被组织者邀请给决赛选手训练他们的走步和“自我展示”。他说，自己的才能被认可，这种感觉很好。他觉得，事情正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真受够了被利用”，阿扎尔坐在咖啡日咖啡馆的老位子上看着窗外说。距离上次海选的时候见到他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他现在住在兰契，和四个朋友租了一间破烂的平房。“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受压榨。他们答应我在塔布里兹的时装周上走秀是付我钱的，我走了。之后一个展销厅开业，我又去给他走了个秀。结果我拿到多少钱？2000卢比。如果他们有点良心，至少应该给我5000。这就算了，他们竟然说是在帮我的忙。”

这两个月里，他也得到了另一种人生经验。“我朋友从一家新开的酒店拿到一个活儿，帮他们组织开业庆典，我们两个一起搞的。我们拿到5万卢比的预算，用这笔钱搞定了所有事——找几个女孩子穿上漂亮衣服在入口迎宾，找了DJ，花环装饰，灯光——最后还省下2万，每人就这么赚了1万！”他这辈子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现在他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大的谎言：“所有那些拍了MV的人，一个都没能发出来。这种事我受够了。”阿扎尔决定自己组织时装秀了。他要开自己的活动策划公司，举办自己的时装秀。“我去参加过其他城市的一些小活动。那里的年轻人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也有很大的野心。我有个朋友做我的合伙人，我们要把选美比赛和时装周结合起来，但是会做得更好。”他已经做好了功课。“首先，我要打印出海选的海报，到各处张贴。我们俩一人出1万，差不多就够花了。然后我们要找赞助商，至少需要一个主赞助商

出10万满足基本开销，再找一些小赞助商付剩下的零星开销。我们还需要当地政客的支持、警方的许可，这些都需要钱。我们还得做个网站，开个Facebook主页。这个计划目标是让我们两个每人省下10万。”他来见我，是想让我帮他的公司想个名字。我提议“Starmakerz”（造星工厂），他说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一下。那还要不要进军孟买呢，我问他。“孟——买，”他一字一顿地说，好像生怕自己忘了整个词怎么念，“要再等等了。”

再见到阿扎尔的时候，是在孟买郊区的贫民窟里。我们坐在塑料椅子上，努力抵挡着突然的强光和巨响。在我们身边，大群兴奋的民众正从小路上向外涌，手脚并用地爬上任何一个能看到前方临时舞台的地方：窗台、阳台栏杆、堆起的石棉板。那是2016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的晚上，我们都在等待特殊的节日活动开始。阿扎尔的造型不一样了，他蓄了胡子，也改变了发型——现在是寸头，头顶上立起来两撮稍微长点儿的头发。他看起来也比以前老了。作为一个十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现在似乎对于周遭的事情十分留心。当我们费力穿过污水横流的孟买贫民窟来到我们的目的地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很亲切，“这里感觉就像米拉路”——像许多孤注一掷的移民一样，他也在这个位于城镇边缘、肮脏拥挤的地方度过了刚来孟买的几个星期。

“我觉得被打败了（*Haar gaya tha*）”，那天早些时候他在安德里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解释为什么离开兰契。我们身边都是穿着像明星一样的年轻男女，盯着他们面前的咖啡。这就是此地成千上万在做明星梦的男女们的日常，当地的经济就是由他们每日的等待驱动着的。过这种生活，你需要的就是口袋里有足够的钱能每天买价格不菲的咖啡，然后坐在那儿等着被“发掘”。很不幸，阿扎尔没有钱。他离开兰契是因为他所有发财的计划都失败了。他的活动策划公司也没能开起来，因为他和合伙人都找不到赞助商。他的第一期蜜蜂贷款也用完了。（“我哥哥决定把钱都投到股市里，结果买的股票马上就跌了。”）他甚至还试过用彩票碰运气。“我们四五个人计划组织两个月中每周让人们下一次注，赚20万，然后各自去追梦。万事俱备。这不是个合法生意，所以我们每周都付当地警方一些钱，好让我们继续，我们每个人投资了3万。计划是这样的，每个下注买了彩票的人在开奖的时候都会得到100卢比，赢的那个人则奖励一辆摩托车。开始的两周一切顺利，但是到了第三周人群发

生了骚乱。警察不得不过来抓我们，我们也只好逃跑了。”

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阿扎尔不是被别人骗，就是计划着骗别人——开始是骗政府拿养蜂贷款；然后骗倒霉的酒鬼们买他的彩票；还用他的活动策划公司骗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他也曾想诚实地赚钱，从开中餐馆到卖门把手，但损失却越来越惨重。他觉得欺骗才是成功法则也情有可原——不靠骗人就赚了钱的人，他一个也没见过。所以，不管我费了多少时间试图说服他别这么干，我觉得他早晚还是会走上老路的。他处理失败的办法是一跑了之：彩民、原来的追债人、银行贷款检察院、家庭问题，统统不管了。他带着所有的东西——床单、枕头、衣服、学历证明、护照，坐上一辆去孟买的火车。下了车，就立刻走上了做宝莱坞明星梦的路。他和另外两个来自北方邦想当幕后歌手的年轻人一起在米拉路上租了个小房间。他签了一家就业中介，搞了两个假的工作证明——阿扎尔·汗现在被勒克瑙的一家五金店推荐做“店面主管”，还被加尔各答的一家餐饮商推荐为“餐饮主管”。很快他就在一家品牌的分店做起了店员，月薪15 000卢比，足够他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了。在孟买落脚之后，他就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找选角中介的电话，然后不停打过去。到孟买一个月后，阿扎尔无家可归（“两个室友都放弃梦想回家了”）、身无分文（“两个星期后我就辞职了，他们让你在一个地方站10个小时，连午饭的时间都不给”），而且身心俱疲（“选角中介——他们总是说会回电话，但是从来也没有回过。在孟买，人们就一直吊着你 [*Yahan pe log ghumaate bahut jyada hain*]。”）他当然也可以像那两个室友一样回家去，但是逃到孟买来已经够丢人了，如果再逃回去就意味着终极失败。于是，他让弟弟汇了1000卢比到他的账户，然后坐下来想一个新的孟买计划。“我给家里的一些朋友打了电话，想看他们认不认识什么已经在这里落脚的人。他们给了我一群在坎迪瓦利工作生活的人的名字。我跟他们说，我都不认识他们，怎么能要求他们给我个住的地方呢？我的朋友笑我说，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知道你的名字啊。我成为恰尔肯德邦先生之后，他们都加了我的Facebook，赞了我发的每一张照片。他们肯定愿意帮我任何忙。”他说。

他就这样开始了在孟买的新生活。等我在孟买见到阿扎尔的时候，他已经和另外四个来自常合的年轻人一起住在坎迪瓦利一个工业郊区的两居室里了。他们都在当地一家手镯工厂里当工人。原来每年都有一批年轻人从他们村到孟买来，在同一家工厂干活。这家工厂的老板也是年轻的时候从同一个村子到孟买来的。作为老派商人，他喜欢招自己老家的人。阿扎尔的新室友们都崇拜他。“他们对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

他们眼中，我来自同一个小地方，但是有着更大的志向。他们在Facebook上关注我的模特生涯，为我获得的头衔而骄傲，还鼓励我追求梦想，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告诉他们，在孟买我什么也不是，我想帮忙做饭和打扫，但他们甚至都不让我自己盛饭。”也是通过村子里的关系，他找到了新的收入来源。“我提出帮助工厂推销手镯，因为我擅长卖东西。我在当地火车上问那些看起来和我背景差不多的人附近的市场都在哪儿，然后把这些地方都记了下来：维拉尔、瓦塞、达希沙。”现在他每天早上都从工厂里拿几副手镯，坐上火车开始一天的生意。“这些都是金属手镯，6种款式，一盒12个。我把他们卖给市场的小贩，价格也不错。就算我一个手镯能赚5卢比，那一盒就是60卢比。”他给我看了手机上那些闪闪发光的手镯的照片。

几小时后，当我们拉开幕布，看到拜库拉分租宿舍的演员休息室时，大家正开始忙碌起来。文化活动在五分钟后正式开始，阿米特·库马尔舞蹈团的八位表演者在橱柜大小的房间里你推我挤，用塑料镜子检查自己的妆容。晚上的节目很简单：女孩子们合着当年的流行曲跳舞，男生则模仿不同年代的宝莱坞明星。一共有五位模仿者，或者叫“二代”（juniors），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年人，有的很老；而他们所模仿的演员有些早就去世了。他们很费力地想要把胸和肚子塞进明显小了好几号的演出服里，带上不听话的假发。被组织者催着准备上场时，他们又照了照镜子，练习了一下他们要模仿的人的小动作：歪头、少年感的笑容、深情眼神……肌肉记忆是很有用的。他们知道外面的观众不是为了他们而疯狂，那些迫不及待的尖叫声都是为了屋里最年轻的男人——当地最炙手可热的模仿者。

站在孟买梦的坟墓中间，山·高希，也就是“二代”萨尔曼·汗，身上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高希打扮成这位孟买最火的明星最经典的荧幕形象：警察。当晚他的面容和举手投足都是萨尔曼·汗的样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留着小胡子，瞌睡的眼睛，发达的二头肌在短袖里面也尽显曲线。高希当晚压轴登台的时候，那些因为没完没了的过气模仿者和肥胖舞者而抱怨不已的贫民窟观众们，立刻从座位上起身，一股脑地冲向他，嘴里还大喊着“萨尔曼”。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高希将汗最著名的台词和舞步结合起来，展现了一段能让观众们记到下一个共和国日的表演。当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休息室，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去跟他握手，当晚的主持人不得不多次维持秩序，而其他的表演者都躲在幕布后面。不管

是不是借了萨尔曼的光，这名气背后都陷阱丛生，不过山·高希似乎非常享受。

高希是在两年前出名的。2014年初，他在纪录片《做大哥》中出演主角。这部纪录片讲的是萨尔曼·汗的银幕形象对于小镇青年们的影响。^[6]在破旧的电影院里，汗的一些年轻粉丝一看到他出现在荧幕上，就要把自己的衬衫撕扯开。对他们来说，汗就是“大哥”。高希他们一帮人不仅是萨尔曼·汗的粉丝，而且还遵循汗饰演的角色所倡导的价值观来生活。一个Facebook群的成员想要将汗的追随者们都聚集在中央邦的小城钦德瓦拉，这些追随者们将萨尔曼·汗电影角色的所有特征都吸收了，既包括强健的体魄、纯洁的道德观，也包括对传统价值的尊重。高希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不但严格遵循大哥的行为准则——包括宣誓禁欲，以保持身体精力和道德纯洁——他长得也碰巧有点像他的偶像。高希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立刻开始按照汗的样子塑造自己的脸和形体。他花很多时间在健身房里练肌肉，熬夜让眼睛看起来像睡眠，还花钱买了很多汗扮演的角色在电影中穿戴的服饰仿款。当钦德瓦拉的年轻人都在申请银行和铁路工作时，山·高希已经凭着顶胯和俏皮话在婚礼和生日派对上嗨翻全场了。

这是一个逃离中产樊笼的绝妙计划。高希如今不用像他父亲一样，大半辈子都在县电力局上班；也不用像他弟弟一样，读完MBA就立刻开始婚姻生活。在纪录片里高希说，如果他长得不像萨尔曼·汗，那他的生活就会像钦德瓦拉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大腹便便，做个小生意，庸碌地过一生”。和阿扎尔·汗一样，山·高希把自己看作人生的架构师。然而，在文化活动上跳舞不是他唯一的赚钱渠道。高希说，他还投资了房地产，涉足了珠宝设计领域。“沃伦·巴菲特说过，一个人一定要有五种收入来源，这样才总有退路。”

电影首映一年后，山·高希放弃了退路，来到孟买。他和老家的朋友一起在安德里租了个房子，他那双睡眠盯上了宝莱坞。他从萨尔曼·汗的替身表演做起，既能赚点钱，又能打通人脉，为之后开启山·高希个人的演艺事业做准备。我第一次见到高希的时候，这个计划已经启动几个月了。我们是在德里的火车站候车室见的，他正要坐车回孟买。他说，他不只在孟买做“二代”萨尔曼，像密拉特和印多尔这样的小地方也邀请他去参加文化活动。在德里，他曾和一群来自孟买的“二代”演员们一起在三星级酒店里表演。“扮15分钟萨尔曼·汗就能挣2万卢比，很合算。他也拿到了电影邀请，还一下拿了两部。其中一部他扮演萨尔曼·汗的替

身，另一部是和同一个制片人争取下来的角色，演一个与萨尔曼无关的主人公。”来到孟买后，我很快联系了他，问他计划是否一切顺利。他说，差不多吧。他收到很多扮演萨尔曼替身的邀请，但是进军宝莱坞却并不那么容易。拍电影需要花很多时间准备才能开始实施，他说。他还一个都没拍呢，一直在等。当时高希33岁，还很有信心自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宝莱坞明星。我问他能否带一带阿扎尔，他才22岁，还在为他的明星梦四处碰壁。高希说，当然可以了。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和他在演员休息室里握手的时候，高希带着十足的大哥范儿瞟了阿扎尔一眼，让他“Facebook联系”。

阿扎尔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很难过。他震惊于舞台的粗制滥造——两个木床拼在一起，上面盖一块五颜六色的布，很廉价——以及俗气的服饰妆容和喧闹的贫民窟观众。他可怜那些舞者和替身演员，觉得他们太拼了。不过能见到山·高希，能看到高希如何模仿宝莱坞最火的明星，不管是走路、说话还是跳舞，都能做得那么好，还是让他很高兴。在回拜库拉的路上，他陷入了沉思。“也许他们是对的——我的脸还没有准备好”，他说。自打在坎迪瓦利落脚之后，他去参加了很多电影试镜，但是所有的制片人和选角经纪人都跟他说了同样的话。“你还没准备好（*Uss layak main abhi tak nahin hoon*）。”他的脸上缺少点什么。再等几年吧，有人建议说。“也许最好再等两三年，健健身，上个表演课，让我的脸有个主角的样子。”他望着出租车窗外说，“有人认为我就是放弃了。有个朋友告诉我说，我的这点困难和别人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他刚来的时候在火车站台上睡了两个礼拜。他说只有经历过这种折磨，才可能成功。但我不信这一套。就像我一直说的，人们在踏入一个行业前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他说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他要去波斯湾，进入他们蒸蒸日上的劳动力市场。他甚至找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签证中介提交了护照和申请表。他不关心会被送到哪里去，也不关心让他去做什么。不管是到沙特阿拉伯当个餐饮主管，还是在迪拜商场里当值班经理，干什么都行。他预计，两年内他就能攒到足够的钱让家人重回中产，享受安德里的咖啡馆、健身房和表演班。他说，只要你有钱，什么也不能阻止你进入这个圈子。“等我回来，我会向所有人展现我的才华。”

[1] <http://inextlive.jagran.com/video/mr-and-miss-jharkhand-2014-show-in-ranchi-201408130007>

[2] 形似燕尾服的传统男士长外套，自莫卧儿帝国时期流行开来，多为开襟，有领。
——编者

- [3] 阿拉伯语“祝你平安”。
- [4]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home/sunday-times/deep-focus/The-small-town-sashay/articleshow/47314385.cms>
- [5] 也称作杜尔迦节，每年10月初起。——编者
- [6]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19/arts/international/the-actor-salman-khan-is-focus-of-being-bhaijaan-documentary.html>

7 骗子

2017年年中，我回到德里为一家全国性报纸工作。几个月后，我开始浏览求职网站。我想起过去三年里我遇到的年轻人们——不是我跟采的那些，而是因为生活没什么进展让我没能跟采的那些。他们一直在讲的只有一件事——他们无尽的生存需求，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工作，山高希看不上的那种真正的工作。

每隔几天，就会有文章报道求职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巨大差距。2016年，有19 000人应征某城市的114个职位；其中有几千名大学毕业生应征清洁工，有些甚至有工程师和MBA学位。同一年，一家国有银行的1 500个职位有170万人应聘；920万人参加了铁路系统的笔试，争夺不到10万个工作岗位；还有700万人祈求获得8 300个初级公务员岗位中的一个。^[1]对于一个没有强有力工会组织的国家来说，私企的工作往往待遇很差且工时很长；于是在国企工作就成了底层求职者最向往的。从司机到老师，不管做什么工作，政府职员总是比私企员工挣得多，福利也更好。只有少部分“有资质”或者“技术娴熟”的人会选择在私企工作。^[2]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而言，很不幸，即便是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政府，每个月也只能提供不到1万个工作岗位。^[3]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呢？很多人都选择了暴动。回去做全职记者不过几个月，我已经报道了两起导致整个城市被封锁的青年暴动事件。这些属于农业种姓的年轻人要求增加教育和就业的配额，因为他们不想继续当农民了，他们也想在办公室里当白领。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后来有一天在浏览求职网站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条广告，一串关键词似乎正是为了这个群体准备的：

- 跨国公司工作
- 国际业务外包
- 零工作经验
- 完成10年级、12年级学业；课程未通过者也可申请
- 英语成绩40分以上
- 一日培训
- 工资25 000到30 000卢比

- 提成不封顶
- 快速的职业发展——开始新生活
- 愿意在任何情况下追求成功

这个工作实在好得离谱。如果薪资优渥的公司会招聘那些有追求、没资历的求职者，那印度年轻人的未来也就没那么糟糕了。和 WittyFeed 这样拥有相似招聘哲学的公司不同，他们要招的这些“英语40分”的职场新手，要做的不是创作爆款内容，而是不停地接电话和打电话。

到了2017年，接线中心的工作（在一家业务外包公司）远没有其在2004年时的那种吸引力了——因为糟糕的监管与菲律宾和美国监狱这样的竞争市场，外包产业在过去几年已经贬值了很多。^[4]不过，这也就是份工作。每个这样的广告最下面，都写着一个“HR”的名字和电话。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而是求职者和职业介绍中介的中间人。

某天我和我的同事给他们打了个电话。“HR”阿米特草草接了电话。他完全不关心我们是谁，连名字也没有问。他说这通电话后他会马上发来一条短信，让我们按照短信的指示做。我们收到的自动生成的短信比阿米特还要冷漠，让我们到德里西部一个招聘中心去面试，到了之后要出示短信最后给出的验证码。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拉金德拉大厦。这个商务中心坐落在德里不太发达的一个区域，在这里，各种提供客户服务的商业大厦像迷宫一样排列着，我们要找的那个也在其列。他们每一个都能提供比别人更好的接线工作：离我们住的地方更近，薪水更高，英文要求更低。在一个房顶快要塌掉的大厦里，唯二两间使用中的办公室里就有一个是招聘中心。在这里，不管我们住在哪儿，一个年轻的中间人都能在我们住所周围的50米内给我们提供一份接线中心的工作。我们告诉他还约了另一个中心的面试，就在马路对面。他说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工作，就用不着再转悠了。

但我们还是去了。原本定好的面试地点和刚才那个差不多——走过狭长、昏暗、发臭的楼梯间，就到了这个招聘中心，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孩正坐在前台玩游戏。他把游戏暂停，看了一眼我们的短信，把我们送到两间屋子中的一间去面试。那天我扮作北方邦的一名高中生，我同事扮作和我资历差不多的表妹。我们面前的面试官——一个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女人，穿着带亮片的绿色库尔塔衫，挑染的头发，涂着深棕色的

唇膏，美甲长且色彩鲜艳——对于我们是谁也毫不关心。自我介绍，她对我们说，然后我们就尽力用“40分的英语”答话。她问我们，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就全靠这个了。她说我们并不是理想的候选人——她对我们的英语能力和自信心都表达了不满——但她还是决定给我们这份工作。在我们假造的简历背面，她写下一堆对于招聘广告的补充：“国际视野，夜班，2万卢比工资，每三个月涨薪30%，六个月后升职。”她甚至给了我们一张小纸条作为聘用书：“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经被我机构的外包部门录用为C.C.E.（客服专员）。”大多数求职者到这时就会起身离去，但我们追问面试官聘用我们的公司名字和具体信息。这问题让她有点恼火，犹豫了一阵她给了个名字，别的什么都没说。我们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她说，下周。但在那之前我们要到德里的另一个地方去参加一天的培训，具体安排还是短信通知。离开之前，我们要为顺利得到这份工作每人付给她500卢比的辛苦费。

短信如约而至，并把我們指去了德里东南一个更偏僻的地方进行“培训”。乌塔姆纳加尔是个培训中心聚集地——医疗、公务员、工程师学校、MBA——这里和兰契的老普路差不多，不过规模是它的两倍，拥挤程度大概是四倍。这里也聚集着很多别的东西：汽车修理店、ATM机、卖芒果的推车等等。我们要去的社区学校，深藏在市郊这一片狼藉里。我们旁边一群背着背包的年轻人也在找这个地方。大家到处问路，对每周一问习以为常的当地人抬起手指向一条小路，头都懒得抬。

每周日都有大约700名求职者来接受这个接线中心的培训。像这样的培训中心市里还有很多，分布在各处。在被赶进分布在学校三层楼的六七间教室之前，我们被要求排成一路纵队，从楼梯口一直排到顶层。想进教室，每人要先付1000卢比，换他们在职介中心给我们的小纸条上盖一个“已付款”的章。坐下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培训，课程内容和穆因·汗的如出一辙。我们的老师是个小伙子，穿着紧身T恤、松垮的牛仔褲，梳着飞机头。他先是要求我们自我介绍，然后指出我们说话和自信心方面的各种问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的模板——“你的名字，来自哪里，住在哪里，学历，经历和兴趣”，以及最理想的结束语，“谢谢大家，这就是关于我的一切。”他提醒我们，英语口语是接线中心工作的核心。他说英语里就没有他不会念的词，“动物园、阿尔法、南希、荣幸、宝藏、视野。”这还没完，“我爸爸去了动物园，我们看到了绿色的恐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波斯王子》。拿到金银很开心。”显摆够了英语，他又带我们回顾他是如何从比哈尔邦的小村子一步步走到古鲁葛拉姆的接线中心的。“只要你有计划，出身如何都不重要”，他

说。底下有学生问他，他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就是挣钱。事业随钱而来。”听到这儿，我在想，接线公司和赚钱不搭边吧。我猜这么想的不止我一个。

后来，我还会想起他走进教室说的第一件事。“有谁知道‘操控’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开车带人兜过风？”他讲完课之后，教室里的大部分人都很困惑，虽然交了一大笔培训费，但他们对于工作本身还是一头雾水。他们想要的，只是开始着手小纸条上承诺给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离开教室之后，又来了一群协调员，把我们带到另外一层。我们又被分成了不同的小组，送进不同的房间，开始新一轮面试。这次面试我们的是真正有兴趣招聘我们的公司代表。我和我的同事问了一名协调员，职介中心跟我们说的那个公司有没有派人来？他看了看那家公司的名字，然后把我们送到一个房间。一个女人正坐在桌前看简历，另外八名求职者在她面前站成一列。轮到我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已经被她的公司录取了。她说她还是想再确认一些事情。“把这个手机卖给我”，她指了指我手里的手机。我用“40分的英文”尽力讲解了电池寿命和自拍镜头。问了我同事同样的问题之后，她让我们等公司电话通知。

很多求职者都带着一张任命书离开了学校，上面写着让他们下周去报到。但这些任命书上都没写公司的名称或者地址，大家都被告知等短信通知具体信息。普拉迪普·萨鲁亚离开的时候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开始在亚马逊当客服了。他不断提醒自己，网上的招聘启事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他返回卢迪亚纳的家，收拾好行李，一周后又回到德里准备开始工作。一个月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去了哪儿。他说他在古鲁葛拉姆一间名字奇怪的小办公室里，他们给他一个稿子让他背下来，然后他就要和房间里另外50名与他同龄的“专员”们一起开始打电话。工作本身很容易，他说，只需要按照名单给美国人打电话，说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告诉对方他们因为偷税受到联邦调查。

十个人里有一个会被吓到，他说。一旦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到恐慌，萨鲁亚就会告诉他们，他要把电话转给另一个部门，他的上司会帮他们通过线上转账把税补上。但他不喜欢公司的工作文化：工作时间很长，“目标”根本不可能完成。干了三个星期后，他就辞职回家了。“所以你是电话诈骗中心工作吗？”我问他。“也可以这么说。”他非常平静地说。挂电话之前，他告诉我说，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工作的人来说，这活儿也不差。他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我应该考虑他的公

司。挂掉电话5分钟之后，我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上面是公司HR的电话。

我遇到萨鲁亚的六个月前，警察突袭了孟买东北城郊一个七层的接线中心，逮捕了700个年轻人。他们都装成美国国家税务局（简称IRS）的工作人员，骗了美国人上亿美元。Phoenix 007接线中心的两名雇员在突袭的两个月前给华盛顿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打电话揭发了他们。^[5]其中的一个告密者——19岁的帕万·普贾里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并不是一直都痛恨这份工作。和萨鲁亚不同，他加入这个公司之前其实就知道他是去骗人的。他父母在郊区一个工薪阶层聚集区开了间焊接的铺子，普贾里大学辍学，就想找个办法“挣大钱”。有一天，一个“HR”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他的简历，觉得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就给他打了电话。他直接被叫到米拉路上的公司办公室——就是阿扎尔·汗刚来时住的那个摇摇欲坠的移民贫民窟——面试。“我被要求自我介绍。我说了我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姐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家属于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村子。我告诉他我通过了12级的考试。我的爱好是玩室内和室外的游戏。”公司认为普贾里的英语和自信心都足以让他成为“收场人”，也就是萨鲁亚这样的“开场人”在介绍情况之后把电话转去的那方。月薪是15 000卢比，不算提成。“我一通电话挣多少美元，我挣的卢比就是这个数的两倍。”换句话说，他只赚到骗来的这笔钱的三十分之一。他们让他转天就来培训。“那一层楼空间很大——至少坐着一百个人，每个都在打电话。HR部门有五六个女孩子，我们十个人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培训。”培训一开始，讲师就问新员工们有没有听说过IRS。他把这个词拼了出来，但是大家都摇头说没听过。“然后他给我们解释说，我们都要以IRS的身份给美国人打电话。他一说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问他，‘这是骗钱吗？’他说是，然后说，如果谁不想干现在就可以走。只有两个人走了。”他给了剩下的八个人一份长达六页的文稿，是这样写的：

“我叫保罗·爱德华，我是美国财政部法律事务处的工作人员。我的员工ID是IRD7613。我们来电通知您，在国家税务局提交的一起法律起诉中您被列为头号嫌犯。现在我需要您拿来纸笔，记一下您的案件ID：IRC7647。这是您的案件编号，我手上还有国家税务局发来的证词。可以的话我给您读一下这份证词，您就知道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了。”普贾里用保罗·爱德华的口音把这段念给我听，在做了一周骗子之后，他就把这个口音练熟了。“你和外国人说一天话，就会开始说得像他们了。”

普贾里坚持让我装作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美国人，这样他就能记起他

的台词了——其实也不用我说什么。“在我读证词的时候请不要中途打断我，因为这段话是被联邦政府监听和录音的，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在我读完证词之后再提问，然后我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不管我问什么问题，普贾里文稿的“反驳”页都有准备好的回答，还有那句能应对一切问题的话：“警局和我们IRS调查官将在30分钟内来到你门口。”说这话的时候，普贾里就会拿着开场人转给他的信息，用姓名和邮编在白页上查受骗人的地址。“很多人在电话里就会哭起来”，普贾里这时没了美国口音。到了这一步，普贾里就会让他们到最近的商场去买一张价值几百美元的苹果充值卡，然后他把电话转给他领导，那个人会记下卡片背面的号码。

普贾里之前很喜欢做这个。“我可享受了（*Bahut maza aa raha tha*）。”他说。我相信他真是这么想的。他给我讲那些瞎编的联邦部门（“EFTPS——哪有这种东西啊！”）和他在台词里加的那些步骤时忍不住笑出声。他很擅长这份工作。做了两个月他就给公司挣了24 000美元的苹果iTunes储值卡。他在2016年7月14日得知了自己的成绩，那天是他生日。“我特别开心”，普贾里对于自己骗美国人的能力非常得意，因为据他的朋友和同事说，美国人自视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更高一等。和公司里很多年轻的员工一样，他也向这个骗局的策划者看齐。那个23岁的年轻人开着豪车——奥迪、宝马、奔驰，住独栋别墅，坐商务舱，还和漂亮女孩约会。生日那天，普贾里收到了5万卢比的提成。“我立刻就花光了。”

然而等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能再做这个了。“我给一位美国女士打了电话，她叫瑞吉拉，住在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我跟她说了我的台词，她就开始哭了。她说她没钱，要到发救济食品的地方去给儿子找点吃的。我觉得很痛苦，我在想，‘如果有人这么对我妈妈我会怎么想？’”普贾里让她等一下，然后告诉他的领导他没法继续打这通电话。“但他完全不在乎。他把电话接过来继续说。”两天后，普贾里和他带去公司的铁哥们开始找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他们在突袭前两个月辞了工作，辞职不到两周普贾里就收到了三份工作邀请。“孟买有很多专骗外国人的诈骗接线中心。包里瓦利有技术支持客服诈骗，坎迪瓦利有伟哥诈骗，乔格什瓦利有贷款诈骗。有两个公司还在做IRS诈骗。”

如果帕文·普贾里什么时候再想为美国人提供这种“服务”，他总能找到工作。虽然他的离职不太体面，但是Phoenix 007仍然是他最刺激的一份工作。成千上万人和他一样在大城市（孟买、德里、加尔各答、艾

哈迈达巴德)的诈骗电话中心装成税务员、借贷机构人员、苹果客服人员或者劣质伟哥制造商。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的刺激程度和拉瓦尼亚·斯里瓦斯塔瓦在WittyFeed刚刚破解美国人的情感密码时的感受是一样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年轻的印度人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诈骗接线中心更愿意雇用刚搬到大城市的小菜鸟——他们能否在工作上取得成功,都取决于他们能否很好地了解世界另一边人们的弱点。自从我第一次看到针对迫切想找工作的年轻人的招聘广告开始,我见了几十个现在或曾经在接线中心工作的骗子,他们都向我展示了对于美国生活的深入观察。

美国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如果出了任何事,他们都找不到人帮忙。

在美国,人们不喜欢自己修东西。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他们就会打客服电话。依赖别人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在美国,人们对自己的隐私、个人安全和个性非常在意。

骗美国人很容易,他们非常容易上当。

这种社会学的智慧驱动了像诺伊达和古鲁葛拉姆这种地方的巨大的就业市场,这些卫星城市的商业布局中很大一部分都留给了诈骗接线中心。“这些地方好就好在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前诈骗者维卡斯·坦沃尔说。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他这样的人——拿着拉贾斯坦邦某小镇大学文凭的普通求职者——接到一通招聘电话,说他的资历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很多时候,这种公司的年轻雇员甚至不用离开这□大楼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者另一种新工作。我在古鲁葛拉姆长至10公里的商业街上的大厦里跑上跑下,想要区分开真的接线中心和诈骗接线中心,区分真的接线员和诈骗犯,结果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一些印度年轻人会在诈骗工作的迷宫里逡巡好几年,从旅行诈骗转到借贷诈骗,再到杀毒软件诈骗。他们告诉自己说,再领一个月的薪水就离开这一行。阿布希·辛格就是这样,拿着坎普尔的工程师文凭来到德里,结果却花了两年时间磨炼诈骗技术。“从古鲁葛拉姆到诺伊达再到德里,我去到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公司。”他的第一份诈骗工作是在古鲁葛拉姆的一□商业大厦里,那个接线中心占地2万平方米,有500个人和他一起做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事情的发展就像恐怖片一样。用户的浏览器会弹出一个弹窗,告诉他们电脑感染了病毒,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屏幕中央闪烁的号码打电话。这个弹窗经常会占据整个屏幕,把电脑锁住,有时候还

伴随着尖利的警铃声。一旦这个电脑用户——不管是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打了电话，辛格或者坦沃尔这样的人就会接起来，虽然时期不同，他们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在电话里，他们就按照上班第一周学的那个剧本来表演。他们告诉那些十分惊慌的来电者，他们需要远程访问他们的电脑，连上之后，他们就带着用户检查电脑内部的系统，把普通的文件都说成是致命病毒。^[6]“我们也在电脑上运行一种软件，凭空编出木马病毒、恶意软件等。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不买我们的杀毒产品——一年299美元，两年399美元——你的电脑就完蛋了。”坦沃尔说，他的目标是从每通电话里赚500美元。他的提成是：每1000美元赚1000卢比，或者赚取金额的1.5%。“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你的上级就会告诉你，‘你是个骗子。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得让客户上当（*Aapko customer ko fasana hai, kuch bhi kar ke*）。”他说。

坦沃尔并不太介意做这种事，相比之下，公司不给提成让他更为恼火。对阿布希·辛格而言也是这样，他很久之后才感到愧疚。“他们的电脑没有任何问题，整个事情就是个骗局。你拿到远程访问权限，然后就瞎编理由，收他们四五百美元。你把他们骗得越狠越好（*Jitni unki maal, utna badhiya hai*）。大多数收到弹窗的人都是干了点坏事的——要么看了黄片，要么违法下载了东西。但是我们也做了坏事，因为我们卖给我们的软件都是微软或者其他公司的软件，从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根据微软2016年的一项调查，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在一年内经历过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每年美国人为此会损失约15亿美元，大部分诈骗（86%）都来自印度。辛格告诉自己，拿到第二个月的薪水他就从这家公司辞职。他确实这么做了，但他之后才发现，能找到的其他工作也是诈骗。“这个公司假装自己是Facebook，”他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Facebook有问题，比如‘忘记密码’。电话里的客服就会说自己是Facebook专家，可以帮这位用户恢复密码，但需要远程访问他的电脑才行。一旦连进了对方的电脑，他就会下个诊断，哈哈。”

在这家公司，辛格经受训练提升了自己的唬人功力：“如果客户不付钱，我连FBI都会搬出来。作为最后通牒，我们告诉客户，监视着所有网上活动的国土安全部会接到通知，然后他们的网络就会被切断，他们在美国境内将再也无法联网且会被列入黑名单。客户最终会付200到2000美元不等，有时候会通过苹果的储值卡交钱。”

以Phoenix 007为例，让新员工忘掉自己的人生目标，转而屈服于

骗人的刺激，只是个时间问题。很多诈骗公司的工作氛围都是按好莱坞惊天劫匪片设置的。“在这家公司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华尔街之狼》里面的人物。”辛格说。这部讲述一群在股市里诈骗的阿尔法男的电影，差不多刚好是在他进入IT骗局这行的时候上映的。“大家来上班时都是大麻嗑嗨了，同层的所有人都嫌其他人不像个专业骗子，从而互相谩骂。”和帕万文·普贾里一样，大多数底层骗子从来都没见过骗局的策划者，但是Facebook上的那些炫耀的照片——豪车、聚会、度假、漂亮女孩——成了底层骗子们共同的目标。

他们关于对错的界限不知不觉变得模糊了。“这是不是诈骗，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一个在电脑病毒诈骗上耗费了整整五年青春的年轻人这样形容他的工作。另一个名叫阿米特·辛格尔的前诈骗犯可以就什么是灰色地带讲上好几个小时，他曾经跟我说，“如果你带着一个三星手机走进一家商店，店员吓唬你说，这个手机随时可能爆炸，不如给我1000块，不管他什么时候爆炸了我都免费给你换个新的。手机会爆炸是个谎言，他这么吓你是为了让你付钱。就这么简单。我们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也是一个道理。他们没有偷你的钱。人们自愿付钱，因为他们被吓到了。也没人把枪顶你头上找你要钱。”

和这些相比，最管用的还是骗子们在金钱和道德之间挣扎时给自己的辩护：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未来的年轻人，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美国人抱怨被骗了，但他们想过电话那头的人吗？没完没了地给他们打电话，每个月才赚3万卢比。

只要最后赚到工资了，就没什么问题。

有人给你付钱——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一些人来说，道德上的挣扎在他们决定不要庸碌一生的时候就解决了。“在德里，你想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免不了要做些手脚的”，苏尼尔·库马尔，一个诈骗接线中心的员工，笑着跟我说。我之前在乌塔姆纳加尔的培训中心假装求职的时候见过他，当时他正好是一个负责把求职者与公司匹配起来的“HR”。他又瘦又高，一头长发，那时26岁，八年前从阿拉哈巴德的一个村子搬来德里。作为辍学生，他最开始在购物中心里当保安，但很快就转向了给他村子里来的年轻人介绍初级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就成了非法工作中介的行家。

库马尔如今自认是个重要人物了。他每月挣15万卢比，手下还雇了8个人。他的手下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型求职网站上扒简历，寻找能够下手的焦虑的求职者。他按照他们能给中介公司输送多少求职者算工资，他的目标是一个月介绍50个人过去。“我从公司收提成：介绍一个‘孩子’2000卢比”，他说。一般情况下，他每个月都能超额完成目标。这个城市广阔的诈骗接线中心的网络——技术支持、保险、银行和旅行——都靠这个灰色的招聘体系拉人。我问他，是否觉得应该为那些“孩子”被逼着做的事情负点责任。干他这行的利润太大了，人们才无暇顾及这些孩子会怎么样。如果每天有100名求职者来找中介，每个人付500卢比，那就是5万。如果每天有500名求职者来培训中心，每人付1000卢比，那就是50万。“你看，每个接线中心都是这样或那样的骗局，没办法的”，他避开我的眼睛。不过，即便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他还是尽量把给诈骗团伙招人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到。“如果（求职者）给你打电话，抱怨说他们被逼参加诈骗活动，那你就说‘真的吗？’你尽力表现出为他们着想，跟他们说‘不如你坚持到这个月末，拿了工资再找其他的工作？’”

他说这是一石二鸟——不但甩掉了自己的责任，还能留下一群“被俘获的孩子”可供兜售。“没有人会在一个诈骗接线中心干到一个月以上”，他说。他们要么因为完不成任务被辞退，要么在一个月里能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自己设骗局。“他们被洗脑了（*Unko fatoon chadh jaata hai*）。他们会想，‘这样骗来的钱可以直接归我，而不是归公司。’”因为诈骗接线中心总是缺人，所以库马尔的生意蒸蒸日上。2017年6月我们再联系的时候，库马尔说他有2500到3000个职位在招人。

当时我们坐在诺伊达的一家咖啡馆里，他跟我说别再找工作了，要做大事。“有什么意思呢，你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喜欢你的工作（*Naukri ya toh milti nahin hai, milti hai toh achchi nahin lagti*）。我爸爸一辈子都做一份工，最近我回家问他，‘值得吗？’我告诉他我不给任何人打工。我能获得至少500个人的尊重，我是有威望的。”库马尔说他不用再工作，钱也会源源不断地往他这来。他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做两件他喜欢的事：跳舞和打板球。

我想起励志演说家桑托什·德夫·塔库尔传到Facebook上的一个YouTube视频，里面讲了“富裕和富有”（*rich and wealthy*）的区别。塔库尔坐在酒店里，戴着个墨镜，说了句从人类存在之日就有的名言：“有钱是富裕；有钱又有时间是富有。”我想，也许库马尔的故事是个很好的

励志演说素材。除了高尚之外，它符合所有的条件；不过大多数印度年轻人最关心的就是，作为一个赤手空拳仅凭一腔热血来到德里的人，高尚能带他们走多远。我渐渐发现，印度的励志市场跨越了道德的界限。在诺伊达见苏尼尔·库马尔的一周前，我去探访了一个专门介绍假工作的就业中心，它的墙上贴满了各位名人讲过的励志名言。

人生中要敢于冒险。赢了，你能领导；输了，你能指导。——
辨喜

我所要求的是，用今天做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不要把自己和世界上的任何人相比。如果你这样做，就是看不起自己。——比尔·盖茨

“你想要做大事吗（*Kuch bada karna hai*）？”苏尼尔·库马尔突然问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双臂交叉支在桌上，提出让我跟着他干。我不用自己找接线中心的工作了，可以帮他找求职者，然后把他们卖到接线中心去。他说让我成为他的就业中介的合伙人，说在我身上看到了巨大的野心；和他一样，我注定要过不平凡的人生。这话还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和我同事一直都没接到我们在乌塔姆纳加尔培训中心面试的那家公司的回信。有一天我们在网上查了这家公司的名字。他们还真有个网站，主页最上面有幻灯片，展示的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以及面带微笑、自信满满的美国人开会和洽谈的场景。在描述中，接线中心的表达委婉模糊：“有创造……环境的热情……重新定义完美……启迪……时刻已经到来……提供精细的产品服务……行业大师的经久之作。”你完全看不出来所谓的“精细产品”和“经久之作”究竟是什么，也看不出这个服务是为谁提供的。网页还列出了公司客户的名单，虽然在谷歌索引上这些客户一个都查不到。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和公司的终极目标——“如果完美是你的追求，那经验就是我们的承诺”比起来算什么呢？

我们打算直接找上门，索要我们已经付了1500卢比的工作。公司藏在德里西北部一个石材市场里，他们所在的四层小楼外面连牌子都没有。但其实这地方并不难找，你在基尔蒂纳加尔地铁站找任何一个人力车夫，告诉他们“玻璃墙（*sheeshe-walla*）接线中心”，他们一句也不多

问就会沿着尘土飞扬的路猛冲过去。在这个卖沙发组合、浴室配件、脏兮兮的灰色大理石板等各种廉价家居用品的迷宫里，还有哪儿能让一群年轻男女不分昼夜地蜂拥而至呢？公司前台面积很小，放着储物柜、一个软塌塌的黑色沙发，墙上还贴着禁毒的海报。我们告诉一个保安头子，我们要见HR部门的人。他给了我们申请表，让我们等面试电话。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做过这些了，但他并不听，于是我们又默默写下了如今已是轻车熟路的假造信息——学历（“坎普尔公立高中”），目标（“抓住每一个机会，成就非凡”），介绍人（“拉金德拉广场全球专业BPO”）——然后等着被叫到接线中心里面去，磨砂玻璃的门前还有持枪保镖把守。

我先被叫了进去。走过一排排格子间，我看到年轻的员工们都盯着电脑屏幕，冲着麦克风说话。我被要求走到办公室后面的一个走廊那儿，一个女子坐在桌前看我的简历，还不断用笔圈圈点点。我告诉她我手里有一封求职中介给的聘书，证明我已经被录用了，她告诉我那个不算数的。“你能把这个手机卖给我吗”，说着，她把桌上的手机扔给了我。我把之前的表演一字不差地又来了一遍，然后她让我跟着接待员到另一边的房间等下一场面试。这次，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又让我表演了一次卖电话。我的同事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然后我们被要求离开这里，等公司的通知。

那时候我已经为这个工作面试四次了，我很想知道如果通过了，我会卖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简历，上面提到她是这家公司的前雇员。我给她——一个短发、笑容洋溢的年轻女孩——发了一条Facebook私信。她回复说很高兴有人看到这个，“我想告诉别人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索娜·卡普尔，23岁，2016年从北方邦西部来到德里，加入了第一个给她工作的公司。她老家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就把她引荐给了公司的HR。刚开始，工作看起来和普通的接线中心没什么差别，直到培训结束，她在工作的第一天接到一份文稿。从那之后的两个月里，卡普尔每天按照名单给大概50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印度人以及移民到海湾国家的印度移民。开场白永远是同一句话：“你想找工作或者换工作吗？”如果他们说想，她就会问他们能不能上网。然后她把他們带到她公司的求职网站上，让他们线上付款4000卢比注册账户。做完这一步，卡普尔就将电话交给“收场人”，由他们将客户带回网站，并向他们提供一套事业腾飞套餐——专业设计简历、塑造社交媒体形象、在线面试指

导、高级国际专家速成等等——帮助他们跨过个人与理想工作之间的鸿沟。“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工作。任何事情都和表面看起来的不一样，一切都是个骗局”，卡普尔说，她在一周之内就搞清了这份工作的真相。“如果客户打回电话来，说要到警局告我们，那公司就会把钱退回去，不过这样的电话我们一天大概只会接到四个。”剩下的人选择向消费者投诉网站倾诉他们的遭遇。我问她为什么明知是骗局还在那儿干，“你会想，开这些接线中心的人每天赚这么多钱，来都来了，那不如我也跟着赚一点吧。”卡普尔说。

当我发现德里那一整片地区都在做求职骗局的时候，我并不太惊讶。在每个印度大城市里，各个行业——银行、IT、保险——处于工作年龄的人都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问他们是否要找工作或者换工作。根据他们的谨慎程度和银行存款，这些受骗者会被骗10万到50万卢比不等。德里警方过去三年调查的案件显示，骗子们的“手法”包括投机公司、秘密接线中心和虚假求职网站。^[7]从警察备案来看，骗子们大都是同一种人——来自邻邦，在首都通过一个个骗局积累经验，然后凭借足够的野心开展自己的骗局。

据卡普尔估计，她的公司每个月能赚几百上千万卢比。显然，想骗印度人这么多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承诺给他们工作，这是他们最想要达成的梦想。我现在知道大多数联系了那些承诺多岗位、提成不封顶的可疑招聘广告的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即便那工作是骗其他求职者。卡普尔的大多数同事——分布在四层的接线中心里的大概400人——都是用我的法子才进公司的。索娜·卡普尔在入职一个月后拿到工资的那一刻就辞职了，她拿到了18 000卢比。而她的朋友还在给毫无戒备的印度年轻人打电话，向他们抛去成功的唯一机会。

[1]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bareilly/19000-graduates-postgraduates-MBAs-BTechs-apply-for-114-sweepers-jobs-in-UP-town/articleshow/50675268.cms>

<http://www.bankexamsindia.com/2013/03/sbi-po-recruitment-number-of.html>

<https://qz.com/823234/desperate-for-jobs-indias-graduates-are-working-as-drivers-maids-and-mechanics/>

[2] <http://www.thehindu.com/data/Entry-level-jobs-pay-more-in-Central-government/article14469396.ece>

[3]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economy/3-years-of-modi-government-pm-has-failed-to-create-jobs-for-the-desperate-young-people-who-gave-him-massive-mandate/686486/>

- [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tech/ites/indias-technology-vendors-paddling-shaky-boats/articleshow/56543653.cms>
- [5]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03/world/asia/india-call-centers-fraud-americans.html>
- [6]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scare-and-sell-how-indian-call-centre-scammers-cheat-foreign-computer-owners/story-cTE5eHZIo3AkjvTJDhokAK.html>
- [7]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teractives/inside-fake-job-industry/>

后记

我曾经也会看不上索娜·卡普尔这样的人。但当我了解了电话诈骗的世界之后，我的想法开始向那些我打了三年交道的人靠拢了。如果要把他们的人生哲学概括一下，那就是：能赚钱怎么都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印度年轻人的现实就是这样——不满现状、寡廉鲜耻、难以阻挡。我所见到的年轻人很少有清晰的是非观；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这些。

我本可以把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简单归结为缺乏道德观念，但这并非真相。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样做没事。潘卡·普拉萨德并不是村里第一个拿免费服务赚钱的疏通者；维卡斯塔库尔不是第一个把贪腐和权力等同起来的政客；阿扎尔·汗也不是第一个为了明星梦付门槛费的人。为什么三个不同的人，想要在政府、政治、娱乐圈这些不同的领域成功，却对于公平与否有着相似的理解呢？因为他们认为，能够为了输赢在对错之间切换，是成功必备的能力之一。

然而，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之上，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想法，而是印度价值体系的核心。没错，确实有些印度人为了达成梦想耍手段，但他们发现自己和新闻里的那些人（政客、商人、明星）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曾经掏心掏肺爱着的国家把他们抛弃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国家不但让他们自生自灭，而且连基本的道德责任教育也没传授给他们。并不是所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做事都没有原则，但是在现代印度社会，有些原则比其他的更被重视。维内·辛格尔和里沙·辛格都被自己相信的观点塑造着，他们只不过是对于印度应该怎样有不同的想法。辛格尔希望印度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希望国家制度有效，希望人们能负起责任；而辛格希望印度能够先证明自己是民主国家，希望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达利特人、女性，所有人都能拥有平等的自由和机会。在可见的将来，他们设想的这两个愿景印度都达不到，但前者是政治民粹主义的发动机，正如纳伦德拉·莫迪从2014年开始展现的那样，而后者则是一辆出轨的列车。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每次被提醒还是很心碎。为争夺北方邦议会席位进行了两个月竞选活动之后，里沙·辛格还是输给了所谓的“莫迪潮”。印度人民党赢下了北方邦议会403个席位中的312个，社会党全军覆没。^[1]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那些志向远大的印度教徒对印度人民党无条件的支持让他们欢欣鼓舞，而他们选出来的这位邦首席部长，在位的唯一贡献就是对异族散播仇恨情绪——这个人就是约吉·阿迪亚纳斯。作为阿拉哈巴德大学选出的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辛格当时禁止他进入校园。她当时拒绝他的理由如今正是他成为勒克瑙首席部长的原因。如果勒克瑙独立，他所管理的会是世界上第六大国。我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想给辛格打个电话，问她对此有什么看法——这是记者的职责——但是我不忍心打这个电话。

与此同时，辛格成功地将更多女性引领到了大学政治当中去。她赢得竞选后一年，没人冒这个险，但是到了2017年的学生会选举，至少有6名女生参加了不同职位的竞选。一名ABVP女成员参加了主席的竞选，另一名女生在被印度国民学生联盟拒绝后，退出了国大党的学生分支，独立竞选学生会副主席。^[2]主席最终花落一个来自SCS的男生。^[3]

印度人民党在邦选举中的胜利不是约吉·阿迪亚纳斯一个人的，还属于所有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归属感的印度教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给我发来短信，庆祝这个时刻。有人说，“是时候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了”；也有人说，“祖国母亲终于被托付给了可信赖之人”。我只好回了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本可以把这当作又一篇讲印度被抛弃的年轻人搞狭隘民粹主义的稿子——一个并非从印度源起，也不可能从印度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我可以安慰自己说，我的工作就是报道我的所见，而且我见到了足够多的事情可以证明，这只是个开始。我本已经打算提出说，只要印度人民党能够消解印度几百万无望的年轻人的焦虑，那他们就不用担心竞选的问题。但同时，我也瞥见了这条路的终点。你无法向年轻人提供工作或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基础，但你却能让他们参与到年轻人所知的最消磨时间的事业中，即身份政治。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肯定会引起反作用。等到26岁的拉吉尼坎特·帕特尔满脸怒气地要求莫迪要么重写印度宪法，要么就承担后果的时候，我不知道莫迪会怎么说。我在马赫萨纳见到了他，这里是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以帕特尔人为主的地区，也是给了印度人民党第一个议会席位的地区，并且一直是印度人民党的票仓。如今，距离马赫萨纳帮印度人民党这个忙已过去30年，现在他们希望印度人民党能够还这个人情，在教育和工作上给他们的年轻人更多配额，因为他们不想待在村里或者管理农场了。但印度人民党知道，比起其他所有标准，现有的配额制度将优先考虑历史性的不容问题，搅乱

这个制度，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年轻的帕特尔人选择了宣战——超过50万人涌入首都的大街小巷，挑衅让警察朝他们开枪。拉吉尼坎特·帕特尔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我说，他爸爸把村里的地卖了供他上昂贵的中学和大学。他本想在毕业之后立刻找个工作，却被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拒绝了。“我申请了一份老师的工作，然后还申请了一份苦工，结果哪个都没拿到。”他说的时候头上青筋暴起。“我们国家的总理怎么能说他要给一个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特殊优待呢？印度为什么会这样（*Yeh kaisa Hindustan hai*）？”他恨恨地说。

帕特尔先是辞去了社区RSS主任的职务。“生存比信仰来得重要”，他说。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应得的东西重要，“如果宪法能被撰写，那它就能被更改。”我在古吉拉特邦之外的地方也听很多年轻人表达过同样的情绪。当我看到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子全体穿着一身黑衣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舞台上挥剑时，我既惊讶又难过。她们想告诉印度人民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为达利特人挫伤马拉地人的自尊心而惩罚他们，要么允许马拉地人屠杀报复。在思考这些选择的同时，印度人民党是否也能给马拉地人预留一些大学和工作名额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不可能了解6亿印度年轻人的各种奇闻怪事，所以我总是回到那些我更能理解的人的生活中去。不管是否按照原计划，他们的生活变化得都很快。诈骗公司的雇员们已经接手了骗局，他们学到了诈骗的技巧，然后就和漫长的工时和迟来的薪水说再见了。通过互相帮助学习各种电话诈骗的流程，他们建立起了专业诈骗的人脉。搞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需要什么呢？五人一组，租一间屋子，搞几台电脑、手机，下载几个软件，找一个卖弹窗的，再找个在英国或美国的朋友借一个银行账户，就成了。他们如何运行这个网络呢？就在Facebook上。这是一种最高效的社交方式——整个Facebook上的人都能被用来做交易。你可以协商弹窗的价格：500卢比10个弹窗，或者100卢比50个弹窗。你也可以决定这个弹窗的冲击力有多大：占据屏幕的一角，还是占满整个屏幕；死机，还是黑屏。你还可以决定在哪儿植入这些弹窗，小黄网还是银行网站。从他们在Facebook上分享的照片我看到，一个个小诈骗员如今都成了幕后军师，也过上了有品质的生活——派对、豪车、约会。他们已经出人头地了，谁管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多少不设防的老年人把他们的养老金都赔进去了呢？

也有人想用正当的工作碰碰运气。维卡斯·坦沃尔上一次和我聊天的时候说，他正准备和在古鲁葛拉姆遇到的一群朋友一起创业——心灵服

务的共享，“占星师、牧师、手相师、塔罗牌占卜师”。一个诈骗老手告诉我，在电话诈骗公司工作几年是积累创业基金的好方法。阿米特·辛格尔最近破产了——他甚至要找我借钱还车贷——但仍然对他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疑。“这里东西太多”，他点点自己的脑壳，说里面蕴含无限财富。帕万·普贾里在离开Phoenix 007后很快又去了一个真的接线中心。然而他对此十分后悔。一半新同事管他叫骗子，另外一半管他叫叛徒，说他向美国人泄密，丢了印度的脸。“印度人真的都是奇葩。”他最近决定，坐办公室的工作不适合他。“他们管你管得太多了。”他也要自己创业了。

WittyFeed也有了一些转变。我认识辛格尔一年以后，每个月至少有一亿人还会访问他们的网站，但其中将近一半都是印度人了。CCO帕尔文·辛格尔说，网络内容的本地市场在蓬勃扩张，如果公司不抓住这个机会就太傻了。所以他们现在抛弃了西班牙语，转用印地语创作内容。他们内容也慢慢从“标题党”转型为“点击党”。他们别无选择。“标题党行不通了。现在你必须写另一些能够让人好奇的东西”，他说这话的时候仍然相当兴奋。他们的网站仍然每天发布70篇稿子，但不得不通过一些筛查。“现在即便是Facebook也只允许你分享高质量的内容了。你得核查事实，保持透明度，提供高清图片和动态影像视频。”

现在网站上的内容对印度读者来说极具吸引力：板球运动员、宝莱坞明星，还有纳伦德拉·莫迪。^[4]他们报道和评论莫迪的所有发言和行动，文章的角度通常是崇拜赞颂（“10件事证明纳伦德拉·莫迪是绝对的牛人”或者“纳伦德拉·莫迪——自拍之王”）和观点建议（“莫迪政府在2019年大选前应该禁止的7件事”）。他们还写了一封很吸睛的公开信，提醒纳伦德拉·莫迪他是印度梦唯一的救星：“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帮助我们为一个‘更好的印度’而勇往直前，为我们的期望继续努力。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为印度追寻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你要与我们共同奋斗！”^[5]

网站对于美国的痴迷没有改变，但如今标题党文章少了，更多的则是新闻（“特朗普总统Twitter上引发狂嘲”“马克·扎克伯格公开了他隐秘的婚姻故事”“道恩·强森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主页上的部分版面被用来讨论美国民主未来面临的问题，内容包括伊万卡·特朗普的投资和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我还是能找到一些曾经最受欢迎的爆款内容，比如“15个最搞笑的猫咪视频”“22个失败的结婚蛋糕”，小狗洗胶水澡的视频，以及一个妈妈把写给女儿的短信发给了陌生人后的慌张视频，等

等。从这一点来看，我猜一定还有很多美国读者喜欢这些爆款帖。不过，这些哈里亚纳邦男孩们现在觉得占领美国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了。帕尔文·辛格尔说，他们在洛杉矶建办公室的计划要暂时搁置了。结果他们在印多尔的办公室又招了20个人。同样搁置的还有维内·辛格尔的火星梦想。不过我相信，他每周还是会激励面前上百个充满好奇的年轻人要敢于追求他们最疯狂的梦想。

那其他人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穆因·汗会成为世界著名的励志演说家吗？我不知道。那么他会主导兰契的英语口语市场吗？会的。潘卡·普拉萨德会继续扩张他的“客户”群，加高他的房子，继续买标志性的东西来彰显他不断提升的社会地位，办最奢华的宴席吗？很可能会。我不太相信阿扎尔·汗会成为宝莱坞巨星，也不太相信维卡斯·塔库尔能够竞选成功。但是我坚信他们会一直为了金钱、权力和名望而不断努力。他们没法继续向上发展了，又无路可退，所以他们就一直夹在现实和梦想之间。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没有回程计划的情况下飞向太空：不管你最终走到哪儿，太阳依旧耀眼，星辰触手可及。

- [1]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national/live-2017-assembly-election-results/article9579978.ece>
- [2]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allahabad/more-women-candidates-contesting-ausu-elections/articleshow/61030541.cms>
- [3]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allahabad/samajwadi-chatra-sabha-sweeps-ausu-polls/articleshow/61087664.cms>
- [4] <https://www.wittyfeed.com/>
- [5] <https://www.wittyfeed.com/story/35683/2/an-open-letter-to-honourable-prime-minister-narendra-modi>

致谢

感谢我的编辑梅鲁·戈卡莱 (Meru Gokhale)、玛纳斯·苏布拉马尼亚姆 (Manasi Subramaniam)、迈克尔·德怀尔 (Michael Dwyer) 对本书的指导。感谢印度企鹅兰登书屋和赫斯特出版社其他同事的辛勤工作和耐心。

感谢奇琪·萨卡尔 (Chiki Sarkar) 让我去了解印度的小镇青年都在想什么。

感谢听我讲述或亲自读过这些故事的朋友们：索娜尔·沙阿 (Sonal Shah)、什万姆·维杰 (Shivam Vij)、迪克沙·马多克 (Diksha Madhok)、塔兰·汗 (Taran Khan)、特普堤·拉希里 (Tripti Lahiri)、阿贾伊·克里希南 (Ajay Krishnan)、苏普里亚·奈尔 (Supriya Nair)、尼基尔·库马尔 (Nikhil Kumar)、阿米娅·戈帕拉克里希南 (Amulya Gopalakrishnan)、瓦伦·拉纳 (Varun Rana) 和亚历克斯·特劳布 (Alex Traub)。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无条件的爱：韦德·普拉卡什·纳拉扬·辛格 (Ved Prakash Narayan Singh)、莫妮莎·夏尔马 (Moneesha sharma)、施薇塔·韦德 (Shweta Ved)、斯瓦蒂·韦德 (Swati Ved)、莎拉·韦德 (Sarah Ved)、阿比曼纽·库马尔 (Abhimanyu Kumar)、高塔姆·卡迪安 (Cautam Kadian)、阿莱塔·安德烈 (Aletta Andre) 和米兰·安德烈·辛格 (Milan Andre Singh)。

感谢阿尔希·萨塔尔 (Arshia Sattar) 和普什佩什·潘特 (Pushpesh Pant) 允许我进入桑伽姆写作之屋 (Sangam House) 和贾扬提宿舍 (Jayanti Residency, 为桑伽姆写作者提供住宿)。

感谢博比·高希 (Bobby Gohsh) 给我提供了《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 的工作, 以及足够的空间探索本书收录的部分主题。

感谢萨曼萨·班塞尔 (Samarth Bansal) 和我一起采写了一个故事。

感谢本书中的每一位, 允许我进入他们的生活。

感谢米希尔·斯瓦鲁普·夏尔马 (Mihir Swarup Sharma), 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译名对照表

(依译名拼音排序)

阿卜杜勒·卡拉姆 Abdul kalam

阿布希·辛格 Abhishek Singh

阿尔琼·库马尔 Arjun Kumar

阿尔琼·蒙达 Arjun Munda

阿夫扎尔·古鲁 Afzal Guru

阿基莱什·亚达夫 Akhilesh Yadav

阿吉特·亚达夫 Ajit Yadav

阿克萨达姆神庙 Akshardham

阿拉哈巴德大学 Allahabad University

阿拉普尔 Allapur

阿米特·库马尔舞蹈团 Amit Kumar Dance Group

阿米特·沙阿 Amit Shah

阿米特·辛格尔 Amit Singhal

阿默德·库马尔·巴拉德瓦杰 Amod Kumar Bharadwaj

阿姆罗赫 Amroha

阿什顿·库彻 Ashton Kutcher

阿西娅·拜格 Asiya Baig

阿约提亚 Ayodhya

埃尔维德·凯杰利瓦尔 Arvind Kejriwal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

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

安德里 Andheri

安基特·慕克帕德亚 Ankit Mukopadhyay

安利 Amway

奥里萨邦 Odisha/Orissa

巴布里清真寺 Babri Masjid

巴拉本吉 Barabanki

拜库拉 Byculla

班达尔 Bandra

班加罗尔 Bangalore

班克路 Bank Road

班尼亚人 Banias

包里瓦利 Borivali

保罗·科埃略 Paulo Coelho

北方邦 Uttar Pradesh

贝多 Bedo

比尔·盖茨 Bill Gates

比哈尔邦 Bihar

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布巴内什瓦尔 Bhubaneswar

布尔尼亚 Purnia

查谟 Jammu

常合 Chanhoh

晨间礼拜 Puja

村委会 panchayat

C. L.巴拉尼 C. L. Balani

达利特人 Dalits

达伦波里 Dharampuri

达希沙 Dahisar

大壶节 Kumbh Mela

大众社会党 Bahujan Samaj Party

道恩·强森 Dwayne Johnson

德拉敦 Dehradun

帝国教育委员会 Imperial Education Board

兜提 dhoti

杜尔迦普加节 Durga Puja

杜帕塔 Dupatta

《焚烧：第四季》 *Jalwa: Season 4*

甘查纹围巾 gamcha

戈勒克布尔 Gorakhpur

公社制 Communalism

古吉拉特邦 Gujarat

古鲁葛拉姆 Gurugram

郭克雷 Gokhale

国际演讲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国民志愿服务团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哈里亚纳邦 Haryana

海德拉巴大学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和平部队 Shanti Sena

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基尔蒂纳加尔 Kirti Nagar

吉姆·罗恩 Jim Rohn

加尔各答 Kolkata

《加勒比海盗》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贾斯汀·比伯 Justin Bieber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金·卡戴珊 Kim Kardashian

《绝命毒师》 *Breaking Bad*

君临城 King's Landing

咖啡日 Coffee Day

卡奥 Khal

卡尔纳尔 Karnal

卡兰 Karanj

卡丽熙 Khaleesi

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

卡雅斯塔人 Kayasths

开场人 opener

开斋节 Eid

开斋节前夜 Chaand Raat

凯蒂·派瑞 Katy Perry

凯莉·詹娜 Kylie Jenner

坎迪瓦利 Kandivali

坎哈伊亚·库马尔 Kanhaiya Kumar

坎普尔 Kanpur

克什米尔 Kashmir

客服专员 Customer Care Executive

孔达 Khunda

口语 Spoken

口语人 The Speaking People

库尔塔衫 Kurta-pyjamas

拉胡尔·甘地 Rahul Gandhi

拉吉尼坎特·帕特尔 Ratnikant Patel

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

拉金德拉大厦 Rajendra Place

拉凯什·夏尔马 Rakesh Sharma

拉拉容吉 Lalajungi

拉瓦尼亚·斯里瓦斯塔瓦 Lavanya Srivastav

辣妹 Spice Girl

赖伯雷利市 Rae Bareli

兰契 Ranchi

《兰契生活》 *Ranchi Lifestyle*

蓝维尔军 Ranvir Sena

老普路 Lalpur Road

勒克瑙 Lucknow

里提什·库马尔 Riteish Kumar

立法会议员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临冬城 Winterfell

笼吉 Lungi

卢迪亚纳 Ludhiana

鲁德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罗摩神庙 Ram Mandir

罗摩万岁 Jai Shri Ram

罗塔克 Rohtak

罗希特·维穆拉 Rohith Vemula

《洛奇》 *Rocky*

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

马赫萨纳 Mehsana

马亨德拉·辛格·多尼 Mahendra Singh Dhoni

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马拉地人 Maratha

马拉维亚 Malviya

玛拉西里 Marasili

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玛玛塔·班纳吉 Mamata Banerjee

玛雅瓦蒂 Mayawati

麦当娜 Madonna

麦考利勋爵 Lord Macaulay

美国国家税务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美国学院 The American

米拉·库尼斯 Mila Kunis

米拉路 Mira Road

密拉特 Meerut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The Alchemist*

穆罕默德·阿科拉克 Mohammad Ikhlaq

穆罕默德·阿扎尔 Mohammad Azhar

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 Mulayam Singh Yadav

穆因·汗 Moin Khan

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奈都夫人 Naidu

尼古拉斯·詹姆斯 Nicholas James

尼廷·梅赫拉 Nitin Mehra

《你能赢》 *You Can Win*

牛民团 Gau rakshaks

诺伊达 Noida

帕尔 Pal

帕敏德·雅利安 Parminder Arya

帕特雷·贝克 Patras Bek

帕万·普贾里 Pawan Poojary

潘卡·普拉萨德 Pankaj Prasad

婆罗门 Brahmins

普惠金融账户 Jan Dhan

普拉迪普·萨鲁亚 Pradeep Saluja

普拉塔普大君 Maharana Pratap

其他落后阶级 Other Backward Class

奇坦·巴哈特 Chetan Bhagat

恰尔肯德邦 Jharkhand

乔格什瓦利 Jogeshwari

《乔希工厂》 *Josh Factory*

乔治·武井 George Takei

钦德瓦拉 Chhindwara

《求爱双城记：我的婚姻故事》 *2 States: The Story of My Marriage*

《权力的游戏》 *Game of Thrones*

全印度学生会 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瑞吉拉 Regella

R. J.山奇 R. J. Shanky

萨德里语 Sadri

萨尔曼·汗 Salman Khan

萨哈兰普尔 Saharanpur

萨勒姆 Salem

萨努·库马尔 Sanu Kumar

萨钦·阿胡贾 Sachin Ahuja

赛琳娜·戈麦斯 Selena Gomez

赛峇峇 Sai Baba

桑迪普·拉纳 Sandeep Rana

桑吉特·索姆 Sangeet Som

桑托什·德夫·塔库尔 Santosh Dev Thakur

嫂子 bhabhi

沙赫纳瓦兹·乔杜里 Shahnawaz Choudhary

沙·辛格 Richa Singh

山·高希 Shan Ghosh

社会党 Samajwadi Party

舍瓦尼 Sherwani

施拉达·巴斯卡 Shraddha Bhaskar

施瓦姆·阿加沃尔 Shivam Aggarwal

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世界印度教徒联合会 Vishwa Hindu Parishad

收场人 closer

疏通者 fixer

数字身份证 Aadhaar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Swami Vivekananda

苏克·德维 Suko Devi

苏尼尔·库马尔 Sunil Kumar

索娜·卡普尔 Sona Kapoor

塔布里兹·汗 Tabrez Khan

塔库尔人 Thakurs

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提拉克 Tilak

提亲 rishtas

托尼·罗宾斯 Tony Robbins

V. S.奈保尔 V. S. Naipaul

瓦塞 Vasai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Victoria Beckham

维卡斯·塔库尔 Vikas Thakur

维卡斯·坦沃尔 Vikas Tanwar

维克拉姆·P.兰巴 Vikram P. Lamba

维拉尔 Virar

维内·辛格尔 Vinay Singhal

维诺德·苏里亚旺希 Vinod Suryavanshi

《我偶尔陷入爱河》 *Pyaar Mein Kabhi Kabhi Aisa Ho Jaata Hai*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乌纳 Una

乌塔姆纳加尔 Uttam Nagar

西蒙·考威尔 Simon Cowellesque

西孟加拉邦 West Bengal

希夫·凯拉 Shiv Khara

希瓦吉 Shivaji

新老虎军 New Tiger Army

《新闻浪潮》 *Khabar Lahariya*

信实通信 Reliance Communications

《星际迷航》 *Star Trek*

雅利安社 Arya Samaj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伊万卡·特朗普 Ivanka Trump

印度国民大会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印度国民学生联盟 National Students' Union of India

印度青年民兵团 Bajrang Dal

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印度人民解放阵线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of India

印度学生联合会 Students' Federation of India

印多尔 Indore

英语口语美国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Spoken English

约根德拉·雅利安 Yogendra Arya

约吉·阿迪亚纳斯 Yogi Adityanath

《越狱》 *Prison Break*

业务外包公司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旃陀罗笈多·孔雀 Chandragupta Maurya

中央邦 Madhya Pradesh

自然创意英语梦 Natural Creative English Vision

《做大哥》 *Being Bhaijaan*